中國事典

上卷



中國事典

中卷



中國事典

下卷



中國事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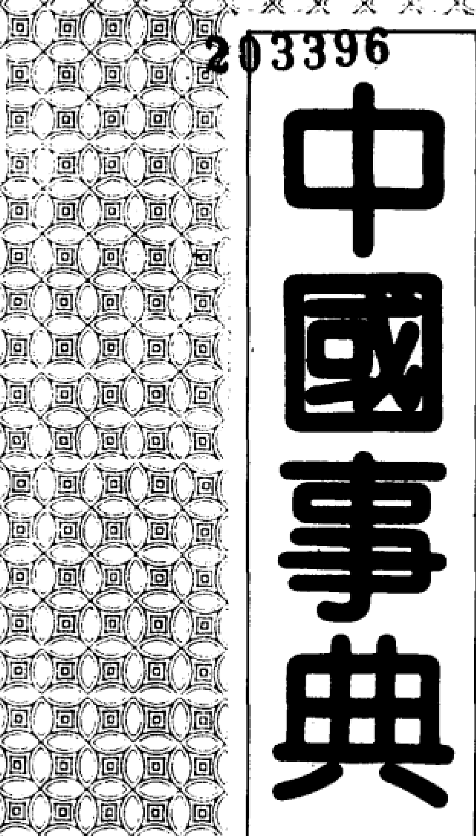
■上卷

名譽主編／周谷城

中外名人研究中心 編

——沈陽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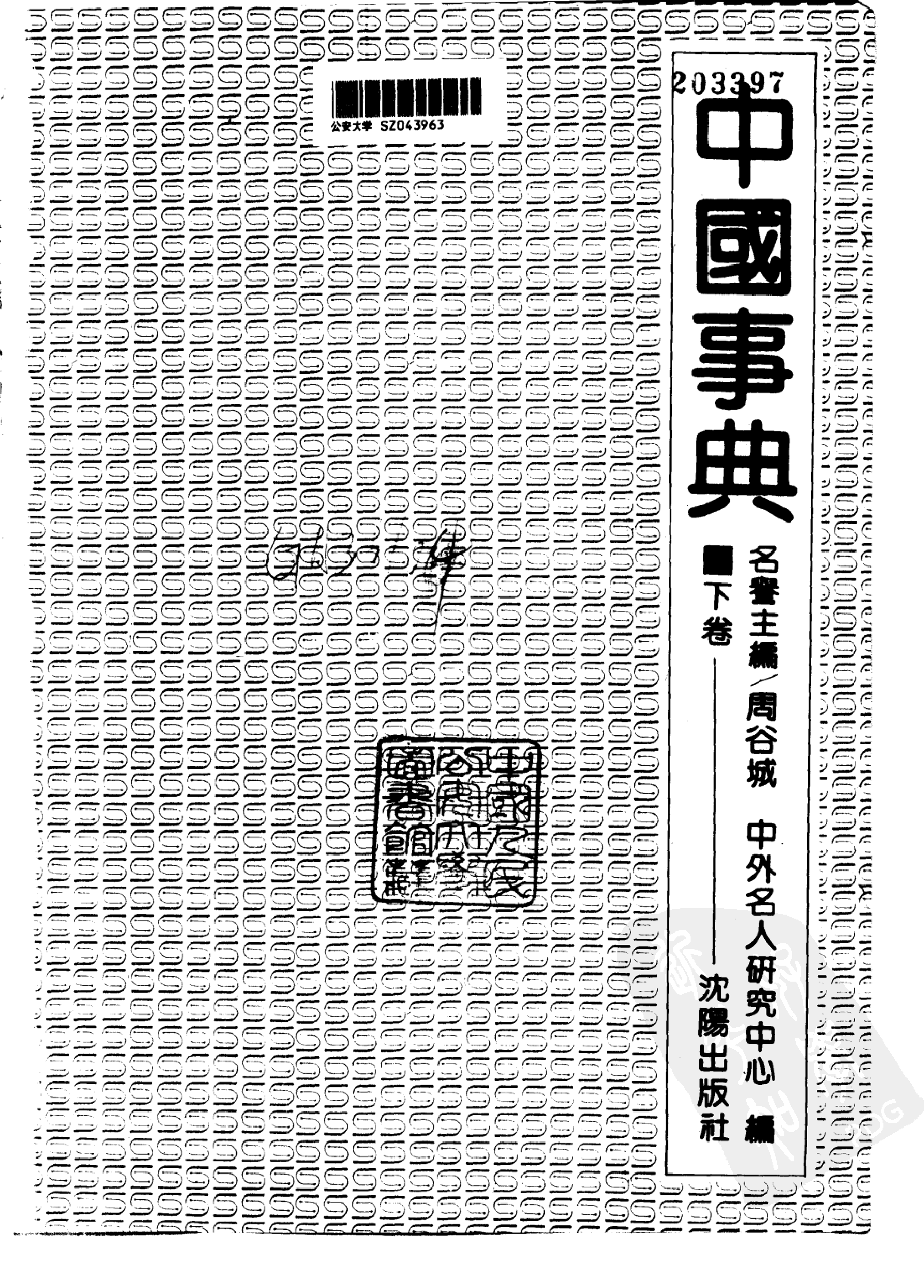


中國事典

名譽主編／周谷城　中外名人研究中心 編

■中卷

——沈陽出版社



公安大学 SZ043963
203397
中國事典
名譽主編/周谷城
中外名人研究中心 編
下卷
沈陽出版社

（辽）新登字12号

中国事典（上、中、下）
ZHONG GUO SHI DIAN
中外名人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曹福志　李树权
于逢春
责任校对：理　文
封面设计：韋桂征
版式设计：李铁岩

沈阳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13纬路19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193.125
字　数：6 000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500

ISBN 7-80556-909-6/K·47　定价：280.00元

索　引

一画

二画

三画

四画

五画

六画

七画

八画

九画

十画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四画

十五画

十六画

十七画

十八画

十九画

二十画以上

中国事典编辑委员会

（以下名单依姓氏笔划为序）

中国事典编辑委员会

（以下名单依姓氏笔划为序）

前　言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连续过程，它的真实内容远比写在纸上的“历史”要丰富多彩。因此，自从人类有了“历史意识”之后，无数的史家都在为怎样才能真实地再现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苦思冥想。于是各种体裁的史书应运而生。

在世界各国古代的历史书中，大致说来有三种编纂方法：即以年代为中心的编年体、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以及以事件为中心的叙述体。在西方，编年体最早出现，叙述体次之，晚出现的是纪传体。后来西方史学的发展，虽然有了更多的形式和体裁，但从总体上说，似乎仍不外乎这几种形式。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向来发达，在历史著作体例的创建方面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远在洪荒时代，我们聪明的祖先就已发明了“结绳记事”等方法，这些可谓中国历史学著作的最早起源。

随着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中国的历史学著作逐渐成形和多元，特别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中国人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借鉴历史上的经验为现实生活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势必推动中国历史学的成长和繁荣。《易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理，万民以察。”这些书大概如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尚书》等。

到了公元前 841 年，即西周共和元年，中国开始有了按年记事的编年史。从此之后，中国历史基本上有了持续不断的记载，在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情差不多都有史可查。据说孔子曾见过 120 国《春秋》，墨子也夸口“吾见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引)，可见当时历史著作的数量之多。

孔、墨所见到的《春秋》，在体例上还存在着极大的缺陷，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可能还只是历史档案，而不是经过剪裁加工的历史学著作。《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应云·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大体反映了这一批《春秋》的性质和价值。

对于这一大批档案性质的历史文献，孔子在其晚年用了相当大的精力加以整理，不仅使之规范，而且赋予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据西汉大儒董仲舒说：“周道衰微，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

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子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生曰）。从而使中国的历史学著作既确立了经世致用、关注现实的思想传统，也使中国历史学著作的体例更趋完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

孔子整理的《春秋》只是编年体，只是在他之后，中国的历史学才逐渐走向成熟。经过二千余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历史书体例已经蔚为大观，丰富多样。仅就史书的结构形式与表达方式而言，至少可以分为编年、纪传、国别、纪事本末、实录、杂史、笔记等。如就史书的内容与编纂重心而言，又可分为典制、地理、方志、人物、科技、教育、学术思想等。再就史书的作用与用途而言，则可分为史论、史评、史考、类书、丛书、书目、表谱、索引、辞典，以及章节体通史等。

史书体裁的多元化，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工具。然而同时也就产生了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们如何才能以最少的时间获得对历史信息量的最大占有?换言之，上述众多体例中，哪一种最适合现代人的需要?

欲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相当困难。因为不仅不同的体裁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工具，而且因为一代有一代的学术，我们现代人所面临的信息爆炸和时间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存在，古代中国人“皓首穷经”是他们那时的正常选择。只是问题在于，自从孔子之后的两千余年，尤其是造纸术、印刷术发明之后的近千年，中国的文化积累委实过快，如果说历代的文献典籍汗牛充栋有些夸大的话，那么传世的二十六史、或二十四史确实卷帙过巨，非现代社会一般学子所能拥有和通读。因此，如何继承中国历史学中的优秀传统，结合现代社会的需要，重新建构一套系统、完整、翔实而又卷帙适度的中国历史著作，便理所当然地摆在了当代史学工作者的面前。

《中国事典》的编纂，是当代史学工作者在前辈学者已有成就基础上的尝试，她在体例上的创新将编年与纪事本末、纪传等体裁融为一体，采用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编写手法，以全新的现代观念对丰富的历史资料进行整合，不仅使纷繁的历史资料井然有序，线索清楚，有章可循，而且在有限的篇幅内尽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以期较传统史书更合乎现代读者的需要。

凡　　例

1. 本典为大型历史专业辞书。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前提下，力求体现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努力做到科学性、稳定性和系统性。述而不作，以期通过对历史资料的重新整合，为检索者提供丰富而有用的基本历史事实。

2. 本典收词范围，上起远古，下迄 1911 年底。举凡一切可相对独立列目的历史事件，无论大小，只要起过一定影响，具有一定的意义，均酌情收录。全书囊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哲学、教育、科技、民族、宗教以及中外交流等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注意平衡，无所侧重。平衡的基本方式以词目释文字数多少加以体现。

3. 所收词目力求稳定，以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为基本原则。

4. 人物的词目包括事务，不论正面或反面，均视其地位和影响，据其重要活动系年编排，以体现以事为主的原则。

5. 释文的编写原则为述而不作，一般不作评论，仅据可信的资料对事实进行描述和解释。

6. 对于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本典的基本原则是或诸说并存，或以一说为主，兼述他说。

7. 历史纪年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

8. 古今地名不同者，夹注今地名。

9. 本典的编排，原则上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序。

编后话

《中国事典》，从我和中外名人研究中心顾伯平先生签订著作权合同始，到今年10月份出版发行，已经过了整整3个年头。1989年9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成就事典》首发会上，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总经理陶庆军先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成就事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建议再出版几部中国历史辞书，以形成一个系列。时隔不久，陶庆军先生将中外名人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总发言人顾伯平先生介绍给我。我和顾伯平先生一见如故，共同签定了著作权合同，等于为编纂、出版《中国事典》这一巨大工程举行了奠基礼。

我觉得，这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对中国5000年历史进行全面系统概括和总结的巨型辞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内容弘富。本典收词范围上自远古，下迄清末。凡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一切历史事件，无论大小，只要起过一定影响，具有一定意义，均收入典内。内容囊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教育、科技、民族、宗教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其规模、范围均超过国内外的同类书，她不仅填补了中国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也将是一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第二，史料浩瀚。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历史资料浩如烟海。本典不是对已有资料、文献典籍的剪贴和摘录，而是以全新的现代观念，对丰富的历史资料进行整合，以现代语体加以规范性的描述和阐释，语言流畅，表述准确。本典的资料来源，除了传世的二十四史外，旁及儒释道的经典、诸子百家历代文集，以及笔记小说、稗官野史等。是目前国内外同类著作中征引资料最多最全的历史辞书。

第三，体例新颖。本典在体例上的创新，是将编年体、纪事体、纪传体等融为一炉，采用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编写手法。每个辞条都对所表述的历史事件兼顾始末，有章可循。本典的体例既克服了编年体的割裂现象，又使繁纷的历史资料井然有序。是一部系统、完整、翔实、权威而又卷帙适度的大型历

史辞书。

《中国事典》出版后，在我编辑的历史辞书中，还缺1911—1949年这段历史，我还打算将1991—1949年这38年的史实编辑成书，作为《中国事典》的姊妹篇奉献给广大读者。

中国历史学会名誉会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欣然担任本书名誉主编；中外名人研究中心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顾伯平先生、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总经理、出版家陶庆军先生对本典的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觉得，这些也应作为一个补充辞条写在《中国事典》的编后话中。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书中的不足及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斧正。

曹福志

1992年10月于沈阳

进士授翰林官之始 翰林院官，皆由荐举，未有以进士除授的。洪武四年(1371)开科举，状元吴伯宗只授员外郎，榜眼、探花只授主事。洪武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定进士一甲授修撰，二甲以下授编修、检讨。又定进士所授官，其在翰林院、承敕监、中书六科的称“庶吉士”；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的，仍称“进士”；其余则以其未更吏事，欲优待而历练，于诸司观政，给以出身禄米，以待擢任，称“观政进士”。庶吉士及观政进士之名，皆系朱元璋钦定。自此，翰林遂为科目进士的清要之阶。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又行进士第一甲第一人授修撰，第二、三人授编修之例。此后，两例互用。

湖广吴奋儿起义 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湖广五开洞民吴奋儿聚众起义，明靖州卫指挥佥事过兴率三百士兵前往围剿，被起义军打败，过兴父子被杀，十一月，辰州卫指挥又奉命征剿起义军。起义军失败。吴奋儿在群众的保护下，逃脱了明军的追捕，继续在乡间秘密活动，组织力量。洪武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吴奋儿再次聚众起义，自称铲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起而响应，号称二十万众。明朝廷诏发武昌、宝庆、岳州、长沙、辰州、沅州诸卫官军征剿。官军失利。吴奋儿占据古州。九月十六日，朝廷又派汤和为征蛮将军，以周德兴、汤醴为副，会合楚王桢及其护卫军号二十万前往征剿。朱元璋敕汤和说：“行师须慎，勿轻视深入，虽来降，亦须审察。楚王尚幼，军旅之事，卿自裁决，然后启王知之。”十月，汤和率官军抵达古州，分遣将士攻上黄诸洞，以计诱擒吴奋儿，械送京师处斩，诸洞平定，共俘获四万余人。不久，诏楚王还国，留汤和抚辑其民。

朱善逝世 朱善(1314—1385)，字备万，江西南昌人。少聪颖好学，十岁通《五经》大义，能文章。元末兵乱，隐居养亲，惟以著述为事。洪武初，召授郡学权授。洪武八年(1375)被荐迁翰林院修撰。次年，以奏对失旨，改典籍，放还乡里。后起复为翰林院待诏，升文渊阁大学士。洪武十八年九月，以疾赐归，卒于家，年七十二。

《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的颁行 《大明律》颁行之后，官民过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多。朱元璋感叹地说：“本欲除贪，怎么朝杀而夕犯！”并以为《大明律》所规定的内容，难以包揽一切。在现实生活中，诸司官员不急公而务私、武臣的跋扈，学士的浮华，舞文之吏玩法于上，豪强之家兼并于下的事例，屡见不鲜。于是，令有关衙门官员，采辑官民过犯案例，分类编排，解释律令条文。至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初一日编成，朱元璋亲自作序，名《御制大诰》，颁行天下，令官民永以为训。后又于洪武十九年三月编成《大诰续编》，十二月编成《大诰三编》，先后颁行，使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史称《三诰》。《御制大诰》列有十目：揽纳户、安保过付、诡寄钱粮、民人经该不解物、洒派抛荒、倚法为奸、空引偷军、鲸刺在逃、官吏长解卖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至抄扎。《三诰》中采辑罪至凌迟、枭示、种诛的案例千百条，弃市的万条以上。尤其是“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一目，是朱元璋特旨设立的，记录了贵溪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姚润、王模拒绝招聘而被杀籍家等，是以前任何朝代所没有的。惟《三编》稍为从宽，但其中所列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的就有三百六十四人。幸而不死还职，皆戴斩罪治事。文武臣僚有过恶的，无不列其名于《三诰》之中，虽不至死，但其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官吏皆重足而立。朱元璋为使《三诰》广泛普及，要求官民人等，户持一册，熟读诰中案例，引以为戒。还规定，狱囚有能读《大诰》的，可罪减一等，否则罪加一等。在地方，府州县学，列《三诰》为课程之一；即使金甲私塾，也得由塾师取徒教授。洪武二十一年，又把《大诰》颁赐给武臣，教其子弟诵习。洪武三十年，天下讲读《三诰》来朝的竟达一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朱元璋皆赐钞币遣还。由此可见其良苦用心。

茹太素贬官 茹太素(?—1389)，山西泽州人。洪武三年(1370)乡举，上书称旨，授监察御史。洪武六年迁四川按察使，以平允著称。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上书言事，长篇大论，元璋切责，因定奏对格式，使直陈得失而无繁文。洪武十年出任浙江布政使司参政，以事还里。洪武十七年召为刑部试郎中，一月后迁都察院佥都御史，复降翰林院检讨。洪武十八年九月擢户部尚书。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元璋宽宥。一天，元璋设宴便殿，赐酒赋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头续韵对：“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元璋为之恻然。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坐事降北平道监察御史，洪武二十二年又坐罪自杀身死。

《省躬录》、《存心录》编成颁行 朱元璋命翰林儒臣编集历代帝王祭祀、祥异、感应等可为鉴戒之事为书，名《存心录》，朝夕观览。接着又命赞善刘三吾编类汉唐以来灾异之应于臣下的事例，另为一书，名《省躬录》，于洪武十九年(1386)三月编成，朱元璋下诏颁行。

工匠轮班之制的制定 其初，工部籍诸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轮作三月，如期交待，名为轮班匠。但议而未行。洪武十九年(1386)四月初一日，工部侍郎秦逵复议实行，量地远近，以

为班次，且置籍为勘合付之。至期，赍至工部听拨，免其家他役。朱元璋批准，著为令。于是诸工匠称便。后来，诸色工匠，岁率轮班至京受役，而无工可役亦不敢失期不至。据此，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令工部先分各色工匠所业，而验在京役作之繁简，更定其班次。大凡三年或二年一轮，使赴工者各就其役而无费日，罢工的得安家居而无费业。于是，更给天下府州县工匠轮班勘合，共二十三万二千零八十九。

彭玉琳起义　彭玉琳，福建将乐人，为阳门庵僧，初名全无，行脚至新淦，自号弥勒佛祖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县民杨文、曾尚敬等与彭玉琳同谋，于洪武十九年(1386)五月十四日发动起义。玉琳自称晋王，设置官属，建元天定。县官率民兵征剿。玉琳失败，被逮送京师就义。

朱元璋令存问年高孤独　洪武十九年(1386)六月二十日，朱元璋下令地方有司存问年老贫民，抚恤鳏寡孤独，使其得以所养，废疾的收入孤老院，给予所用，得终天年。并制定具体条例：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有产业的，不给米，只给酒、肉、絮、帛。应天、凤阳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社士，九十以上赐爵乡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皆与县官平礼，复其家。鳏寡孤独不能自给的，全部蠲免差役，岁给米六石。若孤儿有田不能自耕的，则令亲戚收养，无亲戚的，令邻里收养；其无田地，岁给米六石，亦令亲戚或邻里收养；待长大成人，收籍为民。笃废残疾不能自存的，即日验口收籍，以例给米，以便其生存。士卒亲冒矢石，或肌肤伤残，或因伤亡子息现存而不能生理的，全部放回原籍为民，复其家。垛集土军因征伐伤残的，优免军役三年，改为"贴户"；因伤死亡的，优免军役十年，本户改为民籍，仍免差役三年。将校阵亡，其子世袭，升一等。逃军、逃囚能赴官自首，免罚。山林岩穴隐逸之士，以礼敦遣赴京，量才录用。

《至戒录》编成　《至戒录》，一作《至戒录》。朱元璋为使群臣奉公守法，忠于臣事，命儒士采辑秦、汉、唐、宋为臣悖逆事例，共一百余条，编类成书，于洪武十九年(1386)十月编成，名《志戒录》。朱元璋命颁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诵。使其知所鉴戒。

冯胜奉命征讨纳哈出　朱元璋按照先西南后东北的战略部署，逐步统一全国。在东北地区，元朝的将领先后投降，唯有纳哈出仍盘踞在金山一带，且不断引兵进攻辽阳、辽东等地。当西南地区平定之后，便着手东北地区的统一。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初二日，朱元璋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为左副将军，蓝玉为右副将军，陈镛、王弼为左参将，胡海、郭英为右参将，商暠参赞军事，率军二十万，向东北金山开拔。同时令李景隆、邓镇吴良等随征师前进。三月，冯胜等率师出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遂留兵五万驻守大宁，自率大军直趋金山。六月，冯胜等率主力至辽河东，获纳哈出屯卒及马匹，遂进驻金山之西。分军深入到金山东北，包围了纳哈出。纳哈出孤军无援，计无所出，只好投降。其降卒四万余，牛羊马驼辎重亘百余里。冯胜将纳哈出械送京师，九月初一日封海西侯。从此，朱元璋初步实现了统一。

《鱼鳞图册》的编制　《鱼鳞图册》的编制，进一步确定了土田的所有权，既保证赋税的收入，又防止隐瞒奸欺。比起《黄册》登记的土田更为缜密。本来，《黄册》所登记的土田，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可是，两浙富民，逃避徭役，往往把田产诡寄亲邻佃仆，称作"铁脚诡寄"。久而久之，相习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奸弊百出，称之"通天诡寄"。结果，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于是，朱元璋派遣国子生武淳等分巡州县，清丈土地，核实田亩。其具体作法是：派官到州县，根据税粮多寡，定为若干区，每区设粮长四人。然后由粮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丈量每块土地的方圆四至，绘成简图，编上字号，登记田土姓名和土地优劣、方圆尺寸大小，再编类为册。因绘图大小交错，状如鱼鳞，而称作《鱼鳞图册》。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初七日，浙江布政司及直隶苏州等府县《鱼鳞图册》编成进呈。因其登记的主要内容是土田，所以诸如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等分别注明。如果出卖土田，税粮随契过户，里甲报告州县，州县于年末通行造册解府。从而避免了产去税存和富民铁脚诡寄的弊端，保证了朝廷的赋税收入。

汤和筑城防倭　汤和沉敏多智数，洪武十九年(1385)主动向朱元璋乞求致仕还乡。其时，倭寇骚乱海上，朱元璋就命汤和往浙江沿海练兵筑城。汤和奉命，并请与方鸣谦同行。鸣谦说："倭寇从海上来，就在海上抵御。宜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寇不得深入，入则不得靠岸。"朱元璋觉得鸣谦说得有道理。于是，汤和与鸣谦到了浙江，着手整饬海防。汤和根据沿海情况，拟设卫所城五十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修筑，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从而引起役夫的怨恨，使扰害百姓，百姓深受其苦。有人对汤和说："役夫怨恨，百姓受苦，怎么办呢？"汤和说："成远算的不恤近怨，任大事的不顾细

谨。若再有人发怨言，立即斩首。"洪武二十年(1387)十一月，五十九城筑成。他又稽军次，定考格，立赏令。浙东民四丁以上的，户取一丁戍守，共得五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人。四月，朱元璋又命周德兴往福建筑城防倭。德兴度福建福、兴、漳、泉四郡要害之地，筑海上十六城，籍民为兵，又增置巡检司四十五，分隶诸卫。从而，使海上防卫得到加强。

《御注洪范》成 朱元璋曾令儒臣将《洪范》书于御座之右，以便朝夕观览。因其兴之所至，亲自作注。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二十三日注成。便召赞善刘三吾说："我阅览《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道，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原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奏陈，武王犹自谦虚地说：'我未能。'我每为惕然。遂疏其旨，为朝夕省览。"同时命三吾为其作序。

陈镛战殁 陈镛(？—1387)，临江侯陈德之子。少以功臣子练习武艺。洪武九年(1376)授散骑舍人，十四袭封临江侯。洪武十四年命为右副将军同邓镇、顾时讨龙泉，又同冯胜练兵汴梁。洪武十九年驻兵通州巡边，获番将王脱颜，还与吴祯筑全州城。洪武二十年正月从冯胜北征纳哈出，行至金山，与大将军异道相失，遂于六月二十二日陷入纳哈出军中而死。

濮英不屈而死 濮英(？—1387)，直隶庐州人。初以勇力为百夫长，积功至西安卫指挥，坐军政不修，召还诘责，还卫理事。洪武十九年(1386)加都督佥事。次年从冯胜征纳哈出，抵金山。闰六月纳哈出降，班师回京，奉命将三千人断后。纳哈出余众数十万设伏于途。遇濮英兵，伏兵起而包围，濮英陷于围中被执，绝食不言，乘人不备，引佩刀剖腹而死。朱元璋得知，赠金山侯，谥忠襄。洪武二十一年，进赠乐浪公。

商税不立定额 朱元璋称吴王前，收官店钱。后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州县称通课司。凡商税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处。洪武初年，个别府县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朱元璋下令禁止。洪武十三年(1380)六月，又下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勿征其税，且罢天下抽分竹木场。洪武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户部奏："今天下税课司、河泊所课程视旧额有亏，宜以十八年所立为定额。"朱元璋说："商税之征，岁有不同，若以往年概为定额，本年实际与往年不同，岂不扰害百姓？应随其多寡，从实征纳。"

薛显逝世 薛显(？—1387)，萧县人。赵均用据徐州，以薛显为元帅，守泗州。均用死，薛显以泗州来归元璋，授亲军指挥，东征西讨，灭张士诚后，迁官行省右丞。再从徐达北征，独当一面，攻取山东诸州县。转师河南，捣关陕，北上取卫辉等地，进兵元都。随徐达西向，败廓扩帖木儿于宁夏，取平凉，陕西平定。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大封功臣，因薛显擅杀吏胥、兽医、火者、马军及千户吴富，只封永城侯，不予世券，而分其禄为三，一以赡吴富之家，一以赡所杀马军之家，一以养其母妻，令功过无相掩。次年予世券，从徐达征漠北，又奉命巡视河南，屯田北平，练兵山西，征伐金山。洪武二十年九月召还，十六日行至山海卫卒。追封永国公，谥桓襄。

《武臣大诰》的颁行 朱元璋先后颁行《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之后，又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不知宪典，所以其言语行动往往立法，便于洪武二十年(1387)十二月制《大诰》三十二篇，名为《武臣大诰》以训之，使其知所纪律，抚军士，立勋业，保爵位，颁之中外，永为遵守。洪武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颁赐天下武臣大诰，令其子孙诵习。

大天界寺的重建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始建大龙翔集庆寺于龙河。洪武元年(1368)春，即于其寺开善世院，以僧慧昙领教事，改赐额为大天界寺，朱元璋为之书"天下第一禅林"，榜于门外，洪武四年改为天界善世禅寺，洪武五年又改为善世法门。十四年革善世院，洪武十五年设僧录司于寺内。二十一年二月毁于火，朱元璋命徙于京城南定林寺故址重建，仍旧额"天界善世禅寺"。

蓝玉大战捕鱼儿海 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初八日，朱元璋以蒙古内部空虚之机，派遣蓝玉为征虏大将军，邓镇、王弼、赵庸、吴海、张翼、周武、曹兴等为副北征。月末，蓝玉等率师十五万，由大宁进至庆州，闻知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便从间道兼程而进。四月十二日，师自百眼井至捕鱼儿海南，侦知敌营尚在海之东北八十余里，乃命王弼为先锋，疾驰夺其营。敌以为明军缺水，不能深入，不设防备，又遇大风扬沙。当王弼军突至，大惊失措，落荒而逃。蓝玉等杀太尉蛮子等，俘获其众。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及丞相、知院等数十骑逃遁。蓝玉以精兵追之不及，而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及故太子妃并公主一百二十三人，官属三千，男女七万七千余口，马四万七千匹，驼四千八百余头，牛、羊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余头，车三千余两，以及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不久，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六万余。五月二十一日，蓝玉捷表至京，朱元璋大加慰劳，比之卫青、李靖。

沐英征讨思伦发 洪武二十一年(1388)正月初六日，麓川思伦发入寇，结寨于摩沙勒寨，沐英遣指挥宁正击败，斩杀五百余人。三月，思伦发欲报复

摩沙勒之役，率众号三十万、象百余头寇定边，其他酋领皆响应尽力。沐英闻报，即选精骑三万，自率兵一万昼夜兼行，用十五天的时间，于三十日抵思伦发营。先遣冯诚选轻骑万人与战，思伦发以万人驱象迎战；指挥张因以五十人射象，杀其酋长，大呼而入，斩首数百级，诸军皆乘胜前进。沐英又令军中列火铳、神、机矢为三行列阵中，若象来，前行发，不退，次行发，又不退，三行发。次日，思伦发果驱象队，背栏楯竹帘，钩钎铲镰，左右杂标。沐英分军为三，冯诚前，宁正左，汤昭右，严为军令："闻炮齐战，捷一级，一队赏；退一卒，一队僇。"遂矢、铳齐发，前行之矢发，铳炮动山谷，象皆挺透决骤，沐英军怛呼而鏖战，象皆反走。思伦发骁将昔剌亦率众殊死战，左军少却，沐英登高望见，取佩刀，命左右斩帅首来。恰在此时，见右军一人握刀驰下，士卒大恐，奋呼突阵。大军随机进击，无不以一当百，思伦发军大败，遂走捣其寨，斩杀三万余人，俘获万余人，生获象三十七头，余皆射死。思伦发逃遁，诸蛮震慑。捷报至京，朱元璋告谕沐英："移师逼景东，屯田固垒，以待大军，勿轻受其降。"

解缙进呈《大庖西室封事》 解缙以进士授职，侍朱元璋左右，颇受宠爱。一天，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对解缙说："我与你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解缙遂上封事万言，名《大庖西室封事》。解缙在封事中奏陈：臣闻令数改则臣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翦蔓，诛其奸逆；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其家乡，始终如一。陛下尝说：'世不绝贤。'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今陛下好善而善不显，恶恶而恶日滋，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每多自悔之时，辄有无及之叹。臣又见陛下好观《道德》、《心经》、《说苑》、《韵府》诸书，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于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子，下及关、闽、濂、洛之书，随事类别，勒成一书，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若夫配天宜复扫地之规，尊祖宜备七庙之制，奉天不宜为筵宴之所，文渊未备夫馆阁之隆，太常非俗乐之可肄，官伎非人道之所为；痛惩法外之刑，永革京城之役；妇女非帷薄不修，勿轻逮系；大臣有过恶当诛，不宜加辱；顺天应人，皆此类也。近年以来，台省之违纲，不过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刑多寡为勋劳，而御史纠弹，大都承望风旨，宜陛下之以为虚文塞责也。然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轻重。建不为君用之法，所谓'取之尽锱铢'；置朋奸倚法之律，所谓'用之如泥沙'。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夫有申明旌善之举而无党庠乡学之规，互知之法虽严，训告之方未备。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若古蓝田吕氏之《乡约》，今义门郑氏之《家范》，布之天下，使世家大族，以身先之，将见作新于变，至于比户可封不难矣。至于鼎革之际，民困未苏。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过昔年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欲拯民而革其弊，莫若复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义仓之举，积之以渐，至有九年之食无难者。若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而有过者，里胥必陷于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则又何取夫义夫、节妇哉！夫粢盛之洁，衣服之举，仪文之备，此畏天之末也；簿书之期，狱讼之断，钩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惟陛下垂听焉。"朱元璋得奏，大称其才。不久，解缙又献《太平十策》。朱元璋不及行，表示采纳。而解缙恃才不捡，曾入兵部索皂隶，语言傲慢，对尚书无礼。沈缙奏报朱元璋，元璋说："解缙只不过以冗散自恣罢了。"数月之后，朱元璋下诏，改任解缙为监察御史。

汤和就第中都 汤和(1326—1395)，字鼎臣，濠州人，与朱元璋同乡里。少有奇志，郭子兴起兵，汤和率二十余人投奔其麾下，以功授千户。后从元璋攻大洪山，克滁州，授管军总管。从击陈埜先，中流矢，而拔矢奋击，终于大败陈埜先。再攻取常州，以枢密院同佥镇守其地。奉命围平江，战于阊门，飞炮伤左臂，召还应天，伤愈复往，攻克平江，论功赐金帛。初建御史台，以汤和为左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不久，拜征南将军，讨平方国珍，取庆元，浙东平定。又率军伐陈友定，进拔延平，执友定送京师。大军北伐之际，于明州造舟，运粮输直沽。再从徐达西征。逾太行，取山西诸州县，转战陕西，趋泾州，围庆阳，复以右副将军从徐达在定西大败扩廓帖木儿，遂定宁夏，逐北至察罕恼儿，擒猛将虎陈，获马牛羊十万余。徇东胜、大同、宣府皆有功。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封中山侯。四年伐蜀，入重庆受降。又先后从徐达北征，镇守北平，主持营建中都，赴延安备边。洪武十一年进封信国公。洪武十四年出塞征乃儿不花。洪武十八年奉命率军赴贵州征剿少数民族的反抗。次年正月还京，即向朱元璋乞求告老还乡。朱元璋很是高兴，但由于江南沿海倭寇骚扰不止，便命汤和前往筑城，汤和俯首听命，待完成这一任务后，于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初二

日，携妻子及家人仆从，启程回故乡凤阳。洪武二十八年八月初七日卒，年七十。追封东瓯王，谥襄武。

军士护身敕的颁赐 洪武二十一年(1388)六月，朱元璋命颁赐军士护身敕。朱元璋念军士勤苦，为将领的不知爱恤，多致怨咨，便述始终之际、艰难之故，以及抚绥爱养之道，通上下之志，达彼此之情，直说其辞，为护身敕，颁示军士，永为遵守，于是，军士莫不感悦。

周德兴还乡 周德兴(？—1392)，濠州人，与元璋同里，且少小相亲近。从定滁州、和阳，渡江累战皆有功，迁左翼大元帅。从取金华、安庆、高邮，援安丰，征庐州，进指挥使。从讨赣州、安福，永新，拔吉安，再进湖广行省左丞。同杨璟征讨广西，攻永州，克全州，平定广西，战功居多。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封江夏侯。洪武四年讨伐四川受赏。后多次奉命出征。洪武十三年理福建军务。不久召还。次年，自请出征五溪。洪武十八年又以副将军从楚王桢讨思州。其在楚年久，所用皆楚卒，威震其城，定武昌等十五卫，岁练军士四万四千八百人；决荆州岳山坝溉田，年增官租四千三百石，深受楚人爱戴。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九日赐还乡。不久，又令赴福建筑海防，按籍佥练，得民兵十万余人，相视要害，筑城一十处，置巡司四十五，防海之策始备。事毕归第，复令节制凤阳留守司，并训练属卫军士。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初十日，以其子骥乱宫，坐以帷薄不修罪伏诛。

徙民就宽乡垦荒 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十二日，户部郎中刘九皋奏陈：古时狭乡之民迁于宽乡，使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战争之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建国以来，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朱元璋见到此疏，即谕户部侍郎杨靖：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州、潞州无田地的百姓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处广闲之地。令其自便置屯耕种，免赋役三年，仍每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卫所军士屯田的开展 朱元璋在平定江南时，即命诸将在龙江等处屯田，申明将士屯田之令，康茂才成绩著卓，因以申谕将士。洪武四年(1371)徐达徙山后民屯于北平。洪武七年，王简、王诚、李伯升奉命分别往彰德、济宁、真定经理屯务，又命将邓愈等分屯陕西、河南、北平。还命天下卫所军士屯种，规定：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人授田五十亩，给牛种，教树植，免租赋。洪武十九年，命沐英自永宁至大理，六十里设一堡，留军屯田。洪武二十一年九月初六日，朱元璋敕五军都督府臣："养兵而不病农，莫若屯田。今海宇宁谧，边境无虞。若但使兵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术。其令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兼务，国用以舒。古之良将若赵充国辈皆以此策勋当时，垂名后世。其藩镇诸将务在程督，使之尽力于耕作，以足军储。"于是，卫所军士屯田，全面开展。十月初七日，又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凡卫所系冲要之地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分之五屯田，余卫所以十分之四屯田。洪武二十五年二月，明确规定：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田，十之三守城。屯田军士的比率，初步形成。而屯田的租赋，洪武年间，一般亩收租一斗。至建文四年(1402)才定每军田一分(五十亩)，正粮十二石，余粮十二石。经过若干年的变化，至宣德末年规定：屯军食用的十二石正粮，不必盘量，只征余粮六石，于附近军卫、有司官仓交纳。

《武士训诫录》的颁布 朱元璋以诸将臣对于往古善恶成败之事，少所通晓，特命儒臣编集申鸣、钼麑、樊哙、金日磾、张飞、锺会、尉迟敬德、薛仁贵、刘辟、王彦章等所为善恶为一编，释以直辞，以便官为武职的日亲讲说，使知劝戒。洪武二十一年(1388)十月二十五日编成，颁赐武士。

《武臣保身敕》的颁赐 其时，广西都指挥耿良，以科敛激变良民；江西都指挥戴宗，以收捕山贼，贪求贿赂，致使山贼纵逸。皆因之坐罪。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十一月，命述武臣受命守御之方，崇名爵，享富贵，福及子孙之道，为《保身敕》，颁赐诸武臣，使其朝夕观览，知所鉴戒。

大宁、会州、富峪、宽河城的拓修 洪武二十二年(1389)正月十二日，会宁侯张温、北平都指挥使周兴奏修拓大宁等城，并上其规制：大宁城门五，城周三千六十丈，濠长三千一百六十丈，深一丈九尺；会州城门四，城周一千一百二十丈，濠长一千一百八十九丈二尺，深一丈八尺；富峪城门四，城周九百丈，濠长九百八丈二尺，深一丈三尺；宽河城门四，城周八百一十二丈，濠长八百五十九丈，深一丈五尺。创盖仓廒四十七所，计五百五十间，营房计七千三百三十三间。

宗人府的改立 洪武三年(1370)四月置大宗正院，秩正一品。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改宗人府，设宗人令一人，左、右宗正各一人，左、右宗人各一人，并正一品。以秦王樉为宗人令，晋王㭎为左宗正，燕王棣为右宗正，周王橚为左宗人，楚王桢为右宗人。掌皇九族之属籍，以时修其玉牒，书宗室子女嫡庶、名封、嗣袭、生卒、婚嫁、谥葬之事。凡宗室陈请，为闻于上，达才能，录罪过。其后，以勋戚大臣摄

府事，不备官，而所掌事务尽移于礼部。其属，经历司，设经历一人(正五品)，典文移出纳。

傅友德大战阿资 云南越州阿资起事，以其地险要，曾扬言："国家有万军之勇，我地有万山之险，岂能尽灭我辈！"傅友德奉命征讨。洪武二十二年(1389)傅友德道经平夷，因其山险恶，宜驻兵屯守，遂徙山民往驻卑午村，留神策卫千户刘成置堡戍守。不久，阿资率众寇普安，友德迎战，斩其营长，阿资败退。正月二十四日，友德又派兵袭击。阿资屯普安，倚壁为寨，其众皆缘壁攀岩，坠死者不可胜计，生擒一千三百余人，获马畜甚多。阿资逃遁还越州。二月，沐英遣都督宁正从傅友德往讨，大败阿资，斩杀五十余人，获马牛羊以千计。阿资畏惧，与其母请降。沐英便请置越州、马隆二卫，扼其冲要。又分兵追捕，其地平定。沐英又以陆凉为西南要地，请置陆凉卫指挥使司，得到朱元璋批准。后阿资不时起事，至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沐春等率师趋越州，分道逼其城，伏精兵于道旁，以羸卒诱其出，伏兵尽起，阿资逃往山谷。沐春暗结附近土官，询阿资所在，然后树垒断阿资粮道，阿资被困。沐春遣兵，出其不意攻其穴，遂擒阿资并诛其党二百四十人。接着分兵破广南酋，俘斩千余人。何福分徇宁远，大胜而还。

禁武臣预民事 其初，朱元璋命军卫武臣管领所属军马，除军民词讼事重者许约问外，其余不许干预。至洪武二十二年(1389)二月，广西都指挥耿良造谯楼，令有司起发民丁，科敛财物；青州等卫造军器，亦擅科民财，违越禁例。于是，朱元璋于同月二十二日下诏严禁武臣预民事，申明：凡在外都司卫所，遇有造作，千户所移文达卫，卫达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达五军都督府奏准，方许兴造。其合用物料，并自官给，勿擅取于民。违者治罪。民间词讼，虽事涉军务，均归有司审理，勿得干预。并著为令。

军丁习工艺 朱元璋以军卫营作，多出百姓供给而加重百姓负担。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三月十九日，命天下军丁习工艺。他告谕五军都督府遣官至各都指挥使司，令所属卫所置局，每百户内选军丁四人，并正军中的萎弱者，俾分习技艺，限一年有成。丝、铁、箐、角、皮革、颜料等物料，皆由官供给，勿取于民。

朱元璋诏赐贫民钞 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初七日，朱元璋谕户部尚书杨靖说：闻知九江、黄州、汉阳、武昌、岳州、荆州诸郡多贫民，其遣人运钞前往赈济，每丁钞一锭，沿河递运所水驿夫每人五锭，共九十一万二千六百一十七锭。初九日，又赐居京师的山东流民每人钞二十锭。十二日，赈山东莱州、兖州二府饥民钞共二十六万九千二百一十锭。十五日，赈湖广常德、长沙、辰州、靖州、衡州、永州、宝庆、郴州、德安、沔阳、安陆、襄阳贫民钞共一百四十六万八千七百余锭。

兀良哈三卫的设立 兀良哈原是元朝大宁路的北境。朱元璋立国，为有效控制其地，将锦州、义州、剑州、利州划归辽东都司，并在大宁设都司，管辖兴、营等二十余卫。洪武十四年(1381)封皇子权为宁王，开府其地，洪武二十年纳哈出投降，将降卒安置于兀良哈。洪武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兀良哈之地设泰定、朵颜、福余三卫。以故元辽王阿札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帖木儿为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海撒男答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各领其众，为大宁声援。三卫地亘千余里，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为泰宁，自全宁抵喜峰口近宣府为朵颜，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为福余。其中朵颜尤险而强，叛服无常。

唐铎致仕 唐铎(1329—1397)，字振之，虹县人。朱元璋初起，即侍左右。守濠州，从定江州，授西安县丞，召为中书管勾。洪武元年(1368)出任延平知府，拊辑新附，士民安宁。洪武五年召为殿中侍御史，复出任绍兴知府。洪武六年十二月召拜刑部尚书，次年改太常卿。丁母忧归里。洪武十四年起改兵部尚书，洪武十五年改任谏议大夫、右副都御史。洪武十八年十月迁刑部尚书，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又任兵部尚书。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兼詹事院詹事，五月致仕。洪武二十六年起任太子宾客，进太子太保。洪武二十八年奉命往龙州招谕土官，且参军事。洪武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于京师，年六十九。唐铎为人长者，性慎密，不妄取。朱元璋曾说："唐铎自友及臣至今三十余年，其与人交，不至变色，绝亦不出恶声。"又说："都御史詹徽刚断嫉恶，胥吏不得肆其贪，谤讪满朝。唐铎厚重，又谓懦而无为。人心不古，有若是耶！"福王时追谥敬安。

外卫军犯笞罪例的制定 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二十二日，朱元璋诏定在外各卫军丁犯笞罪例：凡在外各卫军丁犯笞罪以上及护卫军丁犯杖七十以下的，各杖之，仍隶籍余丁俟补役，护卫军丁不许扈驾。其正军及余丁犯杖八十以上的，全部发往属卫，调换无过军丁补充。

功臣榜之建 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初二日，朱元璋在肃清逆党后，仍榜功臣五十七人。其标准是德高望重，连岁总兵。有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耿炳文、吴良、沐英、李善长、郑遇春、王志、费聚、周德兴、赵庸、仇成、李新、俞通源、谢成、张龙、

吴祯、汪兴祖、陈桓、张赫、朱寿、廖永忠、陈德、顾时、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傅友德、蓝玉、叶升、张温、王弼、郭英、曹震、曹兴、周武、吴复、金朝兴、薛显、胡海、张翼、朱亮祖、常升、康铎、孙恪、濮玙、韩政、曹良臣、杨璟、陆聚、梅思祖、黄彬、胡美、郭兴。

朱棣奉命北征　因故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知院阿鲁帖木儿等将为边患。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初三日,朱元璋命晋王棡、燕王棣北征。并授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赵庸、曹兴为左、右副将军,王弼、孙恪为左、右参将,赴北平训练兵马,听燕王朱棣节制。其时,王弼已先在山西练兵,因敕听晋王棡节制。同月二十七日,朱元璋遣使敕谕咬住等,令其归降。三月初二日,燕王率师出古北口,谕诸将说:"虏地旷绝,我千里行师,无间谍难以成功。"便发骑侦虏屯伊都,冒雪抵其营,诸将欲止,燕王不许。因在此之前借指挥观童与乃儿不花的旧交,遣其往招。二十九日,燕王率军至其营,大军压境,乃儿不花与咬住投降。收其部卒数万、畜产数十万而归。而晋王棡出塞,不见敌而还。

军民对支法的推行　洪武二十一年(1388)五月初五日,朱元璋对户部大臣说:"我思天下将校军士月给俸粮,以前于仓庾出纳,恐军民不便,今欲将民间岁租,较定其数拨与。每岁秋成,即令编户送至其家。如此,官无出纳之劳,民无耗损之患,你们可将我这一设想详加商议。而应天府将今年民租先对一卫试行,若便于军民,则著为令。"于是,军民对支法先在应天府试行。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朱元璋命户部普遍推行。具体规定:户部校理各卫官军岁支俸粮实数,以内外有司民户该输正粮对数拨给。如一县之数以对一卫,或多或少,损其赢补其不足;一户之粮,以对一军,多少损益如上例。度其道里之远近,有司以勘合号数编定次第。如金吾卫军五千,即以金吾字为号,自一号编至五十号为止。又如指挥使岁俸四百二十石,务以人户粮额足其数,於勘合簿注之,递发军卫收掌。候其人户输粮之际,对号相符,依数收受,即以实收付之,以凭查照。若一卫所收俱足,则出通关付有司奏缴。

官民服饰的申定　朱元璋见朝廷官员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便命礼部尚书李原名、国子司业龚斅参酌时宜而存古意。李原名等奉命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三月初二日,申定官民服饰:凡官员衣服宽窄,以身为度。文官衣长,自领至裔,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袖桩宽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驸马与文官同。耆老、儒士、生员制同文职,惟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长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宽一尺,袖口五寸。武职官衣长离地五寸,袖长过手七寸,袖桩宽一尺,袖口仅出拳。军人衣长离地七寸,袖长过手五寸,袖桩宽不过一尺,窄不过七寸,袖口仅出拳。朱元璋批准,命颁示中外。

潭王梓焚死　朱梓(1369—1390),朱元璋第八子,洪武三年(1370)年二岁受封潭王,洪武十八年就藩长沙。其英敏好学,善属文。曾召府中儒臣,设醴赋诗,亲品高下,赉以金币。妃於氏,都督于显女。洪武二十三年于显父子坐胡惟庸党伏诛,其不自安,朱元璋遣使慰谕,且召入见,更为恐惧,遂与妃于四月初三日焚死,年二十二,无子,国除。

京师外城筑成　洪武二十三年(1390)四月初七日,京师外城筑成。外城周一百八十里,门有十六:东为姚芳、仙鹤、麒麟、沧波、高桥、双桥,南为上方、夹冈、凤台、大驯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为江东,北为佛宁、上元、观音。

除百官期年奔丧之制　原规定,百官闻祖父母、伯叔、兄弟丧,俱得奔赴。洪武二十三年(1390)闰四月十二日,吏部奏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俱期年服。若俱令奔丧守制,或一人连遭五、六期丧,或道路数千里,则居官日少,更易繁数,旷官废事。今后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的丁忧外,其余期年服制,不许奔丧,但遣人致祭。朱元璋批准,付诸实施。

列侯还乡　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初二日,朱元璋念列侯年老,悉遣还乡。其中有魏国公徐辉祖、开国公常升、曹国公李景隆、宋国公冯胜、申国公邓镇、颍国公傅友德六公,各赐黄金三百两,白金二千两、钞三千锭,文绮三十匹;永平侯谢成、南雄侯赵庸、崇山侯李新、怀远侯曹兴、凤翔侯张龙、定远侯王弼、安庆侯仇正、武家侯郭英(巩昌侯郭子兴)、鹤庆侯张翼十侯,赐黄金二百两,白金二千两,钞千锭,绮三十匹。

《昭示奸党录》的颁布　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朱元璋清除胡惟庸逆党,颁《昭示奸党录》。列二十人:李善长、胡美、唐胜宗、陆仲亨、陈德、费聚、顾时、杨璟、朱亮祖、梅思祖、陆聚、金朝兴、黄彬、华忠、王志、毛骧、于显、陈方亮、于琥。

铁册军之立　洪武二十三年(1390)六月初十日,朱元璋诏礼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户印及敕以铁册。其初,朱元璋以公、侯、伯于国有大勋劳,每人赐卒一百一十二人为从者,称"奴军"。洪武二十三年,以公侯年老,赐其还乡,设百户一人统领其军,以便护卫,给屯戍之印,俾其自耕食,复赐铁册。告谕诸百户道:过去我与群雄并驱,于诸将中拔其出群者为师

首，以统诸军。当是时发号施令，所至摧坚抚顺，敢有以五十步笑百步者斩！是令既行，三军莫敢逡巡，间有违者，法必不贷。自渡江以来，平定天下，今三十有余年，念诸将年老，今其衣锦还乡，命尔等为百夫长，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护卫其家。俟其寿考，子孙承袭，则兵皆入卫，置其屯戍。于是，魏国公、开国公、曹国公、宋国公、信国公、颍国公、凉国公，西平、江夏、长兴、江阴、东平、宣宁、安庆、安陆、凤翔、靖宁、会宁、怀远、景川、崇山、普定、鹤庆、东川、武定、沈阳、航海、全宁、西凉、定远、永平诸侯，皆给以兵。时号铁册军。

《韵会定正》的刊行　《洪武正韵》刊行已久，朱元璋以其字义音切未能尽当，便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学士刘三吾说："前太常博士孙吾与所编《韵书》，本宋儒黄公绍《古今韵会》，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韵归一。"即以其书进呈。朱元璋览而称善，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月二十日赐名《韵会定正》，且下诏刊行。

禁通外番　朱元璋见中国金、银、铜、钱、段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而今两广、浙江、福建百姓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遂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月二十七日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严治其罪。

宴节钱的给赐　其初，朱元璋命天下有司，凡遇天寿圣节及正旦、冬至节日，各赐官吏筵宴，而有司因而科敛，扰害百姓。便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九月二十四日命赐各布政司、都司、卫所、府州县各宴节钱：凡布政司有都司者千贯，府有都司者七百贯，无都司有卫者六百贯，无卫有所者四百贯，无卫所者三百贯；州有卫者五百贯，无卫而有所者三百贯，无卫所者二百贯；县有卫者四百贯，无卫有所者二百贯，无卫所者一百五十贯；卫无州县者四百贯，所一百五十贯。十一月初四日，赐在京文武官冬至节钱。

死罪输粟自赎例的制定　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二月初五日，朱元璋谕刑部尚书杨靖：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论死，其余死罪，皆令输粟北边以自赎。力不及者，或二人、三人并力输运，仍令还家备资以行。著为令。

王国用上书讼善长之冤　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二十三日，朱元璋以善长与胡惟庸通谋反叛罪，逼其自杀。第二年，户部郎中王国用(一说御史解缙代草)上书为善长诉冤。他在书中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借令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太师、国公、封王而已，尚主、纳妃而已，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求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其时大理寺卿陈辉亦上疏，如国用言。朱元璋皆不治其罪。

清理释、道二教　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初二日，朱元璋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规定：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勿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其佛经翻译已定者，不许增减词语。道士设斋醮，亦不许拜奏青词。为孝子慈孙演诵经典报祖父母者，各遵颁降科仪，勿妄立条章，多索民财。及民有效瑜珈教称为善友，假张真人名私造符箓者，皆治以重罪。七月初一日，朱元璋下诏：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寺观非旧额者悉毁。

徙富民实京师　洪武二十四年(1391)七月十五日，朱元璋告谕工部臣说：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我初不取。今天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那样做。我今欲令富民入京师，你们当令有司验丁产殷富的，分遣其来。于是，工部徙天下富民至京师的共五千三百户。

生员不中式处罚例的更定　洪武二十四年(1391)七月十五日，礼部奏：原规定，岁贡生员中式者，送国子监，不中者罪有司，停学官俸，生员罚为吏；今不中者遣还读书，有司、教官罚如旧制。因此，生员不率教者，无以劝惩。朱元璋命更定其制：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年论如例，二年者停俸半年，一年者停俸三月；学官无分久近，罚如例；生员，廪食五年者为吏，不及者遣还读书，次年复不中者，虽未及五年，亦罚为吏。

青文胜为民请命　青文胜任龙阳典史。因龙阳濒于洞庭湖，数罹水患，庄稼被淹，致使拖欠赋税数十万石。可是，上司催粮颇急，敲扑致死相踵。文胜慨然赴京师为民请命，一连数奏，均如石沉大海，便仰天长叹："有何面目归见龙阳父老！"又于洪武二十

四年(1391)七月具奏击登闻鼓以进,遂自经于登闻鼓之下。朱元璋得知大惊,悯其为民杀身,下诏宽免龙阳租二万四千余石,定为额。龙阳百姓为文胜建祠祭祀。妻子贫不能归,给公田百亩以养。

太子朱标巡抚陕西 朱元璋以应天、开封为南京、北京,以临濠为中都。有监察御史胡子祺上书,以为"据百二河山之险,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形胜所在,莫如关中。"元璋为之心动,但不形言表。便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十一日命太子朱标巡抚陕西。他告谕道:"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向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余年,汝可一游,以省观风俗,慰劳秦民。"于是择文武之臣扈从,皆给道里费。既行,元璋复谕:比来一旬,久阴不雨,占有阴谋,宜慎举动,严宿卫,施仁布惠,以回天意。"仍申谕从行诸臣以行止报闻。十一月还京,献《陕西地图》。

刘真征讨哈梅里 其初,哈梅里请以马互市于延安、绥德、平凉、宁夏等卫。朱元璋告谕守将说:"番人黠而多诈,互市之求,安知非藉以觇我!利其马而不虞其害,所丧必多,宜勿听。"时西域、回纥来贡,多被哈梅里阻遏;有从他道而来的,哈梅里又遣兵邀杀。朱元璋大怒,遂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二十一日,遣刘真偕宋晟率兵征讨。刘真自凉州西入哈梅里之境,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包围,知院岳山投降。黎明,兀纳失里驱马三百余匹突围而出,官军争取其马,兀纳失里率家属随马后逃遁。刘真等遂拔其城,斩幽王、国公等一千四百人,获王子及部属一千七百三十人,马六百三十匹。逾年,兀纳失里遣使贡马、骡请罪。朱元璋宥其罪。

塌坊之建 京师辐辏,军民居室,皆官所给,连廊栉比,无复隙地。商人货物至京,或止于舟,或贮于城外民居。驵侩之徒,从而持其价高低,悉听断于彼,商人为其所苦。朱元璋知其情,遂命工部于三山等门外濒水处,为屋数十楹,名为塌坊。商人将货物贮于其中,纳税毕,即可自相贸易,驵侩无法干预渔利,商人称便。洪武二十四年(1391)所司于贫民负贩,亦令其入塌坊纳税,应天府尹高守礼以奏。朱元璋于同年八月二十七日下诏:京师小民负贩勿入塌坊。贫民负贩欢悦。

冯坚上《言九事疏》 洪武二十四年(1391)十月十二日,时任江西南丰县典史的冯坚,上《言九事疏》。疏中说:一、养圣躬。请清心省事,不与细务,以为民社之福。二、择老成。诸王年方壮盛,左右辅导,愿择取老成之臣,出为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图匡救。三、攘要荒。请务农讲武,屯戍边圉,以备不虞。四、励有司。请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别属吏以闻而黜陟。五、褒祀典。请敕有司采历代忠烈诸臣,追加封谥,俾有兴劝。六、省宦寺。晨夕密迩,其言易入,养成祸患而不自知,裁去冗员,庶防其渐。七、易边将。假以兵柄,久在边陲,易滋纵佚,请时迁岁调,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勋臣,实可防将骄卒惰,内轻外重之弊。八、访吏治。廉干之才,或为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劝之道,请广布耳目,访察廉贪,以明黜陟。九、增关防。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辄加捶楚,害及于民,请增置勘合,以付诸司填写差遣,事讫交报,庶有司不轻发以病民,而庶务亦不致旷废。"朱元璋览疏,称其知时务、达事变。遂命吏部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而冯坚在都察院,颇持大体。次年卒于官。

岁贡生员数额的更定 洪武二十五年(1392)正月十一日,朱元璋天下学校,自今年起,府学每年贡二人,州学二年贡三人,县学每年贡一人。二月十三日,命儒学生员兼习射与书数之法。

朱标逝世 朱标(1355—1392),朱元璋长子。元璋称吴王,立为王世子,从宋濂受经。洪武元年(1368)正月,立为皇太子,置东宫,设官属,悉心辅导,选才俊之士充伴读。元璋时时赐宴赋诗,商榷古今,评论文字。元璋又命东宫及东宫官编辑古人可为鉴戒之事,训谕太子诸王。洪武十年,令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奉命巡抚陕西。还京献陕西地图,遂病不起。在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之事。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卒,年三十八。八月葬孝陵东,谥懿文。建文元年(1399)追尊孝康皇帝,庙号兴宗。朱棣即位,复称懿文皇太子。

沐英逝世 沐英(1345—1392),字文英,小名周舍,直隶凤阳定远人。少孤贫,从母避兵,母又死。朱元璋怜而抚养,从朱姓。年十八,授帐前都尉,守镇江,迁指挥使守广信。从大军征福建,缚冯谷保。洪武元年(1368)始复沐姓。移镇建宁,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卫。不久,先后迁大都督府佥事、同知。府务繁积,沐英年少明敏,剖决无滞,深受元璋器重。洪武九年抵关、陕,问民疾苦,事有不便,更置以闻。洪武十年任征西副将军从邓愈讨吐番,西略川、藏,耀兵昆仑。以功封西平侯。洪武十一年讨西番。后又从傅友德征云南。待云南平定,留镇云南。在镇百务具举,简守令,课农桑,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垦田至百万余亩。滇池隘,浚而广之,无复水患,通盐之利以来商旅,辨方物以定贡税,视民数以均力役。疏节阔目,民以便安。居常读书不释卷,暇则延诸儒生讲说经史。洪武二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卒,年四十八。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

詹事府的改立 洪武初年，朱元璋命置大本堂，充古今图书于其中，召四方名儒训导太子、亲王。东宫官属，自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宾客外，则有左、右詹事，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同知左、右率府事，左、右率府副使，谕德，赞善大夫，皆以勋旧大臣兼领其职。又有文学、中舍、正字、侍正、洗马、庶子及赞读等官。洪武十五年(1382)更定左、右春坊官，各置庶子、谕德、中允、赞善、司直郎，又各设大学士。不久，定司经局官，设洗马、校书、正字。洪武二十二年以官联无统，始置詹事院。洪武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改詹事院为詹事府。设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主簿一人，从七品；录事二人，正九品。定春坊大学士正五品，司经局洗马从五品。虽各有印，而事总于詹事府。

公侯岁禄的确定 洪武初，朱元璋赐给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又赐诸武臣公田。洪武以其租税充作俸禄。而勋臣庄田，率多倚势不法。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二十五日，确定给其俸禄，由官支付，其赐田全部交回。于是魏国公、曹国公、信国公、江阴侯、靖海侯、永平侯、蕲春侯等各归旧赐田于官。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一千五百石至千石，伯千石至七百石。

《醒贪简要录》的颁行 朱元璋曾告谕廷臣："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亨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壮，又须耘薅，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或遇水旱虫蝗，则举家遑遑无所望。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刻剥而虐害三事，无仁心之甚。"于是命户部臣备录文武大小官品岁给俸米之数，以米计其用谷之数，又计其田亩出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编辑成书。赐名《醒贪简要录》。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颁布中外，令食禄者知所恤民。

皇太孙之立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皇太子朱标死，八月安葬。九月十二日，立朱标第二子朱允炆为皇太孙。祭告太庙。自此以后，朱元璋命其裁决庶务，宽厚亦如其父，中外莫不称赞。

都司与王府护卫之禁 洪武二十五年(1392)九月三十日，朱元璋敕谕都司官军与王府护卫军，不得擅自往来。他对右军都督府臣说："近闻陕西都司遣兵常随秦王出入。盖王府置护卫，又设都司，正为彼此防闲。都司乃朝廷方面，凡奉敕调兵，不启王知，不得辄行；有王令旨，而无朝命，亦不许擅发；有如密旨不令王知，亦须详审复奏而行，此国家体统如此。今秦府未给护卫，但令以兵五百暂为护从，而都司乃敢增兵至千人，其罪不可赦！我以其皆为旧臣，过去常有劳于国，且不置之法。你们都督府遣人谕告，今后再有违令的，治如律。"

方孝孺人京 洪武十五年(1382)，翰林待制吴沉推荐方孝孺才，被召至京，朱元璋召见，喜其举止端庄，即告皇太子说："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而还。后为仇家诬告，被逮入狱，朱元璋见其名，释放还家。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又被荐至京师，朱元璋说"今非用孝孺时。"遂授汉中府学教授。至任之日，与诸生讲学不倦。蜀王椿得知其贤，聘为世子师，每次讲经，必陈说道德。蜀王大喜，待以殊礼，名其读书之庐为"正学"。

蓝玉擒月鲁帖木儿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建昌降将月鲁帖木儿反叛。七月，四川都指挥使瞿能奉命征讨，月鲁逃遁，瞿能追击，俘五百余人，再搜捕得一千八百余人，月鲁复逃柏兴州。蓝玉征罕东，奉命转战，于十一月十七日，军次柏兴。遣百户毛海诱致月鲁并其子胖伯，遂降其众，送京师伏诛。蓝玉因奏四川地旷山险，土番出入之地如马湖、建昌、嘉定等处，皆宜增置屯卫。朱元璋批准，并令蓝玉班师。

公侯大臣兼任宫保 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二月二十八日，朱元璋令公侯大臣兼任宫保：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兼太子太傅，开国公常升、全宁侯金恪兼太子太保，詹徽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茹瑺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任亨太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修撰，杜泽、楚樟为詹事府丞。詹徽以下兼官者，并给其兼俸。

巡检考课之法的更定 原规定，巡检考满给由，无私过的升正九品，犯私笞的本等用，杖罪的降杂职。洪武二十五年(1392)闰十二月十五日，吏部奏言：巡检之职，当以捕获逃军、逃囚、盗贼等项多者为称职。若只拘过名，不考功迹，则侥幸者多。有在任三年，获军囚三二百名之上，为犯私罪而降者，有全无所获依例而升者。似此功过不明，陟罚未当，乞更定其法。自今巡检考满，捕获军囚、盗贼等项二三百名之上、无私杖者升一级；有私杖者降杂职对品用。一百名之上、无私杖者，对品用；有私杖者降杂职。三十名之上、无私杖者降杂职；有私杖者降边远杂职。不满三十名者，发边远充军。若有强贼及逃军聚众劫掠，能擒获以除民害者，二十名以上、无私杖者，升一级，有私杖者对品用。十名之上、无私杖者对品用；有私杖者降杂职。九品以下、无私杖者，降杂职；有私杖

者降边远杂职。若擒强贼、逃军六十名之上，或只二十名，而又能获军囚二百名之上及擒伪造宝钞及伪印者，具奏升陟。朱元璋批准，著为令。

《周知册》的颁布　洪武二十五年(1392)闰十二月十八日，朱元璋命僧录司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僧寺。时京师百福寺隐匿囚徒、逋卒，往往变易名姓为僧，游食四方，无以验其真伪。于是，命造《周知文册》，自在京及在外府、州、县寺院、僧名，以次编之。其年龄、姓名、字行及始为僧年月与所授度牒字号，俱载于僧名之下。既成，颁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脚至者，以册检验。若有不同，许获送有司械至京师治重罪；容隐者亦治其罪。

杨靖碎珠　洪武二十五年(1392)闰十二月，刑部尚书杨靖逮一武臣，将及审讯，门卒搜其身，得一大珠。卒送至杨靖前，僚属骇愕。杨靖慢慢地说："那有如此大珠，此以伪物侮人。"遂命椎碎，然后报告朱元璋。元璋嘉叹说：杨靖此举有四善：他人见奇物必以献我，以求容悦，而靖不然，此乃以道事君，一善；其人藏珠于身，若穷诘问，必谓有所投献，是以一珠而起大狱，靖有德阴于人，二善；若门卒得珠，因而嘉奖，由是决意求获，人将受法外之苦，靖能杜小人侥幸之端，三善；且人处常易而应变难，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动心，乃斥以为伪物而碎之，靖有过人之智，应变之才，四善。

蓝玉案诛群臣　蓝玉(？—1393)，直隶凤阳定远人。常遇春妇弟。初隶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遇春数告朱元璋，由管军镇抚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1371)伐蜀，克绵州。洪武五年北征，出雁门，败元兵于乱山，再败其于土剌河。洪武七年率兵拔兴和。洪武十一年从沐英讨西番。洪武十二年封永昌侯。洪武十四年征云南，战功居多。洪武二十年从冯胜征纳哈出。次年率师十五万，出大宁，至庆州，与元兵大战捕鱼儿海，杀太尉蛮子，获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以及宝玺符敕金牌银牌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算。朱元璋得知，大加奖慰，比之卫青、李靖。还师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六万。至京，进封凉国公。后又多次奉命出征。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蓝玉谋反，下吏鞫讯。狱词称："蓝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东莞伯河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耤田举事。十月狱具族诛。后颁《逆臣录》，有一公、十三侯、二伯。列侯以下坐党夷灭的约一万五千人。史称"蓝玉案"，与胡惟庸案合称"胡蓝案"。

《诸司职掌》编成　朱元璋以诸司职有崇卑，政有大小，无方册以著成法，恐后来任官不知职任行政施设之详，便命吏部官同翰林儒臣，仿《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诸司，凡其设官分职之务，类编为书。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二十五日编成，名《诸司职掌》。朱元璋下诏刊行，颁布中外。

《稽制录》的颁行　朱元璋自即位以来，封赉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礼。凡封爵、禄食、礼仪等差，皆仿唐宋之制，其间因时损益，以适时宜。但诸功臣多武人不知书，往往恃功骄恣，逾越礼分，甚至肆情废法，奢侈无度。及蓝玉伏诛籍其家，见其服舍器用，奢侈逾制。朱元璋因诏翰林院稽考汉、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号虚实之等第，编辑为书。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编成，名《稽制录》，朱元璋亲自作序，颁示功臣，使其朝夕省览，以遏其奢侈之萌。五月二十日，魏国公徐辉祖、崇山侯李新即按《稽制录》规定，将多出的家人。仪从户交付有司。朱元璋命将多余人等发凤阳隶籍为民。六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又命礼部申严公侯制度奢侈之禁。

学官考课法的制定　原以岁贡为学校常例。洪武二十六年(1393)五月二十二日，制定学官考课法，以科举生员多寡为殿最。县学生员二十名，教谕九年任内，有举人三名，又考通经的为称职，升用；举人二名，虽考通经为平常，本等用；举人不及二名，又考不通经的为不称职，黜降别用。州学生员三十名，学正九年任内，有举人六名，又考通经的，升用；举人三名，虽考通经，本等用；举人不及三名，又考不通经的，黜降别用。府学生员四十名，教授九年任内，有举人九名，又考通经的，升用；举人四各，虽考通经，本等用；举人不及四名，又考不通经，黜降别用。府、州、县学训导，分教生员，九年任内，举人三名、又考通经，升用；举人二名或一名，虽考通经，本等用；举人全无，又考不通经，黜退别用。

俞通渊削爵还乡　俞通渊(？—1400)，巢湖人。以父廷玉、兄通海、通源故，充参侍舍人，从征南北，积功授都督佥事。通源坐胡惟案，朱元璋念其父、兄功迹，于洪武二十五年封通渊为越巂侯，率师讨建昌，城越巂。次年五月二十四日有罪削爵还乡。建文元年(1399)召复爵，二年随大军伐燕王朱棣，战殁于白沟河。次子俞靖嗣。

朱允炆听狱　洪武二十六年(1393)七月。一日，皇太孙朱允炆侍朱元璋侧，见逻者获盗七人，徐徐过目，即告元璋："逮及七人，有六人是盗，而其中一人不是盗贼。"后经审讯，果如其言。朱元璋问其何

以知之？允炆答："《周礼》听狱，色听为先。此人眸子瞭然，顾视端详，是以知其不是盗贼。"朱元璋高兴地说："治狱贵通经，真是如此。"

《永鉴录》编成颁赐　朱元璋令儒臣辑历代宗室诸王善恶悖逆之事，以类为编，直叙其事。洪武二十六年(1393)十二月编成。名为《永鉴录》。朱元璋命刊印颁赐诸王。

李新奉命开胭脂河　洪武二十六年(1393)八月十三日，李新奉命往溧水县督视有司开胭脂河。朱元璋告谕道："两浙赋税漕运京师、岁实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阳，舍舟登陆，转输劳苦；一自大江溯流而上，风涛之险，覆溺者多。我颇怜悯。今欲自畿甸疏凿通河，以通于浙、使转运者不劳，商旅者获便。特命你前往督其事。你至其地，理事唯勤，役民勿暴。"李新奉命而行。及河成，人皆称便。

《世臣总录》编成颁赐　朱元璋令儒臣辑历代为臣善恶可为劝征之事，以类编次，直叙其事。洪武二十六年(1393)十二月编成，名《世臣总录》。朱元璋命刊印颁赐中外群臣。

武官子弟习骑射　洪武二十七年(1394)三月初五日，朱元璋诏令武官子弟习骑射。他告谕五军都督府臣说：我尝令武官子弟演习武艺。今天下久安，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禄，纵酒嗜音乐歌舞为游戏。一旦袭职，使之挟弓矢上马且不能，安能为国效力？近扬州卫指挥单寿袭其父职，率兵往泰州捕寇，猝与寇遇，众军并力迎战，单寿惧而逃跑，且挥众使退，遂致败事。此由其素不练习之故。自今以后，武官子弟宜于闲暇时令习弓马。当承袭的，由五军阅试其习骑射闲习方许。否则，虽授职而只给半俸；三年后复试，不能骑射的谪为军。著为令。初八日，朱元璋又命兵部，凡武官子弟年幼袭职的，待其年二十，以例比试。

命天下种桑枣　朱元璋告谕工部臣说：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暖即忘寒，不思为备，一旦猝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我深知民艰，应百计劝督，使其皆得温饱。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你们可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或遇凶欠，可为衣食之助。于是，工部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三月十一日移文天下有司，督民种植桑枣。且授以种植之法。又令益种棉花，率免其税，岁终具数以闻。

高年老人理乡讼　由于州郡小民因邻里纠纷等琐事兴狱讼，越诉于京。于是，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月十三日严越诉之禁，命有司择民间公正可任事的高年老人理其乡诉讼。若户婚、田宅、斗殴的，则会里胥裁决；事涉重大的，才许告于官。且给教民榜文，使其遵守施行。

修治水利　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初八日，朱元璋遣国子监生及人材分赴天下郡县督吏民修治水利。他说："耕稼，衣食之原，民生之所资。而时有旱涝，不可不备。我每令有司修治水利，而有司不以时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你们往各郡县，集吏民乘农隙相度其宜，凡陂塘湖堰可储蓄以备干旱宣泄、以防霖潦的，皆宜因其地势修治。勿妄兴工役掊克吾民。"至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全国府县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

禁钱用钞　其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以至有以钱一百六十文折钞一贯的。福建、两广、江西诸处，一如两浙。于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朱元璋为此谕户部尚书郁新说：国家造钞，令与铜钱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来，民心刁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致令钞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的治以罪。因此，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十九日下诏禁用铜钱。

新建京都酒楼　朱元璋以海内太平，思欲与民偕乐，便命工部建十楼于江东诸门外，令民设酒肆于其间，以接四方宾旅。其楼有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重泽等名。不久，又增建五楼。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二十三日建成。朱元璋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

《书传会选》编成　朱元璋阅览蔡氏《书传》，象玮运行，与朱子《诗传》相悖，其他注书与鄱阳邹季友所编亦有异同之处，便召致仕国子监博士钱宰等至京，告谕定正蔡氏书传之意。他问：你们知晓天象吗？皆答不知。朱元璋说：我每观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气凝于奎壁间，奎壁乃文章之府，我颇觉奇异。今年春暮，其间黑气始消，文运当兴。你们宜考古正今，有所述作，以称我意。于是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其事，开局翰林院，正定蔡氏书传。其时，礼遇诸儒甚厚，各赐以绮缯衣被等物，又制诗命次韵以和，朝参则班于侍卫之前，宴享则赐坐殿中。且赐钞宴于酒楼，各献诗谢。元璋十分高兴，复遣礼部尚书任亨泰谕诸儒有年耆思归的先遣还乡，而诸儒皆愿留侍左右。洪武二十七年(1394)九月十六日书成。凡蔡氏集传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诸家之说，足其未备。三吾等率诸儒上呈，元璋赐名《书传会选》，会礼部刊行天下。赐诸儒宴及钞，使其驰驿而还。

《寰宇通衢》编成　朱元璋以舆地之广，不可

无书记载，便命翰林儒臣以天下道里之数编类为书。洪武二十七年(1394)九月二十三日编成，赐名《寰宇通衢》。其方隅之目有八。东距辽东都司，陆行三千九百四十四里；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三百六十四里，西极四川松番卫，陆行为五千五百六十里；西南距云南金齿，陆行为六千四百四十四里。南逾广东岩州，水陆兼行为六千六百五十五里。东南至福建漳州府，水陆兼行为三千五百二十五里。北至北平大宁卫，为三千六百二十四里，水陆兼行四千四百二十五里。西北至陕西甘肃为五千零五十里，水陆兼行为六千七百二十里。时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不包括四夷之驿。

傅友德自杀　傅友德(？—1394)，先居宿州，后徙砀山，元末从刘福通部将李喜喜入蜀，喜喜败，从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而走武昌，从陈友谅。朱元璋攻江州，至小孤山，友德降元璋，从常遇春援安丰，略庐州，战鄱阳，轻舟挫友谅前锋。被数创而战益力，复于诸将邀击于泾江口，友谅败死。进击武昌获胜，积功至江淮行省参知政事。吴元年(1367)末，随徐达北征，破沂州，下青州，取莱阳、东昌。洪武元年(1368)从定汴、洛，收诸山寨，渡河取卫辉、彰德，再取德州、沧州，从克元都，守庐沟桥，略大同，还下保定、真定，守定州。西攻山西、陕西。三年从大将军攻定西，大破扩廓帖木儿。再率师克汉中，还军西安。十一月封颍川侯。四年任征虏前将军由陕西南下伐蜀。奉行元璋战略，发奇兵入川，所向披靡。论功为第一。洪武五年副征西将军冯胜征沙漠，败失剌罕于西凉，至永昌，败太尉朵儿只巴，获马牛羊十万余。略甘肃，降太尉锁纳儿等。明年复出雁门，获平章邓孛罗帖木儿。还镇北平。洪武十四年秋征云南。洪武十七年以功进封颍国公。洪武二十年征纳哈出，大胜而还。后或奉命出师，所战皆捷；或练兵屯田，恪守其职。身经百战，必先士卒，虽被创，亦勇往直前。屡次受元璋奖劳。洪武二十五年，以请怀远田被元璋谴责。后以蓝玉伏诛而自惧。遇冬宴，彻馔未尽，友德起立，元璋以为不敬，且令其召二子来。友德便出，提二首前来，元璋大惊说：“何惨忍至此！”友德即出袖中匕首说：“不过想要吾父子头罢了，”遂自杀身死。时为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嘉靖中为其立祠，名“报功。”

王弼自杀　王弼(？—1394)，先居直隶凤阳定远，后徙临淮。善用双刀，号双刀王。初结寨乡里自保，后归附朱元璋，使备宿卫。破张士诚于湖州，攻婺源，斩守将，拔其城，获甲三千，擢元帅。大战鄱阳湖，从平武昌，还取庐州，拔安丰，破襄阳、安陆等，迁骁骑右卫亲军指挥使。又从取平江，赏赉甚厚。吴元年(1367)秋，从大将军北征，下山东，掠定河南北，遂取元都。随大军西克山西，取陕西，进征察罕脑儿，大胜而还。洪武三年(1370)授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十一年副沐英征西番，论功封定远侯。洪武十四年从征云南，加俸禄，予世券。洪武二十年以副将军征纳哈出。次年又以副将军随蓝玉出塞，深入不见敌，蓝玉欲引军还，王弼以为不可，蓝玉从王弼议，进军捕鱼儿海，以王弼为前锋，直逼敌营，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遁，尽获其辎重。洪武二十三年奉诏还乡。洪武二十五年从傅友德等练兵山西、河南。次年召还。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自杀。爵除。

冯胜赐死　冯胜(？—1395)，初名国胜，又名宗异，最后名胜，直隶凤阳定远人。幼喜读书，通兵法。元末兵起，结寨自保。后与兄国用归附朱元璋。国用卒，冯胜以元帅袭兄职典亲军。从元璋抵御陈友谅于龙湾，战石灰山，冯胜披坚执锐，攻其中坚。又进破采石，复太平。从征陈友谅，破安庆水寨，长驱至江州，友谅逃遁。进亲军都护。援安丰，解其围，迁同知枢密院事。奉命出征，战鄱阳，下武昌，克庐州，移取江西诸路，又下湖州，克平江。功次常遇春，再迁右都督。洪武元年(1368)兼太子右詹事，坐小法贬一官为都督同知。引兵取汴、洛，下陕州，趋潼关。授征虏右副将军留守汴梁。不久，从大将军征山西。洪武二年，渡河趋陕西，克凤翔，再取巩昌，进逼临洮，降李思齐。还军围庆阳。冯胜扼驿马关，遂克庆阳，执张良臣。陕西全部平定。同年九月驻庆阳节制诸军。洪武三年以右副将军出西安，攻定西，破扩廓帖木儿，获士马数万。分兵徇略阳，入沔州，移兵吐番，征哨极于西北。凯旋，封宋国公。洪武五年以征西将军率将士出西道取甘肃，至亦乃集路，斩获甚众，全师而还。洪武二十年征纳哈出，降其众。师还，以多匿良马、求大珠异宝等过，收大将军印，就第凤阳。次年奉命调东昌兵征曲靖。洪武二十五年在太原、平阳籍民立卫屯田。皇太孙立，加太子太师，偕傅友德练兵山西、河南，诸公、侯皆听节制。时诏列勋臣望重的八人，冯胜名列第三。因元璋年高多猜忌，屡次以细过谴责冯胜。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召冯胜还京。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坐事赐死。诸子皆不得赐。

编民百户为里互助　洪武二十八年(1395)二月二十五日，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上疏言：“农民之中，有一夫一妇，受田百亩或四五十亩。当春夏时，耕种之务方殷，或不幸夫病而妇给汤药，农务既废，田亦随荒；及病且愈，则时已过。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室家，穷困流离。职此之由，请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

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百姓亲睦，而风俗淳厚。"朱元璋得疏，十分高兴，即告谕户部臣说："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伤，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相周恤。其至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我即位以来，常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我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宁有不亲睦的！户部官以此意告谕天下百姓，使其知晓。"

土司儒学的设立 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初十日，户部知印张永清上疏言：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啰啰，朝廷与以世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道，懵然不知，宜设学校，以教其子弟。朱元璋以为言之有理，即谕礼部臣说："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则难以化。应于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其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此仍是安边之道。"于是，土官儒学渐次设立。

禁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 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在奉天门敕谕文武群臣：我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系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系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只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盖嗣君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及时劾奏，处以重刑。"

不许复立丞相 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在奉天门敕谕文武群臣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及时劾奏，处以重刑。"

《皇明祖训》的颁布 洪武二年(1369)四月，朱元璋令陶凯等编《祖训录》，亲自作序，命大书揭于右顺门之西庑，随时修改。后重加更定，七易其稿，于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编定，名《皇明祖训》，颁布于内外文武诸司。朱元璋再为之作序，备述其创业之艰苦，以及寄予生长深宫之主的厚望。《皇明祖训》首列朱元璋序，下列祖训首章、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等目。朱元璋在颁布《皇明祖训》时敕谕礼部臣说："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盖创业之君，起自侧微，备历世故艰难，周之人情善恶。后世守成之君，生长深宫，未谙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长。至有奸贼之臣，徇权利，作聪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变更祖法，以败乱国家，贻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永为不刊之典。""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于开导后世，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俾子孙世世守之。你们以朕训颁行天下诸司，使知朕立法垂后之意，永为遵守。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

朝参赐食之罢 其初，每旦视朝奏事毕，赐百官食。朱元璋在奉天门或华盖、武英等殿，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门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于门外。其余五品以下官于丹墀内，文东武西，重行列位赞礼赞拜叩头，然后就坐。光禄司进膳案后，以次设馔，食罢，百官仍拜叩头而退，率以为常。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月十二日，礼部臣奏言：百官朝参赐食，实出厚恩。因职事众多，供亿为难，请罢赐食。朱元璋批准。自此以后，朝参毕各回其衙门，不再赐食。

《礼制集要》编成 朱元璋曾告谕翰林学士刘三吾等说：我即位以来，屡命儒臣历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使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谋为不轨，僭用黄罗帐幔，饰以金龙凤文。近来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凤，又铸金爵，以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房廊房悉用九五间数。而苏州府民顾常亦用金造酒器，饰以珠玉宝石。僭乱如此，杀身亡家。尔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第，编类成书，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的，必置之法；成造之人亦治其罪。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一月十五日编成，名《礼制集要》。其目十三：冠服、房屋、器皿、伞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从、奴婢、俸禄、奏启本式、署押体式、服制。颁布中外。

《洪武志》编成 一名《洪武京城图志》，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二月二十二日编成。其中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宫阙门观之制度，以及坛庙、寺宇、街市、桥梁之建置更易，无不备载。朱元璋下诏刊行，颁布中外。

浚治西安城中水渠 西安城中多苦水。洪武二十九年(1396)正月十七日，朱元璋诏修西安城中水渠，引龙首渠水入城中水渠，覆以石甃以障尘秽。计十家作一渠口，以便汲水。渠成，居民称便而获其

利。

擒获倭寇升赏格的制定 洪武二十九年(1396)正月十八日，制定擒获倭寇升赏格：凡各卫指挥获倭船一艘及贼首者，佥事升同知，同知升指挥使，仍赏白金五十两、钞五十锭；千户擒获者升指挥佥事；百户擒获者升千户，其赏给与指挥同。在船军士能生擒及杀获倭寇一人者，赏白金五十两；将校军士在陆地与倭寇交战能生擒或杀获一人者，赏白金二十两、钞二十锭。

任亨泰贬官 任亨泰，生卒不详，字古雍，湖广襄阳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宠遇特隆，建状元坊以旌，授翰林院编修，迁少詹事兼编修。洪武二十七年(1394)五月擢礼部尚书。其时，有日照民江伯儿以母病杀其三岁子祀岱岳，有司奏报。朱元璋怒其灭绝伦理，杖一百，戍海南，因命亨泰定旌表孝行事例。亨泰议曰："人子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有疾则谨其医药。卧冰割股，事非恒经。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堕宗绝祀，尤不孝之大者，宜严行戒谕。倘愚昧无知，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之列。"得到元璋批准。后又议秦王丧礼、世子袭爵之礼，奉命出使安南，述朝廷用兵之故以抚慰。洪武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还京，以在南安南私市蛮人为仆，降监察御史。不久，思明土官与安南争界，词复连亨泰，因以免官。

朱棣巡边 洪武二十九年(1396)二月二十三日，宁王权奏报，近来骑兵巡塞，见有脱辐遗于道上，想必是胡兵往来，恐有寇边之患。朱元璋得奏报说：胡人多诈，示弱于人，此必设伏以诱我军。若出军追逐，恐陷其计。于是敕燕王朱棣，选精卒壮马抵大宁、全宁，沿河南北觇视胡兵所在，随宜掩击。仍敕周王橚令世子有燉率河南都司精锐往北平塞口巡逻。三月初七日，朱棣率军北至彻彻儿山遇胡兵，与战，擒其首将孛林帖木儿等数十人，追至兀良哈秃城，遇哈剌兀，复与战，哈剌兀败逃，遂班师而还。

续置吏部文官历任贴黄簿 洪武二十九年(1396)五月初二日，续置吏部文官历任贴黄簿。分内外二册，其以事去官者，则别置册附录，以便稽考。

表笺文式的颁行 由于天下诸司所进表笺，多务奇巧，词体骈俪，朱元璋颇不满意，便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右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庆贺、谢恩表笺成式。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七月颁于天下诸司。自今以后，凡遇庆贺、谢恩，则如式录进。

开平四屯卫的建立 开平系重要军事要地。朱元璋曾下诏建立开平中屯卫。洪武二十九年(1396)八月初五日，北平都指挥使司奏，已立中屯卫于沙峪。今议立左屯卫于六合营、右屯卫于军台、前屯卫于偏岭、后屯卫于石塔。朱元璋批准。于是又立开平四屯卫，从而加强了边塞的防御能力。

广西兴安灵渠的修浚 广西兴安灵渠，可灌溉田地万顷，亦可通行小舟，国初曾经修浚。洪武二十九年(1396)九月初一日，致仕兵部尚书唐铎以军务至其地，图其状报告朝廷。且言修浚深广，可通官舟，供给军饷。朱元璋便命监察御史严震直发旁县民丁修浚。浚渠五千余丈，筑渼潭及龙母祠土堤一百五十余丈，又增高中江石堤，改作滑石陡，凡陡涧碍舟通行之石，全部以火煅凿去。于是漕运畅通。

赏赉致仕武官 朱元璋念诸功臣多亡，幸其存者欲加恩赉，遂诏天下致仕武臣入朝。洪武二十九年(1396)九月二十日，应诏至京师达二千五百余人，朱元璋召见并赏赉。凡壬辰年(元至正十二年，1352)至甲辰年(至正二十四年，1364)从军，洪武十一年(1378)以前为官的，指挥使赏银一百两、钞二百锭；指挥同知银九十两、钞一百八十锭；指挥佥事银八十两、钞一百六十锭；正千户、仪卫正银七十两、钞一百四十锭；副千户、卫镇抚、仪卫副银六十两、钞一百二十锭；百户、所镇抚银五十两、钞一百锭。壬辰年至甲辰年从军，洪武十二年以后为官的，指挥使银九十两，钞一百八十锭；指挥同知银八十两、钞一百六十锭；指挥佥事银七十两、钞一百四十锭；正千户、仪卫正银六十两、钞一百二十锭；副千户、卫镇抚、仪副银五十两、钞一百锭；百户、所镇抚银四十两、钞八十锭。至正二十五年(1365)，以后从军，洪武十一年以前为官的，赏同。乙巳以后从军，洪武十二年以后为官的，指挥使银八十两、钞一百六十锭；以下至百户、所镇抚，银递减十两，钞递减二十锭。朱元璋还告谕道："元末兵争，中原鼎沸，人不自保。你们奋起从朕，效谋宣力，共平祸乱，勤劳备至。天下既定，论功行赏，使你们居官任事，子孙世袭，永享富贵。我思起兵时，与你们皆少壮。今我年老，你们亦年老。久不相见，心常想念，故召你们来见。所赐薄物，以资养老。你们还家，抚子孙以终天年。"又说："同历艰难，至有今日。顾我子孙保有无穷之天下，则你们子孙亦享无穷之爵禄。"诸将无不感激。朱元璋此举，是在大兴胡蓝之狱后，拢络诸致仕武臣之心、防其反侧的措施。

《通鉴博论》编成 朱元璋曾命宁王朱权仿编年及纲目书法体例编辑史事，洪武二十九年(1396)九月编成，名《通鉴博论》，共二卷。其书至正二十六年(1366)韩林儿事，则称"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此非宁王之书法，而是朱元璋之史法，系其特笔。

诸司奏事次第的确定 洪武二十九年(1396)十月初十日,朱元璋诏定各司奏事次第。礼部会议确定:凡奏事首为都督府,次十二卫,次通政使司,次刑部,次都察院,次监察御史,次断事官,次吏户礼兵工部,次应天府,次兵马指挥司,次钦天监。若太常司奏祀事则当在各司之先。每朝,朱元璋御奉天门,百官叩头毕,分班序立,仪礼司依次赞某衙门奏事,奏毕复入班。伺各司奏毕俱退。若朱元璋御殿,奏事官升殿以次奏毕先退,其不升殿者俱于中左、中右门外两廊伺侯,奏事官出则皆出。若于文华殿启事,则詹事府在先,其余衙门次第同前。凡晚朝,唯通政使司、六科给事中、守卫官奏事,其余各衙门有军情重事,方许奏闻,余皆不许。

高福兴起义 洪武三十年(1397)正月十二日,汉中府沔县吏高福兴及民人田九成、僧李普治率众起义。县教谕王璞告于汉中卫,卫遣兵捕普治。福兴、九成等率起义军入沔县后河及土门,集众至千余人,而陕蜀间番民先后响应。朝廷得知,即诏征西将军耿炳文及郭英发陕西、四川兵围剿。又敕秦王尚炳练士卒,缮甲兵,时刻巡罗,以备不测,警惕无怠。十四日,汉中卫发兵捕高福兴。兵驻阳平关的土门,起义军大集,号天王的何妙顺突出迎战,大败官兵,遂引众入略阳,焚县治,杀知县吕昌,执教谕吕诜,复烧徽州衙门,杀学正颜叔彬。耿炳文、郭英奉命分驻文县、沔县,遣陕西都指挥佥事吴旺将兵一万五千人,四川都指挥佥事俞琪将兵一万八千人等分道缉捕。至九月初一日,福兴奔突无所,遂被俘获。另有汪伯卫、陈妙贵、杨文皋、王师傅、刘普成等,英勇就义。仍留四川都指挥同知赵兴追捕田九成、陈二舍等。郭英还军陕西。不久,召还京师。与此同时,迁汉中卫所属右千户所于沔县屯守。

行太仆寺的设立 其初,太仆寺掌养马之政,各行省设群牧监隶其下。洪武十八年(1385)罢群牧监,以其马归有司牧养。朱元璋虑西北边卫所畜马甚蕃息,而禁防疏阔,于洪武三十年(1397)正月十四日,令在山西、北平、陕西、甘肃、辽东置行太仆寺,以掌马政。行太仆寺设少卿及丞,择致仕指挥、千户、百户充任。每寺设首领官一人,吏三人。

太常寺的改立 吴元年(1367)置太常司,设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典籍、协律郎、博士(正七品)、赞礼郎(从八品)。洪武初,置各祠祭署,设署令、署丞。洪武十三年(1380)更定协律郎等官员秩(协律郎正八品,赞礼郎正九品,司乐从九品)。洪武二十四年改各署令为奉祀,署丞为祀正。洪武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改太常司为太常寺,官制仍旧。建文中,增设赞礼郎二人,各祠祭署俱有更革。永乐初,惟易天坛为天地坛,余悉恢复洪武间旧制。太常掌祭祀礼乐之事,总其官属,籍其政令,以听于礼部。凡天神、地祇、人鬼、岁祭有常。国有册立、册封、冠婚、营缮、征讨、大丧诸典礼,岁时旱涝大灾变,则请告宗庙社稷等等。

光禄寺的改立 吴元年(1367)置宣徽院,设院使(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典簿(正七品),下隶尚食、尚醴二局,局设大使(从六品)、副使(从七品)。洪武元年(1368)改为光禄寺,设光禄卿(正四品)、少卿(正五品)、寺丞(正六品)、主簿(正八品),所属有尚食等局,又移太常司供需库隶其下。洪武二年设直长四人,遇百官赐食御前的,则令供事。洪武四年置法酒库(设内酒坊大使,从八品,副使从九品)。洪武八年改寺为司,升卿秩从三品,少卿从四品,以寺丞为司丞(从六品)、主簿为典簿(从七品)、增设录事(从八品),又置所属大官、珍羞、良醖、掌醢四署,署设司令一人(从六品)、丞一人(从七品)、监事一人(从八品),孳牧所,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未入流)。洪武十年定光禄司散官品秩。不久,罢各局库,置司牲司,又改孳牧所为司牧司(后为司牧局)。洪武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复改光禄司为光禄寺,官制仍旧(少卿已定正五品)。光禄寺卿掌祭享、宴劳、酒醴、膳羞之事,率少卿、寺丞属官,辨其名数,会其出入,量其丰约,以听于礼部。

鸿胪寺的改立 吴元年(1367)置侍仪司,秩从五品。洪武四年(1371)定侍仪使(从七品)、引进使(正八品)、奉班都知(正九品)及通赞、通事舍人(从九品)。俱为七品以下官。洪武九年改为殿庭仪礼司,设使一人(正七品)、副三人(正八品)、承奉一人(从八品)、鸣赞二人(正九品)、序班十六人(从九品);九关通事使一人(正八品)、副六人(从八品)。洪武十三年改使为司正,分左、右司副各一人,增序班至四十四人,革承奉,增设司仪四人。洪武二十二年增设左、右司丞四人(正九品)。洪武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改仪礼司为鸿胪寺,升秩正四品,设官六十二员:卿一员(正四品)、少卿二员(从五品)、丞二员(从六品)、主簿一员(从八品);属官司宾署丞一员(正九品)、司仪署丞一员(正九品)、鸣赞四员(从九品)、序班五十员(从九品)。鸿胪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

《为政要录》的颁布 洪武三十年(1397)正月,颁布《为政要录》。其书载文武官属体统及金书案牍次第、军士月给廪饩、宿卫之禁、屯田之政,共十三条。

朱元璋论民事 洪武三十年(1397)二月十六

日，朱元璋罢朝后坐在奉天门与群臣论民间事。他说：四民之业，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我一食一衣，则念稼穑机杼之勤。你们居有广厦，乘有肥马，衣有文绣，食有膏粱，当念民劳。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的。你们当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几食禄无愧。

朱元璋敕备边十事 洪武三十年(1397)四月初三日敕晋王、燕王备边十事：一、谨斥堠，广布置，务殚智虑，设法提防。二、须选人领精骑潜伏瞭望。三、设十路斥堠，候望消息。四、王所领大军，不宜久驻一处，应东南西北往来，以防不测。五、面谕机宜，约量程途。六、广开屯种。七、注意孳养战马。八、督都司军马，不容懈怠。九、束约有罪将校，立成队伍，悉心点视。十、检验军饷。后又分别敕谕晋、燕二王，告知备边战略和具体措施。

富民册籍的编制 朱元璋曾告谕户部尚书郁新、吏部侍郎张迪等："人有恒产，才有恒心。今天下富民生长田里之间，周知民事。其中岂无才能可用之人？你们应稽诸户籍奏报，我将选用。"于是，户部奉命而行。洪武三十年(1397)四月十一日，富民册籍编制完成呈报：云南、两广、四川不取，籍簿得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隶应天十八府，田地超过七顷的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一户，列其户名。朱元璋阅罢，命藏于印绶监，以次召至，量才录用。

武官从人额数的确定 朱元璋以武官多私役军卒，逾越法制，便命礼部考定其从人额数。洪武三十年(1397)四月十四日，礼部议奏：指挥使及同知六人，佥事及千百户、卫所镇抚四人，皆于正军伍内取用，轮番更直，每三日一易，下直则归队伍操练。凡卫所直厅六人，守门二人，守监四人，守库一人，只选老军充役，每月一更直。朱元璋认为正军占役太多，宜减其数：指挥使及佥事四人，千户以下三人，百户以下二人，每三日一更。余如所议，著为令。

赎罪事例的议定 洪武三十年(1397)五月初三日，朱元璋命六部、都察院等官议定赎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的记过，徒流迁徙的以俸赎罪，三犯治罪如律，杂犯死罪自备车牛运米输边，本身就彼为军。民有犯徒流迁徙的，发充递运水夫。凡运米赎罪的，甘肃车一辆、牛四头、米十石，山丹加一石，永昌加二石，西凉加三石，云南曲靖、普安如西凉之数。

《大明律诰》的刊布 朱元璋十分重视刑法的制定，吴元年(1367)即着手草创，洪武六年(1373)着手修订损益，洪武二十二年编成《大明律》颁布，而出于一时权宜，又颁《大诰》，率多峻令。后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大明律》，三十年五月编成，名《大明律诰》。朱元璋于五月初三日在奉天门告谕群臣："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既久；然而犯者犹重，故于听政之暇，作《大诰》示民间，使知趋吉避凶之道。古人谓刑为祥刑，岂非欲民并生于天地间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凡榜文禁令悉除之。除谋逆并《律诰》该载外，其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之例论断。今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无刑，庶称朕恤刑之意。"又谕皇太孙说："刑原于礼。此书首列《刑图》，次列《礼图》，意在重礼。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广大好生之德，总列名《例律》中。善用法之人，会其意即可。"宣太孙曾请更定五条，元璋采纳；接着又请"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为此乃命改定七十三条。元璋谕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你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即为此理。"

刘三吾科举案的始末 洪武三十年(1397)春，礼部会试，申考官是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及吉府纪善白信蹈等人。中式进士宋琮等五十一人皆为南方人，北方诸生无一人录取。落第诸生纷纷告状，诉说刘三吾是南方人，有意拔擢其乡人。朱元璋为之大怒，便命侍读张信及陈䢼等十二人复阅试卷奏报。其时又有人说：张信、陈䢼等人根据三吾的嘱咐，故意将低劣的试卷呈报陛下。朱元璋更加恼怒，将白蹈信、张信、陈䢼等论死；以三吾年老，与宋琮一同戍边。六月初一日，朱元璋命翰林儒臣于下第卷中择文理优长的得六十一人，复廷试。廷对中擢韩克忠等六十一人，克忠名第一，皆北方之士及陕西、四川之人，赐进士、出身有差。时称"春夏榜"，亦称"南北榜"。

杨靖赐死 杨靖(1360—1397)，字仲宁，直隶淮安人，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选庶吉士，授试户部右侍郎。次年迁户部左侍郎，颇受朱无璋信任。二十二年二月迁户部尚书。次年帛定京官三年皆迁调之制，遂改刑部尚书，忠公有智略，善理繁剧，治狱明察而不事深文。宠遇最厚，同僚不能比。二十六年正月兼太子宾客，并给二禄。不久，兼署礼部。坐事免官。会征龙州，诏杨靖谕安南输杰饷军。白衣而往。三十年四月起改左都御史未赴。时有乡人坐事系狱，家人击登闻鼓状诉，杨靖为其改诽谤草，增饰浮词，被御史弹劾。元璋念其才，留中不问。而御史弹劾不已。于七月初八日，朱元璋乃下诏赐死于家。年三十八。

朱元璋论人之过误　洪下三十年(1397)七月十七日,朱元璋与群臣论人之过误。他说:"凡人之所为,不能无过举,但当平其心则可以知其过。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缪,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缪戾,此物故意所为。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之子过虽微必张,小人之过虽大无形。大凡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人君若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辨别。"又说:"我纵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的,必多君子;其顺从人主之意,必是小人。以忤己而怒,以顺己而悦,致使小人得幸而君子被斥。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于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

申明学规教条　洪武三十年(1397)七月二十日,朱元璋千谕礼部臣说:"太学,育才之地。朝廷厚廪禄,广学舍,延致师儒,以教诸生,期于有成,为国家用。近者,师道不立,学规废弛,诸生惰业,至有不通文理、不精书算、不谙吏事。甚者抗拒师长、违越礼法。甚非育才教养之道。向者已令条陈学规,俾师生遵守。你们宜再加申明。"于是,礼部复颁学规教条于国监:各堂教官所以表仪诸生,必躬修理度,率先勤慎,勿惰训诲,使后学有所成就,斯为称职。诸生每三日一背书,日读《御制大诰》及本经四书各一百字,熟记文词,精解理义,或有疑难,则廉慕质问,务求明白。不许凌慢师长。若疑问未通,阙疑勿辨,升堂背书,必依班次序立以俟,不许逾越。每月作本经四书义各二道,诏诰、章表、策论、判语、内科二道。每日习仿书一幅,二百余字,以羲、献、智、永、欧、虞、颜、柳等帖为法,各专一家,必务端楷。旦暮升堂,必衣冠严整,步趋中节;坐堂必礼貌庄,恭勤诵读,不得脱巾解衣。往业别班会馔,必敬恭饮食,不得喧哗。朔望随班谒庙毕,方许与假出近处游访,不得放肆醉饮,颠倒街巷及与人争斗,有伤风教。一应事务,必先告本班教官,令堂长率领升堂,告于祭酒,可否行之。若有疾病无妻子者,养病房调治,每夜必在监宿歇。虽在诸司办事者,亦必回监,并不许群聚酣饮。遇有选人除授及差遣办事,从祭酒公选差遣,违者治罪。

停止诸王兴造擅役工匠　洪武三十年(1397)八月二十八日,朱元璋告谕工部臣,停止诸王兴造,擅役工匠。他说:天下人匠,编成班次赴工,各有定期。可是诸王府每有兴造,临斯之陕西省,趋此违彼,劳民动众,《春秋》所戒。方今诸王在国宫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礼安分,勿扰于民。我曾听说元时庐州太子为修宫室,令民冒雪运木,监司版图儿见其苦即释。又如威顺王在武昌,因怒小吏械系于市,廉方司官言此小事,王不必追究。威顺王即纳其言。此二王皆知礼奉法,听纳正言,因此能保其富贵。今诸王府宜各守定帛不得么有兴造,劳吉民匠。若有应须造作,而不可已之事,必先奏请方许动工。你们可移文各王府,使其知晓。

乡里木铎的建置　洪武三十年(1397)九月初二日,朱元璋命户部移文令天下民每乡里各置一木铎,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巡于道路,高喊"教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农种时月,清晨鸣鼓集众,鼓鸣皆会田所,及时力田。其怠惰者,由里老督责;若里老纵其怠情不加劝督,将予处罚。还令民凡遇婚姻死丧吉凶等事,一里之内,互相周给,不阴贫富,随其力予以资助。以便使人相互亲爱,风俗淳厚。

罢辽东海运开展军屯　辽东都司军士粮饷,多由海运食 粮供给,虽有部分卫所开展屯田,每军五十亩,收租十五石,但远不能满足需要。洪武二十年(1387)闰六月,令纳哈出降附士卒,编辑为伍,屯田种作。次年三月,令都指挥使叶旺充军府,抚辑军民,垦田万余顷。二十七年六月,朱元璋命定辽等二十一卫军士,自明年起,屯田自食以纾海运之劳。九月,令辽王储校尉、军士屯田自给,十年后始收其租。自此以后辽东军屯才逐步展开。至三十年十月初十日,朱元璋告谕户部臣说:辽东海运辖年不绝,近闻彼处军饷,颇有盈余,今后不须转运。只令本处军人屯田自给。

张龙逝世　张龙(? —1397),直隶凤阳人。初从朱元璋渡江,定常州、宁国、婺州皆有功。从征江州,为都先锋。平武昌,授花枪所千户。后进攻通州,击斩贼将,擢威武卫指挥佥事。从平山东、河南。大军克潼关,张龙奉命为副留守镇守其地。洪武三年(1370)调守凤翔。徐达入沔州,张龙别将一军,由凤翔入辖支栈攻兴元,降守将利恩忠,屡次击却来犯之敌,台佥大都督府事。十一年又从李文忠征洮州,论功封凤翔侯,二十年从冯胜征纳哈出,大胜而还。多次奉命督理屯田于平越、镇远。后以老疾请告归里。三十年十二月卒。

朱棡逝世　朱棡(? —1398),朱元璋第三子。学文于宋濂,学书于杜环。洪武三年(1370)封晋王,十一年就藩于太原。中道笞膳夫,元璋驰谕切责。朱棡修目美髯,顾盼有威,且多智数。但性骄纵,在藩国多不法。有人告发其有异谋,元璋大怒,欲加以罪,太子力救得免。二十四年太子巡陕西还京,朱棡相随来朝,元璋敕其归藩。自此折节,待官属皆有礼,

以恭慎闻。此时，元璋念边防的防御，又想让诸子练习兵事，诸王皆预军务。而朱㭎、朱棣，尤被重寄，屡次命率兵出塞及筑城屯田，大将如冯胜、傅友德皆受节制。又诏二王军中事大方奏闻。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卒，谥恭，限葬地八百亩。子定王济熺嗣。

朱允炆即皇帝位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初十日，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他在即位诏中说：夙夜祗惧，思所以克相上帝，以无忝皇祖之大命，永为宽猛之谊，诞布维新之政。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德维善政，政在养民，当遵先圣之言，斯致雍照之盛，百弼卿士，体朕之怀。

朱元璋逝世 朱元璋(1328—1398)，即明太祖，明朝开国皇帝。幼名重八，又名兴宗，字国瑞。直隶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东)人。自幼贫寒，无以为食，受雇于人，又出家为僧。元至十二年(1352)投入红巾军郭子兴部，以其精明和处事果敢受到郭子兴的信任，亲自到故乡募兵，率军略定远，下滁州，克河州。历任九夫长、总管。郭子兴死，带领其众，任右副元师。再率军渡江，攻克集庆，改为应天府，遂称吴国公。以应天为据点，四处出击，收复地盘；招聘儒士刘基、宋濂等，罗致左右，建职设官。又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巩固和扩大实力。先后消灭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沉杀小明王韩林儿。吴元年(1367)秋，朱元璋实施南征北伐的战略，进展顺利。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军事战争的节节胜利声中，即皇帝位，国号明，建元洪武，定都南京。同年八月，徐达等率师攻克元大都，推翻元朝统治。其后降方国珍、陈友定，平定两广，略定秦晋，平夏平滇，再出兵东北，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与此同时，建立的健全各种政治设施，尤其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采取了种种措施：奖励开垦，移民垦种，均平赋役，兴修水利，轻税便商，改革工匠制度等。还制定"剥皮束草"的酷刑，严惩贪污。后制造胡惟庸案，趁机罢中书省，罢丞相不设，政归六部，集权于皇帝，使封建中央集权更加集中和强化。朱元璋以猛治国，为其统治计而制造血案，使许多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惨遭杀害，以致贤佞不分，善恶不辨。尤其是锦衣卫和廷杖的建立和实施，遗害无穷。然而，朱元璋仍不失为封建社会里有作为的帝王和政治家。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日瘗，在位三十一年，年七十一，同月十六日葬于孝陵，谥高皇帝，庙号太祖。

保举法的制定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十九日，朱允炆命定保举法，令中外五品以上文臣及县令，各举贤才，勿问下僚布衣，唯贤是举。但同时规定，若所举非人，将与之辖坐。

削藩政策的制定 早在朱允炆为皇太孙时，就对诸皇叔手中的权力感到忧虑。他曾在东角门对伴读老师黄子澄说：皇叔们身为藩王，手中握有重兵，又多行不法，照此发展下去，将如何对付？子澄回答说：藩王只有护卫兵，仅可自守。万一有变，临以六师，即可歼灭。象汉代吴楚七国，虽然强大，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大小、强弱、逆顺不同的缘故。允炆对子澄据古论的书生之见十分满意，并表示：果若如此，我就放心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即皇帝位仅两个月的朱允炆，就急迫地问官至太常寺卿的黄子澄：先生不记得东角门的谈话么；子澄以"不敢忘"相答。于是与兵部尚书齐泰等一起议定削藩之策。齐泰认为，应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先解除威胁最大的燕王朱棣的权力。而子澄则认为，燕王久居北平，统有重兵，轻易废除，颇有风险，不如先从周王橚下手。理由是周王在洪武时就多行不法，削之有名；加上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废黜周王，也是剪除燕王羽翼之举，可收一箭双雕之效。朱允炆点头称是，准备付诸实施。七月十二日，恰遇周府汝南王有人告父橚及世子有燉谋反，由李景隆前往勘讯，大索金宝，周王不能应付，遂坐罪执至京师。允炆令诸王议其罪，燕王请宽宥，允炆欲止。齐泰、子澄说：此正是削其权的良机，若不治罪，是妇人之仁。允炆即废周王为庶人，徙云南蒙化。接着征齐王榑至京软禁，又幽代王子在同；诏逮湘王柏，其惧而自杀；废岷王楩，徙彰州。削藩政策实施得较为顺利，燕王演化感威胁。然而，当允炆经过一番准备，着手削夺燕王权力时，遂招致朱棣"靖难"师起，展开了宗室内部的皇位争夺战。不仅使允炆的削藩计划受阻，未达目的，而且被他的皇叔朱棣以此为导火线，把他赶下了皇帝的宝座。这一历史的插曲，留给人们的只是对建文帝的同情和对"削藩"政策的抽象肯定。

卓敬建言徙封燕王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户部侍郎卓敬秘密上疏朱允炆，建言：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徊，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又系金、元兴起之地。今宜徙封燕王于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右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疏入的第二天，允炆召问卓敬："燕王，朕骨肉至亲，你怎么能如此建言！"卓敬叩头说：我所陈奏建言，系天下至计，愿陛下明察而行。"仁厚柔弱的允炆竟对卓敬建言留中不报。

裁汰冗员省并州县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朱允炆命吏部议裁汰冗员，省并州县。据《革除

编年》载，裁汰都察院司狱四人，省左右给事中，裁天下阴阳、医学；革建昌府盱江递运所，南城县蓝田巡检司。又革凤阳、开封、怀庆、平阳等府属递运所，共数十处。省左右布政司使一员，革五府者督府断事官，革夔卅大昌县，省卫辉府胙城县训导二员，省永州府江华县县丞、主簿各一员，革各府照磨所、检校、司狱，省广州府连山县，以其地入连州等。《宪章录》载：革略阳县，革南丹卫附怀庆，省兴济县入青县，省翁源县入英德，省保昌县，省忻城县入东兰，省沔县入褒城，省两当县入徽州省恭城县。

沐春逝世 沐春(1363—1398)，字景春，直隶凤阳人，沐英子。才武有父风。年十七，随父征西番，又从征云南，从平江西寇，皆奋勇当先，积功实授后军都督府佥事。洪武二十五年(1392)六月，袭父西平侯爵，镇守云南，先后征讨维摩十一寨、越隽阿资、宁远刀拜烂。沐春在镇七年，大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凿铁池河，灌宜良调田数万亩，民复业的五千余户。三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卒，年三十六，谥襄惠。弟沐晟嗣。

高巍上书议削藩 削藩之方初起，高巍不以为然，遂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十月上书。他说："高皇帝分封诸王，比之古制，既皆过当，诸子又率不法，违犯朝制，不削则朝廷纪纲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说'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省其力'。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不削之削也。臣又愿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人馈问，贤者下诏褒赏，不法诸王，初犯宽容，再犯赦免，三犯不悛，则告太庙废黜。如此处置，岂有不顺服者！"书奏，朱允炆只是称其言之有理而不能用。

葛诚还燕 建文元年(1399)正月，燕王朱棣遣长史葛诚入朝奏事。建文帝朱允炆召见葛诚密问燕府诸事，葛诚具实以对。允炆遂让葛诚北还归燕，使为内应。燕王佯狂称疾，被建文帝派往北平(今北京)监视燕王动静的左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到王府察探虚实，竟信以为真。葛诚则暗地警告张昺、谢贵说：燕王本安然无恙，望二公勿懈怠。同时密疏建文帝实情。于是，允炆密令张昺、谢贵谋取燕王，葛诚与护卫指挥卢振约为内应。后因张信降燕而事败，葛诚、卢振俱遭杀戮，并罹夷族之祸。

敕修《太祖实录》 建文元年(1399)正月，建文帝朱允炆诏令修撰《太祖实录》。以礼部侍郎董伦、翰林学士王景为总裁官，太常少卿廖升、翰林侍讲高逊志为副总裁官，召国子博士王绅、汉中府教授胡子昭、崇仁县训导罗恢、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程本立和新征教授杨士奇等为纂修官。同时，任命侍讲学士方孝孺总其事。三年十二月，《太祖实录》修成。后因成祖两次重修，此书不可得见。

追尊册封 建文元年(1399)二月，追尊故懿文皇太子朱标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太子妃常氏为孝康皇后；尊母妃吕氏为皇太后。册立妃马氏为皇后，皇长子文奎为皇太子。并封皇弟朱允熥为吴王，朱允熞为衡王，朱允熙为徐王。马皇后(？—1402)，建文皇帝朱允炆之元配夫人，光禄少卿马全(一作马杲)女。据史书称，其性警敏，识大体。洪武二十五年(1392)被册为皇太孙妃，建文元年二月册为皇后，建文四年六月，燕师攻陷都城，宫中火起，马氏自焚而死。

更定官制 建文元年(1399)二月，建文帝采纳学士方孝孺之议，更定官制：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列侍郎以上。改都察院为御史府，都御史为御史大夫。罢十二道为左、右两院，左为拾遗，右为补阙。改通政使司为寺，大理寺为司。詹事府增置资德院。翰林院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设文翰、文史二馆，文翰以居侍读、侍讲，文史以居修撰、编修、检讨。殿、阁大学士并去"大"字，各设学士一人。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增设正心殿学士一人。其余内外、大小诸司及品级、阶勋，悉仿《周礼》制度更定。方孝孺醉心复古，时论以为不急之务。

卓敬建言徙燕王藩地 建文元年(1399)二月二十九日，户部左侍郎卓敬密疏朝廷，称燕王朱棣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似洪武高皇帝。而北平又是形胜之地，士马精强，金、元二朝由是而兴。当今之计宜徙封燕王于南昌，羽翼既经剪除，祸变无从所生；万一有变，亦易控制。此即所谓"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朱允炆看过奏书，第二天就召问卓敬。卓敬叩首跪言：臣下所奏乃天下至计，愿陛下明察；燕王虽为陛下至亲，然帝王之孝，在保安社稷，至亲一节可置而不论。建文帝默然良久，徙封之议终未采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卓敬的"徙封"之策，后来却被朱棣付诸实施了。

削夺诸藩 朱元璋为了维护朱家皇朝的长远统治，"广磐石之安，眷亲支之厚"，先后分封诸皇子和从孙到全国各地做藩王，以便"夹辅王室。"到了洪武末年，所封诸王渐多骄横不法，他们大兴土木，罗致财宝，侵吞民田，蓄养兵卒，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尤被重寄，不惟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大将受其节制，并且朱元璋还诏谕二王"军中事大者方以

闻”。由此显见，藩王无疑对中央集权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早在建文帝朱允炆为皇太孙的时候，就已感到各拥重兵的诸叔多有不逊的危迫，即皇帝位后，他便起用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一同谋划削藩之策。齐泰认为既然削藩，必先从燕王下手，因为燕王居诸强藩之首，一旦翦除其势力，其余诸藩王自然无力抗衡朝廷。黄子澄则不以为然，他主张率先削夺周、齐、湘、代、岷诸藩王，尤其应以周王首当其冲，因为周王朱橚为燕王朱棣同母兄弟，削夺周王等于翦除燕王手足。最后，朱允炆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于是，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间，朱允炆密命曹国公李景隆假装北上备边，兵临开封时，突袭周王府，将朱橚执逮至京师，并谪遣到云南蒙化。不久，又将其召归京师，禁锢于高墙之中。又于建文元年(1399)二月，诏令诸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四月，湘王朱柏被人出首告变，无法自明，阖宫自焚而死。代王朱桂也被削废为庶人，并幽禁于大同；齐王朱榑被废为庶人后，囚闭于京师。六月，废岷王朱楩为庶人，流徙至漳州。迨至七月，燕王朱棣起“靖难”之兵，削藩不了了之。建文削藩集权，是符合明初政治潮流的。但置强藩燕王于不顾，却一味削夺势单力薄的周、代、湘、齐、岷诸藩王，似有喧宾夺主之嫌。兼之，燕王朱棣不失时机地多次为诸藩伸诉求情，取得了诸藩王的信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他举兵夺位的后顾之忧。与此相反，建文朝廷则削弱了诸藩王的向心力，以至酿成祸乱。

朱允炆调兵备燕 建文帝在削藩的同时，即于北平周围积极部署兵力，准备伺机袭燕。朱允炆向齐泰询及图燕之策，齐泰胸有成竹地答称：如今北边有寇警，以防边为名，遣将戍开平(今内蒙多伦附近)，悉征调燕藩护卫兵出塞，去其羽翼，燕不难图。于是，命都督宋忠率兵三万及燕府护卫精锐屯守开平，都督耿瓛练兵于山海关，徐凯练兵于临清(今山东临清)，又调北平、永清(今河北永清)二卫军到彰德(今河南安阳)、顺德(今河北邢台)。并以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左布政使、谢贵为都指挥使，驻在北平城内监视燕王朱棣的行动。

遣采访使巡行天下 建文元年(1399)三月，朱允炆诏遣刑部尚书暴昭、户部侍郎夏原吉、给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分巡天下，问民疾苦，考察官吏，旌廉斥贪，得以便宜行事。

燕王三子还北平 明太祖朱元璋逝世时，诸王世子及郡主都在京师，遗命居丧三年后才能遣还藩国。燕王的三个儿子即世子朱高炽、二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等也同在京师。燕王蓄谋反叛，唯恐朝廷将其子留为人质。于是藉口病笃，上书请求朝廷准许三个儿子归府探视。朱允炆看见朱棣乞子归藩的上书，心存狐疑，便召来齐泰、黄子澄商议去留对策。不料齐、黄二人意见殊异：齐泰力主收逮燕王三子为人质，用以牵制燕王的举动；黄子澄却不以为然，认为收其三子，等于授柄朱棣，成为他起兵发难的口实，不如听任其归，以示对燕王信任不猜，这样方可乘其懈怠不备而袭取。朱允炆闻言，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同意放归朱棣的三个儿子。魏国公徐辉祖是开国元老徐达长子，他的姐姐是燕王妃，作为朱棣的姑舅之亲，深谙燕王早有不臣之心。因此，他获知消息后，坚决反对遣归朱高炽兄弟。并密奏朱允炆说：我这三个外甥之中，朱高煦尤为勇悍无赖，不忠不孝，如果放其北还，日后必为大患。向来仁柔寡断的建文帝听了徐辉祖的劝告，举棋不定，又先后征询徐增寿和怀庆公主驸马王宁的意见，他们则极力袒护燕王诸子，朱允炆遂下定决心放还燕王三子归藩北平。燕王朱棣看到三子生还得以团圆，不禁大喜，更加坚定了他反叛朝廷的信心。

燕王佯狂称疾 建文削藩之初，燕王朱棣即在僧道衍(姚广孝)的策划下密谋举兵。他们暗中选拔将校，勾置兵卒，招纳材勇异能之士。燕王府宅院深幽，道衍率领卫士在后苑操练演习，日夜铸造兵器。为了掩人耳目，在王府深挖地穴，广造重屋，高筑厚壁，并故意蓄养大群鹅鸭，以其鸣叫之声乱杂赶制军械的噪音。建文元年(1399)三月，北平按察司佥事汤宗向朝廷告发新任按察使陈瑛和右布政使曹昱、副使张琏等人接受燕府贿金一事，朱允炆立即下诏将陈瑛逮至京师，不久被谪官广西。六月间，燕王护卫百户倪谅上变，告发燕府官校于谅、周铎等人参预密谋反叛，结果于谅、周铎被逮赴京师处死，朱允炆并下诏责斥燕王图谋不轨。朱棣见情势十分危急，索性佯狂称疾。他一忽儿在街市上狂呼奔走，夺人酒食；一忽儿仆卧于地，整日不醒。当北平左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前往燕府察视时，正值盛夏时节，燕王朱棣却拥坐火炉，颤声念叨着“寒甚”。张昺、谢贵见状，信而不疑。燕府长史葛诚私下警告张、谢二人说：燕王根本无病，千万不可轻信。同时，葛诚密疏朝廷，勿为燕王的假象所迷惑。此时，正赶上燕王护卫百户邓庸入朝奏事，经过一番威逼审讯，邓庸供出了燕王将举兵的实情。齐泰随机发符往逮燕府官属，密令谢贵、张昺准备动手。七月初一日，又密敕原本为朱棣所信任的北平都指挥使张信伺机逮捕燕王朱棣。不料张信阳奉阴违，匆匆赶赴燕府把朝廷密敕和盘告诉朱棣。朱棣感激涕零，对张信下拜说：是将军

保全了我一家性命！事不宜迟，朱棣立刻召来僧道衍等人，急商起兵之计。命令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率勇士八百人进驻燕府，执行守卫任务。一场殊死的搏斗迫在眉睫。

“靖难”之变 张昺、谢贵奉朝廷密令调集卫卒入城，积极加强防务，同时飞章奏报请旨。朱允炆得报后，火速派内使持诏书赴北平，令逮燕王府官属。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六日，北平布政使司吏李友直窃取张昺等人的密件，奔入燕府告密。朱棣看到李友直提供的情报，不由大吃一惊。当时北平满城都是谢贵所帅军士，而朱棣王府护卫的精锐兵卒早被调到开平。朱棣自虑寡不敌众，忙与僧道衍、张玉、朱能商讨对策。朱能说：只须先擒杀统兵将领张昺、谢贵二人，其余敌众再多，也无能为力。道衍献计：如今朝廷既遣内使逮捕王府官属，我们不妨将计就计，把王府官属开具名单交付内使，让他召张、谢二人入府逮人。待其来到燕王府第，只消一人之力，便可擒杀。于是，朱棣依计而行，御坐东殿，潜伏壮士于端礼门内，伺机而发。张昺、谢贵被诱骗至王府，燕王赐宴行酒。侍从端上西瓜助酒，燕王突然厉声喝道：天下百姓、兄弟宗族之间，尚能互相体恤，而我身为天子亲属，却不能保全旦夕之命，时至今日，天下何事不可为呢！朱棣边骂边以瓜掷地，霎时伏兵应声四起，张昺、谢贵束手就擒。连同约为内应的葛诚、卢振等人全被捉捽于殿下。朱棣抛开手杖，起身狞笑道：我朱棣哪里有病，只是为你们这些奸臣贼子逼迫而为之罢了！此时，谢贵诸人方知中计，可惜为时已晚，皆成刀下冤鬼。是日入夜，整个北平陷入刀光剑影之中。朱棣命张玉、朱能等率兵乘夜冲杀出王府，经过一夜激烈交战，至次日黎明时分，北平守军四处溃走，九座城门尽数攻克，燕王朱棣从而控制了北平全城。七月初七日(又有初五、初六日之说)，朱棣聚集将士隆重誓师。他慷慨激昂地宣誓：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受封以来，惟知循法守分。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回，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绪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迫及身，实欲求死。不得已者，义与奸邪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照鉴予心！就在誓师的当儿，天色骤变，黑云压城，顷刻之间，狂风急雨自天而降，燕府房屋上的檐瓦也被掀落于地。朱棣和众将士面面相觑，惊恐万状。这时候，立在旁边的僧道衍镇定自若，走上台前大声说道：真是祥瑞之兆啊！飞龙在天，从以风雨；殿瓦坠地，预示着大王您将易黄瓦覆殿了！明朝制度只有皇帝的宫殿才能使用黄瓦。这突如其来的风雨变故，经过道衍和尚自欺欺人的巧妙阐释，竟然稳住了军心，保证了誓师起兵的成功。

朱棣为了寻求师出有名，不违祖训，同时上书以讨伐齐泰、黄子澄，清君侧之恶，扶国家之既坏为名，堂而皇之地称自己的举动是“奉天靖难”。从此揭开了朱明王朝历史上长达四年的“靖难”战争的序幕。

怀来之战 朱棣移师通州(今北京通县)之后，采纳了张玉的建议，一改即刻挥戈南下的计划，决定趁建文朝廷的北伐之师未抵以前，首先清除来自北平周围的威胁。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八日，朱能率师东取蓟州(今河北蓟县)，守将马宣被俘，不屈而死，指挥毛遂投诚，随之遵化、密云也举城归附。七月十一日，朱棣命部将袭取居庸关，守将俞瑱兵败退附于怀来(今河北怀来)的宋忠部。宋忠是被朱允炆派往北边防燕的将领，起先率兵三万及征调的燕藩护卫精兵屯守开平(今内蒙多伦附近)，朱棣在北平起兵后，宋忠率众部将士经居庸关移师怀来，成为北平的心腹大患。鉴于宋忠兵多势众，燕军将领在商讨对付宋忠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或主张出奇制胜，或主张固守以待。朱棣认为，敌强我弱，论力虽不足，智胜则有余。怀来守军是新集之众，军心涣散不一，而宋忠本人刚愎少谋，若智攻必能获胜。七月十五日，朱棣亲率马云、徐祥等马步精锐八千，卷甲倍道开赴怀来。当朱棣得知宋忠欺骗军中的燕府护卫将士，讲他们留在北平的家属全部被朱棣所杀害的消息后，次日，朱棣以被宋忠征选的燕府护卫将士的家属为先锋，高举旧日的旗帜，向怀来发起进攻。当怀来守军临阵看到熟悉的旗帜，认出自己的父兄子弟时，惊喜异常，相互问候之声，震耳欲聋，随着“宋都督欺诳我们”的呼喊，守军将士纷纷解甲倒戈。宋忠仓皇列阵未成，朱棣却乘机挥师渡河，守将都指挥彭聚、孙泰力拒阵亡。宋忠见势不妙，狼狈回逃入城，燕军也尾随其后蜂拥进城。宋忠从藏匿的厕所中被燕军活捉。宋忠部将除去指挥庄得的一队人马及时突围逃脱外，其余众将士来不及溃散的被歼杀殆尽。由朝廷派往北平周围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为之消灭。怀来之役是朱棣起事后第一场大会战，燕师以少胜多，大获全胜，从而基本扫平了北平的围兵。

耿炳文率师北征 建文帝朱允炆锐意文治，日与方孝孺讨论《周官》法度，军事皆取决于齐泰、黄子澄。直到怀来被燕师攻陷的第九天，谷王朱橞从宣府(今河北宣化)奔还京师时，朱允炆才慌忙召集廷臣商讨对策。议决削除燕王属籍，公布其叛朝罪行于天下，同时命将北征。由方孝孺起草的燕王“称兵

构乱，图危宗社，获罪天地祖宗，义不容赦”的伐燕诏令布告天下。由于朱元璋在世时大肆杀戮功臣，朱允炆感到无将可使，最后只好起用侥幸存活的老将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督宁忠为副将军。并飞檄调发各处军马，率师分兵并进北伐。被征调的有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佥事耿瓛、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友、李晖、平安等部。耿炳文等将士临行前，朱允炆告诫说：你们和燕王对垒作战，毋使朕有杀叔父之名。

建文元年(1399)七月二十四日，以耿炳文为主将的朝廷北伐之师约十三万人向真定(今河北正定)进发。同时，朝廷的平燕布政使司也设置于真定。真定成了朝廷伐燕的前卫阵地。

真定之战 建文元年(1399)八月十二日耿炳文抵达真定，率师驻扎在城南的滹沱河两岸，分遣徐凯带兵进驻河间，潘忠扎营于鄚州(今河北白洋淀、五官淀之间)、杨松率领先锋九千人扼守雄县。朱棣听取张玉的汇报，于八月中秋之夜袭取了雄县，九千先锋将士全军覆没，接着鄚州守军开城投降。八月二十四日，首战告捷的燕军进至与真定数十里之隔的无极。朱棣召集诸将领商议对耿炳文的作战方略，张玉力排众议，认为敌军虽多，而以我乘胜之师直趋真定，一鼓作气攻打新集之敌，是一定能够克敌致胜的。张玉的主张得到朱棣和众将的赞同。

耿炳文是身经百战的明元勋宿将。他把真定驻军一分为二，夹河为营，目的在于互相声援。朱棣面对这位用兵审慎的老将，决定采取“先声后实”对策。他放归在鄚州降附的耿炳文部将张保，让他假装被俘得脱，向耿将军具陈雄县、鄚州败状，燕兵旦夕可至。耿炳文闻听此言，急命滹沱河南岸之师北渡过河，合军防御燕军的进攻。八月二十五日，燕军直抵真定，朱棣从俘兵口中了解到城东南未曾设营，疏于防守，于是率数千精骑自城东南绕至西南，一举攻破两座营垒，守军顿时乱作一团。耿炳文出城迎战，燕将张玉、谭渊、朱能等率众奋击。南师北调的守军立足未稳，仓促应战，朱棣率精骑从阵后冲杀而来，横透敌阵。年过花甲的耿炳文遭到燕师凶猛的奇袭，无心恋战，且退且拒，入城固守。左副将军驸马都尉李坚见主帅耿炳文败下阵来，准备挥戈再战，却被燕军骑卒薛六挺槊刺中，坠马俘获。其他如右副将军宁忠、左军都督顾成、都指挥刘遂等也同被燕军生擒。耿炳文初战失利，拥众退保真定，闭门坚守不出。真定本为朝廷北伐的前卫阵地，兵众粮足，耿炳文长于攻守战术，朱棣攻城三日不下，便鸣金收兵。驸马都尉李坚因伤重不治，死于北归途中；左军都督顾成被朱棣劝降，班师北平后，辅佐燕世子朱高炽居守。

燕王诱拘宁王 建文元年(1399)李景隆挂帅驻兵河间的谍报传来，朱棣付之一笑：李九江(景隆小字)未尝习兵，色厉内荏，如今授之五十万众，无异于自坑，只是纸上谈兵的赵括罢了。但是，朱棣所面临的毕竟是数十万大军，深感自己的兵力不足以出师迎战。于是，他经过缜密筹划，命令姚广孝辅佐世子朱高炽居守北平，自己亲率主力军队游动于外随机应变，在牵制对手的同时，设计取得大宁的强大军马。大宁地处塞外，为宁王朱权所封地，其属下的朵颜诸卫，多为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朱棣早有据为己有之心，却苦于时机不成熟。朱棣起兵北平之初，朱允炆就恐怕宁、燕合兵，于建文元年(1399)八月诏令削夺宁府三护卫。朱棣认为这正是袭取大宁的绝好机会。他于九月二十八日假装援师永平(今河北卢龙)之名，率军取道刘家口，绕过松亭关，直奔大宁。十月六日抵达大宁城下。燕王朱棣以单骑入城，兄弟相见，失声恸哭。朱棣直言穷蹙求援，宁王朱权应允大宁军马附从燕军“靖难”。燕军将士依照朱棣的吩咐，一部分潜伏城外，一部分悄悄入城，私下与大宁三卫部长及戍卒攀交往来，相谋起事。十月十三日，朱棣伪称辞行，宁王朱权设宴饯行于郊外，仪式尚未结束，四周突起伏兵，朵颜三卫骑兵和大宁卫军一呼毕集，拥宁王朱权同行。尚蒙在鼓里的大宁守将朱鉴猝不及防，力战而死，宁府长史石撰不屈被杀。十月十六日，朱棣满怀胜利的喜悦，在宁王朱权及其妻儿的伴行下，率领燕、宁兵马回师南还。

燕立五军 建文元年(1399)十月十九日，朱棣自大宁还师北平的途中，在会州(今河北承德市东北)对燕、宁兵马进行了一次整编，正式设立中、左、右、前、后五军：中军由张玉任主将，郑亨、何寿为副将；左军由朱能任主将，朱荣、李浚为副将；右军由李彬任主将，徐理、孟善为副将；前军由徐忠任主将，陈文、吴达为副将；后军由房宽任主将，和允中、毛整为副将。其中，后军主将房宽、右军副将徐理、前军副将陈文三人为大宁降将。很显然，这支以燕军将领为主体，以大宁降将为补充的正规组编军队，较之袭取大宁前的燕军是大大强化了，为燕师南下奠定了基础。

郑村坝之战 李景隆得知燕王朱棣率师救援永平后，就统帅数十万大军渡过卢沟桥，直抵北平城下。他指挥将士筑垒于北平九门，昼夜发起猛攻，却未能攻克，遂屯兵于坚城之外，归结九营于北平至通州之间的郑村坝，以待朱棣回师。直到建文元年(1399)十一月五日，姗姗迟归的燕军履冰越过白河，首先击溃了李景隆的前哨之师都督陈晖率领的万余

骑兵，然后指挥全军向郑村坝进发，李景隆严阵迎战。由于李景隆已经失去了陈晖的骑兵主力，在勇悍的朵颜三卫骑兵面前一筹莫展。朱棣一马当先，率众将士连破七个营垒，直逼李景隆麾下，中军大将张玉乘胜进抵北平城下。此时，居守北平的燕军也鼓噪出战，李景隆腹背受敌，溃不成军。激战从午时开始，直至傍晚时分，双方才各自收军回营。深冬之夜，天寒地冻，李景隆冻馁难支，扔下正在围攻北平九门的各部将士，乘夜拔营南逃。次日，燕军与围攻九门的朝廷北伐之师再度展开激战。两天后，忠于朝廷的将士在内外夹攻之下，终于被迫解围奔去。十一月九日，朱棣重新回到北平城中。

燕王设计陷吴高　建文元年(1399)十二月，燕王朱棣为了消解永平兵患，对诸位将士说：镇守辽东的吴高和杨文，吴高一向胆怯而谋事周密，杨文却勇而无谋，如果翦除吴高，杨文则无能为患了。于是，燕王遣人向吴高、杨文送上两封书信，信中盛赞吴高深谋远虑，极力诋毁杨文苟且无能，并故意易函误送。二人得书后，各自上奏朝廷，朝廷怀疑吴高有异谋，遂下令削夺吴高江阴侯爵，谪徙广西。杨文一人独守辽东，最后以败告终。

李景隆兵败加官进爵　李景隆北平战败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至京师，黄子澄等人密不奏闻。一天，朱允炆问及黄子澄：外面近传李景隆丧师不利，是这样吗？黄子澄隐瞒战败实情，谎称：听说李景隆取得数次交战的胜利。如今，正值严冬，士卒不堪其苦，暂时退兵德州，以待来春再战。为了防止实情败露，黄子澄遣人密告李景隆，隐匿败绩，勿为上奏。建文元年(1399)十二月，建文帝下令嘉奖北伐之师，加李景隆太子太师，并赐给金币貂裘等物。

安南黎季犛弑主自立　建文元年(1399)，安南国相黎季犛杀其主陈日焜，拥立自己的长子颙为王，不久，黎季犛杀子颙，立幼子䅔，因其年幼而诛杀，自立称王。自谓舜裔胡公满之后，遂更姓名为胡一元，其子黎苍更名为胡奃，国号大虞，年号元圣。不久，自称太上皇，其子胡奃为大虞皇帝。永乐元年(1403)，胡奃自署权理安南国事，遣使奉表朝贡，明成祖朱棣命封为安南国王。

元额勒伯克汗被杀　元朝政权溃灭后，大量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仍留居中原，而一部分蒙古贵族则败退到蒙古草原及东北等地，继续统治着当地的蒙汉各族人民，经过朱元璋多次调兵遣将的攻打，其统治内部也不断发生混战。建文元年(1399)，北元额勒伯克汗为部下所杀，坤帖木儿被立为王。建文四年(1402)，坤帖木儿政权又为其部帅鬼力赤篡夺，鬼力赤自封可汗，废去元朝国号，遂称鞑靼。

朝鲜国王李曔继位　建文元年(1399)正月，朝鲜国王李旦上表建文朝廷，称其年老多病，王位由次子李曔继承。四月二十五日，建文朝廷降旨准其奏请。六月二十六日，礼部尚书陈迪等官于奉天门钦奉圣旨：已先太祖皇帝(朱元璋)诏谕本国仪从本俗，法守旧章，听其自为声教，今后彼国事务，亦听自为。李曔在位两年(1399—1400)，以风疾让位其弟李芳远(李旦第五子)。

白沟河大战　建文元年(1399)末至次年的三月，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双方厉兵秣马，伺机再战。建文二年(1400)四月初一日，李景隆率军自德州北进，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等自真定出兵，约定会师于白沟河。十八日，李景隆兵至河间，遣先锋参将平安至白沟河；郭英、吴杰等移师保定，合军六十万，号称百万。燕王朱棣从四月初五日率师出北平南下，二十日，燕军渡过玉马河，驻营于苏家桥。二十四日中午，燕军渡至白沟河东岸，遭到都督平安的万余伏骑的迎战。平安素称骁勇，奋戈直前；都督瞿能父子率众陷阵冲荡，所向披靡。燕军惊慌失措，连连退却。这时，燕府内侍狗儿、千户华聚、百户谷允等人见势危急，挺身力战，斩首七级，才算顶住了凶猛的攻势。朱棣趁机率部分骑兵绕至平安的背后发起攻击，平安的先锋骑师在燕军的夹攻下溃败了。正当朱棣率领以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丘福将步骑为后继的十余万众继续前进时，李景隆、胡观、郭英、吴杰的六十万大军冲杀上来。双方数十万将士厮杀在一起，难解难分。朱棣曾试图利用骑兵的优势攻陷敌阵，不料，郭英等早已在阵前预藏了大批“一窝蜂”、“揣马舟”之类专门用来对付骑兵冲阵的火器。待燕骑冲至阵前时，火器齐鸣，燕师猝不及防，纷纷落马而死。激战直到夜阑更深，才逐渐平息下来。朱棣在拼杀中迷失了道路，他和剩余的三骑靠河流辨别东西方向，勉强返抵大营。次日清晨，十万燕军渡河准备决以死战，李景隆横阵数十里以待。燕后军房宽首战不利，死伤惨重；平安英勇冲阵，把燕军的先锋大将陈亨刺落下马。朱棣身先士卒，亲冒矢石冲杀在前，他的坐骑三次受创，三次易马再战。后来，朱棣率领一队燕骑被逼到河堤下，他在绝境中情急生智，跃马登堤，佯装举鞭招呼后骑，追兵疑其堤后有伏，迟不敢进。此时，恰巧赶上朱高煦率军救援，朱棣方免于一死。午后，双方鏖战正酣。勇将瞿能父子率万余精兵，大呼“灭燕”口号，再度向燕军猛攻。紧随其后的是越嶲侯俞通渊、陆凉卫指挥滕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意外的一股旋风将李景隆军中的大将

旗杆吹折，顿时朝廷之师无所适从。机不可失，朱棣乘势命令劲骑绕行到敌阵后方，顺风纵火，引烧了李景隆的大营。朝廷军阵大崩，奔声如雷。陷入敌阵的瞿能父子及俞通渊、滕聚等人孤力无助，战败身亡。平安率军与燕将朱能接战，见形势急转直下，溃退而走。燕军乘胜追至月漾桥，降服十余万众，李景隆单骑南逃德州。建文帝朱允炆命魏国公徐辉祖率领的殿后之师，尚未参战，便听到李景隆溃败的消息，因而得以全军归还。

济南之围　建文二年(1400)五月初七日，李景隆自德州奔向济南。两天后，燕军进入德州，城内百万粮储等尽为燕军所获。经过休整补充的燕军继续南下，沿途城守，望风溃散，五月十六日直抵济南城外。此时，李景隆所率的十余万众刚刚到达济南，惊魂未定，仓皇列阵迎战，被燕军再次打败南逃。整个济南城处在燕军的重围之中。此时，济南城内，都督盛庸和山东参政铁铉，以及使燕南归的参军高巍等人誓约死守。朱棣在射书劝降遭到拒绝的情况下，于五月十七日下令堵塞城外河道，以水灌城，全城士民一片恐慌。铁铉假装投降，遣千人出师央求朱棣退师十里，以单骑入城受降。次日，朱棣果然由数十名护卫随从来到城下，当他在“千岁”的欢呼声中骑马进城时，一块事先安置在城门上的铁板骤然而降，击伤了燕王的坐骑，急忙易马回逃。朱棣恼羞成怒，对济南城加紧了攻势。铁铉、盛庸等率全城军民倾力守御，双方相持不下。朱棣又调集大炮轰城，铁铉设计在城墙上悬挂出“太祖高皇帝神位”的神牌，燕军将士面面相觑，没有人胆敢轰城。朱棣自感束手无策之际，从白沟河战场败退下来的都督平安率军准备攻取德州，切断燕军后路。道衍和尚见情势不利，劝请朱棣暂还北平，以图后举。朱棣无奈只好还兵，派人命令其子朱高燧率军南下接应。八月十六日，围攻济南三个月之久的燕军被迫解围北去。铁铉、盛庸乘燕军撤围之机，率兵出击，燕将陈亨受创而死。铁铉军中的宋参军曾建言乘胜北上攻取北平。铁铉虽嘉善其议，但由于军饷困乏，将士守城日久疲惫，而且南将多驽材之辈，不足为恃，终于未能采纳。

燕军袭取沧州　朱棣鉴于建文朝廷让平安、吴杰驻守定州，盛庸驻守德州，徐凯、陶铭驻守沧州，其中德州、定州早已森严壁垒，只有沧州一处城防未竣，若攻其不备，必能取胜。于是决计偷袭沧州。建文二年(1400)十月十五日，朱棣佯称出征辽东，却秘密派遣徐理、陈旭率人至直沽架设浮桥。十六日，师出通州。沧州守将徐凯相信燕军并无南下之意，因而毫无防犯准备，只是督令军士四出伐木，昼夜筑城。十九日，燕军进驻夏家店，两天后经过直沽突然循河南下。一些人纳闷不解，朱棣相欺说：昨夜有二道白气，自东北穿向西南，占卜的结果是“利南”之兆，故而改道南行。燕军日夜兼程三百里，二十五日凌晨时分进抵沧州城下。沧州守军一无防备，临阵奋起抵抗也难挽败局，遂为燕军击溃。主帅徐凯、都督程暹、都指挥俞琪、赵浒等人均为燕军生擒，降卒数万人。燕军偷袭沧州的胜利，打破了建文帝对付燕王的犄角之势。

东昌之役　朱棣偷袭沧州的成功，助长了燕军的士气，他决心再次与南军一决雌雄。于是，朱棣一面命令把沧州所得的战利品运到北平，一面亲率大军南征。建文二年(1400)十一月十二日，燕师由德州进驻临清，盛庸、铁铉恐其长驱直下，遂率兵追蹑其后。十四日，燕军自馆陶渡河，南略地至东平。十二月初四日，燕师驻营汶上，盛庸、铁铉率兵进驻东昌。朱棣准备回师决战，他首先以朱荣、刘江等将士于滑口镇袭破盛庸部将孙霖的先锋部队，尔后全部发往东昌。二十五日，燕师抵至东昌城下。盛庸、铁铉在东昌宰牛设宴犒军，誓师励众，择简精锐，背城布阵，遍置火器、毒弩，做好迎战准备。由于燕军屡胜轻敌，战斗刚刚开始，朱棣即急不可待地率骑直攻盛庸军队的左翼，数击不动，只好绕出阵前猛冲中坚。盛庸故意开阵诱入，待燕军突进后，又合阵围攻。燕将朱能见势不妙，匆忙率番骑救援。此时，火器、毒弩齐发，燕骑损伤惨重。朱棣借朱能冲阵鏖战之机，从重重包围中破阵突出。燕将张玉知道朱棣陷入重围，奋不顾身冲阵来救，他在阵中冲荡，不见朱棣踪影，直至力竭被创阵亡。这时，平安率兵赶来，与盛庸协力作战，势如破竹，燕军步骑大败。次日，两军麾旗再战，燕军又以溃败告终。燕王朱棣率领百余骑殿后北奔，一路上不断遭到尾追堵截。十二月二十七日，燕军退至馆陶，因为平安、吴杰已经占据了真定，切断了燕军归路，朱棣只得改走深州(今河北深县)。在深州又遇到吴杰、平安的追杀，朱棣自感心力交瘁，不敢恋战，竭尽全力冲开一条血路，仓皇北逃。建文三年(1401)正月十六日，燕军回到北平。朱棣对失去大将张玉无比悲恨。他说：胜负是兵家常事，不足计虑；而在艰难之际失去张玉这样的良将，实在令人悲恨之至。

罗贯中逝世　罗贯中(约 1330—1400)，元末明初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说为山西太原人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一说原名贯，贯中为其字，其生平事迹不详。他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是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同时，又是我国最具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在我国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

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加上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并结合作者罗贯中丰富的生活经验而写就的。在思想内容上，全书描写了公元一百八十四年至二百八十年间的历史故事，起自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它集中地描绘了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矛盾斗争，由此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和痛苦，并且对曹操统一北方、刘备统一西南和孙权统一江南的历史功绩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在艺术成就上，全书结构谨严精巧，作者通过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斗争，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重现了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三国时期的古战场面，从而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书中所宣扬的尊蜀贬魏的封建正统思想，以及散布"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等等是不足取的糟粕。罗贯中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著有小说数十种，除《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外，今尚存世者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和《粉妆楼》。他还写过戏曲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戏曲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夹河之战　建文三年(1401)二月十六日，朱棣率燕师南下。二十日，燕军进抵保定，朱棣向诸将分析形势，认为野战容易，攻城艰难，如今盛庸合诸军二十万驻在德州，吴杰、平安驻在真定，我军若屯兵城下，他们必然合力援攻。坚城在前，强敌在后，此为危道。真定与德州相距二百余里，我军介于两城之中，可以诱敌出战，各个击破。于是，燕军东出移师紫围八方。三月初一日，燕军在滹沱河沿岸扎营，同时派游骑为疑兵前往定州、真定，迷惑平安、吴杰，阻延其出师时间，以集中力量对付盛庸。二十日，盛庸率军进扎于武邑县南的夹河。次日燕军也开进于此，两军相距仅四十里。二十二日清晨，燕军开始向夹河列阵而进，至午时抵达夹河。盛庸列阵坚严，阵旁火车、锐弩齐列。燕王朱棣先以轻骑三名掠阵而过，再以步卒五千攻击敌阵左掖，骑兵万余冲其中坚。盛庸的战阵严整，燕军攻冲受挫。以骁勇著称的燕将谭渊见敌阵噪动尘起，便一马当先冲入阵中；盛庸部将都指挥庄得不甘示弱，率众迎击。混战之中，谭渊马蹶跌落在地，庄得赶上举刀斩杀，随谭渊冲阵的燕将董真保也同归于尽。朱棣率朱能、张武等人以劲骑绕出盛庸军阵的背后，在暮色的掩护下突击，庄得率众力战正酣，不意背敌袭击，被创而死。盛庸部将楚智陷阵被执而死，"皂旗张"死时犹执旗不仆。是日战斗杀伤相当，不分胜负。朱棣因连失张玉、谭渊两员大将，心中忿怒难平，遂亲率十余骑追杀敌军，直至夜深不辨，方才就地野宿。天近破晓，他发现周围全是盛庸的军队，乘人不备，跃马鸣角穿敌营而过。朱棣回到自己的大营后，集军列阵，以利再战。他鉴于昨天的战况，改变作战部署，让精骑往来穿插阵间，伺机突击。并勉励将士"两阵相当勇者胜"。二十三日，两军再次展开拚杀。燕军列阵于东北，盛庸列阵于西南。朱棣率领骑兵左冲右突，盛庸战阵开而复合，两军相持不退，飞矢如雨。战斗持续到午后未时，天气陡然变化，东北风大作，尘沙涨天，咫尺不见人我。这时，燕军顺风大呼冲杀，南军逆风而战，目迷风沙，招架不住燕军攻势，只有丢盔弃甲，退保德州。燕师乘胜追击，大获全胜。吴杰、平安自真定率军拟与盛庸合兵攻燕，当行至距夹河八十里的地方得知盛庸战败的消息，只好还师真定。

建文帝巧使罢兵归藩计　朱棣取得夹河战场的胜利后，乘胜击溃了吴杰、平安的军队，并连掠顺德(今河北邢台)、广平(今河北永年)、大名(今河北大名)等地，所过诸郡县皆望风降燕。建文三年(1401)闰三月二十四日，燕军抵达大名府时，传来朱允炆罢谪齐泰、黄子澄的喜讯。朱允炆以夹河之败罢齐、黄之官，本想使燕罢兵北还。可是，朱棣不但没有停止南下，而且使"诛奸除恶"的借口合法化。几天后，朱棣回敬朝廷一封申辩书，他在书中称：比闻奸臣窜逐，臣亦将休兵就藩。而吴杰、平安、盛庸之众，犹聚境上，是奸臣虽出而其计实行，臣不敢奉诏。朱允炆的罢官缓兵之计被燕王戳穿，未能如愿。

薛岩使燕　燕王朱棣不肯奉诏休兵，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措，忙召来方孝孺问计，方孝孺认为燕军久屯大名，天气暑热多雨，其不战自疲；急命辽东诸将士入关攻击永平、真定，直捣北平，这样，燕师必然归救北平，我军可乘机蹑后灭燕。朱允炆采纳了方孝孺的建议，为了赢得调兵遣将的时间，建文三年(1401)四月，由方孝孺草拟了一份诏书，命令大理寺左少卿薛岩持诏北上报燕。同时印制宣谕数千张，一并交与薛岩，让薛岩伺机在燕军中密散将士，以动摇军心。薛岩来到大名，向燕王呈上诏书。朱棣看到尽赦己罪，使其罢兵归藩的诏令，大声说道：帝王之道，自有弘度，发号施令，昭大信于天下，岂能在诏书中挟诈，视祖宗基业为儿戏！公然拒绝了朝廷的罢兵归藩的要求。薛岩在燕军中居留几日后，连随身携带的宣谕也未敢散发就匆匆返朝了。

燕使武胜诣京上书　建文三年(1401)五月，燕军向大名运送粮饷，盛庸、吴杰、平安等率兵分扼

饷道。于是，燕王遣燕山卫指挥武胜南下京师上书。书称朝廷已经许诺罢兵，可是盛庸等人出师断绝燕军饷道，这与诏旨是大相径庭的，其中必有奸佞主谋。朱允炆见书后，曾想罢兵了事。方孝孺知燕王朱棣奸诈有术，便劝阻建文帝说：天下军马一经罢散，再难复聚，若他们不罢兵，长驱犯阙，我们用什么来抵御呢！朱允炆觉得言之有理，遂下令将燕使武胜逮捕入狱，不久处斩。

李远计焚南军粮饷　燕使武胜被捕入狱，燕王朱棣怒不可遏。建文三年(1401)六月，朱棣遣都指挥李远率骑兵六千南至济宁、谷亭、沙河、沛县一带，命令士卒改穿南军士甲胄，混杂在南军中，以背插柳枝为标记，南军竟无察觉。他们一举焚毁了德州的运粮船只，军资器械也化为灰烟，漕运兵士散走殆尽，朝廷闻之哗然。从此，德州粮饷难以为继。六月二十五日，盛庸遣都督袁宇以三万人邀击李远还军，李远设伏大败袁宇。

平安攻北平　建文三年(1401)七月初二日，燕师掠彰德(今河南安阳)；初九日，陷林县。平安见有机可乘，便于十日自真定乘虚攻向北平。平安扎营离城五十里的平村。居守北平的燕王世子朱高炽一边督众固守，一边派人向燕王告急。当时燕王朱棣正在大名指挥作战，遂遣将刘江救援北平。九月十八日，燕将刘江与都督平安战于北平，北平未能攻克，平安战败退保真定。

水西寨之围　建文三年(1401)七月十五日，盛庸传檄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连掠保定诸邑寨，广招义勇，进驻易州(今河北易县)水西寨。水西寨在高山峻岭之间，房昭据险寻机进攻北平。正在大名(今河北大名)的朱棣闻知房昭居寨集结兵粮，以窥北平，迅速班师进援保定。八月初一日，燕军渡过滹沱河，次日攻克保定。朱棣留大将孟善镇守保定，自率数万人马包围水西寨。二十日，朱棣得谍报真定总兵吴杰派遣都指挥韦谅率兵万余向房昭转运粮饷。燕王对诸将领说：房昭若得真定饷粮，据寨固守，就难于拔寨了。我们不如邀击援兵，援兵败退，水西寨不攻自破。于是命令朱荣带兵五千趋向定州，以待还兵合击真定援军。时值秋冬之际，水西寨房昭军中大多是南方人，天寒衣薄，苦不堪言，有些人潜逃出寨投奔了燕军。直至十月初二日，真定援军进抵易州西南百里的峨嵋山下，朱荣自定州驰还，与朱棣的围寨之兵夹击援军，斩首万余级，执获都指挥花英、郑琦、王恭等，房昭、韦谅弃寨而逃。二十四日，朱棣率领凯旋之师回到北平。

倭扰浙东　建文三年(1401)九月，倭寇扰浙东，登岸剽掠，象山知县易绍宗格战而死。易绍宗，攸人。洪武朝时，因从军有功，被授为象山县钱仓所千户。倭寇侵扰浙东，他在壁上大书：设将御敌，设军卫民。纵敌不忠，弃民不仁。不忠不仁，何以为臣！为臣不职，何以为人！书毕，与妻生奠诀别，密令游兵焚毁倭贼船只。后在追杀倭贼时，陷于海岸泥淖中被害。朝廷赐葬行祭，并勒碑纪念。

淝河之战　建文四年(1402)三月初一日，朱棣率军直趋宿州(今安徽宿县)。十四日，平安率步骑四万紧随燕军之后。朱棣决心击溃平安追兵，于是迅速南奔淝河设伏以待。平安的军队追来时，燕将王真等引兵诱战，将士们故意把以束草伪造的束帛掷向追兵，追兵误以为是货真价实的束帛，争相下马拾取。此时，伏兵四起，围堵追兵厮杀起来。不料平安大军突然涌至，燕将王真被重重包围，他连连砍杀数十人，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后，自刎于马上。朱棣得知骁将王真战死，便亲率大军迎战。平安部将火耳灰(一作和尔和)见燕王朱棣出战，挺槊大呼，直取朱棣，可惜燕将童信射毙其马，不幸被俘。火耳灰原系燕府护卫将领，朱棣起兵前被建文朝廷取赴京师，成为平安的部将。他被擒后，朱棣念其旧情，留任宿卫。平安军退屯宿州。

小河之战　建文四年(1402)四月十四日，燕军移驻小河(睢水)，立桥拒守。次日，平安率军夺桥，双方展开激战。这时，都督总兵何福列阵循河东进，与平安合兵攻桥，击败燕军，燕将陈文被斩杀于阵中。平安转战到北坂，拍马横槊冲入燕军，直逼燕王朱棣。燕将王琪见势不妙，跃马入阵，掖起朱棣逃奔得脱。何福率众夺桥而过，勇气倍增。奉命埋伏于树林里的燕将张武等见敌军过桥，忙从林间冲突而出，朱棣乘势率兵反扑，平安、何福不敢躁进，只得退回桥南。两军隔桥扎营，相持数日不下。朱棣不愿困守，乃留兵千余守桥，其余大军暗中东行三十里，半夜渡河绕到南军背后发起进攻。平安、何福猝不及防，面对燕军攻势惊乱失措。眼看南军不支，而魏国公徐辉祖率援兵适至，徐辉祖和平安、何福合力反攻，燕军仓皇溃走。

灵璧之战　建文四年(1402)四月二十五日，何福移营灵璧，与平安合军，深堑高垒，以为持久之计。可是，粮道却被燕军所阻，供给出现危机。二十七日，燕王朱棣获报平安正率众六万人，以方阵护送五万粮饷朝着灵璧进发。朱棣命令壮士一万人遮挡援兵，自己亲率精锐横贯敌阵，截断护饷军队。何福闻讯来援，与平安军共杀伤燕军数千人，燕军被迫退却。这时，朱高煦等数万伏兵突出奋击，朱棣还军再

战;何福腹背受敌,败入营垒坚守。粮饷尽为燕军截取。扼居营垒之中的朝廷军队,因粮草无继,准备突围赴淮就粮。二十八日,何福、平安传令将士,约定次日以鸣炮三声为突围信号。事有凑巧,第二天黎明时分,朱高煦率领燕军前来攻营,炮声大作。守军将士闻炮误认为突围号令,纷纷夺门而出。出营的守营将士和攻营的燕军相遇,顿时人马乱成一团,营垒攻陷,南军大溃。指挥使宋瑄战死,总兵何福单骑而逃,其他如左副总兵陈晖、右副总兵平安、都督马溥、徐真、都指挥孙成等三十七名主要将领,以及监军副都御史陈性善、大理寺丞彭与明、钦天监副刘伯完、指挥王资等一百五十名军官全部被俘。平安骁勇善战,屡败燕师,燕军闻知平安被执,欢呼动地,争请诛杀,燕王惜其才勇,遣送北平,平安遂降燕王。燕王把陈性善等文臣全部放归。陈性善在归途中感叹有辱君命,朝服跃马投河自尽。灵璧战后,建文朝廷每况愈下。

辽东兵溃于直沽 灵璧一战,平安所部全军覆没,盛庸军更加势孤力单。朱允炆采纳齐泰、黄子澄的建议,下令都督杨文率辽东兵马十万赶赴济南,与铁铉合军,以断绝燕师后路。建文四年(1402)五月一日,杨文率军行至直沽时,遇到燕将宋贵等人的截击,结果杨文全师被燕军击溃,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抵达济南。一些本来就处于踌躇观望之中的武臣,干脆降归了燕王朱棣。

燕师克扬州 建文四年(1402)五月七日,燕军抵至泗州(今安徽泗县),守将指挥周景初不战而降。朱棣在泗州匆匆拜谒了曾祖父的陵寝之后,渡淮河,克盱眙,直趋扬州。扬州卫指挥王礼早有降燕之心,听说燕师将至,欲以城降。可是,监察御史王彬、镇守指挥崇刚察知王礼有异谋,事先把王礼及其党羽捉拿入狱。王彬、崇刚据城坚守,昼夜不解甲。朱棣以悬赏官三品擒杀王彬。王彬为了加强防范,他身边常跟随一名能举千斤的大力士护卫。朱棣遣命部将吴玉潜入扬州招谕,与王礼之弟王宗密谋,用重金贿赂大力士的母亲,让她呼唤儿子出来,千户徐政、张胜乘机将正在解甲沐浴的王彬逮捕。十八日,从狱中解救出的王礼开启城门迎入燕军。扬州降附后,燕军相继攻陷高邮、通州、泰州、仪真等地,立大营于高资港北岸,与京师一江之隔,建文朝廷危在旦夕。

诏天下勤王 燕师兵临城下,朝廷岌岌可危。建文四年(1402)五月二十日,朱允炆无奈下"罪己诏",征兵勤王。诏令四方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诸府卫文武之臣,在国难当头之际,各率恭义壮勇之士赴阙勤王,以扶持宗社。至于论功封赏,朕无所吝惜。于是,分遣御史大夫练子宁、礼部右侍郎黄观、刑部右侍郎金有声、工部右侍郎张显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至各地征兵。结果有苏州知府姚善、宁波知府王琎、徽州知府陈彦回、松江同知周继瑜、乐平知县张彦方、前永清典史周缙等人先后入卫京师。同时,召还出外募兵的齐泰、黄子澄,共谋对付意在渡江犯阙的燕军。

割地请和 继朱允炆"诏天下勤王"之后,方孝孺向朱允炆进献缓兵之法,计遣人诣燕军,许以割地请和,以待东南勤王之师。建文四年(1402)五月二十二日,朱允炆派遣庆成郡主渡江议和。朱棣在军营中接见了这位从姝,庆成郡主委婉地转达了朱允炆愿意割地讲和的意思,要求燕王罢兵,不再过江。朱棣回答说:吾受命皇考,封建茅土且不能保,割地岂其本心!此奸恶谬计,欲以见欺,焉可为信?我此行在诛奸恶,以清朝廷,奠安社稷,保全骨肉。朱棣断然回拒了割地议和的请求,庆成郡主只好起身告辞还朝。

瓜洲渡江 建文四年(1402)六月初一日,燕师准备渡江,与扼守浦子口的盛庸接战不利,正欲议和北还,朱棣的次子高煦率骑兵赶来。朱棣喜出望外,仗钺拊其背说:吾儿勉之,世子高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而代嗣。高煦素来与世子不睦,这种许诺无疑使高煦勇气大增,率众殊死力战,盛庸先胜后败,退守江南高资港。这时,总领舟师防江的右军都督佥事陈瑄以舟师降燕,借以阻拦燕师渡江的长江天堑已失去作用。初二日,朱棣祭大江之神,祈求渡江顺利。次日,朱棣誓师渡江,激励燕军克协一心,奋忠鼓勇,摧坚陷阵,斩将搴旗,身当矢石,万死一生,戮力渡江,剪除奸恶。随后,燕军将士自瓜洲(今江苏境内)渡江。盛庸列阵高资港迎战,高煦先率精骑登岸冲阵,将士继后鼓噪而进,盛庸所部将士慑于燕军的浩壮气势,弃地溃逃,燕军轻而易举地占据了高资镇。燕军乘胜进取镇江,守将指挥童俊举城降燕。初八日,燕军再由镇江西进,驻营于龙潭,京师的钟山遥遥在望。

京师陷落 燕军驻营龙潭的消息传至京师,整个都城吏民惊骇不已。朱允炆焦急不安地徘徊。朱棣本以为京师攻防完缮,勤王之师四集,就派部将刘保、华聚等领骑兵十余至朝阳门一带侦察,还报京城并无充足防备,朱棣遂率大队整兵前进,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抵达南京城下。奉命守卫北城西侧金川门的曹国公李景隆和谷王朱橞,预感到建文朝廷大势已去,开城迎纳燕师。燕军从金川门入城,虽有魏国公徐辉祖等率军力战,但无济于事,京师从

此陷落。

朱允炆纵火自焚（一说“逊国”） 朱棣率燕军攻陷京城后，朱允炆见大势已尽，在左顺门亲手把阴谋为燕王攻城内应的徐增寿杀死，奔回宫中，走投无路，阖宫自焚而死。朱棣看到宫中燃起冲天大火，赶忙让中使往救，可是为时已晚。中使从灰烬中检出一具已经烧焦的尸体，向朱棣报告这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尸骨。朱棣故作惋惜地叹道：小子无知，乃至于此！于是，还营龙江发丧，命令有司治理丧葬，并遣官致祭，布告天下。建文四年(1402)六月二十日，朱棣备礼安葬了建文帝朱允炆，还辍朝三日示哀。

与朱允炆阖宫自焚说相反，一说建文帝由地道出亡，翰林院编修程济、御史叶希贤等四十余人随从潜至西南削发为僧，行踪遍及滇、黔、巴、蜀等地，晚年北归朝廷，经审知非妄，遂迎入禁中，目为老佛，六十四岁病逝，葬于北京西山，不封不树，号称“天下大法师之墓”。

燕王令索“奸臣” 朱棣在“除奸靖难”的四年中，多次上书指斥的“奸臣”只有齐泰、黄子澄二人。可是，燕军攻陷京师之后，“奸臣”的范围进而扩大到忠于建文朝廷的文臣武将。第一次揭榜的“奸臣”计左班文臣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大理寺少卿胡闰，寺丞邹瑾，户部尚书王钝，户部侍郎郭任、卢迥，刑部尚书侯泰，侍郎暴昭，工部尚书郑赐，工部侍郎黄福，吏部尚书张纮，吏部侍郎毛泰亨，给事中陈继之，御史董镛、曾凤韶、王度、高翔、魏冕、谢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经历宋征，户部侍郎卓敬，修撰王叔英，户部主事巨敬。凡缉捕缚送之人，皆得悬赏。不久，户部尚书王钝、工部尚书郑赐、工部侍郎黄福和前御史尹昌隆，乞宥罪得免；并宥吏部尚书张纮、吏部侍郎毛泰亨之罪，皆先后授官，或仍复旧职。第二次揭榜的“奸臣”中，增加徐辉祖、铁铉、周是修、姚善、甘霖、郑公智、叶惠仲、王琎、黄希范、陈彦回、刘璟、程通、戴得彝、王良、卢原质、茅大芳、胡子昭、韩永、叶希贤、蔡运、卢振、牛景先、周璇等，共五十余人。另外，礼部侍郎董伦，曾劝请朱允炆亲睦宗藩，因而不列入“奸臣”榜中。

朱棣即皇帝位 燕王朱棣自建文元年七月起兵，至建文四年六月占领京师，所谓的“靖难”战争历时整整四年，从而结束了建文王朝统治的历史。就在燕军进入京城的第二天，被朱允炆削废的诸王便率领文武群臣向朱棣上表劝进，朱棣作态不允。诸王和群臣不甘罢休，一连劝进数日，直至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七日，朱棣在编修杨荣的提示下，首先拜谒了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寝，尔后，诸王和文武群臣备好法驾，奉上宝玺，迎王于道，高呼万岁。这时，朱棣才升辇入宫，在奉天殿接受了以兵部尚书茹瑺为首的群臣朝贺，正式即皇帝位。改元永乐。

革除建文制度 建文四年(1402)七月初一日，朱棣大祀天地于南郊后，回到奉天殿。诏令自今年六月以后，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建文中凡所改易的祖宗成法，一切恢复旧制。七月初三日，朱棣接受吏部的奏请，诏建文时所有更定的官制，一如洪武之旧。

内阁的创立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后，为了处理政务之需，仿效宋朝旧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以备顾问，而不入典机务。朱棣登极后，决定起用一批资浅而干练的文臣参预机务。建文四年(1402)八月一日，朱棣选命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同预朝廷机密重务。九月间，朱棣又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和胡俨等同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他们七人朝夕侍从左右，协助皇帝办理政事。因其在大内殿阁行事，故称“内阁”。内阁参预机务从此开始。不过，此时的阁臣品秩远在六部尚书之下，而且不设官属，不辖诸司事务。到了明仁宗、明宣宗时，开始由六部尚书兼任大学士，阁职渐崇。明英宗天顺以后，阁权益重。明世宗朱厚熜鉴于前朝宦官专权，更使阁臣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之上。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决定方针大计，检准诸司题奏，草拟皇帝诏令，俨然成为百官之长。

大封靖难功臣 建文四年(1402)九月初四日，朱棣大封靖难功臣：中军都督同知丘福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中军左都督，封淇国公，禄二千五百石；都督佥事朱能为中军左都督，封成国公，禄二千二百石；都督佥事张武为中军都督同知，封成阳侯，禄一千五百石；陈厚为后军都督同知，封泰宁侯，禄一千二百石；郑亨为中军左都督，封武安侯，禄一千五百石；孟善为右军都督同知，封武定侯，禄一千二百石；火真为中军都督佥事，封同安侯，禄一千五百石；右都督顾成封镇远侯，禄一千五百石；都督佥事王忠为右军都督同知，封靖安侯，禄一千石；都指挥使王聪为中军都督佥事，封武城侯，禄一千五百石；都督佥事徐忠为前军左都督，封永康侯，禄一千一百石；都督佥事张信封隆平侯，禄一千石；李远为中军都督同知，封安平侯，禄一千石；郭亮为左军都督同知，封成安侯，禄一千二百石；都督佥事房宽封思恩侯，禄八百石；都指挥使徐

祥封兴安伯，禄一千石；都督佥事徐理封武康伯，禄一千石；都指挥同知李浚封襄城伯，禄一千石；张辅封信安伯，禄一千石；都督佥事唐云封新昌伯，禄一千石；谭忠封新宁伯，禄一千石；都指挥佥事孙岩封应城伯，禄一千石；房胜封富昌伯，禄一千石；赵彝封忻城伯，禄一千石；指挥同知陈旭封云阳伯，禄一千石；刘才封广恩伯，禄九百石。论款附功，都督同知王佐为中军都督同知，封顺昌伯，禄一千石；陈瑄为右军都督同知，封平江伯，禄一千石；驸马都尉王宁封永春侯，禄一千石；茹瑺封忠诚伯，禄一千石；增曹国公李景隆禄为四千石。另外，追封故都督同知张玉为荣国公，赐谥忠显；追封故后军都督佥事陈亨为泾国公，赐谥忠勇；追封故都指挥使谭渊为崇安侯，赐谥壮节。永乐元年(1403)五月，再论靖难之功，封驸马都尉袁容为广平侯，禄一千五百石；封驸马都尉李让为富阳侯，禄一千石；封都督佥事李彬为丰城侯，禄一千石；封陈亨子陈懋为宁阳伯，封王真子王通为武义伯，封都指挥同知王友为清远伯，封都督佥事陈贤为荣昌伯，封都指挥同知张兴为安乡伯，封陈志为遂安伯，各食禄一千石。计封侯三人，封伯六人。

徙民北平 建文四年(1402)九月，朱棣命户部核查山西各地无田的民户徙实北平，各郡县仍按户给钞，以便购置耕牛、粮种和农具，五年以后开始征税。永乐元年(1403)八月，定罪囚谪佃北京条例，发流罪以下的囚犯开垦北京农田。同时，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的富民至北京。在永乐二年、三年间，又分别徙山西万户农民至北京。经过几年的徙民，北京的人口大大增加了，为后来的营建宫殿和迁都北京创造了条件。

重修《太祖实录》 建文四年(1402)十月九日，朱棣诏令重修《太祖实录》，命曹国公李景隆和兵部尚书茹瑺为正、副监修官，侍讲解缙为总裁官，以翰林学士王景、右通政李至刚、侍读黄淮、修撰李贯等人为纂修官。又命以建文事附录其后，尽焚原修旧稿。永乐元年(1403)六月，《太祖实录》的重修工作告竣。

册立妃徐氏为皇后 建文四年(1402)十一月十三日，朱棣册立妃徐氏为皇后，并诰告天下。徐氏(1361—1407)，中山王徐达长女，自幼贞静颖敏，雅嗜读书，有"女诸生"之誉。洪武九年(1376)，徐氏被册为燕王朱棣妃，颇受朱元璋之马皇后喜爱。朱棣起兵后，徐氏辅佐世子朱高炽居守北平。建文元年(1399)十月，朱棣北袭大宁，李景隆乘机进围北平，徐氏亲率城中妇女协同守城将士登陴拒守，终于挡住了敌人的攻势。徐氏被册为皇后以后，"旦夕侍上，惟以生民之念"。一次，明成祖朱棣意欲为其亡弟徐增寿(京师陷落时，为建文皇帝所杀)追赠公爵，徐氏力劝不许，朱棣坚持封徐增寿为定国公后，徐氏说："非妾志也"。徐氏曾经类编古人嘉言善行，著有《内训》二十篇和《劝善书》，颁行天下。永乐五年(1407)七月初四日，徐氏病故，享年四十六岁。临终前，徐氏还劝言朱棣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毋宠外戚。同年十月十四日，谥徐氏为仁孝皇后。从此，明成祖朱棣不再立后。

朱棣敕谕功臣守法 建文四年(1402)十二月初三日，朱棣敕谕诸位功臣说：过去以武功开创天下的君主，必然倚赖将臣的辅弼。可是，到后来往往难能保全将臣，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居位高处的人容易骄纵枉法，恃宠而不肯改悔的缘故吧！君主是代天理物的，不能容忍挟私，所以对自己的将臣也要依法加罚。我洪武高皇帝立法垂宪，目的是让后世之人恪守不懈。倘若诸位功臣有违犯宪法，而且罚戒不悟者，将按律诛杀勿论。即是至亲至旧，也不得宽宥。高皇帝英明果断，昔日你们受到高皇帝厚恩，如今又拥戴寡人，我愿诸位长命富贵。如果有人胆敢怙恶不悛，为非作歹，必定问罪不赦，届时莫怪朕寡德少恩。现在就把高皇帝的戒敕布告周知，希望大家永遵不违，否则，追悔莫及。

朱棣论治国之道 永乐元年(1403)正月初二日，明成祖朱棣敕谕中外文武群臣说：上天之德，好生为大；人君法天，爱人为本。四海之广，非一人所能独治，必任贤择能，相与共治。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历代以来，用此道则治，不用则乱。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勤爱保养，生息三十余年，海内晏然，祸乱不作，政教修明，近古鲜比。亦惟任天下之贤，理天下之务，保民致治，以克臻兹。朕靖难承统，重惟天下皇考天下，军民皇考赤子。朕即位以来，夙夜匪宁，思惟抚安，以承付托之重。尔诸文武大臣体朕斯怀，各尽其道，毋怠毋忽，毋虐毋贪，无为掊克，无纵诡随，持尔廉平，秉尔正直，励尔公勤，扩尔忠恕，共守成宪，毋或有违。惟民出赋税以赡军，军执干戈以卫民，军非民不食，民非军不安。希冀尔文武群臣，互为保爱，无有侵害。惟皇考成宪，实万世治安之具，遵之则吉，违之则凶，其悉心一志，敬慎不苟。

恢复被逐诸王爵 永乐元年(1403)正月，刚刚登极改元的朱棣就在华盖殿宴请诸王，同时宣布被朱允炆削废的周王朱橚、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全部复其旧爵，令各归故封。其中周王朱橚因与朱棣为同母兄弟，受恩有加，除复王爵外，并增岁粟二万石。另外，谷王朱橞在燕军攻抵京师时，

开门迎降有功，朱棣特赐乐七奏，卫士三百，改封长沙，增岁禄二千石。其实，这只不过是朱棣为了削减藩王权势所采取的欲夺先予的策略。随着朱棣永乐王朝的巩固，削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削革代王朱桂的三护卫及官属；永乐四年五月，削去齐王朱榑的官属和护卫，八月废齐王为庶人；永乐六年，削除岷王朱楩的护卫，并罢其官属；永乐十年，削去辽王朱植的护卫；十五年，废谷王朱橞为庶人；永乐十九年，朱棣的同母弟周王朱橚被迫献还三护卫。这样，朱棣把当时掌握兵权的大部分亲王，或削其护卫，或废为庶人，基本达到了削除藩王兵权的目的。

改北平为北京　永乐元年(1403)正月十三日，朱棣大祀天地于南郊归来，文武群臣行庆成礼。这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陈请改北平为北京，他们说：自昔帝王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繇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龙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朱棣当即答允下来。二月初三日，设置了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国子监。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北平行太仆寺为北京行太仆寺。行都督府设置左右都督，都督同知、佥事无定员。行部设置尚书二人，侍郎四人，六曹吏户礼兵刑工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次日，遣命户部尚书郭资、刑部尚书雒佥为北京行部尚书。

牧马法的制定　永乐元年(1403)正月十六日，颁定牧马法：牡马一匹配牝马三匹，每岁课征一驹给军士，非征发不得擅自遣用。

遣使贻书鞑靼可汗鬼力赤　建文四年(1402)，元顺帝后裔坤帖木儿被部酋长鬼力赤杀害，鬼力赤本非元帝后裔，各部多不服。鬼力赤遂弃大元皇帝称号，改号鞑靼，自称可汗。永乐元年(1403)二月十二日，朱棣遣使贻书鬼力赤以通好，并赐与银币等物。同年七月十五日，又遣指挥革来等人诏谕鬼力赤，再申讲好修睦。

徙封宁王权于南昌　宁王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个儿子，洪武二十四(1391)年封藩大宁。建文元年(1399)十月，宁王朱权被朱棣诱执入关。当时，燕王曾许以事成中分天下。朱棣即位后，宁王乞请改封苏州或钱塘，朱棣借故不许。永乐元年(1403)二月，遂徙封于南昌。朱棣亲自制诗送行，诏即布政司为王邸。朱权在南昌构庐韬晦，托志翀举，自号臞仙，又称涵虚子、丹丘先生，著有《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太和正音谱》等。另有所作杂剧十二种，今存二种。正统十三年(1448)病故。

侯显出使乌斯藏　早在洪武四年(1371)，明朝就开始在我国的西藏地区陆续设置了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元帅府、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行政机构。洪武七年升朵甘、乌斯藏二卫为都指挥司。朱棣登极称帝后，听说乌斯藏(今西藏)僧人哈立麻精通道术，善于幻化，被称为“尚师”，很想往征一晤。遂于永乐元年(1403)二月十八日，派遣司礼监少监侯显偕同僧人智先一道，带着书币出使西域乌斯藏，以征召尚师哈立麻。并选壮士健马护行。永乐四年十二月，尚师哈立麻随侯显来到京师，朱棣诏命驸马都尉沐昕出迎，并在奉天殿亲自接见哈立麻。次年，朱棣加封哈立麻，赐领天下释教。侯显因奉使有功，擢为司礼监太监。此后，侯显又数次奉诏出使各国。

徙大宁都司于保定　明太祖朱元璋封十七子朱权于大宁，以守御北边。后来，又在兀良哈设置泰宁(今辽宁西拉木伦河以北至吉林洮儿河流域一带)、福余(今黑龙江、嫩江下游一带)、朵颜(今吉林洮儿河流域一带)三卫，在大宁设置北平行都司。朱棣劫归宁王朱权时，选三卫士卒三千人入关助战，屡立战功。朱棣攻陷京师后，把大宁割让给兀良哈作为报偿，并调营州五屯卫和东胜左右卫(东胜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至内地。永乐元年(1403)三月初五日，朱棣诏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并由大宁内迁至保定。自此，辽东和宣府之间声援隔绝，削弱了明朝北边的防御能力。

陈瑄督海运饷　洪武年间，辽东及其以北的军士粮饷全部由海上运输，到了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诏令辽东军屯田自给，而停止了海运。永乐元年(1403)三月十一日，朱棣命平江伯陈瑄与都督佥事宣信二人充任总兵官，各率舟师由海道运粮四十九万余石于辽东和北京，以补北方军储不足。海道运饷自此以为常。

开浚吴淞江　永乐元年(1403)四月初三日，明成祖朱棣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巡视浙西诸郡，治理苏州、松江和嘉兴等地的水患。夏原吉经过实地勘察，上奏拯治之法在于开浚吴淞诸浦。朱棣准命夏原吉督率民丁十余万人，开浚吴淞江下流以通海，上接太湖，并且“度地为闸，以时蓄泄”。次年正月，夏原吉再率民工开浚白茆塘、刘家河、大黄浦等支流，九月告竣。疏浚吴淞江大大便利了苏、松等地区的农田基本建设。

申定金银交易之禁　洪武七年(1374)，明朝开始设置宝钞提举司，翌年诏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规定禁止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只准用金银

易换钞币，违者治罪。可是，到了洪武末年，江南士民和一些行商大贾重钱轻钞，甚至有人以一百六十文钱折算钞币一贯（四百文为一贯），因此造成物价腾贵，钞法大坏不行。永乐元年(1403)四月二十日，朱棣诏令禁金银交易以通钞法，犯者以奸恶论罪。同时规定钞纸昏烂者允许到行在库兑换新钞。然而由于收受艰难，结果金银交易禁而不止。当时，户部尚书夏原吉曾疏请朱棣更钞板上的"洪武"篆文为"永乐"，朱棣命仍其旧。自此以后，朱明王朝的宝钞一直沿用洪武年号。

朝鲜遣使入贡 建文四年(1402)八月初一日，朱棣遣官颁即位诏于朝鲜。永乐元年(1403)正月，朝鲜国王李芳远遣使朝贡。四月，再遣陪臣李贵龄入贡，奏李芳远之父李旦因病需要龙脑、沉香、苏合、香油诸物，朱棣命太医院供给。此后，李芳远又遣使表谢，并请赐冕服、书籍。朱棣特许以金印、诰命、冕服、九章、佩玉、霞帔和经籍等。从此，两国的使臣往还愈加密切，朝鲜贡贺以为常，每岁辄至四、五次。

罪囚谪佃北京例的制定 永乐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制定罪囚谪佃北京例：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犯杖罪者给牛具种子，五年后赋役如民田；犯徒流迁徙者不给直，三年后如民田例科差。

朱棣论创业守成 永乐元年(1403)九月初一日，明成祖朱棣敕谕中外文武群臣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创业难，守成不易。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施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汉唐宋，率由兹道。舜诛四凶，明五刑。夏禹承之，声教达于四海。周公相武王，灭国五十，至成康而后，刑措不用。汉高祖初定天下，命萧何定律令，韩信申军法，至文景，挟书之律、肉刑之惨，一皆除去。唐高祖革隋弊政，定官制，颁律令，太宗贞观之后，惩斩趾，禁鞭背，删定律令，变重为轻，力行仁义，几致刑措。宋初，太祖惩五代之乱，颇用重法，纠惩奸佞，躬自折狱，务底明慎，立法制严，咸平以后，删其繁密，益务宽仁，子孙承之，含弘光大，恭俭纯诚，未尝杀一不辜之人。此历世守成创业之事，刚柔宽猛，礼乐刑政，厥中厥序，莫不递用。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奋起布衣，当胡俗沉浸百年之后，奸雄睥睨反侧之余，拨乱反正，兢兢业业，劳心焦思，昼夜图惟，经权常变，不得已而用刑，特权一时之宜。及立为典常，既有定律颁行天下，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剕宫，并禁不用。朕克遵成宪，仰思圣谟，夙夜祗服，惟欲兴礼乐，举贤才，施仁政，以忠厚为治。尔文武群臣尚思各共乃职，敬乃事，勿为朋比，勿事贪黩，勿恣情纵欲，以干匪彝。至于用刑，必钦必慎，期于刑措，用臻康理，不负皇考创业之艰。

朱棣论任官求贤 永乐元年(1403)九月初六日，明成祖朱棣敕谕吏部说：任官，图治之基；求贤，任官之本。朕以藐躬嗣承大统，日理万机，不敢暇逸，思欲旁招俊异之材，光辅邦家。尔内外诸司于群臣百姓之中，各举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滞下僚，或可剸繁；而优游散地，或抱道怀才，隐居田里，并以名闻。毋娼嫉蔽贤，毋循私滥举。《书》曰："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古训具存，以资共勉。

遣宦官出使各国 洪武、建文年间，明朝政府在外交方面实行的是片板不准下海的闭关政策。明成祖朱棣登极后不久，就依照洪武初年的建制，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市舶提举司，以加强管理正当的中外贸易和友好交往。并且不断地向海外各国派遣使臣，仅永乐元年(1403)就派宦官出使各国达三次之多：九月十五日，朱棣遣宦官马彬等出使爪哇国，并诏谕苏门答腊、西洋琐里等国；同月二十四日，遣宦官李兴等出使暹罗；十月十三日，宦官尹庆奉使诏谕满剌加、柯枝等国。从此开了宦官出使外国的先河。

军功袭职例的制定 永乐元年(1403)十月初一日，制定军功袭职例：凡军官舍人，旗军余丁，或自愿报效，或选令征进，曾历战功升授职役亡故者，由其子承袭，无子者，由其父兄弟侄受袭。职役小者，俱准承继相等的职事，而义子女婿不准承袭。若先前不曾立功，就职后也无战功的亡故者，不许承继其职。指挥、千百户子弟随征有功，先已升至指挥、千百户，后有征进有功升职者，准予袭职，不曾征进者则不许承袭。致仕官守城或征进有功亡故，并年老告代者，原代职子孙也曾随征，或曾任北京卫所职事，及见支优给职任小者，就与父兄所升职事。若职事相等，不许令次子孙别袭。若原替职子孙不曾于北京卫所任事，次子孙曾随征，或于北京守城，如今其父祖欲令袭授所升之职者听任，原替职子孙革闻。

日本国王源道义遣使入贡 朱棣即皇帝位后，曾经派遣使臣诏谕日本国。永乐元年(1403)，朱棣再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可是，他们还未成行，日本国王源道义的使臣已抵至宁波。十月十一日，日本使臣一行来到南京表贡方物，明成祖朱棣优礼相待，对其所携带的兵器等违禁物品，也特准出售。日本使臣还国时，朱棣遣官护送，并带给源道义国王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之物。从此，两国间恢复了洪武末年以来几乎断绝的友好往来。

建州卫的建立 自古以来，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一脉相承，是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满

族的祖先。明朝时,满族称女真,分为建州、海西和东海(又名野人女真)三大部。朱棣登极之初,即派使臣往野人女真部宣谕。永乐元年(1403),又命行人邢枢前往女真各部,因而不断有女真头目率人入关朝见。十一月,朱棣亲自接见了来朝的女真首领阿哈出等人,正式设置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今吉林珲春东北),任命阿哈出为指挥使,赐汉姓名李思诚。其他人被任以千百户、镇抚等。并赐给诰印、冠带,同时还设置了建州卫经历司。从此,明王朝在女真族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卫所设置。后属奴儿干都司辖治。

封胡䍐为安南国王 朱棣登极后,安南黎苍(即胡䍐)遣使朝贡,上表诈称陈氏绝嗣,自署权理安南国事,乞赐封爵。事下礼部商议,礼臣感到其中有疑,遂诏令行人(掌传旨册封之官)杨渤等至安南查访。胡䍐再次遣使随杨渤至京师,进其国陪臣父老所上表。永乐元年(1403)闰十一月十五日,礼部郎中夏止善等奉诏往安南,赐封胡䍐为安南国王。胡䍐复遣使谢恩。

始命宦官出镇及监京营军 洪武之初,朱元璋置宦不及百人,迨至末年,定为十二监及各司局。同时,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干预政事都处斩。建文帝嗣位后,严御宦官,如出外稍不法,地方官有权逮治。因而,在燕军逼近江北时,建文朝廷的内臣纷纷逃至燕师,泄漏朝廷虚实。朱棣即位后,大行封赏。永乐元年(1403),朱棣选遣有谋略的宦官随顾成、韩观、何福等出镇贵州、广西、宁夏诸边,并赐与公爵服,位诸将上。后置三大营,又命宦官提督监京营军。实开明代宦官专权之祸端。

禁民下海 其时福建濒塘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官如实奏报。永乐二年(1404)正月十九日,成祖下令,禁民间海船下海。原有海船,全部改为平头船,所在地方有习,防其出入。

奴儿干卫的建立 永乐二年(1404)二月初二日,忽剌温等处女真路人头目把剌答哈来朝。成祖遂置奴儿干卫,以把剌答哈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等。由此表明黑龙江下游地区归入明王朝的版图。之后,成祖又在斡难河、黑龙江流域的南北地区,以及松花江、乌苏里江、格林河、恒滚河等流域先后设置了一百三十个卫所,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

严禁小秤交易 永乐二年(1404)二月初七日,大理寺官奏陈:市民以小秤交易,请以违制律论处。成祖问工部官:小秤之禁,是否申明?答称已文移诸司。成祖又问:是否榜示于市?答称未榜示于市。成祖说:官府虽有令,市民未悉知。民知令则不犯,令不从则加刑,不令而刑不仁。工部遂将小秤交易之禁,榜示于市。

会试天下贡士 永乐二年(1404)二月十八日,礼部奏请会试选士的数额,按以往旧制,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余人,少者三十人。成祖以其初即位,准予按多数录取,后不为例。并强调,学者成材不易,当取其大略。至于文章略有语病而又无伤宏旨的,可以不必过于计较。但文体不尚虚浮,当取朴实。此年科学取四百七十二人。

始选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 庶吉士一官,设于洪武十八年(1385),当时是从进士中选拔,不专属翰林院管辖。永乐二年(1404)三月初八日,授一甲三人为翰林修撰、编修,成祖复命在第二甲中选择文学较好的杨相等五十人及写字好的汤流等十人为翰林院庶吉士,令其继续就学深造。此后不久,成祖又令解缙等选才思敏捷者就学文渊阁,解缙等选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及庶吉士杨相等共二十八人,以应二十八宿之数。庶吉士周忱,自称少年愿学,成祖非常高兴,于是增周忱为二十九人。成祖命司礼监每月供给他们笔、墨、纸,命光禄卿供给早晚餐,礼部每月每人给灯油费三锭,工部为其选择靠近文渊阁的房子居住,皇成祖经常来馆视察。他们五天一沐浴,由宦官随行。

立皇太子 成祖为燕王时,起兵靖难,世子高炽居守。次子高煦英勇善战,随父征战。高煦在白沟、东昌二战中立功。蒲子口之战,成祖战败,而高煦力战,取得胜利。成祖以为高煦像自己,甚为宠爱;而高煦亦以此自负,图夺嫡位。后来,议立太子,成祖有意于高煦。召邱福、王宁、解缙等密议。解缙说:"世子高敬仁孝,天下共知。夺长为乱道之行径。"成祖仍犹豫不决。文武群臣屡次奏请建太子,成祖不允。一日,群臣应制题《虎彪图》,图上画一老虎领众彪,作父子相亲状。解缙挥笔题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成祖明白其意,深受感动。遂于永乐二年(1404)四月初一日置东宫官属淇国公邱福兼太子太师,成国公朱能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蹇义兼詹事,工部右侍郎金忠为兵部尚书兼詹事,兵部右侍郎墨麟、工部左侍郎赵毅兼少詹事,四月初四日立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封高煦为汉王、高燧为赵王。诏告天下。成祖告诫皇太子说:要体恤上下,为善无间。学勿至迂,明勿至察,严勿至猛,宽勿至纵。谦卑逊志,容受忠良;勤俭安详,惠鲜众庶,以承宗庙,以保社稷。令蹇义、金忠等共同辅导太子。高煦不得立太子,又封国云南,非常懊丧,不肯远行。从此,更加忌恨解缙等人。

封应祖山南王 永乐二年(1404)四月十二日,封琉球故山南王从弟应祖为山南王。琉球在东南海中,自古不与中国来往。洪武初年时,此国家有三王: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皆以尚为姓,而以中山为最强,山南次之,山北最弱。洪武五年(1372),太祖遣使到琉球。随后,中山王朝贡在先,而山南、山北接踵而至,先后贡献不绝。中山、山南王又屡派子弟及寨官之子来中国,学习国学。建文帝即位,三王奉贡如故。成祖即位,诏谕如故。永乐元年,三王一同来贡,成祖赐他们冠带遣归。永乐二年二月,中山王卒,命世子武宁袭位。不久,山南王从弟应祖也遣使来报山南王丧,而山南王无子,请求传位给从弟。成祖应允,并派使者册封。

《文华宝鉴》书成 成祖曾命侍臣将古代的嘉言善行,足以为法鉴者,编辑成书,用来教授太子。永乐二年(1404)四月十四日书成,名《文华宝鉴》。成祖对皇太子说:修己治人之要,俱在此书中。帝王之道,贵乎知要,知要,便足以为治。成祖又对讲臣解缙等人说:皇考训戒太子,尝采经传格言为书,名《储君昭鉴录》。此《文华宝鉴》比起前书,稍加扩充,增加皇考圣谟大训,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法。若能守此,是以为贤君。又说:帝王之学,贵在切己实用。秦始皇教太子法律,晋元帝对太子讲授《韩非子》,而对帝王统治之道废而不讲,所以乱亡。本书所载都是大经大法,你们辅导太子,每天讲说,对他的品德事业定有好处。

卫所屯守军士比率的制定 永乐二年(1404)四月二十四日,更定天下卫所屯田守城军士比率:根据所在之地夷险要僻以量人之屯守为多寡。临边而险要之地,守多于屯;在内而夷僻之地,则屯多于守;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之地,屯亦多于守。

苏松大水 永乐二年(1404)五月,苏、松二府大水成患,吴江一带尤甚,低田尽没,农民车水救田,腹饥力竭,仰天而哭。壮者相率食糠杂菱芡荇藻,老幼入城行乞不得,多投于河。明廷定苏、松等府水淹处给米则例:每大口米一斗,六岁至十四岁六升,五岁以下不与。每户有大口十口以上者只与一石。其不属全灾内有缺食者定借米则例:一口借米一斗,二口至五口借米二斗,六口至八口借米三斗,九口至十口以上者借米四斗。候秋收后抵斗还官。

裁汰诸司冗员 永乐二年(1404)六月十八日,朱棣谕吏科给事中说:官冗则坐食者众,食众则力本者困。生息之道,在于节俭。我昨观吏部所录中外官数比旧额增加数倍。古人说官不必备,惟在其人。你将此意告知吏部,令诸司裁汰冗员,如此方能省国用、舒民力。据此,吏部尚书蹇义奏陈:在京各官,额外添设的送部别用,在外令所辖衙门严行考核。今年所取二甲、三甲进士,量留七十人,分隶诸司观政。各王府教授、伴读有缺,于第三甲进士中选用,其余全部遣归进学。朱棣允准施行。

封安克帖木儿忠顺王 永乐二年(1404)六月二十四日,成祖封哈密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哈密在嘉峪关西一千六百里,汉代属伊吾卢。元末,威武王忽纳失里镇守,不久,改封肃王。肃王死后,其弟安克帖木儿立。洪武中,太祖平定辉和尔地区,建安定等卫,逐渐逼向哈密。安克帖木儿异常惊惧,打算纳贡。这时,成祖即位。派官招谕,允许他们以马易物。哈密随即派人来朝,贡马一百九十匹。永乐元年(1403),安克帖木儿进京师,成祖大加赏赐。从哈密买马四千七百四十匹,从中选好马十匹入内厩,其余给戍边骑士。二年安克帖木儿来朝受封。明年,为鞑靼可汗鬼力赤毒死。

徙山西民实北京 永乐二年(1404)九月二十九日,徙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沁州、汾州民一万户实北京。

严行考察官吏 永乐二年(1404)九月二十九日,朱棣谕吏部尚书蹇义说:原顾虑各处守令未必皆得其人,遂命御史分巡考察。可是,据近日奏报,御史至郡,但坐公馆,召诸生及庶人等役于官者询问,据以为信。若如此考察,怎能得到实情。如入其境,田野辟,人民安,礼让兴,风俗厚,境无贫贼,吏无奸欺,即守令为贤。否则,即守令无所可取。且询言之弊非一端:人有好恶不同,则毁誉亦异。若只凭在官数人之言以定贤与不贤,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赂遗求誉,非直难辨。因此,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官吏贤与不贤,皆令具实绩奏报,严行考察,不得仅凭口头询问。

朱棣用人不疑 永乐二年(1404)十月初四日,有御史奏劾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擅窃威权。朱棣谕侍臣说:任人不安,则不能成功。况大臣奉命边塞,岂能尽拘文法;今当与宋晟讲明,使其释疑。与此同时,朱棣敕谕宋晟:御史奏你专擅,此言官欲举其职,而未谙事理。为将不专,则事功不立。我既命你督理边陲,事有便宜,即行而后奏陈。自古明君任将,率用此道。而忠臣事君,亦惟在成国家大事,不拘细故。何况我知你甚深,而委以重任。希望尽心边务,始终如一,建功立业。

天津卫的建立 因为直沽(天津)为海运商船往来要冲,成祖命于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置天津卫,屯守直沽。同时,由于海运只能抵达直沽,再用小

船运至北京，故命在天津置露屯一千四百所，用来储蓄物品。永乐二年十二月，置天津左卫。

脱脱袭封忠顺王　永乐三年(1450)二月，因忠顺王哈密安克帖木儿被鞑靼可汗鬼力赤毒死，朱棣便将自幼被俘居内地的脱脱(安克帖木儿之兄子)封为忠顺王，遣还哈密，借以控制其地。同时任命周安为忠顺王长史。脱脱不久即遣使贡马谢恩。

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　成祖即位之后，对惠宗去向众说不一，有人说他葬身火海，也有人说建文帝出逃海外，成祖即命郑和追踪。亦可借此机会炫耀武力，以示中国之强大。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郑和与王景弘奉命第一次出使西洋。其船队总共二万七千八百多人，分乘二百零八艘船，其中，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其次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船队由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刘家港)渡海到福建，又从福州五虎门扬帆启航，开始了长达两年多之远航。船队先抵占城，南航至爪哇。永乐五年(1407)，郑和自西洋还，路过旧港时，海盗陈祖义诈降，企图抢劫船队。郑和发兵擒获。由此海内振肃。船队继续西行，经过苏门答腊、南浡里、锡兰(今斯里兰卡)，到达左里(今印度科泽科德)。郑和在此地立碑，以作纪念。碑中写道：其国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这支庞大的船队由此返航，于同年九月回到国内。

宦官典兵　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六日，成祖派宦官山寿等率兵出云州北行，与武城侯王聪会兵，一出巡视边塞情况。每个士兵带着一个月口粮，每三十里置五个骑兵，以备有情况及时报告。山寿率兵，是宦官典兵之始。

赈济苏松湖嘉饥民　永乐三年(1405)，苏州、松州、嘉定、湖州屡遭水患，田土无收。朱棣遂于同年六月二十日命户部尚书夏原吉、佥都御史俞士吉等前往赈济饥民。他告谕道：四郡之民，连年遭受水患，今旧谷全无，新苗未成，老幼嗷嗷，饥馁无告。你们急速前往，督促郡县急发仓粮赈济。与此同时，发粟三十万石，并给饥民牛种。俞士吉至湖州，见该地拖欠税粮六十万石，决心奏陈。然地方官恐获斥责，意欲掩盖真相，乞请士吉以小数上报。士吉毅然说：欺君病民之事，誓不能为！遂如实奏报朝廷，拖欠税粮全部获免。至同年九月，免除上述四处水灾田租三百三十八万石。

免除户口食盐纳钞法　户部曾以钞法不通，是因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为由，请求暂行计口食盐纳钞法，即大口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计其半。至永乐三年(1405)六月二十日，农民深感不便，纷纷上奏，朝廷才下令免除户口食盐纳钞法。

严禁收藏方孝孺诗文　永乐初年，朱棣诏告天下，凡收藏方孝孺诗文者，罪皆至死。庶吉士章朴与序班杨善友善，遂说家藏有方孝孺诗文，杨善便借来阅览。永乐三年(1405)十一月，章朴坐事与杨善一同入狱。杨善便告发章朴家藏有方孝孺诗文。朱棣大怒，立即诛杀章朴，而恢复杨善官职。其时，有方孝孺门人王稌，隐居山中，誓不为官，辑方孝孺遗文，名《侯城集》，得以行世。

沐晟征讨八百诸寨　八百，亦称八百大甸，以其部落酋长有妻八百而得名，又以八百媳妇各领一寨，而称八百媳妇国，位于今泰国北。洪武二十一年(1388)开始入贡，朱元璋遂置宣慰司于其地。永乐元年(1403)又置二军民宣慰使司，以土官为宣慰使，令五年一贡。后内官奉命招谕孟定、孟养等部，途经八百大甸，为士兵所阻。朝廷遣使敕谕，无济于事。遂于永乐三年(1405)命云南镇守西平侯沐晟率兵征讨。同年十二月初六日，沐晟奏言，已破八百诸寨，其土官宣慰使等遣人至军门伏罪。朱棣即令沐晟班师。

驿馆的设立　朱棣即位以来，与外国多所交往，以至贡使日益增多，遂于永乐三年(1405)在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设立驿馆。福建驿馆称来远，浙江驿馆称安远，广东驿馆称怀远。借以接待诸番贡使。

开原广宁马市的设立　其初，外番以马在边塞之地出卖，朝廷命地方衙门以高价收买。于是前来售马的人日益增多。永乐四年(1406)三月初四日，在辽东开原、广宁等处设立马市，一在开原南关，接待海西商人；一在开原城东，一在广宁，接待朵颜三卫商人。由千户答纳失里主持其事。不久，城东、广宁马市废弛，唯有南关马市犹存。

安南胡查袭杀陈天平　永乐四年(1406)正月初七日，故安南国王陈日煃弟陈天平辞归，朱棣赏赐，并封胡查为顺化郡公，尽食所属州县。同时令广西镇守黄中率五千兵护送。三月十六日，天平等至丘温，不见胡查来迎，只有陪臣黄晦卿来接，并以胡查有疾，在嘉林奉迎。后前行将至芹站，因山路险峻，林木茂密，军士难行，不得成列。突然，伏兵大发，袭杀天平。由于桥被斩断，不得前进。黄中奏报，朱棣大怒，遂议兴师讨伐。派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安南平定。

设云南宣抚使司　永乐四年(1406)六月，大古剌等地土酋泼的那浪派人上奏说，他们有七个邻邦，即大古剌、小古剌、底马撒、茶山、底板、孟伦及八家塔。他们以前从来不和中国交往。现在听朝廷说要

有恩于民，都愿归属，请求朝廷派官统理。成祖采纳其建议，并诏设云南宣抚使司二处，长官司五处。由于大古剌、底马撒二处地域广大，各置宣抚使司；小古剌、茶山、底板、孟伦、八家塔各置长官司。以泼的那浪为大古剌宣抚使，腊罔帕为底马撒宣抚使，张早等人为小古剌等地长官使。

诏建北京宫殿 永乐四年（1406）闰七月初五日，淇国公丘福等文武大臣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朱棣遂下诏：从永乐五年五月开始建筑北京宫殿。同时遣工部尚书宋礼往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往湖广、户部左侍郎古朴往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往浙江、右佥都御史仲成往山西督理军民采木。人月给米五斗、钞三锭。命泰宁侯陈珪、北京行部侍郎张思恭督理军民匠造砖瓦，人月给米五斗。命工部征天下色匠、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选军士，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民丁，于明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半年更代，人月给米五斗。其征发军民之处，一应差役及闸办银课等项，全部停止。

苑马寺的设立 永乐四年（1406）九月初六日，设陕西、甘肃二苑马寺。寺设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一员（正四品）、寺丞一员（正六品），首领官主簿一员（从七品）。寺统六监，而每寺先设二监：甘肃苑马寺设祁连、甘泉；陕西苑马寺设长乐、灵武。每监统四苑。监设监正一员（正七品）、监副二员（正八品）、录事一员（未入流）。苑视其地广狭分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马一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圉长（从九品），一圉长率五十夫，每夫牧马十匹。未设的八监、四十苑，命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根据地理条件，次第设置。同月二十六日，又设北京、辽东二苑马寺，各辖六监。

哈立麻人朝封大宝法王 哈立麻即噶举派噶玛噶举黑帽派传承系统五世得银协巴。朱棣做燕王时就闻其名，且有道术，善幻化。永乐元年（1403）四月，朱棣即派司礼少监侯显、僧人智光往西藏迎请哈立麻。永乐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哈立麻随侯显到京师南京。次年二月初五日，哈立麻率僧徒在吴谷寺替朱元璋和马皇后荐福，朱棣遂于三月初三日封哈立麻“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赐印、诰及金银等物，十分丰厚。随哈立麻而来的三位僧徒亦受封灌顶国师。永乐六年四月，哈立麻辞归，朱棣又赠大量礼物，并派中官护送。这是明廷所封的第一位法王。

琉球遣子弟人国学 永乐四年（1406），琉球中山王遣寨官子弟六人入国学。并献阉竖数人。朱棣说：此数人亦为人子，无罪而受刑，于心何忍！命礼部遣还。礼部臣奏：若不收此阉竖，恐阻其归化之心。请皇上赐敕止其再进。朱棣说：谕以空言，不如示以实事。今若不遣还，他们还会继续进献。天地以生物为心，帝王怎能绝人之后！仍令礼部遣还。

严禁削发为僧 永乐五年（1407）正月十六日，直隶及浙江诸郡军民子弟，私自削发为僧、赴京冒请度牒的就达一千八百余人。礼部如实奏报。朱棣大怒说：祖宗早有定制，民年四十以上才许出家为僧。今犯禁如此之多，是不知有朝廷之举。立即命将千余人全部送至兵部编籍为军，发戍辽东、甘肃。为此，朱棣叹息地说：我遵奉祖制，丝毫不敢忽略，而下人当纵肆如此，何况后来。此不可宥。可惜此举皆民螟虫，不可蓄育。

浔柳土司起事 永乐五年（1407）二月，广西浔州（今广西桂平）、柳州等地土司起事。朱棣命广西总兵官都督同知韩观在交趾各堡筹备军队，移师讨剿。韩观与都指挥同知朱广、都指挥佥事方政等商议，分兵两路进军。朱广、方政率湖广等地兵攻庆元、宜山、新城、思思、河池等县，韩观率云南等处兵从柳州出发，攻马平、来宾、迁江、宾州、上林、罗城、融县等地，双双获胜。后韩观与朱广会师，联合攻打永福诸县。杀死一万多人，生擒黄南等一万三千余人，遣返男女一百二十多人。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平定，遂班师。

交趾都布按三司的设立 永乐五年（1407）六月初一日，朱棣以平定安南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设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以都督佥事吕毅署都司事，黄中为副；前工部侍郎张显宗、福建右参政王平为左右布政使；刘本、刘昱为左右参政，周观政、裴伯耆为左右参议；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为按察使，杨直为按察副使，刘有年为按察佥事。工部尚书黄福兼署布政、按察二司事。下设十五府，分辖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又设五直隶州，辖二十九县，属布政司。要害处所，均设卫所控制。同时命吏部左侍郎陈洽持符验二千道，铨选交趾官吏。

徐皇后逝世 徐皇后（1362—1407），中山王徐达长女，幼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洪武九年（1376）册封燕王朱棣妃。靖难兵起，李景隆围攻北平，徐氏激劝将校士民妻皆授甲登城拒守。朱棣即位，册为皇后，屡有建言，曾对朱棣说：当世贤才良将，皆系高皇帝时的功迹卓著之臣，千万不可以新间旧。朱棣嘉纳。徐氏还采《女宪》、《女诫》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

在病榻之上仍劝朱棣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毋骄纵外家。永乐五年(1407)七月初四日卒，年四十六。

安南献俘 永乐五年(1407)九月二十五日，交趾总兵官张辅、左副将军沐晟等派都督佥事柳升、都指挥鲁麟等，押解俘虏伪大虞国上皇黎季犛、伪皇帝黎苍、伪卫王黎澄、伪梁王黎漴、伪新兴郡王黎注、伪太子黎芮等二十五人至京师。成祖对黎氏父子弑君篡位、欺骗朝廷十分恼怒，在廷上对黎氏父子严厉斥责。黎氏父子虽叩头谢罪，终因其罪难赦而被逮下狱。其子孙皆予赦免，并给衣廪。

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 永乐五年(1407)冬，郑和奉命第二次出使西洋。船队经占城、暹罗、爪哇、锡兰，直达印度半岛西岸的阿枝(今印度柯钦)、左里。郑和在锡兰时，向佛寺布施了金、银、苎丝、绢、织金苎丝宝幡、香炉、花瓶、烛台、灯盏、香盒、金莲花、香油、蜡烛、檀香等物。永乐七年二月初一日，郑和于此地立一石碑，史称郑和锡兰碑。同年夏回国。

胡濙奉诏寻惠帝 朱棣对建文帝逊国之事怀疑不决，特于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命户部给事中胡濙以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为名，走遍州郡乡邑。实则暗查建文帝的去向。胡濙在外十余年，至永乐十四年才回朝。但建文帝的下落，终无结果。

《永乐大典》修成 永乐元年(1403)七月，朱棣对学士解缙说：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而篇帙浩繁，难以检阅。我想悉采各书所载事物，按类编排，而统之以韵。《韵府群玉》、《回溪史韵》二书，事虽有统，但记载太略。你们可将有书契以来的经、史、子集、百家，以至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辑为一书，不厌浩繁。解缙等奉命而行。于永乐二年十一月编成进呈。朱棣赐名《文献大成》。不久，朱棣又嫌所收事物，尚多未备。遂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与解缙等重新编纂，同总其事。又命学士王景、王达等五人为总裁，侍读邹辑、修撰梁潜、曾棨等二十人为副总裁，儒士陈济为都总裁，征调中外官及四方老宿文学之士充纂修，选善书的国子监及郡县生员为缮写，共九千一百六十九人，开馆于文渊阁，由光禄寺供饮食。同时派官员分行天下，搜求遗书，以备收录。历时五春秋，于永乐五年十一月修成，改名《永乐大典》，朱棣亲为之序。全书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〇九十五册，收录各类图书七八千种。以韵排次，即按韵母分列单字，按单字以次编入与此字相联系之史籍，便于检阅和利用。成为空前的一大类书。全书有正副本，正本藏文渊阁，副本藏皇史宬。明亡之际，正本毁没；至清咸丰时，副本亦渐散失。它是我国历史上最大一部类书。

朱棣遣使别失八里 鸿胪寺丞刘帖木儿不花等出使迤西还奏：本雅失里初居撒马尔罕，后奔别失八里。鞑靼阿鲁台杀鬼力赤，迎本雅失里为可汗。边将亦奏报：若本雅失里被迎立为可汗，拥其北行，必骚扰边境，请选劲骑出塞伺机袭击。朱棣得奏说：本雅失里若被立为可汗，亦未能大肆其志。可先遣人暗中观察其动静。于是，永乐六年(1408)正月初五日，遣太监王安出使别失八里。同时敕谕总兵官何福等遣人往哈密等处买马，借以侦察本雅失里。并令所遣之人与王安相联络；迤西诸卫所发兵护送。六月二十二日，王安奏报：本雅失里从地道北行，不经哈密，令其所部鞑靼十八人在哈密窥探边事，被忠顺王脱脱羁留。朱棣令将鞑靼人交何福询问，赐赉遣还。遂召王安回京。

开嘉定盐井 四川叙州府(今四川宜宾)南溪县民报闻，嘉定州(今四川乐山)犍为县有四盐井，可开采煎盐。朱棣命户部派人前往查验，果如其言。于是永乐六年(1408)正月初五日，遂命开采，一年可得盐十万〇九千八百斤。

严禁军官贸易 永乐六年(1408)正月十四日，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奏陈：都指挥单政骄恣违法，擅令家人出境易马，乞请惩处，朱棣说：春秋人臣无外交，今军人胆敢为贸易事，如稍有不平，争竞启隙。此事关系重大，虽有功亦不能宽容。遂命捕其入狱，严加惩处。

朱棣告谕功臣子弟习射 永乐六年(1408)二月三十日，朱棣告谕兵部尚书金忠、定国公徐景昌：过去勋业之臣，皆奋起行伍，身历战阵，积累勤劳，致有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谨事朝廷，以致长保富贵。及其子孙，沉于安逸，骄奢淫酗，忘祖父之艰难，玩贪岁月，不习骑射。一遇阅试，手足无措，反用私贿侥幸承袭；一遇征调，百计营免，不能免的，至临阵对敌，畏怯疲懦，堕马弃枪，魂飞胆丧。此皆系骄肆不教之过。自今以后，若初试不中式，罚本卫所充军三年；复试不中，谪戍边防，另选有才能技艺子弟承袭。并移文天下周知。

朱棣书谕本雅失里 永乐六年(1408)三月十二日，本雅失里将立为鞑靼可汗，朱棣为与其联络，且晓以利害借以离间。遂再遣刘帖木儿不花以书谕本雅失里。他说：自元运既讫，顺帝后至爱猷识理达腊至坤帖木儿共六世，瞬息之间，未有一人善终。你保身以终亦为难事。我皇考高皇帝于元氏子孙，加意抚恤，来归之人皆令北还，如遣脱古思帖木儿归，嗣

为可汗。此南北人所共知。我心亦如皇考之心。兹元氏宗祧不绝如线。去就之机，祸福由分，你可审慎处之。若能幡然来归，我将加之封爵。本雅失里未有相应表示。

云南始行乡试 永乐六年(1408)四月十八日，云南监察御使陈敏言上奏：云南自洪武中设立学校，教养生徒，今郡县诸生多有资质秀美、通习经义，应如各布政使司三年一开科取士。并言师儒之职为后学矜式，而云南郡县学校之官多用土人，学问肤浅，容止粗鄙，不称师范。应别用经明行修之士，方可教育有法。朱棣允准，诏云南自当年八月举行乡试。

日本国献贡海寇 永乐六年(1408)，海寇继续逞虐海上，时日本国源道义为国王，遣人搜捕，获寇数人。五月五日，源道义遣僧圭密等百余人入朝，进贡方物，并献所获海寇。成祖命将海寇交刑部，并赐圭密钞百锭，钱十万，彩币五、表里僧衣一袭。赐其随从有别。

朱棣诏罢北京不急之务 永乐六年(1408)六月初三日，朱棣诏谕北京文武诸司群臣：北京军民数年之前，或效力戍行，或供亿师旅，备历艰难。平定以来，劳苦未苏。而营建北京，国之大计，不得不重劳百姓。自今北京诸郡不急之务，及诸买办，全部停止；流移未归之民，免赋役三年；报效靖难之家，厚加抚恤。又谕泰宁侯陈珪及北京行部：方今盛暑，赴工军民，宜厚加抚恤，以时作息饮食，无过于劳累；若有疾病，及时给予医治。

交趾设置 永乐六年(1408)六月十二日，吏部尚书蹇义等奏报交趾设置：建设军士卫门总四百七十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卫十，千户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零八，市舶司一，巡检司一百，税课司局等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获蛮人二百零八万七千五百，粮储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象马牛共二十三万五千九百余只，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二件。

江西广信府瘟疫 永乐六年(1408)七月，江西广信府玉山、永牛二县疫，死一千七百九十余人。九月，户部奏陈：江西建昌、抚州及福建建宁、邵武，自去年至今年正月，疫死七万八千四百余人。十月，江西广信府上饶县疫，死三千三百五十余户。

北京会同馆的设立 永乐六年(1408)八月初六日，设立北京会同馆，馆址为原顺天府燕台驿。设大使、副使各一人。负责接待少数民族官员及外国使臣，掌管通译、伴送、点视贡物及在馆互市等事。

交趾简定起兵 永乐六年(1408)八月初十日，交趾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上奏：简定、邓悉等聚众作乱，请派援兵剿之。简定，为交趾陈氏旧臣。明军初讨交趾时，简定投降。在遣赴京师之前与陈希葛逃脱。与化州邓悉、阮帅等聚众起兵。众人推简定为王，年号兴庆。来往于乂安、化州山中，造兵器、招人马。明军撤兵，他们出击，攻下盘滩、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之要道，骚扰交趾近城，而慈廉、威蛮、上洪、大堂、应平、石室诸州皆响应。官军虽屡出而无功，奏请援兵。成祖以为交趾初入版图，人心不定，贼寇兴起，若不及时灭剿，恐怕滋生蔓延，成不可制之势。遂命发云南、贵州、四川都司，成都三护卫共四万军兵，命黔国公沐晟为征夷将军，从云南出发，前往征讨。仍命兵部尚书刘俊往赞军事。敕交趾都司都督佥事吕毅整兵听调，同时，备水军二万及舟楫器械待用。之后，成祖又遣使谕简定旧顺，"既往之愆，悉赦不问"。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沐晟率军与简定军初战生厥江，官军败绩。都督佥事吕毅、兵部尚书刘俊、交趾布政司参政刘昱皆死。

浡尼国王来朝 浡尼国(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位于西印度洋，是一岛国。永乐六年(1408)八月二十日，浡尼国王麻那惹加那率人入都朝见。成祖慰劳再三，并命将王妃所进中宫笺及其他方物，陈列于文华殿。国王进献完毕，自王及妃以下都被赐予冠带、袭衣。之后，成祖又大宴国王于奉天门，妃以下宴于他所。礼毕，将他们送至会同馆。又赐国王仪仗、交椅、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等。同年十月，浡尼国王于会同馆逝世。成祖哀悼，辍朝三日，并遣官致祭。葬于安德门外石子冈，树碑记之。并在墓旁修祠，春秋祭奠，谥号恭顺。其子遐旺奉敕继位。

吕毅战死 吕毅(？—1408)，项城人。以济南卫百户从朱棣渡江，积功至都督佥事。永乐四年(1406)征安南充右副将军，以功掌交趾都司事。六年八月简定起事，从沐晟征剿，十二月二十四日，战于生厥江，深入陷阵而死。

土鲁蕃僧清来等人朝 土鲁蕃离哈密一千余里，距嘉峪关二千六百里。永乐六年(1408)，其国蕃僧清来率领弟子法泉等来朝贡。成祖为化导土鲁蕃人之习俗，授清来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其弟子七人并为土鲁蕃僧纲司官，赏赐甚丰。从此以后，其弟子来朝贡者络绎不绝，进贡名马、海青等物。成祖亦遣使奖赍。

朱棣论治国安民之道 永乐七年(1409)正月初三日，北京行部及天下布政司、府州县官来朝的一千五百四十二人还任，朱棣告谕道：君国之道，以民

为本。因此设官分职，简贤用能，目的在于安民。为臣者若能体其君爱民之心，付诸行动，天下之民即可得其所。文武群臣，受国家委任，应操节励行，尽诚竭虑。治民之官，专务恤民；治军之官，专务恤军。察其饥寒，体其劳勤。为其除害兴利，教以务本力业，孝悌忠信，尊君亲上，敦行礼义，无作违法之事，才能永享太平之福。

申严边关茶禁 洪武五年(1372)二月，于秦洮河雅等处设茶马司，以川陕茶易西番马。其时，上马给茶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永乐初，朱棣为招致远人，递增其数，致使西番市马日多，而茶经常告匮。至永乐七年(1409)，碉门茶马司用茶八万三千零五十斤仅易马七十匹，而且多为瘦弱。于是，朱棣在同年正月初八日，命户部申严边关茶禁。同时设洮州、甘肃二茶马司，加强以茶易马事务的管理。

朱棣赐元宵节假 永乐七年(1409)正月初十日，以元宵节临近，朱棣谕礼部官：高皇帝法度明备，我恪遵成宪，令四方无虞，民物康阜，思与臣民同乐太平。自正月十一日起，赐元宵节假十日，百官朝参不奏事，有急事具本封进处分；许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著以为令。

朱棣北巡 永乐六年(1408)八月初一日，朱棣即决定北巡，命礼部、翰林院议定巡狩之仪。十一日，诏告天下：将于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监国。亲王只离王城一程迎候，官吏军民于境内朝见，非经过之处，毋得出境。凡道途供应皆已节备，有司不得有所进献。不久，命礼部颁巡狩礼。并行各省：凡有重事及四夷来朝进表，俱达行在所，小事达京师，启皇太子奏闻。永乐七年二月初八日告北巡于郊庙社稷，初九日成行，命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左春坊大学士黄淮、左谕德杨士奇留辅太子；户部尚书夏原吉、右谕德金幼孜、翰林学士胡广、右庶子杨荣扈从。三月十九日至北京。

城门郎的设置 永乐七年(1409)二月初三日，朱棣命在京二十五门置城门郎，正阳、朝阳、通济、聚宝、太平、三山、石城、金川、仪凤九门为内门，每门设城门郎二人；江东、驯象、安德、凤台、双桥、夹冈、上方、高桥、沧波、麒麟、仙鹤、姚方、观音、佛宁、上元、金川十六门为外门，每门设城门郎一员，皆正六品，选武职舍人充任。同月二十五日，皇太子召各城门郎告谕：朝廷设城门郎，专以关防守备，毋受制于权豪。不可纵奸人，亦不可阻平人。宜尽其职。将别遣人巡视，不能尽职者受罚。永乐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罢京师城门郎而不设。

再征简定 永乐六年(1408)十二月，沐晟征剿简定失利，乞请援兵，于是，朱棣于永乐七年二月初九日命英国张辅佩征虏副将军印充总兵官，清远侯王友为副，发南畿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广西等卫所军四万七千人赴交趾，会同沐晟，协力征剿简定。五月二十日，张辅率兵屯北江之仙游造舟，招周围郡县逃民复业。而此时，简定已称大越上皇、从子陈季扩称皇帝，改元重光。至八月初二日，简定兵来攻，张辅遣仪真、徐政接战，徐政督兵殊死战斗，简定兵败去，而徐政中飞枪身亡。同月二十一日，张辅转战于咸子关，简定将阮世海率众二万、列船六百余艘来战，张辅调兵遣将，乘船齐进，炮矢并发，斩首三千余级，溺死不计其数，生擒二百余人，获船四百余艘。阮世海收集败兵，退保黄江。张辅乘胜进击，遂平定交州、北江、谅江、新安、建昌、镇蛮等府。九月，张辅又率兵至太平海口，大败简定将邓景异。由于简定兵屡战屡败，陈季扩恐惧，遣人至张辅军中，自言为陈氏之后，请求封王，张辅痛斥道：奉命讨贼，不知其他！遂斩使者段自始，遣朱荣、蔡福等以步骑先行，张辅亲率舟师紧随，自黄江至神投海，会师清化，分道入磊江。于十一月初十日，在美良山中生擒简定及党羽，械送京师伏诛。十二月二十八日，朱棣令张辅班师。

柳升大败倭寇 永乐七年(1409)三月二十九日，总兵官安远侯柳升奏报：奉命率兵至青州海中灵山，遇倭寇，与之交战，斩杀及溺水而死的不计其数，倭寇仓惶乘夜逃去。后与平江伯陈瑄追至金州白山岛等处、浙江定海卫百户唐鉴等亦追至朝鲜义州界，不见踪迹。朱棣令柳升等还师。

海寇劫钦州 永乐七年(1409)四月十日，海寇阮瑶等进犯钦州，在长墩、林墟抢劫。巡检任宣等率兵抵御，为寇所败。阮瑶等遂焚房舍，毁寨栅，饱掠而去。巡海副总兵官指挥李珪派雷州卫指挥陶英等率军追击。双方展开激战，阮瑶大败，被斩及溺死无数。获船二十七艘，生擒一百六十人。

朱棣戒谕皇太子 永乐七年(1409)四月十八日，朱棣在北京得知皇太子谴责大臣，便赐书戒谕：我命你监国，凡事务必宽大，严戒躁急。大臣有小过，不要遽加折辱；亦不可偏听以为好恶，育德养望，正在此时。天下机务之重，悉宜审察而行，稍有疏忽，遗害无穷。二十七日，又赐太子书：优容群臣，勿任好恶。凡功臣犯罪、调发将士，必须奏决。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 永乐七年(1409)闰四月初七日，朱棣应奴儿干卫官员于其地建立元帅府的请求，决定正式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六

月增置经历司，设经历一员。经过一段筹备之后，于永乐九年春，由宦官亦失哈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护送康旺、王肇舟等官员，至亨滚河对岸的特林，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从而成为直属朝廷、军政合一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管辖辖区的军政事务，统属其众，岁贡海青等物，仍设驿站递送。标志明王朝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

封蒙古瓦剌部诸王 瓦剌原在叶尼塞河上游，一直受元分封，且可与元皇室通婚。元末瓦剌已向西发展，至阿尔泰山以西。元亡后，猛哥帖木儿占据瓦剌。他死后，瓦剌部落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首领控制，势力日盛，与蒙古阿苏特部领主阿鲁台相仇杀。朱棣为利用矛盾，削弱、牵制阿鲁台的势力，遂于永乐七年(1409)五月二十四日，成祖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

丘福征本雅失里全军覆没 永乐七年(1409)六月初十日，百户李咬住及伯兰奏报：给事中郭骥奉命出使，被本雅失里诛杀。又奏：本雅失里、阿鲁台近被瓦剌击败，今逃至胪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准备驱败散之卒掩袭兀良哈诸卫，再侵扰边境。朱棣大怒说：我以诚相待，遣使还其部属。居然执杀使臣，欲肆剽掠，必将歼除。遂命将士严守边境。二十六日谕甘肃总兵官何福，令其整饬士马以待。且告知将遣将率兵征剿本雅失里之意。七月初三日，朱棣命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总兵官，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为副，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率精骑十万，北讨本雅失里。告谕丘福毋失机，毋轻战，一举未捷俟再举。同时遣谕本雅失里，指斥其杀使者、肆剽掠的罪恶。八月，丘福出塞，率千余人先至胪朐河，遇虏前锋，遂遣轻骑千余进击，虏败逃遁，丘福乘胜渡河，获一尚书，询问本雅失里处所，答称自此北去三十里。丘福大喜，急忙发兵追击。诸将建言不可轻进，先遣军士侦察，待大军聚集后发兵。丘福不听，以尚书为先导，进至虏营接战，相持一日，虏兵败退。丘福更加自信，命火真使诈与虏和，自率轻骑继其后，火真犹豫不决，丘福厉声说：不从命就地处斩！先驱而行，诸将士勉强相从，行不数里，本雅失里挥兵而来，包围数重。王聪率五百骑突阵，斩杀数百，死于战阵。丘福、李远被执，不屈而死。王忠、火真亦战死。同月十五日全军覆没。朱棣得报震怒，以诸将无一能任，遂决计亲征。

李法良起义 永乐七年(1409)，江西人李法良以传弥勒教为掩护，在湖南湘潭率众起义，应者云集。事起以后，丰城侯李彬发江西、湖广兵剿之，李法良转战江西安福，后败走吉水。同年九月初二日李法良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 永乐七年(1409)九月，郑和奉命第三次出使西洋。此次率海舶四十八号，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由太仓刘家港起锚，至福建长乐太平港稍事停留，于次年春从五虎门出洋。首抵占城新洲港，再南航至爪哇，西进满剌加，经阿鲁、苏门答腊、南浡里抵锡兰。分派一支船队访加勒异(今印度半岛南部东岸)、阿拨巴丹、甘正里；自率宝船小葛兰、阿枝、古里。返回经过锡兰。阿烈苦奈儿诱郑和至国中，令其子纳言索要宝货，郑和不予。遂暗中发兵五万余人出劫郑和，且断其归路。郑和出于自卫而用兵。他深机密策，令众官兵衔枚疾走，趁夜半之际，发信炮，奋勇杀入，生擒阿烈苦奈儿。于永乐九年六月十六日回京献俘。朱棣将其释放归国，受到诸国的钦佩。

张辅再讨陈季扩 永乐八年(1410)正月二十六日，张辅奉命班师之前，再次率兵征讨陈季扩，其时，季扩困守义安，而其党阮师桧与金吾上将杜元措等别据东潮州之宜阳社，师桧被拥立为王，有兵士二万余人。张辅乘机进剿，斩杀四千五百余人，擒其党羽范支、陈原卿、阮人桂等二千余人，全部斩首。据此，张辅奏陈：季扩、邓景异等尚在演州、义安，近逼清化，而遣兵驻守神投、福成江口，踞清化要路，出没义安诸处。若诸军班师，恐沐晟兵少不敌，请留都督江浩、都指挥俞让、花英、师祐等军协助沐晟守御。朱棣允准。二月初一日，又敕沐晟仍任征夷将军，充总兵官，云阳伯陈旭为副总兵官，再征交趾季扩等。五月，沐晟出兵，与季扩战于虞江，大败陈季扩。季扩恐惧，夺路而逃。晟率兵追至古灵县及会潮、灵长海口，斩首三千余级，俘获其将军黎弄。季扩闻信更加恐慌，只得上书求降。十二月，陈季扩被宽恕免罪，并为交趾右布政使。

朱棣第一次北征 永乐七年(1409)八月，淇国公丘福奉命征剿本雅失里，因轻敌冒进，惨败于胪朐河，全军覆没。朱棣得报大怒，决计亲征。十月初一日，即召诸将议北征之策。永乐八年二月初一日，命皇长孙留守北京，户部尚书夏原吉辅导，兼掌行在部院事。初五日以北征诏告天下。初十日北征师发北京。由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扈从，靖远侯王友将中军，安远侯柳升为副；宁远侯何福、武安侯郑亨将左右哨，宁阳侯陈懋、广恩伯刘才将左右掖，都督刘江等为游击将军，充作先锋；又命薛录、冀节等为骠骑将军，侯镛、陈智等为神机将军，金玉等为鹰扬将军，李文等为车骑将军，分督其属，不隶五军。总五十万众，浩浩荡荡，出德胜门，向北进发。三月初

二日，师集兴和，大阅誓师。五月初一日至胪朐河，朱棣兴之所至，赐名饮马河，名河上平地为平漠镇。同月初三日，遇虏骑进击，得箭一枚，马四匹而还。十七日，得知虏寇与此不远，遂令大军渡饮马河。本雅失里逃遁，朱棣率轻骑追至斡难河，与之接战，本雅失里失败，仅以七骑逃去。明军追击不及而还。二十日，朱棣令分兵追击阿鲁台。阿鲁台占地利之便，时战时退，明军无奈。又遣人召降，阿鲁台犹豫不决。相持多日，时有小胜。但因天气炎热，士兵饥渴，不能持久才于六月下令班师，七月十七日回到北京。

云南召商中纳　永乐八年(1410)三月二十九日，户部左侍郎古朴奏陈：云南所属，边储困缺，请以黑、白、安宁等盐井，不拘次第，召商中纳。规定：大理五井盐每引米一石三斗，黑盐井每引米二石；金齿黑盐井每引米一石五斗，安宁盐井每引米二石；景东白盐井每引米一石五斗。皇太子允准施行。

讨平阿剌马牙　永乐八年(1410)五月二十一日，回回阿剌马牙杀都指挥刘秉谦等，占据肃州(今甘肃酒泉)，反叛，并约赤金蒙古为援。赤金蒙古念明皇厚恩，不应，并率部下擒阿剌马牙之兵六人交给明朝。成祖大喜，重重嘉赏，改赤金蒙古千户所为卫(今甘肃玉门)，授其长塔力尼为指挥佥事，并为他的部下三人封官。至此，阿剌马牙孤军奋战，被千户朱迪等讨平。

河溢开封　永乐八年(1410)八月十九日，黄河发水，开封受灾。毁坏城墙二百余丈，淹没农田七千五百余顷，百姓受灾者达一万四千余户。朱棣特遣工部侍郎张信往视。十二月初三日，兴工修开封城。

榜禁列侯都督中盐牟利　永乐八年(1410)十月初二日，行在左副都御史李庆奏陈：公侯、都督，往往令家人子弟行商中盐，凌虐运司及各盐场官吏，倍数多支。朝廷申明旧制，四品以上官员之家，不许与民争利，已令罢支。朱棣令户部榜谕禁止。

《务本之训》书成　永乐八年(1410)十月初十日，朱棣作《务本之训》书成，赐皇长孙。朱棣以皇长孙生长深宫，为使其知稼穑之艰难，因巡幸北京，令其侍行，以便历观风俗民情及田野农桑勤劳之事，而知国用所需皆出于此。为民之君，宜加悯恤。且举高皇帝创业之难及往古圣贤之君、昏庸之主、兴亡得失等可为鉴戒之事，编辑成书。名《务本之训》，赐皇长孙。

开浚会通河　会通河，为元朝漕运故道，因年之淤塞，不能通漕。洪武中，沙岸冲突，河道淤塞。不得不于陆路置八递运所，用民丁千吉人、车二百余辆，岁久民困。永乐初屡有奏言，议开河济运。朱棣念民困未苏，不予批准。永乐九年(1411)二月二十八日，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奏陈：会通河全长四百五十里，而淤塞处不过三分之一，浚而通漕，不仅可免百姓转运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朱棣遂敕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前往查勘。还奏疏浚之便。且言天时转暖，宜及时兴工。于是，朱棣再遣侍郎金纯发山东及直隶徐州、应天、镇江等府民丁三十余万，给粮赏而蠲免其他徭役及今年田租。命宋礼总督开浚。宋礼采纳汶上老人白英之计策，筑坝城及东平(今山东东平)之戴村坝，遏制汶水，使之南无入流，北不归海。汇诸泉之水尽出南旺湖。中分二道，以四分水流接徐水、沛水，六分水流达临清。利用南汪地势之高，使其水南北分注。又倚地势，置闸三十八座，因时不同，可蓄可泄。历时二百天，至六月二十六日竣工。从此，漕运畅通，遂罢海运，公私两便。

疏浚黄河故道　黄河自洪武年间在原武(今河南原阳)决口以来，会通河淤积；而元代贾治所治故道亦淤。黄河水自此南迁，则河南受灾独重。开封水灾，张信奉命视察，发现在祥符(今河南开封附近)鱼王口至中滦下二十余里处，有黄河故道，河岸与现在河面平，如果疏浚，使黄河之水仍循故道，则水势可减。并绘图上奏。朱棣采纳其议。命兴安伯徐亨、侍郎蒋廷瓒与金纯前往督理疏浚由宋礼总其役。动用民丁十万人，永乐九年(1411)三月开浚，七月二十六日竣工。自封丘、金龙口、下鱼台、塌场会汶水，经徐、吕二洪，南入于淮，此时，会通河已开浚，黄河与之会合，漕道既通，而河南水患亦稍息。

张辅沐晟会兵讨交趾　永乐九年(1411)七月十七日，张辅督兵二万四千，与沐晟会兵讨交趾余寇。其时，季扩党阮师据月常江，树桩四百余丈，两岩置栅二三里，列船三百余艘，设伏山右。张辅、沐晟率军水陆并进。阮师、邓景异来拒。张辅令朱广等连舰拔栅以进，自率方政等以步兵剿其伏兵，水陆夹攻，阮师等皆败走，生擒其党邓宗稷、黎德彝、阮轩等，获船一百二十余艘。十一月初六日，又大败陈季扩于生厥江，杀一千五百余人，余众散走林泽之中，追击剿捕。此役季扩兵几乎全军覆没。十年八月初一日张辅驻舟师安谟海口，遥见贼舟由大安入神投海，即率方政等攻击。此时，贼舟四百余艘，分三路，出神投海外。双方激战四小时，生擒其大将军陈磊、龙虎将军邓汝戏及黎目等七十五人，兵士千余人，斩杀、溺死者不计其数。阮师等望风溃逃。张辅即督兵出海追击不及而还，遂械送邓汝戏等三十五人至京师，其余全部处斩。又进军乂安，少保潘季祐等来降，奉命授其为按察副使署乂安府事。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

合军在爱子江大败季扩军，擒获甚众。唯季扩、阮师逃走。直至永乐十二年三月，张辅追擒季扩于老挝，遂擒季扩及其党，械送京师。长达数年的征剿交趾之役，至此告一段落。

重修《太祖实录》 朱棣初即位之时，即命前监修官李景隆、茹瑺等修撰《太祖实录》。但因其心术不正，加之限期迫近，所修未能精详。因此，朱棣于永乐九年(1411)十月十七日下诏重修。又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为总裁、纂修等官。《太祖实录》自建文至此凡三修。

浙江海溢 永乐九年(1411)十一月，浙江海溢，自海门(今浙江海门)至盐城(今浙江盐城)毁堤共一百三十里。陈瑄奉诏率四十万士兵筑之，为捍潮堤八千余丈。之后，陈瑄又上奏，以为嘉定(今浙江嘉定)濒临大海，江流冲会，海船停泊无屏障可依，请于青浦(今属上海)筑土山。次年土山筑成，赐名宝山。朱棣亲为文记其事。

阿鲁求役吐蕃 永乐九年(1411)十二月，阿鲁台遣使纳款，请得役属吐鲁蕃诸部，乞求明朝廷刻金作誓词，磨其金熔入酒中，饮诸长盟誓。朝廷议欲允许，左庶子黄淮独执不可，他说：彼势分则易制，势合则难图。朱棣对左右大臣说：黄淮谕事，如立高岗，无远不见。遂纳黄淮之议，不与之订立盟约。

遣使赈灾 永乐九年(1411)，浙江、湖广、河南、顺天、扬州分遭水灾，河南、陕西遭受瘟灾，成祖遣使赈之。

令朝觐官陈民瘼 永乐十年(1412)正月初四日，刑部、都察院、六科劾奏朝觐官一千五百人中有勘合数年不完者，请付法司处治。朱棣命各部条陈勘合已完、未完及各官姓名。结果仅有八十员勘合皆完。朱棣说此八十人系克勤于官，命礼部各赐钞五十锭复职。其余未完官员亦姑宥复职。朱棣又问鸿胪寺及六科官：前日命朝觐官言民瘼，已言者几人？答称一百五十人。朱棣说：一郡一县未必都无一事可言，都无一民不安？若再缄默不言治罪。于是各官皆上言民间疾苦。朱棣遂命六部议行：便于民者即行，言有不当者勿闻。时有蒲州(今山西平阳)等处老民言：岁欠民饥，采蒺藜、掘蒲根而食。朱棣即令赈济，且逮治匿而不闻的布政司及郡县官。六月二十一日，朱棣又令：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全部逮捕入狱惩治。

宋礼查勘卫河 宋礼以治会通河之功，大受皇上嘉赏。永乐十年(1411)，御史许湛奏陈卫河水患。朱棣又命宋礼前往查勘。宋礼于同年四月初八日还奏：卫辉(今河南滑县一带)至直沽(今天津)，河岸多低薄，如不究源折流，只务筑堤，恐怕还会溃决，徒劳无益。为长久计，先视会通河抵魏家湾，与土河相连，可穿二小渠，用泄暴水入土河。如此虽遇暴涨，卫河下游可无水患。再从德州西北开一支河，泄水入旧黄河，使至海丰大沽河入海，卫河亦可无患。此工程约需工三千，旬日可完。朱棣允准，令于农隙兴工。

禁宦官干预有司政事 永乐十年(1412)七月二十日，朱棣告谕都察院官：以前因虑在外诸司行事与民有不便之处，偶而遣宦官前往查询，未曾有所委任。况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前行，有司自行奏请，与宦官无涉。近来得知，宦官多有干预有司政事之事发生。因此，都察院可移文中外周知：自今以后，严禁宦官干预有司政事。

朱棣招选幼军 永乐十年(1412)八月初四日，朱棣谕兵部尚书金忠，皇太孙年长，有志略。我令其学问之暇，兼讲武事。你可遣人往应天、凤阳、滁州、和州、北京、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等地选民间子弟年十七至二十有拳勇之长之少年，官给路费、饮食送京师，充任随从。名曰幼军。

敕命边防固守 为防北部边界贼寇侵扰，永乐十年(1412)八月初八日，敕命长安岭、野狐岭、兴和以西，至洗马林一带，加筑石墙，深挖濠堑，以备不测。

囊哈儿卫的设立 永乐十年(1412)八月十四日，置囊哈儿卫。治所在今黑龙江口对岸，库页岛西北部的郎格里。囊哈儿卫设置后，明政府对其进行了有效管辖，委派官员、颁赐印信。

擢升蔺芳 蔺芳，生卒年不详，字仲文，夏县(今山西夏县)人。洪武年间中举孝廉。官累至刑部郎中。永乐中，为吉安知府。后因事被谪为办事官。随从宋礼治会通河，为工部都水主事。永乐十年(1412)，黄河在阳武(今河南原阳)决口，派蔺芳前往调查，提出许多合理建议。在调查过程之中，蔺芳发明了一种加固河堤的方法，即把木头编成大捆，里边填满瓦石，然后打桩固定，再用木头横贯桩柱，牵筑到堤上，如此即可成长久地起到加固堤岸之作用。这个方法，一直为后来筑堤者使用。九月二十二日，以宋礼大力推荐，蔺芳擢工部右侍郎。

杨荣经略甘肃 丰城侯李彬奉命至甘肃，会总兵官宋琥征剿叛番。先后擒获酋长八尔思、朵罗歹等，别遣土官李英防野马川。时遇凉州酋老的罕叛去，都指挥何铭追捕战死。李英追歼，尽俘其众，惟老的罕遁走赤斤蒙左卫。宋琥奏报：老的罕遁逃，被卫指挥佥事塔力尼匿藏。寇首不除，将为边患。朱棣遂于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初一日命右庶子兼翰林院

侍讲杨荣往甘肃议进兵方略。十二月二十七日，杨荣还奏：宜治老的罕之罪。而时值隆冬，运道险恶，非用兵之时。且有罪者不过数人，兵不可出 朱棣采其议，敕李彬等止兵勿进。同时赐敕诘责塔力尼，令缚老的罕械京。次年，塔力尼果擒老的罕以献。

周新冤死 周新（？—1412）字志新，初名日新，朱棣曾独以新字呼之，遂更名新，南海人。洪武中以贡士授大理评事，以善决狱著称。朱棣即位，擢监察御史，多所弹劾，权贵震惧，人称"冷面御史"。进云南按察使，改浙江，决狱惩贪，名著于时。锦衣卫指挥纪纲擅权枉法，胡作非为，又使千户往侦浙中，作威受贿。周新逮捕惩治。千户逃遁，将此情诉于纪纲，纪纲利用职权，罗织罪名，诬告周新。朱棣偏听偏信，遂命逮捕周新。周新至京。周新说道：在内都察院，在外按察司，都是朝廷委任的法官。我奉法捕恶，怎么反治我的罪！朱棣大怒，遂于永乐十年（1412）十二月命将周新处斩。临刑，周新大呼：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我无所憾！不久，朱棣醒悟，觉其有冤，但为时已晚。

建州左卫的设立 永乐十年（1412）置建州左卫，治所设于会宁（今朝鲜境）。命斡朵部酋长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明廷在其地设卫建所，委各酋长以卫所官，目的在于分而治之。

耿通被杀 耿通（？—1412）齐东（今山东邹平一带）人。洪武年间举人。后授襄阳教授。永乐初年，擢升刑科给事中，历左右给事。生性刚直敢言，曾弹劾都御史陈瑛。又言骁骑诸卫粮仓损坏，工部侍郎陈寿不预先修好，至使粮食运到无处可放，损耗严重。又说工部尚书不体恤下人，工匠工期已满，不能及时遣返，至使多人无处安身。陈瑛等人皆因而受到成祖镌责。当时给事中敢与直言者只有耿通与陈谔二人，朝廷上下无不敬畏。之后，耿通擢大理寺右丞。后来，成祖北巡，太子监国。汉王高煦想谋取谪位，私下结私营党，排拨离间。成祖回朝，对太子监国所行之事，多有更改。耿通上谏，以为不必都改，触怒成祖。永乐十年（1412），有人说耿通受人委托而治他人罪，成祖闻听大怒，谓耿通破坏祖法，离间其父子，罪不可恕。最后以奸党论处，耿通遭酷刑而死。

倭寇昌国卫 永乐十一年（1413）正月二十一日，倭寇三千余人进犯浙江昌国卫爵溪千户所，被守军击退，倭走楚门千户所。备倭指挥佥事周荣率兵追击，倭寇大败，被杀及溺者难以数计。浙江都司将所缴获军械俱交京师。

贵州布政使司的设立 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初二，设贵州布政使司。将思州、思南之地分为八府（思州地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地设思南、镇宁、铜仁、乌罗四府）、四州（镇远、安顺、永宁、普安），以贵州布政使司总辖之，其布政使司官员俱用流官，府以下官员参用土官。以行人蒋廷瓒、河南左参政孟骥俱为右布政使，改河南右参政陈俊名为右参政，山西左参议王理、河南按察司副使张翥、江英俱为左参议，副使邹锐、佥事丘陵、进士用宗保俱为右参议，授进士崔彦俊、王恭等为府、州长官。贵州为内地即自此时开始，田氏两宣慰使则废。

北京民户计丁养马 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十四日，成祖令北京民户牧马。计丁养马，十五丁以下养一匹马，十五丁以上养二匹马。因犯罪被发配的，七户养一匹马，其罪则可消除而成为良民。从此，马匹大量繁殖，于是责令百姓牧养，年十五则须牧马。而且分别于宣德四年（1429）、正统十一年（1446）将此法推行到山东、河南，渐渐成为百姓一大负担。

成祖赴北京 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十五日，成祖决定巡幸北京。皇太孙随从，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溥辅佐皇太子监国。十六日，车驾由南京出发。十八日，到达凤阳，谒皇陵。四月初一，车驾到北京，在奉天殿受朝贺。

营建长陵 明成祖朱棣曾令于昌平营造寿陵。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十六日建成。朱棣亲自临视，命名长陵。封其山为天寿。次日，以徐皇后葬于此。

死罪纳赎例的制定 永乐十一年（1413）五月初九，成祖对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大臣们说：近来犯人中连坐、误犯者多，从情理上讲值得怜悯。若确实罪不容赦者处死；有于法当死，而于情可悯，及所犯之罪不够处死的，就令其以钞赎罪。于是，三法司及户部详议后复奏：除公罪依例纪录收赎及按律该死罪，情重者依律处治。其情节较轻者，判斩罪赎钞为八千贯，绞罪及榜例死罪赎钞为六千贯，流罪赎钞为三千贯，徒罪赎钞为二千贯，杖罪赎钞为一千贯，笞罪赎钞为五百贯。无钱赎罪的，依前议发送天寿山种树。成祖允准施行。

杭州大风潮 永乐十一年（1413）五月，时天淫雨、烈风，江潮滔天，平地水高数丈，南北约十余里，东西五十余里。仁和十九、二十都居民陷溺死者不计其数，存者流移，田庐漂没殆尽。

禁止强买分养民间之马 永乐年间，北京各卫所孳生的战马全部分散在民间由民代养，养马者可以依例减免税粮。永乐十一年（1413）六月十五日，成祖告谕行在兵部诸臣说：我曾经下令天下官员、军民皆自愿养马，孳养繁息，买卖自由。这次来北京一

路所见，民间牧马甚繁盛，朕甚喜之。但也闻知一些郡县官吏及势要之人，往往用低价强买民间之马，也有假称为民而实际强夺民马者，使百姓因马而受害。你们兵部要严行约束不法之人，如有民间陈诉，必置之以法。

浙江大疫　永乐十一年(1413)六月，浙江乌程、归安、德清三县疫，死一万零五百八十余人。七月，浙江宁波府鄞县、慈溪、奉化、定海、象山五县疫，死九千一百余人。

封阿鲁台为和宁王　瓦剌(在河套的蒙古别部)马哈木请求赏赐，并扣留使臣。成祖派太监责斥。永乐十年(1412)，马哈木杀其主本雅失里，立答里巴为汗。鞑靼知院阿鲁台派使节到朝廷，请求发兵讨贼以为故主本雅失里复仇，并愿率部为先锋。永乐十一年(1413)七月初一，封阿鲁台为和宁王，以制约瓦剌。从此，阿鲁台归附明朝，年年一贡或两贡。

立永宁寺碑　明朝在奴儿干都司所在地特林(今属苏联)修建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永乐十一年(1413)九月二十二日，太监亦失哈于寺旁立一石碑，名为永宁寺碑，又叫永乐碑。碑文竖刻，三十行，每行六十二字，正书。六、七、十二行顶二格，十一、十五行顶一格。二十行至三十行载有职官姓名，比正文低十九格起书，字体较小。碑正面额题："永宁寺记"，横写大字正书。竖刻正书："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碑的正面以汉字记载了明朝建置奴儿干都司、兴建永宁寺和亦失哈等巡视该地区经过等情。是研究明史尤其是东北地区历史极为珍贵的资料。碑的背面镌刻着女真文和蒙古文，都是正面汉字碑记的摘译。而碑阴的碑额是用蒙古文书写，意为："奴儿干永宁寺"。碑的左右两侧，各刻有汉、蒙、藏、女真四体文字的佛教"六字真言"，并附释音。其汉文为："唵嘛呢叭𠺗吽"，意为："佛法是无边的"。其它三体文字亦为此意。永宁寺碑四体文的镌刻不仅说明明王朝对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区进行了极有效的统治，也说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说明汉、蒙、藏、女真等各族人民对丰富祖国的文化、语言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瓦剌扰边　永乐十一年(1413)十一月初六，瓦剌马哈木犯边。当初，由于成祖诏许鞑靼阿鲁台入贡，马哈木怀恨在心，于是，拘留明朝使臣，又以甘肃、宁夏归附鞑靼的大多是其亲戚为理由，请明朝令其归还。成祖大怒，命太监海童切责。因此，马哈木拥兵饮马河(克鲁伦河)准备入侵，并扬言要袭击阿鲁台。阿鲁台向明朝告警，成祖命开平(今内蒙多伦)守将严阵以待。初八日，诏令宁阳侯陈懋、都督谭青、马聚、朱崇巡视宁夏、大同、山西边防。又命陕西、山西及潼关等五卫军队驻扎宣府(今河北宣化)，中都、辽东、河南三都指挥使司及武平等四卫军队在北京会合，并准备亲征瓦剌。

郑和第四次出使西洋　永乐十一年(1413)冬，郑和奉命第四次出使西洋。此次由马欢、郭崇礼和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负责译事。郑和率船队首访占城，南航至急兰丹(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彭亨，在爪哇稍事停留，转棹西行经旧港到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征得满剌加国王的同意，郑和在此地立排栅设置了远航船队的中途供应站。郑和船队到苏门答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时，遭到老王子苏斡剌的抢劫，郑和将其俘获，回国后献于北京。郑和从苏门答剌派遣一支船队访问溜山国(今马尔代夫)，自己亲率大部访问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的科泽科德)，直航忽鲁谟斯(今波斯湾口一带)。郑和在忽鲁谟斯拜会了国王，赠与礼品，并在这东西方交会的大都市上进行公平贸易。返航时，忽鲁谟斯国王派遣使臣已即丁驾海舶随郑和船队访问中国，带来了狮子、麒麟(长颈鹿)、马匹、珠宝和金叶表文，于永乐十三年(1415)七月抵达中国。同时，在忽鲁谟斯的麻木(今非洲肯尼亚的马林迪)、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不剌哇(今索马里的布腊瓦)、阿丹(今南也门的亚丁)等国的商人纷纷报告本国政府，建议出访中国。因此，至永乐十四年底，两年中来中国访问的有十九个国家的使臣，加强了中国和西洋地区的友好交往。

诏修曲阜孔子庙　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十一日，成祖谕行在户部诸臣：孔子代天立教，所以万世帝王恭敬祀奉他。庙宇须体面，不可只像过去的样子。现在老子、释迦牟尼之观庙遍布各地，皆宏伟壮丽，坚固无比。至于孔子曲阜庙国家岂可不重视呢？朕举兵发动靖难之役时，严禁将士过曲阜，不允许他们损坏亵渎孔庙，将士们都不敢违反此令，你们也要体会朕此番尊孔之意。

民间食盐折收钞币　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十三日，山东莱州府掖县言，民间食盐每年输米九千三百六十八石。近年田稼欠收，百姓缺粮，已蒙朝廷赈贷。其该输盐粮请折成钞币交付。成祖批准施行。

成祖亲征瓦剌　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二十六日，明朝政府征发山东、山西、河南以及凤阳、淮安、徐、邳民工共十五万人，将粮食运到宣府(今河北宣化)，以备成祖亲征瓦剌之用。二月初五，举行大阅兵。初六，下诏亲征瓦剌。命安远侯柳升领大营，都督马旺、陈翼、程宽、金玉为副将；武安侯郑亨领中军，

兴安伯徐亨、都督马英及章安为副将；宁阳侯陈懋领左哨，襄城伯李隆、都督朱崇为副将；丰城侯李彬领右哨，遂安伯陈英、都督费瓛和胡原为副将；成山侯王通领左掖，保定侯孟英、都督曹得为副将；都督谭青领右掖，新宁伯谭忠、都督马聚为副将；都督刘江、朱荣为前锋。发马步军五十余万。此时，和宁王阿鲁台所派使节正好到达，告知马哈木已派乞塔歹率领骑兵到兴和(今河北张北)侦察朝廷动静。于是，成祖命刘江等前往兴和，在城西扎营，并派望哨监视敌情。又命谭青率右掖兵前往兴和操练准备。三月十七日，成祖车驾由北京出发，皇太孙随从，学士胡广、金幼孜、庶子杨荣等扈从。四月初一，到达兴和，大阅兵。十二日，到屯云谷，鞑靼博啰布哈等五人来降。六月初三，前锋刘江在刚哈拉海与瓦剌军相遇，将其击退。初七，成祖率军到达和拉和锡衮(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附近)，瓦剌马哈木、太平、博啰三部迎战。成祖命柳升等攻击其中部，陈懋、王通攻击其右翼，李彬、谭青、马聚攻击左翼，自率铁骑冲击，大败瓦剌三部，斩其王子十余人，部众数千级，并穷追至图拉河(今蒙古境内)，马哈木脱身逃走。战役中，郑亨追敌于和拉和锡衮时，中流箭而伤，指挥满都战死。皇太孙请及时班师，成祖应允。八月初一，车驾到达北京，于奉天殿受群臣朝贺。

设隆庆州及永宁县　永乐十二年(1414)三月初四日设置隆庆州及永宁县，隶属北京行部。隆庆，古缙云氏建立都城之地；金朝置设缙山县；元朝仁宗出生于该县东部，改称为龙庆州。明朝初年，移其地人民入关内，州治遂废。成祖因为该地为战略要地，而且土地肥沃适宜稼穑，故改为隆庆州，又于州东部团山下设置永宁县，隶属隆庆州，徙大批罪囚及被贬官之人充实其地。

进封平阳王济熿为晋王　济熿是晋恭王朱棡之庶子。洪武年间，恭王死，其子济熺嗣。成祖即位后，封济熿为平阳王。济熿自幼因性情凶残而失爱于父。及其年长后就学于京师，又与高煦等狼狈为奸，不为太祖所爱。成祖即位之初，济熺因纵容属下坐罪，济熿乘机唆使其弟庆成王济炫及府中官校不断向朝廷控告济熺之过。成祖信以为真，夺济熺爵位，将其与子美圭一起废为庶人，看守晋王园林。永乐十二年(1414)九月初一，济熿袭晋王封。济熿被立为晋王后，更加骄恣暴横，甚至于残害嫡母谢氏，但是却无人敢言。

成祖遣官按视边境屯堡　成祖曾命边将置屯堡为守备，计每小屯五点七所或四点五所择近便地方筑一大堡，环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堡共有八门，四周有濠堑环绕，堑宽一丈或四、五尺，深与宽相等。聚集各屯粮刍于城堡之内。其中小屯可以量存逐日所用的粮食，一旦有警，即令人畜尽入堡中，合力固守。此命颁下后，久未有报，于是永乐十二年(1414)九月二十七日，成祖命行在兵部、都察院遣官按视宁夏、甘肃、大同、辽东等处屯堡。

行在兵部阅视军伍　永乐十二年(1414)冬十月十一日，成祖谕兵部诸臣曰：目前，天下军伍不够整肃，多因官吏受贿，有逐壮丁而以羸弱补数者；有多年缺伍而不追补者；有伪作户绝及以幼小孩子纪录者；有假公为名而于家私役军士者。遇有调遣，十无三、四，又多是幼弱老疾的人。骑士有的不能引弓，步卒有的不能荷戈，一旦有战事怎么能够击敌呢？你们宜先榜示禁约，然后派人分头阅视。步骑军士，都要健壮，能在马上飞驰射击。队伍须实，军律须严。如果仍踵前弊，必治罪不贷。

诏修《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　永乐十二年(1414)十一月十五日，成祖对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及金幼孜说：《五经》、《四书》都是古代圣贤阐述精义要道之言，其传、注之外，历代诸儒的议论有发挥圣贤之言大义的。你们将其切当之言汇集后，增附于传、注之下。宋代周、程、张、朱诸君子阐述性理的言论，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都是《六经》的羽翼，但是它们都是各自为书，没有将其统一会集起来。你们也分类将其汇集成编。二书务必极其精练完备，以使流传后世。命胡广总理其事，又命朝臣及在外都官有学问之人共同参加纂修，于东华门外开馆，命光禄寺供馔。永乐十四年三月修成，颁行天下，及两京六部、国子监、府州县学，供其阅读、讲授，且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

释迦也失入京朝见　永乐十二年(1414)，西藏黄教(即新迦当教)创始人宗喀巴派遣其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明政府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宗喀巴死后，释迦也失于宣德九年(1434)再次进京，又被封为“大慈法王”。按黄教的宗教习惯，在宗喀巴死后，其两大弟子世世转生，称“呼毕勒罕”(藏语为化身之意)，承传其衣钵。这两个弟子，就是后来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

成祖敕谕百官廉谨爱民　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初二日，成祖敕谕来京朝贺的文武百官曰：治天下之道，君总统于上，臣分别供职于下，上下相承，体统不紊。朕夙夜图治，擢任贤能，倘能尽心办事，天下未有不太平的。夫为官的人，以忠勤廉谨为本，以公正仁恕为先。忠则不欺君，勤则不怠慢，廉则不贪贿，谨则不肆意妄为。公则不为私侵，正则不偏邪，仁则

不暴狠，恕则不害民。不要以为百姓愚蠢，其心实明；不要以为朝廷可欺，有天在上明鉴。不遵朕言，罪而不赦。不久，又将其申戒百官之言榜示于午门之外。

瓦剌遣使谢罪 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初八，瓦剌顺宁王马哈木、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博啰派使谢罪，贡马，并且归还所拘留的明朝使臣，请求仍象以前一样朝贡。成祖答允了其请求。

午门外灯山大火 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十四日夜，午门外灯山起火，有仓猝不及避而死者甚多，其中有都指挥同知马旺。成祖认为是上天以垂戒不德，惧而修省，令各衙门进送物件悉皆停罢，以纾民力。

监察御史分行天下 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十九日，成祖遣监察御史吴文等分行天下，询察吏治得失及民间疾苦。临行，成祖谕之说：百姓艰难，地方官蔽而不报。你们是朕的耳目之臣，宜悉心谘访。凡朝廷所差人及郡县官有贪刻不法的人，立即逮捕。郡县官有不称职及老病之人，一律送京师，惟布政司、按察司的堂上官有罪具状报告。不要冤枉也不要纵容，必合公道，军民利病宜一一奏来，同时敕谕内外官。

解缙死于狱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吉水(今属江西)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授中书舍人。曾上万言书，批评太祖政令屡改、杀戮太多等事。后被罢官八年，建文时再出仕。成祖即位后，擢侍读，直文渊阁，又进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主持编纂《永乐大典》，颇受成祖重视。永乐五年(1407)以“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被谪为广西右参议，后又改任交趾右参议。永乐八年入京奏事，当时成祖北征而不在京师，解缙便私谒太子而还。汉王高煦由于解缙当年主张立高炽为皇太子，而未主张立自己，便怀恨在心，此时以“无人臣礼”进谗。于是，解缙于永乐九年被下狱。永乐十三年正月，锦衣卫纪纲上囚犯名录，成祖见到解缙名字，便问：解缙还活着?纪纲得知此言便借机将解缙灌醉，埋于积雪中，冻而死，年四十七。其家也被抄，妻子、宗族徙辽东。解缙的著作有《文毅集》、《春雨杂述》等。

遣官督抚军屯 由于山西、山东、大同、陕西、甘肃、辽东等地军士操练屯种怠惰不力，成祖于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初五，派指挥刘斌、给事中张磐等十二人前往巡视，并将实情上奏。

置两京城门郎 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初十日，成祖下令置南京、北京二京城门郎。北京丽正、文明、顺承、齐化、平则、东直、西直、安定、德胜九门；南京正阳、通济、聚宝、三山、石城、清江、定淮、仪凤、钟阜、金川、神策、太平、朝阳等十三门，每门六员，秩正六品。其石城、清江、定淮、仪凤、金川五门增注二员，专门负责巡江。永乐十四年(1416)七月裁撤。

立北京马神庙 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十六日，立北京马神庙。当时行太仆寺卿杨砥请立马神庙于莲花池，成祖命翰林院参考古今祭祀仪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之神，国朝南京只祭司马之神，每年春秋用羊一只、豕一只、帛一匹。于是，成祖命北京马神庙，设马祖等神及司马之神五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规格仪制以南京为准。

释工作囚徒 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二十七日，释放工作囚徒四千九百余人。先前，成祖命出在押囚犯输作以赎罪，许多囚犯则借机逃亡，有司请追捕这些人。成祖对工部尚书吴中说：这些人是迫于饥寒而不得已为之。于是命服工役的囚犯全部回家，待秋收后再赴工。令下后，有七百余人不愿回家。成祖悯其感恩，连同那些想要回家的囚犯一起全部释放。

设府军前卫亲军指挥使司 成祖初选童子军随侍皇太孙，永乐十三年(1415)四月初十日，设立府军前卫亲军指挥使司，置指挥使五员，指挥同知十员，指挥佥事二十员，卫镇抚十员，经历司经历五员，千户所正千户二十五员，副千户五十员，所镇抚五十员，百户二百五十员。

金忠逝世 金忠(1353—1415)字世忠，鄞县(今属浙江宁波)人。其兄戍通州亡，金忠便补戍，以善卜而闻名于北平市。燕王朱棣准备发兵南下，召金忠占卜，得铸印乘轩之封。从此，出入燕王府中，常以所占之封劝举大事，成祖深信不疑。燕兵起，授金忠王府纪善，守通州有功，拜右长史，赞军务，成为燕王谋臣。燕王称帝后，擢工部右侍郎，赞世子守北京。不久召还，进兵部尚书。力主立世子高炽为皇太子。金忠以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成为东宫太子辅导官。永乐六年(1408)奉命兼辅皇太孙。永乐十一年成祖北征，金忠辅佐太子监国。此时，汉王高煦谋夺嫡，不断派人谮太子。永乐十二年成祖北征返京师后，便将东宫官属全部下狱。只以金忠勋旧而未问罪，并密令其审察太子活动。金忠言太子无罪，并且愿以连坐担保，所以太子才未被废黜，而黄淮、杨溥也得以保全。金忠虽以占卜起家，又出身行伍，但博览史籍，善谈论。甚得成祖倚重。每被垂问，皆知无不言，且决不泄露。永乐十三年(1415)四月十七日卒，年六十三。洪熙元年(1425)追赠少师，谥忠襄。

海运之罢 永乐十三年(1415)五月，宋礼督治黄河后还京师，奏言：海运所经历的风险很大，每

年都有船只损坏而沉没。有司修补又迫于期限，只得增加科敛，成为百姓的负担，而且船只也不坚固。于是开始废止海运。浙西、苏州、常州、松江的漕粮入淮安仓，镇江、庐州、凤阳、淮阳的漕粮入徐州仓，徐州、兖州的漕粮入济宁仓。令内河船于会通河，以三千艘支淮安，转至济宁；以二千艘支济宁，转至通州。其天津、通州等卫，派官军于通州转至北京。浙江、直隶、湖广、江西等地，除本地存留及供南京的饷粮外，拨二百五十万石，令民船运赴北京通州河西务，大概军、民各运一半。

开凿清江浦　江南漕运至北京的船只到达淮安后，必须经陆运过坝，才能越过淮河而达清江口，耗资费工。当地故老对平江伯陈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至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河口在一直线上，应该凿河引湖水入淮河，以通漕船。陈瑄上奏，朱棣允准。永乐十三年(1415)五月二十九日，陈瑄发民工及官军，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凿渠二十里为清江浦，引导湖水入淮河，筑移风、清江、福兴、新庄四闸，以时渲泄，又沿湖十里筑堤，以便牵引船只。从此，漕运船只可以直达清江口，节省了费用及人力。随后，又疏通吕、梁洪以减缓水势。开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又筑高邮湖堤，在堤内凿渠四十里，以避风浪的危害。又自淮河至临清，建置四十七道闸。淮安置常盈仓四十区，贮存江南漕运之粮，往北至徐州、济宁、临清、德州，皆建仓以利转运。

支运法的制定　永乐十三年(1415)五月，制定并颁布支运法。即百姓按指定就近粮仓纳租，由军伍负责支运。纳者不必供当年军支，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通数年结算，以期不失常额。具体规定：江西、湖广、浙江的税粮运到淮安仓，再分别派遣官军就近转运，自淮安到徐州之间由浙江、直隶的官军负责，自徐州到德州之间由京卫军负责，自德州到通州之间由山东、河南官军负责，依次递运，一年共四次，可运五百万余石粮。从此，海、陆二运皆废。

改封汉王高煦于青州　高煦初不愿去封地云南，便随成祖巡视北京，曾经极力请求与其子同归南京，成祖不得已答应了他；又请得天策卫为自己护卫，把自己与唐太宗相比。黄淮等人下狱后，成祖也渐渐觉察出皇太子无错。因高煦不愿远行至云南，便于永乐十三年(1415)五月二十一日，敕汉王高煦居于青州。但仍拖延不肯前往封地，成祖开始怀疑其有谋反之心。

陈诚出使西域还京　永乐十一年(1413)秋，吏部员外郎陈诚、太监李达等奉命出使西域，历经哈烈、撒马儿罕、俺都淮、八答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渴石、养夷、别失八里、火州、柳陈、土鲁番、达失干、卜范儿等十七国，于永乐十三年(1415)十月二十九日返国。陈诚上所著《西域行程记》二卷，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域地区的山川、物产、风俗等情况，其中曾提到土鲁番居民“信佛教，多建佛寺”。而维吾尔族人民直到十五世纪后期才逐渐全部信仰了伊斯兰教。

山西刘子进起事　山西广灵县民刘子进自言在石梯岭遇道人而得异术，与刘兴、余贵等人聚众起事，自封官职，以皂白旗为号，夺太白王家庄的驿马，杀大同卫卒，官军无可奈何。永乐十四年(1416)正月十九日，朱棣命行在中军都督金玉为总兵官，蔡福为副总兵，率军前往征剿。五月，刘子进等一百三十五人被械送北京。成祖命将其首领斩首示众，其余则被发配交趾充军。

成祖拒封泰山　永乐十四年(1416)四月初十日，礼部祭祀清吏司郎中周讷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宾服，民物阜丰，请封禅泰山，刻石纪功，垂之万世。尚书吕震等亦言：皇上圣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周讷之请，封禅泰山。成祖对吕震说：现在天下虽无事，然水旱疾疫亦间有之。朕每每听到郡县上奏，未尝不惕然于心，岂敢谓太平之世。况且圣经未曾言封禅，唐太宗亦不为封禅。魏徵常以尧舜之事劝谏太宗。你们欲使我居于唐太宗之下，与魏徵爱君之道迥异。你们应以古人自勉，不负宗伯之责任。

纪纲伏诛　纪纲(？—1416)，临邑(今属山东)人，虽为诸生，但善骑射。因靖难之役中有功，累官锦衣卫指挥使，升都指挥佥事。为人便辟诡黠，善钩人意，甚得成祖信任，令其典诏狱。由此日益骄横，私养亡命之徒，造刀甲弓弩以万计。与指挥佥事庄敬勾结兴贩私盐，居处服食器皿皆模拟皇帝，家中畜养歌童舞女，收受贿赂，侵盗官物不可胜计，势倾中外。成祖命给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治罪，永乐十四年(1416)七月十六日磔于市，家属无论长幼一律戍边。同时，庄敬也被夷三族，指挥袁江，千户王谦、李春，镇抚庞瑛，俱论死。

设亦马忽山卫　永乐十四年(1416)八月初四日，成祖命于辽东设置亦马忽山卫，命女直野人头目锁奴兀为指挥使，哈散哈为指挥同知，木答兀等七人为指挥佥事。又分授千户、百户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等。

定议迁都北京　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十五日，诏文武群臣集议迁都是否合宜。在此之前，成祖自北京返回京师，便决意迁都。工部请择日营建北京，成祖说：此为大事，须聚集所有廷臣商议才行。于

是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官上疏曰：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实为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且河道疏通，漕运日广，商贾云集，财货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中京师，天下军民乐于趋事。随后，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等衙门的尚书、都御史等官又上疏曰：北京乃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关，西峙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俯中原，沃土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四夷，制天下，实为帝王万世之都，应敕所司营建，以成国家悠久之计，符臣民之望。成祖采纳其议。

削汉王高煦二护卫　成祖巡视北京时，汉王高煦居于南京，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隶属于兵部，并放纵其护卫军士在京城内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将这些护卫军士逮捕治罪。高煦闻讯大怒，手持铁瓜击杀徐野驴，众人无敢言者。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成祖返回南京，尽得其不法行为数十事，虽然非常愤怒，但是没有完全发作出来，只是夺其冠服，囚系于西华门内，革削其左右二护卫，其所募军士全部调往居庸关北，立保安左右二护卫。永乐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徙封汉王高煦于乐安州(今山东广饶东北)，并令其速往封地，不准久留京师。

《历代名臣奏议》辑成　成祖为使皇太子熟悉古人治国之道，便令翰林院儒臣黄淮、杨士奇等采古代名臣直言汇录成编。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十五日，书成以进。成祖览后嘉许此书，赐名《历代名臣奏议》。并对侍臣说：致治之道，千古一途。君能纳善言，臣能尽忠不隐，天下未有不治。观此书足以见当时人君之量，人臣之直。命刊印，赐皇太子、皇太孙及诸大臣。该书共三百五十卷。所录自商、周至宋、元，分“君德”、“孝亲”、“郊庙”等六十四门，于历代典制沿革、政事得失，可见其大概。

王绂逝世　王绂(1362—1416)，绂一作芾，字孟端，号友石、九龙山人、鳌叟，后以字行，无锡(今属江苏)人。洪武时生员，因事被累，谪戍山西十余年；永乐初，以善书被荐，供事文渊阁，官中书舍人。其为人高介绝俗，工画山水，风格苍郁，多学元人王蒙；亦作平远景，则近元人倪瓒。尤擅长画墨竹，笔势纵横洒落。能诗，有《友石山房集》。

《瀛涯胜览》书成　永乐十四年(1416)，马欢撰成《瀛涯胜览》一书。该书为一卷，十八篇。记述了作者所访问过的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剌加、哑鲁、苏门答剌、那孤儿、黎代、喃渤里、锡兰、小葛兰、阿枝、古里、溜山、祖法儿、阿丹、榜葛剌、忽鲁谟斯等十九个国家的疆域、道里、风俗、物产及其国家沿革的大概。每个国家为一篇，其中因那孤儿很小，所以附于苏门答剌之后。马欢字宗道，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信奉伊斯兰教。曾作为翻译参加郑和的第四次、第六次、第七次西洋之行。

《神僧传》辑成　成祖朱棣曾翻阅佛教著作，采往昔名僧功行超卓者辑为一编，永乐十五年(1417)正月初六日成，名《神僧传》，成祖亲自作序，共九卷。并付梓以传。

废谷王朱橞为庶人　永乐十五年(1417)二月初六，谷王朱橞因谋逆罪被削爵为庶人，并革其护卫及长史司等衙门。朱橞自徙封长沙后，仗恃其开门功，日益骄恣，图谋不轨。其护卫张兴惧怕祸及自身，便将朱橞谋反之事密奏北京，成祖不信。当时，蜀王朱椿之子崇宁王悦燇因罪逃到朱橞王府。朱橞便对众人说：建文帝如今在我府中，我将为他伸张大义。蜀王闻信后告变于朝廷。成祖召朱橞入朝，出示蜀王奏章，朱橞伏地请罪。于是，朱橞及其二子皆被废为庶人，其官属多诛死，只有张兴因曾经事先告发，得以免罪。

陈珪督理北京营缮　永乐四年(1406)，命泰宁侯陈珪董建北京，因其规划营建井井有条，得到成祖的奖励器重。永乐十五年(1417)二月十五日，仍命其督理北京营缮之事，安远侯柳升、成山侯王通为副手。又命吏部为其铸“缮工之印”，并于吏部设经历司，置经历一员，以五品，都事四员，正七品，兼掌行在后府。

禁兵器贩运外国　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二十一日，成祖申谕行在兵部臣曰：国家兵器以御外侮之用。近来有小人贪图货利，私自将兵器贩运出境，牟取暴利，却资助了敌人。如此行为宜严加禁止，有违犯者勋戚不宥。

禁僧尼私建庵院　永乐十五年(1417)闰五月初八日，成祖以洪武年间天下寺院皆已归并，近来却有不务祖风的人，仍于偏僻之处私建庵观，僧尼混处，屡犯宪章。于是命礼部榜示天下，使之恪守清规，违者必诛。

交阯民起事　太监马骐到交阯采办，大索境内珍宝，造成交阯百姓情绪激愤，于是陆那人阮贞，顺州人黎核、潘强，与土官同知、判官、千户等同时而反，顺州土官段公丁、陈思齐死难。交阯总兵官、丰城侯李彬率军前往镇压，于永乐十五年(1417)闰五月十一日上奏，言阮贞已被擒处死，其妻、子送功臣之家为奴。六月十三日，又奏言，在都督朱广、交州中卫指挥同知黄振、交州右卫指挥同知谭公政、顺化卫指挥佥事吴葵、新平卫指挥佥事潘勤等人的合力围剿下，杀黎核及其属下五百余人于阵，生擒潘强等，余

众逃跑。成祖令按功进行奖赏。但是,交趾的起义并没有被扑灭,此后仍不断发生。

张谦败倭 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十五日,成祖派人前往金乡卫(今浙江平阳南),慰劳出使西洋归来的太监张谦及指挥、千户、百户、镇抚、旗军等,各自升赏有差。当初,张谦等奉命出使西洋。归国途中,在金乡卫海上突然与倭寇相遇,明军只一百六十余人,而对方近四千人。经过一番激战,明军大胜,俘获数十人,将其押送京师。成祖命刑部员外郎吕渊等审判申斥倭寇后放还,以交换被掠的中国人。

苏禄国王来朝 永乐十五年(1417)八月初一,苏禄东国酋长巴都葛叭答剌、苏禄西国酋长麻哈剌吒葛剌马丁、故苏禄峒酋长之妻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亲属及随从头目,组成多达三百四十余人的使团,奉金镂表来朝贡,并献珍珠、宝石、玳瑁等物。这是对郑和使团访问苏禄国的回访,也是继渤泥、满剌加国王之后,又一个海外国家首领亲自率领使团来中国进行访问。八月初八,明朝政府封巴都葛叭答剌为苏禄国东王,麻哈剌吒葛剌马丁为苏禄国西王,叭都葛巴剌卜为苏禄国峒王,并赐诰命及袭衣、冠服、印章、鞍马、仪仗。其随从头目三百余人,也各赐冠带、金织文绮、袭衣不等。在京期间,苏禄国三王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八月二十七日,三王辞归,明朝政府对其各赐金相玉带一条,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罗锦文绮二百匹,绢三百匹,钞一万锭,钱三千贯,金锈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袭。其随从头目也分别赏赐文绮、彩绢、钱钞不等。九月十三日,东王巴都葛叭答剌在南归途经德州时,不幸因病去世。成祖命按王礼祭葬,派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主持祭礼,赐谥"恭定"。并在德州为其营建了壮观的陵墓,命其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喇世代留居德州守陵;又留其妃妾、仆从十人守墓,满三年后才准回国;命其长子都麻含继承王位,率众回国。永乐十六年(1418)九月初一,成祖亲自为苏禄东王墓碑撰写碑文,对其表示了深切的缅怀与悼念之情。

北京西宫建成 永乐十四年(1416)八月,成祖下令作北京西宫。永乐十五年(1417)四月二十七日,西宫建成。中为奉天殿,殿之侧为左右二殿。奉天殿之南为奉天门,其左右为东西角门。奉天门之南为午门,午门之南为承天门。奉天殿之北有后殿、凉殿、暖殿及仁寿、景福、仁和、万春、永寿、长春等宫。共有屋一千六百三十余楹。

吕渊等出使日本 永乐十五年(1417)十月初三日,成祖派遣刑部员外郎吕渊等出使日本。当时,捕倭将士擒获倭寇数十人献京师,其首领有征葛成二郎、五郎等,经审讯,方知他们都是日本人。群臣建言,日本数年不修职贡,实为倭寇所阻,今贼首宜诛之以正其罪。成祖曰,对于远夷威之以刑不如怀之以德,朕姑宥其罪遣还回国。于是命吕渊等将其送还日本,并赐玺书谕日本国王源义持,申戒其仿效其父,尽心修贡,约束国人,勿扰明边,否则悔之无及。

蔺芳逝世 蔺芳(?—1417),山西夏县人。洪武年间举孝廉,授刑部员外郎,升郎中。成祖即位,升任吉安知府,有惠政,后因事谪为办事官。以治河有功,复为工部主事,屡迁工部右侍郎。永乐十五年(1417)十一月初十日卒。

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 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成祖朱棣命令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十五年五月十六日,郑和在泉州城外回教先贤墓行香并刻石纪念。同年冬天,郑和船队扬帆出海,相继访问了占城、彭亨、爪哇、旧港、满剌加等国之后,在苏门答剌稍作休息,郑和便派小支船队西航溜山国(今马尔代夫),自己亲率大䑸宝船访问南浡里(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角)、锡兰(今斯里兰卡)、沙里湾泥(今印度半岛南部东海岸),直抵柯枝(今印度柯钦),经古里(今印度的科泽科德)来到忽鲁谟斯(今波斯湾口一带)。由忽鲁谟斯沿阿拉伯海岸南驶祖法儿(今阿曼的佐法儿)。随后,访问了剌撒、阿丹和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的布腊瓦)、竹步(今索马里的准博)、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和慢八撒(今肯尼亚的蒙巴萨)。在郑和船队回航时,随船来访的有祖法儿等国的使者,以及各国馈赠和贸易得来的长颈鹿、斑马、鸵鸟等,于永乐十七年七月回国。

交趾黎利起事 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初三,交趾总兵官、丰城侯李彬奏言,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检黎利反叛,已派左都督朱广前往剿捕。黎利原曾随陈季扩起事,以善战多谋而为金吾将军。归降明军后,被授巡检之职,因此而心怀不满。待明军大部分撤走后,便又起事,横行郡邑,自称"平定王",其弟黎石为右相国,段莽为都督,同党还有范柳、范晏等。朱广率军击败黎利,斩首六十余级,生擒范晏等百余人,黎利逃脱。后将范晏斩首示众。

倭陷松门卫 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二十三日,倭寇攻陷松门卫。当初,浙江按察司佥事石鲁巡按至松门卫(今浙江温岭东沿海),正遇倭寇侵入沿海,而石鲁却因醉酒,未设防守备。及倭寇攻临城下,石鲁便跳墙而逃,以致城池被攻陷。后逮石鲁处死。

交趾起义 永乐十六年(1418)二月二十日,交趾故四忙县知县车绵之子车三,杀知县欧阳智起

义。同时，乂安知府潘僚、南灵州千户陈顺庆、乂安卫百户陈直诚、浮乐范软、偈江黄汝典、邱温侬文历、武定陈木果、快州阮特、善誓吴巨来、同利郑公证、善才陶强、大湾丁宗老、安老范玉，皆乘机起义，自署官爵，杀长吏，而其中尤以潘僚、范玉的势力最为强大。潘僚为故乂安知府潘季祐之子，承嗣父职，因不堪太监马骐的肆意掠夺而起义。范玉为涂山寺僧，自言天降卯剑，号“罗平王”，纪元为永宁，封相国、司空、大将军等官，攻掠城邑。而交趾总兵官、丰城侯则东征西剿，疲于应付。

瓦剌脱欢请袭爵 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二十四日，太监海童、指挥柏龄自瓦剌还。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博啰及弟昂克与顺宁王马哈木之子脱欢各派使节来贡马，脱欢请袭父爵。成祖准许，仍派海童前往瓦剌主持授封之事。

姚广孝逝世 姚广孝(1335—1418)，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十四岁削发为僧，名道衍，字斯道。曾随相城道士席应真学兵法谋术，又兼善诗词古文。洪武中，僧宗泐荐于燕王朱棣，命其住北平(今北京)庆寿寺，随侍燕王二十年，成为心腹谋士。建文初，惠帝准备削藩，广孝劝燕王起兵，并为其筹划军事，自己与世子居守北平。燕王登帝位后，恢复其俗姓，赐名广孝，授太子少师，予冠服，赐二宫人，更得成祖器重，不呼其名，而只呼“少师”。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二十八日卒，年八十四。赠荣国公，谥恭靖。成祖亲作神道碑，将其比于元朝刘秉忠。有《道余录》，对宋儒多有讥诋，但此书被其好友杨洪毁掉。广孝还曾与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等。

日本遣使来贡 永乐十五年(1417)十月初三，刑部员外郎吕渊等出使日本。因当时所擒倭寇多为日本人，所以特遣吕渊前去警告日本国王源义持。永乐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吕渊自日本还，源义持遣日隅萨三州刺史岛津滕存忠等奉表随来谢罪。以并不知晓本国人骚扰中国东南沿海为托词，愿朝贡如初以贷其罪。成祖因其措词顺服，特恕其罪，命行在礼部款待使者。但是，此后沿海倭寇的骚扰掠夺仍不断发生。

重修《太祖实录》成 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初一，监修官、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总裁官、行在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等，上表进重修成的《太祖实录》。此书共二百五十七卷，为二百五十册。另有《太祖宝训》十五卷，为十五册。成祖于奉天殿受书，令别录一部藏于古今通集库，并分别颁赏有功人员。自此，《太祖实录》始定。

胡广逝世 胡广(1370—1418)，字光大，吉安(今属江西)人。建文二年(1400)进士第一，赐名靖，授翰林修撰。永乐时又恢复旧名。自侍讲直文渊阁，累官大学士，仍兼左春坊大学士。其为人敦厚严谨，在朝廷上从未出言伤人。亦从不将朝中机务随意泄露，且与任何人都无私交，所以始终得到恩宠。胡广与解缙同乡，二人共同参预机务，而胡广独以醇谨得宠。曾与杨荣、金幼孜同随成祖北征，并为皇太孙讲解经史。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初八卒，年四十九。赠礼部尚书，谥文穆。洪熙时加赠少师。明朝文臣卒后有谥即始于姚广孝与胡广。有《胡文穆集》。

纂修天下郡县志 永乐十六年(1418)六月初六，诏令纂修天下郡县志。由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庶子杨荣、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右谕德金幼孜总裁此事，并遣官前往各地广泛收集史料及旧志书。

密察皇太子德行 成祖在北京，皇太子监国。汉王高煦、赵王高燧及其同党阴谋夺嫡，便向成祖进谗言，谮皇太子擅赦罪人，造成侍从监国之臣朝夕自危，也引起成祖的怀疑。于是，永乐十六年(1418)六月，遣礼部侍郎胡濙巡视江浙诸郡。临行时密令其到南京后多留数日，以察访皇太子的德行。胡濙到达南京后停留时间稍长，引起杨士奇等人疑心，催他尽快起程，而胡濙则以需治办冬衣为辞搪塞。待到达安庆时，才以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密奏。从此，成祖对皇太子的怀疑才消除。

定各府州县僧道额数 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二十七日，规定僧、道人数在府一级为四十人，州一级为三十人，县一级为二十人。限年为二十，由亲戚、邻居保勘。出家五年后，到僧录道录司考试合格者颁牒，否则罢遣为民。

申严官吏犯赃之禁 永乐十六年(1418)十二月十三日，成祖谕法司曰：唐太宗憎恶官吏贪浊，有犯赃者必绳之以法。所以，当时的官吏崇尚清廉严谨，百姓也免于搜刮之苦，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我也屡敕中外诸司不许随意役使一人，擅自敛取一财。但是，不法官吏却仍恣肆如故。今后，如有官吏贪赃枉法，决不宽恕，必严惩之。

《为善阴骘》辑成 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十三日，《为善阴骘》一书辑成。其初，朱棣视朝之暇，在便殿披阅载籍，遇有为善获报的典型传记，即命近臣辑录，并亲自各为论断而系诗于后。全书共辑古一百六十五人，依类分为十卷。朱棣自序说：人之阴骘固无预于天，而天报之者，其应如响。朕尝博览古人身致显荣，其后裔芳声伟烈，传之千万世，与天地相为悠久者，未有不由阴骘所致。然代有先后，时有古今，

简籍浩穰，难于遍阅，朕于万机之下，因采辑传记得百六十五人，各为论断以附其后，并系以诗，次为十卷，名《为善阴骘》，特命刻梓以传，俾显著于天下，且令观者不待他求，一览在目，庶几有所感发，勉于为善，乐于施德，而凡斯世斯民皆得以享其荣名盛福于无穷焉。书成后，朱棣命赐诸王、群臣及国子监天下学校；又命礼部自今科举许准大诰例试士。

张答里麻伏诛　张答里麻（？—1419），西宁人。其以精通译书，机警善对，得进官僧录司左觉义。他恃宠骄蹇放恣，遂于番僧朝贡胁赀留难，招纳逋逃为僧，冒请诰印图书，侵夺各寺院山园田地。其父显藉势作威，无法无天。都指挥李英发其事，三法司研问论斩。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十七日，张答里麻和其父显同时被磔于市，并籍没其家。

陈珪逝世　陈珪（1335—1419），江苏泰州人。洪武初年，从大将军徐达平定中原，授龙虎卫百户，改燕山中护卫。永乐初，论靖难功累迁都督佥事，封泰宁侯，禄一千二百石。永乐四年（1406），董建北京宫殿，经划不紊，甚见奖重。永乐八年，朱棣北征，陈珪偕同驸马都尉袁容辅佐赵王留守北京。永乐十五年，朱棣命铸缮工印给陈珪，并设官属，兼掌行在后府。永乐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卒，年八十五岁。赠靖国公，谥忠襄。

刘荣大破倭寇　永乐年间，倭寇侵扰沿海地区，成为一大祸患。明朝廷严为防御，派辽东总兵中军左都督刘荣（名荣、初冒父名江）专理备倭事宜。刘荣巡视各岛，到达金州卫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上，见此地宽广，且处滨海咽喉要道，便筑城堡，设烽堠，严阵以待倭寇。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瞭望哨报告倭寇将至。刘荣迅速率兵赴望海埚，犒劳军卒，厉兵秣马，准备迎战。另派都指挥徐刚伏兵山下，百户江隆率壮士暗中烧毁敌船，以断其退路。同年六月十五日，刘荣自率步军与敌交战，假装败退，将敌引入伏击地，大败倭寇，斩首千余级，生擒数百人，无一逃脱者。倭寇连年骚扰劫掠，至此始受大的挫折，不敢再犯辽东。捷报传入朝廷，赐敕褒将，并召刘荣入京。

建宁、邵武、延平等府大疫　永乐十七年（1419）五月初一日，福建建安县知县张准言：建宁、邵武、延平三府，自永乐五年以来屡大疫，民死亡十七万四千六百余口。巡按御史赵升已经核实，徭赋及各卫勾补军役未除豁，皇太子命户部悉除。

杨荣疏陈积弊　永乐十七年（1419）十一月，翰林学士杨荣疏陈十事，指斥府、部、法司的积弊。其大致内容为：一，吏部职专选法。洪武中，内外诸司官吏俱有定额。今该一、二员者，或至三、五员者；该六、七员者，或至十余员。各处考满官到部，当辨其贤否优劣，年劳久近，以为黜陟。今有司三、五考，七、八考不能进一级者；有未满一考、二考即升数级者。而且进士、监生出身自有定例，但是如今却有骤然出任方面大员者，也有任知州及府同知、通判者，也有任典史、吏目者。轻重不论，未审凭何擢用。其中情弊多端，此为吏部之弊。二，户部职掌钱粮出纳，尤当尽心，不容有丝毫欺骗舞弊行为。今府、州、县税粮或有经二、三年未交者，有四、五年未交者。而户部毫不在意，每年以催征为名，派官在外，有一、二年不回者，三、五年不为者，只是贪财好色、盘剥良民，部里明知其罪，却不举奏。其税粮既已送纳到各粮仓，而官吏则盗卖虚出。各府、州、县也狼狈为奸，伪造通关，其实并未送纳到粮仓，部里对其奏缴文件也不辨验查驳。此为户部之弊。三，礼部职掌礼仪。今朝贡使臣到京后，其饮食供帐之具全部委托会同馆，应赏赐者故意迟留。又有各处军民来贡者，往往不立即奏报，只令于会同馆听候，或十日、半月不引奏，或已进贡即遣发。此礼官之弊。四，兵部职掌兵政。今乃尸位素餐，优游度日，兵务废弛，马政不修，军伍有经三五年、十数年空歇不补者，马匹孳生有三、五年拖欠不上交者，以致各卫互相蒙蔽，贪赃坏法。此兵部之弊。五，刑部、都察院职掌刑名。今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令人抱冤负屈，无处控诉。也有关押三年、五年以至十年者，有司官吏毫不过问，以致死于无辜者不少。大理寺职掌详刑，伸冤理屈。今乃一同蒙蔽，随其轻重高下不能有所办理。此刑官之弊。六，工部职掌专造作。当今所急务者不过北京宫殿，其诸造作皆可随宜。而有司官吏不度民力，不分缓急，差人买办物料以一科百，以十科千，民受其害不可胜言。并且对借故逃避服工役的匠人也不追究。七，洪武中定制，凡军器除存留操备之数，其余皆令入库，不许私制。近来却有些人出外往往私带军器，及私藏在家，或公开出售。不知其从何而来，何人为之制造。八，洪武中官府买办物料，只收本色物户自送该衙门交纳。今贪财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银，恣肆贪残，吮民膏血。此皆工部之弊。九，洪武中各卫旗官军士编成队伍，各有统属。今擅收别卫军士入伍，又招逃犯及无赖。此军政之弊。十，内外各卫所军士皆有定数，有缺即勾补。今各卫所官吏只耽于酒色货贿，军伍任其空虚。有勾解到卫，而官吏受赃后放免，及以差使为由纵其在外。此军卫之弊。成祖阅后，密谕杨荣：你说的很对。但如进此言，恐怕与群臣产生矛盾，不如让御史上疏。于是，十二月初九，由御史邓真奏疏，众人皆请罪，诏令“诸司悛改，再犯不赦”。

朱棣敕谕武臣严饬武备 永乐十七年(1419)十二月初七日,朱棣敕武臣说:自古国家盛衰存亡,未有不系于武备之张弛。汉、唐世远,置而不言。近代有宋之时,太祖太宗受天命,将勇兵强,削除暴乱,四海晏然;及其子孙武备不修,丑虏僭窃,驯至海内分裂,宗社丘墟。元以胡人入主中夏,世祖时戎部整肃,甲兵强盛,天下宁谧;传至数世,嗣主荒淫,军政废弛,群雄并作,竟至覆亡。我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时将帅效忠,士卒奋勇,肃清奸宄,遂建洪业。朕嗣帝位以来,夙夜惕厉,唯恐蹈宋、元覆辙。你们世有爵禄,与国家同休戚,修饬武备,为国爪牙,是你们应尽之责,理当究心用事。然而,近来纪律松懈,队伍空虚,军士逃亡悉付不问,甚至通同有司受赇枉法,如此武备,国何以赖!所有这些,皆是你们下不恤军、上不忠国所致。自今而后,你们宜鉴古人之得失,体国家之委任,修职务,抚士卒,实军伍,缮器械,使兵振武举,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你们也可永保富贵。如果你们惟图货贿,苟且蒙塞,不遵朕言,仍蹈前弊,必罪不宥。

在外死罪悉送京师审录 永乐十七年(1419)十二月初十日,朱棣诏谕法司:刑重人所慎。大凡行刑,轻则残肤肌,重则戕性命,匹夫匹妇不得其死,足伤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甚非朕宽恤之道。鉴于在外诸司罔体朕意,滥及无辜,自今开始,外地系囚论罪当死者,咸送京师会官审录。你们在会审之际,必三覆奏,然后行刑,不可轻忽率意。

黄宗载请定交趾考绩 永乐十七年(1419)十二月二十七日,巡按交趾监察御史黄宗载上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图,而郡县官员多为两广、云南的举贡,未历国学,因其愿到远方为官,就授远方治民之官,如果等到九年后再考核黜陟,恐怕更加废弛。应令到任二年以上者,由巡按御史及两司对其进行考核并上报。成祖采纳了黄宗载建议,并对行在吏部说:"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人不端,则民受其害。以前任命的那些郡县官员,是出于不得已的权宜之策,如今御史所言极是,以后应慎重选择官员!"

宗喀巴逝世 宗喀巴(1357—1419)是中国元、明之际藏族佛教改革家,格鲁派创始人。本名罗桑扎巴,因生于青海宗喀地区(今青海湟中县境内)故尊称宗喀巴,意为宗喀地方的人。他七岁入甲琼寺为僧,师从噶当派名僧达玛仁钦,学习藏文、密法及显宗经论等,奠定了佛学基础。十六岁赴西藏深造,先后在噶当、萨伽诸大师指导下研习五论、五明,兼通显密,旁及天文历算、医药、语文,成为博学多才、名震遐迩的佛教大师。鉴于当时佛教戒行废弛,不少上层宗教人物腐化堕落,遂以噶当派教义为立说之本,结合自己的见解,建立体系。他著书立说,收徒讲道,举办法会,极力强调僧人要严格遵守佛教戒律。其宗教改革活动得到了西藏地区统治者的支持与赞助。永乐七年(1409),宗喀巴在帕竹地方政权的资助下,在拉萨大昭寺创办主持了全藏性的大祈愿法会(即传召大会,译言"默朗钦波"),会后在拉萨东修建了甘丹寺。从此,以甘丹寺为根本道场,正式形成了以宗喀巴为首的甘丹寺教派,简称噶鲁派,后读音变为格鲁派,意为善规派。因该派僧众皆戴黄帽,故又称黄帽派或黄教。其诸大弟子纷纷在各地建寺弘法,以其逝世日十月二十五日为宗教节日,扩大影响。永乐六年和永乐十二年,成祖曾两次召请宗喀巴进京,皆因故未能应召。第二次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后来,格鲁派逐渐成为在西藏地方执政的教派,并在蒙藏地区广泛流传,成为藏传佛教中最大的宗派。

唐赛儿起义 唐赛儿是山东蒲台人林三之妻,自称佛母,以白莲教组织群众,主要活动于益都、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等地。永乐十八年(1420)二月十一日,唐赛儿以益都县西南的卸石棚寨为根据地,发动起义,派部将宾鸿、董彦皋等攻破莒州、即墨,烧毁官衙仓库,进兵围攻安丘。成祖诏令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率京军前往剿灭。三月十三日,柳升的军队到达益都,包围了卸石寨。唐赛儿拒绝招降,并派耿童儿诈降诱敌,趁机夜袭官军营寨,杀死刘忠,突围脱险。同时,安丘起义军在宾鸿率领下攻打县城,但是被备倭海上的都指挥佥事卫青率骑兵一千袭击,大败,起义军有六千多人牺牲。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起义军的主要领袖都被群众掩护隐藏,没有遇害。尤其是唐赛儿的下落,始终不详。成祖为了搜捕她,曾大捕尼姑、女道士入京,一一甄别,但是仍毫无结果。

《孝顺事实》刊行 永乐十八年(1420)六月初四日,朱棣将《孝顺事实》一书颁发于文武群臣、两京国子监和天下学校。是书由朱棣命翰儒侍臣辑录古今史传诸书所载孝顺之事而成。全书共十卷,收录孝行卓然可述者二百零七人。每事为之论断并系以诗,明成祖朱棣亲自制序冠首。序云:朕惟天经地义莫尊乎亲,降衷秉彝莫先于孝。因而,孝为百行之本,万善之原,大足以动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强暴格鸟兽孚草木,是皆出于自然天理,而非矫揉造作。《孝顺事实》可使观者尽得为孝之道,油然而生亲爱之心,有裨于明人伦敦风俗的世教。

东厂的设立 朱棣即皇帝位后,恐臣民不服,

便命太监及官校四出侦探，兼及他人隐私，一并搜集奏报。永乐十八年(1420)八月，朱棣定都北京。即在东华门北设立东厂，专理刺探臣民谋逆妖言、大奸大恶之事。朱棣担心外臣徇私，不能反映实情，特命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从此，太监提督东厂，成为常例，太监作为提督，具有随意逮捕、刑讯朝野臣民的特权。朱棣为平衡锦衣卫与东厂权势，既由锦衣卫调充东厂属员，又令东厂太监监视锦衣卫。使之相互依赖、彼此制约，共同对皇帝负责。

侯显使西域　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初十日，遣太监侯显出使西域。由于榜葛剌国王赛佛丁派人来告，其居东印度之地，被西部的沼纳朴儿所侵。于是成祖命侯显前往宣谕调解，并赐金币，沼纳朴儿便罢兵而还。侯显自永乐元年(1403)首次奉命出使西域，至此已为第五次，成为出使次数仅次于郑和的太监。

宣布定都北京　北京宫殿即将建成，钦天监奏明年正月初一为吉日，应御新殿受朝贺。于是，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初四，成祖定都北京，并遣户部尚书夏原吉往召皇太子及太孙，限期十二月底到北京。二十二日，又下诏：自明年正月，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设六部，去行在之称。并取南京各印信给京师诸衙门，另铸南京诸衙门印信，全加"南京"二字。十一月初四，以迁都北京诏告天下。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正式迁都北京，十一日大祀南郊，十五日大赦。

朱高炽关心民瘼　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太子朱高炽由南京至北京，路过邹县，见饥民拾草实以食，深为怜悯，下马入民舍，见鹑衣圮灶，叹道：百姓如此饥寒，怎不报告朝廷呢?随后即遍问疾苦。山东布政使石执中迎谒，高炽痛责。石执中对以乞停灾租。高炽说：民今骨立，怎能忍心收税?当立即赈济。执中议每人赈济三斗。高炽说：每人六斗。我当自奏，不要惧怕擅自作主。高炽于十二月末至京，向朱棣言及山东赈济事，朱棣十分高兴。

郑和第六次出使西洋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二十五日，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卜剌哇、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喃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等十六国，遣使来贡名马、方物，成祖命礼部设宴慰劳。三十日，十六国使臣归国，赐其钞币表里，又遣太监郑和率孔和卜花、唐观保、杨庆、洪保、李恺、杨敏、周满等人送十六国使臣同行回国，并带去成祖的敕书及赏赐诸国王的锦绮纱罗绫绢等物。为了赶季风，郑和一行接到命令后急忙兼程出发，使得十六国使臣中的一部分因赶办不及，未能与郑和一道出发。这样，第二批启程的使臣便于当年十月十六日趁冬季季风刚开始之际，命洪保等护送回还，仍由郑和负责依例赏赐各国。象历次远航一样，郑和船队先到占城，派一支船队送暹罗使臣回国，自己率大粽宝船南航，经马六甲海峡，送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使臣归国后，派太监李兴率一支船队西航，自己则与杨敏、李恺北航榜葛剌(今孟加拉)，然后向南绕过印度半岛到古里，直航祖法儿。又由祖法儿南航，访问剌撒后，南访非洲的木骨都束、卜剌哇，然后转舵回驶，于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回国。郑和这次出使，趁护送十六国使臣回国之际，对沿途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又进行了友好访问。比较重要的事件有，在阿丹国采办珍宝。阿丹国即今天的也门共和国的亚丁。因其正当红海南口，是古代西亚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从古里西行，顺风二十二昼夜可到达。阿丹国气候宜人，土地肥沃，不但适于多种农副产品的生长，也利于各种珍禽异兽的繁衍，所以其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而且，其手工业和商业也较发达。郑和使团的一支分宗，在太监周某的率领下，到阿丹国对其国王及大小头目开读诏敕，进行赏赐以后，便开展贸易活动。阿丹国王特令国人不受限制地与中国船队贸易，以示全力支持。中国船队采购的物品有：重二钱左右的大块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高二尺的珊瑚树数株，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即斑马)、金钱豹、驼鸡、白鸠等。此外，郑和船队还到达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海岸的祖法儿，并首次对其国王开读诏书。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在祖法儿国国王、头目的倾力帮助下，郑和船队同祖法儿人民进行了十分广泛的贸易活动，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

三殿火灾　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初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同时发生火灾。营建了十三年的北京新宫，竟然在落成不到四个月时就被烧，此事对成祖的震动很大，怀疑其统治是否引起天怒人怨。于是，初十，诏文武群臣尽言无隐，直陈其缺失。十三日，又诏令停止一切不便于民及不是当务之急的工程，免除永乐十七年以前拖欠税粮、课程、盐课、马草等项及永乐十八年受灾地区的粮草。十七日本为万寿节，也因三殿发生火灾而停止朝贺。

蹇义等分巡天下　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二十一日，敕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询察所苦。兴未兴之利，革未革之害。诸司官吏中，枉法害民者罢黜，守法爱民者表彰。命蹇义、给事中马俊往直隶应天(今南京)等府、州，礼部尚书金纯、给事中葛绍祖往四川，右都御史

王彰、给事中王励往河南，副都御史刘观、给事中李玚往陕西，副都御史虞谦、给事中许能往浙江，工部侍郎郭进、给事中章云往江西，刑部侍郎杨勉、给事中徐初往福建，礼部侍郎郭敦、给事中陶衎往北京，工部侍郎李昶、给事中刘涣往山东，太常寺少卿周讷、给事中刘荩往湖广，大理寺丞郭衎、给事中艾广往广东，大理寺丞孙时、给事中萧奇往山西，通政司参议朱侃、给事中杨春往广西。

古麻剌朗国王病故福建 永乐十八年(1402)十月间，古麻剌朗(今属菲律宾棉兰老岛)国王斡剌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一行随太监张谦向永乐朝廷上表贡方物。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斡剌义亦敦奔在归国途经福建时，不幸病故。朱棣遣礼部主事杨善谕祭，赐谥康靖。并命地方官以王礼治坟茔于福州茶园山安葬，由其子剌苾嗣古麻剌朗国王，率众以归。

交趾分军屯田 永乐十九年(1421)五月二十九日，交趾总兵官、丰城侯李彬上言：交趾新附，其地荒远，运输不便。请依各都司、卫、所例，分军屯田，以供粮饷。按其所处位置的险易轻重，来分屯守征调的多少。交州左、右、前、中卫及镇夷卫、昌江卫、清化卫等七卫，官军以一分屯田，九分备征守。土军七分屯田，三分备征调；交州后卫、三江卫、市桥千户所，官军以二分屯田，八分备征守。土军八分屯田，二分备征调。屯田每人岁征稻谷三十五石。乂安、新平、顺化三卫，官军三分屯田，七分备征守。土军六分屯田，四分备征调；演州、南靖、新安三千户所，官军全不屯田，土军三分屯田，七分备征调。屯军每人岁征稻谷十八石。成祖诏令实行此法。

老挝逐黎利 交趾的黎利被明军击败后，便逃入老挝境内，而老挝则持观望态度，并未按明朝政府的要求驱逐黎利。永乐十九年(1421)九月，丰城侯李彬将此事上奏。成祖敕李彬拘留其头目，送京师盘问。老挝此时才惧怕起来，于同月十一日将黎利逐出国境。

夏原吉谏阻朱棣北征 永乐十九年(1421)十一月十七日，成祖决意亲征阿鲁台，召户部尚书夏原吉、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刑部尚书吴中等商议，几人都认为不宜出兵。又召夏原吉问边防储备物资的数目，夏原吉奏陈：因连年出师无功，军马储蓄已经丧失十之八、九。加上灾害不断，内外俱疲。况且圣体欠安，还需调护。请派将出征，不必劳动大驾。成祖一怒之下，立刻命夏原吉清理开平(今内蒙多伦)储粮。随后，又将其召还，与吴中一同下狱。方宾则因恐惧而自缢死。成祖原想杀夏原吉等人，经杨荣劝解才怒气稍消，便籍夏原吉家，除赐钞外，只有布衣、瓦器而已。

北京郊庙宫殿落成 自永乐六年(1408)六月开始动工兴建北京，至永乐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的郊庙宫殿全部落成，共历十三年半的时间。其规制全仿南京，但是其高敞壮丽则远远超过南京。又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府邸，共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论营建之功，进封薛禄为阳武侯，擢工部营缮清吏司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营缮所副吴福庆等七人为所正，所丞杨青等六人为所副，以木瓦匠金珩等二十三人为所丞，赐督工文武官员及军民夫匠钞、胡椒、苏木各不等。

成祖第三次北征 起初，阿鲁台为瓦剌马哈木等所败，处境困窘，于是，率其妻孥部落南奔，在塞外苟延残喘。并向明朝称臣，遣使进贡。成祖收纳其贡品，并封阿鲁台为和宁王，母妻皆为夫人，仍居漠北。阿鲁台感激恩德，多次派人进贡，并派其子入朝。阿鲁台在塞外休养生息，财物日富，而其背叛之心萌发。于是，对朝廷使者或者恣慢侮辱，或强行拘留。而其入贡使者回来后也往往沿路抢劫。永乐二十年(1422)三月十八日，他们又袭掠兴和杀死守将都指挥使王焕。因此，成祖遂于永乐二十年(1422)三月二十日亲征阿鲁台。

三月二十一日，大军从北京出发，二十四日，明军驻扎鸡鸣山。此时，传报袭击兴和的敌人逃走，各位将官请求追击，成祖不许说：贼虏非有他计，追之徒劳。明军取道开平，过应昌，乘其不备，直捣其老巢。四月一日，明军到达龙门，守兵报告说贼虏刚刚逃走，在洗马岭丢下二千多马匹，王礼奉命尽收。四月二十九日，成祖在云州举行大阅兵。五月十日，成祖命隰宁守将郭亮说：贼虏来了不要应战，固守其城，等大军到来。十二日，成祖校射，并亲作《平虏》三曲让将士歌唱，以壮士气。十七日，明军从西凉亭出发，在闵安扎营。大臣居营中，五军分驻营外，并建左右哨、左右掖总护其营。步兵在内，骑兵在外，神机营又在外。营外有长围墙，四周二十里长，军中砍柴放牧不得出此范围。二十一日，命前锋左都督朱荣率哨骑五千人前行，其余人回营，遇敌勿轻战，快速回报。七月四日，部队行进到杀胡原。朱荣率军擒获贼虏部属。据他们说，阿鲁台闻听明军出征，很是恐惧，于是，将马匹辎重丢在库楞海，成祖召朱荣等回军中。询问，果然如此，遂决定收兵。

广州等府飓风暴雨为灾 永乐二十年(1422)五月初，广东广州等府发生飓风暴雨，潮水泛滥成灾，溺死三百六十余人，漂没房舍一千二百余间，损坏仓粮二万五千三百余石。灾讯传至京师，监国的皇

太子朱高炽(明成祖朱棣亲征阿鲁台在外)命令户部遣官抚问。

回击大宁三卫 阿鲁台起兵为寇,反叛朝廷,皆因得到了兀良哈三卫暗中相助。成祖吓退阿鲁台以后,对众臣说:阿鲁台之所以猖獗,是由于有兀良哈与之暗中策应。二寇勾结,边患无穷,今当移师翦之。于是,永乐二十年(1422)七月二日,明军步骑二万,分两路征讨兀良哈。成祖说:大军到来,敌人必闻声西逃。七月十二日,明军到达奇拉尔河,只见三卫几万人果然正驱车西行。官军忽降,敌兵仓猝应战。成祖亲自率前锋冲进敌群,斩首数百级,其余都被打散。此地背河,左面是山,大军依山作战。成祖登高察望,见敌军刚要聚到一起,就率军绕到敌军右面,派兵渡河,断敌后路,三面夹击,敌军大败。又派兵绕至敌左面,命弓箭手埋伏林中,又命于山下严阵以待。三卫兵都丢下辎重向左逃窜,成祖率骑兵与山下步兵联合夹击,敌兵跑到林中又遭弓箭埋伏,于是,三卫兵溃不成军。成祖又派兵追出三十余里,斩其部长几十人,掳获牛羊十余万,并荡平敌兵老巢。七月十三日,又分兵进击河西,捕斩多人。十六日,兀良哈余党来到军中,投降明军。

邹缉逝世 邹缉(? —1422),字仲熙,江西吉水人。其力学博洽,自学官荐擢国子助教。永乐初,迁至翰林侍讲。在东宫,兼左春坊中允,屡署国子监事。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北京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忽罹火灾,朱棣下诏求直言。邹缉上疏数千言,极陈时政缺失。同年冬天,进右庶子兼侍讲,预修《太祖实录》和《永乐大典》。邹氏博览群书,居官勤慎,好持正义,淡泊布素。二十年九月初六日卒于官。身没后,家无余资,唯有藏书数千卷。

柳州百姓起事 永乐二十一年(1423)二月,柳州等府,洛容、柳城、宜山、天河等县百姓相继发生起事,多次出击,杀败官军。广西都指挥使鹿荣等奉命围剿,但无建树。言官弹劾鹿荣玩忽职守,请治其罪。成祖姑宥,令其立功赎罪。镇远侯顾兴祖奉命督阵。于是,鹿荣率桂林右卫指挥使雄等带兵进剿。生擒"治平都统将军"袭振海等五人,斩郁打枕等三千一百八十人。叛贼劫掠的平民子遣还男女一百八十多人。袭振海等押解赴京斩首。

谋废太子 赵王高燧即与汉王高煦早就觊觎太子之位。成祖渐闻其恃宠,多行不法之事,遂杀其长史顾晟,并欲削高燧,因太子力解而免。时成祖因疾,不能亲自临朝,国中之事,多由太子明仁统理。明仁体恤下属,对宦官倚势欺人多严加训斥。宦官王俨、江保等人怀恨在心,数行离间,虽未得逞,而太子进见日稀。适逢赵王高燧入朝临京师。王俨诸人以为皇上属意赵王,遂与赵王随从孟贤勾结,与钦天监王成友善。一日,王成密语孟贤诸人:成观天象,且有易主之变。旬月间耳。孟贤大喜,遂与其弟三常、山左护卫老军马恕田之子、兴州后屯卫高正、通州右卫镇抚陈凯等日夜密谋,由高正伪制遗诏,买通近侍,伺机献毒皇上。一等皇上驾崩,即命人劫出禁杖、符玺。并属宦官杨庆养子,到时伪诏从中下,立赵王为天子。然未将此事告赵王,将待事成之后。一日,孟贤、高正又将此事告知高正之甥王瑜,王瑜以为此乃灭族之罪,泣谏不听,遂上告常山中护卫指挥孟贤等纠合羽林前卫指挥彭旭等,将举兵推赵王高燧,谋不轨之事。成祖闻报,急令逮捕,御右顺门亲鞫讯,立诛杨庆之子。并获伪制遗诏。成祖质问赵王,赵王不能言,太子力解,说此乃下人所为,赵王不知。赵王获免。孟贤等人皆诛,并没收家产。

成祖第四次北征 永乐二十一年(1423)七月二十日,鞑靼降人来报,阿鲁台将进犯边境。成祖急召众臣,说:去秋寇犯兴和,朕率大兵捣其巢穴,复剿其党乌梁海之流,敌兵屡败,处境困窘。而今敌将犯边,必以朕既得志,必不复出,朕当率兵先驻塞外以待之。敌不知我出兵必轻肆妄动,我则乘其劳而击,破之必矣。遂令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统帅中军,武安侯郑亨、保安侯孟瑛统帅左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统领右哨,左掖由英国公张辅、安平伯李安统领,右掖命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统领。并命宁阳侯陈懋等居前锋,先行攻击贼寇的西部兵力。命户部料理军实。二十四日,成祖车驾从京师出发,二十六日抵土木河,命学士杨荣参与军事决策。九月十五日,鞑靼故知院有人前来投降,并告成祖说:"今夏阿鲁台已为卫剌特所败,溃不成军。如今听说大军出塞,早吓得远跑,不再敢有向南犯之意。"成祖授给他们正千户,并决定班师,无功而返。

晋王济熿残暴 永乐二十一年(1423)八月二十七日,朱棣第四次北征行至沙城。原晋王现为庶人的济熺及子美圭前来拜谒,成祖见其父子可怜,顿起恻隐之心,遂封美圭为平阳王,让他带父到平阳居住,并拨恭王的部分土地给他。先前,济熿因构陷济熺,而得到了晋王之封位。济熿为王后,更加专横残暴,毒死生母谢氏,并逼人蒸死恭王侍儿吉祥。将济熺父子幽禁起来。绝其饮食。其父兄及随他从宫之人咸遭陷害,无人敢言。后来,恭王宫中一老妇人,跑去向皇上诉说此事,皇上就从狱中召晋府故承奉左微问询,左微历数济熿构陷他人之罪状,皇上马上命左微召见济熺父子。至此,济熺父子才得获释。

十六国使臣、商人至南京 永乐二十一年(1423)九月,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剌、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十六国使臣、商人一千二百多人至南京。因天气渐冷,成祖命礼部在会同馆宴请慰劳他们,之后赐给使者礼品,将其遣还。对那些前来作生意之商人,也赐给与其物品价值相当钱钞。

蒙古王子也先土干来降 成祖大军远道征讨,而敌兵已闻声遁逃,成祖正耻无功班师,永乐二十一年(1423)十月,恰逢蒙古王子也先土干前来投降,成祖心中大喜,赐姓名金忠,后又封金忠为忠勇王,并授金忠的外甥及其下属七人同为都督、都指挥等官,赐冠带织金袭衣。

成祖第五次北征 永乐二十二年(1424)正月初七,阿鲁台又进犯大同、开平(今内蒙古多伦一带)。大同、开平守将先后奏报敌情,而群臣也劝成祖北征,于是成祖决意亲征蒙古。初九,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及西宁(今青海西宁)、巩昌(今甘肃陇西)、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各卫的士兵,以三个月为期限会合于北京及宣府(今河北宣化)。三月初二,谕诸将亲征,命柳升、陈英领中军,张辅、朱勇领左掖,王通、徐亨领右掖,郑亨、孟瑛领左哨,薛禄、谭忠领右哨,陈懋、金忠领前锋。四月初四,车驾由京师出发。命皇太子监国,以大学士杨荣、金幼孜扈从,杨士奇等留京辅佐皇太子。二十五日,车驾到在隰宁,有探报言:阿鲁台去年秋天听说大军来到就远远逃走。到冬天,大雪积至丈余,牲畜大多死去,其部曲也四散离去。近来,听到朝廷又出兵,就逃到达兰纳穆尔河(今蒙古和林东北,或曰即库库诺尔海。亦作答兰纳木儿)。成祖认为敌人一定离大军不远,命诸将速进。五月初五,车驾进驻开平,适逢大雨,士卒有后到而受湿寒的,成祖命诸将抚恤士卒。当时由于连年用兵,白骨遍野。成祖于十五日命柳升等率军士收拾道中遗骨,并亲自为文祭奠。六月初一,车驾到祥云屯。初三,到翠玉峰,命前锋陈懋、金忠探查敌情回奏。初十,车驾至金沙泺,陈懋等带回所得九匹马。十七日,到达天马峰,陈懋派人奏言:臣等已到达兰纳穆尔河,不见敌人踪迹,怀疑敌人逃走已经很长时间了。成祖又派张辅、王通等分兵穷搜山谷,仍毫无发现,皆领兵返回。二十日,陈懋等也因粮尽而还。于是张辅奏言:望给臣等一月口粮,以率骑兵深入,必可擒获敌人。但是,杨荣、金幼孜劝成祖应班师回京,成祖采其议。二十二日,商议分兵两路,成祖率骑兵东行,命郑亨等领步兵西行,约定会合于开平。

从征官军赏格的制定 永乐二十二年(1424)正月二十五日,朱棣诏定从征官军赏格:一品、二品钞二十锭,三品、四品十锭,五品九锭,六品、七品八锭,九品五锭,未入流并办事人才等各三锭;其将军、力士、校尉、旗军等各十锭。

朱棣论武德 永乐二十二年(1424)五月十四日,朱棣在北征途中召诸将告谕:古谓武有七德,禁暴乱为首。又谓止戈为武,是说帝王之武以止杀而非行杀。我为天下主,华夷之人,皆吾赤子,岂间彼此。今罪人唯阿鲁台,其胁从之众有归降者,宜悉意抚绥,无令失所。非持兵器攻我军者,悉纵勿杀。以体我体天爱人之意。

申严越诉之禁 永乐二十二年(1424)五月十四日,皇太子谕刑部、都察院官:军民词讼,自下而上陈告,已有定律,今顽民动辄赴京越诉,及逮问,十之五六不实,虽平民终无罪,但道路往还数千里,不耐辛苦而死者多。今后所告非重事,全部发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理问,无干涉者就遣宁家,有罪者赴京。

周叔光、王均亮起事 永乐二十二年(1424)五月,丽水(今浙江丽水)、政和(今福建松政之南)二县山民周叔光、王均亮聚众起事。巡按御史王复奏请朝廷派兵围剿。成祖以此事问杨荣,杨荣答道:这是愚民无知的表现,他们中有的是苦于有司无道,有的是衣食所迫,不得已才聚集于山谷,以求苟活。如果派兵去镇压,就会使其更加齐心奋战,应派使臣去招抚才好。成祖采纳其建议,派使招抚,果然平息。

成祖朱棣死于榆木川 朱棣(1360—1424),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母孝慈高皇后马氏(一说为嫔妃所生)。朱棣自立为帝,改元永乐,开始了长达二十二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朱棣在位期间,曾五次亲征漠北,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先后六次派遣郑和下西洋(今南洋及印度洋沿岸),从而增强了我国与亚、非(最远抵达东部非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对内则实行削夺藩王兵权,强化中央集权专制;倡编《永乐大典》,对保存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具有积极的意义。朱棣开始重用宦官,成为明中期以后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八日,朱棣卒于第五次北征蒙古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东南),年六十五。八月初十日,灵柩至京,皇太子迎入仁智殿,加殓纳梓宫。九月十日,被奠谥为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葬长陵。事隔百余年后,嘉靖十七年(1538)改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

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成祖。

请罢西洋宝船等事 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初五，释前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于狱，恢复原官职，并以时政相咨询。夏原吉首先讲到东南地区因漕运而民力困乏，请以南京为京师，以省供给之费，并罢西洋取宝船、迤西(云南西部诸府)市马及云南、交趾采办金珠数事。

朱高炽即皇帝位 朱高炽系成祖朱棣长子。洪武二十八年(1395)闰九月册立为燕世子。靖难兵起，留守北平。永乐二年(1404)召立为皇太子。汉王高煦以靖难功，谋立太子，因高炽处事仁厚，终得不废。朱棣数次北征，高炽监国，处理政务。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卒于榆木川，八月十五日即皇帝位。改明年为洪熙元年。九月，立妃张氏为皇后，长子瞻基为皇太子。

汰文官冗员 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十二日，仁宗朱高炽命吏部汰文官冗员。谕曰：古称官不必备。如今文官过冗，贤否混淆，廉污无别，君子小人并处。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縻廪禄，何裨政理！其在内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贤材之人留用，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罢黜。自今吏部任人宜精选勿滥。同月十七日，采纳吏部尚书蹇义的奏议，诏命文官年七十致仕还乡，如其人鄙猥阘茸或有疾而未及七十者，罢免为民。

复置三公及三孤官 洪武年间曾设置三公官，以李善长为太师，徐达为太傅。三孤官无兼领者。建文、永乐时，则罢公、孤官。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十六日，新即位的仁宗又恢复三公及三孤官，由公、侯、伯、尚书兼任。太师、太傅、太保官阶为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官阶为从一品。命蹇义为少保，仍兼吏部尚书，加英国公张辅太师，两人皆二俸俱给。

用钞中盐例的制定 仁宗朱高炽曾谕户部尚书夏原吉：钞法阻滞，是因散出太多，宜设法收纳。民间钞少，钞法自通。当议收纳之法。原吉奏陈：若许有钞之家中盐，收纳钱钞不难。高炽说：此为一时权宜之法，待钞法通即止。但必稍宽为则，民乐依从。遂命夏原吉与吏部尚书蹇义等定各处中盐例。永乐二十二年(1424)九月初一日，原吉等奏：沧州盐每引钞三百贯，河南、山东每引一百五十贯，福建、广东每引一百贯。输钞不问新旧，支盐不拘质次。高炽允其速行。

官司所用物料不许科派 永乐二十二年(1424)九月初十日，工部奏修军器，请求向百姓课征布漆，仁宗朱高炽命给钞购置。并谕曰：近年丹漆、石青之类，所司不究物宜，一概征诸郡县，郡县再逼迫小民完纳，商贩乘时射利，踊价自肥，以致民费千百，朝廷仅得十一。自今官司所用物料，在所产地计值购买，有科派病民者，罪不容诛。

增诸王岁禄 永乐二十二年(1424)九月十三日，赠诸王岁禄：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万石，全支本色；庆府原禄一万石，全支本色；宁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万石，全支本色；代府加米一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全支本色；沈府加米七千石，通前一万石，内本色米六千石，余折钞；唐府加米一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全支本色；鲁府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全支本色；辽府加米一千石，通前二千石，全支本色；肃府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全支本色；秦府原禄一万石内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五千石支本色，余折钞；伊府加米一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全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前一千石，全支本色。汉、赵二府各加米二万石，通前三万石，仍岁加钞十万贯。另各加黄金、钞币有差。

黎利入寇茶笼州、清化 永乐二十二年(1424)九月十三日，交趾黎利骚扰义安的茶笼州，交趾都司都督同知方政被其击败，昌江卫指挥同知伍云因孤军深入而战死。随后，黎利又攻清化，都指挥陈忠也战败而死。当初，太监山寿镇守交趾时与黎利关系很好，回朝后力言黎利可以招降，并以死来担保。于是，派山寿带敕授黎利清化知府。但是，敕书未到而黎利已经骚扰清化。黎利得到敕书后仍然毫无降意，不断四处劫掠。

南京守备的设置 永乐二十二年(1424)九月十六日，高炽令设南京守备，以襄城伯李隆充任，兼领中军都督府事。此为南京枢要之职。

陈瑄奏陈时政 永乐二十二年(1424)九月二十日，平江伯陈瑄奏陈时政七事：重国本，择贤能，苏民力，兴学校，整军伍，谨边防。高炽多采行。时有人言陈瑄奏陈多为寻常之事，高炽说：出自武臣，虽为寻常之事，亦难能可贵。同时加以奖赏，以导不言之臣。

罢革两京户部行用库 初设两京户部行用库，专理倒易新钞，兼收民间金银。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初一日，朱高炽采纳户部尚书夏原吉言，罢金银交易之禁，并广收民间钞入官，凡昏烂钞币全部焚毁。又增加肆门摊诸税，折收旧钞。遂革罢两京户部行用库。待钞法通后仍复其旧。

立皇太子 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十一日，仁宗立皇长子瞻基为皇太子，册胡氏为其妃。又封第二子瞻埈为郑王，第三子瞻墉为越王，第五子瞻

墡为襄王，第六子瞻堈为荆王，第七子瞻墺为淮王，第八子瞻垲为滕王，第九子瞻埈为梁王，第十子瞻埏为卫王。

增京官及军士月廪 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谕户部尚书郭资：往年百官军士扈从，每月给米五斗。如今建都北京，这些人都有家室，恐怕不够维持其生计。常常是遵纪守法者被饥寒所困扰，而贪赃枉法者则肆无忌惮。于是，命令增发京官及军士月廪。

阿鲁台遣使来贡 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一月初二日，阿鲁台闻成祖死，仁宗继位，便遣使来贡马。仁宗下诏宥其罪，接受其贡马。从此，阿鲁台仍然每年遣使朝贡。

御史分巡天下 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一月十二日，仁宗朱高炽令遣监察御史汤淡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并告谕：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近年来，在外为一方父母官的不体察朝廷安民之意，侵扰盘剥，使得民不聊生，现在令你们分行考察。但是，人的才器是不同的。有的人专事谄媚，而不理政事，以致于百姓身受其害；有的人沉静笃实，不善逢迎，而为政简易，百姓对其心悦诚服；有的人滥用刑罚，巧取豪夺，却能够做成一些事情；有的人廉洁无私，谨言慎行，但是却无所作为。你们应当心中明白，具实报告。不要被小人迷惑，不要屈服于权势，不要对亲故存有私心，当众审理，秉公而断。御史是我的耳目，应当不辜负我的期望。一定要先自治，才可治人。如果抛弃廉耻，违背礼法，那么我也不会宽恕你们。你们此行当自勉！又各赐钞二十锭，做为旅费。

虞谦上书言事 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一月，召浙江巡按御史虞谦还京，擢大理寺卿。虞谦应诏上书言七事：一，用人。用得其人则国运兴，不得其人则国运衰。二，兴学校。教育的根本在于老师的模范作用，不在于储备而在于得人。三，端风宪。都察院是监督纲纪之官，现在专门靠其治狱办案，不是设置此官的本意。四，广储蓄。因连年用兵，京师困乏，应事先储备以防万一。五，惜民力。畿内百姓，被牧养官马所困扰，应将其分给无马的郡县。六，通钞法。钞法不行，是由于出多而入少，应当多方收敛而不轻易放出，则自然流通了。七，治奸宄。畿内百姓中盗贼很多，应将其编为里甲，使其互相察觉。仁宗认为其言切中时务，命商议实行。

书三司官姓名于西序 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二月初十日，仁宗朱高炽谕吏部尚书蹇义等：庶官贤否，军民休戚所系。昔唐太宗书刺吏名于屏，朝夕省览，遇有善政，各疏于下，故当时百官皆思奋励，致治太平，以至斗米三钱，外户不闭。皇考亦尝书外官姓名于武英殿两廊。今五府、六部，朝夕接见，得询察其贤否。若三司官，我既不识，又不知姓名，虽或闻其贤否，久则易忘，人臣有善而上忘之，谁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谁复知戒？如此，保以忘治！于是，命书天下都司及布、按二司官姓名于奉天门之西序。

黄骥上疏严贡省事 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二月，礼科给事中黄骥因为曾经三次出使西域，于是上疏言：西域的贡使，多是商人假托的。无赖小人，加入其随从行列，乘机役使他人，运贡物到京师，得到优厚的赏赐。番人慕利，月月入贡，以致于百姓失业，妨害农耕。待其贡使返回时，运送所带货物的车辆达一百多，丁男不足，就役使妇女。而且侮辱驿官，鞭打夫隶，无人敢与之对抗。请敕谕陕西行都司，只有哈密诸国王遣使入贡的，才准许其来京，且只准正、副使可以乘驿马，陕西民力大概可稍微缓解一些。至于西域所产，只有马匹是边关确实需要的，应就近交给甘肃军士，其它如硇砂、梧桐、碱之类，皆无益国用，请一切不要接受。这样，则来入贡的人自然就稀少，浮费更加节省。仁宗嘉纳之，并令立即商议实行。

罢给朝觐官孳牧马 兵部尚书李庆上言：今岁畜马蕃息，除给军外，尚余数千，今朝觐官并集京师，请准以民间例。人给一马放牧，岁课其驹。杨士奇力陈不可说：朝廷选贤授官，而使之牧马，是贵畜而贱士，何以示天下后世？朱高炽许以中旨罢，可无结果。士奇力言，又不报。洪熙元年(1425)正月十八日，朱高炽御思善门召士奇说：朝觐官牧马事，我岂能忘却。听说吕震、李庆等与你不甚融洽，我耽心你孤立，被他们伤害，不想因你奏言而罢朝觐官牧马事。今天我得一奏章，可以草敕而行。遂出示陕西按察使陈智言《养马不便疏》。士奇顿首而谢，草敕罢给朝觐官牧马。仁宗还对士奇说：今后政令有不便，可密以告我。李庆辈不识大体，不足与语。因其为先朝旧人，不忍立即令其致仕。

权增市肆门摊课钞 仁宗朱高炽以钞法不通，民间交易率用金银布帛。命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与群臣议革其弊。原吉等奏：钞多则轻、少则重，朝廷敛散适中则自无弊。今民间钞法不通是因朝廷散出太多，宜为法敛收。请于市肆各色门摊内量度轻重，加其课钞，亦宜少出。民难得钞则钞自重。高炽遂于洪熙元年(1425)正月十九日，令增市肆门摊课钞。并令待钞法通即复旧额，勿为常例。其以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行禁止。

展省官给道里费 洪熙元年(1425)正月二十一日，仁宗朱高炽谕礼部尚书吕震：朝臣在任久，今

皆令其还乡展省。有得诰敕者足为家乡之荣。但到家有养祭宾客之费、往还有道理之费。计其在官俸禄给日用之外有余资的颇少。因此,自今还乡展省官皆赐道里等费:公、侯、伯、一品、二品赐五千贯,三品四千贯,四品三千贯,五品二千贯,六品、七品一千贯,八品以下五百贯。并著为令。

遣官察民利病 洪熙元年(1425)正月二十八日,仁宗朱高炽诏广西右布使周翰、广西按察使胡概、福建太参政叶春等巡行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湖州、杭州、嘉兴等处,察民利病。朱高炽告谕道:我君临天下,夙夜以康济为心。而南方诸郡,灾害频仍。但民众地远,情难上通。特命你们巡行其地,察民安否?何弊当去,何利当兴,审求其故,具实以闻。你们必公必勤,勿徒苟应故事,以副我忧悯元元之意。

各边将军印的颁行 镇守边塞将领,曾多佩将军印,而系皇帝特命,称"挂印将军"。洪熙元年(1425)二月初一日,仁宗朱高炽颁制谕及将军印于边将:镇守云南的称征南将军,两广称征蛮将军,辽东称征虏前将军,大同称征西前将军,宣府的称镇朔将军,甘肃称平羌将军,宁夏称征西将军。此时,陈智镇守交趾,也被颁发征夷副将军印。同时命令有旧授制谕者封交朝廷。为防御北边,仁宗又于同月初四日,命礼部铸征虏大将军印。二月二十四日,铸镇朔大将军印。

郑和守备南京 洪熙元年(1425)二月初八日,仁宗命于去年自西洋回国的太监郑和率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于内则与王景弘、朱卜花、唐观保协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驸马都尉沐昕商议的当,然后施行。

军民犯笞杖运砖赎罪 洪熙元年(1425)二月初十日,刑部、都察院奏言:军民犯笞杖者,宜令运砖赎罪。仁宗准行。同时命官吏犯罪应降、罢者仍依律断。

南京地震 自洪熙元年(1425)二月十八日起,南京接连地震,计有十六次,六安卫亦发生地震。《明史·五行志》载,南京此年共发生地震四十六次。

严禁法外用刑 洪熙元年(1425)三月十七日,仁宗朱高炽谕刑部尚书金纯等,严禁法外用刑。他说:刑以禁暴止邪,岂能专事诛杀!皇祖律令,善善长而恶恶短,罚之轻重,皆适其中。吏比附谬妄,傅会致人死罪,我深为怜悯。五刑之条,莫甚大辟,身首异处,已至极点。自今有犯死当凌迟的,依律科断,余斩役罪,法司并勿傅会。若我嫉恶偶过律外,用籍没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于五奏,若仍不允,同三公大臣执奏,以至允准乃已。著为永制。文武诸司,自今亦不许法外用鞭背等法,尤不许宫人以绝嗣。自宫求用之人,绝其祖宗以至父母而贪图富贵,岂有心事君。今有自宫者,以不孝论。自今犯谋反大逆者,依律连坐,余止其身。古之盛时,采民言,资警戒,今凶险之徒,摭为诽谤,一言涉国,辄罣此名,法吏刻深锻炼,刑之失中,民则无措。今后告诽谤者,一切勿治。

仁宗戒谕皇太子 洪熙元年(1425)四月初七日,仁宗赐皇太子瞻基书,戒谕道:惟祖与孙、父与子,亲爱天下无加。而唯明所以长保富贵寿康之道以期之,圣人之心。你是我的长子。我皇考鞠育提训,随事示之。永乐甲辰春亲征北虏,车驾将发,子孙皆在,顾你告我:古之令主,盘盂剑几,皆有警铭。人主之道,莫大中正。我欲以"人主中正"四字制宝,师还授你当勉,不幸宾天。你今为皇太子,谨制授你。当敬其内以慎其外,隆古帝王传授尽此。

仁宗赐士奇等银章 洪熙元年(1425)四月十六日,仁宗朱高炽视朝毕,对蹇义、杨士奇说:我监国二十年,为谗言所构,心之艰危,吾三人共知。赖皇考仁明,得以保全,以有今日。言毕即潸然泪下。蹇义、士奇亦流涕说:先帝之明,亦陛下孝诚之感,今已脱险即夷,当以自宽。高炽又说:即吾去世后,谁知吾三人同心一诚呢!遂赐蹇义银章书"忠贞",士奇银章书"贞一",分藏于家。同时各赐玺书,多所褒扬。

杨士奇谏止颂太平 洪熙元年(1425)四月,时廷臣有上书颂太平者,大学士杨士奇进言:陛下虽泽被天下,然流徙尚未归,创夷尚未复,民尚艰食。更休息数年,或许太平可期。仁宗嘉纳其言,便对蹇义等臣说:我待你们以至诚,实赖匡弼。数月以来,惟士奇五上章奏,而你们皆无一言,岂果朝廷无缺、天下太平吗?蹇义等惭谢。

诏修《太宗实录》 洪熙元年(1425)五月初四日,诏修《太宗实录》。令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蹇义、少保夏原吉为监修官。令少傅大学士杨士奇、少保黄淮、太子太保杨荣、太子少保金幼孜、太常寺卿杨溥为总裁官。曾棨、王英、王直、陈循、李时勉等为纂修官。宣德五年(1430)正月修成,计一百三十卷,《宝训》十五卷。监修官、总裁官、纂修官升赏有差。

仁宗朱高炽逝世 朱高炽(1377—1425),太宗朱棣长子。洪武二十八年(1396)册为燕世子,永乐二年(1404)二月立为皇太子,二十二年八月即皇帝位。高炽为世子时,初以靖难,居守北平,全城济师。其后,朱棣岁出北征,又以皇太子监国,朝无废事。因高煦等谋位,屡进谗言,终以诚敬而得保全。且说:

“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有谗人也。”在位不满一年，用人行政，以仁厚宽恕为本。洪熙元年(1425)五月十一日卒，年四十八。七月初二日上尊谥仁宗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庙号仁宗，九月初六日葬献陵。

朱瞻基即皇帝位 洪熙元年(1425)五月十一日仁宗朱高炽逝世，六月十二日皇太子朱瞻基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宣德元年。七月初八日，尊母后张氏为皇太后，立妃胡氏为皇后。

敕修《仁宗实录》 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初八日，敕修《仁宗实录》，以张辅、蹇义、夏原吉及成山侯王通为监修官。大学士黄淮、金幼孜、杨荣，学士杨溥与杨士奇同为总裁官。同月十五日，遣进士陆征等采京省事迹，以备修《实录》。宣德五年(1430)正月修成，计十卷。监修官、总裁官等升赏有差。

讨安定、曲先 洪武年间于西番地设置安定(今青海柴达木盆地东北)、曲先(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南)二卫。永乐二十二年(1424)，宦官乔来喜、邓诚被遣赴乌斯藏(今西藏)为使。行至黄羊川，安定指挥哈三孙散哥(故元宗室后裔)及曲先指挥散即思等率众杀朝廷使者，抢夺驼马币物而去。洪熙元年(1425)八月初二日，宣宗命陕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挥李英偕河州卫指挥康寿讨安定、曲先。李英等率西宁诸卫及十二番族之众，深入追击，斩安定一百八十余级，俘七十余人。曲先之众闻讯远逃。安定王桑儿加失夹进京谢罪，得到宽恕。不久，李英擢任左都督。

黎利攻陷茶笼 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二十六日，交趾黎利围茶笼七月，城中粮尽，巡按御史奏折虽然到京，而仁宗已死，茶笼被黎利攻下。宣宗朱瞻基命荣昌伯陈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率军征讨。宣德元年(1426)三月初五日，陈智等师至茶龙，与黎利接战，屡战屡败。四月，降陈智、方政为事官，立功自赎。又派成山侯王通为总兵官，继续征剿黎利。五月，赦黎利罪，许其自新，黎利不听，战火不息。十一月，王通又败。死二三万人，参赞军务的兵部尚书陈洽自杀。十二月，命安远侯柳升充总兵官率军进剿。

遣官清理军伍 宣德元年(1426)正月二十四日，宣宗命吏部侍郎黄宗载等十五人清理天下军伍。因当时军伍缺额严重，而各州县又多欺隐，兴州军士范济进京奏言。于是宣宗命黄宗载等分别前往各地清理。其后定“清军例二十四条”，并将遣京卿给事中御史清理天下军伍定为常规。黄宗载赴浙江；户部侍郎郝鹏赴湖广；刑部侍郎樊敬赴扬州、淮安、凤阳、庐州、滁州、徐州；俞士吉赴应天、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广德、和州；吴廷用赴江西；北京行部侍郎金庠赴北直隶；都察院副都御史李素赴山西；大理寺卿汤宗赴山东；少卿严升赴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徽州；李谦赴广东；施礼赴河南；寺丞张宗琏赴福建；艾良赴四川；通政使司右参议何怀辉赴广西；鸿胪寺丞张人实赴陕西。

尽除开荒田逋税 巡按御史张政奏陈：百姓先有逃徙，荒废田土，逋负税粮。近奉诏赦宥，令其复业。所有积逋，全部蠲免，欢腾远迩，莫不来归。臣见山西百姓多复愁沮，究其原因，因初逃时，有司惧罪，未申户部，无从蠲免。今来归田，有司仍旧征税。恐交不起逋税而又逃徙。宣德元年(1426)二月初六日，宣宗得奏，谕户部尚书夏原吉：大赦之后，何逋不除，岂可谓初未申闻，但要交纳！此乃失信于民。其即下所司，悉予蠲免逋税。

吕震逝世 吕震(1365—1426)，字克声，陕西临潼人。幼称神童，弱冠举于乡。洪武十九年(1386)以乡举入太学。擢山东按察司试佥事，入为户部主事，迁北平按察司佥事。燕兵起，吕震归附成祖，侍世子居守北平。永乐初年，迁真定知府，入为大理寺少卿。永乐三年(1405)迁刑部尚书。六年改礼部。仁宗即位，命兼太子少师，不久进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吕震有精力，能强记，才足以济其为人。但刚愎自负，谄上厉下。因其为旧臣，朝廷虽厌而不弃。宣德元年(1426)四月初三日卒，年六十二。

《外戚事鉴》、《历代臣鉴》成 宣宗朱瞻基以史籍所记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恶足为鉴戒之事，摘录编辑成书，宣德元年(1426)四月十五日辑成，并亲自作序，颁赐外戚及群臣。宣宗告谕道：吾惟治天下之道，必自亲亲始；至文武诸臣，亦欲同归于善。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所以于暇日采辑其善恶吉凶之迹，汇为此书，以示法戒。其择善而从，以保福禄。

贵州土人断罪例的制定 宣德元年(1426)五月二十四日，定贵州土人断罪例：杂犯死罪就彼役作终身，徒流迁徙者以年限役作，应笞者役五月，应杖者役十月。单日释放。

宗室品级冠服仪式的制定 宣德元年(1426)六月十四日，定宗室将军、中尉、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仪宾品级冠服仪式：镇国将军禄千石，从一品；辅国将军八百石，从二品；奉国将军六百石，从三品；镇国中尉四百石，从四品；辅国中尉三百石，从五品；奉国中尉二百石，从六品。其妻各依品受封，仪宾减一等。郡主仪宾从二品，县主仪宾从三品，郡君仪宾从四品，县君仪宾从五品，乡君仪宾从六品。郡王纳妃袭爵，遣使册命。其将军、县主以下婚，但颁诰命

冠服。其余仪伏衣具，皆本邸自备。

变通蓟州军户畜马之制　原因蓟州(今天津蓟县)之东，地广草肥，宜于畜牧，令永平卫军，人牧牲马一匹，两年责纳一驹，免其他役。后军士调拨既多，畜牧马匹皆老幼残疾之人，一人有畜二三十匹的。责驹数额，难于完纳，种马亦耗。于是巡按御史李骥于宣德元年(1426)七月初三日奏陈：请变通蓟州军户畜马之制，分给军少诸卫平均畜养。宣宗诏从其议。

罢湖广采木　宣德元年(1426)七月二十一日，巡按湖广的监察御史刘鼎贯奏言：今湖广正遇旱灾，人皆艰食。又承工部勘合采杉松大材七万株，而大材皆险远之处所产，用力尤艰难，诚恐逼迫失所。于是宣宗皆罢湖广采木。

诸郡水灾　宣德元年(1426)六月至七月，河南久雨。七月二十八日，黄、汝二河溢，开封府的郑州及阳武、中牟、祥符、兰阳、荥泽、陈留、封丘、鄢陵、原武九县，南阳府之汝州，河南府之嵩县，俱漂流庐舍，淹没庄稼。又自六月江水大涨，襄阳、谷城、均州、郧县沿江居民，半数被淹。

内书堂的设立　洪武年间，太祖严禁太监识字。后设内官监典簿，掌文籍，以通晓书、算之小内使任职。又设尚宝监，掌管王室图书，其内官皆仅识字，不明其义。至永乐时，开始令教官入宫内教习内官。宣德元年(1426)七月，立内书堂于宫内，改刑部主事刘翀为翰林修撰，专授小内使书。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后增至四、五百人。其后大学士陈山、修撰朱祚俱专是职。遂定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从此内官始通文墨，司礼、掌印之下则秉笔太监为重。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秉笔太监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硃笔批行，遂与外廷交结往来。

汉王朱高煦谋反死　宣德元年(1426)八月初一，汉王朱高煦于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谋反。高煦狙诈多智，自负才武。靖难时有战功，觊觎夺嫡。永乐中既封汉王，又因有罪自云南徙封乐安，深怀怨望，异谋更急，宣宗即位后，私造火器，籍壮士为军，破狱出死囚厚养之，召集旁近无赖健壮子弟及逃犯，赐银币，编队甲，夺府州县官民所畜马匹。立五军都督府，指挥王斌领前军，常达领左军，千户盛庸领右军，知州朱恒领后军，高煦自领中军。指挥常贤、常兴，千户王玉、李智领四哨。部署已定，授王斌太师，朱恒及长史钱巽尚书，盛庸及典仗侯海都督，教授钱常侍郎，其余各以差授职。遣枚青潜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立捕之以闻。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于济南为应，天津卫镇守都督孙胜，山西都指挥张杰、杨云，青州左卫指挥史斌，河间卫镇抚温英，德州卫指挥郑兴、镇抚刘志等皆约举城响应汉王。宣宗在大学士杨荣劝谏下亲征高煦。至乐安，高煦出降，改乐安为武定州，命阳武侯薛禄、兵部尚书张本留下镇守，遂班师回京。九月，废高煦为庶人，于西安门内筑室禁锢，称逍遥城。王斌、朱恒皆伏诛，只有长史李默因曾谏免死，谪为民。天津、山东诸都指挥以预谋诛死者，六百四十余人，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此事牵连赵王朱高燧，杨士奇为保全赵王奏曰：今上惟两叔父，有罪者不可赦，无罪者宜厚待之。于是不追究赵王。后高煦被铜缸炙死，诸子亦皆死。

王通大败　宣德元年(1426)十一月初六，交趾总兵官、成山侯王通进兵击黎利于应平，遇伏大败，死者二、三万人。兵部尚书陈洽挥刀杀数敌，自刎死。王通负伤逃走。随后暗中派人向黎利许愿，为黎利乞封，不奉朝令，擅割地清化以南予黎利，令官吏军民尽还东关。檄至清化，知州罗通不从，与指挥打忠拒守。黎利移兵久攻不下。

柳升征黎利　宣德元年(1426)十二月二十六日，遣太子太傅、安远侯柳升为征虏副将军，充总兵官，保定伯梁铭为左副总兵，都督佥事崔聚为右参将，率兵由广西赴交趾。又命太傅、黔国公沐晟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兴安伯徐亨、新宁伯谭忠为左右副总兵，由云南入。敕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李庆参赞军务，工部尚书兼詹事黄福掌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与柳升等同行。

申明屯田法　宣德二年(1427)正月初七，宣宗谕户部申明屯田之法。他说：如今海内无事，军士除按数留一部分守备外，其余应全部屯田种粮。所收足以给衣食，则国家可节养兵费用。而且，军士平日不习劳苦之事，一旦遇到征调，就会畏惧艰难，想法逃避。使他们屯田种粮，服劳役，农闲练武，也就不会产生骄气懒惰的隐患了。由兵部派老成军官提督屯田，又命御史以时巡察。

王通击败黎利　宣德二年(1427)二月初七，黎利进攻交趾城，成山侯王通出兵与其交战，大败之，斩其司徒黎豸、司空丁礼、太监黎秘及太尉、少尉等官，获首级以万计，其众奔逃溃散，黎利惊惧丧胆。诸将及三司官向王通建议，应趁敌溃败而毫无准备时乘胜追击，出其不意地擒获敌人首领，如果行动迟缓，敌人必定重新集结，以死相拒。但王通因怯敌而犹豫不决。黎利属下重新聚集后，挖壕立寨，修器械，又四出攻掠不止。

《西汉循吏论》成　宣德二年(1427)三月十三

日，宣宗朱瞻基作《西汉循史论》成，示少师蹇义等，并告谕道：执德以廉为要，廉者法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为本，仁者施之厚而下蒙其泽。忠以奉国，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共勉励。

虞谦逝世　虞谦(1366—1427)，字伯益，金坛(今属江苏)人。洪武二十八年(1395)由国子生擢刑部郎中，出知杭州府。建文中请限僧道田，每人不过十亩，其余均给贫民。此建议被采纳。永乐初召为大理寺左少卿。天津卫粮仓火灾，焚粮数十万石。御史谓主典者盗粮后，便纵火灭迹。逮治近八百人，应死者百人。虞谦言其滥，得减。永乐七年(1409)，成祖北巡，皇太子奏虞谦为右副都御史。九年督两浙、苏、松诸府粮、输南、北京及徐州、淮安。富民赂有司，多得近地，而贫民多远运。于是虞谦建议分为四等：富民而粮最轻者运北京；次轻者运徐州；又次者运南京、淮安；贫民而粮重存留本郡县仓。仁宗嗣位，尤慎刑狱而严大理之选。时大理寺卿缺，遂改虞谦为卿。曾应诏上言七事，皆切中时弊。宣德二年(1427)三月二十四日卒于官，年六十二。虞谦美仪观，风采凝重，工诗画，自负才望。有《玉雪斋集》。

增兵讨黎利　宣德二年(1427)三月，黎利进攻清化不克，又率众八万攻打做为官军往来要道的昌江。朝廷再调武昌护卫官军一千人，成都护卫一千二百人，南京原下西洋精锐官军一万人，中都留守司及湖广、浙江、河南、山东、广东、福建、江西、云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司官军三万三千人，跟随安远侯柳升、黔国公沐晟等征交趾。

王彰逝世　王彰(1366—1427)字文昭，郑州人。洪武二十年(1387)举于乡，补国子生。使山东平籴，以清廉干练闻名，擢吏科源士。逾年，革源士，改给事中，升都给事中，再升刑部员外郎，出任山西布政司参政。永乐五年(1407)召为礼部右侍郎，累官都察院右副御史。陕西佥事马英激肃州民反，杀御史及都指挥。王彰弹劾马英，置极典。又弹劾陈孟旭贪赃枉法，文献盗银课，及金吾指挥李严逐母不养，皆坐死。其他被其论劾者甚众。又进右都御史。永乐十九年(1421)，成祖遣廷臣二十六人巡抚天下，王彰与给事中王励往河南。临法不贷亲故，奏罢不急之征十余事，免贪暴吏九百余人，招复流民五万户，开仓赈济，河南大治。还朝，命督饷北征。仁宗即位，黄河于开封决口，命王彰与都指挥李信往赈恤。宣德元年(1426)命与都督山云巡山海至居庸诸关隘。宣德二年四月初一卒于官，年六十二。王彰严介自持，但用法过刻。当时刘观为左都御史。人谓王彰公而不恕，刘观私而不刻。

黎利攻陷昌江、谅江　黎利率领八万人，并聚集大量象、飞车、冲梯，迫城环攻昌江。又凿地道潜入城。守城都指挥使李任及指挥顾福等率人开横沟与洞相通，从沟中发将军石子轰击，重创黎利兵。黎利又增加士卒和大象攻城。李任与其周旋了九个多月，大小三十多次交战，城中将军二千余人因死伤疾病只剩下一半。而黎利兵又以云梯登城，抢占了城门，李任、顾福仍率死士三战三胜，但是黎利驱象大至，力不能支，二人皆自刎死。守城太监冯智、指挥刘顺也先后自经死。城中军校及男女不屈而死的达数千人。于宣德二年(1427)四月初二日，昌江城被攻破。此时，谅江也于被围九个多月而陷落，知府刘子辅自缢死。

王通许黎利和　黎利攻下昌江、谅江后，并力攻交州。成山侯王通惧怕，闭城不出。宣德二年(1427)四月十一日，黎利致书王通请和，愿奉表谢罪。王通准备答应其请求，召集众人议论，有的沉默，有的同意，只有按察使杨时习表示异议，却遭王通厉声喝叱，众人不敢言。王通遂将清化等州许给黎利，并代黎利转奏立陈暠为交趾王的请求，派人与黎利使节一起入京进表及方物。

林志逝世　林志(1378—1427)字尚默，号蔀斋，又号见一居士，闽县(今福建闽侯县)人。永乐九年(1411)、十年中乡会试皆第一，以廷试第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编修，升修撰。参与修《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古今名臣奏议》，升侍读。不久，升右春坊右谕德，仍兼侍读。两考京畿乡试。为人简静，不苟交处。少受业于王偁，其学经、史、诸子及天经、地志、医卜之说，无不通晓。文章简奥，不蹈袭旧说。居官十五年，恬于世利，入则恭勤趋事，退则静坐一室，优游疏散，醉吟自适，淡然如与世无争之人。还参与修太宗、仁宗两朝《实录》，将成而疾，宣德二年(1427)五月十三日卒，年五十。有《蔀斋集》。

四川松潘"蛮"起事　宣德二年(1427)七月十五日，因四川松潘"蛮"人起事，命都督同知陈怀为总兵官，都督佥事刘昭为副总兵，都指挥同知赵安、都指挥佥事蒋贵为左、右参将，率师前去征剿。四川都司奏言：番人原本没有叛乱的想法，由于千户钱弘听说松潘的官军将被调发去征讨交趾，惧怕去交趾，就谎称番寇来骚扰，应当追捕，以希望免除被调往交趾。而且他还率领官军突然闯入番族住地，逼取牛马，导致番人怨愤。又以大军将前来讨伐相要挟，使番人惊慌逃跑，于是与黑水生番相约一起起事。宣宗命逮捕钱弘等人。直到次年正月，才被都督陈怀才平息。

纳米赎罪例的制定 宣德二年(1427)七月二十日,定官吏军民纳米赎罪例:杂犯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纳米,从一百石至二石不等,纳米者都减死罪,徒流以下皆免罪。无力纳米者,虽然笞杖,仍久系不释。御史郑道宁、张纯等上奏:军储仓拘留的罪犯,无米输纳,从宣德元年二月到现在,已有九十六人死去。请免去追系罪轻者,将其送交所属州县遣还。宣宗从其议。

薛禄败鞑靼 宣宗二年(1427)七月二十一日,镇朔将军薛禄于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击败鞑靼。其时,薛禄巡察边境归还,驻在宣府(今河北宣化)。鞑靼进犯开平,一无所获而回,离城三百余里。薛禄率领精兵昼伏夜行,三夜到达朵儿班你儿兀,纵轻骑捣毁鞑靼营地,大胜鞑靼,杀数十人,生擒镇抚、百户等十二人,俘虏男女六十四人,获马八百余匹,牛羊四千余头。师还,鞑靼跟踪其后,薛禄率军奋击。鞑靼从此远遁。

朱瞻基论治政贵信 宣德二年(1427)八月十九日,宣宗朝罢御便殿,问侍臣:朝廷下令宽恤,或有司阻格,此事属实否?侍臣说:此事时有发生。宣宗说:治天下贵信。我每下一诏令,必度其可行可守而后发。不然,待失信于天下。君欲施仁,而臣僚阻格,此为不忠,其该严禁。今后有阻格不行的,要严惩不贷。

撤兵交趾 宣宗即位后,对交趾用兵之事颇费斟酌,多次与廷臣计议。宣德元年,先有方政陈智奉命征剿交趾,屡战屡败;宣德二年,又有王通、柳升败绩。同年十月末,利用黎利请和之机,于同年十一月十一日,诀计罢兵弃交趾。遂遣礼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罗汝敬为正使,右通政黄骥、鸿胪卿徐永达为副使,诏抚谕安南人民,赦黎利罪,令立陈氏后。召王通、马瑛及三司卫所府州县官吏,尽撤军民北还。自从永乐中占交趾已二十余年,前后用兵数十万,馈饷达一百余万,而转输的费用不在其内。到弃地罢兵时,归还的官吏军民共八万六千余人,被黎利捕获拘留及被杀的人不计其数。

山云镇守广西 宣德二年(1427),广西柳州、庆远"蛮"人韦万黄、韦朝传等,聚众抢劫杀人,残害百姓,诏镇远侯顾兴祖讨伐。当顾兴祖因不救交趾而被逮捕后,公侯大臣举荐山云,称其廉勇有智略,三年正月十三日,命都督佥事山云佩征"蛮"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广西。自从韩观卒后,广西诸"蛮"渐渐强横凶暴起来,山云到达后诸"蛮"才予就抚。

册立朱祁镇为皇太子 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十一日,宣宗时年三十,皇后胡氏未有子,且常生病。受宠的孙贵妃暗中将宫人之子育为己子。宣宗以长子生,十分高兴,名祁镇。祁镇生八日,群臣即上表请册立为太子,皇后胡氏亦数次上表请早定国本。孙贵妃假装惊讶地说:皇后病愈,自可生子,吾子怎敢先皇后之子呢?宣宗不允。于三年二月初六日立祁镇为皇太子。于是皇后胡氏请求逊位。三月初一日,宣宗废皇后胡氏,立孙贵妃为皇后。

御制《帝训》成 宣德三年(1427)二月,宣宗朱瞻基作《帝训》二十五篇成。其篇为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亲、仁民、经国、勤政、恭俭、儆戒、用贤、知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农、兴学、赏罚、黜陟、恤刑、文治、武备、御夷、药饵。宣宗自为序,复题其后以说子孙。

阿鲁台遣使来朝 阿鲁台屡次被瓦剌打败,部曲离散,于是率其属下向东逃往兀良哈,驻牧于边塞。而瓦剌则日益强盛起来。宣德三年(1428)三月十一日,和宁王阿鲁台遣使臣脱脱赤等四百六十人来朝,贡马及方物,以期明朝廷支持。

增广生数额的制定 国初即定生员额数,不久便命增广,不拘额数。宣德三年(1428)三月十六日,礼部尚书胡濙奏陈乞请增广生员:京府学六十人,外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其民少之处,不拘此限。宣宗允准。

颁选武臣条式 宣宗朱瞻基曾谕兵部臣:典兵之职,关系重大。自今凡都司官及卫所正官,必择老诚历练、足为表率之人充任。而人之智愚贤否未易尽知,惟公惟明,方可得人。宜尽心于此。宣德三年(1428)三月二十一日,尚书张本奏言:内外年职不下九万余人,有现任、有多余有老疾优给、有操备未经任事、有犯罪立功或调除、有亲属袭替。必加清理,才知其详。今拟定选武臣条式付与各官。其条式:一脚急,二状貌,三才行,四封赠,五袭荫。令各具年甲状貌及初从军来历、所建勋劳、得官详、及今有无残疾,仍从亲管官及同僚、同队并首领官保勘回报,取其历练有才智之人擢用,方可得人。宣宗允准,且谕此但可稽其履历,若选将任贤,尤当询察其实。

黎利诡言请封 宣德三年(1428)五月初一,黎利遣使奉表谢恩。在此之前,黎利已杀死陈暠自立为王。而此时则诡称,陈暠于正月突然病故,陈氏子孙已经绝灭,国人推举黎利治理军国大事,请朝廷正式册封。宣宗知其有诈,并不想立刻册封。十八日,宣宗又派遣罗汝敬、徐永达等奉敕谕黎利及安南国人,令出访陈氏后裔,并尽快归还官吏、人民及其眷属。

蔡福等伏诛 宣德三年(1428)五月,黎利将一百五十七名官吏送还,而交趾都督蔡福及都指挥

朱广、薛聚、于瓒、指挥鲁贵、千户李忠等六人也在其中。当初，黎利攻打乂安，此六人不战而降，薛福又教敌方制造攻城器具来攻打东关，并为敌方通风报信，充当向导。回到京师后，此六人经审讯服罪，皆弃市，籍没其家。

王通等伏诛 宣德三年(1428)闰四月二十七日，交趾总兵官、成山侯王通等人回京。文武诸臣弹劾王通及都督马瑛，为事官陈智、李安、方政，布政使弋谦，言其"丧师弃地，请置之法"，又言太监"山寿曲护叛贼马骐，激变交民。"二十九日，诏王通与陈智、马瑛、方政、弋谦山寿、马骐俱论死，下锦衣卫，籍没其家。同日，亦将镇远侯顾兴祖下锦衣卫。群臣又弹劾沐晟、徐亨、谭忠逗留及丧师辱国罪，宣宗皆不过问，也无意诛王通等人，只是长期押在狱中等待处决。五月三十日伏诛。

简换都指挥使 宣宗朱瞻基曾谕太师英国公张辅等：都指挥使总制一道，所任至重。近闻多有老疾，卿等宜从公简择果当代之官调换，于在京都指挥使中选用。宣宗三年(1428)六月二十四日，张辅与公侯、伯、都督及兵部尚书会议，以山西等处都指挥使卢整等二十五人老疾，请以所选在京都指挥使宫得等代换。宣宗允准。遂命宫得等分赴各都司换任。

停造新钞 宣宗以钞法不通，谕户部尚书夏原吉：国家造钞，本以便民交易，何分新旧。吾近闻以前民间用钞，不问残缺，惟字贯稍可辨者皆通引无滞，自户部榜出示以钞样务要明白完全。小民无知，缘此便生好恶，自今为梗。今即停造新钞，在库新钞亦不要支付。拣旧造堪者备赏赉，不堪用者烧毁，如此钞法可通。于是，宣德三年(1428)六月二十八日，命造钞工匠休息，郡县岁办桑穰全部停止。

罢北京行府及行部 仁宗欲还都南京，因复设行后军都督府及行部。凡五府、六部文移合行北京、直隶卫所府县者，以及直隶卫所府县申达五府六部者，必须经过行府、行部，文移重复，往往造成错误。宣宗于宣德三年(1428)八月十二日命公、侯、伯、尚书、都御史、学士商议此事，英国公张辅、吏部尚书蹇义等言：北京既有五府、六部大小衙门，其行府、行部应该革除。"宣宗采其议，遂罢行府、行部。改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掌行在后军都督府事，行部尚书李友直改行在工部尚书。诸司仍沿行在之称。

宣宗巡边大败兀良哈 宣德三年(1428)八月十四日，宣宗于奉天门召集公、侯、伯、五军都督府都督，告谕道：北寇在每年秋高马肥时必定骚扰边境，近来边境的守备不知情况如何？东北各个关隘都在京都附近，现在农活将结束，我准备趁田猎的时机亲自巡视各个关隘，整饬军备，你们备齐士卒、马匹，来等候命令。二十八日，车驾由京师出发，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夏原吉，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兵部侍郎王骥，刑部侍郎施礼，工部尚书吴中，右佥都御史凌宴如，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杨溥，太常寺卿姚友直，大理寺少卿王文贵等人扈从，英国公张辅、阳武侯薛禄等分将各兵。宣宗经蓟州(今天津蓟县)至喜峰口(今河北宽城南)外，遇到兀良哈率一万人侵扰边境，遂命西宁侯宋瑛、武定侯郭玹、半城侯李贤、都督冀杰屯兵遵化(今属河北)，而自己率领三千精锐骑兵，每人两匹马，带十天口粮，前去迎敌，文臣只有杨荣跟从。三年九月初六傍晚，抵达宽河(今喀喇沁左翼南)，与敌人相遇。宣宗亲射其前锋，杀死三人，将铁骑分为两翼夹攻，大胜，斩其首领，获军器马驼不尽其数。十五日班师，二十四日，宣帝回到北京。

刘观戍边 刘观，生卒不详，保定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大谷知县，迁监察御史。三十年(1397)擢左佥都御史。建文二年(1400)出任嘉兴知府，永乐元年(1403)任云南按察使未行擢户部右侍郎，后改左副都御史理院事。营建北京，奉命赴浙江采大木。永乐六年擢礼部尚书。永乐十三年改左都御史理院事。永乐十九年巡视陕西，考察官吏，安辑军民，还掌院事。仁宗即位，加太子宾客、太子少保。宣德三年(1428)六月二十六日巡视河道。十月初一日被劾，二十一日逮下狱，其子亦被逮。不久，戍其子于边，令刘观随子赴边，客死戍所。

郭敬镇守大同 宣德三年(1428)十月二十二日，命宦官郭敬镇守大同。当时，武安侯郑亨佩征西前将军印镇守大同，治军严肃，安抚军士有恩。自成祖开始任用宦官监军分镇，以致于其擅用威福，激生事端。一时造成边镇的总兵官被其胁制，往往畏惧。郭敬到达大同后，郑亨处事有理有节，郭敬虽不高兴，但无法刁难。

疏浚济宁北旧河 宣德四年(1429)正月二十一日，总兵官平江伯陈瑄奏陈：山东济宁以北旧河，今冻渐解，挽运将兴。约计用十二万人疏浚疏浚，半月可成。朝廷命山东起集民丁与今运木军士相兼用工。疏浚旧河一百二十余里。

朱瞻基论求言 宣德四年(1429)正月二十二日，朱瞻基御斋宫，召学士杨溥论求言：沧海之大，江河助之，左君臣更相戒饬。吾每念创业艰难，守成不易。今幸海内稍安，顾祸乱每生于不虞。近来群臣，好进谀词，吾颇厌闻。辅德陈过，卿等之责，勿惮直言。杨溥说：直言求之非难，受之为难。朱瞻基说：此言有

理。

诏免文书差误罪 根据旧例，文书差误，依其轻重治罪。宣德四年(1429)二月十九日，吏部奏河南、浙江、贵州等布政司及诸府县并土官等衙门奏本，字有洗补错谬，皆属不敬，乞请逮问。宣宗朱瞻基批道：此系治文书吏之罪，官则一时仓猝失检。俱勿逮问。

申严不孝罪 宣德四年(1429)二月二十一日，宣宗朱瞻基敕谕三法司：致理之道，人伦为先；五刑三千，不孝为大。今在外有司贪受贿赂，宽纵不孝，吏之坏法，莫甚于此。敕至，但犯不孝及有烝父妾、收兄弟妻为妻等败伦伤化者，在外有司勿擅断决，全部送京师如法鞫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此罪，不许复职承袭。永为定制。

诏遣大臣督河漕 宣宗即位后，仍命平江伯陈瑄充总兵官守淮安，督漕运。宣德四年(1429)正月，陈瑄奏疏浚济宁以北旧河。宣宗念其辛劳，遂于同年四月十三日命工部尚书黄福前往，与陈瑄一起经略。同时令二人共同计议减漕运，宽民力。黄福另兼理淮北、河南、山东屯田。大臣督理河漕自此始。

诏令文吏犯赃不赎 宣德四年(1429)六月十三日，监察御史王翱言：近年来因营造宫殿，官吏有犯罪的人，无论轻重，只要去运砖就可官复原职，而使贪赃渎职之人幸免，使廉洁守法的人得不到鼓励，非治国之道。请从现在开始，因犯赃罪应死者，运砖后罢为民，不许复官。宣宗采其议，下诏：文官犯赃，依律科断，不准赎罪。不久，文官中有犯赃而纳米赎罪的，吏部请求降一级任用，宣宗说：纳米赎罪是一时权宜之策，而惩治贪官是立国根本大法。从今以后，官吏有犯赃者，停止纳米赎罪例，依律治罪。

钞关的设立 洪武时期，有商税而无船税。宣德四年(1429)六月二十七日，户部尚书郭资请言：凡舟船受雇装载者，计算所载货物多少，路途远近，一律征钞，设关收取。御史罗亨信也言此事。于是设置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在南京)、浒墅(在苏州)、九江、金沙洲(在湖广)、临清、北新(在杭州)诸钞关，按船的大小长宽而差其额，称为"船料"，而不是按载货的不同收税。只有临清、北新则是兼收货物税。各个钞关都派御史及户部主事监督收税。设置钞关则从此时开始。

严禁文武官妓饮废事 宣德四年(1429)八月二十二日，宣宗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至留宿，败礼坏俗。礼部当揭榜禁约。再有犯者，严惩不贷。

放免南北监生 国子监助教王仙奏言：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固然应当讲习经、史，但是对于书法、算数之学，也应该用心。近年来生员只记诵文字以准备科举考试，于字学、算法，则忽略不习。请令天下学校生员兼习书法、算数，由提调正官按察司巡按御史考试，以备人才之需。宣宗纳其言，遂于宣德四年(1429)九月十一日，放免南、北国子监生年五十以上而学无成效及老疾者二百五十三人，令其还乡为民。

顾佐廉正 宣德四年(1429)十一月，有奸吏弹劾右都御史顾佐"受隶金，私遣归。"宣宗朱瞻基密示杨士奇说：你不是举顾佐廉正吗？士奇说：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归，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人人如此，臣亦如此。先帝知之，因增中朝官俸。宣宗叹道：朝官贫穷如此！而迁怒于弹劾奸吏，欲下法司。士奇说：此小事不必陛下处理。宣宗将奸吏诉状付顾佐，令其自治。顾佐顿首而谢。遂召吏说：上命我处治你，你若改过，吾当不究。宣宗听到顾佐如此处理，十分高兴，说顾佐识大体。其时，顾佐在都察院，台职振举。

罢松花江造船之役 初遣亦失哈率官军往奴儿干，于松花江上造船运粮，因耗资巨大，烦扰军民，加之辽东有警，征虏将军、都督巫凯请罢其役，宣宗遂于宣德四年(1429)十二月二十日，召宦官亦失哈等回京。

夏原吉逝世 夏原吉(1366—1430)字惟喆，其先为江西德兴人，后迁至湘阴。洪武二十三年(1390)举乡荐，入太学，授户部主事，处事皆有条理，甚得尚书郁新器重。建文初，起为右侍郎。次年，充采访使巡福建。永乐初，拜左侍郎。月余进尚书。永乐元年(1403)奉命治浙西大水，永不三年始还，苏州、松江一带农田大利。永乐七年，成祖北巡，命兼摄行在礼部、兵部、都察院事。永乐八年，成祖北征，辅太孙留守北京，总行在九卿事。山东唐赛儿起义被镇压后，曾将随从者三千余人押至北京，夏原吉请于成祖，皆放还原籍。永乐十九年冬，成祖将大举征沙漠，原吉谏阻，成祖大怒，将原吉下狱，并籍其家，自赐钞外，惟布衣瓦器。仁宗即位，复其官，不久，加太子少傅，进少保。宣宗时入阁预机务。夏原吉历事三朝，掌财政二十七年，善持大体。性宽和，有雅量，为诸臣第一。宣德五年(1430)正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五。赠太师，赐谥忠靖。有《夏忠靖公集》。

罢工部采木之役 宣德五年(1430)二月十七日，宣宗朱瞻基谕工部：国家之道，农事为急。今国家无大营缮，当耒作时而采运木植不已，岂不有妨农

事？凡已采之木，随处堆积。军夫全部罢归于农。

宽恤令的颁行　宣德五年(1430)二月二十日，宣宗朱瞻基敕行在部院臣：吾孜孜图治。食念人饥，衣念人寒。今春气已和，民瘼未舒，惧非所以膺天眷、承祖宗，特颁宽恤之令：凡郡县水旱蝗地，速视其灾，以豁赋闻，蠲免三年以前刍薪之税，招饥徙民复业，免役一年；勿责偿倒死官马驴骡及亏欠孳生马匹者；停止采办颜料、生漆诸物，召还为营造监采监买吏；供物非土产勿征，征所产土，除他役；起科官田一斗以上者减十分之二，四斗至一石以上者减十分之三；户有工人役工匠者，一人归，四人者二人归，一人者听合于他户，一岁二岁相度更役，年老残疾，全部放免；赃污士之极丑，理官上罪必核，勿辱人终身。

宣宗作《纪农》　宣德五年(1430)二月二十四日，宣宗朱瞻基侍皇太后谒长陵还。三月初十日，以道中所见作《纪农》一篇示群臣说：吾昨谒陵还，道昌平东郊，见耕夫在田，召而问之，知事之艰难，吏治之得失，因录其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当体念不忘。《纪农》载：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俯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于休，召而问道：怎么如此勤劳？耕者跪答：勤劳，是我的职业。问：亦有休息之时吗？答：农之于亩，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收获，三者皆得勤，有一不勤，劳而无获，就会寒馁，怎敢怠慢！问：冬日可休息吗？答：冬日农暇，得应役于县衙，亦是我职，不敢怠慢。曰：何不改换职业，或士或工或商，可以得以休息：答：我祖父皆务农，以至于我，都没有改换过职业。何况我周围没有从士从工的，我不知他们是否能有时日休息。而有从商的，亦十分辛劳，常走负贩，不出二三百里，远则一月，近则十日才能返回；其获利多的二至十分之三，少的仅有十分之一，还有赔本的，全家失意，戚戚而忧，计其终岁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家务农，若无水旱灾害，辛勤耕作，其收获多者粮食可得两年温饱，少者可一年无忧，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团聚，因此我不能改换职业。问：若平时所见所闻，还知道些什么？答：不能远知。我曾赴县应役，见到两位县官，一人寅出酉归，尽心民事，勤慎不懈，惟恐民失其所，后升迁而去，至今百姓怀念不忘。另一人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不问民之休戚，坐谪而去。后曾来本县，百姓视之若路人。这是我所目睹，其他不知。吾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此为周公所陈无逸之意。厚遣之，而遂记其语。

筑赤城五堡　宣德五年(1430)四月初八，宣宗命阳武侯薛禄筑赤城、团山、雕鹗、云州、独石五座城堡，以便于守卫。诏发军民三万六千人赴工，精骑一千五百名负责保护，全部听从薛禄节制。

宣宗重知府之任　宣宗以知府按其资历任用，多数不称职。适逢苏州等九府缺守，于是命大臣举荐其属下廉洁有才干的人补缺。宣德五年(1430)五月二十五日，吏部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等首荐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诏以为苏州知府。与况钟同时被举荐有：户部郎中罗以礼知西安，兵部郎中赵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户部员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员外郎马仪知杭州，刑部员外郎陈本深知吉安，监察御史陈鼎知建昌，监察御史何文渊知温州。九人皆著声绩，有居官达一、二十年，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呈现一派极盛景象。其中尤以况钟最著，被苏州百姓称为“况青天”。

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　由于安南事件结束，又由于宣宗认为自己“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宣德五年(1430)六月初九日，宣宗命郑和重下西洋。闰十二月初六，郑和率大型宝船六十一艘、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人作第七次远航。船队从南京龙湾(今南京下关)起航，两天后到刘家港。宣德六年元旦，郑和等人在此刻石立碑，记述了以前历次出使的情况，即《通番事迹记》。二月二十六日，船队到达福建长乐，进行远航前的准备。冬季，又在长乐南山寺立一碑，即《天妃灵应之记》，也记述了前六次远航的情况。十二月九日，航队起锚出海。在访问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之后，到达苏门答剌。郑和派一支船队经溜山直航非洲东岸，访问木骨都束、不剌哇、竹步，又派太监洪保率一支船队直航古里，然后访问祖法儿、剌撒、阿丹。郑和本人则率大艅宝船经锡兰、古里，直航忽鲁谟斯。当洪保到达古里时，古里正派船去麦加，洪保派通事等七人带着麝香、磁器等物随古里船只到麦加访问，买回各种珍贵异兽，并画了天堂图。郑和所率大艅宝船于宣德八年二月十八日由忽鲁谟斯返航。同年六月二十一日驶返刘家港。而郑和则于二月在归国途中病逝于古里国(今印度西南海岸科泽科德一带)。

讨曲先卫　曲先(今青海柴达木盆地之西北)东接安定(今青海柴达木盆地之北)，洪武年间设置卫。后遭多尔济巴之乱，部众四散逃亡，被并入安定卫。永乐四年(1406)，仍恢复先朝旧制，分为二卫，以安定指挥三即及散即思为先曲卫正、副指挥使。虽连年入贡，但散即思却经常率部众邀劫往来贡使，梗塞道路。宣德五年(1430)六月十五日，命都督史昭为大将，都督佥事赵安、王彧为左、右参将，与太监王安、王瑾一道，督率西宁诸卫军，以及安定、罕东(今甘肃敦煌等地)之众前去讨伐。十二月二十七日，史昭等

率兵到达曲先。散即思先逃，其党羽脱脱不花等迎战。明将纵兵攻击，杀伤敌人甚众，并生擒脱脱不花及男、妇三百四十余人，缴获驼马牛羊无数。散即思素来狡诈骠悍，宣宗虽然宽恕过其罪，但他仍继续做恶，不肯悔改。见人畜损失惨重，后悔恐惧。次年，派其弟向朝廷贡马并请罪，朝廷令其回原地居住，并归还了他的俘虏。从此，西域部落平静。

开平卫的内迁 洪武三年(1370)，李文忠攻克元上都，设置开平卫(今内蒙古正蓝旗多伦西北)以守备，又建八驿，东边四驿为凉亭、泥河、赛峰、黄崖，接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辖境相当于今大凌河以西、河北长城线以北、辽宁西拉木伦河南地区)；西边四驿为桓州、威虏、明安、湿宁，接独石(今河北赤城北之独石口，为外长城南北交通要道)。永乐帝四次出塞，都经过开平、兴和(今河北张北)、万全(今河北宣化)，曾说：消灭此地残寇，只要守卫开平，则兴和、大宁、辽东、甘肃、宁夏的边防，永远无忧了。永乐元年(1403)放弃大宁，为报答兀良哈靖难出兵入关，以三卫相赠。兴和也于永乐二十年(1422)被阿鲁台攻陷，开平失去了后援。宣德五年(1430)六月，由于鞑靼屡犯开平，于是建独石堡，迁并平卫于此，且屯且守。从此，弃地三百里，尽失龙冈(即古卧龙山，在内蒙古多伦县古开平城北，元筑上都城于此)、滦河(在河北)之险，使边防更加空虚。

薛禄逝世 薛禄(1358—1430)，初名贵，行六，军中称薛六，更名禄，山东胶州人。初以行伍从朱棣靖难，首建奇功迁后军府都督佥事。永乐六年(1408)升都督同知。八年从北征，进荣禄大夫、右都督兼理左军府事。永乐十五年因营北京宫殿，奉命董理，封阳武禄。后多次从北征，皆有战功。洪熙元年(1425)佩陔朔大将军印，率师巡北。宣德五年(1430)再巡边，加少保。智勇兼资，纪律严明，人乐为用，岿然为一时宿将。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三。封鄞国公，谥忠武。

蒋骥逝世 蒋骥(1378—1430)，字良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行人，出使以清谨称。永乐初参预修纂《太祖实录》，升翰林院检讨。修《永乐大典》时，为副总裁。仁宗即位，升左春坊左司直郎。宣德五年(1430)升翰林院侍讲，参与修两朝《实录》，不久拜礼部右侍郎，视事未满二旬，于同年七月二十七日以疾卒，年五十三。

黄福总理屯田 工部尚书黄福上书陈述强兵足食、节省工役，他说：永乐年间，南讨交趾，北征沙漠，加上营建北京，费用不曾缺乏。近来国家没有大的花费，而每年支出仅能维持，如发生旱涝灾害或出兵征调，将无以接济。请征调十万名操备营缮军士，于济宁(今山东济宁)以北，卫辉(今河南汲县)、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以东，沿河屯种，当年可以自给，次年人收五石，第三年则加倍收租。既可节省京师粮仓口粮六十万石，又节省本卫月粮一百二十万石，每年可得二百八十万石。宣宗以为此议很好，下户、兵二部议论。尚书郭资、张本等言：沿黄河屯田确实便利，请先以五万顷为准，征发附近居民五万人开垦。当先派官视察，以待开垦。据此，宣宗于宣德五年(1430)八月十一日，改工部尚书黄福为户部尚书，总理淮北、河南、山东田事，吏部郎中赵新等协理。不久，有人言"军民各有常业，如果分力营田，更加疲劳困扰"。张本等复奏宣宗，屯田事终未实行。

巡抚的设立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遣太子朱标以巡抚之名视察陕西。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派遣大臣分巡天下，了解民间疾苦。后又有大臣奉命赴各地，或称采访，或称巡视，事毕还朝。宣德五年(1430)九月初八日，宣宗始于各省专设巡抚。擢吏部郎中赵新为吏部右侍郎巡抚江西，兵部郎中赵伦为户部右侍郎巡抚浙江，礼部员外郎吴政为礼部右侍郎巡抚湖广，监察御史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刑部员外郎曹弘为刑部右侍郎巡抚北畿、山东，越府长史周忱为工部右侍郎巡抚南畿，总督税粮，安抚地方。然此时巡抚之设仍有临时派遣性质，事毕复命，未划固定地区，不携带眷属。景泰四年(1453)，因巡抚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时有冲突。朝廷遂加巡抚以都御史职衔，设有衙门属员。世宗时又令巡抚兼提督军务，任期三五年以至一二十年，辖地一省至数省。俨然成为总揽一省至数省行政、监察、军事大权之地方长官，原地方三司长官职权日小，变成巡抚属员。

阿鲁台犯辽东 宣德五年(1430)十月初八，阿鲁台进犯辽东(今辽宁辽阳县)，辽海卫(今辽宁开原县治)指挥同知皇甫斌闻讯，赶赴密城东峪御敌，身先士卒，从清晨激战到黄昏，箭尽援绝，最终战死。其子皇甫弼以身卫父亦战死。三万卫(今辽宁开原县)千户吴贵，百户吴襄、毛观骁勇异常，冲锋在前，皆力战而死。最后迫使阿鲁台引退。

俞士吉逝世 俞士吉(？—1435)，字用贞，象山人。洪武末举人，授兖州训导。建文时上疏论时政，擢御史，出按凤阳、徽州、湖广，能辨释冤狱。成祖即位，进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使朝鲜、日本。出督浙西农政，奏除湖州欠赋六十万石。不久，迁山东左参政。洪熙初，入为詹事府詹事。宣德初仕至南京刑部侍郎，宣德五年(1430)十一月十六日致仕。十年五月二十

九日卒。有《栎庵稿》。

筑浙江海堤 宣德五年(1430)闰十二月,巡抚侍郎成均奏言:海盐离海仅两里,有石、土相嵌的堤岸二千四百余丈,海水侵蚀其石,皆已残破,议筑新石于岸内,而存旧堤作为屏障,请按照洪武年间旧例,令嘉兴、严州、绍兴三府协同实施此工程。宣宗纳其议。

张本逝世 张本(1367—1431),字致中,山东东阿人。洪武中以国子生任江都知县,建文中降朱棣,迁扬州知府,以功进江西右参政。不久召为工部左侍郎,以事谪交趾。仁宗在东宫,召其为刑部右侍郎,后迁南京兵部尚书兼掌都察院事,洪熙元年(1425)改行在兵部。宣德元年(1426)加太子宾客。廉介有持,尚刻少恕,时号穷张。宣德六年正月初八日卒,年六十五。

宣宗作《招隐诗》 宣宗朱瞻基屡诏求贤、虑尚有遗逸,特于宣德六年(1431)二月初一日作《招隐诗》示群臣,且自为序。诗称:天之生贤,道蕴其身。幼学壮行,致君泽民。伊尹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尝忘世。秦汉之襄,以退为贤,绝类群伦,岂勿违天。嗟哉若人,于世奚补,区区百年,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统临万邦,求贤图治,宵旰皇皇。群才皆来,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业之贵。缅彼山林,岂天遐遗,往而不来,悠悠我思。漱石枕木,远引高蹈,虽佚其身,而悖于道。卷舒之诗,梧桐飞凰,尔其幡然,予将尔扬。

遣官督陕西屯田 陕西参政陈瑛奏陈:宁夏、甘肃的田地可以引水灌溉,虽然遇天旱也有收获。但两处肥沃土地皆被镇守官及各卫豪强霸占,全不向官府报告、交粮。偶尔有报告的,也只是实际数字的十分之一。而那些贫瘠的土地则分为屯田的军卒。以致屯粮亏欠,兵士饥饿困苦,而官员豪强则日益恣横。并且陕西各卫所的军士是二、三成负责守城,七、八成屯田。以七、八个人耕作来养活二、三个人,是不应该出现供应不足的现象,而各卫往往缺粮,有司疲于运输补给。大概这是由于各卫官员及负责屯田的官员各自损公肥私,凡是屯田军士被派往别处,就不再拨补,除去其名,而占据其土地。请朝廷派官巡视,治其侵占土地、欺骗朝廷的罪行。宣宗同意陈瑛建议,于宣德六年(1431)二月初二日派工部右侍郎罗汝敬赴陕西督办屯田事宜。

浚河以利漕运 宣德六年(1431)二月初四,宣宗采纳御史白圭的建议,命疏通封邱(今河南封邱)金龙口,引黄河水到达徐州,以利于漕运。又根据河南布政使的请求,疏通了自祥府(今河南开封)到仪封(今河南兰考东)黄陵冈的淤塞河道四百五十里。

考察外官 吏部巡抚江西侍郎赵新奏言:今地方大员虽然出身不同,但皆由资历升迁,有的没有施政才干,有的则贪赃枉法,名实不符,言行不一。近吏部勘合令其考察郡县官吏,己之不正,怎能正人!所以好恶不公,去取多谬。请求令吏部先考察布政、按察二司长官品德才能,分别决定留任或者罢黜,然后才能命他们考核属吏。宣宗表示赞同,遂于宣德六年(1431)三月十一日命吏部考察外官必须由布政司、按察司开始。并著为令。

遣柴车经理山西屯田 巡按御史张勖奏言:大同这地方虽然寒冷,但是原野平坦广阔,种植的麦粟也有所收获。而其地却多被官军仗势占据,平民百姓则无地可种,生活日益贫困。请派官同三司长官前去按察,将那些多占的耕地分给无地的军民为宜。宣宗纳其议,于宣德六年(1431)四月十五日,派兵部侍郎柴车前往山西经理屯田事务。

申明迎送之禁 御史傅吉巡按江西,布政使孟桓等率官属出郭迎候,又陪朝王。宁府官奏其违法。宣宗令傅吉等自陈,皆服罪,宣宗免其罪。于宣德六年(1431)五月初六日谕都御史顾佐等:风宪官须守法乃能以法治人。今御史多轻薄少年,不以礼德自治,喜人阿谀奉承,苟失迎送,辄生事挫辱。在外官亦不能自执礼法,谄谀成风。其榜示禁约,申明御史巡按有司迎送之禁。违者治罪。

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 宣德三年(1428)李琦自交趾返京后,黎利派使节奉表谢恩,诡称陈氏子孙已绝,交趾民推举黎利治国,以等待明朝的正式策封。宣宗命黎利继续寻找陈氏后代,但也明白即使陈氏有后,黎利决不会上报。而宣德六年(1431)五月初四日,黎利又遣使谢罪,并以当地土官长老名义为其请封,于是宣宗便于同年六月初七,派礼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持诏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其时,黎利实际上已称帝,纪元为顺天,建交州府为东都,清华府为西都,分十三道,各设承政、宪察及总后使司,其制度多是模拟明朝。

宣宗作《悯农诗》 宣德六年(1431)六月十五日,宣宗朱瞻基作《悯农诗》示吏部尚书郭琏:农者国所重,八政之本源。优劳亙晨昏,半年仅能给,欠岁安可论。既无糠核肥,安得绵絮温。恭维祖宗法,周悉令具存。遐迩同一视,复育如乾坤。尝闻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当慎所择,庶用安黎元。

浑河溢决 宣德六年(1431)六月,浑河水暴涨,于徐家等处决口,造成顺天(今北京)、保定、真定

(今河北正定)、河间(今河北献县)等二十九个州县发大水,庄稼被淹。七月,黄河水位猛涨,于开封决口,淹没了其所属祥符(今河南开封县)、中牟、阳武、通许、荥泽、尉氏、原武、陈留等八县的民居、庄稼。

许三卫互市 宣宗即位以来,兀良哈朵颜三卫掠永平、山海间,宣宗将亲自率兵征讨,三卫头目纷纷谢罪入贡。至宣德六年(1431),仍施以安抚之策,于同年七月二十日,遣锦衣卫指挥赍敕谕朵颜三卫,许其来朝及往来互市交易。

宣宗好微行 宣宗朱瞻基嗜好微行。宣德六年(1431)七月之一日,漏下十二刻,宣宗朱瞻基率四骑至杨士奇宅。士奇仓皇出迎,顿首说:陛下何以宗庙社稷稷身自轻?宣宗说:欲与卿一言而来。次日,宣宗遣中官问士奇:微行有何不可? 士奇答道:陛下尊居九重,岂能遍洽幽隐!万一冤夫怨卒,窥间窃发,诚不可不虑。十余天后,获二盗,经审讯得知其有异谋。宣宗召士奇说:今知卿爱朕。

朱高燧逝世 朱高燧(? —1431)为成祖第三子,母仁孝皇后。永乐二年(1404)四月封赵王,命居守北京,恃宠多不法,邪说左道之人多被其进用。洪熙元年(1425)四月往封地彰德。高燧寡学好武事。永乐七年(1409)成祖初巡狩至北京,闻其过失,震怒,诛长史顾晟,尽执其所用小人,夺其冠带,选国子司业赵季通、董子庄为长史,讲经论史,改简易行。成祖病危,高燧令护卫指挥孟贤等结内侍造伪诏,谋进毒于成祖,废太子而自立。事发,孟贤伏诛,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仁宗初,力辞二护卫,奉藩甚恭。及宣宗擒汉王高煦归,词连高燧,命尽收其护卫。宣德六年(1431)八月二十六日卒,谥简。

始命官军兑运民粮 宣德四年(1429),命尚书黄福奉命协助陈瑄经略漕运,建议恢复支运法。令江西、湖广、浙江民工运粮一百五十万石于淮安仓,苏、松、宁、池、庐、安、广德民工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工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再令官军接运到京、通二仓,这样民力稍减。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陈瑄又奏:江南民工运粮到各粮仓,往返近一年,有误农业。若令民兑运附近卫所官军,运送至京,给与路费耗米,则军民两利。此谓"兑运"。宣宗命群臣商议。吏部尚书蹇义等上《官军兑运民粮则例》,其加耗米数按路途远近为差,每石湖广为八斗,江西、浙江七斗,长江以南为六斗,长江以北为五斗;民有运到淮安的只加四斗。如有兑运不完,仍令民自运到粮仓,其不愿兑运者,听其自便。自此,兑运与支运参行。而军既加耗,又给银两做为盘拨费用,且能附载他物,皆乐于从事,而民多以远运为艰。因此,兑运的多而支运的少。

惩治宦官 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初四,诛宦官袁琦及阮巨队、阮诰、武莽、武路、阮可、陈友、赵淮、王贵、杨四保、陈海等。袁琦自幼侍奉宣宗,伏势贪纵,擅自派宦官阮巨队等往广东等地以采办为名,掠夺军民财物。事发,下锦衣卫狱,抄没其家金银宝物千万计,所用金玉器皿皆僭侈非法。宣宗命凌迟袁琦,斩阮巨队等十人,又命都察院将袁琦罪行榜示于天下。其党羽裴可烈在苏、松诸郡尤为贪暴,被逮至北京后,下锦衣卫狱死。

严禁内官怙宠作威 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初五日,宣宗朱瞻基令都察院揭榜,严禁内官内使怙宠作威:凡先所遣内官内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还官,军民者还军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内官内使寄屯财物,许首免罪;若匿而不首,事发之后,与犯者同罪。自今内官内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举罪同。若中外军民人等有投托跟随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全部判以死罪。

金幼孜卒 金幼孜(1368—1431)名善,以字行,号退庵,江西新淦(今江西清江县东北)人。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户部给事中。成祖即位,孜翰林检讨,与解缙等同值文渊阁,迁侍讲。曾为皇太子讲授《春秋》,并进呈《春秋要旨》三卷。永乐五年(1407)升右春坊右谕德,仍兼侍讲。成祖巡狩北京及北征,幼孜皆扈行。永乐十二年(1414)与胡广、杨荣等同纂《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迁翰林学士。永乐十八年,与杨荣同进文渊阁大学士。仁宗即位,拜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不久,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洪熙元年(1425)进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宣宗立,任修太宗、仁宗实录总裁官。幼孜为人朴实静默,宽容大度。虽然位尊望隆,却无骄纵之色,更加谦恭有礼,将其宴居之室命名为"退庵"。其学赅博,文章宽厚和平,如其为人,不伐善,不求惊人之名。临终前,家人让他为子求承其恩泽,不听,曰:此君子所耻。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十六日卒,年六十四。赠荣禄大夫、少保,谥文靖。

曾棨逝世 曾棨(1372—1432)字子启,号西墅,江西永丰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成祖爱其才,累扈从北巡。参与修纂《永乐大典》,进侍讲学士。参与修纂《太祖实录》,升侍读学士。洪熙元年(1425)升左春坊大学士,仍兼前官。太宗、仁宗两朝《实录》成,进詹事府少詹事。宣德七年(1432)正月二十一日卒,赠礼部左侍郎,谥襄敏。曾

荣天才英迈，喜荐士。工书法，善行、草。为文如泉源，一泻千里，馆阁中自解、胡之后，诸大制作多出其手。有《西墅集》传世。

张政逝世　张政（？－1432），广德（今安徽）人。由进士擢监察御史，巡按山西。持身砺行，政声卓然。遇事则言，不避权要。升按察使，风纪大振。宣德七年（1432）二月十五日卒。

宣宗恤民　宣德七年（1432）二月，宣宗朱瞻基御文华殿，谕大学士杨士奇：恤民诏下，已过二年，今是否有可恤之事？士奇说：前诏减官田租，而户部仍征收如故。宣宗大怒说：今当前行之，废格阻拦者论如法。士奇复请抚逃民，察墨吏，举文学武勇之士，令极刑子孙皆得仕进。又请令廷臣三品以上及在外二司官，各举所知，备方面郡守之选。宣宗一一允准施行。三月初一日，再下宽恤之诏，敕令在必行。并出《减租诗》示廷臣。

卫所儒学的设立　宣德七年（1432）三月二十日，吏部尚书郭琎等复奏陕西按察佥事林时建言：各处卫所宜建学校，以教军官子孙。吏部与有关廷臣会议认为，卫所与府州县治相邻、军官子孙可令入府州县学读书，距离较远之卫所，或一卫所，或二三卫所共设一学，以教子孙。学有所成，可赴本处参加乡试。宣宗允行。宣德十年十月十三日，陕西按察司佥事又奏：各处卫所官军，亦有俊秀子弟，宜建学校以教，可得文武之才，出为时用。英宗纳其言，命天下卫所皆立学校。

巡抚巡按文移事例的制定　其初，敕侍郎分巡各处，抚恤人民，遇有诉讼，重者付布、按二司或巡按监察御史鞫问。吏部右侍郎赵新巡抚江西，按察司谓非六部统属，承行词讼多不回报。赵新咨礼部取明。礼部奏欲行都察院令按察司遵敕而行。宣宗说：遣侍郎四出巡抚，令以词讼之重大者付二司与御史，不惟欲重其任，于大体亦当如此。然诸司文移各有体统，其与都御史顾佐议拟奏闻。于是，宣德七年（1432）四月二十四日，都察院奏所拟巡抚侍郎与巡按御史、按察司文移事例称：圣朝内设监察御史、外设按察司，凡诸司官不公不法，皆得纠举。所以与诸司无承行，此乃重耳目之客、崇纪纲之司。今赵新欲令按察司以问完词讼回报。此刑名重事，系刑部、都察院所掌，纵使按察司回报，不惟其难擅自决断，亦恐其专肆妄为。又虑御史、按察司被其挟制，曲法阿从，以致颠倒是非，出入人罪，此尤不可。请令各处巡按御史及按察司自今遇有巡抚侍郎送到诉讼，其间果系切要重事，则遵敕问理，奏解赴京决遣；如有干碍军职及五品以上文官及当奏之事，则奏请裁决，仍照例呈都察院。乞敕礼部移文，令赵新等巡抚，自今凡有事务，只行移布政司及府州县转行巡按御史、按察司行之。若非切要重事，不得一概径行。宣宗允其所拟，敕巡抚施行。七月二十五日，又申明御史与外官相见礼。

恢复工匠月米旧额　宣德七年（1432）五月二十日，有工匠自陈：常年供役玻璃等厂，旧月支米一石，前不久工部减为五斗，家口众多，不能赡养，宣宗朱瞻基令恢复常役工匠月米一石。

严饬西北边防　宣德七年（1432）五月二十日，宣宗朱瞻基谕兵部侍郎王骥：西北边防，最为切要，必须处置得宜。昨观所进军数，如延安、庆阳诸卫近宁夏，却往戍甘州；临洮、巩昌、兰州诸卫近甘州，却往戍宁夏，舍近趋远，劳费实多。又肃州、镇番、西宁、秦州，皆临极边，当自为守，亦分戍他处，乃别调官军戍其地，此于人情皆非便。尔同成国公朱勇等计议，务在处置得宜。朱勇等奉命严守，又于同月二十九日上边运八事，宣宗允准，令郎中王良、都督毛朔前往专理屯种，务臻成效。

况钟奏陈均征敛　宣德七年（1432）六月初一日，苏州知府况钟奏陈：近奉诏招民开荒，官田起科视民田，无粮种勘豁其粮额。今所属昆山诸县民，死徙从军除籍三万三千四百余户，占种官田，可起科者二千九百余顷，互相补截，其间秋粮可除豁十四万九千五百余石；所属长洲诸县，旧有三十六万余户，官民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余石，民粮不能当官十分之一。国初，令有民粮之家，出马四百余匹，役递濠梁、相城诸驿，约三年一更，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出马之家如故，当未更换。工部征苏松三梭布八百匹，浙江一大省仅征百匹，苏州竟占十分之七，征敛不均，比比皆是。诏书所谓民多愁叹，乞除豁醒刷，以彰陛下鸤鸠之治。宣宗皆从其言。

修天下预备仓　宣德七年（1432）六月，巡按湖广御史朱鉴上言：洪武年间，天下各郡县皆设置预备仓，存积谷物多达万余石，少亦四、五千石。仓设老人监督、富人看守，遇旱、涝灾害则以仓粮赈贷贫民。今预备仓全被废毁，宜遵守旧制，以便使旱涝时有所资助。宣宗认为有理，于是下诏令天下府、州、县修建预备仓。

宣宗制《官箴》戒百官　宣德七年（1432）六月，宣宗亲制《官箴》，以警戒百官。《官箴》共三十五篇，内自六部、九卿以至主事、行人，外自布政、按察二司，各府、州、县以至儒学，武职则自都督府以至各都指挥、内外诸卫，都明确规定了其职责范围内所应遵守的准则，以为鉴戒。宣宗告谕道：吾抚绥兆民，实

赖中外文武群臣，同心同力，兴起治功。远臣既不得数见而告谕，近臣朝夕见面，亦不能数以言谕。因取古人箴儆之义，各著一篇，使各揭于厅，朝夕省览，可期有助职事。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言告我，尤是美事。

宣宗作《织妇词》 宣德七年(1432)七月，宣宗朱瞻基告谕侍臣：吾尝历田野，见织妇采桑育蚕缫丝，制帛累寸而后成匹，亦甚劳苦。遂出所赋《织妇词》示侍臣。《织妇词》称：昔尝历田野，亲睹织妇劳。春深蚕作茧，五月丝可缫。缫丝准拟织为帛，两手理丝精拣择。理之有绪才上机，弄杼抛梭窗下织。斯螽动股织未停，难声三号先夙兴。机梭轧轧不暂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呜呼，育蚕作茧，未必如瓮盎。累丝由寸积为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织者冬寒无挟瓮。纷纷当时富贵人，绮罗烨烨华其身。安知织妇最辛苦，我独沈思一怜妆。

苏州济农仓的设置 宣德七年(1432)八月二十五日，因江南欠收而令各府、县用官钞买进粮食，以备赈贷之用。苏州府以官钞共买进大米二十九万石。旧时公、侯的禄米，军官的月俸，都由南户部支付，苏州、松江百姓将粮食转运南京，每石耗费六斗。巡抚周忱奏令百姓将粮自行运到当地官府，付给运费为每石一斗，每石则可节省五斗米的耗费，合计得米四十万石，加上官钞买进的大米共计七十余万石。适逢令各府、县修预备仓的诏书已下，于是将其分别贮存粮仓，称之为"济农仓"。除用于赈贷之外，每年都有节余，以代民间杂事及欠租，皆按时借给，约定秋收时偿还。其时，虽宽恤备豫诏书不断颁布，但地方真心实意贯彻执行的只有周忱与况钟二人。周忱在任期间，江南各大郡的百姓生活安定，不曾欠负两税。

疏浚六湖 宣德七年(1432)九月十二日，苏州府知府况钟奏言："苏、松、嘉、湖四府之地，共有太湖、庞山、阳城、沙湖、昆承、尚湖等六湖，广袤三千余里，如连降大雨，湖水泛滥，田地淹没。六湖东南出嘉定县吴淞江，东出昆山县刘家港，东北出常熟县白茆港。永乐初，朝廷派尚书夏原吉等疏浚河港，使得水患被除，百姓得利。如今年久失修，河港又已淤塞不通。请派大臣监督当地府、县官员在农闲时征民工疏浚，使湖水能够宣泄，庄稼有所收获。于是，宣宗命巡抚侍郎周忱与况钟共同治理，并计算工程所需人力及用工难易，上报朝廷。

诏命诸将巡边 宣德七年(1432)九月十五日，宣宗朱瞻基命将率兵巡边。告谕道：今国家无事，边塞无警，可以安逸。然居安虑危，乃保邦之道。况西北二边，虏常出没。今秋高马肥，宜预警备。但师行须慎重，无贪利轻进，无肆杀戮。申严号令，整齐部伍，坚利兵甲，以振耀武，使虏慑服，不敢侵掠。而边城各固封守。此为良策。

诏减苏州官田租 太祖籍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官田赋额，而四府之粮，皆以积重而拖欠极多。苏州府田赋又比他府繁重：核计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官田租达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宣宗即位，曾多次下诏减免，亦不能完纳。苏州知府况钟曾奏报：所属昆山诸县，应减十四万九千余石。苏州所辖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余万石，民粮仅十五万三千余石，其余全系官田，有亩征至三斗，轻重如此不均。又请：属县四年逋赋七百六十余万石，量折以钞。然而，皆由户部阻格。待周忱至苏州，二人共同核算奏报。宣德七年(1432)，宣宗根据周忱、况钟奏报，诏减苏州官田租七十二万余石，民困获苏。

宣宗谕天下朝觐官 宣德八年(1433)正月十三日，宣宗朱瞻基谕天下朝觐官：吾承祖宗大位，统御天下，惓惓夙夜，惟在安民。所以屡降玺书，敷陈仁泽，希望黎庶各遂其安。然今布、按二司及府州县官有贤明之人，亦有贪鄙之人；凡命令下有敬谨奉行的，有恬不经急视为虚文的。吾虽切于爱民，而民未曾人人被泽。自今宜务忠勤，体吾心，恤民隐。及职事所当为，勿怠勿忽。以称吾任官养民之意。如不改前过，或虐害纵私，祖宗大法具在，严惩不贷。

禁内使为僧 宣德八年(1433)正月二十九日，宣宗朱瞻基得知各监局小内使为僧人所惑，有的常年素食，有的潜逃削发为僧，遂召监局之长告谕道：人立身自有常道，为臣必忠，为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诵经。佛只教人存心于善，所论天堂、地狱，亦只在心。心存善念，即是天堂；心起恶念，即是地狱。所以《经》云：即心是佛。今后汝等戒之，但存心善，即是修行。敢有潜逃为僧的，皆杀不宥。又命右都御史顾佐榜示卫军、有司及诸关隘，加意盘诘。有小内使削发为僧潜逃在外者，悉捕械来；若寺院藏匿而自首的宥其罪；官司不诘捕及藏匿不首者，一旦发现，全部论死。

郑和逝世 郑和(？—1433)，本姓马，名三保，云南昆阳人。从靖难有功，朱棣赐名郑和。永乐二年(1404)任内官监太监。历事三朝，先后七次，到达三十多个国家，传播中华文明，加强了与访问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于友谊。率领船只之大、航行之远，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成为明代一大盛事。宣德八年(1433)二月，在其第七次出使西洋的返回途中死于古里。(郑和逝世时间，一说为宣德六年，一说为宣德

八年，一说为宣德十年。此处采宣德八年二月之说。）

稽考勾军条令的制定 宣德以前，若都司卫所军旗缺伍，兵部预给勘合，从其自填，遣人取补，及所遣之人，事完还卫，亦从自销，兵部更为稽考。因此，官吏夤缘为弊，或移易本军籍贯，或妄取平民为军，勘合或给而不销，期限或过而不罪，致使所遣官旗迁延在外，娶妻生子，或取便还乡三二十年不回原卫所。虽令所在官司执而治罪，但积弊已久，猝不能革。宣德八年(1433)二月二十六日，兵部以为此皆失于考较所致，请令各卫所将其原填堪合遣去之人籍贯、程限及所取军士籍贯，类册报部。其续填勘合遣去者，于每年末类册报部。其所遣官旗还卫，仍具所解之军及无解之由、有无过期之罪，类册申报。以使勘合出入有所稽考，而为弊过期者，得以究治其罪。宣宗允准。

重立永宁寺碑 从永乐九年(1411)到宣德七年(1432)的二十多年间，朱棣先后九次派太监亦失哈前往奴儿干都司（其统辖范围：西起鄂嫩河，东达库页岛，北至外兴安岭，南临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巡视，宣示朝廷旨意，安抚各族人民。曾经于永乐十一年(1413)和宣德八年(1433)两次在奴儿干都司所在地特林（今属苏联）修建永宁寺，并刻石立碑，碑文用汉、女真、蒙、藏四种文字书写，记述了明政府建置奴儿干都司和兴建永宁寺的经过。永乐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所立的《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和宣德八年三月初一所立的《重建永宁寺记》石碑，是明朝有效地统治奴儿干地区的历史见证。

越诉不实成边 其先奸谲之徒往往构无情之词，赴京陈诉，诬陷平人于罪，以泄私怨，法司不胜其繁，乞请严禁越诉不实之罪，一切诉讼自下达上，越诉者发戍边。此举虽使诬讼减少，但冤抑莫伸，豪猾愈加肆无忌惮。宣德八年(1433)三月十九日，宣宗令法司自今越诉得实勿究，不实者发戍边。

官俸折钞 宣德八年(1433)三月二十七日，兼掌行在户部事、礼部尚书胡濙奏请官俸折钞。他说：南、北二京文武官折支俸钞已经上奏，并于原籍官府勘合填写支给，山后人皆无原籍，顺天等八府官多钞少之地只能在船钞内支给。而且，宣德六年(1431)放支未尽，七年又应当支给。支钞愈多，钞法愈滞。请将七年俸粮每石减旧数后折钞十五贯，以十分为率，七分折给官绢，每匹准钞四百贯；三分折给官绵布，每匹准钞二百贯。文武官俸米每石现折钞二十五贯，旗军同粮现有折十贯或五贯的。请从现在开始，京官每石减作十五贯，在外文武官、旗军请同此例。宣宗准其奏。自此之后，低级官吏更为窘迫。

宣宗诏免逋租 宣德八年(1433)四月十五日，宣宗朱瞻基以旱灾下诏：蠲免京、省被灾逋租杂课，免今年夏税，赐复一年。乏食军民，有司验口给官粮；如无官粮，劝有粮大户借贷，待丰收如数偿还。又敕直隶巡抚御史、在外按察司使理冤狱，减殊死以下，赦在逃军匠罪。有司各举贤良方正一人，巡按御史、按察司使纠治贪酷官吏及生事使臣。

日本遣使来贡 四方国家都派使节来朝，而唯独日本很久不贡。于是，宣宗于宣德七年(1432)命太监柴山出使琉球国时，让其国王转谕日本，赐其敕。宣德八年(1433)五月初二日，日本国王源义教才派使臣来，明朝则赠与白金、彩币。同年闰八月初三，又遣使入贡。

乌罗"蛮"起事 贵州乌罗（今贵州松桃县西北）知府严律己曾奏：所属治古、答意二酋长石各野等，聚众劫掠，出设于铜仁、平头、瓮桥等处，胁迫引诱"蛮"人石鸡娘及筸子坪长官吴毕郎等一起起事，对其招抚则不从。请调官军、土军分别据守要地，边追捕边招抚。于是，贵州总兵官、都督佥事萧授建筑二十四座堡垒，环绕其地据守，但是兵力则被分散，终究难以抵御。吴不跳等四出劫掠，杀死清浪卫镇抚叶受，势力更加强大。萧授又奏：残余苗人吴不尔等逃入筸子坪，勾结土人龙不登等攻劫湖广五寨，应令四川、湖广、贵州之间接境的官兵、土军分路并力攻剿。宣德八年(1433)五月初五，萧授统率各路人马攻城破寨，前后生擒吴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斩吴不尔、王老虎、龙安轴等五百九十余级，归还被掳掠军民男女九十八口，俘获妇女儿童一千六百余口。将吴不跳等送到北京。

慎选都司掌印官 宣德八年(1443)五月十九日，兵部右侍郎王骥奏：据成国公朱勇等言，各都司卫所俱缺老成能干之人掌事，多有托故，经年离职，不思在任亲躬抚恤，整齐军伍，逃亡愈多，虚费供亿。宜行各处巡按御史、按察司及总兵镇守官从公推选每都司卫所掌印官一人，及选老成能干佐贰官二人，常留一人在任理事，专一整饬军马，缮修器械，完固城池，比较屯种，稽考勘合勾军之人。若有作弊，即须究问。军器缺少，则以洪武、永乐旧例，有司支给物料成造；凡有调遣军马，须凭各委官员差调；如军士缺少，器械不精，临期误事，惩治其罪；非有紧急重务，不许辄差。仍以选定官员职名，径自造册回奏。宣宗允行。

宣宗作《闵旱诗》 宣德八年(1433)六月初四日，宣宗朱瞻基作《闵旱诗》示群臣：亢旱久不雨，夏景将及终。禾稼纷欲槁，望霓切三农。祠神既无益，老

壮忧忡忡。馇粥得不继，何以至岁穷。予为兆民主，所忧与民同。仰首瞻紫微，吁天摅精衷。天德在发育，岂忍民恫瘝。施霖贵及早，其必率感通。翘跂望有沴，冀以苏疲癃。

诏减税钞 宣德八年(1433)六月二十八日，宣宗谕户部臣：今内外钞法颇通，所收舟车等项课钞，除旧额与先次减免外，其余增加之数，以三分为率，悉减一分。

慎择乡试考官 宣德八年(1433)七月二十九日，四川按察司副侠朱与言奏陈：设科取士，圣朝盛典，考校不谬，责在主司。洪武间考官必用经明行修之士，故举人无滥取。宣德以来，取士则有解额，所以防抑幸进，期得真才。奈何所司聘召考官，不问贤否，学识何如，多举亲故，是非莫辨，去取多乖。乞令各布政司，今后考官，必先会同巡按卿史、按察司官，从公访求素有学问老成之士，不许引进轻薄无学之徒，庶得衡鉴公平，侥幸路绝。宣宗从其请，命礼部移文各布政司，使悉知儆。又对侍臣说：吾亦闻在外举考试官，多出私意。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己无学识，安能分别人之高下。贤才少有，不为所枉。

汰京师冗官 宣德八年(1433)八月十三日，裁汰京师户、兵、工三部，大理、鸿胪、光禄、太仆及顺天府等冗官七十七员。

陈瑄逝世 陈瑄(1365—1433)字彦纯，合肥人。父名闻，官指挥同知，因坐罪被发配戍守辽阳(今辽宁辽阳县)，瑄请代父受过。瑄机警勇猛，善骑射。初随父官成都，后袭文职为成都右卫指挥同知，迁四川都指挥同知。屡建战功，建文末年，迁右军都督佥事。燕兵南下，受命率水师沿江防御，在浦口迎降。太宗即位后，封其为平江伯。永乐元年(1403)，任总兵官，总督海运。在直沽(今天津城北)建百万仓。会通河开通后，朝廷商议停止海运，仍命瑄经理漕运。造浅船二千余艘，最初运粮二百万石，渐渐达五百万石。筑管家湖、高邮湖堤，开泰州白塔河通大江，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所，便于舟楫。仁宗即位，应诏陈言，皆中时弊。宣德初奉命镇守淮安，兼督漕运，奏请军民兑运，军民两利。宣德八年(1433)十月十七日卒于官，年六十九。封平江侯，赠太保兼太子太傅，谥恭襄。

天方、满加剌国始来贡 郑和于宣德五年(1430)第七次出使西洋时，行至古里国(今印度西南海岸科泽科德一带)时，才第一次得知天方(今阿拉伯半岛，回回之祖国)在其西南。正值古里遣人去天方，郑和于是派人携带货物随其船同行，往返经岁，购买奇珍异宝以及麒麟、狮子后返回。宣德八年(1433)，天方、满加剌国才开始派使节随郑和的船队到中国，向明朝入贡。当时，居住在中国的回人已经遍及各省，自元朝以后，用其历法以参校《授时历》。洪武初年，令专设一科，隶属钦天监，与《大统历》参用。其推算始于隋开皇十四年甲寅(594年)。系穆罕默德辞世之年。

夏旭起义 旭一作九日。宣德八年(1433)江西水灾，后又遭旱蝗，农民苦于官府徭役及地主勒索。江西永丰(今广丰县南)人夏旭领导饥民数千人起义，以大盘山为根据地，夏旭自称都督。后明军突袭山寨，夏旭被俘死难。

东南沿海倭患起 洪熙年间，倭人很久不向明朝入贡，却在沿海不断进行骚扰掠夺。自宣宗对其敕谕后，仍不甘心，不时窥伺着沿海地区。并且这些倭人性情狡黠，经常以船装载着方物、兵器，出没于海滨，如果见有机可乘则用所带兵器大肆掠夺，如果见无法下手则陈出方物而自称朝贡。宣德八年(1433)始，倭人则成为东南海滨一大祸患。

郑亨逝世 郑亨(1356—1434)，合肥人。洪武中袭父职为副千户。洪武二十五年(1392)应募持檄谕鞑靼，至斡难河还，迁密云卫指挥佥事。从靖难，屡立战功，升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武安伯。永乐元年(1403)命守北京。八年，扈从北征，追败本雅失里，又败阿鲁台。出镇宣府(今河北宣化)、开平(今内蒙多伦附近)，规划周详，边备完固。仁宗即位，命佩征西将军印，移镇大同。宣德九年(1434)召还，掌北京行后军都督府事。不久，又命镇守大同。郑亨严肃厚重，执守甚固，善抚士卒。九年二月十七日卒。追封漳国公，谥忠毅。

段民逝世 段民(1375—1434)，字时举，江苏武进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参与修纂《永乐大典》，除刑部主事。又修《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书成，升员外郎，不久，升郎中。山东唐赛儿起义后，擢山东布政司左参政。成祖北征，段民负责督运粮饷至沙漠，能抚恤下人，虽劳不怨。既还，与御史考察郡县官，黜陟能公。宣德二年(1404)召同考试。明年，命署南京户部右侍郎，逾年遂实授。明年改刑部。当初，户部、刑部皆以不治闻名。段民至，纪纲修举，宿弊革除。其存心宽恕，持行廉洁，终身不负所学。宣德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九。成化中，谥恭肃。

交趾土官率部来归 宣德九年(1434)三月初七，交趾谅山府土官阮世宁、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所部三百余避难来归。当时，黎利已经死去，其长子狂妄，次子幼弱，奸臣黎问、黎察等结党仇杀。所

以，阮世宁等请求明朝政府准其迁居广西龙州(今广西龙州县东北)等处，广西总兵官山云转报于朝廷，诏令其随意居住，并敕山云戒饬部属，加强边关的守备。

严侵害军士之禁 宣德九年(1434)五月二十一日，宣宗朱瞻基告谕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概：朝进优恤军士，给以衣食，欲使其感恩而勇公战。近闻官旗史胥人等，妄意诛求，多立名目，率侵月粮，克减冬布绵花。亦有都指挥假托公事，遍历取财，乃以军粮布花变易金银馈送。因此军士衣食不充，多致逃窜。朝廷任彼抚绥，乃更肆为刻削，使恩不下宠，冤情不上通。欲便按法行诛，则是不教而杀。都察院即揭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有再犯者处死，家属戍边。

曹端逝世 曹端(1364—1434)，字正夫，河南渑池人。笃志性理之学，坐下著足处两砖皆穿。其学务躬行实践。永乐六年举于乡，次年登乙榜第一，授霍州学正，历任九年，丁夏归，后起复补蒲州，霍州诸生上章乞留，仍任霍州。修明圣学，人服其化。宣德九年(1434)六月二日卒于官，年七十一。诸弟子痛哭，一州人为之罢市。学者称月川先生，私谥静修。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太极图西铭通书解》、《家规辑略》、《存疑录》、《夜行烛》、《儒宗统谱》、《月川语录》、《曹月川集》。

两京大蝗 宣德九年(1434)七月初九日，两京、山东、山西、河南之大名、元城、内黄、南乐、长垣、魏县、滑县、邯郸、鸡泽、肥乡、成安、永宁、灵璧、山阳、安东、汶上、濮州、潍县、寿光、长山、辉县、汲县、获嘉、新乡、胙城、汤阴、安阳、临漳、修武、济源、河内、温县、孟县、荥阳、河阴、汜水、兰阳、荥泽等处遇大蝗，复地尺余，修禾稼。遂遣御史、给事中、锦衣卫官分赴督捕。

瓦剌脱欢杀阿鲁台 阿鲁台驻牧塞下，被前元代王室后裔脱脱不花袭击，妻子死，牲畜被劫掠一空，只与其子硕尼堪等迁居穆纳山。宣德九年(1434)八月十八日，瓦剌顺宁王脱欢派使节昂克等向明朝贡马，并告知已攻杀了阿鲁台及其子硕尼堪，还准备献上元代玉玺，宣宗婉言相拒，赐纻丝五十表里。

宣宗巡边 宣德九年(1434)九月初六，宣宗决定亲自率军巡边，命武定侯郭玹、西宁侯宋瑛、广平侯袁祯、都督张升及李英分掌行在五军都督府事，行在吏部尚书郭琎兼行在工部事，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概兼行在刑部事，又命太监杨瑛、李德、王振、僧保、李和等提督皇城内外一应事务。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杨荣、礼部尚书胡濙、杨溥、工部尚书吴中等扈从，九月初九，东驾自京师出发。十一月，过居庸关。二十三日，到达洗马林(今河北万全县西北七十里)，准备袭击瓦剌，被杨荣劝阻。二十六日，自洗马林返回。十月初三，还京。

阿鲁台之子请纳款内附 宣德九年(1434)九月二十一日，阿鲁台之子阿卜只俺请求纳款以归附明朝。宣宗念其兵败家亡，无所依靠，怜而安抚。

熊概逝世 熊概(1385—1434)，字元节，初冒姓胡，宣德五年三月奏请复姓熊。江西丰城人。永乐九年(1411)进士，授监察御史，进广西按察使，改广东。洪熙初内召，巡视南畿，奸宄贴息，及诸当革兴之事，皆详列上报。宣宗即位，入为大理寺卿，奉命治水苏、常、松江、杭州、嘉兴诸郡，兼巡视民疾。宣德元年(1426)，苏、杭诸郡及海宁诸卫军饷不断，胡概奏出赃罚米四万二千余石供给。其所到之处，赈穷困，治豪横，礼先贤，修祠宇，饬励学校。宣德五年召还，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时行在都御史顾佐有疾，召任行在都察院。宣德九年十月十一日卒于官，年五十。

四川松潘"蛮"再次起事 总兵陈怀镇守松潘曾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了镇压。不久，御史及按察使弹劾其"终日纵酒，放松边防，而且奢侈犯上"，宣宗大怒，将其召回，令方政代替其总兵之职，都督佥事蒋贵为副总兵。随后，当地少数民族又起事，方政晓以利害，使其大部分归顺。只有任昌、巴诸、黑虎等寨仍继续抵抗。方政率精兵三千五百人攻破西北大寨，蒋贵率兵四千余人攻破任昌大寨，都指挥赵得、宫聚等各进兵，逐次攻破龙溪等三十七寨。前后斩首一千七百余级。方政以四川官军五千人分守所占关寨，招抚溃散百姓。于宣德九年(1434)十月十三日，四川松潘"蛮"起事失败。

初命御史巡仓 宣德九年(1434)十二月，大学士杨士奇奏言：南方运粮至京，非常耗费人力。而仓廪无关防，以至于奸人一次盗窃成千上万，即使前者被捕获，后者仍继续作案，丝毫无畏惧之心。请派风宪官前往各粮仓巡察。宣宗纳其议，遂命监察御史巡视各仓，以防奸人盗窃。从此御史巡仓，一年一更代，著为令。

朱瞻基逝世 朱瞻基(1396—1434)，仁宗长子，幼为成祖所钟爱，于永乐九年(1411)十一月，立为皇太孙，巡幸征讨，皆令其从行。仁宗在东宫，以谗言诬陷，瞻基多为调护，使仁宗转危为安。即位之后，在辅臣辅佐下，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廪充足。且注意民瘼，蠲免赋税，抚恤军士，撤交趾之兵，为人称道。自开国六十余年，民气渐舒，有治平之象。史称"仁宣之治"。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

卒,年三十八。遗诏国家重务白皇太后。二十五日上尊谥章皇帝,庙号宣宗,葬景陵。

朱祁镇即皇帝位 朱祁镇,宣宗朱瞻基长子。母孙贵妃,生四月,即于宣德三年(1428)二月立为皇太子。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瞻基卒,时祁镇方九岁,廷臣有言将立襄王,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率百官请见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宫,携祁镇哭泣道:此为新天子。士奇等伏谒呼万岁,浮议始息。遂于同月初十日即皇帝位。遵遗诏大事白皇太后而后行,大赦天下,以明年为正统元年。

蹇义逝世 蹇义(1363—1435),字宜之,初名瑢。从舅李姓,巴县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复姓蹇,奏事称旨,皇帝书义字赐;以易旧名。常年侍帝左右,参预机密文学。建文初擢吏部右侍郎,永乐时转右侍郎,数月后迁吏部尚书。成祖恶建文改旧制,一切反之,蹇义从容进言,损益随时,间举数事,陈其始末,成祖听从。不久,兼詹事,辅太子监国,同时兼理礼部事。曾巡视江南。洪熙初先后加太子少保、太子少傅、太子少师。宣宗以其劳令解部事,论道如三古公。历事五朝,从政五十年,谙于典故、练达政体。宣德十年(1435)正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三。赠太师,谥忠定。

罢各省镇守宦官 宣德十年(1435)正月十八日,英宗敕浙江等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前遣内官张达等彼处镇守,特为抚安军民,堤防贼寇。近闻军民皆已宁帖,今取达等回京,其原岁随从之人俱发还各卫所著役。凡所辖地方,一应军民人等,尤宜加意抚绥,勿致军卫有司扰害。遇有草寇生发,随即量调官军剿捕,勿遗民患。尔等若视为泛常,不行用心,以致误事,必罪不宥。

杨士奇奏初政合行事宜 宣德十年(1435)正月二十八日大学士杨士奇等奏陈初政合行事宜:整饬内外兵务;南京重地,宜置参赞;山东、江西、湖广、河南灾荒,宜重臣镇守;备边宜给马骑操;校尉宜减,仍堂上官戒约;考察内外文职。英宗嘉纳,令全部施行。

南京参赞的设置 原南京设守备,以武职充任。宣德十年(1435)正月二十八日,大学士杨士奇条陈初政合行事宜,以南京重地,宜设参赞。英宗遂于次日,令设南京参赞。命户部尚书黄福充任,晋少保,参与机务。南京文臣参赞机务自黄福始。

江西等处镇守的设置 宣德十年(1435)正月二十八日,大学士杨士奇等以江西等处灾荒,请设重臣镇守。次日,英宗命廷臣会议,举文武大臣镇守江西等处。于是命擢监察御史王翱为右佥都御史,同都督佥事武兴镇守江西;都督佥事毛翔镇守湖广;都督佥事韩僖、户部侍郎王佐镇守河南;户部侍郎李郁、右副都御史贾谅镇守山东。英宗告谕道:今命尔等前去镇守地方,抚绥人民,操练军马。遇有贼寇生发,随即调军剿捕;城池坍塌,随即拨军修理。其余非奉朝廷敕旨明文,一军一夫不得擅役,一毫不许擅科,违者具实以闻,必罪不宥。

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宣德十年(1435)二月初六日,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英宗即位后,廷臣请皇太后垂廉听政。太后说:勿坏我祖宗法。接着罢除一切不急之务,斥宫中玩好之物,尽心劝皇帝向学。朝廷大政,群臣白太后,太后悉令送内阁,待杨士奇等议决然后行。太后兄彭城伯昶、都督升,惟令朝朔望,不得与闻国事。时杨士奇等荐升贤,宜加委任,太后不许。

裁京师诸司冗费 英宗即位,便敕凡事俱从减省。礼部尚书胡濙等议:钦天监历日五十万九千七百余本,省为十一万九千五百余本;太医院药材九万八千一百余斤,省为五万五千四百余斤;光禄寺糖蜜果品减旧数三分之二,其添造腌腊鸡鹅猪羊二万七千只、子鹅二千只、由四千门等尽行革罢,厨役六千四百名拣选老疾悉皆放回;湖广、江西等处荐新茶芽七千五百余斤,省为四千斤;在京各寺法王、国师、喇嘛六百九十余名,减数存留,余者回原寺住坐,放回云南呵吒力朵分薄五十余名;取回木邦等催办金银内官;革去会同馆办事官;南北两监监生入监年浅者放回,依亲请书;岁贡生员自正统之年为始,府学一年一贡,州学一年一贡,县学三年一贡。英宗悉从所拟。三月又放归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役夫一万七千余人,放库役二千六百四十余人。

曾子良起事 江西连年水旱,官府不能振恤,江西乐安民曾子良等以大盘山(在今江西乐安县西北,绵延数十里,跨新淦、永丰二县界)为根据地起事,自号永顺王,部下达三万余人。朝廷屡次招抚都未成功,于是于宣德十年(1435)三月初六日派都督佥事彭森与吉安府知府陈本深带领官军及地方武装前往大盘山讨伐,严季茂等男、妇千余人被擒,曾子良也于乱军中被杀,余部皆溃散。

吏典犯赃俱发为民 旧例:吏典犯笞杖罪,每十纳钞二千贯,每一百纳钞二万贯。纳钞完日,拨对品衙门参用。宣德十年(1435)三月十五日规定:吏典犯公私笞杖,无赃者准律断决著役;有赃者纳钞完日,俱发为民。

死罪临决必三复奏 宣德十年(1435)三月二十四日,英宗敕谕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及刑

科给事中: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自今凡犯死罪临决之际,必须三次复奏明白,然后加刑。违者处以重罪。

考察地方官吏 宣德十年(1435)四月二十六日,英宗朱祁镇敕谕吏部、都察院:今万物长育之时,天久不雨,又间有水涝蝗蝻。究其所由,或谓牧守之官未尽得人,贪虐暴刻,所在有之,郎命官考察;又或徇私,捷于科征,巧于谄事者以为能事;而勤于抚字,廉介自守者以为不称,公道不明,人怨不恤。果若如此,何望和气。尔典铨之官,任风纪之职,独不思为国家生民考虑吗?今令直隶府州县官从吏部遣官及巡按御史考察;在外府州县官从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考察。务在广询细民,不许偏徇,以昧至公。若考察得实贤才,悉留在职;具名奏闻;不才者起送吏部,照例发遣。其布、按二司堂上官从吏部、都察院考察,属官从巡按御史、按察司考察。今后方面及郡守有仍遵皇考宣宗皇帝敕旨举保,不许故违;但犯赃罪,并坐举主。尔等尽心考察,以副吾恤民求治之急。

年富建言时政 宣德十年(1435)四月二十六日,掌刑科事给事中年富,建言时政四事:严边备,修城池,停补幼军,清理僧道。英宗令所司议行。

初入仕不得除风宪官 宣德十年(1435)五月初二日,英宗朱祁镇谕都察院及各处按察司:近年以来,风宪官未尽得人,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谙;或逞小才以张威福;或搜细过以陷良善。甚至假其权位,贪图贿赂,以致是非颠倒、冤抑无伸,而风纪之道,遂至废弛。自今监察御史有赃滥及失职者,令按察使及其同僚纠举黜退。仍令吏部今后初仕者,不许铨除风见宪。保举务要开具实行闻奏,吏部审察不谬,然后奏除。其后有赃滥及不称职,举主同罪。你们钦承无忽。

敕修《宣宗实录》 宣德十年(1345)七月初七日,英宗朱祁镇敕修《宣宗实录》。命太师英国公张辅为监修官,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翰林学士杨溥为总裁,侍讲学士王英、侍读学士王直为副总裁,李时勉、钱习礼、蔺从善、苗衷、曾鹤龄、马愉、高谷、胡种、邢宽、周叙等为纂修官。正统三年(1438)四月十二日修成,共一百一十五卷。监修官、总裁、副总裁、纂修官等升赏有差。

严私自下海捕鱼之禁 宣德十年(1435)七月二十日,有司奏陈:豪顽之徒,私造船下海捕鱼,恐引倭寇登岸。户部亦奏今海道正欲堤备,宜敕浙江三司谕沿海卫所严为禁约,敢有私捕及纵容者,严治其罪。英宗从其奏,下敕申严私自下海捕鱼之禁。

寺僧拨田自食 宣德十年(1435)八月初四日,广东按察司佥事赵礼奏陈:各处寺观多因田粮浩大,与民一起当差,是致混同世俗。如南海县光孝寺该粮三千石,每当春耕秋收,群僧往来佃家,男女杂坐,嬉笑酣饮,岂无污染败坏风俗?乞依钦定额设僧人:府四十名,州三十名,县三十名。就于本寺量拨田亩,听其自种自食,余田均拨有丁无田之人耕种纳粮。英宗令礼部如所言施行。

攒运粮储事宜条例 宣德十年(1435)九月二十四日,攒运粮储总兵官及各巡抚侍郎与廷臣会议军民利益:一、漕运湖广、江西、浙江,每石米加耗六斗,南畿五斗,北畿四斗、徐州三斗半,山东、河南二斗半。民运瓜州、淮安,正粮尖斛,耗粮平斛。耗粮以三分为率,三分之二给米,三分之一折物。二、明年漕运四百万石,京仓收十分之四,通州仓收十分之六。三、各处设立济农义仓收储济赈米及诸色种子,令州县正官提督。四、淮安、徐州、临清仓,各遣监察御史监收。五、松江征豆万石,到京易腐,改输绵布。六、运军岁支行粮二石。七、疏南北运河。八、归德设闸,引睢水济各洪。九,运粮总兵官及巡抚官每年八月赴京议事。英宗皆从。

"三杨"同心辅政 宣德十年(1435)十一月,太皇太后委任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同心辅政,共商臣民奏章。杨士奇学识渊博,通达国体;杨荣多谋而能断;杨溥儒雅淳厚,谨慎小心。每次议事,杨士奇援引古义,杨荣则以一言决定,其他大臣争论可否时,如有异议,杨溥都能虚己从人,毫无不快之色。颇受舆论称赞,号"三杨"。还有以其居里相称的,杨士奇称"西杨",杨荣称"东杨",杨溥曾自书郡望为南郡,所以称其为"南杨"。

阿台犯甘肃 阿鲁台死后,其所立王子阿台,及所部朵儿只伯被脱脱贴木儿围困,逃往额齐纳路,外为纳款,而屡次入甘肃、凉州抢劫财物。甘肃守臣上报,宣德十年(1435)十月初四,朝廷派使臣前去招谕。十二月十五日,阿台、朵儿只伯又进犯凉州镇番卫(今甘肃民勤县),甘肃总兵官、太保、宁阳侯陈懋于平川将其击败,生擒二百六十余人,获马驼牛羊驴骡三千五百余头。又追至苏武山而还。英宗为加强边防,又派兵部左侍郎柴车协赞甘肃军务,兵部右侍郎徐晞巡抚甘肃。

大藤峡民起事 大藤峡(在广西桂平县西北六十里)介于武宣、象县、蒙山、桂平、平南、藤县之间,四山环绕,绵亘数百里,地势极为险恶。峡口有一大藤横跨江上,居住在此的猺、獞等少数民族"蛮"民起事。其时,山云充总兵官镇守广西,奏请增兵以剿除庆远府(今广西宜山县)、郁林州(今广西郁林

县)少数民族起义。于是朝廷派广东都指挥田真率兵助战。正值浔州(今广西桂平县)等地亦发生农民起义。宣德十年(1435)末,山云派田真率兵与其战于大藤峡,前后斩首九十六级,归还被掠男人、妇女二百零三人。

罢铜仁金场局　永乐年间,遣官赴湖广、贵州等地采办金银课,又派太监、御史前往核实。不久,因金银场之设使岁额大增,于是成祖又下令在浙江、福建开设金银场,该地人民深受其苦。英宗即位后,三杨主持朝政,厉行节俭,并欲封闭坑穴,以苏民困。下诏停止采办。适逢贵州苗民起义,户部首请罢贵州铜仁金场,以期缓和矛盾。英宗采纳其议,遂于正统元年(1436)正月二十一日,下令罢铜仁府金场局。

京军屯种　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之建言:国家每年所用粮储浩大,皆仰给江南军民转运至京,不胜劳苦。况且河道偶有阻窒,则粮饷不充,实非长久之策。目前在京官军为数甚多,除操练造作应用外,可令剩余军士于北京八府空闲田地上屯种。倘遇丰年,必有积蓄,亦可省南方转运之费。英宗从其言,于正统元年(1436)正月二十五日下诏:发禁军三万就近地屯种。接着又据杨士奇等建议,令大宁都司及南、北直隶卫所官军,不必赴京操备,俱下地屯种。既省转运之劳,又养精锐之气。

禁止内外法司锻炼刑狱　正统元年(1436)二月初七日,英宗朱祁镇根据河南布政司右参议邢旭建言,规定:今后人命务要正官检验,强盗要追真赃凶仗,申详会审,若有异词,即与辨明,违者在内从监察御史、在外从按察司官究问。从而杜绝内外法司锻炼刑狱。

严逃民不复业之禁　明朝初年以来的逃民问题益见严重。朝廷虽多次诏逃民复业,厚加优恤,而逃民仍流散隐匿于邻境州县闲住。间或有复业人户,官府又不善加抚恤,被人扰害,于是逃亡如故。流民问题较为严重的河南等布政司右参议邢旭等官屡以为言。正统元年(1436)二月初十日,行在户部请揭榜晓谕督令逃民复业,其亲管州县给帖开写应免税粮、差役,并勿令军民粮里人等逼取私债及陪纳过税粮等等,有违犯的,听其持帖告官;不复业的,如律治罪。若有逃久附籍应办粮差的,审复无碍存留。令在京、在外官员军民之家,书揭于门壁,不得隐藏逃户。令巡抚、巡按等官,比较复业人户,按季报告有司,怠慢者悉听究治。英宗批准施行。

定经筵进讲之制　明朝建国以来,经筵进讲之制,无定地,亦无定期,正统元年(1436)二月二十日,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欲图振兴上言:治国之根本在于圣学,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由讲学而能致治的。凡经筵讲读之官,左右侍从之人,必皆选正人,用之君德,方有所成。于是,英宗下旨以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共知经筵事,少詹王直、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侍讲学士陈循、侍读苗衷、侍讲高谷、修撰马愉、曹鼐兼经筵官,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讲。并令礼部进仪注,始定月讲,御文华殿,诏以月之九日行之。续定每月三日,日以逢二为期,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会讲。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寒暑暂免。遂为定制。三月十二日,英宗初御经筵。

新编《敕符簿》赐诸王　正统元年(1436)五月初二日,英宗派遣内官赍送新编《敕符簿》于代、庆、宁、周、楚、鲁、蜀、肃、沈、辽、韩、唐、伊、郑、襄、荆、淮、梁、赵、秦、晋、靖江等二十二王府各一扇,仍赐各王书,以易世纪元,更属称、换年号。

提督学校官的设立　正统元年(1436)五月二十七日,南京户部尚书黄福上言:近来生员学艺疏浅,宜令布政司、按察司遍历考试,以得真正有才之人。英宗于是下诏:两畿及十三布政司皆设立提学道,专理学校事,按臣不得侵权越职。两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副使或佥事为提督学校官。遂为定制。

顾佐致仕　顾佐(? —1446),字礼卿,河南太康人。建文二年(1400)进士。历任庄浪知县、监察御史。永乐七年(1409),成祖在北京,命吏部选有御史之才者赴行在,顾佐为其中之一。迁江西按察副使,召为应天尹。因其刚直不挠,吏民畏服,被比作包公。北京建都后,改任顺天府尹,为权贵所忌,出为贵州按察使。洪熙元年(1425)召为通政使。宣德三年(1428),大学士杨士奇、杨荣荐顾佐公廉有威,并著风采,为京尹,政清弊革。宣宗大喜,立擢为右都御史,赐敕奖勉,命考察诸御史。宣宗北巡,命顾佐偕同尚书张本等居守。又令约束诸御史纠绌贪纵,朝纲为之肃然。后有奸吏诬奏顾佐受隶贿,私遣归。宣宗乃以吏之章奏交付顾佐曰:你自己处置吧!"佐顿首谢恩,召吏善处。正统初,考察御史不称职者十五人,皆予降黜。而后两度为英宗切责,顾佐遂上章求致仕。英宗赐敕奖慰,赉钞五十贯,命户部免其家之赋税。正统元年(1436)六月致仕,十一年九月卒于家。顾佐有孝行,亲朋友,自身操履清白,然性坚毅,持法深,为言官不喜。是明中期政绩卓著的大臣之一。

定苏松官田赋如民田　自宣德以来,苏州欠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江南巡抚周忱、苏州知府况钟屡请减免。正统元年(1436)闰六月初二日,户部奏称:

浙江、直隶、苏松等地减除税粮之数目,已命重核,尚多不实。盖缘各司府县官不念朝廷供给,惟知掠美沽名,以致仓禀岁用不敷。请移文各处巡抚、侍郎并府、县官员们,用心核实,其地之官田准以民田之例起科征赋。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英宗从其请,并命谕各官:审核之时,务循至公,不得欺官损民以招罪咎。从而减轻了明初以来苏松等地之重赋,民得以安。

于谦建言十事 正统元年(1436)闰六月十四日,巡抚河南、山西兵部右侍郎于谦上疏言十事:接济边储,优养军士,减省吏役,清理军伍,查勘逃户,禁止揽纳,中纳盐粮,取用监生,辨理刑名,存恤孤老。疏下礼部,由大臣会议。除官府给与在途军士口粮,恐造成淹留难行;监生不勤慎者宜黜退为民外,其余均如于谦所言,付诸实施。

罢陕西织造驼毼 永乐年间,曾增设内外各织染织造局,其中包括陕西之驼毼,每年进贡约五十匹,正统元年(1436)闰六月初五日陕西布政司右参政年富言:既造绫绢、毡毼九百余匹,又加驼毼,民以为困。英宗得奏,以为言之有理。加上西鄙不靖,战事频起,遂下令罢除。

十一使臣还国 宣德八年(1433),西洋、西域来朝贡的国家有古里、苏门答剌、锡兰山、柯枝、天方、加异勒、阿丹、忽鲁谟斯、祖法儿、甘巴里、真腊等十一国,其使臣一直滞留未回。正统元年(1436)闰六月二十九日,英宗命礼部稽其在京师使臣,悉遣其搭乘爪哇国朝贡之船回国,并赐敕书,以示怀远之意。

访"圣贤"后裔 英宗即位之初,百废待兴,而尤重儒学。正统元年(1436)七月十七日,顺天府推官徐郁言:国朝尊崇圣贤,宠及其后裔,或荫封爵,或免征徭,甚称盛典也。惟宋袭封衍圣公孔端友,扈从宋高宗南渡,现在其子孙流寓衢州,与民一体,与他人一样服役。再如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司马光、朱熹子孙亦皆杂为编户。乞令所在有司访其后裔,蠲其徭役,择其俊秀之人而教养之。祠墓倾圮者,官为修葺,使君子之德泽,得以久远永存。英宗从其言,遂命有司寻访,免其徭役,修其祠墓。

侯复言边务四事 正统元年(1436)八月初五日,行在户部主事侯复言陕西边务四事:一是,陕西刍运、甘州各卫,士马谷粮俱由陕西各府供给。远至三千余里,民之送纳者岁无宁日。请自令各府税粮运至兰县,然后起发。军夫自兰县运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再自凉州运至各卫,则民免凋敝,而军食足矣。二是去岁招商于庄浪(今甘肃永登)、凉州各卫中纳盐粮,缘路远价高,商旅不至。请减其斗数于兰县中纳,每盐一引,米麦豆四斗于淮浙支盐。运司不拘资次支给,则商旅必集,边储可实矣。三是民运粮赴甘州各卫者,多因路远费繁,上纳不足,宜出息富室以偿之。富室要取厚利有一倍至五倍者。宜令官司禁革,止许子本相侔,使民不重困。四是各边俘获达贼,悉献朝廷。缘沿途护送车马资粮费用不一,请自今惟获首虏、献俘外,余皆随发江南充军,妇女给配军士,可免护送之劳。英宗以为可行,下令有司实施。

钦差巡盐 正统元年(1436)九月十一日,英宗命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行在户部左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等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课。并敕之曰:近闻两淮、长芦、两浙盐运使司及各场盐课司官吏不遵成宪,肆意贪黩,纵容灶户私煎私货,及客商支给,措勒百端。其中有名为巡捕,而私自兴贩者,有假托权贵而自烧煎者,有诈冒客引而沿途鬻卖者,甚至有聚徒集船排列兵器、恣行凶恶者,究其情罪,悉不可容。今特命你们与内臣前去各处往来提督,务要从长区处,俾使盐丁得其所,商贩毋滞,国课不亏,奸弊殄绝。凡有不便于民者,具实以闻。如有阻挠盐法、情犯深重者,械送京师。你们要秉心公直,为国经虑,不要严饬下人,毋使其妄生事端。明代钦差巡盐之制自此始。

封黎麟为安南国王 安南,是明代的朝贡国之一。宣德年间,曾命黎利掌国事。黎利死,又敕其子黎麟署理安南国事。英宗即位,黎麟遣使进香,又遣使表贺、进贡方物。英宗以安南陈氏宗支既绝,而麟又深知大礼,欲使正位。召廷臣会议,诸臣均以为宜。于是,于正统元年(1436)九月二十八日,命兵部侍郎李郁、通政使李亨赍敕印前往安南,封黎麟为安南国王,赐驼印金印,重五镒。黎麟告太庙,并遣捷军管领蔡士明、同知理刑阮大夫阮日升入谢、贡方物。

广西蒙顾十六峒人民起义 正统元年(1436),广西蒙顾十六峒与湖广逃民,因不堪穷苦,相率起义。十二月二十五日,英宗命湖广、贵州总兵官萧授前往镇压。萧授督兵围歼,擒其首领。起义失败。

瓦剌鞑靼二部仇杀 正统元年(1436)冬,瓦剌脱欢以兵追逐鞑靼朵儿只伯。当时二部相仇杀,而阿台、朵儿只伯窜居在外,非瓦剌之敌。故鞑靼部阳乞明朝保护,而阴行寇掠边境。英宗纳成国公朱勇之言,命各边广积储粮以备不虞。

内供撙节 正统元年(1436),英宗改元初期,三杨当国。全国各地坑冶,悉诏封闭。撤去了永乐、宣德年间新增之闸办官,又罢停诸处采办及造下西洋

船木等项冗费，使民困少苏。内供之物，如糖蜜、果脯、酥油、茶芽、粳糯、粟米、药材，或较旧数减半，或减三分之二。皇上所用膳食器皿，如南京工部所造金龙凤白瓷诸器，饶州造朱红膳盒诸器，也多有裁省。后来中官用事，征索渐繁，而民困益厉。

造"逃户周知册" 正统元年((1436)，英宗命山西、河南、山东、湖广、陕西、南北直隶、保定等府州县，造"逃户周知文册"，备开逃民乡里、姓名、男妇口数、军民匠灶等籍，及遗下田地若干，原籍有无人丁应承粮差。若系军籍，则开列某卫军役及有无缺伍，送各处巡抚并清军御史处，督令复业。其已成家业愿入册者，给与户田执照，仍令照数纳粮。若本户原有人丁多，税粮十石以上，而今止存一二丁者，认种地五十亩。原籍有人办粮者，每人认种地四十亩，俱照轻则民田例征赋。原系军匠籍者，仍作军匠附籍，该卫缺人，则发遣一丁补役。该轮班匠，则发遣一丁当匠。原籍为民灶籍，灶户免盐课，量加税粮。如仍不自首，或自首而所报人口不实，或辗转逃移及窝家不举报者，俱发甘肃卫所充军。

太皇太后张氏欲诛王振 英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后张氏(仁宗之后)将朝廷大权悉归内阁，而内阁中三杨等臣皆为累朝元老，王振心惮之，不敢妄为。太后曾派王振至内阁问事，杨士奇等拟议未下，而王振擅自作出决定，士奇恼怒，三日居家不出。太后闻之大怒，欲诛王振。正统二年(1437)正月末，太后来至便殿，召英国公张辅、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濙来见。太皇太后左右之女官，杂佩刀剑，侍卫凛然。英宗面西立于太后之旁，五位大臣面东稍下。太后一一召问诸臣，每人皆有奖励之词。太后对英宗说："此五人是先朝所简用的忠直之臣，国家大事每行必与之商量谋划，不是五大臣赞成的事，决不可行。"接着，太后又宣召太监王振至，王振俯伏于地，太后颜色顿异，怒斥道：你侍候皇上起居多有不当，今当赐死。立时有女官加刃王振之颈。英宗跪下为之请罪，其他五臣皆跪。太后见此情状，说道：皇帝年幼，怎知这种人自古祸人家国！皇上和诸臣为你求请，姑且免你一死。而从今以后，不得再干预国家大事。此后，王振干政稍为收敛。

李仪死于狱中 李仪(？—1437)，河北涿县人。永乐间以荐举授户部主事。出任九江知府，廉政爱民。英宗即位始设诸边巡抚。正统二年(1437)四月，首擢李仪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宣府，多有建置，其居官清廉谨慎，得到边人爱戴。督粮参政刘琏不称职，为李仪所劾，刘琏乃诬李仪有淫乱事。李仪自负清白，言词激烈，遂被逮下狱。正统二年(1437)二月死于狱中。时人颇为之惋惜。

王骥经理甘肃边务 正统初年，蒙古阿台、朵儿只伯等屡次进犯甘、凉边境。大将蒋贵、赵安等出塞无功，而侍郎柴车、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继整饬边防，均不能阻止敌人的攻势，于是英宗在正统二年(1437)五月初一日命兵部尚书王骥前往甘肃经理边务，并特许其便宜行事。王骥急速至任。召集诸位大将，询问上次追敌鱼儿海，谁先败退？众皆答以都指挥使安敬。王骥缚安敬，斩之辕门，一时诸将畏服。王骥又检阅将士，分兵画地，各自防御，边境肃然。且阅军甘、凉，淘汰不堪用者三分之一，定更番法，使兵士得以休息而省转输之费。

鲁穆逝世 鲁穆(1381—1437)，字希文，浙江天台人。永乐四年(1406)进士。家居时，粗衣蔬食，足迹不入州府。谒选后，地方官赠之财物，婉言谢绝。授御史。仁宗监国，屡上封事。汉王官校多不法，人莫敢言。鲁穆上章弹劾，直声振朝廷。迁为福建佥事，理冤讼，摧豪强，不畏权贵。百姓呼之为"鲁铁面"。当时杨荣总理朝政，其家人犯罪，鲁穆以法治之，未尝宽宥。杨荣以鲁穆贤能，荐于朝廷。英宗即位，鲁穆被擢为右佥都御史。正统二年(1437)，奉命到大名府捕蝗。六月初十日，因病而卒，年五十七。天启初谥端敬。家贫不能葬，尚书吴中为之治棺衾，朝廷给舟归其丧。是当时以廉正刚直称著的风宪官之一。著有《葩经或问》、《礼记日抄》等。

杨洪守独石 兵部尚书王骥曾疏言：边军怯弱，是因训练无人。于是推荐千户杨洪，英宗下诏，加杨洪为游击将军，再进都指挥佥事。杨洪以敢战著名，而部下多有诋毁。正统二年(1437)五月，刑部尚书魏源经理大同边务，有人讦奏杨洪之罪，魏源素知杨洪之才，便遣杨洪协助李谦守独石。李谦年高胆怯，与杨洪不谐，杨洪每次调兵，李谦暗中刁难。御史张鹏上疏弹劾，李谦罢归。九月二十三日，英宗命杨洪守独石，杨洪因此得以施展才能，益加自奋。数次击败兀良哈兵，擒其首领，威名震岭北，与边防名将王骥合称为"杨王"。

英宗诏举贤能 正统二年(1437)九月，英宗下诏称：目前地方郡守缺官甚多，令三品以上官员保举贤者备朝廷择用。左通政陈恭疏言：古者择任庶官，例由吏部择选，职任专而且事权归一。今令朝廷官员各举所知，恐怕要开私谒之门，助长奔竞之风气。英宗将该疏移下吏部，令诸臣会议。吏部尚书郭琎不置可否，大学士杨士奇言：宣德七年(1432)以前，布政司、按察司二司及府、州县官用人多不得力，以致害民受苦，于是宣宗皇帝敕令大臣保举。从此，

多得贤能之人。间或有一、二非才者，亦只因举主不明察，甚至是故意徇私造成的。唐太宗力行仁义，命在京三品以上官保举郡守县令，后来竟导致天下斗米买三钱的成效。但所举之人，若有赃犯，必须正保举者之罪，如此，则保举者知谨慎，畏牵连，不敢滥举，而所举之官必尽忠职守。英宗以为然，又下诏，令三品以上官保举贤能。

麓川思任发反叛 麓川与缅甸接境，在金沙江之南。元代为平缅宣慰司。洪武年间，麓川思伦发内附，朱元璋授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司使。洪武二十九年(1396)，平缅入贡，更立宣慰司。不久，思伦发反叛，黔国公沐英奉命讨平。改为孟养宣慰使，以刁氏代替思伦发。正统初，宣慰使刁宝玉力弱，不能制其所属各部，思伦发次子思任发乘机侵缅甸，于正统二年(1437)冬十月，拥众反叛。侵孟定、湾甸、干崖、腾冲、潞江、南甸州(均在今云南西部、西南部)等地。朝廷命黔国公沐晟遣官赍金牌信符，谕思任发还回所侵之地，思任发不奉诏，继续攻掠边邻金齿等地。

章敞逝世 章敞(1376—1437)，字尚文，号质庵，浙江会稽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办山西冤盗，雪数百人，迁员外郎、郎中，改吏部。宣德六年(1431)擢为礼部左右侍郎。与徐琦出使安南，命黎利权理国事，拒厚赠。黎利卒，其子麟嗣位，章敞复奉诏前往，却赆如初。正统初，敞编纂洪武以来条格，使各衙门参酌，吏无能为奸。当时的吏部尚书胡濙比较宽简，而敞佐以严肃。正统二年(1437)十二月卒于官，年六十二。曾参与编辑《永乐大典》及《五经四书大全》。有《质庵文集》。

陈鼎逝世 陈鼎(？—1437)，字重器，广东新兴人。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政绩卓著，声望大振。又擢为建昌知府，治理有方，为百姓爱戴。升为右副御史，又改任刑部右侍郎。陈鼎居官廉慎，淡泊名利。正统二年(1437)十二月卒于官。英宗命给予其祭葬。

黎恬逝世 黎恬(1388—1438)，字率性，号熙斋，清江人。永乐十年(1413)进士，授御史。以荐任南灵州知州。他不歧视当地之民而善治之，教化百姓。黎利反叛后，黎恬北归朝廷。以文才及德行擢为右春坊右谕德。与修《宣宗实录》，进讲经筵。正统三年(1438)正月卒于官，年五十一。有《观过稿》、《征士集》、《斐然稿》等。

姚友直逝世 姚友直(？—1438)，名益，以字行，浙江萧山人。洪武中进士，授中书舍人。累升司经局洗马等职。永乐年间，宣宗为皇孙，友直奉命授书，同时还授蕲献王书。凡有所顾问，必以正对，王以宾礼待之。不久，升为左春坊左庶子。及滕王建国云南，友直升为云南左参政，掌长史司事。滕王逝世后友直因事赴京，宣宗念其旧劳，擢迁为太常寺卿。正统三年(1438)正月卒。英宗遣官赐祭，命令有司给舟车归葬。

禁于释老庙观内祀孔 四川重庆府永川县儒学训导诸华言：孔子祀于学府，佛氏祀于寺庙，老氏祀于观，俱有定制，有等别。而无知僧辈往往欲借孔子以取敬信于百姓，于是绘制孔、释、老三像并列供奉。如永川县过去有寺曰“三圣寺”。佛氏于殿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其亵侮不经莫如此为甚。英宗以愚僧无知妄作，于正统三年(1438)三月十六日，命礼部明示天下，严禁天下祀孔子于释老庙观。

王骥蒋贵等大败阿台、朵儿只伯 朵儿只伯前次遭明军打击之后，军威大挫，连连遣使入贡，意欲休整。乘敌势稍弱，蒋贵率轻骑败朵儿只伯于狼山，朵儿只伯败走石城，与阿台合兵一处。正统三年(1438)四月初二日，兵部尚书王骥、甘肃左副总兵任礼等率诸路军出镇夷关。都督蒋贵统二千五百人为前锋。蒋贵欲孤军深入，副将李安阻止，蒋贵拔剑叱曰：“敢阻军者斩！”遂由间道疾驰三昼夜抵敌之巢。阿台正牧马，蒋贵率军突然冲击其马群，并令士卒以鞭、弓击马，马群惊走，四处逃散。敌失马，只好挽弓步斗，蒋贵纵骑踩蹂奋击，指挥毛哈阿又攻入其阵，大败敌军。随后，蒋贵分军为两翼，另遣百骑乘高布为疑兵，以迷惑敌人。转占八十余里，斩首三百余，擒其伪左丞相脱罗，获金银印各一，驼、马兵甲数以千计。同时，王骥与任礼亦于梧桐林地方大败敌军，追敌至额齐纳路，擒其伪枢密、同知、佥院十五人，万户二人，收降其部落，穷追其余寇至黑泉。都督同知赵安等出兵昌宁，至刁力地方，亦擒其伪右丞、达鲁噶尔齐三十人。明军从分道夹击，转战千余里，朵儿只伯远遁。西部边鄙悉为平定，边患暂除。

大同马市的设立 刑部尚书魏源等，以瓦剌部贡马，援引永乐年间辽东开原等处开马市之例，以六事奏闻皇上：置马市，选贡马，输供具，严禁约，择通事，设牙行。英宗认为马市劳苦军民，不必设置。待远方之人宜宽厚，马不必选。供具可取于公帑，勿需扰民。拒开马市。不久，巡抚大同佥都御史卢睿又言大同宜开马市。并请朝廷允许大同军民平价市马，以明朝官员鞑靼人李原等为翻译，禁止买卖兵器、铜铁等。英宗遂于是正统三年(1438)四月三十日批准在大同开设马市。

修竣京师门楼城濠桥闸 正统二年(1437)二月，明廷大兴土木修造京师门楼、城濠、桥闸。至正统

三年四月竣工。正阳门正楼一座，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城、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座，月城楼一座。各门外立牌楼，城四隅立角楼。另外，又加深城濠，壕之两畔悉垒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全部撤掉，代之以石桥。两桥之间各有水闸，壕中之水自城西北隅环城向东，历九桥、九闸从城东南隅，通过大通桥流出。工程费时一年多，京城面貌焕然，固若金汤。

《宣宗实录》修成 宣德十年(1435)七月初七日，英宗敕礼部修《宣宗实录》。命太师英国公张辅为监修官，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为总裁，侍讲学士王英、侍读学士王直为副总裁，与纂修官李时勉、钱习礼、蔺从善、苗衷、曾鹤龄、马愉、高谷、胡种、邢宽、周叙、尹凤岐、孙曰恭、刁嘉言、陈叔刚、陈询、曹鼐、仪铭、王一宁、杜宁、储懋、杨翥、林文、钟复、董璘、杨寿夫、刘球、刘铉、洪玙、张益等同纂修。正统三年(1438)四月十八日《宣宗实录》修成，共一百一十五卷。张辅、扬士奇等升赏有差。

周忱奏疏通盐课法 正统二年(1437)，淮、扬地区遭受水灾，盐课亏少，英宗命周忱巡视其地。正统三年五月周忱奏：令苏州等府拨出剩余之米，每县量力而拨一、二万石，运赴扬州各盐场收贮，如数出给通行关照各处之公文，准作第二年预纳之秋粮。然后令灶户将私盐于附近盐场分别上纳，照时价给米，即所谓盐课法。此法之行，米贵盐贱，官府得以贮盐，而民得以食米，公私两利，百姓称便。

罗汝敬致仕 罗汝敬(1372—1439)，名简，以字行，号寅庵，吉水人。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累迁侍讲。仁宗时，陈时政缺失，忤旨下狱。后释任监察御史，直声震一时。宣宗时迁工部右侍郎往谕黎利，还督两浙漕运，理陕西屯田，多所建置。正统三年(1438)五月致仕，正统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八。文学才干，皆有可称。有《寅庵集》。

方政征麓川 麓川思任发侵金齿。正统三年(1438)六月二十三日，英宗命都督方政、署都督佥事张荣往云南协同沐昂率兵征剿。十一月二十二日，方政与沐晟、沐昂等率兵进击。兵至金齿，见思任发沿江立栅。沐晟遣指挥车琳往谕，思任发假降，以待救兵。沐晟信以为真，迁延不肯渡江，且阻止方政出战。而思任发反暗中沿潞江渡船三百余艘，欲取云龙。方政得知，独率军士与思任发将缅简大战，斩歼三千余级。正统四年正月，方政乘胜追击，直逼思任发聚居重地上江。因其远攻疲惫，向沐晟求救。沐晟怒其不听节制，单独进兵，仅派少量兵力应付，且至夹象石驻扎不前。方政无奈，自率兵追思任发至空泥。思任发出象阵冲击，遂策马突阵而死。沐晟闻讯，焚江上积聚，奔还永昌。

逮天下逋逃工匠 宣德年间，屡兴土木，征集天下军民工匠用于兴造。英宗即位之初，诸事裁减，罢土木之役以养民省费。不久，为建宫殿，修造九城门楼，改造五府、六部诸司公署，加之又广建京城内外诸佛寺，太监用事，工役繁兴，而工匠多有逃亡。正统二年(1437)二月以后，已逃亡四千余人，到正统三年十一月，逃亡工匠四千二百余人。英宗下令全部逮还。被逮回之工匠皆披枷劳作，军民怨声载道。

山云逝世 山云(？—1438)，江苏徐州人。袭父职为金吾左卫指挥使，从成祖北征，力战有功，累升为都督佥事。宣德初年，佩征蛮将军印镇守广西，增筑四城九堡，铺舍五百余区。居民安宁达十年之久。山云廉洁，善骑射。抚恤下士，身先士卒。公赏罚，严号令同士卒甘苦。以功升为都督同知，又继升为右都督。有疾，英宗遣医视疗，慰劳甚至。正统三年(1438)十一月卒于官。赠怀远伯，谥忠毅。广人立祠塑像春秋祭祀。

陈敬宗请定人国子监事例 正统三年(1438)十一月初七日，国子监祭酒陈敬宗上书言事：旧制，监生视在监年月深浅，以次拨诸司历事。近来有因事故予告者，辄迁延累岁，伺拨历之期方行复监。往往入监虽先，在监实浅。如仍循此例，实助长奸惰。请计其肄业月日多寡以为浅深。其预告者于原限之处，如有过违，并同虚旷，如此，则勤者早得从政，而怠者有所惩劝。而监生所以必待其年久资深而后授官，是因为必使其渐涵滋久，增长见识，这是祖宗之良法。请照旧取拨监生，使之养育薰陶，务期大任。以此抑奔竞之风，收实才真学之用。近来有的监生愿就杂职之例，不拘资历，以为入仕之捷经，如此则士风卑陋，诚非细故，请痛加禁止。英宗从其请。照旧取拨养育薰陶，务期大任。以抑奔竞之风，以收实才之用。

林硕逝世 林硕(？—1438)，字懋弘(一作茂弘)，福建闽县人。永乐十年(1412)进士。授御史，出按山东。宣德初，巡按浙江。为治严肃，就擢按察使。雪冤泽物，不畏强权。千户汤某勾结中官裴可烈为奸，林硕将绳之以法，宦官却诬林硕毁诏书，被逮。林硕在宣宗面前申辩：我前为御史，官七品。今擢按察使，官三品。日夜辛劳，欲报皇上之恩。小人以为不便，欲除掉我，请陛下明察裁夺。宣宗动容，立即释放，并复其官。正统三年(1438)，以事得罪，佥事耿定弹劾，又遭逮讯，不久输赎还职。同年冬十二月升任广东布政使，未及任而卒。

瓦剌脱欢立脱脱不花为汗 正统三年(1438)

朵儿只伯败走后，不久即为瓦剌部之脱欢所杀。脱欢自从袭杀阿鲁台部，悉收其部属。不久，又内杀贤义、安乐二王，尽得其众。脱欢欲自立为可汗。部属不服。于是乃立元朝后裔脱脱不花，以服其众。同时又兼并了阿鲁台部。脱欢自立为丞相，名义上推奉脱脱不花，实际上擅为号令。蒙古部落经此变故，对明朝北边产生极大之威胁。一时朝臣、边将纷纷上言：瓦剌日益强大，且两虏合一，尾大而势已成，非阿鲁台等残寇（指阿台、朵儿只伯之属）之可比！而英宗不省，仅仅戒敕诸将严加防御而已。

方政战殁　方政（？—1439），全椒人。初袭济宁卫千户，从靖难军南下，以功屡迁都指挥佥事。永乐中从张辅平交趾，进都指挥使。仁宗时，奉命赴茶利讨平黎利。正统三年（1438）迁右都督。同年六月，奉命赴云南与沐晟等征剿麓川思任发。正统四年正月初三日，方政独率军与思任发战于上江。遇象阵，策马突阵而死。赠威远伯，谥忠毅。祠于永昌。方政英勇善战，为一代良将。

吴讷致仕　吴讷（1372—1457），字敏德，号思庵，常熟人。永乐中以知医荐至京，洪熙初授监察御史巡按浙江、贵州，迁南京右佥都御史。宣德五年（1430）迁南京左副都御史。刚直有为，宽度振学。正统四年（1439）三月致仕，天顺元年（1457）三月十六日卒。年八十六，谥文恪。吴讷苦节砺行，研性理之学，多有发明，颇有根基。有《思庵集》前后续集、《小学集解》、《性理群书补注》、《文章辨体》、《祥刑要览》等。

沐晟自杀　沐晟（1368—1439），字景茂，凤阳定远人。沐英之子。历官后军左都督。建文元年（1399）嗣侯爵。永乐三年（1405），讨平八百大甸寇边。次年又以征夷左副将军与大将军张辅分道自云南入交趾。擒伪王黎季犛。论功封为黔国公。仁宗立，加太傅，赐征南将军印。宣德元年（1426），奉命会安远侯柳升进讨黎利败绩。正统四年（1439）正月，与方政征讨麓川，不援方政，方政战殁。英宗切责，令其再节制湖广、贵州、四川兵征剿。同年三月二十日，沐晟接诏畏罪，服药自杀于楚雄峨崃驿，年七十二。以平交趾功，赠定远王，谥忠敬。

李昌祺致仕　李昌祺（1377—1451），名祯，以字行，庐陵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庶吉士。预修《永乐大典》，僻书疑事，人多就质。擢为礼部郎中。历广西、河南左布政使。绳豪猾，去贪残，疏滞举废，救灾恤贫，数月政绩可颂。正统改元，上书言三事，皆被采纳。昌祺廉正俭行，淡泊名利。正统四年（1439）四月致仕，景泰二年（1451）卒，年七十五。著有《运甓漫稿》。

倭寇扰浙东　英宗时，规定日本朝贡之船不得超过三只，而来使之人不得过三百，不得多携兵器等等。日本人最初奉约束，不久则贡不如期，动辄满载方物军械，出没于沿海，乘机侵掠，屠杀沿海军民。正统四年（1439）四月，倭船四十余艘，连破台州、桃渚、宁波，大嵩二千户沿所，又攻陷昌国卫，官庾民舍，焚劫一空。英宗下诏加强沿海兵备，诛失事之将官三十六人。后又增设沿海防倭官。

潞江之捷　正统四年（1439）正月沐晟败归之后，思任发愈加猖狂，继续攻掠，犯景东、剽孟定，杀大侯知州刀奉汉等，胁迫孟琏长官等司降之。五月初三日，明朝廷以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兼充总兵官，右都督吴亮为副总兵官，再次征讨思任发。在潞江大败思任发，获赏。

萧授致仕　萧授（？—1445），华容人。由千户从成祖起兵，官至都指挥同知。永乐十六年（1418），擢右军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湖广、贵州。先后镇压贵州少数民族起义。英宗即位，授佩征蛮将军印，镇守如故。正统元年（1436），平定普定阿迟之叛。又镇压文西蒙顾十六峒与湖广逃民起义，进升为右都督。正统四年（1439），征贵州计沙苗族首领苗金虫、苗总牌。萧授镇贵州二十余年，多次镇压人民起义，平定叛乱。进官左都督。四年（1439）六月以老疾致仕。正统十年（1445）卒。赠临武伯，谥靖襄。

吴升请停保举之法　正统四年（1439）七月十九日，工科给事中吴升言：御史为朝廷耳目，理刑狱只为其余事。近年悉命三品以上京官保举，夫御史既蒙大臣举拔，大臣有的奸佞不法，谁肯背举主之私，而敢罄弹劾之公呢？乞请暂停保举。英宗甚以为是。廷议决定，御史缺官，一概于进士、监生、教官、儒士历一任者中考选最优者，再送都察院理刑半年覆用。英宗批准施行。

杨洪大败兀良哈　正统四年（1439）九月十三日，宣大守将杨洪，追击兀良哈于三岔河等处，大败之。不久以宣府总后谭广年老，命洪为右参将辅佐之。杨洪建议加筑开平城，增置独石等墩台六十所。御敌有功。

《宪纲》的刊行　正统四年（1439）十月二十五日，《宪纲》书成，令礼部刊行。英宗朱祁镇谕礼部、都察院，他说：《宪纲》一书，始辑于洪武。其后官制不同，宜因时改定。而中外宪臣，或任情增益。先旁曾敕礼部同儒臣考旧文申明，益以训戒之言、臣下所增，一并删去。书成之时先帝逝世。我今重加考定，增加现行事宜。礼部官员即时刊行，颁布中外诸司遵守。

都察院其通行各道御史及按察司官钦遵奉行。敢有故违，必罪不恕！

瓦剌脱欢逝世 脱欢(？—1439)，蒙古人。正统三年(1438)立脱脱不花为汗，而自掌实权。收阿鲁台残部，使瓦剌强大起来。正统四年(1439)死。其子也先嗣位，称太师、淮王。明朝北部皆服属，脱脱不花空具其名，不复相制。每次入贡，主臣并使，明朝亦发两封敕书答之，称脱脱为"达达可汗"，也先为太师。明朝赐赍也先甚厚，并及其妻子部长。于是也先势益炽，其后竟屡次犯边，为明大患。

黄福逝世 黄福(1362—1440)，字如锡，昌邑人。洪武年间，由太学生历金吾前卫经历。上书论国家大计，朱元璋甚以为奇，超拜之为工部右侍郎。成祖时，又拜为工部尚书。永乐三年(1405)改任北京行部尚书。督安南军饷。安南既平，黄福奉命以尚书掌交趾布政、按察二司事。在交趾凡十九年，深得民心。仁宗即位，回京兼詹事，辅导太子。宣德元年(1426)，再往交趾，战败而还，任行在工部尚书。宣德四年理漕运事。宣德五年改户部尚书。宣德七年，宣宗以南京为根本重地，而黄福又老成忠直，改南京并兼掌南京兵部。英宗即位，加少保，参赞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机务，政肃民安。明代留都文臣参机务，从黄福始。黄福历事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多有建言，切中时弊。公正廉恕，向孚众望。当官不为赫赫名，事微细又无不谨，忧而忘家，老而益笃。正统五年(1441)正月卒，年七十八。追谥忠宣，赠太保。有《黄忠宣集》。

建北京宫殿 永乐年间，奉天、华盖、谨身三殿遭火灾，当时仅稍加修葺。英宗于正统五年(1440)三月初六日，命太监阮安同都督沈清会同工部尚书吴中等重建三殿。奉天门为正朝，国中有大事，皇上临御正殿。同时还修缮了乾清、坤宁二宫。因所用材料俱为过去所积，故此次土木之兴仅役工匠官军七万余人。正统六年(1441)九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及乾清、坤宁宫成。其规制比前更加壮丽。

复命桑巴为国师 桑巴，原系四川松潘祈命族国师。初，镇守松潘都指挥同知赵谅厌恶桑巴，诱捕之，掠其财货，与同官赵得诬以纠众寇边。于是明朝廷命令都督同知李安、右佥都御史王翱将兵前往征讨。不久，王翱闻桑巴之枉，释桑巴于狱，遂奏请诛赵谅，流放赵得。正统五年(1440)四月十六日，招其所部皆听命于桑巴，还其银印，复命桑巴为净戒弘慈国师，又使桑巴招谕其弟，抚安余党，松潘之乱于是平定。

定常股存积之法 正统年间，因开中商人守支年久，虽然减轻开中，但上纳极少。于是遂于正统五年(1440)四月定常股存积之法；长芦、淮、浙盐司以十分为率，八分给守候支盐的商人，称常股；二分收贮于官府，称存积，遇边警始召商开中纳盐。所谓常股，即商人先纳边粮，乃给盐引，然后守场候支常行盐。存积，即积盐在盐场，遇边粮急缺，乃倍价开中，越次放支之盐。

王振度僧道 太监王振喜度僧道，每年必度一次。正统五年(1440)五月以前，已度二万一千人，六月又度一次，前后共二万二千三百余人。黄冠缁衣，布满街市。明建国以来僧道之多，无逾于此。

遣官修备荒之政 阁臣杨士奇等建言：自古圣贤的君主，皆有预备之政。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为心，设置仓库，囤积粮食，以备旱涝之灾，有成法可依。其后有司则不能修举，每遇凶荒，人民流徙他乡。请敕谕户部移文地方诸司，举行洪武旧典，其有隳废者，任听风宪官纠举。英宗嘉纳其言，遂于正统五年(1440)七月初一日，命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等分行天下，修备荒政。其时，太皇太后张氏专以养民为首务，每遇水旱，赈济之费动辄以亿万计，蠲免的灾粮有时达数百万石，闾阎安乐，百姓虽遇灾年而不为所害。其后不久，王振用事，一反正统初年之政，惟蠲租赈荒，尚仍之不改。

杨荣逝世 杨荣(1370—1440)，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荣。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编修。成祖即位后，召杨荣入直文渊阁，并为之更名曰荣。太子立，进右谕德，仍兼前职，多次扈从朱棣北征，深受倚重。永乐十四年(1416)，进为翰林学士，仍兼庶子，永乐十六年掌翰林院事，益见亲任。永乐十八年进文渊阁大学士。永乐二十一年又从北征，还至榆木川，成祖驾崩。荣等商议秘不发丧，益严军令，人莫测。仁宗即位，进太常卿，余官如故。又进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进工部尚书，食三禄。宣德元年(1426)，汉王高煦反。宣宗召荣等定计。杨荣首请宣宗亲征，宣宗从其计。还，以荣决策有功，受上赏。其后几年多次扈从圣驾北巡，破敌有功。英宗即位，委寄如故，参与决策，使正统之初有清明之治。正统三年(1438)，进少师。正统五年(1440)乞归展墓，命太监护行，七月返北京途中卒。年七十。赠太师，谥文敏，授世袭都指挥使。杨荣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谋而能断，权威益重。与杨士奇、杨溥等以"三杨"闻名，是明初一位治世名臣。有《杨文敏集》二十五卷，《后北征记》。

陕西庄浪卫地震 正统五年(1440)十月初一日至十日，陕西庄浪卫(今甘肃永登)地震不止，坏城

堡官民庐舍，压死男妇二百余人，马骡牛羊八百余只。十一月二十二夜庄浪卫苦水湾驿（今永登县东南百里外）又发生五点五级地震，墙壁草棚多倾复。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复震如初。震中烈度（Ⅰo）Ⅷ，震级（M）六点二五。

《大藏经》刊成　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十一日，《大藏经》刊成，英宗亲自作序。博采竺乾秘典。海藏真铨，刊印广传。共六百三十六函，六千三百六十一卷。

河南僧杨行祥下狱　有僧年九十有余，从云南至广西，言称建文帝。令其徒清进前往思恩府拜投土官知府岑瑛。岑瑛执之送到广西总兵官安远侯柳溥处。又械之至京会审。此僧自言：我九十岁，将死，欲葬于祖父陵旁。御史说：建文帝生于洪武十年（1377），今年当有六十四岁。僧词屈，才自陈名杨行祥，河南钧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剃度为僧，历游两京、云南，至广西。英宗于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十九日下杨行祥于锦衣卫狱，四月其后死。其徒十二人均戍边。

定纳谷免役之法　正统五年（1440）定纳谷免役之法：凡民人纳谷一千五百石，敕奖为义民，仍免本户杂泛差役。纳谷三百石以上者，立石题名，免本户杂泛差役二年。

王骥征麓川思任发　正统五年（1440）末，麓川思任发请罪，廷议罢兵。而王振欲示威边陲。兵部尚书王骥阿附王振意，力主用兵。正统六年正月初六日，英宗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都督同知李安、佥事刘聚副之，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督军务，侍郎徐晞督军饷。率军十五万，转饷半天下，征剿思任发，致使麓川再起战火。至十二月，王骥等进军上江，刘聚等渡下江，会兵腾冲，长驱直入，抵杉木笼山。思任发据高邻险，筑堡互为声援。因军力悬殊，王骥等大胜，乘胜进击，截守西峨渡，环攻思任发据点，焚死、溺江达数万人，思任发仅携二子逃奔孟养。王骥获其印信三十余枚，焚其据点。留守以守。奏报京师，英宗及王振大喜，遂令班师。

黄泽被黜为民　黄泽，生卒年不详，字敷仲，福建闽县人。永乐十年（1412）进士，擢河南左参政。曾抚恤南阳之流民，使之复业。仁宗即位，建言时政，多被采纳。宣宗立，下诏求直言。泽上书言正心、恤民、敬天、纳谏、练兵、重农、止贡献、明赏罚、远嬖幸、汰冗官十事，切中时弊。宣德三年（1428）擢浙江布政使。复上言平阳、丽水等七县银冶当罢，并请尽罢诸坑冶，语甚切。宣宗叹息曰：民困若此，朕何由知。遣官验视，酌议以闻。黄泽为官有政绩，然多暴怒。巡按御史马瑾劾黄泽九载秩满，自出行县，鞭鞑盐运使丁镃，又敛白金三千两偿官物，且越境过家，遂逮下狱。正统六年（1441）二月十二日被黜为民。

王瀹致仕　王瀹（1357—1450），字子清，河南太康县人。永乐四年（1406）进士。改庶吉士，参预修撰《永乐大典》。永乐五年（1407）夺情起复，奉命授诸皇孙经于东宫。擢为左春坊左司直郎。仁宗即位，授郑王府左长史。宣德六年（1431）改行在户部郎中。英宗即位，升户部右侍郎，奉敕巡抚两浙。正统四年（1439），赴京会议，改南京户部管事。正统六年三月致仕。景泰元年（1450）正月以疾卒。年七十四。

僧道私创道观之禁　正统六年（1441）四月，巡按御史彭勖奏陈：近来寺院遍天下，男女杂处，伤风败俗；穷奢极欲，攘夺刻剥；室屋深邃。地势远僻，藏匿奸恶。请申明禁例，以绝其患。英宗于同年四月初三日下诏，严禁僧道私创寺观伤败风化，并令都察院、礼部考旧禁例，再出榜各处严禁，若有违及，严加惩处。

柴车逝世　柴车（1375—1441），字叔舆，浙江钱塘人。永乐二年（1404）以举人授兵部武选司主事，历员外郎。永乐八年（1410）从成祖北征，还迁江西右参议。宣德五年（1430），擢为兵部侍郎。正统初，西边不靖。英宗以柴车廉洁干练，命其协赞甘肃军务。调军给饷，悉得事宜。正统三年（1438），柴车以破朵儿只伯功，增俸一级。柴车在边，曾上章数十，悉中时弊，同事多不悦。正统四年进为兵部尚书，参赞如故。不久又奉命兼理陕西屯田。正统六年召还，与佥都御史曹翼岁更代出镇。其时柴车病重，未及回，便于正统六年（1441）六月二十五日卒，年七十三。

武学规制的制定　正统六年（1441）七月初八日，定武学规制：选都督以下材器优秀、家道相称子弟一百四十人，与前选幼官一百人，均分六斋肄业。其所选幼官，若有选除袭替则依旧选补。堂称明伦堂；六斋分别称居仁、由义、崇礼、弘智、惇信、劝忠。读《小学》、《论语》、《孟子》、《大学》、《武经》等。每日授不过二百字，（有志者不拘此限）必须熟读，三日一温习，就所读之书取一节，讲说大义，使之通晓。春夏秋月每日辰时初刻入学，至未时末散；冬月申时散。幼官子弟日写仿纸一张，以百字为度。幼官子弟有事请假，依限赴学。置记过簿，都指挥等官有学规，学官训饬，不从者明书其过，三次不改，具呈总兵官处，随宜惩戒；幼官子弟有犯，量情责罚。提督御史如时稽考毋致废弛。教官、幼官、武职子弟，廪膳，每人月给食米三斗。

吾绅逝世　吾绅（1383—1441），字叔缙，开化

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多平反冤狱,有政声,进郎中,又以政绩超擢为礼部右侍郎。因尚书吕震排挤,而出为广东右参政。不久又恢复部职。改官南京。曾参与考察两广福建官员,虽故人不徇私。其性直率耿直,淡泊名利。正统六年(1441)八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九。

陈本深致仕 陈本深(1381—1460),字有源,浙江鄞县人。永乐初,由乡举入国子监。授刑部主事。善发奸。迁擢为员外郎。宣德五年(1430)出任吉安知府。吉安多豪强,好讦讼。巨猾奸蠹彭博等十九人横行闾里,智取处斩,一府大惊。为政举大纲,不拘苛细。间有所讼,呼至榻前,析曲直遣归。亦不受状。有抑不伸者,虽三尺童子,皆得往白。正统六年(1441)十月初六日,任满九年当迁,郡人乞留,英宗下诏予正三品俸,遂以老致仕。前后守吉安十八年,深得民心。既去,郡人祀其肖像以纪之。天顺四年(1460)卒,年八十。

太监预外廷宴 洪武、永乐以来成例,中官不参预外廷宴会。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初一日,英宗御奉天殿,庆祝宫殿建成,赐文武百官落成宴。英宗遣使问王振何为,王振见使大怒说,周公辅成王,我惟独不可一坐! 使臣复命,英宗蹙然,命开东华中门招王振,百官候拜于门外,王振大悦。士大夫廉耻道丧,士风衰落。

定北京为京师 永乐元年(1403)成祖建北京于顺天府,称为"行在"。永乐十九年(1421)改北京为京师。洪熙初年,仁宗欲迁都南京,命北京诸司仍称行在。正统六年(1441)八月,宁波知府郑恪请定都京师,改号南京,英宗从之。是年十一月初一日,英宗以宫殿成,大赦天下,正式定北京为京师,罢北京行在之称。在南京的府、部、司、寺、院、局悉冠以南京,改其官印。

刘中敷下狱 刘中敷,(? —1453),大兴人。靖难兵起,以诸生守城功,累迁江西右参议。宣德三年(1428)迁山东左布政使,质直廉静,吏民畏服。正统初,召拜户部尚书,正统六年(1441)闰十一月十一日,因瓦剌入贡,英宗询问马驼刍粮之数,茫然不能对,论斩系狱,后释为民。景泰即位,起任户部左侍郎。景泰四年(1453)四月二十四日卒。

设建州右卫 明初,在东北设置卫所,加强对该地区的管理。永乐元年(1403)设建州卫(今吉林市西南)。永乐十年(1412),设建州左卫(今吉林珲春与朝鲜庆源、会宁)一带,以猛哥贴木儿为指挥使。正统年间,两卫部众分别迁居今辽宁新宾县境。正统七年(1442)二月十三日,因猛哥贴木儿之弟范察与其子董山争立,遂命都督佥事董山、范察皆为都督同知,以董山领左卫,另分置右卫,以范察为指挥使领之。至是乃有"建州三卫",系明统治女真人居住地区的地方政权。三卫的指挥使均由明廷任命世袭。

徐永达逝世 徐永达(? —1442),归德人。初为教谕。永乐间拜为翰林编修,侍皇太孙读书。不久,又迁为右中允。宣德初,迁为鸿胪寺少卿,又以寺卿之职出使安南,招南方部落头目黎利降,擢为湖广按察使,改山西按察使。其为政清正、严肃不扰百姓,粗衣蔬食。曾劾巡按御史颜继之暴虐,开罪于都御史陈智,志不能抒。正统七年(1442)二月逝世。巡抚兼少卿于谦临其丧,解金带赙之。

李时勉建言国学五事 正统七年(1442)三月初十日,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言五事;一,重岁贡。圣朝科贡之设,皆欲得人才以资任用,未有轻重之分也。近来由教官九年考满,以举人有无多寡为进退,因而重科举而轻岁贡。乞今后岁贡生员,务选资质端重,通晓文义书算者充贡。其愚劣貌陋老疾者,一律黜为民。教官考满,岁贡皆中科举,虽不及数,亦选科贡俱中者升用,科贡俱不中者降用。如此行之,则科贡俱重,而人才辈出。二,严私假。监生从政,永乐间俱以入监年月为先后,后来祭酒陈敬宗奏准,以坐监年月论深浅。近年来,南京、北京国子监仍以入监年月为先后。如此办法,有些监生丁忧、省祭者,在家延住多年,仿效成风,不可不阻之。乞今后惟依实坐监年月浅深,以次取拨,其丁忧省祭之类俱不作数。如此庶勤怠有所劝惩,虚诈无由仿效。三,均拨历。岁贡中式生员,分拨南北二监,肆业已有定例。缘本监各衙门取拨办事、历事数多,监生不敷,兼用在监诸生。乞今后岁贡生员四十以下告愿读书者,存留本监,以备取拨。四,给医药。本监虽有官医二名,每遇监生患病,予以疗治。但官给药料多有艰难,不能措办。乞敕太医院量给药饵,陆续送监收贮。监生有病,令医者对症修治。五,毁怪刻。近年有民间儒士假托怪异之事,如《剪灯新话》。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亦舍却正学不讲,日夜记意以资谈论。若不禁止,恐怕异端之说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小事。乞令礼部移文内外衙门及各提督学校官,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使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疏上,英宗认为李时勉所言切理可行,遂批准施行。

张信逝世 张信(? —1442),临淮人。嗣其父职,任永宁卫指挥佥事。移守普定、平越,积功进为都指挥佥事。建文即位之初,调往北平都司。受惠帝密诏,命与其他大将谋取燕王。张信密以实情告成祖,成祖立召诸将定计起兵,夺九门。成祖入主京师,进

为都督佥事，封隆平侯。成祖甚重张信，呼之为“恩张”。张信怙宠颇为骄恣。永乐八年(1410)冬，都御史陈瑛弹劾张信强占丹阳练湖八十余里，江阴官田七十余顷。成祖以旧勋不问其罪。永乐二十年(1422)从北征，督运饷。仁宗即位，加少师，并支二俸，给予世侯券。宣德元年(1426)从征乐安。宣德三年(1428)，宣宗巡边征兀良哈，命张信等居守。第二年，信督军一万五千人浚河西务河道。正统七年(1442)五月卒于南京。

焦宏赴浙江备倭 正统七年(1442)，沿海有民与倭寇交通，有的被倭所逼，告以明军之虚实，于是倭寇舍舟登岸，恣行杀掠。浙江三司奏称：自今年(1442)五月二十二日以后，倭寇二千余人登陆袭击爵溪千户所城，虽被官军击却，仍潜伏在海岛，伺机而动。兵部宜遣大臣一员前往。于是，六月二十四日，英宗遣户部侍郎焦宏整饬浙江防倭事，兼理苏松、福建沿海军务。次年二月二十日，焦宏奏陈备倭事宜。他说：浙江沿海卫所，地方广阔，海道崎岖。前因备倭都指挥不分守地方，遇警互相推托，以致误事。我今召集诸将官议得：从乍浦至昌国后千户所十九处，令署都指挥佥事金玉领之；自健跳至蒲门千户所十七处，令署都指挥佥事萧华领之；其昌国卫当南北之中，令总督备倭都指挥使李信居中驻扎，往来提督，使责任有归，边境无患。英宗允行。

吴中逝世 吴中(1372—1442)，字思正，武城人。洪武末，为营州后屯卫经历。成祖取大宁时，中往迎降。以转饷捍御之功，累迁至右都御史。永乐五年(1407)改工部尚书，又改刑部。永乐十九年(1421)与夏原吉、方宾等一道以言北征饷绌，忤旨系狱。仁宗即位，出狱复官，兼詹事，加太子少保。宣德三年(1428)因以官家木石给太监杨庆造宅第，坐罪，下狱，落宫保，夺禄一年。正统六年(1441)，殿工成，进少师，正统七年(1442)六月逝世，年七十一。赠茌平伯，谥荣襄。吴中勤敏多计算，在工部先后二十余年，北京宫殿，长陵、献陵、景陵，皆为吴中主持营造，规划井然，但不恤工匠。

王骥征剿思机发 正统六年(1441)王骥大军平麓川，思任发败走孟养。明朝廷诏谕木邦宣慰司及缅甸宣慰司：能效命擒拿思任发者，即以麓川地予之。不久，思任发又逃往孟蒙，为木邦宣慰司所击，追过金沙江，又败走孟广，最后为缅甸宣慰使卜剌当所擒。于是缅甸挟思任发向明朝求麓川之地。思任发子思机发，复率余众占据者蓝，闻思任发被擒，大为惊惧，于正统七年七月，遣其弟招赛为使入贡谢罪。诸大臣廷议欲因此安抚之，而王振执意不可，于是朝廷不纳其贡，于八月十五日，命王骥总督云南军务，率参将冉保、毛福寿征讨思机发，且图缅甸。正统八年四月，王骥率军至金齿，檄缅甸送思任发。缅甸人表面听命，实阴持两端。五月，王骥调兵遣将，进击思机发。九月，思机发请降，王骥不许。于正统九年二月擒思机发妻子。并以其地立陇川宣谕司，遂班师而还。

置太仓银库 正统七年(1442)九月，复设太仓银库，专以贮银。各直省派发所剩米麦，十库中之绵丝、绢布及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一律入太仓；另外，籍没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以及援例上纳者亦入太仓。明代银库之设自此始。

太皇太后张氏逝世 张氏(？—1442)，永城人。仁宗之皇后。江武二十八年(1395)封为燕世子妃。永乐二年(1404)封皇太子妃。仁宗立，册为皇后。宣宗即位，尊为皇太后。英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操妇道甚谨，立皇后之后，中外政事莫不知晓。宣德初年，军国大议多禀听其裁决。两宫以孝慈闻天下。太后对其家人规矩甚严，不许其参与国事。英宗即位方九岁，大臣请太后垂帘听政，太后说不要坏祖宗成法，应逐渐罢除一切不急之务，时时劝帝向学，委任股肱之臣。因此王振虽得英宗恩宠，太后在世期间终于不敢专擅大政。太后委任三杨等旧臣，政事悉归台阁。正统初年海宇安宁，民得休息，有太后之功劳。正统七年(1442)十月逝世。有遗诏勉诸大臣辅佐英宗笃行仁政，语甚诚恳。与仁宗合葬献陵。

瓦剌入贡 瓦剌人贪图朝廷赏赉，入贡人数超过五十人的规定，骤增至二千余人，大同供亿之费竟至三十余万，屡加敕责而仍不加约束。其使臣所过又多杀掠，邀索财物不成，便动辄挑起衅端。正统七年(1442)春，英宗以贡使太多，限只许三百人入关。冬十月，至大同之使臣仍有二千余人，旬日之后又来百余，英宗下诏姑且接纳之。其使臣暗中以马易弓者，不可胜计。

禁与瓦剌以弓易马 正统七年(1442)冬十月二十八日，巡抚大同、宣府右佥都御史罗亨信奏言，近来，瓦剌贡使至京，官军中有无赖之人，以弓易马，动以千数。其贡使得弓，潜藏于内衣箧中，过境乃拿出。我等考虑瓦剌一贯擅长此器，今国中之人贪其货贿，反与其交换，怎能不助长其威力呢？其敕谕机要重臣密察在京做弓之人，究其卖弓或以弓易马者，严治其罪。一俟瓦剌贡使就道于居庸关，严加盘问检查。并敕谕万全及山西行都司，俱以此禁告知治所部官、军人等。英宗命都察院会同有司办理此事，但不许诘检使臣。镇守边关的太监每年造箭簇数十瓮给予瓦剌使臣，恃王振的庇护，从中获利。

严禁胡俗 正统七年(1442)十二月初三日，礼部尚书胡濙等奏：过去山东左参政沈固曾言，中外官舍军民戴帽穿衣习尚胡制，语言跪拜习学胡俗。系缨、插翎、尖顶、秃袖，以中国之人仿效少数民族之俗，忘贵从贱。宜令都察院出榜，俾巡按监察御史严禁。英宗认为言之有理，遂下令严禁。

况钟逝世 况钟(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江西靖安人。初为书史。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以吕震推荐授主事，迁郎中。宣德五年(1430)出任苏州知府。况钟至任，除奸吏，废烦苛，立教条，公正勤能，不遗余力。又先后奏请蠲重额粮七十余万石，开枉戍一千八百余户。他综理周密，出纳徭役皆有簿籍，吏民贴服。正统六年(1441)秩满当迁，吏民二万余走诉御史张文昌乞留。英宗下诏进三品仍视府事。七年十二月卒于官，年六十。

王振盗毁铁碑 洪武年间，太祖鉴于前代宦官专权，为害国家，特置铁碑高三尺，其上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置宫门内，宣德时尚存。正统七年(1442)冬，王振以太皇太后去世，益加无所顾忌，遂盗取铁碑而毁。

广西浔州大藤峡瑶壮族人民起义 浔江大藤峡在武宣县南，周围多山林岩洞，瑶、侗壮各族人民散居其中。正统七年(1442)瑶人首领蓝受贰、侯大苟率众起事。蓝受贰不久被害，侯大苟坚持斗争，景泰年间再次起兵。

郭琎致仕 郭琎(1371—1447)，字时用，初名进，江西新安人。永乐初，以太学生擢为户部主事，历官吏部左、右侍郎。仁宗即位，兼詹事府少詹事，更名琎。宣宗初，掌理詹事府，兼理吏部事务，宣德四年(1429)四月擢为吏部尚书，留意人才，识得进士李贤辅相器，授吏部主事，后果为名相。郭琎虽为六卿之长，但声望较轻。当时政归内阁，要职选擢，皆不通过吏部。正统八年(1443)春正月十三日，被劾致仕，正统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家，年七十七。

魏复请行警民心厚风俗之法 正统八年(1443)二月二十九日，直隶扬州府通州知州魏复奏：洪武年间，曾经颁教民榜文，令每乡各里各置木铎，选年老或残疾不能生理之人，持铎循行，直言喻众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者每月六次，此诚教化百姓、淳厚风俗之良法。近几年来，木铎之教不行，民俗之浇薄日甚。乞令天下各乡里仍置木铎，循行告诫，使人心有所警省，而风俗日归于厚。英宗批准施行。

招抚逃民 正统八年(1443)三月初三日，英宗谕户部臣：各处逃民先因水旱窘于衣食，又为官府科敛太甚，不得已流移外境，朝廷屡下诏原宥其罪愆，命其听令报籍。近闻有司虑有逃民迁徙无常，遗下税役，使平民受牵累，不容其报籍。其中有愿回原籍者，又以久离土著，恒产无存，公私逋负缠结，不能容身，以致辗转流徙，安养无由。你们户部立即榜谕天下，限半年之内，愿报籍之逃民悉听其报籍。务必安插得当，仍免役三年。愿复业者，官记其名，秋成遣之，如例优恤，公私逋负悉令免除。军匠囚徒在逃者，首先免其罪，罪重者奏闻末减。若辗转观望，不顺招抚者，可以发遣充军。军匠囚徒不自首者，远边充军。有窝藏者，连罪不宥。

魏源致仕 魏源(1382—1444)，字文渊，江西建昌人。永乐四年(1406)进士。除监察御史。洪熙元年(1425)出为浙江按察副使。宣德三年(1428)改任刑部右侍郎。宣德五年出任河南左布政使，与侍郎许廓、布政使李昌祺发仓廪，免逋赋杂役，流民渐归。宣德八年召任刑部左侍郎。英宗即位，进刑部尚书。正统二年(1437)，奉命整饬大同、宣府边务，许便宜行事，易将卒，增亭障，实军伍。边备充实，为一时能臣。正统六年以足疾，奉命朔望赴朝。正统八年(1443)三月二十八日致仕，九年闰七月二十七日卒于家，年六十三。

沈清逝世 沈清(？—1443)，直隶滁州人。由燕山前卫百户累功升为指挥同知。永乐年间，于内府督工营造，升为后军都督佥事。不久又以参将之职镇守大同。洪熙元年(1425)，召还北京，又出为镇守居庸关。宣德四年(1429)，率兵修筑云州等六城，管操神机营军马。宣德十年，升为都督同知。正统四年(1439)，以修筑京都城楼、濠、桥，升为右都督。正统五年又督修奉天、华盖诸宫殿。工毕，封修武伯。正统八年(1443)四月卒。谥襄荣。

刘球应诏陈十事 正统八年(1443)五月二十四日，英宗敕百官修省求直言。翰林院侍讲刘球应诏陈十事：一，勤圣学以正心德。古圣王不作无益之事，故而心正而天不违之。愿皇上勤御经筵，多召进儒臣，讲求至善之道。务必使学问之功至，理欲分离，才能使圣心正而天心自顺。二，亲政务以揽乾刚。政由己出，则使权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视三朝，亲自裁决日常事务，使天下大权由一人总统。愿皇上恪守二圣成规，使权归于一人。三，任大臣以崇国体。古代选择大臣，必征询于左右大夫及国人，其一旦有过失，虽罪至大辟，亦不加刑，仅赐其死而已。今选用大臣，未尝皆出于公论，稍有小过，便动辄桎梏箠楚，不久又复其官职，甚非待大臣之道。愿自今起，择任大臣，宜服从众论；小犯则置之不问，如必不可容，也宜下

法司定罪，使之自为处理，如此似可不违共天职之意。四，选礼臣以隆祀典。今太常寺之卿贰皆缺，宜选择儒臣，使之领其职。五，严考核以肃吏治。古代地方巡守，是为了察査官吏得失，问民间疾苦。现在地方官吏多贪婪暴虐，民不聊生，而军队和卫所尤甚。宜选用公正明智廉洁干练之大臣，分别巡行天下，考察文武百官，使人知劝惩而吏治修善。六，慎刑罚以彰宪典。近来法司所上狱案，多奉皇上之命增减轻重，不敢执奏。及审讯其他囚犯，也观望圣上之意而定轻重，民间多冤，宜使其各任其职。至于运砖、输米诸例，均非古法，尤应罢除。七，罢营作以苏民劳。今京师兴作，已有五、六年，称不烦民而役军，军惟独不是国家赤子?况营作多已结束，亟宜罢工以苏其力。八，宽逋赋以恤民穷。各处水旱，有司既不赈救，只是请减租税，有些地方亦徒事虚文。宜令户部以时赈济，核实减免之数，安养流民。九，息征讨以重民命。麓川近年用兵，死者十之七八，军资爵赏之费，不可胜计，宜敕令缅人斩思任发首来献，思机发既已归顺请罪，应量削其地，分于各寨新附者，则麓川可宁。十，敕武备以防外患。远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宜分遣给事御史阅视京边官军卫卒，以时训练。公武举之选以求良将，定召募之法以诏来材勇之士，广开屯田之规，收中盐之利，以广储蓄备外患。刘球之言多切中时弊。但王振由此更加恨刘球，不久便借故逮刘球入狱。六月十二日，宦官王振指使马顺杀刘球。景泰时，追赠翰林学士，谥忠愍。

王质贬官 王质(? —1444)，字孟瑾，泰和人。永乐中由乡举为训导，迁监察御史。宣德末历四川参政，巡察地方，唯食青菜，人称“青菜王”。擢山东右布政使、户部右侍郎。正统八年(1443)三月迁刑部尚书，同年八月初十日以刑部狱囚越狱贬官，复任户部右侍郎。次年九月十四日卒于官。好古博学，居身俭约，为时所称。

王振陷薛瑄于狱 正统八年(1443)六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少卿薛瑄下狱。先是，宦官王振问大学士杨士奇：“我的同乡中谁可以大用?”杨士奇推荐薛瑄，于是正统六年(1441)八月召提学佥事薛瑄为大理寺少卿。薛瑄至京师，士奇让其拜谒王振，薛瑄以为不可，曰：“拜官于公朝，谢恩于私室是我所不为之事。”不久薛瑄以不趋揖王振而开罪之，故王振因事构陷薛瑄。王振之从子王山曾与某已故指挥之妾私通，欲纳之，指挥之妻不允，妾于是攻讦妻毒杀夫，下都察院审讯，妻之诬服。薛瑄及其同官辩其冤，王振使人劾瑄等受贿，下狱，论薛瑄死罪。会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得释放，罢黜为民。

王振矫旨荷校李时勉 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请改建国子监，英宗命宦官王振前往视察。李时勉没有以大礼接待王振，王振衔恨。欲寻其过失而不得。李时勉曾芟除彝伦堂树之旁枝，王振遂言：李时勉擅伐官树入家。直接取中旨，妄借英宗旨意，于正统八年(1443)七月初五日，将李时勉与司业赵琬、掌馔金鉴一并带枷桎于国子监门前。时正值盛暑，枷三日而不释。监生李贵等三千余人诣阙乞求皇上宽贷。有叫石大用者，上书愿以身代，国子监诸生会集朝门，呼声响彻朝廷。王振闻诸生不平，恐激变，及通政司奏上石大用奏章，王振惧惭。太后闻知，言于皇上，英宗始知王振所为，立即释放李时勉等。

严禁内官私结外廷 正统八年(1443)十月初一日，英宗敕内官内使，严禁私结外廷，嘱托营求。他说：祖宗旧制内官内使职掌内府事务，纤毫不敢透漏。今尔等有不遵法度，与在外各衙门官员私相结交透漏事情，或因公务，营干己私，或因亲情请求嘱托公事，或借拨军夫役以致有司挪移选法，出入刑名，重劳军民，妨废公道。以往之事，悉置不问。自今宜相戒饬，谨遵法度。平素安分守礼者，益加谨慎，用保长久、其有徇情逮法者，即洗心改过；或有不遵祖宗之法，具在必罪不宥!

严禁内外官交通作弊 正统八年(1443)十月初一日，英宗敕在京文武群臣：朝廷建置百官，分理庶政，必能奉公守法，庶有成绩。近来在京内外官员，彼此交通，夤缘作弊，或畏势要，或贪贿赂，遇有事务，私相嘱托，以致文武铨选不出，刑狱轻重失当；军民被其役使，或放富差贫，劳逸不均；或输粮草，辄有挪移。风宪官党比不言，论罪皆不可容。今姑宥不问。继自今素守礼法者，益加谨畏，以保名节；其有徇私玩法者，即宜修省，以图自新，毋为势要所协，毋为贿赂所诱，毋相党比以私灭公，毋事阿附以图侥幸，毋柔儒诡随有妨正道，毋苟容奸邪有旷职掌。庶副朝廷委任，永保名位。敢有不知改悔，仍蹈前非，必治以重罪。

应履平致仕 应履平，生卒年不详，浙江奉化人。建文二年进士，授德化知县。历官吏部郎中，出为常德知府。宣宗初年，擢为贵州按察使。为官所至往往祛除奸蠹，数论时政之得失。宣德七年(1432)，应履平抗疏言勘合之废，他说：勘合之制的设立，是为了防止伪诈。现在右军府遣发至黔者，不遵旧制。小人凭势横求，诈冒何从省。宣宗善其言，命令诸司永守旧制，军府亦因此收敛。正统元年(1436)，应履平劾山云弄权，擅作威福，帝令其自陈，山云大惊，引罪，英宗宽宥之。正统二年(1437)，上书言四事：一，

镇远六府，自湖广改属贵州，当盐川盐，去蜀道远，仍盐淮食为便。二，军卫粮支于重庆，舟楫不通，易就轻赍多耗费，请以镇远秋粮输湖广者就近支给；三，停黎平诸府岁办黄白蜡。四，贵州初开，三司月俸止一石，今粮渐充裕，请增给。所言四条俱得英宗采纳。其后又相继言数事，均得朝廷赞许。正统三年(1438)，升擢为云南左布政使。当时麓川用兵，屡奏劳绩。正统八年(1443)，致仕归。

郑辰告归 郑辰(？—1444)，字文枢，浙江西安人。永乐四年(1406)进士。授监察御史。永乐年间几次出巡访察，政绩颇著。永乐十六年(1418)超擢为山西按察使，纠治贪浊，安抚百姓，声望日高。宣德三年(1428)召为南京工部右侍郎。英宗即位，往四川、贵州、云南，不称职之官员悉为之奏罢。正统二年(1437)，奉命赈南畿、河南之饥。还京擢为兵部左侍郎，转饷宣府、大同。正统八年，以患风疾致仕。正统九年(1444)卒。郑辰为人重义轻财，是明代一位清正之臣。

朱勇等征兀良哈 英宗怒兀良哈三卫入寇辽东，遂于正统九年(1444)正月十一日，命成国公朱勇与太监僧保出兵喜峰口，兴安伯徐亨同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都督陈怀同太监但住出古北口，都督马亮同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各将精兵万人分路征剿。令辽东及各处军马探敌踪迹，搜捕剿杀。会泰宁卫头目与肥沙卫头目战于鄂尔坤，泰宁卫大败。瓦剌又分道截杀，建州卫亦出兵攻之，兀良哈三卫大困。不久，几路征讨兀良哈皆以捷报闻。然都没有大功，仅仅捕其扰边者，夺回所掠人畜而已。但从此以后，巡边者多以斩获之功邀赏，兀良哈三卫积怨，遂甘为瓦剌也先作向导之师。

新建太学成 太学因袭元朝，非常简陋。吏部主事李贤曾上言：国家建都北京以来，太学日益废弛，佛寺却时复修建，举错乖舛，何以示天下！请以佛寺之费修举太学。李时勉亦言。英宗始下诏营建新太学。正统九年(1444)二月建成。三月初一日，英宗车驾亲临太学，释奠于孔子。祭酒李时勉升堂讲《尚书》，词旨清朗。英宗大悦，赐予有加。

杨士奇逝世 杨士奇(1364—1444)，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建文初，召集诸儒修《太祖实录》，士奇充编纂官，授吴王府审理副，仍供馆职。成祖即位，改编修。又简入内阁，典理机务，数月之后进侍讲。永乐五年(1407)进左谕德。士奇奉职甚谨，私居不言公事，举止恭慎，善应对，言事辄中，数言太子孝敬。永乐十五年迁翰林学士，兼官如故。仁宗即位，擢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进少保、少傅，充《太宗实录》总裁官。宣宗即位，修《仁宗实录》，仍充总裁。宣德元年(1426)，汉王高煦反。有人欲罪及赵王，士奇执不可，使赵王得以保全。英宗即位，太后推心任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有事均请三人谘议，然后裁决。正统三年(1438)，《宣宗实录》成，进少师。因太监王振受宠，大作威福，廷臣人人惴恐，士奇亦不能制。正统九年(1444)三月十四日卒，年八十。赠太师，谥文贞。有《三朝圣论录》、《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文渊阁书目》、《及东里集》。

黄宗载逝世 黄宗载(1365—1444)，一名垕，字厚夫，江西丰城人。洪武三十年(1397)进士。授行人。奉使四方，从未收受馈遗，累迁司正。永乐初，以荐为湖广按察司佥事。不久，征诣文渊阁修《永乐大典》。书成，受赐还任。坐不举劾，被谪为杨青驿驿夫。不久又以御史起用，出按交趾。及归，行李萧然，不携交趾一物。洪熙元年(1425)擢为南京吏部侍郎。宣德元年(1426)，奉命清军浙江。进南京吏部尚书。正统八年(1443)五月致仕，九年七月卒于家。年七十九。宗载持廉守正，不娇不随，学问文章俱孚时望，为公卿士大夫所推重。

计澄奏言开科取士之弊 正统九年(1444)七月初九日，云南道监察御史计澄等奏：开科取士，务得实才。今南北直隶凡遇开科，多有诈冒。乡贯报作生员或素无学问，请人代笔，其弊非止一端。乞敕该部会议，今后开科，令御史亲临各处严加考选，必得学问优长素无过犯者令其入试。其在京如遇称系军生并各衙门吏典、承差人等，不由学校，不经考验，其间奸盗贪墨人等无所不有。此等之徒一体不许入试。才能革除奔竞之风。英宗阅后诏谕：求贤之路不宜阻塞，生员、儒士、军生还令提督学校御史考察入试；其吏典、承差人等，礼部严切考察，果通经无过犯，俱容入试，仍移文原籍勘实，如有虚诈，论罪不宥。

复开福建浙江银矿 洪武末年，浙江之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福建之浦城等处，皆有银场，每年征其税课。其后福建岁额增至三万余两，浙江增至八万余两，地力枯竭而民不堪命。英宗即位，下诏封闭坑冶，而仍有流民私开银矿。于是福建参政宋彰，浙江参政俞士悦，奏请复开银场，使利归于上而“矿盗”自绝。章下三司讨论，浙江按察使轩輗力持不可，他说：复开银场仅为一时之利，而数百器用皆出自民间，恐怕有司横加科扰，其患尤深。不如择官典守，严加禁捕，盗自衰自息。朝廷用轩輗言，不开银矿。正统九年(1444)秋七月，处州等地流民数千人，在叶宗留、陈鉴胡的率领下，到福建福安县采矿谋生。福建参议竺渊率官军围捕，被叶宗留所杀。起义军的队伍

日益壮大起来。闰七月初一日，英宗命户部右侍郎王质前往福建、浙江重开银场。遂令福建岁课银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余两，浙江岁课银四万一千零七十余两。盖虽比宣德年间减半，而已是洪武时的十倍。至于内外官属供亿之费，远过于公税。其后民更加贫困，福建、浙江农民起义之火愈演愈烈。

蠲免陕西被灾税粮　正统九年(1444)八月初四日，镇守陕西右都御史陈镒奏：陕西州县数月不雨，麦米俱伤。民之弱者鬻男女，强者肆劫掠。我发仓廪赈济，赎还男女四千人，捕获劫掠者一千七百人，其未获赎者尚多。乞今岁租税量为蠲免四分，其余六分米布兼收，英宗允准，共蠲米四十八万六千石有奇。

文武官受财枉法处罚例的更定　正统九年(1444)八月初八日，大理卿俞士悦等奏陈：据旧例文职受财枉法满贯当绞的充军，其不满贯的俱赎罪为民。武职出百死一生得官，今坐流徒杖罪的全部充军，前功尽弃。而罪及重于文职。请令武职受赃私纵操卒满贯当死的充军，其余不满贯当流徒杖的如旧赎罪还职。则不惟优待武臣，抑且宽恤刑典。英宗批准施行。

英宗敕谕大将巡边　根据旧制，宁夏诸边军，半年一换防。后来边事亟多，三年一更换，又增加选军以防冬季战事，致有一家五六口人在边疆者，军士日益疲困。王骥请每年一更代，当代者以十月至，而得代者留至第二年正月乃遣归，使边备足而军不劳。英宗以为善，遂于正统九年(1444)九月十二日命靖远伯王骥与都御史陈镒巡视延绥、宁夏、甘肃诸边防务，有事悉听其相机处置。

谭广逝世　谭广(1362—1444)，字仲宏，丹徒人。洪武初，从朱元璋征金山，为燕山护卫百户。从成祖起兵立功，屡迁指挥使，留守保定。永乐九年(1411)进为大守都指挥佥事，负责营建北京。既而又领神机营，数从成祖北征，以功进为都督佥事。仁宗嗣位，擢左都督，镇宣府。正统初年，图上方略，正统六年(1441)封为永宁伯，仍镇宣府。正统九年十月召还陛见，是月逝世。年八十二，谥襄毅。谭广在宣府二十年，修屯堡，严守备，增驿传，又请颁给火器于各边。抚士卒有恩，为一代名将。

赵安逝世　赵安(？—1444)，狄道人。永乐年间，从成祖北征有功，累进都指挥同知。宣德二年(1427)，从总兵陈怀平定松潘，进都督佥事。出使乌思藏，宣德四年还。宣德九年，出塞讨阿台、朵儿只伯，败之。正统元年(1436)，进官都督同知，充右副总兵官，协任礼镇守甘肃。正统三年与王骥、蒋贵等分路北征，执蒙古右丞、达鲁花赤等三十人，以功封会川伯。明年移镇凉州。赵安勇敢且有将才，与蒋贵、任礼并称西边良将。正统九年十二月卒。

苏州松江常州等大风潮　正统九年(1444)，苏州府风雨暴至，平地水溢数尺。太湖水高一、二丈，沿湖人畜庐舍无存，渔舟漂没几尽。松江大风雨，湖海涨涌，近海居民有全村漂没者。宜兴大风拔木，水溢漂没千余家。十二月，松江府又降大雪，连续七昼夜，积一、二丈，居民不得出入。

褒奖天下朝觐官　刑科给事中鲍辉曾上言：请于各官来朝时，敕令吏、礼二部询访有廉能之誉、治行超卓者，由礼部官引至御前，而加以奖赏；吏部具录其姓名，待其考满，荐举擢用。英宗从之。正统十年(1445)正月十六日，吏部奏：昨奏命询察各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等衙门前来朝觐之官员，其治行超卓者，即行褒奖赏赐，堪称盛典。但各司官所治地方，或流民失所，或寇盗窃发，或纵容奸豪诬害良善。凡此事情幸经赦宥，其各司官虽有治行，难为超卓。亦有升除未久者，固能修职奉公，其超卓之绩亦未著，颇难推举。今会同礼部尚书胡濙、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文等官，询察得浙江都博运盐使司运使丁磁、陕西巩昌府知府韩福、江西南昌府知府吴本惠、直隶宁国府知府袁旭、松江府知府赵豫、凤阳府知府杨瓒等治行为优。英宗说：褒赏之典，是为劝奖臣工，命令每人各赐织金衣一袭等物，录其姓名，量才升用。

王永书揭王振遭斩　宦官王振专权日甚，朝臣中无人敢言。正统十年(1445)春正月十九日，锦衣卫狱卒王永历数王振罪恶，以书揭于通衢，又于王振之侄王山家揭发其罪，为缉事者所获。刑部坐之以妖言惑众之罪，论斩。英宗下令立即处以磔刑，不必覆奏。

黎澄任工部尚书　黎澄(？—1446)是前安南王季犛之子，黎苍之弟也。季犛禅位于苍，黎苍以其弟黎澄为卫国大王。永乐间，征安南，获季犛父子送京师，长系狱中，惟特赦黎澄黎。黎澄善制神枪，供事内府，以监造器仗有功，秩满，正统十年(1445)六月十二日，遂拜为工部尚书，令其专供内府事。正统十一年(1446)七月卒。

施礼逝世　施礼(1372—1445)，字仲节，顺天府东安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举进士，授行人司司副，升河南布政司参议。一度坐事免职，后以荐举升任淮安府知府，不久召为山东道监察御史。迁大理寺丞，擢少卿。宣德二年(1427)，宣宗命其署理行在刑部事，既而升为右侍郎。正统元年(1436)，升为尚书，不久调任南京刑部尚书。正统十年(1445)六月卒，年

七十三岁。

沐昂逝世 沐昂(? —1445),字景高,定远人。沐英之子。洪武中授散骑舍人,升府军左卫指挥佥事。永乐初升为云南都指挥同知,洪熙元年(1425),升为右军都督同知,掌都司事。宣德十年(1435),升为右都督,奉敕镇守云南。正统三年(1438)征麓川,以功升为左都督,寻命其佩征南将军印,充总兵官率诸军又征麓川,败绩,降为都督同知,仍镇守云南。正统七年(1442)升右都督,从征麓川,师还,升为左都督。正统十年(1445)六月二十二日卒。有《素轩集》。

优免监生徭役 正统十年(1445)九月初八日,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李奎建言:太学乃贤关之地,监生实致用之材,必养之至而后方使才有所成。今府州县生员之家,皆免二人差役,供给生员,使之专心学业。至于南北两国子监监生则无例优免,困苦相仍,士气卑弱。乞照生员之家,免二人差役,此亦造就人才之一端。英宗从李奎之言,命礼部依洪武、永乐年间之例优免监生徭役。

虞祥逝世 虞祥(? —1445),苏州昆山人。由举人历官金华训导、上虞教谕,皆以善教知名。宣德年间升礼科给事中。正统初年,进为通政司左参议,敷奏详明。八年(1443),进户部右侍郎,转兵部,奉命巡抚畿内。其所到之处,铲除贪酷,存问民间疾苦,人民安宁。正统十年(1445)九月十七日卒于官。

李敩逝世 李敩(? —1445),字居学,顺天府涿州人。永乐初,诏开北京国子监,李敩以郡庠生被选。当时仁宗以皇太子身分居守北京,仁宗以"奉圣德、安民生"为题问李敩,李敩以"敬"对,擢居第一,命为监生之首。久之,授京卫经历,历任礼部主事、员外郎、江西左参议、四川左参议、右参政。正统初,升右布政使。正统六年(1441)以大臣举迁为吏部左侍郎。正统十年九月卒于官。李敩刚直勤慎,在四川十余年不以家随,政绩著闻,蜀人称颂。

李暹逝世 李暹(? —1445),字宾旸,陕西长安人。洪武年间以荐入太学。永乐初,擢为户部主事,坐累左迁清河监副。太宗皇帝欲通西南诸少数民族,诏择使以往,李暹以姿貌丰伟,言辞辩正被遣为使,五使西南。又升为户部郎中,不久又奉命督理京畿仓储。正统初以秩满升为右通政,再升为通政使,迁户部左侍郎。再奉命整饬陕西边储屯种。正统十年(1445)九月十三日卒于官。

徐晞致仕 徐晞(? —1446),字孟初,常州府江阴人。永乐初由吏入仕,时建营北京宫殿,授徐晞都事,功成升为营缮主事。宣德中升郎中,不久调为兵部武库司。英宗即位,升试兵部侍郎,往陕西临洮巩昌选练军士,既而虏寇仇杀扰边。英宗命徐晞参赞甘肃军务,寻授侍郎,复命之往守庄浪、凉州。又转为南京户部左侍郎,以麓川督饷有功进为兵部尚书。正统十年(1445)十月致仕。十一年(1446)三月十四日卒。

洪玙逝世 洪玙(? —1445),浙江淳安人。永乐年间以进士授刑部主事,转工部主事,随侍郎罗汝敬巡抚陕西,有能声,善谈论。大学士杨士奇以为奇才,正统初年荐为经筵官,改翰林院侍讲。与修《宣宗实录》。不久又以杨士奇之荐,升为吏部右侍郎。其进退人才,必求其实,不苟为异同,正统十年(1445)十一月三十日卒于官。

瓦剌也先掠哈密 哈密忠顺王卒,正会英宗即位,明朝廷封其子为忠顺王。忠顺王之母系也先之姊。也先强役使西北诸部为其属,沙州、罕东及赤斤蒙古诸卫皆附。正统十年(1445)也先挟其侵略哈密,围其城,杀其头目,虏掠人口。不久便取忠顺王母及妻北还,胁迫忠顺王前往谒见。王惧不敢往,数遣使明政府告急,明朝廷敕令诸部修好,毋相侵。也先不从,仅送王母、妻回哈密。复又取去,大肆侵掠,仍多次促忠顺王归附。忠顺王外顺朝命,而内惧也先。瓦剌破三卫,胁朝鲜,边将知其必为大患,屡书奏报,朝廷终未取进击之策。

定京城九门名称 正统十年(1445)始定京城九门各门名称。分别为崇文、宣武、朝阳、东直、正阳、阜成、西直、安定、德胜,延用至今。

宦官世袭官职 正统十一年(1446)正月十三日,赏赐司礼太监王振等,并授王振侄王林锦衣卫指挥佥事,授太监钱僧保之侄钱亮、高让之侄高玉、曹吉祥弟曹整、蔡忠之侄蔡革副千户,且令世袭。宦官世袭官职实始于此。

蔺从善逝世 蔺从善(1374—1446),河南磁州人。永乐中,历任山东凌县教谕、扬州府学教授、翰林院编修、侍读,选侍皇太孙。宣德初年,与修《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升为司经局洗马,进侍读学士,再改右庶子。正统初与修《宣宗实录》,升为翰林院学士。其赴经筵讲读,语音洪亮,处己待人内外如一。正统八年(1443)四月致仕,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三。

程富下狱 程富(1389—1458),字好礼,号水月道人,歙县人。永乐十二年(1414)举人,授监察御史,出按湖广、江西,迁大理寺少卿。正统六年(1441)迁右佥都御史参赞甘肃军务。正统七年往抚云南有功,迁左佥都御史。再升右副都御史理院事。正统十

一年三月初一日坐事下狱释。九月令回乡治疾。天顺二年(1458)七月三十日卒,年七十。

叶宗留起义 正统年间,流民问题益加严重,逃民四处就食。正统九年(1444)复开闽浙银场,以阻止逃民"盗矿",处州民叶宗留与王能、郑祥四、苍老头、陈鉴胡为首令,聚逃民数千,活动于福建、浙江及广东,江西一带,多次与官军发生冲突。正统十一年(1446)三月初五日,英宗特遣御史柳华前往镇压,并遣兵分捕起义农民,令每村皆置瞭门望楼,编民为甲,择其豪为长,使之自备兵器,督辖巡夫。在明军的围剿中,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诱杀了郑祥四、苍老头等三百余人。而叶宗留率众撤退,重新组织力量,使起义军迅速发展,叶宗留称"大王",延聘龙泉良葛山人叶七为教师,训练武艺,由浦城攻建阳、建宁。叶宗留取江西铅山车盘岭为根据地,在浙、闽、赣三省边区活动,攻破州县多处。正统十三年(1448)七月,叶宗留大败官军于处州(今浙江丽水),击毙都督陈诏。十一月,又设伏大败官军于玉山(今浙赣边界之江西玉山)。在这次战斗中,叶宗留中流矢牺牲。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打击明军,杀都督陈荣、指挥戴礼。起义军声势大振。由陆鉴胡领导的一支起义军攻破浙江的松阳、龙泉,自号"太平国王",改元"泰定"。率起义军进围处州。正统十四年(1449),陈鉴胡接受了朝廷的招降。其余部在陶得二的领导下继续斗争,屡歼明军。景泰元年(1450),叶希八、陶得二相继投降明军。历时六年的矿工起义失败。

复设税课司局 正统初年,英宗诏令凡京城内外所收商税,俱遵守洪武时期之旧额,不得借口钞法妄增。不久,兵部尚书于谦奏言,以各处税课司局收钞数少,官员旷职,虚费俸禄,请凡岁办课钞不及三万贯者悉罢。于是革罢直省税课司局,令有司代征商税;罢济宁、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钞,移漷县税关于河西务;船料税当输六十贯者减为二十贯,商民称便。正统十一年(1446)七月初七日,户部尚书王佐以军旅四出,所费浩大,库藏空虚,乃请置彰义门官房,收商税课钞。又复设直省税课司官。令天下税课司局,征税一万五千贯以上者,俱请复设税课司官。于是征榷渐繁,商民不堪。

杨溥逝世 杨溥(1371—1446),字弘济,湖北石首人。建文二年进士,授编修。永乐初,侍皇太子为洗马。仁宗即位,擢翰林学士掌弘文阁事,不久进太常卿,兼职如故。宣宗即位,弘文阁罢,召杨溥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共同处理机务。宣德九年(1434),擢为礼部尚书,学士值内阁如故。正统三年(1438),《宣宗实录》成,进少保、武英殿大学士,与杨士奇、杨荣并列,中外臣民翕然称"三杨"。以居第方向杨士奇曰西杨,杨荣曰东杨,而溥用曾自署郡望曰南郡,而号为南杨。溥质直廉静,不设城府,性恭谨。正统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卒,年七十五。赠太师,谥文定。

马亮之死 马亮(? —1446),河南淇县人,起行伍。从明成祖靖难之役,因功累迁百户,历升指挥同知,授都指挥佥事,加陕西都指挥同知。永乐间护驾北征,升都指挥使。洪熙元年(1425)升右军右都督。宣德时随征武定州,又从宣宗北征,升左都督。正统九年(1444),以征兀良哈立功封为招远伯,仍任府事。正统十一年(1446)七月二十六日卒。谥荣毅。马亮勇悍善骑,每战身先士卒,所向克捷,为一时骁将。

王振党诬陷大臣 正统十一年(1446)八月二十五日,吏部尚书王直、右侍郎赵新、光禄寺卿奈亨等下狱。当时奈亨谄事王振,被擢为户部侍郎。奈亨曾与吏部郎中赵新有隙,心怀怨望而构陷之,涉及王直与侍郎曹义,一并下狱。三法司及六科廷鞫,奈亨论斩,王直、曹义、赵新俱流放。英宗原宥王直、曹义,夺赵新、奈亨之俸,不久释复奈亨职。为此,行人尚褫上疏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过,遽陷囹圄,事或涉虚,旋即复职。于是今日衣冠之大臣,竟为昨日受辱之囚徒,面对僚友及统属官,怎能无愧!请自今有过犯之大臣召至午门,由大臣会审。事情属实则疏言其轻重,请旨裁决,不实则奏请还职。英宗颇以为言,但惑于王振,终不能改。

广西瑶民起义 正统十一年(1446)九月,镇守广西总兵官柳溥不守成法,激民起义。同月十六日,广西瑶民起义入化州,执知州茅自得,杀千户汪义,声势大盛。

赖巽逝世 赖巽(? —1446),字逊志,江西广昌人。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出巡有风采。曾巡按苏松,纠治豪猾。又考察湖广官员政绩,罢黜参政以下官三百余人,当时竟有闻风解职者。秩满,升云南按察司副使,不久以荐升为云南按察使。正统十一年(1446)十月卒。

吴亮逝世 吴亮(? —1446),来安人。永乐初,为旗手卫指挥佥事,作为萧授的副将镇守湖广、贵州。平定普定阿迟之叛,进升为都督同知。镇压计沙苗民起义,进为右都督。方政殁于麓川,英宗召吴亮还京,命为副总兵,将兵五万征讨麓川思任发。左迁都督佥事,仍佩征南副将军印,镇守湖广、贵州。正统十一年(1446)十一月卒。

邝埜等奏请防御也先犯边 正统十二年(1447),正月十七日,兵部尚书邝埜等奏:瓦剌也先自其父脱欢时吞并阿鲁台部落后,日益强大,而西部

一带少数民族被其驱胁亦无不服从，惟兀良哈三卫不服。也先又亲率人马分道掩杀，自此北漠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衡。前年也先欲俟我边将送彼使臣出境之机乘间抢杀，并分遣人马于甘肃、宁夏等处约期入寇，仰赖皇上深察其奸，敕沿边严备，使其计不得行。目前也先率众远离巢穴来我边窥探，烟火不绝。乞敕令在京各营拣选精壮军马各数万，令智勇头目分别管领，整点军装器械，于瓦剌使臣起程之日，命诸将统领前往宣府、大同两处驻操，壮我边军勇敢之气，消彼虏贼觊觎之心。英宗采纳其议。

李郁逝世　李郁(？—1447)，字文烨，河南洛阳人。由洪武时乡荐授四川邛县学训导，擢工科给事中，举正驳违，无所顾忌。洪熙改元，转礼科给事中，迁光禄寺丞，复出为长沙知府，许便宜行事。宣德八年(1433)召还，升兵部右侍郎。后奉命镇守山东，又持节出使交趾封王，还理部事。正统二年(1437)丁内艰，服阕，调南京兵部右侍郎。正统十二年(1447)正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官。

英宗命天下学校考取附学生员　正统十二年(1447)三月十一日，直隶凤阳府知府杨瓒言：我朝天开景运，文教果兴，内建太学以储天下之英贤，外设府州县儒学以育民间之俊秀。府学额设廪增生员八十名，州学六十名，县学四十名，此外聪明之士不得入学寄名，以俟补增广之缺。寄名者既众，遇开科之际欲报增广，则增广名数已足，欲报儒士则有司多方阻抑，因此无路出身，未免有沧海遗珠之叹。乞敕该部通行天下学校，今后增广生员不拘额数，凡本土子弟自愿入学读书，听凭府州县正官与学官公同考选，俊秀者即收作增广生员。凡遇开科，考其学问，优长者许令应试。英宗允准。于是诸生日众。定制：食廪饩者称“廪膳生”，增广者称“增广生”，皆如旧额，以每年两次考选高等者补充，其额外增取入学者称“附学生”。明朝学校之有附学生自此始。

沙州卫的废除　明建国后，永乐二年(1404)设置沙州卫(今甘肃安西以西)，以其蒙古首领昆济楞、迈珠为指挥使。宣德年间，沙州为罕东(今甘肃敦煌)、西番侵掠，难以安生，向明朝廷乞求迁徙到察罕旧城耕牧。宣宗遣敕不许，又敕命罕东、西番还其所掠人畜。英宗即位后，瓦剌的势力日益强大，昆济楞惧瓦剌胁迫，不能自立，于是率部众二百余人，走塞下陈饥窘状，英宗诏发边粟救济之。且令边臣会议如何处置他们，边臣请徙之苦峪，英宗从之。从此昆济楞不复还沙州，仅遥统其部众。其部众逃入哈密、赤斤(今甘肃玉门西北)者甚多，而罕东则久驻牧沙州不去，朝廷数敕责，诸部皆不奉命。正统九年(1444)，昆济楞卒，长子讷格率其弟恭罗凌戬来朝，朝廷授讷格为都督佥事，授其弟为都指挥使，赐敕戒谕。不久，兄弟相争，部众叛散。甘肃总兵任礼欲乘其窘乏，迁之内地，会讷格也来言欲居肃州(今甘肃酒泉)。去年秋，任礼遂遣使偕讷格先赴沙州抚谕其众，而自率兵随其后。比至，其部发生叛乱，讷格部下多欲投奔瓦剌。任礼出兵迫之，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共二百余户，一千二百三十余人。正统十二年(1447)三月十八日英宗下诏徙之山东，居其头目于东昌、平山二卫，分其部落为三，屯居清平、博平二县。于是沙州遂空，不久为罕东占据。当初明太祖、明成祖先后以次设置了哈密、罕东、赤斤、沙州四卫于嘉峪关外，屏蔽西陲，此时沙州先废，而诸卫亦渐不能自立，西边遂多事。

李时勉致仕　李时勉(1373—1450)，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庶吉士，进学文渊阁，参与修撰《太祖实录》。授刑部主事，又参与重修实录。改任翰林侍读。时勉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曾以言忤明成祖。洪熙元年(1425)上书言事，得罪仁宗，遭廷杖几死，入锦衣卫狱。宣德时获释，复官侍读。宣德五年(1430)修《成祖实录》成，迁侍读学士。正统三年(1438)以《宣宗实录》成，进学士，掌翰林院事兼经筵官。正统六年(1441)为国子监祭酒。时勉曾请改建国学。英宗命宦官王振往视，时勉因待振无加礼，而忤振。王振取中旨，枷三日不解，英宗得知后方释。正统十二年(1447)三月二十一日致仕归里，朝臣及国子生为时勉饯行者几三千人，或远送至登舟，候舟发乃去。土之变，时勉遣其孙上书，请选将练兵，亲君子，远小人，褒表忠节，迎还车驾，复仇雪耻等等。景泰元年(1450)卒，年七十七。谥文毅。成化五年(1469)改谥忠文，赠礼部侍郎。有《古廉集》等传世。

钱习礼辞归　钱习礼(1373—1461)，名干，以字行，吉水人。永乐九年(1411)进士，选庶吉士，寻授翰林院检讨。仁宗即位，迁为侍读，掌理制诰。宣德元年(1426)修两朝实录，进为侍读学士。英宗即位之初，为经筵讲官。《宣宗实录》成，擢为学士，掌院事。正统九年乞致仕，不许。正统十年(1445)，英宗以特旨擢习礼任礼部侍郎。当时王振用事，朝政日紊，达官显贵多造访王振，而钱习礼耻为屈求于太监。正统十二年(1447)六月初七日致仕。习礼笃行重谊，好古秉礼，动有规则。天顺五年(1461)四月二十二日卒，年八十九。谥文肃。

夺张辅田　太监喜宁曾欲侵占英国公张辅田宅，张辅不从。喜宁之弟喜胜，遂率奄奴殴辅家人之

妻,使其堕孕死。张辅诉告英宗,英宗原宥喜宁兄弟而戍奄奴于边。正统十二年(1447)喜宁嗾使青县知县诬奏张辅侵占民田二十顷,六月,上命辅以田还民,而置辅不问。当时王振用事,视诸勋戚如奴隶,诸勋戚亦望尘顿首,惟张辅独与之抗礼,王振亦敬辅。至是张辅多次为喜宁欺侮,亦稍屈以避祸。

英宗敕各边练军备瓦剌 正统十二年(1447)七月十四日,大同参将都督佥事石亨奏:也先并吞诸部,其势日盛,必来犯边。宜令各边守将分别队伍,孰可为正,孰可为奇;大小头目孰可以守,孰可以战,使之各分领操习,庶使兵知将意,将识士情,不致临阵无统,仓猝误事。英宗采纳其议。敕令各处总兵镇守等官,操练所有官军,选拔骁勇者以备出塞。八月初三日命杨洪为镇朔将军总兵官镇宣府,又命左参将石亨守万全。

马愉逝世 马愉(1395—1447),字性和,山东临朐人。宣德二年(1427)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宣德九年(1434)秋进学文渊阁。正统元年(1436)充经筵讲官,再迁至侍读学士。正统五年(1440)奉诏以本官入内阁,参预机务。正统十年升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马愉端重简默,门无私谒,论事务宽厚,有笃厚长者之称。曾奏天下狱久者多瘐死,应简派使者分道决遣。得英宗赞许。正统十二年九月初六日以疾卒,年五十三。英宗深嗟悼其逝,赐棺椁祭葬,追赠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谥襄敏。有明一代赠官兼职自马愉始。有《澹轩文集》。

朱冕建言御虏之策 正统十二年(1447)九月十四日,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侍郎沈固等上疏建言御虏之策:一为守,每秋即收田禾窖藏,老弱尽入城寨。二为战,大同兵分三路,若遇小寇,则一路抵御;若遇大寇,则三路丞援。三为劫,虏昼驰夜宿,选锐士夜劫其营,斩获重赏。四为追,虏得利出塞,负重行迟;不得利则疲困。或据险设伏,或分兵追击。五为选将练兵,保持士气。六为加强兵器,备战车炮弩。英宗以为言之有利,允准实施。

李隆逝世 李隆(?—1447),字彦平,和州人。永乐间袭其父爵为襄城伯。雄伟有将略,数从成祖北征,出奇料敌,为成祖所重。迁都北京,成祖以南京为明朝根本之地,命隆留守。仁宗即位,改镇山海关。不久,又奉命守南京。李隆好读书,论事侃侃,清正谨慎,严守成法,尤礼遇士大夫。在南京十八年,前后受赐朝廷玺书二百余。离开南京时,当地百姓吏民流涕送之江上。正统五年(1440)入京总统禁军。正统十一年(1446)巡视大同边防,申饬戒备,内外凛然。正统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卒。

申严私盐之禁 正统十二年(1447)十一月二十七日,户部奏陈:在京各衙门遣官吏人等,于长芦运司关支食盐,有将批文不投运司,照买私盐装载各处贩卖;又有夹带私盐沿途发卖;还有中盐客商不循旧例,每包添私盐至三四百斤,等等。请令沿途巡检司、批验所等处,务要拘验支盐批文及盐引数目,严加盘诘。若有批文违限夹带私盐的,依律没收入官,官吏人等如例逮问。仍行巡盐御史通行严禁。英宗允准。

申严私茶之禁 正统十二年(1447)十二月二十日,英宗命申严四川、陕西私茶之禁:凡以补纳官茶为名而夹带私茶者,执送所在法司究治,仍问经过关津官吏之罪。

夏时迁官 夏时,生卒年不详,字以正,浙江钱塘人。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授户科给事中。洪熙元年(1425)议改钞法,夏时力言其扰市肆,无裨国用。宣德初,以南户科给事中署理吏、礼、兵、刑四科,不久擢江西佥事,进知州柯暹所撰《教民条约》、《均徭册式》,刊为令,人皆称便。正统三年(1438)迁参议。正统七年奏恤民六事,多议行。正统十二年,以大臣荐,超擢广西左布政使,以廉洁好义,正直敢言称著。年未七十,致仕卒。

金问逝世 金问(1370—1448),字公素,苏州人。永乐初以善书进,后授司经局正字。仁宗在东宫时,喜其字有格法,后坐累与黄淮、杨溥系狱十年。仁宗即位,进升为翰林修撰,每论时政得失皆被采纳。宣德十年(1435)升为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正统八年(1443),调任南京太常寺,次年(1444)升礼部右侍郎。正统十三年(1448)正月卒,年七十九。金问性孝友,能为文,尤长于诗。有《青杨集》、《桂芳集》、《耻庵集》等。

重修庆寿寺 庆寿寺在紫禁城西,金章宗时建立。太监王振媚佛,数言寺之敝陋。英宗于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初三日,命重新修葺。凡役军民万余人,费物料巨万。同年十月修成,壮丽甲京师,英宗临幸,并赐名"大兴隆寺",王振延聘崇国寺僧作佛事。英宗幸寺中,亲自传法称弟子,公侯以下趋走如行童。

王卺致仕 王卺(?—1463),鄗县人。永乐中乡荐,历山东左布政使,所至有惠政、政绩颇著。正统六年(1441)工部左右侍郎,正统七年七月任工部尚书。因性狷介,为王振所侮,遂于正统十三年二月十一日致仕归里,天顺七年(1463)七月十三日卒。

王骥征讨思机发 正统十年(1445)十二月,云南千户王政奉敕币谕缅甸宣慰使索思任发,未即

遣，缅甸以天变生惧，以思任发及妻孥部属三十二人交付王政。王政斩思任发，函献京师。思任发之子思机发仍占据孟养，屡谕不从。正统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英宗命都督同知宫聚佩平蛮将军印，充总兵官，率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官军士十五万人往讨思机发，复命靖远伯王骥总督军务，侍郎焦弘督饷。十月，师抵金沙江，渡江直抵孟养，斩杀无数，思机发死于乱兵之中。南部诸部落皆震惊说：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是天威。王骥与思任发子思禄约定，许其以土目统辖各部，居孟养如故。复与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畏惧，听从朝命。王骥等班师回朝。

邓茂七起义 邓茂七(? 1449)，江西建昌(今永修)人，与其弟茂八为避仇走福建，投奔宁化县豪民陈政景，为众所推重。御史柳华编里甲，茂七兄弟皆为甲长。当地佃农向来须将租米送往地主家中，正租之外，又多有勒索。邓茂七号召佃农拒绝送租，由田主自来收取。田主遂告讼县官，县官不巡检缉捕，茂七拒捕，杀弓兵数人。官军三百人前往镇压，茂七率众杀死官兵、巡检、知县，于正统十三年(1448)四月与陈政景举兵起义。先后攻取了沙县、尤溪等处，推官王得仁与守将及知府镇压，陈政景牺牲。而邓茂七起义军则声盛益大。当时有尤溪炉王蒋福成于旬日之内得万余之众，占据尤溪，与茂七互为声援。加之，福建兵卫久驰，又苦于布政使宋彰虐政，争相投奔起义军的农民竟达数万人。邓茂七于沙县陈山寨建立政权，称"铲平王"。义军围延平(今福建南平)，破泉州，攻占二十余县，与浙江叶宗留起义军相呼应。明政府派佥都御史张楷、宁阳侯陈懋以及梁瑶、陈豫等率京军二万人江浙漕运军二万七千人，利用蒙古族、回族组成的精兵前往镇压。正统十四年，罗汝先、黄琴勾通官军，愿杀茂七以赎罪，邓茂七中计遇伏，起义军伤亡惨重，邓茂七遇难。其余部林子得、邓永祖等拥立茂七兄子邓伯孙以九龙山为根据地，继续斗争。同年五月，邓伯孙中计，杀大将张留孙，复遭官军袭击，邓伯孙被俘牺牲。部将罗丕、廖宁等率余部，转移到深山之中伺机出击。次年，为官军诱杀，起义遂告失败。

禁用铜钱 其时钞既通行，而市廛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五文。于是正统十三年(1448)五月初六日，监察御史蔡愈济为此奏言：请出榜禁约，仍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的擒治其罪，罚以十倍。英宗从其请，禁用铜钱交易。然而明朝廷令禁用铜钱，而钞法仍不通行，商民益以为不便，其后此禁亦渐弛。

刘永逝世 刘永(? —1448)，字克修，江西大庾县人。由进士任刑部主事，历工、刑二部郎中。曾从工部侍郎罗汝敬巡历陕西，又从刑部尚书魏源巡视口北，多有赞画之功。杨溥荐之任荆州知府，刘永爱民如子，正统十三年(1448)六月卒。荆州民哭拜于门者甚众，时人以为刘永有古循吏之风。

申严越诉诬告之罪 正统十三年(1448)六月二十一日，四川按察司副史李匡奏陈：四川军民争讼，不自下而上，往往至京师，驾虚词烦渎圣听。及遣人递回，中途又脱逃，负累递送之人，又有擅自拆动实封等。请严禁重处。英宗命都察院集议，重申今后四川军民人等果系擅动实封及雇人递状，蓦越诉告，并主使教唆、捏词写本状者，决杖一百，改发松潘卫充军。其军余人丁蓦越赴京诬告十人以上，并原告发回，中途在逃的，改发垒溪千户所充军，民人仍发口外为民。

罢大臣保举之法 宣宗时为搜罗贤才，命大臣旁求俊人，布按二司知府有缺，令京官三品以上者保举。其初意未尝不善，但法行既久，多有弊病：先所荐举，后有过恶则力加掩覆，贤否混淆，保举不公。正统十三年(1448)七月二十日，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涂谦言：荐举贤才，就任内外官员。初任之时，莫不砥砺束修，及得授地方知府，不过一二年，遂改常态，往往累及荐举之大臣。乞请该部暂停保举之例，仍遵洪武、永乐旧制，凡方面知府出缺，从吏部于内外九年考满官内，选其才识优长、志行卓异者升授。或者由皇上亲擢朝臣才德素著者任用为便。英宗允准。遂诏罢大臣举官之例。当时，尚书王直稍收其权于吏部，加之给事中余汴、御史涂谦屡以为言，于是罢之，使选举之权悉归吏部。

罢各部郎中员外九载会考之制 正统十三年(1448)八月二十四日，吏部言：近者方面知府缺员，停罢会官保举之例，其郎中、员外郎任满九年，亦宜免会官考试。仍遵旧制，从本衙门堂上官并都察院考核，本部覆考，奏请升黜。英宗采纳其议，遂罢各部郎中员外九载会考制度。

罢边卒田税 正统十三年(1448)八月二十八日，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罗亨信奏陈：永乐时诏边卒尽力开垦，不征其税。皇上即位之初，亦遵旧制。今户部遣官于大同、宣府，经量新垦之地，每人除八十亩外，余地每亩征税五升。而塞北军士守边效劳，岁无宁日，其余丁无他生业，惟事田作。每年自正月伺候接送北虏使臣，至二月出境，三月始得就田，七月又得采草，八月以后修关务边，十月又将迎接使臣。计一岁之中，不得尽力于田亩者常十之，六七。况边境

之地，沙碱硗瘠，霜早雨迟，收获甚微。听其自食、方能勉强自给。若征其税，则人人畏难，不敢耕种，衣食不足，必致逃窜。户部官只知积粟，不知守边得人。人心不固，虽有粟谁与共守？且今边警频至，正宜布恩信以结人心，岂可生事，乞罢经量征税。英宗允准。

张琦逝世　张琦（？—1448），字叔润，山西孟县人。以进士授交阯道监察御史，按治南畿，以才能为人称誉，所司奏留三载，方得回朝。曾陈言利便数事，多被朝廷采纳，继升任江西按察佥事。正统六年（1441），升为工部右侍郎，逾年转升左侍郎。会朝廷有事献陵，琦往治，改为都察院副都御史，正统十三年（1448）八月以疾卒。英宗遣官赐祭葬。

丁璿致仕　丁璿（1382—1448），应天府上元县人。由进士选庶吉士，授工部主事，坐事谪戍。以荐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巡按徐州、陕西、云南，升为左佥都御史。奉命于大同、宣府督运粮储。云南麓川思任发叛，官军征讨失利，召丁璿驰传往视，丁璿陈言用兵便利十余事，遂任为云南巡抚兼督馈饷，麓川平定，召还升左副都御史。正统十三年（1448）十二月致仕，未及行而卒于京。年六十七。

蒋贵逝世　蒋贵（1379—1449），字大富，江苏江都人。以燕山卫卒从成祖起兵。积功至昌国卫指挥同知，迁都指挥佥事。宣德年间，征松潘，镇密云，进都督同知，充任总兵官。正统元年（1436）召还为右都督。正统三年四月，以征阿台与朵儿只伯有功，封定西伯。正统四年（1439）镇守甘肃。正统六年充总兵官与王骥征麓川思任发。次年师还，以功进封定西侯。正统八年夏，与王骥讨思任发子思机发，攻破其寨，回师赏赉加禄。正统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赠泾国公，谥武勇。

王骥征剿思机发　王骥等奉命征剿思机发，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十八日，由腾冲卫进兵干崖，至南牙山登陆抵沙坝，再造舟至下沙江。思机发树栅于江之西岸拒守，王骥等挥兵顺江而下抵管屯，会木邦、缅甸两宣慰亦列兵于沿江两岸。王骥等遣兵奋力攻破其栅寨，得积谷四十余万石，军士饱食，锐气培增。官军、土兵分道并进，尽破山寨。斩杀不计其数。思机发败溃逃遁。四月，奉命班师。

禁约内外官　正统十四年（1449）三月二十一日，英宗谕吏部尚书王直：近闻各处放回官吏，多有挟制官府，交结害民，及诱人为非，以致盗贼生发。吏部当查禁约事例，严加惩处。于是规定：凡放回官吏挟制官府，交结害民的，发口外充军；诱人为非以致盗贼生发的，本身枭首，家属发边远充军。且移文内外法司衙门遍谕示众，使知所警。

湖广贵州苗民起义　麓川之役，兵连祸结，历时十余年。朝廷每次征麓川，尽调云南、贵州兵，将士多死，列卫空虚，深受战争之苦的当地苗、瑶少数民族人民，揭竿而起，反抗明王朝的统治。正统十四年（1449）四月十三日，起义苗民攻围城堡，贵州东路不通。王骥于班师途中，奉命镇压苗民起义，与征麓川侍郎侯琎，都督宫聚等赴南疆，结果为起义军截击，官军死数万，起义军的声势日益壮大。

太监同三法司录囚　正统十四年（1449）五月十四日，大理寺卿俞士悦等以天旱不雨，恐刑狱不清所致，请会审刑部，都察院狱以消天变。英宗遂命太监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会审，凡罪情重者，皆可奏请减刑。当时筑坛于大理寺，金英张黄盖居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抑九卿于内官之下，后竟为定制。

焦宏逝世　焦宏（1392—1449），字克明，河南叶县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宣德初授监察御史，巡按贵州释放疑狱百余起，升为江西按察司副使。正统其持法平恕，名望较著。正统四年（1439），升江西右布政使。六年擢户部右侍郎，多次奉命巡视并署理浙江、苏松、福建沿海边务。督运军饷，从内地出喜峰口；又督民漕运，自淮安达于京城；核实军储，自河南至于陕西。朝廷兴师讨思机发，焦宏奉命督军饷抵金沙江。正统十四年（1449）五月，既班师，便道还家，同月二十四日以疾卒，年五十八。焦宏居官，宽而不纵，严而不残。以崇儒重道为心，恢复濂溪书院，刷新南昌府学，为人称道。

黄淮逝世　黄淮（1367—1449），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三十年（1397）进士，授中书舍人。成祖即位时，召对如流，命与解缙常立御榻左，备顾问，机密重务悉预闻。既而与解缙等六人一并入直文渊阁，改翰林编修，进侍读。太子立，迁左庶子兼侍读。永乐五年（1407 年），进右春坊大学士。永乐七年，成祖北巡，命黄淮等同辅皇太子监国。永乐十二年，成祖征瓦剌还，太子遣使迎稍缓，切责东宫官属，淮等皆坐系诏狱十年。仁宗即位，复官。不久擢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与杨荣等同掌内制。宣德二年（1427）以疾致仕。英宗立，再入朝。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卒，年八十三，赠太师，谥文简。有《省愆集》、《黄介庵集》。

申海上通夷之禁　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海按察佥事董应轸言：原规定濒海居民私通外夷，贸易番货，漏泄事情及引海贼劫掠边地的，正犯极刑，家人戍边；知情故纵者罪同。近年来，沿海之民往往嗜利忘禁。英宗宜申海上通夷之禁。英宗命刑部榜示中外。

英宗亲征瓦剌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

统一蒙古各部后，也先屡次入朝进贡，太监王振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赉瓦剌贡使金帛无数，凡其所请亦无不给予。不久，贡使日增，不久又以虚数报朝廷以冒领廪饩。是年春，也先遣二千人前来贡马，号称三千。王振怒其伪诈，令礼部核实，汰其虚报者不与赏赐及供应，对其贡使之请仅允予五分之一。也先恚怒，于是借减给贡使为衅端，率众大举攻掠明之边境。也先率部先寇大同，至猫儿庄；脱脱不花进犯辽东；知院阿剌寇宣府，围赤城；又有一路专攻甘州。明朝官军相继败溃，北边纷纷告急。王振劝英宗亲征。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英宗不听。同年七月十四日，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力谏：边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备严固。陛下得天之臂助，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宜亲率六师远临塞下。况目前秋暑尚盛，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涩，人畜之用，实有未充。且车驾既出，四方急奏岂能即达。其他利害难保必无。天子至尊而亲赴险地，臣等以为不可。英宗不从，次日下诏亲征，命郕王（朱祁钰）居守。十六日，遣告庙社，车驾发京师，英宗亲征，文武吏卒仓卒就道。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率官军五十万从征，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及翰林院学士曹鼐、张益等扈行，吏部尚书王直留守京师。

当时从行者，张辅居首，但不预军政。阁臣惟曹鼐与张益二人，而益入阁未及三月，相与忧愤。鼐乃乘间谋于诸御史曰：“不杀王振，则驾不可回也。今天子蒙尘，六军气丧，痛恨王振久矣。若用一武士之力，捽王振而碎其首于驾前，历数其奸权误国之罪，然后遣将前往大同，则无意犹可挽也。”诸御史惴惴无敢应者，又谋于张辅而不得机会，遂行。未至大同，兵已乏粮。也先佯避，诱师深入。途中，兵部尚书邝埜多次谏阻亲征，谓：“此兵内犯，一边将之力足以制之。陛下为宗庙社稷之主，奈何不自重？”英宗不省。扈从出关以后，又首请英宗回跸，王振大怒，以邝埜与王佐首倡还师之议忤旨，罚跪草中，至暮不得起。前方败报接踵而至，王振始有还意。八月初三日，还师。王振初议从紫荆关路过蔚州，邀英宗临幸其家。不久又恐蹂躏其乡之庄稼，复折向东。众大将亟言于曹鼐等，谓“车驾宜从紫荆关，可保无虞。”鼐乃言于王振，王振不听。也先大军逼近明军。

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四日，英宗率亲征大军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下午六时左右，距怀来（今官厅水库）二十里，英宗欲入保怀来城，因王振辎重千余辆未至，滞留以待。尚书邝埜再上言：请车驾疾驱入关，严兵为殿后。英宗不听，遂驻土木。瓦剌军四面合围，地无水泉，人马饥渴，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也先已遣兵占据，明军不得发。次日，也先遣使持书来，以和为名，英宗信以为真，令曹鼐起草敕令，派二名翻译持敕偕瓦剌使臣去。王振亟令移营，大营一动，行伍大乱，行未及三、四里，瓦剌以劲骑四面攻入，明军蹈藉死者蔽塞川野。英宗与亲军突围不得出而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锤死，说“吾为天下除此贼。”是役，明朝官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从征遇难者有英国公张辅、五佐、邝埜等五十余人。时中官、从臣皆奔散，喜宁降于也先，悉以中国虚实告之。惟锦衣卫校尉袁彬陷于敌阵，也先使之服侍英宗，不离左右。十六日，英宗命袁彬作书，遣千户梁贵送示怀来守臣，言被俘状，且索金帛。败耗传至京师，百官皆集阙下痛哭。太后及皇后钱氏尽括宫中金宝、文绮等送至也先营中，以赎取英宗。

南迁之争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监国，召集群臣议战守之策。当时京师疲卒羸马不足十万，人情汹汹。翰林院侍讲徐珵（徐有贞）大言：验之星象，稽之天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尚书胡濙极言不可，说：“文皇（指明成祖）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兵部侍郎于谦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京师为天下根本之地，一动则大事去。独不见宋南渡事？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尚书王直、学士陈循等议皆合。太监兴安、金英言于太后：若去，陵寝将谁与守？怒叱徐珵，议遂定，中外军民始固志以守。

于谦主持运粮至京 有人建议焚通州仓以绝也先粮饷，正值应天巡抚周忱在京，言“仓米数百万，可充京军一年之饷，弃之可惜，不如令官军自取之。”于谦以为然，言于郕王，故令“京军及军士有能运粮至京者，官给予脚值。”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九日，以兵部侍郎于谦之议，移通州粮至京师，征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畿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守卫。于是京师始有粮备，人心稍安。

也先拥英宗进犯宣府大同 其初瓦剌首领也先拥英宗过宣府，传英宗之令命守将开启城门，城上有人回答说：我们所坚守的正是皇上的城池，天已黑，不敢开城门，况且该城守臣杨洪不在此地，拒不开门。当时罗亨信仗剑坐城下，严令众将士曰：出城者斩！也先知不可动摇，引兵而去。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二十一日，也先挟持英宗至大同城下索赂，守将都督佥事郭登闭门不纳。英宗遣人对郭登说：朕与郭登有姻亲，何至于如此拒我？郭登回答：臣

奉命守城，不敢擅自开启城门。也先索金甚急，袁彬以头撞门大呼，郭登令军卒以飞桥縋之入城。郭登与广宁伯刘安、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等出城拜谒英宗，伏地恸哭，以二万余两黄金及宋瑛、朱冕、太监郭敬之家资进献英宗，英宗悉给也先。又拥英宗而去。

诛杀王振党羽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二十三日，郕王朱祁钰摄朝，驾御午门左门。右都御史陈镒与诸大臣进言：王振倾危国家，陷皇帝于险地，请诛王振之族以安军民之心。郕王说：需待皇上旨意。百官伏地痛哭不起，进言：王振罪不容诛，殿下若不立即正典刑，灭其族类，我等今日皆死于此廷中。郕府长史仪铭以膝行前，王振之党羽锦衣卫指挥同知马顺叱退，户科给事中王竑愤起，与刑科给事中曹凯一道捽马顺之头发，啮其肉说：你过去助王振作恶，倚其擅作威福。今天事已至此，你竟还敢如此！与众人共击之，立毙。又寻找王振党羽毛、王二人，太监金英见事急，拽之出，众人亦击杀之，三具尸体陈于东安门。过一会儿，有人又执王振之侄王山至，反绑跪于廷，群臣争相唾骂。一时卫卒汹汹朝班大乱。郕王惊惧欲起，尚书于谦趋前扶王，请求郕王宣谕百官。郕王说：马顺等罪当死，他人之罪勿论。众人方渐渐平定。又命缚王山及王振族人，无论老少皆斩。籍其家，得金银六十库，玉盘数以百计，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其他各种珍玩无数。不久，太监郭敬、彭德清皆自大同逃归，朝廷一并籍其家，下狱长系。由于事起仓猝，赖于谦临乱镇定，王振党羽得以伏诛。既出左掖门，尚书王直对于谦说：国家正赖你这样的大才。于谦毅然以宗社安危自任。九月二十九日，录王振之罪榜示天下。

郕王即皇帝位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初一，英宗仍在沙漠。廷臣合请皇太后：英宗皇帝北狩，皇太子年纪尚幼。古人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速定大计，谋立新君以安天下。皇太后同意廷臣之议。郕王闻知惊让再三，避归郕王府，于谦等率群臣又请。正值都指使岳谦出使瓦剌部回京，口传英宗之旨，以郕王年长且贤明，令郕即继统以奉祭祀，郕王于是受命。九月初六日，郕王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遥尊英宗为太上皇。颁诏大赦天下，免除景泰二年田租十分之三。

胡仲伦建言战守之策 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云南提课盐举司吏目胡仲伦因事入京，上疏建言战守之策。他说：当前与瓦剌也先抗衡，有七事不可为，即降皇上万乘之尊，与敌人联姻；敌人假装和议，使我无备，和议之后，骄尊自大；敌人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待毙；敌人也送英宗还京为名，乘机驱入中原进犯；逼上皇英宗之手诏，诱取边城；索求阴山、贺兰山以北之大片土地。现在应严敕宣府、大同守将固守城池，整肃军伍，使敌不敢轻进。如果瓦剌首领也先送驾还京，则应令杨洪邀击其归路，而派石亨占领险要地势，等待英宗皇上的车驾一入关口，立即关闭城门。如此则战无不胜而太上皇得以还京。如果不战而和，则非良计。景帝纳其言。

张骥逝世 张骥(？—1449)，字仲德，陕西安化人。由乡荐授监察御史。张骥前往福建，辩冤明诬凡几千人。正统七年(1442)，以荐奉命署理大理寺事，不久又升任大理寺右寺丞。正统十年奉命招抚山东流民。所到之处，罢一切不急之务，蠲免饥民所欠税粮，凡有不便于民之事，即行革除。还朝升大理寺右少卿，又出京巡视山东、直隶、淮扬等处。正统十三年，镇压福建、浙江发生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太监李德、新宁伯谭忠镇守浙江。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奉诏回京，行至富阳得疾病逝。张骥性刚而有才，其廉洁慎谨之作风尤为时人称道。

也先大举入寇中原 瓦剌首领也先以郕王即位，不可再挟英宗要胁，于是集众会议。喜宁献计：请以送上皇为名，至明朝各边关威胁众将开启城门，召守城总兵官、镇守官出见上皇，乘机逮其将，攻其城。目前京师空虚，长驱直入，明朝廷必将南迁，瓦剌可据京城为大都。也先从其计，遂于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日挟英宗至大同，总兵官郭登闭门不出，也先知其防守严备，不敢攻城。初八日，也先从大同至阳和，攻陷白羊口，守将逃遁。次日也先抵紫荆关，喜宁引兵夹攻。守备都御史孙祥、都指挥韩青战死，紫荆关失陷，也先大军长驱东南，攻居庸关、易州等地。直逼京师。

于谦保卫北京 瓦剌首领也先挟英宗，大举入犯攻北京。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六日，京城告急，景帝亟诏各地诸王遣兵入卫京师，命兵部尚书于谦提督诸营，将士皆受其节制，都指挥使以下不听从命令者可以先斩后报。于谦认为，也先兵势大盛，不可示之以弱。于是分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列阵京城九门之外。于谦亲自与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等于德胜门设阵，以阻挡敌人前锋；都督陶瑾陈兵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坐阵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坐阵于朝阳门，都督杨节阵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同时九城城门尽闭，士卒于门外拒敌，绝其反顾之念。于谦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卒而先退者斩其将！军卒不顾将帅而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将士知必死，无不听命。初十日，朝廷诏令宣府、辽东总兵官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巡抚皆入援京师。十一日，也先大军逼近京城，列阵

到西直门。都督高礼、毛福寿大败敌军于彰义门北，杀敌数百人，夺回其所掠人口千余。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十二日，也先进一步索要金帛万万计。廷臣中有人欲议和，于谦说：今日只知有军旅战事，其他事不敢闻！也先见议和不成，便派兵四出窥掠。十三日，也先遣数骑来窥探德胜门，于谦令石亨于空民房中设伏，又派数名骑兵引诱。也先以万骑逼近，伏兵骤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副总兵范广亲自冲阵杀敌，士卒勇气百倍，遂败也先于城下。也先之弟孛罗卯那孩中炮死，死伤无数。也先军又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斩杀其前锋数人。城上守军发箭炮助战，也先军溃退，拥英宗北逃。京师之围遂解除。

输纳之例的制定 景泰初年，边事未靖而需饷甚急。景泰元年(1450)正月二十四日景帝下令：生员凡纳粟或上马者皆许入国子监；军民输纳，或米或粟或豆或草或鞍马者，也均授予冠带；朝廷以罪罢黜的官吏如输纳上述军饷，可以复职。此令初行之于宣府、大同，其后两畿及诸布政司、辽东等地皆行。有监生郭佑等上书朝廷，痛陈其弊，而未被采纳。不久，又开输豆予世袭之例，邢科给事中曹凯上书抗争：近例，输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挥使，他们受禄十余年，足以偿其所费，又令其世袭，这是以百姓膏血养无功之子孙，而他们则取息之时无穷。如此则有功的将领必曰“我以捐躯获此，他们以输豆也获此，朝廷以我躯命与荏菽一般看待”其谁不解体！请求朝廷自今始，惟令输纳者带俸，不得任事传袭，文职则只限于原籍带俸。景帝以为然，令未授世袭者悉如曹凯所议。

罗亨信致仕 罗亨信(1377- 1457)，字用贤，号乐素，广东东莞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改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出京巡视浙江水灾，奏请蠲免受灾三县之租。进吏科右给事中，坐累被谪至交趾为吏。居九年，仁宗嗣位，始召入朝为御史。核察通州粮储仓库，巡抚畿内，清军山西，所至之处有声望。英宗即位，擢为右佥都御史，练兵平凉、西宁。正统二年(1437)，蒋贵往讨阿台、朵儿只伯，亨信参与军务。弹劾蒋贵以刍饷不继，引兵逗留。次年大破敌军，亨信以参赞功，进秩一等。后改命巡抚宣府、大同。参将石亨请简大同民三分之一为军士，罗亨信奏请朝廷阻止。正统十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如故。土木之变，人情汹汹，有人倡议弃宣府城，致使官吏军民争相出城。亨信杖剑坐城下，严令“出城者斩。”又誓诸将为朝廷死守，人心始定。与朱谦共守宣府，劳绩甚著。景帝即位，进左副都御史。景泰元年(1450)正月致仕，天顺元年(1457)卒于家，年八十一。有《觉非集》。

禁止都人包揽钱粮 景泰元年(1450)正月二十五日，户部奏陈：根据旧制，民间钱粮，亲自送纳。其有包揽之人处以重刑，籍没其家。今在京官舍军民中多有无赖之徒赴京郊，设法引诱送纳之人，包揽代纳。粮则用土掺和，草则用水浇淋。易坚厚之布绢为纰薄稀松，钞贯之完好而抵以破碎软烂。及至官司选退，纳户畏其权势，不敢声张，以至出息偿官，所负愈重，钱粮不完。请严加处治。景帝准允，且敕都察院申明旧章，仍行五城兵马并水陆诸路巡检司严加巡视。遇有此等即擒赴官究治；送纳之人将粮草直接送至仓场交纳。若有屯放军民之家或容留屯放的，一体论罪。

沙窝之役 景泰元年(1450)闰正月初九日，瓦剌首领也先用喜宁计，进犯宁夏。不久，又骚扰大同，总兵官郭登迎击。当时也先已到沙窝，郭登召集部下问计，有人说：敌众我寡，莫若全军而还。郭登说：我军距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马疲倦。贼以铁骑来逼，即欲保全自己，也不可能，按剑而起厉声说：敢言退者斩！直攻贼营，奋勇击敌，诸将随后，呼声震山谷，于是大破其众，追奔四十余里。又败敌栲栳山，斩二百余级，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自土木之败，明边将不敢与敌接战。沙窝之役，郭登以八百人破敌数千骑，军心为之一振。朝廷因此擢封郭登为定襄伯。

悬赏格招陷敌军民 景泰元年(1450)二月初八日，朝廷从副都御史罗通之请，悬赏格招陷敌军民。规定：凡被陷人口，有能自还者，军免差役三年，民免徭役终身，官支全俸，各赏银一两，布二匹。有能杀贼一级者，军民人等俱予冠带，赏银五两，官升一级，仍赏银如上。若能杀也先，赏银五万两，金一万两，封国公、太师。杀巴延特穆尔及喜宁者，赏银二万两，金一千两，封侯。目的在于尽快平边养民。

增设南京卿贰官 景泰元年(1450)二月十三日，都察院左都御史陈镒奏陈：南京系形胜之地、根本之所。今时方多难，彼守备参赞等官，因循怠弛。乞请选能勇廉能之士往彼，训练兵马，镇抚人民。景帝下章礼部集议，因南京各衙门堂上官只一员，事难遍举。特令各增一员，共理庶务。遂推陈勉、谢琏、姚夔、覃浩、杜宁分别任南京右都御史、南京户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左侍郎、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兵部右侍郎。

喜宁伏诛 土木之变，太监喜宁降于也先，将中国虚实全部报告也先，为害甚多。而后又数出计策诱也先扰边，深为心腹之患。于是英宗言于也先，派遣喜宁及总旗高鋆等还京索礼物，同时又暗命袁彬以密书付高鋆，报宣府镇守官设计擒喜宁。景泰元年(1450)二月十七日，喜宁抵独石，宣府守将设伏野狐

岭，喜宁等至其地，伏兵四起，高鋆直前抱持，械送京师，法司诸臣杂治磔于市。英宗闻之大喜说：自此边境稍宁，吾南归有日。

卢睿致仕　卢睿(1390—1462)，字仲思，一字养政，浙江东阳人。永乐十九年(1431)进士，授监察御史，廉政明决，不为利害所惑。正统二年(1437)三月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大同。严法令，除积弊，节浮费，广储蓄，摧强扶弱，人赖以安。正统五年四月以事下狱。正统六年正月获释，参赞宁夏军务，四月代金为巡抚，不久还理院事。正统十一年四月再赴宁夏，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景泰元年(1450)二月二十三日致仕，天顺六年(1462)卒，年七十三。

录土木死事诸臣后官　景泰元年(1450)三月初七日，景帝下诏录土木死事诸臣后官。计有尚书王佐子道阳，邝埜子仪，俱为主事。侍郎曹鼐子恩，丁铉子琥，副都邓棨子璘，俱为评事。通政龚全安子廷晖，太常刘容子鉴，俱为部照磨。学士张益子翊，尚宝凌寿子晖，俱为序班。又有，钦天监正廖羲仲子景明为司历，太医院使钦谦子智为本院吏目等等，以优抚为国死难官员之后人。

黄萧养起义　明代正统、景泰年间发生的广东农民起义。黄萧养，广东南海人，曾因案下狱，领导狱囚数百人，设计越狱，发动起义。正统十四年(1449)率众十余万，船千余艘，围攻广州。称顺民天王(一作顺天王)，改元东阳，封部下为公、侯、伯、太傅、都督、指挥等官爵。义军攻广州有八月之久。景泰元年(1450)三月，佥都御史杨信民以巡抚坐镇，多方招抚，迫使义军攻势转缓。五月，都督同知董兴乘机调江西、两广兵镇压，用"狼兵"(广西溪峒士兵)进至大洲，杀死、溺死义军万余人。黄萧养中流矢牺牲，官军提首以献，并俘其父与子。余部退据大良堡，凭借倚山面海之地形与官军激战，失败后，余众仍在沿海坚持斗争。

杨信民之死　杨信民(？—1450)名诚，以字行，浙江新昌人。永乐时乡举入国学。宣德时，除工科给事中，后改刑科。正统中，清军江西，还奏民隐五事，为朝廷采纳施行。不久以王直荐，擢为广东左参议，一时以清名闻朝野。景帝监国，于谦荐信民守备白羊口。会黄萧养围广州久，官军每攻辄败。杨信民至广州，开城门，发仓廪，收买民心。信民益厉甲兵，多方招抚，降者日至。复又派使臣持檄会义军。黄萧养等一度为之心动，请与信民一见。会面之日，信民单车赴约，隔濠劝萧养投降。黄萧养送之大鱼，信民亦受之不疑，萧养等益为所感，义军军心动摇。这时都督董兴率大军至，黄萧养义军拒绝招安，继续斗争。景泰元年(1450)三月十一日，杨信民暴卒。成化中赐谥恭惠。

王英逝世　王英(1375—1450)，字时彦，号泉坡，江西金溪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庶吉士，读书文渊阁。成祖察英慎密，令其与王直书写机密文字。参与修撰《太祖实录》，授翰林院修撰，进侍读。永乐二十年(1422)扈从北征。仁宗即位，累进右春坊大学士。宣宗立，修《太宗仁宗实录》成，迁少詹事，赐麒麟带。正统元年(1436)，命侍经筵，总裁《宣宗实录》，进礼部侍郎。正统八年(1443)，命署理礼部事务。正统十三年(1448)，进南京礼部尚书。景泰元年(1450)五月逝世，年七十五。谥文安，后改谥文忠。王英端凝持重，历仕四朝。在翰林院四十余年，屡为会试考官，朝廷制作多出其手。有《泉坡集》。

英宗还京　景泰元年(1450)秋七月，瓦剌首领也先遣其知枢密院阿剌作书，派参政完者脱欢等五人至北京请和。尚书胡濙等奏奉迎英宗，景帝不允。于谦曰："皇上大位已定，谁敢有他议！善答也先使臣，是希望舒边患，加强边防。"景帝方始同意。景帝传旨以李实为礼部右侍郎，充正使，罗绮为大理寺少卿，充副使，马显授指挥使，为通事。临行，景帝分别遗书脱脱不花，也先和阿剌，李实遂偕完者脱欢起行。十七日，至也先营，见英宗。也先复命李实归，另遣大臣奉英宗还。右都御史杨善闻知慨然请行，于是景帝遣中书舍人赵荣、指挥王息与杨善出使。二十九日，杨善一行至也先大营。八月初二日引杨善见英宗。初七日，英宗车驾行，也先及诸将送行，伯颜帖木儿再送驾出野狐岭口。景帝遣太常少卿许彬奉迎。十五日，英宗还京，百官于安定门迎接。景帝迎拜英宗于东安门，各述授受意，逊让良久，乃送英宗至南宫，大赦天下。

侯琎逝世　侯琎(1397—1450)，字廷玉，山西泽州人。宣德二年(1427)进士，授行人。出使交趾，不受馈遗。还京授兵部主事。正统初年，进郎中。从王骥征麓川，麓川平，擢礼部右侍郎，参赞云南军务。王骥再征麓川，侯琎以功迁左侍郎，不久调任兵部。景泰初，镇压贵州苗民起义，进兵部尚书总督云南。景泰元年(1450)八月十四日卒于普定，年五十三。

苗衷致仕　苗衷(1381—1460)，字公彝，定远人。永乐七年(1409)进士，授编修，屡典文衔，与修《实录》。正统初年充经筵讲官，迁侍读。正统三年(1438)四月擢侍读学士。正统十年十月以兵部右侍讲兼学士入阁。景泰元年(1450)迁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同年八月二十八日致仕，天顺四年(1460)二月初七日卒，年八十。赠少保，谥文康。苗衷学术醇正，

为士林推重。有《雪窝稿》、《史阁记闻》、《归回录》。

魏骥致仕　魏骥(1374—1471),字仲房,号南斋,浙江萧山人。永乐年间以进士副榜授松江训导。常常在夜间持茗、粥慰劳诸生,诸生感奋,有成就者甚多。召修《永乐大典》,后升太常博士。

宣德初年,再迁为吏部考功员外郎,历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统三年(1438),召为行在吏部左侍郎。多次奉命巡视畿甸蝗灾,问民疾苦。正统八年改礼部,再改任南京吏部。十四年进尚书。土木之变,魏骥率诸司条上时务,多被采纳。景泰元年(1450)九月二十三日,以老致仕家居,忧国忧民,老而弥笃。成化七年(1471)八月卒,年九十八。谥文靖。有《南斋择稿》。

陈敬宗致仕　陈敬宗(1376—1459),字光世,号澹然居士,慈溪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庶吉士,进学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书成,授刑部主事。又与修《五经四书大全》,再修《太祖实录》,授翰林侍讲。宣德元年(1426)参与修两朝实录。明年转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宣德九年,迁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容仪端整,步履有定则,力以师道自任。立教条,革陋习。满考入京,王振欲见,敬宗说:吾为诸生师表,而私谒中贵,何以对诸生?景泰元年(1450)九月致仕。家居不轻出。天顺三年(1459)五月卒,年八十三。后赠礼部侍郎,谥文定。陈敬宗与李时勉初同在翰林,后又同时为两京祭酒。时勉平恕得士,敬宗方严。有明一代以祭酒为人称贤者,曰南陈北李。有《澹然集》。

李贤疏陈政本　景泰二年(1451)二月初八日,吏部主事李贤疏陈政本十策:勤政学,顾箴警,戒嗜欲,绝玩好,慎举措,崇节俭,畏天变,勉贵近,振士风,结民心。景帝嘉纳,令录示左右。礼部尚书杨宁说:读崇节俭一事,潸然泪下。后李贤又陈车战火器之利,亦被采纳。

朱谦逝世　朱谦(?—1451),河南夏邑县人。永乐初袭职任凤阳留守左卫指挥佥事。洪熙元年(1425),随阳武侯薛禄北征蒙古,有功,升指挥使调贵州兴隆卫。宣德元年(1426)复从北征,以功升万全都司都指挥佥事。正统初升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使。不久,充任右参将,守备万全。奉命率所部精骑巡边,大败兀良哈,升后军都督佥事。正统十四年(1449),以北征之功升都督同知,进右都督。也先大举入寇,朱谦与昌平伯杨洪皆领兵入援。后升左都督,佩镇朔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宣府。景泰元年(1450),也先入寇宣府逼近洋河桥南校场,朱谦出兵击退,以功封抚守伯。景泰二年(1451)二月二十八日卒,追封抚宁侯,谥武襄。

再度僧道　朝廷原定僧道三年一度。景帝即位,特诏停止。景泰二年(1451)正月,太监兴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万余人。兵部尚书于谦奏陈: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边又缺战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本末倒置。景泰不听。至同年十一月,讹传明年度僧道。于是僧道赴京达数万人。兵科给事中郑林乞请尽行逐还。景泰才从其议,将赴京僧道全部遣回原籍。

严禁军职受讼　景泰二年(1451)四月初三日,监察御史全智奏陈:各处镇守军职滥受词讼,得贿者泯之不行,不得贿者转发送问,屡兴庶狱,荼毒军民。乞请通行禁约。景帝纳其言,下令严禁各镇军职受理词讼,只许操练军士御寇,毋蹈前非,违者严治其罪。

禁勋戚货买侵利　因京城官店塌房多为贵戚近侍所有,兵科都给事中叶盛等于景泰二年(1451)四月十一日奏陈:贵近勋戚,高爵厚禄,而又侵利于国,贻害于民。乞将在京官店塌房尽数勘实,籍记在官,按季收钞,以资军饷。景帝批准施行。

叶盛奏陈弭灾防患　景泰二年(1451)六月十七日,兵科都给事中叶盛奏陈弭灾防患八事:户部于畿内、山西征役,遵诏停止,减省冗费;分守边关,量赏银、布;京卫军匠于监局造军器战车外,余送操练;法司议条例,分行南京各省清狱;京南捕盗;旌阵亡将士,遍访死节赠恤;谪官之中查例复官;辨别盗贼胁从,或远配,或戍边,庶不枉滥。景帝得奏,除赏赐、军匠条外,全部命有司施行。

章纶奏陈太平十六策　景泰二年(1451)七月十七日,礼部郎中章纶奏陈太平十六策:躬揽乾纲,缉兴圣学,面议大政,为政得人,肃正朝纲,广开言路,敬畏天戒,精慎选举,严明考核,守备边境,征讨不庭,禁止罪犯,官吏养廉,作成人才,端本风化,馈运救荒。景帝嘉纳。

周忱致仕　周忱(1381—1453),字恂如,号双岩,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为庶吉士,进学文渊阁。擢为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永乐二十二年(1424)任越府右长史。宣德五年(1430)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总督税粮。创"平米法"。宣德七年,奏立"济农仓"。宣宗嘉奖。又整顿漕运,进工部左侍郎。正统初年,奉命前往淮扬巡视,兼理松江盐课,仿济农仓法,置"赡盐仓"。朝廷委任益专。两遭亲丧,皆起复视事。周忱亦更加施展才华,见利害必言,言无不听。诸所建明,皆著为令。宣德九年,进户部尚书,又改工部,仍兼江南巡抚。景泰二年(1451)八月二十七日致仕。景帝命李敏代,命其不要轻易变更周忱之法。景泰四年(1453)十月卒,年七十三。谥文襄。有

《双岩集》。

杨洪逝世 杨洪(1381—1451),字宗道,六合人。初袭汉中百户,奉调开平,以功迁都指挥。正统初,以都督守独石,败虏于宣府大石门宝昌州,捕阿台打不花,斩首二百余,封昌平伯,充总兵官镇守宣府。土木之变后,击虏于都门涿州、紫荆关,追至固安,获阿归等四十八人,斩四百八余,俘掠以万计,得马牛弓刀数万,进昌平侯。久镇宣府,号令严肃,士马精强,诸部畏惮,人称杨王。又不擅专杀。颇好文学,请立宣府儒学。景泰二年(1451)九月十三日卒,年七十一。追封颍国公,谥武襄。

禁诸司毋得援夺情例起复 明代文臣夺情起复,自杨荣、杨溥、蹇义、夏元吉开其端,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已成故事,而当时言官中却无一人能言其非者。于是正统以后,遂有京官营求夺情,而在外方面以下等官,往往一有部民耆老诣阙请留,动辄起复还任。景泰二年(1451)九月二十日,吏科给事中毛王、礼部郎中章纶疏言:三年之丧,古今通制。向者朝廷因各边未宁,暂行夺情之典,所留者,都是股肱辅弼之大臣或边防之要臣。近来,各处官司相习成风,或司府副职,或州县幕司,甚至办事官吏一闻亲丧,立即保举夺情。前项官吏素非执政之臣,轻引夺情之例保留,请敕令内外官员,使之敦廉耻之节,以消奔竞之风。景帝于是诏禁诸司起复。

朱徽煣朱徽焟谋反 徽煣、徽焟是岷庄王朱楩(朱元璋第十八子)之世子。景泰元年(1450),朱楩逝世,其次子徽煣嗣位。广通王徽煣有勇力,其家人段友洪以善奇技得宠。后军都事于利宾言徽煣有异相,当为天下之主,于是徽煣谋乱。作伪敕,分遣段友洪与蒙能、陈添行前往苗族地区,用银印、金币诱诸苗,使之发兵攻武冈。苗族首领杨文伯等不敢听其遣。事发,段友洪为徽煣所逮。都御史李实报告朝廷,景帝遣驸马都尉焦敬、中官李琮征召徽煣入京师。湖广总督王来、总兵官梁珤又尽发阳宗王徽焟谋反之罪,同时召徽焟入京。景泰二年(1451)十月令除二人爵,幽禁于高墙之中,十二月,以谋逆之罪废为庶人。其时蒙能方率苗兵至武冈,闻事败,遂举义旗入广西领导苗民起义。

储懋逝世 储懋(1393—1452),字世绩,号澹庵,镇江人。永乐十二年(1414)举人,授吏科给事中。正统初以文学充经筵官,转翰林修撰,与修《实录》,进侍讲。正统十年(1445)十月迁户部右侍郎。正统十四年二月出督福建粮饷。十二月初五日调任礼部右侍郎。景泰二年(1415)十二月初七日进南京户部尚书,时已病不能起,于十八日卒,年六十。

也先杀脱脱不花 瓦剌首领也先与脱脱不花名为君臣,而徒有其名。脱脱不花之妻系也先之姊,也先欲立其姊之子为太子,脱脱不花不从。也先素疑脱脱不花私通明朝,于己不利,故于景泰二年(1451)十二月以兵攻击。不花败走,也先追杀,执其妻子。乘胜胁迫诸部,东至建州,兀良哈,西及赤斤、哈密。

诏命锦衣官专司侦访 正统末年,太监王振乱政。王振党羽马顺既诛,廷臣极言官校缉事之弊,景帝曾采纳,并切责官校首领,命其将所缉人犯悉送交法司察办,官校势焰稍稍收敛。景泰三年(1452)三月十一日,景帝又欲暗察外事,乃命锦衣卫指挥同知毕旺专司侦访。告谕道:今后凡是谋逆反叛,妖言惑众,窥伺朝廷事情,交通王府外夷,窝藏奸盗及各仓场库务虚买实收关单,官吏受财卖法,有显迹重情,方许指实奏闻,点差御史覆核属实,方许执讯。其余事情止许受害之人告发,不许挟仇受嘱,诬害良善,等等。从此,锦衣卫官校又渐用事。

周叙逝世 周叙(1392—1452)字功叙,一作公叙,号石溪,江西吉水人。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选庶吉士。作《黄鹦鹉赋》,甚合成祖之意,授编修。历官侍读,直经筵。正统八年(1443)夏又上言时政,切中时弊。英宗以此章示诸大臣,吏部尚书王直等皆引罪求罢。正统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迁为南京侍讲学士。土木之变,郕王监国,驰疏建言: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殿下宜卧薪尝胆,如越之报吴。使智者献谋,勇者效力,务扫北庭,雪国耻。宜先遣善辩之士,以卑词重币乞还英宗,暂为君父而一时委屈。又条上励刚明、亲经史、修军政、选贤才、安民心、广言路、谨微渐、修庶政等八事。郕王嘉纳。景泰二年(1451)又复上书请复午朝,日接大臣等等,帝因其奏而下诏求直言。叙负气节,笃行谊。曾请继其祖制,重修宋、辽、金三史。诏许自撰,铨次多年,未及修成而于三年三月卒,年六十一。有《石溪文集》。

景帝易储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二十二日,皇太后以土木之变,人心动摇乃令立英宗子朱见浚为皇太子,改名见深。景帝即位后,欲易皇太子,而以己子朱见济取而代之,难于启齿。至景泰三年(1452)四月二十日,广西思明土知府黄㺹致仕,子钧嗣职。其庶兄都指挥黄玹以私怨戕杀黄㺹,并灭其全家,巡抚李棠报告朝廷,有司捕黄玹父子下狱。黄玹大惊,亟遣其党羽千户袁洪至京师行贿,有人教之上书迎合圣意,乃首倡易储之议。黄玹疏称:往年上皇轻身御敌,驾陷北塞,敌人进犯都门,几乎危及社稷,不有皇上,臣民将何归?今已过二年,皇储未建。臣以为,人心易摇,多言难定,争夺之态一萌,则

祸乱不息。皇上即循逊让之美,欲全天叙之伦,恐怕事机叵测,反复无常。万一羽翼养成,权势转移,委爱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宝,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杀,那时则悔之晚矣。乞皇上与亲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计,以统一中外臣民之心,绝觊觎之望。景帝大喜说:万里之外,乃有如此忠臣!于是命礼部尚书胡濙召集群臣会议,且释黄玹之罪。群臣相顾不敢言,惟都给事中李侃、林聪、御史陈英以为不可。太监兴安命群臣署名表示赞同,胡濙、王文、陈循、王直等俱署名,易储之议乃定。二十一日,简置东宫官,悉以文武廷臣兼任。于是王直、胡濙俱为太子太师,陈循、高谷、于谦俱为太子太傅,进仪铭兵部尚书,与俞士悦、王翱、何文渊俱为太子太保,萧镃、王一宁太子少师,商辂以兵部尚书兼右春坊大学士。五月初二日,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见太子,赏诸亲王、公主及边镇文武内外群臣。接着又废皇后汪氏,立太子母杭氏为皇后。在景帝易储中,汪后持异议,曾说:既要立太子,与监国之号相称么?景帝不悦。至此以太子为杭氏所生,请让位,汪氏即默然依从。

巡抚罢而复设　景泰三年(1452)六月十四日,户部奏:各处巡抚侍郎、都御史等官每年八月回京议事。而目前各处贼寇未宁,逃移者尚多。请移文湖广、两广、河南、辽东等一律留该地巡抚,应议之事皆疏陈朝廷,景帝准其议。由于巡抚以职兼兵事,多不便于武官,七月石亨等奏请罢度。于是,景帝于同年八月初八日诏山东巡抚洪英、浙江巡抚孙原贞、福建巡抚薛希琏等各地巡抚官分行天下,考察官理。改巡抚为分行天下,考学官吏,标明巡抚之罢。十二月二十三日,洪英改抚浙江,孙原贞改抚福建,薛希琏改抚山东。标明巡抚官的复设。景泰四年九月,陕西布政使许资奏称:侍郎镇守,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行事矛盾,人难遵守,况文移往来,亦多窒碍。乞将九畴改授宪职,以便于行事。同月三十日,景泰定自后大臣镇守巡抚,皆授都御史衔(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耿九畴亦升右都御史。

王一宁逝世　王一宁(1397—1452),名唐,以字行,改字文通,号节斋,浙江仙居人。十三岁能诗文。其父峻用任国子监丞,一宁从侍。当时仁宗在春宫,以其善抚琴召见,命赋《早过银河诗》,仁宗称善,命就国子监读书。永乐十六年(1418)中进士,授吏部稽勋主事,于文华殿供事。改翰林修撰,与修《宣宗实录》,进翰林院侍讲,两次被选为京察考官。正统十三年(1448),迁礼部右侍郎。景泰初,奉敕前往湖广督理军饷。还升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并入内阁参预机务。一宁与太监王诚等过从甚密。景泰三年(1452),景帝易储,进太子少师,仍兼旧职。秋七月初九日卒于官,年五十六。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谥文通。

王瑶伏诛　景泰三年(1452)秋七月,御用少监阮浪于南宫服侍英宗,英宗赐阮浪镀金绣袋及镀金刀各一,阮浪赠给了太监王瑶。锦衣卫指挥卢忠阴险,见王瑶之刀、袋非同寻常,便将王瑶灌醉窃取。又令校尉李善告变,声言:阮浪传上皇命,以刀、袋交结王瑶,谋复位。景帝大怒,将阮浪、王瑶下诏狱,令卢忠出证。卢忠大惧,佯狂以期免罪。内阁大学士商辂与中官王诚对景帝说:卢忠有疯病,其言不足信。不宜听信妄言而伤大伦。景帝乃下卢忠于狱,谪戍广西,王瑶、阮浪被诛。

华敏极陈宦官之害　景泰三年(1452)九月初一日,南京军匠余丁华敏上言:近年以来,内官袁琦、唐受、喜宁、王振,专权害政,以致国事倾危。望陛下防微杜渐,总揽权纲,为子孙万世所效法。不然,恐祸起萧墙,曹节、侯览之害将又在今日出现。臣才识浅陋,谨以虐政害民十事,为陛下痛切言之:内官家积金银珠玉,动以万计,原其所至,非盗取官内府藏,即搜刮民间百姓之膏脂,为害一也;内官怙势矜宠,占公侯邸舍,兴作工役,劳扰军民,害二也;其家人外亲,皆市井无赖,纵横豪悍,任意作奸,纳粟补官,贵贱混淆,为害三也;内官建造佛寺,耗费运资,营一己之私,破万家之产,为害四也;广置田庄,不入税粮,寄户府县,不受征徭,宦官之田阡陌联亘而民无立锥之地,害五也;家人中盐,虚占引数,转售他人,得倍支巨万,其坏国家之法,夺商人之利,害六也;内官奏求塌房,邀接商旅,倚势赊货,恃强不偿,行商受害,不敢如何,害七也;内官卖放军匠,俾办月钱,致使内府之人,工役繁重,并力不足,害八也;其家人贸置物料,地方有司畏其权势,以一科十,亏官损民,害九也;内官监作所至,动施非法酷刑,军匠涂炭,愁苦不堪,害十也。事下礼部,未被采纳。另有山西都司令史贾斌,亦疏言宦官之害,引汉桓帝、唐文宗、宋徽、钦为戒。辑《忠义集》四卷,采史传所记直谏、尽忠、守节之士,而附采宦官恃宠害政者为鉴戒者。景帝仍饬礼部不必刊行。

申严京师盗禁　因京师内外盗贼蜂起,景帝于景泰三年(1452)十一月十四日下诏:擒获者不分首从,俱处以死;能自首或自陈同盗者免罪,仍给以不自首者家赀之半。

石璞建言弭盗之策　景泰三年(1452)十一月二十八日,工部尚书石璞建言弭盗之策:邦畿千里,

万国瞻依，礼乐刑政，皆由此出，可今盗贼窃发，披甲戴兵，明火劫掠。近闻所获盗贼，俱言谁不惧死？只因粮赏不得全关，妻子饥饿难忍。复审口外边军，夜行日伏，侦探敌情，而其月粮亦行减去，致使生计窘迫。由此激起盗端，实非险道。与减士饷，宁捐臣俸。又闻山东、河南、两畿，今年多水，小民缺食，盗贼潜起，福建、浙江蔓延可畏。乞敕吏、兵工部省冗滥，去蚕食。其文武官俸六品以下如旧关支，五品以上斟酌减支，量添军储；被灾郡县，蠲其徭役，暂停一应军需，遣一二大臣巡视赈济。疏下廷议，景泰诏令：官俸如旧。若有冗员，酌繁简量加裁省。

设立团营 京军共有三大营，自英宗北还之后，于谦认为和议终不可恃，必求自强之法。考虑营政久驰，三大营虽各有总兵，不相统一，一有边警，临期调拔，兵将平日互相不熟习，猝遇敌军，将士彼此不知，甚至姓名不记。于是，于谦选三大营军十万人，分为五营团操，名为"团营法"。以五十人为队，队有长，百人为两队。有领队官，千人有把总，五千人有都指挥。体统相维，兵将相识，可以量敌多寡而相机调整。行之一年，又请增兵五万，并前五营为十团营。每营置都督一人，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每队置营队官二人。仍各由武臣、内臣往来提督。其余军不在团营者，归本营训练，以卫护京师，名曰"老营"。景泰三年(1452)十二月初五日，营制既定，于谦绘图呈进，悉依古法而变通之，京军旧制为之一变。景帝下诏由于谦、石亨及太监刘永诚、曹吉祥提督团营。于谦号令明审，目视，指屈，口奏，悉合机宜。石亨虽为大将，亦只受成而已。

朱鉴致仕 朱鉴(1391—1478)，字用明，福建晋江人，永乐十五年(1417)举人，授蒲圻教谕，迁监察御史，巡按湖广、广东、禁奸戢暴，所至肃然。正统中升山东左参政。土木之变，奉命勒兵勤王，以遏南侵。正统十四(1449)八月，以山西右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保障雁门要害，前后奏疏数十封，皆言边防大计。景泰三年(1452)十月召还理院事，十二月初二日致仕归。成化十四年(1478)七月十六日卒，年八十八。

赵新逝世 赵新(？—1452)，字日新，浙江富阳人，永乐三年(1405)举人，业于国学。参与修《永乐大典》，授工部主事迁郎中。宣德五年(1430)九月迁吏部右侍巡抚江西。讨平蛮寇，兼督税粮，察吏治，询民瘼，一方仰赖。正统四年(1439)九月暂罢江西巡抚，召还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正统十四年四月巡抚山东及凤阳等四府，八月迁吏部尚书仍任。后致仕家居。景泰三年(1452)十二月卒。

杨翥致仕 杨翥(1368—1453)，字仲举，江苏吴县人。少孤贫，随兄授武昌，授徒自给。早年与杨士奇有交。杨士奇入仕后，荐翥经明行修。宣宗诏试吏部，称旨，授翰林院检讨，历修撰。正统中，命其为郕王府僚，为左长史。久之，以年高引归。郕王即大位，召翥入朝，拜其为礼部右侍郎。景泰三年(1452)，进礼部尚书，给禄致仕。景泰四年(1453)十一月卒，年八十五。翥一生笃行绝俗，以厚德为人称颂。

左鼎疏言冗官之弊 景泰四年(1453)三月初一日，山西巡按御史左鼎言：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暂许有罪者赎，盖为权宜之计。乃法吏拘牵，沿为成例，官吏受枉法财，悉得减赎。国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设。主事每司二人，今增至十人。御史六十人，今则百余人，甚至一部有两尚书，侍郎亦为常额之倍，都御史以数十计，此京官之冗滥。外则增设抚民、管屯官。如河南参议，增二为四，佥事益三而为七，此外官之冗滥。天下布、按二司各十余人，乃每年遣御史巡视，又遣大臣巡抚镇守。今之巡抚镇守，也即为方面御史之襄助。其为方面御史，则合众人之长而不足；为巡抚镇守，则任一人之智而有余。有这种道理吗？至于御史迁转太骤，则宜以六年为率。令其通达政事，然后才可治人。巡按所系尤为重大，不要使初任之官，漫然尝试。其余百任事之人，皆应慎择而任用。景帝嘉纳其言。

徐琦逝世 徐琦(1385—1453)，字良玉，先世浙江钱塘人，其祖谪戍宁夏，遂家在宁夏。永乐十三年(1415)举进士。授行人，历官兵部员外郎。明敏善断，居官能持大体。宣德六年(1431)擢右通政，出使安南，不受馈赠。还进南京兵部右侍郎。宣德八年，宣宗以安南贡赋不如额，南征士卒未尽返，命徐琦再次出使安南。琦对安南王黎麟晓以祸福，麟惧，铸代身金人，贡方物以谢罪。宣宗大悦，命取消徐琦戍籍，宴赉甚厚。正统初，考察南畿有司，黜不法者三十人。正统五年(1440)参赞南京机务。正统十四年进尚书，参赞如故。请天下卫所视府州县例皆建立学校，朝廷依其言而行。景泰元年(1450)专理兵部事。后复兼参赞。景泰四年(1453)三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八。谥贞襄。

大隆福寺成 太监兴安自金英得罪被废后，益加专权用事，佞佛甚于太监王振。请景帝别建大隆福寺，费银数十万。景泰四年(1453)三月二十六日，大隆福寺成，景帝命克期临幸。河东盐运判官杨浩切谏：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学，海内之士，闻风景仰。现在又弃儒术而崇佛教，非垂范后世之法。郎中章纶亦上言：佛者，夷狄之法，非圣人之道。皇上若以万乘

之尊,临幸非圣之地,史官书之,传之万世,实有损圣德。景帝乃止。自从王振佞佛,每年一度僧,大作佛事,数年以来,京城内外,建寺二百余区,因此佛教日炽。景帝即位以来,廷臣谏事佛者甚众,景帝终不能尽从。

也先称汗 景泰四年(1453)八月,也先自立为可汗,以其次子为太师。十月十五日,也先遣使贡马致书,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天圣之意也。书末署"添元"元年。书称:往者元朝受天命成为夷夏之主,今我已得其位,拥有其国土和人民,并得传国玉玺,敬请遣使修好。景帝诏命廷臣商议报书所称,于十二月十九日决定从蒙古之习俗,称也先为"瓦剌可汗"。

生员纳米可入国子监 景泰四年(1453)四月二十二日,礼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邹干等奏:临清县学生员伍铭等愿纳米八百石,乞入监读书。今山东等处正缺粮储,乞允其请,以济仓储,为权宜之计。景帝允准。并诏令全国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学生员,有能出米八百石至徐州、东昌、临清以振灾民者,许入国子监读书。后减五百石,又减至三百石。礼部尚书胡濙等言权宜之制,有伤士风。不久遂罢。至此,纳粟之例开,虽不久废止,但以后或遇岁荒,或遇边警,或大兴土木,动辄援引前例行之。军民子弟,亦得援生员例入监,谓之"民生",亦谓之"俊秀",有人竟称之"例监",而监生的社会地位亦渐轻矣。

洪英放归 洪英(? —1458),字实夫,福建怀安人,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选庶吉士,擢礼部主事,改任吏部,迁郎中,累迁至山东布政使。正统十四年(1449)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东,督役夫筑临清城、运河堤。景泰三年(1452)十二月以右都御史改抚浙江。景泰四年六月召还,八月以前考察官吏有私,被劾下狱,不久放归。天顺二年十一月卒。有《澹成集》。

陈镒致仕 陈镒(1389—1456),字有戒,号柏轩,江苏吴县人。永乐十年进士,授御史,迁湖广副使,改山东、浙江,皆有政绩。英宗即位后三月,即擢右副都御史镇守陕西。正统六年(1441)春,英宗以陈镒久劳于外,命与王翱每岁一更代。正统七年,王翱调辽东,陈镒复出镇。岁满当换,而陈镒以陕人乞留,仍留旧任。正统九年春升右都御史,镇守如故。不久,奉命与靖远伯王骥巡视甘肃、宁夏、延绥边务。土木之变后,景帝监国,镒与大臣廷论王振之罪。于是王振之侄王山得以伏诛。也先将入犯,陈镒以于谦荐,出抚畿内。事宁召还,进左都御史。景泰二年(1451),陕西大饥,陈镒以陕民之请,复出镇陕,先后十余年,深得军民心,为前后出陕者所莫及。景泰三年(1452)春召还,加太子太保,掌都察院事。四年(1453)九月初二日以疾致仕,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八。赠太保,谥僖敏。有《介庵集》。

王恂逝世 王恂(? —1453),字用诚,初名振,改今名,湖广公安人。宣德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正统四年(1439)除翰林检讨,与修《宣宗实录》。十三年开修撰。正统十四年升大理寺右寺丞,巡抚贵州。景泰三年(1452)改右春坊右庶子,管国子监司业事。景泰四年(1453),升任国子监祭酒,九月,得风疾卒于官。

陈勉逝世 陈勉(? —1453),字希进,江西于都人。永乐四年(1406)进士,任广东道监察御史,升广东按察副使,召还进左副都御史,宣德十年(1435)七月大理寺卿。景泰元年(1450)二月迁南京右都御史平反狱讼,多所建白,时论称之。其外和内刚,通法律,多吏能,临事敏捷,不负其职。二年二月致仕。四年十二月七日卒。

倭使不法 景泰四年(1453),日本国入朝进贡,至临清,掠居民财货,有明官指挥前往诘责,被殴几死。有司请朝廷执治其使,景帝恐失远人之心,不许。其时倭人除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礼部官员上言:"宣德年间,凡使臣所携私物,俱按时价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不多,却已大获利。今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应大减其值。"景帝令给银三万四千七百有奇,使臣不悦。诏增钱一万,犹以为少,并求增赐他物。景帝又下诏增布帛一千五百匹,日本使臣才怏怏而去。

严禁快船挟货 景泰五年(1454)正月初七日,总漕左副都御史王竑奏陈:原定南京马快船不许附带私货及往来人等。近来公差官员往往私乘,又挟带私货以行。乞通行等约,违者治罪。其掌船官吏妄自应付者,一律治罪。景帝令都察院集议,出榜晓谕。

金濂逝世 金濂(1392—1454),字宗瀚,淮安人。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授御史。宣德初,巡按广东,以廉能称著。迁陕西副使。正统三年(1438)进佥都御史,参赞宁夏军务。濂有心计,善筹画,西陲因其治理而安宁。正统八年秋拜刑部尚书,侍经筵。正统十三年十一月,参与镇压邓茂七领导的矿民起义,以计擒邓伯孙。土木之变后,改任户部尚书,进太子太保。景泰五年(1454)二月二十日卒于官,年六十三。以军功追封沭阳伯,谥荣襄。金濂刚果有才,是有明中期的治世能臣,所至以严办著称。

礼部会试复分南北卷 景帝曾诏命会试遵永乐年间旧例,不限额,不分地区。景泰二年(1451)会试,礼部方奉行,而给事中李侃抗争,以为不可,认

为：部臣欲专以文词多取南方人。刑部侍郎罗绮亦以为言。礼部覆奏："臣等所奉诏书，非从私请。"景帝命遵诏书，不从李侃等议。景泰四年(1453)，给事中徐廷璋又请依正统间例会试，景帝允准。于是，景泰五年二月礼部奏请裁定，又分南、北、中卷。南卷包括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地；北卷顺天、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从此遂著为令。

林聪建言时政　景泰五年(1454)，三月十四日，给事中林聪以灾异偕同官条上时政八事，杂引五行诸书，累计数千言。他说：绝玩好，谨嗜欲为崇德之本，而修人事在于进贤退奸。武清侯石亨、指挥郑伦，身享厚禄，而又多次奏求田地，百户唐兴之田多至一千二百余顷，宜为限制。其余所言"罢斋醮，汰僧道、慎刑狱，禁私役军士，省输班工匠"等等，皆切中时弊，景帝多采纳。

四川黄龙起义　景泰五年(1454)三月，四川黄龙、韦保举众起义，黄龙、韦保自称平天大王，据山寨、掠番州，都总兵黄定千据水坪大寨，四出攻掠。贵州提督军务右佥都御史蒋琳、总兵官都督方瑛，会四川兵前往征剿。同年四月初十日擒韦保等，斩七千九百余，获二百三十余人，械送京师、起义失败。

缅甸执麓川思机发送京师　当初，缅甸人得思机发，仍挟之以为奇货可居。景泰元年(1450)，总兵官沐璘奏请缓征，听其自献为便，景帝从之。景泰五年(1454)四月，缅人索旧地，左参将胡志等许以银戛等处地方与之，三十日缅甸乃送思机发及其妻孥六人至金沙江。总兵毛胜报告朝廷。不久朝廷遣胡志等将思机发等槛送至京，伏诛。

钟同章纶疏请复储　景泰四年(1453)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去世。中外臣工寄望沂王朱见深，欲乘此机会恢复东宫，却无人敢言。御史钟同与礼部郎中章纶相约疏请复储。景泰五年(1454)五月十四日，钟同上疏论时政，兼及复储事。二天后，章纶亦抗疏陈言修德弭灾十四事。他说：孝悌者百行之本，愿陛下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上皇传位陛下，是以天下让；陛下奉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陛下与上皇虽殊形体，实同一人。请还沂王于储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则和气充盈，灾沴自弭。景帝大怒，下二人于锦衣卫狱禁锢。

湖广衡州府大疫　景泰五年(1454)六月，湖广衡州府奏：去冬至今春，雨雪连绵，兼以疫疠，本府所属一州八县，百姓死一万八千余人，冻死牛三万六千余支。

仪铭逝世　仪铭(1382—1454)，字子新，山东高密人。仪智之子。以父荫授给事中，升翰林院修撰，与修《宣宗实录》，升翰林院侍讲。正统五年(1440)升为郕府左长史，持正不阿，有承奉抗王仪，仪铭即日劾奏，朝廷责承奉。景泰初，仪铭以潜邸旧恩升礼部左侍郎，力赞征伐诸大事。次年升南京礼部尚书。景泰三年(1452)，升太子太保兼兵部尚书，仍兼掌詹事府。曾因灾异言消弭在敬天法祖，省刑薄敛，节用爱人，录《皇明祖训录》进于景帝，以致警发之意，深为景帝嘉纳。景泰五年(1454)七月十七日卒，年七十三，赠太师，谥忠襄。仪铭少时学于吴讷。天性孝友，有君子之风。

减两京课钞　当时钞法不行，朝廷令北京、南京市肆园场税悉纳钞，户部按月征收，商民以为不便，有人闭户不敢去市场交易，拔去园中蔬菜，伐果树以避税。给事中陈嘉献言：两京为国朝根本重地，不宜当岁歉之时，兴扰民之政。纵使钞法通行，而百姓已经民不聊生矣。景泰五年(1454)八月，景帝乃下诏令蔬果等暂免纳钞。

陈琏逝世　陈琏(1370—1454)，字廷器，号琴轩，广东东莞人。洪武初年由贡士教授桂林。秩满，进国子监助教。永乐初擢为许州知州，寻改滁州，政绩颇著。成祖北巡闻其治行，进守扬州，掌领滁州如故。九年后，进四川按察使，又改任南京通政使，署理国子监事。正统初，任南京礼部左侍郎。又五年致仕。陈琏孝友和厚，博通经史，以文学知名。景泰五年(1454)十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五。有《琴轩集》、《罗浮志》。

知院阿喇杀也先　瓦剌首领也先自立为可汗，恃其强，日益骄恣，沉湎于酒色。景泰五年(1454)知院阿喇以为自己当迁太师，求于也先说：主人穿新衣，希望您能以旧衣赐臣。也先不许，阿喇怀恨。也先亦素忌阿喇，欲讨灭之，恐不胜，于是亲遣自己的两个儿子守西番，召阿喇二子随从，先鸩杀其次子。阿喇大惊，诈言兀良哈三卫盗马，请召还其长子合击。也先先派赛刊、大同二王于途中鸩杀阿喇长子。阿喇怒甚，给二王前渡，自己在后，勒其部落兵三万攻击也先，数其三罪并说：汉儿血在汝身上，脱脱不花血在汝身上，兀良哈血亦在汝身上。天道好还，血在我矣。也先无以应，约明日交战。退而与巴颜铁木儿商议。也先帐中有阿喇旧部曲三人，久侍也先，也先从不怀疑，这时三人共同趋入帐中，拔佩剑刺杀也先，并杀巴颜等。赛刊王闻变，领七千人跟来。知也先死，弃众而去，为其部下所杀。大同王领其人马西奔。一

年后，鞑靼部首领孛来又杀阿喇，夺也先母妻及其玉玺，访求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立之为汗，号称“小王子。”从此也先诸子分散，瓦剌部渐衰；而孛来及其属下毛里孩等雄视部中，鞑靼之势力又振兴起来。

申严监司送迎之禁 景泰六年(1455)二月二十二日，吏科都给事中奏陈：各地巡抚、镇守等官及地方三司长官，按治所属，往往恣意妄为，凡出入必要官吏迎送，或三五十里，远至百里。凡有咨禀，务行跪礼。间有稍持正之士，便被生事嗔辱。以考试生员为尽职，以赓赋诗词为有才，其军民利病曾不询及。乞申明《大明律》及宪纲严加禁约。景帝说：《大明律》及宪纲有载，为何不予遵守。令礼部、都察院立即申明，若有不遵宪纲，治罪不贷。

革罢江北粮长 景泰六年(1455)三月十一日，景帝根据巡抚淮安等处左副都御史王竑奏陈，鉴于江北直隶扬州等府县粮长科害小民，依湖广之例，将江北粮长尽数革罢。其赋役粮草令官吏、里甲催办。

西安、平凉及常州等府瘟疫 景泰六年(1455)四月，陕西巡抚曹景奏：西安、平凉等府，自正月以来不雨，四月雪霜，瘟疫死者二千人。常州、镇江、松江革府瘟疫死者七万七千余人。

徐有贞治沙湾功成 景泰四年(1453)十月，景帝以沙湾屡塞屡决，命徐有贞(即徐珵)为佥都御史，治理沙湾决口。徐有贞至张秋地方，上《治河三策》：置水门，开支河，浚运河。议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浅滞运，请亟塞决口”，景帝敕令徐有贞如王竑所言行事。有贞又奏：临清河浅且旧，非因决口而塞。漕臣只知塞决口为急，却不知秋冬虽塞，来春必再次决口，徒劳无益，臣不敢邀近功。景帝从其言。有贞乃越过济、汶诸水，沿卫、沁，循大河，相度地形水势，上言：“黄河自雍至豫，防护益坏，水势既凶，由豫至兖，土益疏，水势更猛，而沙湾之东所谓“大洪口”者，正当其要冲，故在此决口，夺济、汶诸水入海之路以去，诸水从之而泄，堤崩溃，渠淤塞，涝则溢，旱则涸，漕道因此而阻。如突然筑堤阻之，则溃者益溃，淤者益淤。今请朝廷允许先疏其水，水势平乃治其决口，决止乃疏通淤塞。于是徐有贞设渠以疏导，内倚古金堤以为固，外恃梁山泊以为泄，又置上下二闸以控制之。凡河流之旁出不顺者，筑九堰以为屏障。堰各长万丈，高三十六尺，厚十尺，栅木络行，实之以石而关键处用铁。景泰六年(1455)五月初七日，工程完成，共役夫五万八千多人，耗五百五十余日。景帝赐其渠名曰广济。从此黄河水不再东冲沙湾，而向北流出以济漕运。又疏通漕渠，北至临清，南抵济宁，建闸于东昌者共八个，用王景制水门法以平水道。而山东之阿、鄄、曹、郓间，田出沮洳者百数十万顷。自沙湾之决垂十年，直到徐有贞治理，决口乃塞，河患乃息。

杖黜言官 景泰六年(1455)七月，景帝诏敕诸臣建言修省。监察御史倪敬同盛昶、杜宥、黄让、罗俊、汪清等奏陈：府库之财不宜无故赐予，游观之事不宜非时而行。往日以斋僧，屡出帑金易米，不知栉风沐雨之边卒，趋事急公之贫民，又何以赈济？近又作龙舟、造燕室，营缮日增，嬉游不少，此非养圣躬之道。章纶、钟同直言见忤，幽锢逾年，此亦非昭圣德之为。乞请罢桑门之供，辍宴佚之娱，止兴作之役，宽直臣之囚。景帝得奏，心中不悦，不久，即机考察之借，罢黜倪敬等十六人。八月，又杖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并在狱中郎中的章比纶，和御史钟同。钟同竟被杖而死于狱中，年三十二。天顺初赠钟同大理寺左寺丞，赐恭愍，与刘球联位并祠，以表彰其忠直。

苗民蒙能起义 广通王朱徽煠既废，苗民领袖蒙能发动湖广苗民起义，集起义军三万余人，攻取龙里、新化、铜鼓诸城，蒙能自称“蒙王”，明朝官兵屡次镇压均不成。景泰六年(1455)十一月，景帝命南和伯方瑛为平蛮将军，充总兵官前往镇压。景泰七年(1456)十二月，蒙能率众攻平溪卫，都指挥郑泰等抗拒，蒙能中火枪死。方瑛遂进兵沅州，连破鬼板等一百一十余寨，起义遂告失败。

《寰宇通志》编成 景帝朱祁钰即位之初，即命大学士陈循等，根据永乐年间集录的地理之类的书籍、资料，编辑整理成书，至景泰七年(1456)五月书成，名《寰宇通志》。景帝亲自作序，颁行天下。全书共一百一十九卷，分两京、用布政司，司下辖府州县，再分别立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古迹、人物等三十门。系明代地方总志。天顺五年(1462)四月《大明一统志》成，即毁《寰宇通志》版，因而传世甚稀，有《玄览堂丛书续集》收录。

孔文英逝世 孔文英(？—1456)，字世杰，陕西安化人。永乐十七年(1419)进士授江西庐陵知县，迁浙江道监察御史，调河南道。正统初年，廷臣荐其堪大任，英宗赐其食五品禄仍为御史。正统五年(1440)，升湖广按察使。景泰元年(1450)转为大理寺卿，镇守紫荆关督练军马。景泰六年，召还，进刑部左侍郎理部事。时黄岩县有专门诉讼之人，构捏齐民三千人，相聚为非，文英奉敕拘问，一讯致得其罗织之情，独械为首一人，至京处治，其余全部遣归。中外服其明果。景泰七年(1456)五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三。

广西桂林府、湖广黄梅县瘟疫 景泰七年(1456)五月,广西桂林府疫,民男妇死二万余人。湖广黄梅县今年春夏瘟疫大作,有一家死三十口,计三千四百余口;全家绝灭有七百余户。

工匠迁官侍郎 景帝即位数年,营建数起,工役繁兴。当时蒯祥以木匠,陆祥以石匠,俱援军功例累迁太仆寺少卿。景泰七年(1456)秋七月二十三日,擢为工部侍郎,仍奉命督工匠。时称"匠官"。

严惩揽纳钱粮者 景泰七年(1456)六月二十五日,景帝根据刑部尚书俞士悦奏陈,鉴于揽纳钱粮者日益增多,榜示禁例,严加惩治:揽纳钱粮及骗其财物者,正犯枷号一月,满日杖一百,全家戍极边之地。

邹来学逝世 邹来学(1402—1456),字时敏,湖广麻城人。宣德八年(1433)举进士,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从靖远伯王骥征麓川,以功升郎中,再迁通政司右参议,督永平山海粮储。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进犯京师,邹来学升任右佥都御史提督永平、山海军务及巡视畿甸、东北诸关隘。邹来学能以权制莅事,被称为最称职之巡抚。景泰四年(1453),升左副都御史,奉命兼制居庸、倒马、白羊、龙泉等关。六年正月改抚应天。景泰七年(1456)七月二十九日卒于官,年五十五。

科考徇私论争 景泰七年(1456)顺天乡试,翰林刘俨、黄谏为考官。榜揭,大学士陈循子陈瑛、王文子王伦皆不中。八月二十八日,陈循等以私憾构讦刘俨等,劾其校阅不公,请如洪武间治刘三吾等罪之并重新开科考试例,欲借此置其于死地。景帝诏命礼部会同大学士高谷复阅。取已考中之徐泰等,有优于瑛、伦者,有相等者,亦有不及者,惟第六名林挺硃卷无评语,亦无私弊,应以疏忽论处。高谷对景帝奏陈:大臣子弟与寒士奔进已不可取,况且他们又不安于义命,竟然欲借此加罪于考官?景帝欲两全。九月,赐瑛、伦俱为举人,准来年一体会试。已中之举人惟黜林挺,其他均不再议。于是六科给事中请论陈循、王文之罪。张宁上疏谓:宋朝范质为相,其从子求奏迁秩,范质作诗戒之;韩亿之子韩维举进士,以其父执政而不就廷试,以此比之陈循、王文,贤不肖何如?况应试者千八百余人,而中式者一百三十五人。倘一概援例干进,岂不败坏科举之制?请治陈循、王文之罪,仍将陈瑛、王伦照不中发回原籍。这时高谷亦请致仕,景帝慰留,仍原宥陈循等而不问其罪。王文本来为高谷引荐,自从入阁后,却与陈循党比。高谷持正不阿,多次为陈循、王文所排挤。由此阁臣之间益不相协,朝政不清。

景帝礼聘吴与弼 景泰七年(1456)十一月初二日,监察御史陈述举荐江西处士吴与弼。吴与弼年十九,见《伊洛渊源图》,慨然向慕,遂罢举子之业,尽读《四书》、《五经》及洛、闽诸录,数年不下楼。家贫,亲自耕作以糊口,非其义则一介不取。四方来求学者甚众,吴与弼教诲不倦。正统末年,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山西佥事何自学先后推荐入仕,与弼俱不出。吴与弼曾叹曰:"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大治,难矣!"至是陈述请礼聘之,俾之侍经筵或备成均教士之选,于是景帝诏命巡抚都御史韩雍礼聘并送吴与弼来京师,然与弼竟不至。

陈祚逝世 陈祚(?—1456),字永锡,应天府吴县人。永乐初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擢河南参议。永乐十五年(1417)疏言建都北京非便,谪为均州太和山佃户。躬耕力作,处之晏然。宣德二年(1427),擢御史,巡按福建,地方大吏多被其弹劾,闽人称颂。又疏劝勤圣学:帝王之学在于明理,明理之道则在于读书。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圣贤格言,无不备载。愿皇上于听政之暇,命儒臣讲说,没有大的缘故,不得中断。使您得以知道古今为何而治,政事如何得民心,必能开广聪明,增光德业,疏还邪佞,天下人民受福无穷矣。宣宗见疏大怒曰:竖儒谓朕未读过《大学》耶?敢如此轻我,不可不诛。械之并其家属俱下狱,禁系五年,其父竟瘐死。英宗立,陈祚得释复官。再巡按湖广。当时太监王振用事,法务严峻,陈祚上言:近者法司定罪,多违定律。如侍郎吴玺误举主事吴轨,宜坐贡举非其人罪,却坐以奏事有规避律斩。及吴轨自经死,狱官狱卒之罪应递减,却援不应为重罪,一概杖之。一事如此,余事可以推想而知。英宗以为然,以其奏章示法司。不久改南京,迁福建按察使佥事,贪官污官望风解绶。天下毋问识与不识,皆推其正直。景泰七年(1456)逝世。

王斌起义 王斌本有军籍,出家为僧,法号悟真,潜伏陕山褒城县(今陕西沔县)山中,秘密组织流民反抗明政府的统治。景泰八年(1457)元旦,王斌率领流民数千人起义,国号极乐,年号天绣,封部下周曾为定天侯,设左右副将等官。为夺取汉中地区,烧绝栈道,抵抗明军。不久为官军袭败,王斌被俘牺牲。

夺门之变 景泰八年(1457)春正月,景帝病重而储位未定,中外忧惧。十一日,都御史萧维祯同百官至左顺门问皇帝安。太监兴安自内出说:你们都是朝廷大臣,不为社稷谋划,徒问安何用?于是众臣集会商议,议请复立沂王为太子,惟大学士王文、陈循议不合,故群臣疏请"早择元良"。疏进,景帝谕令: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期,所请不允。武清侯石亨

知景帝疾必不起，考虑请复立东宫，不如请英宗复位，可得功赏。便与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阴谋迎立英宗复辟。十四日，石亨、张軏夜至徐有贞家，以徐有贞善谋画与之共谋，有贞大喜说：须令南城(英宗)知此意。石亨说：一日前已密告。有贞说：必得审报乃可行事。十六日夜，石亨、张軏与曹吉祥矫称皇太后制，又会集徐有贞家。徐有贞观星象说：时在今夕，不可失。又进一步密语定计。当时正有边警，徐有贞令张軏诡言备变，勒兵入大内。石亨掌门钥，夜四更，开长安门纳兵入，逼近南宫城，城门锢，毁墙入，见英宗于烛下。英宗问故，亨等俯伏，合声请登位。入大内，守门者呵止，英宗说："我乃太上皇。"门者不敢阻止，前入至奉天门，升座，徐有贞等常服谒贺，呼万岁。鸣钟鼓。十七日，英宗召诸臣入朝告谕道：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复位，你们各任事如故。英宗复辟，景帝正病卧，闻钟声，问左右为谁。既知为英宗，连声说：好，好！

英宗改元 天顺元年(1457)春正月二十一日，英宗告即位于宗庙陵寝。下诏大赦天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当日即命徐有贞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次日，加兵部尚书。不久又以夺门之功，封石亨忠国公，张軏太平侯，张輗文安伯，杨善兴济伯，曹吉祥之嗣子曹钦都督同知。

王骥致仕 王骥(1377—1460)，字尚德，束鹿人。永乐四年(1406)进士，为兵科给事中，后使山西，迁山西按察司副使、顺天府尹、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等职，曾三征麓川，朝廷依之平苗，故英宗北狩时，景泰帝亦宠礼之。天顺元年(1457)二月十八日南京总理军务。同年六月致仕。天顺四年五月卒，年八十三。追封靖远侯，谥忠毅。

于谦之死 于谦(1398—1475)，字廷益，浙江钱塘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宣德初，授监察御史。后曾出按江西，政迹斐然，被皇帝亲点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勤勉历事，忠于职守，辄平反冤狱，赈济灾民，威惠流行，伏盗趋避。在官九年，迁左侍郎。曾因姓名相近的御史得罪太监王振而误系于狱，得释后任大理寺少卿，旋又为民所请，复巡抚山西、河南。土木之变后，从兵部侍郎升任尚书，力阻迁都之议。时郕王摄朝，给事中王竑等请诛王振、并廷击振余党马顺，大乱。郕王惊而欲起，谦排众直前掖王止，且启王宣谕"顺等罪当死，勿论。"众乃定。众议立郕王为帝，郕王再谢，谦等以国事力请，遵英宗为太上皇。谦遂调集重兵，在北京城外击退瓦剌军，加少保。景泰元年(1450)，瓦剌也先见无机可乘，被迫释放英宗，初景帝犹豫，于谦以"天佐已定，宁复有他"相慰谏，始迎英宗归。于谦终以和议难恃，努力整饬京营军制，创立团营，总督军务，加强训练，毫不松懈。其才略开敏，精神肉至，至性过人，忧国忘身，僚吏骇服，帝尤重之。景泰八年(1457年)夺门之变后，受诬被杀。年六十。弘治初赠太傅，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正月二十七日，英宗从千户白琦之请，榜于谦党人示天下。

王文之死 王文(1393—1457)初名强，字千之。束鹿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授监察御史，持廉奉法。英宗即位后，迁陕西按察使，正统三年(1438)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后召为大理寺卿。又迁右都御史，巡视延绥、宁夏边务，代陈镒镇守陕西等，进左都御史，为政整肃。景泰改元后，召掌院事。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严冷，中实柔媚。景泰三年(1452)，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直文渊阁，二品大臣入阁自王文始。再进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易储议起，文率先承命，疏请"早选元良"，至朝廷内外误传其与太监王诚等谋召取襄世子。夺门之变后，即日与于谦被执于班内。言官劾其与于谦等谋立外藩、命鞫于廷，抗辩不允。于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三日与于谦同斩于市。年六十五。成化初复其官。赠太保，谥毅愍。

徐有贞排斥异己 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一日，徐有贞入阁，欲尽揽事权，遂佐石亨等剪除诸阁臣，排斥异己，安插亲信。英宗复位，到便殿，复召高谷及商辂入，温旨谕之，命草《复位诏》。石亨对商辂密语，言赦文不须别具条款，商辂说旧制不敢易。石亨很不高兴。遂与徐有贞嗾使言官劾陈循等朋奸，波及商辂，下之于狱。并阻塞辩言，不与上闻。至令诏谪戍陈循、江渊、俞士悦于铁岭，斥商辂、萧镃等为民。陈循虽素有德于徐有贞，亦不得免。江渊既谪，遂进工部侍郎赵荣为本部尚书。

陈循谪戍 陈循(1385—1462)，字德遵，号芳洲，泰和人。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洪熙中进侍讲，宣德中迁侍讲学士。正统元年(1436)充经筵官，进翰林学士。正统九年入阁与机务，迁户部右侍郎兼学士。土木之变后，进户部尚书仍兼学士。景泰二年(1451)二月进少保、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后累迁太子太溥、户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英宗复辟，石亨等诬陷，谪戍铁岭。石亨等败，陈循自贬所自讼，释为民。天顺六年(1462)卒，年七十八。成化中复官秩。有《芳洲集》、《东行百咏集句》。

萧镃削籍 萧镃(—1464)，字孟勤，泰和人。宣德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正统初授编修，正统三年

(1438)进侍读,不久,代李时勉任国子监祭酒。景泰二年(1451)兼翰林学士入阁与机务,次年进户部右侍兼学士。后加太子少师。《寰宇通志》成,进户部尚书。英宗复辟,于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二日被削籍。天顺八年(1464)卒。有《尚约居士集》。

江渊谪戍 江渊生卒不详,字世用,江津人。宣德五年以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土木之变后,极陈固守之策,超擢刑部右侍郎。也先犯京师,参赞范广军务。景泰元年(1450)秋以原官兼翰林学士入阁与机务。不久改户部侍郎兼学士。累迁至吏部左侍郎兼太子少师。景泰六年正月,以太子少师兼工部尚书出阁视部事。英宗复辟,被诬下狱,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二谪戍铁岭。不久卒于贬所。成化初复官秩。

俞士悦谪戍 俞士悦,生卒年不详,字士潮,长洲人。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擢监察御史。正统中历官浙江参政,多次抗倭获捷,迁大理卿。土木之变,以右副都御史留守京师,守德胜、安定二门。事平,于正统十四年(1449)十一月迁刑部尚书。英宗复辟,被诬下狱,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二日谪戍铁岭。成化初赦还卒,年八十。

罢巡抚提督军务之制 石亨在景泰年间,即对文武节制武臣之制不满,数以为言,终未能如愿。英宗复辟,以其功臣之身,再次建言。至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六日,英宗谕户部、兵部二部官说:我今复位,凡百行事宜,当遵祖宗旧制。各处巡抚提督等官,是一时权宜添设,宜即将各官取闲。其各处边备及军民事务,令总兵等官兼理。事有不便及官有不法,从巡按御史究治。重者奏闻区处。从此,巡抚之官不兼提督军务。此后不久,各处巡抚兼督军务官纷纷调动改职。如总漕兼巡抚凤阳、提督军务的王竑改浙江参政,云南巡抚兼督军务的右副都御史郑禹改福建副使。

王直致仕 王直(1379—1462),字行俭,号抑庵,泰和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修撰,历事仁、宣二朝,迁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与修《宣宗实录》,迁礼部侍郎,在翰林二十余年,稽古代言编纂记注等事,多出其手,与王英齐名。时有东王西王之称。正统八年(1443)迁吏部尚书,进少傅兼太子太师。在吏部十四年,年益高,名德日重。英宗复辟,遂于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六日致仕。天顺六年(1462)九月卒,年八十四。赠太保,谥文端。有《文端公集》。

胡濙致仕 胡濙(1374—1463),字源洁,号洁庵江苏武进人。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后迁户科都给事中,曾受命隐察建文帝凡十四年,擢礼部左侍郎,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皇太子监国南京,汉王语谤太子,帝命胡濙官于南京侦视。仁宗召为行在礼部侍郎、转太子宾客,兼南京国子祭酒。宣宗时进礼部尚书,并曾兼领户部,为帝所依重。英宗即位,督上勤勉,虽两失印信,未获大责。土木变后,与侍郎于谦合,朝中内外始有固志。景帝即位,进太子太傅。景泰三年(1452)进少傅,加兼太子太师。英宗复位,力疾入朝,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七日致仕。天顺七年(1463)始卒,年八十九。谥忠安,胡濙历事六朝,垂六十年,中外称耆德。又因在礼部久,凡表贺祥瑞,以官公首署名,人因谓其性善承迎。有《芝轩集》。

杨俊被杀 杨俊(?—1457),六合人。初以舍人从军,累官署都指挥佥事,总督独石、永宁诸处边务。景帝即位后,任都督佥事、右参将等职。因冒江福擒喜宁之功,加右都督,后夺。俊侍父势,横恣轻燥,尝上疏请袭瓦剌未允。数以拔扈、盗军储等被劾,均获免,且袭父爵。杨俊初守永宁、怀来,闻也先欲奉英宗还,密戒将士毋轻纳。既还,又言是将为祸本。及英宗复位,张軏与俊不和,言于朝,遂征杨俊还,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九日,下诏狱死。

景泰帝被废 英宗复辟,改元天顺。天顺元年(1457)二月初一,废景泰帝仍为郕王,迁之西内。寻贬所生母皇太后吴氏复为宣庙贤妃,废后汪氏复为郕王妃,削孝肃皇后杭氏谥号,改怀献太子为怀献世子,皆称皇太后制行之。时汤序请革除景泰年号,未允。二月十九日,郕王死,诏丧葬悉依亲王例,毁所营寿陵,葬之西山,谥曰"戾"。以其后宫唐氏等殉葬。

蒋守约等群臣致仕 蒋守约(1381—1458),字德简,宜兴不初从法师陈坦受业。永乐八年(1410)授太常寺赞,迁协律郎。景泰三年(1452)累官至礼部尚书掌太常寺事。天顺元年(1457)二月初五日致仕。

范广之死 范广(?—1457)辽东人。嗣世职为宁远卫指挥佥事。正统十四年(1449)积功迁至辽东都指挥佥事。精骑射,骁勇绝伦。土木之变后,迁都督佥事,充左副总兵。也先入犯京师,范广奉命守德胜门,跃马陷阵,身先士卒,击退也先,以功迁都督同知。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附于于谦,谋立外藩,遂逮入狱,天顺元年二月初九日磔于市。

李实除名 李实(?—1485),字孟诚,四川合州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礼科给事中。英宗被俘,自请为使迁礼部右侍郎赴瓦剌,还迁右都御史巡抚湖广。景泰五年(1454)召还理院事。天顺元年(1457)二月十四日,以其著《北使录》多虚诞除名。天

顺七年九月逮入狱，不久释为民。成化元年(1465)正月令冠带闲住，八年六月起复，因被劾而令致仕。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卒于家。

朱见深复为皇太子 天顺元年(1457)三月初六日，英宗复立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封皇子见璘为德王，见澍为秀王，见泽为崇王，见浚为吉王。

襄王来朝 天顺元年(1457)四月二十一日，襄王朱瞻墡来朝。襄王在诸藩中，年龄最长，且最贤明。英宗羁北时，众望颇瞩于他。皇太后命取襄国金符入宫，他未从召。景帝未立时，曾上书，请立皇长子，令郕王监国，募勇智士迎车驾。英宗还京师后，又上书景帝，谓"宜朝夕问安，率群臣朔望朝见。"及英宗复辟，石亨等诬于谦、王文以迎立襄王为词，英宗颇疑。后英宗从宫中得其所上二书，又检襄国金符仍在太后阁中，才赐书召襄王，襄王来朝，所受礼待优厚隆重。一日在便殿赴宴，襄王避席说他在路过汴梁时，当地父老拦路说："按察使王槩贤，以诬逮诏狱。"英宗马上释放王槩，命其为大理卿。并诏设襄阳护卫，命有司为王营设寿藏。襄王归时，英宗又亲送至午门外，握手泣别。襄王逡巡再拜，英宗问其有何话说，襄王顿首说："天下人望天下大治如饥渴，愿您省刑狱，少赋税薄敛。"英宗谢曰："敬受教。"目送襄王出端门乃还。

何文渊自杀 何文渊(？—1457)，字巨川，江西广昌人。由进士擢湖广道监察御史。历任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吏部尚书等职。景泰初因与太监兴安等过从甚密，每彰其势，故物议不容，为言官所劾而命致仕。英宗复位，削去前所加官。何自以为当年参预易太子时，首发"父有天下传于子"之言，虑有奇祸，兼传朝廷来抄，天顺元年(1457)四月十四日惧而自缢。

曹吉祥、石亨专权 徐有贞潛黜诸阁老，得尽揽事权，朝廷内外为之侧目，而徐氏愈益放肆，进见无时。他虽最初得力于曹吉祥、石亨，但得志后即自思异于曹、石，又见英宗对二人偶有厌色，乃稍稍裁抑之，且微言曹、石之贪横状，英宗因之有所动。杨瑄初劾曹、石，上问有贞、李贤，所说无异，曹、石怨恨，日夜谋夺有贞。英宗私对有贞谈话，曹吉祥使人窃听，又泄于英宗，谓有贞所言，外间无所不闻。英宗遂疏远有贞。张鹏等狱起，曹、石以为内阁实主之，遂波及李贤。二人见英宗，具陈夺门之功，言内阁欲专权，排除异己，不然，御史何敢？兼以悲哭不已，英宗心动，谕言官劾徐、李图擅专权，排斥勋旧，天顺元年(1451)六月初七日并将二者下狱。杨瑄张鹏皆论死，余者遣戍。曹、石二人又潛言官，英宗也谕吏部"简给事、御史年丑三十者留之。"故一时给事中何玘、御史吴祯等凡三十六人皆调外，台谏为之一空。后因天气骤变，拔木发屋，谓之天怒示警，狱得稍解。徐、李出狱谪广东、福建参政；杨张鹏免死戍辽东；十三道御史除张鹏外，十二个皆谪知县；前请谪外的诸言官皆复职。

徐有贞下狱 徐有贞，生卒年不详，初名珵，字元玉，号天全，吴县人。宣德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习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正统十二年(1447)进侍讲。土木之变，有贞主南迁，被于谦斥责，不敢复言。景泰三年(1452)迁右谕德。后迁左佥都御史治沙湾决口，功成迁左副都御史。景泰八年正月，与石亨、曹吉祥等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位，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诬陷于谦、王文等，皆被诛杀，内阁诸臣斥逐略尽。因擅权枉法，又与石、曹不合，天顺元年(1457)六月初七日下狱，次日降为广东参政。七月初四日再逮入狱。免死，发云南金齿卫为民。成化初令复冠带闲住，十余年后死。有贞善画山水。有《武功集》。

薛瑄致仕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擢授御史，出监湖广银场。正统初还朝，为山东提学佥事，刚直不阿。又擢大理寺左少卿，断狱公正。景帝嗣位后，起大理寺丞、又擢南京大理寺卿。英宗复辟后，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瑄在内阁数月，见曹、石用事乱政，叹曰：君子见几而作，宁俟终日！遂于天顺元年(1457)六月初十日致仕。薛瑄所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一言一行均符合规范。著有《读书录》二十卷，平易简切，自言心得，学者宗之。天顺八年(1464)六月卒，年七十六。谥文清。有《读书录》、《从政名言》、《薛文清集》、《河汾诗集》等。

岳正入阁 岳正(1418—1472)，字季方，号蒙泉，郭县人。正统十三年(1408)进士，授翰林编修，迁右赞善、修撰，英宗复辟，被召见于文华殿。岳正美髯长身，英宗见喜，又问居家、年龄与何年进士，知其年富力强，大加勉励。岳正出遇石亨、张軏，二人愕然，入问英宗，英宗言今天自择一阁臣。两人表面上祝贺。英宗又说：他的官太小了，当提他为吏部左侍郎兼学士。两人却说：皇帝既已得其人，等看他称职之后再加官也不晚。于是，天顺元年(1457)六月十一日，英宗命岳正以原官入阁参预机务。七月初十日，为石亨等人所排陷，被谪为钦州同知，又因外谪路过家乡探老母，逮入诏狱，杖一百戍肃州。成化初，诏复修撰，出任兴化知府，成化五年(1469)闰二月即致仕

归里，八年卒于家，年五十五。谥文肃。岳正博学能文，工书画。学者称蒙泉先生。有《深衣注疏》、《类博杂言》、《类博稿》等。

许彬改调 许彬(1392—1467)，字道中，号东鲁，山东宁阳人。永乐十三年(1448)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迁编修、修撰，充福建乡试考官。景泰初年迁大理寺少卿，转太常寺提督四夷馆，兼待诏，督译书，再迁太常寺卿。英宗复辟，迁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天顺元年(1457)七月初八日，改调南京礼部。八月初二日又谪陕西右参政。至任则乞致仕。成化初命复其官，仍致仕。成化三年(1467)十二月卒，年七十六。谥襄敏。有诗文集。

释文圭出狱 文圭，建文帝之幼子，建文帝被废后，被称为建庶人。文圭被监禁时只有二岁，至天顺元年(1457)已五十七岁。英宗复位，念其无罪久系，欲释其出狱。问李贤，李贤说：这是尧、舜之用心。英宗之意遂决。当日，言于皇太后，太后应允。其左右有人以为不可，英宗说：有天命者，可任其自为。于是遣太监牛玉至凤阳，造房屋。于天顺元年(1457)十月二十六日释出文圭及其庶母以下家属五六十人，皆安置在凤阳，听其婚娶出入自便，给守门人二十，婢妾十数人。文圭初出狱，见牛马亦不识。不久即卒。

田州吕赵起事 天顺元年(1457)十一月十四日，田州府头目吕赵起事，称“敌国大将军”，张旗帜，鸣钲鼓，率众掠南丹，据向武。朝廷命总兵官武进伯朱瑛率兵征剿。不久，吕赵好朱败。

文官封赠诰敕例的制定 天顺元年(1457)十月十六日，定文官封赠诰敕例：一品四道、二品、三品三道，四品至五品二道。

石亨恣横 天顺元年(1457)五月二十三日，御史杨瑄奏陈石亨怙宠专权，石亨得知，泣诉英宗，诬陷杨瑄、英宗不惩石亨，且令工部为其造宅第。至同年末，宅第成，华丽逾制，英宗登翔凤楼，见其新第极伟丽，顾问恭顺侯吴瑾：此为谁家宅弟？吴瑾佯对：此必王府。英宗笑着说：不是王府？又向内臣说：石亨恣横，无人敢发其奸呵！由此，英宗渐恶石亨。

陈汝言下狱 陈汝言(？—1461)，字时献，陕西临潼人。正统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景泰中，以附石亨，迁户部右侍郎。天顺元年(1457)以迎立功，于同年六月迁兵部尚书。天顺二年正月初二日，科道官劾其恃宠险邪，紊乱朝政，收受贿赂，专擅选调。英宗削其职，籍其家，得财货巨万，遂逮入狱禁锢。五年十二月死于狱。

颁行优老之政 天顺二年(1458)正月二十二日，英宗以上皇太后徽号，颁行优老之政：军民之间有年八十以上，不分男女，有司给绢一匹、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加倍给予；男子百岁，加与冠带，以荣终身；年七十以上，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泛差役，无丁之家，有司时加存恤，勿令失所；军官老疾不能任事告替职的，准令儿男赴部替职，免其自来；内外官有父母年老在家、颁分俸助养，准令分俸于原籍关支；两京文官七品以上，未及三年，任内无无过、其父母年至七十未受封的，先给诰敕如其子职给封，不为常例，敢有冒年，治以重罪；四品以上官年七十以礼致仕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年给俸米五石，以资养赡；官吏、生员有亲老愿回侍养的，准令回家侍养，亲终赴部听用；军匠厨役人等，年六十五以上，筋力衰惫的，许令壮丁代替。听其优闲；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司开具实迹奏闻，以凭旌表。英宗强调：优老恩典，有司务当从实遵行，不许虚应故事，违者必罪不宥。

罗绮下狱 罗绮，生卒年不详，磁州人。宣德五年进士，授御史，巡按直隶、福建，有能名。正统九年(1444)参赞宁夏军务，擢大理寺右寺丞，参赞如故。曾以事劾指挥任信、陈斌。二人皆为太监王振党羽。此后屡为振党所陷，谪戍辽东。景帝即位，罗绮诉冤，以于谦、金濂荐，召复故官，进右少卿。副李实出使瓦剌。英宗还，以劳擢刑部左侍郎，镇守四川松潘。天顺元年(1457)五月初一日召为左副都御史。同年六月初二日，以石亨诬陷下狱，降广东参政。罗绮迟迟未赴任。天顺二年(1458)闰二月，罗绮乡人告磁州同知龙约自京还，与罗绮言英宗仍宠宦官，刻香木为王振形以葬，罗绮闻知微笑云：“朝廷失政，致吾辈降黜。”再逮下狱，坐死，籍其家。家属戍边，妇女没入浣衣局。宪宗立，赦为民，还其资产。

诏订《诸司职掌》 天顺二年(1458)闰二月十九日，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李贤等奏言：洪惟祖宗创业垂统立经定制，为万世法则，久而后备。而《诸司职掌》系洪武年间所修，彼时制度尚未有定，以后渐加增损，与前或异，若不重新编纂刊正，难于考据遵行。请令各衙门查照洪武、永乐以来，更定在京各衙门并官员职名等项，逐一备细明白开报本院，委官员数员，仍照旧式类编为书，完备进呈官为刻印，须与各衙门遵守施行。此亦是皇上继志述事之一端。英宗允准，诏各衙门查报，以备类编成书。

张軏逝世 张軏(？—1458)，祥符人。永乐中入宿卫，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从宣宗征讨朱高煦之叛，又从成国公朱勇出塞至毡帽山。正统十三年(1448)以副总兵征麓川。积功至前府左都督，总京营之兵。景泰二年(1451)坐骄淫不道下狱，不久释出。

景帝病，轨与石亨、曹吉祥迎立英宗于南宫，封为太平侯，力促于谦、王文、范广之死。其纳贿乱政，为害一时。天顺二年(1458)三月卒，赠裕国公，谥勇襄。

杨善逝世 杨善(1384--1458)，字思敬，大兴人。永乐元年(1403)任鸿胪寺序班，进右寺丞。仁宗即位，擢鸿胪寺卿。正统时擢礼部左侍郎。后使瓦剌迎英宗归。英宗复辟，封兴济伯。天顺元年(1457)三月以兴济伯兼礼部尚书署部事。天顺二年五月初一日卒于官，年七十五。赠兴济侯，谥忠敏。

复令巡抚提督军务 英宗复辟，石亨以文臣不宜节制武臣为言，请罢巡抚提督军务，于天顺元年(1457)正月奏罢。天顺二年四月，英宗认为，巡抚官革去后，军官纵肆，士卒疲弛，是文武官不相制约之故。请李贤为朝廷举荐有才能者充任。李贤说：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需人最急。英宗遂于天顺二年五月十六日派太仆卿程信赴辽东，山东布政使王宇赴宣府，佥都御史李秉赴大同，监察御史徐三宜赴延绥，山西布政使陈翼赴宁夏，陕西布政使芮钊赴甘肃，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兼提督军务。自此以京官巡抚地方如旧制。

吴与弼至京 英宗欲引贤者为己臂助，乃谋于李贤，嘱其举荐处士吴与弼。英宗遂遣行人曹隆赍礼币前往。吴与弼以朝廷厚意，当赴阙谢恩，遂来京。天顺二年(1458)五月至京师，十六日入朝，即日被授为左春坊左谕德，与弼固辞。英宗于文华殿对吴与弼说：朝廷重卿之学行，特授你宫僚，希望你辅导太子。与弼终不接受。吴与弼留京师二月，遂以疾请回乡，英宗赐敕慰劳，赉以银币，又遣行人送还，令有司月给米二石。

诏修《大明一统志》 天顺二年(1458)八月二十四日，英宗敕谕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彭时、翰林院学士吕原说：我以为天下舆地之广，不可无记载以备观览。古昔帝王皆留意之。我太祖、太宗皇帝曾命儒臣修之，终未完成。景泰年间虽已成书，而繁简失宜，去取不当。今命你们折衷群书，务臻精要，继成祖之初志，以昭示我朝统一之盛，以幸天下而传后世。遂命李贤等为总裁官。历经四年，于五年四月编成，英宗亲自作序，名《大明一统志》，全九十卷。因袭《大元一统志》体例，参考《寰宇通志》，以两京、十三布政司分区，下辖府州县，再分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及人物、古迹等目。最后附有《外夷》各国和地区的地理沿革等。其中所引古事，虽多有错化，甚至句读不通，但保存了不少史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毛胜逝世 毛胜(? —1458)字用钦，初名福寿，元右丞相伯卜花之孙。初嗣羽林指挥使，后进为都指挥使。曾一度叛明逃往塞外，寻复自还。正统七年(1442)以征麓川功，擢为都督佥事。再征麓川，充左参将。麓川之乱平，毛胜进为都督同知。正统十四年(1449)，毛胜镇大同，不久，以武清伯石亨荐，景帝进胜左都督，率三千营操练。也先数次进逼京师，毛胜守京师，御敌建功。事定，被命以左副总兵统河间、东昌降夷赴贵州，镇压韦同烈起义，封南宁伯。巡按御史牟俸劾其贪暴不法数十事，且言胜本降人，狡猾难制，今又数通外夷，恐贻边患。诏令巡抚覆实，不久便置而不问。毛胜天顺二年(1458)八月卒。赠侯，谥庄毅。

李贤请罢锦衣官校刺事 英宗恐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多倚锦衣卫官校为耳目，因此指挥门达、逯杲俱得宠。逯杲遣校尉侦事四出，所至之处，官吏为之震恐，多进美妓货贿以求免，虽亲藩亦惧焉。无贿者动辄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数大家。天顺二年(1458)十月初一日，英宗屏去左右，问李贤政治得失，李贤极言官校出入，逮籍罪人之弊。英宗令人密察，果如李贤所言，遂召指挥佥事门达戒谕道：敢有不悛，罪毋赦。

刘铉逝世 刘铉(1394—1458)，字宗器，号假庵，长洲人。永乐中，用善书征入翰林。举顺天乡试，授中书舍人。宣德时，参预修《成祖实录》和《仁宗实录》，迁为兵部主事，仍供事内廷。正统中，再修《宣宗实录》，进侍讲，教习庶吉士。景帝立，进侍讲学士，直经筵。景泰三年(1452)，以高谷荐，迁国子监祭酒。时以国计不足，放遣诸生，不愿归者停其月廪。以刘铉之请，遂得复给。天顺初，改少詹事，侍东宫讲读。天顺二年(1458)十月初六日卒，年六十五。赠礼部左侍郎，谥文恭。有《假庵稿》、《文恭公诗集》。

青阳沟之捷 天顺二年(1458)十一月，蒙古孛来进犯延绥。当时，杨信充总兵官镇延绥，都督佥事张钦副之，于青阳沟大败敌寇，获捷。张钦又败敌于野马涧等处。捷闻，封杨信为彰武伯，张钦为都督同知，镇守如故。

郑泰逝世 郑泰(? —1458)，字景阳，舒城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授礼科给事中，改吏科。正统初迁都给事中，参预铨官。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迁南京刑部左侍郎，办事明允。景泰二年(1451)二月迁本部左侍郎。天顺元年(1457)二月改南京吏部左侍郎，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卒。

刘广衡逝世 刘广衡(1395—1458)，字克平，江西万安人。永乐二十二年进士，拜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有能誉。升陕西按察司副使，民间少有冤

狱。升陕西右布政使。景泰改元，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镇守陕西。条上时政数十事，多被采用。奉命录囚南京，多所平反。提督辽东军务。天顺改元，召还，调任刑部左侍郎，擢为刑部尚书。不久以疾乞致仕，未行，天顺二年(1458)十二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四。其为人坦诚，不立崖岸，处事通敏，为时人称道。

陈询致仕 陈询(1395—1460)，字汝同，号拙斋，松江华亭人。由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选庶吉士，以才气自负，久不得选。当时其同乡沈度为翰林学士，讽劝陈询少贬损朝政以图速迁，陈询当面斥责。太宗嘉其刚直，擢为翰林院编修。宣德间升修撰，宣宗初充经筵讲官。纂修《宣宗实录》成，升为侍读，再升侍讲学士，坐累黜为安陆知州。正统年间召为大理寺少卿，巡抚大名诸府。景泰初改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经筵讲读，不久改为国子监祭酒。天顺三年(1459)正月初七日致仕。天顺四年(1460)二月卒于家，年六十六。

孛来人寇安边 孛来曾多次进犯宁夏、延绥等处，皆遭失败。天顺三年(1459)春正月，又以二万骑兵入寇安边营，总兵官杨信、石彪连战连捷，斩杀其平章鬼力赤，追出塞，转战六十余里，又大败之，生擒四十余人，斩首五千余级，获马驼牛羊二万余，为西北战功第一。

赐东宫及诸王庄田 天顺三年(1459)四月初十日，英宗以昌平汤山庄、三河白塔庄、朝阳门外四号厂官庄赐东宫；以西直门外新庄村并果园、固安张华里庄赐德王；以德胜门外伯颜庄、鹰坊庄、安宁门外北庄赐秀王，作为庄田。

禁止商旅交易违禁物 天顺三年(1459)五月初三日，英宗据四川土官把事刘华严奴与夷人交易违禁货物，引起边方祸患，下令严禁各处商旅携带违禁物货，深入各处夷地交易，违者严惩不贷。

李贤论"夺门" 天顺三年(1459)五月二十八日，英宗与大学士李贤谈论迎复事。李贤说：迎驾则可，夺门则难以示后世。内府之门，岂可言夺?若视为夺门，则是参与其来之人自大其功而已。若景泰病重不能理事，以至其逝，只有陛下可以复帝位。陛下复位，百辟奉迎，耆旧在列，无功可赏，无罪可惩。岂复以群小为朋，招权纳贿，殃及忠良，上干天象吗?《易》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谓也，英宗以为其言有理。

下石彪锦衣卫狱 石彪(? —1460)，石亨从子。一门二公侯，势盛而骄，多行不义。石亨父子为内外援，英宗颇为之疑虑。天顺三年(1459)四月，彪以军功进爵为侯，英宗欲以封爵使其奉朝请。而石彪谋镇大同，令千户杨斌等保奏，英宗觉其诈，拷讯杨斌得其实，命石彪疾驰入京。八月初一日，下石彪锦衣卫狱，令门达鞫审，得其绣蟒龙衣及违式寝床诸不法事，罪当死。故籍石彪家，并逮其党七十六人。石彪事既发，言官将于朝班弹劾，有人泄露给石彪，英宗闻之大怒，遂下令：禁文武大臣往来，其给事中，御史及锦衣卫官，不得与文武大臣交通。违者依洪武间铁榜例治罪。天顺四年二月石彪弃市。

定朝审之制 天顺三年(1459)十月，英宗命法司会同廷臣于霜降后省察记录重囚之罪状，谓之"朝审"，以后每年霜降后录囚，遂为定制。

方瑛之死 方瑛(1414—1459)，都督方政之子，全椒人。正统初年，以舍人从父征麓川。父战死，瑛立志复仇。迁指挥同知。正统六年(1441)从兵部尚书王骥征麓川，进都指挥使，寻进都督佥事，充右参将，协守云南。正统十三年(1448)复从王骥征麓川，破鬼山大寨，留镇云南。景泰元年(1450)廷议瑛有将略，进都督同知。其年四月拜右副总兵，镇压苗民起义，进升为右都督。景泰三年(1452)，为左都督。景泰五年(1454)征剿草塘苗黄龙、韦保，诏封南和伯。又进封侯爵。天顺三年(1459)十一月卒于镇，年四十五。谥忠襄。方瑛精通古兵法，尝上《练兵方略》及《阵图》，老将多称赞。

罗通致仕 罗通(1390—1470)，字学古，江西吉水人。永乐十年(1412)进士授御史，巡按四川。宣德元年(1426)，黎利反叛，罗通当时任交趾清化知州，擅自传檄割清化以南给叛敌，黎利围攻清化城，罗通等大败之。宣宗大喜，改任户部员外郎，出理宣府军饷。正统初，迁兵部郎中，从尚书王骥整饬甘肃边务，从破敌于兀鲁乃还朝。以罪下狱，谪广西容山闸官，不久又调东莞河泊所官。景帝监国，以于谦等荐，起为兵部员外郎，守居庸关，进左副都御史。景泰元年(1450)召还，参军务兼理都察院事。给事中覃浩等言罗通本以知兵而用，不宜理都察院事，乃解其兼职。通本于谦所举，而每事抵牾，人由不以罗通为直。景泰二年，仍赞军务，东宫改建，加太子少保。景泰四年进右都御史，赞军务如故。通好大言，自陈杀贼功，求世袭武职，为给事中王铉所劾。景帝释不罪。天顺三年(1459)致仕。成化六年(1470)三月卒，年八十一。

逮石亨人锦衣卫狱 石亨(? —1460)，渭南人。嗣父职为宽河卫指挥佥事。善骑射，能用大刀。正统初，以获首功，累迁都指挥佥事。正统三年(1438)正月，敌人三百余骑饮马黄河，石亨追击至官山下，多所斩获，进都指挥同知。不久充左将，从朱冕守大

同。累官至都督同知。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郕王监国,以于谦荐,召其还京掌五军大营,与于谦等保卫京师,击退也先,历右都督、武清伯,进官武清侯。景泰元年(1450)二月,奉命佩镇朔大将军印,帅京军三万巡哨大同。后提督团营,充总兵官。英宗复辟,石亨以首功,进忠国公,遂以恩宠多行不法,其从子石彪亦封定远侯,骄横如亨。两家蓄材官猛士数万,中外将帅半出其门。天顺三年(1459),石彪谋镇大同,英宗觉其诈,以罪下狱。十月,英宗罢石亨之职,绝朝参,四年正月二十四日,锦衣卫指挥同知逯杲等奏石亨怨望益甚,与其从孙石後日造妖言。而且蓄养无赖,专伺朝廷动静,不轨之迹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轻宥,乃下石亨于诏狱。坐"谋叛律"应斩,籍其家。二月十六日,石亨瘐死狱中。英宗命革"夺门"功,穷治石亨党羽,由石亨而得官的尽行罢黜,朝署一新。

徐亨逝世 徐亨(? —1460),大冶人。嗣其祖爵,称兴安伯。永乐十二年(1414)从成祖北征,为中军副将。至土剌河,获马三百。还守开平,将率轻骑往来于兴和、大同备边,其后又屡从征出塞。正统九年(1444)征兀良哈,出界岭口、河北川,论功而进为兴安侯,出镇陕西。天顺四年(1460)二月卒,谥武襄。

沈固致仕 沈固(? —1467),字仲威,丹阳人。永乐中以举人授山东沂州同知,时有建言,召入迁户部员外郎、郎中,出任山东左参政。洪熙时,充大同总兵郑亨书办,此为兼用文武之始。正统初进户部右侍郎。土木之变,以守城功迁右都御史,转左都御史。天顺元年(1457)三月改户部尚书。四年二月初三日致仕,成化三年(1467)二月卒。

宗室请名 天顺四年(1460)四月二十三日,英宗令诸宗室王府:凡无子者方许请继室生子至八岁方许请名,女至十五岁者方许请封,著为定例。

工匠逃亡 工匠被征至京师赴役,驱迫劳累,纷纷逃亡。而管理工役官吏,为得其贿而故意放纵,致使造成乏工。于是,工部令搜捕逃亡工匠。至天顺四年(1460)七月初六日,征天下逋逃工匠三万八千四百余名。但仍不能满足营造之需,英宗斥工部怠事,又令吏部选官二十员赴各地,严督有司搜捕逃亡工匠赴京应役。

敕戒清军御史恪守本职 天顺四年(1460)七月二十二日,贵州清军御史郭本奏陈各镇守总兵官多带京卫官,罔利生事,宜悉征归,以正名器。英宗大怒,以为此系御史生事,即敕戒十三布政司及南北直隶清军御史:你们清理军伍,务在尽心虑竭,以称委任。如郭本不以当务为急,往往具本干预别事。你们当以此为戒,不许一毫干预别事,务必专心清军,以俾军伍充足。毋或效尤,自取罪愆。

榜禁锦衣校尉害人 其时,锦衣卫指挥同知逯杲,数使校尉察事各地,肆意逮捕良善,门达煅狱。于是,镇守、巡抚及三司官每遇校尉前来,宴请犒赏无时日,为应付一校尉,往往费金千万。虽位尊的宗室王府,亦十分畏惧。在外做臣室,在京占田揽税,谁也奈何不得。因此,多有称校尉的赴地方需索。逯杲等恐事败露,于天顺四年(1460)八月十五日请都察院榜禁。而都察院以题为严禁"假"校尉行事害人,榜示中外。

鞑靼孛来毛里孩人寇 天顺四年(1460)八月二十日,鞑靼孛来、毛里孩等分三道自大同,威远西拥众南行,总兵官李文及宣府总兵官杨能抵御之。李文等畏其前锋,不敢出战。不久,敌人大举直抵雁门,攻掠忻、代、朔诸州,烽火彻京师,居民惊走,拥入禁城,不能止。李贤对英宗说:宜出军紫荆、倒马二关。非欲与之对敌,一则安抚人民,一则使彼知惧,不敢深入。兵部亦奏请遣将统率京军赴大同,英宗说:缓不及事,徒劳人马,惟驻关之策可行。于是遣都督颜彪领兵赴紫荆关,冯宗领兵赴倒马关。寇知明军有备,遂引去。

耿九畴逝世 耿九畴(1396—1460),字禹范,号恒庵,河南卢氏人。永乐二十二年(1424)进士。宣德六年(1431)授礼科给事中,其议论持大体,有清望。正统初,迁两淮盐运司同知,痛革积弊,条奏便宜五事,被朝廷定为律例。正统十年(1445)正月迁都转运使。廉名益振。后改官刑部左侍郎。屡辩疑狱,不曾妥协。景帝新立,凤阳岁岁遇灾,民心浮动,景帝命九畴前去巡视招抚,招来流民七万户,境内以安。景泰元年(1450),再次兼理两淮盐政。景泰三年三月,代督陈镒镇陕西。景泰四年转任右副都御史。明代大臣镇守、巡抚皆授都御史之衔;从耿九畴开始。天顺初年,议事京师。留为右都御史。不久,上疏陈崇廉耻、清刑狱、劝农桑、节军赏、重台宪等五事,皆得英宗赞许。不久,为石亨所诬下狱。天顺二年(1458年)改任南京刑部尚书。天顺四年(1460)八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五。成化初谥清惠。

西苑殿亭轩馆修成 西苑之中旧有太液池,池上有蓬莱山。山顶有广寒殿,金时所筑;西南有小山,山上亦建殿,规制奇巧,元时所筑。英宗曾令即太液池东西作行殿三座,池东向西称凝和,池西向东对蓬莱山称迎翠,池西南向,以草缮遮而饰以垩称太素,其门各如殿名。有亭六座,分别称飞香、拥翠、澄波、岁寒、会景、映晖。一轩称远趣,一馆称保和。天顺

四年(1460)九月初四日修成,英宗临幸,并召文武大臣从游竟日。

杨能逝世　杨能(? —1460),字文敬,杨洪之从子。沉毅善骑射,跟从杨洪御敌屡立功,为开平卫指挥使,进都督佥事。景泰元年(1450)进都督同知,充任游击将军。沿边巡徼。不久又与石彪各统精兵三千,训练备调遣。再进升为都督佥事。累进左副总兵,协守宣府。景泰五年召回。总掌神机营。天顺初年,以左都督为宣府总兵官,与石彪破敌磨儿山,封武强伯。也先死后,孛来进犯宣府,杨能御敌失利,为兵部所劾,英宗宥之。天顺四年(1460)十一月卒。

汤序下狱　天顺四年(1460)闰十一月初六日,月食四分有奇。署钦天监事礼部右侍郎汤序不预奏,英宗切责之,下之于狱。英宗对李贤说:月食人所共知,钦天监失于推算,以致救护不行。又说:汤序掌钦天监事,遇有灾异,多隐敝不言,天文吉事,却详书以进。朝廷正欲知灾异以见上天垂戒,而知有所修省。目前汤序如此,怎么是臣子的尽忠之道!李贤答:自古圣帝明王,皆畏惧天变,陛下之意亦是如此。汤序之罪可诛。不久又贬汤序之秩。

李天保起义　天顺四年(1460)末,贵州发生苗民起义。麻城人李天保以不堪明官府勒索赋税,避往贵州,领导苗汉族人民万余人起义。其托名为唐太宗子孙,称王,建元武烈。率众攻中林长官司。五年正月,总兵官李震奉命征剿,俘天保,送京师伏诛。起义失败。

停广东采珠　天顺五年(1461)二月十八日,广东巡抚叶盛奏陈:广东珠池业经二次采捞,目前珠螺稀嫩,须暂停缓采取,方得长大。况雷、廉等府州县夫、蜑等,多被广西流贼劫杀,必须等大兵宁靖人力宽苏之日,方可采捞。英宗命户部议行。

柳溥逝世　柳溥(? —1461),字广达,怀宁人。宣德七年(1432)嗣父柳升爵安远侯。正统中充总兵官镇广西,以廉慎著称。天顺初累进太傅、奉命佩征虏大将军印赴陕西御敌。后召掌神机营。天顺五年(1461)三月十二日卒。谥武襄。

张凤逝世　张凤(1396—1461)字子仪,安平人。宣德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正统三年(1438)十二月迁刑部右侍郎。以主事擢侍郎,前所未有。正统四年(1439)被任命提督京仓。正统六年(1441)三月改南京户部右侍郎,正统七年迁本部左侍郎,十二年(1447)冬,兼理南京粮储。因凤廉洁、谨慎善执法,故有"板张"之称。景泰二年(1451)十二月迁南京户部尚书。景泰四年又改任南京兵部尚书。次年召任户部尚书。曾以灾伤蠲赋多,国用益诎,乃奏请准轻则征租,不惟永绝争端,亦可以少助军饷。得到景帝赞许。英宗复辟,调回南京户部,仍兼督粮储。天顺五年(1461)三月十八日卒于官,年六十六。

英宗议省冗费　天顺五年(1461)四月二十九日,英宗对阁臣李贤说:现在府库钱粮,入少出多;并且军官之俸一季需关银十四万两,何以为继?李贤回答:自古国家惟怕冗食,今一卫竟有官员二千余人。英宗命李贤与吏、户、兵三部议处。李贤主张在京军官老弱残疾者,令兵部以次调外。却以军补其缺,以省冗费。英宗恐一时难行。李贤说:宜安静行之,若无其事,使其不觉可以行。英宗以为然。李贤又言:今日军官,有增无减。自古赏功之典,虽授予金书铁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孙不一再传袭,犯法即除其国;有的能立功,又给其爵。岂有累犯罪恶而不行罢黜者!若再因循下去,时间久远,则天下官多军少,民困岁供,此事不可不虑。英宗说:此事诚可虑,然而亦应逐渐为之。

萧晅逝世　萧晅(? —1461),字养善,泰和人。宣德二年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迁刑部郎中,出任云南按察副使,升云南右布政使,改任湖广左布政使。天顺四年(1460)二月朝觐,以其治行卓异。拜礼部尚书,同年十一月改南京礼部。天顺五年五月初五日卒于官。

英宗杀朱奠监　朱奠监(? —1461),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之庶孙,被封为弋阳王。锦衣卫指挥逯杲听信妄言,诬奠监有乱伦事。英宗命其兄奠培具实以闻,又遣驸马都尉薛桓与逯杲前往核实。奠培奏无其事,逯杲按问亦无此事,英宗大怒,切责逯杲。逯杲大惧,仍执以为实。天顺五年(1461)五月,英宗遂赐奠监母子自尽,焚其尸。时人以为冤。

刘实下狱　刘实(? —1461),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五年(1430)举进士。居三年,选庶吉士。正统初,授金华府通判。母丧归,三年后起复为顺天府治中。景泰时,侍臣荐其文学。景帝召其修《宋元通鉴纲目》。刘实为人耿介,为官正直。天顺初,还原任。天顺四年(1460)擢知南雄府。商税巨万,过去皆入州守之私囊,而刘实不然。宦官至南雄,听信谮言,府僚参谒时,惟留刘实并折辱之。当地百姓争相拥之出。中官惭愧,再召刘实,而实不往。太监回朝,诬实毁坏诏敕,大不敬。天顺五年(1461)五月,被逮下诏狱。刘实从狱中上书申辩说:我居官三十年,未尝以妻子自随。食粗衣敝,为国家爱养小民,不忍困之,以此得罪了朝廷使臣。英宗览书,恶意稍解,且释之,五月二十八日,刘实竟瘐死。刘实政务纷繁,未尝废书,士大夫重其学行。

曹吉祥谋反　太监曹吉祥益不自安，渐蓄异谋。于是家中多藏甲，日犒诸锦衣卫官，金钱谷帛恣意随取，广结死党。千户冯益，曾于景泰年间请徙英宗于沂州，英宗复辟后，以吉祥之庇护得以不诛，客居曹吉祥之从子曹钦之宅。曹钦问冯益：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的吗？冯益说：君家魏武即是，曹钦大喜。曹钦有家人百户曹福来，犯法潜逃，奏行捕治，曹钦却另遣人寻护，私自处死，为言官所劾。英宗令逯杲按问且降敕遍谕群臣：毋自专于宪典。曹钦惊恐。于是反谋遂决。指使其党人掌钦天监汤序择以天顺五年(1461)七月二日凌晨，曹钦自外拥兵入宫废黜英宗，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阴谋既定，七月初二日，曹钦召诸锦衣卫官夜饮。当时怀宁伯孙镗奉诏西征，将陛辞皇上，夜与恭顺侯吴瑾(1413—1401)俱宿于朝房。曹钦死党锦衣卫军官马亮恐事败，暗中逃出，将曹氏阴谋告诉吴瑾，吴瑾又急告孙镗，二人从长安右门隙投疏入。吴、孙二人皆武臣，拙于文字，惟写"曹钦反，曹钦反！"英宗得奏，急执捕曹吉祥，敕令皇城及京城九门尽闭勿启。曹钦知事泄，中夜，驰往逯杲家杀逯杲，斫伤阁臣李贤于东朝房，以逯杲之头逼李贤草奏释其罪，又执尚书王翱。李贤至王翱处索纸假装起草奏疏，幸免于难。曹钦又于西朝房杀都御史寇深。遂率众进攻东、西长安门，不得入，便纵火。守卫拆河堧砖石堵于门。叛军往来叫呼门外。孙镗遣其二子急召西征军，击钦于东长安门，且大呼：有狱贼造反！西征军奔集至二千人，进攻曹钦。吴瑾率五六骑兵路遇曹钦，力战而死。天将亮，曹钦党羽稍稍散去，孙镗领兵追捕叛党，曹钦突走安定诸门，门尽闭，乃归家拒战，孙镗督军入，曹钦投井死。其家无论大小尽诛。初六日，磔曹吉祥于市，尽诛其党羽汤序等，籍其家。十三日，英宗以擒逆贼诏示天下，求直言。

寇深遇害　寇深(1393—1461)，字文渊，唐县人。永乐中以府学生条陈时务，朱棣特令入国学肄业。宣德中擢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正统元年(1436)出任山西按察副使。正统十一年召拜右佥都御史镇守四川松潘，以功升左副都御史。景泰二年(1451)改抚辽东，提督军务。天顺元年(1457)七月召回迁左都御史理院事。天顺五年七月初二日，曹钦谋反，寇深遇害，年六十九。赠少保，谥庄愍。

汴梁黄河决　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四日，黄河泛涨，决汴梁土城，筑塞砖城五门以备，至初六日复决砖城北门，城中水深丈余，官舍民居漂没过半，公帑私积荡然一空。藩府宫眷各乘筏避於城外高处，百姓溺死不计其数。

鞑靼孛来遣使来贡　天顺五年(1461)，鞑靼孛来多次入寇明朝边镇庄浪、平虏城、宣府等处。六月，进犯河西，明官军败绩，关中震恐，进而攻掠永昌、甘州。八月，攻入凉州，守将都督毛忠抗敌。鏖战一日夜，矢尽力疲，敌人益众；毛忠意气弥厉，拊循将士，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敌终不能胜。会宣城伯卫颖援军至，寇解围而去，毛忠以全师凯旋。此后，孛来三次乞和。冬十月，英宗派都指挥詹升、窦显等持玺书前往谕降。二十四日，詹升一行至塞外，孛来听命，遣使来贡，又请改大同旧贡道而由陕西兰县入关，明朝政府允准。贡道改变之后，每年入贡，同时寇掠如故。河套之患由此不绝。天顺六年二月，仍令其由大同入贡。

四川松潘民起义　天顺五年(1461)，发生四川松潘少数民族人民起义。松潘之地，各族人民杂居，旧设参将一人，事权较轻。会守臣告警，朝议设副总兵，以都督同知许贵充总兵官镇守。许贵未抵镇而山都掌地方少数民族起义，许贵奉命便道率兵征剿。许贵分兵两路，连破四十余寨，斩一百余级，擒八百余人。许贵再往松潘，未至其地而卒。

鞑靼内讧　天顺六年(1462)正月初九日，王竑，白圭先后于固原川、红崖川大破入寇之敌，孛来遣使入贡谢罪。孛来与麻儿可儿相仇杀，麻儿可儿死，众人拥立其兄马古可儿吉思，亦号称"小王子"，此后鞑靼部长益加各自专权，延缓边事日棘。

朱祁镇论学校育人　天顺六年(1462)正月十五日，英宗朱祁镇敕谕各提学御史、佥事：自古帝王，率以兴贤育才为首务。学校兴废，关系人才之盛衰，治道之隆替。我即位之初，简学行老成之士，授以宪职，专理学校，行之十余年，颇有成效。景泰中罢志，而废坏日甚。今复兴旧典，你们当尽其职，为一方表率。人必先己，其务端轨范，严条约、公劝惩，使崇于正学，迪于正道。以称简任之意。

英宗遣官封黎灏为安南国王　黎灏，黎麟之次子。安南国王黎麟死，其子黎浚继立，为其庶兄黎琮所弑，并以黎浚游湖溺死告知明廷。明廷不知，乃遣人吊祭，而黎琮已为其国人所诛，立浚之弟黎灏。黎灏即位后，多次遣使朝贡并请求册封。英宗命广西守臣核实。天顺六年(1462)二月二十四日，遂遣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给事中王豫封黎灏为安南国王。

张𫐐逝世　张𫐐(1387—1462)，字文端。河间王张玉之子。永乐三年(1405)授金吾前卫指挥使。正统初迁都指挥佥事，又迁后府都督佥事。景泰元年(1450)奉命掌中军府事，景泰三年加太子太保，六年进右都督。天顺元年(1457)以迎驾功进封文安伯，改掌左军府事。天顺六年二月卒，年七十六。追封文安

侯，谥忠僖。

李贤论兵战守 天顺六年(1462)三月初九日，陕西总兵官、保定侯梁珤，陕西管粮通政司参议尹旻等奏：鞑贼远遁，黄河冰开，官军人马众多，人民供输困难，请令原调策应官军各回原处屯守。事下兵部，朝议虑有后警，犹豫不决。李贤上言：兵可暂不可久，暂则壮，久则老。且寇在边境，安能保其不来侵犯！若虑其复来，则永无退兵之时。目前陕西人民困苦已极，宜如梁珤等人所言，暂退军马以纾供亿。令陕西官军且耕且守，调去之军马俱暂回，只留文武官各一员提督城堡、军粮，庶为妥当。英宗以李贤之言中肯，命廷议施行。

严禁增置酷刑具 天顺六年(1462)五月初八日，英宗根据浙江冠带典吏黄镇奏陈，下令严禁在外大小衙门增置夹棍等件刑具，酷虐军民，违者严惩。

诰敕勘合编号 天顺六年(1462)九月初二日，中书舍人杨贵芳奏陈：诰敕勘合编号，国王以礼字，追封以文行忠信字，文官二品以上以仁义礼智字，三品以下以十干。新制武臣诰命，初以二十八宿字，续编用千字文，后以《急就章》。今文官诰敕，十干已尽。英宗命用十二支编号。

芮钊逝世 芮钊(1408—1462)，字宗远，宝坻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监察御史。景泰初迁江西按察副使。不久迁陕西右布政使，再升左布政使。天顺初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天顺四年(1460)夺情视事。训练卒伍，谨斥堠，广蓄积，为人称道。天顺六年九月初七日卒于官，年五十五。

增修锦衣卫狱 逯杲曾给事锦衣卫都指挥佥事门达左右，门达倚为腹心，及逯杲得志，门达反为之用。逯杲死，门达欲踵其所为，更加广布旗校于四方，缉民间事，告讦者日盛。天顺六年(1462)九月二十日，门达以狱囚过多，狱舍狭不能容，遂请于城西武库隙地增置锦衣卫狱，英宗允准。天顺八年(1464)三月，门达以罪下狱，宪宗下令毁其增设的锦衣卫新狱。

吕原去世 吕原(1418—1462)，字逢原，秀水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编修。正统十二年(1447)，选入东阁肄业，直经筵。景泰初，进侍讲，授小内侍书，再迁侍讲学士兼中允，不久又升左春坊大学士。天顺元年(1457)六月，改通政司左参议兼侍讲，入阁预机务。石亨、曹吉祥用事，独敬重吕原，吕原与岳正列曹、石二人罪状，疏留中不发。曹、石怒，摘敕谕中语，声称阁臣谤讪。英宗大怒，罢岳正之官，留吕原。同年十二月进翰林院学士。吕原性孝友，宽厚详慎，不立崖岸。在内阁，守正持正，与李贤、彭时相得甚欢。天顺六年(1462)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五。赠礼部左侍郎。谥文懿，有《文懿公集》传世。

李侃辞归 李侃(1407—1485)，字希正，东安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户科给事中，景帝监国，瓦剌首领也先进逼京师，有人建议焚毁城外马草，侃乞勿焚，以免复敛为民累。得到景帝的赞许。再迁都给事中。当时给事中敢言者，以林聪称首，侃亦泣谏，矫抗有直声，擢詹事府丞。天顺元年(1457)改太常寺丞，进太仆卿。次年复设山西巡抚，迁侃右佥都御史往任。天顺六年(1462)，考察属吏，奏罢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一百六十人。侃性情刚直，力振风纪，贪墨者敛迹。同年冬以母丧归乡里，军民拥泣，车不能行。服除不出，成化二十一年(1485)九月卒，年七十九，是明中期有名的廉直之臣。

石瑁逝世 石瑁(1399—1462)，字信之，山西应州人。宣德八年(1433)进士。正统初年，授礼科给事中，不久，升任浙江金华知府。景泰三年(1452)，升福建右布政使。天顺三年((1459)进升南京吏部左侍郎，是年冬，召为北京礼部尚书。天顺六年(1462)夏四月初一，石瑁以授敕失仪请致仕，英宗许之。英宗又念石瑁为人笃实，又命王翱、李贤议留。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官，年六十四，赠资德大夫。

戴进逝世 戴进(1389—1462)，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浙江钱塘人。善画，名驰海内，人称浙画第一流。擅画山水人物，尤善写真，喜画葡萄，行笔硬趺，有铺叙运的之物色。宣德年间被召入宫廷。宣宗喜绘事，戴进作《秋江钓鱼图》以进，一红衣人垂钓水次，独得古法。有人指出红衣为品官服色，以钓鱼失大体，因而被逐。天顺六年(1462)，穷死，年七十四。其画影响颇大，从学者甚众，系"浙派"绘画艺术创始人。

焦礼之死 焦礼(1382—1463)，字尚节，蒙古人。袭其兄指挥同知之职，备御辽东。宣德初，宣宗念其守边之劳，别授管失奴指挥使，累进都指挥同知。正统中，积功至右都督。土木之变，英宗被掳，奉命充左副总兵，守宁远。不久，也先逼京城，率师入京护卫。景泰四年(1453)再立战功，进左都督。英宗复辟，以守边功，封东宁伯，天顺七年(1463)正月十四日卒于镇，年八十二。赠东宁侯，谥襄毅。焦礼有胆略，精骑射，善以少胜众。守宁远三十余年，深得士卒爱戴，边陲亦安宁无事。

贡院大火 天顺七年(1463)二月九日，会试，贡院发生火灾。御史焦显锁其门，烧杀举子九十余人。英宗命下礼部左侍郎邹干、郎中俞钦、主事张祥、御史唐彬、焦显于狱。诏命是年八月补行会试，并赠

被焚之贡士皆赐进士出身，

诏行宽恤之政　天顺七年(1463)三月十三日，英宗下诏，行宽恤之政。诏中说，天时违和，地理未尽，吾民衣食，何由自出。欲慰群情，宜加宽恤，条示于后：内外法司，加速审理，具奏发落。停止银场煎办银课，召回差遣官员。停抄造纸札三年。豁免被灾租赋，蠲免天顺四年以前拖欠税粮。禁镇抚官科扰纳贿。存恤流移失所之民。巡按官严纠贪酷官吏。诏书最后说：代天理物，爰推一念之诚，节用爱人，用锡万邦之福。

石璞致仕　石璞(? —1469)，字仲玉，临漳人。永乐九年(1411)举于乡，入国学，选授御史。正统初，历任江西按察使，善断疑狱，风纪整肃，妇竖无不知其名。正统七年(1442)迁山西布政使。正统十三年(1448)召为工部尚书。景帝嗣位，以功兼大理寺卿。寻以罪出京署理大同军饷，还朝加太子太保。又奉命两次往治沙湾决口。景泰六年(1456)改任兵部尚书，与于谦办理兵部事。天顺四年(1460)冬改南京左都御史，这时璞已老聩，不能任事。天顺七年(1463)五月十四日，为门达所劾，罢官归里，成化五年(1469)闰二月卒。

马谅罢归　马谅(1406—1482)，字子谅，全椒人。宣德八年(1433)进士，观政户部，授吏科给事中。正统九年(1445)迁山东右参议，景泰时召任应天府尹。天顺元年(1457)八月迁南京户部左侍郎，后改京师户部。天顺六年二月复还南京任原职。天顺七年五月坐事罢归，成化十八年(1482)十二月卒于家，年七十七。为人精敏，立朝三十余年，清操雅节，始终不变。

门达得宠　逯杲任锦衣卫镇抚时，屡屡捕告谤讪，门达嫉恨。时论皆归门达。待其继逯杲任镇抚，亦仿效逯杲希皇上意旨，百般讨好，深得英宗宠信。有人向门达献策，令其严防人臣。于是门达分遣官校，行缉中外，搜求隐私，吹毛批根，及于僚庶。英宗以为其干练能事，甚为倚重。内外大事，皆予委任。天顺七年(1463)六月二十六日，言官弹劾门达遣锦衣旗校以诈称缉事，四出胁贿。门达恐事败露，即向英宗谢罪，英宗免惩。

陈懋逝世　陈懋(1379—1463)，字舜卿，寿州人。初以舍人从军，立功为指挥佥事。累功进右都督。永乐元年(1403)，封宁阳伯。永乐六年三月佩征西将军印，镇守宁夏，善抚降卒。次年进为侯爵。永乐八年从成祖北征，督军左掖。又先后多次从北征，成祖册封其女为丽妃。成祖死于北征途中，六军在外，京师守备虚弱。仁宗召懋率精骑三千千护卫京师，命其掌前府。宣德元年(1426)，仍镇宁夏。其在镇时间久，威名震漠北。英宗即位，奉命与张辅参预朝政，出为平羌将军，镇守甘肃。又因罪为柴车所劾。正统十三年(1448)，懋奉命佩征南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福建，镇压邓茂七起义。英宗北征被掳，景帝立，诏懋班师。加太子太保，掌中府，兼署理宗人府事。天顺七年(1465)七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五。赠浚国公，谥武靖。其胸次磊落，礼敬士大夫。

王宇逝世　王宇(1417—1463)，字仲宏，号厚斋，河南祥符人。正统四年(1439)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特迁抚州知府。有治世之才，政绩卓著。天顺元年(1457)，擢为山东右布政使，命抚恤山东饥民。天顺二年(1458)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不久又奉命兼抚大同。石亨及其从子骄横，在大同征索甚剧。王宇抗疏论其奸，请置之于法，以直名震朝廷。遭丧，起复为大理寺卿，平反冤狱，有盛名。天顺七年(1463)七月十七日卒，年四十七。

徐恭致仕　徐恭(? —1463)，直隶和州人。永乐元年(1403)袭父职为燕山右卫指挥同知，不久迁金吾右卫指挥使，屡从朱棣北征。宣德三年(1428)改兴州前屯卫。正统元年(1436)选调锦衣卫掌卫事。正统十四年迁都指挥佥事，充总兵官，往浙江金华等处征剿，以功迁都督佥事，再改总督漕立，镇守淮安。天顺元年(1457)迁右都督，仍旧总漕，七年十月卒。

两广瑶民起义　广西瑶民起义，进攻雷、廉、高、肇等地。天顺七年(1463)九月十七日，英宗敕命广东总兵官欧信、巡抚叶盛会同广西总兵官泰宁侯陈泾镇压两广瑶民起义。十月又命巡抚广西佥都御史吴祯节制两广诸军。十一月，广西瑶族起义军夜攻梧州城，劫官库，放罪囚，尽杀贪官污吏，并执副使周琇为人质，使官军数千人不敢发一矢，获胜而去，声势渐次浩大。

陈豫逝世　陈豫(? —1463)，字立卿，合肥人，初嗣平江伯。正统末，以副总兵随从宁阳侯陈懋分道镇压福建沙县人民起义，进封平江侯爵。瓦剌首领也先入犯，豫出镇临清，建城堡，练兵抚民，安静不扰百姓。明年召还回朝，百姓乞留，从之。景泰五年(1454)，奉诏赈恤山东饥民。其后又任南京守备。天顺元年(1457)召还北京，七年(1463)九月二十五日卒。追赠黟国公，谥庄敏。

门达诬陷袁彬　袁彬与门达同掌锦衣卫狱。袁彬恃与英宗有旧恩，不屈为门达之下，门达忌恨，便诬袁彬有罪，并言其曾受曹吉祥、石亨之贿，终于锻炼成狱。有军匠杨埙独抱不平，为袁彬讼冤，疏言：驾在北庭，独袁彬以一校尉保护圣躬，备尝艰苦。现

猝然付狱,我等诚然不解。乞皇上亲审问。使其死无遗憾。并列门达种种不法情状,击登闻鼓以进,亦被逮治下狱。大学士李贤正被宠任,多次痛陈门达之罪,门达恨之入骨,欲一并除之,乃榜杨埙究其主使。杨埙知门达之用心,乃谬称"此李学士教我。"门达大喜,即奏闻,请法司会鞫于午门外。英宗遣太监裴当监视,门达执李贤当面对质,裴当说:大臣不可辱。才未对质。审讯时,杨埙大声说:我一小人,何由见李学士!是门锦衣教我。门达气不能言。袁彬亦历数门达纳贿情状。法司畏惧门达势焰,不敢报告皇上,乃坐袁彬绞输赎,杨埙论斩。英宗于天顺七年(1463)十一月十三日调袁彬南京锦衣卫。不久,杨埙亦得释。

徐承宗逝世 徐承宗(? —1463),凤阳人。徐达曾孙,正统十三年(1448)袭兄魏国公爵。当志读书,以门第自重。天顺元年(1457)奉命守备南京,廉谨自持,镇静不挠,不泛交接,不私役部下一人。天顺七年(1463)初六日卒,子徐俌嗣爵。

朱见深摄事文华殿 天顺八年(1464)正月,由于英宗卧病,便有人进言离间皇太子于英宗。英宗听其言,而颇为疑惑,在便殿召见大学士李贤将离间事告李贤,他说:当前庶事平定安宁,惟社稷根本之事,反有不安,将如何处置?李贤答称:皇太子之废立为朝政大事,望皇上三思。英宗说:我今病体如此,似应传位于皇太子吗?李贤立即回答:如此则宗社之福。英宗即于同月初六日,令皇太子朱见深摄事文华殿。离间谗言引起的议论不平自息。

英宗遗诏罢宫妃殉葬 天顺八年(1464)正月十六日,英宗在病危之际召谕皇太子朱见深及太监牛玉等至榻前,命东宫即位,百日而婚,定后妃名分,罢宫妃殉葬。太祖朱元璋死,后宫多从死,历经成祖、仁宗、宣宗皆有殉葬,多者至数十人。景泰帝虽死时已被废为郕王,犹用殉葬之制。至是英宗遗诏始罢宫妃殉葬。李贤等阁臣手捧遗诏,又惊又悲,以为盛德之事。

朱祁镇逝世 朱祁镇(1426—1464),明宣宗朱瞻基之子。天顺八年(1464)正月十七日死于乾清宫,年三十八岁。英宗习骑射,御琴书,自奉俭约。承宣、仁之业,海内富庶,朝野安宁,老成勋旧,纲纪秩然。又释建庶人文圭,首罢宫妃殉葬,此则盛德事,可为后世效法。而宠宦官王振,擅权开隙,遂至有土木之变,身陷北漠。复辟之后,仍追念不已,可见其被惑之深。二月十二日上尊谥睿皇帝,庙号英宗,葬裕陵。

朱见深即皇帝位 朱见深,英宗朱祁镇长子。母贵妃周氏。初名见浚。英宗陷北漠,皇太后令立见浚为皇太子。景泰三年(1452)被废,封为沂王。天顺元年(1457)复立为皇太子,改名见深。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一日,朱见深正式即皇帝位,时年十八岁。大赦天下。以翌年为成化元年。蠲免天下明年田租三分之一。浙江、江西、福建、陕西、临清镇守内外官,诸边镇守内官,凡正统年间所无者悉罢之。出使各番使者及缉事官校皆召还。

钱溥贬谪 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曾教授宫内太监书,东宫太监王纶从受学焉。英宗病笃,王纶私自赴钱溥家议事,大学士陈文与钱溥邻居,发现其阴谋。不久,英宗死,首辅李贤当起草诏书,陈文起而夺其笔说:无庸,已有起草者。钱溥、王纶定计,欲以钱溥代替你,而以兵部侍郎韩雍代替尚书马昂。李贤大怒,奏闻皇太子。会英宗大敛时太监王纶衰服袭貂,宪宗厌恶之,故而历数王纶之罪,天顺八年(1464)正月二十九日执之下狱,供词牵连十余人。谪钱溥为顺德知县。韩雍素为陈文所不悦,故亦坐累贬浙江参政。

始行内批授官之制 明朝旧制,授官必由内阁或吏部。宪宗即位,天顺八年(1464)二月十七日,始命中官传旨。用工人为文思院副使。此后相继不绝。一传旨,就有百十人得官。时谓之"传奉官"。自文武大臣下及僧道,滥加恩者数以千计。

门达戍边 门达,生卒不详,丰润人,初袭父职为锦衣卫百户。性机敏,有才干,但深沉不露。正统十四年(1449)任镇抚理刑,历迁至都指挥佥事,及掌卫事,与逯杲结怨,惴惴自保。待逯杲败没,即抒发宿愤,分遣官校,行事中外,缉访事情,搜求幽隐,索取货贿,内外官僚重足而立。于是诡服诈冒之人,接迹于途,天下骚然不安。又设计陷害文臣。宪宗即位,门达以太监王纶将受重用,预为结纳。王纶事败,门达被谪至贵州都匀卫,正待启行,言官交章劾其罪。都御史李宾疏言:门达恃恩藐视王法,玩弄威权,文网苛细,大狱屡兴,假托上旨,纵官校四出,子弟奸比,罪岂止于谴谪,应正以国法。天顺八年(1464)二月十二日逮门达下狱,论斩,籍其家。后免死,戍广西南丹卫。宪宗复用袁彬掌锦衣卫事。三月,即毁门达所增建的锦衣卫新狱。

议两宫尊号之争 宪宗即位,命廷臣议上两宫尊号。中官夏时承周贵妃的旨意说:钱皇后久病,不当称太后。而贵妃,皇上之生母,宜以宣德间故事行。阁臣李贤、彭时持不可,力言曰:今日事与宣德时不同。胡后上表让位,故正统初不加尊号。今钱后名分固在,安得为比?中官说:若是如此,为何不起草让表?彭时曰:先帝(英宗)健在时未曾行,今谁敢草!且朝廷之所以服天下,关健在于正纲常。若不正纲常,

遵礼制，将有损于圣德。人臣阿意顺从，是万世罪人。李贤亦极言之，议遂定。将上册宝，彭时又说：两宫同称则无差别，钱皇后宜加二字以便称谓。遂于天顺八年(1464)三月初一日，尊英宗钱皇后为慈懿皇太后，贵妃周氏为皇太后。

释放宫人　天顺八年(1464)三月初五日，李贤偕同官上言：日者君之象征，君德明则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刚以断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则天变自然消弭。又言：天时不和，是由于阴气太盛。从宣德至天顺间，选取宫人太多，浣衣局被没官之妇女，愁怨尤甚，宜皆放还。宪宗采纳其议，中外臣民大悦。

复立团营　于谦初立十团营。英宗复辟，罢而不设，恢复京军三大营之制。朱见深即位后，于天顺八年(1464)三月二十五日，会昌侯孙继宗等，请于五军、神机、三千营中，选壮勇官军十二万，分为十二营：分称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鼓勇，效勇，立威，申威，扬威，振威，各命侯、伯、都督等官坐营团练。宪宗以为善，诏命孙继宗同太监刘永诚总管提督，每遇操练之时，仍遣给事中、御史各一人巡察。四月三十日，召郭登总神机营。分将坐营：定西侯蒋琬奋武营，太平侯张瑾耀武营，广平侯袁瑄练武营，遂安伯陈韶显武营，广宁伯吴琮敢勇营，都督同知赵胜果勇营，都指挥同知敢勇营，都督同知芮成效勇营，都督佥事王瑛立威营，李杲申威营，鲍政扬威营、孙广振威营，各有协赞。

大臣巡边备寇　天顺八年(1464)春，御史陈选疏言：鞑靼部落，孛来最强，又密招兀良哈三卫诸番，结兵屯住。去冬鞑靼来朝，要朝廷赏宴，窥我虚实，其犯边之情已露。而我边关守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仗不利，军士不操习。甚至富者纳月钱而得安闲，贫者迫于饥寒而逃窜，边备废弛，缓急何恃？乞皇上敕命在边诸臣，痛革前弊，每年派遣大臣巡视，使边防有备，寇氛可敛。宪宗朱见深得疏，即命遣大臣巡边备寇。

内臣监枪　天顺八年(1464)四月初十日，宪宗朱见深命内臣赴各营监枪。分遣太监周中于奋武营，右少监王亨耀武营，太监唐缜练武营，右少监林贵显武营，太监张温敢勇营，右少监赵永果勇营，奉御郑达效勇营，太监来童鼓勇营，左副使高廉立威营，奉御王璇伸威营，右副使张璘扬威营，奉御张伸振威营。

年富逝世　年富(1395—1464)，字大有，号谦斋，怀远人。本姓严，讹为年。以会试副榜授德平训导。后擢吏科给事中，迁陕西左参政、河南右布政使等。景泰二年(1451)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提督军务。时经丧败之后，法弛弊滋，年富一意拊循，奏免秋赋，罢诸州县税课局，停太原民转饷大同。时石亨一再违法粜米，年富屡次劾石亨及参将石彪等罪，为石彪等所衔恨。天顺元年(1457)革巡抚官，年富亦罢归，石亨等罗织罪名，逮年富下诏狱。英宗以此问李贤，贤称年富能祛弊，英宗说：此必彪为富抑，不得逞其私。李贤说：诚如圣谕，宜早昭雪。英宗遂使门达从公问事，果然无罪。乃令其致仕。后以廷臣荐，年富起南京兵部左侍郎，改户部，巡抚山东，又迁户部尚书，至天顺八年(1464)四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谥恭定。

轩輗致仕　轩輗(？—1464)，字惟衡，鹿邑人。永乐二十二年(1424)进士，授行人司副。宣德六年(1431)改御史，巡按福建，剔蠹锄奸，风采甚峻。正统元年(1436)奉命清军浙江，劾罢不称职之官四十余人。正统五年，超擢为浙江按察使，居官清廉，一方大治。景帝即位，以右副都御史镇守浙江。景泰元年(1450)奉命兼理两浙盐课。景泰五年复改左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天顺元年(1457)二月，召拜刑部尚书后，引疾乞归。天顺二年召以左都御史赴南京督理粮储。天顺八年春，轩以老乞骸骨，请归乡里。不待英宗许可径归，同年五月二十四日抵家而卒。万历中，赠少保，谥端肃。

皇后的废立　天顺八年(1464)七月二十日，朱见深诏立吴氏为皇后。而在同月初十日，南京礼部右侍郎章纶见有司以遗诏请大婚，即奏陈建言：山河尚新，元朔未改，陛下即位之初，当以孝治天下，请于来春举行大礼。此疏至京，而册立之诏已行。章纶之议，遂不被采纳。其时，年三十五的万贵妃深受年十八的宪宗宠爱，及吴氏立后，即摘其过而杖。万贵妃言于宪宗，致使宪宗勃然大怒，遂于八月二十二日以吴皇后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的罪名，废居别宫。习礼太监牛玉等谪南京孝陵，吴氏父都督同知吴俊戍登州。十月十二日，又立王氏为皇后。万贵妃宠冠后宫，而王皇后处之淡如，故谮不行。

诏修《英宗实录》　天顺八年(1464)八月十六日，宪宗下诏修撰《英宗睿皇帝实录》。由太保会昌侯孙继宗任监修，少保大学士李贤、吏部左右侍郎兼翰林学士陈文、彭时为总裁，礼部右侍郎李绍、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读学士刘定之、南京国子监祭酒吴节为副总裁，学士柯潜等为纂修，至成化三年(1467)八月修成。共三百六十一卷，起宣德十年(1435)正月，迄天顺八年(1464)正月，首尾三十年，附景泰帝事迹于中，凡八十七卷。

复立武举法 洪武年间用武举之法，武臣子弟得于各直省应试，不久遂罢而不行。宪宗即位后，户部郎中庞胜于天顺八年(1464)九月二十九日奏陈乞请复开武举。十月二十四日，宪宗下诏，复立武举法，命直省举诸武艺人，兵部同总兵官考核其弓马策略，分别甲乙以备录用。指挥以下各官子弟，悉令入学。又定武举考试方式：骑马射中四矢、步行射中二矢以上者为中式，骑、步所中其半次之。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问策二道，大略与文闱之式相同。

设置皇庄 天顺八年(1464)十月，宪宗命以没收太监曹吉祥之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自此始。给事中齐庄疏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小民争利！宪宗不理。从此，勋戚、中贵之家，多夺民地为庄田。

王徽王渊等疏陈宦官之恶 当时中官牛玉以罪被谪，天顺八年(1464)十月十七日，南京给事中王徽、王渊等疏陈宦官罪恶：陛下册立中宫，此何等大事！而贼臣牛玉，乃敢大肆奸欺，罪当万死。如仅斥之南京，全其性命，则凡侍陛下左右之人，还有何忌惮！内阁大臣，身居辅弼，视立后大事漠不关心，礼官畏权，辄为阿附。及牛玉事发，国法难免，而刑官念旧，竟至苟容。而李贤等又坐视成败，不出一言，党恶欺君，不如此甚，请并罪李贤等，以为大臣不忠者戒。又尽言宦官之害。宪宗认为王徽等妄言要誉，欲加之罪，都给事中张宁率同官及御史交章论救，乃并谪为州判官。王徽被谪贵州，王渊谪至茂州。

京卫武学的复设 京卫武学废除已久。刑科给事中金绅奏陈乞请复设以育将才。且建议应遴选有学之士，授以学官。令五府各卫指挥以上应袭子弟入学，讲读武经，讨论古今为将胜败之迹。每月初一日，总兵及兵部尚书、侍郎下学考试，以励勤怠。宪宗得奏，于天顺八年(1464)十一月初七日下诏复设京卫武学。于是以太平侯张軏旧第为武学，以南京国子监助教闫禹锡为国子监监丞掌学事。

分俸例的更定 原规定在京文职五品以上、六品以下，支十分之四、十分之三本色米，每年于南京关给。后有分俸于原籍，既分本色十分之二、十分之一，又于南京冒支原数。十分混乱。于是，户部于天顺八年(1464)十二月二十五日奏请，欲分俸原籍者全分之，不复于南京支给。宪宗准行，且著为令。

赵铎起义 赵铎(? —1465)，四川德阳人。初与绵竹人徐贵有仇，为徐贵诬告通盗，受官吏迫害，遂于天顺八年(1464)起义。当时川中小股义军，如天涧沟杨瓒、汉川僧悟升、花溪陈焕章、连山河黄鹞子俱接受其领导。于是赵铎称赵王，设置安将军、席评事等官。进行流动作战，多次攻陷县城，杀长吏。其活动区域以川北为主，南到内江，东到湖广荆襄一带。宪宗诏命巡抚汪浩率官军入川镇压。成化元年(1465)五月在彰明(今四川江油)中伏战死。起义失败。

定西域诸国及哈密人贡之制 成化元年(1465)正月二十日，西域诸国及哈密遣使来贡。礼部尚书姚夔等上言说：哈密贡马二百匹，而使人乃至二百六十人。以中国有限之财，供外藩无益之费，不宜滥行。于是乃下廷臣议，定其一年一次入贡，每次不得过二百人。十月十二日，因哈密失国，流民以入贡之名大批涌入内地，各地不堪重负，再次申令哈密贡使不得过二百人，罕加思兰(今甘肃敦煌北)五十人，吐鲁番、亦力把力(今新疆北)等三年或五年一贡，每次不得超过十人。

任礼逝世 任礼(? —1465)，字尚义，河南临漳(今属河北)人，以燕山卫卒从成祖起兵，积功至山东都指挥使，永乐二十年(1422)擢都督佥事。仁宗即位，命掌广西都司事，寻改辽东。宣宗即位，进都指挥同知。正统初进左都督，正统元年(1436)佩平羌将军印，充左副总兵镇甘肃，以破阿台功封宁远伯。景泰初提督三千营，以老致仕，后起复守备南京，掌中府事，成化元年(1465)正月二十三日卒，赠宁远侯，谥僖武。

开纳粟之例 成化元年(1465)正月，宪宗诏命户部右侍郎薛远整饬两广军饷，薛远请开纳粟之例。宪宗批准施行。具体规定：其一，两广大小衙门三年六年考满官员，许令纳米就于本布政司给由。其二，两广两考役满吏典有能纳米一百石者，送部免其办事，就拨京考，纳米三百石者，免其京考，冠带办事，纳米一百五十石者，于本布政司拨补，三考满日，赴部免考，冠带办事。其三，两广军民舍余人等照纳米则例运于用粮处所，给授散官。其四，两广及湖广、江西为民文职官备米一百五十石运于用粮处所者冠带闲住。其五，淮浙广东等处盐运司，提举司天顺七年(1463)存积见在引盐，就彼定拟斗斛出榜召商中纳。其六，两广等处放回依亲监生坐监三年以上者纳米一百五十石，未及三年者纳米二百五十石，免其坐监，起送听选，其听选给假回还者纳米一百石，不拘挨次，就便选用。其七，两广儒学考试不中生员廪膳纳米五十石，增广纳米三十石，免其充吏，放回宁家。

荆襄流民起义 明朝中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剧烈和赋役的苛重，加之连年不断的饥荒，流民渐多。湖广荆襄地区即为流民的重要聚居区。洪武初，明廷恐这里的流民聚众起义，派重兵剿除该地，试图

禁止流民进入，设立了以郧阳为中心，西到终南山东端，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东北到伏牛山，南到荆山的禁区，并于天顺八年(1464)专设湖广布政使参议一职，专管流民事宜，但并不能控制流民的涌入。到成化初，入山垦荒开矿者已达一百五十余万人。明廷多次强令逐散，流民在走投无路之下，于成化元年(1465)三月在刘通、石龙、冯子龙领导下于房县大石厂立黄旗起义，占据梅溪寺称汉王，国号汉，年号德胜，任命了将军、元帅等职，拥众数十万，分兵进攻襄、邓、汉中，大获全胜，明廷大为震惊，宪宗诏命抚宁伯朱永为充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监军，会合湖广总兵李震、副都御史王恕前往镇压。成化二年三月，义军在梅溪附近打败李震、杀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五月，白圭率兵从南漳、远巡、房县、谷城四路进逼梅溪，刘通率义军转至寿阳，与明军激战两天，刘通被俘，义军中男子十一岁以上者皆被杀，共一万余人。六月，石龙率部分义军转至四川，攻下巫山、大昌，杀夔州通判王祯、奉节县典史及百户二百余人。十月，白圭遣指挥使张英诱降，刘长子缚石龙投降。十一月，石龙、刘长子等义军首领七十三人及其家属五十二人被斩，起义失败。六年十一月，荆襄流民又在李原、小王洪领导下起义。李原与小王洪均是刘通之部下，起义后称太平王、流民附和者达百万人。宪宗诏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官李震前往镇压。项忠又增调土兵、共合二十五万人，分八路进攻义军。同时遣人入山诱流民出山复业，使大批流民出山，削弱了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七月，李原在均山、小王洪在均州被俘，大批流民被屠杀，死者枕籍山谷，而被诱出山的流民也在还乡途中死去。荆襄流民起义复又失败。

减孔子子孙田租 成化元年(1465)四月初一，曲阜孔子第五十六代孙克晌以子孙繁衍，人口众多，日用不给，乞免应纳之租。宪宗下诏：孔子有功于万世，其子孙理应优恤。遂减其田租之三分之二。

四川山都掌少数民族起义 山都掌系永宁宣抚司所辖，是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正统、景泰年间即有起义。成化元年(1465)三月，这里的少数民族复又起义，分别占领了江安、合江等县。成化三年六月，宪宗诏命襄城伯李瑾为征夷将军，充总兵官，太监刘恒监军，晋兵部侍郎程信为尚书，提督军务，前往镇压。李瑾等经珙县至戎县，合贵州兵合攻大坝，得胜而归。但义军等官军退后，复又攻占合江等九县。明廷拟发大兵前往镇压，程信认为此地山势险恶，必有土兵为向导，不宜轻进。成化四年四月，宪宗诏令东川(今云南会泽)、芒部(今云南镇雄)、乌蒙(今云南昭通)、乌撒(今贵州威宁)等府土兵至四川，并调湖广兵和南京战马一千余匹供程信调用。当时义军已攻占上、下罗计，逼近永宁，程信乃令游击罗永忠等由永宁分道并进，义军不敌而败。官兵乘风纵火，先后焚烧二千余寨，斩杀三千余人，俘一千余人，并改大坝为太平川长官司，设官抚治。

张鼐论冗官之弊 成化元年(1465)六月初八日，监察御史张鼐上言：近户部上奏欲于河南、山东、陕西、湖广四布政司各添设参政参议一员，顺天并直隶各府及四布政司各府各添设同知一员，专职抚民劝课农桑。建官用以安民，官多则民扰；立法用以除奸，法出则奸生，故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兴一利不如除一害。今户部所言固有其理，但亦有弊。朝廷置布政司府州县官，无非劝课农桑，修举庶务，以安养斯民，何用专设农桑之官?况今水旱不断，民多饥窘，正当苏民省费之时，所以不宜多设官职，宪宗采纳张鼐之议。

疏理钱法 成化元年(1465)七月十二日，宪宗诏令疏通钱法：凡征商税，钱、钞中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无拘新旧与年代远近，全部验收，以便民用。

袁芳上言救灾之策 成化元年(1465)七月二十六日，户科等科给事中袁芳等上言：多年以来救荒无术，一遇水旱饥荒，老弱转死，丁壮流移，至今南阳荆襄等处流民不下十万，而南北直隶、浙江、河南等处或水或旱，夏麦绝收、秋成无望，米价昂贵，百姓饥窘，恐来春必有死亡流移之患，聚众闹事之祸。乞行统计缺食者之多寡，所在粮仓之有无，设法赈济。另劝存有余粮之大户放贷，按年计息，官府为之立据，待来春收获一并归还。停止各项工役，免去灾区之税粮。饥死路旁者即速掩埋。宪宗诏令户部议行。

韩雍镇压大藤峡瑶壮族人民起义 景泰七年(1456)，瑶族人侯大苟率领瑶、壮族人民起义，聚众至数万人，攻克数郡县，到天顺年间，义军势力发展到广东高州、廉州(今广西合浦)、雷州(今广东海康)等地，并于天顺七年(1463)攻克梧州城。成化元年(1465)正月，兵部尚书王竑荐右佥都御史韩雍可以胜任征讨之事。宪宗乃诏命都督赵辅充总兵官，为征夷将军，太监卢永、陈宣监军，韩雍赞理军务，发兵十六万前往镇压。十一月，韩雍分兵五路，首先攻下修仁、力山(今广西蒙山西)，杀义军七千余人。又分两路进军，一路从北面象州、武宣方向，一路从南面桂平、平南方向，攻至大藤峡口。十二月，义军顽强抵抗，但众寡悬殊，侯大苟被俘牺牲。明军对各族人民

进行了血腥屠杀，血洗大藤峡，积尸如山血如川。韩雍斩断峡中之大藤，改其名为“断藤峡”。宪宗诏令韩雍进右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成化二年，侯郑昂复又率义军余部攻占浔州城(今广西桂平)及洛容(今广西鹿寨)、北流二县，宪宗又命韩雍前去镇压。其后，瑶、壮族人民起义不断发生，韩雍亦有“终难靖乱”的感叹，一直到成化八年，这次起义才被镇压。

萧维祯致仕　萧维祯(？—1472)，名肇，以字维祯行，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宣德五年(1430)进士，授刑部主事。正统中录囚直隶等处，未几升郎中，又升大理寺丞。土木之变后进少卿、卿。景泰三年(1452)加太子少保，景泰四年升右都御史。天顺初调南京，历刑、兵部尚书。成化元年(1465)八月致仕。成化八年三月十五日卒，谥文昭。通敏有才干，读书通大略，为时论所称。

王竑致仕　王竑(1414—1488)，字公度，号戆庵，致仕后改号休庵。其先祖为湖北江夏(今武昌)人，后其祖父王俊卿因事被发配至甘肃河州(今临夏)，遂以河州为其籍。正统四年(1439)进士，授户科给事中，为人豪迈有节，正色敢言。正统十四年，在京师保卫战中为右佥都御史镇守战略要地居庸关，精简兵马，罢免庸将，边防为之一新。景泰元年(1450)四月，巡抚淮安、扬州、庐州(今安徽合肥)三府和徐州、和州(今安徽和县)，并兼理两淮盐课。凤阳、淮安、徐州等地大水灾，王竑尽力赈抚，博得了代宗的赞赏和百姓的拥戴。天顺元年(1457)，王竑以铲除太监王振及其余党事而为石亨辈所恶，遂被降为浙江参政，后又被遣送回里。天顺五年，大学士李贤复起用王竑抵御鞑靼孛来的入侵，王竑与都督冯宗大败孛来。六年，复命竑督漕抚淮安、扬州等府，淮人闻竑再至，欢呼迎拜，数百里不绝。成化元年(1465)，升为兵部尚书。因与李贤不和而于同年九月十五日致仕，居家二十余年，于弘治元年(1488)十二月初三日卒，年七十五岁。正德年间，赠太子少保，谥庄毅。

项忠进言求贤　成化元年(1465)九月十八日，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项忠上求贤三事：其一，为治莫要于求贤，得人莫严于考课，现在考察官吏，不称职的被罢免了，而能干的却未见升迁。他建议吏部挑选巡抚和按察使中之优秀者量为擢用，或给以勉谕，以示嘉奖。其二，至重者将，至危者兵。而今日之陕西边帅，遇敌畏缩不前，这与智勇不全有关，但关健在于手中没有掌握生死大权，况且两军交战，有生有死，如不军法从事，谁肯轻生以御敌？今吏卒只怕敌人，而不怕总兵号令，原因在于总兵之权太轻。假如使吏卒害怕总兵甚于畏敌，进可生退则死，则必克敌。他建议敕给总兵以权，军中如有违令者，一律军法从事。其三，选将不必拘于答策。国家举将才已一年有余，骑射之职尚无人应诏，况且有大将之才的人呢？陕西风土强劲，郭子仪、李晟之辈皆由此出，弓马闲习、膂力过人者不可谓无，只是拘于答策之难而不能进。如果拘泥答策，恐怕无人能进。宪宗即命按其奏施行。

定乌思藏番僧入贡之制　乌思藏长期与明廷保持着“朝贡”式的贸易关系。明帝为了夸耀，回赐物品的价值往往超过进贡的物品，所以番人素以入贡为利，虽屡申约束，而贡者还是越来越多。成化元年(1465)九月二十四日，礼部奏言：宣德、正统年间入贡的不过三四十人，景泰时多至三百人，天顺间达两三千人，及今则往来者络绎不绝。故礼部请降敕谕使三年一贡。宪宗敕谕乌思藏首领阐化王说：入贡之制按洪武旧例，三年一贡，自成化三年开始实行。所遣之人所带文书必盖王印，国师、禅师之印不可。

沈珤等请以副榜举人任学正教谕职　成化元年(1465)十月初四日，吏科都给事中沈珤等言：旧制学校之学正、教谕、训导多于会试副榜举人中选授，往往教有成效，科贡得人。而近来纳马、纳粟并四十以上入监者，俱以记诵旧文，滥授学正教谕之职，遂致学校废弛。请自今学正教谕必用副榜举人，其他止授训导，仍限年五十以下。宪宗从其奏。遂著为令。

龚永吉致仕　龚永吉，生卒年不详，字天民，浙江义乌人。宣德中由国子生授兵部主事，清慎有声。正统初进郎中，旋被谪戍平凉。鞑靼犯边，以尚书王骥之荐起为佐军，有功复任，进大理寺右少卿。历兵部右侍郎，南京大理寺卿。成化元年(1465)十二月初四日致仕。

李贤奏请抚谕荆襄流民　成化二年(1466)正月初四，大学士李贤等上奏说，荆襄地区虽已遣将前往征讨，但其间山林深阻，流民聚众多，起事者闻大军南下，必邀劫流民为其同党，其流民亦恐官军一并剿戮。因此其势必越来越大，也越难于扑灭。宜降圣旨榜文，开谕流民，各安其业，有能擒斩起事首领者，比官军加倍升赏。宪宗以为其言有理，遂诏谕兵部尚书王复按其言行事，以抚谕荆襄流民。

更定团营之制　景泰以前，京都禁军有五军、神机、三千三大营。兵部尚书于谦为提高京军的战斗力，从各营中选精兵十万，编为十团营，其余军归本营，称“老营”。英宗复位，于谦被杀，团营之制遂罢。成化二年(1466)正月初五，监察御史魏瀚等上言说：今京师军士不下三十余万，或占役于私家，或借工于公府，各有所用，能操练的都是一些老弱之兵，而且

马匹瘦弱，兵器不利，以之御敌，安能不败？选将练兵一事，尤系于兵部之得人。今兵部尚书王复，质实有余，应变不足，处此多事之秋，未见其济。宪宗答说，王复升任不久，难责近效。前于三营内选拨精锐官军十二万，分为十二营团练，情弊多端，益滋废弛。今还归三营。分一等、次等训练。仍差给事中、御史不时巡察。于是，兵部会同京营提督选得一等军十四万，宪宗认为人多，今仍分十二营团练，命侯十二人掌管，各以都指挥辅佐、内臣监军、勋臣提督。名为“选锋”。不得入选者仍归本营，名为“老家”，以供公私役使。于是团营复立，其法稍变。宪宗十分重视京营，然缺伍严重，竟达七万余人，多被权贵隐占。加上用宦官汪直总督团营，开内臣掌禁旅之先河，其法益坏。

礼部补定会试规则 成化二年(1466)正月二十四日，礼部上奏：设科取士，期得真才，以资任用，但每年会试虽有禁约，然旧例行而久之不能无弊，今更议申明：一，旧例考试等官于初八日早入试院(九日考试)，一日之间事务多端，宜于初七日早入院。二，旧例就试之日，举人黎明入场，黄昏交卷，有未完者给烛三支。为防故意拖延，宜于四更入场，黎明散题。三，举子入场要严加搜检。入场文成两篇之上者，方许如厕，之后即速回场，不许交接谈论。若有夹带文字或托官军夫匠等人夹带文字入场誊抄者，一经发现即按其职位大小处以惩罚。四，巡绰搜检看守一律由营中差拨，不许冒名顶替。五，提调监视官不许私自入号与举子交接。六，举子入场之后，墙外五城兵马指挥等官率领火夫弓牌，各带什器环墙四面严加防守。七，每场誊录红卷送入帘内，候三场毕，考试红卷文字已定，方许吊取笔墨送入帘内，于公堂对比字号，不许散入同考各房。八，誊录生员务要用心逐字对写，不许失落字样，潦草不真。九、誊录、对读、收卷等官旧例用京官，近吏部取听选官充之，其中有老眼昏花及才不胜任者，今后务要精选四十岁上下，五至七品有行止者充任。十，供给饭食顺天府官多有造作不精，供给失节者，令士子埋怨。本部宜令差一官提督供给之事。宪宗批准施行。

减京官折俸钞 成化二年(1466)三月初十日，减在京文武官员折俸钞。原来俸米一石折钞二十五贯，后因户部裁省定为十五贯，至是尚书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贯，宪宗从之。当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如此使薄禄之吏无以养廉，遂致官场腐败之风日甚。

杨琚上言延绥防务 成化二年(1466)三月十八日，延绥纪功兵部郎中杨琚上言延绥一带防务，他认为延绥庆阳二境东接偏头关，西至宁夏花马池，相距二千余里，而营堡兵备俱少，以致鞑靼屡为边患。如若移展现有营堡往北至河套地区，则不但可以御贼于外，亦可使军民得田于内，如此积聚数年，边储渐充，可省去大批开销。而现在鞑靼入寇，掠去钱财无数，朝廷每年又发重兵御之，一年开销即达十五万余两，而且转运之资又难于数计，若以上述一年之费给予边民，使其协力移展城堡，密置墩台，且守且耕，则边患可除。宪宗以为所奏有证有据，即命兵部议行。

土兵之制的设立 成化二年(1466)三月三十日，巡抚延绥右佥都御史卢祥上言：西北一带营堡兵少，而延安、庆阳府州县之边民习见北来之鞑靼，而且大都骁勇善战，若选作士兵，练习调用，必能奋力各护其家。宪宗遂命兵部复奏，部臣奏请敕御史前往二府会官点选。于是延安之绥德州、葭州(今陕西佳县)，庆阳之宁州(今陕西宁县)、环县，皆选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曰“土兵”；其籍为兵者，量免户租。时得丁壮五千余名，委官训练听调。此法对抵御鞑靼入侵行之有效，但后来即渐废弛。

娄芳上言民生事宜 成化二年(1466)四月初四日，巡按河南监察御史娄芳陈言五事：一、广储蓄，乞令河南所属三年六年考满官免其赴部，于缺粮仓分纳米以备赈济。二、息科征，按派祭祀牛犊八十双，黄蜡果品一万七千八百余斤，乞候秋成之日买解。三、薄赋敛，乞敕该部将各王府禄米行令开封等府官仓收贮，近季开支，免致王府人员扰害百姓。四、审户口，河南、徐州、淮安等处因灾而鬻男卖女者甚多，有的甚至被番僧带出境外，乞赎还原籍。另备种子牛具给予耕种。五、减转运。河南成化元年(1465)兑运粮二十五万石，运费高昂。乞量为存留本处粮仓。宪宗令户部施行。

徐廷章上言边务 成化二年(1466)四月二十八日，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徐廷章奏边方事宜：一、选才能以抚藩夷。可选一员在番夷中有威信之官，不分汉夷加以任命，专职抚治，则边境军民可安。二、移边堡以保居人。西宁水沟堡距水源甚远，不如移堡于大路旧站。三、设学校以训边民。夷人性悍，如开设儒学加以培养，则数年间风俗可淳。四、决功赏以激人心。边防将士杀敌立功，造册上报请赏。却数年间不能完报，遂致将士垂首丧气。乞敕如有造报功册到部，应立差给事中御史各一员前往体查访勘，使赏不逾时，则将士必发奋立功。五、任勇智以固封守。甘肃所属庄浪最为重要，而其地守官都指挥佥事赵英守城有余，出战不足。而守备红城子堡都指挥使鲁鉴虽系土官，但素有智勇，所守红城子堡距庄浪七十余

里，非要害之地，请将鲁鉴调回，令赵英协同操练，另选一员指挥守红城子堡。六、广贤路以资任使。请于卫学选优秀者于科举外纳米出身，则人才不遗于边方。宪宗令决功赏任智勇二事立即实施。

杨瑶上言备边之策 成化二年(1466)五月，兵部武选司郎中杨瑶自陕西回京，上疏论备边四事：一、修武备，各营守备军官无事之秋不思操练，致使士气军容不整，请令各卫所军政职官严督。二、恤军余，陕西延绥等边正统末年因寇屡犯边，兵少不足以御，而且守边士卒多有逃亡者。暂令余丁辏数，以后再行更代。其后因边事不断，戍卒逃亡愈多，无人更代，乃令余丁在边与正军一样领马操练，马死则追偿。如此使一户有余丁二三人者艰于供给。乞令各边巡抚都御史给以粮赏。三、慎边报，各边传报声息镇守等官不审虚实，虚张贼以十为百，以百为千，以图有小捷可冒大功。乞令以后应先侦得虚实，然后再行上报，则使所司区处有所凭据。四、公赏罚，各边军士有生擒斩首之功者，其功常被其将领据为已有。乞令各处总兵官严加查处，赏罚分明，宪宗以为其言切于时务，命兵部尚书王复等议行。

李贤奏请征讨河套鞑靼 成化二年(1466)五月二十一日，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等奏：鞑靼人口不过相当于中国之一大郡而已，但却连年扰边，往往得利而去，其原因在于我之兵威未振也。河套地区原非鞑靼巢穴，虽屡骚扰亦不为大害，而今其毛里孩部大举入内，人马俱处其中，而且出没莫测。虽出兵剿之，但我方兵集而彼已退去，兵散未久而彼又复来，如此不但劳师费财，边民亦不得安宁。今欲安边，必须大举而后可也。乞令兵部会官商议，预积粮草于陕西塞下，令陕西延绥宁夏甘凉大同宣府等处守臣选练骑兵，整理军械什物，制造战车拒马，在明春或今秋进兵搜剿，务求一举成功。宪宗以为可行。兵部尚书王复及会昌侯孙继宗集议，以为此计固然良策，但须主将得人，镇守大同总兵官彰武伯杨信熟知地利，宜召还回京面议。遂召杨信回京，并以修武伯沈煜代其职。六月十三日，宪宗敕杨信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统京营兵万人，马一万二千五百匹，神炮百、神枪千，大同骑步兵五千，宣府骑三千，宁夏骑兵二千，往延绥边境会镇守总兵等官剿寇。又敕都督同知赵胜充副总兵，都督佥事湛清充参将，都指挥同各秦杰守备柴沟堡(今河北怀安)，署都指挥佥事许宁充游击将军，令太监裴当监督军务，右少监廖亨监管神枪，另遣户部官一员措置粮草，御史一员禁约纪功。

李绍致仕 李绍(1407—1471)，字克述，江西安福人，宣德八年(1433)进士，选为庶吉士。正统初授翰林检讨。景泰初召充经筵讲官，升修撰。历司经局洗马兼修撰、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讲。天顺初改尚宝司卿兼侍讲学士，擢礼部右侍郎。成化二年(1466)六月二十六日以疾致仕，成化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五。土木之败时，京师戒严，朝士多举家南迁，绍曰：主辱臣死，奚以家为？终不迁家。绍好学问，居官刚正有器局，能奖掖后进。

整饬延绥、大同边备 成化二年(1466)八月初九日，宪宗遣兵部尚书王复整饬延绥边备，左都御史李秉整饬大同边备。王复由陕西延绥至甘肃，相度形势，上言说：延绥东起黄河岸，西至定边营，接宁夏花马池(今宁夏盐池)，索绕二千余里，险隘俱在内地。而境外没有屏障，仅能凭墩堡以守，一旦有事，军反居内，未及行动而民遭掠已尽。又西南至庆阳，相去五百余里，烽火不接，寇至民犹不知，其迤北墩堠，都相距遥远。请移府谷、响水等十九堡置近边要地，而自安边营接庆阳，自定边营接环州(今陕西环县)，每二十里筑墩台一座，共三十四座，随形势为沟墙。如此可以声息相闻，易于守御。宪宗诏兵部议行。李秉至大同后，首先弹劾镇守中官李良、总兵官武安侯郑弘失律罪，军政为之肃然。

蔚能逝世 蔚能(？—1466)，字惟善，陕西朝邑(今大荔东)人。初为吏。以能授光禄典簿，累进本寺卿，升礼部右侍郎，仍掌寺事。后以忤旨调南京光禄寺卿。成化二年(1466)八月二十六日卒。蔚能居光禄寺三十余年，尽心职守，清慎守法，未尝私取一片肉，先后官光禄者皆不及。

廖庄逝世 廖庄(1404—1466)，字安止，号东山，江西吉水人，宣德五年(1430)进士，授刑科给事中，赈灾陕西，有能声，进大理寺左少卿。景泰五年(1454)上疏劝代宗善事上皇，友爱皇储被廷杖，谪定羌驿丞。天顺初召还，调南京，历南京礼部左右侍郎、刑部左侍郎。成化二年(1466)十二月初十日卒，年六十三，谥恭敏。廖庄性格刚坦，好面折人过，实坦怀无芥蒂。一生清慎，及卒之日，几无以为敛。著有《廖恭敏佚稿》。

四川盐井卫地震 成化二年(1467)十二月十四日，四川盐井卫(今盐源)所属沿边的宁夷堡、黑、白二盐井(今云南盐兴县盐丰县)、长剌长官司(今盐边县和云南接壤处)，直到建昌卫的泸州屯(今西昌市)，自成化元年六月至今，昼夜不时地震，共有三百七十五次，而十二月十四日夜间地震最甚。城垣房屋倒塌甚多，地裂及泉，沿边军民惊疑不安。明廷遣人祭告山川。震中烈度(I_0)Ⅷ，震级(M)为六点五

级。

李贤逝世 李贤(1408—1466),字原德,河南邓州(今邓县)人,宣德八年(1433)进士,授吏部验封主事,迁考功、文选郎中。景泰二年(1452)二月上正本十策,劝谕景帝。同年冬,擢为兵部右侍郎,后转户、吏部。天顺元年(1457)六月因石亨、曹吉祥之陷谪福建左参政,未及成行,吏部尚书王翱奏贤可大用,于是复为吏部右侍郎,七月,升为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掌文渊阁事,从而更受石、曹之辈排挤。李贤以对无虚日、忠心耿耿而博得英宗信赖,在惩治石、曹的过程中,李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及门达用事,李贤又屡遭陷害,他仍然力劝英宗行宽恤之政,罢江南织造,清锦衣卫狱,止内外采买。宪宗即位,升为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依然被门达余党匿名诬陷,于是屡请致仕。成化二年(1466)十二月十七日卒,年五十九。李贤一生以持大体、惜人才、开言路、节财用为急务,所荐引之王竑、李秉、程信等皆为名臣。死后赠太师,谥文达。著有《天顺日录》、《莘野纂闻》、《古穰集》等。

鞑靼连年扰边 自从景泰六年(1455)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被杀之后,瓦剌部落逐渐衰落,而鞑靼部在其太师孛来统治下便强盛起来。孛来拥立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号"小王子",其后相互仇杀,麻儿可儿死,孛来又立马古可儿吉思,亦号"小王子"。成化元年(1465)孛来、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抄掠延绥、平凉、灵州、固原以及大同宣府等地。河套土地肥沃,水草丰富,耕牧兼宜,遂为鞑靼扰边的基地,构成明朝中期的主要边患,明政府被迫以大量的财力人力投入边防,但成效甚微。原因在于鞑靼诸部落均为游牧民族,能骑善射,来去匆匆。成化三年(1467)正月,鞑靼内争,孛来杀死马古可儿吉思,毛里孩又杀孛来,新立小王子。但鞑靼阿勒楚部又与毛里孩部相仇,毛里孩又杀小王子,逐阿勒楚部,毛里孩遂成为鞑靼中之最强者。

朱永等率京军进剿鞑靼毛里孩 成化三年(1467)正月,巡抚山西都御史李侃上言:鞑靼毛里孩拥众入境,深为可虑,乞将原议调搜套官军命总兵官杨信统领并大同偏头关等处精兵分为五路:一路偏头关,一路大同右卫(今山西左云北),其余三路分布威远(今山西右玉南)、朔州(今山西朔县)及八柳树堡(今山西偏关西)各城闭营休士,以强示弱,彼若再举入寇,必以精锐部队深入,老弱者守营,势必分散,我军可乘隙袭之,使威远等三路官军截其归途,偏头关并大同右卫二路急捣其巢穴,使其背腹受敌。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亦上陈方略,与兵部会议说,毛里孩当初表示愿意和好,是缓兵之计,现在又大兵压境,虽有杨信等军,恐兵少贼强,猝难应变,非调京营官军征讨,恐遗后患。宪宗得奏,遂于同月二十九日命抚宁侯朱永佩平胡将军印,充总兵官,右都督刘聚充左参将,都督同知鲍政充右参将率京营马步官军二万,敕谕杨信及大同宣府等军马俱听永调用,合力征剿。

清理京营军士 成化三年(1467)二月初八日,宪宗应六科给事中之请诏命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右副都御史林聪、左给事中潘礼、陈越清理京营军士。宪宗说:在京军士大都有名无实,视其名则案牍充盈,实则队伍空虚。开粮之际填塞仓衢,受赏之日溢满禁涂,及至欲收集队伍赴边御敌,累至旬日不能集起数万。这都是因为总兵等官纵之归休,役之私用,其弊甚多,今特命太监怀恩会同尔等按籍查考,除已调往边疆者,将现在军士点清,以十五万之数来报。若仍蹈前非、抗拒不服的,可处以重治。清理之后,仍用良法加以训练,以备调用。四月初六日,马昂、林聪等奏报:臣等共十四万三千九百零九人,俱系京卫外卫现在操练并放班之数。宪宗以其数多,令仍旧分十二营操练。五月十五日,复奏从三营中选出次等官军十八万六千三百七十六人。

靖州苗民起义 成化二年(1466)三月,靖州(今湖南靖县)苗民起义,宪宗诏令湖广总兵官李震前往镇压,义军首领苗虫虾被李震所俘。但义军并没有畏缩,相反,武冈州、沅州、铜鼓卫之五开卫、苗民纷纷加入起义行列。三年二月,李震率军由铜鼓、天柱分四路并进抵清水江,两月间焚毁八百余寨、屋舍一万三千余间,地窖三千余处,得稻粮三万四千余石,俘二百五十余人,杀二千一百余人,起义遂被镇压。成化十一年,苗民重新起义,成化十二年三月,李震会巡抚刘敷率兵分五路前往镇压,攻破苗寨六百二十余,俘斩义军万余人。

沈固逝世 沈固(?—1467),字仲威,直隶丹阳(今江苏)人。永乐间中乡举,授山东沂州(今临沂)同知,屡迁户部员外郎、郎中、山东左参政,正统间为理饷侍郎。瓦剌首领也先拥英宗至大同城下,沈固与霍瑄等出谒,叩马号泣,众持刃叱之,固无惧色,以守边功劳进右都御史转左都御史。天顺间以石亨荐升户部尚书,天顺三年(1459)致仕。成化三年二月初三日卒。沈固在边二十七年,深谙虏情,上下安之。

复开浙江、福建、四川、云南银场 成化三年(1467)三月十六日,内承运库因岁用赏赐之费不足,请于浙江等处旧罢银坑内如例开采。宪宗说,当今军民贫困,开采之数不宜过多,应如天顺二年(1458)之

数(此年此四处银坑岁采银十万零二千两)从省取之。此诏一出,六科十三道皆上言说,当今国家赋急民穷,银坑封闭多年,此复开采未免劳人且遗患地方,乞暂停止。宪宗以采办银课系祖宗旧制,已从减省,不必停止,乃命浙江、福建二处各遣内臣一员往督其事,四川、云南二处即令镇守内臣兼督,不得扰害军民。

严禁民间贩盐 成化三年(1467)三月,巡抚淮扬等处都御史滕昭奏:仪真、瓜洲二处盐贩贩运私盐盛行,南京卫所以及武进等县军民大户常造千料遮洋大船或卖与盐徒,或自行装载,率人于船上摆列军器,张挂黄旗,密通店主牙行,窝藏发卖,甚至劫掠官民船只,杀伤人命,请备圣旨榜文禁约,若不悔改,盐贩及知情店主牙行等处斩,家属发边远充军。宪宗令都察院按滕昭所言发榜文晓谕民间。十月,以私盐多,官盐不通,而准两淮巡盐御史左钰之奏,申明禁盐事例:夹带引盐越境者擒拿追问,买食者依律问断。贩盐至二千斤者发边卫充军。

四川连续发生地震 成化三年(1467)四月初七日,礼部奏说,四川盐井卫所属沿边宁夷等堡及黑白二盐井马剌长官司一直到泸州,自去年六月至今地震不断,共计三百七十五次,而十二月十四日夜震尤甚,毁坏房屋城垣,沿边军民惊疑不安。宪宗遣行人祭告山川之神,以去灾异。

十二营坐营官的设置 成化三年(1467)四月二十日,设十二营坐营官,以平江伯陈锐坐奋武营,都督同知赵胜耀武营,都督佥事王瑛练武营,右都督刘聚显武营,都督同知鲍政敢勇营,都督同知白玉果勇营,左都督和勇效勇营,都督同知马良鼓勇营,都督佥事武忠立威营,都督佥事湛清伸威营,都督同知张钦扬威营,都督剑事李脉振威营,仍令内官一员协理。

徐廷章奏陈边务 成化三年(1467)六月初三日,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徐廷章奏上边务三事:一、足兵食以备战守。甘肃等卫所大约原额旗军七万二千九百余人,今实有四万一千八百余人,逃亡达三万余人。主要原因在于仓粮不足,无法裹腹。请开盐引或赎罪纳米以补足。二、严边令以警人心。严禁各卫以老弱军人输边辏数,军官不许多方推调、托病及受贿。三、量才贤以资任使。宪宗命兵部斟酌施行。

贾铨逝世 贾铨(?—1467),字秉钧,河北邯郸人,永乐二十二年(1424)进士,授刑科给事中,改礼科,继升云南大理知府。时兵部尚书王骥率兵征麓川,贾铨区划有方,馈运有劳。王骥荐之,遂升云南右参政,仍掌大理府事,寻升左参政,正统十二年(1447)以军民上颂及参赞军务侍郎侯琎之请,再迁左布政使,上言免除云南数年所当贡而未贡之马、银、盐、米等物。天顺初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兼巡河南。成化初召还署院事,三年(1467)六月初八日以病卒,谥恭靖。贾铨为官云南,治行为一时之冠,深得百姓爱戴。

商辂建言时政 成化三年(1467)六月十五日,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商辂上言时政八事:一、勤圣政,行足国裕民、安边御寇之道,任贤去奸。二、纳谏诤,臣下之建言可与不可,都不应加罪,三、储将材,行武举之法,广罗将材。四、饬边备,广储粮草,增置墩台器械。五、汰冗滥,使贤者升迁,革去冗滥之员。六、广蓄积,以救灾荒。七、崇圣道,行孔孟之道。八、谨士习,令生员既习学又习射。宪宗嘉其言有理,命所司施行。

封塔儿巴坚赞为赞善王 成化三年(1467)七月二十四日,宪宗诏封灵藏僧塔儿巴坚赞袭封为赞善王。旧例藩僧封王者赐诰并锦绮衣帽等物,再遣官护送至灵藏给授。礼部以今边事未宁,事宜从省,乞惟赐袈裟禅衣僧帽各一,顺付来朝番僧带回灵藏给授。宪宗准行。

宋杰致仕 宋杰(?—1474),字廷英,直隶定兴县(今河北)人。宣德五年(1430)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升光禄少卿,进陕西左布政使,擢左副都御史参赞甘肃军务。天顺元年(1457)左迁山东右参政,改湖广,寻升右布政使。成化初仍以左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等府,成化三年(1467)八月初五日致仕,十年四月十八日卒。

俞纲致仕 俞纲(?—1478),字宗立,浙江嘉善人。正统初由诸生缮写《宣宗实录》,试中书舍人,授郕王府审理。景泰初升太仆寺寺少卿,再升兵部右侍郎入阁,参预机务。转左侍郎,加升太子少保。英宗复辟,被革太子少保,调南京礼部左侍郎,成化三年(1467)八月初六日被劾罢。成化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卒。

卢祥致仕 卢祥(1404—1468),字仲和,广东东莞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南京礼科给事中,改吏科,以言事谪蒲州通判。天顺初擢礼科都给事中,章疏多见听纳。后以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成化三年(1467)八月初六日劾罢致仕,成化四年八月十二日卒,年六十六,著有《行素集》。

《英宗实录》修成 天顺八年(1464)八月十六日,宪宗命纂修《英宗实录》,以太保会昌侯孙继宗为监修等官,吏部尚书李贤、翰林学士陈文、彭时为总裁官,吏部侍郎李绍春、侍讲学士刘定之、南京国子

监祭酒吴节为副总裁，率纂修官柯潜、万安等同修纂，至成化三年(1467)八月二十四日纂成。《英宗实录》共三百六十一卷。宝训十二卷，目录、凡例加正文共三百七十五册。起宣德十年正月，讫天顺八年正月，首尾三十年。附景泰帝事迹于中，凡八十七卷。监修、总裁、纂修官，各升赏有差。

叶盛上言边务 成化三年(1467)九月初二日，巡抚宣府右佥都御史叶盛上言边务：一，难民被鞑靼俘获逃回者，例送御马监充勇士，否则遣回原籍，因此而有不堪忍受而复回鞑靼营中者，今后发回原籍者应免其差役。有带马而回者，马听其自卖而不必进奉。二，诏书凡民年八十以上者，所司每年给予布绢绵米酒肉，九十以上者给予冠带，而从军者却无此礼遇，乞请一视同仁。宪宗说，中国人不幸陷入虏手，既而来归，其情可嘉；八十、九十岁以上者礼遇当无军民之分。叶盛所言有理，宪宗遂命所司详议。

杨渠上言缉捕扬子江盐犯 成化三年(1467)九月二十三日，南京济川卫署都指挥佥事杨渠上言三事：一、造战船以御折冲，须造多桨船，有风则众帆齐举，无风则众桨并发，船上旁立遮洋，中有敌台，暗设伏兵于内，造成五十至七十艘给予巡盐官军领驾，遇警可以围集杀贼，无事可以沿江操习。二、制利器以振威武。扬子大江，盐贩纵横出没，非犀利兵器不足以御之，乞制造八头担竿等兵器给予操江官军使用。三、选精锐以备策用，现在南京操江官军仅有万余，而且逃亡老弱者居多，今欲往来擒捕，必得精锐士卒。请于江淮济川等卫拣选熟悉水性地理之旗甲与官军共同巡捕盐贩。宪宗命兵部与南京守备斟酌施行。

明军征讨建州女真 建州(今吉林通化)女真部生活在沈阳至朝鲜北部地区，明中期以来屡次犯边。成化三年(1467)五月二十五日，宪宗诏封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军务，武靖伯赵辅为靖虏将军总兵官，率兵征讨建州女真部。九月二十四日，明军分左右哨五道各万骑从抚顺关出塞，至十月三十日，明军攻至建州，大获全胜，共擒九十九人，斩五百三十六人。朝鲜也遣中枢府知事康纯率万人协助明军作战，擒二十余人，斩三百余人。

增贵州取士名额 成化三年(1467)十月，巡按贵州监察御史周源上奏：贵州士子赴云南乡试，跋山涉水达二千余里，而解额只有十人。但贵州与广西同为荒服，而广西取士至五十余人，乞照广西增贵州解额。十一月十二日，贵州左布政使萧俨等官再奏：云贵二布政司儒学共五十余所，而科额共三十名，贵州只有十名，宜量增数以励士风。礼部覆奏，准乡试举人量增十名，其中贵州六名，云南四名。

王翱逝世 王翱(1384—1467)，字九皋，直隶盐山(今河北盐山)人，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左迁行人。宣德元年(1426)为杨士奇所荐擢御史。正统初升左佥都御史，镇守江西。惩贪抑奸，吏民畏爱，寻又理盐法于浙江，宣德四年督兵务于四川松潘，平抚农民起义，宣德六年代陈镒镇陕西，军民借粮不能偿者，悉令免之。宣德七年冬，提督辽东军务，大力整饬边备，修缮屯堡，筹措军饷，军民大悦。宣德八年进右副都御史，宣德十二年率兵击败兀良哈卫犯边之寇，进右都御史，宣德十四年再迁左都御史。景泰三年(1452)召还掌都察院事，复又总督两广，四年召为吏部尚书。成化元年(1465)进太子太保，成化三年七月致仕，十一月初六日卒，年八十四，赠太保，谥忠肃。王翱自奉俭素，门无私谒，家无余赀。官吏部，多方荐举人才，数历中外，俱镇静不烦，方严质直。为一代名臣。

董山伏诛 董山系明正统、成化时期建州女真部的主要首领，曾被明廷册封为建州左卫都督。自成化初年以来，建州卫屡次犯边，明廷多加诏谕均无济于事，成化三年(1467)四月二十八日，董山等来京进贡，五月二十九日，明廷赐宴董山等并送其还家，董山出言不逊，大骂不已，返程到边关后被提督军务左都御史李秉所拘，李秉请先遣其家属回去，告知其部归还所掠人等财物，宪宗允准。后明军大举征讨建州女真，并获全胜，李秉奏言：若董山复归，则边患必大，请即诛杀。宪宗准奏。十一月二十三日，遂诛董山，并戍其余党至福建、广东。

许彬逝世 许彬(1392—1467)，字道中，号东鲁，山东宁阳人，以举人选入翰林译字，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改庶吉士，历任检讨编修修撰，正统末，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英宗将从瓦剌还国，明廷遣许彬至宣府奉迎，英宗命彬书罪己诏及谕君臣敕，并代祭土木之役阵亡官军，以此受知英宗，还擢太常寺卿。英宗复位，进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直文渊阁。不久，为石亨所忌，调南京礼部右侍郎，未行，再贬陕西参政。宪宗即位，命以侍郎致仕。成化三年(1467)十二月十五日卒，年七十六，赠礼部尚书，谥襄敏。

梁珤逝世 梁珤(1392—1467)，字惟善，河南汝阳县人，保定伯梁铭之子，宣德乙卯(1435)袭父爵位。正统末，福建邓茂七起义，命梁珤充副总兵前往镇压，告捷之后班师，未几义军余部重新起事，梁珤因此被谪充为事官，后从石亨而有功，复爵位。景泰元年(1450)拜平蛮将军，前往镇压贵州苗民起义，

斩杀数千义军，论功进保定侯。景泰四年又前往湖南镇压苗民起义。天顺元年(1457)出镇陕西总兵，在凉州大破鞑靼，天顺七年后召还理左府事。成化三年(1467)十二月十六日卒，年七十六，赠蠡国公，谥襄靖。

广西黄公汉起义　成化三年(1467)冬，广西人黄公汉率思恩、浔州二府农民起义，提督两广军务左副都御史韩雍命按察佥事陶鲁与参将夏鉴等前往镇压。黄公汉率义军退至石康(今广西合浦)，逮知县罗绅，劫其县印。后被陶、夏败之于石康邻境六菊山，义军被杀一百九十余人。

扬州盐贩起事　成化三年(1467)，扬州盐贩聚众起事，当地守军失利，宪宗诏命南京佥都御史高明讨之。高明令造巨舰，名曰"筹亭"，往来于杨子江上督战，并于江边建造堡垒候望，盐贩无从藏匿，遂被平定。成化四年八月，再命锦衣卫指挥佥事冯珤缉捕沿江盐贩。时贩盐者连数十艘船，杀死巡江千户及巡江官兵二十四人，宪宗敕冯珤会同高明及总督成山伯王琮严加缉捕。

清理两淮盐法　成化四年(1468)二月十七日，宪宗敕户部诸臣说，边卫粮草不敷使用，皆因盐法废弛，弊出多端所致，今后内外官员之家不许占中盐引，侵夺商利，亏损诸边，其两淮等处盐法，今遣太监王允中、佥都御史高明前往整治，户部须将兴利革弊之事逐一斟酌以闻。于是户部奏清理之法：一，京城内外官员不许占中盐引。二，各缺粮草之处不许予开盐课。三，辽东各仓开中盐课中未纳者限六个月完成。四，两淮盐课利大，所以人多趋之，请存成化三年(1467)盐课，待充边备。五，请照整理两淮盐例清理两浙、山东、长芦(今河北沧州)盐法。六，令盐课司官吏不得作弊受贿。七，不许官豪之家占据贫穷之户之盐课。八，灶丁剪办正课之余盐一律照例送官，不许走私。九，淮浙盐场有上中下项，以分拨起讼，令所司搭派，恐年久复有前弊，请盐法官及巡盐御史查禁。十，河东岁额盐课三十四万四千引，可得银十七万余两，但其盐为蒲解等州县(今山西永济运城一带)人及流民窃取，以致私盐盛行，官盐价贱，宜力行缉捕。宪宗命揭榜示众，两浙山东长芦等地俟两淮事毕再行清理。

诏令中外势家不得擅请田土　明中期正统末到成化初，剧烈的土地兼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皇亲、勋戚、中官及番僧通过赏赐、乞请、侵占等方式大肆掠夺土地。成代三年(1467)，番僧扎实巴乞静海地为常住田，嘉善公主求文安地数百顷，德王请寿张地四千余顷，宪宗皆予。成化四年三月，户科给事中邱弘等上言：国初，山东、北直隶土旷人稀，太祖太宗屡颁诏许民耕种，永不科税。而现在权豪势家，随便指地为闲田，乞请至数十百顷。地逾百顷即是百家之恒产，民生衣食之本，岂可循一人之私而夺百家之恒产呢？乞收前命还给下民，痛革往弊。宪宗纳其言，下诏：自今以后请乞皆不许。著为令。但时过不久，太后之弟庆云伯周寿即违禁求涿州田六十余顷，宪宗又开此例允准。自是勋戚效尤，接踵而来，翊圣夫人刘氏求通州、武清县地三百余顷，周寿弟长宁伯彧求武强、武邑地六百余顷，皆给予。复有给事中李森疏谏，宪宗不复省悟。成化五年八月，周彧又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赋额者籍为闲田。诏遣官按视，皆民所垦辟输赋之田，便据籍步量之，每亩百步，余没入闲田，得七十余顷，周彧不满。宪宗命刑部郎中彭韶、监察御史季琮覆勘。韶、琮不复步田，但言民产不应夺。周彧上疏自劾说不忍夺小民衣食。宪宗诏以田归民。又责彭韶等邀名，竟下狱，言官申救方得获释。

分设广东、广西巡抚　成化四年(1468)三月二十七日，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左副都御史韩雍上奏：两广地大事繁，一人不能遍历各地，乞各增文职大臣一员分巡两广。宪宗批准，乃命韩雍仍以督都专理军务，巡抚官则命兵部会同吏部推举堪任者。于是尚书李秉、白圭合举广东左布政使陈濂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广东，福建按察使张鹏为左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成化五年十一月，佥事陶鲁上言认为两广不可析离，宜仍命大臣一人总之。遂罢两广巡抚，仍以韩雍总督两广事务，于梧州设府，遂为永制。

加番僧封号　成化四年(1468)四月，番僧得幸于宪宗，遂封答巴坚赞为"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扎实巴为"清修正觉妙慈普济护国衍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锁南坚参为"静修弘善国师"，端竹也夫为"净慈普济国师"，俱敕诰命，其服食器用可与王比，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仗为前导，达官贵人皆为避路，每召入宫诵经咒，赠予骈番。至于其徒加号"真人"、"高士"者达几千人，佞幸由此更进一步。

陈文逝世　陈文(1405—1468)，字安简，号斐斋，江西庐陵(今吉安)人，乡试第一，正统元年(1436)进士及第，授编修，正统十二年命进学东阁，秩满迁侍郎。景泰二年(1451)擢云南右布政使，时贵州用兵，资饷云南，民困于转输，文令商贾代输，民倍偿其费，双方为之称便。因治云南而名声日大，再迁广东左布政使。英宗复位，召文为詹事，入侍东宫讲读。天顺七年(1463)进礼部右侍郎兼学士，入内阁，

与李贤相恶。成化初，改吏部左侍郎，同知经筵事，未几进礼部尚书。《英宗实录》成，以总裁官加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成化四年(1468)四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四，赠少保，谥庄靖。

刘孜逝世 刘孜(1411—1468)，字显孜，江西万安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御史，出按辽东。景帝即位，力排南迁之议。再按畿辅，擢山东按察使。天顺四年(1460)，吏部举天下治行卓著者，按察使只有刘孜一人，迁左布政使，天顺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南十府，上疏罢民之重赋，百姓称颂。成化初迁南京刑部尚书，以严为治，官吏畏惮。成化四年(1468)六月十一日卒，年五十八。居官廉慎，治事精密，号称能臣。

朱骥等奏言禁盗安民 成化四年(1468)六月十二日，锦衣卫指挥朱骥同巡城御史胡靖等上言禁盗安民：一，设军马，京城地域辽阔，强贼多骑马，而巡捕官军因步行不能追捕，宜于京城四路各差千百户一员率马军三四十名分两班轮流巡视。二，增夫役，不分官吏旗校匠役之家俱应轮流守望。三，责典守，乞敕总兵官操官队官员对下属兵士严加管束，不许纵容为非作歹。四，禁淫祠，不许良家妇女为娼，违者枷项示众。五，究容隐，不许教坊司官容隐歹徒，违者一并追究。六，清铺舍，各城设立铺舍以防奸盗，但需查斟设立增并。诏下该衙门，多从其言。

满俊起事 满俊，又名满四，其祖父巴丹在洪武初率所部归附明廷，授千户，居开城，以畜牧为生。成化四年(1468)六月十一日，满俊率众起事，自署"招贤王"，数月即聚众数万，关中震动。宪宗诏令陕西总兵官守远伯任寿、巡抚都御史陈价前往征讨。任寿、陈价会宁夏总兵官广义伯吴琮以兵三万进讨，大败而归，都指挥蒋泰、申澄被杀，任寿、陈价被罢官下狱。满俊收拾官军器甲，入据距固原州西北一百零五里的石城。石城异常险固，山上有城寨，四面峭壁，只有一条路可上。七月，宪宗诏命都督同知刘玉为平虏副将军，太监刘祥监军，巡抚陕西右佥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率兵三万六千人围剿石城。十月，项忠等攻克石城山北、山西、山东诸峰及石城东西二门。十一月，经大小三百余战，满俊中诱被擒，起事失败。成化五年二月，满俊伏诛。

皇太后钱氏逝世 成化四年(1468)六月二十六日，皇太后钱氏死。钱氏深得英宗厚爱，英宗临死遗言钱氏死后与己合葬，至是，周太后与其子宪宗均不同意。阁臣李贤、商辂、刘定之均表示愿践英宗遗言。二十七日，廷臣四百一十七人亦上疏宪宗，二十八日，礼部尚书姚夔与诸大臣再疏，宪宗仍犹豫不决，于是给事中毛弘倡言说，此大事，当以死争。给事中魏元偕同官三十九人，御史康允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伏哭于文华门外，声言不得旨即不退，自巳时至申时(早九时至下午四时)，宪宗方允钱太后与英宗合葬。

夏时逝世 夏时(？—1468)，字以正，钱塘人。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授户科给事中。洪熙初力言改钞法之弊。宣德初，命署尚宝司，兼理吏、礼、兵、刑四科。擢江西佥事，曾进知州柯暹所撰《教民条约》及《均徭册式》，刊为令，人皆称便。正统十二年(1447)超擢广西左布政使，前后所上十余疏，虽不能尽用，天下壮其敢言。成化四年(1468)九月二十五日卒。

斥罢听选官 成化四年(1468)十月，御史康永韶等奏请吏部从公考覆两京官员，斥罢年老体弱及才能平庸者以消天灾，宪宗依从。十月初八日，吏部尚书李秉锐意澄清仕路，分别考核监生八千余人，斥罢三百余人，多为大臣之乡故。五年正月，吏部再奏罢浙江等十三布政司按察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县来朝并在任官二千五百零六员，命疾者致仕，才能平庸及素行不谨者冠带闲住，贪暴者为民。谤议纷起。

朝鲜国王李瑈逝世 景泰三年(1452)秋，朝鲜国王李珦卒，明廷册封其子弘韦为王。弘韦在位三年，以年幼且有病，请以其叔瑈掌国事。七年弘韦上表逊位，明廷乃封瑈为国王。李瑈在位十三年，与明廷关系密切，经常遣使臣来贡。成化四年(1468)十一月十二日李瑈卒，宪宗赐谥惠庄，遣太监郑同、崔安往封其世子晄为王，给其妃韩氏诰命。巡按辽东御史侯英就此事上奏说，旧制遣册封正、副使皆于翰林院中选有学行文望者允任，况今所遣同、安二人俱系朝鲜人，坟墓宗族皆在其地，见其国王，未免屈节，有渎中国。乞寝成命，或翰林或给事中及行人内选一员充使。宪宗从之，命今后册封正、副使不遣内官。著为令。

李秉致仕 李秉(？—1489)，字执中，山东曹县人，正统元年(1436)进士，授延平推官，迁都察院经历，寻改户部主事。宣府屯田为豪强所占，秉往视，归田于民，两淮盐课有弊，秉往覆搜出伪印，使冤者得白。景泰元年(1450)进郎中，景泰二年擢为右佥都御史兼参赞军务督饷宣府，鼓励屯作，库储充裕。景泰三年兼理巡抚事并提督军务，大力整饬边备，所上奏章多被采纳。天顺初，因罢巡抚之官改督江南粮储，未几会廷议复设巡抚，乃巡抚大同，后英宗斥其专权而被削官为民，居家三年被起复故官。宪宗立，进右副都御史，未几召拜左都御史，成化二年(1466)

奏诏整饬大同边备。成化三年，命为总督与武清赵辅分五路出塞征讨建州女真，大捷而归，加太子少保。同年冬擢为吏部尚书，锐意整顿吏治，斥退平庸贪暴及年老之官，因而得罪众臣。成化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宪宗令其致仕，革太子少保。时天下学子会试于京，皆为李秉鸣冤。居家二十年，多人荐其起复，不为所动，弘治二年(1489)五月卒，赠太子太保，谥襄敏。

岳正致仕 岳正(1420—1474)，字季方，号蒙泉，直隶顺天人，正统十三年(1448)会试第一，赐进士及第，授编修，升春坊右赞善改修撰。天顺初，因弹劾曹、亨专权而被贬钦州(今广西)同知。因再被奸臣所诬、复下锦衣卫狱，杖百，戍肃州(今甘肃酒泉)。曹、亨被诛乃得为民。宪宗立，复修撰职，充经筵讲官，纂修《英宗实录》。成化元年(1465)四月，出为兴化知府(今福建莆田)，成化五年闰二月十四日致仕，成化十年卒，年五十五。嘉靖中，追赠太常寺卿，谥文肃。有《蒙泉类博稿》存世。

刘定之逝世 刘定之(1409—1469)，字主静，江西永新人，正统元年(1436)进士，授编修，进侍讲，景泰三年(1452)升司经局洗马，景泰七年迁右春坊右庶子。天顺改元调通政司左参议，仍兼侍读，寻进翰林学士。宪宗立，进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直经筵。成化二年(1466)入文渊阁参预机务，进工部右侍郎，成化四年进礼部左侍郎，五年八月初十日卒，年六十一，赠礼部尚书，谥文安。著有《易经图释》、《否泰录》、《宋史论》、《刘文安公诗文集》等。

吴与弼逝世 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江西崇仁人。自小即无意仕进，一生讲学家乡，晚年受知于朝廷，屡征不就。学宗程朱，注重"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做到"贫而乐"。曾言宦官、佛事当除，天下之治可为。名学者胡居仁、陈献章均出其门下。学者称康斋先生。成化五年(1469)十月二十七日卒，年七十九。著有《康斋文集》、《日录》等。

陆祥逝世 陆祥(?—1469)，无锡人。以石工荐营膳所丞，历郑藩工副，累迁工部主事、郎中、右侍郎。成化五年(1469)十二月初二日卒。有异技巧思，尤精于刻镂。

秦崇上言时务 成化五年(1469)十二月二十五日，兵科给事中秦崇上言时务：一、省无益以实边费，省下无益之开支充实边备，体恤士卒之辛苦。二、公轮操以便下情，天下官军有轮操京师的，有更戍边地者，而各处守城官军安坐而食，戍边士卒辛苦万状，请多分班次。以三年为限，二者互为更代。三、重名器以节粮饷，工匠勇士不宜授以职官，纳粟军职不宜世袭。四、资长策以安边方，令各处守臣习知边事，做到有备无患。五、恤贫民以行实惠，令各处修复养济院，以收养孤贫，多方储粟以备荒欠。六、正流俗以汰异端，请尽毁新造寺观，不得私自剃度，妇女不许为尼。吏、礼、兵三部议秦崇疏言有理，但各处城守官军多系老弱，恐难尽戍边之责，而工匠勇士已授职者一旦罢去不近人情，宜自今勿复授。议上宪宗皆从。令纳粟军职止袭子孙二世。

朝鲜国王李晄卒 成化六年(1470)二月初二日，朝鲜国王李晄卒。因其止有一子，年幼而且有病，所以乃传王位于晄之兄暲之子娎。遣使来告并献马及方物请封，宪宗乃命内官金兴、行人姜浩前往吊祭，赐晄谥襄悼，封娎为王，其妻韩氏为王妃并赐诰命。

诏令筑城守边 成化六年(1470)三月十二日，巡抚延绥等处左副都御史王锐上言边事：一、增兵以守地方，宜于榆林添设三卫，镇羌(今陕西神木)、安边(今甘肃环县西北)二营各设一卫，增兵马防守。二、设险以备边患，榆林一带营堡之空隙之地宜筑为边墙以为拒守，虽暂劳人力但得以永为边备。三、团堡以为民生，于居民所聚之处筑为寨堡，务必坚厚，则寇无从剽掠。宪宗说，添筑城堡正系守边急务，令镇守等官参酌举行，务期成功。

遣使分巡州郡 成化六年(1470)二月二十二日，兵部尚书白圭等上言：陕西屡遭寇掠，加以官府酷虐，百姓辗转流徙，困苦已极，倘不加赈恤，恐民饥盗起。况四川、两广之乱未息，福建、浙江病疫流行，四方灾异频发，荆襄流民动以数十万计，衣食所迫，奸盗由之，不可不防。乞命两京贤能大臣循行天下，考核政事得失，黜罢不才官吏，询究军民利病，罢害兴利。宪宗得奏，遂命刑部左侍郎曾翚往浙江，户部左侍郎原杰往河南，右副都御史滕昭往福建，南京右佥都御史吴琛往四川，南京大理寺卿夏时正往江西，大理寺少卿宋旻往大名等府，待秋成无事之后回京具奏。南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湖广、荆襄、两广、贵州俱有巡抚都御史，而云南多系土官，均不必遣使。

申明铨选考课禁约 成化六年(1470)三月二十日，宪宗根据吏部尚书姚夔奏疏，申明铨选考课禁约：一，旧制在外衙门大小官三年、六年考满赴部考核，九年通考以定升黜。近来多有畏避者，或假以差占，或就彼纳米，以致考课之法废弛。自今除边方军马钱粮紧急官员考满申请外，其余务依例三考给由，虽有专责差占及奉例纳米者，三年六年之间亦须一次赴部考核，托故者究问，规避者黜降。二，旧制选授

在外官随即领凭赴任，近年选后多潜住琼城，一两月不辞朝出城，或揭借财物置办衣装，娶妻买妾，又有假道回家三五月者。自今选后限五日赴科画字领凭，除有敕人员并京官赴外任者。俱不得过一月，其余若延过半月之上不辞朝出城者，经鸿胪寺及各城门查出，送法司问罪，复入城潜住者改降别用，过一年之上者革职为民。三，旧例各处土官袭替该都布按三司堂上官，体勘会奏，近年各委官不行亲诣转委属官，取勘迁延。自今各司原委堂上官务照例亲诣所在，勘实具结本司缴奏，不得转委属司，违者治罪。四，各处巡抚巡按官遇有司府州县等官告称老疾不堪任事者，依例就地放免，吏部无从查考。自今务要奏上以凭查考。

征讨鞑靼 成化六年(1470)三月二十三日，宪宗命抚宁侯朱永佩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都督刘玉刘聚充左右副总兵，太监傅恭顾恒监军，右副都御史王越参赞军务，以京兵万人，宣府大同兵各五千人往延绥征讨鞑靼，并命延绥宁夏总兵巡抚等官悉听朱永调动。七月，鞑靼数万人自双山堡分五路入寇，朱永等击却之，鞑靼弃辎重而逃，至牛家寨与都指挥吴瓒相战，吴瓒兵少被围。都督刘聚、神英率大兵解围，斩鞑靼一百零六人，获马牛数千，鞑靼首领阿勒楚尔中箭而逃。此役虽斩获不多，然诸将都力战追敌，边人以为数十年所未曾有之事。成化七年三月，朱永、王越分兵五道，在怀远堡、威武堡再败鞑靼，斩敌一百七十余人。朱永、王越等上言：鞑靼以数万兵出入边塞，而我军堪战者不及一万，又分散防守，怎能御敌？建议发大兵搜套，以为长久之计。兵部以马瘦饷缺，命诸将分兵守御，以图万全。搜套之议阻不能行。此后鞑靼扰边数十年，以为边患。

定乌思藏入贡之制 成化六年(1470)四月初五日，工部奏：四夷朝贡人数越来越多，每年所造衣币赏物不敷使用，宪宗命礼部议减各夷入贡之数。礼部尚书邹干等言：各夷来贡次数均已有定例，惟乌思藏没有，乃定乌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三年一贡，每王遣使百人，多亦不许过一百五十人，由四川入。国师以下不许贡。长河西、董卜韩胡二长官司可隔年入贡，不许过百人，茂州番僧岁许三五十人，其它近乌思藏者，亦不计过五六十人。降敕各番王以示。另令四川镇守等官要委官专门审办，有印信文字者方许放入。

数地发生水灾、旱灾 成化六年(1470)四月，南直隶数县发生水灾，五月，京师、山东、河南大旱，夏麦无收，秋粮不能播种，六月，顺天府、河间府、永平府复又大水，如此旱涝相接，民食草木几尽。八月，宪宗下诏天下，命免各灾区所欠税粮、马匹、子粒、食盐以及各项杂役，赦免囚徒，诏令各地有司尽力赈抚、以免生事。

霍瑄逝世 霍瑄(？—1470)，字廷璧，陕西凤翔人，由乡举入国学，授大同通判，擢知府。诏加山西右参政，仍掌府事，能体知百姓疾苦，质朴勤事，熟知边情。英宗复位，进工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因不能检点，为言官所劾，成化初致仕，成化六年(1470)五月初二日卒。

京师饥荒 成化六年(1470)五月，京师大旱，六月，顺天等府大水，如此旱涝相接，导致京城严重缺粮。九月，大学士彭时奏请发仓储五十万石平粜，至成化七年三月，又复增三十万石。但无济于事，民多被饿死，宪宗诏令于城外挖尸坑掩埋，并令病者委官收恤，军余匠役给所亲收养，余者送入养济院抚视。两次遣数百国子监生返家乡，并驱逐在京游僧。

陈泰逝世 陈泰(1414—1470)，字吉亨，福建光泽人，举乡试第一，除安庆府学训导。正统初擢御史，巡按贵州，再按山西、山东。三为巡按，惩奸去贪，威名远扬。正统九年(1444)擢四川按察使，被诬逮刑部狱，景帝即位获释赦复官，于谦荐其守紫荆关，瓦剌首领也先入犯而失关，景帝免其死。景泰元年(1450)擢大理寺右少卿，都督同知刘安巡保定诸城，命泰以右佥都御史参其军务，景泰三年兼巡抚保定六府，寻命督治河道，自仪真至淮安，浚渠一百八十里，堵决口九个，筑坝堤三个，动用六万人，数月完工。景泰七年移抚苏、松。天顺初巡抚四川，天顺八年(1464)进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诸府，成化元年(1465)十月十七日致仕。成化六年(1470)六月十二日卒，年六十七。

奢靡之风不止 成化六年(1470)，奢靡之风日甚。宪宗专宠万贵妃，中官梁芳、陈喜争进淫巧，奸人屠宗顺辈日献珍异宝石，宪宗动辄以厚礼酬报，甚至有因此而得官的，以至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争相仿效。给事中邱弘等上疏论其罪，请追还赏金，逮屠宗顺论罪，收没其家产以赈饥民。宪宗不许，仅申明禁约，违者论罪，便终究不能禁止。当时京师大旱欠收，而四方游僧竟以万计聚京，弘请驱逐以省冗食，又请纵放在京百兽房及清河寺所育珍禽异兽以省去不应有之开支。宪宗不为所动，奢靡之风更盛。

夏昶逝世 夏昶(1388—1470)，字仲昭，昆山人。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改庶吉士，授中书舍人。宣德中转考功主事。正统十年(1445)升瑞州知府。景泰元年(1450)升太常寺少卿，天顺初升卿致仕。成化六年(1470)八月十四日卒，年八十三。工于诗文书

法，功力不凡。

顺天、保定等府水旱灾 成化六年八月，顺天、河南、真定、保定四府在水、旱灾伤之后，米价腾贵。外州县饥荒尤甚，村落人家有四五日不举烟火，闭门困卧待尽的，有食树皮草根及因饥疫病死的，有鬻妻只夫卖儿卖女的。

孙镗逝世 孙镗(1392—1471)，字振远，东胜州(今内蒙托克托)人，袭济阳卫指挥同知，进署指挥使。正统末，擢指挥佥事，充左参将，参加镇压浙江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景泰初，擢都督佥事，典三千营，也先入犯时进右都督，率兵与也先部大战，颇有所获。景泰三年(1452)充副总兵镇守大同。英宗复辟，孙镗以夺门功封怀宁伯。曹吉祥、曹钦谋反，孙镗率兵与之战，擒曹钦，论功进侯，仍典三千营。后削因夺门而封爵者，镗以捕曹钦功而免。宪宗初罢官闲住，成化七年(1471)正月十五日卒，年八十。赠涞国公，谥武敏。

复设九江苏杭钞关 九江、苏州、杭州钞关设于宣德年间，成化四年(1468)罢设。成化七年二月初九日，户部以京库岁用钞不足，遂议复设。

竹木榷税 成化七年(1471)三月初五日，工部尚书王复以在京盖造公署造成供应器物及在外料造运船费用缺乏，建言添官分往直隶太平之芜湖、湖广荆州之沙市、浙江杭州城南三处，专理抽分竹木，变卖银两，解部以为营膳之费。初止取钞，后易以银，渐增至数万两。此举使商贾利益大受损害，怨言不已，但终不能免。

张谏逝世 张谏(？—1471)，字孟弼，应天府句容县人，由进士授行人，擢监察御史，景泰中提督北直隶学校，天顺元年(1457)调官于南京，寻升河南按察司副使，天顺八年召为顺天府尹，多次上疏请减征料以解民困。成化二年(1466)因与人不和而被谪山东莱州府知府，因有治绩，成化四年复召为太仆寺卿。成化七年(1471)五月十六日卒于官。

张睿逝世 张睿(？—1471)，字志通，河南鄢陵人，宣德五年(1430)进士，授吏科给事中，升都给事中，未几，拜户部右侍郎，提督内外仓场粮草。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犯京，奉命搬运通州城外粮草入城，力保不失。景泰中转左侍郎，天顺中升本部尚书，在官七年致仕。成化七年(1471)五月十六日卒。

孙贤致仕 孙贤，生卒年不详，字舜卿，河南杞县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第一，授修撰，侍经筵。成化六年(1470)预修《英宗实录》成，进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迁侍读学士，掌院事。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引疾致仕。卒年五十四，谥襄敏。

漕粮长运法的制定 宣德年间，平江伯陈瑄议定漕粮兑运法，与以前之漕粮支运法参行。"支运法"指民将粮运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水边四仓，交收运官分派官军转运于通州、天津二仓，往返经年，民多受累。"兑运法"系周忱巡抚江南时议以民运粮储俱于瓜洲、淮安补给脚价，兑于运军，自此变为兑运，而支运者少。成化七年(1471)九月，应天巡抚滕昭议变瓜洲、淮安兑运为长运。"长运法"系指运军直接到江南水边交兑，加损耗外，再给米作为渡江之费。户部以为此法官民两便，请准施行。

刘安逝世 刘安(？—1471)，字文理，直隶宿迁县(今属江苏)人。广宁伯刘荣子，袭爵。正统十四年(1449)与郭登守大同，瓦剌首领也先拥英宗至城下，安出见伏哭，并持金帛犒也先，景帝降敕切责。安驰至京，群臣交劾，左迁都督同知，寻复爵。天顺初进侯，复以功加太子少傅，命掌神机营兼理右军都督府事。成化七年(1471)九月初十日卒，追封峄国公，谥忠僖。

刘玉逝世 刘玉(？—1471)，字仲玺，河南磁州人，先为曹吉祥家仆，后从其外出打仗，得授副千户、积功至都指挥佥事，天顺元年(1457)以夺门功进都督佥事，参与镇压贵州苗民起义，进右副总兵镇守贵州，曹吉祥卒，谪海南副千户。天顺六年复原官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进都督同知。成化四年(1468)，充总兵官征讨满俊，以功进左都督，掌右府事。六年充副总兵至延绥征讨鞑靼，成化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卒，赠固原伯，谥毅敏。

徐瑄逝世 徐瑄(1412—1471)，字子敬，号野庄道人，嘉定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监察御史，出按川广有声。天顺初擢右佥都御史巡按延绥，治绩卓著。天顺八年(1464)以疾致仕。成化七年(1471)十一月二十九日卒。

彭时建言修德安民之要 成化七年(1471)十二月十三日，大学士彭时建言修德安民之要：一，请勿迷惑佛事，浪费钱财、二，传皇上圣旨宜专委司礼监，毋令他人以防诈伪。三，延见大臣以议政事、四，近幸赐予太多，工匠冒官无纪，而重囚死徙者法不蔽罪，宜戒淫刑滥赏、五，虚怀受谏，勿恶切直、六，为官者凡政令失当，宜直言论处、七，清理牧马市地，减退势家庄田。宪宗嘉纳。

宪宗召见阁臣 成化七年(1471)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彭时等上言：天象垂戒，古今罕见，而外人不知皇上忧勤在心，私下议论遇此灾变，竟视如平常，还不能降颜一接臣下，询访民情。臣等欲于明早朝退，诣便殿请见，一以宽

圣心,一以息群议。十七日早朝毕,宪宗往文华殿,召辅臣彭时、商辂、万安等入见。未进殿之前,中官都面有惧色,对彭时等说:皇上初次来文华殿,情绪不佳,不要多说,等到下次召见时再详言。及入,彭时言:天变可畏。宪宗说:已知,卿等宜尽心。彭时又言:昨御史有疏请减京官俸薪,在文臣可,在武臣不可。宪宗说:知道了。万安即顿首呼万岁。彭、商不得已,皆叩头退下。中官乃戏朝臣说:初恨不召对,皇上召见,无奇谋至计,只知呼万岁而已。此事传出,因笑称"万岁阁老"。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宪宗在位二十三年中唯一的一次召见阁臣。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尹直入阁,欲请见宪宗计事,万安制止说:君不闻彭公吗?请召对,一语不合,辄叩头呼万岁。今吾辈每事尽言,太监择而奏闻皇上,皇上没有不答应的,比面对好多了。

安南攻占占城 安南(今越南)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自明立国之后,一直保持着与明政府的友好关系,不时遣使来贡。成化七年(1471),安南国王黎灏令占城向其进贡,占城不从,黎灏遂发兵破其国,俘其国王盘罗茶全及家属五十余人。盘罗茶全之弟盘罗茶悦逃山中,遣使至京告难,兵部认为应当遣使往谕黎灏还占城王,以扫安南跋扈之志。宪宗遂于成化八年命给事中陈峻、行人李珊前往以封盘罗茶悦为王,及行至占城新州港,守者拒其进入,方知占城已被改为安南的交南州。不得已而还朝。后安南又遣兵俘盘罗茶悦,占城灭亡。

王越率兵征讨鞑靼 成化八年(1472)正月,兵部尚书白圭上言欲以十万兵马大举征讨,宪宗允行。于是,先命吏部侍郎叶盛巡边,与总督王越、巡抚马文升、余子俊、徐廷章商议具体事宜。叶盛巡边后上言:三边兵将均缺,边备不足,守为长策。但白圭力主出师。二月,宪宗诏令河南、山西诸府县输饷,不够者预征明年租赋。朝野骚然。其时河南、山西均饥荒、百姓困苦,饿死甚众。兵科给事中梁璟等上言请罢征赋,宪宗不听。五月,命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充总兵官,王越总督军务,三边兵将俱听调遣。十一月,赵辅因贻误战机。宪宗诏宁晋伯刘聚代赵辅充总兵官,屯住延绥。成化九年正月,刘聚、王越等败鞑靼于漫天岭。七月,巡抚延绥余子俊等败鞑靼于榆林涧。王越侦知鞑靼的们都尔、博勒呼、释嘉策凌三个部落联兵深入数千里,至秦州(今甘肃天水)、安定(今甘肃定西)抢掠,即率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将兵万余分左右哨由榆林出境,昼夜兼行二百三十余里,于九月十二日进兵红盐池,前后夹击,焚其庐帐,大胜而归。及鞑靼大部掠抢回来,其家属、畜产、庐帐均已荡尽。自此,鞑靼北徙,延绥得数年之安。

四川荣县农民起义 成化八年(1472)正月,四川荣县农民起义,攻占县城,占据府库,放掉狱囚,然后又攻犍为县,所到之处均获大胜。兵部尚书白圭上言说:宜敕镇守官与巡按御史督兵进剿,兵力不足,可征调附近州县兵力,不可姑息,以免酿成天顺年间赵铎起义之势。宪宗答允。又擢江西布政使夏埙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夏埙乃立"互知会捕法",起义被镇压。

陈宜逝世 陈宜(1413—1472),字公宜,江西泰和县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工科给事中,迁应天府丞,升云南左布政使,再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参与镇压山都掌少数民族起义,以功升兵部右侍郎,提督偏头关防务,成化八年(1472)三月因母丧回乡,二十六日卒于道,年六十。

罗篪致仕 罗篪(1417—1474),字应诏,一字叔和,南昌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云南道监察御史,历湖广按察使,筑武昌江堤以护民居,积粮以赈岁饥、丰军给,百姓称德。成化初官终右副都御史,理南京都察院事。成化八年(1472)四月十一日致仕。成化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卒,年五十八。著有《知庵集》。

郭登逝世 郭登(? —1472),字元登,武定侯郭英之孙。正统中因战功擢锦衣卫指挥佥事,迁署都指挥佥事,正统十四年(1449),拜都督佥事充参将镇守大同,身先士卒,发誓"与此城共存亡"。景泰初,进都督同知,充总兵官,景泰元年(1450)率八百人破敌数千骑,军士为之振奋,封定襄伯。天顺初,掌南京中府事,因遭人弹劾,降职都督佥事至甘肃。宪宗即位,复其爵,充甘肃总兵官。后回京掌中府事,总督神机营兵。成化八年(1472)四月三十日卒。追封定襄侯,谥忠武。

安南数次越界 安南即今之越南,宪宗时其国王为黎灏,其人自负国富兵强,屡屡越界侵广东、广西、云南边。成化四年(1468)冬,黎灏派兵侵据广西凭祥。以后数年中,又侵广东琼州、雷州、珠母海(今北部湾),广西之龙州、上下冻州及云南之临安府(今建水)、广南府、镇南(今南华)亦屡告警。当时安南进贡一直由广西入境,但黎灏一直有侵略云南之野心,适逢镇守云南中官钱能贪恣,遣指挥郭景取其进贡之物,黎灏遂以解送广西龙州逃犯为由,假道云南入境,且发兵于其后,云南大扰。兵部言云南非贡道,龙州罪人宜解广西,不必赴京。成化八年五月,兵部命广西布政司移咨黎灏,晓以大义,令其保守故疆,不许越界,且令其遣人来与广西三司官勘覆龙州及上下冻州等处边界,设立界址,永为遵守。成化十

五年冬，黎灏遣八百余人，越云南蒙自界，声言捕盗，擅自扎营筑室以居，守臣力止，其方退回。

彭时论皇庄之害 成化八年(1472)七月十五日，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时等上言：皇庄之名自古无有，近闻故太监刘永诚之庄田欲立为皇庄，深骇人情，人尝谓四海之内莫非王土，何独以此谓之皇庄？如此下去，畿内八府不是官府禁地，即为势家之庄，百姓何以生存？值今旱涝相仍之年，应不论官私，许百姓入内采食，不得禁治及抽分税钱。此亦救荒之一法。另外，畿内田土日狭，百姓如何养马？如今应交马匹已有亏空，乞有司暂停折卖马匹。宪宗嘉纳其言，又说刘永诚由朕自行处分。

筑海盐等地海堤 成化八年(1472)七月，东南沿海发生大水灾，江海暴溢。苏州、松江、扬州水灾，浙江海溢，杭州、绍兴、嘉兴、湖州、宁波五府水灾，淹没田禾，漂毁官民庐舍畜产不计其数，溺死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余人。于是，令筑海堤，以防海溢并利洪水入海，自海盐至上海筑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九丈，上海华亭至嘉定筑一万七千七百四十八丈，高一丈七尺，下宽四丈，上宽二丈。

御虏战车的创造 成化八年(1472)九月初九日，江西雩都县学生员何京上御虏车制，言其车旋转轻疾，一人可挽，上挂铁网，前置拒马刃，网眼可发枪弩，进可冲阵，退可殿后。宽只三尺，展则六尺，每五十车为一队，用士三百七十五人。辅以淬药弩矢，中者必死，遇敌不论多少，均可使用。兵部认为边境沙碛旷深，溪涧险阻，何京所上战车是否适用，宜遣赴延绥前线与总兵官赵辅、都御史王越等面议。

陈翌逝世 陈翌(1404—1472)，字翀霄，直隶虹县人，正统元年(1436)进士，授户部主事，瓦剌首领也先寇边，奉命往永平等处备刍粮，百方区划，民不扰而兵食充足，进郎中，升山西右布政使。天顺中，再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镇静为治，边人得安。再擢南京户部左侍郎、尚书，劾退贪官污吏。成化八年(1472)十二月十六日卒，年六十九。

北京改设二巡抚 旧制京师八府只设一巡抚驻蓟州。因鞑靼寇边，一官不能兼顾，遂于成化八年(1472)应都给事中梁璟之请设东、西二巡抚：东治顺天府、永平府，驻遵化；西治保定等六府，兼提督紫荆关、倒马关，驻真定。遂为永制。

李侃致仕 李侃(1407—1485)，字希正，东安(今河北永清东北)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户科给事中，迁都给事中，直言敢谏，擢詹事府丞。天顺元年(1457)改太常寺丞，进太仆寺卿，天顺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力振士风，成化九年(1473)正月二十九日致仕，归里时，军民拥泣，至不能行。家居十余年卒。年七十九。

土鲁番攻占哈密 成化初年，哈密无主，其王母努温答失里主国事。成化二年(1466)，诏命哈密故忠顺王脱欢帖木儿之外孙把塔木儿为右都督，摄国王事，成化八年卒，其子罕慎请嗣，许之，而不令其主国事，于是政令无所出，国力渐衰。时土鲁番王强大，其王阿力率兵于八年冬袭哈密，虏其王母，夺金印而还，留其妹婿牙兰据守。成化九年四月，兵部上言：哈密乃西域之咽喉，如弃而不救，恐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西)、罕东(今甘肃敦煌)等卫亦为之所胁，酿成边患。宪宗乃命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刘文前往甘肃经略，并遣锦衣卫千户马俊往谕土鲁番，使其归哈密侵地。文等乃与罕慎及赤斤、罕东等卫集兵进讨，成化十年冬，未及战，谍报阿力集众抗拒，且结别部谋掠赤斤、罕东二卫，文等不敢进，无功而还。宪宗乃命罕慎权主国事，并命边臣筑苦峪城(今甘肃安西东南)，移哈密卫于其地。成化十八年春，罕慎集罕东、赤卫二卫兵一千三百人，与己部共万人夜袭哈密城，牙兰逃，乘势连复八城，遂还居故土。

姚夔逝世 姚夔(？—1473)，字大章，浙江桐庐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乡、会试皆第一，明年授吏科给事中，遇事敢言。景泰元年(1450)擢南京刑部右侍郎，景泰四年改南京礼部同职，奉敕考察云南官吏。天顺元年(1457)进礼部左侍郎，天顺二年改吏部，天顺七年进礼部尚书。成化五年(1469)为吏部尚书，成化七年加太子少保。成化九年二月初九日卒，赠少保，谥文敏。姚夔屡次上言劝戒宪宗亲君子、远小人、节财用、恤军民，并力主逐番僧。在吏部能留意人才，荐人称职。有《姚文敏公奏议》、《姚文敏公遗稿》等著作行世。

黄琛逝世 黄琛(？—1473)，字廷献，福建将乐县人。正统四年(1439)进士，授户部主事，进郎中，整顿苏松钱谷积弊，使钱谷悉归于官。景泰中擢江西左参政，进左布政使，讨平朱绍纲之乱。升南京户部右侍郎，成化九年(1473)二月二十四日卒。居官以干治称。

遣御史刷吏牍 成化九年(1473)三月初九日，都察院奏两京并天下诸司文卷自天顺元年(1457)七月十二日起至成化八年(1472)十二月止，例遣御史照刷。宪宗遂命御史七员分赴各地，聂友良、洪性往两京，龚盛往浙江，程宏往江西，马震往福建，魏秉往四川，樊莹往湖广，云南、贵州、辽东及万全都司由巡按御史兼任。其余南北直隶、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及两广因有灾伤暂且停止，待丰年再行办

理。后定三年一刷之例。

范理逝世 范理(1408—1473),字道济,浙江天台县人,宣德元年(1426)进士,授江陵(今湖北)知县,擢德安(今湖北安陆)知府,俱有政绩,进福建右参政,历贵州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右侍郎。成化九年(1473)五月初十日卒,年六十六。

整饬边备 成化九年(1473)九月二十四日,兵部以边备日弛,乞命巡抚等官或遣大臣前往整饬,宪宗诏令各边巡抚都御史整饬,不必另行遣官。宪宗诏曰:沿边设备已有定规,岁久因循不无懈弛,军马缺乏者补选,兵甲损坏者修理,关口城堡墩台坍塌者加筑完固。若有委用非人、守御无备、贪懦怕死者即行逮问以示警戒。

乔毅逝世 乔毅(1411—1473),字志弘,山西乐平(今昔阳)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选庶吉士,授吏科给事中,进都给事中。天顺二年(1458)升大理寺右丞。成化元年(1465)迁左少卿,六年升工部右侍郎,成化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宽和质实,表里一致,不为矫伪之事。

曾翚致仕 曾翚(? —1491),字时升,江西泰和人,宣德八年(1433)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刑部员外郎、郎中,正统末擢广西右参政,再转河南御史,抚谕南阳流民。天顺五年(1461)迁山东右布政使,限制势家侵占民田,成化初转河南左布政使,开仓赈济饥民。后召拜刑部左侍郎,巡视浙江,考察官吏,罢不称职者百余人。成化九年(1473)十二月初二日致仕,弘治四年(1491)正月十五日卒。历官四十余年,质实勤慎,清正不渝,至死家无赢资。

三边总制的设立 成化九年(1473)十二月,刑部主事王鼎上言认为,延绥、甘肃、宁夏三边,镇抚不相统一,有警不相救援,宜推文武重臣一员总制三边。宪宗从其请遂于成化十年正月设制府于固原(今属宁夏),以王越为总制,自巡抚、总兵以下悉听其节制。三边总制自此设立。

和勇逝世 和勇(? —1474),初名脱脱孛罗,和宁王阿鲁台之孙。阿鲁台为瓦剌脱欢所杀,其子阿卜只庵来归,明廷授之左都督。勇袭锦衣卫指挥使,积功至都督佥事,天顺元年(1457)诏加同知,赐姓名。天顺年间充游击将军进讨两广起事者。成化初,随赵辅、韩雍征讨大藤峡瑶壮族起义,以功进左都督,成化三年(1467)再封靖安伯。十年二月初三日卒,谥武敏。

叶盛逝世 叶盛(1320—1474),字与中,昆山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兵科给事中。进都给事中,景泰初擢右参政,督饷宣府。天顺二年(1458)召为右佥都御史巡抚两广,征讨两广起事者。成化初,迁左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今河北宣化),请减中盐米价,以劝商裕边,举官牛官田之法,垦田四千余顷,买马修堡,边防益固。成化三年(1467)入为礼部右侍郎,后改吏部。成化八年,宪宗诏命其往延绥考察边防,与王越等商议搜套之可能性,后上书主张固守。由于兵部尚书白圭力主出兵,其议遂不被采纳。转左侍郎,成化十年二月卒,年五十五,谥文庄,崇祯末赠尚书。叶盛遇事敢言,屡次上疏论时务,多被采纳。著有《水东日记》等。

韩雍致仕 韩雍(1318—1478),字永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御史,曾出巡河道及江西,参与镇压浙江叶宗留起义及福建邓茂七起义。景泰二年(1451)擢广东副使,寻升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景泰七年为兵部右侍郎。成化初贬为浙江左参政。大藤峡瑶壮族起义爆发后,宪宗诏命其以左佥都御史之职赞理军务,前往镇压起义。韩雍将兵有方,起义很快被镇压。以功升左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多次镇压两广起事者。成化十年(1474)三月因被人所诬,宪宗命其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七,正德年间谥襄毅。有《襄毅文集》。

刘聚逝世 刘聚(? —1474),太监刘永城之侄,籍贯不详。嗣永城官为金吾指挥同知,正统末以“夺门”功进都指挥佥事,复擢都督同知。景泰中因讨曹钦之功进右都督。成化六年(1470)以副总兵职赴延绥御边,有功进左都督,封宁晋伯。成化八年为征虏将军总镇延绥等边,屡次击败鞑靼。九年因病还京,成化十年四月初九日卒,赠宁晋侯,谥威勇。

杭州大火 成化十年(1474)四月十五日,杭州仙桥河东蒋氏火,延及镇楼、伍公庙、海会寺、东岳行宫、玉枢雷院,下逮宗阳宫,南至侍郎府、北至镇宁府、东至巡盐察院,西至布政司,四周六七里,毁民居三千余家。

宋杰逝世 宋杰(? —1474),字廷英,直隶定兴县(今河北)人。宣德五年(1430)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升光禄寺少卿,进陕西布政使,擢左副都御史参赞甘肃军务。天顺元年(1457)左迁山东右参政,改湖广,寻升右布政使。成化初仍以左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等府,未几致仕。成化十年(1474)四月十八日卒。

杨浚逝世 杨浚(1416—1474),字叔玑,号宜闲,直隶无锡人,正统己未(1439)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山西右参政、陕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户部右侍郎。成化初改右副都御史抚治荆襄流民,后巡抚河南。成化十年(1474)四月二十五日卒,年五十九。《明实录》谓其素丰自俭,治官如治家,不择利害

为趋舍。有《杨宜闲文集》传世。

雷复逝世 雷复(？—1474)，字景旸，湖广宁远(今湖南)人。正统元年(1436)进士，授行人，历官广西副使。成化初擢山东右布政使，成化七年(1471)升礼部右侍郎，寻改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继李侃之后，端恪守法，得军民心。成化十年五月初四日卒于官。

修筑边墙 成化七年(1471)正月，浙江布政使余子俊被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其前任巡抚王锐曾奏请沿边修筑城堡，防御鞑靼，以为久远之计。至此，余子俊上言复论此议说：三边惟延绥、庆阳地平，鞑靼每次入寇从这里直入河套屯牧，如此使我反屯外，急宜沿边筑墙置堡，况今旧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连接以成边墙于计为便。尚书白圭以陕西民困，请缓其役。成化八年九月，余子俊再次上言说：今征套士马达八万之众屯于延绥，粮草银饷消耗巨大，且动用大量民夫，急需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请于翌年春夏寇马疲乏时，征陕西运粮民夫，给食兴工，两个月即可完工。宪宗命速办理。成化九年九月，王越等大败鞑靼于红盐池(今内蒙伊金霍洛旗南)，鞑靼北迁，边患少息，余子俊得以一意办理此事。成化十年闰六月，役军四万人，不到三个月筑边墙成，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共一千七百七十余里，每二三里置敌台崖寨以备边警。共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寨八百一十九，时称"橐驼城"。墙内得以安宁，荒地悉分屯垦，一年得粮六万余石。这就是保存至今的"明长城"。嘉靖以后，又于宣府、大同、蓟州北部沿线修筑偏东边墙。

孙曰良逝世 孙曰良(1388—1474)，字艮斋，江西丰城人。永乐九年(1411)进士，授监察御史，出知交州府。正统初超擢广西右布政使，总督广西兵备。官至右副都御史镇守临清，后致仕。成化十年(1474)八月初九日卒，年八十七。所至有能声，有古循吏之风。

王概逝世 王概(1418—1474)，字同节，江西庐陵县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升湖广右参政，河南按察使，善断案。天顺初被诬下狱，为襄王朱瞻墡所救。进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召回京任大理寺卿，再升刑部尚书。成化十年(1474)八月三十日卒，年五十七，谥恭毅。王概所历多在法司，精习律令，一一裁决，无宿案。有《王恭毅驳稿》。

余谦逝世 余谦(？—1474)，字孟亨，湖广宜都(今湖北)人。父任郎中，余谦随居京师，正统初以善书修《宣宗实录》，授试中书舍人，寻直内阁书办，升吏部郎中、顺天府丞。成化初以侍书旧恩升太常寺卿，成化十年(1474)十月二十二日卒。为人朴厚诚实，字画遒劲，亦通文艺。

孙原贞逝世 孙原贞(？—1474)，名瑀，以字行，江西德兴县人。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授礼部主事，迁郎中。正统初擢河南右参政。居官清慎，有吏才，再迁浙江左布政使。正统末年拜兵部左侍郎征讨浙闽农民起义。景泰三年(1452)进兵部尚书，镇福建、浙江。天顺初以老致仕。家居十余年，成化十年(1474)十一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七。著有《岁寒集》。

罢湖广等地采金之役 成化初年宫内奢侈，帑金渐乏，宪宗乃命湖广宝庆(今湖南邵阳)府、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开采金之役。巡抚刘敷命武陵等十二县开二十一个采金场、一年征用民夫五十五万，死于蛇虎大水者不计其数，仅得金三十五两。成化十年(1474)十二月刘敷奏请罢除，宪宗依允。同时应辽东巡抚彭谊之奏罢辽东黑山(今内蒙)采金之役。

申藏"妖书"之禁 成化十年(1474)十二月十三日，左都御史李宾等上言：锦衣卫镇抚司屡次查获妖书，语多荒诞不经，百姓往往被其迷惑，请备录妖书名目榜示天下，并定传习之罪，不至再犯。宪宗依允。其书有《开天揭地搜神记经》、《金龙八宝混天机神经》、《定天定国水晶珠经》、《佛手记》、《周天烈火图》、《六甲天书》、《镇国定世三阳历》、《推背书》等，共计五十余种。

白圭逝世 白圭(1419—1474)，字宗玉，直隶南宫县(今河北)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御史，讨兀良哈三卫，巡按山西，迁陕西按察副使、浙江右布政使。天顺二年(1458)进右副都御史征讨贵州苗民起义，巡抚湖广。天顺四年召为兵部右侍郎，征讨鞑靼，天顺七年进工部尚书。成化元年(1465)提督军务镇压荆襄流民起义，立下大功，加太子少保，成化三年改兵部尚书，兼督十三团营，成化六年，力主发兵搜套，并预征山西、河南、陕西明年赋，引起内地骚然，而搜套之举亦以无功而还。成化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卒，年五十六，赠少傅，谥恭敏。

申明酷刑之禁 成化十一年(1475)二月初五日，国子监祭酒周洪谟上言：天下法司审讯犯人，动辄使用夹棍等酷刑，百姓不胜苦楚，请敕法司禁约，除人命奸盗死罪外，其余止用鞭朴，违者令风宪官论治。宪宗批准施行。

彭时逝世 彭时(1416—1475)，字纯道，江西安福县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第一，授编撰。正

统十四年入阁预机务，寻进侍读。景泰元年(1450)迁左春坊大学士，修《寰宇通志》成迁太常侍少卿。天顺元年兼翰林院学士。宪宗即位进礼部右侍郎兼学士，同知经筵，寻进兵部尚书，兼官如故。修《英宗实录》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成化四年(1468)改吏部尚书，成化十一年正月进少保，三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赠太师，谥文宪。彭时在朝三十年，屡次上言革除时弊，有贤臣之风。著有《彭文宪公笔记》、《彭文宪公文集》等。

《宋元通鉴纲目》修成　《宋元通鉴纲目》又名《通鉴纲目续编》，大学士商辂等奉敕修撰，于成化十一年(1475)四月修成，二十七卷。全书以陈桱《通鉴续编》和胡粹中《元史续编》两书为蓝本，补以宋元史事，撰成是书，专记宋元两代之事。由于取材贫乏，叙事舛漏，不为学人重视。

宪宗诏令区处边夷　成化十一年(1475)五月，宪宗采纳巡抚甘肃都御史朱英奏言，诏令兵部会议，区处边夷：一，移土著以除祸根，将甘州等处久住夷人迁徙河南、陕西。二，安流离以消后患，将哈密流亡者移入内地给田给粮，待其国复后遣返。三，简贡使以省边储，土鲁番等国进贡时不许夹带别部夷人。四，补官长以统操练，宜于边将中推选六七员分拨把总管操。五，补官马以备征操，宜从太仆寺收江南马价内支银八千两至甘凉(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收买。六，分内外以防奸细，将肃州已废夷馆重为缮治，遣官设驿，以待进贡之夷。七，谨烽堠以传声息，于要地择有山有水之处增筑墩台遣军哨守，使烽烟相连，以备来犯之夷。

鞑靼遣使来贡　成化十一年(1475)八月十一日，鞑靼们都尔、释迦策凌遣其使桶哈来朝贡马，明廷设宴款待，酬之采缎等物，并授官给桶哈等九十二人，并予冠带。后来们都尔、释迦策凌都在其内部斗争中被杀或死去，而其它部落又不甚强大，所以边陲稍得平安。

疏浚通惠河　通惠河即元之大通河，郭守敬所凿，亦名潞河，从通州张家湾至京师，元代漕运粮自南方运抵通州后，再从此河转运至京师。至明洪武时通惠河废，永乐中曾修治，复废。成化七年(1471)十月，漕运总兵杨茂上言说：漕运粮自张家湾卸船后用车转运都下，运费高昂且又非常困难。旧有之通惠河水道，石闸尚存，若修闸蓄水，用小船运粮更为便利。宪宗乃遣户部尚书杨鼎、侍郎乔毅前往查看。杨、乔查看后认为可行。成化十一年八月，诏命平江伯陈锐等督漕卒七千人疏浚，至成化十二年六月完工，计浚三泉、四闸，漕舟得通。但其所修仅及元代时通惠河原貌的三分之一，河窄且水易涸，不二载即又浅塞如故。

铜钱折俸例的制定　京城文武官吏上半年俸粮例俱折钞，后因钱法不通，所司请纳钞者可以钱钞中半兼收，引起库钞减少，从成化七年(1471)至十年钞俱未支。成化十一年九月初二日，户部仍请如例钱二百文折钞一贯，先将七年折给，等钱有余则依年折给。宪宗允行。

立朱祐樘为皇太子　成化十一年(1475)五月，宪宗方知纪妃所生皇子已有六岁，遂定名祐樘。六月，纪妃暴卒，(一说万贵妃使人赐其死，一说自缢。)当初隐匿不报的太监张敏亦因惧怕万贵妃吞金而死。十一月初八日，正式册立朱祐樘为皇太子，并大赦天下。

申自宫之禁　成化以来，自宫以求进用者越来越多，宪宗曾屡颁令严禁自宫，但由于这是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所以一直不能绝迹。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礼部上奏说又有自宫及宫其弟、子、侄者四五百人，宪宗命锦衣卫重杖而遣，并申令以后如有再犯，本人处死，全家发边充军。十三年三月，自宫以求进用者至九百余人，成化十五年二月，至二千余人，成化十六年六月，达数千人，虽屡次申禁，反而越禁越多，终成化之世不能禁绝。

周洪谟著《流民说》　成化十二年(1476)五月，宪宗诏命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往荆襄等处抚治流民。右都御史李宾乃将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所著《流民说》呈给宪宗。其说曰：东晋时，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设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民流聚至襄阳，乃设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隶于荆州，南雍并于襄阳，迄今千载，百姓相安。今荆襄山谷旷远，民遭水旱而不能得到赈恤，则转徙于荆襄之势必不能禁。不如因而抚定，在其地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则流民皆可为齐民。驱逐之法诚不可取。宪宗准奏。其后，原杰在荆襄地区设置府县，为明廷一大患的流民问题方得以暂时解决。

原杰抚治荆襄流民　荆襄流民起义被镇压后，明廷企图以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的办法来防止流民的重起流入，但社会矛盾没有解决，饥寒交迫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至成化十二年(1476)，在荆襄地区的流民又集聚到数十万人。同年五月，宪宗命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往规划抚治。于是有十一万三千余户、四十余万流民于当地附籍。十二月，原杰又以襄阳府所属郧县居竹山、房县、商县、洛南、上津中，道路四达，且距襄阳甚远，山林深阻，将吏鲜至，遇事发难以驭制，便拓宽其城，设置郧阳府，以上述

各县附辖。还置湖广行都司，增兵设戍。另于西安府增山阳县，南阳府增南召县、桐柏县，汝州增伊阳县。原杰另荐举御史吴道宏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经过原杰规划抚治，荆襄流民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马昂逝世 马昂(1399—1476)，字景高，一字伯颙，直隶沧州人，由举人入国子监选授鸿胪寺序班，正统二年(1437)拜御史，整饬大同兵备。正统八年升刑部右侍郎，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参赞甘肃军务，景泰初致仕，景泰五年(1454)起复，总督军务，前往剿抚两广，升右都御史，转左都御史。天顺初掌都察院事，天顺二年(1458)迁兵部尚书，后以平曹钦功加太子少保，改户部尚书。成化四年(1468)因被劾卖盐赎贷而致仕，成化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八，赠少保，谥恭襄。

商辂建言时政 成化十二年(1476)七月二十二日，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商辂等建言时政：一为节财用，二为却贡献，三为开言路，四为慎刑罚，五为省工役，六为足军饷，七为饬边备，八为重地。宪宗诏令施行。七月二十六日，遣兵部右侍郎马文升、户部右侍郎程万里整饬边备。八月，遣南京户部左侍郎王恕改左副都御史巡抚云南，治太监钱能贪赃通敌之事。

京军逃亡罪例的制定 成化十二年(1476)七月初九日，英国公张懋上言说：近来京操官军屡有逃亡缺班者，因处罚太轻，有越演越烈之势。乞视景泰年间事例，量其逃亡日月长短，或发边卫罚操、或发远边墩堡哨瞭。事下兵部，兵部上言说：京操官军承平日久，虽存调集之名而无教练之实，加以工役烦多，侵利逼迫，致使逃亡者日众。但现在与景泰年间情况下同，边患稍息，因而立法亦不可太严，以使其可以常行。凡缺一班者，仍准近例，罚班半年；两班不到者，发附近居庸、密云、山海等关，罚班半年；余各量其久近，发大同宣府等边卫。宪宗诏命依允实行。

彭谊致仕 彭谊(？—1497)，字景宜，东莞(今广东)人。正统中由乡举除工部司务，景泰初改御史，景泰五年(1454)从大学士王文巡视江淮，擢大理寺丞，景泰六年擢为右佥都御史，提督紫荆(今河北易县西)、倒马(今河北满城西)诸关，天顺初下迁绍兴知府，历九年，多有惠政，复擢为山东左布政使，入为工部左侍郎。成化四年(1468)改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镇八年亦有治绩。成化十二年七月十五日致仕，家居二十余年，于弘治十年(1497)九月初九日卒。

董兴逝世 董兴(？—1476)，直隶长垣人。初为燕山右卫指挥使，累迁署都指挥同知，正统中进署都指挥使、京营管操。复擢署都督佥事，充右参将，参加征讨邓茂七起义，以功进都督同知。广东黄萧养起义势不可挡，宪宗急遣董兴为左副总兵率江西、两广军前往镇压。景泰元年(1450)二月，义军被董兴部屠杀一万余人，黄萧养中箭而死。董兴以功进左都督，留镇广东。后召还分督京营，与曹吉祥结姻，因"夺门"功封海宁侯，未几充总兵官镇辽东。曹吉祥被诛，被革爵，发广西立功。后复爵，总兵宣府。宪宗即位后被罢职，家居十余年，至成化十二年(1476)十一月十六日卒。

四川播州苗民起义 成化十二年(1476)三月，四川播州宣慰司苗民起义，占领了天坝、干地等五十三寨及重安(今贵州黄平南)长官司之湾溪等寨，宪宗诏令巡抚四川右副都御史张瓒抚捕，起致仕播州宣慰使杨辉协理。十一月，张瓒督军攻破苗寨十六处，斩首四百九十六级，义军失败。成化十五年九月，苗民不堪忍受安宁宣抚使杨友之压迫重新起义，聚至万人。兵部仍起杨辉统兵剿抚，并敕川、贵兵为助。

林鹗逝世 林鹗(1423—1476)，字一鹗，浙江太平(今温岭)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英宗初出为镇江知府，颇有治绩，调任苏州知府。成化初迁江西按察使，历左、右布政使。成化六年(1470)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再转京师刑部，执法不挠。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八日病卒，年五十四。嘉靖中赠刑部尚书，谥恭肃。有《畏斋存稿》。

整顿钞法 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二十三日，大兴左卫指挥使周广上言：近年钞法不行，每钞千贯只值银四五钱，而在京势要殷富之家往往载于各布政司及府州县，嘱托每钞千贯征银五两，其利十倍，乞通行禁止。宪宗诏令今后依势卖钞以及听其嘱托之有司，皆重罪处之，巡按御史要严加纠举。

西厂的设立 明初永乐时设东厂，令宦官刺事，权势与锦衣卫相均。成化十三年(1477)二月，宪宗诏令御马监太监汪直提督锦衣卫校官百余人另立西厂。成化十二年间，民间盛传有金睛长尾怪兽作害京师，所到之处，人即昏迷，宪宗亦怕，另有妖人李子龙用符术交结太监韦舍，藏入宫内，后被处死。宪宗非常厌恶此类事情，因而想知道宫外情况，于是选中汪直刺探。汪直任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其人数权势均在东厂和锦衣卫之上，京师内外直到各王府、边镇都布满了其爪牙，他们不及奏请即逮捕朝臣，刑部郎中武清、礼部郎中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

俱被下狱,甚至连民间争吵打架、偷鸡摸狗等小事亦被处以重法,并以言治罪,以致冤死者相继,人人自危。

陕西宁夏卫地震 成化十三年(1477)四月初一日,陕西宁夏卫(今宁夏银川市)地震,声如雷,城垣崩塌者八十三处。陕西甘肃天鼓鸣,地震有声,生白毛,地裂,水突出高四、五尺,涌出青红黄黑四色泥沙。甘州卧佛巨像,佛首倾落。凉州、甘州(今张掖)、巩昌、榆林、延绥,以及三边俱震。同日山东沂州、郯城、滕县、费县、峄县亦震。震中烈度(I_0)ⅤⅡ,震级(M)为六点五级。

罢设西厂 汪直、韦瑛用事,官校势日横。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内阁大学士商辂与万安、刘诩、刘吉联合上奏汪直、韦瑛十二罪说:汪直、韦瑛之辈专刑杀,擅作威福,肆虐善良,以致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宪宗见到奏文反而大怒,命司礼监太监怀恩、覃昌、黄高至内阁,传旨质问商辂等人,追究主使上奏本的人。商辂说这是大家要为国除害,指出朝臣不论职位高低,有罪都应请准圣旨,才能逮捕审问,而汪直却擅自逮问三品以上京官并抄没家产;大同、宣府均为边关重镇,守官不能一刻空缺,汪直却一次捕问那里的守备官数人;南京为留都,汪直擅自逮捕留守大臣;汪直还经常更换皇帝身边的近侍,所以如果不去汪直,天下就不能安稳。兵部尚书项忠亦倡九卿联合上奏弹劾汪直,宪宗迫不得已,只得撤了西厂,宣布汪直罪行,令其仍归御马监,调韦瑛至边卫,西厂诸旗校调回锦衣卫,天下大悦。西厂虽然撤了,汪直仍然为宪宗所宠任,他伺机对宪宗说,商辂等弹劾他的奏疏是司礼监太监黄赐、陈祖生出的主意,宪宗因此把黄赐、陈祖生外放到南京司香。

禁遏刁讼 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二十六日,都察院上奏说:刁顽之徒不遵禁例,伪饰诈文奏告不干己事,以至逮人甚多,至数年能不结案。已屡次禁遏,然止榜示京师,在外不过移文问刑官司,百姓不知。宜通行天下,令通政使司并六科职掌疏状自后词讼不应奏告者就行参驳,送法司再加详审。如此则刁风可息,刑狱可息。宪宗允行。

原杰逝世 原杰(1417—1477),字子英,山西阳城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御史,巡按江西,奸宄绝迹。再巡按顺天诸府,开仓赈饥。擢江西按察使,治行有绩,赐诰旌异,迁山东左布政使。成化二年(1466)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后召为户部左侍郎。时有奸徒掠百姓开垦之黄河滩地献王府邀赏,原杰请求禁止。改左副都御史理院事。荆襄流民复聚,宪宗乃命原杰出抚,原杰令流民附籍,另设郧阳府、湖广行都司,困扰多年的流民问题暂时得以解决,以功进右都御史,再任为南京兵部尚书,原杰力辞,未赴任而于成化十三年六月初一日卒于南阳,年六十一。赠太子太保,谥襄敏。郧阳、襄阳民念其功而为之立祠。

复设西厂 西厂虽罢,汪直受重用如故,宪宗仍密令其出外敕事。适有南京监察御史戴缙九年秩满,但未得到升迁,于是便极力讨好宪宗和汪直。他假借天有灾异上疏说:近年以来灾异不断,敕谕廷臣修省,未闻大臣进何贤,退何不肖,亦未闻群臣袪何稗政,效何嘉猷。独有太监汪直缉捕奸恶,惩治贪赃,允协公论,足以警服众人,伏望陛下推诚任人,使宿弊尽革,则天意可回。宪宗大喜,遂于成化十三年(1477)六月十五日诏复设西厂,以锦衣卫副千户吴绶为镇抚。汪直的势焰从此更盛。吴绶曾从项忠征讨荆襄流民起义,因罪被劾,此时得志,遂怀报复之心,而项忠曾倡九卿弹劾汪直,吴绶又是汪直之心腹,遂迫使项忠不得不以治病为名请求回家。项忠未及动身,吴绶又指令东厂负责侦事的官校诬奏项忠,又指使给事中郭镗、御史冯贯等揭发项忠违法,并由此牵连到项忠之子项经、太监黄赐、兴宁伯李震、彰武伯杨信等。宪宗命三法司、锦衣卫会审,项忠力辩反驳均无济于事,被革官为民,黄赐、李震等亦获罪。左都御史李宾也因得罪汪直而被夺职。大学士商辂自知处境维艰,遂请求致仕,宪宗许之。从此,其他朝臣更不敢与汪直抗争。如此也动辄获罪,而与汪直相勾结的王越却官升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禁私铸铜钱 成化十三年(1477)六月十七日,刑部上奏说:近年民间所用新钱多系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临清人私自铸造,致使四方客商聚集收买,奸弊日滋,阻坏钱法,宜移文各处巡抚巡按官揭榜禁约:自后事发者即以为首并工匠依律问罪,从犯及知情买使者俱枷项示众,发边卫充军。宪宗依允。成化十七年二月,户部奏京城内外私钱滥行,旧钱阻滞;以致钱轻物贵,不便于民,请严加禁治。宪宗下诏:今后只许历代并洪武永乐宣德钱每八十文折银一钱,私造私贩者枷项问监。

崔恭致仕 崔恭(1409—1479),字克让,直隶广宗(今河北)人,正统元年(1436)进士,除户部主事,擢莱州(今山东掖县)知府,有治绩。景泰中,超迁湖广右布政使,安抚流民,寻迁江西左布政使,定均徭法,酌轻重十年一役,遂为定例。天顺间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疏浚漕河,大治吴淞江,民赖其利。升

吏部右侍郎，寻迁左侍郎。成化五年(1469)进吏部尚书，不久转南京吏部尚书，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致仕，成化十五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一，赠太子少保，谥庄敏。

吴琛逝世 吴琛(1427—1477)，字舆璧，号愚庵，直隶繁昌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监察御史，升大理寺右丞，进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征羌有功。成化初掌南京都察院事。后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总督两广韩雍致仕后，吴琛兼总督两广，成化十三年(1477)八月二十五日卒于官，年五十一。有《愚庵集》。

严文武官乘轿之禁 成化十三年(1477)十一月初三日，太监汪直上言：洪武永乐间人臣没有敢乘轿的，正统时文官年老的才可乘轿，自景泰以来两京五品以上无不乘轿者。乞严定文职三品年六十以上方许乘轿，武臣一概不许。宪宗允行。

杨信逝世 杨信(？—1477)，字文实，六合(今江苏)人，昌平侯杨洪之从子，自小即从洪征战，骁勇善射，累功至指挥佥事，正统末进都指挥佥事、都指挥同知。景泰初进都督佥事，协镇宣府(今河北宣化)，建言使用"鹿角之阵，监阵可捍敌马，结营可卫士卒。天顺初移镇延绥。进都督同知，因御鞑靼功进彰武伯，佩副将军印，充总兵官。成化初还京督三千营，后毛里孩据河套，杨信复至边，屡立战功。成化十三年(1477)十二月初七日卒，赠彰武侯，谥武毅。

周瑄致仕 周瑄(1407—1484)，字廷玉，号葵轩，山西阳曲人，由乡举入国学，正统中，除刑部主事，善治狱。正统十三年(1448)迁员外郎，景泰元年(1450)超拜刑部右侍郎，景泰末出赈顺天(今北京)、河间饥，大举荒政，先后赈饥民二十余万，给牛万余，百姓称善。还京转左侍郎。天顺中，门达大兴冤狱，周瑄多所救正。天顺七年(1463)掌工部事。成化初迁右都御史，督理南京粮储，惩奸革弊。后迁南京刑部尚书，不出五日，狱无滞囚。成化十三年(1477)十二月二十五日致仕，家无田园，迁居南京，成化二十年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少保，谥庄懿。

余子俊上言申明条例 成化十四年(1478)正月二十二日，兵部尚书余子俊等奏申明条例十事：谨选法，严纪功，重爵赏，息争端，革吏弊，重赦令，重地方，顺夷情，省驿传，遴军政，宪宗依允施行。

四川松潘苗民起义 成化十三年(1477)十一月，四川松潘苗民起义，宪宗诏令四川巡抚都御史张瓒前往征讨。成化十四年三月，张瓒率兵分道攻其寨，斩一千零七十余人，攻下白草坝、西坡、禅定等大寨，又攻叠溪(今四川松潘南)、茂州(今四川茂汶)等地，斩二百一十八人，四月班师。

罢纳银纳马纳草事例 成化十四年(1478)三月初四日，十三道监察御史屠滽等上言：近见巡抚宁夏右佥都御史贾俊奏称边储无措，欲将河南陕西山西等处两考吏典及在京各衙门办事满者俱令纳银免考，即与冠带，民间子弟纳银许允知印承差等官，三年六年考满纳银，免其赴部考绩，户部准拟，诏许通行。以往陕西亦有纳马纳草事例，至今朝论不以为是。堂堂天朝，富有四海，应量入为出，用一省百，边储军需何患不足，而为此卖官鬻爵之事？乞痛革前弊，另图长策，以使边备不乏，名器不滥。宪宗诏令：御史所言极是，宜一切罢之勿行。

复开辽东马市 成化十四年(1478)三月二十四日，巡抚辽东都御史陈钺上奏：永乐年间辽东设马市三处。其一在开原(今辽宁)南关以待海西女直，其二在开原城东五里，其三在广宁(今辽宁北镇)，皆以待朵颜三卫。正统间因泄漏边事已罢其二，只有开原南关马市存。近年朵颜三卫以饥困屡请复开，朝廷不许。如若复开，则可收朵颜之心，而于我亦有利。宪宗允行。

邢简逝世 邢简(？—1478)，字居敬，陕西咸宁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刑部主事，擢真定(今河北正定)府知府，有治绩，擢浙江左参政，寻升顺天(今北京)府尹，崇尚节俭，再升南京大理寺卿，寻拜户部右侍郎，成化十四年(1478)五月初五日以疾卒于官。廉介有守，无矫言饰行。

武举条例的制定 成化十四年(1478)五月十八日，兵部尚书余子俊等议上武举条例：欲选武臣，其嫡子就儒学读书习射；九月乡试，三月会试；初场试射，二场试论判语，三场试策；四月一日殿试，赐武举及弟，出身有差，恩荣次第，录名勒碑，亦如进士科制。时汪直用事，欲以建白为名，但其素不知书，其心腹吴绶乃代之撰草，奏请武举设科，乡、会、殿试如文科例，宪宗准其奏，命兵部集议，于是余子俊会英国公张懋等文武大臣及科道官议之，众皆知其不可，亦不敢违，遂上此条例。宪宗乃令兵部移文天下教养数年，俟有成效，巡按提举等官具奏处置。

汪直巡辽东边 右副都御史陈钺出巡辽东之后，数次掩杀建州卫女真人以求封赏进官，激起辽东骚乱。成化十四年(1478)三月，朝议遣重臣前往抚安，宪宗命兵部左侍郎马文升前往。六月，建州听抚。但汪直欲将此功归于己，固请行边，宪宗准奏，于是汪直带王英等人，快马飞驰前往辽东，陈钺远迎至郊外，拜伏在地，以丰盛的筵席和豪华的住所招待汪直，并大肆行贿，远近骚然。

丁川逝世 丁川(1431—1478),字大容,号东陵,浙江新昌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监察御史。成化中尝上言会昌侯孙继宗父子权重,宜加裁损。万贵妃专宠,干预外政,复上疏论谏。官至左佥都御史巡抚延绥,进安边十策,悉允行。成化十四年(1478)六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著有《东陵文集》。

杨瑄逝世 杨瑄(1425—1478),字廷献,江西丰城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御史。无顺初上奏弹劾曹吉祥、石亨而获罪,戍辽东铁岭卫,未至被赦还,复谪南丹卫(今广西宾阳北)。成化初召还,寻迁浙江海道副使,修筑海塘,筑海盐堤岸三千三百丈。十余年政绩卓然,进按察使,西湖水旧可灌溉田四十六万顷,至时堵塞过半,杨瑄请浚,功未成而于成化十四年(1478)七月初一日卒,年五十四。海盐人立祠祀之。

杨福冒称汪直伏罪 成化十四年(1478)七月,江西人杨福以貌似汪直,乃假冒汪直之名,自芜湖历苏州、常州,再由杭州抵绍兴、宁波,所到之处,有司及市舶宦官皆小心侍候,不敢违命,威福大张。抵福州后,为镇守太监卢胜所觉,逮治斩罪。时汪直势震天下,故有人乘借其名而扰民。

黄景隆虐死狱囚 成化十四年(1478)十月二十四日,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沃頖上奏说:吉安府狱中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病故囚犯计三百八十七人,多系知府黄景隆凌虐致死而假称病故。宪宗乃命刑部郎中屠勋、锦衣卫百户杨纲往会巡按御史并都布按三司查勘。勋等查后报曰:死者共四百十七人,其中无罪而被致死者百有六人。于是逮黄景隆入京,成化十五年三月,黄景隆死于狱中。

李衍治理黄河 成化以来,黄河之患很少。成化五年(1469)六月,黄河在开封杏花营决口。成化七年,明廷任命王恕为工部侍郎,总理河道。成化十四年,黄河在开封决口,毁坏护城堤五十余丈。同年十一月,巡抚河南都御史李衍上言说:河南屡有河患,皆因下游壅塞所致,宜于开封附近疏浚,宪宗诏其参酌施行。但李衍主持修浚河道,不久即复塞。

申在外武官私役军士之禁 成化十四年(1478)十二月二十三日,户部郎中刘道以公干至大宁都司(今河北保定)还,上言说:茂山(今河北易县)、保定等卫官私役军士有至百余人者,乞量品给定额,晓谕四方都司卫所以为禁约。事下兵部,尚书余子俊说:此例已定,京营山海等处凡都指挥可役六人,指挥四人,千百户二人,带俸者不在此例,私占五人以下者降一级,五人以上者降二级,甚者除名谪戍。

倪谦逝世 倪谦(1415—1479),字克让,应天府上元县(今南京)人,正统四年(143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满九载进侍讲,改左春坊左中允,进侍讲学士。修《寰宇通志》成进左春坊大学士兼侍讲。天顺初改通政司左参议,进翰林院学士。坐事戍开平(今河北独石口)。成化初入史馆修《英宗实录》,升礼部右侍郎,为言官所劾致仕。成化七年后复起为南京礼部右侍郎,不久进尚书,十三年九月以疾复致仕。成化十五年(1479)三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五。赠太子少保,谥文僖。著有《朝鲜纪事》、《倪文僖公集》等。

李纲逝世 李纲(1425—1479),字廷张,山东长清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御史,历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赃吏至四百余人,时称"铁御史",奉敕编集延绥土兵,还迁太仆寺少卿,巡畿辅马政,拒绝收贿。成化十三年(1477)迁右佥都御史,转左佥都御史,出督漕运,与平江伯陈锐共事。成化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卒,年五十五。陈锐见其笥中只有敝衣,挥泪说"君子也!"为具棺材,闻其清节于朝廷。为时所重。

汪直巡宣府、大同边 成化十五年(1479)七月,宣府、大同镇巡官屡报边警,其实当时鞑靼内乱,释嘉策凌已为亦思马因所杀,无意南侵。边臣欲虚张守御功以求封赏,兵部不知而误信,请遣人前往巡视,宪宗命汪直出巡。所至传供于百里之外,都御史等偕下属伏道迎谒,汪直等过去后才敢起身。至馆,易服请见,唯唯诺诺。其左右大肆索贿,边储为之一空。

夏埙逝世 夏埙(1426—1479),字宗成,浙江天台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巡按广西福建,继清军江西,发镇守中官叶达恣横状,达为敛威。擢广东按察使,迁布政使,调江西。成化八年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安抚苗民。成化十年致仕,杜门养亲,不接宾客。成化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四。著有《岭南集》、《岭南江西行稿》、《三巴稿》及奏议数十卷。

程信逝世 程信(1417—1479),字彦实,直隶休宁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吏科给事中。景泰元年(1450)进左给事中,上中兴固本十事。景泰二年出为山东右参政,督辽东饷,转四川参政,理松潘饷。天顺元年(1457)擢太仆寺卿,理马政有方,天顺二年改左佥都御史巡抚辽东,被人所诬降南京太仆少卿,天顺五年召为刑部右侍郎。成化元年(1465)起兵部左侍郎。四川山都掌少数民族起义,进为兵部尚书提督军务前往征讨,以功进兼大理寺卿。成化六年改南京兵部尚书,成化十一年致仕,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三。赠太子少保,谥襄毅。有《晴洲钓者

集》、《容轩稿》等。

汪直杀辽东贡使 成化十五年(1479)十月，汪直请求出兵辽东。宪宗遂命抚宁侯朱永为靖虏将军，充总兵官、汪直监军，陈越参赞军务，前往征讨建州。闰十月，汪直等出辽东塞，遇建州贡使六十余人，诬其窥边，捆绑诛杀，焚其庐舍，更掘墓以髑髅充首级冒功。班师后，朱永封保国公，陈越升右都御史，汪直则加禄米，升、赏分别多达一千余人，致使辽东积蓄了十余年的粮饷损耗一空，更结怨边夷，导致辽东诸部的报复之举，百姓深受其害。辽东巡按强珍揭发陈越挑起边界纠纷，御史许进亦率同僚弹劾汪直，汪直反谪强珍戍辽东，廷杖许进。

禁约游僧 成化十五年(1479)十月十八日，监察御史陈鼎上言：自成化二年起至十二年共度僧道十四万五千余人，而私造度牒者尚未知其数。此辈游食在下，奸盗诈伪，无所不为，不早为处置，大则聚集山林谋为不轨，小则兴造妖言煽惑人心，为患极大。今苏州等处屡获强盗，多系僧人，乞敕所司禁约。礼部复奏，命通行天下禁之。

杨鼎致仕 杨鼎(1407—1485)，字宗器，陕西咸宁人，正统四年(1439)进士，授编修。景泰三年(1452)进侍讲兼中允，景泰五年超擢户部右侍郎，天顺初转左。成化四年(1468)代马昂为户部尚书，上疏请设监司一员处置陕西汉中流民。在其任内，诸仓有储蓄。后加太子少保。成化十五年十月十一日，给事御史劾其非经国之才，杨鼎乃致仕。成化二十一年六月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太保，谥庄敏。

孙继宗逝世 孙继宗(1395—1479)，字光辅，英宗朝章皇后之兄、会昌伯孙忠之长子。宣德初授府军前卫指挥使，景泰初进都指挥佥事，寻袭父爵。天顺初以“夺门”功进侯，督五军营，兼掌后军都督府事。石、曹事发被解兵权。成化初，提督十二团营兼督五军营，知经筵事，监修《英宗实录》，朝有大事要议，必以继宗为首。《实录》成加太傅。成化十五年(1479)十一月卒，年八十五，赠郯国公，谥荣襄。

邹干致仕 邹干(1409—1492)，字宗盛，号顺庵，浙江余杭人，正统四年(1439)进士。景泰初由兵部郎中超擢本部右侍郎，以才为于谦所重。后改礼部右侍郎，考察山西官吏，黜不职者五十余人。请令诸生输粟入监读书，纳粟入监自此始。成化二年(1466)迁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成化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劾致仕，弘治五年卒，年八十四。谥康靖。

王复致仕 王复(1416—1485)，字初阳，直隶固安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刑科给事中，擢通政参议，景泰中迁通政使，天顺中历兵部左右侍郎。成化元年(1465)进兵部尚书，尝出视陕西、宁夏、甘肃边备，经略有方，所上备边奏章多被采纳，其要为广置墩台，以使守兵相互援助。后以言者谓治兵非其所长，乃以白圭代之，改任工部尚书，力戒无益之工役，成化十四年加太子少保，成化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仕成化二十一年六月卒，年七十。赠太子太保，谥庄简。

汪直督兵征讨鞑靼 成化十六年(1480)正月十六日，宪宗诏命保国公朱永为平虏将军，充总兵官，汪直监军，兵部尚书王越提督军务前征讨鞑靼亦思马因。当时延绥镇守太监张选报鞑靼将犯边，而余子俊认为鞑靼并无犯边意，不宜轻易出兵，但王越见陈钺因征辽东升迁得宠而生妒意，遂力劝汪直出兵。二月，大军至延绥，王越侦知亦思马因无犯延绥意，并已西迁至威宁海子(今内蒙正黄旗察哈尔南)，欲以计袭击，乃劝汪直让朱永率大军由南路进，自己与汪直率轻骑顺塞垣而西，到榆林会合。行至大同，才告诉汪直敌帐在威宁海子，于是尽选宣大两镇兵二万，出孤店(今山西大同东北)，分数道进，值大风，风雪晦冥，潜行至威宁海子，亦思马因犹不知，乃掩击破之，杀其老弱，斩首四百三十余级，获马驼牛羊六千，不至榆林而还。朱永至榆林不见敌，遂无功。王越以功封威宁伯，岁禄一千二百石，汪直增禄至三百石，升官者达二千九百余人，被赏者达一万七千九百余人。由于汪直、王越的偷袭，鞑靼复又扰边不止，百姓深受其害。十二月，亦思马因扰大同，汪直、王越、朱永又率军前往征讨。十七年二月，斩鞑靼一百二十余人，获马七百匹，三月班师回京，王越加太子太傅，朱永爵位世袭。

滕昭逝世 滕昭(1422—1480)，字自明，河南汝州(今临汝)人，以举人授监察御史，天顺中擢右佥都御史，成化初巡抚辽东，未几进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江北淮扬等处，成化五年(1469)召还理院事，又遣巡视福建民疾，未还即命巡抚南直隶，成化七年升兵部右侍郎，不久转左侍郎。后以被劾而致仕。成化十六年四月初十日卒，年五十九。

官庄征租例的制定 成化中，官庄多在河间府(今河北)。成化十六年(1480)五月，东光县官庄征粮无度，每亩征粮达二斗之多，激起民情骚然，于是六科给事中齐章等上言说：天子以四海为家，普天下土莫非所有，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计刀锥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今东光之民失其田地，而赋敛比之公田又三倍其数，民困如此，非死即徙，非徙即盗。十三道监察御史谢显等亦上言其事。宪宗命每亩征五升三合五勺，如开垦荒田则例外。

丽江山崩 成化十六年(1480)五月,云南丽江军民府(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巨津州白石山约长四百余丈,去金沙江二里许,一日山忽裂分其半,走金沙江中,山上木石依旧江水壅塞,淹田漂庐,府州及察院具报以闻。

禁止贵戚世家侵占民田 成化十六年(1480)六月初二日,六科都给事中王坦等上言:户部郎中张祯叔等奉命往河间府静海县(今天津)按视皇亲、锦衣卫指挥王源侵占民田及其家奴恃势害民诸事,俱得其实。永乐宣德年间,许顺天等八府之民于抛荒田地尽力开垦,永不起科,而今王源受赐之地其初只有二十七顷,四至分明,版册可考,但其令家奴划大范围,吞占民田达一千二百二十顷,其中可耕者三百六十六顷,中多贫民开垦成熟之地,乞令退还多占之地。初四日,宪宗诏说:旧赐王源之地仍归其管,余俱还官给民牧种。户部请备榜通行禁革,宪宗允行。

阎本逝世 阎本(1424—1480),字宗元,陕西邠州(今彬县)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户部主事,升郎中,提督永平(今河北卢龙)、山海等处粮草,成化二年(1466)升右佥都御史巡抚蓟州(今天津蓟县)等处,赞理军务。成化六年五月致仕。成化十六年复起为户部右侍郎,督饷西北,六月还京以疾卒,年五十七。

文武官吏俸粮折布例的制定 从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官吏折俸皆未支付。成化十六年(1480)七月十八日,户部尚书陈钺请如例:十一年者于太仓折支银,十二年者于天财库折支铜钱,十三年者于甲字库折支润白三梭布,但布一匹值米四十石折算太重,宜量准三十石,宪宗准行。事实上,三梭布一匹即使极细者不过值银二两,而米价贵则有一石值银一两者,今布一匹折米三十石,轻重失调。后更至以粗润绵布值银三四钱者亦折米三十石,则等于粗布一匹而值银三十两,真自古未闻。

王朝远逝世 王朝远(1423—1480),名汉,以字行,江西进贤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监察御史。天顺中为石亨等所诬,黜衡山县知县,未行即改巡按广东,上言广西瑶民流劫广东事,明廷始命韩雍、赵辅往征。成化四年(1468)升陕西边备副使,多方筹措边饷,以功进陕西按察使,久之进左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未几以疾致仕。成化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八。

申明存恤孤老之令 成化十六年(1480)八月十四日,户部上奏:顺天府宛平(今北京丰台区)、大兴(今北京)二县收养孤老七千四百九十余人,一年赡养粮六千九百余石,布如人数。近来有司不能稽查,任意侵欺,奸弊百出,使孤贫不蒙实惠,其滥收冒支者亦多,且养济院地方狭小,京师眼皮之下弊尚如此,则四方可知。请都察院遣御史并本部官一员督同顺天府五城兵马及二县官以见在食粮孤贫悉加查堪,惩其滥收,将养济院移置宽闲之处,米、布由本县正佐官按月躬亲点阅给散,本府官则一月二次巡视,违者坐罪停俸。宪宗诏令悉如户部所奏通行禁约,以使朝廷德泽下流。

蒯祥逝世 蒯祥(1398—1481),直隶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精于木工,自正统以来凡营造之事无不参预,官营缮所丞、太仆少卿、工部左右侍郎。祥以木工至高官,俭朴不改,出入不乘轿,至老一直参与营造。成化十七年(1481)三月二十七日卒,年八十四。

五年大审例的制定 成化十七年(1481)四月二十四日,宪宗诏命法司慎刑狱,并遣司礼监太监怀恩同三法司录囚。由此定五年一审例:以丙、辛之岁施行,京师内臣审录以为常,称"大审"。南京则令内守备太监施行。明初,成祖定"热审"之例,罪轻者遣,仁宗命阁臣会审重囚,英宗又命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称"朝审",至此罢阁臣会审之例。而内臣大审,放遣之人倍于热审。从而导致太监染指审囚之事,法司俱视太监意而行,不顾明刑本意,弊病丛生。

安南攻老挝、八百 成化十七年(1481),安南(今越南)国王黎灏率兵九万,开山分三道进攻老挝,杀老挝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刀板雅之季子怕雅赛避走八百大甸(今缅甸东部)军民宣慰使司。镇守云南黔国公沐琮即命怕雅赛袭父职,免其贡物一年。安南既占老挝,复又发重兵攻八百,适遇雷击,士卒死者数千,八百宣慰使刀揽那遣兵扼其归路,袭杀万余,安南败归。同年六月,安南贡使将归,宪宗乃敕黎灏深省,归还侵地。

云南剑川州地震 成化十七年(1481)六月十九日戌时,大理府地震有声,民屋摇动。通安州,人皆偃仆,墙垣多倒塌。至亥时,鹤庆府、剑川州地大震,由亥时至天明,连震一百余次,直到午时方止。廨舍墙垣倒塌,压死军民囚犯皂隶二十余人,伤者多人。乡村民屋倒塌一半,压死男妇不知其数,到二十四日卯时方止。震中烈度(I_0)Ⅷ,震级(M)六级。

白行顺致仕 白行顺(?—1482),陕西清涧县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授工部主事,升户部郎中,擢太原府知府,改济南府。成化初升山西左参政,寻转右布政使,久之升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成化十七年(1481)七月十六日致仕,成化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卒。

吴节逝世 吴节(1397—1481),字与俭,号竹坡,江西安福人。宣德五年(1430)进士,授编修,历南京国子祭酒,官至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成化十七年(1481)七月十八日卒,年八十五。著有《吴竹坡诗文集》。

张瓒逝世 张瓒(?—1481),字宗器,湖广孝感县(今湖北)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授工部主事,迁郎中,历知太原、宁波二府,有善政。成化初迁广东参政,转浙江左布政使。成化十年(1474)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镇压播州(今贵州遵义)、松潘苗民起义,以功拜户部左侍郎。成化十五年为左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抚江北诸府,成化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卒。有《东征纪行录》、《土苴内外集》、《征夷杂记》等。

严辽东马市之禁 自成化十四年(1478),巡抚辽东都御史陈钺奏请复开辽东马市之后,朵颜等卫于开原、广宁二处每月两市。后通事刘海、姚安侵牟马市之利,致使朵颜诸卫怀怨,因而又大举扰边,不复来市。成化十七年十月初八日,已升为兵部尚书的陈钺惧罪及己,乃上言说:初立马市,非资外夷马以为中国之用,盖以安抚诸夷,今宜申严禁之例,每为市,令参将及布按使官一人监之,有侵利者宜治其罪,可免激变之患。宪宗准奏。

取太仓库银三分之一入内库 太仓库之设始于正统七年(1442),专以贮银,以支边用,后积至数百万两,续收者又分"老库"、"中库"。成化十七年(1481)十一月十八日,因赏赐过滥,内府银两供应不足,便取太仓库之中库银三分之一以供内库之用。成化十八年十月,复取太仓库银四十万两入内库。此后数年屡次取太仓银供内库使用,致使边用不支。

宪宗宠信方士僧道 成化末年,明宪宗朱见深越来越溺于神仙佛老之事,方士僧道由此加官受赏,导致奢靡之风日甚,国库空虚。方士李孜省初为江西布政司吏,因执法受赃而被罢为民。时宪宗好方术,李孜省学五雷法,厚结宦官梁芳、钱义,以符箓得幸于宪宗。成化十五年(1479)四月授太常寺丞。御史杨守随以"太常职司祭祀,应慎重选人,怎可用赃秽罪人"请罢之",给事中李俊亦以为言。宪宗不得已,乃改其为上林苑副监,但宠幸日甚,并赐其两枚印章:一曰忠贞和直,二曰妙悟通微,许其密封奏请。李孜省乃与梁芳表里为奸,干乱政事。成化十七年八月擢李孜省为右通政,寄俸于通政司,仍掌上林苑事,旋迁左通政。时传奉官日多,方士僧道因此升官者数千人之多,方士顾玒为太常寺少卿,方士赵玉芝、凌中亦累升官至太常卿,道士邓常恩亦进为太常寺卿,均与李孜省相倚为奸。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大臣言官皆极论传奉官之弊,首及李孜省、邓常恩等,宪宗因天象有变而惧,才贬孜省为上林监丞,并令吏部录冗滥名,斥罢五百余人,中外大悦。然十月再复为左通政,益作威福,借扶鸾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江西籍致仕后复起用者极多。李孜省密封推荐,缙绅进退多出其口,阁臣万安、刘吉、彭华皆附之,后复擢为礼部右侍郎,江西巡抚闵珪、洗马罗璟、兵部尚书马文升、顺天府丞杨守随皆被其排挤。继尧,江夏(今湖北武昌)僧人,以秘术因宦官梁芳进,授僧录寺左觉义,进右善世,命为通玄翊教广善国师,其母朱氏为娼家之女,继尧竟为之乞旌,而宪宗亦诏不须核勘即旌其门。日诱宪宗为佛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居民数百家,费国帑数十万,其奸黠窃权,奏请之事宪宗没有不准的。成化二十一年贬李孜省时,亦革其国师号为民。宪宗一朝,西番僧封法王及大智慧佛、大慈悲佛、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计,皆赐诰命。封给方士道士真人、高士称号者亦充盈都下。

邢宥逝世 邢宥(1416—1481),字克宽,号湄丘道人,广东文昌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授御史,出巡福建。天顺中出为台州知府,有治绩。成化初改知苏州,治理严而不苛,诏加浙江左参政,寻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十府,修理水利,省漕运冗费,百姓称便。后兼理两浙盐政,居数年致仕,成化十七年(1481)十二月初三日卒,年六十六。有《湄丘集》。

宦官横行无道 成化末年,明宪宗朱见深溺于神仙、佛老、声色货利、奇巧淫计,方士李孜省、僧继晓、太监汪直、尚铭、钱能等被委以重任,权加内阁大臣之上,对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权倾一时,以至造成许多宦官横行无道。成化十八年(1482)二月,太监郭文自南京还路过沛县,对沛县知县马时中供张不时有怒,遂绑时中之子拷掠,时中之子不胜楚苦,跳河自杀,马时中赶来相救,呼冤不止,郭文更加恼怒,令脱时中衣服,挚之以行。县民甚愤,绕船大呼,郭文怒叱,众皆不退,郭文竟使家奴击杀二人。后命锦衣卫逮马时中至京,谪降广西。尚膳监太监出行,有退避稍缓者,太监令人绑悬于墙,鞭笞至死,法司竟不追问。闰八月,武成后卫仓副使应时用上言:江西景德镇烧造御器,用宦官督工,工费滥溢,请罢遣归,而由诸司管理。宪宗竟下其于狱。时内府供应日繁,守备分守中官布列天下,都以进奉为名,糜帑纳贿,动以巨万计。

复罢西厂 成化十七年(1481)五月,宪宗诏命王越为平胡将军,充总兵官,汪直监督军务,率京营军万人至宣府(今河北宣化)防御扰边的鞑靼亦思马因。及至,参将吴俨等已追鞑靼至塞外,不意反被

包围，死者过半。宪宗置之不问，仍命越、直留屯宣府。是年冬，汪直、王越以寇已退请班师，宪宗不准。当时憎恶汪直的人把陈钺、王越说成是汪直的两把钺（一种兵器）。宫中擅演滑稽戏的中官阿丑有一天在宪宗面前模仿醉人互相谩骂，有人喊皇帝驾到了，他照样骂；有人喊汪太监到了，他赶快避开，说：因为现在的人只知有汪太监。他又摹仿汪直的样子，拿着两把钺到皇帝面前，别人问他这算什么，他说：我带兵就靠着这两把钺，问他什么钺，说是王越和陈钺。宪宗听了笑笑，对汪直的事才稍稍有所了解。但朝臣们这时仍然没有敢公开揭发汪直的。恰逢东厂太监尚铭抓到了大贼，被厚赏。汪直非常嫉妒，恼恨尚铭事先不告诉他。尚铭是由汪直推荐的，势力不及汪直，所以非常害怕汪直会陷害他，于是他收集了由汪直泄露出来的宫中的秘密奏告宪宗，并大量揭发汪直、王越互相勾结的情况，宪宗对汪直才开始有些疏远。至此一直请求班师，而且兵部尚书陈钺也为之请，受到宪宗斥责。不久，宪宗又命王越徙镇大同，以汪直总镇大同、宣府，而召京营将士回京，汪直久镇不还，日渐失宠。给事中、御史趁机纷纷上奏汪直之种种罪状。成化十八年三月，大学士万安知宪宗已恶汪直，乃上章极言京城众口一词，都要求撤西厂。宪宗遂命复罢西厂，一时中外欣然。当月，兵部尚书陈钺以罪被令致仕。八月，延绥边境报警，王越调兵前往支援，得胜。这时大学士万安等怕越有智谋，可能有办法使汪直回京，于是乃调王越至延绥，从而使之与汪直分开。大同巡抚郭镗又提出汪直与总兵许宁不和，恐误边事，宪宗乃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将汪直调至南京御马监，八月，复因言官弹劾被降为奉御。其党羽除已致仕之陈钺外，王越、戴缙、吴绶等被斥为民。次年，韦瑛因诬陷他人而被斩。

军卫附籍法的更定　根据旧例，凡军丁置买田产，许于有司寄编籍册，纳粮当差。后因敕御史清年，敕内开军丁有因附民籍，两相影射。及军伍缺，则又发册原籍勾扰。宜查勘粮草，仍于有司上纳，人丁尽数发回原卫相兼操守。而户部新降《攒造册式》，则又开具各处先任文武官员遗下家属、年久成业者，文职移文原籍官司，武职移于原任卫所，照勘得实，许将丁产尽行报官，编入正图，充当里甲，承纳粮差，其现种田地，照依轻则起科，仍于户下注写原籍贯址及今收缘边，以备查考。成化十八年（1482）五月二十六日，巡抚南直隶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王恕奏陈：宁国府呈欲将先年附籍军丁开发原卫，只存一丁姓名随产在籍，其原无籍名有产欲报的，亦准一丁姓名附籍。宪宗下章奏于户部商议，户部复奏：宜再行十三布政司并两直隶，凡有卫所之处，附籍军丁无粮草的，尽发原卫当差；有粮草的，则户留一丁应纳；丁老及有他故，仍于本卫取回一丁顶户；其无籍续报及田地收除等，俱如宁国府所奏。宪宗允准施行。

陈钺免官　陈钺，生卒年不详，字廷威，直隶献县（今河北）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擢光禄少卿。成化中升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勾结汪直，排斥忠臣，升兵部尚书。成化十八年（1482）三月十七日被劾免官致仕。陈钺工于心计，贪财奸诈，官吏百姓无不畏而恨之。

金绅逝世　金绅（1434—1482），字缙卿，上元（今南京）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刑科给事中，进都给事中，上章弹劾门达。擢南京大理少卿，进南京刑部右侍郎，巡抚江西，酿成凤毛之祸。成化十八年（1482）六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九。性狷介严毅，门无杂宾。著有《心雪稿》、《江西巡视稿》。

怀庆、宣武大水　成化十八年（1482）八月，河南自六月以来，雨水大作，怀庆等府、宣武等卫所坍塌城垣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居民房屋计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间，淹死军民男妇一万一千八在五十七人，漂流马骡等畜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头。

林聪逝世　林聪（1415—1482），字季聪，福建宁德人，正统四年（1439）进士，授吏科给事中，景泰元年（1450）进都给事中，慷慨论事，无所讳忌，弹劾宦官、妖僧及不法官吏。迁春坊司直郎，正统四年春，学士商辂言林聪敢言，不宜置于散地，于是复为吏科都给事中，上言请进贤退奸，限制庄田，罢散僧道，慎于刑狱等，皆切于时弊。当年冬因举乡人为官事被劾，贬国子学正。天顺初超拜左佥都御史出赈山东，还进右副都御史。成化二年（1466）出巡两淮，成化三年与户部尚书马昂请理京军，进右都御史，七年代王越巡抚大同，年底遇疾致仕。成化八年起故官掌南院事，奖励御史上言。成化十三年秋，召拜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成化十八年闰八月二十四日卒于位，年六十八，赠少保，谥庄敏。自景泰以来，论谏之臣，林聪可称为第一。

诏令刑官不得滞讼　成化十八年（1482）闰八月二十九日，巡抚山西左副都御史何乔新劾奏按察司佥事尚敬、刘源避事旷职，延滞词讼，致使知县王徵等事无结断，宜问如律。乞通行天下巡按御史凡三司官于词讼延滞半年之上不予结断者悉奏请执问。宪宗乃诏示天下刑官知晓。

《文华大训》修成　成化十八年（1482）十二月初六日，《文华大训》修成，教皇太子修身治国平天下

之术。书共二十八卷，分为进学、养德、厚伦、明治四纲，宪宗为之作序，命詹事彭华、中允周经等进讲于文华殿。以书成晋万安太子太傅兼华盖殿大学士，刘珝太子太保兼谨身殿大学士，刘吉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彭华以下纂修官皆得升赏。

马谅逝世　马谅(1406—1482)，字子谅，直隶和州(今安徽和县)人。宣德八年(1433)进士，授吏科给事中。正统九年(1444)升山东右参议。景泰时入为应天府尹。天顺初进南京户部左侍郎，天顺七年(1463)被劾致仕。成化十八年(1482)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七。为人精敏，所莅有政绩，出入中外三十余年，清操雅节，始终不变。

苏州吴江大饥　成化十七年(1481)春夏不雨，地裂河涸，禾枯及根，七月有雨飓风，自八月至冬，又连降大雨，太湖水溢，平地水深丈余，荡民庐舍，禾稼尽没。至成化十八年(1482)，田皆芜秽，大饥，斗米百钱，人相食。郡县官在寺庙内赈粥，听人就食，但吏胥从中贪污，百姓所得无几，死者如故。

翁世资致仕　翁世资(？—1483)，字资甫，号冰岩，福建莆田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除户部主事，历郎中。天顺元年(1457)拜工部右侍郎，天顺四年因上奏请减苏松等地织造事被下狱，谪衡州(今湖南衡阳)知府。成化初，擢江西左布政使，后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赈饥。再召为户部左侍郎，未几进尚书，总督京储，并掌部事。成化十九年(1483)二月二十八日致仕，六月初七日卒于途。赠太子少傅，谥襄敏。

禁止宦官牟利中盐　成化四年(1468)冬，宦官潘洪奏乞两淮余盐五万余计，户部不许。但时过不久，宪宗赐太监陈玹万引，潘午万引，自此以后，宦官奏乞盐引者日多。成化十八年十一月，赐御用太监刘通淮盐万引，更甚者，宦官梁芳宠于宪宗，借买珍玩之名，侵盗库金以数十万引，不足则给以盐引，前后奏乞两淮存积余盐不下数十万引，导致商引壅滞，边储日匮。成化十九年三月，宦官王钿奏令家人中支河东(今山西南)官盐二万四千引，户部奏说：势家奏请官盐数以万计，以致中纳者有怨，况且各边仓储空虚，粮草缺乏，此诚国计所系，不可不虑，今王钿违例中盐，宜下法司治罪。宪宗诏说：祖宗之制，内官不许私置产业，违例中盐与民争利，姑恕王钿。户部应查例揭榜禁约，后之犯者必罪不宥。

董方逝世　董方(1416—1483)，字中矩，顺天府漷县(今河北香河西)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大理寺历，升寺卿，转刑部左侍郎。成化十年(1474)以右都御史巡抚大同，寻召为刑部尚书，成化十三年七月致仕，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赠太子少保，谥襄敏。董方久任刑官，明习律令，过目不忘，人俱服之。

章纶逝世　章纶(1413—1483)，字大经，浙江乐清县人。正统四年(1439)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景泰初召为仪制郎中，上太平十六策，后因灾异复陈修德弭灾十四事，疏入忤旨，下狱榜掠。天顺初擢礼部右侍郎，为石亨所忌，调南京礼部，寻改吏部。秩满转礼部右侍郎，居官好直言，不为当事者所喜。为侍郎二十余年，不得升迁，遂致仕。成化十九年(1483)三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一。赠南京礼部尚书，谥恭毅。著有《拙斋集》、《困志集》。

查团营之弊　成化十九年(1483)五月，兵部尚书张鹏上言：京师武备用来控制四夷，必须养威蓄锐于无事之时，方能折冲御侮于有事之日。近来工役频繁，无暇训练，一旦征发，恐不足用，乞罢遣归营，停诸杂役。当时卢沟堤岸及京仓、通州(今北京通县)仓诸役一时并兴，是年春天，又命襄城侯李瑾督军万人修大慈恩寺。而团营见在官军共九万三千四右人左右，而赴上述各工役者即达五万二千人，下场者二万四千六百人，操练者仅一万六千七百余人。保国公朱永亦上言此事。宪宗乃命罢京仓之役，卢沟堤岸及通州仓修毕即回营，大慈恩寺速修。但当时团营之弊远不止此。后定西侯蒋琬上奏说：营帅、宦官习以军士供私役，谓之“应役”；市井游贩之徒，以窜名军籍，为避操练之苦，行贿于官，谓之“买闲”。而提督守营诸官，又诡以空名支饷，中饱私囊，以致缺伍者以万计。宪宗命太监怀恩与户部尚书余子俊前往查实，而其弊终不能革。

程万里逝世　程万里(？—1483)，字道远，华容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吏科给事中，升都给事中、通政司左参议，进右通政，往理易州山厂。成化十一年(1475)内批升户部右侍郎，成化十三年调南京工部右侍郎，未行，科道官劾其素乏清誉，遂令致仕。成化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卒。

郝璜逝世　郝璜(1404—1483)，字廷器，河南光州(今潢川)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历吏部验封司主事、员外郎、郎中。天顺初升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成化二年(1466)转左，未几致仕，成化十九年六月初八日卒，年八十。

鞑靼小王子扰边　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鞑靼小王子率兵三万、连营五十里寇大同，杀掠人畜数万。总兵许宁知敌势方盛，不敢出击，敛聚兵守城。鞑靼兵焚代王别堡，代王欲与敌战，使众人哭于辕门。许宁乃于巡抚郭镗扎营城外，鞑靼以十余诱之，

太监蔡新率兵驰击，遇伏大败，死者千余人，参将刘宁、周玺率兵解围。许宁竟以败绩报捷。七月，鞑靼复聚兵欲寇宣府，宪宗诏命朱永为镇朔大将军，充总兵官，以蔡新监军，率京军抵御。宣府总兵官周玉、参将刘宁、巡抚秦纮、指挥曹洪、都指挥孙成率军力战，鞑靼乃退。

王臣伏诛　王臣，锦衣卫千户，善妖术，与百户王完等以妖术为内监王敬所信任。成化十九年(1483)，王敬奉使苏州、常州等府，带王臣、王完等十九人以从，所到之处凌虐官吏，搜括民间珍玩，夺人室女纵淫，官吏有不从之者多被辱。至苏州，召诸生写妖书，不从，即令有司逮诸生至驿中污辱，诸生大哗。王敬反奏其抗命，下巡按御史逮问。巡抚王恕上言：值此多灾之年，本宜遣使赈济百姓，怎能使王敬之辈横索玩好？今见王敬赍来驾帖，只开"前往苏、常采取药饵，收买书籍"，并无行拘大户索要银两之权。而王敬则动辄以朝廷为名，需索要求，无有纪极，引起东南骚然，民不堪命。时下王敬才来，太监段英又至采办药材冰梅，苏松、常三府已办与价银六百两，镇江、太平(今安徽当涂)、池州(今安徽贵池)、宁国(今安徽宣城)、安庆、徽州(今安徽歙县)、广德七府州与银一千五百两，又发钞于松江，索银二千两。王敬又发盐十五万零五百引与宁国等府，逼银三万二千五百两。又有盐船数百，发至江北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府卫、江西南昌等处逼卖，不知又得几千万两。至苏、常等府，倚势逼取官民银三万六千余两。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及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银，不知又有几千万、数千户。王臣专弄左道邪术，而敬竟听其发置，舳舻相接，满载而归，亏损国体，大失人心。现谨将臣该管地方其索取金银开数奉上，乞望割恩于坏事之小人，明正法典以告天下。其时常州知府孙仁为王敬所诬被逮，王恕又上章相救，并三次上疏弹劾王敬。适逢东厂宦官尚铭亦发现王敬诸奸事，宪宗乃命都察院查实，于同年九月，斩王臣，传首江南示众，王敬戍孝陵卫，王完等戍边卫。

罢斥传奉官　成化后期，传奉官动辄数百人，这些不经吏部考铨选的额外人员，既破坏了官员的考核任免升迁制度，又耗费国帑，平添许多贪官污吏，竞相祸国殃民。陕西巡抚郑时曾上言说：传奉之官，日益冗滥，因首劾宦官梁芳及其引用之李孜省、僧继晓等。宪宗竟谪其贵州参政。陕西人哭送之，如失父母，宪宗听说其事，始有悔意。成化十九年(1483)十二月，吏科都给事中王瑞倡同官上言说：爵赏乃天下之公器，没有功德才能是不能够获得的。近来奸佞之辈骤升高位，内臣染指官职，武官荫袭竟至目不识丁之人。有的人选期不到而得升官，有的人任职外地，骤迁京官，以至于厮养贱夫，市井童稚亦得名器之荣，滥授至此，令有识之士寒心。乞请悉予斥汰，以存国体。御史张稷等亦言：传奉各官，至于末流贱伎升至公卿，屠狗贩缯滥居清要。文臣有不识一丁者，武臣有未挟一矢者；有父子并坐一堂者，有兄弟分踞各署者，更甚者有军匠逃匿，易姓进身；官吏犯法，隐罪有宠，一日而数十人得官，一署而数百人寄俸，自古以来，有如此之政令否？宪宗不得已，乃贬李孜省一秩，凌中等十二人皆罢黜，朝野称快。而梁芳竟未获罪。

京师居庸关、古北口地震　成化二十年(1484)正月初二日京师地震，有声如雷。天寿山、密云、居庸关、古北口一带，城垣墩台驿堡倒裂不可胜计，人有压死者，命拨京营军士二千人修理居庸关楼橹墩台，命工部右侍郎贾俊督修天寿山四陵。同日，自京至大国、宣府诸路俱地震，坏城郭庐舍，裂地涌沙。宣府地裂。涌沙出水。永平府、辽东等地亦震，声如雷。震中烈度(I_0)V Ⅱ—Ⅳ，震级(m)为六点二五级。

尚铭被逐　成化二十年(1484)正月二十一日，署东厂事司礼太监尚铭有罪被逐。尚铭以附汪直而被任领东厂事，汪直被贬逐、西厂被罢后，尚铭遂专东厂事，愈擅权势，鬻爵卖官，无恶不做。他听说京城有富豪之家，乃罗织其"罪名"，富家无奈，只得重贿。事发之后，宪宗诏命杖之百，谪充南京净军，抄其家，金银财宝悉送内府，用车运之，竟数日不绝。吏科都给事中王瑞等上奏：尚铭旧为汪直所引乃入东厂，近为太监李荣、萧敬所引得入司礼监。而李荣曾出使大同结汪直，隐蔽边情，萧敬曾使湖广，所过贪残无厌，乞并加贬斥以绝其根株，否则来患未已。宪宗置李荣、萧敬于不问，而以太监陈准代尚铭督东厂。陈准为人谨慎，既至东厂，告诫诸校尉不要过多干预政事，自是京师稍安。

张成洗改黄册　成化二十年(1484)二月，应天府民张成代人充役后湖库，受人之财改洗黄册。事发之后，南京户部上奏说：国初以天下版籍为重，令有司十年一造黄册，于后湖不通人迹之处建库收贮，并设给事中、主事两员总理其事，凡天下军民奏告户籍不明者于此查验，有开船过湖者必至内府办理手续，事毕交收。近张成入内为弊宜斩，并请揭榜禁约。宪宗乃命斩张成示众。

胡居仁逝世　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号敬斋，余干(今江西)人。曾师事名学者吴与弼，一生绝意仕进，以布衣终其身。一生以讲学为业，筑室

山中，四方来学者甚多。他认为"气之有形体者为实，无形体者为虚；若理则无不实也"。穷理的方法不止一端："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批判"释氏见道，只如汉武帝见李夫人，非真见也。只想象这道理，故劳而无功。儒者便即事物上穷究。"曾作《进学箴》曰："诚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体皆仁。举而措之，家齐国治，圣人能事毕矣。"成化二十年(1484)三月卒，年五十一。万历十三年(1585)追谥文敬。有《居业录》传世。

李田逝世　李田(？—1484)，字舜耕，湖广嘉鱼县(今湖北)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户部主事，升郎中。成化三年(1467)征讨四川山都掌少数民族起义时，李田督饷，以功升广东右参议，进浙江左参政升右布政使，转福建左布政使，未几升右副都御史整饬蓟州(今河北蓟县)、山海关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今北京)、永平(今河北卢龙)等府。成化二十年(1484)四月二十日卒。

设孟密安抚司　孟密(今属缅甸)原为云南土司木邦(今缅甸掸邦东北)之西部辖地。木邦宣慰使罕揲法死后，其孙罕落法袭职。罕揲法之女曩罕弄嫁孟密部长思外法，自以位尊而不受节制，袭据公署，自称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称宣慰使，窃据孟密，欲与木邦一分为二。黔国公沐琮上奏，宪宗诏命三司官往抚，但曩罕弄骄横不服，且欲外结交趾(今越南)，逼胁木邦、八百(今缅甸东部)。兵部尚书张鹏主张用兵。下廷臣议，都说孟密与木邦仇杀，并未侵犯边境，不宜兵而宜抚。于是成化十八年(1482)七月，宪宗诏令副都御史程宗与译者序班苏诠往抚。曩罕弄遣人至京进献金宝，乞别立安抚司，开设治所，直隶云南布政使。下内阁议，万安欲许，刘珝、刘吉反对，而苏诠受思柄之贿，在程宗面前替思柄说话，适逢云南巡抚吴诚卒于官，而以程宗代之，其上言说：曩罕弄与木邦仇杀已久，势难再合，乞如前请。遂于成化二十年六月设孟密安抚司，以思柄为宣慰使。时孟密产金，而木邦兵弱。思柄肆意侵夺，先后占据木邦地凡二十七所。自此以后，诸部扰攘侵夺，中国亦先后用兵数十年。

余子俊造战车　成化二十年(1484)八月，总督大同、宣府军务户部尚书余子俊上言：大同、宣府地多平旷，寇至车战为宜，大概万人为一军，用车五百余辆，每辆用步军十人，行则纵以为阵，止则横以为营，车间用鹿角榨塞其阙，乞敕工部运生熟铜铁至边，大同造一千，宣府五百。宪宗以为此为守边长久之策，准其议。但后来试用即死数人，终归于废。

徐英逝世　徐英(1426—1484)，字士杰，一作时杰，四川中江县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吏科给事中，立朝直言正色，凡百官奏章违忒，无不驳正。进都给事中，升顺天府丞。历河南左、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成化二十年(1484)八月卒，年五十九。

俞钦逝世　俞钦(1431—1484)，字振恭，浙江新昌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选为翰林庶吉士，授礼部仪制主事，天顺初升郎中。天顺七年(1463)，因会试场大火谪迁松江府同知。成化初召还，改兵部武选司郎中，以参加征剿山都掌少数民族起义功升太常少卿。成化八年(1472)升礼部右侍郎，后转为兵部左侍郎。成化二十年(1484)八月卒于官，年五十四。有《思庵集》。

林俊弹劾奸佞　宦官梁芳、韦兴勾结万贵妃，糜帑藏为奇巧淫计，内帑累朝所积金七窖俱尽，其所荐僧继晓亦得金宝不可数计。成化二十年(1484)十月，刑部员外郎林俊上言说：僧继晓以妖言惑众，竭有用之财，供无益之费，工役不息，人怨日兴，当斩其以谢天下。纵继晓为恶者梁芳也，其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数年之间，祖宗百余年之府藏毁之将尽，比之汪直、尚铭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内到朝臣，外到市井百姓，皆痛心灾民之死，莫不欲食芳与继晓之肉，而最终不敢以此言进于上者，实惜官畏死之故，而我不忍畏罪不言，怕的是误了祖宗大业。宪宗大怒，下林俊于锦衣卫狱拷讯。后军都督府经历张黻上疏论救说：今三边未靖，四方灾旱，军民愁苦万状。凡心中怀忧者都怕皇上不能尽闻，为臣不敢尽言。今林俊上言反而得罪，以言为戒恐不是朝廷的福气吧。宪宗为之怒，亦下之于狱，并且想斩杀二人。司礼监太监怀恩为人耿直，为之力争，宪宗益怒，用砚投之说：你岂不是帮助林俊讥讽我吗？怀恩摘去帽子伏地号哭，宪宗斥之出去。怀恩遣人到镇抚司说：你们讨好梁芳而陷害林俊，林俊一死，你们还如何活下去呢？宪宗命将林、张各杖三十，谪林俊云南姚州(今姚安)判官，张黻云南师宗州知州。十一月，南京兵部尚书王恕闻其事，复上言说：天地才有一坛，祖宗只有一庙，而佛竟至千余寺，一寺立而移民数百家，花内帑数十万。人都知此事之非而不说，只有林俊说之；人都知林俊之是而不说，只有张黻说之。而今都置之于法，使人皆以言为犯讳之事，假设再有奸邪误国，皇上如何知道呢？怀恩见到王恕之奏，感叹说：天下忠义，斯人而已！

陕西、山西、河南发生大旱灾　成化二十年(1484)秋季，陕西、山西、河南发生大旱灾。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郑时等上奏说：陕西连年大旱，至今更

烈，饿死之人满路皆是，有人气还未绝，已被人割食。巡抚山西左佥都御史叶淇上奏说：饿死者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至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宪宗命免其税粮，由南京、江西等地转漕运粮六十万石由水路运至河南，分发三灾区。成化二十一年正月，遣官发帑金二十五万赈济。

众臣弹劾奸佞 成化二十一年(1485)正月初三日，宪宗因天象有变而诏敕群臣上言时政得失。吏科给事中李俊率同官上疏说：今日弊政，最大且急者为皇上之近幸干政，大臣不称职，爵赏太滥，工役过烦，进献太多，忠臣未复。天变之来，都由于此。内侍的设立，国初曾有定制，而今一监数十人，其分布藩郡，总领边疆，荐引邪佞，投献奇巧，如梁芳、韦兴、陈喜之辈，不可枚举。乞无令干纪，奉使于外者召回，用事于内者省汰。今之大臣不结内臣则不得进，不依内臣则不得安，此以财换官，彼以官鬻财。乞罢黜此等不称职之大臣。爵赏应加于有功德之人，而现在一年传奉官至千人，数年已数千人；数千人之俸禄，一年以数十万计，皆为国家之租税，黎民之脂膏，不用以养贤才，而用以饱奸佞，实在可惜。如李孜省、邓常恩之辈。乞尽罢传奉官，以使爵赏不滥。京师建佛寺之役无宁工之日，京营将士不遗余力。如国师继晓，假妖以济私，耗费尤甚，中外切齿。乞皇上内惜资财，外惜民力，不急之役皆停罢。假借进奉以牟利者用一书一器竟获利十倍，乞留府库之财为军国之备。陕西、河南、山西大旱，赤地千里，尸骨遍野，乞皇上体天心之仁爱，悯百姓之困苦，加以赈抚。如此则天意可回。一时先后上言者，计有给事中卢瑀、秦升、童柷、御史汪奎，员外郎崔升、彭纲，主事张吉、苏章、周轸、李旦，中书舍人丁玑，副都御史彭韶，南京兵部尚书王恕等，大都为李孜省、僧继晓及传奉之滥而发。宪宗因天象有变而生恐惧之心，乃降李孜省为上林丞，继晓先为林俊所劾，自知难容，乞归家养母，至是亦革国师之号，罢为民。二月，吏部奏放免传奉官五百六十余人，宪宗诏留其中六十七人；兵部奏罢五百零三人，宪宗诏留三百九十四人，其余罢斥。林俊、张黻得免谪，授南京散官。一时朝野称快。宪宗以修省求言，对众臣不好问罪，但内心忌恨，密令尹旻将上言的六十人姓名写在屏风上，遇机则贬出京。后来自卢瑀以下相继贬斥，而李孜省、邓常恩等擅宠如故。

罢军器局冗官 成化二十一年(1485)正月二十五日，军器局军匠金福郎上言说：正统间，本局军民匠五千七百八十七人，只有太监一人、内使一人、工部侍郎一人提督，近来人匠逃亡者多，只有二千余人，而监督内臣增至二十人，且私役优秀工匠，本局只好外聘匠人，增加开支。乃命量减冗官，以免造成军器短缺。

申溺女之禁 成化二十一年(1485)四月初八日，温州训导郑璟上言：浙江温州、台州、处州三府百姓所生女子，因怕日后婚嫁之费，往往溺死，残忍不仁，伤生坏俗，乞令所司揭榜晓谕禁止。其时不仅上述三府，宁波、绍兴、金华以及江西、福建、南直隶等处亦有此事之发生。宪宗下诏：人命至重，父子至亲，今以婚嫁之累而至溺死。今后民间婚嫁装奁要与家产相称，不许奢侈。再有犯者发戍远方。

施纯逝世 施纯(1435—1484)，字彦厚，顺天府东安(今河北安次南)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升鸿胪寺少卿、寺卿。因熟悉礼度得宠，得擢礼部右侍郎、尚书，再加太子少保，升迁之快，前所未有。成化二十一年闰四月十四日卒于官，年五十一。

李宾逝世 李宾(1416—1485)，字廷用，号敬庵，直隶顺天顺义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御史，有直名。超迁太仆寺卿，寻转右副都御史提督永平(今河北卢龙)、山海等处军务，兼理粮储。天顺初改大理寺卿，天顺四年(1460)父丧，起复升右都御史，成化初进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因不愿南居而屡次上章求解职。成化五年(1469)改左都御史，寻加太子少保，成化十三年弹劾汪直，因恐得祸而致仕，成化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卒，年七十。赠太子太保，谥襄敏。

王浚逝世 王浚(1431—1485)，字克深，直隶威县(今河北)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监察御史。以王越荐升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未抵任即改都察院同职巡抚甘肃。后改抚治郧阳。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初二日卒，年五十五。居官有治绩，不负众望。

朱英逝世 朱英(1418—1485)，字时杰，号诚庵，湖广桂阳(今湖南汝城)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御史，参与剿抚浙江叶宗留起义。景泰初擢广东右参议，天顺年间进右参政，成化初改陕西同官，征讨满四时督饷有功。历福建、陕左右布政使，皆推行均徭法，民称便。成化十年(1474)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陈安边事，切于时务。成化十一年总督两广，以安抚为主，瑶民多归附。成化二十年入掌都察院事，寻加太子少保。成化二十一年上言请罢奸佞。是年七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八，赠太子太保，正德中追谥恭简。有《詹庵纪年》、《诚斋遗稿》、《认真子集》。

万贵妃家人皆得官 成化末年，万贵妃擅宠益盛，以至其家子仆皆得授官。成化二十一年(1485)八月初四日，宪宗诏令传升万安为后府带俸都督佥

事，万祥为指指同知，万家仆人徐达为指挥佥事，可世袭。舍人丁安、万泰、王贤亦被授百户。

鲁能逝世 鲁能（？—1485），字千之，广东新会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户部主事。升郎中。成化九年（1473）升陕西右参议，累迁右参政、左右布政使，善理财赋。超拜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初十日卒。朴实勤慎，所至无废事。

李本逝世 李本（？—1485），字立之，四川富顺县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官检讨、编修、侍读。参予修撰《一统志》、《英宗实录》，后升南京太常寺少卿、礼部侍郎、尚书。屡为科道官所劾。成化二十一年（1485）九月初九日卒。

刘珝致仕 刘珝（1426—1490），字叔温，号古直，山东寿光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景泰七年（1456）修《寰宇通志》成，进修撰，天顺元年（1457）进右中允，五年任《大明一统志》纂修。成化初，升太常侍少卿兼侍读，《英宗实录》成，进卿兼侍读，成化七年（1471）进侍读学士，成化十年升吏部左侍郎，仍直经筵。大学士刘定之赞其为讲官第一。在吏部任内，不徇私情。成化十一年升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敢直言。成化十三年升户部尚书兼侍读学士。成化十四年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成化十八年《文华大训》成，进太子太保谨身殿大学士。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以遭忌于万安、李孜省而致仕。弘治三年（1490）三月卒，年六十五，谥文和。有《刘左直集》。

高明逝世 高明（1422—1485），字上达，号恳轩，江西贵溪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敢直言，擢大理寺丞。成化初拜南京右佥都御史。成化三年（1467）受命前往扬州征讨盐寇，造巨舰于江上巡逻，盗遂平。宦官卖私盐者，高明皆据法收没，盐政大治。后以父母年老而致仕。成化十四年，福建上杭民起事，诏起复巡抚福建，督兵征讨，功成复致仕。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四。有《冬养录》、《征闽录》、《安定录》。

陈政逝世 陈政（？—1485），合肥人。袭父平乡伯陈辅之爵。成化三年（1467）奉敕充总兵官镇守两广。成化二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卒。在镇十九年，最谙夷情。杜绝私请，如廉州最为繁华，但未曾一至。

韩定逝世 韩定（1417—1485），字士安，号静庵，直隶咸县人，由译字生授鸿胪序班，历中书舍人、员外郎、内阁书办，为大学士李贤所信任，进太仆寺少卿、寺卿，提督四夷馆。成化二十一年（1485）十一月初十日卒，年六十九。韩定居官四十余年，勤慎无怠，性孝友，尤好恤贫。

娄良逝世 娄良（1411—1485），字至善，河南通许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主事，累升至郎中。景泰中升广西右参政，专理边务。天顺间转督凉州（今甘肃武威）饷事，兼管屯田。成化初擢陕西右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后致仕，成化二十一年（1485）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五。娄良为官清正廉洁，归家时行李极少。

尹龙之狱 尹龙，官翰林侍讲，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尹旻之子。成化末，尹旻权重，与阁臣万安不和，但尹旻与阁臣刘珝为同乡（俱为山东人），所以万安数次欲罢尹旻而不果。成化二十一年（1485）九月刘珝为阁臣万安、刘吉所排斥而致仕。时江西方士李孜省得宠，假言扶鸾得"江西人赤心报国"之语，宪宗竟听从，遂手敕兵部左侍郎尹直（江西人）为户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尹直、万安交结李孜省，加上前已升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的彭华（江西人），遂构尹龙之狱。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尹旻之同乡、武选郎邹袭因事谪外，而尹龙与邹袭关系密切，遂联络一百余人上疏请留邹袭。下吏部议，尹旻说：此为公论，请复邹袭官。但当时宪宗已怀疑尹旻有私于邹袭，乃问：你怎知这是公论？但并未深究。未几，东厂校发现尹龙与邹袭互通，尹旻乃称罪，被夺太子太傅，授太子少保。五月，东厂复发现尹龙勾结官吏收贿事，万安、彭华遂联络数人弹劾尹龙及尹旻，乃下龙于锦衣卫狱，令旻致仕，通判王范、经历张琎等谪。御史吕璋复上奏弹劾侍郎侣钟、秦纮，大理寺丞刘瓛，寺副苏泰，大仆寺卿张海，顺天府丞黄杰，洗马罗景，给事中马龙，御史刘璧、于璧、高辅、张鼐，编修王敕，员外郎杨荣、袁昶，皆为山东人升官，是为尹旻之同党，后来或降或调。七月，工部右侍郎谈论，大常寺少卿刘淳亦因与尹龙、尹旻有结而被罢谪。尹龙之狱开明代党争之先，其弊流习甚远。

诏谕群臣修举职业 成化二十二年（1486）五月，翰林侍讲尹龙事发后，其父尹旻被免吏部尚书职。六月初二日，宪宗诏敕群臣修举职业，他说：人君治国，必先得贤；人臣辅治，必谨奉法。从太祖高皇帝创业至今，岁月滋久，文恬武嬉，往往恣情玩法，堕职偾事，形迹败露。我怕尔等不知儆戒，以致名节不立、勋业无闻，国家将何以赖之？今特戒谕，当奉公守法，以称我求贤图治之意，敢有执迷不悟，仍蹈前非者，我决不姑宥。

赵辅逝世 赵辅（？—1486），字良佐，安徽凤阳人。袭职为指挥使。景泰初擢署都指挥佥事，充左参将守怀来（今属河北）。天顺初，征入右府莅事。成

化元年(1465)以中府都督同知拜征夷将军，前往征讨大藤峡瑶民起义，以功封武靖伯。成化三年拜总兵官征辽东，连战有功，进侯。成化八年，廷议大举搜套以征鞑靼，拜为将军出三边，无功而还，督京营。成化十二年解营务。成化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卒，赠容国公，谥恭肃。赵辅俊辩有才，以武职能文，但好结权幸，屡遭弹劾。

诏谕法司慎刑 成化二十二年(1486)六月二十一日，宪宗诏谕法司说：法司职典刑狱，关系重大，必详慎明允，不得苛纵。近闻堂上及所属官多怠玩不谨，往往迟去公署，早回私家，及问刑又多受嘱容情，观望延调，事久不结，甚至肆意出入人罪，致使刑狱不当，人心不满。今后务须各加省悔，堂上官当正己率下，严督所属勤于职业，明慎用刑，勿蹈前失。敢有不遵约束，旷职做弊者，指实具奏处置，若容隐不报，一并治罪。

商辂逝世 商辂(1414—1486)，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人，举乡试第一。正统十年(1445)会试，殿试皆第一，明代，三试均第一者唯有商辂一人。除修撰，进学东阁。景泰初入内阁参机务，反对南迁，主张抵抗瓦剌。进侍读、学士，再进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学士，修《寰宇通志》成，加兼太常寺卿。天顺初被石亨所陷下狱，寻被斥为民。成化三年(1467)以故官入阁，多有建言。进兵部尚书，转户部。主修《宋元通鉴纲目》成，兼文渊阁大学士。皇太子立，加太子少保，进吏部尚书。成化十三年进谨身殿大学士，上言请革皇庄，赈济灾民。会汪直用事，商辂率同官弹劾之，言语激烈，西厂遂罢。及西厂再立，商辂请致仕。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三，赠太傅，谥文毅。著有《商文毅疏略》、《商文毅公集》、《蔗山笔麈》等。

李震逝世 李震(？—1486)，字懋学，河南南阳人，袭职为指挥使。正统九年(1444)从征兀良哈有功，进都指挥佥事。从征云南，进同知。景泰初充贵州右参将、左参将，因征讨有功进都督佥事。后任湖广总兵官，屡出兵征讨少数民族起事者。成化初，出征荆襄流民起义，论功进右都督。成化十一年(1475)征苗民起义，论功封兴宁伯。汪直陷项忠，李震亦得罪夺爵，降为左都督至南京闲住。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卒。

陈选逝世 陈选(1429—1486)，字士贤，浙江临海人。天顺四年(1460)进士，授御史，直言敢行。成化六年(1470)迁河南副使，寻改督学政。汪直来巡，不拜谒，只长揖而已，词气严正。进按察使。后历广东左、右布政使。市舶中官韦眷收受进贡番人之重贿，番禺知县高瑶收没之，韦眷乃诬陈选、高瑶贪污。成化二十二年(1486)诏命逮陈选至京，及行日，士民数万号哭遮留。同年九月初二日，行至南昌有病而卒，年五十八。正德中追赠光禄卿，谥忠愍。

何乔新勘处播州土司之狱 四川播州宣慰使杨辉偏爱其庶长子杨友，欲夺嫡子杨爱的继嗣权，但诸部不从。杨辉遂与四川巡抚张瓒密谋，请旨另立安宁宣抚司，以杨友为使。杨辉死后，杨友诬杨爱图谋不轨，欲反朝廷。成化二十二年(1486)九月，宪宗诏命刑部左侍郎何乔新前往勘处。何乔新乃宣友、爱二人面对真伪，尽得其始末，遂为杨爱正名，夺杨友之官，斩杨友同谋张渊。播州遂平。

陈俊致仕 陈俊(1419—1488)，字时英，号愚庵，福建莆田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除户部主事，历郎中。天顺五年(1461)督饷两广。成化初，擢南京太常少卿，成化四年(1468)召拜户部右侍郎，善理钱谷之事。历吏部左、右侍郎，后拜南京户部尚书，寻改兵部，参赞机务。后改任吏部。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致仕，加太子少保。弘治元年(1488)二月卒，年七十。谥康懿。陈俊诚心体国，识大体，负德望，为一时名宦。

宋钦致仕 宋钦(？—1499)，字克敬，陕西乾州(今乾县)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历升福建按察司佥事、四川副使、河南按察使，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升南京大理寺卿，成化二十二年(1486)十二月十八日致仕，弘治十二年(1499)七月二十日卒，赠刑部尚书。

万贵妃暴卒 万贵妃(？—1487)，山东诸城人。四岁选入宫，为宫女。后服侍宪宗得宠为贵妃。成化末年，宦官钱能、汪直、梁芳、韦兴等人交结万贵妃，皆假借贡献，苛敛刮民财，倾竭府库为奇巧淫计。其父、兄、弟、侄等皆授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其弟万通之子两岁、养子四岁即被授官，连其家仆徐达亦得官百户。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初十日暴病卒。

马驯致仕 马驯(？—1496)，字德良，福建长汀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户部主事，累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赈济荆襄流民。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十九日被劾致仕。弘治九年(1496)五月卒。

胡拱辰致仕 胡拱辰(1416—1508)，字共之，浙江淳安人，正统四年(1439)进士，出为黟县(今属安徽)知县，有惠政，擢御史。景泰初，出为贵州左参政，历广西、四川左右布政使。成化八年(1472)拜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成化十一年迁兵部右侍郎，寻改左副都御史总理粮储，再改南京工部尚书，

节财省事，人皆称之。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为言官所劾致仕。正德三年(1508)正月卒，年九十三。赠太子少傅，谥庄懿。

唐瑜闲住 唐瑜(1423—1494)，字廷美，上海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南京礼科给事中，出为衢州知府，善断疑案，百姓为立生祠。历湖广右参政、山西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十九日被劾闲住。弘治七年(1494)九月卒，年七十二。

赵文博闲住 赵文博(1425—1497)，字子约，山西代州(今代县)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监察御史。天顺中劾石亨、曹吉祥下狱，寻贬淳化知县，有善政。亨败，擢卫辉知府，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十九日被劾闲住。弘治十年卒，年七十三。

彭华致仕 彭华(1432—1496)，字彦实，号素庵，江西安福人，前阁臣彭时之族弟，景泰五年(1454)进士，馆选授编修。天顺中，因多支廪饩，坐除名，赖大学士李贤救免。成化三年(1467)修《英宗实录》成，进侍读。九年预修《宋元续通鉴纲目》，成化十三年书成进侍讲学士。成化十七年以詹事兼翰林学士。成化二十一年进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成化二十二年进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得风疾致仕。彭华在阁年余，与乡人李孜省和万安相结，排斥异己。弘治九年(1496)十月卒，年六十五，赠太子少傅，谥文思。有《彭文思公文集》行世。

王献逝世 王献(？—1487)，字惟臣，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修《寰宇通志》成升修撰，再进左春坊左谕德兼修撰。成化六年(1470)充日讲官。成化八年升翰林院学士。修《宋元通鉴纲目》成，进詹事府少詹事兼学士，修《文华大训》成升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初七日卒于官。赠礼部右侍郎，谥襄敏。

谢一夔逝世 谢一夔(1425—1487)，字大韶，江西新建人，天顺四年(1460)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修《英宗实录》成升左春坊左谕德，修《续资治通鉴纲目》成进学士，未几擢礼部右侍郎，升工部尚书。成化二十三年(1487)五月十九日卒于官，年六十三，赠太子少保，谥文庄。

陕西临潼、咸阳地震 成化二十三年(1487)七月二十二日，陕西临潼、咸阳一带地震，声如雷，房屋多坏，死者甚众。关中地区，声如雷，山多崩圮，庐舍多倒塌，压死一千九百余人。长安(今西安市)荐福寺塔(即小雁塔)，自塔顶至足中裂尺许，明彻如窗牖，行人见之。波及西安府、高陵、白水，延安府中部、洛川等地同时亦震。震中烈度(I_0)Ⅷ，震级(M)为6.25级。

赵胜逝世 赵胜(？—1487)，字克功，迁安人。袭职为指挥使。土木之变御瓦剌有功，进都指挥佥事，天顺中超迁都督佥事、同知。西征鞑靼有功。成化初，典鼓勇营训练，寻典耀武营。成化四年(1468)充总兵官镇辽东。成化七年召还典五军营，寻改三千营。后进左都督，加太子太保，成化十九年封昌宁伯。成化二十三年修万贵妃墓，于七月十八日骑马坠崖而卒，赠昌宁侯，谥壮敏。

蒋琬逝世 蒋琬(1433—1487)，字重器，直隶江都(今属江苏)人，袭祖父蒋贵定西侯之爵。天顺末，佩征羌将军印，总兵甘肃。成化八年(1472)召还，协守南京，兼督操江。成化十年入督十二团营，寻兼总神机营兵。上言请建北京外城，以防敌之长驱直入。又请将畿内、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田亩分给百姓，以足边用。成化二十年，佩将军印御边，班师加太保兼太子太傅。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五。赠凉国公，谥敏毅。有《筠清轩集》。

刘俊逝世 刘俊(？—1487)，字士英，陕西宝鸡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编修，累升国子监祭酒，寻改南通政司左通政，累官南工部右侍郎。成化二十三年(1487)二月被劾致仕，八月初三日卒。刘俊拒附石亨，人多称之。

朱见深逝世 朱见深(1447—1487)，原名见浚，明英宗朱祁镇的长子。天顺八年(1464)正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改元成化。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一。九月上尊谥纯皇帝，庙号宪宗。在位期间上景帝尊号，雪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亦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里日见充足。但滥施赏赐，专宠汪直，寄情于声色货利，奇巧淫技，导致厂卫特务横行，农民起义不断。

朱祐樘即皇帝位 朱祐樘，宪宗朱见深第三子，母淑妃纪氏。成化十一年(1475)十一月立为皇太子。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次年为弘治元年。十月，尊皇太后周氏为太后太后，皇后王氏为皇太后，妃张氏为皇后。

雷泽逝世 雷泽(？—1487)，字时霖，山西定襄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成化二年(1466)授刑科给事中，成化十一年擢太仆寺少卿，成化二十二年升南京光禄寺卿，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卒。在朝抗直不避权势，疏陈戚畹骄恣，被杖几死，而后复谏不止，闻者

称为铁汉。

贬逐宪宗诸奸佞 孝宗即位之后，科道官皆上疏弹劾李孜省及其党邓常恩、赵玉芝交结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孝宗降旨，谪梁芳南京少监，万喜为指挥使，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等戍边陕西。十一月，梁芳等遇大赦，太监蒋琮乃上言芳等罪大恶极，不当赦免，于是复逮下狱。李孜省不胜拷掠而死，邓常恩、赵玉芝坐交结近侍律当斩，妻子流二千里。孝宗诏免其死，仍徙边。梁芳死于狱中。

罢传奉官、夺僧道封号 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月初一日，孝宗应科道官之奏，降黜传奉官右通政任杰、侍郎蒯刚、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罢遣禅师、真人等二百四十余人，西番法王、佛子、国师等七百八十余人，遣还本土，并追夺诰敕、印章及仪仗诸玉器等物。僧继晓亦被罢为民。弘治元年(1488)十一月，给事中林廷玉复请逮治继晓至京，法司论其罪，认为可以免死。给事中陈璚复言其罪大，不当免，乃命斩其首。

万安致仕 万安(1419—1489)，字循吉，四川眉州(今眉山)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景泰三年(1452)升左春坊司直郎兼编修，修《寰宇通志》成，进右中允。天顺元年(1457)改尚宝司丞，三年转侍讲。成化二年(1466)晋学士，三年进少詹事，寻迁礼部右侍郎。五年，以礼部左侍郎兼学士入阁预机务。成化十二年擢户部尚书。成化十三年，商辂致仕，升万安为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到成化二十三年，累官至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万安平庸无能，结外戚万通为族人，与李孜省勾结，罢斥贤士，以致仕路侧目。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因进房中术给孝宗，孝宗薄之，遣宦官怀恩至内阁摘去其牙牌，勒令致仕。弘治二年(1489)三月卒，年七十一，赠太师，谥文康。

李裕致仕 李裕(1424—1511)，字资德，号古澹，江西丰城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御史。天顺年间，石彪滥报功，诏李裕往核实，石享给李裕写信，李裕将信烧掉，从实报上，由是有强直之名，擢山东按察使。成化初，迁陕西左布政使、顺天府(今北京)尹，皆有治绩。进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江北诸府，修运河，赈灾民。成化十九年(1483)进右都御史，迁工部尚书。后为李孜省之荐迁吏部尚书，言官以此弹劾李裕，李裕心不平，写《辩诬录》，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致仕。正德六年(1511)卒，年八十八。

刘敷致仕 刘敷(1421—1502)，字叔荣，江西永新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擢南台监察御史，历福建按察使、布政使。成化十年(1474)升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平靖州苗民起事。成化十五年致仕。后复起拜右都御史掌都察院事，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致仕。弘治十五年(1502)卒，年八十二。

尹直致仕 尹直(1427—1511)，字正言，号謇斋，江西泰和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选为庶吉士，修《寰宇通志》成授编修。成化初充经筵讲官，成化三年(1467)修《英宗实录》成，进侍读。成化八年擢侍讲学士，成化十一年升礼部右侍郎。成化十五年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成化二十年转南京礼部右侍郎，成化二十二年，因李孜省之荐特召为兵部左侍郎，再擢户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晋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言官劾其与李孜省交密，乃令其致仕。家居二十余年，正德六年(1511)十二月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谥文和。著有《北征事迹录》、《謇斋琐缀录》等。

丘浚进《大学衍义补》 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礼部左侍郎丘浚以宋人真德秀之《大学衍义》只述修身、齐家事，而治国、平天下尚缺，乃博采群书以补之，上于孝宗，孝宗称善，进丘浚为礼部尚书，并下诏将其书刊行。《大学衍义补》共一百六十卷，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军事等各个方面，既博采前人议论，又加按语抒发己见。

怀恩逝世 怀恩(？—1488)，明成化时宦官，苏州人。本姓马，宣德年间入宫后赐姓怀，至成化年间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他识义理、通典故、廉洁不贪，敢于保护朝中正直的大臣，甚至冒死力谏。成化末年，万贵妃与梁芳等勾结谋废太子，怀恩力争，被宪宗斥逐至皇陵司香。孝宗即位后召回，仍掌司礼监。力劝帝逐万安用王恕，一时正人汇进。弘治元年(1488)卒，孝宗赐祠额"显忠"。

禁朝臣私札请托 弘治元年(1488)二月二十二日，太监覃昌传旨戒谕在京诸司说：今后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务段遵守祖宗成宪，不得互相嘱托，损公利己。如内外官敢有写帖子嘱托者，内官送交东厂，外官送交锦衣卫处置，期若容隐不奏，事发后处以重罪。

揭文武大臣姓名于文华殿壁 孝宗即位之初，颇有厉精图治之志。弘治元年(1488)三月初一日，孝宗命吏兵二部各疏两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堂上官及在外镇守巡抚二司、知府并分守守备官皆大书其职名，注其年籍、历任略节，粘于文华殿壁以观览。自是以后，二部每季各具揭贴以进，有升迁或事故去任者，则揭去旧名，以新上任者补之。

重开经筵 孝宗即位后，使部侍郎杨守陈曾上言请遵祖制开大、小经筵，一日两朝，他说：大经筵及早朝可遵旧制。小经筵则须择端介博雅之臣以次进讲，以明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明之方可行之。凡前朝典籍、祖宗谟训、百官奏章当贮文华后殿，退朝披览。日令内阁一人，讲官二人居羊殿右厢，有疑即问。如此一日居文华殿之时多，处乾清宫之时少，则欲寡心清，临政不惑。午朝可到文华门，听取大臣及来觐文武官条陈要事，付诸司议。赴外任者则当戒谕。有大政则御文华殿，使大臣各尽其谋，不当许言断驳正。其它疏章，召阁臣面议。如此则使贤才毕到，视听不偏，大政可举。弘治元年(1488)三月十二日，孝宗御经筵。十三日，复命儒臣日讲。时谢迁为讲官，务积诚开上意，每次进讲，敷词详切，孝宗数次赞许。

马文升上言时政 弘治元年(1488)三月，左都御史马文升上言时政：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撫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孝宗诏下所司议行。

厘正祀典 弘治元年(1488)四月十七日，礼科给事中张九功上言请厘正祀典，不当祀祭者应罢之。下礼部议，尚书周洪谟等议说：释迦、文殊、上清、太上老君不宜修建斋醮，遣官祭告。古礼幽荧祭星，今北极紫微大帝，像之为人，称之曰帝，不合于典。至于风云雷雨，本合祀于南效，复隆秋报，今徇道家言，又有雷声化天尊之祀，实为不敬。岁以正月十五日为真君张道陵生辰，遣官祭告不合于制。大、小青龙神，祷雨无应，不足祀之。梓潼帝君，昔传神姓张，名亚子，蜀人，仁晋战没，人为立祠。唐、宋屡封至英显王，元加号为帝君，景泰中因京师旧庙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神庙食于蜀，宜也，与文昌六星无涉，其祠在天下学校者当毁。永乐中，以道士周思得传王灵官法有验，乃建天将庙祀灵官，谓宋徽宗时有西蜀萨坚授法于林灵素者，其师也，因于庙立祖师殿。宣德中，改大德观，封灵官曰崇恩真君，祖师曰隆恩真君。成化初，改显灵宫，岁易袍服，其费不赀。当革灵济宫祀。金阙、玉阙上帝，盖五代时徐温子知谔、知诲也。神世系事积非甚异，其攒号亦当革。于是祀典为之一正。

钱溥逝世 钱溥(1408—1488)，字原溥，号九峰，直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正统四年(1439)进士，授检讨。景泰三年(1452)升左赞善兼检讨。修《寰宇通志》成升右谕德兼编修。天顺元年(1457)改尚宝司少卿兼编修，寻升侍读学士，任《大明一统志》副总裁。天顺六年充正使赴安南，八年坐累降为广为顺德知县。成化二年(1466)复旧官，寻掌南京翰林院事，十二月升南京吏部左侍郎，后进尚书致仕。弘治元年(1488)五月初八日卒，年八十一。赠太子少保，谥文通。有《使交录》、《秘阁书目》。

常州府靖江大水 弘治元年(1488)五月十八日，靖江风潮泛涨，平地淹没如洋，淹死男女二千九百五十一人，飘荡民庐一千五百四十三间，倒塌县署、仓库、墙垣殆尽。

孙洪逝世 孙洪(？—1488)，字伯大，山东昌邑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兵部主事，迁郎中。成化间历升河南右参政、左右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以威宁海子大败鞑靼之捷进左副都御史，再进右都御史巡抚河南，后为周府仪宾刘宜所讦下狱，寻命致仕。弘治元年(1488)五月二十五日卒。在河南抚治流民，兴修水利，停免王府造作，人颇称赞。

鞑靼小王子来贡 弘治元年(1488)五月，鞑靼小王子率部落潜往大同近边营，长达三十里。遣使一千五百余人请通贡，上书自称"大元汗"。孝宗诏许五百人至京师。自此以后，小王子屡以入贡为名，沿边骚扰，且出没河套地区，西北边境再度紧张。

清理淮浙盐法 成化末年宦官权重，奏讨淮、浙盐无数，两淮积欠至五百余万引，导致商引壅滞，盐法日坏。户部尚书李敏请差大臣前往清理。弘治元年(1488)六月，孝宗诏命户部左侍郎李嗣、刑部右侍郎彭韶俱兼左佥都御史清理盐法，李嗣往两淮，彭韶时已在浙。李嗣乃建买补余之议。即令商人买余盐补官引，而免其劝借，且停各边开中，待欠税完日，官为卖盐，三分价值，其二充边饷，而留其一以补商人未交盐价，由此以余盐补充正课，盐法一小变。彭韶以浙商苦于抑配，为之定折价额，免除遣员，怜于灶户煎办徵赔折阅之困，绘八图以上，条其利弊奏行。

杨继宗逝世 杨继宗(？—1488)，字承芳，山西阳城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刑部主事。成化初擢嘉兴知府，刚廉清正，且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宪宗曾问汪直天下来京朝觐官谁廉，汪直说：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宗一人。九载秩满，超迁浙江按察使。后以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将权贵之庄田还于百姓。因小人所诬，左迁云南副使。弘治初，迁湖广按察使，寻复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铁面无私，罢职者八人。廉介峭直，人莫敢犯，以气节名天下，弘治元年(1488)十月二十四日卒。天

启年间谥贞肃。

继晓伏诛 继晓(？—1488),江夏僧人,本姓黄。成化中以秘术借梁芳之而得宠于宪宗,授僧录司左觉义,进右善世,命为通元翊教广善国师。诱宪宗耽于佛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民居数百家,费国帑数十万。成化二十一年(1485),言官极论其罪,始被罢为民。弘治元年(1488)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科臣林廷玉之言逮治伏诛。

吐鲁番复破哈密 弘治元年(1488),孝宗应哈密国人之请,封罕慎为忠顺王。时吐鲁番阿力已死,其子阿黑麻嗣位,于同年十一月杀罕慎,复占其地。二年,哈密都指挥阿木郎率兵收复哈密。五年,孝宗诏封陕巴为忠顺王,主哈密国事,擢阿木郎为都督佥事。阿黑麻狂妄自大,于六年复袭破哈密,擒陕巴,斩阿木郎。八年,甘肃巡抚许进率兵攻哈密,复之。阿黑麻乃于十年送还陕巴。时王越总制三边军务兼经略哈密,上言哈密不可弃。乃于十一年封陕巴为忠顺王。十八年冬,陕巴卒,其子拜牙袭王位。

余子俊逝世 余子俊(1429—1489),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干著称。出为西安知府,有惠政。成化初,擢为陕西右参政,升右布政使,成化六年(1470)转左布政使,寻调浙江,再拜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上言请修边墙以御鞑靼,宪宗于八年(1472)准其奏,至成化十年修成,使西北边境数年得安,边人多念其功。以军功进左副都御史,再进右都御史。成化十二年移抚陕西,成化十三年召为兵部尚书,奏申明条例十事,又列上军功赏格,使中外有所遵守。后拜户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成化二十年命兼左副都御史,总督宣大军务,请以修延绥边墙之法行于宣大,因连年有灾而不行。宦官韦敬等乃借故弹劾其借修边墙之机侵耗钱粮,遂于成化二十二年被罢太子太保致仕。成化二十三年,复起用为兵部尚书,仍加太子太保。弘治二年(1489)二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一,赠太保,谥肃敏。

李瑾逝世 李瑾(？—1489),直隶和州(今安徽和县)人,襄城伯李浚之季子,嗣爵位。天顺五年(1461)领三千营。天顺八年提督五年营,掌后军都督府事。成化三年(1467)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前往征讨四川山都掌少数民族起义。班师进侯,寻加太保。兼总督十二营。弘治二年(1489)三月卒,赠芮国公,谥壮武。

整顿团营 弘治二年(1489)二月二十七日,孝宗擢左都御史马文升为兵部尚书,并命其兼督十二团营。当时西北鞑靼诸部落不时扰边,而明朝之兵政废弛,战斗力虚弱。马文升严核诸将,黜贪懦者三十余人,又请于团营内选马步锐卒二千人,遇警征调,且遵洪武、永乐年间之制,五日一操,以二日走阵下营,三日演武,孝宗允行。

刘吉等兴两京言官之狱 弘治初,监察御史汤鼐与庶吉士邹智、中书舍人吉人、进士李文祥等屡次上章弹劾大学士刘吉等。弘治二年(1489)二月刘吉与御史魏章相勾结,诬陷汤鼐等私立朋党,抵毁时政,孝宗命皆逮之于狱。刘吉等欲将其一网打尽,幸赖吏部尚书王恕、刑部尚书何乔新、侍郎彭韶鼎力相救。最后,汤鼐戍肃州(今甘肃酒泉),吉人削籍、邹智、李文祥等谪官。弘治二年三月,刘吉又结南京守备太监蒋琮等,兴南京监察御史姜绾之狱。时蒋琮在南京大肆掠夺民田,百姓失田却要承担岁额租课,姜绾乃上章弹劾其十罪。会南京宦官陈祖生违制垦后湖(今江苏江宁北)之田,湖为之淤,而后湖为贮藏黄册之重地,监后湖黄册的南京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向乃上章弹劾陈祖生之违法诸事。于是蒋琮、陈祖生与刘吉合谋陷害南京言官。弘治三年三月,应天府(今南京)尹杨守随奉令勘实蒋之罪,为卢锦、方向鸣冤。孝宗竟听信蒋琮之谗言,罢卢锦之职,方向、杨守随被谪,姜绾等数十人皆被下狱,而置蒋琮、陈祖生于不问。吏部尚书王恕、户部尚书李敏等上言为之辩解,但孝宗听信刘吉等人,于是两京台署为之一空,中外侧目。

开封府河决 弘治二年(1489)五月,河决开封府黄沙冈、苏村野场、沿裹堤、莲池高门冈、王马头、红船湾六处。又决埽头五处,入沁河,郡县多被害,而汴梁尤为严重。时议迁城汴城以避水患,巡按御史陈宽奏陈:迁城摇动人心。况在饥馑之余,公私溃乏,粮食财物如何供给。迁城之议不行。

陆瑜逝世 陆瑜(1409—1489),字廷玉,浙江鄞县人,宣德八年(1433)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景泰三年(1452)升山东布政司右布政使,后转左。天顺二年(1458)以大学士李贤之荐召为刑部尚书,成化九年(1473)以疾致仕,弘治二年(1489)七月十四日卒,年八十一。谥康僖。陆瑜精通法律,且不讳门达、曹吉祥等权贵,平反许多冤狱。

李敏请革庄田 成化初,宪宗以没收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其后庄田遍布郡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有识之士屡次请罢之,但终不行。弘治二年(1489)七月二十三日,户部尚书李敏上言说: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宦官庄田三百三十二,共地三万三千余顷。管庄官校招集无赖之徒,称庄头、

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加辩解即被诬奏，以至举家惊惶，恨之入骨，灾异即由此而生。乞革去管庄之人，将田付与百姓耕种，每亩征银三分，以充各宫用度。但孝宗只言各庄田管业已定，难以收回，仅戒饬管庄之人不可生事而已。

孔镛逝世 孔镛(1417—1489)，字昭文，长洲(今苏州)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都昌知县，升知高州府，境内獞猺出没，镛单骑赴其地谕降。历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计擒悍苗。弘治二年(1489)召为工部右侍郎，九月初三日卒于赴京途中，年六十三。

杨守陈逝世 杨守陈(1425—1489)，字维新，浙江鄞县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成化初充经筵讲官，进侍讲。修《英宗实录》成，迁洗马、寻进侍讲学士，参与修撰《宋元通鉴纲目》、《文华大训》，敢于直言宦官之善恶得失，书成进少詹事。弘治初升吏部右侍郎，充《宪宗实录》副总裁。尝上言劝孝宗多会大臣，复午朝之例，宪宗从之。后令以本官兼詹事府丞，专事史馆。弘治二年(1489)十月十八日卒，谥文懿，赠礼部尚书。著有《杨文懿公文集》。

何琮逝世 何琮(？—1489)，字文璧，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礼科给事中，直言敢谏。曾出使满敕加国(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后擢通政司右参议。成化中转左参议，进左通政掌司事，迁兵部右侍郎，未几转左侍郎。弘治二年(1489)十月卒。

定云南土官承袭之制 成化、弘治年间，云南土官承袭之制混乱，变乱曲直，以致酿成边患。弘治二年(1489)十月二十九日，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王诏上言请定土官先报应袭子弟之姓名，守臣核实，书之于册，至应袭之日再奏请，俟批准方可承袭。

罗明逝世 罗明(？—1489)，字文昭，福建南平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监察御史，巡按广西，罢不法之官。升陕西副使，抚治汉中流民。迁按察使，上救荒十二事以赈饥民。擢云南右布政使，进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经略哈密有功，被召为工部右侍郎，时已病，命未至而于弘治二年(1489)十二月二十九日卒。

白昂治理黄河 弘治二年(1489)五月，黄河在开封决口，益流为二：一自于家店(在今河南原阳县东)经兰阳县(今河南兰考)南，东至归德(今河南商丘)，由徐州、邳州(今江苏邳县南)，入淮河；一自封邱县之荆隆口，经祥符(今开封)、仪封(今河南兰考东)之黄陵冈，东经曹州(今山东菏泽)、濮州(今山东范县南)，入张秋(今山东阳谷东)运河，郡邑多被灾，开封尤甚。有人请迁开封城以避河害，河南布政使徐恪力止之，孝宗乃命发民夫五万人治之。九月，诏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河道，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今河北)三巡抚配合，自决口处至运河，相机修筑。白昂推荐郎中娄性协助。弘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役民夫三十五万，在阳武(今河南原阳)筑长堤，以免黄河水冲入张秋运河，影响漕运。又浚宿州古汴河、归德睢河，使黄河入汴河，汴入睢，睢河入泗水，泗水入淮河，然后入海。即行北筑南疏之策，水患稍宁。

诏命预备仓积粮 弘治三年(1490)三月初四日，孝宗应南京给事中罗鉴之请诏命各州县预备仓积粮，凡州县十里以下者积谷五千石，十里以上二十里以下者积一万五千石，二十里者积二万石。八百里以下限积十九万石，卫千户所积五千石，百户所积三百石。够数者为称职，过者旌擢，不及者罚之。府、州、县及军卫官视此升黜。

四夷馆翻译考选法的制定 弘治三年(1490)五月，大学士刘吉等请选监生年二十五岁以下者二十名，官民家子弟年二十岁以下、有世业子弟习熟翻译者通选一百名，送翰林院四夷馆学习夷语。三年后翰林院会同礼部官考试，中者为食粮子弟，月给米一石。六年后考中优等者与冠带，为译字官。九年后考中优等者授以序班之职。初试、二试不中者，可以三试，再不中者黜为民。监生初入馆，准其坐监食粮习学，三年后考中者，月给米一石，六年考中者与冠带，九年考中优等者，授以从八品之职。三试均不中者，仍送还本监别用。兼习举业者，不精通本业，亦不许参加会试，以使人有定志，译学可精。四夷馆中共分八馆，其名数分配为：鞑靼馆监生五名，子弟二十五名；女直馆监生四名，子弟十八名；西番馆监生二名，子弟十五名；西天馆监生一名，子弟二名，回回馆监生二名，子弟十名；百夷馆监生二名，子弟十四名；高昌馆、缅甸馆各监生二名，子弟八名。孝宗从之。

谢士元致仕 谢士元(1425—1494)，字仲仁，号约庵，晚更号拙庵，福建长乐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户部主事，天顺七年(1463)擢建昌知府，有治绩。擢四川右参政，进右布政使。弘治元年(1488)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安抚土番，赈济流民。弘治二年坐事下狱，弘治三年六月事白后致仕。七年卒，年七十。著有《咏古诗集》。

左钰逝世 左钰(？—1490)，字廷珎，直隶阜城(今属河北)人，由举人选授监察御史，升陕西按察使佥事，理环县、庆阳等处兵备，迁副使。成化十四年(1478)征讨岷州(今甘肃岷县)夷人，十八年进按察使，成化十九年召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后改大同。成化二十二年巡抚山西。弘治初因言官所劾而致

仕,弘治三年(1490)七月二十二日卒。

崔让逝世 崔让(? —1490),字克恭,山西石州(今离石)人。景泰元年(1450)举人,初授监察御史。天顺中迁南京大理寺丞。成化中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弘治元年(1488)八月以疾致仕。三年九月初一日卒。在边屡有败鞑靼之功。

刘昭逝世 刘昭(? —1490),字克明,陕西邠州(今陕西彬县)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天顺元年(1457)升通政司右参议,天顺七年升左通政,天顺九年升工部右侍郎,天顺十五年升尚书,天顺二十年加太子少保,天顺二十三年改户部尚书,寻被弹劾,被罢太子少保致仕。弘治三年(1490)十一月初二日卒。其在工部最久,崇尚节俭,才能亦为时人所服。

王恕建言修省 弘治三年(1490)十二月十五日,吏部尚书王恕建言孝宗修省:乞请经筵不分寒暑,裁止宫观斋醮、西天厂诵经、元宵灯宴、保圣夫人等岁祀,放狮子等兽,撤枯潘巡抚及京通仓监守、织造内匠,停南苑二役、光禄寺岁办柴炭,减畿郡寄牧马之半,岂收马价,免追各仓亏粮,疏盐法损商。孝宗嘉纳,命裁斋供,罢灯宴,而内臣如故,余如所议。

杨理逝世 杨理(? —1491),字贯之,直隶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刑科给事中,进都给事中,擢鸿胪寺左少卿,改大理寺左丞,历左右少卿,进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召为工部右侍郎。弘治四年(1491)正月十七日卒。在河南曾筑开封河堤,赈济灾民。

谢铎上言科贡事宜 弘治四年(1491)正月二十四日,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上言六事:一、择师儒,请求道德之士如韩愈者为太学师,求廉正刚方之士为布政使,提学宪臣。二、慎科贡,乞请禁绝输粟、补廪或以家贫而入国学者。三、正祀典,乞将宋儒杨时入孔庙从祀,而将宋亡后归元的宋臣吴澄之流免祀。四、广载籍,乞将散落天下之经史书板尽送南京国子监储备。五、复会馔,宜修馔堂以便造器皿,以供日用。六、均拨历,今科贡监生多而纳粟监生少,拨历时以十分之六七分属科贡,十分之三四分属纳粟。礼部复议谓其所奏深切时弊,俱可行。但升杨时黜吴澄可另议。孝宗依允。

彭韶奏言爱惜名器 弘治四年(1491)二月初五日,吏部左侍郎奏陈:近来多有无功之人,夤缘请托,受千日户等官,甚至乞恩袭都指挥。不独武职,文职亦如此,或修城微劳而升匠官,或传奏罢革而迁良医。又中书考满,超升三级。乞请陛下爱惜名器,重视廪禄。勿以小官为可与,勿以杂流为天害,宜严加杜绝。孝宗以为言之有理。

周洪谟逝世 周洪谟(1420—1491),字尧弼,四川长宁县(今兴文)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景泰元年(1450)上疏劝帝亲经筵,勤听政,陈时务十二事。景泰三年选为东宫官,升左春坊左赞善,仍兼编修。修《寰宇通志》成,升侍读仍兼赞善。天顺二年(1458)改南京翰林院署院事,天顺八年诏修《英宗实录》。成化元年(1465)以秩满升侍读学士,寻升南京国子监祭酒。服母丧之制后,改国子监祭酒,上言整顿士风,请复洪武中学规,使学政肃然。成化十二年迁礼部右侍郎转左侍郎,以现行之王玑玉衡不确而上疏改制,宪宗即令其造,改之以木制,旬日而成。成化十七年升礼部尚书,成化二十年加太子少保。弘治元年(1488)四月致仕,弘治四年二月卒,年七十二,谥文安。有《疑辩录》、《圣驾监雍录》、《谏垣七疏》行世。

李敏逝世 李敏(1425—1491),字公勉,河南襄城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监察御史。天顺初年,奉敕抚定贵州苗民起义。成化初年,官迁浙江按察使,再任湖广同职,后历山西、四川左、右布政使。成化十三年(1477)升监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率军修治垣堑,击退鞑靼。成化十五年召为兵部右侍郎,逾四年以病归乡。河南饥荒,上言救荒数事,复召以左副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成化二十一年改督漕运,寻召拜户部尚书。李氏巡抚大同时,见山东河南转饷道远,耗费巨大,遂建言除岁支外,番令输银,使军民两便。李氏还极言革除皇庄,还田于民,为世人所称。弘治四年(1491)正月得病致仕,二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少呆,谥恭靖。李敏为人蓬厚,家居时曾于县南紫云山建书院,聚书数千卷,与学者讲习,为乡人所赞。

黄孔昭逝世 黄孔昭(1428—1491),初名曜,后以字行,改字世显,号定轩,晚号洞山迁叟。浙江黄岩人,举天顺四年(1460)进士,授屯田主事。成化五年(1469)授文选员外郎,成化九年进郎中,满九载始擢右通政,久之,迁南京工部右侍郎。弘治四年(1491)六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四。嘉靖中追赠礼部尚书,谥文毅。有《定轩存稿》及《拾遗》行世。

张鹏逝世 张鹏(? —1491),字腾霄,直隶涞水县(今河北),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天顺元年(1457)因劾石亨、曹吉祥而获罪,被戍辽东铁岭卫,复戍南丹卫(今广西上林东北)。宪宗立复原官,擢福建按察使。成化四年(1465),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参与镇压大藤峡起义,其冬还理南京都察院事,改督漕运,兼抚淮,扬四府。成化十年仍还南京都

察院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成化十三年召任兵部右侍郎，成化迁左侍郎，十八年进尚书，成化二十年加太子少保，成化二十一年致仕。弘治四年(1491)六月十八日卒，谥懿简。

刘宣逝世　刘宣(1425—1491)，字绍和，江西安福县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景泰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授编修，景泰七年修《寰宇通志》成进修撰。天顺八年(1464)充经筵讲官，成化三年(1467)进春坊右谕德，成化六年进南京太常寺少卿，成化十七年进本寺卿，掌国子监事，成化二十二年召为吏部右侍郎，弘治元年(1488)转左侍郎，弘治三年进南京工部尚书，弘治四年七月初十日卒，年六十七。刘氏生性耿介，谙熟礼仪典故。著有《冲澹集》。

秦崇逝世　秦崇(？—1491)，字智崇，山东单县人。天顺四年(1460)进士，授兵科给事中，迁都给事中。成化七年(1471)升太仆寺少卿，成化十七年升南京光禄寺卿转南京太仆寺卿，弘治三年(1490)迁应天府尹，四年八月初四日卒。居官三十余年，且皆为财贷出纳之地，能廉介自守，不为所汙。

何乔新致仕　何乔新(1427—1502)，字廷秀，江西广昌人，景泰五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改刑部主事，历广东司郎中，成化四年(1468)迁福建副使，清理寿宁(今福建)银矿事。迁河南按察使，协助都御史原杰抚谕荆襄南阳流民，迁湖广右布政使，时荆州民苦于徭役，乃按人口多少列为九等，民称便。成化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与参将支玉击败鞑靼，进左副都御史，再召拜刑部右侍郎，赈抚山西饥民。弘治初，为万安、刘吉所忌，出为南京刑部尚书，后王恕荐还京任刑部尚书。时刘吉为恶，频兴大狱，乔新力言直之。弘治四年(1491)八月，再因御史邹鲁所诬，乞致仕，孝宗许之。罢归后，屡有人荐其复官，孝宗不能用，为士论所惜。弘治十五十二月二十二日年卒，年七十六。正德中赠太子太保，谥文肃。有《椒邱文集》、《何椒邱集》、《勘处播州事情疏》行世，辑有《百将传续编》。

《宪宗实录》修成　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初三日，孝宗命纂修《宪宗实录》，以太傅英国公张懋为监修官，少傅大学士刘吉、吏部尚书徐溥、礼部右侍郎刘健为总裁官，礼部尚书丘浚、吏部右侍郎杨守陈、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汪谐为副总裁，率纂修官程敏政、谢铎等同修纂，至弘治四年(1491)八月二十三日纂成。《宪宗实录》共二百九十三卷、宝训十卷、目录、凡例加正文共三百零五册。起于天顺八年正月，讫成化二十三年八月，首尾二十四年。监修、总裁、纂修等官各升赏有差。

王诏逝世　王诏(1428—1491)，字文振，真定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工科给事中，迁都给事中、湖广右参政，再升右布政使。弘治元年(1488)转贵州左布政使，其冬，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去弊政之不便者。弘治四年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未及上任即于是年九月初六日卒，年六十四。有《谈录》行世。

邢表逝世　邢表(？—1491)，字居正，顺天府文安县(今河北)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获嘉知县，历知彰德、卫辉府。历升山东左参政、右布政使，改四川进左布政使。弘治三年(1490)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弘治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卒。历任皆能克尽职守。

凤阳皇陵大火　弘治四年(1491)十二月二十六日，凤阳皇陵大火，漫延九十余里，毁大树数千株。

盛颙逝世　盛颙(1418—1492)，字时望，无锡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以劾曹吉祥违法事出知束鹿。成化初擢知邵武府，调延平，以治绩闻。累迁陕西左布政使，时三边多警，灾伤频仍，颙悉心筹画，军民以安。召为刑部右侍郎。值山东饥，改左副都御史往巡抚，举救荒之政，推行九则法，黜暴除苛，民甚德之。成化二十二年(1486)十月致仕。弘治五年(1492)正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五。

广西古田壮族人民起义　弘治五年(1492)三月，广西古田(今广西桂林西南)壮族人民在其首领韦朝威领导下起义，迅速占领古田县城，县官逃，典史被杀。孝宗诏命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千户王珊等率兵进讨，皆中义军埋伏而大败。七月，总督湖广右都御史闵珪与总兵官毛锐再发大军自监桂(今广西桂林)出发，连破七寨，义军寡不敌众，起义失败。

李昂逝世　李昂(1434—1492)，字文举，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工部主事，升知青州，开垦荒田，赈济饥民。擢福建左参政，累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征讨农民起义。改督漕运，开康济等河，浚安平河诸源。弘治五年(1492)三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九。谙练时务，通达经典，晚尤工诗词，有文集及奏议。

总兵佩印　旧例：凡武臣不佩将军印者，不得称总兵。弘治五年(1492)四月初四日，宁晋伯刘福出守蓟辽等处，援例以请，孝宗加总兵官，给总兵长印关防。此后制稍变。

黎淳逝世　黎淳(1423—1492)，字太朴，湖广华容县(今湖南)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修撰，参予修撰《大明一统志》，成化二年(1466)升左春坊左谕德，成化三年因修《宪宗实录》成进左庶子，成化

十三年修《宋元通鉴纲目》成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成化十四年升吏部右侍郎，成化二十二年改南京吏部同职，成化二十三年迁左侍郎。弘治元年(1488)升南京工部尚书，寻改礼部尚书，四年以疾致仕，五年四月十八日卒，年七十，赠太子少保，谥文僖。

收集整理天下遗书　弘治五年(1492)五月，内阁大学士丘浚上言请求天下遗书，内阁藏书按类整理，善为收藏。他说，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为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太祖皇帝于立国之初即诏求天下遗书，平元之大都(今北京)后得其馆阁秘册，又广购民间，一时所积，不减前代。然至今年久，恐已有散失虫蛀，乞敕内阁大学士等计议量委学士并讲读以下官员督同典籍等官开厨将书目一一查验，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及杂书、类书二类，每类多少部，每部若干卷，开列奏报。太宗皇帝当政时，天下多事，犹集儒臣纂《永乐大典》以备考究，今承平百年，怎能使经籍废坠？乞将内阁所藏书籍检其有副本者，分贮一册于两京国子监，若内阁所或不备者，乞敕礼部行天下提学官榜示购访，令所在有司校录呈送，如此使一书而存三本，分藏京师之内阁、国子监及南京国子监，则无佚失之虑。每年三伏时，令之曝书，可免虫蛀之害。另建砖石之所，藏历代明皇帝之实录，可免水火之虑，使后世秉史笔者有所凭据。孝宗嘉纳。

问刑条例的裁定　弘治五年(1492)七月十四日，刑部尚书彭韶等以鸿胪寺少卿李鐩请删定问刑条例议曰，刑书所载有限，而犯罪之情又各不相同，所以有情轻而判重者，也有情重而判轻者，往往取自皇上裁决，斟酌损益，著为事例。如此则行于在京法司者多，而行于在外者少，故在外问刑多至轻重失宜。宜选属官汇萃前后奏准事例分类编集，会官裁定成编，通行内外与《大明律》兼用，使事例有定，情罪无遗。孝宗从之。

刘吉致仕　刘吉(1427—1493)，字祐之，保定府博野人(今属河北)，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经筵官。修《寰宇通志》，进修撰。宪宗即位，召纂《英宗实录》，进侍读，《实录》成迁侍读学士，直经筵，累迁礼部左侍郎。成化十一年(1475)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寻进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修《文华大训》成，加太子太保，进武英殿大学士，后又进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寻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时刘吉、万安与刘珝在阁，政事不修，以至民间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弘治初，进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及修《宪宗实录》成，又进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因营私附会而屡遭言官弹劾。弘治五年(1492)八月初五日与孝宗发生矛盾，孝宗遣中官至其家讽令致仕。刘吉居内阁十八年，没有突出政绩，却因善于钻营而屡屡升迁，因有“刘棉花”之外号，讽其屡遭弹劾而仍不去官故也。六年卒，年六十七，赠太师，谥文穆。

王纶上言救灾事宜　弘治五年(1492)八月初五日，礼科给事中王纶上言六事：一，抚流移，令灾区委官抚恤流民，不许欺凌逐遣。二，急赈济，设法以官银贷卖粟米，或给盐引招商中纳。三，缓催征，粮草布匹马匹夫役等当免则免，当宽则宽。四，均优恤，申报灾情无论早晚缓急，宜一视同仁。五，时播种，被灾地区人口流失，空地必多，乞许附近人户暂且承佃，免征粮草，待其复业还上。六，汰冗官，被灾地方必用廉慎之官，贪残者不能安民反而害民，乞敕抚按等官严加考察。孝宗令下所司知之。

限定宗室妾媵　弘治五年(1492)八月初五日，晋府庆成王锺镒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巡抚山西左佥都御史杨隆等奏陈，恐收养异姓。礼部勘实。又奏陈：宗室自正妃外，限妾媵四人，各将军三人，中尉二人。孝宗允准，并著为令。

叶绅奏陈广西政务　弘治五年(1492)八月初十日，吏科给事中叶绅、刑部郎中顾原赵广西勘事还京，奏陈广西时政：一、远方有司，为贪而仕，岂肯尽职。乞选附近广东、湖广、江西能吏升授。二、国初广西官军十二万，今只八千人，乞募量士。三、遣部曹驻梧州，专理两广粮储。四、广西年职，自参将以下，选本省及广东、湖广将领，庶谙地形、习险僻。五、将吏必习武兑。六、土官替袭，仍令赴京。七、儒学官量为裁省。八、两广年职袭替，俱赵四川纳限救荒，免比试。九、今广西灾情严重，宜纳广西布政使。十、土官例三年进马，乞请折纳银十二两。孝宗皆从。

张峦逝世　张峦(1445—1492)，字来瞻，号秀峰，直隶兴济(今河北沧州北)人。孝宗敬皇后之父。弘治元年(1488)拜督府同知，弘治三年封寿宁伯。立皇太子后进侯。峦起诸生，虽贵但能敬礼士大夫。弘治五年八月十一日卒，年四十八，赠太保，追封昌国公，谥庄肃。

程宗逝世　程宗(1426—1492)，字源伊，直隶常熟人(今江苏)，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刑部主事，迁江西吉安府知府，升四川左参政、陕西右布政使，后转左。再升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处理木邦、孟密两司之冲突，不能公论，遂酿患西南。升刑部右侍郎转左，擢南京工部尚书，弘治二年(1489)致仕，五年十月初八日卒，年六十七。著有《司空集》、《抚夷

集》。

贵州都匀苗民起义 弘治五年(1492)十月二十五日,贵州都匀苗民在乜富架、长脚领导下起义。宪宗诏命提督军务右副都御史邓廷瓒为总兵官,镇远侯顾溥、都督佥事王通前往征讨,由太监江德监军,合云贵川广兵共八万余人。弘治七年三月,副使吴倬诈降乜富架,乜中优被俘,明军乘势深入,连破百余寨,富脚亦被俘,起义失败。邓廷瓒上言说:都匀、清平(今贵州福泉东)旧设二卫,九长官司,以土人为官,因是屡有苗民起事。宜改府县设流官治之,方可久安。即"改土归流"。宪宗从之,设都匀府,独山州、麻哈州(今麻江),清平县。

改开中纳米为纳银 洪武三年(1370)开始实行之中盐法,规定商人输送米粮至边塞或京都,给予其食盐运销权,即盐引(发给商人的领盐凭单),商人持盐引赴盐产地支盐,然后在指定地区贩销。宪宗即位后,盐法渐坏,官府只知招商承办,不计盐之产销。权贵专擅盐利,官商勾结,旧引重用,假引冒领,盐引积压,官盐滞销,私盐盛行,盐价腾贵,开中法原意尽失。弘治五年(1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与盐商勾结,代之奏请召商纳银运司,免赴边纳粮,每引由盐商交官府银三至四钱即可,而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然而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亦撤销,菽粟翔贵,边储日虚。

停纳粟例 成化年间,因河南、陕西等省饥荒始开纳粟之例,凡纳粟者许为监生、吏、典等项。弘治五年(1492)十一月吏部尚书王恕上言说:永乐、宣德、正统年间,天下亦有灾伤,各边亦有军饷,当时无纳粟之例,并没有听说粮食不足,军民困弊。而近年以来一遇灾伤,辄行捐例。以致仕途正路不畅,出身候选,多至十五六年以上仅得一官,而年已向暮,谁肯尽心职业?况彼监生、典、吏既以财进身,岂能以廉律己?贪财害民之事由是生矣!孝宗表示同意,立命停之。

蔡清论纪纲之要 弘治五年(1492),吏部主事蔡清上言说:今日急务在朝廷之纲纪,而其次在边境。今士大夫都说罪可以免,功可以得,苟利其家,而无暇顾及朝廷之事。民之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宦官财富超过王侯之家。朝廷锱铢取之于民,半入庸将之家,而转输于权倖之门,致仕兵弱而不能卫民,正所谓士风弊则人才乏,民力屈则兵力弱。贤者必用,不肖者必去,功必赏,罪必罚,此乃纪纲之大要。

部院大计外官 弘治六年(1493)正月二十三日,部院大计,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县等官。降斥一千四百人,杂职一千一百三十五人。请如例罢黜并调用。孝宗以人才难得,告谕道:两司郡守,年未六十,虽疾不妨视事,素行不谨在前任、见任不谨罢软,非本部确访,或只一处开列,并其余到官未二年,非老疾贪酷严重者,俱予留用。同月二十七日,吏部奉命复奏留外官五十人。九年正月,又降斥官一千一百三十四人,杂职官一千二百二十一人。

李善请筑辽东边墙 弘治六年(1493)二月十六日,巡按山东御史李善请筑辽东边墙:辽东阻辽河为固,滨河八百余里,夏旱水浅,不及马腹;冬寒冰冻,如履平地,况地洼两泞。开原有警,则锦州、义州、广宁之兵,徒望河而叹。旧有陆路,自广宁抵开平三百余里。如开旧路,展边墙,起广宁棋盘山,抵开原来顶山,移八百里之戍,聚首三百里,西路锦、义,中路广宁,东路辽阳,北路开原,声势相接,可无东顾之忧。孝宗报可。

户部请通融理财 弘治六年(1493)四月,内府承运库告缺少供应金银,户部请借太仓银十万两应用,并移文天下摧取弘治二年至五年折粮银两以充内库,复奉旨集廷臣议,拟上三事,以为通融理财之法:一曰折钱钞,谓天下户口食盐钱钞今后每钞一贯折征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当解京者径入内库,当存留者留本处以为官军俸粮,解京之数大约一年可得银二十三万余两。二曰清船料,淮安、扬州、杭州、九江、河西务(今河北香河南)、临清(今山东)苏州七钞关应差户部官前往,其钱钞如前凝折银解京。三曰起存积,天下诸库藏所积金银,除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已准籴谷备赈、贵州、两广给军外,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四川、云南、应天(今南京)、南直隶、苏松等十三府、广德等四州、北直隶、真定(今河北保定)等七府所贮并空月皂隶只侯及粮料等余银于内各取三分之一以入内库帑。孝宗依允。

马文升上言军屯事宜 弘治六年(1493)五月,兵部尚书马文升应诏上言九事。其一为清屯田以足兵食。他说:军士月粮出于屯田,洪武时每军有分屯田百亩者,有三五十亩者,屯军既不支粮,又纳余粮六石,所以仓有余积。以后军士数少,征戍日增,屯军俱出外应役,屯地多为势家侵占,或被军士盗卖,征粮之数不过十之三。另外,亲王初封俱有三护卫,中间有改调二卫者,有三卫全调者,所遗屯田当时失于考查,俱被五府及势家占种,乞差官于至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隶会本处三司屯田官逐一清查,其卫所已无屯军者,让百姓承种,照例纳粮以给军士,使军士困苦得以少苏。七月,户部覆议其所言,请移文天下巡抚巡按会同屯田官查实,被占种或被盗卖者清出还官。孝宗允从。

谢宇逝世 谢宇(? —1493),字伯宽,湖广耒阳县(今湖南)人,景泰初命入文华门与内侍同学为国子监生,授中书舍人,历礼部员外郎,太常寺少卿,再进寺卿兼司经局正字,于内阁制敕房书办。孝宗登位以东宫侍从升工部右侍郎,掌通政使司事,弘治六年(1493)闰五月十六日卒。工楷书、绘画。

王恕致仕 王恕(1416—1508),字宗贯,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由庶吉士授大理左评事,进左寺副,迁扬州知府。天顺四年(1460)以治行最超迁江西右布政使,成化初转河南左布政使。成化元年(1465),荆襄流民起义,擢为右副都御史抚治,以功进左副都御史,寻迁南京刑部右侍郎,成化七年总理河道,后改南京户部左侍郎。成化十二年,以左副都御史巡抚云南,数次上奏云南镇守宦官钱能诸不法事,因宪宗偏袒钱能,王恕即被召回,迁南京兵部尚书。后因数上直言加之钱能诬陷,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抚南畿(今江苏南部),减免田租,周行赈贷。成化二十年复为南京兵部尚书,以直言称于一时。力阻建寺之风与传奉恶习,遂为宪宗所恶,于成化二十二年被迫致仕。成化初召为吏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弘治六年(1493)闰五月二十二日致仕,正德三年(1508)四月卒,年九十三,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端毅。王恕身历数朝,居官四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所荐贤才如耿裕、彭韶、何乔新、刘大夏等皆为一时名臣。有《玩易意风》、《石渠意见、拾遗、补缺》、《王端毅公奏议》行世。

光禄寺奏裁冗费 弘治六年(1493)闰五月二十二日,光禄寺卿胡恭等奏:乾清门猫十一、刺猬五、西华门犬五十三、御马监犬二百一十二、虎三、狐狸三、豹一、土豹七,又西华门鸽子,共岁计豕羊肉并皮骨三万五千九百余门、肝三百六十件、绿豆粟谷等四千四百八十余石,俱乞减省。孝宗允准。出御马监狗七十九只、牲口房鸡鹅鸭豕俱供光禄寺。

黄绂致仕 黄绂(1423—1493),字用章,其先祖封丘(今河南)人,曾祖徙平越,遂以其地为籍。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除行人,历南京刑部郎中,清正刚廉,人称之为"硬黄"。成化九年(1473)迁四川左参议,久之进左参政,历任四川、湖广左、右布政使。成化二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劾无能,申军令,增置墩台,边政一新。弘治三年(1490)拜南京户部尚书,改南京左都御史。六年闰五月二十三日致仕,八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一。居官廉洁,所至有建树。

费訚逝世 费訚(1436—1493),字廷言,镇江(今江苏)人,成化五年(1469)会试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同考礼部,与经筵,升国子司业,秩满升春坊左谕德,仍管司业事,未几升祭酒。弘治元年(1488)充经筵讲官,后改少詹事兼侍读。修《宪宗实录》成,进詹事兼侍读学士,再擢礼部右侍郎。弘治六年六月初三日卒,年五十八。有《自考诒笑补庵》等集传世。

刘瑀致仕 刘瑀(? —1503),字汝器,直隶蠡县(今河北)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监察御史,擢知苏州府,升山西右参政,以事降知四川保宁府。未几仍还职,历升山西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弘治六年(1493)六月初六日致仕,十六年二月卒。

泉州大风 弘治六年(1493)七月初三日,泉州自卯至申时,风雨大作,扬沙走石,开元寺西塔葫芦倾覆,折林木无数,城铺粉堞颓十分之九,坏官私庐舍商舶民船不可胜计。

彭韶致仕 彭韶(1430—1495),字凤仪,福建莆田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成化二年(1466)因请罢御史张岐、复王竑、李秉、叶盛官事下狱,后输赎,寻迁郎中。勘外戚占民田事,请归民,再下狱,言官论救得释。迁四川副使,进按察使,成化十四年迁广东左布政使,因劾梁芳管宦官采物进贡扰民事被调贵州。成化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今南京)。成化二十一年召为大理寺卿,因上言劾贵戚、宦官等奸佞而仍外巡顺天、永平二府。弘治初,召为刑部右侍郎,寻命兼佥都御史整理浙江盐法,进左侍郎,弘治三年(1490)改吏部同官,与尚书王恕甄人才,仕路为清。弘治四年代何乔新为刑部尚书,居部三年,秉节无私,与王恕、何乔新秒"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忌。弘治六年七月十八日致仕,八年卒,年六十六,谥惠安,赠太子少保。有《彭惠安集》行世。

张鎣逝世 张鎣(1423—1493),字廷器,直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景泰初授监察御史,历江西副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成化三年(1467)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父丧服除,起抚河间(今河北诸府,改大同,历刑部左、右侍郎,成化十八年擢本部尚书,明年加太子少保。弘治元年(1489)为南京兵部尚书,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于任,年七十一,赠太子太保,谥庄懿。

土官赏罚法的制定 弘治六年(1493)九月二十九日,带管广东岭西道湖广按察使陶鲁上奏说:凡征巢瑶民起事时多用土兵,而其官多推避,不肯效力,请立赏罚之法以励之。兵部谓:凡起调土兵,其土官能亲率兵参战,斩首功多者,如知县请升流官知

州，知州升知府，知府升参政，俱仍旧管理。其应袭舍人有功者，先与冠带候袭，即许官事。若土官不亲督兵，只令族目代领，或兵不及数，或征剿未毕，先自潜回者，革去冠带，俟有功方许复职，土舍不亲督兵者，不予冠带。孝宗从之。

严永浚疏谏织采绒　弘治六年(1493)十月十九日，西安知府严永浚疏谏织采绒：陕西杂造局织造采绒四十九匹，先坐征二十五匹，支银二千一百七十一两，织造十七人。又拘咸阳、长安、泾阳、三原等四县各匠三百余人，两年各匠费七百全两未完，又征后币二十匹。若供当方，可一袭而止；若赏赉，则赫黄赤紫，非臣下所当。今以三百余家穷年营办，以供抒轴，若不堪言。孝宗命织者以进，余悉停止。

贾俊致仕　贾俊(1428—1495)，字廷杰，直隶束鹿(今河北)人。以乡举入国学。天顺中选授御史，历巡数地，均有佳誉。成化十三年(1477)自山东副使超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在镇七年，有治绩，召为工部右侍郎，寻转左，数月后拜尚书。时举人无至六卿者，贾俊独以重望得之。弘治年初，修太庙后殿成，加太子少保。弘治七年(1494)二月十七日致仕。八年六月十八日卒，年六十八。

吕雯逝世　吕雯(1429—1494)，字天章，直隶安州(今河北保定东)人。以贡士选授陕西道监察御史，擢南京通政司右参议，改南京光禄寺少卿，有治绩，升太仆少卿，理马政有方，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防御有功，升兵部右侍郎，再迁左侍郎。弘治七年(1494)五月初九日卒，年六十六。

康济河堤筑成　白昂治开封决河完工，遂自山东沿运河而南，抵达扬州，奏议高邮湖堤。其时御史孙衍、郎中吴瑞文董理南河事，亦奏：高邮州运河九十里，自州西北三里入新开湖道，湖凡五十里，湖东直南北为堤。洪武中障以土，正统中固以石，屡决屡修。其西北则与武安、张良、七里、珍珠、甓社诸湖相灌注，蒙回数百里。每风涛兴作，扶舟触堤石即坏，且多有溺死者，当于湖东开复河以避禁其险。白昂遂上其议，召工开凿。起杭家咀，历清水潭，抵丁志港，长达四十里，两岸壅土为堤，堤首尾置插，与湖相连。堤东又置四闸、四食洞。弘治七年(1494)六月初八日成。孝宗赐名康济河。

陈桓逝世　陈桓(？—1494)，直隶泰州(今江苏)人，成化八年(1472)袭泰宁侯爵，成化十九年任五军营左掖管操。弘治初改练武营管操，兵部荐为将才，命挂印，充总兵官镇守宁夏。弘治三年(1490)回京，四年开始管操五千营，弘治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卒。

陈音逝世　陈音(1436—1494)，字师召，号愧斋，福建莆田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尝上言时政请起复忠臣，革去法王佛子号位。迁南京太常寺少卿。弘治初升卿，弘治七年(1494)六月卒，年五十九。通经术，从其门者甚多。

刘大夏治理黄河　弘治五年(1492)七月，黄河在张秋(今山东阳谷东)决口，水入运河，夺汶水入海，漕运遂绝。孝宗诏命工部侍郎陈政总理河道，集民夫十五万疏浚黄河故道，堵塞决口，但未完工陈政卒。吏部尚书王恕推荐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才识堪任，于是孝宗于弘治六年正月擢刘大夏为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弘治七年五月，孝宗又遣宦官李兴、平江伯陈锐与刘大夏共治张秋决河。当时黄河水势湍悍，决口处宽九十余丈。刘大夏先治上流，分别开新河浚旧河将水导入黄河道及淮河，而于决口处筑水坝，且合且决，随决随塞，昼夜不息至是年十二月工成。孝宗遣行人前往慰劳，并改张秋名为“安平镇”。刘大夏上言说：安平镇决口已塞，黄河下流已治，运河已通。但必须修筑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河口之堤，使黄河上流南下徐淮，方为运河久安之计。乃于弘治八年正月筑塞黄陵冈等七处河口，于是黄河河势复归兰阳(今河南兰考)、考城(今河南民权北)、经归德(今河南商丘)、徐州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又于黄河沿岸从胙城(今河南延津北)至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余里，又从于家店(今河南原阳东)至小宋集(今山东曹县西)筑堤一百六十余里，大小二堤相翼，黄河始全入于海，北流遂绝，溃决之患始息。

徐贯经理苏湖水利　弘治七年(1494)七月，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前往苏州府、湖州府经理水利。当时苏湖一带时发大水，淹没良田。徐贯与工部主事祝萃役民夫二十余万，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一百三十五处，使水入江或入海，东南水患少息。

李嗣逝世　李嗣(？—1494)，字克承，广东南海(今广州)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历南京户部主事、郎中、迁金华知府，升浙江右参政、福建左、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等府。后升为户部右侍郎，寻转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整理两淮盐法，以余盐补充正课，盐法为之一变。弘治七年(1494)九月初七日卒，年六十九。居官三十余年，箧中只有白金数两，田园无增，时称其清介。

张瑄逝世　张瑄(1417—1494)，字廷玺，号古愚，晚号安拙翁，又号观庵，江浦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景泰时迁吉安知府，擢广东右布政使。成化初征大藤峡徭民起义，督

饷有功，转左布政使。成化八年(1472)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改抚河南。迁南京刑部侍郎、尚书。成化二十三年(1487)二月被劾闲住。孝宗立复官，再致仕。弘治七年(1494)九月卒，年七十八。

佥民壮法的制定　正统、景泰年间，曾召募丁壮训练，以备战事，但未定佥法。弘治七年(1494)十月，应礼科给事中孙𫗧之奏定佥民壮法，今州县七八百里以上里佥二人，五百里以上里三人，三百里以上里四人，百里以下里五人，俱于丁众粮多之家选年力强者，加以训练，遇有调拨给粮以行。富民不愿者，纳银于官，官府如募。

李衍逝世　李衍(1421—1494)，字文盛，直隶隆庆州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兵部主事，累迁员外郎、郎中。成化初升河南右参议，转四川松藩右参议，迁河南右参政，转江西右布政使，未几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再擢为户部右侍郎、转左侍郎，总督三边军储兼赈济饥民，回京升尚书总督京仓，成化末致仕。弘治七年(1494)十月十一日卒，性直爽，所至以严见称。

增筑各边墩台　弘治七年(1494)十一月，兵部上言说：近来各边多次被鞑靼所掠，损失惨重，究其原因，在于各边墩台相距太远，峰火不能相接以及守边将士懈怠所致。乞令各边镇巡等官相视地形，修理墩台，每十里或七、八里为一大墩，四、五里为一小台，大墩守军十人，小台五人。从边关至城堡，每十里或八里只修大墩，筑墙围城，再环以壕暂，只留一门，派兵把守。遇警接递传报，天睛则举炮，天阴则放烟，夜则举火，事先定好峰炮之数以为号令。守墩之军应分为两班，每月一换。天水之处，应修水窖一所，冬蓄冰，夏藏水，预采半月柴薪以用，以免外出汲水打柴被寇杀掠。孝宗从之。

鞑靼侵扰凉州　鞑靼北部亦卜剌因等入河套驻牧，小王子及脱罗干之子火筛居贺前山后，与之相倚，势力日强。弘治八年(1495)正月二十八日，入寇凉州。总兵官都督刘宁与战林山墩，斩三人，擒五十余人。相持至日暮，又来偷袭，刘宁挥兵战，擒其头目一人，斩三十余人。深夜又来，斩二十余人。次日左参将杨玉卒兵来授，副将陶桢兵亦至，北寇姓退逃。

丘浚逝世　丘浚(1420—1495)，字仲深，广东琼山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选庶吉士。修《寰宇通志》成，授编修。宪宗即位，充经筵讲官，进侍讲。修《英宗实录》成，进侍讲学士。修《宋元通鉴纲目》成，升学士，迁国子监祭酒，寻擢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事。孝宗即位，丘浚进《大学衍义补》一书，得褒奖。寻升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充《宪宗实录》副总裁，笔削褒贬，多出其手笔。弘治四年(1491)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弘治七年进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弘治八年二月初四日卒，年七十六，赠太傅，时进光禄大夫左柱国，谥文庄。其在阁四年，言时政之弊，并请访天下遗书、按照内阁藏书，编目分类，对保存典籍颇具贡献，博学多知，被誉为一代文宗。著有《平定交南录》、《盐法考略》、《钱法纂要》、《大学衍义补》、《丘文庄公文集》等，另著有传奇《五伦全备》、《投笔记》、《举鼎记》、《罗囊记》等。

齐章逝世　齐章(1438--1495)，字应璧，号慎轩，直隶滦州(今河北滦县)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升礼科都给事中。弘治三年(1490)进太常寺卿，弘治八年四月初一日卒，年五十八。其为言官屡次抗章论列，陈时政得失，气节凛凛，扶持国是之功居多。

王㒜逝世　王㒜(1424—1495)，字廷贵，直隶武进(今属江苏)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编修，升侍讲。成化初升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讲，寻升南京翰林院学士，南京国子监祭酒，整顿教法，严立程制。再升南京吏部右侍郎。召为户部左侍郎，升南京户部尚书，寻改吏部。弘治八年(1495)四月十七日致仕，五月卒，年七十二。赠太子太保，谥文肃。有《毗陵集》、《王文肃集》。

国子监生拨历事期的制定　明初洪武年间，国子监设六堂课，诸生行积分之法，以八分为率，不及格者仍肄业。又命诸生分习吏事，谓之“历事”，又叫“拨历”，其期以入监之年月为先后，送吏部选用，超异者为显官，平常者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后日重进士，日轻监生，渐多淹滞，拨历或至十余年之久。景泰后，乃频减拨历岁月，每年挑选优者，遂有坐监不及一年者，导致监生在监者少而吏部听选者至万人，又不得官。弘治八年(1495)五月，礼部尚书倪岳上言请定制。监生诸司历事一依旧例，必须日月满后方许分拨。于是监生在监稍久，而选人亦不致壅滞。

何经逝世　何经(？—1495)，字宗易，广东顺德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历官工部郎中，累升广西左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抚流民、御苗酋、黜贪残，能尽守其职。成化二十三年(1487)以疾致仕，弘治八年(1495)五月二十九日卒。

广西平乐瑶民起事　广西平乐境内府江两岸为瑶民聚居之地。弘治八年(1495)七月，府江两岸瑶民与永安(今广西蒙山)之茶山、力山瑶民起事。两广总督闵珪调兵六万，分四哨前往征讨，自象州、修仁(今广西荔浦东南)至平乐，一路破山寨一百八十六

个,斩首六千千有余。

吐鲁番侵河州 弘治八年(1495)七月十四日,吐鲁番速坛阿黑麻自称可汗,侵沙州,胁罕东诸部。兵部尚书马文升计虏黠桀,必加兵。遂召谙熟夷情肃州抚夷指挥杨翥,筹谋对策。杨翥说:以罕东兵三千为降,我兵三千助援,裹粮数日,间道兼程,一举可克。兵部即数罕东、赤斤、哈密三卫选兵,由副总兵彭清统率前往抵御。十一月末,刘宁及副总兵彭清以三千骑出嘉峪关,倍道旬日,抵哈密,番将牙木兰乘马逃遁,官年授城而死,斩余党六十人,降八百人,获陕巴妻女还师。

马文升上言赋重民困 弘治八年(1495)八月二十七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言说:近来灾异迭见,皆由赋繁役重所致。过去百姓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上税,而今却要交纳十之四五。过去京师仓库容易纳满,而近来杂费倍于过去,丝绵花绒布一切物料,交纳反而更难。江南兑运,正粮一石,费用却需三四石。桑蚕尽鬻而丝绢不免,田亩尽鬻而税粮犹存,赋重民困,从未有甚于此时。孝宗令下所司议之。

改马湖土知府为流官知府 马湖(今四川屏山)为安氏世袭知府,租税其地,据其地已有数百年之久。传至安鳌,残虐百姓,每年从每人身上敛财数以万计,且纵淫所部妇女,宠用妖僧百足,滥杀无辜,横恣二十余年。弘治八年(1495)八月二十八日,佥事曲锐请遣巡按御史张鸾前往按治,乃逮安鳌至京师,处以极刑,始改土官为流官知府。

唐珣逝世 唐珣(?—1495),字廷贵,直隶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四川合州(今合川)知州,颇有治绩。升南京刑部员外郎、郎中,出为福州知府,升湖广右参政、布政使,再迁顺天府尹,秉公执法,不畏权贵。升右副都御史整饬蓟州(今河北蓟县)等处兵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后升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岭海府卫州县,屡次征讨起事瑶民。弘治八年(1495)十月初十日卒。

倪岳建言时弊 弘治八年(1495)十一月初五日,礼部尚书倪兵等以灾异修省会奏时弊:仰法圣祖(早朝经筵);倪接群臣(便殿召对),议处宗室(禄费减节),暂停工役,慎重武处,停止织造,停减斋醮,减收粮解(内府白粮),监收皮张,清查马匹,添支粮饷,收录后裔(军职子弟),灾伤马匹,减造文册,审清刑狱,清查匠役,擅科军士,清除吏弊,量定拘亲,惩戒邪逆,莱革科敛(外官假公科敛),宽宥逃罪。孝宗嘉纳。

吴原逝世 吴原(1431—1495),字道本,福建漳浦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成化七年(1471)进右给中,成化九年转左。成化十三年改礼科,成化十五年进兵科都给事中,上言请罢西厂。成化十九年擢太仆寺少卿,成化二十二年进为卿,成化二十三年擢户部右侍郎,总京储事。弘治四年(1491)迁左侍郎,理部事。弘治五年兼佥都御史往浙江赈济水灾。弘治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

薛远逝世 薛远(1414—1495),字继远,广东琼山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户部主事,升郎中。天顺六年(1462)使安南(今越南),还京升户部右侍郎。再以工部侍郎往河南治黄河决口,复改户部。成化六年(1470)总督两广粮饷,以功升左侍郎,既而进尚书,总督京储。成化十三年致仕,成化十五年召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成化十六年以被劾,再致仕。弘治五年(1492)进升荣禄大夫。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卒,年八十二。

耿裕逝世 耿裕(1430—1496),字好问,河南卢氏人。前刑部尚书耿九畴之子。景泰五年(1454)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改工科。天顺中,父九畴为石亨所谗,被贬,裕亦被谪泗州(今江苏盱眙)判官。成化初,召复检讨,历国子监司业、祭酒,采古诸侯、贵戚言行可法者为书授诸生。升吏部左右侍郎,坐尹旻之狱,被调南京礼部,弘治初,召拜礼部尚书,力行节俭。后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弘治九年(1496)正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七,赠太保,谥文恪。耿裕父子两世显贵,而家业肃然,并以名德称于时。

黄宝上言疏通选法 弘治九年(1496)二月,吏部郎中黄宝上言疏通选法三事:一曰擢异才,用人不可只看资格,才行出众者当破格擢升以为激励。二曰汰冗滥,自成化十一年(1475)至今二十年间,举人监生听选者积至一万二千余人,吏员冠带未仕者至三万三千九百余人,大约候选十三四年方得取选,多衰老不堪者,乞令冠带闲住,以免冗滥之弊。三曰严考察,在外诸司官员三年一考,但在京官员却无考察之法,须拟六年或九年一考之法,以使人知进取,职业可修。孝宗诏命所司知之。

朱永逝世 朱永(1433—1496),字景昌,河南夏邑人,抚宁伯朱谦之子。景泰中袭爵,天顺中领宣威营禁军。天顺七年(1463)统三千营兼神机营。成化初改督团营,领三千营如故。成化元年(1465)进讨荆襄流民起义,以功进侯。佩将军印,与都御史王越征讨鞑靼,屡败之。成化十四年加太子太保,成化十五年拜靖虏将军征辽东,以功进保国公,再进太子太傅。成化十七年与王越、汪直出师大同,征鞑靼亦思马因。成化十九年,拜镇朔大将军,至宣府(今河北宣

化)、大同,击败鞑靼小王子。加太傅、太子太师。弘治四年(1491)监修太庙成,进太师。朱永治军严肃,前后八佩将军印,多次奏功。弘治九年二月卒,年六十四,追封宣平王,谥武毅。

朱仪逝世 朱仪(1427—1496),字炎恒,直隶怀远(今属安徽)人。景泰四年袭父朱勇成国公之爵。天顺间命守备南京,兼掌南京中军都督府事,成化二十三年(1487)加太子太傅,弘治九年(1496)三月初六日卒,年七十,赠特进光禄大夫右柱国太师,谥庄简。在南京数十年,有治绩。

朱奎逝世 朱奎(?—1496),字文徵,号鹤坡,直隶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幼擅书法,年十二以奇童奉诏读书翰林,景泰元年(1450)授中书舍人,直文华殿,升尚宝司卿。成化中坐事调广东盐课提举,移四川保宁府同知。寻召还复官,迁太仆寺卿,改大理寺卿,成化二十三年(1487)致仕。弘治九年(1496)闰三月二十八日卒。

叶淇致仕 叶淇(1426—1501),字本清,直隶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御史.天顺初为石亨所诬,出为武陟知县。成化中,起广西佥事,迁陕西副使,擢大同巡抚。弘治初召为户部侍郎,四年出为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居户部六年,能为国惜财用。其力主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导致边储日虚。弘治九年(1496)四月初三日致仕,十四年八月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太保。

罗璟致仕 罗璟(1432—1503),字明仲,号冰玉,江西泰和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编修,进修撰,预修《宋元通鉴纲目》,累官洗马。坐尹龙之狱调南京礼部员外郎。弘治初授福建提学副使,弘治五年(1492)召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弘治九年四月致仕。十六年卒,年七十二。著有《北上稿》。

刘逊之狱 刘逊因弘治三年(1490)南京监察御史姜绾之狱而被谪澧州(今湖南澧县)判官,寻迁武冈知州。岷王朱膺钰以支岁禄不时给奏劾刘逊。弘治九年四月,孝宗命锦衣官校逮刘逊。于是给事中庞泮、御史刘绅等偕同官上言说:锦衣为天子亲军,非重事不宜轻遣。请敕抚按官勘报。孝宗以亲王劾一州官,六科言官即交章奏沮,乃下庞泮等同官四十二人,刘绅等同官二十人于锦衣卫狱。六科署空。后得九卿申救方得释。刘逊被贬四川行都司断事。

彭诚等言僧道之患 弘治九年(1496)四月十九日,南京礼科给事中彭诚等上言说:旧制僧道各有定额,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天下计之,当不过三万六千余人。今又到十年开度之期,各处僧道将有三万二千二百余名待度。成化二年(1466)给度边十三万二千二百余名,成化十二年一万三千三百余名,成化二十二年二万四千五百余名,合计已超旧额十倍。当今四方灾异,流行饥馑,若不禁约,恐为害非小。乞查照旧额,将十年一度事例停止,各处巡按等官清查寺观现有僧道行童,已度者不必追夺,未度者额外不许存留,番令还俗,待正额有缺,方许起送赴度考选给度。违者仍照先年充军事例发遣。孝宗下其奏于所司。

王道逝世 王道(?—1496),字世用,直隶蠡县(今属河北)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初授行人,升户部员外郎,进郎中,升山东右参议,分守辽阳督理边储,寻升劝农参议,迁湖广左参政,再升山东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弹劾宗室扰民者,被杖。弘治七年(1494)致仕,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卒。

整饬京营武备 弘治九年(1496)六月二十一日,兵部尚书马文升等上言说:天下之安危系武备之修否。宣德以来,武备渐驰,至正统间有土木之败。近来天下无事,京军疲困,战马消耗,兵器不精,操练无法。鞑靼诸部虽进贡如常,但安知其无大举入寇之谋?乞严修武备,以防不测。今后兴造诸司不得拨团营军,三大营做工者宜速完工,不许迁延私役。不许侵夺官军草场、马料。清查库存兵器,不足者兵仗器制成样式,令诸司照样制作。弓马绝伦或有出众奇才可为将官者,不分行伍士卒或草野之人俱听举用。如此则兵勇将良,武备修举,虽有外侮亦不足虑。孝宗认为所言切中时弊,悉令施行。

诏举贤才 宣德中,定举将才之制,令天下都司每年选一人,送京师都督府甄别录用。自天顺末立武举法,材勇多由科目进,后虽特诏举用将才,少有应诏之人。弘治九年(1496)六月,兵部尚书马文升请广选举,令府部台省诸人别其才所堪用者奏闻,会官考校,如武举之制。孝宗纳其言,诏举贤才。不久,给事中蔚春又请敕天下郡县,访有山林之士,才堪将帅,以礼聘遣,或据总兵营,或命专大镇,待有成效,掌及举主。孝宗亦从其言,但应诏亦乏人。

冯俊逝世 冯俊(?—1496),字士彦,广西宜山人。天顺四年(1460)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录囚广东,多所平反。升福建按察副使,改湖广,进广东按察使,寻升江西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治马湖土知府安鳌之罪,蜀民称快。弘治九年(1496)七月初五日卒。

杜铭逝世 杜铭(1419—1496),字敬修,四川金堂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刑部主事,升员外郎、郎中,云南、贵州按察司副使、按察使,湖广左布政使,工部、刑部、左右侍郎,工部尚书掌大理寺事,

改刑部尚书。历官四十余年,没有过举。弘治初以言官所劾致仕,弘治九年(1496)七月初六日卒,年七十八。

刘璋致仕 刘璋(1429—1511),字廷信,号梅坡,福建延平人,天顺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出任山东参政、浙江左右布政使。成化二十年(1484)升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抚凤阳等处,盐法、马政亦所规划。后改抚郧阳、四川。成化二十三年召任工部右侍郎。弘治二年(1489)改户部,弘治四年任户部左侍郎,同年冬升南京礼部尚书。弘治七年召还京师任工部尚书。弘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致仕。正德六年(1511)二月卒,年八十三。有《梅坡集》。

冀倚致仕 冀倚(? —1510),字汝华,扬州人。成化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以岁饥赈济河间革府,征偏头关督饷有功,加俸一级。累迁应天府丞、南京太仆卿、应天府尹。曾陈边务及捕盗辑民二十余事,颇见采纳。弘治九年(1496)七月二十日,坐言官论劾致仕。正德五年(1510)八月卒。

黄杰逝世 黄杰(? —1496),字士英,河南洧川(今河南长葛东北)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济南府推官,选为监察御史,升顺天府丞。因得罪权贵左迁广东肇庆府同知,未几转庆阳府知府,升陕西布政司左参政,寻召为顺天府尹,迁户部右侍郎,总督京储。弘治九年(1496)七月二十七日卒。

冯贯逝世 冯贯(1433—1496),字文用,直隶蠡县(今属河北)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监察御史,升大理右寺丞,至左少卿。升右副都御史,寻改大理寺卿,精明于法,持心仁恕。升南京工部尚书。弘治九年(1496)六月致仕,九月初三日卒,年六十四。

禁势家侵夺民利 弘治九年(1496)九月,外戚长宁伯周彧与寿宁侯张鹤龄,经营私利,两家忿争,至聚众相斗,震动京师。吏部尚书屠滽偕九卿上言说:宪宗皇帝曾诏令勋戚之家不得占据关津陂泽,设肆开店,侵寻民利。而现在勋戚诸臣不能恪守先诏,纵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货。都城内外,所在有之。而且永乐间曾榜例:王公仆从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今勋戚仆从至数百,大违旧制,其间多市井无赖,冒名罔利,利归群小人,而民怨不止。今周、张两家以琐事纷争,有损朝廷威望,请戒谕修好,凡有店肆,一律停止。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扰商贾夺民利者,令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执治。仍依永乐间榜例,裁定勋戚家人,不得滥收。六科、十三道等言官亦就此上言。孝宗乃于是月初六日戒谕势家不得侵夺民利。

王霁逝世 王霁(? —1496),字景明,直隶上海(今上海市上海县东北)人,天顺四年(1460)进士,拜南京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屡办疑案,有能声。迁黄州(今湖黄冈)知府,有治绩。迁广西参政、江西按察使,进太仆寺卿,条陈马政十事,宿弊为之一革。迁佥都御史巡抚山东,筹集粮银赈济灾民。召拜大理寺卿。弘治九年(1496)九月初六日卒。

沐琮逝世 沐琮(1450—1496),字廷芳,直隶定远(今属安徽)人,成化元年(1465)袭父爵,黔国公三年仍还镇云南,留心屯田水利,屡次平定夷人起事,将土官改为流官,以功加太子太傅。弘治九年(1496)九月卒,年四十七,赠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太师,谥武僖。沐琮在镇三十余年,为政务持大体,宽而有制,边人安之。

潘荣逝世 潘荣(1419—1496),字尊用,福建漳州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授史科给事中。景泰中上言纳谏之要。天顺六年(1462)出使琉球,还迁都给事中。成化六年(1470)偕同官上言时政,请勿胡封滥赏。民言官二十余年,至是年迁南京太常寺少卿。成化十三年擢户部右侍郎、改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成化十七年召为户部左侍郎,力禁势家、宦官侵夺民利。后迁南京户部尚书,成化二十三年九月致仕。弘治九年(1496)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太保。

徐珪上言请革东厂 弘治九年(1496)十二月二十四日,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断狱,事涉东厂太监杨鹏,法司竟承杨鹏之意,拟将丁哲、王爵徙边。刑部典吏徐珪心中不平,乃上疏说:臣在刑部三年,每见逮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或校尉挟私诬陷,或为人报仇,或受首恶赃令以旁人抵罪。刑官洞见其情,莫敢改正,以致多枉杀人。臣愿皇上革去东厂以绝祸原,则天下可以太平。臣一介微躯,自知不免一死,与其死于虎口,不如死于朝廷。愿皇上斩臣之首,能行臣之言,虽死亦无恨。孝宗以其言狂诞,发回原籍为民。

徐溥等谏烧炼斋醮 孝宗自弘治八年(1495)以后视朝渐少,宦官李广以斋醮、烧炼被宠。弘治十年二月初二日,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上疏说: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曾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一天只有一次,朝参之外,不能再见皇上。奏章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年不过数日,正士疏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烧炼之说进用者。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宋徽宗因之祸身,实为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皇上

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喜庆，不召自至，何必假借妖妄之说以求太平长安呢？自古奸人蛊惑君心，必以太平无事为言。今承平日久，好象无事但其实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百姓困穷，将来之患，灼然可忧！皇上高居九重，众言官皆怕有罪而沉默，我等如果还不上言，还有谁会上言呢？愿皇上严早朝之节，复奏事之期，勤讲学之功，优接下之礼，远邪佞之人，斥诬罔之说。孝宗为之感动。

孝宗召见大臣 弘治十年(1497)三月二十二日，孝宗在御经筵之后，遣太监韦泰到内阁，召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于文华殿，与议国事。自成化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等之后至此始召见阁臣。从这次召见到孝宗卒，共召见阁臣九次。

诏修《大明会典》 弘治十年(1497)三月初二日，孝宗朱祐樘谕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侍讲学士学谢迁：吾嗣承丕绪，以启万邦。远稽左典，近守祖宗成法，夙夜祗惧，不敢违越。惟我太祖高皇帝创业定制，所以为子孙筹划至备，御制之书，连篇累帙，宏纲众目，极大而精，随制随改，无有宁岁。后所施行，未尽更定。至太宗文皇帝继正大统，益弘远图，列圣相承，至于皇考，皆因时制宜，或损或益，盖有不得不然者，期不失于圣祖之意而已。顾其条贯，散见于简册奏牍之间，凡为有司艰于考据，下至闾里或未尽知。皇祖英宗尝有志纂述，事不克竟，以遗朕躬，是不可缓。兹颇仰遵圣制，遍稽国史，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一以祖宗旧制为主，而凡损益同异，据事尔年，汇列于后，梓而为书。以成一代之典。以使天下臣民咸得披诵，庶几会极归极，底于泰和。尔等其各弹心力，详录谨书，务使文质适中，事理兼备，行于今而无弊，传于后而可征，以称我法祖图治之意。遂令徐溥、刘健、李东阳为总裁官，参事兼侍讲学士程敏、侍读学士王鏊、侍讲学士陈守阯为副总裁，开馆编修。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成书，共一百八十卷。全书体例以六部为纲，分述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独中官职守不书)。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后曾于正德、嘉靖、万历年间分别重修，共二百二十八卷。

小王子屡次扰边 弘治十年(1497)五月二十七日，小王子侵犯潮河川，指挥王玉偕刘钦率兵出征，小王子兵假败，王玉追击遇伏，刘钦等二十七人战死，王玉仅以身免。次日，小王子兵复纵兵犯大同，连营二十里，巡抚刘璟仅报警而已。此年小王子屡次扰边，京师震惊。六月，命侍郎刘大夏、李介俱兼左佥都御史，督理宣府、大同军饷。李介至任，大修戎备，先后条陈二十余事，孝宗下所司议行，边人感悦。七月，又令都督杨玉率京营军守备永平，以防内犯。

文官赠荫祭葬例的制定 弘治十年(1497)六月二十一日，礼科左给事中叶绅等上言，认为近来赠荫祭葬之例失之过滥，乞下所司议处。礼部覆奏说：今后文职三品以上考满官如例许一子或孙或承继之侄送监读书，内有未沾一命而死或自以科举出身者，仍许一人补荫入监，如出身不由正途或被劾闲住及病故年远者俱不许预补荫之例。其官非三品以上，但曾侍从春宫讲读辅导有功者，卒后子孙乞恩入监，本部议请皇上裁决。奉命出使外国死于王事者，曾有荫子入监之例，但非事状明白，情可恤者，不许乞荫。祭葬旧例，三品以上官及二品以上父母妻、三品父母俱有祭葬，四品及父母俱有祭，今著为定例。若三品以上官被劾冠带闲住者，祭葬俱无，其三品被劾致仕及在任未及一考者有祭无葬，若二品以上妻只授三品封三品、父母只授四品者，亦只赐之祭，四品未考满，父母未封四品者亦无祭。赐祭坛之数，二品者祭二坛，加太子少保以上者祭四坛，加至太子太保以上者如旧例。孝宗诏从所议。

侯瓒致仕 侯瓒(1428—1508)，字奏璋，保定人。景泰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出任凤阳知府、山西右参政，入为光禄寺卿，进左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擢兵部右侍郎。不久改南京礼部右侍郎，转南京户部左侍郎。阮请岁输米应入仓者即水次给官军，三月省脚价米三万余石以备他费，著之为令。弘治四年(1491)九月迁南京二部尚书，改南京兵部尚书。弘治九年闰三月复任南京工部尚书。弘治十年七月十七日致仕。正德三年(1508)正月二十二日卒，年八十一。

简阅禁兵 弘治十年(1497)十月二十三日，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言说：历代兵制，不使权归一人。汉制有南、北军，南军守王宫，主禁卫，北军护京师，听征讨，各有所掌。而南军尤托以腹心。太祖法古制，十六卫亲军指挥使司不隶五府，为禁兵，即为古之南军；其他卫属五府，即古之北军。永乐中，增设十二卫，又选精壮数千人属御马监，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废弛，请敕大臣拣选操练，令更番直各门，官为钤束出入。孝宗先行。

李介逝世 李介(1445—1498)，字守贞，改字守正，号贞庵，山东高密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选庶吉士，改御史，巡盐两浙，还掌河南道事。以四方灾伤，陈时政数事，多采用。直言敢说，遇不平事，辄率同官论奏。九载满，擢大理寺丞，进少卿。弘治初，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今河北宣化)，历兵部左、右侍郎。弘治十年(1497)，鞑靼小王子犯大同，命兼左佥

都御史往督军饷，并大修戎备，察核官田牛具钱还于军，以其资偿军所逋马价，边人悦之。先后条上二十余事。弘治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卒，年五十四，赠兵部尚书。

童轩逝世 童轩（1425—1498），字志昂，江西鄱阳（今波阳）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南京给事中，进都给事中。成化初调浙江寿昌（今建德南）知县，升云南按察司佥事，提督云贵学政。景泰十年（1474）召为太常寺少卿，掌钦天监事，景泰十五年升寺卿，景泰十九年致仕。弘治元年（1488）复起为太常寺卿，仍掌钦天监事。升右副都御史提督四川松潘军务，兼理巡抚，弘治四年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弘治七年升尚书，十年致仕，弘治十一年（1498）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四。工诗、书，通天文历数。著有《清风亭稿》、《纪梦要览》、《枕肱集》。

陶鲁逝世 陶鲁（1434—1498），字自强，号节庵，广西郁林（今玉林）人。以父荫授新会县丞，迁知县，从韩雍征大藤峡徭民起义有功，升按察佥事，善抚士卒，有智谋，所向克捷。历升左参政、按察使，终湖广左布政使。弘治十一年（1498）二月三十日卒，年六十五。

张淮逝世 张淮（？—1498），字邦镇，河南襄城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历山阳（今属陕西）、芜湖知县，升监察御史，调四川雅州（今雅安）判官。弘治元年（1488）升江西按察司佥事、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整饬蓟州（今河北蓟县）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弘治十一年（1498）四月初五日卒。

张懋等请减工役织造 弘治十一年（1498）五月初四日，英国公张懋、吏部尚书屠滽等上言说：近年工役太多，内而寿安钦安宫、毓秀亭之修，外而神乐观、太仓城楼及皇亲宅第之造，近又于兴济县（今河北青县南）建真武祠，使三军壮气耗于转输之勤，万民膏血浪为土木之饰。又造织金彩妆闪色诸罗缎纱绒，计其工料价银，所需不下百万，奇巧靡丽，皆宜停止。孝宗从之。

李益逝世 李益（？—1498），字景贤，陕西长安（今西安）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监察御史，历升湖广首按察副使、山东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粮储，进南京户部左侍郎，后引疾致仕。弘治十一年（1498）六月卒。

王越击败鞑靼小王子 弘治八年（1495）以后，鞑靼北部酋长亦卜剌因入河套住牧，小王子及火筛居贺兰山后，与亦卜剌因相倚，势日强，西扰甘肃、宁夏，东犯宣大以至辽东，边患日盛。于是廷议复设总制官，先后会举七人，皆不称旨。弘治十年十月，吏部尚书屠滽乃荐致仕左都御史王越，于是孝宗诏令王越起原官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弘治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王越分兵三路袭小王子，斩获数十人，并追至柳沟（今甘肃平罗西北），获驼马牛羊器仗数千。

复封陕巴为忠顺王 弘治十一年（1498）八月，三边总制王越经略哈密奏陈：哈密不可弃，陕巴亦不可弃，宜仍其旧封，令先还哈密，量给修城筑室之费，犒赐三种番人及赤斤、罕东、小秃列、也克力诸部，以奖前劳，且责后效。孝宗允准，遂复封陕巴为忠顺王。而陕巴嗜酒，掊克失众人之心，招致怨恨。

徐溥致仕 徐溥（1428—1499），字时用，直隶宜兴（今属江苏）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编修。天顺中兼司经局校书，侍东宫讲读。成化初，任左庶子兼侍讲，充经筵讲官，参加纂修《英宗实录》。成化十年（1474）擢少詹事兼侍讲学士。成化十六年转太常寺卿兼学士，成化十七年擢礼部左侍郎，典会试。成化二十二年改吏部，成化二十三年入阁预机务，晋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充《宪宗实录》总裁，同知经筵。弘治七年（1494）累官至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弘治八年，孝宗命撰《三清乐章》以为斋醮之用，徐溥以其为道家妄说上奏止之。弘治十一年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同年七月二十九日以目疾致仕。徐溥在朝四十余年，居内阁十二年，温易凝重，度量宏远。既为首辅，事有不可，辄与同官上言论奏，有贤相之誉。弘治十二年九月卒，年七十二，赠太师，谥文穆。曾主持修纂《大明会典》，并著有《谦斋文录》。

宋旻逝世 宋旻（1419—1498），字弘泽，浙江淳安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升寺丞，历左右少卿，升寺卿，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纪纲不立，治绩平平。弘治元年（1488）言官劾其老弱无为，遂致仕。弘治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卒，年七十九。

李广自杀 宦官李广以符箓祷祀蛊惑孝宗而得宠，因成化间例矫旨授传奉官，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以万计，且造私宅，取玉泉山水环绕之。弘治十年（1497）三月，户部主事胡爟、祠祭司郎中王云凤、给事中叶绅、御史张缙等皆上言弹劾李广之罪，请斩其首以弭天灾，语尤激烈。但孝宗对李广仍宠信不疑。李广劝孝宗在万岁山修建一个毓秀亭，说是可以消弥灾异，但亭修成，幼公主死于病。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乾清、坤宁两宫又发火灾。太皇太后因此大怒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李广闻知，因惧怕饮鸩而死。二十一日，孝宗

应司礼监太监蔡昭之请给予李广祭葬和祠额，大学士刘健等上言说：内臣原无祠额祭葬。近年以来，虽或有之，乃奖善褒功之意，实非常典。今李广之死，罪恶盈贯，万口称快，必正其罪以为奸邪不臣之戒。孝宗不得不取消了赐给祠额的诺言，但他对李广仍念念不忘，暗想李广家中可能藏有珍贵奇异之书，可以有助他长生修炼之用。于是遣中使到李广家中搜寻，结果发现了李广贪赃收贿的记事本，上面记录了文武官员送的黄米（黄金）、白米（白银）各千百石的数字。孝宗不懂其中奥秘，说自己曾去过李广家，其家仓库不大，装不了那么多粮食。左右告诉他黄白米是金银的隐语，孝宗才恍然大悟，令即行撤查那些行贿的官员。然而行贿的官员大有人在，包括公、侯、伯、总兵、都督、尚书、侍郎、都御史等京官和地方官，他们连夜到寿宁侯张鹤龄家求解，遂不了了之。众言官就此事数次上奏，请惩治奸臣，孝宗终不能用。

安南国王黎灏逝世 弘治十一年(1498)闰十一月十六日，安南国王（今越南）黎灏卒。其世子黎晖遣陪臣潘综来京告哀，并乞谥，孝宗乃谥其号为灏圣宗淳皇帝，并命行人徐钲往祭。十二月，孝宗遣司经局洗马梁储、兵科给事中王缜往安南封黎晖为安南国王。

王越逝世 王越(1424—1498)，字世昌，直隶浚县（今河南浚县）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天顺初，超拜山东按察使，景泰七年(1463)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成化三年(1467)抚宁侯朱永征毛里孩，以王越赞理军务，是年秋天兼巡抚宣府（今河北宣化）。其后以数次率兵击败鞑靼而升右副都御史、右都御史。成化七年，始总督军务，专理西北边防事宜。成化九年，王越与平虏将军刘聚败鞑靼于漫天岭，以功进左都御史，旋即又率兵袭破鞑靼老营红盐池（今内蒙伊金霍洛旗南），大胜，焚其庐帐而还，自此后，鞑靼北迁，延绥得安数年。成化十年，命王越总制延绥、甘肃、宁夏三边军务，自总兵、巡抚以下皆听其节制。三边设总制自此开始实行。论功加太子少保。成化十一年，还京掌都察院事，兼督十二团营。是时汪直之势方炽，王越乃与之交以图升迁，为君子所不齿。因此得以进兵部尚书，仍掌院事，寻加太子太保。其后数次与王直出兵西征，以功加威宁伯、太子太傅。汪直事发后，王越亦被夺爵除名。弘治七年(1494)，孝宗诏复其左都御史。弘治十年，复又总督三边军务，加太子太保，弘治十一年袭鞑靼于贺兰山后，以功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李广自杀后，言官上奏弹劾其党，词皆及王越。王越忧愤交加，于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卒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年七十五，赠太傅，谥襄敏。

张岫逝世 张岫(？—1498)，字九云，山西安邑（今运城）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监察御史，升嘉兴知府，改开封府，政尚严明，受知吏部尚书王恕，升山东参政、河南右布政使转左，未几升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后因用刑苛刻被令致仕。弘治十一年(1498)十二月初八日卒。

倪岳建言时政 弘治十一年(1498)十二月十九日，南京吏部尚书倪岳等建言时政：推行圣学，预节亲藩，惩究欺蔽，苏息贫穷，修复常平，类解文册，并省重复，减省供亿，署掌印信，稽核名实，均平铨选，照例附选，湔涤过名，疏通郁滞，宽免违限，慎用将官，减省差遣，禁约取索，慎重刑狱，查明禁例，申明旧例，减造军器，量停造作，遵复旧制，裁抑侵克，防革宿弊，祛除民病，惩戒奸贪。孝宗得奏，下于所司。

李杲等诱杀朵颜三卫人 自成化末年，朵颜三卫被鞑靼所逼，走匿边塞，以寻求明廷保护，其势力衰久不振。而鞑靼小王子部及火筛等部相倚日强，为东西诸边患，辽东边塞屡次失事。弘治十二年(1499)正月，辽东总兵官李杲与巡抚张玉、镇守太监任良合谋，以为朵颜三卫积弱可欺，欲杀其冒功掩罪，乃令都指挥崔鉴、王玺、鲁勋设酒席，诱其来市者三百余人赴宴，尽杀无余，竟上奏报捷称：三卫分道入寇，官军败之。廷臣以为朵颜三卫近年来与明廷修好，疑其中有诈。既而朵颜诸部来贡，详诉其事，乃命副都御史顾佐前往核实。弘治十三年正月，顾佐自辽东还，奏李杲等诱杀冒功之事属实，孝宗诏命任良还京，李杲、张玉免职致仕，崔鉴、王玺、鲁勋各降一级。科道官上章弹劾李杲、张玉犯欺骗妄杀之罪，罪当显戮，现在却待以致仕之礼，恐三卫闻之，积愤为患。孝宗不听。朵颜诸部对此事恨之入骨，遂北结火筛复仇，多次扰边。

严左道惑众之禁 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解州（今山西永济西）吏李宁以妖术惑人，自言得聚宝盆于桃花洞。知州程观竟相信此事。二人俱坐斩，后被赦，李宁被发边卫充军。都察院以天下妄言惑众者尚有很多，请出榜禁约，孝宗准行。

李蕙逝世 李蕙(1438—1499)，字德磬，直隶当涂（今属安徽）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刑科给事中，成化十八年升江西布政司右参议，招抚饥民，力杀因饥起事者。弘治元年(1488)升右参政，累升山西左右布政使，有治绩，为士民所称。弘治六年升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寻转左，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凤阳四府。再传升为右都御史，总督巡抚如

故。弘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二。有《萃英集》。

阮勤逝世 阮勤(1423—1499)，字必成，本交趾(今越南)人，其父河为山西长子典史，遂占籍山西。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升台州知府，清慎有惠政。成化中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入为兵部侍郎，调南京刑部左侍郎，皆有治称。弘治十二年(1499)三月三十日卒，年七十七。

程敏政泄漏会试试题 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孝宗诏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程敏政为会试考试官。户科给事中华杲劾程敏政将试题题目卖给举人徐经、唐寅，因徐、唐二人预做文与试题吻合。乃将徐、唐二人与华杲俱下狱。时榜未揭，诏程敏政不得阅卷。已录为进士者，令李东阳会同考官核查，徐、唐二人卷均不在其中，孝宗欲就此了结。三月，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复攻程敏政有可疑之处，程敏政辩解说试题被其家僮窃卖。于是程敏政、林廷玉俱被下狱，徐经、唐寅皆黜为吏。后勒令程敏政致仕，华杲、林廷玉俱被调谪。

程敏政逝世 程敏政(1445--1499)，字克勤，直隶休宁(今属安徽)人，南京兵部尚书程信之子，少年有才，诏读书翰林院。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编修，历左谕德，以学问广博称于翰林。弘治初擢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直经筵。因自傲为人所疾，弘治元年被劾致仕。五年起官，改太常卿兼侍读学士，掌院事。再进礼部右侍郎，专典内阁诰敕。弘治十二年(1499)六月初四日卒，年五十五。有《新安文献志》、《明文衡》、《宋遗民录》、《咏史集》等多种著述。

米鲁起事 米鲁是沾益州(今云南宣威)土知州安民之女、普安司(今贵州盘县)土判官隆畅之妻。因犯事被隆畅逐，遂居其父家。隆畅以年老传职于其子礼。有一位叫阿保的营长，与米鲁有结，遂在隆礼面前替米鲁说情，迎其回来。隆畅听说后怒杀隆礼，焚毁阿保之寨城。弘治十二年(1499)九月，阿保与其子阿鲊挟米鲁进攻隆畅，畅避走云南。贵州总兵官东宁伯焦俊、巡抚贵州都御史钱钺前往和解。但焦、钱归后，米鲁等杀隆畅，据寨起事。隆畅之妾适乌另生有二子，避走安南卫(今贵州晴隆)，阿保欲斩草除根，筑寨围其城。另外，又于普安筑三寨，名其所居之寨曰“承天”，自号“无敌天王”，出入乘黄轝。孝宗责安民献其女米鲁，安民乃攻杀阿保父子，暗中给米鲁兵五百，袭杀适乌及其二子，自请袭为女土官。镇巡等官接受米鲁之贿赂，为其请宥。孝宗诏令进讨，一定要捉住米鲁。弘治十四年六月，总兵官曹恺与巡抚钱钺、中官杨友发诸卫及土兵一万三千余人分道征讨，被米鲁大败，都指挥吴远被虏。七月，诏命南京户部尚书王轼兼左副都御史，提督军务，率兵征讨。王轼兵未至，杨友等议招抚，米鲁扬言愿降，暗中派大兵攻普安、安南城，并断盘江之道，以挡住明军。又劫持杨友，杀右布政使闾钲、按察使刘福及都指挥数人。弘治十五年正月，王轼调广西、湖广、云南、四川官军、土军八万人，会合贵州之兵，分八道征讨，追过盘江，杀米鲁及起事者四千八百余人，破寨千余。

韩文逝世 韩文(？—1499)，字贯道，直隶新城(今属河北)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成化五年(1469)出使琉球，历官户部员外郎、郎中、陕西右参议、右参政、左右布政使，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留心边事。后致仕，弘治十二年(1499)七月十九日卒。

宋琮逝世 宋琮(？—1499)，字廷用，陕西陇西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吏科给事中，升吏科都给事中，升太仆寺卿。为人笃实，在吏科时多有建白，及官太仆，究心马政，有可称者。弘治十二年(1499)七月卒。

郑时逝世 郑时(1423--1499)，字宗良，直隶舒城(今属安徽)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历延平(今福建南平)、福州二府知府，四川左参政、按察使、湖广左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成化末因上言请修时政而被谪贵州参政。弘治初复升左副都御史抚治郧阳(今湖北郧县)，再巡抚湖广，召为南兵部左侍郎，进尚书，后致仕。弘治十二年(1499)八月十四日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少保。

徐镛逝世 徐镛(1444—1499)，字用和，湖广兴国州(今湖北阳新)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行人，升监察御史巡通州(今北京通县)仓，念漕卒困于掊克，定收纳常则，遂著为令。因上言时政被调陕西镇原(今属甘肃)知县。弘治元年(1488)升淮安知府，转广西右参政，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总理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四府，整顿漕运，军民称便。弘治十二年(1499)八月二十八日卒，年五十六。镛居官勤廉，政绩显著。

汪谐逝世 汪谐(1432—1499)，字伯谐，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天顺四年(1460)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预修《英宗实录》成升修撰。秩满升右谕德。预修《续资治通鉴纲目》成升右庶子。弘治初升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充经筵讲官。充《宪宗实录》副总裁。弘治四年(1491)升礼部右侍郎兼学士，未几致仕。弘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卒，年六十八，赠礼部尚书。

云南宜良地震 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初

四日宜良地震，有声如雷，从西南方起，自子时至亥时，连震二十余次，衙门、城铺、寺庙、民房摇倒几尽，死伤男妇无数（一作压死以万计），县城为砖城，洪武二十四年筑于雉山之麓，周四里、高一丈四尺，地震倾圮。法明寺亦倒塌，澄江府河阳（今澄江）官民庐舍倒坏，人多压死。此日震后，或一日一震，或旬日一震，半月一震，一月一震，经四年方止。震中烈度(I_0)IX，震级(M)为六点七五级。

屠滽请罢传奉官 孝宗即位之初，罢成化时传奉官。后修京城河桥成，授工匠四人为官，又传升通政司经历沈禄为参议，尚书王恕、周经曾力止之，终不行。此后传奉渐多，到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一个月中传升达二百余人。十二月初五日吏部尚书屠滽上言请罢传奉官七百九余人，他说：传升文职过多，请惜名器，以堵奸人之进。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言说：国家设武职以待军功，没有临阵斩获不得轻授。今传奉画工张玘为指挥，并准其世袭，在边冒死作战者何以待之？在此之前，六科十三道皆上疏极言传奉之弊，孝宗终不能听。

夏时正逝世 夏时正(1412—1499)，字季爵，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刑部主事。景泰六年(1455)以郎中至福建录囚，多所平反。天顺初，擢大理寺丞，迁南京大理寺少卿，成化五年(1469)进卿。成化六年巡视江西灾伤，除无名税十余万石，汰冗役数万，罢不职吏二百余人，增筑南昌滨江堤及沿河坡岸，民赖其利。后致仕，家居三十年，于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初八日卒，年八十八。夏时正博学有才，多所著述，详于稽核校雠之学，有《瀛屿稿》、《余留稿》、《杭州志》。

张弘至上言异初政事 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二十六日，兵科给事中张弘至上言说：皇上登极之初，革传奉官五百余人，近年复又传升，此异初政之一；登极之初，逐番僧佛子，斩妖僧继晓，近年复又斋醮不绝，此异初政之二；登极之初，罢大学士万安、吏部尚书李裕，朝弹夕斥，近年礼部尚书徐琼等被劾不断，而竟不去官，此异初政之三；登极之初，曾言有大政，当召府部大臣面议，近年未闻廷召，此异初政之四；登极之初，撤镇守、烧造内臣，近年渐复差遣，此异初政之五；登极之初，左右内臣不敢奏扰，近年陈情乞恩，此异初政之六；登极之初，兵部申明旧制，令该科存记，后比例乞升者指奏，近来恩倖乞升，此异初政之七；登极之初，光禄寺供应节约，近年增添，动辄取太仓银，此异初政之八。孝宗令下所司，搪塞了事。

王守仁建言西北边务 王守仁于弘治十二年(1499)成进士，时朝议方急西北边务，王守仁遂奏陈边务八事：一、蓄才以备急。聚公侯之子教于武学，岁擢超异之人，兵部两侍郎更迭巡边，择科二三人以从，使周知虚实，则一旦有急，不患无人。二、舍短以取长。边将骁勇者，多以过失摒弃，诚使立功自赎，贤于不知地利之官。三、减军以省费。边将之请京军，徒以事不济则有所分。诚以赏京军者赏边卒，数万之锐卒可立致。四、屯田以给食。三边之戍，不辍耕农，诚使京军分屯，各食其力，可以少息输馈。五、行法以振威。边将失机，立正军法，可来军威。六、敷恩，以激怒。兵方失利，士气销沮。诚恤其孤寡，室以国恩喻以报仇，则气可愤。七、损小以全大。小有剽掠，一以为当救，一以为可邀，遂以疲劳致败。今许以便宜，惟则大效而小挫不问，则我师当逸。八、严守以乘敝。婴城固守，使足食足成，然后出奇制胜，所败立于不败之地而后能败敌。疏上，授刑部主事。

更定问刑条例 洪武、永乐间定制，法司断狱，均依律拟议，不许妄引条例。英宗、宪宗以后，巧法之吏往往舍律用例，以便借此贪赃枉法，条例由此日繁。至孝宗时，始有修明之举。弘治八年(1495)，以鸿胪寺少卿李鐩之请，命刑部尚书彭韶删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三年二月初六日，给事中杨廉上言说：高皇帝曾命刘基、陶安等详定律令，且言立法贵简，若条绪繁多，可轻可重，则会生奸弊，可见圣祖重律轻例之意。一百三十年来，律行已久，条例渐多，今应以太祖立法贵简之心为主，一切近代冗杂悉为革去。孝宗从之。刑部尚书白昂会九卿定议，择条例可行者二百九十余条，与律并行。孝宗诏命颁行。

陈献章逝世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世称白沙先生。受学于吴与弼，绝意科举。后声名远扬。成化十九年(1483)广东布政使彭韶、总督朱英交荐至京，授翰林院检讨而归，自后屡荐不起。继承陆九渊"心即是理"的观点，认为宇宙只是一理的表现，这理便是心。他说："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始终，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修养主静坐，认为"学劳攘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颇有禅学之意。工书，山居笔或不给，以茅代笔，遂自成一家，时呼为茅笔字。又善画墨梅。弘治十三年(1500)二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三。万历初，从祀孔庙，追谥文恭。著有《白沙集》、《白沙诗教解》。

陈纪逝世 陈纪(？—1500)，字叔振，福建闽县（今属福州）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庶吉士，以监察御史提督北直隶学校，士子服其公明。擢陕西按察使，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召还理院事，升右

副都御史。后以疾告辞。弘治十三年(1500)三月二十五日卒。居官清慎,持法平恕。

火筛屡扰大同　火筛系鞑靼小王子的支部,善于用兵,到弘治后期开始强大,屡为边患。弘治十三年(1500)四月,火筛七千余人自大青山数道入威远卫(今山西左云西),游击将军王杲及都指挥邓洪率军迎击,中伏而败,九百余人战死。孝宗急命平江伯陈锐为靖虏将军,充总兵官,太监金辅监军,户部侍郎许进提督军务,前往御之。五月,火筛又拥众五万骑入大同左卫(今山西左云),游击将军张俊力战。但陈锐怯懦,令诸军坚壁自守,火筛遂所向无阻。十二月,再扰大同,南入百余里,纵掠而去。为火筛屡扰,孝宗分别在弘治十三年四月、五月两次召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面议军政,实为罕见。

众臣上言修省事宜　弘治十三年(1500)五月十四日,五府六部大臣应诏上言修省:早视朝,勤听政,汰冗员,节财力,省差遣,处庄田,清盐法,申禁例,修武备,壮军容,恤官军,止织造,惜边民,停改造,减供应,斥异端,警骄惰,防诈伪。孝宗表示听纳。

徐琼致仕　徐琼(1425—1505),字时庸,号东谷,一号明农翁,江西金溪人。天顺之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廷侍讲、南京侍讲学士、南京太常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弘治三年(1490)迁南京礼部右侍郎,以考满至京,改礼部左侍郎。九年迁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弘治十三年(1500)五月十五日加太子太保致仕,弘治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卒,年八十一。

王克复逝世　王克复(？—1500),字师仁,福建福清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历官刑部郎中,明习法律。累迁江西布政使,时江西讼纸堆积如山,克复一日判完,时称"王一火"。官终南京吏部右侍郎。后致仕。弘治十三年(1500)六月十二日卒。历官以勤慎著称。

邓廷瓒逝世　邓廷瓒(1430—1500),字宗器,湖广巴陵(今湖南岳阳),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淳安知县,有惠政,九载始迁太仆寺丞。出任贵州新设之程番(今惠水)府知府,悉心规划,兴建城郭、学校等建筑,政平令和,夷人得安。九载秩满迁山东左参政,寻进右布政使。弘治二年(1489)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提督军务征讨都匀苗民七富架、长脚起义,以功进右都御史。弘治八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未几巡抚两广兼提督军务,再进左都御史,屡征两广瑶民起事者。弘治十三年(1500)六月十三日卒,年七十一。赠太子少保,谥襄敏。有雅量,待人不疑,世称长者。屡督军务,出战多有胜绩。

杨谧逝世　杨谧(？—1500),字文宁,河南仪封(今兰考东)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昆山知县,以治行卓异擢浙江道监察御史,升太仆寺少卿,转大理寺右少卿,进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今河北宣化),清理势豪所占屯田,还之于军。迁左副都御史,寻升兵部右侍郎,训京营兵马。弘治十三年(1500)六月二十九日卒。居官端慎,不计名利。

召募士兵　弘治十三年(1500)七月初七日,兵科给事中熊伟上言说:臣生长边方,颇知边事,凡土人不是不愿应募为兵,而是召募之法不合适宜。请令愿应募者听就附近卫所编为什伍,随军操练,给予月粮器仗,有功一并升赏。边事息宁之日仍令还农,不得擅自派遣,如此有事则聚而为兵,无事则散而为农。兵部覆奏伟言极是,请移文边臣悉如所拟行事。孝宗准奏。

梁璟致仕　梁璟(1430—1502),字廷美,山西崞县(今原平北)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成化中迁都给事中,擢陕西左参政,历左右布政使,在陕西十五年,有政绩。弘治初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上书奏请停免武当山道士所征杂役。改抚四川。弘治七年(1494)召科南京吏部右侍郎,进南京户部尚书,弘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致仕。弘治十五年七月卒。

萧祯致仕　萧祯(1432—1501),字彦祥,泰和人。天顺八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任员外郎,出任湖广按察佥事、副使、按察使,擢河南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右侍郎,改刑部右侍郎。弘治十年(1497)迁南京工部尚书,弘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致仕,弘治十四年卒,年七十。

张颐逝世　张颐(？—1500),字养正,其先祖为直隶江都(今属江苏)人,后占籍山西太原。天顺四年(1460)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升修撰,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时汪直北征,颐曲意奉迎,遂以军功转左,寻升工部右侍郎。成化十九年(1483)汪直败后被劾致仕。弘治十三年(1500)八月初十日卒。

焦俊逝世　焦俊(？—1500),广东广宁人。少为商贩,成化九年(1473)袭兄寿东宁伯之爵,任左府带俸神机营管操,成化二十一年充总兵官镇甘肃,二十三年改镇宁夏。弘治八年(1495)召掌南京前府事,管理操江,弘治十一年镇守贵州,弘治十三年改湖广,未至即于是年九月二十二日卒。

《寓圃杂记》刊行　《寓圃杂记》十卷王锜撰。刊于弘治十三年(1500)二月前。王锜(1433—1499)字元禹,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本书内部很广,有对直臣义节的颂扬,和对廉洁官吏的称赞,也有对招权纳贿者及肆意凌虐之徒的抨击。对于苏州一带的事

实记载尤详，是研究明史、特别是对研究苏州一带地方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申严沿边伐木之禁 弘治十三年(1500)十一月二十七日，申严沿边伐木之禁。起初盗伐边关材木者甚多，兵部曾请禁之，后修万春等宫及承运等库，禁令遂驰。至是经略紫荆关都御史王之上言请申严禁令，遂有是令。

于冕逝世 于冕(？—1500)，字景瞻，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于谦之子。景泰元年(1450)以谦功授世袭副千户。谦死从坐戌龙门，屡上疏讼其冤。成化初，于谦昭雪，冕自陈不愿就武职，遂改兵部员外郎，累升礼部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应天府尹，后致仕。弘治十三年(1500)十二月十一日卒。通经史，有才干，历官能尽其职。

陕西朝邑地震 弘治十四年(1501)正月初一日陕西等处地震，朝邑被灾尤甚，高原井水枯竭，地裂泉涌，水深尺许，水流成渠，震塌城廓，摇倒房屋五千三百余所，压死人畜以千计，人民逃散，有的城市乡村为之一空。延安、庆阳二府，潼关等卫，同州、华阴、长安、咸阳等县，同日俱震，直到次日仍屡震不止，有声如雷，城垣楼橹倒塌，损坏官民庐舍五千四百余间，压死男妇一百六十余人，牲畜压死甚多。有的乡村地裂涌水泛滥，流而成河。蒲州城北地裂涌出沙水。韩城甚重，声响如雷，倒塌官民房屋五千余间，压死男妇一百七十余，县东八里处遍地决裂，有长一二丈或四、五丈，涌水溢流成河，而蔡家堡、严伯村等亦四处涌水几成河。咸宁、咸阳、临潼、富平、同州、大荔、澄城、华州、白水、延安府、中部、清涧等府州县，同日亦震。而河南省陕州、永宁、卢氏、灵宝以及山西省平阳府、蒲州、安邑、荣河。庆阳府(今甘肃省庆阳)环县、平凉府(今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州(今静宁县)等俱受波及。命钦差镇守陕西等处地方御用太监祭西岳华山之神。震中烈度(I_0)IX，震级(M)七级。

边镛逝世 边镛(？—1501)，字克振，任丘人。景泰年间举人，选授御史。成化三年(1467)征建州有功擢南京通政司右参议，迁南京大理寺右少卿，召为通政司右通政。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在大同设伏击败鞑靼，迁左副都御史，上时政十五事，多见采纳。改南京刑部右侍郎，被劾致仕。弘治十四年(1501)二月初六日卒。

刘震逝世 刘震(1434—1501)，字道亨，号励斋，江西安福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授编修，升侍讲。弘治元年(1488)升右春坊大谕德，管国子监司业事。弘治九年升南京国子监祭酒，弘治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八。性格刚毅，精于经学。为文敏赡雄健，不袭陈言。著有《双溪集》。

王鏊进御边之策 弘治十四年(1501)春，吏部侍郎王鏊进御边之策：定庙算，重主将，严法令，恤边民，广招募，用间，分兵，出奇。又奏：今火筛，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乱政，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边圉空虚，深可为畏。近年边将失律，率令戴罪杀贼，人心日懈，士气不振。望陛下大举乾纲，有罪必罚，有功必赏，专主将将权。厚恤沿边死事之家，召募边方骁勇之士。更请仿前代制科荐举之例以收异材。孝宗得奏，时不能用。

考试武官骑射韬略之术 弘治十四年(1501)四月初一日，兵部尚书马文升会同司礼监太监陈宽、英国公张懋等阅试各营侯伯都督骑射韬略及把总等官骑射之术。及试，往往持弓不能发矢，甚至有堕弓于地者；及询韬略，俱不能答。马文升等请重加究治，或罚俸夺俸，或罢黜除名。并请刊印《武经总要》，颁赐在京武职大臣及各边将领，以资其智识。孝宗从之。

修大同边墙 弘治十四年(1501)四月，修大同外边墙，自西阳河(今山西天镇新平堡)至偏头关(今山西偏关)九百八十余里，宽一丈五尺，高一丈三尺，增置墩堠，修堡寨六百七十个，役夫五万人。命巡抚大同都御史刘宇督办，期半年完工。

小王子等部大举扰边 弘治十四年(1501)四月，鞑靼小王子，火筛诸部连兵大举扰边，自红盐池(今内蒙伊金霍洛旗南)、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入，纵横数千里，延绥、宁夏皆告警。所至杀掠殆尽。孝宗诏命保国公朱晖佩大将军印，充总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军务，太监苗逵监军，前往御之。七月，兵至宁夏，而敌已饱掠而去。朱晖等分兵五路，夜袭敌巢于河套，但敌闻迅后早已转移，明军仅斩敌三人，劳而无功，但仍以捷报闻，受赏者至万人，闻者莫不以为耻。闰七月，小王子、火筛复又以十万骑分道入宁夏，掠固原等地，大肆杀掠，尸骨遍野。明军大败，关中震动。八月，小王子二万骑入宁夏东路、万骑入韦州(今宁夏吴忠南)杀掠，明军躲避城寨，不能抵御。十二月，都给事中屈伸上奏弹劾朱晖等以耗京仓及边储一百六十余万而止杀敌三人，却有万余人受赏，请治其罪，孝宗不能用。

云南大理大水 弘治十四年(1501)六月初一日，大理大雷雨，黠苍、白石二溪水涨，漂没民居五百七十余所，溺死三百余人。

马显逝世 马显(？—1501)，字文明，直隶广平(今河北)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户科给事中。景泰初进都给事中，时奸佞用事，马显指陈时政

得失,多所裨益。寻为权贵所忌,出为河东盐运使,擢四川布政使,升南京兵部右侍郎,进左。成化二十三年(1487)致仕。弘治十四年(1501)七月初八日卒。居官廉介,百姓称之。

翟瑄逝世 翟瑄(1433—1501),安廷瑞,河南洛阳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浙江奉化知县,历升监察御史、大理寺丞、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兼督雁门等关,边储折粮,民困输纳,多流徙失业,翟王宣奏减大半,百姓称便。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弘治十四年(1501)七月初九日卒,年六十九,赠太子少保。

张锦逝世 张锦(1440—1501),字尚纲,陕西岷州卫(今甘肃岷县)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刑部主事,升员外郎、郎中,录囚山东,出赈真定(今河北保定)诸府,皆有名。累迁大理左右寺丞、右少卿,未几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劾罢中官、武将之不职者,请立万全左卫、龙门卫学及定天下武学岁贡额。弘治初开刑部左侍郎,安定侯柳景有罪祈免,锦不为所动,论之如律。后以疾致仕。弘治十四年(1501)闰七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二。

黎福逝世 黎福(? —1501),字天与,江西乐平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御史,上疏天下利病,敢言人所难言之事。累官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擢南京兵部右侍郎。弘治十三年(1500)五月致仕,弘治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卒。天性廉静,事必尽心尽力。

谢昶逝世 谢昶(? —1501),字孟明,黄冈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授户部主事,转员外郎,升四川重庆知府,改九江及赣州府,以清慎称。历升四川右参政、左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成化二十三年(1487)被劾致仕。弘治十四年(1501)八月初五日卒。

秦纮总制三边军务 弘治十四年(1501)九月二十九日,孝宗以言官交章弹劾右都御史史琳等丧师溃职之罪,乃召史琳还,起致仕南京户部尚书秦纮为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之,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秦纮至边,祭阵亡将士,为其记功,掩其尸体,劾败将杨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将,练壮士,兴屯田,申明号令,军威大振。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又请升陕西之开城县(今宁夏固原南)为固原州,设总制府,以防火篩。固原遂成九边重镇之一。

倪岳逝世 倪岳(1444—1501),字舜咨,应天府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成化中,历侍读学士,直讲东宫。成化二十二年(1486)擢礼部右侍郎,弘治初改左侍郎。弘治六年(1493)出为尚书,上言开言路、宽赋役、慎刑罚、黜奸贪、进忠直、汰冗官、停斋醮、省营造、止滥赏数事。弘治九年诏加太子太保,出任南京吏部尚书,寻改兵部,参赞机务。弘治十三年召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有正直之声。曾上言西北用兵事宜,主张重将权、增城堡、募民壮、明赏罚、实屯田等。弘治十四年十月初九日卒,年五十八,赠少保,谥文毅。倪岳善断大事,以片言令闻者服。前后陈请百余事,军国弊政剔抉无遗。著有《清溪漫稿》。

王武起事 弘治十五年(1502)正月,江西新昌(今宜丰)人王武率民起事。江西巡抚韩邦问不能靖灭,孝宗命操江御史林俊前往巡视,不久王武背叛,起事者皆败。

傅瀚逝世 傅瀚(1435—1502),字日川,号体斋,江西新喻(新余)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升修撰兼司经局校书,侍东宫讲读。九载秩满,迁左春坊左谕德,兼经筵讲官。弘治初,擢太常寺寺少卿兼侍读。修《宪宗实录》成,进太常卿兼侍读学士。擢礼部右侍郎,既而以左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事。弘治十三年(1500)出为礼部尚书,崇节俭,戒滥赏。弘治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卒,年六十八,赠太子太保,谥文穆。工书法,善诗文。

董越逝世 董越(1431—1502),字尚矩,江西宁都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编修,进侍读。成化二十年选侍东宫讲读,充经筵讲官。弘治初,进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讲,出使朝鲜。修《宪宗实录》成,升太常寺少卿兼侍讲学士,充日讲官。寻迁南京礼部右侍郎,至工部尚书。弘治十五年(1502)五月初四日卒,年七十二,赠太子少保,谥文僖。著有《朝鲜赋》、《朝鲜杂志》等。

谢绶逝世 谢绶(1434—1502),字维章,江西临川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历员外郎、郎中、四川广西右参议、陕西右参政、福建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召为工部右侍郎,改刑部转左,升南京礼部尚书。弘治十五年(1502)五月初八日卒,年六十九。

秦纮上全胜车图 弘治十五年(1502)五月十九日,总制陕西军务尚书秦纮上全胜车,高五尺四,宽二尺四,长一丈四。上放铳者二人,下推车并放铳者四人,每车重不过二石,遇险但用四人肩行,车上下前后通用布甲遮矢石,甲上皆画猛兽,辕上放铳者亦用布甲护蔽。每遇贼先发车十辆或五辆,直冲贼阵;有阻塞则首车向前放铳,后有自袭则尾车向后放铳;若入贼阵,则各车两厢放铳,使贼马惊扰,自相蹂践。其余车辆或倚角夹攻,或邀贼归路,以成万全之策。孝宗令会同镇巡等官制造奏闻。

秦纮奏陈边备四扼 弘治十五年(1502)五月

二十九日，总制陕西军务尚书秦纮奏陈备边四扼：平凉北四百余里豫望城，固原北三百余里峡石口及双峰台，最为冲要，宜严守备，此为一扼。进而稍南，西安州镇戎所海剌都、打剌赤、黑水口、干盐城，犬牙参错，此为第二扼。又进而南，固原卫、靖虏卫、平滩堡、东山城、白杨城，分布守御，此为第三扼。又进而南，火龙沟、虎山沟、金佛峡、麻张沟、海子口，皆山涧溪径，分兵据险，此为第四扼。以此防边，似为得策。孝宗从其言，令即施行。

郑龄逝世 郑龄(1440—1502)，字梦龄，江西弋阳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工部主事，升员外郎、郎中，直言敢争，力除宿弊，虽被谤而不沮。擢四川左参政、左右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弘治十五年(1502)六月初三日卒，年六十三。历官三十余年，以廉能著称。

项忠逝世 项忠(1421—1502)，字荩臣，浙江嘉兴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景泰中由郎中迁广东副使。天顺初迁陕西按察使，天顺七年(1463)改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抵御鞑靼，开渠灌田。成化四年(1468)征讨满俊起事，以功进右都御史，理都察院事。成化六年，又率兵征讨荆襄流民起义，大肆驱赶杀掠流民。成化十年升刑部尚书，寻转兵部。成化十三年六月，因与九卿上书弹劾汪直而被斥为民。汪直败后复官，不久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十一日卒，年八十二，赠太子太保，谥襄毅。项忠倜傥多大略，练戎务，刚直不阿，敏于政事，故所在著称。

山东濮州地震 弘治十五年(1502)九月十七日戌时，山东济南、东昌、兖州、濮州(今河南濮城)等府地震，有声如雷，半月之间，连震三次，动摇泰山，远及千里而濮州尤甚，压死百余人，民居倾坏千余间，日震三十余次，井水溢，平地开裂泉涌，亦有沙土随水涌出。朝城人多压死，堂邑亦有人被压死。历城、德州、平原、馆陶、高唐州等震坏城垣民舍。观城、范县、大名等倾坏庐舍。山东恩县、聊城、东阿、临清州、夏津、曲阜、汶上、阳谷、寿张、情平；河南开封府、彰德府，卫辉府淇县、辉县、汲县，开封府考城，中牟；山西平凉府、潞州、泽州；畿辅广平府清河，威县、成县以及徐州南京等五省三十多府州县，均受到波及。震中烈度(I_0)Ⅶ，震级(M)为六点五级。

张悦逝世 张悦(？—1502)，字时敏，号定庵，松江华亭(今上海)，天顺四年(1460)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成化中出为江西佥事，改督浙江学校，迁四川副使，进按察使。弘治初迁工部右侍郎，转吏部左侍郎，屡上言请修时政。迁南京右都御史，改南京吏部尚书，转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弘治十二年(1499)致仕，加太子少保。弘治十五年十月初五日卒，赠太子太保，谥庄简。操行清谨，执法不阿。有《定庵集》。

琼州黎民起义 弘治末年，琼州府知府张桓贪财私敛，鱼肉百姓，继任的知府余浚残虐更甚。黎族人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弘治十五年(1502)十一月，黎人符南蛇率众起义，围攻儋州(今海南儋县西)。两广总督潘蕃令副使胡富调兵征讨，义军勇斩参将刘信。户部主事冯颙上言召募土兵，以夷攻夷之策，孝宗从之。弘治十六年七月，义军至数万人。潘蕃率兵进攻，破义军寨一千二百余所，杀义军二千五百余人，符南蛇战死，起义失败。

徐贯逝世 徐贯(？—1502)，字厚一，或作元一，浙江淳安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兵部主事，历升员外郎、郎中，以福建右参政，巡视海道。升福建右布政使，山东左布政使，拜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升工部右侍郎，寻转左，前往苏州、湖州经理水利，疏浚河、湖等工程，功不可没。后升尚书，加太子少保，进太子太保，弘治十三年(1500)致仕，弘治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卒，赠少保，谥康懿。有《余力稿》。

陈锐逝世 陈锐(1439—1502)，直隶合肥(今属安徽)人，平江伯陈豫之子，天顺八年(1464)袭伯爵，坐营管操领。成化六年(1470)镇守两广，充总兵官。成化八年改镇扬州兼督修漕河。弘治初提督京营操练，兼掌左军都督府事。弘治七年(1494)加太子太保，协同刘大夏治张秋运河，以功进太保兼太子太傅，弘治十一年加太傅。弘治十三年充总兵官统京营兵前往大同防御鞑靼，无功而返，被夺俸闲住。弘治十五年(1502)十二月十六日卒，年六十四。

韩镐逝世 韩镐(？—1503)，字民澹，河南卢氏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升浙江右参议，平饥民起事，然后发粟赈济。弘治八年(1495)转左参议，十二年升右布政使，修海堤，查私盐，有能声。升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弘治十六年正月五日卒。

铸弘治通宝钱 弘治十六年(1503)二月十九日，孝宗诏令两京及各布政司照诸司职掌所载多寡之数铸钱，或加或减。北京照初年北平旧数，而南京地方颇广，宜增一倍。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西、广西、陕西、广东、四川俱照旧数。湖广视浙江、福建视广东、云贵视四川，每年陆续铸造，并申禁私铸之令。

徐恪逝世 徐恪(1431—1503)，字公肃，常熟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工科给事中，历升湖广

左参议、河南右参政、左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抑豪族、宽逋赋、均徭役，百姓称便。改巡抚湖广，迁南京工部右侍郎。弘治十一年(1498)致仕，弘治十六年三月初七日卒，年七十三。

王继逝世 王继(1433—1503)，字述之，号樗庵，河南祥符(今开封)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监察御史，升陕西按察司佥事、副使、山西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升户部左侍郎，督理南储，出纳有法，进尚书，未几改南京刑部尚书，转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弘治十六年(1503)四月二十九日卒，年七十一。

席书上言弊政 弘治十六年(1503)五月，云南、贵州屡发天灾，孝宗命南京刑部左侍郎樊莹前往巡视。樊莹弹劾镇、巡等官，并罢黜不职者一千七百人。户部员外郎席书上言说：灾异之生在于朝廷，不在云南，如人元气内损，然后疮疡发于四肢，现在好比朝廷为元气，云南为四肢，怎能舍致毒之本，而专治四肢之末呢？现在内府供应数倍于往年，冗食官有数千，投充校尉有数万。斋醮寺观没有停日，织造频繁，升赏过度，皇帝夺小民之田，宦官增遣不已。屡兴冤狱，刑官亦不敢申。贤臣不能起用，以言治罪者不能复官。文武官传升不断，致使名器大滥。今治云南官吏之罪，正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乞望裁除弊政，去大害，举大政。这时的孝宗耽于声色货利，忙于斋醮祷祀，笃信佛老鬼神，对席书的建议不能举而用之。

顾溥逝世 顾溥(？—1503)，字崇泰，直隶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成化九年(1473)袭祖爵镇远侯，掌五军右掖。弘治元年(1488)充果勇坐营管操，弘治二年拜平蛮将军，充总兵官镇守湖广。统治五年率兵征讨贵州都匀起事苗民，斩其首领乜富架及苗民万余，以功加太子太保。召入京提督团营，掌前军都督府事。弘治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卒，谥襄恪。清慎守法，居官三十余年，家无私藏，至不能成殓，实为少见。

重申亲王之国旧例 条例规定：亲王之国，船不过五百艘，其军校船自备輓。自吉王始乞护送。兴王、岐王护送船达九百余艘，道役数万人。其后寿王、泾王船亦有七百艘，官校横扰。弘治十六年(1503)七月十九日，因荣王将之国，特重申旧例，预加诫谕。

白昂逝世 白昂(1435—1503)，字廷仪，直隶武进(今属江苏)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南京礼科给事中，历升刑科给事中、应天府丞、南京大理寺少卿、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左侍郎。弘治初，以户部左侍郎往治张秋决河，改刑部左侍郎，升尚书，加太子少保，进太子太保。统治十三年(1500)致仕，进太子太傅，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九，赠太保，谥康敏。

南京大水 弘治十六年(1503)七月，大风雨，江潮入南京，江东门内五尺有余，没庐舍男女，新江口中、下二新河，诸处船漂人溺。

范吉献《神机制胜书》 弘治十六年(1503)八月十二日，带闲住知府范吉上言兵事，献《神机制胜书》及所制先锋车、霹雳车。《神机制胜书》言阵法、战法并四大要事。阵法为：如用军一万，除辎重外，用先锋、霹雳车各五百辆，中军百辆，四奇各百辆；马四千，中军八百，四奇各八百。二车列于外，铁骑藏于内，四头八尾，触处为首。在旷野则布圆阵，近城外则雁门阵，彼锐则此曲，彼散则此聚。外车离四奇铁骑百步，四奇铁骑离中军百步。此阵法之大略，战法为：步骑兼用以守，至不追逐，不远攻，至而名，以逸待劳，以寡制众，以车为正，以马为奇。大至发霹雳车、火铳击破；小至发先锋车发弩以射击；将疲后出铁骑精兵以捧。稍见利即收还队，旋出先锋车、长刀、弹手以砍，即时还，乃发霹雳车、大刀、长枪以陷。二队迭进，进则五十步一止，追则三十步一止。二车不远离，四奇不近击，首尾相应，前后联络。此阵法之大略。其大要四则为：选将、利兵、择马、利器。孝宗令甚至陕西总制秦纮随宜任用，有功奏录。

尹旻逝世 尹旻(1422—1503)，字同仁，山东历城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选庶吉士，授刑科给事中，天顺初迁左给事中，擢通政司右参议、左参议。总督陕西军饷，上言备边十策皆可行。擢吏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升尚书，累加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光禄大夫柱国等。成化二十二年(1486)，大学士万安与道士李孜省相结排挤尹旻，尹旻被令致仕。弘治十六年(1503)九月十七日卒，谥恭毅。在吏部二十余年，能秉公用人，为一代名臣。

清理盐法 弘治末年，奸商竞相投靠外戚张鹤龄，乞以长芦旧引十七万免追盐课，每引纳银五分，别用价买各场余盐，如其数任之鬻贩，孝宗许之。自后奸商以之为例，乞两淮旧引至一百六十万，使盐法大坏，奸人横行江湖，官府不能禁治。弘治十六年(1503)九月，孝宗召阁臣刘健等于便殿，论及理财，李东阳极言盐法大坏在于陈乞者太多。孝宗诏令户部核议盐法利弊。

杨一清上言修举马政 弘治十七年(1504)正月十三日，督理陕西马政左副都御史杨一清上言修举马政：一为增种马。陕西马夺辖六监二十四苑，今只二监六苑。臣遍历其地，酌定三等，开城、安宁为上苑，岁马可二万匹；广宁、万安为中苑，岁可八千匹；

清平、黑水为下苑，岁可四千匹。但种马有缺，请给银二万四千两，市种孳息。二为增牧军。牧军旧一千二百余人，今只七百余人。宜编流户给草场住牧。其有投托影占的，绳之以法。兵部复奏，孝宗允行。

申严诬告之禁 弘治十七年(1504)正月二十一日，刑科都给事中于瑁等奏陈：近会问犯人李道明，只以一人无知妄捏妖词文，改百十平人皆罹隐祸，非多官为之辨明，则被诬陷死地。由此类推，恐内外诬枉受害之人尤多。本朝律例：凡诬告平人者坐罪有差，乞敕法司通行内外问刑衙门，明谕禁约，今后本状只许直言所告之事，不许牵引平人。不干己事，以图展转。其各该官司必先参详该论；及干己者，速为理断，内有旁引律该勿论及应立案者，勿与准理。敢有不遵及与施行者皆治以罪。法司复奏，请令天下诸司各以此意刊榜谕众。孝宗允准，申严诬告之禁。

陈道逝世 陈道(1436—1504)，字德修，一字德政，号南山，直隶盱眙(今江苏)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吏部主事，调南京刑部，历员外郎、郎中，升金华府知府，有治绩。弘治间累升江西右参政、云南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疏陈河南地方利病，多见准行。召为刑部右侍郎，寻转左，升南京右都御史，进南京刑部尚书。弘治十七年(1504)二月初十日卒，年六十九，赠太子少保。有《南山类稿》。

申严谶纬妖书之禁 弘治十七年(1504)二月二十七日，吏部尚书马文升奏陈：法司每秋后会审重囚，其中坐收藏妖书惑众问拟重刑人犯甚多。传信妖言多系愚民，与其诛于已犯，不如等于未然。乞敕都察院出榜下名抚按官，翻刊谕众；但有收藏谶纬妖书者，许半月内自首于官，其书即许其煅；官司有私录者，其罪均。仍令地方人等仿有以妖术、妖言惑众者，即捕送于官。都察院复奏，孝宗允行。

罢建塔寺 弘治十七年(1504)二月，孝宗拟在朝阳门外建筑延寿塔以及殿宇廊庑墙垣等，传命内阁撰写诰书，由司礼监太监李荣、内官监太监李兴提督兴建事宜。内阁大学士刘健等上言说：佛老鬼神之事，无益于世，有损于民。今寺观相望，僧道成群、斋醮不时，赏赉无算，竭天下之财，疲天下之力，势穷理极，无以复加。请收回前命，停建塔寺。当时府部大臣和科道言官都交章论奏，请罢其役。孝宗无奈，才停止了这次役作。

刘大夏上言救灾事宜 弘治十六年(1503)夏，南北直隶、浙江、山东、河南、湖广相继发生水灾或旱灾。弘治十七年闰四月初七日，兵部尚书刘大夏上言救灾事宜：一、传升文武官员及匠官除见任管事者，其余月俸暂停。二、内府各监局及光禄寺招收工匠厨役杂工至万人，乞加以拣选，其余发回原籍。三、江西、浙江等地所欠丝绵减半。四、减光禄寺猪羊果品供应。五、应天府及江北诸府州所欠倒失马价及草场子粒未征完者皆予免除。六、内府各衙门、皇城各门、京通二仓及上林苑等处内官俱有定额，今增至数倍，宜量为裁革。七、罢苏杭等处织造宦官，令镇巡官领织造事。八、停斋醮无益之事。孝宗准行。

刘璋逝世 刘璋(?—1504)，字廷圭，河南卫辉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山东高密知县，擢福建道监察御史，历升山东佥事、山西四川副使、山西按察使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颇有治绩。弘治十七年(1504)闰四月十一日卒。

侣钟致仕 侣钟(?—1511)，字大器，山东兖州人。成化二年进士，授监察御史，巡两淮盐，按徽州、浙江。改大理寺右丞，迁右少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兼督柴荆等关。后升刑部右侍郎，坐事谪曲靖军民府知府，改徽州知府。召任大理左少卿，迁左副都御史巡抚苏松诸府兼总粮储。占为户部左侍郎总督京储，改吏部，进右都御史。弘治十三年五月升户部尚书。弘治十七年五月初五日致仕，十八年进荣禄大夫。正德六年(1511)十一月二十五日卒。

安南国王黎晖卒 弘治十七年(1504)五月，安南国王黎晖卒，子黎敬继位。十二月，黎敬卒，其弟黎谊嗣位。

李东阳上言民情 弘治十七年(1504)五月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自山东阙里祀孔毕返回京师。他记述了沿途目见耳闻的情况上书说：自四月以来，经过天津一带，适遇大旱，夏麦枯死。秋田未种，客船稀少，纤夫身夫完衣，百姓面有菜色，极目四望，令人寒心。临清、安平(今山东阳谷东)等处盗贼纵横，杀人劫财者处处都是。传闻青州(今山东益都)劫夺更甚，贼盗百十成群，白昼公然出行，出没无忌，官府捕之不尽。又闻南来人言，淮扬诸府，或掘食死人，或贱卖亲人，流移抢掠，各自逃生。东南为国家财赋所出之地，一年饥荒，竟已至此程度。而北方素贫，没有储蓄，若今年再次歉收，恐无救处之法。国家承平富庶已有一百余年，一时之荒，已不堪处，若有不测，又将何以处之？言及于斯，可以痛哭。只有经过此地，始知民生怨苦之状，郡县凋敝，十倍于前，访问百姓官吏，都说粮草税课，岁有常额，而冗食太多，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年无虚月。内府钱粮，交纳没完没了，京城修造，前后无停之日，做工军士，累力赔钱，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室，田连州县，征科过度，请乞无厌。亲王之国，供亿之费，每至二三

十万，修斋挂袍，开山取矿，作无益以害有益。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嗟怨不已。另有游闲之徒，号称皇亲，附搭盐船，于各处起盖店房，网罗商税。织造内官，纵使群小，拷打闸河官吏，赶捉买卖居民，如此之类，不胜枚举。今日生民贫困已深，国用匮乏已极，唯有节用度，广储蓄，节一分则有一分之益，积一分则有一分之利。伏望立行，以解弊端。

刘大夏论兵政弊端 弘治十七年(1504)六月初三日，兵部尚书刘大夏上言说：京师官军在卫者苦于出钱，在营者困于私役，以致多有逃亡者。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竭军民之力以运粮储，而滥食者不知，尽生民之财以买战马，而私用者罔顾。刘大夏表示自己不能为朝廷分忧，不能为军民除害，要求引咎致仕。孝宗不准，令其明白开具以闻。刘大夏乃复言请革除京操及漕运弊端，严格升赏之法，禁止私役马匹。孝宗准奏。

更定两京考察制 旧制方面官三年朝觐一考察，两京堂上官不与，至五品以下，十年一考察。而居官秩满之期为九年，转迁或除服改补，所以多不及期。弘治十七年(1504)六月初六日，吏科给事中许天锡请京官五品以下六年一考，四品以上自陈听命。孝宗准奏，并著为令。

刘健建言御虏安边之策 弘治十七年(1504)六月二十四日，大学士刘健建言御虏安边之策：出京兵不如募边勇，给大同马不如以金就市大同。又运帑金召商纳粮刍，拔异才，奖游击将军张俊，命都督神英领京军万人待援等。孝宗一一采纳。

殷谦逝世 殷谦(1417—1504)，字文抃，直隶涿州(今河北)人，正统四年(1439)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景泰中升兵部郎中、通政司右通政。天顺元年(1457)被谪汝宁(今河南汝南)府知府，改太原府知府。成化初升陕西右参政，转山西同官，升右布政使。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令二边有警互援。召为户部右侍郎，转左，升尚书加太子少保。后致仕，家居十九年，弘治十七年(1504)六月二十九日卒，赠太子太保。

吴宽逝世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成化八年(1472)会试、廷试皆第一，授修撰，进右谕德。弘治初进左庶子，修《宪宗实录》成，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弘治八年(1495)擢吏部右侍郎，转左，改掌詹事府，入东阁，专典诰敕，侍武宗东宫，上言规劝太子读书。弘治十六年进礼部尚书，仍掌詹事府。十七年七月初十日卒，年七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行履高洁，不为矫饰，自守以正。工诗文书法。著有《皇明平吴录》、《汤媪传》、《家藏集》等。

谢铎致仕 谢铎(1435—1510)，字鸣治，号方石，浙江太平(今温岭)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预修《英宗实录》。成化九年(1473)校勘《通鉴纲目》，建言宪宗以古证今，兢兢业业，方可太平久安。又因边塞有警，条上边备事宜，请养兵积粟，收复东胜(今内蒙托克托)、河套故疆。秩满进侍讲，直经筵。弘治初，召修《宪宗实录》，弘治三年(1490)擢南京国子监祭酒，明年因病致仕，家居近十年，会国子监缺祭酒，部议重新起用，遂擢礼部右侍郎，管祭酒事，复于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致仕。谢氏两为国子师，严课程，杜请谒，增号舍，修堂室，为诸生所爱。正德五年(1510)卒，年七十六，赠礼部尚书，谥文肃。有《伊洛渊源续录》、《谢文肃公集》行世，修《赤城新志》，辑《赤城后集》。

复置起居注 明洪武间设起居注，后废。弘治十七年(1504)九月，太仆少卿储巏上言说：立史官以记言行。今皇上召见群臣，多系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闻，史官无从记录。岁月久远之后，传闻各异，无法弄清事情之本末。乞敕廷臣曾蒙召问者，备录呈览，宣付史馆。如此可使君臣之言论行动无所遗漏。孝宗依允。

张缙请浚河便漕 弘治十七年(1504)十月十五日，总督漕运右副都御史张缙奏陈：淮扬运河，雨水时则利舟，今秋干旱，深冬恐少雪，明年水涸梗漕。乞请先时浚治，闭清江口，修葺仁信等坝，蓄水以便明年漕运。事下所司施行。

秦纮致仕 秦纮(1426—1505)，字世缨，山东单县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南京御史，因弹劾宦官被谪湖广驿丞。天顺初迁雄县知县，改知府谷。成化初迁葭州(今陕西佳县)知州，擢巩昌(今甘肃陇西)知府，改西安知府，迁陕西右参议。成化十三年(1477)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改抚宣府。御鞑靼有功，进左佥都御史。未几召还理都察院事，迁户部右侍郎。后为万安所诬，降为广西右参政，进福建左布政使。弘治元年(1488)擢左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弘治二年进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奏罢中官武将之贪私者，得罪皇亲、安远侯柳景，被罢归。不数月起为南京户部尚书，弘治十一年引疾致仕。弘治十四年，因鞑靼扰边，重新起为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制三边军务，整顿边防，军威大振，并修筑诸边城堡一万四千余所，垣堑六千四百余里，又作"全胜车"以御敌。在边三年，经略有方。弘治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召还回京，十月二十六日致仕。弘治十八年九月卒，年八十，赠少保，谥襄毅。

小王子诸部人扰 自秦纮被召还致仕之后，镇巡官无统摄，备边松弛，弘治十八年(1505)正月初三日，小王子诸部围关州(今宁夏灵武)，入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又掠韦州(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北)。朝廷令户部侍郎顾佐往理陕西军饷，加强边备。同月十八日，小王子又陷宁夏清水营。孝宗得报说：清水营堡系西陲要害，寇直入其掠，边弛已极。宜加强守御。后小王子兵攻关不克，散掠内地。指挥仇钺邀其归路，与总兵官李祥击退。

孝宗赏金 弘治十八年(1505)正月十八日，部院大计天下。孝宗素重兵部尚书刘大夏、左都御史戴珊，召于便殿说：时当述职，诸大臣皆杜门不出，如二卿虽日见客何害！遂拿出白金，亲自授予说：少佐尔廉。且嘱咐道：不要廷谢，以免他人嫉忌。

孝宗诏谕群臣直言弊政 弘治十八年(1550)二月十二日，孝宗御奉天门，谕户、兵、工三部臣：方今生齿日繁，而户口军伍日就耗损，此皆官司抚恤无方，因仍苟且所致。其悉议弊政奏闻。户部尚书韩文等奏陈：耗损之故有二，有因灾伤敛重逼迫逃移的，有因惧充军匠诸役贿里长匿报的。若不加招抚之恩，严稽查之法，则逃逸者永无复业之望，匿报者则别无清理之术。如荆襄流民尤多，宜简命大臣一人往理，其他各行省，巡抚按等官招抚复业。若逃僻军匠等役，评首报改正，违者治罪。自后一年一稽考，仍令有司轻徭薄征，予以宽恤。孝宗说谕：我方图新政理，乐闻谠言。除祖宗成宪不可纷更，其余军民利弊，直言无讳。

李梦阳上言斥外戚 弘治末年，孝宗宠纵外戚。皇后之弟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侯张延龄骄纵犯法。弘治十八年(1505)三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言陈二病：一为元气之病，谓士气日衰；二为腹心之病，谓内官日横。三害：一为兵害，二为民害，三为庄场饥民之害。又陈六渐：一为匮乏之渐，二为盗之渐，三为坏名器之渐，四为驰法令之渐，五为方术蛊惑之渐，六为贵戚骄侈之渐。最后专斥外戚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势如翼虎。孝宗竟下李梦阳于锦衣卫狱。后以内阁大学士谢迁言其赤心报国，方得释。

核实荆襄流民户口 弘治十八年(1505)四月二十三日，宪宗命刑部侍郎何鉴前往荆襄地区抚辑流民。何鉴遍历河南、湖广、陕西交界处，核实荆襄流民二十三万五千余户、七十三万九千余口。

严禁伪钱 太常寺奏：铺户关领物价中有洪武等钱，市不通行，负累未便。孝宗令户部查究其故。户部奉命查究奏陈：本朝原铸洪武等通宝，民间久未行用，而贮于官库者颇多。宜因公用关友时，尽发内帑所积，使之流布，以便钱法通畅。孝宗说：既官库贮积甚多，须设法行用，其再议处所以禁私铸滥用之宜，并查弘治通宝在十二年(1499)所铸数目奏闻。户部再奏：禁私铸，发官帑，罪阻坏，请申明处置。惟是各处所铸弘治通宝，今所铸的才一至二分之二。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五日，孝宗说：洪武等钱行用，宜申禁约，敢有阻当及私铸并知情买使者，必严惩不贷。

明孝宗朱樘逝世 朱祐樘(1470—1505)，明宪宗朱见深的第三子。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初六日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弘治。在位共十八年(1488—1505)，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日卒，年三十六。即位之初尚能恭俭节制，勤于朝政，去奸佞之辈，用贤能之臣，史称“弘治中兴”。但不能始终如一，晚年设坛建醮，宠信李广，趋向骄奢淫佚之道。六月上尊谥敬皇帝，庙号孝宗。

朱厚照即皇帝位 朱厚照，孝宗朱祐樘长子，母皇后张氏，弘治五年(1492)三月定为皇太子。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即皇帝位，以次年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除弘治十六年以前连赋。八月尊皇太后为太皇庆后，皇后为皇太后。

小王子侵犯宣府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二十四日，小王子乘孝宗逝世之机，侵犯宣府，连营二十余里。总兵官张俊遣诸将李稽、白玉、张雄、王镇、穆荣，各率三千人分守要害。小王子兵偶从新开口毁垣入，李稽仓促迎战，白玉、张雄、王镇、穆荣各率军拒于虞台，张俊率三千人赴援，中途伤员，以兵属都指挥曹泰。曹泰进至鹿角山被围。张俊增调五千人，持三日粮，驰解曹泰之围。又分军救李稽、白玉，皆突围而出，惟张雄、穆荣阻于山涧，受困而死。诸军大溃，不得已张俊收军而还，小王子兵追击，张俊等且行且战，仅得入万全右卫城，军士死二千一百六十五人，失马六千五百余匹。张俊告急。朝廷先后派都指挥陈雄、张澄及都督李俊、神英各率京军前往。小王子兵大掠后退去。八月，又转掠大同。十月以数万骑犯固原。同年冬，小王子诸部入镇夷所。

平思恩州 思恩州(今广西桂平之西)与田州(今广西田阳)均为广西境内土官统治之地，从成化年间开始即有纠纷，历来不和。弘治十七年(1504)四月，思恩土官岑浚侵掠田州，死者不可胜数，田州土官岑猛幸免一死。兵部议调两广及湖广兵合击岑浚以平事端。弘治十八年六月，两广总督潘蕃率两广及湖广官军、土军十万八千余人，与总兵官毛锐、太监韦经分六路征讨思恩，败之，岑浚自杀。明军斩其军民四千七百九十人，俘数百人，将二州均改为流官统

治。

幼军解补开豁例的制定 弘治十八年(1505)六月初四日,定幼军解补开豁例:府军前卫逃亡幼军,审年末五十无疾者,仍解本役;若五十以上及疾故者,俱勾壮丁补伍;若役久未经逃者,老疾病故之日,即与开豁,仍三年一次验放。著之为令。

宽恤灶 弘治十八年(1505)六月三十日,巡按浙江御史邢昭奏请宽恤灶户:三丁以下,人免七十亩复其身,或丁多递减十亩,或无余田只免徭役。武宗朱厚照允准。

刘大夏上团营数额 弘治十八年(1505)七月初一日,兵部尚书刘大夏上团营实际数额:精锐六万零五百七十四人,分三哨,名领以把总。次选二万五千三百四十六人,汰二百八十三人。其三大营原额十五万四千二百八十七人,耗九万四千三百四十人。

章格逝世 章格(1426 一 2505),字韶凤,号戒庵,常熟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升刑部郎中,用法平恕。进广东副使,流球使臣贸易他国,被风飘至广州,守臣以海盗执之,格为辨奏,还其资而遣之。进云南按察使,安抚缅甸诸夷。升福建布政使,入为南京光禄寺卿,寻升大理寺卿,弘治九年(1496)致仕,弘治十八年七月初七日卒,年八十。居官近五十年,所至以清慎称。

刘健奏陈时弊 弘治十八年(1505)八月初四日,大学士刘健等奏陈时弊:六月以来,淫雨伤稼。陛下登极诏出。中外欢悦,但各有司视为泛常。如军器、鞍辔二局,各门各马房仓库,各分守守备等内臣,旧设有数,今添至几倍,岂可不减?内官等监匠、御用等监画士,多至数十百人,岂可不汰?内承运库放支,不立印簿,岂可不查?司钥库贮钱,若洪武等钱不行,则新铸妄为虚费,岂可不用?至如内苑禽兽不计其数,宜尽放出;旧宫人年老,或纵令宁家嫁遣。事干宫禁,则断在不疑,责在有司。则请严加催督。其未尽事宜,令查奏处置,务奏实效。武宗虽温旨诏答,而左右宦竖日恣,增益日益多。内府诸监局,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增数倍。

刘岌逝世 刘岌(? —1505),字凌云,四川涪州(今涪陵)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吏部验封主事,迁郎中。累官至太常卿、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为宪宗所宠,加太子少保。弘治二年(1489)致仕,十八年八月初六日卒。

强珍逝世 强珍(? —1505),字廷贵,沧州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泾县知县,擢御史,巡按辽东,奏巡抚陈钺之罪,汪直乃遣锦衣卫千户萧聚逮强珍至京,严刑拷打,谪戍辽东。汪直败后复官,后致仕。弘治初起为山东副使,擢大理少卿,再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改南京右通政,寻以母老致仕。弘治十八年(1505)八月十五日卒。

杨守阯致仕 杨守阯(1436—1512),字维立,号碧川,鄞县人。成化十四年弘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侍读、左春坊左谕德、侍读学士署院事,南京吏部右侍郎。弘治十五年(1502)至京,复留参纂《会典》,书成进左侍郎。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进吏部尚书致仕。正德七年八月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少保。有《碧川文选》、《浙之三会录》、《困学阒闻录》。

裁革武职冗官 弘治十八年(1505)九月初一日,兵部奉诏查武职冗食之应裁革者六百八十三人。有皇亲、保母、乳母、女户、恩荫、录用、勋卫、将军、通事、匠艺人等。其中全由传乞者,思劳相参者,自称功劳照例乞升乞恩改调者各若干人。因言其原有军功宜留应得品秩,乞调者宜还之原卫所。其余请全部裁革。

熊翀致仕 熊翀(? —1510),字腾霄,号止庵,河南光州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武进知县。历迁监察御史、山西按察副使。弘治六年(1493)迁右佥都史抚山东,进右副都御史改抚陕西。弘治十三年迁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弘治十七年十二月迁南京户部尚书,弘治十八年九月十二日致仕,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初十日卒。

金泽致仕 金泽(? 一 1513),字德润,南京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南京,迁员外郎、郎中。历任四川右参议、右参政、广东左右布政使。弘治八年(1495)设南赣巡抚,以右副都御史充任其事。弘治十二年升南京刑部右侍郎,再改南京兵部。弘治十八年五月升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同年九月十二日致仕。正德八年(1513)七月十四日卒。

徐源致仕 徐源(? —1515),字仲山,号淑园道人,长州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迁员外郎、郎中。出任广东参政,升浙江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弘治十三年(1500)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弘治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致仕。正德十年(1515)正月卒。为人修饬。与物无竞。致仕后,两被刘瑾诬陷,以至除名,后瑾伏诛,复官。

立三等薄核诸生 弘治十八年(1505)十月初三日,礼部覆祠祭司主事彭缙请令天下提学官严督各学提调正官考访在学生员,列为三等,以学行兼茂者为上,学不逮行者次之,若行不逮学或有行而无学者居下,记于公薄,每遇岁考,参据以为进退。孝宗准奏。

樊莹致仕 樊莹(1434—1508),字廷璧,浙江

常山人，天顺末年进士，有病归里。后授行人，成化八年(1472)擢御史，出知松江府，能体百姓之苦。弘治初擢河南按察使，安抚黄河灾民，清除田赋积弊。迁应天府尹。弘治七年(1494)迁南京工部右侍郎，寻改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未几以病致仕，家居七年，以中外交荐起原官抚治郧阳，寻改南京刑部右侍郎。弘治十六年，出视云贵，罢免文武不职者一千七百余人。进南京刑部尚书。弘治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仕，犹为刘瑾所诬。正德三年(1508)十一月卒，年七十五。刘瑾败后，赠太子少保，谥清简。

夏英进《莅祚典要》　福建邵武知府夏英，以本朝祖宗及左帝王继体守文，慎初务学等纂集成书，名《莅祚典要》于弘治十八年(1505)十一月二十五日进呈。武宗诏留备览。

敕修《孝宗实录》　弘治十八年(1505)十二月初七日，武宗朱厚照敕修《孝宗实录》，命英国公张懋为监修官，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为总裁官，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张元祯、吏部左侍郎焦芳、右侍郎王鏊、礼部左侍郎李杰为副总裁官，少詹事兼学士刘机等为纂修官。不久，刘健、谢迁致仕。再命大学士李东阳、焦芳、王鏊等为总裁官，吏部尚书梁储为副总裁，翰林院侍讲毛纪、傅珪、丰熙、沈涛、吴一鹏，侍读朱希周，编修汪俊、李廷相、李时、温仁和、何堂等同为纂修官。至正德四年(1509)四月十一日书成表进，共二百二十四卷。预修官升赏有差。

戴珊逝世　戴珊(1437—1505)，字廷珍，号松厓，江西浮梁(今景德镇北)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御史，督南畿学政。成化十四年(1478)迁陕西副使，仍督学政。历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皆谦介有声。弘治二年(1489)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郧阳(今湖北郧县)。升刑部左、右侍郎，进南京刑部尚书。弘治十三年召为左都御史，为孝宗宠爱。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九，赠太子太保，谥恭简。

陆昆奏陈奖直言等事宜　弘治十八年(1505)十二月二十五日，南京监察御史陆昆奏陈八事：奖直言以警循默(课科道疏多寡行殿最)，复面劾以折奸邪，明淑慝以别人才，严行纠察以励庶官，稽诰命以防欺蔽，惩沮坏以养锐气，均差转以消偏重，专委任以精考核。武宗以其言之有理。

刘健奏裁郊祀内侍数额　正德元年(1506)正月二十四日，大学士刘健等奏陈：郊祀驾出，从阉过多。今祭太社、耕籍田、幸太学在即，守卫填拥，若增添内侍，置之何处？请敕司礼监视正统以前旧制定额。又常朝从阉渐增，内府各监局佥书官，或七八十人，或百数十人。光禄寺使办日加，承运库赏赐匠役不知几何？蟒玉乘马不计其数。皇上春秋鼎盛，此后何以处之！望特施睿断，尽行裁革。武宗朱厚照嘉纳其言。

魏绅逝世　魏绅(？—1506)，字廷珮，山东曲阜人。成化十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广西有冒外戚者，事觉被逮，皆避不敢讯问，魏绅一审而得其假冒情状。迁大理丞，弘治十一年(1497)二月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改抚应天，迁右副都御史。弘治十八年七月召回任刑部右侍郎。正德元年(1506)正月二十七日卒于官。

杨一清请修边墙　正德元年(1506)正月，总制陕西等处军务左副都御史杨一清奏请修筑边墙。他说：陕西各边，延绥据险，宁夏、甘肃扼河山。惟花马池至灵州，地域宽延，城堡复疏，寇毁墙入，则固原、庆阳、平凉、巩昌皆受患。成化初宁夏巡抚徐廷璋筑边墙，绵延二百余里；在延绥，余子俊修边墙坚固，因此，寇不入河套地区二十余年。后边备日弛，墙堑日夷，弘治末年，寇连侵略，以至于今。秦竑仅伪四五小堡及靖虏至环庆治堑七百里，不足捍敌。臣久官陕西，颇悉形势。寇动称数万，往来倏忽，未至征兵多扰费，既至召援辄后时，欲战则彼不来，久持则我师坐老。臣以为防边之策，大要有四：修浚墙堑以固边防，增设卫可以壮边兵，经理灵夏以安内附，整饰韦州以遏外侵。今河套据三面之险，当千里之蔽。国初舍河套而卫东胜，已失一面险；其后又辍东胜以就延绥，则以一面而遮千里之冲；遂使河套沃壤，为寇巢穴，深山大河，势乃在彼。而宁夏外险，及南备河，此边患所以相寻而不可解。诚宜扼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而属宁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屯田数百万亩，省内地转输，方为上策；如或不能，及今增筑防边，敌来存御，犹愈无策。武宗允准一清所议，大发帑金数十万，使一清筑墙。不久，因刘瑾构陷，一清所筑边墙仅成四十里之地而止。

林元甫致仕　林元甫(1445—1508)，初名普长，字元甫，以字行，更字秉仁，号豫斋，福建莆田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授工科给事中，言事忤旨，调外任，后复迁都给事中，出任山东参政。弘治十四年(1501)，由陕西左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改贵州、云南。正德元年(1506)二月初一日以疾致仕，正德三年三月初九日卒，年六十四。

王璟等请革皇庄　朱厚照即位之后，太监夏绶乞于重定诸府岁加苇场税，少监傅琢请履亩核静海、永清、隆平诸县田，太监张峻欲税宁晋、小河往来客货，全部允准。又以庄田之故，遣缇骑逮百姓鲁堂等二百余人，畿南骚动。巡抚保定佥都御史王璟于正德元年(1506)二月初五日抗疏切谏，请革皇庄。他

说:此千百顷琐琐之利,恐不是以孝养两宫,宜全部革除,通给小民领种粮。武宗令有司再议。户部尚书韩文等覆奏:畿民宜加存恤,若谓庄田以奉两宫,不可给散小民,则宜移文巡抚官核实,召人佃种,亩征银三分,解部输内库进用。其管庄内官,仍悉召还,以使地方免侵渔之苦。武宗说:你们为国为民,忠心可嘉。但我奉顺慈闱,事非得已。管庄各留内官一人、校尉十人,其余全部占还。子粒如拟征银,不许分毫多取。如有仍前生事为害,令御史具实奏报。大学士刘健等再奏:皇庄既然进奉两宫,自宜委于有司,不当仍主于私人,反失朝廷尊亲之意。同时极言内臣管庄扰民之害。武宗仍执迷不悟。

刘健奏请武宗勤政 正德元年(1506)二月二十三日,大学士刘健奏陈:皇上即位之初,天下引领太平,而朝令夕改,迄无宁日,百官庶府,仿效成风。非惟废格不行,抑且变易殆尽。建白的以为多言,干职的以为生事;累章执奏,则称再扰;查革弊政,则称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君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臣等位处重地,徒拥虚衔。或旨从中出,略不预报;或有所拟议,径行改易。臣等心知不可,义所当言,累有论列,多不见允。苦沥愚诚,乞特允退。武宗无奈,仅只报闻而已。

周玺谏阻武宗观游 正德元年(1506)二月二十九日,礼科都给事中周玺等谏言:陛下即位以来,今日饲鹰,明日饲犬,如是不已,则酒色游观,便佞邪僻。凡可以役耳目、变心志之事,无所不涉,日甚一日,何止于鹰、犬!光禄寺九月内添席七十有奇,增费五千余金,兵荒财匮,将何取办。愿修身养德,放鹰犬,止浮办,节国家之财。礼部等覆奏,武宗虽以为言之有理,但终不能改。

张懋等谏阻武宗微行 武宗朱厚照不理朝政,而颇好微行。正德元年(1506)四月初四日,五府、六部等衙门以英国公张懋为首合词上疏: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忧勤而兴、骄佚而败的。太祖高皇帝百战而得天下,深惧后世溺于宴安,故作《皇明祖训》,首谓"守成之君当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归心,则能承受天眷。若生怠慢,祸必加焉。"贻谋之远,盖与古人异世而同符。近来忽闻陛下宴闲之际,留心骑射,群小杂沓,径出掖门,游观苑囿,纵情逸乐。卫生之害,积于细微;衔橛之危,起于所忽,不可不慎。仰惟天纵圣明,初无此心。必左右近侍引入非道,陛下不察而误蹈。臣等实为寒心。况去岁以来,灾异迭见,若再从事迭乐,何以感动天心!疏入,武宗嘉纳。

马文升致仕 马文升(1426—1510),字负图,号三峰居士,河南钧州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监察御史,历按山西、湖广,风裁甚著。天顺中,迁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陈时政十五事及御边之策。不久,奉命节制三边军务。以忤汪直,被谪重庆。后复官历任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加少师兼太子太师,正德元年(1506)四月初八日致仕。正德五年六月初八日月卒,年八十五。赠太傅兼太子太傅,谥端肃。正德十六年七月加赠左柱国、太师。文升有文武才,长于应变,朝端有大议,往往待之决。功在边镇,外国皆闻其名。有《马端肃奏议》、《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兴后哈密国王记》等。

王轼致仕 王轼(1439—1506),字用敬,公安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历四川按察副使、按察使,南京右佥都御史,迁右副都御史督理粮储,改抚贵州。后还任大理寺卿。凡法司送审罪牍,躬自检勘,多所参驳。再迁南京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正德元年(1506)四月十一日,加太子太保致仕。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八。赠少保,谥襄简。有《平蛮录》。

杨时畅逝世 杨时畅(1446—1506),字知休,陕西咸宁人。成化十四(147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弘治初预修《宪宗实录》,升修撰,充经筵讲官,改右赞善、左谕德、侍讲学士,终官太常寺少卿兼侍讲学士。美风仪、善谈论,有干济才,且以孝友闻名。正德元年(1506))四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一。

王俨致仕 王俨,生卒年不详,字民望,号畏斋,华容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历成都知府,治行为天下第一。擢陕西右布政使。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弘治十三年(1500)七月迁户部右侍郎。弘治十五年六月进左侍郎,核外戚侵民官地数万顷,奏戍其监奴于边。正德元年(1506)五月初三日致仕。后以刘瑾诬陷逮捕入狱,谪戍辽东。刘瑾伏诛,赦还而卒。

李孟旸致仕 李孟旸(1432—1509),字时雍,号南冈,河南睢州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授户科给事中,迁都给事中。历任湖广左参政、广西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擢左副都御史。弘治十一年(1498)十月迁户部右侍郎理部事。弘治十三年七月迁左侍郎。弘治十五年六月再升南京工部尚书。正德元年(1506)五月初五日致仕,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八。有《南冈吟稿》。

刘大夏致仕 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号东山,华容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兵部主事,迁郎中,明习兵事。弘治间治水张秋,事竣移疾归,筑草堂东山下,读书其中,时称东山先生。荐任福建右参政,巡视海道。迁广西右布政使,进浙江左布政使,升右副都御史治运河,以左副都御史理院事。历户部

左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理宣大兵饷，奏减价宽民。后又以右都御史总两广军务兼巡抚，旌贤才，斥贪秽，裁冗费，更役法，裁革不便。弘治十四年(1501)十月召回任兵部尚书，兼理团营。正德元年(1506)五月十七日加太子太保致仕。正德二年十月以事坐戍肃州。正德五年十月以原官致仕，正德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卒，年八十一，赠太保，谥忠宣。有《东山诗集》、《刘忠宣公集》。

仓库空虚可虑 总督仓储户部侍郎陈清、兵科给事中徐忱曾上疏指出仓储空虚可虑。疏下户部会各官集议。正德元年(1506)五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韩文会英国公张懋等议：京库银两，岁入一百四十九万两有奇，以岁用而言，给边折俸及内府成造宝册之类为一百万两，余皆贮之太仓以备饷边急用，因此太仓之积，多或至四百万，少者亦有一半。近年所入，以积欠蠲除，亏于原额，而所出乃过于常数。盖一岁之用已至五百余万两。今海内虚耗，兵荒相仍，以有限之财供无穷之费，若不痛惩侈靡，务为减省，岂能转啬为丰，以济一时之急！因条具经制八事：崇节俭，裁冗食，节冗费，赃罚解部，处置盐法，清查积朽，钱钞折银，清厘草场。武宗诏令所司详究近年支用日渐增加多至数倍之由，及运送各边银两已用未用之数，并有可行长策，议处以闻。七月初二日，武宗从礼部之请，减光禄寺供奉。

朝臣建言时政 正德元年(1506)六月初十日，大学士刘健等奏陈时政：近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奢靡无度，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杀生害物，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弓矢甲胄，不可施于宫禁。望惕然省悟，励精图治，庶可弭灾导和。言官亦各言灾变，谱劾太监丘聚、魏彬、马永成等。吏部主事孙磐应诏上言：今日庶政之弊，莫甚于内臣典兵。今镇守、分守、监枪诸内臣，诛求百计，役占健卒。或抑买弦缨，或扣减马料，或猎伤战马，或私夺耕牛，恶少聚敛，武职夤缘，遇警辄驱羸卒应付，因此不能决胜。及有微功，虚张捷报。更有甚者，迹未离京师，名已登于奏牍。殁者衔冤，创者抱痛。如此兵威岂能复振？乞请尽撤沿边内臣。武宗不理。

八党窃权朝政日非 刘瑾八党窃权，朝政日非，南京御史陆昆偕同官于正德元年(1506)七月上疏极谏：自古宦竖欲擅主权，必先蛊其心志。如秦之赵高等。陛下即位以来，宠信阉寺，颠复典刑。太监马永成、魏彬、刘汉、傅兴、罗祥、谷大用辈，共为蒙蔽，日事宴游，上干天和，灾祲数告，廷臣屡谏，未蒙省纳。若辈必谓宫中行乐、何关治乱，此正奸人蒙君故术。陛下广殿细旃，岂知小民穷檐蓽屋风雨不庇？锦衣玉食，岂知小民祁寒暑雨冻馁不堪！驰骋宴乐，岂知小民疾首蹙额赴诉无路！近来夏秋亢旱，江南米价翔贵，京城盗贼横行，可纵情恣欲，不一顾念吗？伏望侧身修行，贼永成辈以绝乱源，委任大臣，务学亲政以还至治。疏上，武宗仍不省。

大婚靡费 武宗即位以来，山陵、大婚及赏赍需银一百八十万两有奇，部帑不给。请先拨承运库，武宗下诏不许。户部尚书韩文又请：赏赍自京边军士外，请分别给银钞，稍益以内库及内府钱，并暂借勋戚赐庄田税，而敕承运库内官，核所积金银著之籍，且请罢诸不急之费。武宗又不欲发内帑，令韩文以渐经划。正德元年(1506)七月，司礼监传旨：以大婚礼需银四十万两，韩文以户库空虚，请先发十万两，并上疏奏陈：海内虚耗，加以水旱频仍，边储缺乏。皇上初服，宜慎俭德、怀永图。礼有定制，非臣下所敢轻议，然百凡赏赍，必酌时宜，从省约，庶几以身示朴，由进及远而财用以充。武宗下诏，减原数四分之一。

武宗怠政 正德元年(1506)八月二十四日，大学士刘健等言：近两月以来，视朝太晚，或至日高数丈，侍卫执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纵横坐卧，弃杖满地。四方朝见官吏，外国朝贡使臣，疲于久候，非但精神困倦，抑且废时误事。而早朝乃人君首务，天下观瞻，于此为系。况当天变民穷之日，恐惧修省，犹恐不及，若君怠于上，臣荒于下，太平之治，何以能成！臣等叨膺重寄，忧切于中，诚恐圣心别有所系，防误不小，故敢冒死上陈。武宗只说：知道了。不久，刘健又以灾异上言：人君所畏，惟天惟祖宗。皇上纪元之初，天变迭见，所以仁爱警戒者至关。祖宗之制，每日早起，祝天拜庙，然后视朝。遇节日忌辰，因事祭告，必亲自行礼，近来每遣亲王代行，似于尊敬祖宗之义有所未尽。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中世虽以日易月，亦止行于宫中。今先帝大丧，小祥未久，虽大婚事重，吉礼告成，而思慕之诚自不能已。向尝屏去鹰犬，停止骑射，大小臣民，莫不饮为圣德。近者传闻有群小引诱，造成玩器。深夜之际，广为游乐，万一有之，似于谅阁之礼有所未合。前代之典，凡遇天变，必减膳撤乐，今当修省之时而为怠荒之事，似于敬天之义未安。况视朝日迟，午奏多至日暮，诚恐起居无常，寝膳失节，以致耗费精神，妨误政事。伏望敬天勤民，节财省役，进贤去佞，赏功罚罪，以使民心可慰而天意可四。武宗得疏，只是说：你们所言，皆为忧国忧民之事，我当从而施行。可是由于宦竖锢蔽日深，终不能改。

欧信逝世 欧信(？—1506)，字孚先，蓟州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吏部郎

中。出任湖广参政、河南右布政使、山东左布政使，具有政绩。正德元年(1506)初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选将练兵，综理屯牧，兴利除弊，同年九月十四日卒于官。

廷臣弹劾 甚时太监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日导武宗狮游，禁中习武，鼓噪不绝于耳。户部尚书韩文既忧且愤。郎中李梦阳等劝韩文弹劾。于是，正德元年(1506)十月，韩文等叩阁门倡九卿入奏，弹劾刘瑾。奏陈：近朝政日非，秋来御朝渐晚，仰观圣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监刘瑾等八虎置造巧伪，淫荡上心，毬马鹰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遂使天道失序。皆因刘瑾等惟知蛊惑君上，便己行私，而不知昊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此辈，何补于事。今刘瑾、马永成等罪恶昭彰，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疏入，武宗惊泣不食，便遣司礼中官李荣、王岳等入阁议，一日三反，计议将刘瑾等安置南京。大学士谢迁以为处之未尽，应借机诛之。刘健亦觉当该诛死。王岳说阁议为是，即以刘健、谢迁之言回告武宗。武宗尚欲少宽时日。刘健约韩文及诸九卿伏阙面争，王岳从中策应，使武宗同意诛杀刘瑾等。而焦芳驰告刘瑾，刘瑾便率马永成等趁夜环跪武宗面前泣哭，以首触地说：司礼监王岳陷害我辈。武宗详问其因，刘瑾借机诬陷说：王岳结阁臣欲制陛下出入，所以先致我辈于死地。武宗大怒，命逮捕王岳，擢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掌东、西厂。各分据要地。第二天，诸臣入朝，知事已中变。刘健、谢迁等上章乞休，而令焦芳入阁。王岳充南京净军，刘瑾遣人追杀于途。于是中外大权全部归于刘瑾。

刘健致仕 刘健(1433—1526)，字希贤，号晦庵，河南洛阳人。天顺四年(1460)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累迁少詹事。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迁礼部右侍郎兼学士入阁。弘治四年(1491)八月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弘治十二年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代徐溥为内阁首辅。学问深粹，以身任天下之重，屡陈时政，皆被采纳。正德元年(1506)十月，弹刻刘瑾，武宗不理，遂致仕归里，刘瑾为图报复，矫旨削刘健为民。刘瑾伏诛而复官致仕，嘉靖五年(1526)十一月初六日卒，年九十四，赠太师，谥文靖。有《晦庵集》。

谢迁致仕 谢迁(1449—1531)，字于乔，号木斋，浙江余姚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弘治八年(1495)二月，以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入内阁，累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秉节直亮，与刘健、李东阳同心辅政，而见事尤敏，被称贤相。正德元年(1506)十月，奏请诛刘瑾，武宗不纳，遂乞休致仕归里。嘉靖中，世宗手敕促起，入相数月，仍以老辞归。嘉靖十年(1531)卒，年八十三。赠太傅，谥文正。有《归田稿》。

秦民悦致仕 秦民悦(1434—1512)，字崇化，舒城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行人，迁工部员外郎，出任广平知府。再迁江西右参政、右布政使。弘治四年(1471)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乞减庄田租税，以纾民困。后任户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弘治十二年迁南京吏部尚书。次年改南京兵部尚书，弘治十八年又任南京户部尚书。以星变陈时政，多有采纳。正德元年(1506)十一月十六日致仕，正德七年三月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少傅，谥庄简。

韩文致仕 韩文(1441—1526)，字贯道，号质庵，山西洪桐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工科给事中，遇事敢言。出任湖广参议，累官都御史、侍郎、南京兵部尚书。弘治十七年(1504)十一月召为户部尚书，弘治时时入见，上疏请革盐法七弊，其言尽行。正德元年(1506)十月，弹劾刘瑾八党，率大臣极谏，武宗不纳，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刘瑾报复，矫诏罢其官，又矫诏逮捕入诏狱，坐罪罚米输边三千石，刘瑾被诛，复官致仕。世宗即位，加太子太保。嘉靖五年(1526)二月十五日卒，年八十六。赠太傅，谥忠定。有《忠定集》。

张元祯逝世 张元祯(1437—1506)，字廷祥，号东白，江西南昌人。天顺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预修《英宗实录》，与执政意不合，引疾归里，居家讲求性命之学，至二十余年。弘治初，预修《宪宗实录》，迁左赞善，上疏劝行王道，迁南京侍讲学士，后召任詹事。武宗即位，进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正德元年(1506)十二月三十日卒，年七十一，谥文恪。有《东白集》。

张敷华致仕 张敷华(1439—1508)，字公实，号介庵，江西安福人。景泰初以荫入国子监，天顺八年进士，选庶吉士，与林瀚、林俊、章懋称南都四君子。授兵部主事，迁郎中，出任浙江右参议、右参政、右布政使。弘治初擢湖广左布政使。再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改抚陕西、后任南京兵总右侍郎，进右都御史部督漕运兼抚凤阳等处。权贵干请，悉拒不纳，改理南京都察院事，迁南京兵部尚书。正德元年(1506)正月后回京师任左都御史。同年十二月以救韩文忤刘瑾，被令致仕。正德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卒，

年七十。赠太子少保,谥简肃。有《介轩集》。

杨守随致仕 杨守随(1435—1519),字维贞,号贞庵,又号文湖,鄞县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监察御史,巡按江西,所至以风采见惮。升任应天府丞。弘治九年(1496)由南京右佥都御史,迁南京大理寺卿。弘治十三年七月改京师大理寺卿。弘治十八年十二月迁工部尚书仍理大理寺事。遇事持法不挠。正德元年(1506)十二月,以救户部尚书韩文忤刘瑾,被令致仕,后又被捕入狱,罚米千石。刘瑾伏诛,复官仍致仕。正德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少保,谥康简。

刘瑾用事 正德二年(1507)正月,刘瑾等排挤刘健、谢迁、韩文等之后,欲全揽大权,便日构杂艺,供武宗玩弄,趁机取各司奏章奏请裁决。武宗说:我用你们是干什么的,以此一一烦我。于是刘瑾不再复奏,事无大小,任意剖断,传旨施行。武宗多有不知。一月之间,中官传旨,几无虚日。

曾鉴致仕 曾鉴(1434—1507),字克明,桂阳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工部,迁郎中。成化末迁右通政。弘治中任太仆寺卿、工部左侍郎。弘治十三年(1500)迁工部尚书。正德元年(1506)十月,曾鉴与韩文等弹劾刘瑾,武宗不纳,诸大臣留用的,皆附顺避祸,惟曾鉴独守故操。正德二年闰正月初八日进荣禄大夫致仕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

张升致仕 张升(1442—1517),字启昭,号梢岩,江西南昌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迁左赞善,充东宫讲读官,升右谕德。孝宗即位,进左庶子兼侍读。改迁南京工部员外郎。不久,迁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弘治十五年(1502)由礼部左侍郎迁任礼部尚书。遇灾异辄进直言。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十七日进太子太保致仕。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太傅,谥文僖。有《板岩诗文集》。

闵珪致仕 闵珪(1430—1511),字朝英,浙江乌程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监察御史,迁江西按察副使,改广东按察使。成化末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弘治四年(1491)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弘治八年进南京刑部尚书,次年后任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弘治十三年五月进刑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侃侃持正,为时名臣。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十九日加少保致仕。正德六年十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二。赠太保,谥庄懿。有《闵庄懿集》。

朱钦致仕 朱钦(1444—1520),字懋恭,福建邵武人。成化八年进士,授宁波推官,以政绩卓著擢监察御史,出督漕运,按河南,军广西,并著风节。历任山东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湖广左布政使。武宗即位,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以民性酗酒,下令禁酿。正德元年(1506)末,弹劾刘瑾道杀王岳。刘瑾报复,正德二年三月初七日矫诏勒令致仕,后夺其职。刘瑾伏诛,复官仍致仕。正德十五年四月卒,年七十七。

南京添置左侍郎 根据旧制,南京六部只设右侍郎一员。正德二年(1507)三月十六日,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杨廷和、翰林学士刘忠经筵直讲,讲毕,遂讽谏武宗远奸佞,指斥刘瑾。武宗退与刘瑾说:经筵讲书,怎么又添出许多话来。刘瑾便奏:此二人可令去南京。于是令杨廷和任南京吏部左侍郎,刘忠为南京礼部左侍郎。此为南京添置左侍郎之始。外似升迁,实则系刘瑾排挤,使之远离皇帝。

刘瑾榜示"奸党" 刘瑾对刘健、谢迁等怀恨不已,又惧其臣僚支持,遂于正德二年(1507)三月二十八日,矫诏次第论列大学士刘健、谢迁及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检讨刘瑞,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昻、陶谐、刘蒞、艾洪、吕仲、任惠、李光瀚、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士贤,御史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闵、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诰、陆昆、张鸣凤、肖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佑、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卓、朱廷声、刘玉等凡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并传群臣跪于金水桥南,刘瑾以敕授鸿胪宣戒。并因谢迁之故,不许其家乡余姚人做京官。又令六科宣入再出,使其不得休息,借以虐害科道官。

蒋钦弹劾刘瑾 刘瑾胡作非为,引起中外大臣僚属愤怒,弹劾刘瑾的章奏不绝。南京御史蒋钦正德二年(1507)三月所上奏疏尤为激烈,他说:刘瑾是一小人,陛下视为腹心股肱,不知其为悖逆之徒蠹国之贼。臣等待命衽席,目击时弊,有不忍不言之事。昨刘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多者有五千金。若不如数纳贿,即行贬斥;纳贿则立即迁擢。通国为之寒心,陛下置之左右,是不左右知有贼而以贼为腹心。刘瑾传旨禁诸言官无得妄生议论,不言则失于坐视,言之则虐以非法。通国皆寒心,而陛下独用之前后,是不知前后有贼而以贼为耳目股肱。一贼弄权,万人失望。陛下懵然不闻,纵之使坏天下事,乱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乞听臣言,亟诛刘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刘瑾。使朝廷以正,万邪不得入;君心一正,万欲不能侵,系臣之所愿。疏上,被廷杖入诏狱。过了三天,蒋钦又上疏说:臣与贼刘瑾,势不两立。刘瑾畜

恶已非一朝，乘间铲清，乃其本志。陛下日与嬉游，茫不知悟，内外臣庶，懔如冰渊。陛下覆国丧家之祸，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之事。陛下真若心杀刘瑾，枭之午门，使天下知臣蒋钦有敢谏之直，陛下有诛贼之明；陛下不杀刘瑾，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再被杖三十，三日后竟死于狱中。

镇守太监扩权 刘瑾欲广布私人，以分擅天下之权，正德二年(1507)三月，矫旨令镇守太监，全部如巡抚、都御史之制，干预地方刑名政事。并命内阁撰敕给与。

闫仲宇致仕 闫仲宇(1441—1512)，字参甫，号恒斋，陕西陇州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弘治初以按察副使备兵临清，迁浙江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再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进左副都御史督理宣大边储，后还任兵部左右侍郎。正德元年(1506)进兵部尚书，奉命提督团营。正德二年四月十四日加太子太保致仕。正德七年八月十二日卒，年七十二。

叶赞致仕 叶赞(？—1512)，字崇礼，淮安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鞫谳明慎，人称不冤。出迁嘉兴知府，改台州、广信。任四川参议、江西左、右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藩府馈赠，谢绝不纳，总粮储，严出纳，清宿弊，继者多遵其法。转南京工部右侍郎。改刑部，进左侍郎。正德二年(1507)四月十八日致仕。正德七年六月十八日卒。

刘瑾行"红本"、"白本" 刘瑾权倾中外，公侯勋戚，莫敢钧礼。诸司科道官以下，私谒其门相率跪拜。中外章奏皆自行批答。因其不学，即将章奏带回私邸，与妹婿孙聪及松江市侩张文冕等相参决，词极鄙冗，焦芳加以润色。凡内外所进章奏，先具红揭投刘瑾，称作"红本"；然后上通政司，称作"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正德二年(1507)四月末都察院奏谳误名瑾，刘瑾大怒，严加斥责。左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谢罪跪阶下，刘瑾大发淫威，而诸御史以头触地，不敢仰视。

吕𢡟致仕 吕𢡟(1449—1511)，字秉子，嘉兴人。以国子生授中书舍人。成化初官吏部郎中，好学能文、谙于掌故，以荐进太仆少卿，累官至南京太常寺卿。正德二年(1507)五月十九日致仕。正德七年卒，年六十三。曾辑典故因革若干卷。

汪舜民逝世 汪舜民(？—1507)，字从仁，婺源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行人，擢河南道御史，出按陕西、甘肃等处，多所举刺。出任东莞知县，迁江西按察佥事，详谳明允，剖决如流。擢云南按察副使，后任福建按察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郧阳。升南京左副都御史，有才略，矫以风节自励。正德二年(1507)五月十四日卒于官。

汤全致仕 汤全(？—1520)，字完之，松江人。成化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断狱明允。迁贵州按察副使，升湖广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贵州左布政使。正德元年(1506)七月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正德二年七月初三日致仕。正德十五年二月卒。

《历代通鉴纂要》编成 正德二年(1507)六月二十五日，《历代通　纂要》编成，大学士李东阳等进呈。后司礼监官即至内阁传示圣意，令刊刻板本。中官督刊刻者检其中有一二纸装潢颠倒。再次至内阁，目的在于令阁臣更定其序。其时，李东阳不在阁，只有焦芳、王鏊在。焦芳以为总裁是东阳，非已之责，即怠慢中官。中官告于刘瑾，刘瑾本想寻隙裁抑儒臣，便借机检书中字划浓淡不均及微有差讹等百余处，罗织为罪名。于七月初二日矫旨处罚誊写官二十余人。刘瑾专横，可见一斑。

纳银授官之例 正德二年(1507)八月初八日，工部以接济工程，奏陈开纳粟授官之例，请令阴阳、僧道、医官有缺，许其生徒及仕宦子孙、农民纳限送部，免考授官，其等有四。军民客商人等纳银，许授七品以下散官，荣其终身，仍免杂徭，其等有三。民间子弟纳银，许授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诸司承差、知印吏役，其等有八。武宗皆从其请。此虽为权宜之计，但以前的纳粟输边之例无此冗滥。

营造豹房 武宗朱厚照喜游乐。其初，令内官仿设市肆，身穿估人衣与贸易，持簿握筹喧腾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拥至廊下家(即中官于永巷所开设的酒肆)，坐当垆妇于其中，待武宗至，杂而出迎，牵衣蜂拥而入。酒醉即宿其处。由于武宗被群阉蛊惑，于正德二年(1507)八月十五日令于西华门别构院宅，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命名"豹房"。武宗朝夕处其中，称之为"新宅"，日召教坊乐工妇女入新宅承意，乐工以承应不及，又请取河南诸府乐户精技业者日遣送入京，教坊人至者以百计，群小见幸趋承自便，武宗终日于豹房寻欢作乐。不再入大内。正德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武宗又令增建豹房，工部上言：豹房之建，至今五年，所费白金二十四万余两。今又增修房屋二百余间，国乏民贫，何以为继？乞即停止或量减其半。武宗不听，仍继续增建。

李杰致仕 李杰(1443—1517)，字世贤，号石城雪樵，常熟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升侍读学士。历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尚

书。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改礼部尚书。以事忤刘瑾,于正德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致仕,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卒,年七十五。赠太子太保,谥文安。

王华致仕 王华(1446—1522),字德辉,号实庵,晚号海日翁,曾读书龙泉山中,学者又称龙泉先生。浙江余姚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进谕德充经筵日讲官,选侍东宫讲读,迁翰林院学士、少詹事,教习庶吉士,预修《历代通鉴纂要》,再擢礼部左右侍郎。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迁南京吏部尚书,同年九月二十一日,以忤刘瑾乞休致仕。嘉靖元年(1522)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七。赠新建伯。

张鼐入狱 张鼐(?—1510),字用和,山东历城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授襄阳知县,擢监察御史。谪郴州判官。弘治三年(1490)迁河南按察佥事,历按察副使、参议。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改宣府。后回升右副都御史署院事。正德二年(1507)八月初八日迁南京右都御史。十月十四日,以忤刘瑾被逮入狱,后罚米二千石输边,三年后方输完,于正德四年五月令回籍为民。刘瑾伏诛,诏复其官,而张鼐已于五年八月三十日卒。

冒政下狱 冒政(?—1519),字有恒,泰州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弘治三年(1490)迁武昌知府,守正秉公,多所兴革。不久即迁山东左参政。正德元年(1506)升江西右布政使。次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同年十月十四日,以忤刘瑾,被逮下狱,罚米三千余石输边,累岁输完,削职为民。刘瑾伏诛,复职致仕。十四年二月卒。

艾璞下狱 艾璞(1450—1512),字德润,号东湖,江西南昌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历升通政司右通政、光禄寺卿。弘治十八年(1505)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等处。正德二年(1507)以裁革后还。巡抚时,遇勘功臣庄田,忤刘瑾,遂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被捕下狱,谪戍海南。刘瑾伏诛,赦还复职致仕。正德七年卒。年六十三。

开浙江福建四川银矿 正德二年(1507)十二月二十三日,武宗朱厚照以库帑所入,不敷国用,令各镇、巡官查照先年年例开矿采办,时中官秦文等赂刘瑾,复兴此役,浙江守臣言矿脉已绝,乃令岁进银二万两,刘瑾诛后才予停止。

高铨致仕 高铨(?—1510),字宗选,号平山,晚更号遗安老人,江都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历山东、浙江、河南按察佥事,迁河南按察使。弘治八年(1495)升左布政使。次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弘治十三年召任南京工部右侍郎,迁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德元年(1506)擢南京户部尚书。以忤刘瑾,于正德二年致仕。正德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九。赠太子少保。有《平山稿》、《遗安稿》。

戊辰大计 正德三年(1508)正月,考察外官。因此年为戊辰年,又称戊辰大计。因刘瑾招权纳贿,致使不阿附行贿官员,纷纷被贬被削。翰林学士刘俨家富,刘瑾求金,诱以美官,刘俨严正拒绝。被刘瑾加以"帷幄不修",勒令致仕。御史杨南金正直、清高,刘瑾党羽左都御史刘宇恶其不阿附,鞭笞折辱。南金愤而以疾告归。刘宇即向刘瑾进馋言,被贬为民。如此颠倒是非,中外骇异。

屠勋致仕 屠勋(1446—1516),字元勋,号东湖,浙江平湖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历员外郎、郎中,疑狱或事关权贵,均剖决无滞。迁南京大理寺丞,后任大理寺左少卿,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整饬边备,政绩卓著。后还迁刑部左右侍郎,弘治十五年(1502)六月任左副都御史理院事。九月再改刑部左侍郎。弘治十八年九月据右都御史。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迁刑部尚书。三年二月初八日加太子太保致仕。正德十一年十月初四日卒,年七十一。赠太保,谥康僖。

焦芳变科举授官之制 根据旧制,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选庶吉士,三年学成,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正德三年(1508)三月十五日策贡士,得邵锐等三百四十九人,赐景旸、戴大宾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其时,焦芳子黄中亦科举,素无学行,而焦芳想将其列为一甲。李东阳、王鏊以焦芳之故将黄中列为二甲之首。焦芳仍不高兴,便告知刘瑾,遂以内批授黄中翰林检讨。遂使科举授官之制大变。

边储不济 户部曾请如年例输银分给诸边。武宗说:军屯民运,边有成规,若再输银为何:且开中引盐,恐有盗取浪费之弊。令廷臣再议。于是,户部于正德三年(1508)四月初七日集议奏陈:各边初皆取给屯粮,后以屯田暂弛,屯军亦多撤回守城,边储始依靠民运。而其派运之数又多拖欠,致使岁用不敷,才以银盐接济,舍此似无长策。今宜令镇巡官,月核军马现存及物故若干,以杜虚报冒支之弊;行开纳事例。武宗允准,同时令各边折粮银两有盈余的由镇巡官核实奏报;若如以前任意浪费的,遣逻卒伺察,许人告讦。

开武职纳银补官赎罪例 提督宣大等处兵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文贵,经略边关诸墩堡,计用银

五十万两。便于正德三年(1508)四月初九日奏令在京及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有愿纳银授军职的听实授百户一百五十两,副千户二百0两,正千户二百五十两,指挥佥事四百两,指挥同知四百五十两,指挥使五百两,都指挥佥事六百两。军于原卫所;民人在京者填注五府属卫;在外者拨附近卫所带衔,俱只令终本身,不支俸。如曾纳银冠带者,许照数减除,如有职欲升者,百户升副千户,副千户升正千户,指挥佥事升指挥同知,指挥同知升指挥使,俱五十两;正千户升指挥佥事,指挥使升都指挥佥事,俱一百两;百户以上升都指挥佥事,照数递加,俱不加俸。原管事仍旧管事。其有罪问发立功的,每年纳银二十两,免其立功许冠带,仍候原拟立功满日,照旧带俸差操。兵部议可。文贵又乞开入监及僧道给度牒纳银事例。礼部复议:生员愿入监者,廪膳生一百五十两,增广生二百两,附学生二百三十两。又发僧牒二万,道牒二千,每名纳银十两或八两,无力纳银的勒令还俗;僧道官缺,其徒纳银五十两送部,准其承袭。武宗一一允准。结果,银未出京,被劫入刘瑾之门的将尽四分之一。文贵随刘瑾之意,毁古墩台重新营造,内造箭窗炮眼,以便制虏。其实毫无用处。当虏杀掠人畜,谁也不敢出战。

韩邦问致仕 韩邦问(1442—1530),字大经,号宜庵,浙江会稽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大理寺评事,迁寺副、寺正,出任淮安知府。成化二十三年(1487)迁陕西左参政,守关南,再升陕西右布政使,改迁四川左布政使,后补广东,俱有惠政。弘治十二年(1499)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改抚河南。正德元年(1506)后任南京大理寺卿。正德三年正月升刑部左侍郎,同年六月十一日迁刑部尚书致仕,家居二十余年,非公事不入公府。嘉靖九年(1530)八月初七日卒,年八十九,谥庄僖。

徐节削籍 徐节(?—1516),字时中,贵州卫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授内行知县,擢监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权贵,风裁凛凛。弘治元年(1488)迁太平知府,再升云南右参政、广西右布政使,征思南给饷有功。弘治十八年转广东左布政使。正德元年(1506)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会刘瑾擅政,以事见忤,正德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削籍。刘瑾伏诛,复职致仕。正德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卒。

匿名书数刘瑾罪 正德三年(1508)六月二十六日早朝罢,有人将匿名书札遗于御道。书中历数刘瑾罪恶。刘瑾矫旨后百官跪于奉天门下。不久,令堂上官起,刘瑾出立门左;翰林院官跪诉于刘瑾,亦令其起。御史宁杲诉说:我等素知法度,岂敢如此!此或系新进士所为。刘瑾说:此与新进士有何关系,是你们坏朝廷事。我稍加整治,便心怀怨望。你们不知太祖法吗?太监黄伟愤怒,对诸臣说:书中所言皆为国为民之事,挺身自承,虽死不失为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刘瑾不满地说:匿名书罪已当死,况置之御道,是何好男子!即日便逐黄伟于南京。及日暮,悉收下锦衣卫狱,计三百余人。次日,大学士李东阳等奏言:匿名文字出于一人之阴谋,诸臣在朝,仓猝拜起,岂能知之!况今天时炎热,狱气薰蒸,数日之间,人将不能自保。其时,刘瑾已经知晓匿名书系同类所为,才使百官获免。而刑部主事何钺、顺天推官周臣、礼部进士陆伸已中暑而死。其他因蒸热而得病的颇多。刘瑾恣肆凶暴,人人侧目而视。

柳州壮民起事失败 正德三年(1508)柳州所属马平、洛容二县壮民,聚众数万起事,杀富济贫。总督两广都御史陈金偕总兵官毛锐发兵十三万征讨,分四道进剿。至同年七月初三日,官军斩杀起事壮民六千六百三十余人,俘获一千五百余人。壮民起事失败。

武宗诏征工技百戏 正德三年(1508)七月十六日,武宗朱厚照谕钟鼓司太监康能等:庆成宴选用杂戏,令礼部征天下工技百戏入京。于是角抵竿木鱼龙曼衍之类,盛行于京城禁掖。

雍泰致仕 雍泰(1435—1514),字世隆,号正谊,陕西咸宁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吴县知县,作堤捍太湖,民称雍公堤,擢监察御史,迁凤阳知府,改南阳,进山西兵备副使,升按察使、山东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被劾除名。正德三年(1508)初起迁左副都御史提督捍江。同年七月二十三日擢南京户部尚书,因不附中贵,于同月二十七日致仕。正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年八十。谥端惠。有《奏议稿》、《正谊庵诗集》。

许进致仕 许进(1437—1510),字季升,号东厓,河南灵宝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监察御史,出按山东、甘肃,所至裁抑豪吏。迁山东按察副使、广西按察使。弘治初升左右都御史。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后升户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提督宣大军务。弹劾总兵王玺、平仁伯陈锐,被诬致仕归。正德初起为兵部侍郎、兵部尚书、提督团营,正德二年(1507)十月改吏部尚书理部事。其以才见用,能任人,性通敏。刘瑾弄权,稍委蛇,而终被刘瑾所恶,正德三年八月初八日致仕,正德五年八月二十日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谥襄毅。有《平番始末》、《东厓集》。

内行厂的设立 其时东厂、西厂,极为凶暴,致使人人自危,道路侧目,而刘瑾仍嫌不足,便于正

德三年(1508)八月十六日又设立内行厂(简称内厂),亲自统领,凌驾于东厂、西厂之上。其行事比东、西厂更为酷烈。中官施以刑,无得完肤。若被逮捕,一家有犯,邻里皆坐;若沿河居住,以河外居民连坐。屡起大狱,冤号之声不绝。又矫旨全部驱逐京师客佣,命寡妇全部出嫁,丧不能葬的令其立即焚毁。于是京师閧然。刘瑾惧怕激变,罪其失业首倡之人,以安众心。

刘瑾创罚米法 正德三年(1508)八月,刘瑾为肆意报复,折辱为官,创罚米法。凡是不附刘瑾的官员,皆诬以旧事,入于罚米例中。于是罚前户部尚书韩文米千石,输大同;张缙五百石,输宣府。不久,又借其他事故,再罚韩文。文武大臣几无宁日。自韩文罚米千石以下,罚米五百石至二百石的,就有一百四十余人。刘瑾亦借此纳贿,又索巡盐官赂,稍不如意,即责令其补偿商课,追议前任。九月,又罚吏科都给事中任良弼等五十六人,每人三百石至九月末又有八百九十九人,被罚米输边。深受其苦。不仅如此,还责令前后诸官罚米皆定限时日交齐,在京的限一月,在外及去任的,俱自移文至日为始,依水程远近,定限赴仓输纳,违限的听内外管粮官举劾。事实上,诸官罚米,多以公事及边储亏折而被中伤,往往变卖家产予以赔纳,或借债补足。后因事失误而被罚米的,便设法向刘瑾行贿,免遭其苦,以为自全之计。

顾佐致仕 顾佐(1443—1516),字良弼,号简庵,临淮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出任河间知府,亲校册籍,吏无所容奸。驿司供应,令民计亩出钱,里甲得免于偏困之害。擢四川按察副使,入为大理少卿。升右佥都御史提督雁门三关,兼巡抚山西。改南京提督操江,进右副都御史。再迁户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往陕西督饷。转左侍郎提督粮储。正德元年(1506)十二月迁户部尚书理部事。正德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致仕。正德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

周经致仕 周经(1440—1510),字伯常,号松露,山西阳曲人。天顺四年(1460)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进编修,迁侍读、左中允。弘治元年(1488)升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再擢礼部左右侍郎。弘治九年进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弘治十三年以灾异乞休。武宗即位,起复改南京户部尚书。正德三年(1508)三月召任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如故。刚介方正,好强谏,虽重忤旨不恤,宦官贵戚皆畏惧。同年十月十二日致仕。正德五年三月三十日卒,年七十一。赠太保,谥文端。

张泰致仕 张泰(?—1509),字叔亨,顺德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沙县知县,迁监察御史,提督北直隶学校,有明公之誉,后出按云南,执法不挠。历迁南京太仆少卿、大理少卿、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召为工部右侍郎。正德三年(1508)二月迁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理院事,十月十五日迁户部尚书致仕,正德四年七月初七日卒。

罢送各边年例银两 自成化年间开设榆林卫,巡抚余子俊增置城寨,陕西百姓供应不济,奏送江南折粮银补其不足。初以江南原折银例,每米一石,折银二钱五分,放支军士。其后大同等边缺乏,亦暂送银补足,数量不大,不到万两。至弘治间,改开中法,令纳粮运司解部,分送各边,始有年例银两,而盐法、屯田一时俱坏。边例银日渐增加,以至数万,益以各钞关商税,犹且不足,而加赋于民,内帑渐虚,东南民力日竭,边例银两更加缺乏。正德三年(1508)十月户部奏送各边年例银两,刘瑾令户部尚书查天顺以前年例银数。户部奏陈天顺以前并无此例。刘瑾大怒,斥责道:这是户部官通同边方巡抚共盗内帑的证据。于是奏请全部罢送各边年例银两。

谢铎致仕 谢铎(1435—1510),字鸣治,号方石,浙江太平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进侍讲直经筵,以丁忧归而不出。弘治初荐修《宪宗实录》,擢南京国子监祭酒,又以病谢归,家居十年。屡荐迁礼部右侍郎理国子监祭酒事。正德三年(1508)十一月十五日致仕。谢铎经术湛深,文章有体。两任国子师,严课程,杜请谒,增号舍。正德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年七十六。赠礼部尚书,谥文肃。有《赤城论谏录》、《伊洛渊源续录》、《赤城新志》、《林溪净稿》。

吴文度致仕 吴文度(1441—1510),字宪之,吴江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授龙泉知县,迁南京监察御史,偕同官论僧继晓被杖。不久迁汀州知府。弘治中历江西左参政、山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正德三年初进户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同年十月迁南京右都御史,因不贿刘瑾,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迁户部尚书致仕。正德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

刘烈起义 正德三年(1508)冬,四川保宁农民刘烈领导当地农民起义,聚众二千余人,于正德四年七月准备进攻汉中。正德五年六月入陕西,声势大振,与之相接的湖广等地为之震动。后在与官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此次起义失败。但却引发了四川各地百姓的武装暴动。

刘瑾遣官核查钱粮 正德四年(1509)正月十四日,刘瑾遣官赴各地核查钱粮。其时工科给事中吴仪核宁夏、固原等处仓场亏损之数,弹劾历任巡抚都

御史徐廷璋、贾俊、王珣、冒政、孙需、杨一清等十六人,侍郎顾佐及管粮郎中、副使、佥事徐健等十八人,又有通判等一百八十八人。还以马价、盐课劾巡抚宁夏佥都御史刘宪、陕西巡抚右副都御史杨一清及苑马寺卿、佥事、知府、同知及管屯卫官十余人,皆入罚米例,重者五百石,轻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罚一半。时刘宪已死,仍罚五百石;一清亦致仕,仍罚三百石。

诸司百官负京债 刘瑾窃据大权,借以纳贿。诸司百官朝觐至京,因惧怕刘瑾虐焰,纷纷行纳避祸,每省多至二万余两。由于路途携带不便,而贷于京师富豪之家,待回任之后再搜刮偿还。以此名为"京债"。上下交征,恬不为异。刘瑾党羽张采,以阿附纳贿得吏部侍郎,考察内外官,纠折严酷,间示薄罚,诸司官吏不堪其辱,不得已而行贿。刘瑾贪得无厌,招致怨恨。张彩趁机对刘瑾说:你知道百官行贿所用金银是哪里来的吗?不是偷盗官帑,就是搜刮小民。他们借给你送礼为名,而每个官员都肥己营私,送给你的还不满十分之一。而现在都怨恨你。刘瑾听其言,便于正德四年(1509)正月二十七日遣给事中张袷、段豸,御史房瀛等十四人盘查南北直隶各行省钱粮。此时,有御史欧阳云、工科给事中吴仪,奉差完毕回京,依照旧例行贿刘瑾,刘瑾为掩饰劣迹,便将欧阳云等以行贿及贪污罪罢黜为民。

王鉴之致仕 王鉴之(1440—1519),字明仲,号远斋,浙江山阴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元氏知县,擢监察御史,提督南都学校。迁大理丞,转少卿,进佥都御史、南京刑部右侍郎。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改京师刑部,迁左侍郎。正德三年正月转南京左都御史,同年二月又迁刑部尚书。刘瑾专权,鉴之与之抗。正德四年正月二十日致仕。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卒,年八十。

严禁致仕罢黜官留京师 正德四年(1509)二月二十七日,申严休退官员留京师之禁。其时,革职太医院右通政施钦亦在行中,其弟太医院院判施鉴以世籍求留。武宗说:施钦既先世征取,隶籍太医院,可令留京。凡致仕官员若系永乐、宣德年间以来数世名附版籍者亦容留居京师外,其余全部按禁例行事,不准留居京师。

江澜逝世 江澜(? —1509),字文澜,浙江仁和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迁侍读充经筵讲官。与修《大明会典》,进侍读学士,擢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奉命任《宪宗实录》副总裁。升吏部左右侍郎。正德二年(1507)十二月任南京礼部尚书,守官勤慎。不通尺书,著目录以自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昭。

张采奏改官吏考察期限 张采入吏部,一意阿附刘瑾,颠倒威柄。正德四年(1509)三月十七日,奏请随时考察官吏。于是武宗下诏:吏部考察百官不必以时。张采更加为所欲为,箝制百官,既创为非时之举,又增入旧例前所未有之制。首令堂上四品以上官人人自陈,阁部以下不堪其虐,无不先后乞休。同时,又以前遣科道部属,或敛贿侵库,令御史伺察其罪。与刘瑾狼狈为奸,结党营私,肆行暴虐。

三边文职总制的复立 各镇守、巡抚官先后奏陈,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三镇有警.不相应援。兵部据此请仿王越、秦纮等旧例,仍设文职大臣总制三边,镇守、巡抚以下官,皆受节制。武宗允准。遂于正德四年(1509)四月初四日令工部尚书才宽兼右都御史总制延绥、宁夏、甘肃军务。同时令兵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文贵总制大同宣府军务。五月初一日,罢宣府大同总制,改文贵为右都御史巡抚其地。

刘孟削籍 刘孟生卒年不详,字子贤,江西安福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兵科给事中,累迁刑科都给事中。进福建参政。正德四年(1509)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以枉道还里,久不领敕。于同年四月十三日械吏部门,罚粟三百石削籍。

王鏊致仕 王鏊(1450—1524),字济之,吴县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升侍读、右谕德、侍讲学士,充讲官。再擢少詹事、吏部右侍郎,多次上书条陈政事,多见采用。正德元年(1506)十月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不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武英殿。四年四月十四日,以刘瑾专权,志不得行而致仕。嘉靖三年(1424)五月卒,年七十五。赠太傅、谥文恪。有《姑苏志》、《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

《孝宗实录》修成 正德元年(1506)十二月,武宗敕修《孝宗实录》。命英国公张懋为监修官。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为总裁官,吏部侍郎张元祯、詹事杨廷和、翰林院学士刘忠为副总裁。不久,刘健、谢迁去位,又令李东阳、焦芳、杨廷和、王鏊等为总裁,吏部尚书梁储为副。侍讲毛纪、傅珪、丰熙、沈涛、焦黄中等为纂修官,共同纂修。正德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成呈进。共二百二十四卷。因焦芳入阁为总裁,遂操史笔,凡所褒贬,多挟恩怨。对旧时大臣何乔新、彭韶、谢迁辄肆诋诬,反自诩以为直,不恤人言。李东阳等畏避其恶,皆不敢持异同。因此,只好在进呈《孝宗实录》奏表中写道:"是曰是,非曰非,岂敢专于独见;疑传疑,信传信,庶以俟于将来。"

李旻逝世 李旻(? —1509),字子旸,号东

岩，浙江钱塘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预修《宪宗实录》。弘治改元，充经筵讲官。后迁左谕德，侍东宫讲读。迁南京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奉命讲授庶吉士。不久又以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四年(1509)四月初五日，召回京师任礼部左侍郎，同月初六日又调任南京吏部左侍郎。同月三十日卒于官。

韩重致仕 韩重(1442—1510)，字淳夫，号拙斋，山西降州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礼科给事中，累进都给事中，遇事敢言，谏万贵妃之过宠、斥西僧之煽惑，人为悚惧。后历任陕西右参政、右布政使、顺天府尹。弘治十四年(1501)十二月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首劾宦官梁玘，官民称快。改湖广巡抚。正德二年(1507)七月行南京工部尚书，被刘瑾忌恨，遂于正德四年五月初九日致仕。正德五年七月初九日卒，年六十九。

王敕致仕 王敕(？—1511)，字懋纶，山东历城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成化二十三年(1487)坐贬降州判官。弘治三年(1490)迁四川提学按察佥事，九年后迁河南提学按察副使。正德二年(1507)迁南京国子监祭酒。正德四年五月初九日考察自陈致仕。其性敏悟，博学多能，然以才自负而不检于行。正德六年正月三十日卒。

蔡清逝世 蔡清(1453—1508)，字介夫，号虚斋，福建晋江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礼部主事，以病告归。起迁江西提学副使，以忤宸濠，乞求致仕归里。正德三年(1508)起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任命始下而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年五十六。万历中谥文庄。蔡清饬躬砥行，贫而乐施。幼从林玭学，以善《易》闻名。其学初主静，后主虚，因此以虚名斋，而为其号。有《四书蒙引》、《易经蒙引》、《虚斋集》、《密箴》、《看河图洛书说》。

抚按官稽考符验的制定 正德四年(1509)六月十二日，吏部奏陈：两京府部诸司，类行天下勘合，事多未完的，请立稽考之法，抚按官自接管之日为始，一切勘合待完报之后，方许交代。如有互为挪移及迁沿后期的，新旧抚按官俱降二级别用。其三司掌印及守巡官升调事故，勘合未完而擅自离任的，亦降二级。武宗先准施行，并令吏部及都察院稽考科道官查举。其时，刘瑾务为苛刻，而张采又建此议。遂改诸司百官以勘合未完，多有获罪。

曲锐闲住 曲锐(？—1511)，字朝仪，山东莱阳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授大理寺评事，迁寺副。出为福建、四川按察佥事、松潘兵备副使，改河南，擢陕西按察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正德四年(1509)五月召还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同年六月再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曲锐屡升，刘瑾怒其不谢己，遂于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勒令其以旧任冠带闲住。刘瑾伏诛，复其官阶致仕。正德六年十二月卒。

桃源洞农民起义 正德四年(1508)六月，江西乐平农民汪澄二、王浩八等，以桃源洞为中心，发动起义，响应者过数万人，攻城掠县。知县汪和率民兵剿捕失利。汪和被起义军俘虏，且杀民兵三百余人。汪和送起义军金银获释。官军前往征剿，屡战屡败。王浩八遂与东乡、华林、靖安、大帽山等处起义军相呼应，规模越来越大。直到正德七年，左都御史陈金率官军进击，起义军受挫，正德八年正月，王浩八、胡浩三再整军伍起义。同年六月，浩八战死。余部活动在浙江、江西等边界处，坚持与官军战斗。

刘瑾矫旨核盐课 正德四年(1509)七月初八日，刘瑾矫旨遣御史乔岱等往核两浙盐课，追论历次巡盐御史及运司官赔偿商课，自数千两至数百两，按历官年限深浅及欠课多寡以定赔纳数额，皆令输京师内承运库。于是遂有谪戍御史，人人倾家荡产。其中有御史彭程已死，家境十分贫寒，只遗一孙女，将全部家产赔纳，亦为不足，便出卖女儿。当时路人无不为之流涕。

清理屯田骚扰地方 自刘瑾罢各边年例银两之后，边储日匮。正德四年(1509)八月初一日，刘瑾奏请遣御史等官清理屯田。副都御史韩福往辽东，而韩福以征敛为能，所在惊扰。激起义州、锦州等处戍卒为变。其中有高真等焚毁廨舍，驱逐委官。守臣恐事态扩大，发银二千五百两抚谕，才予平息。另有清理屯田的胡汝砺、周东等，皆承望风旨，各边伪增屯田数百顷，令其按数出租，人不聊生。周东在宁夏，尤为苛刻，人心怨愤。

沈周逝世 沈周(？—1509)，字启南，号石田，又号白石翁，长洲人。博览群书，其文，学左氏；诗拟白居易、苏轼、陆游，字仿黄庭坚，尤工于画，与唐寅、文征明、仇英并称为明之四大家。为人耿介。年十一游南都，作百韵诗上巡抚侍郎崔恭。年稍长，知府想以贤良荐举，沈周决意隐遁，风神萧散，如神仙中人。正德四年(1509)八月初二日卒，年八十三。世称石田先生。有《客座新闻》、《石田集》、《江南春词》、《石田诗钞》、《石田杂记》。

文贵致仕 文贵(1449—？)，字天爵，号松斋，湖广湘乡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累官至陕西左布政使。弘治十六年(1503)十二月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正德元年(1506)十二月迁兵部左侍郎理部事。正德三年三月，兼左副都御史总制宣大等处军

务。正德四年四月改右都御史巡抚大同。八月初七日致仕。后卒于家，年九十余。

四川农民起义 正德四年(1509)九月，四川保宁人廖惠、鄢本恕、蓝廷瑞率领四川北部百姓举行起义，攻城掠地，远近百姓纷纷响应。至同年十二月，发展至十万人。廖惠称扫地王，鄢本恕称刮地王，蓝廷瑞称顺天王，分设四十八总管。活动范围扩大到陕西、湖广等地。其时，蓝廷瑞、廖惠主张以保宁为根据地，而鄢本恕主张以汉中为根据地，再取郧阳，由荆襄东下。廖惠率起义军攻克通江，杀明参议黄瓒。同月二十八日，明廷令陕西巡抚黄宝备汉中、商洛，四川巡抚林俊备眉州、保宁，湖广总兵毛伦备荆襄、郧阳，共同征剿起义军。正德五年，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龙滩河的战斗中被俘。蓝、鄢即率军转至汉中，被官军逼四川。正德六年八月起义军在东乡被官军围困，明将洪钟设计诱杀蓝廷瑞、鄢本恕。余部在廖麻子率领下，与方四、曹甫的起义军联合，继续战斗。

刘瑾奏疏盐法 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十八日，刘瑾奏疏盐法四事：一、请免征天下户口食盐银钞；二、请令巡盐御史躬亲掣验；三、请禁私贩夹带；四、请禁空文虚引。户部覆议奏报得旨：刘瑾原奏盐法事宜，经划周详，防范严密，诚为国家重务，既多官会议，户部查算明白，可以经久通行。军民户口食盐仍旧，其余俱永遵行。司礼监立碑在侧，时常省察。

小王子侵扰延绥 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二十五日，小王子率兵伏延绥塞外，轻骑抵新兴堡，诱副总兵侯勋出而包围，参将周诚、指挥岳濂助援，亦被包围。在突围中互杀，斩小王子兵九十余人。小王子掠马匹解围而去。不久，小王子又入掠，围总兵吴江于陇州城，参将王勋来援，吴江获免。总制才宽以捷奏报。武宗赐敕奖励。事后巡按御史胡瓒劾奏：吴江逗留无勇，总兵侯勋轻率寡谋。仅此小役，虽斩获九十余级，而我军士死者亦略相当，还丧马二千七百余匹。奉诏切责。兵部复奏：临敌不可易将，仍令吴江戴罪自赎。武宗允行。

屠滽致仕 屠滽(1441—1512)，字朝宗，号东山，浙江鄞县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监察御史，巡按四川、湖广，皆有声绩。且明法律、善折狱。每奏狱事，举笔立就，不须窜易，以材能称于时。超擢佥都御史，改南京右都御史。弘治改元，奉命总制两广军务，不久召还掌院事，进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升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仍掌院事。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二十八日致仕，正德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二。赠太保，谥襄惠。

才宽战死 才宽(？—1509)，字汝励，迁安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商河知县，阔达无羁，遇事裁决无滞。历任石州知州，潞州知州，南京刑部员外郎、郎中，淮安、西安知府，山西右参政，官至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二年(1507)正月迁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正德三年六月改陕西，未任而迁刑部左侍郎，八月改兵部左侍郎。刘瑾喜其才，于正德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迁工部尚书，同年四月初四日兼右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十一月初五日，御虏花马池，出塞外。次日追击至鞭羊泉，斩四级，虏群集而至，中箭而死。赠太子少保，谥襄愍。

限制镇守总兵养廉田数额 正德四年(1509)十二月十四日，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王宪奏陈：奉敕查核内外镇守等官地土，务足养廉之用，原未分给的不再添给。今查得甘肃等处镇守太监宋彬田一百一十二顷，总兵官署都督佥事卫勇田八十七顷，左副总兵都指挥佥事白琮田十四顷，监枪都知监左监丞王欣田四十一顷，又采草湖田八十七顷，分守凉州御马监太监张昭田三十三顷，右副总兵官都指挥佥事姜汉田二十五顷，分守肃州左参将都指挥佥事苏泰田十三顷，守备西宁署都指挥佥事赵承序田十五顷。户部议复：镇守等官原无给与养廉田土事例。中间多因奏讨相沿，承种耕获采取，不无重劳军士，兼且多寡不均，必至别项渔取。伏望酌量职分重轻，定为等第。庶使与不伤惠，事体归一。武宗诏：镇守给水旱田各十顷，副总兵各半；分守并监枪、游击各旱田十顷，守备旱田五顷；原未给者各给水田一顷。永为养廉定例。多出田土，给舍余人等承种纳税，不得数外滥给侵占。

申明宗室禁约 正德四年(1509)十二月二十三日，礼部奉旨详检累朝政令中凡涉王府条例，一一列出奏报。武宗批答：累朝旧制及现行例，皆申明禁约。郡王、将军以下卒无嗣及郡王进封亲王的，其宗支只许奏请奉祀，不得营求请封及继嗣名目。亲王、郡王生母受封的，从简葬祭。各王府勿容僧尼女冠出入宫禁及私建寺观。违者承奉、长史以下俱罪不宥。仍谕镇巡官周知。

吴洪致仕 吴洪(1448—1525)，字禹畴，号立斋，吴江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历广东按察副使，厘革奸弊，有治绩。迁福建按察使，娇娇有风节。弘治十四年(1501)迁太仆寺卿。迁十八年改工部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厂。正德元年(1506)召回进工部左侍郎理部事。正德三年十二月任南京刑部尚书。正德五年正月十三日致仕。嘉靖四年(1525)末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少保。

王纶致仕 王纶，生卒年不详。字朝言，山东

滨州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礼科给事中,改户科,出任江西右参议,累官至湖广左布政使。正德四年(1509)六月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同年八月迁左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正德五年正月致仕。五月初四日,以杖毙二人逮下狱削籍。后无考。

增减乡试解额 成化末年,焦芳坐尹旻党被谪,怀疑是出自万安、彭华之意。而彭华系江西人,曾诮焦芳无学,焦芳以此对江西人狠之入骨。之前,满剌加遣使朝贡,有使臣亚刘,本为江西人,名萧明举,以罪逃入海外,充作使臣而来。中途,谋入浡泥国索取宝物,且杀亚智。此事奏报朝廷,下所司核查。正德五年(1510)正月二十一日焦芳在内阁,即在奏尾写道: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华、尹直等,素于物议。且其地分试解额过多。于是请裁五十名及停授京职例。焦芳曾作《南人不可为相图》进呈刘瑾,又欲私刘瑾故乡陕西,便暗示给事中赵铎奏言:"乡试额不均。"遂票旨增陕西额为一千,谄媚刘瑾,自增其乡河南为九十五,并及山东、山西俱增至九十。刘瑾、焦芳矫旨,并著为令。其狼狈为奸,徇私变法,大率如此。待刘、焦事败伏诛,皆复旧额。

刊行《见行事例》 正德五年(1510)二月十五日,兵科给事中屈铨,请颁行刘瑾所定《见行事例》,按六部为序,编辑成书,颁示中外,以昭法守。武宗诏"下廷臣议行"。廷臣欲缓其事。而国子监祭酒王云凤复请其事,且请刘瑾如鱼朝恩之例幸太学。廷臣不得已而准刊行《见行事例》。将付之刊行而刘瑾伏诛。

胡汝砺逝世 胡汝砺(1465—1510),字良弼,号竹岩,陕西宁夏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户部主事,改郎中,督饷山西。迁大同知府,敢于任事,绳下以法,治迹颇著。正德二年(1507)迁顺天府丞,进府尹,再进户部右侍郎,不久又兼右副都御史往宣府清理屯田。正德四年改兵部右侍郎,正德五年占还任兵部尚书。因与刘瑾同乡,迁转之速,前所未有。同年三月初一日,未抵任而卒,年四十六。有《竹岩集》。

苏州府吴江昆山大水 正德五年春,大雨如注,至四月湖水横涨官塘,市路浵漫不辨,长桥不没者尺余,浮尸蔽川,所有船户悉流淮、扬、通、泰间,田有抛荒。又遇大疫,死者居半。淼山大水,城廓之外一望汪洋,野无炊烟,死者相枕。

安化王寘鐇反叛 寘鐇,庆王朱㮵裔孙,分封安化,其性狂暴。曾请术士相面,言其当大贵,遂存非分之想,遂与其党指挥周昂,千户何锦、丁广,卫学生孙景文等,阴谋反叛。正德四年(1509)末,少卿周东奉命清理屯田,伪增顷亩,收租贿刘瑾,戍卒皆愤恨而巡抚安惟学又数杖辱将士妻,将士衔恨刺骨。寘鐇知众怒,令景文招诸将宴饮,以言相激,诸将多愿相从。其时,遇有边警,游击将军仇钺与副总兵杨英率兵出塞防御,总兵官姜汉,简锐卒六十人为牙兵,令周昂统领。周昂与何锦为寘鐇定计,设宴招镇巡官饮酒,乘机斩杀。正德五年四月初五日,付诸实施。而惟学、周东不至。周昂、何锦率牙兵,杀姜汉及太监李增、邓广,分遣丁广入巡抚公署杀安惟学、周东,遂焚官府。释囚徒,撤黄河渡船。接着报人招仇钺、杨英降。杨英众溃,单骑奔灵州。仇钺时驻玉泉营,假装应许,引兵入城,称疾不出。寘鐇分遣其众,出金帛犒赏。又说署封官,何锦为讨贼大将军,周昂左副将军,丁广右副将军,其下分授督护、总管等。同时令景文作檄,以讨刘瑾为名,传播诸镇。诸镇畏刘瑾,不敢奏报,只有延绥巡抚封奏,且陈讨贼之策。同月二十一日,朝廷起杨一清为右都御史总制陕西等处军务西征寘鐇,太监张永监军。二十三日,一清未至,而仇钺袭执寘鐇。二十四日,削寘鐇属籍。令,太监张永提督宁夏军务。寘鐇从反叛到失败,前后十九天。八月十一日,太监张永自宁夏还,俘寘鐇及其亲属十八人。武宗戎服御东安门,何锦等从叛者数百人,皆反接由东华门入。献俘毕,金鼓之声彻于大内。正德六年二月,寘鐇伏诛,锢其子孙五人于西内。

安惟学被杀 安惟学(?—1510),字行之,山西临汾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行人。历工部郎中,出平凉知府。任陕西右参政、浙江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正德四年(1509)十二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正德五年四月初五日,安化王寘鐇反叛被杀。

黄宝致仕 黄宝(1456—1523),字廷用,长沙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吏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太常少卿。正德初,迁通政,进应天府尹。正德四年(1509)四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次年四月致仕。正德六年十月,起改山东巡抚,不久,又以疾乞归。嘉靖二年(1523)卒,年六十八。有《东冈集》。

焦芳致仕 焦芳(?—1517),字孟阳,号守静,河南泌阳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进侍讲学士。降桂阳同知,迁霍州知州、四川提学副使,改湖广。召任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改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弘治十二年(1499)六月迁礼部右侍郎,弘治十五年三月进左侍郎。次年六月改吏部。正德元年(1506)四月吏部尚书。同年十月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仍理部事。不久辞部事专内阁机务。屡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焦芳首附刘瑾,荐张采。张采任吏部尚书,居间不尽听焦芳,二

人遂有隙，而刘瑾对焦芳亦不满意。焦芳受岑浚妾，与妻争，刘瑾指斥其过。加之焦芳父子鬻爵荐人无虚日，张采诉于刘瑾。而段炅见势，向刘瑾告发焦芳阴事，刘瑾大怒，当众面斥焦芳，焦芳无奈，于正德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致仕。焦芳居内阁数年，刘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有焦芳之谋。刘瑾伏诛，言官交劾，削其官。正德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卒。

俞俊致仕　俞俊(？—1510)，字尚贤，浙江丽水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江陵知县，擢监察御史，出任贵州按察副使，整饬威清兵备。不久迁江西参政，改福建，历山西布政使，召任顺天府户、工部左右侍郎。正德四年(1509)六月迁南京工部尚书。为人峭直，居官亦有政绩。正德五年六月初五日致仕，七月初五日卒。

刘宇致仕　刘宇(？—1512)，字至大，河南钧州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授上海知县，迁监察御史，出按贵州，谪施秉知县。弘治初迁瑞州知府，转广东按察副使，改山西，升山东按察使。多刚愎自用，而办事干练。弘治十三年(1500)六月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赞理军务。弘治十五年三月擢右副都御史仍巡抚其地。十五年十二月回院。正德元年(1506)二月迁右都御史总制宣大军务。二年正月召回，闰正月迁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四月进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正德三年八月再改吏部尚书，加少傅。正德四年六月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不久归里展墓。正德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致仕，正德七年五月卒。

杨一清张永定计除刘瑾　正德五年(1510)七月，太监张永奉命监军至宁夏，杨一清与之亲善，言语投机，甚为融洽。从言谈中知张永与刘瑾有隙，一清便乘机对张永说：赖公之力，反侧易除，但国家内患可不那么容易除掉。涉及内患，不敢明言，遂于掌上写一"瑾"字。张永面有难色。一清慨然说道：公是皇上信任的内臣，今派公前来监军，即是明证。何不以此次进京奏捷，论议军事，趁机揭露刘瑾罪恶，极陈海内愁怨，恐变生心腹。皇上英武，必听公言而诛刘瑾。刘瑾伏诛，公益柄用，再全部清除弊政，安天下人之心。此真是天赐良机。张永耽心地说：若事不成，后果严重。一清说：若是公在皇上面前进言，事定能成功。万一皇上不信，公可顿首据地哭泣，请死于皇上面前，剖心以明情真意切，言不为妄。皇上必为之心动。若得请即行事，千万不要犹豫。张永听罢说：老奴何惜余年而不报主！遂决心清除刘瑾。二人商议历诉刘瑾罪恶，借机劾奏。

太监张永劾刘瑾　正德五年(1510)八月十一日，太监张永献俘毕，武宗赐酒酬劳张永。其时，刘瑾及马永成等皆在侍。至夜，刘瑾辞归。张永遂向武宗密奏刘瑾谋反情状，且从袖中取出奏疏，数刘瑾不法十七事。武宗刚喝酒，低头说：刘瑾负我。且有所犹豫。张永说：此事不可缓，缓则奴辈皆死于非命，陛下亦无所归！接着，张永等亦数刘瑾平时劣迹。武宗才下令逮捕刘瑾。

刘瑾下狱　正德五年(1510)八月十一日，太监张永弹劾刘瑾，武宗令校卒执至。十二日，武宗以张永奏疏出示内阁，贬刘瑾为奉御，闲住凤阳。十四日，籍刘瑾家。本来，武宗既贬刘瑾，意不欲诛。及籍其家，得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锭又一万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宝石二斗，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衮服四，蟒服四百七十袭，牙牌二柜，金龙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狮奕带一，玉带四千一百六十。又得金五万九千两，银十万九千五百两，团扇饰貂皮中置刀二，甲千余，弓弩五百。其他宝物不计其数。武宗大怒说：奴果反，赶紧逮捕入狱。于是科道官谢讷、贺泰等列刘瑾十九罪，请亟赐诛戮。武宗令法司锦衣卫会百官鞠讯于午门外。鞠讯之日，刑部尚书刘璟，不敢出一语。刘瑾大言：公卿多出我门，谁敢问我！众皆稍稍躲避。驸马都尉蔡震说：我国戚，得问你！便使人批刘瑾脸颊，斥责道：公卿皆朝廷用，怎么是多出你门？你又为什么私藏刀、甲？刘瑾说：用以保卫皇上。蔡震又问：既然是保卫皇上，怎么藏其于私家？刘瑾语塞。于是狱成。

恢复刘瑾变乱旧制　正德五年(1510)八月十四日，收系刘瑾于狱之后，武宗立即下旨：巡抚、兵备官裁革的及乡、会试中额增减的，俱如旧制。考察京官仍依朝觐例。江西之万安、南城，浙江之余姚，仍选京官。其余翰林院调外任的，具名奏报。文武官诰俱免追，已追的仍给还。追赔浥烂粮米并以事罚米的，皆免。职官籍没家产不在叛逆律的仍归还。其余应改正的，令所司详拟奏报。同月二十五日，武宗下诏：远戍官吏释还；其削籍者，仍冠带闲住；都察院毋挞御史。二十九日，复设山东、山西、河南、江西、郧阳、蓟州、保定、苏松、凤阳、云南、贵州巡抚都御史。本月末，廷臣奉命详拟刘瑾所变法请更正的，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武宗下诏：皆如旧制。

张彩下狱　张彩(？—1510)，陕西人，弘治三年进士。授吏部主事、文选员外郎、郎中，被劾家居。焦芳以其为刘瑾同乡，极力推荐。不数月，擢佥都御史、吏部侍郎。正德四年(1509)六月代刘宇为吏部尚书，十一月加太子少保。日出入刘瑾之家，进退人才，唯刘瑾之意是从。不时考察内外官员，诸所迭补，不

循旧格，率意变乱，贿赂肆行。正德五年八月十四日刘瑾被劾下狱，十五日亦逮其下都察院狱，同年十月十六日死于狱。诏戮尸于市，流其家海南。

曹元削籍 曹元(1449—1521)，字以贝，大宁前卫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授工部主事，迁郎中。阿附刘瑾，出任浙江左参政。弘治十八年(1505)升山东右布政使。正德二年(1507)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改抚陕西，正德三年后为兵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升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正德五年二月改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日饮酒谐谑，道闾里鄙语，以刘瑾而屡迁，士论耻之。同年八月十四日，刘瑾下狱，十六日曹元上疏自陈不职之罪，说："请开更生之门，归守先人墓。"词哀而鄙。武宗令其致仕。十八日，科道官举劾，遂削其籍，黜为民。正德十六年卒于京师，年七十三。

大治刘瑾奸党 正德五年(1510)八月十八日，科道官劾内外官为刘瑾奸党，列名有：内阁则刘宇，焦芳，曹元；尚书则吏部张彩，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璟，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澯，礼部朱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侍郎则吏部柴升、李瀚，前户部韩福，礼部李逊学，兵部陆完、陈震，刑部张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谅，南京礼部常麟，工部张志淳，都察院则副都御史杨纶，佥都御史萧选；巡抚则顺天刘聪，应天魏讷，宣府杨武，保定徐以贞，大同张禴，淮扬屈直，两广林廷选，操江王彦奇，前总督文贵、马炳然；大理寺卿则张纶、少卿董恬，丞蔡中孚、张祫；通政司则通政吴钦、王云凤，参议张龙；太常寺则少卿杨廷仪、刘介；尚宝司则尚宝卿吴世忠，丞屈铨；府尹则陈良器，府丞则石禄；翰林则侍读焦黄中，修撰康海，编修刘仁，检讨段炅；吏部郎则王九思，王纳海；给事中则李宪、段豸；御史则薛凤鸣、朱衮秦昂、宇文钟、崔哲、李纪、周琳。其他郎署监司又十余人。于是张彩论死；韩福以在湖广所馈白金数十万两，封识宛然无损，遂论谪戍。其余奸党，或谪外，或闲住，或除名，一时朝署为清。另有传奉检讨胡缵宗、编修邵、黄芳，主事李志学、韩守愚，俱调外任。

刘六、杨虎起义 正德五年(1510)十月二十二日，霸州文安人刘六(名宠)、刘七(名宸)与齐彦名一起发动起义，穷苦百姓纷纷响应，旬日之间集众数千人，屡败官军，"捕盗御史"不敢抵抗。正德六年六月，又与杨虎领导的起义军联合，由河北攻入山东，回兵攻京畿，倏忽来去，势如风雨，势力逐渐扩，达数万人。遂分两路，刘六、杨虎各率一路，时分时合，互相声援。九月，杨虎一路破兴济、沧州，进至山东蒙山，打败明副总兵李瑾，进军济南、东昌、兖州、曹州、莱州等地。明廷增兵遣将，堵截起义军。起义军突破包围圈，于十一月至宿迁渡河，杨虎牺牲，遂推刘惠、赵镃率起义军继续战斗，杀明都指挥王保。由于起义军不断扩大，刘惠及时整顿，自称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镃称副元帅，下有前后左右中五军，各设都督总领。分二十八营，各树大旗为号。置二金旗，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不久，起义军攻破河南裕州，杀明指挥詹济、同知郁采。正德七年二月赵镃一支起义军号十三万，骑五千，最为壮大。遂转战襄阳、樊城、枣阳、随州、新野，破泌阳，火烧焦芳家。此时，明廷派都御史彭泽、咸宁伯仇钺围剿起义军。刘惠、赵镃退至六安。而起义军首领张通、陈翰等投降，赵镃势孤，被明军擒获。刘惠一路转至南召，在与官军战斗中伤左目而自杀。刘六、刘七率领的一支起义军于正德六年(1511)秋，进入山东之后，连破日照、海丰等十城。杀日照典史余清、巡官司福。朝廷派惠安伯张玮、右都御史马中锡提督军务，率京营统率征讨起义军。正德七年四月，官军十万包围起义军，刘六、刘七率起义军突围。而此时刘惠一支又被官军镇压，刘六势孤力单，遂退湖广，败于黄州团风镇，刘六与其子投水自杀。刘七与齐彦名率余军至南通，战斗在九江、安庆及南通长江沿岸，三过南京，如入无人之境。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刘六等在夏口杀南京粮储右副都御史马炳然，攻掠汉口。后以狼山为据点，不时出击。官军齐集，向南通进逼，加之起义军内部不和，多有逃散。同年七月，副总兵刘晖等率官军攻狼山，起义军与之战斗，死伤惨重，刘七中箭投水自杀，齐彦名战死。持续三年，转战数省的起义失败。

白钺逝世 白钺(1454—1510)，字秉德，南宫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迁侍读，充经筵并东宫讲官，升侍讲学士、翰林学士充日讲官、教授庶吉士、掌翰林院事，擢礼部右侍郎，改吏部，进左侍郎。正德三年(1508)十月迁礼部尚书，正德五年九月兼翰林学士专管内阁敕诰掌詹事府事，加太子少保，十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七。赠太子太保，谥文裕。

刘璟致仕 刘璟(1450—1522)，字德辉，河南鄢陵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授刑部主事，历松江知府，奉法勤职，豪右敛迹。迁山东布政使，剔宿弊，严御吏，宽民赋。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正德二年(1507)十二月后还任刑部右侍郎，正德四年七月进左侍郎，十二月进刑部尚书。正德五年九月加太子少保，十二月二十五日致仕。嘉靖元年(1523)十一月十七日卒，年七十三。

武宗诏发太仓银入内库 正德五年(1510)十二月,武宗诏发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库(宝藏库)应用。户部尚书杨一清奏陈:太仓专备三边军饷。弘治间,各边皆有积饷,自刘瑾搜刮天下之财,敛之京师,半入公帑,半归私囊,因此,太仓虽稍有积蓄,而四方库藏为之一空。即今大同边警,各省灾伤,乞省无益之费,为天下惜财。武宗得一清奏疏,仍诏以十万两送入内库。

张宪逝世 张宪(1446—1511),字廷式,江西德兴人。成化八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升山东参政、浙江右布政使,顺天府尹、工部右侍郎,总理易州山厂,又兼右佥都御史,理两浙、福建盐法,九年考绩升右都御史,后召入理院事,改南京都察院,迁南京礼部尚书,刘瑾柄政,勒令致仕,刘瑾诛,最先召用,改南京工部,张宪在考功最久,课核明审,荐士多不识面。历官四十余年,端谨长厚。正德六年(1511)二月初一日卒于官,年六十六。

江西罗光权起义 正德六年(1511),江西瑞州华林山民罗光权、陈福一等率领山民起义,于山谷间据险立寨,周围百姓响应,遂一举破瑞州城(今江西高安),江西震动。地方官纷纷告急,惊惶万状。明廷于同年二月派陈金总制军务,统领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湖广五省官军前往镇压。正德七年五月陈金派按察副使周宪分兵三路围剿华林山。起义军凭借地势险要,杀败明军,活捉周宪,粉碎围剿。陈金不甘失败,再派南昌知府李承勋会合土兵进攻华林,同时取招抚策略,出榜招降,且豢养一起义军投降的黄奇,前往诱降。一切准备妥当,以黄奇为向导,夜袭起义军,四千余人被杀,罗光权牺牲。起义失败。

江西赣州大帽山农民起义 正德六年(1511),江西赣州大帽山何积钦率众起义,借地势险要,不时集众攻掠州县。同年二月,朝廷起复左都御史陈金总督江西等处军务,后又命周南为南赣巡抚,专事围剿农民起义军。起义军与之周旋。周南莅任,即征集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兵,督副使杨璋、佥事凌相、指挥孙堂等分道进剿。江西总制陈金亦遣兵助援。正德七年五月,江西兵自安远入,广东兵自程乡入,福建兵自武平入,包围起义军。先后攻克寨堡,起义军死五千余人。何积钦等首领被俘。起义失败。

蠲免赋税 正德六年(1511)三月二十六日,由于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武宗为安抚百姓,特由张永传旨:近来各处"盗贼"纵横,多因水旱,衣食维艰,有司不能振恤。遇朝廷下诏蠲免,视为具文,征解重复,以致小民冤抑无伸,流离失业,相诱为非,苟延性命,日复一日,实可矜怜!其令都察院出榜分给直隶、山东、河南、四川、江西、湖广、陕西、福建、两广用兵地方,凡被寇之府州县,概免租税一年。

云南北胜州地震 正德六年(1511)五月初六日,北胜州(今永胜)地震,城西北面倒塌,倒坍民房一千五百余家,计五千余间,近屯西山下田陷成湖百余顷。西城外石门阙、灵源河贯穿其下,近屯西山下的军民田地,沉为湖,积水经年不涸,名曰西山草海。震中烈度(I_0)Ⅸ,震级(M)6 $\frac{3}{4}$级。

王敞致仕 王敞(1453—1515),字汉英,号竹堂,江宁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授刑科给事中,历左、右、都给事中,升通政司参议、通政使。正德三年(1508)兵部左侍郎仍掌通政司事,正德五年初署兵部侍郎事,同年三月擢兵部尚书署部事,九月加太子少保。正德六年五月初九日改署通政司事,同月二十六日致仕。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三。赠太子太保。

四川松潘农民起义 正德六年(1511)五月,四川松潘绰岭寺僧发动农民起义,率众烧毁红花屯,指挥胡宁奉命征剿,被农民起义军俘虏。起义军进据黄土坡山,杀千户史宽,总制洪钟请改巡视都御史高崇熙提督松潘军务,兼理巡抚,集结兵力,围歼起义军。不久失败。

山西李华起义 正德六年(1511)六月初五日,山西李华等率众起义,刘瑾党亡命者多从,众至数千,衣帜皆赤。后与刘六、刘七等起义军相呼应,掠壶关县赵村,杀富户,济穷困,远近响应。沈王乞师,诏切责镇守、巡抚官,令军、卫有司失事官俱停俸戴罪征剿起义军以自赎。

周朝佐上言南京守备 正德六年(1511)六月,南京十三道御史周朝佐等上言南京守备:一、重操江。长江之险,武事日弛。若徐州、凤阳之"盗"突奔而南,九江之"盗"顺江而东,南京难以防备。请敕操江都御史及总兵官,慎选久任之士率,使其练习舟师,加强备御。二、选官军。南京操备军士,强壮占役私门,老弱滥充行伍,其把总管队官又皆非将材,乞请南京兵部会科道官阅选,有例外多占军伍投充势要的,太监、总兵官以下悉令指实劾奏。三、严守备。南京城中,"盗"出入自如,往年有盗洪武门金兽环的,守卫之疏由此可知,乞令各城门守臣严加戒备,有私役卖放的,据实重处。武宗诏令所司依议施行。

恤典的更定 正德六年(1511)六月二十七日,酌定恤典:一品葬费三百金,役二百人;二品二百五十金,役一百五十人;三品二百金,役一百人;三品秩未满减半,役五十人。四品以下,特恩酌情。

陈勖逝世 陈勖(? —1511),字时勉,山东单县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廉平颇著。擢通政司右参议、右通政,阅视山西宁武三关边务,还升左通政。正德二年(1507)迁太仆卿。次年改户部右侍郎。进左侍郎致仕。刘瑾伏诛,复官提督京储.正德六年正月还理部事,七月十七日卒。

马中锡下狱 马中锡(1446—1512),字天禄,号东田,故城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授刑科给事中,擢云南按察佥事,改陕西提学按察佥事,不久迁副使,后擢大理寺少卿。弘治九年(1496)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弘治十八年起复巡抚辽东。正德元年(1506)六月后回任兵部右侍郎,十一月进左侍郎。以抑宦冒边功忤刘瑾,改南京工部,勒令致仕。刘瑾伏诛,复官巡抚大同,又迁右都御史往督辽东军务,以功升左都御史。正德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以纵贼罪逮捕入诏狱。正德七年五月十八日死于狱中,年六十七。正德十一年,御史卢雍追讼其冤,令复官。有《东田漫稿》、《别本东田集》。

广东农民起义 正德六年(1511)九月二十三日,广东农民起义军三千余人,由广东入江西,破永丰县,知县朱琎逃遁。起义军乘胜破乐安、新淦,俘参政赵士贤及知县。赵士贤吏走临江,索银赎还。明廷即敕陈金抽调两广土兵分道征剿。

四川方四起义 正德六年(1511)正月,四川仁寿农民方四率众起义。四川巡抚林俊派官军镇压。方四等转战至綦江。进入贵州思南、石阡等府。方四称总兵,任胡子称御史,另有三十余个评事。不久,又转入四川。同年八月,起义军攻东江、永澄等处。九月复攻江津。十月,与官军战,杀死百户柳芳、义官曹腾。林俊督酉阳、播州、石柱等兵分三路阻击。不久又派人招降,方四不从。接着明副使李钺分兵为六哨,四面围剿起义军,任胡子及方四妻妾被擒,起义军失利。方四率余众乘机袭击官军,杀千户田宣、冉廷质等,救回妻妾,遂率二千余众转入思南境内。正德七年,方四复入四川,闰五月,自南川开赴綦江,与官军战斗,方四被地主武装俘获。于同月初七日死难。余部于同年六月入陕西继续战斗。

张永选练团营 正德六年(1511)十月初九日,太监张永奉敕拣选团营官军,得十二万三千七百余.张永又请于将台下选六十万为正兵,又于每营各选三千为奇兵,计四万二千人,随时操练,以备调遣。武宗允准。

刘杲致仕 刘杲(? —1513),字世熙,长洲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累迁至湖广按察副使、三迁至江西左布政使。天下朝觐官,刘瑾皆索重贿,刘杲无所与,力拒不应,士论称其刚正。刘瑾伏诛,以时望当迁擢,而刘杲极力乞罢,遂于正德六年(1511)十月十九日加右副都御史致仕。正德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卒。

陈镐逝世 陈镐(? —1511),字宗之,号矩庵,浙江会稽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礼部主事,改南京吏部,迁员外郎、郎中、山东按察副使提督学校,转江西参政,擢湖广右布政使。正德五年(1510)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正德六年乞致仕,命未下而于同年十一月初一日卒。

京师地震 正德六年(1511)十一月十二日,京师地震,保定、河间二府,蓟州及畿南八县(良乡、房山、固安、东安、宝坻、永清、文安、大城),三卫(万全、怀来、隆庆)同地震,皆有声如雷,动摇居民房屋。霸州尤烈,三日之中地震十九次。又山东武定州亦同日地震。

刘忠致仕 刘忠(1452—1523),字司直,号野亭,河南陈留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侍讲、侍读学士、《孝宗实录》副总裁。以不附刘瑾,改迁南京礼部左侍郎、南京礼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其时宦游者以南京为闲散地,多务苟容,而刘忠毅然持风裁庶僚秩满考察,严肃求实。正德五年(1510)二月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专敕诰,掌詹事府事。刘瑾伏诛,于同年九月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不久晋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正德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致仕。嘉靖二年(1523)八月卒,年七十二。赠太保,谥文肃。有《野亭遗稿》。

科道官奏陈时政 正德六年(1511)十二月初三日,科道官以修省奏陈时政:黜不职,重名器,节财用,禁科索,惩奸恶。武宗从其议,付有司查核施行。

董杰逝世 董杰(? —1511),字万英,号五城,泾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沔阳知州,谪四川行都司知事,不久复职改钧州。入为刑部员外郎署郎中事,出为保定知府,历山东右参政、河南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正德六年(1511)二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十二月初九日卒于官。董杰有豪气,每以才略自负,居官可纪。

李瀚致仕 李瀚(1455—1535),字叔渊,号石楼,山西沁水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授乐亭知县,有惠政。迁监察御史。历湖广按察副使、河南布政使、顺天府尹、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入为左副都御史理院事。正德五年(1510)二月迁吏部右侍郎,九月进左侍郎。正德六年正月迁南京户部尚书,十二月二

十一日致仕。嘉靖十四年(1535)七月十二日卒,年八十一。赠太子少保。有《石楼集》。

孙春致仕 孙春(? —1517),字一元,河南尉氏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出任巩昌知府。后擢贵州右参政,广西左右布政使。正德五年(1510)九月迁应天府尹。正德七年二月十六日致仕。正德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卒。

姜洪奏陈除"寇"安民事宜 正德七年(1512)三月初五日,山东左布政使姜洪乞休,奏陈除"寇"安民事宜:用兵之道,主制客,逸待劳,饱待饥。今"贼"一人尝兼马,一日夜驰二三百里,资食于民。而我军所过,续食易马。"贼"闻将至,列营迎战,则"贼"为主,饱而逸;我顾为客,饥而劳。又官军行不设奇,不分兵、不伏险邀击,及至近"贼","贼"乘间去。事之不克,皆由于此。臣闻东来"贼"亦困乏,攻城不得,掠野无资,且南阻黄河,西阻太行,其往复循环,不过西东二路。宜分官军驻扎要道。列营守戍,责以成功。使其东奔西突,不得休息。若官兵不足,山东士兵可集,互为犄角,"贼"可以平。武宗令兵部议行。

魏英致仕 魏英(1460—1518),字士华,号椒古,浙江慈溪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擢监察御史。历任湖广按察副使、江西右布政使、云南左布政使。正德六年(1511)二月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正德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致仕。正德十三年二月卒,年五十九。有《椒古集》。

杨一清谏武宗视政 正德七年(1512)五月十八日,吏部尚书杨一清以修省谏言:陛下每月视朝不过一二,非所以闻于外夷、垂训后世。又常宿豹房,驻宿累日;后苑练兵,鼓炮之声,震骇城市。以宗庙社稷之身,不自慎惜,使群臣所以夙夜不能安。

姜洪逝世 姜洪(? —1512),字希范,号敬斋,直隶广德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卢氏知县,擢监察御史,陈时务八事,弹劾不避权贵,谪夏县知县,迁广西桂林知府、云南左参政、山西右布政使。不附刘瑾,被矫诏罢归。复罚米输边。刘瑾伏诛,起迁山东左布政使。正德七年(1512)四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六月二十二日卒于官。历官清介。天启初谥庄介。

王鼎致仕 王鼎(? —1517),字器之,号新斋,定远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授上饶知县,改乐陵,迁监察御史,升大理丞、少卿,后谪保昌知县,历同知、佥事,入为顺天府尹。正德五年(1510)九月迁右副都御史理院事。正德六年五月迁右都御史。正德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致仕。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卒。有《两台谏草》、《巡吴录》、《新斋杂稿》等。

张凤致仕 张凤(? —1519),江西宜春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授江浦知县,改知新城、长乐、内黄。迁太平知府,谪沂州知州,再升云南知府,以参政署思南知府事。入为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五年(1510)五月升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正德六年二月改抚苏松,十二日擢右副都御史改巡抚山东。正德七年八月初二日致仕,正德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卒。

云南腾冲、金齿地震 正德七年(1512)八月二十九日,腾冲等地震,次日复大震。城楼及官民廨宇多倒塌,死伤不可胜计。既而地裂,涌赤水,田禾尽没。钟楼倒塌,有一山倾为平地,一村民居数十家皆陷没。金齿(今保山)大震有声,城堞官署民居倒坏,死伤甚众。黄坡山下一民居一夕震移田中,举室无知,屋壁不坏。但震压者不可胜数,民无宁居,多于空旷处搭造简易茅舍以避风雨。举人汪诚家人即寄宿菜园中。大震自丑时至申时,次日又震,半年方止。震中烈度(I_0)Ⅱ,震级(M)为六点五级。

赐义子国姓 中官奴卒及市井无赖,若偶得武宗欢心,即收为义子。正德七年(1512)九月二十五日,赐义子一百二十七人皆国姓。其中以永寿伯朱德、都督朱宁、朱安为首,朱国、朱福、朱刚并为都督,朱春、朱翥、朱增、朱斌、朱政、朱海、朱岳、朱升、朱晟、朱彪、朱镛、朱钫并为都指挥使,朱钦等为指挥,朱璋等千百户、镇抚或旗舍,列籍绵衣、腾骧诸卫。而朱采、朱静、朱满、朱恩、朱窥,皆系亡虏,亦官至千户。自后赐姓日广。

京营边军互调操练 太监萧敬传旨:兑调京营、宣府边军,令其往来操习备御。兵部会官议处奏陈。武宗又传旨:调拨往来数额各三千名。兵部又奏:边军赴京防守,京军赴边操练,则更代烦扰,去往疲劳,是无故而常动。数千之兵,不惟虚费粮饷,而且示人以弱。祖宗成宪:京军卫内,不无故外出,恐有四方窥伺之虞;边兵捍外,不以无事而弛备,恐有一旦仓卒之患。乞请徐议兑调。正德七年(1512)十一月十七日,奏入得旨:你们为国至意,我已具悉。可即于宣府调三千人,限十日至京;京营赴宣府备御者,亦如其数,每年春秋更替,人赏银一两。大学士李东阳上言京营、边军兑调十不便。科道官亦交章谏止。武宗不纳。此后四镇兵马团操大内。边将江彬、许泰、张洪、神周号为外四家军,依凭威宠,市里畏避。

李东阳谏止京营边军兑调操练 正德七年(1512)十一月十七日,大学士李东阳疏谏京营、边军兑调操练十不便。他说:京边官军各有分地,有急事方可互相应援,今无事而动,一不便。京军备边,不习

战阵，难保取胜，恐损国威，二不便。边军入京，骇人耳目，传闻各处，未免惊疑，三不便。京军外出，依恃强势，占住房屋，索要钱谷，需索酒食，强买货物，奸污妇女，将官护短而不肯禁，边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边军在内，狎恩恃爱，傲睨军民，蔑视官府，小则怠玩，大则违犯，治之则或不能堪，纵之则愈不可制，五不便。远离乡井，抛弃骨肉，或风气寒暖不相宜，或盘费供给不相继，六不便。粮草之外必用行粮，布花之外必须赏赍，非紧急不得已之时，为糜费无极之计，七不便。往来交替，无所宁息；仓卒之际，或变起于道途；厌倦之余，或隙生于肘腋，八不便。示京营之空虚，现中国之单弱，九不便。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失，咎将谁归？十不便。乞望陛下博采人言，务求至当。武宗不纳。

江彬入京 江彬初为大同游击镇压农民起义，狡黠有力，善骑射。正德七年(1512)十一月，总兵官张俊属下江彬赴调过蓟州，杀一家二十余人，诬称贼寇而得赏。又曾战于淮上，中三矢，其一中面颊，镞从耳出，拔之再战，武宗听后十分称赞。及还军，过京师，江彬由钱宁得武宗召见，武宗见其颊痕说：江彬真勇健！江彬狡黠有力，又善于骑射，在武宗面前大谈兵事，武宗大喜，遂将其与宣府守将许泰留而不遣。擢江彬为都督佥事，出入豹房，与武宗同起卧，宠在钱宁之上。钱宁忌恨。而江彬知钱宁不相容，便借边军以巩固地位，因大赞边军骁悍胜过京营军。

东西两官厅的设立 武宗即位，十二营锐卒仅六〇五百人，稍弱者二万五千余人。正德七年(1512)十一月武宗令边军与京营互调操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兵每次三千人入京操练。立东西两官厅：选团营及勇四镇兵于西官厅操练。元年所选官军操于东官厅。自此，两官厅军为选锋，而十二团营为老家。已而改团营西官厅为"威武团练营"，以江彬、许泰等提督。另择地为团练教场。给事中汪元锡奏言："拓地则扰居民，兴工则费财力。以朝廷自将之军，而江彬等概加提督，则僭名分。"武宗不听。由于当时工作浩繁，边将用事，京营戎政益坏。给事中王良佐奉敕选军，按籍三十八万有奇，而实存不及十四万，中选的仅二万余。此为明代京营之制一小变。武宗逝世，大臣用遗诏名义罢废。

李东阳致仕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迁侍讲、侍讲学士，侍东宫讲官。弘治二年(1489)迁左庶子仍兼侍讲学士。弘治七年，迁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专理撰拟，弘治八年二月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累官至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当刘瑾用事时，东阳潜移默御、保全善类。为文典雅流丽，工篆隶书。自明朝立国以来，宰臣以文章为缙绅领袖者，杨士奇之后，惟东阳一人。正德十一年(1516)七月卒，年七十。赠太师，谥文正。有《燕对录》、《怀麓堂集》、《诗话》等。

江彬得武宗宠信 自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兵入京师，号"外四家"。纵横都市。每团练大内，间以角牴戏。武宗戎服临阅，与江彬联骑而出，铠甲相错，几不可分辨。正德八年(1513)正月十五日，许泰奉命领敢勇营，江彬领神威营。又改太平仓为镇国府，处宣府边兵。建西官厅于奋武营。赐许泰、江彬国姓。后分别迁许、江为都督佥事。江彬荐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神周勇略，并召入豹房，同为义儿。毁积庆、鸣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江彬又兼统四镇兵、武宗领宦竖中善于骑射的为一营，号中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号声达九门。武宗时时检阅，名为"过锦"。

小王子入犯 正德八年(1513)五月初四日，小王子入犯边境。有五千骑入八股泉，三千骑入靖虏墩，六千骑入镇虏墩，五百骑入沙河，三万骑入碌础河，三千骑入灭胡墩，一万骑入净沟，三万骑入怀远墩。骚扰六七日，杀掠三千余人，劫畜产数万，然后遁去。同月十二日，又有五万骑寇大同。自白羊口入，掠平虏、井坪、乾河等处，围总兵叶春、潘浩于黄土岭高山城，不久解围趋朔州，犯马邑。巡抚都御史高友等，乞命将出师追剿。武宗诏令咸宁侯仇钺充总兵官，统京营军六千人，会镇、巡官守御。

仇钺奏陈兵事 正德八年(1513)六月初三日，咸宁侯仇钺奏陈兵事：一、京军之设，专以重内。各边有警，但宜量发，遥为声援。若多而不精，徒费粮赏。乞将听征京军二万人存留操备。二、各边俱有精兵，因无马匹器械，不尽其用，乞予补充。三、补足各省边兵缺员。四、有功赏，有罪罚，两者分明。武宗令兵部议行。而兑调边军，仍不遣还。

申禁有司科敛 给事中张润奏陈：近日有司剥夺军民，多设名色。钱粮则有加耗，词讼则有供明，文移则有打点，倒文则有违误，肆行科敛。宜令抚按官严加禁约，少苏民困，天意可回。疏下都察院议，以张润所言，皆有禁例，但法久弊生，请申明严禁。武宗下诏：申禁有司科敛，违者严惩不贷。

傅珪致仕 傅珪(1459—1515)，字邦瑞，号北潭，保定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与修《会典》、《孝宗实录》，先后升左中允兼编修、左谕德兼侍讲、教庶吉士、充日讲

官。刘瑾借故降其为修撰。后又迁左中允、历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吏部左右侍郎。正德六年(1511)十二月迁礼部尚书。貌类木讷,及当大事,毅然不可夺。正德八年六月十四日致仕,正德十年四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赠太子少保,谥文毅。有《北潭集》、《傅文毅公集》。

江西丰城陨火星如斗　正德八年(1513)六月二十七日,火星陨江西丰城,火起,烧焚房屋三万余间,死三十余人。户部奏陈:火灾异常,乞敕巡按官查核受灾之家,分别赈济。

亦卜剌与小王子相仇杀　亦卜剌原逃窜西海,秃厮与之相合,逼胁洮西属番,屡次入寇。甘肃巡抚张翼不能安抚,致使其逐渐深入,正德八年(1513)六月末,亦卜剌拥众而来,遣使到张翼处,乞边地驻牧修贡。张翼赠以金帛,令远徙。亦卜剌遂西掠乌斯藏,占据西地,与小王子相仇杀。自此之后,洮州、岷州、松潘等处,岁无宁日。

储瓘逝世　储瓘(1457—1513),字静夫,号柴虚,泰州人,九岁能文。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迁郎中,后改京师吏部郎中,评荐贤否务协公论。历任太仆寺少卿、太仆寺卿。正德二年(1507)改右金都御史总南京粮储。升户部左右侍郎,正德五年正月致仕。正德七年春起改南京户部左侍郎。正德八年初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同年七月初十日卒于官,年五十七。淳行清修,介然自守,工于诗文,好推引知名之士。嘉靖初谥文懿。有《柴墟集》。

吐鲁番复据哈密　吐鲁番曾朝贡求真帖木儿,朝廷不予。正德七年(1512)冬始令哈密三都督送真帖木儿西还。至哈密,奄克孛剌欲押留,写亦虎仙、满剌哈三执不可。遂将真帖木儿送至吐鲁番,并以边情诉告满速儿。满速儿素有吞并哈密之志,遂遣使诱哈密忠顺王拜牙郎叛朝廷。拜牙郎淫暴,担心部属害己,企图与恩克孛剌一起赴吐鲁番。恩克孛剌不从,即奔肃州。正德八年(1513)八月拜牙郎叛归吐鲁番。满速儿令头目火者他只丁与写亦虎仙、满剌哈三取金印,守哈密。又令火者马黑等至甘州索赏。满速儿复据哈密之后,日夜聚谋侵甘肃。

王哲逝世　王哲(1457—1513),字思德,吴江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任监察御史,巡按江西,劾太监董让怙恶骄纵。宁王宸濠畏而敛迹。后擢右金都御史巡视江西。正德六年(1511)致仕,八年九月二十日卒,年五十七。

何鉴致仕　何鉴(1442—1521),字世光,号五山,浙江新昌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宜兴知县,迁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出任河南知府,赈贫民,条行荒政十事。成化二十三年(1487)春迁山东参政,历四川左右布政使。弘治六年(1493)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南,改抚山东,召回任刑部侍郎。正德二年(1507)擢南京刑部尚书,参预机务。六年正月召任兵部尚书。八年十一月初五日致仕,十六年八月卒,年九十。

李士实致仕　李士实(? —1519),字若虚,江西南昌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出任按察副使提学浙江。累擢山东左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召任刑部侍郎。弘治五年(1492)十月以右都御史巡抚郧阳。弘治六年十一月召还理南京都察院事,正德七年七月改京师都察院。正德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致仕,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卒。

林廷玉致仕　林廷玉(1454—1532),字粹夫,号南涧,福建侯官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吏科给事中,历工科都给事中。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调南京都察院管事。正德八年(1513)十一月二十二日致仕,嘉靖十一年(1532)卒,年七十九。有《南涧文录》。

张泰逝世　张泰(1452—1513),字世亨,肃宁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邹县知县。迁监察御史,巡视河东盐课,改按苏松。弘治九年(1496)升陕西按察副使,饬洮州、岷州兵备,不久迁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正德元年(1506)迁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次年召为大理卿。忤刘瑾罢归。正德四年起擢刑部左侍郎。正德六年七月升右都御史总制陕西等处军务。正德八年十二月初一日卒于官,年六十二。赠太子少保、刑部尚书。

李贡致仕　李贡(1456—1516),字维正,号舫斋,江西吉水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改刑部升郎中,出任山东按察副使、福建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左布政使。正德四年(1509)五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十月忤刘瑾致仕且罚米。刘瑾伏诛,于正德五年九月起复原官巡抚顺天,兼抚蓟州等处兵备,修通州城,筑古北口边。正德八年七月迁兵部右侍郎。十二月初五日致仕,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一。赠南京工部尚书。有《舫斋集》。

刘缨致仕　刘缨(1442—1523),字与清,号铁柯,苏州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滕县知县,迁监察御史、太仆少卿。弘治十三年(1500)迁右金都御史巡抚四川,兼理松潘军务。予告归家,后起仍巡抚四川。正德二年(1507)改抚湖广。次年二月召为大理寺卿,六月改兵部右侍郎。正德五年正月迁南京刑部

尚书。正德八年十二月初十日致仕。嘉靖二年(1523)二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二。

南京御史疏劾宁王 正德九年(1514)正月初三日,南京十三道御史罗凤等人联名上疏说:宁王朱宸濠,交通刘瑾,请复护卫,日渐骄恣,掊克富室,侵夺良田,淫刑酷法,动至灭族。自省城南昌以至乡村,凡利所在,百计索取。以致商旅不敢出入,舟楫不敢停泊。民之受害,不可胜言。抚、按、三司受其利,宁负君恩,不予过向。请令宁王改过自新,不得干预有司之事。并令江西百姓,凡被王府侵占田产房舍者,俱准上诉查明,本省镇、巡、三司各官不得接受宁王贿赂,王府人役有生事扰民者,执治其罪,以消后患。武宗不理。

吏部考察官员 正德九年(1514)正月十六日,吏部会都察院考察天下诸司官员,革职、罢免、降调布政使、按察使、寺卿等官,计二千八百八十六人。

乾清宫发生火灾 武宗每年以张灯为乐,所费以数万计。正德九年(1514),宁王为讨武宗欢心,献灯宫廷,别出心裁,奇巧异常。武宗令送灯者入宫悬挂,皆附柱壁、以取新异。武宗观灯作乐,又令人于庭轩间依栏设毡房,贮火药其中,同年正月十六日因不慎起火,延烧宫殿,乾清宫以内皆为灰烬。时武宗往豹房,回顾光焰烛天,居然大笑,说是一棚大烟火。至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工部奏言:重建乾清宫需费银一百万两,请于南、北直隶及天下各府州县加赋于民,每年征收十分之二。因工程紧急,恐征解不及时,暂借内府银五十万应用。武宗不允,令于一年内征齐。自此催征无休止,天下骚然。

诸臣疏谏武宗急罢弊政 正德九年(1514)正月十八日,武宗出奉天门视朝,撤宝座不设,下诏罪己,并令文武百官同加修省。于是诸臣相继上疏,请武宗速罢弊政。正月十九日,大学士杨廷和等以宫灾自劾,要求去职谢政,另选贤能。同时恳请武宗:祖宗创业之艰难,不要辜负天下万民的希望,日理朝政,接见群臣,大开言路以达下情,遣还边兵以防外患,革禁中市肆以肃内,令出西僧于外以绝异端,罢皇店之设以通商贾,停不急之工以纾民力,减免各处织造以省民财。任用正直忠良之士,亲信老成持重之人,日夜勤求治理。二月初十日,南京礼部尚书乔宇等人疏请黜义子,逐番僧,斥优伶,罢皇店,还边兵,停止京师土木之役,撤回南京织造官。疏呈上,武宗多置之不理。

张遇致仕 张遇(?—1518),河南项城县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潞城知县,历南京监察御史、湖广按察司副使,浙江按察使,山东布政使。顺天府尹。进工部右侍郎,总理易州山厂。张遇为人庸鄙无才能而善缘势,在山厂侵牟无厌。改为户部右侍郎,提督仓场。未即任,于正德九年(1514)正月二十七日致仕。正德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卒。

武宗始微行观乐 武宗不理朝政,长夜纵饮,近幸钱宁、张锐、张雄每日导其游宴。为避免引起外人注意,从正德九年(1514)二月初六日开始,武宗即微服以行,夜至教坊司观乐。

增设总制陕西等处军务大臣 陕西三边总制,时设时辍。正德九年(1514)二月初七日,因小王子等部不断率众犯边,诸番部落受侵扰,往往移居甘肃城外,致使居民惊窜,耕牧皆废。廷议请悦增设陕西等处大臣。武宗允准,以兵部右侍郎邓璋为右副都御史,总制陕西、延绥、甘肃、宁夏等处军务大臣。

刘机致仕 刘机(?—1522),字世衡,北直隶大兴县(今北京大兴)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改庶吉士。正德中,累官至吏部尚书,被论归里。后复起为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书,参与机务。正德九年(1514)三月二十七日致仕。嘉靖元年(1522)卒。

江西陈九起事 江西临川陈九,集众起事,据山为险,称王八年。至正德九年(1514)春,江西巡抚俞谏命将进剿,陈九等人失败被害,官军俘斩其众一千七百余人。

武宗诏复徽王庄田 正德九年(1514)四月初三日,武宗准复徽王河南彰德卫庄田二百三十余顷。

武宗诏复宁王护卫及屯田 宁王护卫,于天顺间革除,改为南昌左卫。正德二年(1507),宁王贿刘瑾得复。正德五年八月刘瑾被杀,宁王护卫亦再次革除。至正德九年三月,宁王朱宸濠致书兵部尚书陆完,要求恢复护卫和屯田,又派人挟金钜万遍赂诸要人,属近幸钱宁为内援。四月初四日,武宗下诏从其请。廷臣纷纷上疏谏止,力言不可,陆完从中极力庇护宁王,武宗亦不听劝阻。同年六月初一日,宁王又奏请铸造护卫及经历、镇抚司、千、百户所印,凡五十八颗,武宗亦准。于是宁王益自恣,遣承奉刘吉等人招收江湖大盗杨清、李甫、王儒等一百余人入府,号曰"把势"。

宁王朱宸濠请痛惩宗室横暴 正德九年(1514)八月初三日,宁王又奏言:近来宗枝日繁,多以选用仪宾、点校、校尉为由,巧索民财,肆其横暴。请降旨痛惩前弊。其有怙恶不悛者,许臣击治。兵部尚书陆完等人称赞宁王忠勤,请如奏戒敕榜谕,及许宁王并治其不法者。于是武宗下诏嘉纳,并通令各省巡抚一体禁约。

廖堂进毡帽 传旨按式样尺寸大小令镇守陕

西太监廖堂和巡抚陈寿制造毡幄，供武宗皇帝使用。重门、堂屋、庖湢、户牖，无不一应俱全。至正德九年（1514）九月初四日，廖堂遂进上用铺花毡幄一百六十二间。自此，武宗每次外出郊祀，皆陈设幄幕，不再住斋宫。廖堂借制造毡幄之机，任意朘削，得银数万两，欲贿赂权幸。而陈寿则会所司留作备荒，廖堂恨之，阴谋倾害。不久，陈寿调为南京兵部侍郎。

王寅致仕　王寅（1458—1514），字敬夫，号敬斋，北直隶容城县（今河北容城）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历任大理寺右评事、大理寺副、福建按察司佥事、陕西副使、广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使、太仆寺卿。进工部右侍郎，专理易州山厂。改户部右侍郎，迁刑部右侍郎。正德九年（1514）九月初八日，因病致仕，为人驯谨笃实，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七。

王思指斥武宗荒志废业　正德九年（1514）九月十一日，武宗狎虎受伤，一个多月不视朝。翰林院编修王思为此疏言：孝宗皇帝子惟陛下一人，当为天下万世自重。臣闻陛下狎虎被伤，且骇且惧。陛下即位九年来，不勤理朝政，不亲拜祖宗，不向两宫问安，经筵懒于听讲。究其原因有二：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由是戒惧之心日忘，纵恣之欲日进，好恶由之喜怒，政令出于多门，纲纪积弛，国是不立。荒志废业，唯酒为甚。陛下露处外宫，日湎于酒，厮养杂侍，禁卫不严。即使不幸仓猝生变，何以备之？此臣所以为陛下大为忧虑。疏呈入，留中数日。后来忽然降旨，将王思贬为三河驿丞。

李中请毁佛寺逐番僧　正德九年（1514）十月初五日，刑部主事李中上言：以往刘瑾窃弄威柄，祸国殃民，陛下悟而诛之，天下无不盛赞陛下英明。为何今日大权未收，东宫未立，义子未革，纪纲日弛，风俗日坏，小人日进，君子日退，士气日靡，言路日闭，名器日轻，贿赂日行，礼乐日废，刑罚日滥。民财日穷，军政日敝。刘瑾已诛，而善治一无可举，盖因陛下惑于异端，在禁城深宫之内，盛行异教，于西华门豹房之地建护国佛寺，延进番僧，日与相处，忠言日远，邪说日滋。请陛下毁佛寺，逐番僧，以谨华夷大防；又妙选儒臣，朝夕进讲，则以上诸弊，可以相继尽除。武宗不理。不久，李中被贬为广东驿丞。

夏昂逝世　夏昂（1449—1514），字景德，号懋齐，南直隶吴县（今江苏吴县）人，占籍顺天府宛平县。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工科给事中，升右给事中，历礼科左、右给事中、湖广右参议、福建右参政、江西左、右布政使、南京太仆寺卿。进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迁工部左侍郎。为人醇谨刚直，居官以廉著称。正德九年（1514）十月十三日卒于官，年六十六。

张原疏言时政　正德九年（1514）十月二十九日，吏科给事中张原为官未数月，即上疏极论时事得失，请汰冗食、慎兴土木、禁绝进贡、明信赏罚、广开言路，修德善治。张原借往事奏扰，贬为贵州新添驿丞。

宫内操练　正德九年（1514）十一月初二日，明武宗命兵部选团营官军六千人，分为前、后两营与勇士并四卫营，每营各三千人，由右都督张洪、都指挥桂勇、贾鉴、李隆分别监领，在西官厅进行操练。张洪领勇士营，桂勇领前营、贾鉴领后营，李隆领四卫营。正德十年正月十七日，大学士杨廷和等人上疏谏阻武宗在宫内操练营军，请严官卫之防，以消灭祸变。同月二十二日，吏部尚书杨一清等言：以禁密之地为攻战之场，意外之虑，不可不防。武宗一概置之不理。

林廷选致仕　林廷选（1450—1526），字舜举，号竹田，福建长乐县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授苏州府推官，治狱有绩，升监察御史，出按广西，以战功进为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因病久治不愈，正德九年（1514）十一月十八日致仕。嘉靖五年（1526）卒，年七十七。有《竹田集》。

田景贤致仕　田景贤（1446—1519），字宗儒，号西郭，北直隶涿州（今河北涿县）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历户科给事中、通政参议，官至礼部尚书。时刘瑾窃弄权柄，陷害大臣，田景贤刚正自持，不阿权贵。后加太子少保，署太常寺事。正德九年（1514）十二月二十六日因病谢职。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四。景贤居官四十余载，廉谨如一日，死时至无资治丧，时人颇称其清贫。

户部奏报正德九年全国皇庄顷亩　正德九年（1514），全国皇庄占地计三万七千五百余顷，其中多数分布在北直隶的京畿地区。

戴冠请裁革冗费　正德十年（1515）三月二十六日，户部主事戴冠上疏劝谏：古人理财，务去冗食。近年京师势要之家，子弟僮仆多冒名报功；锦衣如林，多至万余人；入籍勇士，投充监局匠役，又不可胜数。此辈皆为国家柱虫。每年额运漕粮四百万石，近来水旱相继，所入及不如从前，而每年支出却大于从前，计此辈所耗已占去收入的三分之一。陛下为何忍心以万民膏血养此无用之辈？兵贵精不贵多，边军生长边上，知兵习战，足以守御，而今每有战事俱发京军。又宣府入京操练之军，屡经廷臣奏请，仍不遣还。不知陛下何乐于边军而不为边塞的安危着想？没收

刘瑾的家产百万计，不归有司，而归入豹房为私财，天下藏富于民，岂能有私，请尽付给有司以助军需。武宗见疏大怒，下令将戴冠贬为广东乌石驿丞。

张懋病死 张懋(1441—1515)，河南祥符县(今河南开封)人，英国公张辅之子。九岁嗣爵，善骑射，历掌营府，累加至太师。成化、弘治间，曾上言边事，又请免织造。正德中，率文武大臣谏武宗勿与群小狎戏，言皆耿直。然性豪侈，朘削军士，言官多次上疏弹劾，武宗俱置之不问。张懋嗣爵六十六年，握兵权四十年，而生前未尝临阵作战，坐享爵禄，尊宠为勋臣之冠。正德十年(1515)三月二十九日卒，年七十五，赠宁阳王，谥恭靖。

张潒致仕 张潒(1462—1519)，字仲湜，号泾川、广西平南县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侍读，侍讲学士，累官至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为官刚正廉介，不阿权贵，临事明决。正德十年(1515)闰四月初十日退休，以德高望重，为士论所推先，加太子少傅。正德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卒，年五十八。

安金请厉禁奢靡 正德十年(1515)闰四月二十六日，兵科都给事中安金奏：京师为四方表率，近年俗尚太奢，宴会丰盛，居室宏丽，锦锈珠玉下饰于倡优，庵院祷祠遍于民里，请严加厉禁。时值南京吏部郎中欧阳诰奏请续增《问刑条例》。于是礼部请将禁止奢俗载入《问刑条例》，通令天下遵行。武宗诏准。其时有大臣设宴请近幸钱宁，一席费银千两者。盖风俗之坏，自上倡导，虽 有令禁奢，徒为空文而已。

云南鹤庆、赵州、永宁卫地震 正德十年(1515)五月初六日，云南鹤庆府(今鹤庆)、赵州(今凤仪)、永宁卫(今永胜)地震。赵州、永宁卫黑气如雾，地裂水涌，倒塌城垣官廨民居不可胜计，死者数千人，伤者倍之。鹤庆府更甚，府治、正堂、经历司、照磨所，中明、旌善二亭，知府、同知等诸厅舍，儒学、玄化寺及正德二年新建的尊经阁等，官民庐舍，倒塌殆尽，北胜州州城，洪武二十九年用砖石砌成，周围五里三分，高一丈六尺，城脚厚五尺，垛口厚一尺八寸，四门各建城楼一座，俱皆塌倒。丽江府民居倒塌一半。剑川州儒学、庙宇两庑、明伦堂，倾斜倒塌。先是，正德九年五月初六日，太和(今大理)曾发生六点二五级大地震，城廓室庐仆鞩无算，城中有千寻等三塔，俱裂开二尺许的大缝，但旬日再震后裂缝复合，儒学、庙学倒塌。此次鹤庆府等地震，波及蒙化府、姚安府、景东府、云南府、丽江府、大理府及武定州等府州县。连震二、三十次，逾月不止。至九月间，太和又发生六级地震，屋墙尽塌，压死数百人，日每一震，逾旬始宁。鹤庆地震，震中烈度(I_0)Ⅸ，震级(M)为七级。

欧阳旦逝世 欧阳旦(？—1515)，字子相，江西安福县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授休宁县令，升监察御史，历湖广按察司佥事、浙江副使，布政司参政、左、右布政使、进应天府尹，终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为人纯谨，有文名。在湖广、浙江提督学政以宽厚得士心。入仕三十余年，贬议不及其身。知恩报德，乡里重之。正德十年(1515)五月十五日卒。

程启充请严查军职买功冒功诸弊 正德十年(1515)七月初七日，监察御史程启充奏：我朝军职授官，悉以首级为准，载在《会典》。今承平日久，幸门渐开，有买功、冒功、寄名、窜名、并功之弊。权要之家以厚金私赂军人，易其首级，是谓买功。甲冲锋斩获，而乙取之，甚至杀内附平民以为贼，是谓冒功。身在家庭，名隶行伍，是谓寄名。贿赂吏胥洗补文册，是谓窜名。一人之身，一日之间所在获功，甘肃、辽东、宣府、大同、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相去数千里，不出门皆报功计级，骤升显贵，是谓并功。请令兵部逐一清查核实，其已援例升职者，具奏递革。以重名器，振纪纲。兵部议复，武宗下诏不必更议，只如旧行。时爵赏极滥，权要诸家以为互市，疏远弟侄且下至厮养家奴亦皆冒授。此皆为前所未闻。

徐九龄起事 江西建昌县徐九龄聚众起事，出没江湖三十余年，转战江西、湖广、南直隶三省，先后攻打过蕲州、黄州、德安、鄱阳、湖口、九江以及安庆、池州、太平等地。正德十年(1515)七月初十日，巡抚江西都御史俞谏等人督兵讨平，前后擒斩徐九龄等四百八十一人，俘获一百四十一人。

重修太素殿竣工 太素殿，初甚质朴，顶盖茅草。后命工部重修，正德十年(1515)七月十四日工成，务极华侈。总计用银二十余万两，动用军匠三千余人，每年支工米一万三千余石。食盐三万四千余斤。其他俘费以及续添工程又不在此数。是时工役繁兴，禁中自乾清宫大役之外，如御马监、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皆一概更新。工部每每循例执奏，以掩人耳目，其实皆具文而已。内外因缘为利，权奸、奄人所建庄园、祠墓以及香火寺观，皆由工部官银。一时木妖土灾，不堪忍言。

小王子大举犯固原 小王子，先于正德十年(1515)正月出兵犯潮河川(今北京密云东北)。至八月十二日，又以十万余骑自花马池入固原(今宁夏固原)，联营七十余里，肆行劫杀，城堡为之一空。

柴升致仕 柴升(？—1523)，字公照，河南内

乡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工科给事中,历广东布政使。正德中,进为吏部侍郎,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上疏请裁抑中贵,不被采纳,正德十年(1515)十月十五日遂致仕归,为官清廉。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十七日卒,赠太子少保。

武宗遣使往乌思藏迎"活佛" 武宗听左右说西域胡僧能知三生事,人称之为"活佛"。欣然欲一见"活佛",遂命查找永乐、宣德年间侯显入番故事。并于正德十年(1515)十一月二十七日命司礼监太监刘允往乌思藏迎"活佛"入京。内阁大臣梁储等人为此专疏劝谏,祖宗时虽曾遣使西番,盖因天下初定,籍以化导其民,镇抚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承平之后,只因其来贡,厚加赏赐,未曾轻辱命使,远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幡,朝野莫不骇愕。而刘允奏讨盐引至数万,动拨快马船至百艘,又许其便宜处置钱物,势必携带私盐,骚扰邮传,为官民之患。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数万里路,道途绝无邮置,人马如何安顿!假使中途遇寇,如何抵御?亏中国之体,纳外番之侮,无一可取。武仍不听。礼部尚书毛纪等人亦上疏切谏,武宗仍不听。刘允启程时,以珠琲为宝幡,黄金为供具,赐其僧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以钜万计。令刘允往返以十年为期限,所携茶、盐以数千万计。刘允至临淄时,因其队伍庞大,运粮入京的漕船为此受阻不得行。总督漕运丛兰往见,刘允不见,而令人索取船五百余艘,役夫成万余人。丛兰驰疏极陈其害,不予理采。及刘允一行入峡江,船大难进,改用小船,相连二百余里。至成都,有司为其造新馆,旬日而工成。日支官粮一百石、蔬菜银一百两,锦官驿一驿不足供,取旁近数十驿。又置办入番物料计银二十万两,经地方官力争,减至十三万两,派人杂造,日夜不休。刘允等在成都住了一年多,始率四川指挥千户十人,甲士一千人往西,两个月后至乌思藏。番僧"佛子",恐中国诱害,不肯出。刘允部下皆怒而欲胁以威;番人夜袭刘允一行,抢夺宝货器械而去。军职死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居半,刘允本人乘马疾走得免。刘允回到成都,告戒部下不得言败事,空函驰奏请归,则武宗已死。

胡富致仕 胡富(1445—1522),字永年,南直隶绩溪县(今安徽绩溪)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南京大理评事。弘治初,官福建佥事,平反狱四二百余人。后历山东佥事,迁广东副使,招民耕牧荒田三千余顷,进陕西左、右布政使。正德初,入为顺天府尹。正德三年(1508),进南京大理寺卿,升南京户部右侍郎。正德七年命为南京户部尚书。正德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引年归里。居官四十余年,遇事敢为,力除宿弊,始终如一,士论敬重。嘉靖元年(1522)四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少保,谥康惠。有《龙峰集》。

元旦贺礼大乱 正德十一年(1516)正月初一元旦,群臣早早入朝祝贺元旦,而武宗则至酉刻才到奉天殿。及贺礼结束,时已深夜。揖腹之众,竟相奔趋回家,前踏后蹂,互相蹂践。右将军赵郎竟死禁门,其他臣僚或失簪笏,或毁冠裳,丑态百出,至有相慰以得生为幸。而在午门左右,吏找其官、子呼其父,仆救其主,喧闹如市,声彻殿宇。正月初六日,浙江道御史程启充为此上言,请武宗以古代帝王为榜样,昧爽而起,勤于视朝,屏绝游宴。此后,大学士梁储等人亦多次上疏,请武宗自今为始,率循旧规,早朝听政。武宗俱置之不理。

王良佐请裁新增杂役 正德十一年(1516)正月初七日,给事中王良佐言:京储匮乏,皆由于冗食多,请通查食粮人役,分别旧额、新收、老幼、废疾之数,而尽裁其不堪者。如杂用供役缺人,宜月给工食银六钱。按户部所奏,弘治末年每月食粮之数,大约二十五万七千五百余石。今每月增加七万二千五百石,以一年计算,共增加八十余万石。冗食渐增何以至此。疏下兵部议处,兵部说:锦衣卫旧额军匠三万八千四百四十七人。正德以来,刘瑾变乱,增至四万一千二百九十四人。杂役又增一万零三人。其新增者,俱宜裁革,折支银数亦宜如王良佐所言。武宗下诏说:新增军匠免予裁革,以后不许再增,杂役月粮每月折银四钱。不久,兵部复议,若新增军匠每月支粮五斗,亦可少革诈冒,而省国储。内批:仍照前旨,月粮每石折银五钱,银、米间月支给。

武宗准商人开卖河东盐课 正德十一年(1516)正月十六日,商人梁相等奏请开卖河东余盐。诏从其奏。户部说:山西地瘠民贫,用繁赋重,禄米、俸粮供应不敷,皆赖盐利补助。若从梁相等人所奏,则利归私人,贻害不小。梁相等人倚奸罔利,宜置之法。武宗不听。

王云凤致仕 王云凤(1465—1516),字应韶,号虎谷,山西和顺县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礼部主事,历郎中,劾太监李广,被贬为陕州知州。李广失败,王云凤起为陕西提学副使,任山东按察使,升国子祭酒。正德五年(1510)八月,改为南京通政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再改清理两浙、福建盐法。正德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因病致仕。博学力行,居无懒容,俨然终日,与尚书王琼、乔宇并称为河东"三凤"。俱为名臣。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卒,年五十二。有《博趣斋稿》。

黄重奏言官吏迁转事宜 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十三日,户科给事中黄重言四事:两京大臣迁转太快,当重名器;在外司府州县升调不常,当久任用。巡抚、巡按官论荐失实,当慎考核;抽分衙门,诛求太滥,当省征课。

程启充疏请罢革冗官冗兵冗食 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十四日,吏部复御史程启充奏。程说冗官冗兵冗费三者,縻费不可纪极。官之冗,如户、工二部有十侍郎,鸿胪寺有六寺丞,太医院有四通政、三院使、十二判官、二十五吏目。其他卫所、局院传请者不能悉数。请纳臣之言,通行黜革,以苏国用。武宗不听。

武宗准许山西二王府岁禄折银 起初,山西各王府郡王以下禄米,按例以三分之二折银,三分之一给米。其时,庆成和永和二个王府多所克取,民以纳米为苦。刑部侍郎张纶等奉命前去讯问二府狱情,证明情况属实,回京后即上疏请令二府每年禄米俱折为银。经户部商议,同意张纶等人的意见。正德十一年(1516)四月初八日,户部奏请庆成、永和二府岁禄一律折银,其余郡王及将军、中尉仍按旧例支取。武宗诏从部议。

李贡逝世 李贡(1456—1516),字惟正,号舫斋,南直隶芜湖县(今安徽芜湖)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历刑部员外郎、郎中、山东按察司副使、福建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进山西左布政使,令郡邑置立民膏簿,出入有稽,费省民裕。后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因事逆刘瑾,被勒令致仕。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死,李贡复官,令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诸府,增修通州城,筑古北口诸处堡垒。召为兵部右侍郎,力求归里而去。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一。李贡学问渊博,为事勤慎精敏,居官所至称治。有《舫斋集》。

录用自宫男子充海户 正德十一年(1516)五月二十四日,收自宫男子三千四百六十人充海户,每人每月给米三斗。时无票帖不录用者尚有数千人,到礼部门前要求录用。武宗下令:尽逐出送归原籍,再至京奏扰者治罪。

武宗遣太监往苏杭织造纱罗纻丝 正德十一年(1516)六月初七日,明武宗不顾江南民力不济,遣尚衣监太监浦智往苏、杭等处织造纱罗纻丝一万六千七百余匹。工部奏言:浙直两地连年兵荒,请裁减其数,或者每十年五运,以苏民困。武宗不从。令如数织造解运。

李充嗣请禁太监假进贡以扰民 正德十一年(1516)七月初十日,河南巡抚李充嗣奏:近来镇守太监进贡,有古铜器、窑变盆、黄鹰、角鹰、锦鸡、猎犬、羔羊皮之类,皆假名科敛,为己行私取财。此外,又有拜见银、须知银、图本银、税课司银、以及椿草、马价、甲夫、河夫等银,动以数十万计。而左右随从,卖马,卖布,卖纸钞铺陈,又沿途抽索客货,其弊甚多。请行禁止以甦民困。武宗降旨:进贡如旧不变,但不许下人假名科取。河南自从太监廖堂依附刘瑾,假以进贡为名,巧立名色之后,无名之征已经花样百出。其后继位者皆以为常,依然科敛剥削,始终不能禁止。武宗下诏亦无济于事。

公勉仁逝世 公勉仁(?—1516),字尚德,山东蒙阴县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行人,升江西道监察御史,历太仆寺少卿,以逆刘瑾被逮下锦衣卫狱。其后历盐运司同知、四川布政司参议、四川按察司副使、按察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移抚南赣,改为郧阳巡抚。到位不久,于正德十一年(1516)七月十五日卒于官。

小王子寇宣府 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初四日,小王子出动六万骑兵骚扰宣府,攻破城堡二十、杀掠人口三千七百四十九人、畜产三千四百余头。明军都指挥朱春、指挥王唐等人战死。

陈天祥逝世 陈天祥(?—1516),字元吉,南直隶吴江县(今江苏吴江)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青州府推官,升御史。迁陕西西安知府,有治绩,民立生祠祀之。进山东按察副使,整顿天津兵备,镇压刘六、刘七农民起义,进太仆少卿。再进左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军务,讨平苗民起事,进左副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不久,奉命理闽浙盐政,道经吴江,于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二十六日卒于家。赠南京兵部右侍郎。

杨茂元逝世 杨茂元(1450—1516),字志仁,号麟洲,浙江鄞县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湖广副使、山东副使。弘治中,因疏劾太监李兴,被贬为长沙府同知。不久,去官归里。复起为安庆府知府,升广西右参政、云南左、右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改南京都察院,终刑部右侍郎。杨茂元遇事敢言,不媚权贵。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七。有《麟洲存稿》。

徐节逝世 徐节(?—1516),字时中,其先南直隶绩溪县(今安徽绩溪)人,占籍贵州卫(一说浙江寿昌县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授内乡县知县,有政绩,升监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权要,上疏劾锦衣卫指挥牛循不法罪,力攻大学士万安,风裁凛然,毫不畏惧。弘治改元,官太平府知府,进云南右参政。弘治十六年(1503),调为广西布政使,次年转广东左布

政使。正德元年(1506)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以事逆刘瑾,被夺官归家。后复职,致仕。徐节居官甚廉谨,不忍扰民。正德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卒。

蓝章致仕 蓝章,生卒年不详,字文绣,山东即墨县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历官御史、右佥都御史,逆刘瑾,被贬为抚州通判。刘瑾伏诛,蓝章复官为陕西巡抚,改清理两淮盐法,终南京刑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正德十一年(1516)十二月十五,谢职归里。

王宸致仕 王宸(?—1520),字具赡,其先河南郏县人,因从军入籍于北直隶真定。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吏科给事中。时辽东守臣妄杀夷人冒功,王宸奉命往案,予以惩办。未几,迁刑科左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正德三年(1508),改吏科都给事中。正德四年,升光禄寺少卿。正德五年,转为南京太常少卿。正德七年升南京光禄寺卿。正德十年进为应天府府尹。正德十一年致仕。正德十五年十月三十日卒。

葡萄牙使节首次来华 正德十一年(1516)葡萄牙使臣斐罗特罗首次来华。

《草木子》刊行 《草木子》四卷,叶子奇撰。子奇,字世杰,号静斋,浙江龙泉人,是元末的著名学者,明初做过巴陵县主簿。本书写於洪武十一年(1378),正德十一年(1516)由他裔孙叶溥刊行。原稿分为二十二篇,刊行时并为八篇、四卷。内容十分广泛,从天文律历,时政得失到兵荒灾乱等都有涉及、对动植物的形态,也广为搜罗。对元末农民起义史迹,记载最为详尽,多是其他书中不曾述及的,也透露了一些元朝的腐朽和经济情况,是研究元末明初史实的重要资料。

武宗游猎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初二日,武宗告谕内阁、府、部大臣以及科、道官:正月十三日南郊祀礼完毕,将赴南海子观猎。于是大学士梁储等人上疏谏言:朝廷至大至重之事,莫过于郊祀。今祀礼未举而先有意于游猎,可见精诚已分。祖宗一百五十余年以来,未闻有此举动。继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大理寺等衙门亦陆续上疏谏止,而武宗终不省悟。正月十三日,南郊祀礼完毕,武宗遂游猎于南海子。文武诸臣在后紧追至南海子时,大门关闭,诸臣不得入内。至申时始传旨,令诸臣先还朝,在承天门等候。而武宗则至夜里才至奉天殿接受群臣行庆成礼。次日,以所猎禽兽分赐府、部、翰林以及五品以上科、道官。

王守仁推行"十家牌法"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十六日,王守仁行抵赣州,设立巡抚衙门,选练民兵,行十家牌法。其法仿保甲之制,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遇有面目生疏之人、形迹可疑之事,马上报告官府究治明白。如有隐匿不报,十家连坐。同时,王守仁又以连年征调狼兵、土军,动经岁月,縻费过万,有损无益,便召集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之兵,选其骁勇敢战者,每省或五六百人,或四五百人,分队统领,责之分兵备官。

奏请撤还织造中官 正德十二年(1517)二月初四日,给事中任忠奉使陕西,传闻有张太监来采办进贡诸物。遂奏陈:陕西地瘠民贫,衣食无计,况沿边郡县屡遭寇掠,耕牧久废。其腹地又因连年调集士马,转运粮草,亦皆疲敝。米麦无收、民多逃窜流移,十室九空。近来复遣太监往监织造,费动数万,催督峻急,民不堪命。请收回成命,以固邦本。武宗不理。三月二十三日,陕西镇、巡官再以织造为苦,上疏请将两淮、浙江、四川、河东盐课充陕西织造之用。武宗无奈,只好从其请。

加征"白粮" 正德十二年(1517)二月二十二日,内府供用库奏:新添火者五千零三十余人,计增白熟粳米二万四千一百四十八石,请暂于太仓支给一年,仍下嘉兴、湖州等府于岁额加征如所增之数。武宗允准。

文森致仕 文森(1462—1525),字宗严,南直隶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历庆云、郓城二县县令、御史、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十年(1515),进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因病未赴任。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奏准致仕,嘉靖四年(1525年)卒于家,年六十四。有《中丞集》。

魏英逝世 魏英(1459—1517),字士华,号赧古,浙江慈溪县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历官御史、湖广按察副使、江西右布政使,终巡抚贵州右副都御史。致仕归。正德十二年(1517)三月初二日卒,年五十九。有《赧古集》。

丁凤逝世 丁凤(?—1517),字应韶,北直隶蠡县(今河北蠡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鸿胪寺丞、少卿、南京鸿胪寺卿、应天府尹。进右副都御史,总理南京粮储。召入为通政使,官至兵部右侍郎。以病致仕,正德十二年(1517)三月十七日至家而卒,赠右都御史。

靳贵致仕 靳贵(1464—1520),字充道,号戒庵,南直隶丹徒县(今江苏丹徒)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编修。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刘瑾擅权于政时,靳贵被调为光禄寺卿。后复原官,进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在朝侃侃敢言,略无顾忌。主持

科举考试，崇雅斥浮。但在内阁三年，无所建树。正德十二年(1517)四月初七日，为言官所劾，遂要求乞休，诏准。正德十五年八月初七日卒，年五十七，赠太傅，谥文僖。有《戒庵文集》。

汪珊建言边务事宜 正德十二年(1517)四月十七日，南京御史汪珊建言边务五事：一，任边将。公选将材，不以名求，不可贿进。二，复总制。以材堪重任之人为陕西三边总制，朝廷可无西北之忧。三，重禁军。今各边有事，往往出动禁军，及其临敌不过帐前自卫而已，未闻用之摧锋陷阵，以收克敌之功。边军自足为用，只是其精锐多被私人占用，且逃亡数多，请遣官查核补充如原有之数，则禁军可不必出征。四，简内臣。国初内臣之设，自有定制，未闻参与军机於千里之外。今三边要地皆遣内臣监军，将官惧其积威，军士受其剥削，王法不行，军威不振，临敌挫败，宜择其谨密能干者量留数人。其生事害人者听抚、按官纠举，则将士之气可振。五，实边储。今各边粮储多被势豪牵制，以虚数收受侵渔其利，清查之官亦虚应故事。加以连年旱、蝗为灾，仓库空虚。请从宜计处，革除弊端，务必使将士免于饥寒，用命驱敌。武宗不理。

阎顺奏宁王宸濠谋反事 正德十二年(1517)五月初四日，江西宁王府典宝副阎顺，典膳正陈宣等人，潜入京师，告宁王朱宸濠的亲信典宝正涂钦与致仕都御史李士实、都指挥葛江等共谋不轨，挖池造船，掠死良民，逼夺财产，烧毁民房。请令法司派员调查惩治。不久，宁王反诬奏阎顺等人背义私逃。武宗竟令将阎顺等人各杖五十，发孝陵卫种蔬。时内外权贵皆受宸濠贿赂，虽有人上告其图谋背叛朝廷，皆置之不问。

来华外船税银的征收 两广居民私通番货，勾引外国人，与其进贡船只相混图利，招诱亡命之徒，收买子女，出没纵横，民受其害。广东参议陈伯献遂请禁治。其应供番夷，不依规定年份，亦令阻止入境。至正德十二年(1517)五月二十七日，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巧办兴利，上疏请征收来华外船税银。广东抚、按官以及户部以为可行。于是命番国进贡并装货船舶征收十分之一税银，解京及存留为军饷者，俱如旧例，勿执近例阻止。后不数年即发生佛朗机入侵挑衅，为守御之计，每年造船铸枪，所费无数，而应供番夷皆以佛朗机而一概阻绝，舶货不通。

王守仁镇压大帽山农民起义军 福建大帽山农民起义军万余人在詹师富的带领下，以南靖县等地山寨为据点，坚持斗争达十余年。正德十二年(1517)五月，南赣、汀、漳巡抚王守仁，调集大军，并亲自统率精税部队入福建上杭县，以计连破四十余寨。詹师富被俘遇害，部众被俘斩七千余人，散去者四千余人，起义失败。

李浩致仕 李浩(1456—1540)，字师孟，号尚庄，山西曲沃县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有才干，议论侃侃，刚劲不屈。历兵部员外郎时赴京畿地区清理土地，凡势要侵占民田者悉夺回归民。为顺天府尹时，敢抗强权。是时刘瑾把持朝政，巧立名目，百端科敛，李浩一切予以裁抑。后累官至署通政司事礼部尚书。正德十二年(1517年)六月十八日致仕。嘉靖十九年(1540)五月初三日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谥庄简。有《尚庄稿》、《归田集》。

徐俌逝世 徐俌(1450—1517)，字公辅，凤阳人，徐达五世孙，成化元年(1465)袭爵。成化十五年，奉孝陵岁祀，掌南京左军都督府事。弘治九年(1496)，掌中军都督府事，守备南京。弘治十三年辞解任，获准许，加太子太傅。正德六年(1511)，仍奉命守备南京。徐俌先后历官数十年，性最孝，持身廉慎。对权贵，气刚严，不少抑，见者莫不畏惮。正德十二年七月十二日病卒于官。年六十八。赠太傅，谥庄靖。

王守仁更定江西兵制 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十六日，武宗命巡抚南赣、汀(州)、漳(州)左佥都御史王守仁提督军务，给符印，便宜行事。守仁遂更定兵制：以二十五人为一伍，伍有小甲；二伍为一队，队有总甲；以四甲为一哨，哨有哨长，以二协哨为其助手；二哨为一营，营有营官，以二参谋为其助手；以三营为一阵，阵有偏将；以二阵为一军，军有副将，皆临事委派，不由朝廷任命，副将以下得递相罚治。

大庾农民起义军失败 江西大庾(今江西大余)农民起义军，在陈曰能的带领下以山寨为据点，在十多年间队伍迅速发展，声势益振。并与横水、左溪、桶冈三寨(今江西崇义)农民起义军首领谢志山、蓝天凤以及浰头寨(今广东和平)农民起义军首领池仲容互相呼应，彼此配合。巡抚南赣等处左佥都御史兼提督军务王守仁以招抚、进剿对付农民起义军。从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十七日始，焚烧攻陷农民起义军十九个山寨，陈曰能不幸被俘，起义军五百六十余人战死。

武宗微行赴宣府 武宗不顾廷臣切谏，于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初一日微服至昌平，欲出居庸关。巡关御史张钦不敢奉命，关闭关门，视死不开。他说：关门不开，皇上不得出关，违抗天子命令，罪当死；打开关门，皇上出关，天下事不可知，万一生事，我亦必死。宁坐不开关死，千古不朽。于是他佩着皇

帝赐给的宝剑，坐在关门说：敢言开关者斩。又连夜上疏，诸大臣也纷纷追到沙河，请武宗回宫。八月十三日，武宗怏怏不乐自昌平回到宫廷。八月二十三日，武宗又微行，夜出德胜门，疾驰出居庸关。时张钦正巡视白羊口(今山西天镇西北)，欲追车驾而不能，便再次谏阻，因武宗已命太监谷大用守关，张钦感愤不已，西望痛哭。武宗于九月初一日到达宣府。江彬为营建镇国府第，将京城豹房珍玩，女御全部送到宣府，武宗遂乐而忘归，夜入人家掠夺妇女，毁民房以供炊，富民大户率厚赂江彬求免。致使街市萧然，白昼闭户。十九日，武宗驻阳和(今山西阳高)，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日夜纵乐，挥金如土，所费无数，二十七日命户部进银一百万两速解宣府，以备赏劳。户部尚书石玠力持不可，拒绝解纳。武宗下旨切责，石玠冒死抗命，只进五十万两。正德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武宗率侍从四人，再赴宣府玩乐，至二月十三日方回北京。同年八月二十日，武宗以游猎诸边，应用告乏，命开中两淮盐四十万引并发马价银二十万两于宣府、大同二镇。正德十四年正月十七日，武宗又至宣府，转而抵西部边陲，往返数千里，不坐轿，率乘马，佩弓箭，冲风雪，从者皆病惫，而武宗则不觉劳累。二月初八日方回京。

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　正德十二年(1517)九月武宗在阳和时，得知王小子率五万骑扰边，遂命大同总兵官王勋等人分统各军出征，十月初五日自率太监张永等人自阳和入援，在朔州(今山西朔县)杀死王小子部十六人，而明军死亡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武宗掩败为胜，命王勋等人以捷奏于朝廷，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所驻之所辄称"军门"。十月初九日，武宗还驻大同，群臣切谏回京，皆不采纳。直至次年正月初六日，才从宣府回到北京。群臣到德胜门外迎接，序词惟称"威武大将军"，不敢及尊号，众官亦不敢称臣。

横水、左溪、桶冈三寨农民起义失败　横水等三寨农民起义军，坚持斗争长达十余年，震动江西全省。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巡抚左佥都御史兼提督军务王守仁，调集各路大军，进剿左溪起义军，乘胜破横水，最后合攻桶冈，总计毁起义军据点八十四个，俘斩六千余人，谢志山等人被害，并在横水新设崇义县，隶属南安府。与此同时，湖广巡抚秦金出兵镇压以龚福全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俘斩一千余人。

广东府江起义失败　府江地方纵横二千余里，皆为王公珣统率的农民军所占领，为时达三年之久。正德十二年(1517)十一月十四日，总督两广都御史陈金带领总兵郭勋、太监宁诚，调两广等省土兵和官兵，分六路围剿农民起义军，王公珣等一百多人被斩首，一千五百余人被俘。

佛郎机来贡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初二日，佛郎机(葡萄牙)遣使臣加必丹永等三十余人来明朝贡方物，请封。至广东，广东镇、巡官以《大明会典》无此国入贡之例，其使臣亦无本国文书，未可为信，遂留使臣，同时奏请朝廷。武宗诏令方物给其价，使臣遣还。但其使臣久留不去，后通过镇守太监，进入北京。大西洋诸国通中国，实自佛郎机开始。

广东浰头农民起义军失败　浰头(今广东和平)与江西南部山区相毗邻。正德十一年(1516)，池仲容集众起义，号称金龙霸王，并与福建大帽山、江西横水、左溪、桶冈、大庾、乐昌等处农民起义军互相联络，声势浩大。大帽山、横水等处农民起义军相继失败，浰头起义军逐渐孤立。巡抚南赣左佥都御史兼提督军务王守仁设计招抚池仲容。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王守仁以留池仲容观灯娱乐为名，暗埋伏兵，将池仲容等九十三人如数俘斩，然后亲自统兵进剿上、中、下三浰，杀死起义军二十余人。再择精壮百余人追入九连山，内外夹攻，将起义军杀尽无遗，并在下浰新设和平县。

刘丙逝世　刘丙(？—1518)，字文焕，江西安福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改庶吉士，升御史，巡按云南。后督两淮盐课，中官请用二万引为织造费，部议许给，刘丙力持不可，得减四分之三。历福建、四川提学副使，四川左布政使。正德六年(1511)，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进工部右侍郎，入山采木，正德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卒。赠工部尚书，谥恭襄。

石天柱疏谏武宗　正德十三年(1518)二月二十四日，工科都给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方今朝廷空，城市空，仓库空，边境空，天下皆知危亡之祸，独陛下不知！治乱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以痛心为陛下感到可惜，故再次冒死为陛下进一言。石天柱血书心诚语切。血书送上，即易服待罪。时人闻知无不深受感动而为他的安危担忧。可是，武宗仍然不纳忠言，反于三月十九日将石天柱降为临安府推官。

武宗四处游幸纵乐无度　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二十九日，武宗到昌平祭陵之后，即至密云游幸，民间竞传欲括子女敛财物以充进奉，车驾所至，民皆避匿。五月初一日，武宗至喜峰口，欲招朵颜三卫至关宴劳，时地方官和朝廷大臣一再谏阻，武宗俱不理。七月初二日，武宗拟再远游塞外，自命为"总督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命内阁草诏，欲率六军远征辽东、宣府、大同、延绥、陕西、宁夏、甘肃。大臣梁储、毛纪率众官泣谏，皆不纳。大封头年十月在应州

征小王子之功，升赏叙荫者多达五万六千四百余人，封江彬为平虏伯、许泰为安边伯，赏赐亿万计，军功之滥，至此为甚。七月初六日，诏兵部议加威武大将军公爵。内阁为此奏言：今于敕威武大将军公爵，传之四方，势必议论纷纷，说"威武大将军"为何时官制？"总兵官朱寿"为何人姓名？且"亲率六军"之说，既由陛下自任，何为又举而归之总兵官，为总兵官者岂可称为"统六军"？至于"神功圣武"，原为臣下颂扬君上之词，今以其施于大将军，乃至欲加以公爵。公爵虽尊，不过人臣而已，岂可以当神圣之名？事不经，名不正，言不顺，一至于此，自古及今，从来未有，不知陛下为何乐于此？陛下贵卑而贱尊，恶祥而喜异。陛下久不亲政，天下人心危疑忧惧。万一宗藩之中，有人援引祖训，指此为言，不知陛下将如何处置？臣等恐朝廷之上，祸乱将从此开始。请陛下收回前旨。武宗亦不理。七月初十日，武宗遂出居庸关，经怀来、保安，至宣府，并称此地为"家里"，京朝官自是亦以宣府为家。八月十八日，武宗自万全左卫，历怀来、天城、阳和，于九月初一日驻大同。初三日，至偏头关。十六日，武宗降旨自封为"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命吏部如旨奉行。廷臣飞疏极谏，不听。十月初二日，车驾过黄河，十一日抵达榆林。十一月十六日至绥德，纳总兵官戴钦之女。十二月十三日，武宗自榆林，历米脂、绥德渡河，游幸石州、文水，二十三日到太原。车驾所至，掠良家女子数十车随其后，远近骚动，大为民害。武宗还大征女乐，乃至纳寡妇为乐。

孙需致仕 孙需，生卒年不详，字孚吉，别号冰蘖翁，江西德兴县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授常州府推官，治狱有方，升南京御史。历四川副使。弘治中，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修水利，济饥民，裁抑中官贪横，严惩不法大臣子弟。历陕西、郧阳巡抚，招民复业，恢复生产。正德元年(1506)，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正德四年进礼部尚书，未及两个月为刘瑾所恨，罚米输边，令致仕。刘瑾伏诛，孙需复起为南京工部尚书，改刑部尚书，再改吏部尚书。正德十三年四月初八日致仕，嘉靖初年逝世，谥清简。有《冰蘖稿》(《清简公集》)。

陈霁罢官 陈霁(1465—1539)，字子雨，号苇川，南直隶吴县(今江苏吴县)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编修。正德九年(1514)升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充经筵讲官，终国子监祭酒。正德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被劾罢官，嘉靖十八年(1539)卒，年七十五。有《玉堂集》、《归田稿》等。

陈恪逝世 陈恪(1462—1518)，字克谨，号矩斋，浙江归安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宿松县令，升御史。正德初，官江西副使，逆刘瑾，被革职除名，后复官为贵州副使、提督威清等处兵备，升贵州按察使。历山东右布政使、河南、江西左布政使，时吏部奏表彰天下能吏，以陈恪为第一。未几，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汀(州)、漳(州)，改大理寺卿。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二十四日卒于官，年五十七，天启初追谥简肃。有《小孤山诗集》。

张津逝世 张津(？—1518)，字广汉，广东博罗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建阳知县，筑城防盗，建朱熹、蔡元定诸贤祠，置立祭田。弘治中，改为大城知县。弘治十三年(1500)升御史。正德三年(1508)迁泉州知府，因逆太监去官。四年复官为宁波知府，有惠政。正德七年，改山东左参政，进南京右佥都御史，专理操江。十年转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疏请停止织造。终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正德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官。赠南京户部尚书。

福州三卫兵变 镇守太监罗仑假借修城之名，向福建布政司索银三千两。左布政使伍符在闽慎法而守节财用，以取所征三千两太多，仅给罗仑五百两，罗仑由此怀恨在心。又致仕都御史林廷玉、副使高文达托伍符办事，伍符不从，遂恨之。时适遇福州三卫军士已缺粮三月，而伍符方进为巡抚山东右佥都御史，准备起程赴任。于是罗、林、高三人便乘机煽动军士以请求给粮为由，于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二十三日，聚众为变，挟伍符给其粮。罗仑一面奏报诬伍符掌钱谷不尽其职，致军缺粮生变，一面令起事士兵解散，以夺平息兵变之功。后伍符被捕下狱，参加起事的军士五十人被杀，其余遣发戍边。

蒋冕疏谏武宗 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大学士蒋冕因病在家休养，得知明武宗以威武大将军巡边，抱病草疏亟谏：陛下为天地神人之主，中国四裔谁不尊陛下为皇帝！犹称天为天，称日为日，谁敢以"威武大将军"相称？陛下命名于先帝，自祭告外，谁敢称名？况公爵虽尊，低王爵一等，倘若车驾所过，诸王竟以大将军礼见，陛下何词以折之？以前英宗皇帝北征，六军官属近三十万人，犹且陷于土木。今宿卫单弱，经行边境，岂不寒心！请严治左右引导者之罪。蒋冕怀忠报主之心，武宗游兴大发，拒不理采。

朱裕请修改历法 弘治中钦天监推测月食屡次不准，日食亦如是。正德十二年、十三年，连推算日食起复时辰又皆不准。正德十三年(1518)十二月二十六日，钦天监博士朱裕遂上疏言：今所用历书，修于元朝至元十八年，距今已二百三十七年，岁久历不能无差，若不量加修改，恐愈久愈不准确，舛错愈多。请择大臣总理其事。令本监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

法，两相交验，《回回》科推验西域《九执历法》。并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测节气早晚，反复参照比较，则日月交食可正，仪象可验，七政可齐，而天道可合。疏下礼部。礼部以为朱裕及监官历学未必皆精，今十月十五日月食，中官正周濂等可推算，与古法及朱裕所奏不同。请至期考验。后来，礼部奏：古法未所轻变，请仍旧法。别选精通历学者，同周濂等以新法参验。更为奏请。诏从其议。

杨廷和谏阻武宗南巡　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武宗下诏：朕今将不时巡幸，将南下山东、江南。大学士杨廷和于二月二十日上疏谏阻，报言东南为国家财赋所出之地，近年大水为灾，兼以役繁赋重，民不能堪。若复军旅经过，日费无数，其将何以应付？况里河一带，路狭水浅，今营建大木以及漕运粮船，尚未能如期而至，又加以皇船数多，拥挤而行，大木必不能前进，运船必不能急行，误事非轻。意外之虞，尤为不可测。请陛下居深宫，养身体，则国家幸甚，臣民幸甚。杨廷和上疏之后，部、寺大臣以及科、道亦皆连续上疏，谏止南巡，武宗俱不纳。刑部主事汪金还列举不可南巡的九个理由，尤其请武宗力戒嗜酒，以避免左右群小乘陛下昏醉以市权乱政。时人以为汪金此言实为对症之药。武宗不理，并于二月二十五日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令往南、北两直隶和山东泰山进香求神，命工部急修黄马快船备用。杨廷和再疏，毛澄亦谏武宗自加封号之非。武宗皆不听。三月，科道官纷纷上奏谏阻，有以死相谏者，武宗大怒，杖修撰舒芬等一百零七人于午门，多被杖而死，或调外或罚俸。时以为荣。至四月中，当廷杖时，死者伤者相继，武宗为之感动，方罢南巡。

李逊学逝世　李逊学(1456—1519)，字希贤，号悔斋，河南上蔡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弘治九年(1496)升浙江按察司佥事。改陕西，进副使。后三任山东学政，所至务崇宽厚，颇得士心。正德三年(1508)升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次年，入翰林院兼侍讲，进户部右侍郎，提督仓场。不久，任礼部左、右侍郎。正德十年进为南京礼部尚书。正德十一年，以奉贺表入京，改为礼部尚书。正德十二年兼学士，掌詹事府事，入内阁，专管诰敕。并奉命教授庶吉士。正德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卒于官，年六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文简。

邓庠致仕　邓庠(1447—1524)，字宗周，号东溪，湖广宜章县(今湖南宜章)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历行人、御史、两广布政使、南京右都御史，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正德十四年(1519)三月十四日致仕，嘉靖三年(1524)卒，年七十八。有《东溪稿》。

石玠致仕　石玠(？—1521)，字邦秀，北直隶藁城县(今河北藁城)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由汜水县令召为御史，出核大同军饷，按甘肃、陕西，所上边务，悉中机宜。正德中，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召入为兵部右侍郎。历兵部左侍郎兼佥都御史，巡视辽东，出关抚谕海西各部，辽东稍靖。后擢为右都御史掌院事。正德十年(1515)，进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正德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因论救谏阻南巡诸臣，为权幸所怒，遂引疾归家。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六日卒，赠太子少傅。

诏令流民复业　正德十四年(1519)五月初七日，武宗据山东等省巡按御史奏报，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广诸省流民归田复业，官给道费、粮食、庐舍、牛种，五年后起科田租。

吴俨逝世　吴俨(1457—1519)，字克温，号宁庵，南直隶宜兴县(今江苏宜阳)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正德二年(1507)，忤刘瑾被夺职。刘瑾败，吴俨复官历礼部左、右侍郎。正德十一年，进南京礼部尚书。正德十三年，吴俨率大臣上疏谏阻武宗北游宣府、大同。正德十四年五月初十日卒于位，年六十三，赠太子少保，谥文肃。有《吴文肃公摘稿》。

武宗告诫宁王朱宸濠　正德十四年(1519)五月二十四日，武宗遂遣太监赖义、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告诫宁王朱宸濠：叔祖在宗室，属望尊重，朝臣礼待有加。但道路流传，不无可疑。过去府中典宝副阎顺等赴京奏你不法，朕未轻信。近来言官亦相继奏你势将图谋不轨。廷臣皆说，事关国家大计，宜从长计议，不可掉以轻心。朕念至亲，且不深究。然而，隐忍不言，互相怀疑，非两全之道。往日，我宣宗皇帝，因赵府烦言，特遣驸马袁容等人奉旨前往劝诫，即翻然改悔，献还护卫，至永亨富贵。今遣使致书奉告，可仿此意。今你献还护卫和屯田，归还所夺官民田土，遣散贼党，朕亦俯从宽典，并不深究。此朕至情。

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　宁王宸濠得知皇帝遣使南下，欲收己权，便破釜沉舟，于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乘其生日，地方文武官员入府祝贺之机，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当日杀死不从其命的巡抚江西都御史孙燧、按察司副使许逵，御史王金、江西布政使胡濂等十余人捕入监狱。授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飞为左、右丞相，参政王纶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改年号为“顺德”。布告远近，指斥朝廷。

王守仁平宸濠 宁王宸濠集兵号称十万人，从南昌出鄱阳湖。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六日陷南康，次日克九江。七月初一日，宸濠出南昌，自帅水军沿江而下，围攻安庆，欲入南京即皇帝位。时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闻朱宸濠起事，于六月十八日联合江西吉安知府伍文定发兵讨伐。七月十三日，王守仁自江西丰城急赴吉安，调集各路勤王之师八万人，号称三十万人，且力排众议，定计集中兵力攻打南昌。宸濠中计，因久攻安庆不克，果然于七月十五日离安庆回师守南昌。七月二十六日，即在鄱阳湖为王守仁彻底打败，嫔妃淹死，士卒伤亡，李士实、刘养正、王纶等数百人被俘，宸濠本人束手就擒。李、刘二人于七月三十日死于狱中，宸濠于次年十二月在通州(今北京通县)伏诛，震惊全国的“宁王之乱”至此结束，历时仅四十三日。

王鸿儒逝世 王鸿儒(? —1519)，字懋学，号凝斋，河南南阳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郎中。升山西佥事、进副使。正德四年(1509)，任国子监祭酒。历南京户部侍郎、吏部左、右侍郎。清正自守，门无私谒，部属不敢私所。其为学，则务求穷理致用。正德十四年进为南京户部尚书。未履任，而宁王宸濠反叛，王鸿儒奉命督军饷，背发疽不治，于同年七月初七日卒于官，谥文庄。有《凝斋笔语》、《凝斋集》。

洪远逝世 洪远(1450—1519)，字克毅，号仙斋，南直隶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莆田知县，升南京福建道御史、浙江佥事，历副使、按察使、四川、陕西左、右布政使，为官廉洁。再迁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改南京大理寺卿，迁南京右副都御史理院事。不久进南京工部尚书，值宁王宸濠反叛，修城池，治军械，冒暑得疾，于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二十四日卒于官，年七十。嘉靖中，追赠太子少保，谥恭靖。

江彬独揽内外大权 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初一日，武宗命平虏伯江彬提督东厂兼锦衣卫。时张锐居东厂，钱宁掌锦衣卫，而江彬并兼二任，宠贵无尚。自是中外大权皆归于江彬一人。

武宗亲征宁王宸濠 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十四日，武宗下诏南下亲征宁王，命内阁草拟《威武大将军制》，又欲命江彬为威武副将军。阁臣杨廷和坚执不可，武宗切责。廷和称病不出，武宗才罢封江彬为副将军，仍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督将亲征。同月二十二日，武宗命大学士杨廷和及毛纪留守京师，由大学士梁储、蒋冕随驾南下。二十六日，行至涿州时，王守仁奏捷之疏至，且谏阻亲征，武宗意在巡幸江南，遂将此疏秘而不发。廷和、梁储、蒋冕等俱请班师回京，武宗不听，继续南行。时诸权幸欲争平宁王之功，且惧王守仁尽发其交结宁王之罪，到处散布王守仁原与宁王通谋不轨，虑事不成始起兵讨伐。又欲令纵宸濠于鄱阳湖，待武宗自擒。同时命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率禁军入江西。王守仁乘其未至，械押宸濠出南昌，张忠、许泰以威武大将军名义，命将宸濠交还，王守仁不给，遂间道出江西，上书请献俘，再谏止亲征，武宗仍不许。九月十六日，王守仁将宸濠押入杭州交太监张永。并极言江西地方困敝，不堪大军骚扰。十月初八日，大学士杨廷和以及随驾亲征的梁储、蒋冕复请班师回朝。自车驾出发至此，廷臣奏疏达数十次，而武宗终不理会，于十月二十二日从临清出发。十一月初一日过济宁，初六日至徐州，十五日抵达淮安清江浦，三十日入宝应汜光湖捕鱼。十二月初一日至扬州，骑兵夜半遍入人家，掠夺妇女。随从权幸以扬州繁华，要求无所不至，民至重困。十二月十九日抵仪真(今仪征)钓鱼游玩，大选妓女，二十二日行至南京。次年闰八月十二日，始由南京出发返回北京。

潘辰致仕 潘辰(? —1519)，字时用，号南屏，原籍浙江景宁，随从父居京师。幼习儒业，屡举不第。弘治六年(1493)诏举隐居山林才德兼备之士，被荐为翰林待诏。不久，再被荐入内阁诰敕房，掌典籍事。预修《大明会典》成，进五经博士。正德中，刘瑾用事，复降为典籍。已而复故官，升编修，九年后进为太常少卿。潘辰出身布衣，刻苦问学、持身驯谨，办事忠勤，晨入夜归，从无过失，凡有馈遗，坚决谢绝。士大夫重其学行，称为南屏先生。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二十日致仕，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谢世。

抄没钱宁家产 钱宁与江彬互相争宠，素有矛盾。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宸濠反叛，武宗督将南下亲征。武宗离北京时，令留钱宁居守，钱宁恐离武宗身边，为人发其奸，遂求随驾亲征。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武宗至淮安清江浦，江彬于途中尽发钱宁交通宁王谋反事，武宗大怒，遂令收钱宁家属，抄没其家，得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银三千箱、胡椒数千石，其他珍玩财货不可胜计。

禁止民间养猪 正德十四年(1519)十二月十九日，武宗在扬州行在，以“猪”与国姓“朱”字异而音同，下令禁止民间养猪，屠杀殆尽，以至无猪可供祭祀，竟以羊为替代。次年二月，大学士杨廷和等请罢养猪及宰杀之禁，武宗不理。至三月初十日，因清明节将至，太常寺奏：陵寝祭牲已有定制，猪为必用之物，请弛其禁。武宗才许解除禁令。

蠲免淮扬诸府被灾田租　正德十四年(1519)淮安,扬州大饥,人相食。武宗于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下诏蠲免南直隶凤阳、淮安、杨州三府、徐,滁、和三州所属被灾州、县税粮。同年四月初二日,又从巡抚都御史丛兰、巡按御史成英请求,准截留苏、松漕运粮十万石以及轻赍银七万二千余两,凤阳、扬州储库事例银六千一百余两,救济淮安、扬州等府饥民。

陈良器逝世　陈良器(?—1520),字彦成,浙江仁和县(今浙江杭州)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授南京大理寺评事,历寺副、寺正。升为池州知府,居一年余租谷至十三万石,垦田一百六十顷,号为能吏。迁山东右参政、福建右布政使。后改湖广右布政使,转福建左布政使,召为应天府府尹。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二十九日卒于家。

王崇文逝世　王崇文(1468—1520),字叔武,号兼山,山东曹县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选庶吉士,授户部主事,历升员外郎、郎中,诸司章奏及度支拟议多定其手。后历官大同知府、江西按察司副使,四川副使、山西参政。正德十二年(1517),进河南右布政使、躬历省中各地,均平徭役。迁左布政使,居四月,升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等处兼提督紫荆关等关。正德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卒,年五十三。有《兼山遗稿》。

汤金逝世　汤金(?—1520),字完之,南直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由刑部主事升员外郎、郎中,断狱明允,改贵州按察司副使,迁湖广布按察使,进云南右布政使、贵州左布政使,终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后致仕回家。正德十五年(1520)二月二十九日卒。

江西发生特大洪水　正德十五年(1520)五月十五日,都御史王守仁奏:江西诸府发生大水,千里为壑,街巷皆可行船,民栖于树木,室庐漂荡无存,烟火断绝,为数十年来所未有。疏下所司,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始下令免江西税粮。

汪元锡疏言武宗南巡之祸　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二十八日,兵科都给事中汪元锡等人奏言:陛下南巡,长期不返。随行人马,不下数万,供应之费,连及数省;奸宄之徒,诈充官校,陵虐有司,索骗财物;军士在外,妻儿隔绝,不习风土,客死道旁;少女老妇,充行离宫,苦雨凄风,多成怨魂,这些都是陛下所不知的。天下只可以理治众,不可以恃势夺人。陛下不以宫廷为重,专事远游,欲望久安长治,岂可得邪!疏呈进,武宗不理。

王守仁重奏平宁王大捷　早在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二十六日俘获宁王朱宸濠时,王守仁即驰疏奏捷。但由于疏中没有颂扬明武宗的文韬武略及诸权倖功劳,引起武宗和权倖们的极大不满,遂命令王守仁献捷。王守仁无奈,于正德十五年七月重写奏文,称讨平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是"奉威武大将军方略",并将诸权倖的姓名一一列入其中。至此,张忠、江彬等人也成为平息宁王叛乱的"有功之臣"。

广东山民起事失败　正德十五年(1520)八月初一日,官军讨平广东苏峒十八山青龙岗、帽子峰等处山民起事,破巢寨二百一十处,俘斩首从计一万一千二百零三人,逮捕家属四千一百四十八人。

大臣泣请武宗回京　正德十五年(1520)八月二十八日,巡抚都御史王守仁重奏捷之疏至,梁储等大臣复动以危言,请武宗从速回京,武宗始有意还朝。而诸权倖犹欲诱导武宗游苏、松诸府,泛游湖广江、汉各地。于是梁储等人更加忧惧,再次捧疏跪泣于行宫门外,自未时至酉时,跪泣不起,武宗才派人取疏入行宫。梁储等人叩头说:未奉俞旨,不敢起。武宗不得已,许不日还京。梁储等人才叩头谢恩而去。

武宗受俘成笑谈　武宗为显示大智大勇,自以为功,于正德十五年(1520)闰八月初八日,命在南京设广场,并与诸权倖身着戎服,树大旗,整军容,出城数十里,令解去朱宸濠等人枷锁,伐鼓鸣金,由武宗动手擒获,引以为功。然后置械,行献俘礼。武宗此举,传为笑谈。

武宗返京　正德十五年(1520)闰八月十二日,武宗自南京启程,十七日至江口捕鱼游玩。二十日自瓜州过长江,登金山,入镇江,住前大学士杨一清家,乐饮两昼夜,取走《册府元龟》二百零二册。二十七日宿望江楼。九月初一日驻扬州,初七日武宗戎服簪花,鼓骑入淮安城。十五日赴清江浦积水池捕鱼,自划小船,船翻溺水得病,久治不愈。十月初六日至天津,二十六日抵通州(今北京通县),十二月十一日回到京师,前后历时整整四个月。各地官民穷于应付,备受凌辱,怨声载道。

严惩交通宁王之罪　正德十五年(1520)十月二十六日,武宗抵达通州,召勋戚大臣到行在商议宸濠罪,并令惩治交结宸濠之人,于是先后被捕下狱或革职去官的有:太监钱宁等十多人及锦衣卫指挥薛玺、陈喜、监察御史张鳌山、河南布政使林正茂等和吏部尚书陆完。

陆完下狱　陆完(1458—1526),字全卿,号水林,长洲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正德初出任江西按察使。正德三年(1508)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次年改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江防,召为左佥

都御史。正德五年升兵部右侍郎，后兼右佥都御史，镇压刘六、刘七农民起义，迁右都御史仍督军务。正德七年迁左都御史，正德八年擢兵部尚书，提督团营，加太子太保。正德十年闰四月改吏部尚书。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以交通宁王宸濠执至通州下狱，十六年谪福建靖海卫。嘉靖五年(1526)卒，年六十九。

宁王朱宸濠伏诛 朱宸濠(？—1520)，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玄孙，弘治十四年(1501)袭封宁王。反叛被擒，正德十五年(1520)十月被押至通州(今通县)。武宗遂召皇亲、公侯、驸马、伯、内阁府、部大臣以及科、道官，到通州行在议治朱宸濠叛乱罪。诸勋戚大臣奉命开列朱宸濠的罪状，进呈武宗，并定朱宸濠及其同犯宗藩朱栱樤等论死。武宗以为定罪过重，令从轻，改为赐死。同年十二月初六日，宸濠在通州自尽，仍举火焚其尸体。次年六月，诛宸濠私党刘吉、何镗等二十六人；七月将宁王府宗室从宸濠叛乱者或废庶人，关禁凤阳，或论死。同时释放无辜。

黄省曾撰《西洋朝贡典录》 《西洋朝贡典录》三卷，黄省曾撰，纂修于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二十九日，至清嘉庆十三年(1808)才刊印。黄省曾，字勉之，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该本记录了郑和所至二十三国的道里、山川、风俗、物产、器用、语言、衣服等颇详。校正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书中一些文字错讹和脱文。补充了《瀛涯》《星槎》两书中所无的各地土特产品和贡品，其中针路的记载更是其他书中所少见的资料。

明武宗逝世 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明孝宗朱祐樘长子，弘治五年(1492)三月立为皇太子。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即皇帝位。时十四岁。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死于京城豹房，年三十一，无子，谥毅皇帝，庙号武宗，葬于康陵。武宗在位十六年，始终重用宦官，喜好游玩作乐，不理政事。以致正德前期，刘瑾窃权误国，民不聊生，在都城附近爆发了以刘六、刘七为代表的明朝建国一百五十余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正德后期，江彬得势，人心汹汹，在宗室内部发生了宁王朱宸濠反叛，导致国势日益衰落。

明武宗遗诏罢弊政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传武宗遗旨，令：罢威武团练营，营兵回团营，边兵皆散遣还原镇；尽革皇店，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所；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俱给赏遣回国；豹房番僧以及少林僧、各匠役教坊司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俱予罢遣。又按遗诏，放还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入诸内库。以上各项皆由大学士杨廷和奏皇太后施行。

江彬下狱 江彬(？—1521)，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初为蔚州卫指挥佥事，非有他能，惟倔强勇悍。后通过钱宁受到明武宗召见，以健能被留，出入豹房，与武宗同起卧。同时，进毡幄，导巡幸，取悦武宗。由此恃宠擅权，统领镇军。正德十二年(1517)进封平虏伯，正德十四年提督东厂兼锦衣卫，权势大张，任情倾陷廷臣，大肆贪污受贿，培植私党，重用家人。正德十六年三月江彬出逃，三月十八日在北安门被擒下狱，京城内外官民拍手称快。籍其家，得黄金七十柜，每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金银杂首饰一千五百箱，其他珍宝不可胜计。与江彬同时被捕下狱者还有神周、李琮二人。同年六月初八日，江彬及其四子和神、李二人，皆斩首弃市。

朱厚熜即皇帝位 朱厚熜，兴献王朱祐杬长子，正德二年(1507)八月初十日生，母妃蒋氏。正德十四年朱祐杬死，正德十六年三月初九日，从蒋氏之请破例特许嗣兴献王。三月十四日，明武宗朱厚照病死，遗诏立为嗣君。四月二十日，朱厚熜从封地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被迎至京师。当日，在奉天殿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岁。颁诏大赦，改明年为嘉靖元年。是为明世宗。

杨廷和草世宗即位诏书 大学士杨廷和总理朝政三十七日，内外臣民赖以为安。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世宗即位时，命杨廷和起草诏书，凡先朝弊政，多所裁革。其中，锦衣等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被革去者，计十四万八千七百人，每年可节省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佞幸得官者，亦大半被斥去。朝野各界咸称新君神圣并颂杨廷和之功。而诸失职之徒则对杨廷和恨之入骨。杨廷和入朝，有人持刀于轿房，企图行刺。事闻，世宗命派营兵一百人随身保护杨廷和的安全。对此次杨廷和草诏革冗役冗费，在其去官之后，明世宗还念念不忘他的功劳。

大礼之议初起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七日，明世宗即位刚六天即下诏，令廷臣议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主祀及封号。大礼之议自此始。大学士杨廷和诸大臣疏言：当依古制。为人后者称所后为父母，而称所生父母为伯叔父母，此为生人之大伦。如此则正统既明，而所生父母亦为尊崇至极。今兴献王朱祐杬为明孝宗朱祐樘之弟、明世宗朱厚熜生父。所以明世宗直称明孝宗为"皇考"(皇父)，改称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父"、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母时，俱自称"侄皇帝朱厚熜"，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以为万世效法。议送上，明

世宗大为不满说：父母岂可更易？命再议。于是，观政进士张璁等人为迎合世宗旨意，认为世宗是继统而非继嗣，不能用汉、宋故事类比，不能夺父子之亲，应追兴献王为皇考，以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圣孝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由此开始了大议礼的激烈论争。

李鐩致仕 李鐩（1447—1528），字时器，号朴庵，河南汤阴县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授工部主事，官至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在位期间，唯专事结交权臣，固守其位，一切不敢有抗违。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间，与户部尚书杨潭前后致仕。嘉靖七年（1528）卒，年八十二，赠少保，谥恭敏。

王琼下狱 兵部尚书王琼，诛赏悉听中官，不经内阁，廷臣多畏而忌之。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八日，给事中张九叔上疏弹劾王琼滥鬻将官，阿庚权倖，遂被捕下狱。经廷臣会议，定为按《交结近侍律》论死。王琼上疏辨争，改减死戍边。因王琼支持大学士张璁、桂萼议"大礼"，嘉靖七年（1528）二月，经桂萼保举，起为兵部尚书，总制陕西三边军务。

陈金致仕 陈金（1446—1528），字汝砺，号西轩，湖广武昌县（今湖北武昌）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授婺源知县，升南京御史。正德初，官至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以平苗民起事之功，正德三年（1508）十月迁南京户部尚书，次年冬进左都御史。镇压江西、福建等地农民起义，加太子少保。正德十年复督两广军务，进剿府江王公珣起义，加少保、太子太保。正德十四年召入掌都察院事。十六年四月中以老请归。嘉靖七年（1528）卒于家，年八十三。

章懋致仕 章懋（1437—1522），字德懋，号闇然子、谷滨遗老，浙江兰溪人。成化二年（1466）会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官至福建佥事。其后谢职归里，专以读书讲学为事，贫无供具，粗茶淡饭而已。四方学者高其风节，称枫山先生。家居二十余年，屡召不出。弘治中，固辞，不久，官南京国子祭酒，训士有方，人人以为得高师。正德六年（1511）命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力辞不就。正德十六年五月初二日，以南京礼部尚书致仕。章懋难进易退，居官不谋私，三个儿子皆令业农，自食其力。嘉靖元年（1522）卒，年八十六，赠太子少保，谥文懿。有《枫山语录》、《枫山集》。

梁储致仕 梁储（1451—1527），字叔厚，号厚斋、郁洲，广东顺德县人。成化十四年（1478）举进士第一，授编修。弘治初，侍皇太子于东宫。出使安南，拒收馈赂。正德初，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正德五年（1510）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屡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正德十年，出任内阁首辅，加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立身辅政，议事公允，屡次上疏谏武宗止游幸、勤理政，并力抑中官诸不法事。正协十四年宁王反叛，梁储随武宗南下亲征，屡疏苦谏，请及早回京，以安人心。正德十六年五月初五日，致仕归家。嘉靖六年（1527）九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七。赠太师，谥文康。有《郁洲遗稿》。

钱宁被斩首弃市 武宗在位之日，诸内臣得随意入出豹房者，首推钱宁，招权纳贿，作威作福，势行内外，宁王宸濠前后餽送各万计。天下臣民则无不恨之刻骨。武宗病死，言官交章弹劾。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二十日，钱宁及其子钱永安、养子钱杰等十一人，并斩于市。京师百姓，举额相庆。

刘春逝世 刘春（？—1521），字仲仁，四川巴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编修，迁翰林学士。正德六年（1511），升吏部右侍郎，进左侍郎。正德八年为礼部尚书。其掌礼部三年，始终严守典章制度。宗藩请封、请婚以及文武大臣祭葬、赠谥，多所裁正。后为南京吏部尚书。不久，以礼部尚书专典诰敕，掌詹事府事。正德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卒于官，赠太子太保，谥文简。有《刘文简集》传世。

世宗诏发内库银给宣府大同 宣府、大同饥馑相继，官军俸粮多年未支，死尸遍野。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初九日，世宗遂诏发内库银二十万两给宣府、十三万两给大同。并许该处有该抄没入官银两及家产、庄田、地土，俱令抚、按管粮官会估变卖，尽留本镇充赈。

林希元条陈君道急务 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十三日，南京大理寺左评事林希元言君道急务六事，即：务正学、亲正人、用旧臣、清言路、急交修、持久大。又言朝廷大政二：一停止太监参预机务；二罢镇守太监。世宗嘉纳。

裁革锦衣卫冒滥军校 为节省冗役冗费，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十七日，世宗令裁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一千八百二十余人。同月二十二日，再革传升僧道教坊官三百五十余员，尽除内外金刚老以及把总、大管家各色名目。

邓璋致仕 邓璋（？—1531），字礼方，号烟村，北直隶涿州（今河北涿州）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南昌府推官，升大理寺丞，复勘太监苗达等人功次，务绝知友宾客请托，停勒豪贵冒功者九百余人，时论称快。正德初，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为政严明，豪猾收敛，官终南京户部尚书。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二十二日致仕，嘉靖十年（1531）十月二十一日卒，赠太子太保。

张璁上疏议"大礼" 正德十六年(1521)七月初三日,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请尊崇所生,立明世宗生父兴献王庙于京师。其疏以《礼》"长子不得为人后"为据,提出兴献王只生世宗一子,所以应尊崇生父兴献王为考,以正其号,并奉迎圣母,以致其养。世宗得璁疏,大喜,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遂手诏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欲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寿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还手诏。于是给事中朱鸿、汤史、于光,御史王溱、卢琼交章劾璁,世宗不听。其后,张璁又著《大礼或问》,进呈世宗,并说:非天子不议礼,愿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

张纶致仕 张纶(1454—1523),字大经,号敬轩,南直隶宣城县(今安徽宣城)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盐山县令,进监察御史,巡视通州粮仓,拒请谒、杜贿赂。官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上疏请诛太监萧敬等人。正德十六年(1521)七月十六日致仕,嘉靖二年(1523)卒,年七十。有《敬亭稿》。

邵宝致仕 邵宝(1460—1527),字国贤,号二泉,南直隶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许州知州,历户部员外郎、郎中。迁江西提学副使,修书院,教生徒以致知力行为本。又革除当地亲死不葬之陋俗。为身守正,不交权势。进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为避免劳民伤财,奏停处州银矿。转为湖广布政使。正德四年(1509),以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时刘瑾擅政,邵宝入京绝不与通,遂被劾致仕。刘瑾败亡,起邵宝为贵州巡抚。未几,转户部右侍郎,改左侍郎。又命兼左佥都御史,处置粮运。迁为南京礼部尚书。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十一日致仕。嘉靖六年(1527)卒,年六十八。赠太子太保,谥文庄。平生好学,博综群籍,学者称二泉先生,著作甚丰,有《学史》、《端简二馀》、《定性书说》、《漕政举要》、《容春堂集》等。

袁宗皋逝世 袁宗皋(1453—1521),字仲德,湖广石首县(今湖北石首)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世宗在兴献王府时,被选为长史,历江西按察使。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随世宗入京师,骤显富贵,进官吏部侍郎。同年五月十一日,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入阁四月,无所建树,即于九月初七日卒,年六十九。赠太子少保,谥荣襄。

明世宗生母蒋氏至京 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二十五日,明世宗生母兴献王妃至通州。礼部具仪,请由东安门或大明门左门入,世宗断议不允。兴献王妃因兴献王尊号未定,拒不入京。世宗痛哭,提出避位携母回安陆,朝臣惶惧。十月,杨廷和假借母后懿旨,称本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母称兴献后。十月初四日,世宗迎兴献后由大明门入阙。因朝议妇人不谒太庙,故只见奉天、奉慈二殿。

王倬逝世 王倬(1447—1521),字用检,号质庵,南直隶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历知山阴、余干、兰溪三县,有惠政,升御史,謇直明干。进贵州兵备副使,改琼崖兵备,迁广西按察使,历广东、四川左、右布政使,以办治军实功,被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终南京兵部右侍郎,致仕归。王倬居官清廉,不求虚名,务图实效,家居时立义庄田千亩。正德十六年(1521)十一月初十日逝世,年七十五。

明世宗命加生父母皇号 正德十六年(1521)十二月十一日,世宗再下诏加其生父母兴献帝、后分别为兴献皇帝、兴献皇后。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吏部尚书乔宇、侍郎贾泳、给事中朱鸣阳等百余人上疏力争。杨廷和认为,兴献王、妃加帝、后,转之前代,尊称已极。若加"皇"字,是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乔宇说:若加"皇"字于本生之亲,则与正统溷而无别。揆之天理则不合,验之人心则不安,非所以重宗庙、正名分。世宗说:慈寿皇太后懿旨有谕:今皇帝婚礼将行,其兴献帝宜加与皇号,母兴献皇太后。朕不敢辞,尔群臣其承后命。嘉靖元年(1522)春正月十一日,郊祀甫毕,清宁宫小房发生火灾,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上言:火起风烈,此殆天意。给事中邓继曾、主事高尚贤,郑佐相继上言力争:五行火主礼。今日之礼,名紊言逆,阴极变灾。为废礼之应,世宗心动,同意不加"皇"字。三月,上孝宗太后尊号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圣祖母邵氏为"寿安皇太后",本生父为"兴献帝",母为"兴国太后"。

甘州军乱 嘉靖元年(1522)正月二十一日,甘肃总兵官李隆因与巡抚右副都御史许铭不和,乘支月粮之机,唆使部下要求增加军饷,许铭不允,李隆遂嗾悍卒围攻公廨,杀许铭,并焚其尸体,五卫军大乱。明廷召擢陕西按察使陈九畴为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查处许铭案,李隆及乱军首倡者皆处死。

诏减内府岁额盐课 弘治时,内府供用库年派青白盐十七万五千五百余斤,正德以后,屡次加课递增三十五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淮海之间,萧然烦费。嘉靖元年(1522)正月二十八日,御史郑光琬上言:皇上登极,首诏选汰内府各盐局员缺,悉依祖宗旧制。今冗滥既清,供用库新增课额,宜悉罢减,以苏民困。世宗于是诏减年供内府盐课如弘治时之数额。

核京营操卒 由于连年营造,京营上操官军,

有以工役劳费盗马而逃的，有全不赴操的。以致营伍空虚。嘉靖元年(1522)三月十三日，兵部请行访捕。其时，郭勋提督团营，请如弘治间例，许令投首收操。兵部以为各军多系投充冒顶，额外招收，及有名无人，包办月钱。先以查革，冗食稍减。今若听其自首，恐仍踵前弊。宜查原系祖充及成化以前投充，经补二三次的，限三月内许投首收操；其有冒顶及近年投充、新招与有名无人，朦胧保送，俱问发边卫。世宗批准兵部所议，核查京营操卒。

丛兰致仕 丛兰(1456—1523)，字廷秀，号半山，山东文登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户科给事中，进兵科右给事中，迁通政司参议、左通政。正德四年(1509)冬，出理延绥屯田。刘瑾伏诛，擢通政使，不久任户部右侍郎督理三边军饷，还理部事。正德七年奉命巡视居庸、龙泉诸关，督宣、大军饷，进右都御史总制宣、大、山东军务。正德十年夏，改督漕运，兼抚江北。正德十五年迁南京兵部尚书。嘉靖元年(1522)三月十七日致仕，次年卒，年六十八。赠太子少保。

严禁仓场科分恒例 嘉靖元年(1522)三月二十日，巡仓御史刘寓生上言：天下卫所运粮四百万石，常额外加耗名目繁多。如有“太监茶果”一项，每石加耗三厘九毫，计用银一万五千六百两，又有经历司、该年仓官、门官门吏、各年仓官、新旧军斗，等等。俱每石各一厘，其计用一万六千两；还有会钱、小儿银，俱每石一分，计用银八万两；还有救斛面银，每石五厘，计二万两，一年四百万石粮，分外用银十四万余两，军民膏血怎得不困竭。乞请痛革宿弊，以苏漕运困苦，世宗下诏，命内外总督漕运等官，严禁各仓场官科取分例。

胡富逝世 胡富(1445—1522)，字永年，南直隶绩溪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南京大理寺评事。历升顺天府尹、大理寺卿。正德初被刘瑾诬陷致仕。刘瑾伏诛，起迁南京户部右侍郎，进尚书。屡次上疏裁冗食，去宿弊，因事涉权侍，多格不行，遂乞休致仕归里。嘉靖元年(1522)四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少保，谥康惠。胡富历任中外四十余年，始终一节，颇受士林敬重，有《龙峰集》。

禁宗室子弟诣阙 嘉靖元年(1522)四月二十九日，世宗据礼部奏言规定：各王府郡王、将军有事，必启亲王代奏。除机密重事及请封王爵外，其春秋类奏之事，长史司只许批差一人进京，不许一事辄遣一人，在京潜住，营求干事，本府仍将类奏事件总造印信书册二本，一交礼科，一交鸿胪寺。若有王府差来人役挟带空本在京填写的，缉事衙门即访察擒获，追求用印之人，从重治罪。

蒋升致仕 蒋升(1450—1526)，字诚之，号梅轩，全州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南海知县，以政绩卓异征入朝。擢监察御史。升河南汝宁知府，迁湖广按察副使，进浙江按察使，转浙江右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不久，又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等处。改南京户部右侍郎。正德十六年(1521)升南京户部尚书。嘉靖元年(1522)五月二十七日致仕归里，家居四年于嘉靖五年五月十二日卒，年七十七。蒋升天性纯笃，不知世人机械事，历官廉明清介。

王华逝世 王华(1446—1522)，字德辉，号实庵，晚号海日翁，曾读书龙泉山中，学者又称龙山先生，浙江余姚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第一，授修撰，升学士，历詹事府詹事，预修《资治通鉴纂要》，进礼部侍郎，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正德二年(1507)致仕，嘉靖元年(1522)六月初四日卒，年七十七。赠新建伯。王华才识宏达，操持坚定。

章懋逝世 章懋(1437—1522)，字德懋，号闇然子，晚号谷滨遗老，兰溪人，成化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谏观灯，谪临武知县，改南京大理寺评事，迁福建按察佥事。不久，即致仕归里，讲学枫木山，世称枫山先生。后起迁南京国子监祭酒，再乞休还家。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世宗即皇帝位，即家进南京礼部尚书。嘉靖元年(1522)六月初五日卒，年八十六，赠太子少保，谥文懿。有《枫山语录》、《枫山集》。

俺答入寇固原等地 俺答，蒙古鞑靼部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称阿勒坦汗，为达延汗孙。据河套，驻库库和屯(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对明朝贡掠不时，为嘉靖朝严重边患。嘉靖元年(1522)六月二十九日，俺答军千余骑，自井儿堡拆墙入寇固原、凉州、泾阳等地，杀指挥杨洪、千户刘瑞。同年十二月，又寇固原、环、卫间，杀伤军民以万计。

严军职冒籍异姓之禁 嘉靖元年(1522)七月初三日，世宗下令：凡军职有异姓冒籍的，无论所袭世数，并与保勘之人，一律黜削职籍。并著为令。

常州、松江等府大风潮 嘉靖元年(1522)七月二十三日，常州府靖江县大风雨，潮如海，如是三日。民庐倒塌，漂没死者数万。嘉靖年，饥人相食。二十四日，南畿及浙西数千里间，上洋海啸，邑无完屋。二十五日，吴江大风竟日，太湖水高丈余，沿湖三十里内人畜屋庐，漂溺无算。崇明飓风，平地潮涌丈余，人民淹死无数，流移外境者甚多。松江府更甚。自未申时起，海风大作，沿江林木合抱者皆摧拔，至夜半风势更烈，平地水深二丈余，江海混一，茫无涯岸，巨

树在高阜者只露枝稍，沿江首尾相连的船只与庐舍，俱皆沉没，漂溺人死者无数。传相此为百年未有之灾。

陈寿逝世 陈寿(1440—1522)，字本仁，江西新淦人，成化八年进士，授给事中。弘治中迁大理丞，南京光禄少卿，转鸿胪卿。成化十三年(1500)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正德十六年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德初刘瑾用事，令致仕。九年正月起复巡抚陕西。后改南京兵部侍郎，进刑部尚书致仕。嘉靖元年(1522)九月二十一日卒。年八十三。陈寿清廉自持，历官四十年，无家可归，寓居南都，屋室不蔽风雨。

王堂起义 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二十二日，山东青州矿工王堂，率矿徒十余人，于颜神镇(今博山县)起义，转战东昌，兖州、济南等地，大破明军，杀指挥杨浩，都指挥杨纪仅以身免。官军分道围剿，义军遂突至曹州、考城，顺河而西，进入河南开封府祥符、封邱，南抵徐州。嘉靖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以俞谏为提督军务右都御史，督两畿、河南、山东诸军围剿。于考城大战中，为官军镇压。

郑宗仁逝世 郑宗仁(1451—1522)，字体元，直隶任丘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弘治十七年(1504)转南京太仆寺少卿，陈马政，深切时弊。正德四年(1509)改光禄卿。正德七年擢右副都御史提督雁门等关兼抚山西。正德九年召为户部右侍郎提督仓场。三年后兼左佥都御史督宣大军饷。正德十六年，世宗即位，以户部尚书总督仓场。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二十四日卒于官，年七十二。

马隆起义 嘉靖元年(1522)，马隆、柴世隆利用白莲教发动农民起义，后活动于河南卢氏、淅川及陕西商南、山阳等县。

诏革各省冗官 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二十二日，世宗下诏裁革各司、府、州、县添注、添设、署职冗员。除钱粮繁重之处照旧存留外，其余参政、参议、同知、通判、县丞，不系额设的，全部令其回籍，待缺取补。

撤浙江市舶提举司 明制：浙江设市舶提举司，以中官职掌，驻宁波。外国海船至，提举司则平其直，制驭之权在上。嘉靖元年，世宗尽撤天下镇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滨海之人遂操其利。初以商人与海船贸易，因严通番之禁，市利遂移于贵官家。富豪势要负外国海商货值甚巨而不得偿，遂使东南倭患日甚。论者以为，嘉靖初当撤中官，而不应罢市舶。

查勘皇庄及勋戚庄田奏革皇庄之名 嘉靖元年(1522)冬，世宗令给事中夏言等查勘，明确指出自正德元年以后，朦胧投献及额外侵占尽行查出。至嘉靖二年二月，查勘事毕，计顺天八府各项庄田土地计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九顷有余，退断侵占民地计二万零二百二十九顷有余。为此，夏言于同月初四奏陈：祖宗以来，各宫原无庄田，天顺间始立顺义庄田一处，其后增设渐多。以宫壶之贵，下与闾阎争利，似为不雅。请以负廓大兴县庄田改为各宫亲蚕厂、公桑园。其余一切，改为官地，给民佃种，年输子粒银两，户部转解承运库，分进各宫，以充支用。另外，严禁勋贵求请及河南、山东奸民献田王府。世宗得奏，准革皇庄，禁勋戚受献。

毛澄致仕 毛澄(1461—1523)，字宪清，号白斋，晚更号三江，直隶昆山人。弘治六年(1498)进士第一。授修撰。正德间，历礼部尚书。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游幸宣府，毛澄力谏不报。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又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往两畿瞻东岳，毛澄历陈五不可，亦不报。世宗即位，欲崇其所生，复抗疏力争。澄端亮有学行，论事侃侃不挠，世宗敬惮，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嘉靖二年(1523)二月三十日力请归，舟至兴济而于闰四月初十日卒，年六十三，赠少傅，谥文简。有《毛文简集》。

庙制之争 嘉靖二年(1523)二月，太常卿汪举上言，提出安陆兴献王庙宜用十二笾豆，其制如太庙。世宗命杨廷和集议乐舞，礼部侍郎贾泳会公侯九卿上言："八佾既用于太庙，安陆乐舞似当少杀，以避二统之嫌。"世宗命"仍用八佾。"于是，何孟春及给事中张翀、黄臣、刘最，御史唐侨仪、秦武等，南京给事中郑庆云各上言力争，不报。

杨廉致仕 杨廉(1452—1525)，字方震，号月湖，一号畏轩，江西丰城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改庶吉士，弘治三年(1490)授南京户科给事中。改南京兵科，迁南京光禄寺少卿。正德初改太仆卿，历顺天尹，迁南京礼部右侍郎。世宗即位，就迁礼部尚书。嘉靖二年(1523)三月初三日致仕，嘉靖四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少保，谥文恪。杨廉与罗钦顺相友善，为居敬穷理之学，文必根六经，自礼乐钱谷至星历算数，具识其本末。学者称月湖先生。有《伊洛渊源新增》、《皇明名臣言行录》、《月湖集》。

佛郎机人寇广东 嘉靖二年(1523)三月二十一日，佛郎机人别都卢率战船五艘，海盗一千余人，侵入广东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部应战，追击至稍州，生擒海盗首领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人，解救被掠男女十人，缴获战船二艘。后佛郎机战船复来战，王应恩阵亡，

佛郎机海盗败遁。获炮曰佛郎机,副使汪𬭎献于朝。

宫中建醮 嘉靖二年(1523)四月,暖殿太监崔文以祷祀诱世宗崇奉道教。于乾清宫、坤宁宫、五花宫、西暖阁诸处各建斋醮,连日不绝,同时命十余名太监于宫中习经学道,赏赐无数。大学士杨廷和、乔宇,给事中周琊、张嵩、张汝、安磐等交章上疏,弹劾崔文,停罢斋醮。世宗不予理采。闰四月,因天下灾荒,给事中郑一鹏上疏主罢斋醮。其疏说:自正德十六年以来,宫中除常膳外,少有其他支用。自斋醮兴,乾清、坤宁诸宫,以及西天、西番、汉经诸厂,乃至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均建斋醮,祷祀不休。郑一鹏奏改西天厂为宝训厂,以贮祖宗御制书;西番厂为古训厂,以贮五经、子、史诸书;汉经厂为听纳厂,以贮诸臣奏疏,供世宗"经筵之暇,游息其中"。世宗以天时饥馑,暂罢斋祀。

增盐商中纳之课 嘉靖二年(1523)五月十三日,世宗以盐价日高,命量增各商中纳之课。规定:年远者每引增一钱五分;近者增一钱七分。令具如数支掣,不得影射重复规利。

议处筹备粮饷 嘉靖二年(1523)五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孙交上言,议处筹边粮饷。他说:议处粮饷,筹边至计。但今太仓银少,运司盐引开中略尽。核查各边粮草实在之数,不足支一年之用,无烦再发。今宜及时召商籴卖本色,分贮要害,以防不测。其有势豪高价占寓罔利的,严加惩处。且令各府州县将应输京边粮草,加紧运送原定仓库。世宗准允付有司施行。

边方巡抚久任 嘉靖二年(1523)六月初五日,给事中刘世扬上言:出任边方巡抚,职任极重,时刻应付不测。然以前调动频繁,不利御边,亦难使其展尽方略,以安诸镇。因此,各边巡抚并命久任,以责成功。世宗准允,且谕吏部,今后边方巡抚当令其久任。十一月,又定巡抚久任有功,四年以上,赐敕增秩。

日本贡使宗设掠宁波 正德末嘉靖初,日本国王源义植年幼,政出于大夫,诸道争相来华朝贡。嘉靖二年(1523)六月十五日,日本封建主左京兆内艺兴遣僧宗设来贡至宁波,而右京兆细川高也遣使瑞佐偕中国商人宋素卿至宁波。按旧例,凡番贡至,阅货、宴席均以先至者为序。宋素卿重赂市舶太监赖恩,瑞佐虽后至,却先验其货,宴席又坐宗设上首。宗设不服,与瑞佐忿争仇杀,赖恩又暗地给瑞佐兵杖,宗设遂聚众毁市舶司嘉宾堂,劫掠东库,并以搜索瑞佐为名,杀掠至绍兴府,杀总督备倭指挥刘锦、千户张镗,并绑架指挥袁琎、百户刘恩。又自育王岭杀至小山浦,杀百户胡源,肆掠宁波,夺舟而去。事后,宋素卿、赖恩皆伏诛。

林俊致仕 林俊(1452—1527),字待用,号见素,福建莆田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上疏请斩妖僧继晓,并罪中贵梁芳,谪姚州判官。弘治元年(1488),擢云南副使。弘治五年,调湖广,后起南京右佥都御史。正德时,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四川。世宗即位,起工部尚书,改刑部。朝有大政,必侃侃陈论,持正不避嫌。因屡见格,遂于嘉靖二年(1523)七月二十二日致仕。"大礼"议起,与杨廷和合,又因世宗杖决大臣,乃数上疏力救。六年四月卒,年七十六。弘治七年夏六月,《明伦大典》成,追论林俊附和杨廷和罪,削其官。隆庆初复官,赠少保,谥贞肃。有《见素文集》、《西征集》。

王缜卒于官 王缜(1463—1523),字文哲,东莞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累迁工科都给事中。正德初,出为山西右参政,历福建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诸府。因忤中贵,调郧阳巡抚,迁南京刑部右侍郎。世宗即位,陈正本十事。嘉靖二年(1523)四月,擢南京户部尚书,同年八月十七日卒于官,年六十一。

再核庄田额数 世宗以查核各官庄田数目与旧额数不同,下户部再核。户部尚书孙交奏陈:旧额之多的,以奉旨清查退给除豁,地短少之数,乞请俟年丰将原报低洼地土,查有水退堪种及生芦苇的,量征子粒以补。嘉靖二年(1523)九月初九日,世宗降旨,令查弘治、成化间原数,及时奏报。

朱辅逝世 朱辅(? —1523),弘治九年嗣成国公、爵,任南京守备,因乞养母回京,历掌左、中二都督府事,提督三千营操练。正德十一年(1516)充总兵官、佩平胡将军印率师赴白羊口御虏。次年赴南京,仍任守备。时宁王作乱,立有守御功。正德十六年召还回京。嘉靖二年(1523)九月二十二日卒。赠太傅,谥恭僖。朱辅位上公,服食雅素,喜吟诵,有儒者之风。

孙交致仕 孙交(1453—1532),初名蛟,字志同,号九峰,安陆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弘治初荐擢吏部员外郎、郎中,后迁太常少卿提督回夷馆。正德初擢光禄卿,正德三年(1508)进户部右侍郎提督仓场。不久即改吏部。吏部尚书张彩依附刘瑾,不听其规劝,怒调南京。刘瑾伏诛,召拜孙交户部尚书。嘉靖二年(1523)十月十五日,加太子太保致仕,十一年卒于家,年八十。谥荣僖。有《晚节园集》。

彭泽致仕 彭泽,生卒年不详。字济物,号幸

庵，兰州人。弘治三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历刑部郎中。正德初，起知真定。历迁浙江副使、河南按察使，所至以威猛称，擢右都御史。偕威宁伯仇越讨平刘惠、赵镃等于河南。总督川陕，复破平川，进左都御史、太子太保。与王琼忤，乞归，斥为民。世宗初，起兵部尚书。部事积坏已久，泽核功罪，杜干请，兵政一新。嘉靖二年(1523)十月二十三日，以疾加少保致仕，嘉靖后因张璁、桂萼方疾杨廷和，遂逮陈九畴廷讯，戍边，泽复夺官为民，家居郁郁而卒。谥襄毅。

遣宦官提督织造 礼科给事中章侨奏陈：道路传闻，镇守浙江太监梁瑶，遣人挟赀营管织造。若此事为实，官民受害，不可胜言，请戒梁瑶，勿生事端。不久，内织染局太监刁永以皇上用袍服、两宫服御为由，求遣内官提督织造。嘉靖二年(1523)十二月十四日，世宗降旨：依成化、弘治年间例，遣内织染局宦官二员，前往苏杭等五府提督织造事宜。为此，部院大臣、九卿科道官纷纷上疏谏止。大学士杨廷和建言：今日直隶、浙江，水旱异常，百里之内断绝炊烟，卖儿鬻女，动以千计，至于相视痛哭、投水而死，不计其数。若再遣宦官提督织造，不仅逼勒逃亡，且恐激成他变。将来事势，尚不可料。世宗不听，反令蒋冕快速拟敕。蒋冕亦具疏请止，世宗仍不纳，而敕亦久不进。世宗责其怠慢，而蒋冕宁引罪，终不奉命。即使如此，世宗固执己见，遣宦官提督织造事宜，坚持施行。

唐寅逝世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与里狂生张灵纵酒放荡，不事科举，学画于周臣，与祝允明、沈周相友善。后听祝允明劝，举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一，不久以程敏政泄试题事牵连，遂下狱，谪为吏，他耻不就职，自放于名山大川，卜筑桃花坞以居，毕生致力绘画。擅山水，工人物、花鸟，兼及书法，且能诗文。与祝允明、徐祯卿、文徵明齐名，并称"吴中四才子"，又与沈周、仇英、文徵明合称为"明四家"。嘉靖二年(1523)卒，年五十四。有《六如居士全集》、《画谱》等。

撒马儿罕贡使至京 嘉靖二年(1523)，撒马儿罕贡使至京师因贡使入境一切饮食、道途费用，均由明廷支付，所以使臣在途者迁延隔岁，在京者伺候同赏，光禄、邮传费用过大。由礼官奏请，撒马儿罕宜遵制五年一贡，并限定贡使入京人数。

《后鉴录》刊行 《后鉴录》三卷，谢蕡撰，嘉靖二年八月十五日刊行。谢蕡，字维盛，福建闽县(今福建福州市)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该书卷上为刘六、刘七起义，安化王谋反，刘瑾被诛；卷中为宁王起兵，江彬伏诛，哈密都督反叛；卷下为燕王起兵。以刑科题本的形式记录了刘瑾、赵镃、张供等人口供。订正和弥补了一些史书的错误和不足，是研究明史，尤其是为研究明代中叶农民起义提供了原始史料。

群臣议礼夺俸 嘉靖元年(1522)正月末，世宗勉从众议，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事过年余，不复有他议。然而，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同张璁，日夜私诋朝议。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亦各具疏与张璁意合。桂萼揣摩世宗之意，于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上疏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别立庙于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宜称圣母。并将席书、方献夫二疏同时奏陈。世宗得疏心动，于同年二月十三日，亲下诏书由礼部主持廷臣商议。礼部尚书汪俊等集议奏报：前后章疏，惟张璁、霍韬、熊浃、桂萼相同。而两京诸臣共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部议，桂萼等肆言无忌，宜加惩处。世宗不从，下部再议，且召张璁、桂萼于南京。三月初一日，世宗谕礼部，加昭圣慈寿皇太后为昭圣康惠慈寿，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章圣皇太后，皇考立庙奉先殿侧。汪俊建言：献帝徽称之上仍宜加兴献，于本生不失尊崇，于正统无嫌匹敌。世宗切责。初三日，吏部尚书乔宇等屡争大礼，请于孝宗称皇孝，于兴献帝称本生考，世宗仍不听。修撰唐皋、编修邹守益等、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一人，各具疏谏止。世宗大怒，或被夺俸，或被逮捕入狱问罪。

杨廷和致仕 杨廷和(1459—1529)，字介夫，号石斋，新都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进修撰。预修《宪宗实录》，书成进侍读，再改左中允，侍皇太子讲读。修《会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学士，充日讲官。正德二年(1507)，由詹事入东阁专典诰敕。以忤刘瑾改南京吏部左侍郎，五月迁南京户部尚书。又三月召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累官至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武宗逝世，世宗未至，廷和总理朝政达四十余日，以遗诏尽罢前朝弊端，中外大快。及大礼议起，廷和力争，议不和，于嘉靖三年(1524)二月十一日致仕。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诏定议礼诸臣罪而被削职为民。八年六月卒，年七十一。隆庆初复官，赠太保，谥文忠，有《杨文忠公三录》、《石斋集》。

汪俊致仕 汪俊生卒年不详，字抑之，弋阳人。弘治进士，授编修。正德中，参与修《孝宗实录》。因不附阉党刘瑾，调南京工部员外郎。瑾败，召复原官。嘉靖元年，擢吏部左侍郎，进礼部尚书。因议"大礼"忤旨，于嘉靖三年(1524)三月二十一日致仕。卒

赠少保，谥文庄。他尊崇理学，与王守仁交好，学者称“石潭先生”。

群臣伏阙哭争“大礼” 嘉靖三年(1524)三月二十一日，张璁、桂萼被召，行至道途，即上疏条陈七事，极论两考之非，主张以伯孝宗而考兴献王为正。秋七月，璁、萼复列十三事以上，皆条例礼官欺罔之罪。疏入留中。何孟春为论条辨，世宗切责。后帝御平台，召毛纪责之，说：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纪惶怖，召百官至左顺门，敕曰：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今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后四日，恭上册宝。何孟春与尚书秦金、学士丰熙等及翰林、寺、部、台谏诸臣，各上言力争“本生”二字不宜删，章十三上，俱留中不报。七月十五日，世宗罢朝后斋居文华殿，何孟春以宪宗朝尚书姚夔率百官伏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故事，而杨廷和之子杨慎则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王元正、张翀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高呼：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于是尚书秦金等朝臣二百一十五人，遂赴左顺门，跪伏恸哭，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世宗命司礼监太监谕退，众人不去。朱希周又诣请阁臣毛纪、石瑶同赴左顺门跪哭，自辰至午不起。世宗命司礼监录其姓名，并将为首者丰熙、张翀、余宽等八人逮系入狱，杨慎、王元正等人撼门恸哭，一时哭声震撼宫廷。世宗大怒，遂逮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入狱，何孟春等八十六人待罪。庚辰，锦衣卫又追捕奔匿者及待罪者共二百二十人。事后，大学士丰熙等八人编戍充军，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廷杖，王思、裴绍宗等十七人先后决杖病死。

林廷玉罢归 林廷玉(1454—1532)，字粹夫，号南涧，福建侯官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除吏科给事中，历工科都给事中，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调南京都察院理院事，改总督漕运。嘉靖三年(1524)四月初四日，以事忤者罢归，嘉靖十一年卒，年七十九。有《南涧文录》。

仿造佛郎机炮 嘉靖三年(1524)四月二十三日，南京内外守备魏国公徐鹏举等疏请广东所得佛郎铳法及匠作。兵部议佛郎机铳，非蜈蚣船，不能架。宜并行广东取匠于南京制造。世宗允准。

蒋冕致仕 蒋冕(1463—1533)，字敬之，全州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编修。正德间累官至户部尚书。武宗昏庸，朝政混乱，冕持正不挠。世宗即位，“大礼”议起，诸臣揣帝意而自全，冕与杨廷和等力争，以忤贵显张璁、桂萼。后代杨廷和为首辅仅二个月，于嘉靖三年(1524)五月初一日致仕。论者谓有古大臣风。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落职闲住。嘉靖十二年卒，年七十一，谥文定。有《湘皋集》、《琼台诗话》。

名奉先殿西室为观德殿 嘉靖三年(1524)五月初八日，世宗定奉先殿西室名观德殿，奉安献皇帝神主，祭器如太庙。十三日，礼部左侍郎吴一鹏上言：历考前史，并无迎主入大内。乞求供奉于安陆，正百世不迁之祀。其观德殿别立位，时慰孝思。世宗不纳。六月初八日，观德殿用乐舞，太常寺卿汪举言：奉先殿不用乐舞。世宗切责，令其尽速筹备。七月二十一日，献皇帝神主至京。奉安观德殿，上册室。

俞谏逝世 俞谏(1455—1524)，字良佐，桐庐人。弘治三年进士，授长清知县。历江西参议，有平贼功。正德中累擢右佥都御史，治水苏杭诸府，平桃源叛乱，进右都御史兼领巡抚，不久致仕归里。嘉靖初，起复故官，总督漕运。嘉靖二年(1523)八月回院理事，嘉靖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赠太子太保，谥庄襄。

薛蕙削籍 薛蕙(1489—1541)，字君采，学者称西原先生，亳州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刑部主事。因谏武宗南巡，受杖夺俸，旋引疾归。后起故官，历考功郎中。嘉靖二年(1523)，廷臣数争“大礼”，与张璁、桂萼相持不下。嘉靖三年六月十八日撰《为人后解》、《为人后辨》，并辨驳璁、萼所论七事，合数万言以上。世宗览疏大怒，下镇抚司考讯，又为陈洸所潜，遂解仕归里。嘉靖二十年卒，年五十三。有《西原遗书》、《约言》、《考功集》。

王源逝世 王源(1548—1524)，字宗本，号观澜，上元(今南京)人，授锦衣卫都指挥使。天顺六年(1462)迁中府都督同知。家奴依势侵占民田，被言官弹劾，王源将侵占田土全部退给百姓，人称其能改过，封瑞安伯。武宗时累进太傅、瑞安侯。嘉靖三年(1524)七月初三日卒，年六十七，谥荣靖。

乔宇致仕 乔宇(1464—1531)，字希大，号白岩，乐平(今山西昔阳)人。成化进士，授礼部主事。弘治初，王恕为吏部，调他为文选郎，三迁至郎中。擢太常少卿，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宁王宸濠反，扬言旦夕下南京，他严为防备，斩宸濠潜伏在南京的内应党羽三百余人，使宸濠不敢东向。宸濠败，武宗幸南京，论功加太子太保，又加少保。世宗即位，召为吏部尚书，朝政为之一清。“大礼”之争起，世宗召用席书、张璁、桂萼等，他力谏，因忤帝意，遂于嘉靖三年(1524)七月初六日其致仕。《明伦大典》成，夺职闲住。嘉靖十年(1531)十月卒，年六十八。隆庆初复官，赠少傅，谥庄简。他善诗文，兼通篆籀。有《乔庄简公集》。

毛纪罢归 毛纪(1463—1545)，字维之，号鳌

峰逸叟，掖县人。成化乡试第一，登进士。弘治初，授检讨，累迁侍读。武宗立，参与修《孝宗实录》，书成，擢侍讲学士，为讲官。正德五年(1510)进学士。正德十年，迁礼部尚书。正德十二年，命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世宗即位，以定策功，加伯爵，不受。"大礼"议起，杨廷和等相继去职，遂为首辅。朝臣伏阙哭争，俱逮系，毛纪上疏乞宥，传旨切责，遂于嘉靖三年(1524)七月二十六日致仕。《明伦大典》成，追论夺官。嘉靖二十四年(1545)卒，赠太保，谥文简。毛纪有学识，著作有《密勿稿》、《辞荣录》、《归田杂识》、《鳌峰类稿》等。

大同兵变 大同巡抚都御史张文锦以大同无险可恃，乃度地构筑五堡，由参将贾鉴督工，甚严酷，役卒多怨恨。五堡建成，议徙戍卒，贾鉴催促甚急，久积怨恨的戍卒遂于嘉靖三年(1524)八月初一日叛乱，杀贾鉴及张文锦，放出关在狱中的总兵朱振，胁其为帅。明廷派蔡天祐为佥都御史，安抚乱军。不久，兵部尚书金献民过大同，叛军误为征讨，复群聚为乱。明廷命侍郎胡瓒、都督鲁纲率京军三千讨伐。叛军拒守，杀知县王文昌，并围攻代王府。胡瓒军至阳和，总兵桂勇、千户苗登擒斩叛军首领郭鉴，其父郭疤子遂四出焚掠，后逃匿塞外。次年春天，郭疤子等潜入城内，蔡天祐闭门搜索，郭疤子等三十余人皆被斩，叛乱始定。

张文锦被杀 张文锦(？—1524)，安丘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户部主事。正德时为权阉刘瑾所陷，逮系诏狱，斥为民。瑾诛，迁郎中，督税陕西，条上筹边裕边十事，迁安庆知府。计度宸濠将反，与都指挥杨锐预备设防。宸濠浮江而下，文锦虑其攻南京，督军士登城诟骂，宸濠乃留攻，卒不能克，以功擢太仆少卿。嘉靖元年(1522)，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嘉靖三年八月，大同兵因徙戍，请募新丁，而贾鉴杖其队长，郭鉴、柳忠率众反叛，杀贾鉴，裂其尸。走出塞，屯焦山墩。文锦恐叛卒与外寇联系，令副将时陈等招之入城，即索治倡乱者。郭鉴复为乱，焚大同府门，入行都司纵狱囚，又焚都御史府门。文锦越垣匿博野王府内，乱卒欲焚其府，王惧，出文锦，被郭鉴杀害，亦裂其尸，遂焚镇守总兵公署。乱平，侍郎李昆为文锦请恤典，不报。文锦父子及其妻李氏复上疏哀请，帝怒，命执赍疏者治之。副都御史陈洪谟又为文锦请恤，降旨诘责，自此无人敢请。万历中，始赠右都御史。天启初，追谥忠愍。

崔铣致仕 崔铣(1478—1541)，字子仲，一字仲凫，安阳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编修。预修《孝宗实录》，因见权阉刘瑾，长揖不拜，出为南京吏部主事。瑾败，充经筵讲官，进侍读。引疾归，作后渠书屋，读书讲学其中。世宗即位，擢南京国子监祭酒。"大礼"议起，张璁、桂萼等贵显用事，铣疏劾璁、萼，帝不悦，令于嘉靖三年(1524)八月十九日致仕。用荐起，历南京礼部右侍郎。嘉靖二十年卒，年六十四。谥文敏。崔铣学宗程朱，言动皆有则，斥王守仁为霸儒。著述甚丰，有《读易馀言》、《崔氏小尔雅》、《彰德府志》、《文苑春秋叙录》、《士翼》、《后渠庸言》、《洹词》、《政议》、《晦庵文钞续集》、《文苑春秋》等。

更定大礼 嘉靖三年(1524)九月初五日，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尊称由是而定。十五日，诏告天下，咸使闻知。

严禁内臣科索 嘉靖三年(1524)十月十三日，应天巡抚吴廷举上言：内官监监收白熟粳米，额外科索无厌。大率正粮一石，加费二石，方获批单。虽屡次奉旨禁革，而内官监置若罔闻，科索如故。乞请严加禁革，民不为病。世宗得旨下诏：今后内官监收粮，依照旧例，每石加耗一斗，不许分外多收。库余人等有如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财者，如法究治。

边宪逝世 边宪(1464—1524)，字汝成，号桂岩，任丘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青州府推官，发奸谳狱如老吏，郡中畏服。擢监察御史，出按山西。历任浙江按察使、布政使。正德中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宁夏，遇敌于花马池红儿山，五日七捷。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左都御史。嘉靖三年(1524)十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一。

求复官校日众 嘉靖三年(1524)十一月初二日，礼部尚书席书上言：皇上登极之初，诏告天下，令裁革锦衣卫官校及勇士、匠作人等至十余万，每年省京储米一百五十万石。可不过几年，夤缘求复官校日众。皇上虽不许，但颇为优容。请捕治一二，以示警戒。且言中外贵官，自今毋再升锦衣卫诸秩，以开幸门。兵部复请。世宗以为席书所言窒碍难行，不予允准。遂使一批钻营之徒乘机求进。嘉靖四年五月，前朝锦衣卫王邦奇钻营求复官，遂授锦衣卫试百户，同时复官的有九十余人。因王邦奇素怨杨廷和、彭泽，复官后即屡构大狱以泄私愤。

南畿大饥 嘉靖三年(1524)，南直诸府大饥，人相食。巡按朱衣奏言：民迫于饥饿，婺妇刘氏食四岁小儿，百户姚臣、王堂以子卖母，军馀曹洪以弟杀兄，王明以子杀父，无复人道。地震雾塞，臭气闻千里，造反者四起。皇上命户部侍郎席书发库帑，截漕粟赈之。又发帑金十五万分赈淮安、凤阳二府。

吐鲁番满速儿犯肃州 嘉靖四年(1525)正月

初七日，吐鲁番满速儿拥兵二万余骑，围肃州，并分兵犯甘州。甘肃巡抚陈九畴及总兵官姜奭力战，斩火者他只丁，满速儿败退。事闻，世宗命兵部尚书金献民西讨，明军抵兰州，因满速儿早已退兵，遂引兵还。从陈九畴建言，闭关绝贡。

権商税于山海关　嘉靖四年(1525)正月初十日，镇守蓟州等处太监李能奏陈：边关堡墩台无修理费，乞于山海关往来商旅，量取其税，贮以待用。疏下户部议。户部奏称：设关本以诘奸，例不征税。且先年诏旨，凡道路关津无名抽取，业已厘革，不当循私违制，妄开利门。世宗不从户部之议，下旨：从李能之言。令镇守、巡抚委官抽取。

诏修《献皇帝实录》　嘉靖四年(1525)三月十五日，诏修《献皇帝实录》。以定国公徐光祚、吏部尚书廖纪、礼部尚书席书为监修官，大学士费宏、石瑶、贾咏为总裁，侍郎温仁和、李时为副总裁，董玘、翟銮、高嵩、赵铭等为纂修。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成。其书据太监张佐等编《实录》所载兴献王所制序文、各年章奏以及兴献王的《持身治国之要》三十五条纂成。

刘麟致仕　刘麟，字元瑞，本安仁人，世为南京广洋卫副千户，因家焉。绩学能文，与顾璘、徐祯卿称“江东三才子”。弘治九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进员外郎，平反三百九十余人。正德初，出为绍兴知府。因刘瑾衔其不谒谢，罢为民。瑾诛，起补西安，寻迁云南按察使。嘉靖初，召拜太仆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六府。于嘉靖四年(1525)三月二十一日致仕后起改大理寺卿，擢工部尚书。因上节财十四事，中贵大恨。由于牒停浙江、苏、松织造，而上供袍服亦在停中，中官吴勋以为言，遂令刘麟致仕。居郊外南垣，赋诗自娱。晚好楼居，而贫不能构，悬篮舆于梁，曲卧其中，名曰神楼。文徵明绘其图。嘉靖四十年卒，年八十八。赠太子少保，谥清惠。有《刘清惠集》。

建世庙　嘉靖四年(1525)四月二十六日，光禄寺丞何渊疏请建立世室，以崇祀兴献皇考于太庙。礼部尚书席书认为，何渊欲以藩王比之太祖太宗，妄为谀词。而张璁迎合帝意，上疏请于皇城内择地另立祢庙，不与太庙并列。五月，世宗命礼部定议立“世室”。六月，又命工部于太庙左环碧殿旁建造世庙，前殿后寝，一如太庙之制，定庙名曰“世庙”。嘉靖五年七月，世庙建成，世宗自观德殿奉献皇帝主于世庙，复自武英殿迎献皇帝神位于观德殿。礼成，群臣表贺，撰《世庙乐章》。嘉靖十五年十月，更“世庙”为“献皇帝庙”。

陈雍致仕　陈雍(1451—1542)，字希冉，号简庵，浙江余姚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主事，预修《问刑条例》，迁员外郎，出任湖广按察佥事，升广东按察使。后历任河南右布政使、贵州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郧阳、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世宗即位，召还理部事。嘉靖二年(1523)提督易州山厂。不久，擢南京工部尚书。嘉靖四年六月初六日致仕，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二日卒，年九十二。

金献民致仕　金献民生卒年不详，字舜举，号誉溪，绵州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除行人。弘治初，选授御史，按云南、顺天，并著风裁。出为天津副使，历湖广按察使。正德时，历南京刑部尚书。世宗即位，召为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寻代彭泽为兵部尚书。献民请敕天下镇巡官预守战备，并且力请用贤纳谏，罢土木，屏玩好，世宗多采纳。土鲁番速檀满速儿寇肃州，献民兼右都御史总制陕西四镇军务。行至兰州，因陈九畴已败敌，遂还朝。嘉靖四年(1525)六月初九日致仕。嘉靖七年五月二十日被劾逮捕入狱，不久令革职闲住，卒于家。隆庆二年(1568)复秩予祭葬，三年追赠太子少保。

郑岳致仕　郑岳(1468—1539)，字汝华，号山斋，福建莆田人。弘治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官江西左布政使。世宗即位，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不久召还任大理寺卿、迁兵部左侍郎。嘉靖四年(1525)六月十一日致仕，嘉靖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莆阳文献》、《山斋集》。

禁止滥收新匠　嘉靖四年(1525)七月二十三日，兵部尚书李钺奏陈：织染局署事太监刁永奏称监局缺乏匠役，奉旨收用。臣以为不可。粮储与国脉相为流通，军匠与粮储互为损益。查得织染局现在军匠二千一百六十四名，内官监七千八百五十六名，并今新收一千五百余名。一监局以一岁计，该支粮米十五万零二百四十石，其他监局食粮人役难以数计。现今京、通二仓粮米俱无三年之积。乞皇上禁止滥收新匠。世宗得奏，下令监、局人匠各准收五百名，内府匠役从宜量收。

吴廷举致仕　吴廷举(1463—1528)，字献臣，梧州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除顺德知县。忤中官，毁淫祠二百五十余所，以葺学宫、书院，执下狱。后迁成都同知，擢广东佥事。从总督潘蕃讨平南海、清远诸盗。正德初，历副使，发总镇中官潘忠二十罪，潘忠亦讦廷举他事，逮系诏狱。刘瑾矫旨，枷十余日，几死。戍雁门，旋赦免。擢江西右参政。世宗立，召为工部右侍郎，改兵部、户部，迁右都御史。嘉靖三年(1524)，以“大礼”议未定，请如洪武中修《孝慈录》

故事，令两京部、寺、台、省及天下督、抚各条所见，并询家居老臣，采而行之，汇为一书，以诏后世。寻改南京工部尚书，称疾乞休。辞疏中复用“呜呼”字，帝怒，以廷举怨望无人臣礼，嘉靖五年十月二十日勒致仕。家居三年卒，年六十六。隆庆中，追谥清惠。

颁布《大礼集议》 嘉靖四年(1525)十二月十七日，《大礼集议》书成，礼部尚书席书呈进。原编奏议一卷、会议一卷，系学士方献夫纂辑。后又增胡世宁所奏及前人有关典礼的议论为第三卷；再增特建世庙议为第四卷。后张璁又请依春秋例系以年月，始正德十六年(1521)，迄嘉靖四年。大书其纲，细书其目，开附已意于下为纂要上下二卷，附录遗议数篇、古今考证数篇。集议四卷，共为六卷。世宗令颁布于藩府及中外群臣，又令各省刊布以传。

罢饲鹰虫费 嘉靖五年(1526)二月初一日，监察御史雷应龙奏陈：光禄寺每年供鹰犬肉一万六千五百余斤，虫鸟食绿豆、黍稌五千二百余石。此禽兽费民财，请全部罢除。户部覆议，此费可省。世宗说：即位以来，凡百玩好不经目，惟欲慎听图治，以安生民。此鹰犬虫蚁，无所益处，每年畜养耗费以万千计，该管官查实以闻，予以罢除。

改两淮盐法 嘉靖五年(1526)二月十二日，户科给事中管律奏陈：两淮盐课，旧制七十二万引有奇，其常股四分以给工役赈济之需；其存积六分，非国家大事、边镇有警，未尝擅开；粮草皆输本色，未尝滥收银价。所以国不言虚，边不告欠。正德中改存积、常股皆为正课，破例生奸，遂令商人逯俊等自请开中，又皆折收价银，缓急无备。因此，乞请自嘉靖五年始，尽复旧规，则公私两便。户部覆议，世宗允准施行。

芒部改土归流 嘉靖五年(1526)四月初四日，朝廷根据兵部奏疏，四川芒部土官陇寿、陇政兄弟皆死，其本属亲支已尽，无人承袭，遂将其地改为镇雄府，设流官知府，以通判程洸为试知府。分属夷良、毋响、落角利之地，为怀德、归化、威信、安静四长官司，以陇氏疏属阿济、白寿、祖保、阿万四人为长。三年一入朝，贡马十二匹。

唐皋逝世 唐皋(？—1526)，字守之，号心庵，南直隶歙县人。正德九年进士第一，受命修《武宗实录》，进官翰林院侍讲，奉使朝鲜，还迁侍读学士。嘉靖五年(1526)四月初七日卒于官。有《心庵文集》。

赵鉴致仕 赵鉴(1454—1537)，字克正，寿光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萧山知县，擢监察御史巡按宣大。时边帅久不进，上疏弹劾，又陈方略详尽。于是将士奋勇，连战皆捷。正德中，进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大修边务，且谕吐鲁番还哈密侵地。后历任大理卿、南京刑部尚书、刑部尚书等。嘉靖五年(1526)五月十九日致仕，世宗作诗宠其行。十六年七月初九日卒，年八十四。赠太子太保，谥康敏。

诏禁严刑 嘉靖五年(1526)六月十七日，礼科右给事中谢蕡上疏请革严刑，以全民命。世宗得疏，立即下诏：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近来问刑官于罪轻宜用常刑的率用酷刑拷讯伤人，或因而致死。都察院即以此意示各抚按官，令戒谕诸问刑官，自今务以宽恤为念。有严刑致人以死的，降革如法；上官容隐，不及时参纠的，一律治罪。

李福达之狱 嘉靖五年(1526)七月初五日，左都御史聂贤上李福达之狱。李福达，又名李午、张寅。曾因参加王良、李越的白莲教，戍山丹卫和山海卫。后逃还，改名为午(一作伍)为清军御史查获，再戍山丹卫。复又逃居洛川，利用弥勒教聚众数千人，欲图起事。因事暴露，其首领邵进禄等人被杀，李福达因先回家得免，更名张寅。以黄白之术得信于武定侯郭勋，输粟捐官为太原卫指挥。山西巡按御史马录以张寅即是弘治时逃脱的李福达奏报朝廷，并劾郭勋庇奸乱法。都察院查实，诏郭勋对状，言官也交章上疏劾郭勋，三法司及文武大臣拟定其罪。郭勋因在议礼中支持张璁、桂萼，张、桂遂上疏说郭勋因议礼而犯众怒。世宗大怒，遂命张璁掌都察院，桂萼掌刑部，主持三法司会审，张、桂一反前狱，定张寅不是李福达，并诬马录等因恨郭勋而构成冤狱，并上书列开诸臣罪名。嘉靖六年八月，遂罢谪刑部尚书颜颐寿等四十六人，张寅还职。世宗以张、桂平反有功，赐二品服俸，给三代诰命，并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

世宗手书示臣 嘉靖五年(1526)八月二十四日，世宗朱厚熜手书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祸淫十二字颁示辅臣，且谕及皇考昔年垂训之功，今日勉学之勤。

李钺致仕 李钺(1465—1526)，字虔甫，号毅斋，祥符人。弘治九年进士。除御史。巡视中城，理河东盐政，历有声绩。正德元年，因论中官李兴等罪，并请斥尚书李孟旸、都督神英。权阉刘瑾恶李钺劾其党，假他事罚米五百石输边。瑾败，出巩昌知府，寻迁四川副使。以平四方功，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世宗即位，历兵部左、右侍郎，出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李钺长军旅，料敌多中，屡建战功。嘉靖二年(1523)，以塞上无警召还。进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入掌都察院事。嘉靖四年，代金献民为兵部尚书兼督团营。因屡疏不用，遂于嘉靖五年九月十五日致仕，未行而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二，赠太子

少保，谥恭简。

田州岑猛反叛 广西岑氏，明初以来世为土知府。弘治中期，岑猛与思恩岑浚构兵，岑浚攻陷田州，岑猛逃走。总督潘蕃率兵平定岑浚，经刘大夏议准，田州、思恩俱改设流官，降岑猛为千户，徙福建。正德初，岑猛贿赂太监刘瑾，以同知摄府事。后从征江西，进指挥同知，岑猛不满，自恃兵力，侵掠邻境。巡抚都御史盛应期上岑猛反状，嘉靖五年(1526)十月世宗命都御史姚镆调永顺保靖兵，由都指挥沈希仪统领进讨。沈希仪以岑猛妻翁岑璋为内应，杀其长子岑邦彦，又于同月二十七日设计诱杀岑猛，田州乱平。嘉靖六年二月改流官。

俞琳致仕 俞琳(1454—1529)，字德彰，临安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授行人，擢监察御史，所至发奸擿伏，不少顾避，贪横敛迹。历任鸿胪丞、鸿胪少卿、鸿泸卿，再迁礼部右侍郎仍掌鸿胪卿事，改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赈济畿辅，事毕，迁礼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正德十六年(1519)升工部尚书掌司事。世宗即位，加太子少保。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十一日致仕，嘉靖八年卒，年七十六。

席书建言时政 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十七日，礼部尚书席书等建言时政，集议十六事：给长单(户部给解户完纳内府)，裁民运(山东，河南，直隶民运宣府粮草)，定册封，禁越奏，处造办(俱指王府)，久责成，严查勘，停冒滥，核军功，议弭盗，恤高墙，慎诬枉，议军饷，禁奢侈，饬武备，惩严苛。世宗以为言之有理，全部采纳施行，并令四品以上官自谏。

祝允明逝世 祝允明(1461—1527)，字希哲，南直长州人。生而枝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五岁能写径尺之字，九岁能诗，及成年，博览群籍。为文多奇气，尤工于书法，名动海内，与徐祯卿、唐寅、文征明一起，号称"吴中四才子"。弘治五年(1492)举人，官至应天府通判。不久致仕，自放不羁。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二十八日逝世。有《前闻记》、《九朝野记》、《怀星堂集》等。

席书致仕 席书(1461—1527)，字文同，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郯城知县。正德中，历河南按察司佥事、贵州提学副使、右副佥都御史，巡抚湖广。世宗即位，"大礼"议起，他揣帝意，草疏以宋英宗入继大统为例，议尊皇父兴献王为皇考兴献帝，疏成，以示桂萼，萼遂上其疏，合帝意，赐召见，特旨授礼部尚书，自此世宗倚为亲信，眷顾隆异，虽辅臣不敢望。嘉靖六年(1527)二月初五日进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赐第京师。三月十一日卒，年六十七。赠太傅，谥文襄。有《大礼集议》。

何孟春致仕 何孟春(1474—1536)，字子之，号燕泉，郴州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兵部主事。后出理陕西马政。正德初，出为河南参政，不久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镇压十八寨少数民族起义。世宗即位，迁吏部侍郎，代署部事。时"大礼"议起，他在云南就已上疏谏争。入京官吏部，张璁列上礼官欺妄十三事，他偕九卿等具疏驳斥，疏上留中。又与九卿以上官共二百二十九人，跪伏左顺门请谕旨，世宗大怒，逮十八人，孟春被夺俸一月，调南京工部左侍郎。嘉靖六年(1527)二月初五日致仕，引疾归里。《明伦大典》成，被削籍，嘉靖十六年卒于家，年六十三。后复官谥文简。有《何文简疏议》、《家语注》《何燕泉诗》、《馀冬序录》等。

何天衢逝世 何天衢(？—1527)，字道亨，湖广道州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嘉兴知县，擢监察御史。时刘瑾用事，朝臣谄附，天衢耻与为伍，遂被劾中伤，禁锢家居。刘瑾死，起迁河南知府。嘉靖初擢都御史巡抚河南，再进工部右侍郎理易州山厂。嘉靖六年(1527)二月初九日卒于官，赠尚书。

石瑶致仕 石瑶(？—1528)，字邦彦，号熊峰，藁城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弘治末，进翰林院修撰。正德改元，擢南京侍读学士，历南京、京师国子监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召改礼部进左侍。正德十六年(1521)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世宗即位，改吏部尚书。嘉靖三年(1524)五月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嘉靖六年二月十六日致仕，嘉靖七年冬卒于家，赠太保，谥文隐。隆庆初，改谥文介。有《熊峰集》。

王守仁抚降田州 广西田州改设流官后，州人多有怨。嘉靖六年(1527)三月十七日岑猛余党卢苏、王受等纠众为乱，攻陷州城。五月十一日，朝廷诏起兵部尚书王守仁总制两广军务，督军讨伐。王守仁与御史石金定计招抚，遣归诸军，只留永顺保靖兵一千人，解甲休息。卢苏、王受率众乞降，自缚至军门请命。王守仁奏请割田州地，别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为吏目，署州事。并设巡检司十九，以卢苏、王受等人充任，受流官约束。田州乱遂平。

赵璜致仕 赵璜(？—1532)，字廷实，号西峰，安福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历员外郎，济南知府，政绩大著。正德初，擢顺天府丞，以不附刘瑾，被逮除名。后复官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不久改调山东。再迁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还佐部事。嘉靖元年(1522)迁工部尚书。锐意厘革，中官不敢阻挠，得举其职，与秦金齐名。嘉靖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致仕。嘉靖十一年召复故官，未行而同

年七月卒。赠太子太保，谥庄靖。

张嵿致仕　张嵿（1458—1531），字时俊，萧山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弘治初，修《宪宗实录》，命往苏州、松江诸府搜采轶事。事竣，授上饶知县。迁南京兵部主事，进刑部郎中。正德初，迁兴化知府。刘瑾擅政，为隆平侯张祐族人争袭事，削尚书樊莹籍，张祐亦夺官为民。瑾败，起知南雄，擢江西参政，进右布政使，召为光禄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因忤中贵，称疾而归。世宗即位，命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寻召掌南京都察院事，改工部尚书。嘉靖六年（1527）三月二十五日，大计京官，拾遗被劾致仕。嘉靖十年正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

陈洪谟致仕　陈洪谟（1474—1555），字宗禹，号高吾，武陵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刑部主事，转员外郎，改南京户部员外郎，迁郎中。正德时出任漳州知府，有政绩，擢云南按察使，不畏强暴，为民除奸。嘉靖元年（1522）升山东左布政使，改江西左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节财爱民。嘉靖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拾遗致仕。嘉靖八年召任兵部右侍郎，清理军职贴黄，进左侍郎。后复致仕，嘉靖三十四年卒，年八十二。有《治世余闻》、《静芳亭摘稿》、《高吾诗稿》传世。

廖纪致仕　廖纪，生卒不详，字时陈，一字廷陈，号龙湾，东光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吏部主事，迁郎中。正德中历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厂，迁吏部左右侍郎。世宗即位擢南京吏部尚书，调兵部，参赞机务，被劾解职。嘉靖三年（1524），以大礼议被荐任吏部尚书，多次谏言。曾修《献皇实录》，加太子太保。因数与张璁等牴牾，于嘉靖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加少保致仕。卒赠少傅，谥僖靖。有《大学管窥》、《中庸管窥》。

观德殿改名崇先殿　嘉靖六年（1527）四月，崇先殿成。此殿即观德殿更名。世宗以世庙配太庙，崇先配奉先，皆祀献皇帝。

大臣廷推　嘉靖六年（1527）五月十七日，兵部左侍郎张璁奏言：近来佥推吏部、礼部大臣，科道互争，被推之臣，又以历俸年深出争先后。古者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今乃自荐而争先，是大臣会推不由朝廷而由己。因此建议：自今凡致仕大臣必奉明旨起用，方许与推；凡推用大臣，吏部与九卿共定其论，由皇帝裁决。世宗得奏下诏：致仕大臣非奉旨不得径推。吏部以用人为职，凡推用官员，必吏部先举。若舆情未协，亦要明白商榷，不得自陈资序，以亏礼让；亦不得立异纷争，以伤大体。其后援引非人，举用失当的，科道官严加纠正。

核查宣府军储　提督宣大兵部左侍郎冯清曾奏陈：宣府一镇，自弘治九年（1496）以来，兵饷渐增，日长月益，即今天籍稽之官军实七万七千六百余员，岁应支粮九十七万零八百余石，较弘治时兵增一万九千五百有奇，则岁增粮当三十一万三千二百余石，而本镇屯民岁赋及各郡县所输犹如旧额，即间发内帑、中商盐，皆以备虏，大入为客兵益戍之需，而实于主兵无与。嘉靖六年（1527）五月二十一日，世宗令冯清同巡抚周金等严加查核。

姚镆致仕　姚镆（1465—1538），字英之，号东泉，慈溪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除礼部主事，进员外郎。擢广东提学佥事，立宣成书院。再迁福建副使，改提督学政。正德九年（1514）擢贵州按察使，正德十五年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上边务六事，皆付之施行。嘉靖元年（1522）召任工部右侍郎，出督漕运，改兵部左侍郎。嘉靖四年以右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兼任巡抚，以功进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又奏请于田州改设流官，得到批准。嘉靖六年六月致仕，后被张璁攻讦，落职闲住。嘉靖十三年命以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辞而不赴，仍令落职闲住。嘉靖十七年卒，年七十四。有《姚东泉文集》。

重刊《大学衍义》　世宗以《大学衍义》刻写不精，欲将经文并题语大书，诸儒并真德秀注细书。令司礼监刊印并欲述序一篇，以申重刊之意。大学士杨一清等因请世宗制序文冠诸卷之首，以彰帝王之学，以垂来世。世宗以听经筵官讲《大学衍义》五言古诗一章并序文一首写示内阁，一清等依韵恭和。世宗览毕，赐玺书谕答，有忠诚恳到之褒及勉以协恭辅导。因于嘉靖六年（1527）六月初八日命以御制并一清等诗章集成一册，题其名《翊学诗》。

诏令科道互相纠举　嘉靖六年（1527）六月二十四日，礼部右侍郎桂萼上言：杨廷和广树私党，蒙蔽皇上六年。后次第斥逐，但遗奸犹在言路。宪宗初年曾诏科道官于拾遗之后，互相纠举，言路遂清。乞请以旧例以时举行。世宗令吏部会议，侍郎孟春奏陈：宪宗初年，无此诏旨，而桂萼所言在被劾之后，情涉报复。难以服众心、昭公论。且考察已定，不当别议。桂萼又说孟春奉职无状，意在献媚言官，以图幸免。世宗令吏部再议，吏部奏宪宗初令互相纠举不称职之人，不是考察拾遗事例。桂萼所称与例不和。世宗终以桂萼所言为是，斥责吏部党护，遂诏令科道官互相纠举考察拾遗，及时奏报。

罗钦顺致仕　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正德中，因乞终养，刘瑾怒，乃夺职为

民。瑾被杀，复官，累迁至吏部右侍郎。世宗即位，转左侍郎，前后命摄尚书事。嘉靖元年(1522)四月迁南京吏部尚书，嘉靖二年三月改礼部尚书。不久丁忧归里。时“大礼”议起，张璁、桂萼以片纸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他耻与同列，故于嘉靖六年二月服除复原官，五月迁吏部尚书，皆辞不就。同年七月初六日世宗许其致仕，有司给禄米如制。里居二十余年，潜心格物致知之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当时王守仁以心学立教，大江南北翕然从之。他不以为然，尝与守仁往返探究致知与格物的关系。他认为，“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三。赠太子太保，谥文庄。有《困知论》、《整庵存稿》。

贾咏致仕 贾咏(1464—1547)，字鸣和，号南坞。河南临颍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正德九年(1514)充经筵讲官，改兵部主事，迁左中允兼修撰，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正德十六年擢礼部左侍郎，改吏部左侍郎。嘉靖四年(1526)五月以原官兼翰林学士入阁专理诰敕、掌参事府事，再迁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进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嘉靖六年八月十八日致仕，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卒，年八十四，赠太保，谥文靖。

朱希周致仕 朱希周(1463—1546)，字懋忠，号玉峰，昆山人，徙吴县。弘治九年(1496)进士。孝宗喜其姓名，擢为第一，授修撰，进侍讲，充经筵讲官。屡迁礼部右侍郎。时方议“大礼”，数偕其长争执。廷臣谏争“本生”尊号，相率跪伏左顺门，希周走告阁臣毛纪等，说：“群臣伏阙，公等能坐视乎？”亦偕群臣跪伏以请。世宗大怒，命希周与何孟春等俱待罪，而尽系庶僚于诏狱。后由左侍郎迁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六年(1527)八月二十七日，大计京官，因与桂萼不协，乞休致仕，嘉靖二十五年卒，年八十四。赠太子少保，谥恭靖。

定优养故绝卫官之例 嘉靖六年(1527)九月初八日，定优养故绝卫官母女之例：凡卫官故绝，遗有母女的，月给米五石，其中二石本色、三石折色。其折色内，一石折银二钱五分，二石折钞四十贯。此例通行内外卫所，且著为令。

严科考禁例 嘉靖六年(1527)九月二十四日，兵部左侍郎兼学士张璁条陈科目三事，即正文体，明实录，慎考官，申严科考禁例。世宗深善其言，令所司如仪举行。各省分试至考官由礼部举京官或进士，每省二人，驰往供事。监临官不得参预内帘，两京分试主考外五经房，仍各加科部官一员。

巡按官条例的制定 嘉靖六年(1527)十月初三日，世宗根据署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张璁奏陈，制定巡按官条例，具体规定：一、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得互相纠举，其清军、巡盐、刷卷御史同在地方的，一体觉察。二、巡历所至，无得出郭迎接。方面官得与巡按御史均礼，左右对拜分坐，不许伺候作揖。三、御史当遍历郡县，交待不得过期速限，怠事者定行参究。四、御史不得访察滥及无辜，断狱皆自下而上，情重者乃自临决。有司久任且有殊绩的得举五品以上；贪污者得劾；荐举毋滥加于庸流，弹劾勿下及于丞、尉。五、风宪之官贵厚，用法贵宽，不得辄用酷刑，有犯重辟之罪，必须亲审无冤，以体圣明钦恤之意。六、按部所至，无多用导从，饮食供帐宜从俭约。凡设彩铺毡、无名供馈之属，皆不许用，庶免小民供亿之繁。世宗又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遵行，若有违犯，必罪不贷。

张璁斥逐翰林官 嘉靖六年(1527)十月初四日，世宗任张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与机务。其时内阁首辅为杨一清。而张璁以议礼之事，官运亨通，诸翰林官耻与为伍，张璁十分恼怒，遂奏报皇帝，请自翰林院讲读以下量才外补。霎时间，改官及降黜的多达二十二人，翰林院由是为空。

霍韬条陈旧章 嘉靖六年(1527)十二月初五日，詹事霍韬条陈旧章十二事：洪武中传谕百姓种桑枣；永乐初命宝源局铸农器，给山东被兵之民；宪纲御史行部劝课农桑；洪武中遣监生分诣天下，督修水利；诸司职掌载各处闸坝陂池可引水灌田；职掌载内外军职俱有定额；洪武中军职内外袭职比试；太宗升南征首功，余皆颁赏；国初生员兼读《律》《诰》、《教民榜文》、讲《大诰》；国初给僧度牒，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寺观；永乐中私薙发为僧，并父兄发北京种田；景泰中令各寺观限田六十亩，余给民田。世宗阅后，以为言之有理，立即下达各地衙门。

沙保反叛 嘉靖六年(1527)，芒部沙保谋复陇氏土官，拥陇寿子陇胜纠众攻陷镇雄府，执流官程洸，夺其印，杀伤数百人，程洸后逃奔毕节。翌年，川、贵诸军会剿沙保，保败，官军擒斩三百余人。芒部、乌撒、毋响诸苗民复起，攻劫毕节屯堡，杀掠士民。嘉靖九年四月，经四川巡抚唐凤仪、四川巡按戴金、贵州巡按陈讲奏请，革镇雄流官知府，以陇胜为通判，署镇雄府事。

封疆之狱 嘉靖六年(1527)末，因哈密满速儿屡犯边城，忌恨杨廷和、彭泽的锦衣卫百户王邦奇上疏，说：今哈密失国，番贼内侵，是由于彭泽赂番求和、杨廷和论杀写亦虎仙等所致。他提出只要诛杀

杨、彭，“庶哈密可复，边境无虞。”张璁、桂萼因借此兴大狱，世宗遂斥杨廷和、彭泽为民，尽置其子弟亲党于理，有因之自杀者。后又派给事、锦衣官往按。时番酋牙兰上言，诉说犯边实由冤杀写亦虎仙、失拜烟答二人故。桂萼又借此重兴大狱，请留质牙兰，遣译者谕其主归还侵地，并与礼部尚书方献夫、兵部尚书王时中协议，主张查究哈密激变之因。又逮陈九畴入狱，尚书金献民、侍郎李昆以下坐累四十余人。

杨一清论罢斋醮 嘉靖七年(1528)正月，大学士杨一清奏言：宫寝之中，非祀天之所，每日拜祝，恐劳且亵。力主罢斋醮。世宗不理。

团营营务废弛 嘉靖七年(1528)正月十八日，提督团营太监张永奏陈：查十二团营官军，原额十万零七千有奇，今只有五万五千四百有奇；马原额十五万零二百有奇，今只有一万九千三百余匹，且其中病疲瘦瘠过半。营务废弛，莫过于此。乞请勾解酌替补汰老弱，以壮军威；发草场椿棚等银买补马匹，拨给官军。仍申严克减草料顾借盗失之罪，以饬马政。世宗得疏，下兵部议行。

李充嗣致仕 李充嗣(1462—1528)，字子修，号梧山，内江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正德中举治行卓异，巡抚河南、应天，皆有声誉，进工部尚书，修治苏松水利，加太子少保。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改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致仕，九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太保，谥康和。有《梧山集》。

陈九畴入狱 陈九畴，生卒年不详，字禹学，曹州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除刑部主事。正德初，忤权阉刘瑾，谪阳山知县。瑾败，复故官，历郎中，迁肃州兵备副使。世宗即位，进陕西按察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嘉靖三年(1524)，哈密满速儿犯肃州、甘州，陈九畴率兵御击，报捷说满速儿、牙兰俱死于炮石下，实际上二人均未死，世宗已有所怀疑．封疆之狱起，世宗览桂萼疏议，遂以边臣欺罔，于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三日逮九畴入狱。桂萼等欲杀九畴，并株连杨廷和、彭泽，刑部尚书胡世宁力救，上疏言陈九畴保全肃州孤城功，九畴免死，谪戍极边。居十年，赦还。死后，追赠忠襄。

补筑延绥边墙 正德初年，着手准备修筑定边营至宁夏横城堡边墙三百里，因杨一清去任，仅筑四十里而搁置。嘉靖七年(1528)二月初四日，工科给事中陆粲上言补修未完边墙，且极言其利。世宗令推诚心忧国的文武大臣各一员，如杨一清初议，亟往经略兴工；户部速发帑储。

谢迁致仕 谢迁(1449—1531)，字于乔，号木斋，浙江余姚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第一，授修撰。弘治八年(1495)以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入阁预机务。不久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见事明敏，善持论，与李东阳、刘健同辅政，时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武宗即位，刘瑾擅权，他请武宗诛刘瑾，不成，遂致仕归。及瑾诛，复故官。嘉靖六年(1527)，谢迁年已七十九岁，世宗以手敕起为内阁大学士，居数月，于次年三月初七日，仍以老辞归。嘉靖十年二月十八日卒，年八十三。赠太傅，谥文正。有《归田稿》。

重订《大明会典》 嘉靖六年(1527)十月初五日，世宗阅《会典》内载冠礼之仪，成化十四年(1478)有礼成，谒谢奉先、奉慈殿之文。问辅臣彼时未有奉慈殿，何差误如此？杨一清等进言，书成仓促，故多差俣。同时乞请重新修正，庶可失之于前，犹可正之于后。嘉靖七年三月初七日，世宗正式诏令儒臣重订《大明会典》，订正谬误，增入续定事例。嘉靖八年四月初二日，命杨一清等为总裁，霍韬等为副总裁。

凤朝文起事 嘉靖七年(1528)三月二十二日，云南武定土舍凤朝文起事，杀同知以下官吏，劫州印，并举兵与寻甸土舍安铨合犯云南府，滇中大扰。二月，诏以右都御史伍文定为兵部尚书，提督云、贵、川、湖军务，以梁才为户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督理粮饷。发帑金三十万两，调四镇土汉官军征讨。击斩强敌十余人，凤朝文等奔武定，为官军所围，又至东川汤郎箐，被官军杀死。安铨仍据寻甸，列寨数十，官军分哨夹击，攻克其必古，安铨奔四川芒部，为土舍禄庆俘获。官军擒获起事头目有一千余人，斩首二千九百余级，俘获男妇一千二百余人，抚散余众达二万余人。安铨、凤朝文皆枭首示众，籍其产，家属戍边。

沈冬魁致仕 沈冬魁(？—1530)，字伯贞，号立斋，又号漳涯，直隶阜城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中书舍人，历光禄卿，裁浮靡供费。正德十三年(1518)升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条例兴革事宜，揭榜示众，无不帖伏。召任户部右侍郎，嘉靖二年(1523)十月迁南京礼部尚书。嘉靖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致仕，嘉靖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卒。

杨一清建言政务 嘉靖七年(1528)五月二十五日，大学士杨一清建言，今日之务，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变法，在安静不在纷扰，在宽厚不在繁苛。当前急而且要者是举贤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世宗以其言为是。

颁示《明伦大典》 世宗曾令学士张璁、桂萼等纂修《大礼全书》。嘉靖六年(1527)八月十五日，张

璁等以初稿六册呈览。世宗更名曰《明伦大典》。至嘉靖七年六月初一日,《明伦大典》编成,世宗自制序文,宣付史馆,刊布天下。并从桂萼所请,追夺议礼诸臣官。世宗敕令说:大学士杨廷和谬主"濮议"。尚书毛澄不能执经据礼。蒋冕、毛纪转相附和。林俊著论迎合。乔宇为六卿之首,乃与九卿等官,交章妄执。汪俊继为礼部,仍主邪议。吏部郎中夏良胜,胁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阙喧呼。朕不欲已甚,姑从轻处:杨廷和为罪之魁,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法当戮市,特宽宥削籍为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夺其生前官职。蒋冕、毛纪、乔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夺职闲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胜酿祸独深,俱发原籍为民。其余两京翰林、科、道部属,大小衙门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与闻者,俱从宽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编成为民者不问。尔礼部揭示承天门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

牙兰归附 牙兰,又称牙木兰,明曲先卫(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部)人,幼年被吐鲁番所掠,长而黠健,吐鲁番速檀阿力以妹妻之,握兵用事,久为明朝西陲之患。嘉靖七年(1528)六月初二日,因获罪其主,率所部二千余人降归明朝。另有沙州(今甘肃敦煌西部)帖木儿哥、吐巴番族,因不堪吐鲁番岁征妇女牛马,亦率其族属数千帐归附明朝。边臣悉处之内地。

修浚通惠河成 嘉靖七年(1528)六月初五日,监察御史吴仲等奉命修浚通惠河成,因疏五事:时修浚以通运道,专委任以责成效,复旧额以给官夫,改闸座以防水患,处剥船以便粮运。世宗以运河先朝屡经勘议,未得成功。吴仲等仅用时四月而就绪,嘉其勤劳,令科道官查验行赏,所条事宜全部付诸实施。

加上尊号 嘉靖七年(1528)七月,加上皇考、圣母尊号。皇考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圣母为"章圣慈仁皇太后"。诏告天下。

王守仁平定断藤峡 广西断藤峡瑶民,与上林县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古钵、都者、罗黑、剎丁等八寨及平南县北仙台、花相诸寨瑶民相通,盘踞三百余里,聚众起事长达数十年。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平定田州后,州县父老遮道诉状,王守仁遂留南宁。他率军突进,于嘉靖七年八月十二日连破牛肠、六寺等寨,后循横石江而下,攻克仙台、花相及上林县八寨。王守仁初赴广西时,桂萼令其乘机攻取交趾,守仁辞而不应,致遭桂萼忌恨。广西断藤峡平定后,桂萼则诋斥王守仁征抚交失,赏格不行。

吐鲁番寇肃州 嘉靖七年(1528)十月,吐鲁番卫拉特进犯肃州,为游击彭浚所败。卫拉特遣使求通贡,王琼上疏请许之。兵部尚书胡世宁以番酋多变,不宜轻许通贡。张璁等力主王琼所议,许吐鲁番通贡。

更定审编京城甲役之令 嘉靖七年(1528)闰十月十六日,监察御史王仪奏陈:京师官民杂处,十家之中有九家免役。又有以近旁隙舍主匿奸人,贫民至代为更徭,劳役不堪。乞请斟酌丁产,著为定例。其勋戚监局及文武各衙门,俱以等级优免。世宗令兵部同都察院覆核,亦如王仪所议,特批准施行。

王守仁逝世 王守仁(1472—1528),幼名云,五岁改名守仁,字伯安,馀姚人。曾在阳明洞讲学,学者称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弘治进士,先后任刑部、兵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上疏救言官戴铣等,因忤权阉刘瑾,受廷杖,谪贵州龙场驿丞。瑾败,迁庐陵知县。正德十一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康、赣州,先后镇压福建、江西等地农民起义。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叛于南昌,他主动传檄四方,征庥列郡之兵勤王,直捣南昌,活捉朱宸濠。嘉靖六年(1527),又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平息广西思恩、田州瑶民起事。因忤权贵桂萼,被萼诬以擅离职守夺官,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于归里途中。年五十八。隆庆初,追赠新建侯,谥文成。王守仁提倡"心学",认为"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其说比程朱理学宣扬的天理性命更为简单易学,故一度风靡各地南北二京,学者翕然信从。王阳明自诩平生所为二件事:一是"破山中贼",即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少数民族起事;二是"破心中贼",即其"心学"广为传播。其著作有《传习录》、《王文成公全书》传世。

邹文盛致仕 邹文盛(1460—1537),字时鸣,公安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吏科给事中。正德朝累迁至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十五年(1520)改南京都察院佐理院事。世宗即位,迁户部右侍郎,不久转左侍郎。嘉靖三年(1524)迁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振扬风纪,吏民畏惧。嘉靖六年四月改户部尚书。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仕。嘉靖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少保,谥庄简。有《默庵集》、《邹庄简公存稿》。

赎罪与收赎钱钞则例的制定 嘉靖七年(1528)十二月十四日,世宗根据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奏陈,诏定赎罪与收赎钱钞则例:凡收赎者,每钞折银一分二厘五毫。如笞一十,赎钞六百文,则折银七厘五毫,以罪轻重递加折收。令天下问刑诸司皆以此例从事。

诏赐京官节钱勿用钞 嘉靖七年(1528)十二

月十四日，礼部官奏陈：旧制钞一贯折银千文似太重，弘治中每贯折钱十二文有奇又太轻，请更定则例。于是，世宗诏赐京官节钱勿用钞：内阁及一品赐钱二百文，二品三品一百文，四品至六品九十文，七品至九品七十文。公、侯、驸马、伯及衍圣公、大真人，按一品例。其余及朝觐官吏钱、钞各半。凡钞一贯折钱二十一文。

纵放鹰犬 嘉靖八年(1529)二月初八日，鹰房内臣以太庙献艺为由，乞留鹰犬。礼部官奏言：奉先殿每年荐鹿、雁、雉、兔、猪、鹅、鸡、鸭等，《会典》有明确记载，早有定例。请全部纵放鹰犬。世宗命按《会典》所定施行。同月二十日，又籍鹰房田，召民佃种。

林希元论赈襄阳 嘉靖八年(1529)二月十一日，河南襄阳大饥。巡按湖广御史张禄绘图以献，世宗诏令地方有司赈济。广东佥事林希元辑《救荒书》，指陈救荒有二难：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极贫便赈米，次贫便赈钱，稍贫便转贷；有六急：垂死急饘粥，疾病急医药，病起急汤米，既死急募瘗，遗弃孩稚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有三权：借官钱以籴粜，兴工作以助赈，借牛种以通变；有六禁：禁侵渔，禁攘盗，禁遏籴，禁抑价，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此书备载救荒大政要旨，是明朝关于荒政的重要著作。条论诸事，皆诏有司施行。

哈密服属吐鲁番 嘉靖八年(1529)二月，吐鲁番满速儿以牙兰叛归明朝，乃派人贡狮子，并赍译书，表示愿意归还哈密城及原掠人口，同时要求遣还牙兰。甘肃巡抚唐泽以哈密不易恢复，请专图自治之策，上报总督王琼。王琼以为善，遂上言：哈密既归，乞令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木守之。同时提出将满速儿所归各番贡使千余人，散置于沙州。土巴帖木哥部落五千四百人，安置白城山；哈密都督奄吉孛剌部落置肃州东郭；赤斤都督琐南东安置于肃州北山金塔寺；罕东都指挥枝丹置于甘州南山，并欲缚牙兰以还。疏下兵部议，廷臣多言哈密难守，詹事霍韬力持不可。他认为，置哈密者，离西北之交，以屏藩内郡。或难其守，遂欲弃之。将甘肃难守，亦弃不守吗？而兵部尚书胡世宁却认为：先朝不惜弃大宁、交趾，何有于哈密？哈密，非大宁、交趾可比。忠顺自罕慎以来，狎比吐鲁番，且邀索我矣。他极力主张专守河西，谢哈密，无烦中国便。并且提出牙兰本属部归正，非叛者，不宜遣还。权臣张璁用事，力主王琼所议，安置诸番于肃州境内，独留牙兰不遣，如胡世宁所言。而世宗遂置哈密不问，哈密为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木所有，服属吐鲁番。自成化八年(1472)吐鲁番速檀阿力第一次攻破哈密城，到嘉靖八年明廷弃守为止，前后约半个多世纪，明朝廷臣屡为哈密之失和吐鲁番侵扰的责任问题，争论不休。

吴一鹏致仕 吴一鹏(1460—1542)，字南夫，号白楼，长洲人。弘治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正德初，进侍讲，充经筵讲官。因忤权阉刘瑾，出为南京刑部员外郎。瑾诛，累迁至太常卿。世宗即位，召拜礼部左侍郎。数与尚书毛澄、汪俊力争“大礼”。汪俊去，一鹏署部事。后以本官入内阁，专典诰敕兼掌詹事府事。因参与修《武宗实录》，被张璁、桂萼视为异己。书成，出为南京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居二年，南京官劾王琼不职，一鹏遂于嘉靖八年(1529)三月二十日致仕。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初一日卒，年八十三。赠太子太保，谥文端。有《吴文端集》。

伍文定致仕 伍文定(1470—1530)，字时泰，号松月，松滋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授常州推官。精敏善决狱，被称为强吏。魏国公徐俌夺占民田，文定勘归于民。刘瑾受徐俌重贿，兴大狱，文定遂入诏狱，斥为民。瑾败，起补嘉兴。宁王宸濠反，他迎王守仁军入城。丙辰之战，身犯矢石不动。中官张忠、许泰至南昌，欲冒其功，而守仁已系宸濠赴浙江，张忠大恨，文定出谒，遂绑缚，文定大骂不已。以平宸濠功最为卓著，擢江西按察使，不久迁广东右布政使，未赴，而世宗嗣位。上张忠、许泰罪状；又请发宸濠资财，还江西，以资经费；并矜恤因弹劾张忠而陷囹圄，以及宁王府宗人不预谋者，以清冤狱。世宗嘉纳，进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嘉靖三年(1524)，讨获海盗董效等二百余人。嘉靖六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其年冬擢右都御史，代胡世宁掌院事。云南安铨、凤朝文起事，诏进文定为兵部尚书，提督云南、四川、贵州、湖广军务，督军讨伐。嘉靖八年，四川巡按御史戴金疏劾文定，尚书方献夫、李承勋亦诋文定好大喜功，伤财动众。文定遂于同年三月二十四日致仕。嘉靖九年七月卒于家。年六十一。天启初，追谥忠襄。

禁京师佛会 嘉靖八年(1529)三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李时上言：每年四月，京师诸寺有参禅礼佛之会，男女杂处，大败风俗，宜行禁谕。世宗以其言有裨风化，即命有司巡视逮治，都察院榜示中外，严为禁革。

梁材议天下岁用 嘉靖年间，天下岁用日繁，户部尚书梁材等于嘉靖八年(1529)四月十四日议天下岁用。其中涉及宗室俸禄，提出严妾媵之限，收山场湖陂税课河泊之利，裁旗校军匠之食。于军职之费提出：清屯田，严比试，定法令。世宗允准。

张璁致仕 张璁(1463—1530)，字廷献，号惕庵，江宁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工部主事，改礼

部，历迁郎中，升陕西参议。时刘瑾专权，以事谪知宁州。后擢监察御史，历四川、广西布政使，擢南京工部、刑部侍郎。嘉靖五年(1526)四月迁南京右都御史。嘉靖八年五月初三日致仕，九年九月三十日卒，年六十八。

何瑭致仕　何瑭(1474—1543)，字粹夫，号柏斋，武陟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初授翰林院修撰，以不屈于刘瑾，出任开州知州。后历迁工、户、礼三部侍郎。嘉靖八年(1529)五月二十日迁南京右都御史，不久即致仕。二十年九月三十日卒，年七十。赠礼部尚书，谥文定。有《医学窥见》、《柏斋三书》、《何文定公集》。

颁新定铜衡　嘉靖八年(1529)六月三十日，世宗根据都给事中蔡经条议，诏天下司府州县起解管银，但照钦定天平铜法，不得妄增耗银，违者抚按官治罪。其两京内外各衙门听科道查参。又敕内府将旧用铜法送工部改造如制。

林富建言停止采珠　嘉靖八年(1529)八月初二日，提督两广军务兵部侍郎林富上言，极言采珠之害，乞请停止。他在奏疏中说：近来诏下广东采珠，而祖宗时一般数十年一采，未有隔两年一采的。珠之为物，一采之后，数年始生，数年始长，又数年始老。因此禁私采、数采，以使之生养。自天顺年间采后至弘治十二年(1499)方采，珠已成老，所以得之颇多；至正德九年(1514)又采，珠只半老，所以得之稍多；至嘉靖五年(1526)又采，珠尚嫩小，得之甚少。今距前采仅二年，珠尚未生，不仅少甚至不可得珠。在五年采珠之时，病死、溺死的就有五十余人，而得珠仅八千零八十余两。论者即谓以人命易珠。今年再采，恐虽易以人命，而珠亦不可得。何况广东饥民告急，申诉纷纷，盗贼乘间窃发，若再以采珠坐派，耽心百姓愈穷愈急，生意外之变。乞请稍缓数年，池蚌渐老，民困少苏，徐取而用。世宗得疏，不予考虑，仍申明前旨采办进用，无得迟误。

杨一清致仕　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号邃庵，又号石淙，镇江丹徒(今属江苏)人。成化进士，授中书舍人。迁山西按察佥事，以副使督学陕西。弘治十五年(1502)，以荐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武宗初立，命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不久进左都御史，疏请修筑边墙。后为刘瑾诬陷，下锦衣狱，大学士李东阳、王鏊诸人力救，方得免罪。安化王朱寘镭叛，复起总制军务，以中官张永监其军。叛平，激张永揭刘瑾罪恶，瑾被诛，擢户部尚书，又改吏部，兼武英殿大学士，参预机务。嘉靖三年(1524)，以他熟悉边务，改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三边军务。不久改吏部。费宏被斥去职后，遂为首辅。嘉靖八年九月，复召张璁入阁，他为张璁、桂萼相轧，霍韬上疏力诋，嘉靖八年九月十九日遂致仕。嘉靖九年四月，张璁又坐他受赇罪，夺其官职。一清大恨，疽发背而死，年七十七。追谥文襄。有《关中奏议》、《石淙类稿》。

停外戚世封　嘉靖八年(1529)十月初七日，府部科道等官奉旨会议外戚封爵事宜上言：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后循习洪熙旧例，封爵日滥，以至爵赏无章，转相承袭，禄米岁增，国用愈诎。建议遵祖宗旧制，毋得夤缘请封，有出特恩一时赏赉的第如故事，量授指挥、千户、百户等官终其身。世宗览奏说：外戚封爵，既无古典，原非祖制。若有军功，袭封如故。其余以戚亲滥膺封爵，名器既轻，人不知劝，固当裁革。念系先朝恩命及今，已封姑与终身，子孙俱不许承袭。著为令。

刊《大明集礼》　嘉靖八年(1529)十一月二十日，礼部尚书李时等上言：《大明集礼》本祖宗命儒臣纂集制书，百六十年来未及刊布，遂至讹谬日多，考论礼仪无所凭据，请订正刊布，以备参考。世宗允准。嘉靖九年八月梓成，颁布天下。

抚剿"西番"　嘉靖八年(1529)，洮州(今甘肃临潭以西)、岷州(今甘肃岷县)诸番数犯临洮(今甘肃岷县)、巩昌(今甘肃陇西一带)，内地骚动。世宗命王琼便宜从事。王琼乃集众议，且剿且抚，派总兵刘文、游击彭棫分布兵马。次年二月，明军自固原进至洮州、岷州，遣官宣谕诸番。洮州东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禄失等十三族，岷州西宁沟等十五族，皆听抚；岷州东路若笼族、西路板尔等十五族，及岷州剌即等五族，恃险不服。明军分兵攻若笼、板尔二族，斩杀三百六十余人，剌即诸族遂称服。王琼抚定西番七十余族，洮、岷始宁。

胡世宁致仕　胡世宁(1469—1530)，字永清，号静庵，仁和人。弘治六年进士，授德安府推官，性刚直且知兵。历南京刑部主事，上书极言时政得失，与李承勋、魏校、余祐称南都四君子。迁江西副使，疏论宸濠反状，系锦衣卫狱，减死戍辽东。宸濠伏诛后复官，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嘉靖中累迁至兵部尚书，陈兵政十事，又上备边三事。与张璁、桂萼不合，于嘉靖八年(1529)正月致仕，八月起改南京兵部尚书，参预机务，加太子太保。嘉靖九年正月以疾致仕，九月三十日卒，年六十二。赠少保，谥端敏。有《胡端敏奏议》。

李瓒致仕　李瓒(？—1532)，字宗器，山东濮州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刑部主事，擢通政司

参议，以忤刘瑾谪饶州通判。刘瑾伏诛，迁大理寺少卿。不久，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保定。擢通政使掌鸿胪寺事，再以右副都御史经略边关、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改户部侍郎总督仓场，进户部尚书，仍理仓场事。嘉靖九年(1530)五月初八日致仕，嘉靖十一年正月卒，赠太子太保。

魏校致仕　魏校(1483—1543)，字子才，号庄渠，直隶昆山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兵部郎中。嘉靖初任广东提学副使、江西兵备副使。累迁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馆。九年(1530)七月致仕，嘉靖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一。谥庄简。魏校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学，而贯通诸儒之说，择执尤精。著有《大学指归》、《周礼沿革传》、《六书精蕴》、《春秋经世》、《经世策》、《官职会通》、《庄渠遗书》。

推行预籴备赈之法　嘉靖九年(1530)七月，大学士桂萼上言：往岁不登，人至相食，朝廷大发帑藏，费数十万金而不能致数万之粟，原因是未尝预备。今请皇上敕户部发帑银数十万给天下，及时收籴麦豆，可得数万，而小民因得易钱以为生，足以需他日赈饥之用。同时建议四事：随时查放米粟、因地置仓、兼收杂粮、通融本折。世宗以为此举为体国裕民、安边备荒之急务，令如议行。

汪鋐论用佛郎机炮　嘉靖九年(1530)九月初五日，右都御史汪鋐上疏，建议用缴获的佛郎机(即葡萄牙)炮，加强海防。他说，佛郎机炮小者二十斤，可射六百步，用于墩台，每墩用一炮，以三人防守；大至七十斤以上，射程五—六里，则用于城堡，每堡用三门，以十人防守，"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海防可固。但由于将士不善用，终未作为明军装备。

高金入狱　高金，石州(今山西三川河、湫水河流域)人。官兵科给事中。嘉靖九年(1530)九月初六上疏言："陛下临御之初，尽斥法王、国师、佛子，近又黜姚广孝配享。臣每叹大圣人作为，千古莫及。乃有真人邵元节者，误蒙殊恩，为圣德累。"力主削邵元节真人号，并夺其师李得晟恩恤。世宗方欲受长生术，得疏大怒，立下诏狱拷掠，终以其言直获释。寻偕御史唐愈贤稽核御用监财物，劾奉御李兴侵蚀状，置诸狱。后累官至苏州兵备副使。谥襄敏。

章拯致仕　章拯(1479—1548)，字以道，号朴庵，兰溪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工部主事，忤刘瑾，谪抚州通判。刘瑾伏诛，擢南京兵部郎中。嘉靖中累官至工部尚书。桂萼欲复海运，章拯疏陈得失，此议作罢。南北郊议起，章拯极言不可，从此失世宗意。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十五日，坐郊坛祭器缺供，落职而归，不久令致仕。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卒，年七十。赠太子少保，谥恭惠。有《朴庵文集》。

更定祀典　嘉靖九年(1530)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给事中夏言奏请更定郊祀。四月，廷臣集议郊祀典礼。大学士张璁杂引《五经》及诸史，撰《郊祀考议》，力言合祀之非，分祀之是。五月，世宗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为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为皇祇室；作朝日坛于东郊，西郊建夕月坛。七月，命立帝王庙于京师。十一月，世宗祀昊天上帝于南郊，奉太祖西向配。礼成，次日布诏天下，恩赐百官，宽恤小民，大赦狱囚。

李梦阳逝世　李梦阳(1472—1530)，字献吉，陕西庆阳人，徙居开封。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户部主事。武宗时代尚书韩文属草劾刘瑾，下狱免归。刘瑾伏诛，任江西提学副使，以事夺职。家居益跅弛负气，自号空同子，工诗古文，才思雄骜。与何景明、徐祯卿等号十才子。嘉靖九年(1530)卒，年五十八。有《空同子集》。

王磐之死　王磐(1470—1530)，字鸿渐，号西楼，高邮人。少时鄙视功名，筑楼高邮城西，日与名流谈咏其间，因自号"西楼"。善散曲，题材广泛，虽多闲适之作，亦有同情人民疾苦，讥讽时政的佳作，《朝天子·咏喇叭》即是其一。有《王西楼乐府》。

熊大木编印《全汉志传》诸书　明朝小说家熊大木，号钟谷子，建阳人。他于嘉靖年间，编印《全汉志传》、《唐书志传》、《宋传》、《宋传续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通俗小说。其中许多咏史诗，为他自己所作。

桂萼致仕　桂萼(? —1531)，字子实，号古山，安仁(今江西余江东北)人。正德六年正德进士，官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世宗即位，与张璁议"大礼"，受知世宗，遂由南京刑部主事进詹事，兼翰林学士，继进礼部右侍郎，寻擢礼部尚书。嘉靖八年(1529)，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嘉靖十年正月，在内阁纷争中失宠致仕。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卒，谥文襄。有《桂文襄奏议》、《舆图记叙》、《经世民事录》等。

俺答屡次入侵骚扰　俺答不时入侵骚扰，继嘉靖九年(1530)五月率兵入宁夏之后，又犯宣府。十年三月入大同塞，九月犯陕西，十月复犯大同，旋出松潘，侵西川西境。自此之后，年年入侵，杀掠军民人畜以亿万计，构成最大的边患。

李承勋之死　李承勋(1473—1531)，字立卿，嘉鱼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由太湖知县迁南京刑

部主事、南昌知府。正德六年(1511),率军镇压赣州等地农民起义,超擢浙江按察使,历陕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时边备久弛,辽东尤甚。他至镇,招集逋亡,开屯田,筑铁岭、抚顺等城,边防有所加强。后三迁至刑部尚书,再迁至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专督团营。世宗深加嗟悼。嘉靖十年(1531)三月初四日卒,年五十九,赠少保,谥康惠。为官清廉,死时家无馀资。

傅汉臣请行一条鞭法 嘉靖十年(1531)三月二十四日,监察御史傅汉臣上言,请行一条鞭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

边贡致仕 边贡(1476—1532),字廷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与李梦阳等号称"弘治十才子"。授兵科给事中,峻直敢言,治行称最。嘉靖中,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因其早负才名,美风姿,久居南京,优闲无事,游览江山,挥毫浮白,夜以继日。都御史劾其纵酒废事,于嘉靖十年(1531)五月初一日致仕。他参与李梦阳等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为"前七子"之一。其诗风格婉约,但内容不够充实。平生藏书成癖,而一夕毁于火,仰天大哭,遂一病不起,于嘉靖十一年卒,年五十七。有《华泉集》。

王琼请修榆林边墙 嘉靖十年(1531)闰六月初十日,总制陕西三边兵部尚书王琼奏陈,请修榆林边墙。他说:计度榆林东、中二路大边六百五十六里,当修三百一十里;二边六百五十七里,当修二百四十八里。二边系成化时余子俊所修,因山为险,屯田多在其外;大边系弘治时文贵所修,防护屯田,中间率多平地,筑墙高厚不过一丈,可坏而入。现今当先修大边,务得大边补塞,必使凿堑深险,墙垣高厚。计用丁卒一万八千人,乞请发帑金十万,计定明年二月兴工。世宗批准,令延绥镇巡等官如王琼计议举行。

钦安殿设置斋醮 嘉靖十年(1531)十一月十四日,建祈嗣醮于钦安殿。以礼部尚书夏言为醮坛监礼使,侍郎湛若水、顾鼎成为迎嗣导引官,文武大臣递日进香。世宗朱厚熜亲躬初、终两日礼。

诏定军功世袭例 嘉靖十年(1531)十一月二十三日,兵部尚书王宪上言:令甲武臣非军功不得世袭,而军功亦生擒斩首当先奇功等项有不同,要在分别地方难易,时势缓急,事体轻重,不可一律。升赏则例,各年不同,而选法存革亦当有别。遂举永乐以后各次战役,该世袭该裁革,一一列明。世宗令以其所拟,纂入《会典》,永为定例,刊刻榜文,晓谕天下。

桂勇逝世 桂勇(? —1531),籍贯不详。武举起家,历保定参将,擢江西副总兵,改京营,总兵蓟镇宣大,屡立战功,改任大同总兵官,累官至后府右都督。嘉靖十一年(1532)二月初四日卒。

小王子扰边 嘉靖十一年(1532)三月,小王子乞请通贡,朝廷不许,小王子大怒,遂率十万骑入扰。其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蓄宝贝,稍厌兵,而徙幕东方称土蛮,分诸部落在西北边,相率扰边。兵部尚书王宪等集议,且谕总制唐龙厉志逐寇。唐龙求益兵饷,朝廷准行,遂连战小王子,多有斩获。

潘希曾逝世 潘希曾(1476—1532),字仲鲁,浙江金华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因灾异奏陈八事,指斥近幸。出核湖广、贵州军储还,不赂刘瑾,刘瑾大怒,矫诏廷杖除名。刘瑾伏诛,起迁吏科右给事中。嘉靖中历太仆卿,伏阙争大礼。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迁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筑长堤四十余里,期年而成。历兵部左右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五月初四日卒于官,年五十七。赠兵部尚书。有《竹简集》及《奏议》传世。

林富削籍 林富,生卒年不详,字守仁,号省吾,福建莆田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南京大理评事,忤刘瑾下狱。刘瑾伏诛复官,累迁广东、广西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郧阳,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督兵两广,改总督住其地。嘉靖十一年(1532)六月,以海盗逼广州杀掠而削籍。卒年六十六。

王琼逝世 王琼(1459—1532),字德华,号晋溪,山西太原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工部主事,进郎中。改户部,历河南右布政使。正德元年(1506),擢右副都御史,累官兵部尚书。世宗时,张璁、桂萼、霍韬用事,以琼与杨廷和仇,屡荐琼。嘉靖七年(1528),命王琼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抚哈密,保障北边,又集兵讨若笼、板尔诸番,斩三百六十余级,抚降西番七十余族,西陲安靖,以功最加太子太保。召还任吏部尚书。嘉靖十一年七月初十日卒,年七十四,赠少保,谥恭襄。有《晋溪奏议》、《漕河图志》、《掾曹名臣录》、《北边事迹》、《西番事迹》等。

徐元祉奏陈治河 嘉靖十一年(1532)七月二十五日,户部郎中徐元祉奉命赈保定、河间,因奏陈治河之策:先浚本河,使河深宽邃。九河自山西而来,南与滹沱河会合,而不浸真定诸郡;北与白沟河会合,而不浸保定诸郡。又浚支河,令九河流经大清河,从紫城口入;经文都村,从涅盘口入;经白洋淀,从蔺

家口入;经章哥洼,从杨村河入。庶细流派纳,水力以分。又浚决河,每冲处量留一口。复浚合成渠,杀其湍急。又浚淀河,令淀淀相通,虚则受,盈则泄。又浚淤河,令九河东流,悉由故道。高者下,下者通,凡豪强占阻,严加惩治。又浚下河九河,一出青县,一出丁字沽,相互于苑家口。浚则本支等河,直达于海。世宗下诏,付诸实施。

冯恩谪戍 冯恩,字子仁,松江华亭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除行人,擢南京御史。嘉靖十一年十月,慧星见,诏求直言。恩以天道远,人道近,备指大臣邪正。尤极论大学士张璁、方献夫及右都御史汪鋐之奸。世宗大怒,逮下锦衣狱,究主使者。冯恩日受拷掠,语卒不变,竟论死。朝审,汪鋐为主笔,冯恩历数其事,诋斥不已。冯恩出长安门,士民观者如堵,皆赞其"非但口如铁,其膝、其胆、其骨皆铁也。"因称"四铁御史"。冯恩母吴氏,击登闻鼓讼冤,不省。明年冬,事益迫,其子冯行可刺臂血书疏,自缚阙下,请代父死。令再议,改戍雷州。隆庆初,录先朝直言,家拜大理寺丞,致仕。

榜肃朝仪 嘉靖十一年(1532)十月二十六日,世宗谕鸿胪寺:近日文武官朝参不肃,步趋舒缓,序班参差,吐唾耳语,仰首瞻眺,殊不遵礼度。你们当通行传谕,自后须加严恪,如有仍前违慢诸状,大臣疏参,小臣逮治。鸿胪寺据此刊榜揭示,以肃朝仪。

禁宗室越关赴奏 嘉靖十二年(1533)正月二十九日,世宗从靖江王邦宁奏请,下诏:自今各王府宗室有违例越关赴京者,其应得禄米,以出城日为始,截日住支,至回府发落之日复支。中间旷日,不准补给。著为例。

吉囊破西海 嘉靖十二年(1533)春,吉囊拥兵屯聚河套,将犯延绥。见明军有备,突以五万余骑渡河西,袭击亦不剌、卜儿孩两部落,继而窃入永宁境,大掠而去。同年冬,吉囊又犯镇远关。总兵王效、副总兵梁镇败之于柳门,又追杀至蜂窝山,吉囊部被斩杀,溺死者甚众。

周伦致仕 周伦(1463—1542),字伯明,号贞庵,昆山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知新安,累擢大理寺少卿,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嘉靖十二年(1533)五月初四日致仕,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卒,年八十。赠太子少保,谥康僖。有《贞翁净稿》、《奏议》、《西台纪闻》、《医略》。

王廷相申明宪纲 嘉靖十二年(1533)九月初二日,掌都察院事左都御史王廷相奉命申明宪纲:一、巡视仓库。御史所至郡国,务亲临仓库勾校,岁籍开收,稽饯粮之出纳,分别积贮赢缩,定有司之勤惰。如有侵冒虚诡,即为参治,毋得专委查盘,苟具故事。二、巡察盗贼。按巡境内,一遇盗贼生发,即当广布方略,便宜剿捕。若事机重大及地方官怠缓误事,具以状闻。有司赋役清平,民乐各业,能使境内无盗,疏闻旌劝。三、抚恤军士。军士最为劳苦,而军官科害多端。御史至卫,务精核军政,惩汰无良,而疏其抚恤有卓异之官。

禁大船贩海 嘉靖十二年(1533)九月十二日,世宗根据兵部关于大船贩海,招致海盗的奏陈说:海贼为患,皆由居民违禁贸易,有司既轻忽,漫不加察,而沿海兵巡等官又不驻守信地,因循养寇,贻害地方。兵部亟檄浙江、福建、两广各官督兵防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烧毁。自后沿海军民,私与市贼,其邻舍不举的连坐。各巡按御史速查连年纵寇及纵造海船官,具以名闻。

大同兵变 嘉靖十二年(1533)十月初六日,大同兵变。土默特小王子屯兵大同塞外,大同总兵李瑾督促役卒挖浚濠沟甚为严酷,役卒王福胜、王保等数十人遂杀李瑾。世宗命总制刘源清率兵征讨,于阳和捕杀叛军数人,并逮获叛军首领王保等。至夜,叛军杀千户张钦,将关押在狱的参将黄镇、指挥马升、杨麟放出,推为帅,迎战官军,并潜出塞外,诱外寇为助。刘清源昼夜攻城御寇,死者相籍。世宗以刘清源扩大事态,遂夺其职,以张瓒代总制。时郎中詹荣督饷大同,察知马升、杨麟并无反志,于是令马、杨擒斩其首领黄镇以献,许免其死。张瓒到大同,其兵乱已平,遂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将吏,置酒庆功,并赏有功者而还。

张延龄系狱 张延龄(?—1546),兴济人。弘治八年(1459)以都督同知封建昌伯,十六年(1403)进侯,加太保,嘉靖八年(1529)尽革外戚封,不得世袭,与兄鹤龄均在革中,因而横行不法,嘉靖十二年(1533)十月坐事下狱论死,大臣争谏,世宗不得已,命长系狱中。嘉靖二十五年死于西市。

寇天叙逝世 寇天叙(1480—1533)字子惇,号涂水,山西榆次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南京大理寺评事,迁应天府丞。武宗南巡,江彬等恃宠为虐,天叙力与抗争,民得不困。嘉靖初以功迁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右侍郎。嘉靖十二年(1533)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五十四。有《涂水文集》。

许诰逝世 许诰(1471—1534)字廷纶,号函谷山人,河南灵宝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官翰林院检讨,以父许进忤刘瑾,谪全州通判。嘉靖初迁侍讲学士,历国子监祭酒、吏部右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十一月迁南京户部尚书,嘉靖十三年(1534)

正月十八日卒于官，年六十四。赠太子太保，谥庄敏。有《通鉴纲目前编》。

吉囊犯边　嘉靖十三年(1534)三月十四日，吉囊犯黄甫川(在陕西府谷县东北)，复入花马池，均为总兵刘文、副总兵梁震所败。七月，吉囊入犯定边乾沟(又称芦沟，在甘肃靖远县东北)，总兵刘文击退。八月，吉囊又拥十万骑扰固原，亦被击退。与此同时，俺答于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入河套，与吉囊相率为边患，岁无宁日。

方献夫致仕　方献夫(？—1544)，初名献科，字叔贤，号西樵，南海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吏部员外郎。初以议大礼受世宗信任，官运亨通，进少詹事，恃宠放恣，累官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学士。嘉靖十二年(1533)五月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嘉靖十三年正月进少师。同年四月十三日，见世宗恩威不测，遂乞致仕归里。嘉靖二十三年卒，赠太保，谥文襄。有《周易传义约说》、《大学中庸二原》、《西樵遗稿》。

推行垦田劝农法　嘉靖十三年(1534)八月初一日，户部根据直隶巡按御史李袨奏请，拟垦田劝农之法，即令地方有司查勘荒田，招集流民，给以牛种，督劝耕垦，仍免其欠赋；荒年重加赈给。世宗批准通行天下。

刘源清削籍　刘源清，生卒不详，字汝登，号东圃，山东东平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进贤知县。宸濠反，源清积薪环室，命家人事急即举火，勿降宸濠。迁监察御史，累官至兵部左侍郎总制宣大军务。大同兵变，黄绾蜚语中伤而被罢归。嘉靖十三年(1534)十月初二日削籍。

何诏致仕　何诏(1460—1535)，字廷，号石湖，浙江人，弘治九(1496)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工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出任永平知府，擢广西参政。嘉靖二年(1523)擢福建右布政使。嘉靖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不久，召任工部左右侍郎，修会通河，如期竣工。嘉靖八年迁南京工部尚书。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致仕。嘉靖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少保。

刘天和建言修河　嘉靖十三年(1534)十一月二十八日，总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刘天和奏陈：先朝名臣皆不敢引河，试以河水来则激射，至则冲决，退乃淤塞。近来黄河改冲，一支从虑城、萧阳等县下出小浮桥口，而於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运河，俱淤塞断流不入，利去而害独存。明春粮运在即，今宜浚自鲁桥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塞，修师家庄至黄家闸之闸座，及行管河郎中、主事修浚诸泉源，与运河接济。又请征调山东、河南、南北直隶夫役及议处工价粮食，限各郡县朝觐官速于回任，以充委用，申明运军不许多带货物，以致浅滞。世宗请工部议覆下诏：以疏通运河系国家急务，各司府军卫俱听天和节制，务刻期完工，以图永久。遂集役十四万疏浚。嘉靖十四年七月竣工。天和以功迁工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

王德明罢归　王德明(1482—1537)，字宗周，号一泉，清宛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封丘知县，调嘉善知县，迁户部主事。累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嘉靖十三年(1534)十二月，山西晋府中尉表杆等夜饮大醉，与恶少喧哗。德明下表杆等于按察司，宗室蜂起。同月二十三日，德明被罢归。嘉靖十六年卒，年五十六。

乙未大计　嘉靖十四年(1535)正月十二日，考察天下官吏，吏部唯辅臣意旨是从，凡与辅臣有怨的全部罢斥，计九百八十二人。所罢之人，不准奏陈。遂引起轩然大波，纷纷疏论吏部尚书。

王宪乞归　王宪，生卒不详，字维纲，号荆山，山东东平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历知阜平、滑县。召拜御史。正德初，擢大理寺丞，迁右佥都御史。清理甘肃屯田，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又迁户部右侍郎，改抚陕西。后代王琼为兵部尚书。世宗即位，为给事中史道劾罢。嘉靖四年(1525)，廷推总制三边军务。破俺答于青羊岭，加太子太保。因张璁、桂萼欲用王琼为总制，遂改南京兵部尚书。后又为夏言、赵廷瑞弹劾罢归。小王子入寇，条上平戎及诸边防御事宜，召为兵部尚书。定军功论叙之法，诏著之《会典》，为成式。大同兵变，与张璁不合，于嘉靖十四年三月初九日致仕。卒赠少保，谥康毅。

辽东军变　明制：每军一人，余丁三人帮贴；马一匹，给牧地五十亩。巡抚都御史吕经至辽东，于嘉靖十四年(1535)三月二十八日将军户帮贴余丁一并编入均徭册，并收牧地还官，又役军筑边墙，苛虐失军心。嘉靖十四年三月诸军请复旧制，吕经笞杖诉者，诸军遂变，捣毁府门，火烧均徭册，并撕裂吕经冠裳，囚于都司署。吕经被召回京，四月途经广宁，都指挥袁璘拟扣诸军月饷为吕经治装，又激起军士哗变。军士执吕经、袁璘。抚顺军士仿效，执兵备指挥刘雄。七月，巡按御史曾铣上言，力主重治。捕斩数十人，悬首边城，辽东兵变始平。事后，曾铣擢为大理寺丞，吕经谪戍。

吕经谪戍　吕经(1476—1544)，字道夫，号九川，宁州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礼科给事中。乾清宫灾，上疏极论义子番僧边帅之害，迁吏科都给事

中。复极论马升女弟入宫事,又劾方面最贪暴者四人,群小厌恶。谪为蒲州同知。世宗时,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嘉靖十四年(1535)三月二十八日,以苛虐激起辽东兵变,调戍茂州。嘉靖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九。

张璁致仕 张璁(1475—1539),字秉用,嘉靖十年赐名孚敬,字茂恭,号罗峰,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正德进士。世宗即位,议追崇所生,张璁迎合帝意,力折廷臣,擢南京刑部主事。嘉靖三年(1524),"大礼"之议复起,他与桂萼复上疏,成《大礼集议》。嘉靖五年,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嘉靖八年,攻逐杨一清,遂为首辅。他为人刚明果敢,持身特廉,然性狠愎,报复相寻,为廷臣所恶。嘉靖十四年四月致仕。嘉靖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五。赠太师,谥文忠。有《谕对录》、《奏对录》、《保和冠服图》、《张文忠集》等。

蔡天祐逝世 蔡天祐(? —1535),字成之,睢州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吏科给事中,出为福建佥事。历山东副使,分巡辽阳。岁歉赈济,活饥民万余。累迁山西按察使。嘉靖三年(1524)八月,大同兵变,巡抚张文锦被杀,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获叛卒郭疤子等三十四人,兵变始平,寻进兵部右侍郎。天祐以藩禄久缺,又岁当修缮边墙,议增淮盐引价,每万引加银五千,被讦,引疾去。居二年,奉诏起用,未至京,得疾告归,嘉靖十四年(1535)五月十三日卒。天祐有才智,在镇七年,威德大著,父老为立安辑祠。

汪鋐致仕 汪鋐(? —1536),字宣之,婺源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历佥事至浙江左布政使。嘉靖六年(1527)十月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提督军务。嘉靖八年三月回院理事,再迁刑部侍郎,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提督团营,加太子太保。嘉靖十一年九月改吏部尚书。十三年七月,兼兵部尚书督大木。嘉靖十四年九月初一日致仕,嘉靖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卒。赠少保,谥荣和。

盛应期逝世 盛应期(1474—1535),字思征,号值庵,吴江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工部主事。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改抚江西。奏免杂赋,积谷备荒,深受百姓爱戴。进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再任右都御史治理黄河。后召回致仕。嘉靖十四年(1535)九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二。

刘龙致仕 刘龙(1477—1553),字舜卿,号紫岩,山西襄垣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改兵部主事。历侍讲学士,每进讲必屏绝人事,讲章简切明畅,务求感悟。升礼部左右侍郎、南京礼部吏部尚书。嘉靖十二年三月改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嘉靖十四年十月十二日致仕,三十二年(1533)六月初七日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太保,谥文安。有《紫岩文集》。

费宏逝世 费宏(1468—1535),字子充,号鹅湖,铅山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第一,授修撰。武宗立,预修《孝宗实录》。正德五年(1510)进礼部尚书。次年,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后为佞臣钱宁诬陷,乞休归。世宗即位,加少保,入辅政,力劝世宗革除武宗弊政。"大礼"议起,杨廷和去位,遂为首辅,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张璁、桂萼以"大礼"议得宠,被讦致仕。嘉靖十四年(1535)七月,复官如旧。入阁仅两月,于同年十月二十日卒于官,年六十八。赠太保,谥文宪。有《费文宪公集》、《宸章集录》。

移市舶司于壕镜澳 壕镜澳(即澳门),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指澳门整个港湾,包括浪白岛在内。明初,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渤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职掌其事。正德时,市舶司移于高州电白县。嘉靖十四年(1535),指挥黄庆纳贿,请移电白市舶司于壕镜,岁输课银二万两。壕镜遂为闽、粤商人和暹罗、爪哇、佛郎机(葡萄牙)等国商人贸易中心。后以佛郎机人为多,诸国人畏惧,壕镜遂被葡萄牙侵据。

四川建昌卫地震 嘉靖十五年(1536)二月二十八日,夜丑时,四川建昌卫(今西昌市)、建昌前卫至宁番卫等处地震,震声如吼者数次,四川行都司、建昌卫及建昌前卫等大小衙门、官厅宅舍、监房仓库,以及二卫的民居房舍,城楼垛口,墙垣门壁,寺庙神祠等建筑,一时俱皆倒塌。建昌尤甚,山崩地裂,城室尽塌,五昼夜雷声不绝,烈风可畏,水泉河水,尽皆黄浊。压死都指挥一人,指挥二人,千户一人,百户一人,镇抚一人,吏三人,士夫一人,太学士一人,土官土妇各一人。其他军民客商及各族人民被压死者不可数计。如徐都司父子书吏军伴等百余人,无一人得免。有水涌地裂,陷下三四尺,卫城内外俱落浮块,直到下月初六日地震犹未止。此次地震最远破坏距离约三百二十 km,最远有感距离五百六十 km,震中烈度(Io)X,震级(M)为 $7\frac{1}{4}$ 级。

吉囊人扰 嘉靖十五年(1536)四月,吉囊拥十万余众屯贺兰山后,分兵扰凉州(今甘肃武威),又扰庄浪(今甘肃永登),先后被守军副总兵王辅、总兵姜奭击败。同年秋冬再犯延绥、大同,入扰宣府边塞。

毁佛骨佛像　嘉靖十五年(1536)五月,世宗敕廷臣以禁中元时所建大善佛殿所在之地建皇太后宫。同月十一日,命郭勋、李时、夏言等入视殿址。尚书夏言请有司将佛骨等埋于中野,以杜愚民之惑。世宗令予以烧毁。于是毁金银佛像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等一万三千余斤。

苗民王聪起事　贵州平浪苗人王阿向先世为土官,为王仲武先人所夺。至阿向,遂与仲武争印相杀。总兵杨仁、巡抚陈克宅剿平,斩王阿向,以其地属都匀府,改名灭苗镇。仲武招集诸苗,科索不已,诸苗怨恨,遂推阿向属下平浪苗人王聪、王佑为主起事。嘉靖十五年(1536)五月,巡按杨春芳遣参将李宗佑前往抚谕,王聪遂攻夺凯口囤,擒李宗佑,声言乞还土田、官印乃释宗佑。杨春芳上告,诏调官军三万人围剿。王聪所据凯口囤绝险,要害处置弩楼,叠石为防,围攻三月不克。后调宣慰安万铨合剿,攻破诸寨,王聪等皆被获伏诛。官军前后斩杀二百六十余人,降抚苗寨一百五十余所。男妇二万余口。

皇史宬建成　世宗曾谕阁臣:祖宗御容、《宝训》、《实录》应有尊崇之所。同时令阁臣集儒士重新誊录《宝训》和《实录》,作石柜珍藏。于是选择南内之地建神御阁,由吏部尚书汪鋐兼兵部尚书督理。嘉靖十五年(1536)七月二十五日建成,改名皇史宬。其制如南京斋宫,内外用砖石团砌,面积达二千平方米,鸿规敞丽,龙阁崖巍,不假寸木。其中摆放石柜,藏《宝训》、《实录》。夏季反潮,改制铜匣。重新誊录的《宝训》、《实录》,书帙大小,依《通鉴纲目》,每月一册,厚薄适匀,每朝为一柜。而祖宗御容,另行修饰景神殿珍藏。

廖道南忧归　廖道南(?—1547)字鸣吾,蒲圻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四年(1525)纂修《明伦大典》,擢中允,充日讲官。累官至侍讲学士。嘉靖十五年八月忧归,嘉靖二十六年卒于家。家居期间,为世宗作《楚纪》六十卷。又有《殿阁词林记》及艺苑、词垣、讲幄、拱极、玄素子诸集。

刘天和请修双轮战车　嘉靖十五年(1536)八月十八日,陕西总制刘天和奏陈:自国初以来历年所造兵车,至今西边诸镇尚有留存,但皆双轮大车,行动迟缓;孝宗时,造双轮小车,赐名全胜车,行动便捷。今将全胜车稍加损益,车上置炮铳枪斧大小兵器,以一百五十斤为准,箱前树兽面牌,两旁施虎盾以备矢口,两车相连,可蔽二三十人,车用二人更推,一人前挽,又二人扶两翼。既可遏虏,又可据险布防。另有神臂强弓,射可及三百步。亦可仿制。其费用有限,请求制造。兵部覆奏,世宗允准。

刘天和请修边墙　嘉靖十五年(1536)八月十八日,陕西总制刘天和奏陈:宁夏边墙三百里,前尚书杨一清、王琼、唐龙相继修筑。但其中兴武营一带七十余里修筑不坚,当重新修筑。而安边、宁塞二营之间,系虏入扰必经之地,必创筑新墙,以杜干沟入扰之途。从宁朔墩至昌平墩九十里亦得增修,以遏制虏扰。此三处需银二十余万。以臣之见,先在延绥的干沟、干涧及定南、宁朔、兴武营等处兴工,费银七万余即可。目前所费不多,而将来受益甚大。世宗准行。

诸边建立武塾　嘉靖十五年(1536)九月初七日,世宗据监察御史金灿奏请,令诸边建立武塾,教习将士子弟。

严禁私造钱币　嘉靖十五年(1536)九月十二日,巡视五城监察御史闫邻奏陈:现今通用钱币为制钱(祖宗列圣及皇上所铸)和旧钱(历代所铸),二钱并用。近来京师之钱制,既薄又小,触手可碎,字文虽存,而点划难辨。原因是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致使真假混杂,制钱、旧钱壅遏。乞请严禁私造钱币。世宗令都察院揭榜禁约,敢有仍前铸造使用,许巡城御史严侦捕治,处以重罪。

秦金致仕　秦金(1467—1544),字国声,号凤山,无锡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正德时,历山东左、右布政使。弘治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因征讨贺璋、罗大洪,又平郴州、桂阳瑶民龚福全起义,擒获其首领龚福全、刘福兴等,破八十余寨,斩二千余级,以功入为户部右侍郎。世宗即位,改吏部,又改户部左侍郎,署部事。嘉靖二年(1523),擢南京礼部尚书,寻改兵部,又召为户部尚书。"大礼"议起,秦金偕廷臣伏阙哭争,又与何孟春等条陈张璁建议之非。后以屡忤帝意,于嘉靖六年(1527)春大计京官时,自陈致仕。归五年,又起为南京户部尚书,疏陈利民六事,寻召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居数月,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嘉靖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致仕。嘉靖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卒,年七十八。赠少保,谥端敏。有《安楚录》、《凤山诗集》。

京师潞县、通州地震　嘉靖十五年(1536)十月初八日,京师潞县(通州南四十五里,后并入通州)、通州(今通县)地震,居民房屋、城垣多塌,压伤人命。井径震声如雷,越三日复震,八日又大震。顺天府香河、霸州(今霸县)、文安、大城。永平府,万全都司各卫所。保定府新城。真定府武强、井径、赞皇、临城、商邑、柏乡、隆平。顺德府巨鹿、平乡。广平府成安,俱地震,有声如雷。山东省乐陵,起西北至东南,

声如雷。震中烈度(Io)ⅦⅠ—ⅦⅠ,震级为六级。

黄宗明逝世 黄宗明(?—1536)字诚甫,号致斋,鄞县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迁员外郎,从王守仁论学。宸濠反叛,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力谏。后任工部郎中、南京刑部郎中、吉安知府,首建白鹭洲书院。嘉靖五年(1526)迁福建盐运使,次年召修《明伦大典》,迁光禄寺卿。因救编修杨名,谪福建参政。嘉请十二年冬召擢礼部右侍郎,嘉请十四年转左侍郎。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卒于官。

田汝成撰《炎徼纪闻》 田汝成(1503—?),字叔禾,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初授南京刑部主事,寻召改礼部。历官贵州佥事、广西右参议,终福建提学副使。田汝成博学,工古文,尤善叙述。历官西南,谙晓先朝遗事,撰《炎徼纪闻》,为天下所重。后辞官,盘桓湖山,究览浙西名胜,撰《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见称于时。并有《田叔禾集》、《辽记》等论著行世,时推其博洽。

唐胄谏阻征伐安南 嘉靖十五年(1536)十月六日,皇次子载壑生,当颁诏安南(今越南)。时安南黎氏、莫氏内乱,二十余年不来朝贡。礼部尚书夏言、兵部尚书张瓒建言,莫登庸弑逆当讨,帝命廷议。同年闰十二月初一,户部左侍郎唐胄上疏,力谏不可用兵,谓帝王之于荒服,当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内乱,两广遂少边警,不必疲敝中国之力,而为黎氏复仇。世宗命再议。

诏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仍掌府印 洪武十四年(1381)平定云南,武定女土官商胜首先归附,诏设武定军民府,由商胜掌府印。正德年间,改由流官同知掌府印。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朝廷命恢复旧制,府印仍由土官知府瞿氏(女)执掌。

议讨安南 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安南国世孙黎宁遣使至京师告变,备陈莫登庸篡位柄国,乞明廷兴问罪之师。四月,命礼、兵二部会廷臣集议,世宗决计讨之,遂起右都御史毛伯温参赞军务,督军征讨。然朝议慢无定策,故未立即出师。

潘珍削籍 潘珍(1477—1548),字玉卿,初号朴庵,又号莪峰,晚号碧峰,婺源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正德中,历官山东佥事,分巡兖州。迁福建副使、湖广左布政使。正德七年(1512),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累迁兵部左侍郎。时议征讨安南,珍上疏谏曰:今北敌日番,联络万里,烽警屡闻,乃释门庭之防,而远事瘴岛,非计之得也。提出宜派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檄自定。世宗责以阻挠成命,于嘉靖十六年(1537)四月十三日令其闲住,后复官,不久即致仕。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初五日卒,年七十二。赠右都御史。

戒私创书院 嘉靖十六年(1537)四月二十四日,御史游居敬弹劾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导"伪学",乞禁王守仁、湛若水所著之书,毁其所立书院。于是诏令戒私创书院。

御史桑乔弹劾四尚书 嘉靖十六年(1537)六月初三,监察御史桑乔等疏陈禁奸弊以节工役,重边防以销隐忧,弹劾礼部尚书严嵩、工部尚书林庭棉、兵部尚书张瓒、提督西苑户部尚书张云皆"上负国恩,下乖舆望,灾变之来,由彼所致"。诏命林庭棉、张云致仕,留任严嵩、张瓒如故。

吉囊寇掠宣府 嘉靖十六年(1537)六月,吉囊入寇宣府,指挥赵镗战死。秋八月吉囊四万余骑复犯大同,寇宣府,参将张辅国战没。

潘旦致仕 潘旦(1476—1549),字希周,号石泉,南直隶婺源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知漳州邵武。三迁浙江左布政使。嘉靖八年(1529),擢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累迁至刑部右侍郎。嘉靖十五年冬,以兵部左侍郎提督两广军务。嘉靖十六年夏,诏起毛伯温征讨安南,潘旦弛疏力主抚降,不必出兵万里。疏下礼、兵二部,适其族父潘珍以谏言获罪,尚书严嵩、张瓒遂绌其疏不用,命改潘旦为南京兵部。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九日,被迫致仕。将还,吏劝其按例支库金为道里费。潘旦笑曰:"吾不以妄取为例。"嘉靖二十八年卒,年七十四。赠工部尚书。

余光削籍 余光,江宁人。官广东巡按御史。议征安南,余光上言,安南莫氏篡夺黎氏,犹如黎氏篡夺陈氏,不足深较,但当责以称臣修贡,不必远征,以疲中国。世宗咎其轻率,遂夺其俸。嘉靖十六年(1537)十一月八日余光进广东乡试录,礼部尚书严嵩摘其失误,遂被逮削籍。

陆采逝世 陆采(1497—1537),别名灼,字子元,号天池、清痴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为校官弟子,性格豪荡,选梨园子弟,登场教演所写传奇《明珠记》,名重一时。能歌诗,善制曲,作有传奇五种,今存除《明珠记》外,还有《南西厢记》、《怀香记》两种,以情节曲折取胜。嘉靖十六年(1537)卒,年四十一。又有《治域客论》、《太山稿》。

张鹤龄瘐死 张鹤龄(?—1537),孝宗敬皇后父张峦之子。张峦弘治间封为寿宁伯,皇太子立,进封为侯。弘治五年(1492)八月,张峦卒,十一月鹤龄嗣袭侯爵。正德中,进太傅。世宗即位,鹤龄以定策功,加太师,嘉靖二年(1523)八月进封昌国公。鹤龄与弟延龄恃势横肆,数犯国法。嘉靖十二年(1533)十

月,延龄事发,连及鹤龄,被削爵,谪为南京指挥同知。嘉靖十六年十一月,有诬告延龄兄弟挟左道诅咒皇上者,遂逮鹤龄下诏狱,瘐死狱中。

胡缵宗请凿清登莱旧河 嘉靖十七年(1538)二月十一日,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胡缵宗上疏:元朝海运,青州、登州、莱州旧有河道,南北距海约三百余里,舟楫甚便,闸迹犹存,惟马家濠多石,元时凿之未竟。乞朝廷发银,募人治河。世宗依允。

赵贞吉请征聘真儒 嘉靖十七年(1538)四月二十一日,翰林修撰赵贞吉上疏,请征求真儒。提出:征聘之典,乃祖宗旧制,正统年间曾荐举江西儒士吴与弼,成化年间曾征召广东贡士陈献章,"世岂无斯人哉?"

籍张鹤龄兄弟庄田 原昌国公张鹤龄及弟张延龄因罪革爵,户部奉旨查籍其顺天等府庄田。嘉靖十七年(1538)四月二十四日,户部上奏:原系节年钦赏者二十四处,共三千八百八十余顷,责令原佃人户照旧承种,征子粒银解部,许每年一次关领,以为家口食费。原系奏讨者九处,计一千四百余顷,尽数追没入官。其自买顺义县庄田一处,计四十七顷,许令变卖。世宗允准。

许瓒条陈人觐官裁革事宜 嘉靖十七年(1538)五月初二,吏部尚书许瓒条陈入觐官员宜裁革之事:清里甲、清田粮、清驿传、革总理、稽库积、议宗禄、禁兴造、议均役。帝命照其所议施行。

徽王庄田凌虐佃户 徽王赐田在鹿邑,管庄家人凌虐佃户,前户部尚书梁材议由地方官府代征庄田子粒。嘉靖十七年(1538)五月二十二日,徽王奏请乃由管庄人役征收,户部坚持不可,世宗大怒,追降梁材为侍郎,下司官诏狱。

诏议明堂大飨礼 前扬州府同知丰坊欲效仿张璁、桂萼以议礼取通显,上疏请建明堂,尊献皇帝庙号为宗,以配上帝。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十五,诏下礼部集议明堂大飨礼。礼部尚书严嵩援宋儒之说,认为以功德宜配文皇,以亲则宜配献皇。世宗问夏言,夏言不敢对。世宗说:"皇考称宗,岂为过情?"严嵩遂由顺帝意,以为"严父配天,允合周道。"户部侍郎唐胄力言不可,认为明堂宜奉太宗配。世宗大怒,下唐胄于诏狱拷掠,罢黜为民。

徐霖逝世 徐霖(1462—1538),字子仁,号髯仙,别署九峰道人。原籍苏州长洲,自幼定居金陵(今南京)。少补诸生,倜傥不羁,坐事削籍,乃致力藻翰,书画皆工,颇负盛名。尤工曲,与当时散曲家陈铎并有"曲坛祭酒"之称。著作有《丽藻堂文集》、《中原音韵注释》等。相传《绣襦记》亦出其手。嘉靖十七年(1538)七月初二日卒,年七十。

陈沂逝世 陈沂(1469—1538),字宗鲁,后改字鲁南,号石亭,金陵(今江苏南京)人。正德进士,累官布政使参政。嘉靖初,因与张璁、桂萼不合,乃致仕。嘉靖十七年(1538)卒,年七十。少好苏东坡诗,自号小坡。中年宗盛唐诗,文宗《史记》、《汉书》,与何景明、李梦阳等同属复古派,又与顾璘、王韦称"金陵三俊"。善画,工篆隶书法。著作有《金陵古今图考》、《金陵世纪》、《石亭集》等。

尊献皇帝庙号为睿宗祔于太庙 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世宗命礼部议其生父兴献帝称宗祔庙之礼,集文武大臣于东阁。礼部尚书严嵩及群臣所议不合帝意,帝大不悦,遂著《明堂或问》以难严嵩,严嵩惶惧,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世宗又谕严嵩:"太宗靖难,功与开创同,当称祖以别之。"严嵩遂上疏阐发帝意,提出"古者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庙,晋则十一室而六世,唐则十一室而九世。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据,今"皇考亲孝宗弟,臣谓宜奉皇考于孝宗之庙。"并说:"古礼,宗无定数;祖非有功者不得称。我文皇定鼎持危,功莫大焉,尊称为祖,圣见允宜。"严嵩奏出,群臣无敢异议。九月十一日,世宗谕礼臣曰:"献皇帝躬备大德,延及朕躬,宜荐宗称。"于是改太宗庙号为"成祖",尊献皇帝庙号为"睿宗",并奉睿宗主谥太庙。复配享上帝于玄极宝殿,奉睿宗配享。

上皇天上帝大号 嘉靖十七年(1538)十一月初一,世宗以其生父兴献皇帝既称宗配帝,乃于南郊上"皇天上帝"大号,恭进册表,并诣太庙,改上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尊号。皇后助行亚献礼,文武大臣及命妇陪祀。礼成,严嵩奏见庆云,率群臣朝贺,又撰《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以取悦世宗。帝命付史馆。

顾存仁谪戍 嘉靖十七年(1538)十一月十三日礼科给事中顾存仁疏陈五事:广旷荡之恩,崇安静之吏,重抚按之责,精考察之政,抑邪佞之风。末云:"败俗妨农,莫甚释氏。叶凝秀何人,而敢乞度?"世宗崇道,而叶凝秀乃是道士,世宗以为存仁此疏刺己,且恶其欲释杨慎等谪戍诸臣,遂责存仁妄指凝秀为释氏,廷杖六十,编氓口外。穆宗即位,召为南京通政参议,历太仆卿,未几,致仕。

李时逝世 李时(1471—1538),字宗易,任丘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编修。正德中,历侍读、右谕德。世宗嗣位,迁侍读学士。嘉靖三年(1524),擢礼部右侍郎。嘉靖十年七月,加太子太保,后屡加至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时素宽平,无大匡救,而议论恒本忠厚,廷论咸以

时为贤。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卒于官，赠太傅，谥文康。有《南城召对录》。

吉囊犯宣府等地 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吉囊入犯宣府，都指挥周冕战死。八月，又犯河西，总督刘天和击退之。十二月，入犯深井堡，大肆杀掠。

建金箓大斋于内皇坛 嘉靖十七年(1538)，世宗命建金箓大斋于内皇坛，赏赉天师张彦頨有加。嘉靖初年，道士张彦頨入贺，献以“长生之术”，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赐金冠、玉带、蟒衣、银币，遂留京师，张彦頨卒，诏如列侯例赐恤典，命名为“天师永绪”。

王效逝世 王效，延绥人。骑射绝人，中武会试。嘉靖中，累官都指挥佥事，充延绥右参将，擢延绥副总兵。嘉靖十一年(1532)，进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代周尚文镇宁夏。屡败吉囊，因功进都督同知，右都督，左都督。嘉靖十六年移镇宣府，十七年卒。谥武襄。

敕谕南巡 嘉靖十七年(1538)十二月初四，世宗生母章圣皇太后逝世，定梓宫南祔承天(今湖北钟祥)显陵。嘉靖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敕谕南巡，察视山陵。命自涿州至承天丰乐县，沿途建置行宫，修筑驰道；选锦衣卫官一百二十人，旗校八千人；发帑银二十万两备饷。

立皇太子 嘉靖十八年(1539)春二月初一日，立皇次子载壡为皇太子，封皇三子载垕为裕王，皇四子载圳为景王。初二日，诏赦天下。

翟銮充行边使 帝将南巡，虑塞上有警，议遣重臣巡视。时前大学士翟銮以丁忧归里，服除久不召用，大学士夏言遂荐之于帝。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三日诏起翟銮为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充行边使，节制诸边；兵部尚书毛伯温总督宣大山西三边军务；左侍郎樊继祖提督蓟州山海关边备。

铸嘉靖通宝钱 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初六日诏铸嘉靖通宝钱。

诸臣谏阻南巡 时饥荒连年，啼号相续，故群臣力谏南巡。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二十七日工部郎中岳伦上疏谏阻，被斥为民。二月八日，吏部尚书许瓒、都御史王廷相等劝谏，不听。御史刘士贤、都给事中曾烻等谏止，罚俸二月。二月十六日，兵卒孙堂夜入大内御座前，痛陈沿途治设行宫，劳苦吏民，被逮下狱。

安南莫氏乞降 嘉靖十七年(1538)三月，命咸宁侯仇鸾为征夷副将军充总兵官、兵部尚书毛伯温参赞军务征讨安南莫登庸。四月，罢征安南之师。嘉靖十八年二月，起黄绾为礼部尚书宣谕安南。同月十四日，安南莫登庸之子莫方瀛遣使至镇南关请降，并籍其田土户口以献，听天朝处分，凡为府五十三，州四十九，县一百七十六，帝下廷臣集议。

世宗驾发京师 嘉靖十八年二月(1538)十六日，帝发京师，南下巡幸，后妃从行。京山侯崔元、大学士夏言、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严嵩、户部尚书李廷相、兵部尚书王廷相、刑部尚书杨志学、工部尚书蒋瑶等扈行。咸宁侯仇鸾、东宁伯焦栋为左右副将军，翊国公郭勋摄中军佩都护将军印，成国公朱希忠副之，护驾而行。授方士陶仲文“神霄保国宣教高士”，给诰印，亦随驾。命皇太子监国。途中因供应不周、迎驾失仪、行宫起火及谏止巡幸等逮治官吏甚多。

平断藤峡瑶民起义 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提督两广兵部侍郎蔡经会师五万余人，征讨广西断藤峡瑶民起义。

驾至承天 嘉靖十八年(1539)三月十二日，驾至承天。御龙飞殿受朝，谒显陵，改营玄宫，拓展显陵周垣。享上帝于龙飞殿，奉皇考配秩于国社、国稷。诏赦天下，免承天田赋三年，免湖广明年田赋五分之二，畿内、河南三分之一。同月二十二日，回銮。

邵元节逝世 邵元节(1459—1539)，贵溪人，龙虎山道士。先为仙源范文泰所器重，授以《龙图龟范》秘籍。嘉靖初年，应征入京，召对便殿，因献长生之术，而得世宗宠幸。嘉靖十五年(1536)正月，命加“致一真人”道号，赐玉带冠服，领符箓斋醮之事。十二月，皇嗣生，帝以为乃邵元节祷祀之功，遂加授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赐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嘉靖十八年三月，死于京师，恤典如伯爵例。赠少师，谥文康荣靖。方士之有谥，自世宗始。谥而四字，“则益淫也。”

驾还京师 嘉靖十八年(1539)四月十五日，帝还京，入宣武门，群臣失迎者一千一百四十二人，罚俸有差。

夺所赐夏言手敕银章 翊国公郭勋、礼部尚书严嵩妒嫉内阁首辅夏言，相结构陷之。帝南巡回京，又巡大峪山陵寝，夏言撰拟《居守敕》迟缓，加之对侍奉玄修、议礼日不如初，帝遂大怒。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初二日，切责夏言“怠慢不恭”，命夺回累年所赐手敕四百零五道、银章一枚，革除勋阶，勒令致仕。夏言惶惧谢罪。居数日，帝怒消解，又令复官入直，所退手敕、银章亦还之。

王轨削籍 王轨，生卒不详，开平卫人。弘治十二年(1449)进士。正德年间，屡迁山东左布政使。世宗即位，入为顺天府尹。房山地震，轨言召灾有

由，语多指斥，忤旨切责。后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招抚芒部四十九寨，拜工部右侍郎，营造仁寿宫。工罢，改户部，核九门苜蓿地，以馀地归之民。勘御马监草场，厘地二万余顷，募民以佃。进户部左侍郎。巡按御史戴金劾其芒部改土归流，致使疆场不靖，遂罢官。以兵部尚书李承勋荐，迁南京户部尚书。嘉靖十六年(1537)十月改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诏举将材，王轨荐郑卿、沈希仪等二十一人，皆擢用。嘉靖十八年五月以老乞归，疏中言享年七十有四，世宗以为非告君之语，削籍为民，不久，令冠带闲住，后卒于家。

核检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欺隐田粮　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七府赋税甲天下，而里胥豪强，移粮作荒，欺隐坍荒田土，蠹弊特甚。嘉靖十八年(1539)六月二十三日，巡抚欧阳铎、巡按陈蕙呈报查核田粮，计诸州县坍荒、公占田地四千四百二十余顷，米十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余石，清出欺隐田粮六万一千五百五十余石，事下户部议行。

吕柟致仕　吕柟(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第一，授修撰。以忤权阉刘瑾，辞官。瑾诛，复官。世宗即位，以议"大礼"与张璁、桂萼不合，下诏狱，谪解州判官，后累迁至国子祭酒，晋南京礼部右侍郎，署吏部事。嘉靖十八年(1539)七月十一日，自陈致仕。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一日逝世，追赠礼部尚书，谥文简。学宗程朱，以穷理实践为主，重躬行，不为玄论，名闻朝鲜，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他著述宏富，有《周易说翼》、《尚书说要》、《毛诗说序》、《礼问内外篇》、《春秋说志》、《四书因问》、《史约》、《小学释》、《宋四子钞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南省奏藁》、《泾野诗文集》等。

黄绾闲住　黄绾(1477—约1551)，字宗贤，一作叔贤，号石龙、久庵，太平(今安徽当涂)人。以父荫入官。正德五年(1510)，官后军都事。正德七年，以疾告归。嘉靖六年(1527)，擢光禄少卿，予修《明伦大典》。累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先因师事王守仁，为王守仁政敌桂萼所忌，遂罢黜。在"大礼"议中，黄绾所议又与张璁、桂萼相合，受世宗知遇，黄绾乃为其师王守仁讼冤，官至礼部左侍郎。时夏言为礼部尚书，黄绾附夏言而力诋张璁。嘉靖十八年二月起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受命出使安南。至当年闰七月二十六日，出使未行，为其父母请赠诰，帝怒，令削其尚书以侍郎闲住。久之，卒于家。黄绾学初宗程朱，后转师王守仁，称守仁"心学"为"圣学"。晚年批判"心学"为"禅学"，主张"良知"来源于生活，批驳王守仁"致良知"说为"空虚之弊，误人非细。"他著述甚宏，有《易经原古》、《书经原古》、《诗经原古》、《礼经原古》、《春秋原古》、《四书原古》、《中庸古今注》、《庙制考义》、《知罪录》、《思古堂笔记》、《石龙奏议》、《云中疏稿》、《边事疏稿》、《边事奏稿》、《石龙集》、《困蒙稿》、《洞黄黄氏世德录》、《恐负卷》、《明道编》等。

嘉定海溢　嘉靖十八年(1539)闰七月，海水大溢，平地涌波三丈，沿海田多坍没，损粮至三千八百余石。是年歉收。后又发生瘟疫。

日本贡使至宁波　嘉靖十八年(1539)闰七月，日本国王源义晴派遣贡使至中国宁波。自嘉靖二年"贡使之役"后不至。

陶仲文总领道教　嘉靖十八年(1539)九月十五日，进封陶仲文"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总领道教。

大同五堡工成　嘉靖十八年(1539)十月，大同弘赐、镇边、镇川、镇虏、镇河五堡建成，相去各二十五里，分戍三千人，参将一、指挥五领之。

湛若水条陈十事　嘉靖十八年(1539)十一月六日，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条陈留守十事：平物价，急无告，劝耕桑，申礼制，宣圣训，躬骑操，修武教，编保甲，励兵马，定四民。诏允其议。

梁震逝世　梁震，新野人。袭榆林卫指挥使。嘉靖七年(1528)进署都指挥佥事，协守宁夏兴武营，寻擢延绥副总兵，进都督佥事。吉囊、俺答犯延绥，梁震大破于黄甫川。吉囊复以十万骑大举入寇，梁震又大破于乾沟。嘉靖十四年进都督同知，充陕西总兵官。论黄甫川功，又进右都督。明年，移镇大同。俺答入犯，大破于宣宁湾、红崖儿，斩获甚众。进左都督。毛伯温督师，与梁震修镇边诸堡。嘉靖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赠太子太保，赐其家银币，加赠太保，谥武壮。

赐入直诸臣直庐　世宗自嘉靖十八年(1539)常斋居西内，不时宣召诸臣应制，或至夜分。应制所撰之文皆敬奉神仙之青词。为此特于西苑无逸殿设直庐，赐予太师翊国公郭勋、成国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驸马都御邬景和、大学士夏言、大学士翟銮、礼部尚书严嵩等入直大臣。

汪机逝世　汪机(1463—1539)，字省之，号石山，祁门人。少时攻读经史，屡试不第，遂从其父汪以望学医。宗朱丹溪，承其学说，著述甚丰。有《续素问钞》、《外科理例》、《针灸问对》、《痘治理辨》、《本草合编》、《脉诀刊误》。他平生治病医案，由其弟子陈桷等人整理成《石山医案》行世。嘉靖十八年(1539)卒。

翟銮复入内阁　翟銮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

史充行边使，东西往返三万余里，诸边文武大吏竞相馈送，事竣还京，装载千辆，用以广贿贵幸，遂于嘉靖十九年(1540)正月十三日仍以原官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

添设七庙乐舞生 嘉靖十九年(1540)正月十三日，添设七庙乐舞生一千二百二十九名。

谢瑜弹劾严嵩 嘉靖十九年(1540)正月二十七日，御史谢瑜弹劾礼部尚书严嵩贪污强辨。世宗不听。

请通海西诸卫 嘉靖十九年(1540)二月四日，大学士翟銮请饬驿传毋得留阻，以通辽东海西诸卫，并宥其过期之罪，特许通贡。兵部核奏，报可。

马永逝世 马永(？—1540)，字天锡，迁安人。嗣世职为金吾左卫指挥使。正德时，进都指挥同知。江彬用事，练兵西内，马永称疾避之。守备遵化，寇入马兰峪，马永战柏崖、白羊峪，皆有功。正德十三年(1518)进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蓟州。尽汰诸营老弱，听其农贾，取佣值给健卒，由是所率部卒，独雄于诸镇。武宗至喜峰口，欲出塞，马永叩马谏阻。营筑中路城堡，迁军守卫，以功进署都督同知。嘉靖元年(1522)，朵颜把儿孙结诸部寇边，马永迎击洪山口，大败之，进右都督。大同兵变，命马永督诸军平定，乱平还镇。后上书乞宥议礼获罪诸臣，夺官，寄禄南京后府。巡按御史丘养浩、顺天巡抚刘泽及给事、御史交章论救，俱被谴。嘉靖十四年，辽东兵变，乃以马永为总兵官。泰宁、朵颜部寇边，马永击败之。广宁兵变，马永平之，进左都督。李时、王廷相荐其镇守蓟州，以为京师藩屏。未及调，于嘉靖十九年三月初一逝世。辽人为之罢市。丧过蓟州，州人亦洒泣。两镇并立祠。尚书郑晓称马永和梁震有古良将风。

包节弹劾张瓒 嘉靖十九年(1540)四月十八日，御史包节弹劾兵部尚书张瓒卖官鬻爵。张瓒疑为左都御史王廷相嗾使，而讦发王廷相私事。世宗俱不追查。

诏勋戚子弟入监肄业 嘉靖十九年(1540)五月五日，诏敕公、侯、伯子弟入国子监学习，学有可观，奏请叙荫。于是勋戚子弟争相以入学为荣。

诏选淑女 嘉靖十九年(1540)五月八日，诏选京城内外淑女一百名。

蒋瑶致仕 蒋瑶(1469—1557)，字粹卿，号石庵，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行人。正德时，历两京御史，疏陈时弊有旨诘问。出为荆州知府，转扬州知府。武宗南巡至扬州，蒋瑶供御取具而已，无所馈遗。佞倖江彬欲占富民居为威武副将军府，蒋瑶执不可。传旨征调异物，答以非扬州所产。武宗责问："纻白布，亦非扬产耶？"蒋瑶不得已，献纻白布五百匹，诸嬖倖皆怒。驾旋，蒋瑶扈驾至宝应，中官丘得用铁链系之，数日始释。扬州民众感泣，建祠祀之，名声自此大震。世宗即位，历湖广、江西左、右布政使，以副都御史巡抚河南。迁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嘉靖十九年(1540)五月二十七日因年逾七十致仕，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卒，年八十九。赠太子太保，谥恭靖。

湛若水致仕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人。弘治五年(1492)举于乡，师事新会陈献章，不乐仕进。后以母命，入南京国子监，举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时王守仁在京师讲学，湛若水相与应和。嘉靖间，累迁南京国子监祭酒，历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嘉靖十九年(1540)五月二十七日因年逾七十致仕。嘉靖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卒，年九十五。隆庆初赠太子少保，谥文简。湛若水乃明代著名理学家，为学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自谓"阳明(王守仁)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时称"王湛之学"。有《二礼经传测》、《春秋正传》、《古乐经传》、《甘泉新论》、《甘泉集》等。

梁材闲住 梁材(？—1540)，字大用，南京金吾右卫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德清知县。正德初，迁刑部主事，改御史。出为嘉兴知府，调杭州，迁浙江右参政，进按察使。嘉靖初，起补云南，历贵州、广东左、右布政使。时天下布政使以廉名著者，惟梁材与姚镆二人而已。嘉靖六年(1527)，拜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嘉靖七年十二月迁户部尚书，力祛宿弊，屡忤权倖，遂于嘉靖十七年三月致仕。次年五月，复起原官，加太子少保。梁材三掌国计，砥节守公，犹如一日。世宗斋醮所用之龙涎香，物稀价贵，梁材迟迟未能购进，帝大不悦。时诸宫殿土木繁兴，役使外卫班军四万六千余人，翊国公郭勋犹以为不足，拟议再行雇募，梁材力言不可。郭勋遂劾其"变乱成法，侵牟职掌"。帝信之，谓梁材"沽名误事，似忠实诈"，于嘉靖十九年六月七日令其削职闲住。同年十月初四日卒。隆庆初复官，赠太子太保，谥端肃。

复设江淮总兵官 嘉靖八年(1529)因"江洋大盗发"，设镇守江淮总兵官，后革去此职。至嘉靖十九年六月十日，又因"江洋群盗，凶焰甚炽"，复设此官，驻扎镇江，提督沿江上下兵防。且加重金山备倭、仪真守备官事权，分任江南北地方。

宣府总兵官白爵言边防五弊 嘉靖十九年(1540)七月七日，宣府镇总兵官白爵言，镇兵八万，马四万，而兵锋不振者，其弊有五：将不知兵，兵不顾

将；人无斗志，器甲不备；尖夜纵虏，笞罚不加；主将权轻；官吏失职。上是之。

段朝用进献银器 段朝用，合肥人。以烧炼仙丹交结翊国公郭勋。郭勋以段朝用所炼银器百余件进献，说"所化银皆仙物，用为饮食器，当不死。"用以供斋醮，则神仙可致。世宗以为这是祈天的结果，遂于嘉靖十九年（1540）七月二十四日增郭勋岁禄百石。段朝用又献银万两助雷坛工费，世宗大悦，授其"紫府宣忠高士"。段朝用还请岁进银数万两以资国用，世宗益喜。后其术不验，其徒王子岩攻发其诈，世宗命逮子岩、朝用，付镇抚司拷讯，朝用所献银，均为郭勋家物。嘉靖二十二年春二月，郭勋罪死狱中，朝用乃向郭家索还贿赂，并捶死郭家厮役张澜，复上疏渎奏。世宗怒，遂收朝用于法司论死。

请谨士习 嘉靖十九年（1540）八月三日，礼科给事中曾钧疏言士习之弊在于廉污之介不严，静躁之分不明；至于朝中大臣则守局循常，强奢竞靡，强辨伤体，交恶相倾，故请整肃之。帝嘉其言。

俺答入寇 嘉靖十二年（1533）十月大同兵变，叛军多逃塞外投靠俺答，为其刺探诸边及京师虚实。嘉靖十九年七月，北部哈剌嗔纠集俺答、几禄、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十余部，祷旗晾马，大举进犯宣府。总兵白爵、副总兵云冒率军抵御，官军大败。大同守军与俺答秘约，只要其不劫掠大同，大同军即不拦截。八月，俺答遂分道入大同西路，由井坪、朔州直抵雁门关，破宁武关，至岢岚、兴县、交城、汾州、文水、清源，杀掠人畜以万计。俺答退兵，遇大同守军，即以所掠财物馈赠，而大同巡抚史道、总兵王升置之不问。宣府总兵白爵奉命增援，亦观望不战。巡抚山西都御史陈讲以山西告急驰报，下兵部议，兵部尚书张瓒则以"寇且退矣，何事张皇"为辞，以致俺答军携带所掠辎重，徐徐出塞。俺答军此次入寇历时二个月。同年十二月，俺答、吉囊又寇大同。

杨最杖死 杨最（？—1540），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1499）进士。授工部主事。督逋山西，极陈灾民困状，请缓其征。历郎中，治水淮、扬。出为宁波知府，请罢浙东贡币，诏悉以银充，民以为便。累迁贵州按察使，入为太仆寺卿。世宗好神仙，给事中顾存仁、高金、王纳言皆因直谏而得罪。方士段朝用以所炼银器百余件，因郭勋以进，说以此银器盛饮食物，供斋醮，神仙可致。世宗召朝用，朝用说："帝居深宫，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世宗深信不疑，谕廷臣令太子监国，"朕少假一二年，亲政如初。"举朝愕不敢言。惟杨最于嘉靖十九年（1540）八月二十九日抗疏力谏，言："陛下春秋方壮，乃圣谕及此，不过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栖澡炼者所为，岂有高居黄屋紫闼，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举者？""黄白金丹之术，皆可断元气，惟端拱清穆，恭默思道，不迩声色，保复元神、仙药不求而至矣。至于监国，犹不敢议。"世宗大怒，立下诏狱，重杖之，杖未毕而卒，百官震惧。隆庆初，赠副都御史，谥忠节。杨最性淳朴刚直，不能媚人，当道深嫉之。为政清廉爱民，抑制豪强，离官之日，老幼遮恸，留其履袜而祠之。

吉囊败黑水苑 嘉靖十九年（1540）九月，吉囊犯固原，诸将多畏缩不前。都御史刘天和怒斩指挥二人，督总兵官周尚文领兵奋击吉囊于黑水苑，杀吉囊子锡沙王，吉囊遂败退。宁夏巡抚杨守礼、总兵任杰又大败吉囊于甘肃武县铁柱泉。因黑水苑大捷，刘天和进南京户部尚书，杨守礼总督军务，周尚文官复都督同知。

请罢采矿 嘉靖十九年（1540）十月初二，南京礼科给事中曾钧等上言，各路采矿，得不赏费，请尽停罢。报可。

顾鼎臣逝世 顾鼎臣（1473—1540），初名同，字九和，号未斋，昆山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第一，授修撰，累迁礼部右侍郎。世宗好神仙之术，内殿设斋醮，他进《步虚词》七章，优诏褒答。明代词臣，以青词结主知，自鼎臣始。后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加官至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夏言为内阁首辅，鼎臣素柔媚，不能有为，充位而已。昆山旧无城，鼎臣言当事筑城，后倭乱起，昆山得以保全。嘉靖十九年（1540）十月六日卒于官，谥文康。有《未斋集》、《文康公全集》。

霍韬卒于官 霍韬（1487—1540），字渭先，始号兀涯，后更号渭涯，南海（今广州市）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谒归成婚，读书西樵山，经史淹洽。世宗践祚，除职方主事。时杨廷和柄政，霍韬上疏言锦衣不当典刑狱，东厂不当预朝议，抚按兵备官不当以军功授秩荫，兴府护卫军不当尽取入京概授官职等，世宗深为嘉纳。"大礼"议起，礼部尚书毛澄力持考孝宗，霍韬撰《大礼议》驳之，认为若考孝宗，叔兴献，"考之古礼则不合，质之圣贤之道则不通，揆之今日之事体则不顺。"疏上，朝臣咸目为邪说，寻谢病归。嘉靖六年（1527），命直经筵日讲，请撰《古今政要》及《诗书直解》以进，迁詹事兼翰林学士。嘉靖七年四月，进礼部右侍郎。嘉靖十二年，历吏部左、右侍郎，后出为南京礼部尚书。嘉靖十八年，命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协掌詹事府事。霍韬学博才高，然性情刚褊，世宗颇厌之，故不大用。他先后多所建白，颇涉国

家大计。在南都，禁丧家宴饮，绝妇女入寺观，罪娼户市良人女，毁淫祠，建社学，散僧尼，表忠节，既去，士民思之。嘉靖十九年十月七日卒于官，赠太子太保，谥文敏。有《诗经解》、《象山学辨》、《程朱训释》、《渭涯集》、《西汉笔评》、《渭涯家训》等。

王艮逝世 王艮(1483—1541)，原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灶丁。七岁进乡塾，因家贫不能竟学，随其父从商山东。及壮年始读《孝经》、《大学》、《论语》诸书。正德六年(1511)赴赣，拜王守仁为师，追随讲学多年。王守仁死，返乡里讲学，以"百姓日用即道"为题，属王学左翼，人称"泰州学派"。著有《王心斋全集》。嘉靖十九年(1541)十二月八日逝世。

罗洪先夺官 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吉水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第一。授修撰，即请告归。嘉靖十八年(1539)召为春坊左赞善。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唐顺之等疏请皇太子御文华殿受百官朝贺，世宗讳言太子临朝，遂夺其职。年十五读王守仁《传习录》，欲往受业，因父阻未遂，然仍宗守仁"致良知"之学，又精研舆地学，费十数年之功，撰《广舆图》，成为明朝知名学者。四十三年八月十五日逝世，隆庆元年赠光禄少卿，谥文恭。有《念庵集》。

《宁夏新志》刻行 《宁夏新志》八卷，嘉靖十九年(1540)刻行。主纂人是宁夏巡抚杨守礼，纂修人管律，宁夏人。该志始编于嘉靖七年(1528)，收录内容较弘治《宁夏新志》更为丰富。对明代宁夏军政建置、屯田、少数民族状况，记述尤详。还收录宁夏历代七十一位作者三百余首诗词及文章，对于研究宁夏历史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都是重要的资料。

日本贡使献方物 嘉靖十九年，日本国王源义晴派遣贡使硕鼎来贡马，并献方物，明廷赏宴如例，并对日本国王、王妃及使臣所贡方物，各给以价。硕鼎要求明廷给发嘉靖新勘合，同时请归还嘉靖二年(1540)贡使宋素卿没官贡物。言官皆论不可。世宗命礼部会兵部、都察院会议以闻。部院议定：宋素卿货物已入官，俱不许还；以后贡期及贡船如违例，则阻其回国；饬令沿海备倭衙门加强戒备，以备不虞。

佛郎机船市双屿 嘉靖十九年，佛郎机人与中国沿海走私商人相勾结，络绎于浙海，在双屿、大茅等港互市。

杨爵下狱 杨爵(1493—1549)，字伯珍，号斛山，富平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行人。后擢御史。世宗经年不视朝政，岁频旱，湖广饥民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而世宗日夕建斋醮，修雷坛，屡兴土木。方士陶仲文加宫保，而太仆寺卿杨最谏死，翊国公郭勋尚承宠用事。嘉靖二十年(1514)二月初一日，天微雪，大学士夏言、礼部尚书严嵩等作颂称贺，取悦世宗。监察御史杨爵以非瑞称贺，直言极谏。他力陈"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无措手地。方且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士风人心，颓坏极矣。"世宗览疏震怒，立下诏狱拷掠，血肉横飞，死而复苏。所司请送法司拟罪，帝不许，命严锢之。狱卒以帝意不测，屏其家人，不给饮食，屡濒于死。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铉上疏解救，先后杖死狱中，自此无敢言者。后又有工部员外郎刘魁、给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系，历五年不释。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据说有神降于乩坛，世宗感其言，立释三人出狱。未逾月，尚书熊浃疏言乩仙之妄，复令东厂追捕。杨爵抵家才十日，校尉至，与共麦饭毕，即就道。杨爵对其妻说："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顾，左右观者为泣下。三人同系镇抚司狱，桎梏加严，饮食屡绝。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玄殿灾，世宗祷于露台，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传诏急释之。居家二年，于嘉靖二十八年十月九日逝世，终年五十七岁。隆庆初复官，赠光禄卿。万历中，赐谥忠介。杨爵先后系狱七年，日与周怡、刘魁讲论，于狱中著有《周易辨说》、《中庸解》。又有《斛山遗稿》传世。

诏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 嘉靖十八年(1539)闰七月复命咸宁侯仇鸾、兵部尚书毛伯温征讨安南莫登庸。嘉靖十九年秋，毛伯温进驻南宁，传檄莫登庸能束身归命，即待以不死。莫登庸乃率从子莫文明及诸部头目入镇南关，献上土地军民籍，请奉正朔，永为藩臣。毛伯温许之，纳其图籍，疏奏于朝。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三，诏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授莫登庸都统使，改十三道为十三宣抚司，各设同知、副使、佥事，听都统黜陟，一岁一贡。并命核查黎宁真伪，果为黎氏之后，则割所据四府，使奉祀事，否则已之。毛伯温受命，不发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

九庙灾 嘉靖二十年(1541)夏四月初五，九庙灾。时久旱不雨，是日初昏，阴雨骤至，大雷雹以风，忽火起仁庙，遂毁太祖昭穆群庙，惟献庙独存。嘉靖二十四年秋七月，重建太庙成，布诏天下。

周天佐杖死 周天佐(1511—1541)，字子弼，晋江(今福建南安东晋江北岸)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授户部主事。屡分司仓场，以清操闻。二十年四月初五，九庙灾，诏百官言时政得失。周天佐上书说："今阙政不乏，而忠言未尽闻，盖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诏，示人以言耳。御史杨爵狱

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国家置言官，以言为职。爵系狱数月，圣怒弥甚，一则曰小人，二则曰罪人。夫以尽言直谏为小人，则为缄默逢迎之君子不难也。以秉直纳忠为罪人，又孰不能为容悦将硕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临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于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测，万一溘先朝露，使诤臣饮恨，直士寒心，损圣德不细。愿旌爵忠，以风天下。”四月二十三日，疏入，世宗大怒，命杖六十，下诏狱，不三日而卒，终年三十一岁。其尸出狱，曝日中，大兴民祭于柩而哭之恸，或问之，民答曰：“吾伤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隆庆初，赠光禄少卿。天启初，谥忠愍。

邹守益致仕　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安福人。正德六年(1511)会试第一。授编修，逾年告归。谒王守仁，讲学于赣州。宁王宸濠反，与守仁军事。世宗即位，始赴官。因议“大礼”忤旨，谪广德州判官。废淫祠，建复初书院，与学者讲授其间。迁南京礼部郎中，官至南京国子祭酒，嘉靖二十年(1541)四月五日九庙灾，以直谏落职。里居日事讲学，四方学者踵至，皆称其“东廓先生”。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十日逝世，赠礼部侍郎，谥文庄。有《东廓集》。

汪文盛致仕　汪文盛(？—1543)，字希周，枣阳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饶州推官。入为兵部主事。偕同官谏武宗南巡，杖阙下。嘉靖初，历福州知府，迁浙江、陕西副使。擢云南按察使。嘉靖十五年(1536)冬，廷议将讨安南，以文盛才，就拜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安南武文渊占据宣光，率所部万人来降，并献进兵地图，文盛以闻，授文渊四品章服，子弟给冠带。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诸国助讨，皆听命。毛伯温至南宁，文盛以抚议。及论征安南功，伯温及两广镇巡官俱进秩，汪文盛功虽著，然仅赉银币而已。嘉靖二十年四月五日九庙灾，汪文盛自陈疏稍缓，令致仕。嘉靖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卒。

疏浚河漕　黄河南徙，于河南睢县北野鸡冈决口，由涡河经亳州入淮。兵部侍郎王以旂奏开浚山东诸泉，入野鸡冈新开河道，以济徐、吕二洪漕运。嘉靖二十年(1541)五月，命王以旂兼右佥都御史督理河漕。

崔铣致仕　崔铣(1478—1541)，字子钟，号少石，河南安阳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编修，忤权宦刘瑾，调南京吏部主事。刘瑾诛，进侍读。嘉靖初，进南京祭酒，改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升南京礼部右侍郎。嘉靖二十年(1541)五月四日致仕，当月逝世。有《读易余言》、《崔氏小尔雅》等著作多种。

王慎中致仕　王慎中(1509—1559)，字道思，初号遵岩居士，后号南江，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户部主事，旋改礼部祠祭司，终河南参政，二十年大计，因忤大学士夏言落职，嘉靖三十八年卒。慎中为文，初主秦汉，后崇唐宋，尤得力于曾巩，后益肆力古文，卓然自成一家，与唐顺之齐名，时称“王唐”，又称“晋江昆陵”，为当时“唐宋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有《遵岩先生集》。

郭勋下狱　郭勋(？—1542)，武定侯郭英六世孙。正德初袭封。正德中，镇两广，入掌三千营。世宗继位，命掌团营。“大礼”议起，揣测帝意，首助张璁，于是大得宠幸，督禁军。加至太师。嘉靖十八年(1539)进封翊国公。他挟恩宠，揽朝权，擅作威福，网利虐民，京师店舍多至千余区，为廷臣所恶，言官交章论劾，不听。郭勋与首辅夏言素不和。时世宗给郭勋敕书，命与兵部尚书王廷相等同清军役，勋久不领敕。言官纷纷疏劾。郭勋亦上疏申辨，说：“有何事，更劳赐敕语？”世宗怒其无人臣礼。言官知世宗恨郭勋辨语骄谩，刑科都给事中高时遂上疏告发郭勋贪纵不法十数事，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十二日，诏郭勋下锦衣卫狱，论死。次年十月九日死于狱中。

王廷相削籍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平涯、浚川，仪封(今河南兰考东北)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正德初，忤权阉刘瑾，谪亳州(今安徽亳县)。瑾败，召为御史。嘉靖二年(1523)，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讨平芒部首领沙保，迁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嘉靖十二年四月入为左都御史，嘉靖十三年二月加兵部尚书提督团营仍掌院事，嘉靖十八年加太子太保。嘉靖二十年九月，郭勋案起，帝责王相廷“朋比阿党”，削籍为民。嘉靖二十三年九月七日逝世。隆庆初，赠太保，谥肃敏。廷相善诗文，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并称为“前七子”。他博学好论，认为孔丘的正统儒学，自孟轲始即渗入异端，故对孟轲以下诸儒均加以论驳，而对宋以来的儒学批驳尤多。他主张“气载乎理，理出于气”，批驳了程朱“理在气先”说。又以思、见、闻、接习(实践)并重，批驳王守仁的“致良知”说。此外，廷相在天文学、音律学、农学诸多方面都有所造诣，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著作有《王氏家藏集》、《奏议集》、《公移联稿》、《覆奏语略》、《归田集》等。

钱德洪致仕　钱德洪(1496—1574)，本名宽，以字行，改字洪甫，学者称绪山先生，余姚人。与王畿同受业于王守仁，为守仁得意弟子之一。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累官刑部郎中。嘉靖二十年九月翊国公郭勋下狱，移部拟罪。他据狱案拟之死罪，忤旨，竟被逮入狱。后罢斥为民。他周游四方，遍历江、浙、楚、广，循王守仁之“心学”，讲学近三十年。穆宗立，复

官，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神宗嗣位，复进一阶。万历二年逝世，终年七十九岁。著有《平濠记》、《绪山会语》、《绪山集》等。

俺答入寇山西 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吉囊、俺答由大同入，肆掠太原诸处。又移兵向南，杀掠人畜以万计，京师戒严。吉囊载所掠人畜出塞，俺答复入，由太原而南至石州(今山西离石)，劫掠人畜财物。世宗命宣大总督樊继祖发兵应援，继祖怯懦，观望不前，俺答遂纵掠而去。

浦鋐杖死 浦鋐(1482—1541)，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洪洞知县。嘉靖初，召为御史。因疏言武定侯郭勋奸贪，宜罢其兵权，忤旨，夺俸三月。以养母归。母丧除，起掌河南道，以人讦其谈论省署得失，坐罢。家居七年，廷臣交荐，起故官，出按陕西，连上四十余疏，总督杨守礼请破格超擢，未报。杨爵下狱，浦鋐驰疏申救。其疏说："臣惟天下治乱，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则忠谏进而化理成；言路塞，则奸谀恣而治道堕。"他认为杨爵"本以论郭勋获罪，今勋奸大露"，杨爵"前言未为悖妄"。疏入，世宗大怒，于嘉靖二十年(1541)十月十六日命锦衣卫逮下诏狱。陕西民人远近奔送，舍车下常万人，皆号呼哭喊："愿还我使君。"鋐入诏狱，搒掠有加，除日复杖之百，锢以铁押。杨爵迎哭，鋐息已绝，徐张目曰："此吾职也，子无然。"七日而卒，隆庆初，赠光禄卿，任一子。

诏罢余盐 盐筴开中，有常股存积，法皆输边，而掣运于运司，其余盐则输运司以售卖，余盐行而存积废。嘉靖二十年(1541)十一月十五日遂命罢余盐。

定京军脱班之罚 嘉靖二十一年(1542)二月二十八日，提督团营成国公朱希忠上言，官军脱班数多，乞行究治。上命下部详议，且云，官军脱班数多，岂独该卫买闲作弊，坐营大小官员纳贿纵放皆袭以为常。既而兵部勘酌旧例，奏请将少军卫所官员查照失额多少按等究治。诏如议行。

停边将养廉田 嘉靖二十一年(1542)二月二十九日，户部核奏宁夏巡抚范鏓疏言，边镇将领，本朝初无给田养廉之制，边镇军余屯田各有课额，亦无盈余可给将领者。自武定侯郭勋奏以田园地土给各将领耕种，委任奸军以为庄头，索取种子牛具，派拨耘锄人工，为害不可胜言。今宁夏镇庄田五顷有余，拨分总兵、参将、游击诸官者，宜仍归军民耕种。诏令，田地属于军余开垦者，依拟给还；塞下遏虏自辟田地，听其耕种。

王府捐助太庙工费 嘉靖二十一年(1542)四月，秦王进银万两、周王及诸宗人进银六千两资助修复太庙工费。

毛伯温申明宪纲 嘉靖二十一年(1542)四月二十七日掌都察院事毛伯温申明宪纲八事：禁酷刑，慎举劾，革骚扰，惩势豪，省繁文，明职守，正士风，备两造。世宗嘉纳，所陈允行。

俺答寇山西 嘉靖二十年(1541)，俺答派遣使者到大同阳和堡求通贡互市，明廷不许。俺答与吉囊遂分兵入犯。兵退后，又派使者至大同，要求通贡互市。大同巡抚龙大有缚其使者，谎称用计擒获，诏磔于市，俺答大怒。遂于嘉靖二十一年夏六月，纠集青台吉，兕剌哈、哈剌汉及大同叛军高怀智、李天章等各领兵数万，分兵入掠朔州，抵广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复从忻、崞以北，屯驻祁县。俺答精兵戴铁浮图，马具铠甲，刀剑锋利，官军望而惮畏，不敢交战。俺答诸路兵遂经朔州破雁门关，并劫掠太原以南地区，京师戒严。

勒大学士夏言闲住 首辅夏言再罢再相，然帝怪其违旨怠慢，恩宠已移。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二日，世宗手谕都察院，开列夏言罪状，言其欲改皇太后慈庆宫为太子东宫府；乘轿西苑；拒不服戴所赐道士巾；罗织郭勋狱；军国重事径自家裁等。七月一日，诏令夏言革职闲住。

俺答杀掠山西 嘉靖二十一年(1542)秋七月，俺答率军越太原南下，列营汾水东西，四出劫掠潞安、平阳诸州县。复返回太原北上，分掠定襄、五台、盂县，自代州出繁峙、灵丘、广昌，由广武出关，徐徐通过大同左卫及阳和塞而去。俺答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出关，先后劫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害男女约二十万人，掠牛马羊豕共二百万，焚毁官军民舍八万余区，蹂踏田禾数十万顷。

张世忠英勇捐躯 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俺答杀掠晋南还至祁县一带。副总兵张世忠自侯城村起营，突袭俺答，并约诸营官军邀击。俺答以三千精兵围杀张世忠，而诸营官军皆闭营不出，不予增援。张世忠下马步战，箭及火药用尽，俺答军四面围杀，张世忠愤呼："我军被围苦战，诸将竟不相援，国宪天刑宁汝逭耶！"复上马督短兵接战，自巳至酉，张世忠力竭，头部中箭而死。部将张宣、张臣痛世忠死，皆力战死。七月十九日诏赠右都督，谥忠愍。

严嵩入阁 嘉靖二十一年(1542)秋八月十六日，礼部尚书严嵩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仍署礼部事。世宗修仙，刻沈水香冠五赐首辅夏言等，夏言以非人臣法服不奉诏，世宗不悦，夏言渐失恩宠。每逢召对，严嵩则头戴其冠，笼以轻纱，世宗于是

亲严嵩而欲罢夏言。严嵩又勾结道士陶仲文进谗言，致使夏言落职闲住。严嵩所撰青词，颇合帝意，遂代夏言入阁。当时严嵩已年过六十，整日在西苑直庐，未尝一归洗沐，世宗以为严嵩勤奋，愈加信任。吏科都给事中沈良才等劾严嵩贪污奸谄，不宜玷命入阁。帝不听。

刘天和致仕 刘天和(1479—1545)，字养和，号松石，湖广麻城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出按陕西，忤中官下诏狱，谪金坛丞。屡迁湖州知府，多惠政。嘉靖初，擢山西提学副使，累迁南京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督甘肃屯政。改抚陕西，请撤镇守中官及罢民患者三十余事。讨平湖店"大盗"及汉中"妖贼"，进右副都御史。黄河南徙，命刘天和总理河道，遂疏浚汴河及山东七十二泉，不三月讫工，改兵部左侍郎，总制三边军务。吉囊入寇凉州、宁夏等处，天和檄镇将击败之。嘉靖十九年(1540)十一月迁南京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嘉靖二十年九月召为兵部尚书提督团营。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言官论其衰老，遂令致仕。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逝世，赠少保，谥庄襄。

刘魁入狱 刘魁，字焕吾，泰和人。正德中登乡荐，受业王守仁门。嘉靖初，谒选，得宝庆府通判。历钧州知州，潮州府同知。所至洁己爱人，扶植风教。入为工部员外郎，疏陈安攘十事，世宗嘉纳。嘉靖二十一年(1542)九月，世宗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国康民雷殿于太液池西，务求宏侈。刘魁知谏争必得重祸，先命家人置买棺材一具，冒死上章。其疏说："顷泰享殿、大高玄殿诸工尚未告竣。内帑所积几何？岁入几何？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国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复为此不经无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后世。"世宗震怒，于九月十六日杖刘魁于廷，锢之诏狱。与御史杨爵，给事中周怡屡濒死，讲诵不辍。系狱四年始释，复追逮就狱，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与杨爵、周怡同释，为编民，寻卒。隆庆初赠恤如制。

壬寅宫变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乘世宗朱厚熜睡乾清宫，用绳套欲勒死世宗。因误将绳结拉成死结，世宗未死。十六名宫女全部被擒。经审讯，事牵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嘉靖二十二年春二月，命将杨金英等押赴市曹凌迟处死，枭首示众。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亦于宫中凌迟处死，各犯族属均处斩，家产抄没入官。因嘉靖二十一年是壬寅年，史称"壬寅宫变"。世宗为遇变未死，于朝天宫建醮七日。事发次日，世宗移居西苑，自是不复回大内。

张瓒逝世 张瓒(1473—1542)，直隶沧州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吏科给事中，累升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总制宣大偏保等处军务。嘉靖十四年(1535)三月升任兵部尚书，屡加阶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张瓒贪庸鬻爵，专结宦官，纤悉必知，得为之备。虽屡被言官弹劾，先后不下数十章，然终不失宠。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逝世，赠太保，谥恭襄。

龙科桑起事 嘉靖二十二年(1542)正月，贵州铜仁平头苗人首领龙子贤、镇筸苗人首领龙科桑等聚众起事，流袭湖广麻阳县等处。朝廷命都御史万镗征讨。

改派盐课 嘉靖二十二年(1543)正月十九日，改派两淮等盐运司盐引共九十万余，计银三十四万余两，贮宣大镇，备调遣客兵支用。

黔国公诉有司更制侵职 嘉靖二十二年(1543)二月十八日，镇守云南黔国公沐朝辅上言，近者地方有司多纷更典制，关臣职守不使与闻，甚者侵及庄田家事，先臣尝以庄田事奏请，奉旨免予查勘。乞申饬诸臣，悉仍其旧。得旨，务循旧规，毋为更变。

段朝用论死 段朝用借丹术结郭勋得幸，授紫府宣忠高士，改羽林卫千户，又改紫府宣忠散人。乘郭勋下狱，胁其奴仆十万金行贿，奴仆不应，则拷掠之死。嘉靖二十二年(1543)二月二十五日下段朝用镇抚司狱，议没其妻子财产，竟死狱中。

户部奏言宣大兵饷 嘉靖二十二年(1543)三月二十日，户部奏，近来宣大三关每遇兵兴，辄归咎粮饷不足。自去年九月至今年春季，已解去客兵银一百七十四万两有余，主兵米二十五万石。乞申饬边臣须大挫敌军，一费永逸，否则将来经费莫知所出。有旨，不得借口粮饷不足，以图脱罪，若再失事，责有所归。

许绅之死 许绅(1478—1543)，字大章，号訔庵，南京人。嘉靖初，供事御药房，受知于世宗，累迁太医院使。历加工部尚书，领太医院事。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宫女杨金英等谋杀世宗，世宗气已绝，许绅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未几，许绅病不起，乃因惧怕世宗不能治愈惊悸所致。嘉靖二十二年六月八日卒，赐少保，谥恭僖，官其一子，恤典有加。

裁革京军冗员 兵部疏奏裁革冗食条例，嘉靖二十二年(1543)六月十五日命兵科给事中杨上林、御史沈越按疏内所列应当存革者清查京卫、京营官军、力士、匠役之冗滥者。经查，奏革外戚指挥使等七十一人，诸卫指挥使等三千六百人，冗军五千人。

占城人贡 嘉靖二十二年(1543)六月,占城王遣使王叔沙不登古鲁来贡。因贡使诉说数为安南侵扰,道阻难归,明廷遣官护送回国。

许赞请戒饬翟銮、严嵩 嘉靖二十二年(1543)六月二十九日,吏部尚书许赞疏言,大学士翟銮、严嵩皆受人嘱托,为之求官,宜加以省戒。世宗庇护二辅臣,反责许赞,并将有关人员削籍、谪戍、下狱。吏科给事中周怡上疏,极论大臣互争,不能率下,此最不祥之事,误国大祸目前立见。且言,陛下日事祷祀而四方之水旱灾伤未能消,岁开纳银之例而府藏未能实,蠲租之令数颁而百姓未能苏,选将练兵之命时下而边境未能宁,内则财力匮竭而百役烦兴,外则夷狄骄横而九边虚耗,此何故也?皆因未有将命之臣耳。疏入,帝责其"谤讪",诏杖之阙下,逮下诏狱,如杨爵例,锢系狱中。

杖杀叶经 叶经(? —1544),字叔明,上虞人。严嵩在礼部时,因受秦、晋二王府宗人袭封重贿,被叶经揭发,故宿恨之。嘉靖二十二年(1543)九月,叶经以巡按山东御史监乡试,试录上,大学士严嵩诬陷策语诽谤君上,以激世宗怒,下礼部参论。礼部尚书张璧畏严嵩势,请逮考试官周𬬮、提调布政使陈儒及叶经。九月十七日,叶经廷杖八十,削籍,创重而卒。自叶经杖死,弹劾严嵩者少有幸免。

朵颜入寇 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月,朵颜入寇昌平县慕田峪,杀守备陈舜。总兵王继祖率兵增援,乃退。

天方偕西域诸国人贡 嘉靖二十二年(1543),天方偕撒马儿罕、吐鲁番、哈密、鲁迷诸国贡马及方物。此后五六年一贡不绝。

置钱粮簿籍 嘉靖二十三年(1544)正月十一日,户部奏准置钱粮簿籍,朝觐官领还,听巡按御史稽考。

造嘉靖通宝钱 嘉靖二十三年(1544)正月二十二日,命工部造嘉靖通宝钱,依照洪武折二当三、当五、当十式各三万文,续解贮库。

祝雄逝世 祝雄(? —1544),辽东人,起家世荫。历都督佥事。自山西副总兵迁镇大同,以代梁震。后被劾解职。起镇蓟州,署都督佥事。善抚士卒,治军严明,率子弟为士卒先。其子少却,行法不贷。世宗书其名御屏。为将三十年,布袍毡笠,不异卒伍。嘉靖二十三年(1544)二月三日卒。即殁,遗资仅供殓具而已。蓟人立祠祀之。

张潮逝世 张潮(1485—1544),字惟信,号亭溪,一号玉洁,内江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编修,官至署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嘉靖二十三年(1544)二月十五日卒于礼闱。有《玉溪稿》。

加派浙江织造 嘉靖二十三年(1544)四月初一,承运库太监任举请加派浙江等处织造段疋,计费三十万两。工部复言,织造地方,累年逋欠甚多,若再加派输纳尤难,宜将此项加派数目分作三年完解。从之。

日本僧寿光称贡 嘉靖二十三年(1544)八月,日本僧人寿光等人来称贡。礼部上疏说:日本例十年一贡,今贡未及期,而且没有日本国王表文和正使,难以凭信,应照例阻回,所贡方物亦由寿光带回。礼部疏议得到世宗批准。然日本货船来中国贸易,大都延期不去,巡按浙江御史高节请治沿海巡视备倭等官故纵之罪。

安平侯方锐奏讨庄田 嘉靖二十三年(1544)八月二十日,安平侯方锐奏讨张家庄等马房地土。户部谓庄地计二千余顷,正赋所出,军储攸赖,乞勿许,查有大慈恩寺入官庄地计二十顷有余,可给与之。诏如议。

翟銮削籍 翟銮(1477—1546),字仲鸣,号石门,其先诸城人,后家京师。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庶吉士。正德初,授编修,进侍读。嘉靖六年(1527),以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入直文渊阁,寻赐银章,曰"清谨学士"。后以忧归,服阕,久不召用。嘉靖十八年二月,改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诸边文武将吏咸受节制。明春正月,翟銮回京,命以原官入阁。嘉靖二十一年,銮为内阁首辅,进少傅、谨身殿大学士。严嵩入阁后,恨翟銮资历在其上,暗使言官劾翟銮子汝俭、汝孝与其师崔奇勋所亲焦清同举二十三年进士有弊,会御史赵大佑劾銮私同年,吏部尚书许赞亦发其请属私书,世宗怒,下吏部、都察院。翟銮上疏辨解,帝益怒,说:"二子纵有才,何至与其师并进?"遂于嘉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斥翟銮父子、崔奇勋、焦清及分考官彭凤、欧阳唤为民,主考少詹事江汝璧及乡试主考谕德秦鸣夏等入诏狱,杖六十削籍。銮初辅政,有修洁声,中持服家居,至困顿不能自给。后巡边,馈遗不赀,归装千辆,用以遗贵近。得再柄政,声誉顿衰。削籍三年卒,年七十。隆庆初复官,谥文懿。

徐养正疏陈马政六事 嘉靖二十三年(1544)九月六日,给事中徐养正上马政六事:禁驮载,革占用,练军实,择统领,严赏罚,重操练。议行之。

许赞、张璧入阁 嘉靖二十三年(1544)九月十一日,吏部尚书许赞兼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张璧兼东阁大学士,然皆不入西苑侍直,首辅严嵩事取独断,不复相关白。许赞等默默叹曰:何必夺我吏部,

使我旁睨人？

潘鉴逝世　潘鉴(1482—1544)，字希古，婺源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南京大理寺评事，累升四川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升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督采大木，升右都御史工部尚书，再起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嘉靖二十三年(1544)九月十一日逝世，赠太子太保，谥襄毅。有《潘襄毅公文集》。

俺答人侵完县　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月，俺答自万全右卫毁边墙入侵，掠蔚州，直抵完县，京师告急戒严。总督宣大兵部尚书翟鹏，巡抚蓟镇都御史朱方以逗留致震京畿罪入狱。翟鹏永戍边卫，朱方杖死。

毛伯温削籍　毛伯温(1482—1545)，字汝厉，号东塘，吉水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绍兴府推官。擢御史，巡按福建、河南。世宗即位，迁大理寺丞。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后改理院事，进左副都御史。嘉靖十六年(1537)春二月，议发兵征讨安南莫登庸，诏起为右都御史，与咸宁侯仇鸾治兵待命。五月，伯温至京，奏上两广总督侍郎张经用兵方略。会安南世孙黎宁遣使请兴师复仇，世宗疑其不实，命暂缓进讨，伯温协理院事。其冬迁工部尚书。嘉靖十八年春，诏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寻加兼太子宾客。大同所辖镇边、镇川、弘赐、镇河、镇虏五堡，相距二百余里，伯温募军三千防守，给以闲田，永除其赋。以功加太子少保。闰七月，复命毛伯温、仇鸾南征安南。伯温至广西，会总督张经、总兵官安远侯柳珣等征两广、福建、湖广狼土官兵十二万五千余人，分路而进。嘉靖十九年秋，伯温进驻南宁，传檄安南莫登庸归命，待以不死。莫登庸于镇南关献土地军民图籍，愿奉正朔，永为藩臣。毛伯温纳其图籍，奏闻于朝。嘉靖二十年四月，诏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莫登庸为都统使。嘉靖二十一年正月毛伯温还朝，以功加太子太保。嘉靖二十三年十月，俺答军逼畿辅，伯温削籍。嘉靖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疽发背卒。天启初，追谥襄懋。有《东塘集》。

叛人王三伏诛　王三，故大同左卫指挥王铎之子，杀死母亲、妻子，北逃俺答，为之向导。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月随俺答部众至水地庄，被擒。献俘于朝，十月二十四日被磔斩。

醮斋谢玄　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一月五日，宣谕礼部，叛人王三被擒，皆因祷玄修仙之功，即设醮坛谢上帝，秉一真人礼部尚书陶仲文加少师。自此南北告捷俱行谢玄礼。

张邦奇逝世　张邦奇(1483—1544)，字常甫，号甬川，别号兀涯，浙江鄞人。年十五，作《易解》及《释国语》。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检讨。出为湖广提学副使。嘉靖初，提学四川，迁南京祭酒，以身为教，学规整肃。改南京礼部右侍郎。改掌翰林院事，充日讲官，加太子宾客，改掌詹事府事进礼部尚书，改南京吏部尚书，又改南京兵部尚书。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一月七日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邦奇之学宗程朱，与王守仁友善。著述甚富，有《学庸传》、《五经说》、《兀涯两汉书议》等。

辑录御制文集诸书成　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月十一日，辑录本朝太祖、成祖、列宗御制文集及圣学心法、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二十一史等典籍完成。

朝鲜讣告国王丧　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月二十七日，朝鲜摄国事李峼，以国王李娎丧来讣，赐谥恭僖。

戴金致仕　戴金(1484—1548)，字纯甫，号龙山，湖广汉阳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历官内外三十年，有治才，以巡盐采木称旨，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月进兵部尚书。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十一日为言官论劾，致仕去。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七日病卒。有《三难轩质正》。

诏严禁奢靡　先是，礼科给事中查秉彝上言，近来风俗浸侈，都城为最，职官则舆马无制，贵戚则第宅服用无章，士庶则冠婚丧祭宴会之礼逾式，家蓄技巧之功，市列慢藏之贿，转相慕效，渐以成俗，又攘窃恣行，磔人取财，而不为忌。臣常因事而求其故，则始于世禄之家好作无益，崇尚虚靡，以荡民心，四方罢闲无籍之徒，聚党游食，变乱黑白，以愚黔首，此诚败伦圮教之端，薮奸诲淫之地也。嘉靖二十四年(1545)闰正月二十六日，礼部核奏如议，上命严禁奢靡。

续纂大明会典　嘉靖二十四年(1545)闰正月三十日，诏续修大明会典，大学士严嵩、许赞、张璧为总裁官。此前已修至嘉靖七年，今自八年起至嘉靖二十三年止，一应事宜，续予纂辑，以成全书。

诏流民复业　嘉靖二十四年(1545)二月十五日，诏有司招抚流民复业，予牛种，开垦闲田者免赋十年。

周金致仕　周金(1473—1546)，字子庚，号约庵，武进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工科给事中，累迁户科都给事中。疏言裁汰冗食、罢中官横索、当诛马昂。言词恳切。嘉靖元年(1522)由太仆寺少卿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改抚宣府，进右副都御史，再改巡保定。后迁兵部右侍郎，不久，进右都御史总理粮

储，兼抚凤阳诸府，升左都都御史。嘉靖二十年六月迁南京刑部尚书。次年二月改南京户部尚书。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致仕，次年八月初八日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谥襄敏。有《上谷稿》、《榆阳稿》。

何维柏人狱 嘉靖二十四年(1545)五月四日，御史何维柏弹劾首辅严嵩奸邪，宜罢。世宗慰留严嵩而逮何维柏。同月，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薛应旂亦因得罪严嵩而谪官。

楚王世子朱英燿弑父伏诛 朱英燿，楚王朱显榕之世子，性淫恶，与父争妓，纳之别馆，楚王欲罪其卒，英燿遂谋弑父。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月，元宵酒宴，使力士以铜爪杀楚王，英燿又以铜鞭鞭其尸，然后以中风死上奏。楚王侍从破门而出，告发英燿弑父事，巡按官奏闻。世宗命驸马都尉邬景和勘实，逮系英燿入京。五月二十二日告太庙，处以分尸极刑，又焚尸扬灰。护军徐景荣等三十六人被磔，长史孙立等被斩。

翟鹏死于狱 翟鹏(1481—1545)，字志南，号联峰，抚宁卫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除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为卫辉知府，调开封。擢陕西副使，进按察使，性刚介，历官以清操闻。嘉靖七年(1528)，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嘉靖二十年八月，俺答入犯山西内地，起故官，整饬畿辅、山西、河南军务兼督饷。明年三月，除兵部右侍郎。因连乞兵饷，革职闲住。七月，俺答复掠山西，乃起故官，兼督山东、河南军务。修边墙三百九十余里，新增墩二百九十二座，护墩堡十四座，建营舍一千五百余间，得地一万四千九百余顷，募军一千五百人，人给五十亩，省边储甚多。嘉靖二十三年三月，俺答寇宣府龙门所，翟鹏督兵却之，进兵部尚书。十月，俺答又寇膳房堡，毁万全右卫边墙而入，京师戒严。十一月，御史杨本深疏劾翟鹏逗留，下诏狱，坐永戍。行至河西务，复逮至京，嘉靖二十四年六月七日死于狱。

重定优免则例 嘉靖二十四年(1545)六月十日修定职官优免徭役则例。其制：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粮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粮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粮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粮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粮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粮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各减一半；举人、监生、诸生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以礼致仕者免其十分之七，闲住者免其一半。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之例。

发银市马 嘉靖二十四年(1545)六月二十八日，发太仆寺银十四点四万两，于直隶、河南、山东买马。

张璧逝世 张璧(1475—1545)，字崇象，号阳峰，石首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编修，进侍讲。嘉靖初，起太常寺卿兼学士署院事，进礼部侍郎、南京礼部尚书。嘉靖二十二年(1543)二月入为礼部尚书，次年九月入阁，辅政无所闻。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逝世，赠少保，谥文简。有《阳峰家藏集》。

俺答犯延绥 嘉靖二十四年(1545)秋八月，俺答犯延绥及大同，于松子岭杀守备张文瀚。犯大同时，参将张凤、指挥刘钦、千户李瓒、生员王邦直等皆战死。时总督侍郎翁万达、总兵周尚文备兵阳和关，俺答始退。

查秉彝条议宗藩六事 嘉靖二十四(1545)十月五日，给事中查秉彝条陈宗藩事宜：一，议封禄，河南、山东、山西王府禄粮，多于国初已数十倍，今当速图善后之策。二，重恩典。三，肃阃教。四，杜交结，国初分封，除一二远藩之外，不给庄田，今土豪投献，群小勾结，王庄之田在在有之，白莲、弥勒之教盛行民间，皆诈称田庄佃仆，宜严禁之。五，饬藩度，今地方官员与诸宗郡王以下筐篚相馈遗，饮食相缀接，狎昵成风，宜以法责之。六，择王官。疏入，世宗允行。

许赞闲住 许赞(1473—1548)，字廷美，号松皋，河南灵宝人，前吏部尚书许进之子，弘治九年(1496)进士。历官大名府推官，御史，编修，临淄知县，浙江佥事。历升光禄寺卿，刑部侍郎。嘉靖八年(1529)进刑部尚书，改户部尚书，嘉靖十五年进吏部尚书。加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嘉靖二十三年九月入阁，兼文渊阁大学士。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引疾乞休，忤旨，落职闲住。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卒。后赠少师，谥文简。许赞，世家子，练习典故，然晚年颇以贿闻。

熊浃削籍 熊浃(1478—1554)，字悦之，号北原，江西南昌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礼科给事中。宁王宸濠将叛，密奏发之。出核松潘边饷，副总兵张杰倚江彬之势，累赃巨万，滥杀启衅，致死千户以下至五百余人。熊浃尽发其状，张杰褫职。嘉靖初，由给事中出为河南参议。嘉靖六年(1527)，召修《明伦大典》，超擢右佥都御史，协理院事。明年四月，迁大理寺卿，寻迁右副都御史。书成，转左副都御史。嘉靖八年二月，遂擢右都御史，掌院事。因断狱与东厂意相违，帝罪其忤旨，削籍家居。嘉靖十八年七月召为南京礼部尚书，改兵部，参赞机务。嘉靖二十一年召为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二十三年九月代许赞为吏部尚书。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加太子太保。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因谏帝于禁中筑乩仙台，用仙箕语决威福，

削职为民，遣官校押送回里。时严嵩擅柄，诸曹受请嘱如外府，独熊浃不肯行。嘉靖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七。隆庆初赠少保，谥恭肃。

夏言复官 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十九日，夏言复官，仍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入朝，为首辅。位在严嵩之上，盛气凌之，严嵩心恨甚。

吐鲁番人贡 嘉靖二十四年(1545)，吐鲁番满速儿死，其长子沙嗣为速檀。其弟马黑麻亦称速檀，分据哈密。兄弟相互仇杀。马黑麻结婚瓦剌，与其兄相抗争，并垦田沙州，势力渐强。马黑麻叩关求贡，要求移居内地。边臣不许，乃还故土。总督张珩奏闻，诏许其入贡。嘉靖二十六年，定吐鲁番五岁一贡。终世宗朝，土鲁番虽按期入贡，但贡使人数却日渐增多。至嘉靖末，番文至二百四十八道之多。明廷不问，咸为给赐。

设置岷州 嘉靖二十四年(1545)设岷州，隶陕西巩昌府。岷州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处，洪武时设卫治之，俾稍供徭役。自是年设州后，征发徭役繁重，土著人困敝，且恋世官，流官又不乐居其地。十余年后，经都抚合疏上奏，又改卫如故。

那鉴杀那宪 嘉靖二十五年(1546)正月，云南元江军民府土舍那鉴杀其侄土官知府那宪，夺府印，并收缴因远驿印记。巡抚应大猷奏闻，命镇巡官发兵围剿那鉴。

修筑大同长城 嘉靖二十五年(1546)二月二日，总督翁万达与巡抚詹荣奏议：今堡塞虽备，而外拒必得长城，长城必有台、屋、堡、暗门。自阳和至宣府李信屯旧无城，自丫角山至阳和旧有堑，或城而不固。于是议通筑，补故创新，凡三百余里。

孔闻韶卒 嘉靖二十五年(1546)二月十一日，衍圣公孔闻韶卒，其子孔贞干嗣袭。

四川“白草番”起事 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月，四川“白草番”起事。世宗命何卿充总兵官，至松潘征讨。何卿与巡抚张时彻捕获起事首领，俘斩千余人，攻占四十余寨，捣毁“番人”碉房，缴获大量牛马器械。嘉靖二十六年四月，起事始平。

唐龙削籍 唐龙(1477—1546)，字虞佐，号渔石，浙江兰溪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知县，拜监察御史，累迁副都御史协管院事，擢吏部侍郎，晋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总督三边兼理赈济，改刑部尚书，乞终养，归数年，起南京刑部。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月改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该年十二月晋吏部尚书。嘉靖二十五年七月五日，遭言路参劾，疏陈老病，乞休求去，世宗怒其称老忘君，命削职为民，出都门三十里而卒。后其子修撰唐汝楫奏明父不欺君，诏复原官，赠少保，谥文襄。唐龙学优行端，一时称为才臣。有《渔石集》。

禁治僧徒聚众 嘉靖二十五年(1546)七月八日，礼科给事中李文进上言，近年京师宣武门外天宁寺中，广聚僧徒，辄建坛场，受戒设法，拥以盖舆，导以鼓吹，四方缁衣集至万人，昼聚夜散，男女混淆，甚至有逋罪黥徒因缘为奸，故四月以来，京师内外盗贼窃发，辇毂之下岂应有此。又富民豪族朋连党结，倡为外护，愚民无知，破财竭产，争先布施，大者基乱，小者导侈，皆非细故。疏入得旨，奏内通法师及寺主俱令锦衣卫捕系鞠问，余下礼部禁治。

王杲条陈财用十事 嘉靖二十五年(1546)七月十三日，户部尚书王杲上言，天下财赋日以灾伤告减，而岁用粮饷又视往昔倍之，供应不继，深为可虞，乃条陈制财用十事。奏入得旨，漕粮岁输四百万石，悉征本色，乃国家旧规，如何节年任意减折过半？太仓库银，累朝旧积，迩年多因边臣额外奏讨，支费无经，不闻有所节缩稽查，以致仓帑虚耗，岁用不敷，将来益匮，咎将谁执？疏内收复山场湖陂官税，属各王府为业已定者，其勿扰夺；旷役工食亦免追，余俱如议行。

停诸司封奏 嘉靖二十五年(1546)七月，以醴泉出承华殿，廷臣表贺，停诸司封事二十日。嗣后，庆贺斋祀悉停封奏。

加封道士 嘉靖二十五年(1546)八月九日，加封真人陶仲文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掌道教事。工部带俸尚书盛端明、顾可学皆因烧炼仙丹之功加为礼部尚书。

进十眼铜炮 嘉靖二十五年(1546)十月十三日，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张铎进献十眼铜铳炮，大弹可射七百步，小弹可射八百步；四眼铁枪，弹可射四百步，皆足以陷阵摧锋。诏工部如式制造。

俺答寇延安 嘉靖二十五年(1546)四月，俺答率十万骑寇陕西延安、庆阳。总督三边军务曾铣率兵驻扎陕西安塞县北的塞门，派遣参将李珍至榆林县北马梁山捣毁俺答大营，俺答始退兵。五月，俺答款大同塞，边将杀其使。六月，犯宣府，千户汪洪战死。七月，鞑靼军三万余骑又犯延安府，至三原、泾阳，肆意杀掠。九月，犯宁夏。十月，犯清平堡，游击高极战死。

疏请洮河西宁茶马司以茶易银 嘉靖二十五年(1546)十一月十四日，巡按陕西监察御史胡彦奏洮(洮州)、河(河州)、西宁三茶马司，茶斤堆积年久，不堪易马，宜从速估议减价，或量支各军折色，其浥

烂不堪给军者，将三卫寄养茶马人户量加分赏，以资困穷。得旨，茶马乃西边重事，何节年浥烂至十数万计，减价易银并分赏俱允行，不为例。

开甘肃河西屯田 嘉靖二十五年(1546)十一月二十八日，户部议复巡抚甘肃都御史杨博所奏屯田事宜，提出经略河西，莫先于兴复屯田，请令边臣召民垦辟，永不征赋；其故尝征赋而荒芜者，许佃种，一体蠲免。抛荒地土，任民开垦，永不起科；原系起科而荒芜者，蠲赋十年。

曾铣议复河套 俺答据河套，屡为边患。嘉靖二十五年(1546)四月，命巡抚山西兵部右侍郎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该年十二月十七日曾铣上《请复河套疏》。条为八议：一、定庙谟；二、立纲纪；三、审机宜；四、选将材；五、任贤能；六、足刍饷；七、明赏罚；八、修长技。此疏长达万言，指据明悉。世宗命下兵部议行。

曾铣奏修边墙 嘉靖二十五年(1546)十二月十七日，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又与巡抚谢兰、张问行等奏请修筑边墙。自定边营起，东至龙州堡，长四百四十余里，为西段；自龙州堡而东，至双山堡，长四百九十余里，为中段；自双山堡而东至黄甫川，长五百九十余里，为东段，以三年竣工。世宗命兵部发银三十万两，供修边、饷兵、造器之用。

田斌起义 田斌，明中叶山东农民起义军首领，汶上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他与妻连氏、僧惠金等，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起义军转战曹(今山东菏泽)、濮(今河南范县西南)、单(今山东单县)、滕(今山东滕县)诸州县，南及归德(今河南商丘县)、徐州、凤阳一带。后为治河都御史鲁瀚镇压，田斌及连氏等均被俘遇害。

宋景逝世 宋景(？—1546)，字以贤，江西奉新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睢州知州，改御史，累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还理院事，升刑部左右侍郎，南京工、吏、兵三部尚书。嘉靖二十五年(1546)七月，改任左都御史，次年正月七日逝世。赐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

周用逝世 周用(1476—1547)，字行之，号伯川，南直隶吴江县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由行人选授南京给事中，累迁副都御史提督南赣汀漳军务，入佐院事，进吏部左右侍郎，调南京刑部，历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南京刑、工二部尚书，以灾异免官，里居十年。起为工部尚书，治河，寻兼右都御史总督漕务。嘉靖二十三年(1543)十月，进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嘉靖二十五年七月迁吏部尚书。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逝世。赐太子太保，谥恭肃。有《周恭肃集》。

发银织造 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三日，发南京工部银一万七千四百余两，给付机房织造。

选宫女 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十九日，帝宣谕内阁，朕宫中应役数少，虽有宫女近千，中宫妃御所用不足，又多老疾，将来二子、四女之国出府，王用三十余，公主二十余，此祖制也。不预教数年，何以取用？卿等会寀(礼部尚书费寀)计闻。礼部奉旨，奏请差官于畿内选女子年十一以上，十四以下者三百人。

翁万达条议边防修守事宜 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十九日，总督宣大山西都御史翁万达奉诏会同三镇抚镇官议上边防修守事宜。定规划、度工费，修边之事也；慎防秋，并兵力，重责成，量征调，实边堡，明出塞，计供亿，节财用，守边之事也。得旨，俱如拟行。

曾铣出击告捷 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总督曾铣率兵出塞，突袭河套鞑靼军，斩二十七级，生擒一人，获牛马橐驼九百五十四，器械八百五十三件，又督军驱之，"虏遂远徙，不复近塞。"五月，捷闻于朝，世宗以河套部连年入寇，如踏无人之境，大损国威，曾铣率兵出塞，擒斩有功，命增俸，赐予白金文绮。

佛郎机海盗入侵漳州 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佛郎机海盗贿买海道副使姚翔凤和浯屿(今福建金门岛)水寨把总指挥佥事丁桐等人，然后入福建漳州，大肆劫掠。

何卿镇守松潘 嘉靖五年(1526)，何卿以都督佥事镇守松潘，在镇十七年，松潘以宁。二十三年，以北警召何卿入卫，以李爵、高冈凤相代，未几，皆为巡抚劾罢。嘉靖二十六年，四川"白草番"起事，复命何卿镇守，同年四月讨平。

俺答求贡 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俺答诣边陈款，要求通贡互市。总督侍郎翁万达上疏请许开市通贡。兵部议复，"虏节年侵犯，九边横被其毒"，"岂可轻信，以堕虏计"。四月二十八日有旨，不得"听信求贡诡言"。其时首辅夏言主张收复河套，故力绌贡议。

佛郎机海盗劫掠浙江 嘉靖二十六年(1547)六月十一日，佛郎机海盗驾大船八只，哨船一只，入浙江境劫掠。攻七都沙头澳，劫掠居民二十余家，后往崙山抛泊。

复设巡抚浙江兼辖福兴泉漳提督军务 倭患渐重，嘉靖二十六年(1547)六月二十四日，复设巡抚浙江兼辖福建福兴、泉州、漳州提督军务。七月，以巡

抚南赣汀漳提督军务右副都御史朱纨改任此职。

郑王朱厚烷疏议宗藩事宜 嘉靖二十六年(1547)六月二十九日,郑王朱厚烷上言,各宗室赴京奏事,亦非得已,有十岁而未起名者,有终身未嫁娶者,宗子之家益盛,支子之家愈穷。宗室犯罪,祖宗定制,纵有大过,亦不加刑。宗室有犯,不必参究辅导、禁戒下人,就将所统亲王或郡王量罚禄米,以示惩创。礼部议如其奏。

度道士 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二十三日,从秉一真人陶仲文之请,度天下道士二万四千人。八月,授陶仲文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大学士俸,荫子尚宝司丞。

孙继鲁死于狱 孙继鲁(1498—1547),字道甫,号松山,云南右卫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泮州知州。历户部郎中,监通州仓。历知卫辉、淮安二府。因违抗宦官被逮,民卧车辙死数人。改补黎平,清白益著。擢湖广提学副使,进山西参政。数绳宗藩,迁按察使,宗藩百余人拥马,发其装,敝衣外无长物,乃载酒谢过。迁陕西右布政使。嘉靖二十六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四月,因议边备与翁万达相争,被逮下诏狱,九月十六日疽发项而死。讣闻,山西数百人哭于京。隆庆初,赠兵部右侍郎,谥清愍。

两淮盐课贪污案 给事中马锡劾户部尚书王杲、巡仓御史艾朴私受两淮盐运司解银官贿赂,而命管库员外郎余善继收纳低色劣质银两。嘉靖二十六年(1547)九月二十日,诏令逮王杲、艾朴下镇抚司狱追问,王杲极陈冤屈。与此同时,给事中厉汝进、查秉彝、徐养正、刘起宗、刘禄等则上言,此罪乃由署盐运副使张禄贿通大学士严嵩之子太常寺少卿严世蕃所致,宜尽法穷治。严嵩上疏自辩,谓厉汝进等人欲借其子对其"巧诋"、"污蔑"。世宗遂命锦衣卫逮系厉汝进等至阙下,厉汝进杖八十,其他四人杖六十,俱降谪边远杂职。王杲、艾朴发边卫充军,王杲死于戍所,公论以为冤枉。据法司奏禀,确系张禄作弊侵银,其成色不足低银计亏折一千三百七十两。

陆炳被劾 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月十二日,御史陈其学劾锦衣卫都督同知陆炳私盐请托、自立钱法等罪,诏户部会议。陆炳急,向首辅夏言长跪求救,事乃解,仍供职如故。但自此遂与严嵩相结,密谋倾陷夏言,而夏言不悟。

日本贡使周良朝贡 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日本国王源义晴派遣正使周良率六百余人,驾大船百余艘至宁波,要求进京朝贡。巡抚朱纨奏闻。礼部认为,旧例以十年为贡期,来者不得过百人,船不得过三艘,宜以违例却之。经朱纨与礼部反复商议,最后议定:送日本使者五十人进京,其馀留驻宁波原市舶提举司嘉宾馆,按旧例百人以上,量加犒赏。周良等至北京,明廷赏赉如制,并以白银、锦绮报赐日本国王及王妃。

曾铣论复河套十八事 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三十日,总督曾铣会同陕西巡抚谢兰、延绥巡抚杨守谦、宁夏巡抚王邦瑞及三镇总兵会议收复河套方略。会后条列十八事奏闻。十八事是:恢复河套,修筑边墙,选择将材,选练士卒,买补马羸,进兵机宜,转运粮饷,申明赏罚,兼备舟车,多置火器,招降用间,审度时势,防守河套,营田储蓄,以及明职守,息讹言,宽文法,处孽畜。同时上报《营阵八图》,即:立营总图,遇敌驻战,选锋车战,骑兵迎战,步兵搏战,行营进攻,变营长驱,获功收兵。世宗览奏嘉之,并命兵部会议。兵部尚书王以旂会廷臣集议,认为曾铣等复河套之议"俱可施行"。世宗乃命兵部"会同多官,协忠抒谋,以图廓清。"

仇鸾下狱 甘肃总兵官咸宁侯仇鸾贪虐,不听调遣,被三边总督曾铣弹劾,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二月十四日,诏逮仇鸾下锦衣狱。

定西域诸部贡制 嘉靖二十六年(1547),西域诸部入贡。甘肃巡抚杨博上疏说:"西域入贡人多,宜为限制。"礼官遂依明初故事,定哈密每年一贡,贡三百人,送十一人入京,馀留关内,有司供给;哈烈、哈三、吐鲁番、撒马儿罕诸国,道经哈密者,或三年、五年一贡,止送三五十人入京,其余存留如哈密例。滥放进京者罪之。

诏罢复套 嘉靖二十七年(1548)正月初六,世宗忽宣谕,收复河套"师出果有名否?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成功可必否? 一铣(曾铣)何足言,只恐百姓受亡辜之戮耳。"大学士严嵩窥帝意已变,仍逢迎上奏,"河套必不可复,"并诿罪于夏言,说廷臣皆知复套之谬,只是"有所畏耳"。世宗降旨云,夏言私荐曾铣,不顾国家安危,民人生死。夏言惶惧,上疏申辩。世宗责其"强君胁众",命议其罪。严嵩力诋夏言擅权。世宗下诏停罢复套,锦衣卫速逮曾铣来京,科道言官皆以袖视不纠之罪廷杖、夺俸四月,兵部尚书王以旂改督三边。

夏言罢官 嘉靖二十七年(1548)正月初六,世宗入严嵩谗言,令首辅夏言以尚书致仕,余官尽夺。夏言于青词贺表,日渐倦怠,多以旧稿敷衍应命,帝每怒掷于地,宠眷渐失。严嵩闻之,益精治其事,且贿结近侍太监,宠信日增。复套议起,帝忽中变,严嵩趁机阴诋夏言,以激帝怒,夏言遂败。

仇鸾诬奏曾铣 嘉靖二十七年(1548)正月二

十九日，咸宁侯仇鸾诬奏曾铣贿赂夏言，饰罪复套。盖严嵩欲深文夏言之罪，乃代仇鸾草拟此疏。

曾铣被杀　曾铣(？—1548)，字子重，号石塘，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果锐有机略。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长乐(今福建长乐)知县。征为御史，巡按辽东，平息兵变，时论以为才。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因请筑临清外城，进副都御史。改巡抚山西，以功进兵部侍郎。嘉靖二十五年，以巡抚山西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他多次上疏议复河套，请筑边墙以御蒙古，均为权臣严嵩所阻。严嵩又伙同仇鸾及锦衣卫都督同知陆炳诬其克扣军饷、贿赂交结大臣。嘉靖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以"交结近侍官员"罪被斩京城西市，妻子流三千里。其死不当罪，天下闻而冤之，自后以议河套为讳。

朱纨攻破双屿　通倭海盗首领金子老、李光头、许栋、王直等据浙江宁波之双屿港，东南为患。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巡抚浙江兼福建海道右副都御史朱纨督兵攻破双屿，倭寇逃遁。王直据烈港，又吞并横港陈思之盼众，由是海上之寇悉受王直节制。朱纨又遣分巡副使柯乔出海，捣灵官澳，大破之，擒头领三人，倭军六十人。

山东蓬莱、登州近海地震　嘉靖二十七年(1548)八月十二日未时，山东宁海州(今烟台市)地大震，坏民房舍，夜间复震，登州府近海尤甚。登州府城崩，毁民庐无数。登州府所属蓬莱、黄县、福山、栖霞、招远、莱阳、文登等县亦大震，城塌屋坍者甚众。此次地震覆盖面很广，如滨州、利津、益都、高苑；京师顺义、文安、大城、成安、丰润、抚宁、昌黎以及朝鲜国的平壤、顺安、尤岗，海州、汉城、安城等地都受到波及。震中地区在近海，震级(M)为7级。

究治曾铣部将　嘉靖二十七年(1548)九月九日，诏治曾铣同党，参将李珍及指挥田世威、郭震皆被逮下狱，并连及巡抚谢兰、张问行，御史盛唐，副总兵李琦，皆斥罚。酷刑拷李珍，令其招供曾铣克扣军饷行赂事，几死，李珍终不承认。后论李珍死，田世威、郭震谪戍。李珍，坐事失官，为曾铣从徒中录用，积战功至参将。曾铣死后，俺答数入寇，世宗卒不悟，甚至说："此铣欲开边，故行报复耳。"

闻渊疏陈吏治　嘉靖二十七年(1548)九月二十日，吏部尚书闻渊陈言吏治七事：一，严考核；二，公举劾；三，慎录荫；四，重差遣；五，广收录；六，议勘合；七，处吏役。诏俱允行。既而吏部查奏，在京官员往往私营便差，枉道回籍，各差官员共七十人，其不当差而借差者二十四人；自有职业而营求差遣者七人；虽当差而违限者三十七人；差已竣事而日久未回任者三人。疏入，各予处罚。

诏乡官不得论劾本处有司　嘉靖二十七年(1548)九月二十二日，诏以后凡乡官不许论劾本处有司，著为令。

夏言被杀　夏言(1482—1548)，字公谨，号桂洲，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兵科给事中。世宗即位，疏谏革除弊政，奉诏核汰京军冗员，出按庄田，悉夺还民产。夏言警敏豪迈，劾贪鄙不畏权贵，救被诬不避嫌疑。嘉靖十年(1531)迁礼部尚书。嘉靖十五年，进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嘉靖十八年，升首辅，累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后遭大学士严嵩嫉妒诬陷，终以赞决陕西总督曾铣议复河套事而败。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夺官阶，以尚书致仕。四月，下镇抚司狱。十月初二，被杀于京师西市，年六十七岁。妻苏氏流放广西，侄礼部主事夏克承、侄孙尚宝司丞夏朝庆削籍。天下厌恶郭勋、严嵩，故多惜夏言。隆庆初，复原官，谥文愍。有《南宫奏稿》、《赐闻堂稿》、《桂洲集》等。

费寀逝世　费寀(1483—1548)，字子和，号钟石，江西铅山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嘉靖时历官左赞善，南尚宝司卿，左庶子兼侍读掌南翰林院事，累升礼部侍郎兼学士掌院事，进礼部尚书，加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二月十三日卒于官，赠太保，谥文通。有《费文通集》。

盛端明致仕　盛端明(1470—1550)，字希道，号程斋，饶平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历官中外，颇有声。晚年因进修仙方术而宠显，献《摄生集要》、《万年金鉴录》、《永寿真铨》等书，加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虽汲汲引退，然终为士论所不齿。嘉靖二十八年(1549)正月二十四日致仕，次年七月卒，赠太子太保，谥荣简。隆庆初年夺官。

俺答大举入寇　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俺答大举入侵大同，直抵怀来。指挥江瀚、董旸迎战，力竭无援而亡。总兵周尚文率兵万人，追杀至曹家庄，大败俺答。宣府总兵赵国忠又败敌于大滹沱。总督翁万达率精兵增援，俺答败退。

朱纨罢官　朱纨(1493—1550)，字子纯，号秋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历官知州。嘉靖初，累迁至广东布政使。嘉靖二十五年(1546)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安(今大余)、赣州。其时罢市舶，海防废弛，沿海豪族贵姓多与倭寇相通。嘉靖二十六年七月，朱纨改任浙江巡抚兼管福建海防军务。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一举捣毁宁波府双屿港，接着破倭于海上。次年四月败倭于福建诏安，

擒海盗九十六人，皆斩之，并穷治通倭豪右。因朱纨严禁私通外番，故闽浙巨家望族多恨之。闽人巡按御史周亮请改巡抚为巡视，以杀其权。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御史陈九德劾其擅杀，世宗遂遣官按问，削其官职。次年，朱纨含愤服毒自杀，终年五十八岁。自此海防复废，倭患日重。其著作有《茂边纪事》、《甓余集》。

范锪削籍　范锪，字平甫，生卒不详，其先江西乐平人，迁沈阳，遂家焉。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工部主事。迁员外郎。嘉靖三年(1524)，伏阙哭争"大礼"，下狱廷杖。由户部郎中改长芦盐运司同知，迁河南知府。岁大饥，开仓赈济，全活十余万，名由此显，迁两淮盐运使。条上盐政十要。历四川参政，湖广按察使，浙江、河南左、右布政使。嘉靖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起抚河南，召为兵部左侍郎，奉诏经理两关。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兵部尚书赵廷瑞罢，命锪入代，锪以老辞，世宗责其不恭，削籍为民，久之乃卒。隆庆元年复官。

筑大同内外边　嘉靖二十八年(1549)四月二十日，总督翁万达请筑内外边，拟自新宁东路之新宁墩而北至六台子，别为内垣，一百六十九里有余，敌台三百零八，暗门十九，以重卫京师，控带北路。又东路镇南墩与蓟州火焰墩，中空未塞，而镇南而北、而西，亦原未议塞垣，俱宜补筑，以成全险。又请还乘塞之兵。其时，客兵承调，主兵摆边，自夏至冬，聚而不散，劳费数倍，甚觉不堪。故乘塞之客兵及远地主兵，入冬以后可以撤罢，本路土兵则仍其旧。世宗允准。

周尚文逝世　周尚文(1475—1549)，字彦章，西安后卫人。年十六，袭指挥同知。弘治、正德间，屡出塞有功，进指挥使。嘉靖初年，任凉州副总兵，后拜征西将军宁夏总兵官，又镇山西、延绥，俱有战功，进都督同知。嘉靖二十年(1541)召入提督团营听征，进后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镇大同，条上御敌四十余事，修补墙堡七百里，垦田五万顷。与吉囊战墨山，杀其子满罕，大败之，进左都督，又败敌于宣府曹家庄。累加阶至太保兼太子太傅，荫子锦衣世千户。终明之世，总兵官加三公者，惟周尚文一人。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六日病卒，年七十五。周尚文多谋善战，清廉爱士，故战辄胜，为一时名将。然因曾与严嵩父子相抗，故死后恤典为其所阻，至隆庆初，始赠太傅，谥武襄。

沈束下狱　沈束(1514—1581)，字宗安，号梅冈，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除徽州推官，擢礼科给事中。时大学士严嵩擅政。大同总兵官周尚文卒，请恤典。严嵩因周尚文曾劾其子严世蕃骄蹇不法，怀恨在心，遂格不予。嘉靖二十八年(1549)五月十日，沈束上言，"尚文为将，忠义自许。曹家庄之役，奇功也。虽晋秩，未酬勋，宜赠封爵延子孙。"并斥严嵩为"当事之臣，任意予夺，冒滥或倖蒙，忠勤反捐弃，何以鼓士气，激军心?"疏入，严嵩大恚，激世宗怒，杖沈于廷，锢于诏狱。沈束在狱十八年，世宗令狱卒每天奏报沈束语言食息，谓之监帖，或无所得，虽谐语亦以闻。一天，有喜鹊鼓噪于束前，沈束问道："岂有喜及罪人耶?"狱卒奏闻，帝心动，释沈束出狱。隆庆初，复官不赴。万历九年(1581)卒于家。

赵廷瑞逝世　赵廷瑞(1492—1549)，字信臣，号洪洋，直隶开州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给事中，累迁副都御史巡抚陕西，进兵部右侍郎，巡抚如故。改户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饷，改兵部左侍郎。嘉靖二十六年(1547)擢南京户部尚书，未及行，改兵部尚书。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以边功晋太子少保，引疾求去，上疑其畏难避事，令革职闲住。当年六月二日病逝。

户部奏议宣府军饷　嘉靖二十八年(1549)六月六日，户部奏言，宣府官军，国初时三分城守，七分屯种，备操者只三万九千余名；正统以后，撤屯丁为操军；弘治间，增至五万八千余名；正德间，增至六万九千二百余名；今日增至八万四千五百余名。近年，军倍于昔，粮限于额，屯地多荒，塞上粟贵，子粒常蠲，岁派多逋。今查宣府镇岁入粮二十七万三千一百余石，银八十二万二千九百余两，除放折赏俸之外，所余无几。因此折色搭配，甚非得已。若尽放本色，计每年添粮二十一万余石，何以给之。但宜本色、折色通融兼支。从其议。

议决京营事宜　嘉靖二十八年(1549)六月九日，兵科给事中张廷槐疏陈京营坐营等官多营私罔利，掊克诛求，以致行伍渐虚，士马消耗。以前听征兵号十二万，今括为两官厅仅三万六千，且老弱居十分之三，武备废弛，此乃失之择人之过。团营专官之设，似不容已。得旨，仍由兵部尚书兼理，不必增置。其时，给事中张侃亦陈营务四事：一，复重臣；二，久任用；三，慎选补；四，重马政。得旨，各营军少官多，兵部即议查革。兵部议，五军、神机二营，把总官可存者五十九，可革去者三十六。诏如议。

崔元逝世　崔元(1478—1549)，字懋仁，号岱屏，代州人，永康大长公主之夫，封爵至太傅兼太子太傅驸马都尉京山侯。世宗入继帝位，崔元奉金符迎銮于兴王府，故宠眷隆渥，诸勋臣戚畹莫敢比望。嘉靖二十八年(1549)六月十三日逝世，赠左柱国，谥荣恭。

户部议岁征、岁收、岁支、岁储　嘉靖二十八

年(1549)八月二日，户部议复财赋。其时边费浩大，土木屡兴，祷祀频繁，以致帑藏匮竭，海内骚然。成化以前，一岁收入，沛然有余，今则不然。京通仓粮，嘉靖十年以前廪中常有八九年之积，至今所储仅余四年。太仓银库，岁入二百万两，先年一年大约所出一百三十三万两，常余六十七万两。嘉靖八年以前，内库积有四百余万两，外库积有一百余万两。近岁一年大约所出三百四十七万两，较之岁入常多一百四十七万两。年复一年，将至不可措手。请敕诸臣，专意清理，务求节财，每岁年终将一年出纳钱谷修成会计录，内分四项，即岁征，岁收，岁支，岁储，务令简明，进呈御览。得旨允行。

闻渊致仕　闻渊(1480—1563)，字静中，号石塘，鄞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官礼部主事，刑部主事，考功郎中，文选郎中。嘉靖初，进应天府、顺天府尹，累迁南京兵部、刑部侍郎，进南京刑部、吏部尚书。嘉靖二十一年(1542)召为刑部尚书，嘉靖二十六年进吏部尚书，累加太子太保。时严嵩势横，侵夺部权，数以小过夺闻渊俸。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以年七十，请乞致仕，许之。家居十四年卒。赠少保，谥庄简。

詹荣闲住　詹荣(1500—1551)，字仁甫，号角山，山海卫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督饷大同，值兵变，詹荣计擒之，擢光禄寺少卿，再迁太常寺卿。嘉靖二十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逾年，移大同，因功进右副都御史。筑大同边墙一百三十八里，筑堡七所，墩台一百五十四座，召军佃作边地，免其租徭。进兵部右侍郎，署部事。嘉靖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以疾乞休，夺职闲住。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卒。万历中，赠工部尚书。

呈报宗藩人数　宗人府上玉牒，嘉靖二十八年(1549)，亲王至庶人现在一万九千八百九十三人，其阳曲、永和二府及南京齐庶人、建庶人后，不下千人。郡主、县主、郡君、乡君等共九千七百八十二人。

增补《后湖志》　《后湖志》十一卷，赵官编辑于正德八年，万文彩增补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赵官，字惟贤，正德时历官南京户科给事中。万文彩为嘉靖二十七、八年南京户科给事中。全书十一卷。卷一至三为事迹。记述明代后湖沿革、形胜、黄册数目及明代户口、事产等。卷四至十为事例，记载了自洪武以来历代管理黄册官员的奏疏。记述了明统治者通过黄册的编置，达到控制人口、稳定税收、确保差役的用心，记述了黄册制度的发生、发展的经过，反映了明代由盛到衰的变化。卷十一为诗文，描绘了南京玄武湖的胜景。后湖即南京太平门外的玄武湖，是收贮黄册的地方。《后湖志》保存了大量有关黄册制度的贵重资料，是明代黄册制度的专书。

吏部大计　嘉靖二十九年(1550)正月十三日，吏部、督察院考察全国朝觐官员，罢官降职者甚多。其中"年老有疾"副使朱道澜等六名，"罢软"佥事陈瑚等二名，"不谨"布政使王扬等五十名，"贪酷"副使胡汝辅等五名，"才力不及"布政使林应标等二十名，有司并教授等官四千六百余名，诏致仕、罢斥、降调如例。

徐问逝世　徐问(？—1550)，字用中，号养斋，常州武进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历官广平推官，广东布政使，贵州巡抚，至南京户部尚书，所至皆有政绩。后乞休致仕，嘉靖二十九年(1550)正月二十六日卒。有《山堂萃稿》。

户部进呈会计录　嘉靖二十九年(1550)正月二十九日，户部上呈去年会计录，全年共入银三百九十五万七千一百一十六两，共支出银四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二十七两，入不敷出。

琉球子弟人国学　嘉靖二十九年(1550)二月二十二日，琉球贡使来朝贡，携陪臣子五人入国学。

定京师逃户助役银　永乐年间，迁徙浙江、南直隶富民三千户，实京师，充当宛平、大兴二县厢长之役。后来逃亡者众，见役人日少，遂于逃户每人各征银三两助役，厢民便之。嘉靖二十九年(1550)三月七日又议定，逃户故绝者，只行原籍征银二两，未绝者即于本户征银，无复累及他甲。

王学夔致仕　王学夔，生卒不详，字唐卿，号两洲，江西安福县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初任刑部陕西司主事。有政绩，改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值武宗欲南巡，上疏谏阻，引起武宗大怒，被罚跪五日，廷杖几死。嘉靖初年，上疏请裁抑皇亲国戚，又申救言官，升南京太仆寺少卿，再历福建参议、参政等职。后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郧阳，致力于肃靖地方。不久，提督操江，定秦藩、黄艮之变，以功受赏。旋晋升南京大理寺卿，吏部左侍郎，所至皆以廉洁勤劳著称。擢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尚书，四次上疏要求去官归田，不允，迁南京兵部尚书。嘉靖二十九年(1550)三月二十日致仕。万历四年(1576)正月二十三日卒，年九十四，赠太子少保，谥庄简。

王联之狱　嘉靖二十九年(1550)四月，前阳武知县王联殴父、杀人，入狱论死，求解不得。其知世宗喜告讦，乃诬陷河南巡抚胡缵宗迎驾诗中有谤诅君上之语，且将其所恨者副都御史刘隅、给事中鲍道明、御史胡植、冯璋、张治、参政朱鸿渐、知府项乔、贾应春等一百一十人，悉皆构入。世宗命逮胡缵宗等入

狱。刑部尚书刘讱会同法司审理,尽得王联诬罔状,仍判其死罪,而胡缵宗非谤。世宗以刘讱庇护胡缵宗等,乃命革胡缵宗职,杖四十,刘讱亦削籍为民。王联亦以杀人论罪。

俺答寇大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寇大同,毁边墙而入,于沟中埋伏精兵,而以老弱百骑往来诱官军出击。总兵张达轻敌,未及合兵而独率麾下驰击,中伏坠马被杀。副总兵林椿救张达围不克,战死。俺答割其首级而还。事后,逮总督侍郎郭宗皋、巡抚都御史陈耀下狱,郭宗皋谪戍,陈耀杖死。赠张达左都督,林椿都督同知,立祠春秋祭祀。

定县官改调之法 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十日,给事中杨允绳上言,宜剂量政务繁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将郡县分列三等,以为铨除之则,并严禁请托规避。诏从其议。

琼州那燕起事 嘉靖二十八年(1549),琼州黎民那燕聚众四千余人起事。诏发两广官军九千往剿。次年七月,总兵官陈圭、总督欧阳必进督兵剿平之。

仇鸾贿俺答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入犯大同,杀总兵张达,咸宁侯仇鸾贿严嵩之子严世蕃,得起为大同总兵官。八月,俺答、狼台吉复率兵窥视大同,仇鸾惶惧无策。其幕僚时义、侯荣与之谋,重贿俺答,使其寇犯他塞,勿犯大同。俺答受重赂,遗下箭纛为信,遂东犯蓟州。兵部尚书丁汝夔仓皇调边兵一万二千骑,京营兵二万四千骑,分守宣、蓟诸关隘。

庚戌之变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十六日,俺答军由古北口入,大掠怀柔、顺义,至通州扎营白河东,分兵剽掠昌平,杀掠不可胜计。京师戒严,诏各镇勤王。分派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门,急集诸营兵,仅得四五万人,且半为老弱,不能成军。诏城中居民及四方来京应武举者登城御敌。俺答军驻安定门外,围逼都城。勤王兵闻变先后开至,但粮饷不知所出,皆饥疲不任战。时严嵩执政,恐战败无法掩饰,遂命诸将不得出击,以待"寇饱自去"。俺答军在京畿杀掠十多天,然后满载所掠财物、牲畜及人口由古北口徐徐出塞。因是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诸师勤王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庚戌之变"起,大同总兵仇鸾得勤王檄,率大同兵二万骑,驰援京师,驻扎通州河西。保定巡抚副都御史杨守谦率五千骑,延绥副将朱楫以三千骑至,不久,河间、宣府、山西、辽阳援兵共五万余人亦至。世宗益信仇鸾,命其为平虏大将军,诸道兵皆归其统辖,又赐袭衣玉带银两,并赐封记,谕曰:"朕所重唯卿一人,得密启奏进。"

谪赵贞吉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俺答入犯京师,上书乞通贡,语多轻慢。诏百官集议,司业赵贞吉愤言主战,并提出追录周尚文战功,以励边将;释放沈束,以广言路。世宗召其入左顺门,立擢谕德兼监察御史,奉敕宣谕诸军,并给银五万两,犒赏诸军。时严嵩执政,撰敕不令督战,以轻其权,大将军仇鸾亦予刁难。赵贞吉单骑来往诸营,犒赏军士,随即复命。世宗以为贞吉处事漫无区画,徒为周尚文、沈束游说,八月二十五日命廷杖,谪为荔浦典史。

丁汝夔被杀 丁汝夔(? —1550),生座不详,字大章,霑化(今山东沾化西)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改庶吉士。嘉靖初,授礼部主事。因争"大礼"被杖,调吏部。累官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历抚保定、应天,入左副都御史。坐事调湖广参政,后抚河南。历吏部左、右侍郎。嘉靖二十八年(1549),拜兵部尚书兼督团营。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俺答犯宣府,丁汝夔即上言:"寇不得志于宣府,必东趋辽、蓟。"遂请调辽东军赴白马关,保定军赴古北口。俺答军驻大兴州(今北京城西北),去古北口一百七十里,后由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入关城,达密云,转掠怀柔,围顺义城。俺答知保定兵驻城内,遂南下至通州,驻白河东孤山,分掠昌平、三河,犯诸帝陵寝,京师戒严。未几,遂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锋七百骑驻安定门外教场,围都城,分剽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河。时世宗久不视朝,军事无由面白。礼部尚书徐阶固请,乃御奉天殿,不发一词,但命徐阶奉敕谕至午门,集群臣切责而已。丁汝夔以问首辅严嵩,严嵩说:"塞上败或可掩也,失利辇下,帝无不知,谁执其咎?寇饱自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战,诸将亦闭营不出,并以丁汝夔为辞。俺答肆掠无所忌,八日后从容趋白羊口而去。丁汝夔逮系入狱,大窘,求救严嵩,严嵩说:"我在,必不令公死。"但为保全自己,严嵩竟未敢言。八月二十六日,汝夔以守备不设之罪斩于西市,枭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铁岭。汝夔临刑,始悔为严嵩所卖。隆庆初复官。

杨守谦被杀 杨守谦(? —1550),字允亨,号次村,徐州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屯田主事。改职方,历郎中,练习兵计。出为陕西副使,改督学政,拜参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请在偏头、老营堡二所兴举营田,并荐副使张镐为提调,二年后营田大兴,秋获可当籴银十万两,边关谷价减十之五。户部请推行九边。后巡抚延绥,以重赏激劝军士,斩一首升一级,或给白银五十两,兵部著为令。嘉靖二十九

年进副都御史，巡抚保定兼督紫荆诸关。俺答入寇京师，杨守谦率师入援，营崇文门外。诸道兵至，遂移营东直门外。世宗拜仇鸾为大将军，进守谦为兵部右侍郎，协同提督内外军事。仇鸾至东直门观望，斩死人首级报功，守谦孤军逼俺答营，见无后继，不敢战。兵部尚书丁汝夔亦戒其勿轻战。诸军乃以汝夔及守谦为辞，不发一矢。流言传至禁中，世宗大怒。俺答焚毁城外庐舍，火光烛天，诸得幸太监园宅均在于此，他们环泣帝前，称将帅为文臣所制，故寇得至此。世宗怒曰："守谦拥众自全，朕亲降旨趣战，何得以部檄为解？"俺答退兵，坐守谦失误军机之罪，于八月二十六日斩于西市。临刑时，守谦慨然曰："臣以勤王反获罪，谗贼之口实蔽圣聪。皇天后土知臣此心，死何恨？"边陲将士知守谦死，无不流涕。隆庆初，赠兵部尚书，谥恪愍。

贵州铜仁苗人起事 贵州铜仁苗人起事，嘉靖二十九年(1550)九月，总督湖广川贵右都御史张岳督集四川、湖广、贵州三省汉土兵进行围剿，并招抚余众。

置经略蓟镇大臣 嘉靖二十九年(1550)九月五日，命孙襘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提督蓟州军务，节制河间、真定、保定、辽东兵马。

废郑王朱厚烷为庶人 世宗日事斋醮，诸王争遣使进香，独郑王朱厚烷上"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劝以神仙土木为戒，世宗怒下其使者于狱。上《万寿表》，郑王又误失称臣。盟津王之子朱祐橏挟私怨诬告朱厚烷谋反，世宗遣官往讯无征，乃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九月二十二日下诏，以骄慢无礼为由，将朱厚烷废为庶人，幽之凤阳。郑王世子朱载堉，痛父非罪见系，遂在王宫门外筑土室，席藁独处十九年。隆庆初，朱厚烷复爵，载堉始入王宫。

仇鸾总督京营戎政 "庚戌之变"后，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事，上疏力言京营营政弊端，世宗悉纳其言。京营提督太监高忠、成国公朱希忠、遂安伯陈镳遂奏改十二团营为三大营，即：五军、神枢、神机，并设戎政府。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月一日以大将军仇鸾为总督京营戎政，以王邦瑞协理戎政。

征诸道兵入防京师 嘉请二十九年(1550)十月，大将军仇鸾奏请募诸道兵马入卫京师。先以山东、山西、河南诸府兵岁集京师，练备秋防。未几，又选各边镇精锐入卫京师，以京营将分练边兵。各边入京边军每岁共选六万八千人。仇鸾此举，致使边塞空虚，遇警边将不得征集，且使军费陡增，供应浩繁，遗害无穷。

张治逝世 张治(1488—1550)，字文邦，号龙湖，湖广茶陵人，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嘉靖间历官南京吏部侍郎，吏部侍郎，翰林学士掌院事，南京吏部尚书。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晋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召入内阁，加官至太子太保。嘉靖二十九年十月十四日病卒，赠少保，谥文隐。隆庆初改谥文毅，万历初改文肃。张治博闻强识，性亢爽，有气节。世宗崇尚玄修，辅臣皆须供撰青词，张治以此殊不自得，遂郁郁成疾。有《龙湖文集》。

徐学诗削籍 徐学诗，字以言，号龙川，浙江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后，廷臣集议制敌之策。群臣皆以琐细小事应付，惟徐学诗愤然说："大奸柄国，乱之本也。"乃于十月二十一日上疏弹劾首辅严嵩。方士陶仲文密告世宗，说严嵩"孤立尽忠"，遂逮徐学诗下狱，削籍为民。在徐学诗之前，弹劾严嵩获罪的还有叶经、谢瑜、陈绍，皆为上虞人，时称"上虞四谏"。隆庆初起南京通政参议，未之官卒。有《石龙庵诗草》、《龙川诗集》。

兵部论北征方略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一月十日，兵部上北征方略。计为清查各边兵马，老弱缺伍及倒死者，设法补足，以听调遣；广设暗伏，预备军储，务足兵马三月之用；收买马匹；预置火器；大同、宣府二镇积极备战，以图征讨。

平定那鉴 云南元江军民府土舍那鉴杀土知府那宪，惧怕朝廷问罪，乃密约安南武文渊谋乱。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一月，发兵讨平之。

祧仁宗 世宗以其生父兴献帝为睿宗，入太庙。恐后世议祧，欲预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庙。下礼部议，礼部尚书徐阶以"女后无先入庙者"为由抗言，世宗大怒，徐阶遂不敢坚持其说。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一月十三日，命祧仁宗，升祔孝烈皇后于太庙。

富民助边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一月二十一日，从御史杨选所言，宣谕富民助边。有能输粮二千石，或捐银一千两者，官为建坊，以表其宅。如数人合输粮数千石，或捐银千余两者，则共建一坊，以表其里。

监生纳级事例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一月二十一日，户部以边饷不充，又开监生遥授各卫所纳级事例。其中规定：监生历满注选未及一、二年，愿遥授在京七品如光禄寺署丞等官者，纳银五十两，在外七品如布政司都事及州判等官者，纳银三十两。以上各送吏部给札遥授。锦衣卫舍余、小旗校尉、军匠愿纳冠带总旗者，纳银三百两，纳署百户者一千两，署

副千户者一千五百两，署正千户者一千九百两，署指挥佥事者二千二百两。百户并所镇抚愿纳署副千户者银七百两，署正千户者九百两，署指挥佥事一千八百两。副千户愿纳署指挥佥事者银一千三百两，正千户愿纳署指挥佥事者银一千二百两。以上送兵部奏请填注，本卫所衙门管事俱照所署职关支月俸。

核查南京各卫隐田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一月三十日，命查南京四十二卫屯田隐占侵削诸弊，其本丁逃绝他户佃种者，俱署名补伍，不则将原田入官，改募屯军给之。

诏准余盐开中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二月初一，御史杨选请以两淮余盐与正盐一体开边，召商报中，本色免其运司纳银，惟割没余盐依旧征银解部。户部复议，请将两淮余盐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自明年始，照依正引定价，开派宁夏、延绥、宣府、大同、辽东、固原、甘肃、蓟州并山西神池等堡，召商上纳粮草，为各边年例之数。完日，转行盐运司，令商人自行买补。其余盐引目不得增刷，即附正引包中，若有余，仍掣割银两解部。从之。

林希元削籍　林希元，字茂贞，号次崖，福建同安人。正德进士，嘉靖时官至广东按察司佥事，因事罢归闲住。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二月，上呈所著《改编大学经传》、《定本四书》、《易经存疑》，奏乞刊布。诏焚其书，下巡按御史按问，寻褫其冠带，削籍为民。林希元所著之书，自成一家，言多可取。有《林次崖集》等。

详定问刑条例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二月二十五日，刑部尚书顾应祥进呈《问刑条例》，诏刊布全国，一体遵守。

筑正阳三门外城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二月二十五日，命筑京师正阳、崇文、宣武三关厢外城，由兵部侍郎张时彻、梁尚德、副都御史商大节、锦衣卫都督陆炳监工。

定赏罚事例　嘉靖三十年(1551)正月十二日，从大将军仇鸾议请，重定赏罚事例，以激励将士。其例规定：一、获功旧例，首从止二人。今改以五人为伍，为首者升一级，赏银十两，为从者四人，赏银二十两；阵亡一人，四人亦连坐。二、主将部下斩首五十级，副总兵、参将、游击至三十级，守备、千总至二十级，把总至五级，管堡至三级，照例俱升一级。三、出征之期，科道官随军纪验，给以勘合、银牌，即时验功给赏。其应升应降官员，即以获功、失事之日为始，开收俸粮。

沈炼谪戍被杀　沈炼(1507—1557)，字纯甫，号青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除溧阳知县。因忤御史，调茌平。以父忧去，补清丰，入为锦衣卫经历。为人刚直，嫉恶如仇。与锦衣帅陆炳相友善，通过陆炳与严嵩之子严世蕃相识。严世蕃每以酒虐客，沈炼不平，辄为之较，世蕃惮畏。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师，致书乞贡，语多轻慢。下廷臣议，司业赵贞吉请勿许，廷臣无敢从其议者，独沈炼赞同。吏部尚书夏邦谟问："你是何官？"沈炼答："锦衣卫经历沈炼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其议遂罢。时首辅严嵩贵幸用事，边臣争贿赂，及失事惧罪，贿赂益重。嘉靖三十年正月十二日沈炼上书极陈严嵩父子之奸。奏疏说道，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忠谋则多方沮之，谀谄则曲意引之，要贿鬻官，沽恩结客。"沈炼接着列举严嵩父子十大罪状：一，"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二，"受诸王馈遗，每事阴为之地。"三，"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四，"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五，"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六，"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七，"纵子受财，敛怨天下。"八，"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九，"久居政府，擅宠害政。"十，"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疏中并论吏部尚书夏邦谟谄谀黩货之罪，请皆罢斥，以谢天下。世宗大怒，拷掠数十，谪戍保安。塞外人知沈炼因劾严嵩获罪，争骂严嵩父子。沈炼缚草人为李林甫、秦桧、严嵩，聚子弟攒射之，或骑马至居庸关口，痛骂严嵩而归。严嵩大恨，乃使其党路楷、杨顺谋害沈炼。会蔚州白莲教头领闫浩出入漠北，泄边情为患，为官军所获，杨顺遂将沈炼之名窜入闫浩案中，诬闫浩师事沈炼，听其指挥。遂于嘉靖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杀沈炼于宣府市，戍其子沈襄于极边。后又杖杀沈炼子沈衮、沈褒。严嵩败，严世蕃伏诛，临刑时，沈炼所教保安子弟有在太学者，以一帛署沈炼名爵于其上，持于市，见严世蕃头断，大呼："沈公可瞑目矣。"恸哭而去。隆庆初，赠沈炼光禄少卿，任一子官。杨顺、路楷并论死。天启初，谥忠愍。沈炼有《青霞集》、《鸣剑集》、《塞垣尺牍》等。

坐派京料银　嘉靖三十年(1551)正月十九日，户部以各边召募兵马日增，供费不给，广求足用之术。除北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及淮安、扬州、庐州、凤阳、邳州、徐州诸省州郡，或已募兵，或备修边墙，或有雇募外，其余则坐派京料银。其坐派银额是，应天府三万两，徽州府三万五千两，宁国府二万五千两，池州府二万两，太平府二万两，安庆府二万两，苏州府八万五千两，广德、和州、滁州共九千两，浙江十五万六千两，江西十二万两，湖广十

四万两，四川十五万两，福建十四万两，广东十五万两，云南五万七千三百四十两。限本年十月以内解部，违限究处。

诏给陕西诸卫金牌勘合 明初规定，金牌信符，每副二面，颁发“西番”诸部，令约束其族，纳差发马，给以茶引。后诸部所领金牌散失，失而再给。嘉靖二十八年(1549)御史刘仑请复金牌、勘合之制，以便各部纳马给茶。洮州卫列币等、河州卫子刚巴等、西宁卫咎币等部马多，给以金牌；冲卜鸾单等十七部马少，给以勘合。未授职事者授职，原授未袭者承袭。三十年正月十九日，经兵部议，诏给“西番”诸部金牌、勘合。

胡松致仕 胡松(1492—1574)，字茂卿，号承庵，绩溪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嘉靖二十九年(1550)五月任工部尚书。伊王欲拓其洛阳府第，计直白银十万两，以十之二贿严嵩，期必得。胡松据祖制力争，乃止。俺答入寇，仇鸾以边兵入卫，欲悉召其所部实京师，移武库仗于营，以便给调。胡松以“非所以重肘腋，杜微慎防”谏争，执不许。嘉靖三十年二月十七日引疾致仕。万历二年(1574)闰十二月二十三日逝世。有《承庵文集》。

俺答叩关求贡 嘉靖三十年(1551)三月，俺答屡叩宣府、大同各边陈款，乞求通贡互市。其子脱脱率十余骑诣宣府宁远堡暗门，呼通事出，攒刀为誓，求通贡，并赠通事马二匹，留其部虎刺记等四人为质而去。不久，脱脱又缚明军叛卒朱锦、李宝而来，以示诚恳。于是宣大督抚屡上疏奏闻其事。主张开关互通贸易。

开设大同、宣府马市 仇鸾素畏战，密遣人馈货币于俺答义子托克托，暗使贡马通市。俺答许之，投书于宣大总督苏祐。朝廷定议，每岁春秋两市，命兵部侍郎史道领掌马市事。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杨继盛以俺答犯京师仇耻未雪，开市乃示弱辱国，遂上《十不可五谬疏》，仇鸾进密疏陷害，杨继盛被逮诏狱，贬狄道典史。嘉靖三十年(1551)三月四日，诏许于大同、宣府、延绥、宁夏开设马市。四月，大同镇羌堡马市易马二千七百余匹。五月，宣府新开口堡马市易马二千余匹。

益实左卫入贡 嘉靖三十年(1551)三月，益实左等卫都督佥事歹答力等入贡。其还至塔山卫部落，明廷敕文为其所夺，歹答力以状闻，诏守臣谕还之。

安南莫宏瀷袭职 嘉靖三十年(1551)三月十六日，命已故安南都统使莫福海嫡子莫宏瀷承袭父职。莫福海死，莫宏瀷当袭职，然其族人莫正中等乘宏瀷年幼，欲夺其官。莫宏瀷上表修贡嗣，明廷遂命其袭都统使，护守敕印。

龙许保聚众起事 嘉靖三十年(1551)四月，贵州铜仁苗人龙许保聚众起事，突入思州府(今贵州岑巩、玉屏及铜仁县东南部)，捉知府李允简、知事王日谦，经历卢惠，劫狱出囚，掠府库及居民财物，纵火焚烧而去。巡按御史董威以闻。诏降总督张岳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戴罪剿捕。后官军征讨数不利。嘉靖三十九年，总兵石邦宪始剿平之。

商大节下狱论死 商大节(1489—1553)，字孟坚，号少峰，钟祥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丰城知县，以捕盗功擢兵科给事中。科道互相纠劾，谪盐城县丞。三迁刑部郎中，出为广东佥事。改山东按察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兼提督紫荆诸关。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俺答入犯京师，诏城中居民及四方应武举者登城守卫，以商大节率五城御史统之。发帑金五千两，命招募壮士。寇退，复命兼管民兵，经略京城内外，擢右副都御史。募民兵四千人，请以三等授饷，上者月米二石，其次递减五斗。仇鸾恨其独为一军，不受节制，遂以京城四郊委之防守，欲以困之。商大节反对说：“臣虽经略京城，实非有重兵专战守责者也。京城四郊利害，鸾欲专以臣当。臣节制者，止巡捕军，鸾又频调遣，奸宄猝发，谁为捍御哉?”世宗宠信仇鸾，怒责商大节怀奸避难。嘉靖三十年四月十三日下其诏狱。法司希旨，论其当斩。明年八月，仇鸾奸发。商大节部下石镗、孙九思等百余人伏阙讼冤。兵部侍郎张时彻亦上言说：“大节为逆鸾制肘，以抵于法，乞顺群情赦之。”世宗怒，镌张时彻二秩。嘉靖三十二年商大节卒于狱。隆庆初，赠兵部尚书，谥端愍。

诸王献银助边 嘉靖三十年(1551)四月，代王朱廷𡏖献银五千两，汝王朱祐梈献银三千两，德王朱载𡏚献银一千两、战马八匹，徽王朱载埨献银一千两，宁化王府辅国中尉献银一千两，以助边饷。赐敕奖谕。此后诸王献银不绝。

朝鲜人漂流淮安 嘉靖三十年(1551)五月，朝鲜国管令金等八人，因航海遇飓风，漂流至淮安，防守官驿送京师，诏恤遣还。

俺答犯大同左卫 嘉靖三十年(1551)六月，大同马市刚开，遂有俺答兵入犯大同左卫，乃中国叛人萧芹、乔源等诱致之。萧芹、乔源等一百余人，以白莲教出入塞北，散处俺答诸营，恐俺答与朝廷通市失其利，乃赂俺答左右诱其入犯。侍郎史道密逮白莲教张攀龙等五千余人，并执萧芹、乔源妻子，向俺答索取萧芹、乔源等。七月，俺答执献萧芹、乔源。

俺答献叛人萧芹等 大同兵变后，汉人萧芹、

张攀隆、王得道、乔源、丘富等六十余人,潜逃出塞,投降俺答,受到俺答的任用。嘉靖三十年(1551)三月,宣府、大同开马市后,萧芹仍请俺答入塞剽掠,俺答颇不悦。仇鸾遣幕僚时义重赂俺答,要求他缚献萧芹等人。同年七月,俺答擒萧芹等三十余人,械至大同塞下,献于总督史道。史道奏闻,诏进仇鸾、史道官爵。丘富、乔源等三十五人俱逃走。

开浚淮安三里沟 嘉靖三十年(1551)七月十三日,总督漕运兵部侍郎应檟上言,请开通黄河、淮河之间的三里沟,使运船自沟行,出通济桥,由淮河入黄河,航道疏通,且可省费。从之。

马市以牛羊易菽粟之议 嘉靖三十年(1551)八月,大同、宣府马市开后,俺答又提出,不仅以马易币布,而且蒙古贫者以牛羊易菽粟。经理马市史道疏言其便;朝议谓其无厌,既易币布,复请菽粟,后继为难,且朝市暮掠,请勿许。议久未决。帝问首辅严嵩,严嵩亦云不可。嘉靖三十年(1551)八月四日,诏令不许,专意战守。逾年,马市又罢。

李邦珍聚众起义 嘉靖三十年(1551)九月,曲周县李邦珍聚众起义,抢取县库,释放狱囚,转而攻入山东巨野、河南太康等县,又入南直亳州,四省震动。时淮颍间岁荒大饥,饥民多有响应。蓟辽总督何栋于北直隶、山东、河南调选骁健民兵一千五百名,追踪剿杀。

孟尚守聚众起义 嘉靖三十年(1551)九月,山东乐安县孟尚守聚众起义,以二十余骑突入日照县城,执典史范邦彦、百户李济以去。又流动至邳州,被官军围在北门外玄武祠内,官军纵火烧祠,孟尚守等尽被烧死。

李默削籍 嘉靖三十年(1551)十月十八日,首辅严嵩诬吏部尚书李默会推徇私市恩,遂诏李默削籍。李默主诠典,不阿严嵩,舆论称其得大臣之体。

蒙古俺答诸部进犯大同 嘉靖三十一年(1552)正月初四日,俺答部先向明朝贡马四十匹。易马四百匹。至夜竟率众夺回所易马匹,进犯大同,大肆抢劫人畜财物。自此俺答犯边抢掠无虚日。

魏有本逝世 魏有本(1483—1552),字伯深,号浅斋,浙江余姚县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累官至大理寺少卿。嘉靖十九年(1540),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进南京刑部右侍郎。其后,被命为右都御史,总督漕运,未任即致仕归田。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十一日逝世,年七十。有《魏浅斋文集》。

更定边方官久任升除降调格例 嘉靖三十一年(1552)正月十四日,世宗下诏更定边方官久任升除降调格例,规定:巡抚、佥都御史,三年满任,升副都御史,给以诰命,并荫一子。副都御史,三年满任,升侍郎,恩荫一子。以侍郎等官为总督者三年,侍郎升右都御史;右都御史升尚书;尚书则量加宫保,俱留任地方,必满六年,始得内召入京。知府,任满三年者,升二级;资历稍浅者升一级,皆不易其地。

户工二部奏报各边军饷用银数额 嘉靖三十一年(1552)正月初九日,世宗命户、工二部核实库银出入之数。至月底,户部奏:自嘉靖二十九年十月迄本月,所入正税、加赋、余盐,计银五百余万两,外项搜括所入四百余万两,总计九百九十余万两。所出自年例、各边主客兵用银计二百八十万两,新增军饷二百四十五万余两,加以修边,赈恤诸费,总计用银八百余万两。工部奏:工食、料价共用银三十四万五千两。世宗览疏,以为费用过多,疑其中必有虚冒侵苛,遂遣给事中王国桢、御史徐绅等人往各边查勘,参劾有关人员。

宣、大二府大饥 宣府、大同二府发生严重饥荒,人无以为食。而以人为食,嘉靖三十一年(1552)二月初一日,兵部上疏请量借军饷银进行救济。世宗下诏严厉切责二镇守臣不奏报,并命督饷侍郎马坤迅速前往,发给银二十万两,以为赈济之用。马坤请加发银十万两。世宗从其请。

俺答再犯大同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二月初九日,蒙古俺答部二千余骑再次入寇大同,劫掠大用、威虏诸堡。骑兵营坐营指挥佥事王恭率其部御敌于平川墩,俱战死。参将张腾驻兵助马堡,离平川墩甚近,竟畏惧闭垒不出。敌骑遂由高山城、砖窑儿南下,大掠怀仁县石井村等处。

内府营的设立 嘉靖二十九年(1550)九月,世宗下令罢正德间成立的京师团营,恢复三大营旧制。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二月十七日,世宗以营制既定,遂下诏改旧内教场为内府营,操练内侍。目的是以为京兵不足御敌,欲靠内府营作为御敌,拱卫京城。时人评论说:区区内侍,即使训练有方,亦不足以守卫京城。使内侍习兵,只能贻患将来。

更定南北直隶印马御史接差之例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二月二十七日,世宗令更定南北直隶印马御史接差之例。规定:北直隶,如屯田御史,前后更代管事;南直隶亦为三年一差,事毕,俱不必俟代。

饶阳王疏劾大同将官 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初六日,代府饶阳王上疏:我朝与蒙古互市,本为一时羁縻之术,而大同总兵官徐仁,却自以为和平无事,平时侵苛军饷,不讲求战守,一旦敌至,即一筹莫展,称病不出。巡抚何思,则以游言诈骗银币。副总兵官王怀邦,为敌所俘,以贿求生。近来俺答诸部往

来侵扰，徐仁等人竟下令禁止士兵出击杀敌，甚至规定“杀敌如杀人之罪”。致使右卫怀仁东至阳城、天和间，战火四起，淫掠万状，将来地方，莫知如何。世宗阅疏，命逮徐仁下狱，何思、王怀邦俱罢任听候处理。同时令改驻守昌平、都御史於敖巡抚大同，副总兵孙时雍暂摄大同总兵事。并诏大将军仇鸾率师赴大同抗击蒙古俺答。

王积致仕 王积(1492—1567)，字子崇，号虚斋，南直隶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历官广东参议，因性刚直，不趋炎附势，故不得调，至卖衣自给，遂上疏请休。起为陕西参议，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为政有大体，吏民无不畏服。仕终南京兵部右侍郎，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初七日被劾，遂以病致仕。隆庆元年(1567)卒，年七十六。

徐阶入阁 起初，徐阶掌礼部事，撰青词称旨，屡与阁臣同召直无逸殿，并赐飞鱼服等，深受器重。是时，权相严嵩仇恨夏言，欲置之于死地，而徐阶为夏言所引用，严嵩因此亦忌恨徐阶。嘉靖三十年(1551)二月，徐阶请早立皇太子，又请冠婚先裕王、后景王，世宗皆不悦。严嵩遂趁机中伤徐阶，向世宗说：徐阶“所乏非才，但多二心”。徐阶甚惧，由此之后一方面谨事严嵩，另一方面更加精治青词，以迎合世宗。世宗怒气渐消，不久加徐阶少保。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初九日，以徐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同时起前礼部侍郎欧阳德为礼部尚书。

仇鸾出师大同 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月初三日，大将军仇鸾帅师出镇川堡(今山西大同东北)。至猫儿庄遇敌伏兵，官军阵亡二十八人，伤二百一十二人，失马二百余匹。仇鸾奏报斩敌五人，获马三十匹，请赏。兵部议罪仇鸾，世宗以官兵敢出塞作战，仍赏银及纻丝，不予问罪，然自是知仇鸾不足用。

俺答入寇辽东 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月十四日，俺答部把都儿、辛爱犯辽东新兴堡，围百户常禄、指挥姚大谟、刘栋、刘启基等于三道沟，四人皆阵亡。备御指挥王相急驰增援，与把都儿大战于寺儿山，杀伤相当，把都儿退去，千户叶廷瑞率百人助战。次日，王相带伤复战于蜡黎山，全军三百余人皆战死。其年，俺答四犯大同，三犯辽阳，一犯宁夏。

世宗诏颁赏格 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月十七日，世宗从大将军仇鸾请，令诸边壮士有愿于军前立功者，得不时收用，同时悬示赏格于诸边。赏格规定：获敌一人，加官一级，赏银二十两，不欲官者赏银五十两。招徕强壮汉人一人，赏银五两；招徕三人，加官一级，以上递加。获敌中知名者一人，官三级，赏银三百两。获敌大首领来献者，爵以伯，赏银一万两。

倭寇进犯浙江 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月二十四日，海盗王直派部下大头目徐海、陈东、肖显、麻叶等人，勾引日本海寇一万余人，驾船一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县等处登岸，流劫台州、温州、宁波、绍兴，攻陷城寨，杀掳居民，浙东骚动，江南、江北同时告急。

仇鸾回京 大将军仇鸾，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月初率师赴大同以后，不但糜饷无功，屡遭败绩，而且到处骚扰百姓，乃至与家丁争妓，置军机大事于不顾。而是时蒙古俺答纠集各部及朵颜三卫之众，出没塞上，势甚张，致使诸边相继告急。同时自开设马市以来，边墙为敌所坏者十之五六。仇鸾胆怯无谋，于是请以七月防秋之际，调宣府、大同二镇选兵分布于保安(今陕西志丹)、怀来(今河北怀来)之间，以保卫京畿重地。兵部认为：宣、大本为京师门户，未有门户不守，而堂宇能固的。且合宣、大二镇之兵以自守，犹恐不足，一旦调其精锐，留其羸弱，则门户必不能支，必待其深入而后图，将为时已晚。世宗以为兵部所言甚是，又已知仇鸾不足用，同年五月初三日遂诏令仇鸾回京议事。

徐绅请裁革冗滥职官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十三日，江西道御史徐绅疏言：国家财力困诎，弊在设官太多。如，两淮、山东，既有巡抚，又于徐州添设招抚都御史。漕运、河道，职守相通，复于济宁别设管河都御史。山东德州，既有兵备分巡，又有民兵佥事。北直隶藁城，既添民兵佥事，而霸州又有兵备专司。又如，苏州地方，兵备副使、管粮参政，皆非额设，徒滋顿扰。当国家急财之际，请一切罢革。推之布政司、按察司、郡、县有可合并者亦然。京营之卫、之士以及川、广之师，有可罢减者，俱宜议处，以省烦费。

王鸣臣请严禁王府侵占税粮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六月十九日，给事中王鸣臣上疏说：王府置田有禁，载在《会典》。今各宗室广收民田为己私业，以势挟制地方，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贻累粮里。请令巡按御史严查侵占均派里甲庄田之税，将其充作王府禄粮。有司如有阿纵者，治其罪。世宗可其奏。

仇鸾请调辽东诸镇新兵入卫京师 嘉靖三十一年(1552)六月二十九日，大将军仇鸾奏言：各边入卫之兵，经年赴调奔走已疲，请更选辽东、固原、宁夏、甘肃，每镇新兵三千人、延绥二千人，与原选兵分番入卫。世宗不许。

王国桢疏议节财 嘉靖三十一年(1552)七月二十一日，户部复议给事中王国桢条陈节财用六事：

一、边军给赏，宜以其地远近、时间久速为差，不得令内地官军援例妄请。二、各边官军有斩、捕敌首功者，抚臣应及时请行赏，毋致迟误。三、各卫营、监局、光禄寺各衙门所造支文册类，皆收除不清，名粮互异，宜予查核。四、内府库局香品、布添等料以及各仓场粮草，往往商牙、官吏并倚为奸，输纳已完，必待价高时始出通关实收，积以毫厘，动成千万，亦耗财之一弊，亟宜禁革。五、请令各钞关征银解部，接济边储，待边境安宁，仍征钱钞本折轮解。六、召买珍珠等物，须随时酌定价银，使物价不得腾踊。每年终括财赋出入之数，登簿进呈，以查盈缩亏余。世宗下旨：除钞关本折仍轮解外，余皆准王国桢所议。

王忬巡视闽、浙　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四月，浙江巡抚兼提督闽浙海防军务朱纨被罢之后，浙江巡抚并巡视官不设者已四年，而倭患益炽。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漳泉海盗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州、温州、宁波，攻破城寨，杀掳居民。五月，倭寇又陷黄岩县。江南、江北遂纷纷告急。于是给事中王国桢、御史朱瑞登等人相继上疏，说：海疆不靖，自裁革巡视后，闽、浙、直三省军民无人统领，虽设有海道副使，而权轻不便行事，往往狼狈失职，请复设都御史。吏部认为：既设巡视，必当兼总督、巡抚，使其节制诸军，方可责其成功。世宗遂令暂复巡视，于嘉靖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命山东巡抚、右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兼辖福建福(州)、兴(化)、漳(州)、泉(州)诸府。明初东南沿海各地，建卫所，设战船，由都司、巡视、副使等官负责，控制周密。及承平日久，战备弛废，船敝伍虚，兵非常练，船非专业，遇倭寇船至，辄望风逃窜，以故寇船所至，无不残破。王忬奉命赴职，即任参将俞大猷、汤克宽为心腹，统领诸将，布列沿海各镇堡，整饬战备，严督御倭。第二年七月，改王忬为提督军务兼巡抚浙江并福建福、兴、漳、泉四府。

端廷赦逝世　端廷赦(1493—1552)，字思恩，号虹川，南直隶当涂县(今安徽当涂)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历任高安县令、监察御史，首先疏劾武定侯郭勋骄横。升右佥都御史，多有政绩，进吏部右侍郎，终南京右都御史。嘉靖三十一年(1552)七月二十三日死于官，年六十。

仇鸾戮尸　仇鸾，字伯翔，陕西镇原县(今属甘肃)人，仇钺之孙，嗣咸宁侯，为甘肃总兵。后因贪虐被革职。嘉靖二十九年(1550)闰六月，俺答犯边，大同告警。是时仇鸾坐废家居，以贿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蕃，得以复起为太子太保、总兵官，镇守大同。同年八月，俺答将犯大同，仇鸾重赂俺答，约毋犯大同，且许通市。俺答受赂东侵，直入京畿，京师戒严，史称“庚戌之变”。是时世宗下诏诸镇出兵勤王。八月二十一日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仇鸾畏敌不战，连遭败北，但却掩败为功，竟加太保。九月初五日，罢团营，复三大营旧制，以仇鸾为总督京营戎政，颇得专宠。嘉靖三十年三月，兵部主事杨继盛疏论不可开马市，仇鸾恶意中伤，致杨继盛下狱论死。是年五月，仇鸾为满足俺答的要求和避战之计，请开宣府马市。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命仇鸾率师赴大同，师出无功，于五月召回。八月初九日，下诏收回仇鸾大将军印，罢其职。八月十二日，仇鸾病情加剧，郁郁而死。仇鸾起初勾结严嵩父子，及得宠，又与严嵩父子不和，产生矛盾。仇鸾死，严嵩即与锦衣卫都督陆炳一起，尽发仇鸾厚赂俺答之罪。八月二十五日世宗下诏：暴仇鸾罪状，追戮其尸，传首九边，抄家没产。其党时义、侯荣等人，亦皆伏诛。

李承华疏议考察事宜　嘉靖三十一年(1552)八月二十七日，浙江道御史李承华条陈官吏考察五事：一、惜人材，不以一时一事论平生，必须全面考察。二、广询访，考语不能止凭抚、按之言，欲尽公即宜参照各方面的意见。三、严改调，杜绝夤缘请托，降调皆得秉公从事。四、定公言，拟注考语，须核真伪，毋拘异同，功过贪廉必须明确。五、集众论，宜令各方智谋之士杂对公举，以广忠益。世宗允其议。

俺答率重兵劫掠大同　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初一日，蒙古俺答率二万余骑，自弘赐堡(在大同北面)冲破边墙，劫掠大同左、右卫以及安东十七卫。未几，又分兵掠夺平虏卫、朔州、应州、山阴、马邑等处。其后，复分兵攻打山西三关和宁夏。

蒋应奎为民　兵部右侍郎蒋应奎与左通政唐国卿一起，为其子以边功请求升、赏。给事中凌汝志上疏言：蒋、唐二人身为大臣，非但不责各自之子冒功之过，反而冒功请升、赏，无大臣体。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二十一日，世宗得凌汝志疏，怒而命锦衣卫逮捕蒋应奎、唐国卿二人，廷杖，削职为民。

罢各边马市　自开设马市以后，蒙古俺答等部往往乘机大肆抢掠沿边各地人口、财物。朝廷遂先罢大同马市，以示警告，但俺答等部依然肆掠不耻。于是，巡按御史蔡朴上疏极言开市之害。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二十四日，宣诏各边马市悉行禁止，今后有敢建言开市者斩。自此各边马市时罢时开。

王宗茂疏劾严嵩祸国殃民罪　嘉靖三十一年(1552)十月初九日，南京御史王宗茂疏劾严嵩：严嵩本为邪谄之徒，寡廉鲜耻，久持权柄，作威作福，内外

臣民无不怨恨。其祸国殃民之大罪有八：一、任用官员，索取厚赂，至文武将吏，尽出其门，且皆分布要地。二、引用私人，外官迁升不问才品，不计资历，唯贿是问，致使端方正人屡被排斥，不能为国家效力。三、先年被人弹劾之后，马上暗中将家产数万计转移南方江西老家等处。四、在江西各地广置良田，广蓄金银珍玩，为子孙百世之计，不顾国穷民困。五、广养家奴，往来京城，沿途骚扰，虐害居民，人皆怨怒而不敢言。六、穷奢极欲，殊方异产，无不齐备。七、贪肆无比，而恬不知止。八、招募朝士三十余人为干儿义子，充当爪牙打手，致朝廷恩威不出于陛下。天下所恃为安者，财和兵而已。不才之文吏以赂而出嵩门，必剥民之财，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将以赂而出嵩门，必克扣军饷，兵奈何不疲！严嵩所积，可饷边数年，请除去这个害国害民的奸贼，抄其家产以苏国患。严嵩党徒，通政使赵文华得到王宗茂奏疏之后，故意将其扣压数日始上，同时秘告严嵩，使严嵩得以谋划对策，陷害王宗茂。世宗得疏果然庇护严嵩，以诬诋大臣罪将王宗茂贬为平阳县丞。王宗茂上疏时已自度必死，及被贬，恬然出都。

蠲免江西等处被灾田租　嘉靖三十一年(1552)十月十三日，世宗下诏免江西南昌、临江、吉安、瑞州、袁州、抚州、赣州、南安诸府旱灾田租。同日，又诏免北直隶大名、保定、河间、顺德、广平诸府被水田租。

许宗鲁致仕　许宗鲁(1490—1559)，字东侯，号少华，陕西咸宁县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改庶吉士，升监察御史。嘉靖初年，巡视湖广学政，以义训士，省中风气为之一变。其后，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再移抚辽东，甚得辽人信赖。嘉靖三十一年(1552)十月二十一日，被劾致仕归里，筑草堂，积图书，赋诗工书法，年七十死。著有《许少华集》、《辽海集》、《归田集》等。

戴鳌落职归田　戴鳌(1490—1556)，字时重，号东石，浙江鄞县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四川佥事，因逆时相被夺职，家居八年。复起官为河南佥事，进左都御史，巡抚四川，关心民瘼，革弊兴利。嘉靖三十一年(1552)十一月初四日，被诬落职归田，年六十七卒。有《戴中丞遗集》。

翁万达逝世　翁万达(1498—1552)，字仁夫，号东涯，广东揭阳县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出为梧州知府。咸宁侯仇鸾镇两广，纵部卒为虐，万达缚其最横者杖之，声名大著。廷议讨安南，升万达为广西副使，专办安南事，因功迁四川按察使，历陕西左、右布政使。嘉靖二十三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不久，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保定军务。俺答犯边，翁万达饬边备，整军实，修筑边墙，自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诸处为墙一百二十八里，堡七，墩台一百五十四所；宣府西路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诸处为墙六十四里，敌台十所，历时五十日而工成，进右都御史。发代府宗室充灼等叛谋，再进左都御史。嘉靖二十七年八月，因功进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回京理部事。遇父丧，回家守孝。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俺答犯北京，召翁万达代丁汝夔为兵部尚书，因路远不能及时到京。严嵩素不悦翁万达，遂上言诽谤，世宗责万达欺慢，被夺职。仇鸾再进谗言，被降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紫荆诸关。嘉靖三十年二月京察，翁万达自请去职归里，世宗疑其避事，竟斥为民。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兵部尚书赵锦罢官，世宗以万达久历兵事，复命其为兵部尚书，未及赴任，即于同年十一月十三日逝世，年五十五。隆庆初，赠太子少保，谥襄敏。翁万达刚介坦直，勇于任事，深识远虑，善御将士。嘉靖中，边臣"行事适机宜，建言中肯窾者，万达一人而已。"

选民女入宫　嘉靖三十一年(1552)十二月初一日，诏于京城内外并顺天等八府，选民间女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

马从谦死于杖下　马从谦(1495—1552)，字益之，号竹湖，南直隶溧阳县(今江苏溧阳)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授工部主事，因治河有绩，升尚宝司丞，掌内阁制诰，进光禄少卿。是时，太监杜泰提督光禄寺，每年贪没内府银数万。马从谦上疏揭发杜泰贪污罪，并言及宫中斋醮事。世宗恶人言斋醮，杜泰又诬马从谦诽谤。世宗大怒，于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命逮马从谦下狱，廷杖八十，立死杖下。

张润逝世　张润(1470—1552)，字汝霖，号西磐，山西临汾县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宜阳县令，选授给事中，升顺天府丞。后以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宁夏。不久，回京管都察院事。九年任满，升副都御史，因事坐大狱，罢归十多年。以言官推荐，复原官，进兵部侍郎、工部尚书。遇亲丧，回家守制。命起为户部尚书，督理西苑农事，张润不赴，以病致仕。未几，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逝世，年八十三。赠太子少保，谥恭肃。张润端雅有度，居官一意奉公，所至有声绩，刚正自持，屡受挫折，而不改其志。

王忬奏海防赏格　嘉靖三十二年(1553)正月初一日，巡视浙江都御史王忬奏海防赏格四事：一、擒斩真倭、从贼一人，赏银十五两，次从贼首二十五两，渠魁五十两。二、擒斩漳寇、海寇为从者，赏银

三两，贼首五两，船主渠魁二十两，酋首五十两；夺获倭船大者五两，中者二两，小者一两；俘获男妇五名，赏银一两。三、接战之前击破倭船，大船赏银二十两，中船十两，小船五两。四、临阵杀敌受伤者，给银一两，被杀者给银五两，免其家徭役。先登陷阵而死者，给银二十两。

杨继盛疏劾严嵩十罪五奸　嘉靖三十年(1551)三月，兵部主事、署员外郎杨继盛因反对开设马市、疏劾咸宁侯仇鸾，被贬为狄道县典史。仇鸾戮尸，迁杨继盛为兵部员外郎。又迁为兵部武选司郎中。杨继盛怀忠守义，一心报国，抵任一个月，即于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上疏劾严嵩十罪五奸：一、祖宗罢丞相、设阁臣，备顾问，而严嵩则处处以丞相自居，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这是破坏祖宗成法。二、陛下每用一人，严嵩便说是他推荐的；每斥一人，便说此人非他所亲；每宽大一人，则说是他所救；每罚一人，即说是得罪他。这是以陛下之喜怒恣肆威福，窃君上之大权。三、陛下有善政，严嵩都说是采用他的建议，这是掩没君上之功。四、纵子僭窃，委重权于其子严世蕃，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五、对其亲人、私党加官加禄，冒朝廷军功。六、大量接受贿赂，引用奸臣。七、外寇入侵，惧怕作战，误国家军机。八、把持大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九、文武官员升迁，但论贿金多少，致使贪污削剥盛行于世，大失天下人心。十、自严嵩用事以来，贿赂成风，官吏以投机取巧为能事，败坏天下风俗。严嵩不仅犯有以上十大罪，还有五大奸，招权纳贿，结成死党，分布于要害：一、陛下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二、陛下的喉舌，皆为严嵩的鹰犬。三、陛下的爪牙，俱为严嵩的瓜葛。四、陛下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隶。五、陛下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陛下为何爱一贼臣而使百姓苍生死于涂炭！愿陛下听臣之言，察严嵩之奸，或可召问裕、景二王，或询问诸臣。及早将严嵩正法或令其致仕，以全国体。杨继盛之疏呈上，严嵩极力挑拨离间，摘"召问二王"一语为大罪，激起世宗大怒，将杨继盛廷杖一百，下狱穷治，拷掠不已。

朱伯辰议改盐法　嘉靖三十二年(1553)正月二十四日，因东南倭患和西北俺答寇边，兵饷不足，给事中朱伯辰议改盐法，以正盐加带余盐。凡商人报中正盐一引，许带余盐二引，各为一包，连包索共二百八十五斤。正盐开边，由南京户部给引，余盐纳价，运司给以小票。余盐盐价银，淮南定为五钱五分，淮北五钱。每年正盐、余盐，约可得盐银一百一十万两。经清理盐法都御史王绅、巡盐御史黄国用勘议，户部覆议，定正盐一引，许带余盐二百六十五斤，正余盐共五百五十斤为一包，并定盐价银，淮南每包七钱，淮北五钱。奏准施行。

张岳逝世　张岳(1492—1553)，字维乔，号净峰，福建惠安县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行人，因谏阻武宗南巡，被廷杖，贬为南京国子学正。世宗即位，张岳官复原职，迁行人司右司副。后改任南京武选员外郎，历主客郎中。出为广西提学佥事，改提学江西。坐事贬为广东盐课提举，升廉州知府、广东参政。时塞上多事，被荐迁右佥都御史巡抚郧阳，移抚江西，进右副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进兵部右侍郎，召为兵部左侍郎，总督湖广、贵州、四川军务，进右都御史。嘉靖三十二年(1553)正月二十八日，死于沅州，年六十二。赠太子少保，谥襄惠。张岳博览文章，经术湛深，其学不喜王守仁之说，以程、朱为宗。著有《小山类稿》。

诏令买办金宝珍珠　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月初三日，世宗令取太仓银十五万两，进承运库买办金宝珍珠。

孙承恩致仕　孙承恩(1481—1561)，字贞甫，号毅斋，南直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掌詹事府。因不满世宗修仙，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月十一日致仕。嘉靖四十年(1561)八月二十八日卒，年八十一，赠太子少保，谥文简。著有《让溪草堂稿》等。

屠楷致仕　屠楷(1490—1561)，字良植，号直斋，广西临桂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兵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后改官吏部。终南京兵部尚书，参与机务。屠楷仕宦三十余年，持身守正，不树党营私。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以病致仕。嘉靖四十年闰五月初五日卒，年七十二，赠太子少保，谥恭简。

赵锦疏劾严嵩恃权纵欲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十一日，巡按云贵御史赵锦，从千里之外驰疏劾严嵩，说：太祖罢丞相，虑至深远。今之内阁，无宰相名而有宰相实，非太祖本意。首辅严嵩怙宠张威，窃权纵欲，事无巨细，罔不自专，假刑堂以行其爱憎，任情生杀予夺，一概以贿赂之厚薄为转移，群小得志，廉耻扫地。自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以后，吏治日坏，权臣营私，将官无能，皆以贪污、钻营为务。致使朝廷之内，用者不贤，贤者不用，赏不当功，罚不当罪，财用枯竭，外患不止，民穷国匮，内外交困。请立即罢免严嵩。其时，世宗专宠严嵩。本年正月杨继盛劾严嵩十罪五奸，被下狱毒打。二月兵部武选司署郎中周冕劾严效忠等人冒军功，又被下狱拷

掠,削职为民。及见赵锦疏劾严嵩恣肆威权,世宗更加大为不满,竟以"欺天谤君"的罪名逮捕赵锦,下诏狱横加拷掠,杖四十,革职为民。

朱伯辰请筑京师外城 嘉靖二十一年(1542)都御史毛伯温等人曾上疏请筑京师外城。时户、工二部以财力困绌,未能兴工。至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三十日,兵科给事中朱伯辰,以城外居民繁伙,商旅云集和边境日益多事为由,请按土城故址,修筑京师外城。世宗纳其言,并于同年闰三月十九日动工兴建,由总督戎政平江伯陈圭等人提督工程,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刘鲸等人负责监工。外城自正阳门外东道口起,经天坊南墙外至荫水庵,转神水厂接土城广禧门至土城小西门,再经马家庙等处,最后至正阳门外西道口止,全长约七十余里。依旧制:外城墙基厚二丈,收顶一丈二,高一丈八,垛口高〇·五丈,共高二丈三。城外取土筑城,因以为濠。正阳等九门之外,又开门十一座,每楼各设门楼五间,四角设角楼四座。城外每面筑敌台四十四座,每座长二丈五,宽二丈,收顶一丈二,每台上盖铺房一间,共计有敌台一百七十六座。城内每面筑上城马道五路,共计马道二十路。西直门外及通惠河设大水关二座,八里河、黑窑厂等处设小水关六座。此项工程,由户部发工价银二十四万两,兵、工二部发银十八万两,共计四十二万两。历时七个月,至十月二十八日完工。

王以旂逝世 王以旂(1486—1553),字士招,号石冈,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除上高知县。征授御史,出按河南。嘉靖年间,累迁兵部右侍郎。以修浚徐、吕二洪,拜南京右都御史,召为工部尚书,改左都御史,又代为兵部尚书兼督团营。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以旂集廷臣会议,力主曾铣所议。帝意忽变,严旨咎铣,以旂惶恐,尽反前说。曾铣逮杀,以旂代为总督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数破敌军。延绥、宁夏开马市,市马五千余匹,市终无哗。在镇六年,修延绥城堡四千五百余所,又筑兰州边墙,边镇以安。加官至太子太保。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三日卒,军民为罢市。赠少保,谥襄敏。有《漕河奏议》、《襄敏集》。

王直勾结倭寇大举入犯东南沿海 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二十八日,海盗头目王直勾引倭寇,出动战船百余艘,同时在浙江台州、宁波、嘉兴、湖州以及苏州、松江和淮北等处沿海数千里地区内,大肆劫掠财物,残杀居民,掠夺男妇。是时沿海一带小民好乱者,相率入海从倭,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响导。据有关史料记载:真倭(日本海盗)不过十之三,假倭(中国居民)多达十之七。由于有大批中国人加入倭寇的队伍,因此倭患不仅屡扑不灭,而且气焰益张。继闰三月二十九日破浙江昌国卫(今浙江象山东南)之后,四月倭寇又犯太仓,入乍浦,攻平湖、海盐、海宁、上海、江阴诸地。倭寇所至,截杀明军,焚烧城镇,抢劫居民,奸淫妇女,破坏生产,成为当时我国东南沿海严重的社会问题。至同年六月,温、台、宁、绍、杭、嘉、湖以及苏、扬(州)、淮(安)十府各州、县、卫、所,被倭寇攻破焚掠者凡二十余处,历时三月,饱掠而去。

史道逝世 史道(1485—1553),字克弘,号鹿野,北直隶涿州(今河北涿县)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嘉靖十五年(1536),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创建城堡,又开垦耕地数万顷,进兵部侍郎,负责大同、宣府马市。嘉靖三十年召回北京,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逝世,年六十九。

诏设江淮副总兵提督海防 嘉靖三十二年(1553)五月二十五日,南京兵科给事中贺泾奏言:倭寇驻泊宝山,据海为险,乘风肆虐。臣以为南京为根本重地,镇江、京口,为江、淮咽喉;瓜步、仪真,为漕运门户,宜仿照嘉靖八、九等年例,增设总兵官驻扎镇江,整饬江洋,总制淮海,并辖苏、松诸府。兵部议复,世宗下诏设江淮副总兵,提督海防,驻金山卫,并命福建福、兴、漳、泉参将汤克宽任是职。

祁清请裁革冗费 嘉靖三十二年(1553)六月初二日,南京科道官祁清、徐栻,以全国灾伤重大,请革冗费。疏称:今天下被灾地方,不独山东、徐州,邳州,南直隶、山西、陕西、湖广、浙江诸省,亦皆水旱频繁,非破格减免救济,不足以苏民困。目前京师库藏已经空虚,各省搜括已经枯竭,额外征求未已,军需供应尤繁、土木工程频兴,治河之费日广,司农朝不夕给。减免救济费用,从何而出?臣等苦于无计可施,唯有请求裁革冗费,节省繁文,加意节约。户部议复,请通令各省抚、按官相机调查处理。

礼部议定王府庶人口粮 嘉靖三十二年(1553)六月初六日,经礼部会议奏定王府庶人口粮:岁给米七十石,妻妾子女及使女皆衣食其中,不必计口更给;擅婚者岁给米五十石;传生者减庶人之半,每年给米三十五石。此例由世宗批准,通行各王府。

师尚诏起义 师尚诏(?—1553),河南柘城人,以贩盐为生,率数千人起义,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二十六日,攻陷归德(今河南商邱),释狱囚,夺库银。不久,聚众数万人,破柘城、鹿邑诸县。其后分兵在西华、太康、扶沟、许州(今许昌)、临颍等地

流动作战,屡败官军。后为明将曹邦辅袭击,于同年九月转战皖北,转入山东。十月,师尚诏在山东莘县被俘,世宗下令就地处斩,起义失败。师尚诏起义历时四十余日,先后攻破一府、二州、八县,豫、皖、鲁三省为之震动。

万镗削籍 万镗,字仕鸣,进贤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正德中,历任刑部主事、吏部文选郎中、太常、大理少卿。世宗嗣位,进顺天府尹,累迁南京兵部侍郎、右都御史。应诏陈言忤旨,斥为民。以严嵩荐,起副都御史,迁兵部侍郎、南京刑、礼二部尚书,召掌刑部。嘉靖三十年(1551)十月代李默为吏部尚书。万镗为严嵩所引,每事委随,又颇通馈遗。嘉靖三十二年八月五日为严嵩义子赵文华所劾,命削籍。隆庆初复官,赠太子太保。

工部铸钱 民间流行滥恶钱,概以三、四十文当银一分,后来又加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至以六、七十文当一文,翦楮夹其中不可辨。于是给事中李用敬上疏,请以制钱与前代杂钱并行,上品者均按七文当银一分,其余视钱高下分为三等,下等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私造滥恶钱,一律严禁通行,犯者置于法。世宗可其奏,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初二日命工部铸造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嘉靖钱千万锭,每锭五千文。是时税课抽分诸厂,专收嘉靖制钱,民苦钱少,遂用大学士严嵩等人的意见,发内库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给官吏俸粮。又令通行历代钱,有以新、旧钱及铜销为造像制器之用者,按《盗铸律》论罪。至同年十二月初三日,严嵩奏:户、工二部核计铸钱一千九百万锭,需工料银三千一百八十二万零七百七十余两。今户部太仓库贮银仅有一百五十三万六千两,已不敷京、边岁用之数。工部节慎库贮银仅有七十万两,尽数用以铸钱,尚不及十分之一。若行于各省,又恐扰民。今时值灾荒,无从筹措,请嘉靖钱量为依式铸造,陆续解进。世宗从其言。

应槚逝世 应槚(1494—1553),字子材,浙江遂昌县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历任刑部主事、知府、山东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兼山东巡抚、山西巡抚。嘉靖三十年,进为兵部右侍郎,总督漕运。不久,以本职兼右佥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官,年六十,赠兵部尚书。应槚为人和雅有度,贞介自持,居官务实。有《总督苍梧军门志》。

运米宣大昌平三镇 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二月初二日,世宗命运京、通仓米十五万石给宣大二镇、十二万石给昌平镇,作为明年军饷。

蠲免苏松诸府旧欠税粮 江南苏松诸府素为国家财赋重地,由于倭寇大举入犯,致使赋税无从所出。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二月十二日,应原应天巡抚(时已进为南京工部尚书)彭黯之请,下诏免去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遭受倭祸地区,自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所欠田赋,并停征各项改派。

官军平元江 云南元江土舍那鉴兴兵作乱,沐朝弼集土、汉兵会同监督王养浩攻之,那鉴兵败求降。时值发生瘴毒,官军撤退。世宗闻讯,下令克期进剿。新任云南巡抚鲍象贤赴职之后,重新调集土、汉兵计七万人,广备粮草,分兵进剿,以期必胜。那鉴大惧,服毒自尽。鲍象贤遂令百户汪辅入城招抚其众,擒杀首犯,众皆受降。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元江遂平,边民安居。

《水东日记》刊行 《水东日记》四十卷,叶盛撰,初刻於明弘治间常熟徐氏,共三十八卷;嘉靖三十二年(1553),由叶盛玄孙叶恭焕补刻,始为四十卷。叶盛(1420—1474)字与中,江苏昆山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历仕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由於作者久居官场,见闻亦广,又留心掌故,深入考察朝廷旧典,因而对各项制度及其沿革利弊言之甚悉。书中记述了明代前期的典章制度,边政意见,及一些时人轶事,多悉耳闻目睹,可补史传的不足。所录宋元及明人的奏议、诗文也很有参考价值。

葡萄牙侵占澳门 嘉靖三十二年(1553),佛郎机(葡萄牙)人以舟触风涛为由,请求借濠镜(澳门)地曝晒水渍贡物,得到海道副使汪柏的许可,遂建篷数十间。明年,佛郎机通过周鸾冒用他国名义,诳报海道副使汪柏,汪柏受其贿,准许通市。佛郎机商船来,"照例抽分",佛郎机人"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至嘉靖四十三年,在濠镜居住的佛郎机人已超过万人。

廷杖言官 嘉靖三十三年(1554)正月初一日,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人上疏贺万寿,因贺表中失抬"万寿"二字,世宗大怒,令各廷杖四十。世宗历来酷待言官,加之专宠严嵩,受其纵恿,怒责群臣,以怵人心,钳制人口。至于在元旦之日尽杖言官,尤为无体。

河南藩府禄米的议定 嘉靖三十三年(1554)正月十一日,河南抚、按官以本省岁荒,所征折粮五十四万余石,不足以充藩府禄米,请量留临德等仓起运,折银以补禄米。其折银比例,依从周府旧例:始封者粳米一百石,内以七十五石折银,每石折银零点五两,另二十五石给以本色米;粟米九百石,每石俱折银零点三五两。袭封者粳米一百石,粟米四百石,本色、折色兼支,其折银比例与始封者同。将军、中尉、

主君、仪宾及周、伊二府镇国将军，俱全支粟米，每石折银零点三五两。后经户部议，认为河南禄米，每年以零点八两征收，以零点五两和零点三五两放支，一岁所入，尚有所积，而罚金、商税亦可用于补禄米之不足。并拨保定各仓粮价银三万二千余两，补贴河南禄米。

诏停边选事例　先是，因边方乏才，每年春天准许北方举贡监生减年就选，吏部俟边吏有缺，即依照一年一选之例，不时补用。而正选守部者，又以年次不当补边方，以致停壅，公私咸为不便。于是吏部尚书李默上疏极言边选之弊，认为祖宗创制以来，每岁六选，其法最为精密。近年酌行边方事例，已非旧制。今加立边选名色，门径愈多，吏道益杂，承用不便。明世宗以为然，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正月十六日下诏停罢。

倭寇大肆流劫东南沿海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继续入犯沿海地区，大肆劫掠。正月二十七日，倭寇自太仓、南沙溃败突围，转掠苏州、松江各州县，占据南沙五个月，明军重兵围困而不能破。二月初九日，倭寇再犯松江府，明军攻之，不能敌，县丞刘东阳战死。三月二十五日，倭寇自苏、松抢夺民船入海往江北，攻通州、泰州等城，焚掠各地盐场，并分兵剽掠青州、徐州等地，山东震动。同时再犯浙江宁波普陀山，参将俞大猷率将士攻之，败绩，阵亡三百余人。四月初五日，倭犯嘉兴，明军四百余人被杀，五百人溺死于水。初八日倭寇攻陷嘉善，掠海宁等县。十二日，攻通州，扬州千户洪岱等人俱战死。十五日陷崇明，知县唐一岑死于阵。五月初三日，大掠苏州昆山县。六月，倭自苏州转掠嘉兴，明军都指挥夏光阵亡，军大败。七月初八日，倭由苏州流劫嘉善，欲由吴淞江出海，参将俞大猷统兵出击，俘倭七人，斩二十三人。八月十五日，倭自嘉兴回兵柘林等处，进攻嘉定县城，被创退据罗店。九月十七日，倭犯海门县。十月，倭寇二万余人占据拓林等处。十一月二十五日，倭自柘林分兵掠嘉兴、湖州二府。十二月，倭以围嘉兴府不克，分兵劫秀水、归安诸县。不久，转掠嘉善，知县邓植弃城逃遁，居民受害。

顾应祥致仕　顾应祥(1483—1565)，字惟贤，号若溪，浙江长兴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饶州府推官、广东佥事，御寇有功，累官至刑部尚书，奏定律例。时严嵩专权，顾应祥以耆老自居，严嵩恨之，改为南京刑部尚书。嘉靖三十三年(1554)二月十二日，因论决狱囚延误时间，被劾致仕。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初六日死，年八十三，赠太子少保。著有《惜阴录》、《南诏事略》、《授时历撮要》、《测圆海镜分类释术》、《孤矢算术》等。

彭黯削职为民　彭黯，生卒年不详，字道显，江西安福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礼部主事，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应天，总理江南税粮。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十四日，进为南京工部尚书。次年二月二十六日，巡按直隶御史孙慎疏劾彭黯在巡抚任上时，身居重任而不能出死力，以致倭患不止，地方受害。世宗大怒，命锦衣卫将彭黯械送至京，下狱严刑拷打，削职为民，不久死于家。

屠大山出任应天巡抚兼提督军务　应天诸府，原设巡抚一名。嘉靖三十二年(1553)应天巡抚彭黯离职之后，由江西布政使陈洙暂时代理，世宗命再择忠谨可任者为之。吏部尚书李默奏言：苏松巡抚(即应天巡抚)所辖十二府州，地远不便兼辖。且当江南倭患、军兴之际，调兵运饷，难责一人，请增设提督军务大臣一员，专责剿贼(主要是指倭寇)，而令巡抚专督军饷。兵部认为：兵粮两分，行事不便，不如依照近年浙江添设提督军务都御史之例，令提督、巡抚合为一人，以专责任。世宗以为然，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月初四日令陈洙另调别用，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屠大山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江南税粮、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有明一代，巡抚兼提督自此始。

更定钱法　民间私铸的滥恶钱充斥市场，致使物价日益腾贵。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世宗令工部铸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九朝年号钱，每种一百万锭；嘉靖钱一千万锭，每锭五千文。给事中李用敬为此上疏：请以嘉靖钱与前代杂钱并相通行，嘉靖通宝钱以七文作银一分；洪武等年号钱与前代杂钱，上品依嘉靖钱例，七文准银一分，其余视钱高下或十文，或十四文，或二十一文准银一分；一切私造不堪滥恶钱悉行禁止，犯者治罪。世宗从其奏。而官府征税，则专收银或嘉靖钱，民苦钱少。于是又用严嵩等人的建议，发内库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给文武百官的俸粮。由此造成严重后果。于是御史何廷钰奏言：请准许民间用小钱，以六十文作银一分。户部尚书方钝、郎中刘尔牧皆以为不可，竭力反对。何廷钰即诬奏刘尔牧诽谤朝廷用财如泥沙，不加爱惜，又说刘尔牧反对皇帝一意斋醮玄修，同时论劾方钝。世宗览何廷钰奏疏，大怒，命廷杖刘尔牧一百，革职为民，方钝姑贷不问。并采用何廷钰的意见，于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初八日下诏，令民自便，规定嘉靖制钱七文当银一分，洪武等年号钱十文准银一分，前代杂钱三十文作银一分。民间久行的小钱因下令严禁，竟不再用。自此之后，民间竟

相私铸嘉靖钱，与官铸钱通行并用，亦为明代钝法之一大变化。

犯罪军官子孙革袭条例的制定 兵部曾议定犯罪军官子孙革袭条例，奉旨施行。至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月初九日，腾骧左卫舍人乔应龙以其高祖千户乔顺在洪武中论死，例当革去袭封，遂上疏言：臣高祖在国家开创之初，以从征被刑，与洪熙以后和平时期犯法抵罪者不同，故我子孙数代皆得承袭官职。今一旦革罢，恐非朝廷所以恤录军功之意。兵部复议，请以乔应龙为例，凡军职犯罪典刑或监故充军者，系洪武、永乐间已经承袭的，俱照旧不动；凡洪熙以后犯罪者，始予查革。世宗许其奏。

吏部奏陈救荒事宜 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月十一日，世宗以外患日炽，连年灾荒，百姓饥困，严责吏、兵二部及内外官员务以恤民养军为急务，如或误事必罚无赦。吏部为此奏救荒四事：一、停征旧欠钱粮。二、清理狱囚，收拾民心。三、惩治贪官污吏。四、严杀暴横，凡抢劫商贾者必予逮捕问罪。疏上得旨：俱依议施行。

陆杰逝世 陆杰(1488—1554)，字元望，号石泾，浙江平湖县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历官兵部主事、江西按察使、湖广巡抚。进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督修显陵和太和山玄帝宫两处工程，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月十二日卒于官，年六十七，赠工部尚书。

欧阳德逝世 欧阳德(1496—1554)，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历六安知州、南京刑部员外郎。有文行，改为翰林院编修，充经筵讲官。迁南京国子监司业，进南京尚宝司卿、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太常寺卿。不久，以太常寺卿掌国子监事数月，升为礼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任《大明会典》副总裁，教庶吉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卒于官，年五十九，赠太子少保，谥文庄。欧阳德从学于王守仁，讲学以真知实践为主，遇事守正，素为舆论所推重。有《欧阳南野集》。

明军孟宗堰之败 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初五日，倭寇自海盐至嘉兴，参将卢镗率兵抵御，倭寇稍退。第二天，复战于孟宗堰，倭寇设伏，明军丧兵一千四百七十五人，都司周应祯、指挥李元律、千户薛纲、宋应澜等战死。倭寇乘胜占据海宁石墩山，分兵四掠。

黄国用疏言盐政 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二十日，广西道御史黄国用上言盐政六事：一、专掣放以免壅滞。二、定分拨以绝奸利。三、均丁力以省偏累。四、酌伏恤以杜纷扰。五、停垦田以足煎烧(不开草荡为田，保证煮盐燃料)。六、严稽察以防侵越。户部复议以为可行，但三、五、六三条须经有关衙门进一步商议定夺。

吐鲁番等人贡 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吐鲁番、天方、撒马儿罕、鲁迷四地面番王速檀、沙母、沙法儿等，各遣人入朝贡方物，宴赉如例。

乌思藏入贡 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初八日，乌思藏辅教王、阐化王、阐教王、大乘法王、大宝法王各差国师、番僧札吧坚参等来朝贡方物，宴赉如例。

张经总督六省军务 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曾奏陈：洪武间以倭寇侵扰，命信国公汤和经略海防，凡闽、浙沿海之地，陆有城守，水有战船，故百余年来，倭寇不敢入犯。其后法弛弊生，军士有纳料放班之弊，于是强富者放遣，老弱者充役，战船损坏，废弃不修，以致倭寇乘虚而入。请行令各省巡抚严督所辖之区，预集兵船以守要害，追捕纳料逃去军士以实行伍，清理历年积压料银以造战船。张经疏上，朝议以为然。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十八日，给事中王国桢等人以倭寇猖獗，逼近南京，上疏请设总督大臣，督理南直隶、浙江、山东、两广、福建等六省军务，使其调兵筹饷，得以便宜从事。经廷臣推荐，世宗于是日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六省军务，专事剿倭。

诏令对倭寇剿招并行 自海盗头目王直勾引倭寇大举入犯东南沿海以后，廷臣对王直的政策多有分歧。一部分人主张，王直虽然危害甚大，但已有悔过表现，应予招抚。而兵科都给事中王国桢等人则认为：胁从之贼可以招抚，首恶之贼决不可招抚。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二十六日，世宗从王国桢所言，但仍令六省总督大臣张经："剿抚并行，毋误事机。"

官军兵败大同 嘉靖三十三年(1554)六月初四日，俺答兵万余人入寇大同，总兵岳懋中伏战死，大同守军败退。世宗下诏，将原任宣大总督兵部尚书苏祐、大同巡抚都御史侯钺革职，并械逮京师问罪。同时令发库银五万两，以刑部右侍郎陈儒兼右佥都御史赈济大同，总督许论暂兼大同巡抚。

沈应龙罢官 沈应龙，生卒年不详，字翔卿，浙江乌程县(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历刑部主事、郎中，平冤狱数百人。进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遇大饥荒，多次上疏请发钱粮救济，救活饥民八十余万。及进南京刑部右侍郎，即于嘉清三十三年(1554)六月二十七为兵科给事中殷正茂劾其

贪墨不职。世宗遂令沈应龙回籍听用。家居时中风死,年五十六。有《恤刑录》等书。

赈济宣大二镇 嘉靖三十三年(1554)七月初二日,世宗下诏加发太仓银十万两赈济宣府、大同二镇,并命刑部侍郎陈儒勘核宣、大二镇屯田及所需饷银当用本、折事宜,据实奏报。同月十五日,又令发太仓银五万两给宣府。

命撰玄文 世宗迷信道教,一心修仙。嘉靖三十三年(1554)七月二十日,特命驸马都尉邬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吏部尚书李默、礼部尚书王用宾、左都督陆炳同时入值西内,又命署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署翰林院礼部左侍郎闵如霖、吏部右侍郎郭朴、礼部右侍郎吴山并撰玄文。后来,邬景和因不懂玄修文理,世宗不悦,罢其入直西内。未几,赏赐入直诸臣,邬景和辞谢,且说:臣愿洗心涤虑,效马革裹尸之报。世宗怒其怨讪,遂夺爵为民,安置于昆山。

户部请催督起运各省存留余银 嘉靖三十三年(1554)七月三十日,户部请催督起运各省存留余银,以济京、边之急。又言:山东临清、德州二仓夏税秋粮自本年开始,每石折银钱。令富豪大户买米上纳,近地自运本色者,听从民便。世宗俱允其奏。

筑城御倭 嘉靖三十三年(1554)八月初一日,世宗命总督漕运侍郎郑晓督修如皋、海门、泰兴、海州、盐城等处城池塞堡,以防御倭寇。时江南北诸县皆无城,自是筑城固守,倭小入则各自为战,大入则塞堡相联,合力抗击。

明军采淘港之败 嘉靖三十三年(1554)八月初三日,倭寇进攻嘉定县城,与明军募兵参将李逢时、许国及山东民枪手六千人相遇,大战于新泾桥。倭寇败,退据罗店镇,明军追杀不舍,擒斩八十余人。八月二十二日,明军追至采淘港,乘胜深入,遇倭寇伏兵四起,大败,溺水死者一千余人,指挥刘勇等阵亡。十月,应天巡抚屠大山,参将李逢时、许国,副总兵解明道,均以采淘港战败逮问。屠大山罢黜为民,李逢时、许国、解明道论死。

徐鹏举请增造南京新江口兵船 南京新江口,原额设兵船四百艘。后操江都御史潘珍奏减其半,余下二百艘。嘉靖三十三年(1554)八月二十九日,魏国公徐鹏举以倭寇连年扰乱,兵船不足用,上疏请改沙船,并增造二百艘,以复旧额。世宗从其请。

陈圭逝世 陈圭(1509—1554),字世秉,南直隶合肥县(今安徽合肥市)人,平江伯陈瑄后裔,嗣爵平江伯。领宿卫,掌京营佥书中军府,被荐出镇两广,督将讨平封川等地农民起义,加太子太保。召入北京,掌后军府。进总督京营戎政,提督京师外城工程,工成,加太子太傅。嘉靖三十三年(1554)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官,年四十六,赠太傅,谥武襄。

倭寇二次劫掠浙江 嘉靖三十四年(1555)正月初一,海盗头目徐海勾结倭寇,自柘林夺船犯浙江乍浦、海宁,攻陷崇德县,转掠塘楼、横塘等处。其后又攻德清县,杀明军把总梁鹗、指挥周奎、孙鲁、百户陆陵、周应辰、理问陶一贯等。同时围杭州城外数十里,流血成川。时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张经驻嘉兴、浙江巡抚李天宠守杭州。张经以所调狼兵和土兵俱未至,持重不发。

屠侨逝世 屠侨(1480—1555),字安卿,号东洲,浙江鄞县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监察御史,升保定知府,迁光禄、大理寺卿。进刑部侍郎。历南京刑部尚书、刑部尚书。世宗时,改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九年,加太子太保。屠侨历官四十余年,素以清正著闻。嘉靖三十四年(1555)正月十一日卒于官,年七十六,赠少保,谥简肃。有《东洲杂稿》、《南雍集》等。

陈儒勘核宣大二镇侵没屯田 明中叶以后,屯田多被将官侵吞。嘉靖三十四年(1555)正月十三日,刑部左侍郎陈儒奉命勘核宣府、大同二镇屯田,查出宣府额外侵没之数四千零五十余顷,大同五百八十余顷。于是奏言:请将被侵屯田一概定则起科;将官侵盗边饷以及私役人夫等俱应抵罪。诏可其奏。

周珫请免苏松诸府税粮 嘉靖三十四年(1555)正月二十八日,巡抚应天都御史周珫奏:苏松二府连年遭受倭祸,请将去年税粮尽数减免。华亭、上海、嘉定、崇明四县,受害尤为严重,请发银赈济。后经户部议定:苏、松嘉靖三十三年民粮存留者俱如数减免不纳;起运者,除派内府及王府粮米和所议改折外,俱暂时停止征收。华亭、上海、嘉定三县各扣京库米四万石,崇明给银一万两,救济被兵火所害的贫民。世宗允准。

周珫疏言御倭十难三策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二月初八日,巡抚应天都御史周珫疏言御倭十难、三策。十难为:一、倭寇来去飘忽不定,难以测知。二、海岸线长而曲折,难以守御。三、水陆交错,难战。四、倭寇奸诈多端,其计难知。五、倭寇盘据坚久,难备。六、居民脆弱,难使。七、土地泻卤,难以筑城。八、主客兵力有限,难以长久维持。九、粮草缺乏,难以筹集。十、将领骄横而懦弱,难以信任。御倭三策为:一、增建战船,占据要害,来则击之,去则捣之。二、集沙船五百艘迭哨于苏州海口,选士兵万余人守戍于松江护塘,倭寇登岸即掩击于其中。三、集苏、松轻便战船五、六百艘游哨于黄浦、吴淞、太湖等处,使

倭寇步不敢深入，舟不敢横行。同时，请尽快征调狼兵、土兵、漳兵，并留淮、浙余盐银十万两或借南赣军饷八、九万两为粮、赏之需。世宗俱予照准。

增定律例九事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二月十六日，刑部尚书何鳌进律例九事：一、凡强奸缌麻以上亲之妻，如奸前夫女律，奸夫发卫充军，妇女归宗，听夫嫁卖。二、凡用财货冒袭军职者，一律不得袭，其保勘官罢职，若受赂有赃，依枉法论处。三、宗室悖违祖训，出城或赴京者，降为庶人，如有别项情罪，禁锢高墙。四、沿边军职有科敛入已，赃私至二百两上，永戍边卫；四百两上，斩首枭示。五、各沿边沿海及内地府州县卫所，遇寇不能固守以致城陷，被贼杀掳三十人以上、烧毁官民房屋，均按将帅失陷城塞律斩首。六、凡抢夺三次，俱按窃盗三犯律绞。七、军职倚势役占，或受财卖放余丁至三十名以上者，俱比照军职卖放正军包纳月钱至二十名以上律，罢职戍边。八、宗室互相讦奏，或行勘未结而诬奏勘官，或以不干己事捏奏抚按官者，不论事情轻重，均寝不听。宗室奏事应行勘者，俱由巡按官查勘。九、军职犯有人命、失机、强盗死罪及减死充军者，不论典刑监故，其子孙俱不许袭沿边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卫所武职。世宗诏准施行。

赵文华察视江南军情　工部右侍郎赵文华，曾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二月十五日疏言防倭七事：一、遣官至江南祭海神。二、令有司收埋尸骨、减轻徭役。三、增募江淮壮男为水军，大修战船，以固海防。四、增收江南田赋，苏、松、常、镇四府民田一夫过百亩者，重科其赋，同时预征官田税粮三年。五、令富人输财力自效，平息倭患之后论功，或予免罪。六、派重臣督视江南军情。七、招抚通番旧党、盐徒打入倭寇内部，侦察敌情。赵文华之疏呈上，兵部以为一、二、三、五、七五项可用，四、六两项不可行。世宗不同意兵部的意见，下诏严厉谴责，并罢免兵部尚书聂豹。礼部遂复议，从赵文华所言。世宗问首辅严嵩派何人祭海神和督师江南，严嵩说：倭贼侵扰苏、松诸府为时已经二年，调兵无见实效，奏报或多失实。宜如礼部所言遣大臣往祭，并宣布朝廷德意，即令察视江南倭情。请派赵文华担任此职。世宗用严嵩言，于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命严嵩的亲信赵文华祭告海神兼督视江南防倭事。时人就此事评论说：国家遭受倭患，军费开支浩大，应当省事省官，减少地方负担。今反“颠倒是非”，遣官祭告海神，劳民伤财，重扰地方。赵文华到任以后，公私财贿俱入其室，江南为之困敝。他又恃宠牵制兵权，“颠倒功罪，以致纪律大乱，战士解体，虽征兵半天下，而贼势愈盛。此皆严嵩任用非人之罪。”

聂豹闲住　聂豹(1486—1563)，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县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华亭县令，升御史，历官苏州、平阳知府。擢陕西副使。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兵部右侍郎，改左侍郎。嘉靖三十一年任兵部尚书，上疏议防秋事宜，又请筑京师外城，均被采纳，加太子少保。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京师外城完工，进太子太保。嘉靖三十四年二月，上疏反对增设巡视福建大臣和开放沿海互市，世宗大怒，于二月二十九日勒其罢官闲住。嘉靖四十二年逝世，年七十七。隆庆初赠少保，谥贞襄。聂豹好王守仁心学，后以弟子自处。有《困辨录》、《双江集》等。

议处入京民兵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初四日，兵部尚书杨博奉诏议处民兵：京城民兵之设始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之后，其时仓促召募，类多乌合，继而渐次逃去，虚冒粮草。今查在伍之数，强弱相半。请令所司革其老弱，留其精壮。其来自真定、保定等府者，发付各兵备道，充为民兵；在京者，仍由巡捕、参将管摄，与尖哨军人共同巡视城防。凡逃去者，一律不补。世宗下旨：民兵影占杂役，数多徒耗粮草，无补实用。后经巡视京营科道官会议，留其精锐可用者四百九十四人，其余一千多人皆送回原籍。并将占役兵马数多，纵恣乱法的原任兵部职方郎中张重革职闲住。

漕泾之战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初四日，倭寇据川沙、柘林，派遣八千余人犯金山卫。明军总兵俞大猷遣游击白泫等人率广西狼兵夹击，稍有小胜。至漕泾，遇倭数百人，与战不利，丧失二千余人，狼兵头目钟富、黄维等十四人死。起初，倭寇甚惧怕狼兵。经曹泾一战，知狼兵不堪一击，更加疯狂地纵掠淮、扬诸府，犯通州(南通)、海门、常熟、江阴等处。而狼兵遣还不去，在东南沿海地区亦肆意杀掠，祸害几如倭寇。

赐宁安公主庄田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十二日，诏驸马都尉李和于后军都督府带俸，岁禄二千石，并赐给宁安公主仁寿、未央二宫庄地一千一百五十四顷八十六亩。

增铸铜钱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十四日，兵科给事中殷正茂说：今财用不足，惟有铸钱可助国计。户部复议，可在产铜的云南、两广、山东、福建等省铸造铜钱。世宗从户部所议。

裁革侍卫官旗将军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十五日，兵部右侍郎沈良才奉诏裁革侍卫官旗将军二百零三人，留一千二百八十六人。

官军歼灭广东海盗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

月二十日，广东海盗徐铨、方武等，与东南海盗首领王直纠引日本和西洋诸国海盗，纵横海上。两广总督鲍象贤令海道副使汪柏督军讨伐，杀死徐铨等一千二百余人，招抚三百五十余人，海疆稍靖。

张经王江泾大捷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初一日，盘踞柘林(今上海市奉贤县南)的倭寇会合新倭四千余人，突犯嘉兴府。总督张经派遣参将卢镗督率狼、土兵水陆夹击。保靖宣慰使彭荩臣首战于石塘湾，倭寇败走平望。副总兵俞大猷与永顺宣慰司官彭翼南合兵出击，倭寇败奔王江泾(在嘉兴北)。保靖土兵又猛攻其后，倭寇大败，被斩一千九百八十余人，焚溺死者无数，余众逃归柘林不出。明军放火焚其巢，倭寇遂驾船出海逃遁。王江泾大捷，是嘉靖间自与倭寇开战以来，明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战功称第一”。

马头镇之战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十一日，倭寇五十余人自山东日照县登岸，沿途流劫东安卫，至淮安赣榆、沭阳、桃源等县，杀害两省民人一千余人。倭至淮安清河县，因雨受阻，徐、邳官兵合击于马头镇，斩倭四十一人。

王𫓧抗倭而死　王𫓧(1514—1555)，字德成，号苍野，北直隶顺天府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常熟县令。倭患起，王𫓧积极练兵守土，数灭倭寇，有大功。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寇犯常熟，屡攻不克，遂移舟泊三里桥。知县王𫓧、乡官参政钱泮率民丁家兵追击至上沧港，于同月二十四日为倭寇伏兵所杀，年仅四十二，巡按御史金浙上奏其事，诏赠王𫓧为太仆少卿，钱泮为光禄寺卿，各荫一子锦衣卫世袭百户，并赐祭立祀，岁时祭祀。

钱𬭚战死　钱𬭚(1524—1555)，字鸣叔，号鹤洲，湖广钟祥县(今湖北钟祥)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知江阴县。钱𬭚刚果放任，修城池，练士卒，备战抗倭。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倭寇三千余进攻江阴县城，钱𬭚提督狼兵，招募壮士，视死如归，背城决战。狼兵溃败，钱𬭚提兵再战，中伏身死，年三十一，赠光禄少卿，荫锦衣卫百户，立祠祭祀。

周琉削籍　周琉，生卒年不详，字润夫，号石崖，湖广应城县(今湖北应城)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户科给事中，上疏谏世宗南巡，被贬为镇远典史。后累官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诸府。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疏陈御倭有十难、三策，五月进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浙直军务。胡宗宪欲夺其位，赵文华即上疏劾周琉，荐胡宗宪。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周琉遂被削籍为民。

宋爱起事　嘉靖三十四年(1555)六月十九日，山西矿徒宋爱等人集众起事，攻打北直隶定州，越入阜平、曲阳、行唐等县。官军进剿不能克，百户屈伸等十七人被杀。诏令山西、北直两省镇、巡官调兵围剿，起事遂告失败。

倭寇进犯安徽诸县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十三日，倭寇小股自浙江杭州转西流劫今安徽歙县、绩溪、旌德、泾县、南陵等县。同月二十四日，倭犯南京，不克，遂趋秣陵关(今南京市南)而去。

核查太仓中库积贮之数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十六日，世宗命查太仓中库积银额数。户部遂奏言：以往财赋入多出少，库藏充盈，续收银两存于两庑，以便支发。中库所积不动，于是有老库之称。嘉靖十八年以后，因边方多故，支出八十八万九千两。今实存银为一百一十三万六千余两。得旨：中库所贮为备缓急之需，务足一百二十万两之数。非有旨钦取，不得妄用。

杨林桥之战　倭寇自南京流劫溧阳、宜兴。闻明军自太湖出兵，遂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走一百八十余里，到达浒墅关(今江苏苏州西北)。是时盘据在松江柘林(今江苏奉贤县南)之倭，逃遁入海，遭风坏船，剩余三百余人，登岸至松江陶宅镇(今江苏奉贤县东)。巡抚应天右佥都御史曹邦辅，为阻止二股倭寇合而为患，亲督副使王崇古，会合各路军队扼守东路，四面围击，斩倭十九人，倭惧，欲暗中走太湖。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三十日，明军追至杨林桥，将入据浒墅关的倭寇全部歼灭。此股倭寇自浙江绍兴高埠奔窜不过六、七十人，流劫杭州、严州二府，转掠南直隶徽州、宁国、太平三府，再犯南京，行走数千里，杀伤明军四、五千人，杀死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入溧阳、宜兴二县，历时八十余日，始为明军所灭。

赵文华大败陶宅港　察视江南军情工部右侍郎赵文华与巡抚浙江右佥都御史胡宗宪征调浙江、南直隶两省精兵四千余人。浙兵由他和胡宗宪统领，直隶兵由曹邦辅督阵，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初三日，进攻倭寇据点松江陶宅港(今江苏奉贤县东)。倭寇集中主力，猛攻胡宗宪所率浙兵，诸营皆溃，死亡一千余人，指挥邵升等俱没于阵。曹邦辅所率的直隶兵亦中倭寇埋伏，死伤二百余人。“自是倭势益张”。

张时彻罢归　张时彻(1500—1577)，字维静，号东沙，浙江鄞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十二日，以倭寇犯南京，责其失职，勒令致仕。年七十八死于家。张时彻有

才名，有《芝园定集》、《善行隶》、《救急良方》等书。

悬赏购俺答之首 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世宗怒俺答自本年春至秋数次犯宣府、蓟州，杀害赵倾葵、李光启、丁碧三大将，再次下赏格，购俺答之首。赏格定：献俺答首者，赐银一万两，并授爵伯。

仇英逝世 仇英(1506—1555)，字实父，号十洲，南直隶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居苏州，为工匠。后从周臣学画，为文徵明所赞赏，因此知名于世。擅画人物，尤工仕女、山水、花鸟，善水墨、白描。毕生以卖画为生，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明四家"。嘉靖三十四年卒，年五十。

张经被杀 张经(？—1555)，字廷彝，号半洲，福建侯官县(今福建福州)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嘉兴知县。嘉靖四年(1525)，召为吏科给事中，历户科都给事中、太仆少卿、右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嘉靖十六年进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以镇压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有功，进兵部左侍郎。未几，与毛伯温定计抚定安南，进右都御史。平息思恩九土司及琼州黎民起义，进兵部尚书。后以忧归，服阕，命为陕西三边总督，被论罢官。嘉靖三十二年起为南京户部尚书，改兵部。次年五月，以东南倭寇猖獗，命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专办讨倭，便宜行事。时倭二万余人占据柘林、川沙，张经选将练兵，并请调狼、土兵。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初一日，张经获王江泾大捷，杀敌一千九百八十多人，为抗倭以来第一战功。而严嵩亲信、察视江南军情的工部右侍郎赵文华，为攘夺其功，竟在张经报捷之前秘密上疏，说王江泾大捷是他督师出战的结果，同时诬陷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不出兵作战。首辅严嵩却禀报世宗，赵文华所言皆为事实，并诬称苏、松人皆怨恨张经。世宗大怒，于五月十六日下诏逮捕张经。七月二十五日，张经被逮至京，详细奏明进兵经过，请予免罪。世宗不听，将张经下狱论死。同年十月二十九日，与李天宠、杨继盛一起被斩于西市。张经有智勇，能用兵，在江南抗倭期间御将帅，守要害，有功无罪。被严嵩、赵文华陷害而死，天下咸称其冤。隆庆初复官，谥襄敏。有《张半斋稿》。

李天宠被杀 李天宠(？—1555)，字子承，河南孟津县(今河南孟津)人。由御史迁徐州兵备副使，在通州、如皋一带抗倭。嘉靖三十三年(1554)六月，升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时倭寇劫掠绍兴，为天宠所歼。后倭寇犯嘉善，围嘉兴，劫秀水、归安，复陷崇德，赵文华诬谤李天宠嗜酒废事，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被夺职，而以巡按御史胡宗宪代之。未几，御史叶恩以倭寇北新关，劾李天宠，胡宗宪亦言其纵寇，世宗怒，于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下诏逮捕李天宠，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与张经等并斩于西市。李天宠在浙江巡抚任上，无"失律丧师"之罪，世宗听信赵文华谗言而杀之，时人皆以为冤。

杨继盛被杀 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县(今河北容城)人。七岁失母，十三岁始从师学，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从尚书韩邦奇游，手制十二律，吹之声毕和，邦奇大喜，尽以所学授之，声名益著。召改兵部员外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俺答寇京师，咸宁侯仇鸾以勤王得宠，冀以开马市与俺答媾和，幸无战事而固恩宠。嘉靖三十年三月，杨继盛奏言开马市十不可、五谬，被贬为狄道典史。嘉靖三十一年八月，仇鸾死，杨继盛回迁至兵部员外郎。时严嵩以仇鸾曾凌己，称赞杨继盛首攻仇鸾，复改其为兵部武选司郎中。然杨继盛恶严嵩甚于仇鸾，上任刚一月，即以忠君报国为己任，上疏极言严嵩十大罪、五大奸。遂为严嵩所害，下诏狱，杖一百。在狱期间，杨继盛惨遭毒打，但他刚强不屈，泰然处之。时有廷臣上疏营救杨继盛，严嵩党胡植、鄢懋卿劝严嵩不能养虎自贻后患。世宗初无杀杨继盛之意，而严嵩揣帝意必杀张经、李天宠等人，乃将杨继盛名窜入其中。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与张经、李天宠一起被斩弃市，时年四十。杨继盛临刑赋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天下臣民得知杨继盛被害，无不感泣，传颂其名，并由此更加痛恨严嵩。隆庆初年，抚恤直谏诸臣，以杨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后又建祠保定，名旌忠。有《杨忠愍集》。

倭寇人犯福建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初四日，倭寇二百余人入犯福建莆田县及镇东卫，明军千户戴洪、高怀、张鸾(銮)等奋战身亡。同月二十九日，倭寇又犯福建兴化平海卫以及福清等处，明军正千户邱珍、白仁、副千户杨一茂、泉州卫指挥佥事董乾震等俱力战死。

孙浚疏劾赵文华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督师江南、工部右侍郎赵文华以其松江陶宅镇败绩诬诋巡抚应天右佥都御史曹邦辅。给事中孙浚上疏力驳赵文华。说：赵文华称邦辅后至，贻误战机，但曹邦辅督俞大猷进剿时在九月十一日，而胡宗宪的浙兵至次日方进，所以罪不在曹邦辅的直隶兵，而在浙兵，况且苏松士民交口咸称曹邦辅"实心任事"，并力劾赵文华欺诳。世宗因疑赵文华欺妄。后来由于严嵩竭力为赵文华辨解，世宗竟不罪赵文华，而命逮捕曹邦辅。

开采四川等省银矿 世宗曾以各地进矿砂金

银,令开矿以助大工(宫廷大兴土木)。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初四日,又以军需困乏为由,令内阁和各部商议广开银矿。户部尚书方钝等奏言:请令四川、山东、河南抚、按官,严督各属官员加意探访,广为开采。世宗遂命先开四川、山东二省银矿。

陕西、山西发生特大地震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十二日,陕西华州(今华县)、渭南、山西蒲州、临晋等发生八级特大地震。已致仕的南京兵部尚书韩邦奇、南京光禄寺卿马理、南京国子监祭酒王维桢、郎中薛祖学、员外贺承光、主事王尚礼、御史杨九泽、分守参议白壁等人及其家属,同日被压身亡。渭南谢知县全家遇难。压死官吏军民仅奏报有名者八十二万余人,而未经奏报不知姓名者更不可数计。华州、渭南、华阴、三原、富平、朝邑、临潼、同州(今大荔);山西蒲州、临晋、猗氏、解州、万泉、荣河、夏县、安邑、芮城、平陆等地尤甚。是日午夜,声如轰雷,势如簸荡,大树如帚扫地。华州楼墙祠宇及公私庐舍一时尽毁,地陷城塌,地突起成阜,忽裂成涧,涌水成泉,山川移位,道路改观,墙无尺竖,死者十之六。渭南一夜连震二十余次,地裂数十处,水涌,有薪、有船板、有鲜黄瓜、深者二、三十丈。中街南北地陷一、二丈,城中人和街陷丈余。东郊赤水山陷入平地,高不盈丈。五指山毁削无存。渭水北徙四五里,死者十之五。潼关、咸宁城垣倒塌。山西蒲州地裂成渠,城庐尽毁,压死居民数万口。猗氏房屋皆倒,压死宗室职官居民以数万计。临晋城廓祠宇官民庐舍尽倾,压死人畜无算。荣河倒坏城垣及官民房舍万余,压死人甚多,地裂水深三四尺,余震不息。兴平、蓝田、鄠县、泾阳、高陵、盩厔(今周至)、醴泉、同官(今铜川)、耀州、澄城、韩城、蒲城、白水;山西闻喜、绛县、河津、稷山、永和、霍州等城垣多毁,压死人畜甚多。凤翔府、延安府、绥德州;山西平阳府;河南开封府、南阳府等亦震声如雷,墙庐倒塌,人畜死伤。京师获鹿连震三次,城垣庐舍多坏,各地多连震,蒲州连震三年多。这次地震波及陕西、山西、京师(今北京)、山东、南直隶(今江苏)、湖广、汉南等七省所辖一百三十余府州县,其中九十五府州县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次地震最远破坏距离约为450KM,最远有感距离约为800KM,震中烈度(Io)XI,震级(M)八级。

赵文华奏请还京 赵文华江南视师数月,怙宠恣横,牵制兵机,颠倒功罪,公私财赂,填满其室,致使损兵折将,倭寇气焰益张。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松江陶宅镇一战大败,他以为倭寇难平,欲推脱责任,遂乘川兵和俞大猷在周浦和海洋破倭之机,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疏谎称:明军水陆成功,江南清靖,请回北京。世宗竟从其请。然而,是时江南倭寇分兵流劫,殆无虚日。及赵文华离开江南,明军败报仍然络绎不绝。

兵败四桥 嘉靖三十五年(1556)正月二十二日,明军追击新场倭寇于松江四桥,遭到惨败,参将尚允绍、指挥李田、鲍东莱、千户郭勋、崔彦章、李尚节、李鼎、百户赵武、陈请俱战死,阵亡士卒四百余人。

杨宜夺职闲住 杨宜,生卒年不详,字伯时,号裁庵,北直隶衡水县(今河北衡水)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御史,出按河南,以平师尚诏起义,迁南京户部右侍郎。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代周琉总督浙、直、闽军务,专事讨倭。时倭势犹盛,杨宜虽为总督,而赵文华督察军务,威在杨宜之上。杨宜以张经、李天宠之祸,曲意奉迎赵文华。又以狼兵剽掠不可用,请募江、浙义勇、山东箭手,并调江、浙、福建、湖广漕卒、河南毛兵。值客兵大集,杨宜不能驭,川兵与山东兵私斗,几杀参将;酉阳兵溃于高桥,夺舟径归苏州。赵文华以明军久无功,请罢杨宜,以浙江巡抚胡宗宪代之。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初十日,杨宜遂被夺职闲住,因其数谄事赵文华,故得祸轻。

孙应奎致仕 孙应奎,生卒年不详,字文宿,号东谷,河南洛阳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授章丘县令。嘉靖初,历任兵科给事中、户科左给事中,曾两次坐事夺职。后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升户部侍郎,进尚书。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以后,孙应奎建议加派,自北方诸府及广西、贵州外,其他各地以地贫富为差,骤加田赋银一百一十五万两,仅苏州府即每年多征八万五千两。未几,孙应奎又以今岁入仅二百万两,而诸边军费六百万两,国用不足,一切取财之法已尽,请裁革冗员。皆得世宗允准。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孙应奎进呈京边备用粮草之数,世宗疑有侵冒,遣官核实。于是言官疏劾孙应奎粗疏自用,遂改调为南京工部尚书。移南京户部尚书。孙应奎初为谏官,不惧权贵,颇有声名。晚主国计,一切为苟且计,名义大损。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致仕,死于家。

李默入狱 李默(? —1556),字时言,福建瓯宁县(今福建建阳)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改庶吉士。嘉靖初,改为户部主事,进兵部员外郎。调吏部,历郎中。后被劾,贬为宁国府同知,迁浙江左布政使,召入为太常寺卿,掌南京国子监事。博士等官得选科道,自李默发之。历吏部左、右侍郎,进吏部尚书。自正德初年以后,吏部无侍郎拜尚书者。李默为尚书,出于皇帝特别任命,盖为异数。时大学士严嵩

柄政，擅权专横，李默事持己意，不为阿顺，严嵩由此怀恨李默，遂以推举辽东巡抚事，被夺职为民。不久，世宗下特旨复其官，入直西苑，进太子少保，又命兼翰林院学士。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赵文华因东南倭事受到世宗斥责，他知世宗好告讦，即以李默发策试选人，中有"汉武征四夷，而海内虚耗；唐宗攻淮蔡，而晚业不终"一语，上疏弹劾李默诽谤皇上。世宗大怒。同月二十九日，李默被罢坐狱，竟死狱中。李默为人博雅有才辨，以气自豪，不附严嵩。万历时，追谥文愍。有《建宁人物传》、《群玉楼集》。

李本考察两京大臣及科道官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吏部尚书李默罢官之后，世宗依内阁首辅严嵩之意，命大学士李本暂管吏部事。同年三月初四日，李本以管吏部掌考察，上疏奉言，用人之道在于斥除不肖，而去不肖，又必先自大臣始。疏呈上，世宗称其忠，命分别去留。于是，李本秦承严嵩的指意，大肆排斥异己，考察尚书、侍郎、九卿、巡抚、都御史等大臣，南京吏部尚书杨行中、南京礼部尚书葛守礼、南京刑部尚书陶尚德、户部右侍郎艾希淳、刑部右侍郎郑大同、工部左侍郎郭鋆等十五人，或被罢官闲住，或被勒令致仕，或被调外使用。三月初七日，李本又将三十八名科道官尽行罢免。被留用的御史，各杖四十。此次考察，李本勾结严嵩，以行其私，刑赏倒置。自此，不依附严嵩者，俱"屏斥无遗，故公论为之不平"。

诏留两淮余盐银为海防军费　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十二日，诏留两淮余盐之半，于南直、浙江总督军门，以备海防军费之用。

九卿科道官条陈抗倭十事　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十七日，兵部奉旨复议九卿科道官条陈御倭十事：一、选武将，可用者许立功赎罪，不习水战者宜罢。二、任文职，教练将士。三、精选练，革去老弱之兵。四、增兵饷。五、守要害。六、明职掌，分道统兵，各负其责。七、论奇功，破格升赏。八、分信地，各级官员必须固守各自属地。九、计职任，按官阶定擒斩之功。十、行抚谕，遣官敕朝鲜，令其传谕日本国王禁戢诸岛。世宗俱准施行。

倭寇焚烧漕粮　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十三日，倭寇三千余人犯镇江、瓜洲、仪真，焚漕粮三万四千石。复攻扬州，杀死明军同知、都指挥、千户多人。海盗头目徐海、陈东则各拥众万余人佯攻乍浦(今浙江平湖县东南)。

齐恩举家抗倭　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十六日，倭寇流劫无为州，同知齐恩率水军迎战，斩倭一百余人。齐恩长子尚文，次子嵩、叔仲实，弟宝荣，侄慎、寅、友良孙童及家丁钱凤等二十余人，俱随军抗倭。齐嵩年仅十八岁，骁勇善射，率先追击倭寇至安港，倭寇四面围攻，齐恩等二十一人俱战死，惟齐嵩、齐慎、齐寅三人逃脱。朝廷下令，赠齐恩光禄丞，录一子，厚恤其家，并建祠祭祀。

倭寇焚掠浙江各地　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十八日，倭寇再次入犯浙江慈溪。是时两浙俱为倭害，而浙东慈溪遭倭祸独惨，余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乌镇、皂林间，皆为倭巢，前后至者多达二万余人。

册封诸王及王妃　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二十日，遣广宁伯刘允中等为正使，翰林院修撰陈谨等为副使，册封载埢为商河王。子翊锜为安阳王。翊钫为万善王。朝壤为瑞淦王，夫人徐氏为瑞淦王妃。勤烄为海阳王。宙梳为新野王，夫人赵氏为新野王妃。弼渫为淳化王，夫人陈氏为淳化王妃。徐氏为堵阳王妃，虞氏为淮世子妃，王氏为永兴王妃。

三里桥之役　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二十三日，海盗首领徐海勾结倭寇一万余人行劫浙江皂林等处，将攻杭州，游击将军宗礼率九百壮士与倭血战于崇德三里桥，宗礼三战三捷，斩倭三百余人。徐海等俱畏惧，称宗礼为"神兵"。不幸桥塌，宗礼与镇抚侯槐、何衡、义官霍贯道皆死。倭寇乘胜进攻桐乡，久攻不克，遂流劫四乡。是役，宗礼所率皆勇士，以寡敌众，时人以为抗倭"血战第一功"。徐海等人自此气馁，不久即就受降。事闻，诏赠宗礼为都督同知，谥忠壮，荫一子世袭；指挥佥事侯槐、何衡各晋二级；霍贯道赠光禄寺丞。

邹守遇病死　邹守遇(？--1556)，字君哲，福建莆田县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历官江西学政、河南左布政。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师尚诏农民起义军攻陷归德府，邹守遇率兵进剿，因功进户部右侍郎。奉命往陕西祭告山川，赈恤贫民。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自陕回京时病死于河南。诏赐祭葬，赠右都御史，谥襄惠，荫其子为国子生。有《俟知堂集》。

潮州府大水　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大雨，山水大涨，城中公廨民舍漂没者十分八九，食货悉付波涛，数十年储聚毁于一旦。

赵文华督师江南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倭寇劫掠沿海郡县，扬言欲趋留都南京。世宗从巡按赵孔昭及巡江御史邵惟忠疏请，征调湖广、山东、河南、陕西诸路军马，保障留都。为协调诸军，兵部提出遣大臣一人督师。严嵩知世宗疑赵文华上奏欺诳，遂与其谋，命赵文华自请行。严嵩又对世宗说："江南人翘首望文华。"世宗即于同月初八日，命太子

太保、工部尚书赵文华兼右副都御史提督浙直军务。

悬示劝借赏格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十一日,因江南北倭患,诏令各处督抚官悬示劝借赏格。规定:凡军民输银一百两或米一百石以上者,敕旌其门。输银一百两、米一百石以下,及输银五十两、米五十石以下者,有司量加奖谕,以示激劝。

矿使四出害民 世宗曾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下诏广开银矿。嘉靖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蓟州王旺峪进紫矿砂一百五十斤。五月三十日,世宗以天地之宝不可不重,改派左通政王槐、锦衣卫千户金天爵以及内使二人往王旺峪采银矿。六月初二日,户部主事张芹进山东宝山诸矿金二百七十两、矿银二百余两。世宗以为少,命从实开取,严禁官民隐匿侵盗。又命未开之地,各令开采。未几,即派主事沈应乾赴河南采矿。"自是矿使四出为民患。"

俺答犯宣府 嘉靖三十五年(1556)六月十四日,俺答出动三万骑兵进犯宣府。游击张纮迎战,败死。九月,俺答出兵犯辽东平川、锦川等堡。十月,又掠大同。

乍浦之捷 先是,浙江巡抚胡宗宪计劝海盗头目徐海受抚,徐海同意投降。胡宗宪遂命徐海击盘据在吴淞江的倭寇,以为立功赎罪。徐海以为然,斩寇三十余人。与此同时,胡宗宪又命明军总兵俞大猷潜焚徐海的战船。徐海恐惧,以其弟徐洪当人质,并向胡宗宪献坚甲、名剑等物。胡宗宪因此厚待徐洪。同时令徐海擒缚另外二名海盗头目陈东和叶麻,答应给以世爵。于是,徐海擒缚叶麻,献给胡宗宪。这时胡宗宪又令叶麻致书陈东,图谋徐海。而暗中则将此书泄露给徐海。徐海中计,大怒,遂计擒陈东来献,且率其部五百人去乍浦(今浙江平湖县东南),扎营梁庄。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七月二十五日,梁庄明军一举焚毁乍浦倭巢,斩首三百余级,焚溺而死者亦三百余人。余倭狼狈逃窜入海,指挥邓城督兵追击,击沉其船,全部歼灭。

命各地采献灵芝 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十六日,世宗就古人曾用灵芝草作药一事,询问礼部尚书吴山等人。吴山等回答说:"久食有益于身,但服食之法,世未有传。"世宗遂下诏有司往元岳、龙虎、三茅、齐云及五岳等处采灵芝草,并访问民间。此时恰有宛平县民张巨佑采得灵芝五本,进献,世宗大喜,赏赐银币。"自是臣民献芝者不绝"。至嘉靖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礼部奏报:四方所献灵芝一千八百六十四本,世宗诏令要求径长一尺以上者。

胡宗宪诱杀徐海 徐海,徽州府(今安徽)歙县人。曾在杭州虎跑寺为僧,号明山和尚。后逃亡海上,从事走私贸易,成为王直部下的大头目,称"天差平海大将军",屡导引倭寇入侵沿海各地。浙江巡抚胡宗宪利用徐海与同伙陈东、叶麻的矛盾,分化瓦解,大杀其势,并悬赏招降。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徐海谒督府于平湖,稽首称罪。赵文华、胡宗宪、阮鹗厚犒之,命其屯居沈家庄受抚。至时,永顺、保靖、峒兵等皆应命聚集。赵文华乃遣使责问徐海屯沈家庄劫掠罪,徐海知有变,乃于庄外挖深沟以自守。八月二十五日,总兵俞大猷率兵一举攻克沈家庄,徐海投水死。是时,明军又在大隅岛主破倭寇,擒其岛方辛五郎。遂俘徐海弟徐洪、陈东、叶麻以及辛五郎和徐海首献于京师。徐海余党奔舟山,俞大猷统兵歼灭之。两浙倭患渐平。

命废徽王载埨为庶人 徽王载埨父厚爝结交方士陶仲文,并因陶仲文奏其忠敬奉道,被封为真人,赐金印。载埨嗣爵以后益以奉道取悦于皇帝。宫中有需,载埨辄先行奉献。南阳道士梁高辅年八十余,手指甲长数寸,自称能导引服食。载埨以其术和药以进,高辅得宠,拜散人,遂与载埨疏远,载埨忌恨。后来梁高辅为世宗进药,向载埨索取过去所炼之药,载埨不给,而给予陶仲文。高辅遂上言力诋载埨拆民居大兴土木,以及诈称张世德,微服自走南京、扬州选购美女,为官兵所获诸事。世宗怒,诏夺其真人印。时又有民人耿安上告载埨夺其女,世宗命下法司按治,有司于是尽发载埨不法事。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初十日,诏废载埨为庶人,幽禁凤阳。载埨自缢死,其妻妾皆从死。

杭州大火 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十三日未刻,杭州城内熙春桥起火,顷刻遍及数里,越城飞火至永昌坝,一夜始熄,焚数千家,烧毁官民房舍一万余间,清军察院、镇海楼俱毁。

广东陈以明起义 广东新宁、新会、新兴、恩平之间,皆高山丛菁,径道险阻,为瑶民居住之地。其时聚众万余,推陈以明为主,号"承天霸王",流劫高要、阳江等处,官军进山讨剿,屡战皆败。嘉靖三十五年(1556)春,广东巡抚谈恺征诸路土兵进剿,斩杀陈以明及其"飞虎将军"伍廷章、指挥白德元等。至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全部讨平。前后共斩获五百五十余人,听抚者二千五百余人。

何鳌致仕 何鳌(1497—1559),字巨卿,号沆溪,浙江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刑部主事。以谏阻武宗南巡被杖,声名大著。嘉靖初,议"大礼",逆旨,被廷杖几死。后历官郎中、湖广佥事、四川参议、江西左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改提督两广军务。未几,被劾贬官。复官原

职，总理河道，进刑部尚书。何鳌为人清正刚直，宽宏大度，有古代大臣之风，素为士论所推重。嘉靖三十五年(1556)十二月十四日因病致仕。嘉靖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三，赠太子少保。有《沅溪诗集》。

世宗自上道号 嘉靖三十五年(1556)，世宗朱厚熜上其父睿皇帝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其母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世宗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福建始设巡抚 嘉靖三十六年(1557)正月十三日，从工部尚书、提督浙、直军务赵文华之请，始设福建巡抚，统辖福建。并命浙江巡抚阮鹗为福建第一任巡抚，浙江巡抚由总督胡宗宪兼理。

焦栋逝世 焦栋(？—1557)，蒙古人。其曾祖父焦礼有胆略，精骑射，前后守宁远三十余年，天顺元年(1457)以守边有功，封东宁伯，世袭。焦栋于嘉靖中嗣爵东宁伯，提督五军营兼掌中府，任职十年，改为湖广总兵。嘉靖三十六年(1557)正月十三日卒。赠太子太保，谥庄僖。

太监李彬下狱论死 嘉靖三十六年(1557)二月初四日，锦衣卫左都督陆炳劾司礼太监李彬侵盗物料及内府钱粮数十万，私役军丁。世宗命逮李彬下狱论死，抄其家得银四十余万两，金珠珍宝不可胜数。

考察京官 嘉靖三十六年(1557)二月十五日，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京官，年老多病的有工部郎中徐九思等二十五人，奸贪的有兵部主事戴仁等二人，软弱无能的有工部郎中杨汝江等二人，不忠职守的有吏部员外郎李栋等一百零二人，浮躁不实的有户部郎中孟官等十九人，才力不足的有户部员外郎许彦忠等二十六人。诏令各罢官、降调如例。

闵如霖致仕 闵如霖(1503—1559)，字师望，号午塘，浙江乌程县(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改庶吉士，历编修、右中允、左谕德、侍读学士、太常少卿，掌国子监祭酒，升吏部侍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醇谨有文。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科道官陈志、赵钺等以考察拾遗，劾其不职，被勒令致仕。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初四日卒，年五十七。有《午塘集》。

卢绅致仕 卢绅(？—1561)，字汝佩，号书庵，陕西咸宁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历官遂宁知县、工部主事、郎中、湖广副使，终南京户部尚书。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科道官赵钺、陈志等以考察拾遗，劾其不职，与南京礼部尚书闵如霖等一起被勒令致仕。嘉靖四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卒于家。

倭寇大掠江北 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十一日，倭犯如皋，登岸焚劫。十七日，倭流劫海门县，凡二千余人，登岸肆掠。十九日，倭攻通州(今江苏南通)，不克，遂分二路西行，复犯如皋、泰兴。五月初一日，倭转掠扬州、徐州，北入山东。十七日，西犯天长县，明军死亡一百七十余人。又掠盱眙，攻泗州(今安徽泗县)，入高邮、宝应，犯淮安，陷安东(今江苏涟水)。六月初四日，明军水陆夹击，在安东县斩倭一百余人，倭又多焚溺至死，余众驾舟入海，驻泊于庙湾(今江苏阜宁南)，年后始为明军歼灭。

遣官督办川贵湖广木料 嘉靖三十六年(1557)五月十一日，为加紧修复同年四月十三日被火焚毁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世宗除令神木、山西二厂及通州至仪真、龙江关、芜湖等处遗留大木，解京兴造之外，还从大学士严嵩之言，命工部右侍郎刘伯跃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四川、湖广、贵州采办大木，专驻湖广荆州，以时巡历三省，会同各巡抚官计议采办。同时添设郎中二员、副使二员，分省专理采办大木事。至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刘伯跃奏请大工事宜四事：一、酌处木价。将户、工二部开纳事例，令于采木省内输纳，以资木价；二、分任责成。将分派木数，责令该管官刻期报运；三、申明旧例。开土官献木恩典；四、准纳木赎罪。土官犯罪，量其轻重，准予纳木免罪、复职、袭替。此例可通行于两广、四川、云南、贵州。疏上，得旨允行。

陶仲文还山 陶仲文(？—1560)，初名典真，湖广黄冈县(今湖北黄冈)人。少好神仙方术，从罗田万玉山授符术，与江西贵溪县人、原龙虎山上清宫道士、礼部尚书邵元节相善。嘉靖中，由黄梅县吏升为辽东库大使，秩满至京师，由邵元节荐至宫中除妖。十八年(1539)世宗南巡，邵元节病，以仲文代行，以其祷祀之功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给诰印，寻封秉一真人，领道教事。不久，加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太傅，食一品俸。嘉靖二十年，世宗移居西内，日求长生，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陶仲文得以时见，见则赐坐，称师而不名。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加少师。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之世，惟陶仲文而已。久之，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嘉靖二十九年春，加封恭诚伯，岁禄一千二百石。三十六年六月，陶仲文因病回罗田万玉山。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卒，年八十余。特

谥荣康惠肃。隆庆初年，秩谥俱夺。其子陶世恩官至太常卿，隆庆元年因与王金伪制药物，下狱论死。

诏令顺天等处采办珍珠 嘉靖三十六年(1557)七月十九日，诏顺天府买办珍珠四十万颗，广东采办珍珠九十万颗。

福建广东进龙涎香 嘉靖三十六年(1557)七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抚进龙涎香十六万两，广东巡抚进龙涎香十九万两。

赵文华罢官 赵文华(？—1557)，字元质，浙江慈溪县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刑部主事，以考察被论，贬为平州同知，累官至通政使。赵文华性阴险，善奉承，在国子学读书时，严嵩为国子监祭酒，即颇器重他。及赵文华仕宦、严嵩日显贵，遂相结为父子。严嵩欲得私人官通政，以便先得章奏，谋划对策，故命赵文华为通政使。后以请筑京师外城，加工部右侍郎。倭寇犯东南，赵文华两次督师江南。在江南期间，赵文华依靠严嵩，控制兵权，颠倒功罪，害死浙直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并论罢浙、直总督周琉、杨宜。同时，又以征兵集饷为名，提编徭役，加派税粮，截留漕粟，扣除地方解京银两，并且迫胁江浙富民出资捐饷，恣意搜括公私金宝图画以百万计，而用于军旅之需仅十之一二。自盗军饷银十四余万两。嘉靖三十五年二月，赵文华诬奏吏部尚书李默诽谤皇上，世宗以赵文华为忠君，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赵文华既宠贵，志日骄，事权贵渐不如初，世宗恶其不敬。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奉天等殿火灾，世宗欲建正阳门楼，赵文华称病不能办。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世宗遂令其罢官。诏令一出，举朝相贺，人心大快。九月初一日，进而将赵文华革职为民。赵文华失意，一夕腹裂暴死于舟中。著作有《嘉兴府图记》、《世敬堂集》、《祗役纪略》。

修订陕西茶法 先是，户部议陕西茶法，易马正额茶外，尚有赢余，历年陈腐可惜。嘉靖三十六年(1557)九月初一日，世宗命今后每年除正额茶九十万斤招番易马外，另开中一百万斤，召纳边镇，以备军饷。

彭范请依律严惩贪吏 嘉靖三十六年(1557)九月二十七日，刑科都给事中彭范上疏说：明律开示官吏受赃枉法满贯者，以及故禁故勘平致死人命者，皆罪死。但近年来法纪纵弛，有司任意贪酷，不知畏律。据抚按官参奏，如遵化知县刘鸣阳等都是贪酷异常，大为民害的酷吏。然按近日事例，止以停罢不叙为罚，恰适其贪淫之私，富厚之计，不足为戒。宜令所司据律严惩，务尽本法，以为贪酷之戒。抚按官不得徇废法，违者，事发连坐。世宗宣旨："近年有司任意贪酷，抚按多不从实纠举，以致人心玩愒，民受殃害。刘鸣阳等，令各巡按御史严鞫以闻。今后贪酷有司，巡按官即时参问，吏部不许概拟闲住。"

胡宗宪诱杀王直 王直，又名汪五峰，徽州府歙县人。初经营盐业，嘉靖十九年(1540)出海经营走私贸易，远至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后与倭寇相勾结，称"五峰船主"，于宁波双屿港建立据点，又移至烈港，焚掠沿海各地，称"净海王"，又称"徽王"。嘉靖三十一年(1552)，王直先后派遣徐海、陈东、萧显、麻叶等海盗头目，导引倭寇入侵，劫掠浙东、浙西、江南、江北、福建等地。胡宗宪和王直是同乡，他初巡抚浙江时，即令徽州府逮捕王直的母亲和妻子，先囚于金华监狱，后安置于杭州，生活上备加照顾，以为诱饵。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胡宗宪奏请派遣宁波生员蒋洲、陈可愿借市舶提举职名充正副使往日本，宣谕日本国王禁戢诸岛。蒋洲在日本五岛持重赂及王直家书见王直，劝其归顺朝廷，并允与日本通贡互市。日本封建领主源义镇听说中国许贡市，遂派王直装巨舟，并派遣其属善妙等头目四十余人，于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抵舟山岑港。胡宗宪见王直至，夜趋宁波城，，密调参将戚继光、张四维诸健将埋伏，戒备森严。王直见官军戒备，拒不上岸，后派其义子王滶(即毛海峰)入见胡宗宪，胡宗宪派总兵卢镗往来于王直舟上，许官以都督，署司海上通市事，并以指挥夏正为人质。十一月初六日，王直偕叶宗满(即碧川)、王清溪(即王汝贤)入谒胡宗宪。胡宗宪立刻以擒获海寇首领王直奏捷。同时以礼羁留王直，设供帐，并命地方官轮流与其宴饮。嘉靖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王直被逮入浙江按察司狱。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斩王直于杭州(一说十一月二十九日斩于宁波)，叶宗满、王清溪戍极边。胡宗宪以计擒王直功，加太子太保。王直所部三千余人怒骂朝廷不足信，杀死夏正，并誓为王直复仇，遂散掠闽、广地界。

徐浦请罢征江南提编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二月初四日，工科给事中徐浦疏言：浙、直、福建等省，近因倭患，经费不敷，征额外提编，以济一时急需。但因引用非人，借公倍敛，民不堪命。今倭患渐平，正宜与民休息，别求生财之道。而总督胡宗宪等仍于加征之外，照征提编。且历年所费，漫无稽考。前南京御史慎蒙奏止提编，并请以军门钱粮岁终差给事中清查及参纠原任吏部郎中吕希周指名和买，侵官银至三万余两，欲严行追究。事下户部，户部尚书方钝依违两端，蔓词塞责。请罢方钝，以戒大臣之不忠者，而治吕希周罪，并令止军门提编，年终差给事

中稽查。更请严令胡宗宪等凡事节省,不得滥费,以苏民困。

马祖师起事 马祖师,流寓浙江湖州乌镇,以幻术聚众结党,乘东南倭患起,其党羽更相积极活动,煽动远近居民数千人,群起响应,约定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九月起兵,攻打嘉兴府城。因走漏消息,官军急忙搜捕。九月十四日,马祖师树青、白二旗,放火纵掠。兵备参政刘熹督兵击杀,马祖师率众溃逃南浔,官军追至双林,尽歼其众,独马祖师得以逃去。同年十二月初五日,浙直总督胡宗宪奏报朝廷。兵部议复今其众虽平,而元凶未获,宜急赦胁从,严捕元凶,以除乱本。世宗可其奏。

王学益致仕 王学益(?—1561),江西安福县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官工部主事、兵部职方司郎中、福建按察司副使、应天府丞。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督兵平苗民起事。后为言官所劾,削职为民。久之,贵州守臣上疏言其平苗民功,复原官,协管都察院事。升右副都御史,历刑部左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告假还乡。再起为总理河道。召为南京工部尚书,未赴任,因病请休。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明世宗诏以总理河道右都御史致仕。嘉靖四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卒。

请革江南军门纳级之弊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二月初十日,巡按直隶御史尚维持疏论总督军门开纳级之弊。其奏疏说:近年因浙江、南直隶倭患,兵部许于总督军门开纳级之例,此乃一时权宜之计。然此例一开,土豪、市侩、逃军、罢吏等向以惧罪而逃匿者,多得以纳银而往来于白昼,甚至死罪一等,也可以纳银自赎。因此,各官亦以此营私,恣意剥削以自肥。世宗命冒滥朦胧给授者,由巡按御史追夺治罪,充军者不准赎,其罢革官不得以赞画军务为名,生事害民,悉令革回闲住。

暂停山东采矿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二月十九日,因冬寒暂停山东、保定、山西采矿,召采办主事张芹、锦衣千户张钺回京。是时每年先后所入各矿金银:玉旺峪入银七千五百两;保定入金二十八两、银九百二十八两、山东入金八百二十五两、银八千一百四十三两、河南入银一万零五百两、四川入金七百两、银一万一千二百两、云南入金四百两、银一万两。总计不过数万两,而矿使为民患者日甚一甚。其后矿盗四起,采矿弊多利少。至嘉靖三十七年正月,又罢河南采矿,召主事沈应乾等人回京。

高岱著《鸿猷录》 刑部郎中高岱经过多方搜集洪武至嘉靖朝史事,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著成《鸿猷录》十六卷。书中记朱元璋起义至嘉靖朝兵事,对明初统一战争及正统、成化、正德年间明军的主要战事,都有所记述。每事各为一篇,所据多为当代人的传志、奏疏、案牍,史料比较可靠。

议定漕规 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十一日,户部议复给事中许从龙条议漕规十事:一、每年八月会计本色、折色定数,即行所在有司严限催征,本色不过十一月,以便年内交兑,折色不过十二月,以应逐项解支。二、及时修理运船,查核各处料银工价,务必工力有余,可以坚久。三、运船未到之先,责成水利管河官计处工食,疏通河道。四、重把总之选,凡推补升迁,均应博访明试,务在得人。诸运官积弊,如帮钱、长差、药饵、纸札,过准钱之类,一概禁绝。五、责令各运官籍记每船运军人数,先行送科考验虚实,其逃归者,掌印官不得占护。六、革各衙门所押册钱,每遇该运之年,必造册严立期限,所三日,卫五日,各照原定月粮一两六钱八之数支给,不得故为迟难,科索常例。七、正耗米外,轻赍折银仍旧解淮。以十分为率,三分给运官随船应用,其余尽归于把总。遇有不时动支,须一一关白漕司,不许乾没。八、罢京卫各差,如催攒,起票、掣解、巡逻、起米之类。运船到湾,由通州仓员外郎,大通桥主事限期起剥进仓,以杜骚扰。九、各仓收粮,报晒报收,招阄署佥。各仓委官务在守法奉公,不得拖延时日以生奸弊,违者听巡仓御史参劾。十、自今年改折之外,各所司必须督修南回空船,以备来年新运,以八月内报完,正月出兑,三月过淮,使本色不亏,缓急有待。诏如所议施行。

命河南等处助购皇木 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二十八日,因顺天、永平二府灾伤,世宗从巡抚都御史马佩的请求,命将购买皇木价银十万两,均派于河南一省及北直隶保定、真定等府。

高翀请令两广等省出银助贵州采木经费

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月初九日,贵州抚按官高翀等奏:本省采木经费之数,当用银一百三十八万余两,费巨役繁,非一省所能独办。请令两广、江西、云南、陕西诸省通融出银资助。疏呈上,工部以为:各省俱多灾伤,难以资助,可将广东、云南、江西、山西原派盐课大工银督发应用。仍留本省文武官应献助俸银、抚、按、司、道、府官应解赃罪并事例,悉听抚、按官动支。此外,别有权宜良策,令多方计处。世宗依从工部所议。

准江西以粮折纳木价银 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月十三日,江西因岁办大工木料不足,经巡抚都御史马森奏准,以本省嘉靖三十六年起运南京仓粮三十六万六千石,折银抵偿木价。每石折银零点八两,其中零点五两给军,零点三两补抵木价。不为

例。

工部议征京军十万人修建朝门 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月十三日,镇远侯顾寰奏言:朝门工大,京营军力不足,请量令在京各卫所官旗出银募夫,视俸厚薄为差,以助工役,以苏军累。工部以为,每年工兴,多取办营军官为给食,未闻有告病者。近以门工重大,本部议将军夫十万人,分为四班,轮番应役,又以雇募民夫四万六千人助之。可谓劳逸得宜,公私两全,何独累官军且至以银代役?顾寰所请,为姑息之政,不可行。若军中有老弱不堪赴工者,令其自请雇工,有司不问。世宗从工部所议。

户部议理财事宜 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月二十日,户部尚书方钝奏言:天下财赋,每年入太仓银二百万两,旧制以七分为经费,存积三分备兵事、荒歉,以为常。嘉靖二十八年以前,每年支出最多不过二百万两,少者仅七十万两左右。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后,每年调兵遣戍,所增兵马数多,饷额增倍。至嘉靖三十四年、三十五年间,宣、大边事益急,一切募军、赈恤等费,俱取于内库,岁无纪极。嘉靖三十年所发京、边岁用银至五百九十五万两;嘉靖三十一年为五百三十一万两;嘉靖三十二年为五百七十三万两;三十三年四百五十五万两;嘉靖三十四年四百二十九万两;嘉靖三十五年为三百八十六万两;嘉靖三十六年三百零二万两。太仓岁入银二百万两之额,不能充岁出之半。于是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由此大兴。地方有事,有司往往奏留,如浙江、直隶被倭患,川贵采木,山西、陕西、宣府、大同,以兵荒,岁入二百万两之额且亏三分之一。而内庭之赏给,斋殿之经营,皇上不时之征取,年初大同右卫告急,入春以来已发宣、大银二十万两。而天下民运至太仓银仅七万,库银积储大约不及十万两。且边臣奏讨日增,以致内藏空虚,官府搜括已尽,民间科派已极。为解决财政危机,特提出七条措施:一、将嘉靖嘉靖三十四年存积盐引,召商纳银太仓,依原价银一钱加三分,特行超掣。二、将三十三年开派盐引纳米、草本色者,米一石减一斗,草束五十斤减一斤八两。三、将浙江、湖广、江西及南直隶州县原派南京户部仓粮暂借三年,改折一半,发太仓银库。四、江、浙、湖广三省及南直隶州县自嘉靖三十一至三十五年拖欠本色税粮,改征折色,限一年内完解库银。违限不完,仍征本色。五、各处拖欠户部钱粮,自嘉靖三十一年为始,限一年内追解完报。六、各处盐课、盐税悉解户部发边,所在官司不得擅自奏留或别项支用。七、议处赃罚、事例、税契、民兵等银,原因边费浩大而征取,近因营建朝门移助工费。今工部钱粮额足,当分其半还给户部。方钝奏疏呈上,世宗降旨切责其谋国不忠,令再议。次日,户部遂先发太仓银五万两,米二万石,豆一万石,支援大同右卫。

吴时来弹劾边臣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初八日,刑科给事中吴时来疏劾宣、大总督杨顺、巡按御史路楷、兵部尚书许论。疏言:杨顺镇守宣大以来,所请库银三十余万两。而该镇兵食则日见空虚,寇势益猖,城堡尽破,杨顺始终未能报效尺寸之功,失体损威,甘受敌侮。路楷,接受贿金七千两,秘不以闻。去冬寇入应州,屠堡七十,男妇被杀三千人。及奉旨勘复,路楷则皆推诿于镇、巡、府、道、州、县,而将其所杀边民冒充为杨顺战功。许论,雷同附和,漫无成画。此三人党庇一辙,何以为陛下分忧?请亟罢此三人,别选忠诚之臣为之,使边患有救。杨顺等人俱为严嵩党徒。此疏送上,世宗问严嵩,严嵩爱莫能救。世宗遂命锦衣卫官校将杨顺、路楷逮捕至京师,许论削职为民,并令兵部侍郎江东暂理宣大总督。

阮鹗贿倭被捕 阮鹗(1509—1567),字应荐,号函峰,南直隶桐城县(今安徽桐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官南京刑部主事、浙江提学副使。倭寇围杭州时,有司拒不许乡民入城避难,阮鹗亲手打开城门,救活居民数万计。后因依附严嵩亲信赵文华、胡宗宪,被破格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嘉靖三十六年正月,改为特设福建巡抚。起初,阮鹗主张抗倭。自浙江桐乡被倭围困以后,阮鹗为倭寇威势所压倒,转而主和。及倭寇犯福州时,阮鹗非但不战,反而以银数万两和各种布匹重贿倭寇,并用巨船六艘送倭出海。同时奢侈腐化,贪婪无比,敛括民财千万计。于是御史宋仪望等人纷纷上疏弹劾阮鹗。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十六日,阮鹗被捕至京。因他事先贿赂严嵩说情,故未予重治,仅革职为民。阮鹗侵盗的饷银,多于胡宗宪,是时皆追还于官府。隆庆元年(1567),阮鹗卒,年五十九。

吴嘉会下狱 吴嘉会(1512—1588),字惟礼,号南野,湖广湘阴县(今湖南湘阴)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授行人。历右副都御史,巡抚蓟州镇。终兵部侍郎。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奉命疏言战守十二事,亟论如何调兵救援大同右卫以及今后经略大同事宜。疏呈上,得旨允行。三月二十日,御史万民英巡视蓟镇回京时,上疏弹劾吴嘉会巡抚蓟镇期间,侵冒公款,偷工减料,所筑边墙,随筑随倒,致寇乘虚而入。遂诏锦衣卫先逮吴嘉会下狱,候遣官严核钱粮虚出之数,查明之后再作论处。同年七月初三日,吴嘉会被削职为民,万历十六年(1588)卒,年七十七。

刘体乾请革冗吏冗费　世宗为边境告急而财用缺乏所困扰，问内阁首辅严嵩。严嵩说：今库藏空虚，主要是由于理财的人束手无策，不会措划所致，只要裁革冗费，追征地方积公钱粮，立即可得数百万，国用当可充足。请陛下下诏令廷臣议理财之策。世宗以为然。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二十五日，吏部尚书吴鹏等人各应诏上言理财事宜。户部复行二十九事，皆琐细非国体，而请追征旧欠钱粮，并增加赋额，遂大为民困。当时惟有兵科给事中刘体乾上疏反对追征旧欠钱粮和增加赋额的做法。他说：苏轼说过"丰财之道，惟在去其害财者。今之害最大的是冗吏和冗费二项。历代官员，汉代七千五百员，唐代一万八千员，宋代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1469)，武职已超八万员，加上文职共达十万余。今边功升授，勋贵传封请封，机构添设，大臣恩荫，加以厂卫、监局、勇士，匠人等等，岁增月益，不可悉举，多一官则多一官之费。请严令各部，请革冗滥，将可减俸银无数。又听说，光禄寺库银，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两。自嘉靖二十一年以后，供应日增，余藏顿尽。其它各衙门，侵盗尤多。宜明文规定：岁终令科、道官稽查明白，以清冗费。二冗既革，国计自足。舍此而追征旧欠和增加赋额，无非是扬汤止沸而已。于是户部商议，请汰各监局人匠。世宗表示同意。

诏恤京师铺商　是时库藏匮竭，户、工二部所欠各项商价银不只五六十万两。坊市民一充商役，即万金之产，无不立破。民有力者，咸诡冒投托，百方营免，有尽室逃避外郡者。久之，上户渐稀，则佥及中户，再复及中下户，由是市巷萧条，即有千金之产，亦惴惴惶惧。于是给事中魏元吉上疏极言铺商困乏，请以太仓银给补未发商价。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二十七日，世宗以魏元吉所言甚是，诏恤京师铺商。然而，由于边饷急需，太仓银常常难以供应，故虽有存恤之诏，而商困如故。

吴时来弹劾严嵩纳贿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二十八日，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再次疏劾严嵩贪财纳贿。他说：严嵩执政二十年，文武官升迁去留，悉出其手。又暗中令其子严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招权示威，指使公卿，奴视将帅，贪污受贿，财货山积，犹无厌足。用人唯亲，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报告严世蕃而后奏。陛下但知议出部臣，岂知此皆严嵩父子私意！许多正直廷臣无不怨恨严嵩。臣以为除恶务本，今边事不振由于军困，军困由于官邪，官邪由于严嵩父子好货。若不速去严嵩父子，边事不可挽救。同一日，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也分别上疏劾严嵩。张翀说：自严嵩当政以来，国家钱粮给边者十之四，贿严嵩者十之六。严年之富有早已超过数十万，严嵩家之富可知。董传策说：严嵩怙不知戒，居位一日，天下受一日之害。他坏边事，卖官爵，耗国用，用罪人，扰驿传，害人才，必须立即清除。吴时来三人上疏之后，严嵩怀疑徐阶是幕后主使者(吴、张为徐阶门生，董则徐阶邑子)，密奏世宗。世宗信其言，立将三人下狱，追究主谋者。三人至死不承认，都说是太祖高皇帝教导他们的。宣诏俱发边远烟瘴卫所充军。已而，严嵩疏请致仕，世宗"虽慰留之，然自是已稍厌严嵩。"

倭寇进犯浙江福建　从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开始，倭寇重新纠集力量(时称"新倭")，进犯浙江温州、台州诸府，其中乐清、临海、象山等地受害最为严重。至同年四月初四日，新倭自浙江温、台等府窜入福建福州、兴化、泉州，皆登岸焚掠而去。四月十九日，新倭攻陷福清县，抓走知县叶宗文，劫库狱，杀害男女一千余人，焚毁官民廨舍无数。

兵部奏陈裁省驿递事宜　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初九日，兵部奉旨进裁省驿递事宜：国初，以驿递宣传王命，飞报军情。时至今日，成法尽更，糜费十倍。既有站红船，又增设官民座船；既有额定马驴，又增设帮马；既有正差应付，又有借冒关牌，分外逼索。依《会典》事例，应尽毁官民座船，以其费入官。其旱驿马驴，除两京会同馆外，每驿减十之三，非要冲之地减十之五。所过官承，必须正差勘合，勘定职名、地方、夫马之数，方许应付。其他一切分关、倒关、借关、改关及额外铺陈、馈送、折乾等弊，在内听科部、在外听抚按官参革，并以地方所省钱粮之半，解部输边。诏准允行。

户部奏准银钱并用　嘉靖三十七年(1588)四月十一日，户部从御史钟沂奏请，行银钱兼用之法：除起运轻赍粮银外，凡存留，王府及官员折俸、折钞、问罪、纸赎等项，俱得银钱兼用。其民间贸易，许历代旧钱及洪武、嘉靖制式钱相兼行使，如有富豪阻坏及熔铸钱器者，则绳以重法。

大同右卫解围　嘉靖三十六年(1558)九月，蒙古俺答部举兵围攻大同右卫，明军守将王德战死，右卫城中烽火断绝，柴水不通。内阁首辅严嵩与兵部尚书许论，谋划放弃右卫，世宗不许，命诸臣发兵筹饷，并令兵部侍郎江东代替杨顺，出任宣大总督，力图解救大同右卫。其时参将尚表奉命转饷入城，悉力抗御，粮尽，食牛马，拆屋为柴，士卒始无异志。尚表时出奇兵突战，俘获俺答孙及婿与其部将各一人。于是总督江东、巡抚杨选、总兵张承勋等各严督将士先

后出击。俺答兵侦知城中守备益为坚固，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解围而去。是役历时六月，前后动用太仓银以数十万计，皆为守者侵尅，馈赂当权者。

郑晓请严禁各衙门径自受理词讼 先是，南京刑部尚书冯岳上疏说：近来府州县狱囚数多，皆因各衙门滥受民词，不送法司问断，以致淹禁日久，至发生南京上元县越狱事件。请严有司侵官乱法之禁。嘉靖三十七年(1558)六月初三日，刑部尚书郑晓等因之上言：按例，在京军民词讼，俱赴通政司上告，送法司问断，各衙门有应问者，参送法司，不得自决。近来事权不一，诸司各自受词，不复参送，甚至有人以私纸赎谋利，随意审问、拘禁、拷打，颠倒法令，致使良善苦于纷拿，奸顽喜于诈害。请申明《会典》条例，令各衙门通行遵守，使事权归一，亦不至于发生营私舞弊。疏上，世宗命在京军民词讼，各衙门并巡城御史毋得径自受理，违者奏治。

马森奏请江西恢复食用淮盐 先是，江西一省派行淮盐三十九万引，后来南安、赣州、吉安三府改用广东盐，惟南昌等府仍用淮盐二十七万引。于是私贩盛行，袁州、临江、瑞州三府私食广东盐，抚州、建昌、广信三府私食福建盐，致淮盐仅用十六万引，国计大绌。嘉靖三十七年(1558)六月初七日，江西巡抚马森上疏极言其害，请于峡江县建桥设关，禁遏广、闽私贩之路，尽复淮盐旧额，并请增至四十七万引，收其税课，平时价，通商足国。诏可其奏。

蓟州镇军士逃亡 嘉靖三十七年(1558)九月十七日，兵部职方郎中唐顺之自蓟州镇回京时奏言：蓟镇原有军队九万一千余人，今见在只有五万七千余人，逃亡三万三千余人。见在者多老弱不能战。逃亡的原因是由于连年修筑边墙，上山运石伐木，工役繁重，力不足办，贷钱赔货；将领贪污，文吏侵渔，以致士卒贫累，不得不逃。

俞大猷逐倭出浙江 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一月十三日，盘据在浙江柯梅(今浙江舟山岛北部)的倭寇出海，明军总督俞大猷自沈家门(舟山岛普陀)率领水军截击，击沉倭寇粮船，并有斩获。倭寇见势不利，遂扬帆南去。自此倭寇尽入福建和湖广一带。

曾钧致仕 曾钧，生卒年不详，字廷和，江西进贤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行人，升南京礼科给事中，奏罢各处银场。曾钧刚廉疾俗，先后劾参赞尚书刘龙、翊国公郭勋、礼部尚书严嵩等，直声震一时。后出为云南副使，迁四川参政，平贵州苗民起事，进河南左布政使。嘉靖三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总督河道，修筑草湾河，减除徐、邳等处水患。工成，进工部右侍郎。治河四年，入为南京刑部右侍郎。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仕。家居十余年卒，赠刑部尚书，谥恭肃。

任环逝世 任环(1519—1558)，字应乾，号复庵，山西长治县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广平、沙河、滑县三县知县。嘉靖三十年，授苏州府同知。倭患起，任环自告奋勇，统兵抗倭，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名震一时。以功进苏松兵备参政，遇母丧回家守制，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家，年四十。赠光禄寺卿。有《山海漫谈》。

诏定岁进内库银额 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二月二十八日，世宗问户部：祖宗时内库岁入银多至百万，今止得四十万。昨集议各项银不下二三百万，今皆何在？尚书贾应春说：百万之数，本兼军官俸折和内府供用之需。今通计二项，已进过七十四万三千两，内借支十万两济边。其集议银只解到二十七万两，未解者尚有十之八九。已解者，一半调给大同备赈。请容臣等渐次经理，务足原额。世宗说：既有岁派银数，如何故减？此后每年连折俸银共进一百万两，外加预备钦取银，不许亏欠。

采九德《倭变事略》成 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二月采九德著成《倭变事略》。全书共四卷，记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七年江浙倭寇事。作者亲历事变，所记多出自目击耳闻。书中对倭寇侵扰海盐一带的时间、地点、经过、人民受害状况，以及通倭头目王直、徐海等被俘斩的经过，记述尤详。

诏罢革侵冒边粮诸臣 嘉靖三十八年(1559)正月初一日，查理边储户科右给事中魏元吉等，劾奏诸边臣侵冒不职。世宗降旨：近年边粮给发数多，管粮官任意侵费，以致钱粮亏折。原任管粮郎中高光、主事刘崇文俱革职，逮京问罪；原任蓟州巡抚佥都御史马九德，保定巡抚副都御史艾希淳革职闲住；密云原任管粮主事马濂降一级调外；原任管粮郎中等官董策、曹麟、宋守志、王汇征、王霁、李侨、张邦彦、丘纬、继璿、冀练、李郁、张峰、胡志和、刘鲁生各降二级；蓟州兵备副使伊介夫、张子顺、杨胤贤各夺俸三月。

黄懋官请严格各项钱粮开支 嘉靖三十八年(1559)二月十六日，户部复议，同意总督南京粮储、户部右侍郎黄懋官条陈钱粮事宜：一、各卫所官军、马匹关支粮料，如有逃亡、事故、倒失者，应计口扣还，不得仍旧支取，以长奸欺。二、军匠月支口粮，遇小月即扣除一日，不得五年总扣，以恣侵匿。三、长安等四门军人口粮，仍行原委监牧司属官每半月亲诣该仓给散，不得辄委官攒，，以致疏漏。四、凤阳府贮

库钱粮，专备九卫官军岁支等用，自今不得别项借支。其各州、县、卫所历年侵欠税粮、屯粮等银，由抚按官严行查追。诏从户部所议。

冯岳致仕　冯岳(1495—1581)，字望之，号贞所，浙江慈溪县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历工部主事、员外郎、江西按察使、湖广巡抚。进兵部侍郎，总督湖广川贵军务，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二十日因病致仕，万历九年(1581)卒，年八十七。有《恤刑稿》等著作。

俞大猷下狱　倭寇盘据浙江舟山柯梅达一年之久。而浙直总督胡宗宪惧战，始终不命将进剿，致使倭寇得以离开舟山，驾船南行入福建沿海劫掠。于是御史李瑚上疏劾胡宗宪纵倭不战等三大罪。李瑚与俞大猷皆系闽人，胡宗宪因之怀疑是俞大猷为李瑚提供材料。为解脱自己纵倭的罪责，胡宗宪以攻为守，嫁祸他人，上疏诬陷总兵俞大猷对盘据在柯梅的残倭攻击不力，纵倭南奔，失机殃民，宜加重治。世宗偏听偏信，下诏逮捕俞大猷。嘉靖三十八年(1559)三月二十二日，俞大猷被捕至京，下狱凌治。俞大猷为嘉靖中抗倭名将，在浙江前后杀倭四五千人，有功而受害，时人咸谓其冤。直至次年七月，始复其职。

丁以忠请停议山东民兵征银　嘉靖三十八年(1559)三月二十五日，巡抚山东都御史丁以忠奏：山东民兵始议改征银两，民不胜累。后幸停止。近又复议征银募兵。自多事以来，山东赋繁役重，民多逃亡，土荒大半。正额税粮尚拖欠十之七，岂能办此额外非常之赋.请将嘉靖三十六年以前改征减免存留、民兵逋负并以后年份工食通行民免，以苏罢累。且今南倭未清，海运新开，其见在民兵不应复议折征，宜暂留防海，以消意外之变。兵部复议，从其请。

杨大章致仕　杨大章(1491—1568)，字章之，号东桥，浙江余姚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历浏阳、歙县知县、工部主事，官至刑部左侍郎。杨大章为大学士李本幼时业师，依靠李本得升迁，昏庸贪鄙，迷恋权位。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十六日称病求去，世宗疑其非病，特命太医院诊验，遂令归家养病。时论大快。隆庆二年(1568)病死，年七十八。

王忬入狱论死　王忬(1507—1560)，字民应，号思质，南直隶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授行人，升御史。超擢右佥都御史，镇守通州，改抚山东。嘉靖二十九年七月以巡视浙江兼辖福建福、兴、漳、泉四府，先后上方略十二事，督将士击毁倭船五十余艘，请筑浙江各地县城。迁右副都御史，北上巡抚大同，加兵部右侍郎。后改为蓟辽总督，进右都御史。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俺答诸部入扰，王忬兵败滦河，京师震动。同年五月初十日，被捕入狱，嘉靖三十九年十月三十日被斩于北京西市，年五十四。隆庆初，王世贞与弟王世懋为父申冤，诏复故官。

江北倭患渐平　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初一日开始，倭寇出动战船数百艘，转掠江北。后为明军所击，先败于三河(今崇明岛上)，复败于如皋，遂退据庙湾(在今江苏阜宁)。至同年五月二十三日，明军副使刘景韶、巡抚李遂集水陆两军夹攻庙湾，倭寇逃入舟中，明军追奔至虾子港，倭大败，多死亡，余众无几，不能再战，乘风出洋而去。于是江北倭患渐平。

贾应春致仕　贾应春，生卒年不详，字东阳，号樵村，北直隶真定县(在今河北石家庄地区)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嘉靖三十二年，进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次年，改为宣、大总督，筑边墙一万一千八百余丈，开屯田二万顷，边民颂其功。其后历南京户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时国用不足，贾应春上疏请令严催科，更漕政。不久，于嘉靖三十八年六月十四日致仕卒，赠太子太保。

定太仓银库月报出纳之数　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初一日，给事中龚情上疏说：臣于本年正月奉命巡视太仓银库，经稽核库贮银两七十四万有奇。至今未及半年，库贮银仅馀八千余两。各边之年例，商铺之货价，折俸之绢布，军营之草豆盐米，均未支付。国储至此，可为寒心。请皇上责令提督仓场侍郎月报银库内外出入之数，务在简易明白，一览可见盈缩。疏上，户部请令仓场侍郎每两月一具报进呈皇上御览。世宗诏可。太仓银库月报出纳自此始。

辽东大灾　先是，巡抚辽东都御史侯汝谅说：辽左滨海，水陆艰阻。过去遭受天灾，仅数城或数月，未有如今日这样全镇被灾，三年五谷不登的。臣于春初奉命入境，见村里无炊烟，野多暴骨，萧条惨楚，目不忍视。去年凶馑，斗米银八钱，母弃生儿，父食死子，父老相传，咸谓百年未有之灾。今值夏秋之交，水灾虫灾并发，斗米贵至银七钱，冬春更不知如何。请大出内府银钱，以救一镇生灵。世宗闻而悯之，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八月二十五日，诏户部即刻发银六十万两，遣御史一员速去购粮，设法输运，以济百姓之急。年终再发牛具银五万两，以备来春播种。同时借太仓米五万石救济饥民。

苏州"恶少"闹事　苏州官豪势要子女与流氓、地痞相勾结，依仗权势，横行不法，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群聚斗殴，饮酒作乐，严重扰害社会治安。人

们称之为“恶少”，又有“打行”、“札火”诸囮名。嘉靖中，官府招集武勇抗倭，这帮“恶少”又自称“雄杰”，乘机大肆进行活动，群聚剽劫，图财害命。嘉靖三十八年(1559)，应天巡抚翁大立明令府县严加痛治，督导府县缉捕诸“恶少”。诸“恶少”大为恐惧，饮血为盟，用白巾抹额，于同年十一月初十日，各持长刀、巨斧，夜攻吴县、长洲和苏州卫，劫狱囚，鼓噪，攻都察院，劈门而入，翁大立携其妻子越墙逃去。诸“恶少”遂纵火焚衙门，翁大立所奉敕谕、符帜及“令”字、旗牌，一时俱毁。诸恶少气势益盛，复纠众欲劫府治，掠府库。知府王道行督兵勇缉捕。天将明，诸“恶少”直冲葑门，斩关而出，逃入太湖。官军遣兵四散搜捕，俘获首从周二等二十余人。事闻，命翁大立戴罪限期剿灭，以靖地方，府县以下，俱由按臣逮问。

文徵明逝世 文徵明(1470—1559)，字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南直隶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称为：“吴中四才子”。宁王朱宸濠慕其名，以厚礼相聘，他辞病不赴。正德末，以岁贡生赴吏部试，得到巡抚李充嗣举荐，授翰林院待诏。世宗即位，预修《武宗实录》，侍经筵，辞官归里。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一月三十日逝世。文徵明为人和气耿直，不媚权贵。善诗文书画，而画尤胜。工行草，精小楷，擅绘山水，多写江南湖山庭园，亦善花卉、兰竹、人物。名重一时，学生甚多，形成“吴门画派”，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有《甫田集》。

诏行海运输粮入辽 嘉靖三十八年(1599)，巡抚辽东都御史侯汝谅因辽东大饥，议开山东登莱及天津二海道，运粮入辽东。并进呈所勘天津入辽路线：自海口发舟，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沱、桑沱、姜女坟、桃花岛均可停泊，相距不过四五十里，可免风波、盗贼之虑。请动支辽东本镇赈济银五千两，造船二百艘，每艘可装运一百五十石，委官督发至天津通河等处，招商贩运，并令彼此监督，不许夹带私货。经户部复议，除开登莱海道一事容后另议外，其余皆予以同意。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诏行海运，转粮入辽东。

戚继光编练“戚家军” 戚继光，初为登州卫指挥佥事，在山东专事防倭。嘉靖三十四年(1555)，改调浙江都司，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州、台州三府。见卫、所官军不习战，遂奏准招募金华、义乌一带的农民和矿工入伍为兵，前后约得二万人，编为新军，严格训练。并创造了“鸳鸯阵”。“鸳鸯阵”的编制，以十二人为一阵，一人居前为队长，次二人持牌，又次二人持狼筅(用大竹制成的兵器)，又次四人持长枪，再次二人持短兵器，末一人为火兵。作战时，以火器和弓箭为掩护，长短兵互用、密切配合。戚继光所募的农民和矿工，多为健壮、勇敢之民，经过长期的刻苦训练，人人练就了一身杀敌本领，而且军旅整齐，纪律严明。由于戚继光军英勇善战，被人们誉为“戚家军”。戚继光还创造了“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皆力求精益求精，不断更新。因此，“戚家军”的战斗力很强。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朝廷论擒获“海寇”头目王直之功时，称赞戚继光“督兵有纪”。此后，“戚家军”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中，屡建功勋，威震东南。

南京振武营军变 南京振武营，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初三日，由南京兵部尚书张鏊为抗倭而创建的。按旧制：南京各营官军月米，有妻者一石，无妻者减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折银半两。及马坤为南京户部尚书时，奏减折色银为零点四两，诸军始怨。而督储户部右侍郎黄懋官性刻削，各月各卫送支册，必责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补役军丁妻粮，诸军益不堪。其后马坤召入为户部尚书，新任南京户部尚书蔡克廉因病不能视事。诸军以岁大饥，米每石贵至银零点八两，要求恢复原额每石折银零点五两，黄懋官不予理睬。又按规定：每月应于上旬发给军粮。而嘉靖三十九年(1560)二月，时至中旬，黄懋官犹未支给，于是诸军益怒。同月二十一日，兵部尚书张鏊到南京振武营阅军，诸军遂大哗，围攻黄懋官住宅，杀之，裸尸于市。并胁迫张鏊发银犒军。守备太监何绶许给赏银十万两，诸军稍定。至同年四月初七日，南京兵部右侍郎李遂密捕二十五人下狱，后以计悉毙之，军中始定。朝廷令折色银复为原额。

倭寇流劫潮州 嘉靖三十九年(1560)二月，二十三日倭寇六千余人流劫广东潮州等处。守臣告急。廷议认为：闽、广二省俱邻南海，倭寇侵犯广中，“皆以闽人为向导”。今倭势甚张，当令两广克期诛剿。并令巡按御史劾福建抚臣纵倭贻患两广之罪。同年三月十四日，为适应两广抗倭需要，从提督两广侍郎郑纲的奏请，添设广东惠、潮参将一员，专驻揭阳，督兵御倭。同时移潮州捕盗通判于倭寇入广必经之要地黄冈镇。诏如议施行。

马坤罢官 马坤，生卒年不详，字顺卿，号南渚，南直隶通州(今江苏南通)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累官至南京户部尚书，终户部尚书。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初九日，以激南京振武营兵变事被论罢去。有《南渚遗稿》。

张鏊去官 张鏊，生卒年不详，字济甫，号蒙溪，江西南昌县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改庶吉士，

授礼部主事。嘉靖十九年升浙江副使，提督学政。再历广东参政、福建按察使，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初九日，因南京振武营军变一事被劾去官。

蔡克廉去官 蔡克廉，生卒年不详，字道卿，号可泉，福建晋江县人。嘉靖八年进士，累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初九日，因南京振武营兵变事被论去官。有《可泉集》。

鄢懋卿总理两淮等处盐政 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初十日，户部以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不举，请遣大臣总理。严嵩遂用其私人、右副都御史鄢懋卿为之。旧制：大臣理盐政，无总四运司者。鄢懋卿仗恃严嵩父子，尽握天下利柄，骤增盐课银至一百万两，而且所至市权纳贿，受赂巨万，滥受民讼，虐杀无辜，扰害乡里，苛敛商贾，几至激变。而世宗皆置之不问。

唐顺之逝世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学者称荆川先生。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嘉靖十二年，任翰林院编修，参校累朝《实录》。因不肯依附张璁而罢归。嘉靖十八年，起故官。嘉靖十九年十二月，疏请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百官朝贺。帝不悦，有旨："朕疾未平，遂欲储贰临朝，是谓君父必不能起也"，遂夺其官。归乡后，卜筑阳羡山中，读书十余年，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无不涉猎，融汇删削，著成《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世。善文章，推崇唐宋，与复古派前后七子相诋，称"唐宋派"。因与晋江王慎齐名，人称"王唐"，或称"晋江昆陵"。时江南北倭患起，以赵文华荐，命视师南畿、浙江，与胡宗宪协谋讨倭。曾率军泛海，巡视江阴至蛟门大洋，邀击停泊崇明三沙倭寇船只。后援江北，与凤阳巡抚李遂大破倭寇于姚家荡，以功擢右佥都御史，代李遂为凤阳巡抚。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初一日，死于通州(今江苏南通市)。有《荆川集》等。

郑晓罢职 郑晓(1499—1566)，字窒甫，号淡泉，浙江海盐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职方主事。喜披阅旧文牍，尽知天下扼塞和兵马虚实强弱。兵部尚书金献民嘱其撰《九边图志》，时人争相传抄。后以争"大礼"，被廷杖。大同兵变，郑晓极言叛军不可赦，为张孚敬所赏识，欲改置翰林及言官，郑晓皆不赴，不久即以父丧归家。至许赞为吏部尚书，调他为吏部考功郎中，逆大学士严嵩，被贬为和州(今安徽和县)同知，迁太仆丞，历南京太常卿。后改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总督漕运。时大江南北皆为倭寇所扰，漕船几为阻塞。郑晓请发库银数十万，造战船，筑城堡，练兵将，积米粮，前后督兵斩倭九百余级。进吏部左侍郎，迁南京吏部尚书。世宗以郑晓知兵，改右都御史协理戎政，寻拜刑部尚书。因为上疏反对各衙门私自受理词讼，要求事权归一，为严嵩所陷，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被罢落职。郑晓通经术。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卒，年六十八。隆庆初，赠太子少保，谥端简。著作有《禹贡图说》、《吾学编》、《端简文集》等。

遣官清理畿内庄田 嘉靖三十九年(1560)五月二十三日，世宗遣御史沈阳、户部郎中张大化清理畿内庄田。清出隐冒庄田之数为二千五百二十九余顷。另有先朝给赏地一千九百余顷应予追夺还官。经户部复奏，世宗诏可。

魏谦吉逝世 魏谦吉(1509—1560)，字子惠，号槐川，北直隶柏乡县(今河北柏乡)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监察御史，历甘肃、山西巡抚。进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魏谦吉性狂率，历官无善状，淫暴掊克。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初三日卒，年五十二。赠右都御史。

罗嘉宾奏报浙直督抚大臣侵盗军饷银数 嘉靖三十九年(1560)六月初七日，查盘给事中罗嘉宾、御史庞尚鹏等奏报：自浙、直抗倭军兴以来，督抚诸臣侵盗军需银多达数十万两。除去侵欺有术，文饰多端、册籍沉埋，条贯混乱而无法清查之外，仅有案可查的，即有已故督察江南军情工部尚书赵文华侵盗十万零四千两，原总督都御史周琉二万七千两，总督侍郎胡宗宪三万三千两，原任浙江巡抚都御史阮鹗五万八千两，操江都御史史褒善一万一千两，巡抚应天都御史赵忻四千七百两。疏上，令罢赵忻，而对胡宗宪则以有功为借口，不予问罪。

孙陞逝世 孙陞(1501—1560)，字志高，号季泉，浙江余姚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授编修，迁右春坊、右中允，修《大明会典》。嘉靖二十五年，主持应天乡试，升国子监祭酒，历礼部左右侍郎，改吏部。进南京礼部尚书。嘉靖三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卒于任，年六十，赠太子少保，谥文恪。

石永逝世 石永(？—1560)，字寿卿，号静斋，北直隶威县(今河北威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由中书舍人历监察御史、南阳知府、滨州通判、南京太仆寺丞、平阳知府。升都御史，巡抚延绥，改南京大理寺卿，迁南京兵部右侍郎。进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湖广川贵军务。不久，改户部左侍郎，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卒于官。石永为人刚直，为官廉洁，素以风裁著称，死后，家无余积，时以为贞士。

章焕疏论经略中原八要 嘉靖三十九年(1560)七月二十八日,南京粮储都御史章焕眼见朝政日坏,中原征敛繁急,贪吏肆行,水旱连年,民不堪命,遂上言经略中原八事。其中最主要的三件事是:选良吏,欲清中原,必先清吏治;优恤宗藩,使其成为皇家藩屏;慎治黄河,避免兴工聚众,以致乱起。

福建兵变 先是,福建为抗倭之需,招募广东兵。但所募多轻生无赖,日索犒赏,有司难以足其所欲。嘉靖三十九年(1560)八月初六日,福建士卒三百余人起事,自沙县、将乐县出发攻陷泰宁县,官军守备王址战死。兵变队伍遂鼓行入江西广昌、乐安,再奔永丰。巡按御史郑本立奏报,世宗命赠王址为都指挥使,而逮问失职千户王兆元,守巡、参议孙应鳌等夺俸戴罪剿捕。

顾可学逝世 顾可学(?—1560),字舆成,南直隶无锡县(今江苏无锡)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正德中,官至浙江参议,后被劾落职,家居十年。嘉靖时,世宗好求长生,顾可学自言能延年术,用重贿进严嵩,官至右通政。嘉靖二十四年(1545)超拜工部尚书,寻为礼部尚书,再加太子太保。世宗为顾可学延年术所惑,采芝求药,中官四出,大为民害,于是人多怨顾可学。嘉靖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卒,谥荣僖。

开桑乾河 嘉靖三十九年(1560)九月二十九日,从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李文进所议,开桑乾河,以通大同运道,全长计727里。

陆炳暴死 陆炳(1510—1560),字文孚,浙江平湖县人。祖陆墀,以军籍隶锦衣卫为总旗。父陆松,袭职,从兴献王驻守安陆,为仪卫司典杖,累官后府都督佥事,协理锦衣事。母为世宗乳媪。陆炳幼即从母入宫中。嘉靖八年(1529)武会试,授锦衣副千户。其父死,袭指挥佥事,寻进署指挥使,掌南镇抚事。嘉靖十八年,从世宗南巡至卫辉,入夜行宫起火,从官仓猝不知世宗所在,陆炳从大火中救出世宗,自是益得宠,擢都指挥同知,掌锦衣事。陆炳骤贵,又能得阁臣夏言、严嵩欢心,以故权益重。后夏言劾其不法事,遂严嵩陷夏言至死。不久进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复加太保兼少傅。明代三公无兼三孤者,仅陆炳而已。陆炳势倾天下,积赀数百万,营别宅十余所,庄园遍四方。世宗数起大狱,陆炳多所保全。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暴死于官,年五十一,赠忠诚伯,谥武惠。

大同建立兵车营 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同官军立兵车七营。其制为:车一辆,士兵四十人,为一队;合十三队为一小营;合十小营为一大营。以上皆为总兵俞大猷所规划。京营有兵车,自此开始。

福建各地人民起义 嘉靖三十九年(1560),福建由于官府赋役剥削苛重,加以倭寇流劫各州县,以致民困不堪,各地人民相继奋起反抗。其中,有大埔的窖民、南湾的船民、尤溪的山民、龙岩的矿工,南靖、永定等处的流民,声势最大的窖民张琏等人的起事,官兵每战辄败。巡抚刘焘,应接不暇,惟宰牛送给起义之民、拥众自卫而已。朝廷责其戴罪剿捕。

户部奏准景王禄粮 嘉靖四十年(1561)正月二十二日,景王将就食藩国,经户部奏定,每岁给禄米一万石,派湖广德安等府征发本色。其京支禄米三千石,仍派苏州、常州等府,三年后停止支给。另每年给食盐一千引、茶三万六千斤。

罗复奏请马政事宜 嘉靖四十年(1561)正月二十四日,巡按直隶御史罗复疏论江南北马政四事:一、平马价。请以江南、江北马匹尽准改征折价,每马一匹,征银二十四两。二、宽马额。淮安所属州县因水灾、倭患,人户消亡,近又令民计马饷军,民益逃亡,请将见在之民养马解俵,其余逃户暂行豁免。三、严调拨。种马本资蕃育,不得借与民兵骑征,以防损耗。四、请增租。无为州、和州牧地,往往妄夺民田,执为新垦草场,加增租银,重贻民害,请复其旧,仍以荒地可垦者,课租,抵其半。疏上,兵部议复:本色马匹系祖宗旧制,不宜尽折,应为故解俵。其近准暂时改折者方许征银解部。其余各款由抚按官酌行。诏如部议。

潘季驯倡行均平里甲法 潘季驯巡按广东,倡行均平里甲之议。其法:先计州县之冲僻,以为用度之繁简,令民各随丁力输银于官。每遇供应过客及一切公费,官为发银,使吏胥、老人承买。其里长止于在官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广人皆以为便。潘季驯恐后任者不能守其法,于嘉靖四十年(1561)正月二十九日上疏,说:京师离广东绝远,地方官视广东为利薮,屠剥万状,而小民愁苦之声,无路上达,故相聚为盗。臣为之痛心疾首,已将里甲弊政,更张一新。疏上,户部请以其言通行广东全省,如法遵守,年终报告用银数目。得旨允准。

周延逝世 周延(1499—1561),字南乔,号崦山,江西吉水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知县,历兵科给事中,谪宿州通判、南京吏部郎中,升广东左布政使。居广东最久。安南之役及平定崖州黎民起事,俱有赞画功。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进兵部右侍郎,提督两广军务。入为刑部左侍郎,历南京右都御史,吏、兵二部尚书。嘉靖三十四年召为左都御史,

加太子少保。嘉靖四十年二月十一日卒于官，年六十三，赠太子太保，谥简肃。周延为人峭直清介，砥节奉公，士论推重。有《简肃公遗稿》。

代府奉国将军请令有司催补积欠禄粮 嘉靖四十年(1561)二月二十三日，山西代府奉国将军朱聪浸等以禄粮积欠数年，赴京奏言：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曾不一食，老幼嗷嗷，艰难万状。有年过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尸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为民间做工，有流移他乡，有饿死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请令有司清查积欠代府禄米，催征给补，使父母妻子得沾一饱。世宗览其疏，甚悯之，令山西抚按官核报。

赵大佑奏报伊王朱典楧不法事 嘉靖四十年(1561)三月初三日，刑部左侍郎赵大佑、锦衣卫都指挥佥事万文明等奉命复勘伊王典楧不法诸事，回京据实奏报：典楧以修理府第为名，将方城王府、桐城郡主第宅、洛阳县狱等尽行逼夺，侵占官街五道，抑买民房一百余家。又遣军校赴洛阳等县催征钱银，强迫洛阳居民一千余人入府中做工，并擅立东厂，缉捕百姓。其府第为砖城一座，重城一座，各有正门，环城红铺十座。除王正宫外，又建槐椿、清和、鸳鸯、腾光宫殿，百花台、乘风御气阁十一所。又遣内使、军校四出强夺居民妻女四百余人。选民女十二岁以上者七百余人，选留不中，令以金赎。随意逮治地方官，严刑拷掠。世宗诏毁其宫殿，退还官民房舍，放还民女，速图自新。

闽粤赣流民起义 嘉靖四十年(1561)三月初三日，广东黄启荐率领惠、潮山民数千人，攻打海丰、碣石、归善等县，破甲子门巡检司，杀死官军百户魏祚。四月十一日，南赣叶槐、岑冈李文彪各率众万余人，分别围攻安远县和龙南县。闰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流民起义，攻泰和县，大败官军，杀死官军清军副使汪一中、指挥王应鹏、千户唐鼎等。七月十四日，江西流民起义，攻陷玉山县，未几再克永丰县。九月初一日，广东三镇山民张琏等人率众自江西入福建，破南靖县，烧毁县学和仓库，再拥众攻崇安。然后转入浙江，攻打龙泉县。九月十二日，福建山民起义攻陷镇海卫。十月十一日，福建、广东两省流民联合起义，攻福建邵武，复入江西攻铅山、贵溪，回师福建攻建宁。起义频起，朝廷震惊。七月十一日，诏令严惩失事诸臣；命浙直总督胡宗宪兼节制江西，发兵应援；江西巡抚暂加兼理军务。并责令闽、粤、赣三省限期剿灭。

吴鹏致仕 吴鹏(1500—1579)，字万里，号默泉，浙江秀水县(今浙江嘉兴)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工部主事，历福建参议，出使安南(今越南)。后总理河漕，督兵镇压河南师尚诏起义。嘉靖三十五年三月由工部侍郎进为吏部尚书。时严嵩父子柄政，吴鹏在吏部，凡百官进退，悉听命于严世蕃，无敢自专，实充位而已，中外人心，无不鄙薄。嘉靖四十年三月十五日致仕。万历七年(1579)卒，年八十。有《飞鸿亭集》。

吴山闲住 吴山(1500—1577)，字曰静，号筠泉，江西高安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授编修，累官礼部左侍郎。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出任礼部尚书。次年，加太子太保。吴山为人正直，不媚权贵，与严嵩同乡，严嵩子世蕃欲与通婚姻，吴山不可，世蕃不悦而罢。后世宗欲用吴山入内阁，严嵩遂密疏阻之。嘉靖四十年二月，因言日食事，世宗责其卖直沽名。三月十五日勒其闲住，时人不平。穆宗即位，召为南京礼部尚书，坚辞不赴。万历五年(1577)卒，年七十八，赠太保，谥文端。有《治河通考》。

赵大佑请裁减伊王府新增旗校 嘉靖四十年(1561)三月十六日，刑部侍郎赵大佑奏：伊府原额护卫旗军二千名，今多至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余名；仪卫司校尉原额六百名，今多至六千六百余名。宜如正额存留守御宿卫，仍每名量留供丁三名，多余的发洛阳县收籍，编入图甲，办纳粮差。如遇正丁、供丁死亡，照数征补。经兵部议覆照准。

刘采请江西和苏松诸府布绢暂停改折 嘉靖四十年(1561)三月十九日，南京户部尚书刘采奏：自今年开始江西、应天、徽州、苏州、松江布苎、丝绢，暂时仍解本色，停止改征银两。待有积余，再议改折征银。诏可其奏。

京官及有司官不得纳援 嘉靖四十年(1561)五月初四日，礼科右给事中沈淳奏言：往年户、工二部偶因财乏事繁，暂行纳援诸例，本出一时权宜之术。今行之数年，尚不议罢。臣以为此法利不偿害，宜令户、工二部详议，待库藏稍有盈足，即行尽罢，以塞冒滥。必不得已时，亦宜暂时只开王府纪善官以下以及府、卫首领等官与入监遥援等例济用。京官及有司亲民之官不得一概纳援。户部复议如其言，世宗诏准。

唐继禄建言修省事 嘉靖四十年(1561)五月十八日，御史唐继禄因旱灾，上言修省十事：一、抚绥流民。二、捍御边境。三、禁治骄纵。四、经理租赋。五、痛抑侈靡。六、调停催科。七、救济灾民。八、裁革纳级。九、量免入觐。十、黜罚奸庸。令京堂官俱自陈过失，其余由各部和都察院考察去留。疏上，世宗以为可。于是内阁严嵩、徐阶各上疏自陈求罢，世宗下诏

慰留。未几，吏部尚书欧阳必进等率九卿自陈求退，世宗令户部左侍郎刘养直、工部尚书张文宪等致仕，其余留任、降级、外调有差。

陕西宁夏、固原地震　嘉靖四十年(1561)六月十四日，宁夏(今银川市)、固原、庄浪(今永登)等处地震。山崩河决，城垣墩台倒塌，地裂涌出黑黄沙水，压死军民甚多。固原压死诸苑监牧军千余户，牧马五百余匹。广武寺庙倾颓，佛像损坏，城池馆舍倒者十之八九，压死人口大半。红寺堡城亦坏，养正书院、清宁观、鸣沙安庆寺皆倒塌，永寿塔颓其半，游击署亦敝漏不可居。九月，因陕西宁夏固原地震伤人，命发太仓银八千两，并留本省事例银三千两赈恤，并以牧地召佃给种马孳息。波及甘肃兰州、山西太原大同等府，怀仁、平凉府吉州(今吉县)屋瓦有声，陕西榆林、鄠县、盩厔、靖远卫等俱震，逾月乃止，此次地震最远破坏距离约三百二十公里，最远有感距离约五百六十公里震中烈度(I_0)Ⅸ—Ⅹ，震级(M)为七点二五级。

许论罢官　许论(1495—1566)，字廷议，号嘿斋，河南灵宝县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顺德推官，历兵、礼二部主事。好谈兵，幼从父历边境，尽知要塞险易，进呈所著《九边图论》，世宗大喜，颁边臣议行，由是以知兵著闻。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召理京营戎政。嘉靖三十三年出任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立战功，加太子太保。嘉靖三十五年，官兵部尚书。时严嵩父子专权，许论已年老，一切听严氏父子指意，致大同右卫为俺答围困六月而不能解，遂被劾削职。嘉靖三十八年复故官，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给事中郑茂等人劾其侵冒军饷，嘉靖四十年六月二十六日被夺官闲住。嘉靖四十五年闰十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二，隆庆初，复官谥恭襄。

冯天驭罢官　冯天驭(？—1568)，字应房，号伯良，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历大理寺评事、御史，累官至吏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年四月初五日，进为刑部尚书。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因给事中侯廷柱劾其庸鄙，被罢去官。隆庆二年(1568)卒。

林润疏劾鄢懋卿贪冒五罪　嘉靖四十年(1561)八月初五日，南京御史林润疏劾总理盐政左副都御史鄢懋卿贪冒不法五罪：一、需索属官贿赂巨万。二、随意受理词讼，搜括富民钱财。三、宴会日费千金，用钱如土。四、虐杀无辜平民。五、加额重敛扬州盐商，几至激变。疏上，世宗竟加庇护，令其照旧供职。

苏松等府水灾　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十四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七府大水为灾，平地水深数尺，累月不退。抚臣请破例蠲恤。世宗从户部议，命停征是年秋粮，并改折起运改兑米，七府事例赎罚银亦俱留充赈。

诏定内府各衙门工役数额　嘉靖四十年(1561)十月二十一日，刑科给事中侯廷柱奏裁各衙门工役冗食，宜据册定数，遂定内府工役一万七千一百七十名、锦衣卫一万六千四百名、光禄寺三千六百名、太常寺一千一百名。此后有缺，许于在册余丁充补，不得夤缘滥收。

欧阳必进致仕　欧阳必进(1491—1567)，字任夫，号约庵，江西安福县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礼部主事、浙江布政使、两广总督、南京都御史，累官工部尚书。嘉靖四十年(1561)三月，由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进为吏部尚书。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会推礼部尚书不称旨，被勒令致仕。隆庆元年(1567)卒，年七十七。著有《白云山稿》。

永寿宫内历代宝物俱毁于火　永寿宫，为永乐间所建，在皇城西苑内。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发生宫婢之变以后，世宗皇帝即移居于此。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永寿宫突然起火，禁卫不及救，乘舆服御以及先世宝物一时俱化为灰烬，世宗皇帝暂时居住玉熙宫。重建之后，改廒永寿宫为“万寿宫”。

王邦瑞逝世　王邦瑞(1495—1561)，字惟贤，号凤泉，河南宜阳县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改吉士，授广德知州。嘉靖史，历官南京吏部郎中、陕西提学佥事、固原兵备副使、陕西参政。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召为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左、右侍郎。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俺答犯都城，王邦瑞奉命总督京城九门，代摄兵部尚书，兼督团营。京师取消戒严之后，上疏极言团营之弊，世宗纳其言，遂罢十二团营，恢复三大营建制。并改王邦瑞为兵部左侍郎，专督营务。又疏言宦官典兵为自古以来之大害，请尽撤宦官监军。世宗亦从之。进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时大将军咸宁侯仇鸾跋扈专横，欲节制诸军，王邦瑞坚执不可。于是为仇鸾所诬陷，落职家居十年。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初一日，乃起故官。嘉靖四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于官，年七十七，赠太子少保，谥襄毅。有《王襄毅公集》。

张琏起义失败　张琏，广东饶平县乌石村人。因杀死族人，投奔郑八，萧晚(又称萧雪峰)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郑八死后，张琏被推为首领。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琏称帝，年号“造历”。在粤北山中构筑宫殿大寨，周围环列小寨数百，聚众十万人，先后出

击福建汀州、南靖、漳州、延平、建瓯和江西宁都、瑞金等地。嘉靖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南京都督佥事刘显为总兵官，镇守广东、南赣；参将俞大猷为副总兵官，入南赣会兵进剿。俞大猷遂统官军一万五千人迅速追击至闽赣交界的柏嵩岭，破山寨，俘获张琏、萧晚，杀死一千二百余人，遣散胁从者二万人。同年五月十二日，张琏起义失败。六月十八日，张琏在广东被斩。（一说张琏率众突围后移居南洋）。

邹应龙劾严嵩父子不法事　御史邹应龙因避雨内侍家，得知世宗有意罢斥内阁首辅严嵩的消息，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十九日专疏弹劾严嵩父子。说：严世蕃凭借其父严嵩的权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贿遗。每次任用官员按官品高低论价，索取贿银。如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一万二千两转入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两而得知州。至于交通赃贿，为之关节者不下百余人。严世蕃子锦衣卫严鹄、中书严鸿、家奴严年等亦多奸诈黠狡，贪得无厌。严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等处，无虑数十所，抑勒侵夺，怙势肆害，所在民怨入骨。严世蕃在母丧守孝期间，依然拥姬抱妾，金迷纸醉，日以继夜。严鹄回家为祖母治葬事，沿途骚扰，百计需索，郡邑为之一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事，民穷财尽，皆由严氏所致。请立斩严世蕃，以为不忠不孝者戒。严嵩受国厚恩不思报，而溺爱恶子，弄权黩货，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此疏呈上，世宗遂责令严嵩致仕。严世蕃等人下狱。

严嵩罢官　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后因病归里，在钤山读书十年，诗文古辞，颇有成就。回朝以后，进侍讲、历国子祭酒。自嘉靖七年(1528)开始，先后官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南京礼、吏二部尚书。五年后入北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主持重修《宋史》。嘉靖十五年，迁礼部尚书视部事。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进为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严嵩无他才，唯一意献媚世宗，窃权罔利。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加太子太傅，九月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十二月加少傅。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加太子太师，八月加少师，出任内阁首辅，独揽政事。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晋为华盖殿大学士。次年八月加上柱国，并以其子严世蕃为太常寺卿。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害死首辅夏言。于是严氏父子恃宠擅权，相济为恶，擅杀大臣、残害忠良，卖官鬻爵，政以贿成；排斥异己，遍引私人；贪酷无厌，广置产业。尤其是到了严嵩执政后期，东南倭祸和北方边患更加严重，赋役日增，灾害频繁，民不聊生，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天怒人怨，人咸指目严嵩为奸臣。嘉靖三十七年三月，给事中吴时来等人相继上疏历数严氏父子朋奸罔上，祸国殃民诸罪行，请立除严嵩父子，以正国法。自此世宗渐渐厌恶严氏父子。是时，严嵩已经年老，军国大事多由严世蕃代为处理。嘉靖四十年闰五月，严嵩妻欧阳氏死，严世蕃因守孝不得入阁，严嵩受诏多不能答，所进青词又多出自他人之手，不合要求，由是更加失去世宗的欢心。至同年十一月，世宗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失火，严嵩请移居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的南城离宫，世宗大为不满；而大学士徐阶则请重建永寿宫，世宗甚是高兴，至此世宗益信用徐阶。未几，世宗采纳方士蓝道行的建议，有意罢严嵩。御史邹应龙得知世宗意图，于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十九日疏劾严嵩父子。世宗得疏，以严嵩放纵严世蕃，负国恩，令其致仕还乡，而下严世蕃于狱。后严嵩削籍，抄没其家，得金银财物无数。严嵩老病，寄食墓舍。隆庆元年(1567)死，年八十八。(一说死于嘉靖四十四年，又一说死于隆庆三年。)有《钤山堂集》。

江东献保边十策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六月初二日，总督宣大兵部尚书江东上疏，说：御寇之策，以保全边堡为第一，而欲保全边堡，必须做到：一、积粮。二、征还各营选调的士兵。三、选练士兵共守。四、增城疏池。五、屯田耕牧。六、造双轮战车。七、选好将帅。八、信赏必罚。九、厚恤间谍。十、严禁边军通敌。兵部复议，从其言。

户部进理财事宜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七月十一日，户部奉旨集廷臣议进理财之策，计十四事：省兵食，慎调遣，先节省，完积逋，清屯粮，牧马匹，均修边，停外例，处铜价，减供应，杜奏留，议补助，议漕河工银。其中，最重要的是节省兵饷。世宗以近年边饷侵冒多端，特令各抚、按官正己率属、严革积弊。违者听部、科参治。

重录《永乐大典》　三大殿发生火灾时，《永乐大典》藏于文楼，世宗急命左右将《永乐大典》取出，使之得免于火。为重录一部副本，贮藏于他处，以备不测。世宗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十三日下诏重录《永乐大典》。礼部遂召集儒臣程道南等百余人，在史馆内进行分录。至隆庆初年告成，共为正、副二本，原本送归南京，正本藏于文渊阁，副本贮于皇史宬。(一说当时并没有录正、副二本，所谓归还南京原本，似即正本，原本仍在北京。)

世宗更改殿名　嘉靖四十一年(1562)九月初三日，改奉天殿为皇极，华盖殿为中极，谨身殿为建极，文楼为文昭阁，武楼为武成阁。左顺门为会极，右顺门为归极，奉天门(大朝门)为皇极，东角门为弘

政，西角门为宣治。是日，百官表贺，诏告天下。后又改乾清宫右小阁为道心，旁左门为仁荡，右门为义平。

林润疏议宗藩禄米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十三日，御史林润上疏说：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为可虑者，莫如宗藩。因为今日宗室繁衍，岁禄不继，宗藩禄米所支比过去多出数百倍。如河南开封，洪武中惟一个周王府，至嘉靖初郡王已增三十九，将军至五百余，中尉、仪宾不可胜计，举一府而可知天下。今距嘉靖初又四十余年，所增之数又不难推知。计天下财赋每年供京师粮食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多达八百五十三万石，超过供京师之粮一倍以上。如山西存留米为一百五十二万石，禄米则为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王府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以此二省论之，即便田赋粮全征，也不够供王府禄米之半，况且吏禄、军饷皆出其中。因此形成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至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有司困于难供，宗藩苦于不给。于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臣以为宜令大臣和科道集议于朝廷，然后颁论诸王，示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之意。令户部全计赋额，以十年为准，大约兵荒、蠲免、存留费用几何，王府增封几何，禄米及诸费几何，令宗藩晓然，知赋入有限，而费出无穷，共陈善后之策，然后通集众论，请皇上定夺，以为万世不易之规。礼部依其议，世宗诏准。

诏求方士法书 世宗皇帝晚年梦想长生，求方术益急。时丰城县方士熊显进《法书》六十六册，世宗大喜，诏留御览，赐熊显冠带、银币。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初三日，进而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访求方士及符录秘书。二年后还朝，上所得法秘数千册，并荐方士唐秩、刘文彬等人。姜儆、王大任俱进侍讲学士。唐秩、刘文彬等赐第京师。

陆凤仪疏劾胡宗宪十罪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初七日，南京户科给事中陆凤仪劾奏浙直总督胡宗宪欺横贪淫十大罪。大略说：胡宗宪本与海寇头目王直为同乡，其所任蒋州、陈可愿等人皆为海寇奸细。在江南剿倭中，胡宗宪按兵玩寇，且许王直任海防官，与之约誓和好。若不是皇上英明果断，诛杀王直，耻辱将不可雪。而胡宗宪竟自以为功，奏捷于朝廷。近来长夜纵饮，坐视江西、福建之寇。侵冒军饷，睃削民财，督府积银如山，聚奸如友，宣淫无度，大纳姬妾，克扣上供岁造布匹银两，滥给倡优，市贩官职，私役官军。请重加惩治。疏上，世宗命锦衣卫将胡宗宪械押入京。并从此撤消浙直总督之设，任左副都御史赵炳然为兵部右侍郎，提督军务，巡抚浙江。

徐炌请户部尽免两淮余盐加额 起初，两淮余盐额征银六十万两。嘉靖三十二年(1553)新开工本盐引增至九十万两。嘉靖三十九年三月总理盐政副都御史鄢懋卿又增至一百万两。于是商人苦之。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巡盐御史徐炌为此奏言：祖宗时淮盐有常股、存积、水乡，共计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每引重二百斤。边境中盐每引纳银八分。至永乐以后，每引纳米二斗五升。近年递增，算及毛发，正盐之外，有余盐；余盐之外，又有加工本钱，添单、添引，且加以割没。鄢懋卿见掣盐阻滞不畅销，欲为疏通，不知前盐有掣无售，商人困极。请户部尽免加额，每年仍征六十万两。世宗允其奏。于是鄢懋卿所增之额悉罢。

倭寇攻陷福建兴化府 劫掠浙江、广东等省的倭寇纷纷窜入福建，与原在福建的倭寇互相联合，大举进犯福建各地。先后攻掠邵武、罗源、连江、寿宁、政和、宁德、福清、长乐、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以致闽中迄无宁日。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二十九日，倭寇攻陷兴化府，将府城焚掠一空。自倭寇犯东南以来，破州、县、卫、所虽有百余计，但从未及府城。兴化为福建大府，最为繁富，至此为倭寇所陷，远近为之震动。

泉州府大疫 嘉靖四十一年(1562)，泉州府城瘟疫，人死十分之七，市肆寺观死尸相枕，有阖户无一存者。市门俱闭，至无敢出。

"戚家军"兴化大捷 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二十六日倭寇攻陷平海卫(在莆田县东南)。世宗即令副总兵戚继光自浙统"戚家军"入闽会剿；又命提督两广都御史张臬总督广、闽军务。并升参议谭纶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同年四月二十日，戚继光率戚家军与总兵官俞大猷以及援闽广东总兵官刘显合攻平海卫倭寇。巡抚谭纶，令戚继光统中军，刘显统左军，俞大猷统右军。戚继光一军先登，左、右军继之，遂大败倭寇，收复兴化，斩首二千二百人，救出被掠男妇三千余人。倭寇大伤而去，浙、闽以次渐平。七月十六日，谭纶奏报兴化大捷，以戚继光为首功，进都督同知。十月初六日，再升戚继光为福建总兵官，镇守全闽。

严惩外官贪肆害民 嘉靖四十二年(1563)七月初八日，世宗命抚、按官巡视郡县，督察奸弊。于是吏部尚书严讷奏言：近日抚按官随意滥罚滥收，侵渔公款，索取夫马，科派劝借，接受贿赂，厚馈势要，讨好上司，逞威淫刑，掩饰欺诈，潜贿杜法，假公济私。有官如此胡为，国用岂能不亏，百姓岂能不苦！望陛

下明祖宗法度，令抚、按官实力奉行，从公劾奏，使无负保国为民之至意。世宗以为然，令抚按官依议施行，如抚、按官劾奏不当者，由部院即行参治。

诏令崇文门宣课司恢复商税收钱 户部曾请在云南就地开矿铸钱，乃令巡抚以盐课银三万两为工本。数年后，云南巡抚王昺、巡按王诤，俱以费多人少请求罢铸。户部官为此复用主事范燧的意见，以每钱七分当银一分。于是崇文门宣课司收税及官俸仍用银，而民间所积蓄的旧钱更加阻滞不行，钱法遂坏。给事中孙枝上疏请恢复收钱。户部商议同意，世宗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九月初六日，命崇文门宣税司商税恢复收钱。

诏罢闽广总督 广东和平县民李文彪起事，总督闽、广都御史张臬，以李文彪所据地险，难以用兵进剿，倡议招抚李文彪。于是给事中陈懋劾其纵寇殃民。疏呈上，兵部以为张臬非军旅才，并说闽、广相距甚远，不便兼辖，只以提督兼巡抚。嘉靖四十二年(1563)九月三十日，世宗遂令张臬致仕，闽广总督停罢不设。命总理河道佥都御史吴桂芳为兵部右侍郎，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西。

诏罢遣京寺"番僧"往封藏王 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初八日，乌思藏阐化等王请封。礼官按贯例遣京寺"番僧"二十二人为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对监之。行至中途，所遣"番僧"肆为骚扰，不受朱廷对约束。朱廷对还朝，遂白其状。礼部因请自后诸藏请封，即将诰敕付来人带回，罢"番僧"勿遣。如不可，则令附近藩司选近边僧人赍赐之。世宗令著为例。封诸藏王封号不遣京师佛寺"番僧"，自此始。

户部议边饷事宜 嘉靖四十二(1563)十二月初三日，户部集边臣议边饷十二事：一、增河南、山东民兵工食银，每人银三两。二、恢复两广预备银，每年以十万两济边。三、杭州北新关商税解部。四、江淮、济川二卫空役银，每年以二万五千两解部。五、查催各省屯田银，并以三分之一解部。六、河南兑小滩漕余米，每年以一万两解部。七、扣江西机兵工食银二万两解部。八、查核长江芦州税。九、吏承班银。十、查核缺官俸粮。十一、催征契税、商税、引税银。十二、开例贡纳援。世宗从户部议。

请禁辽东海运 先是辽东饥荒，暂时允许通海运，使辽船得以至山东登、莱购粮救饥。后来辽东商人以此为大利，私载货物往来山东。为此，山东守臣以海禁渐弛，恐有后患，疏请禁止海运。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二月初五日遂禁止通海辽船。

诏废伊王朱典楧为庶人 伊王朱典楧，为明太祖第十五子伊厉王六世孙。嘉靖二十一年(1542)嗣封，封地河南洛阳。朱典楧性贪而狡，放纵怙恶。自都御史张永明发其奸恶之后，御史林润、给事中丘岳相又相继奏其不法事。世宗一再下诏，令其改过自新。朱典楧却拒不奉诏。礼部下通牒，更不屑一顾，说通牒毫无用处，只能作纸糊窗户。于是巡抚都御史胡尧臣、巡按御史颜鲸进而会奏朱典楧在国不法事。如，夺占民舍三千余间，以广其宫室；逼残民众，炮烙人尸，强夺他人妻子四百余人；所筑宫室，仿照帝城，选民间良家女七百余人，留其姝丽者供其淫乐，其余则令女家以金赎，不赎则出其尸；诈骗民财三万余两；遣派军校往云南仿制环铠皮甲，并在王府内鸠匠锻造甲胄六百副，枪三千杆，铸行营火炮佛郎机等数百座。典楧等还着戎装，率其宗仪校从一千余骑，出城至河南卫教场演武；私阉宦官，四出招集亡命一百余人，皆给职衔冠带。疏奏入，世宗于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初六日下诏说：朱典楧久蓄异志，恣行僭拟。朕念宗亲，未至厥辜，顾乃负恩稔恶，屡抗明旨，私造兵器等项不臣罪状，昭然显著。既经参论核实，本当重处，姑革爵降为庶人，禁锢高墙，削除世封，以彰国法。乃命驸马都尉谢诏告于太庙，以书谕各王府知晓，并逮治朱典楧王府中论死、发遣者一百五十余人。

韩府宗室群聚索禄米 韩王府在平凉。享受禄米者达一千余人，每年禄米银增至十二万五千两，而岁给不及其半，以致历年积欠禄米银六十万两。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十三日，韩府宗室一百四十余人，越关入陕西西安，索取所欠禄米，拥众围陕西巡抚陈其学住宅，鼓噪辱骂。其学为此数日不敢开门，传令布政司先后两次搜括各项银两七万八千余两付给韩府。诸宗室以为少，迟迟不肯离去，在市中公开抢夺，以致街上无人，商人罢市。陈其学等遂据实奏报朝廷。世宗大怒，下诏切责韩王朱融燧，令其严加约束各宗室。并废宗室朱融熽等人为庶人。

戚继光大败倭寇 福建兴化残倭，重新纠集万余人，围攻仙游县三日。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十四日，总兵官戚继光引兵驰援仙游，与倭大战城下，倭败奔同安，继光趋兵追击至王仓坪，斩首数百级，坠崖山谷间无算。余倭数千人奔逃漳浦县蔡丕岭。戚继光分其兵马为五哨进击，他自率短兵，赤脚攀崖而上，倭伏兵四起，继光愈战愈勇，督各哨兵殊死力战，冲入倭巢，又擒斩数百人。少数逃脱者流入广东，掠渔船出海去。至此，福建倭患暂时平息。

朱炳如疏言盐政 嘉靖四十三年(1564)六月初二日，两淮巡盐御史朱炳如条陈盐政四事：一、江西全省旧行淮盐，系因地制宜，杜绝私贩之路，此法

甚善。其后南赣改用广盐，袁州、吉安二府起而效之，以致私贩盛行，淮盐日滞，宜令袁、吉二府仍然食用淮盐。其各商至府挂号之日，宜仿南赣纳税事例，给文销引，使两淮的存积可以得到疏通，而赣中军饷亦不至乏绝。二、应天府额派淮安盐课四万零八百引，内溧阳一县与浙江盐场相近，私盐易通，近有惑于奸商私说，建议兼行浙盐，宜勿听许。三、河南南阳、汝宁二府以及陈州一州原行淮北盐，近来转行河东盐，以致巡盐不得一概举劾。四、湖广衡州、宝庆二府地近广东，原行淮盐，近改行广盐。今宜悉免淮盐抽税，待其卖尽，再行广盐，并令照例纳银以补两淮优免之数，使彼此轻重适均，人情称便。世宗从其奏。

俞大猷大破倭寇于海丰　倭寇在福建遭到严重打击以后，渐次流入广东。及两广和南赣集所调土、汉兵，乘其初至，突然发起攻击，倭寇兵败，悉夺海船入海。遇起大风，渔船多沉没，不死者仅二千余人，还保海丰县金锡都。广东总兵官俞大猷遂督兵围倭二月。至嘉靖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倭寇粮尽欲走，俞大猷与副总兵官汤克宽设伏兵击之，擒斩一千二百余人。俞大猷击败海丰之倭以后，即移师潮州，进剿与倭寇相勾结的潮州吴平、蓝松山等人。

刘畿请罢额外加派　嘉靖四十三年(1564)七月十九日，顺天府尹刘畿奏言：提编(额外加派之别名)之弊，甚于正额。臣阅本府各州县夏秋两税额，折银不过十万零九千两，而额外加编竟多至十一万二千六百余两。顺天地处京城之下，采办加派无时，添设劝借不已，仅以宛平、大兴二县而言，有全里逃亡无留下一丁的，有仅余下二、三户的。今当编均徭之期，宜令各州县官预先将境内丁田核其原额，厘正欺隐，差役究其因革而裁其冗滥。然后按丁粮之多寡，为赋役之轻重，务使差徭均平，不得额外滥编。疏呈上，户部请交有司查核，奏报朝廷。

停止百官食盐免费之制　旧例：官民户口食盐，皆计口纳钞，自行关支。在京各衙门，每年遣拨办吏一人下场收买。此法由来已久。然而，吏藉官司权势，往往加倍收运，恣为奸利。近年以来锦衣卫官校以至连大船数百艘，塞河而上，沿途私贩，车运马驮，莫敢过问，盐法为之壅滞。于是巡盐御史请令运司开具百官食盐，较定斤两，筑仓于司，待支盐人役到后数包给予。自此之外，不许别有夹带，诸支盐人役亦不得自行下盐场。违者概论如律。锦衣卫官校之私贩由是顿息，各衙门吏既无所获利，一应纳钞，僦輓之费悉所出，多坐累不交，贫者且至弃役而逃。嘉靖四十三年(1564)九月初三日，验封郎中言于吏部尚书严讷，疏请革之。自后百官遂停食盐不支，唯十三道御史岁支如故。

刘焘疏通潮河川　起初，蓟辽总督驻密云，兵将屯结，岁运漕粮十万余石，悉由通州陆运至牛栏山，转输密云，每年运费甚巨。总督刘焘发军卒疏浚潮河川，嘉靖四十三年(1564)九月初七日，正式疏通，直达通州，可驾船运粮，直抵密云，每年省运费十分之七。

徐阶奏太仓库积余银米　嘉靖四十二年(1564)九月二十二日，世宗密谕内阁首辅大学士徐阶太仓库是否有积余？徐阶对答：上年米贱，太仓余二十余万石，以折兑每石该银七钱，二十万石应为银十四万两。今给军每石银五钱，是二十万石止银十万两。故省银四万两，余米八万石。

高耀奏言钱粮事宜　嘉靖四十三年(1564)九月二十四日，世宗令户部选上米千石进宫内食用，并说仓积无二、三年之蓄，户部官当思足国之计。户部尚书高耀因此条陈理财八事：一、岁运漕粮，非灾伤重大，不得轻议改折。二、官军月粮，愿支折色者，酌量米价给之。三、粮运积欠者，除照例讯问外，还要严限追捕。四、粮船漂没，须督工补造，本帮出银补粮，不得从官旗假名侵费。五、在京班军并做工官军行粮每月仍支折色银四钱，永为定制。六、行催各司府积欠绢布毋令倚办币银，致亏国课。七、裁革光禄寺、太常寺厨役、锦衣卫官校及各监局匠役，归所省之费于官。八、清查各营卫官军食粮实数，以防虐冒。世宗说：户部及各衙门，俱须实心体国奉公，以求富足。

乡试考官改用教职　先是，世宗采纳尚书张璁的建议，各省乡试主考官和两京乡试分考官多派遣京官担任。嘉靖四十三年(1562)十月二十日，给事中辛自修、御史罗元祯等人各奏去年顺天乡试科场奸弊，事涉科、部官。于是礼部认为：两京分考官就近选用，人得事先预为谋划，弊端诸多，议论纷纷。请按照旧例，选用各省教职担任。世宗诏自今为始，两京乡试分考官，俱选择年力精壮文行兼优的教职充任。自此各省乡试亦罢遣京官。

严惩私自铸钱　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一月十六日，世宗以钱法日坏，私铸盛行，令内外诸司严加访治。宝源局所筹制钱，各色匠役人等侵料减工，以致轻小滥恶，不堪行使。工部须将其中不法之徒一一访查，访送法司从重治罪，宝源局暂罢铸钱。户部每年将南京、云南及税课司解收好钱一千万文，以备赏赐之用。于是工部悉将作工、炉头、、监铸官凡二十余人，执送刑部，拷讯历年侵盗及冒领工食银之数，并揭发监造副使段相等人受贿故纵罪，分别予罢革。

张岳条陈时政　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二月

初三日，刑科右给事中张岳陈时政六事：议禄粮以安宗室。辨诚伪以正士风。公舆论以蓄真材。杜奸宄以振士气。核部差以肃守官。止开纳以议兵饷。张岳又奏：今各部吏治稍清，惟兵部不思振奋，各司条例，杂乱无章，胥吏朋奸。

夺景王占田还民　嘉靖四十四年(1565)正月初九日，景王病死，年二十九，无子，妃还北京，封地撤销。大学士徐阶奏夺景王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于民，楚人大快。

温如璋请行十段锦法　嘉靖四十四年(1565)二月初十日，巡按直隶御史温如璋条陈议处江南兵食三事，以品官优免太滥，诡寄日滋，请于江南推行"十段锦法"，即总算力差、银差之数，总计十甲之田，派为定则。如一甲之田有余，则留以为二甲之用，不足则提二甲补之，剂量适均，轻重合一。

颁行《宗藩条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御史林润疏言宗藩积弊，请亟议善处宗藩之策。是时周府南陵王朱睦楧也上疏，请立宗学、准宗人科举入仕、革冗职。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礼部集廷臣议定六十七条，进呈世宗，命颁行天下，名为《宗藩条例》。

王崇庆逝世　王崇庆(1484－1565)，字德征，号端溪，四川开州(今四川开县)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累官至南京礼、吏二部尚书。嘉靖四十四年(1565)二月十三日逝世，年八十二，赠太子少保。有《五经心义》诸书。

袁炜致仕　袁炜(1508—1565)，字懋中，号元峰，浙江慈溪县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编修，进侍讲。才思敏捷，极词颂美，以此得宠，骤升为礼部尚书。嘉靖四十年十一月，加太子太保，改为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四十三年八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因袁炜以工青词入阁，时人将其与李春芳，严讷、郭朴并号为"青词宰相"。袁炜自负能文，高傲自大，对人肆加诋诮，故皆畏而恶之。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初八日因病致仕，四月二十八日死于归家途中，年五十八，赠少师，谥文荣。有《袁文荣公文集》等。

王之诰奏辽东垦田事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十二日，巡抚辽东右佥都御史王之诰疏议辽东垦荒八事：一、议工力。以田九百顷为率，用二千四百人，把总二十四员，总委官六员，将各营见在步军六千零四十余名更番拨用。二、议牛具。每牛一头，种田一百五十亩，牧者一人，耕者三人。牧者给草料，免其杂差，惟耕时必随时下田，与耕者三人同力合作，令总委等官不时查验草料。其牛具即于原议修城银给之。三、议种子。计田九百顷，用种子二千零四十石，于上年收获内动支。四、议车辆。登场日，用车一百八十辆装运，每辆银二两，除已造完三十两者，宜于广宁马市税银内支用。五、议供费。每营一百五十顷，须军夫四百名，委官五员，约工一百日，该费口粮六百一十五石，牛一百头，该豆七百五十石，草一万束，俱于本田收获粮草内动支。六、议草秸。每种田九百顷，存积柴草除谷草、豆秸留以饲牛，麦秸一年所得可以变卖银一千两，置补牛具、农器。七、议仓库。各城仓库倒塌，宜给夫丁银两，于今春先后修理，除收贮屯盐二粮外，余仓悉收营田子粒。八、专责成。河西营田由接管都御史负责，河东营田由巡按御史负责，互相督责，各道并大小将领以实举行。奉行不力以及因循误事的，年终查明参究。请令接管都御史协心共济，以图成效。户部议复，俱从其议。

严世蕃伏诛　严世蕃(？－1565)，号东楼，江西分宜县人，严嵩子。由义荫入仕，官至工部左侍郎，掌尚宝司事。为人阴毒，仗父势，招权无厌。然颇通国家典故，晓畅时务。严嵩年老昏聩，而且朝夕入直西内，朝政悉委严世蕃处理。他建第京师，造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于其中，日夜纵饮作乐。又好古尊彝、奇器、书画，搜取不遗余力。凡所欲得，必得而后已。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邹应龙劾严嵩父子，严世蕃论戍雷州(今广东雷州半岛地区)，未至即返。其门客中书舍人罗龙文到戍所后亦逃回徽州，数往来江西，与严世蕃密谋，继续作恶。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南京御史林润，上疏尽发其罪，世宗大怒，命林润将严世蕃逮捕至京，罗龙文亦从广西梧州被捕至京。世蕃至京后，林润等又上一疏，力陈严世蕃诸罪，词连严嵩冤杀杨继盛、沈链事。刑部尚书黄光升将狱词送徐阶，徐阶亲笔修改狱词，只提罗龙文与海寇头目王直相交通，贿世蕃求官。严世蕃以南昌会地有王气，取以兴建宅第，比拟王制，并且暗中交给伊王朱典楧，多聚亡命，南通倭寇，北通蒙古，图谋不轨。又招海寇王直余部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疏呈上，世宗命法司审讯，具实奏报。徐阶即迅速上疏回奏，说事已堪实，具有明证，请亟正典刑。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严世蕃、罗文龙斩首弃市。北京居民闻之大快，各相约持酒至西市看行刑。籍严世蕃家，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两，其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

葡萄牙请求人贡　嘉靖四十四年(1565)四月十七日，侵占广东壕镜澳(即澳门)的葡萄牙人哑喏喇归氏求通贡入市。他初称满剌加国(今马六甲州)，后改称蒲丽都家。两广镇巡官奏报，下礼部议。礼部

认为，“南番国无所谓蒲丽都家者，或佛郎机诡托也。”因此命两广镇巡官查明，如系诡托，即为谢绝；如有汉人通诱，即以法治之。“蒲丽都家”，是中国古代文献上首次见到“葡萄牙”的译名。

董份罢官 董份(1510—1595)，字用均，号浔阳山人，又号泌园，浙江乌程县(今浙江吴兴)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嘉靖四十四年(1565)六月十三日，给事中欧阳一敬劾其党严嵩，接受严世蕃贿赂，为之营解。诏黜为民。万历二十三年(1595)三月初五日卒，年八十六，有《泌园集》行世。董份为人贪险，在官攀附权贵，居乡横行不法，广占田地，蓄积财货，“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是称霸一方的大地主、乡宦。

蔡汝楠逝世 蔡汝楠(1516—1565)，字子术，号白石，浙江德清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行人，历刑部员外郎、南京刑部员外郎、归德知府、江西左、右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召为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工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三十日卒，年五十。蔡汝楠早年好为诗，有重名，中年好经学，为官所至能尽其职。有《自知堂集》、《说经札记》。

成守节奏报严世蕃江西家产 嘉靖四十四年(1565)八月十三日，巡按江西御史成守节进籍没严世蕃江西家产数。其中有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银二百零二万七千零九十两，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共二万七千三百余亩，其他珍珠宝石并诸玩好异物，不可胜计。此外受寄于他人及借贷计银十八万八千余两。世宗命将家财银两悉送太仓，一半济边，一半充内库取用。其田地房产变卖银两，听本处抚按官酌量区处。

江东逝世 江东(？—1565)，山东朝城县(在今山东西部)，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工部主事，历辽东巡抚、陕西三边总督，终兵部戎政尚书总督宣大蓟辽。为政清廉。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卒，赠少保，谥恭襄。

户部奏罢两淮工本盐 嘉靖三十二年(1553)依御史黄国用所议，让盐场灶户于正盐额外煎剩余盐，将运司割没盐银扣留八万二千余两给灶户充工本，增收盐三十五万引。时称为“工本盐”。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巡盐御史朱炳如说“工本盐不罢，不但无益边饷，而且商人与灶户两困，并使往时正盐常例一概失去，盖因积欠日多，有名无实。经户部商议，请自明年开始，两淮所增工本盐三十五万引尽数停罢。运司扣留割没盐银八万二千两解部济边。

胡宗宪下狱死 胡宗宪，生卒年不详，字汝贞，号梅林，南直隶绩溪县(今安徽绩溪)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知益都、馀姚二县。擢御史，巡按宣、大。嘉靖三十三年出按浙江。时歙人、海寇头目王直据海，勾引倭寇入犯江南。自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以后，世宗先后命张经为浙直总督，李天宠巡抚浙江，赵文华督察军务。胡宗宪依附赵文华，陷害张、李二人。超升为右佥都御史。进兵部右侍郎。后以计擒杀海寇头目徐海、陈东之功，加右都御史。嘉靖三十六年正月，命兼浙江巡抚，诱擒王直。嘉靖三十九年，论平王直功，加太子太保。宗宪多权术，喜功名，交结严嵩父子，岁遗金帛女子珍奇淫巧无数。赵文华死后，胡宗宪进一步重贿严嵩父子，横行东南。又创编提均徭之法，加赋额外，大量侵盗军饷，苛敛财物，不计其数。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冒报军功，加少保。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南京户科给事中陆凤仪劾胡宗宪奸欺贪淫十大罪，并指为严嵩党。诏逮入京。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胡宗宪被押至京，世宗说：宗宪非嵩党，命予释放，罢官闲住。后来胡宗宪以万寿节献秘术十四，世宗大悦，将复用。会御史汪汝正籍没罗龙文家，上宗宪被劾时授龙文交通严世蕃的手书，于四十四年十月再次被逮下狱，病死狱中。万历初复官，谥襄懋。有《筹海图编》、《胡襄懋公集》等。

严讷致仕 严讷(1511—1584)，字敏卿，号养斋，南直隶常熟县(今江苏常熟)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讲，累官至吏部尚书，破格拔用人才，使铨政一新，加太子太保。嘉靖四十四年三月袁炜致仕之后，命严讷兼武英殿大学士，参与机务，仍掌吏部，晨出理部事，暮入西苑，供奉青词，小心谨畏，至成疾不愈。同年十一月初十日以病乞归，家居二十年，于万历十二年(1584)卒，年七十四，赠少保，谥文靖，有《文靖集》。

李遂致仕 李遂(1504—1566)，字邦良，号克斋，又号罗山，江西丰城县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行人，历刑部郎中，调礼部，因忤尚书夏言，下诏狱，谪湖州同知。三迁衢州知府，升苏松兵备副使，改广东按察使，释狱囚八百余人，进山东右布政使。因江洋多盗，迁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寇京师，召李遂督苏州军饷，未谢恩，请关防符验用新衔。世宗怒，削其职。嘉靖三十六年，倭寇江北。命李遂以故官巡抚凤阳四府，多次督兵抗倭，有战功，迁南京兵部右侍郎。未几，进南京兵部尚书。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以老致仕。李遂博学多才，长于用兵，然亦善逢迎。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卒，年六十三，赠太子太保，谥襄敏。有《督抚经略

疏》等。

蔡伯贯起义 蔡伯贯，四川大足人。从山西崞县（今原平）李同学习白莲教，回川后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二月二十三日举行起义，称大唐天宝元年。一月间，连破合州、大足、铜梁、营昌、安居、定完、璧山七州县。巡抚刘自强发兵镇压。次年正月二十六日，蔡伯贯被俘遇害，降其众七百余人，起义历时三十六天而败。

《贤博编》撰成 《贤博编》不分卷，叶权撰，书约成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刻于何时不详，流传极少。叶权(1522—1578)字中甫，别号沙南，安徽休宁人。叶权好旅游，曾纵游吴越，北历燕赵，东到福建，南入岭表。《贤博编》及附录《游岭南记》，就是叶权根据遍游各地的耳闻目睹编纂的。《贤博编》内容颇广，对研究明代中叶以后江南社会经济、阶级斗争、民族关系，对外贸以及医学等方面，都有一定史料价值。

海瑞上《治安疏》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初一日，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为正君道，明臣职，求天下万世治安，冒死上疏极论时弊，直刺君过。疏言：皇上即位之初，政令一新，天下欣然望治。但为时不久，即生妄念，企求长生不老，一心求神仙，竭民膏脂，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废，以猜嫌诽谤戮辱臣工，致使天下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兹炽。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赋役日增，四方纷纷仿效陛下，大肆浪费，求神敬佛，使得十室九空，有人说："嘉靖者，家家皆净而无财可用也。"陛下听信左右奸人的谗言，一意梦想长生。陛下应深知妄求长生是毫无益处的，应翻然悔过，日理朝政，以洗数十年来君道不正之积误，洗刷数十年来小人阿谀奉承，臣职不明之耻。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这是今日天下第一大事，故臣冒死为陛下进言。此疏出，人称"万世治安疏"，或"天下第一疏"。海瑞在疏中以空前激烈的言论集中批评了嘉靖皇帝，所以世宗一见勃然大怒，将奏疏掷在地上，命立即逮捕海瑞。有人告诉他说：海瑞上疏时已买好棺材，诀别妻子，遣散僮仆，在朝待死。且托人料理后事。世宗才怒气稍解，将此疏留中数月。后来，世宗仍以为海瑞是在骂他，遂命逮下狱论死。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世宗死，同月二十七日，海瑞获得释放，官复原职，不久进大理寺丞。

廷臣争论开新河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十九日，世宗命工科给事中何起鸣往勘河工，并据实奏报朝廷。三月三十日，何起鸣自沛县回京时奏言：黄河故道难复，开新河费省，且可杜绝后患，宜用朱衡开新河之议。同时兼采潘季驯之言，不舍弃旧河。世宗于是下诏开新河。而潘季驯则仍然坚持修复黄河故道，廷臣亦多以为然。自此朱衡与潘季驯产生矛盾。至同年六月十四日，新河工未成，而黄河再次在沛县决口。言官纷纷疏劾朱衡，以为新河必不可成，朝廷采取调和的办法，命朱衡与潘季驯再作勘查，务图上策，以救灾民。九月二十三日，工科都给事中王元春等又上疏劾朱衡，并要求罢免朱衡。是时何起鸣亦改变自己的看法，以为开新河不可取。从此开始，关于治黄是开新河，还是复故道的争论几无休止。

李亚元起义失败 李亚元，广东山民首领。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李亚元率部攻打河源、和平诸县。总督吴桂芳、南赣巡抚吴百朋调集官军十万，分为五哨，并起用被罢闲住的总兵官俞大猷督兵剿捕，生俘李亚元，俘斩一万零四百余人，夺还男妇八万余人，招降一千二百余人。俞大猷以功复为广西总兵官。

浙赣矿工起义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浙江开化、江西德兴矿工起义，攻打徽州、宁国等处，再入婺源县，焚烧县治。明廷不得不封闭浙江云雾山矿洞，并调浙江、直隶、江西三省官兵会剿。

魏时亮疏言安民六要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七月二十四日，兵科给事中魏时亮建言安民六要事：一、计民生以图长治。二、重举劾以彰劝戒。三、导民行以正风俗。四、定迁赏以严责成。五、慎授官以杜请托。六、重君命以肃纲纪。世宗以为然。

永平天津始通海运 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以后，为防止俺答进犯，燕河、石门二路每年增饷三十万，全靠陆运。右佥都御史耿随卿议开滦河，转运粮饷至永平。自永平西门外一百五十四里至纪各庄入海。自纪各庄至天津卫四百二十六里，俱有海岸可行驶。中间开洋仅一百二十里，有建河、粮河、大沽河、小沽河可以停泊，宜立仓纪各庄，储天津之粮，转轻船自滦河到达永平。至嘉靖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开通，自此每年可省运费甚多，滦河以东各州县亦由此渐为富饶。

吴百朋请调大军镇压江西、广东农民起义

自嘉靖三十五年(1556)起，广东、江西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其中广东和平县岑冈李文彪、江西龙南县高沙保谢允樟、下历赖清规等乘官军御击倭寇之时，相与结党，号为"三巢"，率部攻打附近郡县。至嘉靖四十五年，李文彪死，其子李珍与谢、赖势益猖炽，他们约期分道四出攻城夺邑，已拥众数万人，并占据广东和平、龙川、兴宁、江西之龙南、信丰、安远诸县，一应钱粮、词讼，有司不敢诘问。而无以生计的农民、手工业者，多入山结寨，与"三巢"互为声势。仅赖清规部，就跨据江、广六县，依险固守，官军莫能敌。嘉靖四十五

年八月二十一日，南赣巡抚吴百朋为此请大举派兵镇压江、广二省农民起义。说：夹攻会剿，兵非三十万，银非一百万两不可。疏呈上，兵部以为吴百朋志在镇压农民起义，不烦调兵，现方略已定，本部难以遥制，即令督兵相机进剿。所需军饷，由江西抚、按官负责筹集。

两广并设总兵官　嘉靖四十五年(1566)九月初十日，从给事中欧阳一敬的奏请，以俞大猷为广西总兵官。十月初八日，复设镇守广东总兵官，并以原任惠潮参将署都指挥佥事汤克宽为之。两广并设总兵官，自俞大猷、汤克宽始。

尹台罢官　尹台(1506—1579)，字崇基，号洞山，江西永新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南京国子祭酒，累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被劾罢官。万历七年(1579)卒，年七十四。有《洞麓堂集》、《思补轩稿》。

张永明辞归　张永明(1499—1566)，字钟诚，号临溪，乌程(今浙江吴兴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除芜湖知县。擢南京刑科给事中。疏劾山西总督樊继祖、巡抚史道、陈讲不能御虏寇，又劾兵部尚书张瓒黩货误国，再劾严嵩父子贪污，又劾兵部尚书戴金为御史巡盐时增余盐羡银，阻坏边计。疏虽不尽行，中外惮畏。出为江西参议，累迁云南副使、山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发伊王典模恣横状，嘉靖四十一年五月进刑部尚书。九月改左都御史。张永明素清谨，掌宪在严嵩罢后，以整饬纲维为己任。四十五年十月五日为言官所劾，力求去，诏许驰驿归。卒赠太子少保，谥庄僖。有《庄僖公集》。

胡松逝世　胡松(1503—1566)，字汝茂，号柏泉，南直隶滁州(今安徽滁县)人。幼嗜学，尝辑古名臣章奏，慨然有用世志。嘉靖八年(1529)进士，知东平州。设方略捕盗，民赖以安。迁南京礼部郎中，历山西提学副使。嘉靖三十年秋，上边务十二事，力劾巡抚史道、总兵官王陛，并极陈招抚逃奔漠北壮士，给牛种，免田赋，以固边陲。世宗嘉其忠恳，进左参政。然胡松此疏，为当事者所恶。及迁擢，不给以兵权，令于三关听用，欲加陷害。后来言官劾其建言冒功，虚议无补，遂斥为民。家居十余年，屡荐屡罢。嘉靖三十五年，以赵文华所荐，起陕西参政，分守平凉，条陈严保甲、均赋税、置常平、简伉健数事。三迁至江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奏设南昌、南丰、万安三营，遣将镇压农民起义，进兵部右侍郎巡抚江西。后召理部事，进左侍郎，改吏部，迁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终代郭朴为吏部尚书。胡松洁己好修，富经术，郁然有声望。晚年主持吏部，以振拔淹滞为己任。嘉靖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卒于官，年六十四，赠太子少保，谥恭肃。有《滁州志》、《唐宋元名表》、《胡恭肃集》等

朱厚熜逝世　世宗朱厚熜(1507—1566)，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继位。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午时，因病服用方士所进金石药不治，死于乾清宫，年六十，谥肃皇帝，庙号世宗，葬永陵。大学士徐阶为世宗起草的遗诏说：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乱政，补过无由。自即位至今凡建言得罪诸臣，存者起用，死者优恤。方士交法司论罪。一切玄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予停罢。在位四十五年，登位之初，用大学士杨廷和所拟诏书，力除弊政，时以称治。不久以议“大礼”，兴大狱，罢廷臣，朝纲渐坏。中期以后，专宠严嵩当政二十年，任用非人，功罪倒置，致吏治日坏，国势日衰，东南倭祸不止，北方边患频繁，赋役日增，民不聊生。尤其是晚年不视朝政，专意修仙，梦想长生，举国上下求神敬佛，大肆耗费，国匮民穷，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由此不复存在。

王金论死　王金，陕西鄠县(今陕西户县)人。为国子生，杀人当死，知县阴应麟好黄白术，听说其有秘方，乃为之减刑。王金逃至京师，藏通政使赵文华处，以仙酒献赵文华，文华献于世宗。赵文华督师江南，王金落魄无所归。时世宗命采灵芝于天下，王金厚结中使，得芝万本，聚为一山，号万岁芝山，又伪为五色龟进之，世宗大喜，授太医院御医。世宗遣官求方士于四方，至者日众。世宗知其多妄诞，无殊赐。王金思所以动帝，乃与申世文、陶世恩、陶仿、刘文彬、高守中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七元天禽护国兵策》，并同所制金石药并进。其药方诡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世宗服之，火发不能愈。陶世恩竟得迁太常卿，陶仿太医院使，刘文彬太常博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世宗病死，遗诏归罪王金等。同月十七日，王金等五人并被下狱论死。隆庆四年(1570)，高拱柄政，尽反徐阶之所为，宥王金等免死，发口外为民。

朱载垕即皇帝位　朱载垕，世宗朱厚熜第三子，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二十三日生，母康妃杜氏。十八年二月初一日封为裕王。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世宗病死，同月二十六日，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皇帝，以明年为隆庆元年。大赦天下，减免明年天下田租之半以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所欠税粮。其余悉按世宗遗诏奉行。

《今言》刊行　《今言》四卷，郑晓撰。嘉靖四十五年(1566)由他的外甥项笃寿刊印。郑晓字窒甫，浙江海盐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初授职方主事、和

州同知、太仆丞、南京太常卿、刑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南京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由于他久历要职，日披故牍，谙悉掌故，因而《今言》记述多涉国政朝章、兵戎邦计。当时实事尤多为亲身所历与亲耳所闻。不但可补史书的不足，也可订正正史的谬误。为研究明代前、中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

录用前朝建言得罪诸臣授官 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六日奉旨起用前朝因建言谏争而获罪诸臣，各授官职。

赠恤前朝建言诸臣 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五日吏部奏：前朝建言已死者应分三等赠恤：被戮死者为一等，宜复职、赠荫、厚加谕祭；被廷杖死者宜复职、赠荫，系狱戍边死者宜复职、赠官。其他因谏止箕仙和弹击权倖获罪者，与杖死者例复职。穆宗允准施行。

增加折色 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户部奏言：南京供用库酒醋面局并光禄四署所积米豆，足支数年，应暂征折色解部，其后以三年为率，征本色二年，折色一年，庶无虚费。锦衣卫乌龙潭等三十六仓，每仓有看仓余丁，少者十名，多二十名，月饩不给，宜仿正统十四年例，每丁给月粮三斗于各仓耗米内支给。穆宗允准。

暂停物料采办 隆庆元年(1567)正月十三日，户部奏陈：嘉靖初年御用监、供用库岁派黄腊止八万五千斤，白腊四千斤，年来黄腊增至二十余万斤，白腊不下十万斤，此外，复有召买、有折色，视正额不啻三倍。而皇上用的香品，过去没有徵派事例，近来在广东采办及顺天府召商收买，每年也有数十万斤，增费扰民，应该全都裁省如同嘉靖初年事例征派，其各项采办物料之命应即行停止。穆宗依允。

复设江浙巡漕御史 隆庆元年(1567)正月十五日，户科给事中何起鸣奏：近来漕政废弛，原定江北粮米要在十二月以里过淮，路远者不过明年三月，今则拖至六七月；山东粮米应在四月运完，路远者不能过七月，今则拖至十一月。为确保漕运，请按《会典》规定，恢复国初旧制，于南直隶及浙江杭、嘉、湖等地，添设御史一名，给以敕书，令其专门办理漕运。

徐杲革职 工部尚书徐杲系本部官匠，以修建功历升前职。隆庆元年(1567)正月十九日，都给事中王元春劾徐杲以官匠而至正卿乃滥名器、坏政体，应予罢免。穆宗允准。其子锦衣卫指挥徐文灿亦夺官。二月，徐杲又以贪污修芦沟桥工费罪下狱。

撤西苑诸宫殿匾额 隆庆元年(1567)正月，撤掉世宗在西苑所建修仙宫殿匾额。该月，又追夺助世宗玄修的真人邵元节、陶仲文官诰，籍没其家资。前刑部侍郎鄢懋卿以匿藏严嵩金银罪戍边。

更定裕府庄田租税 隆庆元年(1567)二月初九日，司礼监太监梁钿等奏：裕府庄田累年增税太重，应按照旧额每亩征三分五厘；宝源、和远二店以及煤窑树株等税，应遵正额征解，不得复征房税。穆宗允行。

议定钱法马政 隆庆元年(1567)二月初九日，户部奏言：禁伪钱，余旧钱听民间兼行，其税课等准收钱。兵部奏言：灾伤郡县，每马折银八两，五年审牧。得旨并从。又太仆寺少卿武金请去种马，可得银一百二十万两，许之。原来，种马北七万，南三万，岁五万，京解其一给各军。后寄牧顺天府属县称"寄养"。山西、陕西又设苑监官牧，上苑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陕西茶马司洮河、西宁等卫番族给金牌四十一，纳马一万四千零五十一匹，称"差发"，给茶一百万斤，取于蜀后金牌制废，只给茶易马。

清理内府冒滥职官 内府匠役以工完升官。至太仆寺少卿者二人，苑马寺卿二人，布政使司参议二人，郎中一人，员外郎三人，升鸿庐寺丞、光禄署正等衔的百余人。隆庆元年(1567)二月十八日，内官监太监李芳奏请裁革，事下吏部，以闲住、降职、降俸等斥减之。穆宗依允。

昌平密云仓行乞运 隆庆元年(1567)二月二十二日，户部奏：昌平密云二镇守军月粮，在嘉靖二十九年以前是坐拨漕粮，径运该镇，边军称便。后来运军告困，改由通州仓乞运，奸商猾吏因缘为奸，使米腐烂不能食用。为供二镇月粮，宜将去年漕粮令江北山东二总拨赴两镇，以后按年分循次均派。密云粮由通州水路运至牛栏山，交车户接运；昌平粮由通州石坝更船至大通桥，陆路交车户接运。沿途委官二名督察，不得迟误、侵盗。交纳之地至龙庆、石匣等近仓而止，收仓之日即给回执，不许淹滞。漕运衙门给予耗米脚价及应支粮饷，使边军足食，运军亦沾优恤之惠。穆宗允准。

云南土官凤继祖起事 云南土官凤继祖起事，攻围武定，执杀守官，守臣会同四川贵州土汉兵数万人讨平之。隆庆元年(1567)二月二十四日，云南抚臣吕光洵为土官禄绍先等请功。

林庭机致仕 林庭机(1506—1581)字利仁，号肖泉，瀚季子，廷榻弟，福建闽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嘉靖二十九年迁国子监司业，擢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十四年改南京太常寺卿。嘉靖三十八年升南京工部右侍郎、转南京礼部右侍郎。后升南京礼部尚书。隆庆元年(1567)三

月初五日致仕。万历九年(1581)卒,年七十六,谥文僖。有《世翰堂集》

耿定向奏科场事宜 隆庆元年(1567)三月十五日,直隶担学御史耿定向奏:一、两京乡试主考官应选用品学兼优者提任,不宜论资排辈。二、两京同考官应广取正卷呈送主考,主考也可亲自检阅落卷,有特殊才能者可以破格录取。三、主考官只发初场试卷。然后给同考分别校阅,不宜专委一人,以免遗漏真才实学之士。四、考卷要严立程式,限定字数,违式者不与复录。五、发榜之日,将考取人的试卷交提学官查验钤封解部,以防伪滥。六、革去两京初试监生字号,限定考生名额,试卷不分各房字样,考官择优录取。穆宗允从。

纂修《世宗实录》 隆庆元年(1567)三月二十九日,穆宗命翰林院纂修《世宗实录》,以太师兼太子太师成国公朱希忠为监修官,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郭朴、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陈以勤、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张居正等为总裁官,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仪、詹事府掌府事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赵贞吉、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林树声,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潘晟、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殷士儋为副总裁官。以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姜金和等为纂修官。六月初一日开馆。书未成而穆宗逝世,神宗又命英国公张溶为监修官,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等为总裁官,吏部侍郎汪镗、詹事王锡爵、礼部尚书马自强、礼部侍郎申时行等为副总裁官,赞善陈思育等为纂修官。于万历五年(1577)八月编成表进。计《世宗实录》共五百六十六卷。监修官、总裁、副总裁、纂修官等升赏有差。

土蛮犯长安堡 隆庆元年(1567)三月三十日,土蛮进攻辽阳长安堡,备御指挥王承德率兵力战,中流矢死,明军多被创,指挥宋世举、都指挥高惟忠及副总兵杨四畏以失事逮问。王承统赠都指挥仍令其子袭升二级。

葛守礼请停一条鞭法 隆庆元年(1567)四月二十三日,户部尚书葛守礼奏:直隶山东等处土旷民贫,流移日众,而有司变法乱常,起科太重,征派不匀。新法不论户之等则,只论田之多寡,致使百姓放弃田土,以避差役。黄河以南,太行山东西,土地贫瘠正赋已无力交纳,岂能再加以重役。新法已行之直隶,波及山东。山东沂、费、郯、滕之间,荒田弥望,招人垦种,无有应者。工匠因没有土地而免差。富商大贾虽多有资财,亦因无田而免役。致使衣不遮体、终岁辛劳的农民独受其困。故请正田赋之规,罢科差之法,使小民不逃离土地,以兴农事。国初征纳钱粮,户部开定仓库名目和石数价值,小民照仓上纳,完欠之数瞭然,其法甚便。近年定为一条鞭法,不论仓口,不开石数,只开每亩该银若干,致使吏书因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应命查复旧规,其一条鞭等法悉为停罢,以使税额均而征派便。穆宗允从。

新河工成 黄河决于新集、庞家屯等处,汛滥于徐、沛间,故道不可复浚。工部尚书朱衡主张开通原都御史盛应期所凿新河,因其地势较高,黄河至昭阳湖不能复东,乃从鱼台南阳镇以南东至夏村,又东至沛县留城,共一百四十一里。又筑沛县马家桥堤使尽入秦沟。又凿黄家口导薛河入赤山坝湖,凿黄浦导沙河入独山湖。隆庆元年(1567)五月初五日,八条支河修浚工成,旱则资以济漕,涝则泄入昭阳湖,运道遂通。

户部请颁行钱粮文册 隆庆元年(1567)五月初十日,户部奏:自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四十五年,凡京运京边钱粮完欠起解追征数目及贫民不能完纳者,备纪于钱粮文册之中,自县送府,自府送布政司,来年入觐时送户部稽考,如有隐漏、那移,侵欺以及不如式者,即行参治。穆宗允准。

俺答犯大同 隆庆元年(1567)五月初十日,俺答犯大同任达沟等处,参将刘国引兵抗御,战于西山及谢家洼,俺答引还。

刘畿致仕 刘畿(1509—1569),字朝宗,一字子京,号羽泉,又作雨泉,长州(今江苏吴县)人。嘉靖三十年(1551)进士,知瑞安,严明精练。时承平久,兵防废弛。适倭寇至,乃昼夜戒严,修造御具,率义勇督戢,邑赖无虞。为令五载,勤劳任怨,请托不行,吏胥敛战,清图均役,修创学舍,经史阁,止斋祠,又疏浚天井洋水利。三十五年九月拜吏科给事中。嘉靖三十九年以提督内宫工成,升通政司右参议添注,兼工科给事中。嘉靖四十一年以西苑工成,升太仆寺少卿,迁顺天府尹,进都御史,督抚浙直,巡视温州府等地,复治官塘,大为民便。又建梅头堡,重疏天井洋,邑民立祠,与王士翘并祀,额曰"双爱"。进右副都御史督抚两浙。嘉靖四十二年升南京兵部右侍郎。隆庆元年(1567)八月二十二日致仕。嘉靖三年九月初十日卒,年六十一。著有《诸史将略》。

俺答复扰大同 先是,叛人赵全对俺答说:蓟州一带防御甚固,兵多将广;山西一带则兵弱,亭障稀疏,备御薄弱,石州、隰州富饶且多良铁,官兵主要保卫宣府、大同,不易来救。俺答采纳其议,于隆庆元

年(1567)九月初四率兵六万骑,分三道攻朔州、老营,偏头关诸地。老营副总兵田世威缨城自守,游击方振出战失利,俺答率部南下。总督王之诰闻变,以游兵六千骑兼程抵雁门,而大同、延绥二万骑亦至,但皆相望不敢前。

俺答屠石州 隆庆元年(1567)九月十二日,俺答、赵全等攻陷石州城,男女被杀五万余人,焚烧房舍三日不绝。总兵申维岳驻大武店,距石州城仅四十里,不救,仅尾随之。得到石州失守的报告,发兵二万往援,但亦不敢靠近。俺答又分兵犯涞水、交城、平阳、介休。并大掠孝义、平遥、太谷、隰州等地,破庄堡十七所,捆载徐归,当时正值秋雨连旬,马匹多病死,路又泥泞,皆杖马箠徙步归,将所剽获多弃遗于道。而大同、太原驻军无一人邀击。待俺答走远之后,官兵却斩杀避难士民报捷。

太仓银库入不敷出 隆庆元年(1567)九月十六日,户部尚书马森奏曰:太仓银库岁入仅二百零一万四千一百余两,岁出在京俸禄粮草一百三十五万余两,边饷二百三十六万余两,各省常赋诸边民运今年诏蠲其半,以出入相较,少三百九十五万零四百余两。

郭朴致仕 郭朴(1511—1593),字质夫,河南安阳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选庶吉士,累官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兼太子宾客。南京礼部尚书缺,特加太子少保擢任之,寻进吏部尚书。以父忧去,不久召回加太子太保,嘉靖四十五年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预机务。郭朴同高拱同乡,皆得徐阶荐用。世宗逝世,徐阶起草遗诏,尽尚反当时弊政,但因未与高供、郭朴共议,二人遂与徐阶有隙。高拱致仕后,郭朴亦不断遭到御史庞尚鹏、凌儒等的弹劾,隆庆元年(1567)九月二十三日被迫致仕。万历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卒,年八十三。赠太傅,谥文简。有《文简公集》。

南京监生之变 隆庆元年(1567)九月二十三日,命将两京乡试监生卷各革去皿字号,于是南京国子监中式者仅数人,比原来减少四分之三。揭榜后,考试官王希烈、孙铤等谒文庙,落榜者数百人聚众宣噪,且围攻考官,语甚激烈,许久方散去。南京法司奉令逮治沈应元等为首者。南京守备魏国公徐鹏举以闻变坐视,司业金达以铃束不严之过,夺俸,监生编号如旧。

京师戒严 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等地。土蛮部进犯蓟镇,掠昌黎、抚宁、乐亭、卢龙等地,直至滦河。所到之处,杀掠焚毁不可胜计,京师震动。隆庆元年(1567)九月二十四日京师戒严,令五城御史加紧盘察,巡仓御史督获漕粮入城。次日,兵部及京营各官又条议京城防守事宜。

俺答出边 隆庆元年(1567)十月初五日,俺答出边。俺答自入犯至出边,纵横蹂践,残破大同、石州、文水、交城、清源、祁州、霍州、灵石、汾州、孝义,介休、平遥,以及榆次、太谷,徐沟、太原、阳曲、寿阳、孟平、平乐等州县。劫掠将千里,中间攻陷烧毁杀掳者计损人畜数十万,所过一空,死者枕藉。而官军七日内不发一卒。

定京师九门税课 隆庆元年(1567)十月十九日,刑科左给事中孙枝奏言:都城九门税课原有则例,但近年以来,倍征横索,弊孔滋多。自今分属五城御史各委兵马一员监收,年终会同部官复奏,其原设监生吏典悉行裁革。穆宗允行,并令申明原定则例,张挂榜文。

刘孟胡起义 陕西刘孟胡等拥众五百余人,掳西番寨及闷葫芦山灵寿寺等处,并活动于金州诸县,官久捕不获,隆庆元年(1567)十月二十三日,被擒杀。

阮鹗逝世 阮鹗(1509—1567)号辽峰居士,安徽桐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嘉靖二十四年授南京刑部主事,嘉靖三年后改河南道监察御史,二十八年巡仓御史兼理河道,嘉靖二十九年按顺天府,墨吏望风解绶去。嘉靖三十二年擢浙江提学副使,嘉靖三十五年升广西右参政,擢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捕获起义首领陈东、麻叶、辛五郎等。隆庆元年(1567)迁巡抚浙江右佥都御史。同年十二月初七日卒,年五十九。

太仓粮银收支数额 隆庆元年(1567)十二月十八日,户部尚书马森奏:太仓见存银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两,岁支官军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边饷二百三十六万余两,补发年例一百八十二万余两,通计所出须银五百五十二万余两。以今年抵算,见存银仅够三个月用。京仓见存粮六百七十八万三千一百五十一石,岁支官军月粮二百六十二万一千五百余石,遇润月另加二十二万余石,以今年抵京仓粮仅够二年有余。穆宗手诏:帑匮至此,朕用度毫未妄费,卿其悉心核计。

赵时春逝世 赵时春(1509—1567),字景仁,号浚川,甘肃平凉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选庶吉士,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因直谏被黜为民,久之授翰林院编修。世宗有疾,与罗拱先、唐顺之疏请东宫御殿受百官贺,帝大怒,复黜为民。俺答扰京师,起兵部主事赞理京营,稍迁山东佥事,进副使。嘉靖三十二年擢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是年九月,俺答部入神池、

利民诸堡，时春率马步兵往御，于大虫岭中伏而败。是时，将帅避寇，时春功虽不就，而天下皆壮其气，但被解官归。至隆庆元年(1567)卒，年五十九。时春善骑射，读书善强记，文章与唐顺之、王慎之齐名，著有《浚谷集》。

陈建逝世 陈建(1497—1567)，字廷肇，号清澜，亦号清澜钓叟，广东东莞人。自幼纯心笃学，宏治十四年(1501)邑弟子员。嘉靖十一年(1532)以乡荐选授侯官教谕，作《拟古乐府通考》二卷，督学汪以达命校《十三经注疏》代作进呈于朝，遂颁行下。又代海道汪公作《海防长策奏疏》。嘉靖十七年迁监江府教谕，再升阳信令。到任即以教养为急务，劝课农桑、申明条约，不事蒲鞭而邑大治，暇时又颁小学古训，令家诵而人习之。以母老乞养，邑民攀留再三，至嘉靖二十三年得归，时年四十八岁，至隆庆元年(1567)卒于南都之留城，年七十一。陈建虽门第卑微，官位不高，但博学强记，究心学术，致仕后锐意著述。在南安时与督学潘潢论朱熹、陆九渊异同，遂著《朱熹编年》。在临江时辑《周子全书》、《程氏遗书类编》，又取朱熹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编成前编、后编、续编、终编等四编。又经十年整理，至嘉靖二十七年，著成《学蔀通辩》。根据明朝法久弊滋而著《治安要议》，其他尚有《古今至鉴》、《经世宏词》、《陈氏文献录》、《明朝捷禄》、及《皇明通纪》(又称《明资治通纪》)等书。学者称其为清澜先生。

谈恺逝世 谈恺(1503—1568)，字守敬，无锡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出任山东按察司副使、改四川按察司。擢山东右参政，转按察使，晋福建右布政使、广东左布政使，再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镇压大藤峡瑶、僮民及大罗山起义军，进右都御史。以母老乞致仕。隆庆二年(1568)正月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孙武子》，《虔台续志》，《平粤禄》，及奏议文集。

樊深致仕 樊深，生卒不详，字希渊，号西田，大同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苏州府推官。嘉靖十六年十二月迁户科给事中。嘉靖二十年升通政司右参议，进通政使，以弹劾仇鸾被削职为民。隆庆元年(1567)四月起原官，寻升刑部右侍郎，十月转左侍郎，隆庆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致仕。卒于家。有《西田语略》。

鲍象贤逝世 鲍象贤(1496—1568)，字复之，号思庵，安徽歙县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选授御史，出为湖广佥事，部署江防，以获盗功升云南副使，兵备监安，累任至右副都御史，嘉靖三十年巡抚云南，嘉靖三十二年升兵部右侍郎，提督两广军务。不久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寻又罢官家居，嘉靖四十三年四月以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嘉靖四十四年七月进兵部左侍郎，至隆庆二年(1568)正月三十日卒于家。年七十三岁，赠工部尚书。

吴悌逝世 吴悌(1502—1568)字思诚，号疏山，江西金溪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初授乐安令，嘉靖十六年授广西道御史。嘉靖十八年视两淮盐政，嘉靖四十四年补山西道御史，嘉靖四十五年九月晋太常寺卿，不久，晋太仆寺卿、大理寺卿。严嵩擅权，吴悌恶之，称病家居二十余年。隆庆元年(1567)五月，以南京大理卿晋南京刑部右侍郎。隆庆二年二月初一日卒，年六十七，谥文庄。吴悌学于王守仁，人称疏山先生，有《吴疏山集》。

李开先逝世 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别号中麓放客，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户部主事，调吏部考功，历员外郎、郎中，寻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因不满朝政，嘉靖二十九岁即自请罢官还乡，寄情声歌。开先能文善诗，与王慎中、唐顺之等人齐名，号称“嘉靖八才子”。尤精于词曲，曾作百阙傍装台，为康海所赏识。能演善编，著述极丰，计有戏曲《新编林冲宝剑记》、《一笑散》、《词谑》；院本《园林午梦》，《乔坐衙》、《昏厮谜》、《打哑禅》、《三枝花大闹土地堂》、《搅道场》；散曲《中麓乐府》，《中麓小令》；民歌《烟霞小稿》、《傍妆台小令》、《酸咸构肆》；杂剧《皮匠参禅》；诗文集《李中麓闲居集》、《四时悼闪》、《诗禅》。还改定元人杂剧多种。隆庆二年(1568)二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七岁。有《宝剑记》、《词谑》等。

俺答犯柴沟堡 隆庆二年(1568)二月十七日，俺答犯柴沟堡(今河北怀安南)、新庄等处，守备韩尚忠迎战死，副总兵佟登力战仅免。

京师渤海地震 隆庆二年(1568)三月二十八日，京师、乐亭地震。遵化、顺义等地震有声。距乐亭县城二里的刘忭庄地裂一处宽一尺，长三丈余；又一处宽一尺，长一丈。扬銮坨地裂宽一尺，长三丈，各黑水涌出。迁安滦河岸裂，滦州屋瓦震动有声，经旬乃止。任丘地震如雷，楼屋皆动。辽东辽宁卫宁远(今辽宁兴城)城崩，永平府昌黎、抚宁、卢龙；顺天府丰润、玉田、密云、怀柔、东安、霸州、保定；河间府河间及山海卫，同日俱震。山东济南府海丰，商河、蒲台，登州府莱阳、贵州(今黄县)以及莱州府属昌邑等皆受波及。震中烈度(I_0)V_{N}，震级为六级。

陕西咸宁、泾阳地震 隆庆二年(1568)四月初六日，陕西西安、凤翔与庆阳、平凉、泾阳、咸阳、商

陵等府县地震。震声如雷，尘灰蔽天，城无完室，人畜死伤甚多，余震不止。至十九日，咸宁、泾阳地大震。咸宁县的霸桥、柳巷，泾阳县的迴军、永乐各村镇，俱倒塌如平地，压死朱仲良、陈朝元等二百余人。兴平县亦多损伤人畜房屋。渭南庐舍几倾，鄠县、盩厔（今周至）、富平、白水，凤翔府、平凉府、庆阳府以及山西蒲州、河津、荣河等二省十三府州县同日俱震。礼科给事中何起鸣以西安等地震经月，压伤人民甚众，奏请赈恤，允免二年粮税，户部奏请以本省织造羡余银八千八百三十两，并预备仓粮相兼赈济，命巡抚都御史张祉祭告西岳华山。震中烈度(I_0)IX，震级(M)为$6\frac{3}{4}$级。

曾一本肆意攻掠　隆庆二年(1568)六月十一日，曾一本攻广东省城广州，拒伤官军于赤湾、东灞等处，杀听调知县刘师颜，抚按以闻。总兵俞大猷、郭成住俸立功赎罪，参将魏承游、王如澄，把总俞尚志、朱湘，逮系至京。同年七月，曾一本又率众攻福建。官军出海，于拓林、盐堤及马耳澳等处大败之。十月初五日曾一本等突至南澳，窥福建。抚按官涂泽民、王宗载请大行征讨，命两省镇巡官协办夹剿，务期荡灭，不得彼此推诿，以致滋蔓。隆庆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广东，破碣石（即今广东陆丰东南滨海）、甲子等卫，官军御之无功。雷琼参将耿宗元治军素严，声言要斩失职将官，裨官周云翔、廖凤、曾德久、廖廷等惧而谋叛，乘耿宗元在教场阅军之际，判杀之，并执通刺潘槐，而叛与贼合。五月初八日，曾一本等屯兵平山、大安峒等处，入掠海丰渡河。总兵郭成率兵进剿，南赣巡抚张翀亦遣参将蔡汝兰领兵至，共趋大浦白云屯入平山夹攻之。经月余苦战，各部共擒斩一千三百七十五人，生擒倭寇一人，夺归被掳通判潘槐等，叛将周云翔擒获。八月十二日，曾一本遁入马耳澳，总兵官郭成等兵分三路，进击，擒曾一本被磔弃市。

江西万羊山蓝户起义　万羊山位于江西，跨湖广、福建、广东，各省商民常流聚其间，皆以种蓝为业。遂于隆庆二年(1568)举行起义。同年六月，南赣巡抚张翀命万安营守备董龙前往征剿。董龙督兵至，声言搜山，诸蓝户大恐，遂抗拒官兵，于鄠县青石冈等处啸聚。江西巡抚刘光济主张招抚，张翀则追捕益急。兵部令刘光济、张仲，协谋抚剿之策。

唐继禄逝世　唐继禄生卒年不详，字子廉，上海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授浙江遂安知县，政绩优异，拜监察御史，出按湖广，楚中以里甲为累，里长应役，其家力殚，以至家产倾覆。继禄核县一岁所需，量入为出，百姓便之。后擢大理寺丞晋少卿，再升南京操江佥都御史，晋总理山西等屯盐右副都御史，隆庆二年(1568)七月初七日致仕。

徐阶致仕　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第三，授编修，谪延平推官，迁黄州同知，擢浙江提学佥事、江西副使。召拜洗马，擢祭酒、礼部右侍郎，寻改吏部右侍郎。进礼部尚书，召入直无逸殿，撰制青词，加太子太保。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请用计以待援兵讨敌，帝称差，加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罢相，遂为首辅。累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处事严嵩甚谨，内实设谋除之。严嵩败，尽反其行事，于政多所匡救。隆庆初，与高拱交恶相攻。又于宫禁事多所持诤，太监恨之。隆庆二年(1569)七月十七日，给事中张齐挟怨疏劾徐阶不职，徐阶疏辩乞休。七月十九日准其致仕，遣行人护送。万历十一年(1583)闰二月二十六日卒于家，年八十一岁，赠太师，谥文贞。徐阶事上恭谨，优礼言路，喜好讲学，士大夫多称赞。有《世经堂集》、《少湖文集》。

台州飓风成灾　隆庆二年(1568)七月二十九日。浙江台州府飓风大作，大雨倾盆，海潮汛涨。天台诸山水骤合冲入台州府城，三日方退。冲坏郡城西、南二门，民各上屋脊，敲椽折瓦，号泣之声响彻城中，旧传城中仅存十八家，水未退有屋上生育者，或操舟市中者。水退人畜尸骨满街巷，官府委人掩埋，数日方尽，粗略记之，溺死三万余口，冲决田地十五万余顷，荡毁房舍五万余区。

凤继祖伏诛　隆庆二年(1568)八月初二日凤继祖被杀。其初，云南土官凤继祖与寻甸土舍郑竑争袭职，参政卢岐岳遣使调解。凤继祖不听反杀郑竑，又兵围武定府城，不克，袭击通判胡文显、周良卿等于陆块山，佥事张泽死之。知府周赞迎击亦败。澜沧兵备副使杨守鲁等乃大集土汉兵遇于姜会里州堡，连战破之。凤继祖溃走至青鸡罗山，坠崖谷死者不可胜计。官军追及壁筒河，者色斩继祖请降。是役擒斩一千五百余人，破山东直勒等洞三十余处。

优禄板升降人　隆庆二年(1568)八月十四日，宣大山西总督陈其学等奏：请优录板升降人白春、魏良相、田汝光、田淮、王现等。初大同白莲教徒丘福等教蒙古族人建城堡宫室，布满丰州川，名曰板升，以居亡命于此地的汉人，俺答等入犯时被驱为乡导，边民苦之。隆庆皇帝即位之初，曾悬赏格，应募者以千百计。白春等五人各有部落，产畜饶富。至是各率众来归。授予卫百户。

定擒斩俺答赵全等赏格 隆庆二年(1568)八月十四日宣诏:凡能献斩俺答,能率男妇五百名口、三百名口来归者,依会题例升赏外,仍赏银若干。如能率二百名口以上者授正千户,仍赏银。率一百五十名口以上者授副千户,仍赏银。率一百名口以上者授实授百户,仍赏银。能率二、三十名以上者授以冠带总旗,仍赏银,俱世袭。如能斩获赵全、周元来献者,授都指挥佥事并赏银。如已杀害而不及献首来归者升赏如前。为能来归又能招诱降者亦加升赏。如赵全等能悔罪来降,全免其罪,仍授以指挥佥事并赏银。如能率众来归者,分别授职与赏银,俱世袭。以上赏格也适用于九边各地。

魏太清起义 隆庆二年(1568)八月十五日,陕西魏太清率众五百余人,公行山西绛州、及乡宁、太平等处地方,拒伤官兵,寻渡河去。山西巡按御史宋纁奏曰:山西、陕西及河南等省连年欠收,"民穷盗起",而韩城、宜川之间逋逃更多,应穷治之。倾接诏令,山西分巡河东道佥事吴一平,平阳府巡捕同知赵世祖,各夺俸一月;绛州知州宋应昌问罪;陕西抚按严加剿捕,穷治窝主。

张居正上六事疏 隆庆二年(1568)八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居正上《六事疏》,陈言大本急务六事:一、省议论。顷年以来,议论太繁,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今后宜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须明白直陈,毋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反薄归厚,尚质省文。二、振纲纪。近来纲纪不肃,上下姑息,百事悉从委徇,模棱两可,委曲迁就。法之所在,惟加于微贱;强梗者虽坏法乱纪,而莫之谁何。今后宜张法纪,揽权纲,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以求体统正,朝廷尊。三、重诏令。近来诏旨,多废格不行,视为故纸,是非何由而明,赏罚何由而当?今后宜奉旨即复,据理剖断;酌事之缓急,立限趣报,以求人思尽职,事无壅滞。四、核名实。今称人之才,不必试之从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偾事之时,未必明正其罪。士大夫建方条陈,连篇累牍,而核其本职之业,反属茫然。此所谓名与实不相符合。今后宜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严考课之法,用舍进退,一以切实为谁,毋眩名,毋徇资,毋摇毁誉,毋杂爱憎,毋一事概其生平,毋一眚掩其大节。人有专职,束有责成。五、固邦本。今当民穷财尽之时,必痛加节省,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慎选良吏,牧养小民,端浩爱民者升迁,贪污害民者严惩。抑制豪强,均平赋役,务去耗财病民之弊。正所谓民生遂,而邦本宁也。六、能武备。今边事久废,皆因因循怠玩,姑务偷安。今后宜先自治之图,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疏入,穆宗褒答,下部院议行。此疏乃张居正日后改革纲领。

王穀祥逝世 王穀祥(1501—1568),字禄之,号酉室,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文选司员外郎。因尚书汪𬭎嫉之,左任真定府通判,后归里。隆庆初,简用旧臣,任南京文选主事,称病不就。王穀祥善书画、古文词,与陆师道俱有清望。隆庆二年(1567)九月九日卒,年六十七。有《酉室集》。

庞尚鹏条陈盐法 隆庆二年(1568)九月二十八日,总理江北等处屯盐都御史庞尚鹏奉命条陈盐法二十事,其中关于疏通壅滞者五条,禁止私贩者三条,调停专利偏累者四条,行盐地方者一条,盐课本折者一条,利所当与者二条,弊所当革者四条。

魏尚纯逝世 魏尚纯(? —1568),号嵩麓,河南钧州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行人,升户部四川司员外郎,郎中。陕西布政司左参议,鳌豪宦为横举法绳之。补贵州按察副使,迁右参政,历山西布政使,顺天府府尹,嘉靖四十三年(1564)五月升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旋以疾告归。隆庆元年(1567)二月起用为工部左侍郎,六月升南京工部尚书,九月致仕。隆庆二年十月初二日卒于家。尚纯耿介有风节、历官三十七年,十九任,家无余赀,中州士人无不称赞。

庞尚鹏条上屯田四事 隆庆二年(1568)十月十五日,总理江北等处屯盐都御史庞尚鹏条陈屯田四事:一、开垦抛荒;二、清理侵占;三、査复原额;四、追征子粒。

穆宗选美之扰 南京织染局内使张进朝声称奉命往湖广南直隶等地选取秀女,消息传开,江南婚嫁失所,嫁娶立尽。隆庆二年(1568)十月十五日,命南京法司逮捕斩首张进朝,。其党羽充军。

马芳两败俺答 隆庆二年(1568)十一月初五日,宣府总兵马芳率所部一千余,出独石口外二百里,袭击俺答部于长水海子,败之。旋又击败俺答部于鞍子山。前后斩获八十余人,马四十余匹。诏赏马芳等将领。

邹应龙条陈盐法 隆庆二年(1568)十一月十二日,总理江南屯盐御史邹应龙条上盐法四事:一、议额课。改订每引数额及纳银额数。二、祛奸党。凡破坏盐法者即时收捕。三、厉法禁。私盐盛行,宜添设兵舡专官防御。四、清弊源。复国初团煎之规,严禁私

盐。

限期进珠宝 隆庆二年(1568)十二月十七日,命户部购买带色宝石珍珠等物,限三日之内以进。户部尚书马森等诤谏,穆宗以内府缺用,不听。

限勋戚五世庄田数额 先是,限勋臣五世庄田一百顷,戚畹七百顷至七十顷,废绝及奸冒者并入官。隆庆二年(1568)十二月二十二日,巡按直隶御史刘世曾报称:勋戚五世庄田超过一百顷的甚多,如超过一千三百顷的一家,超过五百顷的三家,超百数十顷的二家。戚畹有田二千八百余顷者一家,一千五百余顷者一家,一千数百顷者七家。废绝者九家,其田约三千五百余顷。赐田不载册者四家,田二百余顷。奸冒者五家,有田约三千余顷,应该追夺。户部议曰:勋戚之家应当稍优,册籍不载者应再核实,废绝者但先世丘墓尚在应量留数顷,以资祀祭。皇上令户部与御史再议。遂定世勋二百顷,兼勋戚一百五十顷。

江西行一条鞭法 隆庆二年(1568)十二月,江西巡抚刘光济请行一条鞭法。先是,嘉靖中叶,由于边防供亿浩繁,国库空竭,乃有"提编"、"加编"等名目相继出现,但是逋欠更多,规避更巧,于是,有的地方官员将各种名目并为一条,谓之"条鞭法"或称"一条鞭法"。其法为总括一州县的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与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增之数,通十岁为一条,总征而均支之。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一切计亩征银,折办于官。亦即按亩出钱纳银,一应赋税徭役完全由官府办理。免去一切烦琐手续,一时称便。至是一条鞭在江西得以推行。

石邦宪逝世 石邦宪(?—1568),字希尹,贵州清平卫(今清平县)人。嘉靖七年(1528)嗣世职为清平卫指挥使,嘉靖九年都清守备,累功进署都督佥事,充铜仁参将,充总兵官镇贵州。以功进署都督同知。石邦宪生长黔土,熟悉苗情,善于用兵,为总兵官十七年,威镇贵州,与四川何卿、广西沈希仪并称一时名将。隆庆二年(1568)十二月,以镇守贵州右都督总兵官卒。

松江府均粮 隆庆二年(1568)巡抚应天右佥都御史林润奏:江南均粮,惟松江府未均。遂命松江府同知郑元韶进湖广按察佥事,专管丈田。凡上乡平米一石,准田二亩七分三厘;中乡米一石,准田三亩一分二厘;下乡米一石,准三亩六分三厘;其不时加派,俱论加耗。

徐纲致仕 徐纲,生卒不详,字立之,号浴泉,又号洛峰,湖广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由西安府推官进吏科给事中,静正不阿。嘉靖三十一年转礼科给事中。世宗建醮,命诸臣黄冠行香,徐纲极力谏阻,被廷杖濒死。寻任应天府丞、升顺天府尹。隆庆元年(1567)授工部侍郎。修世宗陵寝成,荫二子。隆庆二年,听调致仕。

金贲亨逝世 金贲亨(1483—1568),字汝白,号一所,临海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任扬州教授,补南京刑部主事。宁王宸濠起兵,攻安庆,南京震惊,贲亨与同僚谋划城守。转员外郎、郎中。出佥江西臬事,立断淹狱,赃吏豪民震慑。改督贵州学政,迁福建督学,慨然以兴学为己任。隆庆二年(1568)卒,年八十六。学者称一所先生。有《学易记》、《学书记》、《学庸议》、《道南录》、《台学源流》、《一所文集》、《象山白沙要语》、《临海县志》等。

高鳌逝世 高鳌(1486—1568),字企之,嘉定人。舅父原为太医院医士,因传其业,补太医院医士。正德末年,倖臣江彬劝诱武宗南巡,翰林院修撰舒芬等纷纷谏阻,高鳌亦以养身之道谏阻之。武宗以其附合外官而下之诏狱,杖三十,罚跪午门前五日,又廷杖五十,谪戍乌撒。嘉靖初年召还,晋御医,升太医院院判署南院使事,以年老自免,隆庆二年(1568)卒,年八十三。当严嵩柄权之时,高鳌刚直不阿,警告媚事严氏父子者,不要忘记钱宁被诛事,闻者皆错愕避去。

沈啓逝世 沈啓(1501—1568),字子由,号江村,吴江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南京工部管缮司主事。世宗南巡,为之谋划楼船。任守绍兴,海盗许栋、王直等与缙绅私通,沈啓制之,缙绅怨恨刺骨。后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以忤当道罢归。隆庆二年(1568)卒,年七十八。沈啓博览群籍,诸经子史,阴阳律历,水利洪范等,靡不研究,所著甚丰,有《家居稿》、《南北稿》、《西台净稿》、《越吟稿》、《楚吟稿》、《鸡窠岭稿》、《南厂志》、《南舩啓志》、《牧越议稿》、《吴江水利考》、《杜律七言论》、《晴窗便览》等,其中《吴江水利考》资料丰富,对研究太湖一带水利有重要参考价值。

赵大佑逝世 赵大佑(1510—1569),字世胤,号方崖,浙江太平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授凤阳府推官,选广东道御史。嘉靖四十年七月由刑部左侍郎为南京右都御史,嘉靖四十二年五月升南京刑部尚书。隆庆元年四月为刑部右侍郎,旋升南京兵部尚书,八月,以母老乞终养回籍。大佑为人博大和雅,勤于政事,历官中外俱有能声。晚屡荐不赴,隆庆三年(1569)正月初四日于家逝世,年六十岁,著有《燕

石集》。

戚继光奏陈边务 隆庆三年(1569)正月十一日,总理蓟、昌、保定练兵戚继光上疏十七事:其中属蓟镇兵虽多亦少者七条;属不练之失者六条;属虽练而又无益者四条。疏入,改任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今河北迁西)、永年(今河北卢龙)、山海关等处。

马森致仕 马森(1506—1580),字孔养,怀安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太平府知府,嘉靖三十五年六月以江西左布政使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擢江西巡抚右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改户部右侍郎,调大理寺卿。嘉靖四十年养病。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起南京工部右侍郎。嘉靖四十二年三月转左侍郎。四十五年五月以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润十月迁南京户部尚书。隆庆元年(1567)改户部尚书。穆宗命中官崔敏发户部银六万两买黄金,又命买珠宝,马森力谏,不听,隆庆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乃以母老致仕。万历八年(1580)十二月卒,年七十五。谥恭敏。有《恭敏公集》。

蓟辽总督请筑墩台 隆庆三年(1569)二月初九日,总督蓟辽兵部侍郎谭纶奏:蓟、昌二镇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延袤二千四千余里,防守甚艰,宜择要害,酌缓急,分十二路,每百步或三、五十步,筑一墩台,共计三千座。计每岁可造千座。每座可费五十金,台高三丈,广十二丈,内可容五十人。无事则守墙,有警则出击,二面设险,可保万全。请户部拨太仓银三万五千两,请兵部拨马价银一万五千两,以供工费。穆宗允行。

庞尚鹏条陈蓟镇屯田事宜 隆庆三年(1569)二月初九日,总理九边屯田佥都御史庞尚鹏条上蓟镇屯田九事:一、屯田私相典卖,隐蔽难查,应按籍清理。二、荒田一千余顷,召种无人,应令所在将领兵备官就近耕种,给以牛银,三年后收租。三、屯地僻远,原主力不能及者募人开垦、即给为业,并免杂差。四、隐占逃军应严加查禁,其自首者免罪。五、沿边被山水冲坏,或被蒙古骑兵蹂躏的可耕地,地荒赋存,应核实免除。六、边地粮头犹内地粮长,富者巧避,贫者偏累,应将各卫屯户分上中下三则,或独户或数家协济。七、沿边新辟旷土应履亩均分。八、九边地广俗殊,其屯田事应责督抚等官,用心区画。九、蓟镇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始,开中盐额务使商人有赢余,此为足边长策。

停太监阅视京营 原来京营兵每三年由皇帝派遣司礼监太监一人阅视。隆庆三年(1569)二月十四日,穆宗决定亲自大阅,故遣太监阅视事作罢,以后如例。

张登高致仕 张登高,生卒年不详,字子升,濮州(今河南范县)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初任苏州府推官。擢广西道御史巡按顺天府,境内中官贵戚侵压民田,张登高绳之以法,核实归民。都督陆炳,权倾中外,具疏劾之,被逮入狱,榜掠几死,削职归田。隆庆元年(1567)复官,升南京尚宝司卿,加太常寺少卿。隆庆三年二月二十日致仕。

洪朝选致仕 洪朝选(1516—1582),字舜臣,一字汝尹,号芳洲,又号静庵,福建同安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嘉靖二十八年补南稽勋司考功司,嘉靖四十四年六月进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以右副都御史总理南京粮储。五月巡抚山东兼督理营田。山东徭役繁重,民不堪苦,洪朝选随地编差,因粮制役,虽势豪寄庄不少贷。藩府官校多侵夺民田,革之归民。隆庆元年(1567)八月任南京户部右侍郎。隆庆二年三月升刑部左侍郎。三年二月二十日,以原官致仕。万历十年(1582)卒,年六十七。著有《洪芳洲集》、《静安稿》。

吴维岳逝世 吴维一(1514—1569),字峻伯,号霁寰,浙江孝丰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江阴县令,迁刑部主事,历刑部郎中,山东提学副使,湖广右参政,江西按察使。嘉靖四十二年三月为贵州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与李攀龙倡诗社,为嘉靖广五子之一。性精敏,文雄于世。隆庆三年(1569)二月二十三日卒,年五十六。有《天目山斋藏稿》或称《天目山斋岁编》。

王得春条奏时政 隆庆元年(1567)三月二十日,监察御史王得春奏:一、清宫闱。累年选入宫人充满掖庭,其中老弱出闭者未免抑郁愁怨,宜悉简出。二、禁谄谀。近年多献祥瑞,以于恩泽备极谀辞,有灾匿不以奏,乞晓谕中外臣工,四方水旱疾疫寇贼奸宄,宜据实报闻。三、慎题覆。近来言官论事奉旨拟议,该部率多委曲迁就,以致政令不一,今後章疏是者即为复行,非者即与论罢,不必依违两可,以紊国是。四、慎贡选。近奉诏令用人毋拘三途诚为美意,但岁贡中沉沦日久,壮志已隳,似难责其策励,宜查复选贡与工贡并行。礼部复奏,穆宗准从。

京师选宫女 隆庆三年(1569)四月十一日,皇上命礼部曰:祖制皇宫中设六尚并预教以读书,使知礼仪。现宫中缺少,即遵成例,选取民间女子年纪十一岁以上、十六岁以下者三百人进宫。礼部尚书兼学士高仪奉命差官于京城内外及顺天等八府州县选取。后因各府太远,只在京城内外选取。至本月十八

日，礼部即选进宫女三百人。

戚元佐条陈限制宗藩事宜 隆庆三年(1569)五月十八日，礼部仪制司郎中戚元佐疏奏，国初亲王、郡王、将军才四九位，现在玉牒见存者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位，与国初相比不啻千倍，以今年全部收入供给尚不足所需之半。故请：一、限封爵。亲王嫡长子例袭亲王，嫡庶次子许封其四，郡王嫡长子例袭郡王，嫡庶次子许封其三；镇国将军有嫡许封其二，无嫡止许庶子一人请封；其镇辅奉国中尉不论嫡庶只许封一子。凡不得封者，量给资、赐章服。二、议继嗣。亲王可以弟子嗣；亲王无嗣，止许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终弟及之例。亲王有绝嗣者，止推一人管理府事，不得冒请复继王爵。三、别疏属。国制郡王七世孙以下封奉国中尉。今后奉国中尉再传不必赐封，止将所生第一子给银五百两，余听自便。四、议主君。亲王之女只封其三，郡王之女只封其二，将军中尉之女只封其一，郡县主及郡县乡君给禄外，其选配代，免给俸。各女婿不必另给冠服婚，一体听其自便。五、议冒费。冒妾子女、革爵子女、擅婚子女，自今以后所生之子女听其自便。其擅婚子女，今后只赐名。俱不再给口粮。穆宗命礼部集议。

王积逝世 王积(1492—1569)，字子崇，号虚斋，太仓(今江苏太仓县)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授武选主事，郎中、广东左参议。丁忧去，后补官，因耻谒要人，久不得调，至典卖衣物自给，乃上书乞休。补陕西，迁贵州威清道副使。进湖广参政，两浙运盐副使，佥事副使，福建右参政。以破倭功，擢山东按察使，释左布政使，转福建，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迁南京兵部右侍郎。以目疾乞休。隆庆三年(1569)六月初十日卒，年七十八。

赵炳然逝世 赵炳然(1507—1569)，字子晦，号剑门，剑州(今四川剑阁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擢御史，历按云南、浙江，擢大理寺丞进少卿，寻改右佥都御史。核宣大山西兵饷，劾前后督抚樊继祖等一百七十七人侵冒罪。三十六年十二月巡抚湖广。四十一年为左副都御史，十一月，兵部右侍郎，巡抚浙江。嘉靖四十二年二月，请操义乌土兵。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进右都御史。嘉靖四十四年十月以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兼总宣大山西军务，加太子太保。隆庆元年(1567)四月乞休归。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三，赠太子太保，谥恭襄。赵炳然从政数十年，清勤练达，所至有政声。著有《历官奏议集》。

虞守愚逝世 虞守愚(？—1569)，字惟明，浙江义乌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嘉靖十三年任大理寺右寺丞，嘉靖十四年丁忧归，补左寺丞。嘉靖二十年升左少卿，嘉靖二十二年升右佥都御史，抚南赣，嘉靖二十三年迁江西巡抚，右副都御史。嘉靖二十五年改大理寺卿，未任。嘉靖二十九年起南大理，升南京刑部右侍郎。三十年闲住。隆庆三年(1569)七月初一日卒。

瞿景淳逝世 瞿景淳(1507—1569)，字师道，别号昆湖，江苏常熟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三十五年九月，以翰林侍读主武闱。三十七年七月升主试应天。十一月左谕德。四十三年三月，为太常寺卿，署南京国子祭酒。隆庆元年(1567)四月，以南京吏部右侍郎升礼部左侍郎。以兼翰林院学士校录《永乐大典》。纂修《嘉靖实录》，加二品俸，寻以疾乞归。隆庆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三。景淳学行醇谨，见权势不少屈，士人称之。赠礼部尚书，谥文懿，著有《文懿公集》。

广宁设战车营 隆庆三年(1569)八月十九日，巡抚辽东都御史魏学曾请于广宁设立战车营，以游击将军马文龙统之。每二辆中设拒马枪一架，塞其隙。车架上下用绵絮布帷幛以避矢石。每车上载佛郎机二杆、下置雷飞炮快枪各六杆。每拒马枪架上树长枪十二杆，下置雷飞炮快枪六杆。每车二十五人，共车一百二十辆，步卒三千人。

俺答犯大同右卫 隆庆三年(1569)九月初六日，俺答率数万骑入犯大同右卫镇川堡，东西分掠山阴、应州、怀仁、浑源等处。俺答将进犯，官军已侦知之，但总兵赵岢提兵远屯，参将方琦不予设备，游击施汝清畏缩不前，不发一矢，任其杀掠，致使俺答如入无人之境，攻陷堡寨九十三所，杀掠男女及创残数千人，掠马畜粮刍以万计。其能自保者唯副总兵麻锦、参将麻贵、葛奈三人。疏上，总兵赵岢降职三级，总督陈其学降俸二级，巡抚李秋夺俸半年，总兵胡镇、游击文良臣各降一级，参将方琦等六人谪戍，游击施汝清等九人下御史逮问。

熊桴逝世 熊桴(1507—1569)，字元乘，号镜湖居士，江夏(今湖北江夏)人。嘉靖二十九(1550)年进士，知太仓州，劝农兴学，禁吏民为奸、郡大治。嘉靖三十二年以御倭有功，升苏州府同知，河南按察司佥事，苏松兵备佥事。在吴十二年，击海寇大小三十余战，屡捷，升云南参政，迁陕西按察使，左迁山东参政，转浙江右布政，擢佥都御史巡抚广东，进右副都御史，屡成奇捷。隆庆三年(1569)九月，十六日卒，年六十三。赠兵部左侍郎。

郭明起义 广东潮、揭、浦、惠诸县郭明、胡一化、陈一义聚众起义，声势相倚，抗拒官兵近20年。隆庆三年(1569)九月总兵郭成、兵备佥事杨芷、监军

副使江一麟等率官军分路进剿，郭明、胡一化、陈一义被杀，被俘获者一千三百余，起义被平息。

周怡逝世 周怡(1506—1569)，字顺之，号讷溪，太平(今江苏扬中县)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嘉靖二十一年五月由顺德府推官选吏科给事中，以言事廷杖下狱。嘉靖四十五年放归为民。隆庆元年(1567)起除吏科给事中，三月升太常寺少卿。八月，降山东按察司佥事。隆庆二年六月改南京国子监司业，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隆庆三年(1569)十月十七日卒于家。著有《讷溪文集》、《诗录》、尺牍、杂录。

魏学曾致仕 魏学曾，生卒年不详，字惟贯。别号确庵，陕西泾阳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除户部主事，迁郎中，寻擢光禄寺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隆庆初，土默特部入永平，学曾驻山海，檄诸将追击至义院口，大捷，进右副都御史，开屯田二千余顷。迁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枢营，旋改吏部转左侍郎。隆庆三年(1569)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疾致仕。

积谷不如数罚俸 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初四日，湖广抚按刘悫、雷稽古等奏：所属府州县官积谷不如数者罚俸，少三分者罚俸二月，少五分者罚俸半年，少六分、七分者罚俸一年，少八分、九分者例应降调，姑罚俸一年。

厂卫密访部院事 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初五日，刑科给事中舒化等言：皇上以部院政事属厂卫密访，百官提心吊胆，不知所措。今以权归厂卫，万一人非正直，事出冤枉，由此以开罗织之门，是非颠倒，忠良被害。皇上委之厂卫，厂卫必托之番校，此辈贪残，人心忧危。望皇上收回成命，以安民心。

矿工何术起义 陕西洛南县矿工何术等聚众三千余人，占据白花岭诸矿洞十八所，官府久捕不获。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初九日，何术等八人被获论斩，其党施朝凤等四十三人发遣有差。余众解散。

杨博致仕 杨博(1509—1574)，字惟约，号虞坡，山西蒲州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除盩厔知县，兵部武库主事，历职方、户部郎中。大学士翟銮巡视九边，以杨博自随，所过山川形势土俗、士卒多寡强弱皆记之。吉囊、俺答岁犯边，兵部尚书张瓒一切多倚办于杨博。迁山东提学副使，督粮参政。嘉靖二十五年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大兴屯田及肃州、甘州诸泉，进右副都御史，以母忧归。服除召科兵部右侍郎，转左经略总督宣大山西军务。迁蓟辽总督，数却俺答，进吏部尚书少傅兼太子太傅，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十七日致仕。万历二年(1574)十月卒，年六十六。谥襄毅。有《本兵疏议》、《虞坡集》、《杨襄毅公奏议》、《蒲坂杨太宰献纳稿》。

恤典条例的制定 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二十五日，礼部上恤典条例。一、文官祭葬。于本品级内量加一等，父母未蒙封赠者，妻未封赠夫人者，不准并祭。二品祭数本身二坛，被劾闲住者祭葬具无，妻未封夫人者不准与祭。三品祭葬不分在任致仕，俱一坛。四五品官不得重封，未经考满者不得越例陈请。今后不拘品级，凡已授外封及后任京职考满宜封而例不得重封者。二、勋臣祭葬。除皇亲取自上裁及悉遵会典外，今后公侯伯在内掌府事，在外坐营总兵，有勋劳而太子太保以上者，公侯祭十六坛，伯祭十五坛。掌府事，坐营总兵历有勋劳者祭七坛；而劳绩不著者五坛，四坛至一坛；勘实而罪重者并本爵应得祭葬。一概尽削。三、武臣祭葬。如正德、嘉靖间本部所题事例。四、以节义死事者。视实情给予祭葬，赠谥不等。

赵汝濂逝世 赵汝濂(1495—1569)，字敦夫，号云屏，云南大和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选庶吉士。嘉靖十四年授考功司主事。嘉靖十五年调文选司主事。嘉靖十九年升考功司郎中。嘉靖二十三年由尚宝转太常寺少卿，再转右通政。嘉靖二十六年迁太仆寺卿。寻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协掌院事。嘉靖三十三年以原职致仕家居。隆庆元年(1567)进正奉大夫。嘉靖三年卒于家。年七十五。

黄峨逝世 黄峨(1498—1569)，字秀眉，四川遂宁(今四川遂宁县)人，正德十四年(一说为十三年)嫁杨廷和之子杨慎。嘉靖初，杨慎因"大礼仪"触怒世宗，贬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黄峨曾一度至戍所与夫同住，后回四川新都主持家政，直到嘉靖三十八年杨慎病死永昌，三十年夫妻未曾见面，以传递书信抒发情感。隆庆三年(1569)，黄峨病逝于家，年七十二岁。黄峨自幼聪颖，又承家教，工于笔札，博通经史，诗词俱佳，尤擅散曲。她寄给杨慎的长句及小词为人传诵。杨慎曾说："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王世贞也说："用修有诗答妇又别和三曲，皆不及也。"有《杨夫人词曲》等。

徐献忠逝世 徐献忠(1483—1569)，字伯臣，号长谷，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嘉靖四年(1525)举人。任奉化知县，有政绩。寻弃官寓居吴兴。与何良俊、黄宜阳、张之象，俱以文章气节闻名，时称"四贤"。隆庆三年(1569)逝世，年八十六岁，门人私谥贞宪先生。著书数百卷，有《水品》、《乐府原》、《金石文》、《六朝声偶集》、《长谷集》。

高应冕逝世 高应冕(1503—1569)，字文忠，号颖湖，浙江仁和人。嘉靖十三年(1524)举人，授绥

宁知县，迁光州知州，不久归乡，与闽县祝时泰，新安王寅，钱塘方九叙、童汉臣，仁和刘子伯、沈懋学等，结社于西湖，曰紫阳、湖心、王岭、飞来、月岩、南屏、紫云、湖霄等八社，今所传西湖八社诗帖是也。隆庆三年(1569)逝世，年六十七岁。有《白云山房集》、《奚囊橐余》。

《四友斋丛说》刻行　《四友斋丛说》三十八卷，何良俊撰。隆庆三年(1569)初刻，仅三十卷，後又续撰八卷，共为三十八卷，万历七年(1575)重刻。何良俊字元朗，华亭人，仅做过南京翰林院孔目，既归乡著述。全书分经四卷，史十三卷，子二卷，杂记一卷，释道二卷，诗文四卷，书画三卷，求志、崇训、尊生、娱老、考文、词曲、续史各一卷、正俗二卷等十七类，涉及到明代苏松地区政治、经济、赋役、徭役、黄册、防倭、饮食、养生，以及土地丈量、人口消长等等方面，是记述苏松等处地方综合性笔记资料。

京营设文臣为总理　隆庆四年(1570)正月十一日，大学士赵贞吉奏：我朝内外卫兵分隶五府，为避免强臣握兵之害，永乐末年遂结营团操，乃以三千、神机二营统之，因号为三大营。正统末年改为十团营，弘治间为十二团营。正德间增东西官厅。嘉靖二十九年(1550)严嵩建议于五府之外设戎政府，握内外兵藉。后成国公朱希忠等二十人请收戎政武臣及印，仍三大营。三大营各一将领之，赐敕，以文职大臣一员为总理，无事居营训练，有警则总兵挂印出征。穆宗皇帝允从。

王廷致仕　王廷，生卒不详，字子正，号南岷，四川南充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户部主事，改御史，因疏劾尚书汪鋐，被谪亳州判官。历苏州知府，有政声，累迁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由总理河道，右副都御史转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粮储。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改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上，十二月为户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时倭寇未靖，王廷建议以江南属镇守总兵官专驻吴淞江，江北属分守副总兵专驻狼山，遂为定制。以御倭功加俸二级，嘉靖四十五年十月迁南京礼部尚书，左都御史。隆庆元年六月京师雨潦、坏庐舍，命王廷督御史赈恤。御史齐康为高拱劾徐阶，王廷乃劾齐康怀奸党邪，发给事中张齐受贿事，皆得罪去，王廷迁都察院右都御史。高拱再度入阁，嗾御史弹劾。隆庆四年(1570)正月二十八日削职为民，致仕，卒谥恭节，有《前汉书抄》、《后汉书抄》。

毛恺逝世　毛恺(1506—1570)，字达和，号介川，晚号节斋居士，浙江江山人。嘉靖十四年(1525)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以言事为执政者所恶，谪宁国推官。历瑞州知府，升南京工部主事。四十年四月，由河南右布政使为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四十四年四月，户部右侍郎。嘉靖四十五年正月，由吏部右侍郎改左侍郎。十一月升南京礼部尚书。十二月，南京吏部尚书，协理戎政，隆庆元年(1567)五月升刑部尚书。隆庆四年二月初三日致仕卒，年六十五，谥端简。

顾存仁条陈马政　隆庆四年(1570)二月初六日，太仆寺卿顾存仁条陈马政六事。一、优恤种马。近来种马之家苦于官吏侵渔，惟恐自驹。今后凡民间报定显重驹者，即给优恤，仍免徵草料银两。二、责成寄牧。通判专管马政。三、隆重迁选。管马官应久任。四、严督解运。各州县解银解马多被包揽，应严行禁革，并追查各处折色马价京营子粒未完者。五、议派改折。南直隶非产马之地，离京师又远，宜全部改徵折价。六、慎贮卷籍。本寺文移卷籍多被遗忘，请以余闲旧仓改作架阁库，命吏守之。

张鉴逝世　张鉴(？—1570)，四川南充人，嘉靖进士，授会稽令，均田亩，清还豪右侵占民田，流移复业者五千家。守建宁，备兵临清，升山西按察使。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命为山东巡抚右佥都御史，兼督营田，设衮州营田同知二员。嘉靖四十三年四月，以行均田保甲法，招致商贾怨恨而罢。隆庆三年二月起升右佥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隆庆四年(1570)二月十六日卒。囊无一金。有《皇极经世衍义》、《屯操奏案》、《东安图议》、《石州奏疏》、《江泉别集》、《中丞遗稿》等。

曾钧逝世　曾钧(？—1570)，字廷和，江西进贤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行人，擢南京礼科给事中，时四方银场得不偿费，曾钧奏罢之。曾钧为人端严廉正，先后弹劾尚书刘龙、翊国公郭勋、礼部尚书严嵩，侍郎蒋淦、巡抚赵锦、操江御史柴经，声振一时。出为云南副使，四川参政，河南左布政使。嘉靖三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当时徐、邳等十七州县连被水患，曾钧请浚刘伶台至赤宴庙八十里，筑草湾老营河口，增高家堰长堤，缮新庄等，数月工成。嘉靖三十四年十月，进工部右侍郎。隆庆初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乞归。隆庆四年(1570)二月二十二日卒。赠刑部尚书，谥恭肃。

海瑞浚吴淞江白茆港　松江等地大饥，民多思乱。应天等处巡抚海瑞请浚吴淞江白茆港，以工代赈。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黄成乐、上海知县张嵿，按期开浚，共长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余，阔三十余丈，除嘉定应浚外，实开上海自黄艾祁口至宋家桥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一丈，整个工程用银五万余两，工期不

足两月，于隆庆四年(1570)二月二十三日告竣。

海瑞改总督南京粮储 海瑞巡抚应天，一意安抚贫弱，抑制贵势，清理冤狱，退还百姓被夺田地，墨吏望风解绶，巨室惴惴不安。大学士徐阶致仕家居，诸子横暴乡里，海瑞亦绳之以法。徐阶父子遂贿买吏科给事中戴凤翔诬劾海瑞"迂狂颠倒"、"滥受词讼"。吏部复奏，海瑞"有大才"，于隆庆四年(1570)二月二十五日由应天巡抚右佥都御史改调总督南京粮储，但不久又被裁革。海瑞离职，当地民众皆家祀之。

庞尚鹏条陈甘肃屯田事宜 隆庆四年(1570)四月初二日，总理屯盐都御史庞尚鹏条陈甘肃屯田事宜。一、清拨补。屯丁有力者多趋肥美之田，荒瘦之地以苦贫弱，宜分别荒熟，酌置丁力因人授地，因力徵粮。二、给牛种。甘州卫有牛种之资，垦田独多，宜做其法，以后愿得牛种者即以所收息给之。三、广屯种。近边之地，宜令官督军开种，因租为饷，其余人户愿受田者，免其赋役，止令防守。四、兴水利。屯田可通水泉者，应委官修渠，以时蓄泄，因循沮废者重罪之。五、豁虚粮。清理屯粮，以固人心。六、权本折。西宁谷贱，应将庄浪年例银解西宁、将西宁粮运庄浪，乃两利之便。七、缓徵科。极边远荒田，能耕者听为世业，毋得征粮。部复，"权本折"一事，宜下巡按议，余如庞尚鹏言。穆宗准行。

欧阳一敬逝世 欧阳一敬(? —1570)，字司直，号柏庵，江西彭泽人。嘉靖三十八(1559)年进士，由肖山知县，授刑科给事中。严嵩败后，言官争发论事，一敬尤敢言。隆庆初年弹劾吏部尚书杨博，再劾高拱，专柄擅国。条陈兵政人事，部皆议行，擢太常寺少卿。会高拱再起炳政，一敬惧，即日告归，隆庆四年(1570)四月初四日，半道以忧卒。

俺答攻平虏城 隆庆四年(1570)四月初九日，俺答率部由平虏边口大举入犯。山西总兵郭琥等坚壁以待，俺答遂南走朔、应、山、怀诸路。大同总兵马芳等亦有备，俺答乃转掠西路水口儿一带，攻平虏城。参将张刚恐防地有失，又惧俺答深入，乃与守备朱进、张鉴、董尚文等密谋，遣使以重金贿俺答，使犯威远堡。宣大总督陈其学率总兵胡镇救之，总督王崇古遣总兵马芳率兵亦至，经十余日殊死战斗，俺答退去。赐陈其学、靳学颜、方逢时、郭琥、马芳、胡镇等银币有差。张刚由锦衣卫差官校系械至京问罪，其他不力官员罪罚不等。

诏买珍宝 穆宗曾命户部取办年例银两市买猫儿眼、祖母绿等珍宝。户科都给事中李已奏曰：库藏空虚，边饷急迫。户部尚书刘体乾亦曰：珍宝非民间所有，责令召买必泛滥追呼骚动，市民百姓毙于箠者必多，应罢市买。不听。隆庆四年(1570)五月初六日李已等再上疏：近来买玉、买珠，传帖屡下，人心汹汹。府库空虚，小民困竭，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累，却以一时的玩好而费数十万之资。太监崔敏等无端献谄，假公充私应予严斥。疏入，穆宗大怒，命廷杖一百，送刑部狱监候。给事中陈吾德亦被罢黜为民。

谭太初致仕 谭太初，(一作大初)，字宗元，号次川，广东始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嘉靖二十七年三月由户部主事改户科给事中，嘉靖二十八年转兵科给事中，嘉靖二十九年刑科给事中，三十年升江西副使。时严嵩擅权，亲党夺人产，太初置之以法。擢广西左参政。嘉靖四十五年起河南右参政，擢南京右通政，应天府知府。隆庆元年七月升工部右侍郎，隆庆二年正月，户部左侍郎，总督仓场，推荐海瑞可当大任。隆庆四年(1570)五月十七日以南京户部尚书致仕归家，田不满百亩，卒年七十五，谥庄懿。著有《次川存稿》、《族谱》。

黄养蒙逝世 黄养蒙，字存一，福建南安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授遂昌县令，均徭役，民大称便，擢吏部稽勋司主事，转考功郎中，迁南京太常寺少卿，晋光禄寺卿。嘉靖四十年陛南京户部右侍郎，逾二载调户部右侍郎。隆庆四年(1570)六月初五日卒。

潮州府大风水 隆庆四年(1570)六月六日，大风拔木坏屋，雨下如注，洪水猝发，湖寮阻塞，清远都下流被害尤剧，凡久造民房，漂没殆尽。

高翀逝世 高翀(1490—1570)，字允升，湖北安陆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四川犍为县令。嘉靖二十年补浙江右参议，四川按察副使、山西参政，云南按察使，贵州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嘉靖三十九年奉命闲住，嘉靖四十二年诏令致仕。隆庆元年(1567)进资善大夫，隆庆四年(1570)六月十一日卒，年八十一。有《归与稿》、《玉华诗文稿》。

万士和致仕 万士和(1516—1586)，字思节，号履庵，江苏宜兴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改庶吉士，授礼部主事，改南京兵部，迁江西佥事，贵州提学副使，进湖广参政。三殿工兴，采木使者旁午，士和经画备至，民赖以安，迁江西按察使，广东布政使，拜应天知府，迁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粮储，奏请便民六事。隆庆二年正月进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寻改礼部左侍郎。隆庆四年(1570)六月十七日，引疾致仕。万历十三年(1585)卒，年七十一，谥文恭。有《履庵集》、《续万履庵集》、《万文恭摘藁》

杨宗气逝世 杨宗气(1514—1570)，字正系，

一作子正，号活水，陕西延安卫籍浙江归安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由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升刑科都给事中，擢山东参政。嘉靖四十二年六月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提督三关请扣民壮银充兵饷。嘉靖四十三年六月升总督粮储，南京右副都御史。隆庆四年(1570)六月二十日卒，年五十七，有《山西通志》。

刘体乾致仕 刘体乾，字子元，号清癯，顺天府东安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嘉靖二十七年三月由行人选兵科给事中，嘉靖二十九年升吏科给事中，嘉靖三十年升兵科左给事中，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升通政司左参议，右通政使。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为左通政使。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升刑部右侍郎。六月迁户部左侍郎，提督仓场。隆庆初进南京户部尚书，隆庆三年二月进兵部尚书。时内供不足，数令户部取太仓银，又令买金云南，刘体乾不即奉诏，隆庆四年(1570)七月十三日穆宗以其故意违抗，勒令致仕。

陈以勤致仕 陈以勤(1511—1586)，字逸甫，号松谷，一号青居山人，四川南充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选庶吉士。嘉靖二十二年授翰林院检讨，充裕王讲官，嘉靖三十五年迁修撰，嘉靖三十七年进洗马兼翰林院侍讲，嘉靖四十三年迁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总核《承乐大典》，进太常寺卿领国子监，嘉靖四十四年擢礼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嘉靖四十五年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隆庆元年(1567)春擢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总裁《世宗实录》。见同僚多党比，力求去。隆庆四年(1570)七月二十二日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致仕。万历十四年(1586)逝世，年七十六。谥文端。有《青居山房稿》。

林云同致仕 林云同(？—1574)，字汝雨，号退斋，福建莆田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改庶吉士，授户部主事，榷税九江，转广东提学副使，浙江右布政使，寻转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严世蕃私索谢金，云同置之不理，并发所属知县行贿事，因而得罪严世蕃，听勘回籍。隆庆三年起南京右都御史，升南京工部尚书，隆庆四年(1570)七月二十五日致仕。万历二年(1574)卒，谥端简。有《端简公存稿》、《诗稿》。

潘季驯治河 自隆庆元年(1567)以来，河道屡决，阻绝运道，损坏漕船。隆庆四年八月初二日，起任潘季驯为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提督军务。潘任职后，亲自踏勘，提出疏浚黄河故道的治河方案。并亲自督率五万民工，疏浚睢宁题头湾以下正河八十余里，沿河筑堤三万余丈，塞决口十一处，畅通了漕运。

方廉致仕 方廉(1513—1582)，字以前，号双江，浙江新城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授南康府推官，历祠祭主事，主客员外郎、精膳郎中，松江府知府，迁江西按察司副使，进广东布政司左参政，寻进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迁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徐州单出丁夫任二洪役，方廉悯其偏累，省漕司米价募之。升南京工部右侍郎。隆庆四年(1570)八月十一日乞休。

顾存仁致仕 顾存仁(1502—1575)，字伯刚，一字子奇，号怀东，江苏太仓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嘉靖十五年五月由浙江余姚知县选礼科给事中。十七年以言事廷杖，发口外为民。隆庆元年(1567)起南京通政司右参议。嘉靖二年升顺天府丞，再升大理寺少卿。隆庆三年陞太仆寺卿。隆庆四年(1570)八月二十六日致仕。万历三年(1575)卒，年七十四。有《太仆寺志》、《东白草堂集》。

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 把汉那吉为俺答第二子里台吉(亦曰铁臂台吉)的独生子，三岁而孤，由俺答妻一克哈屯抚养，俺答夫妇极为钟爱。及长，娶歹慎部之女为妻，那吉又自聘兔扯金之女，未及婚。这时，蒙古西部的瓦剌奇喇古特部首领哲恒阿哈有女克兔哈屯，实名叫钟金，已受聘于邻近的袄儿都司。俺答闻其貌美，竟强夺为妻。“克兔”蒙语“三”“哈屯”即蒙语“娘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娘子”。袄儿都司怒甚，欲攻俺答，俺答为补偿袄儿都司，遂夺把汉那吉所聘兔扯金之夫女送与袄儿都司。把汉那吉意恨至极，乘俺答西行之机，率妻及乳母之阿力哥等十余人，于隆庆四年(1570)九月十三日南走败胡堡降明。

孙应奎逝世 孙应奎(？—1570)，字文卿，号蒙泉，浙江余姚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累官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坐事左迁山东布政使，进南京户部尚书。隆庆四年(1570)九月十八日卒，著有《燕诒禄》。

吴岳逝世 吴岳(？—1570)，字汝乔，山东汶上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户部主事、郎中，督饷宣府，卢州府知府。改保定府知府，擢山西副使，浙江参政，湖广按察使。嘉靖三十四年润十一月由山西右布政使迁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以病请归十余年，起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寻进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任吏部左侍郎。隆庆元年(1567)三月升南京礼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隆庆四年九月再升南京兵部尚书，参预机务。以考满入京，隆庆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过家而卒。

黄台吉等犯锦州大胜堡 先是，蓟辽有警，总兵王治道率所部四千人赴援，当时巡抚都御史李秋驻义州。黄台吉等突至，李秋驰告王治道，治道即自山海关兼程会李秋于锦州。王治道与参将郎得功率兵出击，至齐家山中伏，总兵官王治道与参将郎得功俱英勇战死。隆庆四年(1570)九月二十三日，黄台吉、卜吉兀等犯锦州大胜堡。

复京营旧制 隆庆四年(1570)九月二十七日，兵科都给事中温纯曰：京营之弊在不择将而添将，不增军而增官，不讲训练而听营制，法令不一，人持己见，议事不决，遇事推诿。巡视京营御史王友贤亦言不便，请仍用武臣一人为总督，文臣一人为协理，统副将，参将，游击。穆宗命罢大提都，更推总督、协理如故。

俺答以重兵压境 隆庆四年(1570)十月初五日，俺答率二万骑至平虏城北六十里处驻扎，使伍奴柱索把汉那吉，势甚张。总督王崇古、巡抚方逢时遣百户鲍崇德出云石堡，至俺答营帐，议交还赵金等及遣还把汉那吉事。

授把汉那吉官职 把汉那吉来降，廷臣意见不一。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以及总督王崇右、巡抚方逢时等力主议和。隆庆四年(1570)十月十三日，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衣，并命总督王崇古等悉如原奏，尽心处置，务求至当。

黄光升致仕 黄光升(？—1586)，字明举，号葵峰，福建晋江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嘉靖十四年十一月由浙江长兴知县选刑科给事中。嘉靖十九年除兵科给事中。嘉靖二十一年升浙江水利佥事，改造王玺“纵横叠砌”筑塘法，首创“五纵五横鱼鳞塘式”，即桩基深固，砌石内外均匀、中间密实，料石方正平整，外石里石纵横作丁字形，上下层跨缝成品字形，层层内缩成梯级形。此塘既可排水，又防咸潮渗入，是当时比较成功的筑塘法。嘉靖三十六年三月由四川左布政使升右副都御史。三十九年四月由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湖广、四川、贵州军务。嘉靖四十一年十月升刑部尚书。隆庆元年(1567)四月致仕。隆庆四年三月起为南京刑部尚书。隆庆四年十月十四日致仕。万历十四年(1586)卒，谥恭肃。有《读书蠡测》、《明代典则》。

顾寰致仕 顾寰(1504—1582)，字君锡，江都(今江苏江都西南)人。嘉靖十二年(1533)佥左都府事，嘉靖十四年守备南京。嘉靖十七年为总兵官提督漕运，镇守淮阳。佥右军都督府事。再镇两广，平定桂林平乐瑶、僮族人民起义。以御倭功入京总督京营戎政，加太子太保。隆庆四年，复提督漕运总兵官镇远侯。隆庆四年(1570)十月十六日以老疾乞休。万历十年(1582)卒，年七十九，赠太保，谥荣僖。

俺答请封贡通市 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十三日，俺答遣使乞封，又为黄台吉乞官，并请求输马易铁锅布帛互市。总督王崇古曰：俺答雄据漠北，又东结朵颜三卫，西连吉囊子孙，若封官黄台吉等以结其心，同时彼中布帛铁锅皆仰给我国，若许封贡互市，归我叛人，和好可久。命赏把汉那吉等采缎布匹，并命总督镇巡等官详议封贡事。

赵贞吉致仕 赵贞吉(1508—1576)，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时方士初进用，贞吉请用真儒赞大业，不听。迁中允，掌司业。俺答围都城，贞吉廷议合帝意，擢左谕德兼监察御史。因严嵩等诬害，被廷杖贬官。后迁至户部右侍郎，因得罪严嵩又被夺职。隆庆初，再起礼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讲《大禹谟》称旨，命充日讲官。隆庆三年八月，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因考察科道事与高拱不合，都给事中韩楫劾之，隆庆四年(1570)十二月二十一日贞吉忿而乞休归。万历四年(1576)十二月十四日卒，年六十九，谥文肃。有《赵文肃公文集》。

孙铤逝世 孙铤(1528—1570)，字文和，号正峰，更号前锋，浙江余姚人，故尚书孙升次子，都御史孙燧之孙。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分校《永乐大典》，纂修《承天大志》。隆庆元年重录《永乐大典》成，升左春坊左中允，赐五品服俸。又任左谕德，国子监祭酒。隆庆四年擢南京礼部右侍郎。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二十九日，未任而卒，年四十三。

马坤逝世 马坤(？—1570)，字顺卿，号南渚，江苏通州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户部主事，历河南左布政使。嘉靖三十年升顺天府知府，大理寺卿，户部右侍郎，嘉靖三十一年左侍郎。嘉靖三十四年升南京工部尚书，嘉靖三十六年改南京户部尚书。嘉靖三十八年户部尚书。嘉靖三十九年以振武营卒之变，稽误月粮被劾致仕。隆庆四年(1570)十二月初五日卒。有《石渚集》。

俺答执白莲教主赵全等来献 隆庆四年(1570)十二月初四日，俺答执叛人白莲教主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麟、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等来献。初，赵全与丘富从山西吕明镇学白莲教，事觉，吕明镇被杀。丘富、赵全等俱投俺答，驻古丰州地，屋居田作，汉、夷杂居至数万人，名曰板升。俺答授赵全等为酋长。丘富死，赵全益用事，曾尊

俺答为帝，为治城郭宫殿。赵全等亦各建堡治第，并教彼攻城之术，引之入犯，破城堡，杀吏卒，无岁不至，边境苦之。明廷曾颁通缉赏格，但久之不获。至是，赵全等被送至京，明廷亦遣使送把汉那吉及妻等以归。本月二十二日，隆庆皇帝亲至午门城楼，接受献俘。是日，赵全等被磔于市，传首九边。

徐文辉逝世 徐文辉(1491—1570)，字朝章，号龙潭，江苏宜兴人。尚书徐溥之孙，以荫入太学，後迁上林苑监左丞监领。园田漆林之入，中贵人依势侵夺，文辉治之以法。擢後军都督府经历，又任岷府左长史。隆庆四年(1570)卒，年八十。

李攀龙逝世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一作子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迁顺德府知府，有善政，擢陕西提学副使。家居十年。隆庆初，荐浙江副使，改参政，擢河南按察使。隆庆四年(1570)以母丧归，悲伤过度，不久即卒，年五十七。工于诗，以声调胜，人谓一代宗匠，与谢榛、吴维狱、梁有誉、王世贞称"五子"，又与吴国伦、徐中行称"後七子"。对纠正明中叶"台阁体"萎弱文风及八股文不良影响起了积极作用。著有《诗学诗类》、《唐诗选》、《韵学事类》、《新刻题评名贤词话》、《草堂诗集》、《镌翰林考正四朝七子诗集注解》、《诗册》、《古今诗删》、《沧溟先生集》、《白雪楼诗集》、《白雪集》。

沈越逝世 沈越(1501—1570)，字中甫，南京锦衣卫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罗田令，邑大治。移令平江(今江苏苏州市)，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平江民为之立碑，罗田亦祀于名宦。为御史，持廉秉公，厘奸革弊。嘉靖二十三年以试事忤旨落职。出任开封府判，稍迁卫辉府推官，再迁德安府同知。因不附权贵，竟致归里。隆庆四年(1570)卒，年七十。有《麓村诗草》，《新亭漫稿》等，为明代诗人。

喻时逝世 喻时(1506—1571)，字中甫，号吴皋，河南光州(今光山县)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吴江县令，擢御史，由应天府丞改南京太仆寺卿。迁巡抚福建右佥都御史，改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进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拜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入为兵部左侍郎协理戎政。改南京兵部、户部右侍郎。隆庆五年(1571)正月二十九日逝世，年六十五岁。有《吴皋先生文集》，《海上老人别集》。

何东序致仕 何东序，生卒不详，字崇教，号肖山，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授户部主事，员外郎、出为衢州知府，迁山东副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进右副都御史。隆庆五年(1571)二月初六日，因得罪高拱致仕。有《九愚山房稿》。

王崇古上言封贡互市事 隆庆五年(1571)二月初八日，总督王崇古上疏八事：一、赐封号官职。俺答可赐王号颁印。老把都及吉囊长子吉能，俺答长子黄台吉，应授都督。其子弟如兀慎、打儿汉等四十六部应授指挥。俺答婿十余部各授千户。二、定贡额。岁许一贡，各定马匹及贡使数额。三、酌定贡期贡道。事毕由原道而回。四、立互市。彼以金银革髹等，我以缯绌布帛铁锅等，互市日期为一个月。市场地点在大同左卫之威虏堡。宣府万全右卫之张家口及山西之水泉堡。五、省边费。过去备边之费，岁不下数千两，今可省为抚赏之需。六、拒收降。今後罪夷投降，俱免收纳，华人来归，许验末马住边堡。七、开荒域。今既和好通贡，边境有数年之安，残域可渐，荒田可渐垦。八、修边备。请皇上命九镇将领，乘暇修备，彼知我有备，不敢复叛。穆宗命兵部廷议。兵部请求将王崇古八议刊刻发给廷臣会议，最后请上自裁，穆宗准行。

姚一元致仕 姚一元(1509—1578)，字维贞，自号画溪居士，长兴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行人。选山东道御史，巡山海关，再按陕西。上供绒毡，陕西颇累，每年可省银四万两。命察视京营，查出大帅陈圭吃空额军饷之弊。出任福建按察副使，兼行海防。迁江西、山东布政使。隆庆四年由太仆寺卿转顺天府尹。隆庆五年(1571)二月十二日致仕。家居与同郡诸老结社山湖间，徜徉自快。万历六年(1578)卒，年七十。

古田土官起事平定 古田僮族韦银豹、黄朝猛等起事，险不可拔，抵拒经年。隆庆五年(1571)三月初一日，调思明等处土兵及汉兵共十余万人，由总兵俞大猷统领，直抵其寨，合营并进，起事遂平。诏改古田县为永宁州，设立守御千户所。古田版图分隶常安镇土司、福禄镇土司和桐木镇土司，编立里甲保长，每村立一僮长，俱听里长管束。

郭乾致仕 郭乾(？—1581)，字孟阳，号一泉，北直隶任丘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兵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河南卫辉知府，潞安兵备副使。进山西按察司副使，转浙江右参政，督饷。迁浙江按察使，升江西右布政使，再改陕西左布政使。嘉靖三十八年四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嘉靖三十九年总督三边。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加兵部右侍郎，四月推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往督陕西三边军务。嘉靖四十五年四月进南京兵部尚书，改南京户部尚书。隆庆元年四月入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俺答通贡议起，宣大总督王崇古、首辅高拱、辅臣张居正等力主通贡互市。郭乾与廷议相悖，郁郁而病。隆

庆五年(1571)三月十六日致仕。万历九年(1581)卒。

胡杰逝世　胡杰(1520—1571),字子文,江西丰城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侍读,调广平府通判、升南京太仆寺丞。嘉靖四十四年升国子监司业、左春坊左中允兼编修。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升南京国子监祭酒。隆庆元年入为国子监祭酒,四年升提督黄右通政,南京太常寺卿。隆庆五年(1571)三月二十一日卒,有《剑西藁》。

李春芳致仕　李春芳(1510—1584),字子实,号石麓,江苏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修撰,以撰青词受世宗赏识,超擢翰林学士,迁太常寺少卿,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嘉靖四十四年兼武英殿大学士,参预机务。居政府持论平恕,不事操切。时徐阶为首辅,春芳每事心推阶,阶亦雅重之。隆庆元年徐阶致仕,春芳为首辅,务为安静。为高拱、张居正排挤。隆庆五年(1571)五月十七日,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致仕。万历十二年(1584)卒,年七十五,谥文定。有《卧病江皋》,《新刻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

靳学颜逝世　靳学颜(1514—1571),字子愚,号两城,山东济宁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授南阳府推官,历吉安府,迁左布政使。隆庆初为太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晋工部侍郎。隆庆四年十一月改吏部左侍郎。因与首辅高拱不和,以病乞归。隆庆五年(1571)六月初一日卒,年五十八。有《间存集》,《靳两城先生集》。

礼部议宗藩廪禄　隆庆五年(1571)六月十七日,礼部复奏:国初亲郡王将军四十九位。今玉牒内见存者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岁支禄粮八百七十万石余,其中郡县主君及仪宾尚不在内,较之国初增加数百倍。全国岁供京师四百万石,每年竭国之数不足以供宗室之半。现国家财力既以无措,宗室又苦禄粮不给,公私两困,势不容不变。为今长计,不得不限服制以杀禄给,听自便以开生路,严法制以禁其非,审时酌变为国家经久之图。穆宗允从。

俺答献赵全余党　隆庆五年(1571)六月二十六日,顺义王俺答遣使恰台吉、打儿汉执赵全余党赵宗山、穆教清、张永保、孙大臣及白莲教徒李孟阳等来献。赏予俺答等银采帑,寻令宣大巡按御史磔赵宗山等,传首九边。

陈庆致仕　陈庆(1510—1588),字履旋,号西塘,又号视轩,永丰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行人,嘉靖四十一年任卫辉知府,隆庆元年任广西布政使,改太常寺卿,隆庆五年(1571)七月初三日致仕。万历十六年(1588)卒,年七十九。有《视轩集》。

俺答上表称贡　隆庆五年(1571)七月十二日,俺答上表称贡,赏顺义王俺答及妻,都督同知昆都力哈、黄台吉、指挥使把汉那吉,指挥同知、千、百户等官,永邵卜大成台吉等六十二员,吉能侄切尽黄台吉及来使布喙罗等七十名,各赏纻丝彩段,布帛银帑有差,并发太仆寺银五千两解边酌量予之,以为定例。至八月十四日,吉能要求进马,破例许之,以后与俺答同来入贡。并准于延绥、红山墩、宁夏清水营互市。

高拱奏言边政　隆庆五年(1571)七月十八日,大学士高拱等上言:今俺答称贡,乘此闲暇,培根固本,虽其欲背约,而我岁有岁功,月有月效,十年无事,常胜在我矣,则和可,战可。不然,赍空橐而战,战不可;画空城而守,守不可;抱空约而和,和又孰可?因此请自今每三年遣近臣巡视九边;以八事考核边臣,即积饷、修险、练卒、锻甲、督屯、理盐、养马、招降。从其议。

陈其学致仕　陈其学(1514—1593)号竹庵,别号行庵,登州蓬莱人,鼎子。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行人,选湖广道监察御史,弹纠不避权贵。嘉靖二十七年巡按两淮盐法,嘉靖二十八年升陕西按察司佥事,榆次参议,肃州兵备副使。嘉靖四十年七月由山西按察使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嘉靖四十二年五月升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四十四年四月总督南京粮储。嘉靖四十五年四月升户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先後擒斩敌九百余,招降二千三百余,夺获马牛器械甚众,修墩台二千四百余座,修缮濠墙八十四里有余。招入京协理京营戎政,升南京刑部尚书。隆庆五年(1571)八月初三日致仕。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十日卒,年八十,谥恭靖。

李迁致仕　李迁字子安,江西新建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任工部左侍郎总理河道。隆庆四年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使总督两广军务。隆庆五年五月以平定韦银豹功加右都御史,不久升为南京刑部尚书。隆庆五年(1571)八月初十日引疾致仕。

云南通海卫地震　隆庆五年(1571)八月二十一日未时,云南通海卫(今通海)地震。声如雷吼,倒坏城堞官衙民居千余所,压死数十人,七日方止。曲江(今曲溪县地)至临安地再震,宁州亦震三日,云龙州城北松牧村有古塔,高丈许、围丈许亦坏。震中烈度(I_0)Ⅶ,震级(M)为六级。

蓟镇昌平敌台成　隆庆三年(1569)春,总理蓟、昌、辽、保练兵事务戚继光上任不久,即调配军卒,开始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镇边的筑修墙工程。隆

庆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蓟镇昌平敌台成。工程蜿蜒曲折，巍峨雄壮，最紧要地区数十步、或一百步筑一台；次要地区一百四、五十步，或二百余步筑一台。敌台一般高三、四丈，周围十二丈到十七、八丈。台基用砖与巨石筑成，高与墙平，向边墙外突出一丈四、五尺有余，向边墙内突出五尺有余。敌台分为三层，中层空豁，四面有箭窗，上层建楼橹，环以垛口。两台相应，左右配合，互助支援。每台设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击，台头、台副二名，专管台内军器辎重。每台驻守军三、五十名，常年守御。五台设一把总，十台设一千总，节节制之，官军可以固守无恐。敌军来攻，即登台作战，居高临下，火炮矢石齐发，而敌军矢石不能及，敌骑不敢近。即使敌军大举进犯，或突入边墙，台内驻军亦可据台固守，别台及地面守军可迅速攻击敌军侧翼与背后，使之处处陷入攻击之中，难入难出。每座敌台备有佛郎机八架，子铳七十二门，铁闩二十四根，铁锤八把，铁剪八把，铁锥八件，钥匙八件，圆木座八个，木梃八根合口铅子二千一百六十个，神快枪八杆。合口铅子四百八十个，木马子四百八十个，火箭五十枝，铁顶尖棍八根，锣一面，鼓一面，旗一面，木梆一面，大水缸四口，石炮五十位，河光大石四百块，河光小石四千块，食米十石，锅二口。敌台之间设有烽堠墩，两墩相去一二里，梆鼓相闻。每墩驻军五名。凡遇敌军马所向之处，该墩即举烽火报警，蓟镇昌平边墙延袤曲折二千余里，不出三个时辰即可传遍所有墩台，能迅速做好抗击敌军的各项准备。驻军平时于敌台附近屯种，以解决军食。戚继光在筑台的同时还积极教练士兵，有的《哨守条约》。

游居敬逝世 游居敬（1509—1517），字行简，号可斋，福建南平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选庶吉士。改监察御史，巡视卢沟桥，清理商人匿税。巡按应天。嘉靖十七年为浙江按察佥事。嘉靖二十年擢广东副使。嘉靖三十七年以山东左布政使升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穆宗即位，擢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左侍郎，隆庆五年（1571）二月十二日致仕，同年九月十日卒，年六十三。

禁毁《皇明资治通纪》 《皇明资治通纪》亦题《皇明通纪》，三十四卷，广东东莞陈建编辑，成书于嘉靖三十四年（1525），上起洪武，下至正德，是明代私人编著的当代史巨著，号称直笔，时人推崇备至。隆庆五年（1571）九月二十二日，工科给事中李贵和奏称：我朝列圣实录皆经儒臣奉旨纂修，藏于秘府，陈建以草莽平民越职僭拟，已犯自用自专之罪，况时更二百年，地隔万余里，以一人见闻臧否时贤，荧惑众听，若不早加禁绝，恐将以谬传谬，为国是之累非浅。疏下礼部覆议，请焚毁原版，仍谕史馆毋得采用，穆宗允准。至明末，不少学者对该书加以补订，陈龙可增补为《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补标题评断通纪》二十七卷；高汝栻增订为《皇明通纪法传录》二十八卷；江旭奇补订为《皇明通纪集要》六十卷；沈国元补订为《皇明从信录》四十卷。此前广东只有新会学、增城学，至陈建《皇明通纪》问世，又有东莞学。

苏佑逝世 苏佑（1492—1571），字允吉，号舜泽，更号穀原，山东濮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吴县令，改束鹿令，皆有惠政。迁广东道监察御史，未几出按宣大，平定大同兵变。十六年按山西，江西提学副使。嘉靖二十一年擢山西参政，分理雁门三关，晋大理寺少卿。嘉靖二十四年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均徭赋，省供亿。嘉靖二十六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嘉靖二十八年进刑部侍郎，改兵部侍郎兼都御史总督宣大军务，屡败强寇，进兵部尚书，以兵饷失事削籍。隆庆五年（1571）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八十。苏佑喜为诗，精豪奔放。有《吴子集解》、《三关纪要》、《法家哀集》、《璅言》、《苏督抚集》、《云中事记》、《穀原诗集》、《榖城山馆文集》。

谭纶致仕 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江西宜黄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除南京礼部主事，职方郎中、台州知府。以兵备副使御倭于福清、仙游、同安、漳浦等处。嘉靖四十二年春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嘉靖四十四年冬巡抚陕西。大足县白莲教徒蔡伯起义，连占七城，命纶督抚四川，进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西。隆庆元年，进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军务，召入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协理戎政。会筑敌台工成，以迁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隆庆五年（1571）十月初四日致士。万历五年（1577）四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八，谥襄敏。纶治兵达三十年，战功卓著。有《谭襄敏奏议》。

殷士儋致仕 殷士儋（1522—1582）字正甫，号文通，山东历城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裕王府讲官，迁右赞善，进洗马。隆庆元年擢侍读学士，兼翰林院事，三月升礼部右侍郎，四月改吏部右侍郎。隆庆二年正月拜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隆庆四年正月进太子太保，十一月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逾月晋少保武英殿大学士。首辅高拱恶士儋不亲己，屡加排挤。隆庆五年（1571）十一月十一日致仕，居家以经史自娱。万历十年六月八日卒，年六十一，谥文庄，学者称棠川先生，有《金舆山房稿》。

曹亨致仕 曹亨（1507—1588）字伯贞，河南

新蔡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授刑部主事,有红罗女者以民间宗教聚众至数万人起义,曹亨提兵往剿,以功擢荆南副使,迁浙江参政。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隆庆四年(1570)五月以兵部左侍郎协理戎政,八月升南京工部尚书。因劾织造太监刘安不法,忤旨,罚俸三月。隆庆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致仕。万历十六年(1588)卒,年八十二。

《练兵实纪》成 隆庆五年(1571)戚继光所著《练兵实纪》成,全书九卷,卷一为练伍法,卷二为练胆气,卷三为练耳目,卷四为练手足,卷五、六、七、八为练营阵,卷九为练将。这是戚继光驻守北方边疆数年实际战斗经验的总结,我国军事科学宝库中一份珍品。

归有光逝世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又字开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授长兴知县,调顺德府通判。迁南京太仆寺丞。隆庆五年(1571)卒,年六十六。有光九岁能文,嘉靖十七年中举,八次考进士不中,後移居嘉定,招徒讲学,听讲者常数百人,人称震川先生。当时以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之风盛行,有光与之相反,推崇唐宋散文,提倡自然流畅的文风,对当时文坛及清代桐城派有较深影响。是明代后期著名散文家。有《震川先生集》、《别集》、《归震川先生文集》、《震川先生全稿》、《震川先生尺牍》、《震川先生试论策集》、《三吴水利录》、《续录》。

俺答请颁经文 隆庆六年(1572)正月十九日,顺义王俺答请给金字番经,并请遣派喇嘛僧人传习经咒,总督王崇古以闻,穆宗允准。

京官外调致仕之例的制定 隆庆六年(1572)正月二十八日,吏部奏陈:今後两京官陞迁外任以疾乞休者,俱予致仕,不许病愈起用。有规避者即降级改用,敢违抗不赴者除名闲住。外官称病乞休者,必其事情迫切,始为代请。其奏荐起用病愈官员,须由抚按官考核裁酌,不得徇私滥举。穆宗允准。

攒造白册 隆庆六年(1572)三月初三日,南京湖广道试监察御史陈堂奏:国初,十年大造黄册,凡户口、田赋、事役新旧登耗之数,皆如实登记。沿袭至今,奸吏那移,豪强影射,弊病不可胜数。黄册掌握在里胥手中,任其增减,钱粮完欠,差役轻重,户口消长,皆与事实不符。故今征钱粮,编徭役,有司都以白册为重。凡人丁事产,皆照白册攒造,黄册已成虚文。

潘晟致仕 潘晟,字思明,号水廉,浙江新昌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嘉靖三十四年七月翰林院侍读,主试应天。嘉靖三十五年九月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四十三年二月为南京吏部右侍郎。隆庆四十四年九月礼部左侍郎。隆庆元年(1567)十一月,改吏部左侍郎,署詹事府,兼翰林学士。十二月纂修《玉牒》。四年十一月南京礼部尚书。隆庆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致仕。万历十年(1582)以武英殿大学士召,至中途论罢。

安庆军变 指挥张志学等怨恨安庆知府查志隆。隆庆六年(1572)三月二十四日,乘支饷之机,张志学纵卒四百余人包围知府衙门,欲杀查志隆,士民汹汹,三日稍解。事闻于朝,诏逮查志隆、张志学等下刑部狱。

曹三旸致仕 曹三旸(1516—1589),字子泰,号雪山,江苏宜兴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大理寺丞,出守漳州府、再守济南府。晋湖广副使,督学山东,再历浙江按察使,江西布政使。隆庆四年五月由顺天府尹升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六年正月奏言:云南岁贡黄金二千两,又益三千两,苦不能措,请求每两黄金输银八两,在京师召买,许之。隆庆六年(1572)四月初五日被迫致仕。万历五年(1577)起为南京工部尚书,因忤张居正,再致仕归。万历十七年(1589)卒,年七十四。

颁俺答顺义王印 隆庆六年五月(1572)二十一日,总督王崇古为顺义王俺答请乞四事。一、请给王印。二、许贡使入京。三、请给铁锅。四、请抚赏俺答等各部亲属。同月二十四日,穆宗命颁俺答顺义王镶金银印。

朱载垕逝世 朱载垕(1537—1572),世宗第三子。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封裕王。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皇帝位。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卒,年三十六。七月上尊谥庄皇帝,庙号穆宗。九月,葬昭陵。《明史》评穆宗"躬行俭约","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但"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谈迁评曰:穆宗"宽大如仁庙,而精勤不若也;安豫如宪庙,而控纵不若也。"冯保矫称遗旨。穆宗逝世当日,皇太子传谕太监冯保入司礼监。冯保,深州人,狡黠多智,恶高拱而与张居正相结,至是替代高拱所荐之司礼监陈洪而据其位。穆宗逝世次日,冯保向十岁的丘太子宣谕"遗旨"有云"朕不豫,尔即皇帝位","依阁臣并司礼监辅导"。按此冯保亦为顾命之臣。廷臣以为太监不当委以顾命,且遗旨亦不应由冯保自抢宣谕,故皆惊骇。史称,此乃张居正、冯保秘密所为,首辅高拱不预。

倭犯广东新宁惠来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七日,倭寇犯广东新宁、惠来,陷电白锦囊所城,转入高雷廉琼境,所过焚劫杀掳。官军先後亦有斩获。

提督两广军务左侍郎殷正茂条奏诸臣功罪。电白知县蒋晓、锦囊所千户侯安邦弃城逃遁，命逮讯。

朱翊钧即皇帝位　朱翊钧，穆宗第三子。嘉靖四十二年(1563)八月生，母李贵妃。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穆宗逝世。六月初十日朱翊钧即皇帝位，时年十岁。以明年为万历之年，大赦天下。七月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

高拱条陈新政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三日，首辅高拱条陈新政五事：有关政事裁决，每日令司礼监写于小帖，皇上御门听政时，亲自宣谕。凡章奏尽呈览，览毕送票，票后再呈览，果妥而后发行。事必面奏，情无壅蔽。间奏应由内阁看详奏拟，未经内阁即径自内批者，内阁可予执奏。官民奏本，不可留中不出。其时冯保居中用事，以为高拱所议则阁权重，司礼轻，故内批云：照旧制行。高拱得旨后说道：安有十岁天子而能自裁？冯保篡改其意，谗言于帝：高先生(高拱)说，十岁儿安能决事！神宗大怒，入告皇太后。高拱因此酿祸不可解。

高拱罢官　高拱(1512—1578)，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充裕王讲官，迁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嘉靖四十一年(1562)按礼部左侍郎。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掌詹事府事，进礼部尚书。嘉靖四十五年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与首辅徐阶(相抗，以私怨逐胡应嘉，科道官群起弹劾高拱，遂于隆庆元年(1567)五月二十三日致仕。隆庆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召还内阁，兼掌吏部事。高拱练达政体，有经济才，多所建白，悉付施行。累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但强直自遂，颇快恩怨。神宗即位。被张居正、冯保排陷，于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被罢官闲住。万历六年(1578)卒于家，年六十七。后赠太师，谥文襄。有《高文襄公集》，《掌铨题藁》，《防边纪事》，《伏戎纪事》，《挞虏纪事》，《靖夷纪事》，《绥广纪事》，《病榻遗言》。

高仪逝世　隆庆六年(1572)六月二十三日。高仪(1517—1572)字子象，别号南宇，钱塘(今江苏杭县)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改庶吉士。嘉靖二十三年授编修。嘉靖三十六年升右春坊右中允，署国子监司业事，侍讲学士。陞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嘉靖四十三年升礼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四年转左侍郎，再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寻掌翰林院事。嘉靖四十五年升礼部尚书。为言官所劾，遂以疾乞归。隆庆六年(1572)，由高拱推荐，掌詹事府。同年四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隆庆六月二十三日卒，年五十六。谥文端，有《高文端奏议》。

漕运程限的制定　隆庆六年(1572)六月二十六日，工部尚书朱衡议奏：每岁十月开仓，民输粟。十一月兑完，漕卒受粟。十二月开封发船，二月过淮，三月过洪，四月到张家湾。永为定例。

吏部京察　隆庆六年(1572)六月二十九日，吏部尚书杨博言：隆庆元年奉命考察京官，二年朝觐考察外官，三年遵例考察京官，四年奉命考察言官，五年又朝觐考察外官。是六年五考，划除殆尽。隆庆六年七月初六日，吏部等衙门又进行考察，黜斥吏部员外郎穆文照，都给事中宋之韩、程文等三十二员；吏部主事许孚远，御史李纯等五十三员，降调外任。光禄寺寺丞张齐等二员闲住，尚宝司卿成钟声调外任，司丞陈懿德闲住。经过此次考察，京师各衙中高拱之党略尽。

刘自强致仕　刘自强(1508—1582)，字体乾，河南扶沟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广平府推官，吏部考功主事，迁太仆寺少卿，补陕西参议。累迁山西副使、陕西参政、按察使、湖广右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抚四川。以功拜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隆庆二年(1568)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四年入为刑部尚书。隆庆六年(1572)七月初七日致仕。万历十年(1582)正月十三日卒，年七十五。

胡松逝世　胡松(1490—1572)，字茂卿，号承庵，安徽绩溪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嘉兴府推官，江西道监御史，升福建按察佥事、河南按察副使，云南参政，贵州按察使，升户部右侍郎、提督太仓，拜工部尚书。伊王欲扩大洛阳私邸，以重金贿赂严嵩，胡松止之。隆庆六年(1572)七月二十七日卒，年八十三。

吏部条陈封赠事宜　隆庆六年(1572)八月初五日，吏部条陈封赠事宜：凡祖父官高于子孙者，得进散官一阶。凡丁忧养病给假官封赠与见任同。凡祖父有削籍者，许令陈情，量准祖父冠带闲住。外官升京秩者许照见职改给，但外任不得引例。

裁并户部文册　隆庆六年(1572)八月二十三日，户部尚书王国光上言：户部金谷之司，尤极冗琐，征派愈烦，奸伪愈滥，以致册籍愈密，其实大同小异．而造册之费甚巨，且又束之高阁，未曾过目。今内阁题造格眼文簿，稽查完欠，简要可守，余归并裁省。从其议。共归并文册二十二，裁省文册二十八，人称其便。

诏修《穆宗实录》　隆庆六年(1572)九月二十

二日，大学士张居正请修《穆宗实录》，神宗允准，命成国公朱希忠为监修官，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为总裁官，侍读学士王希烈、丁士美，吏部侍郎汪镗、礼部侍郎申时行、詹事王锡爵等为副总裁官，谕德陈经邦、何雒文，修撰赵志皋等为纂修官。二十八日开馆，至万历二年(1574)七月修成表进，共七十卷。监修官、总裁官、副总裁官、纂修官升赏有差。

海运漕米 隆庆六年(1572)十月五日户部复议：万世之利在河，一时之急在海。海道叵测，只宜皆此路以备。自万历元年始，只海运十二万石为则。

七苑牧地 隆庆六年(1572)十一月一日，巡抚陕西御史肖廪奏报，勘查七苑牧地共五万五千三百二十二顷，除现牧马八千七百七十匹给地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一顷外，余共征银一万八千二百二十两。往例，每三年巡茶御史同总督抚按查核。报可。

沐朝弼废为民 沐朝弼，定远人。代兄朝辅镇守云南，朝辅子融、巩相继卒，朝弼得嗣沐国公，仍镇守云南。隆庆六年(1572)十一月二十四日，因罪逮至京师，论死。张居正谓其始祖三世皆有大功，请宥之。命发南京为民，卒。

陕西岷州地震 隆庆六年(1572)十二月初七日，陕西岷州(今甘肃岷县)地震，城墙楼台官民房屋十倒八九，压死人畜不计其数。巩昌府同日亦震，经十余日渐止。震中烈度(I_0)Ⅷ—Ⅸ。震级(M)为六点七五级。

张居正进《帝鉴图说》 隆庆六年(1572)十二月十七日，大学士张居正率讲官进《帝鉴图说》。该书乃张居正属讲官马自强等考究历代事，选择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名为《帝鉴图说》。

议王守仁从祀孔庙 隆庆六年(1572)十二月十九日，礼科都给事中宗弘暹请会议王守仁从祀孔庙。从之。

张居正请开经筵 隆庆六年(1572)十二月二十二日，张居正请于明年正月上旬，经筵即开始讲授。又因先帝丧期，请勿设宴，并免元夕灯火。皇上答曰：灯已令停，每侍圣母膳，甚简素，或节日具少量果宴，不设乐。张居正称善。又谕光禄寺，节日期间酒饭酌免之，省七百余金。

诸大绶逝世 诸大绶(1523—1573)，字端甫，号南明，浙江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第一。历官翰林院修撰、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礼部侍郎。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三日卒，年五十一。赠礼部尚书，谥文懿。有《诸文懿公集》。

秦鸣雷致仕 秦鸣雷(1518—1593)，字子豫，号华峰，浙江临海县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历侍读学士、南京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隆庆五年(1571)任南京礼部尚书。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八日，兵科给事中赵思诚上疏弹劾秦鸣雷"只知嗜酒、不顾廉节"，疏下吏部，遂令其致仕。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卒，年七十六。有《谈岙》、《倚云楼稿》。

王大臣之狱起 王大臣，又名章龙，浙江佣奴，曾入戚继光军营为兵，后浮荡流落北京。为人巧捷，善机变，伪着内侍服，与宫中小太监相亲近，窃其牌帽巾服，于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九日闯入乾清宫，为门者所执。案发，神宗令东厂究问。司礼太监冯保欲借此进一步置原内阁首辅高拱于死地，指使他的家奴辛儒给王大臣衣食刀剑，教王大臣编造谎言，说："高拱被罢而怨，与太监陈洪谋大逆。"同时派吏役逮捕高拱的仆人，包围高拱住宅，内阁首辅张居正与冯保相勾结，为构陷高拱，亦请追究王大臣的主谋。为此，"举朝汹汹"。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力请张居正解高拱之危。张居正不得已奏缓其事。杨博暗中嘱咐锦衣卫命王大臣吐露实情。锦衣卫都督朱希孝又将高拱的仆人杂于人群之中，让王大臣识别，王大臣"茫然莫辨"。神宗命加刑于王大臣，王大臣疾呼："许我富贵乃严刑拷打我？我何识得高拱？都是冯保的家奴教给我的！"冯保见阴谋暴露，十分恐惧，遂以生漆酒致王大臣变哑失声，移送法司，于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坐斩，高拱获免。自是廷臣多怨恨冯保，而那些极力为冯保效劳的人则加官晋爵。

诏增供用库黄白蜡 万历元年(1573)三月初三日，神宗令增供用库黄蜡，每年二万五千斤，白蜡三万五千八百一十六斤，所费俱由太仓银出。廷臣以"岁用不敷"，上疏请止，神宗不从。

何栋逝世 何栋(1490—1573)，字伯直，又字子宇，号太华，陕西长安县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初授御史，后官至总督蓟辽军务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性好学，善应变。万历元年(1573)三月十一日卒，年八十四，有《太华集》。

诏举将才 首辅张居正，留心军务，讲求富国强兵。他对神宗皇帝说"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升平日久，武备废弛，员弁受文吏箝制。今后将帅忠勇可任者，宜给以事权，使其得以施展才能"。神宗纳其言，于万历元年(1573)三月十六日下诏在京四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总督、镇、巡等官，各举将才，以备任使。若所举之人立功或坏事，则赏罚"坐连举主"。

戚继光擒获董长秃 万历元年(1573)春，兀

良哈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等率部犯边，驻喜峰口，索赏不得，遂大肆杀掠，蓟镇总兵官戚继光督兵将其击退。至年底，董狐狸又令其弟董长秃再犯边境，被戚继光俘获。董狐狸率部长亲族三百人叩关请罪，请释放长秃。戚继光及总督刘应节决定遣将受降。董狐狸献还被掠边民，戚继光乃释放董长秃，许通贡如故。终戚继光在镇，兀良哈朵颜等部，"不敢犯蓟门"。

罢海运漕粮 万历元年(1573)六月，海运漕粮十二万石，至山东即墨县福岛，忽遇飓风雨大作，覆漕船七艘。失米近五千石，溺死运军十五人。为此，户科给事中贾三近、巡仓御史鲍希颜、山东抚按傅希挚、俞一贯等人俱上疏言海运不便，不如河运可靠，请暂停海运，原海运漕粮十二万石尽入河运。疏下户部议处，于同年八月初六日停止海运。

曹邦辅致仕 曹邦辅(1503—1575)，字子忠，号东村，山东定陶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元城、南和知县，升御史。嘉靖三十四年授为右都御史，巡抚应天。坐事谪戍山西朔州。隆庆元年(1567)，起为左副都御史，进兵部右侍郎。继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上书言整饬边事，宜急练兵。后以左都御史召入北京，协理京营戎政。不久改任南京户部尚书。万历元年(1573)八月二十五日致仕。三年逝世，年七十三，赠太子少保，谥忠烈。

四川都掌土酋起事失败 自隆庆以来，四川都掌土酋阿大、阿二、方三等人，在叙州府兴文县东南的九丝山上称王起事，四出攻打远近州县。为此，四川巡抚曾省吾奉命遣总兵官刘显偕将郭成、安大朝统领官军及四川土司兵计十四万人进行镇压。经过一个月的战斗，至万历元年(1573)九月初九日将阿大、阿二、方三等大小头目三十六人活捉，攻克六十余寨，俘斩部众四千六百人。起事失败。

杨博致仕 杨博(1509—1574)，字惟约，号虞坡，山西蒲州(在今山西运城地区)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官知县、兵部武库主事、职方郎中，二十五年超升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募民垦田，大兴水利。进右副都御史。再召为兵部右侍郎，改本部左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严饬武备。嘉靖三十三年，击败把都儿及打来孙，以功进右都御史，又升兵部尚书。已而改为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嘉靖四十二年入援京师，改吏部尚书。隆庆初年，以吏部尚书理兵部事。万历元年(1573)九月十一日致仕。明年十月卒，年六十六，赠太傅，谥襄毅。

董传策罢官 董传策，生卒年不详，字原汉，号幼海，南直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刑部主事。嘉靖三十七年，上疏劾大学士严嵩积恶误国六大罪，请世宗除严氏父子，以谢天下。疏呈上，世宗非但不听，反而将他送入监狱。后谪戍南宁。隆庆改元，董传策官复原职。隆庆五年(1571)改南京大理卿，进南京工部右侍郎。万历元年(1573)改南京礼部右侍郎。同年九月二十一日以言官劾其受人贿赂，遂被罢。有《奏疏辑略》、《采薇集》、《幽贞集》、《奇游漫记》等。

朱希忠逝世 朱希忠(1516—1573)，为永乐朝成国公朱能玄孙，字贞卿，南直隶怀远县(今安徽怀远)人，嘉靖十五年(1536)袭爵成国公。朱希忠性机敏，善结纳，名在诸勋贵之上。历掌五军都督府后、右两府，总神机营，提督十二团营及五军营，岁禄七百石。历事三朝，先后六十六次代表皇帝出城祭天地。赏赐不可胜纪。万历元年(1573)九月三十日卒，年五十八，十月追封定襄王，谥恭靖。十年，以余懋学言其非例，追夺王爵。

赵孔昭致仕 赵孔昭、生卒年不详，字子潜，号玉泉，北直隶邢台县(今河北邢台)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知县、御史，出按浙江。万历时官至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万历元年(1573)十月初一日致仕。赵孔昭持身守正，为官清廉，性刚毅，不屈权贵。死时年六十五。

张居正与神宗论贵五谷结民心 万历元年(1573)十月初八日，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文华殿为神宗讲解《帝鉴图说》。当张居正讲到宋仁宗不喜珠饰时，神宗说"贤臣为宝，珠玉有何益"。张居正说：历代明君都是贵五谷而贱珠玉，《书》称，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神宗说极是。宫人好妆饰打扮，我要她们注意节省"。张居正说：皇上能这样爱惜财物，这是国家和百姓的幸福。神宗又说：秦始皇解除兵器，而人持木棍还是能伤人的。张居正说：人君以布德修政，施仁义，结民心为本，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神宗以为然。

工部核昭陵工费 万历元年(1573)十月二十一日，神宗令工部核昭陵之费。工部臣奏：隆庆皇帝昭陵所费，除木、石不计外，共用银三十九万零九百三十二两。另据同年十二月初十日巡视厂库工科给事中梁式等奏，昭陵所费钱粮数如下：工部四司共用银五十万一千零五十余两，其中营缮司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二余两、虞衡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五余两、都水十一万八千八百五十四余两、屯田十六万四千六百二十八余两。除户、兵二部银十一万零一百一十九两，工部实用银三十九万零九百三十二余两。

户部奏密云昌平二镇漕粮数 万历元年

(1573)十月二十二日，户部奏密云、昌平二镇漕运未尽事宜，凡七款，有议转输，议寄囤，议粮船，议河道，议边运、议领运。其新旧漕粮数：密云为十五万四千八百一十点八石，昌平为十八万九千二百七十二点五石，专备各镇主客本色支用。

张居正改革 嘉隆以来，军政败坏，财政破产，民不聊生，危机严重。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之后，讲求富国强兵，除旧布新，振纲剔弊，在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建立章奏考成法，澄肃吏治，提高各衙门办事效能。万历六年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抑制权豪富户隐占田土，使全国纳税的土地从过去的四百多万顷上升为七百多万顷，增加了国家的田赋收入。万历九年，在全国广泛推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按亩征银，这是中国赋役制度上一次重大的变革。同时，裁驿站；去冗员，节省财政开支。用潘季驯等人治水，减轻黄河水患。在军事上，用名将戚继光守卫边境，巩固边防。在民族关系上，主张各族人民友好相处，先后用王崇古、方逢时与蒙古互开贡市，解除北部边患。经过张居正十年的努力，这些改革措施多数颇得实效。"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天下宴然"。

张居正立章奏考成法 张居正为"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齐号令，"凡事务实，勿事虚文"，于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十八日奏陈：近年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复无虚日。然而，章奏虽勤，但多敷衍了事，实效甚少。请自今之后，章奏随事考成，一切以事之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凡部、院遇各章奏，或奉旨，或钦依，转行各衙门，俱先酌量道路远近和事之急缓，定期登入文簿，每月终注销。其转行复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等项，另造二册，各注略节及原限，一送六科注销，一送内阁查考。各抚、按奉行事理，有迟误者，该部、院举之；各部院注销有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缴奏有容隐欺蔽者，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则名必中实，事可责成。神宗从其请。张居正建立章奏考成法的目的，是为了整饬吏治，"以为制治之本"。自考成法行，办事效率大为提高，"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焉。要详兼举，张弛共贯"，政体肃然。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四年正月，阁臣申时行等人以为："考成之法，不过催征钱粮、捕获贼犯、提问官员三事而已"。人去事改，考成法的作用渐减。

陆树声致仕 陆树声(1509—1605)，本姓林，后改姓陆，字与吉，号平泉，南直隶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人，嘉靖二十年(1541)举进士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掌南京祭酒时，严整学规，立条教十二以励诸生。神宗即位，于家授为礼部尚书，疏请循旧章、防雍蔽、纳忠言、崇俭德、亲理政、别忠邪。万历元年(1573)宦官有意激其去官，陆树声疏请归里，同年十二月初八日致仕。陆树声刚介廉洁，遇事敢争。通籍六十余年，而实际在官之日极少。万历三十三年去世，年九十七，谥文定。有《平泉题跋》、《长水日记》、《陆学士杂著》、《陆文定公集》等。

刘采逝世 刘采(1500—1573)，字汝质，号安峰，湖广麻城县(今湖北麻城)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知宿州，恩威并著，进户部员外郎、郎中，升四川参议。越五载，改广西按察副使、云南左参政、广东按察使、广东左、右布政，晋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请罢采矿。过三年，进南京兵部右侍郎，擢户部尚书致仕。隆庆元年(1567)，起官南京工部尚书，未任改为吏部尚书。再迁为南京兵部尚书，参与机务。万历元年(1573)致仕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少保，谥端简。

神宗召见廉能官 万历二年(1574)正月十二日，内阁首辅张居正上疏请神宗召见廉能官。他说：太祖时，每遇外官来京奏事，常召见赐食，访问民间疾苦。虽县丞、典史，有廉能爱民者，亦特差行人奖赏之。迨宣德、成化、弘治年间，仍常举行宴赏之典，天下太平实由于此。今值考察之初，宜令礼部仿照旧典，教习他们仪礼。神宗接受张居正的建议，于正月十八日在皇极门按照明朝的仪式，召见浙江左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人，面加奖励，并赐银币酒馔。正月二十三日升谢鹏举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

户部请改粟米输京仓 万历二年(1574)二月初八日，户部以京仓粟少，不敷一月支放，而通州仓粟米多，约可支五年，请将万历二年、三年粟米尽改输京仓。神宗允准。

陶大临逝世 陶大临(1527—1573)，字虞臣，号念斋，浙江会稽县(今浙江绍兴)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翰林院编修、侍读、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掌院事、南京国子监祭酒、少詹事、礼部右侍郎。嘉靖时，吴时来弹劾权相严嵩，陶大临为他定草疏。吴时来被捕下狱，追究主谋，陶大临不顾个人安危，每日至狱中为他送药物。万历初，累官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神宗以讲读效劳，赐钞、布、米等物。万历二年(1574)三月二十五日卒于官，年四十八，赠吏部尚书，谥文僖。律己严而待人宽，正直廉洁，不为势利所动。

石应岳请开藩禁 万历二年(1574)三月二十七日，礼科给事中石应岳上疏请开放藩禁，他说：宗藩开支日增，禄米难以满足。郡王以上犹得厚给，将

军、中尉多不能自存。已有封爵的尚且如此,没有封的困苦不难得知。请以不系赐名授爵者,尽予放开限制,准从士农工商四民之业。其中,有文学才能的,准予参加科举入仕,但不许任京官、握兵权。不然,公无以为给,私无以为养,有伤国体。神宗将此疏下礼部议处。

户部发银修大同边墙 大同,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万历二年(1574)四月初二日,户部发太仓银二十六万二千六百六十八余两修大同边墙,分作五年支给,每年发五万两,最后一年发六万二千六百六十八余两。神宗从之。

万恭罢官 万恭(1515—1591),字肃卿,号两溪,江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官南京文选主事、考功郎中、大理寺少卿。嘉靖四十二年为兵部右侍郎,疏请选兵、议将、练兵车、火器诸事,世宗照准。后命兼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在晋期间,御寇守边,教民耕种及水车之法。隆庆六年(1572),与工部尚书朱衡总理河道,筑长堤三百七十里,仅费银三万两,六十天而工成。又浚高、宝诸河,河患以息。万恭"强毅敏达,一时称才臣"。治水三年,成绩尤著,而工科给事中吴文佳、南京湖广道御史陈堂等竟"劾其不职",万历二年(1574)四月初九日罢官,"回籍听用"。万历十九年卒,年七十七。(一说万历十六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卒)。

尹台致仕 尹台(1506—1579),字崇基,号洞山,江西永新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时严嵩以同乡之故,对尹台颇有好感,欲与他结为姻亲。尹台为人耿直,予以拒绝。遂被外调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临行之前,尹台告诉严嵩:请皇上勿杀直言敢谏的杨继盛。严嵩不听。后尹台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万历二年(1574)四月初十日致仕。万历七年卒,年七十四。有《洞丽堂集》、《思补轩稿》。

诏内外官行久任法 吏科左给事中张楚城曾奏陈:今后知县必历俸六年上下,乃许升取知府。知州必历俸六年上下,乃许升迁。间有才不宜于官,或官不宜于地者,听抚,按查实,量行更易。其藩(布政)、臬(按察)二司参政升布政使,参议升参政,副使升按察使,佥事升副使,皆约以三年左右为限;在内科、道、部属大约六年上下升取司、寺,参政、副使,三年上下升取参议、佥事、知府。疏下吏部集议,内阁首辅张居正以为张楚城的建议甚好,万历二年(1574)四月二十二日,诏令一体遵行。由是,藩、臬、守、令皆得自展才能。

朱衡致仕 朱衡(1512—1584),字士南,又字惟平,号镇山、江西万安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知县、刑部主事、福建提学副使、山东布政使、山东巡抚,所至皆有成绩。嘉靖四十四年进为南京刑部尚书。同年秋天,改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朱衡主张开新河,身体力行,亲督河工。隆庆朝,朱衡先后任工部尚书。多次奏减江南织造,裁抑浮费。万历二年(1574)五月二十日,致仕。万历十二年卒,年七十三。有《道南源委录》等。

华察逝世 华察(1497—1574),字子潜,号鸿山,南直隶无锡县(今江苏无锡)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历兵部郎中、翰林院修撰,曾出使朝鲜。后官至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性刚直,有文学,精于诗。万历二年(1574)五月二十七日逝世,年七十八。所著有《岩居稿》、《翰苑稿》、《皇华集》等。

刘体乾致仕 刘体乾(?—1576),字子元,号清癯,北直隶东安县(在今河北天津地区)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行人、兵科给事中、户部尚书。留心国计,屡次疏请革冗员、冗费,爱惜民力,反对增赋。隆庆中,内供所费无算,数下诏征取太仓银,刘体乾以国计绌乏,亟力疏争,积怨于穆宗,竟被削职夺官。神宗即位,起刘体乾为南京兵部尚书,遂奏言:"留都根本重地,故额军九万,马五千余匹。今军止二万二千,马仅及半,单弱足虑。宜选诸卫余丁,随伍操练,发贮库草场银买马。"又上防守四事。朝廷允从。万历二年(1574)六月二十一日致仕,万历四年五月初四日卒,赠太子少保。

明军大败王杲 万历二年(1574)十月,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大举入侵。辽东巡抚张学颜、总兵官李成梁命将分布要塞,从四面出兵围攻。王杲兵败,部众皆逃奔入王杲所居营寨。寨在高地,形势险要,易守难攻,王杲深沟坚垒以自固。李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数栅。把总于志文等将领督兵冒死登高猛攻,王杲不能支,逃至高台,射杀于志文。此时适遇起大风,明军遂纵火焚烧王杲军营,先后斩杀一千一百余人,毁其营垒。王杲被创,溃不成军,走匿阿哈纳寨。明军乘胜前进,遣精骑出击,王杲败退至南关,为都督,土酋王台抓获以献明军。捷闻,进李成梁左都督、予世荫。进张学颜兵部侍郎。万历三年七月王杲被俘至京,八月二十九日神宗御午门楼,举行献俘仪式,处斩王杲。

山西及淮扬徐等处水旱成灾 万历二年(1574)秋,山西应州、朔州、山阴、马邑、大同等县及安东、中屯、山阴、阴和、高山等卫各以灾报。南直隶高邮州以东两淮所辖吕四等场大旱之后,又发生狂风暴雨,河海并溢,庐舍倾圮万余区,溺死居民一千六百余人、家畜无数,仓库盐场漂荡无存,百姓流离

失所，饥馑无食。徐州、扬州等大雨为灾，海啸河溢。同年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下诏减免山西及淮、扬等处田租，赈济灾民。

李棠致仕 李棠，生卒年不详，字石塘，湖广长沙县(今湖南长沙)人，隆庆朝进士。由吏部郎中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督兵讨平韶州山民起义。终南京吏部右侍郎。万历二年(1574)十一月十七日致仕。李棠廉洁耿直，死谥恭懿。

张居正进呈职官书屏 万历二年(1574)十二月十二日，内阁首辅张居正等仿照前人做法，进职官书屏。疏言：安民之要，在于知人；辩论官材，必考其素。君主尊居九重，坐运四方，如果连臣下的姓名、籍贯都不知道，又怎能一一别其才之贤否而定其升降废罢？朝宁之间，如果百司庶府尚不能认识，又何以能光照千里之外的四方郡国？臣等思所以推广德意、开发圣聪，谨嘱吏部尚书张瀚、兵部尚书谭纶备查两京及内外文武职官，府部以下、知府以上的姓名、籍贯、出身资格，造屏一座。中三扇绘全国疆域图，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各为浮帖，以便更换。每十日该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臣等令中书官写换一遍。此屏即张设于文华殿后皇上讲读进字之所请，以便朝夕省览。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臣等日侍左右，皇上即可询问，细加商榷。臣等若有所，亦得面尽其言，一指顾问。而四方道里险易，职务繁简，官吏贤否，举莫逃于皇上明鉴。次日，神宗降旨，张居正等奏进职官书屏，欲周览舆图、审察众职，俱见其忠。并诏书屏设于文华殿后，以便省览。

倭寇犯浙江、广东 万历二年(1574)，倭寇先后进犯浙江东部宁波、绍兴、台州、温州四府。同年冬天，又相继攻陷广东铜鼓卫等处(今海南省文昌以东沿海地区)，明军总兵官张元勋统兵还击，俘斩八百余人。

柯维骐逝世 柯维骐(1497—1574)，字奇纯，福建莆田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赴，即引病归家。自是闭门谢客，专心读书，教授生徒。久之，门人日众，至四百余人。柯维骐训生徒务求实，讲实用。潜心研究宋、辽、金三史，历时二十载著成《宋史新编》。又有《史记考要》、《续莆阳文献志》等书，并刊行于世。隆庆初年，廷臣复荐之，有司以其年老，但授承德郎致仕。万历二年(1574)卒，年七十八。

神宗第一次亲享太庙 神宗自隆庆六年(1572)六月初十日即位两年多来，一直都是遣官代祭列祖列宗。至万历三年(1575)正月初七日，他十三岁时才第一次亲享太庙。自此以后至逝世为止，他亦很少亲享太庙。

辽东六堡筑成 辽东，为明代九边重镇之首，京师屏障。万历三年(1575)正月，辽东孤山、险山、沿江、新安等六堡相继筑成，并派孤山、险山二参将镇守。六堡成，拓地凡七、八百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抚顺东南)以南，皆受控制。

造京营战车 万历三年(1575)二月十二日，兵部复总督京营戎政、彰武伯杨炳议置造战车一千一百四十辆。中合火器兵仗。库内有者，照数给发；无者，估造以备操练。

诏南京各部"官不必备" 万历三年(1575)二月十二日，以南京吏部右侍郎翁大立改任刑部左侍郎，神宗为此谕吏部："南京职务清简，官不必备。先朝有一人兼掌六部者，以后南京员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对此，时人评论不一。

起居注的复设 万历三年(1575)二月二十七日，大学士张居正得编修张位复设起居注事章奏，遂上言："开国之初设起居注官，每日在皇上左右伺候，记录其言论活动，实为古代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制。及后定官制，始设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盖以记载之事重要，故详加设官，原非有所罢废。值自职名更改之后，遂失朝夕记注之规，以致历朝以来，史文缺略。近来纂修《实录》，臣等为总裁，凡所编辑，不过总集诸司章奏，稍加删改润色，剪裁成编。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具载者，即有见闻，亦无一增入。对于海内流传的稗官野史之书，欲于采录，又恐失真。所以大经大法，实多所未备。凡此皆由史臣之职废而不讲所致。今宜申明史职，以复旧制，令日讲官一人按日轮班，专记注皇上起居，兼记录谕旨、诏敕、册文等项以及内阁题稿。而凡朝廷政事见于诸司章奏者，则另选六名年深学优的史官，专管纂修。事分六科，以吏、户、礼、兵、刑、工为序，每人专纂一科。一律在朝供职，不得别有差派或者托故请假，致妨公务。凡遇常朝，记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后，靠近皇上，以便观听，即古螭头载笔之意。"神宗允准，起居注得以复设。

神宗作牙牌自警 万历三年(1575)四月初五日，神宗有感于日食之变，在宫中作牙牌子，书十二事于其上。其所书十二事为："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神宗将所书十二事悬于座右以自警，并于同日告知内阁阁臣张居正和吕调阳。张居正遂上疏说：皇上所言十二事，虽因天变

自警，其实全系修身治天下之道，可以终身行之。他还逐句发明其义，说：知之非难，难在于行。自今皇上所行与所书有不一致者，允许左右持牌以谏。神宗嘉纳其言。

张居正请严格选派督学官 万历三年(1575)五月初二日，内阁首辅张居正疏请吏部严格选派督学官，他说：养士之本在于学校，敦尚教化在于督学之臣。应该像祖宗朝那样，非明经行修端厚方正之士，决不能授为督学之臣。督学所至，务兴教化，不得天天坐在都城之中，发空议论，沽名钓誉，必须时常遍历郡邑，兴廉举孝，视察学官、博士、弟子之贤否而进之或黜罢之。务在敦本尚实，不得群聚结党，随便议论。凡有讥讽时政，造谣诽谤，敢行称乱者，令有司论如法。神宗以为张居正"所奏俱深切时弊"，敕着实遵行。

杨言疏献六策 万历三年(1575)五月十四日，吏科给事中杨言上六事：一、官吏就近迁改以免旷废；二、教官久任教职以育人才；三、清理军屯以足兵食；四、均平里甲徭役以苏民困；五、严革诈伪以清驿递；六、禁止迎谒官员以息奔竞之劳。

廷臣不入朝视事 万历三年(1575)五月十六日，神宗临朝，而群臣不至者多达二百八十三人，各罚月俸。

南直、浙江等处水灾 万历三年(1575)夏，南直隶和浙江等地相继发生洪水。四月徐、淮大水。五月，淮安、扬州诸处又发生水灾。六月初一日，浙江杭州、嘉兴、宁波、绍兴四府，大风海溢，涌高数丈。人畜淹没、庐舍倒塌无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诸府亦大小水灾。为此，各地抚、按官纷纷上疏请求减免田租、救济灾民。户部令抚、按官选派贤能官吏，从公调查，分别轻重，以便酌情处理。又说：淮、扬等处减租救济所费钱粮，总计应征并已发出的已达银五六十万两。国家经制，各有正项，非专一方，虽缓急之势当知，而无已之求难继。而且救荒无奇策，求其策之善者，全赖有司首先选派不扰民的廉能官督治地方，其次是根据实际情况就地设法解决困难。如果单纯依靠国家救济，不仅不能及时解决困难，而且以国家之大，国家财力亦难以满足。神宗因之下诏罢免各地贪酷成性及年老有病的官员。

葛守礼致仕 葛守礼(1505—1578)，字契立，号契川，山东德平县(今山东德州地区)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彰德推官、兵部主事、礼部郎中、河南提学副使、山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兼河南巡抚、户部侍郎、吏部左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被勒致仕。隆庆元年(1567)再起为户部尚书，上疏奏定国计簿式，颁行天下，夙弊由是以清。时大学士高拱排挤徐阶，葛守礼无所偏，出面调停。及高拱再次为内阁首辅，起葛守礼为刑部尚书。后迁左都御史。时张居正欲借王大臣入宫事兴大狱，倾害高拱，守礼又力劝张居正，解高拱之危。葛守礼在朝四十余年，"正色独立，人以为难"。万历三年(1575)六月初八日加太子少保致仕。万历六年二月初一日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谥端肃。有《端肃公集》。

王之诰致仕 王之诰，生卒年不详，字告若，湖广石首县(今湖北石首)人。由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江西吉水知县，历户部主事、兵部员外郎、河南佥事、河南参议、大同兵备副使、山西右参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大兴屯田，每营垦田一百五十顷，役军四百人。召为兵部右侍郎。不久，以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隆庆元年(1567)进右都御史。隆庆二年，以病辞职。三年起督京营，进右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以战功升南京兵部尚书。神宗即位，授刑部尚书。万历三年(1575)三月告假送母归家，逾时不还。同年九月初六日，致仕。卒赠太子太保，谥端襄。

崔敏奏急缺缎匹 万历三年(1575)九月初七日，内承运库太监崔敏奏急缺缎匹。工部议复行应天等处抚、按官动支无碍官银，令有司织造九万七千九百余匹。于是南京湖广等道御史陈瑄等人上疏说：天地生财有数，不在官则在民，未有无碍官银之说。无碍之说，起于贪墨之吏搜括公款以充之。搜括必加渔猎，渔猎必加科派，科派必加箠楚，此岂陛下所乐闻？以每匹估价银十二两，应天一府计十二万两，则各处该银一百二十三万两。臣等以为与其科派无辜的百姓，不如取之逋税的顽民。查浙江、苏州等处拖欠应进金花银共计一百六十万余两。又查各抚、按赃罚银有二、三年全不解部的。除二分备赈，四分济边，四分系工部额数。此固户部数所本无，又系工部所自出者。至于金花银两，以皇上所用之岁银，供皇上所用之缎匹，不必解部，通融织造，可无议及加派。神宗传旨：缎匹以备供用、赏赐，必不可缺。令陆续解运入库。又说：当时解进的多"粗糙不堪，不值原价三分之一，目不分轻重，一例重估，其中必有冒破情弊"。

万士和致仕 万士和(1516—1586)，字思节，号履庵，南直隶宜兴县(今江苏宜兴)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历任礼部主事、江西佥事、贵州提学副使、湖广参政、江西按察使、山东按察使、广东左布政使、应天府尹、右副都御史等。隆庆初，进户部右侍郎，总督总场。后改礼部左侍郎，以病归里。神宗即位，起为南京礼部侍郎。万历元年(1573)为礼部尚

书。疏论崇俭数事，又奏请杜倖门、容直臣、汰冗员、抑干请，多犯时忌。万历三年(1575)九月二十三日，万士和致仕。张居正死，起万士和为南京礼部尚书，拒不赴。万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七十一，赠太子少保，谥文恭。有《履庵集》。

林凤在吕宋称王 林凤，广东潮安人，系海上武装集团首领，活动于闽、台、粤沿海地区，多次与官军作战。万历二年(1574)率船六十余艘，水陆军数千人，从澎湖出发航行到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地区)。时吕宋为西班牙殖民者所占领，当地居民深受其害。林凤督兵与西班牙殖民者进行斗争，于万历三年九月，攻克吕宋，自称国王。后因寡不敌众，遂离开吕宋，退过澎湖，遭到官军袭击，仅剩船四十余艘，突围赴潮州。

邹应龙罢归 邹应龙，生卒年不详，字云卿，陕西长安县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授行人，升御史。时权相严嵩父子擅政祸国已久，渐失世宗皇帝欢心。邹应龙上疏请逐严嵩，"以清政本"。世宗得疏，勒严嵩致仕，逮严世蕃下狱。邹应龙由此名重一时，晋为通政司参议。隆庆间，邹应龙以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万历三年(1575)初京察时，邹应龙明知为东厂太监冯保所恨，自陈致仕。又因邹应龙巡抚云南时，省内临安地方依兵屡次起事，两败官军，人多归罪于邹应龙用将非人所致，不断上疏劾其败坏地方，损伤朝廷威望。万历三年十月初四日罢归，卒于家。

绰哈之役 万历三年(1575)冬，泰宁部长绰哈，联合土默特各部，率骑兵二万余众，从平南堡南掠，辽东总兵官李成梁遣将驰击。绰哈等转掠沈阳，见城外列营，乃占据西北高地，李成梁发火器攻之。绰哈大溃，弃辎重逃走，明军追至河沟，乘胜渡河，斩绰哈部数千计。史称"绰哈之役"。捷闻，加李成梁太子太保。

甘肃兵变 甘肃镇军饷按规定间给本色(米谷)和折色(银)。万历三年(1575)冬，当供给折色。当时兵备副使邹廷龙以银两缺少为由，尽给本色。伍长石明要求给银而不可得，遂鼓动士兵三百余人，放火焚烧官署，谩骂邹廷龙。邹廷龙被迫全数给银。甘肃巡抚侯东莱将石明等六人逮捕入狱，余者不问，邹廷龙调往陕西。后，石明等人以罪论死。

广东肇庆罗旁瑶民起义 罗旁，在肇庆府德庆州西江(郁水)与南江(泷水)、封川县东的东山与罗定州东安县西南的西山之间，延袤七百里。自明中叶以来，当地瑶民不断发动起义，官府每年发兵镇压。至万历初年，再次起义。万历三年(1575)十二月初九日，提督两广军务殷正茂请集大军前往镇压，得到明神宗的允许。后来，殷正茂另调他职，以兵部侍郎凌云翼代之，乃征兵十五万人，分八路进剿。最后于万历五年三月将罗旁瑶民起义暂时平息下去，破岩洞五百六十四，杀一万六千一百人，俘二万三千余人，招降六千四百余人。同年五月二十日，神宗御皇极门，宣罗旁之捷，改泷水县为罗定州，立神电卫，凌云翼等升赏有差。

毕锵请增贮太仓老库银两 万历四年(1576)正月十二日，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毕锵上疏言：太仓旧有老库、外库之名，老库关门不放，外库支放。查嘉靖二十三年(1544)老库银除动支八十八万九千两外，尚贮银一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两。至隆庆三年查兑，则仅贮银一百万八千七百六十九两。国家财赋岁入有定额，或遇灾伤不得不减；岁出亦有常数，或遇兵荒不得不增。今以万历三年旧贮、新收合计得银七百零三万四千二百八十七余两。宜将老库增银一百万两，编号封贮，积之数年。使外库渐赢，老库益实，此为亿万年无疆之利。但今外库止剩三百九十万余两，而各边主客兵年例、修城、赏赉、京官俸薪、商人料价、官军布花等费，皆取给其中。而各钞关轮年征折本色少银十五、六万两；停止开纳事例又减银三十余万两。故须痛加节省，以绝后顾之忧。神宗得疏，赞赏其议。

刘台疏劾张居正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恨御史巡按在外经常凌辱巡抚，事小有不合，便严厉斥责御史巡按，以故言官多不平。当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奏辽东之捷时，张居正以巡按不得报军功，责刘台违制妄奏，欲绳之以法。刘台不服，于万历四年(1576)正月二十三日上疏弹劾张居正专擅威福，蔑视祖宗成法。如：逐大学士高拱去位，不容旦夕之缓；成国公朱希忠无功而欲越例赠其王爵；不经廷推而引张四维入内阁，荐张瀚为吏部尚书；斥逐言官余懋学和傅应祯；进献《白莲白燕颂》；私自为子弟谋取科第。张居正还在湖北江陵老家大兴土木，建房舍，费银至十万两，制拟宫禁，派锦衣卫官校监治，张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刘台乃张居正所取之隆庆五年(1571)进士，又得到张居正的重用，由刑部主事荐为御史，但却劾攻座师，且疏词之激烈为前所未有，由此轰动朝野。张居正得悉刘台的奏疏之后，愤然大怒，上疏威胁说："刘台为臣所取士，二百年来，未有门生弹劾师长的，臣惟有去位了之"。遂辞职。入宫见神宗皇帝，为自己辩护，说他是为国家正威福，非为个人擅弄权，并"伏地泣不肯

起”。神宗对他宠爱如故，亲手把张居正扶起，说刘台是“谗狠奸人”，“诬罔忠良，肆言排击，意惟树党植私，不顾国家成败”，答应立即派锦衣卫到辽东逮捕刘台。同时对张居正“慰留再三”，要他“安心供职”。

吴桂芳请开草湾河 万历四年(1576)二月十九日，总督漕运兵部左侍郎兼凤阳巡抚吴桂芳上疏请开草湾河(今江苏清江)，说：淮安、扬州二府历年水患不止，灾民号泣，所在凄然，盖源于海滨汊港岁久道塞，入海止云梯关一道，致海涌横沙，河流泛滥，而盐、安、高、宝不可收拾。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顾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请另设水利佥事一员，专疏海道，审度地利，开草湾及老黄河故道，以广入海之路，修筑高邮东西二坝以蓄湖水，不必专事云梯一关。又请留漕粮五万石、内河工银二万五千四百三十余两，以为开河之用。吏、户二部悉如其请。神宗皇帝令吴桂芳悉心经划。遂征集民夫，筹措财物兴工。历时半载，於同年八月河工成，长一万一千一百四十八余丈，塞决口二十二处，役夫四万四千人，实用银三万九千六百六十两，粮四万六千一百七十一石。神宗皇帝以海口开浚、水患渐平，赍桂芳等有差。

张翀致仕 张翀(? —1579)，字子仪，广西柳州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授刑部主事。时严嵩父子擅权乱政，祸国殃民。张翀身怀忠义，上疏劾其招权纳贿，谓严嵩“险足以倾人，诈足以惑世，辨足以乱政，才足以济奸”，请逐严氏，“以快众愤”。被逮入狱拷掠，谪戍都匀。隆庆间，张翀历任吏部主事、大理寺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再移为湖广巡抚、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万历初，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召为刑部右侍郎不受，万历四年(1576)二月二十日致仕。七年卒于家。赠兵部尚书，谥忠简。著有《泽然子》。

戚继光重筑蓟镇三屯营 神宗即位，下令增筑边城，遣兵部左侍郎汪道昆阅视边防。蓟镇总官兵戚继光遂请增拓三屯营。至万历四年(1576)二月完成，共增筑敌台三千余座，为侦察守御之用。且移忠义中卫于三屯营内。又分所部十二区为三协，每协置副将一人，分练士马。时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

抚按官严督有司按季完解钱粮 金花银急缺，户部以太仓备边银二万二千二百余两抵进，并请令各抚、按官勒限完解。至万历四年(1576)三月十四日，神宗下诏：金花原系正供，且折纳甚轻，又分季解进，何尝累民，皆因势豪奸顽之人不纳或领解员役侵欺，以致租欠至一百六十万两。一旦查核，辄称朝廷催科严急，鼓煽流言阻抗，乃以备边银两借供上用。以国家常赋惠养奸豪，非我祖宗立法之意。各抚、按官今后必须严督有司每年务按季完解。敢有倚势抗拒并侵欺者，即便参奏拿解，从重处分。若抚、按官徇私怠玩，当以不称职论黜。时户部左侍郎李幼滋说：近来行一条鞭法，金花与各项钱粮无别，故诏书但蠲各项钱粮，而小民无知，便谓金花亦在其内。有司莫知所办，业已混行催征，小民不明其故，辄谓诏书不可信。以后征收，虽行一条鞭法，务必将款项一一开明：如某户秋粮若干，本色若干，折色若干；金花银若干，漕粮若干，某仓粮若干，某项最急，某项次急，某项虽诏下不免。每户给与印单一纸，以使小民明白不迷，输纳方便。神宗接疏降旨说：令内外诸司，凡事一体遵行祖宗成法，不得妄生意见，条陈更改，反而滋生弊端。违者一律以变乱成法论处。

吴桂芳奏报万历四年实际过淮漕粮数 万历四年(1576)三月十六日，总督漕运侍郎吴桂芳上疏说：万历四年分应运漕粮四百万石，内除改折、截留并山东、河南、徐州，例不过淮外，实该过淮粮二百八十二万八千五百七十五余石，按照上年规定以霜降前一日发单，大寒前一日开兑，自万历三年十二月初七日起至万历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止，运官孙永忠等押帮船共计八千二百一十艘，装载前粮俱数过淮完毕。

命减上供缎匹 先是，内承运库太监崔敏等人以缎匹缺乏，欲仿先朝事例，差官织造。于是工科给事中侯于赵上疏言：自古以来，宦官奉命出外，少有不假公营私，为国家之患的。纵使其人忠厚堪任，而其参随、匠役凭籍声势生事害人亦所必至。况所开疋数大溢岁额，一丝一缕皆民膏脂，东南百姓何以堪。而且皇上登位诏首罢织造差官，曾几何时，而忽有此请。恐怕幸门一开，苏、杭、兰州等地必接踵而行，请令工部复议之后再奏请皇上定夺。浙江道监察御史麻永吉(吉，一作“言”)等亦上疏谏阻，说：国初织造有定所，岁运有定额，皆委官监督，而以按臣纠察之。天顺、成化、弘治年间，偶而派遣内官，然率随置随罢，而当时谋国诸臣如李贤、马文升等人也一再上疏劝谏，以苏民困。皇上即位以来首下民诏取回内官，四海内皆见皇上恩德，而今崔敏忽请差官织造，岂非皇上躬行节俭，与民休养生息之心。乞勒停止，以免扰民。神宗于万历四年(1576)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东南民力凋疲，朕非不知爱恤，但内库供用亦不可缺，准将上用并供用各减一半，遂定为五万九千三百六十匹，约用银五六十万两。仍选廉慎内官督造，

作速催解。

统一各省钱法 万历四年(1576)四月初九日,户科给事中周良寅上疏议钱法:制钱之名实未一,公私之行使未通,造铸之奸弊未除,禁谕之法令未备。请以官员折俸充铸造之本,仍严卖铜之禁,少铸金背火漆,定拟行使价值,赋税正供,爰金纸赎,例用本折,一切邮传军需,各权分数,取办于钱。令既严,则行自广。此疏,送户部议复,定为四款:专监铸之官,申废铜之令,定拆易之数,权简欲之法。神宗览疏表示赞同,令铸镟边制钱,颁行天下,各省如一开铸,与旧钱兼行、务在便民,令严私铸之禁。

重修《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初修于弘治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重修,进呈未刊。万历四年(1576)六月二十一日,大学士张居正等请重修此书。同日,神宗降旨:特命张居正等查照弘治年间创修及世宗敕谕重修事理,择日开馆,分局纂修,"校订差讹,补辑缺漏","以成一代划一经常之典"。同月二十二日以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为重修《大明会典》总裁官。万历二十四日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马自强以及汪镗、林士章、申时行、王锡爵为副总裁官,陈经邦等为纂修官。十五年二月十六日修成进呈,计二百二十八卷,以六部为例,分别记述各部门机构设置之沿革、职掌、事例。首载明代官制,次及户口、田土、赋役。对宗藩、俸给、赏赐、礼、仪、冠服、房屋、器用、乡饮、酒礼以及兵制等等亦有详细记述。其内容较《明史》各志为详。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张居正疏论安民致治之道 万历四年(1576)七月初六日,大学士张居正上疏说:致治之道,莫先于安民;安民之法,莫重于守令。今之为守令者,削下奉上以希声势,奔走趋承以荐举,征发期会以完簿书,苟且具文以逃罪责,其实心爱民者,未曾多见。明春外计,考察举措,乃向背所系,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虚文矫饰,虽名气很大,亦当列为下考。请令抚、按官肃清吏治以俟考成。神宗允准。

宋仪望请修江浙水利 万历四年(1576)七月十一日,巡抚应天右副都御史宋仪望上疏说:三吴财用所出,水利最急。自嘉靖以来,未尝大修,沟港日淤,圩埂尽废,旱涝无备,而根本之忧在于修浚吴淞江、淀山和三泖。盖由"三吴水势,东南自嘉、秀沿海而北,皆趋松江,循黄浦入海;西北自常,镇沿江而东,皆趋江阴、常熟。其中太湖潴水,汇为巨浸,流注庞山、渎墅、淀山、三泖、阳城诸湖,乃开浦引湖,北经常熟七浦、白茆诸港入于江;东北经昆山、太仓,刘家河,东南通吴淞江、黄浦,各入于海。诸水联络,四面环护、中如仰盂。杭、嘉、湖、常、镇势绕四隅,苏州居中,松江为诸水所受,最居下。乞专设水利佥事以裨国计。"疏下工部议,不同意专设水利佥事,但遣御史督责。

河决崔镇 先是万历四年(1576)二月以后,江北大旱,河水断流。至同年八月,河决韦家楼,又决沛县缕水堤、丰、曹二县长堤,于是徐、丰、沛、睢宁、金乡、鱼台、单、曹八州县,田舍淹没无算。

杨思忠逝世 杨思忠(? —1576),字孝夫,号南泉,山西平定州(今山西平定)人。嘉靖二十年(1431)进士,授礼科给事中。嘉靖二十九年,世宗欲迁仁宗的神主入祖庙,并将孝烈皇后附祭于太庙。下廷议,人莫敢言。杨思忠以为不可,上疏据礼力争,世宗大怒,衔恨思忠,每当迁官,辄不批准。过三年,杨思忠上疏贺正旦日食不见阴云。世宗摘其疏语不成文,说杨思忠"怀欺",久不忠,命廷杖一百,斥为民。隆庆元年(1576)起掌吏科,三迁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五年改南京户部右侍郎。万历四年(1576)九月初六日卒。

邵陛请招民开垦凤阳淮安荒田 凤阳、淮安二府本为地广人稀,加以水灾,至万历初年民逃亡过半。万历五年(1577)正月二十一日,巡按直隶御史邵陛上疏请处财用、防欺隐、广招民、开沟洫、给牛种、备接济、缓征役、励司牧、均责成,以招复流民,开垦荒田,安定地方。其言防欺隐,谓:开垦之弊百出,在官预图推卸责任,有捏未荒为久荒,未逃为久逃者;在民则有巧售其奸者,有抛熟地为荒地的,有暂避以为逃亡的,甚至以民地为官地,以甲产为乙产的。为此,必先逐里逐户,彼此对质明白,将空间官地、久荒、近荒民地,见在人户、久逃、近逃人户,分为六类,待流民归里时,按籍授田,佃种之后,原主不得告讦,以绝奸弊。邵陛还请设营田佥事,驻扎于两府之中,经常巡视,将招民垦田之事逐日登记,年终缴查,并选乡民中有心计者为农师,以分理其事。神宗接到邵陛的奏疏之后,令抚按官督率营田佥事,着实举行,务要给以事权,使其得便宜行事,三年之后,遣官核实,以行赏罚。

吴山逝世 吴山(? —1577),字曰静,号筠泉,江西高安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礼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嘉靖三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吴山为人正直,不媚权贵,他与严嵩同乡,严子世蕃欲与为婚姻。吴山坚决拒绝,严世蕃不悦而罢。世宗皇帝欲用吴山为内阁阁臣,严嵩在暗地里极力加以阻挠。嘉靖四十年二月,吴山以日食上疏言事,触逆世宗皇帝,遂被劾致仕。穆宗即位,召吴山为南京礼部尚书,他坚辞不赴。万历五年

(1577)三月十五日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太保,谥文端。

光懋疏言一条鞭法之弊 万历五年(1577)三月,户科给事中光懋上疏:赋役之法,赋属田,役属人。夏秋两税,按其地之肥瘠定等则。至银差,则为顾役之遗意;力差,则为力役之道。按户丁而征调,称为均徭,稽籍定役,与田无干。至嘉靖末年,创为一条鞭法,不分贫富,一例摊派。甚至将银、力二差与户口、盐钞合并于地,而丁力反不预。商贾享逐末之利,农民丧乐生之心,于民甚为不便。

方钝逝世 方钝(?—1577),字仲敏,号砺庵,湖广巴陵(今湖南岳阳)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知内黄、华亭二县,为政有声,拜广西道御史。升户部侍郎,督饷宣府、大同,终户部尚书。在部七年,"廉慎无过"。严嵩为人奸险,竟对方钝进行中伤,为此致仕回籍,居家十八年。隆庆、万历间,朝廷多次遣使存问。方钝"片札不受",廉朴自持。平日读书,惟读《大明律》。万历五年(1577)四月初二日卒。赠太子少保,谥简肃。

谭纶逝世 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江西宜黄县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南京礼部主事、兵部郎中、浙江台州知府,迁兵备副使,再升为右佥都御史,与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等大败倭寇。嘉靖末年,晋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西。隆庆元年(1567)进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疏陈练兵事宜。因功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入京协理戎政。再进为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仍协理戎政。神宗即位,起为兵部尚书。万历初年,加太子太保。五年(1577)四月初三日卒于官,年五十八。赠太子太保,谥襄敏。谭纶沉毅知兵,功劳数多,为一代良将,时人素以"谭、戚"并称。有《谭襄敏奏议》行世。

神宗分封诸子为王 万历五年(1577)四月二十五日神宗御皇极殿,传制封庆惠王世子倪慣为庆王、德恭王世子翊镛为德王。又令衡府翊镃嗣平度王、韩府干洛嗣绥平王。

林云同逝世 林云同(?—1577),字汝雨,号退斋,福建莆田县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自翰林院庶吉士授户部主事。历广东提学副使,立五经书院,教授郡中生徒。晋浙江右布政使,治绩第一。嘉靖二十七年,升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隆庆元年起刑部左侍郎,进南京右都御史不久,改官南京工部尚书。五次上疏乞归。万历二年(1574)复起为南京刑部尚书,主治江宁知县侵没库银,执法如山。后多次恳求去位,得到准允。万历五年五月初八日卒,赠太子少保,谥端简。有《端简公存稿》等。

王希烈逝世 王希烈(?—1577),字子中,江西南昌县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至署詹事府吏部左侍郎。万历五年(1577)六月二十一日卒,赠礼部尚书,谥文裕。

丁士美逝世 丁士美(?—1577),字邦彦,号后溪,南直隶清河县(今江苏清江市)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历右谕德、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充经筵讲官。万历初,改吏部左侍郎。丁士美居官清廉,拒馈遣,绝请托,与人无争。万历五年(1577)八月初十日卒,神宗念其讲读效劳,赠吏部尚书,谥文恪。

李应臣等不入朝 万历五年(1577)闰八月初三日,神宗视朝,命查文武官失朝者,襄诚伯李应臣等五百八十七人不至,各夺俸禄一月。

殷迈致仕 殷迈(1512—1581),字时训,号秋溟,又号白野,直隶南京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授户部主事,历江西参政、南京太常寺卿。万历初年,升南京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万历五年(1577)闰八月初四日,因其家僮为监生茅迪吉等痛殴重伤,遂以病致仕。九年卒,年七十。

倪嵩逝世 倪嵩(?—1577),南直隶当涂县(今安徽当涂)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太常寺博士,拜广西道御史,历升大理寺寺丞及左右少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左副都御史、户部左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疾致仕。隆庆二年(1568)被荐起用,不久引年乞休,诏进一阶致仕。万历五年(1577)闰八月二十四日卒。

刘应节致仕 刘应节(?—1570),字子和,号白川,山东潍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户部主事、井陉兵备副使、山西右参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后以母丧归家守制。隆庆元年(1567)起官,历河南巡抚、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隆庆末年代谭纶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万历元年(1573)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如故。不久,被命为南京工部尚书。再召为刑部尚书。五年闰八月二十七日致仕。万历十八年(1590)卒,赠太子太保。

罗汝芳罢官 罗汝芳(1515—1588),字维德,号近溪,江西南城县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历太湖知县、刑部主事,宁国知府、云南屯田副使等,后官至云南参政。罗汝芳为明代著名学者之一,所至兴学校,教生徒。初从同乡永新县颜钧讲学。颜钧之学归释氏,故罗汝芳之学亦近于佛教。万历五年(1577)闰八月二十七日罗汝芳以云南参政奉表至

京，在城外与刑部尚书刘应节共同研讨佛学，为给事中周良寅所劾，遂被罢官。万历十六年卒，年七十四。门人私谥明德。有《孝经宗旨》、《明通宝义》、《广通宝义》、《一贯编》、《近溪子明道录》、《近溪子文集》等。

石茂华致仕 石茂华(1522—1583)，字君采，号毅庵，山东益都县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知浚县，历扬州知府，以破倭寇有功，晋右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值天久旱不雨，民大饥，至人相食。石茂华奏免田赋，发放仓米，救活饥民以万计。居陕半载，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劾其"废弛不职"，于万历五年(1577)九月十七日致仕。万历十一年卒，年六十二。

张居正夺情 按照封建礼教，父母死亡，在外做官的儿子必须回家奔丧。否则，即是"忘亲"、"夺情"。万历五年(1577)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张居正恐一旦离去，他人谋其位，因此不想回江陵奔丧守孝。遂阳为上疏请守制，阴则"露意冯保使留之"。太监冯保传中旨令吏部尚书张瀚奉诏留张居正。张居正本人也一再要张瀚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出面留他。张瀚终"不为动"。此时，户部侍郎李幼滋，"欲媚居正，首倡夺情"之议。内阁大臣吕调阳、张四维上疏引前朝事例，请张居正夺情视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亦上疏请留。自此"和者相继"。在这种情况下，神宗改变了原无意留张居正的主意，说张居正"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命张居正在官守制。直到次年三月，张居正才归家葬父。朝廷内外对"夺情"一事议论纷纷，反对张居正者抨击他是"贪位忘亲"，置"万古纲常"于不顾。

王崇古致仕 王崇古(1515—1588)，字学甫，号鉴川，山西蒲州(今山西运城地区)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历刑部主事、郎中、安庆、汝宁二府知府、常镇兵备副使、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嘉靖四十三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隆庆初，以功加右副都御史，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居西北七载，获首功甚多。隆庆四年(1570)正月，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主张与蒙古俺答诸部友好相处，罢干戈，通贡市，安边定境。再以功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万历初，召入理戎政。不久，迁刑部尚书，改兵部。王崇古身历七镇，勋著边陲。万历五年(1577)，十月初四日致仕。万历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谥襄毅。有《公余漫稿》。

张瀚致仕 张瀚(1511—1593)，字子文，号元洲，浙江仁和县(今浙江杭州市)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历庐州、大名二府知府。时蒙古俺答围京师，诏征畿辅民兵入卫，张瀚立征八百人，驰至真定，人称其才，迁陕西左布政使，晋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再入为大理寺卿，升刑部右侍郎。不久，改兵部右侍郎，总督漕运。隆庆元年(1567)移督两广军务，被降级调用，居家候命。复起为陕西巡抚，迁南京右都御史，改工部尚书。万历初，以大学士张居正荐，任吏部尚书。万历五年(1577)十月十四日致仕。万历二十一年卒，年八十三。赠太子少保，谥恭懿。有《奚囊蠹余》、《台省疏稿》、《明疏议辑略》。

"五直臣"疏劾张居正夺情 万历五年(1577)十月十八日，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疏劾张居正夺情是违背"万古纲常"。第二天，检讨赵用贤上言，以为不能援前朝故事为张居正夺情制造根据。十月二十日，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是"贪位忘亲"。张居正大怒，十月二十二日杖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八十，皆气绝几死，人莫敢视。十月二十四日，观政进士邹元标又上疏尖锐批评张居正素来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他"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说明他实际上与禽兽无异。张居正杖其一百六十。廷臣相继疏救，张居正不听，竟将吴中行、赵用贤革职除名，艾穆、沈思孝、邹无标分别发配凉州、神电卫、都匀卫充军。吴、赵为隆庆五年张居正所取进士，艾穆为张居正的同乡，他们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出发，不讲私恩，不避权势，疏责张居正夺情，"直声震天下"，时称五人为"五直臣"。张居正由夺情一事，发现有不少人不附和自己，遂借考察之名，将论救吴中行等人的官员或降职，或外调，或罢斥为民。

刘光济致仕 刘光济(1520—1584)，字宪谦，南直隶江阴县(今江苏江阴)人。嘉靖二十二年(1544)进士，由户部主事，历临清推官。俺答犯都城，刘光济自告奋勇督饷云中，临危不惧，英勇作战。后累官南京兵部尚书。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居正谋"夺情"，刘光济力持不可。张居正恨之，嗾御史曾士楚劾刘光济"旷废"，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致仕。万历十二年卒，年六十五。

何维柏致仕 何维柏(1512—1588)，字乔仲，广东南海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福建巡按御史。嘉靖二十四年五月疏劾大学士严嵩奸贪罪，被捕，士民遮道号哭，何维柏"意气自如"，下狱，廷杖，除名为民，家居二十余年。隆庆改元，复官，晋大理少卿，迁左佥都御史。万历初，历吏部左、右侍郎。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十五日，为南

京礼部尚书。同年十二月初五日致仕，万历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太保，谥端恪。有《天山草堂存稿》。

张居正清丈土地 明初立法严厉，见额田亩较多。至明中叶，法制松弛，奸弊滋生，见额田亩由明初八百多万顷减为四百余万顷。为减轻民困，增加国家的田赋收入，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张居正上疏请丈量全国土地，神宗从其请，限三年完成任务。经过这次清丈，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计得土地七百余万顷，比弘治十五年增加三百余万顷。自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但是由于张居正"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按溢额田增赋，无形中又增加了农民的租税负担。

辽东劈山之捷 万历六年(1578)正月，泰宁部长速把亥纠合土默特大举入侵，扎营于劈山。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连夜督兵出塞二百里，大破劈山营，速把亥等死伤不下万余人，被斩四百三十人。又夺其器械牲畜数万。

张居正归家葬父 万历六年(1578)三月十三日张居正出京回家葬父。神宗对他说："先生此行，虽非久别，然国事尚宜留心"，特赐他"帝锡忠良"银章，许密封言事，两宫皇太后亦赐赍有加。同时命司礼太监张宏在郊外设宴送行，百官班送。回家之前，张居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荐礼部尚书马自强兼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右侍郎申时行兼东阁大学士，并预机务。张居正回家之后，神宗命次辅吕调阳等人：遇大事不得专决，必须飞报江陵，听张居正定夺。六月十五日，张居正还朝。张居正往返所过州县，守臣皆长跪迎候，抚、按大吏越界迎送，山珍海味，万般招待。各地藩王亦如是。

令增金花银 初，定金花银每年进内库以一百万两为额。至万历六年(1578)四月二十五日，神宗又诏户部每年增加金花银二十万两，自此以为常额。

庞尚鹏罢官 庞尚鹏(？—1582)，字少南，广东南海县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由江西乐平知县擢御史，出按江、浙、河南。隆庆元年(1567)，进大理寺右寺丞。次年春，以右佥都御史辖两淮、长芦、山东三运司兼理畿辅、河南、山东、江北、辽东屯务。至同年秋天又兼领九边屯务，上盐政二十事，盐利为之大兴。不久，再上九边屯政大要，朝廷允行。庞尚鹏性介直无所倚，其权既重，自负有经世之材，慷慨任事。而诸盐政御史则以事权被夺，皆忌之，欲攻其去。万历六年(1578)六月二十一日回籍听用。家居四年卒。天启中，追谥惠敏。有《百可摘稿》。

王用汲疏劾张居正 万历六年(1578)三月，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任情威福，排除异己，不附和他的迁怒斥逐；用人唯亲，附和他的即不次升擢。又说神宗威福不自出，乾纲不独断，一切听任张居正所为。张居正大怒，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将王用汲削职为民。

潘季驯再总理河漕 万历六年(1578)夏，明神宗命刑部右侍郎潘季驯为工部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理河漕。于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上《两河经略疏》，提出："塞决口以挽正河"，"复闸坝以防外河"，"创滚水坝以固堤岸"，"止浚海工程以省糜费"，"寝开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等六条主要措施，就治理黄河、淮河下游以及整治运河做了全面规划。潘季驯的治河主张，一反前人的做法，反对"多枝分流"，反对开新河，主张修浚黄河故道，"导河归海"，"束水攻沙"，"蓄清刷黄"，使河水不倒灌入淮。神宗从其请。七年冬，两河工成，共筑土堤十万二千二百六十八丈，砌石堤三千三百七十五丈，堵决口一百三十九处，建滚水坝四座，挑浚运河淤浅一万一千五百六十四丈，开挖河道二条，栽护堤柳八十三万二千二百株。用银五十六万两。比原计划节省二十四万两。此后数年，黄河"无大患"，漕运亦较为畅通。

吕调阳致仕 吕调阳(1516—1580)，字和卿，号豫所，广西临桂县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编修。隆庆六年(1672)四月，由吏部侍郎晋为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时，每讲辄引经据典，列古义以规时政，深得穆宗皇帝嘉悦。隆庆六年六月神宗即位，吕调阳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军国大计。吕调阳为人端慎简重，事上以忠。万历四年(1676)十月，加太子太傅。万历六年三月，首辅张居正归江陵葬父，小事由张四维处理，大事派人驰报张居正决断。吕调阳在阁中无事可为，遂称病不出，连上十疏要求归里。神宗以吕调阳"久疾未痊，特准回籍调理"。于万历六年七月初六日致仕，万历八年正月卒，年六十五，赠太傅，谥文简。有《帝鉴图说》。

曹三旸致仕 曹三旸(1516—1589)，字子泰，号云山，南直宜兴县(今江苏宜兴)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由大理寺丞，历守福建漳州、山东济南二府，皆有治绩，晋湖广副使。不久，督学山东。历浙江按察使、江西布政使，召入为户部侍郎，改刑部。万历五年(1577)任南京工部尚书。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致仕，次年卒，年七十四。

诏奖开垦江北、苏州等处荒田 万历六年(1578)秋，神宗诏开垦江北、苏州荒田。先是，七月二十七日令江北诸府民年十五以上无田者，官给牛一

头，田五十亩，开垦三年后起科。九月二十二日，令苏州诸府开垦荒田，六年后征收税粮。

马自强逝世 马自强(1513—1578)，字体乾，号乾庵，陕西同州(今陕西渭南地区)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隆庆中，历洗马，直经筵。迁国子监祭酒，振饬学政，杜绝请寄。神宗继位，升礼部右侍郎，再由吏部左侍郎进礼部尚书，仍充经筵讲官。马自强长礼部时，"每藩府疏至，应时裁决，榜之部门，明示行止，吏无所牟利"。又严禁边臣贪污按额付给蒙古俺答的赏银，每年省费无数。万历六年(1678)三月，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万历六年十月十四日卒于官，年六十六，诏赠少保，谥文庄。有《马文庄公集》。

李时珍编成《本草纲目》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十四岁中秀才，三次乡试落榜，遂决心继承父业，在家乡行医，到河南、江西、南直隶等处进行实地考察。嘉靖三十年(1551)命为楚王府奉祠正，掌良医所事，被荐为太医院院判。不到一年就离开太医院，回到家乡，研究医药学。于次年开始，集中精力编写医书。历近三十年，三易其稿，最后于万历六年(1578)完成《本草纲目》，成为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一部医药学巨著。全书五十二卷，一百九十余万字，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比前人增加三百七十四种；记药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条，比前人增加四倍。还附有插图一千一百一十幅。书中纲目并举，详细地介绍了各种药物的产地、形色、气味及其主要功用，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医药学宝库，在世界医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本草纲目》的主要特点是，分类明确、科学。李时珍采用的药物分类，比欧洲植物分类学家提出的分类法要早一百年，这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杰出贡献。书中还纠正、澄清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说法，对古代医药书籍中的一些封建迷信谬说也进行了应有的分析批判。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书中也夹杂着某些非科学成份。李时珍逝世以后，其子李建元将《本草纲目》及李时珍所写的遗表一起进呈朝廷，万历神宗皇帝以此书有益于实用，命刊行天下。从十七世纪开始，《本草纲目》即流传于世界各地，日、英、法、德等国都加以翻译出版。

令毁天下书院 嘉、万年间，各地兴学校，建书院，蔚然成风。士大夫竞相入院讲学，教授生徒，创立学派。同时利用讲学之机，议论朝政。大学士张居正对此尤为痛恶。神宗遂于万历七年(1579)正月二十二日下令：全国各地巡按御史、提学官切实查访，将各省所有私建的书院，一律改为诸司衙门；书院所立粮田俱查归里甲；各地师徒不得借此聚集会议，扰害地方。先后被毁的有应天等府书院，计六十四处。

王铎被杀 王铎，系后军都督府武成中卫军余(即正军所携带的户下"余丁")，幼年曾出家为僧，后还俗，师事教主林福，习其教，自称为"天地三阳会"首领，盖三阳殿，造混元主佛，封蔡镇等三十六人为天将，并捏造"妖书"与"违法器物"，聚集男女六千余人，以度牒为名，准备发动起义。因事机败露，王铎等人于万历七年(1579)正月二十三日被杀，其众遣散。

修筑大同镇屯堡敌台 万历七年(1579)二月初五日，神宗准督抚侍郎吴兑等人的请求，命筑大同镇屯堡二百五十七座、敌台一千零二十八所。以地之缓冲分为三等，一等为临边要冲、敌所必至之地，预先修筑；稍近边界，敌所不至者为二等；附近腹里，去边稍近为三等。大同镇城的南关左卫亦依议予以修理。

定蓟永密昌四镇额饷银数 万历七年(1579)二月初八日定蓟州镇每岁饷银为五十七万二千一百一十两、永平镇三十三万零四百一十五两、密云镇五十二万九千五百六十一两、昌平镇二十二万六千八百五十两。

马芳致仕 马芳(1517—1581)，字德馨，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机智勇敢。十岁被蒙古俺答部俘虏，后潜归，历任大同镇队长、阳和卫总旗、指挥佥事、都指挥佥事、都督佥事、右都督、左都督。以副将加左都督，自马芳始。嘉靖三十六年(1557)以后，官蓟镇副总兵官、宣府总兵官。马芳有胆略，每战皆身先士卒。十余年为大帅，大小百十战，身被数十创，尝以少击众，战无不捷，威名震边陲，为一时将帅之冠。万历元年(1573)，阅视侍郎吴百朋上疏劾马芳行贿武库司郎中林绍等人，请逮捕问罪。后镇宣府，万历七年致仕，万历九年卒，年六十五。

诏取光禄寺银 万历七年(1579)三月初一日，神宗以两宫皇太后颁行赏赉需要而内库乏银为由，命征取光禄寺银十万两。大学士张居正为此上疏说："财赋有限，而费用无穷。假如积贮空虚、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将可为寒心。希望皇上今后凡百费用，必痛加节省。若再下诏征取，臣等当不敢奉诏遵行。"是时，神宗渐备六宫，多次征调太仓所贮银两。张居正一直不同意这种做法。此后，他又上户部所进的《御览钱粮数目》，请神宗置于座旁，时时省览。同时进言："万历五年收入银四百三十五万余两，六年仅收入三百五十五万余两，比去年减少八十万余两。五年支出银三百四十九万

四千余两，六年支出增至三百八十八万八千余两，比去年多出四十万两。古人有言，‘量入为出，计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余而后可。今则收入少于前，而支出大于前，此不可不留心”。神宗将张居正的奏疏留中不发，而复令工部铸钱给用。张居正以利不胜费，再次上疏予以谏阻。

申严官员到任违限之禁　万历七年(1579)四月初四日，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上疏请更定官员至任违限事例，凡两司方面、行太仆、苑马、运司以及府州县正官，到任日期超过规定时间一个月以上者问罪，三月以上者改为别用，半年以上者夺职。其余庶官及两京各官，一月以上者问罪，半年以上者降职调用，八个月以上者夺职。诏令遵行。

董传策被杀　董传策(？—1579)，字原汉，号幼海，南直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刑部主事。嘉靖三十七年疏劾大学士严嵩积恶误国六罪，被捕下狱论死，追究主谋，严刑拷掠，气几绝。遇地震，减罪，谪戍南宁。后归而居家讲学，声望日重。穆宗即位，起故官，历郎中。隆庆五年(1571)迁南京大理寺卿，进工部右侍郎。万历元年(1573)改为礼部右侍郎，言官劾其受贿，遂免官归家。万历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夜，被家奴杀死。有《董传策奏议》、《采薇集》。

核实勋戚田赋　隆庆二年(1568)，户部议定勋戚庄田世次递减之限，规定：宗室买田不输役者没入为官，勋戚庄田俱听由有司征赋。然乞请赐田及免田赋者仍络绎不绝。于是万历七年(1579)六月十七日神宗应户部的请求，命南北直隶、山东、陕西等省勋戚庄田俱进行清丈，只按规定给予正数，凡逾额及隐占者均依法按治，所收地租银解部备边。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户部奏：顺天等八府州县丈出官勋备边牧马军屯等地共二千八百三十五顷，每年额征银六千九百二十两、粮二十四石。又勋戚新旧庄田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余顷，除成国公朱应桢等应照旧管业，其驸马戚田宛子孙谢文铨等应酌议减夺有差。神宗允准。

何心隐被害　何心隐(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永丰县人，是明代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之一。嘉靖二十五年(1546)中江西乡试第一后，即放弃功名，聚众讲学，肯定人类的物质欲望，主张“与百姓同欲”，师友关系高于一切。因此被诬为“妖逆”。他说：张居正“当国必杀我”，我“当入都昌言逐之”。张居正即暗中指使有司逮捕何心隐。万历七年(1579)八月十一日，巡按湖广御史郭思敬奏何心隐私立求仁书院。神宗得疏下令捕治。遂被押至武昌，杖杀于狱中。

徐中行逝世　徐中行(1517—1579)，字子舆，号龙湾，自称天目山人，浙江长兴县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汀州知府、长芦盐运司判官、湖广佥事。曾加入李攀龙、王世贞诗社，称“后七子”，精通古学，“知名当世”。后，累官江西左布政使。徐中行性好客，不分贤愚贵贱，一视同仁，应之不倦。万历七年(1579)十月十三日死于任上(一说死于万历六年)，年六十三。有《天目山人集》及诗集等。

广西八寨少数民族起义　隆庆初年，以韦银豹、黄朝猛为首领的古田僮民起义被镇压之后，万历初年因为皇朝政府继续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加上土司的残酷剥削，民不堪命，又爆发了八寨僮瑶各族人民起义。起义者没收富民田产，入都市，攻城邑，开仓劫库，杀死官吏，闹得封建统治者惶惶不安。万历七年(1579)十月二十三日朝廷命遣兵进剿，不能平。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提督两广军务侍郎刘尧诲请两广集大兵进行会剿，明神宗从其请。至次年闰四月八寨起义失败。官军杀死起义者多达一万六千九百余人，并将八寨分为三城，又增建二堡。于是广西右江各族“始安辑输赋”。

汪镗致仕　汪镗(1512—1588)，字振宗，号远峰，浙江鄞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署詹事府事。累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汪镗学识渊泓，笃实持重，有大臣之风，仕宦三十年，所至皆简练得体。万历七年(1579)十二月初一日以年老体衰多病致仕。万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七十七。有《余清堂稿》。

李幼滋致仕　李幼滋，生卒年不详，字元树，号义河，湖广应城县(今湖北应城)人。由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行人，历礼科给事中、大理寺卿、户部侍郎。万历五年(1577)九月，大学士张居正父死，李幼滋“首倡夺情议”。同年十二月，升为工部尚书。万历七年十二月初七日致仕。年七十以后卒。

方良曙致仕　方良曙(1515—1585)，南直隶歙县(今安徽歙县)人。由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历湖广按察使、布政使、云南布政使，终应天府尹。万历八年(1580)二月二十五日致仕，万历十三年卒，年七十一。

闵熙逝世　闵熙(1507—1580)，字和卿，号水东，北直隶任丘县(今河北任丘)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历开封府推官、御史、翰林院编修，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最后官至刑部尚书。闵熙为政三十年，所至成绩显著。致仕家居多年，至万历八年

(1580)三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四。

姚弘谟致仕　姚弘谟(1531—1589),字继文,号禹门,浙江秀水县(今浙江嘉兴)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以文学触忤当道,贬为六安州判官。旋迁江西参政,改南京太常寺少卿,领国子监祭酒,升礼部左侍郎,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万历八年(1580)四月初九日致仕。万历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九。赠礼部尚书。

赵世卿疏论张居正新政　万历八年(1580)夏,大学士张居正主持国事,政令严格,明确规定:州、县学取士,不得超过十五人;布政和按察二司以下的官员,办公事亦不准乘驿马;判为死刑的人数,每年有定额;地方官征赋税以九分为合格率,不及格者必须受罚。又一再重治上疏建言之臣。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奏陈"匡时"五要:请广取士之额、宽驿传之禁、减少死判、征收赋税不能太急。同时又极力请开言路,要求神宗发特赦令,放回因建言被发配充军的傅应祯、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人。张居正以其五事与己相左,将其改调楚府右长史,次年京察,以"不谨落职"。

诏革沿边兵备守巡、参游等官　万历八年(1580)六月初八日,神宗以近来边腹地方兵备守巡及武职参游等官,添设太多,非旧制,令各抚按会议裁革,以副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于是,裁革山西宣府怀隆道兵备副使一员、河南总部京粮右参政一员、督粮左参议一员、睢陈道兵备一员、山东督粮左参政一员、总督京粮左参政一员、分巡东兖道佥事一员、陕西督驿传左参政一员、屯田水利副使一员、浪庄兵备道一员、甘肃太仆寺少卿兼按察佥事一员、广西督粮右参政一员、永宁兵备副使一员、四川督粮右参政一员、水利驿传使事一员、叙泸兵备佥事一员、广东督粮左参政一员、湖广屯田水利副使一员、江西饶州兵备副使一员及佥事一员。

林爊逝世　林爊(1524—1580),字贞恒,号对山,福建闽县(今福建福州市)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改庶吉士,历翰林院检讨、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职。万历元年(1673)进南京工部尚书,万历二年改为礼部尚书。遇母丧去官回家,复以侍养老父致仕家居。万历八年六月十五日卒,年五十七,赠太子太保,谥文恪。有《福州府志》三十六卷、《林火庸文集》十六卷、诗六卷。林爊雅好儒学,为人刚直,大节不夺。

俞大猷逝世　俞大猷(1503—1580),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县人。幼治经术说,后弃文学武、袭官百户。嘉靖十四年(1535)举武会试第五名,授千户,守御金门,升广东都司。倭寇侵扰东南时,俞大猷历浙江宁波、台州诸府参将、广东总兵官、福建总兵官,与戚继光等人互相配合,在江、浙、闽、粤屡败倭寇,战功显赫,威名大震,人称其军为"俞家军"。由此成为明代历史上著名的抗倭名将。万历元年(1573)秋天,因督战失利夺职。后复起官为后军都督府佥事。以年老三疏乞休,万历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八,赠左都督,崇祯末年追谥武襄。俞大猷,"为人廉而好施",善待部下,处事持重,有古代大将之风。在东南大小百十余战,所向多有功。其用兵,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有《正气堂集》、《剑经》、《韬钤续编》等。

汪宗伊致仕　汪宗伊(?—1587),字子衡,号少泉,湖广崇阳县(今湖北崇阳)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浮梁知县,迁兵部郎中,忤权相严嵩,自请去官归家。隆庆初年,起为南京吏部郎中,改应天府尹,"裁诸司供亿,岁省民财万计"。万历初,进南京大理寺卿。其后,三次任户部尚书,总督仓场。万历八年(1580)五月,改为南京吏部尚书,九月初七日以病致仕。万历十五年卒。谥恭惠。有《南京吏部志》。

仓场总督和戎政协理不专设　万历八年(1580)十月初二日,胡执礼由户部右侍郎改为左侍郎,总督仓场。神宗命今后仓场总督并戎政协理,俱分别由户部和兵部左右侍郎兼任,不必专设。

令汰内外冗官　万历八年(1580)十月初五日,兵部尚书杨兆协理京营时,神宗有旨:"协理一职,归本部侍郎带管。"杨兆遂上疏请求辞去协理。神宗得到杨兆的奏疏之后,一面命其暂供此职,听候裁决;一面又采纳大学士张居正的意见,决定裁革协理一职,并令吏部核实南北两京大小九卿及其所属各衙门,凡有冗滥者悉予裁革。同时还命令核实各省徭赋以及诸司冒滥冗费等事。

张居正请编辑历朝宝训、实录　大学士张居正等于万历八年(1580)十二月初九日上疏说:远稽古训,不若近事之可征;上溯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请属儒臣将太祖、太宗及其后列祖《宝训》、《实录》逐一简阅,分类编辑,以经筵日分篇进讲。总计四十则,分别为: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谨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逸、正宫闱、教太子、睦宗藩、亲贤臣、去奸邪、纳谏、理财、守法、敬戒、务实、正纪纲、审官、久任、重守令、驭亲信、待外戚、重农桑、兴教化、明赏罚、信诏令、谨名分、拒贡献、慎赏赍、甘节俭、慎刑狱、褒功德、屏异端、饬武备、御寇盗。疏上,神宗立即予以嘉纳。至次年二月,陆续成篇,依次进讲。

诏减各省钱粮　万历八年(1580),神宗多次下诏减免各省钱粮,主要有:二月二十八日蠲两淮盐场逋课二十八万七千五百引。闰四月二十一日蠲福建驿递积逋银二十九万八千余两,二十六日蠲陕西苑马寺牧地积租银六万零八百余两。六月初十日蠲广东隆庆六年以前逋租银十八万五千六百余两。七月二十八日蠲顺天府隆庆二年至万历六年逋租。八月二十三日量折庐州、凤阳、淮安、扬州等府被水田租。九月十九日减山东均徭里甲银九万六千四百余两,二十日,减福建里甲均徭银六万四千五百余两。十月十九日赈常熟、吴江、长洲、昆山四县,苏州府其余各县及松江、常州、镇江诸府量折田租,同月十四日蠲河南怀庆、河南二府存留田租。十一月十七日,裁浙江料价徭编岁额银八万八千七百四十余两。同月二十九日蠲河南明年河堤夫银六万两。十二月十三日蠲泗州等处万历六年改折漕粮十三万三千七百九十余两,十四日减江西里甲均徭诸费银五万三千六百八十余两。以上所减,俱因灾伤,地方困疲。

梁辰鱼逝世　梁辰鱼(1508—1580),字白龙,南直隶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性好侠义,不屑就诸生试。嘉靖间,与著名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有深交,好游嗜酒,走遍吴、楚间。擅长词曲,是明代有名的戏剧家,也是昆曲的创始人。有《远游集》、《鹿城新集》、《浣纱记》传奇为其代表作。万历八年(1580)逝世,年七十三。

吕光洵逝世　吕光洵(1518—1580),字信卿,号泛州,浙江新昌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擢御史,巡按苏松,整理赋役,兴修水利。后,以右都御史,巡抚云南,讨伐有功,升工部尚书,致仕归家。万历八年(1580)卒。年六十三。有《元史正要》、《皆山堂稿》、《可园诗钞》等。

《针灸大成》刊行　《针灸大成》十卷,杨继洲著,万历八年(1580)至二十九年刻成。杨继洲(1522—1620)字济时,三衢(今浙江衢县)人。少年好学,但屡考不中,遂从儒业医。祖父为太医,编著与收藏医书甚多,家学渊源为他提供了极有利条件。《针灸大成》十卷,卷一为针道源流、针灸方宣始论,介绍历代医书、名医。卷二、三、四、五为针灸歌赋,讲运针的方法与注意事项和穴位的部位。卷六、七为十二经穴图,穴位的部位、针法与主治疾病的介绍。卷八、九为内外妇儿各科的论治及名医的针法与灸法。卷十为转录小儿按摩专书《按摩经》。《针灸大成》是针灸学总结性的著作。

裁减文武官员　根据吏部的请求,神宗于万历九年(1581)正月初六日、十六日,分别下诏裁减南北两京六部、都察院等各部门的官员计数百人。二月二十一日,据吏部复议,裁革北直隶保定等府同知,通判官以下五十五员,南京、福建仓大使等四十六员,浙江布政司都事等官二十员,江西、陕西、延绥、郧阳等处司、府、州、县佐贰杂职等官三十员,南赣、贵州司、府、县、驿等官十员,南京中、左二府锦衣卫各佥书、大教场等营把总八员。同月十二日汰苏松徽宁兵备所辖官兵七百七十九员,每年省饷银六千六百余两。四月二十四日裁四川司府州县佐贰杂职等官共二十六员。七月十七日,裁革湖广、广东等处司、府、州、县佐贰杂职等官七十四员,同月二十四日裁革广西司府州县佐贰杂职等官四十九员。十二月初二日,兵部裁京职一百六十五员。

减征均徭驿递等项银两　万历九年(1581)正月二十一日,兵部复顺天抚按张梦鲤等题称:顺天、永平二府所属州县额编驿递站银并军卫协济及外省南马价银共十四万九千余两,近遵例于地亩均徭内通融酌量减征五万七千四百余两,实编银九万一千五百余两。同月二十二日户部复顺天、湖广、陕西、四川新减存留编徭银数:顺天府实编银二十九万零六百余两,减去银十一万五千九百余两。湖广实编银五十七万三千七百余两,减去银十一万九千七百余两。陕西实编银五十一万七千九百余两,减去银七万五千余两。四川实编银五十二万九千余两,减去银五万零六百余两。诏准为例。

减征驿递银　万历九年(1581)二月初九日户部题复河南抚、按褚铁、许子良奏称所属州县额编驿递银四十五万一千六百余两,已裁减过十万余两,今遵旨复裁减十万余两,只编二十四万七千七百余两,通行各属永为遵行。同月二十九日,诏裁减湖广驿递银六万六千二百五十两,实编银十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余两。三月初一日从浙江抚、按之请,减杭州等府额编驿传银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余两、米一百五十石,永免派征。同月二十二日应天抚、按孙光祐、陈荐题称,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广德六府州所属驿递节年支剩银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余两,抵充万历九年分应编支应等数。各府州应编站银自(万历)十年为始,每年共减编一万九千七百五十余两,永免派征。实编六万八千一百三十余两,乞通行遵守。部复从之。七月初六日,兵部复江西抚按疏言,江西站银原额十万余两,万历五年题减十分之三,民困顿苏。今抚按官复加节省三年积银遂至十万余两,每年酌用四万两,则节省十分之六,请将余银六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两抵充万历十年正支,至十一年照前减数派征。神宗说:该省驿传既积有余银,准免派一年,以

苏民困。同月二十七日，诏令：淮安、扬州、凤阳等府属州县，自万历八年以前积欠马价等银，都准豁免，以苏民困。十月初八日，定直隶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五府驿递站银，岁编十八万七千一百九十余两。旧额三十三万余两，历年驿禁通行应付简少，递减十四万余两。江浙、苏、松等府协济马价并免派征。十一月二十八日酌免福建汀州、邵武、延平、建宁、兴化、漳州、泉州七府驿站银，免编一年。因历年节省剩贮库银足抵一年，故有是命。

定各省兵马钱量数　万历九年(1581)三月十八日定北直隶府州县积谷分数，按上、中、下分为三等。九月二十二日定四川兵马钱粮见在总数，以万历七年为额。实在卫所官军五万零三百三十八名，马一千九百二十三匹。添设总兵官、副总兵官、参将、游击、官军三万二千七百零六名，马七十四匹。岁支俸廪衣甲本色米豆十八万七千九百四十余石，折色银三十三万九千零八十余两。十月初五日以福建巡抚刘尧诲册报所列过多，恐有司不如额，反而横征为害，遂定福建所属各州县积谷额数，一律按上、中、下三等征收。同月初七日定浙江兵马钱粮见在总数，以万历七年为额，实在卫所并附近官军共六万四千九百一十二名，岁支月粮六十二万零六百二十余石。添设备倭、防矿将领及军丁三万三千二百九十名，岁支饷银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一十余两。

减免河南应天苏松等府均徭银　万历九年(1581)四月初六日，诏令河南各卫所拖欠班银，自万历六年以前俱蠲免。同月二十一日，应天抚按孙光祐等题称，应天、苏州、松江等十一府州县条编均徭里甲驿传每岁原编银八十七万八千六百三十余两，今递减公费等银七万八千五百余两。又改入平米银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余两，实编银七十七万八千三百八十余两，乞刊册颁布，以便遵守。部复如拟。

《万历会计录》编成　《万历会计录》初于隆庆六年(1572)七月由户部尚书王国光与侍部李幼滋等编辑，费时逾年，国光致仕时于万历四年(1576)二月二十六日进呈，此为《会计录》之蓝本。万历六年(1578)七月，继任户部尚书张学颜，遵神宗谕旨，会同总督仓场侍郎刘思问、户部右侍郎王之垣、主事周希华等，订正国光所进书册，为期二年，编修成帙，由部臣缮写，于万历九年四月二十日进呈，仍乞刊布。时拟名《万历会计录》，二十二日奉旨书册留览，依拟刊行，仍送史馆采录。其后，学颜将户部新题事例、各省续报文册，督率司属郎中等官开行检阅，重加磨算增订，刊刻成书，计四十三卷，四十四册，分为四套，装订二部，于万历十年二月十五日具题进呈御览，另送一部送史馆采录，再陆续印刷颁行省直边镇一体遵守。其体例：以地理区分：先全国，后以省冠府，以府冠县；以收支数额区分：以总数冠分数，以分数合总数；以收支门类区分。先全国田粮旧额岁入岁出总数，次省府州县分数，次边镇饷额，次库监，次光禄，次宗藩，次职官，次俸禄，次漕运，次仓场，次营卫俸粮，次屯田，次盐法，次茶法，次钱法，次钞关，次杂课。各卷又细分章目，分目之下，又附沿革事例。是一部极重要的财政典籍。

方逢时致仕　方逢时，字行之，号金湖，湖广嘉鱼县(今湖北嘉鱼)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历知县、户部主事、工部郎中、知府、兵备副使等官。隆庆初，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以招降蒙古俺答部有功，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万历初，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累进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万历五年(1577)，召入北京理戎政。后为兵部尚书，以平两广功，进少保。万历九年四月初七日致仕，其功与王崇古相同。时人素以"方、王"并称。有《大隐楼集》。

赐寿阳长公主庄田　万历九年(1581)四月二十四日，明神宗赐寿阳长公主庄田二千五百九十五顷又八十二亩，有司征银解给。

胡嘉谟罢官　胡嘉谟，生卒年不详，字子忠，号进庵，又号止吾，陕西泾阳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由知县、吏部主事、大理寺卿、刑部侍郎、户部侍郎，官至南京操江都御史。万历九年(1581)四月二十五日被劾罢官。

辽阳之败　万历九年(1581)四月，黑石炭部进犯辽阳，明军副将曹簠率军追击，追至长安堡，遇伏兵，千总陈鹏以下三百一十七人战死，又失马四百六十匹。朝廷闻讯，命逮曹簠，而不问罪辽东总官兵李成梁。史称"辽阳之败"。

户部请严查勋戚庄田　万历九年(1581)五月初五日户部奏：勋戚庄田，先因冒滥数多，屯田御史沈阳共查出地二万二千七百二十五顷又六十亩。每年征银四万零一百六十余两。既经追还官即当照例征银解部。而州县不行严追，容纵欺隐，原额渐缺。请将顺天、保定、河间三府历年备边银两严查有无侵匿，其未完银两严限追究，如仍亏原额，并原经催各官分别参奏。得旨允行。

令定保定诸府均徭银　万历九年(1581)五月二十三日，保定抚按辛自修等奏，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六府均徭里甲银计九十二万一千一百四十余两。内解部及兵饷等银二十九万五千八百二十余两，无容议减。其公费并工食等银六十二万五千三百一十九两，先题议减银五万五千八百五十余

两，今复议减银六万余两，实征银八十万五千二百八十五余两。乞刊行各属，永为遵守。诏如议行。

林士章致仕 林士章(1524—1600)，字德斐，号璧东，福建漳浦县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国子监祭酒，终南京礼部尚书，万历九年(1581)五月二十六日致仕。万历二十八年卒，年七十七。

兵部请变卖民间种马 万历九年(1581)五月二十九日太仆寺少卿裴应章建议马政归并屯军。是时，南京湖广道御史于有年亦请裁革无用种马。于是兵部再次上疏请变卖种马，说：洪武初年，军马皆由官养，洪武二十八年令改为民养，至永乐十年行于永平等七府；宣德四年，行于兖州三府；正统十一年行于河南彰德等四府。弘治六年，太仆寺少卿彭礼以户丁有限，请只设种马十万匹，岁取驹二万五千匹。由此始有定额。正德二年，御史王济以户马日弊，请令民买解。嘉靖间，浙江道御史钱璞等人请变卖南通州等七州县马四千一百八十六匹。正德二十九年，应天都御史翁大立亦有此议。隆庆二年(1568)，太仆寺少卿武金请种马尽数变卖。穆宗皇帝命革一半，以苏民困。万历二年(1574)，直隶巡按御史胡秉性，请变卖安东等四县马七百五十四匹。至今存者累刍牧，革者累津贴。其他劳费，难以悉数。盖种马原额十二万五千三百六十六匹，今太仆寺存额八万八千余匹，见马四万一千余匹。南京太仆寺额三万七千四百六十六匹，实一万四千八百零八匹。若尽行变价，收贮太仆寺，以苏山东、河南、南北直隶民困。草料折征，每年银十二万五千余两，积十年可得一百万两。兵部疏上，诏从所议，尽行变卖，以除民害。

定江北七府均徭银 万历九年(1581)六月初三日，凤阳抚按凌云翼等题，江北七府州县每年额编里甲均徭银七十九万七千九百七十四两，今减银十二万五千一百九十六两，实存银六十七万二千七百七十七余两。自(万历)十年始，乞照数均派，永为遵守。诏从此议。

辽东、扬州等地暴风雨成灾 万历九年(1581)八月初九日，辽东定辽等卫雨雹如鸡卵，秋禾尽伤，自长安堡至青石岭，约百余里。同月十六日，扬州、泰兴、海口，如皋等处狂风大作，屋瓦皆飞；骤雨如注，陂塘圩埂尽决，漂没官民庐舍数千间，男女死者不计其数。

山东江西奏报丈量田亩数 自万历五年(1577)底，依大学士张居正之议下令全国清丈土地以后，各省相继奉命进行。万历九年九月十四日，山东抚按何起鸣、陈功首先奏报该省清丈结果：全省军民屯粮地、民地，原额总计七十六万三千八百五十八顷，丈出地三十六万三千四百八十七顷。屯地原额为三万六千九百一十五顷，丈出地二千二百六十八顷。粮悉照旧。往日荒地包赔者，以余地均减。神宗对山东首先完报又调停疲累，区划周详，深为满意，下令嘉奖，命吏部表彰山东抚按并司道官。同年十二月初九日，江西奏报：全省六十六州县官民塘池原额外，丈出地六万一千四百五十九顷五十四亩，免另行升科，即将抵补该省历年小民包赔虚粮。又查出南丰县各佃租田四万七千三百石，武宁县未卖没官田三百七十一亩，通行认价出卖，得银三万六千四百九十两，解部济边。巡按王宗载、巡抚陈世宝、参政乔懋敬以及清丈官六十二名，神宗皆令吏部予以表彰论功。

减免广西湖广均徭等项银两 万历九年(1581)九月二十二日户部复广西抚按郭应聘等题，广西通省均徭里甲兵饷驿传银岁编十七万三千四百两，视旧额实减去一万□千七百四十一两，请刊册遵守。神宗准其请。同月二十七日从湖广抚按陈省等奏，以湖广历年水旱，免本省积欠协济贵州等项银两。又命该省起运钦赏诸绢，悉改官解，不得复佥小民，承运库贮绢见支二年，许折价一年。

陈绍儒逝世 陈绍儒(1506—1581)，字师孔，号洛南，广东南海县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户部主事，管仓差，议牧政，减草料银十八万两。后累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万历九年(1581)九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六，有《大司空遗稿》。

户部请临德二仓停收米谷改纳银两 临清、德州二仓与淮安、徐州二仓并称为明代四大粮仓，专门贮积北运南粮，"实南北咽喉"。万历九年(1581)九月二十七日户部奏：临清、德州二仓，历年全收本色，以防漕粮缺额。今河道通行，漕额无欠，两处积粟至一百万石。年久恐成朽腐，请暂时停收本色，改解折色。待陈粮支放过半，仍收本色。神宗从其请。

命卫所屯田不许混入有司册籍 万历九年(1581)十月二十六日神宗下诏：淮安、凤阳、徐州田地多荒芜，自明年开始开荒垦田。但各卫所屯田，一律不准混入有司开垦数内，以免滋扰。

雷礼逝世 雷礼(1505—1581)，字必进，江西丰城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兴化府司里，平冤狱有方，民视之若神明。官至工部尚书，后致仕归。万历九年(1581)十一月初六日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太保。平生好学，知识渊博，明习典章制度，有《明大政记》、《国朝列卿记》等。

林庭机逝世 林庭机(1506—1581)，字利仁，号肖泉，福建闽县(今福建福州市)人。嘉靖十四年

(1535)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迁司业，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累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后改为礼部尚书。隆庆元年(1567)致仕，闭门谢客，自奉如寒士。万历九年(1581)十二月初四日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太保。谥文僖。有《世翰堂集》。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田赋除收实物外，可以银两折纳；二是可以钱代役；三是丁粮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基本精神是，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将均徭、里甲与夏秋两税合而为一，亦即摊丁入亩，量地计丁，按亩征银。只是由于各地情况不同，丁、地摊派的比例各有不同，有的以田为主，丁为辅；有的以丁为主，田为辅；有的丁田各居其半。一条鞭法，创始于嘉靖初年，当时主要实行于南方的一些地区。其后数行数止。神宗即位，张居正为均平赋役负担，增加财政收入，于万历九年(1581)在全国大力推广一条鞭法。结果国库日益充裕，而豪民大户则为此多对张居正产生不满。实行一条鞭法，简便了赋役手续，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对于它的利弊，当时有许多争论。张居正死后十余年，一条鞭法虽然停止实行，但是以钱银代赋代役的做法并没有随之终止。

冯岳逝世 冯岳(1495—1581)，字望之，号贞新，浙江慈溪县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历工部主事、员外郎、江西按察使、湖广巡抚，以兵部侍郎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后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万历九年(1581)卒，年八十七。有《恤刑稿》等书。

淮、扬暴雨成灾 万历十年(1582)正月十二日，扬州、淮安三分司所属丰利等三十场，风雨暴作，海水泛涨，淹死男女二千六百七十余人，消盐课二十四万八千八百余引，生命财产损失严重。巡盐御史任养心请将两淮库贮经纪抚帖纳稻等银一万零二百一十二两，准令照数动支，分别赈给。至于淹消的盐课，则请行令各总灶陆续完补，听候商人关支。户部亦以为言。神宗诏可。

户部奏浙江等省裁革亲族冒免丁粮数目 万历十年(1582)正月十九日，户部奏：大学士张居正子张嗣修恪遵家训，尽革亲族冒免丁粮。于是各省仿效遵行，今据浙江等处报告，共清出人丁四万零四百八十余人，粮六万三千八百八十余石，请将优免定例刊刻于石，以便遵行。神宗从户部之请。

张居正请减免历年旧欠钱粮 万历十年(1582)二月初八日，大学士张居上疏请减免全国积年逋赋。他说：据户部所报，自隆庆元年至万历七年各省未完带征钱粮，不包括户、工二部马价、料价，计银一百万余两，而江南苏州、松江两府因原来税粮独重积欠七十万余两。请皇上命户部查核万历七年以前旧欠钱粮，除金花银外，全部蠲免。神宗诏准，共免一百万余两。其中，有苏松旧欠七十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两、淮、扬等处二十四万九千六百三十两、兵部带征未完纳的十六万四千二百六十两、南京户部未完纳的二十一万五千两，总数超过免租诏令所规定的数量。

杭州兵变 杭州东、西二大营士兵，每名月给饷银九钱，巡抚都御史吴善言奉诏议减三分之一。士兵对此多有怨言。万历十年(1582)三月初二日，营兵马文英、刘廷用等带领众人上诉于巡按御史张文熙。吴善言威胁说：减饷之事已定，不愿当兵的听其回家务农。次日，士兵大噪，围攻督抚衙门。转而拥入巡抚衙门，痛打吴善言。张文熙等多方劝慰，士兵们才放回吴善言。张文熙为此上疏弹劾吴善言抚治无方，处事不当，自找殴辱。三月初九日神宗遂命张佳胤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许其便宜行事，镇压兵变，勒令吴善言去官归家，其余有关人员或降级调用。

周永奏报辽东清丈屯地亩数 万历十年(1582)三月初六日，辽东巡抚周永奏丈出屯地八千九百零三顷五十余亩，屯粮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余石；科地、米地二万四千一百八十八顷七十余亩，科粮地米九万零九百余石。户部说：虽未足国初原额，而较历年已十增其一。中间应行事宜，如屯粮最重，量为递减，养廉，马价等田及额外米粮严行裁削，营田、屯田，各从卫所之便。科粮地米仍照历年征收。其关银、赔补二项，惟广宁屯卫浮粮无田抵补，准予豁免。

速把亥殒命 万历十年(1582)三月十八日，泰宁部长速把亥与弟炒花等率众进犯义州(今辽宁义县)，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在镇夷堡埋设伏兵，速把亥为明军参将李平胡射中，坠马，被斩身亡，其众逃窜。速把亥为患辽东二十年，至此殒命。神宗得报大喜，赐李成梁甲第京师，世袭锦衣指挥使。

赐永宁长公主庄田 万历十年(1582)三月二十五日，明神宗按寿阳长公主之例，赐永宁长公主庄田二千五百余顷。

宁夏土军起事 万历十年(1582)四月初七日，宁夏灵州守御千户所土军马景等人起事，杀死参将许汝继，屠其家。巡抚都御史晋应槐发兵讨伐。官

军捕获起事者三十余人，杀死二十余人。

何宽致仕 何宽(1515—1587)，字汝肃，浙江临海县人。由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历南京刑部主事、郎中、成都知府、大理寺卿，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万历十年(1582)五月十五日致仕。万历十五年卒，年七十三。

杭州民变 万历十年(1582)五月二十八日，绍兴府上虞县流民丁仕卿以反对官府行保甲之制，发动市民起义。折毁楼栅门，焚劫乡官宅舍，肆行抢掠。张佳胤抵杭州后立即张榜安民，市民皆不听，并进围衙门，拘留布、按二司官员，号召民众出刀枪，分路出击，焚劚富室，声势益壮，城中火光烛天，哭声振地。张佳胤召游击徐景星，命东、西两营官兵守卫各衙门，逮捕起义市民。先后捕一百五十余人，丁仕卿等九十五人被打死，韩谨等五十二人被斩，其中包括三月兵变发动者马文英、刘廷用。民变平息。张佳胤上疏报告朝廷。神宗览阅奏疏，嘉叹不已，赏张佳胤、张文熙等人有差。

两广总督刘尧诲奏报官军及应用钱粮数目 万历十年(1582)六月初七日，两广总督刘尧诲奏，该省见在卫所官军共三万四千一百一十三名，应支月俸粮米四十万一千五百五十余石，将领水陆官兵马兵共三万九千一百一十八名、匹，应支饷银三十八万二千零四十二余两，解部济边银二万九千九百九十二余两，其余米四千五百八十三石及余银二万零一百九十三两。

曹一夔疏论盐政 万历十年(1582)六月十三日，长芦巡盐御史曹一夔疏陈盐政九事：一清灶地，二除重差，三禁私盐，四免旧欠，五课私煎，六复盐引，七更盐(改富国为盐场，新镇为银场，以从商便)，八割没银，缴引目，九官买余盐。九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恢复官买余盐的制度。对此，户部答复说：官买余盐之制，已经奏请裁革，不可恢复。神宗亦认为：食盐日用所需，当从民便，今后经商自行发卖，不必派发派散，徒滋扰民。

张居正逝世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县(今湖北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中，官至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神宗初政，他与司礼太监冯保相结，逐高拱，代为内阁首辅。终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卒，年五十八。赠上柱国，谥文忠，命专官护丧归葬。张居正深沉机警，多智数，有大志。他秉政十年，抑近侍，严考成，核名实，载驿站，清地亩，整武备，大力振纲剔弊，讲求富国强兵，对当时经济富庶、政治稳定、边防巩固，多有贡献，是明朝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杰出的改革家。然偏激多忌，挟私报怨，箝制言路。加之整顿赋役触动了权豪势要利益，招致怨恨。他死后不久，太监张诚等人陆续疏劾他，遂被追夺官阶，他所任用的人也先后斥削殆尽，而昔日为他所罢降的则多复官起用。人亡政息，连他推行的改革措施也渐渐付之东流。后来又被抄家没产、“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家属或惨死或发配充军。时人评论说：张居正“功十而罪一”，“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大节不失，功不可没。许多人怀念他的功劳，至天启元年(1621)复官如初。有《张文忠公全集》。

山西大饥 万历十年(1582)六月，山西连年大旱，百姓死亡，平凉、固原城外掘大坑三、五十处，处处皆满，时天热，满坑臭烂。

萧大亨奏报宣府清丈土地顷亩 万历十年(1582)七月初一日，宣府巡抚萧大亨奏，经清丈该镇额地六万三千一百顷三十六亩，均派粮十九万四千九百一十八石，比旧额多三分之一。其中，保安、延庆、永宁丈出余地一千四百六十七顷四十一亩，各照民地额例通融减征外，卫所地各依等则酌量递减。养廉、赡军、学田等地，有原来未征银者，量行征粮。地多粮少，地肥粮轻，以及有地无粮者，俱尽数丈出，以补水滩沙压。有粮无地，粮重减轻之数包赔者，悉与开除豁免。影射者，尽行厘革。

郭应聘报广西丈出官民田地顷亩 万历十年(1582)七月初九日，户部复广西巡按郭应聘奏经清丈该省田粮，除补足国初原额外，多余官民田七百六十八顷八十七亩，该粮三千八百九十八石。于内余粮不多者并入实征，原科过重，均摊减轻者，恐岁费不敷，仍听征输。其余州县、卫所历年隐占失额田粮俱清复完足赋役条编，悉照旧额外，折征纳银，免其杂差。

苏州等府暴风雨成灾 万历十年(1582)七月十三日，苏松诸府太仓、常熟、上海、崇明、嘉定、吴江等县以及扬州府，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河涨海溢，拔树木，毁庄稼十万余顷，漂没民居十万区，淹死二万人。

辛应乾奏山西太原等应役人丁数目 万历十年(1582)七月十五日，山西巡抚辛应乾奏，经编审太原、平阳、潞安三府以及泽、辽、沁、汾四州各属州县，万历十年、十一年徭役人丁共一百五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一丁。除优免者，实在应差人丁一百四十四万零二百二十。卫所共七万一千一百六十二丁，除优免者，实在应差人丁四万一千八百五十六。

诏免豫、鲁、江浙马价银　万历十年(1582)七月二十一日，神宗从河南巡抚褚铁之请，免该省站银三万三千三百九十余两。又准山东巡抚杨俊民的请求，尽免济南、兖州、青州、莱州、登州五府万历七年以前未完驿传站银、马价银计四万三千九百九十余两。免江浙苏、松、凤阳等处未完协济马价、水夫等银共四万三千七百余两。

张佳胤奏浙江清丈土地顷亩　万历十年(1582)七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张佳胤奏称，经清丈中各府州县、各卫所田地山场等项，除补足原额外，属民者多出田地一万六千一百一十二顷十亩，基地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余间，税粮五万七千二百七十余石，租丝十三万九千二百五十余两，钞一千四百一十余锭。属军者多出田地三十四顷五亩，税粮五百六十石。即以多出税粮均派军民额征数内通融减派。将各官民田土，按地定则，因则征粮。并将各废寺湖田、官地荒地等项清查变卖，共银九千六百七十余两充饷。"自此豪猾侵隐可以尽革，民间赔累可以尽苏"。

凌云翼奏江北清出隐占田亩　万历十年(1582)八月初三日，凤阳抚按凌云翼、姚士观奏，江北境内，凤阳一府清丈出隐占田一万八千二百九十余顷。除补失额外，剩一万一千零二十余顷。淮、阳(扬)、徐二府一州清丈出隐占田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余顷，除抵补外，尚有沙压，水滩并水深难量地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余顷。凤阳、淮安等卫所清丈出屯地七百一十三顷二十余亩，除抵补外，尚有水滩沙压地三百六十八顷八十余亩。扬州等卫清丈出地五百七十六顷七十三亩，除抵补外，剩五百五十九顷九十余亩。

诏取太仓及光禄寺银　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二日，神宗命内阁取太仓银二十万两、光禄寺银十万两，作为充赏之用。户部说：旧例，岁征金花银一百万两，续增买办银二十万两，每年共一百二十万两，皆供皇上赐赏之用。但近年金花拖欠数多，已借过备边银计一百余万两，尚未补还。今年二月，奉旨减免带征等项本色绢布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余匹，本色颜料、蜡、茶三十三万七千一百六十余斤，起存本折各项银一百零三万六千六百余两，本色粮米六十五万五千二百余石，马草一百七十七万九千一百三十余束。未入考成拖欠钱粮约计本折尚有二百万余两。神宗明知岁入艰难，仍令照数征取。

褚铁报河南清丈土地顷亩　万历十年(1582)九月初三日，户部复河南巡抚褚铁奏，经清丈所属州县官民地九十四万九千四百九十三顷七十四亩，除补足原额外，多出地八千零九十三顷十七亩。又额外丈出废绝，王府还官及官塘陂堰新增人户民种军屯等地共九千一百一十四顷三十三亩，共征银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四两，俱解司府库凑补各王府禄粮并各卫所官军月粮支用。各卫所屯地四万六千零九顷五十九亩，屯粮二十四万零五百三十七石，新增屯地一万四千九百三十五顷二十五亩，新增屯粮六万四千八百一十一石。除补足原额外，多余地四千一百三十三顷四十一亩。又清查过南阳、唐、邓各卫所开垦屯余地三万二千一百八十一顷七十亩，每年征银二万一千二百四十余两。

王国光罢官　王国光，生卒年不详，字汝观，山西阳城县人，由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吴江知县，历兵部主事、户部右侍郎等职。隆庆四年(1570)起为南京户部尚书，再次总督仓场。神宗即位，还京理户部事。国光有才智、掌国计，多有建树。五年，任吏部尚书，采实政，别繁简，责守令，恤卑官，罢加纳，以功加太子太保。万历十年(1582)十月十三日，云南道御史杨寅初劾其擅支工部银一万两修理大房等罪，神宗接疏责王国光"欺君蔑法"，遂令落闲住位。已念其劳，命复官致仕。

潘恩逝世　潘恩(1496—1582)，字子仁，号湛川，更号笠江，南直隶上海县(今上海市)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历官山东副使、江西副使、浙江左参政，以御倭有功，升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潘恩遇事敢为，不惧强御，疏劾徽王载埨贪虐，伊王曲横骄横，名声大震。进左都御史，致仕。万历十年(1582)十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七，赠太子少保，谥恭定。有《笠江集》。

王汝梅奏报榆林等卫清丈屯地顷亩　万历十年(1582)十月二十日，陕西延绥巡抚王汝梅奏，经清丈榆林、绥德、延安三卫原额屯地三万九千七百五十三顷四十三亩，原额屯粮六万七千七百三十三石，历年失额及沙滩水压甚多。今次清丈，除补足原额外，尚多抛荒屯地三十顷四十三亩，征粮七十一石，以备正额召垦不尽之数。地多粮少、地肥粮轻与有地无粮者，悉予改正。有粮无地、粮重地轻者，悉予开除。

定潞王岁禄旗尉　万历十年(1582)十月二十六日，神宗定其弟、潞王朱翊镠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在京，每年支三千石，钞一万贯。给旗尉六百人，军一千人，以作侍卫等用。

刘斯洁致仕　刘斯洁，生卒年不详，字莪山，北直隶易州(今河北易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祠祭郎中。有藩府奏求优伶，夜遗千金，刘斯洁坚决拒纳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万历元年(1573)二月初一日因事被劾罢官。万历九年十一月，

复起为南京礼部尚书，万历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致仕归家。

陈省奏湖广清丈土地顷亩 万历十年(1582)十月二十九日湖广巡抚陈省奏，经清丈武昌，郴州等府官民田地山荡湖共八十三万八千五百二十五顷四十六亩，除补足失额九千五百六十七顷二十四亩外，尚多五十二万零六百零八顷六亩。通融减派起存官民夏税麦十三万二千石，秋粮二百零三万零二百八十石。鱼课银七百一十二两。武左等卫屯田地山塘堰七万七千七百五十六顷二十一亩，除补足原额屯粮三十九万六千一百二十石，尚多地三万一千二百九十五顷四十八亩，应科屯粮五万一千零八石。

张士佩报四川清出田地顷亩 万历十年(1582)十一月初四日，四川巡抚张士佩奏，经清丈所属军民田地，除补足原额以及豁免无征虚粮、水滩沙压粮外，尚多余田地二十七万四千五百二十余顷。

命办潞王婚礼金珠各色 万历十年(1582)十一月十三日，明神宗以其弟潞王朱翊镠婚礼，令户部取黄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万七千块、各色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珍珠二万四千八百余颗。户部以岁用告匮，要求减少，神宗不听，命照数采办。

冯保闲住 冯保，生卒年不详，字永亭，号双林，北直隶深州(今河北深县)人，阉割入宫。嘉靖中，为司礼秉笔太监。隆庆时，提督东厂兼管御马监。万历初，他集司礼监、东厂等权力于一身，在内廷依靠神宗生母李太后，在外廷与大学士张居正相结，专擅威福，神宗对此甚为不满。及李太后归政、张居正病死，冯保仍不知改悔，“肆横如故”。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被他驱逐的太监张诚回到宫中，尽揭冯保，说他家中的金银财宝超过内府积蓄。十二月初七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揭露冯保家奴徐爵的罪行。十二月初八日，江西道御史李植进而劾冯保利用权势侵吞大量私人财宝等十二条罪状。神宗得疏下旨：冯保欺君害国，罪恶深重，本当处斩，念其效劳日久，姑从宽发往南京闲住，后死于此地。又抄其家，得“金银百余万”，奇珍异宝不计其数。有《经书音释》。

梁梦龙致仕 梁梦龙(1527—1602)，字乾吉，号鸣泉，北直隶真定县(在今河北石家庄地区)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由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历吏科都给事中、顺天府丞、河南副使、河南右布政使。隆庆四年(1570)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五年，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万历初年召他为户部右侍郎，后改为兵部左侍郎，进右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以亲率精兵三千人出山海关援助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立战功，加兵部尚书，再加太子太保。万历十年(1582)十月改任吏部尚书。十二月初七日致仕。家居十九年卒，年七十六。天启中，赠少保。崇祯末年，追谥贞敏。有《史要编》、《海运新考》。

曾省吾致仕 曾省吾(1532—1582)，字三甫，号确庵，湖广鍾祥县(今湖北钟祥)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由富顺知县，官至工部尚书。与大学士张居正关系密切。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初七日致仕。十二年三月被劾削职为民。

陈瑞奏两广清丈土地顷亩 据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初八日户部复两广总督陈瑞的奏疏说，经过清丈所属官民田地山塘共三十二万九千六百三十顷三十亩，除补足原额二十五万九千五百零五顷七十二亩，尚余七万零九十四顷五十八亩。都司所属屯田地塘共七千九百六十九顷四十八亩，除补足原额六千八百五十一顷四十二亩，尚余一千一百一十八顷六亩。其历年失额仃征水冲沙压等项官民田地二万四千五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屯地六百八十九顷三十四亩，通融摊派，照则减征。

陕西报清丈官民地亩 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二十三日，陕西巡抚萧廪奏，经清丈全陕官地共一千二百八十顷四十七亩，比原额少一顷二十七亩。民地五十万二千二百九十九顷二十五亩，除补足原额外，多地三万零九百八十八顷二十三亩，应通融减派均摊足额。其中，富州等二十七州县仍少额抛荒民地一万九千五百三十八顷六十六亩，固原镇东河等卫所少额屯地一千零五十顷八十七亩，并前少额官地俱系先年虚增抛荒之数，应予免除。户部回复:准从其请。

吴承恩逝世 吴承恩(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南直隶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由嘉靖贡生，任浙江长兴县丞。吴承恩自幼爱好神话故事，工诗能文，由于宦途困顿，晚年从事著述。其代表作小说《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我国四大古典名著。另有《射阳先生存稿》等书。万历十年(1582)卒，年八十三。

殷正茂致仕 殷正茂(1513—1592)，字养实，号石汀，南直隶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行人、兵科给事中、广西、云南、湖广兵备副使、江西按察使。隆庆三年(1569)冬，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调兵十四万人，讨平广西古田僮民起事，进兵部右侍郎。后提督两广军务，以功加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万历三年(1575)迁南京户部尚书，四年召入为户部尚书，六年六月致仕。复起为南京刑部尚书。万历十一年正月初八日致仕。殷正茂在两广时，对部下持法严，而自己则贪婪无厌，“岁受

属吏金万计”。万历二十年卒，年八十。

高文荐报延宁二镇丈出荒田顷亩 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十三日，陕西总督高文荐奏，延绥、宁夏二镇丈出荒田计一万八千九百九十顷，招民耕种，三年后起科，以充军饷。阅视都给事中萧彦驳其疏，请永不起科。户部答复说：开垦荒田永不起科，原系旧例。况且延、宁二镇地方多砂碛，未尽可耕，宜听“军民告官自垦，永不起科”。神宗同意户部的意见。

甘肃奏报清丈屯地亩数 据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十五日户部复甘肃巡抚王旋、巡按吴定奏称，因该地土瘠天寒，加以屯地粮重，致使屯额渐亏。今次清丈实在地四万五千九百九十三顷三十五亩，共粮二十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五石，俱定为额。其水退淤出、额外抛荒等地皆听军民随便自行开垦，永不起科。

缅甸莽应礼进犯云南 万历十一年(1583)闰二月，缅甸莽应礼率众进犯云南腾越、永昌、大理、蒙化等处，杀掠居民无数。继而又攻陷顺宁，明军指挥吴继登、千户祁维垣战死。神宗从云南巡抚刘世曾之请，命南京坐营中军刘绖为腾越游击将军、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统兵五千人，并调各土司兵，合力反击，剿灭莽应礼。至同年四月，大败莽应礼，斩其众六百四十五人。

魏允贞疏言救弊事宜 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初四日，山西道御史魏允贞上疏言救弊四事：一公文武之用。文职如九卿，武职如总兵，皆应依制度由多官会推。二严科场之防。读卷官应秉公办事，若有结交权门、受富豪请托者，由科道官指实具奏。辅臣子弟中式，廷试读卷宜按例引嫌回避。三慎台谏之选。给事中、御史必须选用有才干操行、刚直有气节、练达世务、明习朝章、忠实有识之人。四务战守之实。魏允贞疏上，神宗以其“漫逞私臆，语多过当”，降旨切责。

礼部议开藩禁 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初八日，礼部言：皇上以河南抚臣疏陈宗禄不敷恤宗通变事宜，令五府九卿科道官从长会议。据诸臣之疏，不过请限封爵之制，开四民之业，弛出入之禁。对此部议意见不一，有说称便，有说不称便，可否互异。神宗命派人前去河南、山东等处宗禄不敷府分，进行调查，从长计议，务求便宜可行，作速会奏，以便廷议决定。

赐潞王庄田 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十五日，神宗诏给其弟潞王朱翊镠庄田二千顷，盐一千引，由两淮运司解府供应。

吴兑致仕 吴兑(1525—1596)，字君泽，号环洲，浙江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授兵部主事。隆庆五年(1571)秋，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吴兑有智计，以抚服蒙古俺答部有功，于万历二年(1574)初加右副都御史。万历不久，加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万历五年夏，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万历十年，进太子太保，授兵部尚书。万历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因御史魏允贞等人劾其历附高拱、张居正，并贿赂冯保金千两，遂准予致仕。万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二。吴兑长期守边，其功与王崇古、方逢时可相比媲美。

命免苏松驿传等项银两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十八日，免苏、松驿传银六万八千九百余两。七月十二日，免苏松万历十年禄米、盐、布等银四万四千二百余两。

赵贤致仕 赵贤(1534—1606)，字良弼，号汝泉，河南汝阳县人。由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授户部主事，先后赴山东临清监仓、辽东督饷，皆有声。后，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万历初，大学士张居正整饬吏治，赵贤的政绩居巡抚之冠。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二十一日致仕。万历三十四年卒，年七十三。

陕西兴安州大水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兴安州猛雨数日，汉江溢，水高城丈余，全城淹没，公署民舍一空，溺死者五千余人，全家被溺死者不计其数。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 万历十年(1582)，建州女真王杲之子阿台在进犯沈阳时被杀死，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父亲塔先亦身亡。万历十一年五月，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起兵讨伐尼堪外兰，克图伦城，尼堪外兰逃到边塞近地的鄂勒珲城。此役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之始。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完成统一建州女真苏克苏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陈部等五部。此后，他又逐一攻并女真其它各部。

严清致仕 严清(1524—1590)，字公直，号寅所，云南后卫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富顺知县，升工部主事、郎中，出任保定知府。后历易州副使、陕西参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皆以清廉著称。隆庆二年(1568)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僚吏惧其风采，相率勤职效命。罢成都团操，惩强宗悍吏，处处事国利民。万历二年(1574)以后，历任贵州巡抚、两京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张居正柄政，尚书不附丽者独严清。籍冯保家，得廷臣贿赂簿册，亦无严清名。因此，深得神宗器重，进为吏部尚书。严日讨故实，辩官材，自丞佐以下皆亲署，无一倖进者。万历十一年七月初二日致仕。严清在官，约己爱人，廉俭

奉公，二十年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太保，谥恭肃。

凌云翼致仕 凌云翼，生卒年不详，字洋山，南直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由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官南京工部主事、郧阳巡抚。万历元年（1573），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不久，升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以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后历南京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加太子少保。再召为戎政尚书。万历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致仕。

韩应庚条陈救荒事宜 万历十一年（1583）九月十七日，巡按陕西御史韩应庚上疏言救荒十事：一、发仓米以活饥民。二、平斗斛以均赋税。三，清库余以抚逃民。四、借俸薪以助耕种。五、缓催科以苏民困。六、省经费以宽民力。七、减讼狱以给民休息。八、停商税以通货财。九、裁冗役以济贫生。十、设官兵以灭盗贼。神宗皆予允准。

刘思问致仕 刘思问（1519—1583），字汝知，号紫山，云南河阳县（今云南澄江）人。由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授苏州府推官，升御史，迁南京右都御史。万历十一年（1583）八月二十五日，进南京户部尚书，九月二十四日致仕，同年卒，年六十五。

徐学谟致仕 徐学谟（1522—1593），初名学诗，后改今名，字叔明，又字子言，号太室山人，南直隶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历兵部主事，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郧阳，迁湖广布政使。万历六年（1578）被召入京任刑部侍郎。万历八年十二月为刑部尚书。万历二年后又晋为礼部尚书。十一年十月初一日致仕。万历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二。有《万历湖广通志》、《归有园稿》、《徐氏海隅集》。

张士佩致仕 张士佩（1531—1609），字玫夫，号濂滨，陕西韩城县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授绍兴府推官，断狱公允。升巡抚，进吏部左侍郎，终南京户部尚书。张居正死后，吏科给事中邹元标疏劾礼部尚书徐学谟时，并及张士佩，说他不次升擢，飞黄腾达。于是神宗于万历十一年（1583）十月初一日令张士佩以吏部左侍郎致仕。万历三十七年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太保。有《六书赋音义》。

孟一脉疏言时政 南京陕西道御史孟一脉于万历十一年（1583）十一月十九日，上疏建言五事：一曰保圣躬。说近来再选宫女九十七人，非节欲之道。二曰正人心。选士必须先品格后才华。三曰厚民生。今差役繁重，民力日竭，守土官应当实心用事，使民安心于农。四曰禁淫巧。数年来用度无止，今日征光禄寺银，明日取太仆寺银，今日取江西浮梁之磁，明日采广东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殊不知财货易尽，嗜欲无穷。五曰整戎兵。今边疆之臣，日弛戎备，上下蒙蔽，多以败为功。必使其一一讲求战守之备，使将识敌情，兵识将意。时神宗"方留意声色游宴"，所以他一见到孟一脉奏疏，便下诏说："两宫近来织造袍服及器物等项，专备供奉，皆不容已。况发有帑银，原不扰民"。孟一脉"轻率渎奏"，"卖直沽名"，今后言官建白时政，"不许掇拾浮词"。否则，将"重治不饶"。遂贬孟一脉为建昌推官。

南京军士逃亡 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初四日，兵部说：南京军队原额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人，今见在只三万四千二百余人，减少近四分之三。宜令南京兵部按后湖旧册逐一清查补足。神宗从兵部之请。

李伟逝世 李伟（1510—1583），字世奇，北直隶漷县（在今河北天津地区）人，神宗生母李太后的父亲。隆庆改元，授都督同知。神宗即位，封武清伯，进武清侯。李太后能约束其家，李伟有过失，太后即召入宫进行严厉批评。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十三日卒，年七十四，赠安国公，谥庄简。

刘尧诲致仕 刘尧诲（1522—1585），字君纳，号凝斋，湖广临武县（今湖南临武）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历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督军征倭，并与海上武装集团林凤等人在闽、粤等地进行斗争。其后移抚江西。再升为两广总制，与张任等人一起统领大军进剿广西八寨瑶、僮等族起义。终南京兵部尚书，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二十三日致仕。万历十三年卒，年六十四。有《虚籁集》。

王畿逝世 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学者称龙溪先生，浙江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受业王守仁（阳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夏言斥其为伪学，遂去官归里，从事讲学，教授生徒。足迹遍东南、吴、楚、闽，皆有讲舍。年八十余仍不肯休息。善言谈，能动人，所至听者云集，是明代有名的思想家。与王艮齐名，皆得"王学"精髓。死时年八十六。有《王龙溪全集》等书。

范俊削职 万历十二年（1584）正月二十六日，湖广道御史范俊疏陈时政十事：一、奉天道。一念一事稍不正，即无以合天心，顺天道。二、防人欲，明纵欲之害，远绝酒色。三、信诏令，不能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四、定章奏。五、广俭德，爱惜民力，节省费用。六、专事权，亲理朝政，勤于国事。七、惜人才。八、养士气。九、斥巧宦。十、清武职。范俊所言十事，切中时弊。而时神宗"方留意声色游宴"，因此当他接到范俊的奏疏后大怒，认为范俊是"掇拾陈言，轻肆渎

奏，全无爱君之心”，“当从重治处”。经阁臣申时行等人疏救，免去廷杖，削职为民。

屠叔方请释放建文朝被害诸臣后代　万历十二年(1584)二月二十日，广东道御史屠叔方上疏请释放建文朝被害诸臣的后代，以瞑被害诸臣之目。神宗遂下诏：“除齐泰，黄子澄外，凡因方孝孺等人罪被株连者，一律准于释放还乡。”于是远戍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等省得免者凡三千余人。

户部请豁免虚粮　万历六年(1578)大学士张居正丈量土地时，“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致民负虚粮之累。万历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户部同意屯田御史江东之以及户、工二科萧彦、张栋等人的意见，上疏请改正虚浪，以除民累。神宗说：“清丈田地，本为查清虚额，豁免虚粮，永除民累。准你部之议。”

刘一儒致仕　刘一儒，生卒年不详，字孟真，号小鲁，湖广夷陵州(今湖北宜昌)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为人清高廉直，与大学士张居正系儿女姻亲。张居正死，亲党多坐斥，刘一儒则以高洁之名独免，晋南京工部尚书。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十六日致仕，后死于家。天启中追谥庄介。有《刘庄介公瑞芝堂集》。

孙应鳌致仕　孙应鳌(？—1584)，字山甫，号淮海，清平卫(今贵州独山县)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选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出为江西佥事。因平息农民起义有功，迁陕西提学副使、四川右参政。隆庆元年(1567)升佥都御史，巡抚郧阳晋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隆庆三年(1569)二月二十一日致仕。万历改元，历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终南京工部尚书。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十九日致仕，同年逝世，谥文恭。有《左粹题评》、《幽心瑶草》、《教秦绪言》、《教秦总录》、《淮海易谈》、《易谈》、《雍谕汇稿》、《续稿》、《春秋节要》、《律吕分解》、《学孔精言舍汇稿》、《四书近语》、《庄义要删》。

董基疏罢内操　万历十二年(1584)五月初九日，刑部广西司主事董基冒死抗疏，说：内廷清严地，无故聚三千之众，轻以凶器尝试，臣实为皇上的安危担扰。皇上以为有此三千人就可以有恃无恐吗？殊不知此辈皆无当实用。他们安居美食，筋骨无力，一旦执戈衣甲，寒暑演练，没有不怨的。聚三千蓄怨之人于内廷，没有比此更为危险的。且自内操以来，赏赐已超过二万两。长此下去，财力岂能不竭。以有用之财，浪费于无用之地，实在是太可惜了。董基以一片忠君赤诚之心，得到的竟然是被贬职逐出都门。明神宗以其“不系言官，逞臆渎扰”之罪，贬为万全都司都事。直至次年三月因廷臣再三疏谏，才被迫罢内操，并改董基为南京礼部主事。

杨文举疏言四川采木之苦　万历十二年(1584)六月初十日，吏科给事中杨文举备言蜀中采运之苦，条陈从容采取四便：一、无累商民；二、体恤夫匠；三、鼓励土司；四、优待命官。神宗深以为然，令工部立即予以实行。

郑世威逝世　郑世威(1503—1584)，字中孚、号环浦，福建长乐县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江西按察佥事、副使。为人刚直敢谏，数上疏逆夏言、严嵩，不屈权贵。转湖广参议，时严嵩主政，被劾归家，教授生徒，躬耕自给。严嵩败，起官南京右通政，升左副都御史，进刑部右侍郎。因上疏谏阻采珠不报，愤而以病谢政，杜门不出。生活简朴，粗布淡食三十年如一日。万历十二年(1584)卒，年八十二。谥恭介。有《岱阳汇稿》、《长乐乘》诸书。

王之垣致仕　王之垣(1527—1604)，字尔式，号见峰，山东济南新城县人，由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历荆州府推官、刑科给事中、都给事中、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大理寺少卿、南京太仆寺卿、太仆寺卿、顺天府尹。万历五年(1577)，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在武昌杀害明代有名的学者何心隐。万历八年迁户部右侍郎，万历十年督理京营，万历十一年改户部左侍郎，总督仓场。万历十二年八月初一日致仕，万历三十二年卒，年七十八。赠户部尚书。有《历仕录》，详记其劾诛何心隐事。

广西兵变　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初五日，广西平乐营兵起事，杀伤四十余人，并逮捕乡官王佩摇等。朝廷命官兵前往讨伐，参加兵变者几被杀尽，首要分子徐凯被俘不屈，自缢身亡。两广总督吴文华奏报，神宗令将平乐知府周祈(一作周初)逮捕入京问罪。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周祈被逮至京，明神宗欲重治其罪，因阁臣申救，从宽革职为民。

诏取户部银两　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十三日，文书官刘恺口传内阁拟旨，取户部太仆寺银三十万两充赏。大学士申时行等反复请减，语甚切至。神宗准减其半。同日，他又令户、兵二部：因秋祭山陵赏赐各项人等需要，征取太仓银五万两、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应用。兵部复持不可，神宗不听，只好如数送呈。

疏请修订《大统历》　先是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二十九日，钦天监奏：根据《大统历》推算，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午刻将发生日食，时间为九十二秒。但依据《回回历》计算，不会发生日食。至十一

月初一日午刻，果然没有出现日食的现象。《大统历》颁于明初洪武年间，实则沿袭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编定的《授时历》。历久必差，这次《大统历》推算不验，说明它已经失去准确性，亟需重新修订。

余有丁逝世 余有丁(1527—1584)，字丙仲、号同麓，浙江鄞县人。由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春坊、祭酒、礼、吏两部侍郎，累官至礼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性宽大，在内阁与申时行等人和衷共济。万历十二年(1584)十一月十七日卒于官，年五十八，赠太傅，谥文敏。有《余文敏公集》。

诏陈献章、胡居仁、王守仁从祀孔庙 万历十二年(1584)十一月，大学士申时行等奏陈：王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学》，良知出于《孟子》；陈献章言主静，则为沿袭宋儒周敦颐、程颐。而且孝弟出处如陈献章，文章功业如王守仁，纯心笃行如胡居仁，故三人并宜从祀。同年十一月十八日，神宗遂命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三位先臣从祀孔庙，列于薛瑄之后。

工部奏罢开矿 明代的矿业政策不断变化，屡开屡止。至嘉靖以后又广行开采银矿，公私交骛矿利，遂酿成浙江、江西一带盗患不止。隆庆初年，罢蓟镇开采，南中诸山亦立碑明令禁止。到万历十二年(1584)，奸民又不断上言开矿之利；而廷臣则力言其弊，反对开采。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神宗从工部所议。

陈经邦致仕 陈经邦(1537—1615)，字公望，号肃庵，福建莆田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东宫讲读官。万历元年(1573)，充经筵日讲官，历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加太子宾客。改吏部左侍郎。万历十一年，掌詹事府事，纂修《穆宗实录》，官至礼部尚书。万历十二年致仕。万历四十三年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少保。有《陈文恪公遗稿》。

张瀚撰《松窗梦语》 《松窗梦语》八卷，张瀚撰，纂修於万历十二年(1533)前。张瀚字子文，号元洲，仁和(今浙江杭州市)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历庐州知府、陕西巡抚、总督漕运、总督两广军备、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全书八卷，分为三十三纪，内容广泛。有作者任职措置，有作者所到之地的风俗人情，有西北少数民族与明廷的关系状况，有农工商及宗藩的状况，有诠选制度、漕运制度的记述，也有四川盐井、油井、火井数量与地点，更有手工业主的发家史。还记录了花木的培植与鸟兽的驯养等。是一部流传甚少而又是很有价值的史料笔记。

四川建武所兵变 四川建武所士兵骄纵，不听节制，并要求预给月粮。总兵官沈思学骤然裁革，士兵不服，于万历十三年(1585)正月十九日夜哗变起事，放火焚烧总兵官署，击伤沈思学，四川巡抚雒遵不能止。神宗派兵镇压。沈思学除名为民。至同年六月，建武所参加哗变的士兵范泰龙(一作范大龙)、李德等十余人被杀，并传首所部。

张学颜致仕 张学颜(？—1598)，字子愚，号心斋，北直隶肥乡县(今河北肥乡)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历任曲沃知县、工科给事中、山西参议、永平兵备副使、蓟州兵备副使。隆庆五年(1591)，荐升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抚辽期间，学颜首先大力赈恤军民，整饬军伍，招抚流民，督造军械，买战马，明赏罚，以经划战守立功，进右副都御史。万历初，加兵部侍郎。五年(1577)召入为戎政侍郎，再改为户部尚书。重修《万历会计录》，认真理财，协助张居正清丈土地。又随事纳谏，节省宫中费用。万历十一年四月，改任兵部尚书，又加太子少保，进太子太保。万历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致仕。二十六年八月卒于家。赠少保。

颁布《问刑条例》 礼部重修《大明会典》，要刑部提供有关法律资料。刑部尚书舒化与吏部尚书杨巍，遂选辑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历次诏令以及《宗藩条例》、《军政条例》、《捕盗条例》、《漕运议单》中与法律相关的条款，以律令为正文，以事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汇编成书，定名为《问刑条例》。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初十日书成，令刊布中外，司法机关按《问刑条例》执行，不得违反。

董子行奏陈镇抚官宜久任 万历十三年(1585)五月十九日，神宗退朝之后，在平台召见内阁首辅申时行等商议陕西巡按御史董子行奏疏。董疏称：抚镇官当亲自巡历地方，不可推诿给将吏；巡抚宜久任；沿边兵备官宜加优待；沿边同知、通判等官宜慎选用，破格迁除。神宗说：董子行所言甚对，边事重大，若抚镇官不亲历地方，专委小官，岂不误事。申时行等人说：诚如皇上所说，边事全赖抚镇官，若他们每年巡历地方，下人不敢欺骗，自能尽心料理，巡抚久任，不惟人才得以展布，发挥作用，而且百姓亦得相安无事。神宗说：巡抚久任者，宁可加俸加衔，也不可轻易更动。"辅臣召对之典，自孝庙后至是再举"。

龚懋贤疏言政事 万历十三年(1585)六月初三日浙江道御史龚懋贤奏陈：今天下所少者有五：皇上可以倚为心腹之人少、中外兵少、民间财少、士论公道少、天下任事之人少。而所多者则有三：在朝廷冗费多，在天下刑狱多，在时事隐忧多。神宗是其言。

宝应县越河修成 (南直扬州府高邮州)宝应

县西有汜光湖，号重险。明初陈瑄筑石堤于湖之东，蓄水以为运道。但上有所受，而下无所泄，因决为八浅，汇为八潭，则兴、盐诸场皆没。而淮水又间从周家桥漫入，汹涌排空。万历十年(1582)大风，一日溺死千余人。万历十二年毁坏漕船数十艘。于是总漕李世达、巡按马永登、盐官蔡时鼎议于石堤之东开越河，以避其险。万历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工成。河身长一千七百七十六丈，石闸二座，减水闸三座，堤九千二百四十丈，石堤三千零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费银二十余万。总河王廷瞻奏报，神宗赐越河为“弘济”河。王廷瞻进户部尚书，余升赏有差。

廷臣党争之兴　万历十三年(1585)七月，御史龚仲庆再次疏劾李植及吴中行、沈思孝为邪臣。八月，神宗采用前礼部尚书徐学谟议，选择大峪山为造其陵墓之地。动工兴建时，李植以“寿宫地有石，而首辅申时行以学谟言，主张可用，是犯罪”。乃与江东之、羊可立合疏上言：“地果吉利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另择他处。徐学谟以私意主其议，申时行以亲故赞其成，非大臣谋国之忠。”申时行奏辩说：“当初皇上阅视此地时，李植、江东之并没有说此地有石。今已二年，忽创此议，很明显是为了借此倾害大臣。”神宗切责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当时亦在随行，均无一言。今已兴工，却说地有石纯粹是“辄敢诬构”，令夺俸半年。至九月，李植等人仍坚持大峪山寿宫有石，并疏荐明习葬法之人为其“有石”说作证明，疏送上而不予报。此时，本与李、江、羊三人相交结的大学士王锡爵，居然“耻为三人所引”，反戈一击，说李植三人从治张居正、冯保之狱以来，辄自动依附于赵用贤等“撄鳞折槛之党，且日寻戈矛。如大臣许国、杨巍、舒化等，以往尝举为正人，今一言相左，即不惜用刃，此为不平之大。”于是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舆郊、王敬民等，交相攻击李植三人。神宗怒，将李植由太仆少卿贬为户部员外郎，江东之由光禄少卿贬为兵部员外郎，羊可立由尚宝少卿贬为大理评事。然而，是时神宗仍担心“寿宫有石”，于闰九月再次亲临大峪山，结果证明择大峪山吉利，地无石。还宫之后，进而将李植三人调外使用。李植三人被贬调外，引起了另一部分人的不满，并用自己的行动为他们鸣不平。谕德吴中行上疏求去，准之。赞善赵用贤、光禄少卿沈思孝亦要求谢职归里，不得允准。赵用贤以许国等力毁李植三人，抗疏说：“朋党之说，是小人用以去君子，空人国”。语甚愤激。明代万历一朝“党论之兴后自此始”。

冀练逝世　冀练(？－1585)，山东益都县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起家县令，迁户部主事，历光禄寺少卿、顺天府丞，遂以都御史巡抚河南、宣府，兼兵部右侍郎。不久，以年老致仕。再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转户部右侍郎，未及赴任，即于万历十三年(1585)九月十四日卒。

陈道基致仕　陈道基(1519—1593)，字川中，号我渡，福建同安县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至应天巡抚。兴教化，振风纪，惩告讦，风气为之一变。终南京刑部尚书，万历十三年(1585)九月二十一日致仕。万历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五。

王遴致仕　王遴(1523—1608)，字继津，北直隶霸州(今河北霸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绍兴府推官、兵部主事、员外郎。时同官杨继盛为权相严嵩所害，下狱论死。王遴刚直有气节，不避嫌怨，为杨继盛提供粥饭，且以其女嫁杨继盛子。对此，时人无不叹服，而严嵩则因之大恨，遂摘他事将王遴逮捕入狱。事白复官。及杨继盛死，王遴又为他治理后事。隆庆中，官至兵部右侍郎。万历初年，先后任南京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议论持正，遇事敢争，精心理财，裁减浮费，节省开支，宫妃、太监为此颇恶之。万历十三年(1585)九月二十一日致仕，万历三十六年卒，年八十六。赠太子太保，天启中，追谥恭肃。

张四维逝世　张四维(1526—1585)，字子维，号凤磐，山西蒲州(今山西蒲县)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隆庆中，官至吏部左侍郎。家庭富裕，回家养病经常送礼给大学士张居正，又极力交结神宗生母李太后的父亲李伟。万历二年(1574)复起官掌詹事府。次年八月，因张居正引荐，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要决策。张四维与张居正共事最久，对张居正毕恭毕敬，“恂恂若属吏”。张居正死，他始当政，加少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后以父丧归家，守制未满三年，万历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卒，年六十，赠太师，谥文毅。有《条麓堂集》。

裁革惜薪司内官冗员　万历十三年(1585)十二月初一日，神宗诏汰惜薪司冗官，减大炭十五万斤。起初，易州山厂内臣多至五百六十八人，岁支大炭八十五万斤。同日，又令减四川采木三分之一。

丘橓逝世　丘橓(？—1585)，字茂实，号月林，山东诸城县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历行人、刑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强直敢言，不畏强权。隆庆中，官南京太常寺少卿，迁大理寺少卿。不久，因病回籍调理。万历十一年(1583)起为左副都御史，一入朝即疏言吏治积弊八事。改刑部右侍郎，继而命为左侍郎，再晋为南京吏部尚书。万历十三年十二月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简肃。

管志道致仕　管志道(1536—1608),字登之,号东溟,南直隶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万历五年(1577)上书张居正,规其夺情,补刑部主事。六年,疏言时弊九事,进员外郎。后逆张居正,调出为广东佥事,分巡南韶。被劾,降为盐课司提举。万历八年,以考察罢官。万历十三年,复官广东按察使,致仕。万历三十六年卒,年七十四。有《孟义订测》、《问办牍》、《从先维俗议》。

"国本"之争　皇子继位,须先由皇帝册立为皇太子,因系国家存亡根本大事,故称之为"国本"。万历十年(1582)八月皇长子朱常洛出生。万历十四年正月,皇三子常洵生,神宗立即册封其母郑氏为皇贵妃。二月初三日,内阁大臣申时行等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早立太子,尊祖宗重社稷。英宗二岁立,孝宗六岁立,武宗一岁即立为皇太子。今皇长子已五岁,当立为皇太子,正名定分。神宗却下诏说,皇长子年幼体弱,等二三年后再行册立。朝廷内外议论纷纷,怀疑神宗将立第三子为皇太子。于是同月初八日,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贵妃虽贤,但所生为第三子。恭妃生育长子,应首先进封恭妃,其次才进封贵妃。如此,则与礼不违,于情不废。又说:陛下要正名定分,当从内阁大臣之请,早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神宗震怒,将奏疏掷在地上,一再击案说:郑贵妃敬奉勤劳,应当特别加封。将姜应麟贬为广昌典史。接着,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上疏,说恭妃生育长子,五年未闻行进封之典,而贵妃一生子即有皇贵妃之封。贵妃能得之于皇子之生之日,而恭妃何以不能得之于五年敬奉之后。天下不能不疑。神宗不但不听劝谏,反将孙如法贬为潮阳典史,沈璟调外。后御史孙维城、杨绍程亦疏请早立皇太子,俱得罪,被夺俸。时两京廷臣数十疏申救被害诸臣,神宗不理。自万历十五年正月起,"国本"之争日趋激烈,一直延续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才以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而告终。

曲迁乔疏陈纳粮召买事宜　万历十四年(1586)二月初二日,工科给事中曲迁乔等人疏陈纳粮召买二事:一、官解十字等库钱粮,解送本色的,亦应予收纳,不许官商暗中设计阻拦扰害。二、召买物料。国家设立内库,专受四方贡物,以备取用,岁有定额,相沿至今二百余年,从未闻不足使用的。嘉靖、隆庆间一时或有召买,但为数不多。臣等查自万历元年至十三年供用库约该价银十三万八千零七十四两、甲字库价银三万四千八百四十两、丁字库价银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五十七两、承运库价银二十八万二千八百二十三两、丙字库丝绵价银三万九千八百九十二两、银价局金价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三两,通共价银七十七万四千四百八十九两(注:应为七十七万八千四百八十九两)。供用等库的香蜡银朱铜锡油漆丝绵等料,假如管库者注意节约,不仅不乏使用,而且香蜡铜锡油漆诸物足够使用二、三十年,丝绵等物亦够十余年之用。掌库者往往动以缺乏为词,不知器用贮于何所,给何人,而屡行召买。此不可不查。请令司礼监将各项召买物料逐一开明,核实,是否真有缺欠?有无违反定额?要一一比较明白。并请严令各库内官诚心体国,不得随便奏请购买物料。神宗令各库"今后加意节省,不许妄费"。

徐贞明奏开京东水田　万历三年(1775)二月工科给事中徐贞明,疏请开畿内和京东水利:国家定都北京,而粮食皆仰给东南,此非长远根本之计。畿辅诸府,或支河所经,或泉水自出,亦皆足以灌溉农田。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京东今自永平、滦州抵沧州之境,地皆萑苇,土实肥沃。若招抚南人筑塘积水,北起辽海,南至青齐,皆可成良田。待取得成效再逐步推广到河南、山东、陕西。如此则东南漕粮可减,而西北储蓄常充,国计民生永无忧虑。徐贞明疏上,工部尚书郭朝宾以"水田劳民"为由,事遂搁置。其后他在通州潞河写成《潞水客谈》,论述北方大兴水利的好处。兵部尚书谭纶对此赞不绝口。后来,顺天巡抚张国彦等人在蓟州、永平、丰润、玉田进行试验的结果也都证明行之有效。及徐贞明还朝,言官又力持其说可行,特疏推荐。万历十三年三月,神宗超迁他为尚宝司少卿,规划京东水田开发事宜。同年九月,神宗任徐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事。至万历十四年二月,已垦田三万九千余亩。太监、勋戚,恐水田兴而己失利,争言不便,极力阻挠,神宗遂改变主张,执意不让继续开发京东水田。

神宗下诏求言　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初三日,神宗以天象异常下诏求言,要廷臣直言时政,凡有妨害民生者,允许各衙门明白条具,奏请定夺,以仰回天意,以遂民生,共享天下太平之治。员外郎李懋桧、郎中刘复初等,争言皇贵妃及恭妃册封事。神宗却勃然大怒,欲从重惩治。廷臣并没有因此而恐惧,上疏言事者仍络绎不绝。同月初八日,神宗又以内阁大臣申时行的奏请,命令各衙门上疏言事,只能局限于本衙门的职责,并由各衙门的长官有选择地进呈,不得直接送入。言者为此竞相指斥宫廷,攻击内阁,晚明门户之祸自是大起。

申时行论安民之要　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

初五日大学士申时行疏言安民之策，说今有四害，一是催科赋税急迫，二是征派不断加增，三是刑狱日益繁多，四是用度日趋侈靡。民生未安，治效不见。其因有二：一是上下政见不一，二是诏令不行。不仅害民生，且害国家。今欲安民治道，必须"可行则行，当止即止"，不能该行而不行，当止而不止。而欲使诏令之行，则必须从严稽查纠察，不准拖延玩息，杜绝送礼托情，明确职责，从严治官。同时，在朝廷，痛加节省费用；在民间，大力开垦荒田，禁止权豪势要之家侵占民业。

郭应聘致仕 郭应聘(1520—1586)，字君宾，号华溪，福建莆田县人。由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历户部主事、郎中、南宁知府、威茂兵备副使、广东参议、广西按察使与左右布政使，以讨平古田农民起义，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继以进剿府江等处各族起义，升都御史，总督两广。万历初政，以郭应聘讨伐两广人民起义有功，进其为兵部右侍郎。万历二年(1574)，召为户部右侍郎。万历八年起改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终南京兵部尚书。十四年四月初四日致仕。于同年十一月初二日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少保，谥襄靖。

毕锵致仕 毕锵(1517—1608)，字廷鸣，号松坡，南直石埭县(在今安徽池州地区)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官刑部主事、郎中、浙江提学副使、广西右参政、按察使、湖广左布政使、应天府尹、南京户部右侍郎。自万历四年(1576)起官南京户部尚书。时神宗下诏求言，毕锵疏言九事：锦衣旗校至一万七千四百余人，内府诸监局匠役数亦如是，此冗食之尤，宜屏除冒滥。州县丈田滋弊亦当更改。至于袍服锦绮，岁有积余，何烦频织。天灯费钜万，尤不应该。冗滥不可不裁，淫巧不可不革。毕锵所奏，多为切要之事，但由于皇帝左右从中阻挠，不能尽行。万历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毕锵以年老致仕。万历三十六年卒，年九十三。赠太子太保，谥恭介。

袁洪愈请严禁边将隐占屯田 南京礼部尚书袁洪愈疏言：以往由于屯政修举，故沿边兵马之费取于民运盐课屯田而能自给自足。自从屯政败坏，田额旧籍紊乱无存以来，将领不尽心督责、军士游惰成风，间有贫苦的士兵开垦尺寸之地，尚未收成入口，而已先报官增收税银，使之不沾实惠。更有甚者，不才将领还将肥沃的屯田公然侵占，坐夺田亩之利。致使屯田荒芜，兵饷不足，盐法不行，商人受困。请申令各边总督、巡抚诸臣共图长久之计，将屯田、盐法悉心区划，清查屯地，旧有的照旧征税，新开垦永免起科。同时招抚商人，愿自备工本到他处开垦屯田中盐者，听其募人垦植、输纳本色。不许将领隐占屯田、势豪侵吞盐利，阻坏盐法。以期屯盐相济，边疆永固。此疏经户部相应拟议并经神宗允准，于万历十四年(1586)七月初八日由户部答复批准施行。

赵用贤疏言江南赋税征收诸弊 万历十四年(1586)七月十六日，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赵用贤奏：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松、常六府，又居东南十分之六，其他舟车诸费又六倍于他处，东南实为天下财赋之源。而自数年以来，拖欠钱粮日多，小民嗷嗷，十室九空。原因不独在征赋之日增，而在科派之无别，使重者益重；其弊不独在征输之日急，而在隐漏之多端，使困者益困。其中主要的有，田赋之数、混派之弊，征税之则，蠲免之条、偏重之派，派剩之目，白粮之运，兵饷之实，折银之例，存积之重，荒田之核，征敛之欺，经役之累，积谷之例等。神宗降旨：地方赋役，果有情弊，该抚、按官自当查奏。原籍官员如何从未奏请，显是徇私沽名。近来各处奏报全不为公，专一市私恩取直誉。再有如此，治罪不宥。

卢洪春冒死上疏劝神宗勤政 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初五日，礼部主事卢洪春上疏：陛下自九月望后连日免朝，前日又下诏说头眩体虚，暂罢朝讲。连祭太庙，都遣官代行。陛下年轻力壮，诸病症皆不应有，不应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且废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能自安。又前月二十六日传旨免朝时，已是议论纷纷，都说是陛下自己骑马伤额，却引疾自讳，欺骗别人。果系骑马伤额，不过是一时娱乐所致，其害犹浅。如果像陛下自己说的是患病，那就是日夜作饮纵乐造成的，为害就深了。陛下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身居九重，外廷就什么都不知道。陛下平日遇到歌功颂德的必多喜，碰到劝谏的必多怒，一涉及到宫廷的事，立即严厉谴责。谁肯直言以触及讳忌，以生不测之祸。群臣如此谨慎小心，敢怒不敢言，并非主上之福。望陛下以宗社为重，不要文过饰非，掩人耳目。奏疏送上，神宗斥之悖妄，大怒不解，命拟旨治罪。遂予廷杖六十，革职为民。

黄光升逝世 黄光升(? —1586)，字明举，号葵峰，福建晋江县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长兴县令、刑科给事中、浙江佥事、广东按察使、布政使，以讨平少数民族起事之功，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再以办皇木有功，升兵部右侍郎，总制四川、湖广、贵州三省，统兵围剿苗民起义，又立战功召入工部。不久，改南京户部尚书、南京刑部尚书，致仕归。万历十四年(1586)十二月初七日卒，赠太子少保，谥恭肃。有《昭代典则》。

张佳胤致仕 张佳胤(1527—1588),字肖甫,号崌崃山人,四川铜梁县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由知县,历按察使。隆庆五年(1571)冬,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平息安庆兵变,迁南京光禄寺卿,进右副都御史。万历七年(1579)起,历任宣府巡抚、浙江巡抚,平杭州兵变、民变,加右都御史。不久,拜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进太子太保。万历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仕。归二年死,年六十二,赠太子少保,谥襄宪。张佳胤工诗、文,尝与文学家王世贞诸人唱酬,为嘉靖"七子"之一。有《崌崃山房集》。

周子义逝世 周子义(1529—1586),字川方,号儆庵,南直隶无锡县(今江苏无锡)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选庶吉士,累官至国子监祭酒。以训士有方,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万历十四年(1586)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八。赠礼部尚书,谥文恪。平生好学,博览群书,对于经术以及明代濂洛关闽之说颇有研究。有《中书直阁记》、《国朝故实》。

何起鸣致仕 何起鸣(?—1590),字应岐,号来山,四川内江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历官盩厔知县、礼科给事中、顺天府丞。万历十五年(1587)正月二十七日,工部尚书杨兆致仕,何起鸣由工部右侍郎升为本部尚书,二月被劾致仕。万历十八年十一月卒,赠太子太保。

河南修武地震 万历十五年(1587)三月初三日申时,修武地震,有声自西北来,若雷沉而小。戌时复震,摇塌城垛鼓楼、碑亭房舍无数。获嘉未时地大震,声如雷,至夜二鼓又大震。卫辉府汲县、淇县、辉县,申时地震,有声如雷,城堞摧圮,屋宇动摇。开封府申时地震,城堤摧圮。是日,开封府阳武、封丘、杞县、尉氏、商水、中牟、新郑、项城、郾城、汜水、长垣等;卫辉府汲县、延津、浚县、滑县;怀庆府河内、原武、武陟、孟县、温县,裕州;彰德府林县;山西省长治房瓦动摇,户牖震响。陵川地震,以及京师、大名等夜复大震,宿鸟齐飞。数十府州县同日俱震。震中烈度(I_0)Ⅴ Ⅰ,震级(M)为六级。

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三娘子(1550—1612),蒙古土默特部的杰出女领袖。她原为该部首领俺答的外孙女,后俺答以其长得聪明美貌,夺而为妻。俺答死,三娘子配其子,又再配其孙。三娘子一生历配三王,从俺答在位时开始先后掌握军政大权达二十余年,诸部无不畏服。三娘子始终积极推行与明朝政府和睦相处的友好政策,为国守边保境,屡建功勋,使蒙汉两族停止战争,互开贡市,有力地促进了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万历十五年(1587)三月二十六日,撦力克嗣为顺义王,神宗封其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各赐钱物有差。

舒化致仕 舒化,生卒年不详,字汝德,号继峰,江西临川县人。由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授衡州推官,历户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陕西参政。万历初,历官太仆寺少卿、南京大理寺卿、刑部左侍郎、刑部尚书。万历十四年(1586)应诏陈言,请信诏令、清狱讼、禁冤滥,又疏救兵马司吏目。万历十五年五月三十日致仕。卒于家。赠太子少保,谥庄僖。

胡汝宁疏言京师二害 万历十五年(1587)六月初二日,户科右给事中胡汝宁上疏说,今京师有二大害:一为知县差役,倾破民家;二为贵戚铺行,侵夺民利,由此造成京师民贫财尽。神宗见疏说:内府库局铺垫等项,屡经酌议裁减,监收部官及贵戚家果有专利害民者,自当依律究治。

关税本折兼收 万历十五年(1587)六月二十六日神宗下令:临清、河西务、浒墅、九江、淮安、扬州、北新等各关商税,自万历十五年七月初一日始,逐年本折兼收。一半折色,银解太仓;一半本色,输纳广惠库。

命发钱粮救济京师贫户 从万历十五年(1587)六月底开始,北京连降大雨,官民房屋倒塌不计其数,居民被压死、溺死者亦不计其数,民饥困不堪。六月二十九日,神宗令顺天府尹加意赈恤,贫户每人发米五斗,银五钱。压死者,每人一石,银一两。伤者,米七斗,银七钱。

南北旱涝成灾民食草木 万历十五年(1587)七月,南北各地相继发生旱涝,灾情严重。先是,七月初九日,河决开封,开封、陕州、灵宝等府州县大雨不止,漂没人畜不计其数。初十日夜,通州大风雨,漂损漕米八千一百七十三石。二十一日,江北蝗灾、陕西大旱、江南大雨。据户部右侍郎孙丕扬奏,"黄河饥民食草木,陕西富平、蒲城、同官诸县至食石头。今海内困于加派,请酌定岁用,清难裁之冗,息难支之民。神宗见饥民以石为粮,令停止先年不时征取,并遣官分往各方进行救济。

申时行请发留中章奏 皇帝对臣下的奏疏,既不予批答又不交给有关衙门议处,而留于宫中,谓之"留中"。自从进封皇贵妃郑氏,斥逐诸臣以来,明神宗对廷臣所上的有关立皇太子、分封诸王以及进封皇长子生母恭妃的章奏,一概留于宫禁之中,置之不理。万历十五年(1587)十月初五日,大学士申时行为此上疏说:诸司章奏至有停留十余日,一个月或二三月而不发,因循误事,请立即裁发。神宗不听。

郧阳兵变 右佥都御史李材，好讲学。抚治湖广郧阳时，遣部下士兵为诸生供役，士兵多有怨言。他又私自准许诸生请求，把参将公署改为学官。万历十五年(1587)十月初五日，参将米万春遂鼓动士兵梅林等人哗变，入城释放囚犯，毁坏诸生居舍，又直接冲入军门，挟赏银四千两，气势汹汹而不散。二天后，米万春威协李材更改军中不便者十二事，并要求上疏归罪于副使丁惟宁和知府沈铁等，李材被迫依从。丁惟宁不服，指责米万春。米万春欲杀丁惟宁，丁惟宁跳墙逃生。于是李材疏劾丁惟宁激变。消息传到朝廷，神宗诏降丁惟宁三级，李材罢官回籍听候处理。

海瑞逝世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县(今海南琼山)人。嘉靖二十八年(1539)举人。官户部主事时，冒死上"治安疏"，尖锐批评嘉靖皇帝，声名大震。隆庆中，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应天十府，均赋役，摧豪强，平冤狱，责令乡官退还非法占夺的民田，兴修水利，深受百姓拥护。不久因病谢职归家。万历十三年(1585)起迁南京吏部右侍郎，次年二月升南京右都御史，理院事。海瑞一生刚正无私，"不畏死，不爱钱，不立党"，洁己爱民，砥节砺行，为世少见。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卒于官，年七十四。南京居民罢市为他送丧，沿途百余里，哭声震天地。赠太子少保，谥忠介。其著作已辑为《海瑞集》出版发行。

袁洪愈致仕 袁洪愈(1516—1589)，字抑之，号裕春，南直隶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由中书舍人，官至南京太常寺少卿。隆庆五年(1571)以病致仕。万历中，起故官，迁南京工部右侍郎，进右都御史，升南京礼部尚书。万历十五年(1587)改为南京吏部尚书，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加太子少保致仕。万历十七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谥安节。

戚继光逝世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一说安徽定远县人)。他自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中嗣职，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浙江参将、福建总督，先后在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抗击倭寇，屡立战功。其统领的"戚家军"，在抗倭战争中，英勇善战，威震东南。隆庆初，因北部边防多事，奉命北上。二年(1568)五月，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上任伊始，他上疏条陈战守事宜，被命为蓟镇总兵官，进右都督。修蓟门三屯营，筑敌台，又议立车营。遂以守边功，进左都督，加少保。戚继光在蓟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即谢病归。万历十五年卒，年六十。谥武毅。有《纪效新书》、《武备新书》、《练兵纪实》等。

李世达申明律例条款 万历十六年(1588)正月二十六日，刑部尚书李世达、都察院左都御史吴时来、大理寺卿孙钱三人联名上疏，解释律例未尽明确者六事：一、奴婢。官民之家，凡是请工作之人时，立有契约，议定年限者，以雇工论；只是短期雇佣、受值不多者，以凡人论；用财买的义子，恩养年久，配有室家者，同子孙论。恩养未久，不曾配有室家者，士庶之家以雇工论，缙绅之家以奴婢论。二、窃盗三犯，其中赃数不多，或赦前一次，赦后二次，或赦前二次，赦后一次者，俱列入矜疑，奏请改遣。三、强盗。经审查赃证明确，当场被捕者，照例即行处决。其同伙供证明白，年久而被未抓获，赃款亦已花费，或者同伙已被处决而无明证者，一律等到秋后处决。四、合伙杀人。结案之前，如遇主谋者在狱中或在解审途中病故者，准予抵命。结案之后在家病亡者，不准抵命，仍将下手杀人者一并处决。五、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者，有一方的证明材料，即可处决。若击毙于狱中的则碎其尸。六、伪造印文者一律处斩，不问何物成造。神宗准如议施行。

张元忭逝世 张元忭(1538—1588)，字子荩，号阳和，浙江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自幼即好读书，且以气节自负，事亲至孝，躬行实践。万历十六年(1588)三月二十六日死，时年五十一，谥文恭。

潘士藻疏言修省实政 万历十六年(1588)夏，神宗以南北各省灾情严重，令内外修省。同年闰六月初三日，福建道御史潘士藻奏言：今天下之大患，莫过于君臣之情不通，宜仿祖制召对群臣共商大计，罢撤大兴土木，停止织造、烧造，免除金花银不时额外之征。当前修省之实莫过于此。神宗接到潘士藻的奏疏之后，竟然责其沽名卖直，将其连降三级，贬为广东照磨。

刘霖奏定戚臣庄田 万历十六年(1588)七月初八日，户部复御史刘霖奏戚臣庄田，皇后之亲传五世，准留一百顷为世业；驸马传五世，准留十顷供主祀之用；诸妃家传三世，即尽数还官。以为尊卑有别。神宗从其请，但令有出之妃而赐田在一百顷以下者，准留不还。

苏州、松江等府县大风水 万历十六年(1588)七月二十一日夜，苏州、松江等府，东风怒卷，太湖水高二丈余。大风拔木仆屋，田禾皆尽。二十七日以后，大雨经旬，昼夜不绝，禾苗腐烂，庐舍漂没。民大饥，复又大疫，米价踊贵，斗米银二钱，斗麦银一

钱。人啖糠屑，豆饼作粥，继以草根木食，饥民尸者枕藉，饿殍填塞，街巷濠堑浮死，舟行为碍，城内外积骸如山。

阴武卿逝世　阴武卿(1527—1588)，字定夫，号月溪，四川内江县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官南京户部主事、陕西布政使，南京工部尚书，数上疏言事，有益于补救时弊。其后，任南京兵部尚书。万历十六年(1588)七月二十六日卒于官，年六十二。

钟化民请放宽西北马禁　万历十六年(1588)七月二十六日，陕西巡抚御史钟化民奏言：西北土寒，无他产，独养马以资生，而贸易有禁，恐出境之马私通番市。以至并民间孳息，与境内之贸易俱废，则孳蓄少而公家缓急无所赖。此种办法实在是因噎而废食。请量予放宽禁限，如本境有荒情而他境年丰，许出马以取资；本镇缓而别镇急，许出马以协济。如此，则公私之利交得，彼此之用并充。神宗命复议行。

诏修黄河　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十四日，神宗到石景山，观浑河(即今永定河)，见浑河水势汹汹，因问"黄河如何?"内阁大臣申时行等说：浑河来自西北，即古之桑乾河，从此出芦沟桥至直沽入海，水盛时亦汹汹。黄河源出昆仑，自积石龙门会于淮入海，冲决之势，不止十倍于浑河。浑河每次溃坏，远至数十里而止。黄河之决，自徐州至淮安，皆被其害。与漕运关系尤为重大。神宗愕然，乃下诏修黄河，以保护皇陵。

甘肃兵变　甘肃总兵官刘承嗣约束太严，时常鞭挞部下，饷银又不按时供给。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二十日其部众遂反抗起事，持刀欲杀抚臣。事闻，朝廷命罢免巡抚曹子澄和总兵官刘承嗣。

潘季驯疏言河防八事　万历十六年(1588)十月初四日，总督河道潘季驯建议河防八事：一、久任部臣。说水性有顺逆，河情有分合，地势有险夷，只有久任才能熟悉情况。二、责成长令。说理河如理家，今沿河州县长犹家长，调集夫役，备办物料，宜有专责，郡守亦有总理之责。三、禁调官夫。四、预定工料。五、立法增筑。六、添设堤官。七、加帮填土。八、接筑旧堤。神宗命如议实行。

李沂冒死疏言皇上贪财坏法　万历十六年(1588)十二月初三日，吏科给事中李沂上疏，极言神宗贪财坏法：陛下惩办冯保，斥逐宋坤。而今张鲸罪百倍于冯保，万倍于宋坤，为何容忍而不除？外传是张鲸广献金银财宝给陛下，多方请免治罪。内外臣民以为陛下富有四海，岂会爱金银财宝。及见陛下明旨允许张鲸照旧供职任事，才相信献宝为真。让张鲸继续横行不法，以售其奸，国家之祸将从此始。神宗震怒说："李沂欲为冯保和张居正报仇"，"置贪官污吏于不顾，而独谓朕贪，谤诬君父，罪不可宥"。将李沂廷杖六十，削职为民。

刘汝国起义　刘汝国，出身工匠。万历十四年(1586)在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参加梅堂领导的农民起义。梅堂被杀，他潜逃到鄂、皖交界的黄州，太湖、宿松地区，重新集结力量，于万历十七年正月初九日发动起义，自称"顺天安民王"。时值旱灾，饥民多从之，迅速发展到数万人。焚烧官府、驿站，劫夺豪民粮食，以给广大饥民，并与官军展开殊死搏斗，先后杀死安庆指挥陈越、蕲州判官陈策等。使封建朝廷惶恐不安，遂命令鄂、皖各地和南京操江都御史调集大批军队，分兵进围起义军。二月，刘汝国被太湖县乡兵张惟忠抓获，斩于安庆，部众二百五十余人亦遇难，起义失败。

钱邦彦逝世　钱邦彦(1500—1589)，字治征，号景山，南直隶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历高安县令、吏部主事、考功郎中、刑部左、右侍郎，终南京刑部尚书。隆庆元年(1567)四月致仕。万历十七年二月初五日卒，年九十。

徐大化请行一条鞭法　万历十七年(1589)二月初八日，陕西巡按徐大化上疏说：临洮，巩昌一带土地贫瘠，宜立条鞭，以征站银；清户籍以杜影射；整武备以御地方。皆如议实行。

饶伸疏论科场之弊　先是，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右庶子黄洪宪为顺天府主考官，通关节。大学士王锡爵之子王衡举第一，申时行女婿李鸿亦中式。礼部郎中高桂怀疑此中有弊，因摘出中式可疑者八人，内包括王衡，要求复试。反被夺俸。刑部云南司主事饶伸，见事不平，于万历十七年二月十七日上疏，弹劾王锡爵、吴时来：自从张居正二子连占科名以来，内阁大臣子弟中式遂成惯例，黄洪宪"大通关节"，以为一举不足重，居然私内阁大臣之子第一名。子不科试，则录取其女婿。利厚者，非子则及其孙。至复试之日，多有不会写文章者，都御史吴时来不分优劣，一律说成是平通，朦胧报请。王锡爵上疏攻击高桂，更是剑拔弩张、杀气腾腾，无大臣之体。他为相三年、忠贤被斥，引用奸人。今又巧护己私，欺罔君上。吴时来附权蔑法。请一并予以罢免。饶伸的奏疏送上，王锡爵、申时行俱闭门不出，要求去官。另一位阁臣许国正主持会试，内阁遂无一人。

姚弘谟逝世　姚弘谟(1531—1589)，字继文，号禹门，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以文字逆当局，降为六安州判官。后历任江西参议、南京太常寺

少卿、国子祭酒，礼、吏二部侍郎。万历十七年(1589)二月二十二日卒，年五十九，赠礼部尚书，有《宝纶图集》。

令免升授官面谢 以往被升授的官员皆需入朝进见皇帝，当面叩头谢恩。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初九日，久不视朝的神宗，再一次令内官传旨：奏对数多，不耐劳剧，不临朝视政。并令免在京升授官面谢。自是神宗视朝日少。

傅希挚致仕 傅希挚，生卒年不详，号后川，北直隶衡水(今河北衡水)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累官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隆庆末，户部以缺饷，议裁革山东、河南民兵，以傅希挚上疏反对而止。改总理河道，为疏通茶城水道，开梁山以下宁洋山，出右洪口。万历五年(1577)进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后为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历南京户、兵二部尚书，再召为协理京营兵部尚书。万历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加太子少保致仕。

云南永昌卫兵变 云南永昌地方，募川、楚、粤亡命之徒为兵，分立腾冲、姚安两营。刘綎统腾营，邓子龙领姚营。由于常以劳作虐使腾兵，又遭姚兵凌辱，腾兵大不堪，日益不满。姚兵久骄，气势汹汹，遂于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十六日，以索饷为名，振臂大呼，发动兵变，在教场树大旗，杀掠居民，抢夺马匹，声言要赏，并聚众突入永昌城，因城门尽闭不得入，转由永昌、大理入省城，沿途剽掠。黔国公沐昌祚，巡抚萧彦督兵夹击，斩八十四人，俘获六百八十人，姚兵诈降，走宁州、武定、姚安。最后，云南抚、按官借用境外缅甸的军队配合明朝官军，对哗变士兵进行围剿，于同年六月平定。

徐显卿罢官 徐显卿(？—1602)，字公望，号检庵，南直隶长洲县(今江苏苏州市)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累官至吏部右侍郎。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二十二日罢官。有《天远楼集》。

滕伯轮逝世 滕伯轮(1526—1589)，字载道，福建瓯宁县(在今福建建阳地区)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历番禺知县、兵备副使，提督两浙学政，升浙江参政。以平息广东罗旁瑶族起义有功，升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加副都御史，巡抚浙江。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二十八日卒于官，年六十四。赠兵部左侍郎。

郜光先逝世 郜光先(1533—1589)，字子孝，号文川，山西长治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授上海知县，升御史，巡按贵州，首发大中丞及豪贵奸状。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以擒获回族起义首领之功，加右副都御史。不久，阅视蓟、辽军务，升兵部左、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因总制陕西三边有勋功，进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郜光先治军八年，疏陈四十余事，皆得准。万历十七年(1589)四月初九日卒于官，年五十七，赠太子太保。

广东白莲教起义 广东始兴县僧人李圆朗在朔源下洞水宝庆庵，"造妖书，煽动人心，言有易死还生，先天演禽及剪纸为人马，夜则飞动并飞劫杀人诸秘法。诡称翁源人王子龙为黄巢之后，有巢遗金十二窖，愿从者瓜分之。又言子龙乃弥勒降生。子丑年天有大灾，鬼将食人，捐资自投者给米符可免。"经过一番舆论准备之后，万历十七年(1589)四月，李圆朗与王子龙遂聚集始兴、翁源两县白莲教徒数百人发动武装起义，分兵到东桃等处祭旗鸣金，下令东桃人惊走，因肆焚劫。又出兵攻打南雄府等地，声势甚大。广东官府集乡兵进行镇压，王子龙被斩，李圆朗被俘于四月初九日就义，起义失败。

兵部定出洋船只限额 万历十七年(1589)四月二十日，兵部根据福建巡抚周寀的建议，以漳州沿海居民贩海通倭，规定东、西二洋各派船四十四艘，不得超过限额。

何源罢官 何源(1519—1589)，字仲深，号心泉，江西广昌县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官吏部主事，张居正以亲故托之，拒不应。历南京吏部侍郎，主持京察，处事公允，去留得当，为海瑞所称赞。终刑部左侍郎。万历十七年(1589)六月初二日被劾罢官，同年十月卒，年七十一，赠右都御史，谥靖惠。有《心泉集》。

沧州诸镇大风 万历十七年(1589)六月初六日，北直隶沧州、静海、吴桥诸镇刮大风，漕船互击，淹溺二十三人，失漕米三千一百五十七石。

林道楠疏言白粮输纳之苦 万历十七年(1589)七月二十日，湖广道御史林道楠说：苏、松、常、嘉、湖五府解纳白粮额派二十万石。万历九年规定纳米一石，不过加耗米五升，今且加至四斗五升；纳米一百石，不过派铺垫、脚价等银七、八两，今且加至二十余两。如此，则白粮自江南运京师，三石而变成一石，至京输纳复遭此无端之需索，如不设法禁止，受累何穷。请令科道官会同监收官员查革此弊。疏奏送入，得旨：白粮解役苦累可悯，各库局如有分外勒索者，著司礼监查革。

松江上海大水 万历十七年(1589)七月海溢，自一团至九团几及百里，漂没庐舍数千家、男女万余口、六畜无计其数。

姜宝立义田赡族 万历十七年(1589)九月二

十日，前南京礼部尚书姜宝立义田一千亩赡族，请下令有司准予入籍。神宗如其请。

王友贤致仕　王友贤(？—1600)，湖广宁乡县(今湖南宁乡)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历知县、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南京工部尚书，终南京户部尚书。万历十七年(1589)十月二十五日致仕，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逝世。王友贤为人正直，生活简朴，清谨廉洁。

耿定向致仕　耿定向(1524—1596)，字在伦，号楚侗，湖北黄安人。由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累官至大理寺丞，立朝守正，举劾无所私。万历初，历刑部左、右侍郎、南京右副都御史，终总督仓场户部尚书。以赞誉大学士张居正夺情，为时议所论，遂去官回家，居天台山。其学本王守仁，善于启迪后学，人称天台先生。初与晋江李贽相好，后渐恶之，李贽亦数论其短。万历十七年(1589)十一月二十五日复以病致仕，万历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赠太子少保，谥恭简。有《耿天台文集》。

雒于仁疏论神宗酒色财气　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疏言：臣入京一年有余，只有三次见到陛下。此外惟听说陛下身体欠安，拜天地祭祖宗，遣官代往，政事不亲理，圣学久停不讲。臣由是知陛下之病，药物难攻，只有臣的四箴可治。陛下之病在酒、色、财、气。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白天美酒佳肴仍嫌不足，继以长夜作饮，此其病在嗜酒。宠十小阉，溺爱郑贵妃，言听计从，斥逐忠谋，不立东宫，此其病在恋色。不断征索库银，括取币帛，以至拷讯宦官，献上金银珠宝则已，否则便发怒切责，此其病在贪财。喜怒无常，今日打宫女，明日挞太监，罪状未明，立死杖下，积怨怒于直臣，一屈不申，赐死无日，此其病在尚气。四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犹长期不视朝，今后更当何如？陛下有此四病，不说是操生杀之权，人畏之而不敢言；则说是身居深宫九重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保禄贪生之士，害怕威权；怀忠守义之人，何避釜锯！臣今日特撰四箴，劝陛下戒嗜酒，戒恋色，戒贪财，戒尚气。若陛下肯用臣言，即使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奏疏呈上，神宗非但不思己过，戒除四病，反而大为震怒，罢雒于仁为民。

《少室山房笔丛》刊行　《少室山房笔丛》四十八卷，胡应麟撰，万历十七年(1589)孟秋刊行。全书四十八卷，分为经籍令通、丹铅新录、艺林学山、九流绪论、四部正伪、三坟补逸、二酉缀遗、华阳博议、庄岳委谈、玉壶遐览、双树幻钞等十二部分，是以考据为主的笔记，对明代政治制度，朝章典故，社会经济、土风民俗以及佛教、道教等方面提供了很多资料线索，对古典小说传说的创作历史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

永罢日讲　神宗每遇朝讲之日，多令内使传免。万历十八年(1590)二月十二日，内阁大臣申时行请免讲之日仍进经筵讲章，以备皇上观览。"自后讲筵遂永罢"。

杨巍致仕　杨巍(1517—1608)，字伯谦，号梦山，广东海丰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武进知县，升兵科给事中，历山西佥事、参议、阳和兵备副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陕西。隆庆初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裁减所部驿递银十余万两，修筑沿边城堡。神宗立，历任兵部右侍郎、吏部左右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终吏部尚书。万历十八年(1590)二月二十八日致仕。万历三十六年卒，年九十二。赠太子少保。有《存家诗稿》。

王世贞致仕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南直隶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王世贞为人正直，不阿权贵。隆庆元年(1567)八月，任大名副使，升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太仆寺卿。万历二年(1574)九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郧阳，奏屯田、戍守、兵食诸事，俱切大计。不附张居正，被罢官。张居正死，出任南京兵部右侍郎。万历十七年六月，升为南京刑部尚书。万历十八年三月初五日致仕，同年卒，年六十五。(王世贞卒年，尚有万历十九年、二十一年两说)，赠太子少保。王世贞好为古诗文，又熟知朝章典故，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著述宏富，有《弇山堂别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嘉靖以来首辅传》等。

赵南星疏陈天下四害　万历十八年(1590)三月，吏部员外郎赵南星上疏说：如今大臣互相排挤，力谋权势，是为干进之害。正直之臣屡被斥逐去位，宵小之人得志猖狂，是为倾危之害。不问郡守才行、抚按官赃私不严惩，致使吏治日坏，民生日瘁，是为州县之害。乡官之权，大于守令，横行无忌，莫敢谁何，是为乡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吴时来致仕　吴时来(？—1590)，字惟修，号悟斋，浙江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官刑科给事中，疏劾严嵩父子招权纳贿，被严嵩构陷下狱，濒死不屈，发配横州充军。隆庆中，历工科给事中，疏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守蓟镇，专练兵。不久，巡抚郧阳，再升为顺天府丞、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移抚广东。高拱长吏部，贬其为云南副使。后为门

生所劾，落职闲住。万历十二(1584)始起为湖广副使，进左通政、吏部左侍郎，万历十五年任左都御史。吴时来初以刚直敢言著称，晚年不能持正。万历十八年五月初十日致仕，未出都于六月初九日卒，赠太子太保，谥忠恪。有《江防考》。

户部奏岁入不敷所出 万历十八年(1590)六月十四日，户部奏：去年因灾荒严重，数行减免，岁入仅三百三十九余两。而出数比入数多一百万余两，赖老库发银一百八十万两。今年入数不下四百余万两。除已发之外，见库仅四十余万两，老库仅一百七十万两。诸费何从出，犹少一百余万两。于是，工科都给事中邵庶等人说：今日利孔已尽，无复可开之源。而岁入愈少，岁出日增，应当厉行裁革冗员，节省开支。例如，锦衣卫的带俸官役；礼部鸿胪寺的译字生、通事、序班；光禄寺的厨役；各监局的工匠；在外佐贰首领的添设；九边年例与主客市赏的供费，诸如此类，或者是昔无而今有，或昔设而今增，当视其缓急，渐次裁革，以节约为生财之道。另外，京师增修城垣的工役也当罢撤。神宗见到邵庶的奏疏之后，以为京师城垣关系重大，若坍圮日久，将来费用愈多，命照常兴工修理。

更定《宗藩事例》 经朝廷命科臣、礼臣往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省，会同宗室及抚、按官反复商议之后，万历十八年(1590)六月十四日，礼部奏更定《宗藩事例》，计十三条。神宗俱予允准。自此开始，宗室中无爵者均准自便从业。

火落赤进犯洮州 火落赤数犯明朝边境。万历十八年(1590)六月十四日，火落赤率众四千余骑进犯甘肃旧洮州(今甘肃临潭)，明军副总兵李联芳督兵追击，遇伏兵，战死，军溃败，把总何无衡等人俱战没。至七月，火落赤又犯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攻占古城，明临洮总兵官刘承嗣出战，遇大雨，兵败，损失甚众，游击李芳等人战死。火落赤遂掠内地二十余日始退。

钦问开矿 万历十八年(1590)九月十二日，神宗遣内臣责问内阁：屡有人疏请开矿，为何不见户部奏复?内阁大臣申时行等回奏说：天地生财本以资国家之用，况今国库无余财、山泽无遗利，为权宜之计，开矿亦不失理财之一策。但开矿必当聚众，聚众必当防乱。现今山西、河南之间，矿徒啸聚，势汹汹，欲闹事，廷臣正商议如何平息。若官府开矿，恐奸民乘机争利，隐患愈不可测。且朝廷一切事务，关系大体，岂可不惜所费而为。若开矿只为求利，必须事先计算工本，募工之费若干，防兵之费若干，开矿所得之利若干，必见出少入多，不为虚费，而后才可以斟酌开采。切不可因为民间一时之私请，朝廷便可议开。户部之所以迟迟未回复陛下，原因一是为了防患，二是出于爱惜钱财，三是怕差官扰害地方军民，四是不愿意泄露国家目前窘急之状，使外夷更加轻视中国。

遣廷臣分阅九边 兵部曾奏：近来边防废弛，阅视宜严。万历十八年(1590)十二月十六日，神宗遂令廷臣九人分阅九边边防，并严核边臣失职，参劾重处。时奉命前往九边的阅视官分别为：右通政穆来辅阅视蓟镇兼保定、昌平；大理寺右少卿王世扬巡视延绥；光禄寺少卿曾乾亨阅视大同；尚宝司丞周弘禴往宁夏；兵科都给事中张栋阅视固原；吏科左给事中侯先春往辽东；宣府为工科右给事中锺羽正；山西为兵科给事中张贞观；甘肃为工科给事中李汝华。

进呈《累朝训录》 神宗曾谕申时行等人说：祖宗训录乃今朝之史鉴，岂可不得而知。令抄写装订成册，以便朝夕览观，知我祖宗治国家之法，修身勤政之要。万历十八年(1590)十二月二十二日，大学士申时行奉命进呈《累朝训录》，共一千九百二十八卷。二十六年(1598)八月初三日，内阁大臣赵志皋又进累朝宝训、实录计二千三百四十五卷，装成一百套。神宗命置于御前，以备详览。

潘季驯编成《河防一览》 万历八年(1580)，潘季驯第三次担任河道总督时，即完成其第一部治河著作《宸断大工录》。在第四次出任河道总督期间，抱病夜以继日地对此书修改补充，于十八年编辑完成，改名《河防一览》。全书计十四卷，二十九万字。内容有治河背景及朝廷的治河方针；黄、淮、运三河以及相邻水道的工程规划、河防险要处所；潘季驯本人的治河理论；河防的关键地点；治河的工作章程；他本人的治河奏疏；有关黄河河源、黄河决口的历史资料；古今之治河奏疏等。

朱厚烷逝世 朱厚烷(1519—1591)，明仁宗五世孙。正德十六年(1521)，其父懿王朱祐枰死。嘉靖六年(1627)九月，册封朱厚烷为郑王，嗣爵位。正德二十七年，朱厚烷建言时政，反对世宗求神仙，兴土木，引起世宗大怒；宗人朱祐檡又埋怨朱厚烷不为其奏复郡王爵，世宗遂罗织朱厚烷四十条罪状，削其爵，禁锢凤阳高墙十余年。隆庆元年(1567)，朱厚烷获释，复王爵。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二十四日死，年七十三(一说终年七十一)，予祭葬，谥恭王，史称郑恭王。朱厚烷一生勤奋好学，读书能文，礼贤下士，并且自少至老，布衣蔬食。其子朱载堉有父风，刻苦研究，成为明代有名的科学家。这在明代宗室中都是罕见的。

缅甸进犯云南 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二十八日,缅甸莽应里再次率兵侵犯云南永昌(今保山)、腾越(今腾冲),明军副将万国春夜设火炬为疑兵,缅甸兵惧而退,追败其众。

田一俊逝世 田一俊(? —1591),字德万,福建大田县(一说福建将乐县)人。隆庆二年(1568)举进士第一名,选庶吉士,授编修,进侍讲。万历五年(1577)欲阻上张居正夺情,未成;又论救吴中行等人,张居正由此恨之。田一俊遂去职回家。张居正死,田一俊起故官,历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终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方以病致仕,未离家而于万历十九年三月十八日突然病死,赠礼部尚书。田一俊为官廉洁,生活朴素,甘守清苦,至死"家无余资","为众论所推重"。有《鍾台文集》。

樊玉衡奏陈屯政事宜 万历十九年(1591)三月二十八日,户部尚书石星奏报御史樊玉衡所议之屯政四事:一、广招佃,抛荒地土听民开垦,所有招垦事宜专责掌印官经理,不得滥委佐贰官,以滋侵渔。二、清隐占,凡有隐占土田者,许令自首免罪。三、严稽核,屯粮官员一律以完成八分为准,其未完二分至年终由御史视年景丰歉而定,并查屯户有无拖欠屯粮现象。四、重劝惩,凡京外卫所征收屯粮,如期完解者,概予奖励;玩职欠粮者,给予惩罚。各屯田御史差满之日,亦需严加考核。神宗下诏如议实行。

汤显祖疏劾申时行 万历十九年(1591)四月二十五日,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上疏弹劾申时行:言官岂尽不屑,由于权柄为内阁大臣窃据,所以言官向背之情,亦随之转移。言官忠诚正直者不乏其人,但一言相侵阁臣,无不调出京外。言官中亦有无耻之徒,只知自结于内阁执政之人,得到申时行保护,居然重用。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内阁大臣却欺蔽自如。臣以为今日国家失治,内政不修,外患不止,是因陛下有四可惜:爵禄可惜,国家的爵禄被个人用以大量培值私党;人才可惜,群臣风靡,不识廉耻;成宪可惜,内阁大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圣政可惜,首辅申时行执政,柔而多欲,任用私人,靡然坏政。请陛下立即斥逐杨文举、胡汝宁,并严诫申时行反省悔过。神宗得疏,说汤显祖以陪都为闲职,没有权,不遂己志,所以假借国事攻击内阁首辅。遂怒而将其贬为徐闻县典史,后稍升为遂昌知县。

宋纁逝世 宋纁(? —1591),字伯敬,号栗庵,河南商丘县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由永平推官,累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节省兵饷无算。万历初,因与大学士张居正不合,引疾归。张居正死后,以故官再抚保定。万历十四年(1586)进户部尚书。长户部五年,值四方多灾,精心理财,斟酌缓急,节约经费,"上下赖之"。十八年三月,任吏部尚书,拒绝请托,奖廉抑贪,严惩污吏百余人。为人刚正不阿,不媚权势。十九年四月致仕。同年五月十一日卒,赠太子太保,谥庄敬(一说庄敏)。有《四礼初稿》。

魏时亮逝世 魏时亮(1529—1591),字二甫,又字舜卿,号敬吾,江西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历官中书舍人、兵科给事中。直言敢谏,屡次上疏承论国计民生大事,反对中官夺民田,主张宗室耕种田地以代宗禄,说"天下可忧在民穷",守令当为民纾忧,"劝农桑,清赋役"。隆庆三年(1569)升太仆寺少卿。万历十二年(1584)任南京大理寺丞,迁右副都御史,摄京营戎政,疏陈安内攘外十四要务。进刑部左、右侍郎,终南京刑部尚书。万历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卒于官,年六十三。谥庄靖。有《大儒学粹》。

苏松水灾 万历十九年(1591)六月三十日,南直苏、松两府发生大水,淹死数万人。至同年七月十七日,苏、松、常三府以及浙江宁波、绍兴二府濒海地区又发生大风雨,海溢,伤害庄稼,淹死人畜不计其数。

许国请严禁小臣攻击大臣 万历十九年(1591)七月十七日阁臣许国上疏言:"今四夷交犯,而内外小臣争务攻击,致大臣纷纷求去,谁能再为国家做事!请申谕诸臣,各修职业,不得意气用事,攻击大臣。"神宗得疏,即告诫六部和都察院:近来或卑凌尊,或新间旧,或僚属而制官长,或外吏而排阁臣,致使国事纷纷,朝纲混乱,大臣解体,争欲去官,国无其人,朕与谁共理国事!今后再有肆行诬蔑大臣者将重治不贷。

李琯弹劾申时行 万历十九年(1591)七月二十四日,福建按察佥事李琯上疏劾论申时行十罪:一、盐城训导庞尚鸿奏寿宫(明神宗选择的陵墓)有水,不吉利,申时行置之不上奏。二、倡言陛下欲另立皇太子,谋拥立之功。三、请陛下下诏禁言路。四、将司业刘应秋、御史章守诚、主事蔡时鼎告发申时行自己罪状的奏疏,留中不下。其欺君罔上甚于张居正。五、其子申用嘉假冒籍贯,中浙江乡试;其婿李鸿冒籍纳监,沈璟强、汪让代为取中。六、纵家人宋九通贿纳京卫经历,未尝历俸,竟得双封。七、受郜光先之贿金,而私授他为总制陕西三边军务,致使敌寇盘踞两川。八、私收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贿金,为他掩盖败绩,阵亡八百人,竟反以奏捷议赏。九、为秦耀报私怨,而暗中排挤吏部尚书宋纁。为徐春时复私仇,而排斥给事中张养蒙。十、接受被罢官回家听候处理的胡维新之珠宝,而私自将其起用。接受因罪被审问的

李时孝之宝玉，而免其罪。疏末还列上内阁大臣王锡爵诸不法事，谓其与申时行“同恶相济，宜并罢斥，以正欺蔽之奸”。李琯之疏呈上，内阁大臣许国说法司劾阁臣无先例。神宗令选由部、科议处。李琯被革职为民。

许国致仕 许国(1527—1596)，字维桢，南直隶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万历中，历礼部左、右侍郎。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许国性木强，遇事辄发，数与言者为难，无大臣度，万历十九年九月初十日因赞成请立东宫事受到神宗的谴责，遂引病致仕归。万历二十四年卒，年七十。赠太子太保，谥文穆。有《文穆公集》。

申时行致仕 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南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举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第一。万历六年(1578)三月，以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不久，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累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十一年四月，张四维以丁忧归家，申时行出为内阁首辅。万历十九年九月十二日被劾致仕。万历四十二年卒，年八十。赠太师，谥文定。有《赐闲堂集》。申时行为政虽能“务以宽大”，然“无干蛊之略。外畏清议，内因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謇谔无闻，循默避事。”

王一鹗逝世 王一鹗(？—1591)，字子荐，号春陂，北直隶曲周县(今河北曲周)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升布政司参政。以阅视蓟镇有功，进按察使，巡抚顺天，修敌台再立功，移抚宣府。议贡市成功，召入为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以丁忧归家，服满起故官，巡抚顺天，进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有战功。万历十五年(1587)升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疏乞致仕，方得明神宗允准，而万历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卒于京。赠太子太保。

泗州等处大水 万历十九年(1591)秋，泗州大水，淹公署三尺，溺死居民无数，且浸及祖陵。又河决山阳，江都、邵伯因湖水下注，田舍俱为浸伤。工部尚书曾同亨奏报此事，议论纷纷。神宗遂命工科给事中张贞观往泗州勘视水势。

京营武官哗变 工部尚书曾同亨督工，请“清皇内府工匠。”时其弟曾乾亨为监察御史，亦上疏请“裁冗员以裕经费”。京营各武官听信流言，误以为欲减其俸粮，于万历十九年(1591)十月初一日共同起事，群聚入长安门，欲向内阁控诉，适遇工部尚书曾同亨出朝至此，遂闹嚷大哗，围而辱之。兵部尚书石星闻讯，立即前往，传旨解散。掌后府定国公徐文璧被夺俸半年，守门官由法司提审问罪。

赵锦逝世 赵锦(1516—1591)，字元朴，号麟阳，浙江余姚县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江阴知县，升南京御史，清军云南。嘉靖三十二年元旦，上疏劾严嵩乱政，世宗说他“欺天谤君”，从云南被捕至京下狱，榜四十，斥为民。至穆宗继位始复官，进光禄寺卿，升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有战功，入为大理寺卿，历工部左、右侍郎。万历二年(1580)，迁南京右都御史，改刑部尚书。万历五年，反对大学士张居正“夺情”，张居正不悦，令给事中费尚伊劾赵锦“讲学谈禅，妄议朝政”，赵锦遂乞休谢职。万历十一年，授左都御史，时抄张居正家产甚急，赵锦上疏营救，请“稍宽其罚”。其后，加赵锦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遇继母死，归家守制。万历十九年，召为刑部尚书。同年十月二十四日，赵锦由浙赴京行至苏州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太保。谥端肃。

定外戚庄田之制 万历十九年(1591)十二月初二日，诏定戚臣庄田之制：皇后家传五世，留庄田一百顷，不论旁支别派，永远给付遵守。皇贵妃及贵妃家传五世，留庄田七十顷，以为香火地；如无正派，则传至三世，不论多少，尽数还官。驸马家传至三世，准留庄田十顷，以为公主香火地，永远给付遵守；余令还官。”以后养赡、香火庄田递减，都照今规则永远为例。”

科场规则的制定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十五日，礼部条议科场规则六章：一、正文体，非纯正典雅者不收。二、议程录，悉用士子原文。三、专阅卷，考官必阅经。四、别字号，五经卷号不得相混。五、核墨卷，真草不全者不得中式。六、公填榜，析卷时不得随意引嫌更改。神宗说：三考为国家培植人才，必须文理纯正，经术通明，方许收录。其有文词险怪，背经离传者，场后卷发，礼部戒饬程文须用真卷，不得改拟示欺。余如议行。

李献可疏请预教皇长子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二十一日，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率领六科诸臣疏请预教皇长子，说：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十一岁，当及早进行预教，不要继续禁于深宫之中。此疏一上，神宗大怒，并摘疏中误书弘治年号，切责李献可等人“违旨欺君”，将李献可贬一级，调外，其余的人夺俸半年。大学士王家屏以为李献可等人所言甚切，拒不奉诏执行，并将神宗朱批封还。神宗说王家屏无“人臣之礼”。此时，吏科都给事中锺羽正疏言：李献可之疏，臣实赞同，愿与李同罪。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亦言：言官可罪，预教必不可不行。神宗益怒，遂将舒弘绪调往南方，锺羽正与李献可并以杂职发配边疆。大学

士赵志皋上疏论救，又遭斥责。接着，御史、给事中多人纷纷抗疏谏诤，均遭惩处，朝士惊骇。神宗且命李献可等革职除名，永不叙用。

冯从吾抗疏谏诤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御史冯从吾抗疏批评神宗，说："陛下郊庙不亲往，朝讲不御，章奏留中不发，励精图治不见成效，外寇内患不止。近来又传令陛下身体欠和，欲借此掩饰自己的过失。"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打死杖下，外庭没有不知的，天下后世亦不可欺。请陛下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宴安为可恃，勿以将来危乱为可忽。"同月三十日，神宗得疏大怒，令其离职归家。

宁夏哱拜起兵反叛 致仕宁夏副总兵哱拜，因多次受到宁夏巡抚党馨裁抑，其子承恩因强占民女为妾而受到党馨鞭打。加上供给冬布衣、花及月粮银，又不一视同仁。其属军锋刘东旸、许朝等人对此大为不满，终于在哱拜的极力嗾使下，以不如数发给冬衣布、花、月粮银为借口，于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十八日早晨纠集部众，发动反叛，杀死党馨和石继芳，放火焚烧公署，劫夺符印，开库发银，释放囚犯，抢掠居民，杀死游击梁琦、守备马承先。强迫张维忠交出敕印、自缢死。刘东旸遂自称总兵，奉哱拜为谋主，分兵占据城堡，进军各地，进而率兵过河，欲取灵州，联合蒙古套部，"势大猖獗，全陕震动"。三月初八日兵部尚书、总督魏学曾向朝廷报告哱拜反叛，神宗即诏魏学曾调集大军进剿。四月十五日，又命李成梁之子、总兵官李如松提督陕西军务，统兵讨伐哱拜。武臣有提督自李如松始。其后，又先后命董一奎、李赉和萧如董、麻贵为总兵和副总兵，向哱拜叛军发动进攻。此后，又命宁夏巡抚朱正色、甘肃巡抚叶梦熊至军中协助李如松。六月，叶梦熊从甘肃运去神炮火器四百车，征调苗兵，浙江巡抚常居敬亦募浙兵千余人，自备粮饷赴援。诸堡次第收复，惟宁夏镇城(今银川)屡攻不克。于是官兵分为五路并逼城下。继之，梅国桢、李如松统辽东、宣大、山西兵至，军势大振。六月二十五日官军用布袋三万个，盛土登城。官军又乘势环城筑堤一千七百丈，决水灌城。并击退城外套部援兵。城中粮尽，死者相枕，纷纷要求哱拜投降。九月初三日浙兵、苗兵、庄浪兵俱云集城下，官军使间计致使承恩与刘东祐等人互相残杀，然后调集各军奋勇登城，哱拜仓皇自缢死，全家自焚。叛军覆没。十一月十二日，承恩及其党被斩于北京。十二月初八日，以宁夏哱拜平，诏告天下。

王家屏致仕 王家屏(1536—1603)，字忠伯，号对南，山西山阴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万历十二年(1584)，累官至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时王家屏离开史官职位方两年，即入阁辅政，"此为以前所未有"。申时行为内阁首辅时，王家屏在内阁排名中居末位，他为人忠直，刚而不屈，每次议政，秉正持法，不亢不随，且直言敢谏，数次上疏规劝神宗。不久，进礼部尚书。十九年秋，出为内阁首辅，时称"当国"。万历二十年三月十一日致仕。"家屏柄国止半载，又强半杜门，以戆去国，朝野惜之。"三十一年卒，年六十八。赠太子少保，谥文端。有《王文端奏疏》、《王文端集》。

陆光祖致仕 陆光祖(1521—1597)，字與绳，号五台，浙江平湖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万历中，官至工部右侍郎，因议论漕粮改折事逆内阁首辅张居正，引疾去职回家。万历十一年(1583)冬复起官，后官至吏部尚书。万历二十年，以推用饶伸、万国钦被劾，于同年三月十四日致仕。陆光祖强直有识，练达朝章，每议大政，一言辄定，推用人才，不念旧怨，人服其量。万历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太保，谥庄简。有《庄简公存稿》。

潘季驯疏论治河要策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初十日，总督河道潘季驯上疏说：臣先后四次领导河事，总之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强，人欲弃故道开新河，而臣则以为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杀水势，而臣则以为浊流必不可分。去年秋天，雨多水涨，议论纷起，不知有涨必自消。工部说：潘季驯习知河事，言当不谬。但运道与民关系密切，宜经勘河给事中及督河抚、按官共同议定。

潘季驯致仕 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县(今浙江吴兴)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由九江府推官至工部尚书、右都御史。从嘉靖末年至万历中，潘季驯先后四次奉命治理黄河，在理论上创立"束水攻沙"之说；在实际上大力推广以堤治河，并提出了在恢复黄河故道的基础上，综合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详细规划；在行动上，他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带病坚持工作，注意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为了根除水患，呕心沥血，壮于河，老于河，朝于河，暮于河，不辞劳苦，风餐宿水，以至"积劳成病"。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致仕，万历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五。潘季驯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有《河防一览》、《两河经略》、《两河管见》、《留余堂尺牍》等。

王用汲致仕 王用汲(1528—1593)，字明受，福建晋江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淮安推官、常德同知、户部员外郎。万历六年(1578)，王用汲上

疏弹劾内阁首辅张居正挟私报怨，被革职除名。张居正死后，王用汲复官，先后任广东佥事、尚宝司卿、大理寺少卿、顺天府尹，终南京刑部尚书。万历二十年五月二十四日致仕。王用汲"为人刚正，遇事敢为"。除顺天府尹之外，多官于陪都南京，其原因就在于他性格强直。万历二十一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子太保，谥恭质。

王廷瞻逝世 王廷瞻(1521—1592)，字稚表，湖广黄冈(今湖北黄冈)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授淮安推官，升御史，督畿辅屯政。穆宗时，疏言勋戚庄田太滥，请于初给时裁量田数，限其世次，爵绝归官，得允准施行。神宗时，历太仆卿、右佥都御史兼四川巡抚，以抗御松潘诸番功，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再召为南京大理寺卿、南北两京户部左、右侍郎。不久，以右都御史出督漕运兼凤阳巡抚，除水患，兴盐利，开越河，凿渠一千七百七十六丈，筑石闸三座，减水闸二座，修石堤三千零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费库银二十余万两，历时八个月即完工。获得神宗嘉奖，赐河名为"弘济"，升王廷瞻为户部尚书。后改调南京刑部尚书，未上，致仕归。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二，赠太子少保。

周寀逝世 周寀(? —1592)，江西安福县人，嘉靖中进士，由县令进吏部主事、福建巡抚、大理寺卿。迁兵部右侍郎，总督漕运。改吏部右侍郎，致仕。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十一日死于家。周寀持身守正，为政廉洁。

明军抗倭援朝失利 日本关白(宰相)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派水陆军二十余万人、战船千余艘，偷渡朝鲜海峡，迅速攻占了釜山、王京(汉城)、平壤等要地。由于当时朝鲜统治者腐败无能，国防久废，"民不知兵二百余年"，一见到日军，无不望风溃败，日军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几乎占领了朝鲜的全部领土。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不断派人要求明朝出兵援助。而日军在占领朝鲜，劫持王子、陪臣，将府库洗荡一空，进行野蛮的烧杀奸淫的同时，还野心勃勃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边境。同年七月，明朝廷派遣游击史儒率兵二千余人，跨过鸭绿江进抵平壤，由于不熟悉地形，加上大雨，史儒遇伏力战身亡。副总兵祖承训督兵三千余人渡鸭绿江作为后援，亦惨败。

贾三近逝世 贾三近(1534—1592)，字德修，号石葵，山东峄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选庶吉士，历吏科给事中、吏科左给事中。明神宗登位，起贾三近为户科给事中，疏请停止海运，得明神宗允准。不久，升为太常寺少卿，再迁南京光禄寺卿。万历十二年(1584)秋，进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赈饥有方，召入为大理寺卿，未赴任，以亲老归养。后起为兵部右侍郎，复以亲老请归，不许。万历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九。有《东掖漫稿》。

董尧封逝世 董尧封(? —1592)，河南洛阳人。嘉靖中进士，历任推官、御史、甘肃巡抚、南京户、工二部右侍郎，改户部左侍郎，未任而於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初四日卒于家。赠尚书，谥恭敏。

张一桂逝世 张一桂(1540—1592)，字稚圭，号玉阳，河南祥符县(今河南开封)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进侍讲，主持顺天府乡试，中蜚语，调南京兵部员外郎。万历十八年(1590)，改南京国子监司业，终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万历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三。一桂为人耿直端严。有《漱枕堂文集》。

哱拜反叛自杀 哱拜，本为鞑靼人，嘉靖中，降明，屡立战功，累官至都指挥使。万历五年(1577)，哱拜以游击将军统领标兵家丁计千余人，自是得以专制宁夏。十年，进为参将。万历十七年，加副总兵致仕，其子承恩袭宁夏卫指挥。万历十九年，甘肃洮州、河州相继为青海部长火落赤所攻陷。神宗遣尚宝司丞周弘禴以御史阅视宁夏，周弘禴乃举荐承恩、指挥土文秀以及哱拜的义子布延去等人。陕西四镇经略、兵部尚书郑洛命宁夏出兵援助甘肃，宁夏巡抚右佥都御史党馨遂奉令派土文秀率一千名骑兵西援甘肃。哱拜亲到郑洛军门请战，愿以所部三千人与其子承恩一起出征。郑洛既壮其言，允其行。但哱拜潜伏异志，待时而动。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十八日，以不如数发给冬布衣及月粮银为借口，唆使其子承恩及部属起兵反叛。九月初三日，哱拜在官军的围困下，自杀身死，全家自焚。

魏学曾致仕 魏学曾(1525—1596)，字惟贯，号确庵，陕西泾阳县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历户部主事、郎中、光禄寺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隆庆中，历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吏部左、右侍郎。万历初，以上疏言事逆内阁首辅张居正，罢官归家。张居正死，起南京户部右侍郎，再召为右都御史，总督仓场。不久，以南京户部尚书致仕。万历十九年(1591)，起为兵部尚书，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万历二十年二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起兵反叛，魏学曾连战失利。八月被逮至京，夺职为民。九月哱拜被消灭。十一月，论平哱拜功，诸将升赏有差，惟魏学曾仅复其官，令致仕。万历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有《恭襄公文集》。

卢维桢致仕 卢维桢(? —1610)，字瑞峰，号

水竹居士，福建漳浦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三甲第一，授太常博士，进吏部主事，周历诸司十年。升太常少卿，历太仆、光禄、太常、大理卿，转刑部左侍郎、改户部左侍郎。万历二十年(1592)致仕归。万历三十八年卒，赠户部尚书。有《醒后集》、《阳峰集》。

李诩撰《戒庵老人漫笔》　《戒庵老人漫笔》，又称《戒庵漫笔》八卷，李诩撰。李诩(1505—1592)，字厚德，自号戒庵老人，江苏江阴人。李诩见闻较广，读书亦多，本书内容也非常广泛，如有关明代的典章制度，人物传记，有关前代的典故、遗闻轶事，以及一些学术争论等等。有不少条目可补现存史书的失传。有的可与其他史书相参证，如户帖、班匠银，其他书中很少记载，而本书中都有实物记述。是有较高价值的资料书。

平壤大捷　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明廷命令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其弟李如柏、李如梅为副总兵，决心派遣各军援助朝鲜。十二月，经略宋应昌、李如松率军七万人东渡入朝，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抵达平壤，初八日合兵进击平壤，一举攻克，歼敌一万余人，俘获无数，日军逃窜，明军取得了入朝的第一个伟大胜利，史称“平壤大捷”。

陈其学逝世　陈其学(1514—1593)，号竹庵，又号行巷，山东蓬莱县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御史，疏劾锦衣都督陆炳倚仗权势，擅作威福。后任总督陕西等处军务，先后擒斩叛人丘富等九百余人。终南京刑部尚书，致仕归里，杜门不出，谢绝宾客。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十日卒，时年八十，谥恭靖。

诏三皇子并封王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六日，神宗遣内侍以手诏示内阁首辅王锡爵：“欲待适子，令元子与二弟且并封为王”。王锡爵惧失明神宗指意，立即奉诏拟旨呈上。于是举朝大哗。礼部尚书罗万化以及光禄寺丞朱维京、涂杰、王学曾、给事中王如坚、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礼部主事顾允成、张纳陛、郎中于孔谦、员外陈泰来、工部主事岳元声、吏科都给事中史孟麟、礼科给事中张贞观、国子助教薛敷教等，纷纷上疏谏阻，并强烈批评王锡爵。顾允成、岳元声等人甚至率六部同官李启美、曾凤仪、钟化民、项德桢等直接入朝当面指责王锡爵。王锡爵害怕公论，请追还前诏，神宗不从；请下廷议，神宗不许；请面对，神宗仍不理，因自劾求罢。神宗先是大怒，欲重治建言诸臣，后迫于公议，后悔，于同年二月初六日下诏暂停三子并封王之命。

余懋学罢官　余懋学(？—1598)，字行之，南直隶婺源(今江西婺源)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抚州推官。万历初，升南京户科给事中，以首先上疏劾内阁首辅张居正，被除名。后复故官，不久进南京尚宝卿。万历十三年(1585)，疏劾内阁执政大臣罔上营私十蠹，轰动一时，为人所推重。余懋学素以直节著称，其所言好胜必致纷争，激成朋党，后果如其言。余懋学最后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漕储。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以科道拾遗，被论罢去。二十六年卒，赠工部尚书，谥恭穆。有《说颐》。

李如松遣将焚烧日军粮仓　万历二十一年(1593)二月，有谍报说：朝鲜王京有日军二十万人，且声言丰臣秀吉欲亲自出征朝鲜。为此，李如松即令诸将分布要害，扼守大同江等处。又闻侵朝日军将领平秀嘉据龙山，积仓米数十万石，李如松遣参将查大受募死士焚烧，“倭遂乏食”。日军不得已，于四月十八日，撤离王京，退据釜山。

吴中行罢官　吴中行(1540—?)，字子道，号复庵，南直隶武进县(今江苏武进)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大学士张居正为吴中行座主。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夺情视事。朝臣亦多有上疏请留张居正者，吴中行坚决反对，不讲师生情面，首先疏劾张居正不守祖宗法度，置万古纲常于不顾。张居正大怒，吴中行被廷杖，遍体鳞伤，抬回老家，由此名声震天下。张居正死，吴中行复故官，为右中允，直经筵，迁右谕德，终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为给事中王嘉谟等所劾，于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罢去，命家居待召，未及复起而卒，赠礼部右侍郎。有《赐余堂集》。

辛自修逝世　辛自修(？—1593)，字子吉，又字子言，号慎轩，河南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海宁知县、吏科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太仆少卿，数直言上疏，有声名，后以疾归里。万历六年(1578)起为应天府丞，迁光禄寺卿，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六府，奏减均徭里甲银，兴修水利。召入为大理寺卿，进兵部左、右侍郎，升为南京右都御史，疏劾御史沈汝梁贪污受贿，再升为左都御史。十五年大计京官，内阁大臣欲庇护私人，排斥异己，辛自修疏言“请勿以爱憎为喜恶，排抑孤立之人”。神宗善其言，而阁臣不悦，遂以病回家。不久，起南京刑部尚书，复召入为工部尚书，未赴任而卒。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予祭葬，赠太子太保，谥肃敏。

吴国伦逝世　吴国伦(1524—1593)，字明卿，号川楼，又号南岳山人，湖广兴国州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由中书舍人升兵科给事中。时杨继盛被权奸严嵩下狱论死，吴国伦倡众为杨继盛捐资治丧，严嵩怒，将其贬为南康推官。严嵩败，吴国伦出任

建宁同知，迁河南左参政。大计京官时，吴国伦被论致仕。吴国伦才气横放，好客轻财，工诗，求名之士，多走其门。是明后期有名的文学家，与李攀龙等并称“后七子”。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甔甀洞稿》等。

诏撤援朝明军归国 侵朝日军退出王京之后，李如松遣将分扼要害，以李宁、祖承训守开城，杨元守平壤，李如柏守宝山，查大受守临津，刘綎守釜山海口，朝鲜战局至此略定。万历二十一年(1593)夏秋，日军又自釜山移驻西生浦。并送回朝鲜王子。同年七月初一日，明神宗下诏撤李如松大军离朝回国，只留四川参将刘綎以及游击吴惟忠所统之兵合计七千六百人，分守要口。由于兵部尚书石星一意主和议，欲封贡日本，神宗便命沈惟敬再次赴日本军营议和。为此，神宗再令撤回吴惟兵等兵，只留刘綎兵防守。对此，朝臣多持异议，以为“倭情未定”，不宜急于撤兵过多，更不宜急于议和，加以封贡。

孙珑致仕 孙珑(1525—1594)，字文中，号立峰，浙江余姚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武选郎中，万历中累官大理卿，迁吏部左右侍郎、南京吏部、兵部尚书。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改京师吏部尚书，大计京官，力杜请谒，执政皆不悦。遂累上疏乞休。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养病，七月致仕。万历二十二年卒，年七十。赠太子太保，谥清简。

陈于陛请修国史 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初四日，署詹事府事礼部尚书陈于陛上疏请修本朝正史：史家之体有二：一为编年，二为纪、表、志、传。自宋以后，修正史(纪、表、志、传)之风盛行。我朝功业法制，事事超越前代。而史籍则只有实录，正史阙如未备。今朝野所撰可备采择者，无虑有数百种。若不及时网罗，岁月既久，卷帙散轶，欲成信史，将不可得。请陛下立即下诏，设局纂修，以成万世不朽盛事。神宗将此疏交所司议论。第二年三月，内阁就陈于陛所请修国史事，拟定方案，请神宗下令开馆设官修史，分任责成。神宗遂下诏修国史，并由内阁选词臣分任。后决定由大学士王锡爵、张位等为总裁官，陈于陛、罗万化等为副总裁，右庶子余继登等为纂修官。同时往各地广泛选用文行兼优之人，不论品流，均令改为京职入馆，至于山林隐逸之士，亦令吏部访用。出内府藏书，先纪、志，次年表，次列传，限以年月，各送总裁，纂修官必须尽力，不得充差、请假。

赵用贤罢官 赵用贤(1535—1596)，字汝师，号定宇，南直隶常熟(今江苏常熟)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选庶吉士。万历初，授检讨。大学士张居正父丧夺情，赵用贤上疏劾之，被杖除名，时称赵用贤等五人为“五直臣”。张居正死后，赵用贤复故官，进右赞善，充经筵讲官，再迁为右庶子。上《议平江南粮役疏》，极论苏、松、嘉、湖重赋之害，民生坐困。而阁臣申时行、王锡爵竟以吴人不当言吴事，严厉训责，致其议不得行。后改南京国子监祭酒，升吏部右侍郎。王锡爵等素忌赵用贤，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以病罢归。万历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三。后追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赵用贤刚直敢言，疾恶如仇，议论风发。有《松石斋集》、《三吴文献志》、《国朝典章》等。

辛应乾逝世 辛应乾(？—1593)，字伯符，又字效致，山东安丘县(一说湖广东安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授长治知县，以都御史巡抚山西，整饬边备，与士兵同甘苦，累官至兵部右侍郎。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十四日卒。

李世达致仕 李世达(1533—1599)，字子成，号渐庵，陕西泾阳县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南京太仆寺卿、山东、浙江巡抚、南京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终左都御史。世达持正不阿，遇事敢言。万历二十一年(1593)，与吏部尚书孙珑同主京察，阁臣庇护私人，世达斥之几尽，又论救考功郎中赵南星，为吏部右侍郎赵用贤以其女绝婚事被劾鸣不平。同年十月二十二日愤而上疏致仕，万历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太保，谥敏肃。

河南矿工起义 万历二十一年(1593)，河南叶县矿工二千余人发动起义，攻掠文、马二峒。当时，神宗以宁夏、朝鲜用兵，说：“开矿则贼亦可化为兵，且在外可救饥，在内可备用。”然鉴于时势紧张而未敢正式下诏开矿。

陈用宾筑腾冲八城 万历二十一年(1593)，巡抚云南右佥都御史陈用宾在云南腾冲修筑万仞、神护、巨石、铜壁、铁壁、虎踞、天马、汉头八城，设守备二员。“自是缅甸人不敢深入。”

徐渭逝世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又字文清、天池、号青藤道士，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为诸生，有盛名，知兵好奇计。嘉靖中，为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幕僚，于抗倭战争事多有谋划。胡宗宪下狱，徐渭畏罪至发疯，自杀未死，乃杀其妻，被逮入狱，后得免归。善诗文书画，尝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又次之，画再次之”。所编《会稽县志》，表达了他对地方政治经济革新的看法。其文学代表作为杂剧《四声猿》，诗文有《徐文长全集》等。

朱天球致仕 朱天球(？—1610)，字君玉，号国器，福建漳浦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考满入京，值杨继盛被害死，朱天球与

薛天华、杨豫孙、董传策往哭于西市，并经理杨继盛丧事，时称为“四君子”。不久归家守孝。严嵩败后，朱天球进南京太仆寺卿，后逆大学士张居正和冯保，去官家居十九年。万历十五年(1587)，由于众人推荐，起朱天球为南京大理寺卿。万历二十年，升南京工部尚书。以在家久，无意再仕，遂六次上疏乞休。二十一年致仕。朱天球一生修心砥行，晚节尤坚。万历三十八年卒，赠太子太保。有《湛园存稿》。

王体复致仕 王体复(？—1613)，山西太平(在今山西临汾地区)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工部主事，历陕西按察司副使、苑马寺卿、河南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顺天府尹，终巡抚贵州右副都御史。王体复才达敏练，居官清淡自持，历官中外，素有劳绩。万历二十一年(1593)致仕，时论皆以为可惜。万历四十三年卒。

汪道昆逝世 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南明，安徽歙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义乌知县，教民练兵，与戚继光一起募兵抗倭，累官至兵部左侍郎。因尝与李攀龙、王世贞共同切磋古文辞，王世贞称其文“简而有法。”道昆“由是名大起”。万历四十一年卒，年六十九。有《太逐集》等书传世。

《宛署杂记》刊行 《宛署杂记》二十卷，沈榜撰。万历二十一年(1593)刊印。沈榜，湖广临湘人，由举人历知县、户部主事。该书记录了宛平县铺舍、街道、地亩、人丁、徭赋、力役、官庄、马政、奶口、税契、铺行，以及对坛庙、陵园、行幸、宫禁、内府和乡试、会试、殿试等所负担的费用，人民所承受的来自各方面极苛刻、极烦琐的负担。该书着重记载了明代北京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风俗掌故，也兼及金元时期一些宝贵史料。显示了北京地区的特色。

范濂撰《云间据目钞》 《云间据目钞》五卷，范濂撰。书前有万历二十一年(1593)高进孝序。全书五卷，分人物、风俗、祥异、赋役、土木五类。是书记述了江南城市，主要是松江一带织布业、商业、市民习俗、饮食、服饰、家庭用具、戏剧流传、以及土豪乡绅据霸占田产、压榨百姓的情况，《云间抄目钞》如实的反映实际，使乱臣贼子、贪官污吏们所恐惧。是以松江为轴心的有地方特色的掌故笔记。

严督官员“安民灭盗” 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二十日，神宗下诏说：去年各省灾伤，山东、河南以及徐、淮等处尤为严重。朕屡次下令救济，不知有司曾否奉行，百姓是否得到实惠？值此公私交困之时，不知各地除了动用国家钱粮之外，是否有急救便宜措施？各地闹事的矿徒是否已经安置归农？今日四方吏治，“全不讲求荒政，牧养小民，惟以搏击风力为名声，交际趋承为职业。费用侈于公庭，追呼偏于闾里；嚣讼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徕。遇有盗贼，则互相隐匿，或故意徇纵，以求免地方失事之咎。而各抚、按官亦止知请振请蠲，不能汰一苛吏，革一弊法。如此上下相蒙，酿成盗贼之患，朕甚忧之。自今当以安民弭盗为有司之黜陟，如有仍前欺隐及玩视诏令者，当重治不宥。”

褚铁疏言漕法事宜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二月初四日，总督仓场右都御史褚铁上疏说：务核漂流漕米之数，以革奸弊；佥役殷实旗军，以免侵渔盘剥；造坚固漕船，以保仓储；编成水伍，以革强横需索。神宗从其议。

孙丕扬疏言民隐吏治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二月二十八日，右都御史孙丕扬奏，今吏治民隐分为二途，请即以民隐责吏治：一、责守令以实户口；二、责守令以垦荒田；三、责守令以宽赋额；四、责守令以兴礼教；五、责守令以备凶歉。神宗命下部、院施行。

“东林党议”之始 吏部郎中顾宪成先因反对三皇子并封王事触犯神宗，后又在京察中因支持吏部尚书孙𫓶而得罪内阁首辅王锡爵。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二月，王锡爵将致仕，会推阁臣，顾宪成推举王家屏，神宗不用。他又举孙𫓶和孙丕扬，神宗遂怒而革其职。宪成回到故里无锡之后，与弟顾允成共同倡议重修东林书院。并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诸人，讲学其中，“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时士大夫怀志而为当局罢斥者，多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朝内的官员“亦遥相应和。由是东林之名大著”。人称宪成等为“东林党”。其后，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也相继到此讲学，“自负气节，与政府相抗。是为东林党议之始”。而浙江宁波人沈一贯以善于奉承得神宗欢心，遂入阁，成为浙江派官僚首领，人称“浙党”。东林党人以讲学联络人士，浙党恃权求胜。自是东林、浙党互相争斗几达五十年。

陈子贞奏陈垦田通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四月初二日，福建巡按陈子贞奏陈垦田通商四事：一、请开海山海坛、南日二处荒田，三年后起科、充本处兵费。二、请裁租税，将全省寺田逐一清查，照议减租税三分之二，余征充饷。其商税，除挟资入番满载出境本重利倍之外，如本境细微交易尽免。天主山荡，召民佃种，毋为势豪侵占。三、清理屯田、将省中府县屯粮另造一册，备载军名、地亩、坐落、佃种，印给实征由帖，各府里长。遇屯军索租晚帖扣留应纳钱粮，余给本军，粮官止催里佃完纳，勿更扰军。四、请通广东米谷福州、兴化、漳州、泉州之粮大半取足于

广东。广东雷、廉、高、潮等处地阔收多。两省抚、按不问丰歉，概计予籴粜和资，通商互惠。户部允其请。

张蒲奏行制钱 万历二十二年(1594)四月十五日，御史张蒲奏陈：钱法之坏，实由于王府私造。近复阻滞，至如制钱行于民而不行于官，疏通无术。请自宗禄、官俸，下至户口、商税、驿递、工食悉准兼搭制钱。钱粮除起运外，罚赎除积谷外，银、钱兼收。援事例者，搭钱十分之二。省直复开宝源官局，铸万历制钱。原使古钱地方，新旧兼用。严禁王府责成长史等官。部复：需上下通行，毋踵前弊。神宗从其议。

甘士价疏言计吏事宜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初八日，神宗令申饬计典条例，河南道御史甘士价遂上言计吏八事：责成部、院。责成抚、按。责成司、道。责成郡守。资格当略。夤缘当杜。实政当务。人材当惜。

王锡爵致仕 王锡爵(1534—1610)，字元驭，号荆石，南直隶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累官至祭酒。万历五年(1577)以詹事掌翰林院，因反对大学士张居正廷杖吴中行等人，回家不出。万历十二年冬，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王锡爵一还朝即上疏请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神宗俱予采纳。万历十八年，王锡爵上疏请预教皇长子、立皇太子，神宗皆不听，于万历十九年六月再次归里。王锡爵在内阁时，尝请罢江南织造、仃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发库银救济河南饥民，且申救被斥之臣，多为时人所称。二十一年正月还朝任内阁首辅，改吏部尚书，进建极殿大学士。万历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致仕。万历三十五年神宗特加锡爵为少保，遣官召还，终闭门不出。万历三十八年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太保，谥文肃。有《王文肃集》等。

李先芳逝世 李先芳(1511—1594)，字伯承，号东岱，更号北山，湖广监利(今湖北监利)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新喻县令，进户部主事，终尚宝司少卿。万历二十二年(1594)六月十五日卒，年八十四。李先芳精工诗词，著述宏富，有《李氏山房诗选》、《江右诗稿》、《读书私记》、《清平阁集》、《东岱山房稿》等。

王自简起义 南直隶凤阳府颍州王自简(一作王自检)聚众千人，发动起义。旋即遭到官军镇压。万历二十二年(1594)六月二十日，朝廷以颍州兵备副使李骥等俘获王自简等人有功，下令嘉奖，并各赏银有差。

陈有年致仕 陈有年(1531—1598)，字登之，号心谷，浙江余姚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由刑部主事，历验封郎中。万历初，因反对成国公朱希忠赠王事，引病家居十年。万历十二年(1584)起郎中，"谢绝请寄。除目下，中外皆服"。后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疏陈济急六事，被劾违诏，落职闲住。被荐再起，累官至吏部右侍郎，不久升为南京右都御史，主持京察，去留皆得当，有公无私。万历二十一年秋，晋吏部尚书，严于律已，只身居公署，尤其是引用的僚属，皆为公正之人。万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致仕。万历二十六年正月卒，年六十八。赠太子太保，谥恭介，有《恭介公集》。

赵文炳请崇节俭正风俗 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初二日，御史赵文炳上疏极论风俗之坏说：近来风俗奢侈，攀比相高。数日之粮，不足供一席之费；百亩之入，不能买一身之衣。嫁女则玄黄耀目；送死则幡幢满天。居室雕梁画柱，车马饰以金锡；披缁削发，多于农夫；梵宫玄观，拟于北阙之盛。以至缀珠玉于倡优，紧曳朝履于仆隶。风俗如此败坏，民岂能不穷！京师为四方之极、大臣为百官之望。大臣不行节俭，何以为百官的表率。京师不行节俭，何以做天下的榜样。辅臣、九卿，宜身先节约，以为众倡。京师不能节俭，当责之五城御史。直省不能节俭，则责之抚、按。

孙丕扬创掣签法 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初三日，左都御史孙丕扬被命为吏部尚书。挺劲不挠，百僚无敢干以私。为杜绝太监请托，创"掣签法"，(签以竹为之)，大选(凡听选及考定升降者，归于双月，谓之"大选")、急选(凡改授、改降、丁忧、候补，归于单月，谓之"急选")，悉听其人自己抽签，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官吏考选之法，自此一大变。

罗万化致仕 罗万化(1536—1594)，字一甫，号康洲，浙江会稽县(今浙江绍兴)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第一，历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官至礼部尚书。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初九日致仕。同年十月十七日行至途中而卒，年五十九。赠太子少保，谥文懿。有《世泽编》。

中日和议成约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月二十三日，与顾养谦一起力主对日议和封贡的兵部尚书石星，再次上疏请尽快封贡日本说：当初日本攻占朝鲜，是利用其威。及其退还王京、送回王子和陪臣，是讲信用。皇上慨然许封，则当尽快封之。一封而日寇以退，朝鲜以保，外患以息，内备以修。今日军久住釜山，我之欲封不封，既已失信；彼之请封未封，必复生疑。故封后而勒令尽归，宜无不得；封前而数为责备，似难必行。宜一面令日使小西飞进京确示予封之

信，一面令侵朝日军统帅行长即退，以待册使往之。即使行长不敢速归，待册使至而返，亦无不可。封则朝鲜暂安，得自为战守。若复设难成之约，则祸及朝鲜，全罗必失，我辽东亦难以支持。若封后有反复，臣愿自往莅，事不济则治臣罪。神宗允其议，于当天诏日使小西飞进京，许其予封。如日本不退出朝鲜，则兴兵正罪，一意征剿。小西飞进京以后，朝廷集多官面议三事：“一、勒倭尽归巢；一、既封不与贡；一、誓无犯朝鲜。倭俱听命。”并经明神宗允准，“封议遂定”。十二月三十日，神宗从兵部尚书石星之请，命临淮侯勋卫署都督佥事李宗城为正使、五军营右副将署都督佥事杨方亨为副使，各赐武官一品服，往朝鲜釜山封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

杨恂奏陈钱粮积储事宜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一月初一日，户科都给事中杨恂疏请钱粮积储四事：一折征。内库所贮香蜡、颜料、布绢、羽毛、皮张之类，积剩盈余，霉烂腐朽。员役通同解户，虚名实报，抵美易恶，宜逐一清理，除足供用者，其余俱征折色银两，解部济边。二裁革冗员。凡冗官，如译字生、冠带儒士、通事、序班、带俸中书官、乐舞生以及大工升除者；冗役，如官匠、民匠、甲斗、脚夫、厨役以及大婚选授者，每年支耗粮米百余万石，俸薪数千万两，宜逐一裁汰，造册送部科，注销支放，以杜冒滥。三减少料草。二十四马房，有名无实，今马数虽减而草料加额，宜逐一清核。四清查牧地，以杜侵渔。

朱载堉请宗室考试入仕　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郑恭王朱厚烷之子朱载堉奏请“宗室子弟，皆得儒服就试，中式者无论中外职，视才器使”。神宗从其请。后经礼臣会议，至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始正式施行。但规定宗室子弟及第后不得授京朝官。

陈于陛疏言时政六事　万历二十三年(1595)二月初二日，大学士陈于陛上疏请神宗接见大臣、录用人才、劝奖外吏、清查边饷、储养将材，择用边吏。神宗见疏，褒美加纳其言。

吴文华致仕　吴文华(1521—1598)，字子彬，号小江，晚年更号容所，福建连江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万历三年(1575)，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进剿南乡、陆平等处瑶民起事。其后，历户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仍抚广西，迁总督两广军务，巡抚广东，进右都御史，督兵镇压农民起义。不久，召入为南京工部尚书。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致仕。万历二十六年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少保，谥襄惠。有《济美堂集》。

胡嘉谟逝世　胡嘉谟(？—1595)，字子忠，号进庵、止吾，陕西泾阳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由章丘县令，历吏部主事、大理寺卿、刑、户二部侍郎，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万历二十三年(1595)七月初七日卒于官。

周咏逝世　周咏(1533—1595)，字思养，号乐轩，河南延津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历魏县知县，升御史，出按宣府、大同、山东(西)。万历三年(1575)迁大理寺丞，万历四年进左少卿，万历五年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转蓟辽总督，垦田一千四百亩，修筑台垣七十余座，数败虏，生擒速把亥，升右都御史，进兵部左侍郎，致仕。万历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三。

王樵致仕　王樵(1521—1599)，字明远，号方麓，南直隶金坛(今江苏金坛)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行人，历刑部员外郎，著《读律私笺》，“甚精核”。万历初，历任浙江佥事、尚宝卿，上疏救言官，逆张居正，被调出为南京鸿胪寺卿。不久，自求致仕。家居十余年，复起南京太仆寺少卿，迁大理寺卿、南京刑部右侍郎，进右都御史。万历二十三年(1595)九月初八日致仕。万历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少保，谥恭简。为人忠博览群书，精通经学，《易》、《书》、《春秋》，皆有纂述。有《方麓居士集》。

诏复建文年号　礼科给事中杨天民、四川道御史牛应元曾奏：“建文年号，不宜革除，值会纂修国史之时，当更正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号，以复建文元、二、三、四四年之旧。”礼部议从其议。神宗亦表示同意，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九月十六日诏以建文朝附国史《太祖本纪》末，复其年号。

朱载堉进《万年历》　朱载堉一生勤奋刻苦，尽心研究历学，用《大统历》与《授时历》互相对照，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遂融会二家，反复比较实验，著成《万年历》，进呈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九月二十一日礼部复奏，认为朱载堉《万年历》所说弦望各差一日，有问题，不予实行。但当时有人则以为《万年历》所说的“或未尽非”。

盛讷逝世　盛讷(？—1595)陕西潼关卫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大明会典》纂修官。万历八年(1580)，充会试同考官。九年，以九年考满升侍读学士。万历十四年，复任会试同考官及会试武举主考，迁庶子。万历十六年，主考顺天乡试。万历十七年，充经筵日讲官，历国子监祭酒、詹事、礼部右侍郎。万历二十年，充会试主考，改吏部右侍郎，遇母丧归家守孝。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卒。谥文定。

军政之狱　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兵部考

选军政，神宗说：其中有副千户，未经奏请即署四品官职（指挥佥事）。于是，下令严厉责备部臣徇私、兵科不检举揭发。又责备五城御史抄太监客用家时不称旨，责备客用的财产私藏于崇信伯费甲金家而刑部拷讯无实。最后又移怒于南北两京科、道官，责其失职，闭口不言。为此，先后将两京武选郎中、给事中、员外郎、主事、御史等三十余人尽罢斥为民，数十人或被降为杂职，或被贬级调外、发配边方，或仃支俸一年。大学士赵志皋、陈于陛、沈一贯及九卿各疏救，兵部尚书石星还请自己罢职以宽被害诸臣，神宗皆不听。时明神宗严治诸臣的圣旨频频下达，举朝无不震惊。史称“军政之狱”。

马经纶夺职为民 河南道御史马经纶以“军政之狱”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二十二日上疏说：陛下以兵部考察军政之故罪兵科则已，为何蔓及其他给事中，且波及其他御史，致使去者不明应得之罪留者不明姑恕之由。以缄默不言而罪言官，言官何辞！臣以为今日言官之罪，在于：一、陛下多年不拜天，言官不能援故典以谏，是陷陛下不敬天。二、陛下多年不祭祖宗，言官未能争，是陷陛下不敬祖。三、陛下不视朝政，不举朝讲，言官亦不能劝，是陷陛下不勤政。四、陛下去邪不决，任贤不笃，言官言之而不能强得，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那样用人。五、陛下好货成癖，对下少恩，挟怨蓄怒，言官忧虑而不能谏止，是陷陛下放弃初政，不能善终。言官负此五大罪，若陛下肯奋然励精而以此五罪罪言官，岂不更好！奈何责以箝口不言，不责于此而责于彼。更有甚者，当廷臣交章论救之时，陛下不还职于被斥诸臣，反尽落职为民。是陛下自塞耳目，自离腹心，自杀股肱，陛下将与谁共理天下！言官本无大罪，陛下震怒无常，罪以失职，是大失人心，上逆天意。陛下自己不拜天地，不祭祖宗，不爱惜人才，不贱货财，不下诏罪己，咎失人君之职，反而赫然降非常之灾，重罪言官，陛下独不思自为国家之计吗？神宗得疏，愤然大怒，竟斥经纶为民。

工部奏修坤宁乾清两宫 坤宁、乾清两宫因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月初八日火灾，化为灰烬，急需重修。四月初一日，工部奏建两宫有关事项，计有：催征各省直旧欠钱粮，多方筹集经费；铸钱；清查库料；工程分工；赴四川、贵州、湖广采伐楠杉大木；木石；车户；烧砖；发见钱；夫匠；加铺户；明确督造官职掌；停止别项工程等。神宗降旨说：重建坤宁、乾清二宫，工程重大，经费浩繁，你部当计处周悉。有关经费的筹集问题，待与别部酌议停当，再如议施行。

廷臣争论封日本事 自从封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之议起，言官、部司上疏力谏，月无虚日。万历二十四年（1596）五月初十日，廷臣就此事再次展开激烈争论。沈思孝独责石星一意主封，并指责礼部尚书范谦支持石星的意见。范谦推却说：讹言远在数千里之外，你能知其封事必坏吗？沈思孝说：册使李宗城为日本守臣所逐，潜逃至京，损威辱国，酿祸已极，还尚能附和邪臣误国吗！范谦失色，无言以对，退出会议。兵部左侍郎李桢汇集众议呈报明神宗。神宗说：今不论封事成否，战守必不可废。蓟辽督抚等官带有御倭之职，两镇兵马必加意整练，亲自巡阅邻近朝鲜地方，周视要害，积兵储饷；选用谋勇将领带领精兵，申严纪律，前往朝鲜协同教练士兵，固守险要。天津、登莱、浙江、直隶、闽、广等处通令各该督抚将吏一体严行守御。宣、大边兵以及浙兵俱拣选听调。各地务必做到兵行粮随，多方设法转运，或者开通海道，或在辽东就近籴买，使军兴而食不乏。同时命蓟辽总督作速传令朝鲜国王厚积粮草，以待我兵救援。

仲春请开矿助大工 万历二十四年（1596）六月二十四日，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疏请开银矿，以助重建坤宁、乾清两宫大工。神宗马上降旨命户部和锦衣卫各派一人同仲春开采。户科给事中程绍、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各上疏谏阻，神宗根本不听。于是程绍说：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命采矿，自是年十月至三十六年十二月的十年间，先后委官四十余人，派防兵一千一百八十人，俸粮、器械、铅、炭所费计银三万余两，而开矿所得只有银二万八千五百余两，得不偿失。自从此次仲春奏开矿之疏行，献矿洞者踵至。

沈思孝疏言战备五事 万历二十四年（1596）六月二十七日，兵部奏言：本月二十六日该部协理京营戎政右都御史沈思孝以今东西交讧，备御宜先，特条议五事以思患预防，一、久任将领。二、教练标兵。三、举用豪杰。四、增补马匹。五、缮修战具。神宗依议施行。

孙丕扬奏请推补缺官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初二日，吏部尚书孙丕扬以缺官多不补，政事久废，特上疏说：数月以来，廷推、改调、升迁一概停止，因政设官之意不行。请陛下念国家多事之时，将近日推补官员章奏简发。如有不当，亦请明示，以便别推酌补。神宗见疏，置之不理。继孙丕扬之后，四川道御史汪以时上疏亟言地方官多缺不补之害：布政、按察等司各有分工，人专其责。每遇缺官，则抚、按必择近便者一人使之兼管，其职专钱谷者而兼领军屯，其职专兵戎者而令兼领盐马，技能不娴习，情况不了解，遇事难以处理。而舞文者乘此弄其机械，玩法者借以恣其侵渔。文书之往来，狱讼之听断，近者数十里，远

者数百里，又远者千余里。道路奔走，岁月牵缠，费用不支，劳苦勿恤，或卖其妻子而事尚未完，或转死于沟洫而冤莫可诉。司道缺官，废事病民，其害如此。至于知府县令，与地方关系最为密切，可比之赤子于其乳母，府县缺官，可谓赤子断乳，其害尤大。恳请陛下念万民困苦，速行推补地方官。神宗不理。

杨俊民请罢畿内开矿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初二日，神宗命户部在畿内诸府州开矿。同月初八日，户部尚书杨俊民首先上疏反对。他说：真定、保定、蓟州、易州、永平开矿，恐妨天寿山龙脉。请令封闭，并治锦衣卫百户陆松等人争言矿利之罪。神宗却说：真定等五府距离祖陵远，而且皇祖(嘉靖)时曾开采，仍务依前旨差官开采，陆续解进，各地方官不得借言阻抗。同月二十日太监王虎等人即在真定诸府州正式动工开矿。

矿监之祸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初二日，锦衣卫百户陆松、鸿胪寺随堂官许龙、顺天府教授冯时行、经历赵凤华等人，各言开矿助大工；詹事府录事曾长庆请山西夏县开矿。神宗不但皆予允准，而且于同日正式命令户部赴畿内真定、保定、蓟州、易州、永平开矿。同月二十日，承运库太监王虎带领户部郎中戴绍科和锦衣卫佥书张懋忠在畿内上述各府州兴工开采。终万历之世、引起全国民怨沸腾的矿监之祸由此开始。其后，无处不开矿，矿监随之四出，河南则鲁坤，山东陈增，永平王忠，昌黎田进，山西张忠，浙江曹舍，陕西赵鉴，几乎全国十三布政司、南北两直隶无不有太监在督领开矿。并对他们委以大权，又带原奏官前往，其害益滋。开矿无所得，则勒民赔偿。奸人亦借开采之名，横索民财；地方官稍逆意，即以阻挠开矿罪之，不少人为此蒙受不白之冤，以至家破人亡；富家巨室，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下有矿藏，派卒役围捕，辱及妇女，以致各地骚动，民困不堪。群臣百余次上疏谏阻，神宗不听，矿监之祸，愈演愈烈。

褚铁条议漕运事宜　万历二十四年(1596)八月十一日，总督漕运工部尚书褚铁建言漕运六策：一、久任运官以责成效。二、改造京船以省浮费。三、核实完欠以正赏罚。四、预开京口以速粮运。五、改解预支以防挂欠。六、更换交总以便民情。神宗命如议实行。

沈思孝致仕　沈思孝，生卒年不详，字纯父，号继山，浙江嘉兴县人。隆庆二年(1571)进士。万历初，历刑部主事，疏劾大学士张居正丧父夺情，遭廷杖，谪戍神电卫。后复官，以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进工部右侍郎，奏减陕西羊绒。再进为右都御史，协理京营戎政。万历二十四年(1596)闰八月初四日致仕。死后追赠太子太保。沈思孝性刚劲，素以直节著称。然尚气好胜，颇遭议论。有《溪山堂草》等。

杨成致仕　杨成(1521—1600)，字汝大，号震压，南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工部主事、郎中、四川参政、江西布政使、南京工、吏、礼部尚书，终南京兵部尚书。万历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致仕。万历二十八年卒，年八十。谥庄简。有《庄简公集》。

孙继皋致仕　孙继皋(1550—1610)，字以德，号柏潭，南直隶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第一，历修撰、少詹事、礼、吏二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二十二日致仕。万历三十八年卒，年六十一。赠礼部尚书。有《柏潭集》、《宗伯集》。

河决单县黄堌口　万历中，徐州、泗州、淮安、扬州一带，连年苦水患。为此，河道总督杨一魁遂议分导黄、淮，调集民夫二十万人，开桃源黄河坝。所开新河，自黄家嘴至安东五港灌口，全长三百余里，分泄黄河之水入海。又开辟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三座石闸，泄淮河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长江。于是泗州皇陵水患除，而淮、扬得无患。但由于杨一魁专力注意桃源、淮安、泗州之间，而不注意疏浚上流，致使单县、黄堌口一带水患依然如故。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单县黄堌口再次决口，淹没禾稼、人畜，不计其数。

税使之祸　神宗于万历二十年(1596)十月二十二日派大批太监为税使，到各地征税，专供内廷挥霍之用。是日，他命御马监左监丞张烨往通州张家湾征收租税，给以关防，规定每年征取银四千两，分为四季，按季解进。不久，又命太监王朝督征天津。明代中后朝，与矿监之祸并为榨取民膏民脂的税法之祸由此开始。自是二三年间，税使四出，多兼领矿，许多人集矿监、税使于一身，到处横行勒索，贪奸无比，民益不堪，怨声载道。群臣屡谏，神宗无动于衷。

陈于陛逝世　陈于陛(1545—1596)，字元忠，号玉垒，四川南充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万历二十一年(1593)，官至礼部尚书。他性好读书，习知典故，于经世之学尤有造诣。上疏请招集人才，开设史局，纂修明朝国史，并兼任副总裁官。万历二十三年夏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请亲大臣，起用被罢忠贤、奖励外吏、核实边饷、储养将才，慎择边吏，又请神宗亟图更始、兴修百业，并再三力救因兵部考选军政而被削职的言官。神宗俱不采纳。不久，改陈于陛为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是时内阁辅臣计四

人：赵志皋、张位、沈一贯、陈于陛，皆同年生，遇事虽无掣肘。但因神宗一再拒谏，上下隔绝，政事久废。陈于陛为此忧形于色，终日叹息不已。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于官，年五十二。赠太子少保，谥文宪。有《万卷楼稿》。

戴士衡疏言天下大事 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吏科给事中戴士衡疏陈天下大计，说：方今事势，不可知有三：天意，人心，气运。大为可虑有五：纪纲废弛、戎狄侵陵，根本动摇，武备不修，府库殚竭。其切要而当亟正的有一：君心。陛下高居深宫，目不见大臣，耳不听众官之议；美丽当前，燕惰自佚。惟有勤政视朝，才能心清欲寡，政事自修。此疏呈上，神宗置若罔闻。

复议征倭援朝 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拒绝受封，日本军亦未撤离釜山回国，日将清正统战船二百艘驻扎机张营，并同时调动各路人马，准备重新夺回归还朝鲜的战略要地和都市。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二十五日朝鲜遣使向明朝求援。二月初五日，明朝政府遂召集各官议论朝鲜战局的形势，分析日军的动向。十一日再议援朝事宜，决定调宣府、大同和蓟、辽军队七千人，募浙兵三千七百人，并诏令朝鲜设立海防司道官。十五日任命原延绥总兵官、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帅南北诸军，出师朝鲜，征剿日本侵略军。三月十五日，升山东布政司右参政杨镐为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为了加强后援，支持杨镐经理朝鲜军务，紧接着又命兵部左侍郎邢玠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杨镐未至，先奏十事。其中有令朝鲜官民输粟，得增秩、授官、赎罪以及乡吏丁夫等免役。又以朝鲜君臣隐匿钱粮，不饷援朝明军，劾奏其罪。因此，朝鲜官民多怨杨镐。

谢杰直谏神宗"十不如初"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初八日，南京刑部右侍郎谢杰上疏直谏神宗"十不如初"：一为孝亲不如初。以前与两宫皇太后朝夕同欢。今则问安久旷、少行庆贺，甚至连孝安庄皇后的梓宫发引，都托疾不送，遣官代行。二为尊祖不如初。以前四季享太庙。今则每次皆遣官代往。三为好学不如初。以前研究文学、扬榷古今。今则讲席、讲官俱为虚设，有名无实。四为勤政不如初。以前亲理朝政，披星戴月，不敢少怠。今则身居大内，多年不出。五为敬天不如初。六为爱民不如初。以前每遇水旱灾荒，不时发钱粮赈济四方。今则信用奸徒、矿监税使四出开矿抽税，天下骚然。七为节用不如初。以前宫中用度有节，外府积贮充盈。今则江西之瓷、江南之纻、两蜀之扇、关中之羊绒，往往溢额征调。八为纳言不如初。以前谏疏多采。今则章奏留中不发，一言逆旨即斥逐。九为亲亲不如初。以前多方议处宗室禄粮，今则多置王府事于不顾。十为用贤不如初。以前缺官随推补，今则大僚推而不用，庶官缺而不补。谢杰奏疏时亦称"进十规"。神宗俱置之不理。

吕坤疏言收人心 万历二十五年(1597)四月初一日，刑部左侍郎吕坤疏言：陕西羊绒，本为小民贩卖以糊口。自朝廷下令传造以来，百姓苦于催逼，弃桑农而捻线，数百万人提花染色，日夜无休。至于山西之䌷，苏、松之纱罗段绢，每年所派亦不断增加。与其积于无用，不如定以有常，用一年派造一年。如此则宫中可免去收藏之累，天下无多取之忧，陕西、江南之民心即可得。以采木而言，要求丈八之围的大木，所需数量又多。每伐一木，从入山寻找采伐到途中运输扛抬，往往伤死百人。若能减其尺寸，少其数目，则四川、贵州、湖广民心可收。又今矿税无利，征民间纳银，民穷不能支，则括库银代解，朝廷得一金，地方郡县费千金。请下令严禁借解，以收各省人心。请撤皇店，以收畿内人心。吕坤忠君体国，为民请命，所言俱切中时弊，神宗却置之不理。

刘纲冒死上书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十九日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等处发生大火。同月三十日，翰林院庶士吉刘纲上疏说：去年坤宁、乾清二宫发生火灾，陛下下诏，罪己缺乏诚意，与民不沾实惠，臣已知天怨未止。乃大兴土木、伐木、抽税、采石运瓦，远者万里，近者数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费，绝筋骨不足任劳，卖妻子不能偿贷。加以旱潦交加，野无青草，人情怒怨。所在如仇，以致再发生三殿火灾。请陛下自己想想，是否做到日夜"思道"？不思"道"，便是非道。陛下多年以来，不祀天，不享庙，罢朝讲，弃股肱，不纳谏，到处开矿，不畏天命，君臣相隔如万里，今日之灾，是为报应。臣闻有积必有灾。臣请冒死而言积之所在：皇长子冠婚册立，久不举行，是积典；大小臣僚，奏请公事，多半不理，是积牍；地方司府，有官无人，是积缺；被斥诸臣，概不起用，是积才；外有倭患，内有"盗贼"，是积寇；守边治河诸臣，虚词罔上，恬不为怪，是积玩。诸种所积，陛下不能明断，内阁首辅赵志皋不敢执争，势必引起天怒民怨！神宗得疏，留中不报。

周盘请神宗引咎自省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二十九日巡按直隶御史周盘建言：陛下引咎反省，不宜空谈，而当务实：亲临郊庙，以报答天地、祖宗。必举朝讲，以沟通内外远近之情。正皇长子东宫之位，以释群臣疑虑。撤回矿使，以消隐患。起用被废诸臣，释犯囚犯。推补缺官。发内库银，以助公费。停

止采买，以苏民困。严格约束近侍，以广好生。减少织造，以示俭约。神宗接疏，留中不报。

李腾芳疏言安攘事宜 万历二十五年(1597)九月初一日，翰林院检讨李腾芳奏安内攘外八事：定战守，重内地，明赏罚，给将权，练京兵，积粮草，破久法，除宿弊。神宗留中不报。

石星下狱论死 石星(1538—1599)，字拱宸，号东泉，山东东明县人。由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隆庆三年(1569)，上疏直谏，劾内臣恣肆威福，被廷杖，削为民。万历初年复官。十九年(1591)八月，代王一鹗为兵部尚书，不久加太子少保。日军侵朝，石星竭力支持沈惟敬封贡日本之议。万历二十五年正月，日军拒不撤出釜山，封贡事大坏，神宗大怒，下诏逮捕沈惟敬、石星革职待勘。同年八月，日本攻陷全罗外藩、位于朝鲜西海口的南原闲山岛，直接威胁我国天津、登莱。于是神宗于九月初四日诏逮石星下刑部狱。九月十三日定"隐匿军情失误律"，论死，妻与子并永远发边充军。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初九日石星病死于狱中。年六十二。

李桢疏言御倭急要 万历二十五年(1597)九月二十九日，兵部署部事侍郎李桢疏陈抗击日本五事：守王京，以固藩屏；抵汉江，以御狂锋；备旅顺，以息骚犯；防登、莱，以障内蔽；联海岸岛洋形势，以捍狡袭。神宗是其言。

诏授黎惟潭为安南都统使 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月十七日神宗下诏授黎惟潭为安南都统使。其后，黎惟潭按照黎氏惯例，来京进贡代身金人。自是安南遂为黎氏所占有。而莫氏只据有高平一郡，因此其党多流窜濒海地区，时常出没侵犯我国边境。

范谦逝世 范谦(1534—1597)，字汝益，号含虚，江西丰城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世宗、穆宗二朝实录及《大明会典》。后历任布政、按察、太仆寺卿、太常寺卿、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掌詹事府事。再为经筵讲官，国史副总裁、东宫侍班官，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督修昭陵。万历二十五年十月卒于官，年六十四。谥文恪。有《双柏堂集》。

习孔教逝世 习孔教(1536—1597)，字时甫，号豫川，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隆庆二年(1567)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世宗、穆宗实录。升编修、修撰，纂修《大明会典》，充经筵讲官。以逆权相张居正，被劾回家闲住。后被荐复起，历南部郎中、春坊、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会亲丧归家。复起为少詹事，升南京礼、吏二部侍郎，俱不赴，卒。按例，习孔教不得祭葬，但因其"抗论权奸，遗直足嘉，故重之。"

侯于赵逝世 侯于赵(1536—1597)，字宗度，号葵所，河南杞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平阳府推官、户部主事、工科都给事中、江西参政，终右副都御史兼山西巡抚。万历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二卒，予祭葬。人称葵所先生。

龙华民来华传教 龙华民(1559—1654)，意大利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的身份到达中国，先在广东进行传教活动，后继利玛窦任在华耶稣会长，曾参加《崇祯历书》的修订。

王士性撰《广志绎》 《广志绎》五卷，王士性撰，著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初刻于清顺治元年(1644)，再刻于康熙十五年(1676)，流传甚少。王士性字恒叔、号太初，浙江临海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多年任地方官，足迹遍全国。所述方面极广，计有关隘险易，山川名胜，漕河海运，天文地理，物产民俗，草木鸟兽，药饵方物。以及农民起义，蒙古贵族的入犯。王士性学风严谨，注重实地调查和亲身见闻，因而记载翔实，特别是对西南少数民族保留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明军败于蔚山 蔚山，在朝鲜釜山东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援朝明军围攻蔚山，初获小胜。日军闭城不出，坚守待援，围其十日而不能克。日军以诈降为缓兵之计。至万历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日军将领行长率大军骤至，明军大惧。杨镐下及不令，策马先奔，麻贵继之，一时九将皆溃，死者无算。辎重多丧失。杨镐等逃到庆州，怕日军追击，竟尽撤兵逃回王京，且与邢玠合谋，掩败为胜，向朝廷奏捷。时诸营上报士兵死亡者二万人。杨镐见到报告，大怒不止，拒不上奏，只报死亡百余人。赞画主事丁应泰闻明军败绩，面责杨镐，并问他今后如何打算。杨镐拿出内阁大臣张位、沈一贯两人的手书，"扬扬自得"。丁应泰愤而抗疏弹劾杨镐二十八条罪状、又十条羞耻之事。并劾张位、沈一贯与杨镐通同作奸。神宗得疏，大为震怒，欲置杨镐于法，经内阁首辅赵志皋力为营救，才免于逮捕。蔚山之战，明军谋划多时，且倾海内全力，合朝鲜全国之众，至是大败，朝野无不嗟恨。

邢玠疏言御倭之策 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初九日，经略御倭兵部尚书邢玠说：日军据朝鲜的南海，东西八九百里。臣等举兵进剿，若其力不能支，必率水师入内地。所以欲歼灭日军，首先必须重视防守。今总兵周于德统领水师，如果日军转入内地则予以进剿；如果继续占据朝鲜，则当听臣调用，以为夹攻之举。山东总兵李成勋，宜率水师驻扎长山岛，以

守登莱之门户，备旅顺之应援。保定总兵则暂时移驻天津，以巩固内地。神宗交兵部议处。

朱鸿谟逝世 朱鸿谟(？—1598)字文甫，号鉴塘，山东益都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推吉安推官，升南京御史。张居正父丧夺情时，朱鸿谟因疏救吴中行、邹元标等人，语侵张居正，被斥为民，归家讲学。张居正死，朱鸿谟起故官，历江西巡按史、光禄寺少卿、大理少卿，进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巡抚应天十府，请裁上供织造、均徭役，惩治横行不法的贵游子弟。不久，召入为刑部右侍郎，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十七日卒于官。赠刑部尚书，谥恭介。

陆可教逝世 陆可教(？—1598)，字敬承，浙江兰溪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谕德，充经筵讲官，升国子监祭酒。晋南京礼部右侍郎，未任，会父丧，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三月初七日哀毁而卒。陆可教性格耿直，约己急公，拒绝馈遗，气节为人所重。有《陆学士遗稿》。

李如松战死 李如松(1549—1598)，字子茂，辽宁铁岭卫人，李成梁长子。少从父习兵书，骁勇敢战。年十六，随父从征击敌有功。万历三年(1575)，授指挥同知。万历五年，守备黄花镇，万历六年为密云游击，俱有功。万历七年，任马水口参将。万历九年，进都督佥事副总兵。万历十一年，出为山西总兵官。万历十二年，召为右府佥书。万历十三年，提督京城巡捕。万历十五年以总兵官镇守宣府。万历十七年，移镇山西。万历十九年，任中府佥书。万历二十年，征宁夏哱拜，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武臣有提督，自如松开始"。进太子少保、左都督。日军侵朝，明神宗诏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入朝作战、夺回平壤。万历二十五年冬，自朝鲜回国，任辽东总兵官。万历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土蛮犯辽东，李如松率轻骑五千人远出捣其巢穴，中途中伏兵力战身死，年五十。赠少保、宁远伯，谥忠烈。

蔡国珍致仕 蔡国珍(1528—1611)，字汝聘，号见麓，江西奉新县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累官至吏部尚书。二十六年四月致仕。家居十三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恭靖。有《怡云堂集》。

吕坤上《天下安危疏》 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刑部右侍郎吕坤疏言天下安危：自古以来作乱之民有四种，一种是无聊之民，身家俱困，因此有逞乱之心；一种是无行之民，玩法轻生，淫掠是图；一种是邪说之民，利用宗教结社，鼓动民众；一种是不轨之民，乘机滋事，惟恐天下不乱。陛下约己爱民，则四种之民皆为赤子，否则将悉为仇敌。今天下百姓贫困已极，臣久为外吏，见民冻无衣，饥无食，君门万里，谁能控诉！今国家财用耗竭，造寿宫费银八百万两，织造费银几百万两，黄河决口，大工采木，费银又八百万两。又国家防御松弛，三大营马半死亡，人半老弱；九边之兵勇於挟上，怯于作战；外卫之兵皮骨仅存，岂能冲锋陷阵！假使有千骑横行，必选民兵，以怨民斗怨民，谁与合战！人心，为国家之命脉。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陛下素以患贫为事，不知天下只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能富！惟有陛下切实纳臣之言而行之，则人心可收，天心可回。神宗留中不报。

"妖书"之狱 先是万历十八年(1590)，吕坤为山西按察使时，曾撰一书名为《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见之，将其购入宫中，进呈神宗。神宗将此书赐给郑贵妃。郑贵妃在书中加入十二人，且为作序，还指使其伯父郑承恩重刻。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吕坤为刑部侍郎时，上《天下安危疏》，请神宗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于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上疏，劾吕坤所撰《闺范图说》、又上《安危疏》，是"包藏祸心"，结纳宫廷，逢迎郑贵妃。吕坤疏辨。神宗不问。不久，又有人为吕坤的《闺范图说》写一跋文，名为《忧危竑议》，在京师广为流传。大意说：吕坤撰《闺范图说》，独取汉明德马后，因马后系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显以此取媚郑贵妃。而郑贵妃令郑承恩重刊此书，目的是为了立己之子朱常洵为皇太子。又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诬吕坤与郑承恩等相勾结，同盟结纳，羽翼郑贵妃子朱常洵。在戴士衡上疏之前，全椒知县樊玉衡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郑承恩为此大惧，并怀疑《忧危竑议》出于樊、戴二人之手，遂奏报神宗。神宗大怒，郑贵妃也为此泣诉不已。神宗为掩盖朝廷内部斗争，下令逮捕樊、戴，经严刑拷掠，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而吕坤时已因病致仕回家，置之不问。至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在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之后，又出现一文书，名为《续忧危竑议》，计三百余言，在寓门外为内阁大臣朱赓见到。此书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神宗得报大怒，立即令厂卫大捕奸人，"务得造书主名"，遂兴大狱，都城人人自危。郭正域等廷臣，有的被捕下狱，严刑毒打，惨不忍闻；有的被革职为民、勒令回家。有的连家属也受株连。后东厂捕得"妖人"皦生光，经一

番拷讯之后，神宗令将皦生光定为死罪，于万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处斩。长达数年，震惊朝廷内外的“妖书”之狱至此结束。但“妖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始终是个谜，朝廷内部的争斗更没有因此而停止。

陶承学逝世 陶承学(1518—1598)，字子述，号泗桥，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由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中书舍人，迁南京御史，出为徽州知府，政绩卓著，升河南布政使，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陶承学为官之时，于俸禄外，分文无所取。“生平清谨，始终不移”。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初三日卒，年八十一。赠太子少保，谥恭惠。

吕鸣珂逝世 吕鸣珂(1528—1598)，字声甫，号苍南，浙江括苍(浙江丽水县)人。由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累官至工部右侍郎。以丹青擅名。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初四日卒，年七十一。予祭葬，赠工部尚书。有《太常记》。

叶梦熊逝世 叶梦熊(—1598)，字男兆，号龙潭，广东归善县(今广东惠阳地区)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福清知县、户部主事、御史等官。万历十七年(1589)冬，由山东布政使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不久，移抚陕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万历二十年，哱拜起兵反叛，上疏自请讨哱拜，代为陕西三边总督。哱拜平，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终工部尚书、太子太保。万历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卒。叶梦熊曾制作火车、神铳。有《运筹纲目》、《决胜纲目》。

鲁保变卖两淮余盐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初三日，神宗从鸿胪寺主簿田应壁之请，遣中官鲁保变卖两淮余盐。户科给事中包见捷上疏极言其害，神宗拒不纳谏。鲁保到两淮后，议开存积盐。户部尚书杨俊民说：存积盐非没官盐。一旦额外加增，必亏正课，鲁保所奏必不可从。御史马从聘亦上疏反对鲁保的做法。明神宗俱不听。于是鲁保开存积盐八万引，每引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压正盐不行，商民大扰。是时奸人亦竞言盐利，山西、福建诸税监皆领盐课。百户高时夏奏：浙、闽余盐每年可得变价银三十万两。福建巡抚金学曾据实奏报，谓高时夏所言皆非事实，纯属欺君罔上。但贪财溺货的明神宗，对这些劝告根本听不进去。于是福建不得不解进银一万三千多两、浙江解进三万七千余两，借名苛敛，商困愈甚。户部尚书赵世卿指其害起于鲁保，说：“额外多取一分，则正课少一分，而国计愈绌，请悉罢无名浮课。”与此同时，千户朱仁奏言，湖口船税每年可得银万余两。神宗即命令太监李道去督收湖口、长江的税银，并赋于大权，许节制有司。科臣赵完璧、郝敬等人上疏谏阻。神宗不理。

陈大科罢官 陈大科(1534—1601)，字思进，号如冈，南直隶通州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任绍兴推官、吏科给事中、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终两广总督。有定安南功。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初三日，回籍听堪。居家三年卒，年六十八。有《陈如冈文集》。

韩世能逝世 韩世能(1528—1598)，字存良，号敬堂，南直隶长洲县(今江苏苏州市)。隆庆二年(1572)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参加纂修世宗、穆宗二朝实录，充经筵日讲官。历侍读、祭酒。终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尝出使朝鲜，“赠遗一无所受”。又尝自言：“无一事、无一语不实”。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二十七日死。著有《云东拾草》。

惜薪司求加柴炭银 惜薪司所办柴炭，每年共派征户、工二部银二十万两，永为定额，不得加增。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十二日，该司又奏请求增。户科给事中陈(贾)维春上疏说：大概每年所进物料实供上用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尽入私囊。今要求于额外加增，仍无非是为了填饱私囊，而不是真正为国家计盈亏。

吴宗尧疏劾陈增 万历二十六年(1598)九月十一日益都知县吴宗尧冒死上疏劾山东税使陈增违旨营私。他说：经青州知府实地查勘，益都县只有铅砂，绝无银矿。陈增强指有银，强迫开采者纳银。稍有迟缓，即逮捕地方官民。一县官民皆不胜其毒。陛下所得不过十分之一，而陈增私入十分之九。罪不容诛。时户科给事中包见捷亦疏论陈增之罪，并请将其撤回。神宗责吴宗尧“狂逞要名”。不久，山东巡抚尹应元奏陈增背旨虐民二十罪。神示益怒，下诏切责应元，并削吴宗尧职。郝敬再次抗疏谏阻，神宗命夺郝敬、尹应元官俸。陈增趁机劾吴宗尧阻挠矿务，且嗾其党程守训诬陷吴宗尧。神宗遂派人逮捕吴宗尧，并欲杀陈增。吴宗尧被捕至京，下诏狱，严刑拷打。稍息传出，舆论大哗，朝野震动。

张国彦逝世 张国彦(？—1596)字熙载，号弘轩，北直隶邯郸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历任知县、兵科给事中、山西右参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郧阳，改抚顺天。后以军功，进户部侍郎，迁协理京营兵部尚书，改刑部尚书。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月初八日卒，赠太子太保。

明军南海大捷 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二十二日死，日军军心大乱，日将行长、清正皆欲逃归。清正且发舟先走。为防止日军逃遁，明军水师提督陈璘派战船数百艘，分布于忠清、全

罗、庆尚等重要海口。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七日，当日军弃蔚山逃遁时，陈璘立即遣其副将邓子龙偕同朝鲜将领李舜民进行阻击。邓子龙素慷慨，所在立战功，是时他已年过七十，仍不减当年勇，率战船三百艘为前锋，追至釜山南海，带壮士三百人跳入朝鲜战船，直前奋击，日军死伤无数。后因不幸战船中火，遂与李舜臣一起英勇杀敌，壮烈牺牲。会副将陈蚕、季金等率军至，前后夹击，日军无斗志，明军焚其舟，日军于是大败。其得脱登陆者，又为明军陆兵所歼，焚溺者万计。时明将刘𬘩方攻日军行长，夺曳桥寨，陈璘以水师会击，再焚日军战船百余艘。行长部下石曼子疑水师来援，被陈璘击杀于海中，其余日军纷纷扬帆之逃跑。此次釜山南海大战，明军共击沉日船九百余艘，烧死日将岛津义弘，全歼日水军。日军残部退至锦山，十二月渡海匿乙山。岩深道险，明军将士不能进入。陈璘派兵夜蔡，围攻崖洞。至天亮发炮攻击。日军奔后山。明军殊死奋战，日军逃走，陈璘督兵追击，日军无一逃脱。倭援朝战争至此结束。明军入朝作战，历时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才元”。人力、物力损失巨大。但最终打败日军，受到了朝鲜人民世世代代的称赞，还为明军将领邓子龙等人立碑建祠，缅怀他们的英雄业绩。

傅好礼极论税使之害 太常寺少卿傅好礼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上疏极论税使之害：自朝鲜用兵以来，民富者变贫，贫者饿死，思乱已久，为何又派税使四出虐征，盘剥百姓！国家纵贫，亦不当括细民续命之脂膏。况奸徒所得千万，朝廷所得十分之一，陛下何利为之。傅好礼之疏奏入四日，仍不报，他再次疏请。神宗大怒，传旨降其三级，调为大同广昌典史。

矿监税使四出 万历二十七年(1599)正月十六日，神宗听从锦衣卫正千户郑一麟(麒)、羽林左卫中所百户马承恩之奏，遣御马监左监丞高寀往京口(今江苏镇江)榷税(所征之税专供皇帝之用)；暨禄征税于仪真(今江苏仪征)，同时并命高寀兼领矿务。二月初二日又命榷税浙江的太监刘成和采珠广州的太监李凤分别兼领浙江、广东市舶司税课。不久，又命太监杨荣往云南开矿、陈奉征荆州店税，陈增征山东店税，孙隆征苏、杭等处税课，鲁坤征税河南，孙朝征税山西，邱乘云征税四川兼矿务，梁永征税陕西，潘相督理江西瓷厂。于是，合税使、矿监于一身，四出扰民，祸及天下。

沈一贯奏征税之害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二十七日，大学士沈一贯奏：今群小竞言利端，陛下日遣中使四出，络绎不绝，盛明之世岂宜如此。自古财赋之计，未有不与臣工谋而与群小谋的”。臣工计其利又计其害，故能斟酌于利害之时而处置有方，群小只顾其利而不顾其害，往往竭力于掊尅之谋，以至扰乱无极。像变法征利这样的大事，居然随奏随准，星火促行，而不令阁、部商议决定，不许科、道官谏阻反对，大失祖宗之制。今独使一人专敕行事，惟意所为，擅作威福，以势凌辱抚、按，使之不敢一问。中使出入动以刑劾，有司不得调停，此正所谓如虎添翼。群虎百出，逢人咆哮，寸寸张罗，层层设阱。“于是商旅必不行，而赋税无所得，且至于索居民”。居民被索，生理日迫，而祸且至于寻干戈为盗贼。以至百孔千疮，良医莫措其手；土崩瓦解，良吏莫施其力。陛下敛财之意，本以备不测，反以招祸害。又说：派出中使一员，其随从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又各须百人，则至千人。此千人，每家以十口计算，则是万人。万人每日给银一千两，则每年须银四十余万两。而所得只银数万两，徒为敛怨而已。今分遣二十处，每年耗银八百万两，臣请尽撤中使。疏奏入，神宗不听。不久，河南、山东、苏、松、常、镇等地，皆并税于矿使。

包见捷请急罢开矿 户科都给事中包见捷，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十三日上疏请紧急停止开矿：辽左为京师肩臂，视他镇尤重。奸徒敢为祸首，陛下不置之于法，急罢开采，则辽事必大坏，而国家亦将随之灭亡。数日后，包见捷又率同官极论矿税之害。神宗大怒，遂贬包见捷为贵州布政司都事。

周世选辞职 周世选(1532—1606)，字文贤，号卫阳、北直隶故城县(今河北故城)人。嘉靖四十一(1562)进士，历常州府推官、礼科给事中、南京兵部尚书，去官家居。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二十二日下命起用，世选以疾为由，拜疏辞官。万历三十六年卒，年七十五。有《卫阳集》。

杨俊民致仕 杨俊民(？—1599)，字伯章，号本庵，山西蒲州(今山西运城地区)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历户部主事、礼部郎中、河南提学副使。万历初，任太仆少卿、兵部左侍郎，进户部尚书，总督仓场。万历十九年(1591)回京理户部事。值河南大饥，人相食，杨俊民请发银、米各数十万。其后，小人竞请开矿，杨俊民力争不得，税使四出，天下骚然，时议多归咎于他。遂于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致仕。同年六月二十日卒。赠少保。后以东征运饷之功，赠少傅兼太子太傅。

临清民变 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神宗命天津税监马堂兼领山东临清税课。马堂奉命到临清以后，纵容其随行人员横行不法，无恶不作，青天

白日用武力强夺民产，又科敛无度，零星米豆亦皆抽税，以致民多破家。同年四月，临清人民忍无可忍，举行罢市，奋起反抗，万余名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税监衙门，杀死马堂随员三十七人（一说三十四人），马堂本人被救逃脱。朝廷震惊。神宗立即下令逮捕暴动首领。时有民人王朝佐，素慷慨好义，不计较个人生死，见官府到处抓人，残害无辜，挺身而出，舍己救人，慨然说："我是领袖，勿累无辜！"至同年七月初九日被押赴刑场时，朝佐仍一如既往巍然挺立，"神色不变"，从容就义。临清人民为了世世纪念这位大公无私的英雄，立祠祭祀。

诏免东征加派田赋 万历二十七年（1599）闰四月初八日，神宗下诏：东征加派田赋，原"非得已之心"。今东征胜利，凡我文武内外大小臣工当洁己爱民，奉公体国，切念民艰，与民休息。"惟在此时，诸因东征加派钱粮，一切尽令所司除豁，务为存恤，勿事繁苛"。勿违朕意，着实奉行。

许孚远致仕 许孚远（1535—1604），字孟中，号敬庵，浙江德清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万历初，历两淮盐运司判官、兵部郎中、建昌知府、陕西提学副使、应天府丞、广东佥事、通政司右通政。万历二十年（1592）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三年后，迁南京大理卿，终兵部左侍郎。孚远少从学于同乡唐枢。知建昌时，利用公务之余集诸生讲学。其学悉遵王阳明宗旨，笃信良知。从其学者，为刘宗周等，皆为一代名儒。许孚远于万历二十七年七月初五日致仕，万历三十二年卒，年七十。赠南京工部尚书，谥恭简。有《敬和堂集》。

王弘诲致仕 王弘诲（1542—1615），字少傅，号忠铭，广东定安县（今海南定安）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历编修、司业、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加太子宾客，教习庶吉士，充日讲官。参加纂修《穆宗实录》，书成，升南京礼部尚书。万历二十七年（1599）十月初八日致仕归。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一日卒于家。年七十四。有《尚友堂稿》、《天池草》。

郭正域请申饬国子监规 万历二十七年（1599）十月初八日，南京国子监祭酒郭正域条议申饬监规六事：一、扩大名额以罗异才。二、严禁差授以杜请托。三、申禁罚钱以一赏罚。四、勤奋课诵以修职业。五、减少差务以尚实学。六、务复查押以警游荡。"按监规：生员于各衙门办事者，每晚必回监，不许在外宿歇。"礼部复议，多从其请。

武昌汉阳民变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神宗命御马监太监陈奉往湖广征税。陈奉入湖广，恣行威虐，惨毒备至，士民工商无不恨之入骨。陈奉还向朝廷奏报：武昌府兴国州有人挖掘唐代宰相李林甫妻扬氏之墓，"得黄金巨万"。明神宗贪财如命，遂命陈奉将黄金没收，解进内库。陈奉即对掘墓者进行严刑毒打，责其交出所得黄金，并令挖掘境内所有古墓。巡按御史王立贤说：兴国州人所掘乃元代吕文德妻之墓，非李林甫妻墓。奸人讦奏，语多不实，请释不治，停止开掘各处古墓。明神宗不理。于是陈奉便仗势逞威，吓唬官民，责令偿银。其党且有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抓入税监衙门百般侮辱。同年十二月初二日又发生诸生之妻被逼辱事，激起公愤，武昌、汉阳居民万余人，冲入陈奉官署，并用瓦片、石块将其击伤。陈奉为了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报复，居然令卫士举火箭焚民居，打死众多居民。湖广巡抚支可大噤不敢出声，分巡佥事冯应京，不畏强御，挺身而出，为民除害，捕治陈奉爪牙，并疏劾陈奉九大罪。而陈奉则上疏诬陷冯应京阻挠朝命、凌辱命官。神宗偏听偏信，夺冯应京官。

吴国佐起事 吴国佐，贵州皮林苗人，"桀黠无赖"。其叔大荣因叛被杀，吴国佐收其妻，为此而遭到官府的紧急追捕。吴国佐本有异志，得知官府将逮捕他，即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集众起事，自称"天皇上将"。其党石纂太自称"太保"，杀百户黄钟普等，与吴国佐合攻上黄堡。参将黄冲霄、守备张世忠统兵讨伐，吴国佐诈降设伏，张冲霄大败。吴国佐追至永从县，杀死张世忠等千余人，劫掠屯、堡七十余，焚烧五开卫南城，攻陷永从县，并出兵围中潮所。副总兵陈良玭统兵进剿，失利，退驻靖州。而是时官军方集大兵征讨播州杨应龙，无暇对付吴国佐，于是其势益张。同年六月，官军讨平杨应龙。十月，命总兵官陈璘统兵讨吴国佐。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吴国佐兵败被俘，斩其众五百八十余人，同年十二月吴国佐伏诛。

山东雹灾 万历二十八年（1600）四月十五日，莱州府潍县骤雨冰雹大作，形如鸡卵，平地水深尺余，将所种大小麦苗禾等尽行伤压无存，打死男妇王立儿等十名，牛驮不计其数。又兖州府郓城县地方东西长五十里、南北阔八里，于二十三日未时大风，自西北起，拔树飞瓦，大雨如注，冰雹如拳，落有二个时辰，打死牧童赵差儿等十二名，牲畜驴羊五十九头，倒毁民居五百余间，二麦花禾皆毁。又济南府淄川县于二十四日冰雹如卵如碗，怪风震雷，毁民房三千四百七十五间，压死男妇刘溱等十二名，被伤王可智等六十名，倒石场六座，庙宇司铺公署十四处，打伤麦田二百九十六顷八十九亩。

李三才疏请停矿税　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月十七日，巡抚凤阳等处兼海防右佥都御史李三才上疏极论矿税之害说：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皇上为万民之主，不但不给民衣食，反而尽夺民之衣食。征税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多如牛毛，天天竞言矿利，迫害地方官民，上下相争，惟利是闻。比如，在臣所辖之境内，陈增抽税于徐州，暨禄征榷于仪真，鲁保理扬州盐务，邢隆课沿江洲田。千里之区，中使四出，加以无赖亡命，附翼虎狼。如中书程守训肆无忌惮，假传圣旨，诈取钱财，动以万计。听说在湖广的税使还到处掘墓，得财方止。不知皇上心里安不安？皇上爱珠玉，民亦爱温饱；皇上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斗升之积，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历观往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形势如此，而可幸无乱的。李三财的奏疏呈上一个多月，神宗不理，他又再次上疏为民请命，说：近日奏疏，凡及矿税，悉置不听，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民皆为敌国，乱众四起，皇上纵有黄金盈箱，明珠满屋，谁人为守。李三才为国事忧虑，其言深切，而神宗依然不理。

官军讨平播州杨应龙　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慰司，自唐代乾符年间杨端以来，即为杨氏所据有，由宋、元历明，皆授世官。隆庆五年(1571)杨应龙父杨烈死，六年杨应龙袭职宣慰司使。万历十三年(1585)，以杨应龙屡立战功，又进大木营建宫殿，授都指挥使衔，日渐骄横，轻视礼制，肆行劫掠。二十二年十月，神宗命南京兵部右侍郎邢玠总督川贵军务，讨伐杨应龙。万历二十三年五月，革杨应夺宣慰司使，由其子杨朝栋理宣慰司事。其后数年间，杨应龙纠集部众，在川、黔一带攻城龙地，大肆抢掠，残害百姓，击杀官军，十分猖獗，朝廷屡次命将进剿，皆不能敌。万历二十八年正月，杨应龙统兵数万，从五路攻陷龙泉土司(今贵州凤冈)，朝廷调集各省人马进行会剿，由总督李化龙统帅八路大军。其中，川军分四路，黔军分三路，楚军一路。贵州巡抚郭子章驻贵阳，湖广巡抚支可大移驻杭州，就近督阵。同年二月十二日，分道并进，每路约三万人，官兵十分之三，土司兵十分之七，李化龙自将中军策应。经过一百一十四天激战，于同年六月五日讨平杨应龙，杨应龙自焚死，其子杨朝栋等一百余人为官军俘获，部众二万余人被歼灭。播州之役，前后费银二、三百万两，将士死伤不计其数。同年十二月，献俘京师，碎杨应龙尸，斩杨朝栋等于市。次年四月，分播州之地为遵义、平越(今贵州福泉)二府，并改土官为流官，史称“改土归流”。

张问达疏言三弊　万历二十八年(1600)六月初十日，工科左给事中张问达上疏请神宗明辨是非，去奸纳贤：一，别忠佞之言，以绝祸源。如诸作奸武官之言矿、言税，皆为佞言；辅臣、部、院、台省侃侃剖析矿税之大害，皆为忠言。二，严贪酷之罪，以惩巨恶。如诸位内臣狐假虎威，罪大恶极，以至箠杀命官，毁房掘墓，万人痛愤，死有余辜。三，明参劾之权，以正国体。太监陈增、李道、孙朝，陈奉、杨荣等人奉命四出，动辄以阻挠矿税务为名，无故诬陷地方官，百般凌辱，甚至残害至死。请皇上赫然切责。去此三弊，天下或可不至大乱。神宗不理。

王德完条陈理财用人　万历二十八年(1600)六月十七日，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感时触事，上疏说：理财应慎重做到八事：严义利之别。明一体之谊。通家国之用。存敬畏之心。识修省之要。广视听之益。谨安危之几，改苛敛之失，而用人则当慎七事：矿税之使当撤，被逮之臣当恤，抚臣之任当专，选取之命当下，迁谪之臣当用，眚灾之赦当行，辅臣之求当急，神宗不纳。

李植奏辽东马市与义州木市废罢之由　万历二十八年(1600)六月，巡抚辽东右佥都御史李植疏言：辽东广宁马市，万历二十二年以前所费只银二千四百余两。至万历二十三年，委马政官俞万策兼管以后，由于夷酋诡名重名，费比旧增加三倍。二十四年增至四千五百余两。万历二十五年又增至六千四百余两。万历二十六年，前辽东巡抚张思忠察其弊，加以裁核，所费大约如旧额，为二千七百余两。于是虏歹挟宣大之贡。张思忠愤而请革，马市遂罢。广宁马市的兴废经过大体如此。义市木市，前巡抚李化龙奏，少反青欲在义洲大康堡顺河贩运木材，酌许之，只犒酒食，历三年平安无事。后将领多少给其值，夷人遂恨，焚木而去，从此不再来，木市遂罢。义州木市的兴废大体如此。马、木二市羁縻，与宣大不同，顺之则抚，叛之则罢。此夷方市，彼夷进犯，无岁无之，何忠顺之有，如何进行抚赏。请下臣议，以决大计。

余继登逝世　余继登(1544—1600)，字世用，号云衢，北直隶交河县(今河北交河)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参加纂修《大明会典》，进修撰，直讲经筵。不久，进右中允，充日讲官。再历少詹事兼侍读学士、詹事、礼部右侍郎。万历二十六年(1598)，以礼部左侍郎署部事，上疏请罢一切诛求开采害民之矿税，撤回税使，又请明神宗亲临御政、册封皇太子，皆不用其言。为此，余继登郁郁成疾，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卒于官，年五十七，赠太子少保，谥文恪。余继登为人忠诚，遇事不挠。勤奋

好学,熟悉朝章典故。有《典故纪闻》、《淡然轩集》。

福建兴化府怪风大水　万历二十八年(1600)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怪风大雨连作五昼夜,公私廨舍、城垣桥梁、堤岸阡陌,多有倾圮。连江等处亦大雨三昼夜,官舍民庐塌溃者十之七八。

王德完疏请节省费用　万历二十八年(1600)八月二十一日,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奏陈:国家每年所入仅银四百万两,而所出动至四百五十万两以上,原已出大于入。近来因事加增,如宁夏用兵数月,约费饷一百八十七万八千余两,朝鲜用兵七年,约费饷五百八十三万二千余两。又地亩米豆加征税粮援助兵饷等项所费三百余万两。平播州杨应龙,用兵多年,费银一百二十一万六千余两,连川中凑办,共计二百余万两。皇长子婚礼珠宝等项约九百三十四万三千余两,传造袍服四万一千余匹,约用银一百万四千余两。山西潞绅绫织四千七百余匹。皇长子婚礼传买段一万二千七百余,约银十万多两。磁器口传二十三万五千件,约费二十余万两。修浚三山口赵家圈等处,费二十四万多两。而各省直因为灾伤,欠段价料银一百二十四万五千两,又欠厨料银九万六千余两,积之亦既二千六百余万两。当库银空亏之时,讲济虚之策,惟有节省最为重要。臣请减织造,以拯民命;停止宫建营殿以助边储;停买珠玉以贻燕翼;审采办以济国用,促大工以省烦费;发内府库银以救燃眉之急。王德完之疏呈上,神宗留中不报。

广东南澳地震　万历二十八年(1600)八月二十三日,广东南澳及福建诏安地震。城垣衙署,民房倒塌殆尽,人民压死无算。惠末酉时又震,有声如雷,墙垣皆裂。诏安城倒三百九十余堞,毁屋伤人,地裂、山崩、塞溪。揭阳地大震,墙屋倾倒。饶平、大埔县城圮。平和声似雷响,东城墙垣倒塌十五丈。潮阳地大震,有声如雷。福建省漳州府漳浦戌时地大震,一夜五震。水磨经口巨石崩坠。建宁府建安、建阳、瓯宁,屋舍摇动。汀州府上杭;海澄;泉州府同安,以及江西省南安府崇义等,地皆大震。此次地震自二十三日连震数次,翌日又震。波及广东省南海、番禺,顺德、增城、东莞、归善、博罗、长乐、兴宁;福建省汀州府长汀、归化、连城、武平,漳州府安溪,延平府将乐、建宁府松溪;江西省南安府大庾、南康,吉安府庐陵、永宁,饶州府鄱阳,赣州府兴国、瑞金、宁都、泰和,三省数十府州县。震中烈度(Io)IX,震级(M)为七级。

褚铁逝世　褚铁(1533—1600),字民威,号爱所,山西榆次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以县令起家,知河间府,升御史,两按陕西、河南,一督南直隶学政,历大理寺丞、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召入为大理寺卿、工部侍郎。不久,以病归家。后再起为刑部侍郎,进户部尚书,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兼治河道,河工成,加太子少保。万历二十八年(1600)九月十二日卒于家,年六十八,予祭葬,赠太子太保。

赵一平起事被杀　万历二十八年(1600),南北两直隶以及各省,灾害严重,又苦矿税,兵民多起为"盗"。浙江人赵一平,"以妖术倡乱",至徐州与其党孟化鲸等招集众人,自称宋代皇朝的后代,建立官署,拟于明年二月约集各方人马同时起事。至十一月初二日因事机败露,赵一平被杀,未及起事而失败。

田大益直言矿税之害　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十一日,户科给事中田大益冒死上疏极论矿税六害:一、用宦官为矿监、税使,专事劫夺民财。不掘洞即有矿,不从商即征税,凡民间田地皆指为矿,官吏农工皆为征税之人,以致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军国之用缺乏,陛下不撤税使,反而令有司严刑弹压,驱民作乱。此乃"敛巧必蹶"。二、陛下说矿税可以富国裕民,然内库之银日积,而从不以此助军国之需。四海之民正为此反唇切齿,岂可以希望用计智掩天下之耳目,欺骗众人。此乃"名伪必败"。三、财积而不用,一旦大势将去,只能成为奸雄之资本。此乃"贿聚必散"。四、众心不可伤,今天下上自富裕之家,下至耕夫贩妇,无不茹苦含辛,而控诉无门,积怨已久。一旦土崩成势,家为仇,人为敌,众心齐倡,天下必因以崩溃。此乃"怨积必乱"。五、国家全盛二百三十年,至今气数已尽。近来东征西讨,以求快意,对上荡主心,于下耗国脉,国势之倾危在旦夕。此乃"祸迟必大"。六、陛下刚愎自恃,沈迷不返,以奸险的内侍和武官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药石之言不听。此乃"意迷难救"。此六者为今日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则辜负陛下;陛下拒谏不纳,则危及国家。请陛下深察而力反之! 神宗将田大益之疏留中不报。

陈蕖请增开事例以济急需　万历二十九年(1601)正月二十日,户部尚书陈蕖奏言:近日库贮匮乏,九边额饷超过四百万两。去年挪借老库银九十万两。今年各处灾伤,颇多逋负,计年例少银一、二百万两。况别项宣索无时,今年各处灾伤逋负计年例少银一、二百万两。昨御用监取办钱粮,除金宝杂料外,只珍珠一样照估计银一千零五十七万两以上,边饷关系尤重。再三讲求,惟有增开事例可以佐急。神宗准其奏。

神宗召见欧州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欧州耶稣会士。万历九年(1581)"泛海八万里",来到中国,先后在广州、肇庆、

韶州、南雄、南昌、苏州、南京等地进行传教活动，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并广泛与中国地方官吏和士大夫接触，以了解中国的国情和风欲礼仪。万历二十八年，由南京北上，在天津居住六个月。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天津税监马堂向朝廷进利玛窦所献方物，奏报利玛窦请求入京，礼部以《大明会典》不载大西洋，"真伪不可知"，以及利玛窦所献之物不宜入宫中，请赐给冠带令其回国，不许在南北两京居住，"与中国人交往，别生事端"。神宗不纳，下诏准许利玛窦入京。万历二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利玛窦抵达北京城。二月，神宗召见，此系明朝皇帝亲自接见的第一位欧州传教士。利玛窦向神宗进献3天主圣像、圣母像、天主经典、二台自鸣钟、铁弦琴以及世界地图(中国人自此知道世界有五大洲)。神宗亦待以优礼，赐屋于宣武门内，其所需银、米俱由朝廷按时供给。利玛窦在传播宗教的同时，还介绍了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并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给到西方，即做"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之事。利玛窦在北京住了十年，于万历三十八年五月十一日病逝，神宗下诏以陪臣礼葬于北京阜成门外。后人为纪念他而编辑的二部文集《中国札记》、《中国书简》，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利玛窦对中国历史文化、儒家学说、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见解。我国史学界对利玛窦及西方传教士历史作用的评价，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

冯应京被捕　万历二十七年(1599)十二月，武昌、汉阳民变时，湖广分巡佥事冯应京因为民请命，疏劾税使陈奉九大罪，被革职为民。事后，都给事中杨应文上疏论救。神宗竟为此大怒，下诏逮捕冯应京。万历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冯应京在武昌被逮捕。同时被逮的还有襄阳通判邸宅、枣阳知县王之翰以及武昌同知卞孔时。同年三月，冯应京被押至京师下狱，严刑毒打，长期关在狱中。直到万历三十二年九月才获释出狱，万历三十四年正月卒。年五十二。

钱邦彦逝世　钱邦彦(1501—1601)，字治征，号景山，南直隶吴县(今江苏吴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历任知县、吏部主事、南京通政司参议、南京光禄、太常、大理寺卿、南京刑部左、右侍郎，终南京刑部尚书。万历二十九年(1601)卒，年一百零一。

武昌再次民变　万历二十九年(1601)二月，武昌人民得知官府派吏役抵武昌逮捕湖广分巡佥事冯应京时，相率痛哭，愤愤不平，为冯应京呼冤号屈。而湖广税监陈奉则派人到大街小巷到处公布冯应京罪状，引起士民公愤，于同年三月二十六日集合数万人，群起包围陈奉的税监衙门，"誓必杀奉"。陈奉狼狈逃匿楚王府。愤怒的群众遂把其党十六人投入长江溺死。同时，又恨湖广巡抚支可大为恶助虐，焚其衙门，支可大不敢出门。直到冯应京坐着囚车出来劝解，群众才慢慢离开，陈奉在楚王府一个多月不敢露面。

田大益请立罢矿税以安四方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武昌人民再次暴动以后，户科给事中田大益奏言："陛下驱率狼虎，驱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以致天灾地裂、山崩川竭。祸害自皇上而开，民愤由怨积而来，奈何欲塞民耳目以自解释。今湖广之民因为陈奉肆虐，而溺死使者，朝廷使臣不敢入湖广已经两个多月，四方观听亦惟在湖广。臣意陛下当"立罢矿税以靖四方"，奈何犹恋恋不能自割。天下诚为至贵，而金玉珠宝实为至贱。金玉珠宝积如泰山，不能买天下尺寸之地。失去天下，金玉珠宝又有何用！今四方百姓，见陛下在武昌民再变之后仍无意改弦更张，知祸必不解，必定群起为变。当此之时，只有尽杀矿监税使以谢天下，国家才能有救。神宗览疏大怒，留中不发。

诏令户部速办皇长子婚费　万历二十九年(1601)四月初九日，司礼、司役二监奉旨下户部催铺宫等钱粮。户部因奏言：根据簿册所载，二年来共进珠宝六次，计价为银一百八十万两。近日监库纷奏讨，又进三次计价银为四十一万两。通计前后所进用过银二百二十一万两。较之皇上大婚时所用十七万两已不止加出十倍，而犹谓不足备礼，臣实不敢知。今查太仓银库仅有银一千九百两，而该库奏讨共该银一千零三十五万两。臣又不敢言。神宗见到户部的奏报以后，说："大典所用无数，实非得已"，当"设处办送各衙门应用，不得支调缺误。"

暨禄请按实征税　万历二十九年(1601)四月十五日，督理南直隶税监暨禄奏言：臣征庐州、凤阳、徽州、淮安旧税以及沿江船税，各地抚、按俱言诸税重叠，不堪缴纳，请求从宽议处。因事关重大，臣未敢轻易答应。各府旧税及沿江船税二项共银十二万两。今已半年，所征不及万两，始信抚、按所言有据，而原奏请征税之人所言无据，不足凭信。请皇上念民力之艰，按实征解，"毋拘原奏人揣摩之数"。神宗允其奏。"时税使苛暴，独暨禄请宽恤。"

沈一贯请速撤回陈奉以消民怨　万历二十九年(1601)四月十五日，大学士沈一贯上疏说：臣因病在家，知湖广之事更多，不敢不奏。武昌民再变，实因湖广税使陈奉继疏劾湖广分巡佥事冯应京去职为民之后，又大出告示数其过恶，夸张得意。小民家家痛

哭，追送冯应京，因而互相杀伤，心激此变。陈奉见势危急，躲入楚王府，否则必为民碎尸万段。小民又恨湖广巡抚支可大庇护陈奉，随车痛骂，放火烧其衙门。昨湖广巡抚奏疏中，但言失火，隐瞒真相，不说民变的真实原因。今小民群聚围绕，实际并没有解散。就使暂时解散，安知不复再聚而相击？不仅省城武昌，而且湖广全省没有不怨恨陈奉的。由于道途阻塞，消息不通不明真情，实际上众怒有如水火不可犯之势。因武昌之民，前年已遭到陈奉的扰乱，希望陈奉能改过图新。而今陈奉则日甚一日，变本加厉，决然不让百姓活下去。臣考虑到陈奉必遭毒手，但陈奉一人并不足惜，应以国体为重。皇上极宜早发诏令治陈奉之罪，另选老成忠慎之人前往湖广，以安民不要等到百姓杀了陈奉，再采取措施。今税使满天下，而为天下万民所共痛骂者无非三四人而已。陈奉不能使皇上安心，反而使皇上惹恼生忧，皇上何以爱陈奉而不以安湖广四千里之地，活湖广使万人民。下一个圣旨，改换一个税使，百民心以定，国体以尊，且税亦不减少，其利至大。臣在床头千回万转，草此疏以请皇上万万留意，速罢陈奉，以安民心。神宗不理。后来江西湖口税使李道，疏劾陈奉在湖广"水路阻商船，陆路绝贩运"，而且"仇视百姓，征多解少，欺侵国课"，剥民害国。神宗才于同年四月十八日下诏召陈奉回京，以承天守备中官杜茂代领湖广税务。

贵州米价腾贵　万历二十九年(1601)四月间，贵州因发生旱灾，民饥甚，米价骤涨，米每斗至银四钱。

畿辅大旱　万历二十九年(1601)五月礼部奏：自二月至五月初六日，畿辅内外，半年不雨，土脉焦枯，河井乾涸，二麦尽槁。巡按何尔健奏：阜平县丈水洞矿夫张世诚饥饿将六岁小儿杀死煮食。

李戴疏陈旱灾和矿税之害　北方各省，自万历二十八年(1600)六月以后，整整一年没有下雨，北直、山东、河南赤地数千里，山西亦大旱。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吏部尚书李戴说：今北直隶各府旱灾严重，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即食树皮，尸横满道，村空无烟。据巡抚汪应蛟奏称：坐而待救济者有十八万人。夏麦已枯死，秋种未得播，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自连年用兵以来，不断加赋。赋税比二十年以前成倍增加。而再兴矿税，派宦官四出开矿、征税。"不论地有与无，有包矿、包税之苦；不论民愿与否，有派矿、派税之苦，指其屋而挟之曰有矿，则家立破；少纳税，则橐立倾。以无可稽查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就开矿、征税所得而言，如以十分为率，解入内库者一，被税使尅扣者二，为随行人员瓜分者三，为当地恶棍骗去者四。而地方之供应，岁时之馈遗，驿递之骚扰，以及不法官吏的营私舞弊，更是不计其数，小民岂能不困！陛下只知利源易开，且以宦官为可信，岂知此辈剥害小民至于如此！岂知今日苦矿苦税之民，即是前日被灾和遭受战火之民，重累叠困，愁怨叹息，至于如此！湖广一省，民变已四五次，而独近日武昌为甚，陛下试思小民何苦而变，谁非姓命，谁无身家，只因剥削之极，无可控告，变亦死，不变亦死，等死而与见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今村里空，山泽空，郡县空，部银空，国库空，民之穷困如病人血气已尽。神宗不理。

魏允贞致仕　魏允贞(1542—1606)，字懋忠，号见泉，河南南乐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湖广荆州府推官。六年，大学士张居正归葬其父，当地百官争先恐后地前去参加葬礼，魏允贞独不赴，其后且疏劾张居正等内阁诸大臣在科举中，以权为自己的子弟谋私。万历二十一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允贞性格刚强，为官清正，爱惜民力。在晋十年，裁革浮费，讲求战备，奏减役银，招民复业。神宗亦嘉其能，累官至右副都御史。矿监税使四出之时，魏允贞上疏极论税监横行不法，任情生杀予夺，勒索民间，残害官吏，并数裁抑山西税监张忠、孙朝。后因其父年九十余，二十次上疏请回家侍养老父。"廷议以税使害民，非允贞不能制，固留之"。至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致仕。及魏允贞去官，山西士民立祠祀之，朝廷又以其在山西守边有功，进为兵部右侍郎。万历三十四年卒，年六十五。谥介肃。有《魏伯子集》。

苏州织工暴动　司礼监太监孙隆督税浙直，驻苏州，任意横征暴敛，增加苛捐杂税，致使广大机户关厂停产，织工失业。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初六日，苏州织工葛成(即葛贤)毅然领导群众进行反抗斗争，将孙隆的随员、税官黄建节六七人投入河中，放火焚烧税棍汤莘等人的住宅，包围税监衙门，并要求停止征税，史称"苏州民变"。事后，明神宗下令逮捕参加暴动者，葛成视死如归，挺身而出，投案自首，舍己救人，至万历四十一年才获释出狱。

赵志皋逝世　赵志皋(1524—1601)，字汝迈，号谷阳，浙江兰溪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编修。万历初，进侍读，累官至吏部左侍郎。万历十九年(1591)，以申时行荐，进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万历二十二年，出任内阁首辅，加太子太傅，改为建极殿大学士。坤宁，乾清二殿发生火灾时，赵志皋请神宗下罪已诏、立皇太子、罢矿税，神宗皆不用其言。日本封贡之议起，赵志皋积极支持兵部尚书

石星力主和议，及石星败，众皆怨志皋。万历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卒于官。年七十八。赠太傅，谥文懿。有《灵洞山房集》、《四游稿》、《内阁奏题稿》。

刘东星逝世　刘东星(1538—1601)，字子明，号晋川，山西沁水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改庶吉士，历兵科给事中、卢氏县令、湖广左布政使等职。万历二十年(1592)，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奏请以漕米十万石赈济天津各处饥民。后召为左都御史，进吏部右侍郎。万历二十六年，黄河在单县黄堌决口，运道堵塞，起刘东星为工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漕，修浚黄河故道，工期短而费省。神宗嘉其功，进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万历二十八年，奉命开泇河。初议费用为银一百二十万两，由于刘东星力任其役，注意节约，至工程完成三分之一而所费止七万两。万历二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卒于官，年六十四。赠太子少保，谥庄靖。刘东星为人正直，遇事敢为，生活俭约，历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

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十五日，因大学士沈一贯等一再疏请，神宗终於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册封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颁诏告天下。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加冠，福、瑞诸王亦俱加冠。历时十六年之久的"国本"之争，至此结束。时人评论说："从万历十四年阁臣申时行等请立皇太子，至万历二十九年皇太子之位始定。自古以来父子之间，未有受命如此之难也。"次年二月十三日，皇太子成婚，妃郭氏。其费银二百万两。

汪应蛟奏报天津屯田事宜　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十八日，巡抚保定右副都御史汪应蛟奏言：臣于今春开始买牛制器，在天津滨海地区开渠筑堤，种植稻、豆等五千余亩。内水稻二千亩，力勤肥多者，每亩收四五石；豆每亩收一、二石。惟旱稻以地斥卤立槁，无收。同时请进一步扩大屯种面积。同年十一月初三日，户部复议天津屯田事宜，同意予以实行。后来因"屯将非其人"，迄无成功，得不偿失而罢。

沈节甫逝世　沈节甫(1533—1601)，字以安，号镜宇，浙江乌程县(今浙江吴兴)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万历初，历官南京刑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累次上疏"请省浮费，核虚冒，止兴作，减江、浙织造，停江西瓷器"，又尝献治河之策。后因父死致仕。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一月初五日卒，年六十九，赠右副都御史，天启初谥端清。有《阮易楼藏书目录》、《纪录汇编》等。

准复辽东马、木二市　辽东开原、广宁二地马市，始于成化十四年(1478)；义州木市始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后因朵颜诸部屡次犯边，遂罢之。万历二十八年六月，巡抚辽东右佥都御史李植奏辽东广宁马市及义州木市兴废经过，并以事关辽东边防，请朝廷尽快商议对策，以决大计。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以朵颜部长长昂等人纳降并请复市。神宗许其请。

矿税方停即复　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十六日，神宗突然患病，急召诸大臣至仁德门。然后命内阁首辅沈一贯单独入启祥宫，神宗对他说："朕病沉重。前兴矿税，是出于修建三殿、二宫之需，非长久之策。自今开始，矿税、江南织造、江西烧造，俱止勿行。所遣内监，俱令回京。"当晚宣读上述诏书。并说：对此命令，如有奸恶截阻，以及驿递应付迟慢者，指名参处。"可是到次日，神宗转危为安，马上反悔，下令收回诏书，沈一贯不能止。时司礼太监王义正在神宗身边，遂力争说："王言何可反汗！"神宗不思己过，反而大怒，欲亲手杀死王义。王义不畏死，进一步力争，反对神宗收回成命。终因为时已晚，无济于事。自是诸大臣、言官请罢矿税之疏不绝，神宗皆不理，税使肆虐如故。

景德镇瓷工起义　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二十一日，因江西税监潘相及其随行人员恣横不法，引起公愤，景德镇万余名瓷工发动起义，毁器厂，烧税署，打死潘相爪牙陆太守，断潘相饮食。潘相逃走之后，诬奏饶州府通判陈奇可。陈奇可遂被逮下狱。

陈蕖致仕　陈蕖，生卒年不详，字伯含，号应虹，湖广应城县(今湖北应城)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宜宾县令、户科给事中、山西副使、山西参政，终户部尚书。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初二日，明神宗以"今帑藏空虚，边饷告急，户部堂官互相嫌疑推委，借词告病，不肯代君分忧，误军国大事"，勒令陈蕖及户部侍郎张养蒙致仕。万历三十四年予祭葬，万历三十六年赠太子少保。

张养蒙致仕　张养蒙，生卒年不详，字泰亨，号见冲，山西泽州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改庶吉士，历任吏科左给事中、工科都给事中、河南右参政、太仆少卿、左副都御史。张养蒙慷慨敢言，不惧权要。万历二十四年(1596)上疏极论时政得失，批评明神宗缺官不补，用人不当，宠信宦官，税使害民。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再次上疏抨击明神宗"好逸"、"好疑"、"好胜"、"好货"。不久，升为户部右侍郎。万历三十年三月初二日与户部尚书陈蕖同时被勒令致仕。死谥毅敏。

李贽被迫害致死　李贽(1527—1602)，号卓吾、温陵居士，福建晋江县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

举人。万历中官至姚安知府,“一切持简易,任自然”,以德化人,反对暴政。李贽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遭到当局的反对,即于万历八年(1580)七月离开官场,次年春到湖北黄安从事讲学和著书立说。李贽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理学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反对封建伦理道德,主张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由于李贽的著作处处渗透着“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无论通邑大都,穷乡僻壤”,人人争读其书,而封建统治阶级则视之如洪水猛兽,对李贽进行残酷迫害。万历二十九年二月,李贽到达北京通州(通县)。万历三十年闰二月,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的著作“流毒海内,惑乱人心”,请“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将其已“刊行诸书”及“未刊”之书,“尽行烧毁”。神宗收到张问达的奏疏,立即下令逮捕李贽。李贽在北京狱中,毫不畏惧,作诗读书自如”。当听到要把他押回福建老家的消息时,李贽视死如归,说:“我年七十有六,死即死,何以要归家”。三月十五日,他以“七十老翁何所求”的刚强意志,趁侍者为他剃发之时,夺刀自刎,次日气绝而死。李贽学问渊博,著作宏富,有《焚书》、《藏书》、《续藏书》等。

恢复总漕总河分设之制　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十九日,巡按御史吴崇礼上疏,说:国家大务,无过于漕与河。以前并设总漕、总河二大官,不仅繁剧可各修其业,而且艰大之事可期于共济。近因“导黄分淮”之议,所见不同,又为防海备倭患,遂设专责巡抚,以漕运归并河臣。此为一时权宜之计,不可行之永久。况且以前漕运、河道其要在淮、扬,故可以一人兼任。今漕运于东南,而河决于西,欲以一人之身而东督粮储、西治河水,虽有智巧之人亦苦于力之不足。请复旧制,以总河道衙门专管河务,仍驻札于山东济宁,往来巡河督理;总督漕运衙门仍兼管凤阳,巡抚防海军务,驻札淮安。神宗可其奏。

云南腾越人民暴动　云南税监杨荣横征暴敛,肆害官民,作恶多端。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二十二日,云南腾越州人民首先奋起反抗,杀死税监委官张安民,焚毁税厂,史称“云南腾越民变”。事后,神宗命逮捕“真正首恶,依律处治”。经廷臣一再请求列杨荣罪状以定民心,无辜才免遭株及。

李颐逝世　李颐(—1602),字惟贞,号及泉,江西余干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中书舍人。熟悉典故,有才名。万历初,进御史,赴湖广、广西清军,请免士民远戍,只到附近卫所充军。后逆张居正,出为湖州知府,累官至兵部左侍郎、右都御史。在矿税使四出之时,李颐多次上疏批评明神宗纵容税使胡作非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主张上筑决口,下疏故道,以为经久之计。两个月以后,即因积劳成疾,于万历三十年四月十一日卒,赠兵部尚书。

温纯疏请捕治税使　万历三十年(1602)七月二十七日左都御史温纯上疏,说:“税使窃弄陛下威福以十计,参随凭借税使声势的百计,地方奸民窜身为参随爪牙以万计。”国内百姓,困于水旱,困于开矿,已毫无乐生之心,岂能再胜任税使那些虎狼,请即日罢矿税,逮治税使李凤、杨荣、陈增、高淮等人。又说:“李凤浮纵,奸污妇女多至六十六人,积私货三百担。”神宗不听。

张一桂逝世　张一桂(1540—1602),字稚圭,号玉阳,河南开封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选庶吉士。历翰林院编修、侍讲、南京国子祭酒,终礼部左侍郎。万历三十年(1602)八月二十九日逝世(另说死于万历二十年)。著有《滶枕堂文集》。

万世德逝世　万世德(?—1602),字伯修,山西偏头卫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任南阳、元城、宝坻县令,皆有能名。后为西宁兵备佥事,知兵法,善骑射,每战皆捷。日本进犯朝鲜时,万世德以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以大败日军之功,被特命为蓟辽总督。万世德遇事通敏,时称才臣,其为政以宽大简重、息兵宁人为要务。万历三十年(1602)十月十一日卒于官。有《海防奏议》。

贾待问逝世　贾待问(1533—1602),字学叔,号春容,北直隶威县(今河北威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官咸宁县令、礼科给事中、工科左右给事中、怀庆、松江二府知府,注意兴修水利,为民除害。万历六年(1578),进山西参政。万历九年,为按察使,改湖广右布政使,转左布政使。万历十二年,任南京光禄寺卿。不久,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万历十四年,进左副都御史,巡无福建。万历十八年,巡抚甘肃,第二年改抚陕西,被论去官,回家闲住。后起官提督操江,进兵部右侍郎,再抚陕西,以功加右都御史,再加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万历三十年九月,加太子少保。同年十一月初六日卒于官,年七十。赠太子太保。

田大益请补南北两京缺官　万历三十年(1602),南北两京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按、监司缺六十六人,知府缺二十五人。兵科都给事中田大益力请调补,神宗不理。时大学士沈一贯奏:“天下御史巡行差务计十三处,今缺九处。请遣各御史分往任事,以期监察有所责成而纪纲可振。”神宗亦不听其言。

胡应麟逝世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又号石羊生,浙江兰溪县人。万历四年(1576)举人,后久试不第,遂筑室山中,购书四万余卷,亦多有著述。所著《诗薮》二十卷,对王世贞推崇备至。另有《少室山房类稿》、《笔丛》等。为明代有名的文学家之一。

诏户兵二部核九边军数 由于内府费用日增,户部困不能支。九边军队共八十六万多人,将官俱以空名冒支军饷,而对部下多加尅减,致使边民多次发生哗变。神宗担忧局势难以收拾,不得不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正月下诏户、兵二部核实九边军队人数,以制止将官冒名支饷,安定民心。然诏下而弊端如故,毫无效果。

吏部请补各地缺官 万历三十一年(1603)三月初二日,吏部奏言:全国知府缺者十分之五,请令本部推补。神宗不理。时南北六卿正、副职亦多缺。于是大学士沈一贯说:各衙门本章,例应三日即下。今日有奏而不发票,有票上而不发行,人心由此怠弛,政务从而壅滞,且岁月滋久,有人易藉手作奸。如此,何以昭示万世。请将各衙门章疏可行者即速赐允行,不可者亦得明示改正,“必期无一疏不报,无一事不决。”沈一贯之疏呈上,神宗仍不听。

冯琦逝世 冯琦(1558—1603),字用韫,又字琢庵,山东临朐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进侍讲,充日讲官,升少詹事,晋礼部右侍郎。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冯琦上疏说:“近来天下赋额,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户殷足者,则十减其五”。“自矿税使出,而民间之苦更甚”。“陛下欲通商,而彼专困商。陛下欲爱民,而彼专害民”。又数行东征西讨,皆募民丁为兵,取民财为饷。“若一方穷民倡乱,而四面应之,于何征兵,于何取饷”。请陛下翻然改悟,速灭祸乱。不久,进礼部尚书。再请神宗取信于民,急罢矿税。神宗虽不纳其言,然以冯琦明习典故,学有根抵,欲用其为内阁大臣,因沈一贯反对而罢。冯琦素有病,至是连上十六疏乞休,神宗不允。万历三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卒于官,年仅四十六,遗疏请神宗更新图治,补缺官,信任臣工,发章奏,收拾人心。语极诚恳。神宗对冯琦病死亦深感可惜,赠太子太保。天启初,追谥文敏。有《北海集》、《宗伯集》、《经济类编》。

沈一贯上守成遣使权宜三事 万历三十一年(1603)三月初七日,大学士沈一贯、沈鲤、米赓疏言三论。一、守成。今矿税名为收自然之利,实则强搜小民,横剽额外。皇上但见小利,不知大害。为征取矿税,税使严刑毒打百姓;百姓为纳矿银,卖妻卖子,拆屋破家。昔汉文帝说:取百金,即为中民十家之产。妄取天下万金,是伤天下十万家。妄取天下百万金,是伤天下万万家。凭怒逞怨,何所不用其整。二、遣使。本朝立法,莫详于理财,其入有稽,其出有考,以防吏书侵没和解运途中作弊。又乡有籍,而户有符,从无朝夕二三之令,限有时,科有则,故百姓虽出钱而力可给,有司虽征钱而人无怨言。同进起解存留,俱有记帐,数十年之后仍可核知。府史胥徒,但供使令之役,除额定俸薪之外,贪污一钱即视为赃私。始终没有无经利无稽考之事。而今税使四出横索,收百而解上者不及一,利归群小,怨归朝廷。臣等以为让太监操利权,是古往今来最为切忌的。不仅为此,还让此军典兵权。其祸不可不早防。三、权宜。皇上每次下话、俱言开矿、派税使为权宜之计。今并非如此,而是日复一日,开矿不停,税使不撤。岂能以“权宜”二字以箝天下之口!

户部议行条鞭法 万历三十一年(1603)四月十一日,户部上疏请令有司奉行一条鞭法,既酌量征收以充公费,不得佥派里长,挨月轮直,以滋苛刻。一、库役不许佥派民间富户充当。二、不许于预备仓库佥编计级看管。三、条鞭所载供应上官及过往使客,俱有定额,不许分外巧立富民、义民名色,借以供应。四,条鞭夫马,岁有定额,输银在官,而雇役于民。不许遇夫马紧急,再于粮上重纳。五、不许以保甲人户充迎送、勾摄罪犯、打卯应差。六,不许省祭义民充勾摄管工承委之役。七,不许派民当行价值半给,支领衍期。八,不许有司于罚赎之外,横肆科罪,折银充索。九,征银不许粮甲串同保歇吏书任意侵没;征粮不许粮长串同吏书花户任意折乾。官收官解,则严禁火轮面。十,通行江南直省府州县,将一应田土查核见在户名,征粮之日,先行开派,定限收纳,拖欠者坐名查比,以免赔累。十一,凡内库之生绢、阔布,俱照光禄寺料银,供用库麻、蜡,改从官解。户部奏疏呈上,神宗可其请,令颁行。

诸臣疏劾高淮 辽东税监高淮最为横行不法,大肆侵饷渔夺,强迫将领厚馈,并在辽东私养死士二千余名、骑兵七、八百,时时操练。尤其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四月,高淮竟然率领三百余名人马直入京城,驻扎于广渠门。同年五月初六日,御史张似渠劾高淮擅离辽东,潜匿京师,拥兵城下,是“违旨犯禁”。兵科给事中田大益说:高淮不奉诏旨,自辽东拥兵数百人,骑马数百匹,携金持宝,直驻都门,意在经营窥探,妄图典兵权,制造祸乱。工科给事中宋一韩奏:高淮在辽东畜养死士,演练射击,并俨然以将帅自居。同时到处骚扰邮传,需索营卫,蹂躏地方,凌辱

职官,奴役士夫,草菅军民,劫掠行人,乃至勾通属国外吏,假传圣旨,责令朝鲜国王进贡,索冠珠,求貂皮,要马匹,可谓罪行累累。是时九卿诸大臣也纷纷上疏,请重治高淮,绳之以法。神宗俱不听。

册封诸王 万历三十一年(1603)五月初七日,封蜀府奉爵为隆昌王,唐府器增为宝庆王,益府常𣶏为安义王,朱由柭嗣罗川王,周府朱肃𣺌嗣柘城王,朱肃溱嗣瑞金王,朱在拴嗣鄢陵王。

裴应章致仕 裴应章(1537—1609),字元㴾,号澹泉,福建清流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任行人、吏科给事中、太仆、太常寺卿。郧阳兵变发生,命裴应章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郧阳,处治有方,乱遂定。召入为户部右侍郎,历吏部右侍郎,改南京工部尚书。进南京吏部尚书,拜疏不赴。万历三十一年(1603)六月二十七日致仕。死,年七十三。赠太子少保,谥恭靖。有《懒云居士集》、《编蒲蠹余》。

南北大水成灾 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秋,南北各地相继发生大水。六月二十八日,山东泰安州大水为灾,淹死男女八百余人,毁坏民舍数千区。七月二十三日,京师大雨,保定府祁州、安肃县同时连降暴雨,顷刻水深尺余,拔树折木、苗稼尽伤。其中,祁州因为大水,田舍俱没,城垣倒圮。八月初四日,福建泉州府发生洪水,溺死万余人,毁坏民居不计其数。同月,该府同安县飓风大作,暴雨随至,海溢潮涌,冲坏民居、死人无数。

江北等地农民起义 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江北地方及邻近各省,因"灾伤重大",不断发生饥民起义。同年九月十一日,凤阳漕运巡抚李三才言:近来江北各处大风拔木,洪水滔天,饥民蜂起。徐州有赵古元起义,亳州李大荣起义,河南睢州则有杨思敬起义。陛下每有征求,必说"内府匮乏","其实不然"。"陛下所谓匮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满天而已"。小民无食,重以征求,而且鞭挞无时,官惟丐罢、民惟请死。陛下毋谓臣祸乱之言为未必然,若已然,将置陛下于何地!此疏呈进,神宗不理。

江铎逝世 江铎(?—1602),字士振,浙江仁和县(今浙江杭州)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兵部员外郎、福州知府、苏松常镇兵备、淮安监军、扬州参政、山西按察使。播州杨应龙起兵反叛以后,川、贵骚动,湖广震惊。廷议以楚地辽阔,非派重臣驻偏沅不能节制。遂添设偏沅巡抚一员,并特别任命江铎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偏沅。江铎赴任以后,料理器具,指授方略,分布要害,镇守险阻,一切事务皆不遗余力。官军平杨应龙后,以江铎夹攻杨应龙有功,荫一子世袭锦衣指挥。遇母丧回家守制,再起参加讨平皮林各寨苗民起义。万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死于家,赠兵部右侍郎。

孙坤逝世 孙坤(?—1602),河南睢州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5)进士,历刑部主事、员外郎、山西佥事、陕西参议、副使、四川参政与按察使、布政使、太常卿。后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参加征剿苗民唐乔起事。万历十五年(1587),自陈致仕回家。三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卒。

郭正域罢官 郭正域(1554—1612年),字美命,号明龙,湖广江夏县(今湖北武汉)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并充皇长子讲官。万历三十年,官至礼部右侍郎,万历三十一年三月掌礼部事。其时,税使四出。郭正域请罢矿税,反对税监鲁保兼督江南、浙江织造。后因在楚王华奎与宗人华越纠纷案上与内阁首辅沈一贯意见不合,会"妖书"之狱起,沈一贯遂诬其结党,欲捕治他,经都御史温纯等疏救,郭正域始获免。万历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神宗遂令其回籍听候处理。郭正域为人忠直,勇于任事,自守廉介。被罢回家十年死,年五十九。赠礼部尚书。光宗即位追赠太子少保,谥文毅。有《批点考工记》、《明典礼志》、《韩文杜律》。

诏定福王岁禄 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初六日,神宗命令户部:福王朱常洵每年禄米一万石。今在京每年先支给三千石。钞一万贯。待正式到藩府之后,全数供给。

李戴致仕 李戴(?—1607),字仁夫,号对泉,河南延津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兴化县令、户科给事中。万历初,官陕西按察使,处事务行宽简。后累官至工部尚书。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李戴被命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仕,万历三十五年二月初四日卒,赠太子少保。

王元敬逝世 王元敬(1515—1603),字廷臣,号古林,浙江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历许州知州、刑部员外郎、郎中、荆州知府、副使、参政、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应天府尹,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再升为南京兵部右侍郎。不久,被论落职闲住。后经奏辨,官复原职。未几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家,年八十七。

邢玠致仕 邢玠(1540—1612),字式如,号昆田,山东益都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密云知县,升御史,出按甘肃,升河南佥事,历陕西苑马、山西行太仆卿,进陕西按察使,所至皆有治绩。改治兵甘州,有战功,加右布政使。后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迁南京兵部右侍郎。又以兵部尚书总督蓟辽,

赴朝鲜经略军务。以南海大捷,加太子太保。万历三十一年(1603),力请回家养母。朝廷命其为南京兵部尚书,邢玠不赴,遂致仕。万历四十年三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三。赠太保。邢玠为人耿直,敢于任事。临终前仍心系国事,遗疏请除党祸、用人才、发内府银、罢税使,洋洋数千言。

顾养谦逝世 顾养谦(1537—1604),字益卿,号冲庵,南直隶通州(今江苏海门)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任工部主事、郎中、福建按察佥事、广东参议、副使。坐事调为云南佥事,抚服顺宁土官,进浙江右参议。改蓟州镇兵备,再进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以战功,升右副都御史,历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理粮储。改兵部左侍郎。又奉命为蓟总督兼经略朝鲜军务。后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终协理京营戎政、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顾养谦为人倜傥豪迈,以才武称于蓟辽。万历三十二年(1604)正月十二日卒,年六十八,谥襄敏。有《冲庵抚辽奏议》、《督抚奏议》等。

曾朝节逝世 曾朝节(1535—1604),字直卿,号植斋,湖广临武县(今湖南临武)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署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夙著温良恭谦,颇称悫慎,人称其为长者。万历三十二年(1604)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赠太子太保,谥文恪。有《芝园集》、《易测臆言》、《古本大学解》。

李化龙请开泇河 万历三十二年(1604)正月十四日,总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李化龙疏言:河自开封、归德而下,合运入海。其路有三:由兰阳道考成至李吉口,过坚城集入陆庄楼,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浊河,为中路。由曹、单、丰、沛出飞云桥,入龙塘、出徐沟而向徐、邳,是名银河,为北路。由潘家口过司家道,至何家堤,经符离,道睢宁,入宿迁,出小河口入运,是名符离河,为南路。南路接近祖陵,北路靠近运河。唯中路既远于祖陵又济于运河,以前督臣力排众议,兴工开河,终因资金匮乏,不得完工。臣以为为今之计,唯守行堤,亟开泇河。其利有六:一、泇河开而运不借河,有水无水均可通运。二、可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开三百三十里之黄河。三、运河不借黄河,则我为政得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四、估计费银二十万两,开河二百六十里,比以前朱衡开新河,可谓事半功倍。五、开泇河必行召募民夫,春荒时开工,夏麦熟时人散,富民不用赔累,穷民得以救济。六、粮船过河,尽在春天之后,害怕河水上涨,运入泇河,朝暮无妨。其不必怀疑者则二:一保护祖陵,为民抗灾;二徐州向来苦于水患,开泇河可以保护徐州城,安定徐州民心。是时,工科都给事中侯庆远亦以为开泇河有益于民。神宗说:应审度详悉,及时兴工,如经费不敷,许其增加,务图久远之计。至同年八月,泇河开通。但为时不久,黄河又在丰县、沛县等处缺口,为害如故。

福王婚费开支浩大 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二月,福王朱常洵立妃郭氏,万历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合婚,计费银三十万两。

谢杰逝世 谢杰(? —1604),字汉甫,福建长乐县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行人,出使琉球,谢绝馈遗。历任南北两京太常寺少卿、南京五府佥书、顺天府尹。不久,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是时部下被荐升官者多以贿赂作为礼物感谢他。他说:"受贿而后推荐之,是干戈之盗。推荐之后而接受贿赂,则是衣冠之盗。"人以为名言。后进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万历二十五年春,谢杰因为神宗不勤理政事,疏陈十规,神宗虽不纳其言,却召其为刑部左侍郎,再升为户部尚书,总督仓场。时四方遇灾伤,谢杰请每年运粮三百万石以上方许改折。神宗从其言。三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卒。谢杰敢于任事,为官廉洁。有《天灵山人集》、《棣萼北窗吟稿》、《白云编》诸书。

阁臣冒雨伏阙请罢矿税 万历三十二年(1604)五月二十三日,雷火击毁长陵明楼。神宗为此下诏讲求实政。大学士沈鲤请除矿税,并属同官沈一贯、朱赓各草一疏,等待时机呈上。一日,京师忽降大雨,沈鲤说:疏可以上了。皇上历来厌恶讲矿税事,不看这类的奏疏。今日我辈冒雨素服到文华门上奏,皇上必会感到惊讶而视之。于是他们诚心诚意地在雨中伏跪,请神宗惕然思省,翻然改过,速除矿税,勿轻视宗社,勿疏简政事。从辰时跪到午时,神宗还是不出来,最后派太监田义传旨:令他们"各守心供职,不要挟私沽名"。

赵世卿疏论矿税"六不可不罢" 万历三十二年(1604)五月,长陵明楼被雷火击毁时,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今日讲求实政,莫急于罢矿税。历来明王不贵异物,今矿税致民怨,为君德之计,不可不罢,此其一。取民无度,势将驱民从乱,致百姓群起反对朝廷,为国家之计,不可不罢,此其二。开山凿海,税及工商农民,而且操弓挟矢,残害良民,毁坏田庐,祸延鸡犬,数十年而不停止,为国体之计,不可不罢,此其三。税使四出,如虎如狼,到处挖墓,奸淫妇女,人无不怨恨,为民困之计,不可不罢,此其四。国家财赋,不在民间而在官府,今尽括入于奸人之室。以故不断催征旧欠税粮而积欠日多,不断征收关税而关税愈亏,库藏空,民贫如洗。为国课之计,不可不罢,

此其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时，陛下于三年前就下诏说："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为诏令之计，亦不可不罢，此其六。请陛下试思：从服食、宫室，以至营造、征讨，何事不取于民，民何事不供上？百姓无负于国家，陛下何以不恤其难，岂能问心自安。今日灾变迭告，"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罢矿税。无烦再计而决也。"赵世卿之疏呈上，神宗虽以为然，但终不罢矿税。

京师连降大雨　先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六月，昌平大雨，浸坏长、泰、康、昭四陵石渠及陵墙。至七月初一日，京城又连降大雨，"凡两月不止"。正阳门、崇文门一带，城垣中陷者七十余丈，民居多坏。遂发太仓银十万两救济被水居民。是时畿辅永平、保定、真定诸府州县亦大雨不止，溺死男女无数。

借银济边　万历三十二年(1604)闰九月初十日，户部尚书赵世卿奏：各镇下半年年例通该给发银一百五十七万八千余两，今查本库实在各项只有四千五百六十五两，无从给发，乞借发老库银若干，马价银若干。神宗诏借支太仓银二十万两，太仆寺银三十万两，作速解边，以济边镇之急。待日后有余时，务补足归还。

楚府宗人击杀赵可怀　楚王华奎贿赂大学士沈一贯，宗人华越上疏弹劾，被判以诬告罪。诸宗人皆不服，俱言华奎"伪迹昭著，行贿有据"。并到京城上告，明神宗不听，下旨切责诸宗人，罚禄削爵。万历三十二年(1604)秋，华奎又献银一万两资助大兴土木。诸宗人疑其输贿，渡江拦劫，湖广巡抚赵可怀令有司捕治宗人。宗人恨赵可怀治狱不公，庇护华奎，于同年闰九月二十四日集数百人持刀突入巡抚衙门，当场杀死赵可怀。神宗命逮捕诸宗人，有七十三人坐狱问罪。成为当时轰动远近的大案。次年四月，赠湖广巡抚兵部尚书赵可怀为太子太保，荫中书舍人，予祭葬。同时将为首的楚府宗人蕴珍金、蕴锎处斩，赐华堆等三人自尽，华嬿等二十三人禁锢狱中，蕴钫等二十二人革职闲住，蕴鎏等十八人降爵革禄，并停其待封者。

福建等省地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十一月初九日，泉州、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德化等地震。本月初八日已震，初九日夜再大震，自东北而西南，连震十余次，山石海水皆动，地裂数处，郡治尤甚，楼铺雉堞多倾塌殆尽。开元寺东镇国塔第一层尖石坠落，第二第三层扶栏震碎。城内外庐舍倒塌，覆舟甚多。南安县城地震十余次，直到次年正月初六日方止，城堞尽圮，地裂数处，民居倒坏甚多。同安酉时地大震，其声如雷，城廓庐舍多有倾塌，地裂涌水。福州府地大震有声，至夜动摇不止，屋宇将倾，墙垣多倒塌。兴化府大震，自南而北，树木摇动有声，栖鸟惊飞，城塌数处，屋倒无数，洋尾、下柯地、利港田皆裂，涌出黑沙，有硫磺气味，池水皆涸。福宁州夜大震如雷，山谷响应。沙县酉时地震如雷，墙屋倒塌，溪流荡涌，自县城至四乡达百里。漳浦戌时大震有声，民舍倾倒，兴教寺金刚像坏，忠节场、仙云坊二塔顶俱坠落。南门外大陂田中陷一穴，广五丈余，深二丈，水涌出，中有黑沙泥。七都灶山忽坠一大石，先一、二日有气出如烟火。海澄民舍多坏，有裂而泉涌者。江西省广信府上饶、弋阳、永丰、庐溪等亦震，房屋柱磉有坏裂者。浙江省余杭戌时地震，河水腾涌。严州府建德；温州府永嘉、瑞安、平阳，墙屋有坏者，屋瓦多有坠者。慈溪、绍兴府、诸暨、上虞、嵊县，床榻荡摇，屋宇摇动。江苏省高淳戌时地震。苏州府、吴江、吴县、震泽、嘉定及吴淞守御所，俱震有声。波及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德化、惠安，建宁府松溪、泰宁，延平府南平、将乐、沙县、大田，汀州府长汀、归化、连城、武平，漳州府龙溪、平和、长泰；江西省鄱阳、余干、万年、乐平、安仁、玉山、婺源、贵溪、铅山、德安、瑞昌、南丰、兴国、金溪、新淦、泰和；浙江省秀水、奉化，台州府、临海、仙居，衢州府、西安、江山、开化、永嘉、海宁，嘉兴府、嘉善、桐乡、崇德、平湖、乌程、归安，德清宁波府、鄞县、象山、定海、新昌、兰溪、东阳、义乌，浦江、武义、龙游、常山、乐清、丽水、松阳、遂昌；安徽省铜陵；湖广汉川、安陆府、鍾祥；广东揭阳、遂溪等七省所辖九十多府州县，同日俱震。此次地震最远破坏距离约四百五十KM，最远有感距离约八百KM。震中烈度不详，震级(M)为八级。

兵部奏报赏赐外夷布匹额数　万历三十二年(1604)十一月十七日，兵部言：赏给外夷布匹，查历年所买为十三万八千三百七十三匹。今改买山东粗布，增加一万三千二百九十二匹。每布三千匹为一车，计布填车。赴江南苏、杭所用船只、廪粮、马匹，亦酌填勘合，不许阻难，以及委官夹带需索。神宗可其奏。

福王府庄田及征银额数　万历三十三年(1605)正月初二日，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张似渠，奉旨拨给福王府赡养庄田二千八百零一顷又九十一亩，每年征银六千五百八十四两。

汤兆京奏宣大矿税监之害　万历三十三年(1605)正月二十一日，巡按宣、大御史汤兆京奏：臣按属宣府、大同，名为两镇，实系弹丸之地，东西仅七百余里，南北有不及二百里者。设立州县十四，额派税粮通计十万石。比之腹里地方不当一大州县，而且

地皆砂碛，素号战场，拱护陵京。今称重镇，数年以来，税监有张烨、矿监有王虎、王忠，王虎之贪酷横行尤令人发指，已激成广昌之变。及今一切罢免，诚为大幸。不然，包派已有定数，地方官员自能了此，或直接令两镇起解，或归并税使于一人，实为省便。疏呈上，神宗不听。

户部请复旧例储漕粮三分之一于通州仓 万历三十三年(1605)正月二十七日，户部奏言：国家每年漕运东南税粮四百万石，以实京师，而又分设仓储于通州，分漕粮三分之一贮之。近年水旱频仍，改折数多，又兼以本代折，太仓匮乏。先前建议正兑尽入京仓，待京储稍足，再议改储通仓。不意河流迁徙，运船来迟，若再坚守前议，冻阻必多。今督臣游应乾请自本年为始，照旧以三分之一派拨储于通州仓。如本年改折，可给京军照常支放，倘仍前多支本色两月，许于京、通二仓均匀派放。另外，同月二十八日户部又奏：山东及南直隶江北州县，因重灾改折，漕粮应照单例于临清、德州二仓预备粮内支运十七万石，以足额数。神宗俱准其奏。

吏部奏京察官员 万历三十三年(1605)正月二十八日，吏部言，本部会同都察院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员，不称职者有：年老多病者工部郎中陶充等三十人，贪酷成性者兵部主事丁应泰等十人，软弱无能者户部主事金铨等六人，品行不端者户部主事魏之干等九十人，浮躁不实者光禄少卿冯渠等三十九人，才力不及者太仆寺丞曹钥等三十二人。神宗得疏，留中不发。

杨时宁致仕 杨时宁(1537—1609)，字子安，号小林，河南祥符县(今河南开封)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曲沃知县、宁夏巡抚，因抗御外族犯边有功，进右都御史，总督宣，大，累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万历三十三年(1605)二月初六日自动请求致仕。居家四年卒，年七十三。

夏良心逝世 夏良心(？—1605)，字景尧，南直隶广德州(今安徽广德)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南京兵部主事、湖广佥事、山西参议、浙江副使、参政、山东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不久，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六年考满，进兵部右侍郎。万历三十三年(1605)二月十四日卒于官。赠兵部尚书。

南京考察官员 万历三十三年(1605)二月二十一日，南京吏部会同南京都察院考察南京五品以下官员，其中年老多病的有礼部司务马千官等十人，贪酷的有应天府照磨李锐等二人，品行不端的有户部郎中王道正等三十四人，罢软的有兵马汪一麟等三人，浮躁的有吏部主事林汝诏等十人，才力不及的户部郎中张凌云等十四人。神宗得疏，留中不发。

诏留被黜科道官 先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正月吏部奏报京察被黜科道官，神宗得疏之后留中不发。至同年三月初七日，吏部催考察科道官疏。神宗降旨：科道乏人，浮躁不及的姑留用，其余各致仕、降黜如例。同日，明神宗又谕吏部及都察院曰：朕览今大察各官本内，科、道两衙门不称职者甚众，岂皆不肖。内必有徇私之弊，有泄私怨的，有结党谋私的，有欲树权以挟人的，有欲立威以制人的。不然，不称职者何其多，朕不得无疑。时被察而去者，多为内阁首辅沈一贯的党人，如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御史张似渠、于永清等。沈一贯不满，专疏密奏明神宗，并指使其党集中攻击吏部左侍郎杨时乔、左都御史温纯，物别是礼部右侍郎郭正域，说他是此次京察主谋。于是神宗下诏特留给事中钱梦皋等人。继而又下令尽留被黜科、道官，同时严厉斥责杨时乔等。三月十三日，杨时乔、温纯说：察处科道官，万历二十一年为科七人，道十人，二十七年为科五人，道九人。今议处只科四人，道七人，皆参照众议秉公办事，并非挟私报复。请罢臣等。神宗见疏，令其"安心供职，不必陈扰"。

唐文献逝世 唐文献(？—1604)，字文征，号抑所，南直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四年(1586)举进士第一，历任翰林院修撰，詹事府詹事。万历三十一年底，"妖书"之狱起，大学士沈一贯欲以此事谋害礼部侍郎郭正域，唐文献偕同僚往见沈一贯，责以大义。郭正域获免，而唐文献则由此为沈一贯所恨。不久，进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唐文献为人清劲，素以名节自励，多次救人于危难之中。给事中李沂劾太监张鲸，被廷杖，唐文献扶之出，且资助汤药。荆州推官华钰逆税监被逮下狱，唐文献不避嫌，力周旋，使其得免死。掌翰林院时，主持公正，坚决反对沈一贯庇护私人。万历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官，赠礼部尚书，谥文恪。有《占星堂集》。

庄国祯逝世 庄国祯(1527—1605)，字君祉，号阳山，福建晋江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历会稽县令、户科给事中、浙江佥事、江西参议、广西副使、江西提学副使、广西参政、广东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广西左布政使、河南布政使。万历十六年(1588)，升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十八年，进南京刑部右侍郎，改户部右侍郎。万历三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卒于家。年七十九。

曾同亨致仕 曾同亨(1533—1607)，字于野，

号见台，江西吉水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万历初，为大理寺少卿，历顺天府尹，升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因逆张居正，被勒令回家。张居正死后，历任南京太常卿、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进工部尚书，省浮费，减织造，裁冗员。其后，任南京吏部尚书，极谏停矿税，除民害。万历三十三年(1605)大计京官，曾同亨持正不挠。同年四月十四日加太子太保致仕。万历三十五年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少保，谥恭端。

广东琼山、澄迈地震　万历三十三年(1605)五月二十八日亥时，广东琼山(今海南省海口市)、澄迈(今海南省)地震。琼山自东北起，声响如雷，公署民房崩倒殆尽，城中压死数千人，地裂水沙涌出，南湖水深三尺，田地陷没者不可胜计。县城东南的调塘等都田沉成海。县城东五十里演顺都与文昌交界处的新溪港(今东潢港)陷没数十村。县东南八里顿林都的苍茂圩岸与丰华都的后乐圩岸、长牵圩岸俱被毁。县署大堂、东西仓库，全都倒塌。府学、庙堂、斋阁的棂庑半倾。县学、号房、仪门泮池、阈星门、启圣祠、明伦堂等完全倾倒。万历三十一年新建的鼓楼亦震倒。在城外的瑞云桥亦崩坏。县东七十里那社都的迈容桥崩陷。天宁寺、关王庙、文昌祠、明君塔等俱倾倒崩塌。澄迈(今老城)夜地震有声如雷，海沙崩裂，或深及丈见水，高岸成谷，深谷为陵，宇舍坊表，倒塌殆尽，人死数百。午时，银矿怪风大作，有声如雷，摇动少顷，坑岸崩坍，压死矿夫以百计。万历九年重修的学宫启圣祠、拜亭、敬一亭、大成殿、两庑戟门、名宦乡贤祠、石砌泮池、左右衙及西门塔，俱倒塌殆尽。安定县午夜地震，声响如雷，民房、廨宇、坊表，崩坏大半。文昌县官署民居尽毁，压伤人畜。南五图百村，平地忽陷成海，县城及城内的学宫，城北的蔚文书院、城西南的北山庙，城南紫贝山上的紫云庵，紫贝山下的太平桥，与城北十里处的白芒桥，俱皆倒坏。临高县城垣、学宫、民舍尽圮，近海地多龟裂，县东南的马袅场盐田没于海，县学、庙堂斋舍尽倒坏。会同(今琼海)屋坏山崩，人物陷伤。万州(今海南省万宁县)地裂，涌出水沙数尺。新宁启圣公祠倒。南海、四会、石城，雷州府、海康、徐闻、合浦、钦州等俱大震。广西桂林(今桂林市)、平乐二府，至有陷城沉地，水涌山裂，屋宇尽倾，官民半死者。梧州府陆川，声若山崩，震塌城垣房舍，压死居民男妇无数。岭溪学宫倒塌，容县声如霹雳。波及广东省肇庆府高要、封川、儋州；广西省平乐府富川、贺县，梧州府怀集，郁林州博白、北流、兴业，南宁府横州，永淳；湖广(今湖南)临武等，三省二十余府州县，同日俱震。此后有的屡震数月不止，有的连震经年，更有连震数年者。如同年十一月初六日夜，高州府、雷州府、琼州府地大震、有声如雷。廉州、琼州二府尤甚，邑犬狂吠，池鱼惊，跳官民房屋倒塌千余间。此次地震最远破坏距离约三百四十KM，最远有感距离约六百二十KM。震中烈度(Io)X，震级(M)七点二五级。

遣使册封诸王　万历三十三年(1605)四月二十七日，神宗命右通政陈子贞等十二人为正使、中书庄元臣等十二人为副使，册封在锭为奉新王、勤黔为义阳王，在壄为安吉王、由栋为安仁王、载珁为贵溪王、寿镆为东原王、以浩为安丘王、寿碒为邹平王、盛浮为通城王、奉镓为南川王、效毃为保定王、效铚为沁水王、谊沠为永寿王、敏漗为河东王、术辖为蕲水王。

温纯致仕　温纯(1539—1607)，字景文，号字叔文，号一斋，晚年更号亦斋，陕西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万历十二年(1584)以大理寺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后召入为户部左侍郎，进右副都御史，总督仓场。历南京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再召为左都御史。时矿税使四出，所至剽夺，奸淫妇女，民怨载道。温纯极论矿税之害，请急罢开矿、严惩税监。万历三十一年"妖书"事件发生时，温纯力为沈鲤、郭正域辨诬；武昌楚王府宗人杀死赵可怀时，沈一贯欲发兵围捕，温纯力言"诸宗人无反状。"由此两事，使他与沈一贯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三十二年大计京朝官时，温纯与吏部侍郎杨时乔主察典，力斥沈一贯私党，遂被劾"曲庇叛人，且纳贿"，"朋比作奸"。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遂致仕。温纯清白奉公，五次主持南北两京官员考察，"澄汰悉当，肃百僚，振风纪，时称名臣。"三十五年卒，年六十九。赠太子少保，谥恭毅。有《温恭毅公集》。

王基致仕　王基(？—1605)，字对沧，山东莱阳县(一说益都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户部主事、浙江布政使、大同巡抚。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为南京户部尚书，总督仓场，不受贿赂。万历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南京科道拾遗；王基被劾，神宗下旨令致仕。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卒。

支可大致仕　支可大，生卒年不详，字有功，南直隶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礼部主事，终湖广巡抚。万历税监陈奉在湖广为非作歹，勒索民财，激起武昌人民两次暴动，支可大非但不为民请命，反而庇护陈奉，为纣助虐，于二十九年四月被免去湖广巡抚。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因南京科道考察被论，神宗令其致仕。

姚继可致仕　姚继可(1534—1608)，字光父，号又轩，河南襄城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

由南陵县令,累官至工部尚书。万历三十三年(1605)夏,因病连续四五十次上疏,至同年七月二十八日神宗始许其致仕,回籍调理。万历三十六年卒,年七十五。

梅国桢逝世 梅国桢(1542—1605),字克生,号衡湘,湖广麻城(今湖北麻城)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固安知县,升御史。万历二十年,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起兵叛朝廷,李如松提督军务征剿哱拜,梅国桢为监军,用计谋致哱拜兵败自焚死,论功进为太仆少卿。逾年,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加右副都御史。久之,授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在镇三年,先后节省贡市尝银十五万余两。遇父丧回家守制,未满三年,即于万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四。赠右都御史。

京师军械厂爆炸 万历三十三年(1605)九月二十五日,有人赴京师盔甲厂支取火药,因药堆积年久,凝固坚如石,监收内官臧朝以斧劈之,突然起火爆炸,声如雷霆,刀枪剑戟迸射百步之外,臧朝以及把总傅钟等十人当场炸死,军死八十三人,局匠及行人死者不计其数。

曹时聘请大修朱旺口 因连年河决鱼、单、丰、沛诸县间,平地成湖,大为民害。万历三十三年(1605)春,李化龙奏言:自开泇河,起直河至夏镇,与黄河隔绝,山东与南直之间,黄河不能为害运河。独朱旺口以上,决单县则单县成为沼泽,决曹县则曹县尽为淹没。丰、沛、徐、邳、鱼、砀诸地皆命悬一线,堤防宜急整治。同年十月,曹时聘为总理河道,遂请大修朱旺口。神宗许其请。并命及早兴工修浚。

诏罢全国各地矿税 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设矿监税使以来,廷臣上疏谏阻者不下百余次,神宗俱不听,以致矿税使四出,大肆虐民,流毒全国,结果是民穷财竭,各地骚动。而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万历三十三年近十年间,各矿监所进矿银不足三百万两,至于不计其数的金珠、宝玩、貂皮、名马则俱为皇上所有。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内阁大臣再次极论矿税害民状,又言开矿破坏天下名山大川,尽伤灵气,恐对皇上身体大为不利。只有急停开矿,灵气才能恢复。为此,神宗于同月初二日,下诏罢天下矿税,以税务归有司,以岁输所入的一半归于内府,另一半归户,工二部,时称"停矿分税"。然而,矿税使并没有撤回,其害一直延续到神宗病死,方告结束。

鲍希颜逝世 鲍希颜(? —1605),山西长子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洛阳知县,升福建道监察御史,巡视北京、通州二仓,出按应天、浙江。万历八年(1580),降为曲周县丞。不久,升为广平府推官,再历湖广佥事。会亲丧,回家守孝。复起官陕西,历湖广参议、山东副使,改调为滨海兵备,历开原参政,加按察使。其后,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进工部右侍郎,未及赴任,于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

漕粮改折、漂没、入仓数额 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二月二十九日,户部奏:是年漕粮原额四百万石,内除永折三十四万四千三百四十七石,南直、山东灾害改折计十七万七千七百一十石,该进京、通、边仓三百四十信万七千九百四十一石。内漂失焚毁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一石,俱予免尖处补完足额。

梁永作恶 神宗下诏罢全国矿税。陕西税监梁永不仅坚持不撤咸阳、潼关两地的税役,且纠集无赖纵横苛征,渔肉人民,滥捕无辜百姓数十人,横加拷掠,勒索民财。至使人心惶惶。陕西巡抚顾其志为平民愤,将首要分子王遇义等人依法治罪。梁永为此大恨,伺机报复。是时,其党咸阳县人胡奉因与该县知县陈时济积有私怨,即唆使梁永令取咸阳县绒毡一千五百件,价值计银四千两,陈时济怒而不给,梁永遂诬告陈时济抗旨劫税。万历三十四年(1606)正月二十四日,神宗命械逮陈时济。

郭惟贤逝世 郭惟贤(? —1606),字哲卿,号希宇,福建晋江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清江县令,升南京御史。万历二十年(1592),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奏免加派小民。再召入为左佥都御史,疏言"行取不宜久停,言官不宜久系,台员不宜久缺。"又言:今天下多故,缺官不补,政日废弛,忠良被斥。明神宗俱不纳。后进为左副都御史,请早立皇太子,勤理政事,行考选,发章奏。久之,起为户部左侍郎,未赴任而于万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卒,赠右都御史,谥恭定。

封恭妃为皇贵妃 先是,皇三子朱常洵生时即封其生母郑贵妃为皇贵妃。而对于皇长子朱常洛之生母恭妃王氏,明神宗却迟迟不依廷臣之请进封为皇贵妃。在未立皇太子之时,此事曾引起种种猜测,闹得满城风雨。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十四日皇长孙朱由校生。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神宗始进封恭妃王氏为皇贵妃。

沈鲤请速补缺官 万历三十四年(1606)二月十二日,内阁大臣沈鲤、朱赓奏言:臣等于昨日同文武百官齐赴文华殿门,恭候圣驾,见二品班内止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其余尚书、左、右侍郎,员缺甚多。皇上方整饬吏治,而官缺众多,政务荒废,一至于此,谁为修明理乱,事关重大,请令吏部查明各衙门缺官并将前后会推人员内速赐点用,以慰内外臣民之望。神宗见疏不理。

云南人民杀税监杨荣　云南税监杨荣，长期恣行威福，破坏祖宗制度，奏开宝井，又胁迫土司献地开矿，致使边境不安，外夷乘机用兵，犯我边民。御史宋兴祖上疏劾之，明神宗不理。杨荣由是怙宠益横，云南各族人民无不恨之入骨，腾越人民奋起暴动，烧税厂，杀税官。此时，杨荣非但不悬崖勒马，改弦更张，反而怙恶不悛，继续毒虐，残酷杀害居民数千人。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月，杨荣又进一步以取马四十匹不足数为由，擅自逮捕管堡指挥使贺瑞凤，且令指挥于可继等人大肆宣称："要尽捕六卫官"，弄得人人自危。同月十一日，云南指挥贺世勋忍无可忍，带领冤民万余人，冲入杨荣的官署，放火焚烧，杀死杨荣，为民申冤，并杀其党二百余人。奴死主悲，神宗闻知杨荣被杀，数日不进食，且欲逮问守土官。经阁臣沈鲤再三劝解，以及太监陈矩详细分析利害，明神宗才怒气稍消，命令只杀贺世勋一人。

周曰庠疏论神宗言而无信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月二十三日，刑科给事中周曰庠奏诏旨不信八事：诏用大僚而九卿官员空缺如故。诏广庶官而科道考察罢黜如故。诏纳谏而章奏留中不发如故。诏饬边备而枢抚虚位如故。诏罢矿税而征税如故。诏令京城铺商得实惠而内官横征暴敛如故。诏举人才而人才沉沦如故。诏释狱囚而监牢囚犯不减如故。今日皇上如此，如何使天下匹夫匹妇执行诏令。疏呈上，神宗不理。

朱旺口修浚完工　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月，河道总督曹时聘请大修朱旺口，以除丰、沛、鱼、单诸处水患，神宗命立即兴工修浚。万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工程完成，历时五个月，用民夫五十万，费银八十万两，自朱旺口至小浮桥，长一百七十里，渠广堤厚，河归故道。

张孟男逝世　张孟男(1534—1606)，字元嗣，号震峰，河南中牟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广平推官、汉中同知、尚宝司丞、太仆少卿、南京工部右侍郎。万历十七年(1589)冬进户部左侍郎，改户部尚书。万历三十年春，请罢矿税，神宗不听。张孟男再上疏：所征天下租税，皆出卖儿女。朘骨割肉，"聚财以病民，虐民以摇国。"疏凡数千言，于万历三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前属其子呈上。疏上次日卒，年七十三。赠太子太保。

缅甸攻占木邦　起初，云南木邦宣慰司土舍罕拔奏袭封，未及请，缅人诱而杀之。万历十二年(1584)官兵在姚关击败缅兵之后，立罕拔之子罕钦。罕钦死，其叔罕褴约暹罗发兵进攻缅甸。缅人为此恨之，于万历三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出动大军三十万人，围攻木邦城，罕褴向内地请救兵，兵未至而城陷。缅人立孟密、思礼领其众，木邦遂亡。

李三才请起用被斥诸臣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七月初一日，漕运总督李三才上疏请补大臣、选科道官、起用被废弃诸臣。明神宗不理。李三才疏中关于起用被斥诸臣一节说：被废弃诸臣，只是以议论意见触犯当局，遂永远罢斥不用。他们无逆于皇上，今乃假借主怒之威以禁锢诸臣，又借口逆主之名以掩饰自己的过失。负国负君，莫此为甚。李三才此言，是为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三人而发的。自其疏出，而谈旧相张居正等人时事者，又日不可止。

沈鲤致仕　沈鲤(1531—1615)，字仲化，号龙江，河南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地区)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万历十年(1582)秋，升侍讲学士，再迁礼部右侍郎。万历《大明会典》成，加太子少保。万历十四年上疏请立皇太子。万历，册封恭妃王氏为皇贵妃，神宗俱不允许。万历二十二年起为南京礼部尚书，沈鲤疏辞不就。万历二十九年，命沈鲤为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次年七月始入朝。时沈一贯为内阁首辅，深忌沈鲤刚直有威望。三十二年，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沈鲤遇事秉正不挠，因沈一贯忌之，而志不能尽行。及沈一贯数被劾，称病杜门不出，沈鲤始得在内阁行事，于时弊多有匡正，极言矿税之害，请严惩税监杨荣、梁永、高淮，时论称之。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致仕。沈鲤告老还乡，仍心系国事，极陈时政得失。四十三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师，谥文端。有《亦玉堂稿》、《文雅社约》。

沈一贯致仕　沈一贯(1531—1615)，字肩吾，号龙江，浙江鄞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万历二十二年(1594)，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历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万历二十九年九月，赵志皋死，沈一贯为内阁首辅。不久，进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自沈一贯入内阁，朝政已大非。数年之间，矿税使四出害民，正直之臣多被逮下狱，章奏留中不发，缺官不补，沈一贯多次奏请，神宗多不纳其言。及万历三十一年"妖书"事起，万历三十二年武昌楚王府宗人闹事，万历三十三年大察京朝官，沈一贯不能持正无私，威望日下，论者攻其不已。万历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致仕。沈一贯在位时，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四十三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傅，谥文恭。有《敬事草》、《经史宏辞》、《吴越游稿》、《喙鸣诗文集》等。

刘志迈起事失败　刘志迈，福建漳浦县人，原为军中守备。被罢回家之后，与同里庠生程可兆等人，暗中组织群众千余人，共图起事。万历三十四年

(1606)五月十八日夜，刘志迈带领众人在县城教场祭旗，约定于第二天发动起事。遇大风雨，改为二十五日，并分众各二百人于城内外相互呼应。里人李调梅得知此中消息，密告知县黄应举。同年九月初六日，黄应举经过一番策划调兵，封闭城门，大肆搜捕，程可兆等十余人当即被俘。次日在城外的刘志迈知事已败，逃遁而去。

赵贤逝世 赵贤(1534—1606)，字良弼，号汝泉，河南汝阳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起家户部主事，历顺德、荆州知府。迁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再移抚山东，在此两地竭力征剿农民起义，被称为"边才"，得大学士张居正信任。以办辽王之狱有功，进为南京吏部尚书。张居正死，赵贤被夺官，后复原官致仕。万历三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卒，年七十三。

周世选逝世 周世选(1532—1606)，字文贤，号卫阳，北直隶故城县(今河北故城)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由常州府推官，历礼科给事中，终南京兵部尚书，素以刚正不挠著称于世。三十四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子少保。著有《卫阳集》等书。

云南建水州地震 万历三十四年(1606)十一月初一日申时，云南建水州(今建水)地震。是日下午从四时左右开始，由远而近，声若雷响，城垣庙宇官府及民居相继倒塌，死者数千人。府学、尊经阁、启圣祠、乡贤祠、名宦祠及万历二十七年新建的两舍，俱皆倒塌。临安学宫及公私廨舍，倒坏无数，杏坛亦倒塌。连震数月方止，震中烈度(Io)VⅢ－VX，震级(M)为六点五级。

工部四司钱粮出入数额 万历三十四年(1606)十一月十六日，工部奏：该部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司，每年收入为五十七万七千余两，以入数当出数，每年尚欠银六十二万两。

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 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浙江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从小随祖父、父亲居北京，闻朝廷、家事。中年后，祖父、父亲先后去世，便回南方故里，崇祯十五年(1642)卒。家居时，仿照欧阳修《归田录》，将朝章故事及已之见闻，叙录成篇，名《万历野获编》二十卷、附录十二卷。万历三十四(1606)冬撰成。清钱枋因苦其事多猥杂，难以查考，重新割裂排缵，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补遗"部分系沈德符后人沈振搜辑，原为八卷，后仍按钱枋例排比，成四卷，附于书后。《万历野获编》内容丰富，上自朝廷典章制度，治乱得失，山川风物，乃至文人学士趣事逸闻，均有收录，有一定的史学和文学研究的参考价值。

王元翰痛论时政 万历三十四年(1606)十二月初三日，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上疏极言时政可痛哭者八事：一、阁臣，本为皇上心腹，应经常一起共商大事，可是朱赓入阁已三年，居然未见皇上一次面。二、九卿大臣强半虚位，至有整个衙门全无一人，监司、郡守亦多年无官，或一人而身兼数职，致政务苟且不举。三、两京台省，寥寥几人，官吏迁转无期，威令不行，上下贪玩。四、被废诸臣，沦落山谷，长期不起用。五、九边每年缺饷多达八十余万两，居民冻馁，士卒怨恨，边境之患难以避免。而京师积兵至十余万人，每年费饷二百余万两。大都市井负贩游手好闲，一旦有事，能使谁赴疆场与敌人作战。六、皇上深居九重，徒有空存议论，章奏束之高阁，不纳臣工忠言。七、税使满天下，致百姓怨声震天，众心离叛而皇上犹不知有变。八、皇上郊庙不亲往，朝讲不御，危机四伏，自古至今未有如此而天下无事的。又皇上信宦官，爱宫妾，不近正人端士。皇上何独不顾国家安危！请皇上"亟下哀痛罪已之诏，改弦易辙"。疏送上，神宗无动于衷。

刘天绪起事失败 刘天绪，本河南永城县人，流寓南直隶凤阳府临淮县朱龙桥，信奉无为教，抬集教民千余人，谋划起事，自称为"李王"。万历三十四年(1606)九月，刘天绪造"妖书"一册，声言冬至日"李王"出世。并与众徒购造弓刀器械、勇巾红服。刘天绪复自号为"龙华帝王"，余者各封官爵，约定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长至日乘百官祭陵之机起事。后因其众陈继学等人惧怕事发祸及，先期告变，南京兵部尚书孙鑛，于十二月十八日发兵捕获四十九人，磔刘天绪，斩一人，余发配充军。

李成梁弃辽东六堡 辽东六堡自万历三年建成之后，发展迅速，人口日繁，有居民六千四百户。万历三十四年(1606)十二月，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借口六堡孤悬难守，遂与总督蹇达、巡抚赵楫建议放弃该地，将堡内的居民全部迁到内地。凡留恋家室，不愿迁徙者，即动军队用武力强迫他们迁居，造成死亡者不计其数。给事中宋一韩力言"弃地非策"，御史熊廷弼亦持此议，神宗俱不听，而采用李成梁的建议。自是辽东屏障尽被撤除。幸亏李成梁再次镇守辽东时，诸部族的首领人物相继死亡，又开原、广宁之间重开马市和木市，各族人民友好往来，于是有八年时间辽东平静少事。

翁宪祥请补缺官 万历中后期官员升迁改调多积滞无期，大臣多缺不补。抚、按官候代至有十余年不归，部郎则多出差。万历三十五年(1507)正月初七日，吏科右给事中翁宪祥以缺官不补，部郎出差皆有伤国体，上疏说："抚、按官解任，不宜听其去"。又

说："依照祖宗旧制，正郎不奉使。抚、按必俟代。今皆反之，宜申明旧制。"神宗俱不纳其言。

安南莫氏等部侵犯云南 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月，明朝政府授黎惟潭为安南都统使，及黎惟潭死，其子黎维新嗣位，遣使来华进贡，明神宗命授黎维新为安南都统使。而是时在安南已经失去政权的莫氏宗党则多窜处滨海地区，并往往僭称公、侯、伯名号，不断侵犯我国边境，黎维新亦无力制止。万历三十五年二月初五日，安南人武德成又督兵侵犯我国云南，明军总兵官沐叡出师将其击退。其后莫氏宗党仍数来犯，边境之民颇受其害。

增补内阁大臣 自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月沈一贯、沈鲤同时致仕以后，内阁大臣惟朱赓一人。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神宗在廷臣一再的请求下，同意增置内阁大臣。经廷推以前礼部尚书于慎行、礼部侍郎李廷机及南京吏部侍郎叶向高三人，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其中，于慎行去官家居十余年，始起官掌詹事府，于慎行疏辞不就，神宗未置可否。至是因廷推入选内阁，于慎行还是上疏辞谢，神宗不允，始离家赴京服职。

徐学聚致仕 徐学聚，生卒年不详，字敬舆，浙江兰溪县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浮梁县令、右副都御史，终福建巡抚。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致仕。著有《历朝珰鉴》、《明朝典汇》。

湖广浙直等处发生洪水 万历三十五年(1607)六月，湖广黄州府、蕲州、黄冈、黄梅、罗田等处发生洪水，漂没居民无数。武昌、承天、郧阳、岳州、常德诸府，先是大旱，至入夏则连降大雨，毁坏民舍数千家，被灾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同月，南直隶宁国、徽州、太平等府，山洪暴发，繁昌、黟县、南陵等处，淹死男妇无数。是时，浙江严州地区亦是山洪暴发，大为民害。仅建德、桐庐、淳安、遂安、分水等县，即有数千户人家被洪水所淹没。

复河套诸部贡市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中，陕西总督徐三畏奏言：河套部与河东部不同。河东部事统于一，约誓定，历三十年不变。而河套诸部分为四十二枝，各相争雄。尤其是东、西诸部争为监市，与三卫绰哈朋逞威抢掠，已非一日。然而其众号称十万，分为四十二枝，多者不过二三千人，少者则只有一二十人而已。宜分其势，准其纳贡，使先至者获赏，后至者为拒剿，仍须主战以张国威。神宗诏如其请，于同年闰六月二十日，准尽复河套诸部贡市。

京师大雨成灾 自万历三十五年(1607)闰六月开始，京师连日大雨不止，长安街水深五尺。城内各处道路如河，人畜死亡不计其数。至七月，大雨仍不止，沟洫皆壅闭不通，城垣倒塌，民居尽坏。皇木厂，因大水将大木全部漂没。通湾漂溺漕船二十三艘，损失漕粮八千三百六十三石，淹死运军二十六人，沿河两岸民户漂没者无数。七月十五日，神宗命户部发太仓米二十万石平粜，太仆寺发银十万两救济京师受灾居民，并命工部修渠疏通水道。时，礼科右给事中汪若霖就京师二百多年来罕见之水患，上疏说：京师久雨不止，是上天对宫廷和邪臣的报应，今东宫五年不学，诸臣悠悠，莫以为意，大臣私相植党。古人有言："不令不宁，百川沸腾"。今日之事，诚足寒心，不能仅仅斋祷为文而已。户科给事中江灏亦请郊庙、朝御、日讲以及听言、求人、理财六事，以为消灾灭祸之方。神宗皆不理。

郑汝璧逝世 郑汝璧(1546—1607)，字邦章，号昆岩，浙江缙云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户部主事、刑部郎中，因治狱有声，张居正奇其材，调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改吏部郎中。后历太常少卿、福建右参议、广东副使。归家十二年。万历十九年(1591)，起为井陉兵备，不久改为赤城兵备，以战功升榆林中路按察使。万历二十一年，进山东右布政使。再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时河南、山东发生大饥荒，河南至人相食，郑汝璧在山东赈济有方，救治饥民无数。其后被劾回家。二十七年，复起为南京太常少卿。万历三十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三十三年，进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方到任，即患病告归，于万历三十五年七月十七日死于途中，年六十二。有《明帝后纪略》、《明同姓诸王表》、《明功臣封谥考》、《由庚堂集》等。

满朝荐被捕 万历三十五年(1607)正月二十八日，陕西巡按余懋衡疏劾梁永私自运载大宗货物到京畿，且多用民夫马匹。梁永遂大恨，指使其党乐纲收买膳夫，两次下毒，企图害死余懋衡。咸宁知县满朝荐不畏强权，逮捕膳夫，欲置于法。梁永惧祸及已，率其党携兵器冲入县衙，因县中卫兵早有防备，梁永的阴谋没有得逞。时人皆言梁永必反，梁永自称"无反"意，而暗地里养甲士数百人，伺机反抗。咸宁、长安等县亦下令严厉打击梁永一伙，梁永党徒见势不妙，多数已"稍稍叛去"，窜到渭南。满朝荐闻讯，为安良除暴，紧急提兵追击，互有所伤。梁永见状大为恐惧，暗中使人藏奏书于头发里，火速入京诬告满朝荐抢劫上供朝廷货物，且杀死税役数人投尸河中。神宗得疏大怒，不问真假，于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派人赴陕西咸宁逮捕满朝荐。满朝荐被捕至京，下狱拷掠，长期关禁。内外官员皆为满朝荐鸣不平，上疏论救，自大学士朱赓以下多达一百一十疏，神宗俱

不听。满朝荐名闻天下。

郭子章致仕 郭子章(1542—1618),字相奎,号青螺,江西泰和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累官至贵州巡抚。以平播州杨应龙功,加太子少保,进兵部尚书。郭子章一生勤奋好学,于书无所不读,著述甚多,有《平播始末》、《郡县释名》、《豫章诗话》等十余种。万历三十五年(1607)八月初六日致仕。万历四十六年卒,年七十七。

户部历年借支银两额数 万历三十五年(1607)八月十二日,太仆寺少卿奏言:臣查嘉、隆间,旧库积银至一千余万两。至万历十八年西征宁夏哱拜借一百六下万两,赴朝鲜东征日本借银五百六十余万两。二十七年,为边饷借银五十万两,征讨播州杨应龙借银三十三万两。三十一年,又为边饷动支老库二十一万两、马价银三十万两。三十二年,以边饷不足借一百万两。前后所借达九百八十三万两(注:依此计应为九百五十四余万两)。另外,万历二十九年工部以皇长子大婚及册封诸皇子,借银三十五万两。万历三十一年,光禄寺以年例借银三十九万两。今老库见存者仅二十七万两而已。东西二库每年所解仅可供各边年例之用。东那西借,非计臣理财之长策。

宋一韩谏言除旧布新 万历三十五年(1607)八月十八日,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因彗星出上疏言:彗星,扫除之象,刑人之职,小人用之以扫除为职,君子用之以除旧布新。今税监梁永播虐于陕西,李凤苛征于广东,潘相作恶于江西,高淮贪残于辽东,马堂横行于河道。张烨、胡滨、杜茂、鲁保、沈永寿、丘乘云之辈亦多害民如故。陛下宜因星变,尽撤税监,除旧布新,勤政讲学,亲贤远奸,复三朝之制,补九卿缺官,平民怨,信诏令,开言路,发章奏,慎用人,惩贪将,动用内府之积,杜绝借支太仆寺银,省大官俸禄,减少织造,释放囚犯,苏都城民困。然其疏呈上,而神宗留中不发。

姜士昌请辨贤奸 万历三十五年(1607)八月二十九日,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姜士昌入京奏言:皇上准大学士沈一贯与沈鲤同时去政,舆论对沈一贯之去无不拍手称快,而对沈鲤之去则以为十分惋惜。然而,廷臣竟无一人以沈鲤之贤和沈一贯之奸为皇上正言辨白,臣对此深感痛心。沈一贯入内阁,本为王锡爵所推荐。今沈一贯去,而复召王锡爵为内阁首辅,实际上无异于沈一费未去。王锡爵虽有名气,非沈一贯所可比,但他器量偏狭,嫉善如仇。又说:古今称廉相者,唐代杨绾、杜黄裳,此二人皆推贤好士,惟恐不及。宋代王安石固有清名,然其好用学术,罢斥诸贤,致以祸宋。为辅臣者,不可不鉴于此!由于姜士昌此疏,不仅指斥沈一贯、朱赓、王锡爵为遗奸,而且有意讥讽李廷机。于是李廷机、朱赓相继上疏奏辨,指责姜士昌,以激起神宗大怒,不顾廷臣论救,将姜士昌贬为兴安县典史。姜士昌勤奋好学,素以名节自励,守正无私,恨时事之败坏,屡次不顾个人安危上疏请明神宗以国家为重,勤政爱民。此次竟以一言不合而被贬终身。

臧惟一逝世 臧惟一(?—1607),字守中,山东诸城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宿松、太湖知县、户、吏二部主事。后历太常少卿、大理、太仆、光禄寺卿、河南巡抚。万历二十七年(1599),进南京兵部右侍郎,治战舰、核军籍,秉公执法。三十四年以病致仕,次年九月初六日卒。臧惟一刚直无私,居官有大体,在家有德于乡民。死后士民共立碑颂其功。

运司盐课欠额 万历三十五年(1607)十月初一日,户部说:运司盐课,自万历三十四年夏至三十五年春,两淮课额欠至一百余万两,长芦欠至十八万两,山东欠七万余两。玩延如此,边饷岂能不乏。宜遣官守之,严为责成。如有玩忽,即行参处。神宗可其奏。

光禄寺请裁革额外浮费 万历三十五年(1607)十月初十日,光禄寺奏言:寺额办银二十四万两,祖宗时非多,皇上时非乏。万历四年以前,每年所费只十二万两。五、六年渐增二万两。七、八年又增二万两。今至二十四万两或二十五万两,国库岂能不匮。万历二十五年以前,每年收米三万三千四百余石,尽改为折色,今年倍增二万余石,仓库岂能不匮。臣请无名之供养,内外臣工之酒饭,御前之取讨,新添丧礼之糜费,当于裁革。

于慎行逝世 于慎行(1545—1607),字可远,更字无垢,山东东阿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万历二年(1574),进修撰,充日讲官。万历四年,升侍讲。历任侍讲学士、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于慎行明习典制,诸大礼多所裁定。万历十八年正月,上疏请早立皇太子。至冬,又请。神宗大怒,下旨严厉切责。于慎行不屈不挠,再次疏请。神宗责其"淆乱国本",于慎行遂请退休,自是家居十余年。万历三十五年五月,廷推为阁臣,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时于慎行已病魔缠身,同年十一月入京后即请假养病,归卧于家,草遗疏请"亲大臣、录遗逸、补言官"。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卒,年六十三,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慎行为人深沉劲拔,不趋炎附势。学问渊博,贯穿百家,文学为一时之冠,有《谷城山馆诗文集》、《谷山笔麈》等书行世。

徐光启译《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一书，是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公元前330～公元前270年)用希腊文写成的一部数学教科书，名《欧几里得原本》，被公认为西方数学名著。全书计十三卷，前六卷为平面几何学，中四卷为数论，后三卷为主体几何学。出版之后曾被译成阿拉伯文、拉丁文等多种文本。徐光启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天开始，即与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此书。经三易其稿，历时年余，完成了前六卷，并付印出版。后又几次进行修改。清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徐光启的翻译，“字字精美金玉，是千古不朽之作”。徐光启译此论著，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几何学”的本质及其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指出：“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几何”二字，为徐光启所创，成为我国数学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以及点、线，面、平行线、斜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等等概念，都是经过徐光启使用之后，而确定下来的。《几何原本》，是第一部用中文译成的西方数学名著，在十七世纪初期至十九世纪中期的两个多世纪里，这部译著一直是中国人学习数学的启蒙读本，在沟通中西方科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江南大水 万历三十六年(1608)正月，江南淫雨连绵，江湖泛涨。自南京至苏、松、常、镇诸府皆被淹，圩岸溃决，庐舍倾颓，暴骨漂浮。城都宫阙监局昔在高燥之地，今荡为水乡，街衢市肆尽成长河，舟航行于陆地，鱼鳖游于人家。是二百年来未有之灾。

蹇达请早备战守 万历三十六年(1608)二月二十六日，蓟辽总督蹇达上疏说：建州努尔哈赤日渐骄横，辽东隐忧可虑，请早议战守事宜。时蒙古喀尔喀诸部悉已为努尔哈赤所统一。廷臣为此亦纷纷疏请速罢矿税，以安人心，以固边防。神宗先是不加理采，将蹇达的奏疏转给兵部，后始下令整饬边备。

李庭机疏论时政 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二十日，大学士李廷机言：自臣受事以来，饥馑日趋严重，云南、两广之寇敢于横行，辽东建州努尔哈赤渐骄，皆深可忧虑。每见参劾将领之章奏，多是尅饷剥军，没有人与士卒同甘苦。兵弱饷急，太仓久空，太仆亦空，内库难捐，税使难撤，部、院缺官，科、道积滞，人心日以涣散，政事日以废弛，盐法积弊不可禁除，京商苦累莫为计议。至于工作之虚糜，官吏之贪墨，刑狱之淹抑，风俗这奢靡，民间之愁怨，天下事尚有不能尽言者。臣论义则不可当止，论力则不能当正，请赐罢归。神宗览疏，优旨慰留，而对于政事则不置可否。

李成梁致仕 李成梁(1526—1615)，字汝契，祖籍朝鲜，自高祖李英移居中国，为军人世家。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因家贫，四十岁仍为诸生，后袭职辽东铁岭卫指挥佥事，进辽东险山参将。隆庆元年(1567)，以支援永平有功，进副总兵。四年秋，升为辽东总兵官。万历初年，进左都督。三年(1575)加太子太保。六年，论功封为宁远伯。其后，又屡以战功，加太傅。镇守辽东二十年，先后奏大捷十次，得赏银财物无数。其弟李成材，其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李如梓、李如梧、李如桂、李如楠，俱为将帅。自明朝建国二百年来，边帅武功之盛未有如李成梁者。其始师出必捷，威振塞外。后来声名愈高，“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资、马价、盐课、市赏，岁乾没无计，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已。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甚至连其奴仆家丁亦无不荣显。李成梁长期在塞外作战，其所奏战功多有不实。“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万历三十四年，李成梁放弃辽东六堡，为言官论劾，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十九日致仕。四十三年卒，年九十。

锦州、松山军变 太监高淮征税辽东，其党横行，激起民变，高淮遂诬逮诸生数十人，为巡按所劾，明神宗置之不问。万历三十一年(1603)，高淮率家丁三百余人，声言将入京见神宗，潜驻广渠门外。给事中田大益等言：“高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数十万，招纳诸亡命降人，意欲何为!”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亦皆上疏劾“高淮擅离信地辽东，挟兵潜往京师，此为数百年来未有之事。”御史袁九皋等人也分别弹劾高淮。神宗不听。巡抚赵楫劾高淮“罪恶万端，且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神宗还是不听。于是，高淮上疏自称镇守，协同关务，兵部奏其狂妄，神宗心护高淮，说：“朕固命之矣”。高淮自恃无恐，此后进一步招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向朝鲜索取冠珠、貂马，且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害。高淮又时时尅扣军士月粮。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前屯卫军千余人遂发生哗变，“誓食高淮之肉”。同年六月，锦州、松山两军复变，高淮大惧，奔入关内，诬告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杀朝廷命官，劫夺上供钱粮。神宗命逮问王邦才、李获阳，边民遂大哗。蓟辽总督蹇达再疏揭高淮罪状，神宗始命高淮回京，而以通湾税监张晔，兼领其事。

陈用宾、沐叡下狱论死 先是，官军平武定(今云南武定)，改设流官。土司凤继祖之孙阿克迁居金沙江，有马头郑举等四十八人。郑举性慓悍有力，且富于财。武定知府陈典贪恋钱财，借事拘禁郑举，

郑举贿赂之，获免。不久，陈典又将郑举拘禁，郑举再行贿赂，如是者四次。郑举遂恨陈典贪得无厌，诱使阿克作乱，并暗中勾结会川诸蛮，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十二月攻陷武定、嵩明、禄丰，杀死知县苏梦旸等一大批地方官吏。立阿克为知府。万历三十六年八月初九日，以失武定罪，逮捕云南巡抚陈用宾、总兵官沐叡至北京，俱下狱论死。明人谢肇淛评论说：陈用宾在云南十六年，最急于防西事，建开堡，营屯田，用暹罗以分缅甸势力，使腾冲诸处二十年平安无事，切与罪实为相当。因阿克之叛，仓皇失措，遂至身败名裂，可悲可痛。

萧大亨致仕 萧大亨(1532—1612)，字夏卿，号岳峰，山东泰安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5)进士，历榆次县令、户部主事、郎中，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有守边功，转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府、大同，累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一月十七日致仕。万历四十年卒，年八十一。有《两镇奏议》、《藩封纪略》、《夷俗记》。

朱赓逝世 朱赓(1535—1608)，字少钦，号金庭，浙江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万历中，累官至礼部尚书。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大学士。上疏极论矿税之害。时大学士沈一贯欲借"妖书"事件兴大狱，朱赓在家致书沈一贯，请速结案无株连，事乃得解。万历三十三年大计京官，朱赓力言大臣去国必采公论，不可于劾疏定去留。次年七月，沈一贯、沈鲤同时致仕，朱赓为内阁首辅，时年七十二。时朝政日弛，内外解体，朱赓一再上疏请神宗更行新政，于增阁臣、补大僚、开三路三事尤切，皆不得实行。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官，年七十四。赠太保，谥文懿。有《朱文懿奏疏》。

朵颜进犯蓟州 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二月朵颜入犯蓟州，大肆劫掠，参将马栋不能抗御。时援兵所至，居民望见火光，惊为敌至，纷纷逃入京城，每日多达数万人，九门尽闭，京师戒严。兵部尚书李化龙请以银三十万两补蓟镇缺饷，并修军械器具。户部以国库告乏，请暂借内库矿税银，定期补还。神宗不许借用内库银，而命发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户部银十万两，军心稍定。朵颜见明军有备始退去。

言官相互攻讦 工科给事中王元翰居谏官四年，力持清议。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素与王元翰不和。万历三十七年(1609)二月十四日，他指使其门人、云南道御史郑继芳劾王元翰"盗窃巡厂库银无数，炙剥商人，贪赃数十万"。王元翰亦上疏诬诋郑继芳，二人相互攻讦不已。大学士叶向高为此忧虑不安，请神宗发言官章奏，以便部、院大臣评其是非曲直，扶正去邪，以警其余。神宗厌恶言官互相攻击，章奏悉留中不发。郑继芳未得神宗诏令；即遣人围守王元翰家。王元翰愤甚，将衣物图书掷于都门，上疏痛哭离开京城。吏部竟以"擅离职守"罪，将王元翰贬官。自是树党相攻者不已。

杨时乔逝世 杨时乔(1531—1609)，字宜迁，号止庵，江西上饶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工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南京尚宝司丞、南京太仆寺丞、南京尚宝司卿、南京太常寺卿及通政使。遇事敢言，数陈时政得失，切中要害，中外为之传诵。万历三十一年(1603)冬，升为吏部左侍郎。时大计京朝官，杨时乔与都御史温纯力去阁臣所用私人、遭到大学士沈一贯的攻击，神宗亦责其借机"报复"。但不问其罪。杨时乔仍尽心用事，一再请补缺官和起用被废诸臣。是时，吏部缺尚书，神宗命杨时乔掌吏部，又久不置右侍郎。杨时乔一人独理部事五年，持事公允无私，为官刚正清廉，绝请托，拒贿赂，谢交游，住公房。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卒于官，年七十九。赠吏部尚书，谥端洁。有《周易古今文全书》、《杨端洁集》、《马政记》。

杨道宾逝世 杨道宾(1552—1609)，字惟彦，号荆岩，福建晋江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第二，历任编修、国子监祭酒、少詹事、礼部右侍郎兼掌翰林院事。后改为礼部左侍郎，署部事。杨道宾为人端正，明习典章，遇事敢争，屡次上疏请急罢矿税，释放被害官员，以和民心。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卒，年五十八，赠礼部尚书，谥文恪。有《杨文恪公集》。

吏礼二部长贰空无一人 万历三十六年(1608)九月起孙丕扬为吏部尚书，至三十七年二月初尚未抵京；礼部亦缺尚书，于是以吏部侍郎扬时乔和礼部侍郎杨道宾分别署本部尚书。不料，继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杨时乔去世之后，十九日杨道宾又病故，吏、礼二部长、贰遂无一人，乃以礼部侍郎吴道南署本部尚书。

陶望龄逝世 陶望龄(1562—1609)，字周望，号石篑，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三，授编修，历官国子监祭酒。为人正派，乡戚沈一贯、朱赓居内阁，陶望龄从不攀附。在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的"妖书"事件中，沈一贯妄图借机陷害侍郎郭正域，陶望龄力为解。其学笃嗜王守仁"心学"说，与弟陶奭龄皆以讲学闻名于世。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谥文简。有

《水天阁集》等。

河套部拱莬进犯辽东大胜堡 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二月，朵颜进犯蓟州，而河套部拱莬无故为明军杀死百余人。拱莬怀恨，伺机复仇，万历三十七年三月初十日遂率众五千余人进入辽东大胜堡(今辽宁锦县西北)，明军游击于守志出兵抗击、失败。拱莬俘获守将耿尚文，将其五体分尸，且在大胜堡大肆杀掠。然后深入小凌河22里地。是时辽东总兵官杜松驻大凌河，不敢往救，明军大败。

曹时聘逝世 曹时聘(1548—1609)，字希尹，号嗣山，北直隶获鹿(今河北获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南京户部主事、户部郎中、临洮知府，被劾归家。复起为平凉推官，迁湖广按察使、布政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万历三十三年(1605)，进工部侍郎，总督河道，大力修浚朱旺口，使河水归故道，有利于漕运畅通。万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二。

赵参鲁逝世 赵参鲁(？—1609)，字宗传，号心堂，浙江鄞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上疏建言，被贬为高安曲史，迁饶州府推官，两度督福建学政，再历南京太常寺卿。万历十七年(1589)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严海禁、杀商人交通倭寇。后任大理寺卿、刑、兵、吏三部左侍郎。日本封贡议起，赵参鲁力持不可，著《东封三议》，详述封贡之弊。仕终南京刑部尚书。赵参鲁遇事敢争，议论深切，为政忠直无私，累加太子太保，致仕归。万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八卒，赠少保，谥端简。

李化龙疏陈边务 万历三十七年(1609)四月初八日，兵部尚书李化龙奏救辽三事：一、辽东自税监高淮肆虐以来，十室九空，人民痛心饮血。今税使虽撤，而税额不减，仍为三万六千两，民困不堪。宜速停止征收，以急救人心方将叛。二、急助兵饷，以补军中衣械之不足。三、辽东故无塞，四面皆敌，宜急议战守之略。神宗说：辽东孤悬，三面邻敌，民困军疲，准发银二十万两饷将士。九月二十五日又奏屯田十二事，主张先由辽东开始整顿，然后推及各边。整顿的具体办法为：一、定地亩。凡可屯种之地，酌量顷亩，划定段落经界，略仿鱼鳞图册，依军民之别，按量分给。二、核军数，从辽东八万名士兵中，以十之二三，上征调，次守城，下屯种。三、给牛种。以军人应支粮银预给半载，令自置买耕牛，待三年后起科。四、广招募。土著、南方士兵均可。五、薄征敛。以所给田分三则，上则如法征粮，中则减十之二，下则听自便，永不起科。六、置屯堡。约以二三十里间置一堡，使附近民户聚处一城。七、议修防。辽故无塞，议今年修筑河西，明年修筑河东，所费约银六万两，共筑城墙一千四百里。八、纳折色。九、置常平仓。十、核养廉银，以在官粮二十之一为将官养廉之资。十一，专责成，督、抚、按、道各按其成绩决定其升、黜。十二、慎减饷。户部岁给额饷必须如数如期，三年以后再视情增减。

赵耀逝世 赵耀(？—1609)，号见田，山东掖县人。隆庆五年(1591)进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按陕西、江西，以言事逆大学士张居正，被降贬。后起为卫辉府推官，迁兵部郎中，视学河南，巡抚辽东，有边功，为兵部尚书石星所忌，遂请归。再起巡抚保定。赵耀为人正直，屡次上疏触逆当局，故不能尽其才，士论惜之。万历三十七年(1609)四月十六日卒，赠右副都御史。

福建发生特大洪水 万历三十七年(1609)五月，福建各地连降大雨，山洪爆发。其中，建宁等府居民死者近十万人。

请补南京缺官 万历三十七年(1609)六月初二日，南京礼科给事中晏文辉说：留都卿、贰久缺，废政莫甚于此，乞速赐点补。时南京九衙门仅有五人在职，即吏部侍郎赵士登、户部侍郎赵钦汤、兵部侍郎张鸣冈、都察院佥都御史丁宾、通政使王国，余咸空署无人。

熊尚文请禁吏生 万历三十七年(1609)六月初四日，福建学臣熊尚文疏言学政，请禁吏生，以杜倖进。说：汉之人才，出于吏。唐宋昭代之才，出于儒。吏生之设，各省皆无。三品以上京堂考满，方有官生。覃恩，始有恩生。而为吏者，即有吏生，何其无章。以后吏生、乐生、谞生之名，皆不许巧立生端。

陕西红崖堡、清水堡地震 万历三十七年(1609)六月十二日夜子时，陕西酒泉(今甘肃)东南的红崖堡、清水堡一带地震最重，军民被压死者八百四十余人，边墩摇损达八百七十余里，城垣衙舍塌毁无数。东关地裂，南山一带崩。酒泉以北百里的讨来等河，绝流数日。肃州卫地区是夜大风突起，地大震，所坏城垣墙室庙宇，压死之人难以尽述。高台所一带摇墙撼壁，簸荡及边城。震后人生斑疹。以后连续七、八年，每年都地震一、二次。一直到四十五年才止。此次地震最远破坏距离约三百二十KM，最远有感距离约五百六十KM。震中烈度(Io)X，震级(M)为七点二五级。

熊廷弼奏辽东屯田 万历三十七年(1609)九月，神宗命整顿各处屯田。同月初八日，辽东巡按御史熊廷弼奏：辽地可耕，辽兵八万人，若以十分之三屯种，每年可得粮食一百二十万石，省年例银不下二三十万两。并说：军屯宜广给薄科，以为鼓励；民耕宜

轻税置堡,以为民便;官垦宜议升议参,以为奖惩。

詹沂封印自归 詹沂,生卒不详,字浴之,号鲁泉,宣城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由福建知县擢给事中。时张居正夺情之议地,省垣希旨乞留,詹沂独不署名。出任山东按察副使。后累迁太常寺卿、左副都御使,都察院长官缺,奉命署院事。万历三十七年(1609)九月,累章乞休,出城候旨,不待批准,即封印自去。万历四十六年九月予祭葬,次年赠左都御史。

孙鑛致仕 孙鑛(1542—1613),字文融,号月峰,浙江余姚县人。万历二年(1574)会试第一,历吏部郎中,升兵部侍郎,加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是时矿使四出,奸人竞言矿利,鼓噪倡乱,孙鑛请重治。万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致仕,万历四十一年卒,年七十二。有《孙月峰评经》、《孙月峰全集》等。

杨时宁逝世 杨时宁(1537—1609),字子安,号小林,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官曲沃县令、吏部主事、两淮盐运司通判、太仆寺丞。后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宁夏,以战功进右副都御史。终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太子太傅、兵部尚书。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一月初四日死於家,年七十三。赠太保。

李汶逝世 李汶(1536—1609),字宗齐,号次溪,北直隶任丘(今河北任丘)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历工部主事、河南、云南提学副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每年节省经费十余万两。进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终兵部尚书。以功累加少傅。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一月十八日死于官,年七十四,赠太傅。

赵世卿奏报各省钱粮拖欠 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一月二十八日,户部尚书赵世卿言:本年各直省所解共仅银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两,请严限于三月以内尽数完解。神宗说该部钱粮拖欠数多,万分难处,各抚、按须加紧催解。如仍前延缓,准户科分别情况,参奏处治。

徐州民人起事 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二月初五日,徐州吴家庄民人起事,杀死如皋知县张藩。漕运总督李三才奏报知州刘民爱、指挥王正国等失事,并说:因各处饥荒,故流民日众,且千百成群,在在行劫。非速免租,进行救济,安抚人民,后果将不堪设想。

日本人侵琉球 琉球为明朝属国。琉球国王尚永死,其子尚宁遣人请袭封。福建巡抚许孚远请按照嘉靖间郑晓领封之例,遣官一员带皇帝诏书至福建,由琉球国使臣面领归国,或者派遣一位习海的武官与其使臣一同前往。神宗表示同意。后因日本侵略朝鲜,海上多事,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始遣给事中夏子阳等册封,仍令琉球领封海上,永为定制。二年后始完事。是时日本正逐渐发展壮大,有吞灭琉球的野心,而琉球国外御强邻,内则修贡不绝,人少力薄。万历三十七年,日本悍然派兵三千人进攻琉球,俘获琉球国中山王尚宁,迁其宗器,大掠而去。浙江总兵官杨宗业奏报,神宗令镇、巡官严饬海上兵备。

田艺蘅撰《留青日札》 《留青日札》残存三十九卷,田艺蘅撰。万历三十七年(1607)重刊本,残存三十九卷。记述了明代社会风俗、艺林掌故、天文历法、政治经济、冠服饮食。也有对社戏、腰鼓音乐的描绘,有对农民困苦生活的述说,也记录着沈万三、刘瑾、钱宁、江宁、严嵩等豪富、宦官与大官僚等被查抄家产时名色与数目。本书到底何时首次刊行、有多少卷数,倘须探求,但是,现存三十九卷仍是非常难得的资料。

叶向高疏言时务大要 万历三十八年(1610)正月二十八日,辅臣叶向高疏陈时弊,其大端有二:一、时政雍塞。如大僚不补,迁转无期,章奏留中不发,州县官选补积滞等。二、议论滋多。如互相告讦,立门户树党纷争,颠倒是非、不辨黑白。神宗见疏不理。闰三月初三日,叶向高又言:今除水旱灾伤、外患困扰、盗贼横行外,致天下必危必乱之事主要有五端:一承平日久,不知忧隐。二上下融绝,君臣不通。三士大夫好胜喜争,相互攻讦之风日盛。四从上到下,多厚私积,致国家财力告乏,入不敷出。五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不可挽回。神宗仍置之不理。

礼部极论政务弛废 万历三十八年(1610)闰三月二十六日,礼部因京师旱灾,上疏说:今日旱灾皆政务废弛所致。天下人情,莫郁于此时,郁气浮发,必结为灾。试举数端以言之。皇太子,为国家之本,今不令他与诸臣接触,讲明经术,练习世务,而久置之深宫,使耳目俱塞。大臣为国家栋梁,今缺大半;按臣为朝廷考察官吏安抚百姓,今久请不下,甚至刑部衙门无人决狱,小民控诉无路,怨声满狱。内府堆积如山,而民间颗粒不充,父卖子,夫卖妻,惨不忍闻,而坐视其死亡。被逮诸臣,如陕西咸宁知县满朝荐以及武昌府同知卞孔时,皆为一进循吏,为皇上爱养百姓之人,竟以税监罗织罪状而禁锢多年,见天无日。又以前被罢斥诸臣,吏部不断上疏请予起用,而点用者百不得一,登进无期,正气塞结。四海之内皆郁积,以故结成旱灾。若皇上一举新政,则甘霖遍天下,旱象立除。疏呈上,神宗置若罔闻。

正阳门箭楼发生火灾 万历三十八年(1610)四月初二日夜，北京正阳门箭楼发生火灾，至次日辰刻未熄。初六日，刑科右给事中周曰庠为此上疏说：火，积阴所生。阳足制阴，则火安其性，不致妄动。阴或胜阳，则火失其性，不免横发。古人说，道不正，弃贤养奸，官非其人，不讲法律，皆必起火。求之今日，正与相同。正阳门楼与正殿相对，坐子面午，义取当阳，正南面以临天下。自万历二十年以来，皇上深居大内，讲学无期，临朝无日，大小臣工不能见，朝夕左右，不过宦侍之流。精明强毅之心，日敛月消，人才邪正，政事得失，皆置之度外。以前宫殿起火，业已示警，至今十余年玩延如初。所谓"恭己正南面"者，杳无时日，则何取于正阳之名！以故天以火烧正阳门，实在是顾名思义。皇上若锐意振刷，勤政务，信百官，亲百姓，则天下事尚可为。周曰庠之疏呈上，神宗不听。

赵钦汤致仕 赵钦汤(1536—1614)，字师商，号心盘，山西解州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掖县知县、户部主事，终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万历三十八年(1610)四月初九日致仕。赵钦汤为官四十余年，所至政绩显著，于总督粮储尤为突出。成历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赠户部尚书。有《关公祠志》。

王汝训逝世 王汝训(1551—1610)，字古师，号泓阳，山东聊城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元城知县。万历初，历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光禄少卿。后调为太常少卿，转太仆卿、光禄卿。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左佥都御史，升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力锄豪右，被革职为民。家居十五年，起为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工部左侍郎，署部事，力清宿弊，节省冗费数万。王汝训性清介，疾恶好贤，仕宦四十年，直道敢言，为官廉洁。万历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官，年六十，赠工部尚书，谥恭介。

苏禄国王后裔请复原定额粮 先是，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王巴都噶叭嗒剌率领妻子来华，回国途中病死于山东德州。明成祖赐祭葬，并命长子都麻答回国，而留妃葛本宁、次子安都禄等人以及陪臣在德州守墓，每年从德州仓支给米七十五石、布、钞若干，所生子女每月给粮一石，俱免徭役。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德州管仓主事张世才虑其人口日繁难继，奏革去原赐米六十六石，只留九石。万历三十八年七月初八日，苏禄国王恭定东王五代孙安守孙等奏：人口渐多，而赐粮减少，不敷食用，请复原额七十五石。神宗不理。

马鸣銮逝世 马鸣銮(1548—1610)，字君御，号凤麓，四川内江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工部主事，官至总督宣、大军务、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其间，曾镇守宁夏，征哱拜，多有战绩。万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于官，年六十三，赠兵部尚书。有《凤麓稿》等著作。

马从龙请停苏杭织造 先是，内织染局佥书杨进奏织上用龙袍等四万套。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初六日，工科给事中马化龙为此上疏说：国家设南北织染局、南京机房，又有各省直岁造，原足供用，未有派及苏杭者。后因急缺，偶而派及，皇上即位之初即行停止，撤回太监，甚得民心。万历四年，以皇上大婚需用复派一次。至万历九年，不知何故，又派十五万套，匹繁苦极。至万历二十七年前数将完，又派四万一千九百余匹。成历三十二年，再传补二千六千余匹。今东南之民日夜希望撤回织造太监，而该局又有织造龙袍四万套之请。龙袍一套可抵中人一家之产。此外又有额外改造、传派等等，头绪多端，所费不知几万。此项钱粮，原无额设，先年搜括库藏，扣留工料匠价，留事例，留解部半税银，借船料。原议户部出十分之四，工部出十分之六。工料匠价税银，皆营建宫殿所需，不当夺之。户部事例等银，皆为接济军国之需，九边催饷急如星火。织造每二三年即费银百万两，以十分之四计，即损失边饷四十万两。皇上四时服御无几，何必连年解进。收贮甚多，在皇上积之为无用，在地方输纳为甚难，损害民间已难堪，损害边饷则尤为叵测，何乐于为此。请立即停止浙直织务。马从龙之疏呈上，神宗不听。其后，工部右侍郎刘元霖、大学士叶向高相继疏请停止、减额，神宗才同意从新派四万疋中减去三分之一，其余并以前旧欠者，均须陆续解进，不得违误。

詹仰庇逝世 詹仰庇(？—1610)，字汝钦，号咫亭，福建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授南海知县，升御史。隆庆二年(1568)上疏极论内监横索滥征，被廷杖一百，革职为民。万历六年(1578)复故官，升广东参议。不久，请休家居十余年。再起为江西参议，迁南京太仆少卿。召入为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詹仰庇起初以直节闻名，刚而不屈。累官至刑部右侍郎，以病致仕。万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日早卒。赠刑部尚书。有《咫亭文集》。

陈子贞奏陈海防事宜 福建巡抚陈子贞条议海防数事，有：一、重海道事权，以资弹压。二、裁减冗兵，以熟操驾。三、核虚冒名粮，以厘宿弊。四、清侵占屯田，以复旧制。五、禁住倭大船，以绝勾引。六、公出海利泽，以安内地。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月十五日，兵部就此进行复议，并经神宗批准，依议执行。

严禁私钱　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月二十四日,工部署部事右侍郎刘元霖以私铸公行,钱法渐坏,疏请严禁私铸。实行连坐之法,依律究治,并将此项列入各官考课之内。神宗见疏下旨说:钱法关系国计,若私铸纵横,为害不小,依议严行禁辑,且作为各官考核项目之一,不得违玩。

西洋历法始入中国　先是,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入京进贡方物。接着,传教士庞迪峨、熊三拔、邓玉函、汤若望等亦先后至京,他们都精究天文历法。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初一日发生日食,礼部钦天监所推算的日食起止分秒以及亏圆俱不准确。礼部官因此博求知历学者,令与钦天监官昼夜推测,以期历法准确不差。于是五官正周子愚上疏说:来华传教士庞迪峨、熊三拔等人,所带来的他们国家的历法,多为中国典籍所未备者。请按照洪武中翻译《西域历法》之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如数翻译,以补我国典籍之缺。礼部遂奏言:我国精通历法的,如职方郎中范守己、陕西按察使邢云路,著有《古今律历考》,综采详密,为时所称,请改授京官,共理历事。又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历理,可与庞迪峨、熊三拔等人同译西洋历法,供邢云路等人参订修改。然而,历法疏密,莫过于交食,欲议修历,必重测验,请命所司修治仪器,以便从事。神宗先是将礼部的这份奏疏留中不发,不久即命召邢云路、李之藻至北京,参与历事。邢云路据其所学,李之藻则以西法为宗。西洋历法始入中国。

《金瓶梅》问世　长篇小说《金瓶梅》,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问世。全书计一百回,作者署名兰陵(今山东峄县)笑笑生。该书自刊刻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有些人认为是一部专门赤裸裸描写男女两性关系的庸俗作品,列为禁书。其实,它不仅仅是一部言情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对研究晚明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商业史,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小说。

袁宏道逝世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县(今湖北公安)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吴县知县、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礼部主事、吏部主事、员外郎。曾上疏请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外官三年一考察,京官六年,武官五年。得明神宗允准,遂为定制。后因病去政,归家数月死,年四十三。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公安三袁"。亦为晚明文坛上的一个重要学派。袁宏道有《袁中郎集》、《潇碧堂集》诸书存世。

齐、楚、浙三党攻击"东林"　自嘉、隆以来,随着政局的败坏,廷臣树党相攻之势日形严重。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二月,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革职为民,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之后,由于遥相应和者甚多,东林之名大著,人称"东林党",而与此同时,妒忌东林党人者亦日众。于是形成上下呼应,在上廷臣结成朋党交攻由此日盛。其时国子监祭酒、宣城人汤宾尹与谕德、埈山人顾天昆,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人们称之为"宣昆党"。另一方面,自从神宗不理朝政,内外章奏悉留中不发以来,只要言路一攻,则其人自去,以故台谏之势积重难返。台谏之中有齐、楚、浙三党:齐党以亓诗教、周永春、韩浚、张延登为首,燕人赵兴邦等附之;楚党以官应震、吴亮嗣、田生金为首,蜀人田一中、徐绍吉等附之;浙党以姚宗文、刘廷元为首,商周祚、毛一鹭、过庭训等附之。齐、楚、浙三党与"宣昆党"声势相倚,并以攻击东林、排除异己为事,创"大东、小东"之说,目东宫(皇太子)为"大东",东林为"小东"。一人稍有异议,即群起攻而逐之,大僚非其党不得安于其位,天下称他们为"当关虎豹"。万历三十八年,侍郎王图主持会试,汤宾尹以庶子为分校官。举人韩敬,曾受业汤宾尹。会试时,韩敬的试卷为其他考官所弃,汤宾尹越房搜得此卷,与各房互换闱卷凡十八人,强迫王图录取韩敬为进士第一。时知贡举侍郎吴道南欲上疏弹劾,事未成。汤宾尹为祭酒,王图掌翰林院,地位在汤之上,次年京察遂将汤宾尹等人降黜。

河间民众起事　万历三十九年(1611)正月初一日,巡按直隶御史乔允升奏称:河间地方民众聚集至八千余人,已经起事逼近京师附近,宜早作防备。神宗命兵部立即派兵,在京城内外严行缉捕。

孙玮请杜绝借留钱粮　万历三十九年(1611)正月初五日,署户部右都御史孙玮奏称:国家钱粮只有此数,财用之分属各有职事。近年屡奉诏旨,部积空虚,支放不继,不得随便奏请借留,以亏根本。无奈人情玩愒,无视法纪,视边用如儿戏,不尊重本部职事,不奏不问,数行挪借,即使明旨严禁,亦置若罔闻。臣前次上疏所奏,出入共欠银八百九十五万余两,今虽陆续收解,然十不足一。东西两面之患,殊可忧虑,九边数百万虎狼汹汹不保,实可寒心。除臣部行文各地严催前借钱粮作速补解之外,望皇上下旨令一切京边钱粮随征随解,分文不停,抚按不得请留用,有司不得挪借,则国计甚幸。

严禁宗室横行不法　万历三十九年(1611)正月十六日,河南巡抚曾用升奏:宗室横肆,防禁宜先。一、严禁宗室窝藏盗贼。二、严禁宗室抢夺。三、严禁郡王出城。四、严禁宗室出城。五、严禁宗室把持商

税。六、严禁无禄宗室打死人。七、严禁宗室开张赌场。八、庶宗训责当申。九、王官辅宗当选。一一束以法纪。否则，万一狂宗姑恶不悛，百姓挺而走险，为虎添翼；亡命之徒，为纣助虐，天下危亡之忧恐不可免。

李三才罢官 李三才(？—1623)，字通甫，北直隶道州(今北京通县)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万历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是时，矿税使四出，甚为民害。李三才抚淮十三年，即以坚决反对开矿|榷税而得民心。上疏请速罢矿税，尖锐批评神宗溺志货财，同时力裁山东税监陈增及其爪牙程守训，进为户部尚书。李三才虽然才大有重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结交遍天下。但由于他居官不能守廉，颇通贿赂，用钱无度。当时朋党势成，他与东林党人顾宪成有深交，遂成为一个争论不休，毁誉不一的人物。万历三十九年，值内阁缺人，东林党人以为李三才贤能正直，宜当大用。而工部郎中邵辅忠等人则纷纷上疏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贪伪险横"竭力反对他入阁。李三才四疏力辨，杜门不出，要求去官，神宗置之不问。斗争日趋激烈，"朝端聚讼，迄数月未已"。李三才连上十五疏，力请归里，均不得允准，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十八日，遂径自引去。神宗亦不予问罪。其后，齐、楚诸党惧其东山再起，进而劾他盗皇木建私房，侵占官厂基地。李三才益愤，疏请派人调查，神宗派御史前去勘查，"久之无所得"。万历四十三年，李三才再次上疏为东林党人辨白，齐、楚诸党益恨之。四十四年十一月被削职为民。

归子顾疏言东南北运粮料之苦 万历三十九年(1611)三月二十八日，工科给事中归子顾说：东南赋役，莫苦于北运，其受累之甚：一为水脚侵牟。二为沿途需诈。三为交纳之留难。而其迟延更不堪者则有官军漕船虐阻。又江南五府之中，允其随到随行，州县可自为群，不必等候各府集中。或一州一县之中先行，不必等候各县集中。漕军未启行，何妨船户先行，官船未过，可令民船先过。或先或后，俱听其自便，不必非得官先民后，如此，则五、六月风波之险可免，十一、十二月守冻之费可省。

宣昆诸党成员降罢 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三月大计京官以前，仇恨东林党的宣昆、齐、楚、浙诸党即大肆进行活动，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散布说：欲去叶向高，先去孙丕扬；欲去孙丕扬，先去王国(保定巡抚)、王图兄弟"，至大计京官开始时，主持其事的孙丕扬等人将"宣昆"诸党人汤宾尹、顾天埈以及王绍徽等一批人，分别予以罢免、降职或者调外。礼部主事丁元荐亦上疏尽发"宣昆党"诸阴谋罪。浙党首领姚宗文于是上疏攻击丁元荐，为被降黜诸党人鸣冤叫屈，而诸失意被降黜者则相继攻击王图及孙丕扬，皆谓计典不公。

马孟祯疏论时政"三可虑" 万历三十九年(1611)四月十九日，怡神殿发生火灾。御史马孟祯为此上疏说：二十年来，皇上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疏入旨出悉由内侍，真假不可知，此为朝政可虑。臣子分流别户，入主出奴，爱憎由心，信口雌黄，流言蜚语，此为士风可虑。北直、山东、山西、河南，连年旱饥，民间卖儿卖女，食妻吃子，挺而走险，大有一呼四应之势，此为民情可虑。又时山海参将李获阳因逆税监下狱死，马孟祯为其讼冤，并请释放卞孔时、王邦才、满朝荐、李嗣善等为税监所害而坐狱者。神宗俱不听。

熊廷弼请设边镇常平仓 万历三十九年(1611)四月二十七日，巡按辽东御史熊廷弼请设边镇常平仓，括赎锾银籴谷赈边。明神宗从其请，并说：设常平仓有益于边镇，以后接管官照例奏报、作为官吏考核的内容之一。

徐兆魁疏劾东林 万历三十九年(1611)五月初三日，掌京畿道御史徐兆魁劾东林讲学诸人，首先攻击顾宪成。说：臣观今日天下大势尽趋附东林，今年大计京官之误实由此而生。顾宪成自贬官归家，会诸臣讲学于东林书院。不久其徒日众，挟制有司，欺凌乡曲，门庭若市，"假讲学以结党行私，而道德性命与功名利达混为一途"，败坏天下学术。勾结淮抚李三才，专以浒墅关税为书院经费，大肆接受贿赂。讲学所至，仆从百余人，挥金如土，"会时必谈时政"，且"大能使南北交攻，邪正角胜而党附"。并劾孙丕扬、丁元荐等人奸欺，为"宣昆"诸党号冤。其后，光禄寺丞吴炯上书，为东林辨诬，说："顾宪成致书李三才，诚为出位，臣曾责之，顾宪成亦自后悔。今顾宪成被诬，天下将以讲学为戒，绝口不谈孔、孟之道，国家正气从此而损，并非细事"。神宗皆置之不理。

徐大任致仕 徐大任，生年不详，字重夫，号觉斋，南直隶宣城县(今安徽宣城)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工部主事，岁裁革冗费数千万。后奉命赴真州征税，羡一无所私，为官始终以廉洁著称，神宗曾称其为"清节为天下第一"，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万历三十九年(1611)六月初三日，因事被劾致仕。

叶向高疏论神宗"万事不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六月，南北直隶及湖广等处皆发生大水，抚、按官请罢税使以苏民命，神宗不听。六月十四日，大学士叶向高为此上疏说：徐州以北，阴雨连绵，陆地

皆成水潭，水深丈尺，淹田没禾，庄稼尽坏，而且到处飞蝗蔽天，所过之地，千里如扫。京城洪水漂荡，房屋例塌，街道罢市，万室无烟，啼号之声凄惨。今人情所望者惟有二事：一是皇上翻然悔悟，更图新政；二是调发钱粮，救济灾民。而政务之急，莫过于用人。今自阁臣以至九卿、台省曹署无不空虚。南京九卿只有二人，其余皆已推而未点用。其他各省大吏自去秋至今未曾点用一人。赈济之事又不紧急实行。国所以立，惟臣与民，无臣无民，何以为国。“皇上万事不理，以为天下常如此。臣恐祸端一发而不可收拾”。神宗仍然不听。

傅新德逝世 傅新德(1569—1611)，字元明，又字明甫，号商盘。山西定襄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选庶吉，授检讨，进司业、谕德，迁庶子侍读。累官至太常寺卿署国子监祭酒。死年四十三，赠礼部右侍郎，谥文恪。有《傅文恪公集》等。

翁正春献万寿“八箴” 万历三十九年(1611)八月十七日，礼部侍郎翁正春进献万寿八箴：清君心，遵祖训，振国纪，信僚臣，宝贤才，谨财用，恤民命，重边防。

方弘静逝世 方弘静(1516—1611)，字定之，号采山，南直隶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东平知州，筑堤兴修水利，审核户口赋役，皆有成绩。升南京户部员外郎，历四川水利佥事、山东参议、江西副使、饶州兵备。调四川督学使，训士以务学敦行为主。进江西参政。再进为江西左、右布政使。召入为太仆寺卿。不久，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再移抚郧阳，终南京户部右侍郎，以年老致仕。万历三十九年(1611)九月初五日卒，年九十五。赠南京工部尚书。有《素园存稿》。

皇贵妃王氏逝世 皇贵妃王氏乃皇太子朱常洛生母。初为慈宁宫宫人，万历十年(1589)四月立为恭妃，八月十一日生朱常洛，是为皇长子。恭妃王氏一直失宠，而且患有眼病，神宗迟迟不加其徽号。万历二十九年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至三十四年皇太孙生，始进封王氏为皇贵妃。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王氏病危，皇太子请旨前往探视，王氏手拉皇太子衣服，哭泣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皇太子大哭，左右皆泣。同日酉刻，王氏死。经大学士叶向高一再疏请，神宗始赐谥肃靖皇贵妃，葬天寿山。光宗即位，命礼部详议尊谥，然事未竣而他身先死。及熹宗登基，谥孝靖皇太后，移葬定陵。其父王天瑞，封为永宁伯。

赵世卿自动去官 赵世卿(？—1618)，字象贤，号南渚，山东历城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大学士张居正当政，赵世卿奏救时“五要”，张居正不悦，调出为武昌楚王府右长史。次年京察，落职归家。张居正死，复官，历任户部郎中、陕西副使、以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进户部尚书，善理财，军国之用多赖其力。矿税使四出扰民，赵世卿极论矿税之害，请罢矿税。万历三十二年(1604)，苏、松水灾，赵世卿请减免苏、松租税。又极力请减福王婚费和公主出嫁之费。赵世卿素励清操，当官尽职。曾兼署吏部，推举无所私。及大学士李廷机辅政，赵世卿力推之，廷臣遂疑其结党，于是给事中杜士全等人先后攻之，赵世卿自是闭门不出，连疏求去。万历三十八年秋，赵世卿拜疏出城候命，神宗不理。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初一日遂乘柴车经自归里。神宗闻知此事，亦不予治罪。家居七年卒，赠太子少保。

礼部进呈学政条约 万历三十九年(1611)十一月十八日，礼部上学政条约。明神宗从之，并说：教条既酌议妥当，应颁行遵守，以后提学官不许另撰条款。解到试卷，如有文体险怪，不遵明禁者，许纠参处治。

李化龙逝世 李化龙，生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一说生于嘉靖二十一年)，字于田，号霖寰，河南长垣县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嵩县知县。迁南京工部主事，历南京右通政。万历二十二年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御寇有功，进兵部右侍郎，奏开辽东马市、木市。后以病去官。二十七年三月，复故官，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兼巡抚四川，统兵征播州杨应龙。万历三十一年，起右都御史兼工部侍郎，总督河道，开泇河。万历三十二年以平播州杨应龙之功进为兵部尚书，加少保。万历三十五年夏，起戎政尚书。李化龙以京营为根本，奏十一滥、十二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时辽东税监高淮肆虐贪奸，辽人恨之切齿。李化龙请停税课，增兵辽东、屯田助饷。万历三十九年八月，李化龙一品秩满，加柱国、少傅兼太子太保。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卒于任。赠少师，加赠太师，谥襄毅。有《平播全书》、《治河奏疏》、《场居集》等。

叶向高纵论治乱得失 万历四十年(1612)正月初四日，大学士叶向高说：年来天下景象枯槁憔悴至极，臣民之希望年复一年不能实现。今万历之纪已四十年，此亦人望更急之时。臣历查三代至宋元三千多年间，帝王有国四十年以上者，只有十位君主。惟殷之大戊高宗称为盛治，宋仁宗差治，其余皆乱。周宣王、唐玄宗、梁武帝则始治而终乱。三千余年中，有国久长而善终者，只有二三位君主。何其难也，天下大器，帝王大福，器久则必敝，福盛则必衰，凡保守者

没有不败的。臣对于皇上今日既喜又惧。今民穷财尽,内外空虚,外患日肆要挟。尤其是辽东,外寇人犯声势甚大,而我兵无粮,枵腹已久,何以御敌。一旦边疆不支,侵入内地,皇上诚思京师中何事足恃、何策足以自安,不可不寒心!自古国家所恃,惟在人才。今自内阁大臣大僚以及地方方面大吏,无所不空。皇上深居九重于上,而使二三寥寥臣工苟且承顺于下,欲求天下不乱是绝对不可能的。人才不作养,缺官不速补,将来势必无人可用。臣再三恳请会推、考选、补大僚三事,万万不能再拖延。皇上如不以臣之言为然,臣当速行罢去;如听臣言,则当早赐施行,使诸臣早得效用。神宗不置可否。

王万祚疏论赋役不均 万历四十年(1612)正月十一日,南京福建道御史王万祚上疏论述地方赋役不均的五种主要表现:一、佥派赋役不验丁粮多寡和产业厚薄,以均其力。门第萧然,无田无力之民照旧纳粮当差,而势豪大户则漏网袖手,无粮无差。二、选充里长不推丁多或丁粮有力之家,而惟论田亩多少,不分田有肥硗,值有贵贱,致赔粮难卖之田愈多者则役愈重,不数年殷实之户尽为乞丐。三、均徭不按规定只派本等差役,而是随意额外加增,本、折之外又计石派银,每年修船、水脚、水手皆征于田亩之内,及起解临期又有种种加派。四、官员优免不遵历来制度,不断从宽,南北混乱,全无规制,有免田二三千乃至万亩者,大开影混投献之风。五、佥点税课杂役,惟论丁田,不视产业,以致人户逃亡,奸民力图弃田脱粮,使合族包赔绝户之粮,里长包赔一里之粮,飞洒,诡寄由此而生。如此,皆违反祖宗定制,是造成赋役不均的根本原因。必须按大明律和会典的规定,认真予以厘正。其语多切中民害。

孙丕扬疏言部院缺官不补 万历四十年(1612)正月十七日,吏部尚书孙丕扬奏:目下大贤,如沈鲤、郭正域、吕坤皆不得用,名贤,如邹元标、顾宪成、赵南星、于玉立、高攀龙、庞时雍、冯从吾、刘元珍辈等又皆不得用。至于参选科、道诸臣,犹未下旨。查各部院十四正卿,今两京只有四人。部院左右职该二十一人,今两京只有九人,不仅一再催请不补,而且大僚多属虚位。从来未有无官任事而可以虚位致太平的。

孙居相请整饬漕规 万历四十年(1612)正月二十三日,巡漕御史孙居相言:按隆庆四年题准事例,每年漕粮俱限于十月开仓,十二月完兑开帮。如十二月终,有司无粮、军卫无船,督粮司道官及府州县掌印管粮官,并领运把总、指挥、千户、百户各罚俸半年。过正月者,各罚俸一年。过二月者,各降二级,布政司掌印官降一级。至三月终,不过淮安者,督押司道等以及领运把总以下,各降一级。四月终不过吕梁、徐州二洪者,一律予以参劾究治。开兑开帮有期,过淮过洪有限,违限者有参有罚,此立法之严明详备。而数年以来,只有荐举而无参罚;只有例参,而无处分。一官不处,则众官观望;今年不处,则来年效尤。以故一年比一年迟而又迟,以至违限至极。请严旨申明漕规,各官若违限,必当依法处治。明神宗从其请。孙居相又说:往年粮船七千八百八十五只,今回空只有四千一百四十只,其余三千七百四十五只俱未回,请募民船二千只,以助漕运。事后,光禄寺少卿徐必达言:民船必不可募,而漕船则必不可不补。

孙丕扬拜疏自归 孙丕扬(1532—1614),字叔孝,陕西富平县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授行人,升御史,巡按畿辅、淮安、扬州。隆庆中,为大理寺丞,被劾落职,后复故官。万历元年(1573),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严饬吏治,讲求战备,叙功进右副都御史。此后,历任应天府尹、大理寺卿、户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刑部尚书、左都御史。万历二十二年,任吏部尚书,治事挺劲不挠,百官不敢营私。并创"掣签法",以绝内官请托,是当时官员考选制度的一大变革。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因上疏攻大学士张位,被责去官。万历三十六年,复召为吏部尚书。孙丕扬以七十八岁高龄出山再仕,抱着"非荐贤无以报国"的思想,先后推荐名臣十余人,又请起用言官数十人,明神宗俱不用。万历三十八年考核地方官吏时,孙丕扬办事公允,去留升降无不当。第二年,大计京官,孙丕扬主其事,将国子祭酒汤宾尹等人分别降罢。于是遭到宣昆、齐、楚、浙诸党的猛烈攻击,孙丕扬求去之心更为迫切,连上二十余疏,仍得不到批准,万历四十年二月十八日,遂拜疏径归,二十一日明神宗令准于致仕。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赠太保,谥恭介。

万象春逝世 万象春(?—1612)字仁甫,号涵台,南直隶无锡县(今江苏无锡)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改庶吉士,历任工科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时宗室人口日增,而岁禄不继,万象春奉命赴河南、山东、陕西,与诸王府及当地抚、按商议宗禄变通办法,奏便宜十五事,多著为令。又上疏建言:外吏贪残不当遣缇骑逮问,官禁邃密不当宿重兵,廷臣建言贬黜当叙迁,内臣有犯当付外廷按治。此后调出为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万历二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疏劾税使陈增罪恶,保护正直官吏,被夺俸,遂以病归里十五年。复起为南京工部右侍郎,未上位而于万历四十年二月二十日卒于家,赠右

都御史。

刘怀恕逝世 刘怀恕(？—1612),北直隶东光县(今河北东光)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长洲县令。召入为御史,巡按淮安、扬州、山西。后历任大理寺左右寺丞、左右少卿。因病家居十三年,起为右佥都御史巡抚郧阳,未赴任而于万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逝世。

疏请皇上面见大臣 万历四十年(1612)四月初二日,南京河南等道御史等官奏言:臣等历观祖宗朝二百余年以来,未有皇太子六七年不开讲而满朝催请置之不理,未有两都六部尚书、侍郎缺乏至一二人者,未有台、省空虚而长期不补者,以致诸多废堕。皇上深居二十余年,不见大臣一面,不议国家一事。长此不变,不知数年之后,有谁与皇上共治多事之天下。

麻贵致仕 麻贵,生卒年不详,山西大同右卫人。由舍人从军,万历十年(1582)官至都督佥事兼宁夏总兵官,不久移镇大同。万历二十年,带兵至宁夏征哱拜,论功升为总兵官,镇守延绥。万历二十五年,因对日本封贡事失败,命麻贵为备倭总兵官,加提督,统南北诸军入朝鲜抗击日军,数有战功。万历二十七年回国,进为右都督。万历三十八年,出镇辽东。万历四十年五月十六日致仕。麻贵果毅骁捷,善用兵,东征西讨并有功,称一时良将。

顾宪成逝世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别号泾阳,南直隶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6)进士,授户部主事。万历后改吏部主事,请告归三年,再起为验封主事。十五年,因上疏言事被贬为桂阳州判官,迁处州府推官。万历十九年,进泉州推官,举公廉第一。万历二十年,升为考功主事,历员外郎,疏请立皇太子。其后,廷推阁臣,顾宪成推举致仕在家的大学士王家屏,逆旨,遂被削职回家,在无锡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时政,声名大著。万历三十六年,起为南京光禄寺卿,力辞不就。万历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死于家。年六十三。天启初,赠太常卿。崇祯初,赠吏部右侍郎,谥端文。顾宪成未死之前,宣昆、齐、楚、浙诸党曾竭力对他进行攻击。在他死后,攻其者犹不止,至明朝灭亡才结束。有《小心斋札记》、《顾端文遗书》等。

陈惟芝逝世 陈惟芝(？—1612),河南孟津人。由洛川知县召入为御史,巡漕、按苏松、顺天。日本入侵朝鲜,石星等人议封贡,陈惟芝上疏以为非策,并陈言实政数事。明神宗嘉其言,进为应天巡抚。是时税使四出,陈惟芝屡疏请罢矿税。不久,回家守孝。朝廷前后起他为大理寺卿、左佥都御史、南京刑部右侍郎,皆不赴,在家乡救济饥民。万历四十年(1612)六月二十六日卒。

王国致仕 王国,生卒年不详,字之桢,陕西耀州(今陕西耀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改庶吉士,授御史。上疏劾大学士张居士引用私人入阁,并尽发太监冯保罪状,由是出名。后历督南畿学政、掌河南道御史。申时行欲排斥异己者十九人,王国力持不可。遂被调出为四川副使。久之,起故官,历河南学政、山东参议。所在以公廉著称,召为大仆少卿,再出为山西副使、南京通政使。万历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进右都御史,巡抚如故。王国刚介正直,与弟王图并有威望,遂为宣昆、齐、楚、浙诸党人所忌,于万历四十年七月十四日致仕。

黄辉逝世 黄辉(？—1612),字平倩,又字昭素,四川南充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进右中允,充皇长子讲官。历谕德和左、右庶子,升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黄辉居官清正,一尘不染;诗文、书画与陶望龄、董其昌齐名,为时所推重。万历四十年七月二十九日逝世。著有《贻春堂集》、《铁庵诗选》。

刘曰宁逝世 刘曰宁(？—1612),字幼安,江西南昌(一说吉水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编修,进右中允。是时矿使四出,刘曰宁发愤上疏,陈六疑四患,极言税监李道、王朝诸不法罪。其后,历右谕德,掌南京翰林院,迁南京国子祭酒。送母归家,有吏贿其银数千两,刘曰宁严厉斥责,拒不收。不久,起为少詹事,以母丧不赴。服满,召为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万历四十年九月初一日卒于赴京途中,赠礼部尚书,谥文简。

顾其志逝世 顾其志(？—1612),南直隶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长兴县令,升南昌府同知,历部郎、山东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极论矿税之害,力裁税使,深受秦人爱戴。再进为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御敌有法,统将有威,论功升兵部尚书,掌南京都察院事,加太子少保。以守制归家,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十五日卒。有《筹陕存牍》。

李庭机致仕 李庭机(？—1616),字九我,一字尔张,福建晋江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编修,迁祭酒。又迁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万历二十七年,主持京察,持事公正。其间曾兼理户、工二部,重视发展商业,爱惜民力。再召为礼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在"妖书"之狱中,疏救廷臣。万历三十三年夏,率同官上疏请急罢矿税。万历三十五年夏,廷推阁

臣，李庭机被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决策军国大政，引起反对派的忌恨，屡遭弹劾。李庭机连疏乞休，闭门数月不入朝办事，言官数十人攻之益力。李庭机求去，不得允准，遂坚卧不起，待命年余，至四十年九月十九日疏已上一百二十余次，乃陛辞出都归里。其入阁六年，实际秉政只九月。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卒。赠少保，谥文节。有《李文节集》。

兵部请严海禁 万历四十年(1612)十二月初一日，兵部奏：贩海之禁，屡经申饬，不意仍有人公行无忌。查其盘验，虽非通倭之货，但脱逃可疑，应行原籍衙门拘审。并通行所属沿海军卫、有司禁戢军民，不许私出大洋，兴贩通倭，致启衅端。神宗从其议。

王穉登逝世 王穉登(1535—1612)，字百谷，号玉遮山人，南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十岁能诗。嘉、隆间先后两次入游北京。吴中自文征明之后，风雅无定属，王穉登尝及文征明家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申时行、王世贞皆极推重。万历四十年(1612)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八。有《吴郡丹青志》、《吴社编》等。

诏朝鲜练兵防倭 先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朝鲜国王李昖病死，其次子李珲自立为王。明朝政府从其臣民之请，封李珲为国王。李珲遂奏言：日本使者频频前来要挟和议，大有兴兵入侵之势。请大明天朝选将带兵入朝鲜，督同本国训练军队，防备日本。当时神宗以过去已留明军将士在朝鲜，而且教习成法具在，不必再派军队，命朝鲜使者奉旨回国认真整饬军备。后因日本妄图再次出兵侵略朝鲜，辽东巡按张五典上疏说：可用南方兵教练朝鲜水兵，用北方兵教练朝鲜陆军。兵部尚书王象乾说：出水陆兵到朝鲜。饷粮难继，宜以中国之事责中国，以属国之事责朝鲜，朝鲜是属国，只能如此处理。神宗遂从王象乾之请，于万历四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命张五典传旨朝鲜国王，令其自己招募士兵，加紧训练，修造军械、兵船，务求实用，以壮声援。

周孔教逝世 周孔教(？—1613)，字明行，号怀鲁，江西临川县。万历八年(1580)进士，知福清县，升浙江道御史，两度提督北直隶学政，历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左通政。后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救活饥民无数，民立祠祀之。累官至总督河道右副都御史。万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有《周中丞疏稿》、《救荒事宜》、《怀鲁先生集》。

命章奏皆送阁中票拟 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月初五日，命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左侍郎方从哲主持会试，由叶向高任总裁，方从哲为副考官。时内阁阁臣只有叶向高一人，于是叶向高上疏说票拟不便。神宗说：开科取士是国家的大典，例用辅臣总裁不必推辞，章奏可俱送闱中票拟。时人“以为异事”。

叶向高极论福王庄田 万历四十一年(1613)春，廷臣一再上疏请福王离京就藩。神宗传旨福王庄田非四万顷不可。阁臣叶向高说：《会典》规定亲王禄米一万石，养廉名目，已是添设，岂可求多？各直省田土之数，大府方有四万顷，少者只有一、二万顷。自祖宗以来，封王的不少，假使亲王各割去一大府，则全国土地尽为亲王所有。今日非但百姓无田，朝廷亦将无田。臣以为祖制当遵守，福王就藩的大典当举行，不当以土田滋扰天下。至同年五月，叶向高又说：假如福王就藩府必以庄田足四万顷为条件，则其就藩必无时日。福王疏中谓其所言是根据祖宗制度，试思亲王庄田四万顷，《祖训》、《会典》以及历朝功令，哪一条有这种规定？在景王以前，没有庄田数千顷以外的，只因由于当时过份宠爱景王，以致败坏了祖宗制度，福王怎能以此而苛求！况且今日河南、山东、抚、按搜括已尽，恐有奸民以投献为名挟仇报怨。河南、山东、湖广之间，稍有土地者皆不安心乐业，天下必从此多事。疏上，神宗甚为不快，说：“庄田自有成例。且今皇太子和福王的地位皆已确定，何必再生猜疑！”

华懋康建言边务 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十七日，巡按陕西华懋康陈边事十款：裁冗员。开河运。兑钱粮，变通盐法，广积粮，并京盘，修筑要塞，严格哨探，禁冒滥，禁游客，经所司会议，准予悉行。

建福王府工费 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神宗第三子(朱常洵)福王府建成，计费银四十万两，比潞王府增加一倍。时廷臣一再请令福王离京就府，神宗不听。

令廷臣不得结党乱政 万历末年，由于神宗长期不理朝政，廷臣结党交攻日益严重。万历四十一年(1613)五月十二日，神宗告谕吏部、都察院：年来廷臣纷争，议论混淆。朝廷一再优容，置之不理。近日更加怀私逞忿，沽名妄言，攻击排挤，致大臣不安其位，皆欲求去，杜门不出，甚伤国体。自今以后，务必秉公奉职，勿徇己私，各立门户，结党乱政，互相纷争，颠倒是非，诬诋要誉。否则，必罪不宥。

李景元逝世 李景元(—1613)，字伯善，北直隶大名县(今河北大名)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历户、礼二部郎中，升河南副使、山西按察使、布政使，数有边功。再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抗御外族，修筑边墙，节省银数万两，屡次受奖，进兵部

右侍郎。改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因守孝未任，于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卒于家。

李桢逝世 李桢(? —1613)，字维卿，陕西安化(今甘肃庆阳)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高平知县、广东道御史、长芦盐运司知事、归德府推官、礼部主事、光禄寺丞、南京尚室司少卿，顺天府丞。万历中，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召为左佥都御史，再迁户部右侍郎，进兵部左侍郎。万历二十四年(1596)，以封贡日本之事失败，上疏要求罢免内阁首辅赵志皋、兵部尚书石星，由此得罪赵志皋。李桢性质直刚方，数上方略，处事颇当。万历二十六年因考察被论，致仕。万历三十七年，起为南京刑部尚书，引疾乞休，未得允准，擅自离任归里，被明神宗勒令夺职闲住。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卒世。

增置阁臣 万历四十一年(1613)九月十七日，经大学士叶向高百余次上疏请求，神宗终于同意增补内阁大臣，以吏部左侍郎方从哲以及原吏部左侍郎吴道南，并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时吴道南居家守孝方满三年，三次辞谢，神宗不准，至次年始离家入朝。

归子顾疏陈时务 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二月初一日，工科给事中归子顾奏言时务五事：点用大臣，以寄重任。持平议论，以致和衷。慎用差遣，以戒旷职。严禁拖延，以督为令。明信赏罚，以肃风励。

李朴上疏极论言官党同伐异 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二月，户部郎中李朴上疏极言党同伐异。他说：今言官深结戚畹近侍，威制大臣，日事请寄，广纳赂遗，吃喝玩乐，反而诬陷别人，原因就在于皇上不览章奏，大臣柔弱无能，所以他们就更加恣肆猖狂。臣以为他们皆可斩。浙党则有姚宗文、刘廷元等；楚党则有官应震、吴亮嗣等；齐党则有亓诗教、周永春等，他们百人合一心，以排挤忠直之臣为己事。凡攻击东林者，今日指其为乱政，明日目其为擅权，不知东林居何官，操何权柄？顾宪成清风百代，已死犹被攻击；而有人弄弊作奸，卖官卖爵，擅自杀人，却得到保护。请皇上俯察臣言，立赐威断，痛斩诸奸以谢天下。李朴之疏递上，齐、楚、浙诸党群起而攻之，结果李朴被贬为州同知。

户部奏报漕粮进仓额数 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二月，户部言：该年漕粮永折的为 344347 石，因为灾伤折色的计为 199762 石，被漂流毁坏的 28939 石，解进京、通、边仓的计 3545889 石。

《谷山笔尘》刊行 《谷山笔尘》十八卷，于慎行撰。万历四十一年(1613)由其门人郭应宠整理刊印。于慎行(1545—1608)，字可远，又字无垢，山东东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历庶吉士、编修，礼部尚书。内容包括明代的典章制度、人物传记、经籍子史、礼乐兵刑、财赋边塞以及释志等等，其中有关嘉、隆、万三朝的事实，多为作者亲历与耳闻目睹。是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钱梦得逝世 钱梦得(? —1616)，浙江桐乡县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鄢陵知县，选为山西道御史，历巡陕西、北直隶、广西等地，所至皆有能声。升大理寺丞、左、右少卿、南京大理寺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未赴任，即于万历四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卒于家。

四川建昌诸番起事失败 四川建昌(今四川西昌)有源山、拖郎、桐槽、热水诸番。万历四十年(1612)，诸番起事，朝廷命刘綎为总兵官，统兵进剿。刘綎遂率参政王之机等人，分兵八路，刘綎居中节制，相继攻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诸寨，经大小五十六战，斩其众三千三百余人，俘虏九百七十五人，获牛马羊计二千八百四十余只、甲仗无数，诸番巢穴为之一空，诸番起事失败。万历四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四川巡抚吴用先向朝廷奏捷。

王象乾疏言忧在于军乱 万历四十二年(1614)正月十二日，兵部尚书王象乾说：今日仓库空虚，四海困穷至极。以往之忧在于财乏，今日之忧则在于军乱。噪呼之变，一见于遵化，再见于蓟门，三见于永平，到处发生士兵哗变。臣恐九边军士相继效尤，脱巾之呼甚于失伍，萧墙之祸惨于敌人。请令九卿、科、道各官会议，总计天下盈缩，统筹安排，无论宫、府，无分内外，凡可以助军兴、裕国用者，各抒所见。神宗从其言，命军饷由户部会同兵部悉心计处，务在经久可行，各军不得违玩，以安军心。

刘元霖逝世 刘元霖(1556—1614)，字元泽，号用斋，北直隶任丘县(今河北任丘)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历任安阳县令、吏部主事、郎中、太常少卿。其后巡抚浙东、西，加右副都御史，升工部右侍郎。福王建洛阳王府时，多有所要求，刘元霖执奏，力言不可，遂止。进工部尚书。时国家物力凋敝，而屡兴大工，贪污盛行。刘元霖任事公明，节省经费，工部"衙门官蠹一清"。万历四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卒于官，年五十九。赠太子太保。

福王朱常洵之国 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二月，定福王于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之国。三月二十四日，福王出京时，有船一千一百七十艘、军人一千一百人，数倍于前。福王婚费三十多万两，营建洛阳王府所费近三十万两，亦十倍于常制。福王庄田原定四万顷，后因廷臣力争，实给一万九千顷，地跨河南、

山东、湖广三省，皆为肥沃之田，且每亩征银三分。以丈量田亩为名，派出大批人马在河南、山东、湖广等地大肆骚扰。又从福王的请求，将朝廷没收的张居正的田产以及从江苏扬州至安徽芜湖等地沿江杂税和四川的盐、茶银，支给福王府使用。在北京崇文门外开设官店供福王府专用。将河南原食河东盐改为用淮、扬之盐，并在洛阳设店垄断河南全省食盐的专卖权，致使河东之盐受阻不行，边饷由此日绌。福王临行时，神宗还将历年税使、矿监所进献的奇珍异宝尽给予福王，其押运官校一路上横索杀人，沿途百姓叫苦不迭。

归子顾疏请修浚吴淞江　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初三日，工科给事中归子顾奏言：江南岁供财赋半于天下。江南财赋出于农田，农田以水为利，亦以水为害，全系吴淞江之通塞。吴淞江通，则太湖之水有纳有吐，不为民害。吴淞江塞，则太湖之水有纳无吐，大雨暴至，四向溃出，淹没居民，冲毁田地。今吴淞江久塞不通，国家财赋从何而出，欲使国计民生两利，必须疏浚吴淞江，舍此别无良策。吴淞江，自隆庆中巡抚海瑞修浚至今已四十余年，因年久失修，不讲求水利，致使万历三十七、八年大水时，三吴之民尽为鱼鳖，田禾颗粒无收。宜速令工部考查历年修治原委，集工筹银，浚吴淞江，开江南无穷之利。此实为经国理财之急务。神宗得疏，留中不发。

福州商民抗税监　税监高寀在福建十多年间，始终横行不法，任情威福，购置海船，交通倭冠。甚至公然抢夺福州商民价值数十万的货物，下海进行走私活动。福州商民忍无可忍，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五月十一日奋起反抗，围攻高寀税监衙门，声讨高寀的罪行。高寀非但分文不付给商民货物的成本，反而怙恶不悛，派兵杀伤商民百余人，又施放火箭，烧毁民居无数，并策马挟剑突入福建巡抚衙门，劫持地方官吏作为人质。事后，福建巡抚袁一骥、巡按徐鉴，以及大学士叶向高、方从哲、兵科给事中吴亮嗣等相继上疏请严惩高寀，神宗皆置之不理。直到同年六月，神宗始下令将高寀召回北京，但仍不撤税监，以江西税监潘相兼领福建税务。

刘士忠逝世　刘士忠(？—1616)，陕西华州(今陕西渭南地区)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真定府推官，升江西道御史，巡按山西、河南、顺天等处，历顺天府丞，再召为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时河决徐州，刘士忠开三山河，使韩家坝以东得以通船，进为南京大理寺卿。万历四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卒于任，赠工部右侍郎。

姚宗文疏议京营营务　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十二日，巡视京营户科给事中姚宗文疏言京营营务数款，其中有：一、勤课将领，以训练壮士多寡，定将官优劣。二、严格考核营军，不许驮贩私盐，扰乱民间，不许结伙行劫，不许将领隐占役夫。三、修造战车。四、加强捕盗，以免无辜受累。五、裁革冗员冗役，减少费用。六、抚恤贫军。七、公举劾，不使大奸漏网，公私混淆。神宗见疏留中不发。

山西平遥、榆社地震　万历四十二年(1614)九月二十一日戌时，山西汾州府平遥地震，倒塌房屋数百间。亥时，辽州榆社地大震，河南街房塌百余间。代州、长子、阳曲、太原、宁武所、榆次、清源、汾阳、繁峙等，各声响如雷，摇动房屋。沁州、武乡、平阳、泽州，城垛几倒，人有死者。榆次南鲁仙山高塔毁。夏县，平阳付、临汾、保德州，潞安府，潞城；延安府青涧、怀远堡，府谷，延绥镇以及京师真定、广平府永年、肥乡等二十余府州县皆受波及。震中烈度(Io)Ⅵ—Ⅶ，震级(M)六点二五级。

张臣逝世　张臣(1528—1614)，字怀忠，号东山，陕西榆林卫人，行伍出身。张臣矫捷精悍，能攻善战，万历初官至都督佥事。万历十一年(1583)，因屡有战功，神宗下诏升为副总兵，不久进都督同知、左府佥书事、陕西总兵官，镇守固原。万历十八年，改镇甘肃，上方略数事，请足边境兵饷、明敌势、信赏罚。后因病告老还乡。张臣先后守延绥、蓟州、固原、甘肃四镇，名著边陲，为一代良将。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逝世，年八十七。

官应震请去"三偏"　万历四十三年(1615)正月二十三日，户科给事中官应震直言明神宗有"三偏"：一、偏溺福王。皇太子十二年一再请求讲学、瑞王二十五岁请婚、惠王二十二岁和桂王十九岁请选婚，陛下皆不报，独福王"随请随报，屡请屡报"。二、偏徇货利。二十年来开矿征税，商困于市，士愁于途。犹幸有农民在田亩，朝廷才得以有赋税可入。近来宦官、军骑四出，遍历穷乡，农民已苦每亩三分之纳，今再加以分外五分之收，农之困已在商贾之上。三、偏任群小。陛下近年来厌恶士大夫，而独崇信宦官，陈奉、陈增之流或以病死，或致地方激变而死，未闻死于法。近如高寀奉旨回京犹营求回监理事。陛下不绝之于法，反而关怀备至。陛下应去此三偏，同情爱、远货财、斥群小。神宗得疏不理其奏。

胡桂芳致仕　胡桂芳，生卒年不详，号瑞芝，江西金溪人。万历进士，授杭州府司李，升湖广参政，治事严正，屡劾税使不法。进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终工部侍郎、总理河道。万历四十三年(1615)二月初八日因病致仕。

福王府士兵哗变 万历四十三年(1615)四月十四日,河南洛阳福王府士兵八百人,在千户龚孟春的指使下发生哗变。

舒应龙逝世 舒应龙(? —1615)号中阳,广西全州(今广西全州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由知县历部郎,累官至南京工部尚书,改南京兵部尚书。万历二十年(1592),召入京为工部尚书,总理河道。不久,回工部管事,加太子太保,二十三年被革职为民。万历三十九年为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后致仕归。万历四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卒于家。

梃击案 张差"梃击案",为明末宫廷三大案之一,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酉刻。是时蓟州男子张差持枣木棍,撞入皇太子所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内官李鉴,直至前殿檐下,始被内官韩本用等人执获,送交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人拘留。此案发生之后,举朝无不惊骇。次日,皇太子奏报,神宗立即命法司提审张差。根据对张差多次口供的分析和对蓟州的实地调查,参与办案的官员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等认为:张差是一个疯子,"语言颠倒,形似风狂",在家乡受气,愤怒入京,欲赴朝声冤,持棍击鼓。因人地两生,误入东宫,没有人指使。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等人则明确提出:张差"年壮力强,非风癫人"。他手持木棍,闯入东宫,是受人指使的阴谋活动,目的是为了加害皇太子。此事不仅与宫中内官有联系,而且直接涉及到神宗的爱妃郑贵妃及其弟郑国泰。于是郑贵妃惶惶不安,哭诉于神宗,说她蒙受冤枉。神宗下令定张差为"风癫奸徒",且不准再议论此事。同月二十九日将张差由内官偷偷处决。同时革王之寀为民,把要求严惩郑国泰的工科给事中何士晋调出北京,贬为浙江佥事,其他主张"梃击"论者,或被降职或被罚俸。然而,"梃击案"之争并没有因此结束,至天启五年(1625年)仍争论不休。

申严皇城门禁 原来在皇城的左面,每逢初四、十四、二十四三日,俱设市贸易,谓之"内市"。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张差梃击案发生之后,巡视皇城御史刘廷无等人上疏,请禁止内市,以消隐祸。同时在皇城以内四门,内臣出入必须接受检查,四门按时开闭,任何人不得借故阻挠。五月二十四日,明神宗为此下诏:门禁本宜严密,令兵部及巡城科、道官随时严加盘查。厂卫巡捕衙门以及守门官员密切侦察,擒拿奸宄。内市因相沿年久,有助济需,暂不停罢,但任何人都不许持挟铜铁弓箭等物进入,违者必惩。

商周祚请整顿皇城守卫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二十六日,户科给事中商周祚请加强守卫四事:一、专设司官,选择才品兼优的主事一人,在玄武门外附近地方特设公署,赐给印信,以重事权。二、禁革内市。三、清理私占,禁城之外东西两侧并玄武等门周围设立的四十余座红铺,皆为守卫官军栖身之所,巡逻、盘查奸细之用。近来尽为内官占为己有,致使官军露宿街头,必须严加清理,归还守卫官军,惩办私占之人。四、增设近侍,加强东宫护卫。

吴士度请支贫宗钱粮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山西巡抚吴士度奏言:国家分封诸王,赠给官爵,自亲王、郡王以至将军、中尉,俱有定禄,支给钱粮。但由于近年以来,宗室人口繁衍,以致出现无禄而极贫者,他们当中,有的是因擅婚私滥,系妾之子不敢请名者,有的是虽已请名而因家贫不能封爵的,有的是孀妇孤独无依。请每名每月给米一石,折银一钱,从各府正项粮银内支给。神宗从其请。

诏发仓米救济北直隶饥民 因为北直隶久旱不雨,通州、三河等处民饥无食,不少人以抢劫为生,社会秩序日益混乱。万历四十三年(1615)七月初四日,明神宗从蓟辽总督薛三才的请求,诏发通州仓米七万石救济饥民,发临清、德州二仓米十万石平粜,并发北直隶各地备荒米以及收买邻近丰收地区的杂粮,资助饥民,克服灾荒。

牟志夔疏论福王食盐违制 福王就封地洛阳以后,请改食长芦之盐,并增加盐数。万历四十三年(1615)七月十八日,巡盐御史牟志夔奏言:按祖训规定,亲王每年食盐三百引,每引二百斤,皆从封地办支,从未有舍近求远,从二千里以外的地方支付,且其所请盐数一千三百引,大大超过以前的额定之数,这些都是非法的。神宗不听。后来,由于廷臣一再论福王食盐于国计民生两不利,明神宗才下令,说:以前潞王先食两淮之盐,三年改食长芦盐。今福王先食淮盐,一年后改食长芦盐,二年后支取河东盐。

准发钱粮救济山东湖广饥民 山东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三月至六月久旱,贫民乏食,盗贼四起。山东巡抚钱士完为此请发银进行救济。同年闰八月十三日,神宗令以该省布政司库贮解户部的税银六万六千多两及本年临清应解的税银四万两,留省中作为备荒之用。同时,发临清、德州二仓米六万石给饥民、四万石平粜。其时,湖广各地亦水旱频生,巡抚梁见孟请灾重各府州县漕粮并改折银,灾伤稍轻之地折一征二。没有漕粮,南粮的地方,酌情救济。神宗亦许其奏。

卫承芳逝世 卫承芳(? —1615),字君大,号淇园居士,四川达州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知

县，升温州知府，公廉而善抚，民颂其德。后历浙江副使、山东参政、南京鸿胪寺卿、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光禄寺卿。生活简朴，人罕能及。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严绝贿赂，部下受其影响，亦多能洁身自爱。不久，召入为南京兵部右侍郎，迁户部尚书，上疏反对福王奏请沿江杂税和自遣内官征税，明神宗不听。万历间，南京户部尚书有清名者，前为张孟男，后即为卫承芳。终南京吏部尚书，万历四十三年(1615)闰八月十五日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清敏。有《曼衍集》。

浙江豪户隐占田亩　万历四十三年(1615)九月二十五日，南京户科给事中王建中说：本年六月，据浙江嘉兴府嘉善县报告，万历九年丈量田土时，该县豪富大户朱灼(均)等人贿赂经理人员，隐瞒田土三万三千五百亩，诡寄于嘉兴、秀水雨县。"全不输粮，以致概县摊赔"。业经本县查明，请命户部督促该省抚、按官严加查勘，限期上报。并正豪强飞诡之罪，以甦小民赔累之苦。神宗可其请。

梁问孟逝世　梁问孟(？—1615)，字尚贤，号静斋，河南新乡(一说新郑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官浙江西安县令、刑科给事中、山西参政、布政使，以事逆大学士张居正，被降三级。后补湖广参议，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梁问孟有才有德，干练敏达。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月二十七日死于任，赠左副都御史。

李得阳逝世　李得阳(？—1615)，南直隶广德州(一说陕西延绥)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由知县历部郎、知府、布政使，升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终南京工部右侍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二月初十日卒于官。李得阳为政清廉，死至无钱治丧。又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著有《理学臆言》、《义仓漫语》、《古今一览》、《难字备考》、《桐川野史》、《谈斋集帖》。

周如砥逝世　周如砥(？—1615)，字季平，号砺斋，山东即墨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左赞善，官至国子监祭酒。万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周如砥性刚直，居官持身守正，廉洁俭约。死之日，人皆痛惜。有《青藜馆集》。

努尔哈赤建"八旗制度"　随着女真族(满族)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万历二十九年(1601)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了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又增建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计八旗，史称"八旗满洲"。其建制为：每旗("固山")辖五参领("甲喇")；每参领辖五佐领("牛录")。全体女真族人皆分别隶属于各佐领，所有的成员皆统称为"旗人"。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根据当时女真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实行的兵农合一，具有生产、行政、军事三种职能的社会组织形式，全体旗人，平时从事耕作，战时入伍作战。这种组织形式，对于女真族的强大兴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病死。其第八子皇太极(清太宗)继位之后，又将归降的蒙古人和汉人，分别编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共同构成清代八旗的整体。

努尔哈赤即大汗位　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即大汗位，建元天命元年，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后改大金为清，是为清太祖高皇帝)，时年五十八岁。努尔哈赤即位，标志着后金的迅速崛起强大，成为明皇朝在东北的主要威胁力量。努尔哈赤即位曾致书朝鲜国王，谓今后若再援助明朝，必以兵戎相加。

遣使救济山东饥民　万历四十四年(1616)初，山东大饥。青州举人张其猷上《东人大饥指掌图》，各系以诗，有"母食死儿，夫割死妻"之语，见者酸鼻。饥民流离入江淮一带，遂成人市。神宗以山东饥民数多，劫掠可虞，命借太仆寺马价银、临清仓米设法救济。于是户部议：发太仆寺银十六万两以及分振米六万石、平粜米六万石。神宗从户部之请，并于同年正月二十一日遣监察御史过庭训赈饥山东，速行入省，以慰东人仰望之心。不久，过庭训及山东巡抚钱士完上救荒事宜十二条：一定赈规；二广赈地；三劝倡义助赈；四留漕米十五万石平粜；五开事例量减银两，自春至夏止；六酌赎罪；七搜帑藏；八清驿递；九宽禁约钱法盐法，权宜便民；十通水利；十一普赈米；十二酌蠲停。疏呈进，神宗允从。

林烃逝世　林烃(1540—1616)，字贞耀，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林烃的祖父林瀚为成化二年进士，正德时任南京兵部尚书，性刚直，为人谦厚，自守清介。父亲林庭机为嘉靖十四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伯父林庭㭿为弘治十二年进士，官拜工部尚书。林烃兄林燫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万历元年(1573)进工部尚书。林烃授户部主事，历广西副使、太仆寺少卿，进南京工部尚书。林氏三世五尚书，皆内行修洁，为时所称。林烃有父祖之风，曾上疏极论矿税扰民之害，请释逆矿使被逮之臣。在广西副使任上，著有《林氏杂记》一书，书中记严嵩、张居正及他本人的一些情况，所记皆为作者亲闻目睹，史料比较可靠，对于了解嘉、隆、万时期的吏治、民风、政治、经济情况，很有参考价值。万历四十四年正月三十日林烃卒，年七十七。有《复瓿草》。

诏发钱谷救济饥民　万历四十四年(1616)春，南北各地灾害沓至，民心浮动。为稳定社会秩序，

神宗命有司发钱谷进行救济。除正月遣监察御史过庭训往山东赈济饥民之外，正月初九日令赈济北直隶南部六郡，免其被灾税粮。二月初七日，又令赈淮、徐及河南饥民。先是，淮、徐五谷不登，以巡抚唐世济上奏，准改折漕粮，蠲免未完带征米麦。至是，又发淮安府贮库税项溢额银八千七百余两，并借支正项溢额银八千两，易粟煮粥，以治饥民。河南，则留税银四万二千余两，籴谷赈济饥民。

《泾林续纪》事件 《泾林续纪》一书，系周玄伟所著。周玄伟，南直隶昆山县人，进士出身，历官御史、广东电白县令，后罢官归家。其家为累代书香，为当地有名的富户。周玄伟居乡之日，与其子周公缵皆横行不法，恣肆奸邪，万冤山积，乡民恨之入骨。周家又因争科举，争地方霸权，与当地非身份地主张惟惠结怨极深。周玄伟平日好讥议，其所著《泾林续纪》一书，"牵涉时事，干宫禁"。张惟惠为搞垮周家，遂利用神宗专宠郑贵妃和万历末年宫廷内部斗争激烈之机，将《泾林续纪》所记朝廷内部事，通过昆山知县陈祖苞和应天巡抚王应麟奏报于朝廷。明神宗得疏，以其"涉于宫闱"，命立即焚板。万历四十四年(1616)三月初一日，以"诽谤朝廷，污蔑宫禁"罪，将周玄伟逮捕下狱。张惟惠乘势鼓动民众，焚劫周家。及周玄伟死于狱中，当地民众数万人又将张家焚毁一空。周、张两家俱败。

民抄董其昌 董其昌而，为人不正，是上海一带有名的官僚恶霸地主。他家有良田万顷，纳税不过三分。他的儿子董祖常和豪权陈明等人，依仗他的奴势在乡里更是无恶不作，占夺民田，拆毁民房，奸淫民女，伤害民命，民愤极大。对此，董其昌父子不但不自思其过，反而继续为非作歹。万历四十四年(1616)三月十五日，董其昌在家无端辱骂邻里，甚至纵容董祖常带领陈明等人，殴辱生员范启宋之妻与其家仆妇，裸其体，拔其发，且及下体，致血流如注。松江、上海、青浦各地群众闻讯，忍无可忍，不约而聚集起来者多达万余人，他们散传单，贴布告，愤怒声讨"兽宦董其昌，枭孽董祖常"的罪行，并放火把董其昌和陈明的房子全部烧毁，互相传唱"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歌谣。又称"民抄董宦"。

张鹤鸣请增发贵州兵饷 自万历中平息播州杨应龙以后，驻黔官军甚少，而各少数民族则人口日增，尤其是贵州上六卫平定、铜仁、大江、小江、等处苗民经常起事，俘斩官吏，焚劫屯堡，直接影响到邻省云南、四川等省的边境安全。万历四十四年(1616)三月，贵州巡抚张鹤鸣以驻黔官军不满千人(另说有一万三千人)，且事关邻省安危为由，上疏请发给银十万两，以济贵州财力艰难，募兵加饷。兵部议以马价银六万两给之。

河南饥民起事 万历四十四年(1616)四月十九日，河南舞阳、泌阳、遂平等县，饥民数百人纷纷起事，河南巡抚上奏朝廷。神宗以饥民结聚日久，地方有司隐匿不报，降旨切责，并命文武各官防御剿抚，"务期扑灭以遏乱萌"。

亓诗教疏言天下将乱 万历四十四年(1616)四月二十八日，礼科给事中亓诗教疏言时事，以汉、唐、宋三代为鉴，极论天下乱之将始，说：今日之边饷，取之愈穷愈急，用则愈滥愈空，以十室九空之民，半养有名无实之军，半饱有去无来之敌，此颇类似于唐代末年。河北、山东等处，生灵涂炭，盗贼四起，水旱蝗灾频繁，此则颇类于宋末。皇上至今不理朝政，不讲圣学，不祭天地祖宗，皇太子长期不出阁讲学，部院大臣久缺不补，诸臣无心用事，天人交变。"臣恐今日为治之终，乱之始也"。疏呈上，神宗不听。

马从聘致仕 马从聘(1557—1638)，字起莘，北直隶灵寿县(今河北灵寿)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青州府推官，升御史。出理两淮盐课，疏请罢开矿，反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后改为巡按浙江、苏、松，请免增苏、松、常、镇诸府税课。召入为太仆少卿，进右金都御史，巡抚延绥，因失事被夺俸。不久，有战功，不予报，于万历四十四年五月十八日致仕，家居二十余年。崇祯十一年清军攻灵寿，马从聘与三个儿子俱自缢死，年八十二，赠兵部尚书，谥介敏。有《四礼辑疑》、《兰台奏疏》。

山东饥民起义 万历四十四年(1616)五月，江北、山东大蝗，积地尺许，流人集淮上三十余万。同年六月二十日，山东武安饥民三千人发动起义，杀死县主簿孙光耀。

河决朱家口 万历四十四年(1616)六月二十八日，河决河南祥符朱家口，陈、杞、睢、柘城诸州县，皆受其害。主要原因是由于明初所修蓄水斗门，因年久失修，多数遭到破坏。故欲减轻水患，亟需筑堤坝斗门，以广蓄储。

熊明遇疏论"八忧五渐三无"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七月十四日，兵科给事中熊明遇以星变灾异上疏极陈时弊，进八忧、五渐、三无之说。疏中所言八忧有：内库太实，外库太虚；饷臣乏饷，边臣开边；黄河泛滥，运河胶淤等。五渐则有：太阿之柄，渐付中涓；制科之法，渐成奸薮；武库之器，渐至消亡；商旅之途，渐成梗塞等。三无，一是朝廷无纲纪；二是远方无吏治；三是士大夫无人心。八忧未已，五渐继之，五渐未已，三无继之，天下事岂不可寒心！望神宗皇帝

能痛改前非，重振朝纲。神宗得疏，依然如故。更有甚者，当时左右局势的齐党首领亓诗教等人竟以熊明遇与东林党人相通的罪名，将其调为福建佥事，再迁为宁夏参议。

方逢时逝世 方逢时（？—1616），字行之，号金湖，湖广嘉鱼（今湖北嘉鱼）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历任知县、户部主事、工部郎中、宁国知府、广东兵备副使。隆庆初，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再抚大同。其时蒙古俺答所部屡犯边境，方逢时与宣大总督王崇古一起，积极主张与蒙古互通贡市。以安边功，进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与王崇古"首尾共济，边境遂安"。万历五年（1577），上疏反对重开战、罢贡市，极论互贡之利。不久，代王崇左为兵部尚书，兼署吏部事，加太子太保。再以平两广功，进少保。致仕归家，神宗亲手赐书"尽忠"。四十四年（1616）七月二十日卒。方逢时才略明练，处置边事，皆合机宜。其功名与王崇古同，故时称"方、王"。有《大隐楼集》。

归子顾疏言布花之征 万历四十四年（1616）八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归子顾说：嘉定县土田瘠贫，每年所收不能及府中各县之半。永乐间，江南巡抚周忱以土定税，以本县官布十九万匹，准折米十九万石，内折色五万匹，以宽民力。后来重折银，改布样，日朘月剥，民已困累。然而，从未将此列入布花额内。至万历三十年，户部尚书赵世卿以京军急缺冬衣，暂时挪取，遂将此项官布附合于布花，并载入官员考成。后久隔相忘，直用布花名色督征，近来又令久欠之数限期交纳，民何以能堪。请按旧制，不得将官布列入布花项内。使催科之人得以按缓急先后从中调停处置，不至于竭泽为鱼，民或可少困。神宗得疏不理。

黄承玄疏福建海防事宜 万历四十四年（1616）八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抚黄承玄上疏议海防八事：一、整寨游以定经制。二、设标游以备策应。三、重要防以杜窥伺。四、修船舰以足战用。五、恤水兵以除凋敝。六、严巡督以绝偷惰。七、广军储以备不测。八、议征军以收实用。神宗不听。

龙遇奇请罢陕西包税 万历四十四年（1616）八月，陕西巡抚龙遇奇上疏言陕西包税三苦：一、包赔无着之苦。天下税课，便属商贾，陕西三面临边，商贾罕至，历来税额皆派于人丁地亩及津梁、陶穴、筑佣之人。今灾荒严重，死、徙众多，村里为墟，包赔从何而出。二、税额独多之苦。陕西地处边区，土地贫瘠，不但不能与江南相比，即与邻省相较，税额亦为独重。东面山西、西面四川，税额皆止万余，大省河南亦只为六万。陕西地不如山西、四川、河南，而税额竟多至十万。即有减免，已减之额尚多于以上三省未减之数。三、牵误边饷之苦。民止有此财，而官司既督以赔税，自不能并力以输边饷。计十八年来，陕西已输过税额一百五十万两，尚欠边饷二百四万两。催足包赔势必牵误边饷。因此，包税不可不罢。神宗接疏，置之不理。

核查福建盐课 万历四十四年（1616）九月二十一日，户部奏：八闽为大省，产盐最多，盐课仅二万二千余两，似属太少。前福建巡按徐鉴说该省额派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五引，而盐行六帮引少帮多，以致私帮横行。议增二万六千七百七十五引，每年解部银七千三百三十九两，此宜成为定议。又查漳州、泉州、兴化三府，原为行盐之地，近则不买食官盐，置国课于不顾。皆有违祖宗制度。请严行查明其原因，可能有助于国计民生。神宗允其奏。

增九边边饷 九边缺饷，阁臣一再请发库银济边，明神宗始终以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婚礼不敷为词，加以拒绝。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月，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为此上疏，说：今日一二百万两，抚之而有余；如等到将来边境问题严重，即使是动用几千万，仍然不足以安边。神宗不得已同意括内库银三十万两及户、兵二部银八十万两支边。

张鸣冈逝世 张鸣冈（？—1516），江西万安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官御史，因疏劾中官专权，被贬广德州判官。后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力抑税监，为民请命。终南京刑部尚书。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卒。

荆州俊致仕 荆州俊，生卒年不详，字章甫，号吁吾，山西猗氏（今山西临猗）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任长安县令、御史，素以敢言好谏闻名。后被调出为宁夏临巩副使，以边功进刑部右侍郎。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因病致仕。死谥贞襄。

《国朝献徵录》刻行 《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焦竑撰，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明代止刻过一次，清乾隆时列入禁书，因而传本甚少。全书一百二十卷，采有明一代名人事实，其体例是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以下各官，分类标目。其无官者，则以孝子、义人、儒林、艺苑及地方官、寺人、释道等目分载之。自洪武至嘉靖，搜集极博。每个人物事实几乎都论有出处，有些还不见於正史，颇足资考证。

山东农民起义 万历四十四年（1616）山东张国柱等人的起义被镇压之后，又爆发了周尧德、张莱绪、张文朗等人的起义，他们分别在泰山、历城、章

邱、莱芜等处设立头目,四出攻城略地。其中周尧德称“红竿大王”,后改称“平师王”,所至劫富济贫,截杀官兵。山东巡抚李长庚等派兵进行镇压。万历四十五年正月,起义遂告失败。

监犯家属申冤 万历四十五年(1619)二月,镇抚司监犯家属百余人群聚北京长安门外申冤号诉,言:镇抚司理刑缺官,无人问断。监禁日久,死亡相随。因此致有罪者不得依律伏法,无辜者不得早雪其冤,请立即补理刑官,以便审讯明断。大学士方从哲等人亦为此专门上奏,神宗不理。

京察排斥东林党 万历末年,廷臣植党营私,水火相争,几无休止。万历四十五年(1617)三月,神宗命考察京官,由吏部尚书郑继之与署都察院尚书李志主持其事。郑继之为楚人,年老而昏溃;李志则为浙党所牵制,所去留者悉由给事中徐绍吉等人决定,郑继之与李志只是受成而已。一时齐、楚、浙三党盘踞言路,把持政局。他们互相一倡一和,务以攻东林、排击异己为事。起初,叶向高秉政,党争方兴,言路交通吏部,指清流为东林,逐之殆尽,而叶向高不能救。及叶向高致仕,方从哲主持内阁,言路已无正人。至此次京察,齐、楚、浙三党进一步以逐尽东林党人为能事,连退休家居者亦不能幸免,大臣则中以拾遗。从此,善娄为之一空。

刘敏宽致仕 刘敏宽,生卒年不详,字伯功,山西安邑(今山西运城)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累官至总督陕西三边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所至认真讲求战备,先后奏捷三十余次,加少保。万历四十五年四月初六日致仕。

赐蔡应科祭葬 蔡应科,生卒年不详,福建龙溪(今福建龙海)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由瑞州府推官,进户部主事,出守广西,历贵州、广东、广西布政使、广西巡抚,召入为户部右侍郎,死于南京右都御史任上,一生清廉耿介,为世人所推重。万历四十五年(1617)四月十五日赐祭葬。

方从哲请急补缺官 万历四十五年(1617)六月二十八日,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说:部推工部尚书、户、兵二部侍郎以及总督巡抚等官,至今已经两月,仍未见下旨允准点用。工部掌营建,钱粮浩大,事务殷繁;户部司钱粮,事之繁剧倍于他部;兵部职掌兵戎,关系尤为重大。至于封疆大吏,所辖皆为腹心重地,边海要区,河漕大计,俱关国家根本、地方安危,陛下绝不可置于度外。此疏送上,神宗不理。

吴道南致仕 吴道南(1550—1623),字会甫,号曙谷,江西崇仁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后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吴道南为人正直,遇事敢为,明达政体,辅大政不为诡随。万历四十五年七月初五日闻继母死,乃以丁忧致仕。归家居二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文恪。有《日讲录》、《巴山草》、《曙谷集》、《吴文恪集》等书。

《外科正宗》刊行 《外科正宗》四卷。陈实功著,万历四十五年(1617)七月十五日刊行。陈实功(1555—1636)字毓仁,号若虚,崇川(今江苏南通市)人。《外科正宗》是陈实功行医四十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全书四卷,卷一是记述外科常见病的病原、诊断、治疗及调理、禁忌;卷二至卷四为脑疽、脱疽肺痈、疔疮、瘰疬、痔疮、杨梅、金疮、雀斑、冻疮、肾囊、汤疮、火烧、痄瘣、癞疯、白癜风、白秃疮、误谷针铁骨哽咽喉、自刎断喉等等一百多种外科常见病、每病的病理、证状和治疗,有的还有实例,并有三十多种插图,详细描述了各种病的部位及形状。书中还有口腔、肿瘤、耳鼻喉、皮肤等科病的病例,还有手术记录如气管缝合、咽喉食道中异物的取出、鼻息肉的摘除等。《外科正宗》是我国古代外科医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著作。书后附有“五戒十要”,是医家医德的典范教材。

各地呈报灾情 万历四十五年(1617),全国各地水、旱、蝗灾频繁,饥荒瘟疫严重。先是,去冬无雪,入春以后久旱不雨。至三月,江西发生大水。六月,北直隶南部各府饥荒,湖广承天府(相当于今湖北荆州地区)大水成灾,河南开封等处蝗灾。七月,江西大旱,江北、山东蝗灾,福建泉州洪水过后饥疫并生。是年,除江西、北直隶、湖广、河南、山东、福建之外,陕西、山西、广东等省亦先后向朝廷报告灾情,廷臣和有关部门也纷纷请求神宗下令救济各地灾民。神宗一概不予采纳,无视灾民的死活。

柳州大旱 万历四十五年(1617),柳州大旱,融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尤甚,人民死者相继,鬻卖男女不下数千人。

汤显祖逝世 汤显祖(1550—1617),字若士,又字义仍,江西临川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迁礼部主事。汤显祖为人慷慨,有时名,刚直不阿,好言敢谏。万历十八年,神宗以星变严责言官,汤显祖当即抗疏进谏:今日为政之失,在于陛下不慎用爵禄,不爱惜人材,不守祖宗成法,不亲自临朝议政。疏上,神宗大怒,将汤显祖谪为徐闻典史,后迁遂昌知县。万历二十七年大计,被夺官,从此家居二十年。汤显祖一生致力于文学、戏剧研究事业,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万历二十六年著《牧丹亭》,可为其代表作。另外有《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等三种传奇,与《牡丹亭》并称为“临川

四梦”，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张孔教请议处径自去官诸臣　因径自去运官之臣日多，万历四十六年(1618)正月二十一日，吏科给事中张孔教为此上疏说：六科职掌与六部相表里，六科无人则六部事废。以至十三道御史，一人兼数差。在差者，弛担无期；缺差者，弹压无借，故考选台臣与科臣并急。又选补诸臣，有不待允准，不奏而径自出城去官者，今日不知尊主之谊，他日岂望有爱民之政，请严令吏部分别情况，予以议处，以申法纪。

徐大任逝世　徐大任(？—1518)，字重夫，号觉斋，南直隶宣城县(今安徽宣城)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由礼官升南京工部主事、迁吏部主事。后出为参政、布政使、按察使，再召入为鸿胪、太仆卿。徐大任历官中外，皆以廉称，为工部主事时裁减冗费数千万，在真州征税时分文无所私、神宗曾称其清节为天下第一。最后官至南部工部右侍郎，致仕。万历四十六年(1618)二月初四日卒。

曲迁乔逝世　曲迁乔(？—1618)，字允中，号带溪，山东济南府长山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任沁水县令、工科给事中、布政使、按察使、府尹，官终通政司通政使。此人虽颇有才干，但在广西做官时表现平平，名誉不好。万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去世。

郑继之致仕　郑继之，生卒年不详，字伯孝，湖广襄阳县(今湖北襄阳)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初，历官江西余干知县、户部主事、户部郎中、南直隶宁国府知府、四川副使，以亲老归家，久居不出。万历十九年(1591)，以言官推荐，再召起官，先后任江西右参政、太仆少卿、大理寺卿、南京户、吏二部尚书。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召任吏部尚书。时齐、楚、浙三党把持言路往往以其喜怒定大臣进退，郑继之为楚人，且年八十余，凡事皆按诸党意指办理。与齐、楚、浙三党对立的廷臣几乎被贬黜贻尽，忠良为之一空。万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致仕。归家数年卒，年九十二，赠太子少保。

崔景荣封印去官　万历四十六年(1618)二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署尚书崔景荣因屡次上疏乞休，皆不得准，于是日自己封印出城去官。神宗十分不满，说当今部院缺人，非大臣擅自去官之时。

金忠士逝世　金忠士(？—1618)，字元卿，号丽阳，南直隶休宁人(今安徽休宁)。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由知县擢为御史，历按贵州、浙江、河南，所至皆赫赫有声。因直言时政，并疏劾潞王不法诸事，逆旨，被贬为福宁参议，升福建布政使、按察使。再进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奏行备边七事，由此威名大著。万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卒于官。有《旭山集》。

后金攻陷抚顺　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后金努尔哈赤发兵进攻明军。临行之前，努尔哈赤书“七大恨”告天。四月十五日后金步、骑围攻抚顺城，明军游击李永芳投降，守城千总王命印战死，抚顺东册、玛根、丹三城以及台、堡、寨共五百余座悉为后金兵所占据，全城遂陷，后金兵将城中居民尽驱赶到广宁城。同月二十一日，明军广宁总兵官张承荫率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诸营兵援抚顺。后金兵乘胜奋击，张承荫，蒲世芳力战身死，颇廷相、梁汝贵突围后见失主将，亦奋战阵亡。明军将士死亡万余人，幸免者十无一二。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骇。

龙遇奇请立盐政纲法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六日，两淮巡盐御史龙遇奇上书请立盐政纲法，说：祖制，淮盐每年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自套搭行而课额亏。部议谋行见引，附疏积引。但淮南旧引二百万，淮北旧引一百四十万，一朝疏之，诚难于足。今淮南编为十纲，每纲刊定二十万。其挂掣未行引十七万，立附字纲，每年一万七千。带行十年，而淮南可尽。淮北编为十四纲，前三年刻定每纲七万，后三年每纲二十一万，末一年以所余七万并挂掣，极少数附搭行之，行十四年而淮北之旧引可尽。以后逐年止行逐年之引。然法以十四年为期，而新旧道臣相代，不无各立意见。科臣于是欲循弘治、正德之例，各差都御史或科道官一员，一次清理，期内不必续差，庶法立而可守。龙遇奇疏呈上，神宗命著为令，切实遵行。于是立石刻书，用垂永久。

汪道亨逝世　汪道亨(？—1618)，字云阳，南直隶怀宁县(今安徽怀宁)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任郎中、泉州知府、广东布政司布政使、按察使，以征讨钦州农民起义之功，入为应天府尹，仕终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因守边御敌和尽心修筑边墙有功，加兵部侍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卒于官。

陕西雨雪成灾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二十二日，陕西骤降大雨雪，苑马寺、广宁、间城、黑水、清平、万安等六监冻死军马一千九百九十九匹，军士死者二十五人。同年闰四月二十一日再次下大雨雪，冻死人畜无算。

山西介休地震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二十六日卯时，山西介休、寿阳地震。辰时，平遥地震有声，屋瓦皆动，城垣塌倒数处。夜又震，介休为甚。城垣房舍倒塌，压死五千余众。夜二鼓复震，到五月初一日又震。波及榆社、蒲州、静乐、荣河等四十余州

县。震中烈度(Io)Ⅷ,震级(M)六点五级。

敕令辽东文武官不得贻误军机 万历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初五日,神宗令兵部严厉督责辽东地方官,说:近来辽东失城陷堡,损将丧师,大损国威。盖因该处地方官平时失于备战,临战又不能拒敌,疏防玩忽,罪责难逃。你部当严督抚、按各官及沿边将士,亟图战守长策,各处城堡均需用心防守,遇敌应尽力截杀。一旦经略出关,援兵四集,即合谋大举,以振国威。如若再次因循怠玩,致误军机,国法难容,决不轻贷。

京通二仓粮储不足用 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二十四日,总督仓场户部尚书张问达奏言:今仓储空虚,京仓每年支放为二百三十余万石,现在仓之粮为五百八十六万一千五百余石,仅有二年之积。通州仓每年支放七十二万余石,现在仓之粮为三十六万五千八百余石,不过半年之储。所在皆入不敷出,平时已不可支,若有急需更难济事。额之亏,皆由于积弊日久;用之不足,则由于弊之未清。

王士琦逝世 王士琦(1551—1618),字圭叔,号丰舆,浙江临海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重庆知府。时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反叛朝廷,王士琦至松坎予以抚定,遂进为兵备副使,并治其地。不久以山东参政,监军朝鲜,战争结束论功行赏,进秩二级。后因杨应龙复叛,责以不力,被罢职回籍。复起官为湖广右布政使、按察使。居数年,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万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八。

官应震疏陈太仓库匮乏 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二十九日,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奏:太仓之积,初年尚称充足。自征播州杨应龙、征东抗倭、征宁夏哱拜三大役费银多达一千二百余万两之后,渐告空虚。近来又因皇太后李氏逝世、福王赴封地、瑞、惠、桂三王婚礼等共费银至七十余万两。太仓每年所入止三百七十余万两,正额原以供边饷,而今诸费皆取于此,加以灾伤减免救济,太仓岂能不匮!

《玉堂丛语》刊行 《玉堂丛语》八卷,焦竑撰,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刊印。该书是万历以前翰林人物的言行录。书中所述,多是作者耳闻目睹,或采自有关人物的传记、碑铭与年谱以及文集、笔记和杂著。保存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史料。其他如叶淇盐法纳粟实边的开中法,周忱济农仓屯谷法,勋贵庄田增税、市场米麦价格、官僚横行乡里及地主的骄奢生活、官场行贿之风,以及农民起义与宦官干政等等方面,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

工部等拒绝借银助边 万历四十六年(1618)六月初八日,因军饷缺乏,外解之银不至,户部商议向工部、太仆寺各借现银五十万两,以济九边军需。工部、太仆寺各以库贮无几为由,拒绝借给。神宗令工部与太仆寺各借给二十万两应用,其余陆续给发。

太仓入不敷出 万历四十六年(1618)六月二十一日,户部尚书李汝华说:太仓每年收入三百八十九万两,支出边饷三百八十一万两,其余库局内外等用又约四十万两,出大于入。以内供而言,万历六年进过大工铺宫各库监局钱粮共计八十七万六千三百七十五两。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共进过诸王册立分封冠婚典礼各钱粮共二百五十五万七千二百四十七两,几乎为一年之收入。再以边饷论之,九边十三镇边饷,隆庆间每年共为二百三十九万两左右,今增至现银计三百八十一万九千零二十九两。加以各省直奏留赈济灾民,仃征减免,太仓亏额尤不堪言。

户部议筹辽东兵饷 万历四十六年(1618)六月户部奏:辽东兵饷,经议需用银三百万两。今内库已发一百万两、南京户、工二部五十万两、太仆寺及水衡八十万两,总计二百三十万两。但因此中未解者尚多,而数月以来调兵辽东安家诸费已达五十三万余两。以前科臣曾建议用俊秀监生捐官纳钱,此办法在山东救荒时曾经实行过;再用裁减衙门役夫工食之半,此在以往东征抗倭时亦一度实行过,请依故事予以允行。神宗下诏从其议。

吕坤逝世 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知县、户部主事、户部郎中、山东参议、山西巡按史、陕西右布政使,再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三年后,召为左佥都御史,官刑部左、右侍郎。吕坤性刚直,好言敢谏,论天下安危。后致仕家居。万历四十二年,福王朱常洵就藩,要求赐田四万顷,吕坤上书说:国初分封亲藩二十有四,赐田无过万顷。河南已封周、赵、伊、徽、郑、唐、崇、潞八王,若皆取足四万顷,则为两河郡县之半,望陛下裁减。万历四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三。天启元年,赠刑部尚书。吕坤在家,教授生徒,著述"多出新意"。有《实政录》诸书存世。

后金攻陷清河堡 后金军队继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攻下抚顺之后,又于同年七月自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西南进入,围攻清河堡城(今辽宁本溪地)。明军守城副将邹储贤、参将张方旆,以兵万人固守城上,发巨炮还击,后金兵以云梯登城,明军不能支,城遂陷。邹储贤、张方旆皆战死。清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居四山之中,东距宽甸(今鸭绿江以北、丹东以上),南距叆阳(今辽宁凤城东北),北距沈阳。清河一失,金辽震惊,辽东由此而失屏障。在后金军队围攻清河堡城时、神宗曾下令调山海关、保

定、铁岭、大同、广宁、开原诸路兵赴援，尚未出关，又特赐辽东经略杨镐尚方宝剑，得斩总兵以下官。杨镐乃斩清河逃将陈大道、高炫徇于军。直至入冬，四方援兵始集。

户部议改折南京仓粮充边饷 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月十一日，户部议改折南京仓粮充边饷，已报行。而南京户部则只同意以今年仓粮之半改折济边，另一半留给军士。户部说：万历二(三)十五年南粮，今始动支，则实有九年之积，改折二年何损。神宗命下会议。至同年十月十七日经会议定改折南京仓粮一年助边。

开海运通饷辽东 明初曾行海运，通饷辽东。后一度停止。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月，以辽东形势日趋危急，兵饷缺乏，又议开海运饷辽。当时议行登、莱海运，山东巡抚李长庚说：自登州望铁山西北口至羊头凹，历中岛、长行岛抵北信口，又历兔儿岛至深井，至盖州，剥运一百二十里，至娘娘宫登陆，至广宁一百八十里，至辽阳一百六十里，每石所费不过银一两。"户部会议以为便"。神宗于该月十六日下诏行之。

命户部发银慰劳辽东将士 万历四十六年(1618)九月二十三日，神宗命令户部发银二十万两，慰劳辽东前线吏卒。

"三饷"加派 以前已有过额外加派。嘉靖时，"东南被倭，南畿、浙、闽多额外提编，江南至四十万。提编者，加派之别名也。"但那时都只限于局部地区。而明末"三饷"加派则不同，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所谓"三饷"，即辽饷、剿饷、练饷，是为了对付辽东战争和镇压全国各地农民起义而加征全国田赋的一项苛政。辽饷，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九月，至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第三次加派时，每亩共计加派银九厘，全国总共增赋五百二十万两左右。剿、练二饷，出现于崇祯朝。"三饷"流毒全国，致民怨沸腾，从而加速了明皇朝的灭亡。

山西蔚州地震 万历四十六年(1618)九月三十日，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广灵等处地震，官民庐舍多圮毁。河北延庆卫地震，幞山崩。易州、庆都(今望都县)、定兴、清苑、涞水、唐县、河间、任丘、景州、肃宁等州县，及紫荆关、马水口(今涞水县北)、沿河口(今怀来县南一百三十里处)，天津三卫等处，同日俱震，有声如雷。东安、香河、遵化、保定府、容城、新安、宣府、万全都司、顺圣川西城、龙门卫、广昌以及山西省代州、五台、保德州、偏头、神池、阳曲、寿阳、太原、盂县，同日皆震。三十日巳时，寿阳再震，其声如雷，房屋动撼。午时，云西堡(在左云县东北)亦震，房屋多摇动。是日，山西、河北等四十余府州县俱震。震中烈度(Io)Ⅶ，震级(M)为$6\frac{1}{2}$级。

韩取善逝世 韩取善(？—1618)，山东济南府淄川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以户部郎中管粮宣府，进为布政使。不久赴辽东备兵，升辽东巡抚，因事被革为民，回籍。万历四十六年(1618)十一月三十日卒。

《客座赘语》刊行 《客座赘语》十卷，顾起元撰。万历四十六年(1618)戴惟孝刊印。顾起元(1565—1628)，字太初，号遯园居士，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编修，国子祭酒、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后七征不起，居家著述。本书内容丰富，有南京地方文献及金石资料考证，南京山陵水道、宫阙遗址，寺观旧迹的记载，有赋役制度、漕运典章制度的记述，有习俗风尚的变迁，有文人学士掌故逸事的亲见亲闻。是颇有南京历史面貌特色的资料书。

谢肇淛撰《五杂俎》 《五杂俎》十六卷，谢肇淛撰。有万历间新安如韦馆刻本。全书分天、地、人、物、事五部。谢肇淛字在杭，福建长乐人。记述了江南新安与山西商人的情况，记述了江南福建商业、手工业、生产工具、营造技术、建筑工程、农业工具、以及甘藷新品种的推广。本书是研究明代史，尤其是研究明代经济史颇为有用的史料。

余继登撰《典故纪闻》 《典故纪闻》十八卷，余继登撰。万历间由王象乾刊刻。余继登字世用，交河(今河北泊头市)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曾充任过《明会典》副总裁。此书就是据实录和起居注中有关治道资料摘编的。卷一至卷五为洪武朝，卷六至卷七为永乐朝，卷八为洪熙朝，卷九、十为宣德朝，卷十一至卷十三为正统、景泰、天顺朝，卷十四卷十五为成化朝，卷十六为弘治、正德朝，卷十七为嘉靖朝，卷十八为隆庆朝。除政治、经济、及典章制度外也记述了一些社会情况。由於余继登熟悉列朝实录及起居沦，再加上他的耳闻目睹，因而本书所记多为其他书所未有，是研究明史、尤其研究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书。

董承诏疏言辽东六难 万历四十六年(1618)十二月二十五日，兵部员外郎董承诏认为明军在辽东的战事有六个困难：一、将多而难调。二、兵弱而难用。三、饷久而难继。四、后金狡猾而难制。五、地险而难攻。六、助寡而难恃。其中将多而难调，从历史上看可以唐代九节度的军队溃败于相州为证。时人咸以为董承诏所论至为切中要害。而神宗置之不理。

王元雅上言边务之策 万历四十七年(1619)

正月十九日，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王元雅以辽东等处军事紧急，上书献六策。其中有：严责成、别功罪、戎欺蔽、督粮草、核战具（火器战车）等。明神宗接到奏疏，以为王元雅所言甚有道理。但不付诸实行。

命增惠、桂二王婚费 明神宗有八个儿子。其中，第六子惠王朱常润和第七子桂王朱常瀛，皆为李贵妃所生。惠王择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七月初三日结婚，桂王定于同年八月初八日结婚。是年正月二十八日，户部议惠王和桂王的婚费各为银七万两。神宗命各增加一倍，即每人各为银十四万两。

杨镐辽阳誓师 万历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初二日，杨镐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杨镐乘努尔哈赤即将率兵进攻海西卫扈伦四部之一叶赫部之机，在辽阳举行誓师，分兵四路向后金发起全面进攻，令开原总兵官马林督兵四万人，由开原会叶赫部兵二万人，出北路；令山海关总兵官杜松统军六万人，由抚顺出西路，直攻后金首府兴京（今辽宁新宾西老城）；令辽东总兵官李如柏率兵六万人，出南路；令辽阳总兵官刘继帅军四万人，出东路，会朝鲜兵二万人，入宽甸口。各路皆配备监军、助理，总数号称大军四十七万人，各总兵官誓神明，宣军令，并将在抚顺临阵逃脱的指挥白云龙斩首示众，以为警戒。定于三月二日分道并进。

特设户部侍郎专督辽饷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二十二日，神宗命特设户部侍郎一人，驻扎天津，专门负责辽饷事宜，以李长庚兼右佥都御史，出任此职。李长庚接到任命之后，立即上疏请造战船、通水路、议牛车，严海防。当时有关衙门商定每年运给辽东米一百八十万石、豆九十万石、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银三百二十四万两。户部太仓库年年亏空，而专供皇帝使用的内府库则银积如山，物料盈库。于是，李长庚请留金花银改折借税课，以供辽饷之用。他说：据《万历会计录》所载：每年本色、折色通计有银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余两，入内府者六百万余两，入太仓者自本色之外，折色为四百万余两。内府六百万两，除金花、籽粒外，皆为丝、棉、布、帛、蜡、茶、颜料之类，年久皆朽败。把这类物料改折一半（另说“改折一年”），于上无损，于下有益。其他，如陕西羊绒、江浙织造，亦当暂停一年，以济军国之需。神宗看到李长庚的奏疏，大为不满，说金花、籽粒是“祖宗旧制”、“内供正额”，“不得借留”。

萨尔浒之战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杨镐在辽阳誓师之后，由于大雪迷路，各军不能按原定日期分道进攻后金，而军中机密则已经泄露出去。努尔哈赤得讯，制定了“凭你八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方针，相机以待，准备迎击明军的进攻。三月初一日，明军西路总兵官杜松欲夺头功，首先率军渡浑河（辽河支流），连克两小寨，遂乘势冒进浑河南岸的萨尔浒山谷口。努尔哈赤得知消息，以精锐骑兵埋伏于谷口。待杜松军过而将半时，后金伏兵骤起，明军损失严重，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杜松部全军败没，杜松战死。紧接着，后金迅速回师击明军北路马林一军。马林得悉杜松大败，企图结营自固，后金集大兵奋力攻击，三月初二日，马林又大败。此时，辽东经略杨镐以西、北两路皆败，急令东路刘綎和南路李如柏立即停止前进。李如柏奉命回师。而刘綎一军已经深入三百里地，明军继续英勇作战，后金不能破。努尔哈赤遂施展计谋，指使明军降兵持杜松令箭，诡称杜松军已经获胜，诱刘綎军直前深入，终于使之遭到后金的前后夹击。三月初七日，刘綎力战死，全军覆没。仅李如柏一军得以撤回。这场战争历时仅五天，明军三路丧师，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余人、士兵九万人（一说四万五千多人）、马四万匹，军械不计其数。明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朝廷内外一片震惊。有人上疏弹劾杨镐、李如柏，神宗不听。李如柏自杀。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之间极为关键的战争。辽东局势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后金从防御转入进攻，为其后入关打下了基础。

发税银及宫费给辽饷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十八日，神宗命内阁发税银三十六万两及宫费给辽饷。

薛三才逝世 薛三才（？—1619），字仲儒，号青田，浙江定海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改庶吉士。历任兵、户、礼三科给事中，数上书言事，多为采纳，著为令。升湖广参政，节省经费数十万。不久，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裁兵清饷，筑堡修屯，所省粮料银达二十万。再进为总督蓟辽、保定军务，调兵筑营、练火器、修战车。遂以功命为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万历四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卒于京师，赠太子太保，谥恭敏。有《薛恭敏集》。

黄嘉善请动用各项银两援辽东 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明军在辽东三路丧师之后，辽东等地的形势日益紧张，急需大量增加经费，补充兵马，购置军械，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为此，兵部尚书黄嘉善于同年四月二十日上疏，请将各省直的绝军变产银、缺官柴马银、拖欠太常寺马价银，全部解给兵部支用。各省直的税契银、布政司吏纳班银、各州县仓米平粜一半折价银、各运司积余盐课银、河南省的河工节省银、兑军买米节约银，以及各王府、宗藩、勋

臣、土司的议助银、内外各官捐俸银，皆以一半解给兵部，以为抚恤、买马之费。又说：今由兵部暂借太仆寺银、南京兵部银、南京户部银、南京工部银各十万，及早购买马匹，以济边事急需。应造盔甲器械，由工部视情动支各项银两，从速建造，务必做到兵到即给，以便训练。神宗允其议。

援辽军大量逃亡　由于明军屡遭失败，各地援辽军队在赴辽途中纷纷逃亡。万历四十七年(1619)五月十七日，陕西延绥镇(即榆林镇)游击袁大有带领援辽士兵一千余人，至北京昌平时逃亡七百余人。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大同游击焦垣督援辽士兵八百人，到达河北怀来，军士哗变，焦垣本人也私自逃跑。第二年十月，湖广保靖宣慰使彭象乾统援辽兵至北京通州，彭象乾患病，是夜部兵三千人私逃。

李新起义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五月，福建漳州府民李新发动起义，建元"洪武"，与袁八老等人率众一千余名，攻打各地，声势甚大。福建巡抚王士昌令副将纪元宪、沈有容等带领官军前往镇压，起义旋即失败。

林如楚致仕　林如楚(1543—1623)，字道茂，号碧麓，福建侯官县(今福建福州)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授刑部主事。曾督学广东，好贤能，得士甚多。官终工部尚书。万历四十七年(1619)五月致仕。天启三年卒，年八十一。有《碧麓堂集》。

努尔哈赤攻陷开原　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努尔哈赤亲自统兵四万人(另说一万人，又一说六万人)进攻辽东重镇开原。明军开原总兵官马林不吸取萨尔浒之战失败的教训，不知集兵守城，兵尽在四门之外，城中空虚，毫无防备，闻后金兵抵城，慌忙应战，立刻溃败。六月十六日，后金兵占领开原，总兵官马林、副将于化龙等一批将吏战死，士兵伤亡惨重。当时明军铁岭卫派出三千人赴援，也为后金兵所败。至七月二十五日铁岭亦被努尔哈赤攻陷。

熊廷弼经略辽东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略辽东杨镐三路丧师时，朝廷以熊廷弼熟悉边事，即命其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同年六月二十二日，神宗以杨镐无能不堪重任，罢其职，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慨然从命，以尽忠报国，效死疆场为己任，立即上疏朝廷，说：辽东为京师肩背，河东为辽阳腹心，开原系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不收复。请令从速调兵遣将，备好粮草，修造器械，及时供应。并请给予便宜行事。神宗一一如其请。赐尚方宝剑，以重事权。熊廷弼得旨，马上离开北京，抵山海关时，得知铁岭亦已为后金军队所占领，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纷纷逃走，辽阳也岌岌可危。他毫不畏惧，日夜兼程，于八月三日赶到辽阳。入城之后，熊廷弼雷厉风行，诛斩逃将、贪将，奏免铁岭总兵官李如桢，并亲自巡视城防，督造战车，治火器，修城池，招集流民，积极备战。后来又请调兵十八万人，分布于抚顺等要口。神宗亦俱可其奏。自是，辽东人心暂时稍为安定。

杨镐下狱论死　杨镐(？—1629)，字京甫，号凤筠，河南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累官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倭将行长、清正屯蔚山，杨镐进兵久攻不下。行长援兵至，杨镐大惧先奔，丧师二万，反以捷报告朝廷，神宗得知真情大怒、欲诛，辅臣营救得免。万历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后金攻辽东，杨镐奉命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五月，又令兼任辽东巡抚，八月赐尚方宝剑。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杨镐三路败北时，御史杨州鹤等人即疏劾他失职，神宗置之不问。及开原、铁岭相继为后金攻陷之后，言官不断请治罪杨镐，神宗才于同年八月十三日下诏逮杨镐入狱论死。崇祯二年(1629)处斩。

熊廷弼请征土司兵援助辽东　万历四十七年(1619)九月，辽东经略熊廷弼以土司兵精整可用，上疏请征调湖广宣慰司士兵八千人，四川永宁宣抚司兵五千人、酉阳宣抚司兵四千人，石砫宣抚司兵三千人，往援辽东。并请令各帅亲自带领，且以名将为大帅直接统军。又说：历来土司兵只于附近地方调遣，故官无加衔之例，兵无安家之例。今自西南远调东北，道远疲苦，宜予周到体恤，土司正官应予加衔，兵士应给以安家银两，以资鼓励。神宗许其奏。同年十一月，神宗又从兵部左侍郎杨应聘之请，令征湖广永顺宣慰司兵八千人、保靖宣慰司兵五千人援助辽东。

赵焕逝世　赵焕(1542—1619)，字文光，号吉亭，山东掖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任知县、工部主事、御史、顺天府丞，左佥都御史、工部右侍郎、吏部左、右侍郎、刑部尚书，以建言逆旨而被罢家居十六年。后复起为原官，兼署兵部。万历四十年，调为吏部尚书，奏补给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称盛。是时廷臣立党相争，朋党势成，赵焕素不好东林党人，齐、楚、浙三党乘机利用他，排挤异己，打击东林。给事中赵兴邦、李成名等人遂劾赵焕"徇私"、"伐异党同"，万历四十一年十月赵焕被迫致仕归籍。万历四十六年，为吏部尚书。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赵焕卒，年七十八。天启初赠太子太保。

黄承玄逝世　黄承玄(？—1619)，字履常，号与参，浙江嘉兴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工部

主事，经理修浚泇河。进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颇有政绩。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卒，赠工部左侍郎。有《盟鸥堂集》、《北河纪略》、《河漕通考》等。

孟一脉逝世 孟一脉（1539—1619），字淑孔，山东东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平遥县令，以勤廉著称，升为南京御史，刚正不阿，直言好谏。万历六年五月，疏劾张居正迫害邹元标、吴中行等“五直臣”，不是爱忠良，施仁义，被革为民。张居正死，一脉复原官，疏言时政五事，逆旨，被贬为建昌府推官，后迁为南京右通政。万历四十一年（1613），起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不久以病致仕。成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卒，年八十一。

王在晋疏言防夷十要 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十二日，山东巡抚王在晋议防夷十要：一、严海禁。二、勤巡查。三、守金（州）、盖（州）。四、巩固山东。五、结交西北各族。六、保朝鲜。七、鼓舞将吏。八、抚恤军士。九、广用官员。十、防冬令。神宗将此疏留中不发。

熊廷弼疏言辽东战事方略 辽东经略熊廷弼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二十四日上书奏陈辽东战事方略：今日制敌之策有三：一是收复失地，二是出兵进剿，三是因守险要。收复、进剿为时过早，上策应是固守，派重兵布防清河（今本溪）、叆阳（今凤城东北）、抚顺、三岔河等各个险要之地，积极防御，以守为战。并具体陈述了各地军事形势、兵员配备及制敌方略。同时提出为了便于征行居守，对付后金十万名军队，需要召募和征调官兵十八万人，马九万匹。每名士兵年饷银十八两、十八万人，该银三百二十四万两。又每名士兵月给米五斗，该粮一百零八万石。马每匹日给豆三升，九万匹，该豆九十七万二千石；草每日一束十五斤，每年除四个月有青草可食不给外，八个月共该用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若小束则倍之。此皆不得裁减。神宗从其言。熊廷弼“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亦有斩获功”，取得了局部性胜利。

新募援辽士兵多数逃亡 招募新兵是明皇朝为扭转辽东战局，在军事上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但多数应募者入伍之后即私自溃散。辽阳人、御史刘国缙募辽人为兵，所募十七万四千余名，分置于辽东地区镇江、宽甸、叆阳、清河等处，至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河新募之兵全部逃散，镇江、宽甸、叆阳等处亦逃亡过半。其后，巡按辽东御史陈于庭在其奏疏中亦言，所募新兵逃亡严重，仅据各处将领不完全的报告，即有：熊锦部逃亡一千九百余人，杨于渭部逃亡一千五百余人，卞为鹏部逃亡二千六百余人，李如柏部逃亡四百七十余人，赵率教部逃亡四百九十余人。由于逃亡数多，兵力单弱，请急命增募。神宗置之不理。

再加田赋补辽饷 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以辽饷不足，神宗从给事中、阅视辽东兵马的姚宗文之请，下令再加全国各直省田赋，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共增收田赋银二百万余两。是年全国田赋总八百万两。其中，辽饷三百二十四万两，车三万七千辆，牛七万四千头，并加紧制造器械。辽东饷司每年用银达五百万两以上。

王森逝世 王森（1542—1619），原姓石，名自然，后改王道森，再改名王森，直隶蓟州人。幼习皮匠，后以救狐得信香而创闻香教。自称闻香教主，再创弘封教。与无为教、棒检会多相联络，支派繁多，自称白莲教教主。因其长期传教，教徒遍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多至二百余万。万历二十三年（1595），王森以左道乱正之罪被捕判刑，行贿得释。继而入京传教，于万历四十二年再次被捕，万历四十七年死于狱中，年七十九。其子王好贤与徐鸿儒发动起义，失败而死。

杨应聘逝世 杨应聘（？—1620），字行可，南直隶安庆府怀宁（今安徽怀宁）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官知县、户部主事、右佥都御史、宁夏巡抚、右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陕西三边总督、代兵部尚书。在陕西三边总督任上，英勇作战，屡立战功，深得朝廷赏识。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署兵部尚书时，上疏神宗请调湖广等省土官兵二万余人援助辽东，亦得允准。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初六日卒，赠兵部尚书。

第三次加征田赋 万历四十六年（1918）九月，以辽东军饷不足，每亩加赋银三厘五毫，全国共派银二百三十一万两。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神宗又从阅视辽东兵马给事中，姚宗文之请，令每亩再加银三厘五毫，全国增派二百万两。万历四十八年初，辽东经略熊廷弼上疏说：辽东军饷仍然缺乏，兵无粮，马无料。于是户、兵、工等部商议，请神宗再令各直省田地每亩复加银二厘，以补兵、工二部不敷之用。为此，从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开始第三次加征全国田赋，连同前两次每亩计加银九厘。这年全国共增收银五百二十万两，遂为岁额。这一次不加征田赋的省直有北直隶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八府以及贵州布政司（一说北直隶八府没有除外）。时人指出：自辽东战争以来，每亩增赋银至九厘，企图竭全国财力以挽救辽东，而实际结果是民益困而国家财力日趋枯竭，全国已经处于危亡之中。

秦良玉援辽　秦良玉，四川忠州（今四川忠县）人，饶勇有胆略，善骑射，通诗词，明礼义。治军有方，所部号“白桿兵”，纪律严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曾统兵讨伐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为朝廷立下了战功，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女土官。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初四日，朝廷以辽东前线兵力不足，调秦良玉兵援辽，她派其兄秦民屏、弟秦邦屏率三千人先行往辽。神宗为此赐她三品官服，授秦邦屏为都司佥书，秦民屏为守备。秦良玉上疏朝廷，说：派三千人往辽，恐军声不振，准备再派三千五百余人，请配给战车火器。神宗准其请。后来，当秦良玉督兵至山海关时，兵部议再征四川土司兵二千人，秦良玉即与秦民屏驰回四川。抵家第二天，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在重庆起兵反叛朝廷，秦良玉遂统兵征讨。秦邦屏于天启元年在渡浑河（辽河支河）时战死。

皇后王氏病逝　王氏（？—1620）浙江余姚人，生于北京，万历六年（1678）册立为皇后。王氏为人端谨忠厚，深得神宗生母孝定李太后欢心。皇太子朱常洛在东宫时，几次遇到危难，王氏悉心调护，转危为安。神宗专宠贵妃郑氏，王氏不予计较。正位中宫达四十二年，始终以慈孝著称。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卒，谥孝端。后与神宗合葬于定陵。

张铨谏止辽饷加赋　巡按江西御史张铨怀忠守义，正直敢言。万历四十六年（1618）夏，曾上疏批评神宗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是不识将才，后来又批评杨镐四路出师，孤军直入的错误战略。至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神宗下令第三次加征全国田赋时，张铨于同年四月再次冒死上疏，用极为生动的语言说：比如人的一身，辽东为肩背，天下为腹心，肩背患病、依靠腹心的血脉滋灌；如果腹心先溃烂，危亡必立至。竭天下之血以救辽东，辽东未必能救，而天下必先已危。为今之计，应当联络人心以固根本，不可剥民无已，一再加赋，扰乱天下，驱民致乱。内廷库积如山，廷臣屡次请发内库银供辽东兵饷之用，陛下概置之不理，而对于加派之议，则朝奏夕可。为臣实在不得其解。

焦竑逝世　焦竑（1541—1620），为明代著名学者、史学家，字弱侯，号澹园，嘉靖二十年（1541年）生，南直隶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自幼爱好浏览本朝名宦事迹，留心时事，进而研习明朝典章制度。从万历二十二年起，撰写明史《经籍志》。后为皇长子朱常洛讲官，执教有方，善于诱导，多次受到朱常洛的称赞。由于他为人正直，言论行事，不迎合权贵，为此常常受到权贵们的憎恨和打击。万历二十五年，主持顺天乡试，以所取举人语多“险诞”，被弹劾，贬为福宁州（在今福建宁德地区）同知。后复坐事落职，从此闭门不出，专门从事著述，并在南京讲学，盛极一时。焦竑博览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融会贯通，尤精于史学，一生勤奋笔耕，著述宏富，现存世有《国朝献征录》、《玉堂丛语》等等。焦竑去官家居二十年，于万历四十八年（一说四十七年）卒，终年八十岁。福王时，追谥文端。

朱翊钧逝世　朱翊钧（？—1620），隆庆六年（1572）六月初十一日即位。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卒于弘德殿，年五十八。在位四十八年。遗诏命封皇贵妃郑氏为后；罢矿税，召回监税宦官。九月，谥显皇帝，庙号神宗。十月，葬于定陵。神宗十岁登基，用张居正掌管军国大事，不为无功。然长期不理朝政，致内治不修，群小植党营私，纷争不止，遂开晚明宫廷三大案之先河，并由此株连众多无辜。在军事上，边备废弛，战事连年，万历三大征和与后金进行的辽东战争，耗银近二千万两，致使民穷国匮。在经济上，贪财溺货，从万历中期开始，遣税使、矿监四出扰民，盘剥勒索，致民怨沸腾，山东、云南、湖广、南北直隶、福建、广东等省民众纷起反抗。又首创“辽饷”，开明末“三饷”加派之先例，结果田赋愈加征，辽东明军失败愈惨。在用人方面，处处重用宦官，排斥忠良，为此后天启朝宦官祸国殃民埋下祸根。时人评论说：万历一朝是民益贫而吏益贪，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惟知害民，百官不知职业惟以营进。又有人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些评论不是毫无根据的。

易应昌极论时艰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二日，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上疏极论时政，说：今日国势，最令人担忧的有六事。其中最危险的是以下三件：一、天下之兵未可恃。募兵未必有人响应，应而复逃；调兵未必至，至而复逃。而且兵饷甚缺。二、天下之食未足恃。无一年不旱涝，无一地不旱涝。淮南有粮三十万石苦于无船可运；山东征粮六十万石，既无粮又无船。三、天下民心不可恃。各地士兵逃亡，哗变接连不断；饥民蜂起，百姓起义，此伏彼起，地方不靖，无一可恃。请急宽民力，以救民困，广用仁贤之臣共理政事。又请皇太子自捐辽饷一年之用。皇太子对此不予理采。

皇太子朱常洛命令重兵护卫禁城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九日，皇太子朱常洛命令禁门屯卫各门勇士营兵二千八百七十九人护卫禁城（紫禁城）四门，兵一千二百四十八人护卫皇城之门。

李汝华奏报边兵、犒赏数额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九日，户部尚书李汝华奏报：各边士

兵八十六万七千九百六十四人，宜分别给赏。最近发库银一百万两，今又发了三十万两，连同以前发的三十万两，总共一百六十万两。计划以十之六为犒劳费用，十之四作为赏赐，以遵诏旨。皇太子朱常洛准之。

朱常洛即皇帝位 朱常洛，明神宗长子，母恭妃王氏，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未时生。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立为皇太子。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即皇帝位，大赦囚犯，免各直省被灾田租，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后因光宗即位一月而病逝，以御史左光斗之请，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光宗未登基时，奉神宗遗诏发库银一百万两，赏赐九边吏卒，并罢矿税以及监税太监。后又发库银一百万两犒劳边兵。

停止应天诸府三运 泰昌元年(1620)八月初二日，巡按直隶御史田金生疏奏：工部坐派南直隶应天、徽州、宁国、广德三府一州织币三万二千九百匹，岁造不计在内。这些原无额编，惟留工部各司料价支之。按价值、铺垫等银三十二万零五百九十余两，历年存库及见征料价止十六万一千二百多两。除初运外，次运仅十之二三，后运不知从何而生。大抵一运之费，非三年料价不能供；三运之需，非三年蓄积不能办。为此，除岁造照例进呈外，其改造三次，请准停止。疏入，如其请。工部奉命核定苏杭当停者。

山东留银备荒 泰昌元年(1620)八月初三日，户部尚书李汝华上疏说：山东巡抚王在晋报告海运六十万石，尚欠一半，欲留解进户部的银两。当前京边皆急需用银，只有以平价收籴可以通融。今山东报仓谷七十万余石，请以其本平籴。万历四十八年该省加派田赋银为五十四万余两，拟以二十万余两解运户部，三十四万籴两用为收籴仓谷，以为明年备荒之用。以使上下两便。光宗从其请。

发库银修皇极殿 泰昌元年(1620)八月初四日，刑部尚书兼署工部尚书黄克缵上疏，请发库银二百万两修皇极殿。光宗允其请。

周朝瑞上慎初三要 泰昌元年(1620)八月初五日，吏科给事中周朝瑞疏陈初政宜慎三要：信任、行仁、远斥奸佞。光宗得疏大怒。三日之后，宣谕阁臣，周朝瑞停止金花银之议尤为渎扰，诏谪其官。

骆思恭请补锦衣卫旗校 泰昌元年(1620)八月初十日，锦衣卫代理卫事骆思恭上疏说：祖宗朝设旗校十万人，备法驾。万历初年，尚有二万人。今只有一千人。请诏令兵部酌情补充。疏入，命兵部酌议。

史永安奏陈交济之道 泰昌元年(1620)八月十三日，监察御史史永安奏陈：交济之道，人臣所自靖有二，一为严章奏之体，宁简勿繁，宁显勿隐。如陈事达其事而止，论人备其事而止，俾万机之暇，一览无余。使言路永开。二为矢献替之忱、洗涤寸心，滋培元气，不当言则瓶可守，当言则鳞可批。大抵言期于宗社，不必矜名节，言期于国是，不必附清流。至圣明在上，御下之威宜斋，兼收之益宜弘。光宗是其言。

冯三元奏请预备经略 泰昌元年(1620)八月二十日，监察御史冯三元奏请预备经略：今日辽东，天下视以安危。羽檄征兵，飞刍挽粟，水陆兼输，调募并用，悉以为辽。岁中财费几何？士马物故几何？进守仅一沈阳，而屯堡之侵克不与。如此用兵，不下数年，膏火自煎，此立罄之术。兵贵用谋，岂必待十八万而后有为，熊廷弼别有长策，非臣所知，据其引疾，似亦强弩之末，乞急简才臣数人，一旦有急，可以取资左右。

飓风损坏登莱漕船百余艘 泰昌元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飓风损坏山东登州、莱州二处运粮漕船一百多艘，沉溺大米三万九千余石。

淮北及镇江、苏州、松江等府大饥 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饷司杨嗣昌奏言：臣在应天，闻听淮北居民食尽草根树皮，甚或数家村舍，合门妇子，并命于豆箕菱秆。比渡江后，灶户在抢食稻，饥民在抢漕粮，所在纷纭。一入镇江，斗米百钱，渐至苏、松，增长至百三四十而犹未已。商船盼不到关米，店铺几于罢市，小民思图一逞为快。

沈儆炌请云南贡金仍按旧额 云南进贡朝廷的黄金，隆庆以前定额为每年二千两。隆庆四年(1570)令增贡额，以当地抚按官奏请而止。万历十年(1582)，神宗命云南每年增加贡金一千两，由于当地官员极力反对而暂时没有实行。万历四十七年沈儆炌巡抚云南之后，神宗爱财之心不改，又命云南每年增加贡金二千两。沈儆炌上疏力言不可，神宗不听。神宗逝世以后，泰昌元年(1620)八月二十五日，沈儆炌再次上疏，请求云南贡金仍按隆庆以前的旧额每年二千两，以减轻边民困苦。光宗皇帝诏准其请。

范济世奏请申惩贪酷 泰昌元年(1620)八月二十七日，吏科都给事中范济世请申惩贪酷：近年法度陵夷，贪残接迹，此其病在借口怜才。有才而残民蠹国，又何利于若才而用？如郑之范作令贪甚，以小才遂及宽政，追守开原，复私放军士，致陷重城，人顾惜之曰使可改图。谁见失节之妇，晚以清白自见哉！且今之求多者，大约乡科岁贡。甲科监司已为之地，不使闻于直指；即赃私狼藉，怨读言沸腾，又多方为之解说此为甲科，仅仅降调，不二三年俨然复其故物，彼何惮而不恣肆呵！今后御史弹劾贪酷之吏，下

臣科抄参,吏部行巡按御史讯实。光宗允准。

朱常洛逝世 朱常洛(1582—1620)。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皇帝位。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日卒于乾清宫,年三十九。在位一月。十月谥贞皇帝,庙号光宗,葬庆陵。光宗在位期间,力行新政,诏罢榷税、矿税,撤回监税宦官;先后以吏部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㴶、礼部侍郎何宗彦、刘一燝、韩爌、南京礼部尚书朱国祚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改变了此前内阁方从哲一人当政的不正常局面,同时起用了一些万历朝被斥官员。因光宗病危时,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仙药"红丸,服后即死。于是有人提出李可灼乃神宗郑贵妃所指使,故意毒死光宗。由此引起争论,一场震动朝野的"红丸案"即随而起。

"红丸案"始末 泰昌元年(1620)八月,光宗病重,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泻药,光宗服后病情更加严重,一昼夜起来三、四十次,廷臣纷纷指责崔文升不知医,妄进药,也有人怀疑是神宗的郑贵妃所指使。八月二十九日光宗病情进一步加剧,由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光宗服后于九月初一日病死,朝廷内外因之议论纷纷。御史王安舜首先上疏,请重治李可灼。继之,御史郑宗周、郭如楚、冯三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惠世扬、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人先后上疏请斩崔文升、李可灼。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还上疏请究治崔、李奸党。结果,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充军。其后魏忠贤翻"红丸案",李可灼免戍,崔文升被命为总督漕运。直到魏忠贤失势时,崔文升才被捕下狱。

"移宫案"始末 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日光宗病逝,年已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当立为新君。其时光宗选侍李氏仍居乾清宫,朱由校居住慈庆宫。李氏与宦官魏忠贤互相勾结,企图利用朱由校年幼,独揽大权,因而不肯移出乾清宫。九月初二日,都给事中杨涟首先发难,上疏反对李氏继续居于乾清宫;劾其对皇长子无礼,不可将皇长子托付给她。御史左光斗也上疏说:内廷的乾清宫,如同外廷的皇极殿,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居住于此,其余嫔妃都不可于此居住。请李选侍移居于宫妃养老的地方仁寿宫内的哕鸾宫。李选侍得到左光斗奏疏之后大怒,数次遣使召左光斗。左光斗拒不赴见。李选侍益怒,要朱由校议处,朱由校认为左光斗所言极是,催促选择吉日良辰移宫。经过杨、左等人力争,九月初五日李选侍移居哕鸾宫,皇太子朱由校复还乾清宫。是时宫府危疑,给事中杨涟与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定大事,言官只有左光斗积极相助,其余均听杨涟指意,故一时论移宫者首称"杨、左"。

朱由校即皇帝位 朱由校,明光宗朱常洛长子,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十四日生,母选侍王氏。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日,光宗病死,遗诏皇长子继皇帝位。九月初六日朱由校登基,是为熹宗,时年十五岁。颁诏大赦,以明年为天启元年。十一月追谥皇妣孝元贞皇后,生母孝和皇太后。

惠世扬弹劾方从哲 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八日,工科右给事中惠世扬弹劾大学士方从哲十罪:独相七年,妨贤妒能;骄蹇无礼,失误哭临;梃击青宫,庇护党奸;恣行胸臆,破坏丝纶;纵子杀人,蔑视宪典;沮抑言僚,蔽塞耳目;陷城失律,宽议抚臣;马上催督,致丧全师;徇情罔上,鼎铉贻羞;代营诸税,蠹国殃民。又劾方从哲无君者三,一为徇郑贵妃;二为受美珠欲封贵妃;三为代崔文升脱罪。熹宗以世扬轻诋斥责。

礼部奏陈帝统不可遗 泰昌元年(1620)九月十三日,礼部奏陈帝统必不可遗,世系必不容紊。先帝升遐之日,犹存万历庚申之年,而明岁改元之期,即为天启辛酉之始,似乎万历之后,天启继之,而泰昌年号虚而无实。然神宗之统,则受之先帝。上尊谥则有庙号,修实录则有徽称,倘非系以泰昌,则继万历而开天启者,属之谁乎?会议与臣部符合者十居八九,伏乞圣断,敕天下自八月始至十二月终俱为泰昌元年。熹宗允从。

李如柏自杀 李如柏(?—1620),字子贞,李成梁第二子,由父荫为锦衣千户。后又荫为指挥佥事。数从父出塞有功,历密云游击,黄花岭参将,蓟镇副总兵。万历十六年(1588)以御史任养心弹劾解任。久之,起故官,署宣府参将,引疾归。明军援朝,诏如柏署都督佥事,先率师赴援,以功进都督同知,为五军营副将。寻出为贵州总兵官,万历二十三年改镇宁夏,以功进右都督。再以疾归,家居二十余年。会辽东总兵官张承荫战没,文武大臣合疏荐如柏,诏以故官镇辽东。萨尔浒之战明军败绩,李如柏奉杨镐檄撤还,建州兵二十人见之,登山鸣锣,作追击状,如柏军大惊奔走,相蹴死者千余人。言官交章论劾,神宗终念李氏,诏还听勘。既入都,言者不已,如柏惧,遂于泰昌元年(1620)九月十三日自杀。

魏忠贤客氏荫封 魏忠贤于万历十七年(1589)选入宫中,隶司礼监掌东厂太监孙暹。熹宗为皇太孙时,魏忠贤伺候备至,导其游宴,甚得欢心。后与太监魏朝结拜兄弟,并通过他为熹宗生母王氏办膳食。光宗即位,册立熹宗为皇太子,魏忠贤又得客

氏之力，充当皇太子东宫曲膳。客氏，原为北直定兴县民侯二之妻，十八岁入宫，为熹宗乳母，初与魏朝私通，后转与魏忠贤相结。魏忠贤和客氏深得熹宗宠信，泰昌元年(1620)九月二十日，赐魏忠贤世荫，荫其兄魏钊为锦衣卫千户，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荫其子侯国兴、弟客光俱为锦衣卫千户。

黄嘉善致仕 黄嘉善(？—1626)，山东即墨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平阳同知、大同知府、山西兵备副使、陕西参政、山西按察使。以佥都御史巡抚宁夏。迁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总督三边，以功升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总督京营戎政，致仕。万历四十四年起兵部尚书理部事。泰昌元年(1620)九月二十七日以病致仕。天启时先后加太子太傅、太子太师等。天启六年(1626)四月初九日卒。赠少保。

熊廷弼被劾 熊廷弼万历三十六年(1608)曾巡按辽东，在辽数年，颇有治绩。万历四十七年，杨镐萨尔浒丧师，廷议认为熊廷弼熟悉边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经略。廷弼有胆略，知兵事，善守边，然性刚负气，好谩骂，所以各方面关系不太好。为御史时，与姚宗文、刘国缙同在言路，并以排东林、攻异己为事，及廷弼经略辽东，二人意望廷弼，不如愿，遂联手攻击熊廷弼。姚宗文阅视辽东士马归，疏陈辽土日蹙，诋毁熊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又鼓其同类攻击，必欲去之。御史顾慥首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当时光宗死，熹宗初立，朝廷事多纷乱，而封疆议起。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辩，且求罢。而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廷弼益愤，再疏自明，力求罢去。给事中魏应嘉复劾之。泰昌元年(1620)十月四日，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之。

袁应泰出任辽东经略 泰昌元年(1620)十月初四日，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劾，愤然上疏去官。同日，命袁应泰为右佥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替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受命之初，他极意振作，誓与辽东共存亡，忠君报国。熹宗赐他尚方宝剑。袁应泰为人精敏强毅，但用兵却非其所长，谋略不足。熊廷弼守辽，持法甚严，部伍整肃。袁应泰性仁柔，尽改严为宽。尤其是当时蒙古各部大饥，纷纷入辽乞食。袁应泰以为若不急救他们，他们必会投入后金为兵。于是下令招降，来者日众，安置于辽阳、沈阳二城，给其月米，与辽民杂居。而这些降民却经常四出淫掠，辽民多受其害，因之对袁应泰多有指责。天启元年(1621)三月，后金攻沈阳，袁应泰临阵督战，城将破，力不支，见大势已去，佩剑印自刎。赠兵部尚书。

方从哲致仕 方从哲(？—1628)，字中涵。其先浙江德清县人。后隶籍锦衣卫，移居北京。万历二十一年(1593)进士，历官国子祭酒、吏部左侍郎。万历四十一年，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自万历四十二年八月内阁首辅叶向高致仕始，除吴道南一度入阁外，内阁均由方从哲一人单独主持。加阶至少师。但他性情柔弱，不能任大事。对神宗长期不临朝议政、矿税不停、梃击案、东林党争、阁部缺官、各地灾害等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他表面力争，实则皆顺从神宗旨意，“无所匡正”。万历四十七年初，他极力催促杨镐四路出师，结果三路败北，致后金攻陷开原、铁岭。于是言官对其加以激烈地攻击。泰昌元年(1620)九月光宗病逝，“红丸”、“移宫”两案迭起，廷臣多指责他纵庇李可灼、崔文升，袒护郑贵妃、李选侍等人。同年十月，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其任用的给事中姚宗文等人弹劾去官。自是要求罢免方从哲的呼声进一步高涨。给事中惠世扬甚至指出他犯有十罪、三可杀。方从哲遂接连上疏求去。泰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致仕。崇祯元年(1628)二月十六日卒。赠太傅谥文端。

方震孺奏请省议论 天启元年(1621)二月初九日，监察御史方震孺奏请省议论：一为国本一案，次则门户之说。东林之中，原多依附草木，然不当因不肖以及贤。因清冽之叶茂才、朱世守，经济之董应举、赵南星，劲挺之魏云中、马孟祯，净洁之高攀龙、刘策，练达之李邦华，苦节之鲍应鳌、刘宗周，有何罪之锢之终身！又其次则移空之事，公道不彰，群疑愈炽，同官马逢皋所以请会议。杨涟之去就，实系圣躬。乞早赐召对以释群疑。熹宗允准。

孙如游致仕 孙如游(—1625)，字景文，余姚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累官礼部右侍郎，万历四十八年三月任左侍郎。神宗死，与诸大臣受顾命。光宗即位，进本部尚书。光宗死，熹宗即位，于十月受命以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但言官因其入阁不是经廷推而进，交章攻击，如游乞去，未获准许。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十五日，加其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遣官护送归家。家居四年卒。赠少保，谥文恭。

杭州大火 天启元年(1621)三月初五日，杭州城大火，燃烧一昼夜始熄，延烧六千一百余家，男女死者三十五人。至八月复再着火，延烧一万余家。

后金攻克沈阳 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率重兵围沈阳。其时经略袁应泰曾议三

路出师，试图收复清河、抚顺，未及行而后金兵已兵临沈阳城下。沈阳城很坚固，城外浚濠，伐木为栅，埋伏火炮，守卫很严。努尔哈赤猝至，未敢马上逼进城下，先以数十骑隔壕侦察。总兵尤世功家丁追击，斩首四级。总兵贺世贤率亲兵千余人出城迎战，努尔哈赤诈败，世贤乘锐进击，忽然敌骑四合，世贤败北。城中降兵又叛变，断城外吊桥，世贤战死。尤世功引兵来援，亦战死。城外兵皆溃，参将夏国卿、张纲、知州段展、同知陈辅光皆死于阵。当时川浙总兵陈策率川兵渡浑河增援，与童仲揆等皆战死。后金军遂攻拔沈阳城。此一战乃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后金军攻克辽阳　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九日，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在攻取沈阳之后，进攻辽阳。明经略袁应泰在沈阳陷落之后，撤奉集、威宁诸军，合力共守辽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陈兵环守。努尔哈赤兵临城下，袁应泰和巡按御史张铨登城，袁应泰督领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出城五里迎战，明军战败，士卒望风而逃。当晚袁应泰宿于营中。第二天，两军接战，后金军掘城西闸以泄濠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击败明军，渡濠攻城。明军败退，袁应泰入城，与张铨等分陴固守。监军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逾城而逃，军心大乱。二十一日，后金军攻城甚急，应泰督军大战，又败。傍晚，城门楼起火，后金军从小西门入城，城中大乱。袁应泰在楼上知事已不行，于是佩剑印自缢死。后金军遂克辽阳。

袁应泰自杀　袁应泰(? —1621)字大来，凤翔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授临漳知县，转调河内，有治绩。迁为都水司主事，晋升兵部武选司郎中，又迁淮徐兵备参议。山东饥荒，设粥厂赈恤流民，并将额外税银及漕折马价数万金先后发赈，救活许多民众。后来户部劾其擅移官廪，当时已迁为副使，遂以养病为名归家。以后起复为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备兵永平，正值辽左军兴，应泰募兵训练，修关墙，置装备，关外所需粮草军资火药等，有求必应，熊廷弼在辽阳深所依赖。泰昌元年(1620)九月升右佥都御史，周围永春巡抚辽东，一月后擢升兵部右侍郎兼前职，代熊廷弼经略辽东。临行时刑白马立誓，誓与辽事相始终。应泰历官精敏强毅，但用兵非其所长，尽改熊廷弼所为，致使辽事日下。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三日，后金攻取沈阳，明军大败。三月十九日，后金兵攻辽阳，应泰督军力战，监军高出、牛维曜等叶城逃跑，致使军心大乱，城遂失陷。应泰佩剑印缢死于城楼上。赠兵部尚书。

诏修《神宗实录》　天启元年(1621)三月二十五日，诏修《神宗实录》。命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吏部尚书叶向高、户部尚书刘一燝、韩爌、礼部尚书史继偕、何宗彦、沈漼、朱国祚等为总裁官，礼部尚书孙慎行、侍读学士顾秉谦、盛以弘、周道登、郑以伟、李腾芳、钱象坤、孟时芳、周如磐、孙承宗、祭酒吴宗达等为副总裁官，侍读骆从宇等为纂修官。三年叶向高、史继偕等去位，改命大学士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为总裁官，孟时芳、黄儒炳、李思诚、骆从宇、施凤来、丘士毅、李康先、钱龙锡、韩日缵等为副总裁。张惟贤仍为监修官。五年正月，谕史官限按月送稿，务早修成。至熹宗逝世时犹未修成，崇祯初始续成。计五百九十四卷。

诏修《光宗实录》　天启元年(1621)三月二十五日，诏修《神宗实录》同时，诏修《光宗实录》。于天启三年六月由叶向高等修成，共八卷。有熹宗御制序。既而霍维华等改修，未及呈进而熹宗逝世。至崇祯元年(1628)始进呈，原本并贮皇史宬。

毛文龙人据皮岛　皮岛又称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达后金界，东北海则为朝鲜。天启元年(1621)三月，辽沈失陷，沿海居民皆航海逃往山东，无力到达者就滞留在各岛间。当时都司毛文龙正率援师在此，于是招集逃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犄角计。朝廷认为可行，遂授毛文龙参将，后又设军镇如内地。

丁宾致仕　丁宾(1543—1633)字礼原，嘉善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官句容知县，监察御史，南京大理寺丞，南京太常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南京右佥都御史兼督操江，工部左侍郎。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南京工部尚书，自上元至丹阳路面尽易以石，行旅颂之。天启元年(1621)四月十二日致仕。丁宾官南京三十年，每遇旱潦，俱请赈贷，而且时出家财佐之。天启五年(1625)，捐粟三千石赈贫民，以银三千两为下户代输赋税。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年九十一。赠太子太保，谥清惠。

熊廷弼起复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城破，廷臣又推荐熊廷弼，给事中郎郭巩竭力诋毁，并连及阁臣刘一璟。及辽阳再破，袁应泰死，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刘一璟说："使熊廷弼在辽，当不至此。"熹宗于是诏先前劾熊廷弼者，降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郭巩三级，除姚宗文名。御史刘廷宣救之，亦被斥。五月五日下诏起熊廷弼于家。廷弼入朝，首请免言官贬谪，熹宗不许。乃建三方布置之策。进廷弼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赐尚方剑，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

李汝华致仕 李汝华(—1624)字茂夫，睢州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授兖州推官，征授工科给事中，出阅甘肃边务，还朝，历吏科都给事中，多所纠劾。迁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谏止税使，在赣十四年，威惠甚著。进秩兵部右侍郎，召拜户部左侍郎。尚书赵世卿去位，遂掌部事。偕廷臣谏争减福王庄田四分之一，赈济畿辅、山东饥荒等。后来进为户部尚书。万历四十六年兼摄吏部事。辽东军兴需饷，汝华屡次请发内帑不得，遂三次增赋，凡五百二十余万，苛敛百姓，劳师糜饷，天下遂不可支。天启元年(1621)六月五日，加太子太保致仕。天启四年十二月卒于家。赠少保，谥恭敏。

增举人名额 天启元年(1621)六月八日，诏增顺天府举人二十名，应天府十名，其他各省三名。该年，山西中举宗生二人，江西、陕西、河南各一人；山东四民学二名；辽生一名，皆为加额，不在省直名额之内。

王心一疏言不当重赏客氏 天启元年(1621)九月六日，御史王心一上言：皇上谕户部给客氏地二十顷，作为香火，又命工部叙录魏忠贤之功。当此辽东战事方急，“皇上先左右而后疆场”，则不便之甚。东征将士闻之，“毋乃解其体而灰其心乎?”熹宗不听。

奢崇明反重庆 四川永宁，古蔺州地。奢氏，倮㑩种，洪武时归附，世为宣抚使。传至崇周，无子，崇明以远房袭位，阴怀异志。其子奢寅尤骁桀好乱。当时正值给事中明时举、御史李达征川兵援辽。崇明父子请行，先派其女婿樊龙及弟樊虎、部党张彤等领兵至重庆，久驻不发。巡抚徐可求于天启元年(1621)九月十七日在教场内点发各军，而樊、张等以增行粮为名，乘机作乱，杀徐可求及参政孙好古、总兵官黄守魁等，明时举、李达负伤逃走。奢氏分兵攻合江、纳溪，破泸州，遂进攻成都。建号为大梁，设丞相五府等官。

秦良玉勤王 天启元年(1621)九月十七日，四川石柱宣抚司女官秦良玉勤王。奢寅父子反，秦良玉率所部精卒万人擐甲疾趋，潜渡重庆，水陆并进，袭击敌军。朝廷嘉奖之。

王安之死 宦官王安，雄县人。初隶冯保名下，万历二十二年(1594)，司礼监秉笔太监陈矩荐于帝，命为皇长子伴读。光宗即位，擢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用其客中书舍人汪文言之言，劝帝行善政，大学士刘一璟、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皆重之。光宗死，熹宗即位，以移宫事多得王安之力，心德之，言无不纳。及客氏、魏忠贤柄用，深忌王安。天启元年(1621)五月，帝命安掌司礼监，王安推辞，客氏劝帝从其请，因与魏忠贤谋杀之。七月，魏忠贤唆使给事中霍维华劾王安，降充南海子净军，而以刘朝为南海子提督，使杀王安。刘朝为李选侍私阉，因移宫时盗宝库而被下狱，后释放。刘朝既到任，绝王安饮食，王安取篱园中的萝卜吃，三日犹不死，刘朝乃于九月二十四日扑杀之，其状惨酷异常。自此以后，客、魏相为表里，凡王安名下诸宦官，斥逐殆尽。

黄河决口 天启元年(1621)秋九月，黄河在灵璧、双沟、黄铺一带决口，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与黄会，故道遂湮涸。

朱燮元守成都 天启元年(1621)十月，奢崇明围成都。当时城中仅有镇远营兵七百人，布政使朱燮元将入觐，遂留以治军事。崇明军攻城，燮元督军民屡次击退，并斩入城为内应者二百人。双方相持百余日，并破奢氏“吕公车”。后燮元以罗乾象为内应，于天启二年一月底击败奢崇明，解成都之围。燮元守成都时，被擢升为佥都御史，巡抚四川。

周嘉谟罢官 周嘉谟，字明卿，湖广汉川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万历朝为吏部尚书。受顾命，辅皇长子即位，正色立朝，朝廷内外倚以为重。光宗、熹宗相继即位，周嘉谟仍掌吏部，大批起用前朝罢废诸臣，耆硕满朝。天启元年(1621)十月加太子太保。十一月二十九日，因违抗太监魏忠贤，致仕罢官。

经抚不和 天启元年(1621)三月，辽沈失陷，熹宗重新起用熊廷弼为经略，又擢参议王化贞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化贞在广宁招集散亡，激励士民，联络西部蒙古，人心稍定。朝臣信其有才，所奏请无不批准。廷弼入朝，建三方布置之策：广宁用马步兵，列垒三岔河上；天津、登莱各置舟师，设登莱巡抚如天津；而山海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同意，于六月六日命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驻扎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又赐尚方剑。后三边总督张鹤鸣以平苗功，入为兵部尚书。鹤鸣与廷弼相失，论事多龃龉，独善王化贞，所奏请无不从，令其不受熊廷弼节制。加之二人守御方针不同，化贞主分兵守要害，廷弼主集兵守广宁，二人遂有隙，进而互相抵牾。化贞主战，廷弼主守，兵部尚书张鹤鸣及朝臣大多偏袒化贞。十二月十二日，御史江秉谦疏言“经抚不和”，诏命廷臣会议。由于经抚争斗，终于导致广宁惨败。

朱国桢撰《涌幢小品》 《涌幢小品》三十二卷，朱国桢撰，是书始纂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至天启元年(1621)，用时十三年。全书三十二卷，既有典章制度、政治、经济、赋税、徭役，清军勾补，也有社会

风俗，人物传记，琐事遗闻。既有市民抗税风潮的记述，也有均田冶铁的如实记录，是研究明代历史颇有史料的价值的笔记。

罗一贯自杀　罗一贯(？—1622)，甘州卫人。以参将守西平堡。辽阳失陷，西平堡地当要冲，一贯悉力防守，晋副总兵。当时王化贞驻广宁，经略熊廷弼驻右屯，总兵刘渠以二万人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一贯率三千人守西平，议定互相支援。天启二年(1622)正月，后金军渡辽河，围攻西平堡，参将黑云鹤出战败死。罗一贯率部固守，用炮击伤后金军数千人，拒绝后金招降，坚守两昼夜。一月二十一日，后金军环城力攻，一贯为流矢中目，不能战，火药矢石俱尽，遂自刎而死。都司陈尚仁、王崇信亦死之。西平堡遂陷。

广宁之败　天启二年(1622)正月，熹宗以经抚不和、廷弼不能节制，令廷臣议两人去留。兵部尚书张鹤鸣笃信化贞，请撤廷弼再用，熹宗不准，令再议。此时后金兵已渡辽河攻西平，王化贞信游击孙得功计，尽发广宁兵，以得功及中军游击祖大寿为前锋，令会祁秉忠赴援，廷弼亦遣使督刘渠赴援。二十二日与后金军遇于平阳桥。孙得功有意降后金，乃分兵为左右翼，退后，推刘渠、祁秉忠进前交战。渠等力战，互有杀伤，而得功及副将鲍承先等先逃跑，军遂大溃。刘渠、祁秉忠战死，祖大寿逃至觉华岛。王化贞素任孙得功为心腹，孙得功想活捉王化贞献给后金，诈称敌已登城，广宁城中大乱。化贞正闭门署理军书，不知有变，参将江朝栋闯入，掖之上马，二仆人徒步跟随，遂弃广宁，仓皇逃走。与廷弼遇于大凌河。廷弼以五千人授化贞殿后，尽焚积聚，二十六日护溃民入关。孙得功率广宁叛将迎后金军入广宁时，化贞已逃走两日，广宁遂失。

高邦佐自杀　高邦佐字以道，襄陵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授寿光知县，历户部主事、员外郎，迁永平知府、天津兵备副使，转神木参政。邦佐为官有治绩，以嫡母忧归，补蓟州道，因调兵与主官相忤，被劾归。天启元年(1621)，辽阳破，起参政，分守广宁。以经抚不和，知辽事必败，累乞归。刚获准，而化贞弃广宁逃，邦佐乃谒廷弼，请其入广宁图为恢复，廷弼不纳，偕化贞并走。邦佐慨叹："不能存广宁，何颜入关！"遂于天启二年正月自缢于松山公馆。谥忠节。诏与张铨、何廷魁同嗣，额曰三忠。

张鹤鸣巡辽　广宁失守，败书至京，廷臣集议兵事，兵部尚书张鹤鸣盛气骂熊廷弼以自解。既而惧罪，乃自请巡边视师。天启二年(1622)正月二十七日，诏加其太子太保，赐莽玉及尚方剑。鹤鸣惮行，逗留十七日始抵山海关。至则无所筹划，惟日下令捕间谍，厚利安抚蒙古绰哈、宰桑诸部而已。后给事中、御史交章极论其罪，熹宗不问。

缉京城奸谍禁鞭炮　天启二年(1622)正月二十九日，谕兵部：令厂卫严缉京城奸谍，禁止居民燃放鞭炮。

河套蒙古人掠　天启二年(1622)正月，河套蒙古入侵延安、黄花峪等处，深入六百里，杀掳数万人。巡抚张之厚、总兵杜文焕匿不上闻，为御史高推劾奏。

山东郓城、巨野地震　天启二年二月初七日(1622)四月十六日兖州府、济南府、东昌府地震。济宁州发生百年没有的大地震。初六日夜，郓城地震，有声如雷，地裂泉涌，鸡犬鸣吠，墙屋倒塌。巨野城垣雉堞倾倒过半。文庙庑舍皆坏。历城震声如雷，房摇地动。曹州(今菏泽)、城武、曹县、濮州(今河南省濮县)、朝城、金乡、鱼台，皆大震有声。波及兖州府东阿，平阴，东平州(今东平)、汶上、定陶。济南府历城、济阳、齐东、邹平、阳信、淄川、新泰。东昌府聊城、莘县、馆陶。广平府清河、鸡泽、肥乡、成安。河南省河南府洛阳、偃师。开封府杞县、尉氏。归德府商丘、睢州、鹿邑、阳武以及徐州、肖县、沛县、丰县等三省三十余府州县。震中烈度(I_0)ⅥⅠ—ⅥⅠ，震级(M)六级。到三月初七日，济南府、东昌府的历城、长清、济阳、临邑、乐陵、东阿、茌平、肥乡等地又发生五.五级地震，并连震三日，倒坏民居无数，聊城、武定州等同日亦震。

诏免北直加派　天启二年(1622)二月十四日，因北直隶频年烦累，诏免其加派。有司需团练乡兵；辽东难民来归内地，应发谷赈济，使垦荒田。

水西土司安邦彦反　安氏世任贵州水西宣慰司，至万历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土司安疆臣死，弟尧臣袭位。尧臣死，子安位年幼，命其妻奢社辉摄事，社辉乃永宁宣抚奢崇明之妹。崇明子寅犷悍，与社辉争地，相仇恨。安邦彦乃安位之叔父，素怀异志，暗中与奢崇明勾结。及崇明反，调兵水西，安邦彦遂挟安位反叛以应奢崇明，诸部头目纷纷响应，安位幼弱不能制。天启二年二月，邦彦率兵二万攻破毕节，分兵破安顺、平霸、霑益、龙里等处，遂围攻贵阳。

刘一璟致仕　刘一璟(1567—1635)，字季晦，南昌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寻历祭酒，詹事，掌翰林院事，居四年始迁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光宗即位，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予机务。光宗死时，李选侍谋挟皇太子以自重，刘一璟力请始出，及熹宗即位，一璟当国，发

内帑，抑近幸，搜遗逸，中外欣欣望治。因处置盗宝太监事，得罪魏忠贤。一璟持大体，不循言路意，言路颇怨。及客、魏用事，一璟势孤。言官霍维华等交章劾一璟，一璟疏辩求罢。天启二年(1622)三月初一日，魏忠贤从中主之，遂传旨许其去。加少师兼太子太师，璟一子尚宝司司丞。后来魏忠贤专权，矫旨责一璟误用熊廷弼，削官，追夺诰命，勒令养马。崇祯改元，诏复故官。卒年六十九岁。追谥文端。有《文端公集》。

沈潅典兵 天启二年(1622)三月二日，给事中周朝瑞等纠劾大学士沈潅典兵。沈潅募兵五百盘据京城，既不往辽，又不往蜀，岁糜金钱六七万。近又遣门客募兵一万。且又暗使门客潜入皇宫，诱太监刘朝、魏忠贤等练兵。

举办内操 熹宗即位，太监魏忠贤劝诱选武阉，练火器为内操。遂于天启二年(1622)三月，简选精兵，训练于皇宫大内，每训练之时，魏忠贤手持令旗，三军悉听其指挥。其后内操增至万人，穿甲出入，金鼓之声震动宫内外。

孙慎行追论红丸案 天启二年(1622)四月十四，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追论红丸事，劾方从哲包庇李可灼。熹宗下廷臣集议，议者一百一十多人，纷纷俱罪从哲，独刑部尚书黄克缵及给事中汪庆百等数人袒护。慎行复疏论之，且言克缵之谬。后来李可灼遣戍，崔文升放南京，而从哲置不问。

徐鸿儒起义 徐鸿儒山东钜野人，迁郓城，万历末年，在山东传播白莲教，被推为教主。蓟州人王森传播闻香教，森死，其子王好贤传其教。武邑于弘志聚众创办棒棰会，与好贤相联络。三方密约于天启二年八月望日同时起事，而鸿儒以他事相激，于五月先发，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用红巾为帜，攻占郓城。曹、濮震动。六月，攻占邹县、滕县。九月二十九日，山东巡抚赵彦攻破滕县，徐鸿儒被俘，起义失败。赵彦安插归降乡民二万七千余人，获骡马千匹，神枪八百杆，大炮二百零六，弓刀甚多。十一月八日在北京被杀。徐鸿儒在山东传教二十年，起义七个月失败。

复张居正原官 天启二年(1622)五月，户部左侍郎陈大道等合词为原任大学士张居正请恤，列其二十项功绩。熹宗亦认为张居正辅政十载，天下大安，"功不可泯"，准复原职，予祭葬，谥号酌改，房屋未变价者准给子孙奉祠居住。

明军收复重庆 天启元年(1621)奢崇明反，其党樊龙占据重庆达九个月，为其声援。重庆地势险要，三面临江，其出入必经要道惟佛图关至二郎关一路。樊龙自通远门城壕至二郎关连营十七，宿精兵数万。天启二年五月，朱燮元督秦良玉等夺二郎关，总兵官杜文焕破佛图关，乘胜进逼重庆。二十七日，燮元以计擒杀樊龙，生擒龙子友邦及其党三十余人，遂收复重庆。

恤方孝孺遗嗣 方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读学士值文渊阁，当靖难师入，以拒拟诏书，致夷十族。其幼子德宗幸亏宁海谪尉魏泽藏匿，密托诸生余学夔负入松江岛屿，以织网自给。华亭俞允以养女妻之，因冒俞姓，遂延一线血脉。至天启二年(1622)五月，其十世孙方忠奕以贡来京，伏阙上书。六月二日得旨：方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

王纪削籍 王纪(—1622)字惟理，芮城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池州推官，入为祠祭主事，历仪制郎中，擢光禄少卿，引疾去。万历四十一年自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居四年，迁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光宗立，召拜户部尚书，督仓场。天启二年(1622)二月代黄克缵为刑部尚书，廷议红丸案，王纪与侍郎杨东明建议逮李可灼、崔文升，削方从哲官。因劾徐大化及沈潅而得罪客、魏。后沈潅劾王纪护熊廷弼、缓佟卜年狱为二大罪，天启二年七月十日削籍为民，不久即卒。崇祯元年(1628)复官，谥庄毅。

孙慎行致仕 孙慎行(1564—1635)，字闻斯，号淇澳，南直武进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第三人，授编修，累官左庶子。数请假里居，键户息交，覃精理学。万历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礼部右侍郎，署部事，多所匡正。后以会推吏部事，四疏乞归，允之。熹宗立，召拜礼部尚书，天启二年(1622)四月还朝。追论红丸案，并劾方从哲，章下廷议。既而议上，李可灼下吏戍边，从哲置不问。五月，以秦王旁枝进封事力争不得，七月十七日谢病归家。魏忠贤专权，修《三朝要典》，红丸案以慎行为罪魁，遣戍宁夏。未行，崇祯即位，赦免。崇祯八年(1635)奉召入都，卒，年七十二，谥文介。有《玄晏斋集》。

沈潅致仕 沈潅字铭缜，乌程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官南京礼部侍郎，掌部事。万历末年由方从哲推，帝遂用之，疏未发，神宗死。光宗立，乃召潅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未至，光宗又死。天启元年(1621)六月，潅始至。潅曾教习内书堂，魏忠贤、刘朝皆潅弟子，遂与二人深相结。潅曾借辽左用兵之机，请募勇士训练，又与魏忠贤、刘朝勾结，举办内操。后为给事中惠世扬等劾奏，刑部尚书王纪将潅比之蔡京，朱国祚至以去就争，潅不

自安，乃力求去。天启二年七月十七日，命乘传归，进少保。天启四年五月十一日卒，赠太保，谥文定。有《沈文定公集》。

张鹤鸣致仕　张鹤鸣(1551—1635)，字元平，颍川人。中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父病驰归，越六年始成进士，授历城知县，移南京兵部主事。天启初年升兵部尚书。时熊廷弼经略辽东，张鹤鸣与之相对立，而喜巡抚王化贞，令不要受熊廷弼节制，致使疆事大坏。天启二年(1622)七月十七日致仕。累加至太子太师。崇祯八年(1635)农民起义军陷颍川，张鹤鸣被杀。

援黔官兵溃于新添　贵阳被围，连章告急。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率兵赴援，与安邦彦军相持于瓮城河。不久食尽，天启二年(1622)七月，参将范仲仁兵六千先逃，安军乘虚横击，官军尽溃。

孙承宗督师辽东　天启元年(1621)三月，王化贞失广宁，关外五城七十二堡悉为哈喇慎诸部所据，声言助守边，实怀窥伺。经略王在晋与蓟辽总督王象乾只会一意姑息，又请筑重关于八里铺，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以为非策，告诉叶向高，向高不能决。大学士孙承宗请亲身前往勘察，还朝后建议出关筑宁远要害，与觉华岛相犄角。后又面奏熹宗，言王在晋不足任，自请督师。天启二年八月十六日，熹宗诏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进太子太保赐尚方剑，阁臣送之崇文门外。承宗既至关，裁汰虚冒，定军事，申明职守，以马世龙为总兵官，令游击祖大寿等守觉华岛，副将赵率教守前屯。前后筑城堡数十，练兵十一万，造铠仗，开屯田，军声颇振。后定议守定远，命祖大寿兴工筑城，崇焕及满桂守之，城工竣，关外守具毕备。承宗图大举，请饷二十四万，熹宗命所司给之。兵、工二部忌其成功，故用文移往复以缓之，师竟不能出。

朱由检封信王　天启二年(1622)八月二十三日，熹宗封皇五弟由检为信王，遣英国公张惟贤持节、大学士叶向高韩爌捧册，百官于皇极门外东庑行礼。

邹元标奏陈倡学　天启二年(1622)九月初八日，左都御史邹元标奏陈：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臣等所讲论，惟是销反侧以归正直。若分门别户，则名教所不载。若以臣等讲学宜放，则切磋道学一语，直济穷拔苦良方，非尽性致命妙理，亦视斯道太轻。臣又有言：前东林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贵，自歧意见，一倡众和，几付清流。惩前覆辙，不在臣等。诗云："相彼鸟矣，犹求友声。"臣等求友，未得平和之韵，先来同类之疑。愿罢臣以为倡学之戒。

客氏出宫　天启二年(1622)九月二十六日，命客氏出宫。熹宗谕内阁："客氏朝夕侍朕"，今日出宫，"痛心不止"，着以后不时进宫奉慰，外廷不得烦扰。

陕西地震　天启二年(1622)九月，陕西固原州星殒如雨。平凉、隆德诸县及镇戎、平虏等所，马刚、双峰等堡地震如翻，城垣震塌七千九百余丈，房屋倒塌一万一千八百余间，牲畜压死一万六千余只，压死男女一万二千余口。

邹元标致仕　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别号南皋，江西吉水人。举万历五年(1577)进士，观政刑部。张居正夺情，元标抗疏谏，被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谪居六年，居正歿，召拜吏科给事中，劾罢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慈宁宫灾，元标上时政六事，谪南京刑部照磨，就迁兵部主事，召改吏部，进员外郎，以病免。起补验封，调南京，居三年，移疾归。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忧，里居讲学三十年，名高天下。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进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1621)四月还朝，首进和衷之说，荐涂宗浚、李邦华等十八人。又荐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等人。同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元标自还朝以来，不为危言激论，与物无猜，与冯从吾建首善书院于京师，集同志讲学其中，名望日重，然诸不附东林者咸忌之。给事中朱童蒙首劾元标："以讲学为门户"。元标疏辩曰"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且力求去官。天启二年十月十二日允准，诏加太子太保，乘传归，四年卒于家，年七十四，谥忠介。有《愿学集》

冯从吾致仕　冯从吾(1556—1627)，字仲好，长安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改庶吉士，授御史。万历二十年正月以上疏得罪万历帝，罢归。后起长芦盐政，既还朝，适值帝以军政大黜两京言官，遂又削籍归。从吾罢官归，杜门谢客，立志于学，家居二十五年。光宗即位，起尚宝卿，进太仆少卿，以兄丧未赴。既而改为大理。天启二年(1622)擢左佥都御史，刚两月，进左副都御史。因其与邹元标共建首善书院，为朱童蒙所劾。十一月二十九日致仕归家。天启四年起南京右都御史，召拜工部尚书，均辞不赴。天启五年八月削籍及乔应甲毁关中书院，从吾不胜愤悒，天启七年得疾卒，崇祯元年(1628)复官，二年(1629)闰四月赠太子太保，九月谥恭定。学者称"少墟先生"，有《冯少墟集》。

贵阳解围　安邦彦于天启二年(1622)二月反

叛，进攻贵阳。城中坚守，援尽粮绝，初食糠秕草木败革，继遂食人肉。李云、史永安连章告急。十二月三日，王三善大会将士，分兵三路进军，许进不许退，遂夺龙里，乘势急击。安邦俊被炮击死，邦彦逃走，遂抵贵阳城下。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户十余万，最后仅余二百余人。

汪应蛟致仕 汪应蛟字潜夫，婺源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南京礼部郎中，累迁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朝鲜再用兵，移驻天津，及天津巡抚万世德经略朝鲜，既擢应蛟右佥都御史代之。朝鲜事宁，移抚保定。召为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既而进兵部左侍郎，以养亲不出。光宗立，起南京户部尚书，天启元年(1621)六月改北部。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需饷一千二百万，应蛟力阻之。帝保姆客氏求墓地逾制，应蛟持不予，遂见忤，乃力求去。天启二年十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久之，卒于家。有《古今夷语》、《中鐘草》、《病吟草》。

明军兵败陆广河 天启二年(1622)十二月，贵阳解围，安邦彦远遁陆广河外。当时湖广、广西、四川援兵皆先后至，巡抚王三善欲因粮于敌，乃荐刘超为总兵官，与总兵官张彦芳、都司线补充三路并进。天启三年正月，超等至陆广，连战皆捷，有轻敌心。安邦彦诱明军深入，合兵来攻，明军大败。刘超逃出，参将杨明楷被俘，诸将姚旺等二十六人战死。安邦彦势复张，欲再围贵阳，远近大震。

姚思仁致仕 姚思仁(1548—1637)字，秀水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行人，擢御史，累迁太子太傅工部尚书，天启三年(1623)二月十三日加太子太保致仕，天启七年十二月加太子太傅。崇祯四年(1631)存问，崇祯七年八月追坐陵工削籍。崇祯十年四月初八日卒，年九十一。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复秩。

陈邦瞻逝世 陈邦瞻(—1623)字德远，江西高安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南京大理寺评事，历南京吏部郎中。出为浙江参政，进福建按察使，迁右布政使。改补河南，为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使巡抚广西。光宗即位，擢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召拜工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进左侍郎。天启二年(1622)五月疏陈四事，寻兼户、工二部侍郎，专理军需。天启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致仕。不久逝世。四月赠兵部尚书。邦瞻为人伉直倜傥，治浙有声，抚两粤大著威信。有宋、元纪事本末、《荷华山房集》。

周宗建疏劾魏忠贤 天启三年(1623)二月二十八日御史周宗建曾因荐熊廷弼为给事中郭巩所劾。郭巩因劾熊廷弼而被谪外，廷弼被逮后召还。郭巩知魏忠贤最恶周宗建，因力诋“宗建误廷弼，且误封疆”。周宗建抗疏劾郭巩结党魏忠贤，揭露其编辑群臣数十余人，汇为一册，又造匿名文书，俱欲一网打尽。劾疏并及王安之死。疏入，忠贤益怒，率刘朝等激熹宗怒，令周宗建陈交通实状，将加重谴。宗建回疏益侃直，忠贤议廷杖之，阁臣力争，诏夺其俸三月。

朱国祚致仕 朱国祚(—1624)，字兆隆，号养淳，秀水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第一，授编修，进洗马，为皇长子侍班官，寻进谕德。万历二十六年超擢礼部右侍郎，摄尚书事，争国本疏至数十上。后转左侍郎，改吏部，被劾引疾归。光宗即位，特旨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机务。天启元年(1621)六月还朝，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天启三年，进少保、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改武英殿。十三疏乞休，四月七日诏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致仕。次年十月二十五日卒，赠太傅，谥文恪。有《介石斋集》。国祚素行清慎，事持大体，世称长者。

王三善败安邦彦 明军陆广之败，安邦彦合诸苗将趋贵阳。天启三年(1623)四月，贵州巡抚王三善亟遣游击祁继祖等取龙里，王建中、刘志敏救青岩，连败安军，焚其积聚数万。安邦彦不敢出，屯于鸭池、陆广诸要害地，为自守之计。

黄河决口 天启三年(1623)五月，黄河决口于睢阳、徐、邳一带，上下一百五十里内悉成平地，蠲免睢宁县天启元年二年各项钱粮。

川军复永宁 天启三年(1623)五月，朱燮元谋取永宁，总结以往失败的原因在于分兵力弱，于是尽撤诸军会于长宁，连破麻塘坎、观音庵、青山崖、天蓬峒诸寨。与秦良玉兵会合，进攻永宁，击败奢寅于土地坎，追至老军营、凉伞铺，尽焚其营。奢寅受伤逃走，樊虎中枪死。又追败之横山，抵永宁城下，遂攻拔之，降二万人。副总兵秦衍祚等克遵义。崇明父子一路逃入蔺州城。七月，蔺州为参将罗乾象攻克，奢崇明逃至水西龙场客仲坝，依其妹奢社辉以守。总兵李维新攻破客仲，崇明父子窜入深箐，生擒其妻安氏及弟崇辉。

计议辽饷 天启三年(1623)七月三日，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陈兵饷太巨：辽东战起，每年加派新饷四百八十五万余两，今已五年，共约二千余万两。“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只山海一关，每年即需四百万两。此外，近年于登莱、天津、京师、通时、密云、张家湾以及海上共增新兵九万一千多人，岁费需九十万两；蓟镇旧兵议增饷，每年约数万两；其他操赏、牧马、舟车、俸廪等费，每年又需十余万两。总计各处新兵岁费一百二十万两，与山海关四

百万两合之,共五百二十万两。每年加派之四百八十五万两,即使全部用于山海关内外,仍缺三十五万两。而实际上,山海关一带每年尚缺饷一百六十二万两。乞敕户、兵二部总计之,养兵补饷,不病国,不厉民,毋待其变而后图之。上命户兵二部详议具奏。

钟羽正致仕 钟羽正字叔濂,益都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授滑县知县,征授礼科给事中,迁工科左给事中,出视宣府边务。寻为吏科都给事中,万历二十年以请皇长子出阁就学忤旨,斥为民,杜门读书,林居几三十年。光宗立,起太仆少卿,未至,进本寺卿。天启二年(1622)为佥都御史,不久晋左副都御史,改户部右侍郎,督仓场。天启三年春,拜工部尚书。六月十三日,宦官千余人请预给冬衣,蜂拥入署,碎公座,殴掾吏,肆骂而去。羽正因之求去,有《崇雅堂集》。七月十九日罢归。崇祯初复职。

安南犯广西 天启三年(1623)七月,安南禄州何中蔚入侵广西上思州,围迁隆峒,掠凭祥白沙村,巡抚何士晋督率军民击退,至是奏捷于朝。

周之纲奏陈安攘大计 天启三年(1623)七月二十三日,兵科给事中周之纲奏陈安攘大计。其论邮政,凡牌符内出,或奉某差,或差某人为某事,非驾司填写明白,则本科不受任。或有远年,或有买托,概收明登簿。凡自外入,如各镇总兵之差官,纷纭四出,诸王府内守备之差遣,假借无凭,侦其放在各镇,凡一秉钺,即滥请以出,及送情送借,又滥借以入。至王府之执符验,则曰给之抚按,符验之易勘合,则曰姑准换给。内监用夫马,动至数百,出京之执原数,借口传单,尽皆虚冒。请自今抚按总镇所请牌符若干,仍遵往例,事竣时存用若干,并交部送科。至邮符换给,传单滥用,皆可减裁。熹宗命下部议。

疏请量减浙江织造 天启三年(1623)八月十七日,工科给事中陈尔翼疏言:浙省织造料价一百零一万五千四百余两,今亏额三十七万八千五百余两。乞于十八运内减免数万,或每年暂停一运,以苏民困。皇上不允。

赵南星申明宪职 天启三年(1623)八月十八日,左都御史申明宪职:臣无职,以诸御史为职;诸御史皆称职,即臣之称职。彼出而巡方,在举劾得当。举劾之所以不当于人,务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不过曰此我之同乡故旧不能弃;曰此权要之所托不可动。不劾则须举,又从而过誉:贪者廉于伯夷,酷者惠于子产;则所劾皆贪酷而孤拙,又率多从宽。此皆为举劾之不当。臣等请以后按臣差满,将所举劾,令河南道将所举劾发单细访,类送堂官,必举劾允当而后为称职,否则即以不称职论。庶惕然猛省,共图百姓之安。熹宗以为然。

议裁冗员 天启三年(1623)九月五日,刑科给事中解学龙疏言:额饷当核,额兵当清,军需当节,马兵当酌,冗将当裁。洪武年间,文官五千四百余人,军职二万八千余人。万历时,文官增至一万六千余人,军职增至八万一千余人。今日又不知增加几倍。凡可裁者裁之,即可岁省饷数十万两。皇上允准。

张问达致仕 张问达(? —1625)字德允,泾阳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高平、潍二县,征授刑科给事中。父丧除,起故官,历工科左给事中。迁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后召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兼署都察院事。久之,迁户部尚书,督仓场。寻兼署刑部,拜左都御史。天启元年(1621)冬为吏部尚书,连掌内外大计,持论公正。问达更历大任,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并经其手,持议平允,不激不随。先以秩满,加太子太保。天启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加少保致仕。魏忠贤擅国,阉党劾其赃私,命捐赀十万,家遂破。五年卒。崇祯元年(1628)赠太保。

疏议京东屯田 天启三年(1623)十月十二日,户部尚书李宗延疏言:京畿之东,屯地极多,易为见效。今开荒只二万顷,已收麦、黍、稻等五万五千余豆,黑石、粟、杂粮及涿州水旱子粒尚未呈报。得旨,加管理屯田太仆寺卿董应举巡抚官衔,以重事权。同年十二月六日,董应举疏言,京东屯田其难十倍,其利亦十倍。收田安插辽民,是欲藉辽民以屯也;屯于直隶、天津至山海关等处,是为京师左臂也;藉辽力以屯,是以赈济代替召募,不虚费其银于募。为京师左臂,则以屯政寓于政令;不费银于召募,则比之屯田有兵可用者,其难十倍。但若成历,其利亦十倍。

孙承宗详陈守关之策 天启三年(1623)闰十月初一,督师大学士孙承宗详陈守关之略。孙承宗至宁远,同监军袁崇焕、主事鹿善继力主守策,遂任满桂镇之,又命参将高见、贺谦、祖大寿筑城。至是上疏提出,"若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总之以修筑,因辽山以策应,因辽海以守土,因辽人以养人,因辽土以斟酌远近,分布控扼"。并议屯田之法,以因土食民,总计五城十三堡,兵民不下十余万,田可五千余顷。熹宗允准。

郭兴治疏议吏治 天启三年(1623)闰十月十九日,礼科给事中郭兴治疏言吏治:吏治之坏由于奖惩之不明,贪饕之辈,至赃私累万,而处之降调;清风高节,耻于营求者,反以为矫激,排挤中伤。如此,则何以清仕路而神激赏?事下所司议行。

孙绍统奏陈铨政 天启三年(1623)闰十月二十二日,户科给事中孙绍统奏陈铨政。他说:"铨政宜

准祖制。以京堂言之,按定制"南北各正卿一,各少卿与丞或二或三,总计不过三十员。自起废之途开,一概添注,大贤起,老庸亦起,大奸大贪一察再察者亦起,有一署至二三十员。以部属言之,部员职掌,亦自非轻。祖宗朝题准户刑工司属,天故不得轻调,若勤慎者,与吏礼兵一体序选,部分何赏限人,不谓厌薄于此,觊觎于彼。以台省言之,祖制三年一取、三年二取,俱见缺取用。今需次候缺,多至二年。少亦年余,而行取之制失,以抚臣言之,神宗朝令各巡抚官历任年久,方许推行。今席未暖而推报已至,功方新而旌旄又移,而抚臣之制失。以司道言之,升转太易,倏臬倏藩,近且人人热心京师。以府州县言之,神宗初年题准,守令以两考为主,知府历俸六年上下,乃得升迁。近来知府有三年即升;至于州县,有三年两调,而郡邑之制失。所望掌邦治者,为定功令,而后外官始各修实职,地方始受实政。熹宗令章下所司。

王三善进军大方 天启三年(1621)正月,明军败于天启陆广河,安邦彦势力又有恢复。时奢崇明父子屡败,安邦彦援奢崇明,为川师败走。当时总督杨述中驻沅州,朝命屡催,始移镇远,议与王三善不和。奢崇明逃入龙场依邦彦,三善议会师进讨,而述中及诸将皆以为不可。三善力排群议,于天启三年闰十月自将六万人渡乌江,次黑石,亲自督阵,与安邦彦大战于�山,安邦彦大败而逃。三善渡渭河,直抵大方。

赵彦条陈辽东战事 天启三年(1623)十一月二十日,兵部尚书赵彦奏称:辽东敌军造蒙古啰啰车三千余辆,每家作蒙古衣帽,欲借西路往喜峰口。今蒙古称兵挟赏,而东报适至,始知蒙古之通贡不可恃。今关门有南北官兵十三四万,宜及时选锐,分布兵马,划地固守;关门三大将、蓟镇二大将皆一时人杰,宜以忠义劝将士,上下团结,使人人知忠君报国。疏中列举了宜预为谋划者八事。史家云:其时计谋非为不善,然"习纸上之绩",而无实效,致天下之事酿至极溃。

程注奏陈天下急务 天启三年(1623)十一月二十一日,吏科都给事中奏陈:天下最急,莫如辽左,而蓟门为其咽喉。次莫如滇黔,而偏沅为其门户。顷督臣王象乾以忧闻,铨臣议推补,忽而中止,以枢辅踌躇郑重,将议行撤,意谓原抚原自一局,未有专操,必无异议。但督抚得其人,未必不资枢辅之力,若之何自撤藩蔽。偏沅总督已予告,而议专未定,或欲去督而专抚,或欲去抚而尚按,然偏沅故有抚,昔征播州,以支大可移镇;后用江铎,事急则设,事平则止,不独固楚之圉,而正以壮黔之援。今黔中告急,风鹤皆惊,数百里犷悍之苗,非一中丞镇抚其间,何以恬然受我戎索。熹宗令章下兵部。

郝上膏奏陈添注太多 天启三年(1623)十一月二十一日,吏科给事中郝上膏奏陈:京堂添注太多,晋陟无地。计实俸满岁,则放假归籍,递巡抚卿贰缺出,拔才望而用之。监司缺少,率虚召于转例之官,慢君命,误地方,此皆不可训。宜自命下为始,逾岁不任,吏部径作缺另补,而本官仍请旨处分。得旨:京堂填壅,因推升太多,以后照例升转,毋徇情滥推。其方面不到任,即作缺另补,不必一年。

孙承宗奏陈边计 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初七日,孙承宗奏陈:今当裁经略,仍以两抚主其事,总督随时询问,臣当罢遣。如不欲臣离关,请且不推经略,不推总督,以臣督两抚,以防疑归抚臣,居密云,居宁前。又言登抚未可遽裁,登镇仍当早计。熹宗纳其言。

滥赐爵荫 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十二日,吏科给事中许誉卿奏言:近年爵荫太轻,两朝登极、皇子诞生,三品京官以上,人人延荫子孙。至锦衣世袭,非军功不得滥予,而今保姆之属(系指客氏,赐一品名号,荫其子,又赐第宅),阉尹之流(系指太监魏忠贤等),纷纷传奉,兵部不敢执争。又织造太监李实等凌辱地方官长,是乃纲纪日替。熹宗欲重治许誉卿,阁臣力救,遂夺俸半年。

江苏扬州地震 天启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624)二月十日申时四刻,南直隶的应天、苏州、松江、凤阳、泗州、淮安、扬州、滁州等六府二州俱地震,扬州府尤甚。扬州倒塌城垣三百八十余垛,城铺二十余处。应天墙垣摇动,屋脊梁柱俱各有声,城垣墙垛倒塌,高淳地震有声,屋宇倾、水泛溢,句容瓦坠屋覆。常州、镇江、扬州,声如巨雷,摇倒民房无数,压死多命。淮安府湖水翻房宇动。泰州墙垣摇动、江河皆啸。常熟墙屋俱摇,行者皆仆。东刹浮图亦摇倒其顶,城内外地面多裂。崇教兴国寺,塔顶斜倾。吴江、震泽、嘉定、江都、通州(今南通)、泰兴,吴淞所,常州府宜兴,俱震声如雷。松江府华亭、上海、南汇守御所、以沙堡,无锡、靖江,俱屋宇摇动,武进坏屋湖水皆飞。应天府、上元、江宁、六合、吴县、江阴、丹阳、金坛、丹徒、溧阳及江西,同日皆震。震中烈度(I_0)V_I,震级(M)六级。

魏忠贤提督东厂 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二十五日,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领东厂事。万历末年,刑罚弛纵,厂卫缉事亦渐稀简,诏狱至生青草。及魏忠贤提督东厂,任用田尔耕掌卫事,许显纯掌镇抚司,罗织锻炼,严刑惨酷,厂卫之毒遂流遍天下。

客、魏杀后妃　客氏与魏忠贤盗专国柄，虑妃嫔揭发其罪，天启三年(1623)乃矫旨赐光宗选侍赵氏自尽；幽裕妃张氏于别宫，绝其饮食而死；皇后张氏，数于熹宗前数客、魏过失，及后怀孕，客氏密布腹心宫人，以计堕其胎。趁熹宗郊祀之机，杀其所宠的冯贵妃。慧妃范氏以客、魏谗失宠，李成妃为之乞怜，客、魏乃幽成妃于别宫，成妃预备食物于壁间，半月不死，斥为宫人。

遣中官刺边事　熹宗好察边情，常令东厂派人到关门，侦探情况奏报，称为"较事"。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专权，遣其党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带着内库神炮、甲仗、弓矢等数万件到关门，为军中用。又以白金十万及诸币赐将士，实为刺探军情。忠贤以承宗功高，欲亲附之，又令中官刘应坤等带帑金十万犒将士，并申其意。承宗不与交一言，忠贤由是怀恨孙承宗。

荷兰侵占澎湖　荷兰殖民者万历中叶来到中国，万历三十三年(1604)七月，侵占澎湖，伐木建房，为久居计，并借中国商人李锦、潘李、郭震致书明朝。福建巡抚徐学聚禁商民下海，断其接济，荷兰人无所得食，乃于十月末离去。后又侵夺台湾地，筑室耕田，久留不去。接着又出据澎湖，筑城设守，以求通商。守臣说以毁城远徙，即可通商，荷兰人乃于天启三年(1623)毁城移舟离去，巡抚商周祚以遵谕远徙上闻，但荷兰人仍旧占据着台湾。既而复筑城澎湖，进犯厦门，为明军所败，乃又求和。再许其毁城远徙，而又复筑如故。后又停泊风柜仔，出没沿海地区，要求互市。而海寇李旦复助之，滨海郡邑为之戒严。

吴野樵起事　长兴县民吴野樵，为叶朗生之党，逃匿广德、长兴交界地方，县官石有恒缉捕不得。石有恒族人十二房有事相求，有恒不从，忿恨而入野樵党，与谋起事。天启四年(1624)正月初一日，同野樵等突入县放火，杀有恒及主簿徐可行。地方群起相逐，抓获吴野樵及王召魁等，余众皆逃。查检库藏无恙，而狱中所关囚犯皆远去，满城震动。

王三善自杀　王三善(—1624)，字彭伯，永城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由荆州推官入为吏部主事，历考功文选郎中，进太常少卿。天启元年(1621)十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天启二年二月安邦彦反，进围贵阳。至十二月，三善三路进兵，以二万人破敌十万，解贵阳之围。后率军直捣大方，入居安位第，位偕母奢社辉走火灼堡，邦彦逃往织金。三善屯大方久，食尽，不得已而退师。天启四年正月，尽焚大方庐舍而退，安军追击，中军参将王建中、副总兵秦民屏战死。正月十日，三善为降将陈其愚冲落马，自刎不死，被俘遇害。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余人皆死。崇祯初年，赐王三善兵部尚书。

何宗彦逝世　何宗彦字(—1624)，字君美，其父由金溪客随州，遂以为家，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累官詹事。四十二年迁礼部右侍郎，代掌部事。寻转左侍郎，仍代掌部事。宗彦代理尚书事六年，遇事侃侃陈奏，时望甚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会推阁臣，廷臣多首宗彦，独吏科给事中张延登不署名，遂不获准，于是请假回籍。光宗即位，即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天启元年(1621)夏还朝，屡加至少傅兼太子太师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四年正月十五日，卒于官。赠太傅，谥文毅。有《何文毅集》。

贾毓祥奏陈粤西之患　天启四年(1624)正月十五日，巡按广西御史贾毓祥奏陈粤西之患有三，一为交夷，二为土司，三为瑶僮。现设之兵饷但防瑶僮，而交夷土司不与焉。今交夷擅兵，蚕食思陵、迁诸土司，逼我上石、西太平、思明，侵地计二百七十二村。水西之变，泗城、南丹，阴通安酋，思州不受调，瑶僮伺同掠，宾州八寨为群盗根株。土舍名为我用，实相窥隙。宜相度险要，增兵防守，章下兵部，令抚按勘奏。

张嘉策接受荷兰贿赂　天启四年(1624)正月十七日，御史崔奇观弹劾漳南道副使程再伊听任副将张嘉策接受"红夷"荷兰银三万两，许其澎湖互市。

黄尊素奏陈科道之责　天启四年(1624)正月二十一日，山东道御史黄尊素奏陈科道之责。他说：科道之设，惟参驳纠弹，各有司存。自东事告急，辄荐举边才，覃诏一颁，广开起废。于是有乞怜径请。有托介求客，而人遂相沿荐举之常。夫独不知科道之职掌乎？请尚方之剑，是吾责；发蒲轮之徵，非吾责。熹漏吞舟之纲，是吾责；赋招隐之章，非吾责。宗是其言。

杨姜削籍　苏州府同知杨姜，素廉直，织造太监李实诬奏其擅减袍服，得严旨。应天巡抚周起元奏，杨姜守官清正，时谒织造太监，不行僚属之体，因而无罪被诬。李实再奏，周起元再为辨白。天启四年(1624)正月二十三日，杨姜夺职削籍，周起元也因此埋下祸根。

解学龙请修正史　天启四年(1624)正月二十三日，刑科给事中解学龙请修正史。他说：史家之礼，有编年，祖之春秋；纪传，本之三传，我朝列圣实录，只仿编年，而事之首尾不相贯，人之本末不可知。况革除土木，至今公案未定，其间一姓递承，委裘无恙，乃操觚者拘其忌讳，至令参稽尚仍夫矗简，只为袭舛，何以传信。至家乘野书，皆得以肆其私笔，宁非圣朝一大阙事哉！今宜开局纂修正史，刻期告成，故所

以成之者有三，一搜其人，二萃其书，三督其程。熹宗命实录修成再议。

杭州兵变 天启四年(1624)正月，杭州有诸生家张灯，不慎火起，延烧房屋，九营兵卒乘乱而起，拆钱塘门外更楼十座。当时有杨把总，约束营兵勿予乱，被各兵捆绑还营，悬之高竿，欲以弓箭射之，两游击好言抚慰乃定。杨把总被革职。

孙承宗奏陈边方大计 天启四年(1624)二月初三日，督师大学士孙承宗奏陈：今边方大计，不过日守，日款，日恢复。皇上敕臣说：宁远广宁及河东土宇，渐图恢复，乃观天下大议，似专守关以内。而道且说：国家失河套、大宁不失为全盛，何必复辽东。然而辽东不复，关不可守，欲复辽以守关，则关以外必不可不屯兵。屯必不可不修筑，而宁远觉哗之议必不可轻罢。请以守言之：凡客兵利速战，主兵利久守，今关城聚秦、晋、川、湖、齐、梁、燕、赵之众，尽号客兵，无论粮料不继，即其继也，不逋不华而坐食，使自坐困。盖以速战之备为久守之谋，欲进则不足，久守则必变，故议兵必在土著。然蓟少土兵，而守辽以内，则辽兵亦为客，故随辽人之便，安插于两卫三所二十七堡间，以土以屯，曰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使关外之备稍足，则关内之防稍减。况守在关以内，则内备浅薄、守在宁远，则山海已为重关。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再以款言之：臣之初抵关，毳幕旗车，杂踏冈阜，一登陴而腥膻之气扑人，日报劫杀，议远抚场而通官难之。得广宁道议和，初移之中后为百里，又再移之宁远为二百里，以两协提路将分之信地，即抚即防，劫掠希少。今议撤关外之防为守关内，则仍入关为抚，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环听于关门。且宁远有道，宁前有道，镇称辽镇，抚称辽抚，而安插辽人于宁前，则说胎祸。无论十余万生灵何地安宁。而既无宁广之土地人民，何独存宁广之赏。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再以战言之：贼薄宁远，则以置亡置死之兵合与亡与死之众，心坚敢死，气励亡生。而外无可掠，中无可希，炮矢既倍，兵民既济，兼以海出其后，山峙其前，奇伏间出，贼必歼焉。即或越一城而前，宁城已缀其后，即或合一城而守之，各城已扼其吭，即或直抵关门不顾，而前有坚城，后有救兵，自可立见扫荡。又或妄意及海，则觉华岛之驻师与望海台之泊船相控，而长鲸必授首于波臣，又或下关臣之精甲进图恢复，则水师合东，陆师合北，水陆之间，奇奇正正，出没无端，故拒贼门庭之中与拒贼门庭之外其势既辨；而促贼于二百里之外，与贼促我于二百里之中，其势又辨。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有心在天下而边塞之情形未悉，间凭道路之口以为忧疑；亦有心不在天下而边塞之安危不顾，祇念身家之计以为侥倖。伏望皇上立断，无摇众议，庶臣之肝胆有藉而土宇可复。熹宗嘉答。

疏陈边将之贪 天启四年(1624)二月四日，刑科给事中解学龙疏言：现今三农告匮，束手莫支，两辽东三帅各领银一万二千两为治宅第之资令人骇愕。营房每间领造价钱六两，而镇将睹自侵尅，每间实际用银不过五六钱。马料刍豆，十扣其半。疏入，熹宗责其"冗漫"。

周之纲论恤民当除三害 天启四年(1624)二月九日，户科给事中周之纲奏言：恤民当除三害：奸书飞洒民粮；有司火耗太重；户丁逃亡赔补。疏下所司。

朱光祚奏核练饷节费 天启四年(1624)二月十一日，戎政兵部左侍郎朱光祚奏核练饷节费：元年发练饷三万，二年发帑三十万，逾岁费殆二十万，债帅奸徒出入莫问，光祚核银十四万六千二百六十余。勒石贮库。

赵南星奏陈变通铨法 天启四年(1624)二月二十三日，吏部尚书赵南星奏陈变通铨法，他说：四司官额十五人，今仅八人，昔时司官皆堂上自选，无咨访之说，且每省直恒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员外而郎中，皆遍历四司再请告。文选、考功郎事任尤重，偶乏人则他部调补。近者近署皆荐人自代，议者遂有顶首之谤。于是偶有员缺，发单咨访于其乡之京堂科道，而又以吏科河南道非其乡者以示大公，为诸臣绝谤。然而旧人日多，循资起用；远者难到，不得已就近推补，限期速至。其远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调补，不妨一处二人，待远者至而后以一人避之。行此之道，则旬月之间，四司俱满，而铨政可举。熹宗允准。

京师滦州地震 天启四年(1624)二月三十日，京师滦州(今河北滦县)地震。先是，十三日，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地屡震，震坏城郭、庐舍无算。至是，滦州大震，坏庐舍无数，地裂涌水异物。乐亭旧铺庄，地裂涌黑水，高尺余。迁安声如巨雷，塌坏城垣民舍无数。卢龙震倒官民房舍甚多。京城内宫殿动摇有声，铜缸之水腾波震荡。这次地震连续时间长，有的一日二、三震，如东安，辰巳时地震，至申时又震，从乾起有声。迁安一日数十震、卢龙、滦州持续达四十余日。至三月初二日，京师又震三次。大城地累震，屋瓦动摇，夜不敢寝，多有露宿者。东光地大震物皆摇动。昌黎、新安、真定府、蓟州、遵化、玉田、河间府、保定府、天津三卫，以及山东临邑、德平、海丰、武定州(今惠民)等二十余州县皆震。震中烈度$(I_0)V_{\text{Ⅱ}}$，震级(M)为六点二五级。

王象乾致仕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新城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佥都御史，代李化龙经理播州。巡抚宣府。天启时，累官兵部尚书，总督蓟辽，天启四年(1624)三月初三日去职，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崇祯元年，起为宣大总督，时年八十三。二年以病归。崇祯三年六月初二日逝世。王象乾机警有胆略，历官督抚，威名九边。有《开天玉律》。

宋师襄论政务敷衍之弊　天启四年(1624)三月初三日，御史宋师襄疏言。终日讲筹边务、饬吏治、弭盗贼，而终无成效者，乃因各司议事之后，其实际执行与否皆置之勿问。疏入，报闻。

黄尊素奏陈时政　天启四年(1624)三月七日，御史黄尊素上疏，力陈时政十失，涉及封疆多故、荫恤失当、推升失实、忠谗并进、辽人来归、户兵要务、事机渐移、贿赂公行、大臣依违、议论庞杂等事。疏末叹曰："萧墙隐祸惨于夷狄，异日有欲言不敢、欲闻不得者。"疏入，魏忠贤大怒，谋廷杖之。赖大学士韩炉力救，乃夺俸一年。

赐魏忠贤祠额　天启四年(1624)四月二十一日，司礼太监王体乾、魏忠贤各乞祠额，予之。礼科给事中霍守典谏言，此乃恤典，赐在死后而不在生前，二臣为非礼之请，皇上为非礼之予。皇上不听。魏忠贤又因缉捕"伪札"及私铸铜钱之功而受荫赏，给事中彭汝楠、御史刘廷佐言其殃及无辜，株连疑似，害不可胜言。皇上不听。

汪文言下狱　汪文言，字士克，歙县人。初为县吏，智巧任术，有侠气。神宗末，输赀为监生，用计破齐、楚、浙三党。又交结东宫伴读王安，与谈当时流品，安悦之。光、熹之际，外廷倚刘一璟，而安居中，以次行诸善政，文言交关力为多。及魏忠贤杀王安，文言亦下吏，得末减，益游公卿间，舆马常填溢户外。叶向高用为内阁中书，韩炉、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皆与其往来。会给事中阮大钺与光斗、大中有隙，嘱刑科给事中傅櫆劾文言，天启四年(1624)四月二十二日有旨下文言诏狱。魏忠贤本想借此机会大行罗织，但掌镇抚司刘侨纳叶向高及黄尊素言，止坐文言廷杖除名，无诛及者。忠贤谋未逞。

诏增盐课　天启四年(1624)五月初九日，诏增加盐税。除陕西河东池盐及云南旧额不增外，其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广东、四川共增课五十四万七千九百九十三两。

黄汝良致仕　黄汝良，字明起，晋江人。万历十四年(1587)进士，历南北国子监司业，擢东宫日讲官，累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天启四年(1624)五月二十六日进太子少保。致仕，有《河干集》、《乐律志》等。

福宁兵变　天启四年(1624)五月，福宁州官兵由于仓官林廷柱盗窃军储，不及时发饷；州同徐士璋收受贿赂而不追究；王州守又包庇佐贰而不为调解。致使士兵张天锡、王一经等忍无可忍，与众兵卒一起关闭城门，包围官署，殴打贪吏，树旗拆屋，城门关闭达十三天。守道朱宋或作震生往视，抚之乃定。

孙承宗上车营图说　天启四年(1624)五月二十九日，督师大学士孙承宗上车营图说：计骑步二十四营，合为车营，外有前锋后劲，骑兵七营，合骑步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人，内步兵四万一千八百五十六人俱足。骑兵五万一千人，现少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九人。议催各镇兵，可得万人，其马宜六万三千六百一十三匹，今少六千五百八十九匹，拟于京营量选三千五百，太仆寺量兑三千一百，其各营所需细大之数约七十余万，乞发帑金二十四万，熹宗准发十万。

杨涟疏劾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四月汪文言下狱，东厂太监魏忠贤本想借机罗织罪名，打击外廷。但刘侨结案很快，忠贤大怒，以私人许显纯代刘侨掌镇抚司，正人日危。于是左副都御史杨涟愤甚，于六月初一日抗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末云"掖廷都城，即大小臣工，皆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乞正法以快神人之愤"；客氏使居外宅，"无厚其毒"。疏上，忠贤惧，求解于大学士韩炉，炉不应。忠贤遂在熹宗面前哭诉，且辞东厂，而客氏从旁为之剖析，王体乾等从旁赞之，熹宗懵然不辨，遂温谕留忠贤，而严旨责涟。杨涟既劾魏忠贤，一时抗疏继之者，南北台、省、卿、达七十余人，交章论忠贤不法，熹宗皆传旨切责之。

万爆杖死　万爆，字爆夫，南昌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授刑部主事，天启初年，调工部营缮主事。迁虞衡员外郎，司鼓铸，旋进屯田郎中，督陵务。杨涟及诸廷臣交章劾忠贤，率被严旨。爆愤，抗章极论忠贤，谓其自营坟墓仿佛陵寝，坚阻以内官监废铜铸钱之议，"内廷外朝止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疏入，忠贤大怒。当是时，忠贤方恶廷臣交章劾己，无所发愤，思借万爆立威，乃矫旨廷杖一百，斥为民。先令群阉至爆家，爆而殴之，比至阙下，气息才属。杖已，绝而复苏，群阉更肆蹴踏，过了四天，万爆身亡，时天启四年六月十六日。崇祯初，赠光禄寺卿。南明时，谥忠贞。

林汝翥受杖　巡城御史林汝翥曾笞内侍曹进、傅国兴，万爆被杖死后，忠贤矫旨杖汝翥如万火景。汝翥惧，逃到遵化。忠贤遣缇骑百余围叶向高私第，以汝翥为向高乡人(或言是向高之甥)，向其要人，实为折辱叶向高。不久，林汝翥到蓟州巡抚邓渼

处自首。六月二十日，命杖之百，削籍。

叶向高致仕 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福清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改左中允，仍视司业事。万历二十六年召为左庶子，充皇长子伴读官，寻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久之，改吏部。万历三十五年五月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十一月入朝，从万历三十六年到四十二年，独在相位六年，遂准其归。向高归六年，光宗立，特诏召还。未几，熹宗立，天启元年(1621)十月还朝，复为首辅。熹宗冲年即位，不能辨忠佞，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以是得罪忠贤。忠贤默恨向高，而其时朝士与忠贤抗者率倚向高。天启四年四月，汪文言下狱，忠贤惮向高，未敢大治，止罪文言。至六月，杨涟疏劾魏忠贤，廷臣相继抗章至数十上，向高念忠贤未易除，从中挽回，犹冀无大祸。既而工部郎中万燝被杖死，御史林汝翥亦被逮杖。向高以国事不可为，乞归已二十余疏，至是请益力。时加官至上柱国少傅中极殿大学士。七月初九日致仕，熹宗命加太傅，遣行人护归。天启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一作年七十)。谥文忠。有《叶台全集》

广州民变 天启四年(1624)七月十日，两广总督胡应台奏云：广州民变，由于米贵，殴击知府程光阳，辱及巡按。斩杀为首者五人，乃定。

黄河决口徐州 天启四年(1624)七月，黄河决口于徐州魁山堤，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河水一自南门至云龙山西北大安桥入石狗湖，一由旧支河南流至邓二庄，历租沟东南以达小河，出白洋，仍与黄会。徐民集赀迁州治于云龙山。

孙玮逝世 孙玮(—1624)，字纯玉，号蓝石，渭南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行人，擢兵科给事中。以母病，不候命擅归，坐谪桃源主簿。久之，历迁太常卿。万历三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朝鲜用兵，治军天津。后进兵部侍郎，召为右都御史，督仓场。进户部尚书，督仓场如故。大僚多缺，命署戎政。不久，又兼署兵部。都御史温纯去后，八年不置代。至万历四十年十二月，外计期迫，始命玮以兵部尚书掌左都御史事。明年十月告归。天启改元，起南京吏部尚书，改兵部，予机务。天启三年(1623)召拜刑部尚书，其冬以吏部尚书再掌左都御史事。天启四年秋八月病危，上疏荐刘一燝、邹元标、王纪、孙慎行、锺羽正、曹于汴、文震孟、满朝荐等。八月十二日病逝。赠太子太保，谥庄毅。

赵南星致仕 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号侪鹤，北直高邑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除汝宁推官，迁户部主事，调吏部考功，引疾归。起历文选员外郎，疏陈四大害，以病归。再起，历考功郎中，万历二十一年大计京官，与尚书孙钱秉公澄汰。旋斥为民。南星里居，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称为海内“三君”。光宗立，起大常少卿，寻改右通政，进太常卿，至则擢工部右侍郎。居数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齐天下为已任。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锐意澄清，政府及中贵皆不得有所干清，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侧目，滋欲去南星。给事中傅櫆首假汪文言发难，劾南星紊旧制，植私人，南星遂杜门乞休，不许。天启四年(1624)十月，因推举谢应祥为山西巡抚事为御史陈九畴所劾，魏忠贤矫旨责南星朋谋结党，赵南星乞休求去。十月十六日，魏忠贤矫旨切责，放之归。官至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后以汪文言狱词连及，下抚按提问，坐赃五千，遣戍代州。天启七年十月十七日死于戍所，年七十八。崇祯即位，赠少保，谥忠毅。有《史韵》、《学庸正说》、《忠毅公集》。

高攀龙致仕 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别号景逸，无锡人。万历十七年(1584)进士，授行人。以劾王锡爵被谪为揭阳添注典史，之官七月，以事归。寻遭亲丧，遂不出，家居近三十年，言者屡荐，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禄丞。天启元年(1621)进少卿，二年四月疏劾郑养性，卒使还籍。孙慎行追论红丸案，攀龙亦归罪方从哲。改太常少卿，旋改大理少卿。邹元标建书院，攀龙参与其事，元标被攻，攀龙请与同罢，诏留之。进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天启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时御史崔呈秀按淮扬，赃私狼藉。攀龙揭发其贪污事，赵南星议戍之，崔呈秀遂投靠魏忠贤，乞为义子，攻攀龙党南星。赵南星去职，攀龙亦求去，遂于天启四年十月十八日罢归。后崔呈秀仍不甘心，必欲杀之，乃窜名李实劾周起元疏中，遣缇骑往逮。攀龙闻之，于天启六年三月十六日，写遗表，整衣冠，自沉于池。崇祯初，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憨。高攀龙乃明代著名学者，东林党领袖。与顾宪成修复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其中，顾宪成卒，高攀龙领导讲席，世称“顾高”。有《高子遗书》。

杨涟削籍 杨涟(1572—1625)，字文孺，号大洪，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除常熟知县。举廉吏第一，擢户科给事中，转兵科右给事中。当光宗、熹宗之际，定宫府危疑，杨涟出力犹多。未几，迁兵科都给事中。及御史贾继春复论移宫案，杨涟上《敬述移宫始末疏》，于泰昌元年(1620)十二月抗疏归。天启二年(1622)起杨涟礼科都给事中，旋擢太常少卿。天启三年冬，拜左佥都御史，四年春，进左副都御史。是时魏忠贤已用事，群小附之。杨涟与魏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激扬讽议，务植善类，赵忠贤等衔

恨次骨，遂兴汪文言之狱，罗织诸人。杨涟愤而于是年六月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自是以后，魏忠贤日谋杀杨涟。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削籍，并再兴汪文言狱，令其诬陷杨涟等。汪文言至死不承，许显纯乃自为狱词，坐杨涟赃二万，天启五年三月逮入狱。比下诏狱，许显纯酷法拷讯，体无完肤，于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夜中毙命，年五十四。崇祯元年(1628)三月，赠都御史右谥忠烈。十二月改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有《忠烈公集》。

左光斗削籍 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一字共元，号浮丘，人称沧屿先生，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除中书舍人，选授御史，巡抚中城，捕治吏部豪恶吏，出理屯田，大兴水利。光宗崩，定宫府危疑，保熹宗登极，光斗与杨涟两人力为多，朝野并称"杨、左"。廷议改元，以左光斗议定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1620)，明年为天启元年(1621)。天启三年擢大理丞，进少卿。天启四年二月拜左佥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左光斗与其谋，又与高攀龙共发崔呈秀赃私，魏忠贤及其党咸怒。及魏忠贤逐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又假会推事削杨涟与左光斗籍，复构汪文言狱，入左光斗名，遣使往逮。同年十月二十八日下诏狱，许显纯诬以受杨涟、熊廷弼贿，于五年八月初八日为狱卒所毙命。年五十一。崇祯初，赠副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谥忠毅。

明军普定之捷 天启四年(1624)正月，王三善败歿，以抚治郧阳右副都御史蔡复一进兵部右侍郎，代巡抚贵州，寻代杨述中总督贵州、云南、湖广军务，兼巡抚贵州。时安邦彦进围普定，结四十营，绵亘二十里。十一月，蔡复一檄总兵官鲁钦、黄钺等分道御之。钦败敌于汪家冲，钺败敌于蒋义寨，参将尹伸守普定，亦败敌，与大军会合。邦彦势窘，渡河西奔。钦、钺督诸将穷追，长驱织金，焚营数十里，获牛马、甲仗无算。

沐昌祚逝世 天启四年(1624)十二月初一日，征南将军黔国公沐昌祚逝世。沐昌祚隆庆三年(1569)嗣爵，领镇五十六年。命其孙沐启元代镇。该月云南巡抚闵洪学上疏，沐氏庄田租税乞由地方官府征收，以救此一方民命；若仍由该镇征收，请严戒员役定丁，不许生乱。

朱国祯致仕 朱国祯字文宁，乌程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累官祭酒，谢病归，久不出。天启元年(1621)擢礼部右侍郎，未上。天启三年正月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并命。六月，朱国祯还朝，顾秉谦、朱延禧以列命在后，谦居其次。改文渊阁大学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魏忠贤窃国柄，朱国祯佐叶向高，多所调护。天启四年夏，杨涟劾魏忠贤，廷臣多劝叶向高出疏，叶向高愠甚，朱国祯请容之。及叶向高罢，韩爌为首辅，韩爌罢，朱国祯为首辅。魏广微与魏忠贤表里为奸，视朱国祯蔑如。其冬为逆党李蕃连劾之，三疏乞归。十二月二十二日，加少傅致仕，卒谥文肃。有《大政记》、《涌幢小品》等。

再逮汪文言 天启四年(1624)四月，汪文言曾下镇抚司狱，忠贤本拟大行罗织，狱旋解，忠贤志不逞。忠贤以掌镇抚司刘侨不任事，削其籍，而用许显纯代掌北镇抚司，欲再伺机而动。御史梁梦环知忠贤恨未已，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复劾文言，诏立逮之，下北镇抚司狱，即命许显纯鞫治。而大理寺丞徐大化，亦希忠贤指，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于是东林之祸遂起。

李鲁生疏论东林 天启五年(1625)正月初五日，给事中李鲁生疏言，"诸奸倾陷正人"，动曰"中旨"。"夫旨不自中而谁出哉?执中为帝，宅中者王，而旨不得称中，必由汪文言之关说、王安之交通、阁部之雷同，而后为旨，则旨真外矣。"请将被东林人士驱逐之"忠良"再召起用之。熹宗遂命阮大铖等复官，改邹元标、冯从吾等创办之首善书院为"忠臣祠"。

李维桢致仕 李维桢(1547—1626)，字本宁，京山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万历间擢提学副使，浮沉外僚近三十年，天启初以布政使致仕家居，召修《神宗实录》，迁礼部右侍郎。天启四年八月升南京礼部尚书，天启五年正月初八日致仕，次年卒，年八十。博闻强记，文章弘肆。有《史通评议》、《董帝祠额解》、《大泌山房集》。

刘宗周抗旨不就官 原任太仆寺少卿刘宗周辞官家居，有旨起用，擢升为右通政使，刘宗周抗旨不就。其疏有云"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礼义为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或"以退为进"，"藏身愈巧"，"庙堂无真才，山林无姱节，陆沉之祸何所底止?"故"有死不敢趋命"。天启五年(1625)正月二十五日，熹宗降旨：刘宗周"藐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著革了职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崇祯初复官。

乔应甲疏攻东林 天启五年(1625)正月二十六日，副都御史乔应甲疏劾东林人士，谓赵南星、李三才、汪文言、叶向高、魏大中、袁化中、高攀龙、曹于汴等"欺蒙君上"，"世界三十年，不使一日宁静。"二十八日又上疏，谓东林开"时局门户"，议论蜂起，"私人推戴，力排公论。"

后金军取旅顺 天启五年(1625)正月，后金

军取旅顺，游击张盘、都司朱国昌等战死。盖自辽土失陷，惟金州东监海盖，南近登莱，游击张盘以孤军据其地，而兵力单弱，退保旅顺。后金兵来攻，张盘力战死，朱国昌阵亡。

官军败于织金 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明军普定之捷，进至织金。当时蔡复一为总督，朱燮元亦以尚书督四川、湖广、陕西诸军，故蔡复一节制不行于境外。总理鲁钦率兵深入织金，四川、云南兵皆不至。天启五年正月，鲁钦、刘超等自织金旋师渡河还，安邦彦军自后袭击，官军诸营尽溃，死者数千人。

丁乾学等降谪 丁乾学，浙江山阴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官检讨。天启四年(1624)乡试，山东、江西、湖广、福建主考官，为丁乾学、方逢年、顾锡畴、吏科给事中郝士膏、礼科章允儒、兵科董承业、户科熊奋渭、主事李继贞八人，以发策讥刺魏忠贤，天启五年二月初一日降旨诘责，俱降三级谪外。乾学主试江西，试策中引汪直、刘瑾，忠贤尤恶之。方降调赴京师，有指挥佥事高守谦激忠贤怒，矫称"有旨逮问"，守谦导厂卒二十余人拥入乾学寓，箠楚交下。乾学不胜挫辱，天启七年愤郁而卒。崇祯初谥文忠。有《拥膝斋文集》。其他七人亦斥为民。

余懋衡致仕 余懋衡，字持国，号少原，婺源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由永新知县征授御史，极论殿工矿税之弊，出按陕西，监税中官梁永贿膳夫再毒懋衡不死。上奏不省，寻以忧去。天启中授南京吏部尚书，因太监魏忠贤势方盛，天启五年(1625)二月二十四日引疾求退，许之。既而奸党诬诋讲学诸臣，以懋衡及冯从吾、孙慎行为首，遂削籍。崇祯初复官，二年(1629)卒。著有《语录》、《关中集》诸书。

李承恩入狱论死 李承恩系世宗宁安公主之子，魏忠贤欲得其宅，不允。魏忠贤遂诬陷其服饰越制，擅用赭黄袍龙盒等。天启五年(1625)二月二十六日下李承恩镇抚司狱，论为死罪。

周宗建、黄尊素等削籍 天启五年(1625)三月初，给事中霍维华、薛国光；工部主事曹钦程等纷纷上疏，攻击东林人士。周宗建、张慎言、黄尊素、邹维琏、卢化鳌、熊明遇等皆被削夺官诰。

丁元荐逝世 丁元荐(1560—1625)，字长孺，号慎所，长兴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因言事去官。天启五年(1625)三月十四日卒，年六十六。从学于许孚远、顾宪成，以乞节学问闻于世。通籍四十年，前后服官不满一载。有《寻拙文集》、《西山杂记》。

汪文言之狱 天启五年(1625)三月，魏忠贤同党锦衣卫北镇抚司掌司事许显纯等勘问汪文言之狱，辞连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袁化中、惠世扬、毛士龙、邹维涟、邓美、周朝瑞、黄龙光、顾大章、卢化鳌、夏之令、王之寀、钱士晋、徐良彦、熊明遇、施天德等。许显纯坐杨涟等以移宫罪，魏党大理丞徐大化献策于魏忠贤曰："彼但坐移宫，则无赃可指。若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魏忠贤然之。乃令许显纯复鞫汪文言，五毒备至，使引杨涟纳熊廷弼贿，复及左光斗等。汪文言蹶然起曰："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许显纯乃手作汪文言供状，汪文言复张目曰："尔莫妄书，异时吾当与面质。"许显纯即日毙汪文言，而具狱词以上。于是杨涟、左光斗坐赃二万，魏大中三千，周朝瑞一万，顾大章四万。三月二十七日宣旨：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遣缇骑逮至京究问追赃；赵南星等人俱削籍，抚按提问追赃具奏。于是兴大狱。

蔡复一罢官 蔡复一(1576—1625)字敬夫，同安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除刑部主事，历兵部郎中。居郎署十七年，始迁湖广参政，进按察使、右布政使，以疾归。光宗立，起故官，迁山西左布政使。天启二年(1622)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奢崇明、安邦彦反，贵州巡抚王三善败殁，进蔡复一兵部右侍郎代之。寻代杨述中总督贵州、云南、湖广军务，兼巡抚贵州。蔡复一乃召集将吏，申严纪律，遣总理鲁钦救凯里，获普定之捷，长驱织金。天启五年正月之败，三月二十一日罢官。候代，仍拮据兵事，数遣将出战，多有功。至十月，蔡复一卒于平越军中。年五十。好古博学，善属文，耿介负大节，橐无遗赀。谥清宪。有《遯庵全集》。

赵彦致仕 赵彦(—1525)，肤施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行人，屡迁山西左布政使。光宗时以佥都御史巡抚山东，请增兵戍诸岛，设镇登州。天启初镇压徐鸣儒起义，擢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极陈边将尅饷役军处伍占马诸弊，因条列事宜，皇帝称赞，立下诸边议行。天启五年(1625)五月初三日以抗疏劾魏忠贤削籍。不久追叙边功，加太子太傅致仕卒。

卓迈条陈江南情势 天启五年(1625)五月四日，御史卓迈条陈江南情形四款：一，均赋役。江南赋重役繁，侵匿者积欠，花诡者避差，而中户贫民偏受赔贴之累。均平之法在于则壤定赋，量地派役。征收则细比排甲，而不专责粮长；起解则严督正身，而不轻纵包揽。二，重兵防。三，兴水利。四，戢刁风。疏末又言，现今江南各县，县令缺员，因此速选县令，责其刻期赴任，尤为江南今日第一义也。从其议。

翁正春罢官　翁正春(1553—1626),字兆震,号青阳,福建侯官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第一,授修撰,累迁礼部侍郎,极言弊政,以侍养归。天启初,起用为礼部尚书,抗论魏忠贤,再乞归。天启五年(1625)五月二十日罢官,遂不再出。次年卒,年七十四。谥文简。

行宗室限禄法　明后期,宗族繁衍,人口日多,致禄入不敷分配。天启五年(1625)五月,江西御史田珍疏陈限禄一法,以万历四十八年见给之数禄银二十万六千为额,根据各府宗室多寡均定,除亲王本人定额外,以现在人数为准,日后子孙增多,止在原额内均支,要在禄支不滥。遂实行。

各地饥荒　天启五年(1525)六月,延安大风雪三日。济南飞蝗蔽天,秋禾荡尽。是年大饥,致人相食。

萧云举致仕　萧云举,生卒不详,字允升,宣化人。万历十四年进士。累官任吏部左侍郎,天启二年(1622)九月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充《神宗实录》副总裁。天启三年闰十月迁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五年六月初一日,加太子太保致仕。崇祯三年(1630)予祭葬,四年赠太子太傅,谥文端。有《青萝集》。

朱延禧致仕　朱延禧(—1637?)字允修。山东聊城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国子监司业、左中允、左中允兼编修撰诰敕、右谕德兼侍讲、右庶子兼侍读。天启初以礼部右侍郎充日讲官。天启三年(1623)正月进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七月《光宗实录》成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十一月进少保兼太子太保。天启五年正月进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同年六月初十日致仕。崇祯元年(1628)七月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崇祯十年三月予祭葬,赠太保。延禧自称通籍三十年,家居者强半。

锻练杨左冤狱　天启五年(1625)七月初一日,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入镇抚司狱,令五日一讯,逼供征赃。该日方震孺下刑部狱。七月初七日,北镇抚司许显纯奏将杨涟等送法司追赃定罪。宣旨:"杨涟等党庇熊廷弼,沦没封疆,且纳贿招权;移宫一事,陷朕不孝,罪恶滔天。许显纯等何擅求送部(刑部),明属徇私,还着严比,不得宽纵。"

崔景荣致仕　崔景荣(—1631)字自强,长垣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平阳府推官,升为御史,巡按甘肃、湖广、河南,最后按四川。后晋为太仆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万历四十一年入为兵部右侍郎,总理京营戎政。改为吏部,因病辞去。一年后,起为宣府大同总督,召为兵部尚书。辽沈失陷,熊廷弼、王化贞龃龉,崔景荣数为言官所论。御史方震孺请罢崔景荣,以孙承宗代之,遂屡疏求去,告病归家。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专权,起崔景荣为吏部尚书,欲倚为助。及至京师,魏忠贤盛饰大宅以待,景荣不赴。锦衣帅田尔耕来谒,又辞不见。其他诸事亦多不听魏忠贤指使,并要求魏广微申救杨涟、左光斗。于是御史倪文焕、门克新先后劾崔景荣阴护东林,"媚奸邪而邀后福"。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罢官,九月十七日削夺为民。崇祯即位,恢复原职,崇祯四年(1631)卒。

石三畏追论万历三京察　魏忠贤逆党御史石三畏于天启五年(1625)七月上疏,追论万历辛亥、丁巳、癸亥三京察,首劾李三才、顾宪成、曹于汴,并及赵南星、张问达、王象春等。七月二十七日,熹宗命将已死者追夺诰命,见存者削籍为民,而将三次京察被罢黜的人酌量擢用。

毁首善书院　首善书院为左都御史邹元标与左副都御史冯从吾在京师所建,集同志讲学其中。及魏忠贤专权,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等相继去官。天启五年(1625)七月,御史张纳上疏,力诋邹元标、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等,请毁其讲学书院。诏从之。首善书院遂被毁。

毁天下书院　天启五年(1625)八月,魏忠贤逆党御史张讷奏毁天下讲坛。诬奏书院:"遥制朝权、掣肘边镇、把持有司,武断乡曲",建议天下但凡有书院处尽数拆毁。并诬诋邹元标、冯从吾、孙慎行、余懋衡以及侍郎郑三俊、毕懋良等。八月初五日熹宗下旨: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着拆毁,变卖助工。邹元标、冯从吾、孙慎行、余懋衡被削籍并追夺诰命,郑三俊、毕懋良冠带闲住。

魏大中逝世　魏大中(1575—1625)字孔时,号廓园,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行人,数奉使,秋毫无所扰。天启元年(1621)擢工科给事中,疏论王德完,劾沈潅、并侵及客、魏。天启四年迁吏科都给事中,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贤,事多咨访。会给事中阮大诚与左光斗、魏大中有隙,遂嘱傅櫆劾汪文言,并劾魏大中。疏入,魏忠贤大喜,立下汪文言诏狱。魏大中时方迁吏科,上疏力辞,及汪文言狱结,乃遵旨到任。未几,杨涟劾魏忠贤,魏大中亦率同官劾之。魏忠贤大怒。及梁梦环复劾汪文言,魏大中再下诏狱,酷刑拷讯。其年八月五日,狱卒受指,毙之于狱。年五十一。崇祯初,赠太常寺卿,谥忠节。有《藏密斋集》。

袁化中逝世　袁化中，字民谐，山东武定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历知内黄、泾阳，有善政。泰昌元年(1620)擢御史，天启元年(1621)出按宣、大，以忧归。服除，起掌河南道。杨涟劾魏忠贤，袁化中亦率同官上疏劾魏忠贤"障日蔽月，逞威作福"，魏忠贤大恨。后又劾魏忠贤爪牙陈居恭，劾毛文龙叙功之滥，劾崔呈秀赃私狼藉。崔呈秀遂嗾魏忠贤贬袁化中秩，调之外。既而窜入汪文言狱词中，逮下诏狱。崔呈秀令许显纯坐以杨镐、熊廷弼贿六千，酷刑拷掠，天启五年八月十九日毙于狱中。崇祯初，赠太仆寺卿。南明时，谥忠愍。

魏广微致仕　魏广微字显伯，南乐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由庶吉士历南京礼部侍郎。忠贤用事，以同乡同姓潜结之，遂召拜礼部尚书，并兼东阁大学士，予机务。魏广微性阴狡，曲奉忠贤，若奴役然，人称"外魏公"。与顾秉谦共谋，倾害善类，作《缙绅便览》一册，将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列为"邪党"而将魏党六十余人列为"正人"，进献魏忠贤，供其为黜陟之据。先是，内阁调旨，惟出首辅一人，余但参议论而已，魏广微欲擅柄，谋之魏忠贤，令众辅分任，政权始分。杨涟等六人之逮，魏广微实与共谋。尚书崔景荣惧其立死，亟请魏广微谏止，广微不自安，乃上疏请付法司，忤魏忠贤意。魏广微惧，具疏乞休，不许。居两月，复三疏乞休，于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二日许之去。天启七年二月，卒于家，赠太师。崇祯初，名丽逆案，削夺官诰，寻遣戍。

熊廷弼之死　熊廷弼(1573—1625)字飞白，号芝冈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巡按辽东数年，按劾将吏，风纪大振。督学南畿，严明有声，以杖死诸生事听勘归。万历四十七年，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经略，躬身巡历，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人心复固，旋为姚宗文等劾去。天启元年(1621)，辽、沈失陷，复起熊廷弼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又因经抚不和，处事相左，而导致广宁之败。天启二年二月与王化贞并被逮，会审熊廷弼、王化贞并论死，系之狱中。至是以天启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被斩西市，传首九边。已，御史梁梦环谓熊廷弼侵盗军资十七万，御史刘徽谓熊廷弼家资百万，宜籍以佐军，魏忠贤即矫旨严追，罄赀不足，姻家俱破。崇祯元年(1628)诏免追赃，崇祯二年五月许其子持首归葬。有《熊经略全集》传世。

周朝瑞逝世　周朝瑞字思永，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授中书舍人。光宗即位，擢吏科给事中。天启元年(1621)再迁礼科左给事中，既而偕诸事御史惠世扬、左光斗等极论大学士沈㴶结中官练兵为肘腋之患。徐大化力攻熊廷弼，周朝瑞恶之。徐大化力诋周朝瑞，周朝瑞愤，亦反击徐大化。周朝瑞方擢太仆少卿，而徐大化为魏忠贤腹心，必欲杀周朝瑞，窜其名汪文言狱中，与杨涟等五人并逮下镇抚狱，坐妄议"移宫"及受廷弼贿万金，榜掠备至，天启五年九月初二日死于狱。崇祯初，赠大理寺卿。南明时，谥忠毅。

夏之令逝世　夏之令光山人，知攸、歙二县，征授御史。尝疏论边事，力言毛文龙不足恃。魏忠贤怒，传旨削籍，以阁臣救免。及巡皇城，内使冯忠等犯法，劾治之，益为魏忠贤所衔，崔呈秀亦以事衔之。遂属御史卓迈劾之令党比熊廷弼，坐削夺。不久，御史倪文焕复劾其"计陷文龙，几误封疆，"天启五年(1625)九月十七日逮下诏狱，坐赃，拷掠死。

顾大章逝世　顾大章(1576—1625)字伯钦，常熟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授泉州推官，乞改常州教授。父丧除，乃入都，补国子博士。稍迁刑部主事，以奉使归。天启改元，进员外郎。后迁兵部。王纪劾罢徐大化，又疏刺客氏，其党疑王纪疏出于顾大章手，恨之。徐大化令所亲御史杨维垣讦顾大章，赖座主叶向高保护，夺俸归。天启五年(1625)起官，历礼部郎中，陕西副使。及徐大化起大理丞，与杨维垣为魏忠贤鹰犬，因假汪文言狱连及顾大章，逮下镇抚拷掠，坐赃四万，杨、左等五人既死，群小聚谋，谓"诸人潜毙于狱，无以厌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诏天下。"乃移顾大章刑部狱，由是杨涟等惨死状外人始闻。比对簿，顾大章词气不挠。刑部尚书李养正一如镇抚司原词，以移宫事牵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书既上，魏忠贤大喜，矫诏布告四方，仍移顾大章镇抚司狱。顾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狱？"遂饮药，不死，投环而卒，时在天启五年九月十八日，年五十。崇祯初，赠太仆寺卿。南明时，谥裕愍。

柳河之败　孙承宗督师辽东，拜马世龙为大将，领兵居中防守，驻卫城。天启五年(1625)九月，有降敌生员刘伯镪自后金归，声言锦州四王子兵不满三百，可遣师往取。马世龙信之，遂调前锋营副总兵鲁之甲、参将李承先领兵渡河。然所调水兵游击金冠等大船不至，渡河仅以小渔船，往返不能多载，喧闹四昼夜，致使后金发觉，伏兵掩击，明军败北，死者四百余人，二将战死。言官交章劾奏，严旨切责，令戴罪图功。

孙承宗罢归　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因魏

忠贤处处牵制，故屡疏求去。天启五年(1625)四月，给事中郭兴治请令廷臣议去留，论冒饷者复踵至，吏部尚书崔景荣力持之，乃下诏免留，而以简将、汰兵、请饷三事责孙承宗奏报。孙承宗方遣诸将分戍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诸要害，拓地复二百里，罢大将尤世禄、王世钦等，汰军一万七千余人，省度支六十八万。而言官论马世龙不已。会九月世龙柳河之败，死者四百余人，于是台、省劾世龙并及孙承宗，章疏数十上。孙承宗求去益力，天启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熹宗许之。特进光禄大夫，遣行人护归。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高第一反承宗所为，尽撤锦右诸城移关内。崇祯初复官。

吴怀贤逝世　吴怀贤(？—1625)休宁人，由国子监生授内阁中书舍人。同官傅应星乃魏忠贤甥，吴怀贤遇之无加礼，傅应星恨之。杨涟劾魏忠贤去，吴怀贤读疏，击节称叹，书其上曰："宜如韩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时遣戍。"又与工部主事吴昌期书，有"事极必反，反正不远"语，魏忠贤侦知之，大怒，遂矫旨下诏狱，坐以结纳汪文言、为左光斗、魏大中鹰犬，天启五年(1625)十月拷掠死，籍其家。

议盐法立纲铺纲之利害　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初二日，督理钱法工部右侍郎兼管户部盐法董应举上奏立纲、铺纲之利害：补行积引名曰铺纲，其害有六；不行积引，名曰立纲，其利有六。户部尚书李起元反对其议，提出补行积引，淮南岁增二十三万一千两，淮北亦增七万三千五百两，合旧课八十一万一千两，共计已得一百一十一万五千五百两，此则新旧咸宜，商国两利，实未见其害，而立纲则有害而无利。朝廷从李起元之议。

李养正罢官　李养正(1559—1630)，字若蒙，号玄白，魏县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闻喜县令，天启时官南京刑部尚书、刑部尚书。五年(1625)十二月初七日，因违抗魏忠贤而罢归，卒年七十二。

李宗延致仕　李宗延(？—1627)，河南汝南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黔阳知县，擢御史。天启初，起为光禄寺少卿。历太常少卿、大理少卿、协理京营佥都御史。升户部侍郎，督理钱法。迁户部尚书，总督仓场，又回部管事。改吏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创"糊签"之制。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九日致仕。天启七年四月十九日卒，赠太子太保。

薛三省致仕　薛三省，字鲁叔，定海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十三日，因违抗魏忠贤落职。崇祯时起用，不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介。有《薛文介文集》。

黄克缵致仕　黄克缵，字绍夫，晋江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历官寿州知州，刑部员外郎，山东布政使，迁刑部尚书，预列光、熹两朝顾命大臣。三案之争起，黄克缵与东林不合，引疾归。后魏忠贤尽逐东林，召其为工部尚书。到任数月，因与魏忠贤违忤，又引疾求去。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二十八日加致太子太师致仕。崇祯元年起南京吏部尚书，不就。有《古今疏治黄河全书》。

吴裕中之死　裕中江夏人，为顺德知县，征授至御史。大学士丁绍轼陷熊廷弼于死，吴裕中有疏论丁绍轼。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二十八日，魏忠贤传旨谓吴裕中为熊廷弼姻戚，代之报仇，廷杖一百，创重而死。崇祯初，赠太仆寺卿。

董其昌致仕　董其昌(1556—1637)，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华亭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起故官，督湖广学政，谢事归。光宗立，召为太常少卿。天启初，擢太常寺卿，参修神宗实录，迁礼部侍郎，科南京礼部尚书。魏忠贤阉党专权，请告归。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二十九日致仕，加太子太保。崇祯十年逝世，年八十二，谥文敏。董其昌天才俊逸，书法超越诸家，独探神妙；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书。

榜示东林党人　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御史卢承钦求媚魏忠贤，乃仿王绍徽《点将录》前事，上言："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魏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刊名其中。

纂修三朝要典　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五日，熹宗从霍维华、杨所修议，命纂修《三朝要典》。其论梃击案谓：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云等借梃击以要首功；其论红丸案谓：孙慎行、张问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借红丸案以挟私怨；其论移宫案谓：杨涟、左光斗、曹世扬、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命仿《明伦大典》体例纂修，名之曰《三朝要典》。二十六日开馆，以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为总裁，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副之。时方修《光宗实录》，凡事关三案，命即据《要典》改正。同年六月修成，刊布中外。

宁远之战　天启六年(1626)正月，后金知明廷更易辽东经略，且高第又撤关外诸城守具，驱屯兵

入关，而独袁崇焕坚守宁远，乃大举兴军，西渡辽河，于二十三日抵宁远城下。时袁崇焕官宁前参政，乃偕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崇焕更为血书，激以忠义，将士咸请用命。明日，后金军攻城甚急，崇焕发西洋大炮，伤敌甚众。又明日，再攻，复被击退，炮伤努尔哈赤后金军遂兵败而去。捷书闻，举朝大喜，立擢崇焕右佥都御史，驻宁远。桂等进秩有差。

周应宾逝世　周应宾(？—1626)，字嘉甫，浙江鄞县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国子监司业、右中允、右论汰掌南京翰林院事、右庶子、少詹事、詹事。万历三十一年迁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东宫侍班，次年教庶吉士。万历三十三年归。光宗即位，起升南京礼部尚书，奏申饬学政四事。天启二年(1622)八月改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天启三年九月加太子太保致仕。天启六年二月十七日卒。赠少保，谥文穆，有《月湖草》、《九经考异》、《普陀山志》、《旧京词林志》、《同姓名录补》。

太监李实诬劾七人　天启六年(1626)二月，提督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参原任应天巡抚周起元违背明旨，擅减原题袍段数目，勒减袍价，又不容李实驻其地方，故纵苏松二府连年误运，且起元抚吴，惟以道学相尚，“引类呼朋”，党附和逢迎者则有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等。李实是魏忠贤私党，此奏乃迎合魏忠贤之意，欲借此进一步打击东林势力。三月初一日诏遣缇骑逮捕诸人，遂复起大狱。

设各边镇监军内臣　天启六年(1626)三月初五日，熹宗特遣内臣监军，太监刘应坤镇守山海关。大学士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兵部尚书王永光谏止，熹宗以成祖已有旧制，且为恢复封疆之大事，皆不听。

苏州民变　天启六年(1626)二月，太监李实诬劾七人，魏忠贤借机复起大狱，令缇骑至苏州抓人。缇骑至苏，首逮周顺昌。顺昌有德于乡里，士民闻其被逮，愤怒号冤，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顺昌请命。诸生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请抚按以民情上闻，旗尉历声骂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大呼“囚安在！”手掷锒铛于地，琅然有声。众益愤，遂蜂拥而上，纵横殴击，旗尉东逃西窜，立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墙走。巡抚毛一鹭不能发一语，知府寇慎、吴县知县陈文瑞素得民心，曲为解说，众始散。时在三月十八日。顺昌乃自己投案。顺昌既就逮，又三日北行，毛一鹭飞章告变。东厂刺事者言：“吴人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既而毛一鹭言：“缚得倡乱者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乱已定。”忠贤乃安。自是缇骑不敢出国门。九月，五人论死，以属苏州知府寇慎。比临刑，五人延颈就刃，语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义，非乱也。”监司张孝流涕而斩之。吴人感其义，合葬之虎丘旁，题曰“五人之墓”。

鲁钦逝世　鲁钦(？—1626)长清人，万历中，历山西副总兵。天启元年(1621)迁神机营左副将，寻擢署都督佥事，充保定总兵官。奢崇明、安邦彦并反，乃于天启二年十月用钦总川、贵、湖广汉土军刻期解围。未至，围解，钦驰赴贵阳。天启三年正月，王三善陆广之败，钦佐三善防剿，进军红崖，并随三善进抵大方。天启四年正月，三善败殁内庆，钦率残卒还，命戴罪杀敌。明军普定之捷，钦有战功，其前锋直达织金。佐总督蔡复一数败安邦彦。天启六年三月，安邦彦复大举进攻，钦御之河上，连战数日。夜半，安军直逼钦营，将士乏饷逃窜，鲁钦自刎而死，诸营尽溃。鲁钦勇敢善战，为西南大将之冠。

丁绍轼逝世　丁绍轼(？—1626)字文远，南直贵池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赞善，谕德，少詹事，礼部侍郎。天启五年(1625)八月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天启九月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大学士。天启六年三月加少保，改户部尚书，进武英殿大学士。四月二十三日卒，赠太傅，谥文恪。

缪昌期之死　缪昌期(1562—1626)，字当时，号西溪，江阴人。万历四十一年(1583)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因愤言梃击案为给事中刘文炳劾罢。天启元年(1621)还朝，寻迁左赞善，进谕德。杨涟疏劾魏忠贤，有言杨涟疏乃缪昌期代草者，魏忠贤遂深怒不可解。及叶向高去，韩爌秉政。魏忠贤逐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及杨涟、左光斗，韩爌皆具揭恳留。魏忠贤及其党谓缪昌期实左右之。而缪昌期于诸人去国，率送之郊外，执手太息，由是魏忠贤益恨。缪昌期知势不可留，具疏乞假，落职闲住。天启五年春，以汪文言狱词连及，削职提问。明年二月复令缇骑逮问，三月又入之李实疏中，下诏狱。缪昌期慷慨对簿，词气不挠，竟坐赃三千，五毒备至，于五月初二日毙之于狱。崇祯初，赠詹事，谥文贞。有《从野堂集》。

京师王恭厂灾　天启六年(1626)五月初六日辰时(一作巳时)，突然大震一声，如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京师城内，东自顺城门(今宣武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十三里，尽为齑粉。王恭厂(今光彩胡同与永宁胡同)火药局一带糜烧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从空而下。象房倒塌，象群惊狂逸

出。万众狂奔，惊恐万状。天启皇帝闻声急奔交泰殿，御座俱倾，东暖阁窗震落伤太监二人。震响之后，尘土木石，房屋梁柱、椽檩窗壁，从空纷纷而落。长安街一带，从空飞坠人头，德胜门外坠落人臂人腿。有大木飞至密云。石驸马街有五千斤石狮子被震到城外。有衣服飘至西山，挂于树梢之上。昌平州教场上衣服、器皿、首饰、银钱，飘落成堆。经西城御史李灿然现场勘查，乃王恭厂火药库爆炸，塌房一万九百三十一间，压死男妇五百三十七口。但目前学术界对此灾成因众说不一，有火药爆炸说，地震说，陨石说，飓风说，地球内部核爆炸说，宇宙人恶作剧说，地震火药和可燃性气休静电爆炸合成说等等。说内又有：火球引爆说，火药爆炸与地震同时说等等。

王永光奏陈修省之实　天启六年(1626)五月十三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王永光奏陈修省之实，如刑狱系生人命，董以士师、申以覆奏，当诚谨慎。今罪囚半归诏狱，追赃即以毙命，虽其人自不冤，而于好生之德毋乃未惬。其至秋后与不时并律，囊首与绞斩同毙，痛快之事，每干天和。自今以往，轻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目睹自作之孽，比附者幸邀祝网之恩，罪疑惟轻者，或开其湔雪减免之一线；罚其当咎者，仍念其子孙父母之无辜、肃杀之后，继以阳春，正是其时。至于军储告匮，土木繁兴，岂不知生财为急，而急土木不如急军储，议搜括又不如议节省。今既搜无可搜，括无可括，而琐屑凌杂、尽以入告。窃恐焚林竭泽之后，能无鱼鸟散之忧。请自皇极告成，暂停工作，悉以海内之物力，并于军前之挽输。寝其屑琐之诛求，益见圣心之惇大。俟疆城廓清、再完堂构，以未为迟。

山西灵丘、浑源州地震　天启六年(1626)六月初五日丑时，灵丘、浑源州等地地震。灵丘连震一月有余，震摇数十次，全城尽塌，官民庐舍无一存者，压死居民五千二百余人，往来商贾不计其数，枯井中涌水皆黑。觉山寺在县治东南二十里处，创于北魏太和七年及远大安六年，庙貌摧残，遗址故墟，杳莫可寻。大同府所属俱震，从西北起东南而去，其声如雷，摇塌城楼城墙二十八处。浑源州等处，从西起，城撼山摇，声如巨雷，将城垣大墙并四面官墙震倒甚多。蔚州、广昌、隆平震声如雷，城垣颓坏，官民庐舍摇毁无数，人多压死，地裂水涌。是日，京师，天津三卫，宣大俱连震数十次，倒压死伤更惨。此次地震波及山西省襄垣、寿阳、武乡、平定州、山阴、广灵、榆社；京师顺天府大城、蓟州、文安、河间府任丘、献县、交河、南皮、景州、故县、宁津、沧州，保定府祁州、肃宁、束鹿、武邑、容城、雄县，真定府平山、新乐、高邑、隆平、晋州、新安，广平府曲周、邯郸、永年、涉县、鸡泽；山东省济南府历城、武定州(今惠民)、阳信、商河(今济阳)、德州、平原，东昌府曹州，兖州府曲阜，以及河南省一州六县，共波及四省六十余府州县。震中烈度(I0)IX，震级(M)为七级。

周顺昌之死　周顺昌(1584—1626)，字景文，号蓼洲，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福州推官，升吏部主事。天启中，历文选员外郎，署选事，力杜请寄，抑侥幸，清操嚼然。乞假归。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巡抚周起元忤魏忠贤削籍，顺昌为文送之，指斥无所讳。魏大中被逮，道吴门，顺昌许以女聘大中孙，且大骂魏忠贤。魏忠贤遂指使御史倪文焕劾顺昌与罪人婚，且诬以赃贿，矫旨削夺。李实追论周起元，遂诬顺昌请嘱，与起元等并逮。顺昌有德于乡，及其被逮，吴民愤而殴死缇骑，致有苏州民变。顺昌下诏狱，坐赃三千，许显纯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骂魏忠贤，唾血于许显纯面，遂于天启六年六月十八日毙于狱中。年仅四十三岁。崇祯初，赠太常寺卿，谥忠介。有《烬余集》。

周宗建之死　周宗建(1582—1626)，字季侯，号来玉，吴江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除武康知县，调繁仁和，有异政，入为御史，持论数与东林左。天启元年(1621)冬，谏客氏出宫复入，为清议所重。天启二年，以京师久旱疏陈四事，其一直攻魏忠贤，忠贤衔次骨。巡视光禄，与给事中罗尚忠力剔奸弊，节省为多。天启三年冬出按湖广，以忧归。五年三月，冯铨嘱其门生曹钦程诬劾张慎言，而以宗建为首，并及李应升、黄尊素。忠贤遂矫诏削籍，下抚按追赃。明年以所司具狱缓，遣缇骑逮治。既而入之李实疏中，下诏狱毒讯。竟坐纳熊廷弼贿一万三千，于六月二十三日毙之于狱，年四十五。崇祯初，赠太仆寺卿，谥忠毅。

始建魏忠贤生祠　魏忠贤生祠之建，始于潘汝祯。潘汝祯以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奏请为忠贤建祠于西湖，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初二日疏闻于朝，诏赐名"普德"。织造太监李实请令杭州卫百户守祠。自是，诸方效尤，几遍天下。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其诸祠务极工作之巧，像皆以沉香木为之，眼耳口鼻宛转如生人，腹中肠肺俱以金玉珠宝为之。都城内外，祠宇相望。

冯铨免官　冯铨(1595—1672)，字振鹭，直隶涿州(今河北涿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其父被劾罢官，冯铨亦回籍。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进香涿州，冯铨跪谒道左，得

复故官、进右赞善兼检讨。天启五年七月以谕德兼检讨升少詹事，补经延讲官，六月杨涟劾魏忠贤，冯铨阴嗾忠贤行廷杖以立威。八月遂进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九月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天启六年正月任《三朝要典》总裁，四月进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其贪贿太甚，为崔呈秀所嫉，于同年闰六月初二日免官回籍闲住。天启七年十二月给诰致仕。崇祯初年忠贤伏诛，冯铨论贬，赎为民。崇祯十四年谋复官不果。顺治元年(1644)降清，得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二年为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顺治十六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冯铨所以原衔兼中和殿大学士。康熙十一年(1672)十一月卒，年七十八。列之于《二臣传》中。

黄尊素之死 黄尊素(1584—1626)，字真长，号白安，余姚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除宁国推官，天启二年(1622)擢御史，谒假归。三年冬还朝，请复便殿召对故事，面决大政，否则讲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天启四年三月疏陈时政十失，夺俸一年。杨涟劾魏忠贤，尊素亦劾之。万爆被杖死，尊素疏论其事，益忤忠贤。天启五年春，遣视陕西茶马，甫出都，为逆党曹钦程所劾，削籍归。汪文言初下狱，忠贤即欲罗织诸人。即而知为尊素所解，恨甚。其党亦以尊素多智虑，欲杀之，窜其名入李实疏中，遂被逮。使者至苏州，正值苏州民变，城外人并击其舟而沉之。逮者泅水以遁，失驾帖，不敢往。尊素闻，即囚服自投诏狱。许显纯、崔应元榜掠备至，勒赃二千八百，五日一追比。尊素知狱卒将害己，赋诗一章，遂于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二死。年四十三。崇祯初，赠太仆寺卿。南明时，追谥忠端。有《忠端公集》。

李应升之死 李应升(1593—1626)，字仲达，江阴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授南康推官，天启二年(1621)征授御史，谒假归。天启三年秋还朝，疏陈时政，极论天下之弊坏。天启四年正月疏陈外番、内盗、小人三患，讥切近习，魏忠贤恶之。极言立枷宜罢，魏忠贤大恨。李应升知魏忠贤必祸国，密草疏列其十六罪，将上，为兄所止。杨涟疏劾魏忠贤，应升继劾之。以万爆之死极言廷杖不可再，士气不可折。代高攀龙草疏劾崔呈秀，崔呈秀大恨。天启五年三月，曹钦程劾李应升护法东林，遂削籍。魏忠贤恨未已，天启六年三月假李实劾周起元疏，入李应升名，遂逮下诏狱，酷掠，坐赃三千。闰六月初八日卒于狱，年仅三十四岁。崇祯初赠太仆寺卿。南明时追谥忠毅。有《落落斋遗集》传世。

王绍徽闲住 王绍徽，陕西咸宁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邹平知县，擢户科给事中。泰昌时，迁太仆寺少卿，被劾罢官。天启四年(1524)，魏忠贤召其为左佥都御史，天启五年十二月迁为吏部尚书。王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重，故魏忠贤任之要职，使除异己。王绍徽乃仿《水浒传》，将东林党一百零八人编为《点将录》，进献魏忠贤，按名黜汰，魏忠贤甚喜。后因建言朝政，屡忤魏忠贤之意；阉党新贵亦欲取而代之。天启六年闰六月二十二日，崔呈秀指使御史袁鲸劾列其鬻官秽状，遂落职免官。崇祯即位，定魏党逆案，王绍徽削籍论徒。

常州苏州等府风灾水灾 天启六年(1626)七月初一日，大风自靖江东北起，怒号振地，屋瓦横飞，合拱之木立仆，江水为之大涨，城堞楼橹颠没于骛涛巨浸中，浮尸相属。大水八日乃退。号泣而诉者数千人，庐舍漂覆者十且九，老稚死伤甚多。禾黍糜烂，民食艰难，尽剥榆皮而食，榆皮尽及野菜，野菜尽及麦叶。有丐于四方者，有赴沟壑死者，有阖户自经死者，有斩木揭竿而起者，但抚按官漠不以闻。

刘铎之死 刘铎(1573—1626)，字我以，号洞初，江西庐陵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由刑部郎中为扬州知府。愤忠贤乱政，作诗书僧扇，有"阴霾国事非"句，侦者得知，闻于魏忠贤。御史倪文焕素衔刘铎，遂嗾魏忠贤逮治之。刘铎雅善忠贤侄魏良卿，事获解，许还故官。魏良卿从容问刘铎："曩锦衣往逮，索金几何?"曰："三千金耳。"魏良卿令锦衣还之。其人怒，日夜伺刘铎隙，言刘铎系狱时，与囚方震孺同谋居间，遂再下狱。参将张体乾诬刘铎咒诅，刑部尚书薛贞坐刘铎大辟，天启六年(1626)七月十一日斩之西市。崇祯元年(1628)，赠太仆寺卿。有《来复堂集》。

赐公主庄田 天启六年(1626)八月二十日，给遂平长公主庄田二千五百九十五顷八十二亩，如盈德长公主例。

两广总督进献"红夷炮" 万历末，红夷船沉，炮已解京三十二门，尚存十门。于天启六年(1626)八月二十三日，总督两广商周祚将所存"红夷炮"(西洋炮)十进献。

陕西流民起义 天启六年(1626)八月，陕西流民起义，由保宁进入四川，活动于广元、神宣之间，为神宣指挥吴三桂所御。十二月间，又从眉林沟进攻，为守备王虎所击，其首领之一纪守恩战死。后退至陕西宁羌州界。

皇太极即汗位 天启六年(1626)八月，后金汗努尔哈赤病死于沈阳，九月初一日，其第八子皇太极即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

周起元之死 周起元(? —1626)，字仲先，海

澄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历知浮梁、南昌,以廉惠称。行取入都,注湖广道御史。方候命,值京察,居二年,御史命始下。巡按陕西,风采甚著,出为广西参议,分守右江道,移四川副使,未上。辽阳破,廷议通州设监司,命起元以参政莅之。天启三年(1623)入为太仆少卿,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十府,公廉爱民,丝粟无所取。以为杨姜辨冤事,数忤魏忠贤。因纠朱童蒙贪虐,为魏忠贤矫旨削籍。天启六年二月,阉党诬周起元为巡抚时乾没帑金十余万,日与高攀龙辈往来讲学,矫旨逮起元。许显纯酷榜掠,悬赃十万,罄赀不足,亲故多破其家。九月十三日毙之狱中。崇祯初,赠兵部侍郎。南明时,谥忠惠。有《周忠愍奏疏》。

顾秉谦致仕 顾秉谦(1550—1629)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改庶吉士,累官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天启元年(1621)晋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天启二年,魏忠贤用事,言官周宗建首劾之,魏忠贤于是谋结外廷诸臣,顾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天启三年春,遂与朱国祯、朱延禧俱入参机务。及叶向高、韩爌相继罢,何宗彦卒,顾秉谦遂为首辅。自天启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凡倾害忠直,皆顾秉谦票拟。《三朝要典》之作,顾秉谦为总裁,朝廷有一举动,辄拟旨归美魏忠贤。杨涟等六人之逮,顾秉谦调严旨,五日一追比。顾秉谦票拟,事事循魏忠贤指,惟周顺昌、李应升等下诏狱,顾秉谦请付法司拟罪。因阁中同党交轧,屡疏乞休,天启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致仕,进太师,褒谕益谥。崇祯元年(1628)削籍,既而入逆案中,论徒三年,赎为民。崇祯二年,昆山民积怨顾秉谦,焚掠其家,秉谦仓皇窜渔舟得免。后寄居他县而死。

厚赐魏忠贤 天启六年(1626)三月封魏忠贤之侄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为肃宁伯,又进封为侯,同年十月进封为宁国公,次年八月加太师。六年数次荫魏忠贤都督同知、又荫都指挥使、锦衣卫都指挥同知、锦衣卫指挥使。还大量赏赐土地金银。天启六年四月,给肃宁伯魏良卿银一万九千两治造宅第。五月给魏良卿地七百顷。十月赐魏良卿田三百顷,岁禄二千五百石。同月赐魏忠贤田千顷,加禄五千石。同月,再赐魏良卿田千顷。十一月,加魏良卿造宅银三万五千二百八十两;谕褒魏忠贤。七年七月,封魏忠贤从孙魏鹏翼安平伯,岁禄一千一百石,赐田七百顷。八月,封魏忠贤侄魏良栋东安侯,府第田禄同肃宁侯,给宅第价银二万七千七百七十二两,岁禄二千五百石,田千顷。又荫其从孙、外孙、甥、甥孙官。

太监崔文升提督漕河 崔文升本郑贵妃宫中内侍,以侍光宗药被逮,谪南京。及魏忠贤用事,作《三朝要典》,遂于天启七年(1627)正月六日召还,命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崔文升到任,即多参劾,魏忠贤矫旨称其"能力挽漕运,尽心国储",诏旨褒奖,被劾者皆削籍。同时任命司礼太监涂文辅总督太仓银库。

定信王岁禄 天启七年(1627)正月十三日敕后府及吏户礼兵部:朕弟信王(后为崇祯皇帝)年已长,其岁禄万石,今居京师,岁支米三千石,钞万贯;待之国后,米全支。并选王府官员,今在京,先给校尉三百,军一百。

袁崇焕议和 天启六年(1621)八月,努尔哈赤死,袁崇焕遣使相吊。且以窥探虚实。皇太极遣使报之,袁崇焕欲议和,借以修故疆,以书附使者还报。后金方欲攻朝鲜,乃以此阻明兵,得一意南下。天启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遂大兴兵攻朝鲜。袁崇焕锐意恢复,乘后金大军之出,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书议和。崇焕初议和,朝廷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借是修故疆,持益力。熹宗就旨报闻。

袁崇焕奏陈后金易号事宜 天启七年(1627)正月二十六日,辽东巡抚袁崇焕奏陈:后金使九人来款,责问其起兵,答称狩猎,乘便西虏,决不敢擅入宁前。又投汉文夷禀,将向时皇帝改汗字如虎墩之称,而仍彼伪号。因还其书。留其来目,暂放一二人归,令易天聪年号,遵正朔,方与代奏。熹宗说:奴虏狡诈,听信非易,侵地当谕令还,叛人令献,不止去僭号、正朔。一纸夷书,数字改换,便可释憾消疑。

《奇器图说》《诸器图说》刊行 《奇器图说》三卷《诸器图说》一卷王徵译、著,天启七年正月刊行。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陕西泾阳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扬州府推官。对物理学应用机械的研究与实验颇有成绩。与德人邓玉函交往甚密。《奇器图说》就是根据邓玉函口授而译著。全书分三卷,卷一为重解,卷二为器解,卷三为图说。介绍了天平、杠杆、滑车、起重、转重等数十种机械原理。王徵还将研究心得写成《诸器图说》对虹吸、鹤饮轮激、风硙、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连弩散形等十一图。以上两书是当时国际学术交流的范例,是当时应用机械和机械工程学等最高成就。

召还经略王之臣 明军宁远大捷,袁崇焕升任巡抚,与总兵满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满桂还。及王之臣代高第为经略,复奏留满桂,袁崇焕又与不协。朝廷虑败事,命王之臣督关内,袁崇焕督关外,划关而守。袁崇焕虑廷臣忌己,乃上书请"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朝议以袁崇焕、王之臣不相能,召王之臣

还，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尽嘱袁崇焕，与镇守中官刘应坤、纪用等便宜从事。王之臣遂于天启七年(1627)二月二日加太子太保还部。

张国纪回籍 张国纪，熹宗皇后之父。后性严明，见魏、客乱政，数于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会有张匿名榜于厚载门者，列魏忠贤反状及其党七十余人，魏忠贤疑国纪为之。邵辅忠、孙杰欲因此兴大狱，借张国纪以摇中宫，事成则立魏良卿女为后。天启六年(1626)十月乃草一疏，募顺天府丞刘志选上之。疏中极论张国纪罪，上无所问，但令国纪自新而已。然魏忠贤衔国纪不已，其党梁梦环侦知之，复于天启七年二月疏纠张国纪草菅人命、鱼肉小民、擅收皇税、强取民房等，魏忠贤从中究其事。二月三日勒国纪回原籍省愆。

议工部料银 天启七年(1627)二月二十八日，工科给事中陈维新奏：工部四司额派料银八十六万余两，今外解自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天启六年共亏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七百余两，皆因考成不严之故。因请将工部钱粮列入考成，有逋负者，不得升迁，再迟者参论。并议四司不得总支，抚按不得款留，郡县不得挪借。熹宗从其所议。

洪瞻祖奏陈马政 天启七年(1627)二月三十日，太仆卿洪瞻祖奏陈马政：国初马政綦重，事寄不分于边军。赋不隶于部，自宣德正统间，暂纾民力，以马而银，嗣是改折。嘉隆之际，老库积马价千有余万，新库岁额复四十余万，总之银即马也。马专给团营，银则给边费。今之虎墩、炒化加赏之用，而马不为边设，银亦不为边饷用。储边复为种马之用，别衙门不得擅取，而今一切以借为例。万历十八年至今，户部三十二借，共银一百二十九万九千九百八十六两；工部十借，共银十八万七千五百四十两；光禄寺、顺天府各一借，共银四万两。近奉藩封，另札一万八千金，而冏库四朝之积皆尽。马价军国急需，岂得任其积逋，以致库贮匮乏。乞敕核所借，稍补百分之一，外解十分之三，余限续完。许臣等年终类奏之日，参罚量处。章下所司。

王之臣奏论抚赏诸弊 天启七年(1627)三月初一日，原督师王之臣奏言辽东抚赏诸弊：有弊在官商，收货滥恶虚冒；有弊在委官，给散丛窦侵欺；家弊在监守，抵换挪移支剩不还，希图乾没。臣自去年八月接管一季，额外省一万九千六百七十八金有奇，额内露还官银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今交代之际，必政有专属，督臣闫鸣泰，抚臣袁崇焕，乞皇上酌定，以便归一。命下部。

杨茂春上《黄山册》 天启七年(1627)三月初四日，直隶巡按御史杨茂春上《黄山册》。他说：黄山界徽宁间，延袤二百余里。山西北距太平县八十余里，细民之业，山东南距歙县一百二十里。共计山七千七百余亩，其吴养春山三千四百亩。前旨变价三十万，自养春之山而论。谓多年木植，利不下二十万，似概山而论。除养春三千四百四十六亩入官之山，罚其逋税变赃助工外，至原属百姓，容樵采纳税。熹宗允从。

议处瑞王府膳田 天启七年(1627)三月初七日，陕西总督王之采奏：赐瑞王府膳田三万顷，而秦地并未加拓，藩王至瑞府已五，势难拨取。若酌派十分之一，臣当任之，余不能措。或请邻省分担。户部议复：宜陕西任其一，四川、山西、河南分任其二。熹宗允从。

陕西澄城民变 天启七年(1627)三月二十一，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催征甚酷，民不堪其毒，聚众闯入县城，张斗耀被郑彦夫等所杀。

三王之国 三王，即瑞王朱常浩，受封汉中；惠王朱常润，受封荆州；桂王朱常瀛，受封衡州，皆神宗之子，熹宗叔父。时魏忠贤潜蓄逆谋，不利诸王在内，逆党张纳希指疏趣之，遂以次就藩封。瑞王、惠王于天启七年(1627)三月就藩，桂王四月就藩。为三王之国，顺天府需征车四千四百四十三辆，役夫八千四百九十六人。并给仪卫、群牧等官及校尉军士俸廪及道途诸费。

王之寀之死 王之寀（—1627）字心一，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除清苑知县，迁刑部主事。梃击案起，之寀审得其实，辞连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四十五年京察，遂被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劾罢。天启初，廷臣多为之讼冤，召复故官。未几，迁尚宝少卿，逾年，迁太仆少卿，寻转本寺卿。四年(1624)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贤势大张，其党杨维垣首翻梃击案，力诋之寀，坐除名。俄而入之汪文言狱中，下抚按提问。及修《三朝要典》，其梃击事以之寀为罪首。府尹刘志选复重劾之，遂逮下诏狱，坐赃八千，天启七年四月十九日之寀竟瘐死。

后金兵围锦州 后金方征朝鲜，袁崇焕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赵率教驻锦州，护版筑。朝命尤世禄来代，而以左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大凌河。世禄未至，辅未入大凌，后金大军乃于天启七年(1627)五月十一日抵锦州，四面合围。率教偕中官纪用婴城守，而遣使议和，欲缓师以待救。使者三返不决，围益急。连攻十四日不下，后金遂分兵再攻宁远。攻宁远不下，复益兵攻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损伤，乃于六月五日引还，因毁大、小凌河二城。

后金兵攻宁远　天启七年(1627)五月十一日,后金兵围锦州,明廷方调兵应援锦州,后金已于二十八日分兵再攻宁远城。袁崇焕与中官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炮距击。而满桂亦率尤世禄、祖大寿以兵来救,大战于城外,互有杀伤,满桂身被数矢。后金军旋即引去,益兵攻锦州,锦州亦未能攻下,遂以酷暑还师。

范济世致仕　范济世,生卒不详,河南济源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累官至工部左侍郎理工部右侍郎事。天启六年(1626)十二月迁南京户部尚书,七年四月二十日致仕,八月叙功加太子太保。崇祯元年(1628)六月闭任,二年正月削籍。

袁崇焕罢官　天启六年(1627)努尔哈赤死时,崇焕借机遣使,欲议和以缓敌兵,借以修故疆。后金于天启七年正月征朝鲜,也以议和缓明师。及后金军攻入朝鲜,朝鲜及毛文龙同告急,朝命崇焕发兵援。明军方出,朝鲜已降,师还。言者遂谓朝鲜及毛文龙之被兵乃和议所致。崇焕疏辩。及五月宁、锦之战,忠贤因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崇焕遂乞休。七月二日允其归,而以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驻宁远。及叙官,崇焕仅增一秩,而忠贤孙亦封伯,文武增秩赐荫者数百人。

李春烨终养　李春烨,生卒不详,福建泰宁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累官至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天启七年(1627)七月二十四日终养归。

朱由校逝世　天启七年(1627)八月八日,熹宗病重,召辅臣于乾清宫西暖阁,谕之曰:太监王体乾勤练,魏忠贤忠诚。临终,召信王入,谕以后事。二十二日,逝世于懋德殿,终年二十三岁。魏忠贤欲谋不轨,私语都督田尔耕,田尔耕唯唯应诺;而兵部尚书崔呈秀恐有义兵,答以不可妄举,此意乃沮。熹宗遗诏,依据兄终弟及之义,受命五弟信王朱由检即皇帝位。十月七日,谥哲皇帝。上庙号熹宗,葬德陵。熹宗淫逸乐内,嫉谏悦佞,阉宦之祸,剧于天启,加之边患日重,国事大坏,弊极难持。正如史家所云,熹宗“庸懦,妇(客氏)寺(太监)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朱由检即皇帝位　朱由检,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二十四生,光宗第五子,熹宗弟,天启二年(1622)八月封信王,天启六年出居信邸。性沈朗英敏,时魏忠贤柄政,善自韬晦,魏忠贤心慑之,故不敢奸顾命。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朱由校病死。二十四日遵遗命即皇帝位,颁诏天下,改明年为崇祯元年。是为思宗。时朱由检十七岁。九月追谥生母贤妃刘氏为皇太后。册妃周氏为皇后。

钱粮事用朱印　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六日,户部尚书郭允厚奏陈:国讳印色蓝易浓溷,请钱粮事独朱印。思宗允准。

预计关门内外粮料　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八日,巡抚天津户部尚书黄运泰奏预计关门内外粮料,计关内兵六万,各月米五斗,岁支共三十六万七千六百石;班军两防该米七万二千石;马骡二千四千匹。四月至十月月九斗,十一月至三月月一.二石,岁共二十九万五千二百石,预备料豆二万石,计开关外兵八万,岁支米四十八万石;班军二万,岁支四万五千石,加预备粮米三万五千石;马骡三万五千匹,岁支豆四十三万零五百石,加预备料豆三万石。通计米豆一百七十八万零三百石。米派临清、德州仓,余米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召买,豆派畿郡召买。外有鲜米十万石、鲜布万匹,俱宜先期料理。部覆允从。

广西胡扶龙起义失败　天启六年(1626),胡扶龙据广西龙山,掠上黄村及武平,与官军战,守备蔡文龙战殁。广西巡抚王尊德以副使潘应龙进剿。集左江兵三千七百人,由参将康承爵率领;征右江兵四千余人,由参将范景文率领。天启七年二月进师,收买廖扶四为内间,知胡道贵为谋主,遣土舍陈威说道贵,劝扶龙等归,陈威等伏兵于旁。十月初一日,执扶龙等。扶龙等被杀,起义失败。

钱元悫奏陈卿士媚奸　天启七年(1627)十月二十五日,兵部主事钱元悫奏陈卿士媚奸。他说:近年以来,百辟卿士,不媚天子而媚奸臣,至舆厮贱隶,夤缘扳附,立跻显要,玷列卿行,污滥朝署。常伯有续貂之诮,烂羊兴关内之谣,甚非盛世所宜有。厂臣魏忠贤,以枭獍之姿,供缀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权,群小蚁附,势渐难返,称功颂德,布满天下,几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于乳臭,几如梁冀之一门五侯;编列私人,分置要津,几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舆珍辇宝,藏积肃宁,几如董卓之郿坞自固;动辄传旨,钳制百僚,几如赵高之指鹿为马;诛锄士类,伤残元气,几如节甫之钩党株连;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几如桓温之壁后置人;广开告奸,道路以目,几如则天之罗钳吉网。先帝念忠贤有驱使之微劳,闻誉言之日至,岂料威权趋附之至此。使先帝而早知其横窃,亦必有以处忠贤矣。即皇上念其劳,贷之不死,宜勒归私第,散死士,输蓄藏。使内庭无厝火之忧,外庭无尾大之患。魏良卿辈既非开国之勋,又非从龙之宠,安得玷兹茅土,污此彝章,速令解组褫绅,长农没世,至告奸获赏之张体乾,锻炼骤贵之杨寰,夫头乘轿之张凌云,委官开棍之陈大同,号称长儿之田尔耕,宁国契友之白太始、龚翼明等。凡为爪牙,俱明暴

其罪，或殛或放，奸党肃清，九流澄澈。报闻。

钱嘉征数魏忠贤十罪　天启七年(1627)十月二十七日，贡生钱嘉征上言数魏忠贤十罪：一、并帝。封章必先关白，至称功颂德，上配先帝，及奉谕旨，必云朕与厂臣，从来有此奏体乎？二、蔑后。皇亲张国纪，未罹不赦之条，先帝令忠贤宣皇后，灭旨不传，致皇后于御前面折逆奸，遂罗织皇亲，欲致之死。赖先帝神明，祗膺薄惩。不然，中宫几危。三、弄兵。祖宗朝不闻内操，忠贤外协臣工，内逼宫闱，操刀禁苑之中。四、无二祖列宁。高皇帝垂训，中涓不许干予朝政，及忠贤一手障天，仗马辄斥。虿毒缙绅，蔓连士类，凡钱谷衙门，边腹重地，漕运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为。五、克剥藩封。三王之国，庄田赐赉，不及福藩之一。而忠贤封公侯伯之土田，捡选膏腴，不下万顷。六，无圣。先师为万世名教主，忠贤何人，敢祠太学之侧。七、滥爵。古制非军功不侯，忠贤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袭上公之爵，靦不知省。八、邀边功。建虏犯顺以来，堕名城，歼士女，杀大帅，神人共愤，今未恢复尺寸地。宁远稍捷，袁崇焕功未克终，席不及暖。忠贤冒封侯伯，假辽阳广宁复归版籍，又何以酬之乎。九、朘民脂膏。郡县请祠不下百余。计祠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剥髓。孰非国家之膏血。十、通同关节。顺天乡榜，二十六日拆卷，而二十四日崔铎贴出。复上贤书，其夤缘要挟，不可胜数，疏上。报闻。

魏忠贤自缢　魏忠贤(？—1627)，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万历时入宫。泰昌元年(1620)，熹宗即位，被任为司礼秉笔太监，后又兼掌东厂。他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肆毒天下。天启五年(1625)兴大狱，杀东林党人杨涟等；天启六年杀周顺昌等。他自称九千岁，下有五虎、五彪、十狗等死党。崇祯皇帝素知其恶，及即位，嘉兴贡生钱嘉徵劾魏忠贤十大罪，崇祯召魏忠贤，令内侍读之。魏忠贤惧，以重金求助于信邸太监徐应元，崇祯斥徐应元。十一月初一日，命将魏忠贤安置于凤阳，初四日命逮治。初七日魏忠贤行至阜城，得知将被逮，乃自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其侄魏良卿伏诛。

周应秋罢官　周应秋，生卒年不详，字茂实，号春台，金坛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官工部侍郎，生平无持操，党于魏忠贤。天启五年正月由南京刑部左侍郎迁刑部尚书协理部事。同年十二月改左都御史。天启六年七月迁吏部尚书，与文选郎李夔龙卖官分贿，尽逐清流，为魏忠贤门下十狗之首。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日罢官。崇祯元年(1628)三月冠带闲住，六月削籍。二年正月戍边。后卒于戍所。

朱童蒙免官　朱童蒙，生卒年不详，山东莱芜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累官太仆少卿，天启六年(1626)八月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免官，令回籍守制。

李春茂免官　李春茂，生卒不详，山西阳城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累官至湖广左布政使。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迁顺天府尹，先后加右副都御史、右都御史，仍管府事。天启七年十一月初八日以媚祠被劾免官。崇祯元年(1628)削籍，二年正月减等削籍。

崔呈秀自缢　崔呈秀(？—1627)蓟州(治今天津市蓟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天启初求附东林，被拒。天启四年(1624)以贪污被革职议罪，乃求见魏忠贤，为其养子，相与密谋陷害东林党人。从此为阉党魁首，官至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崇祯即位后，阉党自危。副都御史杨所修、御史杨维垣等劾崔呈秀，崇祯乃令其回原籍守孝。后魏忠贤死，时人弹劾崔呈秀为“五虎”之首，宜治之罪。十一月初九日，崇祯下诏削其籍，遣官逮问。崔呈秀自知不免，乃呼酒痛饮，饮罢自缢死。

诏平冤案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十一日敕谕部院：巨恶魏忠贤擅朝廷之威福，密听群奸，矫诬善类，稍有触忌，肆行惨杀。今魏忠贤、崔呈秀天刑已殛，但冤狱未申，岂所以成朕维新之治。今应褒赠、荫恤、复官、起用、开释者即予施行，勿致久淹。

薛贞罢官　薛贞(？—1631)陕西韩城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累官至太仆少卿，天启元年(1621)八月迁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天启三年十一月以川、贵解围功加右副都御史。天启四年迁任南京添设兵部左侍郎，天启五年三月擢刑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同年五月升改理刑部左侍郎事，十月以户部左侍郎总督仓场。天启六年七月迁刑部尚书。天启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罢官。崇祯元年(1628)五月冠带闲住，十月逮入狱，崇祯二年正月论斩，崇祯四年九月卒于狱。

刘诏免官　刘诏，生卒不详，河南杞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累官至山东左布政使。天启六年(1626)三月迁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天启七年六月，加左副都御史。八月，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不久加兵部尚书。十一月十三日免官。后被劾论死。

枚卜阁臣　崇祯即位后，力诛魏忠贤等阉党，因施凤来等内阁大学士皆为魏忠贤所用，不足依靠，乃下诏重新选任内阁大臣。其方式采取由在朝大臣公推，然后仿照古代占卜选官的形式，将写有推出阁臣姓名的纸丸放入金瓶中，焚香肃拜，然后依次用箸

夹出。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十六日,进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预机务。

客氏之死 客氏(?—1627)系保定定兴(今属河北)侯二之妻,入宫为熹宗乳母。熹宗立,封为奉圣夫人,与宦官魏忠贤勾结作恶,被称为"客魏"。她在宫中,害裕妃、成妃,用王体乾、杀王安。到私宅,升厅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头,呼之为"老祖太太千岁。"天启七年(1627)熹宗卒,崇祯即位,命其归私宅。十一月十七日诏其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其子侯国兴伏诛,弟客光先戍边。

黄立极致仕 黄立极,字中五,元城(今河北大名)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曾任少詹事,礼部侍郎。天启五年(1625)八月,魏忠贤因同乡故,升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为首辅。崇祯即位,监生胡焕猷弹劾黄立极等身居要职,陷害重臣取媚于阉党。时御史杨维垣等疑胡焕猷为东林党指使,将其治罪。黄立极内不自安。多次上疏求罢,天启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仕。崇祯元年(1628)正月闲住。

诏止苏杭织造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二十六日诏谕:连年加派,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聊生。朕自御极以来,孜孜民力艰苦,思与休息。今将苏杭现有织造解进,其余暂停,以示敬天恤民之意。

苏茂相请核查京军粮饷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二十六日,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请核查京军粮饷:京军每年放三百余万石,今京通二仓米只有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犹以旧积支吾,后将何继。锦衣卫官于万历间仅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余人,逆珰增补,现在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余人,多支米二十七万。文思院匠,官册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补为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万余石。乞请查覆,思宗允从。

诏定逆案 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命定魏忠贤阉党逆案。时员外郎王守履等奏,魏忠贤逆党,文臣崔呈秀、田吉(兵部尚书)、吴淳夫(工部尚书)、李夔龙(副都御史)、倪文焕(太常寺卿)号称"五虎";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东厂理刑官)、杨寰(镇抚司理刑官)、崔应元(锦衣卫指挥)号称"五彪"。崇祯皇帝命下"五虎"、"五彪"于法司议罪。刑部议:除崔呈秀已死外,吴淳夫、倪文焕当削秩、夺诰命;田吉、李夔龙褫职;田尔耕、许显纯当逮论崇祯元年六月伏朱;杨寰、孙云鹤、崔应元等削夺。崇祯皇帝以为未尽其罪,命再议。至是乃定: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等追赃遣戍;田尔耕、许显纯论死;崔应元、孙云鹤、杨寰戍边。时大学士韩爌等不欲深究树怨,故诸人所拟之罪较轻。崇祯二年(1629)三月,重定逆案,"五虎"、"五彪"皆处死。

毁魏忠贤生祠 天启六年(1626)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自此各地官吏争相效尤,生祠几遍天下。阉党为建生祠拆毁民房,还强迫百姓尊奉魏忠贤,入祠不拜者,都要处以死刑。天启七年崇祯即位,诛灭客魏集团,于同年冬,崇祯帝下诏"天下所建忠贤逆祠,悉行拆毁变价。"

定畿辅料豆本色折色比例 崇祯元年(1628)正月初五日,吏科给事中刘汉儒言,畿辅地区居民甚困,征派无虚日,而最苦者莫若招买料豆,给价常少,给期常迟,是名为招买而实加派。过去督饷台臣欲以京边钱粮征料豆本色,有司每称未便。请留京边实数,算作料豆定价,令有司自行招买,不必征派民间,则民免剥削而有司亦省给算。自明年为始,凡府州县三分为率,二分解本色,一分解折色。诏从其请。

倪元璐上疏 崇祯元年(1628),魏忠贤等已诛,其党徒杨维垣等维护旧局,上疏力抵东林,指东林与崔呈秀、魏忠贤等并为邪党。倪元璐不平,于正月初五日上疏驳杨维垣等。疏入,当权者以互相诋毁而两解之。时魏忠贤虽已诛,但其党徒气焰犹盛,无敢颂言东林者,自倪元璐疏出,清议渐明。

戮魏忠贤、崔呈秀尸 崇祯元年(1628)正月二十四日,磔魏忠贤尸,悬其首于河间,崔呈秀悬首蓟州,又斩客氏尸。寻命司礼监变卖魏忠贤田产,其府第留赐功臣,直隶巡按御史卓迈解到崔呈秀籍没赃银七万一千七百七十七两,金三百四十三两,充户部边饷。其党魏志德、杨文昌、冯继先、付之琮、董永忠、崔铎、王禄,俱永戍瘴地。魏良栋年四岁、魏鹏翼三岁,崔镗四岁,崔钥三岁,以孩瘴释放。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各追赃原籍,倪文焕五千金,吴淳夫三千金,余各千金。田尔耕、许显纯逮至论死。

定辽东地课税则例 崇祯元年(1628)二月初一日,辽东督师尚书王之臣奏陈:辽地千里,已弃掷七年,今欲尺寸收复,惟在以辽民实辽地。民有力者听其自垦,无力者酌借屯本为资,俟秋成征还。地分三等:其近城处泉甘土沃为上,则三年起科;稍远而瘠为中,则五年起科;至于穷边沙卤之场为下,永不起科。部复允行。

诏令奏章务必简练 崇祯元年(1628)二月初二日,崇祯帝厌章奏冗长,谕令各衙门,条奏须简出,毋出千字。如词意未尽,可再奏。至初九日又命各部,自元年二月所发章奏,俱限十日内题复,如仍稽迟,部科互勘。

汪应蛟逝世 汪应蛟(？—1628)字潜夫,南直婺源(今江西省婺源)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由南京兵部主事历礼部郎中,升福建按察司副使,四川提学,山东参政。备兵易州,旋擢天津巡抚右佥都御史,升工部侍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初三日任南京户部尚书,天启元年(1621)六月召入京任户部尚书。不久,致仕归。陛辞犹疏陈圣学,引宋儒语以宦官,宫妾为戒。崇祯元年(1628)二月二十日卒。汪应蛟历任内外,为一时名臣。有《古今夷语》、《中铨》、《病吟草》。

准复被斥各官原职 崇祯元年(1628)三月初五日,吏部尚书房壮丽奉旨查考满、典试、条议、请告、荐举等项被斥各官,准复原官,并补给应得诰命,遇缺即行铨补。

施凤来致仕 施凤来(1563—1642),字羽王,平湖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四十六年转南京国子司业、中允。天启初,进谕德兼侍读学士。管理诰敕,天启三年,詹事府少詹事,四年,詹事,七月,进礼部右侍郎。天启五年转左侍郎,署翰林院事。天启六年,进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七年,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历首辅,依违逆珰。崇祯元年(1628)三月致仕,名列逆案。崇祯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年八十。

张瑞图致仕 张瑞图(1573—1644),字长公、果亭,号二水,福建晋江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授编修,官少詹事兼礼部侍郎。天启六年(1626)七月迁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十月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天启十一月进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天启七年,累进至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瑞图善书,为魏忠贤撰生祠碑文。崇祯元年(1628)三月初七日御史罗元宾劾其为魏党,二十二日告归,进太傅。崇祯十七年卒,年七十二。瑞图又善绘山水,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齐名。时称邢、张、米、董。

赠恤冤陷诸臣 崇祯元年(1628)三月二十四日赠恤遭魏忠贤陷害诸臣,如赠恤杨涟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左光斗右都御史;魏大中、周顺昌太常卿。重新起用袁崇焕,召旧辅韩爌等。

袁崇焕总督蓟辽 崇祯元年(1628)四月初三日,起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镇行边,总督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移驻关门,兼命该省官司敦促上道。

南赣起义军建国号 崇祯元年(1628)四月十一日,南赣(今江西省南部)起义军夺天王,建号永兴元年,率众攻破安远县城,劫库放囚。安远知县沈克封逃走。巡抚洪瞻祖报闻。

毁《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为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在魏忠贤的旨意下编撰而成,于天启六年(1626)刊行。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示谕奏疏档册,加上案语而成。此书旨在奉承魏忠贤,颠倒是非,诬陷东林党人。崇祯元年(1628)四月二十五日编修倪元璐请毁《三朝要典》疏言:"梃击、红丸、移宫三议,閧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议可兼行,其书必当速毁。"崇祯皇帝从之,即毁其版。

李国櫓致仕 李国櫓(？—1631),字元治,号续溪,高阳(河南杞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历任左谕德、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讲学士、詹事。天启六年(1626)七月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十月进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十一月进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与魏忠贤同乡,故又登宰辅。为人正直,人称长者。御史方震孺及高阳令唐绍尧被治罪,皆力为保全。七年,胡焕猷弹劾黄立极等人,涉及李国櫓,后胡焕猷被治罪,国櫓不记前嫌,仍复荐之。同年八月崇祯即位,进少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十月进左柱国、吏部尚书。崇祯元年(1628)五月初九日,加太傅致仕。崇祯四年四月卒于家。赠太保,谥文敏。

御史王相奏言民穷之因 崇祯元年(1628)五月十一日,御史王相奏陈民穷之因,他说:在有司有四弊:一为火耗之侵克;二为滥词之罚赎;三为代折之打劫;四为佐领之横噬。在地方有弊四:一为田粮之隐冒;二为强贼之扰害;三为豪右之欺凌;四为游惰之冗食。在衙门有弊四:一为库藏之侵渔;二为征解之扣除;三为佥派之骚扰;四为仪文之借取。在功令有弊四:一为加派之积欠;二为杂税之保奸;三为防察之吓诈;四为查盘之罪名。凡此等弊,总竭民膏脂,而除此等弊,则惟巡方能之,而其要在选择贤令而已。崇祯帝善其言。

复外官久任及举主连坐法 崇祯元年(1628)五月二十五日,崇祯帝谕吏户兵三部:辅臣刘鸿训奏,官员更调甚速,若不行久任之法,终鲜实效。又云海内差繁赋重,更不可加派。朕切思之,更调速则民受扰,官久任则课成功。今后藩臬郡邑官,务择人地相宜,俱如旧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许朦转改调;言官荐举人才,不无过私市恩。今后吏部以荐疏成册,后或瘝职偾事,举主连坐。

禁有司私派 崇祯元年(1628)五月二十五日,崇祯帝谕吏户兵三部:辽、黔兵事未结,加派前已不少,该部将新旧兵饷造简明册进呈,抚按官查有司

私派即行参处，国法具在，断不宽贷。

核查太仓银库 崇祯元年(1628)六月初四日，工科给事中刘安行巡视太仓银库，奏预支官俸之弊，积侵三十六万。崇祯帝命刘安行同户部清核，自某年某日某人，历历查明，限旬日奏上。

限令抚按完解马价 崇祯元年(1628)六月初六日，太仆寺卿田仰言，寺马专给团营骑操，自种马废而改俵马，俵马起而分本折色，已非立法初意。自行太仆寺废，苑马寺废，各边皆仰给于臣寺，寺之折色而马制荡然。近岁入马价不过四十五万二百余金，皇上不时赏赉不预焉。今各省直又逋负数多，乞责成抚按勒限完解，摘其尤者题参一二。崇祯帝允准。

瞿式耜奏陈朝政不平 崇祯元年(1628)六月初七日户科给事中瞿式耜上书言朝政不平，为王之宷请恤，孙慎行讼冤，追论故相魏广微、顾秉谦、冯铨、黄立极之罪，崇祯帝多采纳其言。又颂杨涟、魏大中、周顺昌为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三人因之赐谥。后又陈时务七事，谓："起废不可不严，升迁不可不渐，会推不可不慎"等。其言多符帝意。

来宗道致仕 来宗道，生卒不详，字路然，浙江萧山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左赞善、右谕德兼侍讲、礼部右侍郎。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迁南京礼部尚书署詹事府。天启七年(1628)正月调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与阉党崔呈秀相结，同年十一月遂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不久加太子太保。崇祯元年(1628)四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时人称其为"清客宰相"。同年六月二十三日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致仕。崇祯二年定逆案，宗道赎徒为民。

杨景辰致仕 杨景辰(—1629)，字载甫，号侗孩，福建晋江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右中允、左谕德、少詹事。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擢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协理詹事府事，教庶吉士。天启六年正月充《三朝要典》副总裁，一徇奸党指，又三疏颂忠贤功德。天启七年十二月迁礼部尚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崇祯元年(1628)正月到阁理事，四月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六月二十三日加少保致仕。二年定逆案，坐落职闲住。同年五月卒。

江辉逝世 江辉(？—1628)，河南嵩县人，进士出身，以庶吉士历吏部左侍郎。魏忠贤建生祠，欲得汪辉题记。江辉不允，即日削夺归里，崇祯元年(1628)六月十九日卒。

严禁私驿 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六日，云南道御史毛羽健极言驿递之害：张居正为相时，最严乘传，当时每马一匹，草料仅二十八金，每夫一名工食仅七两二钱。今日法纪荡尽，巧伪滋彰，兵部之勘合火牌有发出无缴进，缙绅竞相假借，奸棍互相买卖，一纸洗补数番，一人往返数用，而一省之中两院有牌，司道府有票，乡官有帖，应付不一。今日每马加至百余金，每夫一名加至三五十金。民生安得不蹙，国计安得不穷。请皇上宣谕，禁革诸弊。疏上，崇祯帝令内阁拟旨痛革。兵部议覆，抚按官以及有关官员给与勘合，细开姓名奏缴，不许自遣白牌，违者重治。崇祯帝允从。

查州县完欠南粮数额 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九日，南京户科给事中陈尧言疏：南都饥军鼓噪，各省直应解南粮，有司视为可缓，听解户包揽，衙蠹侵挪，以致匮乏如此。请敕总督仓场部臣，备查州县完欠之数，分别上闻，以凭究处，崇祯帝准从。

蓟镇兵变 崇祯元年(1628)七月二十日，蓟门驻军由于饥饿索饷鼓噪，焚抢火药，经多方措处，始解散。至八月初，顺天巡抚请先发欠饷三月，以安军心。下所司速行。并任都督赵率教为总兵官，镇守永平、蓟州，辖马松、大石、曹墙八路。

嘉兴、绍兴等大风海潮 崇祯元年(1628)七月二十三日，浙江海溢，人畜庐舍漂溺无数，嘉兴飓风淫雨，滨海及城郊居民被溺死者不可胜计。绍兴大风，海水直入郡城，街市可行舟。山阴、会稽、萧山、上虞、余姚被溺死者，各以万计。

郑芝龙降明朝 郑芝龙字飞皇，小字一官，泉州南安(福建泉州)人。少与其弟芝虎，从海盗颜振泉为寇。振泉死，被推为魁首，纵横海上，据海岛截商粟，但是与官军作战，官军败不追，俘获将士不杀。于是朝廷遣使招抚，崇祯元年(1628)七月二十四，郑芝龙降明朝，福建巡抚熊文灿善遇之，郑芝龙先后击杀海盗李魁奇、钟斌等，后又平巨寇刘香。

宁远兵变 崇祯元年(1628)七月二十五日，辽宁宁远军中四川、湖广兵因缺饷四个月，发生兵变，其余十三个营起而应之，缚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于谯楼上。八月初，袁崇焕与兵备副使郭广密谋，诱捕其首恶张正朝、张思顺，斩首十五人，平定了兵变。

后金欲攻山海、石门 后金练兵五万，借狐狸衬兵一万，打造盔甲战车，欲于三岔河三路出兵，过宁远围屯，攻越山海、石门等处。崇祯元年(1628)八月初三日，兵部覆请敕边臣多方哨探，随地设防，清野固守为万全之策。崇祯帝允从。

毕自肃自缢 毕自肃(1580—1628)，字范九，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知定

兴，迁礼部主事，历郎中，擢宁前道佥事，累进巡抚都御史。崇祯元年(1628)七月间，辽东逋饷至五十三万余两，宁远军哗变，毕自肃被缚，置谯楼上，捶击交下，伤殊甚。至八月初八日自缢死，年四十九。

行开纳事例 崇祯元年(1628)八月初十日，思宗令行开纳事例，仍遵户七、工三之旧。户部委太仓库司官一员，工部委节慎库司官一员，月于五、十日至公所，会同收纳。巡视科道给帖挂号，互相稽核，仍命户部侍郎一人总理册籍，按季奏缴，每收银百两搭收制钱二十万文，寓疏通钱法之意。

后金犯黄泥洼 崇祯元年(1628)八月二十二日，后金犯黄泥洼。袁崇焕令总兵官祖大寿击却之，斩一百八十级，获马骡百二十。

毕自严条陈理财 崇祯元年(1628)九月初四日，户部尚书毕自严陈理财四事：一，覆民运之逋欠；一，议屯粮之征收；一，严京边之考成；一，汰逾额之营制。蓟、密、永、昌四镇新增盐菜银二十二万六千二百五十四余两，系天启二年(1622)原任督臣王象乾议加，原止题发一年，以后并未题发，极宜议汰。思宗允从。

革广宁、蓟镇塞外诸部岁赏 广宁塞外绰哈、诺穆图、固英及蓟镇喀尔沁等三十六家，每年皆受赏。崇祯元年(1628)九月二十六日，崇祯下旨革去诸部岁赏。时逢灾年，诸部请求救援，崇祯坚持不给，于是诸部归于后金。

瞿式耜请严征解 崇祯元年(1628)十月十二日，户科给事中瞿式耜请严征解，以足军储，令直省将本年钱粮分为三等，辽饷、金花、赉亩为第一；各边兵饷、腹地军粮、太仆寺马价次之；余为第三。征收钱粮先尽京边预报征解日期，以便查催，输纳由单，先期给发，使万姓速知。上供白粮，漕臣差武弁押送，不使漕舡拦阻。备荒米谷抚道不时严核，以积贮多寡为殿最。疏上，思宗皆从之。

刘鸿训削籍 刘鸿训(？—1632)，字默承，长山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出使朝鲜，进右中允，转左谕德，丁忧归里。天启六年(1626)起少詹事。以忤魏忠贤，削夺为民。崇祯即位，召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元年(1628)七月，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刘鸿训居政府，斥责魏阉余党，锐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每曰："主上毕竟是冲主。"帝闻，深衔之，欲置之死，大臣力救，十月二十一日削籍，二年正月减死戍代州。崇祯五年正月十二日卒于戍所。福王时复官。

王在晋削籍 王在晋(？—1643)字明初，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授中书舍人，自部曹历监司，由江西布政使，擢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进督河道。泰昌时(1620)迁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1622)署部事。三月，迁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八月，改南京兵部尚书，寻告归。天启五年起南京吏部尚书，寻改兵部。崇祯元年(1628)三月召为刑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四月改兵部尚书，十月二十一日因张庆臻私改敕书事受牵连而削籍归。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卒。有《历代山陵考》、《海防纂要》、《三朝辽事实录》等。

林梓逝世 林梓(？—1628)，漳浦(今福建漳浦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由南京刑部主事，历升广东右布政使，分守河北道。万历三十七年(1609)升四川左布政使，入为太仆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万历四十四年推为户部左侍郎。不久，引疾归。崇祯元年(1628)十月二十四日卒。

汉南起义 崇祯元年(1628)十月二十八日，汉南起义者四百余人自咸阳两当薄略阳。联合当地起义者三千余人入略阳，逼汉中。官兵追至宁羌、阶州，后复还趋略阳拒战。起义者曾捉获关南道中军王道成，因官军追急，弃道成而遁。

诏会推阁臣 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初三日，诏会推阁员。廷臣列吏部左侍郎成基命及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等名以上。同时被会推者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等共十一人。而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以素无人望不与。遂因此酿成党争。

祁伯裕逝世 祁伯裕(？—1628)大名滑县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由主事、郎中，历升陕西提学副使，分守西宁道、按察使、布政使、甘肃巡抚副都御史，升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管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十七日卒。

明末农民起义爆发 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两朝，北方连年发生天灾，而有司只知刻剥百姓。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县爆发民变，杀知县张斗耀。崇祯元年十一月十七日，白水县民王二首举义旗，聚众攻蒲城之孝童，韩城之淄川镇。接着，府谷王嘉胤、宜川王佐挂并起，攻城堡，杀官吏。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复聚众响应，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固原兵变 明崇祯元年(1628)十二月二十四日固原(今宁夏固原)发生兵变，当时边兵缺饷，士兵乘农民起义爆发之机，一齐造反，劫夺固原州库。巡抚胡廷宴与延绥巡抚岳和声互相推诿，哗变士兵多加入农民起义队伍。明年正月，固原兵攻泾阳、富平，执游击李英。

许维新逝世 许维新(？—1628)，字周翰，棠邑(堂邑县今分属聊城和冠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知泽州，进刑部郎中，知宁国、改松。进河南按察副使、尚宝司卿，调南京。光宗初(1620)，改兵部职方郎中，寻进右通政、光禄寺卿，加户部右侍郎。崇祯元年(1628)卒。赠都察院右都御史。

诏修《熹宗实录》 崇祯元年(1628)诏修《熹宗实录》。命成国公朱纯臣为监修官，大学士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等为总裁官，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姜逢元、侍读学士刘宇亮、傅冠等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等同编纂。时纲纪废弛，史官旷职，至崇祯末始成书。计八十四卷。

诏定逆案 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一日，思宗召见阁臣韩爌、李标、钱龙锡、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等于文华殿，谕定魏忠贤逆案。韩爌等不愿树怨太多，仅定四五十人以上。崇祯不悦，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等为目，将魏忠贤党人罗列其上。三月，韩爌等奏上逆案，崇祯亲自裁定。自魏忠贤、客氏磔死外，其余以六等定罪。崔呈秀等以"首逆同谋"罪立斩；刘志选等以"交结近侍"罪，俱斩，秋后处决；魏广微等十一人与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俱充军，罪名"谄附拥戴"，太监李实等以"交结近侍又次等"罪，俱充军；顾秉谦等一百二十九人以"交结近侍减等"罪，坐徒三年，赎为民；黄立极等四十四人革职闲住。

周道登致仕 周道登(？—1632)吴江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国子监司业、右谕德兼侍读、右庶吉兼侍读、左庶子理诰敕、少詹事。天启时擢礼部左侍郎，以病归。天启五年(1625)秋臣推礼部尚书，魏忠贤指其为东林党人，削籍为民。崇祯即位，召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崇祯元年(1628)正月赴阁理事，七月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道登无学术，奏对鄙浅，掌权后，排挤正人，庇护私交，多次为人所弹劾。崇祯下诏廷议，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言"所劾俱有实迹"，遂于崇祯二年正月致仕。崇祯五年十二月十一日逝世。

裁驿站卒 崇祯二年(1629)二月初八日户科给事中刘懋上书"请裁驿站冗卒，岁可省金钱数十万。"崇祯悦，遂裁驿站卒。其时陕西加派之赋数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山、陕游民至是求为驿卒而不可得。是时，陕西灾荒连年。于是，饥民，失业驿卒和逃亡士兵纷纷投入起义军。

禁民间私自阉割 崇祯二年(1629)二月十六日，上谕曰：《会典》规定，民间有四五子愿以一子报官阉割者，有司造册送部选，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烟瘴地方充军，两邻歇家不举者治罪。近来小民希图射利，违禁私行阉割。自今以后，且不收选，敢有犯者，按法正罪。十六岁以上罪坐本身及下手之人，十五岁以下罪坐主使及下手之人，其主使除嫡亲祖、父依故杀子孙律科断，如系伯兄母舅亲戚人等，与同下手之人必杀无赦。倘有强阉他人幼稚希图诬赖的讯明反坐，亦不姑息，布告中外，确行遵守。

考察京官 崇祯二年(1629)二月二十三日，考察京官。素行不谨冠带闲住者一百人泄露降一级调外任者四十六人，才力不及降一级调外用者十七人，年老致仕者十三人，有疾致仕者八人，老疾致仕者九人，贪酷革职者八人，罢软无为冠带闲住者三人，科道拾遗者二十四人。

蓟州兵变 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八日兵科给事中宋鸣梧疏陈：从来遵化台军营兵、南兵每月一两五钱，北军每月米一石止折银一两，其新设营兵皆折色一两五钱，本色米五斗，有马家丁每月二两三钱五分，无马家丁亦一两五钱，犒赏丰腆，北兵已叹不平，后欠饷日多，诸兵绝望，始离信索饷，各营闻风倡煽。于是东游兵，榆木岭、白羊峪援兵营于二月初三日、初八日集于遵化西门外，伐木立寨，服蟒竖旗，大书"赤心报国，饥军设粮"八字，民起而殴，军起而怒，要索全饷，思得潘中军而甘心焉。至三月二十二日，有司抚定之。次日，巡抚顺天右都御史王应豸以牟饷激变被逮，论死。

顾起元逝世 顾起元(1566—1629)，字太初，号邻初，江宁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崇祯二年(1629)三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四。谥文庄。著有《尔雅堂家藏诗说》、《金陵古金石考》、《客座赘语》、《说略》、《蛰庵日记》、《懒真草堂集》等。

余茂衡逝世 余茂衡(？—1629)字持国，婺源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除永新知县，创官解赋法，民大称便。微授御史。因谏矿税，停俸一年。巡抚陕西，劾奏税监梁永，梁永大恨，寻以忧归。天启元年(1620)起大理寺右少卿，进右佥都御史，参理京营戎政，迁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天启三年八月，廷推南京吏部尚书，以珰势方张，坚卧不起，遂削夺。崇祯初复其官。崇祯二年(1629)三月二十八日卒。

杨鹤总督三边 崇祯二年(1629)三月，以左副都御史杨鹤总督三边。杨鹤，字修龄，武陵(湖南常德)人。初任佥都御史，因得罪魏忠贤免职。崇祯即位，复官，任左副都御史。关中爆发农民起义，总督缺

人，乃拜为兵部尚书，总督讨伐农民军。其时，商洛道参政刘应遇已先击斩王二于白水，又追斩王大梁于汉南。督粮道参议洪承畴也已击破王左挂，义军多被诛灭。杨鹤到任后，督军不利，农民起义军日益增多。

何乔远致仕 何乔远(1557—1631)，字穉孝，晋江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刑部主事，历礼部仪制郎中，进呈累朝驭倭方略。因得罪当道，谪广西布政使经历，以事归。里居二十余年。光宗(1620)立，召为光禄寺少卿。天启二年(1622)，以左通政进光禄寺卿。明年冬，进通政使，以户部右侍郎致仕。崇祯二年(1629)，起南京工部右侍郎，三月致仕。崇祯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五。赠工部尚书。乔远性廉介，家居日释经纂史。著有《名山藏》、《闽书》。

洪承畴败王佐挂 崇祯二年(1629)四月初九日，陕西义军王佐挂攻打耀州(今陕西耀县)，督粮道参议洪承畴，率官兵、乡勇万余人，分十二营，围王佐挂于云阳(陕西泾阳)，天黑后，雷雨大作，王佐挂乘机突围，走淳化。入神道岭。

陕西延安府等地大饥 崇祯二年(1629)四月二十六日马懋才奏：臣乡延安府，去年全年无雨，草木枯焦，民争采山间蓬草为食。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树皮尽，则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饥民相聚为“盗”，与其坐等饥死，不如为“盗”而死。又烧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者，而食人之人，不数日即面目赤肿，燥热而死。于是，死者枕藉，臭气薰天，安塞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不及掩埋者，又不知还有多少？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百姓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而庆阳、延安以北，饥荒更甚。

陕西起义军攻三水 起义首领王二、王大梁虽先后牺牲，但继起者日众，崇祯二年(1629)闰四月初八日，起义军七千余人攻三水，游击高从龙败死。官兵被伤者二千余人。

议改历法 崇祯二年(1629)五月，日食。崇祯帝因旧历法推算日食失验，欲加罪台官。礼部尚书徐光启上言：“台官测候，本郭守敬法，元时尝当食不食，无怪今日之失，宜及时修治，参用西法。”崇祯帝从之，诏外国人龙华民等编修新历法，徐光启为监督。西历自此开始实行。

毛文龙之死 毛文龙(—1629)仁和(今杭州)人，镇守东江。其人无大略，所战皆败，又假称捷冒功，纵容部下淫掠。袁崇焕到任后，上疏请派部臣清理东江军饷，文龙则抗疏驳之，袁崇焕决心除掉毛文龙。崇祯二年(1629)六月初五日，袁以阅兵为名至双岛，邀其观将士射。先设帐于山下，令参将谢尚政等伏于帐外。文龙至，崇焕责问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辩，崇焕厉声叱之，并命去掉冠带絷缚，崇焕历数文龙十二大罪状，文龙丧胆，叩首乞免，袁崇焕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

毕自严条陈赋役全书则例 崇祯二年(1629)七月十一日，户部尚书毕自严条陈赋役全书则例五事：起存之琐细宜备。杂项之开列宜详。驿站之增派宜减。民屯之出纳宜清。裁定之册式宜减。崇祯帝允从。

朱燮元平水西 崇祯元年(1628)六月，崇祯帝起用朱燮元，复其故官，兼抚贵州。朱燮元征发云南兵攻下乌撒；四川兵出永宁，攻下毕节；自率兵驻陆广。水西兵安邦彦与奢崇明来攻，燮元令贵州总兵许成名率兵佯退诱敌，另派兵三路捣其老巢，四川总兵侯良柱，副使刘可训与敌战于永宁，后与成名合击，大破水西兵。崇祯二年八月初十日，斩邦彦，崇明，俘敌数千人。后来燮元又迫降安位，水西、永宁皆平。

后金考试儒生 天启五年(1625)十月，太祖(努尔哈赤)令察出明朝绅衿，尽停处死。崇祯二年(1629)九月初一日，后金考试儒生凡明朝生员为奴者尽皆拔出，进行考试，分别优劣，一等者赏缎二，二等、三等者赏布二，俱免二丁差徭。

杨镐伏诛 杨镐(？—1629)字京甫，号凤筠，河南商丘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蔚山一战，大败，撤兵回王京，与总督玠诡以捷闻。万历四十六年，后金破抚顺，授杨镐兵部右侍郎前往辽东，万历四十七年镐与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号四十七万大军，兵分四路与后金兵战于萨尔浒山，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后开原、铁岭又相继失守，言官上书弹劾杨镐，遂逮下狱，论死。崇祯二年(1629)九月二十九日伏诛。

刘宗周疏谏勿急近功 崇祯二年(1629)九月三十日，顺天府尹刘宗周，上书力谏不要汲汲于近功，尽天下之力以供奉军队，聚天下之军以博一战。崇祯见疏，感叹其忠心，然而终未能用其言。

后金兵入关 崇祯二年(1629)十月二十七日，后金兵分三路，一路攻入大安口，参将周镇死亡；一路攻入龙井关，一路攻打洪山口，明参将张安德等败逃，张万春降。蓟州被围，十一月，京师戒严。

四川成都松潘卫地震 崇祯二年(1630)十二月初四日，成都地震，声吼如雷，连震十二次，房动屋摇，鸡鸣犬吠，河涨水赤，山崩城倒，压死宿城楼营兵数名。松潘卫(今松潘)日震十二次，声如雷。小河营

(即小河守御千户所)同日震,山崩,城塌一百二十丈,压死军民数人。同日重庆府、壁山、广安州、苍溪、珙县、威远等俱震。震中烈度(I_0)VⅡ,震级(M)为六点二五级。

遵化之役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皇太极亲自督军攻入龙井关,以蒙古喀尔沁台吉布尔噶图为向导,攻克洪山口。别将攻克大安口,会于遵化。本月初四日,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入援,于遵化战死,全军覆没。巡抚王元雅、保定推官李献明、永平推官何天球、遵化知县徐泽、前任知县武起潜等,据城拒守,城破皆死。

孙承宗起复 崇祯二年(1629)十月,后金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将兵临都城,廷臣争请召孙承宗。崇祯帝乃诏承宗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及召对,命承宗保护京师。承宗半夜巡阅都城,五鼓而毕,复出阅重城。明日半夜,忽传旨守通州,乃疾驰入城,力为布置。十二月四日,崇祯帝下崇焕于狱,激起祖大寿之变,承宗力为抚定。后金兵退,加承宗太傅,力辞不受。

满桂之死 满桂(? —1629)蒙古人,幼入中国,家宣府(治今河北宣化)。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兵将至京城,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初六日都督大同总兵官满桂入援,以五千兵先至德胜门外。满桂与敌战时,城上开炮助之,误伤满桂军队,满桂亦负伤。后袁崇焕下狱,政府特设文武两经略,以尚书梁廷栋及满桂任之,驻兵于西直、安定两门。朝廷催促满桂出兵,满桂言"众寡势殊,未可轻战"。然而,朝廷多次催促,不得已督军移营永定门外二里,列栅以待敌军,后金兵以精兵四面围之,满桂战死。

申甫战死 申甫(? —1629),故僧,喜好谈军事,曾私制战车火器。庶吉士金声向崇祯帝推荐之。崇祯召见,观其所制军车,即任其为副总兵,并命其招募新军。申甫召募数千人,皆市井游手好闲之人,大学士成基命阅其军队,认为军队不可用,而崇祯不听,申甫所需军装戎器,又不能及时供给,出战辄败,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将战车营于卢沟桥拒敌,后金兵绕到车后出击,而御车人惶恐,战车转动不灵,大败,申甫阵亡。

还醇战死 还醇(? —1629),字于贞,三原人,良乡知县。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后金兵攻良乡,还醇率军吏据城自守。有人言:"县小无兵,盍避去?"还醇毅然答曰:"吾守土吏也,去将安之!"后救兵不至,城破而死,父老乡亲于草间找到还醇尸体,身被数创,乡亲哭而殓之。

山西援兵溃于良乡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宣大总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东、山西巡抚,闻京城戒严,都奏请率师入卫。山西巡抚耿如杞与总兵张鸿功也率五千人赴援。军队曾有令曰:"卒至之明日,汛地既定而后给饷。"山西援兵既至,今日令守通州,明日调昌平,后日又调良乡。驻地累更,三日没有给军饷,军队乃发生哗变。事发后,耿如杞、张鸿功被捕入狱。时四方援兵先后集,以缺饷故,多肆剽掠。

乔允升下狱 乔允升(? —1629),字吉甫,洛阳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除太谷知县,征授御史。天启初,起历刑部左、右侍郎,天启三年(1623)进尚书,后落职闲住。崇祯初,复召为刑部尚书。崇祯二年(1629),后金兵逼近都城,城中大乱,狱囚刘仲企等一百七十人越狱而出,被获。崇祯帝怒,将乔允升及侍郎胡世赏、提牢主事敖继荣下狱,乔允升坐罪判绞刑,后以年老减死,与敖继荣同去戍边。竟死戍所。

后金陷永平 后金兵自通州东行,攻克香河,进逼永平。崇祯三年(1630)正月初四日,黎明,城破,副使郑国昌自缢于城上。知府张凤奇等皆死。接着陷滦州,知州杨濂自刎,太仆寺卿冯运泰先遁。再攻抚宁,参将黄维正力守,四日不克。转攻昌黎,还永平。

明军袭击遵化 崇祯三年(1630)一月初九日,后金兵攻下滦州后,分兵自抚宁向山海,离关三十里列三营。山海北路副总兵官惟贤与参将陈维翰设两营拒敌。后惟贤奉马世龙命,率陈维翰及游击张奇化等往袭遵化。城中兵出击,惟贤军先锋死战,后队乘势进攻,城上矢石如雨。惟贤、张奇化皆战死,士卒死伤三百余人。

刘策伏诛 刘策(? —1630),字范董,武定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由保定新城知县入为御史。后以病归家。天启元年(1621)春起天津兵备,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召拜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五年冬,为逆党劾归。崇祯二年(1629)夏起故官,兼右佥都御史,总理蓟、辽、保定军务。后金兵由大安口入内地,刘策不能御,被劾。祖大寿东溃,刘策偕孙承宗招使还。崇祯三年正月初十日,与总兵张士显并逮,斩于市。

韩炉致仕 韩炉(1565—1644)字象云,蒲州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选庶吉士,进编修,历少詹事,充东宫讲官。万历四十五年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教习庶吉士。泰昌元年(1620)八月,光宗嗣位,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熹宗即位,刘一璟当国,韩炉协心佐理。及叶向高当国,韩炉为次辅。杨涟劾魏忠贤,魏忠贤,求援于韩炉,韩炉不应,魏忠贤深衔之。叶向高罢,韩炉为首辅,每事持正,为善类所倚。天启四年(1624)冬,魏忠贤逐赵

南星、杨涟等，朝政大变，韩炉致仕，朝中公卿遂皆为魏忠贤私党。崇祯即位，起复故官，为首辅，主持定逆案，请归熊廷弼丧。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下狱。韩炉乃袁崇焕座师，中书舍人原抱奇遂劾其“主和误国，宜与钱龙锡并罢。”后又遭庶子丁进，工部主事李逢申弹劾，韩炉于三年正月十五日上疏辞官，朝廷许之。崇祯十七年春李自成陷蒲州，执其孙，令出见，愤郁而卒，年八十。

王子顺转战陕晋 崇祯三年(1630)正月初，陕西农民起义军王子顺、苗美拥三四千之众，南下围韩城。十五日，总督杨鹤等，解韩城之围，王子顺受抚。四月，清涧庠生李攀龙杀苗美于贺家湾。王子顺复起，于四月二十八日由神木过河，攻陷蒲州，分兵二路，东攻赵城、洪洞、汾、霍；西攻石楼、永和、吉、隰，号横天一字王。

刘之纶之死 刘之纶，字元诚，宜宾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改庶吉士。崇祯二年由庶吉士升为兵部右侍郎。时后金侵掠京畿，刘之纶毅然请战，召募万人，分为八营，以副总兵八人分将之。后金兵攻下滦州，驻三屯营，分兵守汉儿庄。刘之纶出蓟州(天津蓟县)，派别将吴应龙等从小路取罗文峪关，自率八营兵抵遵化。后金兵闻报，于三屯营派精兵三万攻之，刘之纶兵大败。后金兵围山，招刘之纶降，左右劝其结阵徐退，刘之纶拒绝，整军再战，崇祯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为后金兵射杀，八营兵只剩一营。

金日观守马兰城 崇祯三年(1630)一月二十二日，后金乘胜进攻马兰城。时副总兵金日观驻守马兰。金日观坚守马兰城，亲燃大炮，头目手足皆被烧，而意气犹盛。后马世龙令参将王世选等赴救，后金兵退。寻，又以二千骑来攻马兰，金日观与王世选等死守不下。

曹于汴致仕 曹于汴(1558—1634)，字自梁，号贞予，安邑(治今山西运城)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崇祯元年(1620)拜左都御史。按制，起用御史，须都察院咨取。当时吏部尚书王永光力荐高捷、史䇹，而曹于汴知其二人不正，不预咨取，高、史二人遂日夜谋陷曹于汴。中书原抱奇又弹劾其与尚书孙居相等五人同为山西籍，为“西党”。而工部主事陆澄源也弹劾其“朋奸”六罪。曹于汴遂自请辞官而去。崇祯七年卒，年七十六。有《共发编》、《仰节堂集》。

李标致仕 李标(？—1635)，字汝立，高邑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泰昌时，累迁少詹事。天启中，擢拜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因师赵南星，阉党恨之，列名于《东林同志录》中，李标惧，遂引疾归。崇祯即位，召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又进首辅。与李标并相六人，后都相继罢免，只有李标在阁稍久，当时门户之争很盛，崇祯深疑朝臣之内有党派，李标遂上疏辞职，崇祯三年(1630)三月初一日李标罢相归家。家居六年卒。谥文节。

题准开纳事例 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七日，工部尚书南居益题开纳事例。接着南直隶巡按王道直解苏、松、常、镇四府道州县等官及乡缙典户所捐银九千八百三十八两充饷，至四月初四日，南居益等率属助饷。崇祯帝优旨核收。从此开捐资助饷之端。

孙居相疏陈雇募民船之弊 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七日，仓场尚书孙居相上言：迩来运船多缺，运事大坏，不得已复雇募民船之说。查运船缺数虽多，而运价额设原厚，除雇船外，尚有余剩。顷年民弱军强，有司粮长每为运粮官旗迫胁而雇募，浸失其初意。于是有军、民平出其值者，有军认三四，民认六七者，甚至有独出于民者。夫运粮原系旗军之事，而移之于民，军任其少而民反任其多。而且漕船过关犹或免税，至应募民舡则无一只获免，锁吊拷勒数且倍之。夫民梯航数千里，为国输将非其本等差役，既装漕粮，即与漕船无异，似应一体免税。思宗从其奏，令所司严饬行。

请复南京新厂铸钱 崇祯三年(1630)三月二十七日，南京户科给事中陈尧言疏陈：南京户部设有新旧二厂。旧厂铸钱搭放军粮兼支官俸，新厂铸钱起自泰昌元年(1620)，原动南本鼓铸南钱，以佐旧厂之不足，一岁之间除军粮商价外，仍以余利解助辽饷。至天启二年(1622)，始用北本改铸北钱，乃铸局在南而铸本自北，事权不一、息微弊滋，故有停止之请。然北铸既停，南铸宜复，安得一罢俱罢。果能设处铸本数万金，便可岁取倍称之利，方今度支告诎，可以受益弘多，故请复新厂南铸，崇祯帝命所司酌议以闻。

白莲教活动于北直山东河南等地 崇祯三年(1630)三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按吴甡疏奏：开封、归德之间，近河诸州县，与山东、直隶接壤。原有“邪妖”借白莲、金禅之教，煽惑村民，勾结亡命，分布号召，在在有之。近日所获“大盗”，皆挟“妖书”，称王号，纵横闾左，跨州连邑，布满三四百里之内，声称紫微星失道，谋举大事。章下所司核议。

农民起义军攻入山西 山西自河曲至蒲津一千五百里，皆与陕西为邻，河最狭。崇祯三年(1630)三月二十八日，陕西起义军由神木渡河，进入山西，攻襄陵、吉州、太平、曲沃。从此起义烽火燃遍山、陕。

行保甲法 崇祯三年(1630)四月初一日，顺

天府府尹刘宗周奏陈：先臣王守仁抚南赣时，行十家牌法以清"盗"源，其法甚约，其治甚广。今日京师至三辅，所在戒严，通天下郡县皆有风鹤之警，征兵括饷殆无虚日，生民不得其所者十家而九，有司又不知所以抚循之，势必尽驱而为"盗"。此时，诚宜行保甲之法。臣谨仿先儒遗意辑为《保甲事宜》，且冠以太祖《教民榜文》十条，总为一编，名《保民训要》。请皇上申饬，自五城御史，以至州县有司，各务著实遵行。崇祯帝准从。

孙承宗收复京东四城　崇祯三年(1630)五月初四日，督师孙承宗誓师，檄总兵马世龙屯丰润待合击；檄总兵朱梅以游击靳国臣取迁安；檄协将王维城等趋滦州合攻，以牵制迁安南援；檄中军何可纲等分双望各山，牵永平之敌；义军游刘法，守备刘启职合三万人屯滦州之莲泊，为声援，兼向导。孙承宗进驻抚宁，祖大寿亦来会合。于是收复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各堡十二。并获后金知府张养初、都御史马思恭、兵道贾维钥、知州杨熠、都督李际春、守备吕及第等多人。后金侵掠受阻，遂取道冷口东归。

张献忠自号"八大王"　张献忠，延安卫柳树涧人。曾为延绥镇军卒，犯法当斩，被鞭打一百而释。乃造反起义，初随神一元为先锋。后据米脂十八寨，崇祯三年(1630)六月初五日，农民起义军王嘉允攻陷府谷、河曲，张献忠起而响应，自称"八大王"。遂与嘉允互为声援。

洪承畴击陕西义军　崇祯三年(1630)六月初五日，农民起义军王嘉允攻下府谷，延绥巡抚洪承畴及文焕闻之，驰兵救府合，击败王嘉允。王嘉允夺路逃至黄甫川，洪承畴复追败之。后还军，于清涧击败张献忠军。其时，农民起义军王左挂欲据绥德起事，洪承畴与巡按李应期又击杀王左挂。

南居益致仕　南居益(？—1643)，字思受，号二太，渭南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崇祯元年(1628)任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后为工部尚书。崇祯三年六月十九日，兵部因试炮爆炸，兵部尚书梁廷栋弹劾郎中王守履失职，南居益上疏救之。崇祯帝认为南居益徇私，乃杖守履六十，将居益削籍罢归。崇祯十六年李自成陷渭南，拥之去，终不降，绝食死。著有《青箱堂集》等。

御史张养浩奏陈盐法事宜　崇祯三年(1630)六月二十三日，江西道御史张养浩言盐法六事：一，重边商以准祖制；二，禁浮课以绝占窝；三，疏存积以应急需；四，革割没以清宿弊；五，专委任以责成功；六，躬交代以防侵欺。章下所司。

清厘私征私派　崇祯三年(1630)八月初一日，原任职方司郎中周梦尹上言：臣理刑南阳，查盘大梁道属祥、陈等十二州县，清出已征未解银五万余两，而他州县可知；南、北直隶各州县征派门摊行户猪羊等税，俱不入册，他州县亦可知。得旨：其已征未解及私征私派等弊，各抚按严督有司，实意清厘。

袁崇焕之死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擢兵部职方主事，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后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天启六年(1626)，因宁远战功，进右佥都御史。三月，为辽东巡抚，抗疏谏止宦官监军，熹宗不听。天启七年七月，魏忠贤指使言官弹劾其"不救锦州"，被迫辞官。崇祯元年(1628)四月，再受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七月，入见崇祯帝，要求"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都要内外配合。八月初，到宁远赴任，平息兵变，整顿军纪。又改组边防，合宁远、锦州为一镇，命祖大寿驻锦州，以中军副将何可刚为都督佥事，驻宁远。调蓟镇赵率教驻守山海关，辽东边防军事，大为振作。崇祯二年十一月后金兵入关，遵化失守，袁崇焕率师入援。后金皇太极施反间计，对俘虏的杨太监透露金与袁崇焕已有密约，然后放其回京报告。十二月，崇祯帝逮捕袁崇焕，下锦衣卫狱。金兵退后，明廷审理袁崇焕案，魏忠贤党徒乘机报复，攻击袁崇焕与大学士钱龙锡"擅主议和，专戮大帅(指毛文龙)"。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以"谋叛罪"被磔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天下冤之。

朱燮元条陈治理水西事宜　崇祯三年(1630)九月初三日，总督朱燮元条陈水西便宜九事。一，不设郡县，置军卫，不易其俗，土汉同安。二，地益垦辟，聚落日繁，土目不得侵轶民地。三，令自食其土，省转输之劳。四，国用方匮，出太府金币劳诸将不足，不若以地，于国无损。五，既许世其土，各自经久远，永为折衝。六，大小相维，无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七，训农治兵，耀武河上，使"贼"日备我。八，从兵民便，愿耕者给之，且耕且戍，卫所自实，无勾军之累。九，军耕抵饷，民耕输粮，各乐其业。

成基命致仕　成其命(？—1635)字靖之，号毖予，大名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改庶吉士，历司经局洗马，署国子监司业事。天启初，起少詹事，累官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改掌南京翰林院事。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以成基命与杨涟有关，落职闲住。崇祯元年(1628)起吏部左侍郎。明年十一月，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崇祯三年四月为首辅，七月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九月致仕。崇

祯八年七月卒于家，赠少保，谥文穆。

奏准教练地雷 崇祯三年(1630)十月初一日，兵部奏：李天成谙用地雷，试有成效。命量受职衔。另立一营教练。

增田赋 崇祯三年(1630)十二月初一日，户部尚书毕自严因度支大绌，上疏十二事，要求增关税，捐公费等。兵部尚书梁廷栋则以兵食不足，上疏言民穷之故，皆因官贪。使官贪风息后，再加派田赋，百姓才会同意。尚书毕自严遂请每亩加三厘，于是增田赋一百六十五万余，合旧所增，共六百八十余万。

钱龙锡入狱 钱龙锡(1579—1645)，字稚文，号机山，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累官吏部右侍郎，天启时忤魏忠贤削籍。崇祯初起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1622)十二月，为吏部尚书王永光所陷，罢归。崇祯三年(1630)八月，御史史𡎴上疏谓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杀文龙，提倡议和，卖国欺君。十二月崇祯帝责钱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逮下狱。当时史𡎴等图谋指袁崇焕为逆首，钱龙锡等为逆党，欲更立一逆案与阉党逆案相抵。崇祯四年，右中允黄道周等上疏请宽宥龙锡，乃释狱，遣戍于定海卫。龙锡在戍十二年，福王时复官归里，卒于家，年六十六。

后金制造红衣大炮 崇祯四年(1631)正月初八日，后金铸造红衣大炮，炮身上镌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并有铸造年月，督造官员及铸匠、铁匠的姓名。后金原无火器，铸炮自此始。

神一元之死 崇祯四年(1631)正月，农民起义军神一元，闻杜文焕军将至，放弃宁塞，攻保安。延抚练国事令总兵贺虎臣赴援，与神一元军战，被神一元打败。初五日，定边副将张应昌率军至，神一元战亡。众推神一元弟神一魁为首领。

赈延绥饥 崇祯年间，延绥一带连年灾荒，人民流亡、从起义军造反，十之有七。职方郎中李继贞上疏请赈济饥民，崇祯四年(1631)正月二十三日崇祯帝遣御史吴甡带十万金赈之。吴甡至延绥，以西安推官史可法主赈事。后即命吴甡代李应期巡按陕西。

召对阁臣 崇祯四年(1631)正月二十六日，崇祯帝召集内阁九卿、科、道及入觐两司于文华殿，讯问御寇、安民、宗禄、兵饷及贵州安位等事，后又诏谕都察院要严格考核巡按御史。

神一魁围庆阳 崇祯四年(1631)二月初八日，神一魁率众数万攻宁夏，都指挥王英兵溃，十四日围庆阳(今甘肃庆阳)，攻破东关。月末又攻陷合水县，活捉知县蒋应昌。不久兵败，降于杨鹤。部众多为绥德、清涧、米脂饥民，各给印票回籍。部将张孟金、黄友才挟神一魁复起，九月十八日据宁塞县。官兵围攻食尽，黄友才杀神一魁投降。

福建起义军攻瑞金 崇祯四年(1631)二月二十二日，福建起义军数千人自长赖坑突攻瑞金县。教谕王魁春署邑事，谕民兵力守。起义军走福建古城。

杨鹤主抚 崇祯四年(1631)三月，总督杨鹤移驻宁州。农民起义军神一魁等向杨鹤请降，其余义军首领金翅鹏、过天星、独头虎、上天龙等也先后请降。杨鹤设御座于城楼，众降者跪拜呼万岁。杨鹤宣圣谕，令其设誓。然后降兵或归伍、或归农，并赦其罪。杨鹤因神一魁最强，将其召至，宣诏赦之。令受降军四千余人驻于宁塞。后受降义军又纷起反官。

刘兴治之死 崇祯四年(1631)三月，皮岛参将刘兴治作乱。毛文龙死后，袁崇焕将其兵分为两协，副将陈继盛领东协，游击刘兴祚弟刘兴治为参将，领西协。兴治与继盛不合。时其兄兴祚阵亡，继盛误闻谍报，谓兴祚未死。兴治愤，择日为兴祚治丧，继盛往吊时，被伏兵所执，同时执杨应鹤等十一人，遂杀继盛与杨应鹤等。兴治与其诸兄弟在长山岛大肆杀掠。登莱巡抚孙元化请都督佥事黄龙为总兵官前往平定，无效，后兴治入参将沈世魁家，尽杀其家人。世魁走脱，于夜间率部下杀掉兴治，其乱乃定。

魏呈润疏言时政 崇祯四年(1631)四月十八日，诏令廷臣上言时政得失。给事中魏呈润上疏言曰：裁减驿站卒所省钱，还不足充军饷的十分之一。而邮传更加困难。势必要再增加人员。山海关中外兵旧额十八万，现在只有十万八千人，合计蓟门援兵，并未超出原额，而军饷却日益增加，此事不可不稽查，抚按诸臣捐赀助饷，大部分索之于民，此事不能不禁。又请大修北方水利。崇祯帝皆纳其言，然并未实行。

不沾泥降而复反 不沾泥原名张存孟，初与王嘉允等起义，崇祯四年(1631)四月在攻葭州时为洪承畴、张应昌所败，遂杀部将樊翅虎，缚紫金龙降明。不久，又拥众胁粮赏，复攻米脂、葭州。

毕自严条陈时务 崇祯四年(1631)五月初四日，户部尚书毕自严条陈时务切实易行者十事。一，关、蓟经制宜定。二，秦晋灾伤宜恤。三，赋役全书宜成。四，州县火耗宜禁。五，省直压欠宜仍。六，六、七两年旧饷宜蠲。七，内供钱粮铺垫宜减。八，东江兵饷宜节。九，召买钱粮宜恤。十，追赃家属宜豁。疏上得旨：所奏殊为裕饷恤民至计。其召买量收本色，即如议行；旧饷应蠲，铺垫应减，追赃应豁者，所司即开列具奏；直省压欠，各抚按详核上闻。

钱象坤致仕 钱象坤(1569—1640),字弘载,号麟武,江浙会稽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天启时,累官礼部右侍郎,阉党攻之落职。崇祯元年(1628)召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崇祯二年因守卫京师功晋东阁大学士,累加少保。御史水佳胤与首辅周廷儒合谋加害钱象坤,象坤遂于四年六月初五日以病致仕。十三年卒,谥文贞。

沈儆炌逝世 逃儆炌(1554—1631),字叔永,归安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工部主事,历礼部郎中、福建提学副使,累迁河南左布政,迁光禄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进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工部尚书。崇祯四年(1631)七月初二日逝世年七十八,赠太子少保。弘光初,加赠太子太傅,谥襄敏。

广东钟国相起义 崇祯四年(1631)七月初二日,广东巡按高钦舜疏奏:增从山民人鍾国相、陆彦博、颜丁峇等聚众数万,起义有年。今经剿抚并用,前后共斩一千一百余级,钟国相等次第歼灭。

疏陈召买、俵马之弊 崇祯四年(1631)七月初三日,广东道试御史宋贤上言:召买、俵马最为扰民,因条列救弊之法。召买当照钱粮多寡酌量分派,仍严饬以津斗收纳,则上不苦挪借,下不苦扣克,而民亦乐于终事。俵马当令官买官解,不愈富户,则畿南温饱之家庶得安枕;章下所司。

后金定官制,设六部 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七月初八日;皇太极集诸贝勒大臣议,定官制,设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贝勒管部事。每部有承政(蒙古承政、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启心郎及笔帖式若干。各司其事,事不留行。

湖广武陵、澧州地震 崇祯四年(1631)七月十七日夜,湖广长沙、常德、宝庆、岳州、衡州等府地震。常德、澧州尤甚。常德府武陵(今湖广常德市),夜半地震有声,黑气障天,井泉泛滥,地裂孔穴,浆水涌出,倒塌荣府宫殿及城垣房屋无数,压死男妇六十人。澧州(今澧县),震声如雷,地裂沙随水涌,房倒树拔,压死人畜无数。荆州府坏城垣十之四,民舍十之三,压死军民十余人。此次地震波及湖广荆州府。夷陵州(今宜昌市),承天府鍾祥、景陵(今天门)、潜江、沔阳州。德安府随州。辰州府沅陵。岳州府慈利、巴陵、平江。常德府龙阳、桃源。长沙府长沙、浏阳、湘阴、湘潭、醴陵、湘乡、茶陵州。宝庆府新化、邵阳、武岗州、新宁、靖州,会同。衡州府衡阳、衡州、永州;江西省南昌府丰城、武宁、宁州、鄱阳。南康府都昌。饶州府乐平、安仁。九江府德化、湖口、瑞昌。袁州府宜春、分宜。抚州府临川、萍乡;南京无为州等六十余府州县。震中烈度(I_0)VⅡ,震级(M)为六点五级。

李自成号"闯将" 李自成,原名李鸿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陕北米脂县李继迁寨人。幼牧羊,后为银川驿卒。崇祯元年(1628),李自成之舅安塞高迎祥起义,号"闯王"。崇祯二年,朝廷裁减驿站,李自成失业,逃至甘州充边兵。崇祯三年,李自成聚众起义。崇祯四年六月初,王嘉胤牺牲,部众共推王自用为领袖。七月间,王自用与老回回、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及高迎祥、张献忠等共三十六营、二十余万人马会聚于山西。李自成从高迎祥,号为"闯将",并与张献忠部会合。

后金兵围大凌城 辽东巡抚邱禾嘉建议筑广宁、义州、右屯三城以御后金兵进犯。督师孙承宗则谓"广宁道远,当先据古屯,筑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以渐而进",遂于崇祯四年(1631)七月动工,令祖大寿、副将何可纲以四千兵据守其地,征发班军一万四千人筑之。将筑成,兵部尚书梁廷栋被罢。廷议"大凌荒远,不当城,撤班军赴蓟。"邱禾嘉乃撤防兵,只留班军万人以守。后金兵闻此事,乃于八月初四日发兵逼大凌城。掘濠树栅、四面围合,另派军截锦州大道。城中兵出战,全败还。禾嘉闻之,与总兵官吴襄、宋伟合军赴援,败还。又夜渡小凌河,驻长山,又败。监军道张春、副将祖大乐等被俘,诸将张吉甫等战死。祖大寿等坚守不敢出城。而援绝。至冬,大凌粮尽,后金兵招祖大寿降,祖大寿杀副将何可纲、张存仁等降后金。

何如宠罢 何如宠,字康侯,桐城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崇祯年间,官至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崇祯帝欲族袁崇焕,因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后周延儒为首辅,何如宠与之不和,乃上书乞休。崇祯四年八月十五日,罢职归家。卒谥文端。

洪承畴总督三边 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因"主抚误国"获罪,二十一日洪承畴以巡抚延绥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兵部右侍郎。

杨鹤下狱 崇祯四年(1631)三月杨鹤招抚农民军,义军降而复反。七月义军李老柴、独行狼等攻陷中部。朝廷曾得杨鹤报谓"庆阳贼就抚,散遣俱尽",后又闻中部陷,久攻不下。御史谢三宾弹劾杨鹤欺罔朝廷。巡按御史吴甡核实上奏曰:"鹤主抚误国",遂于九月二十三日被逮入狱,后遣戍袁州。

复遣中官监军 崇祯初即位时,鉴于魏忠贤祸败之事,尽撤诸镇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诸廷臣陷于门户之争,兵败饷绌,而不能进一策,乃思复用近侍。崇祯四年(1631)九月初九日,复遣中官王应朝、邓希诏等监视关、宁、蓟镇兵粮及各边抚赏。二十

四日，又任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从此太监监军之风大开。诸监军多侵克军款，每战先逃，戎务更坏。

点灯子牺牲 点灯子，原名赵胜，又名赵四儿（一说作孟长庚），原是清涧县书生，被迫于解家沟花芽寺聚众起义，往来于山、陕境内。崇祯四年(1631)九月，败走山西，曹文诏追至稷山，降七百人。后屯于石楼山中，绥德知州周士奇、守备孙守法，趁其不备，东渡河袭之。点灯子败走，被洪承畴俘获。九月二十四日被杀。

张春之死 崇祯四年(1631)九月，长山一战，太仆少卿张春兵败被俘。后金兵劝他投降，张春说："忠臣不事二君，礼也。我若贪生，亦安用我!"遂不食，看守人恳劝，后金太宗文皇帝又赐以酒食，张春感动，始一食。后居古庙，穿旧衣，始终未失臣节而死。

崔景荣逝世 崔景荣(? —1631)，字自强，长垣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平阳推官，擢御史，巡按甘肃、湖广、河南、四川，晋太仆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万历四十一年升兵部右侍郎，总京营戎政，逾年晋兵部尚书。会辽、沈失，遂引疾归。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特起吏部尚书。因屡忤魏忠贤，削籍为民。崇祯改元，复原官。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初一日卒，赠少保。

孙承宗致仕 孙承宗(1563—1638)，字维绳，号恺阳，北直隶高阳县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授编修，历左中允、左谕德司经局洗马。天启初，进左庶子直日讲，迁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沈毅有智略，尤晓兵事。天启二年(1622)正月，广宁失守，二月拜孙承宗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专理边关战守。自请督师辽东，整顿士马，酌用辽人，拟抚蒙古。以功累加至少师、左柱国、中极殿大学士。因救援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魏忠贤阉党谗毁之，遂于天启五年十月引疾致仕。崇祯二年(1629)，后金逼京师，起原官督理兵马。四年明军相继败于长山、大凌城，廷臣劾孙承宗"丧师辱国"。该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罢官闲住，夺世荫。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清军攻高阳，孙承宗率家人拒守，城破被俘，自经而亡。其子尚宝司丞孙钥、贡士孙鉁等俱死。崇祯十二年，赠复原官。南明弘光时，谥文忠，改谥文正，著有《孙文正文集》。

后金禁私建庙宇 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闰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极告谕：奸民欲避差徭，多相率为僧。旧岁已令稽查寺庙，毋得私行建造，今除明朝汉官旧建寺庙外，其余地方妄行新造者反较前更多，该部贝勒大臣，可再详确稽察，先经察过准留者若干?后违法新造者若干?其违法新造者，务治其罪。喇嘛要清查并限制人数。

孔有德之叛 孔有德为毛文龙部曲，文龙死后，入登州，附登莱巡抚孙元化为游击。崇祯四年(1631)八月，大凌被围，孔有德与应元统千余人声援，经月抵吴桥。时天下大雨，军无所食。十一月二十八日，遂与应元谋叛，还师大掠，攻陷陵县、临邑、青城、新城等地。

孔有德攻陷登州城 崇祯五年(1632)正月三日，叛将孔有德攻陷登州城，杀官吏绅民几尽。逮捕巡抚孙元化及监军道王征，知府吴维城，同知贾名杰，蓬莱知县秦世英等。后孙元化被放归，治为死罪，七月弃市。

张可大逝世 张可大，字观甫。南京羽林卫指挥使，万历二十九年(1601)武进士，历官都司、参游、宁绍副总兵，以总兵官左都督镇守山东。崇祯五年正月初二日，叛将孔有德近逼登州城，张可大请击之，而巡抚孙元化持抚议，不可。第二日才发兵合击叛军，大败。其时耿仲明领元化中军，心怀叛志，夜半，有德军至城，仲明等举火为内应，导敌自东门入，城破。初四日张可大乃解佩印付部卒，还署辞母，杀其妾陈氏，自缢而死。事闻，赠太子少傅，立祠曰旌忠，谥庄节。著有《驶雪斋诗集》。

黄道周疏刺辅臣 魏阉余党怀恨大学士钱龙锡，欲借袁崇焕案诬陷之。右中允兼编修黄道周屡次疏救钱龙锡，帝怒，崇祯四年(1631)正月命降调于外。五年春，欲以病求归，临行上疏，其语皆暗刺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崇祯帝闻之不悦。竟斥之为民。

徐从治逝世 徐从治(1572—1632)，字肩虞，一字仲华，海盐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授桐城知县，迁济南知府，兖东副使。天启二年(1622)五月白莲教徐鸿儒起义，徐从治极力剿捕。旋以右参政分守济南，进右布政使；督漕江南。崇祯初为蓟州兵备，抚定哗变，进左布政使。四年任武德兵备。五年正月孔有德叛，巡抚余大成削籍，遂擢徐从治右副都御史代之。孔有德围攻莱州，徐从治力守五十余日，四月十六日中炮而卒。年六十一，赠兵部尚书。有《平妖纪事》、《徐忠烈公集》。

黄河决于孟津 崇祯五年(1632)六月初六日，黄河于孟津决口。崇祯年间，黄河多次决口，军民商户死伤无数。百姓转徙，到处丐食，无路可走，乃聚而造反。

曹化淳提督京营 崇祯五年(1632)七月初六日，罢唐文征提督京营，复以太监曹化淳代之提督京

营戎政。

刘宇烈下狱　崇祯五年(1632)三月,令兵部侍郎刘宇烈督理山东军务,讨孔有德。诏总兵邓玘将蓟门、四川兵,副将牟文绶将密云兵往援莱城。走至沙河。诸帅议抚,孔有德得知官军虚实,潜兵绕至其后,焚其辎重,刘宇烈惧,跑至青州,又至昌邑。推官屈宜阳请入孔有德营议抚,孔有德礼待之,刘宇烈以为叛军可抚,乃请于朝,而孔有德则乘其不备,猝然攻城。事闻于朝,七月二十日逮刘宇烈下狱,后乃遣戍。

闵洪学罢归　闵洪学为温体仁之党羽。由温体仁提拔至长吏部。职方员外郎华允诚于崇祯五年(1632)六月上疏,言"今日之事有四大可惜,四大可忧"。疏入,崇祯帝问其所指。华允诚乃上列闵洪学徇私数事,并劾温体仁遍植私人,而尽害善类,致无一人敢犯其锋。八月初二日,崇祯帝遂罢闵洪学。

莱州解围　崇祯五年(1632)八月,朝廷命朱大典巡抚山东,救莱州。大典率兵数万及关中劲旅抵德州,杀叛敌陈有时,后兵分三路,金国奇率兵从中路进昌平,总兵陈洪范率兵从南路进,参将王之富等从北路进。诸军皆带三天粮至沙河,孔有德迎战,被打败,二十日莱州城围始解。

刘香攻福建　崇祯五年(1632)九月初二日,海盗刘香连攻闽、广沿海郡邑。广州都司许当辰剿击刘香,战死。熊文灿升授总督两广事务,议招抚刘香,刘香佯许之,参政洪云蒸与副使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入刘香舟宣谕,俱被俘获。

陈于廷致仕　陈于廷,字孟谔,宜兴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由知县征授御史,累官吏部侍郎。天启时,因忤魏忠贤,斥为民。崇祯初,召拜左都御史。与郑三俊掌京察,尽去诸不肖者。崇祯五年(1632)九月,两浙巡盐御史祝徽,广西巡按御史毕佐周,擅自鞭挞指挥。事闻后,崇祯帝念疆场多故,欲倚重武臣,下令参核,陈于廷复疏不合帝意,十三日被削籍归家。居二年卒。有《定轩稿》。

农民军群聚山西　崇祯五年(1632)九月,农民军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等聚集山西,分四路出击。连续攻克大宁、隰州、泽州、寿阳诸州县。朝廷乃令宣大总督张宗衡驻平阳,巡抚许鼎臣驻汾州,分地守御。十四日,李自成攻陷修武县,杀知县刘凤翔。

遣贺人龙等赴关中围剿农民军　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朝廷又派贺人龙、李卑、艾万年三将进关中,助张宗衡、许鼎臣围剿农民军。兵至,张、许争三将兵为己部,而贺人龙等无所适从。农民军趁机入据磨盘山,分其众为三:阎正虎据交城,进逼太原;邢红娘、上天龙据吴城,进逼汾州;紫金梁、张献忠攻沁州、武乡,陷辽州。知州李呈章,乡官杨于楷、张友程,举人赵一亨、侯标并死之。

明军围登州　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官军围登州,筑围墙以困孔有德,其城三面距山,一面临海,墙有三十里长,东西俱抵海。明将分番戍守。孔有德军不能出,开炮击官军。李九成出城与官军战,死于阵。孔有德欲弃登州入海。官军龚正祥等率舟师拒于海口,时大风突起,舟破,孔有德军突至,俘龚正祥,然孔有德亦不得出海。

曹文诏节制山陕诸将　崇祯五年(1632),农民军多转战于山西,御史张宸极上疏谓延绥东路副总兵曹文诏在陕剿灭农民军有功,今陕西义军将被灭尽,应令其入晋协剿。崇祯帝乃于崇祯六年一月十一日诏令曹文诏节制山陕诸将讨伐农民军。

农民军入河北　崇祯六年(1633)二月十一日,农民军进入河北,参将杨遇春率兵追之,中伏死。义军连陷赵州、西山、顺德、真定等。又于邢台摩天岭西下,至武安,败左良玉军;守备曹鸣、主簿吴应科等皆战死。农民军在河北势力大震。

克登州水城　崇祯六年(1633)二月二十六日,参将王之富、祖宽等克登州水城。当时孔有德等在围城中,粮绝,但恃水城可逃,故不降。王之富等夺其水城门外护墙,孔有德与耿仲明遂逃。官军攻水城未下,乃采用游击刘良佐之策,以火药炸城。城崩,将士涌入。副将王来聘先登,受伤而死。城破,俘千余人,自尽及投海死者不可胜计,山东平。

王来聘之死　王来聘(？—1633),京师人。崇祯四年(1631),中武会试。当时举子能运百斤大刀者只有王来聘及徐彦琦二人。文榜钦定一甲三人,来聘又居首。武榜有状元,自来聘始。崇祯即授其为副总兵,来聘受命,流涕曰:"上重武若此,欲吾侪效命疆场尔,不捐躯杀贼,何以报上恩!"崇祯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攻登州水城之战中,来聘率先登城,受伤而死。

毕自严入狱　毕自严,字景曾,淄川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松江推官,刑部主事,太仆寺卿,佥都御史。崇祯元年(1628)召拜为户部尚书。崇祯六年(1633)御史余应桂弹劾毕自严:"殿试读卷,首荐陈于泰,乃辅臣周延儒姻娅。"当时有诏:"县令将行取者,户部先核其钱谷。"华亭知县郑友元,已入为御史,先就任于青浦,拖欠金花银二千九百两。事发,崇祯帝责户部,毕自严申辩曰:"友元已输十之七贮太仓。"崇祯帝令主库者核查,证实郑友元并无输金。崇祯六年三月遂将毕自严逮捕下狱。逾月,释之,

又三年卒。著有《石隐园藏稿》。

命各省完解逋欠盐课 各省积亏盐课银三百二十万余两，崇祯六年(1633)四月二十日，命有司如数全解，否则指名参处。金花银积负分现征、带征勒完。

孔有德降后金 崇祯六年(1633)五月二十一日，孔有德等为明军所追，逃至旅顺，总兵黄龙于岛中击败孔有德军、斩应元，生擒毛承禄、陈光福、苏有功等，孔有德、耿仲明逃走，降后金。前登州火器大炮与精其技者皆归于后金。

川兵溃于林县 崇祯六年(1633)六月，川兵邓玘奉诏援剿农民起义军，到济源，射杀义军首领紫金梁，义军乃退至林县。杨遇春追杀之，中伏而死。义军乃用其旗，诱杀其他官军，川军大败，初五日土司马凤仪一军也被义军击败于侯家庄。

郑以伟逝世 郑以伟(？—1633)字子器，号方水，上饶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詹事府少詹事。泰昌元年(1620)官礼部右侍郎。天启元年(1621)，以左侍郎协理詹事府。四年，直讲筵，因与魏珰忤，告归。崇祯二年(1629)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太子少保。郑以伟不善票拟，致使词臣为帝所轻，谕馆员须历外官，阁臣自是不专用翰林。崇祯六年六月十五日卒于官。赠太子太保，谥文恪。

后金兵取旅顺 崇祯六年(1633)七月十四日，后金兵取旅顺。当时，总兵官黄龙驻守旅顺，因鸭绿江有战事，黄龙派水师往援，孔有德等侦知旅顺空虚，遂带领后金兵袭其城。黄龙数战皆败，弹药俱尽，遂自刎。游击李惟鸾自焚其家属，力战而死。

徐光启逝世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四十四年进左赞善。从西洋人利马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遍习兵机、屯田、盐筴、水利诸书。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边警急，自陈请缨，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练兵通州。天启元年(1628)以疾去，天启三年冬起礼部右侍郎。天启五年，以忤魏忠贤遭珰罢。崇祯元年(1628)复官。崇祯二年四月专修历法。七月，兼练兵。三年六月，拜礼部尚书。五年五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崇祯六年十月初九日逝世，赠少保，谥文定，徐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译著甚丰，主要有《农政全书》、《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崇祯历法》及《徐文定公集》等。

农民军攻下伊阳 崇祯六年(1633)十二月初一日，农民军乘胜攻陷伊阳，伊阳知县金会嘉弃城逃跑。乡官故兵部车驾司主事李中正，集家人及里中壮士奋击，众寡不敌，全部战死。卢氏生员常省身，占据险地与义军战两昼夜，力不支，令其妻子自缢，己拔剑自刎而死。

李自成自为一军 李自成于崇祯年间从其舅高迎祥起义，崇祯六年(1633)十二月，起义军渡黄河，攻陷渑池。其时义军诸部以高迎祥最强，李自成隶其麾下。及由渑池渡河入河南，李自成与兄子李过结李牟、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自为一军。李过、高杰善战，顾君恩善谋。

尚可喜降后金 尚可喜(1604—1676)，明辽东(今辽宁辽阳)人。崇祯三年(1630)，东江总兵官黄龙驻守皮岛，尚可喜隶其部下。五年，孔有德叛明，陷登州(今山东蓬莱)，旅顺、广鹿岛副将皆往从之。黄龙遣尚可喜抚定诸岛。时后金兵驻旅顺，尚可喜击走之，遂驻其地。不久，升为广鹿岛副将。崇祯六年七月，东江总兵黄龙兵败自杀，明以沈世奎代之为总兵。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构尚可喜，诬以罪。沈世奎檄召尚可喜到皮岛。尚可喜闻构惧，据守广鹿岛，崇祯七年正月初二日率部降于后金。

农民军入四川 崇祯六年(1633)冬，崇祯帝再令保定、河南、山西诸路官军围剿农民军。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乘黄河冰冻飞渡冲出合围；连克渑池、卢氏、伊阳(今汝阳)三县，从陕西进入河南。河南巡抚元默重兵堵截，农民军转而南下，经汝州(今临汝)至淅川、内乡、光化、南阳。此后，农民军由合营而分军，老回回等五营农民军攻入湖广。崇祯七年正月初五日，罗汝才等部农民军，由郧阳渡汉水，次日攻襄阳，连克平利、白河等处，十四日南破凤县入四川。

陈奇瑜任五省总督 廷议诸镇抚事权不一，宜设大臣统之。崇祯七年(1634)正月初二日，遂擢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晋、豫、楚、川五省军务，围剿农民军。

农民军攻占夔州 崇祯七年(1634)二月初五，农民军攻陷兴山，杀知县刘定国。十五日，下瞿塘。二月二十一日，又攻下夔州府(今四川万源、宣汉、达县、梁平以东地区及湖北建始县)、大宁，围攻太平。由于土司秦良玉率军阻断了农民军前进的道路，崇祯七年三月，入川之老回回等数营义军又自阳平关(今陕西省宁强县西北)入秦州，复返陕西。

后金定丧祭焚衣葬殉法 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二月初五日，定丧祭焚衣及殉葬例。自贝勒以下，牛录额真以上，凡有丧丧者许焚冬衣、春秋衣、夏秋衣一套，不足此数者听之，如旧衣不足，毋得

新制充数。若逾定数及无旧衣而新制以焚化者，被人告发、俱坐应得之罪。夫死其妻许殉，仍行旌表，若妻不殉而强逼侍妾殉者，其妻论死。其违律自殉者，弃其尸，仍令其家赔妇人一口入官。

农民军入汉南　崇祯六年(1633)冬，农民军突破官军的合围，入河南境。攻占南阳后，起义军分军，老回回等五营攻入湖广，李自成等入汉中，张献忠率部赴信阳。崇祯七年正月，张献忠自信阳西去商、洛地区。李自成与张献忠合兵攻取澄城，直逼平凉等州县。二月二十八日，张献忠等十三营义军自河南商、洛西出潼关进入汉南。三月，老回回等部也由川返陕，农民起义军重又联合一起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

后金考取举人　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四月二十六日，命礼部考取通满州、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共十六人，各赐衣一套，免四丁，宴于礼部。

山西、陕西大饥　崇祯七年(1634)四月，给事中吴甘来请发粟以赈饥。时山西、陕西自去年八月至于是月不雨，赤地千里，民大饥，人相食。民饥而乱兴，而明将多杀良冒功。中州诸郡，畏官兵甚于"贼"。疏入，初六日，崇祯帝诏发帑赈饥。

黄绍杰疏论温体仁　崇祯七年(1634)五月，朝廷因大旱求言。刑科左给事中黄绍杰上疏论温体仁，指出体仁秉政数载，天怒人怨，无岁不干旱，无日不风霾，无处不"盗贼"，无人不愁怨；朝廷用人、行事，臣下上一疏，建一议都以体仁为左右，请罢体仁。崇祯皇帝宠信体仁，绍杰被贬一秩。体仁诬其别有指授，且以朋党威胁，绍杰不屈，再劾其罪状：庇私人，用贪秽，黜锢正直；私受贿赂多至万金；其私邸两被盗，丢失黄金宝玉无数，匿不敢言。疏上，崇祯帝大怒，调其为上林苑署丞。

车箱峡之困　崇祯七年(1634)六月，总督陈奇瑜与郧阳抚治卢象升合兵于上津。时农民军各部多入汉南，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见明军四集，误走兴安(今陕西省石泉以东的汉江流域)车箱峡。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时天雨两旬，被困的农民军马疲食尽，李自成用顾君恩谋诈降，以重宝诱奇瑜左右及诸将。奇瑜许。七月起义军从车箱峡脱围者计三万六千余人。

后金军入宣府　崇祯七年(1634)，后金汗皇太极为统一漠南蒙古，二次西征察哈尔。是年秋七月，后金军回师，以明边将扰其境、杀其民、匿逃人为名，七月初八日入上方堡，进围宣府。宣府守兵发炮击之，乃退走应州，兵掠大同，攻陷得胜堡。京师震动，诏令总兵陈洪范守居庸，巡抚丁魁楚等守紫荆，雁门。

后金军入灵邱　崇祯七年(1634)七月，后金军分四路攻掠宣、大地区。是时沿边城堡多失守，后金军攻灵邱。灵邱知县蒋秉采募兵坚守，守备世奇，把总陈彦武、马如豸，典史张标，教谕路登甫，并战死。城破后，知县蒋秉采自缢死，其家合门殉之。远近震惊。

阎生斗之死　阎生斗，字文澜，明汾西人。岁贡生出身，历官保安(今河北涿鹿)知州。崇祯七年(1634)五月，后金大军第二次攻明，其军绕开山海关从北面破长城而入。七月初，阿济格率军从龙门口入边，攻保安州(今陕西志丹)。时保安州虽有民而军寡，势难对敌。保安州知州阎生斗集吏民固守迎敌，二十三日城破，被俘遇害。

李长庚罢免　李长庚(？—1641)，字酉卿，麻城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授户部主事。历任江西右、左布政使，顺天府尹，右副都御史，山东巡抚等职。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官户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出督辽饷，疏奏九事，请留金花银，行改折，借税课以充军费。帝不听。天启二年(1622)迁南京刑部尚书，就移户部。次年召拜户部尚书，未任，以忧归故里。崇祯元年(1628)，起任工部尚书，复以忧去。后复为吏部尚书。崇祯六年正月，长庚率同列上言劾内臣干预朝政事。崇祯七年八月十八日，因推人为官事触帝怒，罢职斥为民。崇祯十四年五月初八日逝世。

李自成围贺人龙　崇祯七年(1634)六月，李自成用计脱出车箱峡，尽杀安抚官，鼓行而西，破陇州，进至凤翔、宝鸡、泾阳、醴泉一带，洛阳农民军数万来会，关中大震。奇瑜遣将贺人龙往击之。闰八月十九日，自成反围贺人龙于陇州(今陕西陇县)。贺人龙，陕西米脂人，初隶洪承畴，后随奇瑜。自成以人龙同乡里，乃遣将高杰遗书约人龙降，人龙不肯，固守陇州两月。总督洪承畴檄将左光先驰援陇州。李自成才率军解围而去。

湖广兵败洛南　崇祯帝以农民军聚集陕西，下令河南兵入潼、华，四川兵由兴、汉，山西兵出蒲州、韩城，湖广兵入商、洛，合剿农民军。崇祯七年(1634)十月二十七日，湖广兵援汉中，被农民军击败，副总兵杨正芳及部将张士达战死。

周士朴罢免　周士朴(？—1642)字丹其，号味澹，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除曲沃知县。泰昌元年(1620)，徵授礼

科给事中。士朴性刚果，不能委蛇随俗，深为魏忠贤所恶，遂谢病归里。崇祯元年(1628)，起为太常少卿，历户部左、右侍郎，拜工部尚书。崇祯帝命中官监户、工二部出纳，士朴耻之，数与中官龃龉。崇祯七年十月，因都尉齐赞元上疏诋之，遂被削籍为民。崇祯十五年八月，李自成克商丘，士朴与妻、妾、子及子妇同日缢死。

陈奇瑜下狱 农民军高迎祥、老回回、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被困于车箱峡而用计伪降，总督陈奇瑜召抚之。起义军脱围后，重又高举义旗，连克数城，关中大震。给事中顾国宝劾奇瑜误封疆，诏解任候勘。御史傅永淳复劾奇瑜解陇州围报首功不实，崇祯七年(1634)十一月二十八日，诏除其名，逮下狱。

农民军入河南 陈奇瑜被逮后，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受命兼摄陕、晋、楚、豫、川五省军务，准备更大规模地围剿农民军。崇祯七年(1634)十二月，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等部由陕东出终南山，进入河南，连克陈州、灵宝、汜水、荥阳等地，声势复震。崇祯帝急令洪承畴出关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合力围剿农民军。

《崇祯历书》修成 崇祯二年(1629)七月，诏令徐光启督修历法。崇祯六年徐光启逝世，任山东参政李天经为光禄寺卿督修历法。至崇祯七年末，《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纂成。全书分为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即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会、五纬星和五星交会等六部分；基本五目即法原、法数、法算、法器、会通等五部分。在修历中，徐光启曾亲自测候日月蚀，并推荐通晓天文算法的李之藻及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邓玉函等参予其事，从而促进了中国天文历法事业的发展。

荥阳大会 崇祯八年(1635)正月初六日，起义军陷荥阳。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大会于荥阳，议拒敌。众采纳李自成“分兵定所向”之策，以革里眼、左金王击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战陕兵；罗汝才、过天星扼河上；高迎祥、张献忠与李自成等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后因陕兵锐，又增射塌天、改世王。明廷调西北边兵及南兵七万余往河南会战，命五省总督洪承畴出关统率，以山东巡抚朱大典协攻。

张献忠攻颍州 崇祯八年(1635)正月初，荥阳大会之后，张献忠与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农民军按定议向东发展。时明军江北兵单，防御空虚。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安徽境内。攻取固始、霍丘、寿州。初十日，张献忠部攻克颍州。农民军兵锋直逼明龙兴之地凤阳。

农民军攻陷凤阳 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五日，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乘胜攻下明中都凤阳。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里。农民军攻占凤阳以后，毁皇陵楼殿，焚龙兴寺，杀宦官六十多人，斩明中都留守朱国相及官兵几千人。农民军树起“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合乐大饮，庆贺自己的胜利。

出帑金助剿饷 崇祯八年(1635)正月二十五日，出帑金二十万两助剿饷，贮于开封，为会兵适中之地。出太仆寺金十万两输西安，又留本省饷十万两。其湖广饷十九万两资镇筸等兵。四川留四万两，又盐课二十万两贮于淮扬，防寇逸。

张献忠攻潜山 崇祯八年(1635)正月，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部攻占凤阳后，张献忠与李自成不合，乃分军东走。初攻庐州(今合肥)不克，转攻舒城又不克。二十三日，献忠率军攻下巢县。越四日，又袭取庐江。明日又兵下无为州，杀知州张化枢。二月初一，张献忠率军围攻潜山，克之。杀知县赵士彦。

张献忠攻取罗田 崇祯八年(1635)二月初春，张献忠连下太湖、宿松，所过太和、霍山、六安、亳州悉被攻取。罗田界湖广、江北之交。张献忠部继攻下宿松后，又连克徐州及虞城、商丘、汝宁、真阳、新蔡，试图打开经河南北上明兵力空虚的陕西通道，遇到阻击后，又转而南进，二月初四日，其别部攻下罗田，打开通往湖广的门户。

杨一鹏之死 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攻取明中都凤阳。消息传到京城，崇祯帝惊惶不已，身着素服，声泪俱下，遣官告庙。诏令征兵剿灭农民军。二月十三日，因皇陵失守，总督漕运尚书杨一鹏被逮下狱。杨一鹏临湘人，崇祯六年以兵部左侍郎拜户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江北四府。至是遂与巡按御史吴振缨、守陵太监杨泽并被逮下狱。杨泽先自杀，杨一鹏弃市，吴振缨戍边。

农民军围桐城 崇祯八年(1635)二月，在张献忠攻取江北许多城镇后，洪承畴忙率军倾师出潼关，布置围剿农民军。时农民军在蕲、黄、汝宁、归德之间展开大规模的流动作战。明应天巡抚张国维东西奔击，忙于应付。初五日，农民军围困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县)长达数日，不克走之。

洪承畴督师 崇祯八年(1635)正月，崇祯帝闻凤阳之变，晋洪承畴兵部尚书兼总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赐尚方剑，令集诸路兵驻楚、豫适中之地。三月初一日，洪承畴至汝宁督师，分遣诸将贺人龙、邓玘、左良玉等进攻农民军。

张献忠攻麻城 崇祯八年(1635)二月底,张献忠率军西进,经霍山、英山进入湖广,三月初三日攻克麻城(今湖北省麻城县)。

张献忠农民军转入陕西 崇祯八年(1635)初,兵部尚书洪承畴自陕西出关,合诸路兵欲将农民军剿灭于豫、楚地区。农民军为摆脱官军的围剿,三月十二日,张献忠与老回回、过天星等部会合攻取宁羌州,长驱西进。张献忠由郧阳故道,经商州(今商县)入陕西,与高迎祥会合于凤祥,陕西农民军势复大盛。

新饷亏额 崇祯八年(1635)四月初二日,户部言,崇祯八年新饷,除蠲免外,酌解部六百八十万石,岁出七百八十六万石,额少七十万余石。

郑芝龙攻刘香 刘香与郑芝龙当初同为海盗,纵横海上,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降明,刘香不从,与李魁奇、钟斌仍为海盗。芝龙乃于崇祯八年四月初八日合广东兵击刘香于田尾远洋,刘香势蹙,自焚溺死。其党千余人到浙江投降了明朝,海盗尽平。

洪承畴会师汝州 崇祯八年(1635)三月,张献忠入陕,与高迎祥、李自成重新会合。洪承畴闻农民军会聚于陕,四月十二日,在汝州(今河南临汝)大会诸将,商议围剿农民军于陕西,洪承畴令邓玘、尤翟文等驻樊城,防守汉江;左良玉、汤九州控吴村、瓦屋,守淅水之要道;尤世威、陈示福、徐来朝分驻永宁、庐氏山中,以扼雒南、朱阳之险。洪承畴亲统大军,与曹文诏一起入潼关进剿。

川兵变于樊城 崇祯八年(1635)春四月,总督洪承畴至汝州,令总兵邓玘戍守樊城,防汉江。邓玘不善驭军,多克饷,军心不附。崇祯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其部将王允成以克饷聚兵鼓噪,杀邓玘二仆。邓玘惧,登楼越墙,误堕火巷,被焚死。

商州之战 督师洪承畴以奏限于崇祯八年(1635)六月剿平农民军,期已迫近,遂率贺人龙、张全昌等西行,下令曹文诏由阌乡取山路直插雒南、商州奔袭农民军,然后再经山阳、镇安进入汉中。时农民军离商州城三十里札营,满山篝火。五月初五日,曹文诏率部偷袭农民军,农民军败走。

吴宗达致仕 吴宗达与温体仁同在崇祯三年(1630)六月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温体仁在阁时只与周延儒互为援手,而同他人不合。惟吴宗达能为之下,故其在阁六年,与温体仁交欢无间,实徒充位而已。崇祯八年(1635)五月二十六日,以衰老乞归。

曹文诏之死 曹文诏,山西大同人。在辽东从军,随熊廷弼、袁崇焕等抗击后金军。以功历官游击、参将等职。崇祯三年(1630)七月,擢升延绥东路副总兵。次年四月,杀害起义军首领王嘉胤,以功擢临洮总兵官。继在陕晋先后击破多支农民军,受命节制陕西、山西诸将。后调之大同。崇祯七年七月,请兵入大同,曹文诏固守怀仁。因失地,论罪充军边卫。山西巡抚吴甡保荐,乃复命为援剿总兵官,立功自赎。崇祯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真宁湫头镇(今甘肃正宁)被农民军包围,自刎而死。

卢象升总理五省 崇祯八年(1635)八月二十四日,以农民军势力大盛,明廷以洪承畴一人不能兼顾,遂擢卢象升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兼湖广巡抚。总督洪承畴办西北,象升办东南。不久,解巡抚任,进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陕西军务,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围剿农民军。

刘荣嗣下狱 崇祯八年九月初三日,总理河道侍郎刘荣嗣被逮下狱。初,刘荣嗣以骆马湖溃淤,漕运不通,乃提议从宿迁至徐州别凿新河,引黄河水注其中以通漕路。此役费金五十万,新河二百余里。其中邳州上下皆黄河故道。深尺许即为沙,朝挖成河,经宿沙落,河坎复平,如此者数四。待引黄河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随水下,遂淤浅不可以行舟。及漕舟将至,而骆马湖之溃决适平,舟人皆不愿由新河。刘荣嗣亲往督之,欲绳以军法,入者苦淤浅,多怨。巡漕御史倪于义劾其欺罔误工,南京给事中曹景参复重劾之,遂逮下狱,坐赃瘐死。其后骆马湖复溃,舟行新河,无不思刘荣嗣功者。

王应熊罢免 王应熊,字非熊,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天启中,历官詹事。崇祯三年(1630)召拜礼部右侍郎。崇祯五年,进左侍郎,与周延儒、温体仁过往甚密。崇祯六年冬,廷推阁臣,王应熊望轻,特旨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命下,朝野胥骇。崇祯八年正月,凤阳陷,廷臣多劾王应熊,王应熊屡疏乞休,十月初九日免其官,仍乘传,赐道里费,行人护行,待之甚优。

汤开远疏论文武官宜待之以平 汤开远,乃汤显祖之子,在左良玉军中做监军。崇祯八年(1635)十月,汤开远上疏,指出崇祯帝待文武之臣不一,于抚臣则惩创之,于镇臣则优遇之。督抚失事多逮系,而大将率姑息。文臣敛手无为,武将却拥兵自重,桀骜恣睢,一旦有警,辄逡巡退缩,即严旨屡颁,哀如充耳。提出只有赏罚平,文武才能用命。崇祯帝得奏大怒,命削籍。左良玉等人合奏乞留,帝乃命戴罪办“贼”。崇祯十三年,以劳瘁卒官。

文震孟致仕 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吴县人,文徵明曾孙。弱冠举于乡,十赴会试,至天启

二年(1622)殿试第一,授修撰。愤忠贤擅政,上疏触帝怒,贬秩调外。后不调而归,斥为民。崇祯元年(1628),以侍读召,历左中丞充日讲官。崇祯三年,忤权臣出任益府,不赴归家。崇祯五年,即家擢右庶子。久之,进少詹事。崇祯八年六月,特擢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政。与首辅温体仁不和,体仁力诋之。帝怒责文震孟"徇私挠乱",于十一月初七日夺官,九年逝世。南明时,追谥文肃。著有《姑苏名贤小记》。

郑鄤之死 郑鄤,天启时因忤魏忠贤而被削籍归。崇祯改元起故官。时逢父母丧未赴,服除应召。时朝中温体仁与文震孟不和,郑鄤曾面讦温体仁,又与文震孟同年友善,故温体仕与郑鄤仇。文震孟罢,温体仁遂诬劾郑鄤假乩仙判词,逼父振元杖母,并说此言出自从母舅旧辅吴宗达之口。崇祯帝大怒,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十一日,乃下郑鄤刑部狱,后移诏狱。因事无佐证,久不决。温体仁乃募诸生许曦诬证之,郑鄤遂被杀。

李自成攻占光州 崇祯八年(1635)春,农民军兵集于陕西。七月,张献忠、老回回等部出朱阳关,入河南。高迎祥、李自成独留陕。八月初五,李自成破咸阳。时洪承畴督关中,卢象升督关外。农民军亦分军,高迎祥战于西,李自成战于东。九月,李自成兵败于渭南、临潼。十月,高迎祥、李自成出朱阳关,入河南。十一月,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连营六十里,大会于河南龙门、白沙,败官军祖宽部。十二月,高迎祥、李自成进兵偃师、巩县。初九日,自成率部攻占光州。

钱士晋逝世 钱士晋(1577—1635),字康侯,嘉善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治梃击案,独右王之宷,出知大名府。崇祯初,以山东右布政擢云南巡抚右佥都御史。筑师宗、新化六城,浚金针、白沙等河,平土官岭、依两姓起事。崇祯八年(1635)十二月初十日卒。

《帝京景物略》刊行 《帝京景物略》八卷,刘侗、于奕正合撰,崇祯八年(1635)刊印。该书详细地记述了北京山川园林、名胜古迹、风习节令、花鸟虫鱼,以优美的文笔描述了明代北京山川、人物、园林、风俗等。

卢象升会诸将于凤阳 崇祯九年(1636)正月初一日,兵部侍郎总理川陕七省军务卢象升大会诸将于凤阳。卢象升上言崇祯帝,提出围剿农民起义的方略。其一:总督、总理宜有专兵专饷。批评事急而后调兵,情危而后增兵;兵至、兵集而后议饷、清饷,要求加重督、理之权。其二,请调咸宁、甘、固之兵属总督,蓟、辽、关、宁之兵属总理,以增其力。其三,各省抚臣,俱要担起封疆重任,不得一有警,即求援求调。其四,台谏诸臣不能不问难易、死生,求全责备,使督抚大臣虽有长材,无从展布。象升言切中机宜。

滁州之战 崇祯九年(1636)正月,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率部东围庐州,取含山、和州。初六日,连营数十里攻滁州。初八日,总理卢象升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等诸道兵驰援滁州,与农民军大战于城东五里桥。农民军战不利,连营俱溃,北退五十里,被斩一千二百余级,从朱龙关到关山,积尸填沟委堑,滁水为之不流。农民军失利后,北渡逼泗州、徐州,复转入河南。月末,部分起义军自南山还商、雒。二月十一日,卢象升奏捷,斩六百七十六级,夺马骡四百余匹。

宁夏兵变 崇祯九年(1636)二月初十日,明驻守宁夏(今宁夏银川)士兵,因兵饷无措,发生兵变。饥兵群起围攻官署。巡抚右佥御史王楫因不能措饷,饥兵索饷无着,乃鼓噪而杀之。兵备副使丁启睿率军镇压,捕获为首者七人,立即处斩,兵变才被抚定。

陈启新奏陈时弊 崇祯九年(1636)二月十七日,淮安武举陈启新奏陈时弊:今天下有三大病:一为科目取人。今之作文,孝弟与尧舜同辙,仁义与孔孟争衡。及见于政事,恣其性情,任其贪酷,酷而民吞其声,贪而民吸其髓。是政事、文章两既相悖,何赖以科目取人!二为资格用人。国初典史冯坚任佥都,贡士彭友信授布政,秀才曾泰授尚书,何尝以资格限?嘉靖间犹三途并用,今惟尚文途,又自分界,贡举止于贡举,明知历任有限,清如是,贪亦如是,毋宁贪以为子孙计。若进士,则于下之爵皆其砧儿上物,天下之官皆其朋比,横行莫问。及曰迁转,不曰其俸久,则曰其资深。诚有如皇上昔谕所谓圣旨可藐暮金自如者,亦何取以资格用人!三为推知行取。科道旧例,选给事、御史,以进士、举人、教官等官项除之,兼行人、博士、中书,及推官、知县,弘治间兼助教教官;嘉靖中,举贡、监生一体考选;万历初,犹行取推官、知县,进士三举贡一。今惟选进士,彼受任时,先科道自居,守巡以科道相待,故虐民凌𫐄,民既不安,又能已于乱?亦何取以推知为科道!国家受此三大病,章句无用,党与日盛,苛暴日加,罗网日密,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而不醒。再陈治病之药,其说有四,而专拜大将之法附焉:一停科目以黜虚文,一举孝廉以崇实行,一罢推官行取以除积横之习,一蠲灾伤钱粮以苏累困之氓。今之将不堪用矣。仰鼻息于文官,听提掇于下吏;威望既莫重于平时,号令胡能施于对

垒。今当徵求真才，聘请登坛，行推毂礼。一切重务，听其便宜行之。有司害民不悛，拊循不实者，亦听处分。罢监制，焚谤书。如此，汉高之坛，文帝之细柳，燕之金台，复现于今。民怨可平，胡寇可弭。崇祯帝异其言，立授吏科给事中。命遇事直陈无隐，又奏中及高邮武举张抱赤兴屯书，令录上。

礼部议选宗才 崇祯九年(1636)二月二十五日，礼部议选宗才：一为荐举。先由五宗保结，长史据结详访，启亲王核勘。开才能实迹以闻，二为考验。部院疏列学行俱卓、博学多闻、精于心计、熟于刑名、娴于礼乐文章，兼通屯田、水利，保障拊循，一一叩其经纶。各分差等，请临轩策问，或召对平台，然后因才授官。三为换授。祖训换授官职，明旨谓是否必拘原品。明品级之不必拘，在外府佐州县正以及教职，在京则中行评博以及部曹，俱筮仕之秩，俟有成绩而递进。今换授国属，请一循其序。四为升转。祖训升转如常选法。五为举劾。黜陟自应一体。六为体统。贤宗居藩邸则宗藩规仪，出而服官，体统一准官制。七为解任。宗室服官，第支官俸，及解任则原禄具存。

刘宗周痛愤时艰 崇祯九年(1636)三月初一日，工部右侍郎刘宗周痛愤时艰。他说：皇上以不世出之资，际中兴之运，即位之初，锐意太平，直欲跻一世于唐虞三代。甚盛心也。而施为次第之间，多未得要领，于是属意恢辽，而贼臣以五年灭胡之说进，更为祸胎。已巳之后，谋国无良，虏氛孔炽，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积轻士大夫之心。由此耳目参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术专尚刑名，政体归之丛脞，天下事不觉日抵于坏，故自厂卫司讥防而告讦之风炽；自诏狱及士绅而常帘之等夷；自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盛，自事事仰承独断而谄佞之风日长；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冠而犯者日众；自诏旨杂治五刑岁躬断狱以数千计，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笔治丝纶而王言亵；自诛求及琐屑而政体伤；自参罚在钱粮而官愈贪，吏愈核，赋愈逋；自敲朴日繁而民生瘁；自严刑与重敛交困天下而盗贼遍起；自总理任而天下之功能薄；自监纪遣而封疆之责任轻；自督抚无权而将日懦，自武弁废法而兵日骄；自将懦兵骄而朝廷之威并穷于督抚；自朝廷勒限尽贼，而行间日杀良报级以幸免无罪。使生灵涂炭，事益极矣。天启圣衷，一旦撤总监之任，重守令之选，下弓旌之檄，严酷令之威，维新之政，方冀与二三臣工洗心剔虑以联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难。得一文震孟，以单词报罢，使大臣失和衷之谊；得一陈子壮，又以过戆生辜，使朝廷无吁咈之风。此其关系于国体人心又非浅鲜！于是求治愈殷，纷更四出，市井杂流，咸得操其讹说，投间抵隙以希进用，而国事愈不可问。皇上不过始于一念之矫枉，而积渐之势，酿为厉阶，遂几于莫可补救，则今日转乱为治之机，断不可已。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则必首体上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风雷；则念祖宗学古之益以率祖，而不至轻言改作；则必法尧舜之恭己无为，以简要出政令；法尧舜之舍己从人，以宽大养人才；法尧舜之从欲而治，以忠厚培国命；并法文武之发政施仁，及议拊循，以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而且还内庭以扫除之役，杜后世宦官之隙；正懦帅以失律之诛，杜后世藩镇之隙；慎宗贤以改职之途，杜后世宗藩之隙。除此三大隙，而苍桑之业，又何虞夷寇！此蚩潢池，言抚言剿，总非定算。但颁尺一之诏，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由，与今日不忍轻弃斯民之意，乃遣廷臣，赍内帑，巡行郡国，为招抚使，招其无罪而流亡者。更令陈师险隘，坚壁清野，听其穷而自归，诛渠之外，不杀一人。此圣人治天下之明效。武生新授吏科给事中陈启新，片言投契，立置清华，称一时盛事。第本生之品，未可遽信。乞先令以冠带办事黄门，稍如试御史例，俟数月后，果有忠言奇计，实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皇上天纵圣明，而诸臣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术以荧主听，使国论愈纷，治效愈难，臣窃痛之。疏上，不报。

后金改文馆为内三院 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三月初六日，后金改文馆为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分任职掌。内国史院掌管记注皇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百官章奏、官员升降、功臣妻女诰命，邻国书札等等，俱编为史册；内秘书院职掌撰各国来往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及辩冤词状、皇上敕谕各官敕书、告祭文庙、祭文武官文；内弘文院职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进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颁行制度等。

山西大饥荒 崇祯九年(1636)二月，山西在遭受连年的旱灾、虫灾后，三月，又发生大饥荒。时饥民无粮，只得食树皮、草叶。树皮、草叶尽，乃人相食。临近山西的河南南阳，也发生饥荒。唐王聿键奏河南南阳饥，甚有母烹其女以食者。崇祯帝乃下诏发三千五百金赈济山西、南阳，并免山西被灾州县新旧二饷。

卢象升奏陈运饷维艰 崇祯九年(1636)三月十一日，总理卢象升奏陈：李自成等奔汉江南，其余观望陕西、河南间。河南、湖广、陕西、四川，大山绵延，其出没无端，若奋剿穷追，何地可歇？凡崇岗峻岭，密箐深林，扳木悬崖，日行三、四十里，马行不能进，人苦于登。此时折色银无所用，本色粮无从运，车

驴无所施，势必以人负米二斗，随兵来往，日食一升，一供兵，一自赡，十日而二斗之粮尽，勿论此十日内遇贼否？相持否？而以千兵入须千人肩运，万兵入须万人肩运，粮以兵运，不出十日而俱归于尽矣。

钱士升奏陈四箴 崇祯九年(1636)三月二十六日，大学士钱士升奏陈四箴：一为宽以御众，如天之覆，贤愚并包，功过在宥，大弦毋急。六辔毋骤，不竞不绒，世跻仁寿，荡荡巍巍，大哉我后。二为简以御下。若网若纲，要领独挈，条自毕张，无为守正，垂拱明堂，执要则逸，好详则荒，程书衡石，徒敝章光。三为虚以宅心。如鉴斯空，妍媸好丑，毕献形容，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以意索照，亿逆则穷，邻铁市虎，载息张弓。四为平以出政，如衡斯准，轻重无畸，衰益必充，舜贵执中，孔戒已甚，救弊矫偏，参调详审，畏卒怖始，罔或不凛。

钱士升致仕 钱士升(1575—1652)，字抑之，嘉善(今属浙江省)人。万历四十四(1616)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天启初，乞归。崇祯元年(1628)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次年，病归。崇祯四年起南京礼部右侍郎，署尚书事。崇祯六年九月召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九年四月，士升撰四箴以献，其言深中时病，帝不悦。时有武生李琎者，请括江南富户，令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士升言此乱本之举。拟旨下刑部逮问，帝不许。士升乃上疏力急，帝怒，四月初七日，士升致仕。永历六年(1652)卒，年七十八。有《皇明表忠记》、《嘉善丁氏家传》、《赐余堂集》、《逊国遗书》等。

乡会试加验骑射 崇祯九年(1636)四月初九日，礼部臣奏陈：乡试、会试二三场兼武经书算。放榜后验骑射。如南人十不得二、西北人十不得三，将提学官参治。崇祯帝允行。

皇太极称帝 崇祯九年(1636)四月十一日，后金国汗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以是年为崇德元年；改国号金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定都沈阳。上尊号"宽温仁圣皇帝"。次日，清太宗率百官祭太庙，尊奉父努尔哈赤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祖父到始祖都尊奉为王。十天后，清太宗大封其臣属。其诸兄弟子侄、诸外藩蒙古贝勒，及明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都封为王。清太宗即位之典持续约二十余天，礼仪多仿汉制。

崇祯帝诏令天下 崇祯九年(1636)五月初十日，崇祯帝诏告天下：朕仰承天道，俯御万方，念此军民，谁非赤子，只因官贪吏狡，年岁凶荒，致饥寒所迫，甘作非为。一二无知，渐至胁从遂众。数年来亡辜被僇，不知其几。朕痛心恻念，寝食靡宁。目今在豫者已困饥深山，在陕者零星窜伏。行将大兵加剿，必定玉石难分，虽指示生路，犹恐各官举行未善，若辈猜惧多端，或疑将领计诱杀降，或疑有司分别看待，或虑日后奸棍诈害，或虑目下生业销亡。种种深情，良可矜悯，为此再颁敕书，遣官驰谕，各抚按大书榜示，从俗开导。如有悔罪投诚，弃邪归正，即称救回难民，逐一查明籍贯，本地编入保甲。在各省分起护归，各安井里之乐，永消反侧之心。道府有司，即以难民收复多寡安插得所为殿最，违者指参重治。其或才力出众，愿向督理军前奏用者，听其图功自见。一体叙录；如怙终不悛，即合力夹剿，务尽绝根株，无滋余孽。抚顺剿逆，朝廷法实无私；出死入生，若等不可失算。诏布遐迩，咸使闻知。

俞冲霄败没 俞冲霄为延绥总兵，崇祯九年(1636)五月十三日，与李自成战于安定，遇伏战没，失亡三千余人。

包凤起奏陈招抚之策 崇祯九年(1636)五月兵部员外郎包凤起奏陈招抚之策。他说：抚则当讲抚之地。今日寇党俾回原籍，乡人指目，一言诟詈，彼不甘心，则原籍不可强之使回。西安、延安、河南、安阳，屠掠之后，有两城可并为一城，两村可并为一村，以空城空村即为安置。按户口，编里甲，给牛种，三年而赋。南阳裕叶间，远者一百二十里，人烟几断，于中路设一县，徒流民实之。抚则当讲抚之资，彼渠魁挟有厚利，胁从者多赤子，宜酌行赈贷。牛种诸费，将于何出？抚则当讲抚之人，以解散属各抚，以安插责司道守令，必专心料理，如可居可耕，新附乐业，在旧民不扰，须择才干县官专其事，县务另行委署，事毕优叙。

林钎逝世 林钎(？—1636)，字实甫，号鹤昭，同安(今福建厦门东北)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授编修。天启时，任国子司业。时监生陆万龄请建魏阉生祠於太学，具簿醵金，强钎为倡。钎乃挂冠径归。魏忠贤矫旨削其籍。崇祯元年(1628)起钎少詹事。九年正月，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钎在阁五月，无所建白。时有谨愿诚恪之称。六月初二日，病卒。赠礼部尚书，谥文穆。

文震孟逝世 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吴县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修撰。时魏忠贤渐用事，数斥逐大臣。震孟愤，乃上《勤政讲学疏》，魏忠贤摘疏中"傀儡登场"以闻，一日讲筵毕，忠贤传旨，廷杖震孟八十，虽经叶向高，韩爌等力争论救，不纳，震孟亦不赴调而归。崇祯元年(1628)改左中允，充日讲官。崇祯八年六月，帝将增置阁臣，召廷臣数十人，试以票拟。七月，擢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不久以何吾驺罢，震孟落职闲住。崇祯

九年六月初三日逝世。年六十三。弘光初，赠礼部尚书，谥文肃。有《文文肃公日记》、《北征纪行》、《姑苏名贤小记》等。

洪承畴奏请合兵凑饷 崇祯九年(1636)六月十二日，总督洪承畴奏陈：秦中兵今实数共骑步一万三千七百余，现选川兵五千三百余人，俱为步卒，专蓝田、商雒等处，堵剿秦豫接界之寇。先是李自成众约三、四万，张天琳、满天星众约二、三万，混天王众约二 万，历次剿散。混天王逃延绥定边，势孤，复合闯将。至张天琳、满天星等，今奔延绥、安定、安塞，犹可督责收拾；闯塌天、闯王、蝎子块等俱出郧、襄，已奔兴安、汉中，进则入三秦，退可犯楚豫，极宜合兵凑饷，力图协剿。

姚士慎逝世 姚士慎(1578—1636)，字岱芝，平湖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选庶吉士，改吏科给事中。万历三十八年请告，不奉旨遽出，谪福建布政司照磨。万历四十四年迁行人右司副，四十六年尚宝丞。万历四十八年，进光禄寺卿，历南京刑部右侍郎，升南京刑部尚书，致仕。崇祯九年(1636)六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九。

清兵入喜峰口 崇祯九年(1636)五月三十日，清太宗派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统八旗兵十万攻明。六月二十七日，阿济格兵分三路入喜峰口(今河北迁西县境内)、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县北)。明巡关御史王肇坤拒战，兵败而死，明军退保昌平(今北京昌平)，清兵再侵居庸、昌平北路。大同总兵王朴驰援，击斩一千一百零四人，俘获一百四十三人。

清兵入昌平 崇祯九年(1636)七月初，京师戒严。崇祯帝急令内臣李国辅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泉关、崔良用守固关。几天后，又命成国公朱纯臣巡视边关。五日，清兵会于京畿延庆入居庸关。十七日，清兵自天寿山后突现昌平城下，攻昌平城。降人内应，清兵陷昌平，明总兵巢丕昌降，户部主事王桂、赵悦，判官王禹佐、胡惟弘等被杀。

高迎祥之死 高迎祥(? —1636)，一名如岳，陕西安塞人。崇祯元年(1628)起义，称闯王。崇祯九年三月，农民军分道入陕：高迎祥由郧、襄趋兴安、汉中；李自成经商洛去延绥；罗汝才等进入房、竹一带。是月，明以孙传庭为陕西巡抚，锐意进剿。七月十七日，高迎祥由汉中、石泉进取西安。十九日，迎祥在盩厔(今周至)黑水峪被孙传庭设伏捕获。不久，被解送京师杀害。高迎祥死后，李自成被推为闯王。

陈昌文奏请部郎例转 崇祯九年(1636)七月二十四日，吏科给事中陈昌文奏请部郎以例转调：按照往例，礼、兵部部郎及科道例转乃得外道，余部郎俱官知府。今畏钱粮参罚，俱就道阙，如松江知府方岳贡十年不调，故府缺或二三年未补，道缺竞趋之。请今后部郎不得多越府转道，道实俸二年方转任加衔，庶收久任之实。捐恤之诏，谓四、五年来，实欠在民，安得欠数之多？收粮之人，半奸胥猾吏，全收不纳，妄开欠户，有司曰此欠在民。上官责逋，何从遍吊，亦曰此欠在民。其未必皆民。祖宗朝，凡有蠲免多系本年租税，则一当百，十当千，胜于蠲久年之逋。设处之令，谓民穷不堪重累，故责院道有司多方措置，或官赋，或各耗余羡，或节省供应，或义助，毫不及此。其实各官未尽有此公费，总之以丁亩为灌输之府，关厢为销归之地，名不加派，其弊尤其。设处原权宜。不当屡行，即不得已行之，正须裒益。通政民本多许封进，顾有冤民，有奸民，又有借冤以售奸，其为害岂直一、二而已。设令抚按虚公从事，庶冤民得白而奸民不敢自喜。

清兵攻顺义 崇祯九年(1636)七月，清兵入京畿，攻陷昌平后，又相继攻下良乡(今北京房山)、围攻顺义(今属北京)。明顺义知县上官荩与游击治国器，都指挥苏时雨等拒城守。城陷，荩与国器、时雨等皆死之。清军乘势，又攻下宝坻(今属天津)、定兴、安肃(今河北徐水)、大城、雄县、安州等近畿州县。

唐王聿键起兵勤王 崇祯九年(1636)八月初一日，清兵犯京畿。唐王聿键起兵勤王。朱聿键(1602—1646)，崇祯五年继唐王封爵，闻京师戒严，乃倡议起勤王师。明制，亲藩不掌兵，亲王府兵，不过备护卫而已，防宗藩擅兵干政。时聿键率勤王兵将至开封(今属河南)，诸大吏惴恐获罪，乃集议请周王劝止。聿键乃止不行。不久，崇祯帝下诏切责，勒还国，废为庶人。

张凤翼自杀 张凤翼(? —1636)，代州(今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广宁兵备副使，忧归。天启三年(1623)，从右参政擢右佥都御史。不久，内艰归。天启六年秋，起复故官，巡抚保定。次年冬，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崇祯元年(1628)以病去。崇祯三年起故官，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以功进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崇祯七年加太子太保。八年初凤阳陷，言官交章劾凤翼。崇祯九年七月，清兵入昌平。给事中王家彦劾凤翼坐视不救。凤翼惧，自请督师，诸将畏不敢进，清兵连下多城，言官劾疏屡上，八月，凤翼惧帝降罪，于九月初二日，服毒自杀。

卢象升总督宣大山西军务 崇祯九年(1636)夏，兵部侍郎总理川、陕、晋、豫、楚、山东、江北七省军务卢象升继滁州、七项山大败高迎祥、李自成农民

军后，兵势大盛。是年七月，清兵再次入犯京畿，京师戒严。崇祯帝下诏召卢象升率军入卫京师，并再赐尚方剑。卢象升率军北上入援；军至真定。八月二十日，清兵退出关外，京师解严。九月二十日，诏象升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备边。象升乃大兴屯政，积粟二十余万。帝谕九边奉以为式。

梁廷栋伏诛 梁廷栋（？—1636），字无它，河南鄢陵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礼部仪制郎中。天启时，迁西宁兵备佥事，转永平兵备副使。值魏忠贤建祠，不署名而归。崇祯元年（1628）起原官，分巡口北道。升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又迁兵部右侍郎兼故官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及四方援军。梁廷栋有才知兵，奏对明爽。崇祯三年正月拜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欲去吏部尚书王永光而代之，王永光之党遂劾其纳贿营私，崇祯四年五月免职。崇祯八年冬，召起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崇祯九年七月，清军入逼京师，梁廷栋与督师张凤翼畏怯不战，自度必罹重罪，遂服大黄药求死。九月卒，诏定其大辟之罪。

刘宗周被斥为民 刘宗周（1577—1645），字起东，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因母丧，家居七年始赴补，后告归。天启元年（1621）起仪制主事。累迁光禄丞、尚全、太仆少卿，以疾归。四年起右通政，会东林党狱，宗周也被削籍。崇祯元年（1628）冬，召为顺天府尹。崇祯八年七月，内阁缺人，吏部以宗周名上，帝诏所司敦趋，宗周固辞，施授工部左侍郎，上《痛愤时艰疏》。疏入，帝怒甚。体仁募山阴人疏论宗周，帝遂不用。宗周上疏告去，至天津复上疏论小人进而君子退皆体仁罪，而帝不察。疏奏，帝大怒。体仁又上章力诋，十月初四，被罢为民。

冯元飙奏陈时弊 崇祯九年（1636）十月初一日，礼科给事中奏陈时弊。他说：臣待罪礼科，与闻掌故，每见钜重诸务，类多废弛，习为固然，莫之省究。如谥法五年一举，今或再访而无一报，历法终古不易，今或持各是而滋大疑，积总成荒，盖难枚举。至若实录，则万世是非之衡，亦一时劝征所恃，历朝以来，虽御世长久，事迹繁重，实录之成，无逾数年，今熹庙七载，书不过八十余卷，翰林有起居之职，六曹有章奏之抄，内阁有票拟之籍，纂辑磨对，企待九年，何徇何疑，坐成废阁，此固非一改一事之偷惰。伏乞皇上毅然独断，即敕所司将宝录实训立行竣役，如宝训颁而是非不公，许廷臣纠正，按治如法。崇祯帝以为然。

宋权疏论铨政之弊 崇祯九年（1636）十月十三日，兵科给事中宋权疏论铨政之弊。他说，仅举边道、边抚言之，进士乙榜。但论才干，不论资格，圣谕煌煌，不啻再三。今大同道、关内道、昌平道、岢岚道、陕西之商雒道、汉羌道、陇州道、陇右之守巡二道，皆为乙榜。河西道则贡生，榆林之靖边道、宁夏之河东道、甘宁之庄浪道、西宁道、皆为乙榜。而内地安富之处，未有乙榜分司。如进士才长，何置于闲地？如乙榜才短，何投于剧区？臣非谓乙榜皆不堪边道，而所以用乙榜，非用其才，用以代进士，至内外轻重之悬殊，则又为异。历数诸巡抚，辽东外官，山海外官，宣府、大同外官、宁夏、甘肃、延绥、登莱俱外官，如外官望轻，何置于衡地？如京官望重，何逸于中权？臣非谓外官皆不堪边抚，而所以用外官，非用其才，用之以代京卿。其余守令，凡水旱盗贼之处，钱粮难完、城郭不固之处，进士不受。即间有一、二贤者除授其间，数月后抚按又奏调善地。曾有抚按题一甲科于兵凶战危之地者？

张献忠攻襄阳 崇祯九年（1636）秋十月，张献忠自均州（今均县西）、老回回自新野、蝎于块自唐县（今唐河）拥众二十万，同时出兵。十三日，攻襄阳。农民军大败总兵秦翼明。湖广震动。献忠佯攻襄阳，转而与罗汝才、老回回、闯塌天等沿江东下。

诏天采铜铁铅银等矿 崇祯九年十月二十五日，金吾右卫千户韩伯孝请开采铜矿于平阳、西安、凤翔、临洮、巩昌、怀庆、河南。崇祯帝允准。

唐世济下狱 唐世济，生卒不详，浙江乌程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累官至大理寺丞。天启元年（1621）二月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天启三年五月乞休归。天启五年三月起迁南京刑部右侍郎，六月改添设兵部右侍郎，十一月迁兵部左侍郎，不久即削籍夺诰。崇祯元年（1628）十月起复原官，二年三月再罢。崇祯五年六月复改南京右都御史。崇祯七年八月擢左都御史。崇祯九年十一月以荐原兵部尚书霍维华下狱。崇祯十年闰四月戍边。弘光元年（1645）正月起改南京左都御史管右都御史事。

侯恂下狱 侯恂，生卒不详，字若谷，河南商丘人。万历时中进士，天启、崇祯时历官御史、贵州巡抚、户部尚书、兵部侍郎等职。曾督军昌平。崇祯六年（1633）五月任户部尚书，为温体仁所排斥，崇祯九年十二月初三日被免职，后又于崇祯十五年起用为督师，围剿农民军。及开封被李自成攻破，罢官。

洪承畴败李自成于陇州 崇祯九年（1636）五月，李自成从米脂率部向西南，渡泾河，过渭水，深入汉中。总督洪承畴闻警，调兵围堵。七月，自成攻徽州，破两当，逼阶州。九月，农民军攻凤翔。十月初，自成与蝎子块、过天星合营驻于陇州。十二月，总督洪承畴率军与自成等战于陇州（今陕西陇县西南）。自

成兵败，率部退走庆阳、凤翔。

两淮盐课 崇祯九年(1636)十二月二十九日，户部类报两淮盐课。崇祯六年以前，积亏二百万余两，命巡盐御史分别议处。淮盐在天启五年(1625)，新旧额银止七十万两，崇祯三年(1630)加至一百二十一万余两，崇祯四年加一百三十万余两，崇祯六年加至一百五十六万余两，因列各官亏完之数，程其功罪。

各省加派银数额 崇祯九年(1636)，御览加派银共二百九十九万三千七百九十余两，工部分用九万两与山东之岛饷五十五万五千七百九十余两不与。浙江加派银四十二万零二百七十二两，江西加派银三十六万一千零三十六两，福建加派银十二万零八百零二两，河南加派银六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一两，山东加派银五十万五千七百五十七两，陕西加派银二十六万三千六百五十一两，凤阳抚属加派银二十七万六千八百八十五两，南直隶加派银三十八万一千八百三十五两，广东加派银二十三万一千一百七十八两，北直隶加派银先奉旨蠲免外，延庆州加派银九百五十三两，保安州加派银二百七十四两。

董其昌逝世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充讲官，出为湖广副使，以疾归。起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请归。起山东副使、莱州兵备、河南参政，并不赴。泰昌元年(1620)召为太常少卿，天启二年(1622)擢太常寺卿，天启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时阉竖擅权，逾年请告归。崇祯四年(1632)起故官，掌詹事府事，崇祯七年致仕，崇祯九年卒，年八十三。赠太子太傅，福王时，谥文敏。晚年横行乡里，纵子行凶，曾激起民变。但绘画书法以及篆刻都有极高的造诣，对当时和以后有很深的影响，著《容台文集》九卷，《诗集》四卷，《别集》一卷，《画禅室随笔》四卷等，辑《神宗留中奏疏》。

张献忠罗汝才攻安庆 崇祯十年(1637)正月，张献忠、罗汝才等出湖广与号称革左王营的左金王、革里眼合。初六日，连营百里逼安庆，"烽火达淮扬"南京大震。明安庆巡抚张国维告警。别部攻滁州。崇祯帝诏左良玉、马爌、刘良佐合兵救援。张献忠等与明军大战于安庆城下，失利。献忠等退守潜山天王古寨。

太监提督京城巡捕 崇祯十年(1637)正月初九日，"御马监太监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王之俊为副。

逋欠赋额各官勒限完复 崇祯十年(1637)正月十二日，浙江、江西、湖广左布政使姚永济、朱之臣、曾道唯，苏州知府陈洪谧，扬州知府韩文镜，淮安知府周光夏，各逋赋，夺官视事，勒限完复。

加派输纳事例 崇祯十年(1637)正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刘遵宪，为了加强对清兵的防御而培筑京城，上加派输纳事例。

张献忠军攻潜山 崇祯十年(1637)二月，张献忠军攻皖不克，退走庐江。二十七日，张献忠军攻潜山。明副使史可法与左良玉等将率兵在枫香驿击败献忠军。总兵马爌与刘良佐也连败农民军于庐江六安。献忠率军退守潜山之天堂寨。明安庆巡抚张国维檄总兵左良玉搜山，良玉不应，放兵掠妇女，屯兵月余，竟北去。

朝鲜降于清朝 崇祯十年(1637)正月，清太倧皇太极亲征朝鲜，责其渝盟助明之罪。清军势如破竹连克义州、安州，直逼都城平壤。朝鲜国王李宗倶，率长子及百官遁南汉山，令次子携眷属避于江华岛，向明求援。明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赴援。清军渡汉江，直抵南汉城西驻营。清太宗遣使谕降。未几，李倧知江华岛陷，援兵皆败，二月乃献上敕印，降于清。三月，明军出海。越数日，才知属国朝鲜已降清。

明军兵败酆家店 崇祯十年(1637)三月，张献忠率军自潜山出，连破太湖、蕲州(今蕲春南)、黄州(今黄岗)等地。二十五日，献忠率军与明军大战于太湖之酆家店。献忠以数万兵围明军数重。又遣将统军阻击史可法等援军。时天雨，农民军从四面进攻，短兵相接，斩明将潘可大等四十余人。明军大败，损兵六千余。献忠率军乘胜东取和州、含山、六合等地。

杨嗣昌建四正六隅策 崇祯十年(1637)三月，兵部尚书杨嗣昌至京师，帝召对。嗣昌博涉文史，多识先朝掌故，且工笔札，有口才。帝与语，大信爱之，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说：恨用卿晚。嗣昌乃议大举征讨农民军。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官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四正六隅合为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专事征讨。为实现四正六隅策，又议赠兵十二万，剿饷二百八十万。措饷之策有四：一为因粮，因旧额量加，额输六合，石折银八钱，份地不与，岁得银一百九十二万九千余两。二为溢地，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余两。三为事例，富民输资为监生。四为驿递，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两充饷。议上。思宗皆允，并改因粮为均输。布告天下。

清兵攻克皮岛 崇祯十年(1637)初，清太宗

征朝鲜。朝鲜告急，明遣总兵陈洪范统舟师赴援。二月，明军始行，闻朝鲜降。四月初九日，清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攻铁山皮岛。山东巡抚告急于朝。帝令洪范及总兵沈世魁坚守皮岛。世魁败于清军，与洪范退守石城岛。副将金日观统诸将及士卒与清兵激战七昼夜，力不支，皆战死，皮岛遂陷。

李自成奔秦州 崇祯九年(1636)夏，李自成败明延绥总兵俞冲霄，攻取米脂、延安、绥德。自成衣锦昼游，往拜父老乡亲，从者益众。崇祯十年正月，李自成率军从凤翔渡渭河，在宝鸡击败明军，进至泾阳、三原，过天星、蝎子块皆来会。未几，陕抚孙传庭、总兵曹变蛟来攻，连战七日，自成军败。蝎子块降于明；过天星走河南；自成率其余十七部集渭南。五月十一日，自成避孙传庭和洪承畴的夹击，率师奔秦州。

清封孔有德等王爵 崇祯十年(1637)五月十五日，清封明降将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王喜忠顺王。麻登云督催粮草使。

傅朝佑论温体仁 傅朝佑(? —1639)，字右君，临川人。万历中举乡试第一，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中书舍人。崇祯三年(1630)，考选给事中，后补授兵科。次年迁工科给事中，出封益藩，事竣还里。崇祯九年，朝佑即家进刑科都给事中，因还朝愆期被劾，贬秩调外。崇祯十年五月，朝佑未行，上疏论温体仁六大罪：得罪于天子；得罪于祖宗；得罪于天地；得罪于封疆；得罪于圣贤；得罪于心性。帝怒，下狱按治。

张汉儒之死 崇祯十年(1637)六月，奸人张汉儒窥温体仁欲罪东林，遂入其门下，相与定密谋，乃抗章诋毁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体仁从中主持之，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谦益危甚，求救于司礼太监曹化淳。汉儒侦知之，告体仁。体仁密奏上，请并坐化淳罪。上以示化淳，化淳惧，自请按治，乃尽得汉儒奸状及体仁密谋，狱上，帝始知体仁有党，遂命汉儒等立枷死。

张溥创复社 张溥(1601—1641)，字天如，太仓(今属江苏)人。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右手握笔处，指掌成茧。崇祯元年(1628)，溥以选贡生入都。与同里进士张采名著于京师。及归，溥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曰复社。崇祯四年，溥中进士，改庶吉士，以养亲乞假归。无论寒暑，手不释书，四方慕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也倾心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崇祯十年六月，溥同里人陆文声求入社不许，乃诣阙言，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帝乃下旨穷追不已。至崇祯十四年，溥已死，而事犹未竟。

温体仁致仕 温体仁(1573—1638)，字长卿，明浙江乌程(今吴兴)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崇祯初，迁尚书，协理詹事府事。崇祯三年(1630)，帝命体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入阁八年，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帝宠信优礼之极。体仁当国排斥异己，时劾者章不胜计，帝皆不省。会因欲下钱谦益、瞿式耜狱，事连司礼太监曹化淳。化淳乃侦得体仁奸状上。帝始晤体仁有党，疏之。体仁佯引疾求去，意帝必慰留。崇祯十年六月十一日，竟得旨罢免。崇祯十一年七月初二日卒，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忠。弘光时，廷臣劾其奸佞异常，贻毒深远。夺荫谥以昭公道，隆武帝从之。

史可法巡抚安庆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明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授西安府推官，稍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迁右参议，分守池州、太平。是年秋，总理卢象升改可法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崇祯十年初，熊文灿代王家祯为总理，专主招抚。七月，史可法被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湖广、江西等九县，提督军务，设额兵万人。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廉信，与下均劳苦，故得士卒死力，数有功。

李自成入四川 崇祯十年(1637)九月二十七日，李自成、过天星等围攻汉中府城(今南郑县)。会洪承畴来救，撤围向西南走。二十八日，闯将自成等攻克宁羌州(今陕西宁强县)。十月初二日，自成与过天星、混天王等九部分三路，分别由七盘关、阳平关、梨树口入川。初四日，自成等入关。初八日，破昭化。十二日，攻剑州。十四日，自成等又三分其军，分别往攻绵州(今绵阳)、盐亭、江油。十六日，自成等兵围成都，七日不下乃去，连下川中三十余州县。

熊文灿主抚 崇祯十年(1637)春，熊文灿代王家祯总理陕、豫、晋、楚、川及南畿军务。当是时，杨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饷大半，围剿农民军。文灿督主军务后，明军屡捷，农民起义陷入低潮。文灿决计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之策。刊檄遍悬通都之地，其文有“心示众家贼，待以不死”。帝闻之怒，但嗣昌曲为之解，文灿仍力主招抚。十月，文灿诱降张献忠部。十一月，罗汝才、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惠登相、王光恩等部农民军也就抚于熊文灿。

曹化淳提督京营 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太监曹化淳受命提督京营戎政。这是化淳再次任此

职。崇祯五年七月化淳曾受此职。时辽东危局日甚一日,中原之乱又久不平。崇祯帝意用中官置要地。先有工部员外郎骆方玺窥帝,乃上言,陛下即位遂置魏忠贤于大戮,岂为溺情阉宦,不过外廷诸臣无一可用而借才及之。人臣感激恩遇皆知仰报,何论内外。若内臣蒙恩受重任,孰不欲弃捐顶踵以酬陛下。不数月,即有化淳提督京营之命。复以李明哲提督五军营,杜勋提督神枢营,阎思印提督神机营,郑良辅总理京城巡捕。于是中官皆布置要地矣。

商周祚疏论御史差规 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二十六日,左都御史商周祚疏论御史差规。他说:各御史差规,原有定序。先中差,后大差,先旧官,后新官。大不再大,中不再中。两京大差及各掌道,俱俟两差之后,此向为例。近差多少人,未免以差待人。于是一新一旧,惟视差定,而先中后大与中大间差之例遂不能拘。前任都御史奉谕申饬七年定例。今欲法归划一,如依中大不再之例。虽均劳逸,第恐人不遇差,则以人候差。差不遇人,又悬差俟人。若提后置前,又人情不平。夫莫非王事,何论中大,宜仍一新一旧,凡差以到任一年为准。序到即注,其报代迟速。或有徇情游移,概置不问。业奉旨允行。臣窃谓差不论中大似矣,然南北两京畿三提学及京营顺天巡按,名曰老差,断不宜新人,必资深满三差或经大差方胜此任。仍照七年定例。任满日任差,但摘京畿等七差坐旧,其余统中大而一,向谓北人不闽广,南人不三边,概不必问,崇祯帝允从。

姜逢元罢归 姜逢元,生卒不详,字仲讱,号箴胜,浙江余姚人。万历进士。历国子监司业,预修《三朝要典》,任副总裁,每搁笔而叹,魏忠贤勒其闲住。崇祯初,起迁礼部右侍郎兼学士掌翰林院事。崇祯五年(1632)擢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崇祯九年七月回部理事。崇祯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罢归。

洪承畴援四川 崇祯十年(1637)冬,时嗣昌主兵事,熊文灿为总理五省军务,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围剿农民军,同年九月底,李自成入川。初,嗣昌、文灿忧陕西农民军出关扰乱剿抚大局,并不以蜀事为忧。待到自成兵围成都,连克数十城后,崇祯帝大惧,急令总督洪承畴率军入援四川。十二月二十九日,洪承畴率副总兵官曹变蛟,由沔县历宁羌,过七盘、朝天两关,岁暮抵达广元。

卢象升奏陈边务 崇祯十年(1637)十二月,总督宣大、山西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卢象升奏陈边务:剿寇需兵,用兵需饷,此为常理。今日兵少而寇多,兵饥而寇饱,兵劳而寇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愈剿愈繁,生灵涂炭已甚。事至此不得不用权宜计。臣有阻寇、疑寇、饥寇之法。一、立寨团筑濠堑以阻寇。寇奔径道虽多,每州县远近必由之路,近山险则立寨,村落则聚团。寨必有泉可汲,并择其峻隘;团必大村镇,围深濠、布密箐,筑牛马墙。其近团路径,以荆棘树枝木石垒断,张毒弩于内,是为阻寇。一挑乡勇设游兵以疑寇。寇每股虽号数万,妇女老弱占其半,不过恃积强之势以拒官兵。拥众依山,伺我远近,悉我虚实,疲我师徒。当募勇敢乡民,有司时犒赏鼓励,使其父母妻子安置寨团或远僻他所,只留敢死百余辈,多则数百辈,各持棍斧长枪短刀,于高山深林侦寇来往,多则避之,少则阻击,夜则衔枚匍匐,或劫营,或窃马骡,是谓疑寇。一收资粮敛头畜以饥寇。寇依山为横,因食于民。官兵追逐,众寡劳佚饥饱之数相悬,岂能必胜,当令各有司单骑遍历乡村,凡近城三十里乡民,亟以粮谷赀财入城。三十里外,或运山寨,或入大村,聚团固守,牛、羊、马、骡、鸡畜等多收敛使无所掠。如资粮供寇,军法重治。是谓饥寇。崇祯帝是之。俱空言无补。

黄士俊致仕 黄士俊(1583—?),字亮垣,一字象甫,号玉仑,顺德(今属广东)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殿试第一。授修撰,历任少詹事,升礼部侍郎协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崇祯九年(1636)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十月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十一年正月初二日致仕。后唐王以原官召,未赴。后相永明王,加太傅。耄不能决事,数为台省论列。辞归而死。

李自成兵败梓潼 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初四,李自成等部闻洪承畴率军入川,齐聚川北。承畴檄川中诸道兵严守要害。农民军据险守川北,久粮乏,承畴以川师诱之,亲率陕兵设伏于梓潼。十三日,自成在梓潼被困,与承畴战不利,率余部走还陕西。

张普薇起义 光泽铅山间的棋山有无为教徒活跃其间,密以烧香为记,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十二日夜,无为教徒张普薇突围铅山县城,拥众横行,其党江义、周入等冲弋贵界。巡抚解学龙檄分守湖东道林日瑞推官吴铸合福建兵剿平之。并捣棋山,破散其党。

开海禁 明廷由于连年用兵,财源匮乏,于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十四日,从工科给事中傅元初所请,开福建海禁,通商佐饷。

裁南京冗员 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二十三日,裁南京冗员八十九人。吏部主事二,户部库大使五,兵部主事二,会同馆大使二,工部侍郎一,主事三,都察院御史七,照磨一,通政司经历一,大理寺左右寺丞各一,翰林院孔目一,詹事府主簿一,国子监

助教一，光禄寺署正二，行人司副一，宗人府经历一，生药局大使一。

黄道周论人才 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十二日，崇祯御经筵毕，召诸臣问保举、考选孰为得人、少詹事黄道周答：人才如树木，须养之数十年始可用。近来人才远不及古，又经摧残之后，必须培养。既复班，崇祯帝又问，道周答：立朝之才，存乎心术；治边之才，存乎形势。先年督抚未讲形势要害，浪言剿抚，随寇团走，事既不效，则谓饷不足。其实新旧饷约二百万，可养四十万之师。今宁锦三协兵仅十六万，似不必别求供剿之用。崇祯帝以为然。

田维嘉罢官 田维嘉，生卒不详。累官至左佥都御史。崇祯八年(1635)七月迁吏部左侍郎。崇祯十年三月擢吏部尚书。崇祯十一年三月初六日被劾罢官归。

朱燮元逝世 朱燮元(1566—1638)字懋和，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授大理评事，迁寺正，出知苏州，有惠政，迁广东按察副使，历陕西按察使，分巡陇右，进四川左布政使。天启初，奢崇明等叛，燮元力守成都。天启五年(1625)，燮元奉命以兵部尚书兼督贵州、云南、广西诸军。燮元赴重庆旋以父丧归。崇祯元年(1628)六月起复原官兼巡抚贵州。招流移，广开垦、募勇士。崇祯二年八月安邦彦、奢崇明皆授首。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以总督川湖云广贵州军务兼巡抚贵州，少师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卒於官，年七十三，赠太师，荫世袭锦衣卫指挥使。燮元明敏有器度，久镇西南，军资赎锾，岁不下数十万，皆籍之於官。治事明决，军书络绎，不假手幕佐。知人善用，使人各当其材，法纪严明。有《蜀事纪略》、《朱少师奏疏钞》等。

李自成洮州之败 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李自成率部从川入陕后，自洮州出番地，总督洪承畴令曹变蛟与贺人龙追歼。自成率军与曹军连日苦战，转战千里。番地人稀粮乏，农民军无以得食，力不支，战死饿死者众。自成洮州败后，率军复入塞，赴岷州及西和、礼县山中。曹变蛟追剿之，自成等潜伏于山中不出。

张献忠降于谷城 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张献忠部农民军在郧襄一带被左良玉、陈洪范等部击败。左良玉部将罗岱箭射献忠面额，良玉追及，刀拂献忠面。献忠军大败，损失颇重，辗转至谷城。时熊文灿为总理统明军，决计主抚，刊檄招降。是年春，献忠以重宝贿赂熊文灿及总兵陈洪范，又使人赴京师贿首辅薛国观。是年四月初八日，张献忠在谷城降于熊文灿。

张至发致仕 张至发(？—1642)山东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历知玉田、遵化。授礼部主事，改御史。万历四十三年，引病归。天启元年进大理寺丞。天启三年请终养。崇祯五年(1628)起顺天府丞，进光禄卿。八年春，迁刑部右侍郎。六月，擢至发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政。崇祯十年，至发为内阁首辅，一切守体仁所为，与诸正人君子为难，时论非之。崇祯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因内阁中黄应恩赇请事，词连至发。遂致仕归。崇祯十四年二月起用。坚辞不赴。于次年七月卒，赠少保。

姚思孝奏陈开市抚赏 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十五日，兵科都给事中姚思孝曾奏陈：开市抚赏，目前驭虏一大机，但不即轻给，稍示郑重，彼遂其欲，吾亦济其事，何损威失礼之有。事下兵部。杨嗣昌覆奏：先朝封贡抚赏，名甚尊，礼甚正。孟子称乐天者保天下，本朝有之。今又一时，女真暂退，正我好事成事之会，密询边臣，各出所长。

孔贞运致仕 孔贞运(1576—1644)，字开仲，江苏句容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左中允兼编修、理诰敕。崇祯元年(1628)擢国子监祭酒，崇祯二年进詹事。不久丁忧归。六年崇祯起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崇祯八年七月调吏部右侍郎。九年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十月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崇祯十年三月进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时温体仁当国。贞运不敢有所建白，充位而已。崇祯十一年四月十六日致仕，十七年七月初四日卒，年六十九。赠少保，谥文忠。

崇祯帝询足兵足食之计 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二十八日，崇祯帝御中左门，召考选诸臣，五人为班递进，问足兵足食之计。知县曾就义答：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从加派以济军需，未为不可。崇祯帝拔其为第一，迁翰林院编修，永城知县成仲龙为兵科给事中。

定高墙罪宗五年一审例 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刑部尚书刘之凤奏陈：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审录，而高墙内宗室罪犯，长期不予审讯，请对高墙罪宗同于天下囚徒例。同月二十四日，崇祯帝允准，遂定高墙罪宗五年一审例。同时又令京师民殊死以下许保候即结。

京城安民厂灾 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初二日，都城十余里内，觉地轴摇撼不已，若地震。不久，轰雷一声起天半，屋瓦碎裂，梁尘飞扬，西北隅白云滃郁，弥漫亘空，中夹苍黄黑子，旋转云际。历二时方散。乃京城西直门内安民厂火药爆炸。震毁城垣，

方圆十数里无完宇，树木俱偃仆立槁。居人行人，互相枕藉，死皆焦黑。更有崩至城外数里，死藉地面。据查居民死伤万余，贴厂太监王甫、局官张之秀俱毙，武库几空，发五千金赈恤。

黄道周致仕　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一作幼玄，一字螭若，又字细遵，号石斋，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不久，内艰归。崇祯二年（1629），起故官，进右中允。后降调。崇祯五年正月，方候补，染疾求去。濒行，上疏语刺延儒、体仁。帝怒，斥为民。崇祯九年用荐召，复旧官。崇祯十年，进右谕德、少詹事。掌司经局。崇祯十一年七月初四，帝召内阁及诸大臣于平台，并及道周。帝与道周数相诘难。是时，帝忧兵事，属意嗣昌，而道周守经，失帝意。及奏对，又不逊。帝怒甚，欲加以重罪又惮其名高，未敢决。有刑部主事张若麒上疏劾道周。同月十七日崇祯帝即贬道周三级，谪为江西按察司照磨。次年起复原官，又以病归。福王时官礼部尚书。南都覆，唐王以为武英殿大学士，率师至婺源与清兵相遇，兵败不屈而死，年六十二。谥忠烈。道周工书善画，以文章风节通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公卿多畏忌。有《易象正义》、《三易洞玑》、《洪范明义》、《孝经集传》、《春秋揆》、《续离骚》、《石斋集》、《骈枝别集》、《大涤函书》等。

崇祯帝谕外戚　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十五日，因外戚张春等数家诳财虐民，每征子钱，夺人田宅子女。于是崇祯帝谕外戚郭振明等说：皇戚驸马之家，姻联帝室，禄享天糈，回视闾阎，不啻天渊。仁人君子，当此遭际，必安心守分，不负国恩。厚德养俭，以保身名。乃有蔑弃礼法，或滥交觊权，至纵令恶棍鱼肉小民，受献霸占，科道瞻徇，有司畏忌。彼茕觋细民，含冤抱恨，惟诅谤呼号而已。天怒降殃，国法罔贷，幽则嗣斩，显则身刑，人鬼交责。即拊心自悔，嗟何及矣。我宜宗章皇帝外戚事鉴，分别善恶，各有报验，足示劝戒，特赐省览。盖不干法纪，即是尊君；不思害人，即是积德。在国恩礼无亏，于己身名俱泰。何其之美！

傅冠致仕　傅冠（1565—1646），字元甫，号季庵，江西进贤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翰林编修。崇祯元年（1628）进左中允，崇祯九年八月以礼部右侍郎署詹事府事，崇祯十年疏言时政，提出保元老，辨才品，政纪纲，信诏令四事，同年八月迁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崇祯十一年六月进文渊阁大学士，性简易，有章奏发自御前，冠以为揭帖，援笔判其上。既知误，惶恐引罪，同年九月二十三日致仕。南明唐王时，以原官督师江西，因嗜酒，被劾致仕。清兵入江西，冠为其门人执献于清军，于顺治三年（1646）被杀于汀州。有《宝纶楼集》。

清兵入塞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二十二日，清军再次入寇。清军分二路进至墙子岭、青山口，明蓟、辽总督吴阿衡、总兵鲁宗文战败而死，中官郑希诏逃走。清军遂长驱直入，兵屯于牛栏山。时明宣、大总督卢象升丁忧，候代未行。帝乃诏督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诸军入卫。二十四日，京师戒严。

召对卢象升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兵入寇。崇祯帝召宣、大、山西三总兵入卫京师，又三赐卢象升尚方剑令督天下援兵。是年五月，象升丁外艰，上疏乞奔丧。帝不准，令席丧候代，进兵部尚书。象升身着麻衣，脚穿草履，头裹白巾，誓师于京郊。崇祯帝派中官高起潜为象升军监军。十月初四日，崇祯帝召见督师卢象升于武英殿，问方略。象升答："臣主战。"时崇祯帝犹豫于战和之间，朝中重臣，杨嗣昌、高起潜、陈新甲都力主和议。初五日，帝发四万金犒军。初六日，又赐御马百匹、太仆马千匹、银铁鞭五百条。决策议战。

李自成潼关南原之败　崇祯十一年（1638）冬十月，总督洪承畴大破自成于潼关南原。洮州兵败后，除自成亲统的六队，混天星、过天星等先后降明。承畴度自成必奔潼关，与孙传庭定计，设三伏于潼关南原，每五十里立一营，令总兵官曹变蛟追自成后。自成军至潼关南原，伏起，军溃，死伤无数。自成身受重伤，妻女、辎重俱失，仅与刘宗敏等七骑突围，匿于商、洛山中。

商周祚削籍　商周祚，生卒不详，浙江会稽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历任太仆少卿、进抚福建右佥都御史、兵部右侍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南京工、兵部尚书。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调任左都御史。崇祯十一年五月迁吏部尚书，同年十二月初七日以瞻徇溺职削籍。

罗汝才降于明　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张献忠谷城受抚。罗汝才等部从宛、洛箕张而西，逼潼关。会陕抚孙传庭引军东出关。农民军联营数十里与传庭战，不胜，奔内乡、淅川而去。八月，罗汝才等自陕州攻襄阳。九月，罗汝才兵败双沟，率九营走均州。十一月，罗汝才叩太和宫提督中官，诡词求抚于熊文灿。文灿令房县知县郝景春单骑入其营，与汝才等歃血为盟，汝才乃率九营降于明。

《皇明经世文编》纂成　《皇明经世文编》陈子龙等编辑，五百零四卷，补遗四卷，共分政治、文教、武备、皇室四大类，子目六十一项，集明初至明末四百二十七人之文集奏稿，保存了大量明代政治经济

资料，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文献。该书还收集了相当多的清朝统治者祖先和明朝的关系，记录了清朝皇帝最不愿意让人们知道的史实，因而该书也是研究清朝前期历史的重要文献。是书编辑始于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十一月编成。参加选辑二十四人，列名参阅一百四十二人。

方逢年罢免 方逢年(？—1646)，字书田，号师蛮，遂安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选庶吉士，天启四年正月授编修充起居注、预修《实录》、典湖广试，天启五年二月忤阉宦被贬秩调外，后削籍为民。崇祯初，起原官，累迁礼部侍郎。崇祯十一年六月，擢礼部尚书入阁辅政。是年冬，刑科奏摘参未完疏。逢年以犯赃私者，人亡产绝，亲戚坐累，几同瓜蔓，遂轻拟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书刘之凤，责逢年疏忽。逢年引罪。十二月十二日罢归。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鲁王监国，召逢年为内阁大学士。顺治三年六月，清兵破绍兴，逢年被俘，因以腊书通闽，事机不密，八月被斩于延平。

卢象升战死 卢象升(1600—1638)，字建斗，宜兴人。开启二年(1622)进士，历大名、广平、顺德兵备，举卓异，进按察使。其善射，娴将略，能治军。以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进兵部右侍郎，赐尚方宝剑。多次击败李自成起义军。会京师有警，召入卫，奏命总督宣大山西，大兴屯利。时宰臣杨嗣昌、中官高起潜主和议与象升议不合，遇时掣肘，象升名虽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十二日，象升与清兵战于贾庄遇伏，奋斗而死。年三十九。赠户部尚书，谥忠烈。清谥忠肃。有《忠肃集》。

刘之凤下狱 刘之凤(？—1640)字雝鸣，中牟(今河南鹤壁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授南京御史。天启六年(1626)被魏忠贤夺职。崇祯二年(1629)起故官。累迁刑部侍郎，遂代郑三俊为本部尚书。崇祯十一年，尚书范景文劾南京给事中荆可栋贪墨，下部讯，之凤予轻比。议狱不当，罪止谪罢，但帝疑其受贿，十二月逮下狱。法司希旨坐绞。崇祯十三年四月，之凤自狱中自白无赃贿。帝置不省，竟瘐死。

洪承畴入卫 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督师卢象升兵败钜鹿，身死。时高起潜拥关、宁重兵近在五十里外的鸡泽，不赴援。及闻象升败，起潜惊恐失措，欲西逃，竟率军东行二十里，遇敌伏军大溃，仅只身逃逸。自请督察军情的枢辅刘宇亮至保定闻败，也仓惶退入晋州，而清军却乘胜长驱直入，分陷昌平、宝坻、平谷等地，京师震动。二十日，崇祯帝下诏徵总督洪承畴率军入卫。陕西巡抚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督援军同行。

清军陷畿辅城池 崇祯十一年(1638)冬，清军在亲王多尔衮和贝勒岳托率领下分左右两翼破长城而入，大举攻明。清军连下迁安、丰润、会于能州河西，从北边绕明京师至涿州。然后兵分八道，纵兵并进。明京师震动，督师卢象升率军迎敌，兵败身死。清军乘胜长驱南下。所过六府城镇皆被攻掠。明守城长吏、将校不是畏缩不前，就是望风先逃。清军在畿辅攻杀虏掠，连下四十三城，京畿残破。

清军入济南 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清军由京畿南下攻入山东。时枢辅杨嗣昌以为德州是清军南下的必经之地，传檄令山东巡抚颜继祖率兵扼守。于是济南空虚，止有乡兵五百、莱州援兵七百，势弱而不能守。清军从畿辅而西，抵山西界，复折而南，绕开德州，下临清，渡会通河，直插济南城下。明军拒城守御死战。初二，城溃巷战死难者甚众。德王朱由枢、奉国将军朱恩赏等都城破被俘。

洪承畴总督蓟辽 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十九日，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率军北上入卫京师。崇祯帝从枢辅杨嗣昌议，进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

吴伟业奏陈时政 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翰林院修撰吴伟业奏陈时政：今日阽危至极，皇上当下哀痛之诏，悯人罪己，思咎惧灾，吊死恤忠，赏功禁暴，使父老子弟，悲愤同仇，人心勃然，战气自倍。临清，只系一州，贾人千金购士，辄用破贼。今以京师之大，公侯贵戚之盛，皇上召之便殿，忠义激励，共捐家财以募死士，更出空头告身数百道，悬犒有功，使人敌营，烧其辎重，毒其水草。臣以为敌气已惰，陛下威灵四畅，敌必逃遁。但敌去之后，方劳圣虑。今日之计，急遣知兵大臣选九边锐卒，再益以川浙兵各数千人，预防今秋。然后大更法制、选将备边，严肃武试、积粟足食。

刘宇亮罢免 刘宇亮，生卒不详，字季龙，号蓬玄，四川绵竹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历南京光禄少卿。崇祯六年(1633)进詹事，纂修玉牒。不久，迁礼部左侍郎。十年七月，改吏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理右侍郎事。八月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次年六月，加文渊阁大学士，代贞运为首辅。时清兵入寇，宇亮自请督察军情。崇祯帝欲革卢象升，令宇亮为总督。宇亮惧，与国观、嗣昌谋，疏请留象升，而宇亮仍往督察。宇亮至保定，象升已战死，闻清兵将至，相顾无人色，急趋晋州躲避，知州闭门不纳。十二年正月，宇亮移师天津，疏论诸将退缩，因及总兵刘光祚，诏斩光祚军前。会光祚适

有武清之捷，宇亮复又具疏为之乞宥。崇祯帝斥责，下部议落职闲住，后被重劾，二月初七日，宇亮被削籍罢免。久之，卒于家。

清兵退归 崇祯十二年(1639)二月，清亲王多尔衮率军饱掠后，从山东北返至天津卫，渡运河东归。三月初九，清军从青山口出关，退回辽东。是役，清军入关达半年，深入二千里，攻占一府、三州、五十五县，二关；杀明总督二、守备以上将吏百余人；俘获人口四十六万余、黄金四千余两、白银九十七万余两。中原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财产损失无可计量。

马进忠、李万庆降于明 川、陕农民军相继为明军剿平后，崇祯帝诏左良玉赴河南。左良玉率刚被授为副总兵的农民军降将闯塌天刘国能在镇平关大败马进忠部。马进忠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二十四日降于明。活动在河南的另一支农民军射塌天李万庆，也连被左良玉败于唐县、内乡。李万庆在明的诱招下，也于四月二十三日降于明。不久，万庆也被授职副总兵。

崇祯帝询问练兵措饷 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二十六日，崇祯召淮扬道参议郑二阳于平台，询问练兵措饷之事。二阳答：臣初到扬州，各营设有官兵，向来相沿虚冒。臣刻意简练，有一额即求足一兵，随时操练。所以防寇五年，不请一兵一饷。崇祯帝说：此一方事。谓天下如何？二阳答：大抵额设之兵，原有额饷，但求实练堪用，则兵不虚冒。即核兵即足饷。若兵不实练，虽措饷亦无益。崇祯帝问练兵？二阳答：臣所见只以参将、游击以下官操练。崇祯帝问如何操练？二阳答：如参将、游击选千人，总选十百，责按兵法。崇祯帝又问措饷。二阳答：措饷，诸臣条陈已十分详尽，关键是得其人。如鼓铸得人，利归公家，否则在私室。崇祯帝问：近来各地灾伤乏饷，如何处置？二阳答：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费。如扬州有催饷主事，不如由巡按催办。崇祯帝说：催饷主事非为定例。二阳说：臣见残破州县，庆都、栾成，急宜下宽大之诏，收拾人心。崇祯帝纳其言。

程国祥致仕 程国祥(？—1639)，字仲若，上元(今江苏省南京市)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历确山、光山知县，迁南京吏部主事，乞养归。起礼部主事。天启四年(1624)，调吏部主事，其冬被魏忠贤除名。崇祯二年(1629)起稽勋员外郎，迁考功郎中，主外计，时称公慎。不久迁大理寺右丞，历太常卿、南京通政使，就迁工部侍郎，复调户部。九年冬，召拜户部尚书。时度支匮乏，国祥多方区划，帝始眷之。崇祯十一年六月，帝召廷臣七十余亲试之。居数日改国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机务。国祥委蛇其间，自守而已。十二年四月，帝召对，无一言。帝传谕责国祥缄默，大负委任。同月二十一日，致仕。同年卒于家。

夏尚纲论京城浚濠 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京城浚濠，宽五丈，深三丈。给事中夏尚䌹奏陈说：连年胡骑入犯，皆藩篱失守，门庭无恙，若使堑水足拒，则去冬长驱如通州、德州、沧州、济南，其为广川巨津更多，而扬鞭飞渡，如入无人之境。则控扼险要，是在人不在险之明证。今掷此百万于水滨，不如移而用之于岩疆，防御要害，使胡骑不敢入。

论文武诸臣失事罪 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清军回师。此役明失陷城镇六十余处。帝命杨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五月初一日，杨嗣昌奏失事五事：曰守边失机；曰残破城邑；曰失陷藩封；曰失亡主帅；曰拥兵观望。于是蓟镇总监中官郑希诏，分监中官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巡抚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及他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论死。被贬削者为数更众。

张献忠复起于谷城 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张献忠受抚于谷城。献忠在谷城表面上“跪拜有礼节”，实际上却训卒治甲杖，不放兵、不应调、不入见制府，“骄不奉法”。献忠在谷城征粮、征税、扩兵，向文灿“要挟无厌”。谷城知县阮之钿度献忠必反，以告文灿。文灿恶闻其语。之钿乃疏闻于朝，也不能用。崇祯十二年五月初九，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农民军杀谷城知县阮之钿，火焚官署，挥军攻房县。

罗汝才起于房县 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罗汝才等九营降于明。熊文灿分处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四营于郧县；惠登相、王国宁、常德安、杨友贤、王光恩五营于均州，署汝才游击将军，令散其党从征立功。汝才言，不愿署官，也不愿食饷，愿为百姓。农民军不肯释甲，带刀耕耘。崇祯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张献忠复起自谷城，汝才也率四营起于房县。献忠、汝才合兵攻克房县，杀知县郝景春，又连下郧西、保康等地。不久，屯于均州的惠登相五营也反，农民军势重新大振。

加征练饷 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二十三日，明廷因东事愈重，乃决策抽练各镇精兵，复加证“练饷”。辅臣杨嗣昌定议：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辽东、蓟镇，及保定、畿辅、山东、河北各镇兵由各总督、巡抚、总兵分练，东西策应，闻警即至。于是有练饷之征。初增剿饷，期以一年而止。饷尽而乱未平，诏征其半。至是，督饷侍郎请全征。帝虑失信，嗣昌曰，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

尽归有力家，百亩赠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于是剿饷之外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合辽饷、剿饷、练饷共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两，民不聊生，使起义军队伍更加扩大。

《吴中水利全书》进呈 《吴中水利全书》二十八卷，张国维著。系其任巡抚应天时所撰。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初九日进呈。书前绘有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府的水利总图，及各府属州县水种图共五十三幅，以及分别辑录了水源、水名，诏、敕、章、奏和论、议、序、记及歌谣。所辑虽以明代文献为多，也广泛收集了唐宋以来诸名家议论。国维在江南曾深入实际，修建了九里石塘，平望内外塘，长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提浚镇江及江阴漕渠。因而，《吴中水利全书》是研究明代江南地区水利建设的重要资料。

宗室授官 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十二日，授宗室朱谋超中书舍人，由棣俱为知州，统𨭌通判，敏灊、谋堡、华通判、常浅、鼎泾、统𦩍、常涊、俱为知县。

左良玉兵败罗猴山 左良玉(1599—1645)，字昆山，临清人。官辽东军右营都司。崇祯元年(1628)宁远兵变，良玉削职回卫。不久复官，与清军战数有功，被荐为副将。崇祯六年，命良玉为都督佥事，援剿总兵官镇压农民军。逐渐成为明军劲旅之一。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反于谷城。七月十七日，良玉率军追献忠，逾房县八十里，至罗猴山。被张献忠设伏围困。左军远道奔袭，兵乏食，前锋将罗岱被俘，良玉大败奔还，军符印信尽失，弃军资千万余，士卒死者万人。

德王由枢被俘 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德王朱由枢被清兵俘获，遣宦官王朝进、张福禄，都司徐文师上书，自广宁入，参将夏成德奏报朝廷。广东道御史汪承诏言：宜烧焚其书，勿令外传；王朝进等宜编置远方，勿让其浪传敌讯。万一皇上展亲之念笃，宜别遣边人量赍用物，俾申德意。若王不造，失守社稷，远播沙漠，庶几戎狄悔祸，隆礼有加，王宜优游塞外以终天年。朕已抚王嗣，俾缵旧服，俟其成立，当使自将待边以泄王愤。如此，庶彼知朝廷大义，可绝其垂涎，杜其凌侮。报闻。

限制题奏字数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初八日，崇祯帝令限制题奏字数为六百五十字，兵、刑、钱谷事不在此例。

郧阳缺饷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十一日，抚治郧阳右佥都御史王鳌永奏陈：郧阳兵缺饷二月。镇兵新旧一万三千人，马二千匹，岁费二十余万。请酌发盐引，召商支卖，收价资军，须行淮盐旧引，川盐惮于入峡，不如因而通之，则民与法俱便。

杨嗣昌督师 崇祯十二年(1639)秋，明军败于罗猴山。帝闻之大惊，八月二十七日，特旨命嗣昌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九月初一，帝召嗣昌于平台。嗣昌言，臣朝受命夕起行。二日，赐白金百、赏功银四万，银牌千五百等。嗣昌条七条以献，悉准。四日，召见赐宴，越二日，嗣昌陛辞。二十九日，抵襄阳。十月初一日，嗣昌于襄阳大誓三军，进剿农民军。时明军诸将积骄玩，无斗志，嗣昌鞭副将、斩监军佥事、劾逮湖广巡抚方孔炤，整饬军纪。

陈继儒逝世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松江华亭人。幼颖异，长为诸生，年甫二十九岁，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杜门著述。继儒工诗善文，兼能绘事。又博文强识，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较核，又收集琐言掌故，编辑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征请诗文者无虚日。侍郎沈演及御史、给事中诸朝贵，先后论荐，皇帝亦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二十三日卒，年八十二，有《逸民史》、《增补陶朱公致富奇书》、《文苑潇湘》、《游览粹编》、《爽心笑谈》、《晚香堂集》、《陈眉公集》。辑有《宝颜堂秘笈》十七种，保存了大量的小说和掌故资料。并辑《国朝名公诗选》。

清兵攻宁远 崇祯十二年(1639)冬十月，清军再次进攻宁远(今辽宁省兴城)。时宁远守将为都督同知金国凤，统军近万人。清军攻宁远，明将士胆怯，国凤愤，率亲丁数十人出据北山冈与清兵苦战，矢尽力竭，与二子及众亲丁皆战死。

金国凤之死 金国凤(？—1639)宣府(今河北宣化)人。崇祯中，以副总兵守松山。崇祯十二年(1639)二月，清兵攻松山，环城发炮，城池台堞俱摧。城中人只能负门板行走。国凤所统兵不过三千，出城突击败还，乃以木石甃补城坏处，奋力杀敌，使清兵屡登屡却。围城四旬，终不下。国凤以功擢署副都督佥事，宁远团练总兵官。再论功，署都督同知，荫锦衣卫千户。同年十月，清军攻宁远。国凤战死。

杨振之死 杨振(？—1639)，文州卫(今辽宁省义县地区)人。世为本卫指挥使。天启二年(1622)，河东失守，振随父及弟夜行昼伏，渡鸭绿江入皮岛。毛文龙署其父子军职。文龙死，振归袁崇焕，为宁远千总，崇祯二年(1629)入卫，以功进都督佥事。邮马山之战，以游击进参将。久之，擢副总兵。崇祯十二年十月，清兵攻松山，巡抚方一藻议遣兵救援，诸将莫敢应。独振请行，至吕洪山遇伏，一军尽覆。振被执令往松山说降。至城下振与从官李禄告城中人坚守，援兵即日至矣。城中守益坚，振、禄皆死。

霍维华逝世　霍维华(？—1636),东光(今属河北)人。万历四十一年(1631)进士。除金坛知县,征兵科给事中。天启间,维华与魏忠贤同郡交好。不久,外艰归。天启四年(1624)复故官,改刑科给事中。天启五年冬擢太仆少卿。次年擢本寺卿。不久擢兵郡右侍郎、署部事。维华每陈奏,必颂忠贤。天启七年进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维华性险邪,为忠贤谋主。其年十月,维华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崇祯改元,附珰者多罢,而维华自如。时江东督师王之臣免,代者袁崇焕未至,维华谋行边自固。帝可之,给事中颜继祖上疏极言其罪,乃寝前命。崇祯九年(1636)十一月,左都御史唐世济以边才荐霍维华,思宗以维华逆案中人,大怒,下世济狱,论遣戍,维华遂忧愤死。

傅宗龙下狱　傅宗龙(？—1641),字仲纶,昆明(今云南昆明)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除铜梁知县,调巴县,后入为户部主事。久之,授御史。天启元年(1621),以疾归。四年夏,起宗龙巡按贵州兼监军。天启六年诏加太仆少卿,忧归。崇祯三年(1630)起故官,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未几,拜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因小故被夺官。崇祯十年十月,帝令即家起宗龙。崇祯十二年五月,以嗣昌荐,召为兵部尚书。嗣昌督师,兵饷不继,上章劾中枢不任。宗龙也劾嗣昌徒耗敝国家。帝怒宗龙。后以戎视封疆下吏罪,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宗龙狱。赞十四年五月初七日,释狱降为事官,赴督师行营赞理军务。同月二十日又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仍充为事官总理陕西三边军务。于新蔡与李自成战,兵溃而死。谥忠壮。

《景岳全书》纂成　《景岳全书》六十四卷,张介宾于崇祯十二年(1640)辑成。《景岳全书》是一部综合性的医学巨著。分《传忠录》、《脉神章》、《伤寒典》、《杂证谟》。集瘟疫、虐疾、咳嗽、霍乱、吞酸、泄泻、心腹病、头痛、口舌、眼目、耳鼻、声音、咽喉、齿病、遗精、遗尿、黄疸、阳痿、疝气、脱肛、脚气、秘结、虫咬等病七十一种。又有《妇人规》、《小儿规》、《痘疹诠》、《外科钤》、《本草正》、《新方八阵》、《古方八阵》及小儿妇人、痘疹外科方剂等。治疗疾病的基本理论、治疗原则、医方针灸穴位以及历代名家评述,且附有病例,药物三百余种,新方、古方数甚多。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农政全书》刊行　《农政全书》六十卷,徐光启著,崇祯十二年(1639)由陈子龙根据徐光启遗稿整理刊印。《农政全书》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等十二篇。它不但总结并保留了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经验,也吸收发展了当时新技术,如对刚刚传入我国的甘薯,就作了很详细说明加以推广。《农政全收》不但对中国对日本、朝鲜及至西欧也产生巨大影响。

洪承畴奏请军务总于总兵　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初二日,蓟辽总督洪承畴奏陈:宁远城有镇守、监军、巡抚、兵备等官,营伍纷杂,事权掣肘。请命军务听总兵官节制。凡监军、巡抚、巡按、镇守等官同于一城的,亦依此例。崇祯帝允准。

方孔炤下狱　方孔炤,字潜夫,桐城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崇祯十一年(1638)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崇祯十三年正月,其部将杨世恩、罗安邦奉调会合川、沅兵剿围竹山义军。两将率兵深入至香油坪而败,杨嗣昌既以孔炤抚议异于己,又忌其言中,遂因此弹劾孔炤,同月十三日逮下诏狱,子方以智伏阙讼父冤,得减死戍绍兴。

玛瑙山之战　崇祯十三年(1640)二月初七日,总兵官左良玉,总督陕西三边侍郎郑崇俭等大败张献忠于太平县之玛瑙山。当时义军分为三路,西路张献忠据楚蜀界、东路革里眼,南路曹操、过天星等。杨嗣昌驻襄阳,而令左良玉专剿张献忠。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战于枸平关(陕西兴安县西),献忠败。良玉请从汉阳西乡入蜀追之。杨嗣昌令良玉别派偏将追剿,良玉不从。时张献忠移军九滚坪,见玛瑙山险峻,将据之。良玉军至山下,而张献忠已占据山巅,良玉乃分兵三路,约闻鼓而上,鏖战久之,张献忠军败。左良玉兵斩扫地王曹威,白马邓天王等义军首领十六人。张献忠妻妾被擒,张献忠逃入兴、归山中。不久又入兴安、房县境,官军畏惧山险不攻,献忠潜伏密林中,贿山民买盐米,山民成为义军耳目,献忠收得散士,声势复振。

罢各镇内臣　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初七日,崇祯帝下诏罢各镇内臣。告谕道:"各镇内员,察饬已久。兵马、钱粮、器械等项,稍有改观,但战守防援,事权未能尽一。遂将总监、分守等内臣俱撤回京另用,凡边务一切钱粮、兵马、边防、剿御等事,着督、府、镇、道一意肩承。

左懋第疏陈时弊　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十四日,户科给事中左懋第疏陈四弊:民困、兵弱、臣工委顿、国计虚耗等。又请严禁将士剽掠、请散米钱,赈济饥民。崇祯帝采纳其言,诏令上灾七十五州县所旧练三饷并停,中灾六十八州县止征练饷,下灾二十八州县等到秋后征饷,并令清理刑狱。

崇祯帝破格用人　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十五日,崇祯帝告谕吏部臣: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考选屡奉旨举贡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

意。就教贡士并试过岁贡生共二百六十三人,俱着于六部司属、都察院、通政司、太常寺各司属及推知正官通行察缺,依次填补。此系特用,后不为例。

罗汝才攻夔州 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罗汝才自南漳、远安到大宁,大昌参将刘贵等将其军阻于雒巫山。石柱女官秦良玉将军陈于雒门百子溪,罗军不能渡,初三日乃转战夔州(四川奉节),良玉率兵驰救,与游击杨茂选击败罗汝才。

苏州、松江、湖州等府大水 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十三日,苏、松、湖等府的吴江、归安等地昼夜倾盆大雨,水势骤发,霎时汹涌,不分堤岸,屋宇倾倒。而米价腾踊,斗米至银三四钱,富家多闭粜,民食草木根皮俱尽,抛妻子死者相枕。强横之徒三五成群,鼓噪就食,街坊罢市,乡村闭户人情汹汹。

崇祯帝恤民疾苦 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十六日,崇祯帝告谕户部、都察院:近来直省告饥,而畿辅、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又有百姓茹土食菜,并无菜色,且剜肉囊骨,殣以泽量,言之堕泪。或天灾流行,人谋感召,贪婪助旱魃之虐,繁苛鼓冯夷之波。民生其间,勿死何待。近虽屡颁轸恤之诏,充耳不闻。今闻惰媮者玩世不遵,虐恢者又奉行未善,各地方官给发积谷银钱若干?赈济招徕流徙复业若干人?田地荒芜,有无给种买犊,多方开垦?富室乡绅,果否输资发粟,设法鼓劝?蠲停钱粮,曾否榜示通知,俾沾实惠?该抚按官以察吏安民为务,务要减从躬行郡县察勘,即以地方饥徙之有无,察官属之殿最。

姚明恭致仕 姚明恭,生卒不详,字玄卿,号昆斗,湖广蕲水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崇祯七年(1634)专理诰敕。历右庶子、詹事、礼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崇祯十二年五月迁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十月进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崇祯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致仕。

蔡国用逝世 蔡国用(?—1640)字正甫,江西金溪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由中书舍擢御史。历大理寺丞、少卿,天启五年(1625),因忤魏忠贤意,勒令闲住。崇祯元年(1628)起故官,屡迁工部右侍郎,崇祯十一年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升十二年六月,以边功,进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崇祯十一月以叙城守功,进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卒于官,赠太保,谥文恪。国用入阁三载,居位清谨,碌碌无所建树。

薛国观罢官 薛国观(?—1641),字廷宾,一字家相,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莱州推官。天启四年(1624)七月补户科给事中,不久迁兵科右给事中,再迁刑科都给事中。崇祯改元,以依附魏忠贤请终养归。崇祯三年(1630)起改兵科都给事中,改礼科。八年九月升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馆。十年八月由右佥都御史迁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十一年六月进礼部尚书,次年进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为首辅。同年六月二十三日夺职放归。复以贪贿被劾,逮之入京。十四年八月赐死。

辑《武经七书大全》 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二十九日,崇祯帝诏辑《武经七书大全》,命大学士范复粹为总裁,礼部右侍郎黄锦、少詹事李绍贤为副总裁,右赞善胡世安、修撰刘理顺、编修方拱乾等为纂修官,开馆编辑。

甄淑罢官 甄淑(?—1641),湖广黄冈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历任光禄寺卿、大理寺卿、南京工部右侍郎。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迁刑部尚书。崇祯十三年七月初十日以前覆饯尚宾事坐贿罢官。十一月二十六日逮入狱。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死于狱。

罗汝才败于兴山 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十四日,罗汝才与明总兵孙应元等战于兴山之丰邑坪,被官军斩二千三百余级,俘五百余人。罗汝才率其众逸走巫山,与张献忠队伍会合。

毕懋康致仕 毕懋康生卒不详,字孟侯,号东郊,歙县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以中书舍人授御史,巡按陕西,请建宗学,改按山东,擢顺天府丞,以忧去。天启四年(1624)起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因不附魏忠贤,与兄懋良,均落职去国。崇祯初懋康起南京通政使,越二年,拜兵部右侍郎,寻罢,不久,再起南京户部右侍郎,督粮储,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十四日致仕。工古文辞,善画有《西清集》、《管涔集》、《疏草》等。

黄胤思上《海运图》 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十五日,临清副总兵黄胤思上《海运图》。他说:难易不可不审,险易不可不明,省费不可不较。海之险非一,人所共知共畏为成山。成山之上,则有始皇桥、白浪礁。臣昔过此,知山内有曲径可通,山外更有大洋可行。成山虽险,淮沙船乘风直走大洋,转刘公岛至登州,此险易至明。登、莱陆运每石至三两五钱,海运每石二钱七分,天津除漂失外,每石省或二金一金。辽饷三百四十余万石,省四百余万金。此省费至明。因列上九议。

农民军入川 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张献忠西走白羊山与罗汝才会合。此时曹操、过天星欲渡江,为明官兵所阻。张献忠至,与之会合。张献忠虽累败,然气犹盛,立马江边,有不前者,辄斩之,官兵乃

退，张献忠渡江后，屯驻万顷山，此时杨嗣昌才自夷陵朔舟而上。而张献忠势力已盛，连续攻下大昌、开县，北攻剑州，将入汉中。又攻绵州、泸州，至开县。杨嗣昌在重庆，召贺人龙、左良玉来援，皆不至。

杨嗣昌出师入蜀　崇祯十三年(1640)八月，杨嗣昌出师入蜀。其时监军万元吉先入蜀，令蜀将把守巴、巫等险要之地。秦将贺人龙、李国奇、楚将张应元、汪之凤、张奏凯专任追击。应元等与义军战于夔州，营于土地岭，人龙逗留不会师。张献忠得知楚军多为新募之兵，乃率大军攻应元与之凤，应元突围，之凤死于山下。张献忠乃与罗汝才进军观音岩，据险以守。

傅永淳罢官　傅永淳，生卒不详。累官太常寺卿、兵部左侍郎。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迁左都御史。崇祯十三年五月迁吏部尚书。同年九月初四日罢官。

朱继祚罢官　朱继祚，生卒不详。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迁南京礼部尚书。崇祯十三年九月初四日罢官。

明军兵败观音岩　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初六日，明军兵败于观音岩。当时万元吉驻守巫山，邵捷春驻于大昌，互相声援。后捷春用其部将之言，认为大昌上、中、下马渡，水浅地平，难以把守，乃兵分三处，各派三四百人以守，义军突至，先破上马渡。元吉急令诸将汇于潭家岭、七箐坎、乾溪等处，又派张奏凯兵屯净壁。捷春派罗洪政、沈应龙二将助之。而张献忠已攻破净壁，趋大昌，遂攻陷大昌。

李自成入河南　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李自成从郧、均进入河南。起初李自成被围于鱼腹山中(四川奉节县东)，时义军中人多出降于官军，李自成欲自尽，为养子双喜劝止。自成部下刘宗敏杀己妻对李自成说，要誓死从君。军中壮士闻之，也多杀妻子誓从自成。李自成乃尽焚辎重，轻骑入河南。

张令之死　张令，永宁宣抚司人。天启元年(1621)，奢崇明反，张令为总兵，从攻成都。崇明败归永宁，张令乃降于明廷，以军功至副总兵，镇川北。令年七十余，马上用五石弩，中必洞胸，军中号"神弩将"，与李自成、张献忠多有战斗。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张献忠攻陷大昌，进逼开县，张令扼守竹菌坪。献忠军大至，张令力战，中流矢死，其军遂败。张令为蜀中名将，既败没，诸军皆夺气。

邵捷春下狱　邵捷春，字肇复，侯官(治今福州市)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崇祯十二年(1639)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崇祯十三年九月，张献忠驻开县，捷春率兵守梁山。义军因梁山河深不能渡，自开县西走达州。捷春退保緜州，把守涪江。义军乃攻剑州、保宁，进入汉中。后在梓潼与应元诸军战，蜀将曹志耀等力战，将义军打退。张一州、张载福战死，涪江师溃。义军占领绵州。杨嗣昌闻蜀兵溃败，斩邵仲光，逮邵捷春，十五日下狱论死。

熊文灿弃市　熊文灿(？—1640)，明贵州永宁卫(今四川叙永)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历黄州推官、礼部主事、郎中、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等官。崇祯元年(1628)官福建左布政使，寻拜右佥都御史兼福建巡抚。五年二月，擢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崇祯十年闰四月初四日，又拜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督军围剿农民军。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降而复举义旗。与罗汝才相联合。声势大振。崇祯帝闻之大惊失色，下令削文灿官，戴罪视事。七月，张献忠在罗猴山大败左良玉。帝大怒，命杨嗣昌来代文灿。嗣昌至军，帝即遣使逮文灿下狱，坐大辟。崇祯十三年十月初六日弃市。

杨嗣昌进军重庆　崇祯十三年(1640)十一月，杨嗣昌率军进重庆。监军万元吉擢前总兵猛如虎为正总统，张应元为副，率军趋绵州，分派诸将把守要害之处，元吉自小路至射洪，在蓬溪处以待义军。义军分驻安岳界，侦知官军至，乃退至内江，如虎追之，元吉、应元则在安岳城下扼守。

张献忠克泸州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张献忠军自緜州转战至汉州，守将方国安逃，遂接连攻下什邡、緜竹、安县、德阳、金堂，又从水道进犯简州、资阳。杨嗣昌由顺庆到果州，令诸将合击义军，皆退缩。张献忠于初五日攻占泸州。泸州三面是江，止立石站一路可行。万元吉原计划伏兵于险要处;将义军击走入永川，但因找不到向导，及至立石时，义军已渡南溪走。

李信投归李自成　李信为杞县举人，故尚书精白之子。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投归李自成。李信因父列名逆案，欲洗刷其罪，曾出米千石救济饥民，民称之为"李公子"。时红娘子反，掳信。信逃归，自首于官府，官囚之。红娘子与饥民共劫狱，杀知县而返，并挟李信投归李自成。李自成改信名曰岩。李自成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李岩编有"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并提出"均田免粮"等口号。使义军军纪肃然。义军迅速发展壮大。

牛金星投归李自成　牛金星为卢氏举人，以磨勘被斥，私自入李自成军作主谋，后潜归，事发后坐罪当斩。已而，从轻发落。遂于崇祯十三年(1640)

十二月投归李自成。

宋献策投归李自成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宋献策由牛金星所荐,投归李自成。宋献策善卜,上谶给李自成,上书"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喜。

增天下关税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下诏增天下关税。崇祯初年,关税每两增一钱,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八关,增五万两。不久,又增二钱。户部尚书毕自严,议"增南京宣课司税额一万为三万",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以"宣课所收落地税无几,请税芜湖以抵增数",自严乃上疏议"税芜湖三万,而宣课仍增一万"。后乃以度支日绌,增加关税二十万两,而商人百姓日益穷困。

袁时中、李际遇起义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开州袁时中聚众数万,破开州。时寿州有起义者名袁老山。袁时中遂自号小袁营以别之。破永宁,杀知县武大烈,攻偃师,知县徐日泰被俘死。再陷宜阳,通判训导、知县等死。是月,河南登封李际遇,以岁饥起义,旬日间聚数万众。

蒲州府大饥 崇祯十三年(1640)大饥,草木皆被吃光,官府於城门外掘坑以埋饿死者,埋且满,饥甚无食的人争到坑内割食其肉,至有父子夫妇相食者。

山东沂州蝗灾 崇祯十三年(1640),蝗遍野盈尺,百树无叶,赤地千里,斗麦二千。民掘草根剥树皮,父子相食,骸骨纵横,婴儿捐弃满道,人多自竖草标求售,辗转沟壑者无算。明年春疫疠继起,死亡过半。

官军败于开县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十五日,官军追张献忠至开县。杨嗣昌自率军队到云阳,其余诸将至开县黄陵城。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迎战。刘士杰率军深入战阵,所向披靡。张献忠登高望见无秦人旗帜,而左良玉军无斗志。乃选壮士潜行于沟谷中,乘高大呼驰下。左良玉兵先溃,士杰及游击郭开、如虎子先捷皆战死,如虎突围出。

李自成克洛阳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初三日,李自成攻下永宁,杀万安王采𨨗,连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阳,众至数十万,以所得赈济饥民,以至所至咸归,声势益盛。参政王荫昌率军至洛阳,总兵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各率兵至。福王出千金募勇士出击李自成。自成军稍退,半夜,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自成军,相笑语,缚荫昌,烧城楼,开北门,二十五日自成军攻入洛阳城。福王朱常洵逃出城,藏于迎恩寺,自成军寻迹捕获。并将其血混鹿肉以食,曰"福禄酒"。并杀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等。

李自成克汝州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攻克汝州。汝州(治今河南临汝)为义军往来之要道,山中又有土寇。知州钱祚征,招募壮士千人,夜半攻入其巢,土寇大败。遂令民千家立一大寨自保,土寇乃降。后李自成军攻汝州,祚征登城拒守,身中箭。月余,大风起,炮炸楼焚,城乃陷。

李自成攻开封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初三日李自成攻开封。城坚厚五丈。义军以洞车掩护士兵挖穴,巡按高名衡婴城固守。周王恭枵拿出库金百万两,招募壮士杀敌,并做米饭以饷军。开封副将陈永福背城而战,杀义军二千,李仙风督诸将游击高谦驰救,又杀义军七百人。自成军遂退走密县。开封解严。

张献忠克襄阳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初五日,张献忠攻克襄阳城。当时,杨嗣昌以襄阳为军府,饷金,甲器各数十万皆聚于城内。每门设副将防守。张献忠出川后,一日夜驰三百里,道上杀杨嗣昌使者,取其军符,以二十八骑进入襄阳城。夜半火起,居民望见火,以为满城皆贼,夺门出城,城溃。张献忠执襄王翊铭于南城楼曰:"吾欲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襄王朱翊铭与贵阳王朱常法皆被杀。

张献忠克光州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二十日,张献忠攻陷光州。张献忠攻破襄阳东下,与罗汝才兵入河南,攻商城。当时知县盛以恒,移任开封同知,将行。张献忠军至,乃与乡官杨所修等拒守。时天下雨雪,守城士兵冻馁不能战,以恒率众射杀义军十七人。后以恒受伤,被抓而死。

杨嗣昌自杀 杨嗣昌(1588—1641),字文弱,一字子微,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除杭州府教授,迁南京国子监博士,累进户部主事、郎中。天启初,引疾归。崇祯元年(1628)起河南副使,加右参政,移霸州。崇祯四年移山海关饬兵备,崇祯五年四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诸处。崇祯七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崇祯八年十月丁忧归。崇祯九年秋起兵部尚书。崇祯十一年六月,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十二月边警,卢象升败死,嗣昌镌级视事。崇祯十二年清兵陷济南落职冠带视事,不久官复原职。九月督师。乃议大举围剿农民起义军,建四正六隅之策,谓之"十面之网",欲委重任于熊文灿。而文灿实不知兵,惟一意主抚,罗汝才、张献忠均暂降。未几,张献忠、罗汝才又反,崇祯帝逮熊文灿下狱,特旨命嗣昌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嗣昌虽有才,然好自用,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坐失机会。督师二年,迄无建树。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嗣昌惊悸,上疏请死。遂不食,于同年三月初一日服毒自杀,年五十四,赠太子太

保。有《野客青鞋》、《杨文弱先生集》等。

张献忠克随州 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张献忠攻随州。知州徐世淳知道张献忠军必至,集士民誓以死守。张献忠攻城,徐世淳住于南城谯楼,日夜把守,援兵未至。守城月余,援尽力穷。张献忠乃佯攻南城,潜兵自北城攻入。世淳勒马巷战,死于军,城遂破。

郑崇俭入狱 郑崇俭(? —1641),字大章,山西宁乡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授河南府推官。屡迁至宁夏巡抚。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二十三日以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崇祯十三年张献忠反,督师杨嗣昌檄秦军入蜀,崇俭率兵直抵玛瑙山进击。五月三日,威名颇振。返回关中。十月,嗣昌劾其撤兵太早,致贼猖獗,削籍。十一月奉命夺官视事。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逮入狱,请以纵兵擅还失误军律。五月二十二日弃市。

袁继咸入狱 袁继咸,生卒不详,字季通,号临侯,江西宜春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授行人,擢监察卿史,谪南京行人司副。历主客员外郎、山西提学按察佥事,未行。调湖广参议,分守武昌,又兼佥事分守武昌、黄州,后移淮扬。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迁右佥都御史巡抚郧阳。崇祯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襄阳陷,被逮入狱。戍贵州。崇祯十五年起原官总理河北屯政,改总督江西、湖广、应天、安庆,驻九江,加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南都伪太子起事,左良玉反,兵至九江,继咸诣其舟,正之以理。良玉约不破城,驻军候旨。良玉死,继咸劝良玉子梦庚旋师,梦庚不听。已而梦庚与继咸旧部郝效忠降清,执继咸北去,不屈而死。

丁启睿督师 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十九日,朝廷以总督三边侍郎丁启睿为兵部尚书、督师,节制陕西、河南、四川、湖广、江北诸军。启睿本不知兵,受重任不知所为。受命出潼关,将由承天赴荆州,湖广巡按汪承诏将船藏起,启睿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邓州,州人闭门骂。过内乡,同样不得入。军队只得行荒山,吃马肉。启睿闻自成军围开封,有军队七十万,不敢去。张献忠在光山、固始间,兵少,乃与诸将相谋。诏檄左良玉,破张献忠军于麻城。开封告急,则曰:“我方有事于献忠,不及也。”

范复粹致仕 范复粹,生卒年不详,字清六,号玉波,山东黄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开封府推官。崇祯元年(1628)召为御史,巡按江西,禁有司害民,奏请削减邮传之不便。崇祯九年九月迁大理右丞,十年九月擢大理右少卿。崇祯十一年六月擢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崇祯十二年十月累进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崇祯十三年薛国观罢,复粹为首辅。辑《武经七书大全》、上《百胜录》。洛阳失陷,复粹等引罪乞罢,不允。崇祯召见廷臣,语及福王,泣下。复粹曰:“此乃天数。”崇祯曰:“虽气数,亦赖人事挽回。”复粹无话可说。崇祯十四年二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五月初六日致仕。顺治初卒于家。

山东李青山起义 崇祯十四年(1641)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一带,大旱,蝗虫起。当时山东等省连岁告灾,给事中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李青山遂率领民众起义,阻断漕运,明廷大震。

薛国观之死 薛国观(? —1641),字宾廷,一字家相。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莱州推官。天启四年(1624)擢户部给事中,寻迁兵科右给事中,七年再迁刑科都给事中,崇祯初以挠察典为清议所不容,以终养去。天启三年(1630)秋,起兵科都给事中,遭母忧,服阕,起礼科都给事中,迁太常少卿,崇祯九年擢左佥都御史,崇祯十年八月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崇祯十一年六月进礼部尚书,其冬,首辅刘宇亮出督师,国观与杨嗣昌联手倾宇亮,明年二月代其位。国观素恶行人吴昌时,及考选,昌时担心国观抑己,因其门人以求见。国观伪与交欢,拟第一,当得吏科。及命下,乃得礼部主事。昌时大恨,与所善东厂理刑吴道正谋,发国观受贿事。崇祯十三年六月,国观被夺职。十月,崇祯以国观行贿有据,遣使逮国观。崇祯十四年七月逮入都,令待命於外邸。国观以为不能死,监刑者至门。八月初八日犹在鼾睡,宣诏毕,顿首不能出声,但言“吴昌时杀我”,乃就缢。

梅之焕逝世 梅之焕(? —1641)字彬父,麻城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授庶吉士,居七年,历吏科给事中,广东副使,山东学政。天启元年(1620)以通政参议召迁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寻丁内外艰家居。当时,魏、客乱政,杨涟首劾魏忠贤,涟被拷杀,之焕因同情杨涟而被诬征赃。崇祯元年(1628)起故官,巡抚甘肃,因得罪首辅温体仁,落职。至崇祯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卒。

洪承畴被围松山 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洪承畴为援锦州率马科、吴三桂等八大将,兵十三万驻松山。清皇太极闻之,於八月二十日亲率大军陈于松山杏山之间,横截大路。洪承畴惧,欲战则力不支,欲守而送粮之路已被截断。于是马科、吴三桂等相续逃走,诸镇兵皆溃。洪承畴所率兵十三万,先后失亡

五万三千余人。锦州之围益急。而松山外援亦绝。

杨国柱败死 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祖大寿已被清军困于锦州,七月总督洪承畴率军往救。二十八日宣府总兵杨国柱先至松山,陷于清军的埋伏中。清军四面呼降,国柱太息曰:"此吾兄子昔年殉难处也,吾独为降将军乎!"奋力格杀,八月初二日中箭而死。

陈羽白奏陈筹牧之策 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二十六日,巡按陕西御史陈羽白奏陈筹牧八策:一、有地无军。合七监牧丁额一万六千一百余,今不上三千,若行原籍勾捕,将三五年未得终事。乞将招抚余民,能自买骡马一匹,许即承牧地三顷,给照永业。二、有军无马。审有力者买骡马一,来岁课驹,稍有者两军买马一,候课驹分养;无力者两军共买马一,官贴其三分之一。三、有马无三驹,系查核不严。请限时核查。四、群内混养,请不许混养骟马。五、种马无资,请稍宽其限。六、换卖例死。七、京例年例,宜从宽解。八、策应。根据马匹,两地相互策应,不限一地。崇祯帝下旨:种马无资关恩饷。京例年例关解额,俱不得轻议。其余各项,允准其议。羽白又奏:臣阅安定监旧报马五百五十一匹,今存四百二十匹;广宁监旧马六百四十八匹,今存二百八十一匹;武安监旧马四十八匹,今二十二匹;清平监旧马二百七十四匹,今存十一匹;万安监旧马四百四十一匹,今存四匹;黑水监旧马七百五十二匹,今存七匹;开城监旧马一千九百三十匹,今存二十八匹。四监之马不上五千匹。询其故,不是寇掠,就是饿毙;不是监城不保,就是牧军并尽。察清平两经寇陷,监丞游之云饥死。余官乞分别严处。

苏州府旱蝗 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至八月,吴江一带,大旱不雨,飞蝗蔽天。官令捕之,日益甚。米价每石银四两,流丐满道,多枕藉死。民间以糟糠腐渣为珍味,或食树屑榆皮。各处设厂施粥,吃者日数千万。

张献忠败于信阳 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总兵左良玉于信阳击败张献忠。张献忠自玛瑙山之败后,屡破数郡,颇为得意。遂再攻信阳。被左良玉击败,降将数万。张献忠受伤,乘夜东奔。左良玉急追,会天下大雨,江溢路绝,张献忠逃走。将至英山又被左良玉副将王允成所击,所从者止余数十骑。张献忠遂投于李自成,李自成欲以其为部属,张献忠不从,在罗汝才的帮助下逃走。

傅宗龙之死 傅宗龙(?—1641),字仲纶,昆明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由知县迁监察御史。天启初应诏募兵,月余得精兵五千。安邦彦反,自请进剿,未得允准。崇祯中历贵州巡按、四川巡抚,保定总督,俱著劳徒。崇祯十二年(1639)为兵部尚书。后弹劾杨嗣昌徒耗国家,不能报效,以气凌廷臣等,崇祯怒,将其下狱。崇祯十四年春,杨嗣昌死,尚书陈新甲荐其才,乃释之出狱,五月初六日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丁启睿,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专征李自成。同年九月,傅宗龙率军驻于新蔡,与保定总督杨文岳会师讨李自成,将趋项城,李自成则伏精兵于林中起而击之,官军大败。后至陈州,宗龙挖堑筑垒以拒敌,守八日,矢石俱尽,夜半突围而走,九月十九日,被俘而死。赠太子太傅,谥忠壮。

刘国能之死 崇祯十四年(1641)九月二十五日,李自成、罗汝才攻打叶县,副将刘国能守叶县。刘国能初为义军,与李自成、罗汝才结为兄弟,后归顺明官军,李自成等深为仇恨。力攻县城,城陷,国能被俘,遂被杀。

李自成克南阳 崇祯十四年(1641)十一月初四日,李自成攻南阳(河南南阳市)。时总兵猛如虎,从杨嗣昌下荆州,移驻南阳。猛如虎据城而守,杀敌数千,后食尽援绝,城被攻破,如虎与参议艾毓初、知县姚运熙俱死。又副总兵刘光祚自项城来,唐王聿镆邀与共守,城陷,亦死之。

许以麦代漕米 崇祯十四年(1641)十二月初二日,许潜山、宿迁、太湖、怀安、桐城、望江等各输麦代漕米,准十之六。不久,又许淮安、扬州输麦抵漕粟。

李自成再围开封 崇祯十四年(1641)十二月二十七日,李自成乘胜再攻开封,连续攻陷其所属许州、禹州、陈留、通许、尉氏、洧川、鄢陵、临颍、长葛、新郑、汜水等十余城。自成攻城,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竭力抵抗,而永福射自成中目,自成遂撤围而去。

崇祯帝敕内臣勿干外政 崇祯十四年(1641)十二月,崇祯帝敕内臣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等毋干外政。并戒谕廷臣:朝廷分职,原是宫府不同。臣子守官,岂容暗奸作弊。况析圭儋爵之义,宜无私交,而防微杜渐之闲,尤先近侍。无奈世风日降,士乞遂靡。虽奉公守法者固多,而行险侥幸者亦有。妩媚交欢,势权媚就,为阿大夫之借誉,左右扫门,有路可通,无径而走,窥探泄漏,视为固然。以后内外大小诸臣,如再蹈前辙,宪典具在,朕不敢私。

张溥逝世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太仓人,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崇祯四年(1631)进士。崇祯六年(1633)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曰复社。交游日广,自谓以嗣东林,执政

嫉恨，朝廷严旨切责。崇祯十四年卒，年四十。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春秋三书》、《历代史论》、《汶魏六朝百三十家集》，及《七录斋诗文集》等。

徐宏祖逝世　徐宏祖(1586—1641)，号霞客，江阴人。不应科举。万历三十五年(1607)始游历生涯，登悬崖，涉深涧，收集地方文献、图志，集采岩石、矿物，考察地理、地质，于篝火旁撰写日记心得。后撰《徐霞客游记》，集中记述其游历间的考察成果，揭示西南石灰岩溶蚀地貌特征。系世界对此类地貌进行详尽考察之第一人。崇祯十四年卒，年五十六。

荷兰占据台湾　荷兰自天启三年(1623)起已占据台湾南之安平，次年即于此地修筑“热兰遮”、“赤嵌城”二要塞，渐次侵占台湾南部。天启六年又占据鸡笼(即基隆)。崇祯十四年(1641)荷兰与西班牙相互为争夺台湾发生战争，荷兰战胜西班牙，遂以胜者之师占据台湾。

杨仁愿奏陈东厂　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二十一日，监察御史杨仁愿奏陈东厂之害：陛下敕谕申交结内臣之律。因稽高皇帝初无所谓东厂缉事衙门。不法之事止于明律而无阴诘。今臣待罪南城，所见词讼，多为假番妄称东厂，则魂魄俱摇，况其真者！此由积重之势所致。如比较事件，则番役即悬价以买事件。甚至诱人奸盗，卖与番役，则诱者获利；挟仇收以首告，而证以恶棍，则挟者逞志。厂臣岂不三令五申禁之。然比较事件，欲其不买事件，吹吹薪止沸，必不得之数。揆之皇上泣罪解网之心，岂不痛伤！伏望先宽东厂事件，而后比较可缓。比较缓而后买事件与卖事件亦息。如臣子获罪，皇上敕抚按以槛车送诸阙下，未为不可。若一遣缇骑，有赀者家门破散；无赀者地方官敛债。卫臣非不三令五申禁之，然彼自为长途计，又安能已。如使其罪可赎，则留彼余财以赎罪，则妻子衣食赖之；自非巨恶，圣明亦岂忍籍没！得旨：谕东厂只缉谋逆乱伦等，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不必概捕。

汪乔年之死　汪乔年(？—1642)，字岁星，遂安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间历青州知府，以怡行卓异迁登莱兵备副使崇祯十四年(1641)任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当时，秦中精锐之师，尽没于项城之战。诏擢乔年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乔年汇集散亡士卒得兵三万，令贺人龙等分将之，攻义军老砦於襄阳。李自成来救，贺人龙等不战而走，汪乔年乃收步卒二千，入城拒守。崇祯十五年二月十七日，义军攻城五昼夜，城陷，汪乔年被俘不屈而死。

清军克松山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十八日，清军攻克松山。松山被清军围困已久，崇祯命顺天巡抚杨绳武督师救洪承畴，又派兵部侍郎范志完，皆敛兵不敢出战。副将焦埏赴援，刚出山海关即败。此时全城食尽。副将夏成德乃遣子至清军做人质，与清军相约攻城日期，己为内应。清军至期攻之，城破。巡抚邱民仰及总兵官曹变蛟、王廷臣等皆死。洪承畴、祖大乐被俘。后二人皆降清。

祖大寿降清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十八日，松山被清军攻下，宁远劲旅尽丧。锦州城内粮亦尽，人相食。祖大寿战守计穷，又闻松山已失，三月初十日，遂率军出降清。清军遂克锦州。

魏照乘致仕　魏照乘，生卒不详，字仲现，号瑶海，河南滑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由知县迁至吏科都给事中，后以忤魏忠贤令罢官回籍，崇祯初复官。崇祯元年(1628)复官，迁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馆。不久，迁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崇祯十年任工部右侍郎。崇祯十一年四月改兵部左侍郎，协理戎政。崇祯十二年五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崇祯十四年二月进太子少傅、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崇祯十五年三月初八日致仕。

洪承畴降清　洪承畴，字孰，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转浙江提学佥事，进山东参议。天启四年(1624)，进江西按察副使。天启七年，进陕西右参政。崇祯二年(1629)升按察使。崇祯三年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崇祯四年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摄五省右都御史加兵部尚书。崇祯十年加太子太保。崇祯十二年改总督蓟辽保定，崇祯十四年钦命督师，七月督师援锦州。崇祯十五年春松山城陷。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邱民养，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副总兵江翥、饶熏等俱被俘死。同年三月十八日，裨将、夏成德缚总督尚书洪承畴降于清。有《洪承畴揭帖》。

孙应元之死　孙应元为京师总兵官。其人骁勇善战，崇祯十二年(1639)杨嗣昌督师襄阳，令其戍荆门。崇祯十三年七月，与副将王允成等破罗汝才於丰邑坪。时称荆楚第一功。崇祯十五年三月，击敌于罗山，孤军无援遂战死。

张献忠克舒城　崇祯十五年(1642)三月，张献忠攻克舒城。舒城无县令，参将孔廷训同编修胡守恒率民共守。后廷训降，乃教敌以车穴城，城穿数处，守恒督民补塞之。献忠射书令其投降，守恒烧其书于城上。三日后，城陷，守恒被杀而死。

谢升削籍　谢升(？—1645)，字伊晋，号青墩，山东德州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授三河知县，改遵化、雄县、青县知县。召为礼部主事。天启

时擢吏部郎中。崇祯元年(1628)任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馆。崇祯二年四月进太仆寺卿,崇祯三年二月升吏部右侍郎。崇祯四年四月擢南京吏部尚书。崇祯七年调至京师任吏部尚书。崇祯十年二月因复奏铨政积弊,被斥罢归。崇祯十二年八月起复原官。崇祯十三年四月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八月进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崇祯十五年四月初七日被劾削籍。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降清,初命为建极殿大学士原衔管吏部尚书事,八月到任,改命与诸大学士共理机务。顺治二年(1645)正月卒,清赠太傅,谥清义,入《二臣传》。

崇祯帝告谕科道官言事 崇祯十五年(1643)四月十二日,崇祯帝告谕科道官:朝廷设立言官以为耳目,乐为谠论,俾助政机。若缄默不言与言而无当,皆非所望。甚有以言为名,挟私逞臆,循声附和,争胜把持,其失职更甚于不言。近时事多艰,亟资忠益,兼收并纳朕意甚殷,乃言官不能仰体,或荐举太滥;或纠谪过苛;或已经处分,追论纷纭;或事宜慎重,哆口腾播,掣任事之肘,启侥倖之端,抗威福之权,失献替之义。于此朕求言图治之本怀甚为不符。昨面传谕,并着颁示宪纲。今特再谕,如乖违职守,定加处治。

明清议和 清皇太极出于内外形势需要,屡次遣使与明廷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奏报崇祯帝,崇祯帝以松山之败,便令新甲密图。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马绍愉受命前往。六月,马绍愉回京,清致书崇祯帝约以平等相交及岁币、疆界事,将议和条款密件送新甲。新甲赴朝,未收藏密件。家僮误以为塘报,付之抄传。于是科道交攻,道路哗然。崇祯帝为推卸责任,下新甲于狱。新甲不认罪,反自诩其功,崇祯帝遂斩新甲。议和事亦自此作罢。

清兵克塔山 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二十九日,清兵攻克塔山。其时,兵部郎中马绍愉驻塔山等候朝廷议和之命,遣人谕清兵勿攻,清兵不听,遂攻克塔山城。城中兵民自焚,无一人降清。

陈龙正奏陈军策 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五日,中书舍人陈龙正奏陈:剿寇不在兵多,期于简练;歼渠非专将勇,藉于善谋。今中原大忧,特设重臣,收拾河北,且屯且练。此非正为河北,正以应援河南,不非独为河南。安则京省俱安,震则京省俱震。若漕运,若河防,种种相关。必方略素优,乃可授任。

贺人龙之死 贺人龙,米脂人。初以守备隶属于延绥巡抚洪承畴手下,崇祯十五年(1642),从总督汪乔年出关击义军,至襄城不战而走。崇祯怒,将杀之。后恐其生变,乃夺职,戴罪视事。孙传庭至陕,崇祯密授传庭诛人龙。五月初一日,传庭乃与巡抚张尔忠谋,以召人龙议事,数其罪而斩之。

张献忠克庐州 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十九日,张献忠攻克庐州。张献忠攻克舒城后,从六安至庐州。知府郑履祥、通判赵兴基,经历郑元绶等人分门把守。时提学御史徐之垣到庐州会试士子。张献忠派人伪装成儒生,带儒冠以入。半夜纵火,城中大乱,城遂破。

山西安邑地震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初三日夜半平陆地大震。震坏城垣民居,,山崖崩裂。初四日,山西安邑(今运城东北)地震,从西北起,声如雷,官民庐舍俱倒。人有压死者。蒲州、荣河人多压死。山西省临晋、垣曲、解州、沁源、阳城、壶关、夏县、垣曲;陕西省潼关卫;河南省河内、武陟、渑池、陕州、阌乡等州县,均受到波及。这次地震地跨三省数十州县,连震不已,初九日又震,十三日又震,以至数十日方止。震中烈度(I_0)Ⅷ,震级(M)为六级。

贺逢圣致仕 贺逢圣(1587—1643),字克繇,号对扬,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逢圣以殿试第二授翰林编修。天启间迁洗马。以忤魏忠贤削籍。崇祯元年(1628)起迁南京国子监祭酒,历詹事,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崇祯九年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十月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十年三月进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崇祯十一年三月,择太子讲官,至发摈黄道周不预,杨廷麟等上章推让道周。逢圣与至发谋,疏称郑鄤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谓不如,何以为太子讲官。疏出,时论哗然,十五日,逢圣乃去职致仕。崇祯十四年二月再召入阁,九月到任。次年六月初十日再次致仕。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入武昌,逢圣投湖死,年五十七。福王时追赠太师,谥文忠。

朱大启逝世 朱大启(1565—1642),字君舆,秀水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南昌推官,进吏部验封主事,改考功文选,历考功员外员。天启中,改文选郎中。因拒绝顾秉谦、冯铨等人的私嘱,又被予告。崇祯初,起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进太常寺卿,催饷江西,久之拜大理寺卿,转刑部右侍郎,寻致仕。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二十二日逝世,年七十八岁。赠刑部尚书。

张至发逝世 张至发(?—1642),字圣鹄,号宪松,淄川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由知县擢御史,历大理寺丞,顺天府丞、光禄寺卿,刑部右侍郎。崇祯八年(1635)七月,改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崇祯九年六月,进礼部尚书,十一月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崇祯十年主礼闱。三月加太子太傅,

六月为内阁首辅，崇祯十一年四月，致仕。崇祯十二年六月，存问。崇祯十四年二月再召，上四疏辞，崇祯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卒。赠少保。

李日宣等下狱　李日宣，生卒不详，字晦伯，号缉敬，江西吉水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御史。崇祯十三年(1640)升为吏部尚书。崇祯十五年五月，日宣因会推阁臣不合崇祯之意，为崇祯指为徇情滥举，同年六月二十四日，命锦衣官将李日宣等六人下狱，后戍边。久之释还卒。

马士英总督庐凤军务　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张献忠攻陷庐州，并陷无为、庐江，演水师于巢湖。孙应元既没，中官卢九德以总兵黄得功、刘良佐之兵击义军于峡山，再战败绩。得功退屯定远。江南大震。时凤督高斗光以失五城而被治罪，礼部侍郎王锡衮推荐马士英知兵，周延儒赞同，于是于六月起用马士英总督庐凤军务。

吴履中疏论崇祯帝之失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监察御史吴履中疏论崇祯帝朱由检之失有二：一为大奸之罪状未彰而身为受过。二为图治之纲领未挈而用志多分。何以言之？临御之初，天下犹未大坏，特用温体仁，托严正之义，行媢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酿成祸源。此为体仁之罪；专任杨嗣昌，恃款抚，加练饷，致民怨天怒，旱蝗盗贼，结成大乱之势。此杨嗣昌之罪。皇上信任二人，二人恃其信任，售其奸欺，不知如何钟爱如何匪躬以自结于皇上，迨深信不疑，然后得为所欲为，无不如意。有执以罪彼，彼不任受。有人说皇上自为之，皇上亦说彼实未曾专擅。乃益深信不疑。是皇上为二奸所误而反代二奸受过。诚暴其罪于天下，使知为二奸所误，未尝自有缺失，亦是收人心之大机。至于图治自有纲领，圣人抚世酬物，因时制宜，如今日内治缺而后戎马生，民生促而后寇盗起，向者虏逞于外而政治愈棼，寇生于内而赋敛愈急，是以生乱。今急宜反其所为，省躬励翼，蠲租解网。乱源已塞，急宜求治兵之人，真能御虏者任边陲，真能剿寇者办内地。先了此两大事，而治功可次第而举。

明军溃于朱仙镇　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初一日，开封告急，崇祯令左良玉赴援。左良玉及杨文岳、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四镇兵驻朱仙镇。左良玉见敌势盛，乃拔营而逃，襄阳诸军皆溃。左良玉军逃至半路又遇李自成伏军，左良玉军大乱，弃马骡万匹，监军佥事任栋死于阵，左良玉则逃至襄阳。寻以朱仙镇之败总督杨文岳免职，总督丁启睿逮下狱。

傅永淳奏陈屯田　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十三日，户部尚书傅永淳奏陈屯田八事，一为军屯。军买官屯，民占军地，奕叶相传，不必究问。但就册报征解，即以折色改征本色。二为民屯。凡荒闲可耕之地，出示召募军民商贾，愿捐资开垦，即给帖为永业。三为兵屯。有事用兵以战，无事用兵以耕，仍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种。四为商屯，依垦田多寡颁给职衔。五为水屯，召习水利之南人，度其原隰，使地无旷土，水无遗利，三年后起科。六为陆屯，择不毛之地，树以桑枣，随其所便，永不起科。七为罪废开屯。八为设官，特遣大臣专理屯务，设屯官分理，宽以吏议，迟以岁月，使其便宜行事，崇祯帝从其议。

崇祯帝严恤典　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十七日，崇祯帝告谕吏部：近来有司不修守备，贼至辄陷，原与冲锋阵亡及持久力诎之士不同。若概赠荫，何以奖励忠劳。今后宜详加分别。除异常义烈，恤典取自上裁。其失事损身，有司六七品赠监司五品，其五品赠监司四品，方简官赠京秩。著为令。

《温疫论》纂成　《温疫论》上下卷，吴有性撰於崇祯十五年(1642)秋。吴有性(1582—1652)，字又可，江苏吴县人。《温疫论》是吴有性继承历代医学理论和实地考察成果的我国第一部瘟疫病的专著。详细记录了白喉、天花、麻风、梅毒、肺结核、流行性脑炎等多种传染病，上卷对病原进行了细致记述，下卷对骚疫、疫痢、妇人时疫，小儿时疫等各种病的传染特点和治疗原则。有着很高研究和实用价值。

安庆兵变　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十三日安庆兵变。其初，副总兵廖应登领三千人，汪正国、李自春各领千人，到处骚扰，黎民重怨。巡抚徐世荫新到任；又值刑科给事中光时亨疏伦廖应登宜正军法，邸报先到；于是兵遂发难，杀都指挥徐良宪。世荫急从南京赶到安庆，徙应登兵太湖，正国兵桐城，乱乃定。

丁启睿下狱　丁启睿，生卒不详，永城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崇祯初，历山东右参政。崇祯九年(1636)，平宁夏兵变，迁陕西右布政使，分守关南，从孙传庭镇压义军。崇祯十一年拜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崇祯十三年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明年加兵部尚书，督湖广、河南、四川、山西及江南、北诸军，仍兼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后李自成克洛阳、围开封，有众七十万，启睿惧不敢援；傅宗龙败殁於项城，启睿不能救。李自成再围开封，启睿避而不战，崇祯十五年七月，朱仙镇会战，官军大败，启睿逃奔汝宁，义军渡河，追四百里，官军丧马七千，将士数万，启睿敕书、印、剑俱失。同年八月十八日，被逮下狱，后释归。福王事黄缘充为事官，事败，脱归而卒。

陈新甲之死　陈新甲(？—1642)，四川长寿

人，万历举人，授定州知州。崇祯元年(1628)入为刑部员外郎，进郎中，迁宁前兵备佥事，寻进副使。崇祯七年九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九年五月，内艰归。崇祯十一年六月，诏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夺情任事。崇祯十三年正月召为兵部尚书。崇祯十四年三月，福、襄二王死，杨嗣昌自裁，新甲举丁启睿代，议者尤其失人。然傅宗龙、孙传庭之起用，亦新甲之力。会锦州被围未解，承畴又困松山，帝深以为忧，新甲不能救。言者劾新甲寡谋误国。松、锦失守，新甲乞罢不许。其初新甲与清暗中议和，崇祯默许，但责其保密。后议和事泄于外廷，言路大哗。崇祯恼怒，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崇祯益怒。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遂下新甲狱。九月二十二日斩于市。

李自成决河灌开封 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二十四日开封城被围半年，食尽。巡抚高名衡等仍固守。高名衡等议决朱家寨口河灌李自成军。自成知之。移营高地，亦驱难民数万决黄河，河水自北门入贯东南门出，水声奔腾如雷。城中百万户，皆被淹。惟周王妃、世子及巡按以下，不及二万人得以逃脱。李自成军也被淹死万余人，遂拔营而走。开封佳丽甲中州，城初围时百万户，后饥疫死者十二三，至是尽没于水。

张献忠败于潜山 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二十四日，凤阳总兵黄得功驻军定远，张献忠率兵攻入桐城，挟持营将廖应登至城下诱降。得功与总兵刘良佐合击张献忠于鲍家岭，张献忠败，逃至潜山，得功追至潜山，擒斩义军闯世王、马武、三鹞子、王兴国。

孙传庭兵败郏县 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二十四日，开封失陷后，孙传庭率军入河南，遂趋南阳，在南阳与李自成军战。自成军兵败东走，遂追至郏县。自成军弃甲仗军资于道，官军忙于拾取，军乱。自成军乃乘机攻击，官军大败。

援汴总兵刘超反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初一日，援汴总兵刘超据永城反。刘超初为四川遵义总兵，曾跟从川贵督抚讨伐义军，后被夺职，数次求官不得。李自成围开封时，刘超请招降土寇协助官军击李自成，遂任其为保定总兵，令其率兵赴援开封。超惧不敢行。同县人御史魏景琦家居见其与土寇相来往，而不与李自成战，诬其为通贼。超怒，杀景琦一家而反。巡抚王汉扬言招抚刘超，而暗伏兵城下，独与诸将数骑入城，反被超所杀。明朝闻之，诏令凤督马士英、太监卢九德、总兵陈永福讨之。连战不克，乃筑长围困之。

清兵入塞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初六日，清兵入蓟州，连破济南、山东州县。当时关内外并建二督，又设二督於昌平、保定。又有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星罗棋布，无地不防，而事权反不一。警报至，急征诸镇入援，清兵已破蓟州，分道南向。河间以南多失守。至山东，连破兖州等府。共攻克八十八城。鲁王朱以派自杀。乐陵、阳信、东原等诸王皆死。至次年四月才予北归，俘三十六万九千余人，获金一万二千二百余两，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余两，牛马等五十五万余头，珍宝缎匹八万余。

李自成克汝宁 崇祯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十四日李自成率诸将，连营五百里，进攻汝宁。总兵虎大威中弹而死，城被攻破。前总督侍郎杨文岳、兵备佥事王世琮、知府付汝为等俱死。时河南郡邑残破，朝廷不再设官，百姓多结寨自保。各寨或降义军，成受朝命，又互相吞并。

刘宗周奏对 崇祯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崇祯召廷臣于中左门，问用督抚之宜，刘宗周对曰："使贪、使诈，此最误事。为督抚者，须先极廉"。又问御敌之事，御史杨若桥举西人汤若望习火器，宗周曰："唐、宋以前并无火器，自有火器，辄依为劲，误专在此"。崇祯不悦，命其退。宗周又进，请释姜埰、熊开元，他说："厂卫不可轻信，是朝廷有私刑"。崇祯怒，而宗周不屈。

李自成克襄阳 崇祯十五(1642)年十二月初四日，李自成攻陷襄阳。左良玉自朱仙镇战败后，退驻襄阳。李自成乘胜攻良玉，至白马渡。左良玉移营于南岸，守浅洲，自成军十万争渡，良玉乃拔营而逃，走武昌。自成军渡过白马渡，遂长驱进至襄阳，襄阳官吏都已逃走，自成军遂趋宜城。

清兵克兖州 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初八日，清军攻兖州(山东兖州市)。兖州知府邓藩锡劝鲁王以派散积储以鼓士气，城犹可存，否则，大事一去，悔之晚矣。以派不听。清军到，各将分门死守，力不支，城破。鲁王自尽，乐陵、阳信等郡王都死。藩锡等战死。

刘宗周致仕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晚更号克念子。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天启初为礼部主事。历右通政，以劾魏忠贤、客氏而削籍。崇祯初起迁顺天府尹，请除诏狱、免新饷，崇祯帝不纳遂以疾致仕。再召授工部侍郎。累官至右都御史，崇祯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以论救给事中姜埰、熊开元忤旨，于十二月十三日削籍归。福王时，起复原官，痛陈时政，劾马士英等，又争阮大铖不可用，皆不被采纳，又乞归里。杭州失守，绝

食二十三日而卒，年六十八。门人私谥正义，清谥忠介。宗周学以诚意为主，慎独无功，清修笃行。学者称念台先生。又曾筑证人书院，讲学蕺山，又称蕺山先生。有《周易古文钞》、《圣学宗要》、《学言》、《人谱》、《人谱类记》、《论语学案》、《道统录》、《阳明传信录》、《证人社约言》及文集等。皆原本性命，阐明圣学，有关世道人心。

《徐霞客游记》纂成 《徐霞客游记》十卷，徐弘祖著。该书於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十五日由季梦良整理完竣。卷一记述了游浙江的天台山、雁岩山，江南的白岳山、黄山，江西的庐山、福建的九鲤湖、河南的嵩山、陕西的华山、湖广的太和山、山西的五台山等；卷二记述了浙江、湖广、江南；卷三、卷四记述了粤西；卷五至卷九，记述了游滇；卷十为诗文。用日记体，热情讴歌了所到过的名川大山，描绘了各种秀丽的风光；并详尽的观察行履所至的地貌、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尤其是对西南边区的石灰岩形成的倒悬洞顶的钟乳石到耸列洞底的石笋，以及天生桥、落水洞、石林石柱等奇峰异洞，危崖怪石等现象，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徐霞客游记》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及岩溶地貌极为重要的资料。

太仓州灾荒 崇祯十五年(1642)春，大旱，斗米钱一百一十文，民有食子者。遗惠祠及隆福寺集饥民千余，日死无算，税粮急，漕米许三分之一改麦折价，每石一两五钱。冬米每石四两，饿死载道，河中浮尸滚滚。城门巷口抛弃小儿百十为群，或有人引去，或视其僵死者，尽弃之丛冢，或聚而焚之，或掘坑埋之，盖不胜数。幸不死者，剥榆树皮为饼，糠皮为粥，一望村落，树皮剥尽，是数十年没有过的饥荒。

湖州府归安蝗灾 崇祯十五年(1642)归安大旱，飞蝗蔽天而下，所集之处，禾苗与芦苇立尽，民削树皮木屑杂糠秕食之，或掘山中白泥为食，名曰观音粉。含山左侧地名良村，强徒数百啸聚作乱，幸亏不日被扑灭，可是，瘟疫继至，但官府不但不蠲免钱粮，反而严刑催科。而苏州府吴县米价贵至每石银三两三钱，麦石二两三钱。民益艰食，流离窜徙，老稚抛弃道傍，城乡房舍半空倾倒，死尸枕藉。

李自成攻陷承天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初二日，李自成攻陷承天(今湖北钟祥)，总兵钱中选战死，巡抚宋一鹤自杀。自成改承天为扬武州，崇王由樻改襄阳伯，邵陵王在铖改枣阳伯，保宁王纪炉改宜阳伯，肃宁王术埁改顺义伯。钦天监博士杨永裕降自成，称天文、地理、礼乐、兵法俱该洽，请发显陵。倏声起山谷若雷霆而止。

李自成建立政权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初二日，李自成攻陷承天(今湖北钟祥)后，臣僚劝自成即皇帝位，牛金星以为时机尚不成熟，而自成心动。于是自成号"奉天倡义大元帅"，罗汝才号"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谋以荆襄为根本，改襄阳为襄京，改承天府为扬武州。自成兄子李过、妻弟高一功迭居左右，亲信用事。以田见秀、刘宗敏为权将军，李岩、贺锦、刘希尧为制将军，张鼐、党守素等为威武将军，谷可成、任维荣等为果毅将军，凡五营二十二将。又置上相、左辅、右弼。其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喻上猷为吏政府侍郎，徐邱为郎中，顾君恩为从事；萧应坤为户政府侍郎，郭附龙为从事；杨永裕为礼政府侍郎；王家柱为兵政府郎中，傅朝升为从事；鄧岩忠为刑政府郎中。孟长庚为荆州防御使，张虞机为荆州府尹，陈荩为扬武防御使，姚锡胤为安陆府尹，李之纲为襄阳防御使，朱铨为襄阳府尹，吴大雁为南阳防御使，刘苏为南阳府尹，黄阁为信阳防御史，金有章为汝宁防御使，邓琏为汝宁府尹，刘懋先为均平府尹。另任命一批州县官，地方政权亦随之建立。

李自成分兵据守防地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建立政权之后，即分兵据守防地，其初，自成攻城掠地多不守，及渡汉江，长驱入荆，见无一兵，遂有据志。先据荆襄，次及承天、德安，渐及汝南，分设卫兵：通达卫制将军任荣光以兵六千守荆州，分二千守荆州；通达卫左威武将军兰养成以步兵八百守夷陵；通达卫右威武将军牛万才以骑兵六百、帅标都尉张礼以水兵六百，分守夷陵；帅标威武将军王文耀以兵六千守澧州；扬武卫果毅将军白旺以兵三千守安陆；都尉董云林以兵六百守荆门；帅标威武将军谢应龙以兵三千守汉川衣马家隔；左卫都尉马世泰以兵六百守显陵；襄阳卫左威武将军高一功、右威武将军冯雄各领兵二千；汝宁卫威武将军韩华美以兵八百守信阳；均平之果毅将军周凤梧以兵二千守禹州、郑州。

徐石麒致仕 徐石麒(1578—1645)，初名文治，字宝摩，号虞求，嘉兴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初入官即忤魏忠贤削籍。崇祯起迁南京礼部主事，累官至刑部右侍郎。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迁刑部尚书。崇祯十六年正月十四日，坐姜埰、熊开元拟罪轻，忤崇祯帝，落职闲住。福王时起南京左都御史，至京改任吏部尚书，为权奸所扼，加太子太保致仕。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二十六日自缢而死，年六十八。谥忠襄。有《可经堂集》。

张献忠克蕲州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二十五日张献忠攻打蕲州。荆王府将校郝承忠，暗通张献

忠,为内应导其军攻城。知州许文岐开炮,打死许多义军。夜半,下大雪,张献忠攻破西门入城,文岐与指挥岳璧被俘死。

王汉战死 王汉(?—1643),字子房,山东掖县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初知河内,迁御史,奉命督理援兵,巡按河南。十五年擢河南巡抚。崇祯十六年二月,王汉入永城招抚叛兵,入城中炮死。赠兵部尚书。

罗汝才之死 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初八日李自成杀罗汝才。初,李自成善攻,罗汝才善战,两人相须若左右手。李自成攻下宛、叶、梁、宋后,兵强众附,始有专制之心,忌罗汝才,乃召汝才亲信贺一龙,缚而杀之。清晨,又率二十骑将罗汝才斩于帐中,悉兼其众。

张献忠克黄州 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二十五日,张献忠自蕲州率军攻入黄州,同知朱统锄御之,死于阵。黄州居民多弃家而逃。黄冈知县孙自一、县丞吴文燮、卫指挥郭以重俱死。克黄州周围各县。

左良玉军作乱 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左良玉军作乱。良玉军多降兵叛卒,桀悍不驯。裨将王允成为乱首,拥兵十余万,自九江而下,破建德,劫池阳,泊舟于三山、荻港,尽夺民船以载兵。都御史李邦华草檄告良玉,并用九江库银十五万两饷之,而身入其军慰劳,左良玉军稍安。

吴甡奏陈集兵措饷 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十四,大学士吴甡奏陈集兵措饷。他说:今日集兵措饷,必巩固江南,乃可恢复江北,则武昌九江其要冲。贼精兵不下二、三十万,我兵非十万不能争锋。孙传庭败余,收拾残卒无几,须俟虏退后,边镇援兵调赴秦中,听传庭选调剿寇。兵力为少厚。臣宜道金陵,急趋九江、武昌,相机进止,且可调集兵饷,接济江北。黔督提并秦、蜀、晋、豫、应、皖、江淮各抚镇兵扼险。崇祯帝从其议,遂议设标兵二万。

倪元璐奏陈时政 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兵部右侍郎倪元璐奏陈时政。他说:今之本谋存乎主术。力行仁义,提振纪纲,爱惜人才,崇尚气节,定心志。一议论:信诏令,慎刑赏,其下则竭忠毕力,惟敌是求,如此何患大功不成,太平无日!臣沿途凡遇兵将,辄称敌实难杀,而遇难民,皆云敌实可图,盖兵将见形,难民见情。凡称铁骑精兵縣亘数十里,冲突飘忽所向无前者,形也;兵将见而震之,真敌无几,辽人过多,又敌人归营,散涣疏略,夜即淫酣,弢弓熟寐,又中怯畏死,稍失利即合营痛哭。又辽人每陵西虏,心志不咸者,此其情也,难民入敌中而知之。夫攻形用力,攻情用谋,今行间诸臣,乌有能用谋。一为掩伏侦间之事者,寡不可御众,弱不可御强。虽零捷时有而大获无闻,防守有余而剿击不足,非不用力,势使然也。至于我兵情形,惟见单弱。臣至淮上,此天下重镇,乃抚院标兵不满三千,每日兵饷不过五分。抚臣史可法,最称忠勇,当敌攻淮北,亦仅画河而守,遏敌南渡。济南、德州土兵皆不满千,山东标兵亦仅三千,其饷皆同淮上。所见应天、浙江、江西援兵,皆无马甲。饷有不足四分的。总兵唐通,今之名将,统兵不满三千,曾对臣言:亦不任杀敌。竭天下之财以养兵,而兵饥如此,宜乎兵多,乃饷薄而兵少又如此。臣诚不知其故。今敌分东、西二路,东路谍至青县大城,西路谍从定州移方顺桥稍西。臣度其必俟两帜相望,西路从保定突冲良、涿,转掠过东,合营出口。宜及敌未合,尽集各路兵并攻东路。勿击首尾,避其锋悍,制奇设伏,直捣中坚。凡敌辎重难民,率居中坚,猝击冲之,难民必乱,势成破竹。东路既溃,则两路自不敢东,势不得不趋固、龙二关,罣于险阻,于是合山西、宣大、保定三路重兵,遮追夹击,亦可得志。如此庶成大创,去不复来。今敌分兵亦与俱分,恐敌合兵不得复合。敌势并力奋死,即遂翻然枕席上过,孰复有谁何者乎!臣度辽人报功,以夺回难民牲口,张皇露布,此于九牛之一毛何损,急须传饬。方今御寇机宜,在于足财安民。以臣愚见,督抚行军,必假利柄,一切屯铸鹾榷之务,悉听便宜。所称满用满钱,胜气自出。昔宋边将家属皆食于县官,市租榷税,悉捐予之。凡将皆有黄金享士,牛酒犒师。终宋之世,名将如云。职此之故,驭将之法,必使难贵易富,贵极必骄,富极必勇。伏候圣裁。

汪伟奏陈当今急务 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翰林院检讨奏陈当今急务:一为布置之法。留都城周回一百二十里,竟一日之足不能遍,集十万之众不能周。是以策留都者谓无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贼自北而来,则淮为之防;贼自上而下,则九江为之防:故御淮即所以御江。而守九江即所以守金陵。盖九江当江汉之冲,倘荆襄之贼,因上流之势,乘风水之便,突如破竹,无所碍阻。往代之事,如王濬之楼船、韩擒虎之飞渡、伯颜之不战而入,皆可为寒心。考之地形:武昌,譬之大门;九江,譬之阶除;太平,譬之堂奥。宜设重臣,驻节武昌。上为图荆襄修复显陵之本,下为扼蕲黄、接九江、巩壮孝陵之势。至于九江宜建督抚,如淮上之制,太平、采石,宜命南京侍郎。建牙于此,作声援而巩堑垒。若文武操臣,宜驻师新江口,以专提防,备于策应。江北浦口,江面颇狭,一苇可航,宜以侍郎一人守之。仍命巡江御史防江防之

所不及。辑陆路之暗通者，此上江之布置也。若城中之守，惟在联合人心，保无内溃。大司马名为赞画，与百姓尊而不亲，府尹府丞，所宜重其权，久其任，以联百万士民之心，内增无形之金汤而分佐司马操江之责任。尤可异者，南中兵部与操江，事不相涉，操江欲用兵而无人，兵部宿重兵而无用，岂成一体并济之谊。臣以为操臣与兵部，军中之事，宜呼吸相应，无以城之内，江之上，功罪不相及，遂置不关。此城内之布置。一为用人之法。又留都最重清议，清议所归，虽处下僚，处草野，而名家巨室，想望丰采，为之奔走而不可得。今操督之臣及京兆，非久任地方，威望素著，人心向往，旦夕受事者，未可胜此而愉快。至于兵则大小水陆四营，神机、巡游二营，未尝乏人。督辅得人，则群才辐辏，况有废弃之将可按籍而起，山林之材可侧席而访乎。此用人之法。钱粮正解尚且亏额，况欲加设抚将，计将安出?臣按南京营兵，旧称十万有余。今大教场存者只六千三百，小教场存兵九千一百，新江口五千八百，总不过三万。而徒手寄操者居十分之三，老稚疲癃者进居十分之七。所恃者只水陆标三营有四千八百，而近亦非其旧。乃兵亏而饷不減，宜依旧额补足，或于各卫之官舍余丁，抽其精壮，补成全伍。此辈以土著之人，旧有旧额之粮，略加鼓舞，壁垒一新。江上督抚，分而领之，自可得防守之助。江守以船为急，察新江口船旧额四百余，今存百十只；水营兵船原数满百，今盖寥寥。察得船只皆有旧额钱粮，一一请出，补足原数。而新设之汛地，尤宜多造船只，以备中流之击。或用有不足，暂借盐课若干；或食有不足，暂截漕艘若干。此亦设处之一法，系便而易行之事。防守既备，务使扁舟不得渡江，孝陵即可安堵，是守武昌，守九江，即所以守孝陵。孝陵既安，然后显陵可规进取，况三吴、两淮、两浙钱粮数百万，都门待以为命者，地形又在金陵之下，一水可通，所系何如其重，而皆视武昌上流以为安危，则其图之可不早而言之可不详。

周延儒自请督师　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初四日，清兵自山东还，将至京城。大学士吴甡方奉命驱流寇，延儒不得已，遂自请督师。崇祯喜。及清兵至怀柔，赵光抃合唐通、白广恩等八镇兵，与清兵战于螺山，皆败。延儒见清兵已还，乃上报，言清军已退，请下兵部议将吏功罪，遂归京师。

徐标入京奏对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初七日，崇祯帝召巡抚保定右佥都御史徐标入京奏对。徐标奏陈：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崇祯帝欷歔泣下。徐标又说：须严边防。天下以边疆为门户，门户固则堂奥安，宜先时修备。与其重治于失事之后而无益，不如严毖于无事之日而有备。又说：修内治全在守令。守令贤则政自简、刑自清、盗自息、民自安。崇祯帝说：诸臣不实心任事以至此，皆朕之罪。徐标说：车战垦田。臣所谓垦者，与屯田不同，只就纳粮之田招民开种，民赋渐复额，国课自完。崇祯帝善其言。

傅淑训除名　傅淑训，生卒不详。历任顺天尹、通政使，户部右侍郎总直省粮饷。崇祯十四年(1641)十二月迁户部尚书理部事。崇祯十六年五月十一日除名。

张国维致仕　张国维(1594—1645)，字九一，号玉笥，浙江东阳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崇祯七年(1634)由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安庆等十府。崇祯十三年改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崇祯十四年夏改兵部右侍郎兼督淮安、徐州、临清、通州四镇。崇祯十五年八月擢兵部尚书理部事。崇祯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罢官。同年七月逮下狱。崇祯十七年正月又以兵部尚书总理浙直粮饷。五月改南京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再进少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督师江上。不久还守东阳。弘光元年(1645)以势不可支，赴水死。年五十二。谥忠敏。有《吴中水利书》、《张忠敏公集》。

郑三俊致仕　郑三俊，生卒不详，字用章，池州建德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元氏知县。累迁南京礼部郎中、归德知府、福建提学副使。家居七年，起故官，督浙江粮储。天启初召为光禄少卿，改太常，擢左佥都御史。四年正月迁左副都御史，因劾忠贤，去职。崇祯元年起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居七年，就移吏部。八年正月，京察，考绩入都，留为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有盗穴工部垣，命按主者罪，三俊拟轻典。帝怒，夺其官，初十日，下狱。朝臣疏救，乃许配赎。崇祯十五年正月复官，七月改吏部尚书。崇祯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罢。明亡后十余年卒。

周延儒致仕　周延儒(1572—1643)，号玉绳，号挹斋，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天启中进左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祯元年(1628)三月召为礼部右侍郎，崇祯二年三月文华殿召对称旨，十二月特旨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次年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为内阁首辅，十一月以修《实录》，加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崇祯六年六月致仕，崇祯十四年二月复入阁理事。崇祯十六年四月清兵掠

山东，自请督师，五月进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延儒师驻通州不敢战，被劾而于五月二十六日致仕，十二月初五日逮入京师赐死。年七十一。

吴甡致仕 吴甡（1589—?），字鹿友，号峕愚，晚号柴庵，兴化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邵武知县，改繁江。天启二年（1622）迁监察御史，以忤魏忠贤削籍。崇祯即位复其官。崇祯七年（1634）九月迁右佥都御史提督雁门等官，十月巡抚山西，不久以疾归里。崇祯十年二月起迁兵部左侍郎，久不至，令落职闲住。崇祯十三年复故官，次年巡视京营戎政。崇祯十五年六月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崇祯十六年三月兼兵部尚书督师。五月加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同月二十六日致仕，十一月戍金齿卫。次年行至南康，闻李自成入京师。不久，福王即位南京，赦还，复旧秩。久之卒于家。

张献忠武昌立国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初一日，张献忠陷汉阳，武昌大震。时武昌城中空虚。三十日张献忠攻陷武昌及旁近属邑后，乃于武昌立国。设五府六部，铸西王之宝。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宫，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下令发楚邸金，赈济饥民。蕲黄等二十一州全部归附张献忠。

立购杀李自成张献忠 崇祯十六年（1643）六月十五日，明廷立赏格：购李自成万金，爵通侯；购张献忠五千金，官极品。仍世袭锦衣卫指挥使，余各有差。

熊明遇致仕 熊明遇，生卒不详，字良孺，江西进贤人。万历二十九年（1610）进士。由长兴知县擢给事中，多所论劾、疏陈时弊，言极危切。坐东林党事，再谪再起。累官兵部尚书，终南京兵部尚书。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二十日罢。有《文直行书》。

皇太极逝世 皇太极（1592—1643），努尔哈赤第八子、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继位称汗，改明年为天聪元年。先后稳定内部，出掠城池，统一女真、蒙古各部，占据朝鲜。创建大清，制定各种政治制度。对明和战并举，势力不断扩大。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卒，在位十八年。庙号太宗。子福临即位，多尔衮、济尔哈朗辅政。

诏制新钞 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二十三日，作新钞。户部尚书倪元璐上言：内发钞式四文，命臣详议，钞法岁有五千万之入，筹国长计。主事蒋臣上八事：一为速颁榜文，十七年三月制钞，秋冬间行，约行钞五千贯，可蠲赋五百缗；二为详真界法，岁行五十万，五岁为界，一界之后，以旧易新；三为制作宜工，御前颁背水研，质厚文清，民间难仿，约费五厘一张；四为倒换宜信，每钞纳银九钱七分，通行输官，俱准银一两换钱四文；五为推行宜审，有司于出入抑勒或私取金银，计赃定罪，尽徙其家于边，屯田自赎；六为积储宜裕，岁入五十万，量留其一于郡县积谷；七为早开铸局，颁钞法郎宜颁钱法；八为设专官，钱法以部侍郎督理宝源局。又有专官钞法，亦宜增设。十一月间，又出南京各监局废铜铸钱。

张献忠克岳州、永州 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初五日，张献忠陷岳州（湖南岳阳）。承天巡抚王扬基，闻张献忠将至，率军千人由岳州至长沙，后为推官蔡道宪所请，乃还岳州，及献忠入蒲圻，扬基又逃。湖广巡抚王聚奎，惧敌，徙长沙。张献忠至岳州，沅抚李乾德、总兵孔希贵与之战于城陵矶，战败。张献忠又於二十四日破长沙，二十八日破衡州。吉王、惠王、桂王俱奔永州，巡按刘熙祚命中军护三王入广西，身入永州守城，九月十九日，城陷被杀。

周应期奏陈宽役 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总理京东、山海、永平、天津、宣大屯务右副都御史周应期奏陈宽役。他说：各道所报，有一邑荒六百五十四百顷，有通邑不满千顷。详询其故，苦积逋，苦杂差，而杂差中如驿马、俵马、芝麻、绵花绒等尤苦。富人倾赀，贫人逋逃，即日募垦种何益。皇上痛念残地，特免钱粮二年，则内库芝麻、花绒等皆免。与其发帑而劝耕，不如使民自耕为长策。与其避役而招集，不如先宽其役为至恩。

李自成克潼关 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初三日，李自成进攻潼关。时孙传庭退保潼关。自成军攻潼关，白广恩力战。高杰因宝丰之败，广恩先走不救，乃拥军不顾。广恩战败。自成军破潼关。广恩奔至固原，高杰逃至延安。孙传庭登城固守，自成军从山后绕至城前而战，城陷，孙传庭战死。

孙传庭战死 孙传庭（1593—1643），字百雅，一字白谷，山西振武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永城知县，以才调商丘。天启初，擢吏部主事，迁郎中，请告归，家居久不出。崇祯八年（1635）秋，起复郎中，超迁顺天府丞。崇祯九年三月代甘学阔为陕西巡抚，围剿农民军。传庭与农民军鏖战数年，因于杨嗣昌等不和，被斥为民，下巡抚核查，长系待决。崇祯十五年正月，起兵部右侍郎，奉命援开封。不久代汪乔年为陕西总督，大集诸将，斩援剿总兵官贺人龙，威震三边，然其转战河南，亦有"柿园之败"。及崇祯十六年五月，改称督师加兵部尚书。十月初三日，传庭遂战死，年五十一。谥忠靖。有《鉴劳录》、《白谷集》。

李自成克延安、榆林 崇祯十六年（1643）十

一月初四日，李自成攻克延安，延安副总兵解文英、县丞姚启崇死。李自成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县，清涧曰天波府。既而，二十九日，李自成又攻克榆林。此时榆林无主帅，总兵王定从孙传庭出关，大败而归，见自成军来，乃率部逃走，众人乃推尤世威为主帅。世威与自成军苦战七昼夜，城破。

李自成克西安 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军自商、华逼进西安。巡抚冯师孔率军守城。主城守者王根子，与自成军通，射书于城下，开东门迎自成军。十二日，城陷。李自成以秦王存枢为权将军，永寿王存桑为制将军。布政史陆之祺、里居吏部郎中宋企郊、提学佥事鞏焴等俱降。李自成改西安曰长安，称西京。发动民从修长安城，开驰道。并亲赴教场校射，明将白广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陈永福等皆降。

李自成征赋 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二十日，李自成改西安府曰长安，禁乡民短后衣，明年粮每石征一两三钱，今冬每石折草六千斤，输长安。各县遣骡三百，征粟千石，大其斗，榜掠巨室助饷。

王应熊致仕 王应熊(？—1647)，字非熊，号春石，四川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后司起居注。天启五年(1625)迁洗马。历任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崇祯六年三月进詹事充《实录》副总裁，丁忧归。崇祯三年(1630)七月召为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崇祯五年改左侍郎。崇祯六年十一月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次年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八年九月被劾归。崇祯十六年四月召入朝，十月二十八日请致仕归。崇祯十七年八月召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总督四川、贵州、湖广军务，开府遵义。顺治四年(1647)十二月卒于毕节。

林汝翥致仕 林汝翥，生卒不详。历右庶子兼侍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充经筵讲官、南京礼部右侍郎、礼左侍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崇祯十年(1637)十二月改理礼部事。崇祯十五年八月加太子少保，十二月加太子太保。崇祯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致仕归里。

冯元飚致仕 冯元飚(？—1645)，字尔弢，浙江慈溪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澄阳知县，改揭阳。崇祯中迁户科给事中，有直声，多智数。历礼科右给事中、刑科左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太常寺少卿、南京太仆寺、通政使、兵部左右侍郎。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迁兵部尚书，十月二十八日罢官。弘光元年(1645)卒。

李自成取士任官 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十四日，李自成遣试郡县诸生，上等任六政府从事，次任守令，又次任佐貳。

范志完伏诛 范志完(？—1643)，虞城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授永平推官。谪湖广布政司检校，擢宁国推官，历官分巡官内佥事。崇祯十四年冬，超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其座主周延儒当国，遂拜志完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十五年正月晋左侍郎，督师出关，总督辽东、宁远诸军。六月易衔钦命督师，总督蓟、辽、昌、通等处军务，节制登、津抚镇，往来三方策应。不久又令志完兼制关内，移驻关门。上疏请仍设蓟督，逾月始以赵光忭充任。而此时清兵已入墙子岭，克蓟州而南下。兵部弹劾其疏防，廷臣言其贪懦。崇祯以敌兵未退，令其戴罪立功。然而志完无谋略，不敢一战，所在州县皆覆没。兵所到剽虏。至德州，佥事雷缜祚弹劾。崇祯十六年，清兵攻下海州等地，既而北归。志完观望，终不敢战。事定，议罪六月十七日遂下志完狱，十一月二十三日伏诛。

赵光忭伏诛 赵光忭(？—1643)，字彦清，江西德化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崇祯中历兵部郎中，擢密云巡抚，以发监视中官邓希诏奸谋，坐遣戍广东。后起迁兵部右侍郎，遂督蓟辽、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兵败伏诛。

李自成克宁夏、庆阳 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李自成攻克西安后，据西安，分兵四出。宁夏镇兵迎战，杀自成军数千，自成军退。平凉闻自成军至，韩王遂奔庆阳，官吏皆逃。自成军至平凉城下，不战而克。李自成军复攻宁夏，总兵官官抚民以城降。自成军乃进逼庆阳。参议殷复兴集士兵守城久之，力不支，城破战死。

张献忠克建昌、抚州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张献忠攻克建昌，初七日又攻陷抚州。张献忠攻克吉安、建昌后，广东、南韶各属城官兵皆逃。副使王孙兰请救不应，连城守将先据城叛，后愤而自尽。兵部侍郎吕大器，代侯恂为总督，无兵不能救援。左良玉与吕大器不合，亦不援。抚州遂克。

李自成克平阳、甘州 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李自成派遣前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二十一日，攻陷平阳，杀西河王等三百余人，平阳总兵陈尚智降。于是山西州县先后溃，或望风请降，秦、晋之间皆被义军所占有。自成军进逼甘州。巡抚佥都御史林日瑞，闻李自成军将至，急结西羌军，严兵以待，而自率副将郭天吉等扼守诸河沿岸。时逢冬季，自成军过河，直抵甘州城下。乘夜攻城，林日瑞等死，二十六日

遂克其城。

李自成驰檄郡县 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驰檄山西郡县说: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自古帝王兴废,兆于民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关西而席卷三秦。安官抚民,设将防边,大业已定。只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丝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许尔绅民缚献,不惟倍赏,且保各处生灵。如官兵共抗,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

东阳诸生许都起事 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二十四日,东阳诸生许都起事。许都,原左都御史许弘纲之孙。有声庠序,任侠喜交游。知县姚孙棐贪虐,借名备乱,横派各户输金,坐许都万金。许都,实中产,勉输数百,自诣告竭。孙棐大怒,摘许都所刊社稿名氏谓造逆反,治以酷刑。时输金者盈庭, 然不平,有姚生执孙棐于座,笞打。群拥许都为主起事。巡按御史左光先闻变,调兵行剿。官兵所至屠掠。东阳兰豁人各保乡寨拒敌,官兵大败。绍兴推官陈子龙谓许都不当反,遣诸生蒋若来赍书往谕。

清　　朝

（1644 年至 1911 年）

顺治嗣位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病死。随即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皇亲贵族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太宗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太宗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是帝位的主要竞争者。太宗长兄、礼亲王代善和两黄旗大臣索尼等力主立豪格为帝,豪格却表示辞让,这就给坚决反对他的多尔衮兄弟及其亲信制造了机会。但在多尔衮亲信力劝其为帝时,太宗的亲信将领佩剑而前,坚决表示以死拥立太宗子为帝。这种剑拔弩张之势,使多尔衮感到自己的力量与争夺帝位的对手相比,并不占有优势,于是提出立太宗第九子、不满六岁的福临为帝,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声称待到福临年长之后即归政。这一折衷方案被诸王贝勒所接受,从而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分裂。福临于顺治元年(1644)入关后,改元顺治。

多尔衮摄政 多尔衮任摄政王后,削弱了诸王预政的权力,并使另一摄政王济尔哈朗退居己下,又清除了主要政敌豪格,实际上获得了皇帝的尊荣的权力,掌握了清廷一切大权。定都北京后,多尔衮为了统一全国,又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为崇祯帝发丧,网罗汉族士大夫、官僚、地主,对降官一再加官进爵,提倡尊孔读经,开科取士,终于吸引了大批北方官僚地主来降,在清军占领区域内迅速建立起统治机构;军事上,他把攻击锋芒首先指向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然后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向南方各省进军。到顺治七年(1650)底多尔衮去世时,南方各省的战事虽有反复,但大半个中国都在清廷囊括之中。他在摄政期间,还实行了一些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如圈地、投充,给汉族人民带来了灾难,引起了他们激烈反抗。

由于多尔衮"代天摄政",赏罚拟于朝廷,其爵位也越来越尊崇。顺治元年(1644)十月,顺治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礼部根据御史赵开心的疏奏,改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顺治帝又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随着多尔衮的位尊权重,他更加独断专行,网罗党羽,排斥异己。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十三日,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坠马受伤,十二月初九日病逝于喀喇城,终年仅三十九岁。二十五日,顺治帝追尊他为"诚敬义皇帝",定庙号为成宗。但是,多尔衮死后仅两月,顺治八年(1651)二月十五日,他的近侍、议政大臣苏克萨哈等首告多尔衮"谋篡大位",于是清廷"并案会审",定其罪名为"阴谋篡逆",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毁其陵墓,暴尸示众,王府也同时被废,其亲信多人先后被处死或贬革。

范文程献策摄政王 范文程,沈阳人,清太宗时授内秘书院大学士。他在清政权取代明朝的关键时刻,于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日上书摄政王多尔衮,提出了有关清进占中原的建议。书中明确把农民军看作清朝的首要敌人,指出清军进取中原的成败,决定于同农民军角逐的胜负,而不在击败明廷。范文程还献策说,第一要任贤抚众;第二要选拔德誉素著者为官,使其更好地为清廷出谋划策;第三,清军南下的目标应该是直趋燕京,如果情况不允许,也应在关内择一坚城,作为日后进兵的据点。这一建议虽未能使多尔衮立即作出反映,但从后来的事实看,的确对多尔衮下定入关决心、实行毫不妥协的积极进取的战略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

满达海要顺治习古今兴废之道 顺治元年(1644)正月十八日,清都察院承政满达海上疏摄政王多尔衮,建议顺治帝及时学习古今兴废之道。顺治帝年幼时本是个聪颖过人的孩子,每当见其父皇太极读书时就高喊自己也要读书。他嗜观书史,一目数行,往往能很快领略书中宏旨。然而,他即位后,多尔衮却漠不关心和有意放纵,引起朝廷大臣的不满。满达海首先上疏,要求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朝夕为顺治帝讲解古今兴废之道。但多尔衮借口顺治帝处于幼冲时期,推说迟一二年后再议。一年之后,受到多尔衮重用的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又上疏强调说:远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现在皇上虽很熟悉满书,但要懂得帝王修身治人之道,还必须学习汉文,熟读"六经"。为此,他们要求挑选满汉词臣,为顺治帝朝夕进讲。但是,多尔衮为保持自己大权独揽的地位,对他们的建议也根本不予理睬。因此,顺治帝直至十四岁亲政时,对汉文依然十分陌生,以致他在阅读汉大臣的奏章时,往往茫然不解其意。

史可法誓师勤王 史可法,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县)人,明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控制着陪都、江南和淮扬地区。顺治元年(1644)二月,他曾受崇祯帝命,以督师名义出兵"勤王"。四月十一日,史可法传令江南各镇兵入援,誓师勤王。二十二日听到京师已被农民军攻破,北向痛哭,发丧,誓师浦口,欲长驱入京,与农民军决一死战。南京的群僚诸将因兵力不足,不敢与农民军对抗,纷纷请史可法择新君以定南都。于是,史可法只得回到了南京。

多尔衮出师中原 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日,多尔衮统率大军,出师中原。先是,四月初七日清廷以多尔衮将出师中原,祭告太祖、太宗。祭文说,经过去年八月和今年二月的两次战斗,山海关外地区尽为清廷所有,完成了太祖努尔哈赤的夙志,现特命

多尔衮率军伐明。初八日，顺治亲自召见多尔衮，特授给奉命大将军印，掌管军中一切赏罚大事，并要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听从指挥，同心协力，以图进取。初九日，多尔衮同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等，以及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至堂子奏乐行礼，又陈列八纛向天行礼。然后，统领满洲、蒙古兵及汉军兵总计约十四万人，鸣炮起行，讨伐明朝。

巡按之兴废 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廷开始向各地遣派巡按。清廷定都北京之后，随着清军南下和征服地域的不断扩大，陆续由北向南派遣巡按。终顺治一朝，其间四次停复。巡按是"天子耳目之官"，其主要职责是：内宣朝廷之"德意"，外察督抚之贤否，上考文武百官之恶善，下问黎民百姓之疾苦。可见巡按兼有察吏安民两大职能。它的遣派是清廷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因为清廷以刀枪征服天下，以巡按随之安定地方，巡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均起了重要的作用。纵观顺治时期的巡按队伍，大多数品行端正，断事公允，其中有一些更堪称"铁面冰心"、"热肠冷面"，颇有作为。当然，"背旨坏法，收囊纳贿"者也不乏其人。但由于巡按主要由汉官充任，引起了满族贵族的极端不安，因此顺治帝死后，辅政的四大臣打着"率循祖制，咸复旧章"的旗号，停止遣派巡按。

李自成东征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虽然明朝灭亡了，但是距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还驻扎明宁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率领的精锐兵力，直接威胁着北京的安全。因此，李自成准备在招抚吴三桂后登极为帝，然后派大军南下以完成一统大业。后来，由于吴三桂一再拒抚转为公开对抗，李自成决定东征，以铲除吴三桂的势力。顺治元年(1644)四月十三日，他率军由北京出发，二十一日到达山海关。这样缓慢的行军速度贻误了战机。四月二十一、二日，农民军和吴军展开了激战，由于清军猝然从阵中冲出，农民军措手不及，吃了败仗。李自成率骑兵数千急忙退至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各首领和散失的农民军也乘夜回到了永平。二十四日，清军和吴三桂军追至永平。李自成因农民军日夜战斗，疲乏已极，无法再战，挥军阻击了一阵之后，放弃了永平，二十七日率军回到了北京。至此，东征失败了。

吴三桂降清 吴三桂，辽东籍，武举出身，崇祯十二年(1639)底任明辽东总兵官，在辽东专擅一方。顺治元年(1644)三月被明廷封为平西伯。三月初六日，明廷鉴于李自成农民军向京畿地区胜利进军、北京局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令吴三桂入援京师。吴三桂在接到命令后，虽兵发京师，但行师迟缓，十四日抵丰润(今河北丰润县)时闻京师失陷，即返师山海关。不久，他接到李自成的劝降信，心中犹疑未决：他一方面因缺乏粮饷，兵力也不足，不足以和农民军对抗；另一方面因在辽东拥有大量田庄和财产，担心投降农民军会丧失自己拥有的势力和地位。当他权衡再三，决定自率精锐赴北京投降时，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将领刘宗敏霸占的消息，便以此为由与农民军公开作对。二十七日，吴三桂看到农民军大举进攻山海关的迹象日益明显，派副将杨坤等携书信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书中要求与清合师抵北京，"灭流寇于宫廷"，并给其土地、财帛作为酬答。多尔衮接信后，立即复信说清军南下的目的要代明统治中国，如果吴三桂降清，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吴三桂在收到复信时，农民军的大队人马已逼近山海关，此时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立即表示降清。吴三桂降清，为清廷打开了逐鹿中原的大门，为其最后夺取全国铺平了道路。

一片石之战 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农民军到达山海关前，即派部将唐通带数百人前去招降吴三桂，行至距山海关二三十里处的一片石时，突然遭致吴三桂和当地豪绅地主武装的袭击。农民军奋勇杀敌，直战至日暮，牺牲了百余名战士，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这次战役规模虽小，但却表明吴三桂已向农民军举起了屠刀，李自成的招降活动彻底破产了。

山海关之战 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到达山海关，即对东罗、西罗、北翼等城发起猛攻，吴三桂督兵顽抗。大战自辰至午约六个时辰，除守御西罗城的吴军设了一个伪降计，使农民军将士信以为真，遭受了一些挫折外，守御东罗、北翼二城的吴军均濒临危殆，难于支撑。不料，当天晚上多尔衮率清军到达山海关，次日凌晨，吴三桂以炮轰击农民军的包围圈，从隙道突围直驰清营，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狡猾而机敏的多尔衮害怕农民军，不敢与之硬拼，于是命吴三桂打头阵，自己则蓄锐不发，按兵不动。吴三桂倾精锐而出，农民军英勇搏战。到了午后，农民军将吴军紧紧包围起来，吴军东驰西突，苦战良久，几不能支。正当双方精疲力竭时，作壁上观的清军从阵右冲出，农民军措手不及，忽然间狂风大作，农民军将士睁不开眼，终于败下阵来。山海关战役是关系到李自成农民军兴亡的一次重要战役。李自成自进入北京后，在军事上产生了麻痹大意思想，在策略和战略上又欠周密的考虑，更没

有看到清军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以为吴三桂不堪一击，结果吃了败仗，在北京也站不住脚，只得撤回陕西。

李自成匆忙登基为帝 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败归北京。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七日，他从德胜门入东华门，原明廷一些官吏上表劝进，大将刘宗敏也说："若不正大位，即求还关中，不可得也。"李自成决定从速登基。二十九日上午，他在明皇宫武英殿内即皇帝位，接受群臣的朝贺。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追尊七代祖妣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但这个匆忙的即位仪式实质上也是一个告别仪式。因为当时北京城内严重缺粮，明朝残余势力待机而动，城外又没有援兵，加之清兵和吴三桂军正在穷追不舍，于是李自成决定暂留几千农民军守城外，其他束装待发。次日五更，他率领农民军出了阜成门，奔驰在回陕西的路上，永远地离开了北京这座宏伟壮丽的古都。李自成离京后，北京又回到了明朝官僚地主手中。两天后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在数万名清兵的簇拥下进入北京，并居武英殿称制，开始了清廷对北京的统治。

多尔衮人据京师 李自成率领农民军离开北京、返回陕西时，曾携带明崇祯太子同行。刚出北京，即遭到吴三桂的袭击，太子走失。于是，京师内外流传吴三桂拥太子入都的谣言。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原明官吏立崇祯牌位于午门哭临，并忙备车驾仪仗出朝阳门迎接太子。不久，有数万骑兵到来，臣民仰视，却是清摄政王多尔衮。正在惊愕间，清兵已大队入城。次日，故明官吏决定改换门庭，上表劝进多尔衮为帝。劝进表虽成废纸，但多尔衮看到明官吏肯忠顺清朝，于是着意笼络和留用明朝大小官僚。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按帝礼为崇祯发丧，谥崇祯为怀宗端皇帝；地方官吏归顺者晋级，抗拒者予以严惩；明宗室来归者，不夺王爵，继续享有特权；安抚百姓，废除明末三饷加派；继续镇压农民军，派平西王吴三桂、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率兵兼程追剿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这就使刚入关的清统治者很快取得了京畿一带官僚、地主的支持，北京的形势也得到了初步的稳定。

八旗驻防京师 多尔衮入据北京后，认识到要维护满族贵族的统治，除了笼络、控制和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外，就必须充分依靠八旗武装作为统治工具。为此，他把南城作为民居，尽圈东、西、北、中城为八旗营地，并使八旗按方位分讯驻守，以环拱紫禁城池。各旗在京城驻守的范围如下：左翼——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城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

京师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设立 顺治元年(1644)，清廷定都北京后，设立了步军统领(或称九门提督)，以统辖满、蒙、汉八旗步军营及九门官兵，同时兼管巡捕二营(南北二营)事务。顺治十六年，清廷又添设巡捕中营，隶步军统领麾下。至此，步军统领的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

通政使司及"登闻鼓"设立 顺治元年(1644)，清廷设立了掌收题本的机关——通政使司，它的主要职责是收纳各省题本，校阅后送交内阁。查有题本不合规制的，揭送内阁参办；如题本有逾限期的，则须移文有关部门议办。在京各衙门的一切奏本，不分公私，也均须送通政使司呈进。通政使司所属有"登闻鼓厅"，内设登闻鼓，供军民击鼓伸冤。"登闻鼓"初设于都察院，顺治十三年十月移置于长安右门外。清廷规定：由科道满汉官轮流值鼓；凡击鼓告状而又确有冤抑者，在京师内必须经各衙门审理，在京师外督抚不为昭雪，由科道官审明封进；越级告者照例责逐。

"顺治通宝"铸就发行 顺治元年(1644)，清廷设立户部宝泉局和工程宝源局，铸钱发行，文曰"顺治通宝"，每文重一钱。宝泉局铸钱供全国经费使用；宝源局鼓铸之钱，要按卯(当时以六千二百二十九串二百七十文为一卯)报呈工部，交节慎库验收，然后作为工部所管各项工程经费发放。

京师出现"人市" 清廷入关前，就有人口买卖。入关后，为满足满族贵族家内役使的需要，又以法律的形式准许贩卖人口为奴。当时，京师顺承门(今宣武门)内大街有骡马市、牛市、羊市，也出现了"人市"。每天，人贩子出没其间。他们有的诱拐无知者，将其先藏在土窖内再寻机外贩；有的将满族妇女、儿童圈诱贩卖；有的拐卖民间子女；还有一种强悍棍徒，托卖身为名而将身价瓜分者，种种恶行，举不胜举。顺治九年(1652)三月十三日，顺治帝鉴于人贩子的罪行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下令："自今以后，将人贩子名色永行禁止。"实际上却是禁而不止，贩卖之风更甚于前。有一个恶名昭著的人贩子金成元，与其结拜兄弟组成了一个贩卖人的集团。他们勾结满族贵族，明目张胆地将拐骗来的民人卖为奴婢，从中牟取暴利，据他自己交代，仅在顺治十二年的半年之间，经他之手就拐卖了一百多人，每个价钱不等，多的达二十余两，少者也可卖至十七八两，总共获利达银二千余两。

清廷颁布剃发令 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三日,摄政王多尔衮在给故明内外官民的谕旨中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是为剃发令。汉人的习俗,原本是将头发束在头顶;而满人的习俗,则是在头中间编成发辫,垂于脑后,周围剃去。强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实质是要在精神上征服汉人,自然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二十四日,多尔衮鉴于清统治尚未稳固,宣布收回成命,允许汉人照旧束发。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清廷在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之后,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稳固,再次颁布剃发令。宣布自布告发出后,京城内外军民限十日内剃发,各省军民自部文到日起也限十日内剃发。剃发令措词极其严厉:"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但是,这不仅没有吓倒大江南北的汉民,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情绪。广大农民、工商业者,有气节的士大夫和中小地主、部分官僚豪绅,都坚决反对剃发。此后,随着清军的逐步深入,江南各地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剃发斗争。

福王监国南京 顺治元年(1644)四五月,当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以及清兵入据燕京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陪都南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明在南京的地主、官僚和军阀为了逃避彻底覆亡的命运,议立新君。以马士英为首的实力派以武力相威胁,拥立明神宗之孙、福王朱由崧。五月初三日,福王监国于南京,南明政权由此建立。五月初五日,福王政权以马士英、史可法等为东阁大学士,分江北为四镇,由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靖南伯黄得功分别驻守淮安、泗州(今安徽泗县)、临淮(今安徽凤阳临淮关)、庐州(今安徽合肥),以屏障南京,防范农民军的进攻。

弘光政权建立 顺治元年(1644)五月十五日,在明朝残余的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的扶植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弘光政权把"讨贼复仇"作为宗旨,命史可法以督师地位驻镇扬州,指挥江北四镇与农民军对抗。但它一开始就分成依附四镇的马士英、阮大铖派和依附左良玉(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军阀)的东林余党。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势同水火。两派都主张镇压农民起义军,而寄希望于和清朝统治者妥协。而弘光帝本人更是终日沉湎酒色,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对人民的剥削甚于往日。弘光政权终于在清军的铁蹄和人民的唾骂声中土崩瓦解。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五日清军占领南京,弘光帝在逃亡途中于二十二日被俘,次年被解京处死。

马阮祸乱朝政 马士英,明朝崇祯末任凤阳总督。福王政权建立后,他以拥立之功升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掌握朝政大权,并在朝中招纳贪官污吏,挟福王以令诸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专以除正人、引奸党为务。为此,他把威名卓著的史可法排斥在外,令其督师扬州,又罢除东林党人高宏图、刘宗周等;荐举奄党余孽阮大铖为兵部尚书。阮大铖入朝后,进一步引荐同党,组成奄党,横行朝中,恢复东、西厂特务机构,创制《蝗蝻录》,准备一网打尽东林党人及反对派。马士英、阮大铖还倒行逆施,破坏原有的铨选制度,公开卖官鬻爵,以贿金之多寡决定官职之大小,同时又大肆搜刮各地金银上供入己。故当时民谣讥讽马士英说:"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马、阮在清兵步步南逼、形势日趋恶化之际,为了与宁南侯左良玉争夺权力,不惜撤除江淮防线,使清兵如入无人之境,迅速攻下扬州、南京,致使福王政权垮台。对外则采取了对清妥协的态度。顺治元年(1644)七月初五日,马士英遣左懋第等向清乞和,被拒绝。南京陷落前,马士英仓皇出逃,阮大铖降清,次年马、阮先后为清廷处死。

左懋第被清幽禁不屈而死 顺治元年(1644)七月初五日,南明福王政权派应天(南京)巡抚左懋第为正使,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少卿马绍愉为副使,携金千两、银十万两、缎绢万匹,北上向清乞和。乞和的条件是:第一,在北京天寿山特立园陵,改葬崇祯帝后;第二,割山海关外地与清;第三,每年向清献银币十万两。但清廷的目的是要消灭南明小朝廷,统一全国,遂不接受和议,并拘捕了左懋第,将其幽禁在太医院,而将陈、马二人释放。陈、马回到南京后,充当了清兵进军南京的内应。次年五月南京被清军攻占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太医院过着幽禁生活的左懋第痛苦不食。当多尔衮派人令他和属下人剃发时,左懋第等坚决拒绝,被下刑部狱。后来多尔衮和汉官多方劝降,左懋第等除力拒外,惟求速死。多尔衮看劝降不成,下令将其斩首。左懋第至菜市口刑场后,问属下人:"悔乎?"属下人回答说:"求仁得仁,又何悔?"左懋第连呼"好,好",南向四拜,端坐受刃而死。

复明运动兴起 顺治元年(1644),清廷定都北京后,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强制推行圈地、缉逃人、剃发、屠城等民族奴役、民族压迫的措施,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一场持续的、广泛的、有组织的民族抵抗运动。其中,一部分明朝遗民和其他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标榜"君亲之尊"、"华夏之防",打着恢复"大明江山"的旗号,披发跣足,奔走呼号,掀起了重重波澜。这就是清初历史上著名的复明运动。随着反

清斗争的深入，复明运动的目的有很大不同：一部分地主、官僚哭祭崇祯，声称要相随高皇（明太祖），恢复朱明皇朝的统治；另一部分地主缙绅、士大夫不是一般地倡言封建纲常、死心塌地忠于一家一姓、眷恋明朝统治，而是首先在于反对满族贵族统治集团的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措施，恢复汉族地主的统治。

清廷定都燕京 顺治元年（1644）六月十一日，摄政王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等定议，应建都燕京，派遣辅国公吞齐喀等携奏章迎驾。七月初八日，顺治帝在告上帝文中宣布：接受多尔衮的奏请，"迁都定鼎，作京于燕"。八月二十日，顺治车驾自盛京启行，九月十九日至京师，自正阳门入宫。

金坛"削鼻班"抗清 顺治元年（1644）五月，江南金坛"削鼻班"参加抗清斗争。明代，江南的地主豪绅称其家内奴仆为"鼻头"，任意驱使，横加挞罚。明末，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这些家内奴仆也起而反抗地主豪绅。他们为了洗刷"鼻头"的侮辱，自称为"削鼻班"。清军南下后，"削鼻班"也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洪流中。金坛彭氏奴仆、"削鼻班"首领潘茂、潘珍自称主帅，聚集数万人，于顺治元年五月攻下金坛县城，接着又进攻附近州县，屡败清军，扰得清统治者不得安宁。次年，清昂邦章京哈哈木亲统大军前来围剿，由于原明锦衣指挥、金坛县人史顺震的告密，清军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捕获了潘茂、潘珍，并将他们解往南京处死。

金声江天一绩溪抗清 顺治元年（1644）七月初十日，金声、江天一在安徽绩溪起兵抗清。金声，字正希，安徽休宁人。崇祯曾封他为翰林院修撰。福王监国时，他被封为左佥都御史，但因与马士英有矛盾而未到任，与门人江天一在家乡日夜操练乡勇，准备抗清。七月初十日，金声率绅衿士民哭于明太祖朱元璋像前，举起了反清大旗。之后，他听从了江天一的建议，在绩溪筑起了丛山关，屯军其中，并号召各地起义。不久，一些回到原籍的明朝官吏，如山东御史、宁国人丘祖德，职方郎中、泾县人尹民兴，徽州推官温璜、池州人吴应箕等纷起响应，很快攻克了宁国、泾县、旌德。八月，清兵三路来攻，但金声等毫不畏惧，采取声东击西、乘间出击的战术，杀伤众多清兵。双方相持累月，终于寡不敌众，旌德、宁国、泾县先后落入清军之手。十月初九日，降将黄澍诈称援兵，编取了金声的信任。次日，清兵里应外合，攻陷绩溪。金声、江天一被俘后，威武不屈，从容就死。

多尔衮提出"嘉与维新" 顺治元年（1644）七月十七日，多尔衮为缓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提出了"自今以往，嘉与维新"。主要内容是：第一，省刑罚。凡是五月二日（多尔衮进京日）以前，不论京内外，事无大小，已发觉未发觉及已结正未结正之刑狱，悉予宥免。同时禁止违谕兴讼者。第二，薄赋税。自顺治元年为始，除正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同时禁止官吏朦胧混征暗派。第三，惩贪官。如发现贪吏污吏加耗受贿等事，朝闻夕奏，予以严惩。第四，禁扰民。凡役使归顺人民及占据市行与民争利者，都要迅速改正。第五，禁投充。新附军民中凡力能自赡者，均各安本业，不准令其投充为奴。

畿南农民军抗清 多尔衮入据京师后，京南的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保定、内黄、大名、冀州（今河北冀县）等地燃遍了抗清的烽火，到处树起抗清义帜。其中，保定香炉寨农民钱子亮、钱楼，乔家寨农民赵建英，宁晋泊农民韩国壁等，号称大王、都司；内黄农民苏自兴联络李自成部将王鼎铉，各称总督、大元帅。他们纷纷据险要为基地，起兵抗清，声势浩大。有的还联络山东、河南义军，有的潜入北京，散布流言，诸如当年八月中秋，清军要屠城，杀掉老、壮，仅留青年和小孩；"满洲的头子们马上要滚回老家了"等等，搅得人心惶惶，统治者也张皇失措，手忙脚乱。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廷以降将沈文奎为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他一到任，各州县告急文书纷沓而至。沈文奎"拮据宵旦，多方调遣"，首先招降了真定义军首领赵崇阳，通过赵崇阳捕斩了韩国壁；接着令总兵王爆带兵围剿各路义军，先后擒杀了钱子亮、赵建英、苏自兴等。至该年底，畿南农民军基本上被清廷镇压。

历法之争 清军入关后，需要改代换历，于是采用了传教士汤若望以西洋新法所修之历法，定名为《时宪历》。顺治元年（1644）七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该历自一六四五年开始，颁行全国。这引起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强烈不满。顺治末年，钦天监回回科的吴明炫和新安（今浙江新安县）卫官生杨光先先后上书，指责汤若望等造历多有谬误，要求停止实行《时宪历》。顺治帝以西洋历法与实际天象符合的程度，胜过传统的历法，拒绝了吴、杨等人的讦告。清初历法之争，暂告一段落。

清廷逼民"投充" 清廷入关以后，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增加奴仆的数量，实行了逼民"投充"的政策，准许各旗招收失去生计的贫民，以供"役使之用"。后来因遭到人民的反对，摄政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七月十七日下令：凡能自赡的新附军民，不准投充为奴。但这一纸禁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满族贵族的逼迫下，发展到"不论

贫富,相率投充"的地步。许多人因害怕土地被圈,或因逃避赋役,携带土地投充旗下;还有的将他姓地土认为己业带投旗下,造成一人投充而一家皆冒为旗下,府县无册可查,真假莫辨,政府控制的人户大为减少。此后,清廷又数次下令,重申禁止投充,但直至康熙初年,"投充"事件仍时有发生。

乌龙会抗清 乌龙会是明末清初江南农民和家内奴仆反抗封建统治的组织。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的消息传到江南后,鼓舞了当地受压迫的农民和家内奴仆。家奴出身的顾慎卿和贫寒士人吕茂成在松江、上海等地组织乌龙会,宣布大地主恃强凌弱的罪状,勒令其交出家产。清兵南下后,他们又积极地在军事上作抗清的准备,并计划攻占松江城,以抗拒清兵蛮横残暴的剃发命令。七月三十日,在清兵的残暴镇压下,顾慎卿受重伤,吕茂成英勇牺牲,乌龙会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但是,乌龙会的成员继续进行抗清斗争,他们中有的和太湖赤脚张三领导的白头军合流,有的加入到声援郑成功抗清活动的行列之中,成为抗清的重要力量之一。

顺治定鼎登基 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一日,顺治行定鼎登基礼,亲至南郊,发布告祭天地文:"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宣布继续沿用"大清"国号,纪元顺治。这标志着清皇朝中央政权在关内的确立,为满族贵族最终篡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摧毁腐朽的南明王朝和完成清的统一大业,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内务府设立 顺治帝入关定都北京后,即设立了内务府,以管理宫禁事务。顺治十一年(1654)裁撤,顺治十八年康熙即帝位后又重新恢复。内务府衙门当时分"内务府堂"(简称"堂上",又称"本府")及所属"七司"、"二院"等,总机关称"总管内务府衙门"。其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所属"七司"是:御用监,系为内务府掌管府藏及出纳总汇的机构;尚膳监,掌内务府所属武职官的铨选、任用及围猎、捕鱼之事,顺治十八年改为采捕衙门;钟鼓司,掌内廷礼乐并考核太监品级,顺治十三年改为礼仪监,顺治十七年又易名为礼仪院;内官监,管理内务府帑项出纳及庄园地亩之事,顺治十七年易名为宣徽院;惜薪司,掌宫廷缮修工程事务,顺治十八年易名为内工部;三旗牛羊群牧处,掌牛羊畜牧事务;尚方司,掌审拟上三旗的刑名案件,顺治十一年设,十二年改为尚方院。所属"二院"是:御马监,掌管"御用"马匹,顺治十八年易名为"阿敦衙门"(阿敦系满语,意为马群);鞍楼,是制备兵具、器械的机构,顺治十一年易名为兵仗局,顺治十八年又改为武备院。

清廷始行捐纳 顺治初年,清廷为解决军费的不足和财政困难,实行捐纳。允许士子"纳粟入监",但是不能得官。后来放宽一步,允许被革职的官员纳粮,以恢复原来的官职。

八旗常备兵制建立 顺治元年(1644)清廷入关后,建立起八旗常备兵制,仍严格实行按民族分别编制的原则,即满洲、蒙古、汉军各为八旗,兵额总数约为二十二万余人。八旗兵以满洲八旗为基干,采取世袭兵制,在年十六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补旗兵。满、蒙、汉八旗,每旗各设都统(满语称固山额真)一人,副都统(满语称梅勒章京)二人;所属骁骑参领(满语称甲喇章京),满洲、汉军每旗各五人,蒙古每旗二人。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其兵丁负责保卫宫廷;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为下五旗。行军巡狩以上三旗和正蓝共四旗居左为左翼,其余四旗居右为右翼。

清定内外文武官制 顺治元年(1644),清廷略仿明制,制定了内外文武官制。设翰林院,置汉掌院学士一人,侍读、侍讲学士各二人。改部院左右参政为左右侍郎。改理事官为郎中,付理事官为员外郎。

顺治尊孔 顺治帝和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极力提倡尊孔读经。顺治元年(1644)六月十六日,清廷遣官祭先师孔子,是为入关后的首次祭孔。顺治于定鼎登基礼的第二天,即在十月初一日,便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仍袭封衍圣公,兼太子太傅;孔允钰等仍袭五经博士。第二年的正月二十七日,改孔子神牌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十六日,顺治又从吏科都给事中张文光奏请,将孔子神牌仍改为至圣先师。

山东榆园农民军抗清 山东西部曹州一带的榆园农民军,原是一支坚强的反明起义队伍。顺治元年(1644)清军占领北京之后,榆园军在李化鲸等人的领导下转入抗清斗争,成为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抗清中心力量。李化鲸等人以濮州、范县(今河南范县)为基地,率军四出攻击清军,并奉明宗室忠义王为号召。反清队伍发展很快,人数达数十万。顺治四年(1647),榆园军还准备与河北农民军会师围攻大名,直逼北京。这时,降清后住居北京的刘泽清(南明福王政权江北四镇之一)也致书李化鲸,要为农民军作内应,事泄被清廷逮捕。清廷看到榆园军势力强大和河北危急,急调出征浙江的原明降将张存仁,总督直鲁豫三省军务,驻扎大名,集中力量剿杀榆园军。李化鲸等挥师山东,于顺治五年七月间连陷曹县、定陶、城武等地,并立天正年号,设官分部,封王、

公、侯，任命州县官。八月初一日，清廷调重兵围困曹县城。榆园军奋起抵抗，炮火轰天，矢石如雨，杀伤了大量清兵。清廷看到单靠武力围困不能迅速攻下曹县，便派河督杨方兴前往“抚慰”，九月十五日李化鲸等人出城与清军谈判时被生擒，十八日又被押解进京，十一月十二日与刘泽清并其弟、侄被清廷处死。李化鲸牺牲后，榆园军的抗清活动仍在鲁西地区进行着。

山东嘉祥满家洞农民军抗清 顺治元年(1644)五月，李自成率大顺军西撤后，山东兖、沂二州所属各县农民纷起抗清。山东嘉祥县满家洞农民军，就是其中著名而又突出的一支。满家洞界连嘉祥、金乡等四县，周围二三百里，有大小洞穴千余个。八月间，当地农民军领袖宫文彩，自称擎天王，拥众二万余人竖旗抗击清军南下，旗帜上大书“大顺”年号，公开表示追随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他们以满家洞为根据地，联合周围的农民军，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击清军。清廷获知消息后，即派济宁道朱国治率军前往镇压。朱国治等人剿抚兼施，多次派人宣谕招安，起义军虚与周旋，实则摆列火炮、枪刀与清军“相角”。次年初，肃亲王豪格亲自坐镇济宁，调动满兵、乡兵约六千余人围困满家洞，宫文彩等二十余人被诱斩。后来，豪格离任回京。六月，清军在河道总督杨方兴的指挥下，大肆进行烧杀，切断水源，堵塞二百五十一个山洞，农民军将士大多自缢身亡，宁死不屈。至此，满家洞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才宣告结束。

南渡三疑案发生 弘光政权建立后，弘光帝本人在过着逐酒征歌、荒淫无耻生活的同时，深恐有人夺取他的皇帝宝座，于是发生了南渡三疑案。一是大悲狱案。大悲是安徽人，父亲姓朱。早年在苏州出家为僧时，与潞王常淓相遇，认做本家。顺治元年冬天，他从苏州来到南京，自称定王，因“国变出家”，法名大悲。并在刑部审讯时高叫：潞王贤明，应为天子，弘光应该让位。最后被弘光帝斩首。二是皇妃童氏案。弘光帝在明崇祯十四年(1641)初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洛阳后，逃到开封，与周王府宫人童氏一见钟情，封她为妃，不久两人在荒乱中散失。弘光帝即位后，童氏前去投奔，弘光毫不眷恋恩爱之情，拒绝见面，并将其下狱。童氏呼天大哭，大骂弘光：“这短命人，少不得死我眼前。”并将一封细书 其入宫日月、相离情事的信，求狱官转交。岂知弘光接信后竟弃之不看，口喊：“吾不认得妖妇，速速严讯！”结果童氏被饿死。三是伪太子案。崇祯太子朱慈烺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后，散失民间，久无消息，忽于顺治二年二月来到南京。弘光群臣在审讯真伪时，有说此人是故明驸马都尉王昺侄孙，被教诈冒东宫。弘光深恐他是真太子，夺自己帝位，但又慑于舆论，只得下诏旨说，暂交人护养，勿骤加刑，待天下百姓均明真相后再申以法律。弘光政权有此三案，弄得人心浮动，有人怀疑弘光帝也是假冒出来的，这更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集团的矛盾。

皇极门颁即位诏 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十日，顺治帝在皇极门向全国颁发即位诏书，提出了“合行条例”凡五十五款。主要内容有：加封亲王宗室及满洲开国功臣；察叙满洲将领及入关后降顺之文武官绅；减免刑法，加恤出征兵丁；地亩钱粮俱照明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起征；蠲免加征之辽饷、新饷、练饷等项，以及清兵经过地方之钱粮；保护明朝及历代帝王陵寝；征聘隐逸山林中有才华者；叙用不贪赃枉法之明朝降谪官员，禄养或叙用归顺之明朝宗室、勋臣及其子弟；禁火耗、重科加罚、巧取民财；蠲免若干种折色银、本色钱粮；对山陕“被流寇要挟，今悔过自新”的军民，予以赦宥；禁重利放债、折准房地，等。

八旗官学设立 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廷批准了国子监李若琳的奏疏，允准满汉官员子弟入国子监读清、汉书。不久，清廷又在京师八旗驻防地，各觅空房一所，立为书院，派国学二厅六堂教官分教八旗子弟。由此，八旗官学建立。以后，清廷规定，八旗子弟每十日赴国子监考课 一次，春秋演射五日一次。

清定诸王以下官员俸禄 顺治元年(1644)十月十七日，清廷制定了岁给诸王以下俸禄：摄政王每年俸银三万两，辅政王一万五千两，亲王一万两，郡王五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二百五十两，公六百二十五两。顺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减摄政王俸银一万两。顺治七年更定王以下官员俸银为：和硕亲王一万两，郡王四千两，贝勒二千两，贝子一千两，宗室公五百两，一二三等公俱一百两，二三等伯俱九十两，二三等镇国将军、三等精奇尼哈番俱八十两，一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俱七十两，一三等阿达哈哈番俱六十两，二等拜他喇布勒哈番四十两，以次至骁骑校、护军校、他赤哈哈番各二十五两。顺治七年(1650)正月十九日，清廷又定王以下官员每年支给俸米数：和硕亲王六千石，郡王二千石，贝勒一千四百石，贝子八百石，宗室公六百石。公以下各有差，最低者骁骑校、护军校等各三十石。

顺治宠眷汤若望 清廷定都北京后，在华居住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很快得到了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十一月二十五日汤若望任钦天监掌印

官。顺治亲政后，他因给孝庄文太后治好病而被尊为“义父”，顺治即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此后，两人过从甚密。顺治不仅在天文、历法、宗教、道德等方面，而且遇有治道、政事时，均相咨商。顺治自己也常到汤若望寓所，仅十三、十四两年，即访汤若望于其馆舍凡二十四次，随意历览教堂书房及花园等处，有时索性共进便餐，欢洽之情有如家人父子。甚至顺治的十九岁生日(1657)也要在汤若望家里过，在顺治的宠信下，汤若望连连进爵加级，并被授予“通悬教师”称号，加俸一倍，随意出入宫廷，结交权贵士宦，不仅使自己在清廷中成为风靡一时的人物，而且传教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至顺治末年，全国各省都有传教士的足迹。由于十四年以后，顺治帝开始崇信佛教禅宗，汤若望企图使其皈依天主教的努力才终于无成。但是，汤若望在顺治的心目中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顺治十六年(1659)，当郑成功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之时，顺治初欲逃回盛京，遭太后叱责后又恼羞成怒，声言御驾亲征，同时拔出宝剑砍碎御桌。大臣们的劝解更增加了顺治的怒气，于是列长队往汤若望处请求援助，获得应允。于是，汤若望的三言两语转变了顺治的情绪，从而使清廷的混乱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顺治临终前，又听了汤若望的意见，改立玄烨为太子，承继帝位。

张献忠建元称帝 顺治元年(1644)初，当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向京师进军时，张献忠率领的大西农民军在四川和明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八月前后攻占了成都，接着派兵攻取四处州县，所至皆克，除遵义和两处土司未下外，据有全蜀。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建国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改成都为西京。他还采用明初官制，任命左右丞相；设内阁六部，任命六尚书；封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为王；立军都督府以统率全军，等等。大西政权建立后，立即遭到了明军和地主武装的围剿。顺治三年(1647)七月，张献忠被迫放弃成都，退守西充县。不料，这时清肃亲王豪格正率军进攻四川。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由叛变的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引路，突然袭击西充凤凰山张献忠营地。张献忠率马步军迎敌，打死了许多清将，一度包围了清军。不久，清援军至，大破张献忠军，反败为胜。张献忠在混战中牺牲。此后，孙可望、李定国等人也采取了联明抗清的策略。

山东青州胶州登莱农民军抗清 顺治元年(1644)九月二十九日，李自成部将赵应元侦察到驻山东青州的清兵人少，于是假意向招抚山东侍郎王鳌永投降，入城后即将其执杀，竖旗抗清，并派人联络附近的农民军。青州知府张文衡闻讯后，好言抚慰赵应元，骗取了赵的信任。十月初，清廷派梅勒额真和托等出征山东，在青州西北驻防。初八日，张文衡和赵应元出城拜谒和托。当张、赵回城时，和托密令清兵随之入城。夜晚，清兵乘赵应元不备，将他和亲信数十人杀死，占据了青州城。

赵应元占据青州不久，山东省两支农民军起兵响应：一支是高密人张舆称总镇大元帅，与武印、徐振、管相国等人联络赵应元的部队，在胶州一带抗击清军。十一月十八日，这支军队为清总兵柯永盛所败，张舆被杀；另一支是由秦尚行、王家忠、翟从谔领导的登莱农民军，这支军队聚众万人，共扶生员杨威为帝，在周围三百里内，“势甚猖獗”。清总兵柯永盛在镇压张舆领导的农民军之后，即赶赴登莱“征剿”，秦尚行、杨威先后牺牲，“散其党七千人”。

朱寿鍪贪酷不法 顺治元年(1644)冬，宣府巡抚李鉴揭发赤城道朱寿鍪有严重的贪酷不法行为。朱寿鍪得知此事，立即派其子嘱绰书泰向英亲王阿济格求救。阿济格给与李鉴印扎，令赦免朱寿鍪罪。不久，阿济格出师陕西途中，至宣府，面谕李鉴说：“寿鍪忠良，尔宜释免。”李鉴认为朱寿鍪是朝廷要犯，如释放他，对阿济格也不利。绰书泰严厉斥责李鉴说：“尔何不惧王，而反惧冲龄皇帝耶?”李鉴不听，拂袖而去。阿济格又派绰书泰、总兵刘芳名强令李鉴宽免朱寿鍪，李鉴终不听命。次年初，此事下内院等衙门会审，朱寿鍪贪酷不法属实。正月初四日，清廷将朱、绰等人处斩，并抄其家产，刘芳名为虎作伥被革职。十一日，清廷嘉奖李鉴鞍马一匹、貂裘一袭、金五十两、银千两，并以朱寿鍪家产给之。李鉴又要求把这些赏赐作为军需费用，清廷“优旨嘉奖，所赏不准辞。”

京师发生“故明太子案” 顺治元年(1644)底，有一刘姓男子自称明崇祯帝太子，来到太监杨玉的家中。杨玉见而怜之，为其更衣后送至故明周后父周奎家，时公主亦在奎处，相见后放声痛哭。周奎先是跪献酒食，继而疑其有诈，于是奏报清廷。摄政王多尔衮闻讯令故明袁贵妃及东宫官属太监等辨认，并问以明宫中旧事，回答不出。袁贵妃等均认为刘姓男子是假冒，只有花园太监常进节、指挥李时荫执以为真。吏部侍郎沈惟炳、御史赵开心等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加详审以定真伪。清廷经过覆审后，声称刘姓系假冒太子，将其和杨玉、李时荫等十五人处决。赵开心因疏中有“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一语，触怒清廷，也论罪当斩。多尔衮考虑到他是言官，免死，但罚俸三个月。此后，清廷又下谕说：有以真太子来

告者，太子必加抚养，来告者也将给优赏。

圈地令推行 顺治元年(1645)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廷下圈地令。清廷迁都北京后，为了维护以皇帝为首的满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和保障八旗兵的生活，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占土地。第一次圈地主要是圈占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以及死于"寇乱"的明朝皇亲、驸马、公、侯、伯和太监等的土地。第二次(顺治二年九月十六日，)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今河北滦县)和遵化等府州县的"无主之地"。第三次(顺治四年正月初九日，)圈地，清廷以上次所圈之地中薄地甚多为由，将近京四十二府州县内的土地，不论有主无主，全行圈占。三次圈地和其它一些零星的圈地，共占地十五万九千多顷，其中皇室庄田就占五千七百多顷。在被圈占的州县内，大部分土地和房屋均被八旗贵族和兵丁夺去，民地所剩无几，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惨不忍睹，有的被迫起来同清廷进行斗争。圈地摧毁了大批生产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后，在广大汉族人民(包括一部分受损害的地主)的强烈反对和斗争声中，顺治帝于四年正月初九日下令，此后永行禁止圈占民田、房屋。命令发出后，大规模的圈地停止了，但零散的圈地仍在继续。顺治十年(1653)十月初三日，顺治帝又重申"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直至康熙八年(1669)，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圈地，方基本停止。

清廷在近畿设官庄 顺治初年，清廷从京畿圈占的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给皇室，于是出现了皇庄，也称官庄。据史载，当时共设官庄一百三十二所。每庄给田三百晌(每晌合六亩)，庄头各给绳地(一绳为四十二亩)。官庄由内务府会计司管理，故又称为内务府官庄。后来，又以近畿土地不足，"展边开垦"，在盛京(今沈阳)等地设置八旗庄田。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在盛京丈出地亩三十二万九千余顷，以其中的二十七万六千余顷为旗地。官庄按生产种类，又分为粮庄、豆秸庄、稻庄、菜园、瓜园、果园、蜜户、苇户、棉靛户等等。各庄均有庄头，役使数量不等的壮丁，生产出来的粮、草、菜蔬、家禽等，供皇室衣食服用，或折成银两，交内务府会计司。

里甲制与保甲制在地方混杂并行 里甲制与保甲制，是清统治者入关后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基层组织。里甲制是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选丁多者十人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它以户为主，目的是弄清一户负担的田粮丁银，以便征收赋役。保甲制是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牌设牌头，甲设甲长，保设保正。它以人为主，目的在于维持地方治安秩序，防止人民反抗。但在顺治年间(包括康熙年间)，里甲制与保甲制经常混杂并行，或合二为一，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其主要表现是：保甲制度中十家为单位的组织形式常常依靠里甲组织来安排，保甲组织参与里甲事务。顺治后期，清廷为了更好地发挥保甲制的作用，采取一些措施使保甲依附于里甲的状况得以改变，保甲组织逐渐自成体系。直至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地之后，保甲制才取代了里甲制。

清廷重用洪承畴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明思宗崇祯末年任蓟辽总督，主持对清战争，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投降皇太极。清廷入关后，洪承畴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为秘书院大学士。他认为，国家要务，莫大于用人，并建议九卿科道会推督、抚、提、镇官员，实行"保举连坐法"，以选拔真才实学者；为此又亲自举荐了许多原明臣出任清朝的官职。洪承畴还建议顺治帝带头学习汉文、通晓汉语、倡导儒家学说，以帮助统治者学习汉族地主阶级丰富的统治经验。这些都得到清廷的首肯。顺治帝为鼓励他进言，特传谕说："凡有所奏，可行即行；如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顺治二年(1645)，清廷占领南京、推翻弘光政权后，摄政王多尔衮派洪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洪承畴到任后，制定了剿抚兼施的策略，一方面用暴力残酷镇压了金声领导的抗清斗争，另一方面招降了隆武王朝中手握军政大权的郑芝龙，使其撤掉仙霞岭之防守重兵，清兵得以长驱而入并打垮了隆武政权。在他的招引下，明朝文武官员纷纷投降。顺治十年五月，洪承畴被特任为太保兼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以镇压全国出现的抗清运动。洪承畴来到湖南后，政治上广行招徕，军事上以守为战，寻机进攻；经济上开垦田亩，恢复和发展生产，以解决军粮。这一政策获得清廷的支持和赞同。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湖广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人心渐有固态"，顺治帝对此深表满意。顺治十四年孙可望降清后，清廷利用西南抗清力量受到严重削弱的有利时机，命令洪承畴率所属将士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广前行，相机攻取云贵。洪承畴提出进兵西南应以收拾人心为本，先得土司之心，而后方可一劳永逸。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允许西南少数民族暂免剃发，照旧妆束，从而缓和了社会动乱，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顺治十六年，清军攻占昆明后，清廷又采纳了洪承畴安定云南内部的主张，命令平西王吴三桂率兵留驻云南，从而使云贵问题获得了基本解决。顺治十七年初，洪承畴因年老多病、两眼昏花而被清廷解任，回京调理。洪承畴劳碌一生，为明清两朝的统治

者效尽了犬马之劳。

京师民出痘者逐出城外 清初，满洲贵族对出痘(即天花)十分畏惧，为预防传染，下令京城内凡民间出痘者，即驱逐城外四十里。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吏役乘机扰民，敲榨勒索，视民命如草芥，致有将身心发热及生疥癣等疮之人一概逐出城外。结果，被逐出者无衣无食，处境十分凄惨，社会也很不安宁。顺治二年(1645)二月十五日，巡视南城御史赵开心建议在城外四十里处择村安置被逐出者，同时要区别真假出痘，"非痘者勿逐"，清廷虽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却未取消驱逐令。

清疏奏事始有题本奏本之别 顺治二年(1645)，清廷命令各衙门奏事皆缮写本章，遂定题本、奏本之别：公事用题本，加盖印章；私事用奏本，不加印。

左良玉"清君侧" 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奄党马士英把持朝政，压制依附宁南侯左良玉的东林余党。顺治二年(1645)四月初四日，屯兵武汉的左良玉发布檄文，列举马士英的八大罪状，声称奉崇祯太子密旨"清君侧"，与马士英公开争权夺势。他亲自率领数万大军东下九江，并于次日打到安庆。不料，左良玉病死军中，子左梦庚统其众，一路烧杀抢掠，南京戒严。马士英不顾弘光君臣抵御清军的要求，急调江北二镇驻防兵抵御左军。不久，左军为黄得功击败，左良玉的"清君侧"随之失败。

匠籍制废除 顺治二年(1645)四月二十四日，清廷明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免征"京班匠价"。官府手工业及官府需用的匠役，均改为雇募制，实行计工给值。这就使手工业者从世袭的匠籍制下解放出来，获得比较自由的身份地位，从而提高了手工业者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清初手工业的发展。

清廷下诏修《明史》 顺治二年(1645)，清廷下诏纂修《明史》，以内三院大学士洪承畴、冯铨、范文程、刚林等为总裁官，以学士詹霸、宁完我等为副总裁官，并选取纂修、收掌及满、汉字誊录等官。但是，当时明朝灭亡不久，档案史料散失极多，实录也很不全，明熹宗天启实录就缺天启四年纪事，天启七年六月及崇祯一朝事迹俱缺。这就给纂修《明史》带来很大困难。为此，大学士刚林在顺治八年二月向清廷提出建议，以重金购求天启、崇祯实录以及邸报、野史、外传等书籍。但由于当时清廷忙于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无暇顾及此事。修史的条件既不成熟，自然也就无成绩可言了。

史可法守卫扬州 南明福王政权建立后，史可法企图联清镇压农民军。顺治二年初，他面对清兵步步南逼，认识到只有奋起抗清，才能保住福王政权。于是，史可法竭力筹划防御，积极备战。四月，清兵迅速渡过淮河，攻下徐州。徐州总兵李成栋降清，并引清兵南下，形势十分危急。史可法立即屯兵清江浦，企图阻挡清兵前进，并连章告急，乞请福王朝廷派兵援助。但掌握朝政的奄党马士英为了维持个人的权势，抽调兵力对付左良玉，使江淮防线崩溃，史可法被迫回到扬州。四月十八日，清兵包围了扬州城。史可法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团结军民守城。二十四日，清军调集红衣大炮轰击扬州城，史可法血疏告急，腐败的福王政权却置之罔闻。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史可法英勇战斗，被清军俘获。清豫亲王多铎劝他投降，史可法慷慨地回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从容就义。他的部将刘肇基继续率领残部，和全城居民一起与清军鏖战，直至人尽矢绝，清军才占领扬州。清统治者痛恨人民的反抗，入城后实行血腥的大屠杀。据史载，屠城十日，被杀的人共计数十万，一座有悠久历史的繁华富庶的城市被毁为废墟。

李自成遇难九宫山 顺治二年(1645)初，清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进攻陕西。李自成在潼关迎敌失利，感到农民军抵挡不住清军两路夹攻，决定放弃西安南行。这年五、六月间，农民军来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地区。一天，李自成带领二十八骑登山阅视山势和道路，突然遭到当地地主团练的袭击，李自成和二十八骑均牺牲于乱刃之下。

内三院改为内阁 顺治二年(1645)三月，顺治帝宣布提高内三院的权任。他在给内外大小各衙门的谕旨中说："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同时又提高内三院的地位，与六部同级。另外，又将翰林院合并于内三院，使其名上均加"翰林"二字。如：内国史院改为内翰林国史院，内秘书院改为内翰林秘书院，内弘文院改为内翰林弘文院。三院的大学士、学士等人数也有相应增加。顺治十五年七月，清朝参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改加殿、阁衔，分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同时又怕阁权加重会影响皇权，降低了大学士的品级。原来合并于内三院的翰林院仍予恢复。

秀才倡言"头可断，发决不可剃" 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五日，清军占领南京后，下令各省十日内剃发，并宣布违抗者将被视为"逆命之寇"，遭致人民的坚决反对，清廷又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相威胁，更激起了人民的反对。江阴秀才许用首先在明伦堂上倡言“头不断，发决不可剃也。”在他的鼓动下，江阴北门外人民纷纷“奋袂而起”，许多知识分子也参加到反清斗争的行列，有的自觉帮助军民守城，有的组织义兵，更有的联络李定国、郑成功等抗清队伍，整个江南战场上几乎没有一次战役没有知识分子参加的。

刘宗周绝食殉明　刘宗周，字起东，明崇祯年间曾任顺天府尹、都察院右都御史等职，后被罢官在家乡浙江绍兴讲学。顺治元年(1644)五月，弘光政权建立后，他曾上疏小朝廷，希望有所作为，但为奄党马士英所逼，愤而辞官，归隐田园。次年五月清兵破南京前，马士英挟持弘光太后到杭州，议立潞王朱常淓监国。刘宗周虽然反对马士英，但为保存明朝社稷，写信给缙绅祁彪佳等人，要他们到杭州议战守事宜。可是，潞王为清军的铁蹄声吓破了胆，六月十三日开杭州城门降清。十五日中午，刘宗周在就餐时得知此消息，放声大哭说：“此予正命时也！”开始卧床绝食。两天后，他接受诸生张应烨的劝告，迁居城外水心庵，遣人寻访黄道周，共商扶明抗清大计，同时少进饭食。十九日，他听到绍兴通判同当地绅衿降清的消息，感到复明愿望十分渺茫，正式开始绝食。清军统帅博洛捎书劝降，刘宗周不屑一顾，只愿殉明。闰六月初八日，刘宗周在绝食近二十天时停止了呼吸。

宁波“六狂生”抗清　顺治二年(1645)，当清兵南下的风声越来越紧时，宁波知府朱之葵准备剃发降清。消息传到城内六个穷秀才、平时爱议论时局并对地主豪绅们不满的董志宁、陆宇燝、王家勤、毛聚奎、华夏和张梦锡(时又称为“六狂生”)的耳朵里，使他们义愤填膺，就想铲除朱之葵，起兵抗清。于是，他们用言语激励城内的一位开明绅士钱肃乐，使其打消了效法刘宗周绝食殉难的念头，积极组织抗清队伍。五月十二日，钱肃乐和“六狂生”在宁波城隍庙的广场上聚集了数千人，大家一致决定保守城池、抗击清兵，并公推钱肃乐为首领，知府朱之葵吓得仓皇溜掉。不久，应钱肃乐之请，定海总兵王之仁来到宁波，即与钱肃乐和“六狂生”议定了划江而守、抗击清兵的计划。

江西农民军抗清　顺治二年(1645)六月，由于南明降将引清兵进入江西，江西的原明官吏和农民军的抗清斗争蜂拥而起，遍及瑞金、兴国、九江、南昌、赣州和宁都等地。顺治五年，彭顺庆领导的农民军攻占了宁都，也坚持了二年，直至七年(1650)二月初八日，清军数路围攻，双方激战三昼夜，起义军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十一日城破，彭顺庆被俘牺牲，大小首领一百五十七人和起义军战士一千一百五十五人全被杀害，宁都城也被清军屠掠几尽。

清廷制定八旗赈济制度　顺治二年(1645)，清廷制定了八旗赈济制度。清统治者定都北京后，为了依靠八旗武装作为统治全国的主要工具，制定了各种制度和措施，千方百计地授予八旗旗人各种特权。八旗赈济制度就是其中之一。该制度规定：八旗涝地，每六亩给米二石；王、贝勒、贝子、公等府属人役给米相同，对于举地投充人役不给米；蒙古按口折给米，准许他们沿边籴米，但不准进入内地；八旗游牧地每口月给米一斗。顺治六年，清廷又规定：凡逢灾年，对王以下、官以上者的俸米加倍给之；旗人按七岁以上为一口，六岁以下、四岁以上为半口。顺治十一年又规定，八旗涝地，满、蒙每佐领给米二百石，汉军每佐领给米百石。此后，清廷又多次发放内帑赈济八旗穷苦兵丁，例如，十二年发放二万两，顺治十四年发放十万两。

鲁王监国绍兴　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二十八日，在故明官吏、缙绅张国维、钱肃乐等人的扶持下，明太祖第十世孙、鲁王朱以海监国于浙江绍兴，建立南明政权。他们筹划扼守钱塘江，得到了江南一些义军的支持，抗清斗争出现了大好的局面。但鲁王和隆武两个政权为了争“正统”，水火不容，总兵方国安等依恃兵权，骄横跋扈，与外戚(鲁王岳父等)、宦官相勾结，祸乱朝政。清统治者剿抚兼施，一方面派大将军勒克德浑进攻浙江，一方面诱降了方国安。顺治三年(1646)六月初二日，清军攻入绍兴，张国维兵败自杀，鲁王逃亡海上。次年七月，鲁王在抗清义师的配合下，率师进攻福州，不久失败，再度漂泊海上。后为明定西侯张名振迎驻舟山，并筹划以舟山为根据地，牵制清兵。顺治八年(1651)九月初二日，清军攻破舟山，鲁王妃及大学士张肯堂自杀，张名振奉鲁王三度航于海上。顺治十年三月，鲁王自动去掉监国号，浙江政权至此覆亡。

清定岁给故明宗室赡养银两地亩　清廷定都北京后，为了笼络汉族官僚地主，于顺治二年(1645)七月二十三日，颁布了每年给明宗室赡养银两地亩的数额：亲王银五百两，郡王四百两，镇国将军三百两，辅国将军二百两，奉国将军一百两。中尉以下，无论有无名封及各王家下人丁，每名各给地三十亩。

蕲黄四十八砦抗清　顺治二年(1645)，随着清军南下，湖广和安徽一些地区的农民军及明宗室、官吏等纷纷起兵抗清。湖广进士王爊和周损、王光淑等在蕲水和麻城，建立了蕲黄四十八砦，与安徽英霍

山一带的农民军联合起来，以明宗室石城王朱统为最高首领。之后，他们率师东进，与江北打着史可法旗号的义师并肩作战，连克句容、高淳、太平等县，一度进逼南京。顺治七年二月，王爀又亲自率军与清兵激战于潜山、太湖间，兵败后被俘，解往南京处死，这支部队也几乎被消灭。

江阴人民开展反剃发斗争 顺治二年(1645)六月二十四日，清江阴知县方亨到任，限军民三日内剃发，否则格杀毋论，引起了全城军民的公愤。闰六月初一日)，城北人民首先举起义旗，立刻得到成千上万人的齐声响应。他们振臂高呼："头可断，发决不可薙！"杀死方亨，举主簿陈明遇为首领，发动抗清斗争。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清军，陈明遇又推荐有军事组织才能的前任典史闫应元统率军务，全权指挥守城。在闫、陈的指挥下，城乡十余万军民，团结一致，修缮城池，筹备军粮、火器和弹药。在八十天的战斗中，江阴人民不仅拒绝了降清的南明将领刘良佐的多次诱降，还打败了清军无数次的猖狂进攻，使众多的清兵战慄无人色，"无不以生归为祝"，清廷三个王爷、十八员战将被打死。清军在江阴军民的顽强抵抗下，始终攻不破城池。最后，调集大炮，疯狂地向城池连续轰击，八月二十一日，终于攻破江阴城。闫应元、陈明遇和十余万军民在街巷中同清军肉搏，最后壮烈牺牲。

嘉定三屠 继江阴之后，嘉定人民也进行了以反剃发为主要内容的抗清斗争。顺治二年(1645)六月，清嘉定知县张维熙到任后，也执行严格的剃发命令，激起了城内外人民的反抗。人们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赶走了张维熙，烧毁了前来镇压的清军船只。此后，为了加强组织力量，他们又推举素有声望的开明绅士黄淳耀、侯峒曾为首领。黄、侯二人纠合义旅，准备武器弹药，全城军民士气高昂，每个人都积极参加城防工作，城楼上高悬"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表达了要与清军血战到底的决心。降将李成栋获悉消息后，急忙率领清军赶来镇压。从闰六月十七日到七月初四日，嘉定人民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坚守孤城十余日，终因寡不敌众，城被清军攻破。黄淳耀自缢身亡，侯峒曾全家投水殉难，两万多军民死在清军的屠刀下。此后，清军又两次屠杀城内英勇不屈的军民，史称"嘉定三屠"。

太湖区域人民抗清斗争 顺治二年(1645)六月初一日，吴江进士吴日生和举人孙兆奎等人，听到清兵南下的消息，聚集一千多人，屯兵在太湖边上的长白荡，准备截击清兵。太湖和洞庭湖上的各路义军也纷起响应，一时声势浩大。他们用白布裹头，被称为"白头军"。接着，吴日生就率领"白头军"攻进吴江县城，杀掉降清的知县朱国佐，还与驻吴淞的明总兵吴志葵取得联系，准备共同收复苏州。但由于吴志葵不积极支援，攻打苏州的战斗失败了。清廷听到吴江失守的消息，连忙调集军队前来围剿。吴日生指挥千余只渔船，半路截击，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清廷不甘失败，再派降将李成栋和松江提督吴胜兆层层围剿，吴日生寡不敌众，泅水潜逃。不久，他又回到长白荡，重新整编军队，制旗铸印，设官分职，阵营为之一新，并从长白荡到淀山湖建立了许多白头军抗清的根据地。次年六月，正当白头军准备攻打嘉善时，吴日生由于误中了清知县刘肃之的诈降计，被捕并解至杭州处死。

陈子龙陈湖抗清 陈子龙，字人中，别号采山堂主人，明末清初承先启后的诗人。顺治元年(1644)南明福王政权建立后，他任兵科给事中，上疏革除弊政，引起群小侧目。次年五、六月间，清廷剃发令传到松江府，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民举兵抗清。陈子龙与陈湖诸生陆世钥等起义，聚众千余屯聚陈湖。他们还致书联络吴淞副总兵吴志葵等人，吴率水师三千自吴淞达淀山湖、茆湖间结水寨。明总兵黄蜚也率船千艘、水师二万自无锡来会合。闰六月初十日，陈子龙设明太祖朱元璋像誓师，军号振武。一时间，起义军声威大振。由于起义仓促，准备不周，陈湖义兵与吴志葵水师在苏州、黄蜚在黄浦江先后为清兵击败。七月，松江陷落，陈子龙几乎被俘，携家逃走昆山(今江苏昆山县)，继续从事抗清斗争。顺治四年(1647)五月十三日，他被清军杀害。

隆武王朝建立 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初七日，南明礼部尚书黄道周、南安伯郑芝龙奉明太祖九世孙、唐王朱聿键监国于福州。二十七日，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福州为天兴府，建元隆武(隆武有光武中兴之义)。封黄道周为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郑芝龙为平虏侯，主持军事。这是南京失陷后，南明建立的第二个政权。八月，隆武朝廷君臣议战守，决定把浙闽交界的仙霞岭作为防线，以兵十五万人把守，制止清军南下；招兵买马，编练行伍，准备明春进兵，收复失地，实现中兴。但是，隆武王朝一开始内部纷争十分激烈，郑芝龙一派和黄道周一派互相倾轧，势如水火。尤其是郑芝龙，他之所以拥立隆武帝，是要打着隆武的旗号，政治上扩张势力，经济上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巨大财产，并寻机出卖隆武帝，以投降清朝，换取更大的荣华富贵。因此，郑芝龙把持的隆武王朝和弘光小朝廷一样一事不作，一矢不发，拥兵不战。顺治三年八月，郑芝龙按照与降将、清军五省经

略洪承畴所订密约，尽撤仙霞岭防线的兵力。八月十七日，清军从容 进入福建。隆武帝于二十一日逃到汀州(今长汀县)，二十八日被俘获，并被押回福州斩首。隆武王朝至此复灭。

清改南京为江南省　顺治二年(1645)六月二十五日，摄政王多尔衮下令，改南京为江南省，应天府为江宁府。

赤脚张三反清起义　顺治二年(1645)，赤脚张三领导太湖流域的广大贫苦农民、渔民举行反清起义。他们雄踞在淀山湖、长白荡、澄湖一带，以宜兴作为根据地，经常神出鬼没地出现在苏州、松江、常州，屡次打败清兵。起义者的阶级立场十分鲜明，不断向地主、富户借粮，名之为“打粮”，然后将粮食财物分发给贫苦农民和渔民；对“村农贫人”实行公平交易，获得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十余年间，起义军声威显赫，以致清地方官吏把太湖流域看作可怕的危险地区。直至清康熙元年(1662)，江西巡抚韩心康看到武力不能剿灭张三起义军，就设计命张三相好、辕弁朱允恭邀张三宴会，预置贮满酒的长柏木桶，待张三到达时，突然将酒桶覆张三半身，伏兵齐出将其捉获。不久，这支起义军也被清廷消灭。

张名振张煌言抗清　张名振，字侯服，应天府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明朝灭亡后，他仍丹心赤胆地忠于明朝。顺治二年(1645)鲁王监国绍兴时，张名振立刻率浙江水军归附，被封为富平将军。当鲁王兵部尚书张国维督师钱塘江时，他背刺“赤心报国”四字，率所部参加堵截清军南下的战斗，并收复了富阳、余杭等县。顺治二年，绍兴失守，张名振又率舟师随扈鲁王出海，奔赴舟山。在隆武帝身边作联络、调节工作的张煌言，这时也毅然投到鲁王名下，并与张名振在福建长垣重建临时政权。张煌言，字玄箸，浙江鄞县人。明亡后，他看到国事颓废，投笔从戎，积极投身到抗清事业中。来到舟山后，很得张名振的赏识，做了监军，两人在浙东和舟山一带招集散亡人员，重组抗清部队。顺治四年四月，清松江提督吴胜兆倒戈反清后，张名振、张煌言应约率军北上，攻打南京。不幸军抵崇明时，飓风大作，舟覆人翻，一军尽失。经此挫折后，他俩抗清意志依然未 加衰退，在浙江一带继续抗清。六年，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鲁王无处安身，又由他俩扈随，再次漂泊海外。十月，鲁王回至舟山，张名振被进封太师，主持国政。但由于鲁王政权内部争权夺势，尔虞我诈，加之张名振又自恃功高无比，骄横跋扈，浙江的抗清势力日趋衰弱，舟山于顺治八年九月被清军攻陷。张名振君臣无处安身，于这年底到厦门投靠了郑成功。此后，张名振辅助郑成功，在福建、浙江一带抗击清军，军威日振，又多次进军镇江，师泊金山，威震南京。顺治十二年底，张名振去世，遗言将其军队归张煌言统领。张煌言认为，要战胜强大的清军，必须团结各方，因而努力与郑成功亲近，以求共同对敌。郑成功非常器重张煌言的智谋策略和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两人团结奋斗，并肩作战，使清军闻风丧胆。这在顺治十六年六月的郑成功北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郑成功以招讨大元帅名义，请张煌言为监军，率领十七万水陆大军直抵南京城下，使清廷为之震惊。接着，张煌言亲率一支军队溯长江而上，迅速攻克了芜湖，并在芜湖规划了进军策略，兵分四路，继续向前进攻，同时传檄四方，宣布北伐的意义。不到半个月的功夫，就收复了徽州、宁国、太平、池州四府，广德、和州、无为三州及当涂等二十四县，当地人民也欢呼雀跃，箪食壶浆，纷起响应，江南、皖南地区再次燃起了抗清的烽火。但当张煌言抵达徽州时，却听到郑成功兵败南京的消息，便立即去信慰问和鼓励，要求他不可急忙后退。然而，郑成功由于立脚不住，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这使张煌言在皖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遭到了清军全力进攻，所得城池丢失殆尽，军队被击败四散，张煌言也孤身逃到浙江天台，再也无所作为了。

黄道周督师北伐　顺治二年(1645)七月二十二日，隆武王朝大学士黄道周出师江西。黄道周，字幼平，福建漳浦县人。隆武王朝建立后，他任大学士，很想辅佐隆武帝匡复故土，实现中兴，但受到郑芝龙的排挤和掣肘。面对清军的节节进逼，黄道周看到朝廷倾危，上疏说：“看目前情形，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自请督师北伐。但郑芝龙以饷绌为辞，不肯给予支援。于是黄道周愤而率其弟子千人启行，沿途招集了七八千人。他们没有兵器，就拿着农具、木棒参加战斗。三年(1646)十二月二十四日，这支手无寸铁的队伍抵达衢州、婺源，为婺源县令和降将张天禄的军队诱歼。黄道周被俘后，解到南京，在洪承畴百般劝降下慷慨激昂，坚贞不屈。顺治三年三月，他在明孝陵旁被杀。

荆襄十三家军兴起　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农民军分为两部分：一由郝摇旗、刘体纯、马进忠等领导，一由李自成的侄子李锦(李过)和他的内弟高一功领导。这两部分兵力总共约有四五十万之多，向湖广(今湖南、湖北)荆襄一带进发。由于两部分军队骤然失去了主帅，又面临着险峻的形势：北面有清军的追击，西面有明朝镇守湖广的何腾蛟官军的阻拦，于是，郝摇旗、李锦等人在击败明官军一次围剿后，决定联合明军，共同抵御清军。明湖北巡抚何腾蛟、参

政堵胤锡等极表赞成。顺治二年(1645)九月，何腾蛟即命人携其手书、"持白牌往"湖南湘阴、浏阳间，授郝摇旗、刘体纯、马进忠为总兵官，郝部十余万人由何腾蛟直接指挥，驻守湖南各地，负责抵御向湖南进攻的清军。与此同时，李锦、高一功等在常德与明军堵胤锡部联合。李锦、高一功所带领的十八营共三十余万人，改号忠贞营，归堵胤锡管辖，何腾蛟将这些农民军略加改编，仍保持他们的独立性，令其驻守在湖广荆襄一带，总号十三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荆襄十三家军。

清定茶马交易条例　顺治二年(1645)七月二十四日，清廷准户部奏，于西陲招商市茶，给予勘合，以易"番"马，"酌量价值，两得其平，无失柔远之义"。上年曾定茶马交易条例，每茶一篦重十斤，上马给茶篦十二，中马给九，下马给七。本年起，年差御史辖五茶马司，通接"西番"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如有私茶出境，即捉拿赴官治罪。

汉官交章弹劾冯铨　顺治二年(1645)七月，御史吴达首劾大学士冯铨，拉开了汉官交章弹劾冯铨的序幕。冯铨，字振鹭，又字伯衡，号鹿庵，顺天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人。明万历时期，他官至翰林院检讨，天启时投靠阉党魏忠贤，成为其党羽中的头面人物。清初，冯铨受到摄政王多尔衮的恩宠和重用，因而也就引起了一些反对阉党的汉官的不满。御史吴达在弹劾书中含沙射影地称冯铨是"贪墨败类"，应予废黜。一个月后，弹劾冯铨事进一步扩大。给事中许作梅等三人、御史王守履等六人，交章弹劾冯铨系魏忠贤党羽，仕清后揽权纳贿，应将其斩首。御史李森先言词最为激烈。他一方面把明亡之因与冯铨的历史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刑部对冯铨之罪不敢问的原因，并表示对此类奸相误国深感忧虑，要多尔衮立彰大法，戮冯铨于市，颁告其罪于天下。显然，此次弹劾大有明末党争再现之势。多尔衮对此极为重视，亲自于重华殿审理。当时刑部大臣启奏汉官所劾不实，俱应反坐。当多尔衮面质时，冯铨仰仗多尔衮恩宠，逐条反驳。多尔衮也认为冯铨剃发在先，遵法勤职，功不可没，同时他又出于憎恨臣下结党，偏袒冯铨，严厉斥责了各汉官。廷讯结果，汉官所劾诸事"俱无实迹"，"前朝旧事不当追论"。事过几日，弹劾冯铨的各汉官不是被夺官，就是降调。冯铨在这场风波过后，更为多尔衮所宠信。

孔闻谦疏请蓄发　顺治二年(1645)十月三十日。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谦上疏清廷：孔家服制，历三千余年未改，请准蓄发，以复先世衣冠。多尔衮得疏大怒，立即下旨斥责：剃发严旨，违者不赦；孔闻谦竟敢疏请蓄发，已犯不赦之条，本当从重治罪，但念其为孔圣人后裔免死革职，永不叙用。

顾炎武著"乙酉四论"　顺治二年(1645)，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为响应南明弘光政权的征召，撰写了著名的《乙酉四论》。弘光政权建立后，顾炎武由原明昆山知县杨永言举荐，获得了一个兵部司务的官职，于是他就把复明的希望寄托于弘光政权，撰写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和《钱法论》，合称"乙酉四论"。在四论中，顾炎武从弘光政权立国南京的实际出发，针对明末在农田、钱法和军制诸方面的积弊，提出了一些解救危难的应急措施。在《军制论》中，他提出了"寓兵于农"之法，强调不能尽驱民为兵，否则民怨沸腾，国事将不忍言矣。在《形势论》中，他主张北守徐、泗，西控荆、襄，南通巴、蜀，进而联天下为一，国势可振。在《田功论》中，他指出当前之急务是召民垦田，发展农业生产，以保证军饷。在《钱法论》中，他指出钱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流而不穷。这些措施虽然切实可行，但在当时弘光政权内部文官同室操戈，武将拥兵自重，水火不容的形势面前终于成为泡影。

云南土司沙定洲起事　顺治二年(1646)十二月初一日，云南临安府王弄山(今云南文山县境内)土司沙定洲起事，攻入昆明。先是，明朝灭亡后，黔国公沐天波成为无主孤臣，所辖土司不愿再受节制，沙定洲更是野心勃勃，欲取而代之。顺治二年八月，沙定洲以助剿叛乱的元谋土知县的名义，率兵驻在昆明城外，在经过串通黔府家奴和周密准备后，他于(1646)十一月三十日，攻入昆明，沐天波逃往楚雄，全滇震动。沙定洲又追至楚雄，沐天波又逃往永昌。时明金沧道副使杨畏知驻楚雄，惧沙定洲来攻，遂劝其西攻永昌，而己趁机加紧修筑城池，调集援兵。沙定洲得知此信，舍弃沐天波，再攻楚雄，失利。顺治三年底，他集中庞大兵力，再将楚雄团团围困。正当楚雄汲汲可危多际，大顺农民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的率领下由四川进入贵州，经过激战，沙定洲逃奔临安(今云南建水)，孙可望等入据昆明。顺治四年四月，李定国战败沙定洲，沙定洲被迫投降，解回昆明处死。

朱谊石联合义军抗清　顺治三年(1646)正月十二日夜，江宁(今南京)城内百姓与城外义军里应外合，突然围攻江宁，清军急忙调兵镇压，为首者三十余人被杀。十八日，明潞安王朱谊石、瑞昌王朱谊泐又与义军联合，聚众二万人分三路进攻江宁。由于清军早有准备，这支抗清队伍很快失败。

清廷议谭泰擅隐谕旨罪　顺治三年(1646)正

月十三日，摄政王多尔衮集诸臣在午门议定固山额真谭泰擅隐谕旨罪。早在顺治帝即位过程中，多尔衮就千方百计庇护、拉拢谭泰，谭泰也竭力阿附多尔衮兄弟。顺治元年冬，谭泰随多尔衮胞兄、英亲王阿济格西征时，两人擅自绕道至鄂尔多斯、土默特，索取马匹。阿济格还胁令宣府巡抚李鉴释免因贪酷不法而被逮问的钦犯朱寿鍪，特别是不把顺治帝看在眼里，蔑称为"孺子"。顺治二年(1645)八月二十八日，诏令谭泰会同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聚集百官，宣布阿济格罪状。但谭泰竟擅隐谕旨，也不"集众传示"，被削去公爵，解固山额真任。不久谭泰因与其岳父、固山额真阿山私遣巫者与人治病，被告发。护军统领图赖和鳌拜共议谭泰罪行，并转奏多尔衮。多尔衮亲自在午门聚百官复勘，但耽延三日，迟疑不议定谭泰罪。图赖厉声质问多尔衮：为何三日不议罪？多尔衮恼羞成怒，反斥图赖态度粗暴，举止狂妄。而当诸王要议图赖罪时，多尔衮又装出宽容的样子，赦免了图赖。最后，谭泰也由众议斩首罪改为监禁。

王斌起兵抗清　顺治三年(1646)二月，湖北郧阳南明将领王斌率三千余人响应大顺农民军起事抗清。他们以房县为据点，树明帅大字黄旗于老寨顶上，并设立中军旗鼓千把等官，占据了远近各寨。王斌还遣子与李过联络。三月初一日，清郧襄总兵官王光恩调集重兵攻破王斌的大本营，擒杀王斌及三百六十余名抗清兵士。

清译《洪武宝训》书成　顺治三年(1646)三月初四日，清廷翻译明《洪武宝训》书成，并以顺治帝名义作序，仍刊刻满汉文字，颁布全国。顺治帝在序文中自认清是继承明统治，表示要与天下共遵明朝祖训，显然有收拾汉族地主阶级人心之效用。

清廷制定新进士授官制　顺治三年(1646)三月十七日，清廷批准了吏部右侍郎金之俊的奏请，决定变通明朝进士授官制度，使得"政体人情，俱得其平"。其具体措施如下：新进士除一甲外，二甲前五十名选部属，后二十名选评博中行；三甲前十名选评博中行，十一名至二十名选知州，二十一名至七十名选推官，其余尽数选为知县。

清廷颁布严惩隐匿逃人律　顺治三年(1646)五月初五日，清廷颁布了严惩隐匿逃人律。清廷入关之后，因数万奴仆逃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此等逃亡之人，称为逃人。清廷为维护满洲贵族和八旗利益，颁布了严惩隐匿逃人律，主要内容是：隐匿逃人(即窝主)不行举首，或被旁人讦告，或被地方官察出，即将窝主及邻佑九家、甲长、乡约人等，提送刑部勘问，一旦情况属实，将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窝主从重治罪，其家资无多者，断给失主；家资丰厚者，或全给、半给，请旨定夺处分。首告之人，将窝主家资三分之一赏给，但不能超过百两银。对于本犯之邻佑九家、甲长、乡约均各鞭一百，流徙边远之地。如地方官未能察出窝主，即按怠忽稽察罪降调使用。如窝主自行出首，罪止逃人，余俱无罪。如邻佑、甲长、乡约举首，也将窝主的家资赏给三分之一。七月又规定：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佑流徙，甲长并另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管官及乡约俱可免罪。

王兴起兵抗清　顺治三年(1646)，广东农民领袖王兴在恩平县文安村聚众起义，势力很快发展到恩平、阳江、阳春、开平四个县，并联合了周围的几支抗清武装，以茫茫大海和崎岖山路为屏障，英勇抗击来犯的清军。同时，他们又与广西的李定国、福建的郑成功互相策应，密切合作，有力地支援了永历政权。王兴本人也被永历政权论功升为虎贲将军，爵广宁伯。顺治七年，两广被清军攻占，永历逃亡云南，王兴所部势单力薄，被迫退守文安村。他带领军民一面垦荒屯田，一面仍不时地与清军周旋。直到顺治十五年，清平南王尚可喜派重兵围困文安，历时十三个月，损失数万士兵和无数军械，才将文安攻下。接着，尚可喜派幕僚前去劝降，王兴令兵士"积日漫骂"，声言"吾祖宗累世受明恩"而决不投降。最后，王兴集所部"给资使散归农"，他本人穿上明朝衣冠，与妻妾一起自杀身亡。这次反清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朱大典阖门自焚　朱大典，号未孩，浙江金华人，明神宗万历时期的进士，曾任户部侍郎。南明鲁王监国时，被封为大学士。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贝勒博洛和浙江总督张存仁率兵渡过钱塘江，连陷绍兴、温州、台州等地，进围金华。朱大典率领全城军民奋起反抗，固守月余，清军未能越雷池一步。不久，清军调来红衣大炮，轰开城池，朱大典全家纵火焚死，无一降者。

潞王"谋为不轨"案发　顺治三年(1646)五月十七日，清廷以"将谋不轨"的罪名处死了降清的潞王朱常淓及被俘的弘光帝。朱常淓，号敬一，明神宗亲侄，隆庆五年(1571)被封为潞王。顺治元年五月，弘光小朝廷建立后，潞王住居杭州。次年六月初八日，弘光朝廷被清军推翻的消息传开后，马士英和东林党人黄道周拥立潞王在杭州监国。但潞王是个花花公子，政治上无所作为，监国三天即派人向清军求和，企图以割让江南四郡换取清廷不进兵的诺言。十三日，他在清军的节节进逼下开门迎降，不久被带到北京"恩养"。顺治三年，清廷见抗清力量屡剿不绝，反而以复明为号召风靡各地，决定将弘光帝和潞王

等处死。五月十七日，清廷以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为借口，搜查潞王住处，果然查出潞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于是将潞王及被囚禁的弘光帝等十一位明朝王爷处决。

林起龙请禁“邪教” 顺治三年(1646)六月十一日，吏科给事中林起龙上《请速禁异端讹言疏》。他指出：入清后，兴盛于明代的各种民间教派，如白莲、大乘、混元、无为等蜂起。它们聚众招群，以烧香礼忏秘密联络，“煽惑人心”，有的则与农民军结合在一起，成为抗清的重要军事力量。如不加严行禁止，必将导致政局不稳。清统治者对林起龙的建言十分重视，立即命都察院、五城御史、巡捕衙门及各省督抚、按察使等官：如遇各色教门，即行严捕，处以重罪，做为防微杜渐之计。从此，清廷开始了对“邪教”十分严酷的镇压。

永历王朝建立 顺治三年(1646)十月十四日，南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立明神宗之孙、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以明年为永历元年。十一月十八日，桂王朱由榔正式继位于肇庆，是为永历王朝。这是南明最后一个、也是维持时间最久(达十五)的王朝。永历王朝实质上是一个西南地主阶级抗清派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余部合作抗清的政权。永历帝是一个懦弱寡断、昏庸腐朽、苟且偷安、贪生怕死的人，从一开始就颠沛流离，到处奔跑，没有过一天安稳日子。自顺治四年初清军进入广州，他慌忙从肇庆逃往梧州，接着又先后逃往桂林、全州、柳州、昆明，最后从昆明逃到缅甸。但是，由于南明将领何腾蛟、瞿式耜先后联合郝摇旗、李锦、李定国等领导的农民军余部，进行抗清斗争，两度声势很盛，出现了两次抗清高潮，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永历王朝曾控制了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云南、贵州七省。永历王朝内部派系复杂，纷争不息；统治集团和农民军领袖间也矛盾重重；农民军内部由于孙可望叛变投清，陷于四分五裂，这就为清兵进军西南创立了条件。顺治十六年闰三月，永历帝在吴三桂率领的清军节节进逼下，仓皇逃往缅甸。

清定皇帝行幸迎送礼仪 顺治三年(1646)十月二十日清廷制定了皇帝行幸迎送礼仪：凡皇帝经过地方，文官知县以上、武官游击以上，于本境道右百步外跪迎送；地方官百里内者来朝，百里外者免。

南明政权日本乞师 顺治三年(1646)十月，南明隆武政权东大将军周鹤芝遣使到日本乞师，以抵抗清军。当时，主持日本朝政的撒斯玛王慨然许诺，约定次年四月发兵三万及所需的战舰、军用物资及器械等。周鹤芝大喜，欲派使臣携带珠玑玩好之物，前往日本迎师。这时肃虏伯黄斌卿怕周鹤芝有了外援后势力强大，难以制服，于是就以借重外国兵，可能成为“吴三桂之续”为由加以拒绝。周鹤芝一怒之下回到福建。不久，隆武政权垮台，黄斌卿听从了鲁王政权侍郎冯京第的建议，派他的胞弟黄孝卿与冯京第出使日本，前去借兵。但他们一到日本，就成了官妓院的常客，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而日本由于承平日久，不见兵革之事，不愿派兵渡海作战。其结果，黄孝卿和冯京第只借得数十万贯钱，于次年回到了舟山。

谢迁起义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农民军领袖谢迁在山东淄川一带发动反清起义。他们首先把斗争矛头对准与清勾结的当地地主，没收了地主豪绅张圣鹄的财产、粮食，分给当地贫苦农民，受到农民的拥护，势力发展很快，因而被清统治者称之为山东“第一巨寇”。十二月，他们攻陷了高苑，但遭到清军的追剿，军师赵束乡被擒斩。次年(1647)六月十三日，谢迁和丁可泽率起义军里应外合攻陷了淄川，逮捕了最先剃发和改换衣冠降清、后被革职居家的原任招抚江西兵部尚书孙之獬，当众宣布其罪状并处以极刑。在起义军浩大声势的影响下，清胶州总兵海行时于顺治十年十月向谢迁等投降，参加起义军。接着，他们即由淄川南下，占领莱、沂，攻克宿迁，震动了江淮地区。不久，清直隶、山东、河南总督马光辉率兵围剿，谢迁等领导的起义军寡不敌众，终于失败。

孙可望“反正扶明” 孙可望，本名可旺，陕西米脂县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青年将领。顺治三年(1646)，张献忠牺牲后，孙可望成为大西军的主要领导人。次年三月，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在向云南进军途中，继承张献忠的遗志，相谋“反正扶明”。四月，进占昆明后，孙接受了明云南巡抚杨畏知的劝告，决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之后，他们又建立了大西政权，设六卿，以干支纪年，尊张献忠为“老万岁”，并在昆明建太庙，岁时祭享。孙可望被众人称为“国主”。接着，大西政权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饬军旅，澄清吏治，减轻人民的负担，使西南局势迅速得到了稳定。顺治九年春，大西农民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刘文秀率领进攻四川，另一路由李定国率领进攻湖南、广西，而孙可望则以主帅身份居中策应。大西军将士在抗清斗争中浴血奋战，屡奏凯歌。

绍武政权建立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初二日，南明大学士苏观生等拥戴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𨮁监国于广州。初五日，唐王匆忙称帝，改元绍武。在苏观生的把持下，绍武政权一开始就没有把抗清放

在首位，相反为了争夺帝统，和刚刚建立的永历政权互相火并，兵戎相见。但是，清兵这时已在降将李成栋的带引下攻破惠州、潮州，直向广州进发。(1647)十二月十四日，清军以十四骑伪称援兵赚开城门，大队蜂拥而入。苏观生急召宿卫百余人抵敌。次日，广州落入清军之手，唐王及苏观生等皆自缢。绍武政权仅仅维持四十一天就覆灭了。

郑芝龙降清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十五日，执掌隆武王朝军国大权的郑芝龙至福州，与清军统帅、贝勒博洛折箭为誓，剃发投降。郑芝龙，字飞黄，小名叫一官，福建南安县人。他原是海盗首领，后接受明朝招抚，官至都督总兵官，拥兵数十万，又把持着对外贸易大权，成为福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顺治元年隆武政权建立后，郑芝龙被封为平虏侯，以翊戴元勋、开国功臣自居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拼命征收赋税，兼并土地，增置庄仓五百余所，田园遍闽粤，但对人民和首辅黄道周的抗清斗争却百般制肘，一事不作，一矢不发，终使之失败。顺治三年六月，郑芝龙正随隆武帝在延平(今南平市)，听到清军渡过钱塘江、鲁王政权败溃的消息，立即借口有海盗偷袭，上表辞行，抛弃了隆武帝，同时命令镇守仙霞岭的南明军撤离。这就使清军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于九月十九日进驻福州。接着，清军统帅、贝勒博洛以"铸闽广总督印以待将军"为诱饵，派人招降郑芝龙。郑芝龙大喜过望，不顾儿子郑成功及部下的极力反对和再三劝告，带领五百人降清。但不到三天，他就被送到北京，不仅没有得到闽粤总督(只被封为同安侯)官位，而且实际上还被软禁起来。之后，郑芝龙屡次被利用为招降郑成功，无奈成功抗清意志坚决，不为所动。于是清廷就把郑芝龙关进监狱，而把他的胞弟及其家属遣戍宁古塔。顺治十八年(1661)九月二十四日，郑芝龙家人尹大器告发他与郑成功书信往来，漏泄军机，图谋不轨，顺治帝决定将他免死，流放宁古塔。次年康熙帝即位，清廷认为郑芝龙已毫无作用，最后将他和子世恩等十余人斩于京师菜市。

顺治封琉球国世子为王 顺治四年(1647)，琉球国中山王尚贤病逝，弟尚质自称世子，"遣使奉表归诚"。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初七日，尚质遣使进贡方物，缴故明所封敕印，并请颁新敕印。七月初一日，顺治帝遣兵科副理事官张学礼等携敕印封尚质为琉球国中山王，赐其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并颁定贡期：每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名，允许正、副使二员及从人十五名入京，其余人员俱留福建待命。

"广东三忠"抗清 "广东三忠"系指南明永历朝兵科给事中陈邦彦、崇祯朝罢官归里之大学士陈子壮和南明隆武朝监军御史张家玉。顺治四年(1647)二月，在广东各路抗清义师风起的大好形势下，张家玉到广东，亲率农民军攻克东莞、新安，陈子壮约会花山农民军起兵于南海县的九江村，陈邦彦会合农民军首领余龙起兵于高明。当时清将李成栋尽其精锐，直追永历帝于桂林，而总督佟养甲留守的广州兵少将微，城内空虚。陈邦彦认为这正是明军图谋收复广州的良机，于是与陈子壮、张家玉等约定本年的七月初七日举火为号，同时攻城。不料，陈子壮却提前两天到达广州，一举攻克了西郭炮台。佟养甲大惊，一方面亲自守城，迅速清除了城内的接应者；另一方面急调李成栋回援。陈子壮见事机败露，遽然撤军，退守高明；后至的陈邦彦见状也只得奔三水，并于八月攻占了清远。八月二十日，清军攻占了高明，陈子壮被执不屈，为佟养甲所杀。九月，清军攻入清远，陈邦彦被俘，月底被害。十月初十日，张家玉在广东增城战败自杀，南明在广东兵力几乎丧尽。

《大清律》颁行全国 顺治四年(1647)三月二十四日，《大清律》修成，颁行全国。《大清律》是在清廷入关后，承袭《大明律》而编定的清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大明律》的翻版，与清初现实的情况相脱节，所以在颁行之初并未认真执行。又由于《大清律》竭力维护满官的特权地位，吏部对处分满官没有律例可行，导致吏治渐趋腐败。为整饬吏治，顺治十二年，清廷决定参照明朝的会典，编为"简明则例"。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廷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使《大清律》日趋完备。

吴胜兆图谋叛清 顺治四年(1647)四月十五日清松江提督吴胜兆策划叛清事泄。先是，吴胜兆因在吴日生牺牲后，收编了一部分抗清义军，势力不断雄厚，屡遭清廷疑忌，于是对清怀有二心。此时，在胜兆营中的吴日生谋士戴之儁趁机劝其叛清归明，为胜兆所接受。接着，戴之儁亲往舟山，联络了南明军黄斌卿和明户部郎中沈廷扬。双方约定：沈和鲁王方面的张煌言、张名振率领南明军队，由海路北上，攻打松江，吴胜兆在城内接应。不料，沈、张的军队在海上遇飓风，军士溺死过半，不能如期与胜兆会师。四月十五日，吴胜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谋叛"，杀死了清推官方姓、同知杨姓后，即被督标将官高永义等生擒，所铸"伪印"也被搜获。不久，高永义将吴胜兆及其同伙陆冏，解往南京处死。沈廷扬和张名振、张煌言的军队也为清军击溃，沈廷扬被俘牺牲，二张逃脱性命。

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抗清 顺治四年(1647)底,江西、广东的降清明将金声桓、李成栋在当地抗清形势的影响和鼓舞之下,倒戈抗清。金声桓,原为左良玉手下麾将,后随其子左梦庚降清,率军进据江西。自以为功高无比,不但未封公侯,只得了个江西提督总兵官,并且还受到巡抚章于天的监视和牵制。顺治五年(1648)正月二十七日,金声桓举兵叛清,杀死章于天,出榜安民,拥护永历政权,又派人劝说两广提督李成栋。接着,金声桓攻下九江。由于他拒听谋士的劝告,未能溯江而上,控制长江的上游,反而率师攻打赣州,误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使清军赢得了喘息时间。不久,清都统谭泰率军自江宁(今南京)进讨,连陷九江、饶州,金声桓狼狈回师南昌,困守孤城。次年(1649)正月十九日,清军攻陷南昌,金声桓在其府中投水死。李成栋,原为史可法部将,后率军降清,他在顺治三年率清军攻打广州的战斗中立有汗马功劳,但因求授高官不得,于顺治五年(1648)四月初十日叛清归明,亲迎永历帝至广东。然而他未能利用当时大好的抗清形势,出兵江西和金声桓的力量汇合,反而忙于在永历小朝廷内争权夺势。当清军围困金声桓于南昌时,李成栋受永历帝之命前往救援,在赣州之役中误中敌计,先自策马奔逃,被迫退驻赣州的信丰。顺治六年二月被清军包围。二十六日李成栋率领所部在突围时渡涧溺死。

谈迁重修《国榷》 谈迁,原名以训,号射父,字仲木,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他平生爱好历史,尤喜治明史。他鉴于明朝官修史书失实较多,私史又讹陋肤冗,立志编纂一部详实有据的明朝史学,并从明天启元年(1621)开始,以历朝实录为基础,参阅三百余种私家著述、地方志乘,历时六年,六易其稿,写完了元末明初到天启朝的历史《国榷》,计一百卷。清初,谈迁又根据邸报、见闻续完崇祯和弘光两朝历史,使《国榷》成为一部完备的编年体明史。不料,顺治四年八月,书稿被人盗走,谈迁在悲痛之余又鼓起余勇,重新搜集资料,刻苦编纂,五年后,《国榷》终于重修完毕。

清定绿营兵月饷 顺治四年(1647)八月二十八日,清廷制定了绿营兵月饷:每名每月凡有马战兵二两,无马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不久又规定,不论战守之马步兵,每名每月均加给米一斗。

丁维岳张尧中起义 顺治四年(1647)九月,山东兖州农民丁维岳、张尧中率众举行反清起义。他们将起义军分作六股,分别攻打张秋、郓城、堂邑、阳谷、冠县和梁山。九月十三日夜,起义军中的两支部队攻克了寿张、堂邑,杀了清东兖道陈一理家眷男妇二十余人。丁维岳则亲自领一支义军进攻张秋,并准备克张秋后进攻梁山。不料清军早有准备,巷战一夜,义军伤亡惨重,"尸与门齐",丁维岳左脸受伤,率军退守濮州、范县交界的陈家楼。接着,清军包围了陈家楼,采用了诱使义军移营的办法,杀得义军"尸满地",损失了三四千人。十一月十二日,丁维岳又率农民军马兵四百余人、步兵不知其数,突然袭击峄县县城,清守军势不能敌。次日城破,起义军蜂拥进城,打开监狱,释放狱囚;又打开仓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十二月,义军又先后攻克了阳谷和梁山。十五日,清军征剿梁山,次日在郓城王家海子与义军进行了一场激战,结果丁维岳、张尧中同时阵亡,这次起义至此失败。

长城留设台座 顺治四年(1647)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规定长城应留台座和设兵丁之数:长城自张家口关门至西黄河至东,共一千四十五里,应留台二百四十四座,每台设军丁三名,共七百三十二名,其余台一千三十二座不用;又自张家口起东至山海关止,共二千四百四里,应留台四百一十七座,每台设军丁三名,共一千二百五十一名,余台二千四百五十座不用。另,凡系捕鱼网户耕种往来之路及民间运木之路及,与鄂尔多斯部交易之地共留关口八处,其常峪、独石等十一口均堵塞。

宁波爆发"五君子翻城之役" 顺治五年(1648)初,宁波"六狂生"中华夏、王家勤和当地士子杨文琦、屠献宸、董德钦(时称为"宁波五君子")听到清驻防浙江的军队调往福建的消息后,欣喜若狂,派人联系四明山大岚山寨王翊和舟山明将黄斌卿,企图里应外合地夺回宁波。但怯懦无用的黄斌卿犹豫不决,不敢出兵;而给王翊的信,中途又被降清地主分子截获报知清军。五君子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贸然发动起义,当即失败。五君子也都被清军俘获,送到杭州,严刑审问,始终不屈,最后壮烈牺牲。

南明大学士朱继祚抗清 顺治五年(1648)正月,南明大学士朱继祚起兵抗清。朱继祚,福建莆田人,隆武政权建立后任东阁大学士。后隆武政权瓦解,他奔还乡里。鲁王即位后,福建一些州县纷起响应,朱继祚也会同鲁王政权的同安伯杨耿合攻兴化。守城监司彭遇飏令将士出战,自己则登城"易明旗帜",出城迎战将士见状撤离,朱继祚顺利地占据了兴化。三月,清军大举反攻,朱继祚等抵敌不住,失败后自杀。

朱容藩称监国于夔州 顺治五年(1648)正月,故明宗姓朱容藩称监国于夔州,建立行宫,大封群臣。南明四川总督吕大器得此消息,兴兵讨伐。次

年春，朱容藩兵败自杀。

四明山大岚山寨反清 顺治五年（1648）春，鲁王监国职方主事王翊等谋袭宁波，事泄，遂以所募之兵来到浙江东南四明山中的大岚山，得到了会聚当地的由黄宗羲领导的义军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依砦结寨，攻破上虞，砍杀清地方官吏，震动了浙东地区。不久，因降清的地主团练军的袭击，起义军遭到了一些挫折，上虞失守。王翊为了壮大义军的势力，积极联合了浙东各路义师，又吸收一万多农民参加。至次年春，起义军接连大败清军，再破上虞，占据了四明山方圆八百里，势力发展到东边的奉化。接着，王翊等人又制定了一些措施，把起义军分成五营和五司。五营专管军事训练；五司专管筹饷，领导义军战士和当地农民开荒种田，不到一年时间，当地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军事力量也大为增强。顺治七年冬，清廷调集两路重兵，一路由奉化、一路由余姚同时出动，将大岚山寨团团围住，并采取了野蛮的洗山暴行。起义军虽然英勇顽强地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失败，王翊也被俘牺牲。此后，四明山区的农民抗清斗争依然持续不断，直到康熙年间还有一些零星的起义发生。

甘肃回民起义 顺治五年（1648），甘肃发生了由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回民反清起义。米喇印、丁国栋原是明朝驻防甘州等地的军官，降清后因对剃发令不满，开始酝酿起义。顺治五年三月，他们乘清军入川之机，杀掉甘肃巡抚张文衡、总兵刘良臣等人，在甘州起兵抗清。接着又攻克凉州（今武威），控制河西走廊；再克兰州，拥立明延长王朱识𨰿，各地回民、一些明遗臣和士绅青衿纷纷响应，义军人数迅速增至十万，号称百万。在各地群众配合下，义军又连克狄道（今临洮）、渭源、河州（今临夏）、洮州（今临潭）、岷州（今岷县）、金县（今榆中）等地，包围了巩昌。清陕西总督孟乔芳得知消息后，立即率兵前往镇压，双方在巩昌城下激战半日，义军伤亡惨重，被迫解围西撤，驻防安定、狄道、岷州、洮州一线。四月下旬，义军在清军主力的围剿下，接连丢失安定、狄道、岷州、洮州，退守兰州。五月中旬，清军攻陷兰州，俘获朱识𨰿，米喇印、丁国栋退守凉州。六月，米喇印在与清军激战中牺牲，凉州失陷，丁国栋退守甘州。顺治六年二月，被清军围困半年之久的甘州失陷，丁国栋又撤往肃州（今酒泉）。直至年底肃州被清军占领，丁国栋被俘牺牲，坚持了一年零八个月的甘肃回民起义才宣告失败。

佟图赖戮力佐清创业 佟图赖是最早投靠满族贵族的辽东大姓佟氏家族的第二代，佟养真的次子。在清廷定鼎北京后，他积极参与了镇压李自成农民军和扫荡明朝残余势力的战事，“身经百战，遍体创痕”，为清统治者立下赫赫战功，为清朝在中原地区统治的建立与加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因此而受到清廷的特殊礼遇和褒扬。顺治五年，佟图赖被授予定南将军，顺治八年又被顺治帝授予礼部侍郎，晋封三等子爵，后又加太子太保，顺治十五年（1648）去世。他死后，佟氏家族的子孙继续为清统治者效命，并屡立功勋。佟氏家族还继续和清统治者联姻。佟图赖的女儿是顺治帝的皇后、康熙帝的生母。这样，佟氏家族在清前期形成了一个依靠军功起家的军事贵族集团和外戚群体，对清廷内政、军事方针起过重要作用，一时有“佟半朝”之称。

清廷禁止高利贷 顺治五年（1648）闰四月十三日，清廷下令禁止高利贷。顺治初年，高利贷在农村十分活跃，地主、官僚、商人大肆进行高利贷剥削，往往利倍于本，利复起利。清廷为缓和阶级矛盾，下令禁止高利贷剥削。规定：今后一切债务，每银一两只许月息三分，不准多索及息上加息；不准放债予赴任之官；禁外任官放债予民，如违犯，双方俱治重罪；诸王府商人及旗下官员家人不准在外省贸易，盘剥百姓。

清定编审人丁制 顺治五年（1648），清廷为周知天下“生民之数”（即户口），以征收丁赋，制定了编审人丁之制。规定每三年编审一次（十三年又改定为五），责成州县印官照旧例造册。以百一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厢，在乡曰里，各有长。凡造册人户，各登其丁口之数，而授之甲长，甲长授之坊、厢、里长，上之州县，州县合而上之府，府别造一总册上之布政司。民年六十以上免除丁赋，十六岁以上（俗称丁）起征。凡户籍有四种：军、民、匠、灶，各分上中下三等。丁分民丁、站丁、土军丁、卫丁、屯丁，总其丁之数而登黄册。督抚据布政司所上各属之册，呈达户部。顺治十一年（1655）十一月三十日，清廷又从户部议，命各省自顺治十三年为始编审人丁地土；各省责成于布政使司，直隶责成于各道；编审时要逐里逐甲查审均平，详载所征丁赋的原额、新增、开除、实在四项数目，造册报呈户部。

天津女英雄张氏抗清 顺治五年（1648），天津女英雄张氏自称明天启帝的皇后，与其同党王礼、张天保印制玉印、令旗，组织抗清队伍。他们联络静海一带的农民军，不断抗击来犯的清军。五月二十四日，张氏、张天保等被俘牺牲。张氏牺牲后，其部下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天津巡抚李犹龙十分畏惧这股抗

清力量，采取了与农民军首领在营中"会饮"的办法，以拉拢关系，试图进行招抚，为清廷发觉，被革职为民。最后清廷调来重兵，农民军因众寡悬殊，坚持到次年初失败。此后，清廷十分重视在天津加强统治力量，派驻重兵，严密监视人民的行动。

于七起义 于七，本名小喜，又名孟熹，山东栖霞县人，清初胶东农民抗清斗争的著名领袖。顺治五年(1648)，他以栖霞县东七十里的锯齿山为根据地，聚众抗清。于七一方面经常率军出击骚扰清军，另一方面又"割富济贫"，除暴安良，打击当地豪绅地主，得到登州地区农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成为当地实力最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被清统治者称之为"诸寇冠"。登州知府张尚贤自知无力剿灭，被迫采取招抚政策，授于七为栖霞县把总。于是，于七利用合法身份广泛交结各阶层人士，暗中组织力量，以图大举。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于七在宁海州(今牟平县)、墨县和海阳县建立了三个据点，势力不断增强。顺治十八年春，按察使宋琬侄赴兵部首告于七和其叔交结，图谋不轨，使清廷大为震惊，急令官兵往捕于七。十月，在于七的领导下，各据点同时发难，登州府属各县瞬间也举起了抗清大旗。他们攻福山，围文登，"焚劫八邑"，给清军以沉重打击。康熙元年(1662)春，清兵云集，围困锯齿山。于七团结军民，身先士卒，骁勇善战，给义军以极大鼓舞。他们坚守两个月后，突围入海，于七下落不明。

清廷始设六部汉尚书 顺治五年(1648)七月十四日，清廷始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在此之前，六部只有满尚书各一员。此时，清廷为了加强对汉族地主的利用与依赖，决定满汉官员共同管理六部，增设汉尚书，以陈名夏为吏部尚书，谢启光为户部尚书，李若琳为礼部尚书，刘余佑为兵部尚书，党崇雅为刑部尚书，金之俊为工部尚书，徐起元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六部汉尚书虽然设立，但终顺治一朝并无实权，只是备员而已，真正的实权仍然掌握在满尚书手中。

清廷许满汉通婚 顺治五年(1648)八月二十日，清廷下谕旨说，当今天下一家，为使满汉官民互相亲睦，允许缔结婚姻。九月十三日又规定：嗣后凡满洲官员之女欲嫁汉人者，须先呈报户部；其无职者之女，凡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户部后方能出嫁，无名者听各牛录章京自行遣嫁；汉官之女欲嫁满人者，也要报户部，无职者听其自便；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

何腾蛟死难 顺治五年(1648)初，金声桓、李成栋倒戈反清后，即和南明军堵胤锡、农民军李过、高一功、刘体纯等共推明湖广总督何腾蛟主盟，出兵北伐，共同抗清。这年八月间，何腾蛟率军攻克永州、衡州，明军马进忠和李过、高一功等相继收复了常德、桃源、澧州、荆门、宜城等州县，湖南失地大部恢复，抗清形势大好。然而，当何腾蛟欲联合各部进攻长沙的重要时刻，与马进忠有隙的堵胤锡却于十月突然令马撤离常德，由李过、高一功等进驻。马进忠骄纵成性，迫于军令不得不服从调遣，但又惧怕堵胤锡和农民军并吞，于是大掠常德西走。这一举动使南明内部矛盾激化，南明军大乱，湖南新复州县为之一空，整个局面顿时混乱至不可收拾。何腾蛟闻讯大惊，轻车至湘潭以调解各方矛盾。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堵胤锡率李、高渡湘江而东走吉安，声援南昌金声桓；一路何腾蛟率马进忠等围攻长沙。次年二月，堵胤锡等离开湘潭后，马进忠部尚留湘乡，使湘潭无兵成为一座空城。清总兵徐勇侦知此事，率轻骑偷袭，捕获何腾蛟。何在清军的诱降面前，坚贞不屈，一再表示"头可断，心可剖"，决不投降。清军主帅知不可强求，于是杀害了何腾蛟。

永历朝"五虎"干政 顺治五年(1648)八月，永历王朝由桂林迁回肇庆后，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日趋激化。以"反正功臣"李成栋为核心，勾结给事中金堡、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及丁时魁、蒙正发、刘湘客等组成"楚党"；以"扈驾元勋"朱天麟、吴贞毓为首组成"吴党"。吴楚两党置抗清大业于不顾，争权夺势，相互攻讦。李成栋父子欲独霸朝纲，跋扈横行，支持、纵容金堡等五人终日聚会，使朝廷政令多从其议。吴党恨之入骨，称五人为"五虎"。其中，金堡因谏言激愤尖刻，切中时弊，最为"可畏"，被称为虎牙。余者，袁为虎头，丁为虎尾，刘为虎皮，蒙为虎爪。五人在朝廷独断专擅，有"言非虎党不发，事非虎党不成"，朝廷"遂成虎市矣"。实际上，五虎中除袁、丁不是正派人士，其它三人所为有力挽颓波一面，不能一笔抹煞。顺治七年初，永历帝在清军连克南雄、韶州，向肇庆进发时，仓皇逃至梧州，并召吴党靠山陈邦傅入朝。吴党骨干吴贞毓等趁此时李成栋已死、五虎势孤之际，纠集十二人，合参五虎犯了十大罪。于是，永历帝大兴党狱。除袁彭年免议外，金堡四人被捕。金堡备受酷刑，坚贞不屈，丁、刘、蒙三人大刑未动，自乞哀招供。此后，宦党马吉翔等人的势力抬头，左右了永历朝政。

清禁民间养马制军器 顺治五年(1648)八月十五日，清廷鉴于各地抗清义师"偷制器械，私养马匹，毒害良民，作为叛乱"，禁止民间蓄养马匹、制造或私藏军器。规定：民间蓄养的马匹，地方官估值给

价，作为清军坐骑；甲胄、枪刀、弓矢器械，可用者收贮，不可用者尽行销毁；有不遵禁谕私自隐匿兵器、马匹者，均作"叛逆"，一经查出或被告发，本人处斩，家产妻孥入官，邻佑十家长杖流；凡习武生童及武举等，只许马一骑、弓一张、披子箭九枝，不准用梅鍼箭，如借人事发治罪。顺治十二年(1655)九月初十日，清廷又重申禁止私贩马匹：嗣后蒙古卖马，只许各旗兵丁人役买用。如有马贩私买者，凡属满人则责成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等，汉人则责成五城并司坊等官严行禁缉。如禁缉不严，被人捕获，将所贩之马三分之一给捕获之人，余皆入官，牛录章京、骁骑校、小拨什库、司坊等官及贩卖者、买养者一并下刑部从重议罪。

姜瓖据大同叛清　顺治元年(1644)六月初六日，故明大同总兵姜瓖降清，仍镇守大同。之后，他便随清军赴陕西，征剿大顺农民军。他不但得不到重赏，连军饷的供应也成问题，而且还受到清廷的猜疑和训斥。当时，山西农民军反清声势浩大，使姜瓖受到很大触动，开始"蓄异志"。顺治五年九月，清廷为防喀尔喀蒙古越过边界，派英亲王阿济格率军驻防大同，这招致姜瓖的猜疑，以为袭己。于是，姜瓖自称大将军，于(1649)十二月初三日据大同叛清。大同左卫(今左云)、浑源、太原、汾州(今汾阳)、泽州(今晋城)等地农民军竞起响应，清朝许多地方官吏望风归降，一时全晋震动。摄政王多尔衮得到山西突变的消息后，一面增派八旗官兵，载红衣大炮急赴大同；一面对姜瓖进行劝降，同时又对姜瓖部下进行分化离间，诱使他们倒戈。顺治六年三月十二日，多尔衮亲至大同督师，再次对姜瓖劝降。姜瓖虚与周旋，多尔衮正要亲自指挥攻城，奉清廷急召回京。清军在敬谨郡王尼堪的指挥下，继续围困大同。七月初一日，多尔衮率师亲征大同。大同在清军长期围困下，城内弹尽粮绝，死者枕藉，部下发生了骚乱。姜瓖部将杨振威于八月二十三日密通多尔衮，二十八日斩姜瓖及其兄弟首级，献城投降。

礼亲王代善逝世　顺治五年(1648)十月十一日，礼亲王代善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六岁。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次子，身历太祖、太宗、世祖三代四朝，地位显赫，爵高权重，曾参与了自满洲兴起至清朝建立前后诸时期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对清朝的发展作过重要贡献，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开国功臣。

清廷追尊太祖以上四世为帝后　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初八日，清廷追尊太祖努尔哈赤以上四世为帝后：高祖泽王为肇祖原皇帝，母为原皇后；曾祖庆王为兴祖直皇帝，母为直皇后；祖昌王为景祖翼皇帝，母为翼皇后；父福王为显祖宣皇帝，母为宣皇后。十一日，诸王大臣纷纷上表章称贺。顺治帝于是颁诏，大赦天下。其诏条例共四十款。其中规定：豁免顺治元年至三年百姓拖欠的钱粮；逃人及其隐匿者，凡于顺治六年八月以前自归免罪，九月以后自归或被人告发者不免罪；惩治贪官污吏；对灾民实行蠲免。

明九江生员起兵抗清　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明九江生员金志达和僧了悟等率当地农民万余人抗击来犯的清兵。他们在鄱阳、彭泽之间结营扎寨，进占池州，又攻取东流、建德，一时声威大振。但不久，他们在清军节节进攻下，丢掉了一个又一个地盘，直至失败。。

满族贵族获得"世袭诰命"　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十一日，顺治帝下诏旨说，满族贵族自开国以来，屡世出征，著有劳绩；命各部将他们分别升叙，实授官员，一概给与世袭诰命。这个规定，使满族贵族不仅本人获得了特权地位，而且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并使这种特权地位永远继续下去。

函可创冰天社和弘扬佛法　函可，字祖心，别号剩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遁入空门，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僧。函可因在顺治二年写的《再变记》，揭露清兵南下时的暴虐罪行，而触怒了清统治者，于顺治五年四月发遣沈阳戍所，"奉旨焚修慈恩寺"。此后，他虽处困扼之中，但壮志不消，与陆续发遣来的明朝遗民壮士交往日密，共抒感慨。顺治七年十二月底，函可借流人、南明使臣左懋第之兄左懋泰生日之机，创立了东北第一个文人结社——冰天社。它虽然仅活动两次，但影响深远，沟通了遗老流人间的思想，推动了他们日后的频繁往来。另外，函可由于对佛教经典的谙通和渊博的知识，受到了当地佛教界的重视。顺治九年三月，他在沈阳各大寺院监院等在内的众僧联名请求下，陆续主持七大寺刹宣讲佛法。他对佛教教义的讲解很有独到之处，指出佛门不是躲身之处，也不是藏愚纳拙之地，"既入佛门便当作佛"。他将儒家思想揉入佛教，告诫弟子实践忠孝节义便是作佛。函可对佛教教义深入浅出的阐发，深深地吸引了广大僧俗听众，"趋之者如河鱼怒上"，因而被称为辽沈地区弘扬佛法的"开宗鼻祖"。

按月编六科史书制度建立　顺治六年(1648)，《明史》总裁刚林鉴于清初明朝官方史料散失殆尽的教训，建议六科每月汇集奏折及谕旨录送史馆，由翰林官分别编纂，供修史时采用，得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批准。清朝由此建立起按月编纂六科

史书的档案制度。

清修《太宗实录》 顺治六年(1649)正月初八日，清廷命纂修《太宗实录》，以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祁充格、洪承畴、冯铨、宁完我、宋权为总裁官，学士王铎、查布海等人为副总裁官。

河北蔚州饥民啸聚起事 顺治六年(1649)正月，在河北农民军抗清斗争浪潮的鼓舞下，蔚州的饥民、逃兵也啸聚起事，组成大营和小营，大营共分十九营，总人数约为五六千人；小营十三营，总人数约二千人。他们平时骚扰清军后方，搅得清军不得安宁；而当一闻清军进剿时，则积极准备炮火、刀枪、旗帜上阵。清统治者哀叹说："居民为盗者十之七八，势难杀尽"。

山西农民军抗清 顺治六年(1649)四月间，山西农民的抗清斗争"蜂起横逞"。在晋东南，抗清队伍有十数万，攻陷汾州府，截断平阳、潞安两府大路，附近州县望风响应；在晋东北，五台、繁峙、宁武的农民军与义军，攻占忻口，围困崞县；在晋西北，抗清义军占据了偏关、河曲、兴岚等县至汾州府属"延袤千里"之地。清军被迫龟缩于太原孤城，陷入四面包围之中。五月，清廷急遣端重亲王博洛为定西大将军，率大军进剿山西，援救太原。起义军人数虽众，但由于分散各地，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因而极易被清军各个击破。六月，清军攻下了平阳和汾州等州县。七月初，清廷又增派亲王满达海、郡王瓦克达率军征山西朔州、宁武。七月底，平阳府和汾州府农民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清起义，清廷急令陕西总督孟乔芳率军增援博洛、满达海。经过多次激烈战斗，清军攻克了朔州、蒲州、临晋、河津等地，又收复了平阳、汾州、太原三府半数以上的地区。九月下旬，博洛、满达海合军攻克了汾州、兴岚等州县。至次年四月，清军陆续攻克了被农民武装占据的其他州县。从此，山西全省的抗清斗争日趋低落。

清廷两封朝鲜世子为王 顺治六年(1649)六月，朝鲜国王李倧病逝。八月二十日，清廷遣礼部启心郎渥赫等去朝鲜祭李倧，赐谥号"庄穆"。同一天，又遣户部启心郎布丹、侍卫撒尔岱为正副使，赉诰敕往封世子淏为朝鲜国王、妻张氏为王妃。十六年五月，李淏病逝。九月二十日，清廷遣工部尚书管侍郎事郭科、礼部侍郎祁彻白前往朝鲜祭李淏，赐谥"忠宣"。同一天，又遣大学士苏赫德、吏部侍郎觉罗硕博会为正副使，往封世子李棩为朝鲜国王，妻金氏为王妃，并送给他们鞍马、貂裘、彩币等物。

李过病逝 顺治六年(1649)七月，大顺农民军统帅、南明兴国公李过病逝。李过，又名锦，李自成之侄，少从自成起义，反对明朝的腐败统治。大顺政权建立，他受封亳侯，为大顺军主要将领之一。李自成牺牲后，他率大顺军和明将何腾蛟、瞿式耜联合抗清，所部被称为忠贞营。隆武政权建立后，隆武帝赐其名为赤心，封为兴国公。李过在抗清斗争中英勇不屈。清统治者在顺治二年一年中"招抚"他六次，结果"人信不还"，表达了坚定的抗清决心。他率领的大顺军和明军精诚合作，多次打败清军，有力地支持了南明各政权。李过因病去世后，大顺军由高一功率领，继续进行抗清斗争。

常若柱弹劾牛金星 顺治六年(1649)八月十七日，户科给事中常若柱弹劾降清的原大顺农民军大学士牛金星父子，其罪名是：牛金星追 随李自成为"贼"，"弑君残民，抗拒王师"；牛金星之子、湖广粮储道牛铨与其父为"贼"，又为官贪婪肆虐，赃私多达巨万。父子二人同为万世罪人，必须申以国法。清廷接到奏疏后，以投诚之"流贼伪官"多能为朝廷效力，不允常若柱所请。九月初一日，清廷又以常若柱参劾牛铨失实，将其革职。

耿仲明自尽 顺治六年(1649)十一月二十七日，清靖南王耿仲明在南下征广州途中，于江西吉安自尽。先是，清刑部查获耿仲明属下牛录章京魏国贤、旗鼓刘养正、梅勒章京陈绍宗等人私自收留、隐匿逃人，于罪当死。顺治帝得知消息，极为震怒，便下旨严责耿仲明纵属下诱掠逃人，是犯不赦之条，命其"严察械归毋隐"。耿仲明接旨后大为惊恐，立即严察此事，并上疏请罪。刑部议定仲明当削王爵，罚白银五千两。清廷因东南频繁用兵，需要耿仲明等继续为其效命疆场，下令对耿仲明从宽保留王爵，对陈绍宗等人也免死。但是，耿仲明未等清廷宽大命令下达，即在江西吉安自缢而亡。他死后，摄政王多尔衮怒其自杀，不准其子袭爵。直至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后，他的长子继茂才得以袭王爵。

清定王以下园田数 顺治七年(1650)，清定出王以下园田数目：亲王八所，郡王五所，贝勒四所，贝子三所，公二所，每所有田一百八十亩。将军给田具体数目为：镇国将军二百四十亩，辅国将军一百八十亩，奉国将军一百二十亩，奉恩将军六十亩。凡给过园地的王、将军停止供应其家口粮米。清廷还制定了公主、郡主及驻防官兵、壮丁的具体应得田亩数目。

朱慈叶聚众反清 顺治七年(1650)正月，南明德化王朱慈叶、石城王朱议涉在福建聚众反清，攻陷大田。浙闽总督陈锦闻讯遣军进剿，擒斩朱慈叶、朱议涉。

清建柔远馆驿 顺治七年，清廷在福建建立了柔远馆驿，以供来京朝贡的琉球使臣途中居住。

郑成功在厦门建立抗清基地 顺治七年(1650七月)，郑成功在厦门建立抗清基地。郑成功，原名森，字大木，郑芝龙子。年少聪颖，颇得隆武帝的赏识，赐姓朱，改名成功，因此被称为"国姓爷"。郑芝龙降清，成功苦谏不听，于是在广东南粤招兵买马，打出"背父救国"的旗号，组织抗清义军。顺治四年正月，郑成功自南粤募兵返回福建安平，会故臣将吏设明太祖帝位，矢盟恢复大明江山。他自称"招讨大将军罪臣"，设官分领各军，闽中旧将"多归心"，势力日渐强大。永历称帝后，郑成功又奉永历年号，先后被封为威远侯、延平侯。自顺治四年至七年(1647－1650)，他率领海上义军，连破福建的同安、海澄、漳浦、泉州及闽南沿海一带地方，进据金门、厦门。郑成功把厦门改名为思明州，成为抗清的政治中心和基地。他在厦门设立"六官"分理庶政，遣官在各地征集粮饷和兵器，分其军为左、右、前、后、中五军，自领中军。此后，金、厦地区的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社会经济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抗清义军不断壮大，势力扩大到广东的潮州、潮阳、惠来、揭阳一带。

俄军入侵黑龙江流域 明末清初，俄罗斯帝国的侵略势力开始向我国黑龙江流域发展。顺治年间，他们多次派兵侵入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不断在达斡尔、朱舍里、赫哲、费雅喀、索伦和蒙古等族居住区内烧杀抢掠，遭到各族人民的坚决抵抗。顺治七年，俄罗斯侵略者攻占达斡尔族首领阿尔巴札驻地雅克萨，还企图派人"劝说"中国皇帝"归附"俄罗斯君主，向其交纳贡赋。顺治八年七月，侵占瑷珲旧城。顺治十一年初又曾占领尼布楚，后在当地蒙古、索伦族人的坚决反抗下，被迫撤出。顺治十五年，再度攻占了尼布楚。

瞿式耜抗清殉节 顺治七年(1650)十月，瞿式耜在广西桂林被清军执杀。瞿式耜，字起田，号稼轩，常熟人，崇祯时为给事中，南明弘光政权时任广西巡抚。永历政权建立后，他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竭诚拥护永历帝，奠都桂林，力图重兴明朝大业。然而，永历帝从无大志，昏昏然苟安于一时，一听到风声紧急就仓皇逃窜，拒绝了瞿式耜的多次规劝。加之永历王朝由于内部党争激烈，置抗清大局于不顾，一味并吞异己，逼走大顺农民军，更加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顺治七年十月中旬，清定南王孔有德率军逼近桂林，督师瞿式耜急令南明军赵印选出师，但赵部却离城逃遁，其余各部也争先奔窜，桂林空无一兵。时总督张同敞回城商议对策，瞿式耜坚定地表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使张同敞深受感动。于是两人冠带，张灯备酒对坐大堂。十一月初五日黎明，清军入城，将二人抓获。孔有德百般劝降，终无一获，最后在独秀山下将瞿式耜、张同敞杀害。

张弘猷"抗误军需事"发 顺治七年(1650)下半年，湖南、湖北战场上发生了长沙知府张弘猷"抗误军需事"，实际上这是续顺公沈永忠一手制造的事端。沈永忠是清崇德年间降清的明将沈志祥(降清后被封续顺公)侄，沈志祥死后因其无子，沈永忠遂得袭续顺公。顺治七年下半年，南明军进攻武冈、靖州、麻城，沈永忠闻讯急发三镇兵马，分别迎击，并借机向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施加压力，滥索军饷。罗绣锦无奈，被迫应允。然而，负责交运粮饷的长沙知府张弘猷一方面谴责沈永忠"哪管小民抵死"，另一方面先凑了银一万两、米一千石运送军中。沈永忠对张弘猷的公开顶撞十分恼火，遂以这些银米不足半月之饷为由，上疏诬陷张弘猷"抗误军需"。顺治帝览疏后，误信沈永忠之言，命罗绣锦"严查速奏"。此后，虽经罗绣锦竭力辩白，张弘猷得以继续任职，但沈永忠却利用顺治帝的失误，更加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公开把迫害矛头直指罗绣锦，终于使其心力憔悴，抑郁成疾，悄然辞世。

阿济格乘丧谋乱夺政 顺治七年十二月，英王阿济格乘摄政王多尔衮病死之机，欲谋乱夺政失败。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骁勇善战，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成为清朝著名的开国功臣。顺治七年冬，多尔衮率阿济格等往边外围猎，年底，多尔衮病危，自知不起，独自召阿济格秘密议论后事。多尔衮死后，阿济格欲当摄政王，暗中派人往召其子劳亲，令劳亲多率兵来，并嘱劳亲不要把多尔衮病死及调兵事告之诸王。与此同时，他又胁迫多尔衮所管两白旗大臣附己，遭到拒绝后又以兵戎相威胁。于是，两白旗大臣决定往"依皇上为生"，并向郑亲王济尔哈朗告发阿济格乘丧欲谋乱夺政。跟随多尔衮围猎的大学士刚林早已察觉阿济格的真实意图，抢先独自"策马行"，日夜疾驰七百里抵达京师，告发此事。清廷立即关闭九门，在阿济格回京的必经之路德胜门外派驻重兵，以防不测。不久，多尔衮柩车还京，行至石门时，阿济格与其子劳亲合军，令部下大张旗帜，环丧车而行。顺治帝亲率诸王、大臣迎柩车于德胜门外，阿济格父子居首而坐。济尔哈朗等见阿济格身带佩刀，举动叵测，派兵紧密监视，并将其随从三百骑尽收诛之，从而粉碎了阿济格的兵变计划，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动乱。(1651)十二月二十六日，议政王大臣会议阿济格罪，将其幽禁，

其子劳亲被革去王爵，降为贝子。阿济格在幽禁期间，不仅没有一丝收敛，反而益加狂暴无礼，在监房内私藏大刀，暗掘地道，声称要放火烧毁监房。顺治八年十月十六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

闻香教王氏家族分成两支 闻香教创于明万历年间。明末清初，闻香教为逃避统治阶级的严酷镇压，改名为大成教，又称作大乘教。顺治七年(1650)，闻香教创始人王森子王好贤的孙子王盐由石佛口迁往卢龙县安家楼和阚家庄。从此，王氏家族分成了东西两支(又称两院)，东支仍居住于石佛口，西支就是安家楼和阚家庄。他们均系各自出外传教，彼此并不知悉；所传徒弟，亦各认支派，不许混杂，甚至连活动的踪迹、教徒的名字也彼此保密。该教传教方式是父子递传，一旦师父故去，教徒和教门的关系也就随之结束。只有重新拜师父的儿子，并再履行一次入教手续，师徒关系方为有效。

顺治亲政 顺治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顺治帝亲政，御太和殿，接受诸王、贝勒、大臣庆贺表文，并颁诏大赦。诏书要求满汉内外文武大小官员殚忠尽职，洁己爱人，任劳任怨；满汉民人要乐业安生，共享泰宁。并提出"合行恩赦事宜"凡十六款，主要内容有：恩赏王公、封赠官员；赦免"十恶"及隐匿逃人以外之罪犯；减免八年份钱粮；增加八年份乡试中额，九年份取中进士四百名；"盗贼"改过就抚者赦罪，等等。此后，顺治在跌宕起伏、繁纷驳杂的十年亲政中，充分发挥了政治才干，不愧为清朝开国时期一位刻意求治、颇有作为的年青皇帝。

顺治削夺济尔哈朗权势 济尔哈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侄儿，自幼随其南征北战，战功卓著，被封为贝勒，参议朝政。清太宗皇太极时，又被封为和硕郑亲王。顺治帝即位之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为两摄政王。但多尔衮为了独揽朝政大权，扩大自己的势力，于顺治五年(1648)二月罗织十余条罪状，将济尔哈朗亲王爵位革去，降为多罗郡王。顺治帝亲政后，济尔哈朗得到了沉冤昭雪，并被晋封为叔和硕郑亲王，还得到了一切朝贺谢恩皆免行礼的待遇。但他仍不满足，在朝廷对多尔衮的一片责骂声中，又企图以元老重臣的身分把持朝政大权，甚至命诸司衙门都要把奏章先送他省览。他还在顺治帝面前喋喋不休地讲述努尔哈赤、皇太极与诸王贝勒讨论朝政得失的事迹，要顺治帝效法。但是，顺治帝刚刚解决了多尔衮的擅权之患，岂容再出一个摄政王？顺治九年(1652)正月三十日，顺治帝毅然作出决定：以后大臣的一切奏章全部要呈递皇帝，不许再送交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从此后，顺治帝就一直将治理国家的大权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顺治命兵部整顿驿政 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十九日，顺治帝命兵部整顿驿政。他在谕旨中指出：近数年以来，四方多故，兵马络绎不绝，差遣繁多，驿递疲用，至今日已极。然而，奉差官员全不知地方苦楚，恣意苛索，驿夫不足，派及民夫，骚动乡里，甚至牵连妇女，苦累生儒，鞭驿官如罪犯，辱州县如奴隶，以致驿夫逃跑、驿马倒毙，人民罢市辍耕，民不聊生。命令地方官如再查出此等违法之人，不拘大小衙门，严厉参奏治罪；以后各衙门均不得滥差官员。

顺治定依附多尔衮臣僚定罪 顺治帝在追论多尔衮罪状及昭示朝廷内外后，为了进一步铲除多尔衮的势力，又将一些依附多尔衮的臣僚治罪。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二十八日，顺治帝命将秉承多尔衮意旨而擅改国史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处死，籍没；大学士范文程也受到牵连，被革职，本身折赎，仍留原任。四月，内大臣冷僧机被革职为民，家产按披甲人给与，其余籍没。次年三月，顺治帝又以故豫亲王多铎与多尔衮系同胞兄弟，本应连坐，但念其战功，追削为郡王。后又以"背朕迎合睿王"、现仍不改前辙、"轻藐朕躬，扰乱国政"的罪名，将内大臣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处死，家产籍没，兄弟子侄革去宗室为民；内大臣拜尹图因年老，免死禁锢。

顺治令将故明亲王郡王送京师看管 顺治帝亲政后，鉴于各地抗清义师多拥戴明室，"招摇惑众"，"恣行不轨"，于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三十日，命令兵部将流落各省的明朝亲王、郡王及其家口送至京师，"分别畜养"；镇国将军以下各照原籍编氓，一体输税当差。他还警告故明宗姓要"悔祸革心，偕游化日，勿犯王章"，如再"惑于奸宄"、构生事端，必依国法惩处。

清廷定亲王郡王贝勒下马例 顺治八年(1651)三月十九日，清廷制定了亲王、郡王、贝勒等进皇宫前下马条例。其中规定：和硕亲王于午门前下马，多罗郡王于午门角楼前下马，多罗贝勒以下俱于阙门下马牌处下马。

清定行军律 顺治八年(1651)四月初六日，清廷制定了行军律例。其中规定：凡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临阵，如七旗退走，一旗迎敌，将退走七旗下七牛录给予迎敌者；如七旗迎敌，一旗退走，即将此旗所属人员分给七旗；如一旗内战走者各半，将退走者所属人员给予力战者。凡是临阵对敌，必要整齐队伍，各按所属讯地从容前进，如违例或单独后退者，或处死籍没，或革职鞭责折赎。队伍起营时，各

旗均要按牛录旗纛整队而行,如有妄自往来行走及酗酒者责治之,如有失火者斩。后又告诫兵将,行军打仗以绥辑地方、安抚百姓为主,不得肆行抢掠、妄杀百姓,抗拒者剿戮,归顺者收养。

清廷定各直省乡试差员例 顺治八年(1651)四月初六日,清廷制定了各直省乡试差员的条例,其中规定:各省正副主考官,分别以翰林、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行人、中书评事等选任;各部衙门均应慎选倍送,由吏部拟定正陪,疏请皇帝任命,但已充任会试房考、乡试主考官不得重送。同时又规定,房考官,顺天由吏礼二部选用,各省由巡按御史选用。

清定有功汉人世袭武职 顺治八年(1651)五月十五日,顺治帝批准了兵部会同内院的奏请:有功汉人大小世袭武职,俱以銮仪卫外卫所用,照新入八旗官员例,给与世袭敕书,酌定汉名品级。其中规定:凡精奇尼哈番一等称銮仪卫都指挥使,正一品;二等称副使,三等称同知,均为从一品。阿思哈尼哈番分别为外卫都指挥使、副使、正副同知,正从二品。阿达哈哈番分别为外卫指挥使、副使、正副同知,正从三品。拜他喇布勒哈番分别为外卫指挥佥事,正从四品。拖沙勒哈番为外卫千总正五品。

陈名夏"结党行私"案发 顺治八年(1651)五月二十八日,外转御史张煊上疏参劾吏部尚书陈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这是陈名夏仕清后第一次被人参劾。这年春天,陈名夏奉朝廷命,为甄别都察院台员事,与分管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大学士洪承畴同往火神庙密议,但未避山西籍御史张煊。名单奏准后,张煊见自己被列入"应外升"台员之列,十分恼怒和怨恨,于是上疏参劾陈名夏。为了证明陈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称河南孟津人王铎资深而不得升为尚书、资浅的右侍郎陈之遴(与陈名夏同为南方籍)却得升为尚书。当时,顺治帝正出外游猎,代行政事的巽亲王满达海见疏后,一面拘留了陈名夏和洪承畴,一面迅速报告了顺治帝。顺治帝得讯后亲审此案。陈名夏为自己百般辩解,指出提升陈之遴的是吏部满尚书谭泰,与己无关。而谭泰也竭力为陈名夏开脱,并在帝前攘臂咆哮,务欲杀掉张煊,诸王大臣惮其凶猛气焰,有随声附和者,也有俯首无言者。最后议定,张煊参劾之事不实被处死,陈名夏不仅无罪,反被授予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晋少保兼太子太保。但不久,谭泰因擅权被处死,陈名夏、洪承畴又被发交郑亲王济尔哈朗处重新审理。洪承畴在审讯中"招对俱实",而陈名夏始则厉声强辩,闪烁其词,词穷后即哭诉投诚清廷之功,请求宽大,被顺治帝骂为"辗转矫诈之小人",革职发往正黄旗汉军下同闲散官随朝办事,张煊却因此得到了昭雪。

清定八旗科举例 顺治八年(1651)六月二十七日,顺治帝批准了礼部议定的八旗科举例,主要内容是:凡遇应考年分,内院同礼部考取满洲生员一百二十名、蒙古生员六十名;顺天学政考取汉军生员一百二十名;乡试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五十名,各衙门无顶戴笔帖式亦准应试;会试取中满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汉军二十五名,各衙门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俱准予应试。满洲、蒙古同为一榜,汉军、汉人同为一榜。乡、会试中,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译汉字文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字文一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

顺治两立皇后 多尔衮任摄政王后为控制顺治帝,曾选择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为皇后。顺治八年(1651)八月十三日,顺治帝正式立吴克善女为皇后,并诏告天下。但时隔两年,即顺治十年(1653)八月二十五日,顺治帝又以吴克善女未经自己选择,且自册立之始,两人志意不协调,吴克善女所为不足以"仰承宗庙之重",而宣布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此谕旨一下,大学士冯铨、陈名夏以及其他一些大臣相继上疏劝止,再三表示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他们还举例说:汉光武帝、宋仁宗、明宣宗虽然都是贤主,但均因废掉皇后而受到批评,恳请顺治帝深思详虑,慎重行动。顺治帝接到奏疏后勃然大怒,声言自己此举是废掉无能之人,严厉斥责他们身为朝廷大臣,不关心国家政务,反在无益之处沽名钓誉,"甚属不合"。诸大臣也终于未能说服顺治帝。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十六日,顺治帝宣布册立蒙古科尔沁部镇国公绰尔济之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十八日,他又以大婚礼成,行庆贺礼,颁诏全国。

顺治伤悼豪格屈死 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一生戎马倥偬,始封贝勒,后晋封肃亲王,是清朝开国的著名将帅之一。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暴逝,豪格和多尔衮均为争夺皇位的主要人物,势如水火。豪格虽曾以"福小德薄",辞去嗣君,但仍遭到多尔衮的忌恨。顺治元年(1644)四月,即顺治帝即位七个月后,多尔衮以"图谋不轨"罪名,欲将豪格处死。幸亏顺治帝啼泣不食,豪格得以免死,但却被废为庶人。清定鼎北京后,豪格被恢复肃亲王爵,但仍遭多尔衮令遇,不畀重任。顺治二年,豪格受命往四川镇压张献忠大西军,大获全胜而归。顺治五年三月,多尔衮又以豪格在征四川时未审结部将冒功案和"附王(济尔哈朗)为乱"的罪名,将其幽禁。不久,豪格因激愤卒于狱。直至八年(1651)八月二十三日,

亲政后的顺治帝才得以追复肃亲王豪格爵，建碑纪绩于其墓，对其屈死表达了不胜悼念之情。

天安门和地安门定名 顺治八年(1651)九月十八日，清廷改京师承天门为天安门。次年七月，皇城北门工竣，清廷命名为地安门。

清敕封正一嗣教大真人 顺治九年(1652)正月十七日，清廷敕封张洪任为正一嗣教大真人。

李定国"两蹶名王" 顺治九年(1652)春，清军大举进攻贵州、川南，三月，李定国受命率大西军东征湖南，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并向广西胜利进军。六月底攻克了广西门户全州(今全县)，未入城便急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闻讯急派将镇守严关，定国诸部包抄阻击，清军大败。七月初一日，孔有德自率精兵与李定国战于榕江。李定国用战象突阵，清军狼狈逃窜，横尸遍野，孔有德负伤弃甲，仅以身免，退守桂林。初四日，李定国率部包围桂林，并以云梯攻城，迅破武胜门。孔有德仓皇计穷，遁走无路，手刃其家室后自焚而死。接着，李定国又攻占了广西八府(广西共分九府)，惟梧州府由清将马雄据守。

桂林失陷、孔有德自焚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朝野震惊。十五日，清廷为挽回败局，急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往湖南、贵州征讨大西军。李定国侦知消息，主动撤出长沙，在衡州附近蒸水设伏。十一月二十三日，尼堪率清军进攻衡州，双方激战一夜，李定国佯败，尼堪自率军穷追，"伏起，斩尼堪于阵"。清廷闻警，上下震动，甚至有放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南明媾和之议。黄宗羲评论说："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自万历戊午(1618)以来所未有也！"

清廷严惩不遵经注士子 顺治九年(1652)三月初八日，清廷以会试中式的第一名举人程可则的文章"悖戾经注"，将其除名，考官胡统虞、成克巩也因所取试卷不遵经注、文理疵谬甚多，而被分别降三级和一级。顺治十七年，清廷因工部侍郎张缙彦所刻《无声戏》书中"不死英雄"一句，起到了煽惑人心、"交结党类"的作用，而将其革职，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

顺治笼络和依靠汉官 顺治帝亲政后，一改多尔衮时期对汉官猜疑、压制的态度，十分注意笼络和依靠汉官。顺治九年(1652)四月，他在一道谕旨中宣布，为防止诸王大臣因循怠玩，允许满汉官吏互相参劾对方的玩误之处。次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又提出，内三院为机密重地，事务殷繁，应选举贤能之人任职，并特别指明每院应设汉官大学士二员。根据这一指令，大学士由原来的七名增至十四名。顺治十一年又增至十七名，其中除两名满人外，其余都是汉官。他们在制定政策、发布政令和处理国家大事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顺治帝还突破了汉官不得掌印的旧规，从而提高了汉官的地位。顺治十二年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顺治帝即命汉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龚闻命后战战兢兢，上疏说部院印务向来由满官掌管，正官公出时也都是次官代理，恳求撤去这一任命。顺治帝未予接受，坚持要他接管印信。顺治十六年，顺治帝又正式下令：今后各部尚书、侍郎等官，不再分满汉，谁受事在先，就由谁来掌印。这就改变了历来各衙门奏事只有满臣、不见汉臣的局面，显著提高了汉官在清廷中的地位。

清设立宗人府衙门 顺治九年(1652)四月二十四日，清廷设立宗人府衙门，掌管皇室宗族属籍，纂修玉牒(谱系)，处理皇族事务。首任掌宗人府事的为敬谨亲王尼堪，贝勒尚善、贝子吴达海为左右宗正，辅国公穆占、拨都海为左右宗人，并设启心郎、理事官等。

顺治始行京察和大计 顺治九年(1652)五月初七日，顺治帝接受吏部建议，决定自亲政年始，每六年(即凡遇寅、申)举行一次京察，对京城内中央机关的官员进行考核。次年初，他又根据大臣的建议，开始"大计天下"，即对各地的大小官员普遍进行甄别考核。一次他在批阅吏部大计疏后，问大学士范文程贪吏为何禁而不止。范文程回答说："彼平居未仕时亦知贪吏不可为，一登仕籍，则见利智昏矣！"顺治帝由此更增强了整顿吏治的决心。当年大计的结果，副使刘应锡等九百六十九人分别受到了革、降、调职及退休的处理。不久，他又进一步将大计制度化，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顺治十年(1653)四月初五日，顺治帝颁发谕旨，正式宣布实行京察，并具体规定：吏部、礼部侍郎及学士、詹事等官由皇帝亲行考试甄别；六部、六科、通政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等衙门官员由堂官开送，吏部都察院察核具奏，区分其中之年老疾病、不能任事及素行不孚众论，或财力可外任者，并限五日内完成。顺治十三年(1656)十月初一日清廷制定了满官京察则例：满官三品以上自陈，四品以下由堂官考核送吏部、都察院；内三院之四品以下官，由部、院会同内院考察；六科掌印官由部、院考察，其余由掌印官考核送部、院。所有考察事宜，俱照八法处分。

清廷制定隐匿、查解逃人功罪例 顺治九年(1652)五月二十六日清廷鉴于逃人屡禁不止，又制定了隐匿、查解逃人功罪例：凡逃人一次拿获者，本

人鞭一百，仍归原主；窝主及其家产给予逃人之主，左右邻及甲长各责四十板，旁人出首者即以窝主家产给赏三分之一。逃人二次拿获者，本人正法；窝主及其家产解户部，左右邻及甲长仍各责四十板，旁人出首者亦给窝主家产三分之一。如系旁人举首或系本主认获，该管州县官每逃人一名罚俸一年，至十三名降一级调用。州县官有查解逃人十二名者纪录一次，三十六名者俟应转之日加升一级。知府所辖州县有隐匿逃人至十名者罚俸一月，一百二十名者罚俸一年，一百三十名者降一级调用；如辖十州县内有获解逃人至一百二十名者纪录一次，二百四十名者纪录二次，三百六十名者俟应转之日加升一级。督抚按道等官俟考查之日查所属地方隐匿多寡并议功罪。武官营伍中有逃人潜身冒名充兵者，该管官分别责罚。船户隐匿逃人者，罪坐隐匿之人。如途遇逃人，有能拿获一名者，赏银二两。凡隐匿之人能自首者免罪。七月十七日，清廷又补定查解逃人例。规定：凡隐匿逃人，无论满汉，或雇佣为工，或租屋给其居住，有保人者罪坐保人，雇者和租屋者及邻佑、十家长、地方官俱免罪；如无保人，容留过十日坐隐匿之罪。逃人如歇宿店家，十日之内店主免究，越十日照例治罪，地方官查送者纪录。夫妻、父子同逃，各自来归者，隐主免查；如一人归一人仍留窝主家，其窝主、邻佑、十家长照例治罪。逃人七十岁以上、十三岁以下旧例俱免责，改为两次脱逃者亦免死，窝主之家治罪。如逃人被获于后次窝主之家，其先次窝主之家免究。窝主家产交与逃人之主，房、地交与户部。逃人自回，无窝主者，兵部径行归结。九月十五日，顺治帝谕令，只将窝主本人家产给逃人之主，其分家另过之父子兄弟等不知情者不得株连。

方以智著《东西均》　顺治九年(1652)，方以智在庐山著《东西均》。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本年八月，他与故明刑部湖广司主事施闰章游庐山，在五老峰化名呐呐子著《东西均》。方以智在该书中大谈儒、释、道三教不可执一拘泥，既不可任受，也不可阂受。他还从明清之际突如其来的世道变化及自己难以逆料的身世飘零出发，把世间万物变化说成是简单而又周而复始的轮回交替；他把意识看作第一位，物质看作第二位，“世无非物，物因心生”。他还认为万物轮回皆由不可知的真阳统率，指出阳统阴犹如天统地，夫统妻，君统臣，鼓吹“尊阳之义大矣”。但在该书中，方以智也表达了一些辩证地看问题的思想，如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见实，实中见虚；长中见短，短中见长等。

清颁六谕卧碑文　顺治九年(1652)，清廷为广行教化，颁布了六谕卧碑文：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顺治十六年，清廷令京师五城设立公所、直省府州县亦皆举行乡约以讲解上谕，使其深入人心。

清苑县民告御状　顺治九年(1652)底，直隶清苑县民路斯行等三百余人因房屋、地产被土豪王仪强行抢夺投充，长期不予补还，流落无依，在京师告御状多次，不仅未予解决，反而遭到刑责。(1653)十二月初四日，顺治帝据审理此案大臣所奏，特向户部颁发一道谕旨，命令王仪将所占房地全部退还县民，免去这三百余户顺治九年应交纳的地租，并对处理此事不力的户部尚书车克及清苑县原任知县周玮分别给予处分，以示皇帝爱养“小民”之意。

顺治帝册封达赖五世为达赖喇嘛　顺治九年(1653)十二月十五日，达赖五世至京师，在南苑谒见顺治帝。此后，顺治和诸王多次宴请他，并赐以金器、彩缎和鞍马等物。顺治十年(1653)二月二十日，达赖五世辞归，清廷派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同贝子顾尔玛、吴达海率八旗官兵护送至代噶地方。四月二十二日，顺治帝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将封达赖五世为达赖喇嘛之金册、金印(文用满、藏、汉字)送往代噶地方。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从此才正式得到“达赖喇嘛”的称号。

清处决京师“大豪”　顺治九年(1653)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处决了京师“大豪”李应试、潘文学，并布告全国。李应试别名黄膘李三，原系明朝重犯，漏网后潜居京师。潘文学系一马贩。两人在京师多历年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有些官吏也不敢举发，生怕举发后朝廷宥其罪而已反受其害。这就更使两人有恃无恐地为非作歹。李应试专一豢养强盗，勾聚奸枭，交结官司，役使衙蠹。远近盗贼争纳重赀、依附其下，他“所喜者，即有邪党代为市恩；所恶者，即有凶徒力为倾害。”他还把自己的住所按朝廷六部的式样修建，如有某部人至或自外来有事于某部者即接入某部房内，自己俨如君临天下的帝王。他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崇文门税务，自立规则，擅抽课税。他的侄子杀人，被害之家也不敢控告。潘文学专以壮健马匹接济远近盗贼，每次多亦一二百匹，少亦数十匹，使群盗得骑如虎生翼。他也广交官府，包揽词讼，常与文武官吏会饮，道路侧目，人皆莫敢如何。此时，清廷因办理其它案件，捉获两人，审讯后俱行枭斩。接着，顺治帝又下令将为虎作伥的兵科给事中李运长及窝盗得赃、行贿纵寇的“蠹恶”高思敬等多人一

并处死。

荷兰使臣两次来华 顺治年间，荷兰为谋求解决中荷两国贸易问题，两次遣使来华。第一次在顺治十年(1653)初，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总督卡里雷涅兹获悉中国皇朝改元，派使者到广州，要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允许通商贸易。两王不敢擅作主张，遂以使者无表文、贡品为由，要他回去转告巴达维亚总督按中国定制进送表文和贡品，以乘便贸易。使者的通商要求遭到拒绝后，又称愿立即打发船只回去备办表文、贡物，并请求允留几人暂住省城。结果，顺治帝以无表无贡、诚敬不昭为由，拒绝贸易，使者只得怏怏而归。第二次在顺治十二年(1655)，巴达维亚总督如翰没碎格正式遣使来华。使者携带的总督给顺治帝的信中要求"(中国)凡可泊船处，准我人民在此贸易"。使者于七月十四日到达广州，次年二月动身进京。留京期间，他曾受到礼部的宴请和顺治帝的召见。巴达维亚来使所带的礼物相当厚重，表明荷兰与中国通商的心情十分迫切。但顺治帝只把来使当作一般的属国通贡，除对其"虔修职贡"之举大加嘉赏外，只将其贡期定为八年一贡，并严格规定：进贡之"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贡使没有获得清廷自由贸易的允诺，扫兴而归。

兴屯道厅设立 顺治十年(1653)，清廷设立了兴屯道厅。清廷定都北京后，见各省地亩荒芜，无法保证赋税的收缴，便令各地垦荒。本年，清廷以兴屯道厅等官专管兴屯(官屯)事宜，加速垦荒工作的进行。清廷规定：不论土著流民，凡参加兴屯均可官助牛种，三年后永准为业；自首投诚的官兵均隶兴屯道，授以无主荒田，听其携家耕种为业。但在封建国家的严密控制下，被编入屯田的农民负担极为苛重，不断大批逃亡。一些兴屯官员为了自身的升迁，于是将屯租摊派给附近民地上的农民，使其无法继续生产而被迫离开土地，造成了"重垦令而田益荒"的局面。顺治十二年，清廷在朝野上下皆"告苦告弊"的情况下，决定撤消兴屯道厅的建置，次年又规定将屯地改回民地。这样，推行仅三年的官屯田制终于失败。

任珍私杀妻妾案发 顺治十年(1653)三月，曾因军功升任陕西兴安镇总兵的任珍，以家法私杀妻妾多人，被革去世职一半。他在家中口出怨言，被家婢告发，刑部审讯后认为应该处死。顺治帝虽然认为任珍曾立大功，但所犯之罪严重，命令刑部会同各官重新审拟定罪。当时，刑部满汉官员以及九卿科道等衙门满官都坚持原议，而以大学士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等二十七名汉官持不同意见，认为任珍案有待进一步调查，不宜草率定罪，但又不敢直言，只是支吾其词，笼统地说以应得之罪处之。顺治帝追问说应得何罪?他们又说应按法律办事，似应勒令其自尽。顺治帝对这种敷衍搪塞的言语大为恼火，严厉斥责他们踵袭明末结党乱政敝习，下令各部所有七品以上官员云集午门外，对陈名夏等严行议罪，自己则亲登午门楼听议。结果，陈名夏被论处死，后被顺治帝改为削其官衔二级、罚俸一年，仍在内院供职；陈之遴等人也分别被降级、罚俸。

顺治帝端午节巡视内三院 顺治十年(1653)五月初五日，顺治帝巡视内三院，看到在值官员寥若晨星，忙问其故。随行的范文程回答说，今天是端午节，大家提前下班了。顺治帝听后不以为然，旋即对诸臣讲话，强调说，要想求安逸，必须先勤劳工作；只有在国家大定后，才能求得个人的永久安乐。他希望群臣知过即改，并表示自己身为人主也要这样做。他还以历代君王为例，告诫群臣只有勤于政事，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他说，昔商汤身为盛德之主，依然不断地检讨、改正自己的错误，因而成就了大业；明武宗正德帝却因为整日耽志嬉游，怙过不悛，未能把国家治理好。这些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清定内外热审之制 顺治十年(1653)五月十五日，清廷制定了内外热审之制，其中规定：每年小满后三法司会审，现监人犯笞罪者释放，徒流以下减等发落，重囚可矜疑者奏请定夺。此制，各直省每年举行一次。

顺治设置内十三衙门 顺治十年(1653)六月二十九日，顺治帝决定设置内十三衙门，定内监之制。十三衙门为：乾清宫执事官、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仗局。各衙门内兼用满洲近臣和太监，规定太监不过四品，内员非奉差遣不许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借弟侄等人名义置买田屋及把持官府，扰害人民；外官也不许交结内官。如有内外交结者，一经检举，查证属实，一并正法。次年十月二十三日，又增设尚方司，使内务府共有十四衙门。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二十八日，顺治帝为防止内监擅政，设立了内十三衙门铁牌，宣称内监(太监)此后如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决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十五日，清廷撤内官十三衙门，以其事归内务府，并训诫后人说：凡事都要遵守太

祖、太宗的定制,“内官俱永不用”。

清廷制定铸钱法 顺治十年(1653)七月二十二日,清廷制定了铸钱法:铸钱务照定式,每文重一钱二分五厘,背面铸一厘两字;每千文作银一两,内外划一通行;现行旧钱难以强齐,一切贸易暂从民便;严禁私铸,官炉夹带私铸者照枉法赃坐罪。

朱由极纠众反清 顺治十年(1653)十月二十四日,清廷以“潜谋不轨”为名,将直隶宛平(今北京宛平县)民朱由极等处决。先是,朱由极自称故明泰昌帝第三子,伙同杨得先等人,制造札印,私设官职,在附近乡民中进行反清活动。不料,此事为乡民宁忠弼等出首。清廷于是将朱由极等人逮捕,审讯后磔为首者七人,斩附从者二十二人。

清予明末“殉难”诸臣谥号 顺治十年(1653)十月二十六日,清廷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地主阶级,遣礼部右侍郎高珩祭明末“殉难”诸臣,并加封谥号:范景文曰文忠,倪元璐曰文贞,李邦华曰忠肃,施邦耀曰恭愍,吴麟征曰贞肃,周凤翔曰文介,汪伟曰文毅,吴甘来曰庄介,王章曰节愍,陈良谟曰恭洁,刘理顺曰文烈,马世奇曰文肃,成德曰介愍,巩永固曰忠烈,金铉曰忠洁,太监王承恩曰忠节。

清廷令优人剃发 顺治十年(1653)十月二十六日,顺治帝谕令各省优人(戏子)剃发。清廷入关颁布剃发令后,各省优人以“欲扮女妆”为名,未剃发。此日顺治帝听了臣下的报告后,下谕旨命令凡托称优人未经剃发者,都要“遵法速剃”;此谕旨颁布十日后,如有仍不剃发者立斩。

清廷设兵部督捕衙门 顺治十年(1653)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廷为确保逃人法的贯彻执行,设置兵部督捕衙门,有兵部督捕满汉侍郎各一员、司官各六员,专门负责缉逃捕窚事务。

陈确著《大学辨》 顺治十一年(1654),进步思想家陈确写出了著名的《大学辨》。《大学》原是《戴记》中的一章,本不是孔子的作品,但自宋代朱熹等表彰《大学》后,将其说成是孔子、曾参的著作,列于“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之首。陈确在《大学辨》中公开否定朱熹之说,指出《大学》决非秦朝以前的儒家所作;同时又对朱熹宣扬的认识有“知止”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认识是在不断发展的,“道无尽,知亦无尽”;认识也不可能一次完成,更不可能达到“知止”的境地,朱熹的“知止”说,实际上混淆了人们对个别事物的认识与对整个世界的认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这是对宋明以来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的理学的公开挑战,具有进步意义。

平一统贺王盛复明案发 平一统,其人来历不详,原是山东榆园军的绿林好汉。贺王盛,字周兼,号无党,镇江府丹阳县(今江苏丹阳市)人,崇祯时历任山东诸城知县、兵部职方主事、太仆寺右少卿等职。李自成克京师后,他先迎降,后逃归。入清后,平一统、贺王盛面对尖锐的民族斗争形势,在江南和南京、无锡一带社会下层人士中,进行秘密的复明活动,同时又与明定西侯张名振领导的海上义师取得了联系。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平、贺部下到镇江进行联络活动时,不料被安徽生员告发,全案由此被清廷破获,平、贺等人相继被逮捕,在遭到两江总督马国柱的残酷刑讯后壮烈牺牲。贺王盛死前,自题《绝命诗》:“悲歌慷慨说天祥,浩气凌虚返帝乡。从此十人离紫禁,相随地下拜高皇。”

户部议定常平仓谷粜籴法 清初,各省由省会至府、州、县,均建有常平仓,“或以便民,或以给军”。顺治十一年(1654),清廷命道员专管常平仓,每年造册报部。顺治十七年,户部议定常平仓谷粜籴之法: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如遇灾荒,即按数给散灾户贫民。该法还特别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务期便民”。

清定仓粮考成则例 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二十六日,清廷制定了仓粮考成则例,以各省常平、义社各仓积谷多寡,定有司功罪。具体规定如下:州县官未完一二三分者停俸,四五分者降俸一级,六七分者降职一级,八九分者降职二级,十分者革职,俱戴罪督催,限文到三月内催完方准开复。粮道以合属通计,未完一分者免议,二三四分者停俸,五六七分者降俸一级,八九分者降职一级,十分者降职二级,亦戴罪督催,三月内催完准开复原职。

钱应魁领导反清斗争 钱应魁,江南太湖流域人。顺治二年(1645),他就投身于太湖吴日生领导的反清斗争。后来,吴日生等败死,钱应魁流迹太湖。顺治十一年初,钱应魁自号平南将军,在太湖流域广泛招集伙党,“党类日繁”。他还多次派人联络李定国、郑成功,以进行抗清斗争。清廷对钱应魁及其领导的义军剿抚兼施,然而未有成效。顺治十五年初,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倾其全力围剿这支起义军。他鉴于太湖烟波万顷,起义军踪迹无定,便檄调官兵,分路扼剿。钱应魁指挥起义军放炮迎击,拼死拒敌,但因清兵在各处扎住路口,“攻杀直冲巢寨”,损失惨重。最后,在清兵炮矢交加之下,钱应魁手持双刀,奋勇迎敌,力竭被俘,壮烈牺牲。

汉官强烈反对逃人法 由于逃人法十分残酷且又危害甚烈,理所当然地遭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

反对。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汉族官吏，出于对满族贵族拥有特权的不满，以及维护封建租佃制、反对农奴制的要求，在朝廷中激烈反对逃人法。还在兵部督捕衙门设立的当月，工科右给事中许作梅就上疏反对该机构的设立。他指出，律令中最重的是谋逆，其次为强盗、人命，但都未设专官；多设一官则多一官之费，多一官之扰，流弊将不可胜言，这表面上是设不设衙门之争，实际上却是以反对设督捕衙门来反对逃人法。顺治十一年(1654)，兵部督捕右侍郎魏琯接连向顺治帝上了两份奏疏，以其所见所闻痛陈了窝主及其家属被罚的惨状，强烈要求停家产籍没之令，重定窝逃之法。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二十五日，兵科右给事中李裀冒死向顺治帝上疏，列举了逃人法由于立法过重、株连过多而带来的七大"可为痛心者"：一是海内无论贫富、良贱、官民，均无法保其身家；二是损害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使封建名分纲常荡然；三是减少了朝廷的供赋和人才的补给；四是立法愈严，逃亡愈多；五是打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生产；六是酷法严刑迫使饥民自毙；七是迫使人民铤而走险。他要求皇帝对逃人的处理"务从宽大"。满族贵族对于汉官中越来越强烈的反对逃人法的呼声极为不满。顺治帝更怒气冲冲地斥责汉官的言行与满洲贵族利益相牴牾，"不克和衷，是何意也?"并警告他们说，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同时，为了彻底压制汉官的异议，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顺治帝将魏琯、李裀革职流徙。这种高压政策，虽然迫使汉官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再谏诤，但并未能压制汉官对于逃人法的异议。

明乐安王图谋反清 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初，明乐安王朱议瀰图谋反清，事泄被捕。朱议瀰原系明朝江西乐安王。顺治二年，明江西总兵金声桓降清，朱议瀰携家眷移住南昌乡下，后被拘回南昌。顺治五年初，金声桓叛清后，尊朱议瀰为王。不久，金声桓失败，朱议瀰全家九十余口俱遭惨杀，只其只身逃出，于是削发为僧，称三和尚。十年五月，朱议瀰以行医为名，来到汉口，联络僧人文秀、若决及道士张应和等数人，以木雕刻印信，散布扎书三千八百六十九号，内有"叨忝天潢，恢复中原"之句，表明反清的决心。他们还广泛招兵，规定凡招五十人者，可给总兵之职。同时又议定于年底在汉川县红旗营起事。不料，原明朝营兵、张应和徒弟卢萃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到县衙门出首，张应和、文秀被捕，朱议瀰、若决等脱逃。次年三月，朱议瀰等也被逮捕，这次反清预谋终于失败了。八月二十五日，清廷以"谋逆罪"将朱议瀰及僧人文秀、道士张应和等处决。

顺治帝始籍田 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十五日，顺治帝行耕籍礼，亲祭先农坛。这是清廷入关后，皇帝首次籍田。按规定，皇帝三推，亲王五推，九卿七推，内院不参与此事。籍田在京师正阳门之西，中为先农坛，有地一千七百亩，其中二百亩给坛户种五谷、蔬菜以供祭祀之需，余一千五百亩收租银三百两，以备维修之费。

顺治帝颁发内帑赈济饥民 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二十四日，顺治帝鉴于畿辅房屋田土多被圈占，加之去年水灾严重、仓廪无备，决定发内帑：户、礼、兵、工四部发库贮银十六万两、皇太后宫中"节省银"四万两、皇帝宫中"节省银"四万两，共二十四万两，差满汉大臣十六员，分赴畿辅八府地方赈济饥民。另外，对于殷实之家捐谷麦或减价出粜以济饥民者，给予旌表；准许商人往丰收处所籴买米粮，如有地方豪强遏闭拦截定予重惩。又赈济八旗灾民，凡涝地，每佐领满洲、蒙古给米二百石、汉军一百石。

永历朝发生"十八先生狱" 顺治十一年(1654)，孙可望杀害了永历王朝十八个大臣，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十八先生之狱"。孙可望是一个充满了政治野心和有强烈帝王欲望的人物。随着大西军据有云贵及出兵四川、湖南和广西，并节节取得胜利。孙可望的个人野心也不断地滋长。他派人到梧州，请永历帝封他为秦王，但永历阁臣坚持明朝"祖训"未有封异姓为一字王的事例，坚决反对，只封其为景国公，引起孙可望的忿恨。顺治九年冬，他派人把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隆所(今安龙)，改名安隆府，作为行宫，达到了受封秦王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永历朝一部分权臣见明政权日渐衰弱，庸懦无能，于是竭力奉承孙可望，纵容他"受禅"，篡夺帝位。顺治十一年初，永历慑于孙可望"僭逼"，在大学士吴贞毓等大臣的支持下，秘密写信给出征在外的李定国，请其回来护驾。这个消息被宦官密报孙可望。他在盛怒之下，严刑拷掠与事诸臣，并于三月胁迫永历帝下诏处死吴贞毓及刑科给事中张镌、翰林院检讨蒋乾昌等十八大臣。十八大臣死后，孙可望虽慑于朝廷内外形势，不敢明目张胆取永历而代之，但与李定国的矛盾却日趋激化，终于加速了分化抗清营垒的步伐。

宁完我密疏参劾陈名夏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初一日，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密疏参劾陈名夏"结党怀奸，情事叵测"。宁完我胪列陈名夏的主要罪状有"倡复冠服、涂改诏旨、结党行私、循情纳贿、纵子肆虐"等等，其中最核心的是陈名夏把"留头发，复衣冠"作为"第一要紧事"，声言是"天下太平"的关键。宁完我还慷慨激昂地大骂陈名夏是"狂吠之

犬”,以宽衣博带为名,行变清朝为明朝,“计弱我国”之实。于是,顺治帝命令内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在午门外会同对陈名夏逐条审问,从重定罪。陈名夏在受审中据理反驳,刑部右给事中刘余谟、御史陈秉彝在旁为之竭力辩护。双方争执不下,在午门楼上的顺治帝见此情景大为恼火,立即召见刘、陈二人严行申饬,并予解职。初议陈名夏论斩,顺治帝以其久在自己身边任职,改为处绞。四月,朝廷中北方籍汉官冯铨等人为进一步剪除异己,纷纷以名夏“亲戚”、“党羽”的罪名弹劾了四十一名南方籍汉官,以致人心惶惶。顺治帝为稳定局势,不使矛盾加剧,亲自警告冯铨,使其不敢再兴风作浪,这场风波终于平息下来。在此之前,顺治帝一再表白自己以宽治政,常常感叹明太祖朱元璋诛戮大臣太为过分。但通过陈名夏案,他又得出了为政太宽“亦不可”的结论,并于五月以“任意结党营私”的罪名,将陈名夏的好友陈之遴发往盛京。

李定国郑成功会师攻粤 顺治十一年(1654)初,李定国率领大西军自柳州出发,四月,连破广东高州、廉州和雷州三府,两广反清义军如王兴等均与李定国联合作战,清将郝尚久和张月也举兵响应。十月,李定国陷高明,围新会。清平南王尚可喜、耿继茂龟缩广州,一筹莫展,接连向清廷告急。这时,李定国亲笔致信郑成功,要他率领水师,共攻广东,灭此两王。郑成功收到信后,由于风向不利,推迟至十月二十九日派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同闽安侯周瑞等率官兵五镇,乘战舰百艘南征,并致书李定国说,此次出师“勉效一臂之力”。但不知何因,林察等未能与李定国会师,而大西军中却因瘟疫流行,死病枕藉,士气低落,加之清靖南将军朱玛喇已率援军到达新会,李定国接连战败,于次年三月退回广西南宁,广东的高、廉、雷三府,肇庆、罗定属三州十八县和广西的二州四县,重为清军所占。李定国经此挫折,元气大伤,不再能有所作为。

吕煌窝逃案发 顺治十一年(1654)八月中,吕煌窝逃案发生。吕煌是山东德州秀才,因私匿逃人被发觉,托清军千总吕献忠行贿于逃人之主赵五子,不料赵五子仍毫不留情,揭发了此事。结果,吕煌伏罪流徙,吕献忠由兵部援赦免议,饶其罪。顺治帝传旨说,贪官受赃,诏款不赦,吕献忠作保行贿事既属实,就不该援赦奏请,令兵部回奏。六天后,部臣回奏稽迟,下旨予以切责。于是部议吕献忠应革职,顺治帝依然不满意,又以兵部堂官显有受贿情弊,令诸王大臣议处。十四日,经部议请旨,兵部尚书噶达辉等要员分别被降革罚俸。顺治帝还以兵部督捕侍郎魏琯条奏减窝逃罪,明为吕煌而发,将其革职流徙盛京(今沈阳)。十七日,顺治帝又以大学士王永吉审理此案时迟缓,在王大臣会议时又厉声争辩,全无小心敬慎之意,革其大学士,降一级调用,罚俸六个月。

清廷与郑成功和议 顺治十一年(1654)八月,清廷派使臣与南明延平王郑成功议和。清廷自郑芝龙降清后,多次派人招降郑成功,均被拒绝。本年八月初,清廷以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为使臣,与郑成功弟世忠赴闽,二十四日到泉州。郑成功要求使者开读诏书,叶成格等以郑未剃发称臣而不能开读,双方相持不下,未取得一致意见。十月十七日,郑成功与清使在安平镇会谈。郑提出议和的先决条件:以浙、闽、粤东近海各郡安插郑氏部众,不奉东西调遣,不受清廷节制,如朝鲜例不剃发;遭到清廷拒绝,和议破裂。随后,郑成功分别给其父郑芝龙、弟世忠各一封书信,指出和议非其本心,他决不做贻笑天下之事,再次表明抗清的决心:“斧钺亦不能移吾志。”二十九日,郑成功遣师南下,期与李定国会师,共同抵抗清军。

清廷更定窝逃罪 顺治十一年(1654)九月初六日,在汉官和各阶层人士反对逃人法呼声的影响下,顺治帝也觉得该法“立法太重”,为防奸徒借端陷害无辜百姓,更定窝逃罪。其主要内容是:隐匿逃人者正法,家产入官;其两邻各责四十,流徙;十家长责四十。窝主自行出首者免罪;旁人出首者,将窝主家产三分之一给予出首之人。逃人二次逃者仍鞭一百,归主;第三次逃者正法。运船隐匿逃人,该管官照民例治罪。若于军船、商船上查获逃人,船主正法,船内财物入官。有顶戴闲官、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及休致回籍官员隐匿逃人,将本官并妻孥流徙,家产入官。满洲家人隐匿逃人,鞭一百,罚银五两,本主罚银十两。生员、僧道隐匿逃人,与平民一例正法。有逃人在营伍中食粮者,管队责四十,百总责三十五,把总责三十,外委、千总责二十五,千总以上至总兵官照地方文官例议处。凡拿获逃人者,给银二两。雇逃人做工或租给房屋,有保人者不分满汉即坐以隐匿之罪,雇者、赁者、十家长、邻佑及该管官均免罪;若无保人,留住过十日者正法,家产入官。凡窝主,不论男女,年七十以上、十三以下,免死入官。同时又规定:拿获逃人不即行起解者,该管官革职,罚银一百两,给与出首之人。逃二次或三次而本主不报部者,鞭一百,有顶戴官员准予折赎。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十三日,顺治在谕旨中指出:本法制定以来,仍有奸徒乘机诈害,致使弊端百出;近几年秋决之重犯,半属犯了窝逃罪,人命至重,“于心不忍”,令议政王大臣

“妥确具奏”。二十六日议定：窝主免死，责四十板，面刺“窝逃”字，并家产、人口入官，听户部酌量给八旗穷丁。

清定丈量土地规制　顺治十一年（1654）十一月三十日，清廷决定编审地土，规定：办纳钱粮地土为民地；不纳钱粮的地土，不论有主无主俱为官地。同时又制定了丈量土地规制：凡丈量州县地用步弓，各旂庄屯地用绳；顺治十二年颁布铸步弓于全国，广一步、纵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方广十五步、纵十六步），有司于农隙时率里甲履亩丈勘。

清设馆编纂《顺治大训》　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二十六日，顺治帝命设馆编《顺治大训》一书。顺治帝为了贯彻他的平治天下以教育、化导人民为先的方针，命将历代经史所载的忠臣义士、孝子顺孙、贤臣廉吏、贞妇烈女以及奸贪鄙诈、愚不肖者分门别类编辑成书，“以彰法戒”，名之为《顺治大训》，令臣民广为诵习。同时，顺治任命大学士额色黑、金之俊、吕宫为该书总裁官。

济尔哈朗请设起居注官　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初七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上疏顺治帝，要求他效法古制，设立起居注官，置诸左右，使之一一记载皇帝言行，“以垂宪万世，传之无穷”，获得了顺治帝赞许。这是有清一代设立起居注官的开始。

喀尔喀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向清纳贡通好　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二十日，喀尔喀大喇嘛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又译作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遣使赍表文到京，向顺治帝敬献佛像、马匹和貂皮等物，与清通好。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名札那巴札尔，顺治初年得到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支持，在喀尔喀蒙古地区传播黄教，成为该地区的政教领袖。他与清通好后，清在喀尔喀设置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墨尔根诺颜、毕席勒尔图汗、鲁卜藏诺颜、车臣济农、坤都伦陀音八札萨克，定例每年各进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年贡”，清廷赏每札萨克银茶筒一、重三十两，银盆一，缎三十匹，青布七十匹。这就促进了清朝和蒙古地区的联系，也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蒙古地区的统治。

顺治帝命开馆编辑太祖太宗圣训　顺治十二年（1655）四月二十九日，顺治帝尊清朝家法，“法祖为先”，仿照《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命开馆编辑《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使皇帝“得朝夕仪型”、子孙臣民恪属遵无斁。同时，以大学士冯铨、车克、成克巩、刘正宗、傅以渐为总裁官，麻勒吉等七人为副总裁官。

俄国使臣三次来华　顺治年间，俄国使臣三次来华。第一次是在顺治十二年（1655）。早在顺治十年，当俄国沙皇政府派兵侵入黑龙江流域时，即派出巴伊可夫为首的使团前往中国。次年，俄国又遣阿布林作为该使团的先遣者来华。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二十四日，阿布林到京。由于他未带表文，顺治“特颁恩赐”、令其带回，“昭朕柔远至意”。顺治十三年初，巴伊可夫使团到京。清廷命使团先交出国书和礼物，然后由皇帝接见；而巴伊可夫则坚持皇帝接见时交国书和礼物，并称接见时只行国礼，不跪拜，立而授表文。清廷以使团不谙朝仪，不令朝见，却其贡而遣之。这年秋天，巴伊可夫使团离京回国。第二次是顺治十四年，俄使臣又携带表文至京。第三次是顺治十七年。顺治十五年，俄国沙皇派佩尔菲利耶夫、阿布林等以“信使”身分来华，携有沙皇的国书、礼物等，其任务着重于同中国贸易。顺治十七年（1660）五月初三日，俄使到京。由于表文中沙皇自称大汗，“不遵正朔”“语多不逊”，清廷群臣提出应退其贡物，驱逐使臣，顺治帝在诏旨中表示，对表文中矜夸不逊处可加涵容，令议政王大臣宴请，察收贡物，“量加恩赏，但不必遣使报书”。

顺治帝喜用“不欺之臣”　顺治帝自亲政后，坚持以公正、廉洁、诚实、有才能为标准任用官吏。顺治十二年（1655）一次廷试之时，他发现徐元粲思路敏捷，文章写得好。等到召对便殿时，按惯例只有懂得满洲语的少年才能中选，因而徐是最后一个受到接见。顺治帝问他多大岁数，回答说已经五十二岁了。顺治帝赞赏他诚实，说就要用这种“不欺之臣”为官，于是破例任命他为庶吉士。顺治十五年四月，顺治帝在殿试阅卷中，怀疑孙承恩与顺天科场案中孙旸为一家，遣学士王熙前去询问。孙承恩当即说明与孙旸实为一家，并表示不能为避祸而欺君。顺治帝很赏识他的文采，尤其喜他不欺君的品德，于是定他为一甲进士第一名，并免其连坐流徙之罪。

济尔哈朗病逝　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初八日，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病逝，终年五十七岁。顺治帝亲政后，济尔哈朗是唯一在世的清朝开国宗室元勋，虽被削夺了政治权力，依然拥有很高的地位，非常关心清朝的一统大业。顺治十二年五月初，他病危时，顺治帝亲往探视，当被问及遗嘱时，回答说：自己身受太祖、太宗和顺治三朝厚恩，以攻取云贵、殄灭永历、统一四海为念。济尔哈朗死后，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立碑纪功，谥曰献。

清定赐恤蒙古王公例　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初二日，清廷制定了赐恤外藩蒙古王公例：亲王去世，赐牛一头，羊八只，酒九瓶，纸一万张；郡王以下

各有差。

紫禁城定名 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初十日,清廷命名宫禁为紫禁城,后山为景山,西华门外台为瀛台。

清定恤刑例 顺治十二年(1655)七月初十日,清廷制定了恤刑条例:凡恤刑官审录罪囚,有死罪可矜疑及事无佐证可结者,具奏处置;流徙以下罪,减等发落;笞罪赦免;赃犯侵盗官银五十两、粮一百石以上者仍监追,如应还官银不及五十两,并入官给主百两以上,监追至五年,或正犯身故、逮及子孙,勘无家产者,奏请豁免。后又规定:每遇恤刑之年,内外一体停决。

清始行武举殿试 顺治十二年(1655)九月二十一日,顺治帝谕令兵部:国家选举人才,共襄治理,文武两途,允宜并重。现中式武举二百二十人,均应照文进士例一体殿试,并将亲行阅试:先试马步箭,次试策文,"永著为例"。十七日,清廷制定了武殿试则例。其中规定武举人在天安门就试,试毕,以卷送午门外东直房读卷官公阅传胪。并先一日,内三院官、兵部官各执选取卷在皇帝面前进呈、跪读,待御批一甲三名毕,名赴内院公同慎榜,加盖印记。

顺治帝赐异姓公书 顺治十二年(1655)九月二十五日,顺治帝颁赐异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御制"之《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儆心录》各一部。其目的就是要汉族官僚做忠于清朝的忠臣孝子、贤人廉吏。

清定漕粮征收期限 顺治十二年(1655)十月十八日,顺治帝以漕运至为重务,常拖欠稽迟,谕令户部:以后除漕运总督外,各省督抚亦当分任责成。除湖广漕粮暂留充饷外,江南、江北、浙江、江西等处,命该督抚督率所属各粮道及州县卫所等官恪遵漕规,冬兑春开,依限到淮;河南、山东督抚应督率所属征兑开行,察催北上。后又议定:各省漕粮征收限十月分内,兑运限十一月分内;过淮,江北限十二月分内,江南、江宁、苏、松等处限正月,江西、浙江限二月;不过淮之山东、河南限正月尽数开行。督抚、粮道、监兑官计违限一至三月以上者,各降罚有差。

清定纂修玉牒制 顺治十二年(1655)十月二十五日,清廷批准了礼部会同宗人府、内院的议奏:纂修玉牒(皇族家谱),应照会典开载论世次,各派所出子孙依次书于本派之下,皆以帝系为统;其余各照次序胪列;玉牒由内院翰林官同宗人府、礼部纂修,共抄四函,一函呈交皇帝,另三函分存于宗人府、内院和礼部;每十年纂修一次;宗室、觉罗等生子年月日时于每年正月初十日送宗人府、礼部记档,以便会纂。

顾仁"坏法受贿"案发 顺治十二年(1655)十一月初五日,顺治帝下令将纳贿行私之巡按顾仁处斩。先是七月初九日,顺治帝派顾仁等巡视各地,临行前告诫他们说,作为皇帝耳目之官,出而代巡,一定要真心勤瘁,洁己率属;如果以为君门万里,任意行私,贪赃坏法,即使铢两之微,必诛无赦。然而时过三月,吏部书吏章冕即刎颈叩阍,讦告巡按顾仁悖旨婪赃、陷害无辜。顺治帝对此案非常重视。为查明章冕所告是否真实,即命将顾仁押解来京,由他亲自会同内大臣严加审理。结果查明:顾仁悖旨藐法,滥收用旧时蠹役六人,又欲向章冕索取贿赂,不遂所欲,即枉法责治,远发真定府,企图将其毙命灭口;刑部司官贺绳烈也居间行贿,为虎作伥。这使顺治帝极为震怒,将顾仁处斩、贺绳烈处绞,同时还将推荐顾仁的王尔禄、王永吉、曹溶等分别降调。十一月二十九日,顺治帝又将顾仁案通报全国,警告巡方各御史,倘有似此违法受贿犯赃者,即行正法,决不宽宥。

清定官员犯贪赃杖流之例 顺治十二年(1655)底,顺治帝在处理顾仁"坏法受贿案"后,十分痛恨贪官污吏剥取民财,并认识到以往贪官蠹国害民之风不息,是由于法度太轻,贪官虽经革职,还能享有赃资。于是,他郑重宣布,今后内外大小官吏凡受贿十两、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赃重者分别处绞,家产入官。在此谕令下,清政府处决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此后,凤阳巡抚林起龙两次上疏,认为这种处分过重,反使贪官惧罪不吐真赃,流徙也就是徒有虚名,请求放宽一些政策,但遭拒绝。直至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初七日,顺治帝才修改了他的政策,宣布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其犯赃罪应杖责者不准折赎。

福州无为教兴 清初,白莲教一类秘密宗教的活动在全国时有发生,福州无为教就是其中的一个教派。该教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股;活动范围很广泛,据说在北京、南京及全国各省都有支派;不分阶层,上自王公将相,下至士农工商皆可入教;教徒平日在教首的带领下,诵读《五公经》,其经内、言图谶变乱之事",带有反清思想;活动方式是夜聚晓散,在"谶悔期"间,男女混处,按主教者的意志活动;教派所需食粮,均由各处教徒献纳,有的教徒甚至倾家荡产而不惜。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破获了福州的无为教,杀害了许多教徒,教主被杖责死于福州府堂。

顺治命编《通鉴全书》和《孝经衍义》 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初四日,顺治帝为吸取历代统治经

验，命编《通鉴全书》，以巴哈纳等为总裁官、张长庚等为副总裁官；又因他即位后宣称要"以孝治天下"，大力提倡孝道，要人民遵奉，故命编《孝经衍义》，以冯铨为总裁官、冯溥等为编纂官。

清定部院满官考察例 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二十一日，清廷为划一考绩典则，制定了部院满官考察条例。其中规定：凡部院满官，除有事故罪过外，三年俸满者，三品以上自行具疏，吏部分别议奏；四品以下官各衙门咨吏部分别议奏。六年京察，三品以上自陈，吏部会同都察院察议具奏；四品以下由各衙门咨陈吏部，吏部会同都察院察议具奏。考察满官时，要分别开列出应加升者、有罪者及才能、不及、老疾等项。

永历帝奠都昆明 顺治十三年(1656)三月初一日，李定国派部将靳统武率军迎南明永历帝入云南，奠都昆明，改云南府为滇都。这是明朝历史上最后一个都城。永历进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此时，明朝疆土只剩西南一隅之地，形势十分严峻：外受清朝大军压境的威胁，内有阉党马吉翔及靳统武等操纵朝政，永历日子很不好过。另外，由于永历到了昆明，使在贵州的孙可望失去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孙和李定国的矛盾更趋尖锐。孙可望失败后，跑到长沙、投降清朝后，呈献了云南地图，详细吐露了云南的军事机密。顺治十五年八月，清军三路进攻云南，李定国急忙由前线退守昆明，商讨避敌迁都的策略。永历小朝廷内人心惶惶，有人主张婴城固守，有人主张逃往四川，马吉翔等主张逃奔滇西，而李定国则主张退守滇南。争论的结果，决定退守滇西。次年初，永历政权狼狈西逃，李定国在磨盘山战役中遭致惨重失败，被迫退往中缅边界，永历帝也踉跄地进入了缅甸。

清在全国推行"辽阳招民事例" 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初七日，清廷作出了在全国推行"辽阳招民事例"的决定。辽阳时属辽东地区，是满洲"龙兴之地"。先是由于清廷定鼎北京之后，满洲大批壮丁及其家口都跟随八旗官兵移驻京师，造成关外地区人烟稀少，土地大量荒芜，严重地损害了满洲的"根本"。为了迅速扭转这一局面，清廷积极鼓励辽阳地区文武官吏招民垦荒，并颁布了奖励条例：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下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把总。若数目之外多招者，每百名加一级。这就是"辽阳招民事例"。本年七月初七日，顺治帝为了加速垦荒工作的顺利进行，趁乾清宫修成，以"颁诏天下"的形式，宣布：各省屯田荒地，已行归并有司，即照三年起科事例，广行招垦，如有殷实人户能开至二千亩以上者，照辽阳招民事例，量为录用。凡是应招的官民，都可以任意耕种，每户给牛一只及犁具、谷种等。

清改定武官品级 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二十三日，清廷为使武官循序升转及按例降调，改定武官品级：左右都督为正一品，都督同知、署都督同知为从一品，銮仪使、都督佥事为正二品，副将、署副将为从二品，冠军使、参将、署参将、掌印都司为正三品，游击、署游击、行掌印都司、省管屯都司佥书、行管屯都司佥书、营都司佥书、署都司佥书为从三品，云麾使、守备、署守备为正四品，守御所千总为从四品，治仪正、牺牲所所牧为正五品，牺牲所所副为从五品，銮仪卫为正六品。

清定州县官蒙隐田地处分例 顺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十二日，清廷鉴于州县官吏在垦荒过程中时常以多报少，或隐匿不报，制定了州县官蒙隐田地罚俸的办法：十顷以下者罚俸三个月，三十顷以上者六个月，五十顷以上者九个月，八十顷以上者一年；至百顷者降一级调用。

清定旗下官员死罪缓免例 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制定旗下官员死罪缓免例。其中规定：满洲、蒙古、汉军官员有祖、父、伯、叔、兄、弟阵亡，及本人出征负重伤者，均可免死罪一次；如罪不至死者折赎；凡强盗重犯者，不在缓免之例。

毛晋校刻《十七史》 顺治十三年(1656)，毛晋校刻的《十七史》成书。毛晋，字子晋，号潜在，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入清以后，毛晋汲古阁藏书达八万四千册，雄踞江南。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组织力量刻印《十七史》。汲古阁楼下两廊前后住满了刻印工匠，规模在海内刻书作坊中首屈一指。印书所用的纸，毛晋特地派人到江西定造，厚的称作"毛边"，薄的称作"毛太"(这些纸名以后仍被沿用而不废)。他在清兵南下，乡里遭劫及动荡不安的形势下，不改初衷，拖着有病之躯，率领子孙、工匠不问寒暑，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顺治十三年，《十七史》终于校刻完成。后人评论说，该书之刻"功于史学伟矣"!

顺治帝限制八旗参加科举 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二十一日，顺治帝发布谕旨，限制八旗参加科举考试。自清廷入关后，八旗子弟看到一旦科举考中既可得升用，获取优厚的俸禄，又可免从军之苦役，于是崇尚文学，怠于武事，热衷于科举。顺治帝为了改变这一情况，继续维持满洲崇尚"国语骑射"的国策，谕令限制八旗参加科举考试，其中规定：每年

的乡会两试俱停，限年定额考取生童；各部院衙门取用他赤哈哈番及笔帖式哈番时，不必分别满汉文学，初用授以笔帖式哈番，停其俸禄，照披甲例给以钱粮；任满三年，如果平时办事勤敏，经过考核给以七品俸禄，再满三年果能称职，即可升补他赤哈哈番；荫各官子弟入国子监读书例亦尽行停止，令其专习武事，于武职补用，待太平之日再照旧例行；每牛录下子弟一人读书例照旧贯彻执行，遇各部院衙门缺员，即以读书子弟补用，不得取用闲散人员。

郎廷佐奏请解决江南三大困 顺治十四年(1657)三月十一日，新到任的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为了缓和江南的阶级矛盾，向清廷提出了"请舒江南三大困疏"：第一，舒官吏考成之困。江南官吏因钱粮积欠多，知考成及降调不可避免，在离职前对百姓尽力捶敲，使社会矛盾激化。郎廷佐建议修改考成规则，废除降调之例，重不过革职戴罪，仍令其在任安心治理，使政事不致废弛。第二，舒民间积逋之困。郎廷佐在校阅赋籍时，发现江南自顺治八年至十三年，积欠钱粮多达四百余万，请以顺治十四年为止，将从前积欠由右布政使清查，侵欺挪借及不应开销者各为一册，民间实欠者为一册，议定一年只征若干，各路督催；而一切新征钱粮，则专责左布政使。这样，就可以清除征新补旧之弊端。第三，舒商民封船之困。江南系商贾舟楫聚集之所，大军经过之处皆封商民船只载送，请以后用江西所造之船运送兵马，使商困得舒，军机不误。顺治帝对郎廷佐上述深切时弊的侃侃陈辞，颇为赞赏，命令所司议行。

清廷制定督垦荒地劝惩则例 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初十日，清廷批准了户科给事中粘本盛奏疏，制定了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先是，顺治十三年，清廷用推行屯田来加速垦荒的计划破产后，又把劝垦荒地的重点放到地主阶级身上，对官僚、地主、乡绅垦荒予以旌奖，并为此制定了督垦荒地劝惩则例：督抚按一年内垦荒地至二千顷以上者记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一千顷以上者记录，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一百顷以上者记录，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卫所官五十顷以上者记录，一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文武乡绅垦五十顷以上者，现任者记录，致仕者给匾旌奖；贡监生及民人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予印照开垦，永为己业；若开垦不实或开过之后复成荒地，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顺治十七年又规定：垦地百顷以上，考试文义优通者以知县用，疏浅者以守备用；垦地二十顷以上，文义优通者以县丞用，疏浅者以百总用。与顺治十四年相比，这次又增加了奖励的比重。

顺治帝始行经筵 顺治十四年(1657)九月初七日顺治帝始行经筵。仪注中规定：讲官由内院酌定数员题用，经书讲章由讲官撰送内院改定后呈皇帝阅过；皇帝升座后，讲官至讲案前一跪三叩头，近案前立，先讲四书毕，由讲经官讲经，退立于原班，同众官出殿至丹墀下两旁排班，行两跪六叩头礼，侍立。

《赋役全书》编定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初七日，清廷为整顿赋役制度，防止不法官吏苛敛，命户部右侍郎王宏祚编写《赋役全书》，颁布天下。该书规定，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标准，征收地丁钱粮；免除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繁重的加派。同时指出，对于过去未起解而今宜增、过去太冗杂而今宜裁撤的项目，都要细加清核，做到条贯井然；对于此后续增的地亩钱粮，各省督抚要按汇题造册报部，以凭稽核。《赋役全书》编成后，每个州县发两本，另立鱼鳞册(亦称丈量册)，详细载明各地上中下田则；又立黄册(亦称户口册)，每年记载各户人丁的增减。鱼鳞册和黄册，与《赋役全书》相表里。在征赋税时，采用明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即以府、州、县一年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与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额，统通编为一条，总征而均支之。为防止地方官吏私派，清廷又向纳税户颁发"易知由单"即通知单。单内详细开列上中下田则及征收的本色、折色、杂项钱粮 数目，并写明征收的总数。易知由单，每年在开征前的一个月，颁发给纳税户作为凭证，以防差错。除此外，还要发给纳税户"截票"(亦称"串票"，或二联印单)。"截票"开列出各户的地丁钱粮实数，"分为十限，月完一分，完成则截之"。清廷在"截票"票面中间，盖以"钤印"，官民各执其半。

顺治丁酉狱发 顺治十四年(1657)，全国举行乡试，因一些地区主考官与应考士子通同舞弊，引起广大士子的强烈不满与抗议。清廷借机兴起大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丁酉狱(顺治十四年为农历丁酉)。"科场舞弊"在封建社会里本来早已司空见惯，但这次大狱蔓延几及全国，以顺天、江南两省为巨，次则河南、山东、山西，涉及士子人数之众，治罪之惨实为历史所罕见。

顺天科场案发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十六日，顺天科场案发。本年顺天乡试科场，参加考试的生员有四千人、贡监生一千七百余人，而录取名额只有二百零六名。当时，翰林侍读曹本荣、侍讲宋之绳为主考官，大理寺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我朴和国子监博士蔡元禧等十四人为房考。由于报考者多，录取名额少，一些士子辇金载银，幅集京师，或直接贿赂考

官，或辗转托人以行贿。而诸考官也欲借此交结权贵，为日后升迁寻找门路，接受贿赂、私许密约者已及千百人，超过了录取名额的四五倍，房考李振邺还将二十五名行贿者书写纸上，以便入围后寻对。诸考官们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经过反复推敲、权衡利弊，最后制定了两条以士子父辈爵位高低财产丰薄为顺序的录取标准：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次之，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子弟无不中；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不素布者又次之。榜发后，众考生哗然。贡生张汉刻揭投科道，蒋文卓刻匿名揭偏传朝野，贡生张绣虎借二人之揭讹诈李振邺、张我朴二房考银一千二百两。本日，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上疏参奏说：北闱榜发之后，途谣巷议，到 处都有不满怨言，此中弊窦甚多。他还举例说，中式举人陆其贤是用银三千多两，同科臣陆贻吉向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的。并指出类似这类事不在少数。顺治接到奏疏后极为重视，命令吏部、都察院严讯，获得真实信息后又于二十五日发布了一道谕旨，指出科场为取士之大典，关系最为重大，况且京师科场为各省之观瞻，岂可恣意贪墨行私，目无法纪？宣布对此案有关人员重加惩处，以戒将来。于是，他下令将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及行贿有据之举人田耜、邬作霖俱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共一百零八人流徙宁古塔。同时，又穷追到底，株连甚广，以致“朝署半空，囹圄几满”，迁延半载，病、死者不绝于耳。十一月十一日，顺治帝又命中式举人复试，但因自己避痘于南苑而未能举行，又使不少复试者流离冻馁，苦不堪言。次年四月，他又亲自审讯了此案其余罪犯，将其中一些人及其家属流徙尚阳堡。

清廷定私铸钱文罪　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初六日，清廷制定了私铸钱文罪。先是，顺治帝以民间多有私铸钱文、扰乱钱法者，命和硕简亲王济度等议定私铸罪。至此，批准了济度等人制定的私铸罪：私铸钱文为首者及匠人处斩，胁从及知情买使者绞监候，卖钱经纪铺户与掺和私钱者杖四十板，流徙尚阳堡；总甲及十家长知情不首者照为首律皆处斩，不知情者以失察罪责四十板，徒一年；告捕者赏银五十两；该管地方官知情不首者亦照为首律处斩，不知情者以失察罪予以降职处分；不能觉察者，内外有关官员分别予以降级处分。

江南科场案发　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五日，江南科场案发。是年，江南举行乡试时，主考官方犹、钱开宗舞弊，榜发后士子大哗，有为诗文杂剧唾骂者。主考官离去时，士子随舟唾骂，甚至向他们投掷砖石。南京书肆还刊刻发行《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近傍为金，暗指两考官姓，书中还揭露了主考官行贿通贿的情形。工科给事中阴应节为此上疏参奏说：方犹等弊窦多端，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打考官，物议沸腾。他还查出了此事中乘机滋弊冒滥的典型：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章钺因与方犹联宗，而被取为举人。顺治帝接到奏疏后，命将方犹、钱开宗及同考官俱革职，并同中式举人方章钺一起解京严审；命总督郎廷佐速行严查科场中一切弊端，将犯人解交刑部；命方拱乾明白回奏。后方拱乾回奏称与方犹从未同宗，章钺不在回避之列。顺治帝又命所司查议。次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此案审结，主考官方犹、钱开宗立斩，妻子家产籍没；同考官叶楚槐等十七人俱绞立决；举人方章钺、吴兆骞等八人俱责四十板，家产籍没，与父母妻子兄弟流徙宁古塔；刑部尚书图海等办事不力或革去加衔加级，或降级革任。

清初罪犯谪戍尚阳堡　顺治年间，触犯清朝刑律的罪犯大多谪戍尚阳堡，并被拨给当地驻防旗人为奴，或充当苦差。顺治十四年(1657)清廷议定，凡卖钱经纪铺户、兴贩搀和私钱者流徙尚阳堡；顺治十七年顺治帝在一道谕旨中宣布，贪官赃至十两者，流徙幕北(大漠以北)地方；顺治十八年又规定，凡“反叛案”内应流人犯俱流徙宁古塔。尚阳堡在今辽宁开原县东四十里，一作上阳堡，满语称为台尼堪(“尼堪”是满人对汉人的称谓)。宁古塔在今黑龙江宁安县内，清初其地尚未开化，行人皆视为畏途。罪犯徙居尚阳堡，犹有屋宇可居，至者尚得活命；而徙居宁古塔的罪犯，有的走至半路即被虎狼所食，或饥人所啖，得生者甚少。

顺治帝崇信佛教　顺治十四年(1657)，顺治帝开始崇信佛教禅宗。他对佛教感兴趣，很可能是受宫中太监的影响。明末以来，太监们就很崇信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并希望皇帝也能迷信佛教而疏于政教，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控制皇帝。顺治帝亲政后，太监吴良辅等人在肃清多尔衮势力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日益成为皇帝的亲信，并使皇帝在处理宫廷事务乃至国家大事时越来越多地有所依靠。顺治十四年，顺治帝在太监的安排下，于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非常欣赏他的言谈举止。接着又召入宫中，请教佛法大意。这年十月，顺治帝又在万善殿召见性聪，赐以“明觉禅师”封号。此后，顺治帝就成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忠实信徒。顺治帝还通过性聪了解了佛教禅宗的高僧及其门徒的许多情况，并陆续召见了其中较为著名的通琇、道忞和茆溪森，让他们在宫中谈经说法。顺治帝对他们都十分宠眷，他们也多方

讨好他。通琇还为福临起了法名“行痴”，号“痴道人”，道忞则吹捧顺治帝为“承愿示生”、“光显吾宗”的“佛心天子”。在他们的薰陶下，顺治帝对佛教简直着了迷。他竟对道忞说，自已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看见僧家的明窗净几，就不愿意再回到皇宫。他甚至还表示，如果不是怕丢下生母皇太后一人，肯定就要随他们出家了。

李之椿复明案发　顺治十四年(1657)，李之椿、李元旦父子潜心经营的复明运动被清廷破获。李之椿，字大生，号组徕，扬州府如皋县人，明天启年间进士，弘光政权建立后升任尚宝司卿。弘光政权溃败后，他离官归里，积极从事复明运动。四年，他因参加赵云、李七领导的反清起义而被清廷鞫讯，两年后获释。出狱后，李之椿鉴于家乡一带抗清斗争逐渐走向低潮，远游闽西，后移居湖州，以求联络永历、鲁王政权和海上义师。不久，他受任永历政权招讨督师阁部，以浙江嘉兴、湖州一带为基地，从事复明和抗清活动。他为争取人心，将部下一人伪托明崇祯太子朱慈烺，并联络了故明永安王，韩王等原明宗室。李之椿的儿子李元旦官至鲁王政权御史。李之椿父子二人还广泛交结明朝遗老、遗民，并通过他们搜罗“党羽”，势力很快波及江南、浙江、山东、河南、陕西、湖广等省。李之椿还很重视武装，既联系海上义师、郧西夔东十三家军，又联络活跃在太湖流域的以钱应魁为首的义军。他多次派人给钱应魁送去空白札付，嘱其“招得好汉或有出力亲信”，促使钱应魁义军势力不断壮大，使清廷疆吏胆战心惊。顺治十四年，正当李之椿领导的复明运动渐趋高涨时，李元旦的家奴谢庭兰跑到京师向清廷告发此事，李之椿父子及一些重要骨干被捕。李之椿在狱中表现坚强，视死如归，后绝食而死。李元旦等四十八人于十六年三月被解至南京处死。

清定户部钱粮考成则例　顺治十四年(1658)十二月初四日，清廷制定了户部钱粮考成则例。其中规定：州县官欠七分者降职四级，欠八分者降职五级；布政使、知府、直隶州知州欠八分者降职四级、欠九分者降职五级。以上官吏俱戴罪督催，完日开复。

清廷部署进兵云贵　顺治十四年(1657)十二月十五日，清廷部署进兵云贵事宜。当时，孙可望在发动对李定国的战争失败、投降清朝以后，清廷认为这是永历王朝内乱、人心未定的迹象，决定乘此有利时机，进兵云南。以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命其同固山额真李国翰由四川前往贵州，相机进取云南；以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统本部及广西官兵，从广西进攻贵州；以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同固山额真济席哈率所部及湖广官兵从湖南进攻贵州。不久，清廷又派多罗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等率军征讨云南，指令他们务必收取云南，“剿荡逆贼”。然而，李定国却只命白文选等扼守南北盘江。这种消极防御的策略，不仅使自己失去了出击的时机，而且又使清军赢得了从容进军的时光。清军经过充分准备，于年底分三路向云南进军，中路多尼部攻陷曲靖，北路吴三桂从间道包抄李定国的后路，南路赵布泰攻陷安隆。李定国全线俱溃，损失惨重。这样，昆明腹背受敌，处于被包围的不利形势之下。

水西土司安坤降清　安坤，彝族人，其家代代相传，世有水西(今贵州黔西、大方、织金、水城、纳雍、金沙等县、市)。明朝时，安氏辖地称为贵州宣慰司。当传至安坤时，明朝已亡，未及履行正式承袭手续。顺治十五年(1658)初，清廷因孙可望、李定国内讧，乘机派三路大军向贵州进发。二月，北路洪承畴部被李定国阻挡在沅州(今湖南芷江)，不得前进，洪以优厚待遇招抚安坤。安坤应允，并派人引导清军由小路进军，迅速攻占贵阳。五月，西路吴三桂至遵义，安坤正式遣使缴印投诚，并引导三桂进取开州(今开阳)、修文、广顺等地。十一月吴三桂向云南进兵时，在七星关遇到了李定国部将白文选的截击，安坤派人为响导，由小道迂迴前进，出现在白文选的背后，切断了他的后路，迫使其军逃遁。吴三桂就这样兵不血刃地顺利进入了云南。由于安坤为清军进入云贵立有功绩，顺治十六年十月，清廷命他正式承袭水西宣慰使，并加都督佥事衔，颁发印信，赐给袍帽、靴带、彩币等。

孙可望叛明投清　顺治十五年(1658)初，孙可望降清。先是，李定国屡败清军，孙可望怕其声望高于已上，于是与部下轻骑进袭宝庆，企图建立奇功以示夸耀，不料由于清军早有准备而打了败仗，相比之下更觉懊恼，也更加忌妒李定国。后来，李定国将永历帝接到昆明，又使孙可望失去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势，这就促使孙可望对李定国由忌妒转为仇恨。顺治十四年七月初，孙可望悍然发动了对李定国的战争。但是，同室操戈，不得人心。两军刚一对垒，孙军前锋倒戈，全军瓦解。张可望见大势已去，急携妻子、财宝北逃，于十一月十五日在宝庆向清军投降，(1658)二十八日赴长沙，抵湘乡，并呈上云南地图，表示愿引导清定进攻云南。十二月初六日，顺治帝敕谕，特封孙可望为义王，但不久又将其送至北京，后在一次射猎时以错射为名，将他射死。孙可望的降清，加剧了大西农民军的分裂，使其人心涣散，

"皆摇摇无固志"。

内外官员结交通贿内监吴良辅 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二十六日,顺治帝经过密行采访,发现朝廷内外一些官员结交通贿内监吴良辅,命内大臣严讯此事。不久,事实真象大明: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陈之遴及官员陈维新、吴惟华、王之纲、王秉乾等,或以名帖书柬,或馈送金银币帛等物结交通贿内监吴良辅,请托营私。顺治帝见此案牵涉之官员甚多,恐株连过多,命对王之纲、王秉乾等一般官员从宽免究,警告他们如再仍蹈前辙,必从重治罪。但将内监吴良辅处斩;陈之遴革职,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盛京;陈维新同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盛京,家产籍没;吴惟华等免死各责四十板,同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宁古塔,家产籍没。

清殿试改在太和殿举行 自顺治元年清廷入关后,中式举人殿试俱在天安门外。十五年(1658)三月初八日,顺治帝批准了礼部奏请,改为在太和殿丹墀考试。

总督张悬锡因受辱自刎 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二十三日,直隶河南山东总督张悬锡因受学士麻勒吉侮辱而激愤自刎,但遇救未死。顺治帝得此消息,除令张悬锡陈奏自刎原因外,将其降三级调用,同时又遣官调查此事。六月二十五日,张悬锡陈奏自刎原因是:学士麻勒吉等人借已迎义王孙可望时失掉礼仪一事,对己竭力侮辱,继而又大肆敲诈勒索,公开索要礼物,侍郎祁彻白更露骨向其索取驼赢;张悬锡经过展转思维,认为麻勒吉等人的真实目的是索贿行贿,违背朝廷意旨,因而予以拒绝,"宁就死,必不敢从",最后被逼无奈,引佩刀自刎。顺治帝认为张悬锡之说有据,指出麻勒吉系皇帝简任近臣,奉命出差时公然逼迫大臣,任意妄行,深负自己委任之恩,命令九卿、科道会审从重议处。七月二十三日,顺治帝下令革去麻勒吉所加之级,再降二级;侍郎祁彻白革去拜他喇布勒哈番并所加之级;学士胡兆龙革去尚书衔并所加之级;三人俱仍留原任。

清更定逃人事例 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十四日,清廷更定逃人事例,制定了查解逃人的奖惩办法:州县官查解十五名者加一级,三十名者不论俸满即升;知府查解三十名加一级,六十名不论俸满即升;道官查解四十五名加一级,九十名不论俸满即升;巡抚查解七十五名记录一次,一百五十名者加一级,三百名者加二级;总督查解数目要倍于巡抚,方能记录和加级;州县官解逃十五名后,地方窝逃一名者,功过不准相抵,仍革职;知府以上、总督以下等官罚俸降级,俱照先前定例;武官功过俱照文官例;满洲家人,不许给票探亲,诈害良民;盛京出征所获人口逃走,及未到京而先逃者,如有本主认领取有保结者,仍给本主,倘此后有冒认假保者,将认主及保人从重治罪;逃人经部文提解者,其地方官免议处,倘在别处拿获,审出行提时在彼处居住者,该地方官从重议处;已获逃人并窝主仍照前定之例,解督捕衙门审理;民人首告逃人,如系挟仇诬告者,即将原告仍照定例责四十板,枷号一月,免流徙宁古塔;民人自首身系逃人,借端行讹者,责四十板,妻子家产人口入官;各处解来逃人,俱送交城门,如有主者,审结后鞭刺交与伊主,如无主认发与各旗认主,夜间交与各旗门上看守。次年十月二十八日,清廷又补定了查解逃人的一些奖惩办法:凡刺字逃人私出境外被地方官拿解者,其经过州县未能查获等官,虽有拿解逃人之功,应加级升转者,不准题叙,仍罚俸半年;容留逃人歇宿店主责四十板;各道员所属州县官如有失察逃人,则降一级留任,降后,所属地方查解逃人至四十五名,即复还原级;早先与明作战时期出边、或在盛京与未到京之先逃走者,免刺,仍鞭一百,给原主,如无主逃人应入官者,免鞭刺;陕西、湖广、四川、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所获逃人著令递解,批文限定日期,如经过地方官选差不慎,钮锁不严,以致逃脱,查参革职,违限者该衙门察参;畏罪潜逃或住屯过限十日之内拿获者鞭一百,过十日者鞭刺。

贾自明受命行缓兵计 顺治十五年(1658)初,清廷派吴三桂等分三路进攻贵州、云南,七月,南明永历帝以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加黄钺,督诸军抵御清军。清经略洪承畴闻讯后,即派部属贾自明往李定国军中行缓兵计。贾自明自称道人,恃幻术,大言上帝以某日助兵,做木偶人数百,长丈许,执幡幢为行阵,李定国受骗上当,四方催促出师日期,总答以须等待。久之无应验,李定国开始疑心,后派人侦知贾自明真实身分,怒斩之。八月,李定国始出师,但军营兵丁锐气已经受挫。

划分满汉官员品级 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二十三日,清廷改定官制,划分满汉官员品级:内三院改称内阁,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仍正五品;设翰林院,掌院学士及学士均正五品。六部满汉尚书,俱正二品;侍郎正二品;理事官改称郎中,正五品;副理事官改称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司务从九品。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三品,副都御史正三品,左佥都御史正四品,监察御史正七品,经历改为司务从九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左右通政正四品,左右参政正五品,经历改为司务从九品。大理寺卿正三

品，少卿正四品，寺丞正五品，寺正正六品，寺副从六品，评事正七品，司务从九品。除宗人府外，其余部院满汉启心郎俱裁去。又添设各道御史三十员。

理藩院大辟条例议定　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十六日，议政王贝勒大臣等遵旨议定理藩院大辟条例。其中规定：凡平人与蒙古王、贝勒福金通奸者，福金处斩，奸夫凌迟，其兄弟外绞；另有下述情形之一者处斩：私掘蒙古贝子等坟墓、截杀来降人众之为首者、劫夺死罪人犯为首者、公行抢夺他人财物、临阵败走、与逃人通谋给马遣行、挟仇行害放火烧死人畜、故意杀人。

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　顺治十五年(1658)，谷应泰主编的《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完成。谷应泰，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早有志于《明史纪事本末》的著述。自顺治十三年，他出任浙江按察使司佥事时，就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广收邸报，并邀请一些社会名士编书，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编辑成《明史纪事本末》。

盛京三部建立　顺治入关后，清各部院衙门均移设北京，而以内大臣官镇守盛京。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为了"隆重陪都"，在盛京设立了礼部，次年又设立户部、工部。康熙元年设刑部，康熙三十年(1691)复设兵部，并设侍郎以下各官。至此，始成盛京五部之制。

磨盘山激战　顺治十六年(1659)二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及赵布泰、尚善等率清军与李定国部战于滇西磨盘山(今马龙县西北)。当时，李定国在清军穷追之下，连战皆败，决定在径隘菁深、屈曲仅容单骑之磨盘山上立栅数重，设立三道埋伏圈，企图乘清军不戒备之机鸣炮为号，首尾横突截击，可获全胜。布置停当，尾追的清军以为李定国早已远遁，一万二千人松松散散地爬上了磨盘山。忽然，明大理寺卿卢桂生向吴三桂投降，并报告了李定国设伏事，吴三桂于是下令清军急退，炮轰埋伏圈。双方短兵相接，激战了约六小时，李定国损失兵马三分之二，被迫率部西撤；清军虽然获胜，十余名都统以下军官和上山之万余名兵士被歼灭，但从此不敢再穷追李定国和南明军。

清立明崇祯帝碑　顺治十六年(1659)三月十五日，清立明崇祯帝碑，碑文由大学士金之俊撰写。碑文总结了明思宗崇祯朝失政的原因，指出，崇祯帝之所以失天下，并非由于他的失德所致，而是朝野内外文武事权在握者无一实心办事之人；并告诫后世之臣要悚然知所警戒，后世之君要慎于用人。总之，国君以安民为政务之本，而安民又要以知人为本，这实为"万世之常经"，永远成为为君为臣的"宝镜"。

顺治帝严禁溺女　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十六日，左都御史魏裔介在奏疏中指出，福建、江南、江西等地溺女婴之风甚盛，"忍心灭伦，莫此为甚"，恳请皇帝严行察禁。顺治帝对此十分重视，立即下谕旨，命严禁溺女恶习。

麻勒吉徇庇尚善案发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弘文院学士麻勒吉因徇庇大将军贝勒尚善纵兵扰民，被夺官。初，尚善领兵入滇，不遵顺治帝"勿得擅取民一草一木"之敕旨，纵兵扰民，戎车所至，狐兔不存，弄得民怨沸腾。经略洪承畴在赴云南视察后，于(1659)闰三月二十九日上疏顺治帝，指出，清兵入滇后，云南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百姓及其衣粮、财物、头畜俱被掳掠和抢尽，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全口，抢天呼地而莫可控诉。而永昌一带更为悲惨，被杀死、拷烙死者堆满道路，周围数百里杳无人烟，人心惶惶，不知所措。顺治帝接到奏疏后，立即派麻勒吉等人携银往赈，并按查尚善罪状。但是，麻勒吉回京后百般为尚善辩解。顺治帝又派安亲王岳乐等复勘，证明洪承畴奏疏属实。顺治帝对此十分恼怒，罢免了麻勒吉的官职，同时命令释放清兵所掠之妇女、儿童。

郑成功北伐　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郑成功称招讨大元帅，率十七万水路大军，在崇明岛登陆，开始北伐。不久，部队至焦山，破瓜州，攻克了长江的重要门户镇江及其所属诸县，一路上清兵不堪一击，望风瓦解。六月二十六日，郑成功部前锋已至江宁(今南京)。七月十二日，郑成功亲自率领十余万大军，连营八十三处，将江宁团团围困。清廷得此消息，举朝皆惊，顺治帝一怒之下拔剑砍碎御座，下令亲征，被谏阻。于是以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统兵增援江南。但是，郑成功却为一时的胜利所迷惑，没有积极进取，使得广大将士无所事事，以为功在旦夕，遨游江上，日夜张乐歌舞，释戈开宴，纵情娱乐，致使战事拖延了一月之久。而困守江宁城里的总督郎廷佐在假投降技俩的掩护下，积极备战。七月二十三日，郎廷佐抓住郑军将士庆贺郑成功生日、"饮酒卸甲"战斗意志松弛的有利时机，根据同诸将议定的作战方案，指挥清军提督管效忠、总兵梁化凤水陆进兵，大败郑军。郑成功的主要将领甘辉被俘牺牲，全军在荒乱中纷纷溃退，"勇锐多投江死者"。郑成功立脚不稳，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

清提高理藩院地位　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蒙、回、藏民族事务的机关。清廷入关前，理藩院的职官是承政、左右参政、副理事官。顺治元年入关后，清改

承政为尚书,参政为侍郎,副理事官为员外郎。顺治十六年(1659),清廷又将理藩院尚书、侍郎改兼礼部衔。顺治十八年,清廷又以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而改称理藩院尚书、侍郎,并添设郎中十一人,同时又规定理藩院的地位列于工部之后,不再附属礼部。

顺治帝加崇祯谥号 顺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初九日,顺治帝自南苑出西红门狩猎,至昌平,见明陵殿宇墙垣倾圮已甚,周围树木多被砍伐,命工部将残毁诸处尽行修葺,禁采树木,添设陵户,并令昌平道官不时严加巡查。(1660)十一月二十七日,他谕令礼部说:明崇祯帝励精图治十七年,考其生平,无甚失德,只因"寇乱国亡,身殉社稷","殊堪矜悯,宜加谥号,以昭实行",特为崇祯加谥号曰庄烈愍皇帝。

朱之瑜东渡日本 顺治十六年(1659)冬末,年逾花甲的朱之瑜在长崎登岸,开始了在日本二十余年的讲学、传艺和著述生涯。朱之瑜,字鲁玙,生于浙江绍兴府一个世宦之家。明崇祯十一年(1638),他曾赴京应礼部试,取恩贡生。弘光政权建立后,朱之瑜因不屑于与阉党马士英为伍,遭到通缉,被迫逃往舟山,为原江北总兵黄斌卿规划抗清战事。顺治十六年冬末,他孑然一身流寓日本后,以家乡水名取号舜水,广泛交结日本思想、教育、学术界朋友,并把中国古代工程设计、建筑技艺的许多经验带给了日本,其影响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例如,在朱之瑜的影响下,日本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创立了水户学派,编纂《大日本史》,该学派对后来的明治维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定世职承袭例 顺治十六年(1659)十二月十九日,清廷制定了世职承袭例:除嫡子孙承袭外,有绝嗣者许亲兄弟及亲兄弟子孙承袭三世,三世之后停止承袭,其嗣养疏远宗族之子,不准承袭。次年(1660)十二月初五日,清廷又改定世职承袭例:凡系世职,有子有孙者仍照常袭替;原规定无子孙者除亲兄弟外,其他人不准袭替,改为无子孙者,有本生祖、父、亲伯、叔、兄、弟、侄男、侄孙概许袭替;其余嗣养疏远宗族之子仍不准袭替。

大乘教图谋反清起义 清初,江南民间盛行大乘、园果等教。"妖人"端应国和曹氏在溧阳县传播大乘数,信教者颇多。该教聚众诵经,夜聚晓散。顺治十七年(1660)夏,他们又与当地抗清力量联合,图谋起义,并以大板书写抗清檄文,立于通衢以号召群众响应。江宁巡抚朱国治闻讯后,立即带兵追捕,次年六月捕获了端应国和曹氏,并穷治教徒,弄得乡村鸡犬不宁。

严申结社订盟之禁 顺治十七年(1660)正月二十五日,清廷从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奏请,严申结社订盟之禁。清初以来,江南之苏、松二府、浙江之杭、嘉、湖三府学人士子妄立社名,纠众盟誓,连名片往来也用同社同盟字样。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为此上疏说,这种情况若任其发展下去,必将植党成风,要求予以严禁。本日,顺治帝谕令严禁结社订盟,并宣布:此后再有此等恶习,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如学臣徇隐事发,一体治罪。

清廷颁赐诸王《三国志》 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二十九日,清廷以翻译之《三国志》(满文本)颁赐诸王以下、甲喇章京以上官,以使臣僚继承太宗皇太极的遗愿,讲求治国平天下之道。

清定八旗汉字官名 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十九日,清廷制定了八旗汉字官名:固山额真汉字称为都统,梅勒章京汉字称副都统,甲喇章京汉字称参领,牛录章京汉字称佐领,昂邦章京汉字称总管。

清定王以下妻女封号 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二十八日,礼部遵旨拟定王、贝勒、贝子、公等妻女封号:亲王、世子、郡王正室曰妃,贝勒、贝子、镇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正室曰夫人,奉国将军正室曰淑人,奉恩将军正室曰恭人。亲王女和硕格格曰郡主,世子、郡王女多罗格格曰县主,贝勒女多罗格格曰郡君,贝子女固山格格曰县君,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女曰乡君,未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及镇国将军以下之女不授封,曰宗女。

清定迟报灾情处分例 顺治十七年(1660)四月十七日,清廷制定了迟报灾情处分条例。规定:凡各直省有灾,先以情形入告,夏灾限六月、秋灾限七月上报。州县官如逾限半月以内者罚俸六个月,一个月以内者罚俸一年,一个月以外者降一级,两个月以外者降二级,三个月以外者革职。抚按道府官以州县报到之日为始,若有逾限,照例一体处分。

董贵妃死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年仅二十二岁的董贵妃去世。董贵妃在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入宫后甚得顺治帝宠爱被封为皇贵妃,而使五位蒙古后妃受到冷遇。特别是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初七日,董贵妃生下皇四子后,顺治帝特别欢快,竟不顾皇子排行之秩序,公然宣布皇四子为"朕第一子",目的十分明显,就是把皇四子作为未来皇位的继承人,董贵妃必定成为皇太后。这就违背了力主以联姻作为加强满蒙政治纽带的孝庄太后的旨意,对满蒙贵族间的政治关系构成了威胁。于是,孝庄太后暗设毒局,必欲置董贵妃于死地而后快。皇四子生下不久,孝庄太后突然宣布"圣体违和",养疴南

苑，并谕诸后妃及百官视疾问安。董贵妃不敢悖旨，拖着虚弱身子前往南苑问安，并朝夕侍奉"废寝食"，经此折腾，她已"形销骨立"，加之皇四子早殇的沉重打击，很快染病不起，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辞世。董贵妃病死的当天，顺治帝即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并公主、王妃等，俱于景运门外齐集哭临；自己则辍朝五日。二十一日，他宣布追封董贵妃为皇后，"以示褒崇"，二十六日行追封礼。

顺治出家　董贵妃去世后，顺治帝为求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整天与茆溪森等人议论佛经，甚至彻夜交谈。顺治十七年(1660)九月，他更请茆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通琇回京后得知此事，十分恼火，当即命人取来柴薪，要烧死茆溪森，这才迫使顺治帝打消了出家的念头。不久，顺治帝又听从通琇的建议，命选僧一千五百人，于阜城门外慈寿寺从通琇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此后，顺治帝虽许以蓄发，但出家之念未消。通琇于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见他时，两人除相视而笑(按：当时顺治帝头发尚未长出，两人中一个是光头皇帝，一个是光头和尚，故相视而笑)外，顺治帝依然向通琇表露了要效法释迦、达磨当和尚的心愿，只是因为两个月后他即因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

通海案发　顺治十七(1660)、八年(1661)间，清廷在江南大兴"通海"刑狱。先是，郑成功和张煌言在内地反清志士的引导和帮助下，几次由海道直入长江，围攻南京，引起了清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因此，当郑成功军队退出江南后，清廷就在扬州、镇江、苏州、绍兴等地，大肆逮捕曾拥护和支持郑成功的人。这就是清初历史上有名的"通海案"。在这场刑狱之中，数千人受到了牵连。其中，情节重的被斩首，轻的则充军宁古塔为奴。例如，清苏松常镇提督马进宝曾多次与郑成功私通信息，被清廷审讯后处决；浙江慈溪儒士魏耕在郑成功退出江南、张煌言孤军无援而陷入仓徨失措时，亲到煌言军中劝其再接再厉、不要气馁，事泄也被清廷杀害。

顺治帝口述遗诏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六日，顺治帝自知病重将不久于人世，急忙召见亲信、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入养心殿，命他草撰诏书。王熙见此情景，匍匐饮泣，不能下笔。顺治帝命他抑制悲痛，在病榻前起草。王熙写完一条呈交之后，恐顺治帝过于劳累，于是奏准在乾清门下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完稿。遗诏除命三子玄烨即帝位、由四大臣辅政外，以十四事罪己。主要内容是：重用汉官，疏远满臣；不体察民艰，兴建殿宇；任用奄人，营私舞弊；贪图安逸，疏于理政，等等。

顺治帝病逝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日，顺治帝染上天花。初七日夜病死于养心殿。他在遗诏中正式宣布立时年八岁的玄烨为太子，即皇帝位。顺治帝死后，遗体被火化，骨灰葬于孝陵(今河北遵化东陵内)。另根据封建礼仪，朝廷大臣在顺治去世后即议其庙号，结果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称其为宗，唯有大司马梁清标提出应称世祖，并指出，虽然太祖努尔哈赤是清朝开国之君，但是顺治帝功劳很大，"入主中华，奄有万方，统一天下"，应该成为"世世所祖也"。于是，众位朝臣在讨论中接受了这一建议，乃定顺治帝庙号为世祖。

康熙帝即位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日，顺治帝染上天花，自知不久于人世，欲立次子福全为嗣，孝庄太后则坚持立玄烨为嗣。于是，顺治派人征求汤若望的意见，汤认为玄烨已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而又伤命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竭力支持孝庄太后。初六日，玄烨被立为皇太子，次日顺治去世，初九日玄烨即皇帝位，时年八岁。是日颁诏大赦，以第二年(1662)为康熙元年。

清廷划一内外各官开复之例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二十九日，清廷为划分内外各官开复之例，规定：嗣后凡内外大小文武官员因事降级而留任者，三年无过方准予题请开复；如三年之内又因过被降，即与后降之日为始，计满三年再题请开复。

金圣叹"哭庙案"发　金圣叹，字若采，本名采，更名人瑞，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他拥护清朝的统治，关心民间疾苦。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十五日，顺治帝去世的哀诏传到江南，江宁巡抚率同官吏举行哀悼仪式。十八日，金圣叹与吴县生员倪用宾等十余人至文庙，呈递揭帖，控告吴县知县任维初贪酷虐民，暴刑催征等劣迹。巡抚朱国治当即逮捕倪用宾等五人。次日，金圣叹等再集至文庙，要求释放倪用宾五人，千余名群众对此表示支持，斥责朱国治徇庇任维初。朱国治严厉镇压，并下令逮捕金圣叹，将其押解南京治罪。接着，他又以金圣叹、倪用宾等人在顺治帝哀诏初临之日，竟敢聚集千百人，"震惊先帝之灵"，目无朝廷，罪大恶极，奏报朝廷。七月十三日，金、倪等人被害于南京三山街，家产籍没入官，妻子流徙。

清定会试南北中卷例　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二十四日，清廷批准了礼部奏请，制定了会试南北中卷之例。清初，会试取士原分南北中卷，后因云贵等省战乱，将中卷并入南北卷内。云贵平定后，清廷仍将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及江宁、苏、

松、常、镇、徽、宁、池、太、淮、扬十一府和广德州为南卷；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省和奉天等处为北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庐、凤、安庆三府，徐、滁、和三州为中卷。其南北中卷中式额数，照赴试举人之数均派。

孝庄太后拒绝临朝听政 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不能料理政务，而其祖母孝庄太后聪明机智、德高望重，在统治阶级中享有崇高声望。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安徽秀才周南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请求孝庄太后垂帘听政。但孝庄太后却无掌握朝政大权的意图，只愿辅助幼主康熙治政，故严词拒绝了周南的请求。

庄廷鑨私著明史案发 顺治十八年(1661)春，庄廷鑨私著明史案发。庄廷鑨，浙江乌程(今湖州市)南浔镇人，出身一个巨富而知书的家庭。入清以后，庄廷鑨趁明天启朝大学士朱国桢一门败落之际，以银千两将朱国桢生前所撰明史稿本购得，并广聘名士，增补天启、崇祯两朝史事，辑成《明史辑略》，未及刻印而庄廷鑨就于顺治十二年病故。其父庄允城费时五年，于顺治十七年冬将书刻成，刊行于世。由于书中有诋毁贬斥清统治者的文字，如称清太祖为建州都督，直呼奴尔哈赤；再如自天命至崇德皆不书其年号，相反于南明隆武、永历则大书特书等等，因而书刊行后，不断遭致恐吓，索取钱财。时归安县知县吴之荣罢官居家，欲通过索诈而偿还八万两赃款以复官。于是，他指使前任浙江粮道李廷枢向湖州知府陈永命告发此事。不料，陈永命早已接受了庄允城数千金的贿赂，拒不审理。庄允城也不向吴之荣行贿。这就使吴之荣恼羞成怒，乃将购得的初刊本呈交法司。清统治者得悉消息后，为压制一切公开的或潜在的反清行动或思想，遂兴大狱。凡刊刻、参校、藏书、售书者，以及失职之官吏，均株连治罪。此案直至康熙二年(1663)才最后了结。

江南"奏销案"发 顺治十八年(1661)六月初三日，江南"奏销案"起。清初，江南赋役甚重，以苏州、松江等府为最；加之士绅"包揽，不无侵蚀"，往往旧赋未清而新赋已近，积欠常达数十万之多。清廷因战事频仍，财政窘急，严催征积欠之令。于是，江宁巡抚朱国治造册报部，皆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溧阳县绅衿之"抗粮"不交者一万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要求朝廷严提究拟。实际上，其中除确有官绅包揽侵蚀外，也有实欠未免者；有完而总书未经注销者；有实未欠粮而为他人影冒立户者；有本邑无欠而他邑为人冒欠者；有十分全完而总书以小怨反造十分全欠者，情形十分错综复杂。朱国治疏上，清廷批道："绅衿抗粮，殊为可恶。"经刑部察议：现任官降二级调用，士绅黜革，衙役照章治罪。于是，四府一县之士绅被黜籍者达万余人，被逮者也有三千人，得免者无几，衣冠扫地，学校为之一空，有乡试方中而生员已革，有取中进士而举人已革。顺治十六年的进士第三名叶方蔼，仅因欠银一厘即被降官，致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

"咒水之祸"发 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十九日，缅甸国王以饮咒水盟誓为名，残酷杀害了永历王朝四十二名大臣和太监，是为"咒水之祸"。先是，永历帝带着群臣逃亡缅甸之后，缅王还能以礼相待。顺治十八年，缅甸发生政变，老王为弟莽猛白所杀。新缅王为了顺利把永历帝交给陈兵中缅边界的吴三桂，于七月十八日派使臣邀请永历帝从臣渡河，饮咒水盟誓，以表"结义同心"。当时，永历从臣沐天波识破了缅王的阴谋，劝群臣勿去。但永历帝重臣马吉翔却要群臣遵重缅人"敬鬼重誓"的习俗，并于次日胁迫四十二名大臣和太监同行。及至，三千缅兵突将他们围困一处，命令前去饮咒水。诸臣惶恐无计，只得从命，结果全被缅兵所杀，马吉翔也死于乱刃之下。永历帝遂成光杆司令，只好听缅王摆布。次年初，缅王将永历帝及眷属送回云南。

清廷下"迁界令" 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十三日，清廷下"迁界令"，福建、广东、江南、浙江四省滨海居民各向内地迁移三十里，"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甲不留。"先是，海澄公、降将黄梧密陈剿灭郑成功之策：将沿海居民迁入内地，使郑氏无物资、人力之接济，将不攻自灭。后来，清廷遣兵部尚书苏纳海视察沿海，决定接受黄梧之策，于是颁布了"迁界令"。此时，四省沿海居民迁离海边三十里，有的则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即以违旨论立斩。清兵还要不时巡界，一遇出界人登时斩首。结果，四省沿海居民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死以万计，惨不忍睹。清廷为缓和事态，又令四省督抚对迁入内地的居民酌给田地房屋，"使之得所"。

郑成功收复台湾 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十三日，荷兰殖民者在郑成功军队勇猛刚强的进攻气势面前，在投降书上签字，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横行东方的老牌殖民主义者荷兰侵入台湾西南的海港鹿耳门，在沙洲上修建了台湾城(今安平)，从此对台湾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主义统治。然而，台湾人民始终未予屈服，多

次进行英勇顽强的反侵略斗争，有力地鼓舞了郑成功的反侵略斗争。

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郑成功与其部将密议后决定攻取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并把台湾作为抗清"东征西讨"的战略基地。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率领二万五千人由金门出发，次日抵达澎湖，四月初一日到达鹿耳门，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接着，郑军从海陆两方面向荷兰侵略者发动了猛烈攻击。在海战中，郑军以木船击沉荷兰的战舰，控制了台湾海面，切断了荷兰殖民者的海上交通联系。在陆战中，郑军在台湾人民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援下，以弓箭和大刀等简陋武器战胜了拥有先进枪炮的侵略者，并击毙了侵略军头子汤玛斯·贝德尔，进而包围了侵略军的最后据点台湾城。荷兰侵略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危机面前不得不放下武器，十二月十三日宣布投降。至此，被荷兰殖民者非法占据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回归祖国。

孙奇逢著《理学宗传》 顺治时期，王学斗杓孙奇逢写出了清代第一部学术史专著《理学宗传》。明末，随着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来临，王守仁之学也入穷途末路，一些崇 奉程朱之学者，欲乘机掀起波澜，将王学置于异端。作为王学后劲的孙奇逢，看到自身学派的深刻危机，决心力挽狂澜，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写出了《理学宗传》，力图以此确立王学的正统地位。《理学宗传》凡二十六卷，其中除卷十二至十四为汉、隋、唐诸儒考外，其余各卷所录均为宋、元、明诸儒。他把宋明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人称之为"宗传"，作为该书的核心。全书各卷，大体首列所录学者生平行事、学术大要，次为著述、语录摘编，末为当时、后世儒林学者的评语及作者的论赞。该书出版后，得到当代学者的颂扬，称之为"发人深省"。

陆世仪著《思辨录》 顺治初，理学家陆世仪著《思辨录》。陆世仪，字道威，别号刚斋。明末，他不满时政，鄙弃功名，悉以著述，经常与同乡友好在一起切磋学问，写下了大量的札记。明清易帜后，陆世仪将逐年札记纂为一书，题名《思辨录》。该书初无体制，后经陆世仪的友人删汰编辑，分类为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天道、人道、诸儒、异学、经、子、史籍等，名之为《思辨录辑要》。大思想家顾炎武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誉称陆世仪为当世之"真儒"。陆世仪在书中极力推崇程朱，将程朱理学尊为"正学"，而将陆陇其王阳明理学一概斥之为"异学"，认为明清之际学风之坏根源于学术界对程朱理学不敬。但他虽好谈"名理"，却力主躬行实践，提醒人们重视对天文、地理、河渠和兵法的研究，并指出"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于世是无补的，不应提倡。

弓长编撰成《龙华经》 圆顿教经卷《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简称《龙华经》)，是清一代民间宗教中影响最大的一部经卷。它是弓长("张"的分写，其人真实姓名不详)于明崇祯末年开始编撰，顺治初年完成的。《龙华经》宣扬古佛和无生老母是天地的创始者、宇宙的主宰。弓长是无生老母的徒弟，遇事都要向无生老母请示。而当"末劫"(指天灾人祸横行、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来临时，弓长按无生老母的指令，在"无影山"(此山为虚构)前造法船、金船等作为救渡众生的工具，同时又将无生老母传授的十步修行法术，教给大地众生，使其顺利回归天宫，摆脱人世间的苦难。《龙华经》还宣扬世界分为三个时期：龙华初会、二会和三会，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时期又分别由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主掌：燃灯佛后，有释迦佛接续传灯；释迦佛后，有弥勒佛接续传灯；弥勒佛后，有天真老祖接续传灯。这天真老祖就是弓长。

五荤道收元教创立 顺治年间，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在京拜太监魏子义为师，习白莲教。回到山东后，他改名刘奉天，创立五荤道收元教，又称收元教，编造了《五女传道书》。刘佐臣以收元结果，即把尘世间受苦难的众生普渡回天宫，作为收徒和壮大该教势力的宣传手段。他创教伊始，为了表示该教与白莲教等"邪教"有本质区别，采用了佛教的一些戒律，并在教名上特意加上"五荤道"的字样，竭力宣称"不开斋"、"不破戒"、"不食大五荤"，而又忌食生葱生蒜。实际上，这个教派依然是白莲教的一支，其根本目的是传徒敛钱。到了清代中叶，该教教规由戒五荤改为戒杀、戒盗、戒淫、戒毁、戒欺，鼓吹仁、义、礼、智、信。

八卦教创立 顺治年间，刘佐臣在创立五荤道收元教时，以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收徒敛钱。这就是八卦教的由来。据说，刘佐臣只传了四个徒弟，即清丰县人秦姓、"南方"郜姓、荷泽县人王姓、金乡县人侯姓。秦姓其人难于考证。"南方郜姓"，即指离卦教的开山祖师、河南商邱县人郜云陇。荷泽王姓，即指震卦教的开山祖师、山东荷泽县人王清容。金乡侯姓，指山东金乡县人侯棠。刘佐臣把金乡一带的震、坎二卦交由侯姓掌管。其他几卦，未有卦主。这为后来的八卦教奠定了基础。清高宗乾隆五十年代初期八卦教正式得名。

说书艺人柳敬亭广说评书 柳敬亭，本姓曹，

名永昌，字葵宇，后指柳为姓，号敬亭，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活跃在明末清初的艺坛和军幕，享盛名近五十年。清顺治年间，他曾先后在左良玉和苏松常镇提督马进宝的帅府中说书。他说书内容广泛，最擅长楚汉、隋唐、水浒故事，而以"英雄盗贼传最神"。他演出手段灵活，缺醒木时可以棋代，缺纸扇时可以尘尾代；语言生动、幽默，经常谈笑风生，滑稽有神；充分利用表情，"眉目耳颊俱作口，神情犹觉闲踌躇"。他还能和下层人民打成一片，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柳麻子"，所到之处常被拦住而不得前行。柳敬亭的说书艺术对扬州评书和北派评书的发展影响很大，被称为早期扬州评书的代表者。

清廷停止加派练饷 康熙元年(1662)，清廷接受了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的谏言，停止加派练饷。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因滇、闽用兵和建造顺治帝的陵墓，财政十分困难。同年七月，议政王大臣会议提出并经皇帝旨准：加派练饷，一律照明代旧例起征。练饷是明末统治者强加给广大人民的一项沉重负担，是为当时的一大弊政。因此，这一消息传出后，人心惶惧，形势非常紧张。那时，魏裔介虽因遭到弹劾而补原官未久，但他对此事之弊深表关注。同年十二月，他在《计兵食以恤民力疏》中指出：近闻各地百姓，虽然凑足了此项饷银，"而人穷粮贱，剜肉医疮，其苦难之状，有难以笔舌形容者！"如果年年加派，稍遇灾荒，广大百姓势必大批的死亡流离，后果极为严重。他建议合计天下兵粮，如能足用，加派练响"即应全部停止。"正所谓"为百姓，即为国家。"疏后两日，清廷即从其言，决定除本年已派外，自康熙元年起一律停止，命户部作速刊示，遍行晓谕，使小民咸知，魏裔介敢言时弊的行动赢得了当时人们的赞许，朝野上下，人心大悦。

永历帝死 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被害于云南昆明。永历帝即朱由榔，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十月。祖籍濠州钟离(安徽凤阳县东)。明神宗朱翊钧孙，明思宗朱由检堂弟。其父朱常瀛，神宗第五子，封桂王。朱由榔是他的次子。顺治十六年(1659)朱由榔逃往缅甸后，缅方要求从臣以下不能带兵器，他下令依从，随从者锐减。同年五月，在缅甸金楼白象王的接待下，他迁居者梗，开始了倍受内外欺侮的流亡生活。顺治十七年，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上疏清廷，强调唯 因永历帝尚在，李定国等"鼓惑人心，窥我边防，患在门户。"题请率军入缅，根除后患。顺治帝决计进兵。顺治十八年，清军大举入缅。新任缅王莽猛白先是编造理由，杀害了永历帝的四十三名大臣、内监，而后，缅兵进入了永历君臣的住所，抢掠财物，从臣妻女与贵人、宫女纷纷自尽。余存者三百余人，无一不病，死者甚众；永历帝已完全陷入绝境。次年元月，他向在缅境旧晚坡驻兵的吴三桂致书，对吴极尽吹捧，并以崇祯帝待之甚厚为理由，希图唤起吴三桂的怜悯之心，苟全活命。吴三桂不为所动，于是，莽猛白于当月初三日将永历帝及其眷属骗出住地。次日，即将他们交入清营。清廷接到奏报，专此祭告顺治帝等，颁诏全国。极表庆贺。直到这时，永历帝还心存幻想，"吴某世受国恩，未必毒及我母子也。"然而，吴三桂则因惧生意外而假传圣旨，康熙元年(1662)四月八日，他命人用弓弦将永历帝及其子缢死于昆明城内篦子坡，后丛葬于昆明北门外，时年三十八岁。

郑成功病逝 康熙元年(1662)五月初七日，郑成功因病去世，终年三十九岁。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便以台湾为抗清复明的根据地，设置府县，建立行政机构。为促进台湾农业的发展，广召大陆居民到台垦荒屯田，派遣汉族中精于农事者到高山族聚集地，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并给高山族人民铁犁及耕牛，发展了台湾的社会经济，由于他征战多年，在台的初创之期又操劳过度，以致积劳成疾。其间，其子郑经在据守厦门时与其弟乳母通奸生子，他闻讯大怒，命金、厦诸将将郑经及其母董氏斩杀。诸将因他正在患病，未从。他更加愤恨。康熙元年(1662)五月，他又外感风寒，病势日重，但他仍强振余威，登上将台，手持望远镜，远望澎湖，是否有船只到来。文武百官入谒时，他依旧端坐床上，谈论国事。因此，许多官员不知其病。及至他病危时，都督洪秉诚调药送至床前，他将药投地，叹曰：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进退无据，罪案日增，今又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复顿足捶胸，双手抓面，大呼而逝。

吴三桂晋封亲王 康熙元年(1662)五月十一日，清廷命晋封吴三桂为平西亲王，并于六月三十日册封。吴三桂成为汉族官员中受封亲王爵位的第一人，并开启了清代汉族王爷封藩自专的先例。自此，吴三桂年俸八千两，仅次于皇子与和硕亲王，仪仗、朝会等均与二等爵位的多罗郡王并列；总管云贵，事权归一。康熙二年十一月，清廷又专此命贵州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具照云南例，著吴三桂管理。并特别写明"听平西王节制。"吴三桂成了总揽云贵两省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不久，清廷批准他的请求，开办云南铸钱局，每年拨给其饷银九百万两。当时，属于他藩下的军队多至七万余名；明国公沐英的庄园

被他全部圈占，建立王庄，广征各项赋税，鱼肉各族人民，借以扩充财势。同年，他迫不得已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对清廷埋下了不满之心，而实际上，他已成为拥兵割据、并能与清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一方之主。

荷兰阴谋再次入侵台湾 康熙元年(1662)五月，郑成功病逝。荷兰殖民主义者急欲乘此时机，蓄谋重占祖国宝岛台湾。逾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命商务专员博尔特为提督，率包括夹板船在内的十二艘船舰，统兵一千二百八十四名，载炮一百三十九门，从巴达维亚(雅加达)启锚进军。同年七月，博尔特的舰队到达闽江口，船上的旗帜写有"支援大清国。"同时，博尔特派员求见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表示愿为先锋，攻取金、厦二岛，但必有清军助其重占台湾为条件，致书中还表示：他们"对郑军以及一切清廷敌人的作战，有万全的准备。"同年九月，因清廷正在同郑经议和，故耿继茂在福州接见博尔特时，拒绝了荷兰人的请求。博尔特恼羞成怒，独自率舰队以海盗故技袭击郑经所部的船队，阴谋未能得逞。康熙二年(1663)底，博尔特野心不死，再次统兵舰到达福建闽安镇。清廷同意与其联合作战，于是，清、荷联军在金、厦打败了郑军，康熙帝传旨嘉奖荷兰有功官兵，并颁《奖励荷兰国敕命书》。但是，博尔特仍然没有达到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的目的，就是和清政府正常贸易的权力，也因其心怀叵测几乎全部失掉。

李定国病逝 康熙元年(1662)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国因病去世，终年四十二岁。李定国在联明抗清后，不忘故主。永历帝朱由榔亡命缅甸，他上疏三十余次，屡议迎之出缅。他为了救出永历帝，入缅后，衣食无着，士兵相继死亡，处境极为艰险。顺治十六年秋，他派使对缅人说："苟送上(永历帝)出，则我罢兵。"对方答复他说：即不怕他攻城，也不怕他迁延岁月，惟知李部"水土不服，兵亦有减无增。"次年，李定国又为此而遣使致缅王，再遭拒绝。这时，农民军既乏船只，又缺粮饷，疾疫流行，惨状丛生。康熙元年(1662)元月，李定国闻缅王将永历帝献与清军，愤恨欲绝，痛感"势既不敌，追无能为。"但仍想尽快恢复云南，继续抗清。他曾斋戒作表，自述生平经历，祝告上天，并说："如天命已绝，愿速死，毋徒苦众人。"同年六月十一日，即其诞辰之日，身患重病。不久闻永历帝被吴三桂杀害，他"仰天大恸，"病势急剧恶化，终于不治而死。临终遗言其子与部将："宁死荒外，毋降也！"李定国从一名普通的农民军战士成长为抗清名将，身先士卒，爱护兵民，誓死抗清，戎马生涯凡三十六年。

实行考满，停止京察大计 清代考核京官和外官的制度分别称京察、大计。康熙元年(1662)七月，康熙帝谕吏部、都察院：停止京察大计，内外大小官员均实行三年考满。具体办法是：外任者，责成当地督抚；内任者，责成分管各部的大学士、尚书等，必须皙公皙慎，开注事迹评语，移送部院，严加考察，甄别去留，以示奖惩。是月，复定三年考察制。凡三年考满，满汉三品京官以上者和各省督抚，均各"自陈"。其余官员立五等评语：一等称职者加一级，二等称职者纪录一次，办事平常者留任，才力不及者降一级调用，不称职者革职。如果添写评语官徇情不公，或明知僚属到期而不考，或地方盗案，钱粮未清者而冒称考满，或各官历俸已满回避不考者，部院、督抚及本官一并治罪。康熙二年(1663)二月，明确因实行三年考满法，凡一、二等称职者即系举荐，停止各省总督、巡抚二年举荐一次例。康熙三年五月，针对考满中一、二等者甚多，强调以后考满，应将三年内某官所办之事，奉旨改正之事等诸方面，察明保奏。倘若考过一等二等之官，本非贤能，又不称职，一经发觉，应对其保之官一并治罪。十一月，定内外文武官考满例，为一等、二等、平常、办事不及、不称职者。各省汇齐具题，县官办事之功过也造册送部、部院之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仍照例复考。康熙四年(1665)一月，山西道御史季振宜条陈考满之弊，如相互吹捧，行贿受贿，盘剥百姓，克扣兵饷，一人一疏，繁琐不堪等等。二月三日，清廷决定停止考满，以后各官升转照例论俸，部院官有不称职者题参，各省督抚则题参本省不称职之官，"自陈"一律停止。十月，又决定恢复京察制，自本年起，对官员考察的时间是每六年举行一次。但是，时过二年，清廷即决定于康熙六年(1667)举行京察、大计，并规定以后仍照旧例，大计三年一次，京察六年一次。

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 康熙元年，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原名施郎，又作施烺，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他自青年时期即以智勇兼备闻名于世，任郑芝龙军前左冲锋，顺治三年(1646)，随郑芝龙降清。不久，他投身于郑成功，屡建战功，任左先锋，成功凡遇军中机密大事都与他商量，施、郑之间"有鱼水之欢。"施琅逐渐恃才自傲，而郑成功也因英年得志，容人的胸怀有限。郑氏亲兵曾德被杀事件后，施、郑矛盾激化。顺治八年(1651)，郑成功下令逮捕施琅及其全家。施琅险遭杀害，独自往投清军，而其父大宣、弟施显均被无端斩杀。顺治十三年(1656)，海澄公黄梧分析了施琅的才能和他与

郑氏的仇恨，认为欲灭郑军，施琅是合适的人选。他向福建总督李率泰建言：施琅“水务精熟，韬略兼优，若欲平海，当用此人。”于是，施琅始任前部先锋。因他攻守有方，所向克捷，授同安副将，招抚郑军将士万余名。顺治十七年(1660)，工部尚书苏纳海发现施琅“有古大将之法，”具疏推荐，次年九月，升同安总兵官。康熙元年(1662)五月，康熙帝谕兵部：福建水师，也应设提督一员。当时，苏纳海已升为国史院大学士，他在遵旨速议时力荐施琅。八月，施琅升至第一任福建水师提督。自次年始，施琅大展雄才，先取金门、再克铜山，郑经败归台湾。康熙三年，晋封靖海将军。康熙六年，他在《边患宜靖疏》中提出了一整套全面而准确的进取台湾的方案，康熙帝非常重视，命他从速来京，当面奏明。次年，他在《尽陈所见疏》中进而分析了局势与郑氏官兵的“故土之思。”但是，由于鳌拜专权，朝臣提出台湾险回，“可抚而决不可征。”是年，清廷决定裁撤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帝命施琅为内大臣，封伯爵，隶镶黄旗汉军，留京师。康熙十七年(1678)，郑军在福建等地接连获胜，姚启圣于危难之际升任福建总督，他以当时之势，“水战更重于陆战，”而水师提督应具备的“廉勇优长，威名素著、深识水性、谙练才能者，”唯有施琅，同时，他又为其子施齐等合家七十三人被郑氏抛尸海中的情况合疏密奏。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病逝，郑氏内部政局动荡。康熙帝认为进取台湾的时机已到，于是，他向内阁学士李光地询问施琅的才干，李对之“力保，”并说：施琅与郑氏是世仇，其心可保；诸将之中，惟施琅最熟悉海上形势；“郑氏所畏，惟此一人。”随后，康熙帝召施琅问计，心中“大悦。”同年七月二十八日，任命施琅为右都督，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太保，勉励他早日完成进取台湾的使命。

郑经夺位 郑经是郑成功长子。康熙元年(1662)五月，郑成功在台湾东都病逝后，提督马信及黄昭等众镇将，议以成功弟郑世袭护理招讨大将军印。不久，马信等相继病故，郑世袭便以黄昭、肖拱宸为心腹，图谋自立。世袭的另一名亲信蔡云则假借郑成功的遗言，拥立世袭继位，布告四方，是为东都之主，并排兵布阵，以拒郑经。其时，郑经率军驻厦门。同年五月十四日，成功病逝的消息传至厦门，户官郑泰、兵官洪旭、工官冯澄世和提督黄廷、参军蔡鸣雷等请郑经在厦门嗣位，称世藩，发丧办事，即延平王之位。至此，郑氏内部，矛盾激化。同年九月，清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遣官到厦门，要求郑经送还其攻取的州县印信，然后，再为其奏请，并将投诚官员照例补用。郑经闻讯之日，正是他急欲平定内乱之时，于是，他与郑泰、洪旭、黄廷等密议此事，他说：东宁(台湾)初辟，先王陡然逝世，又有肖拱宸、黄昭等人制造内乱。清廷闻信，一再派遣官员招抚。顺从他们，有负先王宿志；否绝他们，战争则迫在眉睫。内外交困，实再危险！不如暂借招抚为理由，迁延岁月，待我平定了内乱，再作计较。洪旭认为：此乃“阳和阴违”之计，深表赞同。于是，郑经命杨来嘉等为使臣，将十五颗州县大印送还。同年十月，郑经在认真准备后，命周全斌为五军都督，陈永华为咨议参军，冯锡范为侍卫，率舟师五千，启锚东进。洪旭、郑泰留守厦门。七日，郑经进入澎湖，其将李思忠船飘至台湾，知郑世袭有备，急告。郑经在积极防御的同时，命礼官郑斌前去劝说郑世袭、黄昭等人，息乱归顺。惟黄昭肖拱宸严词抗拒，其余众将则持观望态度。十八日，郑经进军台湾，乘风入鹿耳门(台湾台南安平港北)登岸，周全斌令连夜伐木为栅，以防意外。十九日清晨，刘国轩奋力攻破黄昭营地，黄昭为流矢所中，周全斌令斩其首，大呼示众，黄昭部下皆降。日午天晴，众将都反戈相迎。郑经入安平镇，请世袭至，待之一如既往。蔡云自尽，肖拱宸等被斩首，余等一概不问。众将士仍各回原地镇守。十一月，郑经在台湾安排好部众后，同周全斌、郑世袭等返回厦门。

敕封琉球国 琉球国，位于台湾东北，日本国南面海上，即今之琉球群岛。自我国隋朝时建国。隋大业年间起，与我国往来频繁。清朝初年，琉球国曾派遣使臣，请求册封。清廷也曾于顺治十一年(1654)下册封诏书，然而，因当时沿海各省战事频繁，敕封使未能前往。而琉球国使臣则在福建滞留了八年，一行六十人。先后逝世四十余名。康熙元年(1662)十月初四，清廷传旨：“琉球国使臣，前来年久，殊为可悯，其赏赉者比前加一倍，以彼国贵重之物给与。”康熙二年，在琉球国使臣陪同下，清廷派张学礼为敕封使，赴琉球册封。康熙三年(1664)七月，琉球国中山王尚质派遣使臣至京，感谢敕封，贡献方物。清廷按例宴赏。康熙七年(1668)二月，为方便琉球国使节来朝，康熙帝命福建总督、巡抚、重建柔远馆驿，为其来朝住所。

清、郑议和 自康熙元年(1662)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廷同固守在台湾的郑经、郑克塽之间的和谈，计有十次。康熙帝亲政之前，凡三次，分别是康熙元年、康熙二年、康熙四年。清廷坚持剃发登岸，郑经则明确表示“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先王(郑成功)在日，亦只欠剃发二字，若按照朝鲜事例则可。”“若欲削发登岸，虽死不允！”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亲政，意在与郑氏重开议和。是年七月，派刑

部侍郎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前往福建,同总督、巡抚会商议和之法。随即兴化知府慕天颜、都督佥事季佺,各加卿衔,代表清廷,并持康熙帝的诏书到达台湾。郑经只接明珠信函而不肯受诏。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郑经复派礼官叶亨、刑官柯平往泉州谈判。明珠表示:为他们题请"藩封,世守台湾。"而柯平等仍坚持以朝鲜事例待之,不剃发,"称臣纳贡而已。"明珠劝道:既然称臣,不当异制别服。叶亨等回劝郑经,郑氏坚不让步。此后,在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与同年秋、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和九月、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的五次和谈中,由于当时形势的变幻、双方力量的消长等原因,清廷做出了重大让步,许以郑氏世守台湾、称臣纳贡、通商贸易;承认其如朝鲜例,不剃发,不易衣冠。清廷的主要代表大将军、康亲王杰书明确表示"代为请愿。"康熙帝则强调"郑经乃中国人。"然而,郑经在其要求得到完全满足时,又提出以海澄为往来公所。福建总督姚启圣拒绝说:"谁敢将版图封疆轻议作公所?"和议又废。康熙指示"郑经虽无降意,对其属下仍随时招抚。"郑军将士投诚者日众。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决定兵进台湾。次年九月,郑经子郑克塽派遣官员,来到福建,请求按照朝鲜等外国例,称臣奉贡,奉清朝为正朔,受朝廷封爵,接诏削发过海,但在台湾者则"求免削发登岸"等。康熙帝传旨:郑氏不可与朝鲜等国相比,如果其诚心削发归顺,可以招抚,但须防其缓兵之计,施琅所部仍遵此前旨,勿失战机。终康熙一朝,清、郑议和虽然终归失败,但是,清军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取得澎湖大捷后,最终以和平方式统一了台湾。

颁行"康熙通宝" 康熙元年(1662),清廷颁行用铜制成的"康熙通宝"钱,做为统一货币。因生产的铜量有限,故停止由工部差人办铜,一律改为各关差购买呈送。次年,吴三桂请求申办云南省铸钱局,同样颁给其"康熙通宝"钱的标准版式。

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明夷待访录》始作于康熙元年(1662),次年成书。它是黄宗羲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代表作。该书与他的另一著作《留书》原合称为《待访录》,因作者笔锋犀利,对清廷的忌讳之辞触犯颇多,故刊印时另选择了其中的篇章,题为现在书名,而未刻篇章则被称为《留书》。黄宗羲在该书中阐发的指导思想是"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田制)、(财计)等十三个部分。他推崇上古时代"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业经营者,为天下也。"他以其亲身经历指责"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这些帝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因此,广大人民视帝王为"寇仇",理所应当。"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对于那些臣僚,作者斥之为"仆妾"。其法律也必然是"一家之法",于是,法越严酷,而天下之乱也正是在此法中形成。他主张制定"天下之法",废除"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主,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作者屏弃"君为臣纲"的封建传统,要求帝王"以天下万民为事",而朝臣们也应当"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时,他还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应当公其是非于学校。根除婚丧时的奢侈宴祭,生活中的迷信巫佛、衣食上的铺张浪费。主张工商皆本,平均土地,减轻赋税,讲求民富。

清廷颁行人参采集贸易措施 康熙元年(1662)清廷下令:只准在南京、扬州、济宁、临清四地开设市场,买卖人参。康熙三年(1664),根据议政王大臣会议提议,谕向朝鲜国王移文,严禁朝鲜人民擅出界外采集人参等。康熙四年,清廷又严禁百姓私采人参。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废除了由八旗贵族对生产及买卖人参的独占权,改归国家垄断经营,并派出军队采集人参,官营垄断生产,当时,国家除无偿占有上等人参一百斤、次等人参九百斤外,其余一律折合银两,由国家统一收购。价格则由国家强制规定,并极为低廉。清统治者经营人参的贸易数量并非很大,他们垄断人参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皇室自身的需求和消费,剩余部分才投放市场,但价格极其昂贵,清政府从中获取颇为可观的利润。

清廷禁止养马 康熙元年(1662)清廷规定:照顺治五年定例,凡私自养马者处斩、籍没、邻佑及十家长杖流。康熙十六年(1677),清廷将直接为皇室管理马匹、车辆的机构改名为上驷院,隶属内务府。辖有京城十八马厩、大凌河牧场等。上驷院官员品位很高,待遇与内阁、军机处等大臣相等。养马之禁并不影响清统治者所需马匹,它们主要来源于进贡、调拨和挑选。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帝批准兵部题:民间禁止养马,既不便于民,马也稀少,嗣后请废除养马之禁,听从民便。养马禁令至此废止。

医学家张志聪逝世 康熙元年(1662),张志聪因病去世。张志聪,字隐庵,浙江钱塘人。明代末年,他继承杭州庐之颐医道,筑侣山堂,与志同道合者讨论医学。注有《素问》、《灵枢》二经,集诸家之说。其学问之高,世人公认。此后,又注有《伤寒论》、《金匮要略》。他对《伤寒论》致力最深,历时二十年,几易

其稿，始成书，达到了使后学者“取之有本、用之无穷”的目的，颇得治医学者称赞。张志聪在医学方面的著述，还有《侣山堂类辨》、《针灸秘传》等。

蒙古等族人民抗击沙俄侵略军 俄国政府派军役贵族伊拉里昂·托尔布津为尼布楚总督。当地中国蒙古等族人民在托尔布津刚刚到任之际，即向其侵略据点发动进攻。托尔布津向叶尼塞斯科督军求援。此后，俄国侵略者又多次侵袭我国的赫哲、费雅喀诸部，窜入我黑龙江流域，遭到当地军民的严厉打击，这帮侵略者大败而逃。康熙四年(1665)，俄国派兵增援贝加尔以东侵略军。其中，切尔尼戈夫斯基等八十四人于是年冬占领雅克萨。另一路侵略军也在同一时期侵占我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所管辖的楚库柏兴，并建立据点。土谢图汗多次向俄国侵略者提出强烈抗议。康熙五年，我喀尔喀蒙古、布利亚特蒙古、索伦等各族人民群起抗击侵占贝加尔以东地区的俄国侵略军。在此后数年间，各族人民群情激愤，斗志高昂，不断抗击俄国侵略者。

曹玺首任江宁织造 康熙二年(1663)二月，曹玺以内务府郎中职，首任江宁织造。曹玺，满洲人，本属包衣(满语中奴仆之意)，其妻孙氏是康熙帝的乳母。终康熙一朝，曹玺、曹寅、曹颙、曹頫祖孙三代，任此职长达六十年。康熙帝对他们宠信始终，多方关照。江宁织造虽然是内务府的官员，但由于供应的是皇室贵族的享用之物，所以，他们可以打着皇家的旗号，经营具有特权性质的贸易。此外，他们还兼管“巡盐”、承办铜斛等重要事务。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以曹氏为中心、包括其亲属苏州织造李煦和杭州织造孙文成在内的握有江南经济特权的家族集团。

康熙帝生母逝世 康熙二年(1663)二月十一日，康熙帝生母、慈和皇太后佟佳氏病逝。康熙帝在其母患病时朝夕侍奉，及至母逝，寝食俱废，痛哭不已，近侍无不感泣。清廷专此隆重悼念。佟佳氏，吏部承政(尚书)、正蓝旗都统佟图赖女，顺治帝登基后，选为妃。卒年二十四岁，谥号为孝康章皇后。

“佟半朝”威名著朝野 康熙称帝后，世代忠于爱新觉罗氏的佟氏家族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这个名门大族先后出现了两皇后、一贵妃和两驸马，至于尚书、督抚、将军等重要官职则遍及朝廷内外。他们位尊权重，显赫一时，时人称他们为“佟半朝。”佟氏，辽东大族，祖籍抚顺(辽宁抚顺县)，世居佟佳江，以地为氏，历代经商，“雄资一方。”他们之中，首先归附后金(清)的则是佟养性，并成为皇太极改革中的重要人物。为铸造红衣大炮，佟养性贡献卓著。由他亲手创建的火器汉军成了后金(清)作战时必不可少的劲旅。其侄佟图赖为清廷定都北京，追剿抗清武装，屡立战功。其女为顺治帝妃。顺治十五年(1658)，佟图赖病逝，谥襄勤，赠少保。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因其母系佟图赖女，特授他为一等公，命其子佟国纲袭爵位。同年，康熙帝又将其次子佟国维之女封为贵妃，后晋封皇贵妃，康熙二十八年(1689)，册封为皇后，死后谥封孝懿仁皇后。佟国纲则在征讨噶尔丹的战役中阵亡，康熙帝痛悼至深。在佟氏家族中，还有养甲、养量、佟岱、国瑶、国鼐、国器、凤彩等重要文臣武将。其中，佟国维第三子、孝懿仁皇后的胞弟隆科多在康熙朝官任理藩院尚书兼提督九门步兵统领，掌管保卫京师大权。隆科多的亲弟庆复曾任工、刑、户三部尚书。佟国纲的次子法海又任兵部尚书。时人曾说：以佟养性为首的佟氏，一门群从，号称多才，在当时都是声名素著之人。

陨石落京师 康熙二年(1663)二月十九日，北京上空犹如战鼓擂鸣，随即，有陨石从天而降，落入城内者四颗、城外者七颗，合计十一颗。次日清晨，有人拾视，仍热如炽炭，一时传遍朝廷内外。其时，距康熙帝生母病逝仅九日，人视为奇事。

文字大狱《明史》案发 《明史》案一称《庄氏史案》，发生在康熙二年(1663)。庄氏系指浙江乌程豪富庄廷铣。生年不详，约卒于顺治十二年(1655)。因他重病后双目失明，故以“盲史自居，”并欲著书立说，传文后世，明天启间，内阁大学士朱国桢对明史很有研究，著有《史概》，并完成了纪传体《明史》，惜未刊印，明亡后，朱氏后人因家道败落而出售其《明史》书稿。庄廷铣本属当地富户，遂以白银千两购得。此后，他广聘名士十余人，昼夜纂修此书，又续写了天启，崇祯两朝史实，攘为己作，改名为《明史辑略》。可是，他未及刊刻就病故了。其父庄允城遵其遗嘱，“先刻其书。”同乡朱佑明，系另一巨富，出四、五万资助。庄允城为了抬高该书身价，接连做了手脚。与此同时，他费时五年，以百余册为一套，刊行于世，时为顺治十七年(1660)冬。该书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为正朔，且有指责清朝开国史事的词句，因此，在全书售出后，一再有人据此恫吓、索诈钱财。查继佐等三位学者，因被庄允城私刊其姓名，向学道胡尚衡据文检举。但由于庄氏在官场中不断以重金行贿，事态遂得暂时平息。此后，他又将书中讳碍之处改刊，凡数十页，继续印行。时过未久，贪吏李廷枢、吴之荣认为此书“奇货可居”，继续举发。然而，由于松江提督梁化凤和杭州满洲将军柯奎在受贿后的庇护，庄氏仍安坐其间。吴之荣于恼羞成怒之际，仍欲以此达到

他升官发财、官报私仇的目的，于是，他于康熙元年(1662)九月特携该书初刊本入京，向刑部据呈指控，并嫁祸于朱佑明，酿成大狱。当时，康熙帝年幼，鳌拜等四辅政大臣见状大怒，庄允城被锁拿到京，病死于大理寺狱中。康熙二年(1663)正月，清廷再派吏部右侍郎吴达礼等大臣，亲赴浙江，办理此案。至此，凡被此书株连者，均被逮捕。尤有甚者，一人被捕，其家人、亲友、邻居、奴仆等均难幸免。一时间，杭州监狱竟为此而关押了二千多人。朱佑明及其全家被满门抄斩。此案至康熙二年六月结案，庄廷鑨、庄允城被剖棺戮尸，允城次子庄廷钺及其子孙，凡年龄在十五岁以上者，一律斩首，妻、女发配沈阳为奴。余者，如作序、撰稿、参订、校对、抄写、买书、卖书、藏书、刻工、刷匠、送版、订书等人，无一幸免于难。有关官员，除柯奎、梁化凤等人外，或斩首，或戮尸。朝野之间，一片恐怖。自此，吴之荣不仅得到了朱佑明的财产，且官至右佥都御史。

杂项赋役俱称地丁钱粮　康熙二年(1663)五月十九日，应工科给事中吴国龙疏请，为杜绝款项繁多，易生奸弊。清廷规定：自康熙三年始，一应杂项赋役，俱称地丁钱粮，作十分考成。除每年正月扣拨的兵饷外，余者通解户部。各省均造简明赋役册，送交户部查实。有关颁给民间的易知由单，尽除其他各项名目。至于各部、寺衙门应用的钱粮，应在年前上报数目，户部则于次年支给，并仍在年终核报。

西藏班禅胡土克图逝世　康熙二年(1663)八月初一日，西藏班禅胡土克图逝世。早在顺治四年(1647)，胡土克图即已遣使至京，献上金佛、念珠等名贵之物，表颂功德，故清廷闻讯，遣官致祭。

恢复八旗乡试　康熙二年(1663)九月初七日，清廷恢复八旗乡试，取中的举人有满洲齐兰保等二十一名、蒙古布颜等十七名、汉军姚启圣等一百十八名，均送吏部录用。

清军攻取金门厦门　康熙二年(1663)十月中旬，靖南王耿继茂会同福建总督李率泰，命陆路提督马得功率郑氏投诚将士，并与荷兰十四艘战舰从泉州出发，水师提督施琅和海澄公黄梧则统兵出漳州、海澄，分兵进取厦门。是时，清军船舰出战者三百艘。十九日，清军与郑军各部会战于金门乌沙港。自上午七时过后直战到日近黄昏，双方拼力奋战，炮声不断。总督郑军各镇的周全斌率战船二十艘，往来冲杀，所向无敌，荷舰炮火屡击不中，而马得功的坐舰却被郑军击毁，跳海而死，其亲随精兵三百人全部阵亡。施琅、黄梧乘潮落之机，督清军船舰奋力迎援，时风向、水势均有利于清军，郑军大败。施琅乘胜，率众直取厦门。李率泰统大军接应。这时，事先约好降清的郑氏将领陈升也已赶到。二十一日，清军攻取了金门、厦门，并屠毒当地的广大居民，在将财宝抢掠一空之后，"堕城焚屋，斩割树木、遂空其地"而去。黄梧复向李率泰建言：统兵再取铜山，生擒郑经。李率泰认为"穷寇勿追，"应差人到铜山招抚。是月，郑部守南澳的将领杜辉率官兵二千二百九十八名、战船六十二艘，献南澳投诚。施琅等人招抚的郑部官兵则多达一万八千余人。次年六月，清廷因荷兰助兵取得金、厦，故颁赐荷兰国王缎匹、银两。

水西等地苗民抗清　康熙三年(1664)，水西、陇纳、上下木咱等地的苗民愤起抗清。他们在首领安坤、安如鼎的率领下同清军展开了多次激战，云南总兵刘称被斩。平西王吴三桂调集云南、贵州及广西三省兵会剿。自二月以来，擒杀陇纳等地苗民一千余名，安坤、安如鼎仅以身免。

划分湖广、偏沅巡抚辖地　康熙三年(1664)二月，清政府以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八府归湖广巡抚管辖。以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七府，郴、靖二州归偏沅巡抚管辖。是月，添设湖广按察使司按察使、驻扎长沙府。三月十九日，命湖广右布政，移驻长沙，管辖长沙、宝庆、衡州、永州、辰州、常德、岳州等七府及郴、靖二州。四月，由于明确了管辖范围，偏沅巡抚周召南疏报，岳州、长沙、宝庆、永州等十二府州共开垦土地一千二百一十二顷三十六亩。湖广巡抚刘兆麟疏报，安陆、荆州等十府州陆续垦田一千八百零七顷四十五亩。清初垦田的迅速发展，与划分辖地直接相关。

郑经退归台湾　康熙三年(1664)三月，郑经在接连战败后，众心离散，镇营多叛，诸军乏粮，铜山再难坚守，于是，他与陈永华、冯锡范等率余众，退归台湾。郑经命周全斌断后。周全斌与兵官洪旭不睦，想借此时机偷袭，兼并其部。洪旭则预有防范。周全斌虑入台后，恐为其加害，乃率部自漳浦投清，封承恩伯。郑经的另一战将黄廷也于云霄降清，封慕义伯。工官冯澄世另乘一船随向台湾，途中为其家丁所迫，投海而死。郑经余众士气沮丧。郑经抵达台湾后，鼓励诸镇将士开垦荒田，栽种五谷，储备粮草，发展糖业，支持贸易。此后，农业丰收，兵民相安。同时，他还推广大陆的先进技术，伐木斩竹，烧瓦盖房；严禁赌博，与民休息，修筑丘埕，引海水晒盐，民得其益。并接受陈永华的建议，择地建造圣庙，设立学校，广收人才。是时，台湾在农业、教育等方面取得了进展。

李率泰驰令沿海岛屿设"界沟""界墙"　福建

总督李率泰于康熙三年(1664)三月闻郑经退归台湾,即于当月移师铜山,下令沿海与各岛屿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逢山之处,开凿宽、深各二丈之余的大沟,名曰"界沟。"修筑高一丈、厚四尺有余的高墙,名曰"界墙。"又于登高处建造炮台,二、三十里设大营盘,分兵把守。福建、浙江等沿海诸省皆如此。当时,如有人想从这些地方处出入,必先行贿于守界弁兵,否则,稍有怨言即拖出杀死。此令实施后,沿海居民离乡背景,家破人亡,无以为生。康熙四年六月,李率泰又签署告示,禁止居住在福建的荷兰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一切贸易。康熙五年(1666)二月,李率泰病故。他在遗疏中提出:荷兰夹板船虽已回国,但仍往来频繁,他日恐生事端;迁海之民尽失旧业,应将界限略做放宽,使他们有耕渔之获,从而改变其流离失所的惨状。

鳌拜绞杀飞扬古　康熙帝亲政前,由四辅政大臣辅政,鳌拜是其中的重要一员。内大臣飞扬古与鳌拜等辅臣素有旧怨。康熙三年(1664),鳌拜势焰日炽。飞扬古之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塞尔弼四人,同值御前,不敬辅臣,招致鳌拜忌恨。四月初七日,鳌拜等辅臣借口这些人擅骑皇帝坐马、私用皇帝弓箭射鹿为理由,将他们论罪斩首。复以飞扬古守陵有埋怨情词为借口,将他与其子尼侃及出征之子萨哈连一并绞死。惟色黑以不知情,免死,后发配宁古塔。飞扬古等房屋家产拨归鳌拜之弟穆里玛。折克图之父鄂莫克图、西住之兄图尔喀、塞尔弼之兄塔达等都以其明知子弟犯罪重大,不立即请旨治罪,分别革职、鞭责。

松江人民反清起义　康熙三年(1664)四月,松江(上海市吴淞江以南地区)人民拥立亡明后裔朱光辅(即朱二官)、朱拱榈(即朱日生)起义,称周王,有封职、宝印、札付、号旗等。园顿教、涅盘教、拜空教、大乘教等江南教徒纷纷参加起义。松江知府张羽明发觉后,逮捕总兵金仲美等八十余人,全部凌迟处死。复兴大狱,株连者不计其数。独朱光辅、朱拱榈严缉而未获。张羽明企图通过残酷镇压这次起义而得以高升,然而,时过未久,他也被革职。

明确奉天府辖区　康熙三年(1664)五月,清政府设承德、开原、铁岭三县,添设奉天府丞等官,改辽阳为辽州,会同海城、盖平,均属奉天府。改广宁为府,添设通判、推官等职,设广宁县、宁远州,属广宁府,俱令奉天府府尹管辖。次年元月,又改奉天所属锦县为锦州府,广宁府改为广宁县,属锦州府。

郑氏官兵弃明投清　自康熙元年(1662)至康熙三年(1664),据管理福建安辑投诚的官员贲岱疏报:郑氏部众共投诚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名,食粮兵四万零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二百三十名,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大小船只九百余艘。其中,有郑经亲属郑缵绪、忠明伯周全斌、威远将军翁求多、永安侯黄廷、副统领何义等文武要员。

礼部审讯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　汤若望,字道未,德国人,耶稣会传教士,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封・自尔(Johann Adam Shall Von Bell)。他通晓天文历法,译撰了大量的西欧古典天文学论著。顺治、康熙年间,掌管钦天监达二十年。顺治帝病逝前夕,江南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即以耶稣会非中国圣人之教,以及汤若望所修的《时宪历书》封面不应当题写"依西洋新法"五字,具呈礼部。此外,他还认为汤若望布教的目的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礼部不予受理。此后,杨光先发表《辟邪论》,攻击汤若望及其在华的基督教。康熙三年(1664),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写出《天学传概》,据理驳斥。继而双方展开笔战,杨光先有《不得已》,利类思则刊出《不得已辨》。这年七月二十六日,杨光先在鳌拜等辅政大臣的支持下,再向礼部呈《请诛邪教疏》,指控汤若望等传教士,以修历法为名,窥伺朝廷秘密,内外勾结,图谋不轨,已触犯《大清律》中的谋叛、妖书诸条款。八月初七日,礼部开始传讯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西方传教士及钦天监监副李祖白、翰林许之渐、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等有关人员。又下令各省传教士由地方官拘禁待审。审讯达四个月,至康熙四年元月,判处汤若望等革职去衔,潘尽孝因系武职交兵部惩处,余者则由刑部议罪。此后,汤若望等人又经过多次审讯、议决,险遭凌迟。康熙四年五月初五日,康熙帝命将李祖白等五名钦天监官员处斩,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赦出,汤若望及其他同案犯人则在押待处。不久,康熙帝的祖母(孝庄文皇后)对辅臣如此对待汤若望深表不满,命令立即释放。同年八月,其余各地集中在京的传教士,均被驱逐出京,限期到达广州。杨光先因此而升任钦天监监正之职,住进汤若望馆所(天主教西堂)。康熙五年(1666)七月十五日,汤若望在京病逝,时年七十四岁。康熙八年(1669)八月,康熙帝为汤若望、李祖白等平冤昭雪。恢复汤若望的"通微教师"称号、追赐其原官、归还其 教堂建堂基地、按照原品赐予祭恤费用。至于天主教,康熙帝只准南怀仁等照常活动,严禁各省立堂传教,并命严行晓谕。

李来亨以死抗清　康熙三年(1664),原明末大顺农民起义军,只有李来亨率部众坚守茅麓山,奋力抗清。是年,清军集结二十万人,三路进兵。大败

后，将满汉三省兵"分汛连营，树立木城，挑堑排桩，密匝围之。"同年六月和闰六月，李来亨两次亲自率将士出击，力图冲破清军的封锁，但由于双方实力悬殊，李来亨又孤军作战，更无援军，未能取胜。当双方相持到九月时，农民军粮食用尽，清军重重围困。李来亨自知不能久存，但他镇静自若，大义凛然，在会集了众将、安排好农民军的撤离等事后，当月二十四日，举火焚烧了山寨，并和妻子、亲随等人投火自焚，宁死不屈。李来亨部的三万余名战士，被俘者仅一百五十人。

朱舜水赴日本讲学 舜水，是朱氏家乡浙江绍兴府余姚县的水名（浙江省余姚市），本名之瑜，字鲁屿，流寓日本后遂以故乡水名取为号。朱舜水成长于明末清初，勤奋好学，疾恶如仇，对于官场的腐败现状，尤为痛恨。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他意识到决不能与马士英等奸佞同党，免受世人唾骂，于是，力辞做官之命，马士英等恨他，下令逮捕。朱舜水闻讯，连夜逃往通向日本的海上贸易要道舟山。此后，他坚决支持黄宗羲、王翊、张名振、郑成功等人的抗清斗争。往返日本，乞师发兵，未成。清军围其船，他突围而出。顺治十六年冬末(1659)，他年届花甲，孑然一身，来到长崎，度日维艰，以教书为生。日本关西的著名学者安东省庵是朱舜水早年好友，对他的学识与气节深表敬佩。在安东省庵的倡导下，另外几名友好人士，为舜水连名申请讲学，几经周折，破例获准。自此，他开始在日本讲学著述，并把中国的许多进步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和研究成果广为宣传，倡议日本注重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中国在日本的著名学者。清康熙三年秋(1664)，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国派儒生小宅生顺赴长崎会见朱舜水，相互研讨学问。小宅对舜水非常尊崇，鼎力举荐。德川以懿亲辅政，礼贤下士，事舜水为师，相谈非常溶洽。其间，朱舜水不断提倡改革、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两年后，德川在水户盖好学宫，请朱舜水主持。在日本的二十余年间，朱舜水与思想、教育、学术各界和农业、匠作、建筑、园艺、医界等方面的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影响深远，成就卓著，是中日友好交往史的突出代表。康熙二十一年(1682)二月他在日本江户（东京）逝世，年八十三岁，著有《朱舜水集》等。

京师发生强烈地震 康熙四年(1665)三月初二日，北京在"一阵地动"之后，京师宫殿和全城都在震颤之中，城内房屋倒塌者不计其数，就连坚实的城墙也有百处左右塌陷。与此同时，狂风骤起，横扫全城，灰尘遮天蔽日。人们惊恐万状，争相逃到街上。康熙帝和太皇太后、皇后，妃嫔及宫中的太监、宫女、朝中的要臣显贵等都撤离屋外，在帐蓬中住宿。同一天，又接连发生三次地震。此后三日内，每天都有余震发生。众多百姓无家可归，露宿街头。

云南东部土司反清 康熙四年(1665)四月，云南东部各土司和已灭亡的南明余众乘平西亲王吴三桂征剿水西土司之机，举兵反抗。昆明以东的土司王耀祖据守兴城，建号大庆，攻占易门，直取昆阳、河西。宁州土司禄昌贤占领宁州，攻取江州、通海、宜良，伺机欲取澂江府。土司禄益攻陷嵋峨。故南明开国公赵印选强攻弥勒。龙韬等攻石屏，谋进广西。王朔、李世藩等率兵攻打临安府。云南局势骤变。吴三桂自水西归，亲统大军，分路进剿，生擒王耀祖，破其中心据点大营城。其余诸土司及赵印选等非败即亡。王耀祖等被磔于市。康熙帝传旨嘉奖有功人员。康熙五年八月，根据吴三桂疏议，将云南东部各土司改设流官，设立开化府、永定州。

水西土司改土归流 康熙四年(1665)六月，清政府批准吴三桂的请求，将平定后的水西土司改土归流。在水西共设三府，三府新名由吴三桂拟定具题。康熙五年，定新府名为平远府、大定府、黔西府，改比喇镇为平远镇。每府设知府、通判、经历、司狱、儒学教授各一员；三府共设推官一员，承办三府三府刑名大案。

开广州海口以运兵粮 康熙四年(1665)五月，清政府批准广东总督卢崇峻的请求，在广东省边界的香山县、广海卫、大鹏所、海门所、平海所设出海口，以便官兵运粮。地方官给与验票，设立口子处，拨官兵防守，稽察验票放行。如果借端在海贸易，"通贼"妄行，地方保甲隐匿不首者，照例处绞；守口官兵知情者，以同谋论，处斩；不知情者，从重治罪。

清军占领全川 康熙四年(1665)五月，四川总督李国英疏言：全川已经恢复，当因地设防，酌议增减。其中，应裁减兵额者，督标抚剿五营兵五千名、慕义侯谭弘兵三千名、龙安城守兵五百名等等。应设职增兵者，潼川、绵州、叠溪、建武、重庆等二十二处。此外，广元、成都、松潘卫等十二处武职设置照旧。全省经制官兵共计四万五千名，以"马二步八，"战守各半定额为宜。清政府准其所请。

清廷裁并督抚、明确驻地 康熙四年(1665)六月，清政府决定：湖广、四川、福建、浙江仍各留总督一员外，贵州总督裁并云南，广西总督裁并广东，山西总督裁并江南，江西总督裁并陕西，直隶、山东、河南设一名总督，管三省事。裁撤凤阳、宁夏、南赣巡抚。同月下旬，又明确了各省总督驻地，广东广西总督驻肇庆府、江南江西总督驻江宁府、直隶山东河南

总督驻大名府、山西陕西总督驻西安府。康熙五年，批准平西亲王吴三桂议，云贵总督驻贵阳府。在裁并督抚后，清政府对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江西五省提督的驻地也做了相应的更改。贵州提督驻地由吴三桂确议。

严禁督抚收受贿赂 康熙五年(1666)元月，康熙帝谕吏部等衙门，总督、巡抚均系倚任重臣，必秉公清政，为其僚属做出表率，使百姓安居。今督抚公然收受州县官馈送物，视为常例。更有甚者，尔等居然将不同的州县分成上、下等，按等级收受贿赂。州县官吏为取悦上官，加派民间，以致百姓困穷。今后，如再不改正此等弊端，督抚由科道官查访弹劾，司道以下各官由督抚纠参。如果督抚不严加检查，且徇情舞弊，不予纠参，待事发时，一并从重治罪。同时，他还命吏部等部院通行晓谕各省督抚。

圈换旗地之争 清军入关后，圈地之风甚盛。其时，八旗所圈地，按左右翼次序分配，但因睿亲王多尔衮要住永平府，故将应属镶黄旗的永平一带地方，给了正白旗，而镶黄旗则被分在右翼之末的保定府、河间府及涿州等地区。此事已过二十余年，旗民也早已各安其业。康熙帝亲政前，四大臣辅政，其中，镶黄旗的鳌拜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既为连襟，又同辅政，然而，他们常因事而争执不下，裂痕日深。康熙五年(1666)元月，鳌拜因本属镶黄旗之地被正白旗所占，久耿于怀，决意更换。辅臣索尼、遏必隆都支持他，鳌拜遂移文户部，并以土地不堪为理由。户部尚书、隶正白旗的苏纳海认为土地分配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土地不许再圈圣旨，反对更换。鳌拜暗欲置之死地。此后，虽有议政王大臣议复此事，又有都统贝子温齐等人查勘八旗占地的详情，辅臣等仍称旨说：永平府周围地亩未经圈出，应令镶黄旗移住。并援引顺治帝的凡事俱太祖太宗例行之旨，极欲实现鳌拜心愿。四月，户部遵旨议复镶黄、正白两旗换地一事，以两议请旨。鳌拜等人在称旨时将两议中于己有利的内容全部纳入。是年底，直隶山东河南总督、隶汉军正白旗的朱昌祚和直隶巡抚、隶汉军镶红旗的王登联均据实据理，抗言直谏。鳌拜等对他们称旨严责。不久，在鳌拜一手操纵下，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均被革职，交刑部议罪。年轻的康熙帝知道鳌拜必欲杀害这三人，特召四辅臣询问，独苏克萨哈不语，其他三人坚持应置重刑。康熙帝始终不允鳌拜等人所奏。谁知，鳌拜竟擅自矫旨，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处予绞刑，家产抄没。十二月，这场圈换旗地之争以鳌拜得势暂告结束。其间，共迁移镶黄、正白两旗壮丁六万余人，圈换土地三十一万余晌，迫使大批人民失去土地，衣食无着，饥寒交迫，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同时，鳌拜的行迹使得清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康熙八年(1669)七月，康熙帝亲政后，亲阅苏纳海等三人处绞的案卷，指出此案纯系鳌拜等人在圈换旗地之争中不按律文，罗织罪名，滥杀无辜大臣。苏纳海等"冤死深为可悯，理应昭雪。"八月，追赐苏纳海谥襄愍、朱昌祚谥勤愍、王登联谥悫愍，各予祭葬如例，恩赏苏纳海等三人之子入国子监读书。

林起龙请设分地稽查制度 康熙五年(1666)，漕运总督林起龙针对漕运途中关卡过多，严重延误交兑时间的状况，上《请宽粮船盘诘疏》，提出设立分地稽查制度。林起龙指出：每年从东南各省北运漕粮多达四百万担，分别装在近六千艘船只内，在长达六千余里的水运中，沿途查禁夹带的关卡多至二十余处，凡到一处则每船必查，每舱必搜，致使漕船阻滞，北运迟缓。此外，还有逆风暴雨、冰冻封河等因素，在一年仅有八个月的通航时间内，关卡盘查就占去两个月左右，这样，漕船到达通州的交兑、南返、冬修必然受到影响，拖累来年漕运。形成恶性循环。为此，应只在起运地仪征、瓜州与重镇淮安、济宁及天津仓场各盘查一次，其余诸关卡一律放行。对于押船旗弁的夹带，应有严格规定，每船只限六十石，违者抄没入官。完全禁绝夹带不利于南北互市，并将造成北方各省的南货价格飞涨。同时，对交兑漕粮、沿途包买、贿官行私、奸商搭船等行为治以重罪，直至斩首。如此"大法一施，奸人知警，"诸弊禁绝。康熙帝批准其奏请。林起龙在此任内，还先后题请免除滨海移民的赋税；疏通淮城至运河的河道；修筑济宁等处的堤闸；严禁押运漕船的兵丁欺压百姓等等，深得民心。但是，朝中的一些权贵却对他的这些行动妒恨在心，伺机陷害。康熙六年(1667)，关卡减少后，夹带骤增，朝臣借机争相弹劾，林起龙引咎致仕，不久病逝。

定京城营官遣返游民规 康熙五年(1666)，清政府规定北京城的营官和有关的地方衙署官员，应将无业游民和来历不明人及时遣回原籍，以便清理离乡逃避差役人，维持社会秩序。

鳌拜专权 康熙六年(1667)，鳌拜权势日张，权倾朝野。正月，他命同党、吏部尚书阿思哈为镶白旗满洲都统，不久，又转授为兵部尚书。二月，鳌拜任命另一党羽、辅国公领侍卫内大臣班布尔善为内秘书院大学士。他的孙女婿贝勒兰布本是敬谨亲王尼堪子。顺治九年(1652)，尼堪在同李定国交战中被杀。事隔十五年，鳌拜以念阵亡功为理由，运用手中大权，晋封兰布为郡王。三月，鳌拜对其同党在六部

诸衙门中的职务进行了重要调整，以阿思哈为吏部尚书，正红旗都统噶褚哈为兵部尚书，正白旗副都统马迩赛为工部尚书，镶黄旗副都统泰壁图为吏部右侍郎，迈音达为兵部右侍郎。康熙帝亲政后，因另一辅政大臣索尼已死，鳌拜便班行章奏均自首列，凡事则与弟穆里玛、侄塞木特、纳莫及上述诸人在家中议定而行。对于康熙帝，鳌拜有时竟非常无礼。迫于形势，康熙批准议政王大臣所议，准鳌拜另授一等公，其原有的二等公由子那摩佛承袭。十二月，户部满尚书缺员，鳌拜想将马迩赛安插其间，而康熙帝已授与玛希纳。于是，鳌拜援引清太宗年间也曾设户部满尚书二员事，强请除授。户部汉尚书王弘祚熟悉部务，马迩赛不能独专，鳌拜遂寻机排除。康熙七年二月，鳌拜加太师衔，专恣更甚。

沈天甫案发 康熙六年(1667)，江南(江苏、安徽二省合称)民人沈天甫、吕中、夏麟奇三人撰诗二卷，名曰《忠节录》，或称《启祯集》。沈天甫等三人谎称此书系黄宗羲父黄尊素等一百七十人所作，陈济生编集，故明大学士吴甡等六人作序。沈天甫向夏麟奇授计，夏遂来到吴甡子、中书吴元莱住所，诈取钱财。吴元莱察此书序并非其父手迹，于是，向巡城御史控告。四月，康熙帝闻知此案，谕以“奸民诳称谋叛，诬陷平人，大干法纪，下所司严鞫。”沈天甫等皆斩首。被诬陷者一律不问。

肖震吁请投诚开荒策 康熙六年(1667)闰四月十四日，御史肖震疏言：兵屯即或不能立行，而投诚开荒之策则可立即实行。他认为实施此策有四点益处：一、投诚之众，所携家眷数倍于正式兵额，如果分予荒地，给以牛种，使生活有靠，以为招抚之劝。二、投诚兵没有防御之责，因此，让他们屯田较之负有防御任务的绿旗兵容易得多。三、以近例而论，投诚兵每年所需金钱八十余万，将来规取台湾后，更有后来兵需用钱粮，为此，应规定每有投诚之兵，应给予荒地若干亩，三年后，照旧征税，这样，既有饷银，又增国赋。四、据查，各省荒田尚有四百余万顷，若分给他们，则军储日实，户口渐增，民生安定。康熙帝对肖震的谏言、非常重视，命户兵二部行令各省督抚确查垦荒事宜，依议而行。八月，复命驻在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投诚官兵开垦荒田。自康熙七年(1668)起，每人给地五十亩，预支本年俸饷，作为牛种，次年停发，三年后照例起科。

熊赐履奏言朝廷重大事务 熊赐履，字敬修，一字青岳，号素九，湖广孝昌(湖北孝感)人。顺治十四年(1658)中进士，康熙帝即位，升秘书院侍读。康熙六年(1667)，康熙帝诏求直言。六月，熊赐履上万言疏，直言朝廷重大事务。他指出：生产凋敝，民困已极。“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吏收蠲赋之实而民受其名，官增赈济之肥而民倍其困，对此，应以州县官是否贪廉为考核督抚的重要标准，罢斥督抚中的贪污受贿者。朝廷重大之务有四个方面，一、政事纷更，法制未定。二、职业堕废，士气日靡。三、学校荒废，文教日衰。四、奢侈成风，礼制日坏。他恳请康熙帝选德高望重的学者在其身边，以备顾问。躬行节俭，以为表率；熟读文史，正本清源。当时，鳌拜专权，他认为此疏意在劾己，便请以妄言罪惩处。康熙帝不允其奏，驳斥说：他自言国家大事，与你何干！康熙七年九月，熊赐履又疏言：朝政积弊未去，国计隐忧可虑。鳌拜责以不能指到实处，妄行冒奏，下部议处，降二级调用。康熙帝命加以宽免，鳌拜事败后，熊赐履很受重视，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复任礼部尚书，御书“澡修堂”扁额相赐。

康熙帝亲政 康熙六年(1667)春，四辅政大臣之首索尼带头奏请康熙帝亲政。七月初三日，经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允许，择吉亲政。初七日，康熙帝行亲政礼，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百官上表庆贺。宣诏天下，诏内“恩赦”、十七条。分别派遣内秘书院学士等告祭岳镇海渎诸神。同一天，康熙帝在乾清门处理政务，以后日以为常，时年十四岁。

苏克萨哈被处绞刑 苏克萨哈，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元年(1661)，康熙帝即位，苏克萨哈受顺治帝遗诏，与索尼、遏必隆、鳌拜同为辅政大臣，并于班行章奏时仅位于索尼之后。鳌拜自恃屡建战功，盛气凌人，朝臣多畏惧。在因圈换旗地之争而导致的苏纳海等三名大臣被杀一案中，苏克萨哈独以不语与鳌拜相抗。鳌拜怀恨在心。康熙初年，鳌拜更加骄横，唯所欲为。对此，苏克萨哈自知有心乏力，抑郁寡欢。康熙帝亲政后次日，他在疏中提出因身患重病，不能效力，请守先帝陵园，庶可保全余生。鳌拜等称旨责问：“不识有何逼迫之处，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命议政王大臣议罪。康熙六年七月十五日，下令将苏克萨哈及其子孙与旗下弟兄一并拿问。鳌拜复与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诬以心怀怨望，不欲归政，并通过议政王大臣议其罪二十四条，遂以大逆论，议将苏克萨哈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凌迟处死，余子一等侍卫穗黑等六人、孙一人、侄二人均处斩，抄没家产。族人中有官职者均革职，立即斩首。二等侍卫占布柱等三十七人革职为兵丁。康熙帝闻讯，知鳌拜与苏克萨哈的矛盾斗争由来已久，致成仇恨，此次所诬种种罪状，显系必欲置之极刑，故坚持不允。但是，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公然判处苏

克萨哈绞刑。康熙八年(1669)六月,康熙帝诏以苏克萨哈虽有罪,不当诛灭子孙后嗣,此皆鳌拜挟仇所致,“殊属冤枉。”命恢复苏克萨哈及被株连人等原官,世爵由其子承袭,并发还家产。

黄河桃园南岸决口 康熙六年(1667)八月,河道总督杨茂勋题报,黄河桃园南岸烟墩决口,水入洪泽湖,冲毁堤坝三百余丈,沿河三十个县尽受水灾,高邮县洪水高达二丈,城门堵塞,淹死百姓数万人。康熙帝命速行修筑。康熙十年(1671),桃园县再次决口,毁坏民堤二百五十丈。康熙帝命将本年漕米漕项尽行蠲免。

纂修《清世祖实录》 康熙六年(1667)九月初五日,康熙帝决定纂修《清世祖(顺治帝)实录》,命大学士班布尔善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巴泰、图海、魏裔介、卫周祚、李霨为总裁官,学士塞色黑,明珠、范承谟等十二人为副总裁官,侍读学士达哈他等十四人为满纂修官,侍读学士单若鲁等十四人为汉纂修官。同年,复以巴泰为监修总裁官,其余诸官也有调整。康熙八年(1669)三月初一日,,该书草稿告成。康熙十一年(1672)五月二十日,此书正式编成,全称为《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

查继佐病逝 康熙六年(1667),查继佐因病去世,终年六十八岁。查继佐,字伊璜,号与斋,浙江海宁人。人称东山先生或朴园先生。明亡后从事编撰明史。康熙二年,因庄廷鉠之《明史》案被牵连入狱,出狱后改名左尹,号非人,著有《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国寿录》等书,是清初著名史学家。

根特木儿叛逃沙俄 康熙六年(1667),达斡尔族索伦部佐领根特木儿率其亲属四十人,叛逃至被沙俄占领的尼布楚,并纠集了一支三百余人的武装队伍,长驻尼布楚,为沙俄侵扰我边境效力。康熙九年(1670),康熙帝为索回根特木儿,曾有致俄沙皇国书,其态度非常坚决。

重申禁海外贸易 康熙七年(1668),清政府重申海外贸易的禁令。明文规定:地方甲长同谋放纵者斩首,知情不举者处以绞刑。不知情者杖一百,发配三千里。管地的州县官革职,永不叙用,道、府文官降二级,巡抚降一级。康熙九年(1670)又规定:凡是官兵捉住出海贸易者,赏给一半犯人家产货物,另一半抄没入官。此外,清政府还于康熙五年(1666)明令,自是年起,不是贡期,一概不准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否则,便属违法。

周有德请速开广东边界 康熙七年(1668),两广总督周有德继革职的广东巡抚王来任之后,具疏请求速开广东边界。周有德,字彝初,汉军镶红旗人。康熙六年,升两广总督。在此之前,王来任在其遗疏中痛言迁海令给沿海人民带来的空前灾难,请开原迁之界,招抚迁移之民,安排其耕种采捕之业,以安民生。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周有德直言:已迁之民哭诉,自立海界以来,尽失旧业,乞食无路。恳请“早开一日,早救一日之命!”同时,他又提出了展界复业的具体措施。同一天,康熙帝批准了周有德的请求,命都统特晋等人与定南王孔有德及该地总督、巡抚、提督一道,一面派兵防守,一面安置已迁之民,强调毋误农时。康熙八年(1669)二月,康熙帝下旨展开已禁之沿海边界,迁民大悦。此后,周有德先后调任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康熙十九年(1680)病逝。

南怀仁奏劾吴明烜 南怀仁,初名佛迪南特斯,比利时人,天主教传教士,康熙初年来到中国。他于康熙七年(1669)十二月二十六日,劾奏钦天监监副吴明烜所修康熙八年历内闰十二月,应是次年(康熙九)正月。且有一年两次春分、两次秋分种种误差。康熙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会同确议。同月二十九日,康亲王杰书等复奏:历法精微,遽难定议,应差大臣会同双方验证。于是,康熙帝命大学士图海、李霨等二十名大臣同南怀仁、吴明烜等验证。康熙八年正月二十六日,验证推算历法的结果,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与南怀仁所指诸款均相符合,与吴明烜所修者不合。议政王大臣等会议,建议将康熙九年的历日交南怀仁推算。康熙帝以汤若望案为戒,传旨再议。经再次详议,证明杨光先身为监正,解决不了历日的差错,袒护吴明烜,攻击西洋历法。得旨:将杨光先革职。三月,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同时更正以前历书中的错误。复传旨:今后节气占候,均从南怀仁之言。七月,刑部议:将吴明烜杖一百,发配宁古塔。康熙帝命从宽处理,只责打四十大板。南怀仁任职后,又改造了观象台的仪器,并绘图立说,为《灵台仪象志》。不久,升钦天监监正。历官年久。累加至工部侍郎。康熙二十七年(1688)病逝,谥勤敏。此后,钦天监任用西洋人,并官至监正,监副者,相继不绝。

议定管理地方关税措施 康熙八年(1669)正月,户科给事苏拜疏言:地方官管理关税多有不便,如惧怕上司,希图定额,势必向商民增派税银等,请仍差部员。康熙帝准其请。户部遵旨再议后,清政府决定:关税税额多者由各部派遣满汉官员前往,税额少者仍由地方官征收。京师崇文门税务已经奉旨设官征税,通州坐粮厅、京城左右二翼仓、宝泉局、大通桥、通州西仓、中南仓、张家口、杀虎口等九处仍由户部派官管理。此外,应差各部官员管理者还有:浒墅

关、芜湖关、北新关、九江关、淮安关、太平桥、扬州关、赣关桥、天津关、西新关、淮安仓、临清关、凤阳仓,临清仓与临清关合为一差,江宁仓并入西新关,共十三差,合计关税七十万两。至于运厅、居庸官、徐州仓、德州仓、此四处税银均少,总计才一万二千七百两,故交地方官收理。

定"更名田"制 康熙八年(1669)三月八日,清政府决定免除明代各省废藩田产的变价做法,撤回为此而派出的部员,将未变价田交与该省督抚,并给予原种人耕种,改为民户,称为更名田,永为世业,照例征收银粮。对于无人承种的剩余土地,则招民开垦。康熙九年正月,又虑及更名田内有明代废藩自置地,且予民佃耕,他们在输粮之外又纳租银,为避免负担过重,决定免其纳租,与民田一例交粮。如果已有易价银征收于库者,准许抵交次年正赋。

刘如汉疏请举行经筵日讲 康熙八年(1669)四月,兵科给事中刘如汉疏言:"帝王首务,莫大于视学,莫急于经筵。"请求康熙帝谕示礼部,详考旧章,先行日讲,次举经筵,挑选儒臣,分班进讲。康熙帝"嘉纳其言,下部议行"。九年十月,康熙帝再次强调:经筵日讲,宜即举行。命礼部详察典例,择吉具仪奏闻。不久,礼部选定的月讲日期为康熙九年(1671)十二月二十一日,经筵则依顺治十四年(1657)例,每年春秋举行二次,定于同年二月十七日开讲。自此,康熙帝非常赏识刘如汉,称他"为人甚优"。

康熙帝智擒鳌拜 康熙帝对鳌拜专权早有察觉,考虑到他势力太大,如在外廷逮问,容易激起事端。便挑选了一些年少有力的侍卫,让他们经常练习布库(扑击)之戏,即使是大臣入奏时也不回避。鳌拜认为康熙帝年轻贪嬉,性懦弱,不以为意,更加肆无忌惮。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鳌拜将入见,康熙帝召这些侍卫入宫进行了妥善的安排。稍许,鳌拜入见。康熙帝一声令下,侍卫们以高超的扑击之功,将鳌拜擒获。同时,命议政王大臣等逮捕鳌拜的十三名党羽,及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等有关官员。康熙帝谕称:"鳌拜于朕前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处,即将部臣叱喝。又引见时鳌拜在朕前,理宜声气和平,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还有结党专权,擅用亲信,闭塞言路等等。因此,"鳌拜等倚仗凶恶,弃毁国典",一并严拿勘审。五月二十八日,议政王大臣康亲王杰书等审问鳌拜同党,定出鳌拜罪状三十款,如欺君自专,擅杀苏纳海等人,阴谋陷害熊赐履等等,又审出其同党十二人,拟处以极刑。康熙帝闻讯,传旨:念鳌拜效力年久,不忍加诛,著革共职,抄没家产,严加拘禁。对于鳌拜的众多党羽,或处绞,或斩首,或鞭责,或革职,或降职,或抄没家产,或带罪留任,但多数得以活命。同日,康熙帝传谕内外文武官员,宣布了鳌拜及其同党的罪案始末和判决情况,强调"自后务须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职业,以副朕整饬纪纲、爱养百姓至意。"对于诸多被陷害大臣,死者平冤昭雪,生者官复其职。不久,鳌拜死于禁所。康熙帝命将其子那摩佛释放。自鳌拜被擒后,康熙帝才真正实现了"亲政"。从此,他奖廉惩贪,锐意图治,为清王朝的统一和强盛奠定了重要基础。

康熙帝命永远停止圈地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颁旨,命永远停止圈地。六月十七日,他谕示户部:数年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百姓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此以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今年已圈者,全部还给民间。至于旗人,无地也难以维持生计,是否以古北口等处的边外空地,拨给耕种。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奏闻。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再谕户部:民间田地,久已有旨永停圈占,户部等所存土地分拨时,如有借机扰害百姓、圈占百姓良田、以坏地强换者;或隐占存部良田,妄指拨给百姓土地者,一律严察治罪。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康熙又一次明确下旨:凡属民间开垦的土地,今后永不准许圈给旗下。如旗下有应拨给者,以户部现存的旗下余田分给。

严禁虐待八旗奴仆 康熙八年(1669),刑部尚书朱之弼疏言:八旗奴仆,每年因自杀报部者不下二千人!这是由于他们长年饥寒交迫、并被鞭责凌辱所致。六月,康熙帝在谕刑部时进一步分析了大批奴仆被逼自尽的原因,同意朱之弼所奏,复严肃指出:"以后官民,务须各将家人抚恤训养,勿得仍行逼责致死,人命至重,尔部即行晓谕申饬。"

严格议政王大臣会议保密制度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闻知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内容,在其尚未题请之时,在外之人就已了解。于是,七月,他专谕宗人府、吏兵二部:凡属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事,俱系国家重大机密事务。会议之时,理应极力慎密。今后,必须严加约束闲杂随从人员。至于诸王贝勒的长史、闲散议政大臣,一律停其议政。以后凡在会议时,务必慎密。仅防泄漏国家机密。命以上各衙门、部,立即晓谕,严加申饬。

重修芦沟桥告成 康熙八年(1669)十月九日,清政府重修芦沟桥告成,立碑,康熙帝亲作碑文。碑文中写道:康熙七年,秋雨成灾,芦沟桥的东北面,被水毁坏处有十二丈,于是,命工部侍郎罗多等人,挑选工匠,督造挑浚,疏导水势。复修整如初。"自此,万国梯航,及民间往来者,咸不病涉。""爰勒丰碑,用

垂不朽。”

划分满汉大臣品级　康熙九年(1670)三月十七日,清政府划分满汉大臣品级。具体规定是:满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均属一品,侍郎、学士、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均系二品。汉大学士原为正五品,今改为二品,尚书、左都御史也属二品,侍郎、学士、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均为三品。满洲郎中为三品,员外郎为四品。汉郎中系正五品,员外郎为从五品。

庚戌年会试“得人最盛”　康熙九年(1670)正月,内秘书院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魏裔介受命为本年会试正考官。魏裔介,颇具远见卓识。此次由他主持的会试,誉为“文体一变,”号称“得人最盛”。是年五月,康熙帝命新科进士李光地、王琰、陈梦雷、张鹏翮等二十七人为庶吉士。在本年进士中还有郭琇、陆陇其、赵申乔、徐乾学等人。后来,这些人均以各自事迹而成为清代名臣。

改内三院为内阁　康熙九年(1670)八月十一日,康熙帝谕改内三院为内阁。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此后,大学士、学士职衔及设立翰林院衙门等官均照顺治十五年(1658)之例,大学士分兼殿、阁衔、并兼尚书。如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兼管刑部尚书事等。以上各殿学士及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翰林院掌院学士等,俱兼礼部侍郎。十月,康熙帝授图海等十七名大臣分任以上各职。

颁布“圣谕十六条”　康熙九年(1670)十二月,康熙帝为正风俗,重教化,颁布圣谕十六条,主要内容是: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护良善,完钱粮以省催科等等。其中,他将敦孝弟以重人伦列于首位。

英国人在厦门、台湾通商　康熙九年(1670),英国人在厦门、台湾通商。康熙二十年(1681),清政府关闭厦门商馆。康熙二十四年(1685),复重新开放。

耿精忠管理军务　康熙十年(1671)正月,靖南王耿继茂旧疾日剧。此前,他曾于顺治八年(1651)继嗣为王。顺治十七年(1660),移镇福建,为清初汉官中四大藩王之一。耿精忠是其长子。因此,他于病重之时疏请由耿精忠管理该藩军务,得到康熙帝批准。五月初四日,耿继茂病逝。七月,耿精忠承袭王爵,仍镇守福建。

纂修《孝经衍义》　康熙十年(1671)二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命纂修《孝经衍义》,授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为总裁官。康熙二十八年(1689),该书由礼部右侍郎张英等编纂完成。康熙帝阅后甚感满意,命颁发群臣,复命刊刻印行。

开浚浏家河吴淞江　康熙十年(1671)三月二十六日,江宁巡抚马祜疏言: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和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其河水均由浏家河口、吴淞江口入海,现年久淤塞,以致去年湖水泛滥成灾,请敕工部,传檄总督、巡抚迅速建闸开浚。逾月,江南江西总督麻勒吉等人就此问题具体提出:请以以上六府漕米折银十四万两,留充河工经费,即均摊六府所属之地,分年按亩征还。户部议准。康熙帝下旨:这些府县本已受灾,又令多派征还,苦累百姓,免除派征之议,余如所请。次年,这项工程全部完工。

重订清太祖、太宗《圣训》　康熙十年(1671)四月初四日,因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的《圣训》编于顺治年间,未经裁定颁布,康熙帝特命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图海、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李霨为总裁官,折尔肯、折库纳、熊赐履为副总裁官,达哈塔等十人为纂修官,另设满汉誊录官、收掌官各四名,将以上《圣训》重加考订,尽快编成。

李显贵贪赃案发　康熙十年(1671),京口将军李显贵勾结镇江知府刘元辅,违例折扣兵丁草料。浮算库银,贪赃枉法。是年七月初,刑部等衙门会审此案时提出:李显贵、刘元辅俱应照例斩监候,但刘元辅父刘泽溥曾在山西阵亡,故应免其死,枷号鞭责。康熙帝颁旨:李、刘二人身为封疆大臣,大负委任,罪行重大。刘虽有其父“死难之功,但“婪赃坏法,”均应斩首,秋后处决;总督麻勒吉、巡抚马祜不及早题参,各削所加一级,仍降二级留任;副都统张元勋、张所养各削所加一级,革去部份世职,仍留原任。

定奖励开垦例　康熙十年(1671),清政府为鼓励垦荒,规定垦田二十顷以上者,试其文义,通者授县丞,不通者授百总;垦田一百顷以上者,照例授知县、守备之职。因官员谎报垦荒数目、致使百姓被迫赔累者,准予勘明后豁免。

南怀仁疏参杨燝南　康熙十一年(1672),比利时天主教士南怀仁正奉命编制历法,杨燝南却作《真历言》一书,讥讽钦天监历。于是,南怀仁于该年八月疏参杨燝南。康熙帝命大学士图海等三人,学士哈占等六人及九卿科道会同验证。他强调“历法乃国家要务,关系非轻,”“朕于内外,总无异视。”命他们勿执偏见,谁是谁非,在验证后定论。务必使历法永

行无弊。结果，以杨燝南不谙飞灰候气法，无从验证入奏。杨燝南被送交刑部议罪。

陆世仪逝世 陆世仪，字道威，号刚斋，学者称桴亭先生，江苏太仓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七月，是清初理学中程朱学派的有影响人物之一。对于明代末年的动乱，他非常不满，且鄙薄功名。清代初年，他隐居讲学，晚年曾主持毗陵东林书院，弟子遍布大江南北。康熙十一年(1672)正月，在家中逝世。门人弟子私谥其为尊道先生。康熙时名臣汤斌在其故居建安道书院，以示敬仰之情。著有《思辨录》、《复社纪略》等。陆世仪在其诗文中同情农民，并谴责谷贱伤农等状况。时人将他与另一著名学者、廉吏陆陇其并称"二陆。"

尚可喜请归老辽东 尚可喜，字元吉，号震阳，祖籍山西洪洞，以农为业，后其祖父迁居海州卫(辽宁海城)，尚可喜即生于此地，时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明崇祯七年(1634)，尚可喜以明副将之职率部降后金(清)，封智顺王。顺治元年(1644)，随清军入关，征剿李自成农民军，击败南明永历诸将，顺治六年(1649)，特封他为平南王，镇守广东，为清初四大藩王之一。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尚可喜年已七十，不能理事，将兵事权交与长子尚之信。但是，因尚之信专横骄恣，尚可喜反受其气，无奈，用幕僚金光计，疏请归老辽东，并请求赐还房产田地，携两佐领甲兵等二万四千余人。同月十二日，康熙帝称他情词恳切，能识大体，命议政王大臣、吏、兵诸部确议具奏。四月，吏部以藩王尚存，子无移袭例，不准尚之信承袭王爵。不久，议政王大臣等议：不准尚之信率官兵仍居广东。康熙帝准其议，命尚氏父子尽撤藩兵回籍，该藩下绿旗官兵全部交与广东提督统辖。

禁止殉葬 清廷定都北京后，用奴仆殉葬之风依然存在。康熙十二年(1673)六月十七日，康熙帝命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奴仆随主殉葬。

耶稣会士徐日升到京 徐日升，葡萄牙人，生于一六四五年一月，原名 Thoma Pereira。是时，南怀仁为康熙帝进讲西方音乐，极力推荐当时在印度的徐日升。于是，康熙帝命两名官员前往印度，邀其来京。康熙十二年(1673)正月，徐日升到京，并在御前用钢琴弹奏了中国歌谣，康熙帝对其音乐才能颇为赞叹。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会议时，徐日升等耶苏会士随同以索额图为首的清政府代表团参加谈判。他以翻译之职在避免会谈破裂、敦促俄国使节承认清政府的条件方面多所努力。康熙帝为此赐其袍服。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徐日升在北京逝世，年六十三岁。康熙帝赐银二百两祭葬。

吴三桂叛清 康熙十二年(1673)八月，康熙帝命礼部左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傅达礼等前往云南、会同平西亲王吴三桂及总督、巡抚等，议商布置官兵防地，管理该藩撤兵起行等事。但是，当折尔肯等到达云南后，吴三桂则谎称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行，而实际上，他则与其部下、都统吴应麟、吴国贵、副都统高得捷，其婿夏国相、胡国柱等密谋叛清。同时，他又安排亲信党羽，严守关隘，对过往人等，只准进，不许出。同月二十一日，他公开亮出反叛旗帜，胁迫云南巡抚朱国治同叛，朱国治因拒绝而当即被杀。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等将领均从其叛。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建国号周，以次年为周王昭武元年，铸钱曰"利用通宝。"扣留折尔肯等大臣。命其部属一律剪辫蓄发，改换汉装，并亲自祭奠被他杀死的南明永历帝。军队旗色皆白，步骑则以白毡为帽。封冯苏为布政使、彭化南为云南知府、张国柱与马宝为公爵、王屏藩同李本深等人为将军。复命马宝等将率大军自贵州向湖广进兵，王屏藩等则统领叛军由四川伺攻陕西。未久，吴三桂又致书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以及贵州、湖南、湖北、陕西、四川等省的熟识将吏，同举叛旗。十二月，吴三桂统兵东行，进驻贵州。马宝所部前军兵临贵阳，巡抚曹申吉出降。贵州总督甘文焜知情势骤变，匆忙领十余人乘马逃出贵阳，及至镇远，清军守将已降叛军，甘文焜自尽身亡。是年，吴三桂率叛军攻进湖南，迅速占领了沅州、常德、衡州、长沙、岳州等地。清军极少准备，节节败退。吴三桂所向无敌，举国震动。

杨起隆起义 杨起隆，一名杨起龙，为人果敢，文武兼备。康熙十二年(1673)他假借明崇祯皇帝三太子之名在京师起义。是时，佃户和八旗奴仆倍受压迫，杨起隆决定以他们为反清主力，并以宗教为掩护，形成了李株、黄裁缝等人的骨干力量。康熙十二年，这支待机而起的队伍已近千人，"八旗下无家不遍"！是年底，吴三桂叛乱，京师气氛非常紧张。杨起隆决心利用这一时机，提前起义。十二月十日，他与黄裁缝等三十余人在正黄旗承恩伯周全斌子周公直家中(北京鼓楼西街)密商举事。他自称朱三太子，建年号"广德，"参加起义的人俱称"中兴官兵，"定于两天后的五更时分，以头裹白布、身束红带为标志，同时在京城内外放火起义。可是，就在当日晚，由于有的家仆向其主告发，黄裁缝等四人被捕。接着，周公直也急报正黄旗都统祖承烈，一时间，"凡家奴出首，主人执送者不绝。"于是，杨起隆立即率众起义。十一日，杨起隆在周公直家首先放火为号，起义者都披甲

执刃。都统图海、祖承烈亲统大兵，包围周家。双方激战中，杨起隆等人持刀跃马，冲破清军的堵截，夺路而走。清军误以为杨起隆仍在周家，因此，被捕者只是数十名起义战士。康熙帝闻知，谕令严审黄裁缝等，缉拿杨起隆和其他起义者。同时，他又密遣清军，捕杀了李株等二百余人。京师百姓，惶恐至甚，纷纷准备逃到西山等处。康熙帝为了尽快稳定局势，全力平定吴三桂叛乱，接连颁布“抚安百姓”谕。命将被捕的起义者凌迟、处斩，其亲属免罪。此后，有冒名杨起隆秘密抗清者，有杨起隆旧部公开起事者，均被杀害。直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仍有谕令：“杨起隆一案，时当留意。”次年春，杨起隆在改名换姓之后，出现在武官金玉相家中。有人将他告发。杨起隆随即潜离虎穴。自此，他屏踪息影，不知所终。

天体仪器与火炮制成 康熙十三年(1674)二月，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制成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并绘图立说，以《新制灵台仪象志》进呈。南怀仁升为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卿，仍修历法。吴三桂叛乱发生后，康熙帝谕其监造用于山地作战的轻火炮。是年，南怀仁铸成约三百五十门新炮，并在芦沟桥试射，命中率极高，康熙帝脱下貂裘赏赐。这些轻炮火在平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康熙十八年(1678)，康熙帝准礼部议，将南怀仁制成的《康熙永年历》交翰林院，并令钦天监官生学习，永远遵照执行。

常德、岳州失守 康熙十三年(1674)二月，吴三桂命其将进犯湖南。是月，杨宝荫攻取常德，吴应麟兵陷岳州，吴军逼近长沙，人心日乱。康熙帝命吏、兵二部传谕长沙文武各官：各尽其职，保境安民。命前锋统领硕岱自荆州进军常德，都统朱满率部进驻长沙。三月，康熙帝谕大将军勒尔锦等：“今唯先取常德、长沙，以寒贼胆，方能制胜。”否则，民心业已动摇，广西音信阻绝，倘江西报警，不单馈饷浩繁，唯恐又出他变！复谕：吴三桂既亲自到达常德，我军如进取常德、沣州，吴三桂势以全力进犯岳州，应互相应援，事先有备。不出康熙帝预料，吴三桂水陆军并进，齐攻岳州，清廷守将以城投降。

三藩之乱形成 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收到吴三桂劝其共同反清书信。此前，耿精忠于康熙十二年(1673)九月即欲谋叛清廷，因虑下游诸郡不服，虽已约郑经自海上出兵江南，但见康熙帝决心平定吴三桂之举，遂拟稍待。是时，吴三桂军已攻克常德岳州等地，四川、广西等地接连报捷。耿精忠心中暗喜，决心从叛。并立即与其藩下部将曾养性、江元勋、马九玉、白显忠及福建巡抚刘秉政密谋反清。是月二十二日，耿精忠据福州叛乱，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传檄各府县蓄发，易汉装，铸钱曰“裕民通宝。”命都统马九玉，总兵曾养性、白显忠等分别攻下延平、邵武、福宁、汀州等地，全闽皆为其有。总督范承谟拒绝叛清，被囚。耿精忠遣使至吴三桂军前，约其攻占江南江西；约广东潮州总兵官刘进忠进扰粤地；约郑经出师江南，而他则统陆师攻取江浙，并许以全闽战舰出动。同月，刘进忠据潮州叛附，耿精忠封他为宁粤将军，耿军入潮州。不久，海澄总兵赵得胜、漳浦总兵刘炎叛清，耿封赵为威远将军，刘为定远将军。一时间，江西的广信等十余个府县纷纷响应吴、耿，叛附者甚众。五月，浙江平阳总兵官蔡朝佐剪辫倡叛。耿部曾养性入浙，招降温州总兵官祖宏勋、平阳游击周定猷，复同耿将林冲、徐尚朝等部众，接连占领瑞安、处州等六府县，伺犯宁波，进攻金华，复以数万精兵围攻衢州，聚清湖，水陆合攻，衢州告急。浙江总督李之芳亲统清军，据险要之势，奋力死守。八月，耿精忠部在广信等地发布文告，称由徽州、婺源进取江南诸郡，“如助夷扶暴，大兵一到，定以逆民进行剿洗，寸草不留！”康熙帝在连续接到奏报后，是年四月二十七日，下诏削耿精忠王爵，声讨其罪行，立谕福建军民：既不追究，也不株连，论功叙录，勿自疑畏。先是，命将耿精忠之弟耿昭忠及其他在京城诸弟拘于一室，其属下官员一律解职。命都统赖塔为平南将军，统领副都统马哈达、胡图之部与安南将军华善之部速赴杭州，以保浙江；命定南将军希尔根率其部驰往江西；命迁安庆部分官兵固守南京，复授和硕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力保江南全省。同年六月，命希尔根进入江西，先定广信，后取长沙；授和硕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并于次月授予敕印，前往浙江；命副都统喇哈部速往衢州增援；八月，康熙帝手谕护军统领桑遏：坚守袁州，确保吉安、赣州，避免因其失陷而使广东受阻、形势益危。年底，清军在温州、黄岩、杭州、饶州、衢州、金华等多处大败耿军，歼其部众约十万人，战局始有转机。同时，康熙帝还派遣工部郎中周襄绪等，携敕往闽，招降耿精忠。康熙十五年(1676)，吴三桂、郑经所部连陷惠州等府县，耿精忠又派兵进犯赣州等地，复与吴军联合，阻截清军援救广东。广东总兵官苗之秀等叛清。是年二月二十一日，尚之信派兵包围其父、平南王尚可喜的住处，叛依吴三桂，受封招讨大将军，改旗易服。同月，吴三桂封其为辅德公，后又晋为辅德亲王。尚之信听命于吴，联合郑经，各守边界。六月，尚、耿与孙延龄等分路进犯袁州等地，力图实现与吴三桂会师江西。至此，以吴、耿、尚为首的三藩之乱形成，

战火遍及半个中国。

河北总兵官蔡录谋叛事败 康熙十三年(1674)三四月间，河北总兵官蔡录私通杨来嘉，密谋反清。杨来嘉，湖北襄阳总兵官，与蔡录均为郑成功旧部，先后率领所部降清，授左都督，分任总兵官。是年三月，杨据谷城叛附吴三桂，逾四日，郧阳副将洪福以其部响应。吴三桂即授杨、洪为将军。康熙帝得报，因猜疑蔡录令其兵丁“借称捕鱼，披甲行走，有叛状，民心惊疑”。遂于四月初五日命内大臣阿密达赶赴怀庆，查明此事。蔡之部众亲属称“蔡录造鸟枪，购骡马，与杨来嘉往来，同谋约应吴逆，谋反情实”。阿密达至其衙署，蔡施放火炮，被捕。康熙帝命将蔡录及其与谋之子、侄等一并斩首，其余与此案无涉之投诚官兵概不株连。命吏、兵二部通行晓谕，以安投诚者心。

尚可喜疏志忠清 康熙十三年(1674)，抚蛮将军孙延龄叛清后，其檄文内有三藩之语；不久，耿精忠也起兵叛清。四月初十日，平南王尚可喜疏言，他虽与耿有姻娅之亲，然其年逾七旬，唯知捐驱矢志，力保岭南，以尽始终如一之诚。康熙帝下旨，深嘉其志，命尚可喜与总督金光祖同心协力，共掌两广一应军机调遣及固守地方事宜，务酌万全而行事。次日，准尚可喜请，由其次子、都统尚之孝承袭平南王。是月底，因耿精忠叛，海澄公黄梧等被阻于漳州、泉州一带，音信皆无，康熙帝命尚可喜与广东、江西、浙江等省将军、督抚探明情况，漳、泉之地能守则守，如军力薄弱，可撤至广东、江西。尚可喜疏奏：吴三桂派大军二万，扎营黄沙河。如果孙、吴合兵一处，危害甚大，请调兵速援。康熙帝命副都统根特率其部急赴广东。四月二十八日，又命兵部将各路平叛大军的调度、人选情况，移文通告尚可喜。是时，根特已授平冠将军，与尚可喜在广东共同平叛。七月，尚之孝辞袭王爵，命尚可喜依旧管事。是月，尚部在潮州与叛将刘进忠交战，接连取胜。九月，续顺公沈瑞不甘从叛，尚可喜及时将其接出。康熙帝谕恢复沈瑞原爵，同尚驻广东。鉴于广东因广西之变，势力孤危，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冠大将军，驰往广东，援救平南王。十月，康熙帝以尚可喜为国尽忠，功劳卓著，予以更大权力，谕广东督抚等全体官员，听其节制；应补授的文武诸官，由其任选，然后奏闻；凡属军队调动及招抚等事由其酌定而行。十二月，康熙帝深感尚可喜在吴、耿叛后，“益励忠纯，克抒伟略，”晋封为平南亲王，并以亲王品级顶戴支俸，仍旧管理广东诸事。其子尚之孝袭封该爵，并授予大将军印。但是，尚可喜长子尚之信却于一年后叛依吴三桂，并派兵围困尚可喜住所。时尚可喜正卧病，恨已不能制此逆子，愤而自杀，幸被众人所救。是年十一月初八日，抱憾而死。死前，他仍穿清太宗皇太极所赐朝服，遗命葬海城。康熙十六年(1677)，尚之信降。康熙帝谥其曰敬。康熙二十年(1681)五月，尚之孝乞迎可喜归葬。丧至，康熙帝命内大臣觉罗塔达等臣亲往祭奠，并谕示说：“王素矢忠贞，若人人尽能如王，天下安得有事？每念王怀诚事主，至老弥笃，朕甚悼焉！”准以海州平南王庄园为尚可喜葬地，赐闲散佐领二员，照管其家中人口。

郑经参加三藩之乱 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叛清，再次派遣通事黄镛赴台，请郑经过海会师，并愿以沿海全闽战舰相许，声言“贵藩将水，吾将陆，江、浙唾手可得也。”五月，郑经命参军陈永华守台湾，亲统大军，率领右武卫刘国轩、侍卫冯锡范等至厦门，参加三藩之乱。六月，原泉州提督王进功子王锡藩，以泉州降郑经。先是，吴三桂致书郑经，极尽吹捧，并说：“今天下大举，正千载一遇，时不可失。”希望他直取南京，“或抵天津，断其粮道，绝其咽喉。”郑经则建言说：“以殿下之忠贞而择立先帝之苗裔，则足以号召人心而感奋忠义”。七月，平南王尚可喜围攻已叛附耿精忠的宁粤将军刘进忠，刘向郑经求救，郑经派水师相援，刘即归依郑经，受封定虏伯。十一月，郑经命其将赵得胜攻打福建漳浦，耿军守将、定远将军刘炎献城投降。康熙十四年四五月间，郑经命刘国轩会同何佑、刘进忠等，规取潮州一带未附府县，清安达公尚之信竭力防守。相持日久，郑军粮尽。尚可喜调兵十余万，尽锐来攻。刘国轩决定以退为进，在当母山以逸待劳。尚军立足未稳，刘身先士卒，郑军冒死奋战。是役，郑军以饥卒数千，重创清军，杀其将兵二万余名，生擒七千之众。康熙十五年(1676)，吴三桂命尚之信与郑经画界结盟。是年，郑经败盟，占汀州，但耿精忠复降清朝。自此，郑经在福建节节败退，被迫退守厦门。康熙十六年，尚之信降清，刘国轩弃惠州，完师归厦门。郑军所占闽粤七府尽失。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郑经复命刘国轩率军伐漳州，连克五洲等沿海十余处州堡，有时“一日三捷”。总督郎廷相急檄清军四路进剿，提督段应举、将军喇哈达、赖塔等从泉、福、潮诸州出兵，力图一举歼灭郑军。然而，数千郑氏官兵在刘国轩的带领下，声东击西，忽水忽陆，兵锋甚锐，取平和，占漳平，围海澄，清军都统、提督以下皆败死，郑军复陷长泰、同安诸县。“闽省震恐！”康熙帝诏逮郎廷相，命姚启圣、吴兴祚、杨捷为福建总督、巡抚、提督，战局始变。是年九月，郑军在漳州之战中伤亡惨重。次年，郑

军复起，清廷迫而迁界。郑经为有粮饷，下令加倍征收税米，民多怨愤。康熙十九年(1680)，三藩叛乱败局已定。康熙帝命大集舟师，对郑军剿抚并用。郑军失海坛，献海澄，投诚者一万四千余名。郑经知势不可为，遂弃厦门而退归澎湖。

康熙帝命保举平叛人才 康熙十三年(1674)八月，康熙帝准吏部议覆御史朱尚义疏言，"今闽粤督抚既设，将来守令将弁势必须才补用。"命满汉三品以上的大学士、各部尚书等堂官及八旗都统，凡有真正才能者，不拘文武，照例保举。吏、兵二部甄别录用，并派往平叛军前效力。倘若保举不妥，将保举官员照例议处。

满汉官员捐助鸟枪 康熙十三年(1674)九月二十六日，兵部会议，因平叛需要，令内外满汉官员捐助鸟枪。按捐助数目规定：每十杆纪录一次，五十杆加一级。生员捐三十杆、闲散弟子捐四十杆，准进入国子监读书。富民捐四十杆，给予九品顶戴。三十日，康熙帝准所议。

恢复捐纳例和招民垦田酌量录用制 康熙十三年(1674)十月，因吴三桂、耿精忠等相继叛乱，清军分赴各省平叛，所需钱粮骤然增多，清廷遂复行捐助纳监例，简称捐纳。规定：现任文武各官和乡绅捐银二百两或米四百石者，准记录一次；捐银三百两和四百两或捐米六百石和八百石者则分别记录二次和三次；捐银五百两或捐米一千石者，准加一级。进士、举人、贡生捐银八十两和一百五十两或捐米一百六十石和三百石者，出任之日分别记录一次和二次；捐银三百两或捐米六百石者，出任之日准加一级。增生、附生、青衣等，视其捐银或捐米的不同数目，可转礼部送国子监读书。富民捐银一百两、一百五十两和二百五十两或捐米二百石、三百石和五百石者，分别给予悬匾示旌、九品顶带荣身和八品顶带荣身。凡属大计贪赃、丢城失地、盗骗钱粮、科场舞弊、作恶害民者及三品以上革职官员，不准捐纳。但是，如因逃人盗案、拖欠钱粮及贻误公务而被革职者，自四品官至九品官，视其不同捐银数目，给予原品顶带荣身。革去进士、举人者，捐银一百五十两或二百五十两，分别给予九品顶带和八品顶带荣身。此后三年间，因军需一再短缺，复广升捐纳条例，如纳米菽、马草、鸟枪、弓箭等等，清廷共得捐银二百余万两，而捐纳知县已达五百余人，太学生员增至数十万人。是年，清廷又定招民垦田酌量录用制，规定凡属贡生、监生、生员及百姓垦田三十顷以上者，奏过吏、兵二部，试其文艺程度，分别授予知县、县丞、守备、百总等官。但是，如地方官员对被招民垦田未足额数或垦田钱粮未经起解而擅具题者，照例议处。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乱平定，清廷遂停止各种捐纳事例。

吴三桂图谋取京都 康熙十四年(1675)初，吴三桂欲乘陕西提督王辅臣叛附之机，取道四川、陕西，谋取京都。为此，他遣将布防，派兵七万、苗兵等三千守澧陵、岳州，以拒江北荆州方面的清军。在澧陵，筑木城以守；在岳州，则于城外掘壕三重，环立竹木，设下陷井；在洞庭湖峡口，植丛木为桩，阻挡清军水师。复派兵七万坚守长沙、萍乡等处，以挡安亲王岳乐所率的江西清军。命湖北诸叛将王会、杨来嘉、洪福等攻陷谷城，取郧阳等处，与兴安、汉中叛军会合。吴三桂则亲自从常德移师松滋，驻虎渡口，截击勒尔锦、尚善两支清军，使其相互不能接应，扬言将率军渡江，进犯荆州，决堤灌城。

定开采铜铅制 康熙十四年(1675)，清廷颁定开采铜铅制。规定：凡各省出产铜铅处，有民具呈愿行开采者，由该省总督、巡抚派官监督管理。采出的铜铅，二分入官，八分由民出售。其八分中，四分由官定价收取，另外四分才准听民贩运。此外，也有抽课一分，余皆官买；抽课三分，余准自售之例。康熙十八年(1679)，令各省布政使佐官总管，各府佐官分管，州、县官专司其责。

"河西三将"积极平叛 "河西三将"是指生于陕、甘的三员汉族名将张勇、王进宝和赵良栋。吴三桂叛清时，张勇任甘肃提督，驻镇甘州。康熙帝派大学士莫洛经略陕、甘，以防西线有变。康熙十三年(1674)十一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依吴三桂，莫洛阵亡。此后，王辅臣率军攻城占地，截断清军粮道，黄河以东的甘肃和陕西大部的将官相继叛清。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兰州失守，西北震动。巡抚华善疏言：黄河以西甘肃地方免于失陷，乃张勇之力。以目前情势，只有他才能恢复失地。同月，康熙帝授张勇为靖逆将军，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节制。张勇部下最得力的战将属西宁总兵王进宝。是年，王进宝率兵以革囊结筏，潜引渡河，败叛军于河口，复设伏兵，又败叛军于新城。进而进军八十里，扎营兰州府首县九龙山。叛军轮番冲击，王进宝身先士卒，锐不可挡，连克安定、金县、临洮等地，断绝了兰州外援，又挥军急攻，叛军势穷乞降。兰州既克，张勇布署收复其它失地。此前，宁夏兵变，提督陈福被杀，张勇举荐天津总兵赵良栋继为提督。陕、甘转危为安，皆赖此三将之力。康熙帝颁旨奖励张勇，进一等侯，加少傅兼太子太师。王进宝和赵良栋分别授奋威将军、勇略将军。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帝诏王、赵等恢复四川。大学士图海和张勇等均感到时至寒冬，运饷困

难，希望明年春天再进取。赵良栋则主张立刻发兵入川，并说：湖南已经平定，应复汉中、兴安，愿独任一路。当时清军兵分四路，而战绩则属赵、王二路卓著。赵自凤县克洛阳，大败叛将吴之茂，复取阳平关，收复失地，恢复汉中，与王进宝会师宁羌。次年初，赵克成都，王取保宁，与吴军大将王屏藩等人均有恶战。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分三路进攻云南，时王已患病，张勇则另有任用。赵遂以一路由四川进兵。吴三桂孙吴世璠拼死顽抗，清军统帅彰泰围困昆明九个月未下。赵自告奋勇，率军急攻，亲冒矢石，同叛将郭壮图等殊死搏战，夺新桥，克三市街，部伍森严，秋毫无犯，仅以八天，即克昆明而云南平。康熙帝称他是"真伟男子。"王进宝奉诏到京时，晨夕入朝，康熙帝亲临赏宴，笑语极欢。太皇太后及皇太子也都赐宴内廷。"河西三将"病逝后，康熙帝深为悼念，赐祭葬，分谥襄壮、忠勇、襄忠，子孙袭爵。乾隆年间，均命世袭罔替。

布尔尼兴兵叛清　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兴兵叛清。先是，布尔尼属下人到京，见京师兵力空虚，城门卫兵皆少年，布尔尼闻知，便预谋劫其父叛清。从嫁公主长史辛柱遣弟阿济根向朝廷密报，康熙帝认为叛情尚未暴露，应先免其生疑而察其虚实，遂命侍卫塞棱遍召巴林、翁牛特部王公与布尔尼。诸王公均到，独布尔尼不至。三月十七日，布尔尼逮捕塞棱，并煽惑奈曼等部在二十五日共同叛清，随即率兵直逼张家口。康熙帝于二十七日命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又遵祖母、孝庄文皇后命，以图海为副将军。挑选八旗家仆中的健勇者组成一军，定于四月初五日出师征讨。布尔尼赶忙求助于土默特部，该部拒绝。但奈曼部首领札木山于初五日附布尔尼叛，在察汉郭尔河合兵，致书喀喇沁部杜楞郡王札什同叛，并谎称科尔沁等五部均统兵响应。当时，科尔沁、土默特、喀喇沁等部已经遵照理藩院命令，调兵围歼布尔尼。同时，康熙帝谕布尔尼兄弟及察哈尔部众，严斥他们负国恩背叛行为，希望主动前来请罪。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在达禄与叛军激战，大获全胜，布尔尼兄弟仅领三十骑逃去，科尔沁部额驸沙津统兵急追，斩布尔尼等于阵前。康熙帝命将察哈尔叛军人等安置在义州、锦州等地。四月，察哈尔兵又在鄂西奚抢劫马厂及妇女。康熙帝即命内大臣佟国纲为安北将军，统兵往剿；逾月，哗变的察哈尔兵受抚归清。五月，奈曼部札木山势穷乞罪，谕免死，革去郡王衔，留其家眷牲畜。六月，鄂札、图海班师还朝，康熙帝亲率诸臣在南苑大红门迎接。十月，以功授鄂札黄金百两、银五千两，图海封三等公爵。

康熙帝严斥"裂土罢兵"　吴三桂叛清后，西藏达赖喇嘛表示，吴三桂背 主负国，人皆厌恶。不来则已，来则缚之以献。及至王辅臣叛，陕、甘人心动摇，边外蒙古诸部入边劫掠，清军损兵折将。康熙帝敕谕达赖严加约束，不准生事扰民，复谕他进兵云南、四川。达赖以松潘路险为由，不遵谕旨，并说：蒙古兵力虽强，但难以进军入边。纵得城池，恐其贪据。况且以西南气候论，军队也难服水土。若吴三桂势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鸣张，莫若裂土罢兵！康熙十四年(1675)四月二十七日，康熙帝严斥达赖：吴三桂负殊恩，构衅残民，天人共愤。朕乃天下主，岂容裂土罢兵！如其真心悔罪来归，可准以不死。

册立允礽为皇太子　康熙十四年(1676)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谕礼部时强调"惟建储以重国本。"十二月十三日，御太和殿，遣辅国公叶伯舒等为正、副使，册立十二岁的皇子允礽为皇太子，正位东宫。次日，颁诏全国。清代立皇太子自此始。

康熙帝切责勒尔锦　顺承郡王勒尔锦，礼亲王代善重孙，姓爱新觉罗氏。吴三桂叛，康熙帝授他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以贝勒察尼等参赞军务，委以正面截击吴三桂重任。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初十日，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出师仪式，授予敕印，亲自将勒尔锦等送出长安门。然而，勒尔锦自赶赴荆州前线后，畏缩不敢力战，湖南尽失，只得坐守荆州前线后，畏缩不敢力战，湖南尽失，只得坐守荆州。此后，勒尔锦屡遭康熙帝斥责。康熙十三年(1675)十二月，吴三桂未灭，王辅臣又叛，陕甘危机。康熙帝认为这都是因为勒尔锦等前线将帅，不遵指令，相互观望，迁延不进，致使吴三桂等得以盘据大江以南。为此，他严斥勒尔锦：领兵于荆、岳将近二年，劳师靡饷，未得尺寸之地，坐失事机，罪不胜数。康熙十四年正月，勒尔锦请求增兵，以利渡江作战。康熙帝不准，责其屯兵不前，今又请兵，难道真是要速灭叛军吗？"不过冀免逗留之罪尔。"康熙十五年四月，勒尔锦同吴军在太平街一战又败，退守荆州，具疏请罪。康熙帝斥以"守土三年，未获寸功，"仍希望他立功自赎。康熙十六年(1677)正月，康熙帝连调陕西和河南兵、进取汉中兵增补荆州，令勒尔锦乘机渡江，收复湖南，不准延误战机。康熙十九年(1680)七月，勒尔锦奉命率部至重庆，既未能前进，且中途自返，被迫上疏自劾。康熙帝怒谕他率所属护卫及官兵还京。十一月，康熙帝因议政王大臣等对勒尔锦议处过轻，指出：勒尔锦等统领大军，不能竭力收复失地，却敛取督抚等官的财物，希图肥家，贻误国事，疲敝兵马，困苦民生，其罪决不宽容。命将勒尔锦削去王爵、议政、宗人府职，仍旧羁

禁，所属佐领另行分配。康熙二十一年(1682)，勒尔锦死。

王辅臣叛而复降 陕西提督王辅臣叛清后，康熙帝为使他尽快归附，派使招抚。同时，命张勇、孙思克等河西三将猛击其部众。康熙十四年(1675)九月，王辅臣致书表示，请遣有威望大臣，方肯受降。康熙帝认为这是王缓兵计，命急攻平凉。逾月，王辅臣请求再颁赦书。康熙帝以清军对平凉围而不攻，看出了王是在"诱我援兵，"命贝勒董额从速攻城。康熙十五年(1676)五月底，抚远大将军图海奉命至平凉地区，复与孙思克领兵到城北察看情势，王辅臣突然从城内冲出，统兵万余人，急攻清军。图海令诸将分路反击，孙思克负伤力战，清军感奋，擒斩叛军甚众，王辅臣大败而回。图海复命断其粮道，并命参议道周昌入城招降。王辅臣知待毙之势已成，遂遣副将出城乞降。康熙帝于六月初一日颁赦招抚。七日，王辅臣遣子继贞、总兵蔡元、布政使龚荣遇等至图海军前，献军、民之册及吴三桂所授敕印。逾七日，王辅臣亲自来到图海大营，叩头谢恩，剃发归降。七月，康熙帝命复王辅臣原官，加太子太保，升为靖寇将军。这一年，陕甘局势转危为安，为康熙帝取得平叛胜利奠定重要基础。

耿、郑交恶 耿、郑系指清靖南王耿精忠和据守在台湾的郑成功子郑经。在参加三藩叛乱中，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反目成仇。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十六日，耿精忠叛清，邀郑经会师，并许以全闽沿海战舰。郑经见耿来书，大喜，率兵舰于四月渡江，至厦门。耿命定远将军刘炎往迎。郑虽优礼待刘炎及其弟刘煜，但刘氏兄弟见厦门遍地瓦砾，茅草满野，心甚轻视，遂向耿报郑经"兵不满二千，船不过百只，安能济事。"耿信所报，即通告沿海各边界，照前禁例："寸板不许下海，"禁绝与郑经往来。郑大怒，领兵占同安。耿、郑交恶，遂起兵端。六月，原泉州提督王进功子王锡藩杀死耿部总兵赖玉，以泉州降郑。耿得报，遣官索地请和。郑笑答：天下乃我明太祖之天下，与耿何干？况漳、泉地系我父母之邦，又是耿请我率师渡海，共扶明室，岂墨迹未干，竟先背约！七月，郑部于漳浦、海澄张挂榜文，历数耿反清后，颁发谕示，俱称敕旨，从不以大明为正统。是月，耿部刘进忠以潮州降郑，受封定虏伯。康熙十四年(1675)正月，郑势益盛，据漳、泉、潮三府。耿部与交战，屡败。派官至泉州，向郑贺新年，赠大船五只，希求和解。双方商定：以枫亭为界，通商贸易，遇事相互援助，不得侵伐。康熙十五年(1676)五月，郑乘耿与清军交战之际，命将薛进忠、吴淑占领汀州。此次，郑先背盟，耿、郑交恶益甚。耿精忠降清，迫清军遂进入福州。十二月，康熙帝命杰书进击郑经，速取兴、泉、漳诸府。耿部降清者益众，郑部成孤军敌清之势，士气沮丧，连失汀洲、兴化、泉州，溃散奔逃。郑经知耿、郑交恶，清军得利，遂弃漳州，被迫退守厦门。

沙俄尼古拉使团到京 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以尼古拉为首的沙皇俄国使团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该团一百五十余人，在康熙十五年初到达齐齐哈尔。途中，尼古拉获悉吴三桂等叛乱，即向沙皇报告：如有正规军二千名，不仅达斡尔地区，乃至"中国长城以外的所有土地都可能臣服于陛下的统治。"尼古拉在中国边境还特别接见了早自一六六七年叛逃的根特木尔，保证决不将他交与清政府。康熙十五年(1676)五月，尼古拉到京，傲慢无礼，就如何递交国书仪式，同清廷多次争执。其国书中说：因俄国与中国相距遥远，故未能彼此派使往来。"今特派我近侍世臣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为使，前来呈递文书，并向中国大皇帝问安。"但是，该国书对清政府于康熙九年(1670)提出的交还根特木尔，勿生边衅等要求未做任何答复。理藩院尚书阿穆瑚琅又就此事询问，尼古拉则称沙皇不知此根特木尔事。五月初五日，康熙帝传旨：俄罗斯国"诚心向化，特遣其臣贡献方物，甚属可嘉。"逾十日，康熙帝在太和殿接受尼古拉一行行礼，以茶款待。次月，理藩院题奏：尼古拉自称奉沙皇旨意，提出十二条要求，内有通商贸易、给还被清军逮捕的俄国人、等价交换银四万两和价值数万两的生丝、熟丝、准来使销售随带货物等等，"若按我请求而行，则两国可永相和好。"六月二十日，议政王大臣奉旨议覆：拒绝其无理要求。七月初一日，康熙帝准议政王大臣等议奏：沙皇俄国"向化入贡，应行赏赉。其使臣不娴典礼，不便给与敕书，应令理藩院谕来使：将本朝逋逃根特木尔遣还。另简使臣，遵中国礼行，方许照常贸易。"同时，赐尼古拉等鞍马、袍服等物品。七月二十四日，沙俄尼古拉使团离京回国。

清军收复福建 康熙十五年(1676)七月，耿精忠部中都尉徐光武看到郑经军威日盛，耿军人心惶惶，于是，他秘密派人携书，驰赴衢州守将马九玉，令速请清军入闽。逾月，马九玉遣心腹向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纳款。是月十六日，马九玉率军绕道常山、玉山，由河口分水关进入福建。杰书命宁海将军喇哈达、都统赖塔等将士尾随其后。二十日，清军进入福建关隘仙霞关，耿部守将献城迎降。二十一日，清军收复浦城。九月，赖塔等部清军克建阳、建宁等府城。同月，杰书统兵至延平，耿部守将耿继美等

开城降清。同时，耿精忠遣子献印请降。十月，杰书率师至福州，耿精忠出城迎接，清军入城安民，传檄各府县。复连取郑经所据兴化、泉州、漳州等府。次年二月，除郑经尚据厦门外，清军收复了福建全省。

耿精忠降清 康熙十五年(1676)八月，清军进入了福建关隘仙霞关，连克浦城、建阳、建宁等府县。郑经也在夺得漳、泉、汀诸府后，复取兴化，兵锋直指耿精忠所据省城福州。是时，耿部守潮州、海澄等地官兵纷纷降郑，而白显忠一部在江西又被清军大败，连失建昌、饶州、广信等府县，曾养性部则在浙江被清军所阻。福州势危。九月，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以军贴形式劝耿精忠归降，其书称："郑经与尔有仇，尔当助大兵进剿立功，何久事仇人为叛逆?"许以为他保题，仍为王爵，镇守福建。耿精忠知势不可为，乃生降意。同月十九日，耿精忠剃发易服，遣子耿显祚等向杰书献印请降，兼迎清军入城。逾月，杰书率师至福州，耿精忠领文武官员出城迎降，献上所属官兵印册。清军入城安民，传檄所属郡县。耿精忠向杰书请求立功赎罪。康熙帝命耿精忠保留靖南王爵，统所部征讨郑经以自赎。耿部兵丁照额留用，余者另行安排。复命其弟耿昭忠为镇平将军，驻福州，统辖靖南王藩下留守官兵、家口。康熙十六年三月，耿精忠会同其他清军，率部攻潮州，郑部刘进忠降。八月，康熙帝命耿精忠仍驻潮州。康熙十八年(1679)十月，因福建满洲兵即将撤离，康熙帝虑耿精忠又生他变，谕杰书促其来京陛见。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康熙帝待耿精忠旗下人员全部由福建撤至京城后，传旨：革去耿精忠王爵，即凌迟处死，其子耿显祚革职处斩，党羽白显忠、曾养性、刘进忠等八人凌迟处死，黄国瑞等十五人处斩，耿精忠、刘进忠首级悬挂示众。

尚之信口称降清，心怀二志遭斩 康熙十五年(1676)九月，耿精忠降清，尚之信势益孤。耿仍留靖南王爵，证实康熙帝所言，"如输诚悔罪，仍许自新。"康熙十五年(1677)十二月，尚之信命人携密疏来到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军前，请予准降。喇布立即代奏。九日，康熙帝谕尚之信，将其已往之罪并其属下官兵全部赦免，准立功自赎。康熙十六年五月，尚之信率广东省城文武官兵民等剃发归降，并派其弟尚之瑛往韶州，迎接镇南将军莽依图所统清军。六月初三日，康熙帝命尚之信袭其父尚可喜平南亲王爵，出兵往征湖南。然而，自此之后，尚之信以各种借口，拒绝出兵，驻兵不离省城。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清军接连败与吴三桂军，广西危机。康熙帝即命尚之信火速进兵广西。尚之信则已沿海有警，兵力有限，难以分兵回奏。复以高、雷、廉三州府初定，人心不稳，仍请留驻广州。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尚之信疏称所患痢疾加重，擅自将横州等地前线兵撤至广州。其间，永兴危机，他坐视不救；从征之师，又密嘱勿进。尚之信本性残暴，酗酒伤人，视为常事。对藩下投清官员，他非辱即杀，引起极大民愤。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尚之信偶赴广西武宣。护卫张永祥等赶至京城，首告尚之信诸多罪状。康熙帝即命刑部侍郎宜昌阿、郎中宋俄托等以巡视海疆为名赴广东查实，如罪证确凿，可令都统王国栋将他逮捕。五月二日，宜昌阿与王国栋传檄正在武宣的总督金光祖。金随即兵围武宣，逮捕尚之信并将其押回广州处死。两广局势渐趋稳定。

靳辅治河 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生于天聪七年(1633)。康熙十年(1671)授安徽巡抚。因他实心任事，加兵部尚书衔。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二十四日，靳辅升任河道总督。当时，苏北地区黄、淮、运河有百余处决口，海口淤塞，百姓受灾，漕运受阻。于是，他于四月五日抵达宿迁(今江苏省宿迁县)后，即开印任事，并于七日亲往淮阳灾区实地勘察。他测量水患形势，听取有关治河建议，博采众长，一日而上八疏，指出"河道敝坏已极，修治刻不容缓。"康熙帝早已认为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所以坚决支持靳辅治理黄河。靳辅治河的指导思想是从全局出发，重点施工。首先，挑清江浦以下、历云梯关至海口一带的河身，加筑两岸河堤，用筑堤束水刷沙法整治下流，导黄淮入海。第二、堵塞黄、淮各处决口。他一改往日浪费财力而不保质量的作法，提出筑土御水法，密下排椿，多加板缆，用蒲包裹土，以麻绳缚填，省钱而工程坚固。第三，挑浚清口，使淮河能直奔清口，与黄河会合冲沙。这是当时治河的关键工程。洪泽湖下流高家堰以西到清口，约长二十里，为黄、淮二河会合处，当时已渐淤为陆，只剩一道小河。靳辅主张在小河两侧离水二十丈地，各挑引一道河流，使其分别冲刷，就可以逐渐变陆地为河道。第四，修筑高堰坦坡，借以缓和凶猛的水势。至于治河费用来源等项，他提请预征补还、裁并冗员、明定职守，对河臣奖惩严明，设河兵守堤等。此后十余年间，他继承和发扬我国治河的优良传统，总结民间的宝贵经验，征派民工，明赏罚条例；堵固决口，广修堤坝，部分河水得归故道；创开中河，确保漕运无阻；开辟海口，涸出下河七州县被淹土地；兴屯田之议，广为招垦；知人善任，使著名的治河专家陈潢成为得力助手，在治河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

傅弘烈屡建功勋 傅弘烈，字仲谋，江西进贤

人。顺治年间，任甘肃庆阳知府。吴三桂镇守云南后，时现叛意。康熙七年(1668)，傅弘烈即密奏吴蓄有逆谋，结果，反以诬陷罪被捕，论斩。康熙帝亲政，特命傅弘烈免死，戍广西梧州。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叛，抚蛮将军孙延龄、提督马雄以广西叛附。傅弘烈欲集结兵力，恢复失地，遂假意依附，受吴三桂所封信胜将军职。在泗州等地，招募义军五千人，传檄伐吴。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他密书致吏部侍郎舒恕，告已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孔四贞日夜思念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若能赦免其夫孙延龄罪，封孔四贞为郡主，广西可安。康熙帝闻知，命督捕理事官麻勒吉招抚孔四贞。吴三桂非常愤恨傅弘烈所为，命马雄将他在柳州的亲属全部斩杀。同月，傅弘烈密疏速征潮州。康熙帝遂因福建已定，命拉哈达、耿精忠率部往征，命镇南将军莽依图部夹攻广东。原潮州总兵官刘进忠等知大势已去，遂以惠、潮二府一州二十一县投降。五月，傅弘烈致书麻勒吉，告以清军如从江西、广东交界南安府进兵，则道路畅通。同月，傅弘烈任广西巡抚，复兼抚蛮灭寇将军，给予敕印，拨给军饷马匹。八月，傅弘烈率部收复梧州。九月，吴军猛攻梧州，傅弘烈部与之激战，吴军大败。傅部乘胜连克浔州府等一州四县。康熙帝谕莽依图分兵赴梧州，与傅弘烈共取广西其它失地。康熙十七年(1678)二月，傅弘烈领兵围平乐，因吴军增援，寡不敌众，退守中山镇。康熙帝诏称弘烈部从未支俸饷，确奋勇平叛，屡奏捷功，其心可嘉。责莽依图临阵畏缩，致使已复地又弃于敌。九月，吴军以数万众进攻，傅弘烈孤军奋战，疏报屡请援军，竟无至者！十二月，吴军再次尽锐来犯，藤县失守，梧州告危。逾月，吴三桂孙吴世琮部水陆并进，攻梧州。傅弘烈与莽依图等率满汉官兵迎战，吴军弃营而逃。康熙十九年八月，傅部收复柳城、融县。康熙二十年三月底，马雄子马承荫降而复叛，在柳州计捕傅弘烈，押至贵阳。吴世璠多次以高官厚禄引诱，傅弘烈拒不降吴。十一月十六日，被杀。康熙帝闻而伤悼，赠他太子太师、兵部尚书，谥忠毅。还准于在桂林建双忠祠祭祀。

蔡寅率“白头军”抗清 蔡寅，福建漳州人，种菜为生。早自顺治十六年(1659)，他就以供奉哪吒太子为名，传道布教，组织抗清武装。参加者多为沿海士卒。因其众头裹白布，人们称为“白头军”。康熙十六年(1677)二、三月间，蔡寅率部众进入泉州，大败清军官兵，斩关而出。人以蔡寅为神，从者日众。蔡寅将截获的清军粮饷，救济贫民，并向富户派粮，积蓄以待。此后，蔡寅在漳州、泉州一带迅速扩大队伍，多至数万人。康熙十六年郑经在漳、泉接连败阵，蔡寅遂于三月十九日借机抗清起事。他自称明“朱三太子”，下设提督等官，结交泉州人许挺为内应。是日夜，他领兵至泉州城下，鱼贯缘堞而上，悄然无声。及至部众到齐，即鸣鼓扬旗，直至开元寺前。知内应被擒杀，遂转身挥刀，杀出西门，从者无一被捕。从此，人们更信其神术。此后，蔡寅统部众继续在南靖、长泰、同安、安溪等县的山谷间活动，声势益盛，屡败清军。为此，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在灌口集结满、汉兵，准备进剿，一时无暇顾及郑经。康熙十七年，蔡寅相继为福建总督郎廷相、姚启圣所败，投归郑经，改名蔡明文，授荡卤将军。

清廷抚恤殉难官员及其家属 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二十七日，康熙帝谕吏、户、兵部：自吴三桂叛乱以来，各平叛地方的文武官员，或矢志固守、尽节封疆，或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或从容就义、全家殉难。“此皆为国捐躯，克全忠节，深为可悯。”著各省总督、巡抚察明殉难官员的骸骨及遗下孤苦无依的妻、子，俱准动用正项钱粮，送其各归故里，以慰忠魂。

叛军官兵相继投诚 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吴三桂部总兵官关世荣等率官兵家口一万余人到赣州投诚。同月，郑经部总兵官赖鄂球率官兵一万余名投清。六月，归诚者有吴部总督董重民、刘进忠部总兵陈玉连等。次年，吴部吉安将军韩大任率文武官员九百五十四名、兵丁一万三千余人降清。降清叛军官兵总计三万五千一百余人。康熙十八年底，吴部将军、总兵等文武官员三百八十二名、兵丁一万四千三百余投诚。康熙二十年(1681)四、五月间，吴部各级将领宋国辅、张国柱等十七人，各率所部官兵及印札投清。这些对于清军尽早平定吴三桂之老巢云南起了推进作用。

康熙帝论朋党之害 康熙十六年(1677)七月二十九日，康熙帝召大学士索额图、李蔚等大臣，论及朋党之害，谕示：人臣服官，惟当一意奉公。如若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则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他指出：那些暗结党羽者，形迹诡密，然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因为他们“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逭。百尔臣工，理宜痛戒！若夫汲引善类，不矜已长，同寅协恭，共襄国事。诚如宋代欧阳修所云，君子同道为朋者，是又不可以朋党论之。

设立南书房 康熙帝酷爱读书，常感于内侍中无学识渊博者，以致君臣不能讲论。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二十日，他谕示大学士勒德洪、明珠：在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名，常侍左右，讲求文义。

命在城内拨给房屋,停其升转,在内侍从几年后,酌情优用。十一月十八日,大学士等遵旨议覆,设立南书房,张英入侍,食正四品俸,赐其宅于西安门内。高士奇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与张英同入南书房,并由内务府拨给住房。

韶州激战 康熙十六年(1677),吴三桂分兵进犯广东韶州等军事要地,叛乱之势再次扩大。八月,两广总督金光祖疏奏求援,镇南将军莽依图复以韶州紧急奏报。康熙帝谕示:这都是因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和征南将军穆占拥兵坐守长沙所致,命穆占率部速赴乐昌,截断吴军入韶州后路,命尚之信亲统官兵驰援韶州。九月,吴部金吾左将军胡国柱和亲军骁骑前将军马宝挥兵一万余人,与清军在韶州莲花山等处展开激战。清军奋勇拒战,分兵夹击,破吴军四营,斩获甚众。吴军大败而逃。逾五日,胡国柱部又弃帽峰山而溃,韶州转危为安。康熙帝感到韶州地方重要,先从莽依图请,留额楚等守韶州,后又虑及军情不能延误,命额楚以江宁将军印统领军马,贝勒参赞军务。

举荐博学鸿儒 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二十三日,康熙帝谕吏部:自古以来,凡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清朝同样崇儒重道,培养人材。遂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及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在外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分别举荐不论已仕未仕学行兼优、文词卓越者,以便亲试录用。于是,大学士李霨等举荐原任副使道曹溶等七十七人。八月,吏部题奏,各省举荐的博学鸿儒人员,原令他们从速起程,今陕西李颙等二人、江南汪琬等九人、直隶杜越等二人、浙江应为谦、山西范高鼎、江西魏禧,均以病辞。陕西李因笃也以母老辞。于是,康熙帝再次颁旨:"该督抚作速起送来京,以副朕求贤至意。"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博学鸿儒科在体仁阁考试,参试者一百四十三人,试题为"璿玑玉衡赋"和"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同日,康熙帝命吏部尚书郝惟纳等宣谕:"汝等俱有才学,原可不必考试,但考试正以显其才学,所以皇上敬重,特赐宴,为向来殿试所无,汝等需悉皇上至意。"三月二十九日,又谕吏部:取中一等彭孙遹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等三十人,授以职衔,俱纂修《明史》。其未中者或回任,或候补,或回籍,年老者予以职衔,以示恩荣。告病者不必补试。五月十七日,授取中邵吴远为侍读,汤斌等四人为侍讲,彭孙遹等十八人为编修,倪灿等二十七人为检讨。职衔均属翰林院官。

清军收复岳州 康熙十七年(1678)二月因江西已定,康熙帝遂命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和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进取军事要地岳州。逾月,批准尚善疏请,命湖广总督蔡毓荣率绿旗兵五千名,同攻岳州。是时,吴三桂亲军水师右翼将军林兴珠自湘潭投清,康熙帝授其为建义将军,封侯爵,吴部军心动摇。五月,康熙帝接受林兴珠谏言,谕扎营岳州的水师官兵,进入洞庭湖,并分驻君山等处,以切断岳州叛军同常德、长沙、衡州等地的联系。八月,康熙帝在谕示尚善等将帅的作战方案中强调:我船很多,应在小船内多装火器,乘夜袭扰,不使敌人有喘息之机。同月,尚善病死。贝勒察尼继任其职。十一月,岳州吴军粮饷危机,因而不断出击,欲通粮道,但均为清军击败。十二月,吴部岳州水师将军杜辉密书请降,事泄,杜辉及其共谋者多人被杀,吴军内乱,总兵陈华等吴部文武官兵投诚。康熙十八年正月初八日,吴部总兵王度冲、将军陈珀等率舟师降。岳州守将吴应麒知粮道已断,清军水陆围困,遂于本日弃城而逃。察尼等率清军收复岳州。

吴三桂称帝病死 康熙十六年(1677),吴三桂仍坚守衡州(湖南衡阳)。然而,清军的包围圈已逐渐紧缩。吴三桂于穷迫之时萌生称帝自娱念头。于是,他授意文武官员接连劝进。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初一日,他在衡州称帝,建元昭武,国号周,以衡州为定天府,册封妻张氏为皇后、吴应熊庶子吴世璠为太孙。设六部,置百官,大封诸将为国公、郡公、侯、伯,颁造新历,并在云南、贵州、四川、湖南举行乡试。殿瓦不及易黄,便用黄漆涂饰。搭盖芦舍数百间,权做朝房。筑坛衡山,为祭告天地之处。是日原本晴天,忽然狂风陡起,暴雨骤降,吴三桂称帝礼不得不草草结束。时清军已收复永兴,而永兴乃衡州门户,相距仅百余里。为此,吴三桂倾巢出动,攻打永兴。战斗异常激烈,清军拼死坚守。其间,吴三桂初患中风,又病噎膈,未久,又因饮食不善,染急性赤痢。八月十七日,他在衡州病死,年六十七岁。吴世璠奔丧至贵阳,夏国相、马宝等拥他继帝位,改元洪化,以昆明五华山平西亲王府为宫城。吴世璠以大学士方光琛、国公郭壮图为心腹,封夏国相为上柱国左丞相、马宝为元帅。

清廷再行迁海令 康熙十七年(1678)闰三月十六日,因郑经仍据守厦门,接连进兵海澄,清军在海澄保卫战殊为艰苦,康熙帝令福建仍照顺治十八年(1661)定例,立界迁海,将界外民尽迁内地,严海禁,绝往来。对被迁人民,豁免本年地丁额赋与差役杂项。康熙十八年二月,清廷把福建福宁至诏安一带百姓,尽逐入内地。又量地险要,或十里,或二十里,筑小寨,设守兵,限以界墙。于是,滨海数千里没

有人烟，沿海众多百姓倍受其害。

清军收复湖南、广西 康熙十八年(1679)正月，清军克复岳州，康熙帝命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等分兵速取湘阴、长沙。吴三桂部长沙守将、金吾左将军胡国柱因岳州已失，恐长沙不能久守，遂于二十九日率部弃城而走。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挥兵入长沙。同日，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率大军渡过长江，收复松滋、枝江、宜都诸郡县，乘胜南下湖南，克澧州。不久，岳乐部挺进衡州，与扬威大将军喇布和江西总督董卫国会合，察尼派舟师往援。以上将帅在本月内相继克取衡山、湘阴、华容、湘潭、来阳。二月十三日，喇布部攻打衡州，冲入城内，吴部亲军前将军吴国贵、上柱国左丞相夏国相率部逃逸，清军克衡州府城。勒尔锦奉命与察尼会师，进取常德。吴军焚常德城，吴部按察使陈宝钥献城降。三月，清军复取南安乡、桃园、归州、巴东、宝庆、祁阳等府县。征南将军穆占部连下永州、道州、永明、江华、东安、全州、新兴等府县。四月，广西总督金光祖复浔州府。六月，吴部将军马承荫率官兵三万，献柳州投诚。八月，清军攻取柳城、融县。同月，岳乐部在武冈一带重创吴军，吴国贵中炮死，胡国柱率余众逃遁。九月，广西、湖南连续被清军收复。

黄性震主持"修来馆" 黄性震，字起元，号静庵，福建漳浦人。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康熙帝为扭转福建局势，授姚启圣为福建总督。黄性震闻新总督虚心求贤，可与共事，遂仗剑谒军门，上平海条陈十便。黄性震首言兵法攻心，请建立"修来馆，"收纳投诚将士，来降者不拘真假，均以美衣华屋对待，削弱郑经实力。姚启圣采纳了这一建议。康熙十八年二月，黄性震在漳州设立并主持"修来馆"，规定：郑部文官投诚，从原衔题请，准予照职推补；武官投归，题请换札，保题现任职务。兵民归时，头发全长者赏银五十两，短者则赏二十两，愿入伍者，即拨兵饷；愿归农者，送回原籍，妥善安置，并严禁地方豪强欺压。对来馆投诚者，黄性震命一律给以官府车马，让他们携仆从，乘车骑。同时，黄还力主对收复地中的郑部家眷，严申禁令，不准掠辱。自康熙十七年至康熙十九年，除已安置归农的大量投诚官兵外，尚有投诚官民四万余名，黄性震主持的"修来馆"在康熙帝平定三藩、规取台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郑克壓监国 郑经于康熙十三年(1674)参加三藩之乱，将台湾政务委与副制使陈永华。陈永华胸有韬略，为政廉洁，严于执法，百姓安居。然而，郑经诸弟却恃势骄横，抢夺民田，欺压良善。陈永华屡禁不止，遂以郑经长子郑克壓年已十六，聪明果断，宜行"君行则守"之典，请其监国。郑经准陈永华所请，并于康熙十八年(1679)四月初六日遣礼官郑斌携谕抵台湾，同陈永华共立郑克壓监国，号曰"监国世孙"。

京师等处发生强烈地震 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至晚七时京师发生强烈地震。是时，地声如雷轰，其势如涛涌，白昼昏黑。震倒顺承、德胜、海岱、彰仪等门，坍毁城墙，难以数计。宫殿、官廨、民居，十倒七、八。压伤大学士勒德洪，压死内阁学士王敷政、掌春坊右庶子翰林侍读庄冏生、原任总理河道工部尚书王光裕一家四十三口，其他文武官员、命妇死者甚众，士民死者更不可胜记。二十九日、三十日，复大震，通州、良乡等城俱陷，地裂成渠，流出黄黑水，黑气蔽天。有一名总兵官眷途经通州，家属八十七人因房屋倒坍被压死，仅活三口。康熙帝在景山避震三昼夜。臣民生者露宿街头，枵腹惊惧，死者秽气薰天。此后，时有微震。八月八日、十二日、十三日又大震如初，京城附近三百里内，压死人民极多！十九日至二十一日，降大暴雨，九门街道，积水成河。二十六日晚和九月二十五日，京师再次大震。此次地震波及范围西至陕西、甘肃，北到辽宁，南及江苏、安徽等十省区。七月二十八日首次强震时，康熙帝即谕户部速议救灾措施，命八旗都统亲行详察，命满汉御史协助京师五城御史详细了解塌房伤人的情况。二十九日，户、工二部议定了对无力修葺倒塌房屋和无法棺殓死亡人口的给银数目，康熙帝以其数目尚少，命发内库银十万两赈济灾民。同时，他对于因平叛在外的士兵家属及其住房的被灾情况尤为关切。八月初二日，谕户部：因官员兵丁房屋损坏甚多，凡四品以下官，现领半俸者，此次仍给全俸，兵丁等发给两月银钱。十五日，派官告祭天坛。九月十八日，余震不止，康熙帝亲率诸王、文武官员到天坛祈祷。十一月十四日，谕免受灾最重的通县、三河、平谷本年全部地丁额赋，其余灾情较轻的州县也酌情豁免。康熙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一时，京师再次大震，其声如雷。二十九日，自下午五时起，连震四次，房屋摇动，官民再次撤夜露宿，直至五月十八日，余震尚未宁息。

魏象枢严劾索额图、明珠 魏象枢，字环极，一字环溪，号庸斋，山西蔚州(河北蔚县)人。因他为官清正，康熙帝曾赐"清慎勤"等字。康熙十八年(1679)时，他官居刑部尚书。该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发生强烈地震。魏象枢立即入朝问安，康熙帝很受感动，单独召见。魏象枢请退左右人，奏劾大学士索额图、明珠各立私党，揽权贪纵，陷害异已等恶迹，言

词激烈,声泪俱下。同日,他还连上三疏,弹劾巡抚土克善溺职、刑部主事刘源违法乱纪,恳请严禁火耗、私派、勒索三大弊端。土、刘二臣受到严惩,一时百僚震摄,纲纪肃然。次日,康熙帝严厉谴责索额图等结党营私诸事,警告他们如果赃证俱实,国法具在,定加严惩。此后,索额图、明珠均获罪罢斥。

康熙帝不准言官风闻言事 言官系指清初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又称科道。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吏科给事中姚缔虞疏请仍许科道官风闻言事。康熙帝谕九卿:言事之臣"果能奉公无私,知之既确,言之当理,即当敷陈,何必名风闻方入告也"。二十九日,他又讲论科道衙门本章情弊,命各官谈对风闻言事的见解。康熙帝谕示说:风闻奏事系明末陋习,若此例一开,恐不肖言官借端挟利,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诬害良善。他明确表示:用人则随才器使,无求全责备之心。但如有大奸大贪之徒,参劾属实,法在必行,决不宽恕。今之诸臣,均能料理政务,然徇私利己者多,公忠为国者少。倘若诸臣都能公而忘私,和衷共济,忠于职守,何愁国家不能治平呢。

清军进取汉中、云贵 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二十八日,抚远大将军图海疏报:进取汉中,兵分四路,拟于九月八日出师。康熙帝谕示:各路捷报纷至,宜乘此时早复汉中,速定四川,直捣穷追,勿使敌寇占据险要。九日,他又谕示陕西诸将:吴军溃散动摇,急应尽快进兵,否则,万一有变,使其再据云、贵、川,后悔无及。十月二十二日,奋威将军王进宝率部攻下武关。二十七日,其部猛攻鸡头关,吴部大将王屏藩撤向广元,清军恢复汉中府,大军已达陕、川边界。逾月,图海部和陕西提督赵良栋分别克取甘肃阶州、徽州,兵进四川。康熙帝相信王进宝和赵良栋,命两军继续前进,攻取保宁。康熙十九年初,赵、王二部分别攻克绵竹、成都、保宁。二月,将军吴丹收复重庆,吴部文武官员献城投降,达州等州县均被恢复,四川平定。康熙帝又谕赵良栋进剿云贵,命镇南将军莽依图等军也自两广分道进取。三月,赵良栋疏言进军方略,请以湖广官兵取贵州,另兵四路分取云南。康熙帝从其言,命录其疏,发诸路将帅酌议,敕将军以下诸臣,进征云南,严禁官军抢掠。八月八日,定诸路清军挺进云南路线: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等由广西进,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彰泰等由沅州取贵州,勇略将军赵良栋和吴丹在攻克遵义后直取云南。吴部将领海潮龙率部至赵良栋军前投诚,愿为前驱。十一月,彰泰部在连克贵州诸府县后,直攻省城贵阳,吴世璠等统官兵于夜间逃走。安顺等府一一收复。至康熙二十年三月,贵州全省已定。同年正月彰泰、平南将军赖塔、绥远将军蔡毓荣诸部先后到达昆明附近。二十日,吴部将军胡国炳率一万余名马步军,在城外与清军激战,胡国炳被斩,吴军大败,逃入城内。四月,赖塔等挥军掘壕,围困昆明,吴世璠据城死守。康熙帝命振武将军佛尼勒与赵良栋两军,急速追剿援助昆明的吴军官兵。五月,清军收复失地益多,吴军来降将领和士兵日众,昆明势危。三藩之乱的最后平定已为期不远。

《芥子园画传》出版 《芥子园画传》通称《芥子园画谱》。因刻于清初著名戏剧家李渔别墅芥子园而得名。康熙十八年(1679),该书由王概编绘出版,初集五卷系木板彩色套印。内容为山水谱。此后,王概兄弟王蓍、王臬等人又编二集、三集于康熙四十年(1701)出版,内容分为兰、竹、梅、菊四谱,八卷;花卉草虫、花木禽鸟二谱,四卷。该书为中国画技法图谱,浅明易懂,所以广为流传。清嘉庆年间,该书第四集《人物画谱》刊成,四卷,附《图章会纂》。

施齐、施亥遇害 施齐,即施世泽,清靖海将军施琅长子。康熙十七年(1678),郑部总督诸军中提督刘国轩攻入海澄,施齐等因城陷被执。郑经久知其才,遂待之如宾,多方劝降,欲使清廷疑施琅,不再命他出任福建水师提督,以便扩大郑军攻占之地。施齐隐忍蓄谋,决心归清,并联络族兄施亥等多人,共谋举事。福建总督姚启圣一直力主施琅出师福建,同取台湾,但因施齐尚在郑部,未能如愿,故得知施齐意向后,遂于康熙十九年(1680)遣人密谕,里应外合。施齐、施亥得此密谕,立即派遣心腹人,向姚启圣陈述岛上诸种情势,欲擒郑经,图报清廷。但是,此谋为刘国轩侦破。他密启郑经,并于二月二十三日将施齐、施亥及其眷属七十三口全部处死,抛尸海中。姚启圣闻讯,立刻会同福建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等高级官员详尽调查此事,复"合疏密题",强调"此虽谋擒之功未遂,而郑经因之内变。"不久,清军内外夹攻,金、厦全收。施齐之举、姚启圣疏奏对施琅复职和康熙帝规取台湾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军直取福建沿海诸地 康熙十九年(1680)初,郑经水师集中于海坛。二月,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率官兵二万八千余名、战舰二百四十艘主攻海坛,福建巡抚吴兴祚、总督姚启圣、陆路提督杨捷分别负责声援、策应。二月二十三日,万正色等击沉郑军船舰十六只,歼其三千余人,海坛遂克。郑经知海坛既失,厦门难保。而郑部总兵吴桂、罗士铃等纷纷致书杨捷,详述厦门动摇之势,愿为前导,投诚报效。杨捷遂兵分三路,直取厦门。郑经本想调兵反攻,但是军

中久已无粮，而朱天贵又败于崇武，陈昌献海澄降清，刘国轩退回厦门。于是，郑经知势不可为，焚演武厅行营，率余众登舟返回澎湖。厦门总兵黄瑞面对清军强大攻势，率部投降。厦门遂于二月二十八日为清军所复，万正色率师入城。杨捷遂与姚启圣等合兵一处，乘胜克取金门、铜山。三月十四日，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等疏报，福建沿海诸岛均已为清军收复。

满洲人丁新垦荒田万顷 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初三日，户部郎中鄂齐理奉差往盛京，察勘满洲人丁新开荒地，事竣回奏，称东自抚 顺，西至山海关，南至盖州，北至开原，共计开荒一万余顷，可征收钱粮一万两。

招抚郑经 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初五日，康熙帝命侍郎温代前往福建，听取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万正色等官进取台湾意见。温代回奏，应如万正色所言，不可轻进。大学士明珠也不同意即刻进兵。于是，康熙帝谕兵部：暂停进取台湾、澎湖，令姚启圣、吴兴祚招抚郑经。

清廷讨论开“海禁” 康熙十九年(1680)，给事中李迥条奏船只出海贸易事。九卿詹事科道会议，请令各省地方官查覆再议。八月十六日，康熙帝听取大学士的见解，明珠上奏：福建除鸟船外，尚有其他船只，虽不甚大，也可出海。李霨上奏：船若太小，难于出海。冯溥上奏：出海贸易，对民生非常有利。康熙帝指出：开海禁之意，原为有利于穷民生计。如只准大船入海，恐百姓无力营造大船，应许以各听其便。十一月，福建总督姚启圣等又题请与开“海禁”相关的“还界”一事，认为若迁界则上可以增国赋，下可以遂民生，并可以收鱼盐之利。康熙二十年二月，清廷决定开海禁。

康熙帝认为崇尚清廉乃致治要务 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崇尚清节，乃国家为治要务。为官者皆清廉自守，则百姓自安。他强调说：清廉原不在贫富，谓富者必贪，而贫者必廉，并不正确。当视其居官之心如何。终康熙一朝，奖廉惩贪始终是康熙帝大力倡导并付诸实施的大事。

历算学家薛凤祚逝世 康熙十九年(1680)，著名历算学家薛凤祚因病去世，终年八十一岁。薛凤祚，字仪甫，山东淄川人，自幼喜学历算。顺治年间，他同波兰传教士穆尼阁讨论数学，始改从西学算法，同时，并不拘泥于穆氏之学。薛凤祚所学贯通中、西，被誉为一代历算学家的“功首。”著有《天学会道》、《算学会通正集》、《致用》、《西域表》、《今西法选要》多种著作，内容涉及天文、数学、医学、物理、水利、火器各方面。

郑经病逝 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十二日，郑经败回台湾，其母董太妃责备说：七府连败，两岛亦丧，皆由你无权略果断，不能任人。郑经无言以对。此后，他放纵酒色，生活腐化；情绪消沉，不理政务。同时，他还命以屯册甲数，征兵敛财。每十人抽一兵，十商民输一丁，折价银一百两。大臣为之侧目，百姓怨声载道。十一月，他因身体日差，令子、监国郑克𡒉决断一切事宜。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二十八日，郑经在台湾病逝，终年三十九岁。

郑克𡒉被杀与郑克塽即位 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郑经令长子、“监国世孙”郑克𡒉掌管台湾一切事宜。郑克𡒉秉性刚毅，有其祖父郑成功遗风，郑经宠臣、侍卫冯锡范等深感恐慌。郑经病逝后，冯锡范遂与郑经诸弟密谋，将郑克𡒉骗进内庭，说他非郑氏血脉，乃乳母抱养子，随即把他缢杀。冯锡范le畜谋立其婿、郑经次子郑克塽嗣位，于是，连名文武各官，请郑成功妻、董太妃早定嗣位以安民心。二月初一日，董太妃携年仅十一岁的郑克塽嗣延平王位，以郑聪为辅政公，领护卫，封冯锡范为忠诚伯，刘国轩为武平侯。自此，主幼国虚，郑氏大权集于冯锡范、刘国轩二人手中。

于成龙居官清廉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人(山西离石)康熙十九年(1680)，他升任直隶巡抚。莅任后，即严禁州县官私加火耗馈送上官，请免民间不合理赋税，赈济灾民，严惩贪吏，深得民心。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康熙帝召见，称他“清官第一”，并且，“历升巡抚，益励清操，自始至终，迄无改辙。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竣拒。所属人员并戚友间有馈送，一介不取”！还奖他御马、白银，赋诗以嘉其廉洁，勉励他贵在始终如一。不久，于成龙升江南江西总督。他一如既往，力改江南的奢华之风。自奉简陋，每天惟以粗米蔬菜自给，人称“于青菜。”经常微服私访，解决民间疾苦，百姓称为“于青天。”在任三年，卒于任所。因他居官以来从不带家属，故僚属敛其遗物，仅有几件破旧衣物。

吴世璠自杀身亡 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清军各路将帅以重兵围困昆明，吴世璠据而死守。康熙帝谕迅速攻城。十八日，攻取昆明的战役开始。是时，征南大将军赖塔进军银锭山，绥远将军蔡毓荣领兵夺取重关和太平桥，勇略将军赵良栋、征南将军穆占等挥军夺至皇阁，并克取东、西二寺。二十二日，清军再次集结兵力，猛攻昆明，赵良栋、蔡毓荣、建义将军林兴珠、征南大将军赖塔分别率部攻取得胜桥、大东门、草海和华浦。吴军将领余从龙等出城投降及而又受命入城招抚吴部余众。这期间，吴部将军线绒等

密谋，要生擒吴世璠及其心腹郭壮图降清。二十八日，吴世璠闻变自杀，郭壮图及其子也自刎而亡。二十九日，线绒、吴国柱等一些吴部将领开城迎降。清军入昆明城，立擒吴部大学士方光琛及其子侄，并于军前处以磔刑。戮吴世璠尸，传首京师。是役，吴部投降文武官员一千五百八十余人、士卒五千一百三十余名。至此，云南大捷，三藩乱平。康熙帝赋诗曰："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半到长安。""回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康熙帝命将吴三桂骸骨分发各省，吴世璠首级由刑部悬挂示众，其死党夏国相凌迟处死，巴养元等五人立斩枭示。余者视参加三藩之乱的情节分别处分。

朱方旦案发　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初九日，翰林院侍讲王鸿绪疏参湖广朱方旦以"邪教煽惑"民众。朱方旦，自号二眉道人，假托修炼术，广招弟子，私刻秘书，宣传孔子后二千二百余年而有他眉山夫子。当时，朱方旦之说流传很广，连平定吴三桂叛乱的宁南靖冠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和湖广巡抚张朝珍都相信，称"朱方旦果一奇异神人"，还赠他"至人里"、"圣人堂"、"圣教帝师"诸匾额。康熙帝览奏后，谕示应重加惩治。康熙二十一年二月，湖广巡抚王新命逮捕了朱方旦及其主要弟子，列朱方旦"诡立邪说"等罪名，立即斩首。其弟子顾齐宏、陆光旭、翟凤彩等处以斩监侯。

康熙帝亲自推广种痘　清初，天花病又名"出痘"，人人畏惧。康熙二十年(1681)，种痘法已自江南传到北方。医生朱纯嘏曾为皇子种痘，证明天花可以预防。康熙帝遂亲自提倡种痘法。他说：国初，人多畏出痘，待我知此法后，诸子女及大臣等子女均因种痘而得免此病。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蒙古俱命其种痘，是为良法，卓见成效。初种痘时，老年人视此为怪，我坚意推广，千万人因此而免除性命危险，这难道是偶然的事吗？康熙二十六年(1687)，俄国派专人到中国，学习种痘法和有关医学知识。

施、姚之争　康熙十七年(1678)以来，福建总督姚启圣一再力荐施琅，称他"廉勇优长，威名素著，深识水性"，甚至愿以全家百口担保，请授施琅重任福建水师提督，以便以施琅为先锋，同取台湾，相辅成功。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康熙帝授施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太保，谕以当与福建总督、巡抚等官同心协力，以清海疆，勿负委任至意。十月，施琅到任，即疏言理当独任进征台湾，姚启圣早有亲定台湾之志，因此深感失望，也疏请"宁愿战死海上，而断不肯回厦门苟且偷生。"又从战前准备、总督职责等方面具疏驳斥施琅。康熙二十一年(1682)，姚启圣患背疽日重，毫不惦念妻、子等人，惟以不得台湾为憾。同年八月，康熙帝斥责施琅，仍命施、姚同征。但是两月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大学士明珠等人均同意施琅专征，认为两人同征，则难免彼此掣肘。同时，施、姚在进征的时机等方面也确多分歧，容易使矛盾激化。十月初六日，康熙帝决定施琅根据时机，独自往征，命姚启圣等协助施琅，催运粮饷。姚启圣夙愿既失，仍以大局为重，昼夜督修战船，带头捐赠随征官兵俸饷，并将家中的银盘杯碗、金银首饰全部捐出。官兵见此情景，相视感叹，莫不涕零，各矢用命！但是，在施琅规取台湾前后，施琅、明珠及其他大臣对姚启圣时进微词，康熙帝误听谗信，对他屡加谴责。致使姚启圣蒙不白之冤，忧愤交加，病势日危，遂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悄然辞世，终年六十岁。

《平定三逆方略》始修　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十三日，康熙帝准大学士明珠等人奏，将平定三藩之乱的方略等详细始末，著成一书，"以垂永久"。于是，决定纂修《平定三逆方略》。十月十八日，以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黄机、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阿兰泰、达岱、张玉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牛纽为副总裁官。该书原写为《皇上平定三逆神武方略》，后定为《平定三逆方略》。

清廷纂修三朝《圣训》和重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十三日，康熙帝根据大学士明珠等人奉旨所奏，决定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圣训》。十月十八日，以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黄机、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席柱、王守才、翰 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为副总裁官。同日，重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以大学士勒德洪为监修总裁官，明珠等五人为总裁官，内阁学士萨海、喇布克、侍读学士胡简敬为副总裁官。

《太宗文皇帝实录》告成　康熙二十一年(1682)九月二十二日，《太宗文皇帝实录》告成。康熙帝御太和门，立视捧送《实录》进呈，升座。总裁官、副总裁官、纂修各官上表行进实录礼，诸王、贝勒、贝子、公率文武群臣行庆贺礼。

达赖五世圆寂　康熙二十一年(1682)，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逝世。明天启三年(1623)，他年仅六岁即被迎入拉萨哲蚌寺供养。二十五岁时，他与班禅四世遣人赴青海，密请厄鲁特蒙古固始汗带兵入藏，惩治对黄教进行摧残的教派和贵族，黄教与其寺院得以不断发展。后将西藏首府由日喀则迁往拉萨，兴建布达拉宫，工成，即迁入住锡。他还命喇嘛到盛京，向清太宗上书通好。顺治年间入京，受册封达赖喇嘛金册金印。晚年潜心研究经典，著书立

说，政事则交与第巴桑结嘉错主持。阿旺罗桑嘉错的名著有《相性新释》、《西藏王臣史》等。

康熙帝下令准备反击俄国入侵者 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月初八日，康熙帝在与大学士讨论了为反击俄国入侵者所作准备诸事后，下令勘察河道、修建船舰、进行试航、确定运送军粮的路线和地点。盛京刑部侍郎噶尔图回奏：可在吉林造船百艘，由伊屯门(吉林伊通)运粮至松花江，并在伊屯门、伊屯口(伊通河口)筑粮仓存贮。康熙帝又谕黑龙江将军、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六月以后所需粮饷，应在乌喇造船五十艘，驰往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由萨布素等顺流迎取。四月初四日，因清军已移驻黑龙江，命蒙古乌朱穆秦部发兵、索伦部准备军需物品，均声言捕鹿，以疑俄军。初八日，命宁古塔将军巴海留守乌喇，由萨布素等统兵前往。待七、八月间兵至雅克萨后，根据形势，奏明进兵时间，另派京城每旗五十名士卒前往，可于冬季进取。如冬季不便克取，到期再议别策。选上驷院马二千匹，发往索伦地方放牧，京城旗兵到此，可换马前进。七月初，由梅利尼克率领的俄国六十七名哥萨克兵，自雅克萨入侵中国额苏里地方，遭到清军包围，大部交械投降。七月二十九日，议政王大臣等议，赏俄军降者宜番、米海罗莫罗对二人衣帽，释放余者，由户部安置，并命宜番将理藩院书信带回。信中写道：俄方违背前约，既不将叛逃根特木尔送还，又侵我边境，扰害乃至焚劫我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所以，今命将出师，永驻额苏里。这样，清朝全面反击俄国入侵者的准备工作基本结束。

定任免从叛官员标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月初五日，康熙帝批准兵部题请任免从叛官员标准：各省副将以下从叛武官，投诚后，立有军功八次者留用。不及八次者议革，但如有效力军中、素有劳绩、才堪任用者，只要本省总督、提督保题，仍引见录用。

澎湖激战 康熙二十二年(1683)五月，据守在台湾、澎湖的郑氏，仍坚持不剃发登岸。康熙帝得报，催促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从速进取澎湖。施琅表示：利用南风进取，较为稳当；郑氏内部已人人思危，而守澎湖者是名将刘国轩，经澎湖一战，刘或死或败，郑部则势尽胆丧，台湾可不战而克；七日内，必克澎湖。六月十一日，施琅在铜山大会随征诸将。时值酷暑，台风甚盛，他动员部下：毋惮暑！兵法有云，出不意，攻无备。复聚米做地势，详细布署入港、泊船、进战诸方案。命大书主将姓名于各船风蓬上，以利赏罚。是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二万余名、战船三百余只，自铜山绕道澎湖南，全速前进。十五日，克取猫屿、花屿，晚，泊师澎湖。刘国轩亲领郑军二万余人、战船二百余只镇守；在澎湖沿岸，凡属可登处，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澳外以炮船列阵，岸上有大炮支援。郑军大炮船共二十余艘，每艘之上有三、四千斤红衣大炮一门，熕二十余门，铳一二百门不等。十六日，施琅指挥船队进攻，先锋蓝理等率七支战舰，直冲郑军水阵。刘国轩船队迎战。时南潮已发，郑军四面合围，施琅亲督帅舰，援救诸将，"流矢伤目，血溢于帕"。双方各有伤亡，施琅退兵，刘国轩也因军中缺粮而不追。自十七日至二十日，施琅将清军集结于澎湖罩屿，并为一举攻克澎湖做了充分准备。其间，他严申军令，赏罚分明；克取虎井、桶盘屿；亲驾小船，细查地势；命以"老弱骄兵"计，不断擂鼓，佯装登岸势，迫使守卫炮台郑军不敢助战，刘国轩兵势益孤。二十二日晨，施琅鼓动全军说："今日之行，期在必胜！"命兵分二路，各由五十支战舰组成。东路为奇兵，准备夹攻；西路为疑兵，牵制郑军。又命五十六支战船分为八股，每股七支，再分三层。另外八十支战船为后援。施琅居中督战，下令直冲郑军船阵。刘国轩倾全军抗拒。是役，炮火交加，声如雷吼，烟焰蔽日，咫尺难辨。清军将士奋勇争先，拼死交战，鏖战终日，大获全胜，攻取了澎湖列岛。以杨德为首五千余郑部官兵倒戈归降，余者全部被歼。刘国轩仅以大、小船三十一支败归台湾。清军水师总兵官朱天贵、游击郑邦试等三百二十九名将士阵亡，另有伤者一千八百余名。康熙帝称赞施琅"筹划周祥，调度有方"。命从优议叙、抚恤有功官兵。

刘国轩力主归清 刘国轩，字观光，福建长汀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与清军激战于澎湖，败归台湾。是月二十四日，他向郑克塽、冯锡范等讲述战败经过，群情汹汹。郑部将领何祐等人纷纷同清军秘密联系，请施琅速取台湾，愿为内应。郑克塽急会文武官员，讨论战守之策。部将黄良骥提出：取吕宋(今菲律宾之吕宋岛)为基业，撤离台湾。冯锡范支持此议，郑克塽急命准备。刘国轩认为：众志瓦解，守也实难，但财宝装船，远涉大洋，恐有不测；郑克塽年幼，其叔叔郑聪与冯锡范揽权纳贿，拒纳忠言，令其失望。是时，他心腹人自澎湖回，转达施琅话说，"吾不与为仇。若肯降，吾必保奏而封公侯。前此，各为其主，忠臣也，彼固无罪。"刘国轩很感动，反复思索，决计归清。闰六月初三日，他首倡其议。同月，郑克塽决定同清廷议抚。但冯锡范再三阻挠。刘国轩斥说："当此之际，尚切狐疑，倘一朝变起肖墙，将奈何？！"刘国轩遂调兵遣将，监护郑氏家族及其亲信。七月十五日，又遣胞弟刘国昌为副使，随同郑克塽冯锡范所派

之人，同副将曾蜚赴施琅军前，请求归清。刘国轩一面命红旗官加意巡查，稳定台湾局势；一面致书施琅，请他速赴台湾，以防事久生变。康熙二十三年(1684)，刘国轩单骑至京。三月初六日，官授直隶天津总兵官。四月初二日，康熙帝召见他时，称他素怀忠诚，首先归清，颇多赏赐。

赵吉士等纂修《会典》 赵吉士，字天羽，一字恒夫，安徽休宁人，后入籍杭州。康熙二十二年(1683)，任户部主事。是年六月二十日，康熙帝批准户部题请，命赵吉士和该部主事张琦于入会典馆，纂修《会典》。他后来又参加了《盐法》、《漕运》等书的纂修。

郑克塽投清 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福建总督姚启圣疏请对郑克塽颁敕招抚。是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敕谕中希望郑克 等诚心投归，率众登岸，他将从优录用、妥善安置。康熙帝还强调说决不失信于天下。同日，郑克塽派兵官冯锡珪、工官陈梦炜同侍卫吴启爵、笔帖式常在来到施琅军前，缴延平王册印、招讨大将军印及公侯伯将军都督印。八月十八日郑克塽率刘国轩、冯锡范等文武各官剃发，跪听宣读赦抚。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康熙帝命郑克塽来京，编入旗下。明朝后裔郑部及文武各官在直隶、河南等省安置。康熙二十三年(1685)十二月十三日，郑克塽等到京。康熙帝授郑克塽公爵，授刘国轩、冯锡范伯爵，俱隶上三旗。郑部文武各官二千余名及明宗室、鲁王世子朱桓等均于福建附近各省安置。郑军四万余名，愿入伍或愿归农，均听其自己选择。自郑成功兴师抗清，至郑克塽，奉南明永历为正朔，历三世，计三十七年；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并收复了台湾，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同大陆重归一统，凡二十三年。

施琅进入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初八日，郑克塽、刘国轩和冯锡范派副使何仕隆等人，携书致施琅，内称台湾兵民数十万，恐人心危疑不一，请速来安辑。此前，有人对施琅说：公与郑氏有三世之仇，今郑氏如笼中鸟，何不急灭之？施琅回答说："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啣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八月十一日，施琅统领官兵、船只，自澎湖赴台湾。十三日，到达台湾鹿耳门。郑克塽率刘国轩、冯锡范等文武官员已预先剃发，并预制清朝旗号，遂在鼓乐声中亲迎施琅及其官兵。台湾百姓也壶浆迎师，接踵而至。其后，施琅宣读康熙帝敕谕，郑克塽等欢呼踊跃。施琅礼待郑氏家族，不究宿怨。他还敬重刘国轩，并说：他人不明白，定要断送一方人民性命！惟君明智，保身全国。施琅还亲撰祭文，告祭郑成功庙。文中表达了他对郑成功开发台湾的敬仰之情。十九日，施琅为严肃军纪，分别颁布不准官兵占用民居和地方派办军资等具体规定，强调如有违反者，定加严惩。二十日，颁布《谕台湾安民生示》，希望百姓毋荒农务，照常贸易。规定本年纳谷十减其四，其他一切杂派差徭，尽行蠲免。台湾出现了"市肆不惊、耕耘如故"的稳定局面。康熙帝喜而赋诗："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加授施琅为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

清廷内部对台湾的"弃留之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十五日，清廷得到施琅《台湾就抚疏》，内称台湾土地千余里，户口数十万，或去或留，事关重大。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台湾弃守事，待郑克塽等率众登岸后，令侍郎苏拜与福建总督、巡抚、提督会同酌议具奏。十七日，姚启圣在《舆地既广、请立规模》一疏中分析了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形势，坚决主张"守不可迟"。姚启圣是当时提出台湾必留的第一人。此后，福建其他官员以为台湾"留恐无益，弃虞有害，"各议不一。有些京师大臣则主张"迁其人、弃其地"。内阁学士李光地甚至提出荷兰本无大志，故台湾即使为其所有，也听之任之，只要它纳贡通款，就是永逸长安之道。十二月，施琅至福州，同苏拜等议商台湾善后诸事，主留。二十二日，施琅上《恭陈台湾弃留疏》，痛陈弃台之弊。他详细分析了台湾地势、物产后指出：台湾"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为江浙闽粤四省"左护，"因此，弃留之际，至关重要。主张统辖台湾，巩固边防，维护统一，防止荷兰等国侵略。否则，如再让荷兰占领，实乃种祸！况且，台湾与澎湖互为犄角之势，放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海外，很难固守。总之，"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疆"。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大学士李蔚、王熙支持施琅疏言。康熙帝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他明确谕以"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至此，清廷对台"弃留之争"遂告结束。

吴兴祚请开广东海界 吴兴祚，字伯成，号留村，一作留邨，祖籍浙江山阴(浙江绍兴)。康熙二十一年(1682)，升任两广总督。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因清一统台湾，吴兴祚疏请开广东沿海边界，以广州等七府沿海土地，招民采捕耕种。康熙帝非常重视此议，谕示：今若展界，对沿海人民甚为有益。吴兴祚所奏极是，其浙闽等处也有此等事情。二十一日，他决定浙江、江南、福建、广东四省，每两省派一名大臣前往，就地定议开沿海边界事。二十八日，命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往广东、福建，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统雅思哈往江南、浙江，专责此事。十一月

十一日，康熙帝谕杜臻等：迁移百姓，甚为紧要，应查明原业，各还其主。可传谕该省督抚，务令妥善安置。吴兴祚深感此事关系广大百姓安危，遂殚心竭力，筹画周详，亲自和杜臻等巡查安置，兵民各得其所。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席柱等回京复命，查还广东民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顷，复业人口三万一千三百名。其它三省的展界复业也同时完成。十一月，清廷停止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地区海禁处分例，这与吴兴祚疏请有重要关系。

宜昌阿、金俊贪污案发　宜昌阿原任刑部侍郎，金俊曾任广东巡抚。二人同谋舞弊，侵吞兵饷及原平南亲王尚之信应抄没入官的财产，复接受尚之信属下商人沈上达的贿赂，畏惧告发，遂杀人灭口。宜昌阿等合计贪污白银八十九万两。康熙二十三年(1684)，刑部侍郎禅塔海奉命审理此案，他妄奏沈上达属自缢而死，表示如其系别情致死，愿受死罪。正月二十日，康熙帝谕：禅塔海若不惩治，则宜昌阿等贪官无所畏惧。命将禅塔海拘禁，与宜昌阿、金俊等人一并严加议处。五月十八日，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定宜昌阿等人罪，康熙帝严谕：外出大臣和各部院私作弊端，均起自笔帖式，情罪可恶，一并严惩。于是，宜昌阿、金俊郎中宋俄托、员外郎卓尔图、笔帖式伊色硕多礼及尚之璋等人处以斩监候，道员王永祚处绞监候，禅塔海革职。案内应追缴银两，交与户部，供拨充兵饷用。

定各省钱粮清查法　康熙帝亲政以来，各省总督、巡抚将库银挪为私用，时有发生。名曰补垫，实则多属蒙混销算，因此，户部无凭稽查，管理不清，百姓深受其害。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月初七日，康熙帝根据九卿遵旨议定的清查法，又作了补充修改，规定：一、奏销驳察，仍按现行例实行。二、各省驻防官兵，先尽本省所收粮草支给。如有不敷，照时价给发。有浮冒者，将该管官并该省督抚照例处分。三、以前办理军需浮冒者，由督抚清查明白，限一年内追完。四、各省兵马钱粮数目，由该省将军、督抚、提督等官印领结状，按季送部，以便查实，如有不符，照蒙混例处分。五、直隶等各省奏销钱粮，凡有驳查者，俱令具题完结，不得以咨文塞责。

京师正阳门外发生火灾　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月初十日，京师正阳门外大火，民居受灾严重。康熙帝亲登正阳门城楼，指挥救火。他先命内大臣、侍卫前去扑灭，后又数次派人巡视。发现该城及司坊巡捕营等官，并无一人在场，更无救火者，而都察院左都御史科尔坤等朝廷重臣待火势熄灭后方返回各自府中，于是在第二天，康熙帝对有关官员平日不加预防，遇灾又不急救的失职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设立台湾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十四日，康熙帝批准工部侍郎苏拜会同福建总督、巡抚、提督遵谕议定的管理台湾疏奏，决定：在台湾设立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设巡道一员分辖。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名，分为水陆八营防卫。澎湖则设副将一员、兵二千名，分为二营。每营各设游击、守备等官。自此，清代始在台湾置府设官。

《日讲易经解义》刻成　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二十三日，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等人进呈已刻成《日讲易经解义》。康熙帝称"易经阐发天人理数，道统攸开。""深有裨于典学。"命立即颁行全国。

始修《大清会典》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初四日，清廷始修《大清会典》。康熙帝命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麻尔图、阿哈达、金汝祥、王鸿绪、汤斌为副总裁官，并强调"务使文质适中，事理咸备，行诸今而无弊，传诸后而可征，悉心考订，克成一代之典。"同时，用以昭示臣民。

设专收海洋贸易税官　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初五日，康熙帝以海洋贸易，对民生实为有益，但收税如不定例，恐为商民所累，决定凡属海洋贸易，设专门官员收税，并酌定则例。此后，清廷在澳门、漳州、宁波和江南的台山设立海关，以为粤海、闽海、浙海和江海等四海贸易，并设官收税。

康熙帝首次南巡　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开始首次南巡。行前，谕称本次南巡，正欲体察民情，详知吏治。一应沿途所用已令在京所司储备，毫不取之民间。凡经过地方，百姓自当各安其业，毋得迁徙远避，反滋扰累。如哪个官员敢于悖旨私征，一经发觉，定从重治罪。是日，车离京城，沿永定河经顺天府、河间府，到山东德州。十月初八日，至济南府，观趵突泉。初十日，登泰山顶。十一日，祀泰山神，命以本年泰山香税，修缮泰山顶上庙宇。十五日，到达沂州大石桥，谕大学士等：今日奏章一到，立即呈进，不限时间。是夜四鼓，本章到，康熙帝随即起而详阅，直到天明。十九日，自徐州府宿迁启程，谕侍卫等："有天下者唯贵以德化民，使之无讼。"是日，驻桃源县，康熙帝亲自视察黄河北岸各项险要工程，又谕河道总督靳辅说：每在宫中，向来留心河务，并详细阅览、时加探讨尔防诸书及历年所进河图等，但毕竟未见险情实况。今详勘地势，如肖家渡等七处地区，实甚为危险，所筑长堤与逼水坝须随时保护。命靳辅详加筹划，采取有力措施，使黄河顺

势东下，水行刷沙，永无壅决。康熙帝见河工劳苦，亲加抚慰，命严禁克扣河工食粮。肯定靳辅治河之功。二十二日，在高邮等处，见百姓田庐多在水中，遂步行十余里视察水患，召见当地生员耆老，详询水灾原由，命总督王新命安排拯救事宜。二十四日，渡扬子江，因所乘船系当年战舰，有感于"安当思危，治不忘乱"。二十六日，行至苏州府，强调"去奢反朴，事事务本，庶几家给人足"。二十七日，夜坐舟中，与侍臣高士奇探讨古今兴亡。十一月二日，在南京谒明太祖陵，亲写祝文，遣官往祭。过明故宫，怅然良久，作《过金陵论》，其中写道：万历以后，政事渐废，宦官朋党交相构陷，赋敛日重而民心涣散，致使明 代未到三百年而亡。总结兴亡之鉴，应兢兢业业，日加儆惕！四日，嘉奖廉洁自励的江宁知府于成龙，谕总督王新命等："尔等大小有司，当洁己爱民，奉公守法。"是日，康熙帝于舟中读书又至夜半，侍讲高士奇劝请节劳。康熙帝说："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六日，舟泊江都县，谕以解决高邮等地民间田庐被淹水患，必须将入海故道浚治疏通。务期济民除患，纵用经费，在所不惜！十日，经清河县天妃闸，复登岸视察高家堰堤工，分析了它与洪泽湖等对治黄的重要作用，必须年年防护，不可轻视。十八日，到曲阜孔子庙，在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亲书"万世师表"，免曲阜县明年地丁钱粮。十二月九日，康熙帝由京师正阳门回宫。首次南巡共用六十天。康熙帝时年三十岁。

确查三藩投诚者安置情况　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初七日，康熙帝批准广西道御史钱珏疏言，命各省确查平定三藩之乱时投诚者的安置情况。钱珏题请务使他们各得其所。愿在他乡入籍者，写明作何生计；愿屯田者，编入保甲，官给牛种，拨给开垦田亩；愿为兵者，补入营伍。

雅克萨激战　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亲自巡行东北地区，视察防务，对于战前准备，命令照常进行。他虽然通过有关途径，希望和平解决俄军入侵的争端，但由于俄方的阻挠和破坏，终未奏效。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二十二日，清军兵临雅克萨城(今苏联阿尔巴津)下，康熙帝用满、蒙、俄三种文字照会俄方，严谴其种种罪行，要求他们从速撤离。然而，俄国侵略军恃巢穴坚固，蓄意顽抗。二十四日，俄国援军赶到。是日夜，清军将神威将军炮和火器安放军前，做好攻城准备。次日黎明，遂向雅克萨发起猛攻，俄国侵略军尸横遍野，陷入绝境，余众仍负隅抵抗。于是，副都统郎坦下令在城下三面积柴焚城。俄军头目托尔布津闻知，异常惊惧，请求投降。都统彭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遵照康熙帝谕示，将俄方所部官兵及其妇女、儿童"立视迁归。"这样，由满、汉、蒙、达斡尔等民族组成的清军，在边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一举攻克了被俄国侵略军占据了二十年之久的雅克萨城。是年，托尔布津获悉清军已撤离该城，遂立即率大批俄军重占，复在雅克萨的旧城废址上建立了新据点。康熙二十五年初，康熙帝决定待条件成熟，将其坚决消灭。是年五月二十八日，萨布素、郎坦两路进兵，逼近雅克萨，谕俄军速速投降，对于愿撤返俄军，为其指明路线。时俄军有八百二十六人据雅克萨，并备有十三门炮和较充足的军械、粮食，对清军的警告置之不理。六月初四日，清军以重炮攻城，复断其水源，掘堑围困。经过数次激战，俄国入侵者伤亡惨重，托尔布津丧命，余者束手待毙。九月二十五日，沙皇政府所派外务部衙门书吏魏牛高等人到达京师，乞撤雅克萨围，被迫同意清政府的主张，答应派遣使节，议定边界。至此，清军经过两次战役，取得了收复雅克萨的最后胜利。

八百名应试官交白卷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初一日，吏部题：八旗汉军官既与汉族官员一体升转，必须通晓文义。决定对现任汉军侍郎以下、有无品级笔帖式以上及候选、候补内外员缺官员进行考试。文义通者，仍留补用；不晓文义者，停其以文职用；无品级者即行罢斥。考试内容以作文、翻译二种并行，听其自选；地点定于太和门前，时间则在本月十八日。考试结果，交白卷者八百人。康熙帝令俱都解任，命其读书，待学成后考试补用。其中弓马娴熟者可于各旗中武职补用。次年四月初十日，康熙帝亲自考试各部院八旗汉军等官，内有去年交白卷官，亲定试题六道，各随其便，作满、汉一篇。结果交白卷官达二百六十九人。内阁学士常书对考试作弊官明知不举，蒙蔽行诈，被革职，降为三等侍办。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月十一日，康熙帝命凡部院衙门未经考试者、内外候补者、康熙二十五年(1686)考试时考五等及交白卷者，以及各项监生，俱在乾清门集中考试，并亲命二道试题。五月十四日，命引见本次考试中一、二等官员。

山西巡抚穆尔赛强索礼物案发　康熙二十四年(1685)九月十五日，监察御史钱珏弹劾山西巡抚穆尔赛不仅多加文水等县火耗，而且在嫁女时强索属官礼物。革职通判张谦勾结穆尔赛家人，借机妄诈属官财贿。康熙帝命将穆尔赛提至京师，严加审问。谕以"即今居官者，更有如穆尔赛贪污者乎?!如此文人，尚谓其不生事，嗣后九卿何可信用。"二十三日，因九卿会议穆尔赛强索礼物等事，再谕大学士等，斥责不据实具议，苟且草率，致使地方官员横行无忌。

强调“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嗣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十一月十四日，穆尔赛处以绞监候。

文学家纳兰性德病逝 康熙二十四年(1685)，纳兰性德因病去世，终年三十一岁。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他好读书，爱骑射，善长诗词。年二十二岁，考中进士，官至一等侍卫。著有《纳兰词》，很有影响。另有《通志堂集》、《湛园文稿》、《全唐诗选词韵正略》等。还与徐乾学编刻《通志堂经解》，一千八百余卷。

定八旗户下家人赎身例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定八旗户下家人赎身例。规定：凡八旗户下家人，如主念其数辈效力，自愿放为民；如主不能赡养，愿令具赎身为民，俱呈明本旗报部，转行地方官收入民籍，子孙各依该籍民人办理。倘有以他人名认买檀自出旗，或将子孙私入民籍者，照例治罪，仍归其主。

康熙帝严斥征剿苗民王腾龙 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月十九日，云贵总督蔡毓荣题报苗民王腾龙等聚众劫掠，应行征剿。对此，康熙帝谕大学士：苗民赋性朴实，如其生事，皆因地方官不据情抚恤，反而强行索取马匹、金银等物，诛求不已，遂生衅端！前此吴三桂时，因其对苗民不断勒派，也有此类事发生。二月二十三日，严斥蔡毓荣等云贵、四川、广西各官对苗民“不唯不善加抚绥，更尔恣意苛虐！”命九卿等会议立法，令这些官员痛改前非，对苗民推诚示信，遵其习俗，化导安辑，使其乐业。

纂修《一统志》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初五日，康熙帝命纂修《一统志》，以大学士勒德洪等七人为总裁官，原任左都御使徐元文、内阁学士徐乾学等六人为副总裁官，翰林院侍读彭孙遹等二十人为纂修官。命陈廷敬和徐乾学专理管务。《一统志》始于元代，分省记录全国的自然与社会风情，即总括各地方志。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二月，康熙帝准徐乾学请假省墓时，将《一统志》等书带归编辑。

遣官主持喀尔喀蒙古诸部会盟 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初一日，理藩院疏言：达赖喇嘛所遣噶尔丹西勒图，约于本年闰四月至喀尔喀墨尔根台吉处，应遣大臣莅盟。康熙帝命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四人前往。另遣员分赴右翼扎萨克图汗、额尔德尼济农盆楚克拉布坦、色冷阿海台吉、达尔玛希礼、遵义盆楚克台吉、额尔克济农、左翼土谢图汗哲布遵丹巴胡图克图、车臣汗、信顺厄尔克戴青、墨尔根济农诸处。复在敕谕中强调“中外一体，务使交相辑睦，共享升平”。并分析了左、右翼扎萨克之间的矛盾，希望通过阿喇尼和达赖喇嘛使者共同主持的喀尔喀蒙古诸部的会盟，尽释旧怨，照旧安居。是时，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死，其子噶尔旦台吉请袭父职。康熙帝允准，命阿喇尼就便往祭。

康熙帝赐宋代理学名儒匾额 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帝亲笔书写“学达性天”四字匾额，颁发宋代名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另以此匾颁给张栻、朱熹曾讲学的长沙岳麓书院。

严禁“淫词小说” 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十六日，刑科给事中刘楷请禁淫词小说，康熙帝谕示说：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遂令严行禁止。

调整全国总督建置 康熙二十六年(1687)三月初七日，康熙帝批准大学士等奏请，调整全国总督建置，合并浙江总督、福建总督为浙江福建总督，另有五个总督是江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不设总督，而设巡抚。

湖广巡抚张汧贪赃案发 康熙二十六年(1688)十二月二十一日，山西道御史陈柴芝弹劾湖广巡抚张汧，到任未久，作恶多端，凡所属地方，盐引、钱局、船埠等，无不搜刮勒索，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也按数派钱，吞为己有。康熙帝命将张汧革职，又命直隶巡抚于成龙、山西巡抚马齐、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开音布驰驿前往，将张汧捉拿审问。此案还涉及枝江县知县赵嘉星等贪赃枉法者。康熙帝谕大学士等：科道臣职在纠参，张汧如此贪婪，无人敢言。陈紫芝独能弹劾，甚为可嘉！命传谕吏部，即令内升，以示鼓励。

佟国纲请人满洲册籍 佟国纲，佟佳氏，康熙帝之舅。康熙二十七年(1688)四月初一日，佟国纲疏言：其族原系满洲，请改隶满洲旗下。户部议覆，应如所请。有旨允准，改入满洲册籍。但其同族在镶黄旗的一佐领、正蓝旗的十二佐领、镶红旗的三佐领，所有文武官员及监生壮丁，为数甚多，不便一并更改，仍留汉军旗下。

永行禁止妇女殉葬 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月初四日，就礼部题请旌表山西省烈妇荆氏事，康熙帝说：夫死而殉，日者数禁。今见京师和各省，殉葬者尚众。人命至为重大，而殉者令人恻然。夫寿夭者，只能如此，何为此而自殒妇身！轻生从死，反常之事。如因此而更加旌表，则殉死者益多，有何益处？此后，王以下乃至普通百姓，妇女从夫而死事，永行禁止。

夏逢龙聚兵起事 康熙二十七年(1688)，湖

广督抚议罢兵裁饷，消息传出，标兵群情激愤。五月二十二日，标兵夏逢龙，反对裁兵，在武昌聚众起事，其兵数千均为当年平定三藩之乱时进征云南劲卒。夏逢龙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下设总兵等文武官员，其势甚盛。湖广巡抚柯永升投井而死，布政使叶映榴自刎身亡，总兵许盛中箭败逃。夏逢龙率兵接连攻占嘉鱼、咸宁、武昌、蒲圻、汉阳诸县。六月初三日，康熙帝命都统瓦岱为振武将军，率兵征讨。六月初六日，命河南巡抚丁思孔为湖广巡抚，正黄旗都统巴浑德代替围剿兵变不利的荆州将军噶尔汉。七月初二日，夏逢龙部在应城一带被清军重创，退往德安。七月十五日，湖广提督徐治都大败夏军于鲤鱼潦，杀其将卒四千余人，俘获三百余人。十八日，清军收复汉阳，夏部在武昌文武官弁献城投降，夏逢龙逃至黄州府。二十日，夏部黄州总兵献城降清，夏逢龙被擒，磔斩军前。武昌、黄州诸府县相继恢复。是年，响应夏逢龙者有：江西南昌李美玉、袁大相等，宁都佃户也借此据寨抗租，号曰"佃兵，"不久即分别失败。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初二日，康熙帝决定第二次南巡。谕称：黄、运二河，至关民生。历年工程虽逐渐完善，但应修应塞等事议论不一，以致日心操劳。今再次南巡，躬历河道，兼欲览民情，考察吏治。沿途供应，均不准取自民间！另外，简化仪卫，不设卤薄，扈从者仅可三百余人。凡经过地方，百姓各安其业，严禁地方官及扈从人员借机滋扰。初八日启程，皇长子允禔偕行。初九日，至直隶文安县，谕严禁地方官派民修路。十四日，入山东后，百姓夹道欢迎。谕山东巡抚钱珏：问及连年收成尚好，百姓稍得各安生计，命将明年山东地丁正赋全免，速行晓谕，使偏僻地区尽快得知。此后，又免江南省历年各项积欠银二百二十余万两。二十三日，至宿迁县，康熙帝率领随从大臣及江南总督傅拉塔、河道总督王新命、漕运总督马世济等视察中河。他指着河图对诸臣说：既不能纸上谈兵，也不可因循旧说，必须深入研究地形水势，因时而变。中河现与黄河逼近，如黄堤溃决，将混二而一。因此，镇口闸、微山湖等处在水大时仍要开支河口。二十八日，舟过扬州，民间结彩欢迎。康熙帝担心如此有损物力，命前途诸郡县不准效仿。舟至吴江县，地方官以五百只画舫来迎，康熙帝拒之不乘。二月十一日抵杭州，民间有"建立碑亭，称颂德意"者，康熙帝谕以有损民力，命停止，并对所有请他多在杭州逗留大臣晓以利弊，概不准奏。二十六日到南京，王来熊献《炼丹养身秘书》一册，康熙帝谕示：凡炼丹修养长生及师巫自谓前知，皆妄言不足信，只可欺愚民，通经明理者断不为其所惑。是日，南京士民数万人各捧土产米果等物进献，传谕：取米一撮，即如全纳。复见湖中有装饰华美贡用船，再谕：将造饰物料全部拆卸，用于应用处。其间，他对于江南浮粮太重、纤夫劳苦、恤商除弊颇多关切，均发上谕加以解决。在途经绍兴府会稽山麓时，亲写祭文，致祭禹陵，行三跪九叩礼。令地方官修理禹陵，亲书"地平天成"匾额，作《禹陵颂》和序。谕总督等：务使浙江等地人民崇节俭，兴礼让。同时，江、浙又是人文萃集地，入学额数应酌量增加。又谕：除十恶与诏款所不赦及官员贪赃者不赦外，其余凡属已经过地的监禁人犯，自本年二月十一日以前定为死罪及其他罪行者，已结未结，俱准宽释。二十七日，康熙帝在南京观象台夜观星宿，向诸臣讲论天文学。三月初七日，康熙帝率从臣视察高家堰一带堤坝，强调如果挑浚通江口，必在淮水会合处修置板闸，发挥启闸闭闸作用，使黄淮均敌，可保无患。十九日，自天津入崇文门还宫。此次南巡历时七十一天，康熙帝年三十五岁。

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月初五日，俄国戈洛文使团派使者洛吉诺夫至京，向清廷议定中俄边界使团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致函，内容有请中国代表团前去会谈，双方人数均应相等，相会地点应在两国边界之间。清廷决定在尼布楚会谈，并于九日派官同洛吉诺夫同来人携答书先往。二十六日，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都统班达尔善和文达等代表离京赴尼布楚。行前，康熙帝谕以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如俄国使者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时戈洛文使团随带大批军队，康熙帝遂命随索额图陆路官兵为一千四百名，复命郎坦、萨布素等率水路官兵一千五百名前往，并通知戈洛文，说明原委，请其勿生疑虑。郎坦、萨布素、索额图、佟国纲等分别于六月十日和十五日到达尼布楚，因戈洛文未到，遂致函敦促。七月四日，戈洛文到尼布楚。五日，双方开始做会谈准备工作。八日，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此后，双方代表在会上会下多次交涉。由于戈洛文态度傲慢，出言无礼，并拒绝中方方案，谈判陷入僵局，被迫休会。十日始，转为会外谈判。俄方因得到中方翻译、专教士徐日升和张诚的暗中相助，谈判遂继续进行。本次谈判历时十四天，在中方做出重要让步的情况下，双方于二十三日达成协议，二十四日正式签约，即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文本为拉丁文，两国使臣交换了经过双方签名盖章的满文本、俄文本和拉丁文本。条约共六条，其中，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是最重要的部分。条约明确规定：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

河为两国国界。这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理江流域的广大土地为中国领土。此外,条约还包括对越界侵略和逃人的处理、中俄两国人民相互贸易和尽行拆毁俄方所筑雅克萨等内容。条约还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于石,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月五日,工部规定:在额尔古纳河口和格尔必齐河口分别立碑,二碑均高八尺、宽三尺一寸、厚八寸,正面刻满、蒙、汉文,背面刻俄、拉丁文。次年后,清廷正式立此界碑。《尼布楚条约》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它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张诚撰写日记 张诚(Jean-Francois Gorbillon),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派遣,与其他传教士一道来中国传教。到达中国后,努力学习满、汉文字。康熙二十八年,他与另一名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徐日升被清廷任命为中俄两国边界谈判中中方翻译,并被授为三品官。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濒于破裂时,张诚等向俄方代表晓以利弊,戈洛文等接受其议,同中方缔结了《尼布楚条约》。不久,张诚等传教士数次被召进宫,向康熙帝进讲几何学。他先后八次随康熙帝或其他大臣出行蒙古和东北地区。每次均写出了较为详细的日记,中文译为《张诚日记》,内含中俄边界谈判全过程、噶尔丹进犯喀尔喀蒙古、多伦会盟以及他同康熙帝的私人接触等。

洪升演戏招祸 《长生殿》一剧系清初戏曲作家洪升之作。洪升,字昉思,号稗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顺治二年(1645),从王士祯等名家学诗文。康熙时,为国子监监生。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皇贵妃佟佳氏病危时被册为皇后,旋逝,谥曰孝懿皇后。时值皇后丧葬期间,洪升约集演员等在私宅演出《长生殿》,违犯禁忌,为给事中黄六鸿等弹劾,遂以"大不敬"罪名入狱。后虽释放,但革去监生,在场观剧的好友和演员均遭迫害。当时人写诗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康熙四十三年(1704),洪升漫游江南,在吴兴醉酒,落水而死。洪升著有《四蝉娟》等剧、《稗畦集》等诗集。他与当时孔尚任有"南洪北孔"之称。

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纵子侄作恶害民案发 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江苏昆山人。康熙九年(1670),考中进士,授编修。此后,接连升至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与其弟徐元文、徐秉义皆为朝廷重臣,并称"昆山三徐。"任《明史》总裁官、《大清会典》和《一统志》副总裁官。在朝内结党营私,揽权纳贿,与大学士明珠相互倾轧;在家乡则强夺民产,草菅人命。康熙二十六年(1687),因湖广巡抚贪赃案,徐乾学属受贿之臣,遂自请罢斥,诏以原官、刑部尚书解任,仍领修书总裁事。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十四日,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疏劾徐乾学与大学士徐元文兄弟,放纵子侄、姻亲、家人等招摇纳贿,争利害民,并列其所行劣迹十五款。疏中还指出,江苏巡抚洪之杰对徐氏趋炎献媚,甚属溺职。据《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凡三十四件,内控徐乾学及其子侄等九件、徐元文四件、徐秉义二件、泛指徐氏者八件,此外还有工部尚书翁书元等要臣劣迹状,证明傅拉塔所劾是实。对此,康熙帝所下旨只是:所参本内各款,从宽免其审明。徐元文著休致回籍。后谕徐乾学,严斥,免降调,仍留任。是年冬,康熙帝准其请假,命携书归籍编纂,且降旨褒嘉,赐手书"光焰万丈"榜额。不久,傅拉塔再刻徐乾学嘱托苏州府贡监等请建生祠,仍纵其子侄交结洪之杰,为害益甚。康熙帝命夺洪之杰官,对徐乾学兄弟劣迹则置之不问!

康熙帝初征噶尔丹 康熙二十九年(1690),准噶尔部的噶尔丹为了尽快吞并喀尔喀蒙古,向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俄国首席代表戈洛文表示:愿将雅克萨城"让给",请求俄国派军与他"并肩作战,"矛头直指清中央政府。康熙帝早已看出噶尔丹"势力强横,妄自志大,""断不免窥视中原"。是年初,噶尔丹肆意掠夺喀尔喀蒙古,致使土谢图汗、车臣汗、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纷纷告急,并以乏食请赈。康熙帝命按人口发粮救济。五月,噶尔丹率兵三万,分为四营,渡乌尔伞河,拟袭昆都伦博硕克图等部,声言请兵俄国,并犯喀尔喀。康熙帝严谴其杀戮益甚、拆人妻女的行为,命他对喀尔喀"罢兵息战。"同时,接连调兵遣将,早布预防。六月,噶尔丹于乌尔伞大败清军,进入了距京师仅九百里的乌珠穆沁。二十二日,康熙帝大集文武官员,决定下诏亲征。二十九日,命康亲王杰书、恪慎郡王岳希率部屯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七月二日,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禔为副,出古北口;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札为副,出喜峰口;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努、喇克达、彭春、阿席坦、诺迈,护军统领苗齐纳、杨岱,前锋统领斑达尔沙、迈图等均参赞军务。佟国维、索额图、明珠先留京师,俟大将军至阴山,驰往会合。因大军即将出发,命都统以下察核军需器械,严申军纪。复命常宁率师会合福全大军。十四日,康熙帝启程,首次亲征噶尔丹。十八日,当他进驻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时开始患病。二十三日,巡兵至博洛和屯,仍在发烧,遂从群臣请,即日返回京师。前线战事由福全等主持。

乌兰布通激战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二十九日，噶尔丹率兵长驱直入，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内)屯驻。该地距京师仅七百里，情况紧急，京师戒严。噶尔丹驻扎在乌兰布通峰顶，其兵二万余人则在峰前泡子河的丛林沼泽地带布阵预防，且隔河高岸相拒，筑"驼城"，将众多的骆驼缚蹄卧地，背加箱垛，再蒙上湿毡，环列为垒；其栅隙之处，排列兵士，张弓放枪，兼施钩矛，防御坚固。是日，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率清军至此，设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隔河列阵，以火器为前列，遥攻其中坚之部。八月一日晨，清军分为左、右翼，设鹿角枪炮，徐徐前进。自午至傍晚，右翼内大臣佟国纲奋勇挥兵，冲向敌阵；发枪放炮，进击山下。噶尔丹军隔河以拒，横卧驼阵，为其屏障。佟国纲率军攻至泡子河，率先冲向敌阵，为噶尔丹军突发鸟枪击中，阵亡。但"驼城"已被清军摧毁，阵断为二。左翼内大臣佟国维率兵自山腰斩入，攻破噶尔丹营垒；右翼清军为泥淖所阻，折返原处安营。噶尔丹乘夜色昏黑，率余部逃走。同时，他计图缓兵，争取时间，遂于次日派伊拉古克三至福全军前，请给以土谢图汗、泽布尊丹巴，并说济隆呼图克图即来修好。三日，康熙帝命详为筹划，发兵堵剿，平其余党，一举歼灭。但福全却下令清军，暂停进击。康熙帝认为此役至关重要，怒其贻误战机，断不宽恕。四日，噶尔丹自乌兰布通北撤，沿途火焚草地，以阻追兵，进入刚阿脑儿。十五日，济隆等人携噶尔丹誓书至，表示不敢再犯喀尔喀。康熙帝敕谕"若再违誓言，妄行劫夺生事，朕厉兵秣马，现俱整备，必务穷讨，断不中止！"他知道噶尔丹为人狡诈，必须做好善后军务，以防万一有变。于是，自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全面布署撤军事宜。九月六日，康熙帝命额驸尚之隆等往迎佟国纲灵柩。七日，复派皇长子等迎，赐银五千两，祭四坛，谥忠勇。谕曰："每一思之，痛不能已！"亲书碑文，颇多褒扬。十月六日，命增兵大同、宣府、古北口、张家口等处，以防噶尔丹。十三日，命通知俄国在尼布楚长官，书称"尔国既与我已盟誓和好，当不会以兵援助噶尔丹。"二十七日，命福全率军撤回。十一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命出征诸王大臣在朝阳门外听勘。议政王大臣、郡王鄂扎等奏福全在乌兰布通之战中的种种过失。康熙帝下旨切责其大误军机，命福全、常宁罢议政，罚俸三年，撤去福全三佐领；雅布罚俸三年；佟国维、索额图、明珠等人俱罢议政，与阿密达、彭春等人各降四级留任；革职查努喀；叙录火器营左翼战功。

改京师巡捕三营归步军统领管理 康熙三十年(1691)二月一日，康熙帝谕大学士等：京师重地，人民商贾，四方云集。京城内外，统辖必有专责，消奸弥盗，商民才得安宁。今城内地方属步军统领管理，城外虽属巡捕三营，又属兵部督捕衙门管辖。内外责任各殊，互不相统，遇有盗案，反难缉查。嗣后，巡捕三营也令步军统领管辖。如此则京城内外一体巡察，责任既专，有利于除盗安民。十七日，九卿等遵旨议覆后，又将督捕、都察院、五城所管事宜俱交与步军统领管理。巡捕三营捕获的逃盗等犯，令该统领将人犯移送督捕、刑部完结。同时，换给"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印信。自此，始有"提督九门"之称。

满文《通鉴纲目》译成 康熙三十年(1691)三月二日，《通鉴纲目》译成满文。全书告竣，历时三年有余，即将付梓颁行。康熙帝作序说：自孔子因鲁史而著《春秋》，始有编年系月。司马光奉诏纂修《资治通鉴》，论者认为博而得其要，简而明于事。朱熹本之作《纲目》，纲为《春秋》，目做左氏，足以劝惩而昭法，是为典章之总汇、治道之权术。因此，朝夕阅读，反覆披览，手未释卷，用以研究前代君臣得失之原因，世运升降之始末，遂竟委穷源，详加讨论，已有数年。命译成满文呈览，并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务求畅通无遗，归于至当而后止。是书皆有关于治天下国家之务，"法戒昭然，永为金鉴"。

多伦诺尔会盟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因虑及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曾杀死扎萨克图汗沙喇，致使三部内战频繁，准噶尔部噶尔丹遂乘机东犯，喀尔喀被迫南迁，决定于四月间在上都河与额尔屯河间的多伦诺尔(元代上都地，在张家口和承德北)举行会盟阅兵仪式，并亲自主持会盟，抚绥安辑喀尔喀蒙古，使其尽释旧怨，彼此和好。四月十二日启行，三十日到达多伦诺尔，命尚书马齐等将喀尔喀蒙古诸汗、济农、台吉等列为九等，分别赐赏。五月一日，康熙帝设御帐殿，上三旗亲军居中，八旗中之二个前锋营、十个护军营、四个火器营，此十六营各环卫于外。应召前来的内蒙古四十九旗屯于御营外待命，并以五十里为界，命内外蒙古不得擅入。本日，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遵旨，上疏请罪。康熙帝看到他们归附之意已决，且率众前来，当晓以利弊，责其内相构怨。于是，以故扎萨克图汗弟策妄扎布袭汗号，车臣汗也留汗号。二日，命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朝见。传谕喀尔喀部众："今土谢图汗等将一切大过自行陈奏，当此大阅之时，若即惩以重罪，岂惟朕心不忍，尔等七旗，能无愧于心乎?!"故责其大过，原恕其情。是日，喀尔喀汗、台吉等三十五人朝见，行三跪九叩礼。复按次序入坐，奏乐，大宴。其间，命诸汗与大台吉进御前，康熙帝亲赐其酒，众

皆异常欢喜。三日，赏土谢图汗、车臣汗、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与扎萨克图汗等银各千两、缎各十五匹和多种物品，又赐济农、台吉等银物。本日，召此三汗等三十五人赐宴，让他们各陈所欲言，舒怀共语。复以策妄扎布年幼，赐以皇子所服衣帽等物。传谕喀尔喀汗、济农台吉等：今见尔等倾心感戴，不负屡赐粮草、牲畜和土地之恩，故将尔等与内蒙古四十九旗一例编设，统一名号。扎萨克图汗无辜被杀，该部人民困苦已极，深为可悯，命其亲弟策妄扎布为和硕亲王。土谢图汗长子噶尔旦台吉等七人封多罗郡王，车臣汗族叔、台吉车布登等二人封多罗贝勒，另封固山贝子、镇国公等多人。四日，康熙帝大阅八旗军容。八旗官兵各依次排列阵势，鸣角，齐发鸟枪，声震山谷。五日，亲阅喀尔喀蒙古营寨，将银、布赏其穷苦之民；命定北将军、都统瓦岱率官兵一千余名，前往土喇，探明噶尔丹近况；命原任尚书阿喇尼等编定喀尔喀蒙古各旗，分佐领，划清其游牧地。七日，命将叛附噶尔丹的内蒙古乌珠穆沁部台吉车根等五人斩首。本日，康熙帝起程回京，谕曰：昔秦代筑长城，而我朝则对喀尔喀施恩，使之为备，较长城更为坚固。十八日，抵达京城。经过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蒙古全部归附清朝。

吏部主事朱敦厚贪污案结　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三日，吏部主事朱敦厚贪污案结案。先是，革职县丞谭明命叩阍，指控朱敦厚任山东潍县知县时，擅自私派贪污赃银四万余两。前任山东巡抚钱珏经审俱实。但因朱敦厚与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有私交，遂请托徐乾学致函钱珏。此后，钱珏徇情舞弊，命布政使卫既齐销案。谭明命不服。又命山东巡抚佛伦勘审得实。是日，吏部会同三法司议覆奏：将朱敦厚处绞；今升顺天府尹之卫既齐，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徐乾学、钱珏并应革职；谭明命系大计时被参贪官，仍不叙用。康熙帝降旨：卫既齐免调用，余议皆准。

敕书达赖喇嘛　康熙三十年(1691)六月一日，康熙帝命教习藏文喇嘛丹巴色尔济，谕敕达赖喇嘛。其敕书略云：喀尔喀蒙古已照内蒙古四十九旗编队，给地安置。今已妥为安措，喇嘛闻知，必大欢喜。原扎萨克图汗属下人等，被掠散亡，有在尔处和他处者，喇嘛以普济生灵为本，必能查明，以归原主。再者，噶尔丹穷困已极，如果逃归尔处，作何措置，惟喇嘛裁之。噶尔丹立誓而去，倘再敢稍犯喀尔喀蒙古，“朕必发大兵，分路前进，务期剿灭！”九月十六日，西藏第巴桑结以达赖喇嘛名义遣使至京，疏言及见敕谕“始知噶尔丹不听训饬，是以至此”。康熙帝认为噶尔丹事，非达赖喇嘛本意，乃其使臣及其近侍人等贪利欺蒙所致，遂复敕谕，列举实例，严谴济隆等人。

查京仓储米　康熙三十年(1692)十二月一日，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治道以爱民为要，而利益民生，务在均沾实惠。虽屡蠲免地丁银两，然思交纳漕粮一项，百姓良苦，也欲特赐蠲征。此念已久，命查明京仓储米存余数。二日，大学士等奏：查明仓内现存储米为七百八十万石有奇，足供三年用。命将明年漕粮在江宁(南京)、京口、杭州、荆州等八旗兵驻防地各留十万石，存储以备；各省漕粮按省分府逐年轮免。四日，谕户部：除河南省明年漕粮已有免征旨外，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各省应纳漕粮，自康熙三十一年起，以次各免一年。

王夫之病逝　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初二日，王夫之在湘西草堂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四岁。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人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他自四岁起就在家从父兄受严格的封建教育，十四岁考入衡阳县学，二十五岁时考取湖广壬午科第五名举人。在明、清激烈的社会变动时期，他不应聘，不做官，刻苦自励，埋头著述，完成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著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增添了新的瑰宝。他的著作多达一百多种，四百余卷，其中，《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老子衍》、《庄子通》、《思向录》、《俟解》、《黄书》、《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至今仍在流传。王夫之是伟大的唯物论思想家。他认为，广阔无垠的宇宙充满着物质的“气”，这种气在“阴阳二体”的矛盾对立中不断地运动变化，使世界的万事万物经历着它的聚、散、成、毁。王夫之的辩证思想完整而深刻，他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动静就好象闭和开的关系一样，由开到闭和由闭到开都是运动。王夫之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人的思维器官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叫作性，而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王夫之把他的唯物论和辩征法运用到历史领域，认为历史是进化的，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今天超过昨天，将来胜过现在。人类的黄金时代不是在遥远的往古，而是在可予见的将来。

清政府赈济陕西灾荒　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初二日，康熙帝谕示大学士等人：去年陕西西安等处年谷不收，很少积贮，以致百姓困苦至极。今年丰欠尚未可知，陕西省府州县现存米谷数目应当察明，缮册报部，以备赈济。同年二月初三日，差往陕西赈济户部侍郎阿山、内阁学士德珠从西安返回，向康熙帝奏报有关情况。康熙帝问：“听说受灾百姓有流亡到襄阳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阿山回答：“百姓没

有流亡到襄阳的，听说有流亡到河南的。自赈济以后，人民安定，而且正月两次下雪，不致流散失所。”康熙帝听罢说道：“正月虽然下雪，二三月雨水不调，麦田情况不见得好转。百姓流亡到襄阳的非常多，你却不知道。”于是，康熙帝以阿山为人庸劣，赈济灾民不能尽心，汇报情况模棱两可，解除其侍郎职务，以郎中品级随旗办事。几天后，户部遵照康熙帝旨意，将襄阳、郧阳等处积贮米谷十五万石，选派贤能官员，给运输费用，运到陕西省潼关，再由陕西选派得力官员接收，运往西安等地。后因郧阳山路崎岖，难于运输，只运襄阳十万石粮食到陕西。此外，康熙帝还谕示户部，发银二十万两，用于赈济陕西灾荒。同年四月初十日，康熙帝又谕示户部，免去陕西受灾地区今年的土地税，再增加户部库银一百万两，赈济陕西受灾军民。十八日，康熙帝又谕示大学士等，派遣大臣前往陕西，会同该省督抚，赈济受灾百姓，务必使全体灾民均受益处。十月初四日，康熙帝再次谕示户部，陕西巡抚所属府、州、县、卫、所，康熙三十二年地丁银全部免征。

康熙帝论音乐和数学　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初四日，康熙帝在乾清门召大学士九卿等谈音乐、数学原理。他说：乐律声音高下，循环相生，复还本音，必须隔八。他命乐人取笛和瑟相继审音，至第八声仍还本音。康熙帝还说：圆径一尺围当(即圆周率)三尺一寸四分一厘有奇。朕观入线表中半径勾股法，极其精微，凡圆者可以方算，开方方法就从此出。随后，一一进行了验算，没有一处不相符。康熙帝还说：算数精密，即河道闸门流水，也可算出昼夜所流分数，方法是先量闸口宽窄，计算出一秒所流多少，积至一昼夜，所流的总量，就可以计算出来。康熙帝还命取出测日晷表，以笔画标，指出正午日影的位置，令各位大臣等候观看。到中午时，日影与画标果然合在一处。大臣们上奏说：臣等今日仰承圣训，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感到不胜欢庆。梅文鼎对历算学深有研究，一生著述八十余种。康熙帝对他的著作非常感兴趣，读后就产生好感，认为用力深，议论公平，还在书上做了亲笔批注。康熙帝也很重视学习，亲自组织了对修订历法的讨论，进行实际观测。

靳辅再任河道总督　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初一日，康熙帝重新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康熙帝对河工事务一向非常重视。正月二十六日，差往阅视河工的户部侍郎博际、兵部侍郎李光地、顺天府府丞余廷玺等人从河工返回，以治河事宜并图进呈。康熙帝详阅河图谕示：黄河缓流处可以设立滚水坝，急流处则不可设；应将钱粮实用于险工处，使其坚固，则可永保无虞。二月初一日，吏部议覆：山东巡抚佛伦上疏，该疏中说，原任运河同知陈良谟告河道总督王新命勒取库银；王新命题参陈良谟悬欠河库银两。据陈良谟供认，王新命共勒取库银六万七百两，请将王新命调赴省城质审，河道总督事务暂交漕运总督董讷署理。对此，康熙帝谕示大学士等：朕听政以来，以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日夜考虑，曾写下来悬挂在宫中柱子上。如果河务用人不当，漕运有误，关系非轻。董讷为人性刻，恐怕误事，靳辅熟练河务，又还未老，用他管理，近几年内可以放心无事。于是，靳辅重任河道总督。靳辅再任河道总督后，勤于政务，在康熙三十一年十月曾几次上疏，提出治理黄河的具体规划，希望朝廷一并重用过去曾与他共事的河工人员。这些，都得到了康熙帝的重视，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同年十一月，靳辅病逝于河道总督任上。康熙帝颁布旨意表示深为怀念，并赐谥号“文襄”，给以隆重礼葬。

理学家陆陇其病逝　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二十七日，著名理学家陆陇其病逝，终年六十二岁。陆陇其，原名龙其，后入京师补官职，因避讳改名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学者多称为当湖先生。陆陇其生于明朝末年，自幼随父在动乱的生活中苦读不辍。清朝建立后，陆陇其以伯父殉难，憎恶当朝，遂有隐居之意。由于为生活所迫，便以坐馆人家为生计。二十七岁时，应试补本邑弟子员。四十一岁时，考中进士，补江南嘉定知县。后因不逢迎取媚浙江巡抚慕天颜，被挟私迫害，落职还乡。从此，他专心致力于程朱之学。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于左都御史魏象枢推荐，他被补授直隶灵寿知县。任职期间，察保甲，行乡约，自身守约持俭，务以德化民，使治所内风气为之一变，被举荐为清廉官。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月，他奉命赈饥灵邑期间，亲自下发赈银，杜绝各种弊端，使百姓得沾实惠，吏胥不敢有所假冒。为此，被晋升为太常少卿。陆陇其是较有影响的理学思想家。其学专主程、朱，力诋陆、王，在当时成一家之言。他认为历史上的理学思想斗争主要是真假孔孟程朱之间的斗争，而孔孟程朱的学说是完美无缺的，因此立志为孔孟程朱学说正本清源。他不遗余力地攻击王阳明，否定刘宗周的“慎独”说，认为王阳明学说是立教之弊，应在批驳之列。陆陇其比较有影响的理学著作是《困勉录》、《松阳讲义》、《三鱼堂文集》等。

漠南蒙古设立五路驿站　康熙三十一年(1692)三月，内大臣阿尔迪、理藩院尚书班迪等人奉差前往漠南蒙古地方设立驿站。行前，康熙帝谕示：凡遇边外事务，都用蒙古马匹，不但甚累蒙古，且恐

事亦有误。今设立驿站，虽费用国帑，日后对蒙古地区将大有益处，也不致迟延误事，最为紧要。你们前往料理，务加详慎，要制定确然不易、可垂永久之策，筹划而行。阿尔迪等人到达漠南蒙古地区后，经过三个月的勘察，提出了安设台站的规划：喜峰口外设十五站，古北口外、独石口外均设六站，张家口外设八站，杀虎口外设十二站，每站设驿卒五十名，酌量给予驼马牛羊；驿站所在地的蒙古旗札萨克，除公事外，无权调用驿站设施。康熙帝考虑到同时设置五路驿站，会给漠南蒙古各部带来过重的负担，只批准设置两路，即从喜峰口至科尔沁，杀虎口至鄂尔多斯，并派刑部尚书图纳、内阁学士多林分别具体实施。康熙三十二年(1693)，清政府对另外三路做了具体安排：古北口至乌珠穆沁设立六站，由内阁学士安布禄、侍读学士席密图具体实施；独石口至蒿齐特设立六站，著工部侍郎图尔宸、侍读学士喇锡具体规划；张家口至归化城、四子部落设立八站，派吏部侍郎布彦图、侍读学士额赫礼具体执行。这样，清代漠南蒙古地区官设固定驿站遂初步完备。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政府对漠南蒙古五路驿站又作了程度不同的调整。

喀尔喀蒙古分为三路　康熙三十一年(1692)五月二十四日，理藩院题奏：喀尔喀蒙古既与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同列，请照四十九旗例，给与印信。将土谢图汗、车臣汗、亲王策妄扎卜三部落分为三路，土谢图汗为北路喀尔喀，车臣汗为东路喀尔喀，亲王策妄扎卜为西路喀尔喀。以土谢图汗管北路中军事，扎萨克墨尔根济农郡王古禄西希管北路左翼中军事，扎萨克信顺郡王善巴管北路右翼中军事，昆都苍博硕克图郡王滚布管北路中左军事，扎萨克贝勒西第希里管北路中右军事，扎萨克公苏泰伊尔登管北路中前军事，扎萨克公托铎额尔德民管北路中后军事，扎萨克公万舒克管北路左翼左军事，扎萨克台吉车木楚克纳木扎尔管北路右翼左军事，扎萨克台吉丹津额尔德尼管北路左翼右军事，扎萨克台吉班珠尔多尔济管北路右翼右军事，扎萨克达尔汉台吉巴郎管北路左翼前军事，扎萨克台吉卫征诺颜阿玉玺管北路右翼前军事，扎萨克台吉李塔尔管北路左翼后军事，扎萨克台吉萨木济忒管北路右翼后军事，扎萨克台吉墨尔根代青年陵管北路左翼下军事，扎萨克台吉土巴管北路右翼下军事。以车臣汗管东路中军事，扎萨克额尔德尼济农、郡王纳木扎尔管东路左翼中军事，扎萨克额尔克贝勒车布登管东路右翼中军事，扎萨克额尔德尼济农、贝子布达扎卜管东路中左军事，扎萨克伊尔登济农、贝子彭苏克管东路中右军事，扎萨克达赖济农、贝子阿南达管东路中前军事，扎萨克车臣济农、贝子车卜登管东路中后军事，扎萨克伊尔登济、贝子达里管东路中下军事，管理洪郭尔带青旗务公憨都管东路左翼前军事，扎萨克额尔德尼阿海台吉车林达什管东路左翼后军事，扎萨克额尔克台吉塞稜达什管东路右翼后军事。以亲王策妄扎卜管西路中军事，扎萨克郡王色冷阿海管西路左翼左军事，扎萨克额尔德尼济农、郡王彭楚克喇卜滩管西路右翼左军事，扎萨克察罕巴尔诺颜、贝子博贝管西路右翼右军事，扎萨克台吉额尔德尼哈滩巴图尔滚占管西路左翼前军事，扎萨克车臣台吉吴尔占管西路右翼前军事，扎萨克墨尔根济农、台吉索诺木伊思扎卜管西路左翼后军事，扎萨克台吉额尔德尼滚布管西路右翼后军事，俱授印信。康熙帝谕示：土谢图汗、车臣汗暂停给印，余如所奏。

清政府把喀尔喀蒙古分为三路，属部各从其分地管理军事，从而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各部的管理，巩固了北部边防。

顾祖禹病逝　康熙三十一年(1692)，著名的地理学家顾祖禹病逝，终年六十一岁。顾祖禹字瑞王，号景范，又称宛溪，江苏无锡人。明朝灭亡以后，隐居于常熟虞山，勤苦治学。曾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书成不列名，被荐不做官，专心致力于《读史方舆纪要》的写作。经过二十多年刻苦努力，采集正史、地志，旁及野史，参以山川考察，该书终于写就。《读史方舆纪要》具有浓厚的历史军事地理学特色，其核心在于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指出：战守攻取应以分析地理形势为基础，无论起事之地，还是立本之地，都须审天下大势而后定，否则就会败亡。该书历代州域形势部分，综述明朝以前各代州郡位置、形势，及其与用兵进退之策和成败的关系。各省方舆部分，按明末清初的政区分述十五省的府、州、县形势与沿革、区划，以及各处历代所发生的战争。这两部分形成历代地理形势、沿革、区划与战史浑然一体的独特风格，是全书的主体。舆图要览部分，是明代最完备的兵要图籍，由概况说明、图、表组成。概况说明总论天下大势，分论各省形势、山川险易、物产户口、边腹要地设防、兵员粮饷等情况；地图除一省一图外，另有总图、京师图、九边图说、河海漕运图等；表列有府州县、山川险要，卫、所、关城的沿革、方位、区划、财赋、丁差、民情。《读史方舆纪要》是顾祖禹倾毕生心血之作，是研究中国军事史、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重修曲阜孔庙落成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月初六日，重修山东曲阜孔庙落成，康熙帝派皇子允

祉、胤禛前往致祭。在《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中，康熙帝称颂孔子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正人心"，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灿然于世，与天地共终，实是先贤。还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巡省东方，曾到曲阜祭祀孔子。他登圣人之堂，观其车服礼器，金石弦歌，徘徊很久，不愿离去。看到孔庙多历年所，丹获改色，榱桷渐圮，于是决定动用内帑，派专人前往主持修缮工作。重修工程从康熙三十年(1691)夏天开始，康熙三十一年(1692)秋天基本完成。庙貌一新，观瞻以肃。曲阜孔庙平面呈长方形，总面积约三百二十七亩，周围环以高墙，配以角楼，前后九进院落，殿堂楼阁四百六十余间，门坊五十四座，两千多块碑碣。重要建筑有棂星门，圣时门，大中门，奎文阁，十三御亭碑，大成门，杏坛，大成殿，寝殿，圣迹殿，诗礼堂，孔子故宅，金丝堂，鲁壁等。主体建筑大成殿，取"集古圣先贤之大成"意。殿高二十四点八米，阔四十五点七八米，深二十四点八九米，重檐九脊，斗拱交错、金碧辉煌。四周雕龙檐柱二十八根，前檐巨形石柱雕刻双龙戏珠、海涛祥云等图案，精美绝伦。殿内供奉孔子及其弟子和儒家历代先贤塑像。奎文阁原名藏书楼，飞檐三层，斗拱四重，黄瓦朱甍，面阔七间，进深五间，高二十三点三五米。阁底砖砌平台，重立支柱，工艺奇巧，观瞻堂皇。

俄国使节到达北京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月十五日，俄国使者义杰斯一行到达北京，几天后，受到康熙皇帝亲自接见。义杰斯原系荷兰族大商人，他申请从俄国财政部予支三千卢布现金和价值相等的貂皮及其它兽皮，到中国经商，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命令他持沙皇的国书出使中国。俄国政府给义杰斯的训令内容包括：探明清政府对《尼布楚条约》和两国未定界的态度；向中国皇帝说明，关于两国在蒙古边境等地划界问题，俄国政府的态度；要求中国引渡居住在鄂嫩河畔的"俄国叛民"布里亚特人和温科特人，释放俄国被俘人员；探明中国各地商品行情，外国商人来华经商情况，以及俄国货物在中国的销售情况；要求清政府拨地供俄国建造一座东正教堂；"侦察"黑龙江流域的情况。义杰斯使节团在北京停留期间，曾受到清朝理藩院官员两次接见。理藩院就他提出的要求和其他有关事项答覆说：关于划分蒙古地区北部边境的中俄国界问题，中国方面要求俄方迅速来函定期择地会商划定该段国界；中国不能接受俄国提出的送回"叛离"俄境的温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的无理要求，至于俄国被俘人员愿意返国的，业已遣回；中国不同意俄国侨民在中国建立教堂；今后俄国派遣使臣来华，人员限二百人，如由边境统领派出则限五十人。当大学士等将俄国使节"进贡奏章"翻译进呈时，康熙帝说：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事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

康熙帝颁给西藏第巴金印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二月初二日，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后，康熙帝决定颁给西藏第巴金印。第巴或称第悉，是达赖喇嘛系统的总管人员。当时的第巴名桑结嘉错，传为达赖五世之子。康熙二十一年(1682)二月二十五日，达赖五世圆寂后，第巴·桑结嘉错为了维护他个人的权势地位，竟秘不发丧，并于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以达赖五世的名义，上疏康熙帝，请求赐给金印。该疏中称：现臣已年迈，政务大半由第巴主管，第巴也和我一样，仰体圣意，实心行事。既然第巴已主持主要政务，乞求皇上给印封之，以为兴宠。与此同时，第巴桑结嘉错也以个人名义上疏，表示愿交玉印，乞给以金印。当时，由于第巴桑结嘉错一直对清政府封锁消息，康熙帝多次派遣京师喇嘛到西藏去了解情况，这些喇嘛不是被第巴桑结嘉错制造的假象所欺骗，就是被贿赂所收买，因而清政府始终未能得到有关西藏一些情况的确切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认为颁给第巴金印事关重大，便命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后认为，达赖喇嘛自颁给册印受封以来，恭顺职贡有年，现以其身已老，政事皆由第巴主管，为第巴乞封，以求兴宠；且第巴也表示感戴皇上恩眷，诚心乞请金印，有鉴于此，应同意他们的请求。于是，康熙帝决定颁给第巴金印，印文是"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之印"，明确规定了第巴的权限只是弘扬宗教，而不是主管行政。同时，收回明朝所赐的阐化王玉印。

冒辟疆不应清试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二月，著名的明朝遗民诗人冒辟疆病逝，终年八十二岁。冒辟疆，名襄，江苏如皋人。其先世皆为显宦，祖父为知州，父亲以吏部郎出任会昌副使。他本人曾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副贡，授习理官。清朝建立后，他始终没有应试，一生为布衣。冒辟疆虽出身豪门，却自视清高，不以钻营名利为务，应试科场从不热心，对万贯家财也看作过眼云烟。顺治二年(1645)，他娶秦淮名妓董小宛为侧室，一时被人称为风流教主。不料董小宛于顺治八年(1651)病逝。他的诗文著作较多，有《水绘园诗文集》、《朴巢诗文集》、《先世前征录》以及品茶、古玩、植花等杂著。在清初众多的遗民诗人中，冒辟疆有一定地位。《影梅庵忆

语》是他为董小宛写的悼文，词采艳丽委婉，感情缠绵悱恻，叙事如行云流水，很为当时文学界称道。他的诗作没有什么阔大气势，却有着秀雅妍丽的特点，晚年由于屡受挫折，诗作也多沉郁气韵。他曾写有《和阮亭〈秋柳〉诗原韵》一首，内容是："南浦西风合断魂，数枝清影立朱门。可知春去浑无迹，忽地霜来渐有痕。家世凄凉灵武殿，腰肢憔悴莫愁村。曲中旧侣如相忆，急管哀筝与细论。红闺紫塞昼飞霜，顾影羞窥白玉塘。近日心情惟短笛，当年花絮已空箱。梦残舞榭还歌榭，泪落岐王与薛王。回首三春攀折苦，错教根植善和坊。"诗中既以岐王与薛王（唐睿宗四、五子）歌舞梦醒的史事暗示明朝灭亡，又流露出对往日富贵生活的眷恋，还寄喻了对妓女受人攀折之苦的同情，情感复杂，是冒辟疆诗作中的代表。

东正教北堂建立 康熙三十二年（1693），北京东正教北堂正式成立。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沙皇俄国一直力图通过东正教会在中国建立新据点。义杰斯使团就曾遵照彼得一世敕令，要求为俄商建造一所教堂，被清政府严词拒绝。当时，北京已有一批俄国东正教徒，他们是在雅克萨战争前后被清军俘虏、招降或主动投奔清朝的，大约有一百余人。清政府把他们编入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安置在镶黄旗驻地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受到和旗人同等的待遇，由清政府供给住房、衣食，发给年俸，允许与中国人通婚，并给予信仰自由。康熙三十二年，这些定居北京的俄国人把康熙帝赐给他们的一座庙宇，擅自改成东正教教堂。主持这个教堂的神父马・列昂节夫，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投诚、从雅克萨来到北京的。他利用清政府的优待，在俄国人的中国籍妻子及其亲属中发展教徒。为了活动方便，他极力模仿中国的生活习惯，甚至剃发留辫，乔装打扮成中国人。俄国东正教会和沙皇政府对马・列昂节夫在北京的活动十分重视。后来，托博尔斯克区主教伊格那提给马・列昂节夫送来教会证书，把他的小教堂正式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这个教堂当时俗称"罗刹庙"，后称俄罗斯北馆。这是沙俄在北京建立的第一个东正教堂。

著名工匠雷发达病逝 康熙三十二年（1693），杰出的建筑学家雷发达病逝，卒年七十五岁。雷发达是江西南康人，后来迁居南京。他自幼就喜爱木工技艺，努力学习绘制设计图样的技术，因而三十岁时已闻名于世。康熙初年他应召进京，参加修建皇宫的工程。由于他才艺超群，担任了工部"样式房"掌案，几十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了一套建筑设计的技术。雷发达病故后，其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先后六代从事"官式"建筑二百余年，参加过故宫、园林、陵寝等很多重大工程的设计和营造。特别是在建筑设计图样的革新创造和"烫样"的广泛应用方面，对建筑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雷家设计图样的独到之处有：依据具体条件，统盘规划，程序井然地进行设计；采用平面图与个体透视图有机结合的画法；按实际需要，采取不同比例绘制图样。在设计图样的基础上，雷家还广泛制做和应用"烫样"。烫样是根据实际建设筑构件，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缩制的模型，用硬纸板制做，墙身分片安装，屋顶用沥粉烫出瓦垄。这样做不但可以观看外部结构，而且可以随时拆卸观看内部安排情况。雷发达及其后世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著名的建筑专著《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工段营造录》奠定了基础。

于成龙被革职留任 康熙三十三年（1694）正月二十六日，河道总督于成龙因于河工事宜妄行陈奏，前后矛盾，被革职留任，带罪立功。先是本年正月十八日，康熙帝谕示大学士，指出：为臣者须行实事，不当沽取虚名。于成龙奏称豁免民夫，但河道工程浩繁，不用民夫怎能把事情办好？现在所设官员，多年以来料理工程并无违误处。康熙帝还亲自召见于成龙，问道：你以前说靳辅糜费钱粮，并未尽心修筑河工，现在是否还这样认识？于成龙回答：臣现在就是按照靳辅的办法行事。康熙帝追问：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把事情说明白，而偏要排陷他人？看来，你排陷他人容易，身任总河困难。康熙帝还指出于成龙对靳辅的指控，许多都不符合事实。这样，九卿在讨论给于成龙的处分时，建议革职枷责；康熙帝则以于成龙修河事未完，给以革职留任，带罪立功处分。

康熙帝巡视京畿地区 康熙三十三年（1694）二月十二日至三月初三日，康熙帝巡视京畿地区，先后到达凤河营、河西务、杨村、西沽、天津、王庆陀、信安镇、苑家口、赵北口、段村、李贤村等地，皇太子允礽、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祯随行。在西沽，康熙帝看到运河及浑河决口，百姓受灾，良田受淹，便命直录巡抚郭世隆、天津总兵官李振鼎，会同仓场侍郎常书，自通州至西沽、从西沽至霸州，巡查两边堤岸，将决口应修处勘查明白，立即修筑。在王庆陀，康熙帝谕示大学士等：通州仓米平价发粜，米价顿减，于百姓大有裨益；沿河一带州县已截留山东漕运，卖与百姓，只怕不肖地方官员，或增价卖给百姓，或卖给贩卖人，以致百姓不得实惠。为此，他命巡抚郭世隆派人不时巡察。在蔡家营，仓场侍郎常书奏报巡查河堤的有关情况说：查看运河堤工发现，自通州至西沽地

方，共冲决李家口等五处，应加修筑；白驹厂等五处，堤势危险，也应修理；桃花口、北龙潭口工程似可缓些时候。康熙帝听到这些情况后谕示：李家口等冲决五处，白驹厂等险堤五处，以及上桃花口等缓工二处，都关系到运河航道百姓的生活，不容忽视，应当加速修筑。对所需钱粮数目要做出计划，立即由直隶巡抚郭世隆组织人力实施，不要延误时间，以免影响运河两岸百姓的生计。五月二十日，康熙帝又对龙潭口等运河新堤工程进行了视察，五日后才返回皇宫。

康熙帝评论理学　康熙三十三年(1694)闰五月初七日，康熙帝和大学士等议论理学，并进行评述。他说：初四日那天，在丰泽园召试翰林官，出"理学真伪论"题目。这是许多书中都有的成语。熊赐履见此题大拂其意，应抬头之字竟不抬写，不应用的话也随便乱用。原任刑部尚书魏象枢，是讲道学的人。以前吴三桂叛乱时，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发兵，魏象枢说吴三桂乃乌合之众，何须发兵？过去舜诞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今不凡用兵，抚之自定。与索额图发生争论，造成隔阂。康熙十八年发生地震，魏象枢密奏，速杀大学士索额图，则于皇上无碍。我当时就对他说，凡事都是由我处理，与索额图有什么关系。难道讲理学的也这样挟仇怀恨吗？还有李光地、汤斌、熊赐履，都是讲理学的，但彼此也不相和。李光地曾给德格勒讲易经，李光地请假回籍，我把德格勒召进宫中讲易经。德格勒上奏说，李光地熟精兵务，他本人愿意当将军提督，皇上若将李光地授一武职，必能胜任。德格勒还上奏，说熊赐履所学甚劣，不是可用人。我想辨别他讲的话的真实性，就将德格勒、熊赐履等考试。汤斌见德格勒所作文章，不禁大笑，以至于手持的文章都掉地上了。汤斌向我解释说，德格勒文章不堪一看，臣一时不能忍笑，以致在皇上面前失去了仪态。而汤斌出宫后又向其他人说，我自有生以来没有象这次这样说谎的，实在是不得已而笑。这哪象理学家呢！人应以忠诚为本，怎么能在人君面前说一种话，退下在他人面前又说一种话？现在汤斌虽然死了，李光地、德格勒还在。此外，熊赐履所著道统一书，王鸿绪奏请刊刻、颁行学宫；高士奇也为该书作序，乞请将此书刊行。我看此书内不当的地方很多。大凡是好书，虽不刻自然流市，否则，虽刻也没有益处。道学家怎么能这样务虚名？我讲这些，不过是想表示，我只是以治天下国家之道存之于心里，用不着去和这些人的议论计较。

傅拉塔居官清廉　康熙三十三年(1694)闰五月，两江总督傅拉塔病逝于任所。康熙帝闻讯，谕示大学士：江南江西总督居官良善者，自于成龙以来，只有傅拉塔一人。傅拉塔和而不流，不畏权势，爱惜军民，甚属可嘉，要从优赐恤。傅拉塔是满洲镶黄旗人，姓伊尔根觉罗氏。康熙九年(1670)，由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康熙十七年(1678)，升任内阁侍读。康熙十九年(1680)，授山东道御史。康熙二十五年(1686)，授陕西布政使。康熙二十六年(1687)三月，升任左副都御史，七月，升任工部右侍郎，十一月，转左侍郎。康熙二十七年(1688)，授两江总督。傅拉塔任工部左侍郎期间，曾同礼部侍郎多奇往云南察审提督万正色与总兵王珍互讦事。到云南后，他注重调查研究，多方面听取不同情况，秉公办事，不怀私见。结果，万正色和王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在任职两江总督期间，赣县百姓控告知县刘瀚芳私征银米十余万，并有多种不法事情。布政使、按察使等人对此曲为庇护，不认真查处。傅拉塔了解情况后，立即弹劾布政使多弘安、按察使吴延贵，赣南道钟有德包庇所属贪赃枉法，不行查实，迁延时间，从轻定拟。结果，多弘安、吴延贵、钟有德均被罢官。在勘察广东巡抚江有良、巡盐太常寺少卿沙拜互讦问题时，傅拉塔认真调查，掌握了不少两人受赃不法问题。最后，江有良、沙拜都被革职。傅拉塔自任总督以来，廉洁自持，实心奉职，深得江南官弁士民拥戴。

徐乾学学问卓著　康熙三十三年(1694)七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命大学士等在翰林官员内推荐长于文章、学问卓著之人。大学士等推荐徐乾学文章、诗赋颇为优良。于是，康熙帝命召徐乾学前来京城，修纂三朝国史、典训、一统志、明史等书。不料，徐乾学已在同年四月病逝。康熙帝闻知，深表遗憾。徐乾学是江南昆山人，康熙九年(1670)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康熙十四年(1675)，充日讲起居经注。康熙二十一年(1682)，充明史总裁官。二十二年，迁翰林院侍讲。二十三年，迁侍讲学士。二十四年正月，康熙帝召试翰詹诸臣于保和殿，徐乾学列上等第一，被谕奖为学问优长，文章古雅。徐乾学奉命值南书房，擢内阁学士，充大清会典、一统志副总裁，教习庶吉士。康熙二十五年(1686)，授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康熙二十六年九月，擢左都御史。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充会试正考官，迁刑部尚书。康熙二十八年，徐乾学因卷入大学士明珠等人党争，以原官解任，修书总裁等项，照旧管理。十一月，因许三礼疏劾，徐乾学以年已六十，精神衰耗为词，上疏请求准假回籍，所编之书继续进行。康熙帝准其所请，并赐御书"光炎万丈"匾额。不久，因两江总督傅拉塔所劾，徐乾学被革职。徐乾学死时六十四岁。著有《澹园集》、《读礼通考》等书。遗疏进其所纂《一统志》，康熙帝命有司察收。

清政府扩大步军统领职权 康熙三十三年(1694),清政府决定步军统领增设令箭十二支,以备随时调遣及宣传号令用。这标志着步军统领的职权又有所扩大。步军统领总辖京师内城的治安,并提督九门事务,事关重大。从康熙朝中叶起,清政府逐步扩大了步军统领的职权,令其兼管外城。康熙帝曾说:京城内外统辖必有专责,令其稽察奸宄,消弭盗贼,商民才得以安绪。这样,原来属兵部督捕衙门管辖的城外巡捕三营,开始归步军统领管理,督捕、都察院、城所管事宜,也交与步军统领管理。步军统领职权进一步扩大,他全面负责京城内外治安保卫工作,所有旗、民人等,包括诸王在内,全在其严格控制之中。特别是皇帝出巡时,步军统领除派人跟随保卫以外,还在京城内外增加设防,加强巡逻,直到皇帝回京为止。步军统领之下不设副手,遇事可一人做主,且任期长,是皇帝身边最有实权的一个人物。康熙朝中叶以后清政府扩大步军统领职权,对康熙朝晚期诸皇子的夺嫡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隆科多从康熙五十年起担任此职,直至康熙帝去世。由于他是雍正帝的同党,在康熙帝病危之时,借助于他的力量,雍正帝才比较顺利地取得了帝位。同样,也正是因为雍正初年隆科多继续担任步军统领,雍正帝才比较顺利地巩固了帝位。

墨尔根地方设立学校 康熙三十四年(1695)二月初一日,礼部议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疏言,墨尔根地方(今黑龙江省嫩江市)两翼应各立学,设教官一员,新满洲诸佐领下每岁各选幼童一名,教习书义。康熙帝同意了这一奏请。黑龙江地区文化教育比较落后,萨布素早在宁古塔任职时,就优礼从关内流放至宁古塔的文士吴兆骞、杨越等人。这些人既授徒教书,又撰写诗文。《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黑龙江地区开始进入和平安定、开发经济的新时期,文化教育也得到了发展。萨布素疏请在墨尔根两翼各设一所学校,设立教官,每年从索伦、达斡尔佐领下各选幼童入学,念书识字,这是黑龙江地区建学立师之始。后来,清政府在齐齐哈尔和瑷珲等城,也相继设立学校,设师教学。萨布素姓富察氏,宁古塔(今吉林宁安县)人,隶满洲镶黄旗,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少年时勤奋好学,成年以后,被挑补披甲,在宁古塔城当兵。因他粗通文墨,喜读《三国演义》,勤于职守,富有韬略,被提拔为笔帖式(书手),以后又被提升为武职官。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萨布素被任命为墨龙江将军以后,他一面加强地方防御,屯田备兵,一面加强文化建设。墨尔根地方设立学校,反映了萨布素将军的远见卓识。正因为如此,萨布素被誉为康熙朝的"将军第一"。

太和殿重新修建 康熙三十四年(1695)二月二十五日,重修太和殿工程开始,至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告成,共用两年多时间。太和殿是清朝举行盛大庆典的场所,殿宇高大,气势宏伟。宫殿基高二丈,殿高十一丈,广十一间,纵深五间,建筑面积二千三百多平方米。大殿正脊两端的龙吻,高达三米,檐角上排列的小兽整整齐齐。太和殿不仅外观雄伟,殿内建筑亦十分壮丽。殿堂内开阔高大,七十二根大柱擎立其间。大殿中央,设有二米高的地平台,上设金漆雕龙宝座,宝座周围六根高大蟠龙金柱,每柱雕一巨龙,龙身缠绕全柱,柱下绘有海水江岸花纹。天花板正中,有一盘龙金凤藻井,倒垂着轩辕宝镜。太和殿前面,广场宽阔,占地约三万多平方米。重修太和殿工程的主持者是顺天府木匠梁九,当时已七十有余。整个大殿的外形轮廓,结构组合,全是梁九精心筹划。大殿梁枋檩柱,飞檐斗拱,部件数万,梁九为了准确施工,予先手制木殿一区,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过数尺许,而四阿重室,规模具备。梁九的技艺被人称为绝技。大殿工程所需材料采自全国各地。其中,楠木来自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地;石料来自房山;殿堂内铺设的金砖由江南官窑承烧。重修太和殿工程开始之日和告成之时,康熙帝均派遣官员告祭天地、宗庙和社稷。

李士桢治政有方 康熙三十四年(1695)三月,著名的封疆大吏李士桢病逝,终年七十七岁。他的主要著作《李大中丞政略》,记述了他一生的政绩。李士桢字毅可,山东昌邑人,满洲正白旗包衣。他原姓姜,世为昌邑大族,明末清初,被掳为清八旗军奴仆,后过继给正白旗佐领李西泉为子,即改姓李。顺治四年(1647),李士桢被授为长芦运判,开始了他长期的仕宦生涯。此后,他任过河东运副、两淮运司、江南安庆府知府、陕西延安府知府、广东按察司副使、山西阳和兵备道副使、山西布政司参政、河南按察使、福建布政使、浙江布政使、江西巡抚、广东巡抚等职。李士桢初任广东巡抚时,广东经过连接不断的兵燹扰攘,经济残破,民生凋敝。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他及时地颁布了《抚粤文告条约》十六条,受到了广东百姓的称赞。李士桢把整顿吏治当作第一要务。为澄清吏治,他以身作则,亲自批阅文书,绝不假借书吏,更不让衙役吏胥伸手取索。博罗知县董海、乐会知县张结禄利欲熏心,草菅人命,他便上疏弹劾,题请将他们革职逮问。在整饬吏治的同时,李士桢还注意调整官、兵、民三者的关系,禁止兵役扰民、营棍害民,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此外,李士桢

实行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对特别残破荒凉的地方，他奏请豁免这些县的征银，召集流散农民进行垦荒。对于当地最穷苦的“蛋民”，他给以一定程度的关怀，采取措施禁止防巡官兵需索，以保障他们的渔业生产。

山西平阳府发生地震 康熙三十四年(1695)四月初六日，山西平阳府地区发生地震，房舍倒塌，人民损伤。康熙帝收到山西巡抚噶尔图奏报后，立即派遣司官星驰前往，察勘情况。去过灾区的人回来报告说，灾区屋宇尽皆倾毁，人口多被伤毙，受灾甚重。二十九日，清政府决定，派遣户部尚书马齐驰驿前往灾区，进一步了解情况，察明被灾地方本年应征钱粮，停止征收；此外，对于压死的人，每口给银二两，对于无力修房的百姓，每户给银一两。五月初一日，马齐去灾区前，康熙帝谕示；你传谕巡抚噶尔图，平阳等处地震，房舍倒塌，人民死伤，他应当亲自在灾区设厂居住，救护受灾百姓，听候皇帝谕旨，不应当急急忙忙返回省城。另外，你到那里以后，要详察阅视灾情，要晓谕百姓，不可随意迁徙离散。还有，地震之后，恐怕地方坏人，以及镇标兵丁借端抢夺，扰害百姓，因此，应传谕总兵官周复兴，亲自率领官兵，将受灾地区妥为保护。对于受灾较重的平阳府洪洞县，康熙帝谕示马齐要和噶尔图亲身前往那里赈济，务使百姓均沾实惠。初四日，康熙帝又谕示大学士等，指出噶尔图身为地方大吏，赈济灾区不能尽职尽责，工作未完就急忙返回省城，应严察议处。于是，吏部经过讨论，准备将噶尔图革职，交刑部处理。康熙帝最后决定同意革职，免交刑部。六月十一日，马齐等回到京师，向康熙帝奏报，此次赈济山西平阳府地震灾民共用银十二万六千九百两，停征临汾、洪洞、浮山、襄陵四县，平阳一卫本年额赋。

清政府解决八旗生计 康熙三十四年(1695)五月，清政府有关司署经过调查，得知京师地区八旗兵丁无房舍者有七千余人，便在城外按各旗方位，每旗各造屋二千间，无屋兵丁，每名给两间，不许买卖，兵丁死后没收入官。自康熙朝中叶以后，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随着八旗内部贫富的分化，许多士兵陷入高利贷的罗网，月饷的一半以上要支付借款的利息，以至成年不得娶妻，死后没有葬地。至于八旗奴仆，绝大多数处境更苦。有一次，他们曾聚集四五千人在皇城里请愿，其中八个胆大的，还冲破了侍卫的阻拦，闯进了御花园的第一道门，险些造成暴动事件。康熙三十七年(1698)十一月，康熙帝曾对大学士说：现在满洲斗殴持刀杀人的事件屡有发生，可见习俗败薄，必使迁淳归厚才好。为了解决八旗生计，除为穷苦兵丁建造房屋外，清政府还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提高满洲甲兵的月饷；将余丁归并，成立新佐领，使闲散人可以披甲当差；解决亡故军士葬地及贫困兵士妻室、住房问题；凡遇灾荒，赈济贫民，八旗甲兵一律沾恩，而且比较优厚；增加出征补助；设立官库，代清旧债；对老年及出征伤残人员，给以临时补助；增派驻防，缓和京师地区八旗生计紧张状况；教导旗员，抵制奸商。康熙四十九年(1710)，某些八旗官兵将所支米不运家中，而是即行变卖，以图微利，清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决定以后户部计口支放，余者照时价给银。清政府采取上述措施，解决八旗生计暂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黄宗羲研究历史卓有建树 康熙三十四年(1695)七月三日，著名学者黄宗羲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六岁。死前，他嘱咐家人说：“我死后，即于次日安葬，就用平时穿的衣服入敛，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钱一概不用。”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他对传统世俗礼教进行了大胆的挑战。黄宗羲是杰出的思想家、著名的学者。一生著述六十多种，一千三百多卷，研究领域涉及经、史、子、集、天文、历算、地理各个方面，尤其在历史学方面，成就最高，影响最大。黄宗羲主张研究历史要通今致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以极大的心思精力，编写有关明代的史籍史料，以总结历史教训，启发人们的爱国思想，并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找出历史根据。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后来研究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康熙年间编写的《明史》，是一部史学价值较高的历史著作，其中就倾注和吸收了黄宗羲的研究成果。黄宗羲在史学方面更独特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编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善的学术思想史——《明儒学案》。这部著作将明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史，二百多名学者的哲学、政治思想、学术著作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排比归纳，分清了学术渊源和流派，并作出力求公允的评价，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黄宗羲以他的史学理论和实践，开创了清代浙东史学，培养了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一批有成就的史学家。

刘献廷治学有成就 康熙三十四年(1695)七月，著名学者刘献廷去世，年仅四十八岁。刘献廷，字君贤，又字继广，号广阳子，顺天府大兴(今北京市)人。他少年时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经常彻夜不眠，刻苦攻读。清朝修明史，他应邀参加编撰工作，不署衔，不受俸，不受馆职，只是客居徐元文家中。修史期间，刘献廷经常到京城外面游览，有时，几十天不归，归来即把所见所闻告诉同是修史者万斯同，万斯同

便拿书中记载进行核证。刘献廷治学提倡研究和了解现实。他认为：学者如果只知道过去而不了解现实，纵使博极群书，也只能算半个学者；当然，要了解现实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指出：清史馆许多人考古有余而不切实用。他还批评说：天下事没有不从格物致知入门的，而今读书学道的，都鲁莽灭裂从事，以致于忙碌终身一无所获。这种批评切中了当时学者治学的弊病。在修史期间，刘献廷经常与馆内友人讨论天地阴阳之变、古今兴亡之故、方舆要害、人才邪正以及兵法、文章、典制等，在许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一生治学广泛，对于律历、书教、音乐、理学、诗文、佛老、象纬、医药、法律、军事、农桑等均潜心研究。他主张结合西方先进技术改进中国传统历法；主张应当重视火器的使用和改进；主张不仅要注重疆域沿革及山川要塞的研究，尤其要注重河道变迁的研究，等等。刘献廷著有《新韵谱》、《广阳诗集》、《广阳杂记》等。

康熙帝制定军令十六条 康熙三十四年(1696)十二月十六日，为征讨噶尔丹，康熙帝谕示兵部，制定军令十六条予以颁布，主要内容是：大军出征，各部都统等官要检查武器装备，务期坚利，合乎规范，否则，视情节轻重罚银若干；启行后，兵众必须按队以次行进，不得零星散乱无秩序，违者鞭责示警；军行途中，不许离队、酗酒、喧哗、叫呼，不遵守者该管官即行捕责；所过地方不得扰害居民及蒙古部落，否则，从重治罪；凡军士逃跑，立刻缉拿，依定例治罪，该管官一并严处；下营务按旗列幕，不密不疏，如越旗乱次，前后搀杂，该管大臣官员分别治罪，兵役内有偷盗马匹器物者，按律治罪；发现敌人要立即飞报大营，若妄报不实，或传报迟误，有关官员立即正法，军前示众；严格值夜巡营纪律，无事人夜黑不得擅自行走，发现贪睡偷安现象，察出后严加治罪；与敌人接近，要加强侦察，稳妥布阵，井然有序，交战时所备援兵要及时出击；敌人败退后，严禁官兵掠夺牲畜财物，对贪行攫取者重惩不贷；敌军败退后，要立即派兵马追击，若遇伏兵，或敌军游骑，后队兵与敌接战，前队兵仍行追进；大军凯旋时，严禁售卖军器，或把军器留与蒙古人，违者从重治罪；驼马为全军重要军需物资，如有将遗失驼马隐匿、将疲乏驼马委弃、宰杀，要严加治罪；军粮关系至重，出征官兵要计口按日支领，不按名额领取从重治罪；大臣官员不得在大兵内抽取亲随；大军驻扎时，不得闲惰，要严格遵守各项军令。军令十六条的制定和颁布，为打败噶尔丹奠定了基础。

戴梓成为全国通用兵器专家 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军征讨噶尔丹，依靠戴梓所发明的子母炮，取得了战场上的重大胜利。从此，戴梓被人称为机械和火器专家。戴梓，字文开，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博学多能，通晓天文、历法、河渠、诗画、史籍等，对机械、兵器制造尤为精通。他出身于官吏之家，自幼勤奋好学，对于兵法战守诸器具，尤其用心研习。康熙年间在平定三藩之乱中，他被康亲王杰书派人礼聘，以布衣从军。戴梓从军后，充分利用自己在机械和兵器方面的杰出才能和精巧技艺，创造和仿制了一系列先进的机械工具和兵器，解决了不少实践中的难题。他曾利用滑轮原理、制造了一种运输机械，这种机械既减轻了体力消耗，又提高了劳动效率，相当方便。他还利用发条原理，创造了木机器人。在兵器方面，他所创造的连珠火炮形同琵琶，能连续射击，解决了旧式火铳用火绳点火，易受风雨潮湿影响的难题，同时也吸收了西洋火器能连续射击的优点，使用方便，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戴梓还奉康熙帝命制造了一种冲天炮，又名子母炮，长二尺一寸，重约三百斤，弹道弯曲。这种炮的炮弹大如瓜，用生铁铸成，弹中朝上留有空穴，可装火药。使用时，将炮弹装入炮膛后，再装火门烘药和定炮尺。火门烘药的用药量根据射程远近决定，炮尺目标也随目标远近而定。发射时，先点燃炮弹的炮捻，接着点燃火门烘药。炮弹出膛后，从天而下，片片碎裂；杀伤力极大。戴梓制造的许多兵器，后来都被列入《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成为工部依式定造的样板，全国通用。

叶尔羌人民暴动 康熙三十四年(1695)，叶尔羌人民在莎迪和卓领导下暴动，冲入王府，杀死了阿帕克和卓。阿帕克和卓，本名伊达耶图拉，阿帕克是他的别号。伊达耶图拉是清朝前期我国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的领袖，他作为伊斯兰教贵族势力，在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地区统治长达数十年之久。在他第一次统治期间，由于大肆屠杀自己的政敌与黑山派教徒，致使叶尔羌地区陷入极其混乱的局面。结果，叶尔羌等地的维吾尔各族人民，以黑山派为中心举行暴动，伊达耶图拉逃往中亚避难。康熙十八年(1679)，在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支持下，伊达耶图拉又被拥立为统治南疆的代理人。伊达耶图拉登上汗位后，自称阿帕克和卓(世界之主之意)，以叶尔羌为统治中心，命其子叶海雅执掌喀什噶尔政权，在南疆建立起了白山派和卓家族的统治体系。阿帕克和卓重新当政后，再次大肆屠杀和监禁黑山派及其他教派的伊斯兰教徒。很多人不堪忍受其残暴统治，被迫逃往中亚等地。阿帕克和卓在经济上也残酷地剥削各族人民，所实行的苛捐杂税达二十余

种之多。阿帕克和卓在南疆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了各族人民的不满，特别是他强迫数万民工，花费数万腾格白银，为自己修建豪华的陵墓，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康熙三十四年，黑山派领袖舒艾布的表侄莎迪和卓领导叶尔羌人民暴动，将阿帕克和卓杀死。不久，因阿帕克和卓之死，白山派统治集团陷入争权夺利的内讧，白山派在南疆的统治，遂为暴动群众所推翻。

《古文观止》刊行　康熙三十四年(1695)，吴楚材、吴调侯编、吴兴祚审定的《古文观止》一书刊行于世。吴楚材，吴调侯好读经史，同时又擅长写作八股文，他们为了给当时的学童和其他读书人编纂一本启蒙读物，便从上起先秦、下迄明朝的众多文章中，选遍了二百二十二篇古文，辑成《古文观止》一书。编者认为这些文章都是古文中的精华，所以便用吴公子季扎观赏乐舞《韶箾》时发出的赞词"观止矣"(好极了)来命名这部书。《古文观止》总计十二卷，吸收了宋代以来各种古文选本的优点，所选文章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许多是历来公认的佳作，比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文章。该书所选文章比较好地注意到了题材和文体风格的多样性，不仅有史传、论说文，而且有见闻札记、山水游记、杂文小品和其它应用文，基本上反映了古文绚丽多姿的面貌。此外，该书还破例选录了少量为历代传诵的著名的骈文和韵文。在编排上，该书以时代为序，眉目清楚。选文长短相间，繁简适中。每篇文章都有简要评注，见解精辟。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先秦诸子，如庄子、荀子、墨子、韩非都有许多精彩的作品，但本书编者囿于偏见，一篇也未选收。曹操的文章也被排斥在外。一些表现强烈民族气节的文章也未选入，这和清代实行文字狱不无关系。尽管如此，《古文观止》仍不失为一本好书，它对人们初步了解古文的内容，文体和风格，增长文史知识，认识古代社会，仍有一定的价值。

一征噶尔丹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三十日，康熙帝率中路兵启行，二次亲征噶尔丹。经沙河、南口、怀来，三月初十日出独石口。康熙帝谕示议政大臣等：出口以后，清晨启行，日中驻扎，每日一餐。十一日，户部侍郎思格色奉差在口外掘井，因不知一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被革职，充卒伍从军效力。康熙帝谕示：宿营时以井居中，派官兵看守，不得污坏，以便后队兵接替使用。十二日，康熙帝五鼓时即撤营起程，见军士还在营中或睡觉，或吃饭，经查才知行李到迟，影响了军士的歇息。此后，康熙帝每天都五鼓起床，亲自查看驮载出发后才启行，到驻营时，时间已近中午，行李已到，军士、马匹都可休息。十五日，康熙帝行军到达滚诺尔地方，雨雪交加，军士尚未安营。康熙帝穿雨衣站立路旁，等军士扎营完毕才进入行宫，军士都已炊饭才进膳。十七日，中路军两路会合，按次序前进。命照常日食两餐。十八日，康熙帝生日，停止庆贺筵宴。四月初四日，康熙帝抵达哈必尔汉，正值朝廷使者从噶尔丹处携奏章步行而回。议政大臣等议噶尔丹有逃走之意。康熙帝表示：若费扬古军按期抵达土喇，两路夹击，噶尔丹必不能逃脱。初十日，康熙帝率军至科图，时东路军未至，西路军又以士马困馁，请中路军缓行以待；途中又有俄国助兵噶尔丹的传闻。于是，扈从大臣中有人以噶尔丹已远逃为口实，力请康熙帝回师。康熙帝愤怒地说：此次进兵，筹画再三。我军既至此地，噶尔丹有可能被擒，怎么能懦怯退缩？十四日，康熙帝对黑龙江、盛京、宁古塔兵下达命令，屯扎索岳尔济山，以防噶尔丹东窜。十七日，因距敌已近，康熙帝谕令各营及哨口、斥堠、牧马处夜间不许张灯举火。五月初一日，康熙帝率军至拖陵布喇克地方，谕令随征总兵官岳升龙等：今已逼近噶尔丹，对敌交战时，副将以下有退怯违令者，正法奏闻。初三日，康熙帝指示作战军阵，内大臣长泰等按指示绘成阵图，命全军照图遵行。初七日，康熙帝率前锋兵在前，诸军依次张翼而进，驻于西巴尔台。入夜，康熙帝密谕各营空壁伏兵以待，并且亲自巡视营伍。当时，噶尔丹闻知康熙帝亲征之后，开始还不相信，说康熙汗不在中国安居逸乐，过此无水瀚海之地，难道是飞渡过来的吗？及至登北孟纳尔山，望见大军营地规模，御营黄幄龙幡，环以缦城，外为网城，军容极盛，才大惊失色，传令众人尽弃庐帐器械，连夜逃走。初八日，康熙帝知噶尔丹连夜遁逃，遂亲率前锋兵追赶，沿途获器械帐房等物不计其数。十二日，康熙帝至拖拉阿林，以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哈为平北大将军，率轻骑追剿噶尔丹，并往迎费扬古西路军。十三日，康熙帝率部班师，驻克勒河北。十四日，起程返京。途中，得知费扬古获昭莫多大捷，又进行必要部署。六月初九日，回到京师。

屈大均诗词写作有成就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五月，著名诗人屈大均病逝，终年六十七岁。屈大均，初随父改姓邵，名龙，字翁山，号非池、冷君等，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其父是一个自学成材的乡村医生，嗜书如命。在父亲影响下，大均勤奋好学，少有成绩。明朝灭亡后，他曾出家为僧十二年，这期间，写下了大量诗文。顺治年间，他北上游历，怀着反清复明思想，哭吊崇祯缢死处，寻访宫中遗事，吊袁崇焕废垒，沿途写下许

多深沉悲壮的诗篇。由于几次反清策划受挫，屈大均心情非常苦闷，又由于家贫母老，遂在康熙初年南归省母，同时弃僧返俗。此后，又曾游学陕西，途中亦多有诗词创作。屈大均一生写了大量诗词，分别收录在《道援堂集》、《翁山诗外》、《翁山诗略》等集中。他的诗词多写国家、民族兴亡的大事，充满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和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他自己曾说，他的诗颠倒日月，鼓舞风雷，神化其情，鬼变其状，神出于无声，鬼入于无臭。当时的人也称赞说，他的诗如万壑奔腾，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止，其中多藏蛟龙神怪，不象平湖浅水只有鱼虾。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他的诗是：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由于屈大均诗文有强烈的反清内容，所以，在他死后，诗集多次被销毁。尽管如此，他的著作还是流传下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昭莫多清军大捷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五月，清军在昭莫多击败漠西蒙古噶尔丹主力，获得大捷。康熙三十四年(1695)十一月，康熙帝确知噶尔丹在土拉河与克鲁伦河流域活动后，决定兵分三路前往进剿。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西路军在费扬古率领下向昭莫多进发。不久，哨探报告：在特勒尔济口发现噶尔丹军队踪迹。费扬古立即命令署前锋统领硕代、副都统阿南达、阿迪等率前锋迎敌，且射且退，将噶尔丹军引诱到昭莫多附近大军阵地。费扬古令孙思克率绿旗官兵居中，其他汉军官兵、蒙古官兵、满洲官兵屯居东方山高处，右卫满洲汉军官兵等在西方沿河布阵。全军严阵以待。噶尔丹率万余人进入阵地后，费扬古立即遵照康熙帝予授之策，命令官兵步行奋击。自下午一时战至下午六时，难分胜负。费扬古遥望噶尔丹后阵不动，知道是妇女、辎重所在，便组织精骑绕至敌后方，进行突然袭击。瞬时，噶尔丹军营大乱。清军乘机上马冲击，乘夜往北追赶三十余里，至特勒尔济山口，斩首三千余级，杀噶尔丹妻阿奴，生擒数百人，俘获子女、驼马、牛羊、器物甚多，其中仅牛羊即达二十余万头。只噶尔丹率数骑先众而逃。被打散的噶尔丹士卒投降大将军马思哈的有千余人。五月十八日，康熙帝闻报大喜，降旨嘉奖，从优议叙，并决定班师，留费扬古驻守科图。七月，康熙帝又令费扬古移驻喀尔喀郡王善巴游牧地，招降噶尔丹及其残部。昭莫多之战全歼了噶尔丹主力，给噶尔丹以致命打击，对稳定北方局势有重要意义。

康熙帝遣使往藏　康熙三十五年(1696)八月十一日，康熙帝派遣理藩院主事保住、大喇嘛晋巴扎木素、德木齐索诺木布等人前往西藏，往谕达赖喇嘛、达赖汗、班禅、第巴及策妄阿拉布坦，贬恶扬善，揭露第巴盗用达赖喇嘛名义，纵容噶尔丹及对抗清政府的罪行。康熙帝在给第巴的敕谕中写道：朕崇道法而爱众生，所以，对实心以护道法的人给以眷佑，对阴谋诱人以坏道法的人给以谴责。你第巴原系达赖喇嘛下面管事人，因你不违背达赖喇嘛指示，辅助道法，所以朕才对你加封。现在看来，你阳奉宗喀巴之教，实际上却与噶尔丹狼狈为奸，欺骗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而败坏宗喀巴之教。先是，你以久故达赖喇嘛诈称尚存，派遣济龙胡土克图前往噶尔丹所在地乌兰布通，为噶尔丹诵经，选择交战日期；噶尔丹失败之后，又以讲和为词，贻误我军追赶，致使噶尔丹得以远遁。朕为众生遣人往召班禅胡图克图，你又诳骗班禅，说什么噶尔丹将要杀害，不使他来京师。青海博硕克图济农私下与噶尔丹结姻往来通使，你又不举发；实际上，如果没有你，博硕克图济农与噶尔丹之间不会相与联姻。噶尔丹相信了你唆诱的话，才不遵朕旨。现在西藏许多喇嘛都告诉我说，达赖喇嘛已圆寂九年。对此，你竟敢匿而不报丧，并支持噶尔丹兴兵对抗朝廷，罪恶甚大。何去何从，近期内速来奏报，否则，后悔无及。康熙帝遣使往藏，以及对第巴桑结嘉错罪行的揭露，迅速改变了西藏的局势，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二征噶尔丹　康熙三十五年(1696)九月十九日，康熙帝统兵启程，三次亲征噶尔丹。二十七日，喀尔喀贝勒根敦戴青遣员进贡请安，表示愿擒噶尔丹自效，康熙帝谕示：如擒噶尔丹，不必献俘，即在本处立决。十月初一日，康熙帝率军至鄂罗音布拉克，以费扬古兵士劳苦，遣官携银五千两至军前，酌买皮裘、牛羊给与兵士。初七日，康熙帝谕示，将昭莫多战役中所擒准噶尔男妇三千余人赐银赎出，使其父子、夫妻、兄弟完聚。十三日，康熙帝至归化城。十八日，为防噶尔丹流窜哈密，康熙帝命孙思克率甘州兵，博霁率西安兵进驻肃州，与副都统阿南会合，噶尔丹如来哈密，即行剿灭。二十日，得降人报，噶尔丹已于上月二十二日从枯伦贝尔齐尔向哈密方向行进，康熙帝表示，当乘此机会作速剿灭。二十六日，康熙帝离归化进至达尔汉拜尚地方，派官员招抚噶尔丹属下丹津阿拉布坦、丹津鄂木布。二十八日，康熙帝率军抵黄河边湖滩河溯地方。十一月初四日，准噶尔降人称，噶尔丹现存千余人，食用困乏，天时寒冷，溃散逃亡及冻饿而死者非常多。这期间，噶尔丹部下来降者极多。二十一日，康熙帝渡黄河经察汗布拉克至哲固斯台，并召费扬古驰驿前来商议军情。二十五日，康熙帝至东斯垓地方，召见准噶尔降人格垒沽英，派遣

他返回准噶尔，并命员外郎博什希等携敕同往，招抚噶尔丹。二十七日，康熙帝传令班师。十二月初七日，回师抵杀虎口，十二日抵达大同城内，二十日返回京城。

殷化行勇立战功 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征讨噶尔丹的作战中，殷化行以勇猛机智荣立战功。殷化行，字熙如，陕西咸阳人。他在疆场上战斗了大半生，是康熙年间著名的将领。康熙三十五年，为了对西北用兵，殷化行调任宁夏总兵。他日夜加紧练兵，赶制子母炮，又大量筹集驼马粮食，以及防雨、防寒物品及药品。这年二月，大军出发，殷化行率本部兵马出西路。由于清军没有估计到要深入塞外截击噶尔丹军，所带给养严重不足，又风雨连绵数昼夜，军士饥寒交迫。结果，经过七十多天的行军作战，西路清军处境非常困难。但是，由于殷化行战前准备充分，人有余粮，马有余力，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在昭莫多激战中，殷化行所部奉命抢占一座小山头。当准噶尔军冲到半山腰时，化行率军居高临下，以炮轰击，迫使准军停止了进攻，为清军展开强大攻势创造了条件。在双方激战难解难分时，他又派人告诉大将军费扬古：川中兵应当从柳林中冲出进攻敌人侧翼，敌人阵势必乱；派遣一支军马往南，出其不意进攻敌人后卫部队，敌人必定回护，乘势给敌人以有力打击。这些意见都及时被费扬古接受，清军渐渐取得了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殷化行实行前后夹击，指挥士兵擂鼓呐喊，从山上冲下，准噶尔军立时大乱，溃不成军。殷化行独自率军乘胜向北追击了三十多里。昭莫多之战中殷化行立了大功，被费扬古多次称赞，认为有了他是国家的福气。

颜元主持漳南书院 康熙三十五年(1696)，著名学者颜元开始主持漳南书院。颜元，字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县人。他八岁跟随僧人吴持明学习骑射剑戟及攻守兵法，后来又学习八股文，应考县试，曾说："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从二十三岁起，颜元开始办学塾教授子弟；与此同时，潜心学问，专攻理学，孜孜不倦，终于成为清代前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颜元主持漳南书院工作时，已经六十二岁。他认为讲学应该广博，注意实践。他大胆提议改建漳南书院格局，建正厅三间，名为"习讲堂"。讲授武备，学习黄帝、太公及孙吴诸子兵法、攻守营阵、陆水战法并射御技击；讲授经史，学习十三经、历代诰制、章奏、诗文；讲授艺能，学习水学、火学、工学、象数。为了应付时制，还另设二科，一是静坐科，主要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另一为帖括科，学习八股举业时艺。这两科均不是主科。颜元还在习讲堂正厅大书楹联一幅："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颜元提倡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在当时具有新意；漳南书院的改制，在颜元一生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颜元主持漳南书院仅半年时间。同年八月中旬，漳水漫堤，发生水灾，漳南一带全部淹没，书院也荡然无存。由于资财有限，无力再举，颜元不得不怅然返家。他以教育振兴民族的理想遂未能实现。

三征噶尔丹 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初六日，康熙帝又一次往征噶尔丹，启行率军往宁夏。十一日，抵达宣化府；十九日，出边，谕示山、陕、甘三省巡抚；一切御用所需，均由内廷措办，不得烦民；所过地方多行结队太扰累百姓，今后一律禁止。三月初四日，康熙帝至神木县。噶尔丹子塞卜腾巴尔珠解到，问话时战栗不能对，遂遣送京城，命皇太子传谕诸王大臣、八旗官兵、民人等阅视，交理藩院拘禁。十九日，康熙帝至定边，准许蒙古人在定边、花马池、平罗城三处就近贸易，许汉人与蒙古人在边外一同耕种，各自约束，勿致争斗。二十六日，康熙帝抵达宁夏。闰三月初九日，康熙帝召川陕总督以下文武官员，对他们说：巡行至此，见沿边地方土瘠民贫，但兵丁非常精锐。对兵丁应善于抚绥，他们应得的钱粮要如数发给。闻听近来营中虚报兵数，冒领钱粮，陕西尤其厉害。你们官员都有俸禄，衣食不缺，如果克扣虚冒，就是犯罪。因噶尔丹困迫已极，不必动用大兵征讨，这一天，康熙帝便命昭武将军马思哈选精兵二千进击。十一日，康熙帝又命孙思克、博霁两部暂驻甘州，由阿南达及提督李林隆率兵二千前往搜剿。十三日，噶尔丹败死。十五日，康熙帝离宁夏往白塔，经双河堡至黄河西岸，四月初一日抵狼居胥山。十八日，康熙帝在给宫中总管太监的谕旨中表示：这次率师亲征，除剿灭噶尔丹外，也是为了收服边外厄鲁特蒙古各部落，以为万年之计。四月初七日，康熙帝班师，于黄河西岸登舟启行，经伯都纳、济特库，二十五日登舟陆行。在回师途中，康熙帝作《凯旋言怀》诗，诗中写道："黄舆奠四极，海外皆来臣。眷言漠北地，茕茕皆吾人。六载不止息，三度勤征轮。边坼自此静，亭堠无烟尘。兵革方既偃，风教期还淳。兴廉遵昔轨，崇文育群伦。所用惟才俊，非仅荣簪绅。尔俸与尔禄，脂膏出细民。永念固邦本，不愧王国宾。"抒发了胜利的情思和举贤任能振兴国家的愿望。康熙帝在给宫中总管太监的谕示中，也表露了自己的心境，他说：噶尔丹已死，各部都已归顺，大事已毕。朕两年之内三出沙漠，栉风沐雨，并日而餐，不毛不水之地，黄沙无人之境，可谓苦而不言苦，人皆避而朕不避，千辛万苦之

中立此大功。五月十六日，康熙帝返回京城。康熙帝这一次往征噶尔丹，除相机剿抚外，便中还巡览了边境形势，视察了军民生业。

帝巴密奏达赖喇嘛已经圆寂 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十九日，西藏第巴派遣使者向康熙帝奏报，达赖喇嘛早已亡故。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奉差前往西藏的主事保住回至庄浪，疏奏以圣旨晓谕第巴情况。二十一日，保住来到御营，呈上第巴奏疏，奏词非常恭敬，表示对匿而不报达赖早逝之事已经知罪，希望给以宽大，并说明将派喇嘛尼麻唐前来奏明达赖喇嘛身故事。康熙帝阅毕第巴奏疏后表示：第巴既如此奏恳，事亦可行，即此可以宽宥其罪，允其所请，第巴必感恩，而众蒙古也会欢悦。三月十九日，康熙帝在定边接见西藏第巴使者尼麻唐胡图克图，尼麻唐呈上第巴密奏，言达赖喇嘛早已亡故之事，奏称再生之新达赖喇嘛年已十五，请朝廷对此事暂时保密，不要公布于众。康熙帝说：久知达赖喇嘛已故，如果他还活着，僧巴陈布胡土克图、噶尔丹、济隆等绝不会如此妄行，喀尔喀、厄鲁特也不致遭受破坏。

山西巡抚等官贪污库银激起民变 康熙三十六年(1697)五月十二日，就山西巡抚等官贪污库银激起民变一事，康熙帝谕示议政大臣等：温保居官甚劣，苛虐百姓至于已极。不久前他自奏居官甚善，万民颂美，想为自己立碑。现在看来，沿途百姓对他恨之入骨，都表示不吃其肉无以泄心中之根。温保不能和一般人相比，他曾经为学士官，知道朕平日爱惜百姓之意。甘度居官也非常庸劣。现今蒲州百姓发生变乱，逃入山中。如果山西地方官员平日稍能抚恤百姓，百姓也不会以逃亡山中相抗拒；甚至巡抚倭伦亲自到山里招抚，百姓也不顺从，还要求把温保、甘度拿到山中，当着他们的面正法。现在回想起来，温保、甘度等人居官十分汙浊，朘削小民实在可恨。象这样的贪官不加诛戮，其他人也不知道警戒。命尔等议政大臣、部院堂官会同议奏。议政大臣、部院堂官讨论后奏请：温保、甘度居官十分恶劣，都应当正法，以警众人。可先将他们严拿至京，交与刑部。康熙帝认为可行。康熙三十七年七月初七日，刑部等衙门议奏：原任山西巡抚温保、布政使甘度，横征科派，激起民变，蒲州百姓恨之入骨。温保、甘度应立即斩首。璘将库内收贮银二万八千五百两侵没入己，应将孙毓璘照侵盗钱粮例斩监候。康熙帝最后决定：温保、甘度已经革职，从宽免死；孙毓璘依议应斩，先监候，秋后处决。

福建宁化发生民变 康熙三十六年(1697)五月十二日，福建宁化百姓数十人聚集在大洋庙内外，准备抢劫富户，抗击官府。原来，宁化地处深山，人民穷困。康熙三十五年农业欠收，至康熙三十六年四、五月间，百姓多已青黄不接。于是，民人伊禾首先宣传百姓，组织起来，反抗富豪，实行自救。在他的号召下，雷登九、黎四八、夏志、伍圣、叶庆、刘佛养等人，同聚在吴定祖家中，进一步商议抢劫富豪等事。他们将原存于神会的银两分发买猪，在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二日，会集在大洋庙内外一边宰牲，一边发动百姓，还勒令五通庙祝鸣锣聚众。在县衙拿获数人之后，伍圣便率领数十名百姓拥至县堂，要求县官立即释放被捕之人；叶庆则沿街鼓舞招集平民；夏志高立城头，发表演讲，号召百姓；刘佛养鸣锣放炮，助势张威。造反的人们呼拥着来到阴念良家，伊禾手执鸟枪，争先上屋；雷登九首先夺取前门；黎四八从后门攻入；吴定祖等人统率数十名百姓一哄而进，登堂入室，将富豪阴念良家所有器物抢劫一空。一时间，宁化县城百姓群情激奋，大街小巷纷纷议论此事，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造反的队伍。随后，刘佛养手执利器，夏志统率造反的百姓，又来到富豪雷冲斗、阴上升两家门前。正当造反的人们准备攻门入室时，县令带领防弁兵士赶到。造反百姓遂和官府发生争斗。经过拚搏，造反者寡不敌众，相继逃散。

《康熙皇帝》一书在巴黎出版 康熙三十六年(1697)，法国传教士白晋所著《康熙皇帝》一书在巴黎出版。白晋，一六五六年生于法国曼城，一六八二年二月七日随法国天主教传教团到达北京。由于他博学多才，颇受康熙皇帝赏识。他曾为康熙帝讲授天文历法及医学、化学、药学等西洋科学知识，每日出入宫廷，与康熙帝过从甚密，因此，对康熙帝有较多的了解。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四日，康熙帝为招聘法国耶稣会士，令白晋回国物色人选，特封白晋为钦差。白晋欣然接受此项任务，于同年七月八日离开北京，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九日到达布雷斯特。他带来了康熙帝送给路易十四的礼品，向法国当局转达了康熙帝的旨意，同时，向路易十四上一奏折，即《康熙皇帝》一书。《康熙皇帝》一书简要叙述了康熙帝的文治武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康熙帝的品德、性格、生活、爱好等方面情况。书中写道："康熙帝圣寿四十四岁，已经在位三十六年。他没有丝毫与当今皇位不相称的天资与品德。他威风凛凛，仪表堂堂，举止不凡，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子略显鹰嘴形，鼻尖鼓起。虽然脸上有几颗痘痕，但丝毫无损于他的美好形象。康熙皇帝精神上的美，远远超过他肉体上的美。他天赋极高，博文强记，智力过人，明察秋毫。他有处

理复杂纷繁事务的刚劲毅力，他有制定、指挥、实现宏伟规划的坚强意志。他的嗜好和兴趣高雅不俗，都很适于帝王的身分。他为人公正，伸张正义，倡导德行，爱护臣民。他具有服从真理的性格以及绝对抑制情欲的克己之心。”

奴杀宰相妻 康熙三十六年(1697)，京师发生一起严重的杀人事件：大学士明珠妻被家奴用刀刺中腹部身亡。明珠，字端范，纳兰氏，满洲正黄旗人，康熙朝前期的权臣。居官期间，他贪污受贿，很快成为豪富，生活穷奢极欲。他曾大兴土木，建一园林，风廊水榭间，全部用白玉凿为花，贴在四壁上。还有宽十亩的水池，每到冬天，就用五彩剪成花、叶，浮在水面上作为荷芰，又用各色杂毛做成凫雁。他的妻和舍里氏，为人妒忌、残忍。他们夫妇二人起自寒微，关系和睦。只是和舍里氏从不许明珠与侍婢接近、交谈。一天，明珠偶然说起一个婢女眼睛长得特别好看。第二天，和舍里氏就让一个侍者捧一盒到明珠面前，侍者告诉明珠，盒中盛的就是婢女的双眼。婢女父亲痛愤女儿无辜惨被挖目，便乘和舍里氏一人独在房中，突然闯入，用刀刺进她的腹部，和舍里氏当场身亡。案件发生后，朝野震惊。此后相当一段时间，京师流传奴杀宰相妻事。婢女父后被判处死刑。

清政府运米救济朝鲜灾荒 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月，清政府应朝鲜国王李焞之请，调拨米粮三万石，救济朝鲜灾荒。康熙三十六年冬，朝鲜国王李焞上奏康熙帝：比岁荐饿，廪庾告匮，公私困穷，八路流殍相续于道，吁恳中江开市，贸谷以苏沟瘠，俾无殄国祀。朝鲜人记述这次饥荒造成的后果时也说：是岁八路大饥，畿湖尤甚，都城内积尸如山。康熙帝接报后，立允其请，于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命部臣往天津截留河南漕米，用商船出大沽海口，至山东登州，更用鸡头船拨运引路。清政府还颁发帑金，广给运值，缓征盐课，以鼓励商人，将盛京所存海运米，平价贸易。共水陆运米二万石，内加赏者一万石。朝鲜灾民收到救济粮后，无不欢欣鼓舞。朝鲜国王也具表文上奏康熙帝，陈谢感激殊恩，备言民命续于既绝，邦祚延于垂亡，周转运粮米之快，赈贷之周密，是古所未有。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救济粮运至朝鲜，朝鲜右议政崔锡鼎到边境迎接。七月初十日，清政府吏部右侍郎陶岱从朝鲜返回，疏言遵旨赈济朝鲜事，其中写道：臣等遵旨赈济朝鲜，于四月十九日进中江，随将赏米一万石，率各司官监视，给该国王分赈，其商人贸易米二万石，交与户部侍郎见和诺监视贸易。据朝鲜国王李焞奏，皇上创开海道，运米拯救东国，以生海 壑之民，饥者以饱，流者以还。目前二麦熟稔可以接济，八路生灵全活无算。康熙帝闻奏后，作“海运赈济朝鲜记”。十一月，查出陶岱私带货物售给朝鲜，遂罢其职。

浑河改名永定河 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二十一日，经康熙帝御赐，浑河改名永定河。先是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康熙帝巡视山西五台山，途经浑河灾区，见百姓以水藻为食，亲尝后知百姓艰苦，回京后，向大学士等谕示：霸州、新安等处，数年来水发时，浑河水与保定府南河水常有泛滥，旗下及民人庄田都被淹没，问其原因，才知保定府南河水与浑河水汇流一处，势不能容，以致泛滥。于是，康熙帝命原任河道总督于成龙往察浑河，原任河道总督王新命往察保定府南河要求他们详加勘察，绘图议奏。康熙帝还说：现在农事方兴，不能用百姓力量，可遣旗下丁壮，备器械，给银米，令其修筑，由各部院衙门司官笔帖式带往，十日之内出发。三月初二日，于成龙、王新命出发前请求训旨，康熙帝又给以详细指示。他说：清河发源太行山脉，会漳河、子牙河、滹沱河、易水诸流，其势虽盛，但坚筑堤岸，加以遏止，既使每年发水也不会成灾。漳河支流经大城县入子牙河，其势湍急，几年来文安大城等处屡遭水患，都是该河造成，你们要详细查勘。至于浑河，发自马邑，其源很小，每遇大水之年，就横流泛滥，淹没民田，究其原因，是由于浑河淤沙多，春天水少时，保安以下居民又引黄河水灌田，致使沙粒壅垫，河身积高，遇到霪雨水发，水由高处流向低处，造成河水弥漫，田土冲没。你们要挑 淤沙，河两岸挖掘五六尺深、宽，令水畅流，才不会淤涨。康熙帝还说，筑堤修河工程完毕后，要设立河夫，委官监视，及时修治，大旱年头要除去淤沙，才能保证杜绝水患。三月十六日，于成龙以浑河图形呈览康熙帝，并奏报有关情况。康熙帝对他再次强调：务必在雨水前浚河筑堤完毕，使土地能耕，百姓生计有保障。于成龙表示在六个月内可以完工。七月二十一日，于成龙疏奏霸州等处挑浚新河告成，新河从良乡张家庄至东安郎神河，长二百里，两岸筑堤，束水出三角淀，在直沽入海；并要求皇帝赐于河名。康熙帝遂赐名永定河。此后，浑河便改名永定河。清政府还规定，设永定河河兵三千名，永定河的防护照黄河例实行。

湖南茶陵州黄明起事 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二十五日，黄明在湖南茶陵州、靖州等地聚众起事。黄明原是吴三桂属下将军，潜住苗峒多年，因茶陵州知州私派引起民愤，便伙同陈丹书、吴旦先等集众起事。八月三十日，湖广总督李辉祖疏报：黄明于七月十五日率吴旦先等百余人突至靖州城外，执旗

放枪，暗伤把总李成功等人。又，湖南茶陵州与酃县万阳山连界，七月二十四日，陈丹书率众拥入茶陵州城，署州事永州府同知史在鈩等受伤，大印被抢。九月二十四日，李辉祖又疏报，陈丹书等于八月初六日奔至安仁县，至衡州府城外放火攻门，官兵出击，在常宁县城擒获陈丹书等。起事失败后，黄明、吴旦先等逃往广西、贵州，不久均被捕获。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十八日，清政府审讯黄明一案结束，黄明、陈丹书、吴旦先等三十八人处斩，华虞臣等九十六人发与黑龙江新满洲披甲人为奴。茶陵州知州赵国瑄私派激变，李辉祖失察，经议后再给予处分。

康熙帝第三次南巡 康熙三十八年(1699)正月二十一日，康熙帝以黄、淮连年溃决，下流地方时遭淹没，虽耗费库银数百万两，多年仍无成效，遂决定第三次南巡，查看河道，指示方略，并巡历江浙，察吏安民。他谕户、工、兵等部，南巡一切供应由京备办，严禁沿途官吏借名科派，地方官员也不许馈赠扈从人员，违者均以军法论处，百姓不必引避，有在驻跸处告讦者以冲突仪仗例治罪。二月初三日，康熙帝第三次南巡启行，皇太后及皇子胤禔神等八人同行，于大通桥乘舟南下。十二日，康熙帝舟泊桑园，命直隶巡抚李光地等往视漳河与滹沱河，如漳河故道可寻，即可开通，引入运河；如虑运河难容，即于运道之东别开一河，使之赴海。十八日起，康熙帝只乘一舟，减少扈从，昼夜前进，往阅黄河以南各处堤防。在高家堰、归仁等处堤工，以河工敝坏，令原任河督董安国、原任河道冯佑于运口等处挑浚引河、修筑水坝赎罪。三月初一日，康熙帝召见桑额、于成龙、徐廷玺等，详加指示治河方略，并命于成龙委派效力人员从速开浚下河海口。初六日，康熙帝舟泊高邮州，指出经过测量河水比湖水高四尺八寸，湖石堤被水浸坏，命于成龙迅速派人查验修理。十三日，康熙帝见因南巡，山东、江南地方官员备办船只非常勤劳，便谕示吏部，此等官员中有因公挂误、罚俸、住俸、降俸、降级、革职留任者，皆予宽免；以后对浙江官员亦重申此谕。十六日，康熙帝谕示江南、浙江巡抚，申明出巡纪律，不许百姓因竞相观看皇帝而践踏麦苗。四月初四日，康熙帝渡太湖时，有百姓奏称水东地方田地已无而钱粮尚存。地方官回奏及风浪冲坍，处处皆有。康熙帝说：朕不到江南，民间疾苦焉能知道。十三日，康熙帝亲自祭奠明太祖陵，表示要察访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使世守祀事。后来大学士等奏称，明亡已久，子孙湮没无闻，今虽查访亦难得实，便决定委派该地方佐贰官一员专司祀典，以时致祭。同日，康熙帝还检阅了江宁驻防官兵。因江宁、苏州绿旗兵骑射较差的很多，决定拨督抚标兵一千零五十四名赴河标效力，凡骑射较差者令在河工效力。十五日，康熙帝还命江南巡抚宋荦、江宁织造曹寅修明太祖陵，为明陵题“治隆唐宋”殿额。十六日，康熙帝离江宁府，二十一日抵达扬州府。二十七日，康熙帝渡黄河，乘小船沿途巡视新埽，就修防诸事指示于成龙。五月十七日，康熙帝返回京城，此次南巡历时一百零三天。康熙帝在南巡中见百姓生计大不如前，皆因地方官私派豪取，或借端勒索以馈送上司，或将轻微易结案件牵连多人，故意拖延时间，索诈财物，但督抚对这些情况知情而不参劾，反将行贿官员荐举，十八日，康熙帝谕大学士九卿等议永革横派、严禁贿赂、察吏安民之法。决定今后各督抚要正已率属，查参贪污害民官员，尽革积弊，不得仍前因循，如被纠参，督抚一并治罪。

清政府裁减官员 康熙三十八年(1699)七月十八日，清政府裁减中央各机构官员。裁宗人府满员外郎二员，汉经历一员；内阁满侍读三员，满撰文中书五员，满办事中书八员，蒙古撰文中书一员，蒙古办事中书二员，汉军撰文中书一员，办事中书四员，汉撰文中书二员，汉办事中书六员；吏部汉军员外郎四员；户部蒙古郎中四员，蒙古员外郎五员，汉军郎中二员，汉军员外郎六员，汉主事四员；礼部汉军员外郎二员；兵部蒙古郎中一员，满员外郎一员，蒙古员外郎一员，汉军员外郎四员，督捕满员外郎二员，汉军员外郎二员，汉主事二员；刑部汉军员外郎八员；工部满员外郎一员，蒙古员外郎一员，汉军员外郎四员，汉员外郎二员；理藩院汉院判一员，汉知事一员，汉副使一员，满司务一员，蒙古司务一员；都察院汉军御史三员，汉军都事一员；通政使司汉参议一员；大理寺汉寺丞一员，汉寺副一员，汉军评事一员；起居注满字主事一员，汉字主事一员；詹事府汉中允一员，汉赞善一员；司经局汉正字一员，汉录事一员；太常寺汉协律郎一员，汉赞礼郎二员，汉司乐二员；光禄寺汉少卿一员，汉寺丞一员；鸿胪寺汉序班四员；行人司汉行人四员。总计裁减官员一百二十七名。

琼州黎民被逼起事 康熙三十八年(1699)十二月，雷琼道成泰慎、游击詹伯豸等扰害黎族百姓，勒索花梨、沉香等物，致使黎族王镇邦等攻犯宝停等营，被逼起事。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广东广西总督石琳、提督殷化行分别向康熙帝疏报此事，康熙帝颁发谕旨，命礼部侍郎凯音布、内阁学士邵穆布前往察审。十九日，刑科给事中汤右曾以琼州官员婪索起衅，疏劾总督石琳、巡抚肖永藻、提督殷化行，平

时毫无察觉，事件发生一年后始行题报，是徇庇容奸，希图欺隐。康熙四十年八月十七日，石琳、肖永藻各降二级，殷化行降一级，原任琼州总兵官、现任汉军副都统唐兴尧革职。

费密写成《中传正纪》 康熙三十八年(1699)，著名学者费密完成了《中传正纪》一书的写作，为研究古代儒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费密，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今新都西)人。他早年以诗文闻名蜀中，后来举家离蜀，流寓他乡，晚年定居扬州，专门著述。《中传正纪》共一百二十卷。该书博采经史，依据古代儒学发展的源流，从孔子门人子夏开始，直到清朝初年，共列历代学者传纪八百余篇，涉及学者多达二千余人。费密历经三十年才完成此书的写作。在此之前，他曾摘取该书的主要论述，写成《弘道书》十卷、《圣门旧章》二十四卷。此外，费密在经学、史学、诗文、医道等方面也多有论述，达三十余种之多，二百余卷。只是由于家庭贫寒，生前多未刊行，以至年久散佚。流传后世的，只有《弘道书》、《尚书说书》和《燕峰诗钞》数种。费密除写成《中传正纪》等学术著作外，还写了不少诗。他的诗多是即景抒情，深沉淡雅，有所寄托。费密在写作《中传正纪》以及创作诗歌时，生活相当困苦。由于故乡路远，归计无着，他的心情十分惆怅。他写诗记述了这种心情："木棉花发几回红，十度思归归不得。"但是，他甘于乡村式的寂寞生活，在非常穷困的条件下，既使"妻孥皆菜色"，也勤奋著述，以求"留得灌园名"。他以《中传正纪》等一系列著述，终于成为清朝初年学风转化过程中一名有影响的学者。

唐甄写成《潜书》 康熙三十八年(1699)，唐甄写成《潜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晚年改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县)人。明代，唐氏是达州富豪。唐甄父亲阶泰曾任苏州府吴江知县、南京礼部精膳司郎中。清朝建立后，唐氏一家多因抗清而死，唐甄也不能回归故土，便以其父仕所吴江为第二故乡。康熙初年，唐甄经吏部考选任山西长子知县。任官期间，他奖励农桑，整顿社会风气，获得好名声，后因处理逃人案受牵连罢职丢官。随后举家迁往苏州。多年仕宦生活，加深了唐甄对社会的认识。他决心以著述"权衡天下"。为了抒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在四十岁时他发愤为文，开始《衡书》的撰写，天道人事，前后古今，具备其中。康熙初年，《衡书》初成十三篇，在名士魏禧帮助下刊刻问世。到了晚年，政治失意，生活凄楚，唐甄无法抗拒生活的重压，便继续《衡书》的写作。唐甄安于贫困，专心著述，在他七十岁时，历时三十年，终于最后完成了《衡书》的撰写。他因一生遭受坎坷，书成后便将书名改为《潜书》。全书以论学、论治分类，分为上下两部，共九十七篇。该书撰写宗旨是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于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并非虚言。康熙四十三年(1704)，唐甄去世后，《潜书》得以刊行。当时的著名学者潘来对该书给以很高评价，认为该书论学术、论治道皆人所不敢言者，必传后世而无疑。

蔡毓荣为官文武兼备 康熙三十八年(1699)，蔡毓荣逝世。蔡毓荣，字仁庵，汉军正白旗人，自称锦川人氏(今辽宁省锦县小凌河)。其父蔡士英在顺治年间曾任漕运总督。蔡毓荣初授佐领，兼刑部郎中；后授京畿道御史，兼参领；以后历任内秘书院学士，刑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四川湖广总督，总督仓场侍郎等。他在任职四川湖广总督期间，曾疏陈招民填川垦荒。他认为：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招民开垦洵属急务。他指出：旧例招民限以七百户，始议叙授官，三年升科纳粮，结果，所费钱多，而招徕人民却少。他建议：凡候选及现任文武人员，能招民至三百户者，就可准议叙即用即升，限五年起科。这对清初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吴三桂叛乱发生后，蔡毓荣专督湖广。当时，吴三桂军攻破沅州后，又相继攻下常德、澧州、长沙、岳州。蔡毓荣令副将胡士英等分防江口，令襄阳总兵前往抵御，由于清军奋勇力战，也由于蔡毓荣部署得法，吴军大败。在八年平叛战争期间，蔡毓荣或献合兵会剿之策，或亲率营伍冲锋陷阵，或督造战船，建立水师，都建立了不少功绩。平叛战争结束后，他调补云南、贵州总督。面对人民流离失所、经济凋敝的情况，蔡毓荣招抚散亡，给牛种，劝耕作，创定规制、条例，为云南、贵州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蔡毓荣在军务繁忙之际，还不断写作，著有《通鉴本末纪要》八十一卷，又有《平南纪略》记其平云南事情。蔡毓荣逝世后，人们称赞他是文武兼备的人才。

孔尚任写成《桃花扇》 康熙三十八年(1699)，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和三次易稿，孔尚任终于完成了《桃花扇》的写作。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他早年受封建传统教育，曾应科举试。他学习范围广泛，既爱好诗文，也精通乐律。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帝南巡北归到曲阜祭孔，孔尚任因御前讲《论语》受到褒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从此开始了仕宦生涯。一年以后，他出差淮阳疏浚黄河海口时，接触到黑暗的社会现实，逐渐认识到吏治的腐败。回到京城以后，

便以读书和搜藏古物来填补闲散的生活，以诗歌、戏曲创作来抒发抑郁的胸怀。这期间，他结识了冒辟疆、石涛等人，得到了不少明末遗闻和史料，为创作《桃花扇》准备了丰富的材料。《桃花扇》是写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剧。作品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集中地反映了明朝末年腐败、动荡的社会现实，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全剧的主题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构思，从《桃花扇》所展现的故事情节中，人们看到了明朝三百年基业的复亡；通过侯方域的活动，看清了统治阶级里一部分文人的生活态度和政治面貌；以及以史可法为代表的爱国将领的壮烈殉国，以李香君、柳敬亭等为代表的下层人物的坚贞不屈。《桃花扇》通过精心的艺术创造，例如排场的起伏，情节的前后照应，角色的分配，曲白的分工，而成为一部优秀的传奇作品。此外，在人物的描绘，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桃花扇》也有许多独到之处。

顺天发生乡试舞弊案 康熙三十八年(1699)，顺天乡试发榜以后，有的考生写成文章张贴在街市上，揭露考官不念寒士之苦，利欲薰心，趋炎附势，把朝廷高官的子弟尽列前茅，部院大臣数十人的孩子也都取中，不问文章优劣，只问给多少贿赂钱，结果，满汉富豪大室一片欢腾。文章中还列举了大学士王熙、李天馥，尚书熊一潇，左都御史蒋宏道，湖广巡抚年遐龄等子孙通贿中举的情形。这次乡试的正副考官是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于是，便有“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的传言在民间散布。十一月初三日，江南道御史鹿祐疏参李蟠、姜宸英等纵恣行私。康熙帝命复试后对李蟠等严加议处。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顺天科场复试，由康熙帝亲阅。他对大学士说：这次科考的确不公允，考官等人也太懦弱。朕认为，什么事都应合情合理。既使是宗室大臣的孩子，也不应徇情。你们把这些试卷取走，可传九卿科道齐集详阅，再把情况上奏。二月初一日，顺天科场经过复试，康熙帝再次传谕大学士等：朕起初认为必有答不完卷的人，等到翻阅考卷，才发现都能写出文章，也是值得高兴的事。至于落第的人在外怨谤，也是在所难免，不能杜绝。于是，试卷就在九卿面前启封，照所定等第，缮写进呈，三等以上的仍令会试，四等中确实不行的，即令黜革。原主考官李蟠遣戍关外，姜宸英病死狱中。原来，姜宸英七十岁才做官，因眼花看不清，为李蟠欺骗，入狱后气愤而亡。

孙思克守河西挂绫匾 康熙三十九年(1700)二月，著名的“河西四将”之一孙思克病逝，年仅四十二岁。孙思克，字荩臣，辽东广宁卫(今辽宁北镇)人，隶汉军正白旗。他初为王府护卫，后授佐领、参领等职，又任甘肃总兵、凉州提督等官，在镇守河西地区中做出了贡献。他出任甘肃总兵官时，厄鲁特蒙古一些部落不顾地方官府劝阻，进至凉州(今武威)西南边的大草滩一带放牧，还扬言率大兵掠夺凉州一带。孙思克一面主动与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联系，明罚定法以彰信用，讲修敦睦以市恩惠，开诚布公以结诚心，向灾恤患以修邻好；一面又安不忘危，整顿营伍，训练士卒，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使当地民族矛盾有所缓和，边防巩固，社会安宁。在平定噶尔丹叛乱期间，一次，孙思克率领七千绿旗兵和三千八旗兵分批从宁夏出发，沿黄河北上。在穿越大沙漠时，因水草奇缺，气候恶劣，人困马倒，行军缓慢。孙思克当即决定，他率领四千精兵先行，其余留在当地看护军粮。结果，全军不仅摆脱了困境，而且在追歼噶尔丹的作战中发挥了良好作用。大军凯旋时，康熙帝特别派遣侍卫远道欢迎他，还赐御笔诗扇一把，诗中写道：“天讨恭行日，军威战捷时。列营张犄角，扼吭有偏师。立见穷追尽，能承节制奇。鹰扬资远略，宿望在西陲。”康熙帝召见他时，命他坐在御榻右侧，又赐御书“雄镇秦关”绫匾，以表他镇守河西三十余年的功劳。

陕西官员贪污赈银 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初三日，清政府查明陕西官员贪污赈银一案，并对有关官员进行了处理。先是，陕西咸阳百姓张拱等叩阍，呈告康熙三十二年原任巡抚布喀等，以百姓缺乏种子不能耕种，应给银两购买，而官吏侵蚀并不发给。接着，布喀呈告川陕总督吴赫，于借百姓种子银中侵蚀四十余万两。康熙帝派遣刑部尚书傅塔腊、江南江西总督张鹏翮前往查审，并将吴赫解任审讯。案发后至今已经两年，直至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初三日，才查明当时种子银共计五十余万两，发给民间共三十九万余两，原同州同知蔺佳选、蒲城知县王宗旦、朝邑知县姚士塾、华州知州王建中均侵扣种子银肥已，合计实给百姓银及州县官侵扣用银与五十万两之数相符，布喀所告不属实。于是，清政府决定，将蔺佳选、王宗旦处斩监候，姚士塾、王建中已病故免议，侵扣银追还；吴赫于另案议罪革职，其他有关官员也分别给予处分。康熙帝对官员清廉问题十分重视，此后不久，他曾对大学士等人说：自古帝王用人行政，皆赖大臣荐举贤良。但是，大臣荐举有时也会有看不准之处，有的开始贤良而后又发生了变化。从今以后，朕只看居官操守是否清廉为主要根据，决定对他的提拔与黜免。

苏州踹匠罢工示威 康熙三十九年(1700)五

月，苏州踹匠罢工示威。这次斗争的起因，是由于包头(踹布业主)克扣工钱。结果，踹匠首领之令一出，千百踹匠随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以致包头吓得躲了起来，各作坊也束手无策，没有人敢动工开踹，变乱形势，比以前任何一年都厉害。商民受困，将近一年。苏州是棉织业和丝织业的中心，在织布的染色工序上，需要众多的匠人，脚踹巨石，将染色布匹整压光结。踹匠多为精壮的青年工人，生活贫困，但他们相互团结，富于斗争性。在此之前，从康熙朝初年开始，苏州踹匠就多次发动反抗斗争。有一年，踹匠领袖窦桂甫因年荒米贵，发传单约会踹匠停工，要求增加工银。布商呈请官府弹压，窦桂甫被决杖驱逐。康熙三十一年(1692)，又有罗贵、张尔惠等领导踹匠，要求增加工资，捣毁官府告示，聚众殴抢货物。清政府出面干预后，许多踹匠被枷责，罗贵等十六人逃生。结案后，七十六家布商将官府命令刻立石碑，踹布工价，仍定为每匹一分一厘。康熙三十九年苏州踹匠罢工示威后，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踹匠的管理，防患于未然，规定：嗣后苏州踹匠，要听从长洲县、吴县典史协同城守营委员督率包头约束，平日申明条教所开，察其行藏，不许夜间行走生事，以及酗酒赌博。包头要负责盘查踹匠来历，设立循环簿。尽管官府管束很严，直到康熙朝末年，苏州踹匠的斗争仍很活跃。

捣毁魏忠贤碑　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二十二日，清政府从御史张瑗疏言，将京城西山碧云寺后明太监魏忠贤墓及碑二座扑毁。魏忠贤，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万历时入宫。泰昌元年(1620)熹宗即位，他被任为司礼秉笔太监，后又兼掌东厂。他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天启五年(1625)兴大狱，杀东林党人杨涟等。自称九千岁，下有五虎、五彪、十狗等名目，从内阁六部到地方督抚，他都有私党，致使明朝政治更加腐败。崇祯帝即位后，他被黜职，安置凤阳，不久又命逮治，在途中畏罪自缢。

康熙帝巡视塞外　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三十日，康熙帝巡视塞外，胤礽等皇子九人随行。元月初八日，康熙帝至西巴尔台，见兴安境内喀尔喀蒙古各旗非常贫困，命各借给马匹。各台吉内，凡无马者给牝马十，有马者亦补足十匹，令其蕃养蕃息，八年后将原马归还牧场。六月，康熙帝在塞外巡视途中，喀尔喀、四子部落、阿霸垓部、苏尼特部、翁牛特部、奈曼部、扎鲁特部、鄂尔多斯部、吴喇特部、科尔沁部、蒿齐忒部、喀喇沁部等各和硕亲王、郡王、贝勒、公、台吉等，分别来朝见，各赐袍挂、缎匹、银两等物。七月初二日，领侍卫内大臣、公费扬古随康熙帝巡视塞外，于途中病重，康熙帝命停留一日，亲往探视，赐御帐、鞍马、蟒缎以及银五千两，遣内大臣、侍卫等护送返京。初三日，康熙帝抵乌兰布通。七月，康熙帝巡视途中，各蒙古部落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分别前来朝见，各赐银物不等。八月初三日，康熙帝驻桂勒尔毕喇地方，盛京将军贝子苏努、宁古塔将军杨福、黑龙江将军沙纳海、索伦总管觉罗阿图等率属下官兵朝见。初十日，康熙帝至索岳尔济山，见山势崇隆，是名胜地区，谕令此山今后禁止行围。九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回至京城。在康熙帝巡视塞外期间，九月初一日，费扬古病逝，给予祭葬，谥号襄壮。十七日，和硕简亲王雅布于随同出巡途中逝世，康熙帝命领侍卫内大臣公福善等护丧回京，赐银四千两，给予祭葬，谥号修。

清政府镇压瑶民起义　因广东提督殷化行疏报：连山瑶民常出扰害，总兵官刘虎、副将林芳率兵进剿败回，林芳被杀，康熙四十年(1702)十二月二十日，清政府以都统嵩祝为广东将军，率八旗前锋兵四十名，炮八门，湖广、广东、广西各派总兵官一员，兵四五千名，广州派八旗兵一千名，前往进剿。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初三日，都统嵩祝将率三省兵会剿瑶民，出发前，康熙帝训示：瑶人所居山区通连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林木丛密，山势崇峻，你等不必马上征剿，可先晓示招抚，如不成功，再用武力。还须约束官兵，不得骚扰居民，如果瑶人归顺，查出杀害官兵为首者正法，其余一律宽免。二月二十一日，嵩祝等率兵至广东连州，以该地图形奏闻康熙帝。三月二十八日，康熙帝谕示：如徭民不就抚，则立营于要隘处加以围困，不劳兵力，尔等定会穷迫。四月初十日，嵩祝派人前往招抚，连州境内一万九千多人归顺，除将杀害官兵为首九人正法外，其余人都给予适当安插。随后，嵩祝等撤兵回京。八月十六日，广东广西总督石琳就瑶区善后事宜疏奏康熙帝，指出：瑶民区油岭大小排周围四百余里，难以设立州县，仍归连山县管辖，但于适中地方三江口建立寨城，驻兵控制。设三江口营，在韶州等处拨兵二千名，设副将一员。瑶民丁口田亩各项税饷征收，查明后造册报部。

康熙帝诏修国子监　康熙四十一年(1702)正月二十日，康熙帝颁发诏旨，重修国子监等，由和硕裕亲王福全负责。至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缮完工。国子监位于京城安定门内成贤街，是清朝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是辟雍，专为皇帝讲学而建。康熙帝就曾在这里讲学，解说孔学经义。辟雍深广各五丈三尺，四角攒尖重檐顶，上有鎏金宝珠，覆盖黄色琉璃瓦，四面辟门，环以周廊和水

池，池周有汉白玉雕刻的护栏围护，池上架起石桥，通向辟雍四门，构成辟雍泮水。辟雍北面正房七间，名彝伦堂，是国子监藏书处所。两侧各有厢房三十三间，为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统称六堂，是分科讲授处，讲授内容以孝悌、礼义、忠信、谦耻为本，以六经诸史为业。国子监内有监生近千人。他们中有的是回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学生，也有的是俄国、交趾、高丽（今朝鲜）等国的留学生。因此，国子监不仅是俊才荟萃之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场所。

史学家万斯同逝世　康熙四十一年（1702）夏，史学家万斯同逝世，终年六十五岁。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从学黄宗羲，博通诸史。康熙十七年，荐博学鸿儒，推辞不就；康熙十八年徐元文监修明史，欲荐入史馆，又力辞不行。三十二年，王鸿绪任修明史总裁，延请万斯同至家中，委以编纂事务。明史最后刊定，即以王鸿绪稿本为基础进行增删，而王鸿绪稿大半由万斯同撰写。万斯同精熟史书，淡于名利，奖掖后进，朝野上下均呼他为万先生。万斯同著有《历代史表》、《历代宰辅汇考》、《宋季忠义录》、《石园诗文集》等。

清政府宣布"戒苗条约"　康熙四十一年（1702）九月二十三日，湖广镇筸生员李半等叩阍，称镇筸苗民肆行杀掳，地方官不究于报。不久，给事中宋骏业疏劾湖广总督郭琇、巡抚金玺、提督林本直、总兵官雷如等；平时不能严饬属员加意抚辑，事发生后又不即时奏请剿抚，视民为儿戏，置封疆于度外，应予罢斥。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吏部左侍郎傅继祖、工部右侍郎甘国枢奉旨查明，苗民抢掠，地方官隐匿不报属实，将郭琇、林本直革职，金玺降四级调用，雷如革职留任。不久，湖广提督俞益谟、偏沅巡抚赵申乔题报苗民抢掠，地方不靖，康熙帝为筹一劳永逸计，九月二十四日，决定按广东瑶民例，派大军剿抚。命尚书席尔达同副都统图思海、徐九如率前锋兵四十名前往，调荆州八旗兵及广西、贵州、湖南三省绿旗兵赴湖南苗区。十月初六日，康熙帝谕示：如苗人归降，只诛倡乱肆虐首犯，否则歼其抗拒不服者，不得玉石不分，滥杀无辜。还应设法用计招抚，委婉从事，不能尽恃勇力。十二月，"戒苗条约"宣布，主要内容有：苗民杀内地一人，定要两苗抵命；枪内地二人，定要拿全家偿还。苗民不许制造军器，如果执刀枪行走，就属叛逆，拿获后一定诛杀。有抗粮抗当差者，也是叛逆，也要捉拿正法。苗区有木材、木耳、药材、漆树可以生利，苗民若不劫杀，可让汉民进来教学教做，也可让汉民进来从事买卖，以土产换盐布，此可两得其利，以安享无穷之利。条约中特别强调：大军撤回后，苗民要改过自新，各安生乐业。

彭兼六创立秘密宗教　康熙四十一年（1702），江西瑞金百姓彭兼六组织佃户，编造檄文。康熙四十二年，他又联合黄淑行兄弟四人创立秘密宗教，聚众烧香，日散夜聚，千百成群，据田抗租，揭露田主苛虐，宣传田主如夺田另佃，需每亩赔银一两为"退脚钱"。

康熙帝第四次南巡　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十六日，康熙帝第四次南巡从京师启程。十七日，过涿州。二十四日至济南府。二十五日至长清县黄山店，夜里大风，南村失火，康熙帝命大臣侍卫等前往扑灭。次日，凡该村受火房，一间给银三两。二十六日，康熙帝登泰山，驻泰安州，命免南巡所经过山东二十四州县康熙四十一年未完钱粮，山东受灾歉收二十五州县康熙四十一年未完钱粮亦予豁免，其康熙四十二年钱粮分三年带征。二月初一日，康熙帝谕示山东巡抚王国昌，应妥善抚绥灾民，不可使他们流离失所。官民人等可自愿以银米散赈，降革官员许以赈济赎罪，秋收以后酌量议叙。初二日，又命张鹏翮以漕米二万石遣官运往济宁、兖州等处平粜，桑额以漕米二万石于泰安等处散赈。初五日，康熙帝渡过黄河，在桃园乘舟，至淮安府，沿途视察河堤，指示河工。传旨张鹏翮，永定河修筑挑水坝，很有效益，应遵照式样，在黄河烟墩、九里岗、龙窝三处筑挑水坝数座，试看有无效益。可速备贤能官员，多备物料夫匠，在回銮之前完工。十一日，康熙帝经扬州、镇江、常州，抵苏州。在接见偏沅巡抚赵申乔时，康熙帝指出：湖南私征比正赋多数倍，而收钱粮时火耗亦较别省为重，百姓穷困，大多流离。应严饬属员痛改前非，力减加耗，尽革私征，务使流亡者返回乡里，专心务农。十五日，康熙帝抵杭州，检阅驻防官兵，并赏给银两。十八日，康熙帝离杭州，二十日返苏州，向大学士们指出：大凡居官，固贵清廉，尤必和平，始为尽善。为督抚者，以安静不生事为贵。二十一日，谕各省督抚等官各将藏书目录呈览。二十二日，对大学士等再次强调：地方督抚安静而不生事，于民有益。如果只仗才干，不体谅下情，以此争先出众，百姓必受其殃。二十三日，康熙帝离苏州，二十六日抵江宁府，遣大学士马齐祭明太祖陵，赏赐扈从官兵及驻防兵银两。二十八日，康熙帝离江宁返京，舟经镇江、扬州、高邮、宝应，三月初二日，登岸，察看高家堰堤，谕示防险人员应选比县丞职衔稍大，家产殷实者担任，此等人知自爱身家，又有选用之望，必能尽心防守。随后，康熙帝继续乘舟，经东平府、东昌府、沧州、天津卫，于十

四日在扬州登岸，驻南苑，十五日返回京城。

康熙帝拘禁索额图 康熙四十二年(1703)五月，索额图因“议论国事，结党妄行”罪，被康熙帝拘禁宗人府，不久死于幽所。索额图，满洲正黄旗人，姓赫舍里氏，内大臣一等公索尼第三子。初任侍卫，后授吏部右侍郎，国史院大学士兼任佐领，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领侍卫内大臣，康熙四十年九月，以老乞休。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帝南巡阅河至德州回銮，特召索额图侍奉皇太子允礽，在德州养病。一月后，允礽病情好转，索额图和他一起返回北京。此前，索额图曾被家人讦告，康熙帝留中未宣。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康熙帝命侍卫海青传谕索额图，主要内容是：尔家人告你，朕留内三年，未予宣布，本有宽待之意。但是，你没有愧悔之心，背后怨气冲天，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全国都受朕深恩，如果受恩者半，不受恩者也半，那就会要跟随你了。去年皇太子在德州时，你乘马至皇太子中门方下，仅此一条就该把你处死。你把自己看成是什么人？你任大学士时，就因贪恶被革退，后再次起用，并不思念朕之恩惠。养的狗还知道主人的恩情，象你这样的人既使格外加恩，也属无益。朕本想派人去你家搜看，恐怕连累的人太多，所以中止。如果把你办的事情公布出一部分，你就会被正法。考虑到你原是大臣，朕心不忍；但令你闲住，又恐怕结党生事，背后怨尤议论，还是交宗人府拘禁。皇太子允礽初次被废以后，康熙帝曾说：“过去允礽立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和朕的几乎相似。允礽日益骄纵，实源于此。索额图是本朝第一罪人。”所以，索额图获罪，和太子同党有关。

康熙帝西巡 康熙四十二年(1703)十月初五日，康熙帝谕吏、户、兵三部：乘此冬令农闲之际，欲往陕西、河南、山西观览民风，询察吏治，简阅禁旅，整饬军营。十一日，康熙帝启程西巡，经涿州、安肃、保定、庆都、新乐，十八日至真定府。后自井陉出固关，二十二日抵平定州。康熙帝责问山东赈灾迟缓，朝廷发去银两仍贮库内，京城派出三百余员尚留济南，难道非要饥民逃散之后才开始赈济？经寿阳、榆次，二十五日至太原府。康熙帝谕免山西全省康熙四十二年以前未完钱粮，并晓示山西巡抚噶礼，若岁丰用奢，则来年必致匮乏。教民以礼义，导民以守法，重农务本，藏富于民，则朕无西顾之忧。二十七日，康熙帝在太原检阅驻防官兵。十一月初九日，康熙帝经过介休、灵石、霍州、洪洞、曲沃、闻喜、安邑、运城后，到达晋县。甘肃巡抚、总兵官，四川巡抚、提督等前来朝见。十五日，康熙帝渡过黄河，经潼关、临潼，到达西安府。青海蒙古亲王札什巴图尔、鄂尔多斯郡王董罗布松阿喇布等朝见。十六日，康熙帝检阅西安驻防官兵，见军伍骑射娴熟，军容整肃，非常高兴，表示要大沛恩泽，以示不忘劳苦人员之意。十七日，康熙帝谕示免陕西、甘肃两巡抚所属地方康熙四十二年以前未完钱粮，免河南杞县等十四州县本年度水灾额赋有差。十八日，康熙帝在西安城外阅兵，宴赏蒙古王公等。二十日，召见将军博霁谕示：西安官兵俱娴礼节，重和睦，尚廉耻，且人材壮健，骑射粗练，要保持发扬。并决定奖陕西绿旗兵，把总以上官各加一级，八旗兵将军以下骁骑校以上各加一级。二十一日，康熙帝离西安，十二月初一日至河南府。初二日，康熙帝在孟津渡过黄河，初四日至修武县。因怀庆镇兵射技不堪，营伍不整，官兵铠甲全无，将总兵官王应统及千总一人、把总二人俱械系带往京城审问。初六日，康熙帝召见河南巡抚徐潮，对河南百姓困难而官吏互相容隐、贻误地方进行斥责。十九日，康熙帝返回京城，对大学士等说：南巡多由舟行，西巡均由陆路。各处官民扶老携幼欢腾道旁，每加询问，又令在乘舆左右，备咨地方利弊，所以风俗民情无不洞悉。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江浙较三十八年时更胜，山东近有水旱，河南百姓生计艰苦。

避暑山庄开始兴建 康熙四十二年(1703)，避暑山庄开始兴建，至四十七年(1708)，初步建成。避暑山庄座落在河北省承德市，初称热河行宫，后来康熙帝亲笔题名为避暑山庄，也称承德离宫。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帝开始在北京至木兰围场(今河北省围场县境)途中建立行宫，热河行宫是其中之一，属于住宫。它包括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总面积为五百六十四万平方米。宫殿区，在整个山庄的南部，是皇帝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地方，包括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东宫四组建筑。正宫在宫殿区的最西边，建筑布局严整、对称，主要建筑有丽正门、避暑山庄门，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烟波致爽、云山胜地。松鹤斋布局类似正宫。万壑松风据岗临湖，布局灵活多变，很有江南园林的气息。东宫在松鹤斋东，地势较低，其中的福寿阁，是皇帝宴请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地方。苑景区，又可分为湖区、平原区、山区三部分。湖区，在宫殿区以北。湖光变幻，洲岛错落，亭榭掩映，花木葱茏，一派江南景色，是山庄风景的中心。平原区，在湖区以北，东界宫墙，西、北依山，包括万树园和试马埭两部分。山区，在整个山庄的西部，自南而北，山岳起伏，统称塞山。山内幽谷溪流，峰回路转，极为清雅幽静。康熙帝在他统治的中晚期兴建避暑山庄，是北方民族固有习俗的体现。因为秋冬违寒，

春夏避暑，两地移住，是我国北方游牧、狩猎民族向来的习俗。满族是我国的北方民族，避暑山庄兴建后，康熙帝每年中几乎都有半年时间住在这里，正是满族习俗的体现。

著名诗人叶燮病逝 康熙四十二年(1703)，著名的诗人、诗歌理论家叶燮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叶燮，又名世倌，字星期，号已畦，苏州府吴江(今属江苏)人。他出身于世代书香和仕宦家庭，父亲叶绍袁是明朝进士，曾任工部主事，后因厌恶官场生活，辞官回家。绍袁的子女都能诗善文，全家人吟诗唱和，自相娱乐。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叶燮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四岁就能诵读《楚辞》，少年时已作诗词数百首，且都词藻华丽。康熙初年，叶燮乡试中举，后又考中进士，被选任江苏宝应知县。当时正值三藩叛乱时期，上司逼迫他在赋税上克剥。叶燮宁愿借贷措办，也不愿嫁祸百姓，结果，他被弹劾去职。叶燮离官后，开始了长期的流浪生活。他曾游历泰山、庐山、黄山、嵩山等，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这些丰富了他的生活，对他的诗歌创造和诗歌理论的创立十分有益。叶燮推崇杜甫、韩愈、苏轼的诗，学习他们诗中沉郁、新奇、豪健等特点。叶燮诗歌内容多能反映人民生活的苦难，谴责官吏的腐败和滥杀无辜，诗句富有新奇感人的力量。在诗歌理论方面，他不满意明代前后七子李梦阳等人的复古论调，认为诗歌是人们感情冲动的产物；诗歌的发展不会衰退，而是长盛不衰；诗人应当敢于思考，打破传统偏见；诗人的志趣、理想以及对于生活的态度、认识和判断能力，是诗歌创作的基础，决定了诗歌的生命。叶燮的主要著作有《已畦集》、《已畦诗集》、《诗集残余》等。

山东、河间饥民流入京城 康熙四十三年(1704)三月十一日，因山东、河间饥民在京众多，五城施粥不能遍及，康熙帝命八旗大臣各按旗分在城外三处煮粥赈济，派佟国维、明珠等监赈。汉大臣、内务府也各分三处赈济。二十二日，康熙帝遣各部司官将在京山东饥民分送回籍，河间等处饥民由李光地设法领回。本年初，康熙帝就曾指出：畿南四府、河南、山东百姓生计艰难，大不如前，都是因地方大小官员不能为民除弊，又设立名目，多方征取，以致民力不支，日就贫困。二月二十六日，山东布政使揭报原任布政使刘皑亏空库银，原任巡抚王国昌盘库时竟保题并无亏空。实际上，仓粮亏空竟达五十余万石。四月初九日，因河间水灾，饥民流入京城，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合疏劾直隶巡抚李光地漫无经理，去年竟不报灾，目击流亡，却不进行任何筹画，碌碌素餐，徒以虚文巧饰。五月初七日，康熙帝谕示免山东九十四州县卫所康熙四十二年度水灾额赋，并缓征本年丁粮、漕粮。十月初七日，直隶顺天、河间两府因去年山东灾民流入，米价至今未减，康熙帝命免其明年应征地丁钱粮。同时，又命免山东省明年应征地丁钱粮。许多迹象表明，山东、河间饥民流入京城，虽系灾害直接所致，实际上却与当地官员为政不良有关。尽管清朝中央政府采取一些减免措施，但是百姓生计艰难的局面并未改变。

侍卫拉锡往探黄河源头 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月初四日，康熙帝派遣侍卫拉锡等往探黄河源头，要求务须直穷其源，凡流经等处要详细记述。九月三十日，拉锡返回京师，向康熙帝奏报了这次考察的全过程：五月十三日至青海，十四日至呼呼布拉克，贝勒色卜腾札尔同行。六月初七日至星宿海东，见鄂陵泽周围二百余里。初九日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登山远眺，见星宿海源头有小泉万亿个。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即昆仑之意。南有古尔班吐尔哈山，西南有布胡珠尔黑山，西有巴尔布哈山，北有阿克塔因七奇山，东北有乌兰杜石山。古尔班吐尔哈山下诸泉，西藩国名为噶尔马塘。巴尔布哈山下诸泉，名为噶尔马春穆朗。阿克塔因七奇山下诸泉，名为噶尔马沁尼。三山泉流出三支河，即古尔班索罗谟。三河东流入札陵泽，自札陵泽一支流入鄂陵泽，自鄂陵泽流出，便是黄河。此外，他山之泉与平地之泉流为小河的也非常多，都归入黄河东流而下。六月十一日回程，向东南行二日，登哈尔吉山，见黄河东流至呼呼托罗海山，又南流绕撒除克山南，北流至巴尔托罗海山南。十四日，至冰山西，山最高，云雾遮蔽。蒙古人说此山长三百余里，有九个高峰，自古至今没有见过冰雪消融。经常飘降雨雪，一个月里只有三四天晴空。自此回行十六天，至席拉库特尔地方，又向南行，过僧库里高岭，行百余里至黄河岸。见黄河自巴尔托罗海山向东北流，于归德堡北、达喀山南，从两山峡中流入兰州。自京城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余里。宁夏西有松山，至星宿海，天气渐低，地势渐高，人气闭塞，故多喘息。

兵丁王汉杰聚众抢掠当铺 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初六日，湖广总督喻成龙疏报：镇筸镇兵丁王汉杰等纠集三百余人，在城中抢掠当铺，又出城站队逼官索结。王汉杰应正法，其党三百余名不知姓名应免深究。康熙帝认为这一事件情罪深为可恶，该督理应察明严加治罪，以肃军纪，遂命再详审定拟具奏。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喻成龙再奏王汉杰等应立斩，该管各官并不知情，免议。康熙帝颁旨责其徇庇

具题，殊属不合，将喻成龙革职，遣郎中吴进泰前往究审。康熙四十五年二月，此案终结，为首的王贵等人立斩，为从的王汉杰等斩监候。原任布政使施世纶、按察使董廷恩革职，现任布政使董昭祚、按察使郎廷栋革职留任，提督俞益谟降二级留任。

尤侗一生勤于著述 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尤侗病逝，终年八十七岁。尤侗，字同人，号悔庵，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他一生涉足文史，著作宏富，总计著述三十四种，近一百四十卷。其中，《西堂全集》六十七卷，《西堂余集》六十六卷，收录了他所作的诗词、乐府、杂剧、传奇、论文、笔记以及在史馆内的著作。《鹤栖堂集》六卷，收录了他康熙三十八年以后的作品。尤侗工于诗词，又精通音律，所以他的作品以杂剧和传奇的成绩最为突出。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反映了他对民族压迫的不满。对尤侗学术方面的成就，清朝最高统治者极为重视，多次给以褒奖。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月，康熙帝南巡。八十二岁的尤侗到无锡迎接。三月十八日恰逢康熙帝廷辰，尤侗作《万寿词》祝贺，同时又作《平朔颂》，歌颂康熙帝在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中，御驾亲征并取得乌兰布通和昭莫多之战的重大胜利。康熙帝十分高兴，赏赐酒宴并御书“鹤栖堂”字幅。顺治帝曾称誉尤侗是“真才子”，康熙帝也称他是“真名士”。尤侗曾在自家堂柱上镌刻联语“章皇天语”、“会上玉音”，又将御书“鹤栖堂”三字高悬堂上，准备传于子孙，以为百世之荣。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再次南巡期间，尤侗不顾年迈体衰，仍到无锡迎驾。康熙帝擢升他为翰林院侍讲，晋承德郎，再次赐御书予以嘉奖。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受到两代皇帝的赞赏，在当时实属不多。

阎若璩考订出古文《尚书》为伪书 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著名的考据学家阎若璩病逝，终年六十九岁。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祖籍山西太原，生长于江苏淮安。他笃志经学，潜心考据，以考订晚出古文《尚书》为伪书，而成为名著一时的学者。阎若璩最有名的著作是《古文尚书疏证》，共八卷。《尚书》自秦朝毁于火后，至西汉初年，伏生传述二十八篇，后又得秦誓，共二十九篇，是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家墙壁中得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十六篇，孔安国把它献给朝廷。东汉时期，这十六篇又失传。东晋梅赜献古文《尚书》，变成二十五篇，还有所谓《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作《正义》，将原今文二十九篇与梅赜的古文二十五篇放在一起。以后历代有人对梅赜所献的《尚书》表示怀疑。阎若璩以拨乱反正自任，效法宋人欧阳修，为辨证伪书而不惜向传统偏见挑战。他证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书，从《尚书》的篇数、篇名、字句、书法、文例等提出很多证据，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经过阎若璩的考证，古文《尚书》是伪作铁证如山，不可动摇。一千多年来，伪古文《尚书》被人们诵习，视为神圣的经典，也是宋明理学家的重要依据。古文《尚书》既被证明是伪书，理学家们骗人的鬼话也就被揭穿。因此，阎若璩考订出古文《尚书》是伪书，一方面在考证方法和古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成就，一方面也打击了宋明理学，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

洪升写成《长生殿》 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卓越的剧作家洪升去世，终年六十岁。洪升，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官僚家庭，少年时攻读经史，挥笔写诗，显露出文学才华；后来，又对戏曲产生了兴趣。他曾热心科举，去北京国子监就读，但仕途无进展，遂失意返归故里。不久，又遭到父母不满，失去了优裕的生活，开始浪迹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其中较长时间是定居在北京。走南闯北，四处行役，洪升眼界大为开阔；功名坎坷，世态炎凉，他对生活的感受更加丰富。终于，他写成了著名的《长生殿》剧本。这部根据白居易《长恨歌》及其他传说为蓝本的戏曲，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唐明皇看中宫女杨玉环，册封她为贵妃。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定情，海誓山盟。正当两人陶醉在糜烂生活中时，安禄山乘机叛乱，进取长安。唐明皇仓惶弃京西奔，至马嵬坡，三军骚动，要求处死杨玉环，以安天下。唐明皇无奈，被迫答应，杨贵妃含恨而死。后来，唐明皇退位回宫，触景生情，勾起无穷悔恨和对贵妃的情思。情之所系，感动天帝，终于让他们在月宫团聚，成为天上夫妻，实现了长生殿上的宿愿。该戏人物刻划细腻曲折，情节波澜起伏，富有强烈的浪漫色彩。该剧本问世后，许多艺人争相排演，洪升因此也文誉大增。除《长生殿》外，洪升还写了《回文锦》、《回龙记》、《闹高塘》等传奇，以及《李节坊》、《天涯泪》等杂剧。

康熙帝重视《明史》纂修 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一月二十六日，康熙帝以明史关系重大，特为修明史事作文一篇，命晓谕诸臣。他在文中写道：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因而无时无刻不在自责。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做好；躬行实践，未能做好；知人安民，未能做好；家给人足，未能做好；柔远能迩，未能做好；治臻上理，未能做好；言行相顾，未能做好。对上述一切感到惭愧，

还哪有时间议论明史是非?况且有明以来二百余年，流风善政，不能枚举。因此，明史不能不编好，公论不可不采纳，是非不可不明晰，人心不可不顺服。关系巨大，条目很多，朕日理万机，精神有限，不能逐一细看。如果轻定是非，后有公论者必然归罪于朕。这就是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尔等大臣都是老学素望、名重一时者，对明史是非自有真知灼见。你们认为对的就对。刊行以后，如果认为有不妥处，可以再行讨论。朕是无一字可定，也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识，所以不能进行过多的干预。康熙帝一贯重视纂修《明史》。早在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他就曾表示：纂修明史应当详细认真地进行讨论；修史的标准，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谬执私见，为一偏之论。在康熙帝的关心下，《明史》纂修在康熙朝取得了重大进展。以全部四名现任满汉大学士勒得洪、明珠、李光地、王熙及部分内阁、翰林院学士，补充为监修总裁官及总裁官，标志《明史》纂修工作已经纳入清政府重要议事日程。

清政府实行禁矿政策 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帝发布上谕：开矿事情对地方无益，以后有请求开采者，都不准行。随着清政府禁矿政策的实行，广东海阳县一个商民兴办的最大的矿厂封闭了，湖南许多地方的铅矿也永远封禁了，四川、河南的一些矿厂也都被禁止。清政府在康熙朝后期实行禁矿政策不是偶然的。当时，土地兼并，吏治腐败，农民处境一日不如一日，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规模不等的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对农民“闹事”非常敏感，防范甚严，凡事都以不生事端为要。为此，还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主要内容包括：云南督抚雇本地人开矿及商人王纲明等在湖广、山西各雇本地人开矿照准；其他省所有的矿，未经开采的，或初开采的，严行禁止。上述措施中，云南督抚雇人开矿属于官办矿业，云南铜矿又是清政府铸钱所必须，且王纲明是当时著名的皇商，直属内务府，所以清政府采取了照准政策。而对民间开采，包括地主、商人、贫民在内都严格禁止，尤其不许民间开大矿及大规模开采，以免聚集人多出事。为了防止出现流民，也不许跨省开采，清政府实行禁矿政策，不仅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矿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和发展，而且一度造成了矿业生产的衰落。此外，禁矿引起矿民失业，地方收入减少，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官的反对。各地人民开展以私挖、盗矿为主要形式的反禁矿斗争，从而使康熙朝后期的阶级斗争呈现了更为复杂的趋势。

理藩院致函尼布楚长官 康熙四十四年(1705)二月初三日，清政府理藩院就俄罗斯人越界杀人及布里亚特人向属中国事致函俄国尼布楚长官。文中谈到：接到你的咨呈，谈到我国喀尔喀蒙古二十人沿俄罗斯汗属地河源而上，至额尔古纳附近敖嫩河一带，想盗索伦杀其头领，并盗其马匹衣物等。据本院审问送回的伊尔颠供称：我等并未进入敖嫩山中，亦未杀死三名俄罗斯人，而于我喀尔喀原来游牧的乌尔匝河(今名乌勒吉河)地方打牲、伐木、捕雕。有俄罗斯属下打鹿人二百余名进入我等住处，杀死纳普图基等四人，将我擒拿，沙拉阿玛金等十五人逃出。据此，本是你国打鹿人二百余名侵入我国属地，杀死我喀尔喀四人。而你们反说是伊尔颠即额尔德尼等二十人进入敖嫩河附近山中，杀死你们狩猎的三名索伦人，真是荒谬。既然你我两国边界业已议定，请将你国俄罗斯属下打鹿人二百余名入我界乌尔匝河、杀死伊尔颠即额尔德尼一伙四人情节查明，并行文本院。同日，理藩院又以咨文致俄国议政大臣，言及我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属下鄂勒巴图牛录，康熙三十四年因避噶尔丹而入俄境，事在两国定界之后，应予归还。

康熙帝第五次南巡 康熙四十四年(1705)二月初九日，康熙帝开始第五次南巡，从京师启程。行前，他晓谕吏、户、兵、工等部：河工虽告成功，尚须察验形势，筹画善后规章。康熙帝乘舟经过天津、静海、青县、于二十二日进入山东省境内。在德州，于舟内多次召见历算学者梅文鼎，并赞扬他是“佳士”。又经过临清州、东昌、济宁，于三月初六日进入江南境，十一日抵扬州府。他就河工善后方略指示张鹏翮，并命直隶、山东治河工程按照河南例，由该省巡抚就近料理。十七日，康熙帝抵苏州府，十八日，召见河官，责备河标兵久疏操演，军容不振，与其糜费钱粮，不如奏请裁汰。又命江苏巡抚宋荦主持刊刻《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五日，康熙帝至松江府。二十七日，在松江小教场行宫前检阅江宁八旗及绿旗官兵。四月初一日，康熙帝离松江，初三日抵杭州，初五日在演武场检阅八旗、绿旗官兵，初七日诏赦浙江福建两省死罪以下罪犯，减等发落。十八日，康熙帝离苏州。二十二日抵江宁。二十三日遣尚书徐潮祭明太祖陵，二十六日检阅江宁驻防官兵，诏赦安徽、江苏所属地方死罪以下罪犯，减等发落。二十七日，康熙帝赴明太祖陵行礼，然后离开江宁。二十八日在京口检阅水师。闰四月初一日，康熙帝自江天寺登舟渡江，驻杨州宝塔湾。初六日，康熙帝从扬州启行，经宝应、淮安。于初九日至清口。初十日登陆往高家堰，遍阅河堤。十三日，康熙帝乘舟渡黄河，登陆，巡视九里冈。二十日，

诏赦山东死罪以下罪犯，减等发落。二十二日，谕示河标兵多而无用，命裁去一千零六十一名，留一千名。二十八日，康熙帝等返回京城。

曹寅奉旨刊刻诸书 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康熙帝谕示江宁织造曹寅刊刻《全唐诗》，又命十名闲居江浙的在籍翰林参与校订。曹寅受命后，即于扬州天宁寺开设诗局。他不仅董理刻事，随校随写，不敢少怠，而且从厘定凡例，安排刻板，直到印刷、装璜、也都亲自过问。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全唐诗》终于刊刻完成。康熙帝认为该书刻的甚好，海内文人学士也称誉该书是"康版书"。《全唐诗》是康熙年间彭定求等编成，九百卷，共收唐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附有唐五代词，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并附作家小传，按时代先后编次。间有校注，考订字句异同及篇章互见情况。该书收罗宏富，可窥见唐诗全貌。不过，该书也有误收、漏收，作品重出，小传、小注错误等缺点。不久，曹寅又受命刊刻《佩文韵府》。该书四百四十卷，拾遗一百一十二卷，张玉书等奉敕编纂。书以元阴时夫《韵府群玉》和明凌稚陵《五车韵瑞》为基础增补而成。全书按《平水韵》一〇六韵排列各字，下注反切和各书释义，然后以二字、三字、四字的顺序排列词尾相同的韵藻，下列古书用例。其次是对语——对仗的词语及摘句，即包括这个词的诗句。两书原有的词语列前，增补的词语列后，标上"增"字。本书材料丰富，词目多达七十万条，征引典故时注明出处，为人们查找典故提供了方便。该书因是辗转抄来的材料，未加核对，故错误较多。曹寅除奉旨刻书外，还捐资刻印了施闰章《学馀全集》，朱彝尊《曝书亭集》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拉藏汗杀死第巴 康熙四十四年(1705)，拉藏汗执杀第巴桑结嘉错。拉藏汗，原名拉藏鲁贝，我国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重要首领。祖达延汗、父达赖汗世居西藏执掌政权。康熙四十年，达赖汗死后，拉藏鲁贝杀死其兄，夺得汗位。拉藏汗一走上政治舞台，便与第巴桑结嘉错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拉藏汗怀疑第巴害死了达赖汗，便利用拉萨举行祈愿大法会之机，暗中使人杀死了第巴的近侍官员。第巴桑结嘉错得知情况后，集合部下逼迫拉藏汗离开了拉萨。拉藏汗为了报复，前往当雄集合八旗蒙古兵向拉萨进军。因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上层喇嘛居中调解，第巴桑结嘉错被迫退职，其子阿旺仁青见桑继任第巴。桑结嘉错为了东山再起，秘密买通了汗府内侍，企图在食物中投毒，杀死拉藏汗。不料，事被拉藏汗察觉，拉藏汗佯装返回青海，于黑河(那曲卡)集合蒙古军队，分兵三路，从果拉、盖莫昌、堆隆杀回拉萨。桑结嘉错知道阴谋败露，匆忙集结卫藏兵民迎战。但是，由于缺乏准备，桑结嘉错被拉藏汗打败，逃往贡噶宗，被拉藏汗妻次仁扎西擒获，不久，在莫隆被处死。拉藏汗执杀了第巴桑结嘉错以后，又废掉了桑结嘉错所立的达赖喇嘛仓央嘉错，于是，他全部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直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准噶尔军进攻西藏，被杀止，总计统治西藏十六年。

《古今图书集成》初步编成 康熙四十五年(1706)四月，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初步编成。早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五月，康熙帝就曾令翰林院官员依照《唐类函》体例，从唐至明，辑成完书，以资观览，并作为《唐类函》的续集。但是，该书开编不久，康熙帝又发现以前的类书均不理想，便决定再编一部新的大型类书，初步命名为《汇编》。该书的实际主撰人是陈梦雷，他被诬为耿精忠逆党而发往沈阳给披甲新满洲为奴。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东巡，陈梦雷御前献诗，陈述已往，康熙帝知他曾为进士，授过编修，是少有的人才，便将他召还京师，侍皇三子诚郡王允祉读书，赐宅城北，安顿家属。陈梦雷到城郡王府后，准备给王爷进讲，便开始将古代书籍，按类给以归纳整理。康熙帝闻知这一情况，就接受允祉意见，命陈梦雷编辑大型类书，必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例、部分有纲有纪，勒成一书，以光大圣朝文治。康熙帝对陈梦雷工作极为支持，除指示训诲，钦定条例外，还亲到陈梦雷斋中，书写"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联句相赐。陈梦雷工作更加勤奋，编书进展非常迅速，从康熙四十年十月起，至康熙四十五年四月止，大型类书《汇编》终于初步编成，约计一万五千余卷。康熙帝对《汇编》极为重视，特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并立即组织儒臣编校。由于种种原因，《古今图书集成》直到雍正六年(1728)才刷印六十四部。该书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总计一万卷，分订五千册，约一亿字，内容广博，经史，天文地理，乃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无所不包。

仓央嘉错被废及真假达赖喇嘛之争 康熙四十五年(1706)，被废除的达赖喇嘛仓央嘉错死于青海。仓央嘉错是第巴桑结嘉错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桑结嘉错被杀后，仓央嘉错更加耽于酒色，放荡不羁，日益为拉藏汗所不满。于是，拉藏汗上奏清政府，请求朝廷废掉仓央嘉错，诏准由他另行寻认的意希嘉错为达赖喇嘛。清政府因桑结嘉错过去帮助过噶尔丹，因此对其所立的达赖喇嘛也不感兴趣。清政府一方面派人往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一方面颁旨废掉仓央嘉错，并敕谕拉藏汗将仓央嘉错解送北

京。康熙四十五年，仓央嘉错在赴京途中，死于青海。但是，拉藏汗所立意希嘉错，在青海、西藏僧俗人中，引起了普遍不满。他们纷纷指责拉藏汗所立的达赖喇嘛为“假达赖喇嘛”。康熙四十九年(1710)，以察罕丹津为首的青海诸台吉在理塘寻认了新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他们最初将这个转世灵童安置在德格土司(今四川德格县)，后来又迎居西宁塔尔寺，请清政府予以册封。清政府考虑到蒙古各部的团结，派遣侍卫阿齐图前往宣谕，将新呼毕勒罕送往北京。因察罕丹津说新呼毕勒罕还没有出痘，清政府不得不同意令其暂居青海。此新呼毕勒罕即噶桑嘉错。由此出现了真假达赖喇嘛之争。因为清政府已于康熙四十八年承认拉藏汗所立意布嘉错为真达赖喇嘛，所以，康熙五十四年，清政府又派人往青海，指出理塘所出呼毕尔罕是假。至此，真假达赖喇嘛之争遂告一段落。

康熙帝第六次南巡　康熙四十六年(1707)正月二十二日，康熙帝从京师出发，开始第六次南巡。二十五日，在静海县杨柳青登舟。二月初一日，康熙帝舟泊德州第六屯，对贵州巡抚陈洗密折奏报土司情形颁布谕旨，强调以不生事为主。十五日，康熙帝舟抵江南台庄地方，康熙帝登岸接见耆老，询问农事、生计。二十日，康熙帝由清口登陆，详视溜淮套，见地势甚高，开挖新河工程艰巨，即使挖成亦不能直达清口，无助于泄出高家堰堤下之涨水，因此否决阿山等人所拟方案，命疏浚洪泽湖各口，以利泄水，挑浚蒋家坝、天然坝一带旧河，以通粮船。康熙帝还责备原议溜淮套开河方案坏民田庐、毁民坟塚。二十一日，命将沿途所立开河标竿尽行撤去，百姓见后，均踊跃欢呼万岁。康熙帝晓谕马齐等人说：凡天下事行之有益，自应速办；无益，断不可轻举。好似人身有病，才可用药饵针砭，如果无病，有人说割肉可以延年益寿，断不能听。开河道理也是如此。二十二日，康熙帝对河道总督张鹏翮不随时巡视河堤，唯以虚文为事提出斥责。此后，与此有关官员均革职、降级。三月初六日，康熙帝由扬州抵达江宁府，初八日，检阅江宁驻防官兵，初九日，亲往明太祖陵行礼。十一日，康熙帝离江宁。十六日抵苏州。十七日，密封敕谕致工部尚书王鸿绪，询问有关官员骗买苏州女子事情。二十日，康熙帝离苏州。二十三日至松江府。二十四日检阅松江提标官兵，表彰江苏按察使张伯行居官清廉，并提升为福建巡抚。二十八日，康熙帝离松江。四月初二日抵杭州，初五日检阅驻防官兵。十二日离杭州。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康熙帝在苏州。二十四日抵扬州。五月初二日，向张鹏翮等河官谕示治河形势及方略。二十二日，康熙帝返回京城。

原济关心民间疾苦　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月，大画家原济在扬州去世，终年六十六岁。原济，字石涛，本姓朱，名若极，明朝靖江王后裔。他自幼善于书画，长成以后，继续研习，所画山水、人物、花卉极佳，著有《画语录》一书，总结绘画经验。原济反对泥古与拘守一家，主张创造，主张创立自己的风格。他曾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人的发眉不能长在我的面目上，古人的肺腑也不能进入我的腹腔。我自发我的肺腑，揭我的发眉。他反对庸俗与愚昧。在山水画创作中，在经管位置、用笔用墨、皴法等方面有许多经验，在描写山川、林木、海涛等不同对象与四时变化方面，也掌握了不少技巧。石涛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淮安、扬州两郡大水，雨后洪流，千里直下，许多地方成为泽国。为此，他写了一首《雨歌草》，其中说道：四月五日天不昼，风师雨师天不宥。雨深水湿路不通，农不望耕市不贸。人民畏雨不畏天，只怪司天错时候。淮南三十六州场，千里洪波倾水窦。沿途向释来往希，州岸城围崩莫救。世间薪米喜者登，世外轸恤真难觏。乾坤不发眼前疮，人民怎去心上肉。昨宵梦入江湖宽，两手恨与水相扣。今朝池上望汪洋，飞鸟飞云水上骤。灾祥不记野夫心，雨水不害野夫疚。充分反映了原济和当地灾民的共通心理。

清政府禁止天主教　康熙四十六年(1707)，清政府明确实行禁止天主教政策。最初，利玛窦为传播天主教来到中国。由于利玛窦规矩，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没有发生冲突，所以康熙帝承认传教士信仰宗教自由，出巡时还曾亲临教堂赏赐。康熙四十四年(1705)，罗马教皇十一世派遣使节多罗到达中国，干涉天主教中国教民尊孔祭祖，把中国习俗视为异端，干涉中国内政。这样，天主教传教士就同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发生冲突，并且干扰了清政府正常的统治秩序。对此，康熙帝不能允许。他谕示多罗：近日西洋来人很杂，先将定例晓谕明白，以便后来人遵守法度，不致违反。以后，西洋来人不再回去者方准到内地居住；如果今年来明年去，此种人不许居住。此种人就好比立在大门前，议论人屋内事，既多事，又不令人信服。经过康熙帝的斥责和限制，康熙四十五年，多罗离开北京。此后，康熙帝敕令：凡在华传教士，需领执照并表示永住中国，才许留住；不遵守利玛窦规矩者驱逐出境；领执照长住中国者，和中国人一样受到保护。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发执照。康熙四十七年，清政府对颁发的执照进行了核查，凡不领执照的传教士解送澳门，驱逐出境。清政府实行禁止天主教政策，有效地抵制了西方早期殖

民主义者，保证了清朝封建国家的政治独立而不受干扰，与此同时，也并没有影响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吸收。

朱三太子案结　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二十日，朱三太子案结，有关人被处以不同刑罚。还是同年二月十三日，闽浙总督梁鼐密折奏报“贼党窜聚情形”，就谈到为首者为一念和尚等，以朱三太子名义，安营于大岚山，有众一千余人，现除擒斩五名外，已陆续拿获八十余名。当时李煦也密奏浙江“贼情”说嵊县人张念一、张念二为首，以施尔远为军师，“煽惑民心”，纠众百余在慈溪县羊角殿，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官兵五十余人进剿，千总以下十余人被杀，绍兴府官兵再往剿，才把他们击败。已被捕获的施尔远等人供称：在四明大岚山有众千余，张念一、张念二即张君玉、张君锡，已在苏州拿获。十五日，浙江巡抚王然疏报拿获大岚山张念一、张念二等，康熙帝谕示张念一所供朱三太子及其子等速行追拿。三月初四日，梁鼐又以密折奏报大岚山情形，说派丁役扮作乡民前往察访，“走遍各山，细问土人，并无贼人屯聚处所，现今地方宁谧。”据查，张念一、张念二原系越狱逃犯，初时与叶天祥等六人结党，渐有附合者百余人。先在嵊县、慈溪等处行劫，继至阳觉殿分赃，千总娄汝初等带兵往捕，被伤致死。后因官兵追拿，分散逃匿。张念一与其党十五人逃至苏州被获。据供同伙者九十六人，今已拿获八十五名。不久，梁鼐再次密奏大岚山情形，说张念一等与江苏太仓“奸僧”一念似属两伙，为托名煽惑计，总以朱三为名。据查朱三改名何诚，有子六人，第三子已死，因缉拿太紧，妇女六口已自缢，第五、六子及孙一人已被捕获，朱三与其长子朱尧、四子朱壬在逃。闰三月十二日，曹寅密报浙江审张念一情形：所称朱三太子，不过借端煽惑，恐吓愚民，一时受刑，细问总属不符。一念和尚与张念一等实非同党。四月十二日，山东巡抚赵世显咨报缉获改名王老先生的朱三太子。据供，此朱三太子年七十五岁，是明朝后裔，名叫慈焕，排行第四。有子六人，第三子已死，其余均被拿获。妻、妾、儿媳各一，女三，均已自缢，康熙帝谕示：朱三是明代宗室，解往浙江议处。六月二十日，清政府审结朱三太子案及大岚山案。将朱三即王士元及其子朱壬等解至京城，问明正法。浙江案犯内张念一、张念二等七人凌迟处死，朱兆琦等二十二人立斩，其余二十六人连同妻子发往宁古塔。十月初五日，朱三即王士元父子六人解至京城。朱三供认他真是明朝崇祯帝第四子，九卿等以为明崇祯帝第四子已于崇祯十七年前身故，又传唤明代老年太监均不认识，便以明系假冒，将朱三即王士元凌迟处死，其子五人俱处斩。

《清文鉴》编成　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清文鉴》一书全部编成，总计二十一卷。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康熙帝就提出要编修一部满文字书。当时，他对侍臣讲述了编纂这样一部书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恐怕后生满洲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且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很多可以通用，现今译者尚知其意，后生子弟未必知此。康熙帝把编书的任务交给翰林院学士傅达礼，令他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用，集成一书，以有益于后学。在编修过程中，儒臣们分类排纂，每天缮稿进呈，康熙帝亲自加以审订，大到天文地理，小到名物象数，十二字母，五声切音，全都包括在内。这样，经过三十多年努力，《清文鉴》终于告成。康熙帝赐王以下、内外文武大臣各一部，并亲自撰写序言。两年以后，康熙帝又命教习唐古特书的官员阿尔必特祜、乾清门侍卫拉锡，会同蒙古侍读学士、中书等，编纂了《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一边写满洲字，一边写蒙古字。《清文鉴》的出版，虽然并未能将各地满语方言全部厘定与统一，但是它保证了官方通行的书面满语的规范与纯正，不仅便利于当时的流通与应用，而且对后世亦有很大教益。

《平定朔漠方略》编成　康熙四十七年(1708)七月初九日，《平定朔漠方略》成书。该书始编于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初四日。当时，康熙帝召议政大臣、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学士等，示以北征噶尔丹机宜。诸臣敬阅毕，上奏：噶尔丹穷荒巨寇，煽惑群心。皇上为中外生民计，亲统六师，远涉绝漠，庙谟神算，百日之内，必奏凯旋。于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常书、张英奏请，将皇上征讨噶尔丹所记言行编成书，即可垂于后世，也是一朝盛事。康熙帝允准，并正式命内阁、翰林院负责编撰。十二年以后，《平定朔漠方略》编成，康熙帝亲写序文，其中说：厄鲁特蒙古噶尔丹赋性凶残，中怀狡诈，戕贼其兄弟，兼并四部，蚕食邻封，其势日张，其志益侈。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圉一日不靖。《平定朔漠方略》总计四十八卷，温达等奉敕编纂。记事起于康熙十六年六月，止于康熙三十七年十月。主要载述清政府与厄鲁特蒙古各部交往中康熙帝的上谕，以及有关材料，有些内容为清圣祖实录所不载，是研究清朝前期清政府与厄鲁特蒙古各部关系的重要史料。

康熙帝垂泪废太子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四日，康熙帝巡视塞外返京途中，在布尔哈苏台地方，把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召集到行宫前，流泪宣布废除允礽太子位。当时，皇太子允礽跪在地

上，康熙帝垂泪宣布他的罪状，主要内容是：专擅威权，肆恶虐众，将诸王大臣随意捶挞；穷奢极欲，衣食所用已经超过皇帝标准，仍不满足；恣取国库钱财，遣人拦截蒙古等部入贡使者，抢夺进贡皇帝的物品；对亲兄弟无情无意，对诸皇子不闻不问；结党营私，窥伺皇位，探听皇帝起居动向，企图害死皇帝。康熙帝最后谕示大臣们说：不能让这样不孝不仁之人为国君，否则，国家必被败坏，人民必遭涂炭。说毕，康熙帝痛哭倒地。在大臣们规劝下，他恢复常态，命文武官员发表意见。众王公大臣都表现出非常难过，不敢多说一句话，只是连说皇上所见，非常英明。同日，康熙帝为了打击允礽的政治势力，下令将格尔芬、阿尔吉善、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等人立行正法，将杜默臣、阿进泰、苏赫陈、倪雅汉等人充发盛京（今沈阳），将允礽即行拘执。十六日，康熙帝回到北京，即把诸王、贝勒等副都统以上大臣召到午门内，宣谕拘禁太子允礽事情，康熙帝又亲自撰写祭文，在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还把允礽转移到咸安宫幽禁。二十四日，把此事颁告全国百姓知晓。

清廷储位之争加剧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四日，康熙帝废除允礽太子位后，清廷的储位之争更加激烈。皇长子允禔认为康熙帝立嫡不成，必定立长，于是积极活动。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康熙帝察觉到他的野心后，立即宣布：允禔秉性躁急、愚顽，不可立为皇太子。允禔见自己夺储无望，便向康熙帝推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皇八子允祀，还利令智昏地奏请康熙帝杀掉允礽。这些使康熙帝认识到，如果允禔和允祀结成同党谋取帝位，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康熙帝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不久，发现允禔与一个会巫术的人有来往，企图用巫术镇魇允礽；允礽母惠妃又向康熙帝奏称允禔不孝。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命革除允禔王爵，严加幽禁。皇长子允禔失势以后，皇八子允禩势力骤增。允禩精明能干，党羽多，声势大，在朝中也有一定威望。他积极活动，谋取太子位。但是，康熙帝很快也发现允禩有政治野心，特别是发现他署内务府总管事以后，到处拉拢人，博取虚名，甚至将皇帝所赐恩泽，归功于己，侵欺皇权。于是，康熙帝又以交结党羽，谋害允礽等罪名，将允禩锁拿，交议政处审理，并革去贝勒爵位。在锁拿允禩时，皇十四子允禵保奏允禩无谋害允礽之心，使康熙帝十分震怒，拔刀欲杀允禵，多亏皇五子允祺及时跪抱劝止，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储位空虚，诸皇子夺储之争日加剧烈，康熙帝决定把缺位补上，以堵塞诸皇子争储之路。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复立允礽为皇太子；三月，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授皇太子以册宝。

张英居官有"安心之法"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张英病逝，终年七十二岁。张英，字敦复，又字梦敦，号乐圃，江南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县）人。他于康熙二年中举，康熙六年考取第二甲第四名进士，改授内弘文院庶吉士。张英在朝任职期间，曾随侍康熙帝达二十余年，是清初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张英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期间，正职是礼部尚书。当时，正是乌兰布通之役后，康熙帝舅父、一等公佟国纲在平定噶尔丹叛乱的乌兰布通战役中阵亡。康熙帝非常痛心，务求隆重祭葬。但编修杨暄撰写的佟国纲祭文被康熙帝斥为极其悖谬，下令严惩杨暄，以惩戒将来。张英也因未能详审祭文而被革去礼部尚书，直到两年以后才官复原职。然而，不及两年，张英又因教习庶吉士之误而被连降三级。尽管康熙帝认为张英与那些言行相悖的假道学有很大不同，并且后来仍命他任教习，但是，张英却经过几次波折之后，总结了一套"安心之法"。他经常以白酒一杯、清琴一曲聊以自慰，非理事决不做，费力挽回事决不做，败坏生平、不可告人事决不做。在衙门里，一事当前，只往稳处想，不将迎于事前，也不留滞于事后。就这样，张英克服了往日形神交困的状态，终于又成为康熙帝十分信任的大臣之一。他升任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平定朔漠方略》一书的总裁官。张英不仅是康熙朝的名臣，而且一生写了许多书，主要有《周易衷论》、《易经衷论》、《书经衷论》、《存诚堂诗集》等。康熙帝得知张英逝世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痛，赐祭葬加等，谥号文端。

《佩文斋书画谱》修成　康熙四十七年（1708），《佩文斋书画谱》一书修成。该书是孙岳颁、王原祁等人奉康熙帝敕命编纂。全书一百卷，其中论书十卷，论画八卷，历代帝王书二卷，书家传二十三卷，画家传十四卷，无名氏书六卷，画二卷，御制书画跋一卷，历代帝王书跋一卷，画跋一卷，历代名人书跋一卷，画跋七卷，书辨证一卷，历代鉴藏十卷。该书分门列目，考证精详，所引书共一千八百四十四种，每个条目下均注出处，搜罗极为广博，是关于论书画、书画家小传和书画题跋的巨著。

江苏、浙江等地农民开展夺粮斗争　康熙四十七年（1708），王鸿绪上奏康熙帝，谈及江、浙等地农民开展了夺粮斗争。奏疏中说：江浙去年旱灾，蒙皇上蠲田租，发仓谷，截漕米，又全蠲四十七年地丁钱粮。但是，今年因米价稍贵，穷民未免艰难；又因近年官法废弛，不轨之徒在内煽惑，遂有市井"奸民"倡率饥民吵闹官府，打抢富家，一呼而集遂致数百人，

官府一时无法。近日督抚俱在浙江审事，江宁省下祟官米不得法，遂致"奸民"聚众抢夺米铺三四十家，其余江、浙各府州县此类事件也屡有发生。至于各府州县村镇"奸民"聚众，以米贵为名抄抢富家者更是不可胜数，而官府对此竟不过问，这是变乱发生的重要原因。王鸿绪在奏疏中还建议，待今年收成过后，民情安定之时，再访拿惩治各府州县带头闹事者，以警众安民，只有这样做，才能使百姓害怕国家法律的惩治，消灭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变乱。

熊赐履在朝任职四十年 康熙四十八年(1709)八月二十八日，熊赐履病死于金陵(今南京)，终年七十五岁。熊赐履，字敬修，号素九，湖广孝昌(今湖北孝感)人。他二十四岁成进士，三十七岁升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任康熙皇帝的经筵讲官，四十一岁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提倡程、朱理学，被称为清初的"理学大臣"。熊赐履任秘书院侍读时，曾应诏上万言书，对民情吏治、朝政得失等，侃侃而论，直陈己见，因而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为康熙帝所重视。在充任经筵讲官期间，康熙帝虚心学习，有疑必问，努力探求治国安民之道，熊赐履则是有问必答，耐心讲解，还经常结合国计民生、用人行政等问题，以问答奏对形式，将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灌输给康熙帝。熊赐履还就国家大势向康熙帝提出自己见解，认为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务使家给人足，安居乐业；而河工为国家大役，溃决频繁，长此不治，最为可虑。康熙帝对此深表赞许，平定三藩之后，立即着手治河。熊赐履还就用人行政向康熙帝提出：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从来没有无弊之法。得其人，变化因心，自足以治；不得其人，虽有典谟官礼，也难尽善。此外，在修身明德，格物致知、人性善恶、知行关系、经权文义等方面，熊赐履也经常和康熙帝研究讨论，对康熙帝治理国家有极大启发。熊赐履生平酷爱藏书。他在金陵居住期间，利用金陵书籍甲天下的有利条件，竭力购求，总计得书十万余卷。特意筑屋五间，用来藏书，名为"下学堂"。

著名文学家朱彝尊逝世 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十三日，著名文学家、学者朱彝尊逝世，终年八十岁。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晚号金风亭长，浙江嘉兴人。他生于没落的宰相家庭，对明朝怀有眷恋之情，曾经漫游广东、浙江、福建等地，结交抗清志士张家珍、魏耕、顾炎武等人。康熙十八年，他应博学鸿儒，授检讨，纂修明史。他博学通才，工诗词，写诗二千多首，词六百余首，在清诗词界，是浙派诗和浙西词的领袖。他还辑成《明诗综》一百卷，收明代三千首四百余家诗歌；又纂《词综》，收唐宋金元词五百余家。朱彝尊还致力于经史之学，学问功夫深厚，著有《曝书亭集》八十卷，《经义考》三百卷，以及《竹垞文类》、《日下旧闻》等。

圆明园开始兴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圆明园在京城西郊动工兴建。康熙帝几次南巡以后，对江南灵山秀水发生了极大兴趣。他命善画山水的叶洮设计，在北京西郊海淀西修建园林，作为避喧听政场所。不久，西郊建立起许多园苑，圆明园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时，圆明园正南有澄怀园，西南有蔚秀园和承泽园，东南有朗润园与夕园，东有近春园与熙春园，西有一亩园、自得园、清漪园、静明园与静宜园。在这些园苑中，圆明园规模最大，园景最秀丽，建筑最宏伟。圆明园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三园组成，又称圆明三园，景致非常动人。它周围有二十华里，占地五千多亩。圆明园有四十八景，万春园有三十景，长春园也有三十余景，总计圆明园有一百余景，每一景内还有很多楼、台、殿、阁、廊、榭、轩、馆。圆明园的建筑，绝大部分是中国宫殿式，它不仅吸取了历代宫殿的优点，而且在宫殿建筑的形式上有许多创造性改革，使人感到新奇而不呆板。在平面配置上，也在均衡对称中力求变化，有工字、口字、田字、井字、 字、偃月、曲尺、扇面等形。亭的平面配置则有四角、六角、八角、十字、流杯、方胜数种。殿堂有三卷、四卷、五卷等种。游廊有扒山、叠落各式，与殿宇委曲相通。桥梁有圆孔、莲瓣孔、拱尖孔与石平桥、木板桥等各种式样。园内还有西式建筑——西洋楼，它用白石砌成，再加以精细雕刻，房顶则用中国所特有的琉璃瓦盖成。

康熙帝论禁奢僭崇节俭 康熙四十九年(1710)四月十一日，就御史屠沂条奏节俭事，康熙帝发表议论说：节俭固然是美德，但是大多数人只能说，真正做到的却很少。屠沂所说都是细小处，而糜费多在大的地方。例如，用金钱或取库银馈送礼物，造成国帑亏空；寺庙各有田园，一僧住持一寺即想成为开山始祖，聚徒众成百成千。这些都是很大的浪费。大凡事情说起来容易，办起来就要难得多。过去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这些书朕都见过。后来他任巡抚后，一件事情也没办，只上奏要毁五圣祠，也只是风采一下而已。而过去他刊刻书中许多能办的事情，却一件也没办。二十六日，九卿等议屠沂条奏，康熙帝又说：禁止奢僭而崇尚节俭，极为合理。朕近查宫中人数，皇太后宫及朕所居正宫不过数百人，和明代宫人相比减少了许多。以前光禄寺供应宫中费用每年用银七十万两有余，朕逐渐节省，不使滥用，一年只需七万两。理藩院向来每年赏赐供应外藩

宾客用银八十万两，现在裁减浮费，一年只需八万两。户工两部以前每年所用钱粮数目很多，现在十天一次上奏数目，所需钱粮也已很少。民间僭用妄费，从前屡有禁约，法令也不是不详尽，都是因为奉行不善。同在如果又颁布禁约，也只是徒使法令增多而已。最后，康熙帝命将屠沂原疏发还。

户部发生贪污大案 康熙四十九年(1710)七月二十四日，左副都御史祖允图疏参户部收购草豆舞弊。经刑部审察，书办胡文思、沈遵泗供称：每年商人领银后有送户部堂司官的“公费”，银数帐册都存在商人金壁处。经传问金壁，交出康熙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送银帐簿，内开得银堂官希福纳等、司官根泰等共六十四员。刑部议应将得银堂司官全部革职拿问，尚书张鹏翮等虽无入己银，但其家人曾向商人要银，是否也应革职拿问，需要请旨。康熙帝颁旨表示：此案应由未得银的九卿共同秉公审理，本身不曾得银，家人得银的免革职拿问。二十五日，康熙帝谕大学士等人：希福纳等共侵吞银二十余万两，事已败露，实在可耻。朕反复考虑，终夜不能入睡，如果将他们审问，获罪的人非常多，姑且开自新之路，得赃人员在未审前若将自已所得银全部赔偿，就可免予革职拿问。九月二十四日，九卿等遵旨议奏：查自康熙三十四年户部设立办买草豆监督时起，至康熙四十四年止，得银堂司官共一百十二人，共贪污吞蚀银四十四万余两，连同康熙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希福纳等吞蚀银二十万余两，均应勒限赔完，免其议处。康熙帝最后决定说：部院衙门乃本原之所，希福纳身为大臣，操守贪鄙，不能宽恕，应予革职。

康熙帝南巡造成江南钱粮亏空 由于康熙几次南巡，肆忌拼霍，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月二十二日，康熙帝现在江南总计亏空五十余万两他在谕示大学士等说：留此亏空迁累官民，不合朕宽仁爱养本意。十一月初十日，康熙帝对大学士九卿等两次谈起江南钱粮亏空事情。他说：江南亏空，都是因为南巡费用造成，这不说明反而不好。你们要将朕的谕旨全行抄录，发给有关督抚，令他们查南巡时所用费用数目，只举出大概数目即可。至于以俸禄银扣补，必致派累百姓，绝对不可办。

张英等编成《渊鉴类函》 康熙四十九年(1710)，奉康熙帝命，张英、王士祯等编成大型类书《渊鉴类函》。《渊鉴类函》以《唐类函》为本增补而成，总计四百五十卷，分四十三部，有二千五百三十六小类。除去《唐类函》所辑唐人类书外，又采《太平御览》、《玉海》等十七部类书的内容，编在一起，并采录了二十一史和子、集、杂书中的材料。《唐类函》所辑故实、诗文，只到唐初为止，《渊鉴类函》则补入了元明以前直至明朝嘉靖年间的事类、文章。凡《唐类函》原有的引证，都标“原”字，续增的都标“增”字，以示区别。每类的内容，各分五项，都以释名、总论、沿革为第一，典故为第二，对偶为第三，摘句为第四，诗文为第五，不同于《唐类函》以书名为先后。第一项中《释名》、《说文》、《尔雅》等书的训诂，列在最前，经史子集次之；第二项按典故的朝代顺序排列；第三项采对偶以工致为主，不拘引文的朝代；第四项摘引句，或择序记，或取诗赋；第五项录诗文，分体裁汇集；所有引文一一注明出处。《渊鉴类函》内容充实，检索唐宋以至明嘉靖时的典故、辞藻，使用极为方便。

褚人获成为长篇小说家 康熙四十九年(1710)，褚人获病逝。他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成为清初著名的长篇小说作家。褚人获，字学稼轩，号石农，苏州府长州(今江苏苏州市)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在家塾就读，长大后仍好学不倦，因没有获得科名，就在家乡修建四雪草堂，过着恬淡、优雅、舒适的读书生活，文酒而外，不与一事。褚人获交游虽不广泛，但是，与文学之士毛宗岗、尤侗、洪升等人的接触，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他读书很多，各种书籍便也成了他生活的基础，创作的源泉。褚人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是一百回的《隋唐演义》。这部小说包括自隋文帝伐陈至安史之乱结束共一百多年的历史故事。全书情节，依据罗贯中《隋唐志传》、佚名《隋炀帝艳史》、乐史《太真外传》和其他一些正史、野史、传奇，并且吸取了评书创作、民间传说而写成。全书描述了隋朝末年群雄纷争以及李世民建国的战争过程中，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等英雄人物的聚散，也描述了隋炀帝和唐玄宗骄奢淫佚的宫闱生活和悲欢离合的曲折故事。这部小说强调了瓦岗英雄的侠义，暴露了隋朝杨氏、唐朝李氏两家皇帝和皇室奢侈、腐败、暗无天日的生活，描写生动细致，情节曲折动人。褚人获除写小说外，还写有许多笔记，重要的有《坚瓠集》十五集六十六卷。书中的内容有的是他亲身见闻，有的是抄自他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一定的素材。

福建等地人民发动反富户屯粮起义 康熙五十年(1711)四月，福建发生灾荒，许多农民缺粮。当地富裕大户，乘机屯积米粮，不顾百姓死活，企图获取暴利。泉州府永春、德化两县联界地方人民，忍无可忍，发动起义，反对富户屯粮。他们首先张贴揭帖，指出如果各处富户，不将屯积米石粜卖，就必定要遭到抢夺。随后，愤怒的人民组织起来，开始只有几百人，很快就发展到数千人。起义的人民抢夺富户屯积

的粮米，并竖旗放炮，拒敌官兵。康熙帝得知消息后，曾谕示大学士等说：起事百姓原非盗贼，只因年岁欠收乏食，富户又将米粮屯积，乃不得已而行之。既便如此，清政府还是派军队前往镇压。闽浙总督范时崇檄行汀州镇、漳州镇两总兵官，调延平协游击王继伟、沈必昌，从尤溪大田东路入剿；调兴化协游击杨英，从仙游县进兵，同安营游击晋赋，从安溪县进兵；调漳州城守营游击林发，西路入剿；又调汀州镇标游击杨润，把守永定县。起义的农民见清朝官兵四面合围，便躲入太湖岩地方，后又聚众和清军拚杀。经过后洋及叶板两地激战后，起义农民损失较大，一百四十五人被官军俘获，张振、王富、苏标等领导人先后被擒。起义农民并未因此停止斗争，起义的主要领导者陈五显机智地躲过了清军的搜捕，隐藏到大山深处。后来，范时崇采用剿抚并用策略，派人带领牌照，到深山进行招抚，答应免除死罪，陈五显等二十一人才于本年十月归降清政府。

王士禛居官之余致力著述　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十一日，著名学者王士禛病逝，终年七十八岁。王士禛，字贻让，号阮亭，又自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他出身于大官僚世家，自幼受封建正统教育，有条件博览群书。他二十五岁时中进士，授扬州府推官，居官勤敏，不畏强御，能据案立决疑谳重狱。后迁国子监助教、祭酒等职，还曾充任江南乡试同考官。后来，他又相继升任礼部主事、礼部仪制司员外郎，户部郎中，翰林院侍讲、侍读，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经筵讲官，兵部督捕右侍郎，户部右侍郎，刑部尚书。王士禛居官之余，潜心致力于著述，专攻诗和古文辞，被尊为诗坛圭臬，一代文宗。他一生著述极多，刊行于世的约有三十六种，二百多卷，尤以诗歌最多。他自成进士后，作诗有一千三百余首，到六十七岁时，诗作总计有九十二卷，四千余首，合订名为《带经堂集》，合订前分别为《渔洋集》、《蜀道集》、《渔洋续集》、《南海集》、《蚕尾集》、《雍益集》。之后又有《蚕尾续集》、《蚕尾后集》等。他作诗讲求神韵，力追汉魏唐人风格，要求写诗要天然有真趣，不可造作。在诗论方面，他也能独树一帜，有许多高深见解。王士禛还著有许多笔记丛谈，有《居易录》、《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香祖笔记》等。笔记多沿袭六朝文体，文字简扼清隽，内容也较为广泛，所记内容多耳闻目睹，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学价值。

张玉书居官五十年　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十八日，大学士张玉书在热河病故，终年七十岁。张玉书，字素存，号润甫，江南丹徒(今江苏丹徒)人。他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康熙三年(1664)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左右庶子，日讲起居注官。康熙十九年五月，他以进讲称旨，经部议叙，加詹事府詹事衔，加一级，六月升侍讲学士。康熙二十年，张玉书为内阁学士，经筵讲官。康熙二十一年十月，为教习庶吉士。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升任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康熙二十六年二月，任刑部尚书。康熙二十九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玉书居官五十年间，曾奉命视察河工，澄清了靳辅治河十余年的功过；审理浙江巡抚金鋐捏造虚款及藩司李之粹迎合附会案，使贪官污吏受到查处；跟随康熙帝南巡，对治理黄河多次提出有价值的建议；跟随康熙帝从征噶尔丹，预参帷幄之议，对最终打败噶尔丹做出了贡献。正因为如此，在张玉书随从康熙帝往热河、并在热河病故以后，康熙帝即命大学士温达会同翰林部院官员，以及内务府总管前往吊唁，赐帑金一千两，料理丧事。还派遣内务府监制棺椁幔帐，沿途拨夫役护送回京。康熙帝亲书挽章，加赠太子太保，谥文贞。张玉书故去的次日，康熙帝又亲作挽诗一首，并对大学士等说：朕自幼读书，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五十年来，许多大学士都以年老告辞林下怡养，朕常使人存问。凡在朝诸臣，朕待之甚厚，他们也矢忠尽力，历数十年之久，与朕同白了须发。朕念宿学老臣辞世者辞世，告退者告退，每每伤心痛哭。

邵廷采专心理学　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理学家邵廷采因病去世，终年六十四岁。邵廷采，初名行中，更名廷采，字允斯，浙江余姚人。他出身读书门第，青少年时期在姚江书院学习理学，受教于沈国模。沈国模是书院主讲人，他教导邵廷采说："孺子应当记住，在知人，在安民。"这是邵廷采首次受到当时理学前辈的教诲。除受教于姚江书院外，邵廷采还广泛问学，以使自己对理学逐步有较深的理解。他初读王守仁《传习录》，没有什么心得；后又读刘宗周《人谱》，在认识上才有明显进步。邵廷采四十余岁时，曾主持姚江书院讲席，颁示《姚江书院训约》十条，阐述理学要端，提出立意宜诚、勘理宜精、伦纪宜敦、威仪宜摄、识量宜弘、取与宜严、学术宜端、读书宜进、举业宜醇、功课宜勤，强调务期实践。邵廷采的主要著作，有《思复堂集》十卷、《东南纪事》十二卷、《西南纪事》十二卷、《姚江书院志迫》四卷等。在这些著述中，他强调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者不可不作，即文采未极亦不妨作。这些著作的旨趣义理，在于发明姚江之学，宣扬种种足以表现故明臣庶忠节正直品质的事迹，论述治理国家的思想、理论、措施和制度等各方面问题。邵廷采的学术有一定影响。

他把班、马、韩、欧的史学与程、朱、陆、王的理学两方面的成就，洪炉鼓铸，自成一家，没有金品州界之分。有人慨叹说，自邵廷采死后，不仅东南道学一传景响顿绝，就是想求三百年遗案与胜国轶事讹舛隐讳，也无从征信。

《助字辨略》刊刻 康熙五十年(1711)，《助字辨略》一书由海城卢承琰刊刻成。《助字辨略》，五卷，刘淇编撰，是一部关于虚字的字典书。刘淇字武仲，又署龙田，号清泉，确山人，寓居济宁。他工诗古文，除《助字辨略》外，还有《周易通说》、《禹贡说》、《堂邑县志》等著述。《助字辨略》卷首，作者在自序中，阐明了著述的目的和体例。作者把助字分为重言、省文、助语、断词、疑词、咏叹词、急词、缓词、发语词、语已词、设词、别异之词、继事之词、或然之词、原起之词、终竟之词、顿挫之词、承上、转下、语辞、通用、专辞、仅辞、叹辞、几辞、极辞、总括之辞、方言、倒文、实字虚用，共三十类。解释的体例共分六项：正训，反训，通训，借训，互训，转训。该书搜集材料的范围相当广泛，按时间说，从先秦到元代；以内容论，从经传、诸子、史书到诗词、小说，无所不包。只有元曲中的助字，因为纯用方言，没有收入。《助字辨略》共收四百七十六字，按平上去入四声分部编次，不仅引证排比的材料相当丰富，而且对某些字辨析推论的也很详备精当，有不少是后出的王夫子的《经传释词》所未谈到的。该书除采录经传子史中的虚字外，还收集了各个时期的一些俗语。以方言俗语解释诗词内的文字，这是以前字书中所少有的。《助字辨略》奠定了虚字研究的基础，给后代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佩文韵府》修成 康熙五十年(1711)，《佩文韵府》一书修成。该书是康熙帝命张玉书等七十六人撰，于康熙四十三年始修。它是一部汇编词藻典故的词典。《佩文韵府》根据元阴时夫《韵府群玉》和明凌稚隆《五车韵瑞》的"事系于字，字统于韵"的体例，又大加增补而成。因为康熙帝感到《韵府群玉》和《五车韵瑞》两书韵漏不完、舛伪相踵，才命张玉书等博采典籍，并把这两部书的原有材料都包罗在内，《佩文韵府》原本不标卷次，只依照一百零六个韵部，为一百零六卷，而中分二十四子卷，后因篇幅太多，乃编为四百四十四卷。该书编次字词，先分平上去入四声，平声又分上平声、下平声，每声都依韵目分作数十部，每部收入同韵的单字，每个单字下面排列尾字和这个单字相同的词语，按二字、三字、四字的顺序排列。所收单字，都注明音义，词语下面，则列载名项出典。所收词语典故，凡是《韵府群玉》、《五车韵瑞》所已采的，叫作韵藻，列在前边，两书所未收的，别标"增"字，排在后面。罗列的材料，各以经史子集为次。共一语而诸书互见的，则先引最初之书，其余依次注在下面，又别以对语、摘句附于其末。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帝又命儒臣拾遗补阙，康熙五十五年续编成《韵府拾遗》。原来也不标卷次，后来除依一零六韵部以一韵为一卷外，又把其中篇幅稍繁者，分作六子卷，共为一百二十卷。《韵府拾遗》所补，体例是：为前编已有的单字，加注字书的反切；增补前编未有的单字，兼注音义；增补前编未有的词语，叫作补藻；增补前编未备的注释，叫作补注。

清政府审理《南山集》案 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戴名世当时是翰林院编修，他为诸生时，曾著《南山集》一书，书中关于南明永历朝事多采自《滇黔纪闻》。《滇黔纪闻》为戴名世同乡方孝标作。方孝标曾任学士，顺治十五年因科场案牵连遣戍，一年后赦归。康熙十二年赴滇黔，吴三桂反清，他拒官不受，被黔抚曹申吉拘留。方孝标佯装癫狂，乘间逃出，返回江南，追记在滇黔所见所闻，因著《滇黔纪闻》。康熙二十二年，戴名世在"与余生书"一文中论写史时，认为南宋灭亡前仅居一小岛，而史书中对此记载非常详细，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隆武政权在闽越，永历政权在两粤和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更应当详细记述。康熙四十一年，《南山集偶钞》辑成时，方苞、朱书作序，龙云锷以及戴名世的学生龙玉王捐资刊行。康熙五十年十月十二日，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康熙帝命有司严察审明。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刑部审察戴名世《南山集》案，认为戴名世书内，将本朝年号削除，号入永历大逆等语。据此，戴名世立即凌迟，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内也有大逆等语，应剉其尸骸，二人之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之子年十六以上者俱拟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功臣家为奴。方氏族人拟发往乌喇、宁古塔。汪灏、方苞为戴名世书作序，俱应立斩。康熙帝命九卿议奏。四月初十日，刑部等衙门再议此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汪灏在内廷纂修多年，已经革职，免死入旗。方氏族人不应留于本处，命将刑部奏本暂贮内阁。康熙五十二年二月，清政府就《南山集》案作最后处理：戴名世立斩，其家人从宽免治罪。方孝标之子方登峰等免死，并其妻子充发黑龙江。受牵连的汪灏、方苞等免予治罪，入旗。尤云锷、方正玉免死，徙其家。

江南发生科场案 康熙五十年(1711)，江南

乡试，正主考官左必蕃，副主考官赵晋。十一月初九日发榜，因主考官徇私受贿作弊，士论大哗。二十四日，数百名诸生聚集玄妙观，抬拥五路财神直入学宫。有的人作打油诗讽刺考官，诗中写道：左邱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还有的人用纸糊住贡院匾额，改"贡院"二字为"卖完"。江宁织造曹寅向康熙帝折奏说：今年文场秀才等甚是不平，中者甚是不公，显然有舞弊行为，因此扬州秀才扰攘成群，将左必蕃祠堂全部拆去。江南乡试主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也疏奏：撤闱后闻舆论喧传，有句容知县王曰俞所荐吴泌、山阳知县方名所荐程光奎，都是不通文理者，臣也感到不胜惊愕。康熙帝颁旨命有司严察。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九卿议覆：江南科场贿通关节之副考官编修赵晋改斩立决（后从狱中拖出，借尸冒称自缢），呈荐吴泌试卷同考官句容县知县王曰俞也改斩立决，夤缘中式吴泌及说事通贿俞继祖等照原拟绞监候，呈荐程光奎试卷之山阳县知县方名改斩立决，入场前在贡院内埋藏文字、入场后抄写中式的程光奎照原拟绞监候，请人代笔中式的徐宗轼及夹带文字中式的席玕照原拟枷责，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失察革职。康熙帝就这一事件谕大学士说：现今考试官不遴取真才，只图贿赂，拉关系作弊的逐渐增多，此等人若不严加议处，即行正法，绝对不可。

清政府处理陈四流民案 康熙五十年(1711)，清政府处理陈四流民案，许多官员因此被降级。先是，山东百姓班汉杰叩阍控告山西陈四等聚众抢劫。陈四等供称因康熙四十四、四十五两年本省歉收，故于四十六年自山西带领妇人、子女、亲戚一百三十余口逃荒于陕西庆阳府居住两年半，康熙四十八年至河南，又由河南流移至湖广、贵州。刑部议将该案发往湖广，由总督会同河南巡抚查明严审，陈四等妇人子女发回原籍取保安插。康熙帝认为刑部所议非常荒谬，他说：山陕等省每年都获丰收，陈四等何曾遭遇饥馑？如果是流移饥民，自应徒步荷担，沿途乞食，到有良田地方就应停下耕种，养瞻妻子，为何又乘骡马，手执刀枪等器械绕行各省。似这样十百成群，越界远行，该总督并不上奏，不知是何居心？况且如此多人飘流几年，每日需要许多口粮和喂马草料，都从何处取来？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是流民！以前有伪朱三太子事件，许多人都知道，一些富豪大户还把他迎至家中，供其酒食，请人教他读书，此等事情朕都知道。康熙帝责备刑部尚书齐世武、卞永誉办事草率。十月初一日，经再议，陈四以鸠党抢夺处斩立决，陈六等三十六人及妇女三十六人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康熙帝当日就流民陈四一案召陕西、湖广、贵州三省原任督抚、礼部尚书贝和诺、刑部尚书齐世武、郭世隆、工部尚书陈诜、左都御史赵申乔等，诘问纵容滋蔓陈四等情由，下部察议。经部议，郭世隆革职，陈诜、齐世武各降五级留任，赵申乔降四级留任，贝和诺降一级调用。陈四等所经过府州县官，行文该督抚查参。

噶礼、张伯行互参案发 康熙五十一年(1712)正月，江苏巡抚张伯行上疏力劾两江总督噶礼，告他在上年科场案中，以五十万两银，徇私贿卖举人，不肯审明实情；初到两江总督任，就对两省文武属官，逢迎趋附者，虽秽迹昭彰亦进行包庇，守正不阿者，虽廉声素著也要吹毛求疵。噶礼秘密购到了张伯行的条陈，也捏撰数款，星夜驰奏，劾张伯行有七项罪行，并否认得银五十万两事。一时间，朝野大哗。噶礼，满洲正红旗人，开国功臣何和礼四世孙。他在康熙三十八年七月至四十八年四月任山西巡抚期间，就因贪婪无厌、加派私征、虐吏害民而屡遭御史劾奏。只是因为他矢口否认，康熙帝又未加深究，才不但未被处理，反而升任两江总督。从此噶礼更加肆无忌惮，上任才几个月，就把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一律劾罢。张伯行，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东）人，进士出身，被康熙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官，曾任内阁中书、济宁佥事道、江苏按察使司按察使、福建巡抚等职，为官廉正，刚直不阿。互参案发生后，康熙帝极为重视，先后令尚书张鹏翮、总漕赫寿、尚书穆和伦、张廷枢严审。由于这些人偏袒噶礼，问题未能澄清。还是康熙帝明察秋毫，在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十二日作出决定：噶礼革职，张伯行留任。后来，噶礼欲毒其母，经过严审，问题终于搞清，被令自尽。

清政府实行"孳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二十九日，康熙帝谕大学士、九卿等：朕览各省督抚奏报编审人丁数目，并未把加增之数开报。天下承平已久，户口日多，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土地并未扩大。应令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不增不减，永为定额。此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查明，另造清册题报。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朕就是要知道人丁的实际数，不在加增钱粮。这样，清政府遂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有其历史原因。清朝沿袭明朝制度，地税、丁银分征。清政府虽然多次实行蠲免钱粮，但田赋蠲免不等于丁银减轻。虽然丁银也屡有蠲免，但清政府对人丁一直没有进行彻底清查。康熙年间，人丁增长很快，他们大都不入户籍。这样，国家对这些人无法进行控制和管理，地方官吏豪绅则乘机压榨，

使贫苦百姓不得不迁徙、流亡。流动人口日益激增，必定要干扰社会安宁，引起社会动荡。清政府为了通过改革赋役制度来控制人口，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便决定实行"孳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孳生人丁永不加赋，把全国丁银总额基本固定，从中央到地方不得随意增加，使广大农民负担相对稳定，逃亡人口减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它还为以后清政府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奠定了基础。

允礽太子位再度被废 康熙五十一年(1712)九月三十日，康熙帝宣布再废允礽太子位。当时，他巡视塞外刚回到北京，便向诸皇子宣布：皇太子允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康熙帝奏知皇太后以后，便命人将允礽拘执看守。十月初一日，他又向诸王、贝勒、大臣等宣谕重新废黜允礽的原因：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不辨，大失人心；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康熙帝还告诫诸大臣：今后如果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立即诛杀。允礽太子位再度被废，根本原因是皇帝与储君、皇太子与皇子之间争夺权位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太子复立不久，太子党就又团聚在一起，他们谋求权力和地位，从而与康熙帝要求皇权必须绝对统一发生了矛盾。太子复立后，与诸皇子的矛盾也立即尖锐化，从而遭到了皇子党的大肆攻击。在这两种矛盾中，皇帝与储君的矛盾是主要的。复位不久的太子允礽曾发出怨言：古今天下，哪有四十年的太子？康熙帝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曾对太子党提出警告。康熙五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畅春园大西门内箭厅召见诸王大臣宣称：有人依附皇太子而结党。各位大臣都是朕提升的，受恩五十年了，现在要依附皇太子，不知是何居心？为了彻底粉碎太子党，康熙帝还令将都统鄂善、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副都统悟礼锁拿候审，将步军统领托合齐解职拘禁宗人府。但是，这样做并没有缓解皇帝与储君的矛盾，于是，康熙帝决定再次废掉皇太子允礽。

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部 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派遣图理琛等人出使土尔扈特部。图理琛，字瑶圃，号睡心主人，姓阿颜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他步入宦途后，曾任内阁侍读。康熙五十一年，迁往伏尔加河流域的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派遣使臣到北京朝贡，乘此时机，康熙帝决定派遣使臣前往该部慰问。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图理琛使团一行由北京出发。他们经张家口，过喀尔喀蒙古牧地，进入俄国境内的楚库柏兴(今苏联色楞格斯克)在这里，因等待俄国沙皇准行的谕令，而耽搁五个多月。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他们继续前进。途中，渡过了柏海尔湖(今苏联境内贝加尔湖)，穿过了西毕尔斯科(即西伯利亚)，终于在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初一日，到达了阿玉奇的驻地玛努托海(今苏联马纳特)，受到了阿玉奇派出的喇嘛和官员的热烈欢迎。第二天，使团与阿玉奇汗会面，宣读了康熙帝的圣旨，转交了康熙帝赠送给阿玉奇汗的礼品。阿玉奇汗感激不尽，大张筵席，款待使团一行人。阿玉奇汗还叮嘱使团成员，回国后一定要问候大皇帝。图理琛使团一行在玛努托海停留了十四天，在完成使命之后，于六月十四日启程回国，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图理琛使团是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第一个使团。图理琛回国后，编有《异域录》一书，叙述俄国及土尔扈特山川、民风、物产，翔实地记述了使团与俄国交涉，和阿玉奇等人往来的情况。

清政府处理顺天乡试案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处理顺天乡试舞弊案。顺天乡试中第一名查为仁之父查日昌，请人为其子代笔，贿买书办，传递文章，事发后脱逃被获，处斩监候。查为仁及书役龚大业处绞监候。代作文章的邵坡，革去举人，杖徒。失察的御史常春、李弘文罚俸一年。二十六日，继续处理顺天乡试舞弊案。中式的周启，本系原任步兵统领托合齐家人周三之子，请人代笔，串通誊录吏役通同作弊。事发后，周三又贿嘱司狱弄死首告伊子的邵文卿，希图灭口。周三、周启俱立斩。说合通贿的谈汝龙、高岳，受赃书吏何亮公、钱灿如绞监候。代周启作文的王廷诠杖徒。失察的誊录所、受卷所官、监察御史、提调官等均革职。

学者毛奇龄逝世 康熙五十二年(1713)，著名学者毛奇龄逝世，终年九十一岁。毛奇龄，字大可，又名甡，浙江萧山人。清初参加宁波抗清义军，失败后到处流亡十余年。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检讨，充任明史纂修官。康熙二十四年托病辞官。毛奇龄著述极多，对经学尤为精通。他死后，弟子蒋枢编辑遗集，分经、文集二部。经集有《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术》、《春秋毛氏传》等五十余种。文集合诗、赋、序、记及其他杂著有二百三十四卷。毛奇龄培养的弟子李塨、邵廷采等，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

冷枚绘成《避暑山庄图》 康熙五十二年(1713)，冷枚完成《避暑山庄图》绘制工作，为清圣祖玄烨六十寿辰献上了一份厚礼。冷枚，胶州人，字吉臣，号金门画史，生年不详，约卒于乾隆七年(1742)。他是清朝康熙晚期三个著名的宫廷画家之一，与焦

秉贞、沈喻齐名，擅长于仕女、神佛、罗汉等人物画。冷枚进入清朝宫廷画院的时间，大约在康熙四十年(1701)前后。在任职清廷画院近四十年时间里，他画了大量的画，题材广泛，成绩卓著，很受最高统治者的器重和赏识，在我国画院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冷枚的《避暑山庄图》，取景范围包括平原、湖区佳景的全部，是一幅承德离宫后苑的通景画，即避暑山庄的总图。所画景物从避暑山庄东部崖殿"万壑松风"殿座开始，一层层向北展开，包罗四围秀岭，十里澄湖的整个湖区、平原区的主要建筑群和湖光波影、树石林立的自然风貌。画景右边画到武烈河及东部山区，左边画到西岭山区为止。表现了冷枚将宽旷的避暑山庄后苑部分和远山列岫全部纳入画幅内的高度概括能力和清湛的艺术技巧，看后令人心旷神怡，悠然自在其中。此图近景岗阜陂陀，绿茵似毯，柞柳杂树点缀其间，布景起处平淡天真，烘托出塞北风景。《避暑山庄图》留下了避暑山庄后苑的早期典型面貌，具有一定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清政府严格科场制度　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月初七日，为严格科场制度，清政府同意御史倪满条奏四款：举子入闱，俱穿折缝衣服、单层鞋袜，只携篮筐、小凳、食物、笔砚，其余物件不许带入，以防夹私；添设稽察官兵，举子押进号舍后，不许私从栅栏外出；为防弊窦，天晚不准收卷，即行封门；顺天贡院号舍七千四百余，今科投卷举子七千四百九十余人，由顺天府添造，贡院土围墙改成砖砌。三十日，九卿等又增议四款：为避免传递夹带，将贡院围墙筑高，窝铺席棚不许挨墙搭盖；誊录书手、对读生员，务选择正身，严禁顶替入闱，代人作文；监生考试照例先考试录送，各省监生于乡试一年前起本省印文送部；发榜后，中式举人俱按限期到府丞衙门填写亲供，与试卷一起送部细验笔迹。

《律历渊源》成书　康熙五十三年(1714)，《律历渊源》一书共一百卷编成。康熙帝比较重视自然科学。他曾选拔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集中到宫中学习；其中也有上了年纪的著名学者，从事进一步研究。这些人中，有梅文鼎的孙子梅珏成，苏州府学教授、精通天文历算的陈厚耀，钦天监五官正何君锡之子何国柱、何国宗，蒙古官学生明安图，原任钦天监监副成德。康熙帝经常把这些人召到御座旁，或教他们几何、数学，或和他们互相讨论，研究问题。在听课的人中，还有康熙帝的子、孙，其中以皇三子诚郡王允祉学得最好。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康熙帝决定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在蒙养斋纂修律吕、算法等书，以允祉及皇十五子允禑、皇十六子允禄充任纂修，何国宗、梅珏成充任汇编，陈厚耀、魏廷珍、王兰生、方苞充任分校。康熙帝命将所纂书每天进呈，他亲自修改订正。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论述算学的《数理精蕴》、论述历法的《历象考成》、论述乐理的《律吕正义》等书相继编成。康熙帝将这三书合为一部，赐名《律历渊源》。该书是一部反映当时中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它不仅系统而又条理地收集、编排了明末清初传入我国的西洋数学、几何学、天文学以及声律学知识，而且也汇集了中国传统的历算及声乐精华，颁行以后，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此外，通过这部书的编纂，一批科技人才也成长起来。

康熙帝推广新稻种　康熙五十三年(1714)，康熙帝决定向大江南北推广新稻种。他把一石御稻种发给苏州织造李煦，命其推广，并试种双季连作。康熙帝渴望水稻能一年两熟。他在一首诗中表达了这种心情：紫芒半顷绿阴阴，最爱先时御稻深。若使炎方多广布，可能两次见秧针。水稻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又是高产作物，因此，康熙帝特别注重水稻栽培。他在宫内丰泽园种有实验田，以玉田谷种播水田数区，每年九月成熟收割。一年六月下旬，水稻刚出穗，他去观察情况，突然发现一棵水稻比其它棵都高，而且籽粒饱满，便将其收藏起来作种子。第二年试种，果然又在六月成熟。经过几年的辛勤实验，康熙帝终于培养出了水稻新品种"御稻米"。这种稻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生长期短，适于北方，南方可以一年两熟。康熙帝心中充满了实验成功的喜悦，决定向大江南北推广。御稻种在南方深受欢迎，几年以后，就传播到江苏、浙江、安徽、两淮及江西等地。开始，李煦在苏州的实验没有成功，康熙帝就派专人去苏州进行指导，提早于三月插秧，结果获得成功，第一季亩产与其它稻种相当，第二季亩产则有大幅度的提高。康熙帝不仅在南方推广新稻种，而且也支持在北方通过实验逐步推广。结果，直隶、天津、承德推广种植新稻种都获得成功。

蒙古地区大雪成灾　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十七日，蒙古吴喇忒、阿霸垓、蒿齐忒等部大雪，牲畜倒毙，部民饥困。康熙帝谕示理藩院派遣善骑司官三员分别出张家口、古北口、喜峰口，问明各旗牲畜倒毙伤损情形。三月初二日，派出官员回奏。康熙帝命运张家口等处仓米及牲畜赈济吴喇忒、察哈尔等部各旗，散给两月。三月间，又派遣户部尚书穆和伦前往察看。四月初七日，赈阿霸垓部穷苦人丁十岁以上者每口给乳牛一头，母羊三只，无牲畜台吉每人多给母羊三只。五月初六日，查明苏尼特部无牲畜台

吉、壮丁户口共六万四千九百余人,赈济牲畜,折银十万余两。五月初九日,康熙帝谕示理藩院官员:闻被雪各蒙古因朕赈济,并未损伤一人,朕甚喜悦。蒙古等已知捕鱼,可将渔船及网给与,令仍在泽旁捕鱼而食,将所给米粮节省,留以度冬。又所给牲畜不久蕃息,即可渐至富饶。

俄国东正教徒组织传教团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十七日,经清政府同意,俄国修士及神职人员七人到达北京,主持在北京东正教徒的宗教活动。康熙三十二年,北京东正教北堂建立。康熙四十一年,沙俄政府借口马·列昂节夫年迈,无力主持北京的东正教堂,要求清政府准予俄国另派教士两人来北京接替,清政府没有同意。康熙五十年,俄国政府又派人前来北京,要求清朝理藩院准许俄国另派教士来京接替马·列昂节夫,并以此作为沙俄同意图理琛使团过境前往土尔扈特的交换条件。康熙帝同意了这个要求。这样,俄国东正教修士及神职人员遂来到北京。在这批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中,有修士、大司祭依腊离宛,教士劳伦特,助祭菲里蒙等人,他们组成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住在俄罗斯北馆。这是俄国派遣的第一个北京传教士团。从此,俄国东正教便加强了它在北京的活动。

温达病故 康熙五十四年(1715)五月十五日,大学士温达因病逝世。温达,满洲镶黄旗人,姓费莫氏。他初任笔帖式,后授都察院都事,不久又升为户部员外郎,都察院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兵部督捕理事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户部右侍郎,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等。在任兵部督捕理事官时,温达奉命随皇七子允祐、都统杜思噶尔、副都统达里善、内大臣额驸尚之隆管理镶黄旗大营,在出征噶尔丹过程中,忠于职守,竭尽心力,受到康熙帝褒奖。在任户部右侍郎期间,温达曾远赴西南,调查解决云南、贵州总督巴锡和贵州提督李芳述、贵州护威宁镇印游击高鉴互劾事件,表现出了明察秋毫的办事态度和秉公无私的办事精神。在充任《本朝国史》、《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明史》等书总裁官时,温达都尽心尽责;尤其对《平定朔漠方略》一书的编纂,更是倾尽心血。温达患病期间,康熙帝特派太医院诊视,并赐良药;病故以后,表示深切轸悼,赞扬他久任机务,功劳卓著。

赵凤诏巨赃案发 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月,山西巡抚苏克济疏劾太原知府赵凤诏贪赃三十余万两,奏请革职拿问。赵凤诏父、户部尚书赵申乔以居官不能教子,求赐罢斥。二十五日,康熙帝令赵申乔仍在任供职。不过,他对赵凤诏所行却极为恼怒。康熙帝回忆西巡时,曾与赵凤诏谈起居官清廉问题。当时,赵凤诏振振有词地对康熙帝说:居官受贿,好比妇女失节。赵凤诏以花言巧语欺骗了康熙帝。所以,赵凤诏巨赃案发后,康熙帝斥责他是天下第一贪官,并命刑部将此案查清。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二十二日,经刑部审明,原任太原知府赵凤诏巧立税规,勒索银两,婪赃十七万四千六百余两。经九卿议复应立斩,赃银追取入官。康熙帝谕示大学士等:赵凤诏如此贪滥,不忠不孝已极,应当正法。但是,他贪赃银极多,不可不追,应照数追回。赵凤诏暂缓执行。康熙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经九卿等议复,康熙帝同意,把由县令越升太原府知府而不思洁己的赵凤诏处斩。

意大利画师郎士宁到达北京 康熙五十四年(1715),意大利传教士、画师郎士宁到达北京。郎士宁,原名约瑟·加斯提阿纳,耶稣会士。他在一七一四年五月四日从欧洲乘船来中国,于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九日抵达澳门,半月后至广州,曾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宫廷画师。他曾参与增修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和营造工程。他用西洋法绘《聚瑞图》,还为皇帝画肖像画。他纯用西法作中国形式的画,即用中国的笔、墨、颜色和纸绢,还采取中国的构图习惯,作肖像画如同照片一样。郎世宁与唐岱合绘的《春郊阅骏图》,采用中西混杂的表现方法,既有中国画的传统形式,又取西洋画法之长,透视明暗,注重写实。

蒲松龄逝世 康熙五十四年(1715),《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逝世,终年七十六岁。蒲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他生在一个"书香"家庭,可是祖上都未取得功名。他父亲被迫弃儒经商,到他时就更加贫困。蒲松龄从小热中功名,十九岁时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振一时,以后却屡试不第。三十一岁时,他迫于家贫,应聘为宝应县知县孙蕙幕宾,整天和应酬文字打交道,心情不快,一年以后便辞幕回家。此后主要是在缙绅先生家设帐教学,直到七十岁才撤帐回家。这四十年间,他一面教书,一面应考,始终是个穷秀才,直到七十一岁时,才援例出贡。蒲松龄一生著作丰富,除诗、文、词、赋、戏曲、俚曲和一些杂著外,主要的代表作是《聊斋志异》。这部书在他四十岁时已基本写完,此后不断有所修改和补充,凝结了他一生的心血。《聊斋志异》中部分作品是蒲松龄的亲身见闻,也有的是承袭了过去的题材而加以创造发展,大多数则是记述当时民间和下层文人中间的故事传说。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

封建礼教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另一些作品，则是揭露了封建社会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种种阻碍，表现了他们的反抗斗争。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也是《聊斋志异》的一个重要主题。作者饱含感情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作品，揭露了现实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热情地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

广州海关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约定八款 康熙五十四年(1715)，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开展对华贸易，与中国广州海关订立协定，总计八款。主要内容包括：允许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自由贸易，许其雇佣中国人，许其购买食物及其它必需品，为修理船帆等许在岸上支一帐篷，悬英国旗的舢板驶过关口不予检查，海员衣袋不受搜查，等等。清政府广州海关设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当时，清政府正式宣布开放海禁，置江、浙、闽、粤四海关：江之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浙之宁波，闽之厦门，粤之黄浦，各设监督，管理榷政，进行贸易。在广州，具体办理对外贸易业务的，则由十三行负责。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一千六百年(明朝万历二十八年)，是得到英国女王伊利莎白所授予的特许状，专同东方进行关于生丝、棉织品和宝石贸易的公司，由一个经理和二十四个董事管理。实际上，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欧洲商人、殖民者在东方联合起来进行殖民地贸易的庞大的垄断公司。它一开始就是欧洲资产阶级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强有力的工具，受到他们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广泛支持。他们有权在东方维持自己的海陆军，有权宣战媾和，同时也拥有大量资本，大批装装力量，整批船舰，既可运货，又可作战。英国东印度公司活动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印度半岛，实际上包括整个亚洲。康熙年间，由于中国强大，英国东印度公司还不可能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但是，它与中国广州海关约定的八款，已开始暴露出殖民侵略的苗头。

康熙帝命富宁安效力西陲 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帝命富宁安前往西陲，参加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割据势力的斗争。富宁安，满洲镶蓝旗人，曾任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仓场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当时，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在噶尔丹覆灭以后，由策妄阿拉布坦执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策妄阿拉布坦和清朝中央政权的关系是从属、和平、正常的。但是，随着力量的增长，他逐渐改变了对清朝中央政府极恭顺的态度，派兵抢掠哈密。清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做出全面安排。富宁安就是在这一形势下，以办事大臣的身份前往西陲总统调度。这年五月，富宁安到达甘州。他根据了解的情况，同将军席柱会商后，向康熙帝提出了进兵方略。根据这一方略，富宁安来到巴里坤，选择水草丰美处驻兵。后因策妄阿拉布坦兵退，他又回到肃州经理粮马。在此期间，为了解决向西陲前线运送军粮的困难，富宁安不仅提出了新的运输措施，而且还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屯田措施。清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布鲁尔、图呼鲁克、杜尔博尔金等处派人耕种，结果，清军粮米供应比较充裕。在屯田中，富宁安不畏艰辛，不辞劳苦，亲自踏勘，被康熙帝称誉为“无愧于大臣之道”。后来，富宁安被授为靖逆将军，视师边防，再次驻军巴里坤。他率兵赴乌鲁木齐，擒敌甚多，还获得大批驼马牛羊。此后数年，富宁安一直戍守西陲，防范策妄阿拉布坦割据势力对蒙古其它部以及内地的袭扰。康熙帝命富宁安效力西陲，不仅反映了康熙帝的知人善任，而且反映了当时清朝国内民族关系的复杂尖锐。

顾贞观作词有成就 康熙五十四年(1715)，著名词人顾贞观在故乡病逝，终年七十八岁。顾贞观，字远平，号梁，别号弹指词人，常州府无锡(今江苏无锡市)人。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熟悉文史，擅长诗词，少年时代即加入吴江吴兆骞兄弟为台柱的东南慎交社，在社内以开朗豪放、才思敏捷，而成为佼佼者。青年时代，顾贞观辞亲远游，来到京师，诗词创作得到大学士魏裔介等人的称道。后来，他结识了当朝权相明珠子、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通过性德，把自己少年时代的好友、因科场案流放到关外的吴兆骞营救回归。顾贞观在给吴兆骞的一首词中写道：“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只看杜陵穷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贞观顿首。”感情深沉，缠绵悱恻，动人肺腑。顾贞观晚年回归故里，在无锡惠山脚下造三楹书屋，题名“积书岩”，日夜拥读，足不出户。他这时的诗词创作，一洗过去绮丽藻艳的风格，趋向简朴古淡。他在一首《灌园》诗中写道：“不自量筋力，求为人灌园。意惟营一饱，迹若避群喧。”反映了晚年生活的凄苦潦倒。顾贞观词作奄有众长，自成机轴，被人称为集大成者。作品有《纻塘诗集》、《楚颂亭诗》、《扈从清平遣调》、《弹指词》等。

准噶尔部击退俄军入侵 康熙五十五年(1716)正月，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大策凌敦多卜率兵一万人驱逐侵入额尔齐斯河地区的俄国军

队。当时，俄国政府派遣中校军官巴赫尔慈率领三千人自托皮尔斯克出发，沿额尔齐斯河上溯，企图寻找金矿，并建立亚梅什堡作为侵略据点。准噶尔兵反击获得了胜利，俄军毁亚梅什堡后撤，但又建立了鄂木斯克要塞，派兵驻守。

清政府新定禁海政策 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在畅春园内澹宁居听政完毕，召大学士、学士、九卿、科道近前，指出：现今海防为要。次日，他又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在这两次谈话中，康熙帝明确提出了禁海问题，阐明了禁海的理由和原则。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兵部等衙门遵旨，会同陛见来京的广东将军管源忠、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广东广西总督杨琳，根据康熙帝谕旨，议定了禁海的规则。经康熙帝批准后，下达执行。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商船同东洋贸易照旧，同南洋吕宋、噶喇吧贸易禁止；外国商船前来贸易照旧，地方文武官员要严加防范；禁止向国外卖船、运米出境和人员留住国外。为了更好地实行禁海规定，康熙帝还提出了一系列禁海措施，要求臣下认真讨论，具体落实，主要是：对商船、渔船及有关人员加强管理；在海坛(今福建平潭岛)、南澳(今福建南澳岛)设官阻截私往南洋贸易船只，在东南沿海要冲地方设立炮台，增加驻军，充实水师，经常巡查，严拿违禁者；对沿海各省之间往来商船、渔船实行盘验与护送；选用得力人员充任沿海各省督抚。清政府实行禁海政策，是为了防范海寇和西方殖民势力，同时也为了防范汉人与海外的联系。康熙帝担心汉人与清政府不一心，害怕海内外汉人联合起来推翻清政府。禁海政策的实行，暂时防止了海寇的泛滥，以及海寇与西方殖民势力的勾结，对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有一定意义。但是，它妨碍了我国沿海地方经济的发展。

准噶尔军进扰拉萨 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一月，我国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遣大将大策凌敦多布率军六千，启程进扰西藏。这支军队行动十分诡秘，他们选择了一条崎岖险绝、人迹罕至的道路前进。此外，他们还扬言护送拉藏汗的儿子丹衷夫妇归乡省亲，借以掩人耳目。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准军突然出现在藏北纳克产地区，抢劫了当地波木宝一部人众，然后经腾格里海直驱达木。拉藏汗对此毫无准备，仓促召募兵勇，开赴达木地区迎敌。准噶尔军与拉藏汗的军队在达木一带多次交战，起初双方互有胜负，后来，由于藏军战斗力低下，叛卖活动时有发生，西藏军队无法抵御准噶尔军队的凌厉攻势，拉藏汗被迫撤入拉萨。此后，拉藏汗一面深沟高垒，严密设防，一面向清政府驰书请援。大策凌敦多布包围拉萨后，经过短暂准备，便发起全面进攻。准噶尔军与城里的间谍取得了联系，在城内间谍的策应下，拉萨城里一片混乱，内奸乘机开门迎降，拉藏汗的防守顷刻瓦解，十月二十九日，大策凌敦多布率领准噶尔军涌入拉萨城，凶残地屠杀城内军民，把整个拉萨城浸入血泊之中。准噶尔军占领拉萨以后，大策凌敦多布下令抢劫三天，拉萨城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城内无论男女老幼或被侮辱痛打，或被反绑双手吊起来鞭扑，逼迫他们供出自己的财产所在。拉萨人个个惊恐万状，奔走避难。由于准军的暴行，辉煌壮丽的布达拉宫遭到了严重破坏，甚至五世达赖的寝室、灵塔也遭到亵渎，拉萨城到处呈现一片凄凉景象。

《康熙字典》成书 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字典》修成。康熙帝很早就倡导要纂修一部汉文字书。康熙四十九年(1710)三月初九日，他向南书房侍直大学士陈廷敬提出了编修汉文字书的设想：增明代所编《字汇》之阙遗，删明代所编《正字通》之繁冗。于是，成立了编书机构，张玉书、陈廷敬被任命为总阅官，凌绍雯等二十七人为纂修官，陈世倌为纂修兼校刊官。工作者们十分认真，旧有的书籍《说文》、《玉篇》、《广韵》、《集韵》、《韵会》、《正韵》等都尽量利用参考。此外，以上各书缺乏的，自经史百家，以及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所述，也都尽量利用参考，以便旁罗博证，使有依据。经过五年的努力，这部汉文字书终于编成。康熙帝钦定书名为《字典》，意在使臣民奉为常典，以昭同文之治。由于该字典系康熙帝亲自主持编纂，所以后人通称《康熙字典》。《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零四十三个，在辨形、注音、释义、引例等方面，都比以前的字书完备、周密、合用。它的编排体例，采用《字汇》、《正字通》两书行之有效的部首检字法，并将部首及部中字均按笔画为序，便于查阅。正如康熙帝在该书序言中所说：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康熙字典》亦存在一些缺点，由于它是多人合编，成书较为仓促，不仅体例难于划一，就是在注音、释义等方面，也有失误之处。《康熙字典》的编纂，适应了清朝封建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有利于封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格萨尔王传》出版 康熙五十五年(1716)，《格萨尔王传》藏文版在北京发行。《格萨尔王传》内容广博，结构宏伟，是藏族地区广泛流传的英雄史诗。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在十一至十三世纪间，以藏族民间艺人为主，经过不断丰富加工的民间文学作品。《格萨尔王传》篇幅巨大，其中常见的便有

三十多部，约三十万行诗。书中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说唱体裁，有唱词，有散文叙述，语言流畅活泼，表述格萨尔王一生的英雄事迹。《天岭十筮》、《英雄诞生》两部叙述了人间妖魔横行，天上众神决定派遣神子格萨尔下凡，降生在岭国首领僧伦之家。《十三轶事》、《赛马称王》描述格萨尔英武过人，在全部落赛马会上夺取冠军，从而成为岭国国王，并娶珠牡为王妃。《降服魔国》、《霍岭大战》、《降服霍尔》等数十部长篇中描述格萨尔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反抗侵略，消灭危害人们恶魔的种种英雄事迹。全书反映了吐蕃王朝崩溃以后，整个青藏高原陷于四分五裂，人民渴望出现一个拯救世人的英雄，以结束长期动乱的局面。格萨尔正是这样一个爱民如子、无所不能、英武善战的国王。本书还反映了藏族人民对佛教和本教的信仰，以及两教之间的斗争，是研究藏族宗教思想的重要素材。《格萨尔王传》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很高的评价，它与著名长篇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等相比较也毫不逊色。

禹之鼎绘画名著当时 康熙五十五年(1716)，著名画家禹之鼎逝世，享年七十岁。禹之鼎字上吉，号慎斋，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他出身微贱，曾为人仆役，由于喜欢笔墨，主人便教绘画。学成后，他来到京师，在鸿胪寺序班任从九品官。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清政府派遣使节往琉球册封世子尚贞为琉球国中山王，禹之鼎曾充任伴使，陪同前往。康熙二十七年(1688)，禹之鼎在京师画成《王会图》，形象地记录了康熙年间朝鲜、安南、琉球等遣使入贡的情况。所画人物微妙传神，有人写诗赞扬说："禹生禹生真好手，风雨下笔吞瀛洲。录名同上都护府，伴使直押中山舟。"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张玉书、高士奇、张廷瓒、陈元龙等随行。禹之鼎绘成《北征扈从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叛乱的功绩。禹之鼎以画人物肖像名重当时。他为许多名士作画：曾为吴伟业写照，为宋琬画像，为陈廷敬画《燕居课儿图卷》、《水亭玩鹅图》、《楮窗图》，为王原祁画像，为王士禛画《幽篁坐啸卷》，为吴嘌画《西斋图卷》，为岳瑞画《芭蕉仕女图》，为宋荦作《西坡六景图》、《国门送别图》等。禹之鼎画人物画，技法出入宋元诸家，自成一家之法。此外，他也善于画山水景物，为陈廷敬作《水亭玩鹅图》，树石亭榭，双鹅细草，色色隽永。他为王式丹画《十三本梅花书屋图》，也别具特色。

定商船出洋贸易法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二十五日，兵部等衙门会同在京的广东将军管源忠、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两广总督杨琳等议海防事，规定了商船出洋贸易法。主要内容包括：商船只许往东洋贸易，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不许前往，于南澳等地截住，广东、福建水师负责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外国夹板船仍许前来贸易，各地方官要严加防范。今后海船初造时，应报明海关监督，地方官亲验印烙，取船户甘结，并将船只丈尺，客商姓名，货物往某处贸易填写船单，沿海口岸文武官员照单严查，按月册报督抚存案。出海时，每日每人准带食米一升及余米一升以防风阻，如有超额之米，查出入官，船户、商人一并治罪。以小船偷载米粮运至大船者严拿治罪。把船卖给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人立即斩首。留外国不回的，将知情人同船者枷号三个月，该督行文外国，令其将留下人解回，立即斩首。沿海文武官员如遇私卖船只、多带米粮、偷越禁地等事隐匿不报，要从重治罪。此后，经提督施世骠题请，又补充规定了以下内容：凡康熙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都可返回原籍，免于追究。清政府还将上述规定行文山东、江南、浙江等地将军、总督、巡抚、提、镇等官员，要求他们一并严格执行。早在康熙五十五年十月，清政府就曾规定：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在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定商船出洋贸易法是康熙五十五年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亢珽起义失败，清廷立案审理 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月，河南宜阳知县张育徽横征暴敛，苛虐百姓。该县民人亢珽、亢珩等联合渑池人李一临聚众神垢寨起义，劫永宁知县高式青入寨。阌乡县民人王更一也因知县向澄预征钱粮，聚众围县城。八日，清政府得到河南巡抚张圣佐题报，知亢珽所部已直抵宜阳县城附近，张圣佐已发抚标兵三百名，会同镇标兵前往剿捕，康熙帝命张圣佐，要严拿惩处。七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就河南亢珽等聚众起义事晓谕大学士等：此盗案根源，因宜阳县丁忧知县指称军需科派，预征明岁钱粮，又以道官瘦马分给逼养等情由而激变。亢珽等将知县拿去，官兵往战，攻城破寨，始将知县救回。擒贼兵丁贻累于民，又将村庄放火，此皆原任巡抚李锡任内之事。李锡居官固属不堪，但此贼不尽拿获，断乎不可。著刑部尚书张廷枢、内阁学士勒什布乘驿急往，严加查获详审。一面正法，一面奏闻。二十九日，河南巡抚张圣佐疏报拿获王更一等。康熙帝又谕示勒什布：此事起端缘由，如何渐致滋蔓，要尽行详察。借口军需科派，预征来岁钱粮之丁忧知县，如果属实，即行拿问。八月二十四日，河北总兵官冯君洗疏言：宜阳、阌乡、渑池等处"奸民"聚众拒捕，官兵破寨，"贼首"亢珽逃匿，"党恶"王更一已获，余众俱散。十月二十三日，就河南亢珽起义之事，

康熙帝又谕示大学士、九卿等：今天下承平日久，民生疾苦，事无大小，尔等都要留意。不可认为太平之时，区区小事无防碍。凡事都是由小孳大。自古以来，无不以蒙蔽偾事。今河南"盗"亢珽所据神垕寨，就是李自成据以"作乱"之地，枪炮兵器都在。亢　事总由巡抚李锡、知府李廷臣、知县白澄等居官不善，行止不端，逼迫人民，以致于此。康熙五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清政府处理河南亢珽起义案。经尚书张廷枢等审理，刑部议复，除亢珽自缢外，王更一、李一宁等十五人照谋叛律立斩，为从梁必贵等十五人绞监候，协从尚可务等二十四人及亢珽之弟亢珩发三姓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十二日，清政府又对河南科派激变各官进行了处理：阌乡县令白澄以火耗等项派取银六万五千两，宜阳令张育徽以马价等项派取银四千零五十两，均拟绞监候；河南府知府李廷臣私派滥征，出兵时伤良民，拟斩监候；原任巡抚李锡激变地方，应斩立决。以上诸人均已发往甘肃效力，事完后另结。现任巡抚张圣佐未将情形及时奏闻，布政使张伯琮、总兵官冯君洸缉捕不力，均革职。

清政府严查白莲教徒　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二十三日，据山东巡抚李树德奏报，康熙帝知道河南白莲教盛行，并已传到山东。于是，他谕示李树德及太原总兵官，严拿白莲教徒，不可令其活动。十一月初九日，河南巡抚张圣佐疏报：兰阳县(今河南兰考)民李雪臣子李兴邦，在生员李山义家以白莲教为名"聚徒惑众"，今已拿获。康熙帝命其严审定拟。康熙五十七年(1718)四月二十日，清政府对河南李雪臣白莲教案进行了处理。经尚书张廷枢审理，刑部等议复，除李雪臣已经杖毙外，为首之袁进即朱复业照谋反律凌迟处死，郭英抚袁进为子，照谋反之祖父律斩立决。为从之李兴邦等二十二人俱照谋反律斩立决，孙丙等四人绞监候，洪知所等发三姓地方给披甲人为奴。清政府还行令各地方官，凡有白莲等"邪教"，均严查治罪。

著名画家王翚病故　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著名画家、山水大师王翚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六岁。王翚，字石谷，号耕烟敬人，苏州府常熟(今属江苏)人。他出身于书画世家，长成后又向当时画坛领袖王时敏学画。王时敏以他的江南画坛领袖地位与官僚世家的优越条件，带领王翚参观游览大江南北的名胜古迹，观赏名家所藏秘本。王翚由此作画技艺大长，终于成为一代著名画家。他与王时敏、王鉴、琛祁合称"四王"，加上吴历、恽秦平又称王翚善于临古，他仿唐王维的雪景、五代李成的寒林、董源的松风涧水、巨然的秋山萧寺、荆浩的江山卧游、赵孟頫的鹊华秋色等，都很逼真。他仿古并非单纯的复制前人之画，而是以自己的心神去领会古人的笔意与技法，因而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王翚也注意写生。他在家乡胜景虞山摹写十二景，用古人笔法，写眼前丘壑，各种景色尽在图中。他描绘江南春色，把水田、农耕、绿杨、鸟语等景色都能很好地表现出来。王翚画的手卷，以《南巡图》最为有名。该图十二卷，绢本役色。全图描绘康熙帝从宫中出发，至绍兴大禹庙以及回銮的景象，是歌颂康熙帝南巡的历史画卷。他画的《北征图》、《扈从北征图》，形象地纪录了朝中大臣扈从康熙帝亲征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的斗争。王翚作品清丽，见于著录的有四百件。《清晖赠言》与《清晖阁赠贻尺牍》两书，记录了他和画界交往的重要情况。

康熙帝颁布遗诏　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康熙帝将皇子及满汉大臣等召至乾清宫东暖阁，宣布遗诏。他说：此谕已备十年，如果有遗诏，也就是这些话，披肝露胆，今后将不再谈。康熙帝遗诏已经准备十年。康熙四十七年冬，他得了一场大病，病好后即回顾过去，草拟遗诏，随笔自记，十年来从未间断。这次他向皇子、大臣口述的遗诏，就是十年间所记而准备说出的话。五年以后他去世时发布的遗诏，就是在这次口谕基础上删节而成。康熙帝遗诏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享年高，在位久。他总结说，自秦始皇元年以下，称帝而有年号的总计二百一十一人，而在位时间最长的，就是他自己，为此他感到无比欣慰，第二，殚心竭力，勤于政事。康熙帝说：他从政数十年来，有如一日，孜孜汲汲，小心敬慎，不敢怠慢。因为，一事不懂，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第三，用兵临戎，统一国家。康熙帝认为，他自幼经常狩猎习武，所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等事从不畏惧。对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亲征噶尔丹，进军西藏等业绩，他感到非常自豪。第四，力戒骄奢，节用爱民。康熙帝说，他自幼龄读书，就知酒色可戒，小人宜防；平生未尝妄杀一人；时刻注意节俭，认为均是小民脂膏，未敢妄费。第五，不尚虚文，力行实政。康熙帝指出，他即位以来，从不许人说祯符端应，如同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的祝贺，以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等事。他说：这些都是虚文，实不可取，只应当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

朱天保等因请立太子被斩　康熙五十七年(1718)正月二十日，翰林院检讨朱天保等奏请复立允礽为皇太子，疏中写道："皇太子虽以疾废，但是他的过失只在于骄抗，这是左右小人教唆造成的。如果

派遣名儒名臣例如赵申乔等辅佐他，把他周围的小人都罢免，那么，允礽的德行会日益显现，皇上可以再次享受问安视膳之欢。储位重大，不可象下棋那样轻易变动。此外，如果有藩臣在一旁觊觎，那么，皇上一家的骨肉之祸也许会不可避免了。"这一天，康熙帝在京郊温泉行宫门前召见朱天保，问道："你奏折内说二阿哥仁义，你是怎么知道的？朱天保回答："我的父亲朱都纳曾经说过，所以我知道。"康熙帝又问："你奏折内说如今二阿哥圣而又圣，贤而又贤，你是怎么知道的？"朱天保回答："都是我父亲听看守人说的。"康熙帝问看守人叫什么名字，朱天保回答不上来，只说该死。康熙帝又问："你还是个无知的孩子，几句话就被问住了，一定有同谋通信之人，可据实供明。"朱天保供认："这些都是我父亲同戴保商议，写好奏本令我来陈奏的。"康熙帝于是命将朱都纳及其婿戴保用九条铁链锁拿，连同朱天保一起交诸皇子、大臣严审。接着，由于朱都纳等供词涉及，又将副都统常赉、原任内阁学士金宝锁拿。二十一日，康熙帝亲审朱都纳、朱天保等。康熙帝称朱都纳是任意妄言，希图侥幸，取大富贵。审问中，又涉及到都统齐世、辛泰。二十三日，康熙帝继续亲审朱都纳、朱天保等，称朱都纳奸诡特甚，辛泰是卑污无耻之人。二月二十六日，朱天保案审理结束，朱天保、戴保立斩，朱都纳、常赉从宽免死，金宝交与步军统领永远枷示，齐世交宗人府拘禁，辛泰枷号三个月，鞭一百。

清政府加强海防稽察　康熙五十七年(1718)二月初五日，从福建浙江总督满保疏言，为加强海防，修葺福宁州沙埕等处炮台、城寨，在浙江平湖乍浦等五十处安设炮位四百六十门，添造营房，派兵分防巡守。此外，为加强沿海稽察，还将客商责之保家，商船水手责之船户、货主，渔船水手责之澳甲同䑸，各取保结，限定人数，出入盘查。严禁渔船装载货物，接渡人口。凡往台湾之船，必须经厦门盘验后，一体护送前往，而澎而台；从台湾回者，也须盘验护送，由澎而厦。往来台湾者，须由地方官给照，无照偷渡者严加治罪；哨船私载者将该管官一体参奏处分。

康熙帝裁起居注衙门　康熙五十七年(1718)三月初五日，康熙帝谕示大学士等：历观从来帝王，设立起居注，多有更张，其间也多有裁革，朕在位日久，设立多年。近见记注官内，年少之员很多，都不是经历事体之人。他们尚且自顾不暇，又怎能详细记述朕的谕旨？况且官职卑小，不识事之轻重，有人对于事关重大事情不能记忆，以致将朕谕旨多有遗漏，不能全部记录下来。甚至如记注官赵熊诏，还曾私自抄下谕旨，带往宫外给别人看。记注事情，关系重大，似这样做怎么能行？朕设立起居注，时间长远。在位五十七年，一切政事，现在各衙门档案，何必另行记载。随后，康熙帝命大学士会同九卿议奏，起居注衙门如何裁革。十九日，大学士、九卿等遵旨会议：皇上手书谕旨，及理事时所降之旨，并转传之旨，各处都有记载档案。又如本章所批谕旨，六科衙门既经记载发抄，各部院又存档案，都可稽查。现在记注官多是年少微员，有人对事关重大事记不下来，以致将谕旨舛错遗漏，还有的私自抄写给别人看。如果这些人记下的谕旨彼此不同，相互矛盾，那么后果将不可设想。应将起居注衙门裁去。康熙帝表示同意。

清政府第一次用兵西藏　康熙五十七年(1718)三月，清政府派侍卫色楞和西安将军额伦特各自率兵数千人，从青海出发进兵西藏。准噶尔军袭扰拉萨后，清政府一直密切关注西藏动荡的局势。康熙五十六年七月，驻守巴里坤的靖逆将军富宁安首先向朝廷报告了准噶尔兵侵藏的消息。康熙五十七年初，康熙帝收到了拉藏汗的奏疏，疏中报告了准噶尔进扰西藏的情况，请求朝廷发兵援助。这时，清政府还不知道拉藏汗已不在人世。二月十一日，康熙帝召集议政大臣会议，决定派兵前往西藏，援救拉藏汗。不久，清政府得知拉藏汗阵亡，康熙帝又发布谕旨，立即令色楞统率军兵，前往西藏。五、六月间，色楞和额伦特两军先后渡过木鲁乌苏河(即金沙江上游之通天河)，分道前进。色楞主张迅速进军，拒绝额伦特诱敌之计，结果轻敌冒进，孤军深入。闰八月，色楞、额伦特两军在喀喇河(即黑河)北岸会合准备抢先渡河占领狼拉岭。不料准噶尔军已派精兵据守河口，阻挡清军渡河。准军自清军入藏之日，即佯败屡却，诱敌深入，而以精兵埋伏在喀喇乌苏严阵以待。同时，准军在喀喇河口与清军对峙过程中，还分兵潜往清军背后，堵截清军饷道。清军遇准噶尔伏兵后，突围不成，相持一月有余，最后终因弹尽粮绝而全军覆没。

理学名臣李光地病逝　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二十八日，康熙朝理学名臣李光地病逝，终年七十七岁。李光地，字晋卿，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朝初年，他考中进士后，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耿精忠叛乱期间，他正回乡省亲，为平定三藩之乱，特上蜡丸密疏，被康熙帝称为忠臣。在统一台湾过程中，他推荐内大臣施琅为取台主帅，并认为只有施琅才能胜此重任，施琅后来果然不负厚望，终于统一了台湾。李光地的正确主张受到康熙帝高度赞赏。康熙帝对李光地的学识非常欣赏，有时几天之内就多次召问。他任会试考官，与其他考官一起革除弊政；奉

命视察河情，便绘图呈进，提出治理办法；康熙帝重视人才，他便推荐陆陇其等人。他在任直隶巡抚期间，从安民为要，勘治漳河，宁息水患，亲督官吏，扑灭蝗灾，对于各地灾民，贷以牛种，请免赋税。特别是兴修水利，政绩突出，曾经带病工作，受到康熙帝嘉奖。除直隶巡抚外，李光地还曾任职通政使司通政使、兵部右侍郎、吏部尚书等。康熙帝为巩固清初的统治，亲自提倡程朱理学。李光地深明其意，所以在侍讲和修书等场合中都分外卖力。他称朱熹之功可以和日月争光，对康熙帝信仰朱子，索性不发朱子书回非常高兴。他所校理的《御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成为清代官方书籍。康熙帝经常召他进入便殿，相互探讨程朱理学。李光地死后，康熙常曾伤感地说：大臣中了解朕心思的没有人能比得上李光地。

清政府加强八旗驻防线 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鉴于河南地接六省，十分重要，清政府决定派兵驻防，设八旗满洲蒙古马兵六百名，鸟枪兵二百名驻扎开封府，设城守尉一人，满洲、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八人，蒙古佐领、防御、骁骑各二人。从康熙朝中叶始，清政府对八旗驻防已有重大改进，一方面增加新的驻防地，使八旗驻防在全国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另一方面是利用少数民族增强北部和东北的防务。在京畿、长城驻防线，至康熙三十四年，增设了喜峰口、冷口、罗文峪、山海关及右卫(今山西右玉)驻防点，其中右卫一度形成强大的阵容，设将军一人，护军统领二人，副都统四人，下设相应的护军参领、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和护军校。在运河、黄河驻防线，增加了从德州经开封到西安的黄河驻防线，加强了开封驻防点。在长江驻防线，为适应进兵安藏、巩固西南边疆的需要，在康熙五十七年八月，派副都统一员，率满兵二千六百名驻防成都。在东南沿海驻防线，在福州、广州等地分设将军，下设副都统、协领、参领、防御、骁骑校等员，统率兵丁两千名、三千名不等。在东北三省驻防线，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将黑龙江将军移驻齐齐哈尔，瑷珲、墨尔根等地也设官派兵防守。此外，还将锡伯族、巴尔虎蒙古族编入八旗，驻防盛京、齐齐哈尔等地。在康熙朝中叶以后，遍及全国的八旗驻防点和驻防线已经基本形成(甘肃、新疆等地尚未驻防)，巩固了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

允禵任抚远大将军 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十二日，康熙帝以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率领大军援藏。十六日，康熙帝又命护军都统吴世巴等率领第一路于十一月十五日起程，驻扎庄浪；副都统赫石亨等率领第二路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起程，驻扎甘州；抚远大将军允禵率领第三路于十二月十二日起程，驻扎西宁。二十六日，康熙帝又命：允禵既授为抚远大将军领兵前去，该旗纛，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凡不出兵之王，名选护卫三员，贝勒、贝子各二员，公各一员，随允禵军前往。允禵任抚远大将军以后，诸皇子夺嫡斗争更加激烈。其同党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兴高采烈。允禩多次去允禵家，嘱其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送银两供允禵使用。允禵也表示："皇父年高，皇太子这个差使想来是我的。"允禟又告诉其亲信秦道然等说："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得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还说："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话"。十一月十五日，因允禵率军西征，康熙帝亲往堂子行礼，鸣角，祭旗纛。出征之王以下，俱戎服相从。十二月十二日，抚远大将军允禵率军起程。于太和殿前行颁给大将军敕印仪式。十七日，允禵率部抵上花园；二十八日，抵代遥；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八日，驻扎保德外；二月初十日，到达宁夏，折奏军情。允禵任抚远大将军后，自认皇太子非己莫属，一些文武官员也百般迎合。陕西临洮府知府王景灏在康熙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嘱算命人张瞎子到西宁为允禵算命，称："文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运气"。允禵大喜，赏银二十两。

南阳镇标兵丁闹事 康熙五十七年(1718)，河南南阳总兵官高成标下兵丁，因地方官查拿赌博人等，到知府署内争闹，将知府沈潮抬到教场围辱，看守三天。对此，巡抚随即奏闻，御史杨汝谷也随即题参。康熙帝命刑部尚书张廷枢、内阁学士高其卓前往察审。七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就南阳镇标兵丁闹事谕示：传闻此等人皆诡冒营兵，伙同二三百人诈扰百姓，不独河南一省，别省亦有。他命各省严查，九卿等议禁约。八月十九日定例，嗣后营兵如生事扰民，挟制官长，其假冒兵丁分别首从照光棍例治罪，食粮兵丁也照此例一体治罪。该管官革职，兼辖、统辖官、提督、总兵官分别降级调用。文官知情不报者降级留任康熙五十八年五月，清政府对南阳闹事兵丁做出判决：首犯王爵斩立决，从犯刘长子等绞监候，游击王洪道斩监候，把总罗士英杖责充发，总兵官高成革职。

康熙《皇舆全览图》绘成 康熙五十八年(1718)二月，著名的康熙《皇舆全览图》绘成。早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就下令各省地方官，绘图送兵部，以备披览。但当时的地图是用旧法绘制，不了解大地是球形，所绘全是平面图，里程的计算不能

精确地反映出地球表面的曲率。康熙帝学习了天文、历算、几何知识以后，掌握了采用经纬度的精确测绘技术，便购置仪器，利用出巡机会，实地测量，为绘制新地图积累了素材。在征讨噶尔丹的行军途中，每到一地他都亲自进行实地测量，以明确部队与京师的距离及其所在方位。康熙四十六年(1707)，全国政局日益安定，康熙帝决定委派雷孝恩、白晋、杜德美等耶稣会士以及何国栋、明安图等中国学者、开展大规模实地测量，以绘制一幅比较详细的中国地图。绘制者们跋山涉水，走遍各省，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进行实地测量。经过十一年的艰苦工作，绘图终于胜利完成。康熙《皇舆全览图》以铜版刊印成集，比例是一比一百四十万，前有总图，后有各省分图。除新疆地区外，内地十五省以及关外满蒙地区，经过准确测定，都进行了详细的绘制，关门塞口，海汛江防，村堡戍台，驿亭津镇，以及扼冲据险之地，环卫交通之区，无不包括在内。这部地图集是当时世界上地理学的最高成就，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部，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康熙帝对这部地图的绘成非常满意，令九卿细看详核以后，降旨颁发各省。

俄国特使访问北京　康熙五十八年(1719)四月，俄国特使伊兹麦伊洛夫一行奉命出使中国。他们于七月离开圣彼得堡，于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到达北京。该使团任务是：恢复贸易关系，俄商车辆粮秣可以自费；观察中国国土、资源、军备；要求在北京建立东正教堂；请准俄商进入中国内河及沿海口岸贸易，不限人数，所购商品免税；成立商事法庭处理两国商人纠纷；在北京设俄国总领事馆，于各省派领事或事务官等。十一月初十日，康熙帝接见伊兹麦伊洛夫。伊兹麦伊洛夫行三跪九叩礼，面交沙皇国书，国书上写道："谨以和好之礼向抚育天下至圣皇帝请安。两国永归和好，相处多年，今为两国彼此友好相处，特派我近侍大臣列夫。伊兹麦伊洛夫为使臣，请求至圣皇帝大君主召见。本国使臣如蒙准于谒，由其将我所告之言具奏圣主。""为两国和好之利益，我衷心祝愿中国日益繁荣昌盛，诸事成功。"伊兹麦伊洛夫还向康熙帝进献了沙皇礼品，有镜、钟表、罗盘、制图仪、望远镜、显微镜、晴雨计等。康熙帝对伊兹麦伊洛夫说：尔国君对敌国常御驾亲征，海洋广大莫测，狂涛常起，危险殊甚，望尔国国君多加保重。又说：朕始终欲保持与贵国大皇帝陛下巩固之和平，且我两国无必争之理，俄国为严寒遥远之国家，朕如派兵前往，必致全军冻死，且纵有何益？俄国君主亦同，假如为对抗朕而调兵遣将于贵国所不习惯之炎热地带，岂非使之无端而死耶？两国征战，纵互有所获，究于两国何益？两国皆有许多土地，足以自存也。康熙六十年正月二十八日，伊兹麦伊洛夫向康熙帝辞行，康熙帝设宴款待。此前，将回赠俄国沙皇之礼品金碗、珍珠、绸缎等交与俄国特使，对使团亦有馈赠。俄使在京时，同理藩院互换信件，商讨贸易及逃人等问题。关于贸易，中国方面给予俄国使团一百张盖有印章的文书，俄商可以持文书入境，但每次不得过二百人，中国将于边境建城以利贸易。中国方面希望解决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拒绝缔结条约、派常驻代表等建议。

康熙帝谈行围打猎　康熙五十八年(1719)八月初十日，康熙帝自热河行宫启程围猎。十九日，在土城地方对随从侍卫等人说：朕自幼至今，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只，熊二十只，豹二十五只，猞猁狲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二只，哨获鹿数百只。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野兽，不可胜数。朕曾在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如果是常人，一辈子亦不能达此一天数目。朕所以屡次谕示尔等，是因为你们年纪还轻，应当勤学。凡事没有学不好的。朕不过也是由学而能，哪有生而能者的人。

《骈字类编》开始编撰　康熙五十八年(1719)，康熙帝命儒臣开始编撰《骈字类编》。这是一部汇编词藻典故的词典。全书共分天地、时令、山水、居处、珍宝、数目、方隅、彩色、器物、草木、鸟兽、虫鱼共十二门，又补遗一门，称为人事。所收的词，都按类编次。天地门收日、月、风、云、雨、露、地、土、郊、原等词；时令门收春、夏、秋、冬、寒、暑、晦、朔、旦、曙、朝、暮等词；山水门收山、狱、嶂、峤、巅、岫、石、水、江、海、泉等词，居处门收宫、殿、楼、台、门、户、窗、牖、城、市、梁、栋等词；珍宝门收金、玉、银、铁、铜、锡、宝、珠、贝、钱等词；数目门收由一至十以及百、千、万、亿等词；方隅门收东、西、南、北、上、中、下、前、后、左、右、内、外等词；彩色门收青、黄、赤、白、黑、绿、素、红、紫、丹、粉、苍、翠等词；器物门收冠、弁、冕、巾、钗、钿、针、几、车、舆、舟、网、笔、书、弓、油、盐、酒、饭等词；草木门收谷、米、蔬、菜、茶、药、兰、蕙、桃、柳、梅、杏等词；鸟兽门收鸟兽名称名词；虫鱼门收龙、虬、蛟、螭等词以及一般虫鱼的名称；人事门收福、寿、富、贵、喜、庆、高、大、长、清、顺、动、养、静、平、安等词。《骈字类编》专收两个字的合成词，辑录材料以经史子集为次，总计收一千六百多个单字，所收内容多为《佩文韵府》所缺，因而可补其它词书之缺。

清政府第二次用兵西藏 康熙五十九年(1720)正月初五日，康熙帝决定安藏大兵再次入藏。三十日，他命抚远大将军允禵率军从西宁移驻穆鲁乌苏，管理进藏军务粮饷，居中调度；授延信为平逆将军，出青海向喀喇乌苏进兵，为中路之师；授噶尔弼为定西将军，会合云南都统武格所率部队，从巴塘进发，为南路之师；又派将军富宁安、傅尔丹，分别从巴里坤、阿尔泰出师，为北路配合出击之师。鉴于第一次用兵失败的教训，清政府对第二次用兵西藏进行了周密的部署。除上述军事调遣外，为了使军事行动顺利进行，顺应当时大多数蒙藏僧俗民众的意愿，在二月十六日，正式册封塔尔寺的噶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派满汉官兵及青海之兵护送往藏坐床。四月，噶尔弼率领南路军从四川出发，六月攻克察木多，八月初进抵拉里，准军闻风溃逃。清军分三路渡过噶尔招母伦河，并乘大策凌敦多布迎战清朝中路军、拉萨空虚的机会，在八月二十三日一举攻占拉萨，逮捕了一百零一名给准噶尔充当间谍的喇嘛，将为首五名斩首示众。在南路清军入藏的同时，中路军在延信率领下，从西宁出发，青海蒙古各部汗王各率所部兵，或数百，或数千，随大军护送达赖喇嘛入藏，军容甚盛，所到之处，受到了西藏僧俗民众的热烈欢迎。经过在薄克河、齐嫩果尔和楚玛拉等地激战，准军大败。大策凌敦多布兵败不敢退回拉萨，只率五百残兵逃往伊犁。延信将大军留驻达木地方，仅率轻骑减从，护送达赖喇嘛，于九月初八日向拉萨进发，并在九月十五日在拉萨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清政府第二次用兵西藏，取得了彻底胜利，驱逐了准噶尔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

康熙帝不准行庆贺礼 康熙五十九年(1720)正月十二日，诸王大臣请于皇帝在位六十年时行庆贺礼，康熙帝谕示：现在西陲用兵，军民劳苦。去年正月朔日食，今年七月朔又值日食。海洋飓风飘没官兵船只。山左东三府水发被淹，百姓处于饥馑之中。淮黄水大，仅能抢护。人心风俗未尽淳，官箴政事未尽理。此正君臣孜孜求治之时，庆贺之事著停止。十二月十二日，诸王大臣以皇帝在位六十年，再次请行庆贺礼。康熙帝仍不允许。他说：由于世祖章皇帝因为我年幼时没有出痘，令乳母把我护视在紫禁城外，以致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这是我六十年来最抱歉的地方。正月初七日是世祖章皇帝忌辰，二月十一日是孝康章皇后忌辰，我怎么能在正月初七、二月十一日以前行庆贺礼？况且现在西陲用兵，地方官民运米送饷非常劳苦。山陕两年歉收，百姓有的四处逃难。去年陕西省地震，兵民受伤者很多。今年沙城地震，京师地区也有轻微震感。这正是君臣忧勤求治之时，有什么可值得庆贺的呢？康熙帝不准行庆祝礼，对受灾地区却比较关注。六月初四日，陕西两年歉收，将河南开封等府现存仓谷二十万石运往西安，贮仓备用。初八日，直隶保安、怀来及山西蔚州等处地震，又派官员往赈地震灾民，免除震灾地区本年及明年钱粮。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又派官员往陕西分途赈济，由各部院司官十二员分三路携户部库银赈济灾民。兰州一路携银二十万两、延安，西安两路各十五万两。还将陕西所属常平仓谷六十九万二千石，甘肃所属常平仓谷六十七万二千石，酌量动用散赈。

清政府采取措施减少钱粮亏空 由于各省钱粮亏空很多，康熙帝谕示各省督抚确议，怎样才能除弊清理。康熙五十九年(1720)七月初五日，户部汇总各省督抚复奏，定例如下：州县官征收钱粮应随征随解，迟延不解者，知府查报参处。如州县批解钱粮而布政使抵充杂派，扣批不发者，许州县官申报督抚，并报部院题参。现有亏空各督府应确查原因，如知府共同徇隐以致亏空者，即行参革，由知府独赔。州县官有虚报亏空者，督抚据实题参，审明定拟，于本犯名下追还。如系因公挪用以致亏空者，州县官革职留任，限年赔完。仓谷霉烂者在一年内完补，准其开复。州县亏空钱粮，知府揭报而布政使不转报，或已转报而督抚不即题参者，许知府申报部院，将督抚布政使照徇庇例议处，仍令分赔。卫所官员亏空屯卫等项钱粮，照地丁例处分。各督抚于州县亏空事前不尽心防范，事后不竭力补项者，严加议处，责令分赔。

赵申乔居官清廉 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月二十二日，赵申乔病逝于任上，享年七十七岁。赵申乔，字慎旃，号松伍，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县)人，自幼家贫。他是康熙朝初年进士，曾任县令、刑部主事、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偏沅巡抚、都察院左都御史、户部尚书等职。赵申乔居官清廉。他任浙江布政使时，仅带随从家人十三名赴任。到任三天，即宣布革除"南粮布袋"之弊。一年之内，民间即免除税银四千余两。他办事严谨，不用幕僚，凡事都亲自处理。他对僚属们说：欲令州县无亏帑，应当首先革除藩司陋规。于是，他把时节馈送、钱粮加平、兵饷挂发、奏销部费等多种名目的积弊一一禁绝。对于火耗，他分文不取。在任期间，积累贴解银二千余两。康熙帝闻知赵申乔居官操守，称赞他"居官甚清"，"能践其言"。赵申乔在任职湖南时，湖南因私征加耗非常严重，民情不安，康熙帝严旨申饬。赵申乔奉旨后，建御碑亭，檄告属吏，勒石大道旁。他强调：督抚在地方官中非

常重要，巡抚如有不良念头，非法事情，就应当声讨其罪，使他一天也不能站在百姓之上。他自己粗衣粝食，早作晚休，不敢图巡抚之体面，力图作出表率样子。他还在院署中自题一联：但愿居安若堵，何妨署冷如冰。对于藩臬两司，赵申乔明确提出：漫无稽查是失察，知而故纵是徇庇。他还针对当时的重大弊政，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湖南局势日趋稳定。当他离开湖南时，从长沙至岳州数百里以内，送行者络绎不绝。

广州商人组成公行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广州商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及时地调整价格，决定组成公行。公行最初由十六家组成，后来才定为十三家，便称“十三行”。公行负责办理外商货物报关纳税，代理外商发卖、收购货物。外商到广州，必须与公行联系，受其管束，住在商馆内，不准在广州自由出入和过冬，不准携带妇女，不得随意奴役中国人。

山东发生大盗案 康熙六十年(1721)初，山东贩卖私盐者有人劫掠村落，率党横行，阻塞南北通道。与此同时，青州生员鞠士林倡教集众。为此，地方官捕获一百五十多人。二月初一日，巡抚李树德疏报：私盐巨贼王美公等自称将军，聚党行凶，已被拿获，康熙帝遂命都统托赖、侍郎张廷玉、学士登德前往严审。二十八日查明：王美公等五人纠党行劫，拒杀兵丁，宁县捕役徐钦九与他们私通书信，书信为书办于渊代写。鞠士林带领张元皓等三十五人随同王美公行劫。结果，王美公等五人斩决枭示，徐钦九、鞠士林斩立决，于渊、张元皓三十五人等均偕妻发往科布多、乌兰古木地方。此案在审讯时，被捕者有的自称“仁义王”，有的自称“义勇王”，还称党羽有二千余人。张廷玉查清内情后认为：这是一个大盗案，而不是谋反案，因而只就一百五十余人结案，斩七人，戍三十五人，未多株连。

康熙帝不上尊号 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初四日，诸王、贝勒、满汉大臣、文武百官为庆贺康熙帝御极六十周年，联合上疏恭康熙帝二十字尊号：圣神文武钦明睿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谁知康熙帝和以往一样，仍然给以拒绝。他说：从来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这是历代相沿的陋习，专门欺诳不学无术的帝王，以为是尊称，其实并没有什么尊贵之处。现在国家西部地区用兵，官兵披坚执锐，冒暑冲寒、劳苦已久、人民负重跋涉，挽运远道，也很疲困，再加上有许多地方受灾，百姓更加受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修省图治，使百姓受益，哪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有些微贱无耻之人，以为举行庆典必有殊恩，想有所得；更有人以为六十年庆典必定实行宽大政策，乘机故意杀人犯法。可见庆贺无任何益处。康熙帝拒绝上尊号已有十余次。此前，凡国家取得重大胜利，或逢皇帝四十、五十大寿，执政四十、五十周年等喜庆日，诸王、贝勒、满汉大臣、蒙古王公以及达赖喇嘛等，都纷纷请上尊号。对此，康熙帝一律加以拒绝。他并不是不关心臣民乃至后人对他的评价，只是认为，这种活动铺张浪费，加重人民负担，对朝政有害无益。他曾多次重申：如果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使人民各得其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果一切政治不能修举，既使上尊号又有何益？我决不受此虚名，况且，现在官吏很少廉政，百姓也未富裕，君臣之间没有什么功绩可记，再上尊号，加臣子们官秩，只有负愧感觉，决不会有尊荣可言。

朱一贵起义 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十九日，朱一贵率众在台湾起义。朱一贵，福建长泰人，寓居台湾，耕田养鸭度日。他性情慷慨，喜欢交结朋友，痛恨清朝官吏贪污腐败，苛虐百姓。康熙五十九年(1720)，台湾凤山(今高雄)知县出缺，台湾知府王珍兼摄县事，却把政事交与次子办理。王珍征收粮税苛刻，每石要折银七钱二分，多于内地数倍。他还无故监押百姓，勒索钱财。这些倒行逆施引起民情激愤，朱一贵便与好友黄殿等密谋反清。他们相约得一千余人，砍竹为尖枪，在乌山头竖旗造反。朱一贵起义爆发后，清台湾镇总兵欧阳凯立即派右营游击周应龙率兵前往镇压。四月二十七日，朱一贵在赤山(今高雄旗山)大败清军，周应龙狼狈而逃，清南路营参将留景龙被擒杀。三十日，欧阳凯亲率军一千五百人进攻起义军，朱一贵率众与清军大战春牛埔(今台南市境内)。起义军杀欧阳凯及其以下副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十余名，致使清军溃不成军，先后逃往澎湖或泉州。朱一贵等进驻台湾总兵官署和台厦道署，控制了台湾府治，领众一时达三十万人。五月初三日，朱一贵被部众拥立为义王，建立政权。六月十六日，清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奉命赴台进攻起义军。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次激战，起义军损失惨重。闰六月初八日，朱一贵等人被俘。后被解送京师处死，年仅三十四岁。

俄国企图使准噶尔臣服 康熙六十年(1721)七月，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遣使携书信至俄国圣彼得堡。当时朝廷大军进逼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在信中建议：如俄国与准噶尔人订立反对中国朝廷的防御同盟，准噶尔部将允许俄国“探矿者”自由过境。俄国遂遣使至准噶尔，以沙皇书信交策妄阿喇布坦，书信中写道：如准噶尔臣服俄国，俄国可向中国朝廷

交涉，或作军事示威；准噶尔应允许俄国找矿，并让与领土以便俄国建立要塞，保护探矿。当准噶尔部使者赴俄国消息传到北京后，清政府官员曾向留北京的俄国副使兰格提出抗议。后来，由于形势变化，俄国臣服准噶尔部的企图未能实现。

清政府定台湾驻军制度 康熙六十年(1721)十月初五日，福建、浙江总督满保等疏言：台湾等三县相距辽阔，又隔重洋，防汛额兵不免单薄，请增加兵丁。康熙帝谕示大学士等：福建总督、巡抚、提督都奏请台湾增兵，朕意增兵无用。台湾地方水师营著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陆路营著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驻扎。水师有事，陆路可以照应，陆路有事，水师也可以照应。台湾总兵官移于澎湖，亦著兵二千名驻扎，令其管辖，均有裨益。驻扎之兵不可令台湾人顶补，俱将内地人顶补，兵之妻子，不必带往，三年一换。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员，前往台湾巡查。此御史往来行走，彼处一切信息可得速闻。凡有应条奏事宜，亦可条奏，而彼处之人，都知畏惧，至于地方事务，御史可不必管理。康熙帝令将此旨传至九卿。

梅文鼎病逝 康熙六十年(1721)，著名的数学家、历算家、天文学家梅文鼎去世，终年八十九岁。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宁国府宣城(今安徽)人。他从小得父亲和老师指教，就懂得一些天文知识。九岁熟五经、通史事，有神童之称。在三十岁时，梅文鼎就撰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历算著作《历学骈枝》。这是一本专门解释大统历的书。此后，他更加勤奋。在四十余岁时，在经过了二十年的钻研和思考之后，他撰写了第一部数学著作《方程论》。该书阐发了中国古代算学中多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当时，社会上轻视数学研究，梅文鼎却深入研究中算中的方程问题，纠正了一些传世著作中的错误，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和方法，有益于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在将近五十岁时，梅文鼎开始了对西洋历算的研究。在他亲自作序的《勿庵历算书目》中，计有历学书六十二种，一百四十三卷，算学书二十六种，七十五卷。在逝世的那年夏天，《律历渊源》一百卷全部修成，包括《律吕正义》五卷，《历象考成》四十二卷，《数理精蕴》五十二卷。梅文鼎的代表著作，算术方面有《笔算》、《筹算》、《度数释例》等；代数方面有《少广拾遗》、《方程论》等；几何方面有《勾股举阳》、《几何通解》、《方圆幂积》、《几何补编》、《几何摘要》等；三角方面有《平三角举要》、《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等；天文历算方面有《古今历法通考》、《元史历经补注》、《大统历立成注》等。康熙帝对梅文鼎评价颇高，曾特赐御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

清政府首在西藏的驻军 康熙六十年(1721)，清政府在第二次用兵西藏取得胜利以后，决定加强在西藏的施政措施。二月二十八日，抚远大将军允禵疏言：西藏虽已平定，驻防尤属紧要。他报告了在西藏的清军以及西藏地方官员的情况。于是，清政府决定：派满洲、蒙古以及绿旗兵，总共四千名驻扎西藏，由公策妄诺尔布署理定西将军印务，统辖驻藏兵马，额驸阿宝，都统武格俱参赞军务。这是清政府在西藏驻兵之始。此外，因为空布地方的第巴阿尔布巴首先归附，同清军一起取藏，阿里地方的第巴康济鼐截击准噶尔军回路有功，均封为贝子，隆布奈亲身归附清政府，授为辅国公。清政府决定以阿尔布巴、康济鼐、隆布奈以及达赖喇嘛的总管扎尔鼐等四人为噶布伦(意为政务官员)，联合掌政，以康济鼎为首席噶布伦，组建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这既消除了和硕特蒙古汗王在西藏的影响，也改变了以往第巴一人独揽大权的局面，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理。在招抚里塘、巴塘以后，清政府又接受了四川总督年羹尧的意见，把里塘、巴塘划归四川省，由四川统辖。清政府还在打箭炉至拉萨沿途设立驿站，密切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早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清政府就曾派侍郎赫寿前往西藏，协同当时的拉藏汗办理事务，这成为清政府向西藏直接派遣办事官员的开端，后来发展为驻藏大臣制度。康熙朝中晚期采取的上述措施，加强了清政府在西藏地区的施政。

康熙帝举行千叟宴 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多次举行千叟宴。正月初二日，他把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文武大臣官员，以及致仕退斥人员，年六十五岁以上者，总计六百八十人，召到乾清宫前，设宴款待，还命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闲散宗室等授爵劝饮，分颁食品。初五日，康熙帝又召汉文武大臣官员，以及臻仕退拆人员，年方十五岁以上者，三百四十人宴于乾清宫前，命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间散宗室等授爵欢饮，分颁食品，一切礼仪同于初二日。康熙帝还写七言律诗一首，又命参加宴会的满汉大臣官员每人也各写一首诗，记述参加宴会的盛况，并命名为"千叟宴诗"。康熙帝举行千叟宴，实际上始于康熙五十二年。那一年适逢康熙帝六十寿辰，各地许多老人为皇帝祝寿前来京城。康熙帝对这些人非常关心，多次谕示有关部门：朕闻各省为祝寿来京者甚众，其中老人更多，均非本地人，时届春季，寒热不均，或有水土不服，亦未可知。应立即传与汉官等，如有人患病，即令太医院看治，务得实惠。康熙帝还谕大学士等说：天下许多老人为庆祝朕六十大寿，从数千里以外

而来,怎好令他们空手而回,应赐他们筵宴,然后遣回,于是这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在畅春园正门前,设宴款待各省来京老人,其中,九十岁以上的三十三人,八十岁以上的五百三十八人,七十岁以上的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六十五岁以上的一千八百四十六人。二十七日,又宴请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大臣官员、护军、兵丁、闲散人等,其中,九十岁以上的七人,八十岁以上的一百九十二人,七十岁以上的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六十五岁以上的一千十二人。

康熙帝晚年重用胤禛　胤禛即雍正帝,原名允祯,在康熙帝晚年颇受重用。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巡视京畿地区,经新城至赵北口登舟阅河,直到二月二十一日才返回京城。这期间,胤禛一直随行。同年四月十三日,康熙帝往热河避暑,九月二十八日方才返京。这期间,胤禛也随同前往,并多次参加康熙帝举行的围猎活动,康熙帝晚年重用胤禛的明显标志,是委托他查勘通州粮仓,以及代行主持南郊大祀。十月初九日,胤禛奉命率领隆科多等人查勘粮仓,十八日,他向康熙帝奏报有关情况:通州西、中、南三仓共三百七十六廒,除支放已空者七廒外,其余各廒及院内露屯者四百六十一围,共存米五百一十三万九千石,其年久变色之米七成以下已支放一半者四十五廒,应将此米减价粜卖,使新米入廒,放米领米应有定例,诸王以下均应按廒支给。京师需米甚多,应在京师城垣下另造一仓。十一月初六日,胤禛又回奏京城仓库情形:京城海运八仓,清河本裕一仓,共五百六十二廒,院内露屯共十五围。秋季支放已空者五十一廒,满贮米支放者二百五十九廒,支放一半者一百三十六廒,俱属好米,共三百六十九万六千八百石。变色之米共七十万二千九百石。变色不等应粜卖共二十四万九千一百石。今后米石支放应如通州之例进行。朝阳门至东直门另建一仓,四十二廒。十一月初九日,因康熙帝生病,胤禛奉命代行主持十五日南郊大祀,他遵旨在斋所致斋,并不断遣护卫、太监至畅春园向康熙帝请安。康熙帝晚年重用胤禛,胤禛也表现出办事才干和忠孝品质,为他后来即皇帝位奠定了基础。

台湾人民复谋起义　康熙六十一年(1722)三月,台湾淡水百姓林亨等复谋起义,以"合心王"三字为暗语,事情败露,被擒斩者达数十人。不久,又有黄潜等数十人夜聚昼散,拜旗结义,杀官兵。郑仕等人也聚党谋竖旗起义。但是,这些全被总兵官蓝廷珍遣兵谋杀。针对台湾不稳定的形势,福建巡抚吕犹龙于四月初十日上奏指出:台湾总兵改设澎湖,应令其往来澎台之间,稽查营讯,自不致有误。水师提督姚堂等也上奏说:澎台隔越汪洋,阻风则半月不能至,声息不易相通,彼此难于照应,不如依照旧制,在澎湖设副将,在台湾设总兵,有益于地方事务。清政府采纳了上述建议。此外,还把台厦道所属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所总一员,兵三百六十名,分设于南北两路,战船四只拨归台镇。

福州士兵哗变　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月二十九日,因福州将军黄秉钺开始答应把四旗裁减马粮奏请再行给与,令士兵们攒凑银两作为赴京费用,后来赴京未能成行,而黄秉　也未把银两退给士兵。于是,士兵们在披甲王殿吉领导下哗变,围垒将军大门。后来,经巡抚晓谕以后方才散去。此事经闽浙总督满保疏参,议政大臣等议,康熙帝旨准,将黄秉钺革职,哗变为首兵丁王殿吉、武坤山立斩、家产入官,妻子给功臣家为奴;哗变为从兵丁张伦等六人处绞监候,沈元弼等二百一十八人鞭一百发往盛京,分与汉军佐领下效力。

康熙帝病死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康熙帝晚年因立储失败,精神上无限烦恼和忧伤。他日夜不安,费心劳神。从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起,大病七十余天,心神恍惚,身体虚惫,动转需人扶持,举步艰难,健康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他还要随时防备被暗杀、逼宫、不得善终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死神终于向他走来。康熙帝是因病去世的。从康熙四十七年冬天开始,他就已经疾病缠身,衰老体弱,头晕,腿肿,右手失灵,面部发白。从种种现象看,他得了心脏病和血管病。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去南苑行围。大学士等九卿科道官员上疏,谈到明年万寿七旬大典,应庆贺典礼。康熙帝和往常一样,不同意为他铺张,没有批准。十一月七日,病发,他从南苑回驻畅春园。因为有病,不能亲自行十五日南郊大祀礼,便命皇四子胤禛代替。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一连三天,皇四子胤禛派遣侍卫、太监等到畅春园清安,均传谕旨说病情已有所好转。不料从十三日丑刻开始,康熙帝病情恶化,他命从斋所召皇四子胤禛速归;接着,皇三子允祉、七子允祐、八子允禩、九子允禟、十子允䄉、十二子允祹、十三子允祥,以及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均被召至御榻前,面谕皇四子胤禛继承皇位。戌刻,康熙帝崩于寝宫,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十四日,上尊谥为: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雍正元年至十三年(1723—1735)葬于景陵。

雍正帝即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二十日,康熙帝第四子胤禛在太和殿即皇帝位,历史上

称雍正帝。随后，他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布告天下，以明年为雍正元年。雍正帝即位有其历史的原因。在康熙晚年争夺储位斗争中，雍正帝已经形成了一派势力。其中，有皇十三子允祥，康熙近臣、贵幸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隆科多是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也就是康熙帝的内弟，雍正帝的舅父，当时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手握兵权，负责京师九门、畅春园及宫廷的警卫工作，地位非常重要。这一派力量很强，活动又非常诡秘，没有受到康熙帝的怀疑和指责。此外，其他皇子都是别人抚育长大，只有皇四子是康熙帝亲自抚育，在康熙帝身边长大。因为这种情况，他善于体会康熙帝的心思，问寒问暖，殷勤恳切，获得了康熙帝的好感，被康熙帝认为是又诚又孝之人。雍正帝虽然也和其他兄弟对立，但是只表现在暗处，从不在康熙帝面前表露，相反，他还经常在康熙帝面前说其他兄弟的好话。正因为雍正帝工于心计，手腕高明，知道康熙帝喜欢什么，反对什么，怎样迎合才能讨得欢心，所以，康熙帝对雍正帝的印象一直很好。康熙帝称赞雍正帝是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居心行事，有伟人气魄。由于雍正帝和康熙帝的感情很密切，从未发生过裂痕，康熙帝晚年，经常让雍正帝陪着游园散心。康熙帝得病后，雍正帝曾流着泪照顾服药。雍正帝的孝敬博得了康熙帝的喜爱。这样，康熙帝在最后时刻，便决定皇位由雍正帝继承。

建立密折制　为了加强皇权，有效地控制文武百官，康熙六十一年(1723)十一月二十七日，雍正帝登基后仅七天，就建立了密折制度。雍正帝规定：前朝奏折必须缴回，不容抄写、存留、隐匿。两天后，又颁旨："内而大臣以及闲曹，外而督抚以及知县，有适当人选，便具折密奏。"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六日再下谕："著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事亦须声明"。其后又多次颁旨，制定了密折制的有关具体规章。可以上密折的人员，除科道官外，还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等，以及皇帝特准人员，如职位较低的知府、同知等。未获皇帝批准，任何人均无资格密奏。密折的内容，除陈事外，还可用来举荐。所谓陈事，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帝在全国布置了许多密折人员作为耳目，彼此监视，因此，臣下或民间的许多情况可以通过密折来了解。凡上密折的人员，必须履行保密义务，不得让任何人了解密折内容，密折外泄，必受处分。另外，密折经皇帝批阅发给本人看过后必须按期徼还，不得延误徼期或私藏。此外，密折自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到再徼回宫，都有一定程序，不许紊乱。密折制的建立，使官员间互相牵制，就连督抚大员亦不敢妄为，而皇帝则增加了耳目，洞悉庶务，以此牢牢控制了百官。

禁八旗子弟酗酒妄为　随着清政权的巩固，八旗子弟有的那种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已原日渐淡化。至康熙末年，八旗官员兵丁内，酗酒不肖之徒日增。许多官兵由于沉湎于嗜酒之中，以至萎靡不振，"容貌改常"，其间轻生破产者甚众，肆行妄为者比日可见。面对这一关系到八旗子弟成长的严重的问题，雍正帝决心扭转这一局面。康熙六十一年(1723)十二月十一日，即位只有二十二天的雍正帝即向八旗都统下了一道禁令，要求他们认真清查所属八旗官员兵丁中酗酒不肖之徒，严禁重蹈旧辙。强调，能痛改前非则不予追究。否则，一经查出必严惩，属官员者，即行题参，其中应袭者令他人承袭；属兵丁者，则即行革退，不得纵容。

清查亏空　为了扭转康熙后期出现的钱粮短缺、国库空虚的局面，雍正帝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亏空。他在继位后的一个月，即康熙六十一年(1723)十二月十三日通过户部向各省督抚下达了全面清查亏空的命令："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雍正元年(1723)，一场大规模的清查亏空工作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许多贪官被揭发。雍正帝对此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革职，不许象以前那样留任弥补。一是抄家，籍没家产。六月，山西潞州知府加璋告发原山西巡抚苏克济在任职期间勒索各府州县银四百五十万两，于是籍没家财，以偿亏空，并责令其家人赵七赔偿二十万两。原河道总督赵世显克扣治河工料，侵蚀钱粮，被告发后下刑部狱，家财充公。这一年，不断有官员被革职查封家产，如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前江南粮道李玉堂、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原直隶巡道宋师曾、广西按察使李继谟等，在此过程中，雍正常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命赃官亲友帮助赔偿，禁止地方官和百姓代赃官赔偿等。经过三年的清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各省都清偿了一部分亏空，也惩治了一些贪官。

十一道谕旨训百官　雍正帝在藩邸时，就已察觉其父宽容政策所带来的弊病，即吏治废弛。因此，登基伊始，即着手整顿吏治。雍正元年(1723)正月初一日，雍正帝连续颁发了十一道训谕，对文武百

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内容如下：告诫总督，身为封疆大吏，乃澄清吏治之本，应竭忠尽职，不负皇恩。告诫巡抚，绥辑兆民，乃抚臣之责，应同心协力，以尽职守，不得贻害地方。告诫督学，身为学官，须廉洁持身，精勤集事，更要启迪士子人品端正。告诫提督，要倡率将弁，简任卒伍，整理器械，操练技勇。告诫总兵官，要以宁谧地方为念，且应文武辑睦，军民调剂，各得其平。告诫布政司，职居方伯，责任重大，自当益矢公忠。告诫按察司，既要严刑立法，又要执法公正。告诫道员，职居协理，各有专责，凡事应亲身经历，以杜营私舞弊之陋规。告诫副将、参将、游击等官，虽身居偏裨，亦应预定练兵之法，亲校骑射，严试技勇，洁己律公。告诫知府，既为督抚监司之耳目，又为州牧县令之表率，承流于上，宣化于下，必须廉洁自持，屏绝贿赂，奉公尽职。告诫知州、知县，身为亲民之官，乃吏治之始基也，品秩虽卑，职任甚重，务以爱民为先务，周察所属，安辑乡里。这十一道上谕反映了雍正帝整顿吏治的决心，揭开了雍正朝整顿吏治的序幕。

设立会考府　为了清理钱粮，清查亏空，杜绝钱粮奏销中的弊端，雍正帝于元年(1723)正月十四日下令在中央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会考府。规定，嗣后凡属钱粮奏销事务，无论哪个部门，都要经过会考府清厘“出入之数”。原来各部院衙门动用钱粮，都是自行奏销，营私舞弊之事屡有发生，而且不易察觉，改归会考府稽核之后，就从制度上堵住了这一漏洞。会考府由亲王、大学士等总领其事，下设满、汉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各三人，笔帖式十人，分别办理各部门钱粮奏销事。会考府成立后，办理各部院钱粮奏销事五百余件，其中驳回改正者近百件，这对清查钱粮，堵塞漏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两年以后，会考府裁撤。

重设翻译科　翻译科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特设的一个科目，专为八旗学习满文、蒙文与汉文翻译者而设，适应了清代特点，带有清代的特色。顺治八年(1651)首次举行，后几开几停。雍正元年(1723)正月十六日，为给八旗子弟以进身之阶，雍正帝下令恢复，重设翻译科。后定制，应试者以八旗士子为限，考满文翻译者，以满文译汉文，或以满文作论，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士子均可参加；考蒙文翻译者，只以蒙文译满文，只限蒙古人参加。亦分为乡试、会试，均三年一次，然无殿试。初议乡、会试考三场，后定乡试一场、会试二场。实际上乡试照例举行，而会试至乾隆四年(1739)方举行，中式者俱赐进士出身，优者用为六部主事。尽管在雍、乾时期满人大多汉化，满文的实际用处并不显著，但因有翻译科作为八旗士子出身之阶梯，故仍吸引了一些旗人。

策妄阿拉布坦遣使人贡　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十六日，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使臣垂木喀到京，表示要和清中央政府恢复旧好。雍正帝令理藩院尚书特古忒传谕：“策妄阿拉布坦以前虽有微劳，亦多罪戾。令既遣使入京，可以宽宥。”

举孝廉方正　孝廉方正是清代制科之一种，是继博学鸿儒科之后又新增的一个科目。雍正帝在即位恩诏中，要求各府、州、县、卫官员荐举孝廉方正，暂给六品顶带荣身，以备召用。雍正元年(1723)四月十五日他再次下诏，要求各省督抚速遵前旨，确访所属，果有行谊笃实、素为乡党所推者，即列名具奏。其目的是要以此敦励风俗。雍正二年(1724)，先后有浙江、直隶、福建、广西几省各举二员，俱以知县用，其中年五十五以上者用为知州，遂成定制。其后新皇帝登基均照此例举行。为慎重选拔，乾隆元年(1736)规定：保举孝廉方正，地方官必须详稽事实，如其中果有德行、才识兼优，堪备召用者准破格保举。若所举不实，除本人斥革追究外，其滥行举荐各官照滥举非人例分别议处。乾隆五年(1740)，又定考试例：除朴实拘谨、无他技能、不能应试外，其余赴部验看，试以时务策、笺、奏各一。

豁贱为良　贱民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弊病。雍正时，贱民的存在仍比较普遍，如山、陕之乐户，绍兴之堕民，徽州之伴当，宁国府之世仆，广东之蜑户，苏州之丐户等。他们被列为正式编户的四民(民户、军户、商户、灶户)之外，被剥夺了种种权力，受尽了社会的歧视。四民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不能涉足；四民所穿之常服，他们也不能享受。贱民的存在，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贱民为摆脱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了斗争，以至造成“案牍繁滋”，讼端不止，同时给清政府以很大的震动，使他们认识到：“压良为贱，前朝弊政，亟宜革除。”雍正帝曾一再强调，贱民，“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雍正帝继位之后，即听取了大臣们的建议，先后于雍正元年(1723)四月除山西、陕西教坊乐民籍，九月除绍兴堕民丐籍，雍正五年(1727)四月削除江南徽州府伴当，宁国府世仆七年(1729)五月，除广东蜑户籍，八年(1730)五月除苏州府常熟、昭文二县丐户籍。清政府将他们与良民一体编户，允许他们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清政府又允许已削除贱籍的人四世之后可以“报捐应试”。雍正帝曾说：“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所以励廉

耻而广风化也。"显然,豁贱为良的目的就是要"广皇仁,端风化",并把这视为对贱民的恩赐。尽管如此,豁贱为良毕竟是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措施,它从法律上肯定了贱民身分地位的改变,使沉沦数百年的贱民得以新生,有利于解放这部分生产力,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

削除乐籍 清初,在山西、陕西一带有一种乐户,世代充当官府乐妓,属于贱民之列。雍正元年(1723)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奏请开豁这些乐户的贱籍。山、陕乐户的祖先,是明朝永乐帝夺天下时追随建文帝,而不肯归附的官员。永乐帝得天下之后,惩治了这些官员,并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乐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他们不仅没有正常良民的合法身分,而且还经常不断遭到地方绅衿恶霸的蹂躏。以至数百年来不能跳出火坑。年熙说这些人本是忠义之士的后代,压为贱民,无由自新,请求开豁他们的贱籍,准许改业从良。雍正帝认为这个建议很好,遂交下讨论。王大臣们议复: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雍正帝同意了王大臣们的意见,于同年(1723)四月十九日下令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在削除山、陕乐户的同时,雍正帝还命令豁除京中教坊司乐户,另选精通音乐的良人充当教坊司乐工,从事演奏。从此,教坊司的乐人改变了籍属,成为良人的正式职业。

仁寿皇太后暴卒 仁寿皇太后是雍正帝的生母,康熙时为德妃,雍正帝登基,晋为皇太后,并上"仁寿皇太后"徽号,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723)丑刻死亡。仁寿皇太后从病到死,仅十几个小时。因此,她的暴卒引起了许多议论。原来除雍正帝外,仁寿皇太后还生有皇十四子允禵。允禵与雍正帝虽为同母兄弟,但二人却誓不两立,这自然会给做母亲的带来许多烦恼。康熙帝的去世,给她心灵带来了创伤,以致雍正帝拟上"仁寿皇太后"徽号,并请她从原来居位的永和宫迁到皇太后的宁寿宫,她一概不接受,理由是在丧中不便。因此,当她暴死之后,许多人说她是自杀。允禟太监何国柱等人说:"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允禩太监马起云说:"皇上命允禟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一气之下就撞死了。"

嵇曾筠抢修黄河堤 嵇曾筠,字松友,江南长洲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雍正元年(1723)直南书房,擢左佥都御史。他任官以后的第一个突出政绩就是抢修黄河大堤,并由此开始专门从事治河工作,最终成为与靳辅、齐苏勒齐名的清代治河专家。雍正元年夏,黄河南岸河水陡长,中牟县刘家庄、十里店诸地河堤冲决。河南巡抚石文焯将灾情上报,六月十七日,雍正帝下令派嵇曾筠率谙练河工之人速往组织抢修。嵇曾筠于六月二十二日起程。始入豫境,即闻黄河北岸亦有漫溢,随星驰前往,一路察勘险情。七月初六日赶至黄河大堤,查得漫口共十一处,大者二十余丈,小者八九丈。乃督工镶筑坝台,并派管河各官无分昼夜,加紧防护。鉴于黄河堤岸多年失修,为了防患未然,嵇曾筠决定对堤岸卑薄之处再行加固,遂将十里店一带上下堤岸加帮高厚,镶垫风埽,以资捍卫。黄河自中牟县以下淤淀严重,嵇曾筠又将下流疏通,使河水畅行。十一月,中牟县决口宣告堵筑合龙。雍正帝甚为满意。不久,提升嵇曾筠为河南副总河,协助河道总督齐苏勒一起治理黄河。

制驭太监 雍正帝登基之后,继续严格加强对宦官的管理,制驭太监,以使他们成为不敢过问朝政,只知忠勤服役的工具。雍正元年(1723)六月,雍正帝发现有的太监在打扫时,拿着笤帚从宝座前昂头而过,丝毫没有敬畏之意,于是定下规矩,凡有御座地方,太监要以恭敬之心,急走过去。八月十三日又申明太监接待朝臣的礼节:诸王大臣官员进入大内,坐着的太监必须起身站立,正在行走的要躲避让路,不许光头脱帽,也不许斜倚踞坐。九月,定太监品级,总管太监四品,副总管六品,随侍首领七品,宫殿首领八品。其后,又于雍正四年(1726)六月、雍正八年(1730)六月定宦官官衔,以限制太监官秩不得超过四品。同时,雍正帝严禁太监干预外廷事务,屡发谕旨,告诫外臣不得钻营太监。雍正三年(1725),扫院太监傅国相为一废官复职事向奏事太监刘裕打听可否保奏。按宫中规定,这属违法,而刘裕没有上报,只告诉了总管太监,总管太监也没有奏闻。雍正帝知道后,责令总管太监和刘裕说明原委,傅国相等人锁拿问罪。有些太监的亲友在家乡仗势作恶,当地方官捉拿时就逃入京城。雍正四年(1726)八月,雍正帝下谕总管太监,凡有太监亲属被地方官查拿者,行文到内务府,即按案发落,不必奏闻。雍正帝的这些措施,起到了震慑太监的作用。

罗卜藏丹津叛乱 罗卜藏丹津,清代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台吉,和硕亲王达什巴图尔子。康熙五十三年(1714)袭父位。康熙五十九年(1720),随清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军,次年返回青海。以进藏立功,谋据西藏以遥控青海。清廷未令其掌管藏政,遂怀怨在心。后以固始汗嫡孙自居,欲为青海和硕特诸部首领。雍正元年(1723)夏,诱召诸部头领于察罕托罗海会盟,令各复旧日称号,放弃清廷所封王、贝勒、贝

子、公等封号，且自称“达赖混召吉”，公开竖起了反清旗帜。此时青海和硕特部已归清三十余年，这一分裂之举，遭到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的反对，他们拒绝参与叛乱。罗卜藏丹津遂率兵四千往击。七月初二，清廷决定遣使劝和，并做好了防备其大规模叛乱的准备。七月二十二日，清使常寿往罗卜藏丹津驻地，罗卜藏丹津不听劝告，而且扣留了常寿。随后又煽动在青海僧众中颇有影响的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门汗随其起事，由于察罕诺门汗的支持，于是有近二十万人响应，罗卜藏丹津遂大肆叛乱，进攻西宁，在甘肃、四川的藏人也附从为乱，一时声势浩大。消息传到京城，清廷立即组织平叛大军，八月下旬到九月初，连派年羹尧、岳钟琪、富宁安等分路进兵。罗卜藏丹津原欲入藏与策妄阿拉布坦联络，后遭清军截击，未能入藏，且送还常寿，请求罢兵。清兵乘胜追击，经过数月征战，迫使叛军十万之众投降，罗卜藏丹津逃往柴达木。雍正二年(1724)二月初八日，岳钟琪率精兵五千，直捣贼巢，经过十五天的激战，至二十二日结束，俘获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和妹夫，以及叛乱头子喇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和藏巴札木。罗卜藏丹津改着女装逃跑，历时半年的叛乱被平息。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平定伊犁时俘获罗卜藏丹津，获宥，令居京城，不许擅出。

建立秘密立储制度　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在召见文武大臣时，宣布了他所设想的秘密立储方法。关于秘密立储的原因，他说：立储一事，有关社稷安危，不得不预为之。但考虑自己的孩子尚幼，不便公开，因此决定采取秘密立储的方法。具体做法是，由皇帝将选定的续承人亲笔书写后密封，藏于匣内，然后置于乾清宫上由顺治帝亲笔所写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因此，储君是谁，本人不知，群臣不晓，仅皇帝一人清楚。他宣布之后，诸大臣表示赞成。随后，雍正帝留下总理事务大臣，按所说的方法，书写后将密封锦匣，当着他们的面，藏于“正大光明”匾后。这样，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秘密立储制度正式建立了。雍正帝密建太子，收到了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避免了历代那种皇子争储位，储君与皇帝争权，以及储贰骄纵等弊病。乾隆帝登基后，认为此法甚好，于是继续实行。后来的嘉庆、道光都相继采用这个方法立嗣。咸丰只有一子，同治、光绪无子，因此，也就无从采用此法了。从雍正创立秘密立储制度到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诸帝的嗣承来看，这一制度是成功的。

丽江土府改土归流　丽江土府位于云南西北部。自明初始，这里一直是土司木氏的世袭领地。木氏家族自设关隘，“出入者，非木公命不得擅行”，就连朝廷派来的官吏亦不得竟达。他们鱼肉乡里，对土民进行残酷剥削。他们还垄断学间，不许土民子弟读书。木氏本族历代重学问，而且在云南土司中亦属佼佼者，但其“虑民用智而难治，因如秦人之愚黔首，一切聪颖子弟俱抑之奴隶中，不许事诗书”。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丽江府流官通判题请建学，仍遭到木氏的百般阻挠，“事几寝”。因此，对于丽江土府，清政府早已列为改流对象。雍正元年(1723)八月，丽江土知府木兴病故，云贵总督高其倬抓住时机，立即向雍正帝建议：土知府木兴虽病故，但其罪未惩，现族属又不能管理地方，不如趁此改土归流。得到了雍正帝的批准。丽江府改流以后，从土司庄园内放出奴仆二千三百四十四人。这些奴仆闻知改流，都主动向官府请求交纳丁银，承担赋税，“以等齐民”。清政府还清查出土司田地七百九十顷八十九亩，有些作为官田，有些归还农民，也有些分给原来无地的奴仆。同时，宣布废除土司苛派达二万余两。丽江府的学校也在改流后得以重建。

削惰民丐籍　清初，在浙江绍兴府有一种惰民，籍属丐户，据说是宋代罪俘之后人。他们不得列于四民之名籍，所从事的职业是被当时社会贱视的服务性工作。如男子作小手艺和小买卖，塑造土牛、木偶，捕蛙、龟，卖饧、饼，或当吹鼓手，演戏，抬轿子；女子充媒婆，当伴娘，做栉工，卖珠，当收生婆。地方政府不许惰民读书应试，不许做官，不能充当吏员、里长，不许与良人通婚，也不让与良人平等相处，就连他们居住的地区、房屋样式，以及穿着打扮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与良民相同。他们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更没有任何政治权力。雍正元年(1723)四月，清政府下令削除山、陕乐户籍以后，对这里产生了影响。同年七月十一日，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上奏折请求仿乐户例削除绍兴府属八邑之惰民丐籍。雍正帝让礼部议奏。礼部认为，捕龟、卖饼、作媒是贫民糊口的职业，与乐户逼良为娼不同，若除其籍，岂非反让他们无法为生了。雍正帝不同意礼部的意见，认为能除丐籍，“亦系好事”。遂于九月二十日下令除惰民丐籍，允许他们放弃原来的职业，另择新职，转为民户，并照良民一体纳税服役。

禁建生祠书院　雍正帝登基后不久，便发现各地官吏中有一种不正之风，即修建生祠书院。建生祠书院，前已有之，多是百姓为在本地任官清明者修建，而且是在官员离任之后，以此表示对清廉官员的敬重及怀念。但是到了康熙末年，情况大变，上自总督巡抚，下至知府、知县，所在多有，而且都是本官在

任时所修。虽然情况各有不同,但绝大多数或系属员献媚,或系地方绅士逢迎,亦有包揽词讼之徒,假公派费,占地兴工,致使修建之风盛行。有些地方互相攀比,劳民伤财也一无顾惜,以致园囿亭台,穷极华丽。营建之后,或为宴会游玩之所,或被本官据为产业。雍正元年(1723)九月二十九日,雍正帝下令严禁。他指出,为官者果能实心爱民,清白自矢,必能官去民思。对已经建的生祠书院,除极少数确系名宦去任之后,百姓追思盖造者准予保留外,其余一律改为别用,或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对于今后再有违禁修造者,一经查出,本官及为首之人严加议处。

建立朝考制度 雍正元年(1723)十月十九日雍正帝因考虑到"国家建官分职,于翰林之选,尤为慎重,必人品端方,学问醇粹,始为无忝厥职",于是下令:"将来拣选庶吉士,朕将亲加考试"。同年十一月首次进行,以诗文四六各体出题,从中选其优者为庶吉士,是为进士朝考之始。雍正五年(1727)五月规定:进士殿试后复试论、诏、奏议、诗各一篇,试于保和殿、遂成有清一代之定制。这实际是在乡试、会试、殿试之后又加了一级考试。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新规定朝考试题为书艺一、诗一。这一制度的建立,体现了皇帝对选拔人才的重视。新进士经朝考入选,即可为庶吉士入馆,未入选者,仍归吏部以中书、知县等官铨选,因此,对新进士来说,朝考最为重要,因为是否入选庶吉士,关系到日后的前途。对清政府来说,这一制度的建立,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的效果,"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其余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士子咸以预选为荣"。

温上贵暴动 温上贵,福建上杭人。因不满于清政府的残暴统治,于康熙末即准备组织反清斗争。他曾赴台湾,结识了朱一贵,被朱一贵封为元帅,并奉命返回家乡组织群众。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起义失败后,他转移到江西万载县,广泛联络穷苦的棚民,准备攻打县城。雍正元年(1723),温上贵的行动被万载县知县施昭庭察觉。当清兵前来镇压时,温上贵率众与清兵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因仓促应战,终于寡不敌众,三百多人英勇牺牲,温上贵被俘。同年(1723)十一月十九日,雍正帝旨令三法司核议严惩。不久,温上贵遇难。温上贵死后,其同伴裘永锡、族弟温廷瑞等继续进行反抗活动。他们夜聚晓散,操练武艺,打造兵器,行动更加隐蔽。清政府不断重申对温案要人之通缉,直到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二十五日,由于叛徒告密温廷瑞等被捕,斗争失败。

摊丁入地 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开始实行摊丁入地政策。摊丁入地,又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是雍正朝开始向全国推行的一项赋役制度的改革,旨在改变丁税的征收方法,即将丁银摊入地亩一起征收。清初的赋役制度因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地有地税银,丁有丁税银。丁税银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为主。按丁征收的丁银在清初共有三百余万两。这个数字不算很大,但按丁征收丁银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却很大。由于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进一步发展,贫富不均的现象极为严重,无地或地少的农民无力负担丁税,因而出现"或逃或欠"的情况。这就使清政府征收丁税发生困难,以至失去保证。同时由于农民畏惧丁税的逼迫,或逃亡迁徙,或隐匿户口,又造成人口不实的严重问题,使清政府难以掌握人口实数。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下决心改变丁税的征收办法。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旨在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对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虽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因而一些地区,如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在短期内采取了将丁税摊入地亩去征收的措施,并且收到了"民困以苏"的效果。但是,由于地主以及他们在朝廷中的代表反对,以至这一措施没能向全国推广。雍正元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奏请按地摊丁,雍正帝没有批准。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再请摊丁入地,并要求雍正帝乾纲独断,批准他实行。雍正帝遂令户部等讨论。九月,户部议复,同意李维钧的意见。雍正帝仍不放心,命九卿等再议,并详细询问李维钧的打算。至十一月,雍正帝下决心在全国实行摊丁入地的政策。自雍正二年(1724)起,全国陆续将丁税摊入地亩征收。具体办法是:把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在各州县的土地上,每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自一、二钱至八钱不等。"摊丁入地"在全国实施后,立即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浙江、直隶、山西等地都发生了地主闹事,他们或齐集官府前吵嚷,或转向农民加租。但是,由于雍正帝决心已下,不再改变,因此,这项改革得以贯彻到底。到乾隆后期,全国范围内的摊丁入地基本完成,只有山西省的某些州县到光绪时才最后解决。

添设刑部现审司 为解决八旗命盗案件日增问题,雍正帝登基不久,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添设刑部现审司。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四日,雍正帝批准了佛格等人的请求,正式设置刑部现审司。现审司分为现审左司、现审右司,统称现审司,专门办理在京八旗命盗案件,以及皇帝特交各衙门案件。现审司的设置,使刑部内的分工更加明确。后乾隆六年(1741),根据形势发展,现审左司改为直隶司,现审

右司改为奉天司。至此，清代刑部十七清吏司始为定制。

驱逐传教士 雍正帝继位后，西方传教士在各地的活动更加猖狂，有个别传教士甚至插手皇室的内部斗争，支持允禟、允禩等人，这就促使雍正帝下决心禁教。雍正元年(1723)冬，浙闽总督觉罗满保重新提出查禁传教士的建议，他说，西洋人在各省行教，人心渐被煽惑，请把他们中通晓技艺又愿为朝廷效力的人送到北京，其余一律查出，送到澳门。(1724)十二月十七日，礼部研究了觉罗满保的建议，认为除将传教士驱至澳门外，各省天主教堂应改为公所，对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雍正帝批准了这一建议，并要求各地给传教士半年期限，令他们到澳门集中。命令下达之后，各地进展不一，亦有行动迟缓者。但是，这次的驱逐传教士对天主教是一次较大的打击，各省大小教堂，大多被拆毁，其房屋院落，或改为仓廒，或改为书院。顺天府一些属县的教堂，改为官所，京都之北堂，也改为了病院。

万泉民变 雍正元年(1723)冬，山西省万泉县发生了一起农民反抗官府压迫的事件。该县知县瞿某横征暴敛，渔肉乡里，致使广大农民忍无可忍，终于聚集几千人，直捣县城，抗议瞿某的暴政。瞿某闻讯，惊慌失措，下令关闭城门，愤怒的农民冲破城门，闯入县城。瞿某见势不妙，携带幕僚、家奴越墙逃跑。农民们一举焚烧县衙。山西巡抚诺岷闻讯，一方面向朝廷参劾瞿某，一方面令平阳知府董绅擒拿为首者。董绅调集绿营兵和民壮二百人去乡村拘捕，面对官兵，农民们被迫拿起刀枪，经过一场激战，官兵几乎全部被杀死。这时，董绅不得不亲自出面，来到农民中间，他发誓不伤害百姓，只要交出三个人来，此事即可完结。他还亲自写了文书，保证对交出的人也不加杀害，这样，才算把事态平息下去。

齐苏勒治河 齐苏勒，字笃之，满洲正白旗人。清代著名的治河专家。康熙四十二年(1703)，随康熙帝南巡时，奉命于黄河险要处修筑挑水埽坝，竟于皇帝回銮前毕工，甚得皇帝嘉奖。雍正元年(1723)，授河道总督。上任后即奏言："治河之道，若待濒危再治，则一丈之险顿成千百丈，千金之费则为万金。只有防患未然，方能省力而功就。"又言："以往堤坝之倾圮，弊在河员废弛，冒销帑金。应严定章程，以示劝惩。"均得到雍正帝的肯定。随后，率员周历黄河、运河，测量水势，查勘堤防，惩治贪官，严禁铺张，河员人人畏惧，皆奉法听命。同年夏，河南境内的黄河堤岸多被冲毁，遂组织抢修，当年完工。二年雍正(1724)，又疏通运河，以泄黄河之水。雍正三年(1725)，副总河嵇曾筠于祥符县疏引河，工程将竣，齐苏靳奉命视察，发现引河上口未对顶冲，遂建议移上三十丈，对冲迎溜，并于对岸建挑水坝，挑溜顺行。雍正四年(1726)，又组织堵筑睢宁朱家口决口。雍正五年(1727)，建议黄河斗岸改为斜坡，坡上栽柳树以防水冲。齐苏勒以其治河功，深得雍正帝器重。及其病故，雍正帝甚为惋惜，赐金归葬，晋三等阿达哈哈番(乾隆时定汉名为轻车都尉)世职，谥"勤恪"，并令与靳辅同入京师贤良祠。

取消封驳权 六科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负责"传达纶音，稽考庶政"。它不仅把皇帝批过的臣工题本从内阁领出，誊抄清楚，发给有关部门执行，而且还有封驳权，即使皇帝批准的奏章，六科认为有不妥的地方，仍可封还执奏，若内阁票签批本错误，原奏章的失当之处，就应当接受它的驳正。它还稽察六部，察核奉旨事件完结情况。雍正帝登基后，为了加强皇权，于雍正元年(1723)下令将六科划归都察院，不再使之成为一个独立机构，给事中也与监察御史一样，负责巡视五城、京仓、通仓、巡盐、巡漕等差使。这样，六科的封驳权也随之取消。都察院的职掌在明以前归御史台，这样，自唐以来，封建国家监察机关"台"、"谏"并列的局面至此合二而一。时称"台省合一"。六科划归都察院的命令下达后，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如给事中崔致远即反对这一措施，但雍正帝拒不理睬，遂使这一措施终成有清一代之定制。

田文镜抚豫 田文镜，汉军正蓝旗人，生于康熙元年(1662)，卒于雍正十年(1732)。他在康熙时做过知县、知州，后奉调进京，任吏部员外郎、刑部郎中、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等职。而他成为朝野闻名的能臣，却是到河南任职以后。雍正二年(1724)正月，田文镜初到河南，任河南布政使。八月，署河南巡抚，十二月任巡抚。从此，一直留在河南，直至病卒于任。田文镜一到河南便大刀阔斧，"清厘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之一新"。他处理过几个案子，倍受雍正帝赏识。雍正二年五月，河南封邱县生员为反对士、民一体当差，举行罢考，田文镜敢犯众怒，对绅衿斗争坚决果断，使事态很快平息。对地方官中不法者，他执法甚严，一无避忌，赴豫仅二年，就劾罢属官达二十二名之多。他忠于职守，且精于刑名、钱粮、治河、防盗诸务。到任三年后，河南面貌大为改观，以致雍正帝称赞道："三年以来，整饬河工，堤岸坚固，河汛安澜，年岁丰稔，绅衿畏法，正己率属，地方宁谧，而每事秉公洁己，谢绝私交，实为巡抚中之第一。"并于雍正五年(1727)将其抬入正黄旗。田文镜赴豫之初，已六十三岁，由于他报效心切，操劳过度，因此，一直

有病缠身。雍正九年(1731)五月,他上疏乞休,未允。雍正十年(1732)十一月初六日再上折乞休,雍正帝只好"勉从所请",不料,数日后竟病亡。他的著作《抚豫宣化录》记录了在河南任期的活动。

颁发《圣谕广训》 为了用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约束臣民的行动,雍正二年(1724)二月初二日,雍正帝下令刊刻《圣谕广训》,颁发全国。初,康熙帝曾作"圣谕十六条",自纲常名教之道,至耕桑作息之理,备举要领,作为约束臣民之规范,颁示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雍正帝登基之后,考虑以上各条,遵行日久,民或怠慢,宜申诰诫,乃译其意,衍其文,对十六条逐加说明,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并亲为作序。在序言中,他阐明了颁发的理由,一是要继承圣祖遗愿,二是要提醒百姓成为谨身节用之人,尽除浮薄之陋习,以使风俗醇厚,室家和平。在这本书中,雍正帝采用较为通俗的语言,向臣民,特别是"乡曲小民"灌输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企图进一步控制人们的思想,以稳固"大一统"局面。此书的颁发,采取了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各地定期宣读。特别对读书人,要求更为严格,作为制度,各府州县学,必须备有此书。雍正三年(1724),进一步规定,凡童生的入学考试,必须会背诵其中的一条,否则不能入学,简直是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授农顶带 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雍正帝采取了许多措施,授予老农顶带便是其中之一。雍正二年(1724)二月九日,雍正帝下谕各直省督抚,要求所属各州县于每乡选择一两个勤劳俭朴,无过失的老农给以奖赏,以示鼓励。十一天后,再次下谕,明确规定,所选老农授予八品顶戴,而且每年选举一次。他的目的,是希望在农民中树立起"楷模",以便众人效仿,努力生产,同时也赋予老农督课农民生产的责任,希望起到古代农官的作用。然而,在各地实际推行中,州县官选择老农,听凭绅衿保举,一些豪民通过贿赂绅衿,邀得中选,而真正勤劳朴实的农民却很难入选。有的老农击鼓升堂,传见农民,俨然一个父母官;的有自称"某县左堂",以八品自命,意欲凌驾于正式官品九品的巡检、未入流的典史之上。雍正帝发现这些问题后,于雍正七年(1729)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把冒滥生事的老农革退,另选题补,准许不法老农及保举官员自首,免于追究,否则查出重治不贷。同时,又把一年一选改为三年一选,以示郑重。由于选期延长,老农顶戴难于得到,贿赂之风更盛。因此,乾隆帝登基后,便把这一制度废弃了。

平定青海 罗卜藏丹津叛乱平息后,青海平定。雍正二年(1724)三月初一日,清军凯旋。四月初二日,朝廷叙平定青海功。四月十二日,举行献俘仪式,遣官告祭太庙、庄稷。随后,清廷着手善后事,首先是采取盟旗制度,将青海五部,共分二十九旗,各设札萨克治理,并规定每年会盟一次。一切听命于中央政府。同时采取派兵驻札,修筑土墙,整顿喇嘛寺,规定朝贡和互市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保证了清政府对青海地区的有效统治。

拘允禵 允禵,康熙帝第十子,受封敦郡王。在允禩谋夺储位时,即为其党。雍正帝登基之后,他又表示不满,无视皇兄,因而遭到了雍正帝的严厉制裁。雍正元年(1723)正月,喀尔喀蒙古首领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吊唁康熙帝逝世。后病死于京。雍正帝亲至灵前悬帕奠茶,追赐"弘法大师"。为了进一步笼络蒙古贵族,雍正帝决定派允禵护送其龛座返漠北。允禵对雍正帝的派遣根本不放在心上,他开始借口无力准备马匹行李,不愿意离京。待出发后又一路耽搁。当行至张家口外,便不肯再走,宣称圣旨叫他进口,于是返回张家口住下,并且抱病不前,一呆数月。雍正二年(1724)四月初八日,兵部将此情参奏。雍正帝故意让允禩议处。允禩要求行文允禵,令他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说,允禵既不肯行,何必非要让他去。另外,允禵根本不把额尔金放在眼里,何必要处罚额尔金呢?允禩只好请求将允禵革去郡王爵。这时,允 闻讯,仍安居张家口,亦不差人进京请罪。于是,雍正帝大怒,遂于四月二十六日下令革去允禵郡王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随后又抄其家产,得金银六十多万两。

兴宗学 宗学自唐、宋以来就已存在,是专门培养、教授宗室子弟的学校。清代的宗学,始设于顺治十年(1653)。雍正帝即位后,为了"睦族敦宗",于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初五日下谕大兴宗学。规定,八旗按左右两翼各设一满学、一汉学,宗室子弟十八岁以下入学分习满、汉文,并兼骑射,由政府按月发给银米、纸笔。以王、公一人总领其事,每学设正教长、副教长,由翰林院编修、检讨充任。下设清书教习、骑射教习各二人,又每十名学生设汉书教习一人,政府每年派人对学生进行考试,以决定奖励和惩罚。学习三年期满,分别等第录用。从此,宗学日盛。乾隆九年(1744)又定,每五年一届,简大臣合试两翼学生,钦定名次,按会试中式注册。待会试之年,习翻译者,与八旗翻译贡生同引见,赐进士,用府属额外主事;习汉文者,与天下贡士同共参加殿试,赐进士甲第,用翰林部属等官。

马尔齐哈受责 马尔齐哈原在八旗中以行医为业,雍正帝认为行医之人必然好生,又以马尔齐哈

为人坦率，故于雍正元年(1723)十月提升为刑部左侍郎。雍正二年(1724)五月，雍正帝令刑部重审一刑事犯李元玺，此人曾在康熙时犯案，后被宽免，雍正初年又犯新罪，故雍正帝令刑部再审。马尔齐哈当时是刑部副长官，故而对雍正帝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意思是劝皇帝不必过问这些小事。雍正帝大为恼火，认为是有意讥讽他不应察及细务。五月十二日特颁谕旨，公开斥责马尔齐哈，说他"粗识数字，便在朕前诵述古语"。雍正帝还说："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总揽万机，全在一人之裁决。但云委诸有司，则六部之事付之六部，为天子者惟有端然高拱而已，岂不为逸？但天下之事可以如此料理乎？"最后雍正帝令其"洗心涤虑"，并让诸王大臣监督，若其执迷不悟，即行参奏拘拿。

惩办苏努　雍正帝在惩办允禩方前，先翦其党羽。惩办苏努，便是打击允禩集团的一个步骤。苏努为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英之孙。雍正帝继位后，晋封为贝勒，其子勒什亨亦委署领侍卫内大臣。但是，苏努父子却不对雍正帝表示感恩，反而加入了允禩一伙。勒什亨在雍正帝对待允禵的问题上表示了不满。康熙帝病逝后，允禵从前线返京，雍正帝命允禵前往西宁，允禵知道这是把他发配，故意拖延时间。对此，勒什亨有意袒护允禵，雍正帝遂将勒什亨亦发往西宁。此后，勒什亨的弟弟乌尔陈在面见雍正帝时"显露愤恨之容"，结果，雍正帝又将乌尔陈发往军前。雍正二年(1727)五月十四日，雍正帝特颁谕旨，援引清太宗皇太极对苏努祖父褚英的评价："此人若在，必乱国家，"指出苏努父子谗言离间，暗中钻营，"惟扰乱国家是务"，而且毫无悛改之意，若留在京城，必然还会煽惑众心，于是下令革去苏努贝勒爵，撤回属下佐领，与在京诸子十日内一并迁往右卫居住，并不许派人往来京师。四年(1726)正月初五日，雍正帝又下令宗人府将苏努除名。

封邱罢考　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推行了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旨在解决绅衿与平民耗羡负担不合理的问题。结果在许多地方引起了读书人的不满。雍正二年(1724)，河南封邱县知县唐绥祖为解决黄河堤防用工问题，规定按田出夫，士、民一体当差，遭到本县生员的反对。五月，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拦截唐绥祖，要求他收回按田出夫的成命。不久，河南学政张廷璐按考至开封府，封邱生童集体罢考，范瑚还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以示对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抗议。清政府为"申明国宪"，特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前去审理此案。最后，王逊、范瑚等被斩决，王前等绞监候。为了制止生童罢考事件的发生，雍正十二年(1734)九月规定，凡邀约罢考者，即将罢考之人停其考试，若全县罢考，即全停考试。

重修孔庙大成殿　雍正二年(1724)六月初九日申时，山东曲阜孔庙因暴雨雷击引起火灾。大成殿及两庑俱毁。衍圣公孔传铎将灾情上报，雍正帝甚为关心，他指出："孔子道高德厚，为万世师表，今圣庙受灾，必当迅速恢复旧制，使庙貌重新。"并于同月二十三日派工部堂官赶赴阙里，会同山东巡抚共议重修大成殿事，务必按期完工。所需费用，由朝廷拨给。雍正八年(1730)十月，大成殿修复工程先竣，用银一百十五万两。十月十二日，大学士等奏请仿康熙三十二年修理文庙例，将此次重修大成殿的有关谕旨、修缮情况、所用银两等由孔传铎敬辑成书，以传后世，得到了雍正帝的批准。十月二十三日，雍正帝派皇五子弘昼、淳郡王弘景前往阙里参加落成告祭典礼。

设八旗井田　雍正二年(1724)六月二十三日，雍正帝批准了户部侍郎塞德的建议，下令设立井田，拨京南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县的官田二百余顷，作为井田，选京城八旗内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无产业者前往耕种，满洲五十户，蒙古十户，汉军四十户，共计一百户，各授私田百亩，公田十二亩半。又给每户十二亩半作室庐场圃之用，官给盖房屋，按人口分配。另每户拨银五十两，购置耕牛、农具、种籽。规定私田收入归井田户，公田收成于三年之后交公。并要求井田户于每年十月农事完毕，校围学射。为办好此事，还设置了井田管理处，派塞德前往料理。实行以后，愿去的人不多。鉴于此，雍正帝于五年(1727)闰三月初一日，下令强迫那些没有产业、游手好闲的旗人迁往井田处耕种，连同妻子同行。每户给地三十亩，给银十五两，每五户给牛三只。由于所去旗人不好好从事生产，反而卖掉耕牛、出租井田，管理官员又将井田分成等第，徇私掉换，以致井田非但没有建设，反而破坏甚重。至乾隆帝继位，便将井田改为屯田。

耗羡归公　"耗羡"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部分的补贴，例如熔铸银两时会发生零星损失，粮米收放也会有一些亏损。对这些损失，清政府允许地方官在收税时每两银子加征二、三分，称为"火耗"、"耗羡"。这本是为了抵补合理亏损而增加的附加税。可是，在实际征收中，地方官常常于每两正额银之外加收一钱以上，有的达到四、五钱，更有甚者超过正额的数倍。而"耗羡"收入一向由地方官自行征收、支配，馈送上司，弊端很大。雍正帝继位后，让各级官吏讨论这一问题。山西巡抚诺岷建议实

行耗羡归公，通通上交布政司库。但内阁议复，认为不妥。雍正帝经过一番考虑，决定采纳诺岷的建议，遂于雍正二年(1724)七月初六日下令推行，他首先批评一些官员见识短浅，不懂火耗归公之必要，并且强调："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显然，雍正帝也要通过这一改革来澄清吏治。其后，又具体规定，"每两加耗五分"，作为政府的正常税收，统一征收，各地不得任意增加。征收之后不得留州县，一律存留布政司库，可以从中提取一部分给官吏作为生活补贴和办公费用，称作"养廉银"。这一措施集中了征税的权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一定的作用。

发放养廉银　雍正二年(1724)七月，雍正帝在下令推行"耗羡归公"的同时，还实行了"养廉银"制度。所谓"养廉银"，是在正俸之外发给官员的生活补贴和办公费用。"耗羡"在归公之前，均由地方官私征私用，或纳入私囊，或贿赂上司，弊端极大。实行耗羡归公后，耗羡的征收虽属合法，但收入不归州县，而属布政司，这就使地方官失去了一条生财之路。为防止于此之外再对百姓加征，以致出现新的贪赃枉法行为，雍正帝决定从耗羡归公部分提取一些给州县官作为生活补贴及办公费用，称为"养廉银"，希望以此培养官吏的廉洁之风，以后不再贪赃枉法。清代官员的俸禄很低，一品官年俸银一百八十两，二品官一百五十两，而从九品小官只有三十一两五钱。这微乎其微的薪俸不可能满足官吏的需要，因此，贪赃营私之事屡有发生。实行养廉银制度之后，官吏们可以得到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正俸的收入，这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吏贪污问题，但对减少贪污，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

颁发御制《朋党论》　雍正二年(1724)七月十六日，雍正帝颁发了御制《朋党论》。这实际上是一篇旨在讨伐允禩集团的檄文。雍正帝即位后，就感到了允禩集团对他的潜在威胁。由于允禩多年的经营，终于结成朋党，形成了一股势力。雍正帝为了打击这股势力，在登基之初先是采取了安抚政策，稳住他们。当他感到时机成熟时，便开始了向允禩集团发动进攻。御制《朋党论》便是一个信号。他对诸王、贝勒、满汉文武大臣说："朕今御制《朋党论》一篇颁示，尔等须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如自信素不预朋党者，则当益加勉励，如或不能自保，则当痛改前非。尔等须扪心自问，不可阳奉阴违，倘自干国法，万不能宽。"《朋党论》的主要内容是指出臣子结成朋党，违背君臣大义和臣子事君之道，而朋党习气至今未改，现在必须彻底消除。它为日后处理允禩集团提供了依据。

宁夏垦荒　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清政府自雍正二年(1724)，致力于宁夏垦荒。二年夏，川陕总督年羹尧奉命到宁夏察看河渠。同年七月，年羹尧将视察情况上报，指出宁夏水利工程尚无倒坏，虽间有冲决，然修筑甚易，其水利资源可供溉田"不啻万顷"。建议待秋收后水涸之时由宁夏水利都司查勘修理，得到雍正帝的批准，遂付诸实施。四年(1726)，浚惠农渠。雍正六年(1728)，浚昌润渠，疏流建闸。雍正九年(1731)，重修汉延渠、唐渠。与此同时，清政府积极组织垦荒。六年，雍正帝派单畴书到宁夏，与陕西总督、甘肃巡抚共同商议募农垦荒事，由官府发给牛具、籽种、银两，允许农民将所辟土地永为世业。同时号召宁夏籍的文武官员在原籍尽力开垦。在宁夏地区农业有所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分别于雍正五年(1727)、雍正七年(1729)新设新渠、宝丰二县。

修海塘　浙江旧有防止海潮的海塘工程，但长年失修。雍正元年(1723)九月，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奏请修筑海宁一带海塘。雍正帝认为，多年来地方官假借修塘之名，虚冒钱粮，于不当修处修筑，以至随修随坏。因此没有批准，只令其挑沙疏通，以保海塘无恙。雍正二年(1724)七月十八日，浙江沿海遭受狂风暴雨，海潮泛滥，冲决提岸，居民田庐，多被漂没。灾情上报后，雍正帝于八月二十四月下令安抚灾民，抢修海塘。九月二十一日又令江南、浙江总督、巡抚认真查勘被毁塘工，允许他们动用正项钱粮，作速兴工。(1725)十二月初四日，雍正帝委派前任浙江巡抚吏部尚书朱轼驰驿前往，全面调查塘工修筑事宜，并建议改土塘为石塘，令朱轼速将调查、抢修方案上报。同时强调，"务要工程坚固，一劳永逸，不可吝惜钱粮。"朱轼奉命，即赴浙江，经过详细调查，并会同地方官研究后，一面着手修筑，一面又于雍正三年(1725)三月将修筑方案上呈雍正帝：浙江余姚以西至临山卫三道土塘，旧为民间修筑，今百姓无力，应动帑兴修；临山卫至会稽沥海所，土塘七千丈，应以石为基，就石累土；海宁一带土塘七百六十六丈，应加宽并复条石于上，塘外再加乱石子塘一道；海盐一带石塘圮八十余丈，溃七十余丈，应补筑。共需动用帑银十五万两。另外，上海松江一带塘工，应用十九万两修筑。雍正帝批准了这个方案。在修筑过程中，由于条石不易购买，一些塘工改为外用条石，内以乱石填塞。为此，雍正帝又于当年(1726)十二月二十日再次强调，修筑海塘必须一劳永逸，一定要认真办理，不可草率从事，并建议可仿效江南修理塘工时所用木桩密钉之法。在皇帝的严令及地方官的督率之下，四年(1726)八月，浙江海塘修筑工程告竣。

雍正帝禁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代的矿冶业也日渐兴旺。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政府认为不利的因素，即矿夫聚集，易生事端，地方官难以维持封建治安。因此，对矿冶业的发展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便成了雍正朝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雍正二年(1724)九月初八日，雍正帝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采纳户部的意见，正式下令禁止开矿。他认为，"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而开矿谋利，则属舍本逐末，"殊非经常之道"。同时指出，各地开矿将使民人聚集，而官府难辨奸良，会出乱子，禁止开矿可以防止"游手无赖之徒"钻营闹事，保证地方安宁。雍正帝决心一下，即坚持不变，至到雍正九年(1731)，仍言："粤东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但是，雍正帝对云南采铜却不禁止，而且加以鼓励、扶植，以至云南采铜业发展很快。雍正初年，云南年产铜量为八九十万斤，而到雍正五年(1727)已达四百万斤。雍正帝对云南采铜业的特殊政策，实际上是为解决清政府铸造钱币所需要的大量黄铜。可见，雍正帝矿禁，并非全面禁止任何开采。

朱之琏受封 朱之琏，正白旗人。雍正时任直隶正定府知府。其先人朱文元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三子代简王之后，崇祯时为代王，于松山战役中被洪承畴俘获，入了八旗。朱之琏是早已满化的朱明后裔。雍正帝为了笼络汉人，消弥反清思明的情绪，决定加封明太祖后裔。雍正元年(1723)九月十九日下谕大学士等，说他发现了康熙帝未曾发布的一道谕旨，称赞明太祖崛起布衣，统一华夏，经文纬武，为汉唐宋诸君所不及，且其后嗣亦无荒淫暴虐亡国之迹，应访其支派，授以官职。为遵圣祖谕旨，现于全国访求明太祖支派子姓一人，量授职衔，俾之承袭，以奉春秋祭享。但需防奸徒假冒，免生事端。雍正二年(1724)二月十二日礼部将朱之琏情况上报，认为确系明太祖后裔，应迁入京城，酌授职衔，得到雍正帝的批准。同年(1724)十月八日朱之琏由吏部引见，雍正帝封其为一等候，世袭，负责明朝诸皇陵的祭祀，同时将他族内人丁都招入正白旗。

蔡珽获罪得免 蔡珽，汉军正白旗人，云贵总督蔡毓荣子。雍正初年任四川巡抚。他本是年羹尧举荐的人，后由于年羹尧奏请在四川铸钱，被他以四川不产铅为由否定，于是二人结怨。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年羹尧参奏蔡珽，说他逼死重庆知府蒋兴仁，并且受夔东道程如丝的贿赂。关于逼死蒋兴仁一事，蔡珽曾谎报蒋因病而亡。后雍正帝一再追问，蔡珽承认蒋兴仁是在其威逼、羞辱之下自杀的。于是雍正帝下令将蔡珽革职拿问，逮至京师。待蔡珽押送进京之后，雍正帝召其入见，与之长谈，蔡珽历数年羹尧之罪状。此后，雍正帝的态度为之大变。雍正二年(1725)十一月二十二日，刑部议将蔡珽免死，拟以杖责。雍正帝不同意："大臣可杀而不可辱，何得将封疆大吏解京加责?"后经刑部重议，将蔡珽按律拟斩。雍正三年(1725)正月二十二日，雍正帝下令将蔡珽从宽免罪。并且公开申明了他的理由："朕思蔡珽所犯，系年羹尧参奏，今若将蔡珽置之于法，人必以朕为听年羹尧之言而杀蔡珽。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断不可使人谓朕听年羹尧之言而杀蔡珽。"雍正帝此时已感到了年羹尧的威胁，所以他宁可将蔡珽免罪，也不能让年羹尧得逞。次日，他又对大学士们解释说："以前将蔡珽革职，是以为他有病，现知他身体很好，学问尚优，应补授都察院左都御史。"

阿迷州改土归流 阿迷州属云南临安府。原有土知州一官，为李氏世袭。三藩之乱起，时土知州李思敬以兵相助吴三桂，被吴三桂授为制胜将军。平定三藩之乱后，由于本州民人控告，曾改土归流。其后知州王来宾又以各寨皆系夷民，钱粮难催，请求恢复李氏之地位，代政府催粮，委为"土催"，实际上又恢复了李氏的土司之职。至雍正初年，土司一职由李纯接替。李纯对民人派累巨增，苛虐尤甚，同时抗欠政府之正课。这不仅引起了民人的反对，屡向政府控告，也使官府感到此人一日不除，钱粮一日不完。于是，云贵总督高其倬撤其代征之职。李纯不思改悔，仍于暗中私自征收，威胁民人不许完课交官，并且强占旁甸乡之一百九十八寨。官府屡次提拘，负固不出。雍正三年(1725)二月，高其倬派阿迷州知州元展成前往擒拿，遂捉拿归案。其后，籍其家产，并将李纯本人迁往江西。阿迷州亦改土归流。

威远土州改土归流 威远土州属云南镇沅土府。长年以来，土司横行，欺压土民，无限勒索，民不堪其累。且土司向来不许土民应考，恐其入学，与之抗衡。雍正二年(1724)初，土知州刀光焕隐匿朝廷追捕的要犯普有才，拒不交出。同年四月十九日，云贵总督高其倬以"纵贼不法"罪奏请雍正帝废除刀光焕土司职衔，并将威远土州改土归流，得到了雍正帝的批准。于是刀光焕被革职，并遣送江宁，由该地地方官监督。次年(1725)四月二十八日清政府决定，废威远土州，改设威远厅，设抚夷清饷同知一员，经历一员，添设普威一营，派兵驻扎。同时编里甲户口，清查田地，并对夷人子弟中有志读书者，准于元江府附考，增加元江府入学名额二人。普洱府设立后，威远厅改隶普洱府。

雍和宫定名 雍和宫,清代的喇嘛寺,位于今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大街东侧。雍和宫的前身是雍亲王府,即雍正帝做亲王时的府第,创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雍正帝在走进紫禁城之前,在这里渡过了他的大半生。他广结朝廷要员,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小集团,并加入了争夺皇位的斗争;他了解天下大势,明确了奋斗目标,以求登基后一展宏图;他也曾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第一闲人",不问功名荣辱,潜心学问,并把赏心悦目的文字辑录起来,编成《悦心集》一书。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的王府中进行的。经常出入这里的一些"藩邸旧人"在他顺利登上皇帝宝座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雍正三年(1725)六月十三日,大学士们奏请将雍亲王府升格为宫殿,并要雍正帝亲定嘉名。于是雍正帝为自己的故居定名为"雍和宫"。雍正帝死后,还将其灵柩停放在宫内,并因此将宫内永佑殿、法轮殿等主要建筑改易黄瓦。后又奉其影像于永佑殿,从此成为清帝供奉祖先的影堂。乾隆九年(1744),正式改为喇嘛庙,大部分殿宇成为喇嘛诵经之所。从此雍和宫成为清代宗教活动的中心,承德的外八庙即归这里管辖。

安辑棚民 棚民指在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北、陕西、四川等地山区或丘陵地带居住的外来农民。他们因生活所迫,到异地谋生,或开山种地,或开炉铸铁,或当雇工,因系搭棚而居,故称"棚民"。棚民生活没有保障,故而迁徙不常,一些地方还曾发生过棚民的起义。因此,对棚民的逐渐增多,清政府极为重视。雍正二年(1724),户部尚书张廷玉反映浙江、江西的一些抢劫案与棚民有关,建议设法安辑棚民,把他们变为土著,编入保甲,由地方官严行管理,并允许棚民读书入学,以求得地方安宁。雍正帝令有关官员议处。雍正三年(1725)七月初六日,户部等衙门将两江总督查弼纳、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关于安置浙江、福建、江西三省棚民的办法向雍正帝汇报,主要内容是:照现行的保甲之列,按户将棚民编审入册,责成山主、地主、保长、甲长对所管棚民进行担保;情愿编入土著者,准其编入,与土著一体当差;编册之后,续到者不得容留,有愿回本籍者,准其回籍;棚民入籍二十年以后,有愿参加文武生考试者允许参加,于额定人数之外酌量录取;凡棚民多至数百户或千户以上之地,添拨兵丁防守;棚民有窝匪奸盗等情,地方官及保甲长若失察、徇庇,则分别惩治。雍正帝批准了这一安置办法。雍正四年(1726),各地安辑棚民工作陆续进行,并且取得了清政府满意的效果。雍正帝曾得意地说:"在昔棚民,何有近日光景!"雍正九年(1731)二月,清政府特定江西棚民入学之例,以笼络人心。

内务府佐领下人闹事 雍正三年(1725)十月,在京城发生了一起内务府佐领下人吵闹抢物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裁减内务佐领下兵丁而引起。内务府佐领每年所需钱粮,在康熙三十年间,为三十余万两。而至雍正初,已增至七十余万两。为减少开支,雍正帝根据廉亲王允禩的奏请,决定削减内务府佐领兵丁的人数。此事引起了佐领下人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要夺其钱粮,于是数百人聚集到允禩家吵闹,第二天又到内务府总管李延禧家吵闹,并抢去物件。步军统领阿奇图派兵捉拿为首者。雍正帝得知此事,认为是管理内务府的主要官员经理不善。遂于(1725)十一月初二月特颁谕旨,将管理内务府总管事庄亲王允禄罚俸三年,革去常明、来保内务府总管,来保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同时把为首闹事的五人交刑部监看正法,其余一部分人分别发往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安插做苦差,若原系奴仆,则给该处兵丁为奴。

年羹尧死 雍正三年(1726)十二月十一日,刑部等衙门罗列年羹尧九十二大罪状,要求处以极刑。雍正帝念其前功而令自裁。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曾倍受康熙帝赏识。在雍正帝登基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被雍正帝视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加以重用和培植。雍正元年(1723)二月,授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三月,加太保衔,晋爵三等公,并全权处理西北军务。十月,因罗卜藏丹津于青海叛乱,被授于抚远大将军,赴前线平叛,又晋为二等公。次年三月,大功告成,叙平定青海功,晋爵一等公。对于维护新政权,打击允禩集团等,年羹尧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受到雍正帝的恩宠,加官、晋爵、赐第、赏金,接踵而至。但是,年羹尧妄自尊大,不守臣道,甚至在雍正帝面前也"箕坐,无人臣礼"。他排除异己,结党营私,接受贿赂,侵吞军饷。雍正三年(1725)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自然现象,当时以为祥瑞,照例内外臣工上贺表年美惠贺表,因笔误,把"朝乾夕惕"误写成"夕阳朝乾",雍正抓住不改。此事件后,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范时捷、川陕总督岳钟琪、河南巡抚田文镜等相继参奏年羹尧。四月,命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六月,革去太保衔,严惩年氏子弟及同党。七月,降至三等公,革去杭州将军职。八月,再降至阿达哈哈番。九月,革去所有职衔。十月,遣人去杭州促拿归京。十一月至京。十二月便由刑部等做出了最后的裁决致死。

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发 雍正三年(1726)十

二月十八日在处决年羹尧七天之后，雍正帝将汪景祺斩首枭示，妻子发遣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亲兄弟、亲侄均革职，发戍宁古塔，五服内的族亲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一律革职，令原籍地方官管束。汪景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举人出身。因仕途不得意，于雍正二年(1724)赴西安，任职于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幕府。谀称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功绩远在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人之上。同年五月节前作《读书堂西征随笔》，献给年羹尧。内有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意在讽刺康熙帝之书法，又有非议康熙帝谥号及雍正帝年号之文字。书中尚有《功臣不可为论》一文，乃年羹尧青海建功之后而作，针对舆论中功臣不能自处而遭屠戮的观点，加以驳斥，旨在责备人主，为功臣鸣不平。文章分析人主杀功臣的原因在于对功臣疑之，畏之，怒之，怨之。劝臣子不要做功臣，警告君主不要杀戮功臣。次年，年羹尧案发，在查抄年羹尧杭州住宅时发现了《西征随笔》一书。雍正帝憎恨汪景祺议论讥讽杀功臣事，但又不便发作；后终以其诗句中攻击康熙帝的地方，定为大不敬罪，并指为年羹尧同党。

京畿营田　雍正三年(1725)夏，直隶大水成灾。清政府在赈济霸州、保定等七十二州县厅水灾饥民的同时，决定经营畿辅水利，兴办水利田，并派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率员考察。同年(1726)十二月二十三日，允祥等将考察结果上报，并绘图进呈，同时陈述直隶水利营田事，建议设营田，拣干练河员督率。雍正帝大为赞赏，遂命允祥总理其事。随后，设立了营田水利府，下辖四个营田局，负责兴办直隶水利营田事。雍正四年(1726)，朱轼又提出加速营田工程的建议；鼓励民人开垦，照亩积多寡，给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顶戴；凡到水利府工程处效力的民人，可视其承包工程量之大小，录用为不同职务的官员；降革官员赴工程效力者，竣工之后可以开复；流徒以上罪犯效力者，准予减等。雍正帝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自雍正五年(1727)起，京畿营田便大力开展起来。营田工程有两项，一为修治河道，疏浚建闸，一是营造水田。雍正帝还调来江南、浙江老农教授水田耕作技术。营田很快收到效果，当年，官私垦田八千多顷，每亩可收稻谷五至七石。对于京畿营田，雍正帝一直坚持，收效明显。

惩办允禟　允禟，康熙帝第九子，受封贝子爵。因支持允禩争夺储位，并与其结党，一直被雍正帝视为心腹之患，并寻机惩治。康熙帝病逝后，允禵奉命回京，雍正帝以军中需人为由命允禟前往西宁，实际是将其发配。允禟明白皇兄之用意，推说侍皇父百日冥辰后前往，后来又说等送了陵寝再启程。由于雍正帝一再催行，遂于雍正元年(1723)到了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雍正帝指示年羹尧留意，不要叫允禟将兵丁收买了去。允禟到西大通后，就奏请回朝，雍正帝未置可否，只言“知道了”。却暗中指示年羹尧不得放其回京。雍正二年(1724)四月二十日，宗人府参奏：允禟遣人到河州买草，踏看牧地，属“抗违军法，肆行边地”。请革允禟贝子爵。雍正帝以示宽大，遂免。雍正三年(1725)初，雍正帝闻知允禟纵容家人在西宁生事，遂遣都统楚宗前往约束。待楚宗至，允禟不出迎圣旨，且说：“上责我皆是，我复何言？我行将出家离世！”楚宗将此情汇报了雍正帝。二月二十九日雍正帝召见诸王及满汉文武大臣，当众宣布了允禟的罪恶以及历年与允禩等结党的事实。不久，又有人参奏允禟护卫乌雅图等路过山西定州时欧打生员，且陕西人称允禟为“九王”。雍正帝大怒，遂于同年七月二十九日下令革允禟贝子爵，撤其佐领属下，于西宁幽禁。并行文陕西督抚，日后再有称允禟为九王爷者，从重治罪。雍正四年(1726)正月，有人向雍正帝报告，允禟别造字体写信，暗藏密递，书言“事机已失”。雍正帝认为这纯属“敌国奸细之行，”遂于正月五日下令革去黄带子，削宗籍。不久，允禟被押至保定，直隶总督李绂奉命将其圈禁。五月十四日允禟被改名“塞思黑”(满语，意为“猪”)后又被列二十八罪状，论死。八月，允禟死于禁所。

惩办允禩　允禩，康熙帝第八子。初封贝勒。在康熙晚年争夺储位的斗争中锋芒毕露，并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政治集团。雍正帝继位后，自然把允禩列为主要的政敌。但是为了不操之过急，先稳住对手，雍正帝封他为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并任为总理事务王大臣，表示重用，然后寻机下手。雍正二年(1724)七月，雍正帝颁布亲书的《朋党论》，指责允禩等人结党，实际是向允禩下手的一个信号。八月二十二日，又召见诸王宗室，当众谴责允禩与允禵、允禟等人结党。(1724)十一月十三日，又指责允禩受命总理事务三年以来“所办之事，皆要结人心，欲以恶名加之朕躬。”同月(1725)二十二日又发出上谕：“若有归附允禩，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亦断不姑容。”雍正帝为了最后孤立允禩。先惩治了他的党羽，在把苏努、允禵、允禟等人治罪后，于雍正四年(1726)正月初五日发出上谕，历数允禩之罪状，主要说他“诡计百出，欲以摇惑人心，扰乱国政”，是“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下令褫夺他的黄带子，削除宗籍。正月二十八日，又以允禩妻乌雅氏不恭，革去福晋，休回母家，严行看守，并

告诫允禩,若怀恨在心,必从重治罪。二月初六,将允禩降为民王,不得依宗室诸王例保留所属佐领人员。次日,诸王奏请将允禩正法,雍正帝假称不忍。二月十日,命将允禩在宗人府看守,寻圈禁高墙。三月十二月,允禩奉命改名,自己改为"阿其那"(满语,意为"狗"),将其子弘旺改为"菩萨保"。五月十七日,雍正帝召见诸王大臣、九卿等,历数允禩及允禩等人之罪恶,并要"使中外之人,昭然尽晓"。六月三日,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满汉文武大臣公同议奏允禩罪状四十款,请处死,雍正帝未允。九月十日,允禩病死禁所。

禁用铜器 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需用量猛增。由于制造铜钱的主要原料黄铜生产不足,铸钱不多,以致出现钱贵银贱的现象,即钱价高于银价。一些私人铸钱者趁机毁掉政府的制钱,以大大少于政府制钱中的含铜量铸私钱以图厚利,还有人毁掉制钱改铸铜器,这就破坏了清代的钱法。清政府在严禁私铸的同时,下令禁止使用铜器。雍正四年(1726)正月二十六日户部建议:除乐部等必需用黄铜铸造的器皿外,一律不许再用黄铜制造;已成者,当作废铜交官,估价给值,今后再违禁制造,一律治罪。得到雍正帝的批准。同年(1726)九月七日,雍正帝再下禁令,只准三品以上官员使用黄铜器具,其他一概禁用。现有铜器,一律要在三年之内交清。并指出,不如此则钱价不能平。十月九日重申此令,并指示先在直隶八府及各省督抚驻扎之省城试行之。雍正(1727)十二月十九日,雍正帝特谕京城文武百官、军民人等交售铜器。雍正五年(1727)元月六日又专向八旗官员兵丁申明禁令。这项关于禁止使用铜器的命令以京城收效比较明显,但在地方上由于民间所存黄铜器皿本不算多,加上人们爱惜,不肯当废铜交售,故而收获甚微。

颁赐在京衙门御书匾额 在整顿吏治的基础上,雍正帝为了使在京各衙门都能真正做到尽职尽责,雍正四年(1726)二月初九日,他特意亲笔为这些衙门题书匾额,既作为对他们的鼓励,同时又是对他们的严格要求。匾额共计二十一。宗人府为"敦崇孝悌";内务府为"职思总理";吏部为"公正持衡";户部为"九式经邦",礼部为"寅清赞化";兵部为"整肃中枢";刑部为"明刑弼教";工部为"敬饬百工";銮仪卫为"恪恭舆卫";通政使司为"慎司喉舌";大理寺为"执法持平";理藩院为"宣化遐方";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衙门为"风清辇毂";太常寺为"祗肃明禋";太仆寺为"勤字天育";光禄寺为"敬慎有节";国子监为"文行忠信";鸿胪寺为"肃赞朝仪";钦天监为"奉时敬授";顺天府为"肃清畿甸";仓场总督衙门为"慎储九谷"。

朱轼奔丧回籍 朱轼,字若瞻,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五十六年(1716)任浙江巡抚,次年请修浙江海塘,获准。康熙六十年(1720),山西、陕西旱灾,奉命安抚饥民。及至山西,令被劾司道以下各官出资赡饥民,劝富商出资于南省 米,又设医疗站为饥民诊治,防止疾病流行。雍正帝继位,召进京,充《圣祖实录》总裁。雍正元年(1723),命直南书房,寻加吏部尚书衔,复加太子太保。顺天乡试,充主考官,以办事公慎受雍正帝嘉奖,进太子太傅。雍正二年(1724),奉命勘查浙江海塘,遂驰驿前往,制定修筑方案,取得明显效果。雍正三年(1725),又协助怡亲王允祥经营畿辅水利营田,倍受雍正帝赏识。四年(1726)二月,母冷氏丧。朱轼素以至孝闻名。先是,康熙六十年遭父丧。请回籍治丧,康熙帝以朝廷用人之际,命在任守制,至次年才回籍葬父。至是,雍正帝特命驰驿回籍,赐银二千两治丧。劝其"节哀抑恸,护惜此身"。朱轼具折谢恩,请解任开缺,以终服制。雍正帝见"情词迫切,"但考虑三年守丧为时甚久,且畿辅水利之事正资料理,故允其守孝半年,于八月起身回京。九月,朱轼将至京,雍正帝特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劳,并许素服三年终丧。

鄂尔泰首上改流折 雍正四年(1726)二月二十四日,云南巡抚兼管云贵总督事务鄂尔泰,向雍正帝呈上了他的第一个请求在西南进行改土归流的奏折。内称:"云贵土司毒派夷众,恣肆梗顽。欲靖地方。须先安苗倮;欲安苗倮,须先制土司。"这个奏折引起了议论。原来,在此以前,已有许多人提出在西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的建议,均遭雍正帝的驳斥。如雍正二年(1724),广西提督韩良辅请将广西土司改流,雍正三年(1725),署贵州巡抚石礼哈奏请进取古州,雍正帝一概未准,并提醒他们不可贪利图功,轻举妄动。正是由于皇帝的鲜明态度,使得鄂尔泰的建议一提出,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鄂尔泰坚持己见,并于三月二十日、四月初九日、四有二十五日、六月初二日、六月二十日、七月初九日连上数折,阐明了改流的目的、意义、方针和手段,反复强调:不改土归流,终非远计。特别对贵州长寨苗民阻拦官兵修建营房一事,鄂尔泰态度坚定,力主发兵进剿。贵州文武一闻进剿,"莫不骇目惊心",甚至,"疏上,盈廷失色"。首先反对的是贵州巡抚何世璂,而后贵州总兵官丁世杰又提出三个不可进剿的理由,反对用兵。鄂尔泰驳以三不可不剿。这时,雍正帝一反常态,完全站到了鄂尔泰一边,全力支持改流,并说以前不同意改流

乃因石礼哈等人“非能办理此事之人，故未允其请”。同时斥责韩良辅等人是“小知小见，乃攀枝附叶之举，非拔本塞源之策”。遂即将改土归流的大权交给了鄂尔泰，并要西南诸省官员，听鄂尔泰指挥，“不可另立主张”。于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改土归流在西南诸省开始了。

西南诸省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明清统治者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即废除土司，而代之以流官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清政府开始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广诸省改土归流，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它使内地的行政制度得以在边区实施，推动了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史中边疆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土司制度发展到清代，已进入了它的没落时期。由于土司制度带有浓厚的割据性，因此，它不仅严重阻碍了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随着清政权在全国范围的巩固，解决土司问题即提到了议事日程。清统治者进行改土归流，始终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手段，其含意有二：一是“逆者剿，顺者抚”；二是先剿后抚。实际上是以强制手段来推行改流的。这次改土归流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雍正四年到九年(1731)，主要靠武力征服，改流重点在云贵，大批土司在这期间被废除。第二阶段是雍正九年以后，这一时期用兵较少，改流重点集中在四川、湖广、广西，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善后工作。这次改土归流规模极大，共废除土司约一百五十三个，其中雍正四年至九年大规模用兵时期革除一百一十个；改流之地所设流官一百二十一个，所涉及的地区，以府计算，共四十四个府(包括直隶厅州)，所涉及的民族(以现在的民族而论)有苗、侗、布衣、水、彝、纳西、壮、瑶、土家等，共计十九个。改流以后，清政府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主要是：对革除土司的处理；对新设流官的选任；对各族人民的控制和管理；对各种旧制陋规的禁革；对边区的开发。改流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首先是促进了国家的统一，边防的巩固，同时促进了西南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改土归流毕竟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进行的一项政治改革，它与民族征服政策又是紧密相联的，西南各族人民是在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才换来了本民族的发展。

钱名世赠诗案发 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举，与年羹尧南北乡试同年。雍正二年(1724)，年羹尧进京，时任侍讲的钱名世赋诗相赠，内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之句，还有“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极力称赞年羹尧。因允禵调兵进藏，康熙帝为其立一碑，钱名世认为年羹尧青海之功，应再立一碑。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年羹尧被处死。几个月后，钱名世亦以年党获罪。雍正四年(1726)三月三十日大学士、九卿等奏请将其交刑部从重治罪。雍正帝却别出心裁，说钱名世赠诗年羹尧是文人的无耻钻营，违背圣贤遗教，不配作儒门中人，对他应口诛笔伐，以文词为刑法来制裁。遂下令将钱名世革职，发回原籍，并亲笔书写“名教罪人”四字，令原籍官员制成匾额，挂在钱名世住宅，又令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作一首诗讽刺钱名世，并由钱名世本人把这些诗刊刻进呈，分发直省各学校，以为无耻文人之炯戒。

清军会攻长寨 长寨属贵州省贵阳府广顺州。鄂尔泰主持西南改土归流，大规模用兵，首起长寨。雍正四年(1726)初，为进剿所谓“不法苗倮”，清廷调兵入黔，并于长寨修建营房。二月初一，长寨所属羊城屯、者贡、谷隆、焦山一带苗民阻建营房。鄂尔泰令提督马会伯、威宁总兵石礼哈先行晓谕，若不从，即继之以兵威。长寨苗民不听劝阻，并围军营，吹角呐喊，以示抗拒。四月初九日，鄂尔泰下令进剿，并声称：“今苗既肆明顽梗，杀之有名，藉此一举以慑伏群苗”。长寨苗民占据山口，档木垒石，准备迎战。五月初九日，清兵三路会攻长寨，克九村寨，并占谷隆关。五月三十日攻下者贡屯，六月二日克羊城屯。苗人终不敌清军之进攻，死伤惨重，遂表示归顺。随即，清政府清查户口，重建军营，并增加驻兵名额。八月初五日，以长寨各苗寨悉平，清政府移贵阳同知驻其地，设长寨厅，隶贵阳府。

清廷推行保甲制 雍正帝对实行保甲十分重视。二年(1724)二月，在颁布《圣谕广训》时，即将“联保甲以弭盗贼”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保甲推行不力，盗匪则不能肃清，要求“城市乡村严行保甲，每处各自分保，每保各统一甲，城以防分，乡以团别，排邻比户，互相防闲”。但是，由于清初实行编审，作为征发徭役的根据，因此，保甲制还没有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当雍正帝在全国施行摊丁入地之后，编审停止了，保甲制就显得十分重要。雍正四年(1726)四月二十二日，雍正帝对大学士等说，弭盗之法，莫良于保甲，但多年来奉行不实，稽查不严。要求九卿等根据各地特点，如村落零散、沿海、少数民族地区等详议具奏。七月二十五日，吏部遵旨将议定的保甲条例呈上：十户为一牌，设一牌头，十牌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正；畸零村庄、“熟苗”、“熟僮”，一体编入保甲；地方官不实力奉行，按情节分别议

处；建立民间劝惩办法，对违犯保甲条令的人，若行告发，按被揭发的人数给奖，若为隐匿，予以杖责。雍正帝批准了这一条例，命令各省通行，限一年内执行完毕。十二月，内阁等衙门又根据云贵总督鄂尔泰关于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的建议做出规定；民苗杂处之地，户多畸零，无论民夷，凡自三户起，皆可编为一甲，其不及三户者令迁附近地方，不许独住。

禁锢允禵 允禵，康熙帝第十四子，初封贝子。他与雍正帝均为仁寿皇太后所生，但这对同母兄弟却视如冤家。康熙帝临终留下遗诏，由皇四子胤禛缵成大统，这对允禵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因此，当允禵被召回京拜谒大行皇帝梓宫时，见到雍正帝仍耿耿于怀。他只是远远地给皇兄叩头，进臣子礼而已，毫无亲近之意。雍正帝为示大度，上前将禵他，他仍不动，侍卫拉锡见此僵局，连忙拉他向前。待到离开皇帝，他就责骂拉锡，又到雍正帝前控告拉锡无理，要求将拉锡正法。明为指责拉锡，实为向雍正帝抗议。雍正帝为争取人心，终于忍下了。雍正元年(1723)三月，康熙帝灵柩送到遵化景陵，雍正帝留允禵看守景陵，实际是囚禁于遵化。五月二十三日，仁寿皇太后病故，为慰皇太后之心，雍正帝晋允禵为郡王，但仍囚系于景陵，同时指出："允禵原属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屡加训谕，望其改悔，以便加恩。若从此知改悔，朕自叠沛恩泽，若怙恶不悛，则国法具在，朕不得不治其罪。"雍正二年(1724)七月，雍正帝颁布亲书的《朋党论》，指责允禵与允禩结党。八月二十二日，又召见诸王宗室，当众指责允禵、允禩、允禟等人"俱不知本量，结为朋党，欲成大事。"问题已讲得相当严重。三年(1725)三月，宗人府弹劾允禵前为大将时，苦累兵丁，侵扰地方，糜费军帑，请降爵至镇国公。雍正帝为表宽容，命降为贝子。四年(1726)五月初二日，因有人投书允禵，为其喊冤事被揭发，诸王大臣奏请将允禵正法。雍正帝说，允禵只是"赋性糊涂，行事狂妄，"与允禩、允禵"奸诈阴险"尚有不同。决定将其移回京城，与其子白起，一同禁锢于景山寿皇殿。至到乾隆帝登基，才将允禵释放。

广州发生抢米案 雍正四年(1726)春，正值青黄不接之时，广东米价昂贵，当时的广东巡抚杨文乾又要减少从官仓的粜米数额，致使奸商渔利，民人不堪其累，就连在这里的驻防兵丁亦大为不满。五月下旬，终于发生了广州民人聚众抢米事件。参加者，有平民百姓，也有驻防士兵。他们抢米厂，并打伤前来阻拦的军官和士兵，随即到衙门说理，斥责奸商。(1726)五月二十六日，杨文乾将此事上报。雍正帝认为事态严重，遂派兵部左侍郎塞楞额急赴广州，会同署理广州将军阿克敦、巡抚杨文乾审究。不久，雍正帝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于七月初一日颁下谕旨，指出："凡各省地方有缺米或米价昂贵者，必系其地上年荒歉所致，而广东上年奏报丰收，并未称荒歉。"这里显然带有指责之意。考虑到广东地处边区，为稳定局势，雍正帝要求今后必须做好粮食储备工作，以解决民食问题。抢米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镇沅土府改土归流 镇沅土府位于云南省中部，是鄂尔泰主持西南改土归流于云南打击的第一个目标。鄂尔泰对滇黔的改流形势做过分析，认为贵州应以平"苗患"为主，云南土司多半豪强，残暴横肆，无所不为，应以惩治土司为主。而云南土司中之难治者，镇沅土府刀瀚尤为突出。刀瀚乃镇沅土知府，他横行乡里，目无国法，性嗜贪淫。每年征于土民的税粮、税银只以十之一、二，或百之二、三，交于政府，其余尽入私囊。雍正三年(1725)，镇沅土府所辖威远土州改流以后，其威远盐井亦收归政府管理，这对刀瀚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凭借手中尚有的权力，强占田地，阻拦砍柴烧盐，并且威吓灶户，殴打政府派往守卫盐井之兵丁，在地方上造成恶劣影响，以至官兵亦无可奈何。雍正四年(1726)六月初二日鄂尔泰令临元总兵官杨天纵派兵征讨。六月十九日，官兵擒刀瀚，并撤取其印信(即中央政府铸给的土官官印)、号纸(即中央政府颁发的土司就职文凭)，遂即押解临安，又转押省城。土民闻刀瀚就擒，纷纷向官府控告其强占民妻等罪恶。经雍正帝批准，刀瀚处以斩监候，家口迁往江宁，镇沅土府改流为镇沅府，以威远同知刘洪度署府事。

郭允进投书案发 雍正四年(1726)正月，雍正帝历数允禩诸多罪状之后将其圈禁。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支持、同情允禩的人加紧了活动。天津州民人郭允进自称遇洪觉禅师，得授韬略，书写传单，到处散发。内称"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因允禩被人视为"佛者"，且排行第八，故称"八佛"。所谓"八佛被囚"，实际上是指责雍正帝圈禁允禩。传单中还说，自雍正以来，旱潦灾荒不停。以此说明雍正朝政治之腐败。为了在朝廷内造成影响，郭允进还将传单塞进了刑部右侍郎塞楞额的轿内。雍正帝得知此事，即令直隶总督李绂等捉拿其人，追穷根源。并于同年五月十七日特颁谕旨，一一批驳郭允进之"妄言"，指出，其实乃允禩朋党之奸逆。后李绂上报，除郭允进之外，再未发现造言生事之人。并说郭允进"素有疯疾"。七月二十九日，刑部拟定将郭允进

凌迟处死，雍正帝以其虽有悖逆之词，尚无叛逆之迹，改为立决枭示。

拟定分别流土考成法　雍正四年(1726)八月初六日，主持改土归流的鄂尔泰拟定了分别流土考成法，上奏雍正帝。鄂尔泰指出，自明代以来，土司与流官同样授与职衔，但无考成，因而地方官无法约束土司。现在地方命盗之案日增，就在于土司考成不严，有时官府通缉凶犯，而土司知情故纵，流官亦束手无策。欲求地方安宁，必须严格土司考成。建议制定分别流土考成法：盗由苗寨，专责土司；盗起内地，责在文员；盗自外来，责在武职。责在土司者，未减流官；责在文官者，未减武职；责在武职者，亦未减文员。以此三者，分别议罪，土司无辞，流官亦服。雍正帝接到奏折后，让兵部、都察院等衙门讨论。同年(1727)十二月二十一日，经各衙门讨论，雍正帝批准，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分别流土考成法，责令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五省一体遵行。并且强调：土司如"故纵苗倮，扰害土民"即革职，至有养盗殃民者，题参严拿治罪。倘能严行约束，擒拿盗贼，奏明加级，以示鼓励。

雍正推行耕田法　雍正二年春，雍正帝首行亲耕礼。雍正四年(1726)春，再次亲耕耕田。秋收时，当他听说　田产嘉禾，一茎九穗时，甚为满意。遂即在同年(1726)八月二十七日，下令各省督抚及所属府、州、县、卫之官，俱行耕耕之礼，各地均立农坛耕田，自雍正五年(1727)始，岁仲春亥日，率属亲耕，行九推礼。雍正帝推行耕田法的目的，在于使为官者知稼穑之艰难，悉农夫之作苦，察地力之肥硗，以存重农课稼之心，同时亦可使为农者，断无苟安怠惰之习。此令一下，各地立即执行，耕田遍布全国各州县(州县耕田为四亩九分)。雍正帝不仅下令推行耕田法，而且不时检查各地实行的效果，一旦发现实行不力者，即严加处理。雍正五年(1727)九月二十二日，当他得知广西临桂县知县杨询朋将耕田荒芜，颗粒未收，遂即降旨将杨询朋革职，并留在该县管理耕田十年。六年(1728)六月，浙江总督李卫题参永康县试用知县陈桂于耕田大典草率从事，不合规制，雍正帝也将他革职。雍正帝推行耕田法，表现了他严格要求地方官重视农业生产的决心，在实际推行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安溪罢市　雍正四年(1726)九月二十二日，福建安溪县发生了罢市事件。安溪县典史陈永芳奉上司差委，追征往年的屯地欠银，引起了民人的不满，为了反对官府的这项政策，安溪县民人实行了罢市。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浙闽总督高其倬认定有"奸棍"从中倡导，下令捉拿为首者，并以残酷的杖刑，将这些为首群众活活打死。雍正帝闻讯，表示完全支持高其倬的做法，并批示说："应如是惩治，以警刁顽"。虽然安溪罢市事件迅速平息，但它反映了人民对官府的憎恨，几乎是一触即发。

查嗣庭狱案发　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七年(1706)进士。雍正初年，因隆科多荐举，任内阁学士，后兼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取《易经》中"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其旨远，其辞文"及《诗经》中"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为试题。后被人告发试题荒谬。雍正帝将试题中"正"、"止"二字联系起来，指其攻击雍正之"正"字有"一止"之意，实属"心怀怨望，讥刺时事"。又以其为隆科多朋党，故在除掉隆科多之前先兴此狱。由于顾虑有人"以查嗣庭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其称屈"，乃下令抄其家，得日记二本，终于发现其中有议论朝政之语，如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遂指为"悖乱荒唐"、"大肆讪谤"，于同年(1726)九月二十六日下令将其革职下狱。不久，查嗣庭死于狱中，雍正五年(1727)五月七日，经内阁等衙门议定，雍正帝批准，查嗣庭被戮尸枭示，其子查澐应斩监候，家属流三千里，家产变卖充浙江海塘工程费用。

谢录正暴动　谢录正，湖南辰州府辰溪县人。由于不堪官府压迫，康熙末年开始组织反抗队伍，占踞山谷，操练演习。雍正四年(1726)九月，清政府派兵一千多人前往镇压。谢录正等人率众奋起抵抗，杀伤清军官兵多人。后终因寡不敌众，队伍很快散去，谢录正等人逃匿他乡。清政府下令缉捕，次年，谢录正等被捕。雍正五年(1727)八月十二日，经刑部奏报，雍正帝批准，谢录正被凌迟处死，其妻子给付"功臣"人家为奴，同伴陈彬臣等被杀，张如茂等被发遣到三姓地方为奴。谢录正自组织反清力量到惨遭杀害，前后坚持斗争达八年之久。

修建清西陵　雍正四年(1726)九月，雍正帝命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部府官员筹建他日后的陵寝。雍正五年(1727)四月，允祥选中了遵化九凤朝阳山地，雍正帝本人也表示同意。但动工之后，发现土质不好，遂弃而不用。因遵化地方没有中意的，又转向京都西南的房山，后因这里"地内皆砂"，又另寻他地。后雍正帝委派福建总督高其倬与允祥勘察。高其倬以通晓天文地理著称，经他与允祥调查，选中了易州泰宁山太平峪地方，认为这里"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

气,诸吉咸备”。雍正帝本人亦很满意,但他有个顾虑,即这里远离父、祖陵寝,与建陵一地之理不合。于是他在七年(1729)十二月让臣下为其寻找合理的根据。很快,大学士等奏称: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亦不在一县之境。今选易州设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易州均在畿辅,离京城不远,完全可以建陵。这样,雍正帝算是有了根据,遂于雍正八年(1730)在易州兴工,至乾隆二年(1737)方告竣工。泰陵建有碑亭、享堂、隆恩殿、方城、明楼和地宫,此外还有一群石象生,整个建筑雄伟壮丽。雍正帝修建西陵,也引起了世人的猜测,有人说他狂妄自大,自建中心。也有人说他因谋夺皇位,无颜以见九泉之下的父亲,故而躲避。也有人认为他是迷信风水而另择佳穴。

设观风整俗使 雍正三年(1725)、四年(1726)连续发生的汪景琪、查嗣庭案件,引起了雍正帝的警觉。由于汪、查二人均系浙江人,雍正帝认为二人在浙江必有影响,因此断定浙江风俗浇漓,有必要专派一官前去治理,稽察奸伪,或劝导,或惩治,务使浙江绅衿士庶有所儆戒,“尽除浮薄嚣陵之习,归于谨厚,以昭一道同风之治。”遂于雍正四年(1726)十月六日下谕九卿等,让他们研究具体办法。九卿建议仿唐朝贞观年间所置观风俗使,派官往浙江,省问风俗,稽查奸伪,授为浙江等处观风整俗使,并铸给关防(即清代临时性差遣官员所用之印信),以重职守。得到了雍正帝的批准。遂即委任河南学政、光禄寺卿王国栋为浙江观风整俗使。

停浙江士子乡、会试 汪景琪、查嗣庭事件发生后,雍正帝不仅派观风整俗使去整顿浙江风俗,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对浙江士子的控制。在他看来,读书人首应讲求天经地义,知有君父之尊,然后见诸行事,以备国家之用,非仅欲其工于文字也。从这一点出发,他于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二十七日颁下谕旨,指出浙江文词虽甲于天下,而风俗浇漓,敝坏已极,如汪景琪、查嗣庭之流,自恃清高,傲漫一世,轻薄天下之人,甚至丧心病狂,谤讪君上,实为千古罪人。朝廷开科取士,原欲得人任用。岂能让汪、查之流玷辱科名。同时推断,浙江士子必受汪、查的影响,因考虑到“人心风俗,关系重大,不得不严加整理,以为久安长治之计”,于是下令停止浙江士子参加乡试和会试的考试,直至浙江风俗渐趋淳朴时止。直到雍正六年(1728)这一禁令才被解除,允许浙江士子参加次年的乡、会试。

平金格、阿租之乱 金格、阿租乃四川建昌山营所属“番人”头目。雍正四年(1726)夏,金格、阿租等“煽众狂悖”,与官府为敌。一时,附近之土司也相继起兵,随之为乱。其中有阿都宣慰司慕枝、阿史安抚司乌贵、宁番安抚司安承裔、纽结土千户恩嘴、歪溪土百户菊虐等,共计五十六土司。川陕总督岳钟琪于八月二十六日拨绿营兵二千五百名、金川等处土兵一千七百名进剿。九月二十八日官军与乱军交战,俘获甚众,进而进兵乾县、波罗、下沈等处,招抚数十寨。十一月二十七日擒金格,十二月初三日擒阿租。随后将普雄、凉山、竹核等处番民悉行招抚,剃发留辫,认赋输贡、继而查明追缴从乱之宣慰司、安抚司、土千户、土百户等土司印信(即中央政府铸给的土司官印)五十六颗、号纸(即中央政府颁发的土司就职文凭)四十八张,一并改流。次年二月,其地划归新设之宁远府。

黄河水清 雍正四年(1726)十二月至五年(1727)正月,河道总督齐苏勒、漕运总督张大有、河南巡抚田文镜、山东巡抚塞楞额、陕西巡抚法敏、副总河嵇曾筠等人先后奏报黄河水清。报称,自四年(1726)雍正十二月初九日至雍正五年(1727)正月初四日,陕西、河南、江南、山东四省境内两千里的黄河清澈见底。雍正帝认为,河水澄清两千里,期逾二旬,实从未有之上瑞,他说:“数年之中,荷蒙上天、皇考默佑,叠赐嘉祥,兹又有河清之上瑞,朕细推天人感应之理,自非无因。上天、皇考既赐福于朕,朕即以此福及诸臣。”遂于正月十三日,赐主事、参领、知县、参将以上内外文武官员著加一级,以示加恩。文武大臣也纷纷写贺词,赞扬皇帝英明,以致天降祥瑞。太常寺卿邹汝鲁作《河清颂》,内有赞词“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一句,呈上之后竟惹来了大祸。雍正帝说:“朕继位以来,事事效法皇考。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因为雍正帝一直打着法祖的旗号,所以对“移风易俗”一类赞扬的话亦觉有影射之嫌,于是,在正月二十九日下令将邹汝鲁革职,发到湖北荆州沿江工程处效力。

谢济世劾田文镜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举乡试第一,康熙五十一年(1712)成进士。雍正四年(1726)任浙江道御史。同年十二月,上疏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列“营私负国,贪虐不法”等十罪。在此之前,直隶总督李绂也曾参劾田文镜,为雍正帝所斥。至谢济世奏上,雍正帝认为与李绂所奏内容完全相同,显系受人指使,而且李、谢均为科甲出身,雍正帝欲打击科甲朋党,因而将谢奏掷还,不让他参劾。谢济世坚持不撤,雍正帝大怒,说:“田文镜秉公持正,实心治事,为督抚中所罕见者,贪赃坏法,朕保其必无,而谢济世于督抚中独劾田文镜,不知是何居心?”遂夺其官,让大学士、九卿、

科道会审。刑部尚书励杜讷问:“是何人指使?”谢济世答:“孔、孟”。问:“何故?”答:“读孔孟书,当忠谏。见奸弗出,非忠也。”十二月初八日,刑部等衙门以谢济世参劾田文镜风闻无据,显系听人指使,请求拟斩立决。雍正帝令将谢济世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此案亦免深究。

推行宗族制 雍正二年(1724)二月,雍正帝颁布了《圣谕广训》,第二条就是宣扬“笃宗族以昭雍睦”。他强调,“凡属一家一姓,当念乃祖乃宗,宁厚毋薄,宁亲毋疏,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联”。他号召宗族兴建祠堂,设立宗族学校,添置族产,纂修谱牒,并以这四件事当作维持宗族制度的要务。当时的家族,一部分设立宗祠,并设有族长,由族内自选,主持族政。为了加强政府与宗族的联系,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下令在宗族设立宗正,负责考察族内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封建的道德标准,表彰贤者,惩治不肖者。而族正的人选,却要由政府指定,代表官方,以此加重宗祠的权力。五年(1727)五月,雍正帝又更改了与祠堂有关系的法律条例,他说,凡经官府惩治而不改悔之人,准本族祠堂告官,可以将其流徙远方,以为宗族除害;若本人所犯之罪在国法虽未至于死,而其尊长族人为翦除凶恶,训诫子弟,治以家法,以致身死,可免执行人抵罪。后九卿根据这一谕旨,拟定了相关律例。清政府赋予祠堂以惩治族人的某种司法权,是企图利于宗族权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刀如珍聚众杀流官 雍正四年(1726)六月,镇沅土府改土归流,土司刀瀚以强夺田地,奸占民妻罪拟斩监候,家属被迁往江宁。改流以后,朝廷派刘洪度署理镇沅府事。刘洪度清查土司强占的田地,共计七百零一顷另七十一亩,勒令征收田赋,触及了原土司上层的利益,土司族属、土目人等请求免课,未允,遂心怀不满,借机报复,以图恢复旧日的地位。由于刘洪度对民众亦“苛索银两”、“编粮苛刻”,在平民中也引起了反感。于是,土目刀如珍等煽动反对流官。雍正五年(1727)正月十七日,刀如珍带领数百人围攻知府衙门,他们杀死了刘洪度,并放火焚烧了衙署,抢走了库藏,放走了囚犯。随后据险顽抗,希图招安。云贵总督鄂尔泰发兵进讨,很快将刀如珍等捉拿归案。此事的发生,给清廷敲了警钟,鄂尔泰当即指出,土司族属冀图报复是主要原因,而刘洪度立法过严也给人以可乘之机。雍正帝亦希望,“经此一事,乃转祸为祥,使地方微员亦自知检束”。此后,清廷对新任流官的选任就格外慎重了。

《大清律集解附例》告成 雍正五年(1727)二月,《大清律集解附例》正式刊刻公布。还是雍正元年(1723)八月,雍正帝采纳了御史汤之旭的建议,任大学士朱轼为总裁,重修《大清律》。《大清律》始修于顺治三年(1646),大体上沿袭明律。因为当时修律的目的只是希望有法可依,因而仓促成书,极为粗糙。康熙时曾做过一些修改,以《现行则例》颁发执行,但对律文未作正式变动。因此,当汤之旭以《现行则例》有拟罪轻重不一,事同而法异等弊病,建议重修律例时,雍正帝即采纳了他的意见。雍正帝对重新纂修《大清律》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实际上就是要一方面镇压人民的反抗,一方面约束各级官吏的不法,以维护其“大一统”的封建秩序。在修订期间,雍正帝多次下谕,指示如何纂修,并“一句一字必亲加省览,每与诸臣辩论确商,折中裁定”。雍正三年(1725),完成《大清律集解》和《大清律增修统纂集成》。五年(1727)二月,正式刊刻公布,即《大清律集解附例》。重修的《大清律》仍分为名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篇,三十门,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八百二十四条。并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更加突出了法律作为专政工具的作用。它不仅全部继承了前律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律文,而且更明确地把人民的一切反抗,包括利用宗教结社形式的反抗统统列入“法不容宽”之列,规定一律加以极刑。二是注重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及权威性,追求对律、例文字的准确表达,以使各级官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依律行事”,不出偏差。三是注意到了在惩治犯罪过程中的“公平”原则。如历代法典中都有的“八议”一项,雍正帝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不可为训”。但为了不使人误解,他仍令载入律文,并写明保留“八议”的目的在于“使应议之人咸知自重而不轻于犯法也”。重修《大清律》的颁布,说明封建立法思想日渐成熟。

整顿京城治安 雍正五年(1727)三月,雍正帝下令在京城内严查户口,整顿京城治安,对于有正式职业的人、进京赶考的举人,以及在京城作幕僚的外地人允许留京居住,其他无业者一概视为“奸伪棍徒”,由步军统领、巡城御史率兵驱逐,不许在京停留。同时规定,客店、寺庙,以及官民人家都不许容留行迹可疑的人,违者治罪。闰三月,再颁谕旨,命步军统领阿齐图把京城中的游方僧道,以及自称神仙、聚众做会者押解回原籍,并行文原管地方官,严加管理,不许他们再出境。若今后发现再来京者,连同该管地方官一并治罪,决不姑容。同时,为了防止八旗中的游手好闲之徒为非作恶,雍正帝又命令八旗大臣,将此等人员查出,迁至京城附近的井田,令其耕

种。

拣选会试下第举人 雍正五年(1727)二月，雍正帝为了笼络更多的读书人，在会试之后，命令吏部会同九卿拣选当年会试落选举人中文理明通者引见，以备委任。闰三月初九日，吏部会同九卿将拣选下第举人带领引见，雍正帝命将他们分发各直省，以州县委署试用。并且对他们说："现经下第，选期尚远。朕破格遴选，授以官职，即论感恩图报之常情，亦当人人自奋。"雍正十一年(1733)，再行此举，特对边远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福建六省的落选举人加以选拔任用。乾隆元年(1736)，亦仿此例。其后屡行此选，补授之官主要是教职，并于正榜之外另为一榜，名为"明通榜"。至乾隆末年停，以后下第者，于正榜外挑取誊录，先进各馆缮写，取得一定的资历后再授予官职。这一制度的建立，为更多的读书人创造了进身之阶。

乌蒙土府改土归流 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清政府下令废乌蒙土司，禄万钟母子发遣江西。其地划归云南。乌蒙土府在四川南部，东邻贵州，南接云南，居三省交界处，是内地通往云南的重要通道。土司禄氏世代盘踞于此，扰害边疆，为患三省。他们对抗中央，断绝交通，据险自固，以至原来自中原入滇的通道被阻，人们须由黔中取道曲靖而转入滇。由于乌蒙土司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使鄂尔泰将其列入改土归流的重点，希望通过制服土司而控制三省。鄂尔泰认为，乌蒙土司，凶恶成习，可以威制，似难恩化。遂于雍正四年(1726)冬派滇黔大军分两路直逼乌蒙。当时，乌蒙土司禄万钟年仅十五，而乌蒙兵马不足一万，所恃者惟标刀弓弩，且由其叔禄鼎坤掌握，因此无法与官兵相抗。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军进兵，二十九日下乌蒙。雍正五年(1727)正月初七日，禄万钟母子向四川官员投诚。雍正六年(1728)二月，废土府，改设乌蒙府，派流官管辖。从此，三省道路打通，北可达川，东可至黔，成为交通要道。雍正九年(1731)，乌蒙府因此而改名为昭通府。

杨名时待罪云南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命杨名时待罪云南。杨名时，江南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雍正初曾任云贵巡抚、兵部尚书、云南总督兼云南巡抚等职。雍正帝在打击科甲朋党时，他"挺身乐为领袖"，因而屡遭雍正帝的斥责，并被治罪。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曾下令各省督抚遇有要事必须以密折形式上报，一般公事可用题本，凡用奏折时必须严守机密。雍正二年(1724)，杨名时所上奏折没有遵守密折制度，将其中机密泄露，雍正帝遂于同年十二月下令停止他使用奏折的权力。后杨名时表示认错，请求遇事仍用奏折，雍正帝考虑到实际需要，允许了。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杨名时再次违反密折保密制，把皇帝的批示载入题本(这是制度绝对不允许的)，因而遭到了雍正帝的严厉斥责，说他有意这样做，以证明过去泄密无罪。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下令解任，由朱纲代为巡抚。五年秋，朱纲参奏杨名时在任内空亏钱粮谷仓，杨名时进行了辩解。部议当斩，云贵总督鄂尔泰力主不可严惩，只令其追还亏空。后雍正帝下令让杨名时待罪云南，以待后命。至乾隆帝继位，才重新启用杨名时。

伴当、世仆开豁为良 伴当、世仆，分别是江南徽州府、宁国府的贱民，在当地被称为"细民"。所谓伴当、世仆，实为奴仆，他们没有正常良民的合法身分，只能听大姓人家役使，或从事鼓吹、抬轿一类的职业，且不许读书应试，不许与大姓人家联姻，甚至不得与大姓人家平等相称，同坐共食。雍正五年(1727)四月二十七日，雍正帝提出将伴当、世仆开豁为良。他指出，伴当、世仆有如奴隶，"人人皆得加以箠楚"，此实属"相沿恶习"。应予以开豁为良，"俾得奋兴向上，免至污贱终身，且及于后裔"。遂令安徽巡抚魏廷珍调查，并由礼部议复。不久，礼部提出建议：嗣后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伊主役使；即已赎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存主仆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不再与原主有主仆名分，准许豁免为良；至年代久远，没有文契，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准以世仆对待。雍正帝认为所议允当，批准执行。这样，就将伴当、世仆中的一部分人改成了编户齐民，使他们免受主姓之凌辱。

西藏发生阿尔布巴之乱 阿尔布巴，西藏工布达江人，藏族，以协助清军作战有功封为贝子，兼任噶伦(西藏地方官名称)，管理工布地区兵马事务。雍正五年(1727)六月十八日，他勾结隆布奈，扎尔鼐等人杀害了负责管理前藏事务，地位、权力均高于他的康济鼐，举兵叛乱，并侵扰后藏，造成西藏地区的动乱。随后，又阴谋投奔准噶尔。雍正帝自撤回驻藏部队后，一直担心该地区会发生动乱。因此，雍正五年正月，当他听到副都统鄂齐奏报阿尔布巴"赋性阴险"，康济鼐"为人甚好"时，曾下令告诫达赖、康济鼐、阿尔布巴等人要"和衷办事"。七月，待接到西藏噶伦颇罗鼐奏报阿尔布巴叛乱的消息后，雍正帝认为这是一个重新整顿西藏的好机会，遂于九月下令准备进兵。后因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以抚为上，剿杀次之，又下令停止出师。叛乱发生后，管理后藏的颇罗鼐即统领后藏和阿里的兵士九千，一面截断叛军

逃向准噶尔的道路，一面进军拉萨。雍正六年(1728)七月，围困阿尔布巴等匪首于布达拉宫，并将其擒获。清政府闻讯，速派左都御史查郎阿率川、陕、滇驻军一万五千人进藏，继续平叛。查阿郎于八月进藏后，审讯了阿尔布巴等首恶，并凌迟处死。

泽州翟斌如等聚众案发 雍正五年(1727)六月，在山西泽州发生了一起翟斌如、靳广等人"妖言聚众"案。翟斌如，河南济源县人，曾在陕西郃阳县所谓"妖道"潘凤池处传授符术，能看风水，人称"翟神仙"。靳广，山西泽州人，原为富户王泰来家的仆人，因王泰来待其刻薄，心怀不满，离开王家，与翟斌如等聚众在大箕村练习武艺，准备打劫王泰来家，以及富户卫家、陈家。时有张冉云组织教会，藏有《立天后会经》一部，分元亨利贞四本，内中"俱是泄漏天机的话"，亦在翟、靳等人中传播。后靳广被人告发，泽州知州刘毓岳以查点保甲为名，逮捕会友二人。六月十九日晚，靳广、翟斌如等聚众三百余人，拦路抢劫被捕人员，同时将州役抢去十三名，打伤一名。官府遂下令捉拿凶犯，翟斌如、靳广先后被捕，又搜出《立天后会经》，被定为"妖妄邪书"。七月，雍正帝派监察御史性桂到山西审理，令将"未获人员，当速行密设赏格，严督擒捕务获。"后逮捕三十余人。翟斌如、靳广、张冉云等六人斩决。因为此案的发生，雍正帝特谕各省官员，务将民间秘密结社"铲除净尽"。

签订《布连斯奇条约》 雍正五年(1727)，中俄两国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先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继续推行侵略政策，进一步对喀尔喀蒙古地区进行侵蚀，并且企图通过《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两国通商条款对中国进行掠夺。清政府为制止沙俄的侵略行径，多次行文俄国，要求双方通过谈判划定疆界，而俄国一拖再拖。康熙末年，清政府同策妄阿拉布坦进行战争，俄国政府妄图诱迫策妄阿拉布坦臣服于它，激起清政府的愤怒，遂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令在华的俄国商队离境。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因索还逃至俄国的准噶尔叛乱分子未果，再次拒绝次年应入境的俄国商队来华。俄国政府鉴于清政府的坚决态度，遂于雍正二年(1724)初表示遣返中国逃人。雍正帝派使前往边境洽谈，再次提出订立新的边界及逃人问题的条约。雍正三年(1725)，俄国新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决定派萨瓦・务拉的斯拉维赤伯爵为出使中国大使，祝贺雍正帝登基和宣布她本人的继位，同时谈判两国贸易及划界问题。雍正帝得到俄国遣使通知后，于雍正四年(1726)正月命隆科多往喀尔喀蒙古边境查看疆界，等候与俄使会谈，同时指令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和散秩大臣四格为谈判成员。八月，萨瓦到达布尔河会见隆科多。隆科多同意萨瓦提出进京的要求，但要商队、教士留在该地。萨瓦抵京后，即在京与吏部尚书察毕那、理藩院尚书特古忒、侍郎图理琛等人谈判。萨瓦采取卑鄙手段，收买大学士马齐，从中掌握了清政府的态度和意见，使清政府谈判代表处于不利地位。双方进行了三十多次谈判，于雍正五年(1727)三月就原则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六月，萨瓦回到布尔河，双方继续谈判。隆科多态度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喀尔喀土地。萨瓦蛮横地以发动战争威胁清政府放弃领土要求。恰在此时，雍正帝为惩治隆科多，将其调回京，由策凌任首席代表。谈判继续到七月十五日，迅速按俄方划界方案达成协议，以定约地点命名为《布连斯奇条约》。该约规定：中俄中段边界自额尔古纳河至沙毕纳依岭(沙宾达巴哈，位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西北端)之间，迤北归俄国，迤南归中国。这个条约，把恰克图以北的大片领土让给了俄国。

泗城土府改土归流 泗城土府位于广西西部，北连贵州，南接云南。其地虽无险隘，然绵亘三省，土地辽阔。岑氏土司承袭数百年，举动仪从盛于督抚。雍正时，土知府岑映宸狂妄虐民，横征滥派，挟势滋扰，境内百姓被其鱼肉。他还差遣土役，各执器械，越境捉人，邻境亦受其害。雍正五年(1727)初，岑映宸为侵占普安县疆界，劫杀不休。官府派人前来会勘，他不仅不肯退出所占之地，还每日率土众数千，云集境上，作耀武扬威之状。当鄂尔泰、韩良辅等人将泗城土司的情况上报后，雍正帝于五年二月下谕："泗城土司甚属不法，若怙恶不悛，有应行用兵之外，听鄂尔泰调度。"鄂尔泰先是利用土民对土司的不满，派干役潜入泗城土府，在百姓中广泛散布"官府欲将土司苛派一概减免，救民出水火"等言语，以造成土司的恐慌，当看到岑映宸聚兵于南盘江北，以威胁土民时，随即宣称派兵进剿。摆出进攻的架式。六月二日，岑映宸闻知大兵压境，遂投书鄂尔泰，请降。数日后，又主动交出印信、号纸以求免死存祀。不久，岑映宸及家口一并迁往浙江安插。八月二十日，雍正帝批准改泗城土府为泗城府，设流官管辖。

隆科多案发 雍正五年(1727)夏，雍正帝命将隆科多逮捕。隆科多，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子，孝懿仁皇后弟(即雍正帝舅)。在雍正帝继位的过程中，他起了重要作用，因而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雍正帝一登基就委以重任，并下令称他为"舅舅"。由于隆科多倍受宠幸，遂至忘乎所以，专断揽权，甚至对雍正帝也多有不恭之处。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雍正帝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奏折上

密谕："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实际上这是向臣下宣告了隆科多地位的动摇。隆科多也曾预料自己地位不稳，怕日后抄家，把一部分家财分藏到各亲友家及西山寺庙里，不料被发觉，反而给了雍正帝以罪柄。雍正三年(1725)五月二十二日，雍正帝向大学士、九卿等宣布了隆科多招权纳贿、擅作威福之罪，并说这是由于自己过于信任他，所以只有自责，但警告隆科多要解散党羽，洗心革面。六月，撤消了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门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銮仪卫使等职。七月十二日，以庇护年羹尧罪，将隆科多太保衔削去。雍正四年(1726)正月，雍正帝令隆科多赴阿尔泰岭，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地界，然后同即将来华的俄国使臣合议两国疆界，并说，若实心任事，可宽宥其罪。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宗人府奏劾隆科多私藏"玉牒"(皇族家谱)底本，应以大不敬律治罪。诸大臣奏请待其议界完毕再行审处。六月初八日，雍正帝以议界不必非要隆科多，下令将他逮捕回京。十月初五日，诸王大臣列隆科多四十一大罪状，请求拟斩立决。雍正帝念其前功，免于正法，令将其于畅春园附近永远圈禁，夺其长子岳兴阿一等阿达哈哈番世爵，次子玉柱发遣黑龙江当差。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

设驻藏大臣　雍正五年(1727)六月，西藏发生阿尔布巴之乱，西藏地区出现动乱。这一事件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雍正帝认为："当趁此机，先将西藏事宜料理清楚，以为边防久远之计。"十一月初一日，雍正帝经与议政王大臣等商议，决定派大臣进藏料理，协助管理后藏事务的颇罗鼐平定叛乱，安定地方。并定由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统迈禄前往，于明年春起程。雍正六年(1728)五月，查郎阿等由西宁出口，八月初一日至西藏，遂审讯业已就擒的阿尔布巴等首恶，将其凌迟处死，进而安抚地方。这时，驻藏大臣的任务主要是统领驻藏官兵，并督导颇罗鼐总理藏务。

圈禁延信　雍正五年(1727)冬雍正帝命圈禁延信。延信，清宗室，肃武亲王豪格孙。初封奉国将军，累官至都统。康熙五十七年(1718)，从抚远大将军允禵率师讨策妄阿拉布坦，驻西宁，此间即与允禵结党。五十九年(1720)，授平逆将军，率兵入藏，侵吞军饷银十万两。同年封辅国公。雍正帝登基，因诏允禵回京拜谒大行皇帝梓宫，遂令其摄抚远大将军事，此时延信又与同在西北的年羹尧结党。后授西安将军。雍正元年(1723)晋封固山贝子，寻晋封多罗贝勒。延信于西安将军任内玩忽职守、怠于军务，不事训练、滥保有贪婪罪官员九十余人。对此，雍正帝虽有耳闻，却未加过问。但是，不能让雍正帝容忍的是，延信不仅与允禩结党，包庇年羹尧，而且公开投靠允禵集团。因此，在惩治了允禩、年羹尧、隆科多，处理了允禵集团之后，便开始治延信之罪。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初二日，雍正帝以其罪恶昭著，令革去贝勒爵，并交宗人府严审。同年(1728)十二月初六日，诸王大臣列延信二十大罪状，其中以党援罪为最重，共占七条，请求按律斩决。雍正帝为表示宽大，决定免死，于畅春园附近圈禁，侵吞军饷以财产抵，子孙黜宗室，降红带。

永顺土司受封　永顺宣慰司是湖广有名的大土司之一。湖广的土司与边远省份大不相同，由于这里的经济发展要超过边远省份，因此，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土司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土司制度在这里已出现危机。土民们迫切要求改土归流，土司难以继续控制局面。特别是在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情况下，湖广的土司绝大多数自动呈请改流，永顺宣慰司彭肇槐便是第一个呈请者。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彭肇槐在看到临近的桑植、保靖二土司的土民奔向官府要求改流的情况下，主动向桑植副将杨凯呈请自愿改土为流，并绘具本司舆图，册开土民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一户，男女九万九千三百七十口。湖广总督迈柱得知此情，立即向雍正帝汇报。雍正六年(1728)二月二十一日，雍正帝批准永顺宣慰司改土归流，并表示：彭肇槐实愿改土为流，情辞恳切，不忍拒却，特沛殊恩，以示优眷。为了表彰彭肇槐的举动，雍正帝下令授其为参将，即于新设流官地方补用，并赐以拖沙喇哈番(汉名为云骑尉)之职，世袭罔替。再赏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立产安插。

擒拿刀正彦　刀正彦是云南车里宣慰司所辖之土目，盘据茶山一带。他素与土司刀金宝不睦，久欲夺取车里宣慰司世职，终未得逞，遂于雍正五年(1727)四月煽动茶山一带的窝泥人打家劫舍，危害地方，企图嫁祸于刀金宝，乘机取而代之。云贵总督鄂尔泰闻讯，令普威营参将邱名扬等领兵千余人进剿，并檄知土司刀金宝协同擒拿不法之徒。刀金宝起初不知是刀正彦暗中作祟，接到命令后还委其前去与官军协商会剿事。不久，清军捉住一些窝泥人，其中有带头滋事的麻布朋等人。后，清军终于获悉真正的元凶乃刀正彦，于是下令捉拿，并攻打窝泥人聚集的攸乐地区。同年十一月，邱名扬大败窝泥人于攸乐，事态平息，但刀正彦却潜匿。清廷一面安抚百姓，一面严守各关卡，并行文老挝、缅甸等邻国，不许容

留刀正彦。雍正六年(1728)三月初四,刀正彦及其随从在孟腊地方被清军擒拿归案。

签订《恰克图条约》 雍正五年(1727)七月,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后,双方派出界务官,勘分了中俄中段的整个边界,设置了界标。九月九日,订立《阿巴哈依图界约》,确定了从恰克图向东至额尔古纳河的边界;九月二十四日,订立《色楞额界约》,确定了从恰克图向西至沙宾达巴哈(位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西北端)的边界。清政府根据《布连斯奇条约》以及前此在北京达成的初步协议,拟成总条约草案。雍正六年(1728)五月十八日,中俄双方代表在恰克图正式签字,称《恰克图条约》。这个条约是确认前此各项条约的总条约,共分十一款,有满、俄、拉丁三种文本。条约确认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的中俄边界: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鄂博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依岭(即沙宾达巴哈),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重申"乌第河及该处其他河流既不能议,仍保留原状",双方均不得占据这一地区。条约规定,以恰克图为两国贸易的商埠,允许俄商每间隔三年到北京贸易一次,每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同时规定,中国协助在北京俄罗斯馆内建造东正教堂;接受俄国留学生来北京学习;以后双方不得收容对方逃犯,并严行查拿,送交对方守边人员。《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夺取了大片中国领土,而且取得了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取得的在贸易方面的利益。

张广泗讨八寨 八寨属贵州都匀府,原为夭坝土司地。土司革除后,这里即属流土俱不受制地,既未纳入政府的册籍,也不受土司的统治。清政府称之为"化外生苗地"。八寨周围约计一百四五十里,共一百一十余寨,地势辽阔,户口亦繁,为黔西南都匀、黎平二府之通达要区。清政府在贵州改土归流的重点,即要征服黔西南之"化外苗疆"。在这广阔的地域里,黎平府之古州、镇远府之九股河流域乃中心地带,而八寨则为"生苗之门户"。为了彻底征服这里的苗民,清兵首先要打开八寨这个大门。雍正六年(1728)五月,鄂尔泰调前征苗有功的黎平府知府张广泗来都匀府。六月初九日,张广泗率领官兵进讨八寨。在清军的逼迫下,大部分苗寨表示归附,愿意剃发改装,亦有杨牌、杨尧等寨不愿归顺,力拒官兵。张广泗遂令清军猛攻,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至六月底,在清军"恩威"并施之下,八寨完全为清军所控制。遂即,清军又向周围扩展,很快将八寨附近的一些苗寨亦招抚,前后共计一百九十四寨,四千六百余户,一并编入了清政府的册籍。此役,清军"新辟苗疆"方圆三百余里。得苗民认纳银四百六十七两,秋米二百二十八石。七年(1729)十二月,清政府在此置八寨厅,设理苗同知管理厅事。

平雷波土司之乱 雷波属四川叙州府,位于川滇交界处。雍正六年(1728)六月,原乌蒙土府所属米贴地区之土妇陆氏聚众抢劫,伤害云南官兵。为了扩大声势,陆氏暗中勾连雷波千万贯长官司杨明义、吞都土千户德昌,并煽动附近之结觉、阿路、阿照、平底等地夷人从之。四川巡抚宪德、提督黄廷桂等奉旨进剿,迅速抓住了陆氏。此后,杨明义继续率众与官府为敌,抢夺粮食,伤害兵丁。雍正帝下令进剿。川陕总督岳钟琪亲自指挥平乱,调川、滇二省兵围剿,并于沿路设防,以防逃匿。黄廷桂率兵先攻吞都山,攻破数寨,伤杀、俘获百余人。七月九日,擒土司德昌。于是,分兵两路,直捣雷波。九月,官军与杨明义大战,杀二百余人,俘获甚众,村寨尽夺。九月十六日杨明义就擒。遂即,从乱之大小土司头目纷纷擒获,土司沙骂投诚,招抚民人一千五百九十六户,雷波地区平定。雍正七年(1729)六月,雷波土司地改流置雷波卫。

垫江、万县民变 清政府为了保证赋税征收,于雍正六年(1728)开始在一些地区清丈土地,以防止民间隐瞒田产。清丈的重点是四川省。这是由于四川巡抚马会伯、宪德曾先后反映该省垦田随着人口的增多,隐匿甚重,而且民间因争地而诉诸官府之事屡有发生。因此,雍正六年,清政府遣给事中高维新等赴川办理清查事。清查的结果,清政府大为满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一些官吏大肆勒索,受贿放卖,引起了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一些地方豪强本不愿意清丈,因此,也煽动百姓抗拒清查。雍正六年七月,在四川东部的垫江县、万县先后发生了人民聚众反对清查的事件。该地百姓聚集千余人,高举大旗,站在田头,不许官府丈量。此事影响甚大,震动了邻省。就连清政府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因丈量之臣过于急遽,不善劝谕之所致也"。为了缓和这一矛盾,雍正帝后来命令四川减少额粮较重的州县的田赋。

鄂尔泰组织丹江之役 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组织了征服黔西南"化外苗疆"的第二个重要战役——丹江之役。丹江有两条支流,即大丹江、小丹江,两江汇合以后即为九股河。鄂尔泰对"化外苗疆"的形势做了分析,认为古州、九股为其腹里,都匀府之八寨为"生苗之门户",而丹江则为"生苗之关隘。"雍正六年(1728)六月在取下八寨之后,丹江则成为清军攻取的第二个目标。丹江流域共有苗寨百十余,

丁壮数千，且形势险要。七月二十四日，张广泗率兵进攻，及抵枯桐隘口，受到苗民的顽强抵抗。次日，赶来援助的苗民倍增，他们以枪炮堵截官军，然伤亡亦重。另一路官兵至囊孟隘口，亦受到苗民的阻击。鄂尔泰当即决定增派重兵围剿，他说："若不全力剿除，既无以畏服投诚各寨，而九股生苗亦断难以就抚。"遂调贵州各协、营之官兵来增援。八月下旬，各路官兵继续到齐，合计约六千三百余名。九月，官兵移营前进，杀伤苗人甚众。十月攻下乜告关口，招抚数十寨。十一月十一日，张广泗先取小丹江，仍受到千余苗民的抵抗，经过数日激战，官兵用大炮打死苗民多人，才得以突破阻击。随即以四路围打小丹江。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小丹江、其九股河、清江一带苗民见势亦多归附。十二月初三日，张广泗率兵攻大丹江，先有杨排等八寨来降，五日，又破桃绕等八寨。十一日，已迫七十余寨就抚，至十八日，大小丹江诸寨悉平。雍正七年(1729)十二月，清政府于大小丹江地置丹江厅，设理苗通判掌其事。

三元会案发 三元会，又名空宗教，乃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人牛见德(人称牛三花拉、牛三花子)所组织，以贸易为名，在莱州、青州等府进行传教活动。牛见德自称能超度人的祖宗，宣传"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现在如来，弥勒我主"之经文，告人可以去灾获福，并且与贾得志(教首之一)广收徒众。雍正六年(1728)七月，莱州府高密县有人告发，于是该县首先捉人，被捉教徒供出教首牛见德，随后青州府诸城县、安丘县等地又相继捉了一些教徒，亦供出牛见德与贾得志二人为教首。官府下令捉拿牛见德，因牛见德闻讯逃脱，只捉住其妻孙氏及女儿。山东总兵将此情上报后，雍正帝谕示，既然是邪教，一定要查清是什么教、哪些人参加，要分清有政治目标与敛财两种情况，但对教首务须捕获。山东、河南官员追查一年，毫无牛见德之踪影，只得将捉住的教徒分别处以枷号三个月重责四十板、枷号两个月重责四十板的刑法，草草结案。

雍正帝推广官话 雍正帝继位之后，经过几年的观察，发现一些地方的官员，特别是福建、广东两省官员不能很好地讲官话，以至影响治理地方。雍正六年(1728)八月初六日，他下谕推广官话。谕示中说：官员有临民之贵，其语言必须让百姓共晓，才能通达上下之情，进而把政务办好。可是每逢召见福建、广东官员，总是带有浓厚的乡音，他们已经赴部演礼，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如果赴任他省，如何保证宣读训谕，审断词讼都让百姓听得清清楚楚呢？一旦官民上下，语言不通，需用吏胥从中代为传递，必然会出现弊病。应令福建、广东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他还要求两省有力之家，先于邻省延请官音读书之师教其子弟，然后转相授受。并且规定，以八年为限，如生童不能如期学会官话，则不许参加科举考试，直到官话习会之日为止。雍正帝推广官话的效果并不明显，雍正十年(1732)五月二十七日，署理广东巡抚杨永斌上奏折反映：广东人学官话很困难，自从奉旨推广官话已经四年，但乡音未改。建议改建粤秀书院，延师教徒，并推广官话，得到了雍正帝的赞赏。

曾静投书案发 曾静，湖南永兴人，生员。他不满清王朝的统治，极主反清复明，中年放弃举业，教授生徒，传播自己的观点，人称"蒲潭先生"。雍正六年(1728)，他选择了川陕总督岳钟琪为策反目标，派门生张熙带着他化名的书信和《生员应诏书》赴陕活动。九月，张熙在西安向岳递交了书信。信中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裔，清朝皇帝是金朝女真人后代，当年岳飞抗金，他的后人不应侍奉女真后人，劝岳举兵反清，为祖宗报仇，为汉人雪耻。信中还列举了雍正帝弑父篡位、杀兄屠弟的罪行。岳钟琪见信，立即拘审张熙。在大刑之下，张熙坚不吐口，只称他们势力散布湖广、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这些地方传檄可定。岳钟琪见动刑无效，改设骗局，以礼相待，表示他早想造反，希望其师徒来辅佐。张熙被骗，说了实情，道出了曾静，以及他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岳钟琪即将此案上报。雍正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统觉罗海兰到湖南，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审理曾静一干人犯。后曾静供出他的思想受浙江吕留良的影响，张熙见过吕的弟子严鸿逵及再传弟子沈在宽。雍正帝鉴于案中涉及对他本人的攻击，遂令将人犯统统调往北京审讯，一定要对污蔑他的谣言追根问底。承审官员秉命追问曾静，并到南方各省沿路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所谓雍正帝改诏篡位，毒死康熙帝，逼死皇太后，以及杀兄屠弟等言论均系允禩等人的太监发配途中沿途散布的。曾静本人亦表示悔罪，并且写了《归仁录》。这样，雍正帝即把斗争锋芒转向允禩集团以及吕留良。他根据审讯情况不断发出上谕批驳吕留良的观点，以及允禩集团的诽谤，以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七年十月初六日宣布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且说，不仅现在不杀，就是我的子孙也不能因诋毁我而杀他们。他这样处理的理由是，曾静投书才能获知造谣的元凶，并且昭示天下。曾静虽被免罪，但此案涉及的吕留良、严鸿逵等人却惨遭文字之祸。乾隆帝即位后，没有理睬其父之遗言，仍将曾静、张熙处死。

削夺八旗旗主之权 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进一步削夺八旗旗主权利。八旗自努尔哈赤始建时,即由旗主管理旗下事务,皇帝对八旗只是间接管理,这就造成了皇权与旗主权的矛盾。自皇太极起,清朝的前几代皇帝都谋求削弱旗主的权力。首先是对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定为上三旗,由皇帝亲自统领。对于其他五旗,即下五旗,康熙时又采取派皇子到下五旗作管主的办法,以替代原来的旗主地位。至雍正帝即位,又对本已衰弱的八旗旗主势力做了进一步的削减。八旗都统是八旗的军政长官,是一种职务,由皇帝临时任命,不能世袭,与所在旗的旗民是官民关系,而非主从关系。而管主与都统并存,不仅还会影响皇帝对旗民的直接统治,而且两者易产生磨擦。于是,自雍正六年(1728)起,采取减少管主的办法,同年(1728)十月十六日取消崇安、锡保及信郡王德昭等人的管理旗务,即管主地位。雍正七年(1729)以后再派到八旗的亲王、郡王等均以管理都统事务的身份到任。实际上是去担任(或兼任)都统职位。至此,八旗即全部由皇帝所亲自控制,任何影响皇权在八旗中行使的力量已不复存在。同时,雍正帝还从意识形态上革除旗主的痕迹。八旗都统,满文译为"固山额真",而"额真"满语意为"主",雍正帝为正名份,下令改称"固山昂邦",意为总管,即汉文之都统,而此时的都统,早已不再是旗主的意思。文字上的改变,也标志着旗主权力的实际消失。

设咸安宫官学 咸安宫官学是清代八旗中的上三旗子弟学校。因设于西华门内咸安宫,故名。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十日,因咸安宫房屋空闲,雍正帝下令在此设官学,选内府三旗佐领、管领下幼童及八旗俊秀者九十名,以翰林官居住咸安宫教之。次年正式兴办。分汉书十二房、清书三房,分别教授满、汉文及翻译。各设教司一人,教射、教国语各三人。规定五年后钦派大臣考试,一、二等用七、八品笔帖式。后增加学生名额,并设管理大臣一人,由内务府大臣内特简;协理事务大臣一人,由六部堂官中之满员内特简。同时规定学生结业目标:凡由"闲散人"(未授职者)挑补者,学习十年要能考中"生员"(即府州县学学生),由贡生(各省举报学行俱优者)、监生(在国子监入学者)挑补者,要在三届乡、会试中(每三年一届)考取举人、进士。凡不能达到这一标准者,一律退回本旗。对入学学生除供给生活、学习用品外,每月给银二两,每季另给米五石三斗,待遇可谓优惠。

设立天全州 雍正七年(1729)四月,清政府决定废原四川天全六番招讨司,并于其地置天全州,隶雅州府。天全六番招讨司分正、副二司,分别由高氏、杨氏二土司世袭。在鄂尔泰主持西南诸省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川陕总督岳钟琪分析了天全六番招讨司的情况:其地界连雅州名山、芦山、荥经各县及黎州守御所等处,境内多汉民,语言、服食与内地无异,且民性淳朴,通晓文义,土地亦肥沃充裕。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的目的之一,是要在西南各省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岳钟琪指出:"似此地方,皆非土司所得独踞之乡。"又兼该土司高若璠、杨自唐二人骄奢淫佚,残暴贪婪,罪恶多端,民怨若沸,久愿归流。岳钟琪遂于雍正五年(1727)正月二十九日,奏请将天全土司改土归流,至七年四月得以实现。

除蜑户贱民籍 蜑户是广东沿江沿海的一种渔民,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早在宋元时期,就有蜑民的称呼,他们采珠纳贡,被称为"乌旦户",明代又称"龙户",清初称为"獭家"。长期以来,蜑户被视为贱民,不允许登岸居住,不允许与平民同等相处。雍正帝在削除了山、陕之乐户、绍兴之惰民、徽州府之伴当、宁国府之世仆的贱民籍后,于雍正七年(1729)五月二十八日,下令削除蜑户的贱民籍。他首先指出:蜑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他认为压 户为贱民是不合理的,况且他们也向政府交纳鱼课,应与平民同等对待。因此,他指示广东督抚:"凡无力之蜑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能力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蜑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从此以后,蜑户身分的改变就从法律上得到了肯定。

建立军机处 雍正七年(1729),清廷开始对准噶尔用兵,为保证这场战争的顺利进行,一切军政保密大事均需随时处理,于是,该年(1729)六月十日,雍正帝下令在内阁之外建立军机房,"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这就是军机处的最初建立。雍正十年(1732)三月,改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它一成立,即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南书房的地位,成为施政发令的中枢机构。军机处本为军务而设,非正式机关,军务结束即应裁撤,由于这个机构便于皇帝对军政大事的独裁,所以一经成立即常设不废。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一般为四、五人,以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兼任,均由皇帝亲自任命。军机处的职责是"掌军国大政,以赞军务"。军机处的特点有二:首先是处理政务迅速,其次是办事机密。军机处的性质,决定了它地位的显赫。自从设立军机处,清代的皇帝就真

正做到了朝纲独揽，集权于一身。

建立“廷寄”制度 雍正七年(1729)，在军机处建立的同时，清代的一项新制度——“廷寄”制度也同时产生了。“廷寄”是谕旨的一种下发形式。军机处代皇帝起草的谕旨，一种是先经过内阁，以次及于部院，层层下发，称为“明发”，这种谕旨无须保密。另一种需要保密的，则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本处密封，经驿站传递，直达收件人，称为“廷寄”(又称“字寄”、“寄信”)。“廷寄”的内容，均为机密要事，下发时，根据缓急程度，分为日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及六百里加快几种。经军机大臣张廷玉的规划，“廷寄”形成了一套制度。凡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的叫“军机大臣字寄”，凡给盐政、关差、布政使、按察使的，叫“军机大臣传谕”。字寄、传谕封函的表面均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处盖有军机处的印信。“廷寄”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使皇帝的意志可以畅通无阻地直达地方。

谢济世批注《大学》案发 谢济世于雍正四年(1726)被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及至军营后，大将军平郡王福彭颇敬礼之。谢济世亦讲学著书不辍。雍正七年(1729)六月，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参劾谢济世在军营撰《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雍正帝摘其“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中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指责谢济世有意诽谤自己，遂于六月二十八日令九卿等议罪。与此同时，锡保亦参劾与谢济世同往阿尔泰军前效力陆生楠撰《通鉴论》十七篇诽议时政。七月初五日，九卿等议奏，应将谢济世、陆生楠于军前立即正法。雍正帝决定对谢济世免死，但却密谕锡保，在将陆生楠正法时，亦将谢济世绑赴刑场。待陪绑之后，才宣布对他的免死决定，继续留军前效力。乾隆帝继位后，召还回京。

设觉罗学 觉罗学是清代宗学之外的皇族学校。按清制规定，凡皇族，分别远近，由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算起，他的本支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在雍正初年兴宗学后，因考虑到设立宗学，只令教习宗室，尚未及于觉罗，于是雍正七年(1729)闰七月十一日，雍正帝下令设立觉罗学。规定：八旗各于衙署旁设满、汉学各一，觉罗子弟八岁至十八岁者俱令入学，分习满、汉文。政府每月发给银米、笔纸，每旗派王、公为总管，觉罗二人为教长，于笔帖式内拣选能翻译者一人教授满文，礼部派教习一人，教授汉文，兵部选善射一人，令其教射。每年春秋二季，各旗总管王、公亲自考试，登记档案，优者取为文生员、翻译生员。

颁布《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是关于曾静投书案和吕留良文字狱的历史纪录。雍正六年(1728)九月，曾静投书案发生后，雍正帝通过派人审讯，得知曾静反清思想是受吕留良提倡的“华夷之辩”影响，同时得知外间对他本人的种种传说，如改诏篡位，逼死太后，杀兄屠弟等均来自允禩集团。因此，在审讯过程中，多次针对口供所讲上述内容进行批驳与辩解。雍正七年(1729)九月，雍正帝下令将论述这个案子的上谕编辑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及其忏悔的《归仁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意在使受迷惑之人觉悟。并加以刊刻，颁行于全国各府州县学，要求士子观览知悉。如果不知此书，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曾静口供及《归仁录》，说雍正帝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帝，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帝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又是为雍正帝嗣位及其初政作宣传的著述。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雍正帝于同年十月下令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后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曾静到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地，户部尚书史贻直带张熙到陕西分别宣讲《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乾隆帝登基之后，觉得不宜公开讲此事，遂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

《朱姓家规》案发 曾静、吕留良案发之后，许多地方官员把注意力集中到清查所谓曾静同党，致使文字狱接连发生。雍正七年(1729)十一月，新任湖南巡抚赵弘恩上任之后，接到署任浏阳知县陈梦文呈报的该县朱姓家族收藏的《朱姓家规》一书。该书端首“称谓”条内有“侏儒左衽，可变华夏”二语。赵弘恩认为“当此圣明之世，饮和食德，在在蒙休，乃敢肆其犬吠，狂悖亵慢”，“必曾静一党”。于是捉拿朱姓家人，严加审讯。朱姓家人只承认，编写《家规》，原为敦本善族，不料愚昧无知，竟蹈弥天之罪，但与曾静并不相识。因审讯毫无结果，赵弘恩便于七年(1730)十二月九日将《朱姓家规》一书呈送雍正帝，奏请上裁。雍正帝认为，本朝衣冠并非左衽，因此“侏儒左衽，可变华夏”二语并不属于有意反清言论。加上朱姓与曾静无关，于是雍正帝指示不必深究，但要对朱姓严加教育，以警其余。

陆生楠写《通鉴论》获罪 陆生楠，广西人，举人出身。部选江南吴县知县，引见，雍正帝将其改授工部主事。雍正四年(1726)，监察御史谢济世以结科甲朋党罪革职。陆生楠因系谢之同乡，亦受株连，与谢一同发往阿尔泰军营效力。雍正七年(1729)五月，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参奏陆生楠书写《通鉴论》笔

记十七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雍正帝亲阅笔记，指其所论封建为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实属诋毁郡县之制；所论建储之事，乃刺圣祖不能教育太子；所论兵制极赞唐之府兵，乃讥八旗兵志。并谓“陆生楠素怀逆心”，故“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已不平之怨怒”。七月，特颁谕旨，对其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同年(1730)十二月二十二日，经刑部议定，雍正帝批准，将陆生楠斩于军前，妻子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通鉴论》笔记十七篇烧毁。

设立古州厅 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在指挥清军先后讨平八寨、丹江之后，打开了黔西南“化外苗疆”的门户，遂继续深入腹地，进取古州。古州有里外之分，外古州自宋元以来即已开发，元以后设有长官司等土职。里古州则历代为“化外生苗地”。其地有古州江，上可通都匀三角屯，下可达广西之柳庆，但由于未经开辟，沿江诸苗多未归附，故河道久未开通。雍正六年十二月，张广泗平定大小丹江之后，古州一带已有一些村寨望风归附。雍正七年(1729)三月，雍正帝在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谕：古州等处“生苗”，罔知法度，应以招抚，不能令此地苗人独在化外。七月，张广泗进兵古州，有岑梗、梅得两寨抗拒，副将赵文英领兵进剿，后其余各寨均缴械投诚。很快，清军以武力迫使上、中、下三保苗就抚，古州平。十二月，清政府以新开苗疆，特于此设古州厅，置理苗同知一员，隶黎平府。

李绂以科甲朋党获罪 雍正七年(1729)，李绂因科甲朋党罪，被捕入狱。李绂，字臣来，江西临川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授兵部侍郎，雍正二年(1724)授广西巡抚。因政绩突出，于雍正三年(1725)授直隶总督。四年(1726)三月，李绂在赴京路过河南时，听说河南巡抚田文镜曾先后以各种罪名参奏信阳州知州黄振国、汝宁府知府张玢、息县知县邵言纶、固始县知县汪諴、陈州知州蔡维翰，而黄、张、邵、江都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有人说田文镜无端排斥士人，“不容读书之人在豫省做官”。因此，李绂当面斥责田文镜“有心蹂践读书人”。及至入京，又向雍正帝陈述田文镜“负国殃民”之罪，随后又上疏参劾田文镜“贤否倒置”，信任“本属市井无赖”之人。雍正帝十分器重田文镜，但又怕他被属员欺骗，故将李绂所奏转告他，听取他的意见。田文镜非科甲出身，尤恶科目之人，遂于四月二十七日上疏，指出，言“市井无赖”之人，本人必为进士。六月，他又以黄、张、邵、汪都是同年进士，提醒雍正帝防止科甲朋党，实际是针对李绂而来的。李绂坚持己见，继续为黄、张、邵、汪等人辩护。雍正帝讨厌他的置辩，加以申饬，并将他调离直隶总督要缺，改任工部侍郎。同年十二月，又发生谢济世参劾田文镜事，其内容与李绂所言完全相同，这就引起了雍正帝的重视，于是提出要严厉打击科甲朋党，并于五年(1727)二月向大学士、九卿等颁布了打击科甲朋党的上谕。雍正七年(1729)，谢济世因文字获罪再次受审，供出当年参劾田文镜乃李绂指使。于是，雍正帝即以科甲朋党罪将李绂下狱。直到乾隆帝继位，才给李绂恢复官职。

怡亲王允祥病故 雍正八年(1730)五月初四日，怡亲王允祥病故。允祥自雍正七年(1729)十一月患病后，雍正帝倍加关怀。五月初四日，雍正帝闻知允祥病危，急赴王邸，待至，允祥已故。雍正帝悲恸不已，左右大臣恳请节哀，乃回宫。翌日，再临怡亲王丧次，奠酒举哀，并辍朝三日。雍正帝之所以对这位兄弟有如此深的感情，是因为允祥在所有兄弟中是最忠实于他的。允祥是康熙帝的第十三子，雍正帝登极之后被封为怡亲王。由于雍正帝认为允祥“廉洁奉公”，遂于雍正元年(1723)命总理户部，开亲王管部之先例。在雍正初年打击允禩集团的斗争中，允祥一直是支持雍正帝的，这不得不使雍正帝倍感亲近。雍正三年(1725)，直隶水灾，允祥奉命往勘，十二月上疏，建议兴修水利，设营田，被采纳，遂负责总理京畿水利。在他的督率下，直隶水利工程颇见成效，营田也取得很大成绩。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赐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榜，并对群臣说：“怡亲王事朕，克殚忠诚，职掌有九，公而忘私，视国如家。在朝诸臣，‘忠勤慎明’尚多有之，若‘敬诚直廉’，则未能轻许”。后来又给允祥增仪仗一倍。雍正七年(1729)六月，允祥受命办理西北两路军机。十一月即患病。雍正帝在允祥患病期间，曾为其寻名医治病。待死后，又破格为其办理丧事。他本人素服一月，又命诸臣常服，宴会一律不许举行。同时恢复其原名为“胤祥”(雍正帝登极后，诸兄弟均将“胤”字改为“允”字)，许配享太庙，并批准白家疃等十三村民为其建祠之请求，拨官地三十余顷为祭田，免租赋。

崇明佃农抗租 雍正八年(1730)五月下旬，江苏省崇明县发生了一起佃农集体抗租事件。崇明县地主对于佃农的盘剥，名目繁多，每年除收取夏、秋两季地租外，还要加收所谓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项目。佃户不堪其苦，矛盾日趋尖锐。为缓和地主与佃农的矛盾，稳定地方，崇明县知县祖秉震于雍正七年(1729)下令禁革一切杂派，并立碑，刻禁令于碑上。雍正八年五月，麦收之后，地主催收麦租，迫使佃农反抗。花沙、海梢等村佃农发起抗租运动。他们以祖秉震之禁令为据，聚众鸣锣到新开河市镇，动员商

贾罢市，得到商贾的支持，当地巡检前来阻挠，被愤怒的佃农赶跑。知县祖秉震表示：抄抢富户，本知县不管。一时，佃农声势大震，有位读书人叫夏君钦，还撰写了传单，贴于街市，揭露大地主施大受与崇明镇总兵施廷专联宗，馈送金帛美女，仗势欺人，勒逼佃户交租。江苏巡抚尹继善、浙江总督管江苏盗案的李卫马上将此事上报朝廷。雍正帝一方面认为，佃农聚众抗租之风不可长，一方面也指出，施廷专年少轻浮，传单所揭之事或许有之。最后，此案之处理，一方面将佃农中之为首者朱锁等四、五人逮捕法办以示儆，一方面将施庭专调离崇明，以缓和矛盾。至此，事态得以平息。

古州三保民变 古州于雍正七年(1729)十二月建厅之后，清军即在古州三保地方建营，占去了一些苗寨土地，引起了苗民的不满。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认为：三保地区只经招抚，未示以威，今日又就其地而建营，苗民岂能帖服。他的态度是"防猫亦如防虎"。于是命令营兵声言撤兵，造成空营之状，引诱苗民进攻，以图重创之后而求地方长久之安。但苗民并未攻营。雍正八年(1730)六月，鄂尔泰接到报告，有定旦寨苗民"伏草伤人"等事，遂派兵进剿，于是引起了苗民的反抗。他们将道路堵塞，在地上插上桩签，与进剿的官兵相对抗。清军用枪炮袭击，杀伤苗民无数，而且将斩获首级悬挂营门示众。经过激烈战斗，清军平定旦寨，随即平定与定旦寨互为声援的来牛寨。经过一个月的进剿，至同年七月，清军完全平定了三保地区，同时收缴苗民收藏的鸟枪、炮、标枪等武器。

慰问土尔扈特 雍正八年(1730)六月，雍正帝在派使团赴俄国彼得堡祝贺彼得二世即位的同时，又派出一随队使团到伏尔加河地区慰问土尔扈特部。这支随队使团共二十人，以满达伊为首。他们在到莫斯科后，即转赴伏尔加河地区了解、探望、慰问土尔扈特部的人民，为他们带去了祖国的温暖。雍正九年(1731)夏，雍正帝再次派出以班第巴依、昂邦纳依宝、色楞格等人为首的一行五十三人的使团，前往伏尔加河地区慰问土尔扈特部。由于沙俄政府惧怕清政府加强同土尔扈特部的联系后不利于他们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和奴役，遂在使团到达恰克图后，断然阻止使团前往，致使这次出使半途而归，未得成行。

清军进攻邓横寨 邓横寨属广西思明土府，全寨不过一百九十余户，丁壮不满千人。但长期以来与官府对抗，"专事劫杀"。其寨外设密竹层栅，内挖深濠险坎，又筑土如城，建台安炮，枪箭能出不能入，官兵亦敢近不敢前。雍正八年(1730)，在西南诸省改土归流的最后阶段，广西提督张溥认为对邓横案再不能坐视不管，于是派思恩协副将尚清统兵进剿。八月初二日，尚清在毫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冒昧进攻，结果损兵折将，大败而归。清军的首战失利，使邓横寨声威大震，以致官兵又数次进剿也一筹莫展。其后，新调来协助进剿的齐元辅欲对邓横寨进行招安，又不能成。至雍正八年底，官兵损失重大，进剿毫无结果。而邓横寨却不时出袭官兵，或三五成群，或数十结队。雍正九年(1731)正月，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决意讨平邓横寨，遂调右江镇总兵蔡成贵进剿。二月十四日，蔡成贵抵军前，经整顿营伍，于三月二十日派兵分三路进剿。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以示围困之意，同时清除寨外竹木，置备火器。四月二十四日，参将刘成、游击王钦、袁士杰亲率兵冲破土城，杀入寨内，采用火攻，攻打寨内各甲。五月初四日，邓横寨完全落入清军之手。此战，邓横寨除战死者外，被俘的一百余人被斩于军前，枭首祭旗，幸存的仅有六百余名老幼亦被押解省城。

京师地震 雍正八年(1730)八月十九日巳刻，京师(今北京)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在地震之前，忽然狂风暴雨大起，接着发生地震，掀动了桌椅，打碎了器皿。房屋倒坍严重，皇宫、圆明园、畅春园均有损坏，太和殿的一角也倾颓了。京师方圆百里之内均有明显震感，西北方向尤为突出，就连东陵所在地遵化亦觉微动。地震造成二万多人死亡。雍正皇帝也吓得躲到了船上，随后又住进了临时搭起的帐篷，没敢回宫理政和休息。地震造成了人们的恐慌，甚至引起出兵在外的大小官员的忧虑，担心他们留在京城的家口。清政府随即安抚灾民，凡有屋宇倾圮者，均拨银两以作修理之费，并严禁官吏克扣。对八旗兵丁每旗赏银三万两，圆明园八旗兵丁，每旗各赏银一千两，以为修葺屋宇之用。此外，还赏给满、汉大小文武官员每人半年俸银。

平乌蒙禄氏之叛 乌蒙土府，原隶四川，雍正五年(1727)改土归流后改隶云南。当时，土司禄万钟被革职，发遣江西。原土司禄鼎坤(禄万钟之叔)因前此已归顺清廷，补授河南参将，暂居河南，故留其子禄万福在家乡料理产业。改流以后，禄氏家族的地位远不及当初，故一直心怀不满。禄鼎坤即扬言："就是给我一个汉官，总不如做我的土官无拘无束，好不自在"。雍正八年(1730)八月，禄万福纠集禄氏大小土目，并串通邻近土司举兵反叛，很快逼近东川府。他们拆毁桥梁，沿途堵塞，以致往来断绝，声息不通。清廷闻讯，派兵进剿。禄鼎坤之弟禄鼎明时在省城，力

求随军平叛,获允。不料,九月初九日,禄鼎明突然闯大营行刺,当即被正法。清廷随即将禄鼎坤家口尽行拿禁。禄万钟见此,孤注一掷,力与官兵顽抗。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调兵一万数千名,分三路从东川、威宁、镇雄围剿,战斗异常激烈。清军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时村庄被焚,无辜遭戮,滚崖死者、炮伤毙者不计其数。十月初,叛乱被平息。十月十七日,鄂尔泰报捷,宣告乌蒙府已被官兵收复。

处死道士贾士芳 雍正八年(1730)十月初二日,雍正帝下令处死为他看病的道士贾士芳。贾士芳曾为京城白云观道士,雍正七年(1729),经怡亲王允祥推荐,被雍正帝召见,但因其无用而遣出。雍正七年冬,雍正帝患病,至雍正八年夏,病情更重,于是向其心腹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人秘密发出谕旨,要他们寻求好医生推荐,并说,即使"推荐非人,朕亦不怪,朕自有试用之道。"这时,贾士芳已在河南,雍正八年六月被李卫密加推荐。雍正帝遂命田文镜把他送至京城。七月,贾士芳进宫之后,"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为雍正帝治病。开始很见效果,雍正帝本人亦认为"调治有效",对贾道士大加赞赏。不料,贾士芳得宠不过两个月,雍正帝竟宣布他为妖人左道,并说他要用妖术控制自己的健康,"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于是,下令治其罪。十月二日,王大臣奏请将贾士芳凌迟处死。雍正帝改为立斩,其亲属监候,妻女由地方官严行看守。

徐骏写诗获罪 徐骏是江苏昆山人,刑部尚书徐乾学子。他中进士后即选为庶吉士。此人平时放荡无羁,好作诗词。其所做诗中,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句,雍正八年(1730),他被人告发,说这句诗的用意在于"思念明代,不念本朝",纯属"出语诋毁,大逆不道"。雍正帝接到报案,认定其诗句乃讥讪悖乱之语。雍正八年(1730)十月四日,经刑部等衙门议奏,雍正帝批准,徐骏依照《大清律》中之大不敬罪拟斩立决,他的文稿被全部焚毁。

屈大均诗文案起 雍正八年(1730)十月,署理广东巡抚傅泰看到《大义觉迷录》中,记录曾静门徒张熙供词中提到有一《屈温山集》,亦属反清著作,因而想到了广东的一位著名学者屈大均。屈大均,号"翁山"。傅泰认为,"温山"、"翁山",虽字有别,但音相同,必为一人,遂下令查找屈翁山文集,后果于书肆购得屈翁山文外、诗外、文钞诸书。经查阅这些诗文集,发现其中凡遇到明朝称呼之处俱空抬一字,以示尊重,而对清朝,则"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于是案发。当时屈大均已死三十余年,傅泰密令拘捕其子屈明洪(时任惠来县学教谕)。十月十六日屈明洪闻讯投案自首,交出所存其父诗文及刊板,请正典刑。傅泰以此为线索,严加审讯,并于十月十九日,将审讯结果和屈大均诗文集上报雍正帝。后经刑部核议,按大逆律问罪,将屈大均戮尸枭示,其诗文集全部毁禁,雍正帝因屈明洪能投案自首,决定减等论处,流放福建。

科舍图激战 雍正七年(1729),因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屡次骚扰喀尔喀,而且藏匿青海叛军头子罗卜藏丹津,清政府决定出兵讨伐,以安定北疆。特命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出师北路;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师西路,分进合击。噶尔丹策零闻讯,施缓兵之计,于雍正八年(1780)五月,遣使入京,声称本欲将罗卜藏丹津解送清廷,因闻清兵出动,暂行中止,如能赦其既往,愿听从清廷命令,解送逃犯。雍正帝见此,遂令暂缓一年进兵,要岳钟琪、傅尔丹回京议事,西路军务由副将纪成斌代理。纪成斌命副参领查廪领士卒万人驱赶驼马放牧于科舍图卡伦一带(位于哈密与巴里坤之间)。当时天已寒冷,查廪竟将牧放事委之部下五十人,自己却率众躲进山里避寒,而且终日置酒挟娼。十二月,噶尔丹策零遣宰桑衮木特率兵二万,突然袭击科舍图卡伦,劫掠驼、马十几万头。查廪逃遁,求救于总兵曹勷。曹仓卒出战,大败。清西路军总兵官樊廷,副将冶大雄等得报,率兵两千,与衮木特等激战七昼夜,救出了两处卡伦兵。后又合总兵官张元佑杀退准军,夺回大部分驼、马。雍正帝得知战况;令傅尔丹等速赴军营,准备讨伐噶尔丹策零。科舍图之战,使准噶尔部贵族与清政府的关系又一次破裂,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诺尔布叛清 诺尔布,清代厄鲁特蒙古青海土尔扈特部台吉,莽海后裔,世牧青海。雍正元年(1723),率众响应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反清,后向清廷表示悔罪,被赦免。雍正三年(1725),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但并未真心归顺清廷。雍正八年(1730),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抗拒清廷,派人领兵掠夺科舍图清北路军驼马。诺尔布受命于柴旦木军前效力,并与拉察布设汛腾格里防御。雍正九年(1731)初,当他看到清军受挫于准噶尔,遂乘机盗掠驼马,公开叛清。佐领里塔尔亦追随叛乱。清廷委和硕亲王察罕丹津讨伐。同年秋,诺尔布被察罕丹津所败,就擒。十月初九日,雍正帝下令将其解赴西宁口外,即行正法,妻子免死。另由其胞弟特尔布承袭札萨克一等台吉。

设宣谕化导使 雍正七年(1729)以后,清政府决定对准噶尔部用兵,为此,加重了陕甘人民的负

担。本来，甘陕人民在允禵、年羹尧、延信等人统治下已很贫困，再加此项军需，致使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大增。在陕西，有人对雍正帝的政策表示怨恨，也有人公开指责。为了缓和这一矛盾，保证前方作战的顺利进行。雍正九年(1731)四月初八日，雍正帝派左都御史史贻直、礼部侍郎杭奕禄为宣谕化导使，率领翰林院庶吉士、六部学习人员，以及国子监肄业的选拔贡生等，带谕旨前往陕、甘二省"开导训谕"，以"觉悟愚蒙"。雍正帝谕示说：对准噶尔用兵乃"奉天讨罪，除暴安民"，实属万不得已而为之。而厉兵秣马，诸务纷繁，"虽不敢取办于民财，恐不免借资于民力"。对陕、甘百姓之苦，朝廷已倍加优恤，曾多次蠲免钱粮。今陕西之议论，必有允禵、年羹尧等胁从之党从中煽动。百姓切不可听信小人摇唇鼓舌、诽谤朝廷之言论。如果"能笃尊君亲上之义，消亢戾怨怼之情"，必可使前线早日报捷，边塞永宁，二省民人亦可安居乐业。

审理范世杰呈词案 范世杰，福建汀州府上杭县童生。他不甘于童生的地位，总想寻找进身之阶。雍正八年(1730)，二十三岁的范世杰读了《大义觉迷录》后，向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投递词呈，斥责曾静，颂扬雍正皇帝，受到刘师恕的称赞。待到福建学政戴瀚至汀州主持考试，他又递上呈文，对曾静指责雍正帝夺位的言论加以驳斥，说雍正帝继位之前，以子道事父母，以臣道事君父，至于继位，"三兄有抚驭之才，钦遵父命，让弟居之，而圣君不敢自以为是，三揖三让，而后升堂践天子位"。范世杰的本意是想说明雍正帝同兄弟们很和睦，得位正当，没有弑兄杀弟之事。不料，戴瀚对"三兄让位"非常敏感，认为这是讲诚亲王允祉有抚驭之才，应该当皇帝，所以拘审范世杰，令其招供。同时将其呈词上奏。雍正帝闻讯后，一方面称赞戴瀚做得对，一方面令其会同督抚密审，同时指出，范世杰乃企图侥幸进身之小人，不会有多大背景，要求不必声张。随后，戴瀚与福建总督刘世明、巡抚赵国麟密审范世杰，范供称：汀州城内人人这样讲，他知道雍正帝序居第四，能即位，自应是三个哥哥让位，所谓三兄，是指长、二、三三个哥哥。戴瀚等人审不出什么结果，于是定他造言生事，建议将他押复原籍，由地方官严加管束，每逢朔望，令其宣读《大义觉迷录》。若再生事，必严加治罪。雍正九年(1731)六月，雍正帝批准，此案最终了结。

和通泊激战 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袭击科舍图卡伦清军后，双方矛盾日益激化。雍正帝立即派傅尔丹急赴北路军营，组织讨伐噶尔丹策零。雍正九年(1731)四月，傅尔丹率北路军进驻科布多。六月，噶尔丹策零命大小策零敦多布率准噶尔军三万，进攻清北路军，同时派两千人围困鲁克察克(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以牵制西路军。六月十七日，准噶尔军有人至傅尔丹军营诈降，诡称：噶尔丹策零大军未到，仅有小策零敦多布率军"不过一千"，驻于距清营仅三日路程的察罕哈达，而大策零敦多布因途中有病，留驻和博克山。又散布：噶尔丹策零因与其妹夫不和，发生冲突，为其所败，所以大军未至。对于这些自相矛盾的消息，傅尔丹不加核实，以为机会到来，一面上奏朝廷，一面准备进攻。雍正帝接到情报后，命令大学士等转告傅尔丹，对各种情报"务加详审"，不可贸然行动。此时，北路军副都统定寿、永国、海兰等人也相继劝阻，但傅尔丹一意孤行，发兵一万，分三路进军。噶尔丹策零见傅尔丹就范，先以少量兵力及牲畜引诱清军前锋，而将主力二万埋伏于博克托岭山谷中。傅尔丹不知是计，冒昧趋进，及行数百里，仍不见准军营垒。七月五日，听说准噶尔军两千，驼马万余屯于博克托岭，遂派参赞苏图率兵三千往剿，以丁寿统兵一千五百为后援。先锋部队行不数里，忽"闻笳声远作，毡裘四合，如黑云蔽日"，喊杀之声山鸣谷应，早已埋伏在此的二万准噶尔军立即把清军先锋部队围困于博克托岭山谷之中。傅尔丹闻讯，又派六千兵往援，此时先锋部队已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于是清军移营和通泊(距科布多西二百里)。准噶尔军乘势掩击，包围和通泊，激战之后，清军且战且退，准噶尔军一路追杀。待傅尔丹逃回科布多，仅存二千人，副将军巴赛、查弼纳等俱战死。事后，傅尔丹被降职。

鄂登楚勒激战 雍正九年(1731)七月，和通泊战役后，清廷授顺承郡王锡保为靖边大将军。噶尔丹策零因在和通泊战役中获胜，遂滋长了骄傲情绪。不久，又以大小策零敦多布率兵屯驻哈喇额尔齐斯河和华额尔齐斯河。八月十一日，更跨额尔齐斯河，至索尔毕乌拉克沁地方，留兵四千，作为后援，而令大小策零敦多布率兵二万六千进窥科布多。因科布多清军防守严密，遂抵克尔伦，企图进攻喀尔喀。令海伦鄂勒锥及小策零敦多布之子曼济各领兵三千，劫掠克尔伦、鄂尔海、喀喇乌苏(在科布多东南)。大策零敦多布屯兵苏克阿勒达呼。九月二十日，靖边大将军锡保命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及额驸策凌率兵截击。二十一日，丹津多尔济和额驸策凌遣台吉巴海率轻骑六百夜袭大策零敦多布营垒，诱敌深入。结果，大策零敦多布果然派兵追击，被诱至鄂登楚勒大营。丹津多尔济和额驸策凌列阵接战，战斗自辰至

午，异常激烈，后准噶尔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二十五日曼济等也被击败。于是，噶尔丹策零率准噶尔军自哈卜塔克、拜塔克一路逃遁。

清军解哈密之围 雍正九年(1731)九月鄂登楚勒战斗后，噶尔丹策零仍然踌躇满志，准备做进一步的反攻。雍正十年(1732)正月，他派准噶尔台吉色布腾和小策零敦多布之子策零那木札尔率兵六千，自乌鲁木齐侵袭哈密。准噶尔军在哈密城外塔勒纳沁地区掠夺后，又攻打哈密城。哈密城内的回民奋力抵御，并请清军援助。正月二十七日，岳钟琪遣副将纪成斌往援哈密。二月初，纪成斌率兵至二堡地方，与准噶尔军五千人相遇，清军奋勇作战，杀败准军。准军由沙碛败遁，然而在此截击的清军将领石云倬却坐失机会，使准军逃跑。哈密解围之后，雍正帝十分赞赏哈密回民之英勇，令赏银一万五千两，论功分给。同时将贻误战机的石云倬革职。

平刀兴国之叛 刀兴国，云南普洱府属思茅土把总，雍正十年(1732)闰五月举兵叛乱。他煽动当地的"苦葱"人反对官府，并勾结附近元江四寨"夷人"为之呼应。朝廷派往协攸乐城的官员章伦，经过思茅附近的漫蚌村时被杀，署理云贵广西总督印务高其倬立即调官兵，从元江、景东两路进剿，并把这一情况上报雍正帝。雍正帝认为：刀兴国煽动苗夷"无故谋叛，聚众兴戎，以抗拒王师"，必须镇压，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六月底，进剿兵集齐，分攻元江、思茅，官兵沿途清障，未遇正面抵抗，但每至"山窄树密之处"，即有"潜伏抗拒"。七月初，官兵抵思茅，叛军撤走，思茅城无恙。官兵一面安抚未从乱之各寨，一方面对杀害章伦的漫蚌等村痛加杀戮。随后进攻叛军"巢穴"猛先、回龟一带。叛军以漫龟江为屏障，千余人沿江固守。官兵一路绕道从后面袭击，一路正面驾筏抢渡过江。一周之后，其地为官兵占领。不久，刀兴国于那卡地方被获。在押解途中，刀兴国自杀，官兵割其首级送往省城。八月，继续招抚普洱、思茅、元江、新平一带村寨，叛乱宣告平息。

清军大战光显寺 雍正九年(1731)九月以后，准噶尔军屡次受挫。但噶尔丹策零仍不甘心，总想侵占喀尔喀，扩大自己的势力。雍正十年(1732)六月，他派小策零敦多布率兵三万抢劫喀尔喀游牧地。清廷闻讯，令将军塔尔岱及喀尔喀亲王额驸策凌于本博图山一带拦击。噶尔丹策零得知额驸策凌不在游牧地，遂派兵潜袭塔密尔河的额驸策凌牧地，攻破其寨，掳其妻子儿女，并抢夺牛羊数万。额驸策凌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割辫发及所骑马尾，誓以复仇"。他一面派人送信给靖边大将军锡保，请清军夹攻，一面自率蒙古兵二万回救。他利用夜间行军，且绕出山后，待黎明时，自山上直冲而下，杀声震天。准军毫无准备，梦中惊醒，仓促起身，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尽弃军资，夺路而逃。额驸策凌派兵紧追不舍，转战十余次，追至鄂尔浑河边的额尔德尼昭。额尔德尼昭是喀尔喀大喇嘛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驻地。因产金银，故名，意为"宝寺"。汉籍文献称"光显寺"。寺右面山，寺左临河，且道路狭窄，额驸策零先派人据山扼险，又命满军背水而阵，蒙古军布于河北，亲率劲旅万人伏于山侧。待准噶尔军败退至此，伏兵四起，乘势冲杀。准军大乱，弃甲四窜。额驸策零指挥将士奋勇杀敌。此役击杀准军万余，尸满山谷，河水尽赤。小策零敦多布乘夜突围西窜。光显寺之战，使准噶尔部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对噶尔丹策零也是一次严重的打击。由于形势所逼，噶尔丹策零于雍正十一年(1733)底向清政府求和。清政府鉴于连年用兵，也准备休养生息，遂于雍正十二年(1734)八月遣使赴准噶尔，希望其部与喀尔喀划清游牧界，永息兵戎。

吕留良文字狱结案 雍正十年(1732)，清廷对吕留良案进行审结。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顺治十年(1653)考生员，后思想大变，悔恨猎取清朝功名，康熙五年(1666)弃青衿。雍正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儒科，几经推荐，誓死不就，剃发为僧。他在著述中表现了强烈的反清思想，极力申明华夷之辩，认为这比君臣之义更为重要，又抨击清朝统治，称"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他的弟子严鸿逵继承了他的思想，敌视清朝，希望发生变故。严的弟子沈在宽作诗云："陆沉不必用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他们在南方几省影响很大。雍正六年(1728)九月，曾静投书案发后，曾静供出他的思想是受吕留良的影响，而且他的门生张熙还曾往浙江访求吕留良遗书，受到了严鸿逵及沈在宽的热情接待。于是，吕留良案发。此时，吕留良已死去四十余年。雍正帝在针对审讯曾静的口供所亲写的上谕中，专就吕留良的华夷之辩论进行批驳。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刑部提出将吕留良等人处理结案，雍正帝命交各省学政，遍询各学生监的意见，因为要焚禁吕的著作，怕有人私藏，故以此为名，多做宣传工作。雍正帝还命大学士朱轼等批驳吕留良的四书讲义、语录，九年(1731)十二月成书，刊刻颁发各学宫。十年(1732)十月，吕留良案正式了结。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开棺戮尸；严鸿逵监毙狱中，戮尸枭示；吕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和沈在宽斩首。此外，吕的私淑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留良书籍的人有的斩首，有的充军，有的杖责，吕、严、沈三族妇女幼丁给功臣家为奴。

张廷玉代子谦让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子。康熙十一年(1672)生，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康熙末年任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雍正初年晋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雍正三年(1725)署大学士事，雍正四年(1726)晋文渊阁大学士、《圣祖实录》总裁。雍正七年(1729)，军机处成立，任军机大臣，加少保衔。他身兼数职，工作繁忙，而工作态度却总是谦恭默做。他经常一日三见雍正帝。由于他起草的文字，最合雍正帝的心意，所以，一些上谕多由他代拟。雍正帝夸奖他是汉大臣中"第一宣力者"，并视为股肱大臣，予以赏赐。张廷玉越是得到皇帝的宠幸，越加表示谦恭。雍正十一年(1733)三月，张廷玉子张若霭参加殿试。雍正帝在亲阅试卷时，发现一份试卷字画端正，且卷中所论公忠体国之道言辞恳切，颇有古大臣之风，遂拨置一甲三名，即探花。后来，拆开卷子才知道，此考生即大学士张廷玉之子。雍正帝十分欣慰，他说："大臣子弟能有忠君爱国之心，将来必能为国家抒诚宣力。张廷玉与朕朝夕相处，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之君期朕，而朕亦以皋夔期之。张若霭能禀承家教，实为朝廷之幸。"并遣人通知张廷玉，定其子为探花乃出于公心，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提拔。张廷玉闻讯进见，恳切地对雍正帝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一次考试，谁不希望名列前茅。我已蒙皇恩，若再让儿子占寒士之先，于心实有不安。若蒙皇恩，列为二甲，已为荣幸。"雍正帝说："你家忠尽积德，有此佳子，中一鼎甲，定为众人所服，何必逊让？"张廷玉听罢，跪奏言："皇上至公。但我家已备受恩荣。我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可怜我的愚衷。再说给儿子留个将来上进的机会，更为美事。"最后，雍正帝不得不勉从其请，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以示大臣谦让之诚。四月初一日，雍正帝特颁谕旨，表彰张廷玉谦让之美德，并让普天下之士子共知之。

吴茂育《求志编》案发 吴茂育，浙江淳安人，任宛平县县丞，著有《求志编》。雍正十一年(1733)告假回籍。其族兄、淳安县生员吴雰向所属严州府告发，指其《求志编》"语多狂悖"。同年(1733)十一月九日，浙江总督程元章接到严州府报案，立即调该书仔细查阅，发现其中评论古今处，"语言感慨，词气不平，肆口妄谈，毫无忌惮"。同时，该书的一种本子，前有李沛霖的序文，于纪年处只用干支，书'癸卯九月"，而不写雍正元年，"更干法纪"。于是，下令将吴茂育押解省城，严加讯审，同时上报雍正帝。雍正帝称赞程元章办事得体，并指出，吴茂育之流，比公开的盗贼更为有害，一定要"严加审究，毋涉疏纵"。希望以此来端正浙江之风化。程元章接到朱批谕旨，深深理解雍正帝的本意，于是再上奏折，一方面表示对吴茂育从重究拟，一方面表示要留心访查，力争根除"邪说"，以使人心警惕。

容美民变 容美宣慰司位于湖北西南部，南接湖南，北临四川，是湖广势力最大的土司之一，下属有五峰安抚司、平茶长官司等五土司。土司田氏世袭容美宣慰司世职，欺压土民，作恶多端。雍正时，土司田旻如更加残暴，他自造鼓楼，设龙凤鼓、景阳钟，开玉带河，架月宫桥，住居九重，厅房五重，号称"九五居"，并捉土民三十三人，强行割做太监，俨然是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他为了向土民勒索科敛，滥设刑罚，随意抄家杀人，没人资产。土民由于受到土司欺压而又无律可循，常有含冤自尽者。就连当时的湖广总督迈柱在给雍正帝的奏折中亦称："田旻如实为土司之罪魁，土民之大害也。此官一日不除，土民一日不得安枕。"雍正六年(1728)，湖南永顺等土司自请改流后，对容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容美土民不堪土司之残暴，要求改流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雍正十一年(1733)，有五百余人逃出土司境内，投奔官府。同年十一月，清政府下令捉拿田旻如问罪，容美土民闻讯，组织起来，欲助官府捉拿田旻如，报仇血恨，田旻如面对愤怒的百姓，无计可施，于(1734)十二月十一日自缢而亡。土民见田旻如已死，遂将其子田祚南、党羽田畅如、向日芳、向虎等抓获，押送官府。清政府因势利导，废容美土司，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三月，在其地设鹤峰州。

颁发《朱批谕旨》 朱批谕旨是雍正帝对臣工的奏折用朱笔(红笔)所做的批示。或写于折中，或写于折尾。雍正帝自登基之日起，每日批览奏折，每折或数十言，或数百言。这些批语，正如他本人所言："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非如外廷宣布之谕旨，尚有阁臣等之撰拟也"。由于雍正帝实行密折制，因而奏折只给皇帝一个阅读，而朱批亦只让原奏人知晓。为了使臣民都能了解朱批之精神，以正人心风俗。故决定编辑《朱批谕旨》。雍正十年(1732)书成。三月初一日发上谕，阐明编辑之宗旨。十一年(1733)刊刻成书，颁发给臣下。雍正帝强调，《朱批谕旨》所收实不过总数的十分之二、三，旨在"俾天下臣民展读，咸知朕图治之念，诲人之诚，庶几将此不敢暇逸之心，仰报我皇考于万一耳。"

沈伦《大樵山人诗集》案起 沈伦，江南崇明县人，雍正十二年(1734)九月病故，著有《大樵山人诗集》。沈伦病故后不久，沈家与本县施天一争夺田产结怨。施某挟嫌报复，向官府告发沈伦所著《大樵

山人诗集》中有狂悖语句。崇明县闻讯后即报告江南总督赵弘恩。赵下令捉拿沈伦嗣孙沈自耕，并严加审讯。沈自耕供认：诗集确系嗣祖沈伦所作，诗板藏于苏州沈苍林家，赵遂即密令取诗集原板细加核对，同时提审沈苍林。雍正十二年(1735)十二月九日赵弘恩将办理情况上报，雍正帝倍加赞赏，并在其奏折上批道："甚是！凡此狂妄之徒。自应彻底究惩，以靖悖逆风习"。

苏州机匠叫歇　清代，苏州的纺织业比较发达。到雍正时期，这里碾布作坊的踹匠、丝织作坊的机匠等各类工匠达两万余人。这些工匠工价低廉，不仅受到作坊包头的盘剥和压迫，还要受到清政府的严密控制。因此，工匠们的反抗一直没有中断过。他们为了增加工银，改善待遇，不断进行"叫歇"(停工)斗争。雍正元年(1723)、七年(1729)，连续出现了踹匠的"叫歇"、"增价"事件。雍正十二年(1734)，在苏州府长洲县爆发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机匠的"齐行叫歇"斗争。机匠们联合起来，统一行动，他们以"叫歇"形式与作坊主(机户)进行斗争，要求增加工银，反对无故解雇工匠。"叫歇"斗争很快从长洲县发展到元和县。机户不能平息事态，只好求助于地方官府。官府出面干涉，胁迫机匠复工，并竖了"永禁机匠叫歇碑"。但是机匠们的斗争，仍然取得了胜利，终于迫使机户同意纱机和锻机工匠在工银之外，每人每年另加"酒资"一钱，"工价按件而计"。

古州苗变　古州自雍正七年(1729)征服之后，即设古州厅，以流官管辖。古州地区旧有土官名目，如长官司、副长官司、土舍等。这些土官虽在建厅之后被授予土千总、土把总、外委土舍之名，协助清政府管理苗寨，但总不能如昔日一样耀武扬威。因此，他们一直希望恢复旧日之局面。雍正十二年(1734)七月，当地传言"有苗王当出"，苗人皆信，遂反对流官统治。官府曾抓获造言者"苗人老包"，后又释放，于是一些人"纠众滋事。"雍正帝为避免可能发生的事端，派吏部侍郎吕耀曾、大理寺卿德福，会同地方官员赴古州宣谕化导，但无效果。后又对滋事者进行镇压。结果引起了更大规模的叛乱。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古州、台拱、清江等处苗民聚众反叛，阻塞驿路，蔓延内地，官兵力不能御，连省城贵阳亦为之戒严。三月，攻清江。四月，陷凯里。闰四月，陷黄平旧州、清平、余庆等县。雍正帝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调云南、湖广、广东、广西之兵往援进剿，要求他们"痛加剿除，务尽根株，不遗后患。"又任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鄂尔泰因事变发生，上疏自责，请削伯爵。由于清军内部将领不和，因而平乱进展迟缓，以致大兵云集数月，旷久无功。八月，雍正帝死，乾隆帝继位，坚持平叛，任张广泗为七省经略，统一指挥作战。十二月，三路大军陆续告捷，乾隆元年(1736)正月，收凯里，二月，克丹江，至八月，台拱、施秉、凯里、黄平、八寨等处悉平。

雍正帝暴死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时，雍正皇帝突然在圆明园病故。他自患病到辞别人世，只有两天时间。甚至在患病的前一天还在处理公务。他遗命皇四子宝亲王弘历嗣位，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四人辅政。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享年五十八岁。后谥宪皇帝，庙号世宗，乾隆二年三月初二日葬于易州泰陵(清西陵)，遗诏张廷玉、鄂尔泰将来配享太庙。

驱逐道士张太虚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五日，雍正帝死后的第三天，弘历即下令将原皇父身边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驱逐出京城。他解释说："皇考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深知其非，只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故将张太虚、王定乾等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但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今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同时警告张太虚等人："伊等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所洞鉴。现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因在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弘历即皇帝位　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初三日，弘历御太和殿，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布告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弘历即人们所称乾隆帝。

增设府州县　雍正时，清政府对地方行政机构做了大规模的调整，大量增设了府、厅、州、县，特别是厅的设置。据粗略统计，雍正年间增设和复置的府三十三个，直隶州、厅五十八个，州、厅二十八个，县八十五个，共计二百零四个。约占府、厅、州、县总数的百分之十二。这些新设的府、厅、县，都要经雍正帝批准，一些新设的府、厅、州、县的名称也是由他亲自拟定的。地方行政机构的这一重大变化，反映了清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

准噶尔遣使入觐　先是，雍正帝征准噶尔罢兵议和，噶尔丹策零请定游牧边界。雍正帝敕谕自克木齐克、汗腾格里，上阿尔泰山梁，由索尔毕岭，下哈布塔克、拜塔克之中，过乌兰乌苏，直抵噶斯口为界。事未定，雍正帝病逝。乾隆帝即位，根据西北边情与国家财力，定撤兵守边，与民休息策，并作好议界、驻防等各项准备。乾隆元年(1736)正月，准部噶尔丹策

零遣使吹纳木喀奉表赍贡至京。十七日，赐吹纳木喀入觐，乾隆帝谕示：噶尔丹策零表文内，不遵雍正帝谕旨定界，漫指从前未允的哲尔格西喇呼鲁苏等处为准部边界，欲于喀尔喀境内更留空闲地，是无求和之意，希图通市之利，因而遣使无益。乾隆帝还声明：我为大国之君，唯以兴教安民为念，不想兴戎用兵，业已降旨将大军撤回，只留少量兵弁驻防守边。如果噶尔丹策零奉先旨定界，可再遣使来议。不然，就各保其境。倘若不自揣量，犯我边境，自能办理。二月初十日，吹纳木喀起程回部前，乾隆帝再召见他于乾清宫，命归告噶尔丹策零，抑或遵照指示，止以喀尔喀游牧不过哲尔格西喇呼鲁苏为请，亦属可行。并于敕书之内说明，我为万方共主，不但轸恤内地蒙古，就是准部，也在抚绥之内。你为台吉，应图及久远，将一切利害得失，再四思维，详悉定议。

以杨名时为礼部尚书 乾隆元年(1736)二月，乾隆帝以杨名时为礼部尚书，入教皇太子。杨名时，字宾实，江南(今江苏)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深得考官李光地器重，荐为顺天学政，不久迁侍讲。康熙五十六年(1717)授直隶巡道，在任期间尽除宿弊。二年后，迁贵州布政使。康熙五十九年(1720)，擢云南巡抚。当时大军征西藏，杨名时留驻云南，营馆舍，明约束，绝喧嚣，奏请改军粮每年给本色三季，折色一季，民多称便。雍正三年(1725)，擢兵部尚书，改云贵总督，仍管巡抚事。翌年，因误将密谕载入题本，受到严责，被解任。此后，杨名时居滇七年，留以待命，尽管清贫，仍治学不殆。乾隆即位，下诏起用杨名时。乾隆元年(1736)二月杨名时至京，赐礼部尚书，命入宫教皇太子读书，侍直南书房，兼领国子监祭酒。杨名时又举荐庄亨阳、秦蕙田等七人为助教，并疏请储书太学并刊书板，以供诸生讲习。八月名时病重，遣太医诊视。乾隆元年(1736)九月，杨名时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七岁。乾隆帝命赏银千两治丧，加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杨名时素治理学，著有《周易札记》、《四书札记》、《杨文定文集》等。

经略张广泗平定贵州苗乱 乾隆元年(1736)三月，张广泗奏攻破牛皮大箐，苗疆事平。先是，雍正十三年(1735)春，苗疆官吏征粮不善，各寨苗民起而反抗，攻城掠地，声势日炽，镇远、思州、台拱、清江皆被攻陷，本省兵征调殆尽，奔救不遑，雍正帝乃诏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滇、蜀、楚、粤四省官兵会剿。不久又以董方为副将军，会同办理。七月，又命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前往滇省节制诸军。张照到任后，专主招抚，与哈元生发生矛盾，以致大兵云集，旷久无功，甚至苗疆改土归流成翻案危局。乾隆帝即位，坚主剿平之议，诏张照等回京，授张广泗为七省经略，将军哈元生以下均归节制。张广泗总结得失，改变战术，调黔兵集镇远，保证了云贵之间大路畅通。又简选将士，面授方略，各以精兵四千攻上下九股之苗，自己亲率五千精锐攻清江下流各寨。届期并举，号令严明，所向克捷。乾隆元年(1776)春，又增兵分八路，合力围攻，遇有抗拒，即行荡平。余存苗众纷纷逃入牛皮大箐。此箐居于苗寨中央，北为丹江，南为古州，西临都匀、八寨，东接清江、台拱，盘亘数百里，实为一大森林。危岩切云，老樾蔽天，雾雨冥冥，泥潦没胫，蛇虺所国之地，虽苗民亦不知其深远。苗众以为官军万不能至，乃潜藏其中，等官军退后复出再起。张广泗檄令诸军分扼箐口，层层包围，逐渐进逼，结果，先后焚毁一千二百余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斩一万七千余人，俘二万五千余人；获铳炮四万六千余，刀、矛、弓、弩、标甲十四万八千余。

清厘僧道 乾隆帝即位之初，以缁流太众，品类混杂，真心出家修道者百无一二，渐有游民、逃犯匿迹其中。又有房头"应付"僧，世守田宅，不忌酒肉，甚至娶妻生子。"火居"道士也一样。以致僧徒日众，佛法日衰。不但参求正觉，克绍宗风者寥无几，就是严持诫律，习学小乘之人亦不多见。因恐流弊日深，有玷深规，且于社会经济大有妨害，遂谕令礼部详议清厘僧道法。乾隆元年(1736)四月初六日，礼部议定并得乾隆帝旨准，令顺天、奉天两府各直省督抚，转饬该地方官，于文到三月之内，将各戒僧，全真道士的年貌籍贯，焚修处所，清查造册，取具印结，汇送到部，发给度牒，交各僧道收执。遇有事故，追出汇缴。嗣后情愿出家之人，必给度牒，方许披剃受戒。如有借名影射及私自出家者，查出治罪。其"应付"僧人一体给与度牒，不愿受戒者，勒令还俗。其中老迈残疾既难受戒，又难还俗的，给与度牒，看守寺庙，以终天年。深山僻壤不能远出受戒，及无俗家可归的，也发给度牒，另行注册，永不许招徒。清微正一道士，除龙虎山上清宫由真人给与印照，各直省清微灵宝道士，仍给部照，"火居道士"俱令还俗；年长者暂给部照，不许收徒。僧尼也照僧道例，愿还俗者听其自便，不能还俗的亦给度牒，永不许收年少生徒。妇女必至四十岁以后，方准出家，年少者严行禁止。四年(1739)，乾隆帝再令渐次裁减僧道人数。

定江南水利岁修章程 乾隆元年(1736)六月，乾隆帝以水利关系国计民生，如果使河道疏通，蓄泄有方，旱涝皆备，田庐无虞，对于人民益处非浅；但自雍正开浚以来，已过数年，圩岸不无塌颓，泥沙不无淤积，与其年久浚筑事难费倍，不如逐年修葺，

省工省费。遂命江南督抚及河道总督，令管理河道水利河务各官及滨河州县，各于所属境内，相视河流浅阻，每岁农闲时，募夫挑挖，逐年修葺，定为章程。

禁百工当官贴费　原江浙一带百工匠役奉官役使，名为当官，吏胥从中舞弊，少发或不发工食。如匠役不能亲自当差，则暗中敛钱相助，名为贴费。致使官吏徇私中饱，种种弊规，苦累小民。乾隆元年(1736)六月，乾隆帝命督抚严行禁止。

密立皇太子　乾隆元年(1736)七月初二日，乾隆帝将第二子永琏密立为皇太子。他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总理王、大臣、九卿等，宣谕：宗社大计，莫如建储一事，国体攸关，自以豫定为宜。朕即位已逾半载，未经降旨，实因人心不古，往往有因建储太早，以致别生事端。皇考当日建储，亲书密旨收藏。今唯有循用先例，遵照成式，亲书密旨照前收藏，待皇子年齿渐长，识见扩充，志气坚定之时，再布告天下，明正储贰之位。遂亲书密旨，著总理王、大臣等看视，让总管太监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王士俊悖旨论斩　乾隆元年(1736)七月二十八日，四川巡抚王士俊密奏悖旨，乾隆帝命将其斩监候。康熙时，为安定人心，与民休息，采取以宽治国的方针，晚期法纪废弛，吏治颓败，弊病丛生。雍正帝继位后，加意振饬，政令峻厉，又失于烦苛。乾隆帝登极，主张以宽济严，执两用中，既主用宽，又戒废弛。一些大臣揣测其意，欲承风旨，一时条奏皆主用宽。署四川巡抚王士俊，本任河南巡抚，因垦荒劝捐，贻累民间，遭到户部尚书史贻直疏劾被解职回京。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密折奏事说：“近日条陈，唯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止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传之天下，甚骇听闻。”乾隆帝看后，十分恼怒，即批谕申饬，又将折发王、大臣传阅。御史舒赫德参劾王士俊奸顽刻薄，中外共知。其为河南总督，勒令州县虚报垦荒，苦累小民。此又丧心病狂，妄发悖论，请明正其罪。乾隆帝遂召王、大臣、九卿，谕云：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圣祖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之久，休养生息，物炽而丰。厥后法网渐弛，风俗渐玩。世宗加意振饬，纪纲整肃，弊革风清。凡此因势利导之方，岂谓翻皇祖之案？且雍正九年以后，已开始敦崇宽简，见臣工奉行不善，失于烦苛者，每多纠正。朕即位以来，继承先人遗志，以执两用中之政为政，因时制宜，维持调护，以归于正直荡平之道。乃王士俊訾为翻驳前案，是何居心？王士俊巧诈之习，牢不可破，外饰鲠直，以便己私。敢将悖理之言，妄行陈奏。关系重大，不可姑恕。王、大臣、九卿议处。奏请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乾隆帝颁旨改斩监候。次年释放回籍。

亲试博学鸿词　乾隆帝即位之初，申谕各省督抚，速行保荐博学之士，定一年内候试京师。乾隆元年(1736)九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在保和殿御试博学鸿词一百七十六人，取中刘纶等十五人，分别授于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次年，又于体仁阁试续到博学鸿词四人。授万松龄、张汉为翰林院检讨，朱铨、洪世泽为翰林院庶吉士。

减台湾“番饷”银　乾隆二年(1737)正月，以台湾九十六社于丁银之外，每丁加征“番饷”银多至二两，乾隆帝命将其裁减。

遣使封黎维祎为安南国王　先是安南国王黎维祜其子黎维祎遣使告哀，附贡方物。乾隆二年(1737)二月二十日，乾隆帝命翰林院侍读嵩寿、修撰陈倓同往致祭，并册封黎维祎为安南国王。

修筑浙江石塘　修建浙江海塘，是清代重要水利工程之一，对防御海潮侵袭，保护杭嘉湖一带人民生命财产，发展农业都有直接关系。而海宁、仁和地处钱塘江与东海交汇点上，潮势汹涌，塘工不坚固，极易冲决成灾。雍正十三年(1735)七月议筑海宁石塘，大学士朱轼负责其事，督抚及管理塘工诸大臣均听节制。乾隆二年(1737)四月，朱轼奏报海宁石塘工竣。该石塘在浙江海宁城南，长五百丈，密签长桩，平铺巨石，灌以米汁、灰浆，扣以铁钉、铁锔，十分坚固。八月，乾隆帝又准大学士嵇曾筠疏请，在尖山一带，建筑鱼鳞大石塘五千九百三十丈，需用银一百零六万九千余两。

裁广东、云南杂税　乾隆二年(1737)四月，以广东杂税繁多，如广州、高州、肇庆等四府及海阳、揭阳等县有粪、牛骨、农具、棉条等税，及各种额处加征税，多至三百八十二条，乾隆帝命均予裁革。云南杂税也较多，如曲靖、元江、大理、楚雄、普耳、丽江等地，日用杂贸、鱼、虾、果、蔬等均设落地税，又有正课盐税之外，额外加征盐税，乾隆帝亦命革除。

免江南漕赋　乾隆二年(1737)六月十二日，乾隆帝命豁免江南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起，至雍正十二年(1734)止，未完民欠漕银共三十万六千余两，米、麦、豆共九万四千余石。

直隶试行区田法　原任营田观察使陈时夏，曾向乾隆帝进呈《区田书》，并疏称：《农政全书》内，有营治区田法，于区田四面，凿井浇灌，以防干旱，对北方各省更为有益。古称每亩可收六十六石，合今斗二十石，少亦可得十三四石。但工本较贵，百姓无此财力。乾隆二年(1737)六月，乾隆帝命在直隶地方，选用贤员，暂租民地，官种官收，借给工本，秋收后还

项，先期试行。待有成效，再通行各省。

永定河决口 因连日大雨，浑河水发，卢沟桥及长辛、良乡一带，田地被淹，房屋倒塌。乾隆二年(1737)七月初二日，乾隆帝命官员带库银分两路前往查堪赈济。不久，乾隆帝得到报告说：永定河水漫过石堤，冲刷背后土堤二百五十余丈。南岸漫溢十八处，北岸漫溢二十二处，附近庐舍、田禾全被冲塌、淹没。乾隆帝便又派人分六路前往抚恤、安顿。发仓谷赈直隶宛平、霸州、保定、文安等八十二州县卫灾。派员查勘永定河冲决各处堤工，命星夜抢修堵筑。

修筑清河"千里长堤" 乾隆二年(1737)闰九月，大学士鄂尔泰奏称，直隶清河堤岸，起清苑县界，迄献县臧家桥，流经于顺天、保定、河间三府之境，为数十州县生民之保障，名曰"千里长堤"。而工程隶属霸、保、文、大四邑境内者，最为险要，堤工多有塌陷，上自茅儿，下至龙堂湾约九十余里，应将原堤培筑高厚。其堤底宽八丈，顶宽二丈，高一丈；高过一丈者，相应加宽。龙堂湾转角处，三面受冲，甚为险要，应建月堤。再将大堤对岸支河数道，酌量疏浚。经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工部讨论后议决兴修。乾隆帝命依议速行。

命仍设军机处 雍正帝病重临死时，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辅政，并兼总理事务大臣。乾隆二年(1738)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准庄亲王等奏辞总理事务。但以目前两路军务尚未全竣，日理万机，间有特召交出之事，仍须就近办理，令仍设军机处，著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尚书纳亲、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为军机大臣。二十九日，又命鄂尔泰仍兼管兵部，张廷玉兼管吏部事务。

准噶尔使臣奉表至京 因乾隆元年(1736)，准噶尔使吹纳木喀赍回敕书，内有"尔诚遵皇考前旨定界，则遣使"之语，乾隆三年(1738)正月，噶尔丹策零遣使臣达什等奉表至京，并贡貂皮。表内写道：请嗣后喀尔喀与厄鲁特各照现在驻牧，无相掣肘，彼此相安。乾隆帝以表文内言辞恭顺，事有易成之机，决定遣使赍敕前往准噶尔，与噶尔丹策零将定界之事完结。遂命侍郎阿克敦为正使，御前侍卫旺扎尔、乾清门头等台吉额默根为副使，与准噶尔使一同起程。

准民人置买公产旗地 乾隆三年(1738)二月十六日，乾隆帝谕示：公产旗地准民人置买。他说：先前以旗人生计贫乏者多，令王大臣议，将八旗入官地亩立为公产，取租解部，按旗分给，以资养赡。但此等入官地亩，内有清朝定鼎之初，圈给八旗官兵，将钱粮全行豁免者；亦有旗人与百姓自相交易，出银置买，仍在州县纳粮者，两种原属不同。只因旗产入官，有粮无粮，未经分晰，一并交官收租，是以部册一并造入公产。此项民地，在契买时，旗人执业，民人得价，原系彼此乐从之事。若以入官之后，一概定为公产，不准置买，殊非轸恤黎民本意。为此，特颁谕旨，除原圈官地，为旗人世业，不容民间置买外，其旗人自置有粮民地、现在入官者，如有愿售之人，不论旗、民，一体准照原估价值变卖。将银两交解司库，陆续咨解户部，交各旗料理生息，分给旗人，使得实惠。至于民买官地，地方官不得中饱垄断，务使旗、民两便。

加恤各省贫生 乾隆三年(1738)四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以各省学田银粮，原为给散各学廪生贫生所用，但为数无多，或遇歉年，贫生不能自给，难免饥馁；而伊等身列胶庠，不便与贫民一例散赈。遂决定嗣后凡遇地方放赈时，该督抚、学政令教官开列贫生名籍，送地方官核实详报，按人数多少，均匀分给。

张广泗剿平定番苗乱 乾隆三年(1738)五月，贵州定番苗乱平息。此前，贵阳府定番州姑卢寨苗民头人老排，于正月借称苗女阿埽，为方番司属谷粟寨汉民刘世昌等拐卖，索诈银两，掳去马匹。二月内又率众往打，经过大树寨，即强拉牛只，杀死民人向云登。不久，州官将首犯老排拿获，其子阿沙不知畏惧，于二月十九日纠合数百人，潜至鸡场地方，绑走汉民张具清、陈士林、杨君相三人，以索换老排。二十四日，又烧毁甲浪店房，抢劫财物，砍牛纠众。贵州总督张广泗以苗疆初定，不便加兵，即派精细弁役前往晓谕。说明罪犯止在老排父子，与众无涉，倘将阿沙擒献，可免进剿。但苗民不听，复于三月初二日，攻犯美塘场，肆行抢劫。张广泗遂派官兵二千五百名，土兵九百五十名，由明通关一路进剿。苗人与官兵对阵后被击退；又乘夜偷营，复被重创。于是，清兵分路进剿，二十五日，将首犯阿沙诱获，又将老排所居下新寨、阿沙所居石头寨等全部剿毁。苗民余众逃入大石板寨。二十九日，清军三路会攻，将寨焚毁。苗人败逃入箐。清军又加搜剿，不使漏网。苗乱遂平。

定八旗家奴开户例 乾隆三年(1738)六月十五日，经议政大臣讨论，乾隆帝旨准决定许八旗家奴，放出为民，但须查明注册，只准耕种营生，不准谋求仕宦。

命修南北栈道 乾隆三年(1738)八月初七日，以四川道路之难，甲于天下，而栈道偏桥尤为险隘，借民力修补，没有保证，乾隆帝遂命四川巡抚硕色和西安巡抚张楷委员确勘，将南北栈道，应行修理处，动用公银，分别修理。竣工后，交与地方官不时稽查，坏即修整，以使永远坚固，方便行人。

皇太子永琏殇 乾隆三年(1738)十月十二日,皇太子永琏偶患寒疾,随即不治而死。乾隆帝命一切典礼,照皇太子仪注办理。将元年藏于"正大光明"匾后的密旨取出。谥为端慧皇太子。永琏为皇后所生,乾隆帝嫡子。为人聪明贵重,气宇不凡。雍正帝命名为永琏,隐然示以承宗器之意。乾隆帝即位以后,不行公开册立皇太子礼,因恐其年纪幼小,志气未定,恃贵骄矜,或左右谄媚逢迎,导致失德。甚至有人窥伺动摇,出现争夺储位的斗争。所以密立为皇太子。

直隶总督李卫去世 乾隆三年(1738)十月,直隶总督李卫病逝。李卫,字又玠,江苏铜山人。捐赀为员外郎。康熙五十八年(1719),迁户部郎中。雍正帝即位,授云南盐驿道,雍正二年(1724)升布政使,仍管盐务。雍正三年(1725)擢浙江巡抚,次年命兼理两浙盐政。上疏奏请以盐规银十万两,赴川采米减粜,款归司库。又清理盐政,缉查私贩,奏修海宁、海盐、萧山、钱塘、仁和海塘。雍正五年(1727)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请于沿海空地,招民垦种,本年起科;设灶煎盐,官为收买;渔舟入海,给牌察验,税收公用。又经画浙东水利。雍正帝以江南多盗,总督范时绎、巡抚陈时夏不能捕治,命将苏、松等七府五州盗案,交李卫兼理,将吏听其节制。又命李卫参与勘海筑塘、清理钱粮、考核军政诸事。雍正七年(1729),加兵部尚书衔。当时江宁有张云如以符咒惑民,李卫密察得其党甘凤池等私相诱煽情况,令游击马空北往捕。范时绎原与张云如有交往,便进行包庇,并贿赂马空北还告李卫。李卫就此事上奏朝廷,范时绎被夺官,张云如等问斩。李卫在浙五年,莅政明敏,令行禁止,且优待士人。雍正帝因查嗣廷、汪景祺之狱,停止浙江乡会试,李卫出文告坚决执行。翌年,与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疏言两浙士子感恩悔过,士风丕变,浙江乡会试得以恢复。雍正十年(1732)李卫署刑部尚书,授直隶总督,兼管军事。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命李卫兼管直隶总河。李卫奏请以营田交各州县管理。乾隆二年(1737),李卫揭发诚亲王属下库克嘱托,乾隆帝命治库克罪,并嘉奖李卫秉公执法。乾隆三年(1738),李卫又弹劾总河朱藻贪劣,其弟干预地方赈事。经调查属实,朱藻被夺官,其弟被治罪。李卫在直隶任职六年,为政清廉,并多次疏请审正府县疆界,改定营汛,增设将吏。乾隆三年(1738)十月,李卫因患黄疸,难以办事,解任回籍。二十六日,遗疏报闻。乾隆帝颁旨称赞:李卫才猷干练,实心办事,封疆累任,宣力多年,勇往直前,无所瞻顾。赐祭葬,谥敏达。后入祀贤良祠。

定原品休致大臣食俸例 乾隆三年(1738)十一月初一日,乾隆帝命大学士、尚书以原品休致者,著给全俸,永为定例;凡遇京察自陈,部议致仕人员,不必给食全俸;一二品武职大臣致仕者,给食全俸或半俸,具奏请旨酌情而定。

宁夏银川、平罗一带发生大地震 乾隆三年(1739)十一月二十四日,银川、平罗等地发生大地震。地震发生时,土皆坟起,地裂数尺或丈余,热气上冲,水涌地面,官署民房均倒塌,兵、民伤亡极多,文武官弁亦有损伤。新渠、宝丰两县县治沉没。共计死亡五万余人。十二月十四日,乾隆帝命侍郎班弟驰驿前往,发兰州库银二十万两,赈济灾民。

《八旗通志》书成 乾隆三年(1739)十二月十六日,《八旗通志》书成。该书为官修,从雍正五年开馆编纂。初集共二百五十卷,分为旗地、土田、营建、兵制、职官、学校、典礼、艺文八志;封爵、世职、八旗大臣、宗人府、内阁大臣、部院大臣、直省大臣、选举、八表;以及列传三大部分。收入雍正朝以前事迹。嘉庆元年,续修二集,收乾隆一朝事迹。

大学士嵇鲁筠去世 乾隆三年十二月(1739),大学士嵇鲁筠病逝。嵇鲁筠字友松,江南长洲(今江苏无锡)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由编修迁侍讲。雍正元年(1723)入直南书房、尚书房。擢左佥都御史,署河南巡抚,升兵部侍郎。这期间,他曾考察黄河、沁水发水原因,见黄河北岸沙滩,逼水南趋,至仓头口湾转而下,遇官庄峪山嘴,由西南直注东北,秦家厂等处顶冲受险,故常成水患,便奏请于沙滩开挖引河,导河水由西北流向东南,再建大坝及减水坝,用以排减秦家厂诸地险情。又奏请培筑两岸河堤计十二万三千余丈。由此,嵇曾筠被授为河南副总河。雍正五年(1721),他兼管山东河工,遂疏请将仪封北堤加帮,筑坝,切断支河;另在青龙冈上湾处,开挖引河,导水东流。不久升任兵部尚书,仍管河务。七年(1729),授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次年,署河南河道总督。十一年(1733)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仍总江南河务。乾隆帝即位后,仍命嵇鲁筠总理浙江海塘工程。乾隆元年(1736),兼浙江巡抚,后又改总督兼管盐务。这期间,他清理盐政,改商捕为官役,严缉私贩,定赏罚之例,又疏请于海宁筑尖山坝,建鱼鳞石塘七千四百余丈,砌淳河石墙,修乐清海堤。均得到乾隆帝旨准。乾隆三年(1738)九月,嵇曾筠入内阁办事。十一月患痰疾,回籍调治;十二月于家中病逝。乾隆帝闻讯谕示说:"大学士嵇鲁筠才品优长,老成练达。久任河道总督,茂著勤劳。"加赠少保,赐祭葬,谥文敏。乾隆四年(1739)乾隆帝命祀浙

江贤良祠。嵇曾筠在官，视国事如家事，知人善任，恭慎廉明，屡治河工，成绩卓著。采用引河杀险法，节省很多库帑。他编著有《防河奏议》、《师善堂诗集》，以及《浙江通志》等书。

许准噶尔以阿尔泰为游牧界 乾隆四年(1739)二月二十三日，乾隆帝敕谕准噶尔噶尔丹策零，准许以阿尔泰为准噶尔和喀尔喀蒙古游牧界。谕示中说：今尔遣哈柳来，疏言欲定界，请循布延图河，南以博尔济、昂吉尔图、乌克克岭、噶克察为界，北以孙多尔库奎、多尔多辉库奎、至哈尔奇喇、博木克喇、巴尔楚克为界。厄鲁特无逾阿尔泰岭，蒙古亦止在扎卜堪游牧。亦觉其言近理。但谓布延图、托和尔两卡伦在尔界内，意欲稍向内移。此为圣祖时所设卡伦，岂可移动。科布多并不复驻兵，不必猜疑。俟复奏到日，当明谕喀尔喀，令其游牧不过扎卜勘。

免直隶、江苏、安徽三省额赋 乾隆四年(1739)三月二十二日，以比年以来，畿辅地方屡遇歉收，而江南被灾尤甚，人民乏食，乾隆帝特颁谕旨，将今年地丁钱粮直隶总督所属蠲免九十万两，苏州巡抚所属蠲免一百万两，安徽巡抚所属蠲免六十万两，务使家喻户晓，均受实惠。倘有贪官污吏借端苛索，或私行征收者，该督抚随时查参。

禁民越省进香 乾隆四年(1739)五月十五日，就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百姓进香，不远千里，聚集省会，男女相杂情况，乾隆帝谕示：从未有谄媚鬼神，而可以避灾获福者。无如小民知识短浅，往往惑于鬼神之说，祈求祷祀，所费不赀。其中最甚者，莫如越省进香一事。长途跋涉二三千里，费时二三月之久，初春前往，春暮方归，以乡农有限之积蓄，坐耗于酬神结会之举，以春天最要之时日，消磨于风尘奔走之中。闻说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处风俗大率如此，而河南尤甚。自正月至二月，每日千百成群，先至省会城隍庙申疏焚香，名曰挂号。然后分途四出，成群结队，填塞街衢，树帜扬幡，鸣金击鼓，黄冠缁衣，前后导引，男女混杂，斗殴拐窃，暗滋事端。此等劣习，目前则耗费钱财，将来恐流于邪教。但相沿已久，若骤然惩治，未免扰累。著各省督抚，善为化导，徐徐转移。只要时存善心，勉行善事，必蒙神祇默佑，不必远求。即欲奉佛酬愿，亦止于本境祠庙，虔诚行之，毋得呼朋聚众，跋涉山川，以致误农时耗资财。此后，清政府明确禁止民人越省进香。

额驸策凌奏请分地戍守 乾隆四年(1739)七月初四日，定边左副将军和硕超勇亲王固伦额驸策凌奏请率兵驻鄂尔海西拉乌苏，分兵驻鄂尔坤河、齐齐尔里克、额尔德尼招、塔密尔和乌里雅苏台附近，以防范噶尔丹策零。俟阿尔台山得雪报到后，再撤回过冬。乾隆帝允其所奏。

庄亲王允禄等遭斥革 乾隆四年十月十六日(1739)，就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请将其俱革去王爵，永远圈禁事，乾隆帝谕示：允禄不负总理事务重任，无一毫实心为国效忠处，唯知取悦于人，遇事模棱，不肯担当。看其乃一庸碌之辈，并无才具，岂能有所作为。此则不足介意。但无知小人，如弘皙等辈，群相趋奉，恐将来日甚一日，渐有尾大不掉之势。彼时则不得不大加惩创。弘皙行止不端，浮躁乖张，对朕毫不敬谨，唯以谄媚庄亲王为事，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弘升乃无籍生事之徒，在皇考时获罪圈禁，后蒙赦宥，用为都统。但不知感恩悔过，但思结党钻营，可谓怙恶不悛。弘昌秉性愚蠢，不知率教，伊父怡贤亲王奏请圈禁在家，朕加封贝勒，冀其自新，乃私与庄亲王允禄、弘皙等结交往来，不守本分。弘晈乃毫无知识之人，行为鄙陋，其依附庄亲王等，不过饮食宴乐，以图嬉戏而已。于是，乾隆帝命庄亲王免革亲王，仍管内务府事，其亲王双俸及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俱革退；弘皙革去亲王，不必圈禁仍在郑家庄居住，不许出城；弘升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弘升革去贝子。

许准噶尔通市贸易 乾隆四年(1740)十二月初十日，噶尔丹策零遣使哈柳奉表至京，乾隆帝准以阿尔泰为厄鲁特游牧地，杭爱为喀尔喀游牧地，并准其派三百人赴西藏熬茶。二十日，又许准噶尔通市贸易。规定每四年来京贸易一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每四年至肃州贸易一次，人数不得过百，且时间不得与俄罗斯商人同时。

《国朝画征录》成书 乾隆四年(1739)，《国朝画征录》一书编成。该书为张庚著。记载清初至乾隆初期四百六十余位画家小传。叙述他们经历、特长、流派、师承以及画论等。

许民间自行采煤 乾隆五年(1740)二月初六日，因大学士赵国麟奏请，直省凡产煤处，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堤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采煤，以供炊爨，照例完税，地方官严加稽查，如有豪强霸占，地棍阻挠，悉置于法。乾隆帝谕准直隶、山东、山西、湖南、甘肃、广东等省俱听民采煤，视各地情形，酌定税额，自一二十两，至一二百两不等。

御史褚泰受贿拟绞 乾隆五年(1740)四月十九日，因都察院左都御史查克丹及监察御史宫焕文参奏扬州盐商曹翰思将乙卯纲盐引十六万道，，贿求

四川道御史褚泰，另给无引盐商认领运销，褚泰得银五百两。乾隆帝谕示：褚泰依律处绞监候，秋后处决。

开凿通川河道 乾隆五年(1740)七月二十九日，乾隆帝从云南总督庆复奏请，决定开凿通川河道。该河道自东川府(府治今云南会泽)，由小江口，入金沙江，溯流至新开滩，直通四川泸州，全长千数百里，工费约需数十万金。

永定河复归故道 乾隆五年(1740)九月中旬，永定河复归故道。先是九月初七日，直隶总督孙嘉淦亲至金门闸，会同总河顾琮，督率河员于金门闸上，开挖重堤二十丈，挑浚河槽二百七十余丈，使河水流入金门闸引河内。此引河分东西两股，先将东股闭塞，令河水专走西股。西股中浅窄处，相度开挖，自杨柳青至李各庄，共三千六百余丈，展宽挑深。十五日，工竣。十六日，开河放水。顷刻间，永定河水顺轨安流，复归故道。

重修《大清律例》成书 乾隆五年(1741)十一月十六日，乾隆帝为新成书的《大清律例》御制序文，并命颁行。《大清律例》四十七卷。其中《律目》一卷、《诸图》一卷、《服制》一卷、《名律例》一卷、《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五卷、《工律》二卷、《总类》七卷。律、例并行，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四百零九条。

楚粤苗瑶事平 乾隆五年(1741)十二月初六日，张广泗奏楚粤苗乱已平。先是湖南城步、绥宁苗民起事，又有粤西怀远、融县、义宁瑶民聚集千人，欲往城步。知县、县丞、巡检、把总等前往招抚，被瑶民捉走。以楚粤苗瑶联络呼应，互为犄角，攻楚急则入粤，攻粤急则入楚，清政府遂责成湖南巡抚冯光裕、提督杜凯调兵办理，令两广总督马尔泰、广西提督谭行义负责粤省。楚省调兵万余，粤省拨兵二千，会剿数月，尚未宁事。清政府再命贵州总督张广泗往湖南察看形势，并与冯光裕等面商军事。如事无头绪，颇费周章，则广泗即留楚一面协助办理，一面据实陈奏。不久张广泗上奏：楚粤苗瑶勾结滋事，目无法纪。楚省大兵云集，自应与粤省会商，克期并进，使苗众腹背受敌，不难剪平。乃各省自办，并不关会，军机虚实，悉为逆苗窥破。如令两省提督移驻军营，就近会商，不分疆域，秉公办理，庶可肃清。九月初八日，乾隆帝授张广泗为钦差大臣，总理其事。谕令军前文武官员，不分楚粤，自提督以下，均受节制，一切功罪听其赏罚。应奏闻则奏闻，应办理则办理，该督抚等不得掣肘。又命兵部即将钦差大臣印信驰驿送至。张广泗调兵遣将，攻寨搜箐，分路进剿，将所有已经查明及从前漏获"首逆"，悉行拿获，起事各寨均予攻毁，投顺之众，散归本寨，皆予安插。于是，楚粤苗疆平定。

图理琛病故 乾隆五年(1740)，图理琛因病去世。图理琛，阿颜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以监生考授内阁中书，迁侍讲。康熙五十一年(1712)奉命出使土尔扈特。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还京，往返三载有余，行程数万里。将沿途所见道里、山川、风俗、民情等撰为《异域录》一书，冠以舆图，进呈康熙帝。授兵部员外郎。雍正帝即位后，任广东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擢陕西巡抚。雍正五年(1727)，以吏部侍郎为副使，随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与俄议界，订《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乾隆帝即位后，改任内阁学士。乾隆二年(1737)，以疾去职。三年后病故。

令鄂善自尽 乾隆六年(1741)四月，兵部尚书鄂善因受贿银千两，被赐令自尽。先是工部凿匠俞君弼富而无子，病故后，其孙俞长庚年幼。其义女婿许秉义谋夺产，出名主丧，嘱同族内阁学士许王猷邀九卿往吊，且告发君弼埋银事，步军统领鄂善奏闻。诏鞫秉义，论罪如律，并革王猷职。乾隆六年(1741)三月，监察御史仲永檀，密奏兵部尚书鄂善受俞姓贿银万两，因未得确据，不敢明参，以"风闻言事"，据实密奏，以备访查。乾隆帝初疑永檀诬陷大臣，欲治其罪。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秉公查审。不久命革鄂善职，交刑部严讯。鄂善家人及过付人等俱各承认。乾隆帝召和亲王等七人同鄂善进见，乾隆帝当面讯问，鄂善始犹抵饰，后熟思良久，乃认得银千两是实。二十五日，乾隆帝垂泪谕鄂善：尔罪按律当绞，念尔曾为大臣，不忍明正典刑。然何颜复立于人世？宜有以自处。遂命王大臣传谕，令其自尽。而鄂善忽称并未受贿。乾隆帝怒，令交部严审。四月，王大臣等鞫实，鄂善拟绞立决。仍赐自尽。擢永檀为佥都御史。

度支经费入不敷出 乾隆六年(1741)五月二十日，户部侍郎梁诗正奏："度支经费莫大于兵饷，伏见每岁春秋二季拨解部银，多则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须一千一二百万，入不敷出。盖因八旗兵饷浩繁，所出既多；各省绿旗兵饷日增，所入愈少。请及时变通。八旗闲散兵丁宜分置边屯，以广生计；绿旗兵丁宜量停募补，以减冗额。"户部尚书讷亲等也奏："直省一切正杂钱粮，康熙、雍正年间，岁岁相积，仍有余存。近年以来，统计直省收支各数，所入仅敷所出。倘有蠲缺停缓，即不足供一岁用度。其支放纷烦，尚须酌为裁减，各省官员毋任其增设，工程宜权其缓急。"于是，大学士等议定：嗣后需用人员，止准通省改调，不得奏增；直省新建工

程，俱经该衙门议准、工部核复后兴修；各省城垣令督抚确查，分别缓急豫估后报部，遇水旱不济时，以工代赈；民用堤埝，有应修处，于农闲时劝修，毋动公帑。对此，乾隆帝颁布谕旨：八旗人丁分置边屯一事，著大学士查郎阿等前往奉天一带相度地势，再行定议。其余依议。

除各省秋审、盘查陋习 乾隆六年(1741)六月二十九日，鉴于各省秋审，该督抚会同司道等官，于一日之间草率定议，并未悉心讲论，期于至当。且臬司承办秋审，大张筵席，鼓吹喧闹，有征歌浮白之欢，无恻怛哀矜之意。跟役人等皆获尝劳，以为娱乐。还有督抚盘查司道各库，司道必治席演戏，务极辉煌，并邀将军、副都统及关差学政等文武大员，宴饮竟日，率以为常。乾隆帝谕示：以上二条陋习，力行革除，如不悛改，必加处分。

喀尔钦贿卖生员被处死 乾隆六年(1741)七月，山西学政喀尔钦因贿卖生员，被即行正法。先是三月初八日，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疏参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籍，廉耻荡然，请旨革职。乾隆帝谕著革职，其败检淫泆等情，命侍郎杨嗣璟前往山西，会同该抚严审定拟具奏。五月十七日，以喀尔钦罪已被审实，将其家产查抄入官，本人拿解来京。七月初二日，刑部议奏，将革职学政喀尔钦拟斩立决。乾隆帝谕令解部，即行正法。

乾隆帝初举木兰秋狝 乾隆六年(1741)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开始了初次木兰秋狝之行。此前一个月内，他多次降旨，布置安排秋狝事宜。六月初四日，谕令行围期间，著履亲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在京总理诸事。七月十八日，又谕大学士等："朕因讲武，行围口外，"办理一切政务，与在宫中无异。在京诸臣，理应更加勤勉，精勤奉职，不可稍有懈怠，贻误公事。离京第二天，又下旨减免所过地方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三。二十七日，驻跸怀柔县，三十日，在古北口阅兵，见士兵武技良好，谕赞古北口为畿辅藩篱，该处弁兵，"素称劲旅"，今亲临阅看，果见队伍整齐，技艺娴熟，询由统领大员董率有方，将弁兵丁勤于练习所致，分别予赏赐，以示鼓励。此后一路行围，蒙古王公或亲自随围，或恭迎圣驾，或遣使请安，都十分热情活跃。乾隆帝非常高兴，八月二十日，降谕嘉奖说："尔蒙古等自太祖、太宗时归仁向化，每逢军旅田猎等事，均与满兵一体效力。是以我皇祖、皇考眷爱尔等，无异满洲，教养兼施，百有余年。朕此次巡幸口外，入哨行围，操满洲、蒙古兵丁，所有未经派围前来请安之王、台吉等，俱请随围，意甚诚切。其随围蒙古兵丁，行列整齐，号令严明，均知奋勉。秋狝之典，多年未举，今初行围，尚能与皇祖巡幸时无异，皆尔扎萨克等平素管教有方所致。"随即照康熙六十一年(1722)例，分别厚加赏赐。九月初三日，至承德避暑山庄，住五日，初八日回銮，二十日，回到北京，前后共计二十天。以后除个别年份外，乾隆帝每年都照例举行秋狝。

户部宝泉局工匠罢工 乾隆六年(1741)七月二十七日，户部宝泉局四厂工匠举行罢工，以抗议清政府减发工资。原来，宝泉局鼓铸钱文四厂匠役工价，向例按季发给。今年七月给发工资时，照户部核减数，每卯给发工价银二十二两六钱一分，较从前每卯少银四两有奇。各匠因工价不敷应用，遂停炉不行鼓铸。经宝泉局监督及各厂大使安置匠役，并严饬炉头照常办理，西、北、南三厂工匠按数支领工价后，才开炉铸钱。但是，东厂内翻沙工童光荣，仍指使诸匠不领工价。恰遇有磨钱匠张文仓不听指使，彼此发生口角，童光荣将张文仓戳伤，不治殒命。监督将童光荣拿交大兴县审讯，其余工匠照常支领工价后，方才开炉鼓铸。八月初七日，北厂匠役突然又停炉，声言要算本年秋季新账，并要找算两年旧账，每炉每卯俱要工钱二十八串。虽经宝泉局监督指示开导，众匠役仍然喧闹，定要算账之后开炉。十八日，西厂匠役也忽然上房呐喊，抛掷砖瓦，要求照北厂那样重与炉头找算旧账。随即南厂、东厂亦皆停炉观望，要算旧账，找给工价。清政府户部官员以若不给银，势必喧闹，难于安置，决定取息事宁人之策，暂将存局冬季工料银两，借给炉头，令其按数分给，以使各匠帖然心服，照旧开炉鼓铸。以后再于炉头名下，分年按季扣还，以清帑项。并在开炉后，密访为首之人，查交刑部，从重治罪。乾隆帝闻讯谕示：此等厂风，甚属可恶！京师之地尚且如此，何以宣示四方？遂命兵部尚书办理步军统领事务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要求务必重处，以儆其余。

徐元梦去世 乾隆六年(1741)冬，大学士徐元梦因病去世。徐元梦，字善长，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由庶吉士迁至侍讲，以讲学负声望，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帝召廷臣陈廷敬、汤斌等及徐元梦、德格勒，共试以理学真伪论，命互校尤劣，汤斌称徐元梦文好。康熙帝遂命徐元梦与汤斌同课诸皇子读书。康熙三十二年(1693)，命徐元梦直上书房。康熙五十三年(1714)，授浙江巡抚。康熙五十六年(1717)，升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康熙帝以他通满、汉、蒙文，命甄别满学政及考

官,不称职者尽罢去。次年,徐元梦迁工部尚书仍兼掌院学士。雍正帝即位,复命徐元梦直上书房,教诸皇子读书。雍正元年(1723),令与大学士张鹏翮等甄别翰詹各官,不称职者,勒令解退回籍。时大学士富宁安出外视师,命元梦署大学士。不久又令兼署左都御史,充《明史》总裁,调户部尚书。雍正四年(1727),以翻译本章错误夺官。雍正十三年(1735),充翻译乡试考官。乾隆帝即位,命直南书房,授为内阁学士。升刑部侍郎,以衰老疏辞,调任礼部。充《世宗实录》副总裁,与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再命直上书房,课皇子读书。乾隆元年(1736),乞休,解侍郎任,加尚书衔食俸,仍在内廷行走,领馆事。乾隆六年(1741)冬,徐元梦病重,不久去世,年八十七岁。乾隆帝称赞他践履笃实,言行相符,历事三朝,出入禁廷,小心谨慎,数十年如一日;命发帑治丧,赠太傅,赐祭葬,谥文定。

定拔贡十二年举行一次 乾隆七年(1742)二月十四日,清廷定拔贡十二年举行一次。对此,乾隆帝谕示:国家于科目取士之外,又有拔贡一途,以收未尽之才。人文日盛,又履开恩科,加添中额。所取进士,济济多人;举人则日积日众,竟有多年不得一官者。若又添拔贡,以分其缺,数年一次举行,则人愈多而缺愈少。举人铨选,更将遥遥无期。现在拔贡六年一举,为期太近,理应酌量变通。嗣后著定为十二年选拔一次,永著为例。

定遣犯妻、子分别查办例 乾隆七年(1742)三月十四日,清廷定遣犯妻、子分别查办例:一、发遣黑龙江、宁古塔当差之犯,例应佥妻,及奉旨佥妻、子者,同本犯羁管,妻、子、子孙系情愿随往者,于佥解文内注明,以免滥行羁管。本犯身故,妻、子愿抱骨回籍,即给照报部存案;从前各案未经分晰注明者,详查改正,奏明宽免。二、配所生长子、孙,本犯在日,有欲近地耕种贸易者,准呈明该管衙门,量给假限,逾限不回,查明究治;配所生女,或许嫁他处,或寄养与人,不得查禁。三、赏旗为奴人犯,子、孙前往省视,赴该管衙门报名,回日呈明,给票放行。如旗主刁留计陷,照存养良家男女为奴婢杖一百律治罪。

定永免直省关口米豆额税例 乾隆七年(1742)四月初二日,清廷决定永免直省关口米豆征税。为此,乾隆帝谕示:国家设关榷税,定其则例,详其考核,原为崇本抑末,载诸会典,著为常经,由来已久。其米豆各项,向因商人贩贱鬻贵,是以照例征输。因思小民朝飧夕食,唯谷是赖,非他物可比。关口征纳米税,虽每石所收无几,但商人借口额课,势必高抬价值,是取之于商人者,仍出自于民间。朕御极以来,直省关税屡次加恩减免,又恐榷吏额外浮收,刊立科条,多方训饬。每遇地方歉收,天津、临清、浒墅、芜湖等关口,商贩米船,一概给票放行,免其上税,皆为民食之计。但系特恩,间一举行,未能普免。今特降谕旨,将直省各关口,所有经过米豆应输额税,悉行宽免,永著为例。俾米谷流通,民食充裕。

准广西省开炉铸钱 乾隆七年(1742)四月初十日,因署两广总督庆复奏称:粤西向未开炉鼓铸,唯恃滇省解运。今西省厂铜,照配试铸,与滇钱无异。如开厂添配,搭放兵饷各项,实于民用有济。请将粤西矿铜,留充鼓铸,俟流通后,再停解滇铜,以省运费。乾隆帝遂批准广西省开炉铸钱。

移满洲往边外屯垦 乾隆七年(1742)五月初七日因宁古塔一带,平畴沃壤,五谷皆宜,乾隆帝命移满洲民往边外屯垦。经大学士查郎阿等疏奏并乾隆帝旨准清廷决定:一、选派屯垦人丁,必须是勤俭、安分之人,八旗满洲都统等应于各佐领下,不论兵丁和闲散,择有妻室之单户,令其携眷前往;二、定边界,置屯庄,每户给房屋三间,地三顷,按旗分为八区,房随地造,并于适中处,设总统副都统衙署驻扎,以资弹压。三、给与开垦所需牛具、籽种;四、每旗设立屯庄二处,每庄内选授乡长一人,给七品顶带,令管理一旗二庄,给骁骑校虚衔,并多给地亩,以示优异。

修宁夏水利 乾隆七年(1742)六月初八日,乾隆帝据甘肃巡抚黄廷桂疏请:"宁夏唐、汉、清三渠及各大小支渠,前因该处地震摇塌,各渠裂缝处甚多,急需修理,并应筑坝岸桥闸、老埂长堤等工,请动项兴修",决定兴修宁夏水利。

禁止兵民会盟结党 福建漳铺县兵民结有小刀、子龙二会,知县朱以诚拿获数人审究,会首蔡怀、李珠等恐一并被擒,遂指使赖石于乾隆七年(1742)六月初旬,持刀将知县朱以诚刺割咽喉毙命。九月二十八日,巡抚刘于义上奏中又强调说:各营兵弁,渐染恶习甚深。即如子龙、小刀会内,即有兵丁结连。其余会盟结党,并假造匿名揭帖,或有兵丁串通,或系兵丁诬捏,凡属百姓不法之事,俱有兵丁在内。于是,十一月初五日,乾隆帝谕示:禁止兵丁与百姓会盟结党。

黄淮交涨,散赈救灾 乾隆七年(1742)入夏以来,南方多雨,山水暴发,黄淮交涨,湖水漫溢,河道决口,致使江苏、安徽、湖南、湖北、贵州、江西、浙江、山东等省均有受灾地区。其中江苏、安徽两省水灾尤为严重。安徽凤阳、颍州、泗州所属十九州县,因淮河水发,田园庐舍被淹,夏麦、秋禾无收。江苏徐

州、海州、淮安、扬州四府所属二十九州县，因黄河异涨，洪泽湖漫溢、堤坝冲决，毁民居数万间，人畜死亡难计。淮北盐场、荡地、盐池尽被水淹，灶户停扫。扬州一带中产之家至极贫之户，俱都流离四散惨苦万状。两省灾民有数百万之多。乾隆帝闻报，十分焦急，指示两省督抚，不拘常例，竭力拯救；水退之后，要倍加抚绥，毋致失所。降旨免除被水州县本年额赋。又派熟谙河务的直隶总督高斌和刑部侍郎周学健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南办理赈济与水利诸事。乾隆帝还多次下谕，督令大学士、江南督抚、漕督、河督等调拨银米，赈济灾民；排洪筑堤，重修水利。八月发库银二百五十万两，散救灾民。九月初一日，又命将江南、徐、淮等地所存仓谷共五十四万石，平粜赈灾。又借浙江仓粮十万石，截留山东漕米十万石运至江南备用。九月十六日，乾隆帝又谕示大学士等：江南被水，需用浩繁。已陆续发下江藩、粮、盐三库存银九十四万两、米谷一百一十余万石，上江库银八十余万两、米谷一百二十万石，今年盐课存银一百三十万两。总计两省现在所存银、米，已不下五百余万。但赈恤之务，至明年麦收前，必须接济，应早为预备。著于邻省再拨银一百万两，于岁内解往江南，分贮江苏、安徽藩库，以备按期散给。同日，安徽巡抚张楷奏报：凤阳、泗州两府所属，自七月起至今已赈济完毕。颍州府属自八月起，将次完竣。查应赈贫民，大小口共计二百二十余万。赈济月分，遵旨办理，将最重之凤阳等十三州县，于部例之外，加展三月；次重之定远等六州县，加展两月。按受灾等次，分别赈济七到四个月口粮，一律赈至明年三月止。按例不应赈济之次贫者，也赏赈一月口粮，于所底发给。

杭世骏忤旨革职　杭世骏，字大宗，号堇莆，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1736)，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世骏性亢爽，能面责人过。乾隆八年(1743)二月，考选御史，试以时务策。世骏条上四事，指出："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贤能虽多，较之汉人仅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边隅之士，间何出者无几。今则果于用边省之人，不计其才，不计其操履，不计其资俸，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有意见畛域？"乾隆帝阅后大怒。初九日，降旨诘责。不久，杭世骏被革职回籍。

禁止种烟　江西巡抚陈宏谋以种烟耗农工而妨地利，奏请从甲子年开始，令地方官通行禁止。乾隆八年(1743)六月初二日，大学士等会议认为：民间种烟，废可耕之地，营无益以妨农工，积习相沿，日以滋甚。如直隶、山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种植尤多，种谷之地日益减少。遂请除城内隙地与城外近城畸零菜圃地外，野外阡陌相连大片田土处，一概不许种烟。乾隆帝旨准照所议实行。

乾隆帝初次往盛京谒陵　乾隆八年(1743)七月初八日，乾隆帝奉皇太后从畅春园启銮，前往盛京恭谒祖陵。行前，下谕免除经过地方本年应征钱粮。十五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十九日，继续东行。二十二日，乾隆帝鉴于众蒙古王公、台吉等均请扈从效力，但念其游牧甚远，若全行随驾，不但劳顿，而且恐误应办之事。决定令其随往木兰四围毕，各回牧地。八月初二日，昭乌达盟贡进牛、羊、驼、马，并在碧柳台行宫与卓索图盟盟长会同，"恭进筵宴"。次日，乾隆帝谕示：蒙古人等，修理桥道，备办用项，整齐、妥协，实为敬谨，赏赉其银、米、布匹等物。九月初六日，行围于舍里，乾隆帝谕赞盛京兵丁身材壮健，弓马娴熟，未失满洲旧制；文武官员各相奋勉，训练整齐，办事诚敬，尤为可嘉。决定将生息银二十万两，交奉天将军借与官兵，使其日用充裕。后又赐奉天将军额尔图银五千两，副都统哲库纳银二千五百两，供办差用，又免仓粮一万余石。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乾隆帝恭谒永陵、福陵、昭陵，驻跸盛京。朝鲜国王李昑遣使贡方物。二十五日，以谒陵礼成，率群臣至皇太后宫行庆贺礼，御崇政殿，赐群臣及朝鲜使臣宴。颁诏天下，优恤盛京各级人员。次日，御大政殿赐酺。不久，亲奠开国勋臣岳托、杨古利、额亦都、费英东墓。十月初一日，御大政殿，赐扈从王大臣等宴于凤凰楼前。谕王公宗室等革除陋习，恪守旧章。免盛京、兴京等十五处旗地本年额赋及乾隆七年逋赋。乾隆帝还御制盛京赋，述陈此次恭谒祖陵宗旨、感受与经过。十月初二日，奉皇太后回跸。二十五日，返回京师。二十八日，以谒陵礼成，率群臣至皇太后宫，行庆贺礼毕，御太和殿，王、大臣、各官等进表朝贺。

定大臣乞休举贤自代例　乾隆八年(1743)十月二十日，乾隆帝谕示："昔萧何相汉，终举曹参；羊祜佐晋，亦进杜预。荐贤自代，青史称焉。是以宋代有诏观察荐忠勇自代之条，金朝有敕宰相贤良自代之谕。"遂决定：从明年开始，凡大臣自陈乞罢，令各举德行才能堪以自代之人，随疏奏闻，但不得举同列及位在已上者。

查禁啯噜子　乾隆八年(1743)十月，四川巡抚纪山奏称：现在多张贴告示，查拿啯噜子，并许其自首减罪，以散党羽。原来；四川地广人稀，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福建等省流民都来川地觅食，开始力田就佃，无异于当地土居，后来人多，累百盈千，难于

就业，便找与外省或州县交界处，私自垦种。因遭到禁止，生活难于维持，他们便组织起来，学习拳棒，交结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横行乡镇，强乞强买，号曰啯噜子。其中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师。凡为啯噜者，又各联络声势，相互应援，出没各有记认，党羽日多。捕役乡保，如禀报查拿，必致遭其惨毒。纪山在告示中宣布：如将著名啯噜子渠魁拿获到案，即照光棍例治罪，或枷杖立毙，以其罪名揭示乡镇集场，其协从者照律饬审；如系外来流棍，递回原籍，永远不许出境；如系本省奸民，责令乡保管束，朔望点名稽查。乡保地保齐心协拿者，加以重赏；坐视放纵者，示以重惩；地方官设法擒拿者，特疏保荐；优柔不振者，据实纠参。纪山还提出：查湖广等省外来人，皆因误听从前川省地广人稀之说，群思赴川报垦，不知川省已无荒土可辟。要求以后除有亲族可依，来川帮工为生者，令各省地方官给与印照，使彼此均有稽查。其无本籍印照者，各该管关隘，沿途阻回，毋使积聚多人滋事。乾隆帝批准纪山所请。但是，这些措施，并没能阻止“啯噜子”的活动，他们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反抗斗争也愈来愈激烈。

永定河上游开渠筑坝 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清廷决定在永定河上游开渠筑坝。此前，直隶总督高斌上奏说：永定河上游为桑干河，发源山西境内，绵长八百余里，多开渠道，可以灌溉。前经大同、西宁等县居民捐地开浚未成，尚留渠口旧迹。乾隆六年(1741)，该处土民又呈请借帑兴工。经署督史贻直遣员查勘，事属可行，移交到臣。今日念兴修水利，不特有裨民田，亦可减泄永定河水势。请于桑干河南北两岸，各开渠一道。北岸自山西大同西堰头村黑石嘴起，至直隶西宁辛其村止，计长四十六里；南岸自大同册田村起，至西宁揣骨疃止，计长五十八里。渠尾俱归桑干正河。北岸地势衍顺，应先施工，俟有成效，再行估挑南岸。又山西应州境内浑源河，发源浑源州，汇归桑干河，亦可开渠灌田，应俟两岸渠成，再行商办。至永定河涨发时，湍流奔注，最称险急。若于宣化境内黑龙湾、怀来境内和合堡、宛平境内沿河口三处，建筑玲珑石坝，以束其势，则下游水患可减。亦应先在和合堡筑坝，试行有效，再与黑龙湾二处兴工。所需工料各银，请即动功速办，待营田成熟后，按亩均摊还款。大学士鄂尔泰等认为，开渠既有裨民生，应如高斌所请。唯永定水势汹涌，若于下流层层拦筑，水大之年，上游不无阻遏。还应详慎办理。不久，高斌又复奏：永定河上游，桑干河自西宁石匣村，入山十八里，至黑龙湾，又一百八十里，至和合堡，又四十里，至沿河口，又一百三十里，抵石景山。自和合堡以下一百七十里，皆两山夹束，桑干并洋河等水相汇于此，势如建瓴。今拟于和合堡先建玲珑石坝一处，以勒其直注之势，则下游之患可减。至坝上山势陡峻，坝身止高五尺，遇汛涨时，水即漫坝而过，玲珑坝止于迅流中稍加节制，实不至有阻遏之虞，水路虽经截顿，但在山间喷薄，冲刷泥沙，亦不至有壅淤之患。乾隆帝同意高斌所奏，永定河上游遂开渠筑坝。

纂修《医宗金鉴》告成 乾隆八年(1743)，《医宗金鉴》一书编成。《医宗金鉴》共九十卷，吴谦等编撰。内容分订正仲景全书、删补名医方论、四诊心法要诀、运气要诀、伤寒心法要诀、杂病心法要诀，以及外、妇、儿、针灸、正骨各科心法要诀等。论述各科疾病的诊断、辨证、治法、方剂，简明扼要、切合实用，是中医学方面的一部重要书籍。

拨银兴修直隶水利 乾隆九年(1744)五月，御史柴潮生奏请拨银兴修直隶水利，认为这样作既可接济灾民，又可消除旱涝灾害，变贫穷之区为富饶之地，收一举两得，转败为功效果。乾隆帝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曾在直隶任职，熟悉全省情况，命他办理此事。先派他前往保定与直隶总督高斌酌定规划，将来再共同督率办理。(1745)十二月初三日，刘于义奏报说，经实地勘察，直隶各地旧有淀、泊、河、渠，与拟开泉、渠、河、道，并堤埝、涵洞、桥闸等项，均与司道守令暨地方老农，熟筹确访，察看水势强弱，地形顺逆，民心好恶，权衡利害，分别轻重缓急，制定措施。刘于义还把应行办理的各项工程，酌定规条五项：一、宛平、良乡、涿州，各河沟溪流，于牤牛河相汇后，流入拒马河，常因河身浅狭，导流不畅，漫溢成灾。应将良乡、宛平、房山、涿州境内各河沟，按照旧例，动用民力加以疏通，使之流归广阳、茨尾二河。再将通济桥拆造架高，以利船只航行。二、将新城、雄县境内白沟河各支流拓宽挖深，用取出土筑成堤埝，以防漫溢。三、赵北口水淀，为诸水汇归之地，其西面支河由直沽入海，为北运河蓄泄要区。应在张青口北，另开支河一道，以便分泄。还应将玉带河支流河身开宽，河堤帮筑高厚，木桥改为活板，以利舟船通行。四、东淀河为陵糈漕船往来必经之地，河身迂回曲折。查有旧胜芳河一道，直向东北流去，航程近捷，应重新挖通。五、子牙河上游为滹沱河，发源于山西泰戏山，流经直隶衡水县，北入大成县王家口。每年清、浑并涨，迤南数十百村庄、悉遭淹浸，应截断子牙河，在下游另开河道，迫其改向东流，使清、浑永不相混，消除灾害。刘于义最后指出，以上应办各项工程，约估需银四十七万两，现在豫为料理，俟春暖冰消以后，次第兴工。乾隆帝阅览后，谕示依议速行。

顺天乡试怀挟作弊 乾隆九年(1744)顺天乡试,乾隆帝特遣亲近大臣严密稽查。结果,头场搜出挟带者二十一人,交白卷者六十八人,不完卷者三百二十九人,文不对题者二百七十六人。二场搜出夹带者二十一人,点名时散去者竟至二千八百余人。因当时规定每搜得一人,给银三两,致使有些搜役自己私入纸片以诬陷。取利。工科给事中吴炜上奏指出,科场搜检,不能培土气而鼓善类。对此,乾隆帝竟认为:科场怀挟之弊甚多,势不得不严行搜检。

诗人赵执信去世 乾隆九年(1744),诗人赵执信去世,享年八十余岁。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晚号贻山老人,山东益都人。赵执信从祖名进美,曾任福建按察使,以诗闻名。执信承其家学,自幼即工吟咏。康熙十八年(1679),成进士,授编修。时开博学鸿词科,四方文士群集京师,执信与过从谦谈,一座皆服。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对他尤为看重,订为忘年交。康熙二十八年(1689),赵执信因在国丧期间观演《长生殿》,被言官参劾,革职回籍,此后遂专注于诗歌写作与研究。他不赞成王士祯论诗的神韵说。认为诗以言志,诗中须有人在,诗外尚有事在。赵执信的诗主峻刻,着重反映现实生活,笔力遒劲。著有《贻山堂集》、《声调谱》等。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撰成 乾隆九年(1744),《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成书。该书为,徐元梦、鄂尔泰、福敏等奉命修辑。共八十卷,记载八旗满洲各氏族的源流、世系、最初驻地及归附年月等。

命江南督抚轮阅海防 乾隆十年(1745)正月十五日,乾隆帝命江南督抚更替巡阅海防。他在上谕中说:江南地居腹内,无深山穷谷藏奸聚匪之薮,所最应加意者,莫如海防。今国家承平日久,海疆宁谧,中外习为固然。但防患于未然,此为古训。今江苏省之上海、崇明、刘河、福山、狼山各紧要海口,营讯非不周罗,斥堠非不严密,战舸非不连樯接艘,然俱付之三五偏裨之将,督率兵卒往来戍守。凡形势之扼塞,防守之机宜,口岸之平险,何处为了望之所,何处为守御之区,向例督抚俱未亲至其地,考订讲求。按图聚米,终不如亲身目击。况士卒无知,大都恶劳好逸。若督抚时常临视,自必震动,不至废弛怠惰;且江南海口,数处毗连,附近巡行,往返不过匝月,亦不致劳人废事。该督抚等,应仿效别省总督巡边之例,于海口紧要处,递年轮流巡视一次,不必纷更,以为建白,亦不可草率,视同俱文。则防范之事宜,既得探讨于平日;备御之营制,亦得讲究其万全。更可不时简阅操演,整饬戎行,似属有益。江南各督抚随即妥商定议,本年总督先往,次年则为抚巡,周而复始。还强调往巡时,务将形势扼塞,防守机宜。口岸平险,及何处为了望所,何处为守御区,逐一察看,详细探讨,并顺路简阅沿海营伍。事竣具折奏闻。乾隆帝认为可行,再次谕示:须妥协据实办理,不可虚应故事。

准开赤水河 乾隆十年(1745)四月十八日,从贵州总督张广泗疏请,清廷决定开凿贵州毕节县属赤水河。张广泗奏疏中称:黔省威宁、大定等府州县,崇山峻岭不通舟楫,所产铜铅,陆运维艰,合滇省运京之铜,每年千余万斤,皆取道于威宁、毕节,驮马短少,漕运不前。查有大定府毕节县属赤水河,下接遵义府仁怀县属猿猱地方。若将此河开凿通舟,即可顺流直达四川重庆水次。委员勘估,水程五百余里,计应开修大小六十八滩,约需银四万七千余两,以三年之节省,即可抵补开河工费。再黔省食盐,例销川引,著开修赤水河,盐船亦可通行,盐价立见平减;大定、威行等处,即偶遇丰歉不齐,四川可以运济。实为黔省无穷之利。

大学士鄂尔泰去世 乾隆十年(1745)四月,鄂尔泰病逝。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鄂尔泰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以举人承袭佐领,授三等侍卫。康熙五十五年(1716),迁内务府员外郎,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帝)知其有才,欲结交笼络,遭到拒绝。雍正帝即位后,不怪罪鄂尔泰,反而称赞他为郎官拒皇子,执法甚坚。雍正元年(1723),鄂尔泰充任云南乡试副考官,又特升为江苏布政使。鄂尔泰在任内,礼敬文人士子,为他们收录诗文,编《南邦黎献集》;又用自己应得的公银买谷三万余石,分别贮藏于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以备赈贷。雍正帝称他为封疆之才,誉为"天下第一布政"。雍正三年(1725)八月,鄂尔泰进京陛见,升广西巡抚,未到任,改署云贵总督四年(1726)春,他疏请平定苗乱,改土归流,获得成功。十月,实授云贵总督。随即又讨平云南、四川、湖北、广西等省交界处的苗民叛乱。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推行改土归流。雍正十年(1732)正月,调回京师,授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因经理苗疆功绩,授一等伯,世袭罔替。征准噶尔开始后,鄂尔泰经略陕甘军务。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雍正帝旨令削去伯爵,给假养病。八月,雍正帝病重,鄂尔泰仍以大学士受顾命,同辅政。乾隆帝即位后,鄂尔泰总理事务。乾隆二年(1737),授军机大臣、仍兼兵部事,赐三等伯,号襄勤。屡主会试,充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乾隆四年(1739),勘直隶水利,筹画疏浚永定河、修筑"千里长堤"等事。乾隆十年(1745),加太傅,四月病逝。乾隆帝称赞鄂尔泰公忠体国,直谅

持躬。久任边疆，茂著惠绩，简任机务，思日赞襄。还说他才裕经纶，学有根底，不愧国家柱石。乾隆帝还亲临祭奠，辍朝二日，予祭葬，谥文端，命配享太庙。鄂尔泰著有《鄂尔泰奏折》《平蛮奏疏》，主修《八旗通志初集》、《贵州通志》等书。

普免各省钱粮　乾隆十年(1745)六月初六日乾隆帝以御极以来，所有解部钱粮，除去八旗兵饷、官俸、工程费用外，尚有余积。故直省偶有水旱灾，加恩赈济，多在常格之外。因思海宇父安，首在足民；况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则散于下。因此特降谕旨，拟将乾隆十一年(1746)，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蠲免。经大学士和户部拟定，并报乾隆帝旨准，照康熙五十一年(1712)例，将各省分作三年，全免一周。查地丁钱粮银额，共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余两。将直隶、奉天、江苏、西安、甘肃、福建、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银一千四十二万九百余两；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广西等省银八百六十二万七千三百余两；山东、湖北、江西、山西等省银九百一十九万二千二百余两，分别于丙寅、丁卯、戊辰三年内全行蠲免。

禁用非刑　乾隆十年(1745)九月初九日，太常寺少卿邹一桂奏称，监狱重犯，虽防范不可不严，但律载狱具全图，自有定式。近来禁卒人等，创立非刑，凡遇囚徒，不分多寡，概令排卧一头，于镣铐中横穿长木，锁逼两头，压住手足。狱囚因此毙命者不少。请严行查禁。刑部请旨后决定：今后如有仍用穿木并各项非法刑具者，即照例治罪。

《石渠宝笈》成书　乾隆十年(1745)，张照、梁诗正等奉敕编撰的《石渠宝笈》成书。该书为中国书画著录，总计四十四卷。著录当时宫廷所藏书画。依贮藏所在，各分书册、画册、书画合册，书卷、画卷、书画合卷，书轴、画轴、书画合轴九类，每类又分上等、次等，详细记载纸绢、尺寸、款识、印记和题咏、跋尾等。乾隆五十六年(1791)，又编成《石渠宝笈重编》。

清军征剿上、下瞻对　上、下瞻对，位于四川雅砻江上游群山之中，纵横数百里，为川藏交通要道。该地首领虽已于雍正时归附授职，但属下时常据险抢劫商旅，掠及台站兵丁财物，而官方捕治，上瞻对土司四郎、下瞻对土司班滚又隐匿罪人，不肯交出。乾隆十年(1745)五月，命署四川提督李质粹等调集汉土官兵一万五千名，前往征剿。七月，李质粹进抵东俄洛，会同有关镇协将领，议定兵分三路，同时并举。夔州协副将马良柱出里塘为南路，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出甘孜为北路，建昌镇总兵袁士弼出沙普隆为中路，李质粹驻东俄洛，调度策应。由于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清军压境，上瞻对不少土目、土舍不战而降，土司四郎亦被招抚。北路清军遂越四郎住地撤墩，进驻阿赛，这里距下瞻对土司班滚住地仅数十里。中南两路亦攻下要卡六处，破寨五十余座。但是，清军深入之后，道路险崎，竹林茂密，又遇到顽强抵抗，致使军陷入停止不前境地。于是，乾隆帝命川陕总督庆复到军前调度指挥，并增派满洲兵数百名，前往助攻，又授庆复为文华殿大学士，以示鼓励。至乾隆十一年(1746)二月三十日，战争仍无起色。乾隆帝十分恼怒，颁旨严厉斥责。庆复请求增兵加饷。得到乾隆帝批准，清军官兵遂增至二万四千名，内大臣班第等，也协助办理军务粮饷。三月，庆复进驻灵雀，用明正土司汪结、降人骚达邦、俄木丁等为向导，深入进剿。四月间，连克脉陇冈、曲工山、梁上、细谷等寨，又攻取讷洪多沟口要隘，由茹色渡江，破班滚所驻如郎大寨，班滚势穷，携眷属逃往丫鲁泥日寨。五月，庆复会同内大臣班第、努三，提督李质粹等合力进攻丫鲁泥日寨，施放地雷，焚毁碉楼。班滚在制造已死假相后乘乱逃往金川。六月，瞻对事平。庆复以班滚烧死上报。战争结束后，根据庆复建议，清政府将瞻对一些要隘村寨划给临近各土司管理，剩余地方，委任肯朱、俄木丁等管理，规定应纳额赋；定期派兵巡查；拆毁现有军事碉卡；禁止抢劫商旅。此后，瞻对地区在半个多世纪中，保持了和平、安定的局面。

停止编审妇女　先是江西每逢编审之年，丁男之外，另有妇女；因为盐钞计口交纳，故要将妇女存亡增减数，列入编审内。后食盐课钞摊入地粮，妇女即无可征之项。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二十日，遂命停止编审妇女，广东亦仿照此例查明办理。

卡瓦于茂隆山开矿　乾隆十一年(1746)六月三十日，清政府允准卡瓦在茂隆山开矿。卡瓦是滇省永顺东南徼外人，用内地民人吴尚贤在茂隆山厂开矿，照内地厂例，抽课作贡，每年解银一万一千两。因滇省山多田少，民少恒产。唯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食力谋生，在彼处打礌开矿及走厂贸易，不下二三万人，内外各厂，百余年来从无不靖。以其地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所以清政府才允许卡瓦在茂隆山开矿。

查禁弘阳教　弘阳教传习百余年，牵涉十四州、县，京南紫各庄三教堂，为弘阳教聚集之处，塑有神像。宛平县弘阳教会头有：郎岱村连玉惠，坎檀村任一魁；大井村刘氏等。乾隆十一年(1746)七月十六日清政府将弘阳教徒董应科按律治罪，又将三教堂所塑神像毁弃，改为寺院，田产即充该寺香火，还将堂内所藏经卷、图像销毁。

禁福建天主教活动　因福建福安县有洋人潜

住,招男女二千余人入天主教,书役等俱被蛊惑,乾隆十一年(1746)七月十六日,清政府命福建巡抚周学健,将拿获西洋人送至澳门,勒限搭船回国;从教男人,择情罪重大,不可化诲者,按律究拟;无知被诱者,量予责释。

罗日光聚众抗租　乾隆十一年(1746)七月,福建省上杭县民罗日光、罗日照等,因蠲免钱粮,欲将所纳业户田租四六均分,遂聚众持械拦截下乡收租的业户与典史。他们先将典史驱赶回城,打伤业户,抢夺钱谷,随后又分拨乡民把守道口险隘,手执竹枪木棍,并在高阜地方堆积石块,以备抗拒官府。随从者不下千余人。抗租者占据山头,连接十余里,见知县及千把总到境,就鸣锣放枪,蜂拥掷石。官兵施放弓箭,罗日照等则执枪搠伤县役。八月二十九日,福建提督武进将此事件上奏后,乾隆帝谕示:普免天下钱粮,原期损上益下,与民休息。至于佃户应交业主田租,只能令地方官劝说田主,自行酌减,并未限定分数,使之宽减。减与不减,应听业主酌量。岂有任佃户自减额数,抗不交租之理?罗日光等借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断不可长,应严拿,从重处治,以儆刁顽。

固原兵变　乾隆十一年(1747)十二月十八日夜,固原(今甘肃固原)兵丁因提督克扣军饷,操演过严,发生兵变。他们打开城门,入城抢掠当铺,击碎提督衙门栅栏。清政府命大学士总督庆复、巡抚黄廷桂前往处理,拿获四十余人,将为首重犯即行正法。

《九宫大成谱》编成　乾隆十一年(1746),《九宫大成谱》即《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编成。该书由周祥钰等撰,八十二卷。收集南北曲二千零九十四个曲牌,连同变体共四千四百六十六个曲调,尚有北曲套曲一百八十五套,南北合套三十六套。汇集唐、宋、元、明、清诸宫调及曲调,较为详备。

准民开垦福建沿海诸岛　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十二日,清政府以闽省沿海贫民,生计维艰,而上、下竿塘、西洋屿,大、小嵛山等十四岛,绵延数百里,环绕于闽县、长乐、连江、罗源、霞浦、宁德、福鼎各界,其间可耕之地甚多,若经开辟,数邑贫民,皆得借以谋生;又因当时海宇澄靖,游巡络绎,竿塘等岛逼近内地,遂允许殷实士民前往开辟。

准福建商民赴台贩米　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十三日,因台湾至厦门,水程仅十余更次,中隔澎湖岛,亦兵民聚居之地;台湾虽处海外,但与内地呼吸相通;且其商船梁头高不过一丈以内,总在台厦往来渡载,并不能越洋贩运;漳、泉二府商人赴台贩谷,既不致透越外洋,且于民食有益;清政府决定:以后如遇台郡丰收年,允许漳、泉二府商贾及在台湾的二府民人,自十月起至次年二月止,于地方官处领照贩运。如有夹带射利等弊,严行查禁。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作乱　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进攻邻近土司,又抗拒官兵,起而为乱。大小金川,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形势险要。其地"万山丛矗,中绕汹溪,皮船笮桥,曲折一线。"气候寒冷多变,阴晴雨雪无常,为藏族聚处地区之一,居民皆住石碉之中。雍正元年(1723),清廷以莎罗奔从征西藏有功,授为大金川按抚司,令管其地,其后莎罗奔势渐强盛,图谋并吞邻近诸土司地。他先以女阿扣妻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性懦弱,为妻所制。泽旺弟良尔吉素通阿扣。莎罗奔遂利用良尔吉袭取小金川,诱絷泽旺,夺其印信。经川陕总督檄令和解,莎罗奔才将泽旺放回。乾隆十二年正月,莎罗奔又发兵攻革布什咀及明正两土司。巡抚纪山派兵弹压,反为其所败,千总向朝选陷伏阵亡,游击罗于朝身负重伤,都司马光祖等被困于沃日寨内。乾隆帝以大金川莎罗奔骚扰边境,逼近内地,势益猖獗,必须大加惩创,决定发兵进攻大金川。

颇罗鼐去世　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十五日,颇罗鼐死讯报闻京师。颇罗鼐,后藏人,雍正初年任噶伦,管理后藏事务。阿尔巴布事变发生后,清政府封颇罗鼐为郡王,命接替原康济鼐的职务,总理西藏事务。他在整顿藏政,训练藏军,维护国家统一,安定西藏局势方面,都作出了贡献。颇罗鼐死后,乾隆帝命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

张广泗经理大金川军务　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乾隆帝以云贵总督张广泗征苗有功,熟悉军旅,临阵勇敢,特命为川陕总督,办理征剿大金川军务。四月,张广泗起程赴川,六月,进驻小金川美诺,用良尔吉为向导,锐意灭敌。此时,各省调兵已至三万,乃分两路从河东、河西进攻。河东又分四路,以两路攻勒乌围,两路攻刮耳崖(又称噶尔崖、噶拉依)。勒乌围和刮耳崖均为大金川根据地,又都西临河(大金川)、东阻大山,形势险峻。八月,西路军进至距刮耳崖仅二十余里处。莎罗奔多次遣人乞降,张广泗坚决拒绝。不料,愈接近敌中心地,形势愈险,加之土人善于以石筑碉,险要处皆设碉楼,大小林立,易守难攻,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致使两个月内,官军几无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张广泗继续分路进兵,集中主力攻碉,令兵士砍柴负薪,焚烧敌碉,或挖地道至碉下用火药轰炸,或断水围困,种种办法皆不奏效。张广泗又以昔岭山梁,可以俯瞰勒乌围,直下刮耳崖,预定九月由昔岭进攻,又因土目降而复叛,计划

落空。九月，大雪降临，乾隆帝暂令休战过冬，待来春进兵。在此期间，莎罗奔却不断袭击各路驻守官兵，或攻营卡，或断粮道，使清军应接不暇。张广泗御下过严，罚多赏少，又偏袒黔军，引起多数将士不满。各路清军，遇事不能互相应援，以致张兴等统兵转移，被番兵诱至山沟后，分割围歼。张广泗屡次要求增兵加饷，至十二年底，军营兵士已达五万，日需米面五百石，糜饷劳师，久而无功，屡次许诺，尽皆落空。为了挽回战局，乾隆十三年(1748)初，张广泗又调集官兵，准备于五月分十路进攻。乾隆帝派兵部尚书班第为钦差大臣，前往军营协办粮饷，同时察看军情。二月三十日，班第密奏军营将弁怯懦，军心涣散，建议起用岳钟琪。三月，岳钟琪以提督衔，赴军营效力。

准旗人入民籍居外省 先是乾隆七年(1742)乾隆帝颁旨："自从龙人员子孙外，愿改归民籍，移居外省者，准其具呈本管官查奏。"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初七日，乾隆帝又命："嗣后八旗汉军人等，愿在外省居住者，在京报明该旗，在外呈明督、抚，不拘远近，任其随便散处。"这样，旗人遂可入民籍居外省。

禁止贩买苗民子女 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初八日，清政府刑部行令四川、云南、湖南、广西等省各督抚，转饬所属州县，严禁贩买贵州苗民子女。盗买者，除川贩按例治罪外，将买主照违制例治罪。所买苗民，令原籍亲属领回。

《皇清文颖》告成 乾隆十二年(1747)九月初三日，《皇清文颖》一书告成，乾隆帝亲制序文。康熙时命大学士陈廷敬选辑《皇清文颖》，未及刊布。雍正时允廷臣所请，开馆编辑，随时附益，日久未竣。乾隆帝因命甲子以前，先为编次。凡御制诗文二十四卷，臣工赋颂及诸体诗文一百卷。

封允禵为郡王 允禵是乾隆帝十四皇叔，雍正帝在位时被拘禁，乾隆初年特令释放，赐以公爵，家居十数年来，安静循分，并未生事。乾隆十二年六月，封为贝勒，照常上朝。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初八日，又加封为郡王，上朝如故。

皇后随驾东巡落水死 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乾隆帝奉太后东巡，皇后随行。至曲阜，谒孔林。至泰安，诣岱岳庙，登泰山。三月十一日，驻济南，游趵突泉，奉太后阅兵，亲历下亭。回銮至德州，乾隆帝在舟中夜宴饮乐。皇后富察氏，素性庄重，闻讯恐滋事变，便至乾隆帝舟中进谏，言词激切。当时乾隆帝已醉酒，怒皇后多言，语多不洁。皇后羞忿返回已舟，失足落水而死。皇太后闻讯临视，悲恸良久。乾隆帝亦后悔不已。命庄亲王、和亲王奉太后缓程回京。自留德州，亲视殡殓毕，扶梓返京，丧葬典礼极为隆重。是年秋，湖广总督塞楞额、知府金文醇因在皇后丧期中剃头皆坐斩。江南总河周学健、湖广巡抚彭树葵也因此被革职。

讷亲张广泗处斩 张广泗率军攻大金川，为坚碉所阻，师久无功。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大臣，赴川督师，岳钟琪为提督，内大臣傅尔丹为统领，驰往军营效力。预定五、六月间，兵分十路，同时进攻。以党坝、美卧、甲索、乃当、正地五路，攻勒乌围，由岳钟琪统领。以卡撒、昔岭、纳喇沟、纳贝山、马奈五路攻刮耳崖，由张广泗统领。六月初三日，讷亲抵达小金川美诺军营，因锐意进取，未察情形，即严切督战，下令三日内攻取刮耳崖。命兵士砍木竖城，步步为营，分三路进攻昔岭。大金川兵从正面及左右夹击，官兵三面受敌，伤亡惨重，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副将唐开中受伤。经此惨败后，讷亲不敢专政，军务仍依张广泗。张广泗轻讷亲不知兵，又气凌己上，故意推诿，与讷亲为难。此外张广泗所信用的向导良尔吉与汉奸王秋，实为莎罗奔耳目，清军动息，皆为敌人知悉。岳钟琪请将二人除去，张广泗不听，仍坚信不疑。以后几次小的战斗，清军亦皆受挫。讷亲见攻碉法，死伤太众，便仿效敌人样式，筑碉建卡，谓之以碉逼碉，以卡逼卡。张广泗知非善策，却随声附和，恃为攻敌之术。这样，守碉需人，兵力分散，进攻力量更加单弱。讷亲身为经略，从不亲临督战，每遇战斗，避于帐房内，在火光中遥望兵士进攻，以为指示，传为笑柄。结果将帅不和，兵威日损，士气沮丧，人无斗志。闰七月二十七日，清军三千人由卡撒进攻喇底二道山梁，副将、游击督兵至沟口止，守备又复落后，行进中忽闻番兵数十人从山梁呐喊压下，官兵三千人拥挤奔回，多有损伤。讷亲一筹莫展，无技可施，对战争丧失信心，竟奏请调三千精兵驻守阵地，明年接办；又说俟二、三年后，待敌兵困乏，再乘势进剿。对此，乾隆帝十分愤怒，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将讷亲、张广泗革职。十二月，处斩。

定惩治殴官流民例 因直省流民，千百成群，聚众抗官，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初六日，清政府议定惩治殴官流民例，规定：聚众殴官，积至五十人众者，为首之人，照例拟斩立决，仍照强盗杀人例，枭示；其有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系同恶相济，亦照光棍例，拟斩立决；其余为从之犯，照例拟绞监候；其被胁同行，审无别情者，照例各杖一百。清政府还规定，凡是流民殴官案件，各督抚即据实先行奏闻，严饬所属立拿正犯，速讯明确，分别定拟。如系实在首恶，即一面具奏，一面正法枭示。并将犯由及该犯姓名遍贴城乡，使愚民皆知警惕。如承审官不将实

在首犯审出，混行指人为首，因而斩决，及差役诬拿平人，株连无干，滥行问拟者，即将承审官分别革职，依律治罪，该督抚并严加议处。

浙江巡抚常安贪婪论绞 浙江巡抚常安从乾隆八年(1743)起，每年两次点换盐政承差，共婪收银八千余两。此外每遇盐政承差缺出，新役顶补，共勒取银一千七百余两。乾隆十三年(1748)七月二十五日，常安照风宪官吏求索财物，加其余官吏罪二等，"枉法赃八十两律"，被判处绞监候，秋后处决。

定三殿三阁大学士制 乾隆十三年(1749)十二月初四日，清廷规定：内阁大学士为满、汉各二员，其协办满、汉各一员或二员，因人酌派。大学士官衔例兼殿阁，即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东阁，是为三殿三阁。

定军法从事律 乾隆十三年(1748)十二月，因清律内对玩寇老师、存心贻误者没有正条，为慎重军务，儆戒失律，照示军中武臣，严肃纪律，而激励勇敢，清政府制定军法从事律。规定：凡统兵将帅，玩视军务，苟图安逸，故意迁延，不将实在情形具奏，贻误国事者；凡将帅因私忿娼嫉，推诿牵制，以致糜饷劳师，贻误军机者；凡身为主帅，不能克敌，转布流言，摇惑众心，借以倾陷他人，致误军机者，均属有心贻误，应拟斩立决。

金川事平 乾隆十四年(1749)二月初五日，金川事平。先是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军机大臣傅恒为经略大臣，赶赴金川办理征讨事务。为了保证战争胜利，清政府先后调拨京城、东北各省驻防满洲八旗兵和陕甘、云贵等地绿营兵共计三万五千名，陆续开赴金川前线，又添拨军饷二百万两以济军需。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傅恒历经辛劳赶至军营，首先设计斩杀奸人良尔吉、王秋、阿扣等，以切断莎罗奔内应。又尽撤诸方围碉兵，改变张广泗、讷亲原来的攻防之策，制定直捣敌人中坚的计划，约于四月报捷。随后，傅恒与岳钟琪分兵深入，攻碉夺卡，一时军声大振。莎罗奔慑于清朝兵威，屡遣头人乞降，禀称果贷其死，当为经略大学士建祠顶祝，还表示对傅恒所约"不许再犯邻封，退还各土司侵地，献出马邦凶首，缴出枪炮，送还内地民人，与众土司一体当差"等条，一一尊命。傅恒把情况上奏。乾隆帝以糜饷劳师，得其地不足耕，得其人不足使，虽絷二酋之颈，也无足轻重，谕令傅恒纳降罢兵；又用皇太后懿旨说服傅恒，对敌人网开三面，允其归降。二月初，莎罗奔遣使至岳钟琪军营乞降。岳钟琪请示傅恒后，轻骑简从，径赴莎罗奔驻地勒乌围。莎罗奔亲献茶汤以进。岳钟琪饮用。遂宣布皇上威德，告以恩赦之意。莎罗奔等顶经立誓，椎牛行炙。次日，坐船出洞。二月初五日，莎罗奔同郎卡带领喇嘛及头人等，焚香跪迎经略大学士傅恒。至此金川事平。捷报至京师，乾隆帝大喜，封傅恒忠勇公，封岳钟琪三等公，加兵部尚书衔，其余参赞大臣等亦交部议叙。

赐庆复自尽 乾隆十四年(1749)九月，瞻对土司班滚见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降清，便也托请泰宁寺喇嘛达尔罕堪布代为禀降。清政府遂派员前往泰宁，班滚率领弟兄、土目、头人等，出界跪迎。二十一日，乾隆帝以从前庆复报班滚烧死，犯有欺罔捏饰罪赐其自尽。

散文家方苞去世 乾隆十四年(1749)，方苞去世。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因为给戴名世《南山集》作序，案发牵连入狱，不久免罪入旗。因文学有名望，受大学士李光地荐举，召入直南书房。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帝即位，赦方苞及其族人出旗归原籍。后迁内阁学士，命教习庶吉士，充《一统志》总裁、《皇清文颖》副总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升礼部侍郎。方苞一生致力于古文复兴运动，为清代散文桐城派的创始人。他主张为文要"通经明理"，讲究"义法"，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提出"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建立起桐城派的文论基础。这对纠正南宋以来空疏芜杂的文风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他受程、宋理学影响很深，要求文章内容必须"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语言上一味追求淳厚古朴，轻视诗词、歌赋、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又使散文的发展受到严格的限制。他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多为经说、书序及碑传之属。也有一些寓意深刻、语言简洁的文章，如《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都是清代散文中的优秀作品。

乾隆帝西巡五台山 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初二日，乾隆帝奉皇太后西巡五台山，驾发京师。谕扈从王公大臣，一应官员人等，严戒践踏禾苗，违者议处。免经过地方本年应征钱粮十分之三。又以原任翰林院编修王居正，以前因两次考试均列四等，令休致，今到五台接驾，著以知县补用。十三日至十六日，驻跸菩萨顶大营。赏银万两，命山西巡抚办理未到地方修路开销，并赐晋省地方官等宴。二十日，谕：直隶为畿辅重地，路当要冲，政务繁多，州县各官，或遇调委差务，署内事件难于兼理。著吏部从候补、候选人员内，拣选州县十员，佐杂二十员，回銮后引见，交该督差委，遇缺酌补。补完之日，再行简发，永著为例。三十日，至四圣口阅永定河堤工。三月初三日，命减免直隶上年被灾地方钱粮。初六日，还宫。以回銮接

驾，大学士史贻直，未候传宣，先行散去，命交部察议。

定边左副将军策凌病故 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初五日，功绩卓著的超勇亲王固伦额驸策凌病故。策凌，博尔济古特氏，蒙古喀尔喀部人，为成吉思汗直系后裔。幼随祖母归清，居住京师，教养于内廷。后尚圣祖女和硕悫公主为妻，授和硕额附，赐封贝子，命携所属归塔密尔驻牧。康熙末年，出征准噶尔，屡立战功，授为扎萨克。雍正元年(1720)，封多罗郡王，次年入觐，命与同族亲王丹津多尔济驻阿尔泰，任副将军，用正黄旗纛。雍正九年(1729)，从靖边大将军锡保攻讨噶尔丹策零，用偷营诱敌计，击败大策零敦多卜军，进封和硕亲王，升授喀尔喀大扎萨克。翌年，噶尔丹策零派小策零敦多卜率兵三万，由奇兰至额尔德毕喇色钦，额附策凌率兵于本博图山迎敌。准噶尔军潜袭塔密尔，掠策凌二子及牲畜而去。策凌闻讯，回军驰击，取得了著名的光显寺大捷。叙功，赐号超勇，晋封固伦额驸。雍正十一年(1732)，命佩定边左副将军印，屯驻科布多，长赛音诺彦部。乾隆元年(1736)，他带领喀尔喀兵一千五百名驻扎乌里雅苏台，分防鄂尔坤。准噶尔遣使议界，以其二子陷准部相要挟，策凌严辞峻拒，准部无计可施，遂定以阿尔泰为牧界。策凌死后，乾隆帝称赞他是“国家长城。”特赐配享太庙，崇祀京师贤良祠。命其长子成衮扎布袭亲王爵。

定旗员回避庄田例 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初二日清廷定旗员回避庄田例，其中规定：州县为亲民之官，五百里内，旗庄鳞次接壤，词讼案件，动相关涉，不便任用满员。以后汉军仍尊旧例回避直隶。其满洲人员，著回避五百里以内。道府、同知等统辖之员，本人庄地有在所辖区内者，报明该督，奏请调补。盛京州县，其中有庄地在本境者，亦著呈明报部，另行扣补。

西藏珠尔默特作乱 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发生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作乱事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主持全藏行政事务后，为巩固自己地位便想除掉主持阿里克地区事务的兄长珠尔默特策布登。为此，他多次向驻藏大臣傅清诬告其兄杀害他派去的官员，抢夺商旅财物，用兵把守通藏道路，声言欲来西藏等，想借机加害。为了维护西藏地区的和平与安定，乾隆帝命驻藏大臣傅清传谕训斥，令其兄弟和好。对此，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表面服从，内心却把驻藏大臣和驻防官兵视为自己称霸西藏的主要障碍。乾隆十四年(1749)，纪山接替傅清继任驻藏大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倨傲不恭，迟至一月才出面相见，并广布私人，对驻藏大臣的活动严加监视。还提出撤掉驻藏官兵的无理要求。同时，他又采取阴谋手段袭杀己兄珠尔默特策布登，诡称病死，欺骗清廷。对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他心怀疑忌，毫无尊信恭顺之意；对反对他的班第达等行政官员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以致颇罗鼐原来依靠信用之人，多被杀害、抄没、革职。对他这种恣行无忌的举动，驻藏大臣纪山不加阻止，反而迁就顺从。乾隆十四年末，清廷将纪山调回，仍派傅清及拉布敦为驻藏大臣。傅清等到任后，开始限制珠尔默特的不法行为。对此，珠尔默特极为愤恨，加速发动叛乱的准备。他一面派人潜往准噶尔通款借兵，约为外援，合谋为乱；一面将四百多名驻防汉兵逐回内地，同时切断邮路，阻止交通。乾隆十五年九月，驻藏大臣、副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将情况奏报朝廷，提出相机除之的建议。但军书旬日不致，遂当机立断，定计智擒。十月十三日，傅清与拉布敦以议事为名，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招至驻藏大臣公署楼上，当面历数其罪，拔刀将其杀死。跟随珠尔默特前来的卓呢罗卜藏扎什跳楼逃出，传唤党羽，聚兵围楼，施放枪炮，纵火焚烧。傅清中枪后自尽，拉布敦与叛军格斗遇害。叛乱者抢去库银八万五千余两，屠杀驻藏兵民一百二十八人。次日，达赖喇嘛出面理事，收集余兵，按抚人众，传令沿途台站照旧应付官兵，严禁杀害汉人。不久叛乱头目卓呢罗卜藏扎什等十三人先后被拿归案，绞决处死。乾隆帝因为傅清、拉布敦“先事靖变，为功甚大”，追赠一等伯，命在被害地方建立双忠祠，以示纪念。

李绂去世 乾隆十五年(1750)，李绂因病去世。李绂，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人。家贫好学，博闻强记，读书过目成诵。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至左副都御史。雍正二年(1724)，授广西巡抚，奏请禁止开矿，重视练兵。察出督抚、司道、府厅分得羡余银八十二万两，勒限赔偿，雍正帝嘉其秉公执正。雍正三年(1725)，升任直隶总督，奏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贪虐，其属吏黄振国等皆冤枉。是年冬，御史谢济世亦劾田文镜贪虐。复举黄振国例。济世被夺官，发戍阿尔泰军前。雍正帝以济世奏言与李绂相同，疑其结党，降李绂为工部侍郎。新任直隶总督宜兆熊劾知府曾逢圣、知县王游亏空钱粮，又劾知县李先枝私派累民，此三人皆为李绂所荐举。于是，雍正帝责李绂欺妄，革职下狱，列其罪二十一事，按律当斩。李绂在狱读书自若，寝食如平日。雍正帝以李绂既知悔过，且学问尚优，命免死，令纂修《八旗通志》。乾隆元年(1736)，为户部侍郎，方开博学鸿词科，李绂所举已众，又嘱别官代荐所知

者。乾隆帝责其妄举，降为詹事。后迁内阁学士。乾隆八年(1743)因病辞官，乾隆帝问有何陈？对以“慎终如始”。李绂一生治学，学术宗陆九渊，经济取王安石，文章取欧阳修、曾巩，于经史有根底，议论有见地。他反对空谈心性，主张躬行实践，注重匡时济世。所著有《穆堂类稿》、《别稿》、《陆子学谱》、《宋子晚年全论》等。

乾隆帝首次南巡 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以省方问俗，考察官方戎政，阅视河工海防，了解民间疾苦，奉母游览为由，乾隆帝首次南巡江浙。行前，他命将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地丁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地丁银三十五万五千余两全行蠲免，浙江因无积欠，蠲免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三十万两。减直省缓决三次以上人犯之罪。十三日，奉皇太后离京，免经过直隶、山东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定为以后南巡成例。减免安徽歙县等十五州县旱灾额赋，免山东积欠仓谷五十七万余石。二月，免两淮灶户积欠四万二千余两。二月初八日，渡黄河阅天妃闸、高家堰，准动帑兴修高堰大坝里坝等处石工七十三丈五尺。经过淮安，见城北一带，内外皆水，仅有土堤，思人烟凑集之区，设有异涨，何能抗御。命改建石工，以资保障。赏革职太仆寺卿熊学鹏原衔、右副都御史叶一栋、署江苏巡抚户部侍郎王玑、河南按察史缪孔昭等鸿胪寺卿衔。命前来接驾的革职提督杨凯以总兵补用。因为两淮盐商踊跃急公，恩准将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之外，每引赏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由运河乘船，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至苏州，谕三吴士庶各敦本业，力屏浮华。准献诗学子考试录用。三月，至杭州，参观敷文书院，颁赐江浙各书院殿版《十三经》、《二十二史》。登观潮楼阅兵，裁杭州汉军副都统。奉皇太后遍游西湖名胜，至绍兴祭禹陵，还杭州。命高斌仍以大学士管河道总督事，谕浙江士庶崇实敦让，力田耕作。回銮时，绕道江宁(今南京)祭明太祖陵，阅兵。奉皇太后亲至织造机房观织。命原任大学士陈世倌仍旧入阁办事。谕令献诗考中之蒋维植、钱大昕、吴烺等，照浙江之例，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沿运河北上，至蒋家坝、高家堰阅视河工，定洪泽湖五坝水志。谕示说：洪泽湖上承清、淮、汝、颍诸水，汇为巨浸，所恃为保障者，惟高堰一堤，天然坝为其尾闾，伏秋盛涨，辄开此坝泄洪，下游诸县，全被其患。下游居民深以开坝为惧，而河臣转借为防险秘钥。今南巡周览形势，方知天然坝断不可开，当立石永禁。河督高斌等，请于三滚坝外，增建石滚坝，以资宣泄。增三为五，以仁、义、礼、智、信为次。于智、信二坝石面上加封浮土，必须前三坝过水三尺五寸，犹不减盛涨时，再启智坝之土；仍不减，乃及于信。这样节宣有序，比之开天然坝一往莫御，水势自然不同。又以高堰石堤至南滚坝以南，旧有土工石堤，有首无尾，命于新建信坝北雁翅以北，一律改建石工，南雁翅以南至蒋家闸，水势平缓，用石基砖砌。使首尾完固，永为淮扬利济。四月，从陆路至泰安，祀岳庙拈香。五月初四日，还京。此次南巡，从京师至杭州，往返行程水陆共计五千八百里，历时五月余。

纪山自裁 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二十八日，乾隆帝以纪山前岁驻藏，怯懦无能，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曲意奉迎，事事顺从，任其恣意妄行。甚至令兵丁演戏，班名自乐，设宴观剧，日在梦乡。又送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八抬轿，派人教演番奴抬练，以肆其志，并与之盟誓，致使其逆谋益坚。后傅清与拉布敦至西藏，以体制裁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遂成嫌隙。是傅清和拉布敦之死，皆纪山丧心无耻曲意逢迎所致。事关军国重务，不容屈法，遂从宽赐纪山自尽。

停止知县三年行取例 清沿明制，直省知县，专重资格，按俸迁转，三年行取一次，吏部按期奏请。乾隆帝以此为相仍故套，于吏治人才毫无裨益，乾隆十六年(1751)五月二十六日命知县中凡有才能杰出人员，可由督、抚题保擢用，永行停止直省知县三年行取例。

制定《西藏善后章程》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平息后，为了削弱藏王的权势，乾隆十五年(1750)至十六年(1751)间，清政府对西藏的行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是废除封授西藏郡王制，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由四名噶隆组成，“噶隆事务，不可一人专办”。进藏平叛的四川总督策楞，根据乾隆帝的指示，于乾隆十六年拟定了《西藏善后章程》，主要内容有：一、“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噶隆人数，按照旧例，仍为四人，但应该选通晓黄教者一人，赏给扎萨克大喇嘛名号，与其他三人共同办理藏务。二、噶隆办理政务，应在噶厦公署衙门，不得于私宅办事；裁革过去噶隆私行补放之官，噶隆处理地方事务，应由众噶隆秉公会商，妥协办理；上奏朝廷的重大事务，须请示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酌定办理。三、对补放第巴头目等，噶隆不得私自办理，必须公同秉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对官员革除治罪，也务须秉公查明，分别定拟，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指示遵行。四、各寺院之堪布喇嘛或遇缺出，均由达赖喇嘛酌情选派，各噶隆不得仍按陋规，专擅办理，私自选派。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清政府还决定在西藏长年驻兵一千五百名，令提督大员率领弹压，三年轮换一次，成为定例。

温台县贫民抢米 乾隆十七年(1752)四月，浙江温台县发生贫民抢米事件。事平后，为首者以大枷枷号，遍游城乡两月，然后永远枷禁。乾隆帝谕示说：大凡抢夺之案，多由富民居奇闭粜而起。地方官遇有灾伤，即当先期一面劝富民出所有余，通融平粜；一面密为弹压保护，务使两得其平。

马朝柱招军起义 乾隆十七年(1752)，马朝柱在鄂皖等省散扎招军，准备起义，事未成而败露。马朝柱是湖北罗田县民，又名马太朝，原为湖北蕲州人，移居江南霍山县，与白云庵僧人正修往来。因家贫难以度日，设法聚银，立志反清。经与正修商议，遂托言：朝柱十六岁时，梦见神人告诉其师父在护国寺，醒后寻至霍山县火星堂，见庙中神像与梦中所见相同，询知此庙原名护国寺。庙僧以朝柱非凡，指赴金山，见扬五和尚，又与梦相符。年二十，复梦神告知桐城万山九龙洞有兵书、宝剑，往取得之而归。他还称西洋有幼主朱洪锦，系明朝后裔，还有大学士张锡玉，大将吴乘云系吴三桂后代，李荣爵即李开化等，统兵三万七千名，共同辅佐。正修将此事汇成一书，到处传播，便有人出银入伙。后朝柱又到罗田县天堂寨，开山烧炭，预制铜镜、铜笏、铜枪、旗帜等物，枪上刻"太朝军令"，约众游观。并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劝众出银，歃血结盟，从者甚众。又有医生胡济修加入，倚为谋士，作《敬神》、《囤粮》等文，还草檄文一篇，称西洋大都督吴乘云所颁。乾隆十六年(1751)冬间，马朝柱令刘廷佑等在罗田僧塔寺、英山大坳沟等处，开店招人。将檄文、号令、表赞等到处传扬，并制蟒袍、补褂，顶帽，托言西洋所颁赐。又秘作诏书一件印制百张，对众开读。乾隆十七年正月内，马朝柱将诏书作扎散发；撰拟印文，上写"统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禄永昌"十六字；造兵器、买硝磺，积极准备起义。一时流言四起，引起官府注意。蕲州知州李泌至铁匠王廷赐家起获刀片、白布，拿获李仁宗等人后，马朝柱仍以"太朝军令"印字制旗发往各地，希望"分路纠合"，同时并举。四月初四日，马朝柱率领妻子部众，登上安徽英山天马寨山头，公开起义。官军围剿，两天后，山寨失守。马朝柱及一些骨干人员乘乱逃走，不知所终。其母亲、妻子及随从起义者二百余人全被捕获，分别处死、治罪。至此，"马朝柱假捏神符，勾结匪党，散扎招军，积粮制械"，以兴复明朝为号召的起义活动，在清军分路穷搜，迅速查办下，宣告失败。

蔡时田受带关节被斩 乾隆十七年(1752)八月，顺天乡试，主考房官入帘时，在内帘监试御史蔡时田行李内搜出关节二纸，外帘监试御史曹秀先辨认，系其侄举人曹咏祖笔迹。乾隆帝以为即位以来，留意整饬，应当诸弊尽除，人知畏法，不料尚有愍不畏死，藐法行私，潜通关节者，实出情理之外。蔡时田身为御史，以监试为职，竟然受带关节，尤属不法，实在可恶。命将蔡时田革职，曹咏祖革去举人，曹秀先解任；案内有名人犯交在京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刑部严加刑讯，切实审拟定罪。十四日，和硕履亲王允陶等复奏：将蔡时田严刑鞫讯，据供所带关节二纸，原拟入帘时，遇有相识之人，相机转托，并非实有其人，质问曹咏祖，所供相同。于是，以"蔡时田身为御史，奉命监试，反倒收受关节，串通嘱托；曹咏祖奔竞夤缘，藐法营私，情罪俱为重大"，二人均被处以斩刑。

四川杂谷改土归流 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四川杂谷等地改土归流。先是，杂谷土司苍旺与梭磨土司勒儿悟、卓克基土司娘儿吉构衅，清政府派员前往调处。苍旺抗执不尊，竟将梭、卓所属土民番寨，聚兵攻毁，又私造枪炮，潜谋不轨。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以杂谷地方延袤二千余里，为西南一大部落，距旧保县不远，中有古维州最为险要，若被苍旺攻占，便可直趋保县，势将难治，请调兵四千进剿。朝廷发兵后，清军先遣队很快由保县驰抵维州，占踞三关要口并一切险隘，及桥梁可通处。续发官兵也接踵而至。遂并力进攻杂谷脑寨，断其水路。结果自旧保至杂谷脑沿途各寨，自愿投降的一百零六寨，归附人数四万余名，且全部愿意改土归流。十月初三日，清政府准将杂谷地区改土归流，并在杂谷脑等处设官、筑城、驻兵。

学者厉鹗去世 乾隆十七年(1752)，诗人学者厉鹗去世。厉鹗，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康熙末年举人。厉鹗自幼聪明好学，喜爱写诗，早年便为文坛所重视。全祖望对他的诗文才学极为赞赏，曾说厉鹗既长于游山之什，又深于言情，尤其擅长作词，深得南宋诸家之胜。厉鹗学问博洽，留心金石碑版，精熟辽宋史实，所著《辽史拾遗》，极具功力。厉鹗久客扬州马曰琯玲珑山馆，得以博览群书，所见宋人集子极多，又求之于诗话、画录、山经、地志、说部，片词只句悉加收录，遂积三十年功力，著《宋诗纪事》一百卷，极为详备，为一般词章名家所不能比。还著有《诗集》二十卷，《樊榭山房文集》八卷。

画家高翔去世 乾隆十七年(1752)，画家高翔去世。高翔，字凤冈，号犀堂，有时又写作樨堂、西堂、西唐等，别号山林外臣，扬州人。大画家石涛晚年定居扬州，高翔当时年纪尚轻，但二人却结为忘年交。石涛死后，高翔每逢岁春，都为石涛扫墓，从未间

断，直到辞世。高翔还与著名藏书家“小玲珑山馆”的主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结为好友，经常参与马氏兄弟举行的诗文集会。马曰琯写有《哭高西唐》诗：“垂髫交契失高贤，傲岸夷犹七十年。白袷惯倾花屿酒，青山只取研田钱。两家老屋常相望，一样华颠剧可怜。同调同庚留我在，临花那得不潸然。”从中可见高翔孤傲的性格和卖画为生的清贫生活。高翔绘画，主要是画山水，其次是画梅，偶尔亦画人物、佛像。其山水画吸收弘仁和石涛的笔法特点，形成简练秀雅的风格。但大幅山水，缺乏气韵，笔墨也觉松散。所作疏枝梅花，亦清淡秀丽。他还工于八分书法，也能篆刻。著有《西唐诗钞》，已失传。

卢鲁生伪撰奏稿被处死 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因伪造孙嘉淦奏稿罪，被凌迟处死。还是雍正初年，孙嘉淦以翰林院检讨上封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以直言敢谏而闻名。乾隆帝即位后，尤被倚重，上疏言事，多予采纳，官至尚书、大学士。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帝以首举南巡，令有司预为准备，两江总督黄廷桂供办铺张，督责严苛，属吏怨苦。遂有人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之名，撰写谏止南巡疏一篇，全稿长达万言，指斥乾隆帝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并遍劾廷臣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等，暗为流传，及于内地十七省。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云贵总督硕色奏称，驻安顺府提塘吴士周呈内有密禀一纸，词殊不经，竟系假托廷臣名目，胆肆讪谤，甚至捏造硃批，种种妄诞，不一而足。当即传谕步军统领舒赫德及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督抚，密加缉访。于是各地陆续查出传抄伪稿案八十多起，涉嫌被拿者千人以上，其中文武官员、贡监、旗员、商人、士庶、僧人、土司无所不有。因查办不力而受处罚的督抚大吏有十数人之多。经过一年半由秘密到公开地追查拿问，直到乾隆十八年二月，辗转追至江西传抄的江锦章，又追至彭楚白，始供系抚州卫千总卢鲁生给稿传抄。提审卢鲁生，经再三究问“反复开导”，始供认自行起意并与南昌守备刘时达商谋捏造。卢鲁生为四川南部县人，曾任长淮卫守备，因事降调千总。乾隆十五年七月，虑及办差赔累，希停止南巡，遂与刘时达编造伪稿，凑成“五不解，十大过”名目。复思孙嘉淦肯上条陈，借名耸听，于各帮会议公事时，给众阅看，交书办彭楚白抄传。乾隆十八年二月，清廷将卢鲁生先行正法。三月，又将刘时达及卢鲁生长子卢锡龄、次子卢锡荣斩监候，秋后处决。

清查南河亏空 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洪泽湖水涨溢，高邮东罗坝决口，邵伯运河二闸冲决，下游高邮、宝应一带被淹。学习河务布政使富勒赫上奏：南河各厅将岁修抢修钱粮任意亏空，致使工料无措。乾隆帝遂命署尚书策楞、尚书刘统勋前往查核，发现浮冒蒙混种种滋弊，总计亏空十一万五千余两，其外河同知陈克济、海防同知王德宣亏缺，皆至二三万两；通判周冕应办物料，全无储备，以至二闸被冲，束手无策。乾隆帝谕示限亏帑人员一年赔补，到时不完，就地正法；又将河督高斌、协办河务张师载革职，留工效力赎罪。九月，黄河复决于铜山县张家路，南注灵、虹诸县，归洪泽湖，夺淮而下。乾隆帝以秋汛已过，何致冲漫河堤，其中显有情弊，便将该管同知李敦革职拿问，责高斌、张师载往同山勒限堵塞。不久，策楞奏劾同知李敦、守备张宾侵帑误工状。乾隆帝谕令将李敦、张宾即于该工正法，使在工人员知所惩戒。以高斌、张师载负恩徇纵，命将二人绑赴行刑处所，目睹行刑后，再行释放。

杜尔伯特三车凌来归 准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后，内部纷争，达瓦齐夺位，率兵进攻杜尔伯特蒙古。该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等，集众商定依附清政府之计，遂于乾隆十七年(1753)十月，率部众三千余户一万余人，离开额尔齐斯河牧区，扶老携幼，翻越阿尔泰山，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跋涉，终于在乾隆十八年(1754)十一月抵达清军驻地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奏闻此事，乾隆帝十分重视，令成衮扎布告以“尔等俱系准噶尔台吉大员，率领部众输诚向化，甚可嘉悯”，准其移入卡内。又遣侍郎玉保等前往抚慰，先后接济牛羊一万多只，粮四千余石，使其度过严冬和寒春。乾隆十九年闰四月，清政府为他们编设旗分佐领，定名为杜尔伯特赛音济雅哈图盟，命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暂在乌里雅苏台地区游牧。乾隆帝还令三位车凌带属下官员及随从一百三十余人，由侍郎玉保陪同，沿新设台站，赴热河入觐。五月十二日，乾隆帝到达避暑山庄，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为贝勒。次日，召见于澹泊敬诚殿，赏赐银两。五月十六日，乾隆帝在万树园宴请三位车凌、各地蒙古王公及从北京来的王公大臣等，还命健锐营骑士表演马技。郎世宁将此场景绘成《马技图》，留为纪念。连续几天的欢宴和召见垂询，乾隆帝了解到很多准噶尔内部的情况。

吏部尚书孙嘉淦去世 乾隆十八年(1753)，孙嘉淦去世，终年七十一岁。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家境贫寒，力耕苦读。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授检讨。雍正时，以直言敢谏闻名，性格憨直，清廉自律，颇受器重，官至吏部侍郎。乾隆帝即位后，孙

嘉淦上疏："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主之一心。"受到乾隆帝嘉纳，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适逢河南郑州有疑狱，乾隆帝命使者往勘，不得实情，复令孙嘉淦往讯，得其冤状，十余人尽被释放。乾隆三年(1738)四月，迁吏部尚书，仍兼管刑部事。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朱藻贪劣误工，乾隆帝命孙嘉淦与尚书讷亲往鞫，得实，论罪如律。十月，授直隶总督。时畿辅酒禁极严，犯罪违法者很多。孙嘉淦疏奏：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查获私酿案件三百六十四起，犯法者一千四百余名。臣到任一月，查获私酿案件七十八起，犯法者三百五十余人。其未报自结，吏役兵丁已经拿获而受贿放掉者，更不知多少。正犯之外，牵连受累者，又不知多少。以日用饮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薮，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盐枭未靖，酒枭又起，天下骚然，殊非政体。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于昔，什倍之利所在，民众必以性命争之。本为民生计而禁止，反而滋扰至此，立法不可不慎。乾隆帝览奏后，下诏对造酒采取弛禁政策。犯法人大为减少。乾隆六年(1741)，调任湖广总督，疏言：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一峒之中，取头人信服者为峒长，使其约束寨长而听命于县令，如是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于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乾隆八年(1743)，因徇庇属下被夺官。乾隆九年(1744)，授宗人府府丞，次年迁右副都御史。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任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十七年(1752)，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嘉淦居官有八约自戒："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著有《孙文定奏议》。

四川提督岳钟琪卒于军　乾隆十九年(1754)，岳钟琪病死军中，终年六十九岁。岳钟琪，字子美，四川成都人。初以赀捐同知，后改武职，累迁至四川永宁协副将。康熙五十八年(1719)，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卜侵西藏，岳钟琪随都统法喇率兵出打箭炉，抚定里塘、巴塘等地，次年攻拉萨，大败策凌敦多卜军，西藏平定。师还，擢四川提督。雍正元年(1723)，出兵征青海，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请以岳钟琪为参赞，率六千人抚定上、下寺东策卜诸番，剿平呈库、活尔贾二部。雍正二年(1724)授奋威将军。郭隆寺喇嘛与罗卜藏丹津呼应作乱，岳钟琪与诸军合击，擒其首达克玛呼图克图，尽歼叛众，焚毁寺庙。进攻罗卜藏丹津，擒其母及妹，罗布藏丹津换妇人服逃去。出师十五日，斩首八万级，青海事平，授岳钟琪三等公，兼任甘肃提督，雍正三年(1725)，又兼甘肃巡抚。四月，署川陕总督，护理军务，不久实授川陕总督。雍正五年(1727)，平定禄万钟、陇庆侯叛乱，将乌蒙、镇雄等地改土归流。雍正七年(1729)，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屡侵喀尔喀诸部。雍正帝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出北路；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西路，分兵进讨。雍正十年(1732)，大学士鄂尔泰劾岳钟琪专制边疆不能歼敌，降为三等侯，六月召回京。张广泗又劾岳钟琪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种种失宜，雍正帝尽夺岳钟琪官爵，交兵部拘禁。乾隆二年(1737)，释归。乾隆十三年(1748)，起岳钟琪为提督，命赴大金川军营效力。金川事平，加岳钟琪太子少保，封三等公，赐号威信。乾隆十七年(1752)，杂谷土司苍旺为乱，率兵讨平。乾隆十九年(1754)，力疾往重庆捕治"乱民"陈琨，归途中死于资州。岳钟琪性沉毅，多智略，治军严整，关心士卒疾苦。终清之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兵隶麾下受节制，唯岳钟琪一人。乾隆帝诗内，称岳钟琪为"三朝武臣巨擘"。

阿睦尔撒纳兵败内附　阿睦尔撒纳是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台吉，其母为准噶尔部策旺阿喇布坦之女。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死后，其次子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以母贵得立，因暴虐恣肆，为部众攻杀，又立其庶兄喇嘛达尔扎为台吉。因为喇嘛达尔扎是私生子，部众不悦，大策凌敦多卜孙达瓦齐、小策凌敦多卜子达什达瓦，欲立策零少子策妄达什，喇嘛达尔扎率兵袭杀达什达瓦及策妄达什。达什达瓦部下萨喇尔率千余户降清，授为散秩大臣。达瓦齐遂联合阿睦尔撒纳图报复，阿睦尔撒纳也欲乘机促其内讧，而后有所图。于是，二人合兵突袭伊犁，杀喇嘛达尔扎，达瓦齐自立为汗。阿睦尔撒纳迁往额尔齐斯河地区，渐露侵夺准部之意。达瓦齐为自卫计，屡派兵攻打阿睦尔撒纳，不胜，乃自统精兵三万扑攻阿睦尔撒纳，又使骁将玛木特领乌梁海兵八千，东西夹击。阿睦尔撒纳考虑不能敌，便想借清朝兵力灭达瓦齐，而后占据其地。乾隆十九年(1755)秋，遂率众与其兄班珠尔及杜尔伯特台吉纳默库内附降清。清廷令萨喇尔前往迎劳。十一月十三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阿睦尔撒纳等，赐宴抚慰，骑马校射，又用蒙古语询问变乱始末。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杜尔伯特台吉纳默库、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为郡王。不久，准部骁将玛木特见诸台吉相继内附，知达瓦齐不可辅，亦脱身来归。

小说家吴敬梓去世　乾隆十九年(1754)，小说家吴敬梓客死扬州，终年五十四岁。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称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生于世

宦之家，祖父为监生，作过州同知，父亲为拔贡，曾任江苏赣榆县教谕。吴敬梓幼年丧母，随父宦游，二十三岁中秀才，后来屡试不第。由于他不善理财，又爱交游，慷慨好施，遂使祖业难守，家道中落，为族人所歧视，家产被侵夺，奴仆皆逃散，田地卖尽，亲朋故友都将他拒之门外，断绝往来。于是，他怀着极大的忿懑移家南京。此后，生活更加贫困，有时靠卖书换米，晚年竟穷到"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的地步。吴敬梓天资聪颖，过目成诵，虽受正统儒学教育，却不喜八股文，偏爱诗赋与"杂学"。二十九岁参加科举考试，遭到斥逐，便绝意仕途。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荐他应试"博学鸿词"，被他托病拒绝。家境变化，世态炎凉，生活道路坎坷，使他对程朱理学，科举入仕产生了憎恨和蔑视。在接触社会中，又看到了很多丑恶现象，促使他用笔去进行讽刺与抨击。他从四十岁起，用十年时间，创作了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在书中，他把那些科举出身的贪官，横行乡里的贡监，利欲熏心的士子，附庸风雅的名士，招摇撞骗的清客，以及围绕在这些人物身边的各色人等，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从而对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官场黑暗、吏治腐败、文化道德堕落等进行了揭露、批判与抨击。同时又把一些"市井小民"作为正面人物，赞美他们纯朴、善良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吴敬梓的其他著作，主要还有《文木山房集》、《诗说》(已佚)和《金陵景物图诗》。

清军征讨达瓦齐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军两路出师征讨准部达瓦奇。北路以定北将军班第为主帅，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副，额驸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郡王青滚杂卜、纳默库、班珠尔，尚书达尔党阿，将军阿兰泰，内大臣玛木特为参赞，统兵三万出乌里雅苏台。西路以定西将军永常为主帅，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为副，亲王额琳沁多尔济、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邑布腾，总督鄂容安等为参赞，统兵二万出巴里坤，约于伊犁东北三百里处博罗塔拉河会师。两路分别以阿睦尔撒纳、萨喇尔各率精兵数千名，仍用旧为前锋，两路将军及参赞在后缓行。准噶尔各部见清军进剿，望风而降，各台吉、宰桑带领所属，或数百户、或数千户，携酒牵羊，接应清军。师行千里，兵不血刃，两军于五月初一日会师博罗塔拉河。清军进剿之时，达瓦齐尚在伊犁纵酒为乐，全不设备。及闻大军将至，急遣亲信宰桑出令征兵，而自率亲兵万人，退往伊犁西北一百八十里格登山，阻淖为营，企图抵御。清军擒获其亲信宰桑，尽知所部解体状，士气倍增，争渡伊犁河，长驱追袭。将至格登山时，侍卫阿玉锡等乘黑夜带二十余骑往探道路，又竖起军旗，突入达瓦齐军营，呐喊冲杀。敌众惊溃，自相蹂躏，达瓦齐率二千余人逃走，余众皆不战而降。后达瓦齐逾天山，南走回疆，部下半途散逃，仅率百余骑奔投乌什城。城主霍吉斯旧与达瓦齐亲善，但此时已得将军班第檄文，故意派人携牛酒迎候，乘达瓦齐酒醉时，擒献清军。与此同时，青海叛酋罗卜藏丹津亦为清军俘获。二人遂被槛送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赦免他们死罪，又封班第为一等诚勇公，萨喇尔为一等超勇公，霍吉斯为郡王，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食亲王双俸。此次清军出师仅百日，无一战之劳，而准部悉平。

胡中藻诗狱起 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帝亲自制造了一起文字狱，将胡中藻斩首，弃市。先是，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同受雍正帝遗命辅政，后二人各立门户，朝廷中满人附鄂，汉人归张，党同伐异，彼此攻讦，视若仇敌。乾隆帝察知，屡用雍正帝《朋党论》戒责。及鄂尔泰死，张廷玉休致，其门人仍倾轧不止。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为鄂尔泰门生，历任内阁学士，广西、湖南学政。所著《坚磨生诗钞》中，有"记出西林第一门"句，及"谗舌青蝇"等语，借以颂扬鄂尔泰，隐斥张廷玉等。鄂尔泰侄鄂昌为广西巡抚，援引世谊，与胡中藻往复唱和。乾隆帝闻讯极为反感，欲假文字案，惩一儆百，打击朋党势力，遂于乾隆二十年三月，颁布谕旨，摘胡中藻诗句若干，逐条指斥。乾隆帝把"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等句，视为诽谤清朝言语。而《照景石诗》中所用周穆王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个典故，则被指为借题发挥，暗寓讥刺。"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又被认为是指责乾隆帝疏于政事，赈灾不周。乾隆帝还指其典试所出经文题内有"乾三爻不像龙"，谓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显系诋毁。再有"并花已觉单无蒂"句，指为讥刺孝贤皇后之死。等等。最后，乾隆帝斥责胡中藻鬼蜮为心，语言吟诵之间，肆行悖逆诋讪，实非人类所应有。而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于是，胡中藻斩首弃市，鄂昌也以负恩党逆，赐令自尽。鄂尔泰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

湖北设立丝织局 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二十日，湖广总督开泰把湖北设立丝织局事报闻朝廷：原来，荆州素出绫绸丝布，所需丝都产自湖北本省，但工匠技艺陈旧。若请江浙工匠教以染造，自可改

观，并可纺织绸纱。于是，开泰经与抚臣并在省司道共同捐办，由江南雇募工匠至楚，又选觅荆州工匠到省，设立织局，使之试织。结果所织宫绸府纱，颇肖江南所产，商店也都闻而购买。

阿睦尔撒纳逃归作乱　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先是，清军征准噶尔前，乾隆帝已定事平之后，仍众建以分其势之策，按杜尔伯特、辉特、和硕特、绰罗斯四部，分封四汗，如喀尔喀例，设立旗分盟长，令四汗兼理。各部俱在原处游牧，不必迁移。而阿睦尔撒纳欲为四部总汗，专制西域。乾隆帝虑其有此异志，故当出师之初，即密谕班第，告以朝廷处置意见；又使额附色布腾巴勒珠尔暗中监视。不料色布腾反与之亲昵，阿睦尔撒纳亦倚其为奥援。及伊犁平定、色布腾随大军凯旋时，阿睦尔撒纳私以己意请其代奏，约以七月下旬待命。班第、鄂容安留驻伊犁，与阿睦尔撒纳、萨喇尔商办善后事宜。阿睦尔撒纳隐以总汗自居，将达瓦齐财产据为己有，凡有仇隙者，任意杀害。不穿清朝官服，不戴清朝翎顶。用兵行令也不用定边左副将军印信，而私用"噶尔丹策零小红钤记"。不与班第等商量，擅自调兵九千防守哈萨克。至书邻部讳言降清事，只说统领满、汉、蒙古兵来平准噶尔。此外，对于应办之事，一味拖延，唯与宰桑头目私相往来，行踪诡密。又指使党羽散布流言，谓"不立阿睦尔撒纳为汗，终不得安"。班第、鄂容安等将此奏闻。乾隆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帝以阿睦尔撒纳叛迹昭著，密令班第将其在军中诛除，勿懦忍贻后患。但此时大部清军已撤，留驻兵丁仅五百人，班第等不敢举事，遂以朝廷将行分封四汗，诏令阿睦尔撒纳九月至热河行饮至礼，偕诸部台吉一同受封为由，催其入觐，欲就内地执杀。还令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与他之同行，暗中监督。阿睦尔撒纳与色布腾原本有约，但色布腾回京后，见情况有变，不敢为他代奏。阿睦尔撒纳待命不至，不得已而起程，沿途迁延，仍存侥幸。到八月中，尚无音信，疑事有变，恐入觐遭祸，遂谋叛乱。八月十九日，他行至乌鲁古河地，以距原牧地不远，诡言暂归治装，交出定边左副将军印信，由额尔齐斯河间道逃归。额琳沁多尔济次日醒悟，追之不及，乃驰报班第。阿睦尔撒纳派人抢掠台站，断绝清军粮道，公开号召伊犁诸厄鲁特起而为乱。于是，伊犁诸喇嘛、宰桑等争起响应，率兵抢掠伊犁。班第、鄂容安等带五百兵丁向崆吉斯撤退，二十九日，至乌兰库图勒，被赶来叛军重重包围，力战不支，班第自刎，鄂容安刺腹而死，萨喇尔被俘。刚刚平定的准噶尔重新陷入混乱之中。

画家李方膺去世　乾隆二十年(1755)，画家李方膺去世，终年六十一岁。李方膺，字虬仲，号晴江，别号秋池、抑园等，江苏南通人。他父亲李玉鋐官至福建按察使，很受雍正帝赏识。雍正七年(1729)，李玉鋐入觐时，雍正帝赐其第四子李方膺知县职。李方膺至山东乐安、兰山任知县，后因反对总督王士俊强令垦地而入狱。乾隆帝即位后，治王士俊罪，李方膺才被释复官，调任合肥，代理滁州知府。不久他因不肯逢迎而被罢官。其后寄居南京，卖画为生。李方膺善画松、竹、梅、兰及小品，主张直接向生活学习，创造出自己的艺术风格，曾自题梅花诗云："铁干铜皮碧玉枝，庭前老树是吾师，画家门户终须立，不学元章与补之。"用笔倔强放纵，不拘成法，老干新枝，苍劲有致，人称"蟠塞妖娇于古法未有。"他画的《风竹图》，以秃笔画竹叶，横涂纵抹，表现出竹子在风雨中飘摇的神态，情景交融，别有意境。他画的《游鱼图》，用简洁洗练的笔法，画出春水方涨时，一群活泼可爱的鱼儿在稻田里畅游的情景，表现了热爱生活，赞美自由的天然情趣。李方膺的作品，诗情画意和谐一致，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史学家全祖望去世　乾隆二十年(1755)，全祖望因病去世，终年五十一岁。全祖望字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人。乾隆时进士，改庶吉士。曾与侍郎李绂共同借抄《永乐大典》，世人渐知大典之可贵。全祖望尚气节，不肯逢迎权贵，为当事者排斥，散馆列下等，以知县用。遂辞官归里，专心著述。他家境贫寒，衣食难继，而笔耕不辍，写出许多重要的著作。他曾先后主讲蕺山书院和端溪书院。著有：《鲒埼亭集》、《外编》、《诗集》、《经史问答等》。全祖望人格高尚，重气节，生平推崇黄宗羲，承黄氏遗志，从四十二岁起，经过十年辛勤努力，续修完成《宋元学案》，为研究学术史作出了贡献。他还致力于宋末和南明史事及浙东乡土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为明末清初抗清死节的忠贞之士、耆旧先贤、进步学者，撰写碑铭志传，表彰他们的民族气节和高尚品质，记述其学术流派、造诣及品行，对后人了解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史大有裨益。

定八旗驻防兵丁置产留养例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初二日，清廷制定驻防兵丁置产留养例。此前，清廷规定，各省驻防兵丁不准在外私置田产，死后骨骸及寡妻，仍令各回本旗。因国家承平日久，内外相安，若仍照旧例办理，则在外当差者，转以驻防为传舍，未免心怀瞻顾，不图久远之计，而且咨送络绎，也觉纷烦，地方官颇以为累。于是，清廷遂制定此例，规定：嗣后驻防兵丁，准其在外置立产业，死后

即在各该处所埋葬，其寡妻停止送京。如有兵丁无力置地营葬，该地督抚则用公项置买地亩，作为穷兵公葬地。

八旗家奴出旗为民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初二日清廷定八旗家奴出旗为民例。清廷原来规定，八旗家奴因身隶旗籍，不能自由谋生。后来，由于八旗户口日繁，清廷感到与其拘于成例，致使生计日益艰窘，不若听从其便，俾得各自谋生，遂决定：在京八旗及在外驻防八旗奴仆，俱准出旗为民；其情愿入籍何处，各听其便，所有本身田产许其带往。以后每隔数年查办一次。

遣满洲人往拉林垦种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清廷决定遣三千满洲人往拉林垦种。清廷所以作此决定，是因为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恃一人钱粮，供多口食用，终恐拮据，因此便于拉林开垦地亩，建造房屋，挑取八旗满洲前往屯种。清廷对于前往者，由京起身之先，便每户赏银治装，沿途还供给车辆草束，到达后又给立产银两并官房田地，以及牛具籽种等。大约一户需银百余两，所遣三千满洲，用银不下数万余两。清廷还要求这些人到那里后，各宜撙节用度，努力垦种；稍有余暇，勤习骑射，以便学有所成，在彼处亦可挑取马甲差使。并警告说：设有不肖匪类，恣意横行，或不愿在彼处安生，潜逃来京，一经拿获奏闻，即于彼处正法示众，决不姑息。

伊犁得而复失 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阿睦尔撒纳反叛后，清廷将其罪状宣示中外，又治失察诸将之罪。同时，乾隆帝如期于九月在热河召见归降的厄鲁特诸部台吉，照四卫拉特旧制，封噶拉藏多尔济为卓罗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漫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任命策楞为定西将军，玉保、富德、达尔党阿为参赞大臣，哈达哈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征讨阿睦尔撒纳。新封四汗皆愿率部从征。十一月，命玉保为前队率领清军与厄鲁特四部兵丁，西出巴里坤，向伊犁进发。一路上在诸部台吉、宰桑配合下，与各路叛军作战，或剿灭、或招抚，进军比较顺利。阿睦尔撒纳此时屯兵博罗塔拉河，四出剽掠，十二月，进占伊犁。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清军到达吐鲁番，萨喇尔从伊犁脱身来迎，玉保率队长驱而西，各路清军向伊犁靠拢，阿睦尔撒纳见势对己不利，弃城逃走，清军收复伊犁。玉保引兵追击阿睦尔撒纳，至特克勒河，探知离叛军仅有一日程地。忽然有人来报，说台吉诺尔布已将阿睦尔撒纳擒获。玉保相信，遂屯兵不进，并急报主帅策楞。策楞不审虚实，率尔露布告捷。二月中旬，乾隆帝闻报大喜，为策楞、玉保等加官晋爵，以军务告竣颁诏天下。阿睦尔撒纳却借此缓兵之计，向哈萨克境内逃去。策楞、玉保知道真相后，不去追捕，反倒互相推咎，借口马力已竭，屯兵伊犁。四月十六日，乾隆帝以策楞、玉保乖张失机，命将二人革职，解京治罪。命达尔党阿为定西将军，富德为副，任追剿事，又以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负责应援。五月，达尔党阿率兵二千，哈达哈率兵四千，由西、北两路追剿阿睦尔撒纳。七月，清军大败哈萨克与阿睦尔撒纳联军二千余人，继而又以寡击众，再创告捷，追及只隔一谷，相距二三里，“贼仓卒不及驼载”，阿睦尔撒纳易服而逃，几乎被擒。不料阿睦尔撒纳故技重演，使一哈萨克人又施缓兵计，说什么欲擒阿睦尔撒纳来献，但需待其汗至，请大军缓行稍待。达尔党阿听信其言，下令驻军。致使阿逆从容逸去。北路军在哈达哈率领下进至四颜山，遇哈萨克阿布赉叛军千人，也不迎击，任其远逸。从征厄鲁特各台吉、宰桑见前后两将军“见卖无能”，心生轻视之意，遂相继背叛，都统和起被诱杀。阿睦尔撒纳闻四部构乱，自哈萨克返回，与新叛各部台吉、宰桑相会于博罗塔拉河，自立为四部总汗，继续为乱。伊犁再陷。策楞、玉保于解京途中也被乱兵杀害。

青滚杂卜撤驿之变 乾隆二十一年(1756)七月，青滚杂卜发动撤驿之变。青滚杂卜系成吉思汗后裔，喀尔喀和托辉特部郡王，在清军征讨达瓦齐时，他以参赞大臣随北路军出征。北路邮驿，向归喀尔喀应役，自准部用兵以来，军报络绎不绝，需用马驼、兵丁、跟役颇多，给喀尔喀人带来骚扰。青滚杂卜等王公贵族也以连年用兵为累，因而在进军途中与心怀异志的阿睦尔撒纳颇亲近，将班第、鄂容安等参奏阿睦尔撒纳事私行泄露。阿睦尔撒纳反叛后，清廷追究责任，将科尔沁亲王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削爵，亲王额琳沁多尔济处死。青滚杂卜对此十分不满，谓我喀尔喀本成吉思汗后裔，例不治罪，散布流言，并在乾隆二十一年七月，撤所设台站，公开反叛。在他影响下，一些随军出征的喀尔喀王公亦纷纷撤回守卡兵丁，抢劫台站财物，劫掠过往商人。一时间，北路台站自十六站至二十九站尽撤，邮路断绝，文报不通，对平叛大军极为不利。清廷命章嘉呼图克图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同喀尔喀各王公会盟，晓谕属下擅离座卡台站之人，各回原处当差，防止叛乱扩大，孤立青滚杂卜。同时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调兵进讨，令尚书纳延泰、侍郎阿桂等协助。不久，各台站次第恢复，青滚杂卜逃至中俄边界处，十一月被阿桂拿获，伏诛。

乾隆帝第二次南巡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十一日,以免江苏、安徽、浙江累年积欠钱粮,赈江苏清河等十九州县水灾,乾隆帝奉皇太后启銮出京师,开始第二次南巡。免经过直隶、山东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被灾地方十分之五。二月,免经过江南、浙江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受灾地方十分之五。初五日,奉皇太后渡河,至天妃闸,阅木龙。免江南乾隆十年以前清项积欠,免两淮灶户乾隆十七年至十九年未完折价银两。十三日,渡江,诣范仲淹高义园。二十二日,至苏州府,奉皇太后临视织造机房。阅兵于嘉兴府后教场及石门镇。二十七日,奉皇太后至杭州府,因接驾绿营兵丁吹奏箫管细乐,传谕吹竹弹丝,技近优伶,嗣后营伍中但许用钲鼓铜角,其箫管细乐概行禁止。三月十八日,奉皇太后至江宁府,免江宁、苏州、杭州三府附郭诸县本年额赋。亲祭明太祖陵。二十三日,以史贻直接驾沂州,命仍入阁办事。二十八日,渡河。四月初四日,至徐州阅视河工,见所过桃源、宿迁、邳州、睢宁等处,百姓鹑衣鹄面,相望于道,降旨赈期展至五月,截留漕粮,以备平粜,又将积欠籽种、口粮全行免去。亲阅高堰、清口、徐州等处工程,并与司河务诸臣详加筹酌,将所有应疏应筑各项,以工代赈,同时并举,分任大臣,以专其事。以黄河至徐州渐窄,北岸苏家山一带,又复迫束大溜,近城石堤,最为重要,应培旧筑新,加强其防护能力,命尚书刘统勋等善为经理,加紧督催,务于伏汛前竣工。六塘以下,为沂沭诸水下游,积水无由宣泄,洼地多成巨浸。或建滚坝,或筑涵洞,或开沟渠,著侍郎梦麟确勘办理。下河高宝诸河,入江入海各有分途,小港支渠,或浅或淤,以致水无所归,不特兴、盐七邑被患,高宝首当其冲,城垣庐舍可虑,命副总河嵇黄,于昭关设滚坝一座,其下复开支河,南关旧坝改筑滚水石坝。徐城南北各工,仍令张师载、高晋办理,务于四月完工。初五日,至孙家集阅视堤工,命将高堰、武家墩面北一带河堤改用砖砌。初六日,渡河,至荆山桥、韩庄闸巡视。初十日,至曲阜谒孔林。二十六日,还京师至圆明园。

清军再定准噶尔 先是,定边右副将军兆惠闻厄鲁特诸部复叛后,以一千五百兵自济尔噶朗河转战而南,沿途杀敌数千,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至乌鲁木齐地区,因连日数百战,军中无坐骑,官兵皆步行雪淖中,所食惟瘦驼疲马,至特讷格(今阜康县),遂不能冲击,而敌众又会集而来,处境极为困难,乃结营自固。其时军食将尽,又值大风雪,恰巧侍朗图伦楚率巴里坤兵来迎,方才解围。兆惠得新兵,剿平巴雅尔部,回到巴里坤。乾隆帝知兆惠可当重任,又以绰罗斯、辉特二部叛乱,认为厄鲁特人不可以德招服,非灭其种族,边疆不得安宁,决定发兵大剿。三月,命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出北路,大举征讨。当时,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为其兄子噶尔布所杀,台吉尼玛复杀噶尔布,诸部皆内讧;且又痘疫流行,厄鲁特人患者皆死。兆惠等乘势进兵,累战皆捷,对参与叛乱的台吉、宰桑及其部属尽行杀戮,甚至对投降的首领及壮丁也不放过,诸叛酋先后败死,准部大致平安。阿睦尔撒纳闻知清军所向披靡,自博罗塔拉河向西逃窜。兆惠穷追,至哈萨克部。其汗阿布赉已与阿睦尔撒纳生衅,又惧怕清军,遂遣使清廷,誓擒阿酋以献。正好阿睦尔撒纳率二十人往投,阿布赉便派人收其马匹。阿睦尔撒纳惊逸,携八人徒步入俄罗斯境。清军在阿睦尔撒纳遗弃的车内,发现俄人勾引其"加入俄国籍"的四封信。理藩院行文俄国,索要阿睦尔撒纳,被拒绝。八月,阿睦尔撒纳患痘死。几经交涉,俄国于次年正月,将其尸体送至恰克图,清廷派人相验无误。至此,持续三年之久的平叛战争宣告结束,准噶尔部再次平定。

彭家屏获罪 彭家屏,字乐君,河南夏邑人。康熙时进士,累官至江苏布政使,因病辞职。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乾隆帝二次南巡,彭家屏接驾。乾隆帝召见他时,询问地方情形,遂奏河南夏邑、永城等四县,上年遭水灾严重。乾隆帝询问巡抚图尔炳阿,却奏并不成灾。乾隆帝遂命图尔炳阿与彭家屏一同前往查勘,如受灾实重,即办赈济,不可回护。后来乾隆帝驾过徐州,见灾民困苦状,想到夏邑等地与徐州接壤,受灾村庄不知如何,便派步军统领衙门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观音保访得夏邑等四县,连岁未登,灾地未固,夏季未种,穷民景况不堪入目,还从那里收买童男二人,只用钱四五百文。乾隆帝回銮北还时,夏邑民人张钦拦道诉县吏讳灾,请易贤者为县令。乾隆帝以"玩视民罪",将图尔炳阿革职,诸县吏均坐罪。至邹县,又有夏邑民刘元德控县吏施赈不实。乾隆帝怀疑有人主使,命侍卫成林将刘元德等押回河南究审,了解到彭家屏及诸生段昌绪唆使情况。成林到夏邑与知县召段昌绪不至,去其家捕捉,于卧室中抄出吴三桂叛乱时发布的反清檄文,上面还有段昌绪的"圈点"加批,赞赏称快。乾隆帝闻知大怒,令严加追查抄自何处;又以彭家屏曾在云南任职,怀疑其家也藏有此类文字,便召彭家屏至京师,诘问有无传抄吴三桂檄文及其他禁书。彭家屏回答家中藏有《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及明季野史数种,未曾检阅。乾隆帝责其设辞逃避,命夺职下刑部,使人至其家查验。彭家

屏子传笏将书焚毁，乾隆帝命逮段昌绪、彭传笏入狱。后来，彭家屏以“狂悖无君”罪，命在狱中自尽。图尔炳阿以缉邪功大，讳灾罪小，仍留原任。

回部二和卓叛乱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五月，回部大小和卓布拉尼敦和霍集占，自立为汗，发动叛乱。天山南路清代称回部，维吾尔族人民世居其地，信仰伊斯兰教，以农耕为生计。康熙十七年(1678)，噶尔丹乘机侵入回疆，掠其首领阿布都实特，拘禁于伊犁。命阿巴克居叶尔羌，以准噶尔人为昂吉，管理回部各城，征收租税。康熙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败亡后，阿布都实特至京师，受到礼遇，被清政府护送回叶尔羌，令掌回疆事。后其子玛罕木特为和卓，为众尊服，欲据叶尔羌独立，摆脱准噶尔统治，策妄阿拉布坦将他俘获，并囚禁于伊犁。玛罕木特生二子，长曰布拉尼敦，次曰霍集占，即所谓大小和卓，拘留伊犁，使督回民垦地耕种。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征讨达瓦齐，平定伊犁，霍集占兄弟得释。班第等奉旨将布拉尼敦遣回叶尔羌旧地，使安抚各处回众。霍集占仍留伊犁，掌管回教事。阿睦尔撒纳叛乱，霍集占“率众助逆”，清军平叛再入伊犁。阿睦尔撒纳逃走，霍集占亦返回叶尔羌。清廷欲借大小和卓之力，招服回众，和平统一南疆。布拉尼敦“欲安集回地各城人民，听候大皇帝谕旨。”而霍集占不从，认为“莫若与中国抗拒，地方险远，内地兵不能即来”，且准噶尔已灭，近地并无强邻，收罗各城，可以自立。布拉尼敦等听从。于是霍集占传示属下，整顿鞍马器械，欲自称汗。库车、拜城、阿克苏三城阿奇木伯克(城主)鄂对等不响应，走伊犁依兆惠。乾隆二十二年(1757)五月，霍集占兄弟据叶尔羌、喀什噶尔，称巴图尔汗，将前往招抚的清军副都统阿敏道杀害，集众为乱。

雅尔哈善得库车空城 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将“霍集占罪状”宣谕回部各城，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额敏和卓、哈宁阿为参赞大臣，顺德讷、爱隆阿、玉素布为领队大臣，率师征讨。五月，雅尔哈善等统满汉官兵万余人，由吐鲁番进至库车城下，发动进攻。此城依附山岗，用柳条沙土密筑而成，十分坚固，叛军据城固守，清军屡攻不克。霍集占兄弟闻报后，穿越戈壁滩大沙漠，急驰来援。清军领队大臣爱隆阿统兵截击，两战皆胜，敌兵死伤过半，霍集占引残部逃入城内，闭门不出。雅尔哈善未能乘机强攻，而是围城绝粮待其自毙。六月初，城中饮食困难，弹矢将尽。原库车城伯克鄂对了解敌情，熟悉地形。向雅尔哈善指出，霍集占困守危城，食力已尽，必不肯坐而待缚，定会乘我不备突围而去，返其巢穴，整兵复来，那时将难以对付。并说其逃走之路只有两条：一是由城西鄂根河水浅处渡河而去；一是由北山口通向戈壁，逃往阿克苏。“若于二路各伏兵一千，则贼酋可擒矣”。雅尔哈善不听其言，不加防备，不巡营垒，终日奕棋，饮酒为乐。六月二十四日傍晚，有一位索伦老兵，闻城中驼鸣，似负重载，立即回营，向雅尔哈善报告说：驼鸣高目健，敌人要逃跑了。雅尔哈善不信，一笑置之，饮酒如故。结果霍集占等率四百余骑乘夜遁去。都统顺德讷闻报，令待天明发兵。及晓往追，敌人已渡河断桥远飏而去。雅尔哈善以炮攻城不下，改挖地道，为守兵察觉，清军守城兵丁尽被焚死。八月，守城敌将阿布都克勒木乘清军不备，又率四五十骑夜遁。结果，库车城内所余老弱三千余口，二十五日出降。雅尔哈善围攻三月，仅得一空城。乾隆帝得讯，十分震怒，命将顺德讷、雅尔哈善处死。

兆惠被围黑水营 两和卓逃出库车城后，清廷命定边将军兆惠移师追击，乾隆二十三年(1758)八月，兆惠率前锋驰抵库车城。时两和卓逃奔阿克苏，伯克霍集斯闭城不纳，投奔乌什，又被拒之城外。于是，小和卓霍集占回叶尔羌，大和卓布拉尼敦据喀什噶尔，东西成犄角之势，以为背城一战之计。兆惠一路追击，先后抚定阿克苏、沙雅尔、乌什、和阗等回部诸城，大伯克霍集斯等率属归顺。此时清军尚未到齐，兆惠命副将军富德留驻阿克苏，自领步骑四千余人先行，越过戈壁滩，行程一千五百里，于十月初抵达叶尔羌，在城东四十里辉齐阿里克地方，隔叶尔羌河，选择有水草处扎营，因此河又称黑水河，故名黑水营。兆惠分兵八百，使副都统爱隆阿带领，扼住喀什噶尔敌人来援之路。十月初六日，清兵二千余人，分七路进攻叶尔羌城，占领城东北一座高台，追敌至城下。守兵出战三次，退回城中。叶尔羌城高大坚固，清军仅能围其一面，无法攻克。兆惠欲引敌出城野战，便于十月初三日率轻骑渡河，劫城南英峨奇盘山牧场。谁知方渡四百骑，而桥忽断，城中敌人五千余骑突出袭击。兆惠率师奋突迎战。敌步兵万余继来，敌骑复张两翼围攻兆惠军，使隔河清兵不能救援。清军人自为战，杀敌千余，浮水还营固守。总兵高天喜、前锋统领鄂实、副都统三格、侍卫特通额等一百余人相继阵亡，将军兆惠亦多处负伤。敌乘胜渡河，围困清军。兆惠一面派人突围至阿克苏，请后继部队来援；一面将军情驰报朝廷。在被围期间，他临危不乱，团结全军将士，严密防守，沉着应战，伺机杀敌。在粮食奇缺，弹药不足的处境下，想尽办法打击敌人，坚守待援。结果，历三月之久，敌人不能跨进清营一步。

经学家惠栋去世 乾隆二十三年(1758),经学家惠栋因病去世,终年六十二岁。惠栋,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元和(今吴县)人,为乾嘉汉学吴派的开山人。惠栋曾祖有声、祖周惕、父士奇,皆清初知名学者。他们继承顾炎武以来的传统方法,主张治经应从研究古字古音入手,通过训诂去弄懂经义,这对惠栋有很大影响。惠栋长于治易,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等。他反对宋人说易,也反对魏晋时期王弼等人空言注易,而专宗汉人虞翻之说,参考荀爽、郑康成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人称由此使"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惠栋所著《古文尚书考》,考订出东晋晚出二十五篇为伪,而以郑玄所传二十四篇为孔壁真古文,较阎若璩更为缜密,使晚出古文尚书为伪乃成定论。但是,由于惠栋专注于汉学的森严壁垒,对汉人易说搜辑钩稽不遗余力,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不加鉴别,兼收并蓄,也导致了博而不精,泥古信古的流弊。惠栋的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及以后的王鸣盛、钱大昕等。他们恪守惠栋尊崇汉儒说经的宗旨,别立门户,形成了和宋学相抗衡的"汉学"壁垒,又都是苏南人氏,故被称为"吴派"。

黑水营围解 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月二十日,驻阿克苏头等侍卫舒赫德看到兆惠派人送去的告急文书和爱隆阿的移文,立即飞章入奏。十一月十三日奏折到京,乾隆帝看后十分震惊,下令调集兵马前往援救。即日授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阿里衮、舒赫德等为参赞大臣,即速从阿克苏率兵驰援,解兆惠黑水营之围。同时,又派兵六千赶赴叶尔羌,拨银三百万两,解赴甘省备用。十二月初四日,舒赫德等领兵三千五百余名,马一千七百余匹,从阿克苏起程。富德于十月初十日,闻兆惠被围,即从乌鲁木齐选五百余名官兵日夜奔驰,十二月二十五日,与舒赫德在巴尔楚克相会,遂冒雪前往驰援兆惠,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初六日,富德等率军行至呼尔满地方,遇敌五千骑,转战四昼夜,杀敌颇众,布拉尼敦及大伯克数十人受伤,遂得再进军,而距黑水营尚有三百余里。人困马死,敌人众多,层层阻截。正月初九日,富德等到达沁达尔,遭回军激烈攻击,不能前进。值此危急关头,驻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奉命领兵六百,马驼三千,乘夜而至,爱隆阿也领兵千余名赶到。他们在夜间遥望火光十余里,知清军与敌相持,即横张两翼,大呼进击,直压敌垒。富德等乘机挥军掩杀。三路军同时奋击,大败敌军,十三日至叶尔羌河岸,距黑水营仅二十里。兆惠在营察觉围营敌兵减少,又听远处有炮声,知援军已至,便派人通信息。十四日,富德等分兵两路急进,兆惠乘机率军冲出敌围,内外夹攻,歼敌数千。两军会合,振旅返回阿克苏。长达三月之久的黑水营之围,终于以清军安全撤退而解除。

平定回疆 黑水营解围,兆惠、富德率军返回阿克苏,稍事休整,即派兵收复和阗等城。又遵照乾隆帝谕旨,筹画攻取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城,擒歼霍集占兄弟。乾隆二十四年(1759)五月,内地增派的兵马粮饷,陆续到达阿克苏,新旧官兵合计三万人。六月初,两路进军,兆惠由乌什取喀什噶尔,富德由和阗取叶尔羌,各领兵一万五千人。此时,大小和卓的处境已与前大不相同。因他们偏信从伊犁带回的人众,疏远回疆旧部;又以战争期间,赋税繁重,催敛凶横,因而遭到广大维吾尔族人民怨恨。加之黑水营之役,清军被围三月,坚守不屈,最后胜利解围而去,使和卓部众惊骇,皆无斗志。因此,霍集占兄弟闻清军大举来攻,深为恐惧,不敢再议战守,遂携妻子部众,驼载辎重,弃城而去,逃亡葱岭以西。闰六月,兆惠、富德各领兵至,两城回民争献牛酒果饵,扶老携幼,跪迎道左。喀什噶尔、叶尔羌两城抚定后,兆惠留喀什噶尔,办理善后事宜,富德等率军追击霍集占兄弟。先以明瑞统前锋千余人,追至霍斯岭,斩敌五百。七月七日,大军齐集,追至阿尔楚山,富德等指挥清军列阵攻敌,杀敌千余,斩其骁将阿布都等。三日后,追敌至伊西尔库河,两岸皆山,形势险峻。布拉尼敦护送家属辎重先行,以做逃跑之计,霍集占率众据北山,欲决死战。山脚下有路逼河,仅容单骑,清军分扼路口,敌无处逃遁。清军以铳手攻击,又用火炮向北山射击,同时命鄂对与霍集斯树回纛,大呼招降。回众蔽山而下,声如奔雷。霍集占挥刃砍杀,亦不能止。降者一万二千余人,获驼马牛羊万余。霍集占兄弟携家属及旧仆四百余人,向巴达克山逃去。富德遣人致书索取,其汗素勒坦沙擒杀两和卓,函其首而献。至此,回疆平定,天山南路统一。

兆惠等抚定喀什噶尔等城事宜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二十二日,定边将军兆惠抵达喀什噶尔城后,即安抚回众,并将设官、定职、贡赋、铸钱及驻兵分防等事宜列款具奏。一、喀什噶尔地居西北,距嘉峪关六千余里,城周十余里,城中回人二千五百余户。东界乌什、阿克苏,西界安集延、布鲁特,南界叶尔羌、北界布鲁特,总计大小十城七村庄,一万六千余户,数十万口。二、各城村办事官员,以阿奇木总理一城,伊沙罕协助办事,下设管理租赋、刑名,水利、匠役、捕盗、经教、屯田、馆驿、园林等职。三、岁贡赋数,比噶尔丹策零时酌量减免。原来每年纳粮六万七千腾格(一腾格折制钱五十文),纳粮四万零八百

九十八帕特玛(一帕特玛准官石四石五斗),减至每年纳钱六千腾格、纳粮四千帕特玛。四、共交官兵进剿粮饷折钱一万三千腾格,俱折收粮石。五、回部原行钱文,每文重二钱、一面铸准噶尔台吉名,一面铸回文;应行改铸,每文重一钱二分,一面铸“乾隆通宝”汉文,一面铸叶尔羌满文及回文。八月,兆惠等又将办理叶尔羌善后事宜奏闻。叶尔羌所属二十七城村,计三万余户、十万余口。在噶尔丹策零时,每年纳钱十万腾格,请减为每年纳钱一万二千腾格。其它各项,如喀什噶尔办理。十二月,舒赫德又酌定和阗六城贡赋,议定谷石,按十分取一减收,其采玉、采金等项,也酌量减征。此后,乾隆帝又命回部诸伯克三年轮班入觐;自伊犁至叶尔羌,屯田驻兵,分屯劝垦,以资军用。

画家汪士慎去世 乾隆二十四年(1759),画家汪士慎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四岁。汪士慎,字近人,号巢林,安徽歙县人。一生清贫,客居扬州,卖画为生。他性格孤傲,与世无争。不幸在五十四岁和六十七岁时,先后害眼病,双目失明。因此,生活更加穷困潦倒。处在当时世态炎凉、凄惨寂寞的境遇中,汪士慎没有退缩,反倒自我安慰说:“衰龄忽尔丧明,然无所痛惜,从此不复见碌碌寻常人,觉可喜也。”而且,还练习着用手摸索写字作画,经过艰苦努力,竟至“工妙胜于未瞽时。”汪士慎善于画竹与梅,同时工篆刻和八分书。刻印与高翔、丁敬齐名,评者谓“汪似胜高”。他的八分书,师法汉代碑刻画象石题字,具有清高孤傲的风韵。他所画梅,清淡秀雅,透出一股疏香冷气。此外,汪士慎还工诗,有《巢林诗集》传世。

经学家顾栋高去世 乾隆二十四年(1759),顾栋高去世,终年八十一岁。顾栋高字复初,又字震沧,晚年自号左畬,江苏无锡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曾任内阁中书。雍正时,以奏对越次罢职。归里后专意著述,自壮至老,手不释卷,遂博通六艺。乾隆十五年(1749),诏举经明行修之士,栋高亦被荐,授国子监司业衔,奉命归里。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巡接驾,召见于行在,加祭酒衔,御书“传经耆硕”以赐。顾栋高著述甚多,主要有:《大儒粹语》二十八卷,《尚书质疑》二卷,《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篇》三卷,《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其学尚未脱理学气,《大儒粹语》即为调和各家之说所作。《尚书质疑》共四十一条,是对书中一些问题,提出疑问,发表自己的议论。《春秋大事表》是他最著名的一部经学专著,倾注了他毕生治学的心血。该书将春秋一代大事,分析归纳列表五十,附加舆图,使研究者可以一览而了然其大势。条理详明,议论精当,多发前人所未发,是一部治经兼治史地的佳作。其治《诗》,也能纵观各家之长短,主张立论不可先持成见,应以理权衡,以免偏主之失。

授回疆诸伯克 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清廷命阿布都拉为乌什阿奇木伯克,阿什默特为和阗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为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鄂对为叶尔羌(今新疆莎车)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氏为阿克苏阿奇木伯克,索勒屯和卓为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十二月,各伯克入觐,乾隆帝于瀛台设宴召见。

移民实边 乾隆帝于清军统一天山南北地区之后,积极推行移民实边政策,用以发展新疆地区的经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月初九日,颁他谕说:国家生齿繁衍,自乾隆元年(1736)至今,二十五年之间,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而提封止有此数,余存颇为艰难。而且古北口外一带,以往历代皆号岩疆,不许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立业,养育子孙,获利甚丰。假若从而禁止,不准他们出口垦种,是损害百姓利益。现在乌鲁木齐、辟展各处,屯政方始兴办,客民已源源不断地前往贸易,茆簷土锉,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去营生耕作,荒地开辟,就食者日多,对国家治理百姓的根本大计十分有益。利益之所在,虽欲禁止,而不能止。清廷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后,新疆屯田迅速发展,计有兵屯、回屯、民屯、旗屯等,总计十余万人,都归乌鲁木齐管辖。自官田之外,其馀土地听民自占,农桑、土地、徭役、赋税与内地无异。国家赋税百万,地不加增,而户口日盛。

以阿桂总理伊犁事务 乾隆二十五年(1760)八月,清廷授阿桂为都统,命总理伊犁事务。阿桂,字广廷,满洲正蓝旗(后隶正白旗)人,大学士阿克敦之子。先是,讷亲督师讨金川,奏请以阿桂参军事。及讷亲获罪,提督岳钟琪并劾阿桂,逮部治罪,后得释。准部叛乱,命阿桂赴乌里雅苏台,与靖边将军成衮扎布搜讨准部逸兵,遇事奋勉,始渐任用。准部平定,又从富德合剿回众,至是还伊犁。西域既平,地方万余里,必须驻兵镇守。命各军营大臣等议,皆谓其地辽远,难驻守。阿桂独上言:“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臣观伊犁海努克(今伊宁县南)等处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若开垦屯田,则兵食可渐充。”乃上屯田方略:一、请增派回人屯田;二、请官兵驻防协同垦种;三、请建置城郭;四、请预备马驼。乾隆帝嘉其勇往任事,即如所议行。阿桂总理伊犁事务后,酌留马匹,分设台站,以通文报往来。不久,又请将沿边运

出粮米俱赴伊犁，简各省军流人犯中能工匠技艺者悉发伊犁，以备任使。后阿桂督造农器、促屯耕种，岁获大丰。

画家李鲜去世 乾隆二十五年（1760），画家李鱓去世。李鱓，字宗扬，号复堂，别号懊道人，墨磨人等，扬州府兴化县人。康熙五十年（1711）中举，康熙五十三年（1714）以画充内廷供奉，不久以"才雄颇为世所忌"，被排挤出宫廷。后任滕县知县，"为政清简，士民怀之，以忤大吏罢归"。回乡后，常到扬州卖画。坎坷不平的功名仕途，使李鱓的理想遭受打击，心情感到压抑，因而在生活上放纵自己。他的苦闷情绪只能借书画加以抒发。为摆脱"剥啄催租恼吏频，水田千亩翻为累"的处境，他曾"复作出山之想"，终未实现。在绘画艺术上，李鱓早年曾学画山水，当内廷供奉时，尊康熙旨令，随蒋廷锡学画花卉，后又从指头画家高其佩学习。在此基础上，他建立起自己的花鸟画风格，并取得一定成就。后来他受石涛豪爽奔放画法的启迪，用破笔泼墨作画，风格为之大变。李鱓主张绘画要"自立门户"。其画挥洒自如，酣畅淋漓，纵横驰骋，不拘绳墨。但也有部分作品，因受心情影响，流露出一种颓唐情绪。

紫光阁落成赐宴 乾隆二十六年（1761）正月初一日，以紫光阁落成，乾隆帝命画大学士公傅恒等诸功臣像于阁。又赐大学士、画像诸功臣，并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台吉等一百七人宴，回部郡王霍集斯等，叶尔羌入觐伯克萨里等，哈萨克汗阿布赉来使苏勒统卓勒巴喇斯等十一人与宴。

密折奏报京员贤否 乾隆二十六年（1761）正月二十四日，御史吕光亨奏请京员于察典之外，照外省督抚分别属员贤否例，令该堂官各行密陈。乾隆帝以为这样可以于循例考察外，得各抒所见，以备参考，不独有裨于校核人材，即大臣之衡鉴公私，亦了然可睹，于辟门达聪之道，不无裨益。但每岁入告未免太繁，应定于京察前一年举行一次。又部院属员众多，主事、笔帖式等以下，尚在造就储才之列，可不列入。不久，清廷定如下章程：各部院郎中、员外郎以上，俱令各堂官详加察看，填注切实考语，分一、二、三等，于京察前一年十月内，具折密奏，不得会商附和。至内阁侍读与员外郎一体较俸升转，虽秩止六品，应由内阁具奏。科、道由都察院密奏；宗人府副理事官以上，由宗人府密奏；赞善以上，由詹事府密奏；编修、检讨以上，由掌院密奏。其坐补原部及在部办事候补人员，应一体列入，使知惩劝。盛京各部及内务府各衙门，凡有员外郎以上等官者，均照此办理。

弛贵州汉苗通婚之禁 乾隆二十六年（1761）六月，以黔省民、苗错处，往来密切，通婚以来，数十年相安无事，一旦复申禁令，转致惊疑，且恐兵役借端挟诈，更滋烦扰，清廷准黔省汉苗结亲，概免查禁。

颁给四部诸伯克印信 乾隆二十六年（1761）八月，清政府将回部三十一城，分为三等：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为四大城；乌什、库车、英吉沙尔、辟展为四中城；沙雅尔等为二十三小城。准各城俱设阿奇木伯克，依城等级，颁给分寸不同印信。

乾隆帝第三次南巡 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月初二日，乾隆帝决定奉皇太后开始第三次南巡。行前，诏免江南三省积欠钱粮。十二日，离京启銮，免经过直隶、山东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受灾地方十分之五。赈顺天、直隶、文安等二十八州县上年水灾，免山东惠民等十五州县卫历年民欠银谷。二月，赈江苏高邮、安徽太和等十六州县水灾。初八日，奉皇太后渡河，阅清口东坝、惠济闸，登舟巡视河堤。十五日，免两淮灶户从前带征未完折价银两，对两淮盐商原有加衔至三品者，加奉宸苑衔，未至三品者，加按察使衔，其余按原衔俱加一级，以示奖励。又准自壬午纲始，二年内，纲盐、食盐每引加赏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十七日，至焦山阅京口水师。至苏州，谒文庙行礼。三月初一日，奉皇太后至杭州。次日，至海宁阅海塘，命岁修老盐仓一带百余里柴塘，增坦水石篓，以资拥护，并命修尖山、塔山之间石坝。免江、浙当年未完地丁、屯饷、漕项，又灶户课银。旋登观潮楼，阅福建水师。赐浙江诏试贡生沈初等二人举人，进士孙士毅等二人并授内阁中书。初十日，奉皇太后临视织造机房。加钱陈群刑部尚书衔。二十六日，祭明太祖陵。幸两江总督尹继善官署。赐江南诏试诸生程晋芳等五人举人，与进士吴泰来等三人并授内阁中书。二十九日，渡江。四月，阅高家堰、谕令济运坝至运河口五百余丈土堤一律接建砖工，并规定高堰五坝水志，"上坝增一尺之水，下坝开一丈之门，"以解除下游水灾。回銮至河，命庄亲王允禄等奉皇太后，由水路回程。自登陆由徐州阅河工。以黄河淤沙渐积，经常瀑涨，各处闸坝宣泄无节，致下游被灾，命于徐州水志长到一丈一尺五寸时，方准将毛城铺以东唐家湾引河开放，水落即行堵闭。洪泽湖清口并照此例行。旋阅峄山湖，至邹县祭孟子庙。再至孔庙行礼，谒孔林，登泰山，至玉皇顶拈香。免山东齐河等四十四州县卫所上年水灾额赋。至德州行宫，迎送皇太后登舟，命刘统勋会勘景州疏筑事宜。五月，至涿州，赈长芦所属仓州七县及严镇等七场上年受灾灶户，免赋不等。初四日，回京住圆明园。初八日，至黄新庄迎皇太后回銮，居畅春园。

新疆实行军府制 清军平定准噶尔和回部叛乱之后，清政府在天山南北地区，筑城驻兵，设官建置，实行军府制。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始命明瑞为伊犁将军，驻节惠远城，总统天山南北两路军政事务。下设都统、参赞大臣，统领乌鲁木齐、巴里坤、塔尔巴哈台等处驻军。南路与伊犁相通之叶尔羌、喀什噶尔、哈密等处驻扎官兵，亦归伊犁将军兼管。其地方军政事务，由各处驻扎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办理，如有需用伊犁官兵之处，准咨商将军，就近调拨。各回城又设阿奇木伯克，管理本地事务，受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辖治。

学者江永去世 乾隆二十七年(1762)，学者江永去世，终年八十二岁。江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人，学问渊博，对经学、音韵学、算学均有较深造诣。江永少年时就学乡塾，见明丘浚《大学衍义补》，书中多征引周礼，感到惊奇，便借抄《周礼》，朝夕讽诵。此后努力治经，凡《十三经注疏》，古今制度及钟律、声音舆地无不探赜索隐，追本溯源，而对天文、地理亦甚留意。乾隆间诏举明经之士，人欲举荐，他辞谢不就，寄书弟子戴震说："驰逐名场，非素心也。"江永著作宏富，有：《七政衍》一卷、《金水二星发微》一卷、《冬至权注》一卷，《历辨》一卷，《岁实消长》一卷，《历学补论》一卷，《中西合法拟草》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乡党图考》十一卷，《律吕阐微》十一卷，《律吕新论》一卷，《春秋地理考实》四卷、《古韵标准》六卷、《四声切韵》四卷、《音学辨微》一卷、《周礼疑文举要》六卷、《仪礼释宫增注》一卷，《深衣考误》一卷、《礼书纲目》八十五卷、《读书随笔》十二卷、《考订朱子世家》一卷、《河洛精蕴》九卷、《近思录集注》十四卷、《四书典林》四十卷等数十种之多。江永治学成就可分为礼学、音韵学与乐律学、历算学三个方面。礼学以《周礼疑义举要》最精，其书融会郑注，参以新说，于经义多所阐发，解释《考工记》尤为精赅。至《礼书纲目》，因以朱熹晚年所作《仪礼经传通解》未成书，故作此书完成朱子未竟之绪。天文历算之书，则推阐梅文鼎之学说，而使之愈加详明，间亦纠正其疏漏。音韵学方面，其《古韵标准》一书，以诗三百篇为主，谓之诗音，而以周秦以下之近古者附录谓之补韵。清初音韵诸书，除顾炎武外，这是最有系统的著作。其《四声切韵表》，考究切韵，对入声分析尤详。至于音乐之作，如《律吕新论》、《律吕阐微》，运用算学知识，考订推算，分析入微。礼学、算学、音学，在清代形成专门学问，江永对此均有相当贡献，故受到乾嘉诸大师的尊敬。

定职官犯罪脱逃治罪例 乾隆二十八年(1763)四月初十日，乾隆帝阅看刑部本章，内有瑞昌县知县刘景福疏纵革职千总朱振清脱逃事由，便勒令查阅原参治罪本案。发现该千总先因侵用旗丁粮米被参革职，后又畏罪潜逃，而刑部仅引用平民犯罪脱逃律例，加等定案，然后又援赦减为流徒。乾隆帝认为这样执法，殊未明允。他指出：职官与常人地位身份不同，常人因罪逃跑，加等惩处，于法已足；若身为命官，一但犯罪，只有束身归罪而已，竟悍然潜逃匿迹，行同鬼蜮，蔑视刑章，若不分别差等，加以惩儆，则君子怀刑之义何在？且既为职官，自然不应当与常人一例看守，致其轻易逃脱。于是，刑部遵旨定职官犯罪脱逃治罪例，主要内容有：嗣后职官负罪逃脱，除罪应斩决、绞决者毋庸议外；斩候、绞候，改为斩决、绞决；军流改绞候；徒改军流；杖笞改杖一百，徒三年。

大学士史贻直去世 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十四日，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史贻直病逝，终年八十二岁。史贻直，字儆弦，江苏溧阳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由检讨五迁至侍进学士。雍正初年，在南书房行走，迁吏部侍郎，奉命至河南按治总督田文镜劾信阳知州黄振国等事。雍正七年(1729)，再次受命到福建，按治巡抚朱纲劾按察使乔学尹等事。雍正九年(1731)，征准噶尔，受命协理陕西巡抚办输饷事。雍正十年(1732)，以湖广转饷艰难，上奏请在河南府陕州傍河诸州县积谷，实行转搬之策，为雍正帝嘉纳。不久授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七月召还。乾隆帝即位后，署湖广总督，贻直令属员勘筑长江、汉水堤，一千三百余丈；又会同巡抚高其倬平定湖南城步苗乱。后被召回京师，历任工、刑、兵、吏部尚书。乾隆九年(1744)，授文渊阁大学士。乾隆二十年(1755)，令致仕回籍。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南巡，史贻直迎驾，令在家食俸。不久召还京，仍授大学士。史贻直去世后，入祀贤良祠，谥文靖。

果亲王弘瞻被革爵 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果亲王弘瞻被革爵停俸。弘瞻是雍正帝第六子，因为果毅亲王允礼死后无子，庄亲王允禄等请以弘瞻为其嗣，承袭王爵。弘瞻善于诗词，雅好藏书。御下极严，遇有不法之人，立加杖责。崇尚节俭，喜欢居积，曾开设煤窑，占夺民产。随从乾隆帝南巡时，私托两准盐政高恒售卖人参牟利，又令织造、关差以贱价代买绣缎、玩器，占公家便宜。圆明园失火时，他居住最近，而到得最迟，并且与诸皇子谈笑如常，对火灾毫不戒意。乾隆帝为此很不高兴，又闻知他在大臣选拔官员时，为门下私人向阿里衮请托。于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十三日，乾隆帝宣谕发其罪状，痛

加训饬说：果亲王弘瞻，为朕幼弟，从小教养，冀其成才。但弘瞻却屡蹈愆尤，不知绳检。奉命到盛京恭送玉牒，谩奏先赴行围等候，种种谬戾乖张，不可胜举。又其家赀岁赢巨万，不能厚养母妃，反倒时常索取。又在外面交结浸渔，不顾颜面，目无法纪。如不加惩罚，则劣风难止。于是弘瞻被革去王爵，永远停俸，以观后效，并解除一切职务。

定州县官无故赴省参处例 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月初十日，吏部议定州县官员无故赴省参处例。主要内容有：各省官员缺出，需要派人代理，该管督抚可在试用人员及邻近府、州、县佐杂人员内拣选委任，而不得委任相距太远的人员署理公事。至于紧要员缺，人地相需，仍听任督抚斟酌办理。如果有人擅离职守，无故赴省，查参时照擅离职役例，处以罚俸；久驻省城，逗留不归者，照移驻官员恋居城邑，不即移驻例，处以革职。如果督、抚、司、道不进行揭参，督、抚降一级留任，司、道、府降一级调用。

大学士梁诗正去世 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一月十四日，东阁大学士梁诗正病逝，终年六十七岁。梁诗正，字养仲，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及第，授编修，迁至侍讲学士。乾隆帝即位，召命南书房行走。乾隆三年(1739)，补侍讲学士，升户部侍郎，曾上疏说：八旗生齿日繁，不设法令其自力更生，全由国家供养，势难久长。东北兴、盛二京地，沃野未能尽辟，可以酌派旗人前往屯种，使其世享耕牧之利，以时讲武，还可实边。至绿营兵饷，岁用钱粮之半，冗额浮支岁不下数十百万。其增设兵额可以酌量裁汰，以后遇有开除空缺，即令停止募补。乾隆十年(1746)，升户部尚书，又上奏疏说：每岁租赋，扣除兵饷和各项经费后，所余仅有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请以节俭为要，不大兴土木，要避免进行战争。此后，梁诗正转任兵部、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乾隆十五年(1750)，调吏部尚书。乾隆十七年(1752)，梁诗正以父年高乞回籍奉养。乾隆二十三年(1758)丁父忧，召署工部尚书。乾隆二十五年(1761)，服阕，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二十八年(1764)，授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死后谥文庄。著有《失音集》、《西清古鉴》等。

《皇清职贡图》修成 乾隆二十八年(1763)，《皇清职贡图》书成。该书是清代官修地理书，从乾隆十六年(1751)开始编辑，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完成七卷，乾隆二十八年(1763)续成一卷，合卷首共为九卷。第一卷载朝鲜、英国、法国、日本、荷兰、俄罗斯等二十余国。第二卷以下分载西藏、新疆、东北、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各民族，绘有男女图像，并附简短说明，叙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生产、生活和风俗等情况。

弛禁蚕丝出洋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清政府决定弛禁蚕丝出洋。此前，因内地丝斤、绸、缎等物价值渐昂，经御史李兆鹏等先后条奏，请定出洋禁令，以裕民用。但实行时间已久，内地丝价不但未减，有的地方反而更贵。可见生齿繁衍，需用增多，丝价上涨，是人口增长的自然结果，并非因出洋造成。此外，出洋的丝斤，都是土丝及二三类粗糙丝，非腹地绸、缎必用的精好物料。而禁止出洋，则江浙所产的粗丝，反不能得利，既无益于外洋，更有损于民计。况且，所产粗丝不准出洋，势将搀杂在头等好丝之内，一体售卖，这对民间织造尤多未便。当时，英吉利、加喇巴等国，曾先后以丝织业缺料为由，向清朝恳请贷买，已得到旨准。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出洋丝斤弛禁，准予限量出口。

著名小说家曹雪芹去世 乾隆二十九年(1764)，著名小说家曹雪芹逝世。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是著名小说《红楼梦》的作者。其先世为汉族，后为内务府正白旗包衣。自曾祖起，三代任江宁织造。其祖父曹寅能诗文、善词曲，很受康熙帝信用，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康熙帝六次南巡，有四次住在他的府内。接驾办差耗银数十万，加上平日生活奢华，造成极大亏空。雍正初年，整顿财政经济，曹家受到追查；又受继位政争的牵连，雍正五年(1727)，曹雪芹父曹頫被革职抄家，仅留北京部分财产，作为养赡家属之资。雍正六年，曹雪芹随父母由南京迁居北京。乾隆初年，雪芹十五六岁时，曹家又遭祸变。从此，这个赫赫百年的"钟鸣鼎食"之家，便彻底败落。以后，曹雪芹迁居北京西郊，过着瓮牖绳床，举家食粥，卖画沽酒的贫困生活，在贫病交迫，穷愁潦倒中，从事《石头记》(即《红楼梦》)的创作，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于写成八十回《石头记》手稿。小说《石头记》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描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兴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生动地反映了封建大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斗争，批判了封建制度的黑暗与腐朽，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势。因此，人称《红楼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和百科全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书中也反映了作者为封建制度"补天"的幻想和找不到出路的悲观情绪。

书画家金农去世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

代杰出的书画家金农去世。金农，字寿门，号冬心先生，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平生以"布衣"为乐，好古力学，能为诗与古文，精于鉴赏金石、书画。喜游历，客居扬州。工隶书，笔法朴厚；楷书自创一格，号称"漆书"。篆刻，得秦汉法。五十岁后，始作画，凡画竹、梅、鞍马、佛像、人物、花鸟、山水，俱造意新奇，苍劲朴拙，风格高逸，尽脱时俗。其号甚多，因画而异。画竹号稽留山民，画梅号昔涯居士，画花鸟号龙梭仙客，画人物号耻春翁，画马号冬心先生，画佛号心出家盦粥饭僧，画山水号曲江外史。有《冬心先生集》等行世。金农与汪士慎、李鱓、黄慎、罗聘、高翔、李方膺、郑燮合称为"扬州八怪"。

秦蕙田去世 乾隆二十九年（1764），秦蕙田病逝，终年六十三岁。秦蕙田，字树峰，号味经，江苏金匮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兼太子太保。居官勤谨，深为乾隆帝所倚重，在朝二十余年，公余之暇，闭门谢客，专力经术，自谓："儒者舍经以谈道非道也，离经以求学非学也，故以穷经为主。"生平尊崇学者，奖励后进。所著有：《周易象日笺》、《味经窝类稿》、《五礼通考》。其中，《五礼通考》最具学术价值，亦因此书而确立他在经学中的地位。该书依照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将五礼分为七十五类，凡乐律、天文、推步、勾股、割圆、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无不收载，体大物博，历代典章俱备，保存中国古代礼制史材料极多，使用价值可与《文献通考》相匹。

乾隆帝第四次南巡 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乾隆帝开始第四次南巡。行前，诏免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历年因灾未完地丁、漕项银两。十六日，奉皇太后由京师出发，免直隶、山东经过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三。二月，渡河，阅清口东坝木龙、惠济闸。免江苏乾隆二十八年以前熟田地丁杂款旧欠，以及经过地方州县本年额赋之半。闰二月初一日，至苏州。谒文庙，免江宁、苏州、杭州附郭诸县本年丁银。免浙江经过地方本年赋税之半。初七日，奉皇太后至杭州。至海宁阅塘工，命将五百三十丈绕城石塘，全部筑成三层坦水，原来二层坦水内有桩残石缺处，查明更换，以收护城保塘长效。观潮后，回杭州。加沈德潜、钱陈群太子太傅。三月，幸焦山，奉皇太后驻跸江宁府，亲至明太祖陵奠酒，临视尹继善署。十一日，奉皇太后渡江。阅高家堰堤工，奉皇太后渡河。召尹继善入阁办事。四月十二日，驻跸德州，命简亲王丰讷亨等奉皇太后从水路回程。乾隆帝由陆路，于二十一日返京。二十四日，迎皇太后居畅春园。

乌什回民起义 乾隆三十年（1765）二月，新疆乌什回民起义。清政府驻乌什城办事大臣素诚酗酒宣淫，"甚至留各伯克妻于署，令兵役裸逐为乐"，民众痛恨无处投诉。同时，他还任意加重当地的徭役和赋税，对回民进行种种科派和苦累。乌什城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暴戾无亲"，经常纵容属下强行抢买回民布匹粮食，夺去他们肥壮的马匹羊只，却将瘦弱的加倍抬高价钱卖给百姓。因此，乌什人民与驻地满回官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乾隆三十年二月，素诚强征当地回民二百四十人运送沙枣树，派赖和木图拉负责护送，但却不告知运送地点。运送夫役向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询问，阿布都拉不仅不告诉，反而用木棒责打询问者。回民忍无可忍，于二月十四日夜里，在赖和木图拉的率领下，拿起武器，进攻驻守乌什的清军，素诚和阿布都拉登山抗拒，被起义者包围。素诚自杀，阿布都拉被擒。乾隆三十年（1765）八月十五日，清军攻进乌什城，乾隆三十年八月十五日，明瑞督兵竖云梯登城，经过激战，城被攻陷。清兵入城，尽诛丁壮，将幼童及妇女发往伊犁。乌什城回民坚持七个月之久的起义终于被镇压。

定巡查与俄国疆界例 乾隆三十年（1765）八月二十日，根据黑龙江将军富僧阿等奏请，清政府定巡查与俄罗斯疆界例：自黑龙江至格尔必齐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七里至头堪山；自黑龙江入精奇里江（今结雅河），北行至托克河口，计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里至兴堪山；自黑龙江经精奇里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复过英肯河，计水程一千三百零五里，自英肯河口行陆路一百八十里至兴堪山；自黑龙江入钮曼河（今布列亚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默勒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十五里，自河口行陆路四百五十六里至兴堪山。呼伦贝尔与俄罗斯接壤之额尔吉纳河，处处设有卡座，直至珠尔特地方。自珠尔特至莫里勒克河口，添设二卡；于索博尔罕添立鄂博。黑龙江城与俄罗斯接壤处，有兴堪山绵亘至海。以上地区，每年派官兵，于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两口及鄂勒布、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呈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等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最后均报兵部备案。

定举人铨选例 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十九日，据吏部议奏，清廷定举人铨选例。嗣后各督抚于接到部文日，定限一年内，行文调取各举人据实验看。其年力尚健，堪膺民社者，给咨赴部候选；原就教职者，准在本省具呈。若年在七十岁以上，不堪供职，免其调取验看。该督抚题请赏衔。举人已经拣选，原系候选知县，应从优以中书科中书、大理寺评事、太常寺博士等衔，由吏部掣定，奏请赏给；其已经截取，

愿得职衔者，亦照此办理。举人应选班次，有知县、直隶州州同、监库等大使三项。知县双月用五甲、五举、四捐、三升；单月用四补、四捐、四甲、四举。捐班无人，以举人抵补。捐例人员用完后，其抵捐举人，改为举人抵班。直隶州州同，双月用四举、一捐，单月用一应补、一举。两班后，用捐纳一人，如应补无人，以举人抵选。盐库等大使缺出，一补、一捐、一举，如应补无人，以举人抵用。拣选举人发往各省试用者，不拘升调缺，概准题补。举人分发各省试用者，止准题补升调遗缺，至挑选人员。以教职铨补者，学政、教谕，双月，用挑选举人二员，将班内应用人员，选用一人；单月将挑选举人，与应补人员轮用。

诗人画家郑燮去世　乾隆三十年(1765)，郑燮去世。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县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惠政。他出身贫苦，颖悟好学，蔑视权贵，同情人民，赋性旷达，人以为狂。弃官后，居扬州卖画度日。他能诗、工书、善画，世称"三绝"。他主张作诗应反映社会生活，不同意王士祯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他写的《私刑恶》、《悍吏》、《孤儿行》、《潍县竹枝词》等诗，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表达了对民间疾苦的关心与同情。他的书法，以画法入笔，折中行书和隶书，创造出一种自称"六分半书"的书体，纵横错落，飘洒有致。绘画方面，擅长花卉木石，尤工水墨兰竹。笔墨劲秀，风致潇洒，自然清新，独具魅力。其笔法效法石涛，兼得徐渭等笔意。但他自述画竹无所师承，主要是通过观察自然，细心体验和构思，幻化创作而完成。他说："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又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他的画格调清新，为人喜爱。他还主张绘画艺术，要"慰天下之劳人"，反映其情趣。他的一首题画诗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把文人画的涵义，引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天算学家明安图去世　乾隆三十年(1765)，明安图去世。明安图，字静庵，蒙古正白旗人。幼年即选为官学生，入"钦天监"学习，后任钦天监监正，与修《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御定仪象考成》。因法国传教士杜德美用连比例演周径密率(即计算圆周率)及求正弦、正矢之法，"藏匿根数，秘而不宣"，"故作繁难，以炫异欺愚"。明安图遂发奋钻研割圆术和求圆周率的新方法，积思三十余年，著《割圆密率捷法》初稿。该书不仅独立地论证了杜德美秘而不宣的三个公式的"立法之原"，而且创造了十个新公式，合前总称为割圆十三术：圆径求周、弧背求正矢、弧背求正弦、弧背求通弦、弧背求矢、通弦求弧背、正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矢求弧背、余弦求正弦正矢，余矢余弦求本弧、借弧背求正弦余弦、借正弦余弦求弧背。第一次突破了用几何方法求圆周率近似值，采用解析方法计算圆周率，用连比例归纳法证明割圆术。明安图的《割圆密率捷法》，被清代学者称为"明氏新法"，明安图被誉为"弧矢不祧之宗"。

杰出篆刻家丁敬去世　乾隆三十年(1765)，丁敬去世。丁敬，字敬身，号钝丁，别号龙泓山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丁敬的篆刻吸取秦汉及前人长处，善用切刀法刻印，苍劲质朴，别具一格，为浙派"西冷八家"之首。他爱好金石文字，工书能诗。著有《武林金石录》、《砚林诗集》等。

普免各省漕粮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初一日，乾隆帝以国家安宁，疆宇式辟，北庭、西域二万余里尽隶版图，外有耕屯之收获，内无粮饷之馈劳，而且连年丰收，仓有余粟。命所有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应输漕米，著照康熙年间例，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为始，按年分省通行蠲免一次。各省蠲免次序为：山东、河南，江苏，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此次蠲免漕粮，总计约四百万石。

授郎世宁侍郎衔　郎世宁，意大利人，出生米兰。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画家兼建筑家。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北京传教，不久任清朝宫廷画师，曾参与增修圆明园建筑工程。擅长肖像、花鸟、走兽，尤工画马。他的作品参酌中西画法，注意透视和明暗，注重写实，刻画细致。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郎世宁因病在京去世。初十日，乾隆帝以他自康熙年间入直内廷，颇著勤慎，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内府银三百两，料理丧事。

皇后那拉氏去世　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在乾隆帝秋狝木兰期间，皇后那拉氏忧愤而死，年约五十。皇后那拉氏，佐领那尔布女。雍正时为皇子弘历的侧室福晋。乾隆二年(1737)，册为娴妃。乾隆十年(1745)，进封娴贵妃。孝贤皇后死，又进封皇贵妃，摄六宫事。乾隆十五年(1750)册立为皇后，历次巡游，都随乾隆帝同行。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四巡江南，抵杭州，因皇帝宴游失度，皇后极力劝谏不听，遂怒而剪发，以此忤旨，乾隆帝以其犯国俗之忌，命人将她先送回京师，从此失宠。三十一年七月，乾隆帝得知皇后那拉氏去世消息后，命"所有丧仪止可照皇贵妃例"办理。后来被安葬在裕妃园寝，未能如孝贤皇后那样葬于胜水峪地宫之内。皇后

那拉氏生二子：永瑆、永璟。女一，早死。

杨应琚罢官　先是，缅王莽纪觉时，屡发兵攻中国云南普洱车里等地。乾隆三十年(1765)，莽纪觉死，其弟孟驳立，势益张，焚掠横肆，逼近思矛内地。为了保境安民，乾隆帝命地方官员调集军队，对缅军"大加惩创"，穷力追剿，肃清边徼。于是，云贵总督刘藻调遣绿营、土练七、八千人进剿，因指挥不当，三路皆败。一时督抚提镇束手无策。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清廷将刘藻革职，调陕甘总督杨应琚任云贵总督。是年三月，杨应琚到任，正值当地"瘴疠大作"，缅军掠抢退去之时，镇将乘机收复孟艮、整欠、车里等土司地。杨应琚派人"正经界，集流亡、厘户口、定赋税"，设官、定职，上奏朝廷。然后会集所属文武官员商议进兵。有腾越副将赵宏榜"首陈木邦、蛮莫各土司愿内附，缅酋势孤易取状"，应琚信其言，欲出兵攻缅。迤西道陈作梅、永顺总兵乌尔登额等皆议边衅不可开，杨应琚不听。遂奏缅甸易取，机有可乘，请求出兵征讨。乾隆帝以"全盛之势，不防乘时集事"，同意进兵。于是，扬应琚计划调兵一万四千人，于八月进攻。他一面行文缅甸，号称合各国精兵五十万，载大炮千门，将入境证讨；一面遣人至缅属诸部劝降，各部犹豫观望，归附者仅为一些小部落。六月，杨应琚派赵宏榜带兵五百出铁壁关，乘机袭取新街，扼住金沙江口，蛮莫、木邦、整卖、景线等土司次第内附。九月，应琚至永昌受降。此时，缅甸已调兵数万，分路来攻。先占木邦、景线等地，再从水路取新街。时刘天佑等领兵四百往援，敌兵数千猝至，天佑战死。宏榜力拒二日一夜，兵力不支，焚辎重器械，突围逃回铁壁关。杨应琚闻警，痰疾发作。乾隆帝命侍卫福灵安前往探视，并密令察看军情。十一月，提督李时升进驻铁壁关，遣诸将分路出关，欲图收复木邦及新街等地。在双方相持不下时，缅甸佯乞罢兵，分军绕出万仞关，纵掠永昌、腾越边境，破铜壁关而去。杨应琚隐瞒真情，而屡与李时升连署奏捷，并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月，慌报缅甸遣使乞和，疏请罢兵。乾隆帝从其奏报中看出破绽，遂连降严旨，责其欺饰。不久福灵安也将赵宏榜、李时升失地退守，慌报战功等情奏闻。乾隆帝大怒，遂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月，将杨应琚革职解京。经廷讯后，令其自尽。授明瑞为云贵总督，经理征缅军务。

《闲闲录》案祸殃众学者　乾隆三十二年(1767)五月，蔡显《闲闲录》文字狱案发生。蔡显，字景真，号闲渔，江苏华亭人，雍正年间举人，在家乡教书为业，著有《闲闲录》、《红蕉诗话》、《宵行杂识》等书，自行刊刻流传。这些书中记载了一些地方官绅的不肖言行，被当地官绅怨恨。于是，他们摘取书中的一些诗句，诬指为怨望讪谤之词，又散发匿名揭帖进行陷害。蔡显自信无罪，便携带自己的书籍向当地官府自首，希望当事者为之剖白。不料这些官员竟将书内失志怨愤之语指为罪证，将蔡显定凌迟处死罪。乾隆三十二年(1767)六月初五日，乾隆帝以蔡显身为举人，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重新审理此案。先阅原书签出各案，多为侘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及细检《闲闲录》等书未被签出之处，见有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羹尧案得罪；又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行怒嗔"。等诗句，乾隆帝认为这是"有心隐约其词，甘与恶逆为伍"，命将蔡显改为斩决，其子蔡必照改为斩监候，将蔡显书籍通行销书毁版，所有为书作序和帮助校刻的二十四名学者，分别遣戍边远地方。

明瑞征缅破蛮结　乾隆三十二年(1767)五月，明瑞以云贵总督兼征缅将军赶赴永昌，先后调集满汉官兵二万六千余人，议定两路出师，会攻缅甸国都阿瓦。九月二十四日，清朝大军分路出境，一路由明瑞统兵一万七千，由宛顶向木邦攻锡箔；一路由参赞大臣额尔景额领兵九千，由虎居关往老官屯攻猛密，约于阿瓦会师。明瑞统军出发时，正值连日大雨，山路泥泞，人马阻滞，行进迟缓。至十月初十日，始到宛顶。十八日进入木邦，缅兵已经弃城而去，遂留兵五千，令参赞珠鲁纳统领驻守。明瑞率兵一万二千继续前进。十一月，造浮桥渡大垒江抵锡箔，缅兵千人退守大生桥南岸。清军绕道过江，击溃敌兵，斩杀五百余人。十一月二十九日，到达蛮结附近，缅兵数千突然从密林冲出交战，明瑞麾军厮杀，斩敌二百余人，敌兵退去。明瑞登山了望蛮结形势，见敌人甚多，所设十六寨，俱在险要处，密林之内，隐约见有埋伏，复列象阵。明瑞遂与诸将商定先攻中坚之策。十二月初二日，领队大臣观音保领兵先据山左，哈国兴等分三路登山，向下俯冲，直逼大营；明瑞等率先冲击，兵士奋勇，先以刀砍伤大象，使其倒奔，冲突缅兵，敌军败退。黔兵十余人奋勇跳入大寨木栅内，众兵乘势攻入，缅兵披靡。一连又破三垒，战至二更，其余十二寨之敌乘夜遁去，蛮结尽破。这一仗计杀缅兵二千余人，明瑞督军作战，被击伤一目，犹自坚持指挥。捷报至京，乾隆帝十分高兴，嘉赏众将，授明瑞一等诚嘉勇毅公。

明瑞败死小猛育　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二月，明瑞率军破蛮结之后，孤军深入，行至小猛育，粮尽援绝。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初十日，战败自缢

而死。清军在蛮结重创缅军后，本已人困马乏，粮饷不继，处境险恶。领队大臣扎拉丰阿、观音保劝明瑞乘胜回木邦，整旅再进。明瑞忿而不听，率军继进。行至象孔，离阿瓦仅七十里，但导引无人，迷失道路，粮食将尽。明瑞知道会攻阿瓦无望，又怕猛密军已至，自己身为将军退兵，依法当斩。其实，额尔景额进军猛密时，途次老官屯，为敌所阻，相持月余病死，诏命其弟额尔登额代替，战益不利，而明瑞不知。明瑞闻说猛笼有粮，且地近猛密，遂至猛笼就食，果得粮二万余石。时至岁暮，驻七日始行。因不得猛密消息，决定取道大山，转由木邦还师。此时缅人得知清军粮尽，派兵追击。明瑞等领兵且战且退，与诸将轮番与敌交战，故日行不过三十里。至大山附近之蛮化，清军扎营于山顶，缅军扎营于山腰。明瑞以敌军轻我太甚，决意设计回击。于是令兵士于次日五鼓，照往常吹号角三遍，而预伏大军于深箐，敌军闻号角之声，以为清军将退，争相上山。不料清军枪炮齐发，四面进逼，敌无去路，死者约四千人。自是，不敢再追，每夜在数十里外开炮轰击数声则止。清军留蛮化五日，以所获牛马犒师。后得波龙人导引，从间道退出。在明瑞军陷入困境的同时，原来留守木邦的珠鲁讷等五千人，也在缅军攻击下，全军覆没。至此，明瑞军与内地联系全部断绝。乾隆帝得知明瑞孤军深入，久无消息，多次下令额尔登额援救木邦，而他却畏敌如虎，不敢径进，反而绕道退回宛顶，逗留不前。明瑞孤军奋战，退至距宛顶约二百里的小猛育，遇敌兵四五万人追击。清军分七营拒战终日，明瑞以援军不至，无法生还，遂分遣诸将率兵士乘夜退去。而自己与观音保等领亲兵侍卫数百人殿后御敌，终于力尽不支。观音保以遗矢刺喉而死；明瑞身负数伤，怕落敌手，力疾行二十里，割发授家人归报，自缢而死。乾隆帝闻报，以额尔登额屯兵宛顶，观望不救，逮至京师，凌迟处死。又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再征缅甸。

两淮盐政贪污案发　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两淮盐政贪污案发。据新任两淮盐政尤世拔奏：从乾隆十一年起，两淮盐政等官员商定，令盐商于每张盐引内多交税银三两，以备皇帝南巡办差和历年庆典赏赐用。按每年销盐二十万引至四十万引计算，二十余年内，总计多收税银一千余万两。而查阅档案，此项银两却从未上报。乾隆帝闻此深感骇异。遂命江苏巡抚彰宝密往扬州，会同尤世拔详查此事。不久彰宝回奏说：详讯两淮总商，令其开出清单，查历年提引各商，共获利银一千九百余万两，除历年办贡及预备南巡差务用银四百六十七万余两外，尚有各商未交余利银六百数十万两。想此项银两，必与盐政等暗行馈送情弊有关。复加严讯，总商黄德源等供：从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三十一年，共交过原盐政高恒银十三万五千余两，均系其管事顾蓼怀经手收进。尤世拔也奏称：普福任内支过八万五千余两。此事传出后，朝野震惊。乾隆帝立即命将原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盐运使卢见曾革职交审，并查封其任所资财和原籍家产。但是，经过查访和各级审讯，最后结案时，该案情却大为减轻，贪污银数也大大减少；高恒和普福所受银两，多数用于办差或公务；商人欠交的银数也只有三百多万两。乾隆三十三年(1768)八月三十日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隐匿提引银两，私行营运寄顿，被判为绞监候，秋后处决。九月十日，原任两淮盐政高恒受银三万二千两，普福私销银一万八千八百余两，均判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帝南巡时因为公捐银两赐予商人的顶带一律革去，所欠银两三百九十万，限令十年还清。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内阁候补中书徐步云等，因此分别被充军或革职。

黄教领导台湾冈山起义　乾隆三十三年(1768)，黄教领导台湾冈山人民起义。黄教是台湾冈山地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因为不堪当地封建政府的压迫，于乾隆三十三年夏秋之间，聚集贫苦农民二百余人，掀起反抗官府的武装斗争。当年十月初二日，黄教竖起大旗，直接向官兵驻地发动进攻，缴获大批武器军械。面对农民军的进攻，台湾镇总兵王巍胆战心惊，“观望数日，始带兵前进，离贼巢数里，辄行驻扎，施放空枪，自焚营帐。”乾隆帝闻报，急调福建提督吴必达率水陆军队数千渡海作战。在数倍于己的清军进剿下，黄教率领起义军退入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凭借有利地形，继续坚持斗争。在南起凤山、北至诸罗一带，出没无常，先后给进剿的清军以沉重打击，乾隆帝对王巍、吴必达等极为不满，下令将二人革职留任，戴罪擒贼自赎。与此同时，他还宣称：“黄教一日不获，此案一日不了。”并先后增调军队，继续向起义军发动进攻。在严旨督催下，当年三月底，主持进剿事务的叶相德等以重金收买叛徒，将黄教刺杀于诸罗山中。同时，又分率军队大举进剿，先后捕拿起义部众一百五十余人。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的黄教起义终于被镇压。

学者齐召南去世　乾隆三十三年(1768)，著名学者齐召南去世，终年六十六岁。齐召南，字次风，号琼台，晚号息园，浙江天台人。乾隆元年(1736)，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大清一统志》纂修官，武英殿校刊经史官，《明鉴纲目》馆纂修官。八年

(1743)充日讲起居注官。乾隆十二年(1747)充《大清会典》及《续文献通考》纂修官。翌年，授礼部侍郎。十四年(1749)，以母老已病辞官。归里后，主教蕺山、万松两书院。不久因同族齐周华文字狱，以循隐罪，拟流，抄家。乾隆帝念其年老赦免，给还部分财产，作为养赡之资。齐召南以病残之身，兼以恐惧抑郁，乾隆三十三年去世。齐召南性机敏，善考订，尤其熟悉史地掌故。所著有:《水道提纲》、《历代帝王年表》、《后汉公卿表》、《史汉功臣侯第考》等。其《水道提纲》专考河流，以郦道元《水经注》，明于西北而暗于东南，且对域外水道未详;黄宗羲《今水经》知南而不知北，固作此书予以补正。书中以巨川为纲，以所汇众流为目，故名纲目，条理清楚，注解详明，足资研究史地者参考。齐召南精于经史，所作《尚书》、《春秋》、《三传》、《礼记》等注疏考证及《汉书考证》后序诸篇，于经传源流得失，史籍版本异同，原原本本，无不洞悉。齐召南与杭世骏同试词科，同官翰林，交情最密，相知最深。杭世骏称《一统志》内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六省，皆齐召南所编辑。外藩属国，向无底本，为齐召南所创新稿。明史纲目前纪二卷，神、光、熹三朝，为齐召南所新辑。武英殿经史考证，齐召南立功尤多。周召南一生为学，自天文、历律，以至山川、舆地，无不究习。其《宝纶堂文钞》八卷及《续集》十八卷，为门人及后人所编辑校刊。

傅恒征缅议和罢兵　乾隆三十三年(1768)四月，缅甸因与暹罗交战，不想再与中国构衅。遂放回清军被俘士兵，令其代为致书清军统帅，请求纳贡息兵。副将军阿里衮据以奏闻，乾隆帝不允，决计再次对缅甸大举进攻。他下令从东北、福建、四川、贵州等省调拨满汉水陆官兵四万余名，派往云南军营待命;又将各地贮存、制造的冲天炮、九节炮、火箭、火罐等军用武器，以及避暑祛瘴药物等送往军前备用，还拨银二百万两，备马五六万匹以济军需，至年底准备就绪。乾隆三十四年(1769)二月，正式授傅恒经略敕印，并设宴为诸将送行。傅恒于二月二十一日离京，三月二十四日至滇。四月，与阿里衮、阿桂等议定进兵方略。傅恒力排众议，决定提前于七月出兵，又定三路进兵计划:一路由傅恒统率自戛鸠江(又称槟榔江)出河西，经猛拱、猛养，取木疏，直捣阿瓦，是为正师。一路由阿桂率领自江东，经猛密南行，为偏师。一路由阿里戛等率福建水师由江顺流而下，以为策应。当年七月二十日，傅恒自腾越起程，率军渡戛鸠江西行，猛拱、猛养献象、牛、粮食而归服。时缅甸正值秋收期，不及迎战，所以傅恒军行二千里，兵不血刃。但途中雨多路滑，驮马倒毙，兵士食宿不易，再加天气炎热，生病的人很多。傅恒改变原定取木疏、攻阿瓦的计划，收兵而回。十月，再率师至蛮莫与阿桂等相会合。大军将出伊洛瓦底河，缅军已列舟扼住江口，又分兵两岸拒敌。于是，哈国兴将水师，阿里衮、阿桂将陆军，分别在两岸前进。东岸敌先至，阿桂令矢铳齐发，骑兵劲旅从左右冲入，敌兵大溃。哈国兴等率舟师乘风进攻缅军水师，敌船自相撞击，杀溺数千人，河水变赤。西岸阿里衮军也连破敌栅，其余敌兵逃去。清军三路大捷。此时，傅恒与阿里衮染时疫病倒，诸将商议不攻阿瓦，可就近攻取老官屯。不料老官屯依坡临河，寨栅构筑十分坚固严密。清军进攻旬日不得进，采用大炮轰击，以火药炸，均不能破其栅;用老藤拉勾，又被敌兵砍断。而其栅有水门可通舟，故运粮械不绝。后阿桂拨战舰五十艘截其运道，敌始惧，方遣使乞和。当时，清军因水土不服，病者极多，加上战斗中伤亡，四万多官兵，只乘一万三千人，减员过半。阿里衮于十一月病故，傅恒也卧病不起。在这种情况下，闻敌方求和，诸将皆争请罢兵。在乾隆帝允准后，傅恒遂派哈国兴等前往敌寨议和，经过谈判，议定:缅甸对清朝称臣纳贡，归还俘虏，交回侵占土司之地;清朝以木邦、蛮莫、猛拱、猛养诸部人口，付还缅甸。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二月和约既定，清军即焚舟、镕炮撤兵。傅恒还京后，不久即忧愧而死。这场历时四年、耗帑一千三百万两的征缅战争遂告结束。

沈德潜去世　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因病去世，终年九十七岁。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南长州(今江苏省吴县)人。他自幼从吴县叶燮学诗，兼制八股文，但补诸生后，历岁科试三十余次，乾隆四年(1739)，始成进士，年已六十七岁。散馆时，乾隆帝称他为江南老名士，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五迁至内阁学士，乾隆十二年(1747)，命在上书房行走，升礼部侍郎，令校《御制诗集》，称赞他诚实谨厚。乾隆十四年(1749)，乞归里，命原品休致，令校毕《御制诗集》后放行。乾隆帝曾说:“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且令归里后有所著作，许寄京呈览。后进所著《归愚集》，乾隆帝亲为作序，称其诗与高启、王士祯相伯仲。乾隆帝南巡时，屡加封赏，又几次召至京师，加以优礼。沈德潜去世后，赠太子太师，谥文悫，入祀贤良祠，乾隆帝亲为作挽诗。沈德潜以诗名于时，他提倡的“格调”说，成为乾隆时诗坛一大派别的宗旨。他遵循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为诗应“微而婉，和而庄”，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为宗旨。他提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性情”即指符合正统观念的思想感情;“论法”是指作诗要师法古

人，古体诗要学汉魏，近体诗要学盛唐。他的诗论是继承叶燮和明代前后七子的理论，加上个人的体验发挥而形成的一种派别主张。沈德潜选辑的《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和《国朝诗别裁》风靡于当时。其著作有《归愚诗文钞》、《说诗粹语》等。

再免全国地丁钱粮一次 乾隆三十五年(1770)正月初一日，乾隆帝为了庆祝自己六十寿辰，根据"内外经费度支，有赢无绌，府库所储，月羡岁增"的财经条件，颁布谕旨，命从本年起，分三年时间，将全国应征地丁钱粮再行普免一次。同时还规定，"轮蠲之年，遍行劝谕各业户等，照应免钱粮十分之四，令佃户准值减租，使得一体仰邀庆惠"。此次蠲免钱粮总数，计有二千七百九十四万余两。

贵州巡抚良卿被斩 良卿，富察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七年(1743)进士，累迁至贵州巡抚。贵州产铅，岁采运供铸钱，以粮道主其事。乾隆三十四年(1769)八月，良卿疏劾威宁州知州刘标运铅不足额，短缺一百余万斤，并亏工本运价。乾隆帝命将刘标革职，令良卿详审。九月底回奏：刘标亏欠铜本脚价银四万八千三百余两，少铅七百余万斤，短工本脚价银十余万两，并劾该管粮道永泰，请派大臣会审。乾隆帝命内阁学士富察善至贵州会同良卿按治，遂将刘标任所及原籍财产查封。永泰向户部呈报刘标亏空缘由，因长官婪索，揭按察使高积营私枉法，事涉良卿。乾隆帝令解良卿职，又派刑部侍郎钱维城、湖广总督吴达善前往审讯。会乾隆帝接征缅副将军阿桂奏报，内附普安州民吴倎呈控官吏、土目借口军兴，私派累民，侵蚀恩赏银两状，命吴达善密勘；而刘标派人至户部诉上官婪索，并呈簿记，内有前任巡抚方世俊索银六千两的记录，命一并严鞫。吴达善先后疏言，刘标积年亏帑银至二十八万余两，良卿意存弥补掩饰，及见事不能掩，才以访闻奏劾；及追缴银六千余两，令留抵私填公项，不入查封，始终隐饰。高积贩卖存库水银二万六千二百斤，良卿与居住同城，交往密切，不行察究，败检不法，有意袒庇。良卿长支养廉银一千七百九十余两，以前布政使张逢尧及高积署布政使时支放。普安民吴国治诉知州陈昶借军兴私派累民，良卿即令陈昶会鞫，敷衍了事，以致吴倎贿驿吏，方得附奏折包内送达御前。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月，乾隆帝谕责良卿负恩欺罔，罪不止于违法婪赃，命即于贵州省城处斩。其子富多，富永，著削去旗籍，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为奴。高积、张逢尧、刘标皆坐罪。方世俊审实，得银千两，解刑部，绞监候，秋后处决。

渥巴锡回归入觐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初八日土尔扈特蒙古台吉渥巴锡在木兰围场入觐乾隆帝。土尔扈特蒙古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明末清初，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下，移居额济勒河(今苏联伏尔加河)下游。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共经历了七代、八位首领。这期间，土尔扈特蒙古部始终和清朝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乾隆二十六年，渥巴锡成为土尔扈特蒙古首领。这正是俄国叶卡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叶卡德琳娜女皇在封建贵族和大商人的支持下，对全国农奴加紧剥削和压迫的同时，对土尔扈特蒙古也实行高压政策，妄图达到完全控制整个部落之目的。以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首领们，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经过充分酝酿，决定离开俄国，返回祖国。乾隆三十五年(1771)十一月二十日，土尔扈特蒙古人民拿起武器，举行起义，踏上了东返祖国的征程。渥巴锡将三万三千户近十七万人的东返队伍组成三路大军，通过冰封的乌拉尔河，越过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多次粉碎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二十六日，到达伊犁河支流查林河畔，和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完成了武装反抗沙俄奴役、东返祖国的壮举。乾隆帝特派伊犁将军舒赫德主持接纳土尔扈特蒙古部事宜。当时，清政府赈济土尔扈特蒙古部众，计有牛羊二十余万头，米麦四万多石，茶二万余封，羊裘五万多头，棉布六万多匹，棉花近六万斤，以及大量毡庐等。此外，渥巴锡等土尔扈特蒙古首领在清政府精心安排下，还在九月初八日抵木兰围场，当天即在伊绵峪觐见乾隆帝，向乾隆帝进献了七宝刀、银削刀，还有弓箭、腰刀、鸟枪、自鸣钟表等物。乾隆帝以蒙古语和渥巴锡交谈。渥巴锡等随乾隆帝行围三天，于九月十三日离木兰围场，十七日到达承德避暑山庄。十八日，乾隆帝在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个别召见渥巴锡，同他进行长谈。渥巴锡向乾隆帝面述了东返历程和祖辈的历史。在承德期间，渥巴锡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所有盛会，赐宴万树园及溥仁寺，命设灯宴，观火戏等。九月三十日始，渥巴锡等土尔扈特蒙古首领分四批先后离开承德。清政府对渥巴锡等回归非常重视，乾隆帝撰写了《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对渥巴锡等土尔扈特蒙古首领分别授予汗、亲王、郡王等爵位，还按原来土尔扈特部系统，指定牧地，编设盟旗，给以妥善安置。

阿尔泰以金川事革职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二十日，大学士、四川总督阿尔泰因进攻金川

不力，被革去职务，留于军营效力。大金川首领莎罗奔死后，其兄子郎卡主持司务。郎卡日益肆虐，屡侵邻境，致使该地区社会动荡，人民生活不得安定。总督阿尔泰传檄宣抚，但郎卡抗不受命。后来，乾隆帝命阿尔泰传檄九土司环攻郎卡。在九土司中，和郎卡土地相邻、兵力相等的，只有小金川和绰斯甲布。阿尔泰未能利用小金川等力量以制约郎卡的跋扈，却以苟且息事为策，致使郎卡反与绰斯甲布联姻，又以女给小金川土司泽旺子僧格桑为妻，造成三部鼎联之势，其余土司不敢抗争。郎卡死后，其子索诺木袭土司职，泽旺老病，子僧格桑主事。索诺木与僧格桑关系更加密切。不久，索诺木诱杀革布什咱土司官，僧格桑攻扰鄂克什及明正两土司，大小金川势力更加鸱张。对于大小金川之事，阿尔泰惟图急于迁就了事，一味畏首畏尾，不愿也不敢承担攻克小金川的艰险重任。对此，乾隆帝多次发布谕旨对他进行严厉申饬。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乾隆帝对军机大臣谕示中，就指出阿尔泰总欲图姑息苟安，事事迁就，致使小金川反复滋衅。十一月二十日，乾隆帝终于以阿尔泰历载养痈，株守打箭炉三月不动，将其革职，而以温福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统兵进攻小金川。

乌鲁木齐建城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十七日，从伊犁将军舒赫德奏请，乾隆帝命建乌鲁木齐城，驻兵屯田。为严密设防，完善建制，清政府设乌鲁木齐参赞大臣一员，领队大臣一员，俱受伊犁将军节制。不久，因乌鲁木齐所属地方宽阔，而距伊犁遥远，兵民辐辏，应办事件众多，为有益于管辖兵丁，办理诸事，而于体制亦相符合，遂将参赞大臣缺改为都统一员，仍属伊犁将军节制。

钱度贪赃被处死　乾隆三十七年(1772)初，云南查获一起大贪污案，主犯是云南布政使钱度。钱度系科甲出身，乾隆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广西道监察御史，外授安徽州知府，转江安督粮道、河库道，二十九年升任云南布政使，乾隆三十三年擢广东巡抚，未及行，移广西巡抚，就任不久因故降调云南布政使。先是，乾隆三十四年二月，乾隆帝谕示军机大臣，就云南运解北京的铜历年短欠迟误进行责问。云南布政使钱度代云贵总督明德撰拟奏文，上疏辩解。乾隆帝正要采取措施进一步调查之时，乾隆三十七年初，云南省宜良县知县朱一深上揭于户部，控告钱度贪婪，勒令属员购买金玉。乾隆帝立命刑部侍郎袁守侗前往云南，会同云贵总督彰宝、云南巡抚李湖查审其事。三月初，贵州巡抚图思德折奏：钱度家人张林、顾安，送箱笼赴滇，带有金玉器件，已将其物截留，押送家人至滇查办。乾隆帝览奏后，立刻意识到钱度有贪赃行为，便命彰宝、李湖等立刻严讯钱度，务得实情。不久，江西巡抚海明折奏，拿获钱度家人王寿，查出白银二万九千余两，并钱度亲笔书信，言及或做地窖，或作夹壁，将这些银两好为收贮，以作永久之计。至此，钱度贪赃行为全部败露。原来，钱度遇放藩库支放铜本等项银两时，每百两扣平余银一钱七八分不等，计前后共发放银二千二百余万两，共扣平余银四万余两。此外，他还勒令属员购买玉器古玩，多收价银。乾隆三十七年(1772)七月二十六日，钱度被押赴法场斩首。

桂林兵败墨垄沟　乾隆三十七年(1772)五月初八日，金川败报奏闻京师，乾隆帝命将四川总督桂林革职逮问。桂林原是军机处行走兼户部侍郎，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被派往金川前线，十一月补授四川总督，掌平定金川事宜。十二月，即桂林授职之初，清军破硐克寨，连获小胜，军事形势尚属可以。但是，由于四川军营将领不睦，互相讦告，进攻小金川战事很快出现不利局面。乾隆三十七年三月，桂林率兵攻克小金川达乌，清军伤亡很重。四月，桂林遣将薛琮等人统兵三千，携五日粮，欲截小金川甲尔木后路，不料被甲尔木潜从后路抄截，被围在墨垄沟七昼夜。薛琮等派人向桂林告急，桂林却只图安逸，先回卡了军营，又陆续将明亮、铁保等军撤回，致使薛琮等孤立无援。当薛琮等差人越险来营禀称粮尽请兵救援，桂林竟说饿了自会出来等话，并不商议作何救援。结果，薛琮全军因粮尽饥馁，力不能支，乃全行覆没，突围而出的只有官兵二百余名。桂林不但不援救薛琮，而且到卡了后，又不以军务为重，一味狂妄骄纵，不住帐房，修立房屋居住，勒取属员供应，终日与人酣饮欢聚。乾隆帝将桂林革职拿问后，又以阿尔泰署四川总督，进兵事交阿桂专办。

停五年编审造册制　乾隆三十七年(1772)六月十八日，据李瀚奏请，清政府停止编审造册制。乾隆帝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编审人丁，旧例原因生齿繁滋，恐有漏户避差之弊，是以每届五年，查编造册，以备考核。今丁银既皆摊入地粮，而滋生人户又永不加赋，则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无裨实政。况各省民谷细数，俱经该督抚于年底专折奏报，户部核实具题，交付史馆记载，所以户口每年岁增多少，都可按籍查对，没有必要藉五年一次另行查办，徒滋纷扰而已。

杭世骏病逝　乾隆三十七年(1772)，著名学者杭世骏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八岁，杭世骏字大宗，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元年召试博学鸿词，授翰

林院编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经》、《二十四史》，纂修《三礼义疏》等。后因上书言事，有违乾隆帝谕旨，免死放归返回故里，从事撰述，教授学生，在当时学术界颇有影响。主要著作有《史记考证》、《三国志补注》、《道古堂文集》和《道古堂诗集》等。

开四库全书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十一日，乾隆帝命派军机大臣刘统勋为总裁，设纂修三十员及提调等职，以翰林院署内遍西房屋一区为办事之所，开馆纂修《四库全书》。先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乾隆帝向全国发出一道谕令，命各省官员广泛搜集前代遗书和本朝人著作，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由此揭开了纂修《四库全书》的序幕。不过，当时清政府只是下诏征书，还只着眼于收集，对编纂整部书辑录的大型丛书，还无明确设想。乾隆三十七年底，安徽学政朱筠一面把自己访得的书籍开单上报，一面将个人对办理此事的一些设想写成奏章，进给乾隆帝，希望得到采纳施行。朱筠建议的主要内容是：抓紧搜集罕见的旧刻本和抄本；充分利用皇家藏书；著录和校勘应当并重；除书籍外，对金石碑刻上的文字及图谱，也要留心搜集，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乾隆帝见到朱筠奏章，十分注意，命朝中大臣认真讨论，拿出具体意见和办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朝臣经过讨论，肯定了朱筠的建议，并商定选派翰林官员，开馆校勘《永乐大典》等书，还拟出具体条例，呈请批准。于是，乾隆帝决定成立纂书机构，开始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八年开馆到乾隆四十六年第一份告成，四库馆共任命正式馆员三百六十人。其中，正副总裁二十六人，总阅官十五人，总纂官三人，总校官一人，提调官二十九人，总目协勘官七人，四种纂修官兼分校官四十九人，缮书处总校官四人，缮书处分校官一百七十九人，专职分校官三人，督催、收掌、监造官四十三人。此外，开馆期间共征用、募用抄写人员三千八百四十一人。

编辑满文《大藏经》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十五日，乾隆帝命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认真校核，译成满文，令章嘉呼图克图负责其事，每完成一卷，即进呈一卷，以候裁定。

温福兵败木果木　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月初十日，定边将军温福在进兵小金川过程中，不幸战死。温福曾从兆惠征讨过回部大小和卓之乱，也曾主持过征缅军务，以勇敢善战闻名。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他受命指挥清军进攻小金川。起初，他统率官兵，奋勇向前，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自乾隆三十八年初，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当时，清军分三路进攻。温福以攻噶尔拉碉固路险，墙坚冻滑，改从别道攻昔岭，驻营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达，以守小金川之地。温福以为自己是主帅定边将军，又是大学士、兵部尚书，因而刚愎自用，获胜骄傲，居功自负，仗势凌人，轻视同僚。当进攻昔岭遭金川兵猛烈抵抗难以继进时，他不广泛听取意见，却修筑碉卡数以千计，将二万士兵分散于各碉卡之中，当需要向皇帝奏事时，才派兵进攻敌人碉卡。进攻时他不恤士卒，不谙地形，也不察敌情，致使官兵人心涣散。不仅如此，温福还以小胜自鸣得意，缺乏对全军的统筹安排，每天只和提督董天弼等人饮酒作乐。参赞大臣、都统伍岱上密折弹劾温福，说他自以为是，不听人言，以致众兵寒心。参赞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也赞成伍岱意见，但是，都被温福诡辩驳回，使乾隆帝只相信他，反而处分了伍岱和色布腾巴勒珠尔。参赞大臣海兰察对温福屯兵坚碉之下也十分不满，曾经扣刀讥讽温福说：身为大将，只知闭寨高卧，苟且偷安，不如饮刃自尽，也便于其他人竭尽全力。对这一切，温福置之不理，仍是因循苟且。温福将大营扎于木果木，命侍卫德尔森保领兵驻扎簇拉角克一带，令提督董天弼守底木达。由于清军防范松懈，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乘机让僧格桑派遣许多小头人由美卧沟出至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初一日夜，金川兵抢占了底木达，击杀董天弼，随后又夺占粮台，潜攻木果木。初八日，金川兵夺据炮局，初九日抢占大营东北山上木栅。初十日，僧格桑率军突然逼近清军大营，劫木栅，占卡寨，夺炮台，发火枪。在金川兵四面进攻下，温福仓皇失措，中枪而死。此外，四川提督马全，署贵州提督牛天畀，总兵张大经，副都统阿尔素纳、巴朗，御前头等侍卫德尔森保，副将二达色、多隆武、赵琮，参领观音保、德保、额尔塞、阿哈达，知州徐谂、吴璜、彭元玮、常纪，知府吴一嵩，以及主事、知县、同知、典史、副参领、护军校、骁骑校、协领、防御、都司、守备、参将、游击等，共一百余员，全部阵亡，兵士阵亡三千余人。木果木军营遗失米粮一万七千余石，银五万余两，火药七万余斤，大炮五尊。

《日下旧闻考》始编　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月十六日，乾隆帝命对《日下旧闻》一书详加考证，悉作补充，编为《日下旧闻考》。《日下旧闻考》由大学士于敏中、英廉任总裁，窦光鼐、朱筠等根据《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而成，于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刻版出书，是以往最大最完全关于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等的资料选辑。全书一百六十卷，仍沿用《日下旧闻》的编次目录。但是其中二十卷的国朝宫室、两卷的京城总记、四卷的皇城、十四卷的国

朝苑囿，则都是新增加的。此外，官署十二卷，原在城市门内，独立了出来；郊坰原六卷增为二十卷；京畿也从十卷增加到三十七卷。

阿桂收复小金川　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初六日，阿桂统率清军，收复小金川全境。乾隆帝自获悉温福丧身木果木之后，即抓紧进行再征金川的准备工作。他委任阿桂为定边将军，以丰升额、明亮为副将军，任命富德、色布腾巴勒珠尔、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又调集京兵、吉林兵、索伦兵、湖广兵、山西兵、云南兵共二万三千名，以后又陆续增派满、汉官兵至十万名；还筹拨大量军需银两和枪炮弹药。一切准备就绪后，阿桂即兵分三路，首先收复小金川。阿桂亲统西路兵马，色布腾巴勒珠尔固伦额附为参赞大臣，副将军丰升额统率北路，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副将军明亮统领南路，富德为参赞大臣。西路阿桂两天之内就攻下了阿喀木雅、木阑坝等形势险要之地，十一月初三日又收复了美诺。南路明亮也连克碉卡，十一月初六日攻取僧格宗。至此，清军将小金川之地全部攻取。乾隆帝获悉捷音后十分高兴，连下数道上谕嘉奖官兵，从厚赏赐，并亲写纪事诗一章颁赐阿桂。

定聚众结盟罪例　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月二十二日，在审理揭阳县陈阿高等聚众结盟案后，遵照乾隆帝谕示，刑部定聚众结盟罪例：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的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方充军。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的绞监候，为从者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排列，即属匪党巨魁，首犯绞立决，从犯发极边烟瘴地方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的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的各减一等。

停止查补僧道度牒　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十二日，山西道御史戈源上疏，就礼部奏请自乾隆四年以后，僧道未给度牒者，交地方官通查补给，以备僧纲、道纪等官之选，指出：查乾隆元年至四年，僧道无度牒者已有三十四万余人，自四年迄今，私自簪剃的恐不下数百万人。如果纷纷查补，必多滋扰。戈源提出今后永远停止颁发度牒，如遇选充僧道等官，著地方官查其实在戒行严明者，具给咨部，给照充补。对此，乾隆帝谕示同意戈源所奏，并指出僧道度牒本属无关紧要，而查办适以滋扰，所有礼部奏请给发度牒之处，今后永远停止，选充僧道官，令地方官查明具给办理。

山东王伦起义　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二十八日，山东寿张县(今阳谷县)党家店人王伦，利用清水教(白莲教支派)发动民众，举行武装起义。王伦精拳棒，善医术，在寿张、堂邑等县穿梭往来，念经聚会，传授符箓咒语，图谋反抗清朝统治。他为人慷慨，好扶危济贫，为人治病，不收酬金，在百姓中有很高威信，经过长期活动，组织了一批基本群众。乾隆三十九年，寿张县等地年岁歉收，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民众普遍不满，王伦乘机聚集教徒，准备反抗。起义原定于十月发动。因消息走露，知县要大肆捕人，王伦得阳谷衙役教徒密告，遂提前举事。二十八日夜，王伦率乡民教众，白布缠头，各带器械，攻入寿张县城。他们冲进衙署，杀死知县，占据城池，开仓济贫。同日，王经隆在堂邑县张四孤庄起兵响应。随后，王经隆与王伦会合一处，起义军声势大振。王伦攻占寿张后，自称"真紫微星"，设置元帅、先行、国公等官职。九月二日，起义军攻占阳谷。清军前来镇压，游击赵福被农民军击毙，总兵惟一失败后逃往张秋。农民军很快又攻下堂邑。初七日，起义军一支将山东巡抚徐绩围至临清城南柳林；另一支在王伦率领下，夺占运河咽喉临清旧城。当时正在热河行在的乾隆帝闻讯后，立即命大学士舒赫德调钦差大臣关防，由天津驰赴山东督师；又命额附那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率键锐、火器二营一千人及索伦善射手前往镇压；还命直隶总督周元理、河南巡抚何煟等率兵四面截攻。起义军占领临清旧城后，开典库，夺粮艘，漕运一时梗阻。他们还挖掘地道，准备攻打新城；多次和清军交锋，均获得胜利，清军总兵惟一、格图肯为此被斩。正当起义军胜利发展之时，清军大队援兵到。九月二十三日，舒赫德率领清军抵达临清，与当地清军、地主武装一起向农民军进攻。清军救出徐绩后，又分两路攻打临清旧城。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城内，利用街巷逼窄、房屋鳞比地势，和清军巷战。起义军首领杨五见清军在街内烧杀抢掠，纵身从房上跳下，挥刀猛杀敌人；女首领乌三娘，率领女兵与清军血战，直到最后牺牲。清军终于占领了临清旧城。二十七日，王伦在原河南巡抚汪灏院内小楼上举火自焚死。王经隆不久也被俘牺牲。王伦起义历时一月，终于失败。

波格尔拜会六世班禅　乾隆三十九年(1774)，英国东印度公司秘书波格尔，以同西藏通商为名，从不丹进入后藏，拜会了六世班禅喇嘛。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是英国商人、殖民者在东方进行殖民地贸易庞大的垄断公司，是英国资产阶级原始积累强有力的工具。它不仅

拥有大量资本,还拥有大批武装力量。乾隆三十九年四月,英国首任驻印度总督赫斯定派遣一支探察队前往西藏,波格尔就是该队的负责人。行前,赫斯定指示波格尔,探察队必须察明拉萨与西伯利亚之间的大片土地和交通情况,以及孟加拉到拉萨、拉萨至附近各地区的道路、地形和居民情况,设法缔结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商约,争取在拉萨设立英国商务代表机构。十月,波格尔到达日喀则。他抵达日喀则的第二天,便拜会了六世班禅,呈交了赫斯定的信件及礼物。在和六世班禅谈话中,波格尔请求为他打通各种关系,以便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一个地方性的通商务约,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西藏经商。六世班禅表示将把他的意见转告拉萨有关官员。不久,西藏地方政府从拉萨派出的代表到达日喀则,在和波格尔约见中明确表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有关签约问题须由清朝中央政府决定,西藏地方当局无权作主。波格尔签约企图破灭后,又向六世班禅表示,希望和班禅喇嘛管辖的后藏地区单独签订一个商约。六世班禅在和波格尔的几次谈话以及此后写给东印度公司的复信中,也明确表示:整个西藏是在中国大皇帝(即乾隆帝)主权管辖之下的地方,西藏的一切无不听命于北京的朝廷。六世班禅还向波格尔指出:东印度公司俨若王者,日以战争之克服为能事,藏人不能允许英人进驻。波格尔入藏的另一个意图,是利用中国邻国尼泊尔廓尔喀族王朝兴起,与锡金争地,而锡金与中国西藏有隶属关系,通过挑拨,离间中尼两国关系,以便从中渔利。但是,六世班禅告诉他: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派兵前往保护锡金,争端不久即可平息,不需要外力帮助。波格尔的企图又未能得逞。

禁广西商民出口贸易 先是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十五日,清政府将乾隆九年开放的由村隘口封禁,商旅由平而、水口两关验照出入贩货。六月二十八日,清政府又决定,所有商民概不准擅越边境贸易,如果在边界地区彼此贸易,须选择关口适中地方,酌定日期,派官稽查。

阿桂攻占勒乌围 乾隆四十年(1775)八月十六日,阿桂等统率清军,攻占大金川官寨勒乌围。勒乌围碉寨高坚,墙垣巩固,其南为转经楼,过甲尔日桑桥而南为科布曲山腿,与官寨互为犄角,枪炮俱可相及,其间寨落木城石卡鳞次栉比,联络接应。此外,它前阻大河,后负高磡,对河扎乌古、阿尔古一带枪炮既能隔水救援,其后高磡层层,每层一丈至数丈不等,磡上均有卡栅碉座,防守也非常严密。从转经楼到甲尔日桑桥再到科布曲,陆路既可通行,而用皮船过渡,也很便利,所以大金川人死守。七月底,阿桂率军进抵勒乌围,分兵包围后,既用大炮轰摧,又用冲天炮击打,还从勒乌围转经楼碉卡密排之中,一面攻抢占据,一面拿栅横截而下,以断大金川后路。阿桂还命令冷角寺一带官兵由西北合轰官寨,沿河向南拿栅,以断大金川兵下水之路。由于败退的金川兵全聚于此各碉寨内,大金川首领索诺木又把噶喇依一带金川民众召于此处合力抗拒,枪炮紧密,高磡陡削,兵力难施,所以,阿桂又令官兵砍伐树林作为柴捆挡牌,并将口袋装盛沙土,官兵匍匐地上,头顶柴捆土袋,以手扳转而行,一至磡沿,层层堆起,赶运木柴,连起三层高栅以击磡下金川兵,又在地道中运往炮位,轰击从磡下挖沟抗拒的金川兵。结果,八层高磡,均被清军连日逐步抢占。八月十五日夜,清军向勒乌围发起总攻。海兰察率同纳木扎格尔德从官寨东南进攻,普尔普、台斐英阿从南进攻,福康安、特成额、明仁从西北进攻,伍岱从东北进攻,阿桂及丰升额领兵各处接应。清军四面围攻,呼声动地,抛掷火弹,如流星闪电。清军乘势各自攀援登寨,蜂涌入围,金川兵抵挡不住。十六日,清军终于攻占勒乌围。莎罗奔及其妻子等逃往噶拉依。

文渊阁等建成 乾隆四十年(1775),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建成,以备储藏《四库全书》。文渊阁位于北京皇宫中文华殿之后,整座建筑为面阔六间、重檐八角硬山式楼房,气宇轩昂,高敞疏朗。楼房外观为两层,实际为三层。阁顶用绿剪边黑琉璃瓦覆盖,屋脊用绿、紫、白三色璃璃瓦装饰。阁前有一蓄水方池,池上石桥拱跨,阁后假山叠翠。文源阁位于京郊圆明园,文津阁位于承德避暑山庄,它们的建筑形式,与文渊阁基本相同,只是园林点染各有千秋。

追谥明季殉难诸臣 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初七日,乾隆帝命议谥前明靖难殉节诸臣。他说:永乐一藩臣,乃犯顺称兵,阴谋篡夺。诸臣以大义自矢,与其不共戴天。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虽然轻率寡谋,识见迂阔,但是尊主锄强之心,实可鉴谅。在大势已去情况下,他们还募旅图存,抗词抵斥,既使殒身湛族,也百折不回,实在是无愧于名教的人。景清、铁铉等人,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均志节凛然,义烈可嘉。这些人为国捐躯,成仁取义,不可湮没于世。早在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帝就曾命议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以崇奖忠贞,风励臣节。他当时说: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等人,均足称一代完人。他们或死守城池,或身殒行阵,均视死如归,岂可令他们事迹湮没不彰?于是,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等官,遵乾隆帝谕旨,从明史及通鉴辑览等书中,徵考殉节诸臣的姓名,恢复他们原来的官职,并

给以谥号。

金川息平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初四日,清政府最终平定金川。先是莎罗奔等失陷勒乌围,逃往噶拉依。噶拉依是大金川官寨,为索诺木驻地。清将阿桂等根据变化情况,遂兵分两路:北路自勒乌围,夺大金川上游,南下扣攻;西路据河西辅攻。乾隆四十年十二月,阿桂等率领清兵克寨夺卡,进据噶占山梁,直捣噶拉依;明亮等则率领清兵克险据寨,进抵独松隘口,克期合攻噶拉依。从二十二日起,阿桂、明亮等会攻噶拉依。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索诺木母及其姑、姐妹出降,但索诺木、莎罗奔等皆在官寨中拼死抵抗。于是,阿桂等督师筑长围,断水道,陷卡夺碉,层层逼近。又施炮击,兼用火攻,历四十余日。二月初四日,索诺木水断粮尽,计穷力竭,遂率兄弟及大小头目二千余人,跪捧印信投降,金川叛乱至此平定。以平定金川之功,阿桂晋升一等诚谋英勇公,并居紫光阁图画功臣像之首;丰升额由公升为一等子;封明亮为一等襄勇伯;海兰察为一等超勇侯。四月,索诺木被磔于京师。清政府平定金川历时五年,费帑七千万。金川平后,噶拉依设总兵,勒乌围设副将。以后又将金川改土归流,以大金川地为阿尔古厅,小金川地为美诺厅。

清廷删销书籍 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十六日,乾隆帝命有关衙署删销书籍。他在谕示中称:前因汇辑《四库全书》,谕各省督抚遍为采访,现已陆续送到各种遗书,令总裁等悉心校勘,分别应刊、应抄及存目三项,以广流传。对于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的,应当在销毁之列。经过各督抚呈进,馆臣详悉检阅,以及朕亲加披览,认为有些书不可不区别甄核。随后,乾隆帝举例说: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金堡、屈大均则遁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而缅颜苟活,这些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刘宗周、黄道周等立朝守正,风节凛然,他们的奏议慷慨极言,处处表现出忠义,最后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熊廷弼受任疆场,材优干济,所上封事,语多剀切,特别是"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于边塞"二句,令人动心欲泪。王允成南台奏稿,弹劾权奸,指陈利弊。叶向高为当时正人,不负众望,他的奏疏,人读后几乎要痛哭流涕。这些书关系到明末丧乱,足资考镜,只改动其中违碍字句便行,不需销毁。于是,自此之后,清廷大肆删销焚毁书籍。仅浙江一省,到乾隆四十七年,就毁书二十四次,毁掉书籍有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江西巡抚海成,一年之内曾搜缴禁书八千多部。乾隆帝在位期间,焚毁的禁书共有七十一万卷!

清廷恢复翻译科试 乾隆四十一年(1777)十二月初八日,乾隆帝谕示:翻译乡会试停止以来,已二十余年。近日满洲学习清文、善翻译者越来越少。现在应以乾隆戊戌年八月,考试翻译举人,已亥年三月,考试翻译进士,既与文武科场日期两不相碍,又可有一年时间从容准备,以求翻译益臻精熟。就这样,清廷翻译科试正式恢复。

国史馆编列《贰臣传》 乾隆四十一年(1777)十二月,清廷国史馆决定编辑《贰臣传》。初三日,乾隆帝就此颁发的谕示中称:崇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罹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冯铨、王铎、宋权、谢升、金之俊、党崇雅等人,在明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于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为开创大一统规模,这些人不得不加以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不过事后平情而论,作为一个人,以胜国臣僚,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却畏死幸生,腼颜降附,也称不上是完人,既使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也不能掩。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也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遵照乾隆帝谕示,国史馆总裁便查考姓名事实,逐一类推,编列成传,陆续进呈乾隆帝。《贰臣传》一书共十二卷,列一百二十五人,都是降清的明朝官吏,如刘良佐、洪承畴、钱谦益等。

民壮停止演习火枪 乾隆四十二年(1777)二月二十六日,大臣国泰上疏指出:各属民壮鸟枪,应令实力操演,以收实用。谁知乾隆帝却认为,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说:各省地方,设立民壮,是为了巡缉盗匪,防护仓监,协助营兵,同资守御。民壮是由乡民召募充当,与入伍食粮兵士不同;况且火药关系重大,也不便散给人役。如果都使演习鸟枪,并令熟练进步连环法,对于除暴防奸,并无裨益。另外,各省训练纯熟火器的人太多,则又不可不预防弊害。乾隆帝还举例说,山东王伦滋扰一案,就是因为他们不善施放枪炮,所以很快才被平定。结果,清政府决定,各省州县额设民壮,应尽心训练,操演寻常技艺,与兵丁等同资捍御,以收实效,无需演习鸟枪。

武科不得改用鸟枪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初一日,清廷重申不许武科改用鸟枪。先是,总督高晋奏请将武举考试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少,分别字号考试。对此,乾隆帝谕示:鸟枪原系制胜要

器，而民间断不宜演习多藏。即如山东王伦聚众之事，幸其不谙放枪，故易剿灭。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卖火药、铅丸俱难禁止。于是，高晋所奏不得实行。

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获罪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十二日，王锡侯被交刑部严讯。王锡侯是江西省新昌县举人，他删改《康熙字典》，另作《字贯》，被乾隆帝认为"全不知有尊君亲上之义"，因此获罪入狱。巡抚海成及布政使、按察使均以失察革职。清廷决定，与《字贯》相类似的书，无论旧刻新编，都要查出解京销毁；收藏这类书的人家，即行交出可不治罪，如藏匿不交，一经发现，将予以严惩。

王伏林倡教被杀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甘肃河州(今临夏东北)百姓王伏林等因念经传教，被清政府杀害。王伏林及其助手张志明、王九儿倡立新教后，入教者达二千余人。他们建立了比较严密的组织，在王伏林手下，有十二人被封为十二星，二十八人被封为二十八宿。清政府侦知后，即派差役前往锁拿，王伏林等仗剑拒捕伤差。随后，清政府又出动军队，于本月十三日在王家坡地方，对王伏林教众进行剿杀。王伏林、张志明、王九儿当场遇害，教徒五百二十二名被捕，其余的四散逃逸。清政府决定把被捕者发云、贵、川、广烟瘴地方，及东三省给索伦人为奴。

闲散宗室移往大凌河　乾隆四十二年(1778)十二月十七日，清政府决定将京城闲散宗室移往大凌河。据盛京将军弘晌奏称，大凌河马厂西北，杏山、松山地方，有泽田万亩，土地肥美。于是，京师闲散宗室愿移往该处者有一百十五户，大小共二百零三名。清政府决定对移往者，每人给银二百八十两，暂给八十两，治装起程，到该处后，再给二百两。每人给土地三顷，一半官为开垦，一半自行从容开垦，或令家人耕种，或募民耕种，不得私行典卖，否则查出治罪，迁往该处的宗室，仍照京城宗室例，每年减半给与银两，十年以后全行裁汰；每人还给以耕种器械，到该处后还先给一年口粮。清政府将迁往的闲散宗室分为四屯居住，每屯拣选二名老成者，赏戴金顶，协同将军办事。盛京(今沈阳)旧居宗室内，因人口众多，不能度日，有愿迁往者，也可以酌给地亩钱粮，由盛京将军一同办理。迁往宗室内如有人妄行滋事，或私将房地典卖，和该管官员一并治罪。

戴震逝世　乾隆四十二年(1777)，杰出的思想家戴震因病去世，终年五十五岁，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今屯溪市)人。他少年时学《说文》，青年时研《注疏》，二十八岁补诸生，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乾隆四十年赐同进士出身，封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读书博学强记，思想深邃，对天算、历史、舆地、音韵都有深入研究，尤其精于经学，为一代考据学大师。在音韵学方面，他首立韵类正转傍转之例，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著名学者段玉裁及王念孙父子都出其门下。在哲学方面，他肯定世界是"气"的变化过程，而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就是"道"。所以，"道"既是生生不息的运动体，也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客观物质。"气"的内容是"阴阳五行"，即"道"的实体，"理"是其运行所遵循的规律。戴震提出"理在气中"的命题，从而批驳了理学家"理在事先"的命题。在伦理学方面，他反对道学家宣扬的"去人欲，存天理"，认为这是理学家"以理杀人"的理论，提出"理在欲中"。戴震的主要著述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声韵考》、《方言疏证》、《直隶河渠书》、《藏府算经论》等。

追复多尔衮封爵　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初十日，乾隆帝命追复睿亲王多尔衮封爵，补入《玉牒》，补继袭封。当时，乾隆帝阅读《实录》后，感念开国之初，多尔衮首先统众入关，肃清宫禁，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均其经画；后又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不料死后蒙不白之冤，削夺封号，于心未惬。乾隆帝强调说：朕宁敢复翻成案，因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于《实录》的，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又怎能不为之昭雪？多尔衮复爵后，乾隆帝又命照亲王园寝制度，修其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将其事迹由国史馆敬谨辑录，添补宗室王公功绩传。和多尔衮同时追复封爵的，还有豫亲王多铎。此外，又以礼亲王代善后改封康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后改封简亲王，肃亲王豪格后改封显亲王，克勤郡王岳托后改封平郡王，也都一律复其原号，配享太庙，以示睦亲彰善，继绝昭屈。

王尔扬撰墓志触讳　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八日，乾隆帝就王尔扬撰墓志触讳事做出裁定。王尔扬是山西举人，他所作《李范墓志》中，在"考"字上用"皇"字。山西巡抚巴延三访查此事后，认为这纯属悖逆举动，便派人将王尔扬及有关人众押解到省，严加审讯，准备判刑，同时将情况上奏乾隆帝。谁知乾隆帝览奏后认为，此系迂儒用古，并非叛逆。他解释说：皇考之字，见于《礼经》，屈原《离骚》，欧阳修《泷冈阡表》，都曾使用过。在臣子尊君敬上之义，固应回避，但迂腐无知，泥于用古，不能算是叛逆。至于代为书写的人，更不值得追究。乾隆帝还强调说：王尔扬如果本科会试中式，也不过是榜上扣除，现在既未取中，下科仍可令其会试。这种事既然不是叛逆，

就不要查办，千万不可漫无区别，率予严惩。

乾隆帝第三次东巡盛京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二十日，乾隆帝率八旗官兵从京师起行，开始第三次东巡盛京。八月二十四日至盛京，九月二十六日回宫，历时两月有余。因太后在上一年去世，这次未到热河，因此时间较短。这次东巡的目的，主要是缅怀祖勋。九月初一日，他在盛京下了一道长谕，详述谒陵的重要性，训示子孙必谒祖陵，否则即为忤逆子孙，若有臣僚谏阻谒陵，即诛戮毋赦。他说：我后世子孙，诚能处尊位而常缅前劳，览当年原巘而兴思，拜旧里松楸而感怆，自必懔然于天眷之何以久膺，惕然于先泽之何以善继，知守成之难，兢兢业业，永保勿坠，则我大清累熙重洽之盛，洵可绵延于亿万斯年。

准西洋人进京效力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初八日，乾隆帝谕两广总督桂林、广东巡抚李质颖：向来西洋人有具呈广东督抚衙门，情愿进京效力的，都经该督抚等转奏送京。但是近年以来，未见有续来的，或系该国本无人呈请，也可能是曾经见呈，而该督抚没有转奏。今后你们要即行查明，据实见奏。如西洋人请进京效力的，即为奏闻送京，不必拒阻。

乾隆帝宣谕内禅年限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就金从善呈请建储事，申言立储流弊，宣明归政日期。他说：朕历览诸史，今古异宜，知立储之不可行。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懦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致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衅隙。平心而论，立太子一事并无益处。汉武帝立太子据，致有巫蛊之祸；唐太宗立太子承乾，竟以谋逆废黜；即明洪熙为太子时，汉王高煦百计相倾，东宫诸臣接踵下狱，幸而洪熙谨慎，得以保全，但以忧谗畏饥成疾，在位不克永年。至于立嫡立长，尤非确论。汉文帝最贤，并非嫡出，使汉高祖令其嗣位，何至有吕氏之祸。唐太宗为群雄所附，使唐高祖不立建成而立太宗，则无玄武门之变。明永乐以勇略著闻，使明太祖不立建文而立永乐，则亦无金川门之难。我朝家法，并不预定储位。皇祖时曾立理密亲王为太子，后以怙终废，遂不复建储，而属意于我皇考。雍正元年，皇考亲书朕名，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内，而不预宣示。及朕缵承洪绪，效法前徽。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昔唐宣宗闻裴休立储之请，曰“若立太子，则朕为闲人”；又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郁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泣下。这些均为朕所嗤鄙，安肯踵其庸陋之见。

高朴在叶尔羌正法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将叶尔羌参赞大臣高朴就地正法。高朴是乾隆帝慧贤皇贵妃侄，祖、叔均为大学士，门第显赫。他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期间，私役维吾尔族百姓三千余人，到远距叶尔羌城四百余里的密尔岱山采玉，然后将这些玉石运往内地贩卖，获取重金。为此，许多维吾尔族人或葬身于崇山之上的悬崖之下，或劳累伤病而死，以致叶尔羌地区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地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激于义愤，为维吾尔族百姓请命，冒死上疏弹劾高朴。乌什办事大臣永贵获悉后，立即把有关情况，以及亲往叶尔羌，将高朴翎顶拔去，与案内人犯质审的经过上奏乾隆帝。乾隆帝览奏后非常重视，在四天之内，连下十道上谕，严厉督促臣僚彻底清查此案。案情明晰后，乾隆帝考虑到回疆是否稳定关系重大，决定将高朴处死。他在上谕中指出，回疆办事大臣，经理该处事务，责任匪轻，当体朕意，抚辑回民，俾得安居乐业，不宜稍有派累滋扰，以致贻误国事。高朴在彼，回人无不抱怨，回众积怨日深，一二年内，必致如昔年素诚在乌什激变之事，而叶尔羌地大城坚，较乌什尤甚，尚复成何事体？

妃毒殴宫女致死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初八日，惇妃将宫内使女毒殴致死。 妃汪氏平日深得乾隆帝宠爱，她在乾隆四十年正月为六十五岁的乾隆帝生下最小的公主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但是，惇妃性格暴躁，虐待下人。乾隆帝获悉惇妃殴死宫女消息后，非常愤怒，立即召集诸皇子及军机大臣，下达谕旨，严厉斥责惇妃之过，并把她降为嫔，还训诫诸皇子以此为鉴，禁止纵性滥刑殴毙奴婢。乾隆帝在谕示中强调说：惇妃将宫内使唤女子责处致死，事属罕见，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且不足使各位宫闱之人咸知警畏。诸皇子各有福晋、格格，家庭之事，当法朕于宫闱，不稍溺爱徇情。

徐述夔写诗获罪 乾隆四十三年(1779)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廷对徐述夔诗狱案做出处理。徐述夔是位举人，家住江苏东台县。他在《一柱楼诗》中，写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等诗句。结果，乾隆帝认为这些诗是影射讥刺，便命将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戮尸，其孙徐食田论斩。失察的江苏布政使陶易、列名校对徐首发俱斩监候。已故的礼部尚书沈德潜曾为徐述夔写传，内有赞扬徐述夔“品行文章皆可法”的内容，乾隆帝便也命将其御赐碑仆倒，磨毁碑文，并撤出乡

贤祠。

井陉县民聚众控官 乾隆四十四年(1779)二月,直隶井径县百姓梁进文等百余人,以知县周尚亲采买仓谷三千石,每石官价九钱三分,实付九钱,在十三日午后至正定府,向钦差、侍郎刘浩寓所控告。不料刘浩敷衍推脱,至三更时知府贴出告示,梁进文等人方才散去。乾隆帝得知消息后,命将知县周尚亲绞监候,总督周元理、侍朗刘浩去管理兴隆寺庙工,梁进文等斩首示众。

《明季奏疏》编录 乾隆四十四年(1779)二月二十五日,清廷编录《明季奏疏》。此前,乾隆帝在阅读四库全书馆节次汇进各省送到违碍书籍中,发现明末阁臣徐必达《南州草》,所载奸商奸珰,结贿欺君诸疏,俱持论不挠,极为伉直;萧近高《疏草》内,载有劾大珰潘相等以矿税扰民;宋一韩《掖垣封事》,也有劾东厂及税监李凤、梁永等蠹国病民诸疏,均属详明剀切。还有侯震旸《天垣疏略》,以客氏再入禁中,抗章极论,并及于沈潅交通内臣,也能侃侃不阿。于是,乾隆帝认为,虽然明朝自神宗以后,朝多秕政,但是诸臣目击国势阽危,往往苦口极言,无所隐讳。尽管其君置若罔闻,不能稍收补救之效,而遗篇见在,凡一时废弛瞀乱之迹,痛切敷陈,足资考镜,决定编辑《明季奏疏》一书,以使天下万世,知道明朝所以灭亡的原因,同时也可垂示将来,永为殷鉴。

《蒙古王公表传》开始编辑 乾隆四十四年(1779)八月初一日,清廷开始编辑《蒙古王公表传》一书,当时,乾隆帝认为:国家开基定鼎,统一寰宇,蒙古四十九旗,及外扎萨克,喀尔喀诸部,咸备藩卫,世笃忠贞。其抒诚效顺、建立丰功者,不乏其人;宣奠奏绩,著有崇勋者,也指不胜屈。为了奖励猷而昭未来,乾隆帝遂命国史馆会同理藩院,将蒙古各扎萨克事迹谱系,详悉采订,以一部落为一表传,其有事实显著的王公,在部落表传之后,再每人立一专传。这样,则建功端委,传派亲疏,都可按籍而稽,昭垂奕世。受命后,国史馆总裁大臣等,即选派纂修各员,详慎编辑,以清、汉、蒙古字三体合缮成帙,陆续进呈乾隆帝。成书后,同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一样,以汉字录入四库全书。与此同时,各部落也将所部表传、专传,以三体合书,编辑一册,以使其子孙更知观感奋励。

《回部王公表传》开始编辑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九月初二日,清廷开始编辑《回部王公表传》一书。乾隆帝认为:各城回人自投诚以来,宣力军前,封授王、贝勒、贝子、公爵者,不乏其人,应同内外扎萨克一样,一体加恩,编纂表传。于是,理藩院会同国史馆,照蒙古王公编纂表传例,将回人内实心效力、立有军功的,也编纂成表传,以表示乾隆帝一体矜恤回部臣仆之意。

大学士于敏中去世 乾隆四十四年(1779),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于敏中,字叔子,江苏金坛人。乾隆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为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于敏中才思敏捷,深受乾隆帝器重。他曾与朱筠一起力主开四库全书馆,并任总裁主其事。他还充任国史馆、三通馆总裁。著有《素余堂集》等。乾隆帝得知于敏中去世后,特地发布上谕,称赞他品端才练,学识兼优,久直内廷,小心谨慎,历数十年如一日,懋著勤劳。加恩于敏中入祀贤良祠,并派皇八子带领侍卫十员往奠茶酒。

散文家刘大櫆逝世 乾隆四十四年(1779),刘大櫆因病去世,终年八十二岁。刘大櫆,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他是方苞的弟子,为桐城派重要作家之一。对散文的主张方面,他强调重法。认为好文章,必须重视方法技巧,音节字句。有《海峰文集》、《海峰诗集》、《论文偶记》、《历朝诗约选》等著作传世。

乾隆帝第五次南巡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十二日,乾隆帝从京师出发,开始第五次南巡。扈从的有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直隶官员、回部郡王台吉、四川土司等。这次南巡的目的,乾隆帝说是"省方观民、勤求治理"。南巡途中,他多次颁发谕旨,所有经过直隶、山东等地,本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十分之三;凡老民老妇,均加恩赏赉,以示优老引年至意。经过山东时,他派遣官员至曲阜祭祀了先师孔子。沿途他遣官祭已故河道总督靳辅、齐苏勒,大学士嵇曾筠、高斌等祠,亲自视察清口东坝等地堤工。此外,他还在杭州、江宁等地阅兵,召见和加恩江浙地区的士绅,拜谒了明太祖朱元璋孝陵,颁布了移风易俗的谕示。五月初九日,乾隆帝返回京师。

伊犁人口增多 乾隆四十五年(1780)二月初二日,伊犁将军伊勒图、喀什噶尔领队大臣惠龄奏称,伊犁地区兵民户口,已渐增至十余万人,事务繁多,同知一员管理难周。于是清廷决定,将伊犁现有兼管民人理事同知,改为抚民同知,管理地方事务;添设理事同知一员,办理各营刑名案件;除惠远城、惠宁城设巡检各一员外,再添设二员,管理伊犁移驻的三千眷兵,以及日益增多的商民。

李侍尧以纳贿治罪 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文华殿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因贪纵营私,纳贿勒索,被革职削爵抄没家产,并且处以斩监候。李侍尧是八旗勋旧大臣之后,其四世祖李永芳乃闻名

关内外的清朝开国元勋，娶太祖努尔哈赤孙女，尊称抚顺额驸。其子霸彦以功封一等伯，后追赠"昭信"名号。李侍尧父李元亮，官至户部尚书。李侍尧本人也深受乾隆帝赏识，被称为"天下奇才"，曾任副都统、工部侍郎、广州将军、两广总督、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湖广总督、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他在云贵总督任上，收受题升迤南道庄肇金银二千两，通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按察使任圻银五千两，临安府知府德起银二千两，东川府知府张珑银四千两。另外还收受素尔方阿送银五千两，德起送银五千两。还分别卖珠子两颗，勒要银五千两。总共赃银三万一千两。对于李侍尧纳贿罪，大学士、九卿等均主张处以斩立决，唯独户部左侍郎和珅主张处以斩监候。后经各省督抚讨论，乾隆帝决定对李侍尧处以斩监候，其家属予以宽待。

清政府定乌里雅苏台将军等职限　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初十日，清政府议定了乌里雅苏台将军等职限。乌里雅苏台将军，原为征讨准噶尔设立，那时将军相继由公富尔丹、顺承郡王锡保、平郡王福彭担任。军务停止以后，又先后由成衮扎布、车布登札布等额驸担任，并非世袭职位。庆桂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后，考虑到既要使将军、参赞不必办理喀尔喀蒙台游牧事务，又要使将军、参赞及四部落盟长各有专办事件，不至瞻顾误事，也不至越畔营私，以期长期奉行，乾隆帝遂命军机大臣会同兵部拟定条例，最后决定：乌里雅苏台将军系办理边疆、巡察四部落台卡之职，除寻常事件，听喀尔喀盟长自行办理外，至事关紧要，及调发兵马诸务，该盟长、副将军、扎萨克应统遵将军节制，违则参究；四部落副将军及王公扎萨克等，每年轮班驻扎乌里雅苏台，听乌里雅苏台将军、参赞调拨兵马，及巡察部落，接设台卡等务，不必办理游牧；四部落盟长会盟办事，要先报理藩院，由院示覆；贼盗人命等案，该扎萨克呈该盟长，报院定夺，如有不秉公办理，或被人控告，或经将军等参奏，照例治罪，扎萨克要由四部落盟长约束，如有扰累，该盟长据实奏办，以示惩儆。

清廷再停鳌拜世袭公爵　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初六日，清廷决定停鳌拜世袭公爵。先是，鳌拜被康熙帝宣示二十四大罪状拘禁，死后念其旧勋，追赐一等男，令其弟孙相继承袭。后雍正帝复其一等公世袭罔替。乾隆帝阅读实录后认为：鳌拜功罪迹状显然，若不核其功罪，明示创惩，在鳌拜一家之侥幸所关犹小，而后来秉钧执政者无复知所顾忌，将何以肃纲纪而杜佥邪？于是谕示，现袭鳌拜公爵德生出缺时，即行停袭公爵，仍照康熙帝所降谕旨，给予一等男爵，世袭罔替，以示国家法外施恩旧勋之意。

六世班禅进京圆寂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进京为乾隆帝祝寿，不幸在京师圆寂。还在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罗布藏巴勒垫伊西就请章嘉胡图克图代奏，于庚子年(四十五)前来京师敬祝大皇帝七十万寿。乾隆帝对此非常高兴，允其所请，并谕示隆重接待。他特遣皇六子质郡王永瑢和吏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永贵赶赴岱汉迎接，陪同前来热河，命向导处大臣编定从岱汉经察哈尔、多伦诺尔、克什克腾、翁牛特、喀喇沁、赛因达巴罕等处到热河的行程经住宿地点；召陕甘总督、山西巡抚入京陛见，面谕妥办接待班禅的食宿等事。漠南蒙古哲里木盟长奏称帮马二千匹、驼二百头，喀尔喀四部蒙古王公也愿帮助马驼，供班禅使用。乾隆帝特令在热河为班禅建须弥福寿之庙，供班禅来时居住。沿途各省官员遵乾隆帝谕旨，认真安排，迎送接待十分周到，七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清旷殿召见六世班禅，赐座慰问赐茶；二十四日，又在万树园大幄次，赐班禅及扈从王公大臣与蒙古回部王公等人宴，赏赍冠服金银缎匹。班禅率众胡图克图为乾隆帝诵经祝寿。九月二日到达京师后，乾隆帝又多次赏赐。不料班禅出痘，于十一月初二日在京师圆寂。乾隆帝闻讯后十分悲痛，对护送灵柩回藏等事做了妥善安排，还把详情谕示达赖喇嘛知道，又命在北京西黄寺内为六世班禅建藏经卷、衣履石塔，名清净化城塔。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缮进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三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缮写完毕，呈进乾隆帝。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纪昀、陆锡熊等人对采入书籍，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叙述该书大旨、著作源流、作者爵里及得失辨订等，按经、史、子、集分类。该书呈献乾隆帝后，直到乾隆五十四年才由武英殿刻版，总计二百卷。著录收入《四库全书》中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共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

苏四十三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十八日，苏四十三率众杀死河州副将新柱、知府杨士玑，攻占台堡，发动反清起义。先是甘肃安定(今定西)人马明心在回教中创立新教，后到循化(今青海循化)撒拉族中传教，因新旧教冲突，被逐回籍。不久，马明心又潜回撒拉族传教，新旧教又生事端。旧教首到省控告，总督勒尔谨派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副将新柱带兵前往查拿新教首。新教苏四十三等人

扮成旧教迎接新柱，新柱宣布官府为旧教作主，新教不遵约束即斩尽杀绝。于是，苏四十三等人乘机起义。二十一日，苏四十三率众攻占河州城（今甘肃临夏东北），放出监犯后，又进逼兰州，占领城西南华林山。清政府命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蒙古亲王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等前往镇压；还宽宥李侍尧罪，令其署陕甘总督，驰赴兰州。四月初六日，清军收复河州，遂集兵兰州。苏四十三等率众在华林山设寨坚守。六月十五日，阿桂等命清军四面环攻，推土填壕，破栅断水，还抛投火弹。寨破，起义军粮尽矢绝，寡不敌众，激战中苏四十三等英勇牺牲，余部退守华林寺。七月初六日，清军火烧华林寺，起义军士卒全部牺牲。苏四十三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令设立乡约，禁止新教，分段管辖，具结担保，以加强对回族地区的统治。

禁直省大吏设立管门家人收受门包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月初三日，乾隆帝命各督、抚、府、道不许收属员门包，也不许设立管门家人。原来，在查抄革职总督勒尔谨家产时，从其家人曹禄名下抄出银一万数千两，并有金器等物。经军机大臣提讯，曹禄供称系历年在其主任上所积门包，营运生息所致。对此，乾隆帝认为，门包乃陋习相沿，不可不力为饬禁。督抚等养廉优厚，赡给身家外，一切延请幕友，赏给家人等项，还属宽余，不需任听家人向属员恣索门礼。况且督抚家人既向属员索取门包，则司道府厅等家人势必效仿，而州县官无力供给各上司门包，势必向百姓索取，如此层层朘削，于吏治民生关系极大。乾隆帝还指出，督抚原系封锁衙门，设有中军及巡捕等官以供稽查传禀，一应亲族奴仆俱例禁出入与属员接见。督抚等如果仍令家人传事，以致积收门包盈千累万，那还谈得上什么封锁呢。于是，为革禁流弊，乾隆帝遂命督抚至道府，今后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交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乾隆帝还强调，此项规定要每年汇奏一次，如有阳奉阴为，仍蹈故辙，或经科道参奏，或于别事发觉，该督抚欺饰之罪绝不宽贷。

甘肃捐监冒赈案发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三十日，甘肃捐监冒赈案要犯勒尔谨、王亶望等被处以死刑。还是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请求甘肃捐监，得到乾隆帝批准。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被委以开捐收粮重任。不料勒尔谨、王亶望等人相互勾结，他们把监生交纳的监粮折色银据为已有，然后又以每年因旱灾赈济的名义，将这些银两冒销。这样，监粮银便全部落入王亶望等官员手中。苏四十三起义发生后，阿桂等屡次奏报军情，都谈及因雨水太多而延滞用兵，这引起乾隆帝警惕，怀疑过去甘肃连年奏报旱灾有假，便命人仔细访查办理。于是，甘肃官员营私舞弊案全部暴露。勒尔谨、王亶望一伙通过捐监冒赈侵吞上千万银两。此案既涉及到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还牵连到知县、署知县六十三员，知州五员，同知三员，通判五员，县丞二员。共计侵盗银两一千两以上的甘肃省府州县官员。有一百零二人，二万两以上的有二十人，一万两以上的有十一人，一千两至九千两的有二十六人，最多的吞银至九万两。案发后，勒尔谨被命自尽，王亶望立即处斩，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绞监候。此外，侵吞二万两以上的二十人也立即正法，一万两以上的十一人斩监候，一万两以下的也判斩监候。总计陆续正法的有五十六名贪官，免死发遣的有四十六人。

新疆官员多报粮价侵蚀帑银 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初四日，钦差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合奏：甘肃捐监冒赈案内牵涉到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三处，额收粮十万石，济木萨、奇台、穆垒、昌吉等处收五万石。现在甘肃捏冒等弊俱经查办，乌鲁木齐等处，亦恐有挪移亏缺之处，请饬交新任都统明亮彻底清查。经过调查后发现，乌鲁木齐各州县官，自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就不照市场卖粮的实际价格报销，而是浮开多报。比如，小麦每京石用银不过八九钱至一两零九分不等，州县却以每石一两八九钱具报。据各州县官供认，每石多报银三四钱或五六钱，通计各官历年侵冒银两一万两至数百两不等。各官还供认，通同舞弊，馈送都统索诺木策凌银两自一千两至数千两不等。结果，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乾隆帝做出裁定：收受馈送银一万两的原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令其自尽；原奇台县知县窝什诨侵用帑银四万余两，立即正法；侵蚀银一万两以上的德平、伍彩雯、王喆等人立即处斩，索诺木策凌管家人王老虎等即行处绞，其他有关人犯四人分别发往烟瘴地方及黑龙江充当苦差，虽遇大赦，不得省释。

准武职官员虚额名粮归人养廉 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二十八日，根据大学士阿桂所奏，清政府决定将武职官员虚额名粮纳入养廉。当时，各省武职大小官员，都有虚额名粮，阿桂奏请拟将此项归入养廉银，另行补充实额。他说：此项经费岁增三百万两，统计二十余年，即需用七千万两，岁久则难以为继。乾隆帝为此谕示：以即位初年，户部库银不过三千万两，今已增至七千余万两，且与其聚之于上，不如散之于下，而且在官多一分，即在民少一分；如以

岁支增三百万两计，至乾隆六十年归政时，所用也不过四千余万，加以每年岁入所存，其时库藏转即位时，自必尚有盈余。于是，乃决定武职官员虚额名粮归入养廉。

定满洲驻防官兵退休回京就养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发布上谕说：向来各省驻防满洲，已安居百有余年，京城并无伊等近族。而京城满洲生齿日繁，若准其进京，无以为生，反为无益，是以概不准来京。自开辟新疆，分派官兵前往驻扎以来，在京满洲陆续驻防各省者甚多，此内亦有派往驻防时，因子弟在京当差，仍留在京的。如这些人在驻防处年老退休，没有所依赖的人，难免不流离失所，使人于心不忍。今后各省新派驻防人员内，如有年老退休，实在无依赖之人，而京师尚有子嗣，可以就养，该处将军等应当查明，准其回京。于是，清政府决定，满洲驻防官兵，退休回京就养的，一律自备资斧来京，不必由官办理。

《四库全书》告成　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二十九日，《四库全书》告成，有关人员受到乾隆帝嘉奖。自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开馆，历时十年，四库馆员先后总计有四千一百八十六人，所辑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第一份《四库全书》缮写告成后，又陆续缮写六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今沈阳)文溯阁、避署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于北京翰林院。

陈辉祖抽换侵吞入官财物被处死　乾隆四十七年(1782)初。乾隆帝观看浙江解京的原浙江巡抚、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的查抄家产，发现呈览物件大多不堪入目，与这位赀财多达三百余万两的大贪官很不协调，顿起疑心，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便命新任浙江布政使盛柱留心察访。不久盛柱奏称，查出王站柱底册不符，抽换显然。乾隆帝又派大学士阿桂亲往浙江，传问王站柱。据王站柱称：查抄王亶望赀财时，会同府县佐杂，每日亲往点验，交府县各官收管，金约有四千数百余两，银约有二三万两，玉器甚多，当即造有三分底册，一分呈送总督，其余两分分存藩司、粮道衙门。王站柱还说：查办时，总督陈辉祖曾吊取备用物件阅看。陈辉祖这时也上奏辩解说：以银易金之事，系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并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不如易换银两，较为实济，我便同意了。不料国栋在供词中，承认以银换金，偷换朝珠，皆陈辉祖主使。最后经过反复审讯查证，陈辉祖终于承认，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他以四五万两白银盗换了价值九万余两的黄金，纯获利白银四五万两。这些银两已交其妻舅申兆岑，令开典铺生息；还有杂色金一千余两，嘱其易银营运。同年十二月初二日，陈辉祖以"盗臣"之名被判为斩监候，有关人员发往河南省河工效力赎罪。乾隆四十八年(1783)二月初三日，又因查明陈辉祖贻误地方，武备废弛，仓谷亏空，被乾隆帝令其自尽，以为封疆大臣废弛地方者戒。

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　乾隆四十七年(1782)春，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属员，遇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或六七万之多。布政使于易简，也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同。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绶之子；于易简，为大学士于敏中弟，对国泰极为奉承。四月初四日，乾隆帝读过钱沣奏疏后，立即命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和御史钱沣前往查办。和珅与国泰关系密切，因此极力袒护国泰。钱沣对此十分清楚，便先数日微服至良乡，见和珅仆役骑肥马往山东送书信经过，暗下记住其容貌，待他回来时，便喝令左右搜其身，果然得到国泰写给和珅的私信，言及已借银填库备查等情。钱沣立即持该书信上奏。和珅知预谋败泄，查办时不敢再懈怠徇情。七月初八日，以国泰、于易简亏库银二百余万两，乾隆帝命他们在狱中自尽。此后，和珅深恨钱沣，终于在乾隆六十年将钱沣毒死。

《河源纪略》成书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十四日，乾隆帝命馆臣编辑《河源纪略》一书。本年春，因河南省青龙冈漫口，合龙未成，乾隆帝乃派大学士阿桂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探查黄河源。事竣，阿弥达返回复命，并据按定南针绘图具说呈览。阿弥达奏书中说：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即黄金河，此河实系黄河上源。其水色黄，回施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贵德堡，水色全黄，始名黄河。在阿勒坦郭勒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即黄金北极星石，其崖壁黄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为分百道，全是金色，入黄金河，此则真黄河上源。乾隆帝览奏后，认为所奏河源非常明晰，纠正了康熙四十三年侍卫拉锡关于河源即星宿海的说法。乾隆帝谕示四库馆总裁，督同总纂等，悉心纂办，将御制河源诗文冠于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译对汉音的，均照改定正史，详晰校正无讹，颁布刊刻，并录入四库全书，以昭传信。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河源纪略》编成，共三十六卷，绘图列表，考古证今，杂录沿河所见风俗、物产、古迹、轶事。不过，该书以星宿海西南阿勒坦噶达

素齐老上之天池为黄河源，仍然有误。

旻宁诞生 乾隆四十七年(1782)八月初十日，颙琰次子旻宁出生，母喜塔腊氏。旻宁后为清宣宗道光皇帝。

《皇舆西域图志》成书 乾隆四十七年(1782)，官修《皇舆西域图志》编成。该书由傅恒等奉敕撰，始纂于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完成初稿。乾隆四十七年，又由英廉等修改增订。全书正文四十八卷，另有卷首四卷，共五十二卷。卷首是乾隆帝接见卫拉特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贡使、王公贵族的题咏和记事。正文分列图考、列表、晷度、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政、贡赋、钱法、风俗、音乐、服物、土产、杂录等十九门。卫拉特蒙古各部系谱，风俗、出产、用物、音乐、准噶尔部官制全部载入。此外，还有乾隆帝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等文。

给袁崇焕裔孙官职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为人慷慨有胆略，好谈兵。明朝末年，他率兵镇守辽东，阻挡清军进关。后皇太极施反间计，袁崇焕被崇祯帝误杀。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月十八日，乾隆帝读《明史》，感到袁崇焕督师蓟辽，尚能忠于所事，只是其时主阍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遂令将其入继为嗣的五世孙袁炳，照熊廷弼裔孙例，酌授官职。

乾隆帝第四次东巡盛京 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月二十四日，年过古稀的乾隆帝从京城动身，开始第四次巡幸盛京。二十九日，他到达承德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离开山庄，九月十七日到达盛京，十月十七日回到宫内，历时近四个月。这次东巡，除巡视沿途地区情形外，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怀柔蒙古。途中，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等在叶博受村广慧寺行宫迎驾，于行宫东门外设大毡庐，侍皇上宴毕，阅捉马诸技。科尔沁亲王恭格喇布坦、巴林郡王巴图等在五里屯大营迎驾，于行宫西门设大毡庐，侍皇上宴毕，也阅捉马诸技。乾隆帝分别给以赏赐。他还下谕奖晋效劳王公台吉说：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弟、巴林郡王巴图、敖汉公桑济扎勒，在御前行走多年，此次随朕前来盛京，均各实心奋勉，朕甚眷爱。喇特纳锡弟、巴图均加恩赏给亲王职衔，桑济扎勒晋封固山贝子。

《古今储贰金鉴》始编 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十九日，乾隆帝命辑《古今储贰金鉴》。他说：历览前代建储之弊，及我朝家法相承，于立储一事不可行，已明降谕旨，宣示中外。至史册所载，因建立储贰酿成事端的，不可枚举。应当勒成一书，以昭殷鉴。于是，他命皇子等同军机大臣，及尚书房总师傅等，将历代册立太子事迹，有关鉴戒者，采辑成书，陆续进呈，以皇孙等师傅誊录，书成后即名《古今储贰金鉴》。

《逆臣传》始编 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二十五日，乾隆帝谕示国史馆，用《贰臣传》例，编纂《逆臣传》。他说：修国史是为了彰善瘅恶，信今传后。前代诸史，皆由后世史官编纂，胜朝事迹，历年久远，烟没失传，以致网罗散佚，采及稗官，褒讥好恶，任意轩轾，率无定评，不如及早裒集，免致闻见失真，传疑袭误。他还说：国史体例与历代史不同，馆臣纂辑，应据事直书，不用分别各门。比如忠烈廉孝，以及奸臣宦官，历代皆附入列传，我朝并无此等事。只有《贰臣传》一门，前经降旨，另编甲乙，是我朝开创所有。这是扶植纲常，为世道人心之计，自应另立专门，以存直道。至于叛逆诸臣，如吴三桂等，也应明正罪状，另立一门，以昭斧钺之严。于是，乾隆帝命国史馆官员，利用实录以及军机处档案，将乾隆四十年以前的满汉臣工、宗室王公、蒙古王公中的叛逆者，编为《逆臣传》，陆续进呈，钦定成书颁行，并写入四库全书，垂为信史。

乾隆帝第六次南巡 乾隆四十九年(1784)正月二十一日，乾隆帝从京师出发，开始第六次南巡。和前五次一样，这次他仍乘坐安福舻，翔凤艇作为备用。沿途地方官员三十里以内接送。皇十一子永瑆、十五子颙琰、十七子永璘随驾。所有经过直隶、山东地方，本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十分之三。所有办差文武各官，住俸、罚俸、降级各案，准其开复；如无此等参罚案件，各加一级。在山东省德州境内，直隶广宗县民人李知止，直至轿前叩阍，被处以重刑。在晏子祠行宫，乾隆帝写成《济水考》一文。他沿途拜谒了少昊陵，在曲阜谒见了孔子庙，遣官祭祀了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祠，以及宋臣范仲淹祠、韩世忠祠、故大学士蒋溥墓、巡抚汤斌祠、张伯行祠、总河陈鹏年祠。三月，进入浙江境内，视察了沿海石塘工程。二十四日，他撰写了《南巡记》一文，总结性地叙述了六次南巡的原因、目的及成效。闰三月，乾隆帝到达江宁(今南京)，在这里接见了安南国(今越南)使臣黄仲政等，并遣官祭祀明太祖陵。四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一行返回京师。

定绿营告休人员食俸例 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初六日，因松潘镇总兵刘俸旧伤复发，行动艰难，请解任调理，乾隆帝谕示说：向例武职旗员，年至六十以上，因老病告休，曾经出兵打仗受伤的，都加恩给全俸，但是绿营却无此例。绿营人员既能效

力行间，打仗受伤，为国家出力，后因老病告休，不能与旗员一体邀恩食俸，未免不妥。为表示对满汉官员从无歧视，清政府决定：嗣后绿营告休人员，除未经受伤者，仍照向例办理外，其年届六十以上，因老病乞休，曾经打仗受伤的，均照旗员之例，一体给与全俸，并作为法令固定下来，予以颁布。

乌鲁木齐行保甲法 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初十日，因乌鲁木齐近日人烟稠杂，遵该都统海禄之请，清政府决定在那里实行保甲制。照内地编排保甲，设排头、甲长、保长，按户填写门牌，随时稽察各厂挖金人等，该地方官给票查验。

甘肃回民起义 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十五日，田五领导回民在盐茶厅(今宁夏海原)小山地方起义，攻破西安州营土堡。田五原是甘肃伏羌(今甘谷)伊斯兰教新教阿訇，早就在传教中酝酿起来，因此修筑石峰堡，制备器械。正月，他在靖远聚议，定于五月初五日举事，被旧教徒密报，便把起义日期提前。起义后，田五率众沿沙沟一带往攻靖远，陕甘总督李侍尧、固原提督刚塔等率兵前往镇压。起义队伍奋死抵抗，首领田介洪、吴二、韩二先后战死，田五又身受枪伤，在马营水地方自刎身亡。起义余部在张文庆、马四娃等率领下继续作战。乾隆帝命大学士阿桂为将军，福康安、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带领火器营、健锐营兵前往甘肃镇压。张文庆、马四娃等率领起义军攻陷通渭县城，知县王倰藏匿仓房，训导刘德跳楼伤腿，典史温模自缢而死。清政府以总督李侍尧坐玩，褫职论斩；提督刚塔失机逮向，远戍伊犁；命福康安为陕甘总督。起义军攻占通渭不久，退守马家堡、黑庄两处，失利后，遂踞守石峰堡，凭险御敌。张文庆等采用诱降计，将清军诱至堡内，里外夹攻，西安副都统明善中矛而死。阿桂、福康安统兵四面包围石峰堡，层层分布，断绝水源，鸣炮轰击，别掷火弹。七月，张文庆等水断矢绝，在一天深夜率众突围，死伤一千余人。清军乘机攻入石峰堡内，张文庆、马四娃及起义军两千余人均被俘。甘肃回民起义最终失败。

阿奇木伯克鄂斯璜因功晋封 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月初六日，喀什噶尔阿奇木伯鄂斯璜被清政府晋封为贝子。原来，大和卓布拉尼敦死时，其子萨木萨克约三四岁，被其乳母潜携到安集延，后又到喀什噶尔迤外色默尔罕地方。萨木萨克派遣回人托克托素丕等与喀什噶尔回人默罗色帕尔潜通信息。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额穆尔，也潜留托克托素丕等。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阿里木，也接受了萨木萨克信。这些，都为鄂斯璜所访知。为掩饰罪状，阿其睦、阿里木等便诬告鄂斯璜与萨木萨克有联系。清政府经过调查，弄清了真相，便晋升鄂斯璜，治罪额穆尔，并令阿里木、阿其睦向鄂斯璜赔罪。

乾隆帝登基五十年举行庆典活动 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乾隆帝御极五十年举行庆典。初一日，乾隆帝以五十年国庆，颁诏天下，决定：各直省有同堂五世的，由各督抚查明，送军机处汇奏，给予赏赉；王妃以下、奉恩将军之妻以上，公主以下，乡君以上，年过六十的，俱加恩赐；外藩王妃以下、公扎萨克台吉塔布囊妻以上，年过六十的，满汉大臣命妇，年过六十的，也俱加恩赐；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及内扎萨克喀尔喀等蒙古未经入宴，年七十、八十、九十以上的，分别赏赉，百岁老人，则题明给与建坊银两，并加赏大缎一匹，银十两；满洲兵丁，系披甲效力行间，年过六十，因残废疾病闲住，不能入宴的，加恩赏赐；军民年七十以上的，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八十以上，给与绢一匹，棉十斛，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加倍，至百岁的，题明旌表，并加赏大缎一匹，银十两；各省儒学，以正贡作恩贡，以次贡作岁贡；国子监贡监生，及各官学教习，免其坐监期一月，内外满汉大臣文武官员，俱加一级，试职各员，俱准实授；各直省军流以下人犯子，俱减等发落；各处养济院，所有鳏寡孤独及残疾无靠之人，有司留心，以时养赡，毋致失所。初二日，乾隆帝御重华宫，召大学士及内迁翰林等恭宴，以千叟宴联句；御紫光阁，赐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台吉，朝鲜国、暹罗国使臣，并金川土司等宴，初六日，御乾清宫，举行千叟宴，宴亲王以下暨士商兵民等年六十以上者三千人。

陈世元往河南教种番薯 陈世元原是福建省监生，为了在河南推广番薯，他不顾年老多病，远离家乡，来到河南，推广既能高产、又能耐旱的番薯，以作为百姓的食粮。乾隆五十年(1785)十月初六日，陈世元因感受风寒，在河南省病故。乾隆帝闻讯后，对他的报国急公精神极为赞赏，决定赏给他国子监学正职衔，以示其身后之荣。

《清一统志》续修告成 乾隆五十年(1786)十二月二十日，续修《清一统志》告成，同时完成的还有《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清一统志》是清代全国性的地方总志，初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于乾隆八年(1743)，三百四十二卷。二修始于乾隆二十九年，成于五十年，共五百卷。该书因在重定西域，平定金川之后修成，内容更加丰富，考订更加精详。每省先有图表、总叙，再以府州等分卷。

乾隆五十年灾害严重 乾隆五十年(1785)全国发生了严重的灾害。三月初十日，甘肃玉门北发生地震。春天，湖北宜城、兴化、随州(今随县)、枝江大

饥，人食树皮。秋天，山东青州(今益都)府属寿光、昌乐、安丘、诸城等县大饥，父子相食。此外，福建建安、江西萍乡等地水灾，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山西、河南、直隶等地区普遍干旱，其中，湖北、河南、山东尤其严重。各省灾害所需赈银一千四百余万两。

《清文献通考》成书　乾隆五十年(1785)，《清文献通考》一书编成。该书是清代前中期行政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料汇编，三百卷，稽璜等奉敕撰。分为田赋考、钱币考、职役考、选举考、职官考、效社考等二十六门。

增定武职官阶　乾隆五十一年(1787)七月初九日，乾隆帝命增定武职官阶。当时，三通馆进呈《皇朝通志》"职官略"一门，所载文武官阶多有不协之处。志内文职由正一品起，武职则由从一品起；文职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共十八阶，武职自从一品至正七品，止十二阶。乾隆帝认为这样制定武职官阶，显然是重文轻武，不利于重阃寄而励戎行。后经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吏兵二部详议，武职人员中，领侍卫内大臣、将军为正一品；蓝翎长为正九品，太仆寺委署固山达为从九品；绿营经制外委千总为正八品，外委把总为正九品，额外外委为从九品；乌鲁木齐都统为从一品；委署前锋侍卫、下五旗包衣参领为从五品；委署步军校、内务府领长为从六品；委署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骁骑校、副护军校为从八品；包衣佐领、察哈尔副参领、佐领为从四品；营千总为正六品；卫千总为从六品；裁正四品驻防参领、正六品监造火药官、正七品亏匠固山达。

梅调元活埋百姓被处死　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月初一日，乾隆帝命将活埋二十三人的劣绅梅调元处死。起初，湖北孝感县民刘大么等因上年荒欠，携器具向本处村民借粮。乡绅梅调元担心自己家被累，便令其子将刘大么等捆至僧寺拷打，进而在三月初十日将刘大么等二十三人活埋。乾隆帝闻讯后非常愤怒，认为开销帑银五百万两，督、藩、臬赈恤不力，灾民不能沾实惠，以致有贫民乏食，抢夺米粮等事，命将原湖广总督特成额(已迁云贵总督)、布政使永庆、按察使王廷燮、前署孝感县知县秦朴，俱革职拿问。梅调元等人则被凌迟处死。

富勒浑故纵家人勒索钱财论斩下狱　乾隆五十一年(1786)秋，两广总督富勒浑被判斩监候。富勒浑是大学士阿桂族孙，早年中举人，作过内阁中书、户部郎中。从乾隆二十八年授山西冀宁道起，升迁较快，乾隆三十五年由浙江布政使署巡抚，三十七年调任陕西巡抚，不久擢任湖广总督，以后又历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礼部尚书、工部尚书、闽浙总督，乾隆五十年七月，调任两广总督。尽管乾隆帝一手提拔起富勒浑，但是对他的操守一直存有怀疑，便命人访察。结果发现，富勒浑的家人殷士俊居住常熟，他原本是一平民，但在他家中却查出现存及借出银钱共二万余两，田地六百三十余亩，房屋三所，还起出殷士俊之子殷孝基捐监部照一张。对此，乾隆帝又惊讶又愤怒，谕示说：殷士俊以微贱长随，拥赀数万，且父子蒙混捐纳，滥膺顶戴，计其一切赀财，俱系跟随富勒浑为长随后所得，富勒浑未必没有知情故纵。以后又查出，富勒浑到任广东后，各盐商馈送其家人李世荣花钱一千圆，方准各回安业；洋商潘文岩等称，殷士俊勒派各商分买人参一斤，浮卖价银四千七百两；李世荣令洋商购买物件，短发价银一百圆；还点派口岸，全书巡等缴银一万九千六百余两，交殷士俊、李世荣转交内署。后来，乾隆帝以富勒浑志得意满，纵容家人长随，关通婪索，营私舞弊，漫无觉察，刑同木偶，已属知情故纵，查抄家产，处斩监候；殷士俊、李世荣等处绞。

台湾林爽文起义　乾隆五十一年(1787)十一月二十七日，林爽文以"安民心、保家业"相号召，率众在台湾起义。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乾隆三十八年随父迁居台湾彰化县大里杙庄，以农为业。后来他加入天地会，成为彰化天地会首领。乾隆五十一年秋，官府镇压天地会，焚烧村庄，林爽文遂揭竿而起。二十八日，他率领起义军攻下大墩官军兵营；二十九日，攻下彰化，杀死知府孙景燧、知县俞峻。林爽文称盟主大元帅。十二月初六日，他率众攻下诸罗(今嘉义)县城；初七日，再下淡水城(今新竹)；十三日，夺占凤山(今高雄)，知县汤大奎自杀。不数日，台湾全岛各地均悬天地会旗帜响应。乾隆五十二年正月，林爽文带领天地会起义军分水陆两路，进攻台湾府城。闽浙总督常青派水师提督黄仕简等领兵二千前往镇压，陆路提督任承恩，以及台湾总兵官柴大纪，也都率兵进攻林爽文起义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林爽文在盐埕桥失败，遂退往漳化县，建立政权机构，不久又迁至大里杙。三月，起义军利用凤山城空虚之机，在首领庄大田领导下，又占领了凤山县城，清朝总兵官郝壮猷败回台湾府城，不久被清政府斩首于军前。八月，清政府加强了进攻林爽文起义军的兵力，并调整了领兵将帅。原将军常青改任湖广总督，授福康安为将军赴台；又命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普尔普、舒亮为领队大臣，恒瑞、蓝元救、柴大纪仍参赞军务；增调兵力十万人，陆续驰赴台湾。十一月，福康安率军击败起义军，解了诸罗之围，随后又和柴大纪会合，攻占了大里杙。乾隆五十三年正月，林爽文等在

老衢崎被福康安部扮作民人的广东屯练军俘获，福康安遂率军进入台湾府城。三月十日，林爽文等被解至京师凌迟杀害，起义终于失败。

准汉人娶蒙古妇女为妻　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初九日，经刑部奏请，清政府准许汉人娶蒙古妇女为妻。乾隆帝在对军机大臣的谕示中说：国家休养生息，中外一家，本无畛域之分。从前定例内地民人不准婚娶蒙古妇女，或因民人等暂时出口谋生，在彼婚娶，易滋事端，是以设有明禁。近来生齿日繁，内地民人孑身出口贸易种地的不可胜计，伊等相处日久，往来婚娶，势难禁止。于是，"民人不得婚娶蒙古妇女"一条，遂在有关法律中删去。

准许昌平开矿　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月二十二日，乾隆帝谕示准许昌平州(今北京昌平)开矿。先是，孟生蕙奏言：昌平州坐落正当京城乾坎之位，其山即京城北面屏障。山以虚受，气以实流，实者削之使虚则甚易，虚者补之复实则甚难。乾隆帝览奏后，认为孟生蕙所言实属迂谬，特别是折内所写"安畿辅数百里内之坤舆，葆神京亿万斯年之元气，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措语更属荒诞。乾隆帝指出：京城外西山北山一带，开采煤座，及凿取石块，自元明以来，迄今数百余年，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从未闻以关系风水。如果说开设厂矿，聚集多人，恐滋扰地方，那么，每年采取煤斤石料，所用人夫不知有多少，并未见滋生事端。结果，孟生蕙交部严加议处，昌平州开采矿藏照常进行。

改定乡、会试科场条例　乾隆五十二年(1788)十二月二十四日，经大学士、九卿等议，清政府改定乡、会试科场条例：将五经轮流分试，然后各出一题成五艺，论题删。生员岁试，在五科后，该学政亦轮流间出。童生仍用四书文二，经文删、闱中号戳，令知贡举、监临、督率提调、监试等官，将号戳通行挽搅，眼同外簾名员，分手戳印，不得假手吏胥，致滋买嘱连号之弊；停止预备空白试卷例；嗣后稽察龙门大臣，各按照品级携带跟役，并发给腰牌，以昭严密；嗣后临点不到举子，仍应随时禀点，违则扶出等。

柴大纪遭嫉被杀　柴大纪，浙江江山人，自武进士授守备，擢至总兵，移驻台湾。以守诸罗封为太子少保、参赞大臣、一等伯。福康安率清兵解诸罗城围后，柴大纪出迎。他自以为功高拜爵赏，又是在围城刚解之时，匆忙不具櫜鞬礼，对此福康安非常不快，便向乾隆帝弹劾柴大纪奏报诡诈不实。乾隆帝曾经阅读过柴大纪守诸罗城的奏章，并且感动得落泪，所以便谕示福康安不必因柴大纪礼节不谨而直揭其短，而应略短取长。当时福康安已准备将柴大纪斩首，便怂恿侍郎德成也讦告柴大纪。这样，乾隆帝遂命将柴大纪逮至京师鞫讯。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二十一日，清廷采纳福康安议，以柴大纪纵驰贪黩、贻误军机罪斩首，其子发往伊犁为奴。

廓尔喀兴兵侵藏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一等诚勇公庆麟奏折送到京师：廓尔喀兵东向入寇西藏。廓尔喀军入侵西藏，是沙玛尔巴唆使造成的。原来，六世班禅入京朝觐期间，乾隆帝多次厚赐珍宝财物，京师各王公大臣以及内外蒙古王公也多所施舍，不下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珍宝不可胜计。六世班禅圆寂后，其同父异母兄仲巴呼图克图全部据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及唐古特兵(藏兵)，也不给班禅亲弟沙玛尔巴，借口是他系红教喇嘛。这样，沙玛尔巴感到非常气愤，便于乾隆四十九年前往廓尔喀，极言仲巴呼图克图拥有班禅的巨额资财和奇珍异宝，唆使其出兵劫掠扎什伦布寺。廓尔喀入侵西藏，也与贸易纠纷有关。以前，廓尔喀与后藏之间的贸易，都是使用廓尔喀所铸银钱，掺有铜铅，成色不纯。后来，廓尔喀改铸新银钱，银的成分增加，便要求西藏人承认一个新银钱当二个旧银钱使用，西藏人不同意。在贸易中，一些藏商将廓尔喀人必须购买的食盐搀入沙土，牟取厚利。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苛取商人物件，第巴桑干将廓尔喀人的货物任意加税。这一切，都引起了廓尔喀人的不满。当然，廓尔喀入侵西藏，最主要原因是廓尔喀国正在迅速发展，军事力量相当强大，执政者力图对外扩展。正是以上这些原因，廓尔喀于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派兵入侵西藏，占领了聂拉木、济陇二处，不久又夺取宗喀，围攻胁噶尔寨等。

杨重英顾惜名节　杨重英原是道员，受命出使缅甸，在那里羁留二十一年，独居佛寺，未娶妻生子，非常顾惜名节。后缅甸款关投诚，向清朝奉表纳贡，并且将杨重英送回中国，不料杨重英途中病故。乾隆五十三年(1788)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帝闻讯后，加恩赏其道员职衔，以示轸恤。

复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　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一月二十日夜，清两广总督孙士毅传乾隆帝谕旨，复封黎维祁为安南(今越南)国王。先是安南国王黎维𥚄死，其嫡长孙维祁嗣立。后阮岳称帝，封其弟阮惠为北平王，二人不睦，相互攻杀，黎维祁乘机取阮惠所居长安。阮惠大怒，遣将攻入升龙(今越南河内)。黎维祁出走，其母率老幼六十余口进入广西境内避难，并请清朝给予援助。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乾隆帝命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师出援。并铸印备封

黎维祁。孙士毅受命出师，同广西提督许士亨率两广兵一万出关，以八千兵为主力直插升龙，以兵二千驻谅山。此外，马大经还率云南兵八千出白马关(今马关)，与凉山兵成犄角形。十一月十三日，清军强渡寿昌江。十六日，许世亨与阮惠军大战于市球江。清军一面列枪炮隔江攻打，一面潜至上游乘农家小船暗渡。十九日，清军进抵富良江，阮惠军败退。二十日，清军进入升龙，黎民宗族百姓出迎，孙士毅等遂进入城内，是日夜，他传旨令黎维祁袭封安南国王。

封阮兴平为安南国王 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初三日，阮惠(即阮兴平)统兵打败清军进据黎城后，就差人赍表叩关，表示向清朝情愿投诚纳贡；二月初九日，他又派遣武辉璞二位官员，赴镇南关，赍表求贡。当时，阮惠正与暹逻(今泰国)交战，国内许多宗族也还没有彻底归顺，在这样的内外交困形势下，他认为，取得清朝的谅解和承认，受其册封，名正言顺地成为安南国王，对提高自已的威望，使安南官民臣服于己，会起极大的作用。因此，阮惠不断遣使求贡，竭力谋求乾隆皇帝宽恕，允其纳贡通商，册封其为安南国王。不仅如此，阮光平还请求来年亲自到京，为乾隆帝八十五生日祝寿，并表示为许世亨等立庙奠祭。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决定许贡允降。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以黎维祁优柔废弛，而阮光平方造邦伊始，命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不久，又令黎维祁率所属来京，归汉军旗，编一佐领，即以黎维祁掌管。

孙士毅败退人关 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二十五日，清廷收到孙士毅奏折，知道清军大败，黎城失守。原来，孙士毅本系文官，对军务并不精通。他从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相继任大理寺少卿、广西布政使、云南巡抚、广西巡抚、广东巡抚，直至两广总督，基本上没有带过兵打仗。因此，他占领黎城后，误认为是阮惠军惨败，清军所向无敌，实际上，是阮惠主动后撤，企图伺机再进。结果，他既不遵照乾隆帝谕旨迅速撤兵，也不严密设防，只是想贪图俘获阮惠报功。阮惠探知其虚实后，声言率军来降，实际上是分兵围袭。孙士毅中了阮惠"借宿一夜"之计。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一日，清军营中置酒张乐，正在兴高采烈之际，阮惠兵马突至，孙士毅仓皇御敌。阮兵数万，猛烈进攻，又用象载大炮冲阵，清军众寡不敌，黑夜自相蹂躏。孙士毅匆忙撤走，渡过富良江后，即砍断浮桥，以防阮兵追击。可是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官兵夫役一万余人，尚未过江，遂全部被阮兵砍杀，或溺死江中。孙士毅拚命逃窜，退回镇南关(今友谊关)，尽焚弃关外粮、械、火药数十万，士马还者不及一半。初六日，阮惠重占升龙。乾隆帝谕示，将孙士毅革职，以福康安为两广总督。

清政府在西藏设站定界 乾隆五十四年(1789)六月二十七日，从四川成都将军鄂辉等条奏，清政府决定在收复廓尔喀侵占的藏地后，设站定界：抽拨绿营官兵一百五十名移驻扎什伦布地方，由后藏至前藏地方，分立塘汛十二处，以唐古特兵(藏兵)安设；拉孑、胁噶尔、萨喀、宗喀、聂拉木、济咙等处，或添设唐古特兵，或修砌卡碉，以严防守，以资了望；西藏官兵按寨落多寡编定数目，随同绿营驻防，一体练习，月给口粮；在扎什伦布、拉里、察木多等地设置粮员，建置粮台，贮备两年粮食；西藏所属寨落，设立第巴管理，差遣堪布、囊苏赴京进贡，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及噶布伦等拣送妥人，酌定数目，沿途不得随意需索；驻藏大臣及噶布伦，每年应轮赴后藏，亲往稽察；驻藏大臣二人仍同居一处，遇有公事，可随时商办；西藏贸易外番，第巴头人应秉公调处，不许互相欺压争竞，噶布伦要随时访察；凡有关涉汉、回、外番等讼事，均令朗仔辖呈报，拣员会同审理；聂拉木、济咙、绒峡三处与廓尔喀连界，廓尔喀人来藏贸易，第巴止准收二十分之一税，并勒碑界所，长远遵循；驻藏大臣衙门官兵应役，应酌定名数，按期更换，禁兵丁雇役番妇，以肃营伍；西藏噶布伦、戴绷、第巴等，办理地方，管束兵丁，均关紧要，今后大处紧要地方缺出，仍令奏补，偏远第巴等缺出，由达赖喇嘛自行选择；理藩院司员并驻藏游击，要铸给办理藏番事务章京关防一颗，驻藏游击关防一颗，以便办事呼应较灵；宗喀、济咙、聂拉木等处，为廓尔喀人往来门户，应照阿里第巴例，由部发给号纸，以专责成；嗣后解赴藏地兵饷，仍以元宝起运，以便番地买卖交易；于川省闲款内加给银五百两，饬办缎布烟茶银牌等项，以备奖赏唐古特兵；自南墩迤西一路，凡属西藏所管之地，照旧归驻藏大臣管理，巴塘迤东土司地方，归川省将军督提衙门就近管理，江卡、乍丫、察木多并移驻后藏各营汛台站，统归驻藏大臣总理，巴塘、里塘安设塘汛官兵，就近归阜和协副将兼辖；打箭炉出口以至西藏，所派文武各官，三年期满应出具考语，奏明咨送本省将军督提，考察保题，仿照边俸报满例，一体升用。

定立禁约回民章程 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一月，准陕甘总督勒保奏，定立禁约回民章程，内容如下：回民礼拜日期，止准于本村寺内念经，不许另赴别寺，也不得多索忏钱；如有婚丧事件，止准延请本寺乡约头人，别寺之人，不得搀夺；仍令照依编造保甲之法，将回户应归某寺念经，造册备案；平时教

习经文，止准延请本寺回民教读，不许勾引隔村别寺人，也不许私自添建礼拜寺和私筑城堡；专设回民义学，教以诗书，以利化导。

准士子阅抄《四库全书》 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以四库全书荟萃古今载籍，不仅要内府珍藏，藉资乙览，还要其流传广播，沾溉艺林，使石渠天禄之藏，无不家喻户诵，遂谕示：镇江文宗阁、杨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准士子赴阁检视抄录，俾资搜讨。文渊阁等贮藏底本，亦许翰林就近检录，掌院学士不得勒阻留难。

海岛民居不得尽行焚毁 先是清朝官员顾学潮奏称：沿海各省所属岛屿，多有内地民人建盖草棚房屋居住，日聚日多，诚恐相聚为匪，查察难周。清政府于是决定，各海岛如有匪徒潜搭草棚房屋居住，立即烧毁。不久，闽浙总督伍拉纳上奏：福建所属海岛四百五十七处，浙江所属海岛五百六十一处，多有民人居住。有的搭盖棚房零星散处，有的建盖瓦房，已编保甲，有的渔讯时暂行搭厂。如果遵照定议，悉行烧毁，概行驱逐，恐怕烟户稠密的地方，使谋生之民一朝失业，转致漂流为匪，请将编甲输粮的免其驱逐；零星散处的可烧毁草棚，人口随籍安插；渔讯时暂行搭厂的不便概行禁阻，应令地方官取结给照，认真稽查。针对上述情况，乾隆五十五年(1790)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帝谕示；所有各省海岛，除例应封禁者久已遵行外，其余均著仍旧居住，免其驱逐。至零星散处人户，僻处海隅，地方官未必能逐加查察，所说烧毁棚房，移徙人口，也属有名无实。今各岛聚落较多的，已免驱逐；此等零星小户，皆系贫民，亦不忍独令向隅；而渔户出洋采捕，暂在海岛搭棚栖止，更不便概行禁绝。于是，鉴于沿海民人居住海岛，久已安居乐业，清政府决定海岛民居不得尽行焚毁。

尹壮图直言遭议处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以后历任郎中、御史、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官。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一月，就督、抚坐谴而令交纳罚银贷罪问题，他上疏指出：这种做法的结果，使桀骜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清廉自矢的，也不得不望属员资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不容不曲为庇护。所以罚项规定虽严，不但不能动其愧惧之心，而且使其潜生玩易之念。尹壮图建议，永停罚银例，将罚项改记大过若干次。乾隆帝阅其奏疏后，令指实复奏。于是尹壮图再次上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员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不料，乾隆帝览奏后大怒，认为尹壮图把当今之世说成民不堪命，太过分了。便命户部侍郎庆成和尹壮图一起出察府库亏空。庆成已受和珅指使，处处掣肘，使尹壮图得不到实际情况，反弹劾他妄言。尹壮图于是被逮至京，下刑部大狱。最初，尹壮图草拟奏疏时，其弟英图偷窥其户，尹壮图笑着说：弟不必代兄忧，兄首早已悬都市，弟代养老母天年即可。廷议尹壮图罪，拟斩决。乾隆五十六年(1791)二月初四日，乾隆帝命将尹壮图革职留任，以内阁侍读用。

彭元瑞徇隐革降 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月二十七日，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彭元瑞，因徇私容隐罪，被革去原职，降授为侍郎。彭元瑞原管理武英殿、国子监事务。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武英殿校录缺出，彭元瑞将其婿饶文屣咨送，后因诸生啧有烦言，乾隆帝令武英殿提调具文驳回，而国子监咨送原稿，仅注明“回避”字样，未经划行，也未停止咨送，表现了彭元瑞徇私滥送之弊。此外，彭元瑞侄彭良异顶名舞弊，事发后良异以家有老母，再三哀求，彭元瑞即听从容隐，未拿送到部。因以上问题，彭元瑞被降革职务。

回疆设立满文学校 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初一日，回疆(新疆南部)阿奇木伯克迈默特阿布都拉呈请设立满文学校，选其子弟及众伯克之子弟内质可造就者，教习礼仪等。乾隆帝批准了这一请求，派选通晓满文满语员弁前往教授，还赏给迈默特阿布都拉大缎一匹。

廓尔喀侵据扎什伦布 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初七日，廓尔喀兵占据聂拉木；八月二十一日，侵据扎什伦布(今日喀则)。消息传到京师，朝野大惊。先是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人入侵后藏。乾隆帝以理藩院侍郎巴忠会藏语，命其任监军，前赴西藏办事。巴忠自恃为御前侍卫，希图草率了事，便同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私议与廓尔喀和解：廓尔喀退回侵占的后藏聂拉木、济咙、宗喀(今西藏吉隆)三处地方，西藏每年给廓尔喀元宝三百个。巴忠还以廓尔喀乞降上奏，欺骗朝廷，同时又促使廓尔喀人入贡受封。但是，丹津班珠尔未能如期给廓尔喀人元宝。这样，廓尔喀人便以“未完债项”为借口，大举入侵聂拉木，又相继占领济咙、宗喀，侵犯定日，后又侵据扎什伦布。廓尔喀兵占据扎什伦布寺，肆行掳掠，将塔上镶嵌绿松石、珊瑚等摘去，金银佛像抢去大半，金塔顶、金册印都被掠走。一时后藏大乱。班禅七世丹贝尼玛因早已被驻藏大臣移往前藏，才得免于祸。随乾隆帝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的巴忠闻讯后，立即畏罪投水自沉死。乾隆帝命四川总督鄂辉、成都将军成德等，率领川军四千人，由打箭炉出口进藏，驱逐廓尔喀入侵者。

清政府在西藏开炉铸钱 西藏原来不铸钱币，行用廓尔喀钱。乾隆五十六年(1791)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谕示：我国家中外一统，同轨同文，官铸制钱，通行无滞，区区藏地，何必转用外番币货。况廓尔喀将所铸之钱，易回银两，又复搀铜铸钱，向藏内交易，源源换给，是卫藏银两，转被廓尔喀逐渐易换，尤属不成事体。若在内地铸钱运往，程站遥远，口外又多夹坝，运送维艰，不如在西藏地方，照内地例，安设炉座，拨派官匠，鼓铸钱币，驻藏大臣督同员役监制经理，也可不虞缺乏。于是，清政府开始在西藏鼓铸官钱行用，旧存廓尔喀钱文，一律销作银两。乾隆五十七年(1793)十二月初六日，清政府进一步明确了西藏铸银币钱模，正面用汉字铸"乾隆宝藏"四字，背面用藏文亦铸"乾隆宝藏"四字。

恰克图重新开市 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十六日，应俄国请求，清政府准于恰克图开市。还是雍正六年(1728)五月十八日，中俄两国在恰克图正式签字互换了恰克图条约，规定恰克图是两国贸易地点之一。乾隆二年，中俄北京贸易停止，也归于恰克图。但是，由于俄国人私收货税，或俄兵持械进入卡伦抢夺，俄国延不交犯，或俄国少校妄自尊大，有伤和气，清政府多次停止恰克图互市。对此，俄国政府因贸易大受影响，乃表现出焦急不安，并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恢复恰克图互市。在一次俄国萨那特衙门致清朝理藩院的文件中，俄国政府表示，从前恰克图贸易通商，于俄罗斯大有裨益，敢乞施恩复准开市。这样，经乾隆帝谕示，恰克图始重新开市。

福康安统兵入藏 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一月初二日，因廓尔喀大举入侵西藏，洗劫扎什伦布寺，乾隆帝授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统兵由青海入藏，反击廓尔喀入侵。乾隆帝在谕示中，还命福康安昼夜急行，限四十日抵藏。此后，鄂辉、成德相继革职，以惠龄为四川总督，奎林为成都将军。清政府还先后从东北调索伦兵二千，从金川调士兵五千，调川兵三千，并藏内官兵三千，总计约一万七千余人，开往前线。

治仲巴呼图克图等罪 乾隆五十七年(1792)闰四月二十九日，乾隆帝令治仲巴呼图克图、孜仲呼图克图等罪，以为西藏众喇嘛鉴戒。原来，在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入侵扎什伦布过程中，仲巴见势不妙，在敌兵未到之前，即将细软、物件搬至东喀尔藏匿。孜仲与四名堪布喇嘛，则在吉祥天母前占卜，妄称占得不可与贼打仗。结果，扎什伦布僧俗人心惑乱，没有进行什么抵御，就大部散去，造成廓尔喀兵毫无顾忌地抢劫扎什伦布。在治仲巴呼图克图罪的同时，乾隆帝还命鄂辉、和琳亲到布达拉，传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前后藏的呼图克图、喇嘛等，告以清兵进剿廓尔喀贼匪，完全是为了保护黄教。

廓尔喀向清军投降 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二十二日，清军统帅福康安接受了廓尔喀国王拉纳·巴哈都尔投降的请求，反击廓尔喀的战争基本结束。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福康安受命驰抵后藏，立即整兵进行反击，在擦木、邦杏等地连获胜仗，随后又收复济咙，歼敌千余人。济咙以外，高山耸峙，道路崎岖，行走艰难。福康安把清军分成两路，他自率一路由济咙直夺界隘热索桥，成德等则率另一路由聂拉木直奔关隘铁索桥。乾隆五十七年六月，福康安领兵抵达廓尔喀关津热索桥。这里两边是悬崖峭壁，前面又有河流阻挡，敌人设碉卡防守，难以攻取。福康安便派兵潜从上游捆木渡河，分兵三股，奇袭敌军。廓尔喀兵败退，清军占卡焚栅，夺桥前进。成德率另一路清军也攻碉夺卡，占据山梁，强夺铁索桥。福康安和成德分别领军夺渡热索桥和铁索桥后，便翻越高山，攻占要道，深入廓尔喀境内数百里，很快逼近了廓尔喀都城阳布(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期间，孙士毅、和琳、鄂辉、惠龄在前后藏、东西路也源源不断地把粮食、火药等物资运到军前。七月初八日，廓尔喀国王感到势穷力竭，表示愿送还所掠扎什伦布财定、金塔顶、金册印，并呈献沙玛尔巴骨殖，认罪乞降。八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命福康安接受廓尔喀投降。九月初四日，清军由廓尔喀境内全部撤出，退回济咙。不久，因反击廓尔喀功，福康安受赏一等轻车都尉，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海兰察晋封一等功，孙士毅为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和琳补工部尚书等。乾隆帝还命把挑起事端的沙玛尔巴尸骨，分别在前藏布达拉(即拉萨)、后藏扎什伦布(即日喀则)以及察木多一带通衢大站地方悬挂，还将起衅犯事原因及过程，布告示众，以为儆戒。九月十六日，清政府定廓尔喀五年一贡。十月初三日，廓尔喀国王拉纳·巴哈都尔派使到北京入觐。

金奔巴瓶定活佛 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二十六日，乾隆帝第一次提出以金奔巴瓶抽签法方式，确定达赖、班禅等大喇嘛的化身呼毕勒罕。十一月十七日，正式颁布金奔巴瓶制。达赖、班禅系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两弟子，因黄教禁止娶妻，故宗喀巴遗嘱达赖、班禅俱称呼毕勒罕(活佛)，圆寂后，新出数名呼毕勒罕孩童时，由拉穆主持，吹忠降神，以确定呼毕勒罕所在。但是，拉穆吹忠往往受人嘱托，假借神言，徇情妄指，以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亲族姻娅，递相传袭，总出一家，与蒙古世职无异，甚至

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以至众心不服。仲巴与沙玛尔巴均是呼图克图，同为前辈班禅弟兄，仲巴系扎什伦布商卓特巴，坐享丰厚，沙玛尔巴居住廓尔喀，未能分享，遂唆使廓尔喀兵抢掠，这些都是呼毕勒罕不真及族属相袭的流弊。乾隆帝清楚地认识了这些情况，便创金奔巴瓶制，以定达赖、班禅等大喇嘛的呼毕勒罕。金奔巴瓶制的具体做法是，设金奔巴瓶一于拉萨大昭寺，内装象牙签数枚，遇有呼毕勒罕出世互报差异时，将报出孩童数名的出生年月日及名姓，各写一签，放入瓶内，焚香诵经七日，由驻藏大臣会同大喇嘛等在众人面前抽签决定。蒙古地方，各旗部落供奉的呼图克图很多，大小不等，则在京城雍和宫内设一金奔巴瓶。如蒙古地方某旗某部落出有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其有关小孩年月姓名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交掌印扎萨克达赖喇嘛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由理藩院大臣公同掣签。金奔巴瓶制度的颁定，不仅达赖、班禅和西藏的呼图克图，就是青海、蒙古的呼图克图，其择定呼毕勒罕之权，实际上都已归属清政府。这对加强清朝中央政府对蒙藏地区的管辖，起了重大作用。

乾隆帝颁布《御制十全记》 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初三日，因允准廓尔喀国王修贡停兵议和，乾隆帝亲撰《十全记》，记述执政以来的“十全武功”，谕令军机大臣将此文缮写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建盖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远。这“十全武功”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二次受廓尔喀降。

鄂辉枷号于前藏 乾隆五十七年(1793)十二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命将鄂辉等人永远枷号于前藏，以为大臣不肯用心办事、致藏地不靖者戒。鄂辉是满洲正白旗人，由前锋逐渐升任守备、总兵、将军。在平定台湾过程中，他亲俘林爽文，被图形紫光阁。在第一次廓尔喀侵扰后藏时，鄂辉在四川，与提督成德率师赴援。当时，巴忠示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令贿赂廓尔喀交出侵地，鄂辉便擅自与廓尔喀议和，疏陈善后事。不久，他被授为四川总督。及廓尔喀第二次侵藏，乾隆帝因鄂辉误用巴忠议政滋事，削夺其官职，授副都统衔驻藏，为福康安督饷。廓尔喀投降后，藏地事平，鄂辉便被枷号于前藏。不久又释还京师。

颁布《钦定西藏章程》 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月二十一日，清政府批准了福康安所奏《藏内善后章程》，后以此为蓝本，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这一章程是福康安等率军击退廓尔喀入侵后，鉴于西藏地方制度废弛，弊病很多，遵照乾隆帝旨意，会同西藏大喇嘛及有关官员，共同议定的，并得到八世达赖强白嘉措和七世班禅丹贝尼玛的拥戴。《钦定西藏章程》总计二十九条，藏文原本存于拉萨大昭寺和扎什伦布寺内，主要内容有：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均系属员，事无大小，都要禀明驻藏大臣办理，扎什伦布诸务，也要一体禀知驻藏大臣办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以及前后藏大小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一经呈报出世，指出数名，均由驻藏大臣将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满、汉、藏三种文字缮写牙签，贮于钦颁金奔巴瓶内，先期传唤喇嘛齐集大昭寺，诵经七日，届期驻藏大臣亲往监同抽掣；前后藏遇有噶布伦、戴本、商卓特巴以下大小番目等缺，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亲族人等，不准干预公事；大寺坐床堪布喇嘛缺出，俱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秉公拣选，给与会印执照，派往住持；达赖喇嘛所管大小庙宇喇嘛名数，开造清册，及噶布伦所管卫藏地方，各呼图克图所管寨落人户，一体造具花名清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喇嘛处各存一分，以备稽查；藏内喇嘛前往各外番地朝山礼塔的，由驻藏大臣给与照票，限以往还日期，回藏之日，仍将照票缴销，不得逗留边外，如有潜行私越的，一经查出，即行究治；外番人等来藏布施瞻礼的，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禀明驻藏大臣，验放进口，事毕后查点人数，发给照票，再行遣回；廓尔喀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通向布施书信，俱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书，方可发给，噶布伦等，不得与外番私行发信；在藏居住贸易的廓尔喀、克什米尔等地方人，准其常川兴贩，查明该番、回商头等名数若干，造具清册，递交驻藏大臣衙门存案备查；凡在藏贸易的外番商民，请领驻藏大臣照票出口，过江孜、定日，由该备弁查验明确，始准放行，其自外番来藏的，也由该备弁查明人数，报明驻藏大臣，一体按名注册，以备查考；藏兵额数为三千名，分驻拉萨和扎什伦布各一千名，定日和江孜各五百名，军队定期操演，按时检阅，并在各地设立鄂博，驻藏大臣每年五、六月间轮流巡边；西藏地方政府收支，均须报驻藏大臣审核；禁止廓尔喀钱在藏地流通，鼓铸官钱，铸钱局事务由驻藏大臣监督。此外，《钦定西藏章程》在贸易、马政、租赋、差徭等方面也都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

福崧途中正法 乾隆五十八年(1793)二月初六日，福崧在解至京师途中，被乾隆帝命饮鸩而死。福崧是满洲正黄旗人，官至浙江巡抚，署两江总督。此前，浙江盐道迁两淮盐运使柴桢，以亏帑私移两淮

课银二十二万两充补，被查出拘讯。福崧以领两淮盐政，在尚书庆桂审查过程中，被认为曾婪索柴桢银十一万两，侵公使银六万余两，其母游西湖用灯彩等银又有二千余两。结果，福崧论罪当斩，乾隆帝命逮至京师。福崧作为封疆大吏，曾得罪过大学士和珅，并了解和珅一些阴私。因此，和珅害怕福崧到京师后，会于己不利，便以蜚语激乾隆帝发怒，致使福崧在解至京师途中被迫自杀死。

定西藏与廓尔喀疆界　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二十八日，西藏与廓尔喀疆界划定。此前，福康安派遣人员带同第巴曾前往勘明，西藏与廓尔喀在热咙桥设立鄂博为界。至此，又将鄂博以外的拉结、撒党两处归廓尔喀，而廓尔喀则把玛尔宗地方归还西藏。

英使马戛尔尼入觐　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初十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英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人。英国使团一行共七百余人，带有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图册、毡毯、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礼物。该使团于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到达大沽，在天津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北京。到京后，除留一部分人在圆明园和皇宫内安装所带仪器外，主要成员都前往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谒见时，马戛尔尼以见英皇皇礼觐见乾隆帝，单膝下跪，随后呈递了国书。乾隆帝赐宴并向英王和使团正副使节赠送了礼物，又派大臣陪同使团游览了山庄。使团在参加了乾隆帝八十二岁生日庆典后，返回北京。到京后，使团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主要内容有：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洋行，买卖货物；于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在此收歇，存放货物，居住商人；在广州附近得一同样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免税或减税；英国货船，按照中国所定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乾隆帝在给英王的敕书中拒绝了上述一切要求。敕书中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州，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敕书中还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准将铁器等贩人新疆　乾隆五十八年(1793)九月十六日，从伊犁将军保宁奏请，清政府准将铁器等贩运新疆。乾隆帝在谕示中说：新疆民人，所有种地应用器具，钢铁铜锡等物，在所必需，既非本地所产，而内地又不准其贩卖，于生计未免有碍。于是，原来禁止出关贩卖铁器等规定遂停止执行，同时还强调，这些物品不得使哈萨克、布鲁特等外夷转相贸易。

人口增加十五倍多　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发布上谕说：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我国家承平日久，休养生息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增。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乾隆帝还指出，为计及久远，总须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方可户庆盈宁，收耕九余三之效。各省督抚务必劝谕百姓，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毋得相竞奢靡，习于怠惰。

刘之协被捕逃脱　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初九日，白莲教首领刘之协被捕后逃脱。刘之协是安徽省太和县原香集人，白莲教支派混元教首领。他的师傅刘松于乾隆四十年被捕后，发配到甘肃隆德县配所。刘之协与弟子宋之清继续传教，以弘扬刘松未竟之业。乾隆五十三年，刘之协被选为总教首，在安徽、河南、湖北等省传教，称"牛八掌教，弥勒转世"，假托朱明后裔，宣传反清复明。后来，刘之协被捕，官役将他从太和解往河南扶沟，中途刘之协乘机逃脱，隐居在河南新野县教徒家中，秘密串连河南、湖北、四川的教徒，继续从事反清活动。由于刘之协逃脱，河南巡抚穆和蔺、扶沟县知县刘清鼐均被革职。

嵇璜逝世　乾隆五十九年(1794)，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嵇璜因病去世，终年八十四岁。嵇璜字尚佐，是已故大学士嵇曾筠子。他二十岁成进士，选庶吉士，曾侍从其父治河，因而熟习河工事务。嵇璜曾奏请修补高堰石工，以及归仁堤闸，均获得谕旨批准。他任河东河道总督期间，一次，去巡视河工。当时天色已晚，而虞城工地恰好出现险情，嵇璜立即赶往该处。在雨雹交替袭击下，下埽岌岌可危，随从的人脸都吓白了，有的人劝嵇璜暂时躲避一下。嵇璜不听，站在堤上大声说：我要和埽在一起！不久雨雹停息，河堤安然无恙，随从的人对嵇璜更加敬佩。

学者汪中逝世　乾隆五十九年(1794)，著名学者汪中因病去世，终年五十一岁。汪中，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他出生于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幼年丧父，生活艰苦。他考上拔贡以后，未再应试，为了谋生，便长期游幕在外。汪中治学讲究实事求是，合于世用。

他搞音训考证，便很重视求真和致用。他继承反理学的传统，指出理学家所尊奉的《大学》一书，并不是孔子所作。他激烈抨击封建礼教，反对要求妇女殉节、守节。他很注意诸子的研究，先后校勘考释了《老子》、《墨子》、《荀子》、《贾谊新书》等。他高度评价荀子，认为荀子才是孔子学说的真正继承人。汪中的代表作《述学》，是他一生治学心得的结晶，是一部中国古代学制学术史，只是因为迫于贫困，牵于人事，限于力量而未能全部完成。汪中一生著述约二十余种，以“通儒”而流传后世。

湘黔苗民起义 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十三日，石柳邓等领导湖南、贵州苗民发动反清起义。石柳邓是贵州松桃厅(今松桃苗族自治县)大寨人。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他同湖南永绥厅(今花垣)黄瓜寨人石三保，相约于乾隆六十年正月十八日在两地同时发动起义，以“逐客民，复故土”相号召。由于起义消息被汉族地主杨芳侦知告密，石柳邓遂提前于十三日发动起义。十八日，石三保亦率众起义。几天后，凤凰厅(今湖南凤凰县)属吴陇登、吴半生，乾州厅属吴八月等纷起响应。二十九日，湘西苗民义军在鸦西寨大败官军，杀死镇筸镇(今湖南凤凰县南)总兵明安图、永绥副将伊萨那、同知彭凤尧，不久又攻下乾州城(今湖南吉首西南)。闰三月，石柳邓率义军南攻松桃，并以兵包围贵州镇远镇总兵珠隆阿于正大营城内。清朝总督福康安、提督花连布闻讯后率兵赶到，十八日解正大营围后，便放火烧山。二十六日，义军撤出松桃，石柳邓率师入湘西，与石三保在永绥黄瓜寨会师。黄瓜寨是湘黔苗民起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石柳邓与石三保在黄瓜寨会师后，福康安与和珅等分别率川、滇、黔、湘清军尾追逼进黄瓜寨。四月，清军绕道进攻黄瓜山大梁，起义军采取“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战术，巧妙利用地形，避实就虚，东游西击，打击清军，还击败了护送粮饷的花连布军。后来，终因寡不敌众，石柳邓与石三保率领义军被迫转移，清军占领并火烧了黄瓜寨。石柳邓、石三保自黄瓜寨转移后，继续联络各部，集结力量，与清军进行斗争。他们在乾州平隆推举吴八月为王。福康安与和珅率清军分路围追起义军。吴半生在鸭保寨兵败后投降。在福康安“以苗攻苗”的策略下，吴陇登也归附清军。十一月，吴八月率领义军转战至卧盘寨，吴陇登伪装溃散，也混入卧盘寨。初三日，吴八月被吴陇登计俘，解至福康安军营后遭杀害。湘黔苗民起义遇到严重挫折。

宣立颙琰为皇太子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乾隆帝御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及王公大臣等，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建元嘉庆元年，届期归政。乾隆帝在谕示中说：朕即位之初，就曾表示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他同时又强调：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

乾隆帝连续制裁贪官 乾隆六十年(1795)九、十月间，乾隆帝对封疆大吏的贪污不法行为，陆续给以严厉制裁。九月初八日，前闽浙总督富勒浑以在任期间，索取盐商等银五万五千两，被查抄家产，发往热河效力赎罪。初九日，雅德因在闽浙总督任内，索取盐商银四万五千两，被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二十一日，前任黑龙江将军都尔嘉、明亮、舒亮，因在任内犯有侵渔貂皮等罪，分别被杖流、论绞和留乌鲁木齐效力。十月初九日，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在任内侵吞库银八万五千余两，收受盐规银十五万两，受厦门同知黄奠邦馈银九千二百余两，家有如意一百余两；福建巡抚浦霖婪索馈银，贪黩不法，家存银二十八万余两，金七百余两；按察使钱受椿在审案时，私向伍拉纳和浦霖抽换案卷，藐法徇情，三人俱被斩首。

嘉庆帝即位 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日，乾隆帝御太和殿，正式把皇位传给嘉庆帝，自己称太上皇，实行训政。嘉庆帝名颙琰，是乾隆帝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初六日，母亲是孝仪恭顺纯皇后魏佳氏。嘉庆帝六岁开始读书，以兵部侍郎奉宽为师，十三岁通五经，向工部侍郎谢墉学今体诗，向侍讲学士朱珪学古文古体诗。他自幼深得乾隆帝喜爱，十四岁那年，乾隆帝认定他为继承人，按秘密建储法，把他的名字写上后，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也是这一年，乾隆帝为他完成了大婚礼。嘉庆帝未即位前，喜读历史书籍，对上下三千年历朝治绩一目了然。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被封为嘉亲王。自此之后，每年东西陵春祀，坛庙祷祈，他都代表乾隆帝前往行礼。因此，虽然他的皇位继承人身份内定后并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他一天比一天更受乾隆帝宠信。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在位六十年的乾隆帝终于在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以及王公大臣等，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嘉庆帝即位这一天，礼仪十分隆重，乐部设中和韶乐于太和殿前檐下，丹陛大乐于太和门内，传位诏书、传位贺表一应具备。嘉庆帝即位的消息，由礼部、鸿胪寺官员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宣布，不过，由于乾隆帝还活着，作为太

上皇训政，所以，嘉庆帝即位的前三年里，实际上不掌大权，只是个傀儡皇帝而已。

白莲教起义 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十日，白莲教徒张正谟、聂杰人等在湖北宜都洋郑畈聚从起义。白莲教在民间早已秘密流传。乾隆朝后期，白莲教在各地的活动更加活跃。它的支派很多，名目不一，大多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宣传弥勒转世，入教者可免灾难。乾隆三十九年(1774)，河南鹿邑县人樊明德创立白莲教支派混元教，传经授徒，提出换乾坤，换世界等口号。不久，樊明德被捕，惨遭杀害，其弟子王怀玉逃脱，而王怀玉的弟子刘松则被遣戍隆德县。乾隆五十三年(1788)，刘松与其弟子刘之协把混元教改名三阳教，推刘松为老教主，称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扬言入其教的人，可以免除水火刀兵之灾，继续传教授徒。乾隆五十四年(1789)，刘之协感到力量单薄，便前往湖北襄阳，吸收原收元教教首宋之清加入三阳教。宋之清原为收原教教首孙贵远的三传弟子，一直在湖北、河南交界的地方秘密传教。他转入三阳教以后，派手下许多精明强干的弟子分赴各地，广为传经，各自收徒，开始了反清斗争的准备工作。这样，白莲教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等广大地区传播开来。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政府接连破获白莲教组织，相继逮捕白莲教骨干刘松、刘四儿、宋之清等人，并把他们全部处死。以教首刘之协等少数人幸免于难，为了反抗清朝政府的镇压而继续斗争。嘉庆元年正月，张正谟、聂杰人等终于以"官逼民反"相号召，领导白莲教起义，向清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斗争。

王聪儿等率众起义 嘉庆元年(1796)二月初二日，王聪儿等人率领白莲教徒在襄阳黄龙珰(今湖北襄樊东南)起义。王聪儿，又称齐王氏，湖北襄阳人。她自幼流落江湖，娴习骑射，貌美侠勇。其夫齐林是襄阳县总差役，又是白莲教襄阳地区总教师。齐林等原定于正月元宵节(十五日)起事，因密谋外泄，被捕杀，首级悬挂于城门，同时被捕杀者一百余人。齐林徒弟刘启荣、张汉潮等要为齐林发丧复仇，便在二月初二日聚集白莲教徒几千人，推举王聪儿为总教师，在齐林故里襄阳黄龙垱起义。王聪儿时年二十岁，衣著尽白，非常有号召力。起事后，她率领白莲教军攻打襄阳城，未能攻下，又打樊城。这期间，同时起事的白莲教另一首领曾大寿违反军令，王聪儿下令将其斩首。于是，王聪儿领导的白莲教军纪律更加严明，活跃于湖北、河南边界地区。这期间，原来由齐林约好的白莲教起义四处发动。在荆州，有聂杰人、张正谟、刘宏绎、覃正潮起枝江，踞灌脑湾；在荆门，有熊道成、陈德本攻破了当阳县，占据了城池；在郧阳，则有曾士兴、曹海阳起竹山，并攻破竹山、保康。此外，还有杨子敖起耒阳，谭贵起旗鼓寨，楚金贵、鲁惟志起孝感，林之华、覃加耀起长阳。这些起义军与王聪儿领导的白莲教军相互呼应，声势日益浩大。

清军分路攻堵白莲教军 嘉庆元年(1796)四月初一日，嘉庆帝谕示军机大臣，要调兵遣将，分路攻堵白莲教军。结果，陕甘总督宜绵、总兵百祥分攻郧县、郧西一带；乌鲁木齐都统永保、西安将军恒瑞分攻竹西、保康一带；湖广总督毕沅、杭州将军成德分攻当阳、远安一带；湖北巡抚惠龄和富志那分攻枝江、宜都一带；湖广提督鄂辉和彭之年分攻襄阳、均州一带；大学士署四川总督孙士毅督攻川、楚交界一带。嘉庆帝要求各路官兵分投掩捕，办一处必须肃清一处。不久，他又命拨库银二百万两，以备军需。

徐天德等率众起义 嘉庆元年(1796)九月十五日，徐天德与其弟徐天寿，以及王登廷等人在四川达州亭子铺率领白莲教徒起义。徐天德，四川达州(今达县)亭子铺人，世代务农，曾充当州役，后被斥革，遂习白莲教，传授教众。湖北白莲教徒发难以后，四川白莲教徒众也积极准备，欲起而响应。因此，徐天德起义后，群众纷纷参加抗清武装队伍，十几天时间，就组织起近万人的军队。徐天德称大都督，白莲教军都以白布缠头，竖立旗号。徐天德起义不久，东乡的白莲教首领王三槐、冷天禄、张子聪等，也聚众响应。于是，四川的白莲教起义逐呈波澜壮阔之势。陕西巡抚秦承恩屯兵兴安，四川总督英善、成都将军勤礼善率兵进剿，都慑于起义军的声威，畏缩不前。英善派中营游击尚维岳、左营游击范懋率二千人驻扎娘娘庙，令左营都司清福出东乡天星桥为犄角之势。徐天德领导白莲教军在亭子铺停留数日以后，便转屯麻柳场，乘清军不备，夜袭娘娘庙，打死了尚维岳、范懋、清福以及把总多名，清军全军覆没。然后，徐天德又率领白莲教军，扫荡了达州、东乡、太平、新宁、渠县、大竹等地的团寨乡勇武装。于是，白莲教军辗转蔓延，势不可遏。十月，太平的白莲教首领黄富才、卿有义起事，徐天德便率起义军经太平进入陕西境内，分兵攻打兴安府的安康、平利、紫阳等县。在徐天德白莲教军率领下，陕西各地的白莲教也纷纷举起义旗。十二月二十九日，徐天德领导的白莲教军攻陷东乡城，杀死清朝总兵袁国璜、知县张宁阳等，声势大振。

石柳邓战死，苗民起义遭重创 嘉庆元年(1797)十二月十七日，将军明亮奏报清政府，石柳邓中枪身亡，苗民起义受重创。石柳邓是贵州松桃厅

(今松桃苗族自治县)大寨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二月,他同湖南永绥厅(今花垣)黄瓜寨人石三保,相约在乾隆六十年正月十八日在两地同时发动起义。由于起义消息泄露,石柳邓遂提前于十三日发动起义;十八日,石三保也率众起义。不久,凤凰厅(今湖南凤凰)属吴陇登、吴半生,乾州厅属吴八月等纷起响应。二十九日,起义军在鸦西寨大败官军,杀死清朝总兵明安图、永绥副将伊萨那、同知彭凤尧,攻下乾州城(今湖南吉首西南)。乾隆六十年闰三月二十六日,石柳邓率师入湘西,与石三保会师于永绥(今湖南花垣)黄瓜寨,在这里和清军展开激战后,转移到乾州平陇。嘉庆元年七月十八日,石三保军被清朝四川总督和琳击败,石三保被俘后,解至京师被害。石柳邓率领苗民义军继续奋战,在平垅一带活动。九月,清军在当地汉族地主的协助下,大举进犯平垅。石柳邓率众展开了英勇的保卫战,一直坚持了三个月,击毙清将守备王泰和等人,给清军以重大杀伤。后来,清军由平陇后山贵鱼坡、大顶坡等处分路进攻,破木城,夺石卡,使苗民起义军陷于困难境地。起义军首领吴八月的八子吴廷礼、吴廷义被叛徒出卖,石柳邓在战斗中受伤后壮烈牺牲。清军攻陷了平陇,苗民起义遭受到重大挫折。

女科学家王贞仪逝世　嘉庆二年(1797),兼资文武、六艺旁通的女科学家王贞仪病逝,年仅二十九岁。王贞仪,字德卿,自号江宁女史,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她的祖父王者辅是一位具有历算学术的中下级官吏,曾任丰城知县和宣化知府,先后都因得罪上官落职,最后一次还被发配到吉林,病死在戍所。她的父亲王锡琛是科举道路上的失意者,但却是一个有学识的好医生,曾汇集自己的临床经验,撰成《医方验钞》四卷。出生于这样环境的家庭里,王贞仪对世态人情比较敏感,对于现实生活有自己独特的考虑和认识,思想中的某些方面突破了当时社会的桎梏,表现出一定的解放和进步倾向。她否定相沿已久的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封建迷信活动,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来阿世取容。在祖父和父亲的熏陶培养下,王贞仪在青年时代不仅具备了经史诗文的修养,而且还在天算、医药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科学水平,成为清代乾嘉时期一位卓越的女科学家。她广泛地涉猎了古代著名天算家张衡、祖冲之等人的著作,对某些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阐发和解释。王贞仪研究了勾股、测量、方程各方面的学术,写下了许多天算方面的著作。针对当时历算有中西法不同流派,她主张集思广益,不要有门户之见。王贞仪还对天文学中的若干天象问题作了阐述和解释,对岁差等问题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她还反复阐述了地体浑圆的论点,解释了人在圆形体上环立而不倾跌的原因,是地球周围都处在和天体的相对空间关系之中,没有上、下、正、侧的区分。在医学方面,王贞仪不仅从医书中学习了医理,而且还能切脉治方,提出了察脉、视人、因时、论方、相地的医道五诀。王贞仪撰写了许多科学专著和诗文集,主要的有《星象图释》二卷,《书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重订筹算正讹》、《西洋筹算增删》、《女蒙拾诵》、《沈疴呓语》各一卷,《象教窥余》四卷,《文选(诗赋)参评》十卷,《德风亭初集》十三卷,《德风亭二集》六卷,《绣线余笺》十卷。

襄阳白莲教军抢渡汉江　嘉庆二年(1797)五月十二日,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襄阳白莲教起义军,在陕南兴安(今安康)与紫阳之间白马石抢渡汉江成功。此前,起义军活动在陕西南部的秦岭山区。后来,王聪儿、姚之富与王廷诏、李全等三路义军会师于镇安,在表带铺击败清军,击毙清军护军统领阿尔萨瑚等,接着又在王家坪设伏,重创清军。五月初,起义军由汉阴、石泉直趋紫阳,抢渡汉江。紫阳白马石等处,居汉江上游,水深不过三、四尺,船只只载义军中的老幼妇孺,其余多系骑马浮渡。身体强壮的战士,每两人挽手划水而过,渡江场面甚为壮观。襄阳义军渡江五天以后,清军统帅惠龄才率领军队缓缓而来。嘉庆皇帝又气又急,大骂惠龄等人是无耻已极,传旨严行申饬,惠龄被夺官衔、世职、花翎,降为领队,而以宜绵总统军务,惠龄听其节制。襄阳义军顺利渡过汉江,为进军四川铺平了道路。王聪儿等率领白莲教起义军兵分三路进入四川,穿越大巴山区,到达通江、达州,不久又由通江竹峪关进抵东乡,与四川义军会合。王聪儿、姚之富等驻开县南天洞,李全等部驻温汤井,分屯山冈,延亘三十余里。各路义军决定重新设青、黄、蓝、白分号,并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确立各路义军的建置。襄阳义军黄号以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王光祖、樊人杰为首领,白号以高均德、张天伦为首领,蓝号以张汉潮为首领,下面各附以其他将领。襄阳白莲教军抢渡汉江成功,与四川起义军胜利会师,使白莲教起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史学家王鸣盛病逝　嘉庆二年(1797),著名历史学家王鸣盛病逝,终年七十六岁。王鸣盛,字凤喈,又字礼堂,自号西庄,晚年改号西沚居士。江苏嘉定人,乾隆年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被弹劾降光禄寺卿。乾隆二十八年(1763),母丧告归,卜居苏州。他早年治经,宗郑康成

学，撰有《尚书后案》及《周礼军赋说》。退官后专治史学，历二十年著成《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晚年自编考证文字《蛾术编》一百卷。王鸣盛对于小学、金石学、目录学也都有研究。此外，他生性俭素，无声色玩好之误。

毕沅去世 嘉庆二年(1797)七月初三日，毕沅病死于湖广总督任的消息上达清廷，嘉庆帝赠其太子太保，并赐祭葬。毕沅，字秋帆，又字缃蘅，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继为翰林院侍讲，兼《大清一统志》及方略馆纂修。乾隆三十一年起，出京外任。先官陕西按察使，上奏甘肃干旱，免欠赋四百万。后任陕西巡抚，督垦田，浚水渠，收碑碣，储学宫，曾谏言陇右耕作与畜牧相兼，实为边土无穷之利。后来又任山东巡抚，奏蠲山东积欠四百八十七万，常平社仓粮五十万余石。他居官期间，先后镇压过回民、苗民以及白莲教起义。毕沅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居官于外几十年间，主持编纂了《续资治通鉴》，还延清学者编写了《传经表》、《湖北通志》、《史籍考》等。他还著有《关中胜迹图记》、《西安府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记》、《灵岩山人诗集》、《灵岩山人文集》等，是清代著名的文史学家。

贵州布依人起义 嘉庆二年(1797)正月二十六日，贵州布依人起义的消息报闻京师。贵州南笼府(今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布依族人以韦朝元为首，汉人桑鸣升为军师，率领布依、苗、汉人于普坪起义。不久，起义军势力延及安顺府属郎岱、归化(今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和贵阳府属广顺、罗斛(今贵州罗甸)等厅州地区。嘉庆帝闻讯后，立即谕示军机大臣，认为贵州苗疆关系紧要，一切调度机宜，人少照料难周，决定派将军勒保从黄柏山出发，轻骑减从，驰赴南笼；又派珠隆阿、张玉龙等带领从别省调往贵州军兵，前赴南笼；还决定再从别省调兵一二千人驰援贵州南笼，以期火速扑灭布依人起义。后来，在清军四面围剿下，韦朝元等人被俘身死，起义失败。

乾清宫失火，众太监受罚 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紫禁城内乾清宫、将泰殿发生火灾。次日，嘉庆帝谕内阁、内务府大臣，将失火延烧的太监，以及失于稽察的总管首领太监等，分别治罪。嘉庆帝说：宫禁重地，该太监等不能小心看守，以致失火延烧，获罪甚重，本应照拟严办，朕仰体上天好生之德，量予从宽。结果，原拟绞决太监郝士通，改为应绞监候，秋后处决。原拟绞候首领太监张士太、刘顺、王进录，免死，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原拟发遣的散众太监二十二名，均免其发遣；其中李从祥、孙天成二名，系专管东暖阁的人，重责四十板，发往吴甸铡草三年；张宽等二十名，俱重责四十板，交总管分拨当差效力。至于专管总管太监顾进朝，革去总管，仍回瀛台，在太监上当差，并罚钱粮六年。总管太监萧得录、张进喜、刘芳、佟安、佟玉明，虽均系总管，但究非专司，俱免其革去顶带，仍各罚钱粮四年，以示薄惩。不久，嘉庆帝又命军机大臣传谕刑部，将太监郝士通发往黑龙江，给打牲乌拉、索伦、达呼尔为奴。

王聪儿等投崖牺牲 嘉庆三年(1798)三月，襄阳白莲教军首领王聪儿等在郧西上津堡南投崖壮烈牺牲。原来，襄阳白莲教军准备进攻西安，因清军在川陕有较多机动兵力，尤其地方乡勇众多，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王聪儿等便准备率队转移。不料清军死死缠住白莲教军不放，使襄阳白莲教起义军逐渐陷于被动地位。在清军的追逐下，白莲教义军先是在山阳的石河、宽坪与清军激战，接连失利后，又且战且走，退到湖北郧西的三岔河。这里两旁都是高山峻岭，白莲教军被迫走进山沟，如果义军从沟口奔向大路，就可毫无阻挡，摆脱清军追击。谁知郧西知县孔继榦率领数千乡勇，赶在白莲教义军的前面，堵住了沟口。白莲教军被装进了口袋里，前有乡勇堵截，后有清军追赶，两侧都是山梁。既使在这种情况下，八九千名白莲教军仍然顽强奋战，占住山梁，奔突沟口。但是，多次冲击，未能突出包围，白莲教军只好集结在左右两个山梁上。清军侦察到王聪儿、姚之富被困在名为卸花坡的左山梁上，便全力攻扑。王聪儿等率领三千多名白莲教军战士一边放枪，一边推下滚石抵抗。清军和乡勇人多势众，蜂拥而上，白莲教军中有许多老弱妇幼，力战不支。王聪儿和姚之富率领义军转移到山梁最险峻的地方，弃马爬越。清军团团围住了山梁，白莲教军无路可走，仍奋力抵抗，纷纷倒在血泊之中。王聪儿率领女战士十余人，与姚之富等登到山顶，誓不做俘虏，不受侮辱，相继投崖，壮烈牺牲。当时王聪儿年仅二十二岁。

王三槐被俘 嘉庆三年(1798)八月初九日，清军统帅勒保上奏嘉庆帝：白莲教军重要首领王三槐已被俘获。王三槐是四川白莲教军首领，称东乡白号。该部是四川省白莲教起义军的主力，被清政府认为是最强悍的一支。嘉庆三年初，王三槐率领白莲教军，与清军大战于云阳、开县之间，切断了清军的粮道，使清军缺饷两月，乡勇四散。后来，王三槐又率领四川白莲教军与清军激战于开县梓橦庙、九龙山、铁

索桥，以及太平金盆池，使清军总兵朱射斗惨遭败绩，清军大炮丢弃沟渠，被白莲教军缴获，均丢入金盆池中。王三槐虽然作战勇敢，指挥有方，但是，他对清朝统治者的招抚、诱降阴谋却认识不清。他过分相信南充知县刘清，赞誉他是不欺压百姓的“刘青天”。他曾跟随刘青进入清军统帅宜绵大营，企图用诈降手段袭击清军，只是清军有所准备，才未能得手。王三槐率领四川白莲教军击败朱射斗以后，便在太平、开县之间与清军周旋。清军将领勒保不能战胜王三槐，便设下毒计。他派遣都司马龙和贡生刘星渠两人，进入安乐坪劝说王三槐谈判招安事。王三槐依仗以前去过清军大营，并没出事，便把刘星渠留作人质，而随马龙前往。结果，王三槐进入清军大营后，即被逮捕。后押解京师受审，招出《供单》，被凌迟处死。王三槐死后，四川东乡白号白莲教军在冷天禄率领下，继续和清军进行斗争。

罗其清被俘 嘉庆三年(1798)十一月，四川白莲教军重要首领罗其清被清军俘获。罗其清，四川巴州(今巴中)人，父子兄弟均习白莲教。嘉庆元年，他在方山坪起兵，被推为元帅，称巴州白号，以苟文明为副帅，与达州徐天德、东乡王三槐相呼应，又联结通江冉文俦、太平龙绍周为左右翼。方山坪四面陡峻，坪顶宽广，上有水田、池塘、房舍，罗其清率领队伍在这里和清军对抗。他还率兵两破巴州，声名大震。嘉庆三年六月，罗其清与冉文俦在营山县箕山会师，部众将近万人。箕山周围百余里，三面陡绝，只有东南方向可通道。罗其清等人在箕山安营扎寨，防守严密，无懈可击。但是，罗其清与冉文俦不能团结合作，在几次战斗中，二人分别被清军击败，于是，罗其清被迫放弃箕山基要，退据大鹏寨，在清军的包围中，开始了更为艰苦的斗争。大鹏山地势险绝，宽广一百余里，半属悬崖，山上水泉堰塘很多，易防难攻。十月，清军四路围攻大鹏寨，昼夜轰击，纵火焚寨。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清军从南、西两面突破了山寨。罗其清率部撤退，且战且走，退据虚空寨后，再次被清军包围。因为虚空寨无粮无水，无法防守，又被迫突围至方家坪。在这期间，白莲教义军遭受了严重挫败，溃散殆尽；罗其清也被清军俘获，不屈而死。罗其清死后，四川白莲教军余部由苟文明率领继续斗争，转战巴州各地。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苟文明、冉文俦同时战败身亡。

袁枚病逝 嘉庆三年(1798)，著名文学家袁枚病逝。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庶吉士，任知县。由于他个性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章彝尊，好名人字画，好书，便辞官自适，在南京小仓山修葺随园居住，赋诗作文。袁枚著述有《小仓山房文集》及外集四十三卷，《小仓山房诗集》及补遗三十九卷，《小仓山房尺牍》十卷，《随园诗话》及遗补二十六卷，《随园随笔》二十八卷，《新齐谐》及续二十四卷。袁枚的思想比较自由解放，对当时统治学术思想界的汉、宋学派都有所不满，而特别反对汉学考据。他主张诗写性情，认为诗人不失赤子之心，作诗不可以无我，即要有真性情，要有个性。在袁枚看来，性情是诗的根本，一切题材内容、音韵格律、语言风格等，都是有定而无定，恰到好处即妙。他宣称对于古今人诗作，对于各个流派，要无所不爱，无所偏嗜，主要看他们有无表现性情。他反对模仿唐宋、大谈格律、以书卷考据作诗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诗风，更不喜爱一切迭韵、和韵、作僻韵、用古人韵等等来束缚性灵，以文字为游戏。袁枚对于诗的见解，对当时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诗风，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由于袁枚的诗直抒性情，写自己的生活感受，因而具有清新灵巧的风格。他的许多诗意境明晰，别有韵味。不过，缺乏现实社会内容，所作不出家居生活或旅行纪事的范围，则是袁枚诗的根本缺点。

乾隆帝病卒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乾隆太上皇帝病死，享年八十九岁。嘉庆元年正月，乾隆帝举行内禅礼以后，即把皇位传与嘉庆帝，而以太上皇帝训政。实际上，乾隆帝仍然掌握朝廷大权，许多活动都是以他为中心举行的。嘉庆二年正月初一日，嘉庆帝侍乾隆太上皇帝到奉先殿行礼；又御太和殿，率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蒙古王公台吉，及外藩使臣行庆贺礼，礼成，太上皇帝还宫；又侍太上皇帝到寿皇殿行礼；还侍太上皇帝到乾清宫，赐皇子亲藩等宴。初三日，嘉庆帝侍乾隆太上皇帝御重华宫，茶宴廷臣及内廷翰林，以平定苗疆联句。初十日，嘉庆帝侍乾隆太上皇帝御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回部郡王、外藩使臣等宴，赏赉有差。十一日，嘉庆帝侍乾隆太上皇帝前往圆明园。十四日，嘉庆帝侍乾隆太上皇帝御奉三无私殿，赐皇子亲藩等宴；御山高水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外藩使臣等食，直到十六日均如此。十五日，嘉庆帝侍乾隆太上皇帝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十六日，嘉庆帝侍乾隆太上皇帝御正大光明殿，赐大学士、尚书等宴。以上只是正月里的部分活动，其他月份的活动还有很多；嘉庆三年正月里的活动也大致如此。由此可见，乾隆太上皇帝未死前，确实还掌握着朝廷大权。乾隆太上皇帝的驾崩是比较突然的。嘉庆四年正月初一日，嘉庆帝

还奉乾隆太上皇帝御乾清宫，率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蒙古王公、额驸、台吉，及外藩使臣，行庆贺礼；又侍太上皇帝御乾清宫，赐皇子亲藩等宴。初二日，乾隆太上皇帝感到身体不适，嘉庆帝在养心殿侍候，不离左右；这天晚上，乾隆太上皇帝病情加重。初三日辰刻，乾隆太上皇帝驾崩于养心殿。乾隆太上皇帝死后，清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祭葬礼，谥号纯皇帝，庙号高宗，当年九月十五日葬于裕陵（清东陵）。乾隆太上皇帝死后，嘉庆帝才开始亲政。

嘉庆帝惩治和珅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八日，嘉庆帝颁布谕旨，革大学士和珅职，下狱治罪；十五日，诏宣和珅罪状。和珅，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乾隆朝中叶为文生员，袭三等轻车都尉职；后得乾隆帝宠爱，擢御前侍卫，晋升军机大臣兼步军统领，官领侍卫内大臣兼理藩院尚书事，又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管理户部。他操柄权政，作威作福，积怨朝野。嘉庆帝即位前即知其奸，即位后，以乾隆太上皇帝在，不便处理。乾隆太上皇帝死，和珅失去依靠，嘉庆帝开始对他进行惩治。嘉庆帝宣布和珅有二十大罪，即：以拥戴自居；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乘椅轿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妄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于各路军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皇考圣躬不豫，毫无忧戚之情，谈笑如常；皇考力疾批答奏章，字迹间有未真，胆敢口称不如撕去另拟；兼管户部报销，竟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上年奎舒奏循化、贵德二厅番众二千余，抢劫达赖喇嘛商人牛只，肆劫青海，竟驳回原折，隐匿不办；皇考升遐后，谕旨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擅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大学士苏凌阿重听衰迈，因与其弟和琳结亲，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等在其家教读，保列卿阶；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所抄家产，楠木房屋奢侈逾制，多宝阁等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屿无异；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百姓称“和陵”；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大珠较御用冠项尤大；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埋银三百余万两；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珍珠手串。十八日，嘉庆帝令和珅在狱中自尽。死前，和珅写了一首诗，其中说道：“月色明如许，嗟余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

冷天禄牺牲　嘉庆四年（1799）三月初十日，四川白莲教军首领冷天禄壮烈牺牲。冷天禄，四川东乡人，原在邑务农。嘉庆元年九月，他和王三槐等人一起领导四川东乡白莲教徒起义，势力日益发展壮大。嘉庆三年八月，王三槐被俘死后，冷天禄为大元帅，率众转战于川东南充、广安、定远等地。嘉庆四年三月初十日，他率领白莲教军三四千人，行至顺庆府广安州（今四川广安）城头堰地方，遭到额勒登堡统领的清军抄截。额勒登堡先派刘君辅举兵将冷天禄引诱，又派总兵杨遇春、总兵衔穆克登布各为一路，于左右山沟绕山密抄。冷天禄当时有些麻痹轻敌，大军向前进发，他自率八百人断后。杨遇春等人争功心切，冒雨进军。冷天禄军陷入包围。尽管冷天禄手舞蛇矛，率众奋勇突围，无奈清军围困多重，冲不出去。激战中，冷天禄额部中箭，翻身落马，又中乱矛，力竭身死。冷天禄牺牲，四川东乡白莲教义军失去指挥。第二天，起义军大部队正乘船渡石笋河，清军将领杨芳率兵赶到，乘义军半渡之际，突出攻击。白莲教义军大败，五艘渡船倾覆，损失惨重。

清政府禁止京畿开采银矿　嘉庆四年（1799）四月十九日，嘉庆帝就宛平百姓潘世恩、汲县百姓苏廷禄呈请在直隶邢台等县境内开采银矿，给事中明绳据以入告事颁布谕旨。他说：朕恭阅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于开矿一事，深以言利扰民为戒。圣训煌煌，可为万世法守。矿藏于山，非数人所能采取，亦非数月所能完事。必须是千百人为群，经年累月，设立棚厂，凿砂煎炼。以谋利之事，聚游手之民，生衅滋事，势所必然。纵使官府经理，尚且难以约束多人，若听一二商民集众自行开采，其弊将无所不至。这在边疆省份犹不可行，何况近在畿辅？他府犹不可行，何况近地大名？各该处向有私习邪教的人，此时对他们禁止尚且不够，怎么又能听任他们聚众呢？国家经费，自有正供常赋，川陕民乱，指日即可平定，国用本用不着考虑不足，怎么能又穷搜山泽，锱铢计较呢？结果，潘世恩、苏廷禄以“藉纳课为词，以小民而议及帑项，实属不安本分”罪，押回原籍，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滋事。给事中明绳，以开矿事冒昧转奏，明系商人嘱托，希望事成后分肥而已，用心卑鄙，交部议处。这样，清政府就明确表示了畿辅地区禁止开采银矿以及其它矿藏。

云南发生地震　嘉庆四年（1799）七月二十七日，云南发生地震，石屏、建水二州县灾情严重。其中，石屏地震西北的宝秀等一百八十四村情形最重，近城九铺次之，东南的吴家庄等四十九村又次之。由于地震发生在深夜，人们大多入睡，猝不及避，以致人口多有伤亡。统计城乡共倒塌瓦房五千七百二十八间，草房九千二百八十六间，压毙男妇大口一千一

百六十口，小口一千六十一口，压伤男妇大小共一千一百四十九口，实在被灾各户男妇大口八千四百六十口，小口六千二百八十三口。建水灾情较石屏要轻，共倒塌瓦房五百三十四间，草房一千五百三十八间，压毙男妇大口二十一口，小口九口，压伤男妇大口共五十五口，实在被灾各户男妇大口一千二百八十四口，小口八百二十三口。此外，石屏州城四门城楼、墩台、卡碉、炮台全行坍塌，周围内外城墙，亦多有震坍之处。建水县城垣、仓库、衙署不过间有坍损。地震发生后，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富纲立刻委员分路查勘，并飞札各州县具报情形，采取了相应的救灾措施。经中央政府允许，蠲免所有各灾户应征本年条丁公耗粮米；照例瓦房每间给银五钱，草房三钱，压毙大口每口给银一两五钱，小口五钱，伤者不论大小，每人给银五钱，现存大口给谷一石，小口五斗。

洪亮吉遣戍伊犁　嘉庆四年(1799)八月二十七日，洪亮吉因事革职，不久遣戍伊犁。洪亮吉，字稚存，江苏武进人。少年孤贫，奋力学习。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督贵州学政，任满还京，入直上书房。嘉庆三年大考翰詹，他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人所忌，以弟丧辞归。不久，大学士朱珪上书建议，重新起用。洪亮吉遂致书成亲王永瑆，称十几年来，督、抚、藩、臬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官吏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毫不考虑，只顾目前；官民吏治，不认为是急务，只图保住自己的官。洪亮吉还直接指出：当今皇上应当效法宪皇帝的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结果，嘉庆帝认为他“妄测高深，意存轩轾，狂谬已极”，不仅把他革职，还遣戍伊犁。嘉庆五年，因为京师发生旱灾，洪亮吉才被释回籍。此后，洪亮吉专心著述。他精通经史，长于音韵、地理学及诗文。他曾提出人口繁殖与生活资料，如住房、粮食等增长率的不协调，所以“治平”时代潜伏着社会危机。他的主要著述有《春秋左传训诂》、《补三国晋书地理志》、《意言》等，大多汇编于《洪北江全集》。

冉天元战死朱射斗　嘉庆五年(1800)正月二十九日，四川白莲教军首领冉天元战死清军总兵朱射斗，取得重大胜利。冉天元是四川白莲教军通江蓝号冉文俦的侄子，冉文俦牺牲后，通江蓝号义军便由冉天元率领。冉天元英勇善战，尤其会用伏兵。嘉庆五年正月十五日，冉天元乘清军大队人马赴陕甘作战、川境空虚之机，联合各路义军巧渡嘉陵江，顺利进入川西，进攻蓬溪县城。清朝统治者对此感到极为震惊，认为这是多年来所没有的事情。四川总督魁伦因此被革职留任。当起义军进抵蓬溪县的高院场时，恰与赶来征剿的清军总兵朱射斗部相遇，双方展开激烈搏斗。冉天元率数千义军踞山下扑，山坳伏军突出云合，将朱射斗军围困数重。朱射斗寡不敌众，遇坎落马，被白莲教义军战士斩于阵前。朱射斗以下清军参将罗定国、参领额森保、骁骑校萨英阿等多人，也被义军斩杀。高院场激战清兵大败，嘉庆帝闻讯十分恼怒，赐令署四川总督魁伦自尽，成都将军阿迪斯遣戍伊犁，四川提督七十五逮京治罪。

马蹄冈激战冉天元转胜为败　嘉庆五年(1800)二月二十四日，在马蹄冈战役中，冉天元转胜为败，不幸战死。高院场战斗之后，为了接应进入甘肃的义军，冉天元率大队北上梓潼、剑州(今剑阁)。清政府急令德楞泰自陕西回师，屯兵广元阻挡。嘉庆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德楞泰兵至马蹄冈，见白莲教军分据九个山包，排列整齐，严阵以待。他便督兵抢占黄茅岭。白莲教军遂兵分四路，每路有马兵四五百，步兵二三千，直扑下山。德楞泰也兵分四路，自领侍卫阿那保等为一路，持刀砍杀。冉天元在火石垭设伏兵万人，德楞泰被诱陷伏。清军主力进入伏击圈后，白莲教军战士猝然并起，用湿棉絮裹毛竹牌抵挡清军的弓箭火炮，轮番向前冲杀。清军被层层围困，饥渴疲劳，数路皆败。清军统帅德楞泰仅率数十亲兵，下马据山岭，以为必死。冉天元身穿蟒袍，其弟天恒草帽插花翎，带众登山，径取德楞泰。在此关键时刻，地主团练头目都司罗思举，急令兵士取石块乱击。一时间雨石纷纷，白莲教军没有防备，均弃竹牌后退，拥塞道路。这期间，冉天元坐骑中箭，跌入山涧，不幸被俘遇害，冉天恒也中箭牺牲。白莲教军失去指挥，溃不成军，乃转胜为败。马蹄冈战役后，四川白莲教军尚有万余人，他们在冉天泗、王士虎等统领下，抢渡潼河，继续和清军战斗，并一次又一次打败清军。

陕西白莲教军重创清军　嘉庆五年(1800)八月，高天升、马学礼等领导的陕西白莲教军，在西乡县法宝山地方重创清军，击毙清军提督王文雄。嘉庆五年初，清军统帅额勒登保亲自出马，调集各路清军，分头围剿陕西白莲教军。四月，白莲教军被逼至渭水以南，高天升、马学礼部南下文县。五月，为声援川西白莲教军的战斗，高天升、马学礼部打下四川龙安，分兵袭击松潘一带，川西震动。六月，陕西白莲教军夜袭陕甘总督长麟营盘，袭劫提督定柱营帐，战死原任将军富成、总兵扎尔杭阿。清军固原提督王文雄率兵追击白莲教军。当时高天升、马学礼等统率白莲教军进入陕西西乡县堰口，屯驻法宝山。王文雄分兵三路进攻。白莲教军从坳中突出一支截敌后，又从山上间道扑出一支袭其侧，其余全部出动，把王文雄团

团围住。白莲教军逐渐缩小包围圈，矢如雨注，刀矛交击。王文雄心腹受矛伤十余处，并被折断左臂，当场毙命。此外，清军官兵乡勇受伤阵亡者不计其数。

清政府重申严禁采矿 嘉庆六年(1801)，清政府重申严禁采矿政策。三月初八日，就军机大臣议驳保宁等奏请开采金砂一折，嘉庆帝谕示内阁：塔尔巴哈台所属各处金矿，在乾隆年间就禁止采挖，实力遵行，恐怕还难免有偷挖之弊，如果官为开采，必要召集多人，奸良不辨，而且甘、凉一带游民，也会纷纷到来。这些无籍百姓，聚集起来容易，遣散开来很难，对边疆地区影响太大。于是，嘉庆帝命保宁将产金处所严行封禁，勿令偷挖滋事。九月二十六日，就上年直隶总督胡季堂奏请在大名(今河北大名)地方开设铅厂，以及明安等奏大兴县民张士恒等呈请在承德府平泉州(今河北平泉县)属四道沟、云梯沟等处，自备工本，开采铜矿，嘉庆帝再一次颁布谕旨，强调开矿之事断不可行。他说：开矿俱系无业游民，攒凑资本，互相邀集，趋利若鹜。倘已聚集多人，而矿藏渐竭，那时怎样把这些人遣散，难免不滋生事端。况且该地与蒙古山场相连，如果让蒙古人感到内地官民都是牟利之人，对国体影响极大。此外，现在户、工二部鼓铸用铜，照例由云南省起解运京，非常充裕，无须另筹开采。今后矿产洞口，要永远封禁，不准开采。地方官也应严加查察，不许再有私行偷挖事情发生。

白莲教军日趋失利 嘉庆六年(1801)，各地白莲教起义军处境艰危，日趋失利。这年五月，四川白莲教军首领徐天德等据守陕西白河县黄石坡，清军统帅德楞泰督兵围追。徐天德被迫东走西乡，又由西乡趋紫阳。清军固原提督赛冲阿逼于仁和新滩。当时暴雨水涨，情势急迫，徐天德在两河口因舟覆不幸溺死。九月，白莲教军重要首领尤绍周从四川太平攻入湖北竹溪，同清军西安将军赛冲阿激战失利，走陕西平利。二十七日，尤绍周在平利所属汝溪、盘龙山、岳家坪一带，与赛冲阿、温春所率五路清军冒雪激战，兵败阵亡。至嘉庆六年底，由于清政府采取剿抚并用、分兵合击、坚壁清野、结寨团练等政策，各地白莲教军相继失利，许多重要将领，例如高天升、张世陇、徐万富、王士虎、卜兴昂、王廷诏、冉天泗、赵志成、张允寿、张天伦、武怀志、王镇贤、徐天寿、王登高、郑三元等或战死，或被俘死。白莲教军虽然已陷入困境，但他们仍与强大的清军作殊死战斗。

章学诚病逝 嘉庆六年(1801)，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因病去世，终年六十四岁。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四十一岁时才中进士。他曾主持定州定武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主编有《湖北通志》，协修《续资治通鉴》。他用几十年时间写成《文史通义》。在这部书中，他从古代典籍、州郡方志、金石图谱、诗文歌谣、官府簿牍、家谱传状等各方面搜取了大量资料，给后人启示了广途，开拓了眼界。他还在这部书中明辨了史书编述工作中的不同功用，即有著述，有比类。著述是根据原始史料加以润色溶铸，成为有义例有条贯的专门写作，此类是未经整理的原始史料。这两种工作缺一不可。此类替著述准备了丰富的材料，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在这部书中，章学诚提高了方志在史学中的地位，具体指出了方志应该具有的实际内容和写作规格。《文史通义》是一部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除《文史通义》外，章学诚还写有《校雠通义》、《方志略例》等。

广东博罗天地会起义 嘉庆七年(1802)九月，广东博罗县天地会首领陈烂屐四、张锦秀等率会徒起义。他们以红布包头，手持器械，高擎旗帜，占据山险，几至万余人。嘉庆帝闻报后，命总督吉庆、巡抚瑚图礼调兵往攻。二十三日，起义军元帅张锦秀被俘。十月初五日，陈烂屐四在罗俘山战死。这次起义波及东莞、博罗、石龙、增城、归善、龙门、河源、永安(今广东紫金)等地区。起义军到处张贴对联，上边写：身背宝剑游我门，手执木棍打江山；英雄豪杰定乾坤，万里江山共一轮；争天夺国一枝洪，泄漏军机剑下亡；地镇高岗一派溪山千古在，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白云冬青洪姓府，天照分明成祖家；飘飘摇摇影无踪，万物静观日已红；日照西河映北斗，被世山谷身真洪。另外，起义军还宣传八拜：一拜盟心王宝明，二拜誓愿招过上天神，三拜社公肝胆尽忠义，四拜交付一家四海人，五拜兄弟结拜似青龙，六拜招贤纳士集英雄，七拜尽忠尽义公侯位，八拜后日称帝各封王。天地会起义后，由于两广总督吉庆疏于防范，被嘉庆帝免除协办大学士，革去总督职，不久自杀身死。

恒乍绷率众起义 嘉庆七年(1802)二月，云南丽江府维西厅(今维西)农民恒乍绷，率领怒、白、汉、纳西等各族百姓三四千人起义，反对清朝统治。他们持械焚寨，抗击官兵。嘉庆帝闻报，即命云贵总督琅玕派兵往攻。清军先后有数千人参加对起义军的镇压，其中包括籐牌兵。五月，起义军占据的康普寨被清军攻破，起义军首领腊者布被俘。恒乍绷领导起义军继续坚持斗争。嘉庆八年十月，恒乍绷被清军俘获，这次起义最终失败。

清政府恢复蒙古会盟派大臣参加制度 嘉庆七年(1802)八月十一日，应蒙古亲王蕴端多尔济之

请，嘉庆帝同意恢复蒙古会盟派大臣参加制度。会盟制度是清朝统治蒙古的一项重要措施。清政府规定，一旗或数旗合为一盟，在指定地点会盟。每盟设盟长一人，办理会盟事务，盟长由本盟内旗长中选任，报清朝理藩院请旨简放，由理藩院颁给印信。会盟的礼节十分隆重，届时清政府要派大臣带随行官员前往。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以派大臣参加恐致扰累蒙古各部，便停派大臣参加会盟。这次清政府恢复了派大臣参加蒙古会盟制度，遂具体决定：漠北蒙古赛音诺颜、札萨克图汗二部在乌里雅苏台会盟，与定边左副将军一同办理；土谢图汗、车臣汗二部事务，在库伦会盟解决，与库伦办事大臣一同办理。会盟的主要任务是简稽军实，巡阅边防，清理刑名，编审丁册。简稽军实即察阅兵丁，包括修理器械，练习骑射等内容。巡阅边防即对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以及清政府在蒙古族地区所设驼马牛羊牧厂的戍防。清理刑名即审理刑事诉讼案件。编审丁册即统计户口，编选壮丁。

陈德行刺嘉庆帝　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二十日，陈德在顺贞门行刺嘉庆帝未果。二十日这天，陈德进东华门，绕至神武门，潜匿顺贞门。嘉庆帝进宫斋戒，将入顺贞门时，陈德持小刀突前行刺。定亲王绵恩首先奋力推却，衣被浮伤；侍卫丹巴多尔济身被三伤。固伦额驸亲王拉旺多尔济、御前侍卫珠尔杭阿、扎克塔尔、桑吉斯塔尔等遂一拥而前，才将陈德擒缚。当时随嘉庆帝进宫的还有一百余人，却都袖手旁观，没采取任何行动。就此事件，嘉庆帝两次谕示内阁。在第二次谕示中，他说：二十日进宫斋戒，将入顺贞门，突有一人趋出。彼时朕乘轿已入宫门，实未见其面貌，差内监询问御前大臣，方知其凶悍拒捕情状。因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竟日，所供情节出乎情理之外。次日又添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仍如前供。比如猘犬噬人，原无主使；鸱枭食母，岂有同谋。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嘉庆帝还斥责袖手旁观之人：见此等事尚且漠不关心，怎能指望他们平日尽心国事。二十四日，陈德及其子禄儿、对儿被斩首示众。拿获陈德的定亲王绵恩、固伦额驸喀尔喀亲王拉旺多尔济赏御用补褂；封绵恩子奕绍为贝子，拉旺多尔济子巴彦济尔噶勒为辅国公；赏乾清门侍卫喀喇沁公丹巴多尔济为贝勒，在御前行走；御前侍卫扎克塔尔世袭三等男；珠尔杭阿、桑吉斯塔尔世袭骑都尉。废弛门禁的阿哈保、苏冲阿分别革去副都统衔。

清政府对边外实行封禁政策　嘉庆八年(1803)，清政府强调要对边外继续实行封禁政策。五月初二日，嘉庆帝就禁止贫民携眷出口制定章程一事谕示：山海关外，系东三省地方，为满洲根本重地，原不准流寓民人杂处其间，私垦地亩，以致妨碍旗人生计。这是多年以来实行的措施。乾隆五十七年(1722)京南受灾，高宗纯皇帝格外施恩，准令无业贫民出口觅食，系属一时权宜抚绥之计，事后即应停止。不料近年以来，民人多有携眷出关，并不分别查验，概准放行。既使因为嘉庆元年秋天，畿南州县遭受水灾，间有穷苦百姓携眷出口，但因上年直隶丰收，民气已经恢复，也不能成为出关的理由了。为什么直到今年春天，还有数百户携眷出关呢？韦陀保正任副都统，专负责稽查事宜，可是漫不经心，放出这么多人出口，又不上奏，实在是失职，应交部议处。今后民人出入，除只身前往的贸易、佣工、以及就食贫民仍令呈明地方官给票，到关查验放行，造册报部外，携眷出口的人户一律禁止。就是关内某些地方受灾，贫民想移家谋食，情愿出口营生，也应由地方官查看灾情轻重，人数多少，报明督抚，据实陈奏，候旨允行后始准出关，同时还要明定限期，不得日久因循，以致滋生弊端。八月初四日，就蒙古牧地不得增垦一事，嘉庆帝又谕示：蒙古地方容留民人租种地亩，日久必致有碍游牧。嗣后不准另垦地亩，添建房屋，侵占游牧处所。从前租种的田地，要按令纳租；聘娶蒙古妇女为妻的人，死后其妻子给与该处扎萨克为奴。

清政府定《青海蒙古野番诸制》　嘉庆八年(1803)十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军机大臣等议准钦差侍郎贡楚克扎布奏定《青海蒙古野番诸制》。内容如下：定界设卡，以资防守，立鄂博，使不得私越；设头目，给翎顶，使野番有所约束；循化、贵德两厅营，令每年会哨，使知震慑；民番交易，示定市期，以便稽察；劫夺杀伤，以交踪相验为据，使不得捏报；明示劝惩，以靖盗源；不容蒙古、野番人户混处，以绝串通；两厅营定为三年更替，衡其功过，以专责成。

蒲台县发生重大人命案　嘉庆九年(1804)四月二十七日，山东蒲台县发生重大人命案。原来，该县百姓张林德与盖彭年不事农桑，专以贩卖人口为业。几十里外有一老农郑可能，无妻无子，与侄儿郑恺同居。郑恺已经成年，尚未婚娶，郑可能切望他早日成家，生儿育女，便克勤克俭，积攒一笔财礼。可是，多次央人说媒都不成功。无奈，委托张林德给物色一个合适的姑娘。张林德与盖彭年商议，出外寻觅，用十千文买得李家一个女儿，乳名小二姐。张把小二姐领回家中，梳洗打扮，又伙同盖彭年伪造了一张三十千文的卖身契，通知郑可能前来领人。郑可能到了张家，嫌身价太贵，犹豫不决。张、盖二人花言巧

语，说道："一分钱，一分货，十分钱，买不错。孩子的终身大事，宁肯多花几个钱，图个人才标致，和睦孝敬，莫要吝惜计较，遗恨常年。"又威胁说："这小二姐是专门为你侄儿寻的，如若毁约，就告官理处。"郑可能看小二姐相貌还算端正，身材也很苗条，与侄儿正相般配，便咬了咬牙，当场交付了三十千文，领着"侄媳"回家。二人走至中途，一阵风把李小二姐的头巾吹落，郑可能抬眼一看，这姑娘竟是个秃子。出高价买了一个光头媳妇，郑可能知道上当了，领着小二姐转回张家，决意退人。张、盖二人费尽唇舌，死说活劝，郑可能坚不答应。当日晚，郑即在张家歇宿。这天夜里，在郑可能进房就寝后，张林德与盖彭年密谋对策，盖提出：将李小二姐送入郑的住室，让他们男女同宿，这样就可以此挟制，逼郑可能将人领回，不敢退悔。张林德连连称妙，便逼小二姐前去叫门。郑可能在房内厉声申斥，小二姐也哭哭啼啼不肯相从，跑回自己房中睡觉。张林德见阴谋不能得逞，即亲自撞入郑的住房，破口大骂。郑可能本来就怒火满腔，自然反口回击。一来二去，两人挥动老拳，大打出手，互相揪扭，不可开交。张林德心起杀机，拔出尖刀直刺郑可能腹部。郑受伤倒地，当场死亡。为杀人灭口，张、盖二人又杀死李小二姐，伪造了一个郑可能杀人后自杀的现场，以此逃脱罪责，欺骗官府。不久，这起重大人命案被查明，张、盖二犯被处斩决。

蔡牵焚死总兵胡振声　嘉庆九年(1804)六月，蔡牵在浙江温州浮鹰岛海面，焚死清军总兵胡振声。蔡牵，福建同安县西浦乡人，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父母早亡，自幼孤苦伶仃，长大以后，以弹棉花为业。乾隆五十九年(1794)，他率领失业无业渔民、船工在漳泉一带海面起事。他为人多谋善断，崇信重义，体贴下属，深得群众拥护。嘉庆七年五月初一日，蔡牵开始向清军主动出击。他率船队乘夜攻下厦门海口的大小担山炮台，将炮位摧毁。嘉庆九年夏，蔡牵率领大船八十余艘，突然从台湾海面进入闽海，清朝福建水师不敢出战。恰好当时温州总兵胡振声率浙船二十四艘至闽运木材，总督玉德即令胡振声迎敌，而闽水师却不予支援。蔡牵率船至浙江温州浮鹰岛海面，与胡振声船队相遇。蔡牵船队发炮轰击，将胡振声坐船焚毁，胡振声当即身死。结果，蔡牵大获全胜。嘉庆帝闻讯又急又气，逮金门镇总兵吴奇贵、副将张世熊等，治以不援之罪，又命浙江提督李长庚为总统，督率闽浙水师，专门对付蔡牵军。

白莲教起义失败　嘉庆九年(1804)九月初五日，清军统帅德楞泰进《余氛扫荡三省全功告蒇》折，标志着白莲教起义基本失败。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后，纵横川、楚、陕、豫、甘五省，至嘉庆七年十二月，清军将领额勒登保等以平定白莲教起义上奏嘉庆帝，各地白莲教主力基本上相继失败。不过，在深山老林中，白莲教余众仍坚持斗争。于是，额勒登保等又先后分路围击，白莲教军后期首领宋应伏、刘渣胡子、温亚利、宋国品、张世虎、赵聪观、熊老八等相继遇难。清军随之各路班师，令乡勇还乡。不料乡勇还乡后，又多有同白莲教军汇合一起，继续起事，清政府不得不再派额勒登保、德楞泰等将再次领兵围击，穷搜崇山密林。直到白莲教军最后的首领苟文华、罗思兰、苟文润等被俘，历时九年、遍及五省的白莲教起义才基本失败。

钱大昕病逝　嘉庆九年(1804)，著名学者钱大昕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七岁。钱大昕，字晓徵，又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人。乾隆年间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少詹事、广东学政等。乾隆四十年(1775)，因父丧返归故里，定居苏州，先后在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讲学。钱大昕学问渊博，在文字、音韵、训诂、天文、历算、地理、金石等方面都有成就，尤其精通史学。他所著《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是其考证历史的代表作。在考证方法方面，既比较异同，也进行专题研究。在考证内容方面，主要是官制、地理、氏族、年代，间或加以评述。在考证历史中他注意实事求是，即考究史实，不发空论。钱大昕还著有《十驾斋养新录》、《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四史朔闰考》、《声类》、《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潜研堂文集》、《潜研堂诗集》等。他还参与修订《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等。

清政府禁西洋人刻书传教　嘉庆十年(1805)四月，清政府明令禁止西洋人刻书传教。十八日，就御史蔡维钰奏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一折，嘉庆帝谕示内阁：京师设立西洋堂，原为推算天文，参用西法，西洋人来京学艺居住用。近来各堂西洋人，常与内地百姓往来讲习，并有刊刻书籍，私自流传等事。他们在本国习俗相沿，信奉天主教，自行讲论，立说成书，原所不禁。至于在我国内地，刊刻书籍，私与百姓传习，向来就有禁令。因奉行日久，未免懈弛，以致使好事之徒，创其异说，妄思传播，而愚民无知，容易被其迷惑，所以不可不申明旧例。今后管理西洋堂务大臣要留心稽察，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毁，并随时谕告在京西洋人等，务必安心学艺，不得与内地百姓往来交结。三十日，就广东民人陈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赐递送书信地图，并查出传教习教各犯，嘉庆帝再次谕示内阁，强调若不严行惩办，何以禁异说而杜歧趋？遂命将刊刻汉文经三十一种并向旗民传

教的西洋人德天赐，送往热河圈禁；将为德天赐递送书信、地图的陈若望，在教堂讲道的汉军周炳德，民人会长刘朝栋等，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人为奴；将充当会长的妇女陈杨氏，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将教堂存贮经卷及其刊刻板片，一律检查销毁。不久，清政府制定了稽查西洋教章程，明令禁止西洋人刻书传教。

纪昀病逝 嘉庆十年(1805)二月，纪昀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号石云，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能诗能文，他的著名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以搜奇记轶为主，内容包罗万象，可与元朝的志怪小说媲美。

河北昌黎发生地震 嘉庆十年(1805)闰六月十一日，河北永平府属昌黎县发生地震。该县衙署、监狱、仓廒、墙垣都有倒塌；儒学祠庙墙垣震倒数处；近城十里的五里铺、泗涧村、前后山庄、何家庄、八里庄等处，房屋墙壁，间段倒塌，并未伤人。地震时，在监人犯已经提出看守；仓谷盘量另贮。昌黎县知县何安澜前往四乡查看。地震后，直隶总督吴能光批饬何安澜速将监墙赶紧修筑坚固，安顿监犯；仓廒、衙署，自行酌量整理。吴熊光还飞饬在永平一带查工的通永道嚝楚贤，就近驰往履勘昌黎县被震村庄，如有实在无力贫民，量为抚恤。

蔡牵与清军激战鹿耳门 嘉庆十一年(1806)二月，蔡牵与清军在鹿耳门经过激战，顺利退往闽浙海面。嘉庆十年，蔡牵船队在闽浙海上屡遭挫败，飘泊无所依托，决定攻取台湾，建立据点。他率海上义师至台攻入凤山(今台湾高雄)，在海面沉舟鹿耳门，阻隔内地兵船；在陆路则联络洪四志义军，围攻台湾府城。清政府调广州将军赛冲阿为钦差大臣，率兵赴台督办军务，后授为福州将军；又增派德楞泰为钦差大臣，护军统领扎克塔尔、温春以及提督薛大烈等驰赴福建军前。嘉庆帝还谕示江西巡抚温承惠督粮运军需，以接济水师提督李长庚军。李长庚率领浙江水师三千人渡海，至鹿耳门，因海口为沉船堵塞，不能通过，便进入汕大港。蔡牵分兵与李长庚作战，遂未能攻下府城。不久，金门总兵许松年、澎湖副将王得禄等也率部队乘船来攻。蔡牵与清军展开激烈决战，战船被焚毁三十余艘，不得已夺占洲仔尾。蔡牵将大船驶进口门迎敌。李长庚出北汕，许松年出南汕，合击蔡牵船队。蔡牵不敌，又损失战船二十四艘，后退至鹿耳门。李长庚等率领清军水师包围了鹿耳门。蔡牵船队因沉舟塞住鹿耳门口不能驶出，形势十分危急。不料两日后，海潮聚涨，沉舟漂起，蔡牵乘机装换蓬索、火药，率兵乘船，在初七日那天夺门出海，顺利撤退到闽浙海面。此后，蔡牵义军便在闽浙海面与清军水师周旋。嘉庆帝闻讯十分气恼，下令以阿林保为闽浙总督，代替玉德，并夺李长庚花翎、顶带。

宁陕新兵哗变 嘉庆十一年(1806)六月，陕西宁陕镇驻兵因清政府减发饷银而哗变。原来，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平息后，原各随营乡勇，挑补各地所增设兵额，名为新兵。陕西增新兵六千余人，驻守秦岭腹地宁陕地区。这里地险粮贵，按规定在每月饷银外加发米盐银五钱。当时布政使朱勋以未奉部文为口实，停发银钱，致使新兵哗变。陕西提督杨遇春正奉命进京，宁陕总兵扬芳调署提督，副将杨之震未加请示，擅自决定鞭笞哗变者。于是，哗变新兵在陈达顺、陈先伦等人率领下，杀副将，劫库狱，相继攻陷陕西洋县、城固、宁羌等地，有众万人。七月十六日，嘉庆帝闻报后，命德楞泰、杨遇春、杨芳等率军往剿。变兵攻鄠县，杨芳赴援，被变兵打得大败而逃，杨芳本人臂部受重伤。接着，杨遇春督率大军与变兵大战于方柴关，清军又被打得大败。宁陕变兵都是二杨的旧部，在武力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杨芳和杨遇春决定采取招降办法。他们先沟通了变兵中的蒲大芳，随后杨芳单骑进入新兵营。蒲大芳诱杀了陈达顺、陈先伦等人后，交械投降。十月，德楞泰以"现存二百二十四名，准备遴选将弁，分投管带，暂归原营，约束操防"上奏嘉庆帝。嘉庆帝原要把哗变新兵斩尽杀绝，闻报后十分恼怒，命罢德楞泰领侍卫内大臣职，将陕甘总督倭什布发乌鲁木齐效力，杨遇春降为总兵，杨芳遣戍伊犁，蒲大芳等二百人到新疆塔尔巴哈台戍守。不久，杨遇春、杨芳分别复官、释回，而蒲大芳等则全部斩首枭示。

直隶官员串通侵帑 嘉庆十一年(1806)九月初五日，嘉庆帝命有司审讯串通侵帑的直隶官员，分别治罪不等。从嘉庆元年起，到嘉庆十一年止，司书王丽南等私雕假印，舞弊营私。地丁耗羡杂款项下俱有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弊，计有二十四州县，共侵盗银三十一万六百余两。此内竟有与州县讲明每虚收、重抵、冒支银一万两，给与司书及说事人使费银二三千两不等。各州县实省解银六七千两。经有关人员逐细研鞫，按州核稽，究出串通知情的州县张麟书等十一员。对现任者经过提审，均认通同舞弊属实。对此，嘉庆帝实感骇异。他说：这是我朝未有之事。从前外省不肖官吏作奸犯科，如甘肃捏灾冒赈之案，最为重大，不过也只是借办赈为名，虚报侵肥，从没有身任州县，与胥吏等勾连一气，公然将正项钱粮，私雕假印，挖改公文，虚捏报解，抵冒分肥，至三

十余万两之多。若似此朋比为奸，将各直省应征钱粮，奸胥劣员得以任意乾没，纲纪何在？亟应彻底讯究，加等严行惩办。结果，直隶总督颜检革去顶带，押送来京，听候部议，后发往乌鲁木齐效力；山西巡抚同兴也开缺来京，听候部议；昌平州知州戴书培革职锁拿来京；其他州县各官也都降革不等。后来，清政府决定，侵银万两以上者斩首，万两以下者遣戍黑龙江。

清政府处理私给民船执照案 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二十九日，清政府处理私给民船执照案，有关人员受到惩罚。原来，宗室徒义等受船户田洪如等贿银四百两，私给民船执照，准其将船投充渔利各案，事情涉及到亲王、贝勒、额驸、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多人。嘉庆帝闻讯后，命将宗室徒义革去奉国将军，圈禁二年；庄亲王绵课革去都统，退出内廷，不再署领侍卫内大臣；怡亲王奕勋以尚未管事，罚俸一年；贝勒绵律革去贝勒，责四十，圈禁二年；贝勒绵誉退出乾清门，罚俸二年；额驸索特纳木多布斋革去护军统领，罚俸一年；侍卫德昌、福珠、隆阿、舒惆等俱枷号三个月，期满后发往伊犁当差。不久，嘉庆帝又命将宗室绵传革去侍卫，当众责四十，发往盛京圈禁六年。

达州、西乡兵变 嘉庆十二年(1807)正月，四川达州(今达县)和陕西汉中西乡清军相继发生兵变。清军达州营守备王国雄，平时待兵一味苛虐。上年冬季，应发冬、春二季饷银，但是，王国雄扣留不发，勒令先买马匹。对此，兵士们非常愤慨，他们在王得先、孔传世、刘金定等人领导下，发生哗变，攻打监狱，释放囚犯，焚烧兵营，夺取饷银，杀死知县，占领达州城，一时间声势十分浩大。达州兵变发生后，王国雄惊慌失措，带领随从逃出城外，躲避两日不敢动弹。恰值四川总督勒保在陕西办理完宁陕新兵哗变事宜，闻信后立即返回四川查办。他饬令桂涵、罗思举等统兵将领就近向哗变士兵进攻。在激烈的冲突中，清军署游击塞普征额身受棍伤，提督丰绅、总兵田朝贵、游击涂陞等也都受伤轻重不等。由于力量悬殊过大，达州兵变最终还是被镇压下去了。王得先、孔传世、刘金定死难，哗变士兵伤亡不计其数。清政府对镇压兵变的清军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失职者给予惩罚。赏副将桂涵总兵衔，擢马兵罗贵为千总，均赏巴图鲁名号；赏知州余永宁、花翎外委刘继先等蓝翎，道员严士鋐亦给予升迁。王国雄则立即正法，以昭炯戒。此后不久，陕西汉中西乡营士兵在周士贵等人领导下亦举行兵变。清政府西安将军德楞泰立即率兵截剿，周士贵及哗变士兵多人战死。清军对有功人员亦给予奖励，赏副将罗思举总兵衔，祝廷彪等人巴图鲁名号。

蔡牵战死李长庚 嘉庆十二年(1808)十二月二十四日，蔡牵领导的海上渔民在与清军水师激战中，击毙清朝浙江提督李长庚。蔡牵经过鹿耳门激战返回闽浙海面后，由于得到沿海百姓的支持，船只增加，粮药充足。与此同时，清政府也进一步部署了剿灭海上义军的计划，实行坚壁清野，并拨巨款赶造大船。这样，在几次与清军的遭遇战中，蔡牵均告失利，处境又日益困难。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李长庚偕同福建水师提督张见陞统兵尾追蔡牵船队，穷追不舍，把蔡牵义军追逼到黑水外洋。当时，蔡牵部只剩大船三艘，小船十余艘，指挥船的舷篷也被打破。就是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蔡牵仍然率领水上义军英勇斗争。李长庚情况与此不同。他是福建同安人，乾隆年间的武进士，一方面武艺高强，一方面熟悉沿海情况，因此见蔡牵军狼狈情况，以为胜券稳操，流露出趾高气扬神气。李长庚贪功心切，在追击蔡牵军过程中，把自己的霆船挂住蔡牵船的后艄，准备跃登活捉蔡牵，不料李长庚船比蔡牵船低五六尺。就在李长庚即将登跃的时候，蔡牵镇定指挥，命令小卒从艄尾发炮。结果，飞出的炮弹正打中李长庚咽喉、额角，李长庚立刻倒在血泊中。清军指挥船失去统帅，顿时混乱；张见陞又昏庸懦怯，见李长庚死，恐惧万状，下令闽水师迅速撤离，退出了战斗。于是，蔡牵领导的义军船队幸免了被歼的命运，但因实力损失太大，也退到安南海面休整。

马礼逊到达广州 嘉庆十二年(1807)，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马礼逊是受伦敦布道会派遣，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个人。当时，清朝政府禁止外人传教，因此，他不得不依托于英国殖民机构，从 1809 年起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二十五年，并先后任英国特使阿美士德及驻华贸易监督律劳卑的秘书和译员。他多次建议英国政府在中国自设法庭，以取得治外法权。马礼逊对汉语文造诣很深，是著名的汉学家，编著有《汉语语法》、《华英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等书，还将《圣经》译成了汉语。他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后死在广州，葬于澳门。

英军侵略澳门炮台 嘉庆十三年(1808)，英军侵入澳门炮台。七月二十一日，英国商船带兵驶进广东香山鸡颈洋面。八月初二日，英军三百人公然登岸，在澳门三巴寺、龙嵩庙内居住，还分别占据了东西炮台。他们散布说：恐怕在澳门的西洋人，被法兰西欺阻贸易，所以派兵船前来保护。二十三日，英军又驾坐舢板艇驶进虎门，至省城外十三行方才停住，

要求在澳门居住。清朝两广总督吴熊光命令他们返回黄浦候旨。嘉庆皇帝得报后，谕示吴熊光要对英军严加诘责，并命令他们驶出。英军迟迟不动，直到十月间才开始撤离。后来，嘉庆帝以吴熊光在英军侵占澳门时表现怯懦，罢免其总督职务，不久又遣戍伊犁；广东巡抚孙玉庭也因此被革职。嘉庆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嘉庆帝就韩崶奏《查阅澳门夷民安堵并酌筹控制事宜》一折，在谕示军机大臣时，又涉及到嘉庆十三年英军侵略澳门炮台问题。嘉庆帝说：澳门地面，西洋人旧设炮台六座，自伽思兰炮台至西望洋炮台迤南沿海一带，本有石坎，因形势低矮，上年英吉利夷兵即由此爬越登岸。这里应当加筑女墙一道，增高四五尺，长二百余丈，以资防护。

清政府制定禁止流民出口私垦章程　嘉庆十三年(1808)九月二十九日，嘉庆帝批准户部议覆盛京将军富俊等奏《严禁流民出口私垦章程》，具体内容是：嗣后民人出山海关至奉天属各处，由原籍起关照一张，填注姓名及前往处所，到关验明放行；仍在原籍起随身护票一张，填注所往地方，交官备查。如出山海关至威远堡法库边门外，则由原籍起关照二张，一照山海关存留，一照边门存留。此外，守口员弁要实力巡查，并出示晓谕各处无业贫民，不得偷越出口私垦，致干例禁。

清政府制定《民夷交易章程》　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十九日，清政府制定《民夷交易章程》，付诸实行，主要内容有：各国护货兵船，俱不许驶入内港；夷商销货，要依限回国，洋商要早清夷欠。澳内西洋人不准再行添屋；民人眷口，也不准再有增添。引水船户，给照销照，俱责成澳门同知办理。夷商买办，要选择殷实可靠人，始准承充。洋货到粤后，由该国自行投行，公平交易。

知县王伸汉以罪正法　嘉庆十四年(1809)七月初十日，江苏省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以罪正法。嘉庆十三年(1808)，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首当其冲，房倒屋塌，饿殍遍道。清政府为避免灾民暴乱，标榜"恤民"，派李毓昌前往山阳县，视察赈银发放情况。李毓昌字皋言，山东即墨人，嘉庆十三年考中进士。他奉委之后，立即带着仆人前往赴任，决心秉公办事，消除侵冒，做个廉明的"清官"。山阳县令王伸汉是一个雁过拔毛的赃官，平日里就敲骨吸髓，鱼肉百姓，弄得怨声载道，臭名远扬。遇到灾荒，他更看成发财的良机，一方面谎报灾民人数，冒领赈银，另一方面缩减实发数目，大事克扣。这一年，山阳县领得赈银总共不过九万多两，却有将近二万五千两落入他的腰包。李毓昌到任后，察看灾情，核对户口清册，发现大量问题，逐一列出条款，亲自草拟呈文，准备上报藩司。王伸汉见势不妙，便前去拜望李毓昌，提出若高抬贵手，愿以白银万两相赠。李毓昌严词拒绝了王伸汉的贿赂。王伸汉不肯束手待毙，用重金买通了李毓昌的仆人。先是用砒霜把李毓昌毒伤，继而又勒毙悬挂，伪造成李毓昌自缢身死的现场。李毓昌族叔李太清在清理死者遗物时，在一本书中发现一纸，上写"山阳知县冒赈，以利陷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顿生疑窦，认为其侄恐另有死因，遂书写状词，赶赴北京，向都察院具控喊冤。都察院依照规定，转报朝廷。嘉庆帝命令山东巡抚吉纶把李毓昌尸棺运到省城详验，又命将山阳知县及有关人证调集进京，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直接审讯。结果，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王伸汉等人无法抵赖，先后供出了谋杀李毓昌的动机和手段。于是，王伸汉被抄没家产，立即处斩；李毓昌被赏加知府衔，优厚安葬；李毓昌的族叔李太清封为武举；其他有关人员也分别给以罚处。

清军击败蔡牵等海上义师　嘉庆十四年(1809)，蔡牵等领导的海上义师处境日益困难，在和清军斗争中，虽然有时也获得胜利，但是最后还是完全失败了。这一年二月，粤、闽海上义师首领朱濆，与清朝总兵许松年在海上展开激战。朱濆自起兵以来，多次打败清朝水师。他的船队有五千斤大炮、二千斤大炮、一千斤大炮多尊，曾攻打台湾鹿港、淡水、噶玛兰、苏澳等处。不料这次和许松年对阵，朱濆却处于劣势。战斗刚进行不久，朱濆就被炮弹击毙，余众四散溃逃。八月，蔡牵部又和清军在海上展开激战。清政府自李长庚战死以后，就命其裨将王得禄任福建提督，邱良功为浙江提督，联合起来进攻蔡牵。开始，蔡牵联合朱濆游弋于浙、闽、粤海面，后来，清朝浙江巡抚阮元设反间计，挑拨朱濆和蔡牵的关系，朱濆单独出走，为清军所败，蔡牵势力更加孤弱。当时蔡牵有战船三十余艘，因得不到铅丸，只好以番银作炮子。十七日，蔡牵航至定海舟山外黑水洋，王得禄与邱良功率闽浙两省船队，全力专攻蔡牵座船。蔡牵倾力还击，与邱良功座船两篷相结。蔡牵以碇击邱良功船，并以矛伤其左髋，邱良功身体受伤，战船毁坏，失败逃跑。王得禄船队乘势前来。蔡牵以银丸击伤了王得禄的前额和手腕，王得禄在疼痛之余，命令兵士投掷火斗、火罐，烧毁了蔡牵的船舵和尾楼。蔡牵见寡不敌众，便举炮自裂座船，沉海而死。十一月二十八日，朱濆弟朱渥率众三千三百余人投降清军，交出船四十二只，炮八百余门。十二月二十八日，郭婆带领粤洋众五千余人投降清军，交出船九十余只，炮四百余门。自朱濆、蔡牵战死，朱渥、郭婆降后，广东海面

还有张保仔、香山二等领导的数万义军,往来海上。由于清政府堵塞高州、雷州各港,断绝生资与接济,又改粤粮水运为陆运,将硝矿各厂由商办改为官办,以及团练乡勇等,使张保仔等海上义军不能登岸,粮食、弹药来源断绝,于是,嘉庆十五年三月,张保仔等人投降了清军,交出船只二百七十八号。不久,蔡牵余部陈赞等也投降了清军。这样,浙、闽、粤三省海疆基本平息。

清政府在京师查禁鸦片 嘉庆十五年(1810)三月,清政府官员发现京师有人藏匿鸦片,遂开始查禁。先是大臣庆桂等人上奏,京师广宁门(今广安门)巡役查获民人杨姓身藏六盒鸦片烟,请交刑部审办。初二日,嘉庆帝谕示内阁:鸦片烟性最为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时间长久便会危害人的生命,是败坏社会风俗的最大祸害,早就应当在查禁之例。该犯杨姓胆敢携带进城,实属藐视法律,著即交刑部严审办理。最近听说京师购食鸦片烟的人很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崇文门专理税务,仅在所属口岸地方稽察,恐怕难以周到。仍著步军统领、五城御史在各门禁严密查访,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至于闽、粤生产的地方,也要严令该地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不得把这一切当成空文,任贩卖、吸食者们偷运鸦片。

清政府议海运问题 嘉庆十五年(1810)二月二十八日嘉庆帝命江、浙两省承招商船,试办海运。由于河工敝坏,运道节梗,漕运阻滞,仓储渐空,嘉庆帝才有此谕。不料清政府内许多官员认为海运实属不可行,特别是两江总督勒保,竟举出十二条理由反对试办海运。他说:元至元十九年至明永乐十三年虽行海运,而漕运仍不废,今若海运与河运并行,则漕运官弁不减,徒增海运之费;江南至天津海道,沙礁丛杂,天庾正供非可试于不测之地;开凿山东胶莱运道,工力难施;海运若由旗丁领运则旗丁不习海洋,如责成船户收兑则船户偷盗私卖、捏报沉失、甚至有通盗济匪等弊;海行迟速平险,均非人力可施;海运需筹经费,而今物力昂贵,费用过于浩大;海运需用船一千七八百号,即需银一千七八百万两;雇用商船,难于实现;查元、明海运,每年必有粮米漂失,今生齿日繁,土地所产粮食,不够百姓食用,怎能再有漂失数目;海运需要添设水师防护,士兵要增加三四万名,这部分军饷,难以供应;京师地区百货去集,都由粮船携带,如果改由海运,就不能使装米船多带货物,致使京城物价,必定昂贵,势必影响百姓生计;如果改为海运,常年运漕八九万人,一旦失业,难保不流为盗匪,势必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嘉庆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嘉庆帝谕示:河漕二务,其弊相乘,其利也相因。漕运由内河行走,已有数百年,只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河流顺轨,漕运才能按期遄达,保证无事。即使万一河湖水位高低不齐,漕船不能畅行,也只有起剥盘坝,或酌量截留。为暂时权宜之计,断不可轻议更张,这就是利不百不变法。经过上述讨论,清政府决定海运暂停试办。

清政府设热河都统 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十七日,清政府把热河副都统改为都统,都统衙门设随同办事理藩院司员、刑部司员、理刑笔帖式、印房笔帖式、主事若干员,办理所属事务。热河,以温泉得名,又名承德,是介于清朝京师和爱新觉罗家族发祥地之间的重要地区。这里,既管辖木兰围场,清前期帝王曾在此举行秋狝大典,又是清代行宫遍布之处,著名的避暑山庄就在磬锤峰下、热河之畔。热河全境旧设五厅,即热河厅、喀喇河屯厅、四旗厅、八沟厅、塔子沟厅,后又增设乌兰哈达厅、三座塔厅。后来,热河厅改为承德府,喀喇河屯厅改为滦平县,四旗厅改为丰宁县,八沟厅改为平泉州,乌兰哈达厅改为赤峰县,塔子沟厅改为建昌县,三座塔厅改为朝阳县。清政府最初在热河设总管、副总管,后来又改设副都统,下设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笔帖式等员,以及士兵二千名。热河都统设立后,所管辖的范围,主要是热河各处驻防官兵,卓索图和昭乌达两盟军务,热河所属各驿站,以及八沟、塔子沟、三座塔、乌兰哈达理事司员等。热河都统的设置,反映了清朝对漠南蒙古各部统治的加强,也反映了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漠南蒙古各部在清政府的统一管辖下,和中央政权关系的日益密切。

清廷设广东水师提督 嘉庆十五年(1810)八月三十日,两广总督百龄上奏《筹议分船巡缉洋面章程》折。为此,嘉庆帝晓谕军机大臣:广东洋面,绵亘数千里,近年来"盗贼"猖獗。自百龄到任以后,严杜接济,大振兵威,将各路著名首伙"大盗"分别剿抚,一律荡除。此次又筹议善后章程,分布各路师船,责成巡缉,所办实为周妥。此时洋面肃清,已无大股"盗匪",但寻常劫夺"小盗",尚难保其必无,若不随时捕获,则日久啸聚,恐又萌蘖滋事。各镇将务必在所管洋面认真巡逻,以期有盗必获。朕听弁兵等积习相仍,往往于真盗不能捕获,反将海滨无业贫民如渔船昼户人等,妄拿报官塞责邀赏,以致诛及无辜。从前伍拉纳在闽浙总督任内,任性妄为,即有这种事情,实在可恨。现在粤洋"巨盗"收捕一空,海疆宁谧,但恐弁兵人等积习未除,或妄拿滋事,特此训谕该督抚等,一定要随时密查,对于捕获案犯,必须详细审查,

务必判罚得当。如果有妄拿邀功的人，立即严参办理，绝对不能姑息，也不能任他们藉口因循，塞责了事。至于所议的派员分设巡哨，挑用船只以及酌给捕盗口粮等项章程，均照该督所请办理。于是，清廷决定添设广东水师提督一员，驻扎虎门。改左翼镇总兵官为阳江镇水师总兵官，移驻阳江。

台湾发生地震 嘉庆十六年(1811)二月二十四日，台湾发生地震。淡水倒坏南门城楼一座，仓廒六间，兵房八间，演武厅一座，居民瓦房十二间，草房七间，压毙男妇共十四口，压伤五名。彰化城内倒坏民房二间，土墙一座，各保倒坏居民瓦屋四间，草房三间，压毙兵丁一名，并男妇三口，压伤六名。嘉义县坍坏城上女墙四十九垛，军装库一间，居民瓦屋七间，草房四间，压毙男妇三口，压伤五名。地震发生后，淡水知县朱潮、彰化县知县杨桂森、嘉义县知县周慎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所有压毙兵民人口，分别收殓给恤，倒塌城楼女墙廒库兵房演武厅等处，分别勘估修葺。

大学士明亮革职 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御史韩鼎晋密奏，内城有开场聚赌事。嘉庆帝当即命军机大臣询问韩鼎晋，密奏中指的是什么人。于是，韩鼎晋又再奏一折，嘉庆帝才令步军统领禄康等密行查拿。结果，先后拿获赌局十六起，内有八起得到音讯后提前散局。显然，这其中或者有人泄露、或者有人探听到了韩鼎晋的条奏，秘密告诉了这些聚赌的人，他们才可能事先散局，逃避审查。对此，嘉庆帝非常恼怒，他对内阁大臣们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近日探听朝政之风甚烈，令人痛恶。这种人如不改过，决不轻恕。后经调查，内城聚赌的多是各位大臣的轿夫。明亮家的轿夫就多次开局聚赌，正要查拿他时，他闻讯逃匿，余众亦散，只有空棚。嘉庆帝命人做进一步调查，才知明亮轿夫得以先逃，实系明亮派人送信所致。而明亮却狡辩说，他对于御史参奏轿夫赌博事，是听朝房窗外有人传说的，具体是什么人的声音，没有能辨清。嘉庆帝认为明亮是陋态未除，很不老实，经军机大臣讨论后，六月，决定革去明亮太子少保衔，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镶蓝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管理稽察坛庙事务、上书房总谙达、清字经馆总裁、紫禁城骑马、双眼花翎也全行革去，因军功所得伯爵，仍留三等襄勇伯。此外，稽查此案不力的福康，也革去内大臣、东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及步军统领职务。

嘉庆帝训谕八旗 嘉庆十六年(1811)六月十二日，嘉庆帝训谕八旗，主要内容是：八旗子弟，国家世仆，百有余年，英才辈出，不可胜纪。但是，由于生齿日众，其间也有失于教训的子弟，又遇见一些不肯为国家作养人才、只知道食禄保位的都统、副都统，再加上作奸犯科、开局哄骗的不良百姓，所以一些八旗子弟逐渐趋于下流，甘为卑污，如蛾投火，不知改悔。这些人只图片时逸乐，不考虑一世身家，实在是很可怜的。奸匪棍徒多方引诱，最可恨的就是聚赌。那些开局的恶棍，用意只在敛钱，一些八旗子弟受愚弄，昏迷不觉，实在可哀。好赌的人有五大弊害：食禄国家，不知节俭，妄希恩泽，终至困穷，是一大弊害；上不能供父母甘旨，下不能顾妻子饥寒，是二大弊害；学习文武，俱缺资本，终为无用之人，是三大弊害；一入赌局，有败无胜，典卖物品既穷，偷窃之心顿起，是四大弊害；偶为鼠窃，未犯国法，胆益放恣，最后导致身败名裂，是五大弊害。这五种弊害，贤者必不犯，不肖者必不改。特书此数语，诞告八旗，务令家喻户晓。嘉庆帝还说：八旗都统、副都统七十余员，何忍视国家有用之子弟，半为无用之匪徒，为什么不对他们加意训导呢？诸臣中能尽一分心力，国家受一分之福。如果一些八旗子弟能翻然改悔，日引月长，恢复旧习，成为良才，这实在是国家的福份；如果诸臣无一人尽心尽力，八旗子弟无一人翻然改悔，这是国家的大不幸。

严禁西洋人潜往内地 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十四日，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福庆上奏嘉庆帝，谈及西洋人贺清泰、吉德明已年老多病，毕学源尚能通晓算法，此三人请令留京；高临渊、颜时莫、王雅各伯、德天赐四人，学业未精，留京无用，应遣令归国。嘉庆帝闻奏后谕示内阁，贺清泰、吉德明、毕学源三人准其留京，饬令在西洋堂安静居住。高临渊等四人，交步军统领衙门，在他们起程时，派参将、游击二员，酌带兵丁数名，伴送至良乡县。直隶总督再于文职同知通判内、武职都司游击内，拣派妥员，带同兵役接替伴送出境。山东以下经过各省，均照直隶一体派员接替，到广州后，交两广总督松筠收管，等到有方便船只，饬令他们附载归国。沿途所过地方，以及在广东居住期间，均不许他们与内地民人交接往来。十六日，清政府明令严禁西洋人潜往内地。嘉庆帝谕示内阁说：西洋人住居京师，原因他们熟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先用。现在京的西洋人共十一名，除福文高、李拱辰、高守谦三人，现任钦天监监正监副，南弥德在内阁充当翻译差使，毕学源通晓算法，留备叙补，贺清泰、吉德明二人均年老多病，不能归国，此外，学艺未精的高临渊等四人，已饬令归国，现在留京的西洋人只有七人。这七人中，有官职差使的，出入往来都有在官人役，随地稽查，不能与

旗民人等私相交接；年老多病的，不过听其终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也不准擅入。管理大臣，及官员弁兵，巡逻严密，不至发生传教惑众等事。至于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地方，也就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从前外省拿获习教人犯，总说传播始于京师，今京师已按名稽核，彻底清查，若外省再有传习此教的，必定另有西洋人在那里煽惑，地方匪徒私自容留，不可不加以严禁。除广东省向有西洋人来往贸易，其居住处应留心管束，不得任其私行传教，有不遵禁令者，即按例惩治外，其余各直省，各督抚都要饬属通行详查。如现有西洋人在境，以及续有西洋人潜来的，均令地方官即行查拿具报，一面奏闻，一面递交广东遣令归国。如地方官查办不力，致令传教惑众，照新定条例，严参重处。若内地民人私习其教，又影射传惑的，地方官一律查拿，按律治罪。

四川发生地震　嘉庆十六年(1811)八月初十日，四川口外百利、甘孜、绰倭一带地方发生地震。绰倭地方倒塌房屋五百九十八户，压毙藏民男妇及喇嘛共四百八十一口。百利、甘孜两处地方地震较轻，虽然房屋间有倾攲，但是为数不多，而且没有压毙人口。地震发生后，打箭炉同知王世焘亲至地震灾区逐处查勘，并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对于压毙人口，每大口一名赏给银二两，小口一名赏银一两，楼房每间赏银一两，平房每间赏银五钱。

《嘉庆重修一统志》开始编纂　嘉庆十六年(1811)，清政府组织人力开始编纂嘉庆朝《大清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是清代全国性的地方总志。清代修《一统志》有三次：第一次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于乾隆八年(1743)，三百四十二卷；第二次修于乾隆二十九年，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四百二十四卷；第三次修于嘉庆十六年，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百六十卷。因三修始于嘉庆年间，其增辑内容又止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所以又名《嘉庆重修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是清朝三部一统志中最完备的一部，记载嘉庆以前清朝疆域政区状况，首为京师，下分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以及青海、西藏等地区。每一地区先列地图、建置沿革表；继以总叙，概述每一地区基本情况；再以府、直隶厅、州分卷，下列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二十五目。《嘉庆重修一统志》事博文约，门类细致，考证精详，是研究清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京师闲散旗人迁往吉林　嘉庆十七年(1812)四月初二日，清政府决定将京师闲散旗人迁往吉林。为此，嘉庆帝谕军机大臣等：八旗生齿日繁，京城各佐领下，户口日增，生计拮据，虽经添设养育兵额，而养赡仍未能周普。前日举行大阅典礼，各旗营队伍整齐，由此想到养先于教，为他们筹谋衣食不可不考虑周到。国家经费有一定数额，旧设甲兵额数，现在已不可能增加。各旗闲散人为额缺所限，不能领取份粮，致使其中年轻可造就的人材，有的在家中闲居荒废时日，还有的血气方刚，游荡滋事，非常可惜。因此想到，东三省原是国家发祥地，而吉林更是土壤肥沃，地广人稀。近来柳条边外采参山场，逐渐移远，其间空旷地方，不下千余里，都是肥沃的土地。内地流民，也有的到那里私自耕种。从前乾隆年间，高宗纯皇帝考虑到八旗人口众多，就曾分拨拉林地方，分给土地让他们耕种，这些旗人到现在仍然安居乐业。现在也应采取这种办法，将在京闲散旗人，陆续资送前往吉林，拨给他们土地，使他们或自行耕种，或招佃取租，这足以保证他们的生计。将来地利日兴，家计日裕，这些旗人可以在那里练习骑射，其中材艺优良的，也可选到京师当差。于是，赛冲阿、松宁等大臣，开始派员去吉林进行调查，看那里有多少闲置土地，可以供养多少旗户，需要盖多少草房，用多少耕牛和粮种，并把这一切用图画表现出来。不久，京师闲散旗人就陆续迁往吉林。

《吉兰泰盐务章程》订立　嘉庆十七年(1812)六月二十八日，清政府订立《吉兰泰盐务章程》。吉兰泰盐池位于黄河上游，邻近宁夏。吉盐原定引地，太原、汾州等属六十四厅州县。自招商承办以来，折本亏课。原因主要是太原、汾州等地有本地土盐，以及鄂尔多斯等处蒙古盐，价廉易购，而吉盐道远价昂，因而无人售贩。于是，据钦差侍郎阮元等奏，清政府决定订立《吉兰泰盐务章程》，规定吉盐引额为八万七千五百道，照长芦例定为余引，从嘉庆十八年开始，咨部领引，交商行运。吉盐引地既归潞商承办，无需吉盐销贩，吉兰泰盐池还给阿拉善王玛哈巴拉，仍听该处民人自行捞运，以资生计。原额课银六万三千五百八十两，由河东商人按年完纳。吉盐既已停止，阿拉善王玛哈巴拉赏项，也随之停止。

清政府严禁贩食鸦片　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初十日，清政府规定：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的，革职杖一百，加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对此，嘉庆帝颁发谕旨说：近来侍卫官员中，风闻有违禁买食鸦片的，因事未发觉，所以免其查究。

这些人若不知悔改，将来一旦有人举发，就照新例惩办，决不宽贷。供役内廷的太监，也有买食鸦片的，情节更属可恶。总管内务府大臣要先通行晓谕，如有违禁故犯的，立行查拿，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嘉庆帝还说：鸦片烟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祸害与鸩毒相同。奸商嗜利贩运，许多人受害，都是因为各处海关私纵偷运造成的。以前虽曾降旨，要各省海关监督等严行查禁，但是数年以来并未遏止；甚至有的海关还私征鸦片烟税银，这不是给那些贩运鸦片的人引路吗？无怪乎鸦片烟的流毒越来越广。今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沿海各关，如查有奸民私贩鸦片烟冒禁过关，一经拿获，将鸦片烟立时抛进海中，奸商按律治罪。如果管关监督等阳奉阴违，并私收税课，该省督抚要实力查参，把该监督先行革职，由驿具奏，从重惩治。各处辗转营贩鸦片烟的人，五城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以及各直省督抚等，要一体严查，按律究办。

李文成起义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初七日，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在河南滑县起义。李文成，河南滑县谢家庄人，木工出身。嘉庆十六年，他在天理教内被拥戴为教首，掌管"震卦"。天理教又名荣华会，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徒众以八卦作为分股名目，在北方各地积极发展组织，所以又叫八卦教。嘉庆十八年八月，八卦教首领李文成等人在河南浚县道口镇聚会，商定于九月十五日，在北京、河南、山东等地同时起事，然后共同攻打北京城。会后，李文成回到滑县，私买战马，蓄养士卒，铸造甲仗，颁分旗号，集中全力从事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的战友牛亮臣在滑县大坯山东坡，专门组织教徒数百人铸造军器；他本人则在谢家庄大犒起义军，进行宣传鼓动。因为人多势众，机密泄露，被清政府侦察到。滑县知县一面密报巡抚请兵镇压，一面先发制人，在九月初五日，派衙役将李文成、牛亮臣等首领逮捕下狱。审讯时李文成闭口不言，足胫被夹断，两股被打烂；牛亮臣被杖数百，血流遍体。李文成、牛亮臣被捕，起义消息外泄，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另一首领宋元成认为，不如提前举事，直取滑县，事成后再攻取别的地方。这一意见被众人采纳。初七日，宋元成等聚集滑县教徒五千余人，个个头缠白布，身穿白衣，攻陷了滑县县城，杀死了知县强克捷和巡检刘斌，从监狱中救出李文成、牛亮臣等，起义提前爆发。随后，李文成在滑县衙署内设羽帐，树大旗，上写"大明天顺李真主"七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又大封诸卦主为诸卦王，各首领为各宫伯、卦伯，各类先锋、总管。接着攻占了滑县附近的军事据点和屯粮要地道口镇，重兵围困北上要道浚县。几天之内，河南、山东天理教徒据浚县，破长垣，占定陶，克曹县，起义部众很快扩及到八万余人。嘉庆帝闻报后，立即命令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会同浙江巡抚高杞、山东巡抚同兴进攻天理教军。

天理教军攻打紫禁城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林清领导天理教军，攻打京师紫禁城。林清，本籍浙江，久居直隶大兴县黄村，原为大兴巡检司书吏。嘉庆十一年五月，他加入荣华会，因为轻财好义，很为教民拥戴，掌管"坎卦"。林清传教活动遍及河北各地，重点是京畿附近。教徒中除农民、小市民、说唱卖艺者外，还有下级吏役和宫禁中的低级太监。嘉庆十八年八月河南浚县道口镇会议之后，林清即返回黄村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李文成起义提前发动后，由于清兵堵截拦阻，队伍没有能迅速北上，因此林清对滑县起义发生变化一无所知，仍按原来计划进行准备。九月十五日，林清联络的教徒二百余人，分成东、西两队，乔装打扮，分别潜伏在东华门外和西华门外，准备的兵器则混杂在酒肆中。将近中午，在太监接应下，两队相继夺门入宫。东队由陈爽居首，刘呈祥押后，太监刘得财、刘金引路，进入东华门；西队由陈文魁居首，刘永泰押后，太监高泰、高广福引路，进入西华门。太监王福禄、阎进喜居中接应。按原计划规定，进入紫禁城后，由陈爽指挥战斗，林清坐镇黄村，等候河南天理教军的到来。进入东华门的天理教军，很快被司阍官兵发现。官军急忙关闭城门，天理教军大部分被关在苍震门外，进入宫廷的仅十余人。这十余人经过激烈战斗，终因道路不熟，力量过于单薄，而被杀被俘。进入西华门的天理教军，先攻打尚衣监文颖馆，然后攻打隆宗门。由于时间耽搁，隆宗门关闭，有的进入内右门。宫廷内展开了一场浴血战斗，天理教军有的由门外诸廊房越墙进入内宫，有的被阻于隆宗门外，陷身虎穴，以寡敌众，全无畏惧。当时，皇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等正在上书房，闻变后戎装上阵，用鸟枪射击天理教军。不久，内务府大臣领兵进入神武门增援，火器营一千多官兵也进入宫内。进入皇宫的天理教军经过英勇搏斗，最后被残酷镇压。起义教徒有三十一人牺牲，四十一人被俘。紫禁城侍卫护军四十一名被打死，六十名被打伤。十九日，在黄村等候消息的林清被清军捕获，不久与其他起义的天理教徒一同被磔身死。刚刚木兰秋狝返回的嘉庆帝在烟郊行宫闻讯后，大惊失色，连忙颁布罪己诏，还作诗说：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李文成自焚身死 嘉庆十八年(1813)十一月

二十日，在司寨之役中，天理教军失败，李文成举火自焚身死。李文成起义后，一直以滑县为大本营。随着清军的不断进攻，起义军占据的地方逐渐丧失，滑县便暴露在清军面前。天理教军的另一首领刘国明为了救援李文成，亲自率八百义军，取道清兵围困薄弱的北门苇塘区，夜入县城，救出李文成。他们集合起义军战士四千余人，西进太行山，攻下辉县山内的司寨。不料清军也尾追到司寨，并且把司寨团团包围起来。十一月二十日，清军开始了对司寨的进攻。司寨背山临河，沟深墙固，便于防守。清军多次进攻，都被天理教军击退，激烈的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寨前布满了清军士兵的尸体。下午，清军越濠而入，炸毁了寨墙的一角，冲入了寨内。天理教军退据民房，和清军展开巷战。战斗一直延续到天黑，双方仍相持不下。于是，清军统帅杨芳便下令举火焚寨，边烧边攻。刹那间烟焰蔽空，天理教军战士处境艰危。最后，李文成、刘国明等被围困在一座碉楼中。杨芳亲自率众登楼，企图活捉李文成。就在这时，只见楼上闪出一将，自称刘国明，持刀跃出，击杀清军十余人，刘国明也英勇战死。杨芳又下令喊话，有活捉李文成来献的，受上赏；李文成若自动投降，其余人均免死。天理教军战士大义凛然，他们高呼"李文成在此，要杀即杀，绝不投降！"清兵层层围困，冲入碉楼。李文成等即举火自焚，数十人互相拥抱在一起而死，没有一人投降清军。

清军攻下滑县　嘉庆十八年(1814)十二月十二日清军攻陷滑县，天理教起义最后失败。李文成牺牲后，天理教起义军面临迅速瓦解的危险境地，滑县成了最后的一个据点。滑县城墙坚厚，外砖中沙，炮火难以攻破，所以清军围攻数十天，始终未能攻下。司寨之役后，清军集中兵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加强了进攻滑县的力量。十二月初十日，清军统帅那彦成下令各路清军同时对滑县五个城门发起攻击。清军暗挖地道，埋下炸药，把西南角的城垣崩裂了二十余丈。随后清军一拥而入，冲进南门，其他各门也连续被清军攻破。天理教起义军战士在城内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双方都有很大伤亡。十一日，天理教起义军依民房负隅抵抗，仍然控制着城内据点五六十处。清军无可奈何，便纵火焚烧民房，起义军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天理教起义军首领牛亮臣、徐安国劝李文成妻子张氏装扮成难民出城，但是，张氏毅然表示：与滑县城共存亡，不战死不是英雄！随后，她挥刀巷战，击杀清军多名以后，自缢而死。清军攻下了滑县城，天理教起义军战士惨遭杀戮。大元帅宋元成阵亡，艮宫王王道隆、震宫王刘荣顺、巽宫王冯相林、坎宫王尹振、乾宫王寿光德等首领全部壮烈牺牲。牛亮臣、徐安国被俘以后解送京师，磔死枭首。轰轰烈烈的天理教起义最终失败了。

箱工万五起义　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万五领导木箱工人在陕西岐山县起义。岐山县地处南山老林地区，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各处无地的破产农民，流离失所，便纷纷来此开荒度日。于是，不少商人便利用这里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开设木厂、纸厂、炭厂，有的还开采铁矿，铸造农具、铁锅等，谋取厚利。木商开设的木厂在当地称为"木箱"。木商用包谷雇用木工，砍伐树木，然后锯成木板运出山外。嘉庆十八年，南山秋雨绵绵，包谷欠收，粮价上涨，木商们以包谷雇夫役获利顿减，便纷纷停工，以致当地木工失业缺食，面临饿死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岐山县三才峡木箱包头万五(万全忠)，带领二百多木工到箱主处借粮。谁知箱主不但不借，还对他们横加辱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万五领导木工们愤怒地夺取了箱主们的粮食，起义就这样爆发了。万五领导起义的木工们南下郿县入山，在独流河、青龙寨、佛爷滩等地焚烧木箱，攻破地主的寨堡。在斗争过程中，很多穷苦的木工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起义军迅速扩及到五千余人。万五对起义军进行了组织整顿，队伍分成黄、青、红、绿、白五号，各号首领称元帅，下设先锋、总兵等。各号时分时合，相互呼应。万五起义后，清朝陕西巡抚朱勋立刻向京师告急，嘉庆帝命陕甘总督长龄率一千五百人星夜赶到起义发生地，还命那彦成限期剿灭天理教起义，然后移师会剿木工起义。不久，清政府又命杨遇春率步兵以及吉林、黑龙江马队赶往陕西，还调任杨芳为陕西西安总兵，以加强对万五领导的箱工起义军的镇压。二十七日，箱工起义军在西江口平木山等处和清军展开了激战。起义军遭受到很大损失，江元帅、何元帅、大旗手等十数员将领战死，万五被逼退入太白山老林深山之中，嘉庆十九年正月十二日，清军会师老君岭，并在宽沟口设下埋伏。十三日清晨，万五率众不幸进入清军埋伏圈。清军发起突然袭击，箱工起义军缺乏准备，战死大半。万五受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不久，起义军余众也被清军诈骗设伏歼灭。万五领导的箱工起义遂告失败。

学者法式善病逝　嘉庆十八年(1813)，法式善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法式善本名运昌，字开文，又字梧门，号时帆，蒙古乌尔济氏，隶内务府正黄旗。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历任左庶子、国子监祭酒、侍讲学士等官。乾隆帝弘历把他改名为法式善，是满语

勤勉的意思。他的确也是一个勤奋的学者，曾参与《皇朝文颖》、《全唐文》等书的编纂。法式善精于史学，对清朝典章制度尤为熟悉。他还擅长文学，是当时有名的诗人。他论诗主张"神韵说"，作诗学唐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诗风清峭峻刻，幽微宕往。主要著作有《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陶庐杂录》、《存素堂诗集》等。

清廷复开捐官例 嘉庆十九年(1814)正月初七日，从侍郎吴璥奏，清廷复开捐官例。清廷采取这一措施是万不得已之举。吴璥奏疏上达朝廷后，嘉庆帝即交户部核议，结果有两种意见。潘世恩、苏楞额等人同意暂开捐例，卢荫溥、桂芳、赵秉冲等人建议将常例推广加增。对这两种不同意见，嘉庆帝认为，推广常例，事多格碍难行；暂开捐例，能否有益于经费的解决，也未可知；或许在这两种措施之外，还有更好的措施，可使国帑充裕。于是，他命曹振镛、托津、铁保、英和四人再行妥议具奏。英和认为捐例弊病很多，充裕国帑的办法，一是复名粮之旧，二是多开矿厂。曹振镛等三人则认为暂开捐例可行。对此，嘉庆帝又表示，复名粮之旧，已经实行；开矿则流弊很多，实不可行。当时，清廷军需、河工各项动用，均出常年经费之外，国家收入有一定数额，而支出浩繁，财政竭绌。所以，在没有其他好措施的情况下，清廷也只好采取暂行捐官例。嘉庆帝无可奈何地承认，这是万不得已之举，并非认为捐例是必须实行的。他说：诸臣食君之禄，皆当忠君之事。各大臣果有真知灼见，能为裕国之策，必须字字确切，毫无流弊，不准泛论纸上空谈，仍犯议论多而成功少的毛病。如确有把握，立能济军需、河工之用，这样的措施上奏后，立即将捐官例停止。如果只说捐官例弊害，而无良策，这种奏疏等于没用。

清政府禁止私运银两出洋 嘉庆十九年(1814)正月，户部侍郎苏楞额上《严禁海洋私运》奏折，其中指出：近年以来，夷商贿通洋行商人，借口保证返回夷兵盘费为名，每年都将内地银两偷运出洋，几乎有百数十万之多。这些夷商已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又将低潮洋钱运进，任意欺蒙内地商人，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嘉庆帝览奏后，谕示军机大臣：夷商交易，原令彼此以货物为准，以使中外互通有无，方便百姓。若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随后，嘉庆帝命蒋攸铦、祥绍等人，查明每年夷商等偷运足色银两出洋实际有多少，并制定章程，严密禁止。

《全唐文》纂成 嘉庆十九年(1814)闰二月二十六日，大学士董诰等纂辑《全唐文》成书。《全唐文》共一千卷，收唐五代作家三千零四十二人，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先列帝王、后妃、公主作品，然后按时代顺序将作家依次排列，并附小传。最后几卷则收录释、道两家和不知作者生平或姓名的文章。该书以《唐文》为蓝本，并采辑《永乐大典》、《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而成，收罗很广，基本上反映了唐代文章的面貌。但是，也有误收、漏收的现象。后来，清人陆心源编有《唐文拾遗》、《续拾》，对《全唐文》一书作了补充。

清政府准粤商采矿设厂 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二十二日，清政府表示同意粤商采矿设厂。先是两广总督蒋攸铦上《粤省查办匪徒情形折》，谈及粤省地广民稠，良莠不齐，全在地方官员实力整饬，以斯渐革侥风。奏折内还具体谈到，六浮山及回肚面山二处，有商人黄大通等铁厂、锅厂三座，每处工丁一二百名。因恐人众难于稽查，全部饬令封禁，令该商将各工丁妥为遣散。嘉庆帝览奏后当即指出：所办尚未妥协。上年陕省南山，即因木商停工乏食，木工起而闹事。今粤省山内铁锅等处，该商久已利为恒业，而工丁等也借此谋生，如果突然给以封禁，这数百名失业工丁，岂是一二个商人所能遣散的？如果这些人流离失所，变成无籍游民，进而转变成流匪，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嘉庆帝谕示军机大臣，粤省矿厂不宜封禁，但应官为设立章程，或编造丁册，令该商人等递加保结，地方官再按季考察，使各贫民有糊口地方，又不致滋众闹事，才是正确的办法。

清廷裁兵节饷 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二十六日，清廷决定裁兵节饷。这一天，嘉庆帝谕示内阁：从来兵制与国赋相权而行。我朝建设各省营兵，久有定额，其小有损益，也都根据地方情形，随时酌定。只是乾隆四十六年添补名粮额缺案内，一时各省骤然增兵六万六千余名，为数较多。至今三十余年，于武备并无益处，而帑项已多用至四千余万。嘉庆帝命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兵部，将增设兵粮额数，酌量汰减。又经各省总督，山东、山西、河南巡抚，成都将军，河道漕运总督等讨论，最后清廷决定：除直隶、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六省，及河东河标，或兵额本减，或控制紧要，难以酌减外，江苏裁额兵三百六十五名，漕标裁八十四名，河标裁二十五名；江西裁额兵一千八十三名；浙江裁额兵七百二十八名；福建裁添募暂设兵一千三百五十名，马五百六十匹；湖北裁额兵一千六百三十六名；湖南裁额兵一千五百五十四名；山西裁额兵一千八百六十五名；四川裁额兵六百三十名；广东裁马六百九十六匹；广西裁额兵六百三十名；云南裁额兵二千三百三十二名；贵州裁额兵

一千九百五十八名。统计裁兵一万四千二百四十名，马一千二百五十六匹，每年共节省饷银二十七万一千九百三十二两，米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五石。

清政府禁奸商囤积米粮　嘉庆十九年(1814)八月十七日，嘉庆帝谕示内阁，严禁奸商囤积米粮。这天，给事中杨怿上《请禁奸商囤积米粮以济民食》奏折，谈及本年安徽省干旱少雨，粮价昂贵，该省巡抚胡克家奏请动拨藩库银二十万两，委员分赴邻省采买米石，运至该省备用。实际上，安徽省庐州六安毗连的双河镇、三河镇一带，有吕姓米商修盖仓房，沿河七十余里，盘踞多年，每年积谷百余万石，贱买贵卖，仓名有二十八丰号数，其余分户囤积者尚有不少。嘉庆帝阅览该奏折后指出：从来通商都是为了便民，怎能在粮价昂贵之时，贫民需粮之日，容许奸商居奇牟利？他随即命胡克家等人委员查明该商囤积粮米数目，然后由官府定出价格，开仓出粜，以便粮食流通，穷民得资接济。嘉庆帝还谕示：如果该商人等抗违隐匿，即将粮石入官平粜，仍治以应得之罪。

胡秉耀等假借明朝后裔起事　嘉庆十九年(1814)十月十二日，江西巡抚阮元上奏：胡秉耀等“谋逆”要犯已被拿获。胡秉耀是江西百姓。他买到一本残书，内有阵图以及造反等俚语，便向他的同伙邱恭泽、杨易、卢胜辉等人宣传说，他已解得书内阵图，如果能有带头起事的人，大家就能得到富贵。杨易便说朱毛俚可以假托前明后裔。朱毛俚被邀入伙后，对自己能任首领也深信不疑。他们便一起到积善禅林商议造反事，取书内的俚语，称后明晏朝年号，胡秉耀等都被封为官职，对相继入伙的人，都给以劄付。阮元任江西巡抚不久，便在各地方严密编查保甲，结果发现了胡秉耀等人准备造反，遂将胡秉耀一行人拿获。胡秉耀等十七人凌迟斩决，程麟祥等三十五人绞监候，朱毛俚拿获后处以极刑。阮元则被赏加太子少保衔，赏戴花翎。

清政府查拿红胡捻子　嘉庆十九年(1815)十一月二十一日，嘉庆帝谕示河南、安徽等地查拿红胡捻子。捻子，河南等地民间行傩驱疫、裹纸燃膏为龙戏的称呼，原起于康熙年间。山东、河南、安徽百姓相聚拜福拜捻，后来日益增多。二十一日，御史陶澍上奏，河南南汝光一带，以及安徽颍、亳等处，近来红胡“匪徒”日聚日多，“横行”益甚。每一股称为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成群结队，且有头目指挥。河南息县、光山、正阳、罗山、汝阳、项城尤其厉害，头目名叫王妮仔。安徽红胡捻子的头目叫李东山、马大振，每人手下都有千人。嘉庆帝闻奏后，命河南巡抚方受畴、安徽巡抚胡克家立即查拿红胡捻子。不久，王妮仔、李东山、马大振等人相继被清政府捕获。

清政府整饬洋行　嘉庆十九年(1815)十二月初二日，嘉庆帝谕令整饬洋行。原来，粤省地方濒海，向准各国夷船前来贸易。本年八、九月间，英吉利国护货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竟敢驶至虎门，经两广总督蒋攸铦示以兵威，派员诘责，方才退出。后来，蒋攸铦将这些情况密奏给嘉庆帝，提出要整饬洋行事宜。嘉庆帝览奏后，非常赞同，并表示今后不可不严申禁令。他还说：该夷船所贩货物，全藉内地销售，如呢羽钟表等物，中华尽可不需，而茶叶土丝在彼国断不可少，倘一经停止贸易，则其生计立穷。内固藩篱，不可使外夷轻视，于是规定：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许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遛。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倘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人馆舍。

历史学家赵翼病逝　嘉庆十九年(1814)，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赵翼因病去世，终年八十八岁。赵翼字云崧，又字耘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参与修纂《通鉴辑览》。以后相继出任广西、广东知府。乾隆三十七年(1772)被弹劾，辞官还乡。曾主讲于安定书院。他工诗善文，长于史学，勤于著述。对“廿二史”(自《史记》至《明史》)做读书笔纪，考证异同谬误，参互校核，以评修史曲直，综合分析以论史事得失，著成《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该书除对廿二史考证外，还对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原因，多所记述。其著述还有《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瓯北诗抄》、《瓯北诗话》、《平定两川述略》、《平定台湾述略》、《粤滇杂记》等。

清政府准吉林开采煤矿　嘉庆二十年(1815)正月初三日，清政府同意吉林开采煤矿。此前，吉林将军富俊上奏，言及吉林旗民生齿日繁，木山采伐渐远，取薪不易，请于缸窑、胡家屯、营盘沟、田家屯(即半拉山)、丁家沟、波泥河六处开采煤矿，以裕旗民生计。嘉庆帝览奏后，谕示内阁，认为富俊所奏自系实在情形，同意在以上六处开采煤矿，同时强调责成该将军妥立章程，约束稽察，如办理不善，以致滋生事端，惟该将军是问。

甘肃二十年不敷兵粮　嘉庆二十年(1815)正月二十二日，嘉庆帝对甘肃二十年不敷军粮情况十分不满。当时，甘肃各州县额贮京斗仓粮六百一十余万石，折仓斗粮四百三十余万石，亏短各色粮一百七

十余万石，除去已支兵马粮料二十四万二千余石外，实在应存各色粮二百三十余万石，可是应需兵粮仅有二十余万石。对此，嘉庆帝非常气恼地谕示军机大臣：怎么河东驻兵处各州县一点仓贮粮也没有？其中亏缺情弊已属显然。由于甘省二十年不敷军粮，陕甘总督先福要求清政府拨银三十八万九千两。嘉庆帝最后批准了这项请求，照旧例交州县领办。

清政府定禁鸦片令 嘉庆二十年(1815)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决定进一步查禁鸦片。此前，两广总督蒋攸铦奏酌定《查禁鸦片烟章程》，请于西洋货船到澳门时，先行查验，并明立赏罚，使地方官知所惩劝。二十三日，嘉庆帝谕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嗣后西洋货船至澳门时，自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至粤省行销鸦片烟，积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处分。恐伊等瞻顾因循，查拿不力，嗣后有拿获鸦片烟之案，除查明地方委员等，有得规故纵情事应严参办理外，其仅止失察者，竟当概行宽免处分。至所请拿获兴贩烟斤，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分别纪录加级及送部引见，并军民人等拿获奖赏，以及诬良治罪之处，俱著照该督等所请办理。

查禁闻香教 嘉庆二十年(1816)十二月十六日，清政府查禁闻香教，有关人员被判刑。直隶滦州(今河北滦县)石佛口王姓，其先世自前明以来，倡立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子孙承袭，已历十世二百余年，后改名为清茶门。直隶总督那彦成以邪教总匪恶根为名，将王姓传教人拿获，并进行了严酷审讯。十六日，嘉庆帝就此案谕示军机大臣，命将闻香教首凌迟处死，其余省内外习教者，发往新疆给回民为奴，王姓族人未习教者，也要徙至云南、贵州、两广安插。

古文字学者段玉裁去世 嘉庆二十年(1815)，古文字学者段玉裁因病去世，终年八十一岁。段玉裁，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乾隆年间举人，曾在贵州、四川等地任知县。他精于音韵、训诂，著有《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春秋左氏古经》、《六书音韵表》和《说文解字注》等三十余种。其中《说文解字注》，用三十余年时间写成，阐明《说文解字》的体例，分析文字的形、音、义，并对许多字的解释提出新的观点，修订前说，在词汇学、词义学方面，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学问家姚鼐病逝 嘉庆二十年(1815)，学问家姚鼐因病去世，终年八十四岁。姚鼐，字姬传，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曾为《四库全书》馆纂修官。书成，弃官返籍，主持书院教授四十余年。他勤于著述，存世文字有《惜抱轩文集》及诗文笔记等。姚鼐是清代继方苞之后的著名散文家、桐城派后期领袖。曾编选《古文辞类纂》，宣传桐城派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和气格、辞调上的阳刚、阴柔、阳主阴辅、阴主阳辅四种类型作为论文标准，拓展了传统文论的天地。《登泰山记》是体现他文论思想的典范文章。

九世达赖暴亡 嘉庆二十年(1815)正月初三日，九世达赖隆朵嘉错暴亡，年仅十一岁。九世达赖是西康邓柯地方春科土司之子，父名丹增曲结，母名团柱卓玛。隆朵嘉错被认定为达赖灵童后，丹增曲结被清政府封为公爵，以后即随达赖灵童入藏。隆朵嘉错三岁时被认定为达赖灵童，由西康迎至拉萨，在公塘寺暂住，由七世班禅丹贝尼玛会同摄政济咙呼图克图及三大寺代表，一致向驻藏大臣要求，说灵童确系第五世达赖喇嘛转世，请奏明皇上，免予金瓶掣签。嘉庆帝派成都将军特清额来藏颁旨，免予金瓶掣签，并赐给哈达、长寿佛、宝石念珠、金铃杵等赏品。接着，又派都楞郡王、噶勒丹锡勒图呼图克图及侍郎侍卫等多人来藏，看视坐床，批准达赖乘黄轿，启用前辈达赖之印，赏银一万两。隆朵嘉错于嘉庆十三年八月初三日在布达拉宫坐床，拜七世班禅丹贝尼玛为师，剃发受戒，并取法名。当时，英国殖民主义者对西藏边界诸国采取侵略行为，由于清朝自嘉庆年间以后日趋衰落，对此采取不闻不问态度，所以，藏边诸国对清朝表现离心和疏远，这又给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可乘之机。那时，廓尔喀国内发生动乱，英国殖民者乘机控制了哲孟雄(锡金)，随后又打败廓尔喀(今尼泊尔)人，使廓尔喀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在此之前，英国驻印度总督明多曾派人去拉萨朝拜九世达赖隆朵嘉错。英、廓战争爆发后，嘉庆二十年正月初三日，隆朵嘉错突然在布达拉宫暴亡。九世达赖死后，嘉庆帝下令一面寻访转世灵童，一面由掌办商上事务的第穆呼图克图摄政。

清政府拒绝援助廓尔喀 嘉庆二十年(1815)二月初五日，清政府拒绝给正在和英国殖民主义者作战的廓尔额以援助，不久，廓尔喀成了英国的保护国。当时，廓尔喀国内发生内乱，廓尔喀噶箕(大臣)乃尔兴与国王不和，噶箕聚众叛乱，将国王拉纳·巴哈都尔逐出阳布(即加德满都)，国王又集合各地兵力，夺回阳布，噶箕乃尔兴欲逃到西藏避难，请示当时的驻藏大臣英善，英善拒绝乃尔兴来藏。不久，廓尔喀国王又为叛军所杀。乘廓尔喀国内乱之机，英国殖民者帮助哲孟雄收回了被廓尔喀过去占领的领土。廓尔喀人对此不甘心，便出兵反击英国殖民者，将侵入廓、哲两地的英国兵打败衄，并逐出境外。后来，英国重新集结大兵，向廓尔喀大举进攻。廓尔喀

人一面派兵阻御，一面向驻藏大臣喜明报告，要求帮助军饷，遭到驻藏大臣的拒绝，喜明并责备廓尔喀人以前多事，不应惹英国人。接着，廓尔喀人被英国军队打败，廓王又向驻藏大臣报告，要求清朝出兵援助，并提出"若投诚披楞（披楞即指英国人），即不能朝请"。驻藏大臣不但拒绝出兵援助，并严行驳斥。二月初五日，嘉庆帝也对此表示：廓尔喀与披楞互相争斗，自取败 ，天朝岂能过问？由于廓尔喀人得不到清朝的任何援助，只有向英国人求和，结果，嘉庆二十一年，廓尔喀和英国订立了萨格里条约，廓尔喀除给英国割地三处外，还承认英国可常驻代表在加德满都。

台湾发生地震 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十一、十二两日，台湾发生地震。台湾、凤山二县，并澎湖厅城乡房屋，均无坍塌，亦无压伤人口。嘉义县城内官民署舍，墙壁间有倾攲，土城坍塌三十余丈，倒坏垛口七百余座，倒坏夫店三间，压毙小夫二名，斗六等保倒坏民房七十一间，压毙男妇十六名。彰化县城内，暨鹿港南投地方，共倒塌民房三十二间，压毙客民幼孩二名，压伤民人一名，演武厅及仓廒间有倾倒。淡水厅城内同竹堑地方，倒塌民房十三间，压毙男妇二名，幼孩六名。桃涧等保共倒塌房屋一百一十二间，压毙男妇八十五名，仓廒营署兵房军装局间有坍塌，震损沪尾水师炮台，墙垣倒坏一百余丈。噶玛兰厅衙署监狱库局祠庙略有倒塌，并倒坏店屋十二间，压伤一人，余止墙壁倾圮。以上各厅县，有力之家伤毙人口，已自行收殓，房屋亦随行修葺。无力人家，各厅县量给钱银，以资收埋，并捐给修造房屋费用。倒塌城垣衙署仓廒营房等处，也陆续修葺。

陕西发生轻微地震 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二十日，陕西发生轻微地震。陕西同州府属地方，与山西蒲州，河南陕州地界毗连。地震时，潼关、华州、华阴、朝邑、蒲城、澄城、大荔、郃阳、白水、中部等厅州县，都有反应。城楼、衙署、仓廒、监狱、庙宇、营房、民房均有倒塌，城垣亦有坍损臌裂之处。后经确切调查，潼关等十厅州县，地震中死亡民人二十余名，都由该地方官捐棺殓埋。间有倒塌的民房，无力修理的，也由官府给予修费。各厅州县坍塌衙署、监狱、自行修补。庙宇、城垣、仓廒、营房，在有关藩司查勘后，也由有关部门分别修理。

河南陕州发生地震 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二十、二十一两日，河南陕州发生地震，损失比较严重。陕州在河南省正西，距开封省城七百二十余里，而与山西省相邻。陕州境内，共倒塌瓦草房屋土窑一万五千余间，压毙男女大小一千三百四十余口；所属灵宝县境倒塌瓦草土房屋一万四千余间，压毙男女大小三百九十余口；所属阌乡县境倒塌房屋八十余间，压毙男女大小七口。灾害发生后，清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救灾措施。对于受灾无力贫民，于仓存本色谷石内，按照水旱灾伤抚恤例，先行散给一月口粮，大口给谷三斗，小口减半，听其自行煮食。压毙贫民，给收瘗费用，每大口给银二两，小口给银七钱五分。对于倒塌瓦草土房屋无力修复的，循照水灾例，每瓦房土窑一间，给银一两，草房一间，给银五钱。另外，这次地震中，陕州城垣墙垛，尽行脱落，只有根脚尚属坚固。灵宝县城垣间有损坏，北面坍塌比较严重。监狱、仓廒也有毁坏。函谷关一带驿路，坡土下卸，间段壅塞。文庙、武庙、殿宇、墙垣、仓房、考棚、衙署也多有坍损地方。对上述所有坍损各项工程，清政府派人查勘后，均采取相应措施，修缮整理完固。

山西发生强烈地震 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二十一日，山西发生地震；二十二、三两日，仍有余震发生，各方面造成重大损失。据查，永济县各乡倒塌瓦土房二百余间，压毙男女五十八人。县城东北城楼稍裂，仓房坍塌一间，四关厢倒塌民房四、五间，压毙七人。临晋县东南乡坍塌民房十二间，压毙男妇十五人。虞乡县九十七村倒塌房屋数十间，并数百间及千余间不等，共压毙男妇大小六百八十三名，民房全塌的，只能搭盖窝铺暂住。解州各村坊，压毙男女九百四十四人，仓库、监狱、考棚、城垣均有倾塌，压毙禁卒解役三名，压伤绞犯一名。安邑被灾村庄共一百五处，倒塌房屋九千八百余间，压毙男女二百九十余人，仓廒、监狱、城墙亦俱坍塌。夏县压毙男女十五人，土房倒塌一百八十余间，窑房倒塌二百五十余座。猗氏县四乡倒塌民房共二百五十三间，压毙男女三十七人。荣河县塌卸房屋数间至十余间不等，压毙男妇三名。万泉县东乡窑房间有倾颓。芮城县城关、民舍、仓库、监狱稍有坍裂，乡村塌房很多，压毙男妇一千六百余人。平陆县民房窑洞震倒十之三四，压毙男妇三千余人，城垣、仓狱、衙署各墙垣，亦有坍塌。灾害发生后，清政府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救灾措施，掩埋成人每名给银二两，未成年的七钱五分；伤者成人给医药银一两，未成年的五钱；房修费全塌瓦房每间给银一两二钱，土房给银八钱，半塌瓦房每间给银五钱，土房四钱，每户不得过三间；救济粮每名成人每日给米八合三勺，未成年的减半，时间为四个月。

京师铸钱工匠罢工 嘉庆二十一年（1816）六月，京师铸钱工匠罢工。本年五月初旬，工部宝源局因将增复料钱只发给炉头，众匠役不服，便在贾喜子等人领导下，关闭厂门，扣留司员、监督，停炉罢工。

六月六日，户部宝泉局工匠亦相继行动，包围炉头，并在大厅前喧聚。对于这些情况，钱法侍郎佛柱并不上奏，准备将料钱分给匠役，以图将就了事。嘉庆帝召见佛柱等人了解工局情况，佛柱等都以安静无事回奏，并不提及匠役罢工等事。后来，御史萧镇经过访求，上《工部宝源局匠役停炉误铸，挟制官长，请严行惩创，并钱法侍郎因循不奏，请旨查办》奏折，嘉庆帝才了解有关情况。于是，二十七日，嘉庆帝命将佛柱等人交都察院严加议处；监督马禧、马瑞辰、周维垣等著军机大臣传讯具奏；铸钱匠役中目无法纪者，著英和派兵前往镇压。不久，贾喜子等人被捕。佛柱、吴炬等即行革职，以为满、汉侍郎不实心任事者戒。

清廷责令英使回国　嘉庆二十一年(1816)七月初八日，嘉庆帝颁布谕旨，责令英使回国。乾隆五十八年时，英国遣使来到中国。由于英使恪恭成礼，不愆于仪，受到乾隆帝接见。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派遣使节前来中国。嘉庆帝以英国国王笃于恭顺，深为愉悦，循考旧典，爰饬百司，在英国使臣到来之日，瞻觐宴赍，都要仿照乾隆朝礼仪举行。英使到达天津后，嘉庆帝派官吏前往赐宴。不料英使在谢宴时，并不遵照清朝礼节行事，即不行三跪九叩礼。嘉庆帝先是以远国小臣，未娴仪度，可从矜恕，后又特命大臣在英使将要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英使所行三跪九叩礼，并强调英使必须行此礼。清廷安排会见英使的日程是：七月初七日，令英使瞻觐；初八日，在正大光明殿赐宴颁赏，再于同乐园赐食；初九日，陛辞，并于是日赐游万寿山；十一日，在太和门颁赏，再赴礼部筵宴；十二日，遣行。谁知初七日瞻觐之时，英使已至宫门，嘉庆帝也将御殿，才知英使拒绝行三跪九叩礼。清朝大臣不得不以英国正使、副使都患急病，不能移动为由，上奏嘉庆帝。嘉庆帝遂责令英使回国，还强调说：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又命将带领英使误事的工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苏楞额，理藩院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和世泰，礼部尚书、镶黄旗汉军都统穆克登额，给予降职外分。

罗家彦奏《筹画旗民生计章程》　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月二十九日，御史罗家彦上奏《筹画旗民生计章程》。该章程内强调指出，八旗老幼男妇，皆以纺织为业，可以缓解旗民生计艰难问题。嘉庆帝览奏后，就认为其事不可行；交八旗都统讨论后，他们也以为事多窒碍，共同驳回。十一月初九日，嘉庆帝谕示内阁：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其次则诵读经书，以为明理治事之用。若文艺即非所重，不学亦可。是以皇子等在内廷读书，从不令学作制艺，恐类于文士之所为。凡以端本务实，示所趋向。我朝列圣垂训，命嗣后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谋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且营谋小利，势必至渐以贸易为生，纷纷四出，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住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近日旗人耳濡目渐，已不免稍染汉人习气，正应竭力挽回，以身率先，岂可导以外务，益远本计矣。即如三年一次阅选秀女，寒素之家，衣服尚仍俭朴；大臣官员之女，衣袖宽广逾度，竟与汉人妇女衣袖相似，此风渐不可长。现在宫中衣服，悉依国初旧制，乃旗人风气，日就华靡，甚属非是。各王公大臣之家，皆当力敦旧俗，倡挽时趋。不能齐家，怎能治国？罗家彦此折若出于满洲御史，必当重责四十板，发往伊犁。念该御史系属汉人，不识国家规制。但他想更我旧俗，已不能胜言官之任。于是，罗家彦被革退御史，仍为编修。

教徒交经具结　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二月间，湖北省传习白莲教的三百六十四人，在地方官劝令下，纷纷交出经卷，具结呈悔。嘉庆二十二年正月初五日，该省沿习天主教的，又有三十七名将经卷、十字架、图像等交到官府，还有十余名交出大乘经卷。为此，嘉庆帝谕军机大臣：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向来信教者最多，这些省的督抚应仿照湖北作法，明白出示晓谕，凡向来习教之家，如真心悔悟，将经卷及有关教书到官投缴，出具改悔甘结，州县官将所缴经卷申详督抚验明销毁，即将投悔人奏明，免其治罪。嘉庆帝还强调，对于白莲等教，所以严拿务获者，系是从逆者，不是习教者。

天津设立水师　嘉庆二十一年(1816)闰六月二十九日，嘉庆帝谕示内阁：直省沿海地方，如广州、福州、浙江乍浦，江南京口，都设有水师驻防，沿海省份的绿营，也设有外海水师，每年操演，按期会哨，定制周详。天津为畿辅左掖，大沽等海口直达外洋，从前曾建设水师驻防，后经裁撤。该处拱卫神京，东接陪都，形势紧要，自应参考旧制，复设水师营汛，以重巡防。于是，他命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兵部，将天津地方应如何分驻满汉官兵，增设统辖大员，以及一切建置事宜，操防规制，详细妥议具奏。十一月，嘉庆帝又明确降旨：天津添设水师。嘉庆二十二年三月初五日，天津设立水师，新添水师兵一千名，分为左右两营。并添设天津水师总兵一员，管辖两营水师营弁兵丁，给敕印俸廉，建盖衙署、兵房。不久，又从福建、江南、广东、浙江等省拨调船只炮位，同年五月一切办理完竣。

哈尼人高罗衣起事　嘉庆二十二年(1817)三

月十六日，哈尼人高罗衣起事报闻京师。最初，江西、湖广等处汉族商人，前往云南省临安府贸易，取利过苛。嘉庆二十一年冬，哈尼人高罗衣等，借驱逐汉人为名，聚众万余人起事，自称窝泥王，并将附从汉人授以官职，还以汉人章喜为军师，攻略江外土司。嘉庆帝闻报后，命云贵总督伯麟率师往击，不可靳惜小费，迁延时日。不久，高罗衣及章喜先后被歼俘，起事失败。嘉庆帝也谕示，嗣后禁内地商人私往该地贸易，侵夺土人生计。

福建布政使被逼自缢 嘉庆二十二年(1817)五月，福建布政使李赓芸被总督汪志伊勒逼自缢。李赓芸为官清廉，但汪志伊固执苛求，索要银两，李赓芸不给，汪志伊便以势参奏。承审署道涂以辀迎合汪志伊，对李赓芸勒供凌逼，厉声拍案，李赓芸不堪受辱，自缢而死。福建士民得知李赓芸死，纷纷莅灵祭奠，捐资建祠，赠匾表扬，联合呈诉。嘉庆帝遂遣派官员调查，终于弄清了事情真相。二十四日，嘉庆帝命将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革职，知府涂以辀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到配之日再加枷号三个月。几天后，嘉庆帝还表示：李赓芸之死，虽由于涂以辀勒供凌逼，但李系藩司大员，缘事逮问，如果实有罪愆，自当静俟国法；若此心皦然，横遭冤抑，亦应据实控诉，朝廷必为昭雪。乃率效匹夫满渎之谅，性情殊为偏急。李赓芸不宜特予旌扬。

定蒙古抢劫治罪例 嘉庆二十三年(1818)二月二十五日，清政府规定：嗣后蒙古地方抢劫案件，如俱系蒙古人，专用蒙古例；俱系汉人，专用刑律。如蒙古人与汉人伙同抢劫，核其罪名，蒙古例重刑律者，蒙古人与汉人俱照蒙古例问拟；刑律重于蒙古例者，蒙古与汉人俱照刑律问拟。

《明通鉴》纂修官员受处分 嘉庆二十三年(1818)五月初六日，《明通鉴》纂修官员受到不同程度处分。嘉庆帝在给内阁的上谕中指出：纂辑《明通鉴》一书，其体例原全仿范祖禹《唐通鉴》。不料馆臣等意图卷帙繁富，以为书成奏请议叙地步，便规仿《通鉴》辑览叙次，凡书内御批关系到明朝地方的，全部恭载。纂辑到万历、天启年间，又不请旨，就以兴朝隆业，载入胜国卷中，以致按语措词乖谬。论明熹宗用人不当，已属失词，又以熊廷弼比方李兴弼，尤为纰缪。纂辑明神宗朝事迹，按语却颂扬本朝，词句虽无大谬，显然有乖体例。结果，副总裁、满洲大员秀宁以"武不能教训兵丁，文不能编纂书史"，降为头等侍卫，前往新疆换班；戴均元革职留任；正总裁曹振镛降三级留任；编修张岳崧、万历朝史事按语拟稿者易禧善革职；侍讲朱珔降为编修。

禁州县官交结豪富 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一月二十六日，嘉庆帝颁布谕旨，严禁州县官交结豪富。此前，御史李远烈上《敬陈管见》奏折，指出直省州县官遇有公事下乡，应择清静庙宇暂寓，不得借居富家别业，彼此结纳，以致造成汇缘请托等弊害，有的书役滥充保家，唆讼串供，从中渔利，实为地方之害。至于相验人命多带书役需索酒食，吓诈银钱，更属大干法纪。二十六日，嘉庆帝通谕各督、抚严行饬禁，如所属州县中，有与富家子弟结拜师生及认为义子、请托公事，并纵令书役把持词讼，相验人命不轻骑减从，骚扰闾阎者，一经查出，即严参惩办，勿稍姑息，以肃纲纪。

山东清理积案 嘉庆二十三年(1819)十二月二十四日，嘉庆帝命将山东巡抚衙门有关官员议叙议处。山东巡抚衙门积案一千三百七十四起，和舜武四月由河南巡抚改调山东巡抚后，已审结积案一千一百二十起；臬司衙门积案六千零八十余起，温承惠自二月任山东按察使后，已审结积案五千四百余起。二十四日，嘉庆帝谕示内阁，认为山东省以前盗风甚炽，现在匪徒敛戢，行旅安然，积舜武、温承惠办事认真，卓有成效，应加恩交部议叙；前任巡抚陈预、臬司张五纬因循废弛，实难辞咎，陈预降补刑部主事，非奉特旨不准保升；张五纬发往军台效力，期满后不准即行奏请释回，候旨办理，以示惩儆。

蒙古部落不准演戏 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19)，嘉庆帝宣谕，蒙古各部落禁止演戏。漠南蒙古(内蒙古)土默特贝勒贡楚克巴勒桑在世时，曾挑派幼丁四十名，终日演戏，家中设有戏台。贡楚克巴勒桑去世后，济克默特扎布袭职，又挑选部落幼丁四十名，派当蒙古音乐差使，实际上就是教演戏班。热河都统伊冲阿经理藩院把上述情况奏报后，嘉庆帝极为恼怒。他指出：近日蒙古王公，渐有此风，豢养优伶，大改敦朴旧习，实为忘本逐末。二十五日，嘉庆帝命将济克默特扎布罚俸二年，所有两次挑取幼丁，俱撤归各佐领下当差，嗣后各蒙古部落挑取幼丁演戏之事，永远禁止。此外，嘉庆帝还斥责办理此事过程中，伊冲阿糊涂冒昧，理藩院率行议准，俱属非是。

经学家孙星衍去世 嘉庆二十三年(1818)，孙星衍因病去世，终年六十六岁。孙星衍字渊如，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后任山东布政使。他为官清廉，不谀权贵，法主宽恕，曾平反冤狱多起，又治理黄河水患。后因病返籍，博览群书，勤于著述。他治学范围广泛，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金石碑刻，都有涉及，且取得显著成就；还工篆隶，擅

诗文，精考据，喜藏书。孙星衍曾积二十二年之功，撰成《尚书今古文注疏》，集《尚书》研究之大成。此外，他还有《周易集解》、《金石萃编》、《尔雅广雅训韵编》、《史记天官书考证》等著作传世。

翁方纲去世 嘉庆二十三年(1818)，诗人、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六岁。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选庶吉士，再授编修，后官至内阁学士。翁方纲精研经学，长于考订，认为多闻、阙疑、慎言三者为考订之道。他还精于金石、书法。书法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论诗主张内容质实而形式雅丽，是清代肌理说诗论的创始人。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复初斋文集》等。

甘肃发生地震 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月初一日夜，甘肃巴燕戎格厅地方发生地震，震倒民间土窑三座，压毙男妇十名，该厅城南砖垛全行倒坏，并被摇倒营房一间，仓廒五十七间，其厅署房屋墙垣，及所属扎什巴甘都堂两处城堡土垛，也多坍塌斜欹。碾伯县南乡，共震倒房屋五十一间，土窑十九座，压毙男妇大小一百一十六口，受伤男妇五十八口。灾害发生后，巴燕戎格通判李师唐、碾伯县知县陆瑛等采取了相应的救灾措施，将压毙人口捐棺掩埋，受伤者给赀调养，坍塌民房按间给银修理。所用抚恤银两，由陆瑛等捐赀办理，不用官帑。

宗室犯事先摘顶带 嘉庆二十四年(1819)五月十九日，清廷对宗室犯事的处理做了新规定。此前，宗室犯事到官，向不跪讯，致使他们有所恃而不知畏惧。十九日，针对宗室中屡有不顾行检、干犯法纪的现象，嘉庆帝颁发谕旨，指出嗣后宗室犯事到案，无论承审者何官，俱先将该宗室摘去顶带，与平民一体长跪听审，俟结案时，如实系无干，仍奏明给还顶带。嘉庆帝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稍示裁抑，使那些叠经训诫、总未悛改者共知戒惧，以期达到犯法的人日渐减少。

河南兰阳等地河溢 嘉庆二十四年(1819)七月二十四日，黄河水在兰阳(今河南兰考)、祥符(今河南开封)等地溢出。嘉庆帝闻讯后，罢东河总督叶观潮职，命他在黄河南北两岸工地分别枷号，并派李鸿宾督东河。不久，黄河大堤武陟缕段决口，马营坝也溃塌。洪水东流，穿过运河，注入大清河，然后分为二道：一经大清河由青城一带归利津牡蛎口入海，一经徒骇河由霑化久山口入海。嘉庆帝闻报后，命户部发银一千一百余万两，委官调料，筑坝修堤。后因坝基不固，李鸿宾被罢斥，叶观潮再任东河总督职。

清廷定蒙古地区安设卡伦巡缉章程 嘉庆二十四年(1819)正月二十五日，清廷定漠南蒙古(今内蒙古)地区安设卡伦巡缉章程，主要内容有：四子部落、茂名安、乌喇特共添设卡伦十处，轮住该蒙古官兵巡缉；缉捕不力蒙古员弁分别三限惩处，俟数年后，一无劫案，再停止此例；被劫案件，经同知详报，将军派员带同事主，与乘骑乌拉赴就近该扎萨克印务处，守候缉拿贼犯，扎萨克属下人有能拿送者奖赏，窝留者从重治罪；大青山后商旅经行要路，准商民捐盖房间，以为官兵住所，并设卡伦，就近令土默特四佐领轮住巡缉，其乌兰布拉克地方，非商民经行之路，所设官兵，裁归有房间处驻扎巡缉，其房间应令交官经管，不许汉人居住，致匪徒引诱蒙古；沙毕诺尔窝藏抢劫黑徒，应交锡勒图呼图克图严行查拿，傥有窝留及不查缉者，该管十家长发遣，该管事扎萨克喇嘛斥革；蒙古穷苦无依者，令本属有牲畜台吉章京喇嘛等收养，为其牧放牲畜，糊口有资，庶不盗窃，其每年收养若干，册报将军衙门；商民被劫，俱于三五日内呈报，其迟逾一两月，致查勘无踪者，即不为准理，并讯明除身被盗伤、并患病、并抢去脚力不能速报外，如无故迟延，仍加责惩，其售卖马驼等项，俱令牙行查询来历，蒙古黑人，令税口一体严查；商民捏报，该同知查出情弊，即令申报将军、副都统及归绥道，亲加提讯，果系假捏，于旧例杖一百外，加枷号一月，如系同知讳盗，即严参惩办。

兵部行印遗失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初八日，清廷对兵部遗失行在印信案进行处理，有关官员遭议处。嘉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嘉庆帝木兰秋狝驻跸巴克什营行宫，随营携带钤用兵部行印，因书吏俞辉庭在帐房中熟睡，造成行印被窃。行印遗失后，俞辉庭用备匣加封顶充，并贿赂兵部堂书鲍干含混接失。当月司官未开匣验视即入库。鲍 又做手脚行印似在库中被窃，以图推卸责任，致使行印失落半年之久才败落。为此，嘉庆帝命将八十六岁的兵部尚书明亮降五级，后又以刘镮之为兵部尚书。其他有关官员戴联奎以从三品翰林京堂补用，曹师曾、常英以四品京堂补用，常福赏给四品顶带，管理圆明园。随后，又命礼部补铸兵部行印，并定拜印时堂印与行印同捧至大堂启椟拜瞻。

嘉庆帝驾崩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颙琰在热河避暑山庄病死，终年六十一岁。当年七月十八日，嘉庆帝木兰秋狝，从圆明园起行，皇次子智亲王旻宁、皇四子瑞亲王绵忻、皇孙贝勒奕纬随驾。在六天的旅程中，嘉庆帝分别在南石槽行宫、密云县行宫、要亭行宫、两间房行宫、常山峪行

宫、喀喇河屯行宫驻跸，观看了直隶深州地方敬献的多穗禾，颁布了有关匿名揭告本管官定例的谕示，批示了前一年江西、安徽、江苏等地情实罪犯的斩、绞处理。二十四日到达热河以后，嘉庆帝感到身体不适，为此，曾到城隍庙拈香，到永佑寺行礼。二十五日，嘉庆帝病情未有好转，仍照常处理政务，旻宁、绵忻朝夕侍候。向夕，嘉庆帝病情突然恶化，戌刻，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嘉庆帝在位共二十五年，谥号睿皇帝，庙号仁宗，道光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葬于昌陵(清西陵)。

旻宁即皇帝位　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二十七日，旻宁御太和殿，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道光元年。他就是宣宗成皇帝，也称道光帝。道光帝是嘉庆帝第二子，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生于皇宫撷芳殿中所。他年幼时勤奋好学，编修秦承业、检讨万承风都当过他的老师；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侍读学士徐颋也给他讲过策论的课程。从这方面说，道光帝有比较好的文化素养。他在童年时代还练习过骑马射箭，九岁时他曾随从祖父乾隆帝外出打猎，他亲自射中了一只鹿，受到乾隆帝赞赏，得到了黄马褂、花翎的赏赐。嘉庆十八年九月，天理教徒攻打皇宫，攻入内右门，已经到了养心殿的南面。道光帝正在书房看书，听到喧闹声，提着鸟铳和弓箭走出来，亲手打死了两个天理教徒。这一事件后，他被封为智亲王。旻宁在嘉庆四年(1799)四月初十日被秘密立储。嘉庆帝临死前，召御前大臣赛冲阿、军机大臣托津、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等人，公启带在身边的秘密建储匣，宣示御书秘旨，立旻宁为皇太子。嘉庆帝死后一个多月，旻宁便在紫禁城内继承了皇位。

张格尔首次犯卡　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初七日，张格尔犯卡消息报闻京师。张格尔是已故大和卓布拉尼敦之孙。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天山南北路，大和卓被杀，其子萨木萨克自巴达克山逃入浩罕(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东部)，后屡回南疆滋事。萨木萨克有三子，次子即张格尔。张格尔自称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即白帽回)之和卓，在英国支持下，由浩罕入扰新疆南部。张格尔率兵三百余人，将图舒克塔什卡伦官兵杀伤，并将伊斯里克卡伦马匹抢去。后来由于清军采取了措施，张格尔首次犯卡后，又被追逃出。

清廷筹划八旗生计　道光元年(1821)初，清廷再次筹划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所谓八旗生计，系指驻防京师及各大城市的八旗兵丁及其子弟，主要依靠朝廷所发的粮饷生活。但兵有定粮，饷有定额，多数旗人不能当兵，成为闲散余丁。清廷为保证兵源，规定闲散余丁作为八旗军队的候补人员，不能离开本佐领居住，也不能自谋生计，造成数十万八旗子弟不事生产，游手好闲，专靠朝廷救济或典卖份地、房屋，借债度日。许多人因此而生活无着，构成满族严重的社会问题。八旗生计问题早在清初就已产生，以后随着生齿日繁，问题也愈加严重。清廷也曾多次采取过诸如赏赐银两、增加兵额、京旗移垦等措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收效甚微。道光元年初，清廷制定《移驻京旗闲散章程》，命驻京旗人三千户到吉林屯垦。十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等，奏请将各省绿营马兵分半数作为旗缺，令驻防旗人子弟就近送补，但未被道光帝接受，反以莠言乱政罪受到降职处分。十一月，清廷又专门制定了有关清查旗人抱养民人为子问题的具体规定。虽经多方筹划，仍未能解决根本问题。

清廷严禁鸦片贸易　道光元年(1821)，清政府重申严禁鸦片贸易。十一月二十九日，准两广总督阮元奏请，将徇隐夹带鸦片洋商摘去顶带。道光二年十二月，又因鸦片烟之来，俱由福建、浙江、江南通海口地方私带，而以广东为最，清政府决定在通海各口岸及关津渡口，无论官船民载，都要认真查拿，如有私运夹带鸦片者，立即从严惩办。道光三年八月初二日，清政府再次命严禁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定官员失察鸦片烟，一百斤以上者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三级调用。

《新疆识略》告成　道光元年(1821)正月，《新疆识略》付梓刊印。该书在伊犁将军松筠主持下，由徐松纂辑。总计十二卷，首一卷。先列新疆总图和南北两路、伊犁各图，并有叙说；次列官制、兵食、财赋、库储、田野、畜牧、厂务、边卫等。书中记叙了许多清代中叶土尔扈特、新疆察哈尔营、厄鲁特营活动的重要史料。

云南永北彝人起事　道光元年(1821)二月初十日，云南永北彝人起事报闻京师。云南永北厅(今永胜)属土司土目，将土地典卖给汉人耕种。土民生计困难，心怀怨恨。由唐老大(唐贵)为首，以“驱逐汉民”相号召，聚众七八千人起事。起事者主要分为二支：一支由唐老大率领，活动在永北厅地区；另一支由傅添贵、陈添培率领，渡金沙江，至楚雄府大姚一带。清政府命总督庆保督兵往击，又以成都将军呢玛善为钦差大臣，督办永北军务；还调贵州提督罗思举，帮同庆保往攻。四月，大姚一路陈添培兵败寨破，添培被俘；永北一路唐老大率众坚守公、母二寨。庆保破大姚路后，会兵攻公、母二寨。五月二十四日，唐老大寨破被俘死。七月，傅添贵亦被俘死。彝人起事

失败。

清政府定洋人应遵守中国法律 道光二年(1822)三月初七日,清政府明确申定,洋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先是,英国护货兵船停泊伶仃山,洋人赴山汲水,与本地人斗殴,双方互有伤亡。广东督抚令英人交出凶手,英人起初藉词延诿,后竟开船扬帆逃逸。为此,清政府正式告知英国政府:中国定例,凡斗殴致死人命,无论先后动手,均应抵命;洋兵在中国犯事,应遵中国法律办理,将查出凶犯,附搭货船,押解来粤,听候查办。以后不应再派兵船赴粤,如货船必须保护,必须严谕领兵官,一定要遵守中国法律。

青海"野番"事平 道光二年(1822)五月,清政府平定青海"野番"起事。先是青海贵德、循化番民约二万人,越界至黄河北及盐池一带插帐住牧,有的贩运茶叶、粮食、食盐和火药,并与回、汉、蒙古民相联结。道光二年正月,清政府命其返回原住牧地,遭到抗拒。于是,陕甘总督长龄率兵相机攻剿。二、三月间,长龄督兵分东、西、北三路并进,驱逐番帐。四月,又移师南截,夜袭毡帐,并用炮击。番民头目乙旦木被击死,噶布占被俘,死数百人,清军获牛、羊一万五千余只,余众向雪山奔散。五月二十六日,长龄奏报:黄河以北,全境肃清,蒙古边民,悉皆安堵。道光三年正月,清政府对青海番民又逐一进行编查,设立千户、百户,分别管辖,把守渡口,如有一人私渡河北,将该千户治罪。

定商民与蒙古贸易章程 道光三年(1823)三月初一日,从那彦成等奏请,为解决西宁、凉州(今甘肃武威)等处商民,赴蒙古游牧地区贸易,既无固定地方,来去亦无期限,以致汉蒙混杂,并夹带违禁器物等问题,清政府制定《商民与蒙古贸易章程》,规定:各州县羊客与黄河南北蒙、番交易,以现定地界为限,不许径赴蒙、番游牧处所收买;甘、凉、肃州羊客,由西宁办事大臣衙门发给大票小票,逐一注明,严定期限,各守卡据以查验;蒙古羊只许于四月至九月,按指定处所售卖,事竣不准逗留;黄河以南番族出售羊只,由循化、贵德两厅给票办理。

林则徐兴办江浙水利 道光四年(1824)八月初二日,两江总督孙玉庭保奏江苏按察使林则徐综办江、浙水利事务。先是,江苏苏州、松江、常州府和太仓一州及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河道垫淤、海口不畅,塘闸损废,时有泛溢。为解决水患,江苏绅士提出疏浚河道建议,打算开挖刘河故道,以泄上游之水,遭到地方官的反对。林则徐大力支持疏浚河道的建议,"未半月,水尽泄"。后又向两江总督孙玉庭建议,暂时动用江宁、江苏两藩库现存银两疏浚吴淞江、黄浦江、刘河。孙玉庭对林则徐的才干颇为赏识,遂与浙江巡抚帅承瀛联合保奏林则徐总管江、浙治水事务。不巧适值林则徐母亲亡故,照例应回籍守制。但南河高家堰十三堡决口尚未堵住,湖水尽泄,急需堵口蓄水,以利灌溉。因力劝林则徐继续督修堤岸。林则徐之父也责以国事为重,遂以素服前往,日夜督修,终于功成。

首开海运漕粮 道光五年(1825)二月初五日,清廷命江、浙试办海运。六月十一日,江苏巡抚陶澍奏请河海并运漕粮。道光六年,清廷第一批海运漕粮抵达天津。已往的漕运,都是经运河运到京师。但由于运河常年失修,黄河又经常决口,常使漕运阻滞,为京师衣食造成不便。计划仿民间商船海运货物之法,雇用大号沙船,分起装运,后因有人提出,漕粮改征折色银两,停运治河。陶澍上奏反对,提海运之议,主张实行河、海并运办法。他认为,江苏额征漕粮为数甚巨,民间以米易银,一时难以出粜,必致谷贱伤农;再者太仓储粮,陈陈相因,遽尔停运,必将造成府库空虚。故折色与停运皆不可行。应自翌年(道光六)开始,漕粮海、河并运。广招商船,分作两次装载,计可运米一百五十余万石,实行海运;其余仍然河运,于秋冬季节疏通河道,加固堤防,至来春湖水益增,自可引导济运。清廷采纳了陶澍的建议。不久,两江总督琦善正式奏请将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应征漕粮,雇沙船一千余只,分春、夏两次,海运米一百五十万石至天津。得旨允行。道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海运米船九百余艘,运米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余石驶进天津海口,卸米后,复往奉天买豆南运。从此,漕粮海运得以实施,并逐渐代替河运取得主要地位。

平定张格尔叛乱 道光六年(1826),自称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的张格尔率兵大举进犯回疆,焚掠军台,阻断台路,南疆各回城纷纷告急。清廷闻报,命长龄为扬威将军,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钦差大臣参赞军务,调固原提督杨芳、甘肃提督齐慎、宁夏将军格布舍、乌鲁木齐提督达凌阿、领队大臣祥云等,分别统领陕西、甘肃、宁夏、乌鲁木齐、伊犁及黑龙江、吉林兵二万余人进疆平叛。张格尔此次进犯,计划周密。他拜其祖父大和卓木之墓,据墓扎营,派其弟巴布顶攻破英吉沙,复连克叶尔羌、和阗,兵围喀什噶尔。喀城参赞大臣庆祥率军民固守两月。八月二十五日,叛军掘地道入城,庆祥督兵巷战,力竭自尽,领队大臣乌凌阿、穆克登布,帮办大臣舒尔哈善等战死,城陷。张格尔连克四城,复派兵五千进犯阿克苏、乌什等地。清军达凌阿、巴哈布等出兵迎击。叛军围攻协领都伦布营盘,额尔古伦

率锡伯兵往援,内外夹击,歼敌千余。十一月,张格尔派兵三千踞守乌什西南柯平南北回庄,提督杨芳督兵往攻,全歼守敌。道光七年二月,将军长龄等率大军三万进攻额什噶尔,三战三捷,四城相继收复。张格尔败走后,众叛亲离,清廷悬赏缉拿。长龄等用反间计诱张格尔入卡,将其擒获,解送京师,道光八年五月磔于市。

方东树作《汉学商兑》 道光六年(1826)著名桐城派宋学家方东树写成《汉学商兑》一书。自乾、嘉以后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学术思想界主要为两大学派——"汉学"和"宋学"的天下。汉学重考据,宋学讲理学,两派互相攻击,争论不休。先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著名汉学家江藩所著《汉学师承记》问世。书中介绍了清初至嘉庆数十位汉学家的履历、著作、学术成就等,为汉学家争正统地位。对此,方东树针锋相对,在《汉学商兑》中对汉学家进行指责,认为汉学家只知埋头考据古代服饰、宫室等"尘饭木胔",不但了无益处,"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位于禅与心学"。方东树以为,对古代重要的典章、名物等进行考据虽也是必要的,但"义理之学"更不可缺。所以,在他看来,只有二程、朱熹的理学才是于民众国家有益的学问。另外,方东树还对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进行攻击,将戴震"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主张说成是"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

《皇朝经世文编》刊行 道光六年(1826),贺长龄、魏源等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是书仿明末陈子龙等编《皇朝经世文编》体例,辑官书、论著、奏疏、书札等而成,内容包括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类,皆为经世致用文章,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情况的重要史料。以后,直到清末,张鹏飞有《皇朝经世文编补》、盛康有《皇朝经世文续编》、饶玉成有《皇朝经世文续编》、管窥居士有《皇朝经世文续编》、陈忠倚有《皇朝经世文三编》、何良栋有《皇朝经世文四编》、求是斋有《皇朝经世文五编》、麦仲华有《皇朝经世文新编》、甘韩有《皇朝经世文新编续编》及《皇朝经世文时务续编》、润甫有《皇朝经世文统编》、于宝轩有《皇朝畜艾文编》等陆续刊行,先后共达十余种,体例相类,内容也互有异同,皆为研究晚清史之重要参考材料。

喀什噶尔激战 喀什噶尔为南疆重镇,是清廷统治回疆的中心地区。道光七年(1827)二月,扬威将军长龄、参赞大臣杨遇春、武隆阿等率军三万,沿浑巴什河进袭喀什噶尔。二十四日,清军击败张格尔屯驻羊阿尔巴特之兵,杀敌万余,俘虏三千。张格尔复于沙布都尔庄外,决水成渠,以十万余众踞渠死守。二十五日,清军先以连环枪炮轰击,然后步兵强渡渠水,短兵相接,马队两翼包抄,将叛军逼退至浑水河边,复分路追杀,击败敌人援兵,共计杀俘敌兵四万余人,夺得枪炮、马匹无算。张格尔两败后,命回庄十五岁以上男子皆当兵,不从者即遭杀戮,再次纠合十万残兵,在阿克瓦巴特庄山冈布阵。二十八日,长龄等督清军马步兵两翼齐进,施放喷筒,又使人着虎衣虎帽,舞动藤牌,敌军马惊阵乱,纷纷窜逃。清军乘胜追杀,毙敌二万,生俘二千。清军三战三捷,兵锋直指喀尔噶尔。张格尔沿距喀什噶尔十余里之浑河列营二十余里,负隅顽抗。适遇大风,长龄欲退兵屯营,杨遇春力持不可,遣索伦兵千余骑,绕道下游以牵敌势,自率大兵乘狂风日晦之机骤渡上游,冲入敌阵,叛军土崩瓦解,张格尔率数十骑逃走。三月初,清军进占喀什噶尔。不旬日,英吉沙、叶尔羌、和阗等地相继收复。

《广州纪录报》刊行 道光七年(1827)十一月,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在广州创刊。发行人为英国怡和洋行经理马德生,执笔者为马利逊、施赖德。道光十九年迁往澳门,道光二十三年又迁香港,改名《香港纪录报》。是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家英文周刊。

定稽查新疆茶叶、大黄章程 原来,新疆每年茶叶私贩出卡者达二三十万斤,安集延人亦贸易茶叶、大黄出卡。道光八年(1828)四月,清政府首定新疆南路(回疆)贸易茶叶、大黄,由官商承运行销,不准私运。七月,清政府又定新疆北路茶叶、大黄,亦行官引,禁止出卡。

限制白银外流 道光九年(1829)正月二十三日,御史章沅奏称,来广州通商的外国商人,违例私易银钱,致使外国银元通行中国,中国官银大量外流。特别是鸦片走私日益严重,仅此一项就使每年外流白银达数百万两。因此,建议朝廷重申禁令,嗣后通商,必须遵守定例,只准易货,不准易银,违禁物品,不准私入。道光帝准其所奏,并命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巡抚卢坤等妥议具体章程。七月,李鸿宾等奏上"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鸦片)入口章程"七条。次年七月,李鸿宾等又奏上"查禁纹银出洋及内地分销鸦片章程"六条。虽然再三重申禁令,但白银外流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清廷下令防范英船 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两广总督李鸿宾奏称,英国商船延不进口卸货。道光帝遂于是月初五日谕令防范英船,指出:至广东贸易的各国商船中,以英国商人最为不驯,且私带鸦片,偷买内地官银出洋,为害尤甚。因此,令李鸿宾等

实力稽查，如其"渐知悔悟，查率进口"，则相安无事，否则即不准开舱，严行驱逐。后英国商船先后驶到福建、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并刊刻《通商事略说》，谓广东买卖不公，希望另易口岸，均遭拒绝。

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去世 道光九年(1829)，著名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去世。终年五十三岁。刘逢禄，字申受，一字申甫，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嘉庆十九年(1814)中进士，官礼部主事。自幼从外祖庄存与、从舅庄述祖习今文经学，终成大家。其学务通大义，不专章句，对《春秋公羊传》造诣尤深。推崇董仲舒、何休学说，尝言"晋唐以来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门，不升其堂者也。"所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发挥"张三世"的改制思想，对近代改良主义学说颇有影响。又撰《左氏春秋考证》，排斥《左传》，非难刘歆。其余著述尚有《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公羊春秋何氏答难》、《申何难郑》、《论语述何》、《中庸崇礼论》等。

裨治文到广州 道光十年(1830)，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到达广州。他是第一个到中国来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 1801 年 4 月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26 年毕业于阿默斯特大学，后经教会介绍，考入安多弗神学院。经过三年严格训练后，被派往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到广州后，先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学习汉语。道光十二年四月，在广州创办英文版《中国丛报》(旧译《中国文库》、《澳门月报》)，担任总主笔直到道光二十七年。向美、英等国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资料，鼓吹以武力强迫清政府订立条约，打开中国大门，传教士应不顾中国法律深入内地活动等等。与此同时，他还在一些在华外国人成立的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道光十三年与人合作开设博济医院。道光十九年林则徐虎门销烟，裨治文应邀前往观看，并写出极为详尽的观察报告。道光二十三年任美国传使顾盛的译员兼秘书，直接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前往上海，参加《圣经》中译本的修改工作。在上海，裨治文除传教外，还先后充当美国公使马沙利与麦莲的助手。咸丰四年(1854)，曾随麦莲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进行为期六天的考察，后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北华捷报》上发表长篇报告，叙述考察情况，对太平天国革命采取敌视态度。咸丰六年至咸丰九年，担任上海文理学会(后称亚洲文会)会长。咸丰八年《天津条约》签订时，裨治文多次向美、英、法、俄四国代表献计献策，并代译重要文件。咸丰十一年十月，因患痢疾，在上海去世，终年六十岁。遗体葬在上海。

新疆玉素甫叛乱 道光十年(1830)，赴喀什噶尔查处回疆善后事宜的钦差大臣那彦成，对安集延人查抄家财，断离眷口，驱逐出卡，并禁绝其茶叶、大黄贸易，引起安集延人强烈不满。八月初十日，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趁机纠合霍罕、安集延兵发动叛乱，突入喀什噶尔卡伦，杀害守卡官兵，进逼喀什噶尔城。事先，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伊萨克曾密告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但扎隆阿不信。及叛兵攻至，始命帮办大臣塔斯哈率兵轻出，在明约洛遇伏，塔斯哈兵败阵亡。叛军长驱直入，直抵喀什噶尔，回城失守，汉城被围。玉素甫又分兵围困英吉沙，并四出劫掠，附近回庄子女、玉帛、牲畜等被掠几尽。二城被围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与英吉沙领队大臣棍楚克策楞等分率本城军民守御孤城，叛军虽绕城环攻，又灌水、挖城，均未得逞。九月，清廷闻报，急命陕甘总督杨遇春进驻肃州，固原提督杨芳、甘州提督胡超统陕、甘之兵入疆，又以长龄为扬威将军，杨遇春为钦差大臣，都统哈良阿、提督杨芳参赞军务，调兵三万，往援喀什噶尔。十一月十二日，乌鲁木齐提督哈丰阿、伊犁领队大臣孝顺岱，分率乌鲁木齐和伊犁满、汉、蒙、回援兵进抵叶尔羌。十四日，胡超亦率兵到达。清军在叶尔羌一带屡败敌兵，复向英吉沙推进。围城叛军闻风逃窜。旋即移师喀什噶尔，玉素甫兵败远遁，清军不血刃而解二城之围。事后，清廷追究责任，那彦成以"办事失宜，误国肇衅"罪革职，扎隆阿则因玉素甫围城之时，听信谣传，指伊萨克通敌，将其衙署抄没，并拘禁城中回人，妄杀大小伯克、回人四百余名而论斩。

改革两淮盐政 道光十一年(1831)十二月，清廷针对两淮盐务中官盐滞销，私盐猖獗之弊，着手改革两淮盐政。淮盐为清代盐业重要部分，历来由官商垄断，禁止私贩。但行之日久，弊端丛生。由于官盐滞销，使民间多赖私盐，灶丁积有余盐，也往往卖与私贩。致使一些私盐巨擘，竟至连樯成帮，器械林立，串通官府，犍驴转运，使官盐受到进一步的冲击。为解决这一问题，清廷多次采取措施，革除盐商弊端，逮捕私盐巨犯，并于道光十年十二月制定《两淮盐务章程》十五款，从"裁浮费"、"去窝家"、"革陋规"等方面对两淮盐务进行整顿。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从两江总督陶澍奏请，改革两淮盐政：淮北畅岸，仍归商运；其余滞岸，即照山东、浙江票引兼行之法，设税局发放票照，征收盐税，设行店听民购买，运往各地销售。从此，官商对淮盐的垄断被打破。

湖南瑶民起义 道光十一年(1831)十二月，湖南永州瑶族农民因不堪官绅胥役的盘剥欺虐，在

赵金龙率领下举行起义。他们与广东起义瑶民遥相呼应,聚众千余,以红布裹头,连破洪江、黄竹等寨,在九嶷山扎下大营。道光十二年正月,湖南提督海陵阿、副将马韬等率官军五百前来镇压起义瑶民。赵金龙派人假扮夫役,为官军抬送枪炮、器械,诱至池塘墟,伏兵四起,阵斩副将马韬,提督海陵阿欲冲下山坡突围,亦被击毙,游击王国华、守备吴鉴等皆未能逃脱,起义军大获全胜。清廷闻报,大为震惊,急命湖广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湖南提督余步云及两广总督李鸿宾,调集鄂、湘、粤三省兵会同进剿。三月,罗思举等兵至永州,分兵三路,越山居峒。起义瑶民被逼出山寨,退至羊泉,依长街、民房、石墙固守。罗思举密檄各路清军,将羊泉四面包围。四月初六日,清军发起总攻,以枪炮、火弹、火球掷击,起义军踞房死守。官军焚毁房屋,赵金龙等退至杨家大屋。二十六日,起义瑶民弹尽援绝,赵金龙战死,六千余人被官军俘杀,起义失败。赵金龙死后,另一支瑶民起义军在首领赵幅金率领下退到广东连州八排一带坚持反清斗争。八排地方山峦环绕,毗连三省,有大小冲、坪七十余处,烟户五、六万家。五月,两广总督李鸿宾遣总兵余德彪率兵进剿。广东兵行不惯山路,又多染鸦片烟瘾,故临阵怯懦。六月,起义军夜袭官军大营,大获全胜,李鸿宾因此而诏捕下狱,发往新疆。清廷复命禧恩署两广总督,督兵前来。禧恩用按察使杨振麟策,以洋银、盐、布等为诱饵,使义军军心动摇,然后施炮轰击,以火焚寨,分兵三路,大举进攻,赵幅金等兵败被杀。至此,湖南瑶民起义被最后镇压。

《劝世良言》刊行 道光十二年(1832),基督教(新教)最早的中文布道书——《劝世良言》问世。著者梁发,广东高明人,本为雕版印刷工人,粗通文墨,二十二岁起为苏格兰长老会员马礼逊信徒,道光三年被封为宣教师,成为第一个华人牧师。所著《劝世良言》一书,经马礼逊修改、校订后在马六甲印刷出版。全书约九万字,分为九卷:卷一称《真传救世文》、卷二《崇真辟邪论》、卷三《真经圣理》、卷四《圣经杂解》、卷五《圣经杂译》、卷六《熟学真理论》、卷七《安危祸福篇》、卷八《真经格言》、卷九《古经辑要》。内容多半摘《圣经》章节而成,并结合中国风俗人情,阐发基督教教义。梁发在书中宣扬上帝是"独一真神",只有信仰上帝,死后灵魂才能进入天国。又劝世人"安于天命","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永享天堂之真福"。称颂西方传教士为"善人君子",否定儒、释、道三教,但承认"儒教所论仁、义、礼、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相符合"。《劝世良言》为西方殖民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早期结合的产物,对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起过重大影响。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 道光十三年(1833)六月,德籍传教士郭士立(又译郭实腊)在广州创办汉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中文杂志。郭士立在编辑这一刊物期间,还曾与在广州的外国人一起组织"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计划出版大量书刊。但因这一组织的成员大都忙于参加侵华战争,实际上并未出版什么书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出版了十二期后移交给"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曾休刊数年,道光十七年继续出版,不久停刊。

林则徐奏请改革币制 道光十三年(1833),江苏巡抚林则徐就给事中孙兰枝所奏江浙地区银昂钱贱、商民交困事复奏朝廷,提出改革币制主张。孙兰枝在原奏中,从地丁、漕银、盐课、关税及民间买卖等方面论证了由于钱贱银昂所造成的商民交困情况,提出禁止私铸、收受小钱,定洋钱之价等。林则徐承认银昂钱贱、商民交困的现实,但反对骤平洋钱之价和骤禁洋钱流通。他建议朝廷建立本国的银本位货币制度,一面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以增加洋银收入,一面逐渐抑制洋钱流通,最终达到全行禁止的目的。具体措施如下:对市面流通洋钱的俘价应照纹银为准;自铸银币;严禁鸦片、查拿烟贩,对造成白银外流者严加处分;收缴、杜绝私铸小钱,改以往论斤收缴为大小钱折算之法。清廷部分地接受了林则徐的建议,并由刑部议定出纹银出洋治罪专条。

英船闯人虎门 道光十四年(1834)八月,英国兵船闯入黄埔。先是,英国贵族、上议院议员、海军高级将领律劳卑出任驻华商务监督,奉命以查办商务名义来到中国。其来华的真正目的是:设法将英国在华商业势力推广到广州以外地方;在中国沿海寻找海军据点,为将来发动战争做准备;保护鸦片走私贸易。六月,他乘船抵达澳门,后又直驶广州。照惯例,英国商人只许在澳门居住,欲入广州,需先经税关批准,但律劳卑无视中国规定,擅闯广州。两广总督卢坤闻知,传命制止。律劳卑拒不听命,并以平等款式投书卢坤,提出无理要求。卢坤以其公文不合程式为由,拒绝接受,同时下令"封舱",中断中英贸易,并修理炮台,整顿珠江防务。八月初五日,律劳卑率兵船两艘,士兵三百余人乘潮强行闯入虎门。初七日,通过大虎炮台,初九日驶至黄埔河面。驻守炮台清军发炮轰击英船,英船亦发炮还击,并煽动广州英商配合其侵略行为,扬言中英战争即将发生,中国应负全责。卢坤调水陆诸军包围英国商馆。律劳卑本以

为只要派出“拥有少数船舰的英国武力，到沿海来活动”，就可以毫不困难地逼中国就范，及见中国军民抵抗坚决，其计划难以得逞，且中断中英贸易，又使英国商人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只得退回澳门，使此次英国兵船擅闯虎门的侵略行动以失败告终。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死 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死于广州。马礼逊，英国诺森伯兰人，1798年加入苏格兰长老会，1804年入传教士传习所受训，后到伦敦学习医学、天文学和中国语言，嘉庆十二年(1807)八月到达广州。马礼逊来华后，努力掌握中国语文，仿效中国生活方式，还将自己的名字译成汉字马礼逊。从嘉庆十四起年，马礼逊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翻译达二十五年之久，并行医、传教，用中文翻译《圣经》。嘉庆二十四年十月，马礼逊将《新、旧约全书》全部译出，于道光三年在马六甲出版。是为《圣经》的最早中译本。嘉庆二十一年和道光十四年，马礼逊曾先后出任英国特使阿美士德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秘书兼翻译，并创办了“中国伦敦会教会”。在宗教外衣掩盖下，马礼逊长期从事侵略中国的活动，多次建议英国政府在中国自设法庭，取得治外法权。为培养远东传教士，他还于嘉庆二十三年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道光二十二年后迁到香港)，编辑出版了《华英字典》，编写了若干本有关中国语言的小册子。马礼逊是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

清廷增定防范洋人贸易章程 道光十五年(1835)三月，两广总督卢坤等奏请增定防范贸易洋人章程。十四日，清廷增定章程八条：外洋护货兵船，不准驶入内洋；洋人偷运枪炮及私带其妇人等至省城，责成行商一体稽查，洋船汲水买办，由澳门同知给发牌照，不准私雇；洋馆雇用民人，明定限制，严防勾串作奸；洋人在内河应用无篷小船，禁止闲游；洋人具禀事件，一律由洋商转禀；洋商承保洋船，应认派兼用，以杜私弊；洋船在洋私卖税货，责成水师稽查，严禁偷漏。

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 随着鸦片走私日趋严重，清廷内部掀起一场“弛禁”与“严禁”之争。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系统提出弛禁鸦片主张。许乃济，浙江仁和人，字叔舟，号青士，嘉庆进士。曾任广东按察使，纵容鸦片走私。继任光禄寺卿，太常寺少卿。在他看来，吸食鸦片虽于人寿命有损，但“今海内生齿日众，无减耗户口之虞”。他认为，鸦片之所以走私盛行，使大批白银外流，是“鸦片烟例禁愈严”的结果。因为：禁烟前鸦片入关纳税，在洋行以货易货，白银并未外流、禁烟后鸦片不能公开贸易，不仅得不到税收，且走私“皆用银私售”，至使大量白银外流；禁烟前内地可种罂粟、制土烟，禁后利薮全归外洋；禁前吸食自由而人少，禁后“吸食者日众，几遍天下”；禁前贩运无需走私，而禁后“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因此，许乃济力主开放烟禁，提出：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宽种罂粟之禁，以土烟抵洋烟，使夷人之利日减，“迨无利用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除文武员弁、士子兵丁之外，“其民间吸食者一概勿论”。许乃济的观点得到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阮元，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𡎴，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一大批官僚士大夫的支持，却遭到严禁派的猛烈抨击。后道光帝态度愈来愈倾向严禁派，乃于道光十八年九月将许乃济降职。

朱成烈奏白银外流 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御史朱成烈奏《银价昂贵流弊日深请敕查办折》，指出：广东海口，每岁出银至三千余万；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二千余万。一入外洋，不与中国流通，又何怪银之日短，钱之日贱。初五日，道光帝谕各沿海督抚并海口各监督，严行稽查，勿使白银偷漏出洋。

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 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驳斥弛禁派观点，力陈鸦片输入之害。黄爵滋，江南宜黄人，字德成，号树斋，道光进士，历官编修、御史、给事中、鸿胪寺卿等。提倡经世之学，主张刷新吏治，扫除贪污，整顿军备，巩固边防，特别对鸦片泛滥痛心疾首。黄爵滋指出：历来禁烟，法令虽严，却未能击中要害。如：“严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但因查烟员弁图私受贿而有名无实；“查拿烟贩，严治烟馆”，可地方官之幕友、家人多有吸食者，皆与烟贩、烟馆关系密切，岂能不加包容？至于许乃济所陈“开种罂粟之禁，听内地熬烟”之策，则因土烟质量不好，也难收抵抗洋烟之效。他认为：“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只有重治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因此，他建议朝廷严降谕旨，给吸食者一年戒烟期限，如逾限不戒，则平民处死刑，官吏加等治罪，子孙不得应试。

广州人民包围洋馆示威 道光十八年(1838)，由于鸦片走私愈加严重，直接危害到清王朝统治，使道光帝不得不下决心禁烟。各省官吏纷纷搜缴鸦片，惩治鸦片贩子。十月二十六日，广州地方官在外国商馆前广场上当众处死中国烟贩，美国领事

降下美国国旗表示抗议。随后，又指使一批美、英鸦片贩子和流氓冲入刑场，拆毁绞架，殴打行刑人及观众，阻挠施刑。这一暴行激起广州民众公愤，自发地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侵略者暴行的示威活动。当天下午，约有近万名群众将商馆包围，抗议外国人保护烟贩，破坏中国法律。美、英暴徒竟向示威群众大打出手，用棍棒向人群"逢人就打"。愤怒的群众高呼"消灭洋鬼子"的口号，用石块回击他们，将商馆玻璃窗打碎，栏杆拆毁，吓得洋人藏在商馆里不敢出来，那个带头向中国人民挑衅的美国领事竟吓得精神错乱。最后，侵略者不得不向广州知府求援，官军赶到，驱散示威群众，为侵略者解围。此次群众示威，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反抗外国侵略者暴行的巨大力量和坚定决心，有力地推动了禁烟运动的开展。

林则徐广东禁烟　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东主持禁烟事务。林则徐，福建侯官人，字元抚，一字少穆，嘉庆进士，历官编修、御史、道员、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力主严禁鸦片，在湖广总督任内，收缴烟具、烟土，查封烟馆，配制、推广戒烟药物，成效显著。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奉诏到京，连续八天被道光帝召见，商讨禁烟大计。林则徐一到广州，马上雷厉风行地实施禁烟措施。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林则徐传见"十三行"商人，斥责其见利忘义，为外国鸦片贩子效力的罪行，并传谕外商：限三天将所有鸦片尽数交出；各人出具中英两种文字的甘结(保证书)，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挟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开始，鸦片商人企图蒙混过关，一面作些不再贩运鸦片的空洞保证，一面用重金行贿。林则徐严词拒绝，并郑重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看贿赂不行，另耍花招。他一面令英商拖延不交，一面指使大鸦片商颠地乘夜逃走。但林则徐早有布置，派人截回颠地，然后照"违抗封舱"旧例，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兵包围商馆，撤出"沙文"(馆中仆役)，并切断趸船与商馆往来道路。义律无奈，只得下令交出全部鸦片。从二月中旬至四月初，共收缴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多斤。与此同时，林则徐在广东省内大力禁烟，颁布《禁烟章程十条》，严惩贩卖、吸食鸦片者，两个月内捕获贩卖、吸食者一千六百多名，收缴烟土、烟膏四十六万多两，烟枪四万余只。林则徐广东禁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行动，是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一次有力还击。

虎门销烟　林则徐广东禁烟，共收缴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麻袋，合计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经道光帝批准，就地在虎门销毁。虎门位于广州东南珠江入海口，北面珠江，南面零丁洋海湾，东、西临山，地势险要，为广州南大门。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二日，虎门要塞观者如堵，山脚下搭起一座礼台，一面黄绫长幡迎风招展，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州海口事务大臣节制广东水师总督部堂林"。林则徐在广东文武官员的陪同下，亲自主持销烟。先在海滩上挖成两个十五丈见方的池子，池底铺以石条，四壁栏桩钉板，以免渗漏，前设一涵洞，后通一水沟，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将鸦片切成小块投入卤中，浸泡半时后再投入石灰，立刻"浓油上涌，渣滓下沉，臭秽熏腾，不可响迩。"池中水汤滚沸，观者欢声雷动。到退潮时，启放涵洞，随浪送入大海，再用清水刷洗池底，不留涓滴烟灰。连续二十余天，将所有鸦片全部销毁。虎门销烟这一壮举，有力地打击了英国鸦片贩子的气焰，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在文明伪装下卑鄙、肮脏的面目，一洗外国殖民者及本国贪官污吏加诸中国人民的耻辱，显示出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

龚自珍作《己亥杂诗》　道光十九年(1839)，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创作了大型组诗——《己亥杂诗》。共三百一十五首。皆为七言绝句。次年自编自印，分赠友人。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史学、经学、考据学基础。但仕途不得志，二十七岁中举后，屡举进士不第，只得于嘉庆二十五年出任内阁中书。直到道光元年三十八岁时才中了一名三甲进士，也不过作到礼部主事。道光十九年辞官而去，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正值清朝封建统治危机四伏，西方殖民者虎视眈眈，鸦片祸害愈演愈烈，大量白银外流使政府财政匮乏，人民困苦。所有这些龚自珍皆有亲身体验，加以官场失意，遂受到极大触动，并在《己亥杂诗》中充分体现出来。在《己亥杂诗》中，作者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总结，其中不少自述家世、仕宦经历、师友交游、生平著述，但更多的，则是表达作者忧心国事，对腐败政治的不满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腐败的现实，他不是消极叹息，逃避，而是积极抗争，大声疾呼，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在《己亥杂诗》中，作者写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充分表现了龚自珍批判腐朽，呼唤光明的革新破旧精神。另外，《己亥杂诗》开清代诗坛一代新风，语言瑰丽，意境鲜明，诗味浓烈，震撼

人心，为近代诗歌中不可多得的上品。

林维喜事件发生　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二十七日，一批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白昼行凶，殴伤当地村民多人，其中林维喜伤重于次日死亡。案发后，林则徐严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交出凶犯抵罪，但义律玩弄手段，以一千五百银元收买死者家属，要他们证明林维喜是"误伤致死"，拒不交凶，还公然侵犯中国主权，擅自在中国境内一艘英舰上自行设庭审讯，并通知中国方面派人赴英船观审。审讯结果，以"罪犯不发觉"为词，对五名凶犯仅处以三至六个月的监禁与六十到八十元的罚金。七月，林则徐为捍卫中国主权，下令停止英船的食物等供应，撤回为英商雇佣的中国买办和工役，直到将英船逐出澳门。林维喜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国侵略者的强盗本性和企图从中国攫取领事裁判权的野心。

穿鼻激战　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二十八，中英"穿鼻之战"爆发。先是，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之后，传谕外国商人，凡愿出具"永不挟带鸦片"甘结的外国船只，允许入口贸易。此谕一下，大受守法外商的欢迎，许多外国船只，包括一些英国商船，纷纷准备具结入口，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一面百般阻止英商具结，一面不断派兵船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七月二十八日，义律率兵舰一艘、武装商船十只，在九龙海口突然向广东水师开炮。水师官兵立即在参将赖恩爵的指挥下发炮还击，激战五小时，英舰败退。九月初九日，英商船"担麻士葛号"遵令具结，林则徐派水师护其入口。九月二十八日，另一艘英国商船"撒克逊号"也申请具结进口，被义律得知，恼羞成怒，亲率兵舰两艘至穿鼻洋将其截回，并炮击为其护航的广东水师船，挑起穿鼻洋海战。广东水师在提督关天培率领下英勇反击，激战两小时，装有二十八尊大炮的英舰"窝刺疑号""被提督船上放炮打伤船头并绳索等件"，数十名英军受伤落水。义律见事不妙，率兵舰逃走。中国水师也有三船受伤。以后，从九月底至十月上旬，盘据九龙尖沙嘴一带的英国兵舰，接连六次向官涌一带中国炮台发动攻击，均被广东水师击退，毙伤英军多人，并将全部英国兵船逐出尖沙嘴洋面。穿鼻之战及其与之相关的九龙之战、官涌之战等是鸦片战争前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前哨战，由于以林则徐为首的中国文武军民团结一致，坚决果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中英贸易停止　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一，林则徐奉旨停止中英贸易，但仍规定凡遵令具结、查无鸦片的外国商船准入口贸易。时各国商船具结进口者六十二只，其中美国商船四十五只。可是，道光帝和一些朝廷大臣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该夷等自必畏慑投诚，呼求免死"，有人甚至提出"封关禁海"，"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不久，道光帝下诏永远停止英国贸易，驱逐船只，不必取结。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宣布广州正式"封港"，中英贸易正式断绝。

《四洲志》编成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主持编成《四洲志》。林则徐不仅是我国近代最早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官员，也是清朝高官显宦中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在广州禁烟期间，林则徐非常重视对外国情况的了解，"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他专门设立翻译馆，组织懂外语的幕僚翻译外国图书资料，并根据英国人慕瑞《地理大全》部分内容，亲自主持编成《四洲志》一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经济情况等，是中国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

《澳门月报》辑成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广东禁烟时，为了解外国情况，派人摘译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澳门办的《中国丛报》。(也称《澳门月报》)、英国商人在广州办的《广州周报》、以及其它外文报刊，整理后辑成《澳门月报》，选其要者，附奏进呈道光帝参阅。内容包括各国情况介绍和各国对禁烟运动的反映。自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一年，共出五辑。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二十九日，英国军舰封锁广州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林则徐广州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发动侵华战争。同时，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里兹、格拉斯哥、布里斯特等大城市商会纷纷要求政府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著名鸦片贩子查顿上书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提出详细的作战计划。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议会发表演说，声称禁烟事件使英国利益蒙受损失，英王尊严受到影响。英国政府任命曾任印度总督、英国好望角舰队总司令的乔治·懿律和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负责对清朝进行军事和外交讹诈。道光二十年三月，英国议会经过三天辩论，以九票多数通过支付军费案，建立起一支由四十八只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四千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以乔治·懿律为总司令、伯麦为海军司令、布尔利为陆军司令。计划第一步封锁珠江口，然后占据舟山群岛，进而北上天津，胁迫清政府接受赔偿烟款、割让岛屿、开埠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侵略要求，如得不到满足，就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五月二十二日，英国军舰齐集澳门，二十三日，伯麦宣布自

本月二十九日起封锁广州。是时，林则徐已任两广总督，大力整军经武，在虎门、横档两岛横亘木排、铁链，添置炮台、战船，购买西洋大炮，还招募当地渔民、疍户五千余人编为水勇，宣布如英军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懿律等见广州防备严密，遂率军北上，六月初三日炮击厦门，又为闽浙总督邓廷桢率金沙兵备道刘曜春督师击退，不久，兵犯浙江。

定海激战 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初，英国侵略军在进犯广州、厦门未能得逞后，转而攻击浙江定海。六月初二日，两艘英船开至定海海面测量水道，进行侦察活动。对此，清定海总兵张朝发不但不作任何准备，反认为是“夷船被风吹来，恒有之事，无足深讶”。定海镇兵额原定一万余人，后减至二千余人，其中半数是从“栉工、修脚贱佣”等贫民中临时雇募而来，“操防巡缉，视为具文，其废弛亦非自张始”。六月初六日，大队英舰驶入定海港，向定海县知县姚怀祥发出照会，限其在半个时辰内投降，交出定海及其所属岛屿，遭姚怀祥拒绝，英军遂发起进攻。知县姚怀祥与总兵张朝发急忙布置抵抗，无奈“兵不习战，仓促应变，闻炮声多畏缩”，结果张朝发受伤退走，姚怀祥投水自尽，典史全福大骂英国侵略者被杀，县城陷落。英军任命传教士郭士立为伪知县，纵兵在定海大肆奸淫杀掠。十二日，英军封锁宁波及长江口，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提督祝彭彪束手无策。二十二日，清廷命福建提督余步云赴浙江会办洋务。二十六日，又命闽浙总督邓廷桢派水师赴浙会剿。七月初九日，素来反对禁烟的两江总督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身份来到浙江。

英船北犯天津海口 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十四日，英国舰队抵达天津海口，扣留、抢劫海面上中国粮船。直隶总督琦善不但不予反击，反派员犒送英军饮食。十九日，英军统帅乔治·懿律向琦善提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致清朝宰相的照会，攻击中国禁烟使英人蒙受损失和污辱，林则徐逼夺了英国的“货物”。因此，英国要求赔偿“货价”即烟价、割让沿海一岛或数岛、赔偿军费等等，否则必将“相战不息”。八月初四日，琦善与查理·义律等在大沽口海滩帐篷里开始会谈。谈判中，琦善在答复英人照会上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又表示只要英船返回广东，就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时，还以皇帝的名义向英军赠送大批牛、羊、鸡、鸭、蛋、粮食等物，以示“羁縻”。八月下旬，英军见压迫清朝屈服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天气逐渐转冷，恐北方海港冬季冻结，兵船不宜久留，加以军中疾疫流行，遂同意返回广州继续谈判。八月二十二日，道光帝任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同时传谕沿海督抚，英船经过，不必开枪放炮，又裁撤兵勇，“以节糜费”。另外，在查理·义律与琦善等谈判的同时，乔治·懿律却亲自带领兵船，分成数股，前往渤海湾各地、辽东半岛及山东沿海一带进行侦察、测量，绘制地图，搜集了大量情报，为以后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做准备。

林则徐被革职 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初八，道光帝诏革林则徐、邓廷桢职，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留粤备查问差委。二十五日，林则徐接到革职上谕。在此之前，林则徐已屡遭皇帝申斥，被迫自请处分，但仍密切注视着战争全局。他一方面继续大力加强广东海防，一方面派人到定海一带密探敌情，并数次上奏朝廷，指出定海英军“病死者甚多”，补给困难，已处于“进退维谷之势”，不但“伙食无多”，“即炮子火药，亦不能日久支持”。因此，他主张利用民心民力，组织、奖励军民杀敌。还建议，趁定海英军招诱居民回城之际，将兵勇扮做乡民，隐藏于定海城乡各处，“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对林则徐的正确意见，道光帝等不但不予采纳，反而急不可待地将其革职。

沙角、大角激战 道光二十年(1841)十二月十三日，接替乔汉·懿律为英国全权代表的查理·义律，因其所提十四项议和条款未能得到圆满答复，突然通知琦善，要“依照兵法办行”。琦善自接任两广总督以来，一反林则徐所为，尽撤江防，裁兵遣勇，使广州一带防务大为削弱。十五日，英舰十余艘从正面轰击沙角炮台，另以轮船、舢板运兵，绕至背后强行登陆。面对强大敌军，沙角守将、副将陈连升率所部六百余人坚决抗击。终因敌众我寡，琦善又不肯发兵援救，战至下午，陈连升父子战死，沙角炮台陷落。大角炮台同时也被英军占领。琦善闻知，竟下令将各炮台守军撤退，连夜写信派心腹鲍鹏向义律乞和，英军因而得以长驱直入虎门。

《穿鼻草约》签订 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三日，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琦善因沙角、大角炮台失陷，背着清朝政府与英国全权代表义律议定《穿鼻草约》(亦称《川鼻草约》)。主要内容为：割让香港给英国，赔偿英国烟价六百万元，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英军撤出沙角、大角炮台，归还定海。琦善不敢据实奏闻，诡称赔款为“商欠”，割香港是许英人在外洋一小岛“泊舟寄居”。但又作贼心虚，终于未敢在条约上加盖钦差大臣关防。英国方面则不待条约正式批准签字，就片面宣布《穿鼻草约》成立。并于正月初四强行占领香港。广东巡抚怡良以义律在香港发出的

布告为证，向道光帝参揭琦善私割香港。道光帝大怒，宣布不承认此约，下令逮捕琦善，查抄家产入官。二月初六，琦善被革职。锁拿解京，以祁埙代为两广总督。

清政府对英宣战　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八日，清政府对英宣战。沙角、大角炮台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帝大为恼火，立即发布上谕通告中外，声讨英国侵略行为，宣布调川、黔、湘、赣各路军队开赴广东，调鄂、湘、皖各路军队开赴浙江，决心对英军"痛加剿洗，聚而歼旃"。同时要求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命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又诏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赴粤主持军务大事。

虎门激战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初三日，虎门之战爆发。义律得悉清朝对英宣战，调大军前来广东消息后，乘奕山等迟迟未到之机，先发制人，派人清除钉在海中的木桩，大举进攻清军虎门一带阵地。初五日，英军以十八艘兵舰包围横档、永安两炮台。该处为虎门要塞的中心门户，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曾经惨淡经营，整修炮台，安置木排铁链。但自琦善到粤后，水勇被裁，海防渐弛，所置木排等大多为风浪冲散。英军逼近虎门时，关天培派总兵李廷钰请求琦善增兵。时琦善手握重兵，仅驻防八旗兵、督标兵及抚标兵即不下万人，而镇守炮台之兵每台不过数百。但琦善拒不发兵。初六日拂晓，英军乘上风向炮台发起进攻，清军奋力反抗，因炮台四面环水，弹药、援兵皆为英舰阻隔，终于失守。同时，靖远、镇远、威远、巩固等炮台也遭到英军进攻。六十二岁老将关天培在靖远炮台率军死战，身受十余处伤，仍亲自燃放大炮。英军从后面登陆，关天培手刃数敌，壮烈牺牲，守台将士四百多名皆战死。炮台陷落。不久，镇远、威远等炮台相继失陷，虎门要塞落入敌手。初七日，英舰开入珠江，乌涌炮台陷落，林则徐所购西洋大炮及原存旧炮三百八十门全被英军抢走，英军乘胜占领距广州仅二十里的猎得、二沙尾。至此，广州门户洞开。

广州激战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中英广州之战爆发。四月初，清朝对英宣战后，双方均增兵广州。二月初九日，英国陆军少将卧乌古率两船英兵到广州，准备新的进攻。两天后，清朝参赞大臣杨芳也带兵到达广州。杨芳认为，英军之所以迅速攻占虎门，是因为有"邪术"，只要破其"邪术"，则不攻自败。因此，他一到广州，立即命人搜集民间马桶，盛以女人粪尿，作为破敌法宝。又用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满以为可以一举破敌，谁知"邪术"未破而英军已抵广州城下。三月二十三日，将军奕山到达广州。他虽贵为皇侄，却对行兵布阵之法一窍不通，只知日夜饮酒取乐，希图侥幸成功。四月初一，奕山决定乘夜火攻英军，乃派出兵勇一千七百余人，暗携火箭、火弹、喷筒、钩镰等物，于傍晚出城，分伏三路，约定夜十一时闻炮齐起，突袭白鹅潭英船。是夜，火炮齐鸣，战场上不断传来捷报，奕山极为得意，于帅府大摆庆功宴。谁知第二天清早一查，英军只损失了几只舢板，反是泊于珠江两岸的民船被烧毁一大片。初二日英军反扑，以军舰三艘进攻西炮台，汽船一艘进攻泥城港，放火焚烧清军大小兵船三十九艘、火艇三十余艘。数天之中，清军全线溃败，逃入广州城中，城外炮台皆为英军占有，广州城陷于英军炮火之中。初六日，英军集中炮火猛轰城北贡院奕山住所，奕山急忙在城头竖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乞降。初七日，奕山接受英军提出的全部条款，签订《广州和约》。广州之战终以清朝惨败而告结束。

《广州和约》订立　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初七日，清靖逆将军奕山，因广州战役失败，不得不接受英军提出的全部条款，签订了《广州和约》，规定：清方于一星期内缴纳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元，清军六日内退出广州城六十英里以外，英军撤出虎门。事后，奕山一面就地搜刮赔款，一面以谎言欺骗朝廷，将大败说成大胜，自己求降说成英人乞求通商，赔款说成商欠。道光帝闻报，批道："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批准了《广州和约》，以期早日结束战争。但英国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旋即撕毁和约，扩大侵略战争。

三元里人民抗英　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广州三元里人民自发掀起武装抗英斗争。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约五里地方。广州战役开始后，英国侵略者的暴行及清廷的无能，激起三元里一带人民群众的义愤。在《广州和约》签订前一天的四月初六日，广州城北各乡义勇首领齐集牛栏冈，议定联防抗英，"一乡锣响，众乡皆出"。初九日，盘踞四方炮台的小股英军窜到三元里一带抢劫行凶，调戏妇女。村民鸣锣报警，菜农韦绍光等当场击毙英军十余名，其余抱头鼠窜。为防英军报复，村民集会于村北三元古庙，约定以神座前一面三星黑旗作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举人何玉成等士绅联络附近一百零三乡人民共商抗敌大计，利用"社学"建立起一支由农民，渔民，纺织、打石及烧炭工人，会党成员和爱国士绅组成的人民反侵略武装力量。初十日清晨，五千义勇进攻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四方炮台。英军

司令卧乌古派布尔利少将留守炮台，自率英军两千出外迎战。义勇将英军诱至牛栏冈一带丘陵地区，手持刀矛锄耙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杀来，“不呼而集者数万人”，将英军团团围困。下午一时，大雨倾盆而下，英军火药受潮，枪炮失灵，仓皇撤退。参战农民将英军分割包围，展开肉搏，计杀死英军毕霞少校等近五十名，生俘十余人，缴获大量战利品。下午四时，卧乌古带英军逃回四方炮台。十一日，广州附近番禺、南海、花县、增城等县四百余乡义勇数万人，前来与三元里人民汇合，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英军躲在炮台中不敢出来，派汉奸混出重围，向广东官府告急，并威胁说，“再有义勇相扰，则将打破议和，大举进攻。”奕山大骇，急令广州知府余保纯等前来将群众驱散，使英军得以脱险。十八日，义律贴出告示，恫吓广东人民：“后毋再犯”，当地人民针锋相对地出示反驳，同时宣告：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即可杀尽侵略者。三元里抗英斗争，是中国人民自发地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第一场大规模战斗，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厦门激战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初十日，英国侵略军攻占厦门。先是，《广州和约》签订后，道光帝以为大局已定，下令沿海各省撤兵。但英国侵略者却并不以此为满足。该年三月，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接到义律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后，认为得到的权益太少，不予批准，乃召回义律，另派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增调援军，扩大侵华战争。六月二十四日，璞鼎查抵达澳门。七月初五日，璞鼎查留兵舰六艘、军队数百人看守香港，自率大小军舰十四艘、陆军二千五百多人北进，初九日闯入厦门海口。闽浙总督颜伯涛急调水陆军兵守鼓浪屿。初十日，英军大举进攻。守军顽强抵抗。击沉英舰一艘、伤五艘，但未能挡住英军攻势，炮台失守。金门镇总兵江继芸等战死，鼓浪屿、厦门相继失陷。颜伯焘退守同安，被降为三品顶戴，革职留任。在英军大举北犯厦门时，有人上书两广总督祁𡎴，以三元里抗英事例说明人民力量的重要，建议趁广东英军兵力薄弱之际，发动各乡义勇配合军队反攻，一则可以收复失地，二则亦可解厦门之急。但祁𡎴拒绝采纳，坐失良机，致使厦门陷落。

龚自珍去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二日，龚自珍病逝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朝中叶以后，龚自珍鉴于社会危机逐渐加重，不甘埋首考据之学，先后创作《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当时社会黑暗，抨击专制制度，大声疾呼“更法”、“改图”，对土地占有、八股取士、官制职掌、币制税制、西北边防、东南海防等问题提出改革主张，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之风气。龚自珍强调改革是历史之必然，他忠告清朝统治者，“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龚自珍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痛斥英国鸦片走私，激励林则徐坚决禁绝鸦片，决不能“游移万一”。对破坏禁烟的官吏绅商，应杀一儆百；对侵略者更要“修整军器”，加强防御。龚自珍善诗文，为文博奥纵横，诗词风格清新，自成一家，号称“龚派”。哲学上既反对孟子“性善论”，又反对荀子“性恶论”，主张“性无善无不善”。在历史观方面具有变易、进化观点，所以对许多问题的探求、研究中能注重其发展变化情况。后人将其所留二百多篇文章、五百余首诗词辑成《龚自珍全集》。

台湾军民抗英斗争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至次年二月，台湾人民掀起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高潮。早在道光二十年九月，英国军舰就曾窜抵台湾鹿耳门外洋，被台湾兵备道姚莹、总兵达洪阿督水师击退。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军在进犯闽、浙沿海的同时，再次窜扰台湾。八月十六日，英军运输船“纳勃达”号在鸡笼万人堆洋面触礁下沉，船上英军纷纷乘舢板逃命，为鸡笼守备许长明等追捕，毙敌三十余人，生俘一百三十三人，缴获大量武器、地图等物。次年正月三十日，英军三桅兵船一艘驶入淡水、彰化之间大安港。守港清军伪饰渔船，命人扮作渔夫诱使英舰由土地公港驶进，触礁，岸上伏勇当即驾船围捕，俘敌五十四人，缴获英军从宁波掠得的兵器、号衣、旗帜等物。

第二次定海激战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七日，英军再次攻陷浙江定海。先是，英军为增援广东，于当年正月撤出定海。清廷命葛云飞为定海镇总兵，又调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协助防守定海。葛云飞等到定海后，克服重重困难，大力整顿军队，加强海防。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率军攻陷厦门之后，第二次进犯定海。八月十二日，英舰云集舟山洋面，向定海发炮猛攻。定海守军五千，在军粮匮乏，每日每人只得光饼六两甚至稀饭三碗的情况下，枵腹作战六昼夜，给英军以沉重打击。十七日，英军以猛烈炮火向定海城后晓峰岭发起猛攻，守军无炮，只能用抬枪御敌。下午，英军从晓峰岭登陆，攻入县城，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相继战死，定海再次陷落。

镇海失陷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二十六日，英军在攻下定海后，又向镇海发起进攻。驻守在

镇海前线，负责浙江海防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一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投降。战前，裕谦集众宣誓，表示决不退却，决不议和，誓与镇海共存亡。广大爱国官兵在裕谦的激励下，士气极为高涨。面对英军疯狂的进攻，裕谦亲自登城，指挥守军重创敌人。但是，扼守镇海城外招宝山的浙江提督余步云却贪生怕死，不等英军来攻，先挂起白旗，英军一登岸，余步云立即丢弃炮台，西逃宁波。镇守金鸡山的总兵谢朝恩战死。英军居高临下，俯攻镇海，裕谦见事不可为，投水自尽，为亲兵所救，次日至余姚服毒殉职。镇海陷落。

湖北钟人杰起义　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湖北崇阳县发生钟人杰等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钟人杰为崇阳县秀才，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因反对地方官横征暴敛，曾聚众抗粮。照清律，凡聚众四、五十人发动抗粮，为首者"斩立决"，协从者"绞监候"。崇阳县知县下令逮捕钟人杰、汪敦族二人。当地农民激于义愤，劫狱救人，酿成巨案。清政府闻知，派人前往查办，钟人杰等发起大规模请愿活动，并肉袒自首，表示无意反抗朝廷，只请官府主持公道。但清政府坚持"剿灭"，终于官逼民反，激起反清武装起义。钟人杰与陈宝铭、汪敦族等聚众三千，攻占崇阳、通城，杀死知县，钟人杰自称"钟勤王"，竖起都督大元帅旗帜，分设知县、千总等官，并开仓济民。起义军发展迅速，人数增加至一万余人，收取乡间铜铁制造兵器，攻克通山，围攻蒲圻，武昌、汉口纷纷戒严。道光帝急令湖南、江西两省严密防堵，着湖广总督裕泰调湖北兵五千余人、陕甘兵二千余人前往镇压。起义军被地方士绅诱出城外，遭官军围困，虽奋起抗击，终遭败绩。正月二十八日崇阳城破，起义被镇压，钟人杰被俘。当年五月在北京遇害。

浙江清军抗英失败　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浙江清军抗英以失败告终。浙江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后，道光帝决定出师反击。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四，任命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调集江西、湖北、安徽、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军队前往浙江。同时命沿海各省添兵筑堡，团练自卫，又命厦门、广州乘机出兵，使英军首尾不能相顾。奕经愚蠢无知，从北京至浙江，一路流连酒色，勒索贿赂。尚未交战，先命帐下秀才们比赛，看谁的奏捷文告写得生动出色。又迷信神佛，十二月十八日忽得一梦，见"洋人纷纷上船，窜出大洋"。手下也投其所好，随声附和，乃坚信为"天降吉兆"，决定择日进兵。二月抵达绍兴，宿迁举人臧纡青建议：选募壮勇三万，事先分伏三城，水陆并攻，见夷即杀，遇船即烧，然后以大军接应，伏舟港口，内外交攻，必可尽歼英军。奕经却认为浙江兵勇皆不可用，仍坚持以大兵进剿为主。为选开战吉日，特至庙中求签，得一虎形签，乃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凌晨三至五时)发起总攻。是日，奕经调大兵一万余人，分三路发起总攻，企图一举收复宁波、定远、镇远。却不料，他所选定的"吉日、吉时"，正值江南阴雨天气和黎明前黑暗之时。连日阴雨，道路泥泞，运输困难，军中断粮多日，加以天黑路滑，士兵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又以三城内皆有内应，严令不得携带火器，只能以刀矛等与手持先进滑膛枪，且以逸待劳的英军作战。结果，进攻宁波的清军遭到早有准备的英军猛烈夹击，死伤过半，仓皇后撤；另外两路则因指挥错乱，未到指定战场即先行溃败。英军乘机反扑，迅速攻陷慈溪，清军全线崩溃，奕经等逃往杭州。五月，英军攻占乍浦。道光帝只得再次妥协，派大臣耆英署杭州将军，加钦差大臣头衔，会同已革两江总督伊里布向英军乞和。

马宗禹起义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捻党马宗禹在江苏徐州府萧县一代发动反清起义，夺取清军马匹兵器，击伤清军把总及兵役多人。十月，马宗禹与纵江、李兆阳等复率捻党在安徽亳州起事，转战于苏、皖、豫三省交界处。清廷令苏、皖、豫三省督抚"督率兵勇，四路兜擒"。十一月，马宗禹被捕，起义失败。

吴淞激战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国在取得浙江战役胜利之后，不理睬清政府的求和，又从印度调来大批援军，包括战舰百余艘、陆军万余人，大举进犯长江，攻打吴淞口。吴淞口为长江门户，筑有东、西两处炮台。战前，两江总督牛鉴曾向道光帝吹嘘："我军以数千精锐接仗，何难聚而歼之"。他在沿海筑塘岸，派三百兵勇，身着虎衣、头戴五色面具，隐身塘后，不时跃出，手舞足蹈，想以此吓退敌兵。真正指挥抗敌的，是年近七十的江南提督陈化成。五月初八日，英军向吴淞炮台发起猛攻。陈化成亲自率兵镇守吴淞西炮台，与来犯英军激战两小时许，创敌战舰数艘，将其击退。英军见正面不能得手，改从侧翼小沙背登陆。负责陆路防敌的牛鉴，见敌来势汹汹，竟丢弃冠袍仪仗，混在败兵中逃跑。结果全军大乱，英军进占东炮台，西炮台受到水陆两面夹击。陈化成督兵死战，身受七处重伤，口喷鲜血，仍手执战旗，指挥作战，直至壮烈殉国。吴淞炮台失守。宝山、上海也相继失陷。

镇江激战　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四日，英军以七千陆军，在战舰支援下进攻镇江。是时

镇江守军不过两千余名，除参赞大臣齐慎与湖北提督刘允孝率部分兵勇防守城外各地外，守城清军只有副都统海龄率驻防旗兵一千及青州兵六百。道光帝又决心妥协，不予增援。是日，英军在击退城外清军之后，由镇江城西北登岸，一路佯攻北门，一路猛攻西门。守城清军在众寡悬殊之下，英勇抵抗，从城墙上用抬枪与火绳枪猛烈轰击，打死英军多名。英陆军司令卧乌古指挥主力拚死攻城，爬上城墙，清军与之肉搏，有人甚至抱住敌人一起跳城，同归于尽。英军入城后，又遭到清军顽强的巷战抵抗，共计被击毙三十七人，伤一百二十八人，失踪三人，为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城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城陷后，海龄夫妇举火自焚。英军纵兵烧杀，使镇江城内"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十余天内"无日不火"，繁华的镇江城变成一片瓦砾。

《南京条约》签订　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底，英国军舰开至南京下关江面，陈兵南京城下，清廷彻底屈服。七月二十四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中英《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如下：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商寄居贸易，英国可派驻领事等官；割让香港给英国；向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其中烟价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协定海关税则，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此外还规定有取消行商制、以往因为英国效劳而被监禁者免罪"加恩释放"等条款。八月初二，道光帝批准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创了外国殖民者以条约形式使其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掠夺"合法化"的先例。从此，古老东方帝国的大门被西方殖民者的大炮轰开了，各国侵略者接踵而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

《圣武记》刊行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魏源写成《圣武记》并刊行。全书十四卷。魏源目睹林则徐被诬革职，痛恨庸臣误国，侵略者肆虐行凶，遂发愤而著此书。书中记述了清王朝自开国至道光年间一系列重大军事活动，颂扬盛世武功，推求盛衰之理，筹划海防之策及练兵筹饷之道，以激励道光帝"延天下之人材"，"饬天下之人心"，发愤图强，重振国威。进而指出，朝廷若能以外夷之长技而御之，官无不材，境无废令，则又"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充分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

广州发生火烧商馆事件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六，广州爆发火烧英国商馆事件。起因为英国水手强买中国小贩水果不给钱，反用刀将该小贩砍伤，引起当地市民愤怒，群起痛斥英人。英人逃入商馆，关闭大门，从楼上用砖瓦投打群众。当天夜晚，广州市民放火烧了英国商馆，并"齐呼杀贼"。清朝官府闻讯，带兵赶来救火，也被愤怒的群众用飞石击退。事后，英军头目璞鼎查向清政府发出威胁，扬言要以武力解决，英国商人也一口咬定说这次事件是早有预谋，小贩同水手的纠纷只是导火线而已。清朝政府害怕英国侵略者，竟然杀害了十名无辜群众，赔偿商馆损失二十六万七千元，才将此事平定。

《海国图志》刊行　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所著《海国图志》刊行。初刊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为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又增为一百卷。此书是魏源根据林则徐《四洲志》等译稿为基础，搜集了明末以来直到近期西方人所写有关世界史地的著作、舆图、科技资料，中国历代史志及近人研究西方情况的著作，以及他本人在宁波、姚莹在台湾审讯英俘的口供等，写成的一部介绍各国地理、历史以及部分科技知识，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探求学习西方富国强兵道路的重要著作。书中热情歌颂了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业绩，谴责投降派"夷兵不可敌"的卖国论及顽固派视坚船利炮为"奇技淫巧"的愚昧无知，主张避敌所长，攻敌所短，不与其于海上交锋，而在内河严密布防，诱敌深入，再予以堵截歼灭。特别是深入批判了统治者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自守政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建议在广东建设造船厂、火器局各一个，聘请西方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以及建立新式海军等等。另外，魏源在书中还提醒人们警惕"鄂罗斯兼并西北"。所有这些看法、建议等充分显示了魏源所具有的远见卓识。

广州人民发起反英军入城斗争　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1842—1849)，广州人民自发掀起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的斗争。照例，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向居广州城外洋馆。道光二十二年九月，英国代表璞鼎查与清朝钦差大臣伊里布谈判五口通商章程时，曲解《南京条约》，无理要求进入广州城，因广州人民坚决反对而未能实现。次年六月，广州开市，英国再次要求入城贸易和租地建屋。主持广州社学的士绅何有书上书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指出"各县联络千有余乡，团练义民十余万众，"皆反对英人入城。耆英迫于人民压力，通知英人暂缓入城。道

光二十五年十二月，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乘兵船驶入珠江，援福州已准英人入城例，胁迫耆英与广东巡抚联名发布告示，准许英人入城，广州知府刘浔且与英人密订入城日期。广州群众痛骂官府，撕毁告示，张贴揭帖，约以英人入城之日，闭城起事，“先杀勾通卖国之奸官，然后与鬼子决战”，十二月十七日，数千群众拥入府衙，焚毁朝珠公服，知府刘浔跳墙逃走。社学又贴出揭帖，约期攻打城外洋馆。耆英乃于十九日再出告示，拒绝英人入城，并将刘浔撤职。德庇时也被迫退回香港。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德庇时又以佛山居民殴击英兵为借口，率兵船二十余只，士兵千余名偷袭虎门，闯入内河，炮击广州，提出包括广州入城在内的七项要求，限八小时答复。耆英既怕英人，又惧民变，决定“凡所要求皆许之，惟入城一事，约在两年以后。”道光二十八年，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文翰继任英国公使。道光二十九年正月，文翰以两年之期已到，要求践约入城。徐广缙支吾其词，未敢冒然答应。文翰派兵舰闯入省河，并以“助兵弹压”、北上“询问”、“阻运截漕等相威胁。徐广缙上奏朝廷请示，道光帝答以“只得暂入，不得常住”等含糊之词。广州人民闻知，坚决反对。从正月至三月，市区及附近各乡社学、公所纷纷筹集经费，制造器械，设置栅栏，城乡义勇户户出兵，人数竟达十几万人，加紧操练，准备随时痛击侵略者。徐广缙见民心不可侮，乃照会文翰，拒绝其入城要求。文翰慑于广州人民的反抗威力，命兵舰退出珠江，并于三月十九日复照徐广缙，放弃入城要求。持续七年之久的广州反入城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云南刀承绪起义 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云南腾越厅彝族人刀承绪聚众千余人发动起义，抢收田谷，反抗官府。起义军转战猛㖄、干崖一带。云南提督汪道诚、龙川江巡检马伟堂等带兵前往镇压。六月起义失败。次年四月，刀承绪被捕。

湖南曾如炷起义 道光二十三年(1843)，湖南武冈爆发曾如炷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年，武冈地区发生灾荒，地主杨居南乘荒运米出境，曾如炷等聚众反对，遭武冈知州徐光弼镇压。曾如炷、曾以得、杨老六等在洪崖洞组织群众武装，于当年五月包围州衙，击毙徐光弼。湖南巡抚吴其浚、永州总兵英俊等带兵前往镇压，杨老六、曾辛酉等七十余人在高沙市被俘。六月，曾如炷、曾以得等退至新化，战败牺牲。

“拜上帝会”创立 道光二十三年(1843)夏，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教义，同冯云山一起在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会”，也称“拜上帝教”、“太平基督教”。道光二十四年三月，洪秀全与冯云山漫游广东，历经省会、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函江、阳山、连山等地，一路宣传教义，寻找志同道合之人，但收效甚微，遂于连山西入广西。八月，冯云山来到桂平紫荆山区，在当地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发展会员，使拜上帝会逐渐发展壮大。十月，洪秀全回转家乡，先后创作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为拜上帝会完善理论依据。道光二十七年二月，洪秀全至广州从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了解宗教仪式，七月来到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此时会众已达三千人，洪秀全遂与冯云山一起制定拜上帝会仪式：会员入会受洗有悔罪奏章，朝起夜睡有祈祷文，食饭有感谢文，礼拜有赞美诗，其它如灾病、生日等事皆有祭告奏章等等。又定“十款天条”，系从《圣经》中摩西“十诫”而来，即：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慌话、不好起贪心，作为会众守则。随即率会众捣毁象州甘王庙及其它庙宇偶像，反对封建神权，扩大拜上帝会影响。道光二十九年，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结为异姓兄弟，组成拜上帝会领导核心，聚集力量，筹划起义。整个太平天国时期，拜上帝会作为维系太平军乃至太平天国革命的宗教力量，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拜上帝会也随之消亡。

《虎门条约》签订 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十五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广东虎门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通称《虎门条约》，或《虎门附约》。共十六款，附有《小船定例》三款。这是《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主要内容包括：一、准许英人在通商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境内设置“租界”最早的“条约依据”。二、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益，英国均可“一体均沾”，这使英国取得了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此项规定后来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过程中互相援引，从而攫取了更多的特权。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签订 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十五日，清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广东虎门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共十五款，主要内容有：一、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英民人之间倘有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这就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二、规定海关税律为值百抽五。开协定关税之例，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

墨海书馆设立 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将其在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设立的印刷机构迁到刚刚开埠的上海,建立墨海书馆。它是为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编译、出版机构,并将近代西方印刷机器和印刷技术首次传入中国。该馆先由麦都思主持,后由伟烈亚力继任。前后存在约二十年。开始只印刷《圣经》及一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道光三十年以后,为扩大该教会在中国的影响,也先后翻译出版了部分西方科技著作。咸丰二年(1852)到咸丰九年,共译印了九种科技图书。其印刷机器曾用一牛旋转轮轴,故时人有诗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字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

台湾洪协起义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月,天地会首领洪协、被革武秀才郭崇高等人,领导台湾嘉义县农民两千余人举行反清起义。他们发动四乡农民,抗粮拒税,攻城夺地,声势浩大。闽浙总督刘韵珂派台湾总兵率部前往镇压。起义军先后六次英勇抗击官兵,终因寡不敌众,洪协等兵败被俘,遇害。

湖南杨大鹏起义 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湖南耒阳爆发农民抗粮起义。起义领袖为杨大鹏、蒋庆云、蒋文昌、段大荣等。耒阳知县李金兰、后任知县叶如珪等假公济私,任意加征钱粮,以钱折银,从中渔利,百姓不堪其苦。杨大鹏为本县秀才,有一亲戚段某,因未能如期完粮,幼子被强扭入狱,两次"京控"(入京告状),均被递解回籍。杨大鹏之弟亦遭无故扣押。于是杨大鹏等联络四乡农民千余人,阻截粮户,抗拒官兵,攻城劫狱,发动起义。后湖南提督石玉生亲率重兵前往镇压,起义军寡不敌众,杨大鹏被捕遇害,起义失败。

《望厦条约》签订 中英《南京条约》订立后,作为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主要帮凶的美国,急忙派出身鸦片贩子的顾盛为专使,率舰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正月到达澳门。他运用外交讹诈和军事恫吓手段,于当年五月十八日迫使清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中美《望厦条约》。该条约共三十四款,附《海关税则》。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日后如要变更海关税率,须"与合众国(美国)领事等官议允。"二、美国人有权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楼,开设医院、教堂。三、清政府必须保护在华的美国人,"令其身家安全"。四、美国人与中国人或其它任何外国人之间在中国的一切诉讼,只能由美国领事按美国或其它外国的有关法规进行处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五、美国兵船可任意到中国各通商港口"巡查贸易",中国无权管理。此外,《望厦条约》还规定,十二年后对五口贸易等条款可以"稍有变通"。《望厦条约》也称《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是中国代近史上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黄埔条约》签订 中英、中美签约后,法国殖民者也不甘落后。道光二十四年(1844)七月,法国派使臣剌萼尼到达澳门,以欺骗、讹诈的手段,于当年九月十三日在停泊于广州黄埔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上,与清两广总督耆英签订《中法五口贸易章程》,也称《黄埔条约》。共三十六款,附《海关税则》。据此,法国不但轻易取得了英、美已然得到的诸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又得到了一些新好处。如:法国人于通商口岸租赁房屋或租地建屋,"其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为法国后来扩大租界留下借口。另外,《黄埔条约》规定清政府有保护教堂安全的义务,成为后来逼迫清廷弛禁天主教的借口。

五口通商大臣设立 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政府正式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这是鸦片战争后至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前,清政府专门办理外交和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以后,随着上海逐渐发展为全国通商及外交事务的中心,广州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为英、法侵略军占领,清政府遂于咸丰九年初命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商务。六十年代初,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一度由江苏巡抚充任,驻上海,其后例由两江总督兼领。咸丰十一年以后,五口通商大臣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职务,其职权也发生变化,虽仍沿用旧称,实已成为"南洋通商大臣"。

《上海地皮章程》订立 在中国境内划定租界,是近代史上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一项重要手段,英国是第一个向中国勒索租界的帝国主义国家,上海则是中国境内首先出现租界的地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正式开放。英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一到上海,马上借口《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有允许英人携带家眷,寄居通商口岸,并可以租地建屋的规定,强迫清苏松太道宫慕久同意将上海县外黄浦江边一百三十亩荒地租为英国领事馆用地。以后又强行将租地面积扩大到一千零八十亩,并规定在该地区内,英人可以向中国土地所有者私自租用土地。道光二十五年,巴富尔胁迫宫慕久签订《上海租地章程》,也称《上海地皮章程》,于当年十一月初一日由宫慕久以道台告示方式正式公布。章程共二十三款,规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也称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为英国租借地。租地、租屋洋商,应会商修建木石桥梁,植树护路,挖沟

排水，雇用更夫。领事官经各租主请求，召集会议，会同商议，摊派以上各项所需经费。他国商人愿在划归英商承租之洋泾浜界址内租地建房，应先向英国领事官申请。这些规定使英国领事馆在该地享有最高权力，为殖民者"治外法权"提供了合法依据。次年七月，双方又议定租地西以边路(今河南中路)为界(东临黄浦江)。这块总面积为八百三十亩的"特殊"地段，即后来的英租界。是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强占的第一块租界。

丽如银行设立中国分行 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西印度银行改称的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同时设立分行。它是为外国银行侵入中国的开始，也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新式金融机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金融活动主要由公司、洋行承担，主要业务是进行国际汇兑和金融周转。自丽如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之后，大批外国银行侵入中国。大量吸收中国资金，扩大自身势力，发行纸币，垄断外汇，并通过对清政府贷款攫取各种特权，逐步把持了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另外，外国银行的入侵，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发展、变化。过去，中国的旧式金融机构分官办和民办两种。官办金融机构主要为属于中央户部和工部的钱法堂及其下设的铸钱局，负责全国货币的铸造、发行、保存和管理。民间机构则指各地盛行的各种钱庄和票号，主要从事银钱兑换、汇兑、收受存款及对官府和一般工商户的放款业务。随着外国银行的不断设立，中国旧有的钱庄、票号等逐渐被近代意义的银行所代替。

柯拜船坞设立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在向中国进行商品输出的同时，也开始进行资本输出。随着外国船只在中国沿海、沿江航行权的不断扩大，外资船舶修造业应运而生。道光二十五年(1845)，苏格兰人柯拜在广州黄埔建造"柯拜船坞"，雇佣中国工人从事船舶修理工作。它是为中国最早的外国船舶修造工业。此后，随着外国大小船厂的设立，不仅长期垄断着中国的船舶修造业，挤垮了中国旧式的造船业，还压抑着中国新式民族造船业的发展。另外，"柯拜船坞"也是外国人在华设立的第一家工厂。自"柯拜船坞"建立以后，各种加工工业如茶叶加工、机器缫丝、制糖、制革等外资工厂相继建立。"柯拜船坞"的设立，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滥觞。

广西邓立奇、钟敏和起义 道光二十五年(1845)，邓立奇、钟敏和在广西藤县赤水圩发动农民起义。邓立奇号称"平地王"，钟敏和称"高山王"，声势浩大。不仅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地方统治，对后来该地区不断出现的农民革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洪秀全作《原道救世歌》等 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845—1846)间，洪秀全利用重回家乡执教的一段时间，埋头理论创作。他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西方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借"上帝"之口，揭露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宣扬拜上帝会拯救苦难民众的宗旨，相继写成《原道醒世训》、《原道救世歌》、《百正歌》等。道光二十八年又写成《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等文章。是为太平天国早期重要文献。其中《太平天日》一文正式发表于同治元年(1862)，其余皆于咸丰二年(1852)编入《太平诏书》中刊行。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指出，当今之世到处存在着仇恨和欺诈，"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又以儒家经典中"天"、"帝"等字句比附基督教的上帝，创造出一个主宰天下万物的"天父皇上帝"。在他看来，整个"天下凡间"，皆在"皇上帝主宰化理"和"生养保佑"之下，"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进而号召人们"相与挽已倒之狂澜"，变"乖漓浇薄之世"为"公平正直之世"，以求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原道救世歌》和《百正歌》则以诗歌形式宣传天父上帝为独一真神，"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劝告人们只拜上帝，不拜邪神，切戒淫邪、"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等"六不正"行为，改邪归正，要人们"脱俗缘，莫将一切俗情牵，须将一切妄念捐"，以求建立新的社会风尚。在《原道觉世训》中，洪秀全将社会划分成正与邪、神与妖两个对立营垒，将清代统治者乃至历代封建皇帝比作阎罗妖，"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为人民革命指明了战斗目标。《太平天日》主要记述了洪秀全 1837 年生病时的一个"异梦"。在梦中，洪秀全被天父上帝接到天上，洗净全身污秽，剖腹"出旧换新"，然后俯瞰全世，看到"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又在天兄耶稣帮助下打跑天上妖魔。最后，天父赐其宝刀、金玺，命其下凡做太平天王。仗宝刀以斩鬼魔，以金玺治服邪神，诛妖救世，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创作的"三原道"等文章，在当时对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确实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整个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

清政府弛禁天主教 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月，清廷正式宣布弛禁天主教。第一次鸦片战争以

后，大批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无视清政府的限制，千方百计向中国内地渗透。道光二十五年，法国传使剌萼尼利用《黄埔条约》换约之机，以各地实行弛禁令“有名无实”为借口，要求清政府公布弛禁令，切实执行，否则，“两国之事，正未可知”。在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之下，道光帝乃明降谕旨，正式颁布天主教弛禁令，发还康熙末年以来没收的天主教堂。从此，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确立内地传教权之前，十几年中，就有五十多名传教士(以法国最多)深入包括北京在内的内地二十个省份和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不包括东正教)。大大加深了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江苏金德润起义　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苏昭文(今常熟)县知县在收漕时任意加征，引起农民不满，在金德润率领下聚众暴动，冲入县城，砸了县吏朱正安家。五月，又因各乡地主加收地租，再次激出民变，愤怒的农民纷纷冲入土豪劣绅家中，先后捣毁了陆家市、娄家桥、归市、中市、吴市、东周市、何市等地地主四十余家。江苏巡抚李星沅闻讯，急忙调兵镇压。起义农民奋起反击，终因官军势大，起义失败，金德润被官府杀害。

广州民众围攻商馆　道光二十六年(1846)夏，广州爆发群众围攻外国商馆斗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很多外国官员、水手、商人等以征服者自居，在广州横行霸道，干尽坏事，中国民众对此极为愤慨，多次掀起抗暴自卫斗争。道光二十六年(1846)闰五月十五日，英国商人金顿无故殴打中国水果摊贩，激起民愤，广州民众纷纷奔赴现场，包围了外国商馆。傍晚，愤怒的群众高喊着“打洋鬼子”、“杀洋鬼子”的口号冲开了英国商馆的大门，将其院墙推倒，窗户砸烂。英国领事一面派人通知广州官府，一面命外国武装匪徒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三人，打伤六人。示威群众并未被侵略者的暴行吓倒，反而越聚越多。后清兵赶到，将示威群众强行驱散。两广总督耆英唯恐人们“散而复聚”，特命“文武委员，连日多带兵差，无分昼夜，常川驻扎”，为侵略者充当保镖。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群众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抗暴自卫大示威被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

容闳等第一批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道光二十六年(1847)十一月十八日，在香港马礼逊学校求学的容闳、黄胜、黄宽三名学生，在校长布朗带领下赴美留学。次年二月二十七日到达纽约，进入麻省芒松学校学习。不久黄胜因健康原因返回香港，容闳与黄宽于道光二十九年毕业。黄宽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咸丰七年(1857)回国，历任广州惠爱医院医师，香港国家医院院长。他是中国第一个赴欧美学习西医之人。容闳于道光三十年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咸丰四年毕业。次年回国，任职于广州美国公使馆。咸丰十年曾到太平天国京城天京，向洪仁玕提出七条新政建议，未被采纳。同治二年(1863)参与筹建江南制造局。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1875)，任留美学生监督，后任清朝驻美国副公使。光绪二十四年参加戊戌变法，光绪二十六年在上海参加维新派唐才常发起的“张园会议”，任会长。维新运动失败后，容闳逐渐倾向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民国元年(1912)在美国去世。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者。

郑复光作《镜镜诊痴》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用近代科学方法在光学领域进行初步研究，主要代表人物为郑复光和邹伯奇。道光二十六年(1846)，郑复光编著的光学著作《镜镜诊痴》五卷刊行。是书总结了当时西方及我国旧有的光学知识，分明原、镜类、释圆、述作四部分，对面镜、透镜、望远镜、放大镜及各种照明灯具等光学仪器的成象原理和制作方法作了详细论述，并附有插图。尽管《镜镜诊痴》对光的本性与色的关系等方面介绍和研究不够，但作为中国第一部近代光学著作，仍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全书于道光二十七年由杨尚文收入《连筠簃丛书》。

沙俄吞并中国西北领土　中国西部边界本在巴尔喀什湖一带。十九世纪初，沙皇俄国在向中亚扩张的同时，也开始觊觎中国西北地区。道光十一年(1831)，沙俄西伯利亚和亚洲委员会决定把中俄边界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斋桑湖，直到卡伦线。道光十六年，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戈尔恰科夫声称：从政治上和商业上考虑，俄国都应在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直到中国西部，喀什噶尔等地“牢固地立定脚跟”。道光二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七(1846—1847)，沙俄武装人侵巴尔喀什湖东南喀拉塔勒河、伊犁河等七河地区。咸丰四年(1854)强占阿拉木图，将伊犁河下游一带据为已有。还强行筑起一条长达七百公里的堡垒线，北起阿亚克斯，中经科帕尔，南到维尔诺要塞，从而实现其“国界往前推移”的计划。咸丰六年至咸丰八年，沙俄先后组织各种“考察队”到伊克塞湖、伊犁和喀什噶尔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绘制地图，积累了大量情报资料，为今后进一步侵略中国做准备。

广州人民开展反租地斗争　根据《虎门条约》，英人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屋地基，须经居民业主同意，不得任意强租。但英国殖民者却不顾居民和原业主的强烈反对，多次强租硬占房屋和地皮，以至引

起当地民众不满，掀起群众性反租地斗争。道光二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6—1847)，英国强租广州新豆栏街口(十三行附近)及河南地方(今广州芳村对岸)，两广总督耆英不但不加制止，反命地方官强迫业主议价出让。广州各界人士闻讯，纷纷动员起来，张贴揭帖，揭露英人霸占中国房屋土地阴谋和清朝官府的卖国行为。指出："此等奸臣害国，乃皇帝自取其亡。"如果英国仍"强行霸占，我等公议，明伦堂同举义兵，先杀耆英，后剿英逆。"道光二十七年四月，英人擅自在河南洲头嘴地方丈量地段，设置界标，企图强行租占。河南四十八乡绅民三千余人来到英国商馆前示威，递交抗议书，明确表示："河南地方，寸金寸土，皆民血产"。英国如强行霸占，当地人民必将"舍死相争"，"非我大宪所能压服者也"。各社学也组织民众轮流巡查，终于使英国强租河南地的企图未能得逞。

湖南雷再浩起义 道光二十七年(1847)九月，湖南新宁农民在青莲教首领雷再浩率领下聚众起义。雷再浩为新宁黄背峒人，瑶族，早年与李辉、陈名机及广西全州李世德、肖立山等一起加入反清秘密结社青莲教(属天地会系统)，组织棒棒会，在湘、桂交界处进行反清斗争，影响甚大，当地汉、瑶群众踊跃加入。新宁起义后，雷再浩率义军至广西全州梅溪口和大埠头(今属资源)，与李世德的起义军会合，攻占全州咸水口等地。附近汉、瑶各族农民及广西东北部平乐、恭城等县贫苦农民纷起响应，争相"拈香拜盟"，或攻打县城，配合起义军。起义军迅速扩大到数千人，转战于湘、桂边界都庞岭和越城岭一带山深林密处。十月，清廷调湖南、广西两省兵力联合进剿。起义军英勇抗击，重创官军，无奈双方力量悬殊，在全州西延败于广西提督马殿甲部，李世德牺牲，雷再浩率余部退至新宁。十月二十六日，新宁举人江忠源率领所属团练武装进袭农民军，雷再浩被俘遇害，起义失败。

广州黄竹岐人民抗英 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月二十八日，六名英国侵略者携带手枪等凶器，闯入广州城西黄竹岐村，与村民发生冲突，当场打死村民一人、重伤一人。村民无比愤慨，将六名英国强盗全部殴毙，弃尸河中。清两广总督耆英闻讯，急忙派兵前来镇压，先后逮捕村民十七人，以讨好英国侵略者。但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德庇时亲率兵舰来到广州，要求耆英将参与抗英之村民不分主从，全部处斩，"并将黄竹岐及毗连之滘表、坑滘二村洗平，以昭儆戒。"按《大清律》，互殴致死人命，罪不至斩，何况村民抗暴自卫，实属无罪，但耆英不敢得罪英国殖民者，竟下令将捕押村民四人立斩、一人斩监候、一人绞监候、三人充军、六人杖一百徒三年。还向德庇时照会表功："本大臣因与贵国和好，特为从严惩办。为英人伸冤，亦可谓不遗余力"。黄竹岐事件的发生，激起广州各界强烈义愤。上层士绅联合向德庇时发出公启，驳斥英方无理要求；社学知识分子态度更为强烈，他们四处散发《阖省社学同启》，痛斥耆英的卖国罪行："哀哉！痛哉！中国之受辱，一至于斯也！耆英之误国残民，竟至此极也"。"其视我民为何国之民？自视己身为何国之臣？自有权奸以来，未有丧良心、无廉耻若耆英之极也！"并警告英国侵略者，如再到黄竹岐一带挑衅，社学将"传齐诸路壮勇，到十三行将鬼楼鬼种尽行诛戮烧毁，以相报复。由于广大民众的团结斗争，英方终于未敢再到黄竹岐一带骚扰，耆英的卖国嘴脸也因此而暴露天下。

冯云山被捕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1848)，洪秀全密友，拜上帝会创始人之一及实际领导人冯云山被捕。冯云山，广东花县人。自幼与洪秀全同学，早年应试不第，充村塾教师，道光二十三年与洪秀全一起创立拜上帝会。同年八月，冯云山只身进入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先后充当雇工、塾师，在当地烧炭工人、贫苦农民中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发展拜上帝会会众，培养出杨秀清、肖朝贵等一大批革命骨干。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紫荆山石人村地主王作新纠集地方团练逮捕了冯云山，在押解途中为拜上帝会会众所救。十二月十二日，王作新复亲率团练再次逮捕冯云山和卢六，以"阳为拜会，阴图谋叛"罪名关入桂平县狱。洪秀全闻知，立即回广东设法营救。由于冯云山被捕，洪秀全离开，拜上帝会群龙无首，出现组织涣散现象。危急关头，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以天父代言人身份发号施令，挽救了拜上帝会；并发动会众捐钱营救冯云山。冯云山在狱中坚持斗争，向浔州府控告王作新"恃衿横嚼，架题寻害，请饬桂平县提讯雪冤"，又给桂平知县写诗三首，"呈求伸雪"，还创制了一部新历法，即后来太平天国颁行的《天历》。由于冯云山自己努力与广大会众的积极营救，道光二十八年九月，桂平县判定冯云山为无业游民，以递解原籍管制结案。在返粤途中，负责押解的两解差听冯云山讲了大量革命道理，中途将其释放并与之同上紫荆山加入了拜上帝会。

上海徐家汇建立教堂 道光二十七年(1847)，法国天主教主教罗类斯，利用清廷宣布弛禁天主教之机，在上海县徐家汇地区强买民地，修建教堂。当地中国民众闻知，极力反对，先后约有八十余

人来到教堂工地，阻止修建。法籍主教赵方济、法国驻上海领事等联合向上海官府施加压力，迫使上海县知县发出布告，宣布徐家汇地方已售予法兰西罗主教建造教堂，现在购料集匠兴工。如有无赖棍徒，以及外来流丐，在该处阻挠工作，并盘据窃料者，许该地保扭获解县。将当地民众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徐家汇天主教堂建成后，成为法国殖民者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基地。

广西罗大纲起义　罗大纲，原名亚旺，广东揭阳人。早年为江湖游侠。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广西荔浦马岭一带以设染房为掩护，组织天地会，发动起义。后活动于武宣、阳朔、平南、永安、桂平一带，从事反清斗争。道光三十年十月率部加入拜上帝会。金田起义爆发后，罗大纲率所部数千人在大湟江口加入太平军，受封左二军军帅。

青浦教案发　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月，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三人违反上海开埠时有关"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规定，进入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传教，散发布道书，并与停泊当地的漕船水手发生争执殴斗。事后，英国领事阿礼国在法、美、比利时等国领事支持下，硬将距上海九十里以外的青浦说成是在官定范围之内，无理要求清方"惩凶"，且殴辱清苏松太道咸龄，并停付关税，以军舰扣留即将启航北上的一千四百艘运粮漕船，又派副领事乘兵船到南京，向两江总督李星沅施加压力。清政府闻知，派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前往处理此事。耆英在英国领事等威逼下，将咸龄革职，又把参与争殴的十名漕船水手押在上海海关前枷号示众，并判其中一人徒刑，一人流放。另任出身十三行商人，当过上海美国旗昌洋行买办的捐班道员吴健彰署理苏松太道。

《瀛环志略》刊行　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继畲编著《瀛环志略》刊行。徐继畲字健男，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道光二十三年曾在厦门向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借摹世界地图册。道光二十六年，徐继畲任福建巡抚，开始择录中外有关世界地理方面的图书资料，编辑成书，取名《瀛环志略》。全书十卷，对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史地沿革、社会变迁等详加论述，并附有地图。该书出版后曾风行一时，翻刻本极多，且传入日本，影响甚大，与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等同为中国近代史上较早介绍世界地理及各国概况的著作。

葡萄牙霸占澳门　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初三日，澳门葡萄牙官员亚马勒以清两广总督拒绝其请裁澳门海关，在广州设立领事馆的要求为借口，驱逐清朝澳门同知，封闭海关，劫掠财物，并停止交纳自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向明朝政府"借居"澳门以来按年向中国交纳的租税。七月初五日，清军士兵刺杀了亚马勒。事后，英国兵舰开到澳门，英、法、美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公开支持葡萄牙殖民者的侵略行径。于是，葡萄牙遂于该年悍然出兵将中国领土澳门强行霸占。

湖南李沅发起义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十三日，湖南新宁爆发李沅发领导的农民起义。李沅发，湖南新宁水头村人，天地会首领，曾参加道光二十七年雷再浩起义。道光二十九年夏、秋间，新宁一带发生水灾，地主豪绅趁机抬高粮价，重利盘剥，官府也以"平粜"为名搜刮百姓。李沅发遂以"劫富济贫"为号召，倡立"把子会"，发动当地汉、瑶群众，又联合广西全州一带农民共三百余人，于该年十月举起义旗，一举攻克新宁县城，杀死县官，破狱放囚。起义军迅速扩大到两千余人，乃分设五营，各营管带称"大哥"，自称"总大哥"。清军围困新宁，起义军顽强抵抗，激战四十余日。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军夺回新宁，李沅发率起义军退至湘、桂边界高山丛林之中，连败江忠源、刘长佑等地主武装，击毙清军参将玛隆阿。后起义军由全州、兴安、灵川、永福等地攻至怀远、龙胜一带，与各地天地会众会合，沿途瑶、僮、汉各族农民纷纷加入，队伍扩大到四、五千人，复设十行，委派军师、先锋等官，相继占领湘、桂、黔三省边界地区十余州县，声威大振。清廷闻知，将湖南提督英俊等革职，命湖广总督裕泰率湘、鄂、桂、黔四省清兵全力进剿。道光三十年二月，李沅发挥师攻占湖南靖州，旋即退入广西，经融县、永宁、永福、阳朔、荔蒲、修仁进入大瑶山。四月，李沅发自称"抚江王"，率部退回新宁。清军步步紧逼，将起义军四面包围。五月，李沅发在紫金峰战斗中负伤，被湖南提督向荣俘获，起义失败。八月十七日，李沅发在北京就义。

道光帝死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清宣宗道光帝旻宁死，终年五十八岁。道光帝即位后，正值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鸦片走私盛行，不仅病国害民，且使大量白银外流。为维护自身统治，他多次下令严禁鸦片入口，禁止各省种罂粟，熬制土烟。特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鸦片战争爆发后，由于他表面虚骄自大，内里懦弱无能，且对世界情势懵然无知，时而急于求胜，时而妥协求和，加以朝政腐败，将帅无能，致使战争失败，被迫与外国侵略者订立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损害，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

咸丰帝即位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六日,清文宗显皇帝奕訢即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奕訢是道光帝第四子,姓爱新觉罗氏。奕訢少年时,与其六弟奕䜣一同读书,关系密切。奕訢聪明机敏,奕訢木讷寡言,故于其父道光帝心中地位以奕䜣为重。后奕䜣用其师杜受田之计,在诸皇子围场行猎时故意空手而返,道光帝问其原因,答以"鸟兽方在孕育,子臣不忍伤害生命致干天和,且不愿与诸弟争胜"。道光帝遂认为奕訢为人厚道,适为人君,因而被立为皇位继承人。

福建乌石山教案发 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英国一名传教士和一名医生来到福州,由英国代理领事金执尔向城内乌石山神光寺僧人租赁房屋居住,租期半年,得侯官县知县兴廉批准。此举开创了英国人在通商口岸入城居住的先例。神光寺本为当地生童会课之地,英人租屋消息传出,绅民大哗。在籍养病的林则徐联合地方士绅上书福州官府,要求驱逐英人。一些在朝的闽籍官员闻讯也上折声援。闽浙总督刘韵珂与福建巡抚徐继畬企图以劝说英人自行搬出平息此事,受到言官抨击,咸丰帝亦传旨申饬,只得于是年十二月命地方官迫英人交出神光寺房屋,迁往道山观英国翻译官住地。此事遂告结束。

金田团营 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洪秀全以武装起义时机已然成熟,向各地拜上帝会会众发布总动员令,命务于当年十月初一日以前到达金田村集中"团营"。各地会众接到团营命令,立即变卖田产家业,偕全家老小奔赴金田。先后参与团营的,包括紫荆山区会众两千余人,秦日纲率领的贵县龙山失业矿工千余人,苏十九率领的桂平饥民千余人,黄文金率领的博白会众二千余人,赖九率领的陆川会众数千人,石达开率领的贵县会众数千人,以及金田附近千余人,合计二万余人。其中有汉人,也有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会众。到达金田以后,将变卖家产所得悉数上交"圣库",各人衣食杂用均从"圣库"领取,所有团营会众皆按男女分营,实行军事编制,领取军械、被服、旗帜,接受军事训练,并开始与清军进行武装斗争。

沙俄侵占黑龙江下游地区 道光三十年(1850—1853)六月至咸丰三年九月,沙俄多次入侵我国黑龙江下游一带,将大片中国领土置于其军事控制之下。早在道光二十九年正月,沙俄政府就专门成立了一个"阿穆尔特别委员会",派涅维尔斯科伊率领海上"考察队"对黑龙江口一带及库页岛北部海岸进行勘察。沙俄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根据其勘察结果,决定"占据黑龙江口"。道光三十年六月,涅维尔斯科伊再次侵入黑龙江口,在明代所立永宁寺碑所在地特林强行登陆。当地中国官员对此提出抗议,涅维尔斯科伊竟蛮横地声称,俄国人有"独一无二的权利"留在这里,要求中国官员立即离开此地,且以双筒手枪进行恫吓,并公然发布通告宣布:"鞑靼海峡沿岸和直到朝鲜边境的整个黑龙江边区,连库页岛在内均属俄国的领地"。七月初六日,沙俄入侵者强占庙街,公然升起沙俄国旗,宣布在此建立以沙皇尼古拉一世名字命名的尼古拉也夫斯克哨所。对此,尼古拉一世极表赞赏,并悍然宣称:"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咸丰元年下半年,涅维尔斯科伊第三次来到黑龙江下游,派人四出搜集情报,为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作准备。咸丰三年正月,沙俄强占奇集。五月侵入哈吉湾,并擅自命名为"尼古拉一世皇帝港"(今苏维埃港)。七月强占阔吞屯,建立马林斯克哨所。八月三十日,涅维尔斯科伊侵入库页岛南端优良港湾——阿尼瓦港,两天后强行登陆,升起俄国国旗,在港湾东面建立穆拉维约夫哨所,并宣称:"库页岛作为黑龙江下游的延续地区,属俄国所有。"沙俄上述在黑龙江下游的侵略活动,为以后进一步侵略整个黑龙江流域奠定了基础。

穆彰阿被革职 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二十八日,权相穆彰阿被革职,永不叙用。穆彰阿为满洲镶蓝旗人,字子朴,号鹤舫,嘉庆十年进士,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等职。深受道光帝信任,道光八年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达二十余年。他坚持"抚夷"媚外立场,包庇走私烟贩与受贿官吏,从中分肥,对林则徐等人的禁烟活动在暗中百般破坏。鸦片战争爆发后,他诬陷抗战派大臣,怂通道光帝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支持琦善对英国侵略者屈辱求和。英军侵入长江流域,他公开主降,支持耆英等与侵略者订立不平等条约。因其当权日久,门生故吏遍布朝内外,时称"穆党",势力浩大,败坏国事。咸丰帝即位不久,将其革职,永不叙用。咸丰六年(1856)病死。

林则徐去世 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十九日,林则徐在广东潮州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七岁。鸦片战争爆发后,由于林则徐在广东防御严密,使英军入侵广东企图未能得逞。道光二十年九月,因受投降派诬害,被革职。道光二十一年赴浙江协助筹划海防。次年充军伊犁。在新疆,林则徐兴办水利、开辟屯田。且意识到沙俄殖民扩张威胁,曾预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道光二十五年起复,先以三品顶戴署陕甘总督,次年授陕西巡抚,道光二十七年迁云

贵总督。先后镇压过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起义。于云贵总督任内曾奏请准许招商集资，开采矿业。道光二十九年因病辞职回籍。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复诏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西会同郑祖琛、向荣等镇压天地会起义，十月初二抱病启程。二十四日，诏夺郑祖琛职，命林则徐以钦差大臣暂署广西巡抚。而其已先于十九日在潮州普宁行馆病逝。当地民众闻林则徐卒，皆罢市，闾巷痛哭，通城缟素，以悼念这位敢于抗击外国侵略者而被屈含冤的一代哲人。遗著有《林文忠公政书》、《畿辅水利议》、《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四洲志》、《林文忠公家书》、《信及录》等。

拜上帝会发起“迎主之战” 道光三十年(1850)十一月，各地拜上帝会会众陆续到达金田团营。时洪秀全、冯云山正在广西平南县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中秘密布置武装起义事。清广西浔州协副将李殿元出巡平南思旺圩，探知花洲一带有拜上帝会会众聚会，遂同署平南知县倪涛、秦川(即思旺)巡检张镛等率兵勇、团练前往，封锁路口，断绝花洲与外界交通，加以围困。洪秀全一面组织当地会众准备抵抗，一面派人往金田告急。杨秀清等闻讯，急命蒙得恩率精兵数百往援。十一月二十日，在思旺圩全歼清军，阵斩张镛，李殿元、倪涛仅以身免。蒙得恩等到山人村与洪秀全会合，次日护洪秀全回返金田。

蔡村江激战 拜上帝会会众金田团营，队伍迅速发展，声势越来越大。清廷得到消息，急忙调兵遣将，前往镇压。道光三十年(1850)十一月十二日，，以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广西巡抚，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赴广西办理军务。是月下旬，驻守桂平的清镇远总兵周凤岐，派部下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率贵州兵进剿金田村。太平军事先得到消息，在金田外围布下伏兵。二十九日，伊克坦布率部经过蔡村江木桥，突然伏兵四起，清军措手不及，立时大乱。太平军拆毁木桥，切断清军退路，阵斩伊克坦布。周凤岐闻报往援，又被击败。是役为太平军金田起义前夕一次大胜，使清军再不敢轻言进剿。

金田起义 道光三十年(1851)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率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誓师起义，太平天国革命正式爆发。是日正值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拜上帝会会众于金田村“恭祝万寿”，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洪秀全为太平军制定了五项纪律：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太平军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包红巾，表示与清王朝誓不两立。十二日，太平军挥师东进，攻占江口墟。罗大纲、丘二嫂、苏三娘等天地会首领率部加入太平军。十七日，广西提督向荣率清兵万余分两路进犯江口墟。二月初六日，太平军进入武宣境内。二十一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建立军师及五军主将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肖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先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太平军于东乡设立大营，前锋进抵武宣东南三里墟。三月初二日，广西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等率清军六千南北夹攻三里墟，太平军奋起迎击，大败清军。初九日，清廷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驰往湖南办理防堵事宜。二十六日，又命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四月，帮办广西军务、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抵武宣。太平军撤离武宣，奔象州。五月初十日，太平军在象州梁山村、独鳌岭、马鞍山一带大败乌兰泰，斩清军贵州参将马善宝等二百人。六月初，折回桂平紫荆山和金田地区。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 咸丰元年(1851)七月初十日，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规定俄国得在伊犁、塔城设立领事馆，俄国商人在该地享有免税贸易及领事裁判权等特殊权益。从此，沙俄商品大量涌入新疆地区。此外，该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沙俄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而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成为沙俄对中亚地区深入侵略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官村激战 咸丰元年(1851)八月二十日，太平军在广西平南官村一带大败清军向荣部，取得自金田起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先是，七月十五日，太平军与清军在紫荆山西之双髻山作战不利，被迫突围。十九日，洪秀全于茶地下诏，要求全军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以杨秀清负责全军的军事指挥，各军各营皆必须听其将令。二十六日，为严肃军纪，又杀死临阵退却的黄以镇。经过一系列整顿，太平军战斗力大为加强。八月十六日中秋之夜，太平军分三路自新墟出发，经五峒山东至平南县之思旺、官村一带，清军副都统乌兰泰部纵火焚掠新墟，提督向荣率部尾追，于二十日亦到达官村，扎营数十座。太平军在冯云山、肖朝贵等率领下，乘敌立足未稳，突袭劫营，大获全胜，阵斩千总杨成贵，缴获大批军火、器械、粮草、服装等军用物资。向荣部全军崩溃，只得收拾残兵，退入平南县城，托病月余不出，自言是其从军数十年来从未有过之大败，并因此丢了提督顶戴。官村之战后，太平军乘胜北上大旺墟，沿大同江水旱两路直指永安州。

周锡能案件发 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二十九

日，太平天国破获周锡能反叛案件。周锡能，广西博白人。早年为博白拜上帝会骨干，与黄文金等率众参加金田起义，受封军帅。咸丰元年五月，太平军转战象州时，周锡能请准返回原籍，以团接未能入伍之会众为名，招得一百九十余人，投靠清钦差大臣赛尚阿，被许以六品顶戴，命其潜回太平军为内应。十月二十一日，周锡能带朱八、陈五回到永安，窥探城防虚实，策动监军朱锡琨、巡查黄文安等叛变，并企图行刺太平天国领袖，配合清军夺取永安城。杨秀清根据其逃出敌营的可疑情节及回来后的诡密行动，又查知其拉拢朱锡琨、黄文安等的夜间谈话，断定周锡能为"反骨妖人"。二十九日，当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前来议事时，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锁拿周锡能，审讯出其企图"内应谋反"罪行，第二天将其全家及同谋者斩首示众。

太平天国永安建制 咸丰元年(1851—1852)冬，太平军在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进行了一系列政权建设，史称"永安建制"。先是，该年闰八月初一日，太平军将领罗大纲等率军攻克永安城。是为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城市，初七日，洪秀全进入永安。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下诏，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列一等；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列二等；石达开为翼王，列三等。西王以下皆受东王节制。又封秦日纲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其余有功将士均晋封官职。十二月十四日正式颁行天历，废清朝纪年，以金田起义之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本年为壬子二年。规定一年为三百六十六日，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六节气为十六日，其余十八节气皆十五日。仍以干支纪年，但将地支中"丑"改为"好"、"卯"改为"荣"、"亥"改为"开"。又颁布"太平礼制"，规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尊卑等级和烦琐的礼仪制度。另外，洪秀全还多次诏令全军不得私藏所获财帛等物，一切金宝绸帛尽归天朝圣库，违者议罪；不得违反十款天条；不要受清军诱惑以及命人民蓄发；刊刻颁行太平天国官方文书等等。"永安建制"为太平天国政权奠定了初步规模。

捻军起义爆发 咸丰元年至四年(1851—1854)，河南、安徽等地捻军纷纷举行起义，并逐渐汇合在一起，号称"捻军"，成为太平天国以外另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捻军，最初称捻党、捻子。起源于清初，本为淮河两岸贫苦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秘密团体，以后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成员包括农民、手工业者、盐贩、渔贩、游民、裁撤兵勇和下层知识分子。早期主要以抗粮、抗差、吃大户、劫富济贫等为主要活动，一般数十人至数百人为一股，谓之一捻、出则为捻，居则为民，互不统属，也无统一纲领、旗帜，各部首领皆称为"捻头"、"趟主"等。太平天国兴起后，各地逐渐掀起反清起义高潮。河南、安徽等地捻党群起响应。咸丰元年，南阳捻党乔建德聚众两千在角子山起义；李大、李二聚众千余在南召起义；凤阳、颍州等地捻党也纷纷起事。咸丰二年初，安徽亳州和盐贩子张乐行及龚得树等著名捻头，在安徽蒙城雉河集聚众万余发动反清起义，一度攻占河南永城，遂开始有"捻军"之称。十月，永城冯金标、亳州朱洪占、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人分别结捻起义，拥立张乐行为总首领，在蒙城、亳州一带从事反清斗争。咸丰三年四月太平军北伐，进一步推动了各地捻军起义的发展。五月夏邑王冠山起义，六月阜阳李士林、固始刘吉元、霍丘与固始边界的李昭寿、薛之元等分别起义，九月蒙城、亳州一带五十八捻联合，以武大僧、马和尚、陆风、汪邦位为首领，号称"四大天王"，积极开展反清活动。咸丰四年二月，北伐援军由皖北入豫，苏天福率众起义至永城，当地捻党四千余人起义响应；雉河集、义门集地区白莲教兼捻军首领张捷三聚众万人起义，自称"太平顺天王"，树"太平天国金田正将军"旗号。各地捻军起义的爆发，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的北伐。

永安突围 咸丰二年(1852)二月十六日，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先是，咸丰元年年底，清钦差大臣赛尚阿亲赴前线，督广西提督向荣与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从北南两路大举进攻永安城，并设长围断太平军粮道。二月十四日，城中粮尽，洪秀全下令突围。十六日深夜，罗大纲率兵两千击破东北古苏冲清军，得火药十余担，从水路出关，为太平军主力突围打开通道。三更以后，两万余太平军分批撤离州城东去。十七日上午，清军赶到古苏冲，太平军主力已然突围，后卫部队与清军激战至傍晚。十八日，乌兰泰率部抢占龙寮岭高地，进犯平冲，夹攻秦日纲部，太平军战死两千余人。时洪秀全等已抵昭平，闻讯立即命主力占据平冲、旱冲、崩冲两侧山梁及前后隘口冲渠，设伏以待清军。十九日清晨，当向荣、乌兰泰等率军进入三冲峡谷时，两侧伏兵齐起夹攻，并截断其退路，清军大败。是役，清军被歼四千余人，天津镇总兵长瑞、闵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等毙命，乌兰泰受伤。太平军乘胜由小路直趋桂林。

蓑衣渡激战 咸丰二年(1852)四月十八日，太平军与清军江忠源部大战于广西全州蓑衣渡。先是，太平军于四月初撤桂林之围北上，十六日攻克全

州。十八日，太平军水旱两路继续北进，行至蓑衣渡遇伏。蓑衣渡在全州城北十余里，临近湖南，重峦叠嶂，山有山坳可通。渡口西岸有沙滩突出河面，故渡口河床窄仅百米。清知州江忠源预先率部于渡口北约三里的水塘湾一带砍伐竹木，打桩拦船，堵塞河道，设伏兵于两岸山岗。太平军舟师至此，遭突然袭击，不能前进，与清军激战两昼夜，损失严重。洪秀全弃舟登陆，攻全州时中炮受伤的冯云山因伤势恶化不幸牺牲，将士伤亡甚多，辎重丧失。太平军被迫改变原定水旱两路直取长沙计划，从陆路进袭永州（今零陵），未克，乃南折攻占道州，进行休整、扩充。

太平军进军湘南　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在蓑衣渡受挫后，改变原定计划，由陆路攻入湘南。二十五日攻克道州，随即以道州为大本营，分兵掠地，相继攻占附近江华、永明等县，七月初三日攻克湘南重镇郴州。太平军在攻占道州、郴州等地之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借以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扩充力量。约有五万余人加入太平军。其中包括许多经过战斗锻炼的天地会会众，也有不少道州、郴州一带的挖煤工人。由他们组成的"土营"，擅挖地道，在以后一些攻坚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道州休整期间，太平军领导层中曾就今后战略问题进行过一番争论。一些人代表了占太平军大多数的广西农民"怀土重迁"的情绪，主张取道灌阳返回广西，天王洪秀全也有入粤之意，但遭到东王杨秀清的反对。他认为，"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为今之计，只能继续北进入湖北，然后东向直取南京，据为根本，进而夺取天下。洪秀全接受了杨秀清的正确意见，确定了继续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另外，太平军在进入湘南以后，还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的名义，相继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谕》三篇文告。文告中，对清王朝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历数了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来残害汉族人民的滔天罪行。并特别对汉族知识分子责以民族大义，号召他们变计来归，与人民群众一起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同享太平"的理想社会。文告的发布，表明太平天国在宣传方面已突破了单纯的宗教形式和内容，直接向清朝统治挑战，它不仅起到振奋人民群众革命精神的作用，而且具有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共同反清的策略意义。文告发布后，迅速传遍四方，甚至武昌内外，"亦多有之"，对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扩大太平天国的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

叶赫那拉氏入宫　咸丰二年（1852）五月初九日，叶赫那拉氏以秀女身份入宫。那拉氏为满洲贵族叶赫那拉族后代，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之女，乳名兰儿。咸丰元年被选中秀女，次年入宫，被咸丰帝看中，封兰贵人。后屡次进封，至咸丰七年封懿贵妃。咸丰帝死后，那拉氏因为新皇帝生母，"母以子贵"，被尊为"圣母皇太后"。"辛酉政变"后"垂帘听政"，从此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去世，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奉行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政策，是为清末反动势力的总代表。

广西"升平天国"起义　咸丰二年（1852），广西南宁天地会会众在胡有禄、朱洪英等领导下发动起义。胡有禄为广西武宣人。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即与其兄胡有福与罗大纲等在湖南宁远聚众起事，进攻阳朔失败，胡有福牺牲。咸丰二年，胡有禄在南宁再举义旗，且与起义于湘桂边界的湖南东安人朱洪英联合，人数从数千迅速发展到三、四万人，转战于湘桂边境地区。咸丰三年五月，起义军攻克湘南永明县城，次年八月十八日攻占广西灌阳，建号"升平天国"。朱洪英称"镇南王"，胡有禄称"定南王"。奉"太平天德"年号。起义军以红巾包头。故亦称"红巾军"。曾进攻湖南道州、嘉禾、江华等地，并占领灌阳附近的恭城、富川一带。咸丰五年二月，太平天国天官丞相罗大纲使人邀其前往会合，胡有禄、朱洪英乃下令蓄发，并于四月出兵进袭湖南东安，然后北上欲与太平军会师。途遇清湖南巡抚骆秉章率师堵截，内部又发生邓正高叛变事件，使北上计划受阻。八月，湘军王鑫等部加紧围攻东安，起义军战斗失利，被迫撤离。胡有禄率部转战于湖南邵阳、祁阳等地，最后在新宁被俘遇害。朱洪英率部退回广西，转战于湘桂黔三省边区。后重又挥师入湘，同治十三年（1874）在湖南宜章被捕就义。余部由陈永秀等率领重返广西，继续坚持反清斗争。

厦门人民反对掠卖华工　咸丰二年（1852）十月，厦门人民掀起一次反对外国殖民者掠卖华工的斗争。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殖民者就开始以澳门为基地掠卖中国人口。战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外国侵略者更加变本加厉，公开以厦门为中心，在上海、广州、汕头、香港、澳门等地掠骗中国劳动人民，贩往美洲、非洲、澳洲及东南亚一带作苦役。据统计，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厦门被掠卖的华工有二百八十名，咸丰元年竟达二千零六十六名，因而激起厦门人民的反抗斗争。咸丰二年十月十日，厦门人民捕获为英商合记洋行拐骗华工的人贩子，扭送至参将衙门惩办，而英国人桑穆竟明目张胆地将人犯从参将衙门带走，厦门人民大为愤怒。次日，人民群众在全城张贴告白，并全体罢市，对外国殖民者提

出警告和抗议。十三日，一千五百多名厦门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合记洋行门前示威，英国侵略者竟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八人，重伤十六人，轻伤无数。清朝官府不但不为死难群众作主，反诬蔑人民"煽动生事"，出动军队将示威群众驱散，事后也仅要求英军赔偿，不敢提及惩凶。愤怒的厦门人民拆毁洋行，惩办汉奸，袭击运载华工的船只，迫使英人中止了在厦门掠卖华工的罪恶活动。

太平军进军湖北　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初七日，太平军水旱两路从岳州起程进军湖北，直趋武汉。先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侦知长沙清军兵力空虚，乃命西王肖朝贵率兵两千，从郴州出发，北上攻取长沙。其时长沙守军只有八千，如太平军主力继至，破城有望。但由于洪秀全等因道、郴之胜而轻敌，未能及时支援，使肖朝贵兵力单薄，攻城只限于南城一隅，不能致敌死命。后清军援兵四集，肖朝贵于七月二十九日中炮受伤，不久去世。洪秀全得到消息，方于八月二十八日率军抵达长沙城下，此时长沙城防清军已达数万，对太平军的进攻拚死抵抗。洪秀全、杨秀清等乃改变作战部署，派石达开率部渡湘水西进。十月十九日夜，太平军主力撤长沙之围，西北走宁乡、益阳，转攻"楚北门户"岳阳。在岳阳一带，太平军缴获大量武器、船只，吸收大批渔民、船户、纤夫等参军。洪秀全封唐正才为典水匠职同监军，统率众船，正式建立水营。十一月初七日，太平军主力水旱两路从岳州出发，"千舡健将，两岸雄兵"，大举进军湖北，兵锋直指武汉。十三日，太平军攻克汉阳，十九日夺取汉口。在汉阳与武昌之间辽阔江面上，太平军搭起浮桥，横跨长江。十二月，大军强渡浮桥，向武昌发起猛攻。初四日太平军挖掘地道，轰塌文昌门城墙，攻占武昌城。是为太平军出师以来攻占的第一座省城，进军湖北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太平天国《天命诏旨书》刊行　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刊行《天命诏旨书》。书中辑录天父(代言人东王杨秀清)、天兄(西王肖朝贵)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贵县、咸丰元年在东乡至永安等地下凡时的圣旨，以及天王洪秀全自金田至长沙发布的诏旨。并以之作为太平天国教育课本，要求太平军将士"通军熟读记心，免犯天令"，"识法忌法"。

太平军进军南京　咸丰三年(1853)正月初二，太平军自武汉出发，水师战船万艘，顺流东下，陆军于两岸屏障水师，长驱直捣南京。先是，太平军连克武汉三镇，威胁苏皖，震撼豫蜀，使清廷大为惊慌。咸丰帝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以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又破例增设两钦差大臣：一为署河南巡抚琦善，率军进防信阳、新野；一为两江总督陆建瀛，督师扼守江皖。是时，在太平军内部，针对今后战略，产生三种意见，争论十分激烈：一为北进河南，问鼎中原；二为西入巴蜀，"再图四扰"；三为东下江南，占领南京。最后，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令其直犯江宁"，确定了顺江东下，取南京以为根本，徐图进取的战略方针。其时清廷在长江下游一带防御薄弱。钦差大臣向荣跟在东进的太平军身后，只知尾随，不敢追击。太平军在广济老鼠峡下巢湖一战，阵斩清寿春镇总兵恩长，击溃所部清军约三千人，两江总督陆建瀛闻讯逃回南京。太平军连下九江、安庆、芜湖，正月二十九日直逼南京城下，陆军占据雨花台，水师扎营于水西门外。南京城内一片惊恐，文官"茫然不知守御"，武将"原不知武为何事"。守城清兵五千，半数为驻防八旗，外加乡勇万余，"皆市井无俚"，城未破已四散逃命。太平军兵临城下，一面积极准备攻城，一面宣传革命宗旨，动员群众支持。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太平军于二月初十日以地雷轰塌南京北城仪凤门，攻破外城，斩陆建瀛；次日分别从南城聚宝门及水西门、旱西门入城，破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等。前后不过十二天，整个南京遂为太平军占领。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　咸丰三年(1853)二月二十日，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改名"天京"。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何去何从？又在太平天国两位主要领导人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产生了分歧。天王洪秀全主张分军镇守江南，主力直趋中原，取河南为基业，直捣北京。东王杨秀清却计不出此。认为攻克南京标志着革命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产生了"建都即成，天下大定"的思想，假借"天父下凡"，压洪秀全同意建都南京。于是，太平天国"奉天体天之意"，将南京改名"天京"，并发布《建天京于金陵论》，正式建都于此。

清政府创设厘捐　咸丰三年(1853)三月，雷以诚奏请在河南、江苏等地推行厘捐。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税收减少，军饷激增，部库储存渐趋枯竭。咸丰三年二月底，帮办扬州军务刑部侍郎雷以诚采纳幕客钱江建议，在扬州里下河地区仙女庙、邵伯、宜陵等镇劝谕米行"捐厘助饷"，随即奏请朝廷于河南、江苏等地府县广泛推行"抽厘"。抽厘亦称"厘捐"，是对运销过程中的日用必需品抽收百分之一税款，作为临时性筹款措施，实为变相捐输。厘捐分"活厘"(亦称"行厘"，抽行商之货物通过税)、"板厘"(亦称"坐厘"，抽坐商交易税)，又分"从量抽厘"与"从价抽厘"。后经胜保奏请推行于其他各省，咸丰五年，

湘、鄂、川、新、奉、吉、皖、闽等省相继仿行。咸丰七年,胜保复奏请于全国各省一律办理。后名目日见繁多,如统税、统捐、产销税、铁路货捐等等,且税率极不一致,并不限于值百抽一。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并未将厘捐撤消,继续征收,直到清末。民国二十年(1931),民国政府始将其正式裁撤。

英使文翰访问天京 咸丰三年(1853)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英国香港总督兼出使中国全权代表文翰访问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先是,当太平军沿江东下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向文翰建议,由英国出面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并借此向清廷索取更多的特权,但当文翰赶到上海,准备找两江总督陆建瀛谈判此事时,陆建瀛已死,南京已为太平军占领。于是,文翰改变计划,派翻译密迪乐至前线了解太平军情况,得出结论:清朝在南中国的统治权已不复存在,如果外国进行干涉,只能无限期延长兵灾与混乱。六月,英、法、美先后宣布"中立"。十五日,文翰自上海前往天京,考察太平天国实况,探寻其领导人对外国的态度。当文翰一行的座舰驶入太平天国水域时,太平军镇江、瓜洲炮台开炮示警,英舰被迫停驶,说明原委,始得通过。二十日,文翰及其随行人员翻译密迪乐、"哈尔士"号舰长费尔班、帮办事务吴德格等抵达天京。先派密迪乐等拜会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表示英国将"绝对保守中立"。对此,韦昌辉等明确回答:"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又表示,只要英国不助满人,彼此可以相安无事,甚至成为亲密的朋友。次日,文翰书面照会太平天国,要求承认中英《南京条约》及英国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二十三日,东王杨秀清复照文翰,表示如其忠心归顺,愿为藩属,则许其"头人"及"众弟兄"随意来天京,或效力,或通商,悉听其便。二十五日,文翰离开天京,行前再次声明英国在华之条约权益,希望太平军进抵上海时,不要侵犯英人生命财产,若遭侵犯,必将引起与鸦片战争相同的结果。二十六日,文翰抵镇江,派密迪乐会见守将罗大纲。罗大纲警告英人勿助清兵,勿售鸦片。二十八日,文翰回到上海,此次访问,使文翰了解了太平天国对外政策,虽令其大失所望,但也亲眼看到太平军强大的实力,不敢冒然公开帮助清政府,决定暂时采取观望态度。

福建小刀会起义 咸丰三年(1853)四月,福建爆发小刀会起义。"小刀会"作为南方民间秘密结社,创始于乾隆年间。道光二十九年(1849),归国华侨江源、陈正成等在厦门建立小刀会,后又在广州、上海、宁波等地发展组织。其归国时,购得洋小刀数百,遍赠同类,结为小刀会,其臂力超人者,用双刀,故又名双刀会。太平天国起义后,福建海澄一带小刀会发展到二、三千人,准备起义。后因事机不密,江源、陈正成等为清廷捕杀,会务遂由黄威(或称黄位)主持。咸丰三年四月初七日,黄威与黄德美等率领会众在海澄起义。初十日攻克漳州,击毙清总兵曹三祝、汀漳龙道文秀等。十一日占同安、厦门、十二日占漳浦。起义军在厦门建立政权,黄威以"汉大明统兵大元帅"名义发布文告,指斥清朝黑暗统治,号召人民进行革命,在其占领区内免除苛捐杂税,并派人赴天京与太平天国联系,未成。清廷调重兵反扑厦门,黄威等率起义军顽强抵抗,多次击退清军及团练的进攻,终因粮尽援绝,于十月十一日退出厦门。黄威率众入闽粤海面,坚持斗争到咸丰八年;黄德美退至龙溪,为当地团练所俘,起义失败。

福建红钱会起义 咸丰三年(1853)四月,福建永春县霞陵人林俊领导红钱会起义。红钱会为福建天地会一支,采用康熙年间铜钱式样,刮去康熙二字,中涂红色,以为会徽,会众各持一枚作为标记,故名。咸丰三年四月,永春武秀才林俊(又名林万青)与童森、黄有、苏卓等领导红钱会众在其家乡霞陵与黑钱会首领陈湖联合发动起义。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先后攻克德化、永安、大田、沙县、龙溪、仙游、安溪等州县,与黄威领导的厦门小刀会相呼应,转战闽北山区达五年之久。林俊曾派人与太平天国取得联系,洪秀全封其为烈王(或曰顺义侯)。咸丰八年,太平军杨辅清部入福建,林俊闻讯,自顺昌县北上迎接,途经光泽仁寿桥,遭地方团练伏击,林俊战死。余部在永春一带继续坚持斗争,同治四年(1865)被左宗棠镇压。

太平军出师北伐 咸丰三年(1853)四月初一日,太平军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太平军精兵两万,自扬州出师北伐。随后,春官正丞相吉文元、殿左三检点朱锡琨亦分别自浦口、六合相继统军北上。北伐军本着"师行间道,直趋燕都"的战略方针,一路过关斩将,连克仪征、浦口、滁州、凤阳、怀远、蒙城、亳州等地。五月初六日大败清河南巡抚陆应谷部,于初十日占领归德(今商丘)。本计划在此渡河,因清军封锁了一切船只,遂西进攻开封。不克,继续西进,于汜水、巩县一带觅船渡过黄河。七月二十八日,自济源入山西,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洪洞,经屯留,占潞城、黎城,折回河南,自涉县、武安入直隶,击败清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所部万余人,乘胜占沙河。八月十一日,进兵距保定六十里之张登店。清廷大震,京师设巡防所,宣布戒严,咸丰帝

准备逃往热河，三万多户官民逃出北京。但北伐军并未直接北上，而是东进克献县、交河、沧州，前锋直达杨柳青，进攻天津。由于天津布防严密，且时近冬令，太平军不惯寒冷，攻天津受阻，乃屯兵于静海，独流一带，过冬待援。是时，清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钦差大臣胜保等屯兵于杨村一带，与太平军形成对峙局面。咸丰四年正月，北伐军在既缺粮草、又断音信的情况下，主动放弃静海、独流，步步为营地向南撤兵，希望与援军会合，但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太平军出师西征 咸丰三年(1853)四月十二日，太平军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殿左一检点曾天养、殿右八指挥林启容等，奉东王杨秀清之命，统帅战船千余只溯江西上，大举西征。十八日，西征军进占安徽西梁山、裕溪口、雍家镇。五月初一日占池州，初四日攻克安庆。赖汉英、曾天养、林启容等继续西进，初七日占江西彭泽，十二日占湖口，十六日占南康府，人民缚知府恭安、知县罗云锦近迎太平军。十七日占吴城镇，十八日围攻南昌。清江西巡抚张芾、湖北按察使江忠源等顽强固守，赖汉英乃决定先攻占附近州县，断其接济，再全力攻城。于是丰城、瑞州、饶州、乐平、景德镇、浮梁、都昌等地先后为西征军攻占。五月二十七日，太平军国宗石祥祯、韦俊等率军进援江西。六月十八日，曾国藩亦遣知州朱荪诒率湘勇一千二百人自长沙援江西、训导罗泽南，编修郭嵩焘等率军数千驰援。七月二十四日，西征军攻湘军罗泽南、朱荪诒、郭嵩焘等于南昌附近。后杨秀清以西征军攻南昌三月不下，命撤围北上，八月二十七日占九江。后西征军分兵两路：一路由石祥祯、韦俊率领，沿江西上攻入湖北；一路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自安庆经略皖北。赖汉英以攻南昌不力，革职调回天京。

清政府发行当十钱 咸丰三年(1853)五月，清政府为解财政拮据之急，开始发行当十钱。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连续不断的内忧外患，使清王朝财政日益困窘。为解燃眉之急，遂开始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首先是减重小钱的出现。按雍正年间定制：每枚制钱应重一钱二分，每千枚应重七斤八两。道光年间开始出现不足重量铜钱，每千枚仅重四、五斤，工部宝源局与户部宝泉局所铸之钱也大小不一，且有掺铅过多现象。咸丰三年五月，清廷批准铸造发行当十钱，每枚仅重四钱四分。以后，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相继出现。皆远远不足规定重量，其中当千大钱每枚仅重二两。咸丰七年又出现铸铁制钱和铅钱。后这些新钱因币值不足，难以流通，不得不停止铸造，但因此而造成币制败坏，金融混乱，财政拮据问题不但未能解决，反而愈加严重。

清政府发行官票、宝钞 清政府在铸行不足值之金属货币的同时，又开始发行纸币，与制钱并行。咸丰三年(1853)五月，清政府开始发行官票，同年十一月发行宝钞，皆由户部负责。官票相当于实银，分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四种；宝钞相当于制钱，分五百文、千文、千五百文、二千文四种。同时规定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文，宝钞二千文抵银一两。后因发行数目过大，缺乏必要的准备，致使官票不能兑银，甚至宝钞也难以全部兑现，市面拒绝使用，流通困难。至咸丰十年，官票、宝钞终于停止发行。除户部发行纸币外，咸丰年间开始设立的京城及各省官银钱号也被授权发行纸币，更是漫无限制，信用尤差。京城官钱局不数年即告裁撤，而地方各官钱号则一直照发纸币，致使整个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太平天国铸钱 咸丰三年(1853)六月，太平天国正式在天京朝天宫开炉铸钱，设专官司其事，共四人，职同指挥。试制多时未成，直至次年五月以后方才成功。太平天国钱币分金币、银币(两者非通用品)、大钱、中钱、小钱诸种。金币状若铜钱，中间方孔未穿透，银币分大小两种，小者如小铜钱。大钱似为开炉钱或镇库钱，又有如吉利钱者，重八点一二五公两。中钱有当百钱、五十钱、十钱多种，轮廓与外国银圆相似，每枚重五钱至一两不等。小钱当一文，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各种钱币一般为圆形方孔(间有圆孔)，正面为“太平天国”四字(初期作“天国”，也有作“太平”者)，背面为“圣宝”二字，间有作“通宝”者，还有不刻者，种类较杂。太平天国早期曾以锡造金田起义钱，面文为“太平通宝”，背上刻云龙、风虎，且有“会风云”三字，后期在地方如江苏苏州、浙江杭州等地也有铸造，不如前期严整划一。太平天国铸钱不计工本，讲求质佳工良。大钱量重，尤为精美。因其质量远较清朝“咸丰通宝”、“同治通宝”为佳，故不论清廷如何严禁，仍多有流至清朝统治区者。

上海小刀会起义 咸丰三年(1853)八月，刘丽川等在上海领导小刀会起义。上海小刀会创立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首领为刘丽川、周立春等。刘丽川，广东省香山县人，农民出身，曾做过伤科医生，道光二十五年加入天地会。道光二十九年到上海，与福建人陈阿林、江苏人周立春、潘启亮等联合兴安会馆董事李仙云、嘉应公所董事李少卿、上海商董徐渭仁等建立上海小刀会。对外称“义兴公司”，主要成员为农民、城市劳动者、失业船夫以及受外国侵略者排挤的中国行会商业资本家。咸丰三年七月十三日，嘉

定农民千余人在徐耀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一度占领县城。随即与上海小刀会周立春等联合，于八月初三日再次攻占嘉定。初五日，刘丽川率上海小刀会起义响应，占领上海县城。杀死知县袁祖德，活捉苏松太道吴健彰。刘丽川在上海建立“大明国”，后改名“太平天国”，自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并上书洪秀全，表示愿意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小刀会起义军纪律严明，又于上海全城遍贴布告，痛斥清朝及外国侵略者罪行，阐明起义宗旨为“反清复明”，故从者甚众。不久相继占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并计划与苏州小刀会起义军配合，夺取苏州。小刀会占领上海，使围困太平天国天京的江南大营之主要饷源江海关税收陷于停顿，且势必影响到即将到来的海运漕粮，故清廷大为惊恐，急调江南大营军队前来镇压，八月二十日，清军攻入嘉定，周立春被捕，死于苏州。小刀会退出青浦等地，集中力量守卫上海县城。从此，小刀会起义军从进攻转入防御，继续与清朝统治者及外国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田家镇激战　咸丰三年(1853)九月，太平军西征部队在湖北田家镇半壁山大破清军。八月底，太平军石祥祯、韦志俊等率部自江西九江进占湖北武穴镇，并进攻田家镇。清署湖北按察使唐树义、前武昌府同知劳光泰、总兵杨昌泗等督兵死守。太平军遂改变作战计划，准备先以水旱两路大军夺取长江南岸的半壁山，进而控制江面及北岸的田家镇。适值清湖北按察使江忠源率部增援田家镇，使清军兵力增加到近万人。九月十三日，太平军数万人马水陆并进，向清军阵地发动猛攻。江忠源先赴水营督战，令开炮迎击。寻水营兵溃，战船几为太平军所获，急登岸率陆师顽抗，又告失利，只得败走广济。唐树义、劳光泰、杨昌泗等皆败逃，清军全军覆没。太平军遂占领田家镇，并长驱入鄂。

法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　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初六日，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访问期间，布尔布隆以镇江、扬州天主教徒受到太平军“迫害”为名，向太平天国提出责难，要求太平军保护天主教。太平天国顶天侯秦日纲接见了布尔布隆，声明太平军未曾压迫天主教徒，同时警告布尔布隆，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帮助清廷与太平天国为敌。布尔布隆在天京期间，亲眼看到太平军纪律严明，天京秩序稳定。因此，离开天京后，他建议法国政府采取“中立”政策，未敢公然与太平天国为敌。

三汊河激战　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太平军为援救扬州守军，与清兵大战于扬州西南十五里之三汊河。先是二月，太平军占领扬州。四月，林凤祥、李开芳等率军自扬州出师北伐，留曾立昌、陈仕保等镇守该城。清钦差大臣琦善等设江北大营围困扬州。六月，太平军自瓜洲赴援，攻取三汊河失利。九月，太平军于虹桥战胜清参将冯景尼，进驻三汊河。十一月初，太平军以扬州被困甚急，粮道断绝，复派赖汉英、石镇仑率部救援。先从仪征进袭未成，遂改由三汊河沿运河推进，步步为营，大举进攻。二十四日击溃清据守扬子桥的冯景尼部，复连败清参将师长镳、知事张翊国、刑部侍郎雷以諴等，直抵扬州城下。二十六日夜，曾立昌、陈仕保等率城内太平军及当地百姓安全撤出，南退至瓜洲。事后，太平天国对参战将士予以表彰，皆授予“平胡加一等”勋位。

杨秀清假托天父杖责洪秀全　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二十四日，东王杨秀清借口洪秀全苛责女官，假托天父附体，杖责天王洪秀全。杨秀清本为紫荆山烧炭农民，在当地据有一定号召力，经冯云山介绍加入拜上帝会。道光二十八年三月，杨秀清借营救冯云山之机，取得“代天父传言”特权。太平天国起义后，杨秀清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成为地位仅次于洪秀全的太平军实际领导人。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杨秀清借口洪秀全苛责女官，假托天父附体，要对洪秀全杖责四十。北王韦昌辉等再三恳请开恩宽恕和代为受杖，均遭拒绝，直到洪秀全俯首听命，接受杖责，方才罢休。事后，洪秀全不忿，借杨秀清上朝劝慰之机指桑骂槐，杨秀清针锋相对，隐约警告。双方假戏真做，彼此心照不宣，最终以相互妥协而告结束。

《天朝田亩制度》颁布　咸丰三年(1853)冬，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咸丰十年重刻刊行。基本内容如下：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切土地归天国所有，按产量高低分为九等：亩产一千二百斤为第一等上上田，以下以一百斤递减，至亩产四百斤为第九等下下田。分田不论男女，十六岁以上全份，十五岁以下减半，杂以九等，好坏搭配。二、寓兵于农，全体人民依太平军编制组织：五家为伍，设伍长；五伍为两，设两司马；四两为卒，设卒长；五卒为旅，设旅帅；五旅为师，设师帅；五师为军，设军帅。自两司马至军帅，称乡官，选本地人充任。军帅以上，县设监军，郡设总制，称守土官，由上级委任，以构成地方各级管理机构。以“两”为基本行政单位，设“圣库”及礼拜堂各一座，由两司马总管二十五家的生产、分配、行政、司法、教育、礼俗、宗教及军事训练等各项事务。每一农户为一生产单位，除种地外，还要从事植桑养蚕、纺织和饲养鸡、猪等家庭副业，所获农副产品，除留够全家衣食至可接新谷外，其余一律交入

圣库，遇有婚丧嫁娶，由圣库支付所用，一切鳏寡废疾者皆由圣库供养。三、各级官吏皆需遵守“十款天条”及上级命令，尽忠报国者提升，受贿弄弊者贬黜，详核其统属，列明贤恶，逐级上报，保升奏贬。普通民众遵条令和力农者或举或赏，违条令和惰农者或诛或罚。《天朝田亩制度》本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精神，否定封建土地私有制，集中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得到土地的愿望，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但它要求在小生产基础上废除一切私有财产，平均一切社会财富，只能是一种幻想，不可能付诸实施。

太平天国开科取士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正式开科取士。原定每年十二月初九日(天历)天王诞辰举行，旋以幼天王于十月出生，遂改于十月初一日举行。咸丰九年后改为九月九日文试，九月十九日武试。每试取元甲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封职同指挥；二甲无定额，称翰林，封职同将军；三甲无定额，称进士，封职同总制。中试者皆于其称呼前加“天试”字样。考试用八股试帖体，题目出自《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和《天命诏旨书》等。应试者不论门第出身。自咸丰三年至同治元年(1862)共开十科。咸丰九年洪仁玕总揽文衡，改定考试制度，于咸丰十一年颁布《士阶条例》，规定改三年一科；文试进士改称达士、翰林改称国士，武试进士改称壮士，翰林改称威士；除二甲首名传胪仍封职同将军外，国士、威士职同总制，三甲首名会元职同监军，达士、壮士职同军帅。原定同治三年起照新制度实行，因天京失陷未果。太平天国科举考试除上述“天试”外，尚有“东试”、“北试”、“翼试”数种。东王杨秀清生日在八月，北王韦昌辉生日在六月，翼王石达开生日在二月，故“东试”自咸丰三年至咸丰六年杨秀清去世，每年八月初十举行；“北试”自咸丰四年至咸丰六年韦昌辉去世，每年六月二十日举行；“翼试”自咸丰四年至咸丰七年石达开出走，每年二月初一举行。考试内容、形式及取士授职等与“天试”大体相同。(以上日期凡“月”、“日”皆为天历。)

湖南朱九涛起义 咸丰三年(1853)，湖南爆发朱九涛领导的天地会起义。朱九涛本名邱昌道，湖南郴州人，天地会大首领，假托朱明后人。咸丰元年改名为朱九涛，以“广东老万山”为本堂堂名，组织群众，准备起事。咸丰三年，朱九涛与王大才、黄中环等率众数千人在郴州发动武装起义，自称“太平王”，击败知州戚天保，击毙团总喻德位，活动于郴州及永兴一带，以油榨墟为基地。湖南巡抚骆秉章闻报，派悍将罗泽南率湘勇前来镇压。咸丰四年，油榨墟失守，朱九涛率起义军突围，次年在郴州周源山被戚天保捕杀，起义失败。

贵州杨元保起义 咸丰四年(1854)正月，贵州独山布依族农民在杨元保率领下举行武装起义，揭开了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序幕。杨元保原籍广西，贫苦农民出身，参加过李沅发领导的天地会组织，后移居贵州独山州播让村。因其父带头抗捐被捕，惨死狱中，遂领导当地布依族农民起义反清。数日之间，起义军即发展到数千人。除布依族外，水族、苗族、汉族农民及手工业者也纷纷加入起义队伍。驻守独山州的清军前来镇压，为起义军所败，整个黔南为之震动。贵州巡抚蒋霨远闻讯，急派官军数千前来围剿。杨元保率起义军奋起抵抗，连败官军。二月，起义军围攻独山州城，遭清军内外夹击，战斗失利，被迫退回播让等山寨固守。三月，复撤至广西边境，杨元保被俘，被解送贵阳，四月在贵阳遇害。起义失败。

湘军成立 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建成一支新式团练武装——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发展与壮大，清王朝统治陷入危机。作为其主要统治支柱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强大的太平军面前，显得腐朽不堪，“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面对这一现实，清朝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将挽救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曾于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地方团练武装身上。咸丰二年七月，太平军进攻长沙，咸丰帝特命陈孚恩帮办江西团练防堵事宜；十二月，太平军进攻武昌前夕，复命湖南在籍侍郎曾国藩帮同办理湖南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咸丰三年正月、二月间，又于南北十省中先后任命四十多位在籍大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但是，这班大官僚大多昏庸之辈，所办团练往往成效甚微，只有曾国藩脱颖而出，靠练湘军起家成为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中兴名臣”。咸丰四年正月初一日，曾国藩从湘乡赶到长沙，开始筹练湘军。他深悉绿营中普遍存在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将腐朽，不堪一击的种种弊端，故所练湘军依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所创“戚家军”为模式，以家族、乡土、师生关系等为纽带，网罗了一批文人士子作为将领。所有勇壮皆由各营营官自行招募，只服从营官一人，各营编列番号，互不统属，直接受曾国藩指挥。其陆师每营五百人，下分四哨，每哨八队，火器刀矛各半；水师每营四百余人，配有快蟹、长龙、舢板等船二十一艘，后增至勇壮五百余人，船三十艘。整个湘军从上至下采用层层相依、

各对其上级负责的办法，由曾国藩指定统领，统领自选营官，营官自选哨官，哨官自选什长，从而开创近代军阀制度“兵为将有”之先河，成为清代兵制一大变革。曾国藩以封建纲常伦理思想武装湘军，各级军官主要从文士中选拔，以儒教治军。同时还特别重视新式火器的运用，从外洋购置大批枪炮，用以装备湘军。因此，这只新组建的军队战斗力较已往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强出甚多。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湘军初步建成，计陆师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加上夫役、工匠等后备人员共一万七千余人(后逐渐扩大到十三万余人)。出征前，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崇奉洋教、杀人放火、荼毒生灵、毁坏纲常名教。他以封建卫道士自居，打出维护儒家传统的旗帜，故具有很大影响与号召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

太平军增援北伐 咸丰四年(1854)正月和四月，太平天国两次派军增援北伐。先是，咸丰三年冬，北伐军攻天津受阻，屯兵静海、独流一带，派人回天京请援。次年正月初七日，东王杨秀清派夏官正丞相黄生才、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与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率部自安庆出发，增援北伐军。一路经安徽、河南、江苏进入山东。途中，北伐援军不断扩大队伍，吸收了大量起义农民、贫民及失业者。三月初，包围运河边工商业重镇临清。清山东巡抚张亮基、胜保及其先遣将军善禄等急忙增援临清。北伐援军击败张亮基、善禄等，于当月十五日攻占临清，清军逃出临清时，将城中粮草全部焚毁，使北伐援军无以为食。随即胜保及新任山东巡抚崇恩又包围临清，断绝了城中一切接济。北伐援军补给困难，部分新兵军心涣散，哗变、逃跑事件时有发生，乃于二十一日撤出临清，拟北上阜城。沿途新附者不听指挥，相率南行，清军乘机截击，北伐援军损失严重，二十七日退至清水镇。四月初一南退冠县，又遭地方团练及胜保马队前后夹击，新附者狂奔，全军溃败，遂由江苏丰县策马涉旧黄河，淤泥陷马蹄，除两千多人渡河南下外，其余全部殉难。曾立昌跃马跳河死，黄生才在冠县孔家集被俘，死于济南。渡河部队转战凤台展沟集，陈仕保战死，许宗扬逃回天京，被收入东牢。随后，太平天国又派燕王秦日纲领兵第二次北援，但刚到舒城，就兵败折回。此后，太平军主力既要对付围困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又要分兵于西战场与湘军激战，故再无能力组织北伐援军，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北伐部队。

张继庚案件发 咸丰四年(1854)二月，太平天国天京发生张继庚阴谋破坏案件。张继庚，字炳垣，江苏南京人，清朝禀生。咸丰二年秋，太平军进攻长沙时，曾随湖南布政使潘铎缒入长沙城，抗拒太平军。解围后，张继庚返回南京，协助清兵筹划城防。并募勇千余人助守城池。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张继庚混入韦昌辉典舆衙内教书，化名叶知法(或作芝发、知发、子法)，暗纠同伙，密盟谋叛。曾挑拨太平军湖南籍水营士兵与杨秀清亲兵互斗，并使人出城约清江南大营攻城。后虽因阴谋泄漏而破产，但张继庚因用化名而漏网。继与混入织营为总制的原南京监生吴复成合谋，煽惑水西门等处将士与杨秀清亲兵及织营人员约六七千人入盟。咸丰四年二月，师帅张沛泽发觉其阴谋活动，将张继庚逮捕，吴复成逃脱。张继庚被捕后诬陷太平军中两广、两湖籍将士为同谋，致使数十人无端遇害。咸丰五年，张继庚被杀。

靖港激战 咸丰四年(1854)四月，太平军在湖南靖港大败湘军。是年正月，太平军西征进入湖南，连克岳州、湘阴，二月初九日攻克靖港，旋取宁乡。曾国藩率湘军反扑，太平军在宁乡、靖港作战失利，撤回湖北。湘军乘势攻陷岳州，准备兼程东下，援救武昌，太平军重新集结兵力组织反攻，再度挺进湖南。三月初十日，太平军重占岳州，二十五日击败湘军水陆师，再克靖港，且以林绍璋部间道取湘潭，拟南北夹攻长沙。曾国藩为解长沙之危，派兵反扑湘潭，并亲自率领水师战船四十只、陆师八百人于四月初二日进攻靖港。太平军以猛烈炮火轰击湘军水师。曾国藩以水急风利，派人于两岸以缆绳牵舟缓行。太平军出队歼其牵缆之人，复以小划艇二百余只进逼敌船，乘风纵火，大败湘军水师，焚其战船三分之一。陆路湘军亦被太平军击溃。曾国藩损兵折将，愧恨交加，在靖港对岸铜官渚投水寻死，为其手下所救。

湘潭激战 咸丰四年(1854)四月，太平军西征部队在湖南湘潭为湘军所败。先是，三月初十日，西征军再克岳州。二十七日，林绍璋率部间道攻取湘潭，拟南北夹攻长沙，曾国藩于二十八日派副将塔齐布率湘军陆师进犯湘潭，复以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率炮船助战，所用大炮为英、美洋铁炮，远较土炮精利。四月初一日，湘军水陆并进，猛攻湘潭。太平军主将林绍璋指挥不当，内部不和，水师系临时以民船组成，战斗力较弱，致使作战失利。初三、初四两日，太平军陆路、水师接连受挫，初五日被迫自湘潭撤退，是役太平军前后水陆十战皆败，阵亡万余人，溃散亦以万计，船只被毁者近两千艘。林绍璋因此被革职，久未起用。湘潭之战后，太平军再次撤出湖南。湘军则长驱东下，直犯江西九江。从此太平军不得不以重兵对付湘军，不能再行支援北伐。

英、美、法开始第一次"修约"活动　咸丰四年(1854)四月,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联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到达广州,借口《望厦条约》中有关于十二年后变通贸易条款之规定,根据"最惠国待遇",今《南京条约》已届满十二年,应予修改,故致函清办理外交事务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全面提出修约要求,主要内容有: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进出口货物子口税,外国公使驻京。另外,美国公使提出:要在长江流域及其支流的任何口岸城市及港湾进行贸易,美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任何地区贸易、传教、居住,并取得租赁、建筑的自由;法使除提出类似要求外,还要求释放非法潜入陕西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法国传教士。显然,这些修约内容,早已远远超出对某些贸易条款"稍有变通"范围,而是企图再次强加给清政府一个比《南京条约》等更为广泛的不平等条约。对此,叶名琛当然不敢冒然答复,只得采取拒不接见,避不回答的办法。五月,包令与麦莲到昆山面见两江总督怡良,采取威逼利诱手段,再次提出修约要求,并扬言要到天津办理交涉。怡良仍采取敷衍办法,借口办理外交为两广总督职责,要他们回广州商办。七月,英、法、美三国公使串通一气,又一次向叶名琛要求修约。叶名琛仍抱着"接触愈少,麻烦愈小"的宗旨不予接见,并向咸丰帝建议,对付外国人的办法,"惟有相机开导,设法羁縻"。三国公使再次广州碰壁后,八月回到上海,利用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劝咸丰帝"允其所请",未被采纳。九月,英、美公使率兵船北上大沽口,要求到天津修约。清政府深恐侵略者借机寻衅,不愿在近畿重地谈判,乃派长芦盐政文谦与前任长芦盐政崇伦前往听取英、美公使意见,要求他们仍回广州交涉。英、美公使提出了更为广泛的修约要求,并以修约不成,即要发动战争相威胁。最后,咸丰帝仅同意减免外商所欠上海关税和广东茶税,其余一概不准。侵略者虽欲以武力达到目的,终因兵力不足,未敢妄动,只得于十月南返。第一次"修约"活动宣告失败。

广东何禄起义　咸丰四年(1854)五月,广东东莞天地会首领何禄聚众起义。何禄也称何六,广东顺德人,天地会首领。曾加入太平军。咸丰三年奉洪秀全之命回广东进行革命活动。次年五月,何禄在广东东莞石龙墟率天地会会众起义反清,拉开两广天地会起义的序幕。何禄起事后,广东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东江一带东莞、惠州、增城、博罗等地起义军皆推何禄为首领,率起义军参加广州围城之战,后继续活动于东莞一带。咸丰五年,两广总督叶名琛派官军前来镇压,起义军作战不利,何禄率众北上入湘南,相继占领郴州、桂阳、茶陵、永兴、酃县等地,以郴州为基地,与当地天地会起义军肖元发、焦玉晶、许月桂等部结合,共同抗击清军。咸丰六年,为湖南巡抚骆秉章所部王鑫、刘长佑等击败,两万余人牺牲,何禄于郴州毛栗墟被捕遇害。

陈开、李文茂起义　咸丰四年(1854)六月,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等起义反清。陈开、广东佛山人,驾船为业。该年六月十一日,陈开在广东南海县佛山镇率天地会会众举起义旗,建号"大宁国",自称"军师","大王",起义军号称十万,占据佛山。李文茂,广东鹤山人,原系粤剧艺人,早年加入天地会。陈开起义后,李文茂在广州北郊佛岭寺聚众响应,与陈开部汇合,起义军蓄发易服,头裹红巾,故有"红巾军"之称。旬日之间,连陷数十州县,使省城广州陷入"势孤援绝"境地。六月十九日,起义军围攻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纠集地方豪绅组织团练,并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抗拒。他先后从东莞、香山、新会、潮汕等地调练勇数万人到广州协助守城,又倚仗英、美、法等国船只运送援兵、粮食、武器等入广州城。起义军围攻广州达五月之久,未能攻克,于当年十一月底被迫撤退。叶名琛残杀起义群众,先后达十数万人之多。咸丰五年夏,陈开、李文茂会同广西天地会首领梁培友等率众四万余人,乘船千余艘,自广东肇庆出发,沿江西征,一路攻梧州,破藤县,经平南围攻浔州,于八月十七日攻克浔州府城。起义军在浔州建立革命政权"大成国",改浔州为"秀京",用"洪德"纪年。陈开称"镇南王",设官分职,征收赋税,铸造"洪德通宝"。以李文茂为陆路总管,梁培友为水路总管,领兵先后攻克贵县、武宣、象州、平南等地。咸丰六年十月,陈开、李文茂、梁培友在梧州会师,决定陈开改称"平浔王",驻浔州;梁培友称"平南王",驻平南;区润称"平西王",梁昌称"定北王",分驻大湟江;李文茂称"平靖王"。广西巡抚劳崇光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求援,骆秉章先后派蒋益澧、刘长佑等率湘军大举入桂镇压起义军。咸丰七年,梁培友在廖洞堡阵亡。次年梁昌被俘牺牲。咸丰九年李文茂在庆远深山中病逝。区润在浔州病逝,咸丰十一年七月,广西按察使蒋益澧攻陷浔州,陈开被俘牺牲,大成国败亡。

外国人控制上海海关　咸丰四年(1854)六月,上海海关落入外国人掌握之中。先是,咸丰三年八月,上海小刀会起义捣毁上海海关。外国侵略者借口代征税金,于八月初七日夺取上海海关管理权。次年六月初五日,清上海道吴健彰与英、法、美三国领事商定《上海海关章程》。根据这一协定,六月十八日,由英、法、美三国领事分别推举英国人威妥玛、法

国人斯密司和美国人卡尔为委员，正式成立“上海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由威妥玛总负责。咸丰八年威妥玛去职，由曾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职员的李泰国接任。

贵州黄兵起义　咸丰四年(1854)，贵州桐梓爆发“黄兵”起义。起义领袖是杨凤、陈寿、李时荣等。起义军皆以黄巾包头，自称“黄兵”，攻占黔北桐梓、仁怀一带。云贵总督罗绕典闻报，率军前来镇压。起义军南退余庆，在龙溪与官军作战失利，杨凤被俘牺牲。余部在邹辰保率领下继续斗争。咸丰九年被清军剿灭。

贵州斋教起义　咸丰四年(1854)八月，贵州桐梓一带爆发杨隆喜、舒裁缝等人领导的斋教起义。斋教又称“老官斋教”，系由明教演变而来的秘密宗教组织，崇奉弥勒佛，以“天国普有”为宗旨，与白莲教联系密切，素有反清传统。杨隆喜又名杨应龙，桐梓瀼里九坝人，斋教首领。他利用斋教号召群众，聚集力量，密谋起事。舒裁缝为遵义大溪里芝麻坪人，以裁缝为业，走遍滇、黔，曾参加过咸丰四年初杨元保起义，失败后潜回家乡，与杨隆喜结为密友。八月初，杨隆喜、舒裁缝等人在九坝聚集斋教教众及贫苦农民千余人，攻占桐梓县城。建立起义政权，以杨隆喜为都督大元帅，建号“江汉元年”，并发布檄文，痛斥满清暴政，申明起义宗旨，受到当地各族群众的支持。起义军横扫黔北，势力达于黔、川边境。清廷急调黔、滇、川三省军队前往围剿。十二月中旬，川军攻陷起义军后方九坝、桐梓；下旬，滇军与黔军侵占了起义军主要据点遵义雷台山。杨隆喜率部退往黔西安底、都匀一带，二三月间战败自杀。五月，舒裁缝也被清军捕杀，余部溃散。起义失败。

第二次田家镇激战　咸丰四年(1854)十月，太平军西征部队在湖北田家镇与湘军大战失利，损失严重。是年八月，太平军石凤魁、黄再兴部自武昌撤出，退守田家镇，与奉命来援的秦日纲部汇合，自田家镇至蕲州，沿长江北岸建土城四十里，又从田家镇横跨半壁山江面安设铁锁，并于半壁山上建营垒五座，引水为濠，严密布防。十月，湘军大举来犯，攻势甚猛。初四日，秦日纲与湘军道员罗泽南、知州李续宾部大战于半壁山，先胜后败，伤亡数千。适韦志俊、石镇仑、韦以德等率部自芜湖来援，初五日，于北岸田家镇分路渡江，与湘军塔齐布、罗泽南等大战竟日，石镇仑、韦以德等千余将士战死，被迫退回。十月十三日，参将杨载福、同知彭玉麟所部湘军水师以烘炉大斧斫断拦江铁锁，自江面进攻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败走武穴。湘军随后追杀，水师于江面纵火，陆师在南岸助攻，烧毁太平军船只约三千号。十四日晨，秦日纲、韦志俊等率部自田家镇东向退至黄梅。

沙俄穆拉维约夫武装航行黑龙江　咸丰四年至咸丰七年(1854—1857)，穆拉维约夫不顾清政府抗议，先后四次派遣船只，运载大批侵略军非法闯入黑龙江。道光二十七年八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授意其放手侵占中国黑龙江地区。咸丰三年十月底，穆拉维约夫根据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大祭司巴拉第提供的关于中国事态的详细情报，制定了旨在侵占黑龙江北岸的所谓武装“航行”黑龙江计划，即利用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东北边境兵少粮缺，各路无防之机，开辟黑龙江航线。沙俄政府特别会议批准了穆拉维约夫这一计划，并授权其与中国谈判中俄东段边界问题。咸丰四年四月三十日，穆拉维约夫第一次派遣船只非法在黑龙江上武装航行。咸丰六年十二月，沙俄悍然宣布成立以庙街为中心的所谓“滨海省”，明目张胆地将黑龙江下游划入该省辖区。咸丰七年闰五月十六日，穆拉维约夫又发布命令，宣布在黑龙江北岸建立“阿穆尔防线”，将这一地区分别置于该防线的第一、第二军分区控制之下。到咸丰七年十一月，沙俄在黑龙江北岸从上游到中下游建立起许多军人“村屯”，派兵把守，并让俄国人“移民”屯垦，企图在军事强占的情况下，造成既成事实，胁迫清政府认可，达到其侵占黑龙江流域的目的。

上海小刀会北门激战　咸丰四年(1855)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在上海县北门一带重创法国侵略者及清朝官军，史称“北门之战”。是日晨，法军舰队司令辣厄尔联合清军向上海县城发动进攻，炮击北门城墙。在舰队炮火掩护下，约二百五十名法军攻入县城。小刀会起义军在潘启亮等指挥下奋起迎战，他们隐蔽在高大建筑物中向法军射击，击毙法军多名，迫使其退出县城。法军退出后，清军随后涌入。潘启亮率起义军冲出建筑物，与清军肉搏，将其赶至城墙边缘，纷纷滚下城墙。是役，小刀会起义军共毙伤法军军官四名，士兵约六十名；清军二千余名。

湖口、九江激战　咸丰四年(1855)十一月至十二月，石达开等率太平军在湖口、九江一带大败湘军，挽救了西部战场危局。第二次田家镇之战后，太平军西征部队损失严重，被迫撤退，湘军步步紧逼，猛扑九江，西征形势危急。咸丰四年十一月，太平天国成立西征指挥部，派翼王石达开及胡以晃等自安庆赶到湖口主持战事，罗大纲自饶州领兵来湖口协防，青年骁将陈玉成也从江北赶至九江助林启容守

城。与此同时，曾国藩亲临前线督战指挥，以悍将塔齐布、罗泽南等联合湖北按察使胡林翼会攻九江，派水师扑向湖口，扬言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石达开到达湖口后，亲自领军守御东岸县城，坚壁高垒，严密防堵。每夜派小船下放纵火，并不断施放火箭火毬，掠扰湘军水师。十一月十二日，湘军以轻便快船一百二十余艘冲入鄱阳湖内，石达开立即堵塞湖口水卡，断其出路。是夜，石达开派小船袭击湘军停于江面上的快蟹等大船，两岸太平军以火箭、喷筒协助，共烧毁湘军船只四十余号，其余退往九江。十二月十五日夜，林启容自九江、罗大纲从小池口南北两岸同时发起反攻，焚毁敌船百余号，湘军水师大乱，“辎重丧失，不复成军”。石达开、罗大纲等以轻舟逆流而上，直取曾国藩座船，曾国藩惊骇至极，再次投水寻死，复为手下所救，仓荒逃往南昌。是役扭转了西征战场形势。为太平军三克武昌创造了条件。

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 咸丰五年(1855)正月初一日，在外国侵略者与清朝官军联合进攻下，上海小刀会起义军被迫退出上海县城，刘丽川壮烈牺牲，起义失败。上海小刀会起义后，不仅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也使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的利益受到影响。小刀会起义之初，外国侵略者表面宣布“中立”，暗中却勾结清军，破坏起义。随着起义的深入、发展，外国侵略者也从伪装中立逐渐变为公开镇压。咸丰四年五月，美国公使麦莲与英、法领事召开会议，决定强迫小刀会退出上海城。十月，英、美、法等国侵略者与清军协议，加紧修筑界墙，封锁上海城与租界的交通，断绝起义军的粮食供应与军火接济，法国舰队司令辣厄尔宣布“法军对叛军进入包围战争的状态”。对此，起义军针锋相对，揭露外国侵略者的伪善面目，警告其不要“援助胡满”，并庄严表示：起义军不怕法国人，如其敢来，“就等他们来，并跟他们一拚”。十一月，起义军在上海县城北门一带重创来犯的法国侵略者及清朝官军。在清军与外国侵略者的重重包围和封锁之下，小刀会起义军坚守孤城十七个月，终因弹尽粮绝，于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日趁夜突围。起义军首领刘丽川、周秀英、徐耀等在突围激战中牺牲，潘启亮率部分起义军突围后加入太平军，另一部分起义军则进入江西参加天地会起义，后也并入太平军。

港英当局颁布船舶法令 咸丰五年(1855)二月，香港英国当局为扩大对华走私贸易，特别是为便于鸦片走私和拐卖人口，竟无视中国主权，违反中英《虎门条约》规定，擅自颁行《香港一八五五年第四号法令》，宣布中国船只可以在香港办理英籍登记，从而取得悬挂英国国旗、受英国保护的权益。这一法令严重损害了中国水上治安，破坏了中国主权。致使一批中国不法船主在英国庇护下，公然违法走私，掠卖人口，直至进行海盗活动。

太平军北伐失败 咸丰五年(1855)正月至四月，林凤祥、李开芳所部先后为清军所败，整个太平天国北伐遂以失败告终。先是，咸丰四年初，北伐军被困天津附近，杨秀清等两次派兵北上增援，皆遭败绩，遂放弃了增援计划。从此，北伐军彻底陷入孤军作战的困难境地。二月，春官正丞相吉文元在直隶阜城战斗中牺牲。五月初，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部分北伐军自直隶连镇到达山东高唐，欲与援军汇合，但此时北伐援军已然溃败，李开芳部被清军胜保部围困高唐。固守连镇的北伐军主力，在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率领下与清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部相持不下。后僧格林沁引水淹连镇，北伐军突围不成，粮草告尽，以黑豆充饥。咸丰五年正月，西连镇陷落，北伐军两千余人退保东连镇。正月十九日。东连镇亦为清军攻破，林凤祥受伤被俘。于二十七日在北京遇害。二十九日，被困高唐的李开芳部撤至茌平冯官屯，为清军追及。清军引水灌屯，屯中水深数尺。四月十六日，屯破，北伐军全军覆灭，李开芳被俘，向僧格林沁乞降不成，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被杀。北伐军将士在两年中驰驱六省，震撼清都，牵制了大量清军，有效地支援了南方太平军主力和北方人民的反清斗争。

贵州张秀眉起义 咸丰五年(1855)三月，贵州台拱地区爆发张秀眉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张秀眉为台拱翁刚寨(或曰板凳寨、张家寨、报晓村)人，苗族，与人佣工。咸丰五年春，台拱地方官擅自提高粮钱折合标准，从斗粮折钱四五百文增至两千余文，大大加重了当地苗民的赋税负担。张秀眉与包大肚等歃血为盟，领导苗民反对“折征”，聚众数千人冲入台拱城，地方官或逃或死。张秀眉与高禾、包大肚、金干干等商定，以村寨为单位分别组织各地苗民起义反清。三月十五日，张秀眉等在台拱掌梅里发动起义，贵州东南部清水江两岸广大苗族农民分别在高禾等人领导下起义响应。起义军推张秀眉为大元帅，高禾、阿务当为副元帅。八月，起义军攻占丹江厅城。次年夏、秋，复连克施秉、清江、台拱、黄平、清平、都匀等州县，并与侗族起义军联合攻克苗疆重镇古州厅城，清军守将总兵桂林登楼自焚。咸丰七年正月，起义军在都匀附近大破清军，贵州提督孝顺兵败自杀。到咸丰八年，起义军已发展到数十万人，控制了贵州东南苗族聚居的大部地区。同治八年(1869)，张秀眉又领导苗民起义军在黄飘、羊安两地两次大败清军，消灭清军两万余人，击毙提督荣维善等，同治

九年，清军调集重兵，对张秀眉起义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攻陷台拱等地，起义军被迫退入雷公山地区，继续战斗。同治十一年三月，张秀眉兵败被俘，在长沙就义。起义失败。

黄河决口铜瓦厢 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夺路流入渤海，从而结束了南流黄海的历史。铜瓦厢在兰考县东坝头乡以西，为明、清两代河防险要之一。黄河由西向东流，至此地折而向南。该处东北地势低洼，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在此决口。是年六月中旬，黄河大水，开封、兰考一段水位猛涨，又遇大雨，水势汹涌，一望无际，许多地段堤水相平。六月十八日，铜瓦厢以下无工堤段塌掉三、四丈。是夜南风大起，风助水势，使崩塌迅速扩大，至十九日堤坝完全溃决。铜瓦厢决口后，黄河分为三支：南支由山东菏泽赵王河东流；另两支由东明县南北分流，至张秋穿运河后复合为北支。以后北支渐塞，南支成为干流，夺大清河由利津入渤海。此次黄河改道，给河南、河北，特别是山东许多地区造成巨大灾害，并使张秋一带运河受到冲击，堤毁岸崩，漕运梗阻，直接危及到清王朝统治。另外，铜瓦厢决口后，原下游河道迅速干涸，造成千余里河道两岸城市、乡村水源断绝，更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困难。

捻军雉河集会盟 咸丰五年(1855)秋，各路捻军会盟于安徽蒙城雉河集，公推张乐行为盟主，从此，捻军由分散渐趋统一。捻军起义后，皆各自为战，彼此既不统属，又少联系。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发展，各捻首领日益感到有联合起来共同御敌的必要。早在咸丰四年，张乐行就曾与苏天福联合作战。咸丰五年七月，各路捻军大会于雉河集，共建"大汉"政权。张乐行称"大汉永王"，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职。各捻分编五旗，各以黄、白、红、黑、蓝为本旗旗色。张乐行、龚得树、苏天福、侯世维、韩志万为各旗总旗头，称"大趟主"，皆听盟主调遣。总旗下设大旗，为组成捻军的基本单位，可独立作战，人数少则万人，多则十数万不等。大旗下设小旗，也无固定编制。各旗一般皆步、骑混合，初期以步兵为主，到后期则渐以骑兵居多。会盟后，张乐行以盟主身份发布《告示》及《行军条例》，揭露清廷腐败，阐明捻军宗旨，明确组织纪律。从此，捻军声威大震，成为北方抗清主力。当年八月，捻军自雉河集出击，在永城境内击败清军。九月进攻归德府城，十一月在永城附近大败湖南提督武隆额所部清军。清廷革武隆额职，改派河南巡抚英桂负责剿捻军事。咸丰六年二月，捻军五路从皖入豫，困英桂于归德城中。四月，为清军丘联恩及袁甲三所部战败。五月，清军攻占雉河集。捻军撤出后，在浍河桥击败尾追其后的清军崇安部，六月南下攻占霍丘重镇三河尖，七月回师夺回雉河集，继续与清军进行顽强斗争。

《博物新编》刊行 咸丰五年(1855)，英国医生合信编辑的《博物新编》在广州被译成汉文，由上海墨海书馆刊行。《博物新编》共三集，内容涉及天文、气象、物理、动物等各个方面，其中第一集重点介绍了西方近代化学知识。文中谈到"天下之物，元质(即化学元素)五十有六，万类皆由之而生"。另外还介绍了氧(以"养气"或"生气"代表)、氢("轻气"或"水母气")、氮("淡气")、一氧化碳("炭气")，以及硫酸("磺镪水"或"火磺油")、硝酸("硝镪水"或"水硝油")、盐酸("盐镪水")等的性质和制造方法。书中没有引入西方的化学符号，内容也较为初浅，缺乏系统性，大体反映了十九世纪初西方化学所达到的水平。

贵州姜映芳起义 咸丰五年(1855)，贵州天柱县爆发姜映芳等领导的侗族农民起义。姜映芳为天柱革溪汛侗族贫苦农民。咸丰五年，他与陈大六、龙海宽、李子金等在天柱县执营乡发动起义，长期活动于贵州东部天柱、锦屏、三穗、清江、玉屏、岑巩一带地区，到同治元年(1862)，起义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姜映芳自称"定平王"，曾与广西天地会李文茂、贵州苗民张秀眉等起义军联合作战，并五次攻入湖南。同治元年八月，在姜映芳起义军主力东进湖南之际，被清军乘虚而入，占领其根据地九龙山和铜仁汉寨。姜映芳本人在从汉寨退往高拐时被俘牺牲。其余部在陈大六等领导下坚持反清斗争，直到同治七年才被清军剿灭。

号军起义 咸丰五年至同治七年(1855—1868)，贵州爆发声势浩大的"号军"起义。"号军"又称"教军"，为白莲教支派灯花教组织的起义军。其内部各支因头巾、号褂、旗帜颜色的不同，分别称为"红号"、"黄号"、"白号"、"青号"等。号军以贵州东北地区为根据地，主要活动于铜仁、思南、石阡、湄潭、瓮安、开阳及贵阳外围各州县。咸丰五年九月，铜仁府举人徐廷杰与杨大镛等率领当地反"折征"的农民冲入铜仁府城，击毙知府葛景莱。江口、印江等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连克松桃厅、思南、玉屏等地，起义群众增至万人。因这支起义军皆以红巾包头，故称"红号"。十二月，湘军入黔镇压红号军，攻陷铜仁，徐廷杰等牺牲，余众在朱元兆等领导下继续坚持反清斗争，后转入"白号"军中。"白号"为号军起义主力，领导人刘义顺。咸丰八年起义于思南英武溪。主要活动区域在乌江流域，以偏刀

水、觉林寺、城头盖、荆竹园为四大基地。"黄号"主要首领为何得胜、胡胜海等，咸丰七年起义以来，主要活动于贵阳外围及觉林寺一带，尊白号刘义顺为总首领，同治三年，遵义商人之子张保山，诡称为明代崇祯帝十二世孙，改名朱明月，被号军推为领袖，称朱王(或曰秦王)，刘义顺被推为大丞相，在城头盖、觉林寺一带建立政权。同治七年，湘军席宝田、李元度率军攻占荆竹园、偏刀水等号军基地，川军唐炯复率军万余人参与对号军的围剿。二月，湘军攻占觉林寺，朱明月、胡胜海殉难。后何得胜病逝，其妻黎氏继统其众。六月，号军基地上大坪被川军攻陷，黎氏投敌，刘义顺撤退途中被俘，押到成都遇害。支持斗争达十四年之久的号军起义至此失败。

马神父事件发生　咸丰六年(1856)正月二十四日，广西西林县知县张鸣凤依法判处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死刑。先是，马赖于咸丰三年非法从广州潜入广西西林县从事间谍活动，并勾结官府，作恶多端，包庇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抢掳奸淫，激起民愤。咸丰六年正月，新任西林县知县张鸣凤将马赖及不法教徒等二十六人逮捕归案，并将马赖与教徒二人处死，其余论罪各有差。其时法皇拿破仑三世为巩固其军事独裁统治，扩张大资产阶级的海外权益，正企图勾结英国发动侵华战争，遂以此为借口，以保护教会权益为名，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八月，法国通知英国政府，准备派一支法国远征军到中国。九月，英国又制造了"亚罗号事件"，两国遂联合对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天京破围战　咸丰六年(1856)二月，太平军击溃清军江北大营，五月破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长达三年之久的围困。先是，咸丰五年底，太平军为解镇江及瓜州之围，特从西征前线调回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部，次年二月，镇江守将吴如孝会同秦日纲等内外夹击，重创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与总兵张国梁所部清军，并乘胜由金山渡江至瓜州，大败清江北大营统帅、钦差大臣江宁将军托明阿于扬州土桥，连破虹桥、朴树湾、三汊河清营，江北大营一百二十余座闻风溃散。三月初，太平军再克扬州。四月底，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大破吉尔杭阿所部清军于镇江高资镇，吉尔杭阿以洋枪自杀。张国梁由六合来援，亦为太平军所败。五月，翼王石达开取道皖南北进至溧水，清钦差大臣向荣集聚精兵全力争夺，造成江南大营兵力空虚。适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自镇江回天京，屯营燕子矶，东王杨秀清命其攻破江南大营方准入城。于是秦日纲移营于尧化门、仙鹤门以扼江南大营之背，向荣急派副将王浚率兵防堵。十六日，石达开兵分三路进援天京，攻占黄马群，切断了江南大营至仙鹤门、石埠桥一带必由之路。向荣命都司冯子材争夺黄马群，并将张国梁自溧水星夜调回。十八日，石达开、秦日纲等大败清军，攻破孝陵卫二十余座清营。杨秀清复派军南出通济门攻七桥瓮，东出朝阳门围扑清军大营。向荣、张国梁等败走淳化镇，十九日退往丹阳，江南大营全面崩溃。秦日纲等乘胜追击，克复句容，进军丹阳。向荣于绝望之中，自缢而死。太平军天京破围战取得巨大胜利，控制了上自武汉，下至镇江的长江水面，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

云南李文学起义　咸丰六年(1856)四月，云南哀牢山区爆发李文学领导的彝族农民起义。李文学为云南弥渡县瓦卢村人，雇农出身。咸丰六年四月初七日，李文学在太平军战士王泰阶(汉族)、李学东(彝族)协助下，聚众五千，在瓦卢村天生营誓师起义。起义群众共推李文学为"彝家兵马大元帅"，在密滴村设大元帅府，李文学发布檄文，揭露满、汉地主狼狈为奸，欺压人民的罪恶，号召各族人民共同起来革命，"铲尽满清赃官，杀绝汉家庄主(地主)"。当地汉、哈尼、傣、白、回、苗、傈僳等各族群众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万余人，逐步控制了蒙化、弥义、镇南等十余州县三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五十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起义军采取耕战结合措施。将十八至四十岁的男女组织起来，教以战阵之法，"战则集之，不战则耕；男任战，女任运，男女各有职"。还根据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要求，推行"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不纳租，薄赋二成，荒不纳"的土地政策，等于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在农民起义军控制的地区内，农牧业、纺织业、狩猎业皆有所发展。同治十一年(1872)，李文学率军三千救援被围于大理的杜文秀部回民军，兵败军溃，因叛徒出卖被俘，于同治十三年二月遇害。彝族起义军亦于光绪二年(1876)被清军镇压。

美国第二次提出修约　咸丰六年(1856)四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伯驾到达广州，借口中美《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再次提出"修约"要求。其要点为：外国公使驻京；中国全境开放，无限扩大贸易；外国人可以在华自由传教；改造中国司法机关。随后，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和法国代办顾随也先后照会叶名琛，支持美国修约要求。先是，伯驾来中国就职前，曾分别到伦敦和巴黎，与英、法外交大臣商讨对华讹诈问题。其时英、法已感到和平"修约"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准备诉诸武力，因此只表示将在外交上予以支持，并未与美国一起行动。叶

名琛接到美使等照会后，于当年六月上奏朝廷。咸丰帝表示，可酌允变更一二条，以示羁縻，不准其来京，实际上仍坚持拒绝全面修约态度。伯驾在广州未能达到目的，遂赴上海，分别找到已革上海道吴健彰和摄理上海道兰蔚雯，重施威胁利诱故伎，以英、法、美三国联合一致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为条件，引诱清廷同意其修约要求，并扬言，如清廷拒绝其建议，各国可能将与太平天国签订条约。吴、兰二人答应转告两江总督怡良，而怡良此时早已接到咸丰帝不得为美使等"妄求"代奏的谕旨，乃以两广总督为办理夷务之钦差大臣为辞，劝伯驾回粤呈请。结果，伯驾在上海活动了四个多月，仍劳而无功。九月，英国已在广州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十月，伯驾也停止其修约交涉，回到香港参与英法侵略活动。

江西边钱会起义 咸丰六年(1856)七月，江西吉安、建昌交界处爆发边钱会起义。边钱会为太平天国时期活跃在吉安、建昌一带的帮会组织。"以钱涂朱，描金为字"作为本会标志。咸丰五年冬，太平军西征占领江西部分地区，对边钱会产生重大影响。咸丰六年四月，边钱会首领林双桂被清军捕杀，激起广大会众义愤，乃于是年七月聚众数千发动反清起义。起义会众在太平军西征部队支援下，相继攻破南丰、新城、贵溪、铅山等地，击毙清建昌知府何栻。不久，广信府城亦为边钱会占领。清政府急忙抽调福建、浙江清军前来镇压。边钱会与太平军相互配合，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清军周旋，牵制了江西及闽浙地区的部分清军，有力地声援了太平天国革命。

洪秀全密诏杀杨秀清 咸丰六年(1856)八月初四日，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奉洪秀全密诏杀死东王杨秀清，引起"天京事变"。自建都天京以后，杨秀清居功自傲，专横跋扈，上逼天王洪秀全，欲取而代之，曾假托天父下凡，借细小事故竟要杖责洪秀全，使洪、杨矛盾逐渐激化；下压首义有功将领，如呼奴使婢，杖责燕王秦日纲、兴国侯陈承熔、卫国侯黄玉昆等，引起部分将领对他不满。咸丰六年夏，太平军击溃清军围困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杨秀清以为这是扩大个人权位的好机会，同时也为试探洪秀全对自己的态度，为最终夺取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作准备，乃于当年七月公然逼洪秀全亲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洪秀全佯为应允，暗中却密诏韦昌辉、石达开速回天京"勤王"。韦昌辉接到密诏以后，立即率领心腹武装三千于八月初三日深夜从江西赶回天京。他与秦日纲一起，派心腹武士迅速占领城内要塞，然后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杨秀清措手不及，于初四日凌晨被韦昌辉所杀。为防止杨秀清亲信部下为其复仇，韦昌辉定下一计，要尽捕东王余党置之死地。初四日上午，天王洪秀全下诏，谴责韦、秦二人杀人太多，"令受鞭刑四百"，东王逆谋自天泄露，其余党一概不问。次日，韦、秦二人在天王府前伪装受刑。杨秀清部下五千余人不知有诈，前来观刑，不料竟遭突然袭击，解除武装后全部被害。随后，韦昌辉等又对不甘束手就戮的杨秀清部下进行残酷镇压。总计前后约两万余人惨遭杀害，尸首被抛入江中，由西水关流出至下关江口者不计其数。被杀之人多为太平军骨干，使革命事业蒙受重大损失。

云南杜文秀起义 咸丰六年(1856)八月，回民首领杜文秀率云南回民起义军攻占大理，建立革命政权。杜文秀为云南永昌府保山县廪生，曾为乡塾教师，为人忠直，素为民众敬仰。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杜文秀因家属为清军所杀，未婚妻被掳，与白廷扬等赴京控告，无结果而返。咸丰四年，永昌发生回、汉争讼事件，杜文秀被捕入狱。咸丰六年被云南云州回民起义军蔡春发营救出狱，遂回乡聚众反清。八月，杜文秀率回、彝起义群众数千人攻占云南大理，建立革命政权"平南国"，被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以马金保为"总理行营军务大司军"，杨荣为"彪旗大将军"。杜文秀起义军对外与太平天国政权通好，对内实行联合汉族与其它民族的政策，奉汉人沙谦为军师。起义军控制地区达五十三州县，划为永昌、蒙化、江迤、江外、川陕等省。在其控制区内，起义军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严肃吏治军纪的措施，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同治五年(1866)，清廷用"以回攻回"毒计，调投降清军的回民起义军败类马如龙进攻杜文秀起义军。杜文秀打败马如龙，并于同治六年以二十万人马围攻昆明。同治七年，清廷任命靠镇压云南回民起义起家的岑毓英为云南巡抚，在英、法等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洋枪洋炮打败了杜文秀起义军。同治八年杜文秀率军退守大理。同治十一年大理陷落，他吞食鸦片(或曰孔雀胆)后投往清营，请求以自己一死换取清军免杀起义回民。岑毓英杀害杜文秀，纵兵对杜文秀部下回兵进行野蛮屠杀，起义最后失败。

亚罗号事件发生 咸丰六年(1856)九月初十日，广东水师在停泊于黄埔港的一只中国商船亚罗号上，逮捕了两名中国海盗和十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过去，此船为走私方便，曾向香港当局领过通航证。但在被查捕时，此证早已过期，船上亦不再悬挂英国国旗。而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却在接到亚罗号所雇英籍船长报告后，立即赶到船上，硬指此

船为英国船，企图截留被捕人员。执行公务的中国水师人员拒绝了巴夏礼的无理指责和纠缠，坚持将人犯带走。于是，巴夏礼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声称中国水师违反中英《虎门条约》第九款，还造谣说水师兵勇曾扯下悬于船上的英国国旗，是对英国的侮辱，要求立即送回被捕人员，公开赔礼道歉。叶名琛不愿事态扩大，乃复照指出亚罗号确系中国商船，被捕人员中确有海盗，答应将其他被扣水手放回，但巴夏礼与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蓄意制造事端，于九月二十三日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如不在二十四小时内答应全部要求，即要"进兵攻城"。叶名琛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将被捕人员全部送到英国领事馆。巴夏礼又故意刁难，借口礼貌不周，拒不接受。二十五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率领英国军舰突入省河，进犯广州，正式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咸丰六年(1856)九月二十五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借口"亚罗号事件"，率兵舰突入省河，进犯广州，悍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两广总督叶名琛事先未作任何战争准备，闻警后仍满不在乎，甚至下令"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因而给予侵略者以可乘之机。数日中，英国舰队接连攻占猎德、龟江、凤凰冈、东安、西固、海珠等沿江炮台，于十月初一日攻破广州外城，并一度攻入内城，纵火焚烧民房，抢劫总督衙门。此时叶名琛方知大事不好，慌忙逃到巡抚衙门，同时派绅商伍崇曜等出城向英国领事讲和。英军因兵不满千，而各地赴援广州的清军及团练达数万人，遂于当日晚撤出广州，退据虎门以待援军。咸丰七年春，"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大资产阶级决定发动侵略战争，议会也通过了扩大侵略战争的提案。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陆海军前来中国，同时向法、美、俄三国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是年九月，法国拿破仑第三政府以"马神父事件"为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大使，率领侵略军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直接参与对中国武装侵略。美国则因其内部政局不稳，没有参加英法联军，但派出全权大使列卫廉，同英法密切配合，趁火打劫。沙俄为侵占中国北方领土，也积极支持英法等发动侵华战争。从而，英、法、美、俄四国结成侵华联合阵线，进一步扩大了由英国首先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石达开迫杀韦昌辉、秦日纲　咸丰六年(1856)十月初，翼王石达开起兵讨韦，洪秀全下令杀死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命石达开"提理政务"。先是，韦昌辉杀死东王杨秀清后，总揽军政大权，其骄横专权不下于杨秀清。八月中旬，石达开自武昌赶回，目睹天京惨状，责备韦昌辉妄杀无辜，引起韦昌辉嫉恨。为独揽大权，韦昌辉密谋杀死石达开，天王洪秀全也对石达开心存疑忌。石达开见事不妙，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乃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尽行杀戮，并派秦日纲领兵追杀石达开。石达开至安庆起兵，以"肃清君侧"为名，讨伐韦昌辉，请天王洪秀全杀韦昌辉以平众愤、正国法。时韦昌辉在朝中倒行逆施，滥杀无辜，合朝文武群起反韦。韦昌辉犹欲顽抗到底，竟举兵围攻天王府，企图杀洪秀全夺取最高统治权。洪秀全乃联合朝中文武杀死韦昌辉、秦日纲及其党羽二百余人，并将韦昌辉首级送至石达开军中，诏其回京辅政。石达开回京后，合朝欢呼，众望所归，洪秀权命其"提理政务"，主持军国大事。但是，洪秀全鉴于杨秀清、韦昌辉专权的教训，对石达开心存戒意，特封其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与石同理朝政，从而种下了太平天国分裂的祸根。

广州火烧十三行　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广州人民为反抗英国侵略者进犯广州，放火将外国侵略者集中的十三行烧毁。先是，该年九月，英国军舰借口"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连陷珠江诸炮台，激起广州各界人民极大义愤。九月二十七日，广州各乡团勇及各界群众数千人曾计划"放火尽烧十三行"，因两广总督叶名琛严令禁止而未果。十月，广东人民发表《广东阖省人致英酋公函》，愤怒谴责英国侵略者"忽动干戈"、"残害粤民"的罪行，并对其提出严正警告，如仍坚持与广东人民为敌，定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与此同时，广州人民不断采取各种形式对侵入省河的英军兵舰进行骚扰和袭击。十一月十七日夜，广州人民用柴薪、火油等物向十三洋行发起火攻，美、法商馆首先烧毁。次日午后，火势借风力更为炽烈，整个十三洋行被烧成一片瓦砾。外国侵略者无处存身，只得逃到船上躲避。

太平军枞阳会议召开　咸丰六年(1856)十二月，太平天国豫天侯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在安徽北部枞阳镇会商与清军作战方略。先是，当年十一月，清军利用"天京事变"爆发，石达开大军撤离之机，相继攻陷武昌、汉阳。石达开回京辅政后，为改变武昌失守，清军水师进犯九江的不利战局，命太平军东线坚守句容、溧水；西线坚守九江及其以下长江水道，西南坚守江西，并向鄂皖边境大别山一带挺进，同时任命陈玉成、李秀成分任主帅。十二月，陈玉成、李秀成会于枞阳，商定：李秀成率部回转桐城，陈玉成则挥师由枞阳东下，经无为州、巢县西进攻庐江，然后回兵桐城与李秀成会师。咸丰七年二月，陈王

成、李秀成在桐城附近大败清福建提督秦定三等部，占领舒城。二月初八，李秀成攻占六安，十六日陈玉成、李秀成会合捻军占领正阳关。二十三日李秀成与捻军龚得树、苏天福等配合攻占霍丘。

香港发生毒面包事件　咸丰六年(1856)十二月三十日，香港数百名外国人因吃面包而呕吐，化验证明面包中有砒霜。据说因药量过大，食后不久即引起呕吐，故未造成命案。事后香港当局逮捕了五十二名中国人，其中十人被指为谋杀犯，拟判处死刑；其余四十二人被关押二十昼夜。但始终未审出结果，成为一大疑案。

李善兰译完《几何原本》　咸丰六年(1856)，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合作，完成了明末徐光启与利玛窦未曾译完的《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工作。李善兰，字壬叔，号秋初，原名从兰，字竞芸，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自幼酷爱数学，十五岁时即通《几何原本》前六卷。三十岁后，所学渐深。道光二十五年(1845)出版了《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等数学著作。他创造的"尖锥求积术"和以诸尖锥合积表示对数的方法，得到国内外数学家的好评。咸丰二年，李善兰来到上海墨海书馆，从此开始其翻译外国科学著作的生涯。他与伟烈亚力合作，继续翻译明末徐光启和利玛窦未曾译完的《几何原本》后九卷。李善兰不懂外文，故以伟烈亚力口述，李善兰笔录的方式进行翻译，共用了四年时间，终于将《几何原本》后九卷译完，使中国有了欧几里得几何体系的完整译本。

太平军九江保卫战　咸丰六年底至咸丰八年(1856—1858)，太平军为捍卫江西九江，与湘军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战斗。先是，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清军攻陷武昌，记名按察使李续宾率湘军水陆师向九江逼近。十二月十三日，清军向九江发起进攻。镇守九江的太平军将士在林启容的率领下激战六昼夜，终于将敌人打退。林启容以功封贞天侯。咸丰七年二月，湘军自宫牌夹至白水湖尾修筑长濠六道，长三十余里，深二丈，宽三丈五尺。五月筑成，将九江三面围困。八月十五日，小池口陷，九月初九日，湖口又陷，两年前被太平军困于鄱阳湖中的湘军水师乘机冲出，与外江水师会合，巡守北面江岸。九江遂四面受敌，成坐困之势。咸丰八年春，湘军攻势愈急。曾掘地道以地雷轰塌东门、南门城墙。林启容率部奋力抵抗，重创敌军，又将城墙修复。四月初七日，湘军又以地雷炸崩东南城墙一百余丈，冲入城中，林启容率部浴血巷战，一万七千多名太平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九江终于落入清军之手。九江扼鄂、赣、皖三省水陆咽喉，其陷落使太平军在江西的战斗更为艰苦，安庆也暴露于敌人面前，并间接危及到天京的安全。

太平军、捻军霍丘会师　咸丰七年(1857)二月，太平军与捻军会师于霍丘。捻军自起义以来，一直活跃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地区，成为太平天国北方屏障。咸丰七年春，太平天国合天侯李秀成通过其部下李昭寿，邀请捻军加入太平天国，得到捻军首领张乐行的赞同。二月二十三日，太平军李秀成部与捻军龚得树、苏天福等部在霍丘会师。从此，捻军开始蓄长发，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以太平军旗帜代替原来的五色旗，各部将领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印信。捻军首领张乐行受封为成天义，以后又先后被封为征北主将(咸丰十年前)、鼎天福(咸丰十一年前)、沃王(同治元年前)。两军联合以后，捻军势力更为壮大，不仅在淮河流域牵制了部分清军主力，减轻了天京的压力，并且与太平军配合进行过多次重大战役，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天国革命。但是，捻军参加太平天国是有条件的，即所谓"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与太平军有事则联合作战，无事则各自行动，依然保持着某种独立状态。

曾国藩回籍守制　咸丰七年(1857)春，曾国藩因父丧回籍守制，一度被剥夺军权。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以咸丰帝为首的满洲贵族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之间，目标虽然一致，但在权力分配上，却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咸丰帝既要依靠曾国藩及其湘军来镇压太平天国，又不愿给曾国藩以更多的军政实权。因此，他一面命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主力在长江中游一带鏖战，同时又坚持用由满洲亲贵控制的江南、江北大营来围困天京，以期达到曾国藩及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的目的。对此，曾国藩颇为不满。咸丰七年春，曾国藩以父丧为名，上了一个《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诉说其"报国"、"事君"之诚，无奈只是个"在籍侍郎"，没有兵权、财权和"文武黜陟之权"，所以"办事艰难"。原想借此要挟朝廷，索取实权，不料咸丰帝竟然降旨将其兵部侍郎开缺，准其"回籍守制"，连湘军的统帅权也一并夺去。曾国藩追悔莫及，只得又上折表示"军务未定"，"自到籍以来，日夕惶悚不安"。咸丰帝置之不理，将曾国藩闲置了一年多。后因战局恶化，湘军将领不服调遣，才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但仍然未把曾所希望得到的"事权"给他。直到咸丰十年以后，江南、江北大营彻底瓦解，清廷不得不将镇压太平天国、挽救清朝统治的希望完全放到曾国藩等汉族地主身上，才被迫让步，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悉归

节制。从此，曾国藩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

石达开率军出走 咸丰七年(1857)五月，翼王石达开因受天王洪秀全疑忌，安、福二王排挤，被迫离京出走，沿途裹带太平军精锐十数万人，造成太平天国严重分裂。先是，韦昌辉伏诛后，石达开回京辅政。因其"文武备足"，在太平军将士中享有很高威望，被推为"义王"。但是，洪秀全鉴于杨秀清、韦昌辉专权的教训，对石达开心存疑忌，表面上以石为"通军主将"，"提理政务"，实际却是为了将其留在京中，不让其出外统兵。另外，洪秀全还封自己兄长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同理朝政，以分石达开之权。安、福二王昏聩无能，却每每擅作威福，干预朝政，对石达开百般掣肘。石达开对此深为不满，同时又对洪秀全的无端猜忌非常不安，终于受其心腹张遂谋等挑动，于咸丰七年五月私自离京，自安庆前往江西。他沿途张贴布告，表白自己无端遭迫害，不得已而飘然远引的苦衷，博得众多太平军将士的同情，十数万太平军精锐随其走上分裂道路。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曾多次派人前往规劝，但他执意不听，反而放弃了江西根据地，全力进取浙江。咸丰八年春，石达开围攻浙江衢州未克，乃于是年夏撤围攻入福建，连下邵武、汀州等地。福建山多粮贵，石达开数十万大军无法久居，且屡战不利，军心动摇，遂计划远征四川。九月，石达开回师江西。咸丰九年初，石达开率军进袭湘南，四月转向西北进攻宝庆，拟于宝庆会合各军进军四川。无奈围攻宝庆两月有余，始终未能得手，只得于是年七月撤围南走广西。攻桂林不下，九月占领庆远，改庆远为龙兴，对太平天国官制礼文多所更改。咸丰十年夏，石达开回到家乡贵县，手下将士开始对其产生不满情绪。不久，其部下彭大顺、朱衣点等率众二十余万脱离石达开回转天京。咸丰十一年，石达开率部再出广西，绕道湖南、贵州、云南进入四川。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 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十四日，英法联攻占广州。先是，该年秋，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和法国全权大使葛罗分别率英、法侵略军至香港，组成五千六百多人的联军(其中法军一千人)，封锁广州，双方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十月二十七日，额尔金、葛罗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入城"修约"，"赔偿损失"、英军把守河南地区各炮台等，限令十日内答复。并扬言如不应允，即令水陆军兵进攻广州。面对侵略者的战争威胁，叶名琛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其部下要求调兵防守，并请求召集广州市民团练自卫，均遭叶拒绝。其时广州水师船只大部已被英军焚毁，叶名琛非但不予补充，反将水师兵勇裁撤；陆师原有万余人，亦被裁抑大半；各乡团练在叶名琛的禁止下也已纷纷解体。广州事实上已成为一座不设防城市。十一月十一日，额尔金与葛罗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否则将于十三日晨开炮攻城。叶名琛急忙命人摆设沙盘，亲自扶乩，得吕洞宾语"十五日后便无事"，不由得喜出望外。因此，他既不与联军交涉，也不布置防守，一心只等吕祖的话应验。十三日，英法联军全数登陆，占据海珠炮台，开炮攻城。城内商店、民房相继着火，总督衙门亦遭炮击。叶名琛此时方惊骇至极，逃到内城粤华书院躲避。次日城陷，巡抚柏贵、将军穆克德纳投降。数日后叶名琛被俘，解往香港。叶以为要将其送往英国，乃声言"欲面见其王以理论"。行前特意带足食品，表示耻食敌粟。后被拘于加尔各答，自称"海上苏武"，英王未见而食品告尽，乃绝食，不久去世。时人讥之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后，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抢走布政使衙门库银二十二万七千两。又指派英国人巴夏礼、哈罗威和法国人修莱组成所谓"联军委员会"，扶持卖国贼柏贵等建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开始了英、法侵略者在广州历时四年的军事统治。

魏源去世 咸丰七年(1857)，著名思想家魏源在杭州病逝，终年六十三岁。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早年从经学大师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与龚自珍齐名。鸦片战争前，魏源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撰写"筹漕"、"筹鹾"、"筹河篇"及"湖广水利议"等。又助江苏巡抚陶澍筹办漕运、水利诸事，对各种社会实际问题多有接触。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深感外敌入侵，国势孱弱，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入两江总督裕谦幕，直接参加了反侵略战争。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将帅误国，使战争失败，魏源感愤至深，于道光二十二年著成《圣武记》十四卷，推求盛衰之理，筹划海防之策。同时，他从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得出结论。要战胜外国侵略者，就必须了解外国情况，遂遵林则徐之嘱，在林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扩充材料、内容，编成《海国图志》，向国人系统地介绍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等。魏源将清朝的衰弱与西方国家的强盛原因作了探索，提出了许多强国御侮的办法。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反对投降派"抑民以奉外"的反动方针，提倡利用"义民"抵抗外国侵略，同时又尖锐地批判了顽固派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的愚昧，提出学习西方选兵、练兵、养兵之法，

并效法西方，自己设厂制造轮船枪炮。咸丰三年太平军逼近扬州，时任高邮知州的魏源，组织地主团练，对抗太平军。不久，他感于"世乱多故"，弃官学佛，"不与人事"，直至病逝。其主要著作有《古微堂集》、《老子本义》、《诗古微》、《元史新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并协助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

港澳中国员工罢工　咸丰八年(1858)三月，由广州附近各乡义勇组成的佛山团练局贴出告示，号召下香港、澳门等地为洋人教书、办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之人，在一月之内概行辞退回家，以抗议英法联军对广州的入侵。结果一月之中，告归者达两万余人，其中自香港罢工回家者几乎占当地服役华人的十之七八。是为外国在华企事业中中国雇员、工人反抗侵略者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运动。致使香港变成了一座死城，洋人各项商务活动陷于停顿，物价飞涨，侵略者们不得不"身司炊爨，不堪其苦"。

第一次大沽激战　咸丰八年(1858)四月初八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挑起第一次大沽之战。先是，三月，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与法国全权大使葛罗率领英法联军大小舰船二十六艘、官兵两千余人来到天津白河口外，会同美、俄两国代表要求清政府速派全权大臣在天津或北京与之谈判。清廷派仓场侍郎崇纶到白河口谈判，额尔金等以崇纶地位太低，没有全权为借口拒绝接见。清廷只得又加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负责交涉。但侵略者仍然拒绝谈判。四月初八日上午八时，英法联军限谭廷襄两小时以内交出大沽炮台。十时，联军开始向大沽炮台开炮袭击，同时以数十只小轮船和舢板闯入大沽口，向炮台发动猛烈进攻。镇守炮台的清军官兵奋起还击，激战两小时，摧毁敌船三艘，毙伤敌军约九十名。游击沙春元、都司陈毅、千总常荣恩、刘英魏等四百余名守台将士先后殉国。由于谭廷襄及直隶提督张殿元、署天津镇总兵达年等负责陆路指挥的文武大员畏敌逃跑，全军溃散，大沽炮台终于落入侵略者手中。十四日，英法联军进逼天津，清廷被迫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乞和。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　咸丰八年(1858)四月十六日，清黑龙江将军奕山与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瑷珲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正当英法联军进犯大沽口，清政府陷于"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沙俄政府趁火打劫，阴谋霸占我国东北地区大片领土。四月初十日，穆拉维约夫率兵船直趋瑷珲，次日与奕山在瑷珲进行谈判。谈判中，穆拉维约夫重弹"助华防英"的老调，宣称只有把黑龙江以北割让给俄国，才能遏止英国的侵犯。因此，为了"双方"的利益，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定边界。同时派出军舰，在黑龙江上鸣枪放炮，对奕山等进行武力恐吓。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的奕山，再次被沙俄的炮舰政策所征服，于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共三条，主要内容为：俄国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精奇里江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准原住之中国民人"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由中国官员管辖，俄国人不得侵犯；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由于《瑷珲条约》使中国主权和领土蒙受重大损失，清政府拒绝批准，直至咸丰十年中俄《北京条约》订立时才被迫予以承认。

中俄《天津条约》签订　咸丰八年(1858)五月初三日，沙俄驻华公使普提雅廷利用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进逼天津、北京之际，以"调解人"的面目，强迫清朝全权代表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于天津海光寺与之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共十二款。主要内容有：俄国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南、琼州等七处口岸通商及停泊兵船，若别国在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俄国得在原定中国陆路通商地点扩大贸易，对俄国商人数目及其所带货物、资本多少不加限制；俄国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享有领事裁判权；俄国东正教教士得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日后中国若给予其他国家以通商等特权，俄国得一律享受；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借勘界进一步霸占中国领土)。双方商定，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

中美《天津条约》签订　咸丰八年(1858)五月初八日，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进逼天津、北京之际，以"调停"为名，迫使清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于天津海光寺与之签订不平等的中美《天津条约》。共三十款。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倘准许其它国家公使驻京，应准美国一律照办；增开潮州(后改汕头)、台湾(台南)为通商口岸；耶稣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美国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清政府给予其它国家的特权，"无论关涉船只海面、通商贸易、政事交往等事情"，美国得以"一体均沾"。次年七月十八日，美国公使与清政府代表在天津北塘互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

中英《天津条约》签订　咸丰八年(1858)五月十六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在天津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先是，该年四月十

四日，英法联军在攻陷大沽、进抵天津城下之后，照会清政府，要求速派“头品可以主持之大臣二员”前来谈判订约。限二日内答复，否则即攻天津，并进京谈判。清政府急忙于四月十七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驰往天津议和。谈判中，英、法代表对清方大要流氓手段，百般威胁利诱，强迫清方代表接受其预先拟好的条约条款。桂良等虽一再讨价还价，无奈心中畏敌如虎，且以南方太平天国革命为其“心腹之患”，期望早日与侵略者妥协而得以全力镇压人民革命，遂于五月十六日被迫接受英方条款，与之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另附《专条》。主要内容如下：一、英国得派公使驻京，并在通商各口岸设领事官，与清政府外交往来用平等礼节。二、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三、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四、英国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并得在各通商口岸任意租地盖房，设立教堂、医院、仓库等。五、英国商船可在长江一带通商各口往来。六、中英两国派员在上海会谈修改关税税则事宜。七、确定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八、中国对英赔款白银四百万两。双方商定，一年之内在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 咸丰八年（1858）五月十七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法国全权大使葛罗在天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后，葛罗伙同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对清政府进行战争讹诈，强迫清廷速派头品顶戴、有主持大事之权的大臣二员至天津与其订立新的不平等条约。谈判中，葛罗与额尔金串通一气，对桂良、花沙纳等威逼利诱，终于迫使其接受了法国预先拟定的条款，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另附《和约章程补遗》六款。主要内容如下：一、法国得派公使驻北京，并在通商各口设置领事官，与清政府以平等礼节进行外交往来。二、增开琼州、潮州（后改汕头）、台湾（台南）、淡水、登州（后改烟台）、南京为通商口岸。三、法国天主教教士得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四、法国得往内地游历，得在各通商口岸任意租地建房，设立教堂、医院、学校、坟地、仓库等，中国人如有触犯、毁坏等事，地方官应加严惩。五、凡中国与各国议定的税则、关口税、吨税、过关税、出入口货税等，法国皆可一体均沾。六、确定领事裁判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七、法国兵船可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停泊。八、中国对法国赔款白银二百万两。双方商定，一年内在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

太平军击溃江北大营 咸丰八年（1858）八月二十日，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合破清军江北大营。先是，咸丰八年初，天京形势危急。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截断天京的交通及粮道，实施新的包围。为解天京之困，新任后军主将李秀成离京赶赴芜湖，与其弟、新任左军主将李世贤分军南北两路。李秀成率精兵五千活动于江北含山、全椒一带，作战不利，遂于七月初六日与太平军各地将领会议于枞阳，研讨解天京之围的作战方案。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打垮较为薄弱的江北大营，以确保天京与江北地区的交通线，然后回师南下，粉碎江南大营。枞阳会议后，新任前军主将陈玉成率部由潜山过舒城，击溃安徽布政使李孟群部清军，攻占庐州（今合肥），八月进逼滁州东南的乌衣。八月十九日，李秀成部自全椒至乌衣与陈玉成会师，大败清钦差大臣德兴阿、胜保等部。次日，复于小店击溃江南大营总兵冯子材率领的五千援兵，乘胜进袭浦口江北大营。陈玉成、李秀成前后夹攻，九洑洲太平军亦浮水前来相助，歼敌万余人，德兴阿率残兵连溃百余里，军矢令书皆失，自扬州带来的九千斤大炮十余门亦全部为太平军缴获，江北大营被彻底摧毁。随即，陈玉成、李秀成乘胜扫荡苏北战场。连克江浦、六合、天长、扬州，清军道员温绍原被击毙，德兴阿败走仙女庙。咸丰九年二月，清廷撤消江北大营，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和春节制。

中英、中法《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订立 咸丰八年（1858）十月初三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上海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款，附海关税则。主要内容为：各口税收划一办理，中国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海关对进出口货物除例外（指丝、茶及鸦片）和免税品（指外国人用品）两项外，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或土货自内地运出，除一律按时价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外，其它如厘金、常关税等一切税项概予免征；承认鸦片贸易合法，改名“洋药”，每百斤收税银三十两。十月十九日，桂良、花沙纳又与法国全权大使葛罗签订中法《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款。从此，中国海关落入外国人手中控制，鸦片贸易合法化，大量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加快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

太平军三河大捷 咸丰八年（1858）十月初十日，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在安徽三河镇大败湘军。三河（今属肥西）为庐州（今合肥）南部屏障，是太平天国屯集米粮军火的重要据点，太平军在此筑城一座，砖垒九座，分军驻守。先是，湘军乘太平军东下之机，派浙江布政使李续宾率六千精兵连陷太湖、潜

山、舒城、桐城等地，于该年九月猛攻三河，太平军九座砖垒皆被攻破，守将吴定规向天京告急。洪秀全急命太平军东线主力回师驰援。陈玉成闻讯，立即挥师西指，同时奏调李秀成部同去救援。陈玉成采用迂回包抄战术，率军兼程经巢县、庐江绕至湘军背后，在三河东南白石山至西南金牛镇一带连营数十座，切断敌人退路，又命庐州守将吴如孝率部南下，阻击舒城一线敌军援兵。适李秀成亦率部赶到，遂将敌军四面包围。十月初五日，太平军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至初九日逼近湘军大营。次日黎明，李续宾派人袭击金牛镇，适遇大雾，陈玉成亲率士卒自后方杀出，将袭击金牛镇之敌分割歼灭。李续宾随后亦领兵杀来，双方展开激战。时李秀成部自白石山前来助战，吴定规亦从三河城中杀出，三面夹攻，李续宾大败。至十月十三日，六千湘军精锐全部被歼，李续宾、曾国华（曾国藩之弟）及湘军文武官员四百余人均被击毙。太平军乘胜收复舒城、桐城、继克潜山、太湖，安庆之围不战自解，湘军受到沉重打击。

太平天国颁布《天王赐西洋番弟诏》 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太平天国颁布《天王赐西洋番弟诏》。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率舰队至天京江面示威。根据《天津条约》，英国取得了在长江沿岸各口的通商权利。额尔金认为太平军妨碍了条约的执行，想以武力威吓太平天国，迫使太平军撤出沿岸各口。在此之前，太平军曾屡次通告：外国兵船于战争或封锁期间驶近城堡时，须先派小船报告守军，以免发生误会。但额尔金置之不理，擅自率军舰侵入太平天国水域，因而遭到太平军各炮台炮击。英舰被迫驶回，向太平军乞求过境。洪秀全遂撰此诏，派林绍璋送至芜湖交与额尔金。诏书用七言韵文，共一百八十二句，概述拜上帝会的信仰主张、太平天国的历史使命和对外政策，认为太平天国与“西洋番弟”是“同敬天父同一家”，应“同顶爷哥灭臭虫（指清政府）”。

博济医院建立 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美国人嘉约翰在广州重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毁于战火的中国境内第一家西医医院，取名“博济医院”。博济医院的前身，是道光十四年（1834）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伯驾开设的一家眼科医局。道光二十年五月因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而一度停办，道光二十二年恢复。咸丰五年，因伯驾出任外交官离开医院，改由另一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办，次年毁于战火。咸丰八年十二月，嘉约翰在广州南郊选定新址重建。从此直到一九四九年，故也是在华历史最长的一所教会医院。同治五年（1866），嘉约翰在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校，招收男生学习西医。孙中山先生就曾就读于南华医学校，中国第一位赴欧美学习西医的黄宽也曾在该校任教。自光绪五年（1879）始。南华医学校开始增收女生。民国三年（1914）又附设护校。博济医院为培养中国早期西医人才作出了贡献。

柏葰科场案发 咸丰八年（1858），大学士柏葰以科场舞弊罪被杀。咸丰八年顺天乡试，正主考为大学士柏葰，副主考为尚书李凤标、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发榜后，舆论哗然。御史孟传金奏称中试前十名中有一满洲人名叫平龄，朱墨不符，且曾在剧院登台演戏，请求究治。咸丰帝提其试卷覆勘，查出诗文中悖谬不通者甚多，遂将柏葰革职，李凤标、程庭桂调任，听候查办。其时正值户部尚书肃顺等用事，与柏葰一向不和，欲借此兴起大狱，排斥异己。调查中牵涉到柏葰门丁靳祥，又查出同考官郎中浦安为新中试之主事罗鸿绎通关节，居间者为兵部主事李鹤龄，且程庭桂之子程柄采亦有收贿事。咸丰九年二月狱成，柏葰浦安、罗鸿绎、李鹤龄、程柄采斩首，程庭桂遣戍，平龄、靳祥已死于狱中，考官及新中举人革流降革者数十人。

户部宝钞案发 咸丰八年（1858）冬，户部尚书肃顺派员查办宝钞处宇字官号舞弊案。先是，清廷因财政匮乏，特发行钞票、大钱，设宝钞处、官钱总局分领其事。又设官钱号，招商出纳，共设乾字官号四、宇字官号五。因宝钞、大钱缺乏信用，全靠法令强迫推行，致使官民交累，弊端丛生。是年冬，肃顺任户部尚书，派员查核宝钞处宇字官号欠款，发现其数目与官钱总局存稿不符，遂奏请查办。先后牵延两年，查出宇字官号司员朦混办稿，将官款化为私欠。于是将司员王正谊、李寿蓉等革职究办，商人张兆麟等逮捕严讯，共抄没司员及商户数十家。又奏劾官票所官吏交通舞弊，籍没官吏亦数十家。

贵州白旗起义 咸丰八年（1858），贵州普安大坡铺一带爆发回民起义。起义军以白巾帕头，自称“白旗”，称敌军为“红旗”，推举张凌翔、马河图、金万照等为首领。数年中，相继攻占新城、兴义、普安、安南、贞丰、归化等州县，人数发展到十余万，并在新城建立政权。同治三年（1864），贵州提督赵德昌率清军围剿白旗起义军。起义军奋起抗击，不幸战败，张凌翔、马河图在兴义府被俘就义，余部继续坚持斗争。同治九年，贵州巡抚曾璧光以云、贵两省兵力进攻起义军，外国侵略者也直接参与了对起义军的围剿，并以洋枪洋炮支持清军。同治十一年，坚持反清斗争达十四年之久的白旗起义军终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领导人金万照等被捕死难。

《中外新报》创刊 咸丰八年(1858),中国第一家近代中文日报刊《中外新报》在香港创刊。《中外新报》改变了以往中国报纸所采取的书本形式,第一次采用西方的报纸形式进行编排。初为晚刊,两天出版一次,后改日刊,以四开白报纸单张印刷。内容多以广告及各种商业消息为主。创办人伍廷芳,时任英商《孖剌报》译员,借用《孖剌报》所购中文活字创办《中外新报》。代价是每月向《孖剌报》交纳印费,并免费为《孖剌报》刊登部分广告。

清廷开征子口税 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按照中英《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开始向外国商人征收子口税。凡进口洋货运销中国内地,或出口土货自内地运销国外,除在口岸海关完纳百分之五的进口或出口税外,另缴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以代替沿途所经各内地关卡应征的税、捐和厘金等。时称海关所在地为"母口",内地之常关、厘卡所在地为"子口"。以后,外国侵略者通过中英《烟台条约》(光绪二)和中日《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一),又取得只交纳子口半税的特权。子口税的规定,不仅侵略了中国主权,而且起到保护洋商、洋货,排斥华商、华税货的作用。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在实施关税新税则的同时,将子口税及其它通过税一并裁撤。

第二次大沽激战 咸丰九年(1859)五月二十五日,大沽守军大败侵入内河的英法联军舰队。五月初,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和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相继到达上海,会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拼凑联合航队,以《天津条约》批准书在京互换之期将到为借口,准备武装闯入天津海口,强行进京。五月十三日后,三国公使分率英舰十九艘、法舰两艘、美舰三艘,军队两千余人相继到达大沽口外。清廷派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去北塘迎接,并指令各国公使须由北塘登陆,随行人员不得超过二十人,不得携带武器,由恒福负责护送至京。三国公使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合理要求和安排,坚持要打通白河,武装进京。五月二十五日,英国舰队司令何伯下令对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袭击。阵守大沽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率,率清军将士奋勇还击。激战一昼夜,击沉敌舰四艘,击伤多艘,打死打伤英国侵略军四百六十四名,法军十四名,生擒二名,重伤英军司令何伯。英国舰队虽然得到美舰支持,亦无力再战,不得不竖起白旗狼狈撤走。是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与外国侵略者作战取得的最大胜利。

云南李永和、兰大顺起义 咸丰九年(1859)春,云南昭通爆发李永和等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李永和也称李短鞑,云南昭通人。是年夏,与同乡兰大顺(即兰朝柱),兰二顺(即兰朝鼎)等在家乡牛皮寨结盟起义。九月,起义军自云南盐津老鸦滩进入四川,连克筠连、高县、庆符等州县。咸丰十年正月占领自贡盐场,大批盐工加入起义军,声势大盛,因以川南为基地,活动于岷江西岸广大地区,兵锋达于成都附近之新津、灌县一带。四川总督曾望颜、成都将军崇实等惊恐不安,闭城自守。十月,起义军集结于自贡、富顺一带,连营百余座,人数达三十余万。为接应太平军石达开部入川,李永和、兰大顺曾联名致书与石达开联系,但终于未能使两军会合。咸丰十一年,起义军攻城略地,李永和进驻眉州;兰二顺围攻绵州。清廷调湖南巡抚骆秉章为四川总督,率湘军黄淳熙部万余人入川镇压。起义军分兵三路:李永和以青神为中心,活动于岷江流域;兰氏兄弟活动于涪江流域,攻克射洪、江油,人数达十余万;另一起义军将领周绍涌率部转战于嘉陵江及川东地区。八月,兰二顺部在绵州为湘军所败,退到岷江西岸,与李永和互为犄角,年底复为骆秉章大败于丹棱,兰二顺于十二月在麻柳沟战斗中牺牲。兰大顺率余部退入川北丛山峻岭中。兰军失败后,湘军与四川提督蒋玉龙等合力围攻李永和部,大小二十余战,李军大败,李永和于同治元年八月在八角寨被俘牺牲。兰大顺自川北入陕南,攻占洋县、山阳等地,一度与太平军陈得才、赖文光部配合作战,兰大顺受封文王。同治二年十月,兰大顺率军北上盩厔,进窥西安,并联合陕西回民军,声势复盛。同治三年,刘蓉率湘军入陕进攻兰大顺,兰军奋起抵抗,击毙饮差大臣、西安将军多隆阿。后以寡不敌众,撤出盩厔,退回陕南。途经汉阴,遭团练袭击,兰大顺牺牲,起义最后失败。

上海开展反掠卖华工斗争 咸丰九年(1859)六、七月间,上海爆发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者掠卖华工斗争。先是,六月二十四日,停泊于吴淞口外的英轮"吉尔楚得号"发生四十余名华工投水淹死惨案。事后,上海人民寻找失踪壮丁,发现法国领事住宅中拘禁了大批被掠华工。激起各界人民公愤,纷纷发布揭帖,谴责英、法侵略者进攻大沽和掠卖华工罪行。苏松太道吴煦出面索回宁波籍华工一百五十四人,上海籍华工则未被释放。七月初,愤怒的上海人民打死掠卖华工的英国人波顿,打伤英国领事李泰国,又将法国教堂门匾捣毁。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两江总督何桂清将掠卖华工的罪犯林才成等四人处死,但对英、法、美等国侵略者掠卖华工的罪行则不敢究问。

洪秀全为杨秀清恢复名誉 咸丰九年(1859)

八月，洪秀全下诏规定七月二十七日（系指天历。旧历为八月初六日）为东王升天节，正式为杨秀清恢复名誉。早在咸丰七年十月太平天国出版的戊午八年新历上，就照列了杨秀清生前的爵职，并加以“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封号。在咸丰八年《天王赐西洋番弟诏》中，洪秀全赞扬了杨秀清，指出他的死是因“期至朝观遭陷害”。为了给杨秀清续嗣，洪秀全将自己的第五子洪天佑立为扬秀清嗣子，封为“幼东王”，称“东嗣君九千岁”。在崇礼杨秀清的同时，对韦昌辉则加以贬斥。对韦昌辉之死，称“丧”而不称“升天”，除名削爵，《朝天朝主图》中亦不列其位次，东、西、南王均有嗣君，唯独不给北王立嗣。

《资政新篇》刊行 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刊行《资政新篇》。该年三月，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到达天京，被任为军师，封干王，总理朝政，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洪仁玕根据自己近几年在香港、上海等地学到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知识，结合太平天国部分实际问题，写成《资政新篇》一文，共六千多字，呈送洪秀全以资借鉴。经洪秀全批准正式刊刻颁行。洪仁玕认为，治国必先立政，立政关键在于“设法”、“用人”两条。在用人方面，作者着重强调应“禁朋党之弊”。设法则从“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风风类”主要为民众教育内容，提倡敦厚风俗，革除腐败风气。“刑刑类”主要论述新的刑法制度，如善待轻犯、恩威并用、废除酷刑等。“法法类”为全文的重心，主要阐述政策、制度。文中公开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先进科学技术，并向人们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况。称英国为当时“最强之邦”，原因是“法善”；美国也是“礼仪富足”；俄罗斯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学习邦法及火船技艺，回国后“大兴政教”（指彼得一世事），百余年来声威日著；而日本也因与美国通商，得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根据以上经验，洪仁玕提出一套兴利除弊方案。兴利又分政治、经济两方面。其中政治四项：一、加强中央集权，“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二、普设乡官、乡兵。三、各省设置独立的“新闻官”，办报纸。四、设医院、学校等。经济六项：一、兴车马之利，造火车、轮船，修筑道路，发展近代交通。二、建立邮政事业。三、开采金、银、铜、铁、锡等矿，制盐，并准民间招工开采。四、兴修水利。五、奖励技术发明。“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六、开办银行和保险事业。除弊六项：一、禁止私门请谒，杜绝卖官鬻爵。二、反对传统迷信，查禁庙宇寺观，焚去一切惑民之说。三、严禁贪污。四、禁止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五、禁止饮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六、禁止买卖人口、使用奴婢、溺婴等。《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但因其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只字未提，也未涉及如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这一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前提，所以尽管洪秀全在上面批了许多“是”、“甚是”，并称为纲领性文件予以公开颁行，却对太平天国革命几乎未起任何作用。

李善兰译成《代数学》、《重学》等书 咸丰九年（1859），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合作译成英国数学家棣模甘的《代数学》、美国数学家罗密士的《代微积拾级》，与另一英国人艾约瑟合作译成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的《重学》等西方科学著作。《代数学》为传入我国的第一部符号代数学的译著。在此之前，我国的数学书籍中并无“代数”一词。李善兰根据这门数学以字代数的特点取名为“代数学”，使代数一词一直沿用至今，并传至日本。《代微积拾级》是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学传入我国的第一部译著。“微分”与“积分”这两个数学名词，也是由李善兰创译而沿用下来，并传入日本的。此外，现代数学中常用的诸如常数、变数、函数、系数、指数、虚数、已知数、未知数、级数、单项式、多项式、展开等名词，皆为李善兰在翻译西方数学著作时，根据原文名词的概念反复推敲后创译而沿用至今。《重学》为我国系统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力学著作，共二十卷。分别介绍了静力学、动力学、流体力学方面的知识。其中关于牛顿运动三定律及用动量概念讨论物体运动等内容是第一次介绍到我国。李善兰在墨海书馆工作了十年，先后翻译数学、物理、天文学等西方科学著作六种八十六卷，对沟通中西科技交流，促进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英国设立广州招工公所掠卖华工 咸丰九年（1859），英国殖民者在广州设立招工公所，专门从事向海外掠卖华工勾当，是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地区较早开设的贩卖人口的机构。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曾发生过到广东的外国商船回国时私带中国“无业游民”到海外作苦工。鸦片战争后，外国人贩子更是经常出没于各个通商口岸，掳掠我国劳动力向海外贩卖，号称“猪仔贸易”。最早从事这一罪恶活动的，有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继之而来的是英、美、法、俄等国。掳掠地方主要是福州、厦门、广州、汕头、上海、宁波等地，香港、澳门为两大转运站，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则是贩卖中心。自英国广州招工公所设立后，法国、西班牙等国也相继成立招工公所。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北

京条约》,规定:以后凡有华民,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从而使西方殖民者获得了掳掠华工的合法权利。同治七年(1868)的《蒲安臣条约》中又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由于殖民者有条约作护身符,掠卖华工更加肆无忌惮,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竟达五十万人左右。

《谈天》刊行 咸丰九年(1859),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根据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所著《天文学纲要》十八卷,合作译成《谈天》一书,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同治十年(1871),科学家徐建寅又补充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成果,于同治十三年再次将《谈天》刊印出版。书中对太阳系的结构,日、月、行星、卫星、彗星、恒星的运动及其规律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并介绍了有关变星、双星、星云、星团等方面的知识。就其内容的广度而言,已经包括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绝大部分成果。在该书翻译出版时,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各写了一篇序言。李善兰在序言中驳斥了乾嘉学派权威阮元、钱大昕等人怀疑和否认哥白尼日心说的言论,把从哥白尼经开普勒到牛顿对太阳系结构和行星运动的认识阐述得十分清楚,大力宣扬和捍卫了哥白尼等人在天文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谈天》一书的翻译和流传,将自哥白尼开始,由牛顿完成并建立在牛顿古典力学体系上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税务司设立 咸丰九年(1859),两江总督何桂清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协助"管理中国海关事务。先是,咸丰三年(1853),英、法、美三国乘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夺取了上海海关行政权。咸丰八年,外国侵略者抓住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各口划一办理"的含混规定,硬要将半殖民地化的上海海关制度推行到其他各口岸,由外国人"帮办"各口岸税务。腐败的清政府事实上接受了这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于次年以曾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职员的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并授权他"选募"其他各口所用的外国人,从此确立了英国人在中国海关的统治地位。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任命李泰国为中国总税务司。同治二年(1863),李泰国离职,改由另一英国人赫德继任。同治四年在北京正式设立总税务司署,由赫德常驻北京统辖全国各海关。与此同时,中国沿海各商埠和长江沿线各口岸三十余处也先后实行了由外国税务司控制的海关制度。从此,中国海关大权完全落入外国侵略者手中。名义上,清政府在各通商口岸委派海关监督一名为该地通商事务最高行政长官,税务司只是海关监督助理,总税务司归总理衙门领导,但由于总税务司掌握了募选各口税务司的人事大权,副税务司、帮办等等高级职员也均由外国人担任,故实际上总税务司及各口税务司已成为凌驾于清政府及各口海关监督之上、控制清王朝财政命脉、进而操纵清朝政府的外国侵略机构。

安庆保卫战 咸丰十年(1860)二月至(1861)十一年八月,太平军为救援安庆,与湘军进行了多次艰苦卓绝的战斗。安庆为长江中游重镇、安徽省城,又是太平天国京师西大门。自咸丰三年正月攻克安庆以来,一直以之作为天京和西线太平军人力物力的供应基地。咸丰十年二月,曾国藩分三路进攻安庆:曾国藩之弟、道员曾国荃率部进犯安庆西北集贤关,副都统多隆阿率部攻桐城,道员李续宜率部接应。曾国藩设大营于皖南祁门,胡林翼等设大营于皖北英山(旋移营太湖)。五月,湘军攻占枞阳,完成对安庆的包围。十月,曾国荃所部陆师万余人自集贤关攻城,复有水师助战。太平军固守待援,曾国荃乃掘长濠围困安庆。十一月,英王陈玉成率部西征武汉途中图解安庆之围,与湘军多隆阿、李续宜部大战于桐城挂车河,未能取胜。次年三月,陈玉成回师集贤关,于菱湖北岸筑垒十三座,并派部将吴定彩率兵千余入安庆城助守。四月,陈玉成率太平军与曾国荃所部水陆师大战于安庆城郊,失利,乃留部将刘玱琳镇守赤冈岭,陈亲去天京求援。五月,湘军攻陷赤冈岭,刘玱琳等太平军将士两千余人牺牲。七月,陈玉成率援军再救安庆,苦战半月有余,劳而无功。八月初,安庆城内粮绝,湘军乘机以地雷轰倒北门城垣,攻入城中。守城太平军在饥饿垂绝的情况下奋起抵抗,经过激烈巷战,两万余人全部壮烈牺牲,安庆陷落。陈玉成率部退守庐州(今合肥)。

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 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十六日,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再解天京之围。先是,一月初十日,江南大营清军攻陷江浦、九洑洲,添筑堡垒,增掘长濠,加紧围困天京。为解天京之围,必须彻底摧毁江南大营。干王洪仁玕与忠王李秀成等决定以"围魏救赵"之计,奇袭杭州,调动江南大营清军,然后乘虚破之,解除天京威胁。二月二十七日,李秀成率精兵攻克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等死之。清廷急调江南大营总兵张玉良率部援浙。李秀成乃于三月初三日自杭州间道回援天京。闰三月,英王陈玉成、中军主将杨辅清、左军主将李世贤、右军主将刘官芳、定南主将黄文金、平西主将吴定彩等各路太平军亦齐集天京城外,城内太平军则从七桥瓮、上方

门、安德门等地出击，太平军五路并进，向江南大营清军发起猛攻。陈玉城率部首先突破清军长濠，攻陷得胜门至江边一带清军营垒五十余座，歼敌数万。随后，太平军进攻孝陵卫，钦差大臣、江南大营主帅和春狼狈逃跑，营内存银十余万，军火局内所存枪炮，子药等皆成为太平军战利品。围困天京达八年之久的江南大营被彻底粉碎。

太平军挺进苏、杭 咸丰十年(1860)春，天京外围战斗胜利结束以后，太平天国领袖们又进一步制定了东下苏、杭、沪的战略方针。闰三月二十五日，忠王李秀成率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刘玱琳等各路太平军大举挺进东南，经句容进兵丹阳。闰三月二十九日黎明，太平军乘大雾分道疾进，踞守丹阳的江南大营帮办张国梁部清军一触即溃，张国梁落水而死，钦差大臣和春逃往常州。驻守常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拥兵两万，却腐败不能战。四月初一日，清军开东门逃跑。何桂清逃往上海；和春逃到浒墅关，绝望自杀。四月十三日，太平军在苏州人民的协助下，顺利占领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随即，太平军分兵掠地，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先后攻克苏南各重镇。六月，英王陈玉成挥师南下，自天京经宜兴进入浙江，连克临安、余杭等地，直逼杭州卖鱼桥。不久因安庆告急，回师安徽，未能拿下杭州。咸丰十一年四月，太平军李世贤部再次攻入浙江，连克浙东、浙西大部地区。八月，李秀成率部自江西攻入浙江，与李世贤会合，于十月包围杭州。十一月底，在杭州人民的配合下，太平军攻克杭州。太平天国分别以苏州和杭州为中心，建立苏福省和浙江省，以之作为天京的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地。

太平军两次进攻上海 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两次进攻上海。上海地处东南前哨，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也是中外反动势力集中的地区。咸丰十年，太平军进军苏、常，逼近上海，上海的中外反动分子极为恐慌，清苏松太粮道杨坊乞求法军代守上海。四月初六日，英国公使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联合发出布告，表示愿负责"保护"上海，并随即组织联合部队，在上海近郊布防。四月十三日，杨坊等资助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进攻太平军，于五月二十八日攻陷松江。六月十五日，太平军后军主将李秀成率部于青浦击败洋枪队，华尔身受五伤，部下损失达三分之一之多，狼狈逃回上海。太平军乘胜收复松江，并于七月初二日进攻上海，占领徐家汇，逼近上海西、南两门。上海英、法侵略者协助清军顽抗。李秀成因敌人炮火猛烈，自身兵力不足，加以嘉兴告急，遂于是月初五日撤兵。咸丰十一年(1862)十二月初八日，李秀成乘浙江大胜之势，自杭州分兵五路进军上海。上海官绅在英国参赞巴夏礼的主持下成立上海会防局，筹措饷械，督调军队策划防守事宜。同时英法联军也从天津陆续调到上海，组织了一支一千七百多人的干涉军，由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与法国海军上将卜罗德指挥在上海布防。同治元年一月二十六日，何伯、卜罗德率英法干涉军，华尔率洋枪队凭借精良的武器向屯兵高桥的太平军发起进攻，太平军作战不利。二月初一日，何伯又率兵偷袭肖塘太平军，并对村民进行烧杀抢掠。三月初六日，英国上将士迪佛立率领刚从天津开到上海的英国援军，会合何伯、卜罗德及新到的沙俄侵略军进攻七宝、王家寺太平军大营。次日，卜罗德以大炮轰毁罗家港太平军营垒。初十日，李鸿章率淮军自安庆乘船抵上海，也加入了进攻太平军的行列。三月十九日，士迪佛立、卜罗德率英法侵略军猛攻周浦太平军，打死太平军六百余人，并将被俘的三百名太平军将士残酷屠杀。四月十九日，太平军与英法军、"常胜军"(洋枪队)、淮军大战于奉贤南桥镇，击毙卜罗德。李秀成闻知上海太平军作战不利，立即从苏州赶到上海前线，组织反攻。太仓一战，击毙清知府李庆琛，歼敌五千，并乘胜攻克嘉定，进逼上海。五月初二日，李秀成大败华尔的"常胜军"，进围松江，不久克复青浦，俘获"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五月二十一日进至法华镇、徐家汇、九里桥，直逼租界和上海县城。次日，李鸿章率淮军进攻太平军，太平军作战失利，李秀成率部退至苏州，第二次进攻上海失败。

洋枪队成立 咸丰十年(1860)四月，美国人华尔得清苏松太道吴煦和粮道杨坊赞助，在上海招募了一批外国水手、逃兵、流氓等，配以洋枪、洋炮等精良武器，成立洋枪队。华尔自任领队，美国人法尔思德、白齐文任副领队，驻松江广富林进行训练。五月中旬，洋枪队袭击太平军占据的松江、青浦等地，为忠王李秀成所败，被歼近三分之一，华尔身中五伤，狼狈逃回上海。自咸丰十一年始，改募中国人为士兵，以外国人为军官，扩充至千人。

沙俄吞并乌苏里江地区 咸丰十年(1860)五月十四日，沙俄悍然出兵占领中国东北重要海口海参崴。中俄《瑷珲条约》订立后不久，沙俄又将侵略魔爪伸向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咸丰八年五月初二日，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东正教大主教英诺森的陪同下，乘船抵达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处的伯力，擅自将该地命名为"哈巴罗夫卡"，以纪念十七世纪中叶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的沙俄殖民强

盗哈巴罗夫。此后到咸丰九年间，穆拉维约夫亲率船舰不断闯入乌苏里江，并在江东地区建立了二十三个军人村镇，移民三百多户，派兵三千余人驻守。沙俄侵略者对世居此地的中国居民任意枪杀，强行撵走当地中国官员和岗哨，还派人四处非法勘查，私自绘制中国东北边界地区地图，将《瑷珲条约》中割去的中国领土和乌苏里江以东所谓中俄"共管"地区全部划入俄国版图，对中国政府的多次抗议置之不理。沙俄侵占海参崴后，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至此，沙俄在北起黑龙江口，南到图们江口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包括库页岛全部实行了军事占领。并于咸丰十年十月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将这片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彻底吞并。

北塘激战　咸丰十年(1860)六月十五日，英法联军占据北塘。先是，咸丰十年初，英、法政府为报复上年大沽口惨败及在中国掠夺更多的特权，再度分别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英、法驻华全权专使，并以克灵顿和孟斗班分任两国侵华军司令，准备扩大侵华战争。是年春，英国军舰及运输船一百七十三艘，军队一万八千余人，法舰三十二艘、军队七千余人陆续开到中国。六月中旬，英法联军舰队再次集结大沽口外。其时，负责天津一带防务的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因上年大沽之胜骄傲轻敌，于北塘一带除埋设了一些地雷外，竟尽撤该地防务，专守大沽。此情况被先期到达渤海湾刺探清军情报的俄使伊格纳切夫探知，密报葛罗。于是英法联军遂制定自北塘登陆，抄袭大沽炮台后路的作战计划。六月十五日，英法联军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北塘，顺利完成了登陆计划。十七日，联军两千余人在侦察前往大沽道路时，与清军发生遭遇战。二十六日，联军一万余人分两路猛扑新河和军粮城。经过激战，清守军三千余人全军覆没，新河、军粮城相继失陷。二十八日，联军占领塘沽。七月初二日，白河南岸的大小梁子亦告失陷。大沽炮台遂陷于腹背受敌境地。

第三次大沽激战　咸丰十年(1860)七月初五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北塘之战后，大沽炮台陷于腹背受敌境地。七月初三、初四两日，联军数百人由塘沽进至石缝炮台背后作进攻准备，被清军击退。初五日晨五时，联军向大沽口北岸炮台发起猛攻，海上敌舰亦发炮助攻。镇守炮台的清直隶提督乐善率军顽强抵抗，经过一天激战，毙伤敌军四百余名，乐善力竭捐躯，守台将士全部壮烈殉国，炮台陷落。驻守南炮台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见大势已去，率部撤往天津。直隶总督恒福在英军巴夏礼的威胁下，将南炮台及全部军火物资拱手交给英法联军，自己也于初七日逃回天津。第三次大沽之战遂以清军惨败，炮台陷落而告结束。英法联军兵锋直指天津。

英法联军攻陷天津　咸丰十年(1860)七月初八日，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先是，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镇守南炮台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撤至天津。又以天津"较之大沽，不啻天渊"，更难扼守，遂将天津炮台大炮运回北京，小炮及绿营官兵撤至通州，将天津拱手让给了侵略者。七月初八日，英法联军侵入天津以后，以占领者的姿态宣布：天津城置于军事管制之下，文官仍留原任，由英国侵略军翻译官巴夏礼"监督政务"。直隶总督恒福、天津县知县等清朝官员遂成了侵略者的附庸。天津绅商张文锦等还专门成立"支应局"替侵略者办理供应等事。天津陷落后，咸丰帝急命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恒祺为帮办大臣在天津与英法联军议和。谈判中，英法方面提出天津开埠、赔款英法各八百万两、各带侍卫一千人进京换约、保护天主教、允许华工出口等条款。桂良等唯命是听，接受了全部条件。咸丰帝担心外国军队入京会危胁其统治，坚持先退兵，后定约，令桂良等不得签字，谈判遂无结果。

通州八里桥激战　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七日，清军在通州城西八里桥迎战英法联军。先是，该年七月，英法联军因天津谈判无结果，遂于二十四、二十五两日，自天津向北京逼进。沿路数百村镇尽遭掳掠。咸丰帝急忙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与英法联军重新议和，同时令僧格林沁在河西务一带防堵。联军侵占河西务后，派巴夏礼、威妥玛等为代表，于七月二十九日在通州与载垣等初次会谈。载垣表示愿接受英法方面过去提出的全部要求，但英法代表又提出向中国皇帝面交国书，遭载垣等拒绝。八月初四日，英法联军进犯通州张家湾，谈判破裂，清方拘囚巴夏礼等英方代表二十六人、法方代表十三人。同日，僧格林沁兵败，通州失陷，联军继续向西推进。八月初七日，联军自郭家坟分三路向八里桥一带猛扑。其时，驻守八里桥一带清军不下三万，分别由僧格林沁、胜保、瑞麟统率。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西路英军从于家卫方向包抄，清军西面僧格林沁所部首先溃退；中部胜保左颊、左腿中弹落马，阵营亦乱；东面瑞麟虽继续在八里桥头与法军展开激烈争夺，无奈孤掌难鸣，终于被迫西撤。是役清军全线溃退，伤亡过半。次日，咸丰帝自圆明园逃往热河。

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　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之后，将这座中外驰名、精美绝伦的"万园之园"付之一炬。圆

明园历经康、雍、乾、嘉、道五代一百多年的增修扩建,成为汇江南众多名园之胜景,集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的“万园之园”。园内珍藏着大批历代罕见的典籍书画、鼎彝礼器、铜瓷古玩、金玉珠宝,堪称人类文化艺术的宝库。八里桥之战后,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听说中国皇帝正在圆明园,遂绕道安定门、德胜门,直逼北京西郊,于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占领圆明园。在圆明园,英法侵略者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抢劫。先由军官们分批进入,随后下令士兵可以进去“自由抢劫”。参与焚掠圆明园的英国侵略者戈登供认,“离开圆明园时,军中每个人都获得值45镑以上的掠夺品”。这些抢来的奇珍异宝,除大批运回本国外,还在天津街头公开拍卖,然后将钱按等级发给军官和士兵。抢劫之后,为销脏灭迹,并对清朝进行报复,英法联军悍然放火,八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火烧圆明三园;九月初五、初六两天又烧毁了周围香山、玉泉山、清猗园等地。一座世界名园就这样被外国强盗们毁成了一片残垣断壁。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　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九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先是,咸丰帝获悉通州兵败,联军进逼北京,遂于八月初七日以载垣、穆荫办理和局不善,撤去钦差大臣职务,改派其六弟恭亲王奕䜣为钦差大臣继续求和,自己于次日清晨率后妃、皇子及王公大臣逃往承德。此时的北京城,物价飞涨,人心慌慌,官眷、商民等出城逃避者“十有七八”,六部九卿无人入署办事,京城内外十余万清军“溃散十之八九”。八月二十一日,联军直抵北京城下。次日抄至德胜门外土城,暗袭僧格林沁,清军不战自溃,退往西郊圆明园。联军尾追,攻占圆明园。奕䜣等逃往万寿寺。二十四日,清廷释放了先前拘囚的联军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二十六日,联军照会奕䜣,限于二十九日开放安定门交联军驻守。是日,奕䜣等决定交出安定门,联军遂侵入北京。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　咸丰十年(1860)八月,太平军各路将领云集天京,准备进行第二次西征,以解安庆之围。西征军主力由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分别率领,计划于次年三月会师武汉。八月中旬,陈玉成首先率部北上,于十月中旬进驻桐城西南挂车河,试图顺道解安庆之围,结果遭到失败,只得继续西进,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攻克湖北黄州(今黄冈),距武汉仅一百六十里。是时武汉清军不满三千,士子官绅纷纷逃窜,如果陈玉成长驱直进,武汉指日可下。但他却听从了英国参赞巴夏礼的劝告,且以为李秀成尚未进入江西,不愿冒孤军深入之险,遂放弃武汉不攻,留部将赖文光守黄州,自率主力撤回安徽谋解安庆之围。李秀成本就立意经营江浙,对以大军西征湖北三心二意,经洪秀全再三催逼,才于咸丰十年九月自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出发,十月下旬进逼曾国藩祁门大营。时曾国藩兵力单薄,无力抵御,预写遗嘱,准备后事。湘军悍将鲍超闻讯疾援。李秀成未能探清敌情,放过祁门,绕道徽州转入浙江,于次年初进入江西,五月才进军武汉。此时陈玉成已然退回安徽,李秀成遂在鄂南一带召集数十万起义群众,六月退回江西,不久远走浙江。由于李秀成未能按期与陈玉成会师武汉和英国侵略者出面干涉,致使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劳而无功,解救安庆计划未能实现。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　咸丰十年(1860)九月十一、十二两日,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在京签订。先是,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后,进一步对清政府进行威胁:如不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即将以同样的方式焚毁北京城内宫殿。恭亲王奕䜣等早被英法联军吓破了胆,不敢面见英、法代表,明知沙俄包藏祸心,也只得乞求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从中斡旋。伊格纳切夫答应“居间调处”,但要以清廷与英、法媾和后,立即与俄国签约解决边界问题为条件。同时还威胁奕䜣,不管清政府是否愿意,都必须接受英、法方面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否则“北京城就会因此而毁灭”。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胁和俄使的劝诱逼迫下,奕䜣分别于九月十一、十二两日,代表清政府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和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礼部大堂交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九款、中法《北京条约》十款。除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外,还包括以下内容:一、赔偿英国军费八百万两、恤金五十万两,法国军费八百万两、恤金二十万两。二、增开天津为商埠。三、允许华人赴英、法属地及外洋各处做工。四、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九龙半岛界线街以南)给英国。五、赔还教产给天主教堂。另外,葛罗还指使充当翻译的法国神父在条约中文本中偷偷加入“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条文。《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军队相继于九月下旬退出北京。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　咸丰十年(1860)秋,沙俄利用英法联军强占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新约之机,借口“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与之签订新约。该年十月初二日,清钦差大臣恭亲王奕䜣与俄使伊格纳切夫在北京签订《中俄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共十五款。除强迫清政府确认《中俄瑷珲条约》外,尚有如下内容:一、将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二、规定中俄西段疆

界，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即伊塞克湖）至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为界。此条款为今后进一步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三、增开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为商埠，准许两国边民自由贸易，准许俄国商人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张家口零星贸易。四、俄国得在喀什噶尔、库伦增设领事官，重申在华俄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经恭亲王奕䜣等奏请，于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初十日，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总理衙门"一切仿照军机处办理"，官员分大臣、章京两级。以亲王一人总领，另设总署大臣若干名，于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特简。最初的总署大臣为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三人充任，其后一般七、八人、多则十余人。章京则从内阁、部院、军机处司员中挑补，最初定为满、汉各八人，以后逐渐增加。其中总办章京四人、帮办章京二人，综理日常事务，其余分派各股办事。总署设独立公所，分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另设司务厅、清档房等。下属机构有同文馆、总税务司署，并管辖南、北洋通商大臣，选派出使各国大臣等。总署职权极广，总揽清廷外交事务及与外国有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方面大权，但无权指挥各省督抚。在总署存在的四十年中，恭亲王奕䜣任总领大臣前后凡二十八年；庆亲王奕劻，前后凡十二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山东文贤教起义 咸丰十年（1860），山东邹县爆发文贤教起义。先是，咸丰三年，白莲教支派文贤教首领宋继鹏、冯开疆、郭凤冈、李捌等人以邹县白莲池为中心进行活动，势力所及，达于曲阜、泗州等地。他们购置武器，训练教徒，自立"天纵"年号，设置官职，秘密准备武装起义。咸丰十年，邹县知县林士琦率兵勇两千进山围剿，宋继鹏等率领教众两次打败林士琦，正式誓师起义。咸丰十一年攻克邹县，起义力量进一步发展。同治二年，（1863），清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率部镇压文贤教起义。起义军兵败，山寨被清军攻破，三万余人死难。

山东长枪会起义 咸丰十年（1860），山东菏泽一带爆发长枪会农民起义。先是，咸丰九年，山东菏泽郭家糖房秀才郭秉钧在家乡兴办团练，取名"一心团"，或称"长枪会"。他们控制旧黄河口岸码头，靠为粮、盐船只装卸货物获取经费，发展组织，逐步扩大成一支拥有十万人众的团练武装。首领除郭秉钧外，尚有刘占考、倪广和、焦桂昌等，活动于菏泽、曹县、濮州、定陶等地。咸丰十年捻军赵浩然、刘玉渊、李成等部从此经过，对长枪会影响甚大。山东团练大臣杜翻本就对人多势众的长枪会颇为忌惮，此时乘机告变，诬郭秉钧等谋反。于是长枪会被迫起义，攻占范县，在运河截夺漕船、盐船，屡败清军。咸丰十一年，僧格林沁和胜保联合进攻长枪会起义军，刘占考叛变投胜保，长枪会起义失败，郭秉钧率起义军余部加入捻军。还有部分起义群众留在当地，转入黄河与运河交叉之"水套区"，继续进行斗争。

山东幅军起义 咸丰十一年（1861）春，山东南部爆发刘双印、孙化祥等领导的幅军起义。先是，山东运河沿岸徐、海、邳、宿、郯、兰、滕、峄一带漕运船夫，以"匹布分幅帕头"，组成秘密团体，号称"幅党"。咸丰十一年春，捻军进入山东，幅党首领刘双印、刘平等率众起义于峄县云谷山，孙化祥、孙化清兄弟聚众起义于费县岐山。同治初年黄河改道，漕运改为海运，原倚漕为生的大批船夫失业，纷纷加入幅党起义军。起义队伍迅速扩大，经常与捻军李成、李帛部，长枪会起义军张守义部等配合作战。同治二年（1863），清漕运总督吴棠、总兵陈国瑞等率部围剿幅军。孙氏兄弟等战死，刘双印突围后投奔邹县习文教起义军。幅军起义失败。

广西延陵国起义 咸丰十一年初（1861），广西农民起义领袖吴凌云在太平府自称延陵王，建立农民政权延陵国。先是，咸丰二年夏，广西天地会首领吴凌云率领壮族、汉族农民在广西太平府新宁州陇罗圩发动起义，当地各族人民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咸丰七年，攻入新宁州城。咸丰十年，起义军先后攻克养利、太平、龙州等地，控制了左、右江大部地区。吴凌云以长子吴亚终守太平、次子吴朱元守养利，自己于次年初在太平府称王，修筑宫室、蓄发易服，铸"延陵玉玺"，分封部下梁国桢、梁谦之等数十人官职有差，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延陵国。同治元年（1862），清军攻陷太平府，吴凌云率起义军撤至陇罗圩。次年初，清军围陇罗圩，昼夜猛攻。吴凌云率众突围时不幸牺牲。余部在刘永福等率领下继续坚持斗争。

贵阳教案发 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初五日，贵州团务道赵畏三率领团丁烧毁贵阳青岩镇晁家关教会学堂，逮捕教徒张如洋等四人，并绑赴法场处斩。先是，法国天主教贵州主教胡缚理以《天津条约》为护身符，在贵阳一带强行传教，并违反清廷法规，擅乘紫呢大桥，雇用鼓吹，盛设仪仗，招摇过市，

且强占民产，威胁官吏，种种不法，激起当地绅民公愤。贵州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恕联名向全省官吏发出公函，指斥天主教为“异端邪说”，教会“肆行无忌，心实叵测”，发起“灭教”运动。候补道缪焕章编撰《救劫宝训》(亦称《救世宝训》)，鼓吹“屏黜异端”，号召灭教。于是田兴恕部下官兵首先在贵阳附近展开激烈的驱教活动。五月初五日，遂发生青岩教案。同治元年一月(1862)，开州(今贵阳)知府戴鹿芝又借群众控告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唆使教徒拒缴春节赛会捐款之故，将文乃耳及教堂教士、教民四人逮捕处死。教案发生后，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哥士耆向清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英、美等国公使也推波助澜，主张“严办官吏，以儆效尤”，故交涉经年未决。同治二年十一月，清政府在法国新任驻华公使柏尔德密的战争恫吓下，将田兴恕革职，发配新疆；缪焕章革职永不叙用；何冠英、戴鹿芝、赵畏三已死，毋庸议处；接替何冠英任贵州巡抚的韩超交部议处；《救劫宝训》书板销毁；提督衙门拨给胡缚理充作教堂，赔款一万二千两，才将此案了结。

浙江金钱会起义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浙江南部爆发赵起等领导的金钱会起义。浙江、福建一带天地会支派繁多，有金钱会、红钱会、江河会、小刀会等各种名目。太平天国时期，浙江金钱会首领赵起在平阳、瑞安、永嘉等地秘密活动，于当地贫苦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中间发展会众，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以铜汁浇铸康熙制钱之面，上刻“金钱义记”四字散给会众，作为标记。咸丰十一年七月，赵起同周荣、朱秀三、缪元等一起在平阳钱仓聚集会众，起义反清。起义军一度占领福鼎、温州、平阳等州县。同治元年一月(1862)，闽浙总督庆瑞派总兵秦如虎率军镇压。起义军作战不利。赵起率余部投归太平军。次年在德清殉难，起义失败。

咸丰帝死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逝，终年三十岁。上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逃到承德以后，不久即患病。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口授遗诏，立其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同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额驸景寿，以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要他们辅弼幼主，掌管朝政。次日，咸丰帝病死于避暑山庄。十一月，定谥号为“显皇帝”，庙号“文宗”。

同治帝即位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咸丰帝死后，载淳即位，以明年为祺祥元年。尊其嫡母、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为皇太后，称“母后皇太后”；尊其生母、咸丰帝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为皇太后，称“圣母皇太后”。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次日发生北京政变。十月初九日，载淳在北京举行登极大典，正式即皇帝位。废除原赞襄政务八大臣所定祺祥年号，改明年为同治元年。

清廷发生“垂帘之争”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六日，御史董元醇上疏朝廷，以皇帝年幼为理由，请求由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奏折中说：“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遂引起清廷内部一场“垂帘之争”。先是，咸丰帝死后，六岁的载淳即皇帝位，大权掌握在咸丰帝生前任命的“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载淳生母、野心勃勃的慈禧太后那拉氏不甘心受人摆布，企图效法古人，垂帘听政。一些朝臣也想借机捞取政治资本，董元醇上奏不久，内阁学士、兵部侍郎胜保，山东巡抚谭廷襄等故意违反清朝祖制，以黄折向皇太后请安，表示对垂帘之议的支持。对此，肃顺等八大臣立即进行反击。他们以小皇帝名义发出上谕，斥责胜保等违背朝廷体制，交部议处，并通令各级官员，今后不准向两宫太后请安。董元醇上奏的第二天，那拉氏召见八大臣，要他们照董元醇所奏传旨实行，肃顺等“勃然抗论”，并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双方争论激烈，以至吓得小皇帝啼哭不止，“遗溺后衣”。最后，肃顺等以祖制无垂帘之礼为辞，驳回董氏建议。表面上，“垂帘之争”以八大臣暂时胜利告一段落，但那拉氏并未甘心，暗中勾结恭亲王奕䜣等，加紧作政变准备。

胡林翼死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六日，胡林翼在武昌呕血而死，终年四十九岁。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授编修。道光二十八年(1848)署贵州安顺知府，道光三十年署镇远知府。两任内先后镇压当地苗民、瑶民及会党起义多起。咸丰元年(1851年)补黎平知府，推行保甲、团练，对抗农民起义。咸丰四年擢贵东道，奉命率贵州团练三百余人到湖北抗击太平军，寻赴湖南助曾国藩练湘军，镇压安化农民起义，授四川按察使(未到任)，旋调湖北按察使。年底随曾国藩进犯九江、湖口，受挫。调湖北布政使，率部援武汉，署湖北巡抚。咸丰六年十一月，率部攻陷武昌，实受湖北巡抚，赏头品顶戴。咸丰七年以后，继续与湘军配合，在安徽、九江、湖北等地镇压太平军。咸丰八年陷九江。次年，策划分兵四路进犯安徽，移师太湖，配合曾国藩攻安庆。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清军攻陷安庆，晋太子太保。八月二十六日在武昌病死。其著作

辑为《胡文忠公遗集》。

辛酉政变发生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三十日,太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䜣等在北京发动政变,从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手中夺取了朝政大权。载淳即位后,其生母慈禧太后那拉氏对辅政八大臣不甘雌服,遂联合慈安太后钮祜禄氏与肃顺等八大臣争权,并暗中与在京的恭亲王奕䜣等进行联系。八月初,奕䜣在与外国侵略者取得默契后,以奔丧为名,赶至承德避暑山庄,与那拉氏等密商后返京进行政变布置。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灵柩自承德起运回京。那拉氏故意让肃顺负责护送,自己同钮祜禄氏及小皇帝由其他七大臣等扈从先行回京。二十九日,那拉氏等到京,于当日召见奕䜣,次日发动政变,将载垣、端华等革职拿问,同时派人逮捕了尚在密云途中的肃顺。十月初一日,封奕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初五日改祺祥年号为同治。初六日命将载垣、端华赐自尽,肃顺斩首示众,景寿等五人或革职或遣戍。十一月初一日,那拉氏与钮祜禄氏在养心殿正式垂帘听政。由于钮祜禄氏性情“和易少思虑”,不愿多问朝政,朝廷大权遂落入那拉氏一人之手,从此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去世,她掌握清朝最高权力达四十余年。

肃顺死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太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䜣等联合发动政变,逮捕了护送咸丰帝灵柩于密云途中的“赞襄政务王大臣”肃顺,于十月初六日绑缚菜市口斩首示众,终年四十五岁。肃顺字雨亭,一字豫庭,清朝宗室,郑亲王端华之弟。咸丰初以敢于任事渐受重用,官至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主张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族官僚镇压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对前大学士耆英参与议和深恶痛绝,具疏请予正法。后与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谈判,严词拒绝沙俄对我国乌苏里江以东的侵略要求。在咸丰帝的支持下,肃顺大力整顿吏治,惩办贪污。戊午科场案,力主将主考官、大学士柏葰斩首,以振纲纪;又疏劾户部宝钞处与官票所官吏和不法商人因缘为奸,交通舞弊,籍没官吏、商人数十家。由于肃顺办事不讲情面,且恃宠而骄,目无余子,所以引起朝内外一些人的嫉恨。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肃顺随咸丰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并于咸丰帝临死前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对那拉氏的争权夺势,肃顺与其它顾命大臣一起进行了坚决反击,以致双方矛盾日趋尖锐,终于酿成“辛酉政变”,肃顺被杀。

安庆内军械所设立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安庆内军械所,也称内军械所,制造火药、子弹、炸炮等,用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是为中国最早的官办制造近代武器装备的军事工厂。厂内“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规模较小,以手工制造为主。同治元年(1862),著名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与华蘅芳、华世芳兄弟等人一起,在安庆内军械所试造蒸汽舰船。经过数年努力,首先制成我国第一台蒸汽机。并在此基础上于同治四年造成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命名为“黄鹄”号。同治三年清军攻陷南京后,内军械所由安庆迁至南京,次年改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

洋务运动开始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开始。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殖民势力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进一步加深,为综理一切和外国交涉事务及与之有关的各项“洋务”,清政府特于咸丰十年底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随之设立南洋、北洋通商大臣。从此,办理“洋务”渐成为清政府政治、经济活动中一项重要事务,而积极倡导、兴办各种“洋务”的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即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某些制度办法,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所以,洋务派优先考虑的目标是“强兵”。为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洋务派自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聘用外国军官,购买洋枪洋炮和一些船舰训练、装备清军,同时创办军事工厂,自己制造枪炮子弹和轮船。自安庆内军械所设立后,洋务派在山东、湖南、湖北、江苏、福建、上海、直隶、四川、甘肃等地先后创办了大批军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等,皆属于官办工业企业。为了培养洋务人材,清政府还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设立同文馆、西学馆,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随着军事工业的不断增加,所需经费、原料、燃料,运输等日益紧张,于是,洋务派又在“求富”的口号下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兴办了一批民用工矿企业和运输业。其中最著名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开平矿物局、天津电报局、兰州制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铁政局、湖北织布局、天津至山海关铁路等等。此类企业中,有官办、也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属于规模较大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但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另外,洋务派还购买和制造了大批军舰,创建新式海军。中法战争前,清朝海军包括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三部分。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管

理一切与海防有关的事务。洋务派举办"新政",标榜"求强"、"求富",却坚持与人民为敌,过分依赖洋人,终于在中法、中日战争中遭到彻底失败,但其所办军事、民用企业,对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倡导的作用。

黄崖山开展抗清斗争 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五年(1861—1866),太谷学派传人张积中在山东肥城、长清之间的黄崖山一带领导抗清斗争。张积中字石琴,江苏仪征人。贡生出身,曾拜合儒、释、道三家为一,自创"太谷学派"的周太谷为师。咸丰六年,张积中不堪清围困天京的江北大营骚扰,携眷迁居山东济南附近,在黄崖山一带讲学授徒,从者甚众。咸丰十一年,因避难迁入黄崖山中的各地群众达八千余家。张积中命弟子修筑山寨,购置武器,凡入山者以其财物半数归公,又于山外城镇设立商号,以所赚供山寨用度。当地清朝官吏以其聚众荒山,图谋不轨,上书告变。山东巡抚阎敬铭命张积中投案对质,遭张拒绝。阎敬铭遂派清军万余人包围山寨,进行围剿。张积中率众顽强抵抗。同治五年,山寨被清军攻破,张积中及寨中群众全体死难,无一降者。

山东宋景诗起义 咸丰十一年(1861),山东堂邑(今聊城西北)一带爆发宋景诗等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宋景诗为山东堂邑小刘贯庄人。早年曾当过兵,作过小贩、拳师,并贩过私盐。咸丰十年曾于家乡聚众抗粮,要求减免钱漕。次年与白莲教首领杨泰、左临明等在堂邑、冠县等地发动起义。起义军以"天龙八卦"形式进行组织领导。宋景诗所部属坎卦,旗为黑色,故称"黑旗军"。黑旗军在宋景诗、姚泰来、朱登峰等率领下,接连进攻附近各县县城,声势浩大,远近震动。清钦差大臣胜保对黑旗军采取"剿抚并用"之策,诱使宋景诗投降清军。同治元年(1862),宋景诗率部参加淮北攻捻及陕西攻回战事。胜保死后,宋景诗受多隆阿排挤,于同治二年返回山东,重举义旗。同年九月,被清军僧格林沁部击败,宋景诗离队出走。同治十年被安徽巡抚英翰拿获杀害。

"中体西用"口号提出 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文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道出了以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某些具体办法,来维护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为宗旨的所谓"中体西用"的主张。以后,凡谈"西学"者大都采取类似说法。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鼓吹"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对这一主张作了系统的阐发。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将其付诸实践,并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

外国公使驻京 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1861—1862),英、法、美、俄等国驻华公使根据《北京条约》规定,相继入驻北京,在东交民巷一带设立第一批公使馆。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间互换使团本为正常之事,但因当时的清朝是半殖民地国家,外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公使驻京的权力,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其目的和作用,用美国公使伯驾的话来说,就是为了更好的"驾驭"中国政府,来到它的身边,使它"变得驯顺多了"。因此,外国公使在北京自居征服者地位,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对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扩大其在华侵略特权,干涉中国内政。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更公开划定使馆界,驻兵防守,禁止中国人在使馆界内居住、通过,中国政府不能在界内行使主权,并于使馆界四周修筑高墙,设置炮位、枪眼、俨然成了北京城内侵略者的兵营和"国中之国"。

清政府确定"借师助剿"政策 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十日,慈禧太后那拉氏以同治帝名义发布上谕,正式宣布了清廷"借师助剿"的决策。早在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攻楚南时,就有人提出请洋人派"火轮船入江助剿"的建议,因两江总督沿江阅兵而中止。次年太平军兵临南京,上海道吴健彰奉巡抚杨文定之命,向上海美、英、法领事乞援,要求外国兵船开入长江,帮助清军驻守南京。其时外国侵略者因尚未摸清太平军虚实,不愿冒然表态,是以未曾答应。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美国在英、法支持下,曾以"助顺剿逆"为条件,向清廷提出修约要求,战争结束后,各国侵略者再次向清廷明确表示愿意助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咸丰十年九月,《北京条约》刚一签字,法使葛罗即向恭亲王奕䜣表示,法国所有船只兵丁愿悉听调遣,帮助清廷"攻剿发逆"。俄使伊格纳切夫也提出愿为清军"教铸枪炮",并派兵镇压太平军。咸丰十一年(1861),英、美两国也先后提出愿助清廷"压平内乱"。对此,清廷中许多实力派大臣极表赞赏。奕䜣、曾国藩、薛焕等相继向朝廷建议"借师助剿"。是年十一月,太平军攻克宁波、杭州,十二月再次进攻上海,终于使清廷下了最后的决心,作出"借师助剿"的决策。从此,中外反动派公开勾结在一起,对太平天国革命进行残酷镇压。

淮军成立 同治元年(1862)正月,李鸿章练成淮军。先是,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攻入安徽

时，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奏调编修李鸿章襄办军务，在安徽办理团练。是年十月，吕贤基被太平军击毙，李鸿章也多次败北，遂于咸丰八年冬投入曾国藩幕府。咸丰十一年冬，李鸿章在曾国藩保荐下赴淮南募集当地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吴长庆军部地主团练武装编练淮勇。次年正月练成，由李鸿章率领开到安庆，与原湘军程学启、郭松林部合并，号称淮军，约七千人，其编制、营规皆与湘军同。二月，李鸿章率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开赴上海，置大营于近郊新桥，勾结英法干涉军、华尔洋枪队在奉贤、松江、青浦一带抗拒太平军，并采取"剿抚兼施"策略向太平天国苏南地区反扑。十二月，李鸿章招降常熟、昭文、太仓一带太平军守将，会同"常胜军"攻陷太仓、昆山等地。同治二年十月攻陷苏州、无锡。次年二月夺取浙江嘉兴，四月攻陷江苏常州、丹阳。六月天京陷落后，李鸿章率淮军配合湘军攻取浙江湖州，继赴安徽、江西、福建等地镇压太平军余部。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李鸿章大量购置洋枪洋炮、雇用外国军官装备、训练淮军，逐渐扩充至六、七万人。同治五年至同治七年，李鸿章率淮军在山东、河南、湖北、江苏和直隶地区镇压了东、西捻军。同治十一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先后抽调淮军军官赴德国学习，并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培养淮系将领，使淮军成为中国第一支新式装备的武装力量，并形成了在清末政治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淮系政治集团。光绪十年(1884)，淮军将领张树声、潘鼎新等在中法战争中兵败被革职，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中，淮系将领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和叶志超、卫汝贵等部淮军均遭惨败，淮军势力渐衰，其地位逐渐由袁世凯新式陆军所代替。

太平军远征西北　同治元年(1862)正月，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等奉英王陈玉成之命远征西北，"广招兵马"。三月十九日，陈得才等攻入陕西，四月进逼西安。旋闻安徽战事不利，乃自西安东向，攻克华州，出潼关，拟打通豫、陕通道，联络捻军回救陈玉成。陈玉成遇难后，陈得才等率部转战于河南唐县、南阳及湖北枣阳、随州(今随县)一带。十月，陈得才等进攻湖北郧阳，沿汉水而上，于同治二年八月进占陕西汉中。同治三年初，陈得才等分三路东援天京，未至而天京陷落，遂留安徽一带与清军作战。十一月，陈得才等在安徽霍山黑石渡为清军僧格林沁部所败，部下马融和部七万余人降敌，祜王蓝成春被叛徒出卖遇难，陈得才服毒自尽。余部由遵王赖文光等率领与捻军合并，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　同治元年(1862)二月初四日，清政府被迫与沙俄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主要内容包括：俄国商人在中国边界百里之内进行贸易概不纳税；"小本营生"之俄商，可在蒙古各地任意贸易，概免纳税；经陆路运至天津的俄国货物，其应纳进口正税"照各国税则三分减一"；运往天津、通州(今北京通县)之俄国货物经张家口时，可酌留十分之二在当地销售，免纳子口税，正税同样三分减一；俄商自张家口贩运土货回国，只纳子口税百分之二点五，免纳出口正税。该章程的签订，开了陆路通商减税之恶例，使中国在税收方面遭受严重损失，并为沙俄侵略者对我国西北、蒙古及东北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创造了条件。

"常胜军"成立　同治元年(1862)二月十六日，清政府将原由美国人华尔统带的"洋枪队"改名"常胜军"，以苏松太道吴煦为督带，记名道杨坊与华尔为管带。外国人称之为"松江军"或"昆山军"。不久，"常胜军"扩充至四千五百多人，由外国军官教练，以洋枪洋炮装备，在上海附近及浙江宁波、余姚等地进攻太平军。是年八月，华尔在浙江慈溪县城被太平军击伤毙命，改由副领队美国人白齐文继任。十二月，白齐文因索饷事被革职，暂由参谋长英国人奥伦暂代。次年一月，英军工兵队指挥官戈登被任命为统带，继续与太平军为敌。全军分五、六个步兵团、四个攻城炮队、两个阵地炮队、一个舰队，共三千余人。同治三年四月十六日在昆山解散。

南昌教案发生　同治元年(1862)二月十七日，南昌群众捣毁天主教育婴堂，拆毁教堂及传教士罗安当座船，罗安当乘夜逃出南昌。先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以《天津条约》为护身符，在南昌地区强索民地、民房，网罗教徒，强行传教，激起民愤。适值反对教会的《湖南阖省公檄》传入南昌，立时"众论沸腾"，南昌绅民汇集豫章书院，捐资翻印湖南公檄，一昼夜印出数万张，贴遍南昌城内外大街小巷。不久遂发生南昌教案。教案发生不久，南昌街头又出现《扑灭异端邪教公启》，号召全省绅民"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共灭邪教、驱除侵略者。罗安当从南昌逃到上海，通过法国驻沪领事诉于法国驻京公使。法使遂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借机索取江西抚州城外丁家山与九江西门外之琵琶亭及附近空地，交罗安当承管，以为建造房屋之用，并要清政府以七万两白银赔偿其损失。此时清政府正与法国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遂指令江西巡抚沈葆桢以赔款一万七千两，重建教堂了结此案。

衡阳教案发生　同治元年(1862)二月，湖南

衡阳、湘潭等地群众纷纷焚毁天主教教堂、学堂、育婴堂、药材房等，对外国殖民者打着宗教旗号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予以坚决反击。先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以《天津条约》为护身符，要挟清朝湖南巡抚以宾礼相待，并在衡阳、湘潭等地强占民田、民房、修筑教堂、学堂等，进行文化侵略，激起湖南人民公愤。二月间，全省士绅公议驱逐天主教，"有界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诡寄者，执之；有习其教者，宗族不齿，子弟永远不准应试"。又发布《阖省公檄》，指斥教会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伤风败俗，不久遂发生衡阳教案。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馆代办哥士耆向清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进行讹诈，迫使清政府将衡阳、湘潭两县知县革职，赔修教堂，赔偿损失了结此案。

太平天国设立海关 同治元年(1862)三月，太平天国在浙江宁波设立海关。先是，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攻克宁波，原清朝海关即行关闭。太平军宣布三个月内不收关锐。次年三月，太平天国于甬江之东设立海关，称"天宁关"，公布税则，发给执照，开始征税。以太平军将领潘起亮为海关监督。除天宁关外，在天京下关一带还设有"天海关"，由天京直辖，以太平军将领梁凤超负责该关事务。除征税外，一些外事活动也通过天海关进行。

天京会战 同治元年(1862)，五月初，湘军大举进犯天京。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陆师两万进驻雨花台，兵部侍郎彭玉麟率水师进泊护城河口，形成对天京的包围。洪秀全急诏东线忠王李秀成率部驰援。此时李秀成正在全力经营苏南地区，不愿立即回师西向，经洪秀全再三严令催逼，才于该年八月分三路回援天京：李秀成与李世贤率主力进攻围京敌军，陈坤书领兵攻取芜湖金柱关断敌粮道，杨辅清、黄文金等进攻宁国牵制敌援。闰八月二十日，李秀成率部向雨花台湘军发起进攻。激战四十五天，湘军伤亡数千，曾国荃面部受伤，几乎丧命，曾国藩哀叹"心已用烂，胆已惊破"。但太平军陈坤书部为彭玉麟水师所败，未能断敌粮道，湘军水陆配合，拚命抵抗，饷械兵员不断得到补充。而李秀成二十万大军既缺冬衣，复少军粮，将士饥寒，各部将领又不能同心协力，遂于十月初五日停攻撤兵。虽然暂时缓解了天京危局，却未能抓住战机，消灭湘军主力，天京仍处于清军包围之中。

陈玉成牺牲 同治元年(1862)五月初八日，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在河南延津为清军所杀，年仅二十六岁。陈玉成原名丕成，广西藤县人。自幼父母双亡，十四岁时随叔父陈承镕参加金田起义，为太平军童子兵。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陈玉成被任命为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次年随韦俊西征，三月与曾天养等攻占湖北云梦、应城，五月率突击队奇袭武昌成功，升殿右三十检点。咸丰五年随秦日纲、韦俊等再取武昌，随后转战于湖北、安徽等地，屡建战功，升冬官正丞相。咸丰六年春，随秦日纲援镇江。时清军围城数重，内外信息难通，陈玉成亲率壮士数人乘小船冲破清军封锁，进入镇江，与守将吴如孝约定内外夹攻之计，大败清军，镇江之围遂解。随即渡江破江北大营，克扬州、浦口、仪征。五月，参加破江南大营之役，负伤。咸丰七年封成天豫、又正掌率、前军主将，与李秀成等同主太平天国军事。咸丰八年八月，会合李秀成部在浦口摧毁江北大营，十月在三河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稳定了上游局势。次年五月封英王。咸丰十年闰三月，陈玉成与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五路大军共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之围，为进攻江、浙扫清了道路。咸丰十一年西征湖北，被英领事劝阻未攻武昌，回师救安庆，接连失利。八月安庆陷落，陈玉成坐镇庐州(今合肥)，派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去河南、陕西招兵，力图恢复上游。同治元年四月因庐州被困，率部突围，北往寿州，为叛徒苗沛霖诱捕，送至颍州(今阜阳)胜保大营。在解往北京途中遇害。留有经敌删改的笔录供词(即《英王陈玉成自述》)。

"常捷军"成立 同治元年(1862)六月，浙江巡抚左宗棠与驻宁波的法军舰队司令勒伯勒东、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等相互勾结，募集中国士兵约千人，以洋枪洋炮进行装备，聘用法国军官教练，在宁波组建一支军队，号称"常捷军"，也称"花头勇"、"花勇"、"黄勇"、"信义军"、"中法混合军"等。由勒伯勒东亲自担任统领，日意格任帮统，宁波善后局供给军饷，配合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后逐渐扩充，最多时达到三千余人，一般维持在一千五百人左右。曾参与攻占余姚、奉化、上虞等地。该年年底，勒伯勒东及其继任者买忒勒在绍兴相继受伤毙命，改由德克碑统带，参与攻占绍兴、富阳、杭州、湖州等地。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解散。

同文馆设立 同治元年(1862)七月二十九日，恭亲王奕䜣等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该馆为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最初只设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后陆续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学等班。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以后兼收年岁较长的满汉科举出身人员。学习期限初定三年毕业，自光绪二年(1876)后改为两种：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诸学者，八年毕业；年岁稍长，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五年毕业。课程设置最初

只有英、法、俄、汉文，同治六年后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除汉文外其它课程多由外国人担任教习。其经费、人事等权基本控制在总税务司赫德手中。同治八年，赫德提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同文馆总教习，总管校务近三十年。光绪二十七年(1902)并入京师大学堂。

太平军击毙华尔　同治元年(1862)八月二十九日，"常胜军"领队美国人华尔在浙江宁波被太平军击伤毙命。华尔于一八三一年生于美国。1846——1848年在诺维奇大学肄业，受过基础军事训练，后在海上及中南美洲从事冒险活动。曾在法国军队中任过尉官，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后回美国助父经商。咸丰九年(1859)来到中国，在清军水师"孔夫子"号炮船上担任大副。次年四月，为阻止太平军进军上海，在清苏松太道吴煦和候补道杨坊的赞助下，由华尔负责召募外国士兵、水手、流氓等组成洋枪队，与清军及英法干涉军配合作战。咸丰十一年加入中国籍。同治元年一月，华尔率部配合英、法干涉军攻占高桥等地，并于松江一带击败太平军。二月被清廷任为参将，四月，以攻陷嘉定、青浦、奉贤等地，升为副将。八月奉调赴浙江宁波，二十八日进犯慈溪，被太平军击伤，次日毙命。

阿思本舰队事件发生　同治元年(1862)，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受清政府委托，在英国购买兵船七艘，并私自召募六百余名水手、军官，与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订立协议，由阿思本统领助攻太平军。规定该舰队除清朝皇帝的命令外不受任何人指挥(皇帝命令也需李泰国付署才能生效)。同治二年八月，阿思本率舰队开到上海。清政府命总兵蔡国祥为舰队总统，以阿思本为帮统，负责实际指挥，归曾国藩、李鸿章等节制调遣。阿思本以清政府之决定与原协议不合而不满，曾国藩等也因指挥不动而反对，双方争执不决，并引起美、法、俄等国公使不满。曾国藩建议"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清政府遂赏阿思本白银一万两，令其将舰队开回英国变卖，舰队成员就地遣散。后因卖价尚不足遣散费，只得另行拨款添补。是为清廷建立海军的第一次尝试。

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成立　同治元年(1862)，美国旗昌洋行在上海成立旗昌轮船公司，专门经营中国沿海及长江沿岸的客货运输。它是中国境内第一家近代专业航运公司。外国轮船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取得在中国沿海任意航行的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一特权又扩大到长江流域。不久，许多外国洋行如宝顺、怡和、琼记、旗昌、广隆、吠礼查、沙逊等纷纷购船行驶于长江水道，逐渐垄断了长江航运，使长江流域中国旧式航运业遭到毁灭性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洋和长江旧式航运业，在道光年间拥有沙船三千余号，咸丰年间减至二千余号，同治年间只剩下不足五百号了。旗昌轮船公司成立后，各种外国轮船公司相继问世，同治四年，英国成立省港澳轮船公司，在香港、澳门和广州一线开辟航路；同治六年，英国轧拉佛洋行主持成立公正轮船公司，也挤入长江水道；同治七年，北清轮船公司成立，在上海、天津之间开辟航道。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航运业基本为外国人垄断，形成"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的局面。

上海洋炮局成立　同治元年(1862)，江苏巡抚李鸿章委派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城外开办上海洋炮局。不久发展为马格里和刘佑禹、韩殿甲、丁日昌等分别主持的三个洋炮局。其中马格里洋炮局已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聘用外国工匠四、五名，每月可制造大小炸弹四千余枚，还曾制造出几种迫击炮。同治二年，洋炮局迁往苏州，改称苏州洋炮局。又从遣退的阿思本舰队购买了一批制造军火的机器，使生产能力大为提高，每周可生产各种子弹、炸弹一千五百至二千枚，主要用于装备淮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西北回民起义　同治元年至十二年(1862—1873)，西北陕、甘、宁、青广大地区活跃着许多支回民反清起义军。同治元年三月，太平军西征部队进入陕西，各地回民纷纷起义响应。十九日，伊斯兰教阿訇任武聚众起义于渭南，与洪兴同被推举为元帅。任武曾参加过咸丰七年至八年(1857—1858)云南回民起义，回陕西后，藏匿于渭南仓渡镇清真寺，秘密发动群众，制造军械旗帜，准备武装起义。同治元年春，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强迫回民抽拔壮勇，又在华州虐杀回民，任武遂率领渭南回民杀张芾，攻克华州等地，围攻西安，占领渭河流域，屡败清军。后由于西安、大荔一带数十县汉、回群众相互仇杀。死亡达数十万人，削弱了反清力量。同治二年初，清廷以多隆阿为钦差大臣，西上攻回，相继攻陷回民军后方基地羌白旗、王阁村等地，并借口"护汉"，在史家河一带屠杀回民，使六十里内尽成白地。任武等于同治三年率部退往甘肃。其时，甘肃、宁夏、青海广大地区回民也纷纷起义，并逐渐形成四支主要力量：以马占鳌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甘肃南部；以马化龙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宁夏南部；以马文义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青海东部；以马文禄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甘肃西部。其中以马化龙部力量最强，成为整个西北回民起义军的中坚。同治七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西上攻

回，在陕甘交界处招降了以董福祥为首的散兵游勇，成为回民军凶恶的敌人。同治十年左宗棠攻占回民军马化龙部活动中心金积堡，次年又在太子寺击败甘肃南部回民军，并打败了青海回民军马文义部，占领西宁。同治十二年，甘肃西部回民军首领马文禄向清军投降后被杀，白彦虎率部逃往新疆，清军占领肃州。至此，坚持十二年之久的西北回民起义全部失败。

博罗胡吉尔卡伦抗俄激战 同治二年(1863)四月二十四日，沙俄侵略者二百余人携带枪炮闯入中国西北边疆博罗胡吉尔卡伦，被中国军队阻止后退回。二十六日，沙俄侵略者再次以一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炮兵排进犯博罗胡吉尔卡伦，并炮击中国边防哨所。守卡清军对入侵者进行了坚决抵抗。他们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伏兵于敌军即将经过的山谷两侧山梁上，待沙俄侵略者进入山谷后，突然万箭齐发，当场击毙敌部队长安东诺夫中尉，其余或伤或逃。五月十九日，沙俄侵略军在列尔赫中校率领下又一次来犯，再次遭到守卡清军的坚决抗击。双方激战数小时，终于迫使侵略者退出卡伦。六月中旬，沙俄侵略军接连三次向博罗胡吉尔卡伦大举进犯，均被清军击退。清军总计歼敌一百余人，缴获大炮、炸弹等武器多件。

石达开被害 同治二年(1863)五月，石达开在成都被四川总督骆秉章杀害，终年仅三十二岁。石达开，广西贵县人，客家地主出身。因受土著地主排挤，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加入拜上帝会，与洪秀全等结成异姓兄弟，称天父第七子。金田起义后，受封左军主将、翼王五千岁，参与指挥攻克武昌、九江、安庆，占领南京等战役。咸丰七年(1857)他负气离天京出走后，率军转战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屡遭失利，遂于咸丰九年回到广西家乡，幻想稳居山林。部将彭大顺、朱衣点、吉庆元等率领二十万大军离他而去，重返太平天国，石达开只得重聚数万人，于同治元年正月向四川进发。同治二年三月，石达开率部转战至四川紫打地(今安顺场附近)，为大渡河所阻。清军勾结当地土千户王应元、土司岭承恩等步步紧逼。石达开走投无路，辎重尽失，妻儿七人投河自尽，乃致书四川总督骆秉章，表示愿以一身换取全军将士免遭屠戮。四月二十七日，自率幼子石定忠及亲信数人至洗马姑清军总兵唐友耕营投案，随即被解往成都。五月初十日受刑而死。所部将士均被清军施计杀害。

赫德继任总税务司 同治二年(1863)十月初五日，总理衙门以原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中办事不力，将其革退，改派另一名英国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赫德出生于爱尔兰亚尔马郡波达当。1853年毕业于伯尔福斯皇后学院，次年(咸丰四)来到香港，任职于英国商务监督公署。咸丰五年任宁波副领事助理。咸丰八年调广州领事馆助理，并出任英法联军在广州建立的侵略机构“三人委员会”秘书。咸丰九年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咸丰十一年代理总税务司。自同治二年至宣统三年(1911)去世，担任清政府总税务司达四十八年之久。赫德在中国制订并推行了一整套半殖民地的海关制度，长期掌握着中国海关的行政和人事大权，控制着清王朝的财政命脉，还直接参与清朝的外交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他长期受到清政府及李鸿章等人的信任，光绪三十四年请假回国时，清政府特为其加尚书衔。是英国侵华势力的主要化表人物之一。

苏州失陷 同治二年(1863)十月二十四日，太平天国叛徒郜永宽等刺杀慕王谭绍光，将苏州献于清军。先是，该年七月初九日，淮军总兵程学启部进逼苏州。八月，忠王李秀成率部来援，与淮军、“常胜军”在苏州附近连战数日，不分胜负。十月十七日，“常胜军”夜攻苏州娄门外石垒长城，太平军苏州守将谭绍光跣足赤膊督战，打死打伤敌军官兵一百八十人。次日，太平军败类康王汪安钧与程学启议降。十九日，李鸿章亲督“常胜军”与淮军以四十六门大炮猛攻苏州。二十日，李秀成率亲兵万余人撤离苏州，留谭绍光等死守。二十二日，纳王郜永宽再与程学启议定降约，以暗杀谭绍光、献出苏州为条件，换取清廷二品顶戴。二十四日，谭绍光召集郜永宽、汪安钧、北王伍贵文、宁王周文佳等八人商议防务，为郜等所杀，苏州遂陷。后郜永宽等八叛徒亦为清军所杀，降众被迫遣散。

广方言馆设立 同治二年至同治三年(1863—1864)，清政府为培养洋务人才，先后在上海、广州设立“广方言馆”。同治二年，清廷批准江苏巡抚李鸿章奏，仿北京同文馆例，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称“广方言馆”，也称“上海同文馆”，招收十四岁以下文童入馆，学习外国语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先设英文、法文两班，后增设日文、俄文班，三年毕业。经费由江海关支拨。同治八年并入江南制造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兵工中学堂。同治三年，广州将军瑞麟、两广总督毛鸿宾仿照上海例，亦奏清廷在广州设立“广方言馆”，又称“广州同文馆”，招收十四岁至二十岁的满、汉学生及二十岁以上科举出身的学员。先设英文班，后增设法、德文班。三年毕业，派充各衙门翻译。经费由粤海关支拨。

洪秀全病逝 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七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病逝于天京,终年五十岁。洪秀全原名火秀,又名仁坤,广东花县人。七岁入塾读书,十六岁因家贫辍学,随父兄种田为生,十八岁任本村塾师。自道光八年(1828)起四赴广州府试皆不第。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一文中吸取基督教教义,创立拜上帝会。后又发动金田起义,建立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日渐泥于宗教,深居简出,奢侈享乐,疏于政事,且与掌握太平天国实际领导权的东王杨秀清矛盾日深。"天京事变"及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选拔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等作为主要军事骨干,又于咸丰九年任命族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颇有振作气象,且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但清廷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加紧勾结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进行联合镇压,安庆、苏州、杭州等地相继失守,天京被围。洪秀全滥封王爵,迷信"天父",拒不采纳"让城别走"的意见,困守孤城,终于在天京陷落前夕去世。

汇丰银行设立 汇丰银行也称"香港上海银行",由在华的太古、沙逊、旗昌、禅臣等十大洋行的英、美、德商人共同发起,于同治三年(1864)设总行于香港,次年开始营业,同时在上海设立分行,并陆续在日本的横滨、神户,中国的汉口、厦门、福州、天津、北京、广州、青岛、哈尔滨、大连、沈阳、汕头以及东南亚各地设置分支机构。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其资产及行政管理权越来越集中到英国商人手中,又与其它在华英商相结合,逐渐成为英国在华经济权益的代表,以"汇丰银行伦敦最高委员会"为其最高决策机构。汇丰银行在中国的经营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经营汇兑。对外国在华洋行给予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等财务上的便利和支持。由其经手买卖的外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额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因而操纵着中国的外汇市价。二、吸收中国人的存款和发行纸币。同治四年共吸收存款三百余万港元,至民国三年(1914)已增加到三亿三千万元。发行纸币两种:一种是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的银元券另一种是五两、十两、五十两、百两的银两券,多流通于香港、上海、广州等处。三、以贷款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自同治十三年(1874)"福建台防借款"开始,至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时期,二十年中共向清政府贷款十七笔,合计库平银二千八百九十七万两,占同期外国对华贷款的百分之六十三。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95—1911)又对华贷款二十九笔,计银二亿多两,占外国对华贷款百分之二十七强。通过贷款,汇丰银行还取得了中国关税、盐税的收存权。随着营业范围、规模的扩大,其资本额急剧增加。初设立时,额定资本为五百万港元,实收资本二百五十万港元,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仅在华资本就达一亿五千余万美元,占全行资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四。解放后,在中国的分行除上海分行由中国政府指定经营外汇业务外,其余均歇业。

天京陷落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湘军曾国荃部攻陷天京。先是,同治元年五月初,湘军围困天京。太平军多次试图解围皆未成功。苏州失陷后,李秀成建议洪秀全"让城别走",遭到拒绝。同治三年正月,李秀成率部进攻曾国荃大营不利,反被湘军攻陷天保城,进逼天京东北部太平门及神策门外,天京合围,粮源断绝。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去世。五月初三日,洪秀全长子洪天贵福即位,是为幼天王。月底,地保城亦为湘军占领,并借居高临下之势日夜炮击天京,且据地道以炸药轰城。此时城中太平军万余人,能作战者不足四千,面对湘军五万余众的日夜猛攻,拚死抵抗,先后击毙敌总兵三人,卒勇无数。六月十六日,天京城墙被炸药轰塌二十余丈,湘军蜂拥而入,城陷。太平军"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李秀成、林绍璋等拥幼天王突围而走。曾国荃指挥湘军对城中百姓进行了一场野蛮的大屠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

李秀成被害 同治三年(1864)七月初六日,曾国藩杀忠王李秀成于南京。李秀成,或作寿成,原名以文,广西藤县新旺村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自幼家贫,随父种山、帮工为食。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进军永安,经过藤县,李秀成参军。定都天京后,任右四军帅,驻守天京太平门外。次年升二十指挥,赴庐州参与守城。咸丰六年升地官副丞相,参加镇江解围之役、攻破江南大营之役。天京事变后,驻守安徽桐城,以招收捻军张乐行、龚得树有功,升地官正丞相。咸丰七年驻守六安、霍山,力固安徽,封合天侯,任副掌率,与又正掌率陈玉成同掌兵权。一度因奏请天王体恤百姓,明定赏罚,宽刑轻税,重用翼王,不使安、福二王把持朝政而触怒洪秀全,被削爵革职,不久恢复。咸丰八年八月,会合陈玉成攻破江北大营,收复浦口,十月取得三河大捷,稳定了安徽局势,次年封忠王。咸丰十年春会诸路大军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之围,后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因李秀成行动迟缓,致使西征无功。咸丰十年和同治元年,两次进攻上海,均未成功。同治元年五月,湘军进逼天京城下,洪秀全急调李秀成回京驰援,与湘军大战四十余日,终以粮草不济退兵。同治二年苏州被围,李秀

成对部下郜永宽等暗中通敌不加过问,反率主力离苏州而去,致使守将谭绍光被杀,苏州落入清军之手。回到天京后,劝洪秀全"让城别走",遭洪拒绝,遂留城防守。同治三年六月天京陷落,李秀成保幼天王突围,将自己的战马让与幼天王骑乘,自骑劣马断后。旋因受伤迷路,马不能行,遂藏百姓家。七月二十一日被俘于天京东南之方山。二十七日,曾国藩自安庆来到南京,亲审李秀成。李秀成乃于囚笼中写"自述"数万言,以"保民"、"保军"、防御洋鬼为条件,提出"收齐章程"十条,为曾国藩招降太平军献策,并劝曾反满独立。不久被害。年四十一岁。其"自述"经删改后被呈送清廷,刊刻传布。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订立 同治三年(1864)九月初七日,沙俄政府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关于中俄西段边界的规定,强迫清钦差勘办西北界事宜大臣明谊等,与俄国钦差分界全权大臣扎哈罗夫及巴布科夫在塔尔巴哈台(今塔城)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具体划定自沙宾达巴哈山口(今苏联境内)至浩罕边界的中俄西段边界。通过此约,沙俄将《北京条约》中定为界湖的伊塞克湖边划为俄国内湖,连同《中俄北京条约》,共割占中国西北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及斋桑淖尔南北地区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幼天王被杀 同治三年(1864)十月二十日,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南昌被凌迟处死,年仅十五岁。幼天王为洪秀全长子,初名天贵,后加福字。从小诵习拜上帝会经籍。自咸丰十年(1860)起以幼主名义发布诏旨。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即位。天京陷落后,幼天王由忠王李秀成等护送,于六月十七日逃出,二十一日到安徽广德,二十六日由堵王黄文金迎入湖州。拟往江西会合李世贤、汪海洋等,遂于十月复回广德。月底,太平军将领蔡元隆降清,黄文金等奉幼天王转战皖浙边境一带。八月黄文金病逝,余部进入江西。九月二十五日,幼天王在江西石城荒山之中被清军俘获,十月二十日在南昌被害。

洪仁玕被害 同治三年(1864)十月二十五日,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南昌被清廷所杀,终年四十二岁。洪仁玕,字益谦(一作谦益),号吉甫,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族弟。少应科举,累试不第,充乡塾教师。道光二十三年(1843)皈依拜上帝教,是为该教最早的教徒之一。次年洪秀全、冯云山出外传教,洪仁玕因家人反对,未能同行,赴清远任塾师数年。金田起义后,应召赴广西,因未赶上太平军,返粤。咸丰二年(1852)至香港,结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详述拜上帝会成立经过,韩因以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不久回省。咸丰三年再赴香港,受韩山文洗礼,并教书为业。咸丰四年至上海,谋往天京未果,仍回香港教书,且任伦敦布道会布道师达四年之久。咸丰八年离港北上,次年春辗转至天京,不久封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因其居港前后六年,又在上海墨海书馆学习天文、历算约半年时间,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有较多了解,遂于咸丰九年写成《资政新篇》,经洪秀全批准于该年刊行。又奏改历法,确定"每四十年一斡旋",继撰《颁新政喧谕》、《克敌诱惑论》、《兵要四则》等文,合刊为《干王洪宝制》。咸丰十年春,为解天京之围,献"围魏救赵"之计,太平军因以破江南大营。是年夏,太平军攻克苏州,洪仁玕函约上海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前来,与之讨论宗教问题,并邀美国传教士罗孝全至天京顾问宗教事务。咸丰十一年二月赴安徽、浙江等地催调太平军西征,四月会合陈玉成援安庆,旋回转天京。同治二年十月再次出京催兵谋解天京之围,未果。天京陷落后,幼天王等逃到湖州,洪仁玕前来会合,谋入江西投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不料李世贤等已去福建,遂护幼天王寻踪西行。九月至江西石城,全军败散,初九日被俘。十月二十五日在南昌从容就义。

金陵书局创办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在攻陷南京后,创办金陵书局,后改名南京官书局,专司官府刻书事务,从而改变了以往官府刻书多由州县学宫或官办书院负责的状况。继金陵书局创办之后,各地方官办书局纷纷设立,较为著名的有:杭州浙江书局、武昌湖北官书局(即崇文书局)、长沙湖南书局、南昌江西书局、成都存古书局、济南皇华书局、太原山西官书局、广州广雅书局、昆明云南书局以及福州书局等。各书局皆由地方官府主办,以雕版印刷为主要方法,所刻之书,大多为传统的经、史、子、集类书籍。清朝统治者之所以于此时热心刊印古书,目的是为了尽量掩饰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腐朽、凶残的面目,以宏扬传统儒术来笼络士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但大量古代典籍的重新刊刻,也使因长期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如金陵书局初创时,首先刊刻了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船山遗书》五十八种二百九十六卷,对保存王夫之著作、为后人提供研究王氏学说的完整资料起了积极的作用。

阿古柏叛乱发生 同治四年(1865)正月,中亚浩罕国封建主阿古柏率兵入侵南疆。先是,新疆某些少数民族首领企图利用当地人民的反清起义实行封建割据。同治三年,喀什噶尔封建主金相印为攻取汉城,竟里通外国,向浩罕乞师。浩罕王遂派帕夏(意

为总司令)阿古柏随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和卓侵入喀什,并相继占领新疆南路八城,于同治六年成立“哲得莎尔”王国,自称“毕条勒特汗”,且得到沙俄及英国侵略者支持。

革奕䜣议政王职 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七日,恭亲王奕䜣被革职。先是,奕䜣因支持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垂帘听政,受封议政王、军机大臣。奕䜣利用自己的亲贵身份把持朝政,逐渐引起慈禧太后猜忌,矛盾日深。同治四年三月初六日,慈禧责备奕䜣议政尽用汉人,奕䜣不以为然,双方发生争执。次日,慈禧亲笔诏书,责奕䜣骄盈溺职务,召对不检,罢直军机、议政。后经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公奏:“恭亲王咎由自取,尚可录用”。慈禧遂命其仍在内廷行走,并总管总理衙门。四月十四日,恢复奕䜣军机大臣职务,不复议政。

捻军激战高楼寨 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四日,捻军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率部全歼僧格林沁清军于山东曹州(今菏泽)高楼寨。先是,同治二年雉河集失守,张乐行遇害,张宗禹、任化邦等率领捻军余部于同治三年春在河南南部与太平军赖文光部会合,奉赖文光为领袖。赖文光将捻军按太平军军制进行整编,决定易步为骑,保存和发展了捻军战术上灵活多变,精骑善走等优点,建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新军。同治四年正月初三日,赖文光等大败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于河南鲁山,随即东进开封,渡黄河故道入山东。僧格林沁率军尾追。捻军先以避实击虚、“盘旋飘忽”的战术将清军拖得疲惫不堪,然后在曹州高楼寨一带利用有利地形设下伏兵。四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率部追来,进入捻军阵中,一场激战,清军全军覆没。僧格林沁藏入麦田之中,被捻童张皮绠刺杀,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等均被击毙,总兵陈国瑞重伤逃脱。是役全歼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使捻军骑兵力量大为增强。

江南制造局成立 同治四年(1865)五月,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美商旗记铁厂,又将上海和苏州两个洋炮厂并入,再加上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来的机器设备,建成江南制造局,也称“上海制造局”、“上海机器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治六年自虹口迁往高昌庙,不断加以扩充,渐成为清政府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其下属机构包括:机器厂、铸铜厂、铸铁厂、炼钢厂、轮船厂、枪炮厂、火药厂、汽炉厂、公务厅、工程处、炮队营、广方会馆等等。职工人数三千余人,房屋二千余间。其产品主要有枪炮、水雷、弹药、机器等,并能修造轮船,中国第一台明轮蒸汽军舰“恬吉号”即由江南制造局于同治七年制造。江南制造局的创办经费为五十四万三千两,自同治六年起拨江海关二成洋税为常年经费,每年三十至七十万两不等。其机器设备及主要原材料基本上依赖外国,技术大权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辛亥革命后改称“江南造船所”。江南制造局也于民国六年(1917)改称“上海兵工厂”,抗战爆发前停办,所留厂房及部分机器在抗战中被日本人拆毁,厂地并入江南造船所。

太平军汪海洋部失败 同治四年(1866)十二月底,太平军汪海洋部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黄沙障全军覆没。先是,天京陷落后,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相继率部攻入福建,占据漳州、汀州一带,坚持抗清斗争。清廷命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兵三路入福建围剿。同治四年二月,汪海洋率部攻入广东镇平(今蕉岭)。清军全力围攻漳州,李世贤全军覆没,只身突围投汪海洋。汪海洋事先坐视漳州失陷而不救,后又暗害李世贤于军中,对太平天国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李世贤死后,汪海洋率部在赣粤边境继续与清军作战,并一度进占嘉应州。但终因敌人势力过于强大,太平军内部又出现不和现象,于同治四年十二月底全军覆没于黄沙障,汪海洋重伤去世。至此,太平军除遵王赖文光等率部并入捻军外,其余全部被清军镇压。

金陵机器制造局设立 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自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将原苏州洋炮局迁往南京,扩充后建立金陵机器制造局,简称“金陵机器局”、“金陵制造局”。名义上由清政府委派总办经管,实际大权掌握在英国人马格里手中。该局从外国购置机器,聘用外国工匠作为技术指导,主要生产枪支、火炮、子弹及其它军用物资。到同治八年,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弹及各种军用品。光绪五年(1879)以后,金陵机器制造局已成为拥有机器厂三座,翻砂、熟铁、木作厂各两座,以及火箭局、火箭分局,洋药局、水雷局在内的近代军工企业。产品主要供应淮军及本省各防营应用。光绪七年后又添设火药局。其常年经费,自光绪五年后由南、北洋各拨银五万两,以后南洋又加拨一万两,总计十一万两,光绪十一年后又由户部增拨江海、九江、江汉各关税银十万两。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党政府将该局并入上海兵工厂,改称“上海兵工厂金陵分厂”,次年又改称“金陵兵工厂”。

四川酉阳发生教案 同治四年(1865)、同治七年(1868),四川酉阳地区两次发生群众捣毁教堂、殴毙外国传教士事件。先是,同治三年,法国天主教

川东主教范若瑟唆使教徒欺压群众，激起民愤，以致“民教争殴”事件不断发生。次年正月，酉阳县富绅冯仕银等率众焚毁教民房屋，拆毁法国传教士住所。川东各县群众闻风响应，以“诛灭天主教，斩革除根”相号召。七月十九日，冯仕银等又将前来“抚慰教民”的法国传教士玛弼乐痛殴致死。法国公使伯纳格扬言要派兵入川，四川总督骆秉章遂杀群众冉老五抵命，并赔银八万两。

清政府设立防军 同治四年(1865)，清政府改变其历来奉行的“事终勇撤”政策，部分保留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发展起来的湘、淮勇营，以之作为沿海各省的主要驻防部队，号称“防军”。先是，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全国以湘、淮军为主的各路勇营达数十万人。靠练湘、淮军起家的一些地方督抚不愿将勇营全行裁遣，纷纷要求清政府改变以往仅以绿营、八旗为经制部队的旧制，选留勇营劲旅，每省多者万余，少者数千，屯驻要冲，以补绿营、八旗兵之不足。清政府在国家内忧外患，八旗、绿营疲弱无力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创立防军制度。以后，各省防军范围逐渐扩大，凡绿营之外招募的兵勇一律称其为防军。防军的营制饷章大体仍依曾国藩所创湘军制度推行，但湘军的长夫之制及士卒募选之法则多被防军取消。防军无全国统一编制，各省规模时有变化，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统计，全国计有防军二十七万一千二百一十二名。其操练分为队列、技能和战术操练。既效法湘军勇营操法，又注意学习西方近代陆军操法，聘请外国教官进行训练。在战术操练中，既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阵法，又借鉴了近代西方的散兵战法。但因防军沿用湘军以营为最高建制单位的习惯，营以上无固定编制，使其战术操练局限于一营数百人范围之内，缺乏大规模协调作战能力。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防军一直是清朝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在防军中又以淮系势力最大，装备最为精良，因而造成淮系首领李鸿章二十多年中一直在清政府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文馆学生赴外国考察 同治五年(1866)二月，清政府派前知县斌椿及同文馆学生凤仪、德明、彦慧等人出国考察。先是，总税务司赫德告假回国，行前建议总理衙门派遣同文馆学生随其赴外国进行游历、考察。清政府为了解外国情况，培养洋务人才，接受了赫德的建议，于二月初七日派斌椿等随赫德离开上海，先后至法国、英国、瑞士、俄国、普鲁士等国进行考察。当年九月十八日返回北京。是为同文馆学生出国考察之始。

捻军分军东西两路 同治五年(1866)九月十二日，捻军主力在河南分军东西两路。先是，同治四年，捻军在山东高楼寨阵毙僧格林沁，清廷急调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师剿捻。曾国藩以挖壕设防，坚壁清野之策围困捻军。为摆脱困境，赖文光等捻军首领决定将主力分为两支：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首王范汝增、魏王李蕴泰等率东捻军转战于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张乐行侄)、怀王邱远才等率西捻军进军陕、甘地区，与西北回民起义军联络。九月十八日，曾国藩令直隶提督刘铭传等率部进攻东捻，浙江提督鲍超等率部进攻西捻。十月，清廷以曾国藩剿捻无功，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诸军，专办剿捻事宜。

西捻军十里坡激战 同治五年(1867)十二月十八日，西捻军在陕西西安城东灞桥十里坡大败清军。先是，西捻军在梁王张宗禹等率领下自河南进入陕西，所向克捷，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八日进抵灞桥，直逼西安。陕西巡抚刘蓉急率湘军自华阴回救。捻军折走蓝田，刘蓉东追。捻军复西上，将湘军三十余营诱至灞桥十里坡，突然以马队回师猛攻，湘军溃败，提督刘厚基、道员黄鼎等败走，汉中镇总兵肖德扬、记名提督杨得胜、肖集山、肖长青、道员肖德纲等被杀。谭玉龙部被围三昼夜，后因捻军主动撤围他往，方才得脱。

发昌机器厂开设 同治五年(1866)，上海发昌机器厂创建。它是中国最早的私营机器制造厂。初为锻铁作坊，后不断扩大规模，更新设备，至同治十二年已成为初具规模的近代工业企业，称“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光绪二年(1876)开始制造小火轮、车床等。八十年代称“发昌机器船厂”，俗称“发昌机器厂”，以制造小火轮为主，为当时上海民族资本机器工业中最大厂家。后因受外商排挤，日趋衰落，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英商耶松船厂吞并。

福州船政学堂创办 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州船政学堂，也称“求是堂艺局”。它是中国最早的造船及驾驶技术学校。分前学堂、后学堂，招收十六岁以下学生入学。前学堂学习轮船制造，主要开设法文、算术、几何、代数、三角、天文、地理、航行等课程，由法国人主持，学期五年，先后毕业学生八届，共一百八十名。后学堂学习轮船驾驶或管轮，主要开设英文、算术、几何、画图、机械图说、机械操作等课程，由英国人主持，学期五年，先后毕业驾驶专业学生十九届，共二百四十七名；管轮专业学生十四届，共二百一十名。学生毕业后一般授以水师官职或派充监工、船主等。辛亥革命后，前学堂改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改为海军学校。

马尾船政局创立 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马尾船政局,也称福州船政局。是为清政府经营的规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厂。初期由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分任正、副监督,总揽一切事务,雇用数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工人约一千七百至二千名。整个船政局由铁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自同治八年铁厂开工至同治十三年,五年中共制造轮船十五艘,均为木质。光绪元年(1875),船政局依约辞退洋人,一切设计、施工等皆由中国人担任。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新造轮船十九艘,包括木质、铁质两种,其马力、质量等均较过去有所提高。马尾船政局创办经费为四十七万两,常年经费每月由闽海关拨银五万两,同治十二年起每月从茶税中增拨二万两。光绪十年中法战争中,马尾船政局遭到严重破坏,中日甲午战争后,生产更趋下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抗战时又遭严重破坏,生产陷于停顿。战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

捻军激战尹隆河 同治六年(1867),赖文光等率东捻军大战清军于湖北尹隆河(今永隆河)一带。先是,捻军自河南分兵后,东捻军进军湖北,计划渡汉水循宜昌入川。同治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安陆(今钟祥)罗家集全歼湘军四营,生擒提督郭松林(以足伤被弃道旁,始逃脱)。复于德安(今安陆)新家闸全歼淮军总兵张树珊部,阵斩张树珊。次年正月十五日,大败淮军提督刘铭传部于尹隆河,击毙总兵唐殿魁、田履安等。湘军提督鲍超率部突袭东捻军之背,使刘铭传及其余部得以逃脱。东捻军损失万余人,遂放弃入川计划,北走河南。二月,东捻军重入湖北,在蕲水六神港大败湘军,阵斩记名布政使彭毓橘,重回尹隆河一带,复为鲍超、刘铭传等部所阻,只得再次退回河南。

美军登陆台湾 同治六年(1867)五月十八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台湾琅𤩝登陆,被当地高山族群众击退。先是,自道光二十七年起,美国曾数次派船到台湾勘察煤矿、测量港口等。同治六年二月,美船罗佛号船长等人在台湾南部琅𤩝(今恒春)登陆,被当地高山族群众杀死十三人,只逃走一名中国水手。三月,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率军舰前来报复,被击退。五月初,美国又派军舰两艘进攻台湾。十八日,美海军陆战队一百八十多人在琅𤩝登陆,进行偷袭。当地高山族人民利用地形熟悉等有利条件袭击美军,打死其领队军官,将其驱逐到海边。美军侵台失败。

东捻军失败 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一月,东捻军被清军镇压。先是,该年五月,东捻军自山东郓城突破清军围堵,进屯东平,复逼烟台,为英、法侵略军击退。六月,李鸿章命淮军刘铭传会同山东巡抚丁宝桢部沿胶莱河一线防堵。七月,东捻军突破胶莱清军防线,西走潍县。十月,在江苏赣榆为清军所败,鲁王任化邦被叛徒潘贵升刺杀。十一月再败于山东寿光海滨,首王范汝增战死。经过赣榆、寿光两次大战,东捻军主力损失殆尽。十二月初八日,遵王赖文光抢渡六塘河,率两千余人突破重围,沿运河东岸南下多次,力图渡过运河,均遭失败。十一日,赖文光在扬州瓦窑铺因坐骑为清军击毙被俘,十六日在杨州英勇就义。东捻军最后失败。

西安机器局设立 同治六年(1867),陕甘总督左宗棠从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调募了一批熟练工人,派人向外国购买了机器设备,在西安筹建西安机器局,同治八年正式建成。西安机器局主要生产洋枪、铜帽和开花炮弹等,其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皆远不及江南制造局等大企业。同治十一年,左宗棠将西安机器局机器设备迁往兰州,改名兰州机器局,又从浙江、广东、福建等地调募工人,由记名提督赖长主持。主要生产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弹,并能仿造普鲁士式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劈山炮及炮架等,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其经费概由甘肃关内外办理军需款项内拨支。

天津机器局设立 同治六年(1867),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办"天津军火机器局",也称"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以英国商人密妥士为总管,聘请英国技师,开办经费为二十一万三千两,雇用工人约一千四百至二千五百人。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后,改由李鸿章接办,以沈保靖代替密妥士,扩充人员,增添设备,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兵工厂。其常年经费约三十万两,由天津海关和烟台海关拨四成关税充当,天津机器局下分东、西两局。东局设城东贾家沽,以制造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为主,另附水师、水雷、电报学堂;西局设城南海光寺,主要制造军需物资、器具和开花子弹等。光绪十九年(1893)又新建一座炼钢厂,从英国买进全套设备,可铸造六英寸小钢炮。光绪二十一年改称"北洋机器制造局"。光绪二十六年被八国联军焚毁。

蒲安臣率中国使团出访各国 同治七年(1868)一月,清政府派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率中国外交使团出访西方各国。先是,《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美、俄等国公使先后驻京,但清政府尚未派出驻外使团。后经外国公使多次要求,清政府遂决定遣使出洋,向各国"陈述中国的困难",表达中国希望"友善"和"进步"的诚意。同治六年十月,美国驻华

公使蒲安臣即将离任，向清政府表示愿为中国"出力"，清政府遂聘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次年一月，蒲安臣以"大清国钦差大臣"身份率中国使团出访美、英、德、俄等国。其成员有：英国使馆翻译官柏卓安、海关法籍职员德善、总理衙门章宗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等。同治九年一月，蒲安臣因病死于俄国彼得堡。清政府为酬谢其担任驻华公使时"和衷商办"及此次出访各国"为国家效力"，特"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

台湾教案发　同治七年(1868)春，台湾府凤山县民众焚毁英、法教堂，打死、打伤教徒各一人。先是，同治五年，英国耶稣教传教士在台湾府打鼓城(今高雄)外强租房屋建立教堂，引起公愤，清地方官吏令其限期撤离。同治七年初，英国传教士又在凤山县埤头城买房建堂，强行传教。二月，当地壮勇和民众群集，将教堂焚毁，教徒一死一伤。六月，英国教堂修复，又被群众拆毁。其时正值英商怡记公司在台湾违法收购樟脑，私运出口，被鹿港同知查获标封，英国公使阿礼国为取得在台贸易和传教特权，借机一面强迫总理衙门派员查办，一面派军舰至台湾进行武力威胁。十月，英国军舰突然炮击安平炮台，进占安平协署，杀伤兵勇数十人，焚毁兵营及火药库，并强逼当地官绅交付担保银四万元，赔偿军费一万元。闽浙总督英桂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与之达成协议：取消台湾官厂的樟脑专卖权，允许英商自由采购远销；允许英人在台湾自由贸易和旅行、居住、传教，永远保证教会安全；赔偿怡记公司"损失"六千元、教堂三千余元；惩办各起教案之主使人。又将鹿港同知洪熙恬、凤山知县凌士荃革职，才了结此案。

乌苏里江人民举行抗俄起义　同治七年(1868)四月，乌苏里江东南青岛(今阿斯科尔德岛)爆发中国淘金工人反抗沙俄殖民者的迫害和驱逐的武装起义。四月初九日，沙俄派水兵登岛镇压，被早有准备的起义群众消灭过半。后沙俄又从海参崴调来西伯利亚舰队围攻青岛，起义者被迫转移。撤到大陆后，起义群众不断主动袭击沙俄侵略者，相继烧毁黄岛、石庙子、蛤蟆塘一带俄卡，将守卡俄兵全部消灭。起义者联合苏城等地人民，扩大抗俄武装，队伍迅速扩大至近三千人，并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普遍支持和响应，且声称要攻破海参崴，迫使沙俄不得不宣布滨海一带处于战争状态，调动大批军队进行镇压。一个月后，青岛人民抗俄起义失败了，但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中国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并未停止，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对侵略者进行打击、骚扰，使沙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能对该地区实现有效的统治。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设立　同治七年(1868)五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建成开馆。先后在馆中担任译书工作的中国人主要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徐建寅、赵元益、李凤苞、郑昌棪、王德钧、江衡、钟步律、严良勋、徐华封、舒高第等；外国人包括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的玛高温、林乐知、金楷里等。该馆自建成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共翻译各种外国图书一百余种，绝大多数为军事技术、水陆兵法及各类科技书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译书机构，对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起了积极作用。

《中美续增条约》订立　同治七年(1868)六月初九日，以清政府"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头衔率使团出访各国的美国前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擅自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即《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也称《浦安臣条约》)。共八条，主要内容为：一、中国于原订贸易章程外，欲与美国商民另开通商、行船之路各事，均得自订章程，但不得违反原约规定。二、清政府得在美国各埠设置领事，美国当照各国例予以优待。三、两国人民在对方国内都不得因宗教不同而受到歧视。四、两国人民前往对方游历、居住，皆照最惠待遇办理。五、两国人民皆可在对方进入大小官学，并受最惠待遇；皆可在对方设立学堂。六、美国"向不赞成"无故干预别国内政，将来办理各种制造事业需外国帮助时，美国自愿襄赞。该条约的签订，为美国扩大掠卖华工，加强对中国的文化、宗教侵略提供了方便。同治八年十月双方在北京交换了条约批准书。

捻军起义失败　同治七年(1868)六月二十八日，西捻军败于山东茌平徒骇河，全军覆没。先是，同治五年十二月，西捻军在陕西灞桥十里坡大败清军，进逼西安。清军总兵刘松山率湘军来援，西捻军遂撤离西安，于同治六年二月到达渭北回民起义军活动地区。为粉碎左宗棠坚壁清野战略，冲破清军围堵，西捻军在该年九月间进军陕北，连克安塞、延川、绥德等城，并大败刘松山，杀其部将李祥和。十一月，得东捻军被围消息，西捻军立即东进，十一月二十二日突破清军黄河防线，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同治七年一月直逼北京西南卢沟桥，计划进攻北京以吸引清军主力，解东捻军之围。清廷急命恭亲王奕䜣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理巡防事宜，又命钦差大臣左宗棠总统直隶境内各路清军防堵西捻军。西捻军因孤军深入，遭到清军包围。二月二十三日饶阳一战，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等战死，遂渡滹沱河南下。三月二十五日进入山东，后转战于直晋交界一带地区，

并一度进逼天津。清廷命左宗棠严防直晋交界，李鸿章严防直鲁交界，又派钦差大臣都兴阿赴天津等处，会同左宗棠、李鸿章进攻西捻军。西捻军寡不敌众，被围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六月二十八日在平南镇一战，西捻军全军覆没，仅梁王张宗禹率十八骑冲出重围，不知所终。至此，坚持十六年，纵横八省的捻军起义最后失败。

扬州教案发 同治七年(1868)七月初五日，扬州文武生员数百人烧毁教堂，打伤教士。先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金缄三在江苏扬州设立育婴堂，虐死婴儿四十余名，激起民愤。该年六月，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戴德生又在扬州租赁房屋，设立教堂。扬州文武生员立即会议驱逐洋教。但传教士们执意不离扬州，扬州生员遂再次会议，决定采取激烈行动。他们四出张贴揭帖，号召群众反对教会。七月初五、初六两日，投考生员们聚众毁坏戴德生住所，烧毁英国内地会教堂，殴伤戴德生等教士数人。事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赶赴镇江、扬州"查办"此事，又激起当地群众激烈反抗。麦华陀遂率军舰四艘、军队数百前往南京，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从重查处。曾国藩在麦华陀的武力威胁下，将扬州知府撤职，赔偿教会损失，并于教堂门前立碑，申明保护教会宗旨。

《万国公报》刊行 《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同治七年(1868)七月十九日，由基督教会在上海创刊，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初为周刊，以宗教内容为主，销路不广。自第三百零一卷起更名《万国公报》(同治十三)，成为以刊登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至第七百五十卷停刊。光绪十五年(1889)复刊，改为月刊，成为广学会宣传刊物，多载时事论文和中外重大政治法令，传播西方宗教、文化等，发行量渐增，至戊戌变法时已达三万八千四百份。对维新派产生较大影响。光绪三十三年(1907)停刊。

"恬吉号"蒸汽军舰制成 同治七年(1868)八月，中国自制的第一艘木质明轮蒸汽军舰"恬吉号"(后改"惠吉号")下水。先是，同治六年，江南制造局造船厂建成，并修建了一座长一百米的船坞，同时由机器厂和锅炉厂分别制造船用机器和锅炉。"恬吉号"即为该厂以自制的机器和锅炉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建造而成的。该舰长一百八十五尺，宽二十七点二尺，排水量六百吨，马力三百九十二匹，吃水八尺，备炮九门。当"恬吉号"军舰在黄浦江举行下水试舰仪式时，上海全市为之轰动，欢庆我国第一艘明轮蒸汽军舰试航成功。

酉阳再次发生教案 同治七年(1868)，法国传教士李国(J. F. Rigaud)在酉阳组织洋枪武装，修筑城堡，奴役人民。教民龙秀元又仗势逞凶，捆殴老妇，逼民退婚，抢人家产，毁人房屋，激起民愤。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二十日，酉阳民团首领何彩率众焚毁教堂，杀死李国。富绅张佩超等支持团众抗击教民。在民教冲突愈演愈烈的形势下，知州田秀栗却护教抑民，下令将团民缴械解散。华籍教士覃辅臣乘机残酷报复，杀死民众一百四十五人，伤七百余人，焚屋百余所。事件发生后，法国署理公使罗淑亚立即离京南下，同法驻华海军司令率舰亲往四川镇压。在罗淑亚的恫吓下，清政府派湖广总督李鸿章赴川处理教案事。在交涉过程中，新到任的川东主教梅西满(Mihieres)对民众"任意妄指，以为要挟"，对凶犯覃辅臣则加意庇护。李鸿章对法国传教士的罪恶行径不敢过问，最后以处决何彩、惩办张佩超、赔款银三万两结案。覃辅臣则于事后随前主教范若瑟"出洋议事"，致无从究办。

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 同治八年(1869)三月十六日，中俄签订改订俄人陆路通商章程，共二十二条，将原规定运往天津的俄国货物在张家口"酌留十分之二"改为"酌留若干"，允许俄商在蒙古各地任便贸易，一概免税，并不限于"小本营生"。

遵义教案发生 同治八年(1869)五月初五日，贵州遵义府居民因不满教会欺压，打毁法国教堂、学堂、医馆等，杀死教士赵司铎，并传知府属，不准再行习教。事发后，八月二十九日，法国公使罗淑亚致函总署，要求撤调、审讯贵州巡抚曾璧光。九月初五日，清廷命李鸿章负责查办遵义教案。后因李鸿章忙于镇压回民起义，光绪九年(1870)五月，清廷又命成都将军崇实驰赴贵州，与曾璧光一同办理此事。直到十一月二十九日，遵义教案才彻底清结，中国赔银七万两。

丁宝桢处决安德海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太监，同治八年(1869)七月，冒称奉差出京，到处招摇滋事。八月初四日，同治传旨山东巡抚丁宝桢严捕安德海，就地正法。旋于泰安将安诱获，八月初七日在济南处决。十一日，同治又命将随从太监共六人一并绞决，并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严饬总管太监，嗣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

中英新定条约及善后章程签订 同治八年(1869)九月十九日，中英签订《中英新定条约十六款》、《新修条约善后章程十款》及税则十条。主要内容为：开放温州、芜湖为商埠；英国之洋布、大呢、洋绒等进口时正子两税一并完纳，在通商口岸省份，均免重征；英商从中国内地买土货出口，沿途交纳税

金，其税额如超过子口半税，超过部分发还英商；英商可雇用中国木船在内河行驶，装运货物；九江关备轮船一艘，拖带鄱阳湖一带的货物；英商修理船只、船坞，物料免税；中国进口鸦片，每百斤增税至五十两，出口生丝，按值百抽五征税等。这一条约因英商反对，英国政府未予批准。

安庆教案发生　同治八年(1869)初，法国天主教教士韩石贞(PlerreHende)、英国内地会教士密道生、卫养生等进入安庆后，以低价强购民房，改为教堂，引起群众不满。五月，湖南反教揭帖传到安庆，时值府院考试，安庆府各地文武考生云集一起，情绪激昂。九月间，考场附近贴出揭帖，约期拆毁教堂。九月三十日，英教士密道生、卫养生乘轿往府署，要求查办。群众和考生愤起阻拦，武举王奎甲率众捣毁西右坊、东右坊英法教士住所。密、卫二人避入府署呼救，韩石贞连夜乘船逃往上海。十月初三日，英、法驻华公使阿礼国、罗淑亚共同对清政府进行要挟、恫吓，罗淑亚还与法国水师提督率兵船六艘赴沪，又以四艘赴南京，以两艘经安庆、九江至汉口查办教案。清政府当即命两江总督马新贻等迅速结案。马对罗淑亚的无理要求一一答允：指拨城内官地或仓廒衙署之类为教会堂基；赔偿损失四千元；惩办"肇事首犯"；重申保护教士，申斥护教不力的安庆各级官吏。

丁韪良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　丁韪良(W. A. P. Martin)字冠西，美国教会长老会派传教士，道光三十年(1850)来华，在宁波传教。咸丰八年(1858)任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同治二年(1863)到北京设立教会。同治八年(1869)十月二十三日，经总税务司赫德推荐，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历时二十五年之久。光绪二十四年(1898)得二品官衔，受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卸职。丁敌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列强瓜分中国；又提出"以华制华"。曾协助张之洞在武昌筹建大学堂，未果。还讲授过国际公法，翻译过有关西方基督教、国际法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一九一六年死于北京。

天津教案发生　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搜罗爪牙，拐骗人口，强占民田，激起民愤。同治九年(1870)五月，教堂附设的育婴堂死去婴孩三、四十人，同时，拐骗幼童的事情不断发生。五月二十三日，数千民众激于义愤，前往教堂抗议，要求惩办凶手。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VictorFontanierHenri)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弹压。因崇厚只派去几名官弁，丰大业感到不满，于是又闯入崇厚衙门开枪恫吓，并捣毁衙门器物。归途中遇上天津知县刘杰，又开枪打死刘杰的随从高升。丰大业的秘书西蒙(Simon)也鸣枪威胁。民众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及西蒙打死，接着鸣锣聚众，焚毁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打死外国教士、商人二十人。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集军舰到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查办"，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曾、李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判处民众二十人死刑，缓刑四人，二十五人充军，天津知府、知县也被革职遣戍，向外国赔款四十九万两，并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赔礼道歉。

清廷改设北洋通商大臣　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北洋大臣"。咸丰十年底(1861)，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随着通商事务的不断扩大，同治九年(1870)十月二十日，清政府决定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改设北洋通商大臣，加"钦差"名义，例由直隶总督兼任，管理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兼督海防和办理其他"洋务"。每年海口解冻，移驻天津，冬令封海，再回保定。

马化龙降清　同治七年(1868)，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率军攻回。同治八年(1869)八月，提督刘松山率老湘军从陕北绥德进攻花马池(今宁夏盐池)，至吴忠堡，围金积堡。西北回民起义军首领之一马化龙乞降，左宗棠不许，主张"痛剿以服其心"。是年底(1870)，刘松山到马五寨受降时，突被回军中反对投降者开枪打死，清军大乱。回军又乘势反攻，局面大震。同治九年(1871)底，刘松山之侄刘锦棠继统老湘军力攻，十一月十六日，占领金积堡。马化龙再次投降。左宗棠令其召各地回军至金积堡就抚，阴谋"先抚后剿"。回军被骗回后，左宗棠大肆杀戮，不留一人，马化龙也被处死。

俄军攻占伊犁　早在同治五年(1866)，沙俄就同阿古柏政权达成非正式协定，彼此同意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互给对方入境追捕逃犯的权利。此后不久，沙俄伺机侵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两个卡伦，控制了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谷，并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同治九年七月，俄军占领穆扎尔特山，扼住了伊犁通往南疆的咽喉。同治十年(1871)五月初，沙俄乘阿古柏侵占乌鲁木齐并向东进犯之际，借口安定边境秩序，派郭尔帕科甫斯基率兵长驱直入，大举进犯伊犁。五月十七日，攻占伊犁九城及附近地区。旋设官分治，移民垦殖，在伊犁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同时，派兵四处扩张，控制了北起塔城、额敏河，南至晶河

(今精河)、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的准葛尔盆地西部地区,并向其他各地渗透。

中日议定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 光绪九年(1870)九月初七日,日本使臣柳原前光曾到天津,与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商议立约通商事。十月初八日,总署上奏,允准日本明年派员来华时再议立约事。十月十一日,又照会日本外务省,允与立约。同治十年(1871)三月九日,日本派大藏卿伊达宗城及外务相大丞柳原前光为全权大臣,来华议约。六月,与清廷全权大臣李鸿章在天津谈判。日使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并要取得"一体均沾"特权,遭中方代表拒绝。七月二十九日,《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最后画押,商定:两国商民准在对方指定之通商口岸贸易(中国开放十四个,日本开放八个),但不得进入内地;两国商货进入口岸,均照对方海关税则完税;两国在对方指定口岸可设领事,约束本国商民,民事案件归领事审理,刑事案件由领事和地方官会审。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日本提出改订本条约,遭清廷拒绝。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初四日,李鸿章与日使副岛种臣在天津换约。

武昌文华书院创办 武昌文华书院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旧中国创办的大学。同治十年(1871)由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创立于武昌。原名"文氏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改名"文华书院"。以"培养忠于教会的知识分子"为目的。初有学生二百余人。设有天文、地理、西洋史、数学、物理、化学、体育等课程,兼习四书五经。学制原为预科六年、本科三年,后改十年制。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称文华大学,分神、文、理、医四学院。

曾国藩病死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在南京病死,终年六十二岁。曾国藩,湖南湘乡人,出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吏等部侍郎。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又从倭仁、唐鉴讲习程朱理学。咸丰三年(1853),奉命帮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次年正月,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剿杀太平军。四月初二日败于靖港,愤而投水自杀,遇救。八月,又率军攻占武汉。九月,加兵部侍郎衔,率部东下,破田家镇。十一月(西历 1855),攻江西九江、湖口,不久,水帅败绩,武汉为太平军克复,曾遂困守南昌。咸丰六年(1856)秋,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曾国藩乘机反扑,十一月,再陷武汉。咸丰八年(1858)四月,占领九江。咸丰十年(1860)六月,授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其节制。次年八月,督其弟曾国荃部攻陷安庆。十月,奉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同治元年(1862)春,为协办大学士。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旋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次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次年授大学士。曾与李鸿章等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屈从法国侵略者,杀害无辜良民,受到社会舆论谴责。旋调任两江总督。死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正,其一等侯爵由其子曾纪泽承袭。有《曾文正公全集》。

《申报》创刊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二十三日《申报》由英商美查(ErnestMajor)创办于上海。初为双日刊,四个月后改为日刊。宣统元年(1909),因营业不振,由该报华经理(买办)席裕福(子佩)收买。一九一三年,由史量才接办。

《俄阿条约》签订 同治十年(1871)沙俄侵占伊犁后,挟其军事威势,派考尔巴斯(Kaulbars)出使喀什,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初三日,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即"俄阿条约"),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领袖,阿古柏同意沙俄在南疆通商、建立牙行、设置商务专员等,俄国货物的关税定为百分之二点五。此后,俄国的商货、军火不断地输入南疆。

第一批留学生赴美 早在同治七年(1868),容闳曾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条陈,其中有一条便是选派青少年赴美留学。此后,曾国藩、李鸿章等接受容闳的建议,并一再上奏清政府,申述选派幼童出洋学习的重要性。同治十年(1871)七月,又奏上出洋游学章程并获准。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八日,第一批幼童詹天佑、梁敦彦、黄开甲等三十人,由陈兰彬、容闳率领,从上海启程,赴美留学。至光绪元年(1875)九月,前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

轮船招商局设立 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新式航运企业。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李鸿章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十一月正式成立于上海。因朱其昂经营不善,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李鸿章委任唐廷枢为总办,改组全局,重订《局规》及《章程》。朱其昂、徐润、盛宣怀、朱其诏先后任会办。唐、徐专管轮运、招股等事宜,朱、盛负责漕运和官务。第一期资本一百万两(用近十年才凑足)。名为商办,实由官商合办。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十九个重要商业港口设有分局。光绪三年

(1877)以银二百二十二万两高价购进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一批旧船和设备,船只由十二艘增至三十余艘,成为一支实力可观的商船队。招商局因遭外国轮船公司的忌恨、竞争与排挤,业务一度难以维持,中法战争期间,经马建忠之手,暂时售与旗昌洋行。光绪十一年(1885)收回局产后,李鸿章派盛宣怀督办全局,马建忠、谢家福为会办,招商局由官商合办改为官督商办,但仍连年亏损。宣统元年(1909)归邮传部管辖。

继昌隆缫丝厂开设 同治十一年(1872),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简村开设继昌隆缫丝厂(俗称"继昌隆丝偈"),采用自己设计的机器缫丝,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缫丝厂。该厂雇佣工人六、七百人,制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甚厚。光绪七年(1881)被南海知县下令关闭。陈启源将工厂迁至澳门,改称复和隆丝厂。光绪十年(1884)得清政府许可,又将工厂迁回简村,改名"世昌纶",继续开工经营。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发生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晚清轰动朝野的一大公案。毕秀姑,绰号"小白菜",同治十一年(1872)嫁予浙江余杭城某豆腐店伙计葛品莲。婚后租举人杨乃武屋,相邻而居,来往无间。时杨丧妻不久,葛怀疑毕与杨私通,葛母亦从中挑弄。同治十二年(1873)冬,葛品莲暴卒,其母向县署控告毕氏谋杀亲夫。县令草率验尸,臆断葛为中毒身亡,将毕氏拘押刑讯。毕不堪皮肉之苦,伪供与杨有奸情,合谋杀夫。杨乃武遭拘押后,却矢口否认。县令将此案上报杭州府,府署施杨以酷刑,杨屈打成招,假认以砒霜作案。此案报省后,拟将小白菜凌迟处死,杨乃武斩首示众。浙江巡抚杨昌浚亲自审讯。毕、杨二人料难翻案,屈供如前。同治十三年(1874)刑部核案时,悬而未决,派浙江学政胡瑞澜承办,严刑审讯中,二人依然屈认。到光绪元年(1875),京中御史边宝泉上奏异议,请将此案提交刑部仔细查讯,浙籍京官联名上书请求复核,刑部奉命移棺京师,于光绪二年(1876)当众开棺验尸,验明葛品莲实系病死,并非中毒死亡,此案真相始得大白。杨乃武、小白菜先后获释,杨昌浚以下审办官员均受处分。此案传说多所歧异,后曾编成戏曲,流传民间。

刘永福杀安邺 早在同治元年(1862),法国便开始侵略越南,攻占交趾(南圻),强迫越南与之订立《西贡条约》,割让嘉定等三省及昆仑岛。同治六年(1867),法军又攻占永隆、河仙等三省。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法军头目安邺先后攻占河内、海阳、南定等城。越南政府请刘永福率黑旗军协助抗法。十一月,黑旗军与法军战于河内郊外,十一月初五日,击败法军,杀死安邺,迫使法军退出河内。

王韬创办《循环日报》 同治十二年(1874)十一月十七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王韬,字紫诠,号仲弢,江苏长洲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第一个报刊政论作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离家乡赴上海,任职于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屡向清廷献"御戎"、"平贼"等策,未被采纳。咸丰十一年(1862)底,因被怀疑上书太平天国地方官,策划攻打上海,遭官方缉捕,被迫逃往香港。同治六年(1867),由英国传教士理雅各邀往英国译书,并游历英、法、俄等国。同治九年(1870)回国,返抵香港,曾为《华字日报》积极撰稿。同治十二年(1873),王韬与朋友黄平甫开始筹划自己办报,先是集资设立一所专营印刷业的中华印务局,然后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循环日报》。王韬自任主编。该报是近代中国最早传播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的报纸。它以"强中以抑外,诹远以师长"为宗旨,每日载论说一篇,评论洋务,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变法自强,成为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新闻占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一,分京报选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三栏。每月另出月报一册,择重要新闻和评论汇编而成,单独发行。光绪十年(1884)王韬离职后,影响渐衰。

四明公所事件发生 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十八日,上海人民示威反对法租界侵占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馆)的公墓,被法国水兵、租界商团、美国陆战队枪杀七人,重伤十二人。外国侵略者也有人被打伤,房屋被焚数处。法租界公董局被迫暂停在四明公所公墓内筑路。

日军进犯琅琊 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台湾高山族将因遇飓风漂流到台湾的琉球船民误杀五十四人,当时,琉球是中国属地,此事本与日本无关,而日本却将此作为侵台借口。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同治十二年二月(1873),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派副使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进行质问与讹诈。同治十三年二月(1874),日本政府设"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长官,在长崎设立侵台军事基地;又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进攻台湾。美国供给日本军火,派船为日本载运军队,前美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充当侵台日军参谋,美国军官亲自参与指挥作战。三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在琅琊强行登陆,受到高山族人民英勇反击。日军在琅琊地方烧杀抢掠,并在龟山设立都督府,意图久踞。清政府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

部署防务，先后调军万余人至台。日军进退两难，急思退兵。

中日签订《台事专约》 《台事专约》又称《中日北京专条》。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军在琅琊登陆，在龟山设都督府，意图久踞台湾。清廷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兵赴台，进行防御部署。日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八月，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等抵达北京，对清廷大肆进行恐吓威胁，要求赔偿军费。清廷代表开始则据理力驳，后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调停”下妥协。九月二十二日，恭亲王奕䜣与大久保利通在北京签订了《台事专约三款》，另附“会议凭单”一件。主要内容为：日军退出台湾；中国允给“抚恤”银十万两，日本在台修道、建房等件，中国留用，需偿银四十万两；中国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给日后日本正式兼并琉球以口实。十月二十五日，日军全部撤离台湾。

同治帝病死 同治十三年(1875)十二月五日，同治帝因患痘疹而死，年仅十九岁。谥号毅皇帝，庙号穆宗，光绪五年葬于惠陵。他自同治十二年正月亲政后，毫无作为，只是以颐养太后为名，下谕兴建圆明园。

光绪帝即位 光绪元年(1875)正月二十日，光绪帝即位，年仅四岁。光绪帝名载湉，醇亲王奕譞子。他即位后，年号“光绪”，太后那拉氏再度垂帘听政。

马嘉理事件发生 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英国为在中国西南地区扩张势力，企图修筑一条由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同治十三年(1874)，英上校军官柏郎(HoraceA. Browne)率领武装探路队近二百人，从缅甸出发，探测到我国云南的路线。英国驻华使馆派职员马嘉理(Augustus-RaymondMargary)从北京经云南入缅接应。光绪元年正月(1875)，马嘉理偕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不先行知会地方官，便遽行闯入云南，并扬言要进攻腾越城(今腾冲)。曼允山寨景颇族人民力阻英国侵略者通过。正月十六日，马嘉理向当地群众开枪逞凶，群众义愤填膺，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中国人打死，并把探路队赶回缅甸。英国借此事件大肆向清政府进行威胁、讹诈，光绪二年(1876)七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

《小孩月报》创刊 光绪元年(1875)四月，《小孩月报》在上海创刊，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主编，清心书馆出版。月刊。内容有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等。文字浅显易懂，插图均为雕刻，铜版尤为精美。是为中国最早的近代儿童画报。一九一五年停刊。

南洋海军成立 光绪元年(1875)，清廷命南洋大臣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筹建新式海军。光绪五年(1879)，沈葆桢病死，筹办海军事务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一手主持。光绪十年(1884)初具规模，有巡洋舰、炮舰等十七艘，多由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制造，也有购自外国(主要是英国)者。分驻江宁(今南京)、吴淞及浙江等地，负责东南海防。实力远在北洋之下。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败、北洋海军覆灭后，南洋海军部分舰船曾调防北洋。宣统元年(1909)，清廷成立海军事务处，将南、北洋各兵舰改编为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

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 光绪元年(1875)八月二十一日，日本军舰侵入朝鲜领海，在江华岛测量海口。炮台开炮示警，日舰便攻毁炮台，日军登陆，屠杀朝鲜军民。光绪二年(1876)二月二日，日本胁迫朝鲜缔结了《江华条约》，攫取到一系列侵略权益。

延平教案发生 同治十三年(1874)，美国传教士在福建延平(今南平)建盖教堂，立被当地绅民阻止。光绪元年至二年(1875—1876)，美教会仍拟强行建造，引起公忿，延平居民又两度拆毁教士住宅，将教士驱逐出境。闽浙总督李鹤年却将知府革职，赔修教士房屋。

格致书院落成 格致书院是晚清新式书院。同治十三年(1874)，科学家徐寿、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共同发起于上海公共租界，光绪元年(1875)落成。王韬曾任监院。聘请西洋教师讲授化学、矿学知识，按期延请中外名人学士讲演格致原理。书院设有博物院、藏书楼，供学生实习或阅览。光绪十年(1884)改为中等学校，由公共租界工部局接管。

川东教案发生 自同治八年(1869)酉阳教案结束后，法国川东主教派遣教士到各县发展教会势力，激起川东各县反洋教斗争。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元年(1873—1875)，黔江、南充、营山、内江等县都有杀教士、毁教堂事件发生。光绪二年(1876)初，邻水县教民王同兴结伙抢劫杀人，激起民愤，群众将大批教民驱逐出境，拆毁教堂五处，焚毁教民房屋一百余家。三月十三日，江北厅(今江北)陈子春、聂钦斋集合四十八场乡民数千人攻打教堂，焚毁医馆十余处、教民房屋二百余家。五月十九日，涪州(今涪陵)张在初等聚众焚毁教堂多处，劫毁教民一百余家，驱逐大批教士教民。九月，又有数千乡民拥至涪州城，焚毁教堂及教民房屋。四川总督丁宝桢以赔白银七万九千二百两结案。

淞沪铁路通车 光绪二年(1876)闰五月初九

日，英商怡和洋行修筑的淞沪铁路全线开通，共长五英里。初十日举行通车典礼。十二日开始营业。六月十四日，发生一起火车压死行人事故。九月初八日，两江总督沈葆桢派道员盛宣怀等与英商议定以二十八万五千两购回此路，仍准行驶一年。至光绪三年(1877)九月十五日，赎路款项付清后，遂将路轨拆掉，运往台湾，投置海边。

皖南教案发生　光绪二年(1876)闰五月二十二日，安徽建平县(今郎溪)教民黄之绅、杨琴锡将雇农阮光福、安定山拘入欧村教堂杀害，激起众愤，当地农民八百人攻击欧村教堂，烧死了黄、杨二人。接着，广德、宁国、宣城各县旋又掀起了反洋教斗争，捣毁教堂、学校、住宅等四十余所。两江总督沈葆桢将教民白会清、监生胡秀清、客民陈阿才三人处死，抚恤被毁教堂；被教会控告的士绅董何渚、余应龙等判决无罪。

清军克复乌鲁木齐　左宗棠镇压关内回民起义军后，积极准备规复新疆。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侵台，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集中全力筹备海防，左宗棠则力主加强新疆防务。左氏的意见获得广泛支持。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八日，清廷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原乌里雅苏台将军)为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军务。光绪二年(1876)三月十三日，左宗棠移驻肃州。四月初三日，刘锦棠率老湘军自肃州西进，六月初一日抵达济木萨，连败白彦虎与阿古柏兵，六月二十八日，克复古牧地。二十九日，克复乌鲁木齐。至九月中，新疆北路全部收复。

中英《烟台条约》签订　《烟台条约》原称《滇案条约》，又称《中英会议条款》或《芝罘条约》。光绪元年(1875)正月，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英国借此一再对清政府进行威吓、讹诈，二月十二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中英双方共同调查马嘉理一案，并提出偿款、免厘等多项要求。五月十六日，清廷命李鸿章往云南查办马嘉理一案。七月二十八日，又命李鸿章、丁日昌与威妥玛妥议此案。十一月十二日，清廷从李翰章等奏，将云南腾越厅同知吴启亮、总兵官蒋宗汉撤职。英国并不因此满足，而是得寸进尺，光绪二年(1876)五月十一日，威妥玛又向总署提出六项要求，即张贴惋惜马嘉理及保护洋人告示；英国派人往各处察看告示；遇有伤害英人案件，准英国派员观审；会商滇边商务；英国派员在大理、重庆居住；增开通商口岸。同时还要求中国派大臣到英国赔礼道歉等。对以上要求，总署未予批准。五月二十四日，威妥玛又以下旗绝交相威胁，并声言中国如不接受其要求，英国即诉之战争。六月初八日，清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赴烟台，与威妥玛会商滇案。七月初三日，李鸿章与威妥玛正式开始谈判。七月二十六日，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共三部分十六款，附有《另议专条》。主要内容有：第一部分是了结滇案办法，英国派员到云南调查五年，察看通商情形，准备商订滇缅边界及通商章程；中国赔款银二十万两；清廷在各地张贴"滇案"处理告示，并派钦差大臣前往英国表示"惋惜"。第二部分是"优待来往"，各地涉及英国人生命财产案件，英使馆可派员前去观审；总理衙门会同各国驻京大臣商订礼节条款。第三部分为通商事务，中国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为轮船停泊码头；租界内洋货(除鸦片外)免征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中外商人，都只纳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另议专条》规定：英国如派探路队从北京经甘肃、青海赴西藏，或经四川入藏，或由印度来藏，总理衙门应酌情发给护照，或令西藏地方派员照料。七月三十日，清廷批准《烟台条约》，英国迟至光绪十一年(1885)才予批准。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初三日，中英双方在伦敦交换了批准书。《烟台条约》使英国取得了更多的通商特权和侵入我国云南、西藏地区的便利条件。

清军克复吐鲁番　光绪二年(1876)，清军平定北疆的分裂割据势力后，光绪三年(1877)春，刘锦棠又率军南下，三月初七日，攻克南疆门户达坂城。徐占彪等又先后攻克七克腾木、辟展城(今新疆鄯善)。三月十三日，张曜、徐占彪与刘锦棠军会克吐鲁番，收复吐鲁番全境。

阿古柏自杀　光绪二年(1876)，清廷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军讨伐阿古柏。三年，清军连克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等城。阿古柏见大势已去，遂于四月初十日在库尔勒自杀。其次子海古拉运尸西去，行至库车，被兄长伯克胡里袭杀。伯克胡里抢走阿古柏尸体，退守喀什噶尔满城，阿古柏政权陷于一片混乱。

清军收复阿克苏城　光绪三年(1877)春，清军克复吐鲁番之后，七月，刘锦棠部继续西进，九月初一日收复喀喇沙尔城。白彦虎决开都河水阻止西征军。九月初三日，西征军越过水淹区，抵达原阿古柏大本营库尔勒。九月十二日，击溃白彦虎，收复库车。十五日，收复拜城。十八日，收复阿克苏城。二十一日，又收复乌什。至此，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及附近各城镇，全部收复。

清军收复和阗　自光绪二年(1876)六月至三

年九月，清军先后克复了乌鲁木齐、吐鲁番、阿克苏等地，此后于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中旬，又连续收复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英吉沙尔三城。(1878)十一月二十九日，又收复了和阗。南疆西四城彻底平定。至此，新疆除俄国占领区外，全部被清军收复。

崇厚出使俄国 崇厚，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举人。咸丰十年(1861)底，任三口通商大臣，署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任出使法国大臣，就天津教案一事赴法“谢罪”。光绪四年(1878)，阿古柏政权灭亡后，于五月二十二日，崇厚被派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前往俄国谈判索还伊犁问题。

开平矿务局成立 开平矿务局是清末官督商办的大型新式采煤企业。光绪二年(1876)九月，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赴唐山开平一带勘测，发现此地蕴藏有丰富矿产，且质地优良，李遂于次年八月派唐筹办，并拟定《直隶开平矿务局章程》，招商集股。光绪四年(1878)六月二十五日，在直隶(今河北)唐山开平镇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光绪七年(1881)全面投产。雇工三千人，当年产煤三千六百余吨，次年增至三万八千吨，第三年又增至七万五千吨，光绪十五年(1889)达二十四万七千吨，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更增至七十三万吨。该局不断扩充设备，改善运输条件，光绪十二年(1886)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光绪十五年(1889)还购买了一艘运煤船，往来于天津、牛庄、烟台等地。至光绪二十年(1894)，轮船增至四艘。在塘沽、天津、上海、牛庄等港口，设有专用码头和堆栈。该局产煤主要供应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也大量销售市场，获利甚厚。到十九世纪末，总资产已近六百万两，是洋务派所办采矿业中成效最著者。光绪十八年(1892)唐廷枢死后，由江苏候补道张翼接任总办，因盲目扩建，耗资过巨，大借外债，致使外国垄断势力渗入。光绪二十六年(1900)实行中外合办，改名“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在英国注册，矿权逐渐为英国霸占。

兰州机器织呢局筹设 兰州机器织呢局是清政府最早经营的机器毛纺织厂。光绪四年(1878)由陕甘总督左宗棠筹设。甘肃善后局拨款二十万两，总兵赖长向德国泰来洋行订购成套机器设备四百箱。光绪六年(1880)八月十二日开工，有纱锭一千零八十枚，毛织机二十台，染整机全套，二十四匹和三十二匹马力蒸汽机各一座。厂房二百三十余间，占地二十余亩。雇用德国工匠十三名。工厂颇具规模。名义上由赖长主持，实权操于德国人之手。因所购机器性能与当地原料不合，以致产品质量差，成本高，销路不畅。光绪九年(1883)，因锅炉破裂停工。后改为洋炮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聘用比利时人为工程师，改称兰州织呢厂，经营仍无起色，遂于宣统二年(1910)招商经营。

日本侵占琉球 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中日订立《台事专条》，中国承认琉球难民为日本国属民，日军侵略台湾为“保民义举”，给日本正式吞并琉球留下口实。光绪五年(1879)三月八日，日本侵占琉球，改置冲绳县。四月初八日，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抵天津，晤李鸿章，“慨然以调处自任”。五月初十日，总理衙门照会日使，反对废琉球改置冲绳县。十四日，琉球官员向德宏抵津，向李鸿章请援。十六日，日本政府向格兰特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不愿第三国过问。格兰特劝中国“宽让”，并以“中日失和交战”威胁清廷。光绪六年(1880)，日本派代表来华谈判，要求清廷承认日本吞并琉球。李鸿章建议清廷用“延宕”之法，此后，再不提琉球问题了。

《里瓦几亚条约》签订 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崇厚于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初八日抵达彼得堡。三日后开始与俄谈判。俄国内部对是否交还伊犁，意见不一，直到光绪五年(1879)五月，才统一意见，逐步向崇厚提出条件。八月十七日，崇厚在沙俄胁迫下，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十八条(即《交收伊犁条件》，简称《崇约》)，另有《瑷珲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主要内容为：一、中国仅收回伊犁城，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却划归俄属。二、赔偿“代收代守”伊犁兵费及恤款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三、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免税。通商路线增开三条：除原有从恰克图至库伦，经张家口、通州到天津外，增加尼布楚至库伦；从科布多至归化，经张家口转天津；从新疆经嘉峪关、西安或汉中至汉口。由陆路运入天津、汉口的俄国货物，进口税较海路运入者减低三分之一。开放松花江，俄商可行船至伯都讷(今吉林扶余县)贸易。俄国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七处增设领事。条约签订后，国内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崇厚丧权辱国；清政府也以此约“流弊甚大”，拒绝批准，并将崇厚革职拿问，光绪六年(1880)七月初七日开释。

祥生船厂工人罢工 光绪五年(1879)九月二十七日，上海英商祥生船厂工人在为日本三菱公司修理轮船时，英籍监工以工人操作缓慢，横加殴打。工人郑晋卿等提出不得殴打工人的要求，被拒，工人遂愤起罢工。结果，以厂方不得扣减罢工期间工人工

资为条件复工。

延平再次发生教案 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美国传教士以开书店为名,在延平租地建屋,开办福音堂,强行传教。十一月初二日,堂内举行礼拜仪式,附近幼童闻声前往观看。美国教士竟开枪射击,打伤路人,激起公愤。顷刻间,聚集数百人,痛殴教士,怒毁堂内器物。闽浙总督何璟在美国驻福州领事威逼下,竟以赔款、"惩凶"结案。

圣约翰大学创立 光绪五年(1879),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施若瑟将雅各、广恩两教会学堂合并,在上海创办圣约翰书院,自诩以训练中国"未来领袖和司令官"为任务。光绪十四年(1888),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出任院长,采取全盘欧化办法,对学生进行外语训练,并开始注重自然科学。光绪十六年(1890)起设置大学课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改为大学,次年,分设文、理、神、医等学院。

《维新日报》创刊 光绪五年(1879),《维新日报》在香港创刊,陆骥纯、陆建康、黄道生等先后主持编辑工作。中法战争期间,以多载中国战胜消息,受到社会欢迎。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刘少云接办。宣统元年(1909)改名《国民日报》。

长兴抗粮 光绪六年(1880),浙江巡抚谭钟麟通令各府县勘查熟荒征收钱粮,长兴县官绅协议将田赋一律增二成五征收,全县农民大哗。二月十二日,数千农民赴县请愿,知县开枪伤人,群情更加激愤,将知县衣箱焚毁。

天津水师学堂创建 光绪六年(1880)七月十七日,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准,派前船政大臣吴赞诚在天津筹办水师学堂练船事宜。光绪七年(1881),水师学堂建成,派严复为总教习,聘用英国军官教练,仿英国海军教习章程制订条例和计划。经费由北洋海防经费内开支。分驾驶、管轮两科,驾驶科专习管驾轮船,管轮科专习管理轮机。开设英文、算学、几何、代数、三角、重学、天文、舆地、测量、驾驶、化学、格致等课程,兼习经史文义,训演外国水师操法。学生入学年龄十四至十七岁,学制五年,其中四年在学堂学习各种课程,一年上练船实习。学生毕业后任职北洋海军,或选送外国留学。

中国电报总局成立 光绪六年(1880)八月中旬,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奏准筹设津沪电报线时,在天津成立官办的津沪电报总局,委派盛宣怀为总办。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津沪线完工前,正式命名为中国电报总局。津沪电线通报后,经营四个月,亏损甚大。自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改为官督商办,招股集资,分年缴还官办本银(湘平银十七万八千七百余两),听其自取报资,以充经费。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王荣和等集股湘平银八万两,是其创办资本。(1882)十二月,李鸿章奏设苏浙闽粤电线,光绪九年(1883)六月,两江总督左宗棠奏设江宁至汉口的长江电线,均准由中国电报总局办理,于光绪十年(1884)建成;同时扩大招股,两年后资本合计八十万元。光绪十年(1884)春,总局由天津移至上海,一方面与外商公司交涉折冲电报利权事宜,另一方面统筹各路电线的架设,陆续建成干线多条,如广东广西线、江西广东线、直隶陕西线、湖北四川线以及北京恰克图线等。又协助官府架设官线若干条。商线官线遍布各省,殊方万里,呼吸可通。还帮助邻邦朝鲜兴建电线二千余里。光绪三十四年(1908),商线共计四万一千四百一十七里,占全部电报线的百分之四五点五六。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盈利显著增加,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资本总额达二百二十万元。每年除照章支付股东官利一分外,发放红利数厘至一分不等,成为众所歆羡的投资对象。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北洋大臣袁世凯奏准电报收归官办。十二月(1903),清廷派袁世凯为督办电政大臣,吴重熹(直隶布政使)为驻沪会办大臣,饬将电局收回,认真办理。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初一日,吴重熹在沪接办各省电报商局,厘订章程八条,令各分局遵办。光绪三十三年三月(1907),邮传部奏派杨文骏(前署广东臬司,雷琼道)督办电政;次月改中国电报总局为上海电政局。光绪三十四年五月(1908),邮传部尚书陈璧奏请由部备款收赎商股。在确定每股(票面为一百元)赎价问题上,官商双方争执不下,发生了一次"电股风潮"。邮传部初定每股给价一百五十元,加上年息洋二十元,计一百七十元。后加价十元作为优待。股商根据上年帐略,实存资产五百二十八万余元,每股应分二百四十元。郑观应主张公估,则资产总值肯定超过帐面金额,每股价值当在二百四十元以上。有的股商提出,照上年及近期的股票市价每股二百元作为赎价。均未被邮传部采纳。最后仍以邮传部所定每股一百八十元收赎,于八月基本办理结束。宣统三年(1911)四月,上海电政局移至北京,为电政总局;原上海电政局改称上海电报分局。

《中美续修条约》签订 十九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先后有数十万华工在美国从事最繁重的劳动,对美国西部的开发和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国内排华风气日盛一日。光绪三年(1877),美国国会要求美国政府与中国改订同治七年(1868)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

美国曾利用该条约扩大招募华工，开发西部资源)。光绪五年(1879)，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U. S. Grant)利用调停中日关于琉球问题的时机，迫使清政府答应对华工赴美可以“改章办理”。光绪六年(1880)十月十五日，美国驻华公使安吉立(J. B. Angell)与清总理衙门大臣宝鋆在北京签订了《中美续修条约》。共四款，另有“续约附款”。规定：对华工赴美，美国“可以或为整理，或定人数、年数之限”。光绪七年(1881)六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互换该约的批准书。自光绪八年(1882)起，美国制订出一系列排华法案。到光绪三十年(1904)更提出排华法案无限期延长，激起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掀起一场反美爱国运动。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设　上海机器织布局俗称“老洋布局”，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官督商办机器棉纺织企业。早在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便曾派魏纶先出面筹办织布事宜，但魏无法筹集资金，所以该计划未能实现。光绪四年(1878)九月初十日，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呈请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奏准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几经变动，光绪六年(1880)，确定由戴恒、龚寿图、郑观应、经元善等人负责筹办，郑观应任总办。开办资金五十万两。全套机器从英、美购置，拥有纱锭三万五千枚，布机五百三十台，雇工多时约四千人。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奏准专利十年，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得另行设局。光绪九年(1883)，因郑观应挪用股本作股票投机，筹建工作陷于停顿。光绪十三年(1887)，李鸿章复派龚寿图接办。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才建成投产。营业兴旺，纺纱的利润尤高。光绪十九年(1893)夏，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向英国增订机器。九月初十日，织布局清花间失火，全厂付之一炬。十月，李鸿章派盛宣怀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椝负责恢复织布局，招募新股一百万两，在织布局旧址设厂，取名“华盛纺织总厂”。

中兴煤矿公司创办　中兴煤矿公司是旧中国最大的私营采煤企业。矿区在山东枣庄。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招商试办。初为土窑。光绪二十一年(1895)遭水淹封闭。光绪二十五年(1899)，直隶矿务督办张翼奏请改为中外合办的“华德中兴煤矿公司”，以山东盐运使张莲芳为华总办，卸任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为洋总办。议集资本二百万元，华股占百分之六十，德股占百分之四十。后德股未招到，全赖华股维持。光绪三十四年(1908)，向农工商部注销“华德”二字，定名为“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有限公司”，但仍给予德璀琳可与华股同样分利的股份四万七千元。该公司为私营煤矿中成立最早、经营效果较佳的一个企业。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　《中俄伊犁条约》原称《中俄改订条约》，又称《圣彼得堡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光绪五年(1879)八月崇厚与俄国擅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因遭朝野反对，清廷未予批准。光绪六年(1880)正月初三日，清廷改派曾纪泽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取代崇厚继续对俄谈判，交涉改约。初十日，清廷照会沙俄政府，不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六月二十四日，曾纪泽抵达俄京彼得堡，二十九日开始谈判。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光绪七年(1881)正月二十六日，曾纪泽与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伊犁，取消了《崇约》中割让特克斯河流域条款，但仍割弃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及北疆斋桑湖以东地区；在商务方面，将《崇约》中的“概不纳税”改为“暂不纳税”，保留旧有的恰克图至天津的商路，并添设赴嘉峪关一路，取消了旧约规定的从嘉峪关至汉口的商路，还废除了沿松花江航行至伯都讷贸易的规定，增设领事的地点由旧约的七处改为二处(嘉峪关、吐鲁番)；赔款则由原来的五百万卢布增加到九百万卢布(合银五百零九万两)。四月十八日，清廷批准了此约。七月二十五日，在俄京换约。光绪八年(1882)二月初四日中俄双方正式办理了收交伊犁手续。此后，俄国利用《伊犁条约》中关于“勘界”的条款，以及光绪八年至十年(1882—1884)的五个边界议定书，共割占了中国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光绪十八年(1892)，俄国又出兵帕米尔，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二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济南教案发生　光绪七年(1881)，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山东济南勾结奸徒，骗取民房，改为教堂。六月十八日，泺源书院师生发出揭帖，要求收回房屋。传教士向美国驻华公使捏告教堂被拆坏。美使馆派参赞到济南向地方官进行要挟，以退还原房价及赔偿“损失”结案。

朝鲜发生“壬午政变”　光绪八年(1882)壬午六月九日，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率不满闵妃和亲日派金玉均所行改革之朝人攻入王宫，杀兴宣君李最应及日人数名，李 应称国太公，自行专政。闵妃急向清政府求援。十日，汉城发生兵变，烧毁日本使馆。十五日，日本外相井上馨率舰赴朝。同日，清廷谕令李鸿章、张树声饬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候选道马建忠带兵前往观察，相机办理。二十七日，丁汝昌抵朝鲜仁川，日军亦到，旋入汉城。七月初七日，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应张树声、丁汝昌之约，率部七千人自登州

抵朝鲜，张謇、袁世凯同行。十三日，吴长庆、丁汝昌等诱执大院君李昰应，次日送往天津。闵妃重新主政，擒杀乱党数百人。八月十二日，清政府命将李昰应安置于保定，永远不准回国；又命吴长庆部暂留朝鲜。

朝日订立《济物浦条约》 光绪八年(1882)七月，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借口朝人焚毁日本使馆，要求朝鲜赔款谢罪，并限三日内答复。朝相闵泳翔请求展缓时日，以待清廷态度。七月十七日，经李鸿章示意，朝鲜大臣李裕元与日使签订了《济物浦条约》，规定朝鲜赔款五十万日元，并向日本谢罪。日本取得在朝鲜的驻兵权利，并声称与中国有同样的出兵权利。

中朝订立《水陆通商章程》 光绪八年(1882)八月二十日，天津海关道周馥、候选道马建忠与朝鲜大臣赵宁夏、鱼允中在天津议定《中朝水陆通商章程》，规定：北洋、朝鲜互派商务委员驻汉城、天津，朝鲜人民在华受中国法律管理；中朝自由捕鱼、自由贸易，互相往来，招商局船只定期在中朝间航行。

中法商订越事办法 光绪八年(1882)十月十七日，法国公使宝海到天津，与李鸿章商谈越南问题，提出先商边界及商务，并要求中国撤兵。十八日，李鸿章派马建忠与宝海商订越事草案三条：一、越南向中国进贡，中国撤兵，法国声明无侵占越南土地、损害越南主权之意；二、越南开放保胜(黑旗军根据地)；三、中越以红河为界，允许红河通航。十月二十二日，清廷批准这一草案，同意驻北圻清军后撤。

中法签订越事备忘录 光绪八年(1882)十月十八日，李鸿章派马建忠与法国公使宝海在天津商订了越事草案三条，即中国撤兵、通商、中法分巡红河南北。十一月十一日，李鸿章与宝海又根据以上协议，在上海签订了越事备忘录，拟定越南事宜三条：一、中国若从越南撤兵，法国则不侵占越南土地、不贬削越南国王治权；二、开放保胜为商埠；三、在云南、广西界外与红河中间之地划定界限，北归中国保护，南归法国保护。法国政府没有批准这一草约，并于光绪九年(1883)正月二十六日将宝海撤回。四月初九日，法国议会通过以五百五十万法郎作为远征越南军费。茹费理内阁派遣孤拔、波特等人先后率兵增援。

公和永缫丝厂设立 光绪八年(1882)，浙江丝商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丝厂，资本十万两，丝车一百部。光绪八年至十三年(1882—1887)间，营业状况不佳，光绪十三年(1887)以后，生产逐渐发达。至光绪十六年(1892)，丝车已增加到八百五十八部。

同文书局创设 同文书局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近代石印图书出版机构。光绪八年(1882)，由徐鸿复、徐润等集股设立于上海。购置石印机十二架，雇工五百人，专事翻印善本古籍，先后出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十七日，该局不慎发生火灾，大批设备被焚毁，损失约一万五千元。因保了火险，且未殃及附近的仓库、宿舍，因此很快便又恢复生产。后来，印书日多，因资金大量积压，遂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停办。

开平煤矿工人罢工 光绪八年(1882)，开平煤矿直隶籍工人因总办唐廷枢特别优待广东技工而歧视当地工人，向矿务局要求和广东工人同工同酬，在矿厂举行罢工，使煤矿大半陷于停工状态。数日后，罢工被镇压。

浪穹教案发生 光绪九年(1883)，法国教士张若望在云南浪穹(今洱源)勾引奸徒入教，戕害人命，奸淫妇女，拷打农民，激起民愤。二月十九日，吴大发等人到浪穹县长营教堂索还被拐妇女，张若望竟开枪行凶。群众愤而围攻教堂，将张若望等十人烧死、杀死。附近地区受法国教士欺侮者，亦纷起捣毁教堂。清政府以将吴大发等充军、赔款五万两结案。

纸桥大捷 光绪八年(1882)三月，法国西贡总督黎眉派交趾支那海军司令李维业率军再度攻陷越南河内，企图开通红河，直窥云南。光绪九年(1883)二月，法军又攻占越南南定。越南北圻总督邀黑旗军相助。四月十三日，李维业率法军四百余人进犯河内城西怀德府的纸桥，刘永福指挥黑旗军在纸桥西侧关帝庙设伏，经三小时激战，打死打伤法军约二百人，李维业丧命，法军大败而去。刘永福因战功卓著被越南政府提升为三宣正提督。

法越签订《顺化条约》 光绪九年(1883)六月，越南国王病死。七月十六日，法军进攻顺化海口，十七日，侵入都城顺化。二十三日，以武力胁迫越南订立了《法越新订和约》，即第一次《顺化条约》，共二十七款。根据这一条约，法国变越南为自己的保护国，控制越南的内政外交。法国公使何罗栏当即贴出告示，声言越南全境属法，并驱逐黑旗军出境。

沙面示威 光绪九年(1883)七月，英籍海关职员罗根在广州街上无故杖击中国平民，并以手枪打死儿童一名，伤两人。八月十日，葡萄牙人狄亚士在英轮"汉口号"上又无端将一名中国工人推挤水中淹死。一月之内发生两起人命案，激起群众极大愤怒，他们冲入沙面租界示威，并烧毁洋商的一些房屋。

中法战争爆发 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十三日，法军六千人在孤拔率领下，向驻防山西(今河内

西北)的清军和黑旗军阵地发动进攻,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军连战失利,法国乘势要挟,光绪十年(1884)四月十七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并声明将北圻清军撤回边界。闰五月初,法军强行接收越南谅山附近中国军队驻地,遭到还击,法军败退。六月十五日,法国海军进犯台湾基隆,被守军击退。七月初三日,停泊马尾军港的法国军舰突然袭击福建水师。由于清廷的避战求和政策和指挥无能,致使舰队仓促应战、被动挨打,终遭全军覆灭的厄运。初六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八月,法舰再犯台湾,遭沪尾(今淡水)军民痛击。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舰北犯浙江镇海,遭清军炮击,法军败退,司令孤拔受重伤,后死于澎湖。与此同时,在中越边境,清军却抗击不力,节节败退,使法军得以攻占边防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遂起用老将冯子材为广西军务帮办,重行部署战备,二月初八日,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十三日,又取得了谅山大捷,重伤法军司令尼格里。刘永福黑旗军也在临洮大败法军。中国军队的节节胜利,使河内法军异常惊恐,准备逃窜。法国茹费理内阁亦因战败倒台。而中国清朝政府却乘胜求和,二月十九日,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二十二日,命令前线军队于三月初一日停战,十一日撤兵。四月二十七日,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由于清政府的怯懦退让,使得中国不败而败,而法国却不胜而胜。

山西失陷 光绪九年(1883)九月,法国政府任命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谋占越南北部。十一月十二日,孤拔率兵六千人自河内出发,进攻山西(在河内西北)。清主将云南巡抚唐炯先期逃往兴化,又私自逃回云南。黑旗军与清云南防军五千人向法军应战,自十五至十七日,血战三日,毙敌三百余人。十七日,山西失陷,刘永福、唐景崧等突围,退至兴化(在山西西北)。

北宁失陷 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法军攻占山西后,继续向清军进攻。光绪十年(1884)正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二月,米乐率兵一万二千人自河内和海阳出发,分水陆两路,会攻北宁(在河内东北)。北宁前敌指挥、广西巡抚徐延旭未作认真战备。二月十五日,清军二万人不战而退,北宁失守。二十二日,法军又西向攻陷太原(在河内北)。三月,兴化亦告失陷。至此,法军完全占领了红河三角洲,使清军陷于被动地位。

《述报》创刊 光绪十年(1884)三月初一日,《述报》在广州创刊,由海墨楼石印书局承印。每日出四版一小张,逢十无报。每月汇编为一卷,名《中西近事汇编》。内容除新闻、评论外,还刊载了不少石印的新闻插图。它严厉谴责法国侵略者"悖理横行,不仁不义",刊登大量有关中法战争的消息、电讯、评论和来稿,呼吁清朝政府加强战备,认真对付侵略者的进攻,反对"输金议和"的投降主义。

慈禧撤换军机五大臣 自光绪九年(1883—1884)十一月至十年三月,清军在越南战场上连连失利,先后丢失山西、北宁、太原等地。光绪十年(1884)三月初八日,左庶子盛昱上奏折弹劾李鸿藻保举非人,建议给予处分;并说奕䜣、宝鋆了解内情却不加阻止,亦应负一定责任。一直与奕䜣有权力矛盾的慈禧,利用这份奏折大作文章,与醇亲王奕譞共同策划,三月十三日,以"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罪名,将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一概逐出军机处;同时任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五人为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大臣,组成新的军机处。三月十四日,慈禧又谕令军机处遇有紧急事情,会同奕譞商办。从此以后,军机处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奕譞及其心腹孙毓汶手中。

袁世凯会办朝鲜防务 光绪八年(1882),朝鲜"壬午政变"平定以后,清军吴长庆部暂留朝鲜。九月,吴长庆派营务处同知袁世凯等为朝鲜练兵千名。光绪十年(1884)四月四日,经李鸿章奏准,撤吴长庆军内渡,但仍留军千人驻扎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同时,以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光绪十一年(1885),袁又被李鸿章保荐为三品道员,改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前回国。

《点石斋画报》创刊 光绪十年(1884)四月十四日,《点石斋画报》在上海创刊,该报为旬刊,由英商美查(Major)主持的点石斋石印书局石印发行,随《申报》附送,也单独发售。吴友如负责编绘,作画者有田子琳、金蟾香、周暮桥等。以画时事、社会新闻为主,还有大量宣传西方科学,反映民间风俗的图画。对清朝腐朽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罪行有所揭露,亦杂有庸俗迷信之作。光绪二十二年(1896)停刊。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签订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光绪十年(1884)四月十二日,法国代表福禄诺抵达天津,与李鸿章商谈通商、撤兵等问题。四月十七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

款》,共五款。主要内容为: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不索赔款,不伤中国体面,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声明中国自北越撤兵,调回边界。法国见清政府退让,便继续扩大对华侵略战争。

北黎事件发生 北黎事件亦称观音桥事件。光绪十年(1884)四月,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规定中国自北越撤兵,但未确定撤兵日期。五月二十九日,法将杜森尼(Dugenne)却根据福禄诺自定期限,率法军七百人强行向谅山推进,至越南北黎的观音桥,逼迫清军撤退或投降。闰五月初一日,清军派联络官三人到法营交涉,法军扬言要接收越南谅山、高平两省,并无故枪杀清军联络官,向清军营地发起攻击。清军奋起还击,法军溃败。初六日,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向总署抗议"中国背约",要求赔偿。总署予以回驳。

马尾海战 马尾海战又称马江海战,是中法战争中的重要战役。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二十三日,法国借口"北黎事件"派孤拔率远东舰队闯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与中国军舰同泊一条江上。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和会办海疆事务大臣张佩纶不作戒备,又禁止港内福建水师舰只移动,自缚手足。七月初三日下午,法舰向福建水师发动突然袭击,何如璋、张佩纶弃师不顾、仓皇逃遁,中国舰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旗舰"扬武号"被水雷击伤,舰上官兵仍用尾炮还击法旗舰"伏尔他"号;运输舰"福星号"亦冲入敌阵与法舰激战,后中弹爆炸,舰上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海战历时三十分钟,福建水师舰船被击沉七艘,官兵伤亡七百多人。初四日,法舰又轰毁马尾船厂。初六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

台湾人民抗击法军 光绪十年(1884)六月十五日,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率舰进攻台湾基隆,轰毁炮台。十六日,法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帮办台湾军务大臣、台湾巡抚刘铭传派提督章高元、总兵曹志忠各率所部进行反击,法军大败,退回海上。八月十三至十四日,法国舰队司令孤拔率舰十余艘,分头进攻基隆和沪尾(今台湾淡水)。刘铭传基于战略考虑,放弃基隆,集中兵力守沪尾,法军遂占基隆。十四日,利士比率舰四艘进犯沪尾,被守军击退。十七日,孤拔从基隆派兵支援。二十日,法军约六百人在舰队掩护下分三路登陆,清军分路迎击,激战三个多小时,法军伤亡惨重,逃回军舰。攻占基隆的法军,在狮球岭一带亦遭狙击。台湾军民的抗法斗争,打破了法军攻占台湾的计划。九月初五日,孤拔宣布封锁台湾,孤立守军。但大陆人民冲破封锁,不断接济台湾人民。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下,台湾人民严守沪尾,又多次击退自基隆向台北进犯的法军,保住了台北。

新疆改建行省 早在光绪三年(1877)七月,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便上奏清廷,主张在新疆设行省、改郡县,获清廷允准。光绪十年(1884)九月三十日,新疆正式改建行省,省会设于乌鲁木齐汉城即迪化城,设置巡抚及布政使各一名,刘锦棠为新疆第一任巡抚。

朝鲜发生"甲申政变" 光绪十年(1884)甲申十月十七日,朝鲜开化党金玉均、洪英植等发动政变,借日军百余人占王宫、杀后党。朝鲜后党向驻朝清军求援。十八日,吴兆有、张光前率驻朝清军攻占王宫,击退日军。二十日,驻朝日使竹添进一郎以袁世凯等入据王宫,遂自焚使馆,率兵冲出汉城,走仁川。十一月初五日,清廷派北洋会办大臣吴大澂查办朝鲜事宜。初六日,日本政府派外务相井上馨为全权大臣率兵二千赴朝;丁汝昌亦率超勇、扬威二舰及旅顺陆军抵朝。十一月二十四日(西历1885),朝日订立《京城条约》,规定朝鲜对日谢罪、赔款、惩凶。十二月初七日,井上馨建议中国撤回驻朝清军,被中国拒绝。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议朝鲜事宜,并命吴大澂会同商办。

镇南关大捷 光绪十年(1885)十二月,法军大举进攻越南谅山,后一直闯入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冯子材率王孝祺、王德榜、苏元春等部在镇南关的关前隘筑长墙、掘壕沟,部署兵力。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七日,法军统帅尼格里率兵二千余人分三路直扑关前隘,被苏元春、王孝祺等部击退。初八日晨,法军主力猛攻长墙,冯子材奋勇当先,率军抗敌,夺回了关前隘的东岭、西岭。越南义民千余人前来助战。法军三面受敌,败逃关外,退回谅山。清军乘胜追击,二月十三日收复谅山,重伤尼格里。十四日收复谷松、观音桥等地,法军只得退回到北宁、河内。是役,法军死伤二百八十七人。十五日,法军败讯传到巴黎,茹费理内阁被迫辞职。清朝政府却乘胜求和,命前线清军限期撤回境内。

临洮大捷 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八日,冯子材率清军在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同时,在北越西线,岑毓英率滇军、刘永福率黑旗军在临洮大败来犯的法军,并乘胜克复广威、黄岗屯、鹤江、老社等十数州县。

中日订立《天津会议专条》 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又称《天津条约》或《朝鲜撤兵条约》。光绪十一

年(1885)正月二十八日,日本全权大臣尹藤博文抵达天津,同李鸿章谈判关于“甲申政变”后的朝鲜问题。从二月十八日到三月初一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先后举行六次会谈。三月初四日,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共三款: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日后朝鲜若有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派兵,彼此应先行知照,事定仍即撤回;两国均不代朝鲜练兵。

《中法新约》签订 《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又称《李巴条约》。光绪十一年(1885),正当中国抗法斗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清政府却乘胜求和,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下令前线各路清军限期撤兵。三月二十九日,清政府指派李鸿章为谈判代表,和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Jules Patenôtre)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四月二十七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主要内容为:一、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二、在中越边界保胜以上和谅山以北,指定两处通商地点,允许法国在此设立领事,并准法商居住;三、降低中国云南、广西同越南边界进出口货物的商税;四、中国日后建筑铁路应向法国商办;五、法军撤离台湾、澎湖。从此,法国侵略势力伸入中国云南和广西地区。

天津武备学堂创建 天津武备学堂是清末第一所新式陆军学校。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初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清廷,请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其规制略仿西洋陆军学堂,聘用德国人为教官。经费由北洋海防经费内开支。最初挑选各营中弁目入堂肄业,文员愿习武者亦一并录取,学生一百余人。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化诸学,炮台、营垒诸法,演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并兼习经史文义。初仅肄业一年,考试及格,便发回各营。后逐渐延长年限,选派年轻学生肄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有学生二百八十人,分设马队、步队、炮队各科。毕业生多入湘、淮军旧营,北洋系将领多出自该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时被焚毁。

浙江仙居起义 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十六日,浙江台州仙居哥老会成老大率众二千余人起义,围攻县城。因事机不密,台州府预先派兵增援。会众被清军打败,成老大被捕。

中英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初七日,曾纪泽与英国外相沙里斯伯利(Lord Salisbury)在伦敦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鸦片入口,每箱(百斤)向海关一并缴纳税厘一百一十两(正税三十两、厘金八十两)后,由华商持凭单运往内地销售,中途不再征收任何捐税。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设立 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初六日,清政府为收回海军统一指挥权,在北京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大臣,庆郡王奕劻、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实权仍由李鸿章掌握。李利用海军衙门整顿海防名义,大力购置外国船舰,并将南洋及福建水师较好的船只都拨到北洋,以扩充北洋海军;又在“以利海防”名义下,管理开办铁路事务。光绪十四年(1888)编成北洋舰队,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设置了提督、总兵等海军官职。海军经费原定每年四百万两,李鸿章为向慈禧太后和奕譞献媚,同意将海军经费移建颐和园之用。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便不再添置新舰。光绪十七年(1891)以后又停止购买军火。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覆灭,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遂将海军衙门裁撤。

中法订立《越南边界通商章程》 《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又称《滇粤陆路通商章程》或《天津协定》,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二十二日,由清廷全权代表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戈可当(M. G. Gogordan)在天津签订,共十九款。主要内容为:中法互派领事;议定进出广西、云南边界货物的税则,凡进口税减收五分之一,出口税减收三分之一;华民在越南受法国法律约束;互换逃犯等。法国政府以与其侵略要求相距甚远,拒绝批准此约,并重派代表来中国谈判。

《广报》创刊 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二十三日,邝其照在广州创办《广报》,吴大猷、林翰瀛、肖竹朋、罗佩琼、劳宝胜、武子韬、朱鹤等人先后担任主笔。四号铅字排印。内容分论著、本省新闻、中外新闻等,附有宫门钞、辕门钞及货价行情。

中英订立《缅甸条款》 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英国出兵攻陷缅甸首都曼德勒,俘虏缅甸国王。十一月二十七日(西历1886年元旦),英国宣布上缅甸并入英属印度,又进而逼迫清政府承认其吞并缅甸。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清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与英前署驻华公使欧格纳(N. R. O'Conor)在北京签订了《中英缅甸条款》,共五款。主要内容为:英国允许缅甸每十年向清王朝进呈方物一次;清政府承认英国在缅甸取得的一切特权;中英两国应派员勘定中缅边界,另立边界通商事务专章;英国同意暂缓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但原则上规定了藏印边界通商。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初七日,中英两国政府派代表在伦敦交换了批准书。

重庆教案发生 光绪十二年(1886),美英两

国传教士在重庆城外险要地带强修教堂，激起众愤，居民联名向巴县官吏控告，未果，于是士民广布揭帖，约期反教。五月底，商人罢市，武生罢考，群众纷起参加斗争，连续焚毁美国教堂和英、法洋房三处，并围攻恃教欺民的教民罗元义的住宅。罗竟雇人逞凶，打死民众十一人，打伤二十二人。群众益加愤恨，组织起来，四处"打教"。六月下旬，数千人奋起焚毁城内英、法教堂和英国领事馆，并捣毁城外白果树法国天主教教会书院。重庆反洋教斗争掀起了整个川东地区的反洋教风潮，江北、铜梁、綦江、南川、大足等地均有"打教"事件。事发后，英、美、法公使向清朝政府大肆要挟，清政府急派四川总督刘秉璋"查办"。刘以处死凶手罗元义，又处死民众首领石汇，赔款二十三万五千两结案。

天津《时报》创刊　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十一日，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与怡和洋行经理笳臣在天津创办《时报》(日报)，聘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主笔。每日有论说一篇，亦转载他报社论，鼓吹侵略有理，有"外人在华北的圣经"之称，是英国在华重要喉舌。五年后自行停刊。

山东冠县发生教案　光绪十二年(1886)，法国传教士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河北南宫县属)唆使教民强行拆毁玉皇庙，霸占庙前民田，改建教堂。村民阎书勤等聚众夺回庙产，以武力护庙。由于地方官袒护教会，使这场斗争延续多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东昌府知府派兵为教会撑腰。光绪二十二年(1896)，阎书勤请来梅花拳首领赵三多，聚集拳民二、三千人，亮拳示威，清军被迫撤离。不久，山东巡抚李秉衡判决教会不应侵占公产，并允许重建玉皇庙。光绪二十四年(1898)，继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却拨银一万两为教会修建梨园屯教堂，并抚恤教民；又命冠县知县逮捕阎书勤等，阎被迫逃离。八月，阎书勤、赵三多等聚众二、三百人，在冠县蒋家庄(今属河北威县)竖起"助清灭洋"旗帜，攻打红桃园教堂。地方官派兵镇压，阎书勤、赵三多等突围逃散，反洋教斗争继续在各地蔓延。

大足教案发生　光绪十二年(1886)，四川大足县民众因不堪外国传教士肆虐，拆毁龙水镇、三驱场、万古场等地的教堂。光绪十三年(1887)，又将重建的龙水镇教堂夷为平地。但教士又纠工重建，并扩展地基，加厚围墙。光绪十六年(1890)，教堂重修竣工，适值当地传统的灵官庙会会期临近，教士彭若瑟胁迫知县发布告示，严禁迎神赛会，并派兵守卫教堂。六月十九日，灵官会会期，又发生教徒打死群众和烧毁民房事件。群众怒不可遏，奋起捣毁教堂。余栋臣组织煤窑、纸厂工人及挑贩数百人竖旗起义。六月二十三日，攻入龙水镇，发布檄文，号召群众驱逐外国传教士。清廷急派桂天培带兵到大足"查办"。桂对起义者剿抚兼施，余栋臣率众退至西山，坚持斗争。四川总督刘秉璋以缉捕"凶手"、赔银五万两结案。

天津自来火公司创办　光绪十二年(1886)，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淮军将领周盛波等在天津合资设立"自来火公司"(即火柴厂)。开办资本一万八千两，由德国人李曼负责采购机器设备。光绪十七年(1891)投产。不久，发生火灾，木制厂房被焚，损失不大。后来，公司公开招股，资本增至四万五千两，由吴懋鼎任总办，聘请英、俄两国商人购买机器，并帮同稽查帐目。所制火柴大多运销河南一带。

中国铁路公司成立　中国铁路公司亦称天津铁路公司、津沽铁路公司。光绪七年(1881)，开平矿务局修筑从唐山到胥各庄长约十五公里的轻便铁道，专运煤炭。中法战争后，洋务派为了军事的需要，积极提倡兴筑铁路。为把唐胥铁路延伸到芦台，李鸿章在开平矿务局下设运煤铁路公司，命伍廷芳、吴炽昌主持。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醇亲王奕譞奏准把唐胥铁路向东再延伸至山海关，向西延伸至天津和北京。李鸿章为了修筑这些铁路，将开平运煤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仍由伍廷芳、吴炽昌主持，金达为技师，承建津沽等铁路。

中法订立《续议商务专条》　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签订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由于法国政府以距其侵略要求甚远，拒绝批准，并重派代表来中国谈判。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六日，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孙家鼐与法国驻华公使恭思当(J. A. E. Constans)又在北京签订了《中法续议商务专条》。主要内容为：边界贸易的进出口税再度减低，进口税减收十分之三，出口税减收十分之四；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两通商口岸外，又增加云南蛮耗一处；法国在中国南境、西南境享有无条件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此专条和《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均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才经中法两国政府互换批准。

中法订立《续议界务专条》　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初六日，中法两国代表在议定《续议商务专条》的同时，又在北京签订了《续议界务专条》，大体勘定龙膊(由保胜南岸沿河而上百余里处)以东中越边界，其中大部分地段系"就图定界"，只有小部分地段经过实地勘定。

广东水师学堂创办　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十四日，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清廷，请在广州设立

“广东水师讲堂”，光绪十九年(1893)改名“广东水师学堂”，经费由海防经费中开支，聘用英国军官教练。分设管轮、驾驶两科，管轮科学习机轮制造原理及运用之术，驾驶科学习天文、海道及驾驶、攻战之法。同时开设英文课，兼读四书五经。最初招收学生七十名，分内学生(由博学馆旧生中挑选)、营学生(由军营武弁中挑选)、外学生(招收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文生)三种。学成之后拨入练船，在沿海口岸实习一年，再选拔优秀者分赴外国学堂、兵船上学习。

广东陆师学堂创办 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十四日，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清廷，请在广州设立广东陆师学堂，经费从海防经费中开支，聘用德国军官教练。分设马步、枪炮、营造三科，所开课程与天津武备学堂略同，均学德文，兼读四书五经。最初招收学生七十名，分内学生(由博学馆旧生中挑选)、营学生(由军营武弁中挑选)、外学生(招收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文生)三种。三年毕业，择优出洋，分赴各国学堂及陆军实习。

台湾改建行省 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十六日，闽督杨昌浚、台抚刘铭传会奏清廷，请将台湾改建行省。清廷采纳这一建议，将台湾正式建省，辖三府一州五厅十一县。新设首府为台湾府，辖台湾、彰化、云林、苗栗四县和埔里社厅；原台湾府改为台南府，辖安平(原台湾县)、嘉义(原诸罗县)、凤山、恒春四县和澎湖厅；台北府辖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厅、南雅厅；添设台东直隶州，由原卑南厅升置，辖花莲港厅。

中葡订立《北京条约》 光绪六年至九年(1880—1883)间，葡萄牙多次企图迫使清政府承认澳门归葡所有，未果。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二日，总税务司赫德派金登干与葡方代表议定了一个《中葡草约》(又称《里斯本议定书》)，承认葡萄牙享受最惠国待遇，允其永驻和管理澳门以及澳属之地，葡在澳门协同中国防止鸦片走私。据此，同年十月十七日，清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与葡萄牙全权代表罗纱(Thomas de Souza Roza)在北京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五十四款及洋药缉私专约。主要内容为：中国仍允许葡萄牙永驻和管理澳门以及澳属之地；允准葡国派公使驻京；葡在中国通商口岸设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葡与各国同享通商特权，并得在商埠租地建屋，设立教堂等。

广学会成立 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是清末外国传教士、领事和商人在中国创办的最大的出版机构。光绪十三年(1887)由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创立于上海，由光绪十年(1884)设立的“同文书会”改组而成。光绪二十年(1894)改称广学会。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任第一任董事长，英国传教士韦廉臣、李提摩太先后任总干事。主要成员有英国的慕维廉、艾约瑟，美国的丁韪良、林乐知、李佳白，德国的花之安等。标榜“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编译出版大量宗教、政治、史地、伦理等书籍，如《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发行《万国公报》，宣传宗教、西学，鼓吹改良，对维新派影响很大。该会在北京、奉天(今沈阳)、西安、南京、烟台等地设有专门机构，进行会务活动。

通久源轧花厂创建 光绪十三年(1887)，买办商人严信厚在宁波设立通久源轧花厂。开办资本五万两，购置日本出产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另有四十台新式轧花机，雇工三、四百人，日夜开工。光绪十七年(1891)，出售轧成的棉花达三万担。

漠河金矿开办 漠河金矿是清政府经营的著名金矿，矿区在黑龙江省呼玛县漠河、奇乾河一带。光绪十二年(1886)黑龙江将军恭镗奏请举办，清政府遂命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员前往勘查筹办。光绪十三年(1887)，李鸿章与恭镗开始筹划开采，奏定《漠河金厂章程》。次年成立“漠河矿务局”，具体负责采矿事宜，在漠河、奇乾河两处设立金厂，雇工一千五百人，开办资本近二十万两。光绪十五年(1889)投产，当年产金一万八千两。光绪十九年(1893)又在观音山设立分厂。次年产金二万八千余两。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漠河金矿被沙俄出兵强占，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始收回。宣统三年(1911)归黑龙江省办。

英军侵略西藏 英国早就企图从印度向我国西藏扩张。光绪二年(1876)《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根据其中的另议专条规定，迫使清政府同意它派员入藏“探路”。光绪十二年(1886)又派人从哲孟雄(今锡金)修筑道路到西藏境内。西藏地方政府在隆吐山要隘建卡设防，英国反诬藏兵“越境戍守”。光绪十四年(1888)，英国借口哲孟雄问题，悍然出兵二千多人，向西藏地方军队发动进攻。正月初八日，攻毁隆吐山藏兵营房。藏兵英勇抗击后，转移到亚东山谷。四月间，藏兵突袭英军营地，终因寡不敌众，隆吐山、亚东、朗热等要隘相继失守。清廷一意妥协，一再命令藏兵撤出隆吐山边卡，并将积极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革职，以长庚代之。又命驻藏帮办大臣升泰驰赴前线，与英国“罢兵定界”；还派海关税务司英人赫政(赫德之弟)协助升泰同英国谈判。光绪十六年、十九年(1890 和 1893)，清廷与英国先后签订

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英国侵略势力打开了中国西藏的门户。

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初受业于名儒朱次琦，博通经史。光绪五年(1879)游香港，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光绪八年(1882)，始"大购西书"，讲求西学。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鉴于中法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严重，遂于十月初八日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这是康有为把自己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变为正式建议的开端。上书历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危机之状，强调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吁请皇帝迅速"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国家的危亡。这次上书由于"大臣阻格，不为上达"，光绪皇帝没有看到，但它却在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爱国人士中辗转传诵，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康有为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声誉。

北洋海军成立　北洋海军是晚清新式海军主力。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侵略台湾，清政府开始重视海防建设，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光绪元年(1875)起，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先向英国定购了八艘守口大炮铁船，光绪五年(1879)以后又向英国订制了超勇、扬威二艘快船(也称巡洋舰)和镇中、镇边二艘炮船，向德国订制了铁甲巨舰二艘、钢甲巡洋舰一艘，即后来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同时，李鸿章还加紧筹建海军基地，设立水师学堂，聘用洋员训练海军。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海军衙门成立，李鸿章掌握实权，又乘机扩充北洋海军，从德英两国订购了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两千吨级的巡洋舰。光绪十四年(1888)，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编成了北洋舰队，共有各种舰船二十二艘，官兵四千余人。十一月十五日，李鸿章派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林泰曾为左翼总兵，刘步蟾为右翼总兵。至此，北洋海军正式成立。

华新纺织新局筹设　华新纺织新局是清末设立的官商合办的机器纺织厂之一。光绪十四年(1888)在李鸿章支持下，由上海道龚照瑗及严信厚等在上海筹办。光绪十六年(1890)，聂缉椝也参与筹办。光绪十七年(1891)开工。开办资本四十五万两，最初有纱锭一万二千枚，布机二百台，光绪十九年(1893)，纱锭增至一万五千枚，布机增为三百五十台。中日甲午战后，受外商纱厂竞争，连年亏损。光绪三十年(1904)，由聂缉椝派人组织复泰公司租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复泰公司改组，该厂股权三分之二以上为聂占有。宣统元年(1909)，该厂又被聂以低价收买，成为聂独资经营的私产，改名恒丰纺织新局。

广东银元局设立　光绪十四年(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设立银元局，铸造银币。此后，各省陆续设立。光绪三十一年(1905)天津造币厂成立后，各省银元局改为该厂的分厂。

建宁发生抢米事件　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福建建宁府米价由每石二两猛增至三两左右，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浦城县北乡民众数百人拥往米店抢米，又到县署将知县熊汝梅揪出，欲行殴打。后经官绅出面劝解，知县允减米价，群众始散去。建宁城内亦有群众鸣锣聚众，要求知府减低米价。

汉阳铁厂工人罢工　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因汉阳铁厂翻译曾海笞打广东籍工人，激起众怒，二百余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将曾开除。道员蔡锡勇劝令先行复工，再调翻译。工人不同意。道员恽祖翼调兵二百余人前往镇压，工人被迫复工。四月三十日、五月初十日，又举行两次罢工斗争。

德华银行开办　光绪十五年(1889)，由德国十三家银行合资创办的德华银行在上海设立，这是德国资本在华活动的中心机构。光绪十六年(1890)开始营业。在成立后的二十年中，先后于汉口、青岛、天津、香港、济南、北京、广州等地设分行二十所。中日甲午战争后，该行与汇丰银行一起，向清政府提供"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并和汇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共同承担以关税为担保的庚子赔款保管人。后又代表德国参加帝国主义对华贷款的银行团。曾在中国发行过银两券、银元券两种纸币。

兰州府学吏局建立　光绪十五年(1889)，兰州府学吏局建立，宣统元年(1909)演变为法政学堂(今兰州大学前身)。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签订　光绪十四年(1888)，英国出兵西藏，攻占隆吐山、亚东等要隘。清廷一意妥协，速派驻藏帮办大臣升泰前去议和。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二十七日，升泰与英国驻印度总督兰斯顿(Henry Charles Keith Lansdowne)在加尔各答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共八款。主要内容为：清廷承认哲孟雄(今锡金)归英国保护；划定中国和哲孟雄的边界；游牧、通商等问题，留待日后再议。英国由此侵占了哲孟雄，并向西藏伸展触角。

湖北织布局筹建　光绪十四年(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筹设织布官局。次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光绪十六年(1890)闰二月四日，张之洞奏请将其在广州筹设的织布官局迁往武昌，设立湖北织布官局。光绪十九年(1893)建成开工。雇工约二千五百人。此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建成湖北缫丝局，

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湖北纺纱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建成湖北制麻局。是为“湖北纺织四局”。四局初为官商合办，后改官办。除纺纱局较有成效外，其余皆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光绪二十八年(1902)租给粤商应昌公司经营。

江南制造局工人罢工 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二十一日，江南制造局工人为反对新任总办刘麒祥把每日工时延长一小时，鸣放汽笛，宣布罢工。二千工人无一人上工，坚持到下午，刘麒祥被迫同意增加饭钱，工人方答应复工。

澧州哥老会起事 光绪十五年(1889)，澧州哥老会首领徐树堂、陈启元、廖星阶等在周家冈开堂放票，聚众结盟。当地团总声言要报官查办，廖星阶等遂于光绪十六年(1890)八月初四日起事，杀死团总。初六日，驾船赴新州，与前来围捕之差勇发生战斗。初十日，进攻澧州城，被兵勇击败，廖星阶等被捕，光绪十七年(1891)被杀害。

湖北枪炮厂筹建 湖北枪炮厂是清末湖北当局经营的新式军用企业。光绪十四年(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设立枪炮厂。次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光绪十六年(1890)便把他筹办的枪炮厂迁至汉阳大别山下，名“湖北枪炮厂”。并添购机器，兴建厂房。光绪二十年(1894)建成，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式开工。原与汉阳铁厂合而为一，旋即分开。分炮厂、枪厂、炮架厂、炮弹厂、枪弹厂，雇用工人约一千二百人。设备齐全，规模较大，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光绪二十四年(1898)添设炼钢厂和无烟火药厂，旋并入枪炮厂。创办经费七十万两。管理权初由德国人控制，后又落入日本人手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称“汉阳兵工厂”。

燮昌火柴公司创办 光绪十六年(1890)，某商人在上海设立燮昌火柴公司。开办资本五万两，生产木梗硫磺火柴。药品从欧洲进口，梗木、箱材及纸均从日本进口。日产火柴二十余箱，后增至五十大箱(每箱五十大包)，质量较差。主要销售于江西、安徽等内地省分。

扬州教案发生 光绪十七年(1891)，江苏扬州会党为反抗教会势力，发布揭帖，约期拆毁教堂。地方官出示禁止。但告示甫出，即被人撕碎，另贴红条云：“官府受贿，保护洋人”。四月间，五、六千人包围教堂，冲坏后门，打毁围墙。后地方官派兵强行将群众驱散。

芜湖教案发生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初三日，安徽芜湖市民发现两个天主堂女修士拐带两名幼童，遂将她们拘送保甲局，保甲局又将她们送至县署。法国教士闻讯，亲赴县署将其保释。初五日，又有一名妇女向教堂索还幼孩，教堂不肯交还。消息传出，一时间，人山人海。王光全、傅有顺率众五千人，将教堂围住，旋又放火烧毁。英国驻芜湖领事要求芜湖道派兵弹压。群众并不畏惧，更聚众近万人，围攻英领事公署，烧毁海关外籍人员住宅。斗争自午后开始，直至次日天明。知府沈秉成下令长江水师兵船向群众开炮，将其驱散。事后，英、法、美、德、日、意、比、西、俄等国公使联名向清政府“抗议”。两江总督刘坤一将王光全、傅有顺处死，撤换道员及芜湖知县，赔款银十二万六千两结案。

丹阳教案发生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二十五日，江苏丹阳县人民发现教会墓地埋葬儿童尸首七十余具，育婴堂内亦无一活婴，遂产生公愤，群起将教堂焚毁。官府速派兵弹压。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县，亦纷纷掀起反洋教斗争。两江总督刘坤一将六个知县一并惩处，又将二十一人逮捕判刑，赔款十二万元结案。

武穴教案发生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二十九日，天主教徒欧阳理然携带四名幼童送往九江法国天主教堂，路过湖北广济县武穴镇码头时，死去一名幼童。当地群众对教会积愤已久，见此更怒不可遏，当即聚众千余人，焚毁武穴教堂，击毙英国金教士(William Argend)及海关检查员柯林(Green)。停泊九江的美国军舰闻讯后，迅速开赴武穴示威，会同英国驻汉口领事要求“惩凶”。湖广总督张之洞遂将为首民众二人处死、八人充军或笞杖，赔款六万五千元。

《新学伪经考》刊行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所撰关于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著作，共十四卷。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刻成，初刊于广州。该书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提出：东汉以来历代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古文经《毛诗》、《书经》、《周礼》、《逸礼》、《易经》、《左氏春秋》等，均系东汉时刘歆伪造，故称“伪经”；刘歆伪造经书的目的，是为王莽篡权制造理论根据，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是新莽一朝之学，故称“新学”。《新学伪经考》引导士大夫怀疑古代典籍，向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根据提出挑战，打破了泥古守旧、恪守祖训的陋习；为变法制造舆论，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把古文经传一概斥为伪造，不免武断。该书问世后，多次翻刻、石印，流传颇广。光绪二十年(1894)、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朝政府曾先后三次下令将此书毁版。

宜昌教案发生 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二十八日，湖北宜昌法国天主教圣母堂收买一名被拐带

的游姓幼童。二十九日，亲属到堂索还，居民也群集堂外并向官府报告。知县派人到教堂检查，隔壁美国圣公会洋教士竟向群众开枪，击伤一人。数千人激于义愤，焚毁法国天主堂、圣母堂、美国圣公会三处及英教士和商人住宅六所，并毁坏英国领事署，打伤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传教士四人。事后，英、法、美、意、比、德、俄、日、西班牙九国驻华公使联衔向清政府交涉，英、法战舰上驶宜昌，驻泊汉口的英、德、俄、意四国战舰定期联合放炮"演习"，陆战队在租界"操演"，进行武力威胁。湖广总督张之洞电令宜昌地方官"悬赏缉凶"，将朱发金、赵宗雅等十余人充军或笞杖，赔款白银十七万五千余两结案。

金丹道起义　光绪十七年三月(1891)，天主教会在热河建昌(今辽宁凌源)派遣教民强行向各铺户"借粮"，在理教首领林玉山、徐荣到教堂说理，徐荣被教士枪杀，林玉山逃脱。教堂进而建立武装，戕害人民。被迫害的农民、矿工相率参加金丹道和在理教，反抗压迫。十月初十日，金丹道首领李国珍、杨悦春宣布起义。十三日，攻克朝阳。在理教首领郭万淳(一作万昌)率众数千人响应。十一月初一日，起义军占领乌丹城，李国珍号称元帅。赤峰、建昌一带贫民纷起响应。一月之间，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分设将帅，立三十六营，纵横数百里，横扫四州县，声威大振。所到之处，"焚堂灭教"，前后惩办了八百多名教士、教民。清政府急调直隶、热河、奉天三省军队"合剿"。起义军坚持两个多月，大小数十仗，最后失败。李国珍、杨悦春、郭万淳等死难，二万多起义群众遭到屠杀。

康有为开设"万木草堂"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开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康有为自任总教授、总监督，撰《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以康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要讲学内容。探讨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及其沿革得失，兼授西方哲学、历史及社会政治学说。鼓吹托古改制，按照改良派的需要塑造孔子、改造儒学。学生最初不满二十人，光绪十九年(1893)增至一百多人，其中梁启超、麦孟华、徐勤、陈千秋、欧榘甲等都成为日后变法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光绪二十年(1894)被清政府解散。

辅仁文社成立　辅仁文社又称"辅仁书报社"，是清末爱国进步团体。光绪十六年(1890)由杨衢云、谢缵泰、温宗尧等在香港发起，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十五日正式成立。有社员十六人，杨衢云为社长。以"开通民智"、"尽心爱国"为宗旨。光绪二十一年(1895)加入兴中会。

俄军侵入帕米尔　光绪十八年(1892)，俄军侵入帕米尔东部一带，毁掉清政府在帕米尔所设之卡伦，驱逐当地中国驻军，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沙俄又背着清政府与英国立约，瓜分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

《新闻报》创刊　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初一日，英国商人丹福士在上海创办《新闻报》，延蔡尔康为主笔。曾接受张之洞、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入股。报纸的文字和版面安排尽可能地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该报的言论一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维护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攻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也刊载一些试帖诗、八股文以及猎奇性的社会新闻。它是长期披着"华人之耳目"和"营业报纸"的外衣的洋商报纸。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人福开森接办该报。

刘燕飞起义　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二十六日，贵州普安刘燕飞约集回民起义领袖徐老四等在南里打峰岩竖旗起义，委派官职，定期攻城。参加者达数千人。清军分兵围攻，起义军击毙清将徐炳文。后因寡不敌众，刘燕飞被捕牺牲。徐老四进入广西、云南继续活动。旋亦被捕死难。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签订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又称《藏印议订附约》或《藏印续约》，为光绪十六年(1890)《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附加条款。光绪十九年(1893)十月二十八日，清参将何长荣和英政务司保尔(A. W. Paul)在大吉岭签订，共十二款。规定：开放西藏亚东为商埠，允许英商自由贸易，并准英国派员驻扎；亚东自开放之日起，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限制藏民在哲孟雄界内游牧。西藏门户被英国侵略者打开。

华盛纺织总厂设立　光绪十九年(1893)，李鸿章派盛宣怀在被焚毁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旧址设立华盛纺织总厂。开办经费二百零八万余两，其中商股八十万两。次年投产，有布机七百五十台，纱锭六万五千枚，雇工约四千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盛借口亏本，招商顶替，改名"集成"，继改名"又新"，把该厂变为己有。

《盛世危言》出版　《盛世危言》是中国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的代表作。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咸丰八年(1858)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此后二十年左右，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同时，又自己经营贸易，投资轮船公司。光绪六年(1880)后，先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及上海电报局总办。关心时政，热心西学。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初，思想日渐成熟，撰成《盛世危言》一书，光绪十九年(1893)正式出版。该书共五卷，正文五十七篇，附录、后记共三十篇。书中所论相当广泛，主张变法图强，发展资本主义；参照西方政治制度，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民共主"；批评洋务派只学西方坚船利炮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提出要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表达了要求"富强救国"的呼声。后来，郑观应根据"局势变迁"，几次改编重版，计有《盛世危言》五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八卷本。辛亥革命后，郑又另编《盛世危言后编》。此外，还有坊间自行翻刻本。版本繁多，卷数、编排多有歧异。

陈炽撰成《庸书》 陈炽，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光绪举人。历任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遍历沿海各地，曾到香港、澳门考察。是中国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之一。光绪十九年(1893)撰成《庸书》，分内外两篇，各有五十子目。内篇论及农田、水利、政治、军事、边防、海口、学校、书院、宗教等；外篇论及议院、报馆、工商、铁路、轮船、驿传、外交、巡捕、天文、格致、电学、西医等。主张改革封建专制政体，仿行西法，设立议院；改科举，兴学校；主张关税自主，建议设立商部，制定商律，保护民族工商业。该书对维新变法运动具有直接影响。

自强学堂设立 光绪十九年(1894)十二月二十二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设自强学堂于武昌，由原方言商务学堂改建而成。主要培养通晓洋务的买办、翻译和教学人员。分方言(外国语言文字)、格致、算学、商务四斋，每斋收学生二十人。方言斋学生住堂肄业，其余三斋只按月考核成绩。光绪二十三年(1897)将算学斋并入两湖书院，格致、商务两斋停办，专办方言斋，招收生童分习英、法、德、俄四国语言文字，五年毕业。自强学堂为晚清官办的新式学堂之一。光绪二十七年(1901)后改为文普通学堂。

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 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三日，朝鲜民间反政府秘密组织东学党(又称"东学道")在金罗道古阜郡拒纳附加税举行起义，以全琫准为总督，传檄四方，痛诋吏治腐败。二月，朝鲜南部全罗、忠清、庆尚三道人民群起响应，揭"逐灭洋倭"、"除暴救民"旗号，与政府军交战。四月二十八日，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国王请求清朝政府派兵，协助镇压。五月初八日，东学党受抚，退出全州。

中美华工条约签订 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十一日，美国国务卿葛礼山(W. Q. Gresham)与清朝驻美公使杨儒在华盛顿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共六款。规定：居美华工离美期限超过一年者，不得再入美境；不准华人入美国籍；居美华工都须按照美国国会通过的苛待华工条例进行登记。此约以十年为期。光绪三十年(1904)，美国拒绝废约，并要求续订新约，激起中国各界人士的反美爱国运动。

日军侵入朝鲜 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三十日，朝鲜政府正式致文袁世凯，请速电恳李鸿章派兵赴朝，协助镇压东学党起义。日本政府也极力诱劝清政府出兵，其驻朝代办杉村还向袁世凯保证，请中国出兵平乱，重在商民，"别无他意"。李鸿章听信日本的"保证"，于五月初一日派淮军将领、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兵二千余人赴朝，并按光绪十一年(1885)《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于五月初三日由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政府，通知中国出兵一事。其实，日本早在接到通知以前，就作好了出兵占领朝鲜的准备，并按预定计划于五月初二日成立了战时大本营，同日，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任和保护使馆商民为名，派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为先遣队，从日本出发，于五月初六日在仁川登陆，初七日侵占汉城。同时动员七、八千人的兵力继续出发，于初十日、十三日先后在仁川登陆，分据汉城附近要地。李鸿章面对占有优势的日军，既不敢抵抗，也不敢增援。东学党起义被镇压以后，他建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但日本蓄意扩大事态，不仅拒绝撤兵，反而提出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十八日，汪凤藻照复日本，拒绝接受其无理要求。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 光绪十八年(1892)，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光绪二十年(1894)初，怀着"求知当道"的愿望，起草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李鸿章书》，准备北上天津，求见李鸿章。在这篇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自强主张。上书完稿后，先请陈少白作了一些修改，又商请曾经做过澳门海防同知、当时已辞官在广州闲居的魏恒为他写了一封去见盛宙怀的信，信中要求盛宙怀出面转请其堂兄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孙中山。然后，孙中山携带上书及魏恒的信，在陆浩东的陪同下，经湖南到上海，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盛宙怀的介绍函，同时还得到其同乡前辈郑观应的帮助。郑直接修书与盛宣怀，要求盛介绍孙中山去见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还特别提出要盛氏代求李鸿章转请总署发给孙中山游历泰西各国的护照。这年五月，孙中山抵达天津，将上书托人递上，并期待着李鸿章的接见。时值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因李鸿章忙于军务，孙未被接见；李是否看过孙的上书，亦不得

知。上书虽然失败了，但孙中山却由此领到一张出国考察农业的护照。

日军占领朝鲜王宫　东学党起义平息以后，日本蓄意扩大事态，拒不从朝鲜撤兵，并提出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无理要求，遭中国方面拒绝。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二十三日，驻朝日使大鸟圭介向朝鲜国王李熙提出一份“改革内政”的书面要求，六月初二日，又提出“改革内政”二十六条，初八日更提出“补充说明”数十条，索取修筑铁路、架设电线等特权，限三日内答复。十七日，大鸟接到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机密电令，要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立即挑起中日军事冲突。十八日，大鸟要求朝鲜驱逐清军并宣布废除中朝签订的各条约。二十日，大鸟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其于当天夜里十二点以前答复日本的要求。二十一日，朝鲜政府未予答复，日军随即攻占朝鲜王宫。二十三日，大鸟迫使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一切章程，并“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战争一触即发。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1894—1895)，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因战争爆发于旧历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以掠夺朝鲜和中国为首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加紧扩充军备。光绪十八年(1892)，日本提前完成了自光绪十一年(1885)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并拥有排水量七万二千多吨的海军舰只，总吨位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的北洋海军。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决定利用这一事件侵略朝鲜、进攻中国。四月二十九日，日本内阁决定率先出兵朝鲜，两天后派出陆战队进驻汉城，五月初二日设立战时大本营。不久，以保护侨民等为借口，急剧增兵万余人，占据战略要地。五月初三日，清政府根据光绪十一年(1885)订立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通知日本，中国应邀出兵朝鲜。待东学党起义被镇压下去，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却遭到日本政府拒绝。六月二十一日，侵朝日军占领朝鲜王宫，发动政变，并攻掠清政府驻朝总理公署。二十三日，日舰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突袭中国由朝返航的运兵船，正式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七月初一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开战后，李鸿章坚持避战静守的方针，使清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八月十六日，平壤战败。十八日，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面袭击清提督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双方激战五个多小时，互有损失，日舰略占优势。李鸿章旋下令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军港。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并掌握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遂由海陆两线直通中国国门。九月下旬，日军兵分两路进攻中国东北：一路渡鸭绿江，攻占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另一路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十月攻陷大连、旅顺。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日军从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丁汝昌等将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正月十七日，丁汝昌在绝望中自杀。二十二日，日舰开进威海卫港，并在刘公岛登岸。威海卫基地完全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二月上旬，日军又连续攻占了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辽东军民虽然进行了英勇抗击，但已无法扭转战争败局。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此，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丰岛海战爆发　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东学党起义平定以后，日军拒绝从朝鲜撤兵。清政府请求各国出面干涉，强迫日本撤兵。但这种依赖“调停”的希望很快便告破灭。在主战派的压力下，李鸿章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陞阿等四军从辽东渡鸭绿江进军平壤，并高价租用英国怡和公司“高陞号”等商轮三艘，运兵渡海，增援驻牙山清军，由北洋海军“济远”、“广乙”、“操江”三舰护送。日本探悉军情，派舰队集结牙山口外，准备截击。六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国军舰从牙山返航，驶抵丰岛海面，突遭日舰“吉野号”、“浪速号”及“秋津洲号”袭击。中国军舰“广乙号”奋勇抵抗，受重伤后搁浅焚毁；“操江号”被劫；“济远号”官兵发尾炮重创紧追的日舰“吉野号”，然后返回基地；“高陞号”官兵宁死不当俘虏，拒绝投降，旋被鱼雷击沉，七百余人殉难。日舰从此取得朝鲜海面的制海权。

牙山战役爆发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三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偷袭中国军舰和运输船的同时，日本陆军四千余人向朝鲜牙山出动，准备偷袭当地中国驻军。六月二十七日晨，日军寻战，在安城渡遭清军伏击，伤亡颇众。天亮后，日军大举进攻，在成欢驿与清军发生激战。聂士成率千余人死力抵抗，终因不得后援，众寡悬殊，战败突围，退往公州，牙山失守。主将叶志超早已率部从公州向平壤奔逃。李鸿章依据叶志超谎报，奏称清军在牙山大败日军，战功甚大。清政府特发上谕嘉奖，并命叶志超总统驻平壤诸军。

平壤战役爆发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牙山战役后，七月初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日本政府

任命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率侵略军万余人于八月十一日，分四路进犯平壤：少将大岛义昌率步骑五千、炮二十门，由汉城西北进大同江东岸；中将野津贯道率步骑五千、炮二十门，由汉城渡大同江直扑正面；少将立见尚文率宁朔支队步骑二千、炮六门，自江东县渡大同江袭击城北；大佐佐藤练太郎率步骑三千、炮十二门，自元山登岸，断平壤退义州大道，围攻城北。清军亦于十一日划分防区：以左宝贵军二千人、丰升阿军四千人守正北高地牡丹台，掌北城命脉及义州通道；叶志超军三千人当正面与左军取犄角势；以卫汝贵军四千人防正南与西南隅大同江口一带；以马玉昆军驻正东及大同江东岸。共炮三十二门。叶志超居城中调度策应。十三日，日军前锋抵大同江东岸，攻马玉昆营。十三日至十五日发起佯攻，吸引清军专防东路。一路日军偷袭平壤西南门，卫汝贵部与之相持至午后二时，日军始后退。十五日，日军继续总攻平壤，左宝贵营激战尤烈。叶志超主突围北撤，左不从，自赴牡丹台山顶督战。马玉昆部、卫汝贵部败日军于大同江东岸及平壤西南。十六日，日军宁朔、元山支队集中炮火，猛轰牡丹台左军阵地。左宝贵不支，退入城内，登玄武门指挥，士兵拚死力战。左宝贵在恶战中中弹阵亡。叶志超率将士放弃平壤，仓皇撤逃，狂奔五百余里，于二十二日渡鸭绿江退入国境。清军伤亡两千余人，六百人被俘。日军伤亡六百八十余人。此后，战火烧至中国境内。

黄海海战爆发　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十三日，李鸿章派招商局轮船五艘运兵十二营增援平壤清军，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定远号"等北洋舰艇十六艘护航。十七日到达鸭绿江口大东沟，彻夜登陆。十八日上午返航途中，突遭由日本海军中将伊东祐亨率领的"松岛号"等十二艘日舰袭击。丁汝昌下令迎战。日舰利用航速快、炮位多的优势，以新式快速之"吉野号"为首，避开北洋舰队"定远"、"镇远"两主力舰，绕向侧后猛轰两翼小舰，而以首炮狂轰定、镇两舰背面，致使北洋舰队队形混乱，陷于被动局面。丁汝昌负伤后仍坚持指挥旗舰"定远号"炮击敌舰。"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军舰受重创后，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撞去，以期与之俱尽，不幸被鱼雷击沉，全舰官兵二百五十余人壮烈牺牲。"经远号"管带林永升率官兵力战，后亦被鱼雷击中，英勇殉难。"济远"、"广甲"两舰相继临阵脱逃。"超勇"、"扬威"两舰早已中弹沉没。日舰乃集中炮火猛轰"定远"、"镇远"两主力舰。定、镇两舰铁甲坚厚，炮弹难以穿透，日舰无能为力。其旗舰"松岛号"反被"镇远"所发巨炮两次命中，引起火药爆炸，死伤百余人。"吉野号"、"赤城号"、"扶桑号"、"西京丸"亦均受重伤，运转不灵，"赤城号"舰长坂本丧命。接仗约五小时，在暮色苍茫中日本舰队首先撤退，北洋舰队也返回旅顺。是役，北洋舰队沉没五艘，死伤官兵千余人；日舰重创数艘，死伤六百余人。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故意自认大败，下令北洋舰队修理完备后全部藏入威海卫军港，避战保船，拱手让出了制海权。

日军侵占九连城　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初一日中日宣战后，清政府命四川提督宋庆之毅军，聂士成之芦榆防军，刘盛休之铭军，吕本元、孙显寅之盛军等六十余营，统归宋庆指挥；另有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部镇边军十二营自立一军，共七十余营，约四万人，驻防以九连城为中心的东北疆域。九月二十二日，日军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率日军一万三千人集中义州。二十六日，日第一军前锋一千五百人由安平河口偷渡鸭绿江，依克唐阿部败逃。二十七日，日军第一军主力以大炮掩护，自义州渡鸭绿江，守岸铭军等一触即溃。日军遂向九连城东北虎山清军阵地猛攻。清军前路、总兵马金叙率部抗击，屡败敌军，因孤军无援而败；后路聂士成所部继起抗击，一、二小时后亦败走；宋庆率大军退凤凰城，走摩天岭；依克唐阿溃奔宽甸。九月二十八日，日军入据九连城，陷安东。丰升阿等逃奔岫岩。十月二十一日，日军陷岫岩，丰升阿等再逃析木城。凤凰城、长甸、宽甸、海城等旋亦先后失陷。同年十二月(西历 1895 年 1 月)，日军进逼辽阳，遭到中国军民英勇抵抗。

金州战役爆发　金州位于大连湾北面，为旅顺要塞的后路关隘。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二十六日，日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侵华日军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旋占貔子窝，直犯金州。旅顺守将正定镇总兵徐邦道率所部千余人奔赴金州御敌，会同金州副都统连顺军在大和尚山一带抢筑工事，扼守道路。十月初七日，日军攻东路山隘，被守军击退。日军又分兵由复州包抄清军背后。初八日，双方激战。徐邦道孤军抗敌，寡不敌众，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撤回旅顺。金州失陷。不久，大连亦告失守。

日军攻陷大连　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二十六日，在日第一军偷渡鸭绿江、进犯九连城的同时，日第二军三万人在陆军大将大山岩率领下，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准备从背后袭击大连、旅顺。十月初，日军到达貔子窝，旅顺震动，大连吃紧。徐邦道率部在金州御敌，因寡不敌众，退守旅顺。十月初十日，日军分三路进攻大连湾炮台，守将赵怀业已先一日逃走，兵勇溃散。日军轻而易举便占领了大连。然后又攻旅顺。

慈禧大办六十寿辰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日,即日军攻陷大连的同一天,慈禧在宫中大办六十寿辰,在皇极阁行礼庆祝。宫中连日演戏,光绪帝及诸臣陪坐听戏三日,诸事延搁不办。

旅顺战役爆发　旅顺是清北洋海军基地,有海岸炮台十二座、陆地炮台九座,装有大炮七、八十尊。驻有黄仕林、卫汝成、姜桂题、程允和、张光前、徐邦道等六军,约一万三千人,由龚照屿统率。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日,日军入据大连后,休整十余日。十月二十二日,开始猛攻旅顺外围。龚照屿已先一日逃往烟台。诸将推姜桂题为首,观望不行。惟徐邦道率残部迎击于旅顺北面的土城子,毙敌近百名,终以后援不继、寡不敌众而被迫退归旅顺。二十四日,日军集大炮一百多门,以主力猛攻旅顺,徐邦道再次迎战,因兵单势孤而败。二十五日,旅顺陷入敌手。日军在旅顺连续进行了四天大屠杀,杀死中国人上万。

兴中会成立　兴中会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绪十九年(1893),孙中山在广州行医之余,曾与陆皓东、郑士良等集会,提议创设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尚未建立组织机构。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受重视,遂前往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二十余人,于十月二十七日成立兴中会。其《章程》规定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在入会秘密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纲领。会员由几十人增至一百二、三十人,多数为华侨中、小资本家,也有部分工人、会党和知识分子参加。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在香港吸收杨衢云等创办的辅仁文社,成立兴中会总部,推黄咏商为首任会长。旋谋划广州起义,事泄流产,陆浩东等被捕牺牲,孙中山逃亡国外。光绪二十五年(1899)派陈少白去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次年初出版。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派郑士良在惠州(今广东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因外援不继,中途遣散。该会先后在横滨、长崎、旧金山、台北、河内及南洋、南非等地遍设分会,在华侨中发展组织。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入会誓词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华兴会、光复会等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

清廷发行"息借商款"　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为筹措甲午战争军费,接受户部建议,向官绅商民借款,并拟定《息借商款章程》,规定月息七厘,六个月为一期,两年半还本付息。颁发印票,面额一百两为一张。应募人集款万两以上者,予以"虚衔封典,以示鼓励"。此为清政府最早发行的内债。初在北京办理,由户部向京城银号、票号借银一百万两,后推广至各省会、关埠。由于各地推行办法不同,流弊百出,遂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停办。共认借款一千一百余万两。

小站练兵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清政府为试练新式陆军,派胡燏棻在离天津七十里的新农镇即小站地方训练"定武军",共十营四千七百五十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温处道袁世凯招致幕友,译撰兵书十二卷,贿缘荣禄等,骗取"知兵"虚名,于十月接替胡燏棻在小站继续督练新军。并拟定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的营制、饷章,续聘德国洋员十余人。又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网罗徐世昌担任参谋营务处总办,冯国璋为步兵学堂监督兼督练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任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王士珍任工程学堂监督兼工程营统带。将定武军扩充至七千三百人,定名"新建陆军",完全按照德国营制、操典进行训练。光绪二十四年(1898)底,新建陆军编入武卫军,称武卫右军。在镇压义和团运动时,兵力扩充至一万七千人。此后又扩编为六镇(相当于师),成为北洋军主力。

帝后党争爆发　帝后党争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光绪为中心的帝党与以慈禧为中心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争斗,因其交织着对民族危机和国家改革的不同态度,故又含有新旧之争的性质。帝党主要成员有翁同龢、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官僚士绅;后党主要成员有李鸿章、荣禄、刚毅等握有军政实权的重臣大吏。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党争围绕和战问题展开,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甲午战后,帝党倾向变法图强,逐步与维新派结盟以反对后党;后党则顽固守旧,阻挠新政。光绪二十四年(1898),党争趋于白热化。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后,后党强行罢黜帝党首领翁同龢,逐回原籍,同时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节制北洋三军。光绪帝则将堵塞言路的礼部六堂官怀塔布、许应骙等革职,将阻挠新政的李鸿章等赶出总理衙门;对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特别赏给官品,令其入值军机,参与新政。但手中无实权的光绪帝毕竟不是慈禧太后的对手。八月初六日,后党发动政变,幽禁光绪,捕杀维新党,惩办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僚。帝后党争以慈禧再度"训政"、总揽最高统治权而告终。

辽阳保卫战　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日军按原定计划,大举进犯中国,先后攻占了九连城、安东、凤凰城、长甸、宽甸、岫岩、海城等战略要地,进逼辽阳,并声言"取奉天度岁"。十二月二十日(1895),

日军始犯辽阳。辽阳一带的汉、满各族人民在谢永恩、徐珍、魁福、锡寿等人的领导下，组成团练，奋力迎击，部分八旗官兵也配合作战。一个月内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守卫在虎耳山、摩天岭的聂士成部也冒寒苦战，多次重创日军，并收复连山关，击毙日将富刚三造，打击了日军气焰。辽阳军民的奋勇抗战，粉碎了日军进占辽阳、并通过辽阳到盛京(今沈阳)过年的如意算盘。

威海卫激战 威海卫(今威海市)位于烟台、成山之间，遥对旅顺，同为拱卫渤海的门户，是北洋海军的基地之一。以刘公岛、日岛和黄岛为屏障，刘公岛上设有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黄海海战后，李鸿章下令北洋舰队全部躲入威海卫军港，避战保船，造成了坐守待毙的局面。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出动舰艇二十五艘，护送日兵二万余人，在威海东南十余里的荣城湾登陆。二十七日，清军营官孙万龄率部于桥头集附近多次击退从陆路进犯的日军，旋因无援，兵单而败。三十日，日军分两路从陆上包抄威海卫背面，并以日舰从正面炮击威海卫，封锁港口。李鸿章严令海军提督丁汝昌避战保船，严禁出海作战，致坐失战机。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初三日，日军攻南岸炮台，守兵自发抵抗，北洋舰队发炮支援，战斗两日夜，击毙日军左翼司令大寺少将。正月初五日，日军第六师团再攻南岸炮台，守台官兵英勇御敌，伤亡惨重，分统刘超佩败逃，南岸炮台失陷。日军遂在南岸炮台猛轰港内北洋海军。正月初七日，炮台全部失守。初八日，日军进占北岸炮台，威海卫陷落。丁汝昌据刘公岛组织反攻，击沉敌舰两艘，鱼雷艇五艘。因日军炮轰，北洋舰队"定远"、"来远"、"威远"、"靖远"诸舰相继沉没，十二艘鱼雷艇突围未果，全部被掳。正月十三日，北洋海军副提督英人马格禄和顾问美国人浩威勾结部分将领，煽动兵勇水手哗变，逼丁汝昌降敌，丁宁死不从，并下令沉舰毁台，部属拒不从命。正月十七日，日炮轰刘公岛，"镇远"、"济远"、"广丙"等舰弹药将尽。又得烟台信，知山东巡抚李秉衡退至莱州，等待陆上援军已不可能。丁汝昌令诸舰突围，兵将仍不从。十八日，丁汝昌及守岛记名总兵张文宣等自杀。马格禄、浩威及营务处道员牛昶炳等旋盗用丁汝昌名义，遣程璧光向日本舰队请降。二十日，牛昶炳与日本海军中将伊东祐亨签订刘公岛降约十一条。所余舰艇十一艘及其它军械皆入敌手。北洋海军覆灭。

严复发表《原强》等文 严复，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号瘉壄老人，福建侯官人。同治五年(1866)，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同治十年(1871)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五年。同治十三年(1874)，日、美侵扰台湾期间，严复曾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测量海口，筹备海防。光绪三年(1877)赴英国留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制度深表倾慕。光绪五年(1879)学成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执教达二十年之久。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严复痛国势日危，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至四月，在天津《直报》上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反对顽固守旧，提倡向西方学习，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富强中国。其具体方案为：禁止鸦片与缠足，崇尚尚武精神；废除八股时文，提倡西学；废除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这些文章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戊戌维新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牛庄激战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初四日，日军由海城分路进犯牛庄，清军徐邦道、李光久等率部迎战。扼守海城北面的依克唐阿部败退辽阳。二月初五日，日军占领牛庄东北面的险隘鞍山站，切断牛庄和辽阳的通道。初八日，日军佯攻辽阳，而移主力第三、第五师团自鞍山突袭牛庄。清将魏光焘、李光久率军赶到，不守要隘，而屯聚市内民舍。日军冲进牛庄，清军据民房苦战，伤亡近二千人。魏、李突围西走。日军在牛庄挨户搜索，大肆屠杀抢掠。十一日，日军占营口。十三日又占田庄台。辽东半岛遂全部沦入日本侵略者手中。

李鸿章赴日议和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旅顺失守后，慈禧害怕日军进犯京津，支持奕䜣委托美使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后于十二月二十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恒、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请前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议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初七日，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借口中国代表张、邵"全权不足"，拒绝谈判。正月十九日，清廷被迫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谈和约。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参赞马建忠、伍廷芳及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前往日本。二十三日抵马关。二十四日开始与日本谈判。

《马关条约》签订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在马关(今下关)春帆楼开始谈判。谈判过程中，日本肆意勒索，所提各项条款，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并时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被迫在条约上签了字。条约共十一款，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

内容为:一、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二、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三、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搭客装货,日本政府得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五、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设立工厂、输入机器,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在华制造的一切物品得免征各项杂税,所有日货均可设栈寄存;六、交换俘虏,中国即行释放日本军事间谍或被嫌逮之日本臣民。四月初八日,清政府批准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四月十四日,中日双方在烟台互换批准书,《马关条约》开始生效。

三国干涉还辽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认为这是对它独霸中国东北的直接威胁,遂于三月二十三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正式向法、德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如不答应,即对日本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三月二十九日,三国驻日公使奉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要其退还辽东半岛,并限期答复。三国海军也同时出现在日本海面,大有兵戎相见之势。英、美两国也不愿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胀,也劝告日本接受三国的要求。日本经过中日战争,已十分疲劳,无力对付三国,于是决定对三国让步。四月十一日,日皇宣告接受三国劝告,退还中国辽东半岛,但提出中国需以相当款项补偿。九月初二日,三国与日本商定中国补偿“赎辽费”三千万两;中国偿清上述款项之日起,三个月内,日军撤出辽东半岛。九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签订交收辽南条约。此后,三国以干涉还辽邀功索偿,强迫清政府给予租借军港、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特权。沙俄更乘机迅速扩大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势力。

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败,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四月初八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在松筠庵集会,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指出割让台湾将失去全国民心,力主拒绝和议,明定对策。上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认为前三项还只是权宜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上书还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还建议裁撤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改革官制。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过去举人坐公车,故称也是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这次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台湾民主国成立 《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到台湾,引起台湾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表示要誓死保卫台湾。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二十四日,清政府派李经方赴台湾办理交割事宜,并责令台湾官兵内渡,禁止大陆军民接济台湾抗战。台湾军民决心独立自救。在丘逢甲等台湾士绅的动员倡议下,台湾人民于五月初二日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义勇统领,刘永福为民主将军,陈季同为外务大臣,俞明震为内务大臣,李秉瑞为军务大臣,林维源为议院议长(未就,次日去厦门),又以蓝地黄虎旗为国旗,立国号为“永清”,以表明“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台湾民主国”的成立,是台湾人民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而采取的一种爱国行动。五月十一日,日军攻占基隆。十二日,“民主国”总统府兵变,唐景崧化装逃回大陆。十五日,日军侵占台北,“台湾民主国”败亡。

成都教案发生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五日,端午节,成都人民举行掷果会,英、美传教士将掷果孩童捕入教堂。民众派三人到教堂交涉,亦被扣押。群众当夜焚毁英、美教士住宅及教会医院。次日又继续焚烧英、法、美各国教堂,天主教主教杜杭(M. J. Durand)受伤。此后,四川乐山、屏山、宜宾、雅安、灌县、泸州、阆中、大邑、冕宁、新津等地亦相继毁教堂响应。四川全省共计焚毁耶稣教堂三十处、天主教堂四十处。事件发生后,英、法、美各国对清政府大肆恫吓,派军舰八、九艘在长江各处示威,各国公使又联衔提出“抗议”。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将四川总督刘秉璋、四川候补道周振琼、署成都知府唐承烈以及华阳、乐山、灌县、大邑、冕宁、新津等县知县革职,将朱瑞亭等六人杀害,十七人充军,并赔偿成都各教堂银七十万两、川南法国各教堂银二十一万余两、全川英美各教堂银十万余两。

康有为第三次上书光绪帝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初六日,又第三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变法的步骤和《公车上书》内容的补充说明。上书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是: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前三策已见于《公车上书》。关于练兵,本次上书提出的办法

是：一、汰冗兵而合营勇；二、起民兵而立团练；三、练旗兵而振满蒙；四、募新制以精器械；五、广学堂而练将才；六、厚海军以威海外。这次上书递到了光绪手里，光绪阅后，非常重视，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一份呈送慈禧，一份留在乾清宫，一份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处。

中日订立台湾交接文据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二十四日，光绪帝命李经方为特派全权委员，与日本商办交割台湾事宜。二十六日，又令台湾大小文武官员陆续内渡。五月初十日，李经方带同美国顾问科士达在日舰护送下抵达基隆港外，在日轮上会见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出具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并澎湖列岛等"清单"，签订了交接台湾文据。台湾遂沦入日本侵略者手中。

新竹保卫战　中日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不甘当亡国奴的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以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人为首领，痛击日军。刘永福也令分统杨紫云率新楚军会同台湾义军共同抗日。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下旬，日军主力近卫师团分两路进犯通往台中的门户新竹。义军和清军分路于大科嵌、大湖口、龙潭陂等地据险狙击，激战六日，日军溃退。五月底，日军再次来犯，守军因粮械不济，被迫退出城外。闰五月初一日，日军占领新竹。闰五月十八日，义军分三路反攻，与日军反复争夺新竹城东十八尖山和枕头山，姜绍祖死难，诸军亦因无援而退。六月下旬，杨紫云中炮阵亡。新竹争夺战，大小二十余仗，牵制日军达两个月之久。

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光绪帝　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初八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光绪皇帝，更加详尽地陈述了"变法曲折之故"。上书再次吁请光绪"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又进一步提出了下情上达、广求人才的具体办法：一、下诏求言；二、开门集议；三、辟馆顾问；四、设报达聪；五、开府辟士。第四次上书正式提出了开设议院的主张，从正面论证了设立议院的必要性。但上书被顽固派拒绝代呈，未能上达。

中俄订立《四厘借款合同》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偿付对日赔款而举借外债。俄国为攫取侵略权益，乘机以干涉还辽邀功，抢先揽借，但因财力不足，遂与法国联合作债主。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十四日，清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国各银行商董在圣彼得堡(今列宁格勒)签订了《四厘借款合同》，共十九条，另附《四厘借款声明文件》一件。规定：借款总额为四亿法郎，合一亿金卢布(约合白银一亿两)，由四家俄国银行与六家法国银行分摊；年息四厘，折扣九四又八分之一(94.125%)；分三十六年还清，以关税作担保。到期若不能偿还应付本息，应向俄国提供别项收入加保。因该款为俄、法合借，故亦称"俄法洋款"。俄法集团通过这笔借款，得以插手中国的海关管理。

古田教案发生　光绪十八年(1892)，刘祥兴、柳阿七在福建古田创立斋会，三年中发展会众三千余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后，刘祥兴等以抗税为号召，发出"官逼民反"的匿名布告，准备于是年八、九月间起义。英、美驻福州领事根据古田传教士的情报，向闽浙总督边宝泉告警。边宝泉立即派兵前往镇压。刘祥兴被迫提前行动，动员斋会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告密的外国传教士。六月十一日，掀起反洋教起义。三百多名斋会群众在"龙爷将要征服外国人的上帝"的旗帜引导下，向古田英、美教士聚居区花山进发，围攻教会休养院，焚毁教堂及教士住宅，击毙教士十一人，伤五人。事件发生后，各国公使联衔提出抗议，英国军舰开赴福建示威，英、美领事先后抵古田"查办"。清政府电命边宝泉"照办"。结果，以逮捕民众二百余人，杀害刘祥兴等二十六人，判无期徒刑和永远充军六十六人，将副将唐有德、知县王汝霖等革职结案。

《中外纪闻》创刊　《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是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北京出版的第一份报纸。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二十七日创刊于北京。双日刊。由梁启超、麦孟华等编辑。北京强学会成立后，"先以报事为主"，根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建议，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以与广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相区别，十一月初一日正式出版，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中外纪闻》以编译西电西报、介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情况和刊载上谕、奏章为主要内容，意在广开知识，改变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的闭塞状况。每次一册，随《邸报》附送在京官员，每次约二、三千份。十二月初六日(1896)与北京强学会同时被清廷查封。前后发行月余，共出版十八期。

彰化保卫战　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初一日，日军攻占新竹，旋又向南推进，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四日，相继陷苗栗、大甲溪。黑旗军吴彭年部及义军吴汤兴、徐骧等部退守台中重邑彰化。黑旗军将领王德标率七星队驻彰化境内大肚溪，狙击渡溪日军。七月五日，徐骧率义军三百人诱敌深入，义军李邦华、镇海军营官李仕高正面接应，新楚军营官陈尚志、义军吴汤兴与沈仲安由后路左右包抄，大破日军。七日又败日军。八日，日军由汉奸土匪引导，猛扑

彰化东门外八卦山，守将李士炳、沈福山、汤人贵等率部奋勇抗击，激战八小时，死伤极重。九日，敌精锐部队日皇近卫师团千余人以快枪快炮环攻，守军冲入敌阵，展开肉搏战。八卦山失守后，清军、义军又在彰化城内与敌巷战。吴汤兴、吴彭年、李仕高、李士炳、沈福山、汤人贵等均战死。徐骧率余部突出重围，退往台南。彰化陷落。八月，台湾军民奋起反攻，但未能夺回彰化。

台湾军民收复云林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十三日，侵台日军入侵云林，次日又犯大莆林。杨泗洪、朱乃昌等率军伏击，在黄荣邦、林义成、简成功、简精华等部配合下，大败日军，毙敌数百人，收复大莆林。杨泗洪、朱乃昌均战死。肖三发代杨泗洪指挥黑旗军前敌各军，简成功总统义军。日军陆路战败，急派兵舰十余艘攻击台南各海口，汉奸土匪蠢动响应。刘永福推行联庄法，检举汉奸土匪，地方渐靖。七月十六日，刘永福部王德标率七星队，联合黄荣邦义军二千五百人、林义成义军三千人、简精华义军数千人，攻克云林县城。日军弃城而逃，王德标会同义军追杀。日军一部窜入山中，被林义成军围歼。十八日，肖三发督各军继续追击，日军战败退入彰化城。王德标部及各路义军包围彰化，日军凭炮火防御，不敢出战。八月，日军反攻，台湾抗日军民伤亡惨重，云林、大莆林再次失陷。

北京强学会成立 北京强学会是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以北京为中心的维新派重要政治团体，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或强学局。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初，成立于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由康有为等筹划、发起，帝党成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推户部主事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会员数十人，除维新人士如杨锐等之外，徐世昌、袁世凯、张之洞、聂士成以及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都曾入会。李鸿章表示要捐二千两银子入会，由于甲午战败后李的名声不好，没有被接受。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讲“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作有《强学会叙》，痛陈列强侵略下的危机形势，及成立学会挽救时局的宗旨。强学会成立后，“先以报事为主”，发行《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光绪二十一年(1896)十二月六日，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北京强学会随即被清廷查封。

中西学堂创办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十二日，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设中西学堂于天津。中西学堂亦称天津西学学堂，分头等和二等学堂，学习各四年。伍廷芳为头等学堂总办，蔡绍基为二等学堂总办，美国副领事丁家立(C. D. Tenney)为总教习。二等学堂为预科。头等学堂的课程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普通学科有英文、数学、制图、物理、化学、天文、地学、万国公法、理财学等；专门学科有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等。学生毕业后，或派往国外分途历练，或委任洋务职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毁于八国联军之役。后经重建。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北洋大学。

嘉义保卫战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日军攻占彰化后，刘永福命王德标率七星队保卫台南重地嘉义。八月下旬，日军以海路攻台南，牵制刘永福部，以陆路攻嘉义。王德标等先在城外营中埋下地雷，然后弃营进城。日军入据营房，被地雷炸死七百余人，其余仓皇撤退，王德标出击，沿途伏兵杀敌无数，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受重伤，不久毙命。八月二十四日，日军卷土重来，用大炮轰塌嘉义城墙，涌入城内。七星队、义军浴血巷战，伤亡极重，总兵柏正才及林义成、林昆冈等均战死。王德标、简精华被迫退入山中。嘉义陷落。九月四日，日军又攻占台南。台湾人民为保卫祖国领土，抗击日本侵略者前后达五个多月，打死打伤日军共计三万二千多人。

兴中会广州起义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香港兴中会总部成立后，孙中山与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等密谋在广州起义。他们分头联络会党、防营、绿林与水师官兵等，约期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分道攻城、发动起义。重阳节前夕，各路队伍准备就绪，起草讨满檄文，以“除暴安良”为口号，制作青天白日旗为义旗。后因香港军械约期未到，又遇叛徒告密，起义遂告流产。九月十日、十一日，陆浩东、朱贵全、丘四等先后被捕，二十一日遇害。二十六日，孙中山、陈少白等经香港逃亡到日本。

中日签订交收辽南条约 根据中日《马关条约》，日本割占辽东半岛。经俄、法、德三国出面干涉，日本同意交还，但要索取相当数量的“赎辽费”。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十日，清廷派李鸿章、王文韶为全权大臣，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妥议商约。九月二十二日，李鸿章、林董在北京签订了《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中日条约》，通称中日《辽南条约》，共六款，另附《议定专条》一件。主要内容：清政府以白银三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款项付清后三个月内日军撤出辽东半岛。

李提摩太提出《新政策》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英国传教士，同治九年(1870)来华，先后在山东、东北、山西等地传教，并与清朝官僚结交。光绪十六年(1890)，应李鸿章之聘，赴天津主办《时

报》。次年，任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总干事，出版大量书刊，宣传基督教，传播西学，也附和中国的维新运动。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加入强学会，想以此对维新派施加影响。九月二十七日，又通过翁同龢，向光绪皇帝提出了名为《新政策》的长篇意见书，建议清政府聘用二名外国顾问，成立由八人组成的内阁，其中半数阁员由赫德、艾迪斯、科士达、德鲁等英美人士担任，实际上是要将中国政治置于外国的控制之下。还建议设立"新政部"，作为推行"新政"的领导机关。维新派真诚地把李提摩太等外国传教士引为同调，来往密切，希望与他们合作，共同推进变法维新运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李提摩太赴北京，拟任光绪帝顾问，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未成。

上海强学会成立　上海强学会是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以上海为中心的维新派政治团体。康有为在北京筹设强学会之后，又以上海"为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是"合群"和讲求自强的重要地区，组织上海强学会可以扩大维新声势，推进变法运动，于是离京南下，前往南京，同两江总督张之洞联络。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上海强学会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正式成立。上海强学会的序（宣言）由康有为起草，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其章程由张的幕僚梁鼎芬会同康有为共同拟定，经费主要由张之洞资助。章程标明"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通声气、联人心、聚图书、讲学术、卫国保教为宗旨，并规定了四项任务：一、译印图书，学习西学，去塞求通；二、出版报刊，了解外国情况；三、设立图书馆，搜集中外学术著作，"以广考镜，而备研究"；四、开办博物馆院，置办仪器，"以为益智集思之助"。十一月（1896）发刊《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会员数十人，活动于江浙一带的维新名士黄体芳、黄遵宪、张謇、陈三立、章炳麟、汪康年等均为该会会员。就在《强学报》创刊后不久，北京强学会被清廷查封。张之洞见风转舵，借口不同意宣传"孔子改制"和用孔子纪年，亦下令查封了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

华俄道胜银行成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二十二日，沙俄对旧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华俄道胜银行成立。该银行由俄国圣彼得堡万国商务银行联合法国的霍丁盖尔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巴黎国家贴现银行等共同组成。资本六百万卢布，八分之三由沙俄募集，八分之五由法国募集。董事八人，沙俄五人，法国三人。资金虽然以法国银行所出为多，支配权却由沙俄掌握。光绪二十二年（1896），沙俄政府派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到北京活动，诱使清政府从俄法借款中拨银五百万两（约合七百五十六万二千卢布）入股，遂以中俄合办名义掩护其侵略活动。总行设在圣彼得堡（今列宁格勒）。上海、汉口、天津、北京、牛庄、大连、长春、哈尔滨、满洲里、张家口、乌鲁木齐、伊犁等地设有分行；福州、厦门、广州、镇江、汕头等地设有代理处。曾在中国境内发行金卢布、银两、银元多种纸币。代表俄国参加帝国主义对华贷款的银行团，并攫取中东铁路建筑权。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后，营业受到打击，基础动摇。宣统二年（1910），与俄国另一家法国投资的北方银行合并，改称 Русско-Азиатскии Ъанк（意译"俄亚银行"），中文名称未变。

《强学报》创刊　《强学报》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上海强学会的机关刊物。根据康有为的安排，门人徐勤、何树龄于光绪二十一年（1896）十一月下旬由广东来到上海，主持办报事宜。十一月二十八日，《强学报》正式出版，徐、何二人为主笔，上海强学书局铅字排印，似为五日刊。康有为作序，倡言"学则强，群则强"，号召士大夫同求中国自强之学。该刊论说一栏以发明强学之意为主，次录上谕，刊布廷寄，鼓吹设会办报，力言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病，阐述变法当知本原，主张开设议院以通下情。采用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北京强学会被查封后不久，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亦于十二月初八日前后被张之洞封禁。《强学报》从创刊到停刊，前后发行仅十天左右，共出三期。

官书局成立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一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将原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书局正式改为官书局，隶属总理衙门，命孙家鼐为管理大臣。开办章程规定：所办事宜为藏书籍、刊书籍、备仪器、广教肄、筹经费、分职掌、刊印信七项；不得议论时政、臧否人物和挟嫌妄议。全局分学务、选书、局务、报务四门。曾译刻各国有关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武备、工程等各种书籍。刊行《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延请通晓中西学之人为教习，讲授各种西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官书局归并京师大学堂管辖。

《英德洋款合同》签订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开始筹借第二期对日赔款。英国声称：这次如不向它借款，它将不惜诉诸武力。经过争夺，英德集团压倒俄法集团，取得了列强对中国的第二次借款权。二月十日，由赫德代表总理衙门，与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了《英德洋款合同》（又称《英德借款详细章程》）。共十八款。规定：借款总额为一千六百万英镑（合银一亿两）；以九四

折扣(94%)交付，年息五厘；限三十六年还清，不得提前或一次还清；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偿还期限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必须由英国人充任，从而使英国获得了控制中国海关行政三十六年的保证。

文廷式被革职　文廷式，字道希，号芸阁，江西萍乡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升侍读学士。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主战甚力，严参李鸿章畏葸，挟夷自重。甲午战败后，坚决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支持康有为发起强学会，常于松筠庵广集维新人士，议论时政，深为慈禧忌恨。李鸿章授意御史杨崇伊劾其交通内监等。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十六日，清廷以文廷式遇事生非，语多狂妄，命革职，永不叙用，并逐回江西原籍。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后，曾东走日本。光绪三十年(1904)卒于故乡。

南洋公学创设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二十六日，盛宣怀在上海徐家汇镇北创办南洋公学。何嗣焜任总理，张焕纶为总教司。全校分设四院：师范院，为我国第一所新型师范学校；外院，为师范院附属小学，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中院，为中学性质的学堂；上院，为大学性质的学堂。师范院训练一年以上者，选充各院教习。外院、中院、上院各设四班，每班学生各三十名。开办经费由招商局、电报局绅商捐助。最初开办目的在培养通达中国经史大义的政治人才，实则毕业生多数学习工艺、机器、制造、矿冶、商务、铁路、船政等，优秀者选送外国，留学深造。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名上海商务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称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改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中俄密约》签订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政府对俄国产生了很大幻想，希望联络俄国牵制其他列强。沙俄看出了这一点，便寻找机会向清政府索取好处。光绪二十二年(1896)，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应俄国政府的要求，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赴俄国庆贺沙皇加冕。俄国政府以中俄共同防止日本侵略为词，并以三百万卢布给李鸿章作报酬，诱迫李鸿章于四月二十二日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法文本称为《防御同盟条约》)，即《中俄密约》。密约共六款，另附规定约文以法文为准的专条。主要内容为：一、日本如果侵占俄国远东领土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军、陆军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二、缔约国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不得与敌方议立和约；三、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地方官应尽力供应所需；四、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该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其详细合同由中国驻俄公使与华俄道胜银行商订；五、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有权通过该铁路运送军队和军需物品；六、本条约自铁路合同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十五年，届期六个月以前，再行商办展限。通过这一密约，沙俄政府把侵略势力伸入了中国东北地区。

山东单县发生教案　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鲁南、苏北一带大刀会数千人起义，攻教堂，逐洋人。五月五日，山东单县庞三杰联合大刀会拆毁教民房屋，焚烧薛孔楼洋学，毁坏教堂多处。五月二十三日，清廷命地方督抚速即剿除。两江总督刘坤一派兵前往单县，捕杀数十人。此后，大刀会众继续在鲁南一带活动。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签订　根据中日《马关条约》第六款：中日将派全权大臣依西例议定通商条约。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二十九日，清廷命李鸿章、王文韶与日本代表商订商约。后因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加冕礼，清廷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改命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妥议通商事宜。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十一日，张荫桓与日本驻华公使、全权大臣林董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共二十九款。另有中日双方照会各三件。主要内容是确认日本在华享有与西方列强相同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九月十三日，总理衙门又根据林董要求，订立中日通商条约公立文凭四项：在新添的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口岸专设租界，中国可酌课机器制造税，但须在天津、上海、汉口、厦门设专管租界，山东军队不得逼近威海卫四十里以内。

《时务报》创刊　强学会被清政府查封后，时任江宁洋务局总办的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欲以报馆为倡始”，后与汪康年相遇，共同策划办报，并邀请梁启超参加。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初一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该刊物为旬刊，每册约二十余页，以石板印连史纸上。总理为汪康年，梁启超任主笔，其他撰稿人有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炳麟等，另聘张坤德为英文翻译、郭家骥为法文翻译、日人古城贞吉为日文翻译。所辟栏目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中外杂志、域外报译等，以域外报译所占比重最大，另载有各地学规、章程等。《时务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为宗旨，梁启超的《变法通议》首先就是在《时务报》上刊出的。《时务报》的刊行，在社会上大受欢迎，数月之间，销至万余份，“为中国有

报以来所未有”。张之洞以该刊论说太新，通过其幕僚和亲信汪康年，频加干涉。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梁启超终于愤而去职，《时务报》的议论亦随之“改弦易辙”。“百日维新”开始后，五月二十九日，御史宋伯鲁上《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请明降谕旨，将《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六月初八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后由汪康年改办《昌言报》。《时务报》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创刊，到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停刊，历时二年整，共出六十九册。

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签订　沙俄为扩张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势力，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即酝酿把连接莫斯科和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东段穿过中国东北。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沙俄政府着手制定有关计划。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沙俄诱迫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后，遂派财政部次官拉曼诺甫与清政府驻俄、德等国公使许景澄谈判具体的筑路细节。八月初二日，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在柏林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另附《华俄银行总办罗启泰函》一件。规定：成立所谓“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其章程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铁轨宽窄应与俄国铁轨一律；俄国有权用铁路免费运兵；公司建造、经营、防护铁路所需之地，若官地则无偿征用，若民地则按时价付给；公司在铁路沿线享有独占的行政权和警察权。东省铁路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始修筑，光绪二十九年(1903)完工。

孙中山伦敦蒙难　光绪二十一年(1895)，孙中山因广州起义失败被迫逃亡国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抵英国伦敦。九月五日，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诱捕。十一日，孙通过使馆英籍清洁工人柯尔暗中致书英人康德黎(孙在香港西医书院时的老师)，向康求援。经康德黎等奔走营救，以及英国政府出面干涉，孙中山于十八日恢复自由。是年冬，孙用英文撰成《伦敦蒙难记》，详细记述了蒙难经过。

清廷设立铁路总公司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九日，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设立芦汉铁路公司，并举荐津海关道盛宣怀督办。清廷遂命盛即日来京，以备咨询。九月十三日，光绪帝召见盛宣怀，盛详细陈述了借款筑路的具体打算。九月十四日，铁路总公司正式设立，命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该公司事务，命王文韶、张之洞协助办理。

通艺学堂创设　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元济在严复帮助下，在北京创办西学堂，同年冬改称通艺学堂，倡习西学。课程有英文、数学。学生四、五十名。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被迫停学。张元济亦被革职。

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十六年(1890)起从师于康有为，深受康氏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康有为共同发起“公车上书”，八月，参加强学会，任书记员。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上海《时务报》上陆续发表了《变法通议》这一重要政论著作。该书除自序外，正文由《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论科举》等十三篇组成。运用资产阶级进化观，反复阐述变法的必要和不变法的危险，认为“变者乃天下之公理”。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要求清政府仿效日本，进行变法维新，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文笔生动流畅。在当时知识界广为流传，产生了深刻影响。

谭嗣同撰成《仁学》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激进的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光绪二十二年底(1897)，他撰成重要哲学著作《仁学》。该书共两卷，五万多字。书中杂糅儒、佛、道、墨各家及西方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宗教思想等，构成独特的哲学体系。认为“仁”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故自称其哲学为“仁学”。谭嗣同借用物理学上的“以太”概念解释“仁”，认为世界的日新变化由“以太”所决定。并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现象，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顽固思想。他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封建纲常名教，号召人们勇敢地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种种网罗，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权、自由、平等学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仁学》的一部分连载于《清议报》上，旋又连载于上海《亚东时报》。后来，正式刊印成书，单独发行，在晚清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英续议缅甸条约》签订　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初三日，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订立《中英滇缅境界及通商修正条约》，即《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亦称《西江通商专约》及《滇缅重定界约专条》。规定：开放云南腾越、思茅、广西梧州三口通商；中国如在云南修筑铁路，允与缅甸铁路相接；中国割让野人山一部，猛卯三角地永租与英国管辖，未经与英国议定，中国不得将江洪地区及孟连让与他国。五月初六日，中英双方互换该条约文本。

商务印书馆创立　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初十日，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创设于上海。最初仅经营印刷一项。光绪二十六

年(1900),接盘日人所经营的修文印刷局。次年,张元济、印锡璋加入该馆为股东,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光绪二十九年(1903),置编译所,张元济、王云五曾任所长。初以印刷商业簿册报表为主,后主要业务转为出版新式教科书、英文读本及英汉词典等工具书、西方学术著作,兼及古籍与科学、文艺作品。印行《东方杂志》等期刊。

《知新报》创刊　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二十一日,《知新报》创刊于澳门,康广仁、何廷光为总理,徐勤、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刘桢麟等人为撰述。始为五日刊,自第二十册起改为旬刊,至第一百一十二册,又改为半月刊。设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各国情况等栏目,载有农事、工事、商事、矿事、中外交涉新闻、各省新闻等。与上海《时务报》遥相呼应,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戊戌政变发生,《知新报》从九月初一日第六十八册以后,重要论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笔名、化名,并多录译著;但仍刊登有关新政的文字,曾著论指斥清廷,为维新变法辩护。光绪二十六年(1901)十二月初一日出至第一百三十三册后停刊。

尚贤堂成立　尚贤堂,原名为"中国国际学会",是帝国主义在旧中国设立的文化侵略机构。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李佳白等发起成立于北京。邀请在京清朝官吏及士大夫为会员,李佳白自任会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迁往上海。以"美化庸众,转移人心,使中外教民趋于和洽"为宗旨,宣扬殖民主义。竭力鼓吹基督教与孔教"互相和合","互相辅助",以防兴起"社会之骚动"。

《湘学报》创刊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二十一日,《湘学报》在长沙创刊。原名《湘学新报》,为旬刊。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先后任督办,蔡钟浚为总理,唐才常、易鼐、陈为镒等主编。设有史学、时务、舆地、算学、商学、交涉等栏目,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科学文化知识,宣传变法维新。湖南巡抚陈宝箴曾通饬各州县订购,在知识界影响颇大。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二十一日停刊,共出四十五册。曾按原状汇编为《湘学报大全集》。第一至四十册曾分类汇编为《湘学报类编》。

浏阳算学馆成立　浏阳算学馆是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维新派的第一个学术团体。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败后,谭嗣同致书其师欧阳中鹄,痛陈时局危迫,阐述变法的必要,建议在浏阳设立算学格致馆,肄习科学知识,先作试点,逐步推广。又上书湖南学政江标,称西国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无一不自测算而得",要求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永远肄算"。禀上,获准。但遭到封建顽固派阻挠。谭嗣同遂自行筹款,先成立算学社,招学生十六人,聘晏孝儒为掌教。师生精研算学,功效渐著,风气顿开。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正式办起算学馆,探究算学格致制造之理,以求中国科学之昌明。同年,上海亦成立算学会。次年,戊戌政变后均解散。

《集成报》创刊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初五日,陈念谦在上海创办《集成报》。该报为旬刊,连史纸石印,每册约三十叶,分谕旨、章奏、论说、时事、新闻、各国杂电等项,分类辑录,以便检阅。除谕旨、奏折外,均录自各种报刊,实为文摘性刊物。所采录的报刊,计有《万国公报》、《时务报》、《博闻报》、《新闻报》、《直报》、《循环报》、《福报》、《叻报》、《汉报》、《广报》、《中外新报》、《申报》、《官书局报》、《知新报》、《富强报》、《农学报》、《湘学新报》、《汇报》等数十种。

中比议定《芦汉铁路借款合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六日,清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比利时银行团代表在武昌签订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此为草合同。六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签订了正式合同——《芦汉铁路借款续增合同》。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八日,又在上海改订正合同——《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四百五十万英镑,年息五厘,按九折交付;偿还期为三十年;以本铁路及其所属一切产业为担保;由比国银行团派员监督铁路修筑、经管铁路营业;筑路所需材料,除汉阳铁厂提供一部分外,皆由比国银行团承办。比利时银行团受俄、法集团支持。俄、法正是通过比利时银行团出面,取得了芦汉铁路的投资、修筑和经营权。俄国的势力从此可由东北直趋南下,伸入河北、河南、湖北广大地区。

上海农学会成立　上海农学会又名务农会,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倡导农学的团体。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由罗振玉、蒋黼、徐树兰、朱祖荣等发起成立于上海。其宗旨是: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讲求农学,植国家富强之原。该会翻译欧美、日本各种农书、农报,设立农务学堂,又发刊《农学报》,译载各国农务诸报及本会开办后一切情形。并筹款购置新式农机,拟在江浙购田试办,以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浚利源。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附设东文学社,培养翻译人才。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经济支绌,学社解散。

《农学报》创刊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罗振玉、蒋黼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农学会,旋创办《农

学报》(亦称《农会报》),“专译各国农务诸报,及本会开办后一切情形”。初为半月刊,次年改为旬刊,线装石印。分奏折录要、各省农事、西报选译、东报选译、农会博议等栏,还译载有农学入门、蚕桑答问、农学初阶、农具图说等,是我国最早的农学刊物。光绪三十一年(1906)十二月停刊,共出三百十五册。

圣学会成立 圣学会是戊戌变法时期广西的维新团体,因借广仁善堂供孔子,故又称“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由康有为、唐景崧、岑春煊、蔡希邠等发起成立于桂林。以尊孔教、传圣道、育人才、开民智为宗旨。会章规定:一、逢庚子日集会读经;二、广购图书仪器;三、出版报纸;四、设立义塾;五、开农工商三业学堂。参加者有开明士绅、青年士子共二百多人。发行《广仁报》,提倡新学,宣传变法维新。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后停止活动。

测量学会成立 测量学会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研究测量的学术团体。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由谭嗣同、杨文会、刘聚卿、茅子贞等发起成立于江宁(今南京)。订立章程十条:一、练习仪器;二、专精一门;三、测立距;四、测平距,测求经纬度;五、分测;六、会测;七、绘图;八、定尺;九、日记;十、著说。会中购备各种仪器,每人先习一器,各专一门,联络同志试行,俟有成就,徐图扩充。定期聚会,会员各述所知,互相传习,练习测量天地风雨的变幻、山河路岸的距离。还拟赴吴淞口溯江测至金陵,绘制长江下段粗图,以增益读者,利于国防。

苏学会成立 苏学会是戊戌变法时期江苏的维新团体。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由章钰、张一麐、孔昭晋等发起成立于苏州。立会旨意有三条:一、以因时制宜为主,互相讲习,振起人才,为将来建立学堂张本;二“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三、专以学问相砥砺,勿议朝政。规定入会者无论学术深浅,名位尊卑,皆以平等相待。该会还购备史学、掌故学、舆地学、算学、农商学、格致学等方面的书籍,供会员研习。

质学会成立 质学会是戊戌变法时期湖北的维新团体。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在武昌成立。“意在劝学,务崇质实”,故名质学会。其《章程》谓世变日亟,乏人才则无以济变,非学无以成才,非讲无以成学。故主张分科学习,以开风气之先。拟分经学、史学、法律、方言、算学、图学、天文学、地学、农学、矿学、工学、商学、兵学、格致学等十四科,前六科为兼习之学,后八科为专门之学,“习专门必兼六科,乃为有体有用”。并拟编印学报、译著书籍,以裨实用。

《经世报》创刊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初五日,《经世报》在上海创刊,旬刊。创刊人为山阴胡道南(钟生)、新昌童学奇(亦韩),章太炎、陈虬、宋恕等任撰述。设有皇言、庶政、学政、农政、工政、商政、兵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本馆论说等栏目,除论说外,多转载英、法、日文报章,以记述国内外大事与介绍新学术、新知识为主。连史纸线装,每册三、四十叶。上海设有分馆,北京、天津、山东、福建、安徽、江苏等地设有分销处。同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十六册。

《萃报》创刊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二十五日,《萃报》在上海创刊,周刊。朱克柔(强甫)任主笔。设有谕折、章程、中国要务、外国要务、路透电音、中外新闻等栏,附有“通论”。该报“尽集群报,拮其精英、汰其糟粕”,所萃集的内容,除录自国内报纸如《苏报》、《申报》、《官书局报》、《沪报》、《汉报》、《广州报》、《闽省会报》以外,还有录自国外或香港报纸者。“通论”的内容,也大都从国内外报纸转录或译述。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十八日第二十一册起,移至武昌出版。

《实学报》创刊 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初一日,《实学报》在上海创刊,旬刊。王仁俊任经理,章太炎任撰述。设有实学平议、实学通论、章奏汇编、英报辑译、东报辑译、法文书译等栏目。该报按天、地、人、物四纲编纂,“以讲求学问、考核名实为主义”。以“实学”相标榜,刊有很多攻击康、梁改制学说,反对新政的文字。文字古雅,不如他报通俗。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出完第十四册即告停刊。

《新学报》创刊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新学报》在上海创刊,半月刊,吴县叶耀元(子成)为总撰。以“振兴教学、切磋人才”为宗旨,主要刊登算学、政学、医学、博物等方面的新理新法。每册二十四叶。苏州、北京、天津、陕西、广东、福州、厦门等地设有分销处,并远销至香港、新加坡。

女学会成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秋之交,女学会在上海成立,李闰(谭嗣同妻)、黄谨娱(康广仁妻)为倡办董事。此为戊戌变法时期以妇女为主体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团体。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三日,又在上海城南的桂墅里创办中国女学会书塾(近代中国第一所自办女校),经元善任总理,设中文、西文、医学、女红四门课程。城内淘沙场设分校,专备就近女生走读。六月,女学会独立创办《女学报》(近代中国第一份女报),反对缠足,提倡女学,追求妇女解放。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女学会书塾

中止。

《求是报》创刊 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初五日,《求是报》在上海创刊,旬刊。陈季同、陈寿彭创办,陈衍主编。分内编、外编,内编包括交涉、时事、附录;外编包括西报、西律、制造、格致、泰西稗编诸门。所译又分四类:各国新闻、格致学、律学、西人著述。

译书公会成立 译书公会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翻译出版机构。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在上海成立。由恽积勋、恽毓麟、陶湘、董康、赵元益等主持。旨在“开民智、广见闻”,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主要业务。该会曾向伦敦、巴黎购买关于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气、矿务、商务、农学、军制等方面的书籍,次第译出。每周将译成之书汇订成《译书公会报》,精印发行。又摘译英国《泰晤士报》、《律例报》、法国《勒当报》、《国政报》、德国《东方报》五种报纸,附于书籍之后,以备浏览。还广译东方蚕桑各书,并刊简明善本,绘图列说,以冀发展中国的蚕桑事业。

《译书公会报》创刊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一日,《译书公会报》在上海创刊,周刊。译书公会主办。恽积勋、陶湘为总理,杨模、章炳麟为总主笔。旨在“开民智,广见闻”,“以广译东西切用书籍报章为主,辅以同人论说”。汇译英国《泰晤士报》、法国《费加罗报》、德国《东方报》、美国《自立报》、日本《政策报》等报内容。亦译载欧洲新出版的有关政治、经济、外交、史地、科学等方面的新书,如《交涉纪事本末》、《万国中古史略》、《延寿新法》等。但所载各书,均未译完。所见最后一期(第二十册)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五日出版。

时务学堂创办 光绪二十三年(1897),维新派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是湖南重要新政之一,由谭嗣同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及学政江标的支持和赞助。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发布《湖南时务学堂缘起》,阐明了设学校、培养维新人才的宗旨。既有成议,陈宝箴遂任命熊希龄为提调,主持学堂的一切行政事务,决定延请梁启超、李维格分任中、西文总教司,另聘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唐才常等任中文分教习,王史为西文分教习。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招考,录取学生四十名。九月正式开学。十月中旬,梁启超由沪抵湘,拟订《学约》十章,即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一日,时务学堂第二次招考,录取内课生三十名,外课生十八名,附课生七名。闰三月,又录取第三期学生,其中内课生四十六名,外课生五十二名,各送北洋学生十名。时务学堂的功课,分为两种,一为普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粗浅的格算诸学;一为专门学,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学生须先钻研儒家著作中的“微言大义”,然后择取中外政法比较参证,以明了维新变法的旨意。教习还勉励学生研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以求治国之道。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学生已达到二百人左右,其中著名的有蔡锷、林圭、秦力山等。时务学堂的教学深为封建顽固势力所忌恨,四月,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纠集劣绅叶德辉等人上书陈宝箴,攻击梁启超、韩文举等人“阴行邪说”,“实皆康门谬种”,要求陈宝箴“严加整顿”。这一要求未被采纳。王先谦又伙同叶德辉等煽动他们控制下的三个书院的部分守旧学生,制定了所谓《湘省学约》,以加强对书院学生的控制,防止他们受时务学堂的影响。叶德辉还写了《𬨎轩今语评》、《长兴学记驳义》、《读西学书法书后》、《正界篇》等文,对康、梁的民权、平等学说肆意诋毁。在封建顽固势力的猖狂进攻下,时务学堂主事人渐存妥协,熊希龄一方面上书抚院,吁请“立案”,研究解决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对梁启超的毁谤一事,一方面又迫于“恶势”,辞退了中文分教习。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亦相继离湘而去,时务学堂被迫停办。戊戌政变后,改为求是书院。

《国闻报》创刊 《国闻报》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重要报纸之一。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一日,由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创办于天津。日报。严复等主编。十一月十五日起增出旬刊,名《国闻汇编》。以“道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为宗旨,宣传西学,鼓吹变法自强。载有上谕、论说、外电以及各地新闻。并派记者到国外采访。选译外国报刊达百余种。《国闻汇编》曾按期连载严复译述的《天演论》部分内容,阐发保种保群自强进化之公理。该报与上海《时务报》南北呼应,在维新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1898),旬刊停办,共出六册。八月戊戌政变后,日报转售与日本人。

《渝报》创刊 上海《时务报》、湖南《湘学报》等接踵而起后,宋育仁亦在四川联络同仁,谋兴学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在重庆创办《渝报》。宋任总理,杨道南任协理,潘清荫、梅际郇任正、副主笔。该报为旬刊,土白纸木刻线装。主张“通经致用”,“扶持圣教而济时艰”。设有上谕、奏折、论文、国内外及本省新闻、重要译文等栏,末为重庆市场物价表。报中载有不少介绍西方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材料。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停刊,共出十五册。

大同译书局创办 大同译书局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编译出版机构。光绪二十三年(1897间)九、十月间由梁启超等集资创设于上海。康广仁任经理。规定首译各国变法之书,以备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译书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次以艺学。曾刊印《经世文新编》、《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以及《中西学门经》、《日本书目志》等新学书籍。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后被迫停办。

巨野教案发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山东曹州巨野县张家庄教堂德国神父薛田资(Stenz)在当地发展教会势力,庇护教徒,欺压民众,激起公愤。十月七日,德国传教士能方济(NiesFranciscus)和韩·理加略(Hen Le Ricandus)二人途经张家庄,夜宿薛田资卧室,当即为大刀会众所杀,薛田资则以宿他处获免。济宁、寿张、菏泽、单县等州县人民,旋起焚毁教堂和教士住宅,殴伤教士、教民。久思侵占中国港口的德国政府,即以教案为借口,于十月二十日出兵强占胶州湾。二十六日,德国公使海靖进而向清政府提出六项侵略要求,包括惩办山东巡抚、赔款、抚恤、"租借"胶州湾、在山东筑路开矿等。清政府迫于德国的威胁,将山东巡抚李秉衡、巨野知县许廷瑞革职,赔偿教堂损失,代建德国教堂三处,逮捕群众九名入狱,其中处死二人,判徒刑二人,同时谕令各省地方官切实保护教堂、教士。

胶州湾事件发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二十日,德国借口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派军舰强占胶州湾,夺取青岛炮台。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强租胶州湾九十九年,并攫取了在山东的路矿特权。

《蒙学报》创刊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蒙学报》在上海创刊,旬刊,叶瀚等编辑,上海蒙学报馆出版,石印本。报分两类:一为母仪训育之法,一为师教通便之法。母仪训育分养育、劝诵、仪范、演习四目;师教通便分演习、字课、数理、方名、智学、史学、时事七目。以启蒙为主,也译述西文通俗儿童作品。

《通学报》创刊 光绪二十三年(1897),《通学报》在上海创刊,任申甫主编。初为旬刊,后改月刊。所载有英语与世界语,分历史、地理、理化等科,由浅入深。出版六年后停刊。

不缠足会成立 早在光绪九年(1883),康有为就在广东南海倡议妇女不缠足。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氏在广州发起成立粤中不缠足会,再次倡导妇女不缠足。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麦孟华、康广仁等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规定入会者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女子,凡八岁以下缠足女子一律放足。同年,长沙、潮州、福州等地相继设立不缠足会,宗旨相近。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后停止活动。

知耻学会成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拟联合满、汉人士组织经济学会,并已拟定章程,请庆亲王奕劻作序,但奕劻要删去"会"字,"议不合,事遂已"。于是,康有为支持寿富等发起知耻学会。梁启超撰《知耻学会序》,称外患日逼,民贵知耻,"特标此义,立会以号召天下"。寿富撰《知耻学会后序》,指出: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中国之耻,至斯极矣"。知耻"莫如为学","学则智,智则强",期望民智渐开,国势复振。

粤学会成立 光绪二十三年(1898)十二月十三日,康有为欲继强学会未竟之业,邀合旅京广东人士二十余人,在南海馆发起成立粤学会,数日一集,倡导变法图强。又以各会馆皆为京官会集之所,欲"因而导之",遂草一疏,交御史陈其璋上奏,请将京师同文馆群书颁发各省会馆,以便各京官讲求,了解西学。三月,扩大加入保国会。

闽学会成立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初十日,林旭、张铁君等邀合旅京福建籍同乡在北京福建会馆发起成立闽学会,以期振励士气,互通声气,讲求变法,挽救危亡。林旭为"倡始董事"。三月,扩大加入保国会。

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康有为赶赴北京,于同年十二月(1898)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陈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并警告说:如果再不变法图强,"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在上书中,康有为提出了三点具体计划:一、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二、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还提出了国事付国会议行及颁行宪法的主张。上书递到工部,工部尚书松溎"恶其伉直,不为代奏",没有及时送到光绪手中。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召到总理衙门、由王大臣"问话"时,第五次上书才得以上达。

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召到总理衙门,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五大臣"问话"。康有为再次申说了变法的主张,

并提出了变法的步骤，同时批驳了荣禄、李鸿章等人的诘问，受到翁同龢的赞赏。初四日，翁同龢把延见康有为的情况向光绪帝作了汇报，并对康加以保荐。光绪拟召见康有为，受到奕䜣阻拦。于是，光绪命康有为把所有建议书面递呈。正月初八日，康有为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吁请光绪皇帝决行变法，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提出了变法的具体办法：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制度局下分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局、工局、商局、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局，分别推行各项新政。上书还谈到了派员出国游历、翻译西书、变通科举等问题。《统筹全局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全部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光绪帝看了这个奏折，非常满意，更加坚定了变法之志。

清廷发行"昭信股票"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偿付《马关条约》规定的第四期对日赔款，右中允黄思永于正月初九日奏请筹借华款，造自强股票。经户部议决，定名"昭信股票"，寓"以昭信守"之意。正月十四日，正式颁发。二月初九日，户部又拟定具体章程十七条，规定公债发行总额为库平银一亿两，面额分一百两、五百两、一千两三种，共印造一百万张，年息五厘，分二十年还清，前十年付息，后十年本息并付，以田赋、盐税作担保。由户部设昭信局，各省设分局，办理公债发行及偿还事宜。债票准许抵押售卖，但须报局立案。募集债款十万两以上者，由各省报请给奖。"昭信股票"发行后，流弊甚多，遭舆论谴责。同年七月二十二日，经户部奏准，著即停办。

关西学会成立　关西学会又称陕学会，戊戌变法时期陕西、山西旅京人士组成的维新团体。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十八日，由阎乃竹、宋伯鲁、李岳瑞等发起成立于北京。旨在会友辅仁，互通声气，讲求变法，挽救危亡。立《学规》四条：一、治经义，以经术言变法，反对琐碎支离的汉学与空谈无根的宋学；二、治国闻，研习欧洲及日本的语言文字、格致算学等；三、广应求，别省人士也可入会；四、定会期，每周聚会一次。同年三月加入保国会。

《岭学报》创刊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日，《岭学报》在广州创刊，旬刊。黎国廉任总理，朱淇任撰述，岭学报馆印行。旨在考订西学西政之源流得失。刊有不少介绍西政、西艺的译文。分国政篇、邦交篇、文教篇、武备篇、史学篇、民事篇、谕旨、奏疏、西文译篇等，编例"略仿《湘学报》"。

南学会成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计划加速实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等"思保湖南之独立"，使南中国"可以不亡"，因而组织学会，联群通力，发愤自强"。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初一日，经谭嗣同、唐才常等组织发起，南学会正式成立于长沙。第一次开会，湖南巡抚陈宝箴亲临讲演，以示支持。该会"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根据《南学会大概章程》，由湖南巡抚选派本地绅士十人为总会长，再由这十人各举所知，引为会友。还规定在省城长沙设总会，各府厅州县设分会。其活动方式以讲演为主，另设答问。谭嗣同、黄遵宪、皮锡瑞、邹代钧分别主讲天文、政教、学术、舆地，每次听讲者达千数百人。会中还经常讨论地方重大兴革事宜，提出方案，供省政当局参考，有寓地方议会于学会之意。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击、破坏，南学会的讲学只办了三个月。戊戌政变后，张之洞致电陈宝箴等，以为南学会"迹近植党"，饬令裁撤。

《英德续借款合同》签订　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政府开始筹借第三期对日赔款。英德集团再次压倒俄法集团，取得了这次借款权。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九日，清总理衙门与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了《英德续借款合同》十七款，另附《付还本利日期数》一件。规定：借款总额为一千六百万英镑(合银一亿两)；以八三(83%)折扣交付，年息四点五厘；分四十五年还清，不得提前或一次还清；以海关税和苏州、淞沪、九江、浙东货厘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以上各处厘金由海关总税务司派人征收；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必须由英国人充任。

中德订立《胶澳租界条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十四日，清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与德使海靖在北京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亦称《德租胶澳专条》。共三端十款。主要内容是：德国租借胶州湾，租期九十九年；德国军队可以在胶州湾沿岸百里以内自由通行；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并享有铁路沿线三十里内的矿产开采权；德国获有承办山东各项工程的优先权。通过这一条约，德国不仅得以租借胶州湾，而且把山东全省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湘报》创刊　《湘报》是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维新派的重要刊物。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十五日由谭嗣同、唐才常等集资创刊于长沙。日刊。唐才常等主编。由长沙校经书院编辑出版。以"开风气，拓见闻"为宗旨。设有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政、各国时事、商务等栏目。文字浅近，通俗易懂。散为日

报，合为月报。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实行君主立宪，遭封建顽固派忌恨。六月二十日出至第一百一十六号时曾一度停刊。七月初五日复刊，戊戌政变后，被地方官饬令停办，由王笏等"承顶接办"，续出至九月二十日最终停刊。前后共出版七个多月，计一百七十七期。

中俄订立《旅大租地条约》 《旅大租地条约》原称《中俄会订条约》，又称《中俄条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二十二日，俄国借口协助中国抗德，派舰队进占旅顺。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六日，清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在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规定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海面租与俄国，租期二十五年，期满经两国相商仍可展限；租期内该地完全归俄国管辖；旅顺口辟为军港，只许中俄船只使用；俄国享有修筑中东铁路通大连支线的特权。同年闰三月十七日，又在圣彼得堡(今列宁格勒)签订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共六款，进一步确定俄国建筑铁路及在租借地附近的独占权。从此，东北全境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北京蜀学会成立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杨锐等联合旅京川籍同乡，在北京四川会馆发起成立蜀学会，以期互通声气，共同讲求变法维新。三月，扩大加入保国会。

保国会成立 保国会是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重要政治团体，康有为等发起，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于北京粤东会馆。议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为：一、"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三、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实效，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还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皆设分会。保国会先后集会演说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由于封建顽固派的攻击、威胁、破坏，一些投机分子畏祸退出，会员由二百人减到百人左右，不久便不得不自行停顿。尽管保国会因被破坏而夭折，但它的宗旨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会上发表的演说，却在天津、上海、广东各地报刊登载，影响很大。

延年会成立 延年会是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的维新团体。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初五日，由谭嗣同、熊希龄等倡立于长沙《湘报》馆内。该会力主改革烦琐礼仪和无所事事、虚耗光阴的陋习，提倡省去无谓之应酬、纷扰，珍惜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一日程数日之功，一年办数年之事。规定凡有要事商谈，须先致函相约，过时不候不见；会谈只可言事之本末，言毕即行，不得无聊闲谈。戊戌政变后解体。

四川蜀学会成立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宋育仁、廖平等在四川成都发起成立蜀学会，各府、州、县设分会，以通经致用、讲求实学为宗旨。学会以集讲为主，分伦理、政事、格致三门讲习。提出《学会六戒》：戒胶执、戒慢、戒非笑诘难、戒诋毁、戒忿争、戒羼言，作为会员守则。会中购有书籍、仪器、图册数百部，与成都中西学堂、算学馆联为一气，并于尊经书院发刊《蜀学报》，辟论撰专栏，宣传变法救亡，采录译报，登载学会讲义和会员新得，供各地会友学习。

《岭海报》创刊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岭海报》在广州创刊。该报是《岭学报》附设的日报，日出八开八版。主笔陈庆材、区宝庆等。内容以介绍新学和报道有关变法维新的消息为主。后为胡衍鹗把持，成为保皇派的报纸。光绪二十九年(1903)，洪全福广州起事失败后，极力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张之洞撰成《劝学篇》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同治十二年(1873)授四川学政。后调任山西巡抚。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时，再升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抗击法军。光绪十五年(1889)调湖广总督。光绪二十年(1894)代刘坤一为两江总督。甲午战败后，变法呼声日高，张亦上疏阻和议，要求变通旧法，力除积弊。光绪二十一年(1895)，捐金资助《时务报》，列名强学会。而一旦察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同自己大相迳庭，张便力加诋辟。光绪二十二年(1896)，下令查禁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旋回湖广总督任。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撰成《劝学篇》。这是戊戌时期对抗变法维新思潮的代表作。全书共二十四篇，计四万余言。分内篇九：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外篇十五：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本"指封建的纲常名教，"通"指有关工商业和学校报馆诸事。前者不能动摇，后者则可以变通举办。该书系统阐述和发挥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思想，主张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它极力攻击维新派"开议院、兴民权"的政治主张，断言"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同时极力赞颂清王朝的"深仁厚泽"、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该书具有调和中

西、折衷新旧的色彩，深得清廷赏识。光绪帝披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并发布上谕，命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令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劝学篇》“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帝国主义者对此书也很欣赏，先后译成英、法文字出版。光绪二十六年(1900)，纽约出版乌特勃来基(Samuel I Woodbridge)译本，题称《中国唯一的希望》(China's only Hope; An Appeal by the Greatest Victroy Chang Chintung)。

遂溪事件发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法国强租广州湾(今广东湛江)后，不待划界，即派海军向遂溪进犯，激起当地民众反抗。光绪二十五年(1899)，署遂溪知县李平书组织团练四千余人，提出“保卫家乡，打倒法国鬼”的口号，抗击法国侵略。九月到十月，在黄略村、麻章、平石村等地，多次击退法军，打死打伤法军百余人，迫使侵略者不得不把租地范围由方圆一百里缩小到三十里左右。后法军联合清军进行镇压，遂溪人民反侵略斗争遭到失败。

《时务日报》创刊 《时务日报》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报的报纸，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十五日在上海创刊。当时，《时务报》已风行全国，但月只三册，又以提倡变法为主，经理汪康年乃别出此报，纪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转圜时务，广牖见闻”。并革新版面，增加材料，分栏编辑，用报纸两面印刷，开我国日报改进之机。六月，《时务报》改为官报，七月，《时务日报》亦改名《中外日报》，出至宣统三年(1911)停刊。

《无锡白话报》创刊 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二十一日，《无锡白话报》在无锡创刊，五日刊。第五期起改名《中国官音白话报》，每两期合出一册。裘廷梁及其侄女裘毓芬创办并主编，为我国早期白话刊物。该报“谈新述故，务撷其精；间涉诙谐，以博其趣”，“汰芜秽，存精英，以话代文”，旨在“广开民智”。设有中外纪闻、无锡新闻、富国策、养民新法、海外奇闻、海国妙喻等栏目。

《蜀学报》创刊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蜀学会在成都成立后，闰三月十五日便出版《蜀学报》，作为蜀学会会刊。报馆设于尊经书院内，宋育仁任总理，杨道南为协理，吴之英为主笔，廖平为总纂。旨在“昌明蜀学，开通邻省”。首录谕折，次论撰，次近事，“及分纂官士农工商五门成就”。载文以“有关实用，可以考镜得失”为准，不分中外。曾刊载康有为的《保国会序》等。

严复译《天演论》出版 《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 H. Huxley)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序论与本论两篇的中译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严复已将此书译成初稿，并附加许多案语，以阐述己见。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部分译稿发表于《国闻汇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正式出版。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观点，激励国人变法维新，以冀由弱变强，否则将沦于亡国灭种而被淘汰。为变法图强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思想界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

中英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法国强迫清政府允其强租广州湾后，英国政府立即要求强租九龙半岛作为“补偿”。四月二十一日，清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等与英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所谓“新界”，租借给英国，租期九十九年；租期内该地区完全归英国管辖。

戊戌变法运动发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的改革方案，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此后的几十天中，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光绪帝先后颁布了一百多道除旧布新的改革诏令，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戊戌新政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拼命抵制和反对。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下令缉捕康有为、梁启超。八月十三日，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变法失败。

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三日，康有为代御史杨深秀拟了《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四月二十日，又代侍读学士徐致靖拟了《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自己也上了一道《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根据杨深秀、徐致靖、康有为等人的奏章，召集军机全堂，“下诏定国是”，决定变法。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旋准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利用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不断地上奏折，递条陈，提出了一系列新政建议。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先后颁布了一百多道除旧布新的改革诏令。从内容上看，六月上旬以前，光绪颁布的新政主要是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有：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凡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等各种有利于生产发

展者，即赏给官衔或给予专利；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文教方面有：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军事方面有：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等等。六月上旬以后，新政由经济、文教、军事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主要改革有：删改则例，裁汰冗员，撤销闲散重迭的机构；准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官吏不得阻挠，等等。新政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一致抵制和反对。光绪颁布的变法诏令，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还能认真执行外，其他地方督抚大多置若罔闻。在中央，有些新政机关形式上虽然建立起来，但基本上被顽固派所把持。因此，变法诏书大都成为一纸空文。到慈禧发动政变以后，新政基本上被彻底推翻。

慈禧罢黜翁同龢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咸丰状元。历任户郭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光绪帝师傅。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愤于李鸿章割地求和，倾向变法维新。平日与光绪帝甚为接近，辅翊光绪筹谋新政，深为慈禧所忌。光绪二十四年(1898)，“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第四天，即四月二十七日，慈禧便迫使光绪帝下令免去翁同龢的一切职务，驱逐回籍。革职的理由是：翁同龢“办事多未允协”、“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慈禧罢黜翁同龢，意在孤立光绪帝，这是她反扑新政的信号，对光绪帝和维新派都是一个沉重打击。

荣禄出任直隶总督 荣禄，满洲正白旗人。由荫生以主事用，数迁侍郎，兼内务府大臣。光绪四年(1878)，工部尚书，因纳贿被参免职。光绪二十年(1894)，授步军统领。次年授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他反对变法，恪守祖训，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七日，即“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第四天，翁同龢被罢职的同一天，慈禧强迫光绪皇帝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五月初五日，荣禄便由署理而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陆军)三军。于是，荣禄“身兼将相，权倾举朝”。

光绪召见康有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五日，即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后第三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上一折，向皇帝保荐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张元济等“维新救时之才”。二十八日，光绪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量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召见中，康有为向光绪陈述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形势，提出要尽变旧法，请求光绪统筹全局，“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还建议大胆择用有才之士，允许他们上条陈，协助办理新政。康有为还着重指出了八股试士的危害性，并对答了译书、游学、游历等事。对康提出的各种看法和主张，光绪均表同意。召见后，旋准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利用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不断地上奏折、递条陈，提出了一系列新政建议，如开制度局议行新政、奖励工艺创新、振兴商务、开矿筑路、裁撤厘金、废八股改试策论、兴学校、办报馆、禁缠足、裁旧军练新兵等等。百日维新期间，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推行的新政，在许多方面，尤其在文教、军事方面，直接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

清廷废除八股考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康力陈八股之弊。二十九日，康有为、宋伯鲁又上疏请改八股为策论。五月初五日，光绪帝发布“上谕”：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废八股，改试策论。戊戌政变后，八月二十四日，清廷宣布恢复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等项分别考试。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又下诏：自明年始，乡会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清廷正式宣布彻底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推行新式学堂。

中英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 继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之后，英国要求按照租让旅大的同样条件租借威海卫。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三日，清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与英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将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包括刘公岛、威海湾之群岛及沿岸十英里地方)租与英国，租期二十五年，期满经两国相商仍可延长。

余栋臣再次起义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四川大足县多次发生民教冲突。光绪十六年(1890)，余栋臣竖旗起义，攻毁龙水镇教堂。清廷派兵镇压，余栋臣率众退至大足县边境西山中，继续坚持斗争。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余栋臣被川东道逮捕，押送荣昌县监狱。蒋赞臣、唐翠坪、张桂山等数百人劫狱救出余栋臣，拥归大足龙水镇。余栋臣经过准备，于五月十三日，宣布再次起义，派兵到荣昌县郑家湾教堂捕捉法国教士华芳济，并当众宣布洋人包揽词讼、强买田产、奸污妇女、残害儿童等种种罪行。次日，发布檄文，痛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号召群众驱逐洋人，以雪国耻。六月上旬，起义军在大足击溃“剿办”的清朝官兵。八月，起义军分路出击，北攻铜梁、

安岳，南攻永川、江津，东攻重庆，西攻内江，所到之处，打毁教堂，没收教民财产。起义队伍发展至一万余人，编为一百哨。影响波及三十余州县，焚毁教堂、医馆二十余处。十二月，清廷命四川布政使王之春率兵镇压。余栋臣再次退入西山，遭清兵围困。十二月十一日(1899)，余栋臣投降清军，起义失败。事后，清政府向侵略者赔款银一百一十八万两结案。

京师大学堂开办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光绪皇帝根据御史王鹏运的建议，命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会商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宜。四月二十三日，颁发"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五月十五日，总理衙门奏上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张元济为总办(后由黄绍箕、余诚格继任)，许景澄为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为西文总教习。初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为宗旨，议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十科。戊戌政变后，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两堂，学生不及百人，性质仍与旧时书院无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停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复校，设预备科(政科、艺科)、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次年增设医学馆、译学馆及进士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宣统二年(1910)，改设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

诏改书院为学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先后奏上《请开学校折》、《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根据康有为的一再吁请，光绪帝于五月二十二日发布"上谕"，命改各地书院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凡不在祀典之民间祠庙，亦一律改为学堂。戊戌政变后，新政中辍。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再令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作育人才"。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02)，又谕将宗室、觉罗、八旗等官学改设中、小学堂，并归入大学堂办理；各省驻防官学、书院一律改为小学堂。

《女学报》创刊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六日，《女学报》在上海创刊，康同薇(康有为之女)、李蕙仙(梁启超之妻)等任主笔。此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妇女报纸。设有论说、新闻、征文、告白等栏，鼓吹男女平权，施教劝学，提倡民主、科学，主张兴办女学，反对缠足，以求妇女解放、国富民强。约于同年七月底停刊。

《中外日报》创刊　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宣传变法维新。七月初一日，改名为《中外日报》。义和团运动期间，主张严厉剿杀义和团。此后，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光绪三十四年(1908)，因经济拮据，由上海道蔡乃煌资助。不久，汪康年将报馆售与蔡乃煌。销数大减。宣统三年(1911)三月停刊。

诏设农工商总局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初五日。康有为奏上《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建议于各省设立农学局、地质局，于京师设立农商局，各省设分局。同日，光绪帝发布"上谕"：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及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各省设立分局，各省府州县皆设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其工学、商学各事宜，亦著一体举办，统归农工商总局大臣随时考察。戊戌政变后，八月二十四日，清廷裁撤农工商总局。

裁撤詹事府等衙门及三省巡抚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十四日，光绪帝下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只管河南工之东河总督；同时，裁撤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及仅管疏销之盐道等官。七月十六日又谕饬詹事府等已裁衙门一切事宜，归并六部。二十三日又发布"上谕"：原东河总督所管山东运河归山东巡抚兼管。戊戌政变后，八月十一日，清廷宣布：詹事府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等职亦于九月十八日宣布恢复。

《翼教丛编》刊行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封建文人苏舆汇辑的《翼教丛编》一书在湖南长沙刊行。全书共六卷，以"翼圣教、扶纲常、复名教、正人心"为宗旨，"专以明教正学为义"。辑录有封建守旧分子朱一新的《答康有为五书》、安维峻的《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文悌的《严劾康有为折》、张之洞《劝学篇》的部分内容、叶德辉的《𬨎轩今语评》，还收有《湘绅公呈》、《湘省学约》以及王先谦、叶德辉的书牍等。宣扬宋明理学，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护封建纲常名教，攻击康有为、梁启超"伪六籍，灭圣经"，"托改制，乱成宪"，"倡平等，堕纲常"，"伸民权，无君上"，竭力阻挠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该书还曾在上海石印出版。是戊戌维新时期反动出版物之一种。

英德订立瓜分津镇铁路协定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中比《芦汉铁路借款合同》签订以后，英国于七月五日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筑天津至镇江等铁路的要求，与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发生矛盾。英国被迫与德国政府直接交涉，以两国共同分割英国在非洲

的殖民地为条件，来换取德国在津镇铁路上的让步。德国对非洲觊觎已久，愿与英国妥协。双方遂于同年七月十七日达成协定：天津到山东南境的铁路由德国修筑，由山东南境至镇江的铁路由英国修筑，全线竣工后由双方共同经营。此外，还议定：英国的铁路投资范围是长江以南各省和北经河南至山西；德国的铁路投资范围是山东省以及自黄河沿岸至南京一带。实际上是双方互相承认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该协定签订后，两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了承筑津镇铁路的要求，并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九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津镇铁路借款合同》。

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礼部主事王照奏请光绪游历日本及各国，并请立商部、教部。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不肯代递。王照斥责怀、许等人阻遏新政，声言如不代递，将径投都察院转呈。许应骙即上疏弹劾王照咆哮公堂、借端挟制，又谓日本多刺客，王照请皇上游日本，居心叵测，应加惩办。七月十六日，光绪帝下诏，斥责怀塔布等人狃于积习，致成雍蔽，著交部议处；并命今后各衙门司员条陈事件，即由该堂官原封呈进，毋庸拆看。七月十八日，谕将怀塔布、许应骙及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六人即行革职；同时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资鼓励。戊戌政变后，八月十五日，清廷重新起用怀塔布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十九日，命将王照革职严拿，查抄家产。

光绪召见袁世凯 戊戌新政从推行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拼命抵制和反对。面对慈禧的连连反扑，光绪帝和维新派深感大祸临头，在一筹莫展之中，他们想把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拉过来，对付慈禧和荣禄。经康有为、徐致靖的荐举，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六日，光绪发布上谕，"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八月初一日，光绪召见了袁世凯，暗示袁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并破格提拔袁为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袁世凯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光绪的"特恩"表示感激涕零，另一方面又到世铎、奕劻、刚毅、裕禄、李鸿章等旧臣处尽力周旋。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 "百日维新"期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连连向新政进行反扑，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上旬，政变已有一触即发之势，情况十分危急。光绪帝已预感到"朕位几不保"，连续发出两次"密诏"，命康有为等"妥速筹商"。在一筹莫展之中，维新派把一线希望寄托在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八月初三日，康有为等决定派谭嗣同去"说袁勤王"。当天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在北京的寓所，劝袁拥护光绪，杀掉荣禄。袁当面表示对光绪的"忠诚"，为救君国，"必当生死以之"。而当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反复筹思"，感到光绪皇帝没有实权，投靠光绪，将自身难保，而投靠慈禧，则高位易得。于是，于初五日上午，袁乘车回天津，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和维新派。

慈禧发动戊戌政变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御史杨崇伊上密折，请慈禧"即日训政"。初四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密作政变准备。初六日凌晨，慈禧经过周密布置之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自己重新"训政"，继而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政变后，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余全部被取消。

"戊戌六君子"被杀 慈禧发动政变前一日，康有为离京赴沪，在英国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也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去日本。谭嗣同却拒绝了别人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遂被捕。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三日，谭嗣同与其他被捕的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共六人，同时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工商学报》创刊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钱塘汪大钧在上海创办《工商学报》。该报为周刊，每期二十余叶，连史纸铅字排印。以"振兴工商业，收回利权"为宗旨。分谕旨恭录、奏折录要、论说、公牍、中国工商情形、译编、东方商埠考略、附录等栏。对中国商政及各种工艺商务情形，报道尤详；还译载各国商务律例及商务学堂章程等。

中英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 英国为了减轻芦汉铁路的重要性，并阻挡俄、法插足长江流域，急于揽到关内外铁路的借款权，以便向北扩展势力。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二十五日，关内外铁路会办胡燏棻与英国中英公司在北京签订了《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二百三十万英镑，年息五厘，九扣实付，四十五年还清；该款用于修筑奉天(今辽宁沈阳)中后所至新民屯(今辽宁新民)铁路及营口支线；备还津渝、津芦铁路欠款；以北京至山海关铁路财产、收入和新筑铁路收入作担保；铁路总工程师由英国人担任；中国保证本合同内所指铁路永不让与他国。

《清议报》创刊 《清议报》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的主要刊物。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十

一日，在日本横滨创刊。旬刊，用孔子纪年。发行兼编辑署"英人冯镜如"，实为梁启超主编，麦孟华、欧榘甲等辅佐。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鼓吹保皇立宪。设有论说、名家著述、文苑、外论汇译、纪事、群报撷华等栏目。"国闻短评"开日后各报"时评"之先河。该刊继续宣传救亡图存，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与文化学术等。曾首先发表谭嗣同所著《仁学》的一部分内容。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十一日，因报馆失火而停刊。共出一百期。此后，横滨新民社曾出《清议报全编》二十六卷，但内容有较多增删，编次亦与原刊不同。

中国女学会成立　光绪二十四年(1898)，沈和卿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女学会，经元善任总理。专门向妇女讲授中西史书及一切有关实用医算乐律等学，采仿泰西、日本师范，以开风气。此为近代中国第一所自办新式女校。

《格致新闻》创刊　光绪二十四年(1898)，《格致新闻》在上海创刊，月刊，朱开甲、王显理等撰译。后与《益闻录》合并，改名《格致新闻汇报》，每周出版两期。

《孔子改制考》刊行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所撰关于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著作，共二十一卷。光绪十八年(1892)，康有为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开始编著，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上海大同译书局正式刊行。书中阐发"托古改制"理论，宣称《六经》皆孔子所作，是孔子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行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改革主张，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认为孔子改制的精义主要反映在《春秋》一书中，而《公羊传》则是阐释《春秋》的典籍。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需要出发，附会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解释历史发展趋势。认为"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这一划分并不科学，但确认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强调当时中国应由据乱世通过改革进入升平世，冲破了顽固派"敬天法祖"、"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守旧思想，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顽固派攻击此书"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骂为"灭圣经"、"乱成宪"的叛逆行为，要求清政府将该书毁版。

广西会党起义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点会首领李立廷以"劫富济贫"相号召，率众在广西陆川起义，旬日之间，攻克了陆川、北流、博白等县。次年，苏松贞又在武鸣起义。虽遭失败，但推动了广西会党起义的高涨。光绪二十八年(1902)，黄三率部七千余人在上思起义，覃老发在永宁(今并入永福)起义，另部数万人在左江地区起义。义军势力遍及广西南部和西部。光绪二十九年，起义军攻克土州、东兰州、怀远等地，旋又占领柳州，直逼省城桂林。清政府命署两广总督岑春煊调集粤、桂、滇、黔四省军队会剿。光绪三十年(1904)，起义势力更扩大到广西全省并漫及湖南、贵州边境。清政府又调集七省军队进行镇压。次年八月起义失败，余部退入黔、滇边界继续斗争。

中英银公司设立　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合资设立"中英银公司"(简称"中英公司")。总公司设立在伦敦。北京、上海设分公司。曾先后贷款给京沈、沪宁、沪杭、广九等铁路，包办铁路材料购买和一切建筑工程，取得对所建铁路的监督、管理权。又资助福英国公司，间接投资于矿业。

安徽涡阳捻党起义　光绪二十四年(1899)十一月二十六日，安徽涡阳县捻党首领刘朝栋(刘疙瘩)、牛汝秀(牛世修)率党众数百人起义。淮河以北、宿州以西广大地区的民众纷纷起而响应，义军骤然扩充至二万余人。清政府迅速调集安徽、江苏、河南三省兵力围剿。未及半月，刘朝栋、牛汝秀等被捕死难，起义遂败散。

茌平义和拳兴起　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义和拳朱红灯部转战到山东茌平县一带，与临近高唐县义和拳首领心诚和尚互通声气，联成一片。在朱红灯的宣传鼓动下，茌平八百六十余庄村民皆设厂练拳，成为当时山东省内规模最大的一支义和拳队伍。义和拳是民间习武结社与白莲教相结合的组织，通常以设坛设厂练拳的方式结成团体。随着清朝末年洋教的流入和向广大村镇的渗入，教民倚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情况的出现，山东、河南一带的民众，往往通过设坛练武结成团体的形式进行反洋教、反侵略、保卫身家的斗争。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山东冠县梨园屯义和拳在赵三多等人率领下，不断掀起反洋教斗争，遭到清政府的严厉剿杀。但残酷的镇压并没使义和拳反洋教、反侵略斗争烈火熄灭。光绪二十四年夏，山东泗水人朱红灯在长清县设场练拳，组织反洋教斗争，被推为义和拳首领。在清政府的剿杀下，朱一度受挫，于第二年初转战到茌平。经过与心诚和尚等义和拳各部的联络，和朱红灯的宣传组织活动，鲁西北地区的反洋教斗争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声势也日益浩大。

毓贤接任山东巡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春，清政府命张汝梅为山东巡抚时，曾希望他能有效

地遏制义和拳运动。但张汝梅在办理民教纠纷过程中，感到民教纠纷大都因外国教会方面引起，对教会放纵教民欺压百姓，惹事生非也十分不满，力主持平解决纠纷，不一味弹压中国百姓。同年，张汝梅奏请改义和拳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张的建议一度为清政府采纳。张汝梅的这种态度，使义和拳运动得到了扩展，引起了外国传教士的不满。外国传教士的喧嚣及义和拳活动扩展的趋势，使清政府颇感不安。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初三日，清政府任命曾血腥镇压山东大刀会的刽子手毓贤接任山东巡抚，企图把义和团运动彻底绞杀。

大生纱厂正式开机 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十四日，张謇创办的第一个企业大生纱厂正式开机。《马关条约》签订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华经济侵略更为疯狂，中国国内一片设厂自救，抵御经济掠夺的呼声。光绪二十二年(1896)，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允许在籍官员招商办厂的奏请获准，遂委派张謇在通州(今南通)招商办厂。张謇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中感到清政府难以自振，毅然绝意仕途，憧憬实业救国的理想。他接到张之洞托咐后，经过思考，认为通州盛产棉花，力韧丝长，冠绝亚洲，而且织布业发达，以兴办纱厂最为合适，便欣然受命。他邀集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郭勋、樊芬、潘华茂等商人组成董事会，筹集资金。但富户对把大宗款项交给张謇这种未办过实业的读书人很不放心，加之当时上海棉纱市场萧条，更持观望态度，使筹措股金的进展很不顺利。厂址选在唐家闸后，一些工程要陆续上马，微少的股金根本不敷用，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纺机更没有着落。张謇不得已向封建官府求援，接受了折价五十万两白银的官方纺机，做为官股，商定设法自筹五十万两的商股，变商办企业为官商合办企业。企业性质改变后，其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都可能受官方控制干预，部分董事因此退出董事会，五十万两的资金更难筹措。张謇被迫再次请官府帮忙，后刘坤一请盛宣怀领去一半纺机，给张謇减轻了二十五万两的负担。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厂房、运机器、盖仓库、筑路修桥等工程同时并举，开支甚大，现金腾挪不开，捉襟见肘。张謇又奔波于武汉南京之间，恳请张之洞、刘坤一的援助，并给故友旧识写信告贷，以至字字有泪，句句含血。由于张謇的坚韧不拔，屡蹶屡起，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历尽危难，把纱厂建立了起来。张謇亲自给纱厂定名为“大生”。寓意为“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建厂工作告竣后，社会上风言风语不断，纷传厂虽建成，纺不出纱。为了杜绝这种流言，张謇广邀宾客，在四月十四日正式开机，纺出新纱。

义和拳改称义和团 光绪二十五年(1899)，山东清平县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同年夏季，清政府转变了对义和拳一味绞杀的政策，改行抚剿兼施的策略，新任山东巡抚毓贤亦在署理山东民教纠纷的过程中，思想感情上日渐积蓄起仇外洋、恶教民情绪，遂奏请朝廷承认义和拳为合法民间团练，正式改义和拳为义和团，以便从中控制，使义和拳活动不超越清廷划定的范围。从此以后，山东义和拳争得了合法地位，陆续改称义和团，清政府的公文中亦以义和团称呼义和拳，后来直隶、天津、北京的义和拳也普遍采用义和团名称。

孙中山、梁启超晤谈两党联合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亡日本。日本人想借此机会促成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合作，而孙中山为扩大队伍也极希冀争取改良派。同年秋冬间，在日本人宫崎滔天(宫崎寅藏)、平山周居间联络下，孙中山、陈少白等多次与梁启超会谈合作事宜。后陈少白拜会康有为，要求康“改弦易辙”，放弃保皇的改良主张，实行“革命的办法”，携手推翻清王朝。但由于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光绪皇帝)”的顽固立场，谈判未得结果。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康有为离日赴加拿大后，孙中山等又多次与梁启超接触，就两党合作之事反复函商晤谈。梁启超经与孙中山长谈，并在韩文举、欧榘甲等人的鼓动下，也渐有赞同革命的趋向。同年夏秋之交，两党商议了一个合作的初步方案，准备合并成一个组织，举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推陈少白、徐勤起草联合章程。而徐勤根本反对联合，函告康有为说梁入孙中山圈套。康有为闻讯后强烈反对合并，命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务，两党联合事遂搁浅。

敦煌莫高窟古代藏经洞被发现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二十五日，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人员在清除第十六窟淤沙时，偶然发现一个小洞，门仅高出地面一米，洞长二点七米，宽二点五米，高三米，顶呈覆斗状，空间约为十九立方米。洞内有长方形禅床式低坛，上塑高僧洪䛒坐像。洞北壁绘有比丘尼与侍女图，西壁嵌有一方石碑，为洪䛒告身敕牒碑。洞内满满地贮存着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等文物约五万余件。大量的文字典籍文卷，除汉文写本外，还有六分之一藏文、梵文、佉卢文、粟特文、古和阗文、回鹘文等各种民族文字写本。还有绢本绘画、刺绣等美术品数百件。写本中除大量佛经、道经、儒家经典外，还有史籍、诗赋、小说、民间文学、地志、户籍、帐册、历书、契据、状牒、信札等，包括从公元四世纪近十个朝代

的文物图书。其中以唐五代人的民间文学的变文抄本为最多。变文，是唐代口语白话体写成的歌唱或讲述奇异故事的唱本话本。这些文本的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演绎佛经故事；一类为古代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及当时人物故事，如《降魔变文》、《秋胡变文》、《捉季布传文》等。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交接时震惊中外学术界的大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从此，研究敦煌艺术文化的人日渐增多，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形成“敦煌学”这一专门学科。但同时也引来了各国文物强盗的疯狂掠夺。在藏经洞发现后，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鄂登堡等人曾前往敦煌，从藏经洞盗走了大量珍贵文物。

保皇会成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十三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千岛地方成立“保皇会”。早在这一年春季，康有为赴英国，请求英国政府支持中国维新运动，迫使慈禧太后将权力移交光绪皇帝。在抵英之前，曾在加拿大逗留逾月，游历了维多利亚、温哥华、渥太华等地，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康有为做了多场宣传维新变政、富国强兵的演讲。每逢演讲，远近各埠华侨，往往驱驰“千数百里来观”，且均为康有为发愤救国、复权光绪的慷慨之词所动。加拿大地区华侨对以康梁为首的维新党人的敬佩，对维新政变的热忱，使康有为大受鼓舞，启发了康有为组织团体，把华侨力量纳入其维新勤王活动轨道的念头。他立即致书梁启超，言及组织团体事。梁启超闻讯，欣喜若狂，认为“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足过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吾不辞辛劳苦以办之”。同年五月，康有为在英国的求援活动未获成功，便立刻返回加拿大，开始了组织华侨维新勤王的团体。六月初，康有为与加拿大华侨中较有威信的李福基、叶恩等人会议磋商，在维多利亚成立“中国维新会”。后又经商议，将“中国维新会”的中文名称改为“保救大清皇帝会”，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六月十三日，康有为与李福基、冯秀石父子、徐为经、骆月湖、刘康恒等在加拿大千岛地方正式创立保皇会。该会以保救光绪帝，反对慈禧太后、维新改良为主旨。十五天后，维多利亚、温哥华两地华侨皆举行盛会，庆贺保皇会的成立。接着，康有为、梁启超、徐勤、欧榘甲等人四处奔走活动，在新加坡、日本、南北美洲、澳洲等地迅速建立起一批保皇会组织。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

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里，日、俄、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强占了中国沿海一些最优良的港口，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十九世纪末在经济上迅速崛起的美国对打开中国市场也怀有强烈的欲望，但由于在这段时间内它正忙于对西班牙的战争，和平息菲律宾人民的反美斗争，无暇兼顾，结果在掠夺独占性势力范围的行动中落后了一步。美国不甘于向隅不问的地位，为了弥补损失，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至十月，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先后训令美国驻英、俄、德、日、意、法各国大使，向各国提出关于“门户开放”的照会，该照会亦被称作“海约翰原则”，并请各国对照会做出承诺。“门户开放”的主要内容是：一、承认各国在华攫取的势力范围及租借地内的任何既得利益，互不干涉。二、各国运往前述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的货物(除“自由港”货物外)，一律遵循中国现行的约定关税率，税款概由中国政府照章征收。三、各国在其势力范围内所有口岸，对他国船舶，不得课以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口税；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所建筑、管理或经营的铁路上运输属于他国臣民的货物，不得征收高于本国同等里程、同等类型货物的运费。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在承认和维护列强在中国的“租借地”、“势力范围等一切既得特权的前提下，使各国在中国均可求得均等的贸易机会。也就使晚到的美国，可在“门户开放”的旗号下，实现其插足全中国市场的目的。由于“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列强在中国既得利益为前提，并要求共享均等的在中国贸易机会，加之当时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皆不具备独吞中国的力量，因而得到多数列强的赞同。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海约翰声称：各国已经接受门户开放政策，各国“所表示之同意是最后确定的”。同年六月，正当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之际，海约翰又向前述六国及奥、比、西、荷、葡共十一国，发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这个照会除了进一步肯定第一次“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以外，又强调了三点：一、保护美国的侵华利益和维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其在华侵略权宜。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三、主张以华治华，通过维持清政府统治，来“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之一切权利”。美国政府两次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构成了美国侵华政策的根本方针。这个政策在同年十一月再次为侵华列强肯首，并成为八国联军入京后，各国在北京进行分赃谈判的基本原则。

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 义和团来源于

白莲教和秘密结社，这些教、社，最初都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甲午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控制的加强，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乡村的渗透，使中国民众将原来反清政府的秘密结社和教门，变为专门对付外国侵略者和横行霸道的传教士的组织，反清的号召逐渐让位于反侵略的号召。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后，山东巡抚张汝梅主张持平解决民教纠纷，并对义和拳组织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后，冠县的义和拳首领赵三多首先打出了"助清灭洋"的旗号。毓贤接任山东巡抚后，接过了张汝梅对义和拳以抚为主的政策，并奏请清廷宣示义和拳为保卫身家的团体。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初，朱红灯在平原县杠子李庄，领导颇具影响的打教活动中，树起了"兴清灭洋"的大旗。此后，"顺清灭洋"、"保清灭洋"、"扶清灭洋"等口号都参差出现，到光绪二十五年底二十六年初，遂大都统一为"扶清灭洋"。

义和团森罗殿挫败清军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八月间，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义和团在李长水带领下，冲击当地教堂，对平日欺诈百姓的教民李金榜进行了清算。对义和团恨入骨髓的县令蒋楷，在接到李金榜报案后，立即派捕头陈德和带兵前往围捕。杠子李庄义和团虽奋力突围，但有六名团民被俘。李长水突围后，请义和团著名首领朱红灯率团援助，朱红灯遂邀集千余义和团民汇集杠子李庄，冲击教堂，严惩教民，要求蒋楷释放被捕团民，交还抢掠钱财。蒋楷亲自带兵镇压，被朱红灯等杀得大败而逃。朱红灯决定乘胜攻打恩县刘王庄等教堂，率二千余团众进驻森罗殿。蒋楷败逃后，故意扩大事态，以"恐滋巨患"为辞，请山东巡抚毓贤派兵镇压。毓贤遂派济南知府卢昌诒及管带亲军营补用知府袁世敦率骑兵两哨前往。卢昌诒尊毓贤"出示开导"，"不准孟浪生事"之意，到平原县后即释放被捕团民，将讹诈妄行的陈德和收押，并派人到杠子李庄劝团民解散。袁世敦得知朱红灯驻扎森罗殿，即率兵赴森罗殿，不顾朱红灯警告，分三路包剿义和团。朱红灯定计集中力量，歼敌中路，以三倍于敌的团民，在九月十四日，猛扑中路清军，杀伤十余人，挫敌锋芒。清军为义和团声势所慑，狼狈逃窜，朱红灯等得胜后立即转移。毓贤得败讯，感到难以武力剿灭义和团，更坚定招抚的想法。他把森罗殿之战归罪于蒋楷激成事变，对袁世敦行为孟浪给予处分。清政府采纳了毓贤意见，亦倾向于招抚义和团，使义和团在森罗殿之役后发展更为迅速。

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法国政府两度照会清政府，要求中国不得将邻近越南的广东、广西及云南割让给其他国家；滇越铁路由法国修筑；中国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中国将来设立邮政局，必须请法国人襄办。闰三月初二日，法国军舰占领雷州附近炮台，进至吴川、遂溪等地，进行要索。清政府无奈，满足了法国的无理要求，从此，云南、两广都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但由于广州湾租借地的具体条件尚需谈判，界址还要勘察，加上当地人民武装抗法斗争，所以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十四日，广西提督苏元春才与法国水师提督高礼睿正式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条约共七款，主要规定：广州湾租给法国，租期九十九年；租界之内全归法国管理，并可设防和驻扎军队；允许法国修筑自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

兴汉会成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夏，孙中山为了在国内发动新的武装起义，派毕永年偕日本人平山周等赴湖南、湖北等地联络哥老会，提出兴中会与哥老会联合反清的建议。毕永年等在两湖活动了月余，返回日本，报告孙中山活动取得显著进展。秋季，孙中山又委派兴中会会员陈少白、郑士良等在香港设立机关，联络会党，与广东反清秘密会党三合会取得密切联系。此时，毕永年等再次到长江流域，在哥老会首领中进行加入共同反清阵线的劝说。十月，联络会党的工作基本就绪，陈、郑、毕等遂以兴中会名义，邀请哥老会、三合会各路首领在香港集会。出席会议的有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毕永年、宫崎滔天(宫崎寅藏)等十余人。会上议定纲领三则，决定两湖、广东、福建一带哥老会、三合会与兴中会结合成一大团体，取名"兴汉会"，歃血为盟，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后，由宫崎滔天携带特制总会长印章赴日送交孙中山，此举具有公认孙中山为反清革命领袖的含意。

朱红灯、心诚和尚就义 毓贤对义和团的招抚政策，使山东西北部义和团迅速扩展。团众四处攻打教堂，驱逐教士，与助教士为虐的地方官府作对，引起了在山东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的极度恐慌。他们纷纷致函各自驻华领事，或直接告到驻北京的使馆，指责毓贤"明知道义和拳在本省存在，规模庞大，声势汹汹"，却把竭力镇压义和团平原县令蒋楷、清军统领袁世敦等人撤职。义和团在当地的迅速发展，四处扰教，实与毓贤的纵容支持直接相关。推请各国领事、公使出面，要求清政府将毓贤革职，永不提用。美国公使康格闻讯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冬之间，数次联合法国公使毕盛，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照会，屡申毓贤在山东的所作所为"是鼓励盗匪"，"要负现在行动的责任"。面对来自外国侵华势力的

压力，毓贤不能不为自己的前程计议。于是他改变了一意主抚的作法，在严查保甲，整顿团练，开导劝说的同时，加强了对义和团的镇压，以改变其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光绪二十五年十月，毓贤指派济东道道台吉灿升督同清军统领马金叙，率军赴山东西北地区保护各地教堂，镇压打教团众。马金叙兵进博平县，在十月十九日夜晚，包围了花园寺，恰巧义和团主要首领朱红灯因伤在此养息，不幸落入清军手中。紧接着，马金叙又以利禄相诱，收买了义和团另一主要首领心诚和尚的外甥，通过他探听到心诚和尚转移到高唐县后杨庄。遂于二十一日夜，率军急赴后杨庄，将心诚和尚俘获。朱红灯、心诚和尚被逮后，激起了广大义和团众的义愤，他们在高唐县义和团首领王立言带领下，向山东西北的多处教堂发起攻击。各国公使因各地教堂遭受沉重打击，再次照会清政府，斥责毓贤镇压不力，强烈呼吁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充任山东巡抚。清政府畏于列强的一再逼迫，不敢继续让毓贤留任，在十一月四日下诏，令毓贤卸任赴京陛见，并依列强所请，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毓贤自感危险临近，又不愿把在押的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留下，增加袁世凯邀功领赏的资本，还幻想通过杀戮朱红灯和心诚和尚，换取清政府的谅解和支持，暂缓列强对他的一味追究。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毓贤离任的前两天，朱红灯、心诚和尚这两位声威卓著的义和团首领在济南英勇就义。

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　山东西北部义和团会众在王立言带领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末十一月初，对禹城县十七座外国教堂连连发起冲击。各国公使认为这皆山东巡抚毓贤纵容义和团之过，更迁怒于毓贤。十月三十日，美国公使照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清政府“立刻给山东一电，立即实行保护外人的方案”。三天后，康格再次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强求将毓贤撤职，改派“能干、勇敢、有胆量”的人来接替。他提出的人选即正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康格在照会中指出：既然毓贤没有充足的武力来保护传教士和镇压义和团，就应该“派一位能干的代替他的职位”，把袁世凯在天津“操练很好的军队调来”，“在该省开创一个新纪元”，清政府迫于威逼，依列强推荐，于十一月初四日，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二十三日，袁世凯率其新建陆军开到济南，二十四日，接任署理山东巡抚。在此后不久，袁世凯便开始了对山东义和团的血腥镇压。

“中国号”飞艇设计完成　谢缵泰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设计“中国号”飞艇，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完成了设计。谢缵泰是广东开平人，同治十一年(1872)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他中学毕业后，随父亲到香港，就读于皇仁书院。学习期间，他对数学和手工技艺兴味颇浓，并喜欢议论时政，与杨衢云等人组织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自任。西方飞艇试制成功的消息传到香港后，引起谢缵泰的极大兴趣，遂从光绪二十年开始自行设计飞艇。五年后，完成了“中国号”飞艇设计。他的飞艇设计以铝为艇身的主要材料，艇身悬在气之下，电动机安装在艇身的后部，带动螺旋桨，作为飞艇飞行的推进器。设计完成后，谢本打算将其献给当时的清政府，但遭到清朝当局的冷遇。谢缵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设计图纸和有关说明寄给了英国的飞艇研究专家，获得了极高的赞赏和评价。

《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刊行　光绪二十五年(1899)，福州索隐书屋刊行《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该书是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脍炙人口的代表作，被译成许多种文字，风行世界，内容为巴黎贵族青年亚猛(阿芒)与巴黎名妓马克(玛格丽特)之间的爱情悲剧。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用他流畅的文言将此书翻译成中文，由福州索隐书屋首先出版。当时译者署的是其别号冷红生。小说刊行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时“风行大江南北”，有“外国《红楼梦》”之称。从此，外国言情小说的翻译蔚然成风，并对中国鸳鸯蝴蝶派哀艳小说的出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中国日报》创刊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月二十五日，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又名《中国报》)创刊，报社社址在香港士丹港丹利街二十七号。报名为孙中山亲定，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意。《中国日报》每日出两大张，分栏编排，内容以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闻和评论为主。《中国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由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战友陈少白担任，协助他经营报纸和负责编辑撰稿工作的先后有王质甫、杨肖欧、陈春生、郑贯公、廖平庵、卢信、陈诗仲、黄世仲、洪孝衷、陆伯周、冯自由等。该报初创时，发表了《中国报序》，阐明其办报宗旨在“欲使中国维新之机勃然以兴”，“使中国之人明外交之道”，“识内治之理”，“知农工商矿之利弊”，“举凡中国旧染污俗又将一洗而新之”，没有直接亮出革命旗号。半年以后，言辞才逐渐趋于激烈，并直书革命字样于报端。此后该报公开提倡民族民主革命，猛烈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报道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介绍西欧、美国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学说。相继发表《解辫发说》、《论民权》等文章，报导了东京革命党人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活动，并全

文刊登章太炎写的纪念会宣言，还发表了要国人警惕俄国侵吞国土的文章《中外关系论》等，被称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在《中国日报》创刊两个月后，该报又办了一个旬刊《中国旬报》，设论说、中外新闻、中外电音、视听录、衡鉴录、党局、鼓吹录（杂俎）等栏目，每期一万二千字。主编由杨肖欧、黄鲁逸担任。旬报于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停刊。

反对建储事件发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虽然禁锢了光绪帝，但仍感到保存帝王名分的光绪对其是个巨大的威胁，企图谋害他。她先是散布光绪帝病重消息，借病做文章，置光绪帝于死地，因英国公使窦纳乐等警告，并派外医入宫诊视，未能得逞。事隔一年，慈禧太后又宣称“帝久病不能君天下”，准备废立。她密电地方各督抚，以自家威严压地方大吏附和。但遭到地方大吏的反对，刘坤一在复电中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李鸿章亦劝告后党不可操切行事。在海外的康有为，鼓动保皇党华侨纷纷发电国内，“请皇帝圣安”，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梁启超则利用《清议报》为光绪帝大唱颂歌，猛攻后党丑恶行径，又一次阻止了慈禧太后去光绪帝的阴谋。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荣禄向慈禧太后献计，请“立大阿哥”为同治帝载淳子嗣，“徐篡大统”。光绪二十五年(1900)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召王公大臣、满汉尚书集议于仪鸾殿，逼迫光绪帝下诏，宣布以病先退，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预定于庚子年元旦(1900 年 1 月 31 日)光绪帝行让位礼，改元“保庆”。此事公诸于世后，慈禧太后命人运动各国公使入宫祝贺，不料各国公使不仅不贺，还放风绝不承认新皇帝。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闻讯，立即鼓动上海绅商名流一千余人，于二十六日联合发出保皇通电，恳请光绪帝“力疾临御”，坚持亲政。此后，各地阻止建储的通电、公告，雪片般飞往北京。清廷下令捕捉经元善，而经在英国的帮助下逃往香港。在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联络华侨号称十万之众，通电国内，揭露建储阴谋。加上当时京城中盛传外国军舰集结于北洋海面，慈禧太后及其党羽被迫搁置建储计划。

励志会成立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由部分留日的中国学生组成的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会在日成立。会员约四十余人，由戢翼翚、沈翔云等任干事；主要骨干有曹汝霖、章宗祥、吴禄贞、傅慈祥、秦力山、杨廷栋等。该会初建时，“尚无革命与不革命之分”。曾定立会章五条，“不外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国家别无政见”。该会成员初期倾向维新，但又与孙中山革命党有所接触。自立会谋划起义时，许多会员回国参与自立军活动，傅慈祥等会员死于起义。起义失败后，戢翼翚、沈翔云等返回日本，开始远康、梁，而近孙中山，并创立《译书汇编》和《国民报》等刊物，革命色彩逐渐浓厚。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励志会进入最兴盛期。是年六月，清廷推行新政，有“酌用东西洋各国留学毕业生”之议，励志会遂发生分化，激进派戢翼翚、沈翔云、秦力山等走向革命，而章宗祥、曹汝霖等投靠清廷，励志会旋解体。

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 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后，即准备以镇压山东人民反洋教斗争，报答外国使团对他的赏识。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二十八日，肥城县大刀会群众，杀死了路过当地的英国牧师卜克斯。袁世凯夸大案情，判处二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二人有期徒刑，并将肥城知县撤职。他还向当地人民勒索白银九千两和五亩空地给教会，罚出事地点群众白银五百两，“在卜克斯被害处立碑”。为了镇压山东义和团，他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奏请清廷允许他扩充新军马炮步队二十营，增立一军，称武卫右军先锋队，后又新募马步八营。扩军之后，袁世凯对山东各地仇教打教的义和团开始了血腥屠杀。平阴县邢兆陆、邢兆复兄弟为首的义和团，高密县孙文为首的义和团，茌平、高唐一带王立言为首的义和团，博平、清平、夏津、邱县一带王玉振、徐福为首的义和团，陵县、临邑、禹城一带李传和、王立东为首的义和团，冠县阎书勤、高天祥为首的义和团，乐陵、海丰一带孙洛泉为首的义和团，均遭到袁世凯军队毁灭性的打击。到四、五月间，王玉振、王立东、孙文、徐福、孙洛泉等义和团首领先后牺牲，义和团十余部均被袁军扑灭，残存的义和团只能忽聚忽散潜伏活动，或转入直隶。由于袁世凯的屠杀，使本来仇教打教的义和团“今复仇官”，他们愤怒地发出“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呼声。袁世凯为此寝食不安，为防人刺杀，以致“于卧室外密护铁网”。

直隶义和团运动日趋高涨 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冬间，直隶省即有义和拳活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山东省义和团运动兴盛之际，直隶省民众或到山东“学拳”或请山东师父来“授拳”，反洋教斗争随之高涨。直隶省南部和东南部的大名府，冀、深两州，河间府三个地区的义和团，多次攻击焚烧教堂，并与前来镇压的官军对抗。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十分恐慌，派贵州提督梅东益、道员张莲芬率清军攻剿三地区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由于袁世凯的血腥屠杀，山东部分义和团转入直隶。由于两省义和团的沟通和联络，加强了直

隶义和团的力量,促使直隶义和团运动从南部向中部扩展。三月二十二日,义和团焚毁清苑县姜家庄教堂。定兴、涿州、新城、易县等地义和团,闻讯纷纷前往支援。他们“或十数人一起,或二三十人一起,壮丁幼童皆有。持长枪者十之七八,持腰刀手袋者十之二三,持鸟枪者甚少。或腰红带,或蒙红巾,目不旁视,鱼贯而行”,“街市官署,无敢过问”。法国天主教驻京大主教樊国梁写信给裕禄,要求对直隶义和团“不分首从,尽法惩办”。四月二十四日,裕禄派张莲芬、练军分统将杨福同率军驰往涞水镇压。杨在涞水肆意砍杀,激起众怒。团民遂于定兴县石亭设伏,将杨及所部马、步队七十余人击杀,残兵溃逃。义和团乘胜追击,于二十九日占领涿州县城。一时间,涿州团民达二、三万人,黄巾、红带者,城厢内外皆满。为阻止裕禄调兵镇压,义和团焚烧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车站,折毁铁路百余里及沿途桥梁、电杆,使芦保、京津铁路中断,裕禄无力控制直隶局势。五月初二日,清政府命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严拿匪首,解散胁从”。初三日,又命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直隶总督严饬地方官统带各员合力镇压义和团。裕禄急派提督聂士成率部往保定镇压,但遭义和团阻击和困扰。义和团运动遂在直隶日趋高涨,以至北京外围郊县“村村皆有”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兴起 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季,天津地区开始出现一些义和拳的群众性活动。秋季以后,天津西郊、南郊义和拳的活动明显增多。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义和拳公开亮出义和团的旗号,在天津城内,活动更加公开化,他们“痛诋洋人,仇视教民”。二月初,义和团匿名揭帖贴遍天津,号召拳民于三月初一日起事,攻打天津的外国租界。二、三月间,天津城内外,时有幼童、青年演练义和拳,又有青少年妇女演练红灯照,不少清兵亦参加义和团,声势日渐高涨。天津地方当局对义和团的公开活动十分不安,认为“必酿巨祸”,从直隶总督裕禄到天津知县阮国祯,最初都主张对义和团加以查禁和镇压,正在这时,迅速流传的著名揭帖《只因鬼子闹中原》在天津城内出现。揭帖道出了义和团出现的原因、斗争方式及其目的:“助神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神发怒,佛发烦,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独念咒语说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路,拔电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法、俄势萧然。洋鬼子,全平完,大清一统太平年”。进入四月,天津已是拳坛林立,其中以庞维(庞围)、林黑儿(黄莲圣母)两支最为著名。为赶制武器,业冶铁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相继。清地方官府曾出告示禁止冶铁,拳民闻讯,纷集县署,逼官驰禁,官方被迫从之,冶铁锻刀者遂遍街巷。五月十二日,安次县义和团乾字团,首领杨寿臣率数百名团民进入天津。接着,静海一带义和团著名首领曹福山率数千乾字团团民入津,五月下旬,有“天下第一坛”之称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又率七千团民进驻天津,裕禄失去对天津的控制。从进入五月以来,天津义和团已开始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战斗,他们首先与在大沽登陆的外国侵略者开战。五月初六日,独流镇团民与俄国哥萨克马队冲突,团民死二、三十人。初十日,义和团在天津郊外又与侵略军发生了战斗。此时,天津租界内已进驻联军三千余人,他们开始炮击义和团。十八、十九两日,天津义和团焚毁城内教堂八处。二十日,俄军用机枪扫射前往天津火车站的义和团,三四百名团民死亡。二十一日零点五十分,法、英、俄等国联军从海面和炮台后侧同时猛攻大沽炮台,天津镇守总兵罗荣光率守台官兵奋勇还击,激战六个多小时,打死打伤联军一百三十余人,击伤敌舰六艘,但北洋海军统领叶祖珪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守台将士被迫放弃炮台。从此,法、德、英、俄、日等国联军纷纷从大沽登陆,进入天津,天津义和团开始了抗击联军的更英勇的战斗。

各国公使要求清政府剿灭义和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二十一日,各国驻华首席公使、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将法国主教樊国梁写给法国公使毕盛的信交各国公使传阅。这封信中说:义和团的主要目的是要消灭欧洲人,北京现已被拳民包围,教堂和教士已处在当年天津教案前夕的险境,请派海军陆战队前往北京加以保护。翌日,在毕盛的请求下,葛络干召集驻京公使团会议。会上,毕盛吁请各国公使重视樊国梁对形势的估计,建议各国调兵来京保护使馆和教堂,并联合照会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有力的屠杀政策。英国公使窦纳乐则认为,调军来京,反而会激怒义和团,主张先采取联合照会清政府的方法。窦的建议得到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支持,遂议决联合照会清政府剿灭义和团,若五日内得不到圆满答复,再提请各自政府批准调动军队登陆或组织海军示威。四月二十三日,葛络干代表各国公使将联合照会交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要求清廷:下令将继续活动的拳民及其首领“一并正法”;将给拳民提供住房和集会场所的人“一并收监”;将纵容、帮助和指点拳民的人“尽数诛戮”;将拘办拳民不力的官员“概

行惩处”，并将此措施布告北京、直隶及北方其他各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第五天复各国公使，清政府与各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并正在草拟严厉镇压义和团的上谕。各国公使对总理衙门的回复十分不满，于四月二十八日晚，再次召开公使会议，议决由窦纳乐和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面见总理大臣奕劻，说明各国要求，如果仍得不到满意答复，将立即调兵进京。奕劻在第二天接见了窦纳乐、格尔思，明确表示义和团不仅反对友邦，也反对政府，是国家的敌人。清政府正在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护使馆和教堂，他本人亦“愿意亲自，承担对所有外国人的保护”。奕劻的态度，安定了公使们的情绪，公使们遂决定再等待一天，观察清方行动，然后再议是否调兵入京。

慈禧太后决定招抚义和团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季以来，直隶、天津一带的义和团日趋活跃，并陆续进入北京。北京的义和团活动亦由近郊地区向城内中心地带扩展，焚烧教堂，打杀教民及与外国使馆卫队的冲突日益频繁，各国使团一再威逼清政府予以镇压。对此，清朝统治集团内剿抚对垒分明。端王载漪等为使溥儁早日继位，其集团人员更加飞黄腾达，主张利用义和团，与扶保光绪皇帝的列强抗衡。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诸大臣许景澄、袁昶、联元等与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相呼应，认为招抚义和团，授列强以入侵口实，将使中国蒙受更大损失，坚决主剿。慈禧太后忌恨列强干政，倾向于借义和团之手泄私忿；但又怕列强大兵入境，颠覆其统治。由于她的动摇不定，在四、五月间发布了一系列有抚有剿，自相矛盾的谕令。五月初十日，慈禧太后派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前往涿州，劝散和察看义和团，以便最后决定对义和团是剿是抚。涿州一带义和团首领李来中表示，义和团“实为教民欺压，团练学艺，为各保身家之计，并不敢抗拒国家”。从官中到地方，有为数甚多的官吏，因痛恨列强的对华侵略，同情和支持义和团抵抗外侮的爱国举动，也纷纷要求清廷对义和团采取招抚政策。载漪等人倚仗其在清政府中的实力地位，利用国内舆论的支持，在朝廷内逐渐占了上风。刚毅回京后，将涿州及直隶其他地区义和团活动的情况，向慈禧太后报告，谓义和团人数甚众，且山东、直隶一带“无处无之”，因此“宜抚不宜剿”。慈禧太后在载漪等人的影响下，坚定了主抚的决心。五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皇宫，当晚就召集亲信会议，“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荣禄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人“不以为然”，但他们胆小怕事，不敢得罪端王。载漪等人基本上控制了会议，使慈禧太后决定招抚义和团，暂时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其进入北京城，当义和团从十七日开始大规模焚烧教堂时，也未加以干涉。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发布对外宣战谕诏后，同时颁布了招抚义和团谕诏，称义和团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令各省督抚招抚义和团，“如能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必能得力”。又命英年、载澜会同刚毅统帅京师、天津一带团民，将直隶各州县被捕团民一律释放，并发放粳米赏银支持义和团。义和团被奖为“义民”后，各地义和团普遍树起“奉旨义和团”旗帜，向清政府登记挂号，接受招抚，“扶清灭洋”的口号响彻北方地区。

义和团在廊坊抗击联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上旬，开进天津租界内的各国联军已逾二千人。五月十一日前后，各国驻华公使被授予武力镇压义和团全权。他们立即要求在津的各国部队向北京进发。五月十三日，八国联军正式组成后，制定了夺据天津，由铁路进犯北京的计划。次日，联军中统帅英军中将西摩率联军二千余人，分三批由天津乘火车北进。消息传到北京，董福祥率领的清兵甘军迅速控制了北京车站，准备迎击联军。十五日，前往火车站迎接联军的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甘军射杀。在联军开往北京的途中，沿铁路线的义和团及民众破坏了铁路，随处拦击侵略者。联军只得边与义和团及民众作战边修路行进。第一天只走了四十多公里，第二天走了十六公里，第三天则进军不过五公里。当联军到达廊坊时，被蜂拥而来的义和团及民众包围。这些团民和民众直扑联军，英勇无比，其中多数为少年，联军开枪射击，团众死亡惨重，但仍前仆后继。附近村庄团民闻枪声纷纷赴往战场，使联军被团团围困在廊坊。十八日，联军突围北进，团民则继续围堵，奋不顾身，直逼火车。他们面对来福枪和机关枪的扫射，毫无惧色，勇猛前冲。同日下午，义和团又猛攻京津路上已被联军占据的落垡车站，迫使西摩派部分联军回援。这一路联军被包围在廊坊和杨村之间，前后两端的铁路都被拆毁，火车无法行进。联军进退失据，供应断绝。二十日，西摩率领部分联军退到杨村，企图改由运河水路北犯。二十二日，数千义和团团民和二千余甘军将士向廊坊的联军发起猛攻，激战两个多小时，毙伤侵略者五十四人，残余之敌被迫全部退至杨村。当日夜晚，义和团和甘军袭击杨村，联军又伤亡近四十人。在义和团和甘军的围击下，联军“进京之路，水陆俱穷”。二十三日，西摩无力北犯，遂率部从杨村由水路逃往天津，

沿途继续遭到义和团和民众的袭扰和打击，伤亡惨重。二十七日，联军退至西沽，夺占武库，随即又被清军和义和团围住。直到三十日，大队联军赶到，才使被围的联军退回天津。这一被称为廊坊之战的战役，联军被击毙六十二人，伤二百二十八人。事后，联军统帅西摩心有余悸地说："义和团所有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

义和团运动在北京进入高潮 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冬间，北京郊县即有一些青少年暗中习练神拳。随着山东、直隶义和拳运动声势的扩大，北京义和拳活动也逐渐由远郊僻静处向中心地带发展。先是北京城邻近郊县拳民，开始进入北京城近郊。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间，城内东单牌楼西裱褙胡同于谦祠堂内，出现了城中心地区的第一个义和团坛口。景山后墙外空地，此刻亦成义和团练拳最活跃的场所，"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入四月后，北京义和团团民中纷纷传言，说是在西郊温泉山煤洞中，掘出一块明代刘基(伯温)预言石碑，碑文有"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趋炎附势，肆虐同群"；"红灯夜照，民不迷津"；"义和明教，不约同心"；"待到重九日，剪草自除根"等语，依此碑文，义和团团民准备在九月初九日起事，击杀洋鬼子。五月初，冀中和顺天府属各州县团民不断涌入北京，北京义和团声势更壮。五月十二日，义和团在北京外城示威，高呼"杀洋鬼子"，群情激奋。十三日，清政府调董福祥甘军入京，驻扎天坛。义和团首领李来中派人前往活动，使甘军士卒加入义和团者超逾五百，其中以虎神营、神机营中士卒最多。甘军中的满族将士，几乎都参加了义和团。十四日，清廷中主张招抚义和团的一派得势，慈禧太后亦下招抚决心，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默许其入京。从此，京外义和团团民昼夜鱼贯进入京城，日以千计，到处设立神坛拳厂，北京城顿时成为义和团的世界。义和团有宫中贵族支持，甘军响应，威力更大，以致扬言"愿得一龙(指光绪皇帝)二虎(指奕劻、李鸿章)头"。不久，"京师里九外七各城门，皇城各门，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门，均派义和团民驻守"。端王载漪等甚至带领数十名卒义和团团民入宫，查验二毛子(指教民)。五月十七日，北京的义和团开始焚烧教堂，搜杀教民。慈禧太后又感到"京城内外，扰乱已极"，于十八日下诏："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着步军统领衙门迅饬派出弁兵练勇，严行查拿，将首要各犯悉数务获惩办，并解散余党"。十九日，慈禧太后召李鸿章、袁世凯入卫。二十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向西什库天主教总教堂发起猛攻。此时，进入京城使馆的联军先遣队士兵组成巡逻队，经常上街击杀义和团民，各国使馆官员亦参与其间。十九日，他们杀戮义和团民近百人。德国公使克林德，比利时公使姚士登等，均多次带兵捕杀义和团，杀害团民数十人。由于联军先遣队经常以使馆为据点，攻击枪杀义和团，激起了义和团民的极大愤慨。于是，义和团与董福祥甘军一道，于五月二十四日，对各国驻京使馆发起围攻。克林德等人亦于当日，被虎神营士兵在东单牌楼击毙。围攻战持续了五十六天，团民们奋不顾身地进攻战，把北京的义和团运动推入高潮。

清政府对各国宣战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宣布对各国开战。光绪二十六年入春以后，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以及各国列强的出兵危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义和团是抚是剿，对列强是战是和的分野也更为清晰。京官以太常寺卿袁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吏部侍郎许景澄为首，封疆大吏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为首，力主不与列强开衅，严厉镇压义和团。而后党集团的王公大臣，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为首，主张招抚义和团，以为其用，直至对列强宣战。载漪是诏立大阿哥溥儁之父，徐桐为溥儁的老师，刚毅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并一直怀有与荣禄争拥待之功的心思。他们对列强扶保光绪皇帝充满怨恨，企图借"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武力解决废立问题，使溥儁早日登基。慈禧太后对列强干预朝政亦忌恨在心，且摄于义和团声势，恐强行镇压会激起事变，危及其统治；但又怕招抚义和团导致列强出兵，后果堪虑。于举棋不定中，她连续四次召开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剿抚和战。五月十二日下午，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以载漪为首的和以袁昶、许景澄为首的两派展开激烈争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各支持一方，没有结果。同日，慈禧太后命刚毅、董福祥募拳民精壮者成军，"折冲御侮"，其余遣散。载漪等为促使慈禧太后不改变主抚政策，下决心不与列强调和，于当晚伪造了一份列强"归政照会"，其中一条为"勒令皇太后归政(光绪皇帝)"，派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于午夜呈交荣禄。荣禄见照会信以为真，绕屋疾走，终夜徬徨，黎明急报慈禧太后。慈禧见后大怒，不问真伪，即于下午再次召开御前会议，高叫"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遂遣徐用仪、立山、联元至各国使馆，劝阻联军入侵；各国若必欲开衅，可即下旗归国。与此同时，命荣禄率武卫军备战；并以"民教寻仇，京城内外，扰乱已极"，命各省督抚派兵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十三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的电奏到京，坚决反

对对外宣战，力主镇压义和团。主和派见有封疆大吏声援，袁昶即于二十二日上《急救目前危局折》，奏称局势危迫，亟图补救，坚持主和。慈禧太后遂又召集大臣会议，强令众臣通过宣战，但不立即发布宣战之诏。又命王文韶、立山、许景澄再往各国使馆，劝阻联军勿犯北京。二十三日，大沽失陷战报到京，午后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强行决定对外宣战；命许景澄照会各国使馆，限二十四小时内离京，由清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二十四日，慈禧太后撇开光绪皇帝，独自召集枢臣会议。会后发布紧急谕诏，称洋兵聚集津沽，中外衅端已成，令各省督抚联络一气，共挽全局。二十五日，清政府正式颁布宣战谕诏。同时还谕各省督抚招集"义民"组团，借御外侮。

八国组成侵华联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初一日晚，义和团焚烧丰台火车站的消息和京津铁路轨道均被拆除的谣言，同时传到东交民巷。各国公使感到形势急剧恶化，立即举行会议，一致"同意不失时机地调来卫队保护各国使馆"。会后，葛络干代表各国公使向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照会，声称"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公使已经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提供运输便利"。与此同时，各国公使又分别电请各自政府立即派兵进驻北京。法国公使则在召开会议之前，已经向本国发出请兵电报，英、美、俄、日等国公使也在会议之前，即把军舰调往大沽，并通知做好登陆准备。初二日，驶抵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先后接到奉命进京的电报，并迅速派出陆战队，由海河乘船到达天津，准备向北京进犯。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感到各国派兵进京事关重大，于初三日拒绝了各国的要求，直隶总督裕禄亦秉旨传令，不准外国军队乘火车进京。各国公使闻讯后，推英、俄、法、美公使前往总理衙门，威胁说各国调兵进京决心已定，若中国政府提供便利条件，各国将派少量军队，否则将派大军强行赴京。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迫于列强威逼，命令总理衙门同意各国调兵入京，但每一国派兵不得超过三十名，一旦恢复平静应立即撤离。初四日晚七时左右，三百三十六名英、俄、美、日、法、意侵略军率先乘车到北京。五月初六日，八十名德、奥侵略军也到京，这些部队实为八国联军的先遣队。此后，各国舰队陆续在天津大沽口外集结，各国政府亦纷纷电告这些舰队的统帅，可根据形势的变化，与其他各国军队协调，采取军事行动。五月上旬，进入天津租界内的各国军队已达二千人。五月十三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电告在天津的英军统帅西摩中将，北京形势严峻，迅速带大队英军向北京进发。同时，各国驻津领事和海军统帅在英国领事贾礼士请求下举行会议，在美国领事的撺掇下，会议决定将在津的八国现有兵力组成进军北京的联军；由在津军队中级别最高的西摩为统帅，美国的麦卡加拉上校为副统帅。八国联军遂在此日正式组成。

《东南保护约款》议订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间，北方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英国政府很担心这场斗争蔓延到英国势力范围内的长江流域。而东南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封疆大吏，亦不希望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东南，引起列强的入侵和战乱，使其利益蒙受损害。于是共同酝酿一个互相保护的方略。五月十八日，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华伦致电国内，建议英国政府尽快与清湖广、两江总督取得"谅解"，帮助他们在辖区内"尽力维护秩序"。二十日，英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复电，授权华伦通知张之洞、刘坤一，英海军将支持他们维持秩序。翌日，英国驻汉口领事与张之洞商议长江流域治安事。张之洞表示他与刘坤一皆极愿与英联络互相保护之事。英国单独行动引起列强的不满，为防止英国一方势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扩张，其他列强亦要求参与互保活动。经督办铁路事务、东南众多企业的大股东盛宣怀的牵线联络，由刘坤一、张之洞主盟，有李鸿章、袁世凯极力支持的东南大吏，与以英、美为主的各国列强就互保问题进行商议。正在商议期间，慈禧太后关于"宣战""招抚"的决定，由荣禄于五月二十五日密传给李鸿章。盛宣怀得悉后，恐因此影响互保谈判，建议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将此谕隐匿不发。刘、张见宣战上谕后，感到互保一事有关逆旨，颇为犹豫。盛宣怀遂电告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陈说利害，指出不速订互保协议，则江南糜烂，局势更难收拾；又派沈瑜庆赶到南京，会同东南实业巨人张謇一道向刘坤一"再为陈说"，劝其坚持互保宗旨。张謇以"无朝廷不足以存东南，因名分不够；无东南亦不足存朝廷，因财政粮饷出于此"相告，指明保东南即保朝廷，使刘坤一决意承当东南互保牵头人。同时，沈曾植也说动在汉口的张之洞。刘、张均以为盛宣怀主张"思虑周密"，要求盛宣怀帮助上海道加快互保谈判。并电令上海道余联沅在盛指点下与各国领事紧急会商。刘、张还与李鸿章相约，凡五月二十四日以后的上谕概不奉行。经过一番商议，迅速拟成了互保约款，并安排了谈判技术细节。五月三十日，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共同会议，盛宣怀以两江、湖广地区公请帮办身分出席。当日议定《东南保护约款》九条，《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前者规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由督抚切实保护。后

者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上海道协助维持地方治安。为扩大互保地区，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分别致电东南各省督抚，请其赞助并参加。李鸿章首先表示全力支持；山东巡抚袁世凯随即仿照东南各省实行互保；闽浙总督许应骙于六月十八日与英、美、俄、日等六国订立《福建互保协定》。互保范围由苏、赣、皖、鄂、湘扩大到浙、闽、粤、川、陕、豫、鲁等十多省。东南互保约款均没正式签订；但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其各项条款均付诸施行。

清政府向列强求和 慈禧太后凭多年的统治经验，深知得罪了各国列强，一旦战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颁布对外宣战及招抚义和团诏书后，反而更加不安。一方面义和团在奉旨组团后，队伍迅速扩充，阻击联军，攻打教堂、使馆愈演愈烈，使慈禧太后产生“祸起肘腋”之忧。一方面是清政府收到一系列照会，均声称派兵入华，只为弹压义和团及一切阻拦联军赴京者，并不针对清廷。且经查明，各国并未发出“归政照会”，所谓归政照会系伪造的，使慈禧太后感到列强不逼迫其归政，则不存在来自列强的威胁，因此必须尽早就宣战一事取得列强谅解。另一方面，在宣战谕诏发出后，主和派并未停止求和活动，东南封疆大吏亦纷纷批评匆忙宣战，转战为和的呼声又渐高涨。再就是宣战之后，清军并未能有效地扼制联军进犯的势头，大沽失守，联军步步向北京进逼，更促使慈禧太后很快就改变宣战的态度。五月二十九、三十两日，慈禧太后连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致电，表白宣战不得已的苦衷，说明招抚义和团乃被逼采取的临时措施，并“仍尽力保护”使馆，试图通过封疆大吏，将她这求和信息传给列强。六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又通过清驻外公使直接告白于列强：“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指义和团)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将两省教士教民使无遗类”，这才不得已进行招抚。还自甘下贱地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并向列强保证：“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六月初七日，清政府命驻俄、英、日三国公使向所驻国呈送国书，再次将宣战的责任推在义和团身上，求三国“暂弃小嫌，共维全局，”向其他各国疏通，“排难解纷”、“挽回时局”，结束战争。随后于六月十三日，授李鸿章以全权名义，令他与各国协商，准备乞和。

义和团攻打紫竹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五月间，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各国纷纷将战舰集结到天津大沽，遂派遣一批批海军陆战队登陆，进入在紫竹林的租界。各国联军进入租界后，即与租界地内武装起来的人员相配合，以租界为据点，不断地攻击和枪杀义和团民和当地民众。五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占据大沽炮台后，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立即分数路围攻紫竹林租界，进行反击。联军为了控制海河，企图占领河东武备学堂，学堂内爱国学生奋起抵抗，联军久攻不下，放火焚烧房屋，使储藏军火爆炸，数十名学生壮烈牺牲。义和团闻讯赶到，经战斗，迫使联军退回租界。五月二十四日，二千余联军从塘沽开往紫竹林增援。义和团在其途经的浮桥两端截击，打死打伤联军近百名，其中包括一名德国将军。攻打紫竹林的战斗中，以老龙头火车站战场最为激烈。该站地处交通枢纽，是租界北面的门户，有俄军一千七百余人驻守。天津义和团著名首领曹福田率数千团民及清军，对老龙头车站发起猛攻，在义和团潮水般的冲击下，打得侵略军“皆高挂白旗，以示不战”。但曹福田仍率团民攻打不休，西方记者云：俄军“竟死伤有五百名之多”。六月初一日，曹福田给租界联军下了道战书，指出天津市内人烟稠密，交战伤及百姓；而天津东郊“有旷野，堪作战场”，要求侵略军“定准战期，雌雄立见”。翌日，义和团著名首领张德成率“天下第一团”进入天津。六月初三日，即投入攻打紫竹林，激战数小时，一度占领火车站。六月初六日，张德成又率团从马家口冒死猛攻租界。为冲破侵略军的地雷封锁，张大摆“火牛阵”。团民以火牛开路，冲入租界区，杀死杀伤许多侵略军。直至六月十八日天津失陷，义和团和清军围打紫竹林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一个月，毙伤大量联军，使得侵略者“狼狈不堪”，“相对而泣”。

英国策划李鸿章据两广独立 北方义和团运动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季进入高潮后，英国政府为保护其在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已经攫得的权益，一方面拉拢清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酝酿东南互保协定；一方面又企图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脱离清政府，据两广“自主”。四、五月间，香港立法局华裔议员何启，在香港总督卜力授意下，草拟《平治章程》，建议兴中会与李鸿章合作，据两广独立。他还亲与兴中会骨干陈少白密商，准备请孙中山帮助李鸿章组织“独立”政府。李鸿章幕中要员刘学询函邀孙中山赴广东“协同进行”。孙中山得讯后，有些犹豫，据以往对李的了解“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又觉得“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遂决定“分头办事”。孙一方面加紧准备在广东组织第二次武装起义；一方面偕杨衢云、郑士

良、宫崎滔天(宫崎寅藏)等去广州与李鸿章商谈合作。在五月十五日途经香港时,孙得知李鸿章尚在观望北方形势,且有诱捕自己的企图,改派宫崎滔天、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三名日本人前往广州谈判。宫崎滔天等到广州后,与刘学询商议,议定保障孙中山生命安全,借款六万元为双方合作条件。刘经李鸿章同意后,先付款三万元。六月十六日,清政府诏令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次日,香港总督卜力致电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谓李鸿章北上经港时,拟允孙中山到港与李商谈合作。索尔兹伯里复电,谓英政府对孙中山五年驱逐令未满期,不许卜力向李鸿章谈与孙中山合作事。六月二十日,孙中山到香港海面,香港警署以五年驱逐令未满期,不准登岸,合作会商未能进行。六月二十一日,李鸿章离粤准备北上,英国遂放弃拥李据两广独立计划,兴中会与李鸿章合作尝试亦告流产。

天津沦陷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一日,大沽炮台失陷后,天津义和团及清军即开始攻打紫竹林,天津战役由此爆发。六月初一日,义和团著名首领张德成率"天下第一团"五千余人入津,参加战斗。清政府鉴于驻津清军势单力薄,聂士成部武卫前军仅十营驻津,遂急调马玉昆、宋庆驻山海关军队往津增援。在津清军也加入了攻打紫竹林的战斗。聂士成部为清军中战斗力较强的新军,在租界与联军恶战十余次,斩杀敌军比其他各军都多。但各国联军从大沽源源进入天津,至五月底六月初,紫竹林内联军已逾一万四千人,且有野炮五十多门,机枪三十余挺,战斗力大为加强,六月初三日,领事团将战守事宜移交联军,加强了军事指挥。十三日,租界联军分路向天津西南郊进攻。六千余联军在纪家庄屠杀团民群众上千人,随后扑向驻守八里台的聂士成部,将其团团围住。聂士成率将士与敌军激战两个多小时,伤亡严重,复以弹药不继,遂奋力突围。但由于联军炮火猛烈,"聂军几无一生者,惟见尸身仆于血泊中"。聂士成左右腿均被击中,仍身先士卒,奋臂驱马向前杀敌,身上又中弹多处,"腹破肠出,犹挥军前进",不料,头部连中两弹,遂壮烈牺牲。聂士成死后,清军失去统帅,天津防御力量急剧衰退。十四日,新任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接手天津战事。他伙同马玉昆大肆屠杀义和团。在攻打租界时,义和团的先锋,宋、马却令清军在背后枪杀团民。十七日,侵略军对天津发起攻击,宋庆不思迎敌,反"下令军中,痛杀拳匪",半日之间,城内神坛多被捣毁。义和团接受招抚后,对清军毫无戒备,结果被戮数千人,以至无人守城巡街、盘查奸细。宋庆屠杀义和团后,护送直隶总督裕禄等逃到杨村,马玉昆逃往北仓。坚守天津城的义和团及练军,虽兵力单薄,仍顽强抵抗。十八日凌晨,日军扮团民赚开天津南门,用炸药炸毁城墙,联军大批涌入,守城军民与敌展开肉搏。张德成、杨寿臣等义和团首领虽负伤仍率众杀敌,后抵敌不住,撤出天津。练军守备宋春华等多人战死在城墙上。这一战毙伤联军七百多人。侵略军攻陷天津后,在城中心鼓楼架炮,向逃难人群轰击,使城内鼓楼至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联军连日屠杀,使海河上漂尸阻塞了河流,城内死人满地,房屋无存。官署、钱庄、商店、工厂、仓库、民宅,均被抢掠一空。仅长芦盐务署一处,被日、美侵略军抢去的白银,就可堆成高宽各三十英尺的银山。造币厂的几百吨存银,被俄军抢光。二十六日,由列强主持的天津都统衙门成立,对天津、静海、宁河等地实行殖民统治。俄国率先在占领区强行成立俄租界,占地达五千九百多亩。各国纷起效尤,已占有租界的英、法、日、德则乘机扩大地盘;未占有租界的意、比、奥也各占一块,形成各国列强分治天津的局面。

俄军制造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血案 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位于黑龙江省瑷珲县黑河镇北岸,本是中国的一个居民村。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将其割占,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当地居民多为世代生息在那里的中国人,以做工经商为生。为了永久地拥有这块土地,俄国蓄意对这里的中国居民进行血腥屠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中旬,俄方通知当地中国居民说:中俄已经开战,要把他们送往黑龙江对岸,各家不许闭门上锁。六月十九日下午,俄军突然封锁黑龙江,扣留所有船只,不准中国居民过江。二十日,俄军四处搜捕中国居民,随后将被捕者关押在警察总部,后转移到结雅河边一个木厂的院子里。从二十一日开始,俄军出动大量骑兵、步兵,将被捕的中国居民分成四批,最多的一批有三千余人,驱赶到黑龙江畔。途中走不动的、掉队的,均被俄军砍死或枪杀。人群到达江边后,俄军强逼着他们泅水渡江,许多人被迫投江,结果溺水而亡。俄军对不愿下水的人,先是开枪扫射,后又由马队冲入人群,恣意劈砍,使得江畔尸体纵横,江中"骸骨漂溢"。泅水到对岸逃生者,仅八十余人,直到二十四日止,被残杀淹死的海兰泡居民则超越五千。当俄军向海兰泡居民举起屠刀的同时,还血洗了江东六十四屯。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东岸,从瑷珲县黑河镇对岸的精奇里江口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勒津屯对岸的一段土地。中国人民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历史上曾有六十四个中国

居民村落，因此得六十四屯之名。当地聚居着两千多户汉、满、达斡尔等族中国居民，共有一万多人，历来属瑷珲副都统管辖。从六月二十一日始，俄军几次冲进这块中国领土，大肆残杀劫掠。他们将在各屯拘捕的中国居民，赶入一间大房子里活活烧死。其余中国居民被迫逃离家园，哭号于江滨。瑷珲副都统凤翔部清军，虽于六月二十一日渡江击退俄军，护送五千多中国居民过江。可经历这番残杀、焚烧和掠夺，中国民众惨死七千余人，财产损失合三百多万银元。此后不久，俄国竟宣布江东六十四屯归俄国管辖，不准已经逃离的中国居民重返家园，从此将这块中国领土强行霸占。

俄国侵占东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俄国侵略军占领中国东北。先是同年夏天，由于义和团反侵略斗争的高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合谋组织联军，进入中国境内镇压义和团。俄国政府一面派兵参与进军北京的联军；一面借口保护正在修筑的中东铁路，调集十七万大军，兵分六路入侵东北。第一路从伊尔库次克和外贝加尔攻入海拉尔，经呼伦贝尔，越过大兴安岭，进逼齐齐哈尔。第二路由海兰泡进攻瑷珲，七月初十日入城后，屠杀中国民众一万五千人，并纵火烧城，使这座古城化为废墟。该军又经墨尔根，与第一路俄军于七月末抵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八月初一日，黑龙江将军寿山派营务处总理程德全与俄军商议停战，定约俄军不攻省城，俄军可出入省城。三天后，俄军单方面毁约，突然发起攻击。齐齐哈尔随即陷落，寿山以死殉职。军用物资及饷银三十余万被侵略军卷走，库府财物、书籍档案亦被席卷一空。第三路由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进攻三姓、哈尔滨。第四路由双城子(乌苏里斯克)攻入绥芬河，经牡丹江向哈尔滨挺进。第五路由海参崴出击，直趋珲春，占领宁古塔后，进军吉林。吉林将军长顺派人乞和，八月初一日，与俄方签订降敌"和议"，约定"两军相见，以白旗先，各不开枪，让道而行"。俄军军需粮秣均由当地供给，清军一律缴械，银库、军械由俄军看守。俄军入吉林省城后，拆毁制造军火的机器局，抢走造币厂的大量存银。第六路从欧洲由舰船载至旅顺登陆，进攻盖平、营口、辽阳、奉天。参与八国联军的部分俄军，还从关内经山海关，攻占了锦州。闰八月初八日，俄军进占清王朝的发祥地盛京(今沈阳)。十月下旬，东北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全部沦陷。在俄军侵略东北的整个过程中，有大约二十余万无辜的中国民众在侵略者的屠刀下丧生。

惠州爆发起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十五日，郑士良、黄福等在惠州起义。先是同年五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在香港与兴中会员举行会议，共同研究在广东组织起义的准备。会上议决"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日本诸同志则留港助杨、陈、李等办事"。六月二十日，孙中山再抵香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惠州发难指挥权交郑士良；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陈少白、杨衢云负责接济饷械；毕永年赴长江流域联络会党。郑士良联络潮州、惠州、嘉应各属会党和绿林首领，集合于惠州归善三洲田，等待香港方面运来枪械，即行发难。闰八月初，孙中山由日赴台，建立起义指挥中心，并与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取得联系，日总督许以支援孙中山起义。清两广总督德寿探得惠州将起义消息，调集四千清军逼近三洲田。起义军决定先发制人，于闰八月十五日，由黄福率精锐八十人夜袭沙湾，毙敌四十，俘敌三十，首战告捷。郑士良即指挥义军乘胜向深圳推进，拟攻新安，趋广州。旋接孙中山来电，告知枪械不能由香港转运，令义军改道取闽南，接应他从台湾运械内渡。义军乃折向东北，直趋镇隆。二十二日，大败清军于佛子坳。继而又在镇隆、永湖、崩冈圩连败清军。二十八日，义军进至三多祝，人员扩展到二万余，声势颇大，亟待孙中山带干部前来指挥，并输送枪械。不料台湾总督秉承新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旨意，禁止日本人参与起义，不准孙中山在台湾活动。而孙等原订军械"全是废物"。孙中山指望落空，只得派日本人山田良政传信郑士良，"谓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自决进止"。义军在清军进逼下弹尽援绝，于二十九日败散。郑士良率少数骨干避往香港，日本人山田良政因迷路被俘，旋遭杀害。

唐才常组织中国国会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初一日，唐才常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国会。戊戌变法被镇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日本，以保皇反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相号召，企图通过请求列强干涉及其他活动，达到使光绪皇帝重新掌握实权。不久，幻想"尊王"的唐才常也逃到日本。唐找康、梁磋商，议定在长江流域发动武装"勤王"，由康、梁负责募集经费，唐负责回国组织发动。鉴于当时长江流域的会党大多已接受兴中会的领导和留日学生中倾向革命者甚众，唐才常便与孙中山和部分留学生商谈在长江流域"合作"起事，采取"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的策略，以达到借用兴中会在会党中及留学生的力量。唐才常邀请留学生秦力山、吴禄贞等二十余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先

后回国筹备起兵。六月，唐才常到上海后，借日本人田野橘次的名义，设立东文学社，以教授日语为掩护，成立正气会机关。在正气会二十余条章程中，既有"非我种类，其心必异"等民族革命的语言，又有"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等保皇派口号。不久，唐才常将正气会改名为自主会。七月初一日，唐才常邀集上海维新人士在张园开"中国国会"，到会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毕永年等数百人。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自任总干事。国会宣布宗旨三条：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拥护光绪皇帝复辟。因宗旨自相矛盾，章太炎、毕永年表示反对，并劝唐才常与康、梁分手。唐以经费需赖保皇会提供，婉言拒绝。章太炎当场自剪发辫，宣布决裂。毕永年因劝唐无效，加上兴中会原先联络的会党首领在保皇会引诱下弃毕投康、梁，愤怒至极，乃削发为僧。

清政府杀五大臣　光绪二十六(1900)年七月三日，西太后以"离间"罪为借口，杀支持光绪帝的吏部侍郎许景澄等大臣。早在光绪二十五年末二十六年初(1889年底1900年初)，慈禧太后、载漪等策划废帝立储阴谋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太常寺卿袁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联元，户部尚书立山等五大臣就"力言其非"，"意不谓然"，引起太后、载漪等人的忌恨。在商讨和战的四次御前会议上，五大臣又都站在光绪一边，反对招抚义和团，对各国宣战，"彼此居然结成一团"，更激怒了慈禧太后、载漪之流，使他们心生罗织罪名，借机诛戮之心。七月初三日，慈禧太后以"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的罪名，将许景澄、袁昶处死。七月十七日，又以"动辄离间"的罪名，杀徐用仪、联元、立山。

北京陷落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先是七月初十日，约二万联军自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发。十一日，在北仓的马玉昆部首先与联军接仗，当地义和团也参加了阻击战，共毙亡日军四百余人，英军一百二十人，最后联军攻克北仓。十二日，联军兵临杨村，宋庆军与联军刚一交锋，旋即败退，杨村失守，从天津退驻杨村的直隶总督裕禄"见事不可为"自杀身死。同日，因"请赴前敌决一战"，被任命为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的李秉衡临危受命，率几个幕僚及数百义和团出京御敌。名义上李节制各地调来的"勤王师"四军，"实无一兵应命"。十三日，李秉衡行抵马头，与夏辛酉军相会，随即进驻河西务。十五日，联军兵逼河西务，张春发军尚未见敌便逃遁。万本华、夏辛酉则接仗即败，河西务陷落敌手。李秉衡退至马头，适逢宋庆、马玉昆等败军万余，溃逃如流，充塞道路，难以阻遏。各军见此，全无斗志。陈泽霖军未战先溃，逃往济宁。万本华军不战北逃，遁入山西。夏辛酉军亦调头向山东逃窜。丧失军旅的李秉衡，于十六日退到通州(今北京通县)张家湾。十七日，联军兵锋直指张家湾，李秉衡自尽殉国，联军进占张家湾。十八日，联军进入通州，宋庆闻风而逃。十九日，联军直抵北京城下。俄军首先由东便门攻城，遭到甘军及义和团的顽强抵抗。至二十日凌晨，俄军破东便门，直逼建国门。守城甘军据高阻击，矢弹横飞，俄军伤亡惨重，华西里耶夫斯基将军被击成重伤。激战延续到下午，俄军才占领建国门并从此涌入内城。俄军抢先攻城后，日军随后向朝阳门、东直门发起攻击，在朝阳门遇到甘军的拼死抵抗，从二十日清晨打到黄昏，日军才得以进占朝阳门。英军在俄、日两军行动后，即在广渠门发起攻击，守兵先已溃逃，英军遂于下午两点最先进入内城，通过水洞爬进东交民巷使馆区。法、美等国军在这之后相继进入北京城。负责北京防卫的最高统帅荣禄，以及他所率领的武卫中军及神机、虎神等营清兵数万，早已作鸟兽散。但仍有部分清军及义和团团民坚守着皇宫，他们筑街垒，设障碍，与联军展开巷战。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等，微服出德胜门逃离京城。同日，联军调两千余人前往西什库，解义和团攻打之围。义和团力不能支，最后败散。二十二日，北京陷落。联军入京后，对北京义和团及广大民众进行了残暴的屠杀，他们包围各坛口，搜捕屠杀义和团民，仅庄王府一处，就杀死烧死团民一千七百余人。驻京的十一国公使馆成员也参与了杀戮，并以杀人的数目互相炫耀。城内尸积遍地，腐肉白骨纵横。联军还在城中肆意放火，凡设过拳坛的王公府邸、寺观和民宅，"皆举火焚之"，使昔日金碧辉煌的北京城，一变为到处破墙残垣，满眼荒野萧条。大批珍贵图书档案遭到焚毁和劫掠。

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西逃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开始西逃。八国联军攻破东便门后，慈禧太后慌忙召集朝廷官员商议对策，众官员"相顾愕眙，无敢出一语"。后有人主张打白旗投降，有人主张向各国公使求降议和。慈禧太后举棋不定，又召集几次会商，但赴会官员愈到愈少，最后仅到二、三人。负责城防的荣禄亦逃得不见踪影，慈禧太后感到事态严峻，决定带溥儁等逃离京城。为防列强挟持光绪皇帝执政，于己不利，亦挟光绪皇帝同行。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后等不及梳洗，即微服从德胜门逃出，临行前，还将光绪皇帝

宠妃珍妃投入井中溺毙。随其西逃的仅载漪、刚毅等十数人，护卫清军百余人。二十三日，慈禧太后等逃到怀来县，在此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二十四日，广东布政使岑春煊率兵前来，护卫慈禧太后。二十五日，慈禧太后被迫下"罪己诏"。二十九日，授权李鸿章"便宜行事"，催其"迅速办理"投降事宜，朝廷不为遥制"。八月初一日，慈禧太后等逃到怀安。八月初五日，慈禧太后到山西大同。十三日，宣布剿匪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命直隶地方官"严行查办，务净根株"。随后慈禧太后调各军进攻义和团，并向联军请求"助剿团匪"。十七日，慈禧太后逃到太原。嗣后，又逃到陕西西安。

自立军起义失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正气会改自立会后，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加紧组筹自立军，以为武装"勤王"之旅。林圭首先在汉口秘密设立军事机关，联络会党，运动清军，仿照会党颁发票布的办法，向成员发放"富有票"，上书"救民保国"。以武力驱除义和团，"讨贼勤王，以清君侧"，推翻慈禧太后政权，拥戴光绪皇帝重新柄政相号召。唐才常将自立军分为七军，秦力山统前军，驻安徽大通；田邦璿统后军，驻安庆；陈犹龙统左军，驻湖南常德，沈荩统右军，驻湖北新堤；林圭统中军，驻汉口。另有总会亲军、先锋军。唐自任诸军督办，总机关设在汉口。唐才常等预定于七月十五日，在汉口、汉阳及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勤王"。由于康、梁的接济汇款迟迟不到，起兵一再延期。但是，因长江沿岸戒严，秦力山未得通知，如期在大通起兵，发布"讨贼勤王"告示，宣称"清君侧，谢万国"，经三天战斗，起义被清军镇压。唐才常遂将起义之日改在七月二十九日。英国原计划通过康有为使自立军起事，宣布东南独立，选择湖广总督张之洞或两江总督刘坤一为"独立"政府首脑。由于法、德等国反对，加之联军已于七月二十日占领北京，英国放弃东南"独立"计划，遂与张之洞联合破坏自立军起义。七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勾结汉口英国领事，破获自立军总机关，将唐才常等人逮捕。二十八日，唐才常在汉口被杀，自立军起义"勤王"计划遂告彻底失败。张之洞、刘坤一随即严厉镇压自立会会众，株连甚广，捕杀百余人，自立会亦告瓦解。

《訄书》初刻本刊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章太炎著《訄书》初刻本出版刊行。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底，章太炎在台湾时，就将其原先发表的和新撰的论政、论学文字辑订成《訄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交给祝心渊在苏州刊印。次年七月前，初刻本印成，一册五十篇，另补佚二篇。《訄书》具有强烈的反满革命思想，在《不加赋难》等文章中，无情地批判了清政府对中国民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在《分镇》等文章中，斥责了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刑官》等文章中，流露了章太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向往。在《原教》、《公言》、《原人》、《原变》等文章中，宣扬了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思想。初刻本反映了章太炎二十世纪初的思想状况，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走上反清革命道路起了很大影响。

清政府派奕劻等为议和大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十四日，慈禧太后正式诏令奕劻、李鸿章、荣禄为议和全权大臣，同时谕令与英美等国有联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办议约事宜，均准便宜行事。

瓦德西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七月间，进入天津的八国侵略军已达三万人，为了保证"在中国领土内的统一行动"，各国列强认为应把"所有这些特遣部队的总的统率和指挥权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英国主张由侵华联军中"军阶较高的司令官"来担任，日本则提出根据在华部队的人数多寡来考虑总司令的人选，俄国认为俄军是攻占大沽炮台和天津的主力，最有资格担当总司令一职。德、意、奥都或明或暗地支持俄国，但英、美、日都反对由俄国人任联军总司令。七月初，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又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为借口，先后向俄、英两国提出由德军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很快得到俄、英两国的赞同，美、日两国随后也表示同意。七月二十三日，一直持反对态度的法国也表示同意任瓦德西为联军总司令。九月二十六日，瓦德西率大批德军到达北京。

各国外交使团提出《议和大纲》 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十一日，法国提出六点要求，照会各国以此作为对华谈判的基础。六条内容为：惩办罪魁；禁止输入军火；赔偿各国、各社团及个人的损失；在北京设立一支卫队永久保护使馆；拆毁大沽炮台；联军在京沽之间设立若干军事据点，以敞开北京至渤海的通道。此后不久，各国驻华外交使团重新组成，于九月初六、初九两日，对法国的要求进行讨论。经过反复磋商争执，在六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对指使围攻使馆和杀戮教士的罪魁，特别指明董福祥、毓贤二人，处以斩刑；宣布凡是在其辖境内发生排外纠纷的官员，立即革职；增加赔款数额；设立使馆区，不许华人居住；拆毁大沽炮台以外的另一些炮台；在全国张贴上谕两年，禁止民人加入

排外会社，违者处死；取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命外务部大臣。德、日两国又提出对克林德、杉山彬之死的处理方案。又经过多次计议策划，公使团归纳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十一月初三日，公使团以同文照会形式，将《议和大纲》交清政府议和大臣，转达西安行在。李鸿章等议和大臣为保慈禧太后的地位，在谈判过程中，不停奔走于各国公使之间，特别请俄国斡旋。作为报答，李与俄国公使格尔思签订了《天津俄租界议定书》，使俄国强划天津租界合法化，甚至准备以东北主权作交易。在俄国坚持下，列强终于同意用苛刻条件，换取对慈禧太后的谅解。慈禧太后西逃后，十分惧怕各国把她作为首祸论咎，"常悁栗不自安"；及得约，未见追究之辞，如获免罪赦书，大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布谕诏，谓"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会，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又按各国公使要求，在谕诏上加盖御玺，作为照会副本，二十七年(1901)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分送各使馆，正式生效。

史坚如谋刺德寿未遂牺牲　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下旬，兴中会会员史坚如、邓荫南等在广州得知惠州三洲田已经起义，而广州方面则因筹款不足，军机尚无着落，一时不能召齐会党，策动起义响应，遂决定采取暗杀活动，刺杀两广总督德寿，使敌方失去首脑，惊惶混乱，给惠州起义以有力声援。史坚如等在总督府后租一宅院，挖地道通至德寿的卧室下面，埋置炸药。九月初六日，史坚如引发炸药，巨响震动全城。可惜地道未掘到位，只将总督府后墙和附近几户民房轰塌，德寿从床上震落在地，却未丧命。次日，史坚如前往现场探视结果，被清方逮捕。被捕后，史坚如备受酷刑，坚贞不屈，于九月二十八日慷慨就义。孙中山闻其死讯后，称史坚如的牺牲"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亚泉杂志》创刊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由杜亚泉编辑出版的《亚泉杂志》在上海创刊。《亚泉杂志》为半月刊，内容是介绍近代理化博物等自然科学知识，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办而没有外国传教士参与的中文科学期刊。创办人杜亚泉是浙江绍兴人，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自幼兴趣广泛，年轻时对物理、化学、博物、医药、政治、法律、哲学等中西书籍均有涉猎。后感传统古旧文词太空洞，不如自然科学对国家有实用，遂倾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光绪二十六年，杜亚泉到上海，自费创办亚泉学馆，招收学生普及博物知识，为辅助教学和更广泛地宣传自然科学知识，创办《亚泉杂志》。由于杂志发行量很少，仅出了十期便不得不停刊。

《开智录》创刊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初十日，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编辑的《开智录》在日本横滨创刊。《开智录》为半月刊，最初用油印，后来刊物接受了孙中山资助的二百元印刷，改为铅印，借《清议报》的印刷所印刷，并随《清议报》一同发行。刊物主编由郑贯一担任，冯自由、冯斯栾等任撰述。在郑贯一主持下，刊物先后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大井宪太郎的《自由原论》、中川笃介的《民权真义》、《法国革命史》等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思想的专著，还发表了许多带有反抗列强侵略，批判封建制度的政论文章。因其"文字浅显，立论新奇"，颇受南洋、美洲一带华侨读者的欢迎。但在出版了十余期后，因遭到保皇派干涉和《清议报》的压制，不得不停刊。

《译书汇编》创刊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十五日，以江苏籍留日学生为主编辑的《译书汇编》在日本东京创刊。《译书汇编》为月刊，每期一百四十余页。创刊时，编者声称其宗旨为"务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主要译载欧、美、日等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新思潮等方面的著作。戢翼翚、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是主要编辑者。该刊初期连续翻译登载了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著作，受到国内外青年和学生的青睐，风行一时。一年多以后，刊物变成以著述为主，编译为副，每期附录"欧美政治法律经济各新书目"，被人们视为"足为研精西学之一助"。该刊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十五日更名《政法学报》，而更名后仅出了十一期即停刊。

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初三日，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抨击了俄国政府对中国的无耻侵略，揭露了俄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的野蛮行径。他在文章一开始就写道："俄国正在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动员了好些军区，耗费了数亿卢布，派遣了几万名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次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的确，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列宁还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俄国政府的侵华战争，亦给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其侵略中国的目的之一，在于将国内深重的阶级矛盾转嫁于战争。他号召俄国人民识破政府制造民族仇恨，转嫁危

机的阴谋，行动起来，“打碎战争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

忠义军武装抗俄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十万余俄军占领东北后，四处烧杀抢掠，东北民众纷纷组织起来，武装抗俄。在当时东北抗俄义军中，实力较雄厚的是刘永和为首的忠义军；王和达为首的义和团余部及农民军；杨玉麟为首的镇东军。为了有效地打击俄国侵略者，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三支抗俄主力军在吉林海龙实现联合，统称“忠义军”。联合后将士达两万余人，原忠义军首领刘永和为总统，统率全军。忠义军以“御俄寇、复国土”相号召，得到辽东百姓的积极支持。忠义军活跃在海龙、通化一带的高山密林中，采取据险伏击，迂回包围，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打得俄国侵略军坐卧不宁。俄军为镇压忠义军调集了大批军队，并要求清地方当局配合围剿，同时还兼施诱骗、招抚、暗杀等手法。忠义军部分首领在这种情况下动摇。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刘秉和、姜海山、李贵春等坚决抗俄的将领相继牺牲和被叛徒刺杀。刘永和、杨玉麟等则于冬季接受清吉林将军长顺招抚，忠义军抗俄斗争以失败告终。

中俄进行交收东三省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九月间，俄国利用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之机，占领中国东北三省。联军对华作战停止后，清政府提出交收东三省一事，俄国政府要求与清政府进行单独协定的谈判。十一月十二日(1901)，清政府授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商议交收东三省事宜。李鸿章为在与列强谈判中取得俄国支持，力主出卖东三省。十四日，交收东三省谈判正式开始。二十七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先向杨儒口头提出约稿十三条。杨儒指责这个约稿是“因利乘便，以力制人”，拒绝答应。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第七次会商时，俄方正式向杨儒提出议款十二条，主要内容有东三省由俄国“设兵保路”；禁止清军驻扎东三省，只准设“马步巡捕”，名额须与俄国商定；东北三将军之委任，由俄国支配；俄国购买山海关至营口铁路；“东三省蒙古、新疆等处矿产、铁路及其他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予他国；不准中国在上述各处自行造路”等等。不经讨论，俄方便逼杨儒画押，杨儒以条款须无损我自主之权方可签字对，双方争执不下。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初九日，清政府命奕劻、李鸿章商请各国公使，劝阻俄国强迫签约。各国不愿俄国独吞东北，接连向俄国质询。刘坤一、张之洞联合上奏，力主拒绝签约；并劝朝廷联英、日拒俄。杨儒与维特谈判七次，与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谈判十四次，俄方横施恫吓，杨儒据理力争，仍无结果。在此期间，维特托人通知李鸿章，如要能促成签约，将以五十万卢布相酬，“以后还可多给”；同时威胁说，“逾期将决裂”。李鸿章遂向慈禧太后进言，尽早签约。正月二十二日，拉姆斯道夫提出最后约稿十一条，压迫杨儒，限十四日内画押，不能更改一字，逾期停止谈判。李鸿章与奕劻电示杨儒：“势处万难，不能不允，即酌量画押，勿误！”杨儒要求与俄方继续谈判。均遭拒绝，且中国皇帝国书、外交部文件，俄政府也一概不收。二月初二日，清政府电令出使各国公使，请各国代清展限签定东三省交收之约，以筹妥协。初四日，维特见杨儒，催促杨儒签字。杨以未奉“确旨”不签。维特谓：如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杨答曰：私自画押，该当何罪？”维特保证，若清政府“欲加罪于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杨正告维特，“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初五日，拉姆斯道夫又约杨儒签字，杨再度拒绝。同日，各国公使向清政府声明，公约(指十一国与中国谈判之约)未定之前，不得与他国议立专约。清政府在北京外国公使团压力下，通知各国公使，谓“中国不敢遽允俄约画押，请先议公约”。初十日，清政府命李鸿章向俄使婉商，先订公约，再议专约，交收东三省谈判暂告一段落。

杨衢云遇刺 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未遂后，德寿即悬赏购革命党领袖的首级，其中杨衢云首级赏价为白银三万两。友人曾劝杨衢云暂避东南亚，但杨坚持留在香港，以教授英文谋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二十日，杨衢云正在给学生上课，被清广东当局指使的凶手开枪击中。杨被送入医院，次日死亡。杨衢云是福建海澄(今龙海)人，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光绪十七年(1891)，他与孙中山结识，常以爱国图强为话题交谈。次年，杨与谢缵泰创立以“开通民智、研究新学”为宗旨的爱国团体辅仁文社，并担任社长。光绪二十一年(1895)，辅仁文社并入兴中会，杨被举为兴中会会长。四年后，杨辞会长职，荐孙中山继任。惠州起义时，杨衢云负责接济饷械。起义失败后，杨仍留居香港，遂遭暗杀。

徐建寅逝世 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十二日，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建寅不幸逝世。徐建寅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其父是晚清著名科学家徐寿，曾翻译了《汽机发轫》、《化学鉴原》等近代科学著作，为近代化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徐建寅自幼追随其父，耳闻目濡，参加实验，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治二年(1863)，他协助其父完成了木壳轮船“黄鹄号”的制造。同治五年

(1866),徐寿受命襄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并主持翻译馆,徐建寅参与了翻译近代科学书籍的工作,翻译出《化学分原》、《声学》、《电学》、《兵学》、《器象显真》、《石板印法》、《造铁全法》、《汽机新制》等科学、兵法新书二十多种。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创办天津制造局,调徐建寅负责研制火药必需的硝酸。徐凭借对化学的丰富理论知识和实验技术,很快研制成功,且比进口货便宜许多。光绪元年(1875),徐建寅奉调任山东机器局总办,"躬自创造,未尝延用西人",建成一座新型枪炮弹药工厂。光绪五年(1879),徐建寅以驻德参赞名义,到德、英、法考察造舰及军事工业。徐建寅在欧洲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仔细了解生产过程和设备运转,工人操作细节,把他认为对中国有参考价值的东西都记录了下来。在他逗留欧洲期间写的《游欧杂录》中,他详细介绍了许多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金属加工工艺和设备,如模锻、挤压、冲制成型、仿形切削、转炉炼钢、电冶铜等等,有的笔记几乎同技术文件没有区别,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有益的启示和影响。戊戌变法时期,徐建寅以其丰富的科技知识和实践,被派任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督理。但戊戌政变后,许多新事物被扼杀,农工商总局亦被裁撤。徐建寅后来受张之洞之邀,到湖北帮助兴办工业和训练新军,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外国停止向中国供应火药,徐建寅遂赴汉阳钢药厂研制硝化纤维无烟火药。徐建寅认为:列强交迫,军火尤为重要,所以殚精竭虑,夙夜赶制,"日手杵臼,亲自研炼",终于试制成功,并准备大量生产。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十二日,徐建寅与工匠们一起拌和药料,不想机器磨擦过热,生火炸裂,声如霹雳,火焰冲天,徐建寅与在场的另十三人同时遇难。

景廷宾率众起义　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直隶广宗县官绅和教士议定"地方赔款",赔偿当地教会损失京钱二万吊,引起当地民众的义愤。民众推举武举出身的景廷宾(1861－1902)为首领,抵制地方赔款。该年冬季,新知县魏祖德到任后,强令各村每亩摊派赔款捐四十文,再次激起民仇。景廷宾传帖聚众,遂在城郊武装示威,宣称"所有地丁捐款概不缴纳",赢得全县民众的响应,景所在的东召村成为抗捐运动中心。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袁世凯派练军前往广宗镇压,炮轰东召村,景率众转移巨鹿县。三月十六日,景廷宾率数千民众在巨鹿厦头村宣布起义,自号"龙团大元帅",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大旗。起义军迅速扩展到近四万人,多为原义和团团民,转战巨鹿、邢台、唐山、内丘、新河、平乡等县。起义军提出"复仇雪耻"的口号,向洋教士、洋教会发起攻击,在威县处死法国教士,使冀、鲁、豫边区震荡不已。清政府在列强的催逼下调兵遣将前往镇压。袁世凯令段祺瑞、倪嗣冲猛攻起义军。法、德、日等国侵略军六千余人也从北京直赴南宫、冀州助剿。四月初二日,清军围攻起义中心广宗县件只村,村落在炮火中化为焦土,景廷宾等经死战突围。但不久广宗、巨鹿、威县、南宫等处根据地相继陷落,景被迫向山东、河南边境退却。五月,景廷宾在临漳兵败被俘。六月,在威县英勇就义。景死后,余众四散,起义遂告失败。

广东独立协会成立　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东西洋各报风传清廷将把广东省割让给法国的消息,留学日本的广东籍学生闻此大为惊骇。郑贯公(贯一)、李自重、冯斯栾、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等遂共同发起,成立"广东独立协会",初在东京开会,后会址移往横滨。协会主张广东宣告独立,不接受清政府的出卖割让。该协会的活动得到当时居住在横滨的孙中山的赞助,冯自由、郑贯公、李自重、王宠惠等经常前往孙中山寓所商议活动计划和方法。兴盛时期该会会员多达二百余人。

清政府设督办政务处　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为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要求清政府进行所谓"改革"。清政府鉴于国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统治日趋不稳,也不得不对传统方式做改弦更张,遂公开表示将实行"新政"。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初三日,清政府下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以为推行新政的办事机关。派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昆冈、鹿传霖六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后又增派瞿鸿禨)、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派袁世凯)遥为参预。政务处下设提调二人,章京若干。该处负责制订新政各项措施,掌管各地官吏奏章及办理全国官制、学校、科举、吏治等事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督办政务处改为会议政务处,次年并入内阁。

《国民报》创刊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二十二日,由留日学生编辑的《国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国民报》为月刊,设有社说、时论、丛谈、外论、译编、纪事、答问等栏目,除所译原著者外,撰稿人一律不署名。秦力山是该刊的总编辑,沈翔云、戢翼翚、雷奋、杨廷栋、王宠惠、冯自由、卫律煌、唐才质、张继等人为该刊的主要编辑者和撰稿人。《国民报》在创刊时即揭橥"唤起国民精神"的宗旨,并以"廉悍不羁,峻削锋利"的文墨,在留日学生早期创办的刊物中,第一个宣传了"革命排满"的思想。在《国民报》上发表的《说汉种》、《中国灭亡论》、《正仇满论》、《二十世

纪之中国》等文章中，遣责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施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的封建独裁者；攻击了对内实行种族压迫，对外御敌无术、为虎作伥的清朝政府；批判了康梁保皇党人和国内的立宪派，“持论多与《清议报》交绥，务胜之以为快”。因而报纸一出，即得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关注，并在经济上给予援助。孙曾捐资一千元，以为印刷费用。该刊在译编专栏中，翻译登载了杰斐逊等人起草的《美中独立檄文》，威曼的《革命新论》等文章专著，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观，阐述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意义和正义性。该刊在时论、丛谈等栏目发表的文章中，鼓吹“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反映了脱离了康梁保皇思想影响的留学生们逐渐倾向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过渡。该刊大部分向国内发行，“每期输入上海逾二千份”，但仅出了四期就停刊了。

《教育世界》创刊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教育世界》杂志在上海创刊。《教育世界》初办时为旬刊，后改为半月刊，由教育世界社发行。该刊每册后附译书，有各学科规则、各学校法令、教育学、学校管理法、学级教授法、各科教科书等。教科书分小学级、中学级，大都采自日本。这一刊物是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该刊的创办者和主要编辑人是罗振玉、王国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该刊共出了一百六十六期。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称外务部　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要求下，对传统的官制和政府机构作了一些形式上的改变。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初九日，清政府宣布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该旨令宣称：“现当重定和约之时，首以邦交为重，一切讲信修睦，尤赖得人而理”，因此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行改组。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派奕劻总理外务部事务，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禨为尚书，余寿朋、联芳为右侍郎。

《辛丑条约》签订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全权谈判大臣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法、意、奥、西、荷、比十一国公使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另有十九个附件。主要内容有：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白银九亿八千余万两，被称为“庚子赔款”。二、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由各国派兵驻守。三、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大沽沿途的炮台；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各国派兵驻守北京和北京至山海关沿线十二个战略要地。四、清政府在各地颁布上谕两年：“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毕斩”；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惩处祸首诸臣将；有外国人“被虐”“被杀”地区，“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五、清政府允将各个通商条约中，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其他应办的通商事项，“均行议商”。六、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七、清政府分派诸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谢罪”；并在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杀处建立牌坊。

清政府在列强逼迫下“惩凶”　先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初二，慈禧太后为求得列强宽恕，即发布惩处“肇祸诸王大臣”上谕，将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使英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分别给予革去爵位等不同处分。列强声称处分人员太少，且处理太轻，要求对上述人处以死刑。清政府被迫于九月二十二日，再次宣布惩处肇祸诸王大臣，便仍不能使列强满意。在列强的威逼下，清政府不得不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布新的惩处肇祸诸王大臣谕诏。令载勋自尽；载漪、载澜发配新疆，永远监禁；毓贤着即正法；已故刚毅追夺原官职；董福祥着即革职；英年、赵舒翘定斩监候，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徐桐之子)正法；已故的徐桐、李秉衡夺原官职，并撤销恤典。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五人开复原官，恢复名誉。此外，清政府还应各国要求先后惩处了一百余名地方军政官员。

清政府设局编译教科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奏变法，议及兴办学堂，先行设局编译教科书。二十日，清廷命刘坤一、张之洞按会奏所陈，择要举办。当月，编译教科书的机构成立，该局设在江宁，初名江鄂书局，后改江楚书局。刘世珩为总办，缪荃孙为总纂，陈作霖、姚佩珩、陈汝恭、柳诒征为分纂。书局成立后即开始编译书籍。罗振玉、刘大猷、王国维在上海翻译日本书籍。另由陈季同、陈庆年先后主译西书。

清末留学热潮兴起　十九世纪末二十年代初，在资本主义列强日益加重的侵略掠夺下，清政府再次把留学纳入革新政治的内容。从光绪二十年(1898)末始，天津武备学堂、上海南洋公学、新方言馆、湖北武备学堂、汉阳铁路学堂等学校都陆续对外派遣留学生。这一阶段派遣的留学生除了为继续培

养技术制造和管理人员外，大量的是学习军事和法政等科目。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知识分子受新学传播的影响，激于日深的民族危机，除了通过官派途径出国外，还纷纷自费出国，寻找救国振兴的真理，留学热潮逐渐兴起。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在对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国人更感到日本的迅速强盛，是因学习西方、维新变革卓有成效，大批的留学生拥入日本，留学热潮更为高涨。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留日的官费、自费留学生猛增至八千人。

慈禧太后返回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及文武百官自西安启程返京。当时，“仪卫甚盛，发卒数万人，各省所供献太后私财六七百万，尽辇之而东”，车辆多达三千余乘。他们出潼关，途经洛阳、开封，于十一月二十四日(1902)在直隶正定改乘火车到省城保定。二十八日，慈禧太后等自保定乘火车至北京马家堡车站，遂乘舆经永定门入正阳门还宫。慈禧太后进宫后，随即令人挖掘出逃前埋藏的金玉宝器，因未丧失兴奋异常。十二月九日，慈禧太后接见各国驻华使节。这是她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给各国使节以前所未有的礼遇。二十三日，慈禧太后又接见北京公使团的夫人们，并问候曾被义和团围困过的使节夫人。

《新民丛报》创刊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一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任主编。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章程》中宣示了该报的三条宗旨：一、报纸取《大学》新民之义，因为要维新中国，必先维新民众，中国所以不振，在于民众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将采取中西道德为德育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为智育原本。二、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附从。三、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不为危险激烈之言。报纸初期着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想政治学说，宣传变法维新，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报纸行文多以梁启超的报刊体，文字流畅，笔中常带感情，语言生动，颇受读者欢迎。创刊不久，发行量就超过五千份，最多时达一万四千份。但在康有为严格督导下，报纸坚持立宪保皇，反对推翻清王朝的民主革命。后来与革命派报刊《民报》就革命与保皇、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土地国有”等问题展开过激烈论战。该报于光绪二十三年(1907)七月停刊，共出了九十六期。

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　光绪二十七年(1901)，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逾千人，留学生中遂酝酿组建中国留学生会馆，以便联络感情，结成团体。但由于经费无着，筹建之事提起旋辍。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三日，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在东京九段坂偕行社大宴中国留学生，出席学生二百七十四人，觥筹交错之间再次提出成立留学生会馆事，并请蔡钧资助，蔡钧接受了学生的申请书，并当即同意。于是，与会者全体议决举蔡钧为会馆总长，留学生监督钱恂为会馆副长，还推举了会馆章程起草员。二月初七日，留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召开大会，公议会馆章程，选举了十二名会馆主要工作人员。章程共分五节，主要内容是定名为清国留学生会馆，宗旨为“联络情谊，交换知识”，并规定了职员人数、选举办法、经费筹集。二月二十一日，在会馆所在地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召开了会馆成立大会，并宣布正式开馆。会馆干事范源濂致开馆辞，郑重宣布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从此，中国留日学生有了民主自治的团结核心，该组织对内有约束中国留学生纪律的责任，对外有代表留学生争取合法权利的义务。

中国教育会成立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蔡元培、蒋智由、章太炎、黄宗仰、林獬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以便借办教育之名，鼓吹革命。同年冬，中国教育会正式成立于上海，蔡元培被推为会长。该会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揭櫫其宗旨为“编订教科书，改良教育，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会员共计一百余人。该会为收容南洋公学退学青年，曾创办爱国学社(南京陆师学堂退学学生亦来就学)、爱国女校、镜今书局、军事讲习会、同川学堂、女子俱乐部，编辑过《中国白话报》。该会的常熟支部办有后塔小学，同里支部办有自治学社。该会员亦经常 为《苏报》撰稿，还曾在张园组织演说，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苏报》案发生后，该会重要成员章太炎被捕，会长蔡元培逃离上海，该会的活动基本停顿。

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　从光绪二十六年(1901)十一月开始的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因列强干涉暂时中止。《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陆续从北京撤走，交收东三省事宜再次提上日程。但此时原先谈判的主要参与者杨儒、李鸿章相继逝去，清政府遂派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负责与俄国交涉。俄国一再制造借口，拒不从东北撤兵。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英、美、日等国以利害冲突，也出面干涉，迫使俄国不得不作出撤兵的姿态。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初一日，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与清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会办大臣王文韶在北京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共四条，规定俄国将东三省归

还中国;俄军自签字起十八个月内分三批撤离东三省;俄军撤离前,清政府不在东北“另添练兵”,撤退后,清政府将在东北驻军人数“随时知照俄国”;俄方交还山海关、营口和新民厅沿线铁路后,清政府应给予“赔偿”。次年三月,俄国在第二期撤兵期满时,不仅违约不撤,反而增派军队,并照会清政府外务部,提出进一步侵略东北的七条无理要求。接着,俄国沙皇又任命阿列克塞也夫为远东总督,将东三省划归其统治。由此激起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日本与俄国对东三省的争夺也愈益激化。

支那亡国纪念会举行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十九日,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以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一六六一年被杀为明朝灭亡的标致,到光绪二十八年,正好是二百四十二年。为了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章太炎、秦力山等决定于明末崇祯皇帝自缢身死的日子(三月十九日),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借纪念明朝灭亡,激发留学生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仇恨。章太炎亲自撰写了大会宣言,号召留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要人们继承明末各地抗清志士的传统,为推翻清朝统治坚决斗争。纪念仪式定在东京上野公园西菜馆精养轩举行,留学生报名赴会者数百人。举行纪念会的消息震动了整个学界,清朝驻日公使蔡钧闻讯,亲访日本外务省,要求日方干预。日本政府应其请,令警视总监取消纪念会。三月十八日,章太炎等被东京牛输区警署传唤,勒令禁止开会。十九日,数百名留学生,因事先不知会议被阻,如期赴会,均被密布在精养轩的日本警察劝散。孙中山带华侨十余人,特从横滨直来参加纪念会。他得知事情经过后,与章太炎、秦力山等约定,下午在横滨永乐酒楼补行纪念会。届时,六十余人出席纪念会。孙中山主持,章太炎致纪念辞。这次纪念会是留日学生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明确以反清为宗旨的重要集会,对鼓动、教育爱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次纪念会召感下,香港等地的革命知识分子,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

《大公报》创刊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十二日,曾担任过法国驻蒙自领事馆雇员的英华,在资本家、商人柴天宠、王郅隆资助下,在天津主办的《大公报》创刊。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方定六、刘孟扬、王瀛孙、黄与三、郭定森等。《大公报》的主要政治倾向是拥护维新改良,亦曾为立宪运动大造舆论。《大公报》以敢于直言在社会上较有影响,曾指名道姓地批评炙手可热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并刊载了沈荩被杖杀事件。在戊戌党禁尚未解除之际,还登过清朝钦犯梁启超的文章,该报比较注重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从大处落墨”而不屑于登载“猥邪琐屑之事”。因此《大公报》的发行量较大,刚创刊即有三千八百份,三个月后达五千份,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层中颇有影响,亦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一份报纸。

清政府颁《奏定学堂章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清政府任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并命他裁定学堂章程具奏。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二日,张百熙进呈《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章程》以及《蒙学章程》各一份,共六件,候旨颁行。这些章程对辛丑年以后清政府设立的各级各类学堂的学制、入考方式、教学内容等,做出了一些系列规定,是中国近代学堂教育体系整体设计的最初方案。进呈当日,即由清政府颁行,被称为钦定学堂章程。

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经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清政府任命吴汝纶为北京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夏季,吴汝纶被派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教育考察。在日本期间,吴汝纶写下《东游丛录》一书。吴汝纶归国后,其弟子又根据他带回的资料,编成《东游日报译编》一书。两部书均详细记述和介绍日本的学制、教育现状以及日本文字语言使用等内容,对清末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

爱国学社成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第五班学生贝寿同等五十余人,因抗议校方压制言论自由,闹退学风潮。退学学生百余人派代表请求中国教育会办学。中国教育会遂于十月十七日,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设立爱国学社。蔡元培任总理(校长),吴稚晖为学监,章太炎、黄炎培、蒋智由、蒋维乔等担任义务教员。旋又在登贤里成立爱国女校。学社学生分寻常、高等两级,学制均为两年。寻常学级的课目有伦理、算学、物理、化学、国文、心理等。学务由学生联合会自治(分全部学生为若干联,每联约二三十人,听学生自行加入某联)。学社创有《学生世界》杂志。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在日本东京组建的拒俄义勇队,致电上海爱国学社响应其拒俄斗争。该社本拟在上海组织拒俄义勇队,但缺乏军事教员,四月,南京陆师学堂亦闹学潮,林砺、章士钊等四十余退学青年到上海,加入爱国学社,爱国学社遂按拒俄义勇队的改名组

织军国民教育会，增 加军事训练课程。五月，《苏报》案发，章太炎被捕，蔡元培等出逃，爱国学社被解散。

《新小说》创刊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九日，由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月刊在日本横滨创刊。主要编辑者有韩文举、蒋智由、马君武等。刊特以发表小说为主，兼及诗歌、戏曲、笔记和文艺理论。创刊号上，发表了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名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章对小说的社会作用、社会影响、在文学中的地位及艺术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并第一次提出小说必须改革的主张。梁启超在该文中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对此后小说理论研究的展开、创作的繁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创刊号上，还发表了梁氏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此后还连载了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或暴露当时社会的阴暗，或提出社会改革的设想，多与时局政治相关，染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开创了晚清小说发展的新阶段。《新小说》的创刊，可视为近代中国粗具规模的新型小说刊物的发端，它与后来创刊的《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被称作晚清四大小说杂志。

青年会成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留日学生秦毓鎏、张继、叶澜、董鸿伟、汪荣宝、周宏业、冯自由、陈独秀等在东京筹建反清革命团体。他们原拟仿照意大利独立前的反抗组织"少年意大利"，取名"少年中国"，后为避免清朝当局的注意，仍寓少年中国之意，取名青年会。该会会约第一章即表明，"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显露了鲜明的反清革命色彩。该会初创时有会员二十余人，多数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他们编撰了《法兰西革命史》、《中华民族志》等书籍，鼓吹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是留日学生中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小团体。青年会成立不久，即在留日学生中取代了励志会的地位。次年，各省学生纷纷成立同乡会，并创办期刊杂志，很多青年会会员被举为干事、编辑员。在拒俄运动中，该会大多数会员参加了拒俄义勇队。

《女学报》创刊 光绪二十八年(1902)，《女学报》在上海创刊，该报编辑部设在上海新马路华安里。《女学报》为月刊，由《苏报》代为发行。该报初期用薄纸单面印，翌年改用报纸双面印，每期六十页。该报设论说、演说、女界近史、译件、尺素、词翰、插画等栏目。该报的创办人兼主编是《苏报》发行人陈范的长女陈撷芬。后期《苏报》的革命宣传，给了她很大影响，使她成为革命的同情者。在创办《女学报》的同时，她还担任着上海受国女校的校长。《女学报》完全以妇女为对象，除了提倡女学之外，该报进一步提出了争女权的思想，主张妇女独立，"不受男子之维持与干预"，男女平等，并把妇女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联系起来，号召妇女和男子一道，共同改变国家"受制于外人"的状况。该报还通过刊登来信和附加编者按语等方式，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排华的行径进行揭露和批判。是中国近代第一份带有明显反清革命色彩的妇女刊物。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苏报》被封，《女学报》一度中断出刊。此后不久，又在日本恢复出刊，光绪二十九年末三十年初停刊。

广西会党起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广西农民在哥老会领袖陆亚发领导下发动反清起义。起义军提出"劫富济贫"的口号，首先发动于上思、永宁(今并入永福)及左江地区，随即攻克二十余座城镇，迅速蔓延到整个广西南部和西部。翌年，起义军攻陷土州、东兰州、怀远等地，省城桂林吃紧，清地方当局惊恐万状。十一月，清廷命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调集粤、桂、滇、黔四省清军对起义军进行会剿。起义军与清军周旋，挫败清军会剿，到光绪三十年(1904)，形成南宁、柳州两个中心，起义势力遍及广西全省及湖南、贵州边境。清政府又陆续调集粤、湘、滇、黔、鄂等省清军"协剿"。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义军在清军的镇压下失败，义军残部退入黔、滇边界，时隐时伏地与清廷斗争。光绪三十二年(1906)，同盟会领导钦廉上思起义时，义军残部参与了起义。

清政府宣布翰林须入京师大学堂肄业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二日，清政府宣布自下一年会试开始，凡一年授职翰林院修撰、编修者，二、三年改翰林院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必须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咨送翰林院散馆"，以备录用。知县签分到省，也必须入各省课吏馆学习。

《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完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曾祐撰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完稿。这部教科书只将中国古代 史写到隋朝，但却是近代中国人用进化论观点指导历史研究的第一次尝试。在该书中，夏曾祐把中国历史置于上古、中古、近古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去思考，强调古今事变的因果联系，并将其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贯穿于全书。该书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历史分期的见解。其中"中国五千年之历史，战国为古今之大界"，并具体分析了战国时期各种改革，认为其中的军政改革，"此事与家族社会与国家社会不同之界，较他事为尤甚"，实为战国封建说的初次猜测。其中"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时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

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比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道光以后,与天下相见,数十年来,乃骎骎有战国之势,于是识者知其运将转矣"。实为划分古代与近代史分期的首次尝试,是近代史学史首出的卓见。夏曾祐还在书中"历史之益"一节中,强调"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民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即让人从史书中汲取教益。这部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新颖的历史书,使人耳目一新,深得当时读者欢迎。

华衡芳逝世　光绪二十八年(1902),晚清著名科学家华衡芳逝世。华衡芳是江苏金匮县(今无锡人),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他幼年时偶得一残缺不全的明代数学家程大位所著《算法统宗》"读而好之","不数日而通其术",从此对算学发生浓厚兴趣,经常到书坊搜集算学书籍。在其父支持下,他得以纵览中国古代算学著作。后到上海入由外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咸丰九年(1859),由他著文,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作图的《抛物浅说》完成。华氏研究成就的日高,引起洋务大吏的重视。同治四年(1865),华衡芳应召到江南制造局,协助徐寿主持技术事务。后参加制造局译书馆的工作,与外国译员合作译出《金石识别》、《地学浅说》、《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合数术》等有关地质、矿物和数学方面的书籍。与此同时,他"潜心著述",先后撰就《算学笔谈》、《开方别术》、《积较术》、《开方古义》、《循环小数考》等数学著作。华衡芳把一生的大部分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数学事业,甚至无暇顾及家庭,妻死子亡,他都未能亲自料理后事。除了科学研究和数学之外,华衡芳对地位利、禄十分淡漠,直至他溘然离世,"未尝一涉宦途","敝衣粗食,穷约终身"。

《湖北学生界》创刊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初一日,由湖北留日学生同乡会主办的《湖北学生界》杂志创刊。《湖北学生界》为月刊,每期一百余页,六至七万字,设有论说、时评、政法、经济、实业、教育、理科、医学、地理、小说、外事、国闻、留学生纪录等栏目。刊物发行人为王璟芳、尹援一、窦燕石。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刘成禺、蓝天蔚、但涛、张继煦、卢慎之、周维桢、金华祝等。该刊以"输入东西学说,唤起国民精神"为宗旨,揭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反对瓜分阴谋,宣传排满复汉的民族主义思想,是留日学生所办的革命刊物中第一种以省份命名的刊物。该刊登载过《黄黎洲》、《历史广义》、《中国民族考》、《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等有影响的文章,还对各省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民主活动,都加以详细报道。该刊较有特色的是留学生纪录栏,"博采各省留学诸君言论,所记均属直接要闻,凡中国各报所不能采访者,一一贡诸国人左右"。该刊自第六期始更名为《汉声》,同年八月初一日停刊,共出了八期。

《浙江潮》创刊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留日的一百零一名浙江籍学生在日本东京组织同乡会,二十日,该会编辑的《浙江潮》杂志创刊。《浙江潮》为月刊,每期一百余页,约八万字。刊物设有社说、论说、时评、政治、经济、哲理、军事、教育、历史、传记、文学、杂文等栏目,最初担任主编的是杭州人孙翼中,在其后的主要编辑者和撰稿人有蒋方震、蒋尊簋、许寿裳、王嘉祎、蒋智由等,这些人大多为光复会会员。编辑部就设在王嘉祎的寓所。《浙江潮》编者们在发刊词中声明:"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因"不忍任其(中国)亡而言之",而"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共同挽救祖国危亡。杂志创刊不久,即逢留日学生为抵制俄国侵占东北而掀起的爱国运动,留学生们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抗俄义勇队,并派人回国请愿,《浙江潮》对这场运动给与了较多的关注和报道,同时发表了大量抨击列强侵凌,唤起民众反抗的文章。这一时期,为了探索救国途径,认清国情,留学生们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活动,《浙江潮》是对这项活动反映得最为详尽的刊物。该刊陆续发表了三十四篇调查报告,涉及到政治、经济、国防、交通、教育、物产、税收、商业、出版、农业、宗教、风俗、人物、自然地理等各个方面,是了解当时社会状况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在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方面,《浙江潮》上刊登过《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民族主义论》、《铁血主义之教育》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该刊共出了十二期,于光绪三十年(1904)初停刊。

震旦大学成立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初三日,法国传教士出资创办的震旦学院(震旦大学前身)开学。该学院创建的发起人为马相伯。马相伯是江苏丹阳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他于同治九年(1870)获天主教神学博士,授职为神甫。同治十一年(1872),他担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一职。后曾任清政府驻日公使参赞、驻神户领事等职。震旦学院是由他商请耶稣会创办的,校址设在徐家汇,马相伯自任总教习(即院长),各科教师由耶稣会委派教士担任。学院设预科、本科二制,预科一年卒业,本科二年卒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该院部分爱国师生因学潮脱离该校,马相伯等遂以这些人为主,在上海江

湾新创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

沈荩就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初八日,反清义士沈荩受刑身死。沈荩是湖南善化人,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他早年倾向维新,在戊戌变法时期,经常与谭嗣同、唐才常等过往,思想比较激进,认为要在湖南革新政治,非有一番破坏不能奏功效。变法失败后,沈荩赴日本留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沈荩返回上海,与唐才常等人共同组建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为着手自立军起义事,沈荩转至汉口,活动于湖北新堤一带,任自立军右军统领。因外援不至,起义一再延误,自立军起义失败。沈荩逃回上海,后潜往北京,一面从事新闻工作,一面暗中继续从事反清活动。他以古董商身份掩护,进行新闻采访,因他知识渊博,格调优雅,与许多王公贵族往来颇频,常常探出一些秘闻。光绪二十九年春,中外哄传清政府与俄国商订密约,但均不能详密约究竟。在密约即将签订前两天,沈荩设法探清密约内容,抢先在天津报刊上刊出,引起全国民众与国际社会群起而攻,遂使密约无法签订。沈荩因此深遭清政府忌恨,不久即被逮捕。慈禧太后得报后,令刑部迅速将其处死,刑部慑于社会舆论压力,主张经过审讯,查清案情,但慈禧太后不允,并亲下手诏,于六月初八日,用木棍将沈荩杖杀于狱中。据当时目击者云:沈被打得血肉横飞,最后遍身骨头尽露,但沈不叫一声苦,未求一句饶,直至气绝。几日后,赛金花因人命案被捕入狱,关在沈荩就义的狱室,将沈碎肉碎骨集中,掩埋室中。

上海举行拒俄大会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初一日,在上海的江苏等十八省商学各界、爱国人士,汇集到张园,召开拒俄大会。与会者齐声谴责俄国对我国东北的"并吞"政策,并指斥清政府的亲俄外交"昏昧狂惑"。会议致电清外务部,表示全国人民对俄国的七项无理要求"万难承认"。会议还通电各国,申明即使清政府承认七项密约,"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爱国学社、育才学堂、爱国女学及务本女学学生也参加了集会。四月初四日,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也举行集会,"疏争俄约"。稍后,湖北、安徽、直隶、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及日本留学生亦举行了类似的集会抗议,从此拉开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的序幕。

《官场现形记》开始连载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上海《繁华报》开始连载由李伯元创作的小说《官场现形记》。小说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描绘了晚清社会形形色色的官僚群像。这些地位权势不同的各层官僚,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鱼肉民众,出卖祖国,最后出卖自己的灵魂。小说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晚清官吏贪污腐败,媚外卖国的丑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抨击了封建社会末世的官僚制度。作者李伯元,江苏武进人,生于同治六年(1867)。青少年时擅长制艺和诗赋,曾以第一名考中秀才,以后却屡试不第。后来他到上海,接触到新事物新思想,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愈加不满。

拒法运动发生 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广西民众即因不甚忍受清政府为庚子赔款的"摊赔",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声势越来越大。广西巡抚王之春剿抚并用,却始终不能平息人民的反抗斗争。王遂乞请驻越法军入境协剿,允诺"平乱"后,以全省铁路、矿山权益为酬。法国驻越提督随即令驻谅山侵略军北入广西,与清军联合镇压起义民众。事情传出,舆论哗然。留日学生闻讯怒不可遏。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初二日,留日学生在东京清国留学生馆召开各省评议员会议商讨对策。翌日,全体留日学生开声讨大会。大会发出函电,强烈要求清廷罢黜王之春巡抚职,废除其与法国私订的卖国信约。大会还要求国内"协应""拒法"斗争,群起反对法国出兵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立即响应,在上海张园特开"拒法大会",致电清廷,要求严行阻止法军入境,"免王职以谢国人"。四月初四日,又集议于广肇公所,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罢市、罢工,声援"拒法惩王"的斗争。

拒俄义勇队组成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初三日,五百余名中国留学生集会于东京锦辉馆,在声讨俄国侵略行径之后,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一百三十余人签名入队,陈天华等五十余人签名加入本部。女留学生则组成赤十字会,报名参加随军看护工作。拒俄义勇队以古斯巴达人反击波斯入侵,扼险据守的事迹自励,决心开赴东北前线,与俄国队决一死战。大会还决定派钮永建、汤檍(即汤尔和)为特派员赴天津,促清北洋大臣袁世凯挑头主战。还致电上海各爱国团体响应参与拒俄行动,并派人到南洋各地宣传。四月初六日,拒俄义勇队改名学生军,制订《学生军规则》,正式编成队伍。蓝天蔚被推为队长,下设甲乙丙三个区队,每个队下设四个分队,共计一百二十二人,天天进行操练。清政府十分仇视这一爱国行动,认为这是"托拒俄以谋革命",命驻日公使蔡钧要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学生军,并密令逮捕回国代表。许多留学生经此感觉到在清政府统治下,爱国无路,异常激愤,迅速转向革命。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初,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的秦毓鎏、黄兴等决定,将学生军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他们在《发起军国民教

育会意见书》中指出："俄拒东三省，各国必与之争，争必出于战，无论孰胜孰败，吾之大地终非吾有矣。……东三省亡，而吾之土地皆随东三省俱亡矣"。因此必须建立军事组织，反对俄国侵略。而清政府是拒俄之阻力，故"必先除阻力"，进行反清革命，"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鬼雄"。四月十日，原学生部分成员集合于东京锦辉馆，决定成立军民教育会，推谢晓石为临时议长，议决《军国民教育会规则》。该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提出鼓吹、起义、暗杀三种革命方法。军国民教育会初成立时，会员共计有二百余人，多数为华南、华中沿海地区的留日学生。主要活动为学习射击、学造炸弹、进行革命宣传、策动起义。该会成立后，即分派会员（称为"运动员"）回国积极展开反清革命活动。清政府得讯后，曾密令地方官吏对回国学生进行镇压，要求"随时获到，就地正法"。这一反动措施，激起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反清斗争。同年，上海爱国学社也组成军国民教育会。

《绣像小说》创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李伯元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创刊。《绣像小说》为半月刊，内容十分之九为小说，十分之一为杂文。小说包括创作小说、翻译小说、传奇及弹词、班本、时调、杂记形式的作品。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文中指出："欧美化民，多由小说，博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钜卿，魁儒硕彦，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绣像小说》杂志陆续发表了《文明小史》、《活地狱》、《老残游记》、《邻女语》、《负曝闲读》等一系列干预现实，暴露清政府统治的昏庸黑暗，斥责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作品。该刊于光绪三十年（1906）四月停刊，共出了七十二期。

邹容著《革命军》刊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初，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刊行。邹容祖籍四川巴县，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他幼年即接触到《天演论》、《时务报》等书刊，崇尚维新。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遭戮，他忿然写下"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诗句，以示走革新之路的决心。光绪二十八年五月，邹容为寻求救国之途赴日留学。在日本期间，他又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法国革命史》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经典著作，积极投身于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为了动员更多民众参加反封建革命，邹容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起开始了《革命军》一书的写作。同年三月邹容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这部前后七章，共两万余字，全面论述当时革命问题的小册子脱稿。金天翮、蔡寅、陶赓熊等阅过手稿，深为书中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辞所动，遂分头筹印书之款，请上海大同书局印行。五月初，《革命军》一书印成发行。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统治者，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为此，他将"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他指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扼杀了中国的一切生机，出卖了中国的大片国土，抑制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继而揭示了他的革命建国纲领。这就是"先推翻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诛杀满洲人所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敌对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定名中华共和国"。由于全书明白晓畅，生气勃勃，富有战斗精神，发出了振聋发聩的革命口号，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革命军》一经刊行，不胫而走，许多进步报纸纷纷加以介绍和评议，而当时的革命者则将此书视为宣传革命的重要读物加以印刷和散发，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发行量占第一位的图书，引起了社会震荡和清朝统治者的恐慌。

《苏报》案发生 《苏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十六日，初办时由中国人胡璋的日本籍妻子生驹悦为馆主，实为受日本外务省控制的日商报纸。因该报大量兜售黄色新闻，并利用言论索贿行诈，声名狼藉，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转给中国人陈范接办。陈范原倾向改良，随着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革命思潮的勃兴，转而靠近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同年，鼓吹革命的爱国学社成立后，《苏报》的主要撰稿人几乎都是该社成员，被世人视为该社的公开言论机关。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陈范聘章士钊担任该报主笔后，使《苏报》的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厚。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出版，《苏报》在四月十三日刊登了《革命军·自序》；五月十一日，又刊登了《介绍<革命军>》和《读<革命军>》。这些文章无不笔墨酣畅地疾呼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论述革命之必要。谓《革命军》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无不拔剑

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第二日，又刊出章太炎写的《<革命军>序》，称该书为动员推翻专制政府的号角。五月十六日，《苏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挑选了章太炎《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内容，文内将尚在帝位的光绪斥为“未辨菽麦”的“载湉小丑”。这一系列慷慨激越的文章，引起了清政府的震怒，必欲去之而后快。五月中旬，两江总督魏光焘派俞明震专程到上海，与上海道袁树勋秘密策划封禁《苏报》，戕害邹容、章太炎阴谋。五月十六日，俞、袁串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发出拘票，对《苏报》有关人员实施拘捕。五月十七日，中外警探包围《苏报》馆、爱国学社，抓走章太炎等人。邹容闻讯，于翌日自动投案。五月二十四日，工部局查封《苏报》馆和爱国学社。六月初三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审讯章邹。清政府则在中国土地上充当外国租界法庭上的原告，控章、邹故意污蔑清朝皇帝，“心怀叵测，谋为不轨”。章、邹坚贞不屈，义正辞严据理相争。章太炎还在《狱中答新闻记者书》中，宣称是代表四万万人民，要与清王朝斗争到底，并预言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从章、邹被拘之日起，清政府就与公共租界方面交涉，希望将章、邹“引渡”给清方，然后解往南京杀戮，甚至不惜以出卖沪宁铁路权相交换。但列强从维护在华治外法权考虑，并顾及社会舆论未予同意，直至十一月十八日，额外公堂才判决章、邹以终身监禁。判决宣布后，引起舆论大哗。额外公堂被迫于次年(1904)四月十八日改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期满逐出租界，《苏报》案至此告一段落。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初八日，章太炎监禁期满出狱；而邹容却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初九日在狱中病死。清政府本欲借此案戕害章、邹，收杀一儆百之功，结果适得其反，更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

《国民日日报》创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十五日，由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成员及返回国内的留日学生革命团体成员主办的《国民日日报》创刊。报社设在上海英租界二马路中市街。章士钊担任主编，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陈由己(独秀)、张继、何靡施、陈去病、谢晓石、苏曼殊、金天翮等，在官方登记的发行人为外国人高茂尔(A·Gomoll)。《国民日日报》在创刊之始就毫不隐讳其革命立场，声称办报目的在于“图国民之事业”，并去因“当今狼豕纵横，主人失其故居，窃愿作彼公仆，为警钟木铎，日聒于我主人之侧，敢以附诸无忘越人之杀而父之义，更发狂呓，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同时发表《黄帝纪元说》一文，公然摒弃清朝皇帝的帝号，改用公元和黄帝纪元并列的方法纪年，“以发汉种民族之观念”，是近代第一个用黄帝纪元来纪年的革命派报纸。《国民日日报》设有社说、外论、警闻、政海、实业、学风、短评、文苑等栏目。在该报发表的《革天》、《道统辨》、《王船山史说申义》、《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等文中，对封建神权、君权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展开了批判。对康、梁保皇党人极尽讥评调侃。该报的文学副刊《黑暗世界》，由连横(慕秦)编辑，专门揭露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社会的腐败黑暗，连载《南渡录演义》一类借历史进行反满宣传的小说。《国民日日报》锋芒毕露地反清革命宣传，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惧。两江总督魏光焘在该报创刊不久，即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该报并未屈服，但后来因编辑经理两部在权限问题上发生争执，致使“元气已伤，无法继续出刊”，遂于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自动停刊。

革命军事学校成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孙中山与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结交，常在一起研究布尔人抗英的游击战术，认为“此法最适用于揭竿起事之中国革命军”。当时，一些留日学生经拒俄运动，萌发学习军事的要求和愿望，孙中山遂于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建一所革命军事学校。学校以日野熊藏为校长，聘请日本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传授军事知识及枪炮火药制造方法，尤其注重讲授布尔散兵战术及以寡敌众的夜袭法。入校学习者有十四人，由孙中山主持宣誓仪式，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孙中山离开日本，该校因内部纠纷，不及半载即停办。

陈天华著《猛回头》《警世钟》刊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陈天华所著《猛回头》一书在日本刊行。陈天华祖籍湖南新化，生于光绪元年(1875)。戊戌变法时期，陈入新型的新化实学堂，渴望参与变法，改革时政。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末他到日本留学，受留学生中革命气氛的感染，逐渐成为反清爱国运动的活跃分子。四月，邹容《革命军》一书刊行后，陈天华深受感动，萌发了用民间通俗说唱体裁撰写警世之作，激发国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强烈欲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伏案疾书，不时热泪盈眶，写成《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小册子。在有四万余字的两本小册中，陈天华向国人大声疾呼，中国已面临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时刻：“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相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还有我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他号

召国人在危局面前奋起，反抗列强侵略，推翻替列强做“守土官长”的清封建王朝。“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他呼吁全国民众拿起武器，不怕牺牲，一齐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弹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近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陈天华的小册子因通俗易读，朗朗上口，并肯有极大的革命感召力，六月份刊印的《猛回头》，仅十余天就销售五千册。秋季，《警世钟》一书亦在日本刊行，并一再重版。初版的这两本小册子没有署陈天华的真实姓名，而是分别署的“群学会主人”和“神州痛哭人”，陈天华因这两部深受欢迎、流传甚广的小册子，被人们称“为革命党之大文豪”。

《女界钟》刊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金天翮的力作《女界钟》刊行。金天翮是江苏吴江人，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光绪二十九年他到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邹容、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一起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的诗文、文学评论在当时很有声望，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孽海花》的前几章，就是金天翮写的。《女界钟》是中国最早阐发妇女解放的专门论著。该书以男女平等为主旨，驳斥了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种种论调。书中提出应从六个方面恢复妇女权力，即入学、交友、营业、管财、出入自由及婚姻自由的权利。书中还呼吁妇女同胞在摆脱“女子者奴之奴也”的奴隶地位，做生活的主人。妇女自身应逐步建立新的道德观与贞节观。由于金天翮用天赋人权、民主、自由的新观念论述妇女问题，多少带有妇女解放纲领的性质，因此他被称为中国妇女界的卢梭。

清政府设立商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底，政务处督办大臣奕劻奏请在七部之外新增设商部，“以为振兴商务之地”。清政府允其所请。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十六日，商部正式成立。奕劻之子载振补授商部尚书，伍廷芳、陈璧补授左右侍郎，后又聘东南实业巨人张謇充当商部头等顾问。八月初六日，清政府命将全国路矿事务归商部办理。商部成立后，颁发了《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劝办商会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一系列兴办商务、奖励实业的章程。同时还奏请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通饬各级官吏及局卡委员，“一律认真恤商持平，力除留难延搁各项积弊，以顺商情而维财政”。商部还认为“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工商亦无以为资。”遂提出清查地亩，辨别土宜以及兴修水利，发展畜牧，设立农务学堂与农事试验场等建议。

《老残游记》连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初一日，《绣像小说》第九期开始连载刘鹗创作的小说《老残游记》。《老残游记》通过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在游历中的所见、所闻、所为，反映了晚清的某些社会现实。全书主要刻画了玉贤、刚弼两个酷吏的形象，揭示了封建末世的黑暗。在晚清动荡不安的局势下，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统治者非常倚重那些镇压群众反抗的“清官”来维持残局。而《老残游记》却比较深刻地鞭挞了所谓“清官”的恶行。该书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三部书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作者刘鹗，江苏丹徒人，生于咸丰七年(1857)。他很早即对西学发生兴趣，研究过数学、医学，对治理黄河、兴修水利颇有见解，而且颇有劳绩。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连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十五日，《新小说》杂志第八号，开始连载吴趼人创作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伏》。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全书共八册，一百零八回。通过九死一生(即作者的影子)在二十年中耳闻眼见的无数怪现状，向读者描绘了一幅行将崩溃的清帝国的社会画卷。书中所反映的社会面比较广泛，不仅写了官场人物，洋场才子，而且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但它的重点还是暴露官场的丑恶污浊。作者吴趼人，广东南海人，生于同治五年(1866)。是晚清最多产的小说家，共创作小说三十余种。

《俄事警闻》创刊　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初九日，占驻东北的俄军强行闯入奉天省城，锢拘清朝盛京将军增祺，并向清廷提出新的侵略要求，东北形势再度吃紧，促使中国的拒俄运动再次高涨。不久，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回到上海，联络组织对俄同志会进行拒俄活动，十月二十七日，创办《俄事警闻》以为同志会机关报纸。报社社址设在上海福州路惠福里。报纸分消息、言论两大部分，以拒俄宣传为主旨。担任编辑和撰述的主要有蔡元培、王小徐、刘师培、何琪、陈去病、叶翰、林獬等。《俄事警闻》的消息部分专门报道俄国侵华的“警闻”，这些警闻比

其他报纸的报道更为详尽。言论部分每期都发两篇论说，一篇用文言，一篇用白话文。其中《俄祸》、《告学生》、《告军人》、《告革命党》等社论，剖析了沙皇俄国一贯的侵华政策，介绍了中国华北地区面临的危机，研讨了解决东三省问题的方略，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拒俄，与沙皇俄国的侵略行径作坚决的斗争。《俄事警闻》影响很大。“内地同志，多有集款定购此新闻，送茶坊酒肆，供人阅看”。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俄事警闻》更名《警钟日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六日，《警钟日报》停刊。

《中国白话报》创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初一日，《中国白话报》在上海创刊。该报为月刊，设论说、历史、地理、新闻、实业、科学、传记、小说、戏曲、歌谣等栏目。著名的近代资产阶级报刊活动家林獬(白水)为该报创办人和主编，主要编辑者为林獬的妹妹林宗素等。《中国白话报》以“鼓吹爱国救亡”为宗旨，直言不讳地声称“巴不得我的这本白话报变成一枚炸弹，把全国种种腐败社会炸裂了才好”。在该报论说栏中，发表了大量宣传反满革命思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团结御侮的受国思想。在地理栏中先后介绍了黄河、长江、珠江、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中华名山大川，中国的丰饶产物宝藏。在历史栏中则介绍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汉族的祖先及历代反对暴政抵抗外族入侵的名人和民族英雄。在小说、戏曲、歌谣栏中，则登载过《玫瑰花》、《娘子军》、《博浪锥》、《断头台传奇》、《人种歌》一类以反秦、抗金、抗元、抗清为内容的小说、戏剧、诗歌。是当时白话文刊物中历时较久、影响最大的一种。该报从第十四期始改为旬刊，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二十九日停刊。

《铁云藏龟》出版 光绪二十九年(1903)，《铁云藏龟》抱残守缺斋石印本印成刊行，是为中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籍。先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发现当时作为中药的龟板甲骨上刻有文字，便收购了大批有文字的甲骨，收藏达五千余片。他经过整理挑选，精选出一千零五十八片，著录成《铁云藏龟》一书。

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 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因钦定学堂章程很不完善，清政府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重新厘定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1904)十一月二十六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复奏重订学堂章程。重定的章程规定：“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重订章程包括各类学堂的章程及译学馆、进士馆章程。另附有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各学堂考试章程、奖励章程等，是一份更全面的教育体系及管理的规定。清政府于当日即颁布该章程，谕即次第推行。该章程遂被称为《奏定学堂章程》，亦称为“癸卯学制”。

《女子世界》创刊 光绪二十九年(1904)十二月，《女子世界》杂志在上海创刊。《女子世界》为不定期刊物，二十四开本。该刊设有社说、演坛、实业、教育、科学、史传、译林、专件、记事、文艺等栏目。该刊初创时主编为丁初我，第六期以后为陈志群，主要编辑者和撰稿人有曾朴等。丁初我是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会员，陈志群与上海同盟会会员有密切来往，都是思想比较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该刊的革命色彩比较浓，在发刊词中宣称：改变妇女地位是整个国家强盛的起点。针对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勇敢地向妇女界发出了“我亦国民一分子，不教胡马越雷池”的号召。提出改变妇女地位的根本办法是兴女学，包括读新书、注重体育、反对缠足、提倡自重等等。该刊陆续发表了《女子家庭革命说》、《女界革命》、《争约之警告》、《女权说》、《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革命与女权》等大量文辞激烈的政论和文学作品。积极鼓吹“政治之革命”与“家庭之革命”并举，号召中国妇女以苏菲娅等外国女中豪杰为榜样，和男子一道，“携手以上二十世纪之舞台，而演驱逐异族光复河山，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活剧”。《女子世界》共出版了十八期，至光绪三十三年停刊。

抗俄铁血会成立 光绪三十年(1904)初，日俄为争夺中国，在中国境内挑起日俄战争。京师大学堂学生丁开嶂，基于对列强侵略和清政府的愤慨，与同学张榕等赴东北进行抗俄和反清活动。到东北后，丁开嶂在奉天组织抗俄铁血会，发布檄文，声讨俄国侵略中国的罪行。檄文宣称其宗旨在于“纠合海内外学生将弁及直、奉、吉、黑四省之绿林领袖”，“大败俄罗斯于东清而后止”。入会者半为学界志士半为绿林会党。同年，丁开嶂在兴京一带组成起义军，与俄军交战“二十余次”。日俄和约签订后，该会遂告解散。

西藏军民进行江孜争夺战。 光绪二十九年(1903)末，英国派荣赫鹏、麦克唐纳率近万名侵略军，闯入西藏的亚东，然后分兵两路，一路进攻干坝，一路向西藏首府拉萨挺进。光绪 三年(1904)二月上旬，英军谎称停火谈判，突然对守卫堆拉曲眉仙角的藏军发起攻击，屠杀藏族军民一千五百余人。二月二十日，英军对拉萨的屏障要塞江孜发起攻击。经过几次战斗，英军于三月初占领江孜城。三月中旬，西藏地方政府组织起近万名军民与英军展开壮烈的江孜

争夺战。二千余藏军在江孜东北面卡罗拉山谷阻击英军主力。三月十九日,西藏军民得知江孜守敌不足二百人,立即派出近二千人奔袭江孜,夺取了江孜的大部分村落,毙敌数十人,将英军围困在江孜的江格林卡。五月十一日,七千余英国援军赶到江孜,西藏军民在敌我力量悬殊,武器极其简陋的情况下,与英军展开了殊死抗争,他们凭屋据险,守卫每一寸土地。平原据点失守后,就退守高山阵地。在弹尽水绝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坚持战斗三天三夜,打退英军多次进攻,表现了西藏军民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五月二十三日,英军重新占领江孜。拉萨失去屏障,于六月二十二日沦陷。

《东方杂志》创刊 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十一日,由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东方杂志》创刊。《东方杂志》初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该刊设谕旨、社说、内务、军事、外交、实业、教育、宗教、文件、记载、调查、附录、小说等栏目。初期的主要编辑者有著名的明清史学家徐珂、孟森,《亚泉杂志》的创办者杜亚泉。该刊是一种文摘剪报性质的刊物,各栏刊出的文字多数是从当时国内外报刊上剪辑来的,只有很少部分是直接从作者那里组来或自己撰写的。该刊的记载专栏分中国大事记、世界大事记、中国时事汇录、世界时事汇录等类门,连续而详细地辑录了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如徐锡麟刺杀恩铭、长沙抢米风潮、莱阳抗捐等,查考翻检十分方便。赞赏和推动实行宪政,是该刊的政治倾向。

日俄战争在华爆发 光绪二十九年(1904)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海军中将东乡根据统帅部的决定,下令攻击停泊在旅顺和仁川的俄国舰只。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联合舰队分三路出发,一队十艘开往旅顺,一队八艘开往大连,舰队主力开往长山岛。当天下午四时左右,日本海军向驻守仁川的俄国军舰开火(翌日击毁两艘俄舰)。当天夜间,驶到旅顺的日舰向停泊在此的俄国舰队发动突袭,击毁三艘俄舰。二十四日,沙俄对日宣战,二十五日,日本对俄正式宣战。清政府外务部二十七日宣布:日俄开战,中国严守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地区划为"交战区"。

孙中山重订致公堂章程 光绪三十年(1904)春,孙中山鉴于洪门会员中很多人已忘却反清宗旨,而且分布于北美的不少洪门组织又为保皇党徒把持,遂向设在旧金山的致公堂建议,举行全美洪门会员总注册,并表示愿意亲自到各地,对洪门会进行反清革命宣传。他的主张得到黄三德和总堂各职员的赞同。五月,孙中山为致公堂重新订立了章程。在新订章程中,孙中山指出:"向章太旧,每多不合时宜;维持乏人,间有未惬众意。"因此需重新修订。在新章程中,孙中山强烈谴责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抨击了保皇党的保皇立场,并在《纲领》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清政府赦免戊戌变法案人员 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初八,清政府特赦戊戌变法案所涉人员,宣布除康有为、梁启超外,戊戌变法案内其他人员均被宽免。已革职者,开复原衔,通缉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律开释。

科学补习所成立 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二十一,武汉军、学两界的革命者三十余人集会,正式成立反清革命团体"科学初习所"。吕大森被举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为宣传干事、时功璧为财政干事、宋教仁为文书、康建唐为庶务,所址设在武昌阅马厂附近的多宝寺街。科学补习所以补习研究科学为名,实以"革命排满"为宗旨。科学补习所的一项主要活动是介绍知识分子和会党成员加入新军。被介绍参军的人,先在补习所接受反清革命思想教育,牢记"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宗旨。同年九月中旬,华兴会起义事泄流产。九月二十日,张之洞派兵搜查科学补习所,革命党人事先得报隐匿各地,补习所遂自行终止了活动。

中英签订《拉萨条约》 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二十八日,统帅英军入侵西藏的荣赫鹏,逼迫西藏哲蚌、色拉、噶尔丹三大寺的寺长罗生戛尔曾等人在拉萨签订了《拉萨条约》。该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为:开放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江孜、拉萨通道上的炮台山寨一律削平;向英国赔款五十万英镑。其中第九款规定:除非得英国同意,西藏地方土地不得出让予外国,西藏地方一切事宜不准外国干涉,不准外国在西藏地方取得铁路、电讯、矿业等权利。条约送北京,清政府拒不签字,并电令驻藏大臣有泰改约,但英方代表荣赫鹏不予理睬。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又派唐绍仪、张荫棠等赴印度再同英方谈判。英国代表要唐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唐指出英国与西藏定约无效,应与中国政府重新定约,并拟定约稿,将《拉萨条约》第九款全部删除,加"英国无有侵占西藏之意"等语。英方接受重新议约原则,但力图否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并制造宗主权谬论。唐绍仪对此据理驳斥,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侵犯。谈判由僵持而最后停顿。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英在北京重开谈判。四月四日,签定《中英续增藏印条约》,把《拉萨条约》作为附约。约中规定"英国国家应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

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对于《拉萨条约》第九款的内容，该条约中规定：“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享受”。

华兴会成立 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十六日，黄兴以庆贺自己三十岁生日为名，约集章士钊、彭渊恂、刘揆一、柳大任叔侄、宋教仁、周震霖、徐佛苏、胡瑛、翁巩、秦毓鎏十一人，在长沙保甲局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众人推黄为会长，宋、刘为副会长。为避人耳目，防清政府迫害，对外用“华兴公司”名称。十二月三十日(1904)，华兴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百余人。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为副会长。黄兴在会上号台联合各界，反清革命。根据黄兴的建议，华兴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并确定先雄踞一省，发动各省响应的反清革命战略。华兴会正式成立后，在长沙南门外设“华兴公司”为总机关；设“东文讲习所”以联络学界；设“黄汉会”以联络军界；设“同仇会”以联络会党。华兴会会长黄兴，湖南善化人，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戊戌变法时期入武昌两湖书院，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并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留学，在东京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参与创办了《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等杂志，全力投入反清民主革命。拒俄运动期间，黄兴积极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后被派往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华兴会密谋起义事泄 华兴会正式成立后，黄兴、刘揆一等立即密谋发动武装起义，商定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寿辰，将炸弹安放在湖南省城官员贺寿之处，以炸弹引发为起义信号。长沙的起义以武备学堂的华兴会会员和地方军队中倾向革命的士兵为主。萍乡、浏阳、醴陵一带，准备说服当地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响应。并派陈天华前往江西说服防营统领服膺革命；在武昌建立华兴会支部的胡瑛、宋教仁负责运动当地新军；章士钊、杨守仁到上海策应联络；还派两人到四川联系会党。形成湖南首义，四处响应的起义计划。不久，黄兴、刘揆一乘夜踏雪赴湘潭矿山，与当地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喝酒畅谈，使马福益接受华兴会领导。但起义未发而消息泄露。黄兴在友人帮助下，辗转逃往日本。马福益改名陈右衡逃往广西，随后返回湘西洪江隐匿，其会众交游得胜、萧子金统率。马到湘西后，与黄兴时通信息，互相联络，准备以洪江为根据地，再次组织发动起义。马遂潜往安源联络矿工加入起义。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马福益不幸在湘乡境内被清军逮捕，三月初八日，在长沙被害。

《国粹学报》创刊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革命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主办的《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国粹学报》为月刊，分政、史、学、文等类，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为宗旨，并把国粹的宣传和反清革命的宣传紧密结合在一起。该刊的主编是国学保存会的发起人邓实，担任编辑和撰稿的主要有黄节、陈去病、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马叙伦等，多为国学保存会会员。南社成立后，编撰者又多为南社社员。这些人大都是有造诣并有强烈反满思想的国学家。《国粹学报》刊登了大量研究祖国历史文化、发扬民族传统，表彰宋末明末忠义节烈，激发民族感情的文章。该刊还搜集了不少明清间的禁书，以《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的名义出版，在当时的舆论界和学术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宣统三年，该刊停刊，共出版了八十二期。

黄遵宪逝世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二十三日，有近代新派诗旗手之称的黄遵宪于故乡逝世。黄遵宪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8)。黄遵宪自幼喜爱诗文，青年时写下“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 ”的诗句，主张诗文不应以剽窃模拟、拾古人牙慧为上乘，而应融入新事物，抒发各人自己的情怀。光绪三年(1877)秋，黄遵宪经同乡何如璋推荐，被任命为清朝驻日大使馆参赞，开始了长年的外交生涯。黄遵宪在日时期，与日本文化界往来密切，向日本友人介绍了《红楼梦》等中国文学巨著。同时他对日本国情有了较多的了解，遂着手《日本国志》的撰写，以使国人认识近代发展迅速的东邻。光绪八年(1882)春，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为当地华侨争取权益的事情。他还写了大量的诗文，记录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风情，其中描写美国总统竞选全过程的《纪事》一诗很有名。除了将国外的所见所闻所感以诗的形式反映出来外，黄遵宪诗歌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均写入诗中，对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的许多战役、许多主要战将、许多事件，他都有长诗纪咏，如《冯将军歌》、《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度辽将军歌》、《马关纪事》等等，被称为史诗。他的诗题材广泛，不拘旧格律，被梁启超誉为新派诗的擎旗人。戊戌变法期间，黄遵宪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出资创办维新刊物《时务报》。赴湖南做按察使后，黄遵宪大力支持巡抚陈宝箴的新政，亲任湖南时务学堂总理，培养维新人才。在慈禧太后扼杀维新运

动过程中,黄遵宪受到牵连。被迫返回故里,他常以诗词自娱,但依然关心国家命运。光绪三十年间,黄遵宪早年患有的肺病加剧,终于不治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孙中山承认学生可作革命领导 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随着留学生运动的高涨,以学生为主的爱国知识分子成为国内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的部分,他们频繁发起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在海外组织革命的孙中山逐渐感到,爱国学生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力量。光绪三十年末,孙中山前往欧洲,试图与爱国留学生接触,希望吸收这部分人参与革命。而在具有反封建倾向的青年学生心目中,对孙中山长年不屈的反清斗争亦十分钦佩。光绪三十一年初,德国和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致函孙中山邀请他到布鲁塞尔会商组织反清团体之事。二三月间,孙中山到达布鲁塞尔,与从柏林赶来的朱和中就反清革命进行了讨论。孙中山向朱和中等介绍了他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阐述了他的革命策略。朱和中等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十分赞赏,但对孙中山以会党为革命领导和骨干的策略提出异议。他们认为革命不能撇开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并用光绪二十九年以来爱国学生革命活动的大量事实加以说明。但孙中山在最初却坚持有功名的人和留学归国的军官搞不成革命的观点,指出自己多年从事革命主要依靠的是会党,今后应继续以这部分力量为领导和骨干。朱和中等又以光绪二十六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为例加以反驳,认为会党难于控制,其主要兴趣并不在于政治革新,并有劫掠旧习,并指出孙中山历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的支持。经过三天三夜反复辩论,孙中山接受了朱和中等人的意见,认为爱国学生中全心全意献身革命的人,均可作革命的领导,也是革命的骨干力量。随后在留欧学生中,发展了三十余人加入其革命组织。

清政府宣布改革刑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英、美、日、葡等国向清政府表示,若中国能参照西方律例,对刑律进行改革,则放弃其领事裁判权。清政府感到"墨守旧章授外人以口实,不如酌加甄采(外国刑律),可收长驾远驭之效"。遂于四月初六日,派刑部右侍郎沈家本、驻美国公使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把修订《大清律例》纳入"新政"范畴。沈家本、伍廷芳受命后,参照西方和日本等国的刑律,将《大清律例》中相互重复,已经停止以及特别残酷的封建判刑条例进行了合并和删除,把充军、流刑、徒刑改为服劳役;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把笞、杖改为处罚金,轻罪禁用刑讯;将虚拟死罪改为流刑、徒刑。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日,清政府采纳了沈家本、伍廷芳的部分修订意见,宣布删去《大清律例》中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随后又颁布"恤刑狱"若干条,"禁止刑讯、拖累、变笞杖"。

清军机处发查禁革命书报电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七日,清军机处奉命向各地方当局发出查禁革命书籍、报纸、期刊的电文。电文中谓:"近闻南中各省,书坊报馆有寄售悖逆各书。如《支那革命运动》、《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并吞中国策》、《自由书》、《中国魂》、《黄帝魂》、《野蛮之精神》、《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瓜分惨祸预言》、《新民丛报》、《热血潭》、《浏阳二杰论》……等种种名目,骇人听闻,丧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市,不独坏我世道人心,且恐环球太平之局,亦将隐受其害。此固中法所不容,抑亦各国公法所不许。务希密饬各属,体察情形,严行查禁"。

《孽海花》刊行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孽海花》初集(一至十回),二集(十一至二十回)由小说林书社出版,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发表了二十一至二十五回。先是光绪二十九年末,金天翮(松岑)应《江苏》杂志之约,开始撰写《孽海花》小说,第一、二回于当年十二月初一日(1904)出版的《江苏》杂志上发表。光绪三十年(1904)夏秋之交,金将已发表的前两回及新写成的三至六回寄给小说林书社的主办人曾朴。曾朴见稿后,认为可以金雯青、傅彩云(影射洪钧和赛金花)故事为线索,做反映晚清政治、社会文化变迁讥讽官场黑暗的鸿篇巨制,并与金拟下了全书六十回的回目。金认为曾朴的想法很可取,且已有成熟考虑,遂同意由曾朴将其原稿随意修改,然后由曾继续完成小说。曾朴遂接过了创作《孽海花》小说一事。《孽海花》与一般小说不同,书中人物,无不有所影射,所述之事,大都可以考稽。作品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通过当时京城内外官僚名士、封建文人的思想生活和社会风气,展现了清末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情况,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歌颂了冯子材、刘永福等抗敌英雄,还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口,宣传了"天赋人权、万物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曾朴是江苏常熟人,生于同治十年(1871)。他早年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曾入同文馆学习法文,翻译过雨果等人的作品,文学兴趣日浓。后来参加戊戌变法运动,与康梁等维新派过往

颇密，在清政府杀害女革命家秋瑾时，他还签名抗议。光绪三十年(1904)，他创办了小说林书社。他家与朝廷大吏有亲缘关系，和帝师翁同龢等是同乡世交，对朝廷宫中之事知之甚多，所以才能写出勾画晚清政治社会变异历史画卷的力作。

孙中山访第二国际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中旬，孙中山第二次来到布鲁塞尔，经贺之才介绍，走访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即第二国际常设机构)。孙中山与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处书记胡斯曼晤谈。提出了接纳他的革命组织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请求。孙中山向王德威尔得、胡斯曼扼要地解释了他的组织的目标和纲领："第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指满族统治者)，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每人依其财产数量缴纳租税"，目的在于"防止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就如欧洲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四月十五日，佛兰德文版的《人民报》对这次晤谈进行了报道。

抵制美货运动发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七日，上海工商界召开大会，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提出：以抵制美货反对美国续订《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以及迫害华工华侨事件，并通电各省商会传谕商界共同行动。上海的倡议迅速得到各地的响应，广州、天津、长沙、汉口、苏州等城市民众纷纷参加抵制美货活动，学生发传单斥责美国罪行。一时街上开会演说风起，通电往返，国内外华文报纸杂志舆论也以此为中心。六月二十六日，抵制美货运动正式开始，工人不运美货，企业不加工和进口美货，商业不卖美货。报刊指斥清政府专制卖国，声称"勿依赖清政府"，只能依靠全体民众的力量。各阶层人民还纷纷建立群众性团体，公开宣布"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形成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反美运动。美国政府见此威逼清政府禁止运动发展。八月初二日，清廷发出谕旨，禁止民众抵制美货，否则严厉镇压。在清廷的严厉镇压下，运动以失败告终。

《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湖南、湖北、广东、江苏、安徽等有反清革命思想的留日学生，倡议"破除地方团体意识"，决定联合创办一个革命刊物。不久，《二十世纪之支那》在东京创刊。《二十世纪之支那》设有论说、学说、政治、军事、实业、历史等栏目，标榜"爱国主义"。该刊主持人为宋教仁、程家柽。担任主要编辑、撰稿和发行工作的有田桐、白逾桓、陈天华、刘公、鲁鱼、何湛霖、雷克宇、张炳标、高剑公等。该刊在创刊号刊载《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声称办刊宗旨是："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为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创刊号上印有轩辕黄帝的肖像，附有"嗟予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祖"的题辞，并使用黄帝纪年，流露了反清革命倾向。七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黄兴提出《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半数以上成员已加入同盟会，可将该刊改组为同盟会机关刊物，与会成员一致同意，随后开始办理交接手续。然手续尚未办完，七月二十七日，该刊第二期出版，登载蔡汇东《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对中国辽东半岛的领土野心，引起日本官方的恼怒，将已印好的刊物全部没收，宋教仁、田桐等被日本警方传讯，刊物也因此被查禁。不久，该刊改为同盟会机关刊物的交接手续完毕，遂改名为《民报》出刊。

清政府决定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四日，清廷发出谕旨，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稍后，清廷续派商部右丞绍英参与此事。由载泽、徐世昌、绍英为一队，赴英、法、日、比等国；戴鸿慈、端方为一队，赴美、德、意、奥等国，时人称之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以国内及留学国外的青年学生为主的反清爱国运动日益高涨，国内群众性反对清政府压榨的斗争也此起彼伏，迫使清朝当局一再宣示要实行变法和新政，使立宪派人士感到立宪有望，加紧推波助澜。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状元实业家张謇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不久，清朝驻法公使孙宝崎亦电呈《上政务处书》，请求立宪。国内外改良派报刊纷纷为立宪鼓噪，以至"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接着，云贵总督丁振铎、署两广总督岑春煊、贵州巡抚林绍年也相继以立宪入奏。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些身居高位，权势显赫的洋务大吏也把立宪之论挂在嘴上。五月三十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请朝廷宣示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同时还奏请朝廷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面对朝野一片立宪呼声，清政府已不能不对此作出相应的表示，遂派五大臣出洋考察。

孙中山与黄兴在东京会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七日，孙中山到达日本横滨，不久便前往留学生最集中的东京。孙中山在日本友人宫崎滔

天(宫崎寅藏)家中,询问东京留日学生活动情况、有无出类拔萃人物。宫崎滔天告以两三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猛增,其中黄兴是个极为杰出的人物,是反清组织华兴会的首领,在留学生中威望甚高。孙中山遂请宫崎滔天介绍他迅速与黄兴晤面。同时参加会面的还有末永节、张继。在餐桌上,孙中山与黄兴就时局和反清斗争形势交换了意见,又就兴中会同华兴会等革命组织联合等问题进行商议。整个会谈长达两个小时,孙、黄定下各个革命组织联合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大计。六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又与宫崎滔天到华兴会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华兴会的另两位首领宋教仁、陈天华会谈。孙中山重述联合各党,组建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并表明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孙中山的言谈给宋、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促成了联合的实现。

中国同盟会成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二十八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领袖,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聚集到日本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内田良平的寓所,举行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筹备会,共议政党名称、纲领、誓词、加入仪式和推选章程起草者事宜。到会者七十余人,代表了十七个省的留日学生。会上孙中山首先演讲“革命之理由”、“革命之形势”、“革命之方法”,阐发了三民主义思想,然后讨论政党名称。最初有人提议定为“对满同盟会”。孙中山认为革命并非专为排满,更在推翻帝制,创建共和,所以应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后有人指出政党为秘密团体,不宜公开标明革命字样。经过商讨,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接着,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并提议将誓词作为同盟会革命纲领。有人认为应取消“平均地权”一条。孙中山根据世界革命发展趋势和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对此做了耐心的解释,使得誓词和宗旨终被多数人接受,并表决通过。孙中山遂率领众人举行宣誓加盟仪式。会议最后推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等八人负责起草同盟会章程。七月二十日,一百余名同盟会员来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借日本人阪本金弥的住宅,正式举行同盟会成立会议。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同盟会章程草案,确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经过讨论修改后,集体通过中国同盟会章程三十条。接着,黄兴提议选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与会者一致举手赞成。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下设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黄兴任执行部庶务总干事(相当于常务副总理)、汪精卫任评议部评议长。邓家彦、宋教仁分任司法部判事长、检事长。会议决定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国内为东(设上海)、西(设重庆)、南(设香港)、北(设烟台)、中(设汉口)五个;国外为南洋(设新加坡)、欧洲(设布鲁塞尔)、美洲(设旧金山)、檀香山(设火鲁奴奴)四个。最后,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与会者鼓掌赞同。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主持下,立即展开了发展组织,建设国内外分支部;编辑机关报,与康、梁保皇派论战;积极准备新的武装起义的工作。

清政府下令废止科举 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变通科举。谓科举阻碍新式学堂的兴建,请按年递减中额,在数年之后,彻底停止科举,呈入后未经覆议。同年底,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复奏重定学堂章程后,又联衔重申“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奏称“时势阽危,非人莫济,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请自下届丙午科起,乡、会试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俟三科后中额减尽,即停止乡试;学政、科试取进学额,于乡试两科年限内,计两次岁考,两次科考,每次各减四分之一,俟学额减尽,即停止岁、科试,以后生员尽出于学堂。清政府允其所请,宣布递减科举中额。然而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列强侵凌日重,国内危机四伏,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于八月初四日联衔奏请立即停止科举。该奏折谓:“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即以递减科举中额,期以三科减尽之法,已缓不济急。请朝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清政府接受袁世凯等人呈请,于当日谕告全国,“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寿终正寝。

吴樾炸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未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二十六日,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位出洋考察宪政大臣,带领大批参赞随员,到正阳门火车站乘车离京,前往上海转乘轮船赴外国考察。当五大臣登车后,革命党人吴樾暗藏炸弹,乔装成皂隶,尾随跟上专车。他刚进入车内,正逢机车与车厢挂钩,车身突然震动,触发炸弹,吴樾当场死难,而五大臣中只有载泽,绍英受了轻伤,其余人皆无恙。吴樾,安徽桐城人,早年崇拜康、梁,后阅读了《警世钟》《孙逸仙》《黄帝魂》等革命书刊,幡然省悟,成为激进的革命党人。他曾组织过军国民教育

会保定支部，主编《直隶白话报》，而对于冒险和暗杀活动尤为热衷，写有《暗杀时代》一书，把暗杀视为反清革命的主要手段。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他得知五大臣出洋的消息，立即从东三省入关，决心以炸毙五大臣，挫败清廷假立宪骗局。他写下遗书，怀揣炸弹行刺，不料出师未捷身先死。由于吴樾的行动，延缓了五大臣的出行。直到十一月十五日，五大臣才启程离京，但原来派定的徐世昌、绍英，改由顺天府丞李盛铎、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顶替。

中国人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开设大观楼影戏园的沈阳人任景丰，有感于在中国放映的皆是外国电影，拷贝经常断缺，萌生了自行拍摄中国影片的念头。任景丰青年时曾到日本学习过照像技术，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他就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开办了第一家照像馆(丰泰照像馆)，有较丰富的摄影实践经验。这年秋季，他从德国人开的祁罗孚洋行购买了一套摄影器材及十四卷胶片，便筹划自拍电影。当时北京风行京剧，任景丰认为拍摄戏剧片既富有中国特色，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便请来当时享誉戏坛的京剧老生演员谭鑫培，在丰泰照像馆的院子里，利用自然光进行拍摄。谭鑫培表演的是京剧《定军山》中的一些片断。因为当时电影还处在无声电影阶段，所以基本上以武打动作为主。整个拍摄过程持续了三天，摄影者为丰泰照像馆的照像技师刘仲伦。这是中国人拍摄电影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把电影同中国的传统戏剧结合在一起，加上谭鑫培扮演的黄忠把古代名将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至，放映时受到热烈的欢迎。

《民报》创刊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三十日，《民报》在东京创刊。《民报》初创时为月刊，后来为不定期出版，每期约六至八万字。该刊设有社说、时评、译丛、谈丛、纪事、撰录、图画等栏目。实际担任主编的先后有胡汉民、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人。该刊的大多数文章由本社成员撰写或编译，主要撰稿人有章太炎、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汪东、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刘师培、黄侃、汪增璧等。《民报》的宗旨就是宣传同盟会的纲领，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化为常识而深入人心。在创刊号上，孙中山亲自撰写了发刊词，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本社简章》中宣布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中，有“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土地国有”三项，实际上是三民主义的具体化。光绪三十二年初，《新民丛报》连续刊载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共和革命。《民报》发表号外，专门予以批驳，拉开了革命与立宪的论战序幕，《民报》遂成革命派阐述观点的主要阵地。《民报》十分重视当时世界上各种学说的介绍，在创刊后的第二期上，就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是最早的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的文字。宣统二年(1910)初。《民报》出版了最后一期，总共出刊二十六期。

日俄签订《朴资茅斯条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七日，日、俄签订了《朴资茅斯条约》。光绪三十年初，奉天大战结束，日、俄双方都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日本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出面非正式地请求罗斯福出面调停。俄国在四月对马海峡之战失败后，被迫接受美国的调停。此前，日本以承认美国吞并菲律宾；承认英国巩固在印度的统治为条件，换得美、英同意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七月初十日，俄国全权代表维特和日本全权代表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开始议和谈判。经过十次会议的讨价还价，在美国等国的撮合下，双方于八月初七日，在《朴资茅斯条约》上签字。条约正文十五条，附约二条，主要内容是：一、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政治军事经济上均享有卓绝的利益，如指导、保护、监理”的权利。凡是日本认为必要的措置，俄国“不得阻碍干涉”。二、“俄国政府以中国政府之允”，将俄国从中国攫取的旅大租借地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均转让给日本。三、俄国政府将从长春至旅顺段的中东铁路支线及其所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均移让给日本。四、日、俄两国可在各自霸占的铁路沿线驻军。五、俄国宣布取消在东北的一切有违机会均等主义的权益。六、俄国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库页岛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并该处一切公共营造物及财产之主权，永远让与日本。

清政府设立学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四日，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后，山西学政宝熙随即于九月上书朝廷，谓学制“变更伊始，造端宏大”，欲令全国整齐划一，断非补苴罅漏之计所能为，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所以奏请于京师设立学部，以为“总汇之处”，专管学堂事务。经政务处会同学务大臣议覆，清政府于十一月初十日谕令设立学部，位在礼部之前，并将国子监归并学部。荣庆被任命为学部尚书，熙瑛、严修被任命为侍郎。第二年(1906)三月初一日，学部奏准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规定“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

陈天华蹈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初六

日，在清政府要求下，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即管束）规则》，对留日中国学生的活动大加限制。规则颁布后，广大中国留学生认为这一规则"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暗中酝酿一场反取缔规则的运动。陈天华对日本政府的行为十分愤慨，但感觉到留学生中确有许多追求利禄之人和民族败类，恐怕难于组织起统一行动，故没有积极支持这场运动，还婉辞了宋教仁要他撰文号召的约请。从十一月初八日起，就读于日本各校的八千余名留学生同心同德，相继集体罢课，使陈天华不胜惊喜。而日本政府控制下担报刊舆论却对中国留学生的行动大加污蔑和指责。十二月十一日的《朝日新闻》，将中国留学生的集体罢课归结为是"清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陈天华见此异常气忿，但同时担忧留学生一旦不能团结一致，把斗争进行到底，出现日本报刊攻击的放纵卑劣的状况，将是中国留学生和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认为，此时用口头呼吁去唤起学生团结坚韧可能是无力的，便毅然决定以身投海，以自杀来震惊国人，激励留学生坚持斗争，并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不是放纵卑劣的芸芸众生。他用了一天的时间，写下三千言的《绝命书》，声明他之所以蹈海，是为了使国人有所警悟，以实际行动，回击外人对中国人的污蔑，他希望留学生们牢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八字，卧薪尝胆，刻苦求学，振兴中华民族。他还在《绝命书》中对一系列革命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非常有价值的是他认为在宣传革命时，要注重政治问题，而不宜过于强调民族问题，反对倡言戮杀满族人民的复仇观念。十一月十二日早晨，陈天华坦然离开寓所，将《绝命书》寄给留学生总会，然后从容地在东京大森湾投海。陈天华的蹈海，大大激励了留日中国学生的反取缔规则斗争，数千名留学生集体回国，惊动了国际舆论和日本朝野，使日本政府对取缔规则作了新的解释，承认了留日中国学生提出的一系列正义的要求。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初一日，陈天华的灵柩运抵长沙。初七日，长沙各界一万余人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公葬。

中日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初五日，清政府在得知日俄议和及议和有关条款后，通过外交部向日、俄两国声明："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清政府）一概不能承认"。但日、俄两国却置之不理，擅自签订了瓜分中国东北权益的条约。事后，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根据《朴资茅斯条约》中俄国转让给日本的旅大"租借地"及中东铁路支线权利，"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的规定，强逼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十月二十一日，中日全权大臣开始就有关事项进行谈判。十一月二十六日，小村寿太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与清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条约正约三款，附约十二款。主要内容有：清政府承认《朴资茅斯和约》中俄国让与日本在南满的各项权利；允许日本在奉天（今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划定租界；安奉铁路仍由日本管理，为期十五年；凤凰城（今凤城）、辽阳、新民、铁岭、通江子（今昌图县通江口）、长春、吉林、哈尔滨、珲春、三姓、法库门（今法库）、宁古塔（今宁安）、海拉尔、瑷珲（今爱辉）、满洲里、齐齐哈尔十六处"开埠通商"；日本享有在鸭绿江右岸森林开采权。这个条约使东北几乎全境对外开放，为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东北大开方便之门。

收回矿权运动兴起　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福公司通过《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掠得山西潞安、平定、盂县、泽州四矿煤铁开采权及平阳府煤铁石油开采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山西人民首先展开收回矿权的斗争，全省绅商要求巡抚张人骏主持废约，山西籍留日、留欧学生也组织了争回矿权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二十六日，山西籍留日学生李培仁为抗议英资方对中国矿权的掠夺，愤而投海自尽，从此激起更大规模的斗争。次年，山西绅商成立保晋矿务总公司，主张收回矿权自办矿务，并在公司简章上规定"唯收华股，不收洋股"。福公司在山西人民的抗争下，勒索了二百七十五万两白银的"赎金"，放弃采矿权。光绪三十四年（1908），奉天人民经过斗争，收回锦西暖池塘煤矿；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排除了德国资本，归华商自办。宣统元年（1909），安徽省绅商学界为收回铜官山矿权，开始连续不断的斗争，组成安徽省路矿公会，号召联合沿江各省，对外国资本掠夺中国矿权行径"实行文明抵制"。同年夏，四川人民经过斗争，以二十二万两白银"赎回"被英国江北公司攫取的江北厅煤铁矿，由中国人自办。山东绅商学界又经过一年斗争，于宣统元年末，在被德国资方勒索了三十四万两白银"赎款"后，收回茅山等五处矿权。河南、云南等地人民也为收回采矿权展开了斗争。宣统三年（1911），云南人民收回被法、英霸占的临安、澂江等七府锡、铜、金、银等矿权利；山东收回津浦济南至曲阜、兖州沿路被德国霸占的矿权；湖北逐出炭山湾煤矿德国的资本，归华商自办。

收回路权斗争兴起　先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函商借款，以川汉铁路修筑权相交换。四川人民

闻讯奋起反对，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川汉铁路总公司。该公司章程规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宣统元年(1909)，该公司筹款修筑宜昌至万县段。光绪三十一年(1905)，浙江、江苏两省人民发起废除盛宣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英国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争取当地绅商自办苏杭甬铁路运动。当年六月，浙江成立铁路公司，后集股四百余万，并开筑杭州至嘉兴段铁路。第二年，江苏亦成立以张謇为首的江苏商办铁路公司。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清政府不顾人民反对，将苏杭甬路交英国“借款修筑”。诏下后，浙江铁路业务学生邬钢呕血而死，浙铁副总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身亡，使苏浙收回路权运动推向顶点，至宣统三年(1911)初，苏浙人民最终赢得商办铁路斗争的胜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提出与美国资方废约，要求自办粤汉铁路。该路修筑权是美国合兴公司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在与清政府签订的《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中攫得的。到光绪三十年(1904)，该公司仅筑了九十华里，还将部分股份转售给比利时银行。三省人民提出收回路权后，合兴公司派柏士来华，诡称代表华丰公司，愿接办粤汉铁路。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也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维护其所夺路权。但由于三省人民坚持斗争，并得到各省人民支持，中国留日学生还组织了三省铁路联合会，通电力争自办。在人民的反抗下，美国合兴公司以勒索六百七十五万美元“赎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八日，交还粤汉铁路筑路权。三省绅商民众遂分别成立铁路公司，筹款筑路。光绪三十三年(1907)，还发生了河北、河南、江苏等省人民要求从英、德两国资方，收回津浦路的斗争。收回路权斗争的基本力量，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和爱国学生。因运动本身对发展民族工商业有利，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官绅也极为关心，立宪派头面人物充当了运动的领导，斗争形式是“文明抵制”。

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论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日甚一日，康、梁等维新变法的主将，此刻却不能与时代俱进，对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十分惧怕，坚持拥立光绪皇帝实现君主立宪的立场。康、梁利用其保皇会所属的各种报刊，大肆鼓吹保皇和君主立宪的主张，诋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康、梁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双方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各自的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1906)，同盟会在《民报》第三号上发表号外，题名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文章列出了双方在十二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其中主要几项是：“《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以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实指民生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革命派和保皇派的二十多种报刊全部投入了论战，论战的中心实为三点：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改变土地制度。经过了二年左右的争论，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与康、梁保皇派的界限，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孙中山革命派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革命派最终以昂扬的斗志，严密的推理，激烈的言词，使更多的人唾弃保皇理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在思想阵地占据了主导地位，为革命斗争实践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新民丛报》被迫停刊，标志着保皇派在论战中的失败。

南昌教案发生　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末，南昌知县江召棠秉公处理了新昌(今宜丰)棠浦镇教案，弥祸定乱，保全了一个县民的性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江召棠又将因病保释出狱的南昌荏港二名犯罪的教民追查归案。江召棠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的极端不满。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二十五日，王安之给江召棠写信进行恐吓威胁，未能奏效。后以宴请为名，再三邀请江召棠，谓有要事相商。江召棠屡辞不获，于正月二十九日下午赴邀。席间，王安之强求江召棠推翻新昌棠浦旧案，释放荏港二名犯罪教民，扩大传教特权。江坚拒不允，王安之恼羞成怒，拿出一刀一剪逼江自尽，狂言“汝死案即可了”。江愤极用刀自刎，因怕痛而歇手，未能至死。王遂令下人持江手，握刀剪猛戳江咽喉，伤重至死。南昌百姓闻讯后，怒不可遏，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全城鼎沸。二月初三日，南昌周围各县百姓汇集百花洲，众势汹汹，分四路奔赴天主教堂，沿途一片喊打之声，引起观望群众响应，纷纷加入暴动队伍，接连捣毁四处法、英教堂和学校，杀死王安之等六名法国教士和三名英国教士。次日，英、法军舰驶入鄱阳湖，炫耀武力进行威吓。清政府惊惶失措，于初五日，谕令江西巡抚胡廷干“督饬严拿首要，按律惩办”，极力保护江西各处教堂，妥为抚恤受到伤害的英、法两国教士民人。胡接命后，即通令南昌、新建两县各警署、城防营弹压暴动民众，逮捕一千六百余人，其中大部分是“教民挟仇诬

告,希图报复者”。二月十三日,清外务部派津海关道梁敦彦会同法国使馆人员前往江西查办南昌教案。英、法公使为此几次向清政府提出惩凶、赔款等无理要求。清政府在列强逼迫下,处死十名百姓,并对二十七人处以各种徒刑,还将江西巡抚胡廷干、臬司余肇康、布政使周浩等人撤职。四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与法国订立善后合同,赔法教士恤银五万两,教堂损失银二十五万两,医院银十万两,此案方算了结。

日知会成立 先是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长沙起义事泄,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遭破坏,补习所主要成员刘静庵、曹亚伯等逃避。曹亚伯后到日本,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曹亚伯返回武昌,与刘静庵共商再建革命团体。曹、刘认为:要唤起革命,首先应“灌输知识”,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刘静庵因与美国基督教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有交情,后又充任该会所设日知会司理,遂借日知会阅报室陈列革命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并联络反清革命志士,原科学补习所成员相继归来。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刘静庵另拟日知会章程,名不变而实变,日知会遂成革命团体。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日知会开正式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余人。日知会成立后,十分注重在学生、新军和会党中进行革命宣传。每星期日开演讲会,阐述世界大势及中国面临的危机,启发人们的爱国革命意识,发展会员,扩大组织。不久,东京同盟会总部派余诚为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前往武昌,余即依靠日知会展开革命活动。四月,刘静庵、冯牧民率先加入了同盟会,大多数会员亦随之加入同盟会,日知会会址改成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刘静庵任总干事。同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派胡瑛、朱子龙、梁钟汉赴湖北,依靠日知会的力量,响应起义。但由于熟悉日知会内情的郭尧阶告密,湖广总督张之洞将刘静庵、朱子龙、胡瑛、李亚东、梁钟汉、张难先等逮捕下狱。日知会会员遂化整为零,组成其他革命小团体,日知会活动即告终止。

芦汉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二十三日,芦汉铁路全线通车,定名为京汉铁路。早在光绪十五年三月初二日,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就提出修建从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故称芦汉铁路。分北京至正定,正定至黄河,黄河至信阳,信阳至汉口四段,预计八年完工,总经费一千六百万两白银。清朝廷允准了张之洞所请,但筹修未久便搁浅。甲午战后,变法维新、修路办厂呼声日高,张之洞再次提出修建芦汉铁路,指出“此路四通八达,必宜先办”。清政府遂委派张之洞主持修筑芦汉铁路。鉴于经费困窘,张之洞提出借洋款,而不让洋人入股,永保铁路主权;成立总公司;边筹款边修筑;向华侨招股等办法,并推荐名下有巨款,身兼买办官吏的盛宣怀为铁路督办。此事定局后,各国列强都欲插手,图谋控制这条未来的交通干线。张、盛等人迫于经费无着,遂与比利时银行团签订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使俄、法支持的比利时银行团控制了芦汉铁路。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芦沟桥至保定一段首先修成,年底通车。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汉口至河南信阳的一段也筑成通车。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底全线修竣,总长度为一千二百一十四点四九公里。

清政府宣示预备立宪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秋之交,出洋考察宪政的大臣先后回国。他们将在国外请梁启超等人草拟的有关宪政的报告上复朝廷,请行立宪。六月三十日,端方、戴鸿慈在陛见时,面奏宪法请访日本,兵农工商请访日本、德国。考察大臣载泽还独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折中谓实行君主立宪,一可使皇权永固;二可使外患渐轻;三可使内乱消弥。他还为朝廷谋划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企图以此连拖带骗,应付社会上立宪的舆论。他们还主持辑成《列国政要》、《欧美政治要义》百余卷。尽管如此,载泽等假立宪的建议还是遭到满族亲贵中顽固派的反对。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八、九两日,清朝王公大臣、集会商议立宪事宜,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出席了会议。会上,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铁良、军机大臣学部尚书荣庆、大学士孙家鼐对立宪持否定态度,但载泽、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等主张立宪并左右了会议,遂于七月十日上殿面奏,请行立宪。十三日,清廷颁发上谕,宣示预备立宪。这份谕旨虽宣布“仿行宪政”,但又称“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因此“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此谕发出后,顽固官僚因可拖延松了一口气,而真心立宪的人士则对清廷的敷衍态度十分不满,开始酝酿大规模的促进立宪运动。

《复报》创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十五日,复报正式创刊。先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夏,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柳亚子,在家乡吴江创办油印周刊小报,名为《复报》。光绪三十二年,柳亚子到上海,一面筹建同盟会外围组织青年自治会,一

面筹办报纸进行革命宣传，遂把在吴江油印的周刊改编成月刊，送往日本铅印出版。四月十五日，《复报》正式创刊。该刊主编是柳亚子，长期协助编辑撰稿的有田桐、高天梅、高燮、陈去病、金天翮、陈志群、蔡冶民、刘季平、马君武等人。光复会首领陶成章、章太炎也为该刊撰写过不少文章。该刊的宗旨是"发挥民族主义，传播革命思潮，为国民之霜钟，作魔士之露檄"。《复报》文字浅显，大多为口语化的白话文，每期还登一些白话诗文。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停刊，共出十一期。

《云南》杂志创刊 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执行部干事刘揆一召集云南籍会员李根源、杨振鸿、赵伸等人，告以孙中山、黄兴认为云南有动发革命之可能，应速办一云南杂志进行鼓动宣传。经过数月筹备，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二十八日，《云南》杂志创刊。杂志社设在东京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云南》杂志为月刊，设有论著、译述、时评、传记、小说、文苑、调查、大事月表、图画等栏目。该刊初创时由李根源、赵伸负责，后来担任编辑主任的先后有席聘臣、张耀曾、孙志曾等。该刊以"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为宗旨，揭露清王朝苛虐百姓，媚外殃民的种种罪行，宣扬"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非少数贵族之国家，更非君主一人之国家"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该刊曾对光绪三十三年(1907)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黄兴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作了极为详尽的连续报道。《云南》杂志特别注重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宣传，向读者介绍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英、法觊觎云南领土，攫取云南权益的历史和行径，号召"我国民宜竭全体之力以抵抗之"。对云南民众的觉醒，云南地区反侵略斗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是发行量仅次于《民报》的革命刊物。该刊曾两度被迫停刊，但一直坚持到宣统三年(1911)五月才终刊，先后出版二十三期。

清政府厘定中央官制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清政府宣示"仿行宪政"，次日即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著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戴鸿慈及袁世凯共同拟制厘定中央官制的方案。袁世凯希望借此机会扩大其权势，多方行贿钻营，将亲信党羽塞进为改革官制而设置的编制馆。而众多满族王公大臣对袁世凯势力的日益膨胀，猜忌重重，不甘让袁世凯计谋得逞，怂恿御史赵炳麟上奏，反对袁世凯等操纵的官制改革。慈禧太后本无立宪诚意，对赵所言十分顺耳，九月二十日下诏，谓"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接内近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这次官制改革，不过是裁并、增设几个部和更易几个部院的名称。厘定中央官制后，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均仍旧；巡警部改民政部；户部改度支部，将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兵部改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立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改法部；大理寺改大理院；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增设邮传部；理藩院改理藩部。除外务部设总理大臣一员，会办大臣二员(其一兼尚书)外；各部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都察院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改为给事中，并以次设立资政院及审计院。各部尚书均充参预政务大臣。九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命鹿传霖为吏部尚书，溥颋为度支部尚书，溥良为礼部尚书，铁良为陆军部尚书，戴鸿慈为法部尚书，张百熙为邮传部尚书，寿耆为理藩部尚书，徐世昌为民政部尚书，荣庆仍为学部尚书，载振为农工商部尚书。按旧制，各部例设尚书二员，满汉各一，侍郎四员，满汉各二。新制不分满汉，"择贤简用"。十一部十三个大臣、尚书中，满族贵族七人，蒙古贵族一人，汉满官僚仅五人，满汉畛域反而扩大，暴露了清王朝借机集权的意图，引起了立宪派的不满和批评。

上海宪政研究会成立 光绪三十二年(1906)，随着立宪运动的开展，上海文化教育界人士创立了宪政研究会，十月二十四日创刊的《宪政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该会的宗旨："考查政俗，研究得失，以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该会主要成员有袁希涛、沈恩孚、黄炎培、狄楚青、陈冷、雷量、史量才等，多为学校教员、报刊总理或主笔。十一月初，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后，多数研究会成员转入该会。

萍浏醴起义爆发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十九日，同盟会策动萍乡、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武装起义。先是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华兴会在长沙发动起义流产。次年，参与谋划长沙起义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又被杀害。马福益旧部萧克昌、李锜在安源煤矿联络矿工数千人，哥老会另一首领龚春台在浏阳、醴陵一带继续发动会众，都等待时机，图谋再举。光绪三十二年春夏之间，长江中下游阴雨连绵，洪水横溢，湘赣交界的萍浏醴地区灾情严重。当地官僚豪绅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使广大农民和矿工苦不堪言，纷纷投入会党，酝酿反清起义。正在此时，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湖南展开活动。刘道一坐镇长沙，筹划全局，他约集革命志

士，会党首领蒋翊武、龚春台、刘重等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聚会，转达黄兴意见，准备利用潜伏于萍乡的会党“发难于浏醴，而直扑长沙”，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响应。蔡绍南到萍乡与联络会党的魏宗铨会合，通过活动，使当地各路会党接受同盟会的反清思想。蔡、魏邀集萍浏醴各路会党首领百余人，在萍乡蕉园，举行开山堂大典，推举龚春台为大哥，饮酒宣誓，“尊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十月十九日，洪江会首领廖叔保在麻石聚众二、三千人，举汉字旗，首先发难。蔡绍南、龚春台闻讯，立即通知其他各处响应。义军占领上栗市后，进行了整编，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任大都督，蔡绍南、魏宗铨任左右统领，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历数清廷卖国殃民十大罪状，号召“破数千年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使地权与民平均”。贫苦农民、安源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纷纷加入义军，“不数日而集众数万人，蔓延数县之地”。孙中山闻讯后，急派胡瑛、宁调元、孙毓筠、杨卓林、段书云、禹之谟、权道涵等到苏、皖、赣、湘、鄂等省发动起义，以图响应。清政府对来势凶猛的起义十分惊慌，急饬两江总督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岑春蓂调集清军五万人，前往镇压。起义军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屡次挫败清军，缴获枪枝逾千。但因起义军没有形成一个坚强领导核心，旗号各异，加之敌我力量悬殊，虽苦战经月，接战二十余阵，终被清军各个击破，革命党和起义群众万余人死于此役。萧克昌、刘道一、蔡绍南等罹难。同盟会派遣回国响应起义人员多被通缉。禹之谟、杨卓林等被捕遇害。胡瑛、孙毓筠、段书云、权道涵等被终身监禁。

保皇会更名国民宪政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二十四日，康有为以保皇会总头领名义，在纽约出版的《中国维新报》上发表《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行大庆典告蔵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文中大肆吹嘘自己首倡变法，全力保皇的奇功异勋，主观臆断地指出，清政府主张立宪维新，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怨恨已经释然，故今后无须再行保皇，而应转向推动立宪，并异想天开地准备回国与清政府合作推行宪政，分得部分权力。因此他通知保皇会全体会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元旦，举行大庆典，祝贺保皇会大功告成，国民宪政会正式成立。梁启超认为康有为企图把宪政果食一口囫囵吞下的贪婪嘴脸，必将引起国内立宪派的恶感，拒绝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更名通知。事后，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将保皇会改为帝国立宪会；在政治上拉拢国内立宪派与其合流，不要太狂妄自大；在内地多设分会，多办报纸，逐渐扩大自身影响。康有为认为梁的设想比较实际，遂同意把国民宪政会改称帝国立宪会。

孙、黄、章制定《革命方略》　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冬之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共同拟制了指导各地举行反清起义的文件《革命方略》。《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民军之关系》、《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划》、《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八个文件。《革命方略》明确提出和阐述了实行武装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基本方略。全部文件的主要精神是组织国民军，推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在《军政府宣言》中，文件说明了革命建国的程序是分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军法之治，就是军事斗争和军事管制时期，因此要成立军政府，军事和地方行政，均由“军政府总摄之”。军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扫除积弊，废除清朝各种暴政，纠正风俗之害，施行教育、兴办农工商实业、设警察、修筑道路等。军法之治以三年为限，三年后进入约法之治。在其他七个文件中，孙、黄、章等详细阐明了军政府与各处民军的关系；革命军召募新兵的要求；接受降兵的条件；攻取和控制城镇及解决军需的办法；军政府对外政策态度；招降清朝将士的策略；废除清朝苛捐厘税的规定。《革命方略》的制定，不仅确定了武装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宗旨，同时提出了组建由资产阶级政党指挥军队的明确目标，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设想、过程及具体做法。对同盟会在此后领导的革命实践，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初一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发出“预备仿行宪政”的谕诏后，海内外立宪派人士虽然对诏文中透露的拖沓空泛及官样腔调十分不满，但又为清廷的公开允诺所诱惑，认为有望通过运动和敦促实现立宪，遂积极筹建团体，以展开全国性的促进立宪运动。江浙一带的立宪派对此最为积极，立即在上海集议谋创团体。此时，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了同北方的袁世凯倾轧，派亲信到上海，找到有东南实业巨人之称的张謇，怂恿他以其声望拉人结社，组成立宪团体。岑还许诺资助一万元的开办费并每年疏资一千元为日常活动经费。于是，张謇与上海的官、绅、商、学各界代表人物连日磋商，多方撮合，谋定成立名为“预备立宪公会”的团体。因岑春煊提供了大量经费，所以他府中的老幕僚郑孝胥被举为会长，在江浙绅商中颇有声望的张謇、汤寿潜任副会长。张元济、夏曾佑、王清穆、雷奋、许

鼎霖等新派名流都是会中的主要人物。邮传部侍郎沈云沛也与立宪公会有关系，袁世凯亦企图插手影响它，因此，在立宪运动中，预备立宪公会具有领袖群伦的重要地位。

陕西民众进行抗捐斗争 光绪三十二年(1906)，陕西巡抚曹鸿勋摊派西(安)潼(关)铁路捐款，激起扶风、华州、华阴、渭南、高陵、大荔等十余县民众的强烈反抗。农民首领张化龙等人聚众围攻扶风县城；田莲得等率众冲毁渭南厘局；刘豹子等带领民众到华州县衙门示威，冲毁县学堂；雷荣昌等砍断华阴县境内电线杆，并"打闹衙署"。各县斗争持续了四个多月。十一月二十七日(1907)，抗捐民众进入同州府，捣毁教堂两座及官钱局、官盐局等衙署。曹鸿勋先后派兵镇压各路抗捐民众，张化龙、田莲得、刘豹子、雷荣昌等数十名抗捐农民首领陆续遭到杀害，许多农民被判处监禁。但清政府又慑于民众反抗的威力，下令将路捐一律停止。

俞樾逝世 光绪三十二年(1907)十二月二十三日，近代著名学者俞樾逝世。俞樾是浙江德清人，生于道光元年(1821)。他是道光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后罢官侨居苏州，主讲紫阳书院，晚年又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国学大师章太炎即是他晚年的门生。他长于经学研究，所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书，为乾嘉学派后期代表作；《春在堂随笔》、《茶香室丛钞》等笔记，搜罗甚广，保存了丰富的学术史和文学史资料；他还很重视小说、戏曲的研读，强调其教化作用，将石玉昆所著《三侠五义》改编成《七侠五义》。他一生著述不倦，善诗词，工隶书，学识渊博，对群经诸子、语文训诂、小说笔记，撰著颇丰，辑为《春在堂全书》。当时社会上有一句流传颇广的话，叫做"李鸿章只知作官，俞樾只知著书"。

禹之谟就义 光绪三十二年(1907)十二月二十四日，禹之谟被清政府绞杀于湖南靖州。禹之谟，湖南湘乡人，生于同治五年(1866)。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帮办运输粮饷，办事出色，受两江总督刘坤一褒奖。后幻想实业救国，在长江下游考察，拟开办矿业，因遇阻而止。戊戌变法期间，禹曾与维新派接触，赞同变法。变法流血失败，禹从中悟出："倚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与虎谋皮"，反清思想日浓，倡革命救亡之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会，参与筹划自立军起义。起义流产后，禹之谟逃往日本，在大阪、千代田等工厂实习，学习纺织工艺和应用化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从日本购置一批纺织机械回国，兴办织布厂，几经迁徙扩充，最后定厂在长沙。他以工厂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设图书馆，提供革命书刊给青年和工人阅读。他还以工厂所赚之资兴办教育，先后发起兴办了湘乡旅省中学堂、师范学堂和惟一学堂。因此，禹之谟在长沙工商学界颇有声望，被举为长沙商会、湖南教育会、学生自治会的会董、会长、干事长。光绪三十年(1904)，禹参与了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的创建。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后，黄兴致函禹之谟，请他在湖南创立分会。他通过联络发动，组建了同盟会湖南分会，被举为会长，领导湖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著名湖南籍革命宣传、活动家陈天华为抗议日、清政府勾结压制留学生革命运动，唤起国民觉悟投海自尽后，禹之谟策划了迎还烈士灵柩回湘公葬活动。在公葬那日，禹之谟慷慨陈词，宣讲烈士悲壮事迹，大大激发了群众斗志。禹所领导的湖南革命活动，深遭清地方当局忌恨，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政府将他逮捕。禹在狱中遭到清吏惨无人道的折磨，但始终表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气概。就义前，他断指写下致全国同胞书，谓"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毋奴隶其心而生！"。

《小说林》创刊 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小说林》杂志在上海创刊。《小说林》为月刊，以刊登翻译作品为主，亦有创作小说、戏曲、杂著等，也常发表一些关于小说理论的文章。主编是黄人(摩西)，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徐念慈等。该刊发表的比较知名的作品有曾朴所著《孽海花》二十一至二十五回，吴梅为纪念秋瑾牺牲而创作的《轩亭秋》杂剧，较有名气的小说评论家徐念慈写的《小说林缘起》、《余之小说观》等小说理论文章。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该刊停刊，共出版十二期。

《神州日报》创刊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二十日，《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社址设在四马路群学社书店三楼。该报是继《警钟日报》后，革命派在国内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每日对开三大张，设有社论、论说、专电、要闻、各省通信、杂俎、沪事评论、本埠新闻、商业新闻、余录、文苑等栏目。《神州日报》的主办者是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杨毓麟、王天生、汪允宗、叶仲裕、金淮、汪彭年、邵力子等。《神州日报》并不公开标榜自己是革命派言论机关，但其革命倾向十分明显。在该报的新闻报道中，常详细报道各地武装起义的情况，给反清斗争以舆论上的支持。该报发表的《呜呼盗贼世界》、《北京官场之酒色财气》、《盛宣怀之贪污史》一类文章报道，对清政府统治下的黑暗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揭露

鞭挞。该报还对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吞食行径进行了报道，号召国民团结起来，与列强抗争。在《警钟日报》停刊后，《神州日报》是上海地区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影响较大的报纸。

革命党发动黄冈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十一日，黄冈之役爆发。广东潮州饶平县黄冈镇，是闽、粤两省交通孔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该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会党势力日益壮大，有“三点会党渊薮”之称。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福建人黄乃尚、华侨许雪秋曾在潮州预谋发动起义，因事机泄露而流产。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许在新加坡谒见孙中山，受命在“潮、嘉等处相机发难”，遂回潮州，联络原三合会首领同盟会会员陈涌波、余既成(纪成、继成)等广集同志，惨淡经营，预定于光绪三十三年初发难。由于各路义军行动不一，起义被推迟。四月十一日，潮州清军到饶平黄冈搜捕革命党，陈涌波等被迫集合群众，于当晚仓促举事。起义军七百余人，“旗号大书革命字样”，于次日攻占黄冈，擒杀司官巡检王绳武及守城把总许登科。陈涌波、余既成以革命军正、副司令名义发布檄文，宣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宗旨。又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陈”的名义发布告示，免除苛税，“除暴安民”。两广总督周馥急命潮州总兵黄金福率兵进剿。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亦率二千清兵前来镇压。十三日晚，陈涌波、余既成分两路攻潮州和井州(距黄冈二十里)。次日，余既成在井州战败，陈涌波得讯往援，复被清军击败。由于革命军起事仓促，主要领导人许雪秋尚在香港，内部意见纷纭，又未集中兵力迎敌，虽经与清军七次激战，但寡不敌众，粮械缺乏，被迫于十六日宣布“解散”，已到汕头的许雪秋亦中止活动。是役起义军战死九十四人，事后被捕遇害的党人六十余名，余既成等逃亡香港。

话剧《黑奴吁天录》公演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二十一日，话剧《黑奴吁天录》在日本东京公演。中国大量学生赴日留学后，一些人对日本风靡一时的“壮士剧”(又称新派剧)发生了兴趣。光绪三十二年(1906)间，曾延年(孝若)、唐肯、孙乾三、李岸(息霜)等人组成团体“春柳社”，学习新派剧，这是中国最早的话剧艺术组织。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春，曾、唐、孙、李等人将小仲马《茶花女》中的一段，改编成话剧，在留学生组织的游艺会上演出，使不少人为之倾倒，纷纷要求加入春柳社。人员的骤增，使春柳社萌发了演一场完整的大型话剧的念头。社员将林纾、魏易翻译的小说《黑奴吁天录》改编成剧本，在日本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藤泽浅二郎的指导帮助下，经过三个月的排练，于四月二十一日，在日本东京的本乡剧场演出。话剧共分五幕，粉墨登场的演员林林总总有数十人。这是中国人改编并在剧场正式公演的第一部话剧，受到留日中国学生和旅日革命者的欢迎，日本戏剧界对这次演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同盟会发动七女湖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二十二日，负责惠州起义的同盟会会员邓子瑜闻讯黄冈革命军猝然举事，立即派陈纯、林旺、孙稳等集合部分三合会会党，在惠州府归善县属七女湖举事响应，夺取清军防营枪械，击毙清军多人。二十五日，义军进攻泰尾，连克杨村、三达等圩。因清军集中于黄冈，惠州兵力空虚，义军乘胜占领柏塘、公庄、水口、横沥、三经等处，“各乡会党纷纷来会，声势大振”。五月初二日，义军在八子爷击毙清军管带洪兆麟，所部死伤极众。消息传出，广州震动。两广总督周馥急调李准由黄冈驰援惠州。起义军前后与清军激战十余日，屡败清军。初三日，邓子瑜知黄冈起义失败，他处亦未响应，惠州孤立无援，遂在梁化圩解散队伍，将枪械埋藏地下。起义军大部隐入罗浮山区，小部分逃亡香港。

《新世纪》创刊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十二日，《新世纪》在巴黎创刊，刊址设在濮侣街四号。该刊为周刊，经费主要由担任清政府驻法使馆商务随员的张人杰供给。编辑主笔有李煜瀛、吴稚晖、褚民谊等人。该刊以反对一切政府，“倾复一切强权”为宗旨。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活动和政治主张，是其宣传的首要内容，该刊刊载了许多有关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生平及思想的文字。对民粹主义和暗杀活动的鼓动，也是该刊宣传的主要内容。《新世纪》杂志一直出版到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三日，总计一百二十一期，是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

徐锡麟刺杀恩铭　光绪三十年(1904)冬，反清志士徐锡麟在上海会见蔡元培，加入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后光复会首领陶成章授以浙东会党机密，徐锡麟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跋涉于浙江诸暨、嵊县、义乌、东阳等县，结交了一批会党首领。八月，徐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招收各地会党头目入学，进行军事训练。学生入校即为光复会员，毕业后受学校光复会领导人节制，藉以积蓄革命力量。当年冬季，徐又赴日本，拟入军校未能。适时陶成章主张筹款捐官，打入清政府，谋握兵权，相机起事之策，徐甚赞同，遂于光绪三十二年返回国内，捐资为道员，被分发到安徽试用，深得巡抚恩铭重用，先后担

任安徽武备学堂副总办，巡警处会办，巡警学堂监督。他利用合法地位，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积极准备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到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校务，积极训练会党骨干，加紧联络会党，组织"光复军"，并与徐锡麟约期于六月初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然后分兵取南京，占江苏、安徽、浙东各省要地。不料五月初，绍兴会党过早暴露形迹，清地方当局四处查拿革命党人，秋瑾将险恶情形通知徐锡麟。徐锡麟怕日久生变，遂决定于五月二十八日，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杀死恩铭等省城文武大员，占领安庆，发动起义。后毕业典礼于二十六日提前举行，徐锡麟在进呈学生名册时，突持双枪向恩铭射击，恩铭连中七弹，旋即身亡，文武各官仓惶逃遁。徐立即率领陈伯平、马宗汉及学生占领军械局，遂遭清军包围，双方激战六小时，徐锡麟等二十余人被捕。徐锡麟在刑场上大义凛然，自称"革命党首领"专为排满而来，被清吏剖腹剜心杀害。

杨翠喜案发 光绪三十二年(1906)末，清政府准备将东北改行省制，派奕劻之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出关考察。载、徐路过天津，住北洋督署。袁世凯党徒段芝贵以候补道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在接待伺候载振时极为周到。一次袁世凯在督署款待载振看戏，载振见女伶杨翠喜，惊为天人，赞不绝口。段芝贵悉其隐，以一万二千金将杨翠喜从天津大观戏园买出。当载振等返京过津时，段把杨翠喜献给载振，载振大喜。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初八日，清政府诏令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由徐世昌任职，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巡抚，分别由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担任。徐、唐、朱、段，均为袁世凯党徒，特别是段芝贵，以一个候补道超级拔擢引起官场哗然。其时，军机大臣瞿鸿机与袁世凯倾轧激烈，遂乘机唆使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赵即以段芝贵重金购歌妓，贿赂载振得官上奏。慈禧太后闻奏，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查报。载振闻讯将杨翠喜匿退。载沣、孙家鼐为保全皇室体面，以查无实据复奏。赵启霖遂以"奏劾不实"革职。消息传出，报章腾议，丑声四播。清政府只得撤免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载振也疏称"踏蹋有难安之隐"，请辞农工商部尚书。

秋瑾就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六日，秋瑾被清廷杀害。秋瑾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光绪三年(1877)。她自幼崇敬历史上横刀立马、驰骋疆场的英雄，行侠仗义的豪杰。光绪二十八年(1902)随其夫到北京，结识了思想开放进步的吴芝瑛，日本人陶狄子、服部繁子等人，读了各种新书新报，受"外潮之刺激亦渐深"，进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光绪三十年(1904)春，她冲破礼教束缚，变卖首饰，赴日留学。在日本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四处演说，并重兴了处于停顿的妇女组织"共爱会"。她还创办《白话报》，鼓吹推翻清王朝统治，提倡男女平权，参加冯自由等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瑾回国，经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六月重返日本，入青山实践女学校。旋即参加同盟会，被任评议部评议员及浙江主盟人。光绪三十一年末三十二年(1906)初，为反抗日本政府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秋瑾愤然回国，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安置留日回国学生。正月，赴浙江湖州浔溪女校任教，暑假返上海，与尹锐志等在虹口设立"锐进学社"。年底(1907年初)，秋瑾又创办了《中国女报》。春季，秋瑾至诸暨、义乌、金华等地联络会党，图谋响应萍浏醴起义，因起义失败未果。秋瑾回到绍兴后被推为大通师范学堂督办，与徐锡麟约定皖、浙同时举事，借学堂联络军队、会党，训练会党骨干，组织光复军，举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预约于五月二十六日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诱清军离杭州后，起义军乘虚攻省城，如不克，则返回绍兴，由金、处入江西，攻安庆，与徐锡麟相呼应，后改为六月初十日发动。五月初，绍兴、武义、金华等地会党过早暴露形迹，清政府搜捕党人。秋瑾将浙江险情通知徐锡麟，徐于五月二十六日仓促起义失败，徐被戮，其弟供出秋瑾，适逢绍兴劣绅探悉秋瑾预谋起义，浙江巡抚张曾敭立即派兵往绍兴缉捕秋瑾。六月初三日，清军包围大通师范学堂，秋瑾知徐锡麟牺牲后痛不欲生，拒绝避走，遂被清兵捕获。绍兴知府贵福深夜提审，秋瑾坚贞不屈，拒答讯问。写下"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绝笔书》，壮烈就义，年仅三十一岁。

清政府成立宪政编查馆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五日，清政府将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直属于军机处。宪政编查馆下设编制、统计两局。各局置局长、科员若干人，另设提调二人。以后又陆续增设了译书处、图书处、官报局等机构，负责办理宪政、编制法规、统计政要以及翻译东西各国宪法等事务，以研究利用最有利的宪政形式来保持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宣统三年(1911)四月初十日，清政府诏废内阁、军机处，颁布新内阁官制，宪政编查馆随之撤销。

中日交涉间岛问题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十一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照会清外务部，谓"间岛"，(朝鲜称中国图们江北岸的江东滩

为"间岛"系指中国吉林省延边一带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地区。该处清初属宁古塔辖地，光绪年间并入吉林省延吉厅）为何国国土未定，日驻朝统监将派员前往保护朝民。同日，日军中佐斋藤季治郎率宪兵自会宁向延吉进发。十五日，在延吉强行设立"驻韩统监府派出所"。清外务部促民政部尚书徐世昌立即派员前往处置。徐世昌、唐绍仪遂派道员王崇文、监督员吴禄贞赴延吉查看"间岛"事件。十六日，清外务部照会阿部守太郎，声明"间岛"问题，实为日方强立名目生出，其地早已归延吉厅所属，在图们江以北，确系中国领土，日本断无派员前往"保护"之理。十九日，清外务部再次照会阿部守太郎，要求日方撤回入延吉宪兵。八月初六日，清外务部就"间岛"事件照会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十二日，清外务部通过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敦请日本宪兵撤出"间岛"地区。同日，致电清驻日公使杨枢转商日本外务部，请日方迅即撤兵。经反复交涉，据理力争，日方最后不得不撤出侵占地域，承认"间岛"为中国领土。

《中兴日报》创刊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十二日，刚刚加入同盟会的陈楚楠、张永福等在新加坡创办了《中兴日报》，社址在新加坡吉宁街十三号。最先担任主笔的是《中国日报》推荐的何子耀、王斧。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大批原来在安南一带进行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同盟会会员，因受法国当局驱逐，转移到新加坡，纷纷参加了《中兴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胡汉民、汪精卫、田桐、居正先后担任该报主笔，大大提高了该报宣传革命思想的水平。在与康、梁等保皇党的论战过程中，孙中山在该报先后发表《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平实尚不肯认错》等重要文章，是东南亚一带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的主要言论阵地。宣统元年以后，同盟会骨干相继离开新加坡，该报力量大为削弱，宣统二年(1910)初停刊。

同盟会发动钦廉防城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二十六日，同盟会员王和顺等起义于广东钦州王光山。广东钦州所属三那(那黎、那彭、那思三圩)，盛产蔗糖，清政府对此地课以奇重糖捐，当地人民苦不堪言。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四月间，曾聚集万人举行抗捐起义。起义虽遭镇压，但人民心中埋下了复仇种子。当地群众派代表赴河内，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援。孙中山命同盟会会员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入钦州腹地陆屋、三那等地联络民团、会党，准备起义。王和顺在三那得到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赵声的帮助，曾前往河内求援的梁建葵等集合民军千人，枪数百来会合王和顺。适时廉州防城清军哨官刘辉廷、李耀堂经革命党运动，同意率部反正。王和顺得孙中山同意后，决定袭占防城。七月二十六日，王和顺率二百人往钦州王光山起义，随即奔袭防城，驻防清兵倒戈响应，起义军遂于二十八日占领防城，杀县令宋晁元。王和顺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发布《告粤省同胞文》、《告海外同胞书》及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告粤省同胞文》，申明起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民主立宪政体，行土地国有制度，使四万万人民无一不得其所"的宗旨。《告海外同胞书》则谴责了清政府"弃民不顾"，"视民如仇敌"的罪恶。此后，义军随即冒雨移师攻钦州。其时黄兴已潜入钦州，策动清军倒戈内应。清新军统领郭人漳，佯装"赞成革命"，暗中伙同钦廉道王瑚扼险拒守。黄兴受骗按郭人漳之意，指示王和顺转攻有重兵驻扎的广西南宁。起义军攻取钦州计划未成，只得改打灵山。郭人漳派兵尾追，并乘机攻陷防城，使义军腹背受敌。义军攻灵山等地未果，退兵木头塘，改道取南宁，连破横州、永淳二城，队伍增至三、四万。两广总督张人骏急调桂林、柳州、郁林等地清兵围剿。八月初，起义军以枪械不济，退回三那。八月初十日，王和顺解散起义军，遁往越南。梁建葵率余部退入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刘辉廷等率百余人由马笃山到那勤、大碌伺机再举。历时半月的钦廉防城起义失败。

共进会成立　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同盟会在东京的部分会员认为孙中山等人置力于华南偏远地区起义，对全国影响不大，主张应以长江流域为中心，运动革命。同盟会调查部长焦达峰等人对同盟会组织涣散、行动迟缓的现状也十分不满，因而筹划建立一秘密机构，遂邀集张伯祥及日知会成员孙武等人，联络流亡在日本的部分同盟会、日知会成员和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等会党首领百余人，于七月间，在东京清风亭成立共进会，意为"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的道路"。该会发布的宣言称："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推戴孙中山为领袖，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但将"平均地权"改为含混不清的"平均人权"。采用同盟会的誓词(亦改动一句)和三等九级军制。该会组织严密，定法规十条，设有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财政、党务、文牍各部，各设部长一人。摹仿会党开堂，烧香，结盟，入伙方式。第一任会长为张伯祥，二、三任为邓文翚、刘公。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九月间，共进会会员分别回国，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会党中发展会员，发展组织。宣统元年(1909)春，焦达峰、孙武等在湖北汉口长清里设立共进会总

机关,武昌、长沙、南昌、岳州等地设立分机关,以"中华山"为名,统一长江流域会党,集两湖会众一千多人,编五镇军队,以刘公为大都督,刘荣为副都督,黄申芗等分任统制,密谋起义。后由于指挥不一,行动错乱失败。孙武、刘公等总结经验,于宣统三年(1911)初,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号新设秘密机关,将工作重点由联络会党转向运动新军,人员扩充至二千余。后同盟会中部总会总干事谭人凤来汉口,策划共进会与湖北另一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合作,于七月二十四日实现联合,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并于八月十九日发动了武昌起义。后自行停止活动。

政闻社成立大会遭冲击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梁启超、徐佛苏、蒋智由、麦孟华以及留日学生张君劢等三百余人组织成政闻社。该社提出四项政纲:"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并表白"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九月十一日,该社在日本东京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以推动立宪运动。与会者千余人,革命党人张继、金刚、陶成章等四百余人亦进入会场。梁启超到会讲话,刚讲至"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张继高呼"打",遂率众冲向讲坛。梁启超"逃自楼曲,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其他"政闻社员去赤带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不久,政闻社在上海创办《政治》月刊,鼓吹君主立宪,设立议会,出七期而止。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政闻社本部迁往上海,由总长马良主持社务,创办法政学堂,联络国内立宪团体,秘访王公大臣,向南北各省扩展组织。并参与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引起清政府恼怒,于七月十七日被下令查禁。

社会主义讲习会成立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二十三日,同盟会会员刘师培、张继等在日本东京发起组建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刘师培等声称"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欲于排满后另立新政府"。初建时有会员九十余人,章太炎和日本人宫崎滔天(宫崎寅藏)等都参与其活动,每星期集会一次。该会主张"废尽天下帝王大统领";"废尽天下中央官吏及地方官吏";"废尽天下之议员及公共团体之执行员";"废尽天下之兵丁警察";"废尽银币及钞币"等等,建立"不设政府"、"人人劳动"、"人人衣食居住均一律"的"新社会"。该会认为"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社会主义讲习会成立后,刘师培与其妻何震等创办《天义报》,次年(1908)又出版《衡报》,专门宣传无政府主义。

同盟会发动镇南关起义 防城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派黄明堂为镇南关(今友谊关)都督,到镇南关、平宜等地运动游勇、绿林,组织反清起义,派王和顺相机夺取水口关,以为响应。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二十七日黎明,黄明堂率那模乡勇八十余人偷袭镇南关,占镇南、镇中、镇北三炮台,附近游勇得讯纷纷与起义军会合。孙中山闻捷报后,立即偕黄兴、胡汉民等赶往镇南关指挥。二十九日,清参将陆荣廷率军来犯,孙中山亲自开炮轰击敌军,并在炮旁为伤员裹伤。对此孙颇有感慨,谓"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陆荣廷屡战不胜,"密函约降",以为缓兵之计。孙中山信以为真,寄希望于陆荣廷反正,乃决定由黄明堂孤军坚守镇南关,亲偕黄兴赴河内筹款购械接济,并向华侨募款,以为收买陆荣廷之资。孙黄离去后,清广西提督龙济光率援军与陆荣廷会合,共四千余人猛扑镇南关。起义军以寡敌众,从十一月初四日夜浴血奋战到初五日下午,毙敌甚多。清军先后占据四方岭及小尖山,义军退入垒中坚守。入夜,因弹尽援绝,"攻守均感失据",义军乃弃炮台突围,退入越南燕子大山。是役,共杀死敌军二百余人。

《四川》杂志创刊 光绪三十二年(1906),留日四川籍学生雷铁崖、邓絜等创办《鹃声》杂志,但所涉及问题范围很小,且断断续续,仅办三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川籍留学生决定在原《鹃声》基础上新创刊物。十月,以四川留日学生同乡会名义主办的《四川》杂志创刊。同盟会会员吴玉章被推为编辑发行人。该刊主笔为雷铁崖,他撰写了《敬告全蜀》一文,陈述了列强窥伺下的四川危急形势,向四川民众发出革命图存的呼喊,文辞畅达锋利,脍炙人口。在刊出的四期中,反对英、法、日等列强侵略中国云南、东北的文章报道占了很大比重。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日本当局在清朝撺掇下对该刊进行迫害,指控《四川》"鼓吹革命";"激扬暗杀";"煽动日本殖民地反对帝国";并借口该刊第四期所登日本国内消息有"反对天皇"嫌疑,对该刊提出诉讼。结果该刊被判处罚金一百元,编辑发行人吴玉章有期徒刑半年,缓期执行,该刊遂被封停版。

《神州女报》创刊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至六月间,原《女子世界》杂志主编陈志群多次致函《中国女报》主编秋瑾,商洽办妇女报事宜。事未成秋瑾因起义事败牺牲。十一月,陈志群几经活动又创办一妇女刊物,取名《神州女报》。为了纪念秋瑾,《神州女报》在创刊号上刊登了《神州女界新伟人秋瑾传》,还重新发表了秋瑾所撰《演说的好处》、《创办中国女

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勉女权歌》等文章。因《神州女报》带有强烈的民主革命色彩，仅出两期即被停刊。

清政府颁布《大清报律》 光绪三十三年(1908)十二月十三日，清政府颁布《大清报律》。该报律是由清商部、民政部、巡警部和法部共同起草，经宪政编查馆议复后，奉旨颁行的。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商部、巡警部等部门就曾拟定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和《报章应守规则》，对有反清倾向的报纸、杂志的出版加以限制。《大清报律》共有四十五款，其中主要规定为：报纸创办前必须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并交纳保证金；每期出版前必须送交地方行政机关或警察机关审查；禁止刊载"诋毁宫庭"、"淆乱政体"、"扰乱公安"的言论，违者"永远禁止发行"；禁止刊载"未经官报、阁钞发布的谕旨章奏"，违者处两年以下徒刑及二百元以下罚款；国外出版的报刊违反上述规定者禁止入境，由海关没收后入官销毁。

日轮私运军火案引起交涉 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初四日，澳门商人柯某购买日本军械，由日轮"二辰丸"私运至澳门九洲洋面，被清舰缉获扣留，并将日本国旗卸下。十三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就广东扣留二辰丸一事，向清外务部提出抗议。二月初一日，清外务部复照日本公使，扣留军械，释放二辰丸，对下日旗事道歉，并提议由英国公断，遭日方拒绝。十一日，日公使向清外务部提出道歉、赔款、惩官、释船、收买被扣军械五项要求。十三日，清政府以赔偿损失，鸣炮谢罪了结此事。同日，政闻社徐勤、徐佛苏等人就二辰丸一案召集旅沪粤人开会，倡导抵制日货。十七日，广东各地民众愤于二辰丸一案，群起抵制日货。粤商自治会集众数万人，订当日为国耻日，并调查日本运入货物，不与贸易。上海、广西、香港等地随之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香港中国民众专门组织"振兴国货会"，运动持续八个月，日商遭受重大损失。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成立 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把持中国诸多产业的清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扩充，成立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盛任总理。其中汉阳铁厂始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光绪十九年(1893)初成时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炉两座。大冶铁矿投产于光绪十七年(1891)，原均为官办，筹办费白银五百八十万两，因经营不力，常年亏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招股一百万两白银接办。光绪二十四年(1898)，盛宣怀又招股一百万两白银，创建萍乡煤矿局，以解决汉阳铁厂燃料问题。汉冶萍公司成立后，工人总数约八千人，每年产煤六十万吨，铁砂五十万吨，出钢七万吨，但因管理腐败，仍未改变亏损严重的问题。

同盟会发动马笃山起义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法国殖民当局逐出越南。孙中山临行前，指示黄兴再入钦廉发动起义。黄兴遂同越南华侨中同盟会会员二百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自任司令。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二十五日，他们进入钦州。二十七日，黄兴兵至小峰，遇清军阻击。黄兴诱敌离开阵地后，分三路猛攻，大败清军。三月初二日，革命军进占马笃山，人员增至六百余。革命军在黄兴指挥下，在钦州、廉州及广西上思一带，转战四十余日，屡败清军，"声势日盛"，"清官闻风而慄"。孙中山对此大喜过望，谓"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敌，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但由于革命军孤军深入，又没有建立根据地，且把接济粮弹的希望，寄托于屡诈革命党的清军统领郭人漳。郭人漳再次背约，并攻打革命军。这一切导致革命军军心逐渐涣散，纪律废弛，难于再与清军周旋。黄兴迫不得已遣散革命军，自己则返回越南。

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 河口是滇越铁路的交通孔道，在镇南关起义同时，孙中山亦筹划在河口起义，以此为依托，以图云南。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孙中山派黄明堂、王和顺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起义军百余人，开赴云南边境，汇合当地会党、游勇，在孟坝寨设立前敌指挥部，伺机发难。四月初一日凌晨，黄明堂率军向河口发起攻击。清军防营一部闻讯，击毙其管带蔡正钧，起义响应。革命军与反正清军会合，攻占河口。次日，革命军又经过激战，毙清边防副督办王镇邦(玉藩)，夺取河口炮台，黄明堂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严申军纪。云南人民久受清政府残酷压榨，纷纷响应起义，清军亦倒戈迎降，革命军"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大振"，遂分兵出击。至四月初四日，连克南溪、新街、坝洒，直逼蛮耗、蒙自，队伍扩充到三千余人。初六日，孙中山委任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立即赴前线督师。黄兴赶到河口，投诚清军拒不听从调遣，黄明堂，王和顺亦不服其指挥，黄遂于十一日折回河内，拟另组敢死军投入战斗。十三日，黄兴在越南老街遭法警截留，旋被驱逐出境。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又应清政府要求，封锁中越边境，阻禁革命党及粮械进入云南，并迫害、驱逐大批旅越革命党人，使河口革

命军陷入孤立无援困境。云贵总督锡良在起义爆发后，一面调兵镇压，一面向清政府告急，清政府即派刘春霖帮办云南边防事务，令广西提督龙济光率防营增援，又命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陈夔龙接济饷械，四川、贵州地方亦派军往援。革命军与清军在老范寨、泥巴黑、羊子街等地相持二十余日，最后被清军击败。二十七日，清军占领河口。黄明堂率六百余人撤至越南境内，嗣被法国殖民当局勒逼缴械，强行遣散。

美国国会通过庚款办学提案 光绪三十二年(1906)，曾在中国从事传教、经商达三十年的美国人史密斯，面谒美国总统罗斯福，力陈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中国，用来培植中国留学生，会获得极大的好处。次年(1907)史密斯写的《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出版，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美国在中国的机会与责任"，极力鼓吹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是"当务之急"，不可忽视。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竭力赞助史密斯，在其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说："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詹姆士还对于日本、欧洲已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表示十分焦急。他的结论是："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支配，是比军旗更为可靠。"他们的建议得到美国一批议员的支持，他们共同提出一项议案，要求退还大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经费。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二十六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这个议案，并决定从次年(1909)起，逐年拨款资助中国派留美学生。

预备立宪公会请速开国会 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湖南绅士熊范舆首先上书请开国会。随后，雷光宇以全湘士民名义上书，预备立宪公会成员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福诜专折上奏，皆力陈开国会之必要。一时间，国会问题成社会热门话题。立宪派多主张于两三年内即开国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张謇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致函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及河南、直隶、山西、安徽、四川、贵州等省立宪派头面人物，商约齐集北京，恳请清政府速开国会。六月初，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张謇、汤寿潜等又两次发出请开国会电，谓"今日时局，外忧内患，乘机并发，必有旋乾转坤之举，使举国人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潜弥，富强可以徐图……决开国会，以两年为限。"从此揭开大规模速开国会请愿活动序幕。

清政府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二十四日，清政府批准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诏令"即着各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一律办齐。"《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规定："咨议局钦遵谕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冶安为宗旨。"咨议局通过的议案，需报该省督抚认可，才能生效。如被认为"一、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二、有妨碍国家治安者；……'督抚有权'奏请解散"咨议局。章程颁布后，各省立宪派均忙于张罗咨议局议员选举活动，暂时把请开国会事搁置一边。至宣统元年(1909)秋，各省咨议局先后建立，议长大多为各省绅商教育界较有声望的立宪派人士。

湖北军队同盟会成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二十八日，湖北军队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秦柄钧为会议主席。众推任重远为总干事，主持会务。为防止泄密，议决不定会章，以同盟会之章规为章规；亦不举领导，以同盟会之领导为领导。入会者有四百余人。军队同盟会创办了《通俗白话报》，由陈少武担任主笔，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十月，任重远等策划刺杀湖广总督陈夔龙，事泄，任重远前往四川，会务无形停滞。

各省代表赴京请开国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初，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张謇、汤寿潜电请召开国会后，各省绅、商、学界代表纷纷赴京，请速开国会。先是湖南代表到京，催问都察院何以不将雷光宇以全湘士民名义写的请愿书转递清朝廷。随后，河南、江苏、安徽请愿代表联翩而至，一封封请愿书投进都察院。清政府于七月十七日查禁积极鼓动开国会请愿的政闻社，严拿其成员，企图杀一儆百，但京师请愿人员更是络绎不绝。七月中下旬，直隶、京师、八旗代表连日上书。吉林、山东代表接踵进京。在京已递请愿书的各省代表，又联合上书宪政编查馆。此后，山西、浙江代表也到北京，在京山西籍官员驱车乘轿往正阳门车站迎接本省代表，声势颇大，哄动京师。湖广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端方、清驻德公使孙宝琦等也先后上奏清廷，请开国会，或者速定开国会的期限，以免人心沸腾。

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七月间，各省绅、商、学界代表、预备立宪公会成员纷纷到京请速开国会，外省部分封疆大吏也具奏附和，清统治者被迫于八月初一日，颁布《钦定

宪法大纲》，核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九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期满召开国会的方案，以此平息一浪高过一浪的速开国会请愿。这个大纲的主旨，并不是赋予臣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力，而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至高无上的君权。在大纲中明文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总揽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大权；统率陆海军；亲自裁决对外宣战、媾和、签订条约等外交事项，议院不得议决或参预等等。实质是假立宪之名，强迫国民继续忍受君主专制制度。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相继病死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以后，自戊戌政变失败即丧失权柄与自由的光绪皇帝，因长期抑郁寡欢，且一直患有痨瘵痼症，病情日趋恶化，终于当年十月二十一日心力衰竭而亡。当年九、十月间，慈禧太后亦有咳嗽、肋痛、口渴、舌干及肢体软倦无力等症。光绪皇帝病逝之日，慈禧太后开始不思饮食，翌日午时，太后方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醒后，太后自知末日将至，遂急召光绪皇后、监国摄政王，重新发布懿旨，赋予摄政王载沣有裁定政事之权。未刻，慈禧太后死于中海仪鸾殿。

安庆马炮营新军起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陈独秀在芜湖出版《安徽通俗报》，鼓吹民主革命思想，同时与柏文蔚等在芜湖安徽公学联合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岳王会，以崇拜岳飞，实行反清为主旨，熊成基、倪映典等加入新军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均加入了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岳王会成立后，更以在安庆新建的新军为活动对象，加紧发展会员，酝酿武装起义。熊成基在南京炮兵速成学堂毕业后，被调回安庆，继而任新军三十一混成协炮兵队官，加快了起义的准备。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熊成基等计议乘湖北、江苏、安徽新军太湖秋操时，在安庆发难，设立了专门机关，负责起义的筹备和指挥。因范传甲在南京联络新军时走漏风声，安徽巡抚朱家宝加强防范，起义之事暂息。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范传甲等乘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死，清统治集团"群情震骇"，约集安庆新军革命志士于杨家试馆会议，决定当晚发动起义，众推熊成基为安庆革命军总司令，由马炮营在安庆城外发难，并预约队官薛哲等在城内接应。晚上九点，炮营士兵斩木为兵，手持桌腿，杀死管带冲出营房。马营士兵随即击伤管带，与炮营会师，并号召步兵响应革命。不久，新军马炮两营，六十一标全标，六十二标第三营，辎重队全队均聚集到义旗下，熊成基率这千余人直扑安庆。安徽巡抚朱家宝本已奉命去太湖参加秋操，因得布政使沈曾植急电，知安庆人心浮动，于十月二十六日带兵回安庆戒守。马炮营举事后，薛哲为清兵所制，不敢轻动。起义军于翌日拂晓用炮轰击，硬打猛攻，却因没有内应，清军死守，不得入城。经一昼夜激战，义军伤亡甚重。适时，清水师提督陈从周率兵轮五艘，发炮摧毁起义军阵地，七营清军亦从太湖逼进起义军。熊成基见腹背受敌，突围退往集贤关、庐州(今合肥)。至庐州东乡时，仅剩三四十人，熊成基被迫解散余部，分头隐遁。熊成基逃往寿州，旋赴日本。安庆马炮营起义是新军起义的开端，失败后遭清军株连杀戮的军人学生不下三百人，范传甲、薛哲等被捕遇害。

群治学社成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主持湖北军队同盟会会务的任重远，因策划刺杀清湖广总督陈夔龙事泄，离鄂入川，军队同盟会活动处于停滞状态。革命党人黄申芗、杨王鹏、钟琦、唐栖支、郭抚宸、邹毓霖等十人经商议，决定将湖北军队同盟会改组为群治学社。十一月二十日，黄、杨等在武昌小东门外沙子岭金台茶馆，召开群治学社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通过简章，谓以"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为宗旨；规定设社长一人，文书二人，会计一人，庶务一人，评议员若干，组成领导机构。与会者选举钟琦为庶务。该会成立后，一方面在新军中展开反清革命活动，扩充力量，要求成员每人每月介绍二名新同志入社，新人入社须经三名成员介绍，并经派员考察，一方面又在宣统元年(1909)接办了汉口《商务报》，作为群治学社的喉舌，以詹大悲为总主笔，进行宣传活动。

溥仪登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中旬，光绪皇帝病入膏肓，御医已下"恐将猝脱"诊断。慈禧太后遂于福昌殿召见军机大臣张之洞、世续、醇亲王载沣商议立嗣。慈禧太后欲立溥仪继嗣，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张、世怕出现光绪皇后垂帘听政局面，主径立载沣。慈禧太后以为同治、光绪已是兄弟相继，再立载沣，三代均兄弟传承，史无前例，定立溥仪。二十日，正式谕诏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其子溥仪入宫读书。二十一日，光绪皇帝死于瀛台涵元殿，慈禧太后颁懿旨以溥仪为嗣皇帝。次日，慈禧太后亦病死。二十五日，载沣等定建元年号为宣统。十一月初九日，举行溥仪登基大典。先由载沣抱着在中和殿接受侍卫大臣们叩拜；续而由载沣扶着坐在太和殿龙椅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定明年为宣统元年。

袁世凯罢职回籍　光绪三十四年(1909)十二月十八日，清廷颁布谕旨，罢袁世凯职，命其回籍养病。庚子之役后，袁世凯屡获升迁，并通过训练新军，开办军事学堂，使京畿一带六镇新军都控制在他的

亲信党徒手中，同时衰买通权臣奕劻，巴结慈禧太后，逐渐成为政治上炙手可热的人物。立宪运动声势日涨之时，袁又观测风向，附和立宪。清政府宣示改革官制之后，凯觎内阁副总理地位，企图进一步左右朝政。袁氏所作所为，引起朝廷内守旧派的不满，也深为满族王公贵族忌恨，溥伟、载沣、载泽、铁良、良弼、善耆等少壮贵胄，更急于削弱袁世凯权势，将国家政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后，少壮贵胄们便迫不急待地要将坐拥重兵，勾通宫闱的袁世凯锄掉。载沣、载伟、载泽等本欲将袁杀死，但奕劻、世续、张之洞等军机大臣力言不可，认为如此作法，可能导致北洋军被逼采取行动，祸起萧稿；西方列强也将出面干预。于是，十二月十八日清廷发布谕诏，谓"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命其"回籍养病"。谕诏下发当日早晨，袁氏已知罢斥经过，异常惊恐，怕还有后命，慌忙由张怀芝保驾，微服逃到天津直隶总督杨士骧处。后经奕劻、世续等通风，保其无事，才返京晋见摄政王，"谢恩"辞行。二十二日，袁仓皇出京，先在河南卫辉住数月，后于宣统元年(1909)四月迁到京汉铁路经过的彰德，购下原天津盐商何炳莹一座别墅，改建扩充，定名养寿园居住。他在园中安设了电报房，与亲信党徒保持密切联系，并写下"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一诗，窥测时机，准备东山再起。

清政府颁布《调查户口章程》 光绪三十四年(1909)十二月初十日，清政府颁布《调查户口章程》十一章四十条，对全国人口进行普查，经一年多调查统计，清政府于宣统二年(1910)六月公布了人口普查结果，当时全国人口为三亿二千零六十一万。

《民呼日报》创刊 宣统元年(1909)三月二十六日，《民呼日报》创刊。报社社址在山东路望平街一百六十号。该报日出对开四张，在宣传广告上声称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于右任自任报社社长，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范光启上海同盟会员(鸿仙)、徐天复(血儿)、吴宗慈、王无生等。该报一创刊，即从揭发清政府官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等事实入手，向清王朝发起攻击。该报副刊还发表了大量鼓吹民族革命的慷慨淋漓的旧体诗词。整个报纸言论的激烈程度在当时的报刊中十分突出。因此该报一出版，即遭到反动统治者的忌恨，六月二十九日就被迫停刊。两个月后，于右任利用上海各租界各自为政之机，改在法国驻沪领事馆注册，在原地址又创办了《民吁日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民吁日报》出了创刊号。于氏在《宣言书》中表达了要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继续挥笔战斗的决心。由于于右任不便出面，该报先后由朱少屏、范光启、景耀月、王无生等代为主持，仅持续四十八天即被查封。

清学部奏准变通中、小学堂章程 宣统元年(1909)三月二十六日，清学部奏准《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变通中学堂课程》两项文件，咨行各省，遵照办理。《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分初等小学为三种：一为五年毕业的完全科；一为四年毕业的简易科；一为三年毕业的简易科，并规定了完全科、二种简易科的学科课程、授课时刻表。《变通中学堂课程》中将中学堂分为文科、实科两类。文科课程以读经讲史、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为主课；以修身、算学、博物、理化、法制、理财、图画、体操为通习课。实科以外国语、算学、物理、化学、博物为主课；以修身、读经讲史、中国文学、历史、地理、图画、手工、法制、理财、体操为通习课。文、实二科学制均为五年。

京张铁路建成通车 宣统元年(1909)八月十二日，清邮传路奏报京张铁路工程全部告竣。京张铁路是联结北京和北方重镇张家口的一条铁路干线，途经地势险陡的燕山山脉，其中南口以北关沟路段居庸关、青龙桥、八达岭等地，层峦叠嶂，溪涧纷歧，自古号称天险。英国、俄国为争夺该路筑造权明争暗斗了很久，最后达成均不插手的默契。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宣布自行修筑该路时，外国人士曾预言："中国会修关沟这段铁路的工程师还没有诞生"，"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詹天佑被聘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十一年(1872)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光绪四年(1878)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专业。光绪十八年(1892)，在修筑天津到沈阳的铁路过程中，他在英、日、德等国工程师均束手无策的滦河，建起中国第一座近代大铁桥。他任总工程师后，激励身边工程人员，谓"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不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的国家！"他带领工程人员在京张之间的山谷河流间奔波数月，勘查了三条路线，确定了一条最佳路线，比英国工程师金达设计的路线减少隧道二千多米。为使列车便于通过地势高陡的八达岭一带，他依据山势，创造性地设计了"之"字形路轨。他将总工程师总事处设在工地，亲临修筑现场指挥。京张铁路修成后，路长三百五十七里，连岔道长四百四十九里。十九日，举行京张铁路通车典礼。

南社成立 宣统元年(1909)十月初一日，南社在苏州虎丘正式成立。先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

七月初七日，青年爱国诗人陈去病、吴梅、刘三等十一人在上海愚园聚会，商定成立神交社，倡议社员继承明末复社文人的传统，积极参与反清斗争，并开始酝酿成立南社。起名南社，援引"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当时清王朝的中心在北方，起南社之名，亦有反对北方清政府之意。南社的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主要活动中心在上海。南社成立时，即定下宗旨：直接配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诗文"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宣传推翻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南社初建时，有社员十七人，十四人为同盟会会员，后又大都参与编辑革命报刊活动，因此南社有同盟会宣传部的别称。次年，该社出版《南社》杂志，选编社员的作品，每年出二至三集，分诗、词、文录三部分。到辛亥革命前期，南社发展到二百余人，集中了这一时期活动于东南各地的爱国青年文人。南社成员在政治思想上，明确拥护民族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统治。在文学上，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翻译文学都有建树，其成员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周实、宁调元、吴梅都是颇有知名度的文化人。南社成员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创作及评论，他们都激烈地反对清末文坛上的宋诗派、同光体、汉魏六朝派、中晚唐派、常州词派和桐城派等旧文学，反对当时文坛一度出现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对近代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各省咨议局集议赴京请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清政府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宣统元年(1909)初，摄政王载沣又诏示重申"预备立宪"宗旨，命令各省在年内成立咨议局，并开革了几位阻碍立宪的官吏。立宪派人士感到兴奋，纷纷热衷于咨议局议员的选举活动。九月初一日，各省咨议局宣告开会。与此同时，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极言清政府若不速开国会，将导致众叛亲离，立宪派只能"袖手旁观"，眼看着革命党推翻清王朝。他要求务必缩短预备立宪时间，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准许召开临时国会，并呼吁各省组织起来联合请愿。随后，江苏咨议局致函各省咨议局，请各局推派代表齐集上海，洽商进京请愿问题。十月初，江苏、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十六省咨议局代表五十五人陆续到达上海。十月十五日，代表聚于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众推福建咨议局副议长刘崇佑主持会议，前后集会磋商八次，决定组成三十三人的"请愿国会代表团"，举江苏方还、湖南罗杰、奉天刘兴甲及刘崇佑为干事，赴京请愿。

劳乃宣奏请推行"合声简字"　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十六日，宪政编查馆参议劳乃宣奏请清政府推行其"合声简字"。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福建同安人卢戆章，仿拉丁字母笔形创"中国切音新字"字母，开始了近代中国人创制汉语拼音的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参与戊戌变法的王照，受日本片假名启发，创制汉字笔画型拼音字母"官话合声字母"。后以被通缉钦犯身份在北京悄悄办塾推行，在京津一带得到传播，袁世凯亦赞成用官话合声字母对北洋军进行启蒙教育。劳乃宣征得王照同意后，在官话字母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成宁(南京)音、吴(苏州)音、闽、广音等方言拼音方案，统称"合声简字"，"以方言为阶梯，以官音为归宿"，在南方推行。他任江宁提学使期间，曾在南京设立"简字半日学堂"，两年间教授学生数百人，这些人又"转相授受，推于江浙各属，通晓者甚伙；素不识字之妇女村氓，一旦能阅书报，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尔能视"。他进京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后，遂有建议清官方推行其汉语拼音方案奏折。

《西学东渐记》刊行　宣统元年(1909)，容闳自传《西学东渐记》由美国纽约亨利·霍尔特图书公司出版。容闳是广东香山南屏镇(今珠海)人，生于道光八年(1828)。容闳家庭贫寒，幼年被送入澳门外国人开办的学堂。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美国，入麻省孟松学校。道光三十年(1850)考入耶鲁大学，旋入美国国籍，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大学毕业生。咸丰五年(1855)回国，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曾到太平天国天京(南京)访问，试图通过农民政权实现其振兴近代中国的设想。同治二年(1863)，他入曾国藩幕，并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选购机器。后说动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清政府派学生赴美留学，于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元年(1875)受命主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后任留美学生监督，旋又任清政府驻美副公使。光绪二十四年(1898)参加变法维新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上海张园参加"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宣统二年(1910)容闳邀孙中山赴美商谈，表示支援革命。该书原用英文写成，英文书名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共二十二章。从其出身之时写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比较详细地记叙了他经历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热心参与的教育、政治、经济活动。该书后由徐凤石、恽铁樵节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改名《西学东渐记》。

各省咨议局代表在京请愿　宣统元年(1909)末,各省咨议局代表"请愿国会代表团"组成后,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在上海设宴饯行,要代表"秩然秉礼,输诚而请","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也不已"。十二月,全体代表齐集北京,初六日,代表赴都察院,递上由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署名的请愿书,书谓"(开国会事)若更徘待之九年,九年之中,患机叵测"。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代表们还遍谒亲贵大臣,进行游说。书上十余日,清政府下谕诏,仅对请愿之举说了句"具见爱国悃忱,朝廷深为嘉悦",而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又未划一为由,断然拒绝代表请求,坚持照原定九年期限,循次筹备。

汪精卫等谋刺摄政王未遂　宣统元年(1910)十二月十八日,同盟会会员熊成基谋刺从欧洲考察回国的贝勒载洵,事未成而被捕遇害。宣统二年二月中旬,同盟会会员刘思复、谢英伯、陈自觉、朱述堂、高剑父、程克等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以暗杀清廷要员为目的。同盟会南方支部书记汪精卫自宣统元年后,对支部工作不甚热衷,而孜孜于暗杀活动,认为只有冒险成功,才能"挽回党人的精神",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宣统二年(1910)春,他致信孙中山、黄兴,写下"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豪言壮语,并不顾孙、黄等人劝阻,执意与黄复生(树中)、喻培伦(云纪)策划炸死宣统皇帝之父摄政王载沣。由于他们的预谋被北京当局侦破,三月初七日,黄复生、汪精卫等被捕,清政府认为杀一二人亦难阻革命,不如慢慢软化,遂判处黄等终身监禁。

《地学杂志》创刊　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以中国地学会名义编辑出版的《地学杂志》在天津创刊。初为月刊。该刊不仅翻译介绍世界现代的地理科学知识,而且发表中国现代地理学研究考查的新成果。最初主持编辑该杂志的,是中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和地理教育家张相文。张相文,江苏桃源(今泗阳)人,生于同治五年(1866),曾担任上海南洋公学地理教师。光绪二十七、二十八年他编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为中国地理教科书之嚆矢。他的《地文学》一书,系统传播了现代地学知识,为中国最早的现代自然地理教科书。宣统元年(1909),他约集白毓昆、陶懋立、韩怀礼、张伯苓创立中国地学会。该会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自然科学学会,《地学杂志》即成为最早的中国人创办的自然科学学会刊物。该刊所有编辑人员均只尽义务,不取报酬。因经费困难,刊物出版不久即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季刊,后又改为半年刊。

同盟会发动广州新军起义　宣统二年(1910)正月三日,倪映典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先是光绪三十三年,同盟会会员赵声到广东任新军第二标二营管带,不久升任标统,扩大了同盟会在广东新军中的宣传组织活动。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因与熊成基密谋安庆起义事泄,避走广州,被赵声推荐任广州新军炮兵排长。倪在广州设立机关部,"专以运动军队为事",向士兵演说三民主义,揭露清廷暴政,许多士兵深受影响,纷纷要求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冬,广州新军及下级军官半数以上已加入同盟会。其时朱执信运动南海、番禺、顺德各省民军也大体就绪。革命党人认为组织一场大规模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同盟会南方支部遂决定在次年(1910)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后举行起义。不料当年十二月三十日,新军二标士兵华云衷因与警察发生冲突被捕。次日,第二标士兵数百人手执木棍,拥入城内,捣毁巡警分局,两广总督袁树勋派兵弹压,如临大敌。新军群情激奋,要求立即起义。军警冲突,打乱了同盟会预定计划。倪映典等决定提前于宣统二年正月初六日起义,正月初二日,倪从香港赶回广州,在燕塘新军炮兵一营,发现士兵已作好战斗准备,遂当机立断,枪杀一营管带齐汝汉,宣布起义。各营士兵纷纷响应,共推倪映典为司令。倪集起义军约三千人,宣誓"愿为革命战死",冲毁协司令部,分三路攻打广州城。初三日晨,倪映典率领义军由沙河向大东门进军,欲占省城,与清巡防营统领吴宗禹军二千余在牛王庙遭遇。清水师提督李准派人诱降,倪拒绝,并挥军进攻。清军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甚众。李准又命水陆缉捕处帮统李景廉指使巡防营军官唐维炯、童常标,利用二人曾加入同盟会,又与倪系安徽同乡关系,约倪洽商反正。倪中计遭敌突袭,中弹牺牲,两军激战逾时,起义军阵亡百余人,遂向燕塘溃退。次日,义军因弹尽援绝,无力再战,退守白云山、石碑一带,遂告失败。清军四出搜捕,起义军先后被捕百余人,逃到香港百余人。

《国风报》创刊　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十日,《国风报》在上海创刊。《国风报》为旬刊,每期八万字左右,社址在上海四马路。该刊设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等栏目,以论说为主。该刊在创刊号广告中称"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梁启超是该刊的主要编辑撰稿人,每期半数以上的文章均出自其手,所有稿件都由梁在日本大体编定后,寄至上海印刷出版。协助梁担任编撰的主要有汤觉顿、麦孟华等,是《政论》杂志

停刊后，康、梁立宪集团的主要舆论工具。该刊上陆续发表了《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国会与义务》、《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责任内阁与政治家》、《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等较有影响的文章，论及国会、内阁、官制、法制、财政、实业、外交等问题，对当时立宪的理论和运动都有一定指导意义。

国会请愿同志会成立 宣统元年末(1910)，各省咨议局代表“请愿国会代表团”第一次赴京请愿失败后，立宪派并不灰心，代表团亦随即在京召开会议，商议策划第二次请愿，为了有力地组织和发动请愿活动，代表们经讨论决定：一、扩大请愿运动的声势，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联合绅、商、学各界，“凡赞成请愿者，均得入会为会员”，京师设总部，各省设分会。二、依在沪决议，草拟咨议局联合会章程，定每年六月召开会议。三、设报馆刊行日报。不久，由张謇发起，由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等召集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在京成立。该会《章程》宣布：以“请求政府即开国会为目的”，“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随后该会创办了《国民公报》，由徐佛苏任主编，为速开国会大造舆论。该会还发表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号召各地立宪党人参加到该会，以壮请愿声势。此后的几次大请愿，基本由该会组织主持。

长沙发生抢米风潮 宣统元年(1909)春夏间，湖北的荆江，湖南的澧水、沅水暴涨成灾，经年不退；长沙、衡州(今衡阳)、宝庆等地又遭虫旱之灾，澧州、安乡、常德、岳州、宝庆、衡州大批饥民逃往长沙。宣统二年(1910)春，湖南巡抚岑春蓂等官吏、地主豪绅，英、美、日等国洋行及奸商乘缺米之机，竞相抢购谷米，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并将大量粮食运往邻省，牟取暴利，致使全省粮食供应更加紧张。湖南常年米价，每石二三千文，该年二月初，每石已涨至七千余文，长沙米价更是一日数涨，致使民不聊生。广大饥民要求减低米价禁止奸商外运谷米，但官府对民众呼声置之不理。三月初二日，长沙南门外卖水为生的黄某之妻，两次去粮店买米，均空手而返，愤恨投水。黄某亦率子女投水，全家惨死。消息传出，民众愤极，初三日，长沙南城外民众一百多人，捣毁抬价的碓房，冲向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开粜坊救济饥民。善化县县令郭中广被迫允次日开仓平粜。初四日，岑春蓂急派巡警道赖承裕带兵逮捕领头捣毁米店的木匠刘永福。官府失约捕人，使群众忍无可忍，立即聚集起来，将赖捆在树上鞭打。岑春蓂派兵救走赖，人群遂拥向巡抚衙门，要求“减价粜米”。沿途汇集饥民万余人，有的高呼“抚台给饭我吃”，有的怒吼“把抚台拖出杀死！”愤怒的饥民冲进巡抚衙门头门，”打辕门，毁照壁，锯桅杆，捣石狮”。当夜，城内外各碓坊堆站之米被抢劫一空。初五日，全城罢市。岑春蓂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伤四十余人。群众毫无惧色，徒手与清军博斗。且愈聚愈多，两日间迅速发展到二万多人，捣毁米店百余家，焚烧巡抚衙门，捣毁关税、官钱局、大清银行等衙署，外国教堂、怡和洋行趸船栈房、美孚煤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日本三井洋行、日本领事馆、日本邮局亦遭焚烧捣毁。岑春蓂走避，清军开枪镇压，民众又有死伤。初九日，英、美、日、法、德各国派军舰闯到长沙，配合清军镇压，捕数百人，伤亡不计其数，舆论大哗。湖南全省沸腾，各地群众“相继而起”。清政府被迫罢免岑春蓂，出示平粜，风潮逐渐平息。

共和会成立 宣统元年(1909)十月初九日，同盟会会员胡鄂公、熊得山、钱铁如等在直隶保定组成反清革命团体共和会筹备会。宣统二年(1910)四月初八日共和会在保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与会者有天津、北京、保定、通州等地代表，宣示以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国，融合种族界限，发展全国实业为宗旨，拟俟机全体加入同盟会。代表举胡鄂公、林伯衡、熊得山等七人为干事，胡任干事长。参加共和会者多为京、津、保各学堂学生及新军第六镇士兵，共三千余人。后共和会相继在北京、天津、通州、太原、广州、桂林、武昌等地设立分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一日，该会并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

莱阳民众奋起抗捐 宣统二年(1910)春，山东莱阳地区遭受霜灾，冬麦枯萎，农民“缺食者十居八九”。但该县官吏竟串通地方豪绅，利用清廷举办“新政”的名义，额外增收捐税。四月十三日，山东莱阳饥民七百余人，在联庄会首领曲诗文率领下拥到县衙门，要求用被官绅吞蚀“积谷”抵充捐税，撤换鱼肉人民的差役、绅董乡长。翌日，县令朱槐之派兵镇压，引起群众极大愤怒。五月初六日，曲诗文带领数千乡民，焚烧土豪劣绅房宅。第二天，抗捐抗税民众增至三四万人，再次提出减免税捐钱粮等要求。朱槐之被迫允许，旋被革职。新任知县奎保仍照旧科收捐，并派兵往柏林庄捉拿曲诗文。五月二十六日，山东候补道杨耀琳率兵到莱阳镇压，烧杀抢掠，奸污妇女。莱阳民众愤官府食言，肆行焚杀。二十七日，在曲诗文、于祝三、李秀山等率领下，聚众数万，于南岚村正式起义。三十日，曲诗文带众攻打莱阳县城。山东巡抚孙宝琦急调登州镇总兵李安堂、新军第五镇第

一协统领叶长盛率兵镇压。六月初六日，山东烟台道派何锡、修振邦等前往莱阳招抚，诱骗抗捐抗税农民停止反抗。初八日，叶长盛等炮轰莱阳，民众死四五百，伤千余人。后清军用火炮轰毁柏林庄，又杀伤民众数百人。曲诗文拒绝招抚，在莱阳城下与敌激战。清军猛扑起义军根据地马山埠，起义军力不能支，遭到失败，部分起义群众退往海阳、荣城一带继续斗争。

清政府颁行币制 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六日，清政府颁行币制则例。该则例规定暂以银为本位，以圆为单位，以一圆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辅币，圆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制。

国会请愿同志会发动第二次请愿 宣统二年(1910)五月初十日，在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发动下，各省立宪派代表进行第二次请愿，拼凑成由直隶省绅民旗籍代表等十七个请愿团体组成的代表团，号称代表在请愿书上署名的二十余万民众，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书上后，清朝廷召开御前会议，经一番讨论，于二十一日下发谕诏，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由，坚持“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会”，并指出“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第二次请愿又以清政府的拒绝告终。

咨议局联合会成立 宣统二年(1910)五月，由国会请愿同志会发动组织的第二次速开国会请愿失败后，国内立宪派随即准备发动第三次请愿。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致函各省咨议局议长，邀请他们齐集北京，组成“议长之请愿团”。七月，各省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等陆续到京，在京召开各省咨议局联席会议，并成立咨议局联合会。与会者推举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会长，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副会长，孙洪伊、杨廷栋、刘崇佑、雷奋、周树林、汪龙光、孟森、吴赐龄、王法勤等为审查员。会议讨论了各省咨议局共同关心的问题和议案，决定在资政院开会之际，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并通过了向资政院提出的请速开国会案。在此之后，该会联合各省督抚、民间团体、商会、地方绅、商、学界及海外华侨，酝酿大规模请愿活动。宣统三年(1911)四月，该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常会，要求取消皇族内阁，商议组成全国性立宪派政党，五月初宪友会成立后，咨议局联合会遂告消逝。

振武学社成立 宣统二年(1910)春，长沙抢米风潮日涨，湖北反清革命团体群治学社与另一反清革命组织首脑焦达峰联系，策划乘机于三月十五日午夜十二时发动起义，因被清吏发觉未成。清地方当局遂查封《商务报》，群治学社被迫停止活动。革命党人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廖湘芸等又商议将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八月十五日，杨、李等于武昌黄土坡新军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部召开成立会。众推杨王鹏为会长，李六如任文书兼庶务。章程佯称“本社专以联络军界同胞，讲求武学”为宗旨，借以掩护其反清革命活动。会上还制订了较群治学社更为严密的制度——标、营、队代表制，规定总部设干部会，由新军各标的革命分子派代表参加；各营、各队之间不得互相联系；营代表只能承标代表之命，队代表只能承营代表之命，以防泄密。要求每个社员每月介绍新社员一人，但不得滥收。以蛇山、蕲春学社作为各标、营联络机构。该社成员不久即逾千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发觉后，未加声张，只将杨王鹏、李六如等人开除军籍，草草了事。

冯如制成双翼飞机试飞成功 宣统二年(1910)，冯如制成双翼飞机试飞成功。冯如是广东恩平人，生于光绪九年(1883)。因家中贫寒，冯如幼年即随亲眷赴美国，在旧金山和纽约等地做工谋生。在“日作营生，夜习西文”的生活中，他逐渐感到“国家富强，由于工艺发达，而工艺发达以机器为权舆”。在纽约工厂里，他刻苦钻研机器工艺，经十多年努力，掌握了不少机械技术和机械学知识及电学理论。光绪二十九年(1903)，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试飞成功，使冯如深受影响，遂立志从事飞机制造。光绪三十二年(1906)，冯如回到旧金山，开始钻研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在旅美华侨的热心资助下，冯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旧金山以东的奥克兰设场制造飞机，并于宣统元年(1909)建立了广东飞行器公司。同年，制成一架飞机。八月初八日，冯驾机在奥克兰附近的派德蒙特山丘试飞成功。八月初十日，《旧金山观察者报》在头版报道了这次试飞的消息。宣统二年(1910)，冯又制成一架当时世界上性能较先进的双翼飞机，从八月末开始试飞和表演，飞行高度为三百一十米，时速一百零五公里，大获成功，受到孙中山和旅美华侨的赞许，成为我国第一个航空设计师和飞行员。同年，他参加国际飞行协会举办的飞行竞赛大会，获得优等奖，并取得了美国国际航空学会颁发的甲等飞行员证书。美国和英国都以重金招聘冯为飞行技术教练，但他决心报效祖国，拒绝了各国的聘约。宣统三年(1911)正月，他与助手朱竹泉、朱兆槐等人携带两架飞机回国，并准备将在美国的广东飞行器公司迁回广州，企图为中国的航空事业一展身手。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对航空事业毫无兴趣，使冯制造飞机的

一腔热望化为泡影。

资政院开议 宣统二年(1910)九月初一日，清政府在预备立宪中设置的咨议机构资政院开议行开院礼。摄政王载沣临院宣布训辞。根据《资政院院章》规定，资政院议员分钦选、民选两类，各占一百议席。钦选议员由宗室王公世爵十六名、满汉世爵十二名、外藩王公世爵十四名、宗室觉罗六名、各部院官员三十二名、硕学通儒十名、纳税多者十名组成；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选举产生，因新疆咨议局缓办未选出，共有议员九十八人。资政院常年会每年举行一次，以三个月为限；临时会无定期，以一个月为限。资政院职权为议定国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制定法规、弹劾大臣及议定奉特旨交议事项。资政院议长副议长由皇帝钦派，由贝子溥伦、法部侍郎沈家本分别担任。资政院开议三个月，民选议员希望资政院能做出点议会的样子，经常慷慨陈词，据理争辩，但除了转递了一份请速开国会的请愿书；并使几个兴学、垦荒一类议案得到清廷同意外，其余与时政相关的重要提案，均属徒费口舌。十二月初五日(1911)，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闭会。立宪派人士称这个资政院为非驴非马的议会。

第一次全国运动会举行 光绪三十四年(1908)，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派遣体育干事爱克斯纳来华，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办了"体育干事训练班"，组织了一些体育活动。为了扩大影响，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决定发起组织较大规模的运动会。宣统二年(1910)九月十六日，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在南京举行。这届运动会分三组比赛：一是全国高等组分区比赛；一是全国中等学校组分区比赛；一是圣约翰书院等六个学校的比赛。前两组以华北、华南、上海、吴宁(苏州、南京)、武汉五个区为参加单位。竞赛项目包括田径、足球、篮球、网球四大项。田径有五十码、一百码、二百二十码、四百四十码、八百八十码跑，一百二十码低栏，八百八十码接力，跳高，跳远，撑竿跳高，铅球、链球等十二个单项。经过四天角逐，上海区获高等组田径、网球两项冠军，总分第一。华北区获中等组总分第一。圣约翰书院获六校比赛总分第一。这是中国全国规模的第一次体育盛会，所以辛亥革命后称这次运动会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共有一百四十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赛事，但没有女运动员参加。

立宪派发动第三次请愿 宣统二年(1910)五月，由国会请愿同志会发动的第二次请愿失败后，在京请愿代表即举行会议，决定扩大请愿代表团的组织，打破原来以咨议局议员为限的界线，吸收各界团体参加，选派专员分往各地游说联络，鼓动更多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名，预定在宣统三年初举行第三次大请愿。七月，各省咨议局头面人物在京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咨议局联合会，决定将请愿提前在资政院开议期间发动，遂加快了活动。他们一方面奔走于各省督抚门下，请封疆大吏联衔上奏；一方面函催各省各团体加紧请愿签名活动，并于八月组成请愿代表团到京。八月末九月初咨政院开议前后，各省代表团已经陆续到京，号称代表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一百万人。九月，将请愿书交资政院。请愿书谓"时局骤变，惊心动魄者，不一而足"，外而"日本遂并吞朝鲜，扼我吭而附我背，俄汲汲增兵窥我蒙古，英复以劲旅捣藏疆，法铁路直达滇桂，……德、美旁观，亦思染指"；内而"各省饥民救死不赡，铤而走险"，若不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则全局瓦解"。九月二十日，资政院议决将请愿书上呈。二十三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共十八个总督、巡抚、将军、都统联署的奏折又到京。清统治者感到国内革命风声日紧，危机四伏；各省咨议局、绅、商、学界再三请愿；现督抚又联名电奏，若仍胶执九年预备成见，必陷入被动。遂于十月初三日发出谕诏，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之期缩为五年，并称"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令各省请愿代表"即日散归"。

国会请愿代表团被迫解散 宣统二年(1910)十月初三日，清政府颁诏将召开国会期提前，立宪派对朝廷的这个决定虽极不满，但亦无可奈何。国会请愿代表团感到"既奉朝命，劝谕解散，自不能再行存在，致招干涉"。于是宣告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临散前，以代表团名义发出一份《通告各省同志书》，谓"某等承全国诸父老委托之重，匍匐都门，请求国会。积诚罄哀，一年于今，三次上书"，"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表示了对清王朝假立宪的愤懑与无奈。但部分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于诏下当夜，约集国民公报报馆中，"经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

《东华续录》刊行 宣统二年(1910)，《东华续录》(又称光绪朝《东华录》)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发行。《东华续录》是朱寿朋仿照蒋良骥、王先谦等编辑《东华录》体例，收录光绪朝有关朝章国典、兵政大礼与列传等材料辑成的一部编年体资料长编。该书所刊文字主要依据邸抄、京报，部分采摘于报纸。起自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迄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凡三十四年。共有六十四册，二百二十卷，四百六十余万字。

文学社成立 宣统二年(1910)冬，湖北新军

中反清革命团体，振武学社领导人被逐出军营后，振武学社社务由蒋翊武代为主持，革命力量基本未受损失。风头过后，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蔡大辅等集会于武昌阅马厂集贤酒馆，商定将振武学社更名为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作掩护，继续进行反清活动。宣统三年(1911)正月初一日，蒋、詹、刘、蔡以新年团拜为名，约集振武学社各标代表，在黄鹤楼畔风度楼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文学社。以"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为实际宗旨，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共推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邹毓霖为会计兼庶务。文学社成立后设总机关于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并在汉口、汉阳等地成立分机关。以詹大悲等于数月前创办的《大江报》为喉舌，立"增进人群道德，提倡社会真理，灌输国民常识"宗旨，积极进行革命宣传，使湖北地区革命形势日趋高涨。随着社会上保路风潮的发展，文学社迅速扩展到三千余人，为武装起义打下雄厚基础。经同盟会中部总会筹划，文学社与湖北另一反清革命团体共进会于七月二十四日实现联合，共同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并于八月十九日发动了武昌起义。起义后，文学社遂停止了活动。

上海商团成立 宣统三年(1911)二月，上海商界著名人士李平书、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发起组成上海商团。该团属于商业资产阶级的自卫武装团体。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建的南市商团公会为基础，联合商余学会、商学补习会、韫怀商团、商务印书馆体育部第二十多个行业性和区域性商团组织而成。团员约五千人，编成五个中队，设正副团长各一人。该团主要成员为一般中小商人，也有部分店员、职员及宗教界、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参加。会中"经常演说时事形势，宣传救亡图强"。武昌起义后上海光复时，该团大部分团员参加了反清斗争，配合民军发动武装起义，在攻打上海制造局等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并承担地方防务和维持社会治安。其后在上海民军及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该团又组织义勇队随军出动。

同盟会发动黄花岗起义 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史称"黄花岗之役"。宣统二年(1910)春季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灰心泄气。孙中山遂于十月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会议，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骨干及南洋、东南各省代表参加了会议。孙中山在会上批评了革命党内因失败而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情绪，指出"一败何足馁"，激励大家"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决定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之不反顾，与虏一搏"。他号召"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出财"。会后，孙中山黄兴等亲自到华侨中募捐，集得港币十九万元，遂派人到日本购买武器。十二月，黄兴，赵声等到香港组成了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黄兴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长。除分派革命党人前往长江流域联络反清革命团体响应外，即着手发动广州新军，防营、巡警及番禺、南海、惠州等地会党参加起义。他们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精选出一支由八百人组成的先锋队，在广州设立了秘密据点三十八处。宣统三年(1911)三月初十日，统筹部在香港拟定于十五日起义，以赵声、黄兴为革命军正副总指挥，分十路进攻广州，再分兵出湖南、江西、福建，夺取长江中下游，然后大举北伐。许多华侨纷纷回国，准备参加战斗，革命党人更决心作奋力一搏。不料同盟会会员温生才未与任何人打招呼，即于初十日白天刺杀清署理广州将军孚琦，引起清广东当局严密戒备，一些运送武器的革命党人亦遭逮捕，加之款饷和枪械未能如期送到，黄兴等被迫将起义推延到三月底。二十五日黄昏，黄兴前往广州准备指挥起义，得知起义计划泄露，两广总督张鸣岐增调两营巡防军布防广州，并开始搜捕革命党人，许多人建议再次推迟起义。黄兴认为继续推迟，将意味整个起义前功尽弃，亦将失信于踊跃捐款的海外华侨，决定于原订的二十九日冒险起义。黄兴立即致电胡汉民，率在港的三百余先锋队员偕武器，于二十八日晚赶到广州。但电报延误至二十八日晚十点方到香港，最后一班赴广州的船早已启航。二十九日午后四时，因香港先锋队员未赶到，黄兴只得将原订十路进攻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进攻总督衙门；另一路攻广州北小门，接应参加起义的新军进城；第三路守大南门；第四路袭取巡警教练所。黄兴率一百二十余名先锋队员攻入总督衙门，张鸣岐逃走。起义军纵火焚烧了总督衙门，继续前行。在东辕门外，起义军与清广州水师提督李准卫队遭遇，展开激烈巷战，战斗持续了一昼夜，因伤亡重大，被清军击败。黄兴伤右手，断两指，仍坚持指挥，直到只剩孤身一人时才躲入一家绸布店，经同志护送到香港。长期担任宣传工作的朱执信，一反平日文弱之态，截短长衫，双手各执炸弹奋勇当先，胸腿受伤，仍不下火线，直至子弹打光，才避走香港。喻云纪(培伦)在起义前，日夜赶制炸弹。起义时随黄兴进攻督署，身负一筐炸弹，左手持号筒，右手执枪，勇猛当先，抛掷炸弹，清兵见之披靡。后全身多处受伤，仍率众据一米店力战多时，在突围时被

捕。方声洞自督署冲至双底门，孤身被围，犹挥枪突杀，毙敌二十余人，血流遍体，弹尽力竭而死。他起义前曾给家人留下遗书，谓“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其余三路因见敌众我寡，未按计划行动。胡汉民等从香港赶到广州后，起义已告失败，遂撤回香港，在战斗中不少先锋队员受伤被俘，在清当局屠刀面前，他们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同盟会会员林觉民起义前致妻子诀别书，谓“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临刑时，他俯仰自如，色不少变。李德山临刑前大骂清吏“认贼作父，不知羞耻”。喻云纪在刑讯时，义正辞严地说：“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此役革命志士死亡达八十余人，孙中山扼腕叹息“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广州人民激于义愤，不顾清地方当局迫害，冒着生命危险，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具，葬于城郊红花岗，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亦以此命名。

清华学堂正式开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退还大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宣统元年(1909)五月，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游美学务处，专营向美派遣留学生事宜。九月，游美学务处决定设立一个留美预备学堂，遂选定在海淀清华园建立游美肄业馆，规定办学宗旨为在国内招考学生，经过培训，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深造。宣统三年(1911)，肄业馆建成，改名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四月初一日正式开学。学堂第一任总办由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担任，学部郎中范源廉任会办，胡敦俊任教务长。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随即更名为清华学校，早期留美学生唐国安任校长，周诒春任副校长，张伯苓为总务长。清华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法、生活习惯等都仿效美国，校内活动和教学大都用英语，被称为“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学生从入学培训到搭船赴美，一般要经过八年的学习。

皇族内阁成立 宣统三年(1911)四月初十日，清廷诏令裁撤军机处、会议政务处等机构，颁布新订内阁官制，设责任内阁。摄政王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筹组新内阁。新内阁旋即成立，奕劻(皇族)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满族)、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肃亲王善耆(皇族)任民政部大臣，镇国公载泽(皇族)任度支部大臣，贝勒载洵(皇族)任海军部大臣，贝子溥伦(皇族)任农工商部大臣，宗室寿耆(皇族)任理藩部大臣，荫昌(满族)任陆军部大臣，绍昌(满族)任法部司法大臣，梁敦彦任外务部大臣，唐景崇任学部学务大臣，盛宣怀任邮传部大臣。内阁名单公布后，引起国内舆论大哗。因阁员中满族占九人，其中皇族就有六人，而汉人仅有四人。这与过去政府中尚书满汉各半的规定相比，汉族比重大为减少，所以被外间讥为“皇族内阁”。

保路运动兴起 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一日，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声称干路均归国有，支路准各省绅商集股自修。如有违抗，即照违制论。二十二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正式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二十五项，借款六百万英镑，将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人民争回的路权再行出卖。光绪三十、三十一年川汉、粤汉铁路收回后，清政府已定为官督商办。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铁路公司到宣统三年已筹集资金四千余万两，除广东全部为商股外，其他三省则募集了大量民股。所谓民股，即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目下附抽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特别是四川、湖南两省，清地方当局还“按亩派捐”，使广大农民负担沉重，许多“无产可破者，至鬻子以相应”，这种捐股在两省股款中，占了很大比重。因此路权的得失，涉及四省持有股票的地主、商人、资产阶级和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利益，致使这四省民众的反清保路斗争愈演愈烈。四月十六日，长沙湘路公司开全体大会，筹议抵制铁路国有。十八日，长沙绅学商民各界一万余人前往巡抚衙门请愿；长沙至株洲沿线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宜昌筑路工人数千人手持铁锤、棍棒，与弹压清军搏斗，击杀清兵二十余人。五月初十日，广东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议决铁路商办。两广总督张鸣岐出示取消股东会议议决案。商民遂以不用清政府发行的纸币、挤兑现银的形式进行抗议。地方当局采取高压手段，禁止各报刊刊登反对言论，股东们逃到香港，组织保路会，继续抗争。留日学生也群情激奋，声援国内，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海外华侨则鼓动以“格杀毋论”的办法来对付铁路国有政策的执行者。四川的斗争则更为激烈。五月二十一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当场成立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为会长。此后，各县陆续成立同志会，参加者超逾十万。鉴于人民的反抗，各省督抚曾奏请暂缓接收铁路，均不被清廷所允。七月初一日，成都民众开万人大会，号召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并举刘声元等为代表，赴京陈情。立宪派连夜赶写《保路同志会公启》，刊发光绪牌位，宣扬“文明争路”。翌日，成都及

周围州县纷纷罢市罢课，街道搭席棚，供光绪牌位，引上谕“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分贴两边，户户举哀号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因势利导，与哥老会联络，组织四川保路同志军，决定乘机发动武装起义。清廷命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严行镇压。赵于七月十五日诱捕蒲殿俊，制造成都血案，遂导致保路运动走上更加激烈的武装斗争形式。

宪友会成立 宣统三年（1911）四月，咨议局召开联合会第二次常会，与会者商议了组织全国性立宪派政党一事，推定黄为基、雷奋、张国溶、徐佛苏等人草拟章程、政纲，并定党名为宪友会。五月初六日，在松筠庵召开发起会。初八日，宪友会在北京湖广会馆成立。该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具体政纲有六条：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二、督促联责政府；三、厘理行省政务；四、开发社会经济；五、讲求国民外交；六、提倡尚武教育。该会设常务干事三人，经投票选举，由雷奋、徐佛苏、孙洪伊担任，另有文书员二人，会计员二人，庶务员二人，调查员八人。总部设在北京，各省陆续设立支部，以湖北、湖南、江苏、四川、福建、江西、直隶、山东等省声势最盛。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 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初六日，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湖南、江苏籍的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宋教仁、赵声、居正等与孙中山长期偏重在华南、西南发动起义的方略相左，认为西南边陲即便举义成功，也难引起全国震动，主张改变发难地区。宣统二年（1910）四五月间，他们在日本东京集会讨论，宋教仁提出：“在中央革命为上策，然运动不易；其次为长江流域；边地实下策也”。与会者大多认为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的中策比较现实可取，遂推谭人凤召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磋商。会上宋教仁提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主张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同时并举，建立革命政权，然后北伐。谭人凤要求采取“事权统一，责任分担”的行动计划。会后，谭人凤到香港，向黄兴陈述成立中部总会的计划，得到黄兴首肯。宣统三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宋等人更急谋长江中下游起义，于闰六月初六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会议发表宣言，认为以前革命的失败，在于同盟会“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中部总会将“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机关制取合议，救偏僻，防专制。”“中部总会不设总理”，“虚位待贤”，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五人为执行部部长。居正负责湖北的工作，焦达峰负责湖南的工作。中部总会成立后积极推动了长江各省的革命活动，特别是促成了湖北省文学社和共进会两革命团体的联合与起义方案的制订，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

外蒙古独立 宣统三年（1911）六月，俄国开始精心策划外蒙古脱离中国的阴谋。蒙古位于中国北部，蒙古地区中部有一条戈壁沙漠，以北称外蒙古，以南称内蒙古，自古都是中国领土。六月十五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召集部分封建王公贵族，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秘密会议，讨论如何脱离中国。会议决定派代表到彼得堡求援。闰六月二十一日，叛国分子土谢图汗部副将军杭达多尔济亲王率外蒙古少数封建王公代表团抵达彼得堡。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次日即接见了代表团。代表团以承认俄国保护，给予俄国种种特权，最后换取了俄国对外蒙独立的武力支持。从此，在通往库伦的路上，“俄兵踪迹络绎不绝”。七月初五日，俄国通过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清政府从即日停止在外蒙办理移民、练兵、整顿吏治等新政。八月中旬，俄国一方面通过驻华公使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一方面敦促外蒙王公贵族立即独立。杭达多尔济回到库伦后，加速了脱离中国的活动。十月初十日，外蒙古少数王公贵族在八百余俄军的配合下，强行驱逐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翌日，发表“独立宣言”，成立“大蒙古国”，拥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汗。

成都血案发生 宣统三年（1911）七月初七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应四川保路同志会所请，奏报清廷铁路暂归商办，未获批准。四川民众的反抗情绪更高，抗粮抗捐活动遍及各县。清廷电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带兵入川，并命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运动。初十日、十二日，赵尔丰又两请清廷同意商办，缓和民愤，清廷依然不允，严责赵尔丰弹压。七月十五日，赵尔丰以谈判为名，诱捕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保路同志会会长邓孝可、股东会会长颜楷等十一人。成都民众闻讯，齐集总督衙门，人员逾万，请求释放被捕川绅。赵尔丰下令开枪，杀害请愿民众三十二人，伤数百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此事激起四川民众的极大愤慨，纷纷拆毁电线，沿途设卡断绝官府通讯往来。十六日，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组织保路同志军攻打资州，哥老会首领秦载赓、侯宝斋率民团数万，亦与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农民武装云集响应，围城人员不下二十万。清廷命湖广总督瑞澂派兵入川，在成都城外与同志军激战。十八日，成都城外同志军为清军所败。但此刻整个四川沸腾，各地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展开了武装反清革命斗争。

武昌起义爆发 宣统三年(1911)八月初三日，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与当地新军中的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合并，同时建立领导起义的机构。文学社首领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首领之一孙武为参谋长，他们对在武昌发动起义进行了部署。只因被邀为统帅的黄兴迟迟未到，一直引而未发。八月十八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起义总部检查炸弹，不慎爆炸受伤，被送进医院。俄国巡捕闻爆围住宝善里十四号，搜出文告、旗帜、名册等物移交清地方当局。清地方当局根据名册逮捕共进会首领刘公之弟，得知起义计划，遂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蒋翊武等见事机泄露，议决于当晚十二时起义，但因传递消息人延误，作为起义号角鸣炮的炮队未接到命令，各部遂按兵未动。而是夜设在武昌的起义机关亦遭破坏，蒋翊武等逃往郊县隐匿，革命党三十余人被捕，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第二天拂晓就义。天亮后，湖广总督瑞澂按名册继续捉拿党人，形势紧急。此时，各路革命党人已接到十八日发出的起义令，又闻刘复基等殉难的消息，新军工程八营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立决定于八月十九日夜以枪声为号起义。晚七时，士兵程正瀛打响了第一枪，熊秉坤带工兵营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各路军中革命党闻枪而动，按原定部署，向各自的目标发起攻击。二十日清晨，总督衙门被攻克，瑞澂逃至楚豫号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逃往汉口，武昌遂为起义者占领。二十一日，汉阳、汉口均告光复。

湖北军政府成立 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日上午，武昌全城已为起义者所据，革命党人立即在谘议局开会，商议筹建革命政府。但此时策划起义的领导人有的被杀、被捕，刘公、孙武还藏在汉口，蒋翊武遁于新沟，虚位以待的黄兴消息杳然，参加会议的其他革命党人都资望过浅，而且没有意识到掌握政权的重要意义，会议基本上为立宪派人物和下层官兵所左右。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建议："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省，请一致响应，以助成伟举"。众人同意，但不知以何人名义发电，于是有人提议用黎元洪名义，立宪派首先附合，临时革命军总指挥吴兆麟极力赞同。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生于同治三年(1864)。黎元洪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战后被张之洞邀至湖北，参与训练新军。他曾三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以军务娴熟，素爱军中文化人，有一定威信。但黎元洪心中并无革命意识，武昌起义当晚还亲手枪杀革命党人周荣棠，后化妆藏匿。当起义士兵将黎从藏身之处推到会场，举他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时，他怕革命一旦失败，自己"从逆十恶不赦"，坚辞不受，起义士兵只好将其监视起来。经过商议，与会者仍让黎元洪挂都督名，并以黎的名义对外通电，附合革命的汤化龙任民政总长，由革命党人组成"谋略处"，负起军政府的实际领导责任，湖北军政府遂告成立。当日晚，谋略处议决军政府设在武昌谘议局；废除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以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和通电全国；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接着，军政府宣布废除清廷一切苛捐杂税，颁布《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随着汉阳、汉口的光复，革命风潮的高涨，列强相继承认起义军为交战团体，黎元洪见政治天平倾向革命，逐渐转变态度，于八月二十六日宣誓就任都督之职。他随即颁布《都督府组织暂行条例》，取消谋略处，以都督兼总司令；汤化龙任政事部长，革命党人失去对军政府的控制。

武汉保卫战开始 武昌起义后，清王朝统治者惊恐异常。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即谕令将湖广总督瑞澂革职；停止刚开始的新军永平秋操，着军咨府、陆军部速派陆军两镇，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南下；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海军溯江而上；令程允和率长江水师会集武汉；又命河南巡抚宝棻派新军五十二标赴汉口，与张彪残部汇合，共同围剿武汉起义军。二十三日，镇压武昌起义的清军调配完毕，荫昌为第一军军统，军咨府正使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八月二十七日，武汉保卫战拉开序幕，湖北革命军在汉口外围刘家庙与清军展开激烈争夺战，至九月初六日，刘家庙火车站得而复失，革命军损失数百人。初七日，清军经大智门攻入汉口市区，革命军依断墙残垒与清军展开巷战，清军以先焚烧再进攻残忍手段，革命军伤亡数千人。九月十一日，汉口沦入清军之手。十月初一日，清军向汉阳发起攻击。负责指挥保卫战的黄兴，因旧官僚和立宪派的破坏掣肘，调度不灵，屡屡贻误战机，汉阳门户被敌叩破。黄兴集主力于十里铺，亲自坐镇前线，"每见敌炮落在咫尺，总司令不为动"，激励革命军与敌撕杀，但终因众寡悬殊，汉阳又于十月初七日失守。长达一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虽以失败告终，但牵制了清政府大部分精锐部队，使各省相继光复，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中华民国公报》创刊 武昌起义后，刚从监狱中救出的共进会员牟鸿勋便找到军政府领导人，商量创办报纸事。经过活动，黎元洪特批创办费六百元，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公报》创刊。《中华民国公报》社址在武昌大朝街六十八号，

即原湖北官报印刷局。该报为日报，初创时有时一日出两次，每次一至三张不等，后固定为每日一次二张半。该报设有社论、要件、专电、译电、西报译要、东报译要、特别纪事、紧要新闻、外省新闻、武昌新闻、神州月旦、江汉阳秋、文苑、谐谈、插画等栏目。在办报章程中，该报宣称“以颠覆现今之异族恶劣政府，改建简单社会主义之民国”和“说明现今世界之大势，陈述精密之学理，内以指导民族之进行，外以联合世界之情感”为宗旨。《中华民国公报》第一任社长牟鸿勋，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张樾、任素、张祝南、蔡良村、朱峙三、刘菊坡等，多为两湖总师范的学生。该报挂“公报”招牌，实为共进会直接控制的言论机构。报纸的主要内容为四个方面：一、军政府和下属各部门及各革命团体的公告。增刊登过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旗、帅旗等图样；鄂军都督和所属参谋、军务、外交、政务等部的文告；招兵买马的启示；新出革命书籍广告等等，给人以除旧布新欣欣向荣印象。二、报道起义进展情况和各省光复情况。三、报道有关清政府应付革命的情况。四、刊登对有关革命形势和军政府内外政策的评论。报纸除了在湖北发行外，还被送到其他各省，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其他各省的光复斗争。

湖北军政府颁布《鄂州约法》 宣统三年(1911)八月下旬，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宋教仁等到武昌，湖北革命党首领居正、孙武、刘公等遂与宋商议制订一个约法，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前，与宪法效力相等的根本大法，并用以号召各省。宋教仁随即草拟了《鄂州约法》，由湖北军政府颁布。《鄂州约法》共七章六十条。该约法宣布：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居住、保有财产、自由营业等权利；享有任官、考试、选举、被选举等权利；需尽纳税、当兵等义务。约法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以一次为限，其权限类似于总统，总揽政务。在议会未开设前，都督有暂时制订、公布法律之权；对外宣战、讲和之权；统帅水陆各军之权；有依法律任命官吏、宣布戒严、大赦、减刑等权。都督对议会负责。议会有制定法律，议定条约、审理预算、决算，向政务委员提出条陈、质问或弹劾的权力。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务委员会、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作为司法机关的法司，各有权限，互相牵制。该约法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为思想基础，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的一部大法，基本上勾划出以总统制为蓝本的共和国方案，向社会展示了民主制共和国的形象。它是对清王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本否定，同时淘汰了资产阶级立宪派追求的君主立宪方案。《鄂州约法》的颁布，对动员民众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产生了很大作用，其他省份光复后，大都以该约法为蓝本组建政府。

黎元洪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宣统三年(1911)八月初三日，在湖北反清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商议武昌起义计划时，即决定邀请黄兴等来武汉主持大计。武昌起义后，黄兴、宋教仁等于九月初七日到达汉口，随即赴武昌。黎元洪派骑兵，高擎“黄兴到”大旗，遍游武汉，以安定人心。黄兴到后，文学社领袖蒋翊武及部分革命党人，根据原订由黄兴主持大计方案，主张拥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或南方民军总司令，以黄的革命威望，号召全国，地位和职权均在黎元洪之上。但原先拥立黎元洪的部分军官、旧官僚及立宪派人士认为如此一来，将使其已经把握的领导权丧失，遂极力阻挠。他们力主由黎元洪委任黄兴职务，归黎元洪统率，一再提出“大敌当前，目前首要任务是在驱逐清兵出境，促成各省响应，至于黄兴个人的委任和公推的问题，对此不应该过于争执，以免影响军事前途，亟应团结军心，黄兴由黎元洪委任，就是团结一致的最好机会，不可更张，以生内乱。”共进会领袖孙武等人与之沆瀣一气，排斥黄兴领导。黄兴、宋教仁只得迁就妥协，使旧官僚及立宪派阴谋得逞。九月十三日，根据湖北原立宪派首领汤化龙、胡瑞霖的主张，在武昌阅马厂搭拜将台，效仿秦汉之交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故事，让黎元洪以最高权威身份，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的印信、委任状、令箭。黄兴发表简短演说，“表示坚决抵抗到底，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通过这种登台拜将的形式，进一步抬高了黎元洪的地位，使身为战时总司令的黄兴需依法律服从黎的领导，从此处处受到黎的牵制，号令难行，指挥不灵，使武汉保卫战中各军配合失调，战机屡遭贻误，终告失败。

湖南光复 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一日晨八时，长沙城外革命党人联络的新军鸣枪起义。焦达峰、陈作新等率两支新军进入长沙城，合攻巡抚衙门。巡抚余诚格已先期匿逃登舰，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义军击毙，起义者遂宣告湖南独立。次日，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共同组建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和运动新军的同盟会员陈作新为正副都督，原谘议局长、立宪派首领谭延闿担任参议院长。湖南军政府成立后，焦达峰“以援鄂为唯一重大事务”，下令扩军，不久即派王隆中率独立第一协出援湖北，增强了首义地区的抗清武装力量。但由于革命军主力的出省作战，致使湖南革命党人失去了有力的武装支持，谭延闿暗中策动新军管带梅馨在九月十日发

动兵变，将焦达峰、陈作新等革命领袖杀害，谭延闿自为都督，使湖南政权落入立宪派手中。

陕西光复 宣统二年(1910)夏季，陕西同盟会、哥老会、新军代表在西安大雁塔召开"联席秘密会议"，使各股反清力量联为一体。宣统三年(1911)春，哥老会已经准备好发动反清起义。四川保路风潮愈演愈烈后，陕西新军也跃跃欲试。武昌起义前夕，陕西革命党即将起事的风声充盈于西安的大街小巷。武昌首义消息传到西安后，陕西革命党与哥老会首领经过密商认为："应该抓紧这个时机，积极作好起义的准备"，决定于九月初八日发动起义。此时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西安将军文瑞得知新军可能有所举动，下令将驻省城新军调往外县，使之难以联合起事。在新军一标一营调往汉中后，钱能训又令二标三个营及一标三营开赴宝鸡、凤翔、长武等地。身为同盟会员的一标三营督队官钱鼎见事情紧迫，立即与各营革命党和哥老会首领商议，决定将发动起义提前到九月初一日，同时推举协司令部参军兼二标一营管带、留日学生张凤翙为首领。九月初一日，正值星期天，军装局巡防队士兵都休假外出。革命党人率领新军及哥老会，迅速占领了军装局，各队起义士兵到军装局领取枪支弹药后，随即向城中各官署和军事要地发起攻击，并占领了藩司衙门及古楼等处。次日，起义军攻占满城。钱能训闻报逃匿，文瑞自杀。起义成功，义军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名义发布安民告示。九月初四日，革命党人和哥老会首领聚集于军装局，宣布陕西反正，组织军政府，会议共推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钱鼎和哥老会首领万炳南任副大统领。西安反正后，外县各路会党，新军亦纷纷起事。不久，全省大部分州县均告光复。

山西光复 同盟会成立后，山西籍的同盟会会员就开始了运动宣传新军士兵革命的工作，武昌起义前夕，山西的新军基本上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武昌起义后，山西巡抚陆钟琦侦知新军不稳，一方面从外地调军入省，以抗衡倾向革命的新军；一方面下令将省城新军调往晋南风陵渡，以分散力量。革命党人见此，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在开拔前领得子弹后发动起义。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七日，新军领取子弹后，第二营四个队长胁迫管带姚维藩指挥起义，姚接受总司令官的推戴，并率军攻打省城。初八日拂晓，起义部队从新南门进入太原。进攻巡抚衙门的一队经过激烈战斗，占领抚署，陆钟琦被击毙。另一队起义军夺取军装局后，各队转攻满城。仅半天功夫，太原城即为义军占领。当日，起义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省谘议局开会，筹建军政府，并宣告山西光复。阎锡山与谘议局议长梁善济、副议长杜上化相勾结，被推为都督。

江西光复 湖南响应湖北起义，并宣布光复后，江西受到巨大的冲击。宣统三年九月初二日(1911)夜晚在九江的革命党人立即策动新军第五十三标、五十五标和炮兵营的官兵举事，并控制了九江。九江附近的湖口炮台、马当炮台守军闻讯后，也相继宣告归附革命。起义军组建了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拥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都督。九江反正的消息传到省府南昌，群情激奋，纷纷准备迎接民军南下。与此同时，湖北共进会派丁筠堂，湖北军政府也派了十余人前往南昌，在南昌绅商、新军之中策动响应湖北的起义。九日深夜，驻南昌的新军第五十四标首先起义，城内陆军小学堂，和测绘学堂学生随即参与战斗，南昌的城守、巡防、水师各军都挂白旗响应，起义者遂控制了整个南昌。九月十一、十二日，南昌绅学商各界先后在商务总会、教育会商议组织军政府。当时江西革命党骨干均在各地，南昌城中的革命党人地位低微，难于驾驭局势，商议结果推原江西巡抚冯如骙为都督。冯拒绝任职，又改举混成协协统吴介璋为都督，并宣告江西光复。军政府成立后，政局十分波动，彭程万、马毓宝相继接任都督。直到后来南京政府派同盟会员李烈钧到江西任都督，局势才大体稳定。

云南光复 云南革命党人争取新军的工作进行得很早，到宣统初年，云南新军中下层大都倾向革命。宣统三年(1911)三、四月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即准备将大规模反清起义地点选在云南。武昌首义胜利消息传到云南后，云南革命党人跃跃欲试。九月二十六日同盟会员张文光、陈天星等率云南新军第七十六标和防军部分士兵首先在腾越起义，占据腾越后，张文光称滇西军都督，分兵下永昌、永平等州县，进图省城昆明。此时，昆明新军中革命党人已经密议，商定在重阳节举事，推选蔡锷为未来军政府都督。九月九日晚，新军第七十三标士兵打响了第一枪，第七十四标随后响应，冒死猛攻军械局、九华山等处。经过激烈战斗，击毙统制钟麟同，布政使世增亦被杀，义军于次日上午占领军械局、总督府等处，云贵总督李经羲逃匿。九月十一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起义者依前约推蔡锷任都督，宣布云南光复。

上海光复 宣统三年(1911)三、四月间，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同盟会员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到上海，同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沈懋昭、李平书等加紧联络，创设革命外围组织中国国

民总会。因清廷对宪政毫无诚意，热心立宪的沈懋昭、李平书等上海总商会首领都转而拥护革命，积极参与谋划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员李燮和为总司令，率三十余名敢死之士到上海，策动响应。李凭借沪军、炮台、巡防营官兵多湖南籍的关系进行联络后，与陈其美相约于九月十五日起义。而陈其美想抢先发难，以头功居都督席位，遂召集同党另行密谋，决定利用商团武装，提前起义。九月十三日，陈其美率商团攻打江南制造局。因兵单被俘。李燮和李书平闻讯急忙发动沪军巡警商团第武装围攻制造局。次日晨，制造局总办张士珩逃遁，工人内应，起义者占领制造局。上海道刘燕翼逃往租界，起义遂告成功。十五日，同盟会、光复会等各派集议成立上海军政府和推选都督。陈其美亲信运用帮会势力，哄堂大嚷，选陈其美为都督。李燮和因在上海遭排挤，转到吴淞，称中华民国光复军总司令，至此上海宣告光复。

贵州光复　武昌起义，湖南、江西、云南等省反正的消息传到贵州后，给了贵州的革命党人极大的鼓舞。贵阳陆军小学和贵州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经过密商，拟于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至二十一日之间，利用夜间演习之机，发动起义。因立宪一再受挫转向革命的贵州自治学社也认为时机成熟，准备策动贵州反正。自治学社首领张百麟亲赴巡抚衙门，劝巡抚沈瑜庆宣布和平独立，并请沈出任都督。沈瑜庆拒绝张百麟之请，并准备将张逮捕。自治学社遂决定于九月十五日起事，同时与陆军小学和新军联络。九月十三日，沈瑜庆与贵州宪政派合谋搞"贵州自保"骗局，企图在十四日召开的自保会议上逮捕张百麟等人。自治学社闻知后立即商定将计就计，在自保会上"以兵劫沈瑜庆"，此计尚未实施，陆军小学学生走漏起义讯息，被当局闻知，并行将镇压。陆军小学紧急决定，于十三日破军械库取枪，即刻发动起义，并迅速通知自治学社和新军。新军得告，即于当晚十一时宣布起义，官兵共推同盟会会员陆军小学总办杨荩诚为指挥，攻打省城。抚署卫队营自管带以下均加入义军。沈瑜庆见大势已去，只好向自治学社控制的谘议局交出政权。十四日，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整队进入贵阳，贵州军政府于当日成立，杨荩诚被推为都督，新军队官赵德全为副都督，贵州宣布光复。

江苏光复　江苏省是资产阶级立宪派最为活跃的省份，巡抚程德全一向善观风色，与张謇为首的江苏立宪派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随着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特别是上海光复后，江苏震动，程德全认为"军国之事，已无可为"，开始设法自我保全。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此刻也感到清王朝已穷途末路，为了保全立宪派绅商在江苏的身家财产，只有劝程德全尽快宣布独立，才可使江苏不受革命起义战乱殃及。在张謇等人的活动下，江苏资产阶级上层以全省的地主绅商的名义拟写了一篇《江南自保商榷书》，呼吁两江总督、安徽、江苏巡抚主动"明建义旗，宣告独立，以释群疑，以备匪类"。此时，程德全亦察觉新军不稳。遂准备接受绅商敦请。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五日，在程德全与江苏省地方官绅合谋下，新军马、步、辎重队"一律袖缠白布，直达巡院"，要求程德全反正，并举其为江苏都督。程德全当即宣布："当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务必秋毫无犯，保全闾阎。"随后在原抚署门口，挂上"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旗子，程德全改称都督。在此之后，江苏各府州县官绅纷纷仿效省城，根据程德全的电令"奉宪独立"。不久，江苏除南京外，全告光复。

浙江光复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江南后，江苏、浙江革命党人就在上海聚会，经讨论认为应在杭州发难响应。于是浙江的光复会会员和同盟会会员立即在浙加紧联络新军和其他武装力量，浙江新军、巡防队、警察中多数士兵均赞同举事。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三日，上海反正的消息传到杭州，当地革命党人决定乘当局慌乱之机，马上发动起义。次日晚，驻杭州新军第八十一标、八十二标、其他州县集合来的会党及上海驰来的敢死队，分几路进取省城。杭州城内的警察、工兵营的革命士兵则打开城门接应，使起义军很快攻下抚署，并逮捕了巡抚增韫。十五日，省城几乎全部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只有驻防将军德济督旗兵顽抗不降。经反复攻打和劝说，德济提出只有推举浙江立宪派首领汤寿潜为都督才肯投诚。早在举义之前，浙江光复会和同盟会的会员在商议都督人选时，身任谘议局驻局议员的同盟会会员褚辅成，已提出由汤寿潜做都督，并派人赴上海迎汤返浙。德济闻知后，放弃抵抗。汤寿潜到杭州任都督后，接受旗兵投诚，并释放了增韫。但佐将贵林要旗兵隐匿枪支弹药，陶成章、褚辅成捉住贵林，搜出枪弹，才使杭州局势稳定。此后，浙江各府州县革命党人纷纷策动武装力量，据城独立，清朝地方官吏非逃即降，全省遂告光复。

广西光复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广西后，省城以外府州县的革命党人立即行动起来。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十日，同盟会会员刘崛等联络梧州邻近的绿林会党两千余人，进入梧州，集合各界代表，宣布反正。九月十五日，同盟会会员罗佩珩等策动浔州境内的会党、绿林、团练、巡警数千人，起义攻占平

南城。随后又汇合各县地方武装万余人,攻克藤县。进取浔州。此后柳州、玉林、南宁等地相继发生兵变、起义。省城桂林的革命党人也联络驻扎城郊的新军和当地会党近三千人,于九月初九日向桂林城进军,但因路被水淹受阻。广西巡抚沈秉堃见变起肘腋,惊恐万状。谘议局中革命党人黄宏宪、蒙经等和立宪派,乘机向沈指陈利害,"倘不宣布独立,糜烂即在眼前"。沈见局势无可挽回。于十六日夜同意宣布广西独立。次日,在立宪派操纵下,沈秉堃被推为都督,改抚署为军政府,传檄全省各府县迅速反正。但光复后的广西政局动荡,巡防营发动叛乱,沈秉堃见新、旧军队磨擦,便借故离开广西。地方实力派,原广西提督陆荣廷乘机接任都督。

安徽光复 武昌起义爆发后,散在外省的安徽籍革命党人相继返省,组织武装响应。同盟会会员吴春 、陈独秀等人凭借过去运动革命的基础,经过多方奔走,约集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第六十一标、六十二标代表、陆军测绘学堂、陆军小学堂、新军马、炮营、工程队中的革命党人,共同商定在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九日晚,以两标中的革命士兵为主力,起义攻取省城。因行动仓促,未能成功。此时安徽周围各省先后光复,至使省内群众革命情绪高涨,革命党人遂立即重新聚集力量,图谋再举。九月十五日,革命党人张汇韬、管鹏组织民军在寿州起义,随后占据寿州、六安、风台、定远等县。合肥、芜湖、颖州、临淮相继飘起义旗。立宪派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加紧奔波于巡抚朱家宝和革命党之间,"斡旋宣布独立"。朱家宝此时得到袁世凯的密电暗示,遂同意宣布安徽独立。革命党人事前忙于策动武装起义,未议及起义后的政权归属问题。十八日,谘议局出面宣布安徽光复,举朱家宝为军政府都督,革命派也没有争议。朱家宝换了招牌后,军政各方一切如旧,引起民众和革命党人的不满。同盟会从九江调来黄焕章,撵走了朱家宝。后都督几次易人,直到同盟会会员孙毓筠接任后,政局才稍得安定。

福建光复 武昌起义前,同盟会会员许崇智等在福建新军中宣传革命,成效显著。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在福州组织军警特别同盟会,新军和巡警中下层官兵入盟者甚多。武昌起义,湖南光复消息传到福建后,参加特别同盟会的军警络绎不绝,几乎全部入盟。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见军心已变,遂附合革命。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福州新军中革命党人经商议,决定在九月十九日起义,推孙道仁为都督,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福建谘议局议长、立宪派人士高登鲤等得知新军发难在即,企图抢在革命党人之前攫取政权,便于十八日召开谘议局会议,要闽浙总督松寿交出政权。但松寿和福州将军朴寿以组织旗兵"杀汉团"负隅顽抗相答。十八日晚,许崇智等根据原计划,率各路义军集结到于山。次日拂晓,义军发起攻击,经过一天战斗,旗兵势穷力竭。朴寿被击毙,松寿自杀,余众缴械投降。二十一日,福建军政府成立,孙道仁被推为都督,福建宣告光复,而政权大部分掌握在原谘议局立宪派手里。

袁世凯任清内阁总理大臣 宣统三年(1911)八月初八日,清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上奏辞职,请让袁世凯执掌大权。武昌起义后,外国报刊为袁世凯出山大造声势,谓只有袁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袁的党羽旧部也四起呼应,哄托"非袁不能收拾"的气氛。八月二十三日,奕劻、那桐、徐世昌再次向载沣提议起用袁世凯,并强调此为"东交民巷"的意向。载沣迫于形势,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提出既向清廷要权,又向立宪派和革命党买好的六项条件。载沣未允,袁便以足疾未痊,辞不受命。九月初六日,清廷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湖北海陆各军均归其节制,袁才于九月初九日离开彰德。九月十一日,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辞职,清廷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要他立即赴京组织责任内阁。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凯组阁完毕: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

广东光复 武昌起义成功,湖南、江西反正,消息传到广东,广东革命党人急切地准备再次起事。革命党人经过策划,将省城外民军分为四军:江东为第一军,由谘议局议员陈炯明指挥;北江为第二军,由徐维扬指挥;西江为第三军,由苏慎初指挥;韩江为第四军,由姚雨平指挥。宣统三年(1911)九月初三日,化州首先起事,攻取州城。初八日,陈炯明、邓铿在惠州起事,十八日占领惠州城。同时潮、汕地区也响起反清枪声。广州革命党人组织的机关部也向下属发出总动员令,要求迅速集合队伍,五日内赶到省城郊区,会攻广州。九月初,数支民军已隐伏在近郊待命。两广总督张鸣岐鉴于情势,被迫与革命党人联系,以为退路。广州的豪绅巨商和立宪派,成了革命党人与清地方当局斡旋"和平独立"的中间人。广东的革命党头面人物胡汉民等,过高估计清军的力量,又自感没有掌握足够的武装力量,遂希望谋得廉价的和平光复。广东清乡督办江孔殷、谘议局议长邱逢甲在广州多次邀集上层人士会议,决定承认共和政

体。经张鸣岐和革命党人首肯，决定在谘议局共同商决广东独立问题。在九月十八日举行的共同会议上，作出即时"宣布独立"决议。翌日，广东公开宣告独立，张鸣岐被推为都督，原提督龙济光被推为副都督。张自知难容于众，不等督印信送到，即微服逃往沙面。龙济光也避不就职。各界代表遂与谘议局部分议员重新开会，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九月末，广东军政府正式成立。

保安会成立　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反正消息传到东北后，工商兵学各界异常兴奋，东北革命党百余人分头秘密集议，决定乘此有利时机，"共谋起义，促动关外三省独立"。随后分往各地发动反清起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初期频繁调动军队，封锁消息，监视党人动向，图谋扼制东北革命活动。但面对东北人民闻知各省起义后日益高涨的反清情绪和独立的要求，感到不能一味硬压。此时，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劝告赵尔巽："唯一明智的办法是稍微顺着革命运动的潮流走"。谘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吴景濂等也向赵进类似之言。赵同时闻知：东北革命党骨干张榕等正准备在东三省策划"和平光复"，成立"保安会"，逼清总督赵尔巽出走，然后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宣布独立。赵尔巽随即决定抢先下手，与谘议局联合，组建一个名义上"接收政权"的国民保安会，度过革命危机。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二日，奉天省城各界和自治团体代表大会在谘议局召开，宣布成立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自任会长、吴景濂、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祯祥任副会长。九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吉林、黑龙江两省也如法炮制，分别成立保安会。原吉林巡抚陈昭常、原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分任会长。革命党人张榕仅担任了点缀性的奉天保安会参议部副长。

山东假称光复　武昌起义和各省相继反正消息传到山东，要求革命的各层人士随即酝酿反清起义。但山东革命党人领袖、同盟会会员徐镜心等害怕出现大乱局面，宁愿与立宪派头面人物丁世峄等联合行动，一意谋求和平独立。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五日，徐、丁等聚集各界人士在谘议局开会，提出独立约章七条，要求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限其三日内答复。而孙宝琦在奏报清廷后，宣告成立山东临时政府。革命党人和要求革命的各界群众对此十分不满，在二十三日再次商议独立问题时，革命党发动济南各学堂大批学生参加，要求孙宝琦宣布独立。与会的新军第五镇军官也逼孙宝琦宣布独立，否则"以兵器相加"。孙则提出三个条件，总揽一切权力，才能宣布独立。与会得"一律承任"，并推孙为都督，第五镇代理统制贾宾卿为副都督，孙称这种独立"譬之开店，换一牌招而已"。二十六日，袁世凯在京组成新内阁。袁亲自要孙宝琦取消独立，第五镇反动军官也胁迫孙取消独立，甚至放风欲杀贾宾卿。贾宾卿逃遁，孙宝琦于十月初四日宣布取消独立，为时十二天的假光复结束。山东革命党人在独立取消后，才真正致力于组织武装起义。

四川光复　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反正后，成都、重庆两地革命党人不敢轻举，没有响应。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五日，龙泉驿新军二百余人在排长夏之时率领下起义，才拉开四川光复的序幕。十月初一日，义军抵重庆郊外。初二日，同盟会会员张培爵等组织各界群众数千人，在朝天观开独立大会，敢死队持械逼迫重庆知府缴印反正，迎夏之时军入城。旋即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被推为都督。初五日，泸州宣布独立，成立川南军政府。初六日，端方带入四川的鄂军革命士兵起义，杀死端方，返回湖北，川东、川西的反清烈火也燃烧起来。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避开革命打击，与蒲殿俊为首的立宪派及地方士绅密订官绅独立三十条。初七日，他们宣布成立四川军政府，由蒲殿俊任都督，赵的心腹朱庆澜任副都督，赵名义上下台，实际仍操大权。十八日，赵尔丰唆使成都巡防营兵变，蒲、朱逃匿，赵以总督部堂名义发布文告，妄图卷土重来。原陆军小学总办、同盟会会员尹昌衡立即率新军平定叛乱，杀死赵尔丰，自任都督，稳定了成都局势。此后，尹昌衡与重庆军政府函电往来，达成合并协议，尹任统一后的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

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召开　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一日，在张謇、赵凤昌等人穿梭活动后，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出面，联电上海都督陈其美，援引美国独立战争时召开"十州会议总机关"，"卒收最后成功"之例，倡议各省旧时谘议局和现时都督府各派一名代表，常驻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翌日，程、汤以苏、浙两省代表名义，电请全国各省派代表到上海，会商组织临时政府。二十五日，到达上海的江苏、福建代表与上海代表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正式亮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牌子。在此之前，黎元洪于十九日已署衔发出通电，请各省代表到湖北商议组织临时政府，因传递延误，二十七日才到上海。此时浙、苏、闽、湘、直、鲁、豫等省区代表已经到沪，而赣、粤、桂等省区代表则前往湖北。上海方面经集议，以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名义致电黎元洪、黄兴，要求会议在上海举行，并议

决"承认武昌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推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代表。湖北不接受上海的电请,派代表居正、陶凤集赴上海,说动各省代表赴湖北。经代表会讨论,各省代表均赴湖北,同时"各省一人留沪"。十月初九日,到湖北的十一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开会,举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十月十三日,会议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四章二十一条。十四日,因江浙联军已克复南京,会议遂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驻上海代表则议决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十五日,会议议决议和条件四条,议决以汉口为议和地点,伍廷芳为议和代表。因武昌军情紧急,会议由汉口迁往南京续开。二十二日,十五省代表在南京开会,举汤尔和为议长。会议原定于二十六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但由于一些主张将大总统席位留给袁世凯的人反对,会议决定缓举临时大总统。二十七日,苏浙军人以汉阳败绩为由,反对黄兴当大元帅,遂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而代行大元帅职权,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黄兴以"这等大事,应待总理(孙中山)归来决定。"未赴南京就职。

华侨革命飞机队飞抵上海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美国,在美国的洪门筹饷局拨款购买了冠绪司式飞机六架,聘请美国飞机修理技师威尔霍,随革命志士旅美华侨李绮庵、余夔等驾机回国,支援国内起义军的反清斗争。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这支最早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组建的空军飞机队飞抵上海。孙中山归国后,对华侨革命飞机队赴国内支援反清作战表示欢迎,朱卓文随后驾机在南京后湖机场试飞,引起国内外观注。

革命联军克复南京　宣统三年(1991)十月十二日,江浙联军占领南京。南京为江南政治文化中心,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中部总部领导人宋教仁等即着手准备夺取这个重镇。部分同盟会会员赴南京设置起义机关,柏文蔚则在新军第九镇策动反正。清两江总督张人骏怀疑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有反清之念,于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七日,将徐部调至离城六十余里的秣陵关,不补充子弹,断其军实。清江南提督张勋复派人谋刺徐绍桢。徐对此极为不满,此时经柏文蔚等策动,九镇新军下级军官多归附革命,徐迫于形势,率部起义。他与城内同盟会会员苏良斌等谋划于十八日,内外夹击张勋部。而苏等在联络总督卫队、暗查队、巡防营部分士兵后,即于十七日夜先行举事,被张勋镇压。十八日,徐绍桢率军攻雨花台,因缺乏弹药,被张勋击败,退往镇江,徐转赴上海。在上海,经同盟会中部总部与几方协商,决定组成江、浙、沪联军夺取南京。不久,浙军朱瑞部、沪军洪承典部、济军黎天才部、苏军刘之洁部、镇军林述庆部等万余人齐集镇江。二十一日,各军推徐绍桢为联军司令。十月初一日,徐召集参谋团会议,拟定进攻南京作战方案。次日各军开赴南京。初四日,联军攻占马龙山炮台,初五日晨又乘胜夺取幕府山炮台,清军一营投降,联军据高轰击城内清军。同日,中路联军攻占紫金山麓的马群和孝陵卫。初七日,另一路联军进攻高桥门,杀清江防统领王有宏。各路联军共同向朝阳门外天保城发动强攻,于十一日占领该处。联军在该处架炮轰击城内张勋指挥部北极阁。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在该处观战,身边卫兵被炸死数人,张、铁落荒而逃,张勋亦率残兵败将渡江窜往徐州。十二日,联军入城,清军残部揭白旗投诚。兵逼太平门的镇军司令林述庆见状率先冲入总督府,自称临时宁军都督,南京遂告光复。各路联军入内城后,不满林自称都督,内部出现裂痕。同盟会中部总部领袖宋教仁等决定并征得各军同意,迎江苏都督程德全驻南京,取代林述庆。

中国话剧创始人之一王钟声就义　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三日,中国话剧创始人王钟声英勇就义。王钟声,浙江上虞人,生于光绪八年(1881)。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到德国得来伯大学学习法律,获学士学位。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成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广西任教,在此期间加入同盟会,并因抨击清政府假立宪,宣传革命,均在短期内去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王到上海,结识了马相伯等社会名流。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必良戏剧。"从此舍弃自己原有专业,投身戏剧界。在马相伯等赞助下,他组建了中国国内第一个话剧团体春阳社,成为中国话剧的创始人之一。同年五月,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演出话剧《黑奴吁天录》,影响波及国内。八月,王钟声领导的春阳社在上海也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这部话剧的演出虽有明显的传统戏剧程式的烙印,但却是话剧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次登台亮相,被视为话剧在国内演出的开端。王钟声除了组织剧社演出外,还创办了一所培养新剧演员的"通鉴学校",开了中国创设专业戏剧学校的先河。后因他演出《秋瑾》、《徐锡麟》、《爱国血》、《官场现形记》等鼓吹革命、揭露清政府腐败统治的新剧,深遭清廷嫉恨,被解回原籍。辛亥革命期间,他参与了上海光复的武装斗争,在陈其美部下任参谋。不久,他前往天津,与京津一带同盟会会员暗中运动起义。宣统三年(1911)

十月十二日，他被直隶总督陈夔龙逮捕。在法庭上，王钟声指出：清廷已下谕大开党禁，不得擅以嫌疑捕人。军法官被驳得理屈词穷，最后竟以行营拿获奸细律将其判处死刑。就义前王钟声高呼“驱逐鞑虏，光复大汉”等口号。

北方革命协会成立 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三日，湖北军政府派同盟会会员胡鄂公(原名胡新三)、吴若龙、冷公剑等为湖北革命军代表，赴北京、天津一带，策划北方革命活动，以加速推翻清王朝。十月十一日，同盟会会员汪精卫利用其声望，邀集胡鄂公、白逾桓、彭家珍等人，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定)支部，汪任支部长，白任参谋部长，彭任军事部长。十月十二日，胡鄂公、孙谏声、白毓昆等召集京、津、滦(州)、通(州)、石(家庄)等地革命同志五十余人，于天津北洋学堂开代表会议，设立湖北军政府代表办事处，并决议在津成立京、津、滦、通、石总指挥处，由胡鄂公任总指挥。会后，白逾桓、孙谏声、吴若龙等同盟会成员与胡鄂公协商，为便于同盟会支部联络其他北方革命团体。十月二十四日，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英租界内成立，胡鄂公被推举为会长。会上议定革命协会简章九条，协会宗旨为“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增进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在北方革命协会的推动下，京、津直隶一带的革命党人发起了一系列反清起义。南北议和成后，汪精卫等以清帝退位，革命已达目的，宣布各团体一律解散，北方革命协会随之解体。

辛亥南北议和开始 宣统三年(1911)十月二十八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召开首次会议。先是宣统三年八月，袁世凯被清廷重新起用后，就准备用抚剿并用方略平息革命。九月十二日，受袁世凯指挥的北洋陆军攻陷汉口后，袁世凯几次遣人与武昌革命政权进行谈判，但均因袁世凯一方坚持君主立宪而导致破裂。十月初，袁世凯通过汪精卫致函武昌，再次要求进行南北和谈，并暗示可设法让清帝退位，但需举袁为总统，黎元洪接受了这一要求。不久，袁世凯通知黎元洪，将派唐绍仪等为代表赴武昌商讨大局。此时汉口正在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与会代表同意了袁世凯的议和建议，并提出推翻清政府；主张共和政体；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四项条件。代表们还提出议和地点在汉口，南方革命军政府方面以伍廷芳为议和代表。十月十九日，唐绍仪前往汉口，但江苏、上海革命军政府方面反对在汉口议和，唐本人也想在上海谈判，各国驻上海领事也希望在上海谈判，议和地点遂改在上海。十月二十八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首次进行会议。伍廷芳提出由代表会议议决的四项条件，唐绍仪将条件电告袁世凯请示。袁世凯接电后，即说动奕劻等人，在御前会议上争得开国会讨论政体的谕旨。袁复电后，南北议和代表商定了开国会的地点和时间。但不久，孙中山归国，十七省革命政府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闻讯，担心如此将使其居总统之位的设想落空，便以“南人先组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迫使唐绍仪辞职，造成谈判破裂。

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 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孙到上海后，即召集各省同盟会会员开会，强调团结和参与组建新政权，使会员重新振作。初七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密商组建临时政府事。孙、宋为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发生争论，黄劝宋放弃内阁制，宋力争不让。宋、黄为此专程赴南京，商于各省代表。各省代表认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总统制，不便修改，否定了内阁制。十一月初十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出席会议的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华侨列席代表二人。上午九时，正式投票，每省一票。候选人为孙中山、黄兴、黎元洪。投票结果孙中山十六票，黄兴一票，孙中山以超过投票总数三分之二当选。孙中山闻讯后，立即致电南京和各省，表示“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无发动，竟承选举，何以克当?唯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事典　　（下卷）
作者＝中外名人研究中心
页数＝２７２０
ＳＳ号＝８０４００６２８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８０４００６２８
出版日期＝１９９３年０３月第１版
出版社＝沈阳出版社